中东大历史（套装共5册）

犹太人三千年简史+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无规则游戏+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独霸中东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东大历史（套装共5册）

犹太人三千年简史+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无规则游戏+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独霸中东



总目录

犹太人三千年简史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



犹太文丛

宋立宏 主编

犹太人三千年简史

[美] 雷蒙德·P.谢德林 著

张鋆良 译　　宋立宏 校译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From Legendary Times To Modern Statehood



浙江人民出版社

犹太人三千年简史

（美）雷蒙德·P.谢德林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太人三千年简史/（美）雷蒙德·P.谢德林著；张鋆良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6

ISBN 978-7-213-09442-2

I．①犹…　II．①雷…②张…　III．①犹太人-民族-历史　IV．①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62245号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From Legendary Times to Modern Statehood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8.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This publication is supported by Dr. William H. Fern.

地图审图号：GS（2019）4488号

犹太人三千年简史

［美］雷蒙德·P.谢德林　著　张鋆良　译　宋立宏　校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汪　芳

营销编辑：陈雯怡　陈芊如

责任校对：杨　帆

责任印务：程　琳

封面设计：秦　达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9

字　　数：213千字

插　　页：12

版　　次：2020年6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442-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图1　“大卫的登基标志着成熟的以色列君主制正式启动，也标志着古以色列人明确出现在历史上。”（参见此处）图为公元5—6世纪加沙地区一犹太会堂里马赛克地板上的大卫像（头像经过修复），上有希伯来文铭文“大卫”。宋立宏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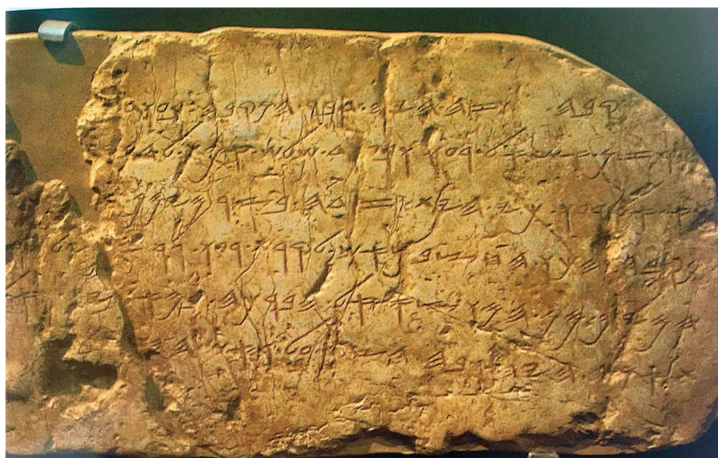


图2　“希西家加固耶路撒冷的城防，开凿著名的西罗亚水道（至今仍可参观）以保障城市供水。”（参见此处）图为西罗亚水道中发现的铭文，内容是纪念水道开凿完成。刻于公元前8世纪。



图3 “从1947年开始，死海西面的旷野中发现大量写本和写本残片。”（参见此处）图为发现死海古卷的以色列库姆兰地区的山洞。



图4 希律“最著名的工程是重修圣殿”（参见此处）。图为希律圣殿的复原图。



图5 “今天耶路撒冷的哭墙（也称西墙），正是当年希律圣殿的挡土墙的残留。”（参见此处）宋立宏摄。



图6 巴尔·科赫巴“自称‘以色列的亲王（ha-Nasi）’，还发行带有‘以色列救赎元年’之类铭文的钱币”（参见此处）。图为巴尔·科赫巴起义第二年（133或134年）发行的银币，直径28毫米。一面（左）图案为耶路撒冷圣殿，两旁的铭文是“耶路撒冷”。另一面（右）为住棚节礼器“四类”：香橼果，旁边是束着桃金娘叶和柳条的棕树枝；周围的铭文是“以色列自由的第二年”。



图7 “在犹太民间传说中，哈德良是近乎恶魔般的存在”（参见此处）。图为以色列境内发现的哈德良青铜雕像。宋立宏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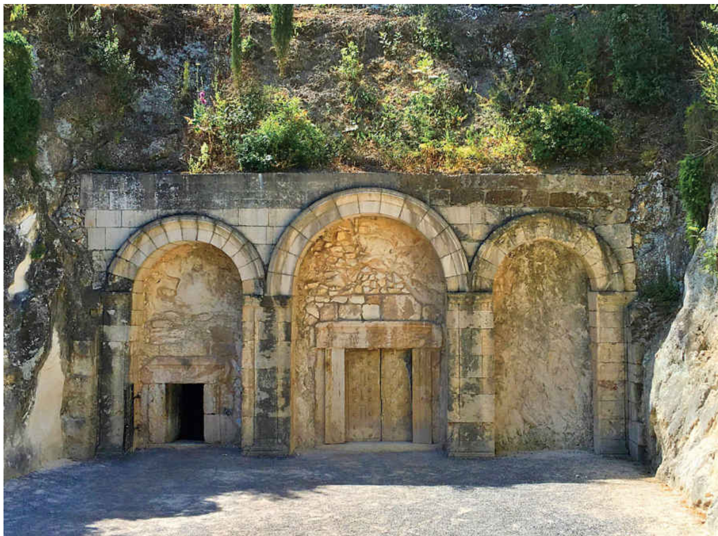


图8　“2世纪末，犹太族长拉比犹大编定和颁布《密释纳》，此书很快成为拉比犹太教的核心教科书，一直沿用至今”（参见此处）。图为埋葬犹太族长拉比犹大的洞穴墓地，位于以色列贝特夏里姆（Beth She7021.jpg arim）。宋立宏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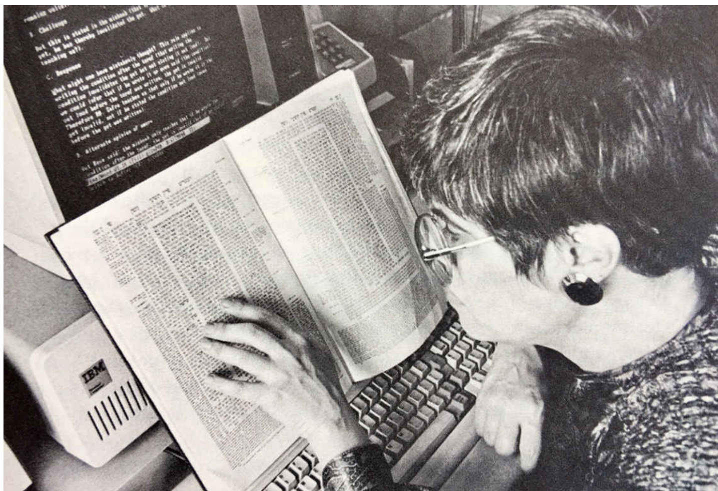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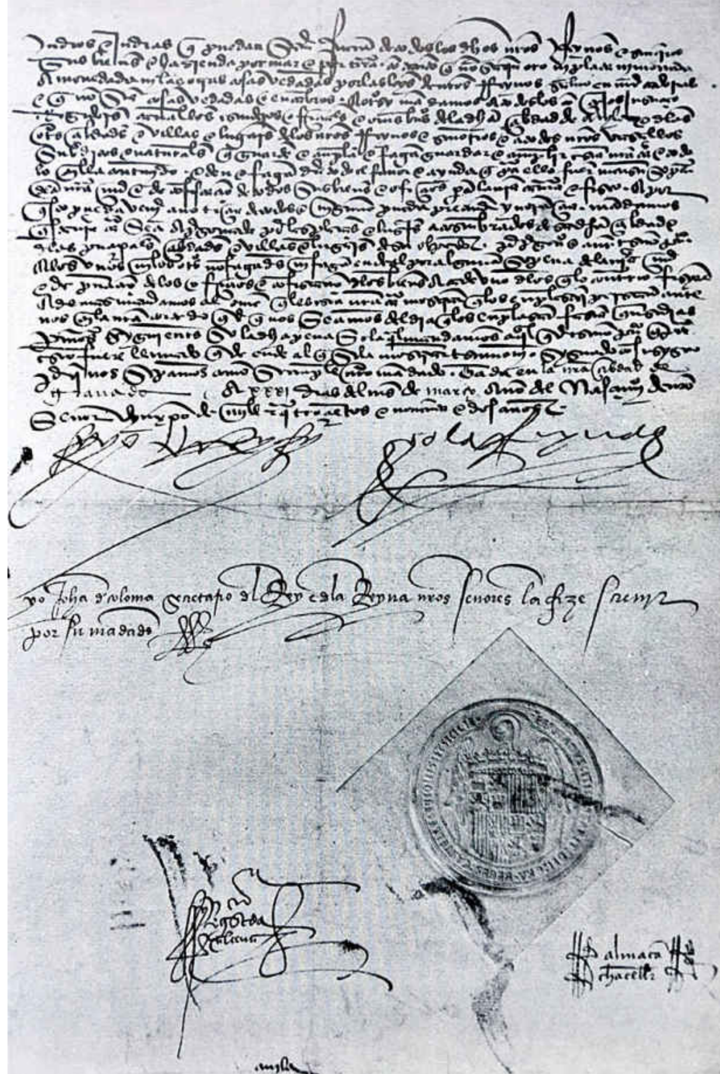
图9　研习者学习一页《塔木德》时，“一手的两指叉开，一指对着原文，一指对着评注，参照阅读”（参见此处）。



图10　迈蒙尼德（1138—1204年），“伊斯兰时代最著名的犹太人”（参见此处）。图为在其出生地西班牙科尔多瓦的迈蒙尼德雕像。



图11　在14世纪，撒母耳·哈列维在“托莱多建造美丽的犹太会堂，这是西班牙屈指可数的几座留存至今的中世纪犹太会堂之一”（参见此处）。



yo Joha d coloma secretario del Rey e dla Reyna nros señores la fize screuir por su madado

图12　1492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决定把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驱逐令于3月31日签发（参见此处）。图为1492年3月31日签发的驱逐令。



图13　在16世纪，“最有权势的塞法迪犹太权贵是格拉西娅·纳西夫人（约1510—1569年）”（参见此处）。图为格拉西娅·纳西像，单面青铜章，左边希伯来文铭文是她的名字，右边拉丁文铭文是“年方18岁”，出自意大利佛莱拉。



图14　采法特的核心人物是人称“狮子”（Ari）的以撒·卢里亚拉比（参见此处）。图为卢里亚在以色列采法特的墓地。宋立宏摄。



图15　“17世纪以沙巴塔·泽维为核心的弥赛亚运动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场”（参见此处）。此图据说是1666年在士麦那见过沙巴塔·泽维的人画的他的画像，在传世的泽维画像中可能最接近他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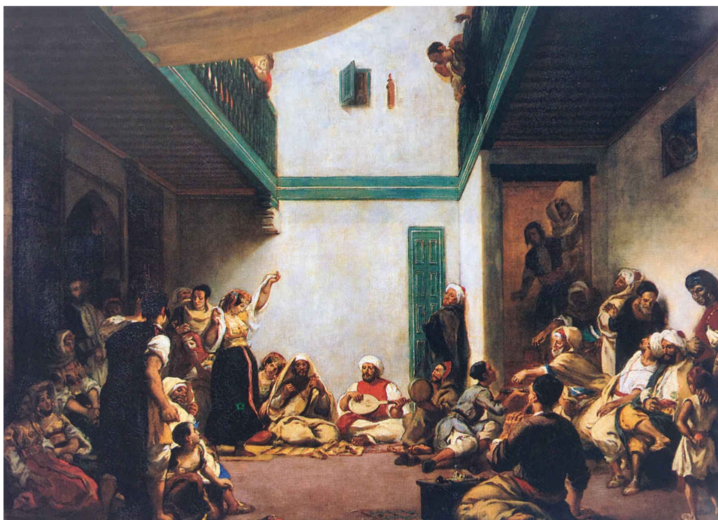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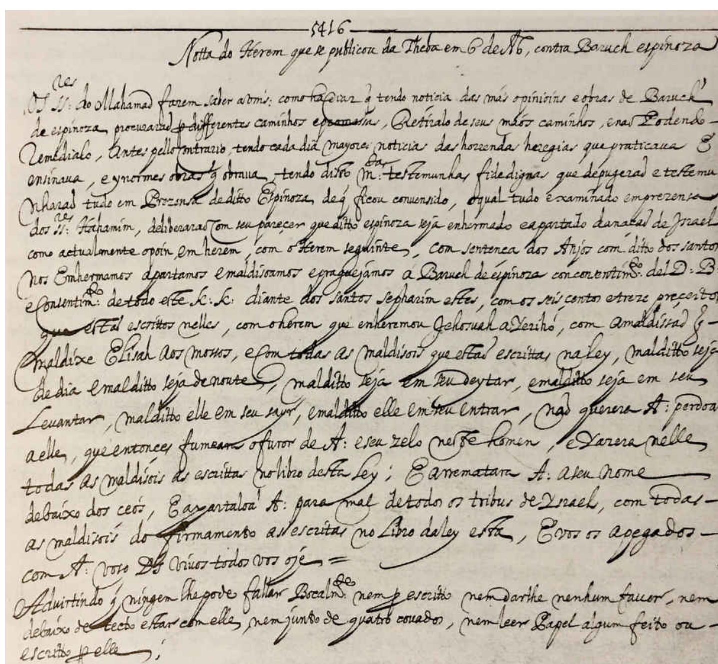


图16　“摩洛哥犹太人从未获得法国公民身份，但在保护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参见此处）法国在1830年征服摩洛哥。法国名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于1832年游历北非，后带着大量表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生活的素描回国，并以此为素材创作油画，包括这幅《摩洛哥的犹太婚礼》（1841年）。



5416
Notta do Herem que se publicou da Theba em 6 de Ab, contra Baruch espinoza

Os SS.res do Mahamad fazem saber a vms: como ha dias q tendo noticia das más opiniõins e obras de Baruch
de espinoza, procurarão por differentes caminhos e promesas, Retiralo de seus máos caminhos, e não podendo
Remedialo, antes pello contrario, tendo cada dia mayores noticias das horrendas heregias que praticava e
ensinava, e ynormes obras q obrava, tendo disto m.tas testemunhas fidedignas que depuzerão e testemunharão
tudo em prezença do ditto Espinoza, de q ficou convensido, o qual tudo examinado em prezença
dos SS.res Hahamim, deliberarão com seu parecer que ditto espinoza seja enhermado e apartado da nação de Israel
como actualmente o poin em herem, com o Herem seguinte, Com sentença dos Anjos com dito dos santos
nos Enhermamos apartamos e maldisoamos e praguejamos a Baruch de espinoza con consentim.to del D. B.
e consentim.to de todo este K. K. diante dos santos sepharim estes, com os seis centos e treze preceitos
que estão escrittos nelles, com o herem que enheremou Jehosuah a Yerihó, com a maldissão q
maldixe Elisah aos moços, e com todas as maldisois que estão escrittas na ley, maldito seja
de dia e malditto seja de noute, malditto seja em seu deytar, e malditto seja em seu
Levantar, malditto elle em seu sayr, e malditto elle em seu entrar, não querera A. perdoar
a elle, que entonces fumeará o furor de A. e seu zelo nesse homen, e Yazera nelle
todas as maldisois as escrittas no libro desta ley; E arrematara A. a seu nome
debaixo dos ceos, E apartaloa A. para mal de todos os tribus de Ysrael, com todas
as maldisois do firmamento as escritas no Libro da ley esta, E vos os apegados
com A. vosso Ds. vivos todos vos oje =
Advirtindo q ninguem lhe pode fallar Bocalm.te nem por escritto nem darlhe nenhum favor, nem
debaixo de tecto estar com elle, nem junto de quatro covados, nem leer Papel algum feito ou
escritto pello;

图17　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在1656年被革除教籍”（参见此处）。图为将斯宾诺莎革除出塞法迪犹太社群的革除令，1656年7月27日颁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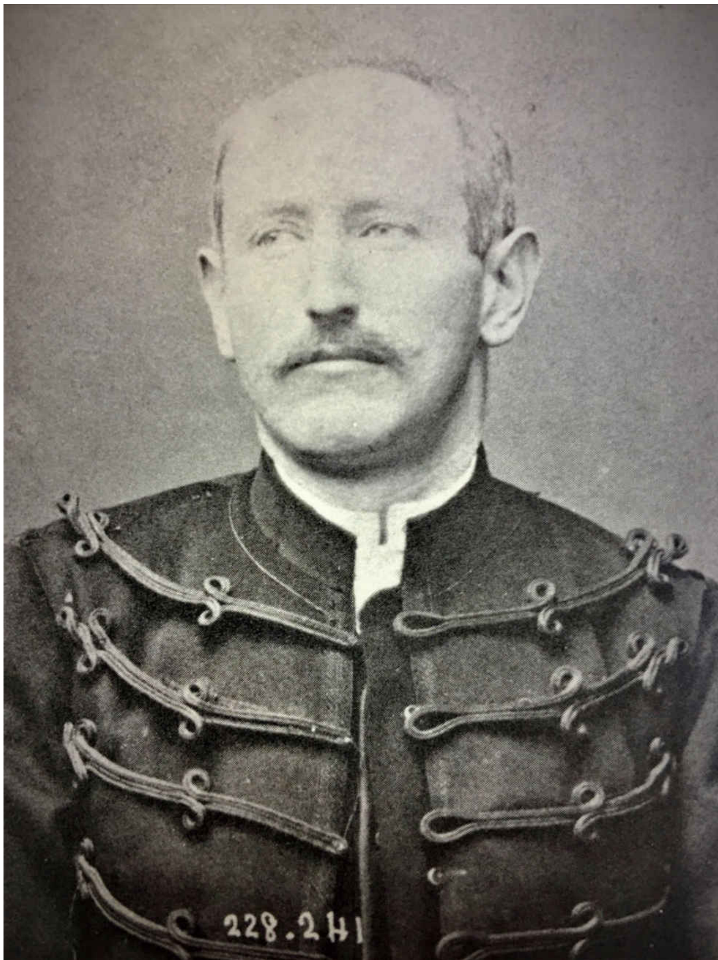


图18　“德雷福斯是法军的犹太人高级军官，1893年被控犯有叛国罪，作为罪证的文件后来被证实系伪造。”（参见此处）图为被剥夺徽章的德雷福斯，警局照片，1895年。



图19 “以色列·巴阿尔·谢姆（约1700—1760年）创立的哈西德主义最先席卷乌克兰，然后横扫其他斯拉夫领土，它是对推崇《塔木德》所产生的过度理智倾向的纠正”（参见此处）。图为以色列·巴阿尔·谢姆生前使用的犹太会堂，位于今乌克兰（当时属于波兰）的梅吉比日（Medzhybizh）镇。系1929年以前的照片。



图20 “德裔犹太小贩扎堆聚集在城市中的德语街区（比如纽约的下东区）”（参见此处）。图为纽约的下东区，约1900年。



图21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东欧移民潮是犹太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它从根本上永久改变了美国犹太人的特质。”（参见此处）图为约1909年的明信片，已在美国站稳脚跟的犹太人伸手迎接新来的犹太移民，希伯来文铭文意思是“我们要藏在你的翅膀中”，鹰象征美国。



图22　美国保守派犹太教的领袖所罗门·谢克特（1847—1915年）“是杰出的犹太教学者，曾在剑桥大学教授拉比文献”（参见此处）。图为谢克特在剑桥大学整理19世纪末在埃及发现的中世纪犹太文书（关于这些“戈尼萨”文书，见参见此处）。



图23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苏联和美国的士兵解放了剩余的集中营，集中营囚犯的状况让他们目瞪口呆”（参见此处）。图为1945年5月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向前来解救的美军欢呼。



图24　“把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转变成一场国际运动的，却是一名同化了的匈牙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年）”（参见此处）。图为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赫茨尔陵墓。宋立宏摄。



图25　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参见此处）图为今日以色列特拉维夫海滩上的大卫·本-古里安像。宋立宏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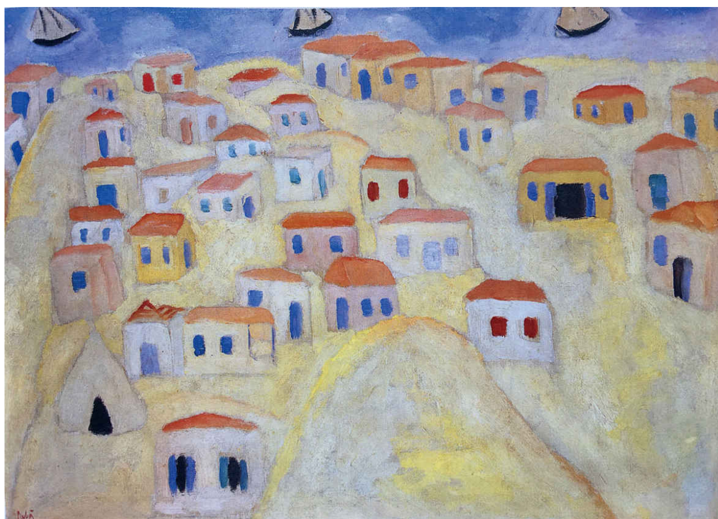


图26　“1909年，第一座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在巴勒斯坦建立”（参见此处）。图为以色列画家流便·鲁宾（Reuven Rubin）作于1923年的油画《特拉维夫的房子》，他捕捉到此城建在沙丘上的初貌。



图27　卢巴维奇派哈西德在梅纳赫姆·孟德尔·施内尔松的领导下，出人意料地充分利用现代广告技术，引起广泛关注。“有传言说施内尔松本人就是弥赛亚，但他直到1994年去世从未自称是弥赛亚。”（参见此处）图为纽约布鲁克林卢巴维奇派哈西德居住区金斯敦大街（Kingston Avenue）上的标牌，上有施内尔松像和“迎接弥赛亚”的字样。宋立宏摄。



图28　1991年苏联解体后，许多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他们的数量多到改变了以色列的人口结构”（参见此处）。图为1991年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苏联移民。

什么构成犹太史的连续性
——中译本导读

书写历史并非自古就有的犹太传统。近代以前称得上是历史的犹太书写寥寥无几。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术语叫“旧约”）中有些书卷被当作历史书，但《圣经》作者视历史进程为宗教真理不断展现的过程，体现的是上帝之手对人类事务的干预和控制，故历史在犹太传统中并非希腊意义上的探询，而是对神意的演绎。例外自然有，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约瑟夫斯（Josephus），这位公元1世纪的犹太史学家借鉴希腊史学模式，用希腊文撰写了自创世到他那个时代的犹太史，然而，几乎没什么犹太人在18世纪以前阅读过，他的著作能够传世，完全是倚赖基督教教会的保存。

到了18世纪，对犹太人历史的兴趣才显著出现。开风气之先的是基督教作家。雅克·巴纳热（Jacques Basnage）的十五卷本《犹太人历史》（1716）从耶稣时代一直写到18世纪，其副标题明确说这是“充当约瑟夫斯所作历史的延续”。巴纳热是新教加尔文宗在法国的信徒（即胡格诺派），因为宗教信仰而被逐出法国，流亡荷兰。他撰写这部犹太史，除了秉持基督徒一贯有的向犹太人传教的热情，也包含对犹太人在后《圣经》时代流落天下的感同身受的移情。

自19世纪初起，随着历史在德国大学里渐渐脱离神学或希腊罗马经典著作而被单独讲授和研究，犹太学者才开始以学术批判的眼光看待自身过去。其时，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虽然已让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广泛流行，但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传统偏见依然根深蒂固，犹太人要想切实获得所在国的完全公民权利，仍旧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欧洲犹太人也感到有必要改革犹太教，剔除其中肉身复活等现代启蒙理性视为迷信的成分，以便让传统犹太教在一个宗教已退入私人领域从而可供个人自由选择的时代重现生机。正是在对外和对内这两条战线上，书写犹太史成了一些德国犹太学者顺应时代要求的一把利器。

在亚伯拉罕·盖格（参看本书此处）等学者看来，后《圣经》时代的犹太史已没有什么政治内涵。公元70年第二圣殿的毁灭（churban）是

犹太传统中莫大的灾难，犹太人因此在巴勒斯坦丧失政治主权，犹太教也从此彻底改变：学习宗教经典一旦取代圣殿中的动物献祭，成为宗教崇拜的形式，犹太教就成了一个可以带往世界各地的宗教，进而为一神思想在万民中的传播迈出决定性一步。因此，犹太教本身并非因循守旧者声称的那样一成不变，改革犹太教不仅在历史上有先例可循，更是促成犹太宗教传统获得更大发展的必由之路。相应地，书写犹太史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记录和分析宗教教义、仪式和制度的历代流变，让当时对犹太教的改革显得可以接受。

对政治维度缺失的强调还带有现实政治因素的考量。在盖格这类德国学者眼中，比第二圣殿毁灭更加重要的是亚夫内（Yavne）经学院的建立。《塔木德》中记载了一则传奇：罗马大军围攻耶路撒冷期间，拉比约哈南·本·扎卡伊预见圣城陷落和圣殿毁灭，便吩咐门徒把他装进棺材抬出城，然后来到罗马统帅面前，凭借机智获得许可，在亚夫内建立学院，确保继续有人研习犹太圣书（参看本书此处）。亚夫内为犹太教日后的千秋大业奠定基础。盖格等人以亚夫内为分水岭，重新定义犹太人：在亚夫内经学院建立以前，犹太人是享有政治主权的民族，而此后犹太人只是一个精神上自由的宗教社群。将后《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定性为宗教社群，其当下的政治内涵显而易见。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做一个有犹太信仰的公民是可以接受的，但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就必然令德国主流社会猜忌他们到底更忠于德国，还是更忠于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只有打消主流社会对这种双重忠诚的顾虑，才有利于犹太人获得所在国完全的公民权利。

于是，最早书写犹太史的德国犹太学者形成了一种共识：犹太人的历史独特性最能够体现在他们的一神观念之中，因此犹太史的本质是犹太信仰的历史。换言之，犹太人近两千年来流散在世界各地，既没有国家又没有土地，犹太史的连续性靠犹太教体现，书写犹太史就是书写犹太教史。

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的十一卷本《犹太人历史》（1853—1876年）堪称德国犹太史编纂的最高结晶，也是整个19世纪出现的影响最大的犹太史作品。到格雷茨写作时，犹太史是犹太教史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他更愿意用“民族魂”（*Volksseele*）这个比宗教宽泛

的观念来统摄犹太史。他既没有脱离犹太民族抽象地去谈论一神观念，也没有关注犹太过去那些纯粹物质的方面。他聚焦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饱含激情地刻画出一部犹太集体灵魂的历史。不过，在格雷茨的时代，同化之风在德国犹太社群中越刮越烈，反犹主义也已在德国社会冉冉上升。他要在这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因此，他书写犹太史，并不是为了拓展启蒙，也不想寻求让基督教社会在政治或智识上接受犹太人，而是要通过揭示犹太人走过的不同历史道路，为被现代性重创和削弱的犹太身份聚气和寻根，以重新恢复犹太人的自信；对于非犹太文化，他很少掩饰自己从道德和审美立场做出的负面评价。这种旨趣当然与渐渐兴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南辕北辙，因此格雷茨遭到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厉声讨伐也就不奇怪了。

进入20世纪，在民族主义大潮的席卷下，德国犹太学者一直小心翼翼回避的用民族界定犹太史连续性的路径终于在东欧开花结果。东欧多民族、多语言共存的现实让西蒙·杜布诺夫（Simon Dubnow）反对犹太人不是民族而是宗教社群的观点，他认为犹太人漂泊了上千年，已成为精神上的民族，无需常规民族发展所依赖的国家和土地。事实上，这种不植根于土地而以历史与文化为安顿的民族，在他看来恰恰代表了民族发展的最高阶段。研究犹太史，就应当研究承载民族精神的民族制度。在他用俄文撰写（但最早用德文出版）的十卷本《世界犹太人史》（1925—1929年）中，历史上形形色色自治的犹太社群（*kehilah*）便取代一神观念，构成体现犹太史连续性的主线。这部巨著也不再是宗教史、思想史或文学史，而毋宁说是一部制度史（杜布诺夫自称是“社会史”）。杜布诺夫笃信，犹太人可以在异族统治的政治框架下通过自治的民族共同体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这恰恰是持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家竭力反对的。他们认为犹太人生活在异族统治中根本没有希望，唯有时刻不忘《圣经》中的“应许之地”，才能确保犹太人幸存，故犹太史的主旋律应当是揭示历代犹太人对“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这是“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文术语）的渴望和回归。这种立场的代表自然来自1925年开办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学家，他们几乎清一色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后来当上以色列国教育部部长的迪努尔（Ben-Zion Dinur，1884—1973年）主张，犹太史的

核心是以色列地的历史，犹太人在流散地的历史尽管不乏闪光之处，但更多的是迫害和苦难，由此造成的反抗迟早会把犹太人领回犹太史的起点，即以色列地；1700年，一群波兰犹太人在一位信奉犹太神秘主义的拉比的带领下移居耶路撒冷，此事鲜为人知，但到迪努尔眼中就标志着现代犹太史的起点。相形之下，杜布诺夫把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代犹太史的起点，因为正是这次革命把政治平等权赋予犹太人。以色列国研究《塔木德》时期历史的头号权威阿隆（Gedalyahu Alon，1901—1950年）认为，亚夫内在历史上实为罗马人拘留战俘和逃犯的集中营，约哈南·本·扎卡伊是违背自己意愿而被送到那里的。这样，在德国犹太学者眼中确保犹太人幸存的纯粹的智识基础，就被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否认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学者看来，政治奴役没什么好粉饰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政治上的不作为和对国家概念的放弃。阿隆的解读还强调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难以调和的对立，这也是这派学者的一个特点。

生活在以色列国之外的同辈犹太学者当然难以认同这些激进的观点。英语世界声望最高的犹太史学者要数萨罗·巴龙（Salo Witmayer Baron），他是美国大学里犹太史学术研究的开创人。在他的十八卷本《犹太人社会与宗教史》（1952—1983年）中，核心不是以色列地，而是犹太人和犹太宗教。巴龙反复声称，犹太人的创造力与某方土地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写出多卷本犹太史的前辈，他也与他们明显有别。杜布诺夫虽然承认犹太人可以生活在异族统治下，但他对犹太民族的情感依恋使他不可能将犹太人所受的苦难归咎于他们自己，他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外部因素对犹太精神生活的影响在他那里也被最小化了。与之对照，巴龙总是结合特定时空下的普遍情况来论述犹太人、犹太教和犹太社群的发展，犹太史始终是内在的犹太因素与外在的非犹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连篇累牍的注释中包含大量非犹太史料。正因为熟悉犹太人生活的外部环境，巴龙坚持认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犹太史绝非像格雷茨等人描绘的那样，是“催人泪下的”（lachrymose）受苦受难史；相反，犹太人的整体生活条件起码不低于周围非犹太人的生活条件，就算遇到极端情况，他们也有能力调整适应，并在此过程中激发丰富的创造力。然而，巴龙将犹太史正常化的努力在学界之外影响不大，他对犹太史就是一部血泪史的反驳不幸隐没在纳粹屠犹投下的漫长阴影之中，他沉溺于细节考证的写作风格则牺牲了可读性。

随着后现代思想席卷学术界，民族变成想象的共同体，传统是发明的，书写无非体现了权力，整个世界更像是一个集合各种话语的文本。在这种将一切相对化的智识氛围下，为历史叙述找寻任何一以贯之的稳定本质或核心就显得徒劳无益。虽然历史学科并没有因此而终结，但犹太史编纂却呈现出新的特点。

2002年，美国犹太史学者大卫·比尔（David Biale）主编的《犹太人的文化：一部新史》（*Cultures of the Jews: A New History*）出版，这部1000多页的著作由国际团队合作撰写，作者主要来自北美，但也包括以色列和法国学者。比尔认为，“民族”与“宗教”如今已不再是一成不变或铁板一块的客观范畴，而更多是主观构建，即历代犹太人相信自己有共同的民族传记和共同的文化。此外，犹太文化与犹太身份的产生还离不开犹太人与其邻居之间的权力关系，所以他主编这本犹太史，目标“是展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以及犹太世界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聚焦的是断裂和非连续性，以及不同地点和不同时代的犹太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不存在一个宗教社群，而只有多种犹太文化，正如“文化”在此书标题中是复数所强调的那样。此书尤其关注了以前被忽视的中下层和欧美之外的犹太文化，却没有单列一章谈论犹太哲学或思想史。尽管比尔认为无法再像前辈那样继续构建种种宏大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s），但犹太人阶层之间、性别之间以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共生（symbiosis）和混杂（hybridity）反倒构成此书一以贯之的特色。

今天，书本已不再是人们了解传统的唯一媒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博物馆、互联网和影视作品获取历史知识。这些传播历史的新媒介显然已对历史书写本身产生影响。英国人西门·沙马（Simon Schama）的三卷本《犹太人的故事》是为配合同名电视纪录片撰写的，已出的两卷（2014，2017）共超过了千页。此书画面感逼真的精湛开篇完全出人意表：居然不在应许之地，而在埃及，还不是亚伯拉罕、摩西待过的埃及，而是公元前5世纪埃及象岛上驻扎的一支犹太雇佣军（对照本书此处）。这在《圣经》中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仅靠19世纪末意外发现的纸草才为人所知。象岛犹太人不说希伯来语，不爱读书，关心时尚，与异族通婚，甚至公然违反《圣经》中不得在耶路撒冷以外建造圣殿的

禁令，自行建造了一座圣殿。一言以蔽之，这些神圣文本之外的犹太人才构成犹太史可靠的起点。全书的核心论点就蕴含在这个起点里：象岛犹太人迥异于传统犹太史学所塑造的那种虔诚、自闭、饱受迫害、被迫放债的犹太人，他们这类颇适应周遭环境的犹太人同样在历史上生生不息，理应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叙事等量齐观。沙马光大了巴龙所开创的将犹太史正常化的努力，他在这条路上恐怕比任何前辈都走得要远。他眼中的犹太人不只是精神上的“圣书之民”，因为全书焦点是犹太文明的物质遗存——纸草、陶片、壁画、马赛克地板、羊皮卷写本等。沙马仿佛博物馆馆长，娴熟地讲解着心爱的展品，对自己想到的任何相关背景也一并巨细靡遗地娓娓道来。然而，一件展品与下一件之间未必有时空上的联系，如果说传统的“历史”首先意味着按照线性时间展开叙述，那么这本大作的确名副其实，是一串串饶有趣味的“故事”。

后现代盛行的文化多元主义在保护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并号召主流社会关怀这些群体的同时，也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诉求。正统派犹太人如今也开始书写他们以前漠不关心的历史，不仅愿意考虑非犹太内容，而且讨论自己的写作立场，并采用注释、参考书目等现代学术形式。这些著作是为正统派犹太人所写，在他们中间甚至颇为流行，其中美国出生、现居耶路撒冷的拉比韦恩（Berel Wein）的著作特别有影响。在韦恩看来，一部犹太史就是在忠于犹太传统还是反叛犹太传统这两极之间来回摇摆的种种表现的集成。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中，他的主角与重点自然是犹太教史上的重要拉比和犹太人内部的重要争论，谁能最终赢得胜利是一目了然的。“我越是阅读和研究犹太史，就越清楚地知道一位作者和策划者在引导以色列走向自己的命运。” 这是要逆流回到《圣经》中上帝之手引领人类事务的神学史观。

对照上述犹太史学编纂的种种取向，谢德林这本1998年出版的犹太简史的特点就明朗了。本书不是犹太教史，犹太宗教在谢德林眼中只是犹太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太人的语言、制度、书籍和历史本身同样重要。每个时代的主要犹太社群构成这本犹太史的叙事主线，杜布诺夫的遗产依然清晰可见。而在谢德林的视野里，只有与非犹太人的社会和文化不断互动的犹太社群才能繁荣与持久，才构成各个时代的主流犹太社群，这与巴龙的思想一脉相承。谢德林博士毕业于巴龙执教的哥伦比

亚大学，后长期任教于纽约的美国犹太神学院，这是保守派犹太教的旗舰学校（见本书此处），其学风素以博采传统和现代学术的精华而闻名。谢德林参加了比尔主编的那本犹太史的写作，与比尔一样，他在本书中也着意揭示不同犹太社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开创性地在通史著作中突破欧美中心论，系统介绍了北非和中东犹太人在近现代犹太史上所起的作用，本书第六章的内容至今能在中文世界填补空白，这方面的学术优势主要得益于谢德林自己就是精研伊斯兰世界犹太诗歌的顶尖学者。本书不是多卷本或大部头的犹太通史，因而更有利于呈现出整个犹太史的发展脉络，而不至于让初学者见树不见林。但即使如此，要把漫长的犹太史精练到这个篇幅，仍难免用到不少令普通读者茫然的专有名词和术语。作者思虑周详，特地为每章配上大事年表、地图和知识要点栏，从而大大有助于读者消化吸收和把握重点。

总之，这本犹太史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观点上不刻意出奇制胜却又能充分反映现代学术发展的潮流，取材上则在围绕流散地和以色列地的叙事之间达成平衡，是对三千年犹太史凝练而精到的综合，堪称引领读者一窥犹太史堂奥的难得佳作。此书出版20年后未经修订仍在不断重印，足见它在构思和写作方面的成熟。

约十年前，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教授向我推荐了此书，此后我一直用它作为研究生教学的教材或补充读物，对此书的价值体会渐深。张鋆良没有告知我便将它译成中文，令我欣喜，这对他应当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我在他译文的基础上做了校对和修订，这对我自己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让我对怎样精练、准确地表述犹太史有了新的体会。我请谢德林教授为中文版更新了书后的“犹太史书目”，其中有中译本的我已附上相关出版信息。谢德林教授还修订了原书极个别地方，中译本里不再一一标举。原书无注释，中译本脚注由我添加，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尽可能简短为要。原书历史人物和地名众多，未在索引中出现而又比较生僻者，中译本正文已附上原文。中译本的出版除了需要感谢斯特恩教授当初的推荐，还要感谢汪芳编辑的支持，杨沁龙、乔卉楠也为译稿提出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书目附言】

谢德林教授在书后“犹太史书目”的“通论”下列有犹太史基本书目。关于犹太史学编纂，除了“通论”中推荐的Yosef Hayim Yerushalmi的开创性著作，本文还参考了这个出色的选本Michael A. Meyer(ed.), *Ideas of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1974)以及这本近著Michael Brenner, *Prophets of the Past: Interpreters of Jewish History* (Princeton, 2010)。关于约瑟夫斯，参看泰萨·瑞洁克的《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周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通论”中Louis Finkelstein主编的著作是把犹太人设想成宗教社群的代表作，H. H. Ben Sasson主编的著作是反映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代表作。阿隆对亚夫内的解读见 Gedalyahu Alon, *Jews, Judaism and the Classical World: Studies in Jewish History in the Times of the Second Temple and Talmud* (Jerusalem, 1977), pp. 269-313。谢德林教授建议本书中文版删去原书“通论”中列入的巴龙的多卷本犹太史，显然是因为此书可读性不强，但巴龙的历史观至今在英美学界影响不衰。拉比韦恩的代表作是Berel Wein, *Survival: The 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Modern Era 1650-1990* (New York, 1990)。

中文世界已出版几本犹太史译著。阿巴·埃班的《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部犹太通史译著（中译本缺原书最后一章“今日犹太世界”），原书名为《我的人民：犹太人的故事》（Abba Eban, *My People: The Story of the Jews*），出版于1968年，作者当时任以色列国外交部部长。罗伯特·M.塞尔茨的《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色地梳理了犹太思想和犹太历史的关系，原书名为《犹太人民，犹太思想：犹太历史经验》（Robert M. Seltzer, *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History,* 1980）。塞西尔·罗斯的《简明犹太民族史》（Cecil Rot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黄福武、王丽丽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根据第六版译出，写到1967年六日战争，作者是庶几与巴龙齐名的英国犹太历史学家，史学观点也与巴龙相近，反对犹太史就是血泪史。西门·沙马三部曲的第一卷《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中译本已经出版（黄福武、黄梦初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沙马写作此书的

缘起正是多年前受邀续写塞西尔·罗斯一本未竟的犹太史。伯纳德·J.巴姆伯格的《犹太文明史话》（Bernard J. Bamberger, *The Story of Judaism*, 1970；肖宪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是一位美国改革派拉比写的犹太教史。另有两本图文并茂的犹太史图录的中译本（出版信息见“通论”），也有助于普及犹太史。

宋立宏

2019年2月

于香港道风山

目录

什么构成犹太史的连续性——中译本导读
引言
第一章　古以色列人的起源和王国　公元前1220年以前至公元前587年
第二章　犹地亚和流散的起源　公元前587年至公元70年
第三章　罗马治下的巴勒斯坦和萨珊治下的巴比伦　70—632年
第四章　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　632—1500年
第五章　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　9世纪至1500年
第六章　奥斯曼帝国和中东的犹太人　1453—1948年
第七章　西欧犹太人　1500—1900年
第八章　东欧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　1770—1940年
第九章　纳粹屠犹
第十章　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的起源
第十一章　1948年后的犹太人
跋语　犹太人的前景
致谢
犹太史书目
索引
译后记
返回总目录

引言

“犹太人简史”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因为犹太人素以古老和历史悠久著称，更何况犹太人的故事没法单独讲述，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小民族的历史一直在为其他更强、更大的民族的历史作注脚。要把握犹太史，理想的做法是展现整个犹太史的舞台，它包括从伊朗到地中海的亚洲地区、欧洲、北非，以及大西洋彼岸的北美。这众多地区和文化中的更替与变化塑造着犹太史，也成就了犹太人。但要理解整部西方历史和犹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显然不是一本小书能完成的，而鸿篇巨制又定然会使那些刚刚开始探究犹太人的读者望而却步。

本书恰恰是为这类读者设计的，目标是让犹太史的悠长脉络明白易懂，以讲故事的方式让读者看清犹太史的发展轮廓。本书还想帮助读者开始系统地思考犹太史的若干基本问题：犹太人从何处来？他们为何离开故土？他们往何处去？他们如何在多个世纪的流散中保持犹太身份？哪些大模式决定他们当中的不同社群具有不同的特征？他们为什么如此讨人嫌，以致穷困落魄和遭人驱逐充斥在他们的大部分历史中？他们如何受现代性影响？当代犹太人拥有引以为豪的民族身份和成就斐然的民族家园，他们是如何从过去的饱受蹂躏中脱颖而出的？

犹太史引人入胜，但并非一部怪力乱神的历史。犹太人的源远流长可能在世界历史中也不多见，但它完全能像其他人类的制度和活动那样得到合理解释。不过，由于历史对定义犹太身份举足轻重，犹太史常常被叙述成一个理想化的民族神话，而不是被讲述为带有人类缺点和趣味的真人真事。犹太人的民族英雄，比如犹大·马卡比、阿齐瓦拉比、迈蒙尼德和大卫·本-古里安，都受到赞颂，成了所有人类价值观的典范；他们的敌人则被诅咒为妖魔邪祟的化身；在某些历史环境中扮演犹太人角色的非犹太人被称为“正义的外邦人”（righteous Gentiles）；而那些追求自己利益而非广大犹太人利益的犹太人则被污蔑为叛徒。在这类刻画中，后见之明造成误判。比如，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拉比犹太教逐步成为犹太教的主导形式，同时期其他形式的犹太教则被当作异端邪说。

民族神话对于塑造民族身份极为重要，世界上所有的家族、部落、族群或民族都有各自的神话。但这些神话往往相互冲突，不同的人群又将自己的历史奉为正宗，以致与其他人群的友善互动很难开展。当前的中东冲突就是绝佳例子，展现出两种民族神话之间的对立不可调和，而这种例子世界上比比皆是。美国的印第安人、资产阶级、黑人民族主义者讲述美国历史的方式完全不同。如果不同的人群坚持自己对历史和民族命运的看法是唯一正确的，那么他们就无法和谐共存。因此，学术性的历史对于社会至关重要，它的一个目的，就是鉴别对民族历史的曲解，并尽可能以人力所及的中立态度纠正此类曲解造成的后果。

如何从学术性的历史中清除民族神话，这个问题对最早期犹太史的影响尤其大。关于这一时期，我们掌握的大部分信息来自《圣经》，这是一部绝妙的民族历史，记载了展示神迹的故事，并假定上帝之手控制着以色列和其他民族的命运。此外，由于《圣经》文本具有神圣性，读者往往怀着两种偏见看待《圣经》：传统的信徒容易将其中的字字句句当作真实不虚，而不信教的人则觉得是满纸荒唐言。一旦结合考古遗存和其他古代史料阅读《圣经》，并运用阅读其他古代宗教文本时所用的工具，就能获得一些有用的历史素材，但《圣经》是犹太人对自身起源的记述，和任何关于民族起源的故事一样，必须谨慎和批判地加以看待。

本书还要避免另一个相关的曲解，它源于我们把自己时代习以为常的地缘政治概念叠加在更早时代上。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由穆斯林主导的北非、中东、西亚所组成的“东方”与欧洲所在的“西方”之间的文化鸿沟自古就有。近几个世纪以来，这种东西方的划分说得通，但如果把它运用到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十字军东征的1500年，便只会造成混乱。在这一时段早期，我们所谓的东方比大部分我们所谓的西方更加希腊化，比如，公元前1世纪的伊拉克远比现在法国所在的地区更加“西方”；在这一时段后期，地中海各地分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领地，因而在宗教和语言上多有差异，尽管如此，各地之间的文化和商业联系还是比人们想象的要密切。此外，在这一时段的多数时间里，现今在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发展上落后于欧美的地区反而先进得多——它们实际上是当时的“发达国家”。本书试图充分重视中东的犹太人，中东犹太社群经常被

视为边缘或带有异域风情的，但在多个世纪里，它却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成功的犹太社群。

本书还要纠正一个类似的曲解，即忽视中东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在现代犹太史上的作用。这两个犹太社群（在当代讨论中经常被混为一谈）虽然在现代随着东道国的衰落而式微，但在以色列国建国以前，无论就人数还是文化活动而言，他们一直是重要的，他们的后裔目前在以色列国是人数庞大的新兴力量。然而，就连研究犹太史的资深学者也常常忽略他们。本书要试着还他们以应有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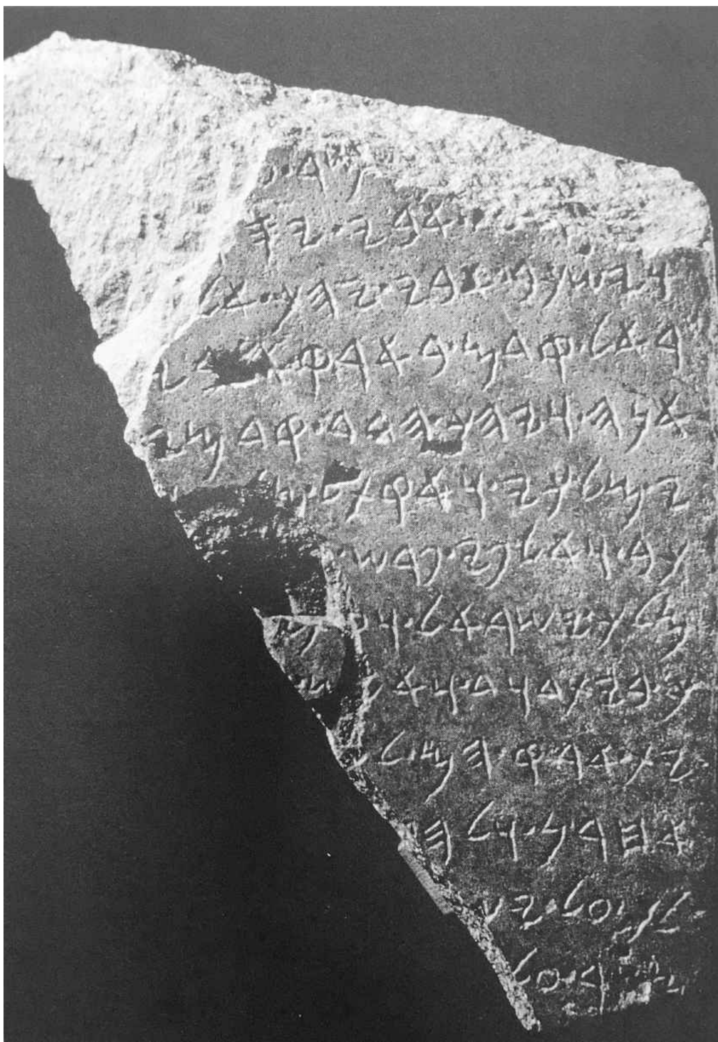
犹太人分散在众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一个地区的犹太社群与其他地区的犹太社群经历不同，采取的文化形式也不同。因此，对于大部分犹太史，如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难免显得牵强和混乱。对于某些时期，将较大的犹太社群分开单列，把它们当作平行单位，再按时间顺序讲述它们的故事，叙事线条会显得更加清晰。这种方法也能为理解现代各犹太社群的不同特点奠定更好的基础，比如，可以揭示为什么二战前波兰的犹太人会迥异于战前土耳其、摩洛哥或美国的犹太人。

本书不是犹太宗教的历史。如同所有的人类制度和犹太人自身一样，犹太教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演变，这一演化过程的迷人故事值得单独讲述。但犹太人和犹太教完全不是一回事，两者在现代更是泾渭分明，澄清这点很重要。在20世纪末，相对而言，世上几乎没有犹太人再把宗教信仰或行为作为界定犹太人的主要依据，连世上绝大多数犹太人，包括其中积极认同犹太身份的许多人，也难以讲清楚犹太教的教义和实践。有理由认为，犹太人并不共享同一宗教而是共享同一历史，虽说大多数犹太人很可能不会这样明说。相应地，本书虽然也涉及宗教，但仅仅将之作为犹太身份的几个组成部分之一，和犹太人的语言、书籍（世俗的和宗教的）、制度以及历史本身等量齐观。我们的话题不是犹太教，而是犹太人。

受篇幅所限，我无法一一提及历史上每个犹太社群，对一些有趣的犹太社群，只能忍痛割爱，要么省去，要么一笔带过，其中包括印度、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布哈拉、也门和中国的犹太人。将本书篇幅增加一倍并不难，难的是把它缩减到现在的规模。我努力坚持的原则是，

只系统描述每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群，即看得到大局的社群。作为补偿，我提供了足够多的参考书目，读者自可顺藤摸瓜，对犹太史最感兴趣的方面继续探索。

上文已经强调，无论研究什么历史，都应以人力之所及，尽可能获得一种全球视野。但我还是要承认，我自己与本书话题的关系不能算中立。我自视为犹太史的积极参与者、热忱的希伯来语研究者、有选择地奉行犹太宗教传统的人、中世纪希伯来语文学的专业学者。尽管我个人长期对本书话题沉潜含玩，但我已经尽力在书中维护此处提倡的全球视野。我发现犹太人的一切都引人入胜，而令我尤感兴趣的是，犹太人是如何与自己栖身其中的不同民族与文化展开互动，既适应周遭的环境，又保留风格各异的传承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本犹太人简史，也让读者多少感受到我的这份热情。



在但废丘（Tel Dan）发现的早期亚兰语石刻，来自公元前9世纪，第九行提到“大卫家族”。照片,版权方为泽夫·拉多万。

第一章　古以色列人的起源和王国

公元前1220年以前至公元前587年

犹太史长剧的第一幕是古以色列人（Israelites）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以色列人在地中海东岸当时称作“迦南”的地方建立王国，这个王国持续了400多年，毁于公元前587年。古以色列人王国的历史并非传说；该王国国王的事迹、作战的情况、若干社会经济状况和大量宗教信息，就保存在《圣经》的几卷历史书中（主要是《列王纪》和《历代志》）。这些历史书中的部分记载可以被考古遗迹和本地区其他民族保留的记录佐证或纠正。这是因为，古以色列人的王国（在历史上有段时间被分成两个王国，见下文）虽然占地不大，但所处的地理位置对相邻的列强很重要。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公元前）	世界通史
	约3200	埃及王国建立
先祖时代	约1900	
	约1728—1686	汉谟拉比王统治巴比伦
	约1650—约1550	埃及喜克索斯王朝
	约1370—约1353	法老阿赫那吞统治埃及
	约1290—1224	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统治埃及
出埃及	约1280	
	约1224—1216	法老梅内普塔统治埃及
约书亚率军征服迦南	约1250—1200	非利士人在巴勒斯坦定居
士师时代	约1220—1020	
撒母耳	约1050	
扫罗	约1020—1000	
大卫	约1000—961	
所罗门	961—922	
王国分裂：罗波安统治犹大，耶罗波安统治以色列	922	
约沙法统治犹大	873—849	
亚哈和耶洗别统治以色列	869—850	
亚他利雅统治犹大	842—837	
耶户统治以色列	842—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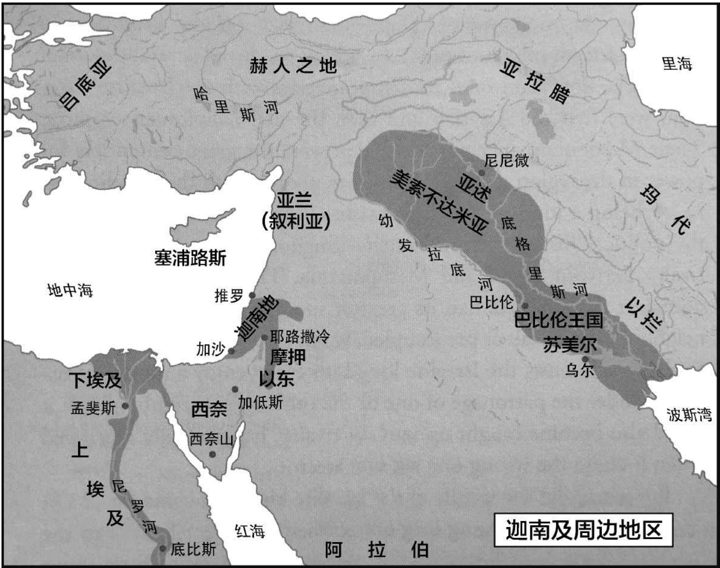
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以色列	786—746	
乌西雅王统治犹大	783—742	
	745—727	亚述国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
亚哈斯统治犹大	735—715	
何细亚统治以色列	732—724	
	727—722	撒缦以色五世
	722—705	撒珥根二世
以色列灭国；北方十支派遭放逐	721	
希西家统治犹大	715—687	
	705—681	西拿基立
西拿基立攻打耶路撒冷	701	
约西亚	640—609	
	612	尼尼微被巴比伦人攻陷
米吉多战役	609	
	605—562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约雅斤被放逐到巴比伦	597	
西底家	597—587	
耶路撒冷沦陷；巴比伦之囚开始	587	

迦南地的西南面是埃及，一个伟大而强势的王国，埃及不间断的历史始自大约公元前3200年。隔着东北方的沙漠，往东就是另一个古老文明的故乡美索不达米亚，它同样始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孕育出几个强国。和古以色列人王国同时代的主要帝国先有亚述人的帝国，再有新巴比伦帝国。在古以色列人的时代，这些美索不达米亚国家和埃及是该地区权力的主要竞争者，而古以色列人的领土恰恰构成它们中间的地理桥梁。古以色列王国的大部分政治史，反映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竞争史。一旦周围重要的邻国国力虚弱或者自顾不暇，古以色列人的王国（或者说两个王国）就能获得最大的成功；一旦邻国国力强盛或者竞争白热化，古以色列人的王国就能蒙受某个邻国的恩泽，实现适度的繁荣，但它也可能卷入竞争，进退维谷。最终，它还是选错投靠对象，惨遭灭国。

不过，古以色列人王国的人民究竟从何而来？关于这个问题，原始资料含糊不清。《圣经》以外明确提到古以色列人的最早资料，是一段大约公元前1220年的埃及碑文，内容是纪念埃及法老梅内普塔

（Marniptah）在迦南地战胜古以色列人和其他几个民族。但是，古以色列人的起源以及接下来直到建立君主制的这段历史隐没在黑暗中。和大多数民族一样，古以色列人为他们的起源创作了一个故事，它部分基于事实，部分基于对各种大事件的师心自用的解读，部分则基于民间传说。

《圣经》以外的记录显示，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早期，有几波移民迁入美索不达米亚（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相当于今伊拉克和叙利亚东部）和迦南，他们都属于一个半游牧民族，史称西闪米特人或亚摩利人。这些人很可能是定居在迦南北部（大致相当于今叙利亚东部）的亚兰人和定居在迦南南部（大致相当于今以色列）的古以色列人的共同祖先。这些移民在人种上接近迦南土著，并接受了迦南土著的语言和文化。在这些移民中，有些人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主要在中部山区和南部地区的荒漠中活动，饲养牛、绵羊和山羊，偶尔种种地；有时他们跟定居的农耕人口起冲突，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与人交往。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也有这样的边缘民族，史称哈比鲁人或阿毗鲁人。这两个名称不表示族群或氏族，而表示社会阶层，或许就是“希伯来”一词的来源，《圣经》则把“希伯来”这个词和亚伯拉罕联系在一起。(1)



有些迦南人和亚摩利人前往埃及，趁着埃及中王国虚弱，于公元前1720年左右占据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在公元前1650年左右，他们接管

整个国家，建立起自己的埃及王朝，史称喜克索斯王朝，持续了大约100年。

《创世记》和《出埃及记》记载的古以色列人自己的故事，与上述大迁徙十分吻合。《创世记》声称希伯来人亚伯拉罕是美索不达米亚人，他遵从上帝的命令，迁居迦南地。他和儿子以撒居住在迦南，但他的孙子雅各逃荒去了埃及。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成了重臣。他和雅各的其他11个儿子，即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一起享受荣华富贵，但他们的后代却沦为埃及人的奴隶。《圣经》关于迁居埃及的记叙，能很好反映公元前15世纪阿毗鲁人在埃及的出现。约瑟的飞黄腾达则与第18和第19王朝有非埃及裔朝臣的零星记载相符。《圣经》描述古以色列人受到奴役，建造比东（Pithom）和兰塞（Ramses）两座城市，这可能和历史上两个工程有关：塞索斯一世（Sethos I,公元前1305—前1290年在位）在阿瓦里斯（Avaris）城建造赛特神庙，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90—前1224年在位）在派兰塞（Pi-Ramses）创建新都城。与非常普遍的印象相反，古以色列人不可能参与建造著名的吉萨金字塔，如果他们真到过埃及，也是金字塔建成后将近1000年的事。

古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过程叫“出埃及记”，记载在《圣经》的同名书卷中。与上文提到的史实对照，出埃及可能发生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发生在此时，也能和上述梅内普塔碑文中提到的公元前1220年左右迦南地的古以色列人相合。但碑文中的古以色列人和从埃及来迦南地的那些人是同一群人吗？从《圣经》记叙的主体看，他们似乎是同一群人，因为这种记叙假定全体古以色列人都在埃及。不过，《圣经》中另有记叙强烈地暗示，他们逃出埃及进入迦南后，与几支人种上有联系的部落汇合，这些部落并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也没有去过埃及。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正是这些不同人群的联合创造出后来被称为古以色列人的民族。这是今天大部分历史学者接受的说法。

《圣经》的叙述把古以色列人历史中的所有事件都定性为神意。据《圣经》记载，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前往迦南地定居。亚伯拉罕一抵达迦南，上帝就告诉他，他的后代将在埃及当奴隶，但最终会获救，返回迦南地，作为上帝的选民永远生活在那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都住在迦南，但雅各的儿子合谋将自己的弟弟

约瑟卖给一帮以实玛利商人，约瑟被带到埃及；这些事都在上帝的计划中，为的是让这个家族安然度过日后的饥荒，不过当事人毫不知情。约瑟历经艰险，当上大官，能够在父亲和兄弟最终逃荒到埃及时接济他们，把他们安置在尼罗河三角洲某处，《圣经》称此地为歌珊地。

《圣经》接着说，在约瑟和器重他的法老去世后，雅各的后代继续繁衍，数量之多，引起新统治者敌视，终使他们沦为奴隶。一个在埃及出生的古以色列人摩西救了他们。新法老曾下令把所有古以色列人的儿童投入尼罗河淹死，但法老女儿救下摩西，养在皇宫里。摩西多行奇迹，引诱法老释放古以色列人，但徒劳无功；最终，他把古以色列人带到《圣经》中称为“芦苇海”（通常译作“红海”，但不能认定就是现在的红海）的水边。他向上帝祈祷，海水便神奇地分开，他们得以通过，而后海水合上，将埃及军队淹没。接着，古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半岛南部的西奈山，在今天名为摩西山（Jebel　Musa）的山脚下扎营。他们在那里目睹上帝显现的奇迹，领受祂的律法。根据古以色列人的传统，正是这件事将古以色列人祝圣为上帝的选民，也把遵从上帝特殊命令的责任强加给他们。

离开埃及时，古以色列人小心翼翼，避开沿海岸线进入迦南地西南部的道路，这条道上遍布埃及人的要塞。不过，他们一旦试着从南部进入迦南地，就发现道路受阻。他们在别是巴正南面的绿洲加低斯（Kadesh）长期驻扎，又在旷野中流浪了一段时间，然后向东绕行一大圈，避开刚刚形成的以东王国和摩押王国（分别位于死海的东南面和东面，在今约旦王国境内），征服约旦河东岸的亚摩利人王国的都城希实本（Heshbon）。此时，渡过耶利哥对面的约旦河对他们来说已成坦途。摩西这时去世，继承他的是约书亚。

接下来的事情，《圣经》中有两种说法。一说古以色列人征服耶利哥，通过三次迅捷的战役横扫此地，再由古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将它瓜分。但是，《圣经》又说这次征服进展缓慢，缺乏协调，到约书亚去世时仍未竟全功。考古证据尚不能让我们下结论，但却证实许多迦南人的城市在公元前13世纪后半叶被毁，并显示一些城市在同一时期反复经历了毁灭和重建。似乎可以肯定，古以色列人一开始在中部山区要比在沿海平原或者耶斯列平原更成功。

从公元前13世纪末到公元前11世纪末，迦南的古以色列人组成一个十二支派的联盟。两个支派（流便和迦得）完全定居在外约旦，一个支派（玛拿西）控制约旦河两岸的领土。犹大支派控制着约旦河以西的南部领土，约旦河以西的中部领土被便雅悯、以法莲和玛拿西占领，较小的几个支派占领耶斯列平原北部的领土。然而，迦南人的飞地遍布四方；部分沿海平原还掌握在源自爱琴海的敌对的侵略者手里，他们被统称为海上民族，其中的非利士人将成为最令古以色列人头疼的势力。很久以后，正是非利士人的名称将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让它得名“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今天依然为人熟知。

古以色列人的联盟没有正式的中央政府或首都，但各个支派因为一个圣约和一位叫耶和华（Yahweh）[2]的共同的神而同气连枝，互相负责。圣约收纳在圣龛即约柜里，后来安放在中部山区的示罗。必要时会召开所有支派的长老会，共同谋划统一行动，但各个支派通常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有时也临时结盟。魅力超凡的领袖不时出现，领导几个支派或者所有支派，讨伐征战。《圣经》管这种领袖叫“士师”，这些豪杰智勇双全，一生的事迹丰富多彩；以笏、底波拉、基甸和参孙是其中最有名的士师。

古以色列人逐渐从游牧民族变为农耕民族；他们建立城镇，砍伐森林，发展技术，还要应对没有被征服和吞并的迦南人族群的敌视。但是，他们的联盟不够强大，不足以对付非利士人，后者是一群侵略成性的军事贵族，并不满足于攻击邻居，还一直伺机利用埃及的弱点，想侵占整个迦南。非利士人占有重大技术优势，懂得制铁，能熟练驾驭战车。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他们在亚弗（Aphek）的一场大战中获胜，夺得（被带到战场的）约柜，摧毁示罗城，占领大部分地区。作为回应，古以色列人建立君主制，以便协调作战，他们选出扫罗任首位国王。

于是，突出士师之领袖魅力的政府形式被君主制替代，这并非人人所乐见；扫罗能当选，不光是因为得到德高望重的先知撒母耳（他起初反对这种改变）的支持，还要归功于他的人格魅力，这让他的统治看起来像是旧政权的延续。不过他虽然一开始对非利士人的作战卓有成效，但后来就变得反复无常，时不时流露出沮丧和愤怒，还屡有误判。撒母

耳转而支持扫罗王麾下的年轻将领大卫，此人和非利士著名英雄歌利亚打仗，获胜后声名远扬。作为战士，大卫受到爱戴，让扫罗相形见绌。扫罗妒火中烧，将标枪冲着大卫投去，欲刺杀他，大卫只能逃到非利士人那里避祸。在他们中间，大卫玩起危险的两面派游戏。他冒迦特的非利士王之名，领着自己的民兵一次次假装袭扰犹大支派，但实际上，他却肆意袭击敌视犹大支派的亚玛力人和其他迦南人部落，因而被犹大支派的人当作保护者，赢得口碑。

大约公元前1000年，古以色列人在耶斯列平原惨败于非利士人。扫罗的三个儿子被杀，扫罗自杀；扫罗幸存的儿子伊施巴力（Eshbaal）继位，但没能坐稳王位。大卫从犹大支派那里收获回报，他们在希伯仑将他推举为王，这很可能得到非利士人的首肯。软弱的伊施巴力遭谋杀后，大卫轻易获得北部各支派的支持。几年之内，他又征服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交界处一块重要的迦南人飞地，将其主城耶路撒冷作为自己的领地，并把约柜（之前已从非利士人手中收回）运到那里。这样，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君主国的首都，这个国家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南方犹大支派和北方被统称为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还有位于中央的连接南北方的圣所。(3)

古以色列人崇拜的神叫耶和华。不过，虽然耶和华也像异教徒的众神一样，有专用名字，但祂和古以色列人邻居的众神都不同。在同时代的各族人民中，古以色列人特立独行，是一神论者；换言之，他们只承认耶和华是真神，是天地的创造者、世界的主宰、全人类命运的掌控者。异教徒民族崇拜多神，大多认为有一位主神支配其他诸神，并且尤其庇护自己，但他们也接受这个事实，即其他民族也忠于各自民族的守护神。然而，古以色列人不承认任何其他神明的合法性。古以色列人为呈现耶和华而采用的形式，有时和异教徒邻居的拜神形式相似，他们还经常用源自本地异教的术语描述耶和华，但古以色列人的一神教在发展成熟后，就不允许用任何形式呈现耶和华，也不允许在崇拜时使用偶像。耶和华崇拜的主要仪式是动物献祭，以及由世袭的祭司阶层的成员向祂的圣所供奉农产品。这类崇拜遍布古以色列人分布的区域，不过当王权强大时，统治者试图把它限制在耶路撒冷的皇家圣所内。

大卫的登基标志着成熟的以色列君主制正式启动，也标志着古以色

列人明确出现在历史上。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统治了（大约）80年，在后世犹太人的想象中，这段时间是犹太史上的黄金时代。大卫将国土向东和东南扩张，打败外约旦的王国亚扪、摩押和以东；在北面，他在现今的叙利亚打败亚兰人新建立的诸国；而在地中海沿岸，他迫使非利士人向他进贡。他控制着从地中海到东部沙漠，以及从西奈沙漠向北直到推罗（坐落在迦南北部地中海海岸线上的腓尼基人国家的首都）、向东北直到幼发拉底河的大部分领土。这样，他实际上替非利士人实现了控制这整个地区的野心，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帝国的中心。

大卫

《圣经》中对大卫王生平及统治的记叙组成《撒母耳记》上下篇，是《圣经》中篇幅最长、最生动的故事之一，可能也是现存最早的希伯来语叙事，兼具民间传说和史实。

《撒母耳记上》叙述大卫成为以色列王的过程。根据这一叙述，大卫起初是犹大支派的牧童，这是民间传说的典型描写手法，以暗合他是“其子民的牧者”的身份。先知撒母耳决意用更能干的领袖取代扫罗王，他秘密将大卫膏立为王（在古代以色列，确认君王身份的仪式是行膏油礼而非加冕礼）。年轻的大卫仅凭牧羊人的投石器，就在一场战斗中击败并杀死非利士勇士歌利亚，从而引起扫罗王的注意。这一英勇功绩令他家喻户晓，但也招致扫罗的嫉妒和敌视。

扫罗时常抑郁消沉，一旦犯病，他就将大卫招进宫，为他弹琴解闷。一晚，扫罗一时冲动，把标枪掷向大卫。大卫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加入扫罗的宿敌迦特王的宫廷。在伺机返回期间，他多次组织袭击，表面上是针对犹大地，实则将矛头对准迦南人。扫罗和其子约拿单在同非利士人的战斗中丧生，大卫此时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军事领袖，他成了犹大王，定都希伯仑。几年后，他又当上北方各支派的王，把犹大和以色列并为一个王国。他夺下位于犹大和北方各支派分界线上的迦南人城市耶布斯，以此作为首都，改名耶路撒冷。

《撒母耳记下》讲述大卫执政期间的一系列故事，他骁勇善战，但并非全然正直。他不得不面对几场针对他的叛乱，最揪心的一场由他亲子押沙龙发动，事态一度非常危急，大卫和他的宫廷不得不逃到约旦河对岸。押沙龙后来遭到父王反击，落荒而逃，被大卫的一名士兵追杀。他死后，大卫痛不欲生。

《撒母耳记》对大卫身上的缺点毫不避讳。他迫切想占有手下一位将领的妻子拔示巴，遂将她的丈夫派往前线送死，再娶她为妻。此举受到先知拿单的强烈指责，大卫忏悔，得到宽恕。后来，他和拔示巴生下的所罗门继承了王位。

犹太传统日后不仅视大卫为战士和君王，还把他当成诗人纪念。辑录在《圣经》之《诗篇》里的许多甚至全部诗歌，据说就出自大卫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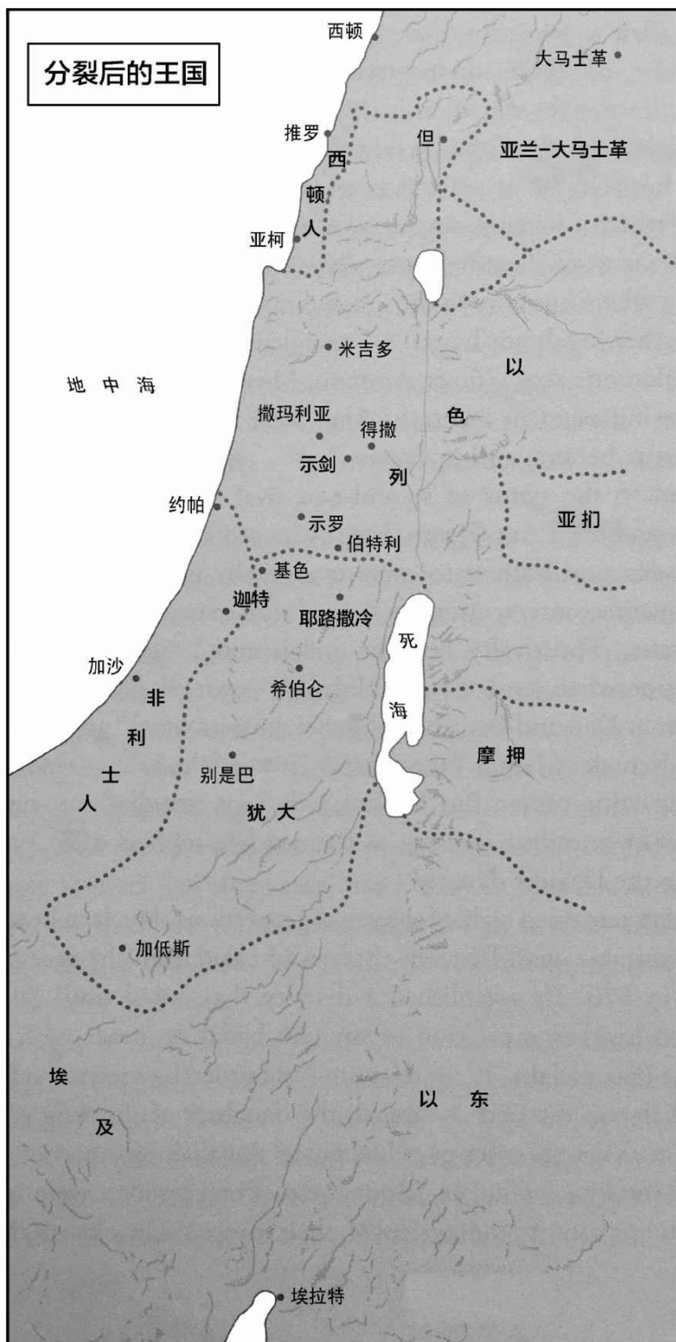
不少叛乱显示，并非所有古以色列人都对此感到满意。大卫的亲生儿子押沙龙的反叛可能只反映泛泛的不满情绪和他的个人野心，而示巴·本·比基利（Sheba ben Bichri）的反叛却是北方众支派在犹大支派的统领下躁动不安的信号。在大卫晚年，他的儿子亚多尼雅（Adonijah）试图破坏他让所罗门继位的计划，但大卫生前就把王位传给了所罗门。

所罗门（约公元前961—前922年在位）继承了安定的王国，他把注意力从战事转向国家的商业发展。他与埃及和推罗结盟，又利用自己身处两片海域之间并且横跨主要商路的地理位置，发展红海和阿拉伯半岛的贸易。他在南部沙漠开采铜矿，与埃及人、基利家人（Cilicians）、赫人（Hittites）[(4)]做马匹和战车生意。由此实现空前的繁荣，城镇扩张、技术进步、人口增长，一种超越地域偏见的文化也登场了。繁荣使所罗门可以大兴土木，包括建造耶路撒冷的大型王宫和圣殿，为此他还特地从推罗请来一名建筑师。繁荣也促进了文学发展，大卫的宫廷历史（《圣经》中《撒母耳记》的核心部分）和以色列起源的故事就形成于这一时期。这部作品没有完整保留下来，不过《摩西五经》（即《圣经》中犹太人称为《托拉》的部分，由《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组成）的作者将之作为主要资料来源而大加引用。研究五经底本构成的学者将这部散佚的作品称为J底本。

然而，对民众来说，所罗门的建筑工程和帝国的行政管理是重负，不但带来复杂的行政系统和沉重的赋税，而且为了国家利益强迫民众服劳役，此举不得人心。鉴于和推罗的贸易出现赤字，所罗门不得不割让北方几座城池。所罗门偏袒自己所在的犹大支派，引起众怒。地方祭司眼见耶路撒冷圣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自己的地位日渐式微，也滋生不满情绪。经过两代君主的统治，这个国家已经改变，不再是一个由简朴的农民、牧民组成的松散的部落联盟，而成了一台有社会分层的经济机器：民众不仅受一小群贵族剥削，还屈服于一个讲话口音和生活作风越来越陌生的宫廷的种种需求。

所罗门自己没有尝到这些不满的恶果，但他一去世，王国就一分为二。他的儿子罗波安虽然继续掌控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但是北方各支派拒不承认由大卫促成的与犹大支派的联合，另立耶罗波安为王，此人原是所罗门的宫廷大臣。北方王国的首都起初放在示剑，后来迁至得撒（Tirzah），最后定在撒玛利亚。它在几个短命王朝的统治之下维持了200年，直到公元前721年被亚述人攻灭。与此同时，犹大依旧由大卫的王朝统治，直到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人攻灭。北方王国名为以色列，这在古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容易造成混乱；因此，在这一时期，所谓的“古以色列人”，通常不是指整个族群，而仅仅指北方王国的居民。

无论犹大还是以色列，都不够强大，守不住大卫和所罗门打下的江山。亚扪、摩押和非利士人的一众城市再次独立，亚兰的领地也失去，大马士革成为重要的竞争势力。犹大和以色列沦为二流国家：犹大经常面临埃及的压力，以色列经常面临大马士革的压力，这两个国家还会通过直接干预邻国以及与邻国政治串通而不断相互施压。犹大和以色列之间的竞争也体现在宗教上，耶罗波安设立自己的官方崇拜，在但、伯特利两地修建神殿，其臣民不再把耶路撒冷圣殿这个大卫皇室的官方圣地视为自己的崇拜中心。不过，耶罗波安并不像忠于大卫王朝的一帮先知所指责的那样，他既没有拒绝原来的民族宗教，也没有引入偶像崇拜。



犹大的稳定维持了几代人，但以色列相对动荡，频频更换统治者，直到公元前876年暗利登基。他建立的王朝一直维系到公元前842年，并通过与犹大和腓尼基人保持和平而恢复了以色列的强国地位。和平由联

姻达成：暗利的儿子亚哈迎娶推罗王的女儿耶洗别，暗利的女儿（或孙女）亚他利雅则嫁给犹大王的儿子。（这两位强势的妇女都将在各自的时代呼风唤雨。）由此强大的以色列终于再次征服摩押，而犹大再次控制以东。亚哈还和亚兰-大马士革开战，但后又捐弃前嫌，联合亚兰和其他北方国家一起对付来自亚述的严重得多的威胁。后来，他又和亚兰交战，被杀。他的儿子约兰失去摩押，亚哈王朝从此衰落；这在一长段碑文中有记述，此碑名为米沙（Mesha）石碑，现藏于卢浮宫。

宗教保守派人士，特别是先知以利亚和他的弟子以利沙，强烈反对暗利王朝。这些人反对外来膜拜，以色列和推罗的紧密合作使此类膜拜在以色列流行。耶洗别是他们的眼中钉，因为她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自己的异教信仰，还迫害耶和华的信徒。公元前842年，以利沙策划政变，一位名叫耶户的将领控制全国，他把耶洗别扔出窗外，屠戮了整个亚哈家族和耶洗别的推罗膜拜的信奉者。

与此同时，在亚他利雅的影响下，犹大地也经历了类似事件。她在丈夫约兰和儿子相继去世后独掌大权，杀光所有可能反对她的约兰的亲眷，并扶植巴力神的膜拜。但是，亚他利雅没有真正的追随者。大祭司的妻子从亚他利雅的大清洗中救下襁褓中的王子；公元前837年，他年满7岁，大祭司在圣殿中立他为王，亚他利雅遭处决。

以色列和犹大两国一直比较弱小，直到公元前8世纪80年代，这时亚述势力遭到削弱，而两国都出现能干的国王，遂使国力暂时中兴。两位国王的统治时期几乎同步，以色列王是耶罗波安二世（公元前786—前746年在位），犹大王是乌西雅（公元前783—前742年在位）；在他们的统治下，两国都有所扩张，领土合起来几乎恢复到所罗门王国时的水平。但在耶罗波安二世去世后不久，亚述在强大的新统治者提革拉毗列色三世领导下卷土重来。亚述人可怕的军事机器决定了北方王国的剩余历史和犹大王国剩余历史的大部分。

提革拉毗列色三世先发动战争，征服巴比伦，再把注意力转向西方。到公元前738年，所有位于叙利亚和迦南北部的国家都向他进贡，其中就包括几近无政府状态的以色列。以色列和大马士革试图向犹大施压，令其加入对抗亚述人的地区性联盟，但被犹大国王约坦和亚哈斯先

后拒绝。亚哈斯在位期间，这个联盟的成员国侵袭犹大，想改立一个听话的国王。面对侵略和来自其他地方的攻击，亚哈斯只得向提革拉毗列色三世求助。亚述人的大军横扫这一地区，所向披靡，联盟瞬间土崩瓦解。占领以色列后，提革拉毗列色三世迁走当地部分人口，缩小其领土，还扶植傀儡国王何细亚掌管残山剩水。然而，何细亚拒不纳贡，还向埃及求助。藐视亚述大帝国，无异于自取灭亡。公元前724年，亚述王撒缦以色五世发动进攻，俘获何细亚，占领大部分土地。公元前721年，撒珥根二世攻占首都撒玛利亚，北方王国的历史就此终结。

亚述征服者按照惯例，把当地人口迁走，再从其他征服地区迁来人口填补。北方王国的大部分人口被迁往上美索不达米亚，他们最终与当地居民融合；北方王国的领土上住着从叙利亚和巴比伦迁来的人口，他们和以色列剩余的人口混居。这在传统犹太史上称为北方十支派的流亡。不过，新来的人口从以色列遗民那里知晓并接受耶和华崇拜，两群人后来融为一体。虽然他们依旧自视与犹大人民关系密切，但这种关系在公元前5世纪恶化，双方更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这一地区后反目成仇。

此时距亚述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仅剩一个多世纪。公元前703年，巴比伦发生的一场起义给推罗带来机遇，非利士各城市、犹大和其他一些势力组成反亚述联盟，犹大王希西家（公元前715—前687年在位）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为了防止亚述人报复，希西家加固耶路撒冷的城防，开凿著名的西罗亚水道（至今仍可参观）[5]以保障城市供水。亚述王西拿基立在公元前701年进军此地，骇人的屠杀和大规模的外迁接踵而至，希西家不得不割让部分领土并增加贡赋。但西拿基立没有占领耶路撒冷就突然撤离，根据《圣经》的叙述，这是由于他的军队忽然奇迹般地出现大量死亡。尽管如此，犹大仍要继续向亚述人纳贡，直到约西亚王（公元前640—前609年在位）时期，他在位期间正逢亚述因为巴比伦的崛起而衰落、瓦解。

在约西亚统治时期，犹大王国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但已是强弩之末。他收复被亚述人占去的北国以色列的部分领土，还发起一场席卷全国的宗教改革，以清除由亚述人强行推广的外来膜拜。他把献祭仪式严格限制在耶路撒冷举行，以此重申犹大的独立和他的宗教权威。按

照《圣经》的说法，改革起因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发现一卷古经（可能是《申命记》），上面规定不得在其他任何地方举行献祭仪式。为了庆祝新律法的颁布，耶和华和这一民族所立的约得以更新，当时已湮没无闻的逾越节庆典再次举行。

公元前609年，埃及军队穿过耶斯列平原，打算帮助垂死的亚述帝国抵抗巴比伦人。约西亚王试图率军挡住埃及人，预先阻止埃及-亚述联军的胜利，但战死沙场。巴比伦王国这时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只得转而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犹大的新国王约哈斯遭废黜，由约雅敬取代，他向埃及纳贡。

巴比伦王国向西扩张，蚕食埃及领土，犹大王国覆灭的序幕拉开。巴比伦将领尼布甲尼撒（他很快称王）在叙利亚打败埃及人，向南逼近犹大，胁迫约雅敬在公元前603—前602年间向他称臣。约雅敬试图反抗，转而求助于埃及人。在随后与巴比伦的战争中，他死去，由18岁的儿子约雅斤继位。约雅斤在抵抗尼布甲尼撒三个月之后投降。他和皇室成员、高官以及犹大王国的大量财宝被掳往巴比伦；他的叔叔，即约西亚王之子西底家，被立为傀儡国王。

西底家也想反叛，他显然指望得到埃及的援助。但这些援助远远不够，公元前587年，经过长期围攻，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攻破耶路撒冷的城墙。西底家看着儿子们在他眼前被杀，随后被弄瞎双眼带到巴比伦。耶路撒冷遭焚毁，城墙被夷平。许多高级将领被杀，剩下的被掳走，犹大国彻底灭亡。一个名叫基大利的犹大贵族被任命为地方长官，管理这片巴比伦新领地，但犹大官员们很快密谋，将他当作通敌者暗杀。

铭文

从《圣经》时代幸存至今的文字记录尽管为数不多，却能够让我们了解古代以色列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可确定年代的最古老的希伯来语铭文是基色历，来自所罗门时代。它刻在一块质地软的石灰岩小板上，出自儿童之手，很可能是当时的学校作业，列有一年中各月份适宜从事的农业活动。

犹大和以色列王国时期留下许多陶片（*ostraca*），上有用古希伯来语字体写的铭文，系墨水所写。有一组陶片的内容是物资清单，比如葡萄酒和油，是公元前8世纪运往北方王国都城撒玛利亚的王宫的。有块陶片来自公元前7世纪末，铭文内容包含一位农民对监工虐待的抗议。内盖夫地区也发现一批陶片，上面是某个名为艾尔亚什夫（Elyashiv）的军需官的档案，他负责管理亚拉得（Arad）的仓库。这些文书记录了向犹大军队及其雇佣兵分配补给的情况。另一批陶片上是一些写给拉吉（Lachish，这是耶路撒冷附近一座城镇）的军事总管亚乌什（Yaush）的信件，写于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前不久。

公元前8世纪末还流传下一块纪念性碑铭，纪念西罗亚水道的竣工。根据《圣经》中的《列王纪》和《历代志》记载，希西家王兴修这一工程，是为了将基训河水输送到耶路撒冷城墙内的西罗亚水池，以防亚述人围攻时城内缺水。另一块纪念性碑铭是迄今在该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块，它用摩押语写成，这是迦南人的一种语言，和希伯来语非常接近。它纪念的是摩押王米沙在亚哈王去世后对以色列王国发动的叛乱，和《列王纪下》中的描述吻合。这篇铭文的风格和《列王纪》的风格极为相似，但它以摩押人的立场描述当时的政治事件。米沙宣称摧毁了古以色列人的诸城，将古以色列人俘获为奴，并从尼波（Nebo）的一座耶和华神殿中夺取圣器。《圣经》对此事结局的记载颇为不同，两个版本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

在内盖夫北部一座旅客驿站中，一些大型储物罐上的铭文引起很大争议。这些铭文写于公元前9世纪，提及“撒玛利亚的耶和华”神和他的“亚舍拉”。在《圣经》中，“亚舍拉”（*ashera*）一词频繁作为迦南人的宗教膜拜的名字出现，但它在迦南人的铭文中是一位女神的名字。一

些学者把铭文中的这个词解读为耶和华的一种属性，但其他学者把它解释为迦南女神的名字，她可以被当作耶和华的妻子。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铭文中的“亚舍拉”便反映出一神教出现之前古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当时耶和华仍是异教神祇，与该地区其他民族的神祇没什么不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有两小块银牌上镌刻着一段祈祷文，内容几乎和《民数记》6:24-26中祭司的祝福语一般无二，至今仍在传统的犹太会堂里被每日吟诵。这两块银牌是护身符，成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系随身佩戴之物。这段祈祷文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段来自《圣经》时代但不依靠《圣经》流传的《圣经》文本：“愿神赐福给你，保护你；愿神使祂的脸光照你；愿神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犹大地的君主制持续了400多年，对于一个处在兵家必争之地的小国来说，能维持这么久，已经令人尊敬了。但其子民不允许它被遗忘。他们带着对这个王国的记忆，开始流亡，哪怕身处流散地，依然怀着有朝一日终将恢复旧日荣耀的梦想，砥砺前行。这一理想中的复兴后世称为弥赛亚时代。在巴比伦，流亡者创建多种宗教制度，将他们对王国的记忆和复兴王国的梦想鲜活保存了多个世纪。后来，弥赛亚梦想和一神论原则一起成为犹太教的典型特征。



以斯拉宣读律法，杜拉-欧普洛斯（位于今叙利亚）古犹太会堂的壁画。壁画翻拍，版权方为泽夫·拉多万。

(1) 见《创世记》14:13。——校者注

(2) 汉语学界又译作“雅威”。这个神名（יהוה）在犹太传统中不发音，不能念出来（17世纪的沙巴塔·泽维曾当众念出此名，被革除教籍，见本书此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译成“耶和华”和“雅威”没有区别。——校者注

(3) 以色列十二支派中利未一支负责献祭与宗教事务，散居其他支派之中，不拥有土地。——校者注

(4) 本书《圣经》时代的地名和人名的翻译参照和合本。赫人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赫梯人，学界仍有争议。——校者注

(5) 因为是希西家所建，故而又称为“希西家水道”。——校者注

第二章　犹地亚和流散的起源
公元前587年至公元70年

巴比伦帝国强大而短命。到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居鲁士将之征服，继而建立规模空前的大帝国，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在对待被征服者方面，居鲁士比前辈仁慈：他允许臣民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让他们的首领承担政治责任，尊重他们的宗教膜拜。在公元前538年，即征服巴比伦后不久，居鲁士下令在新设立的波斯犹地亚省重建犹大地人的社群和膜拜。流亡者获准在约雅斤之子设巴萨王子的带领下返回故土，此人是倒数第二位犹大王。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前539	居鲁士征服巴比伦
重建开始；首批流亡者回归犹大	前538	
	前525	波斯人征服埃及
所罗巴伯执掌犹大	约前522	
	前522—前486	大流士一世
第二圣殿建成	前515	
	前490	马拉松战役
	前465—前424	亚达薛西一世
以斯拉	前458？	
尼希米主持耶路撒冷城墙重建；以斯拉颁布《托拉》	约前445	
	前423—前404	大流士二世
象岛圣殿遭毁	前410	
	前404—前358	亚达薛西二世
	前401	埃及脱离波斯统治
	前333	伊苏斯战役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巴勒斯坦	前332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
	前323	亚历山大逝世
	前323—前285	埃及托勒密一世
	前312—前280	叙利亚塞琉古一世
托勒密一世征服巴勒斯坦	前301	
	前223—前187	叙利亚安条克三世

安条克三世征服巴勒斯坦	前200—前198	
	前175—前163	叙利亚安条克四世
安条克四世废黜大祭司奥尼亚三世	前175	
耶路撒冷变成希腊人的城市，改名为安条克	前172	
安条克四世掠夺圣殿	前169	
安条克宣布犹太教非法并亵渎圣殿； 马卡比起义开始	前167	
犹大·马卡比领导起义	前166—前160	
犹大举行仪式将圣殿再次献给上帝	前164	
犹大完全征服耶路撒冷； 尼迦挪战役； 犹大和罗马签约	前161	
犹大遇害，约拿单取而代之	前160	
约拿单任大祭司	前152	
前大祭司奥尼亚四世在埃及狮城建造圣殿	约前145	
约拿单遇害，西缅取而代之	前142	
西缅被任命为族长和大祭司	前140	
约翰·许尔堪任大祭司	前134—前104	
亚利多布一世	前104—前103	
亚历山大·雅拿	前103—前76	
撒罗米·亚历山德拉王后	前76—前67	
庞培介入内战；罗马控制犹地亚	前63	
	前44	尤利乌斯·凯撒遇刺
希律	前37—前4	
	前27—公元14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圣殿重建	19	
犹地亚、撒玛利亚、以土买合并为一个罗马行省	6—41	
本丢·彼拉多	26—36	
耶稣受十字架刑	约30	
卡利古拉推行帝王崇拜而引发危机	37—41	卡利古拉皇帝
亚历山大城反犹暴动	38	

希律·阿格里帕	41—44	
	41—54	克劳狄皇帝
	54—68	尼禄皇帝
	62	使徒保罗逝世
亚历山大城犹太人遭屠杀；犹地亚叛乱开始；韦斯巴芗征服加利利	66	
	69—70	韦斯巴芗皇帝
提图斯征服耶路撒冷；圣殿被毁	70	
马萨达陷落；狮城圣殿关闭	73或74	

约雅斤早在公元前597年就被流放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帝国崩溃以前，尼布甲尼撒的继任者将他从囹圄中释放，并给予一定优待；在巴比伦，他定然成为来自犹大地的流亡贵族圈的核心人物。随着波斯帝国的崛起，许多在巴比伦的犹大地人也飞黄腾达，这群上层人士中的一些人跻身波斯宫廷权贵。这类人已经没什么动力返回新设立的波斯犹地亚省。巴比伦的犹大地人依然觉得与犹地亚人有历史、家族、文化和宗教的联系，他们也依旧是个独特的族群和宗教团体；但他们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亡者，因为他们自愿留在国外。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埃及。靠近阿斯旺的尼罗河中有一座小岛，名为象岛，岛上驻扎着一支雇佣军，由犹大地人组成，他们可能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就已到此；这个殖民地存在了200多年，和波斯的犹地亚省一直有联络。象岛犹大地人建造了一座圣殿，举行与耶路撒冷相同的献祭仪式，哪怕耶路撒冷的第一圣殿毁灭后，他们仍将献祭仪式维持了很久。他们也并非埃及唯一的一群犹大地人，在公元前587年犹大王国覆灭以后，有些犹大地人曾逃到埃及北部。

巴比伦和埃及的犹大地人的社群，可以看作是最早、最持久的流散社群（Diaspora communities），这个术语指生活在以色列地之外的犹太社群。伊拉克的犹太社群绵延不绝，一直维持到1951年；埃及的犹太社群虽然几度濒临消亡，但次次绝处逢生，不过现今似乎真要永久泯灭了。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才适合谈论今天所谓的犹太人。在历史上和

世界各地，这些人自认为彼此不仅相互联系，还与古代以色列人王国的子民有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族性、文化、智力传承还是宗教方面的。

《圣经》

《圣经》是希伯来语古籍的汇集。尽管想尽办法，我们仍然无法弄清这些书是何时又是如何被遴选、集结成一部权威正典的。我们只知道，到公元1世纪，所有今天组成《圣经》的书籍都被视作神圣的经书。在希伯来语中，《圣经》叫*Miqra*（“读物”）或*Kitve haqodesh*（“神圣的经书”）；有时又称*Tanakh*，此词由三个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犹太传统用这三个词分别代表《圣经》的三个部分：《托拉》（Torah，又称《摩西五经》），《先知书》（Nevi'im），《圣录》（Ketuvim，或《圣文集》）。

《托拉》讲述了古以色列人的故事，从亚伯拉罕迁居迦南地讲到摩西去世。其间，古以色列人下到埃及，受奴役，然后逃离，再在沙漠中流浪40年，最后抵达约旦河边，渡河重新进入迦南地。这一叙述还充当律法的框架，这些律法即十诫以及后来构成犹太宗教法基础的大量民事和宗教规定，将用来管理古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生活。它还详细描述了献祭仪式，到古以色列王国时期，这些仪式就成为民众的主要宗教仪式。

《先知书》部分包含两类不同的书籍。前四卷内容承接《托拉》的叙述，从古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迦南地开始，经过士师时代、扫罗建立君主制、大卫与所罗门执政、王国分裂，一直讲到第一圣殿毁灭和古以色列人在公元前587年丧失主权。《先知书》剩下的部分包含以色列众先知的言论，先知是祭司阶层以外的宗教领袖；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他们向民众布道，又告诫国王应谨记宗教责任，并为他们揭示政治事件的宗教含义。最著名的布道先知是以赛亚、耶利米、何西阿、阿摩司、以西结。最后几位布道先知（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活跃在从巴比伦之囚回到犹地亚的初期。

《圣经》第三部分内容驳杂，其大部分书籍出自波斯时代。这部分以《诗篇》起首，《诗篇》包含150首宗教诗歌，可能是作为圣殿仪式的一部分而用来吟唱的。《箴言》是关于宗教举止和道德品行的格言集。《约伯记》是探讨苦难问题的长诗，全诗以民间故事为框架，主人公约伯忍受苦难，最终蒙福。接下来是名为“五卷”（Megillot）的五部

短作：一卷是情诗（《雅歌》）；一卷是哀悼耶路撒冷毁灭的挽歌（《耶利米哀歌》）；一卷是对生命意义的沉思（《传道书》）；一卷是关于大卫王一位祖先的故事（《路得记》）；还有一卷是关于波斯宫廷阴谋的故事，这场阴谋差点让波斯犹太人灭族（《以斯帖记》）。《但以理书》包含一位在波斯的犹太朝臣在波斯所见的关于南国犹大人流亡和回归的异象；《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叙述了回归家园的故事（《尼希米记》实为公元前5世纪一位犹地亚省省长的个人回忆录），而《历代志》扼要重述了历任犹大王的故事。

在没有共同的政治框架、共同的语言或民族机构的情况下，怎样才能维持犹太身份？巴比伦犹太社群的领袖用一本书解决了这个问题。犹太宗教传统坚持认为，这本名为《托拉》的书（由《圣经》前五卷组成，“托拉”意为“教导”）是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的，但后来湮没无闻。而此时，巴比伦那些来自犹大地的长老将它重新颁布，并把学习它和遵行其中的律法作为这个民族的主要宗教责任。历史学家对这一过程的描述略有不同。据他们所说，《托拉》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巴比伦那些来自犹大地的长老，利用王国时期的古老文件，编纂出一部正式的民族史，以及法律、习俗和宗教实践的汇编，从而能够以宗教行为为基础重组民族认同，并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民族认同转化成一种宗教。这些变化留在犹太身份和犹太宗教上的烙印至今可见。

犹地亚只是耶路撒冷周围一片狭小地带。得到波斯皇帝授权后，设巴萨和另一位犹大王室后裔所罗巴伯率领返乡的人民，努力在犹地亚重建被毁的圣殿。早期的重建工作成就有限，因为犹地亚人必须与贫穷及连年歉收作斗争。在政治上，犹地亚仍然从属于更大的波斯撒玛利亚省，它就是从撒玛利亚省分割出来的，它争取独立的努力自然遭到撒玛利亚当局的敌视。第二圣殿最终在公元前515年建成，其规模比不上宏伟的所罗门圣殿（一些老辈人还记得它的模样），也没有赢得住在撒玛利亚的耶和华信徒的效忠。耶路撒冷的防御工事仍是一堆废墟。

虽然人们试着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这一工程直到皇帝批准尼希米接管后才完成。尼希米是亚达薛西一世的犹太朝臣，从公元前445年到公元前433年以后某个时间掌管犹地亚，此后又掌管过一段时期，但

为时稍短。作为领袖，尼希米效率高、意志强，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作为《圣经》的一卷留存至今，其中描述了他不得不面对撒玛利亚省省长参巴拉（他甚至派人暗杀过尼希米）和外约旦省省长多比雅的反对。在第二次掌权期间，尼希米致力于加强犹地亚省的各项宗教制度建设。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某个时刻，可能就在尼希米的任期内，另一位犹太官员以斯拉也从巴比伦来到犹地亚，波斯皇帝委托他把《托拉》立为该地区的法律。《圣经》的《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里保存的亚兰语文书中就有对以斯拉的委托书，还包含对一场动人庆典的描述。在这场庆典上，《托拉》在波斯皇帝的授权下第一次被正式公开诵读，并被作为犹地亚省的法律而颁布。这是犹太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至今都要在犹太会堂里每次诵读《托拉》的仪式上礼节性地再现。



犹地亚当局试图约束象岛犹太人的宗教活动，但似乎并没有采取措施关闭象岛圣殿，尽管它的存在有违《申命记》的律法（见第一章）。它一直维持到公元前410年，这时，一些埃及人军团开始反叛波斯人的统治，而犹太驻军继续效忠波斯人。象岛附近有座埃及公羊神克努姆（Khnum）的神庙，其祭司趁乱摧毁犹太圣殿，因为犹太人的动物献祭冒犯了他们的膜拜。镇压反叛后，波斯当局鉴于象岛圣殿历史悠久，允

许重建，但又不想触犯耶路撒冷当局和埃及祭司的敏感神经，遂规定只能在圣殿中献果蔬。圣殿得以重建，但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象岛上的犹太聚落却消失无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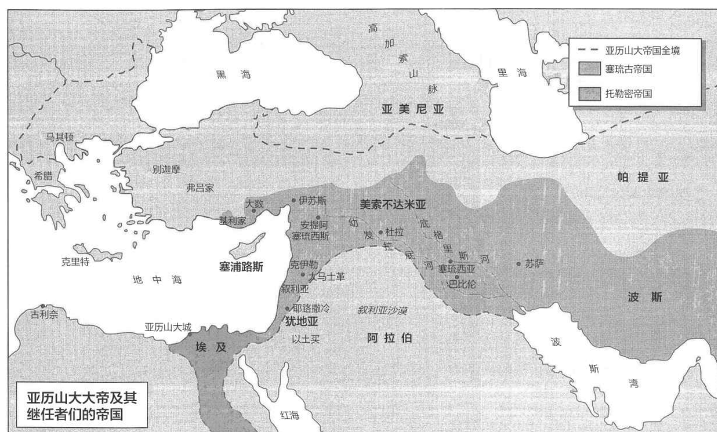
对历史学家来说，在波斯时期剩余的岁月里，犹地亚的历史一片黑暗。我们只知道犹地亚由大祭司和波斯任命的省长共同治理，奉行一种神权政体。尼希米去世约一个世纪后，亚历山大大帝到来，犹太史的轮廓才再次清晰。犹太人的命运也随之急剧变化。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首次进攻波斯帝国。11年后，33岁的他英年早逝，此时，他已征服波斯全境，包括犹地亚（公元前333年）和埃及。所有这些领土——几乎包括全部犹太人的流散地，都被希腊文化打上深深的烙印。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犹太人对希腊文化又爱又恨，连死命抗拒它的人也很难逃脱它的影响。在更广的范围里，犹太与希腊理想的相互影响将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特色主题。

在亚历山大统治期间，撒玛利亚城叛乱，作为惩罚，马其顿殖民者来此定居。为了在宗教上区别于马其顿异教徒定居者，本地居民（他们是古代北方以色列王国居民和公元前8世纪由亚述人引进的定居者的后代）在示剑（今天叫纳布卢斯［Nablus］）建造耶和华圣所。从此，这一宗教社群就叫撒玛利亚人，一直延续至今，但人数已大大缩减；《新约》故事中的“好撒玛利亚人”[1]，就反映出三个世纪后犹地亚民众对他们的轻蔑。

亚历山大一去世，他的帝国就被手下将领瓜分，犹太人分布在两个辖区：塞琉古得到伊朗东部领土、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建立塞琉古王朝，巴比伦流散社群的犹太人就生活在这个王朝中；托勒密建立托勒密王朝，统治着埃及及其境内的犹太人流散社群，直到公元前30年。包括犹地亚省在内的地中海东岸领土此时名为克伊勒-叙利亚，它夹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两大强权间，是兵家必争之地，就像在古代以色列列王统治时代一样。埃及一开始占得上风，从公元前301年起控制这里。埃及人统治了一个世纪，没有干涉犹太事务，而是让原先犹地亚的神权政体在大祭司和长老会的领导下继续运行。在这个世纪里，埃及犹太社

群迅速发展，尤其是新建的亚历山大城很快成为犹太人生活的中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士兵表现突出，延续了以前象岛驻军的军事传统。他们非常希腊化，以致在法律上被当作希腊人，换言之，他们和统治者同属一个社会阶级，而有别于埃及臣民。为了给这些希腊化的埃及犹太人提供便利，《托拉》在这一时期被译成希腊文。到公元前3世纪末，在流散地生活的犹太人可能比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多。



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继任者们的帝国

公元前198年，塞琉古王朝统治者安条克三世（“大帝”）将托勒密王朝赶出亚洲，夺得巴勒斯坦。安条克三世允许犹地亚继续作为半自治州存在。但在他的第二位继任者安条克四世“神显”统治期间（公元前175—前163年），犹地亚和希腊统治者的关系破裂。塞琉古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罗马的扩张，安条克三世为此已经蒙受了一次羞辱。财政吃紧致使塞琉古统治者洗劫臣民的神殿。神殿总是不错的财富来源，里面的祭器和装饰多为贵金属，此外，神殿向来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因而常常充当公款甚至私人储蓄的存放地。因此，塞琉古王朝打起犹地亚圣殿的主意，把它当作潜在的财源。

但是，安条克四世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不止于安条克觊觎耶路撒冷圣殿的财宝。安条克四世渴望用希腊文化统一臣民，此时希腊文化刚在中东各民族中兴起，其组成部分是希腊的语言、时尚、宗教活动，以及包括哲学和体育的教育体系。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将希腊文化带给犹地亚，让当地人对希腊文化的态度产生分歧。许多贵族，包括祭司阶层（他们在神权政体中属于统治阶级）在个人生活中采用希腊方式。有些人更进一步，渴望把民族宗教和文化现代化，甚至不惜将圣殿仪式希腊

化，并将那些按希腊标准衡量就显得怪异和原始的《托拉》律法废除。这些贵族和安条克有着共同利益，但和抵抗这些改变的犹地亚人格格不入。

犹地亚有位祭司，叫约书亚或耶孙[2]（当时，上层犹地亚人普遍同时拥有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名字，就像今天许多美国犹太人同时拥有希伯来语和英语名字一样），他向安条克四世行贿，要求获得大祭司一职，并许诺将犹地亚希腊化。正统的大祭司遂出逃，但仍遭暗杀；他的儿子逃到埃及，在那里的狮城（Leontopolis）建起一座圣殿，在随后几个世纪，这座圣殿一直是犹太人重要的献祭场所。

耶孙把体育馆引入耶路撒冷。这是典型的希腊设施，里面向异教神祇致敬的各种赛事都需要裸体参加（“体育馆”［gymnasium］一词来自希腊语“裸体”一词）。这些赛事带有宗教色彩，大大冒犯了耶和华信徒。此外，体育馆的裸体规定让奉行割礼的传统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了不显得土气或落后，许多犹地亚人放弃割礼，有的甚至不惜忍受痛苦的手术以恢复割礼前的原状。这样，引进体育馆成了把耶路撒冷变为希腊城市的第一步。

随后，耶孙的大祭司职位由梅涅劳斯接任。耶孙还只是行贿，梅涅劳斯居然卖掉圣殿中的礼器，还助纣为虐，协助安条克四世在公元前169年洗劫圣殿，甚至将圣殿外墙上的金叶剥走。至此，民众开始激烈反抗希腊文化的拥护者和塞琉古的统治。为了镇压反抗，安条克四世摧毁部分耶路撒冷，处决一批民众，并把城墙拆除。他在圣殿附近建起一座城堡，名为阿克拉（Akra），里面驻扎着塞琉古卫戍部队，此后25年，阿克拉城堡一直是犹地亚人仇视希腊统治的焦点。安条克四世还强制推行希腊化政策。《托拉》一度被波斯皇帝亚达薛西一世定为犹地亚人的法律，如今却被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废除。《托拉》经书被毁，割礼、安息日和犹太节日等典型的犹太宗教制度全面遭禁。异教祭坛遍地皆是，民众还被强迫吃猪肉，以此证明他们服从新法律和新膜拜。公元前167年12月，圣殿本身正式改作异教神祠，猪肉被献上祭坛。安条克四世又下令，让民众把他当成神崇拜。帝王崇拜是亚历山大引进的，近东地区希腊统治者治下的异教徒臣民不以为怪，但在信奉一神教的犹地亚人眼中，这简直是疯了，他们很快把安条克四世的尊号“神

显”（Epiphanes）谑称为“疯子”（Epimanes）。

安条克的举措标志着犹太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主题——犹太教作为受迫害的宗教这种观念——出现了。犹太人此前所经历的不幸，都还只是纯粹的政治后果，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个小族，居住地恰好是南面和东面列强的必争之地。他们的宗教虽然和异教徒邻居的宗教大相径庭，但也只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特色，尚未成为攻击对象。相反，安条克的举措，与其说针对的是他执政初期就已经控制的犹地亚省，不如说是针对犹地亚的宗教和文化。他像许多犹地亚人那样，决意让这种宗教和文化与他王国里的其他宗教和文化相协调。结果，诞生了第一批犹太殉教者，并引发了一场叛乱，他在该地区的控制力逐渐削弱。

叛乱由一个保守的乡村祭司家族发起，他们住在莫德因（Modein）村，领导人叫玛他提亚。他和五个儿子开展游击战，袭扰塞琉古部队，捣毁异教祭坛。玛他提亚的三子名为犹大，人称犹大·马卡比（“马卡比”为绰号，意为“锤子”），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犹大胜仗连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反抗者，到公元前164年12月，他攻进耶路撒冷，围住阿克拉城堡中遭人恨的守军，让古老的仪式在遭亵渎的圣殿中重新举行，恢复耶和华崇拜。光明节（Hanukkah）就是为纪念这一事件而设立的节日，整个犹太世界至今仍在庆祝。不过，犹地亚仍是塞琉古王国的一个省。

公元前162年，安条克的继任者正式废除他的政策，将《托拉》恢复为犹地亚的法律，又任命阿耳基慕（Alcimus）为新的大祭司。此举终结了犹地亚拥护希腊文化的派系，犹大的叛乱本该到此为止。但是，犹大反对对阿耳基慕的任命，认为他在安条克实施迫害期间的行为，已构成宗教上的污点。于是，他再次进军，这次不是针对异教徒，而是针对犹地亚人中阿尔基慕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曾和犹大并肩共同对抗安条克的军队。塞琉古新任国王底米丢（Demetrius）一世派出将领尼迦挪（Nicanor）迎战，但犹大获胜。公元前161年，犹大再次获胜，进入耶路撒冷，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塞琉古王国日益衰败，和其他臣服于该王朝的小国首脑一样，犹大也转而投靠罗马，罗马元老院批准犹地亚享有政治自由。自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征服犹大王国以来，犹地亚人第一次获得承认，可以独立。然而，罗马从此也毫不含糊地介入了犹地

亚事务。

公元前160年，犹大被杀，他的弟弟约拿单成为家族首领。8年后，塞琉古王国的篡位者任命他为大祭司，以回报他派兵支持这位篡位者对抗底米丢一世。这一任命改变了马卡比家族统治的性质：他们当初发动起义，是为了反抗塞琉古王朝和犹地亚统治阶级的希腊化，然而，约拿单却经由塞琉古王朝的任命而掌权，并像其他希腊化的专制小君主那样行事，即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战斗，并在一众塞琉古王位的觊觎者之间斡旋。他的哥哥兼继承人西缅停止向塞琉古王朝进贡，并攻下阿克拉城堡。公元前140年，西缅在一次全民集会中宣告成为大祭司，兼任族长[3]，由此创立一个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7年，史称哈斯摩尼王朝。

只要哈斯摩尼王朝的存在有利于罗马，它就可以在塞琉古王朝的漫长衰落中繁荣。它最辉煌的成就由这几位君主取得：约翰·许尔堪（公元前134—前104年在位）、亚利多布一世（公元前104—前103年在位）和亚历山大·雅拿（公元前103—前76年在位）。许尔堪扩张领土，向北占领加利利地区，摧毁撒玛利亚人的圣殿，向南占领以土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内盖夫地区），强迫当地人犹太化。亚利多布在传统的大祭司头衔之外，又接受了国王的头衔；雅拿则完成对沿海地带的征服，还将领土扩张到外约旦。在此过程中，这个统治家族的性质彻底改变：从祭司出身的致力于推翻希腊化统治阶级的反抗者，演变成一连串希腊化的专制君主。

有些人对这种发展变化做出反应，他们退出主流社会，宣布和圣殿膜拜断绝关系，因为他们认为哈斯摩尼大祭司的行为亵渎了圣殿。此类宗教社群出现在这一地区的好些地方；最有名的是爱色尼派的社群，这个半隐修的组织起源于公元前2世纪，位于死海边的荒野。大部分学者认为，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就来自这个社群的图书馆。

法利赛派是另一个不时反对哈斯摩尼王朝的团体。他们似乎源自非祭司阶层，渴望恪守仪式的纯洁和宗教的正直，因此有时会和当局起冲突。他们的领导层不像祭司那样负责膜拜，而是精通专门的宗教律法和学问，这类宗教传统是对《托拉》的补充，他们称之为“口传托拉”。他

们强调，人人都有义务奉行日益复杂和细碎的宗教实践，而不能仅仅靠祭司阶层代表民众举行的献祭来间接履行民族的宗教责任。到公元前1世纪，他们当中也包括一些祭司和贵族。约翰·许尔堪和亚历山大·雅拿有时会用暴力手段镇压法利赛派，但是雅拿的遗孀兼继任者撒罗米·亚历山德拉王后（公元前76—前67年在位）似乎受到法利赛派的影响，在她执政期间，他们甚至可能握有相当权力。一些学者认为，今天犹太教的主导形式，即拉比犹太教，就是以法利赛派的教导为核心而最终发展起来的。

死海古卷

从1947年开始，死海西面的旷野中发现大量写本和写本残片。其中有些是《圣经》和其他已知古书的残卷；还有一些是前所未知著作的残篇。大多数残片是用希伯来语写在羊皮纸或纸草上的，少数以亚兰语和希腊语写就。它们大部分应该写在和罗马人的战争（公元66—70年）之前。由于没有其他同样古老的希伯来语写本存世，也由于它包含前所未有的材料，死海古卷对于我们了解第二圣殿晚期的犹太教极其重要。

死海西北角的库姆兰地区有些山洞，里面发现的死海古卷为数最多。虽然有些学者持异议，但多数人认为，在犹地亚陷落前一两个世纪，住在这里的某宗教社群的成员将古卷放进库姆兰的山洞，要么是作为档案留存，要么是想在反罗马的战争中妥善保管。许多学者认为，该社群是爱色尼派的一个定居点。该社群的法规和信条在《会规手册》《大马士革法规》《感恩诗篇》《战争卷》等文书中得到阐述。我们由此知道，这个社群的成员不仅把耶路撒冷祭司阶层的领袖视作篡位者，还斥责犹地亚的哈斯摩尼王朝的诸王，但他们尊崇更早的大祭司家族，特别是其中一位神秘的殉教者“公义教师”。他们宣称拥有特别的神启，知晓如何真正解释《托拉》，并拥有自己的宗教历法。他们认为，自己正生活在一场天崩地裂的战争的边缘，作战一方是他们自己即光明之子，另一方是他们的对手即黑暗之子，这场战争将导向世界末日，让他们重获权力。如果他们确实是爱色尼派，那么他们当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社群中，奉行财产公有，严守关于洁净的律法以致把外来者统统当作不洁，有些人甚至终生未婚。他们的一些教义似乎和早期基督教教义有渊源。

死海古卷支离破碎，再加上相关学者间的学术竞争所引发的问题，致使其出版和解读举步维艰、旷日持久。直到最近，人们还在为这项工作的拖沓而争论不休，但需要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已经有大量死海古卷被出版和译成英文，很容易获得。未出版的古卷中，大部分目前也发行了临时性质的版本。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团体，名为撒都该派，但我们知之甚少。他们看

来主要包括见多识广、属于贵族的祭司阶层，而祭司是前文提到的两个团体反对的对象。

从犹大·马卡比时代开始，罗马人成为犹地亚政局的幕后推手；撒罗米去世后，朝纲混乱，罗马人便直接插手。庞培大举进攻整个近东，占领耶路撒冷，将犹地亚变成罗马的属国，剥夺许尔堪二世（公元前63—前40年在位）的国王头衔（但仍然让他当大祭司，所以他名义上仍是犹太人的领袖），又削减他的领地。公元前37年，罗马人干脆废黜哈斯摩尼王朝，转而立希律（公元前37—前4年在位）为犹地亚王。

希律的统治标志着犹地亚历史一个有趣的转折，因为他连犹地亚人后裔都不是。他的祖先是以土买人，本居住在犹地亚以南的土地上，约翰·许尔堪后来征服和同化了以土买。希律的父亲在哈斯摩尼王朝供职，后被尤利乌斯·凯撒任命为犹地亚摄政官。希律有外族血统，不能担任大祭司；大多数法利赛派从不承认他是合法统治者，双方关系一直紧张。他渴望赢得臣民的支持，为此摆出尊重犹地亚的文化和宗教的姿态，但实则完全效忠于罗马人的利益，热衷于希腊文化。他能够上位，是因为一批批罗马将军和皇帝都发现，他是冷酷无情的操纵者、才华横溢的外交家和顾全大局的人，这些品质可堪大用。

希律的政治生涯与罗马史上一个重大事件——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冲突——有交集。希律支持安东尼。但安东尼的情人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她施计离间他和安东尼，企图让巴勒斯坦脱离希律的统治，重新划归她管辖。公元前31年，屋大维通过阿克兴（Actium）战役打败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希律反而赢得屋大维的信任，尽管他一度效忠于屋大维的死对头，但他还是设法让屋大维相信，他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当上奥古斯都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后，屋大维让希律成为罗马在东方最有权势的诸侯。希律大举扩张，其领地几乎跟约翰·许尔堪和雅拿时期的领地一样大，还包括许多非犹太人口。他随心所欲地重组国家行政体系，削弱犹太教公会（这是犹地亚的最高审议机构）的权力，限制大祭司的任期，并起用一支只效忠于他个人的外籍雇佣军。

希律和他的王国一起飞黄腾达。他采取措施扩大灌溉、镇压匪盗，

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作为统治者，他世故老成、见多识广，把希腊文人和学者迎到犹地亚。他兴建引水渠、剧场和其他公共建筑，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项目改善国家形象。他还营造新城市，在古代撒玛利亚城原址上新建的塞巴思特（Sebaste）和地中海边上的凯撒利亚尤其受人瞩目；他建造新要塞，如耶路撒冷的安东尼亚要塞（the Antonia）、耶路撒冷南缘的希律堡（Herodion）、建在悬崖上可俯瞰死海的马萨达（Masada）；他还为自己建起富丽堂皇的宫殿。他最著名的工程是重修圣殿，在大规模拓宽原址的基础上，宏伟的宗教建筑群拔地而起，彻底替代之前已历经四百多年的朴素建筑。这种对民族宗教的敬意，就连希律的诋毁者也点头称道。事实上，希律重修圣殿，部分目的恐怕就是要赢得保守的犹太臣民的效忠。今天耶路撒冷的哭墙（也称西墙），正是当年希律圣殿的挡土墙的残留。

不过，这些成就都有代价。出于病态的猜忌，对任何能威胁到他权力的哈斯摩尼家族成员，希律统统赶尽杀绝，包括他的妻子玛利安妮（Mariamne）和三个儿子——在这些公案中，他的怀疑有时完全是合理的。然而，他又对自己犯下的恶行感到愧疚和抑郁。他的宫廷仿佛颓废的中心，聚集着残暴、阴谋和背叛。即便如此，希律仍是整个犹太史上成就最大、最丰富多彩的人物之一，完全配得上他的俗称：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

这一称号还用来区别那些同名家族成员（故又有“大希律”的意思），他死后，他的王国被罗马人分割成几部分，同名家族成员成为这几部分的统治者。其中一位叫希律·安提帕，又叫分封王希律（Herod the Tetrach，公元前4—公元39年在位），统治着加利利地区和一部分外约旦；他就是杀害施洗约翰的那位希律王，据说是受他妻子希罗底和继女撒罗米[4]的挑唆。

犹地亚和罗马帝国的关系从此每况愈下，最终引发公元66年的犹太人叛乱。首先是在公元6年，犹地亚被重组为罗马行省，由多位异域出生的总督（procurators）先后执掌。他们大多腐败无能，从而激化了犹太人民和罗马当局的紧张关系。其中本丢·彼拉多最有名，他在任期内（26—36年）将耶稣钉上十字架。此事对日后的世界史至关重要，更别提对后来犹太史的影响了，但在当时，它只是众多反映罗马残暴统治犹

地亚的事件之一。彼拉多曾下令将象征罗马帝国的鹰徽加在军团旗帜上，就引发过更大的骚乱。多年来，颐指气使的罗马官员、苛捐杂税、敌对的罗马军队和军队中无处不在的异教仪式，都让犹太人的怨恨日益加深。卡利古拉皇帝在位期间（37—41年），怨恨差点酿成叛乱，卡利古拉要求人们把他当作神崇拜，并下令在耶路撒冷圣殿中竖立他的金像。幸亏疯狂的皇帝很快一命呜呼，动乱才得以平息。

在卡利古拉的继任者克劳狄治下，情况暂时好转，他扶植大希律的孙子希律·阿格里帕，让他担任这一地区北部的统治者，后来又当上犹地亚王（41—44年）。希律·阿格里帕和皇帝私交甚笃，能得到皇帝准许，在这个多事之地便宜行事；与此同时，他比大希律更同情犹地亚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因此更受臣民信任。法利赛派视他为盟友，不过非犹太人臣民不他，当时人数还不多的耶稣的追随者尤其厌恶他。

但犹地亚本土仍归罗马总督治理，他们让罗马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形势日趋严峻。匕首党（*Sicarii*）现身城市街头，用匕首刺杀涉嫌勾结罗马统治的人。在凯撒利亚（总督驻地），犹太人和希腊人爆发冲突，而平民与士兵间的矛盾更是不断。最后一任总督是弗洛鲁斯，他大肆敛财，甚至企图侵吞部分圣殿财宝，酝酿已久的叛乱便无法控制了。公元66年，祭司不再代表罗马献祭，群众起义随即爆发，很快演变成罗马史上著名的“犹太战争”。

战争持续了四年，部分是因为罗马人猝不及防，部分是因为罗马将领韦斯巴芗在公元68年尼禄皇帝死后为了争夺帝位而离开战场。在犹太战争间歇期，犹地亚不同的犹太派别出现内讧，导致最终的溃败。其中，奋锐党人（Zealots）特别棘手，这些人是暴力革命者，会攻击贵族和其他在他们看来不积极作战的团队。公元69年，韦斯巴芗皇位坐稳后，派儿子提图斯（Titus）完成对犹地亚的征服。罗马军队在公元70年攻破耶路撒冷，焚毁大希律建的圣殿。一些要塞多挺了几年；匕首党被围困在马萨达要塞内，为避免落入罗马人手中，他们于公元73或74年集体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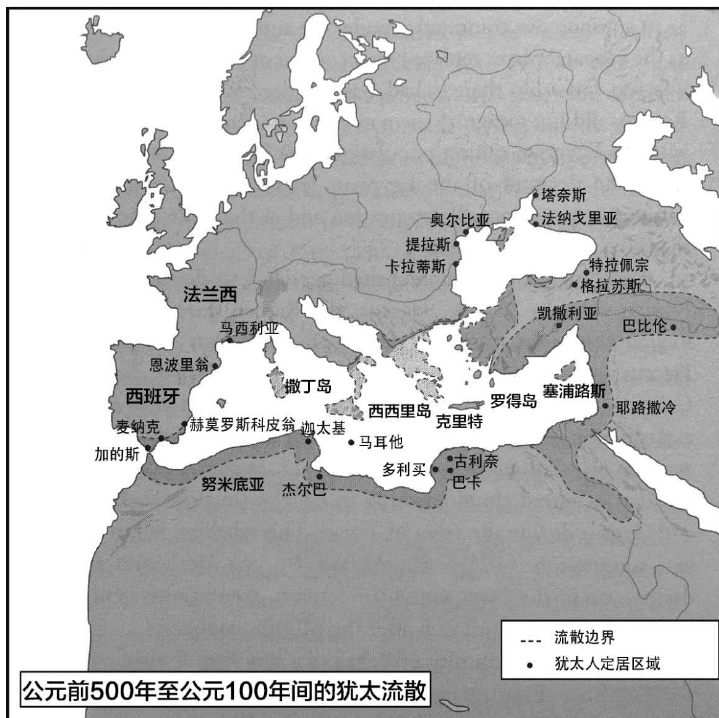
攻占耶路撒冷是韦斯巴芗登基以来的首场军事大捷，他举行盛大的凯旋庆祝。他发行纪念币，又将犹地亚俘虏和劫自圣殿的礼器作为战利

品游街示众。罗马广场上竖起一座凯旋拱门，纪念此战；拱门内侧的浮雕上刻画着劫自圣殿的七枝烛台。这座拱门至今矗立在广场遗址上，供游人驻足怀古。

罗马人征服埃及（公元前30年）后，希腊化的埃及犹太人仍然繁衍兴盛。他们享有自治社群的地位，由一位名为“族长”的领袖管理，这一职位后来由长老会取代。但是，他们的待遇不如托勒密王朝时期好，因为罗马人不承认他们是希腊人，而把他们归入埃及臣民。埃及犹太人既要求被承认为自治的社群组织，又要求享有全部公民权利，这在罗马人看来实在太放肆了。

因此，埃及犹太人的地位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每况愈下。公元38年，罗马的埃及总督弗拉库斯煽动暴民反对他们。在卡利古拉皇帝将弗拉库斯撤职，并（因为其他原因）处死后，暴乱虽然平息，但犹太人不满意，直到卡利古拉遇刺（公元41年），他们自己又发动了一场暴乱后才罢休。公元66年，他们再度起事。公元115—117年，正值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他们发动最后的暴乱，这也是同时发生在古利奈（Cyrene，位于今利比亚）和塞浦路斯的犹太人起义的一部分。这场叛乱引起对亚历山大城犹太社群的暴力镇压，当地著名的犹太会堂被毁。埃及犹太社群从此一蹶不振，哪怕到了穆斯林征服埃及后很久都没见起色。

巴比伦犹太社群却在帕提亚帝国[5]的统治下繁荣昌盛，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帕提亚帝国从塞琉古王国手中夺得对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罗马人接管巴勒斯坦以后，随着罗马人在那里的统治越来越暴虐，东部的犹太人日益忠于帕提亚，它当时足以和罗马分庭抗礼。作为回报，帕提亚人优待犹太人，像从前的波斯人那样赋予他们自治权。帕提亚犹太人开始兴旺，逐渐从农业生产生活转向城市商业生活。



帕提亚的犹太人自治可能已经由一位叫作“流散领袖”（exilarch）[6]的官员负责管理，虽然该职位要晚些时候才广为人知。根据传统，只有发端于大卫的犹大王朝的后裔才能担任此职。上文提到，犹大王约雅斤（于公元前597年遭放逐）死于巴比伦。在那里，他起初身陷囹圄，后来获释，享受王室待遇。对于受大卫家族的后裔管理，巴比伦流散社群感到欣慰和自豪。这一职位将历经帕提亚帝国、萨珊帝国和几个世纪的伊斯兰统治，直到公元11世纪才消失。

到公元70年，犹太人再也不仅仅是一个中东小国的居民。甚至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如上文所见，巴比伦和埃及就已经出现重要的流散社群。而到公元70年，重要的犹太社群已遍布中东，罗马城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罗马西部各省中也分布着犹太社群。犹太人仍然自视为古代犹大王国居民的后代，罗马人依然视他们为犹地亚人。他们每年从世界各地向耶路撒冷缴纳半个谢克尔[7]的圣殿税，而一旦犹地亚的犹太人叛乱，身在流散地的他们也会受到打击报复，不得不忍受反对犹地亚的暴乱。这样，巴勒斯坦在许多方面依然构成犹太身份的核心，但与此同时，犹太教正在重新定义自己，正在变成一种可以带往世界各地的宗教。



发现于罗马晚期古城贝特谢安的七枝烛台和其他圣殿物品。照片，版权方为泽夫·拉多万。

(1) 见《路加福音》20:25-37。——校者注

(2) 约书亚（Joshua）是希伯来语名字，耶孙（Jason）是希腊语名字。——校者注

(3) “族长”（ethnarch）这个头衔来自希腊文。——校者注

(4) 此“撒罗米”又常常译作“莎乐美”。——校者注

(5) 又译作“安息帝国”。——校者注

(6) “流散领袖”的原文是亚兰语Resh Galutha。——校者注

(7) 谢克尔（shekel）是古希伯来和现代以色列国的货币单位。——校者注

第三章　罗马治下的巴勒斯坦和萨珊治下的巴比伦
70—632年

罗马人在公元70年摧毁圣殿，但没有彻底毁掉犹地亚，也没有从耶路撒冷驱逐犹太人，不过，他们的手段确实严酷。不少犹太人被捕，另一些人逃离，还有许多人因为土地遭到没收而陷入赤贫。犹地亚正式变成罗马一个行省。犹地亚人被强行征收一项惩罚性的犹太税（*fiscus Judaicus*）：每年必须向罗马城卡皮托林山丘上的朱庇特神庙支付两个德拉克马，以取代以前每年向耶路撒冷圣殿贡奉的半个谢克尔。不过，公元前587年那样的大规模驱逐，这次倒没有发生，受罪的主要是贵族阶层。日常生活一如既往。

另一方面，民族宗教却因这次灾难而深受影响，永久改变了。随着犹地亚膜拜中心的消失，祭司阶层消亡了，祭司以前不仅是统治者，还是宗教领袖。祭司阶层一旦瓦解，就为新兴的平民宗教领袖施展拳脚腾出空间，后者是第二章提到的非祭司阶层的精研宗教传统和律法的专家，如今叫“拉比”（意为“夫子”或“教师”）。他们肩负起重建这个民族的宗教生活的责任。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埃及犹太人起义	115—117	
	117—138	哈德良皇帝
巴尔·科赫巴起义	132—135	
哈德良迫害犹太人	135—138	
犹太族长犹大编纂《密释纳》	约200	
犹太人成为罗马公民	212	
拉夫抵达巴比伦	219	
	226	波斯萨珊王朝开始
	306—337	君士坦丁一世
	313	米兰敕令宽容基督教
	354—430	圣奥古斯丁

	360—363	叛教者尤利安试图逆转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
《巴勒斯坦塔木德》成书	约380	
犹太族长制遭废除	429	
	476	西罗马帝国灭亡
《巴比伦塔木德》成书	约499	
查士丁尼皇帝干涉犹太信仰	553	
	590—604	教宗格里高利一世
波斯人短期占领巴勒斯坦	614—617	

有个传说解释了宗教领导权从祭司向拉比的转移这一现象。约哈南·本·扎卡伊是当时最重要的拉比，他对抵抗罗马的战争持反对态度。罗马人围困耶路撒冷时，他佯装死亡，让门徒把他装进棺材抬出城（罗马人允许困在城里的人出城埋葬死者）。然后，他来到韦斯巴芗面前，后者对他的胆识、智慧和反战态度印象深刻，授权他在亚姆纳（Jamnia，这是希腊语，此地希伯来语叫亚夫内［*Yavne*］）建立一所学院。这位拉比分得清轻重缓急：城市、圣殿膜拜和政治主权皆可有可无，体现在《托拉》和不断增加的宗教律法中的宗教传统则必须保证。约哈南·本·扎卡伊及其同道由此迈出重要一步，开始将犹太教重组为拉比犹太教，这是犹太教传播最广泛的形式，至今不衰。拉比犹太教专注于不断学习《托拉》和与之相关的口述传统，要求信徒一丝不苟地奉行教规，这些教规又被理解为一套律法体系。拉比们将学习《托拉》置于犹太宗教生活的中心，从而在无意中为犹太文化日后专注于各种智力活动奠定了基础。

犹太会堂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堪称犹太人生活中有特色的机构。“会堂”（synagogue）一词源自希腊语，意思是“集会”；作为集会场所，犹太会堂早在圣殿被毁前就遍布各处，当时可能用于某些宗教仪式（尤其是巴勒斯坦以外地区），如祈祷。但圣殿被毁后，随着集体祈祷仪式开始定期举行，随着诵读和解释《托拉》日益在公共宗教中发挥重要作用，犹太会堂逐渐成为主要的公共宗教机构。圣殿被毁将公共崇拜去中心化，有助于拉比将宗教生活的责任交给每个人。中央宗教机构被毁是创伤性事件，但从创伤中恢复是可能的，因为延续宗教的基础已经找到。

第二章曾提及115—117年流散地犹太人的起义，犹地亚人倒没有受此影响，但罗马占领后的暴虐和农民的贫困所引起的紧张情绪在发酵，并在第二次大规模犹地亚人战争中爆发。战争导火索是哈德良皇帝（117—138年在位）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哈德良在帝国全境重建了众多神庙和城市（包括太巴列和塞弗里斯［Sepphoris］的神庙），他要把耶路撒冷变为罗马城市，献给朱庇特，城名改成伊利亚·卡皮托林（Aelia Capitolina）[(1)]。这种亵渎古都的做法让犹太人民忍无可忍。

这场起义于132年爆发，要比66—70年那次战争更有组织性，而且今非昔比，这次连拉比都支持，比如深受爱戴的阿奇瓦拉比。起义领袖是西蒙·巴尔·科西巴，他当时很可能被当成弥赛亚，因为他自称“以色列的亲王（ha-Nasi）”，还发行带有“以色列救赎元年”之类铭文的钱币。他以巴尔·科赫巴的名字广为人知，这个名字意思是“星之子”（犹太传统赋予这个典出《托拉》的短语以弥赛亚的解释），他举手投足也一如古代的犹太君王和军事领袖。可是，光靠巴尔·科赫巴颐指气使的个性、他的受人拥戴和著名拉比的支持，还不足以制胜。他于135年被杀，手下残兵败将则在贝塔尔（Bethar）和隐基底（Ein　　Gedi）被罗马军队围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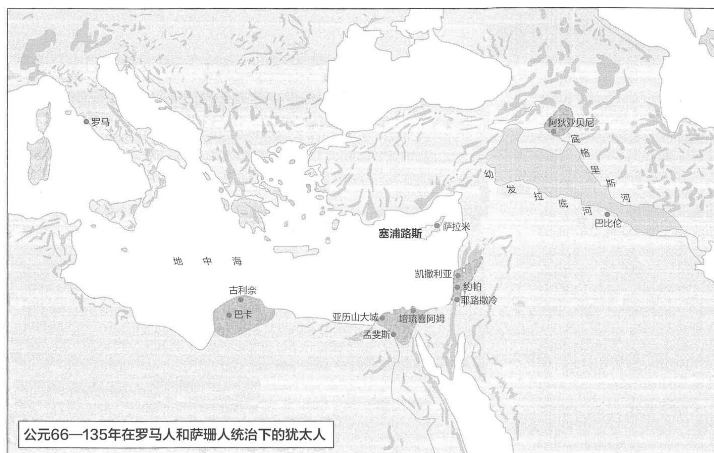
罗马人对第一次起义表现得尚属克制，这一次却把新仇旧恨统统算在这个不幸的行省上。他们迁走犹地亚的所有犹太人口，用非犹太人取而代之。许多犹太人被遣送到北方的加利利，其余的被当作奴隶卖掉；从犹地亚流出大量战俘，多到据说让奴隶的市价跌到和马差不多。耶路撒冷沦为彻头彻尾的异教城市，哈德良的塑像矗立其间，市中心可能还建起朱庇特神庙，甚至不让犹太人进城。割礼被法律禁止，并且传统的观点认为公开传授《托拉》和任命拉比在当时也是非法之举。犹地亚行省的名称改作叙利亚-巴勒斯坦，这样，源自祖先所在的犹大支派的地名，就被源自犹大支派的宿敌非利士人的地名取代，尽管非利士人老早就消失了。至此，罗马人用尽一切手段，将犹地亚人及其宗教从这一地区抹去。

这些措施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许多人纷纷逃离，让叙利亚、小亚细亚和罗马的犹太人口迅速膨胀（他们在罗马的地下墓穴现在仍可参观），甚至连西班牙、高卢和莱茵兰[(2)]的小规模犹太人口也得以增长；

还有些人干脆离弃整个罗马领土，加入帕提亚帝国控制下的巴比伦地区的犹太社群，这里未受起义影响。对拉比活动的禁令致使一批殉教者出现。有些拉比，比如阿奇瓦，不顾禁令，坚持布道，故而被捕入狱，惨遭处决；犹太传统常常提到哈德良时期的十位殉教者，视之为犹太教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在犹太民间传说中，哈德良是近乎恶魔般的存在，堪与安条克四世和提图斯比肩。

行省起义平定以后，各类宗教限制在哈德良的后继者治下逐渐松弛，罗马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在2世纪最终达成某种妥协。罗马要求犹太人管好他们中的极端分子，阻止暴力反抗的爆发。作为回报，犹太教被承认为“特许宗教”（permitted religion）[3]，犹太人还不用参加皇帝崇拜和其他涉及异教仪俗的市民义务。后几任皇帝放宽了割礼禁令，但只对犹太人放宽，仍禁止非犹太人行割礼，这相当于禁止非犹太人皈依犹太教（在2世纪后期，皈依被明确定为非法；就是从这时开始，犹太教形成了日后不大愿意接受皈依者的传统）。由于通货膨胀，两个德拉克马的犹太税的负担大大减轻。最重要的是，罗马人允许犹太人创建自治机构。

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不久，在加利利召开了拉比大会，加利利此时已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的中心，成立了一个有审议权和立法权的中枢机构“犹太教公会”（Sanhedrin），它与圣殿被毁前就有的类似机构同名，由名为“犹太族长”（patriarch）[4]的官员领导，这一头衔也是圣殿被毁前就有的。犹太族长须是希列的后代，希列是圣殿被毁前一个世纪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也像巴比伦的流散领袖一样，据说是大卫王的后裔。希列的后代富有而杰出，早在圣殿被毁前的一代人中就已当权，后来又执掌亚姆纳的学院。在2世纪期间，犹太族长制（patriarchate）先赢得犹太人的承认，然后罗马人又承认这是犹太人的中枢政治制度。犹太族长及其管理团队制定法律、征收税赋、任命法官和其他公共官员，并且规范宗教实践尤其是宗教历法。随着犹太族长制生根成熟，罗马人逐渐允许犹太人享有更多的自治，而拉比也渐渐配合他们原先仇恨的罗马当局。犹太族长一职声誉日隆，到4世纪，犹太族长享受罗马元老的待遇，并向罗马帝国全境的犹太人征税。



公元66—135年在罗马人和萨珊人统治下的犹太人

一群拉比组成犹太人生活的中枢组织，获得政府承认，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拉比犹太教由此向永远成为犹太教的主导形式迈出重要一步。这一进程的里程碑出现在2世纪末，犹太族长拉比犹大编定和颁布《密释纳》，此书很快成为拉比犹太教的核心教科书，一直沿用至今。《密释纳》是一部律法集成之作，不仅涵盖当时拉比司法能力所及的每个领域（比如宗教礼法、商业贸易、财产、继承、法律程序和侵权行为），还涉及一些已经失效的领域（比如与圣殿有关的律法）。自从编定以来，《密释纳》就是拉比学术的基础文本和组织原则，尽管在现代，拉比在大部分这些领域中的司法权已经无效。

犹太人和罗马人达成妥协。巴勒斯坦犹太人此时受到的待遇，很像这个大帝国里的其他小民族，只不过他们无须遵守异教礼俗。和其他臣民一样，他们于212年被卡拉卡拉皇帝赐予罗马公民权。在3世纪，巴勒斯坦犹太人经受的种种困苦，倒不是因为犹地亚和罗马以往的相互敌视，而是由于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经济政治的整体衰弱。巴勒斯坦变得一贫如洗，人口持续减少。

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的巴比伦犹太人却过得还不错。公元226年，萨珊帝国取代文化多样和政治涣散的帕提亚帝国，巴比伦犹太人遭受些许迫害，失去自治权；新政权在统治伊始采取措施，推广琐罗亚斯德教，抑制其臣民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多样性。巴比伦犹太人一度觉得，连罗马人的统治都比波斯人的可取。但到沙普尔一世时期（241—272年），宗教政策放宽，旧的关系得以恢复：波斯统治者允许犹太人在流

散领袖的领导下拥有相当的自治权，而巴比伦犹太人在支持萨珊对抗罗马方面也是可信赖的，因为罗马已是萨珊人的宿敌。虽然巴比伦犹太人从未遭到罗马军团的镇压，但他们依然忠于犹地亚犹太人，怀有强烈的历史认同感。

在进入3世纪以前，巴比伦犹太人一直把巴勒斯坦的拉比视为宗教导师，巴勒斯坦的犹太族长被奉为最高宗教权威，甚至在流散领袖控制的地区，情况也一样。犹太族长实施权威的一条途径是控制宗教历法，他每年都会重新制订宗教历法，并通告流散社群。在哈德良迫害时期，许多学者逃离巴勒斯坦，巴比伦学院的地位上升，但巴比伦能够成为宗教研究中心，要归功于两位3世纪的拉比：一位是撒母耳，他是富裕的巴比伦学者，和皇帝沙普尔一世私交甚笃；另一位是拉夫（Rav），他原本是巴勒斯坦的拉比，是犹太族长拉比犹大的门徒，于219年抵达巴比伦。正是拉夫把《密释纳》介绍给巴比伦犹太人。拉夫在苏拉（Sura）创办学院；撒母耳则在尼哈地亚（Nehardea）创办学院，但此镇后来遭毁，学院迁至蓬贝迪塔（Pumbeditha），从此以蓬贝迪塔学院之名著称。这两所学院很快成为衰落中的巴勒斯坦诸学院的竞争对手，两者之间也互相竞争。作为犹太智力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它们一直存在到11世纪。

犹太人和罗马帝国在3世纪达成的均衡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一世执政时期（306—337年），他个人接受基督教，并启动了把它变成罗马帝国国教的进程，从而改变了西方历史的进程，犹太历史的进程也随之改变。作为犹太人的一个教派，或者说作为犹太教内部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宗教运动，早期基督教只获得有限的成功，因为拉比们与它不共戴天，而拉比们在罗马人治下拥有管理犹太事务的权威。但是，作为一场向罗马帝国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其他地方的异教徒传教的运动，基督教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调整自身以迎合非犹地亚的异教徒的过程中，基督教产生了根本变化。直到此时，犹太教仍然只是一个有着特定历史的特定民族的宗教（先后历经过君主统治、巴比伦流放、回归和重建、罗马占领、圣殿被毁），怀有特定的民族抱负（恢复君主统治和重新成为独立的民族）。基督教却建起一个超越民族范畴的社群，关注的是共同的信仰，而非共

同的历史和得到律法认可的生活方式。这样，基督教就把借助一位君王重建民族的犹太理念转变成通过一位救世主来实现个人救赎的观念，它还废除了几乎所有成为犹太教最显著特点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不过，基督教仍保留了犹太一神论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让许多开明的异教徒困惑不已），拒绝承认所有其他宗教的合法性，包括犹太教的合法性，虽说其一神论的源头就出自犹太教。基督教用三个世纪的时间成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帝国的国教，这里面的故事虽然引人入胜，却不是犹太史的一部分，但其结果却至今塑造着犹太史。

从基督教兴起到君士坦丁统治的这段时间中，可以找到日后犹太-基督两教关系的根源。在公元1世纪，不再信仰希腊众神和罗马异教的人，在罗马帝国比比皆是，他们转而从东方的外来宗教中寻求启示。这些人没有放弃异教徒身份，但却把外来神祇及其仪式的某些成分吸收进自己的宗教生活，例如波斯的密特拉神、埃及的伊希斯神，或者弗里吉亚的西布莉（Cybele）神。同样，犹太教的传统形式及其基督教变体形式，也在东方各省甚至罗马城一些上流社会的成员中找到追随者。由于加入犹太教需要接受痛苦的割礼，也由于其貌似任性的各项禁令，罗马人很少彻底皈依犹太教，不过许多人采纳了犹太教的部分习俗，比如在安息日点蜡烛、出席犹太会堂的仪式，以及庆祝某些犹太节日，就像他们也会庆祝其他宗教的节日那样。这类人叫“畏神者”（God fearers），有时会遭到世故的罗马人嘲笑。但是，犹太教的传教活动也曾取得一定成功。最显著的例子来自小王国阿狄亚贝尼（Adiabene），它位于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36—60年统治这里的国王皈依了犹太教，此人还向耶路撒冷的圣殿慷慨解囊。

早在使徒保罗（卒于公元62年）的领导下，基督教就宣布废止犹太教的仪式，从而扫除给皈依造成的巨大障碍，使基督教在和传统犹太教争取皈依者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为了证明这种废止合情合理，保罗宣称，巴勒斯坦和流散地的犹太人并非以色列宗教的真正传人。他宣称，由耶稣信徒组成的精神社群才是“真正的以色列”。这样，保罗既占用了犹太教依靠其悠久历史而拥有的权威，又割裂了犹太教和一段特定民族历史及生活方式的关联。“真正的以色列”不再是宗教仪式独特、民族抱负无望的犹地亚省的人民，而是基督徒所构成的跨民族社群。

基督教运用两种辩护技巧来支持其主张。一种是从基督论的（Christological）角度阐释经文，即用希伯来语《圣经》论证基督教教义真实不虚。这种方法专为和犹太人辩论而制定，但也能吸引已经对犹太教感兴趣的异教徒。另一种技巧是诋毁犹太教，利用并扩大既有的反犹观念，这些观念源自希腊化时代，后来又被信奉异教的罗马人进一步发展。

《塔木德》、米德拉什和皮尤特

在拜占庭和萨珊时期，巴勒斯坦与巴比伦的犹太智力中心的主要文学创作是《塔木德》、米德拉什和皮尤特。

自中世纪以降，《塔木德》就是传统犹太人研习和献身的主要对象。这部巨著汇编了律法辩论、民间故事、奇闻轶事和谚语格言。在现代以前，拉比们不仅负责宗教事务的仲裁，还在商业和社会组织的所有领域扮演法官角色，《塔木德》里的律法讨论是他们做出法律裁决的依据。直到今天，《塔木德》仍然是正统派神学院培训拉比的主要科目，恪守传统的犹太人则对之勤加研习，作为虔信上帝话语的一种仪式性行为。

《塔木德》形式上是对《密释纳》的评注，后者是犹太族长拉比犹大在大约公元200年编著的一部法典。实际上存在两部《塔木德》：约公元380年编成于太巴列的《巴勒斯坦塔木德》，以及约公元499年编成于今伊拉克所在地的《巴比伦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经过中世纪获得权威性，今天谈起《塔木德》，一般是指《巴比伦塔木德》。它用亚兰语写成，这是穆斯林征服以前伊拉克人使用的语言。这部著作文风简练、引经据典，需要经过长年研习才能掌握。在传统犹太社群里，有本事"学会一页《塔木德》"，就能给普通信徒赢得名声。为了方便研究这部头等重要的著作，中世纪出现许多评注，其中最著名的是拉比所罗门·本·以撒（1040—1105年）的评注，此人又叫拉熹，住在特鲁瓦（今法国）。在现代版本的《塔木德》里，拉熹的评注以窄窄一栏的面貌出现，且总是和《塔木德》原文并排印刷；研习者学习一页时，一手的两指叉开，一指对着原文，一指对着评注，参照阅读。现代印刷版的《塔木德》还附有其他在中世纪和近代编写的评注。

"米德拉什"（midrash，复数为midrashim）最初是阐述宗教观念的一种方式：先引用希伯来语《圣经》的一段经文，再发挥——要么解释内容，要么引申到一个全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向。作为一种技巧，米德拉什用来发展宗教思想和解决宗教律法问题。但米德拉什还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因为特定的米德拉什被汇编成书。这些米德拉什中，有些按照所对应的《圣经》章节编排，有些是为《摩西五经》和《圣经》

中的其他书籍而编。《塔木德》中的许多律法讨论就在考察作为特定律法来源的一些米德拉什，以决定哪一条米德拉什在什么情况下具有权威性。还有些米德拉什与宗教观念和态度有关，常常构成布道的依据。

“皮尤特”（piyyut，复数为piyyutim）是为犹太会堂宗教仪式创作的诗歌。许多古代会众习惯使用诗体祈祷文，而非现代传统祈祷书中标准的散文体祈祷文。会众不仅指望领祷人在仪式中领唱，还期待他为每个安息日和节日的仪式创作不同的诗歌，以免听到完全重复的仪式内容。后来，祈祷书的文本逐渐固定不变，皮尤特就随着标准祈祷文一起朗诵。在整个中世纪，创作皮尤特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艺术活动（在有些中东的犹太社群里一直持续到现代）。虽然皮尤特的创作已经停止，但直到今天，犹太会堂中仍能听到一些皮尤特。

如前所见，犹太教的某些方面自古广受称赞，但有些方面也引起敌视。开明的异教徒就无法理解，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尊重其他民族的神祇和礼仪；对可以接受众神的异教徒而言，犹太人除自己的上帝以外拒绝承认任何神，反倒更像是渎神者和无神论者！此外，犹太人在宗教上反对帝王崇拜，这虽然是严格奉行一神论的必然结果，但却有不忠于国家的嫌疑，鉴于犹地亚人屡屡叛乱的前科，嫌疑就更大了。另一个政治原因更醒目。在希腊人的城市中，犹太人喜欢扎堆生活，尽可能结成单独的团体，但同时又索要公民权利。第二章已显示，这种愿望中暗含的这对矛盾，已引起亚历山大城罗马总督弗拉库斯的敌视，是造成公元38年暴乱的原因之一。最后，异教徒的敌视中包含了十足的宣传成分。安条克四世企图为自己在公元前2世纪袭击耶路撒冷圣殿的行为辩解，办法就是攻击犹太宗教；亚历山大城有位名叫阿皮翁（Apion）的作家，写了一部翔实的反犹宣传作品，为公元38年对犹太人闹事的镇压辩解；连声名卓著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也不例外，在讨论公元70年圣殿被毁时，他延续了抨击犹太教的传统。这样，截至2世纪，已经出现一批反犹文献，可供基督教领袖利用，基督徒还更为情绪化、更有针对性地指控犹太人是弑神者，反犹文献遂与日俱增。

在4世纪早期以前，基督教与罗马磕磕碰碰，产生的问题比犹太教与罗马之间的问题还多。犹太人建国的雄心已被彻底击碎；他们在故土

上的人口骤减，根本无法对罗马帝国构成威胁。但是罗马视基督教为威胁，对它积极迫害了两个多世纪。迫害平添怨怒，基督教一旦获得罗马帝国官方宗教的权势，就把怨怒发泄到它的母系宗教上。从此，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境遇急剧恶化。

在4世纪，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中心。西罗马帝国勉为其难地支撑着，与东罗马帝国分分合合，还经常遭受蛮族入侵，最终在5世纪土崩瓦解；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于476年遭废黜。与此同时，巴勒斯坦落入说希腊语的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控制。

从4世纪到7世纪，拜占庭统治巴勒斯坦。在此期间，许多法律陆续颁布，限制犹太人从事宗教和商业活动，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通婚，还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或新建犹太会堂。犹太族长希列二世向流散地犹太人宣布节期日历的权威遭到剥夺。（他不得不将制定宗教历法的原理对外公布，流散地犹太社群从此在一个重要领域内摆脱了巴勒斯坦的控制。）犹太人还被禁止拥有基督徒奴隶，从而在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尽管我们今天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但它却是罗马帝国农业生产的基础；因为这条禁令，犹太人不可能再和基督徒奴隶主竞争，他们耕田种地，只能安于自给自足，无法再做其他打算。这一限制虽然可能只对少数大地主有直接影响，但却是令犹太人离开土地的第一步，犹太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在中世纪几乎完全成为城市居民。

一些基督教教会领导人要求全面禁止犹太教，主张像3世纪罗马人对待基督徒那样对待犹太人，让他们在改宗和死刑之间二选一。在西班牙，这真成了政策，西哥特国王西塞巴特（Sisebut，612—621年在位）逼迫犹太人在改宗、死刑和流亡之间选择。但在多个世纪里，教会对待犹太人的权威态度是由圣奥古斯丁（354—430年）阐发，并经教宗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确立为教会政策的。该政策虽说相对温和，但仍然不够宽容：犹太人顽固不化，拒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完全应该被镇压和羞辱，但还不能彻底消灭，而是要让他们生活在丢脸的贫困中，为社会所排斥，以此既惩罚他们顽固地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这条包含在他们自己经典中的信息（基督徒已把犹太人的经典称为“旧”约，认为其中暗藏的信息能证明基督教这个新宗教真实不

虚），又作为基督教之优越和非基督徒之厄运的永久见证。为了让如此对待犹太人的建议显得有理有据，奥古斯丁引用经文：“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5)]此话本是古代一位犹大国王对其子民的敌人下的诅咒，现在却被奥古斯丁用在犹太人自己身上。奥古斯丁的原则很苛刻，但在中世纪得到教宗的一再确认，有时还成了犹太人的救命稻草。

在4世纪，犹太人两次试图摆脱拜占庭的压迫。波斯皇帝沙普尔二世在美索不达米亚威胁罗马帝国，一些巴勒斯坦犹太人想趁机翻身，于351年在帕特里修斯（Patricius）的领导下起义，很快遭到镇压。在尤利安皇帝（又叫叛教者尤利安）执政期间（360—363年），出现了更好的机会。尤利安试图逆转帝国的基督教化进程，将一种开明的异教信仰恢复为官方宗教。他不但废除反犹法规，还承诺重建圣殿，允许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定居。然而，他英年早逝，这些计划全部落空，而他的继任者都是基督徒，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手段比尤利安的前任更加严厉：限制生计，下降地位，逼迫他们皈依基督教。犹太族长制成了犹太自治权的最后残存，连这也在429年遭废除。差不多与此同时，基督徒成为巴勒斯坦的主要人口。在查士丁尼一世执政时期（527—565年），罗马的控制最终侵入犹太人的内部生活，除了更严格地执行以往的反犹社会法规，查士丁尼还干涉关于如何奉行仪轨的争论。他借机制定条例，规定如何举行犹太会堂的宗教仪式，甚至公然禁止拉比在仪式上讲解经文。

然而，巴勒斯坦的拉比学院不为所动，继续活跃，并于4世纪取得一项标志性成就，即编纂出《巴勒斯坦塔木德》（有时误称为《耶路撒冷塔木德》）。这部大作汇编了拉比们对《密释纳》的讨论和评注，包含许多古代的律法和宗教传统。这一时期还编辑了米德拉什，这是对一些缩写的布道文和布道时的经文讲解的汇编。这一时期另一文学活动密集的领域是仪轨诗歌皮尤特的创作，这在整个中世纪都是犹太人主要的艺术活动。巴比伦的拉比也很活跃，他们在5世纪集体编写了《巴比伦塔木德》。和《巴勒斯坦塔木德》一样，它也是一部围绕《密释纳》的拉比学说汇编；与《巴勒斯坦塔木德》不同，它将在中世纪渐渐为全世界犹太人所接受，成为拉比犹太教的权威原典。《巴比伦塔木德》至今仍是正统派犹太人训练拉比和虔诚研习的主要焦点。（第四章将讨论《巴比伦塔木德》是怎样获得权威地位的。）这样，尽管生活在压迫之

下，拜占庭时期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仍创作出一定数量的文献，它们和《巴比伦塔木德》一起，至今仍是拉比犹太教的基础文献。

到这一时期末，结束罗马和波斯绵延数个世纪恩怨的最后一场战争爆发，正是在此期间，巴勒斯坦犹太人差点就能摆脱拜占庭统治的黑暗时代。波斯皇帝库思老二世（Chosroes　II）于603年开始进攻罗马东部各省，到614年已经征服耶路撒冷，这要部分归功于犹太人的协助，他们长久以来一直视波斯为潜在的解放者。库思老杀死并迁走大量基督徒，然后把耶路撒冷交给犹太人，在被官方禁止涉足此地将近300年之后，犹太人终于再次成为它的主人。不过好景不长，波斯人很快看清，犹太人积贫积弱，人口也不够多，保不住波斯在巴勒斯坦的这个据点。617年，库思老改变决定，恢复基督徒对耶路撒冷的支配权。几年后，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开始反攻，于629年攻进耶路撒冷，正式恢复拜占庭对它的控制。

希腊和罗马的反犹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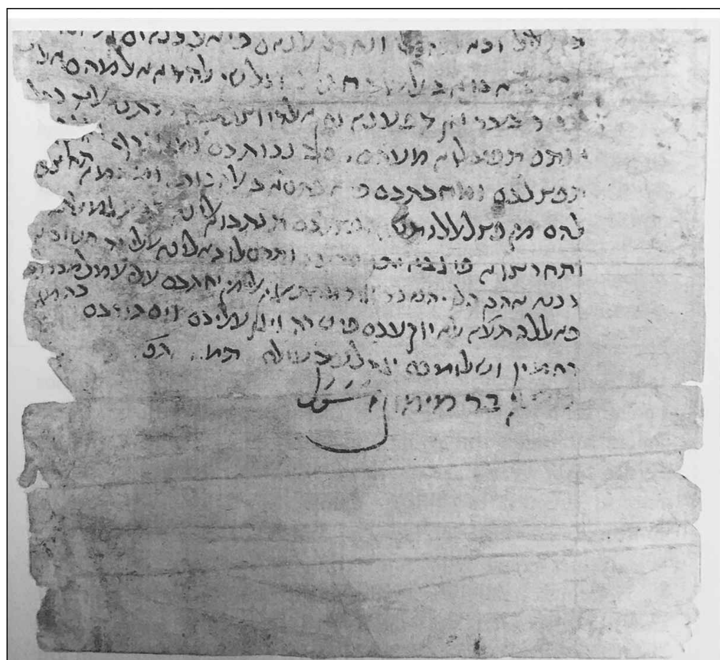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把希腊的语言和文学带到亚洲广大地区。希腊的扩张使希腊学者和文人接触到新的、具有异域风情的亚洲文化，其中就包括犹太人的文化。早期希腊作家用赞赏的口吻把犹太人描述为哲学家民族，就像印度的婆罗门那样。这很可能是因为犹太人的饮食限制让他们想起毕达哥拉斯派的苦行苦修，也可能因为《托拉》中的律法在他们眼中是创建政治和宗教乌托邦的尝试。后来，一位罗马作家赞扬犹太人的耶和华崇拜，认为耶和华和罗马的朱庇特是同一位神灵，他还赞扬犹太人禁止偶像的行为。1、2世纪的许多罗马人被犹太教吸引，有的（甚至包括图密善皇帝的一位堂兄弟）还皈依了犹太教。不过，就连研究人种的希腊学者也会语气厌恶地提到割礼等犹太习俗，并嘲笑犹太人拒食猪肉。

诽谤犹太人的始作俑者是政治宣传家。早在公元前200年，一位亲以土买（因此是反犹派）的希腊作家就写道，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崇拜金驴头。（在后来作家的笔下，想象中的这头供奉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驴被换成猪。）埃及作家在描述埃及紧张局势的同时，传播了诸多对犹太史的曲解和污蔑。他们宣称，犹太人最早作为外来征服者入侵埃及，他们在埃及城镇中纵火，摧毁当地神庙，虐待百姓，直到被赶出埃及。还有人声称，法老时代来到埃及的犹太人之所以遭驱逐，是因为法老决定清除埃及的麻风病人和其他不洁者。法老役使他们去采石场做工，后来又把他们安置在阿瓦里斯。在那里，他们的头领摩西下令禁止崇拜埃及众神，不准食用埃及人崇敬的动物，而且严禁与外人交往。在安条克四世亵渎耶路撒冷的圣殿后，也传出政治动机类似的指责，说安条克在圣殿中发现一个希腊人，正在被养肥，是预备给每年举办的人牲的。

在1、2世纪罗马作家的笔下，反犹宣传是个常见主题。他们厌恶犹太人，既因为犹地亚反抗罗马的暴动，也由于犹太人在罗马上层阶级中的传教活动颇为成功，这在罗马保守人士看来不啻是异邦人和异邦习俗的入侵。罗马作家尤其喜欢嘲笑犹太人不吃猪肉的禁令（猪在罗马人眼中特别宝贵，既是美味又是祭品），他们还把割礼说成自残，把守安息

日当作懒惰。著名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是罗马保守人士的代言者，他指责犹太教是“异邦迷信”。不过，与此同时，许多重要的罗马作家，尤其是哲学家，继承了赏识犹太人的早期希腊传统。他们特别推崇摩西，将他描述为哲学家和立法者。

希拉克略的胜利令犹太人痛苦失望，但他们不久就感到宽慰。没过几年，罗马和波斯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抗终于落下帷幕，拜占庭失去对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控制，而波斯帝国干脆消失了。此时，这一地区和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将由7世纪出现的一股新势力决定，那就是伊斯兰。



迈蒙尼德的亲笔信，用犹太-阿拉伯语写成，发现于开罗的戈尼萨。最后一行是迈蒙尼德的签名。信件翻拍，版权方为苏珊·考夫曼。美国犹太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 “伊利亚”来自哈德良的名字；“卡皮托林”表明是献给朱庇特神的，因为此神最有名的神庙坐落在罗马城的卡皮托林山丘上。——校者注

(2) 莱茵兰（Rhineland），德国莱茵河以西地区的通称。——校者注

(3) “特许宗教”（religio　licita）这种说法来自基督教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0年），并不是罗马法中的正式术语。——校者注

(4) “犹太族长”的希伯来文是*Nasi*。《圣经》时期的部落领袖和国王可用这个词称

呼，巴尔·科赫巴曾用这个词自称（上文译作“亲王”）。今天以色列国的总统也叫*Nasi*。——校者注

(5) 见《诗篇》59:11。——校者注

第四章　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
632—1500年

到公元7世纪，拜占庭帝国、萨珊帝国及其臣民都已经被几个世纪的战争耗得筋疲力尽。一股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新势力乘虚而入。

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既有沙漠中的游牧民，又有城镇定居者。他们在两大帝国的边界上生活了几个世纪，与两个帝国做生意，充当它们的雇佣兵，抢劫它们的商队，有时还成立一些小王国投靠其中一方，故而对罗马和波斯两个世界都相当熟悉。他们大部分是异教徒，但也不乏基督徒和犹太教信徒。似乎正是通过与后者的对话，一位麦加的商人穆罕默德（约570—632年）开始相信一神论原则：神只有一位，祂没有形体，只通过神圣经典向世人显现，并将在最后的审判日出现，审判全人类。他曾体验到种种异象，神在其中委托他在他的人民中用阿拉伯语传播这一信息。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622	伊斯兰教纪元元年：穆罕默德进入麦地那（Hijra）
	638	阿拉伯人征服耶路撒冷
	642	阿拉伯人征服埃及
西班牙宣布犹太教非法	694	
	711	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
	762	巴格达兴建
阿南发起卡拉派运动	约765	
萨阿迪亚高昂	882—942	
亚伦·本·亚瑟在太巴列确立希伯来语《圣经》的权威文本	930	
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成为西班牙穆斯林统治者的朝臣	940	
	969	紧邻福斯塔特的开罗兴建
哈扎尔王国灭亡	11世纪初	
最后一位有影响力的高昂哈伊逝世	1038	

撒母耳纳吉德逝世	1055或1056	
格拉纳达大屠杀	1066	
	1071	塞尔柱突厥人征服耶路撒冷
	1099	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
犹大·哈列维逝世	1141	
	约1146	西班牙的穆瓦希德王朝
	1171	萨拉丁控制埃及
	1187	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夺取耶路撒冷
迈蒙尼德逝世	1204	
	1248	基督教征服除格拉纳达以外的西班牙全境
	1258	蒙古人征服巴格达
纳赫马尼德在巴勒斯坦	1267—1270	
	1269	马林王朝控制摩洛哥
	1291	阿卡陷落标志着十字军对巴勒斯坦的统治结束

622年，穆罕默德领着信徒迁徙到麦地那，在那里以他的宗教即伊斯兰教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群，它很快发展为成功的小国。穆罕默德死后，他的众多启示被汇编成书，这就是伊斯兰教神圣的经典《古兰经》。他的追随者袭击并征服邻近地区，将新宗教传播开来。在短短几十年里，他们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巴勒斯坦和埃及，又从波斯帝国夺取伊拉克和波斯。到8世纪中期，居鲁士在1200多年前建立的波斯帝国（见第二章）消失无踪，而拜占庭帝国被压缩到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的部分地区。

当时世界上的大部分犹太人便成了整个伊斯兰帝国的居民，这个帝国东起印度河，西至大西洋，西班牙也包括在内。由于这个变化，巴勒斯坦、埃及和西班牙的犹太人，几乎立刻摆脱了在怀有敌意的基督徒统治下所忍受的迫害、骚扰和羞辱。这也是从流散开始后，他们首次被纳入一个统一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体系。这两个因素促使他们欣欣向荣，发展出近代以前最成功的流散地犹太社群。

阿拉伯人刚开始征战四方时并没打算让全世界皈依伊斯兰教。虽然存在个别宗教强迫现象，但总的说来，人们改宗伊斯兰教，是因为伊斯兰统治下的状况更有利于穆斯林；同理，他们改用阿拉伯语，只是因为

它是政府管理和公共生活所用的语言。和基督教及犹太教一样，伊斯兰教也与异教水火不容，但它尊重基督教和犹太教，视它们为一神论姊妹，因为它们也拥有一部神启之书。因此，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能够遵守特定的条件，穆斯林就允许他们保留祖先的宗教。

在伊斯兰统治下生活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被当作“迪米”（*dhimmis*），即“受保护的臣民”。他们的身份地位由一套名为《欧麦尔条约》的法规规范。根据这些法规，迪米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保障，宗教实践受到宽容；作为交换，他们要缴纳特别的税款，行为举止也要与臣民的身份相配。他们不得新建教堂或犹太会堂，也不得维修旧场馆，不得公开举行宗教游行或传教。他们也不得袭击穆斯林、携带武器或骑马，而且必须穿有别于穆斯林的服装。后来又增加了其他限制：他们的住宅不得高过穆斯林的住宅，不准使用阿拉伯语名字，不准学习《古兰经》，不准售卖发酵饮料，也不能担任公职。

忍受这些有辱人格的规定，还要付钱才能享受这些待遇，对于落入伊斯兰统治的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来说，是可耻的负担，故《欧麦尔条约》刺激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但对于曾经生活在基督教国家的犹太人来说，《欧麦尔条约》的内容虽然听起来严苛，实际上却带来解脱，因为这意味着伊斯兰宗教和国家承认他们的地位，并且保障他们有权利生活和维持信仰——这次并非在圣奥古斯丁那种羞辱性的逻辑下苟延残喘，而是在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的责令下自在过活。虽然穆罕默德在晚年谴责了犹太人，还在麦地那迫害过犹太人，但伊斯兰教没有像基督教那样与犹太教直接竞争，而且也没有什么敌视它的历史原因。于是，在伊斯兰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欧麦尔条约》中的歧视性规定经常被无视或通融。总的说来，只要伊斯兰教处在强盛时期，比如从它兴起一直到约10世纪以及15和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将在第六章探讨），犹太人就建造华丽的住宅，起阿拉伯语名字，有些还学习《古兰经》；基督徒则开酒馆，售卖发酵饮料（甚至经常卖给穆斯林）；没有人介意穿着区别身份的服装，反正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另一个原因也使早期穆斯林统治对犹太人影响不大。和基督教统治时的情况不同，犹太人不再是唯一遭歧视的宗教团体，更不是这些团体中人数最多的。轮到基督徒尝尝最受歧视的滋味了，他们在伊斯兰治下

的宗教地位要比犹太人的更成问题。虽然《古兰经》把基督徒和犹太人同归为“圣书之民”，但是三位一体的教义使恪守一神论的穆斯林在神学上怀疑基督宗教，而十字架和圣像在基督教崇拜中占据的显赫位置，也让严禁崇拜任何造像的穆斯林把基督徒看作偶像崇拜者。犹太人数量少得多，且恪守一神论，在反对造像方面几乎同穆斯林一样坚决，故在这一时期引起的关注和怀疑要少得多。最后一点是，与基督徒不同，犹太人没有政治身份，他们的独立国家消失已久；而和伊斯兰世界隔地中海相望的（并且在西亚部分地区接壤）是拜占庭帝国，这个基督教神权政体与伊斯兰世界战事不断，伊斯兰领地上的基督徒迪米自然被怀疑通敌，或者至少心系外敌。由于这些原因，为数众多的基督徒起初不如犹太人受待见。

随着伊斯兰帝国的建立，西方历史的重点开始从说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世界转向说阿拉伯语的帝国，而它的范围比前两者中任何一个在鼎盛时期的都大。20世纪的欧美读者必须努力消化这个事实，因为作为欧洲的文化后裔，我们自然容易认为，历史的主流就是欧洲历史。但是从7世纪到13世纪，欧洲远远未入流。自5世纪蛮族入侵以后，西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都已衰败，欧洲文明进入衰落期（经常被称为黑暗时代），过了几个世纪才恢复。在东方继承罗马的拜占庭帝国，领土已大大缩小，在抵御伊斯兰帝国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伊斯兰帝国辽阔、强势、繁荣，它用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来团结内部，其领土除了取自波斯帝国等地，还有许多原来属于罗马和拜占庭帝国。幅员辽阔带来巨大的财富和伟大的文化，被征服民族的技艺和学识都融入新兴的跨民族的伊斯兰文化。因此，欧洲的黑暗时代正值伊斯兰的黄金时代，而全世界犹太人中的大部分成了这个伟大帝国的居民，是其伟大的受益者。

巴勒斯坦犹太社群在伊斯兰统治下有所恢复，但没有恢复到它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前所拥有的领导地位。638年，阿拉伯人从拜占庭帝国手里夺下耶路撒冷，废除从哈德良时期正式生效的犹太人不得在城中定居的禁令。不过，阿拔斯王朝[1]于750年掌权，将巴格达建为首都（762年），巴勒斯坦恢复了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通道的历史地位。而巴格达则成了世界性大都会，在这座涌现过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等伟大哈里发的都市中，伊拉克的犹太社群（仍然称为巴比

伦社群，尽管巴比伦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兴旺繁荣，成为最显赫的流散社群。穆斯林允许犹太人维持在波斯统治时期就享有的半自治身份。作为犹太人的首领，流散领袖至少在理论上成为朝臣，不仅领导当地流散社群，还领导哈里发治下的所有犹太社群，负责收税，并为帝国全境的犹太法庭任命法官。据说，每逢他上朝觐见哈里发，街上会有传令官跑在前面，用阿拉伯语高呼："我们的大师、大卫之子在此，闲人回避！"因为流散领袖仍自称是犹大国王约雅斤（见上文）的后裔，享受一定程度的王室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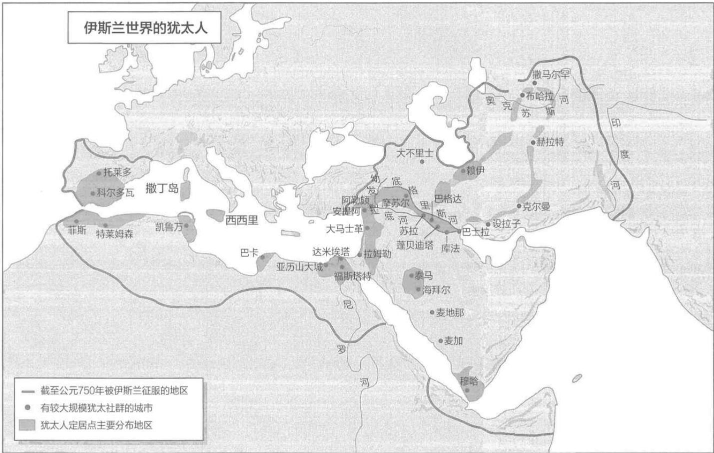
伊斯兰的统治状况有利于城市生活和贸易，犹太人受到普遍趋势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城市化，脱离农业而转向商业。到8世纪末，在伊斯兰世界，住在城镇中当工匠或商人的犹太人要比犹太农民多得多。地中海和红海在政治、文化与语言领域的统一促进了国际贸易，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一些犹太人开始在地中海和印度（公元1000年左右在柯钦［Cochin］附近出现第一个犹太社群）之间积极开展贸易活动。

无论对于穆斯林主体民族还是犹太少数民族，繁荣都带来文化发展。穆斯林在巴格达的中央集权也将世界性的权威赋予伊拉克的犹太机构。苏拉和蓬贝迪塔的犹太学院搬到巴格达，从整个伊斯兰世界筹集资金和招募学员，院长被视作犹太宗教传统的主要诠释者以及宗教律法与实践的最高权威。他们顶着"高昂"（*gaon*，复数为*geonim*）的头衔；术语"高昂"源自意为"荣耀"的希伯来语单词，同时也是"雅各的荣耀学院院长"[2]这一华丽头衔的简称。

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犹太人享有一定的自治；拉比不仅仅是礼仪和家庭律法方面的专家，更充当法官和社群权威。遍布伊斯兰世界的地方拉比将疑难案件提交给高昂仲裁，案件内容涉及社群组织、商业、继承，以及离婚（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更多牵涉财产分割，而非单纯宗教事务）。高昂的回答叫"答复"（*responsa*，相当于伊斯兰教的"法特瓦"［*fatwa*］）。

伊拉克犹太学院里教授的主要科目是宗教律法。首要的教科书自然就是《巴比伦塔木德》，它是高昂们的先驱——萨珊时期苏拉和蓬贝迪塔学院的院长（见第三章）——所汇编的关于犹太宗教传统的巨著。正

是巴比伦高昂们的世界性权威赋予《巴比伦塔木德》高于《巴勒斯坦塔木德》的地位，让前者在犹太世界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学习，至今亦然。同样，由高昂编纂的祈祷书也成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标准读物，以致旧的巴勒斯坦祈祷仪式全都被彻底废弃。高昂给犹太宗教生活的许多方面留下永恒印记；7—11世纪的这段时期号称犹太史上的高昂时代，这是恰如其分的。



最精力充沛、最有影响力的一位高昂是苏拉的萨阿迪亚·本·约瑟（882—942年），他的事业堪称犹太智力生活的里程碑。萨阿迪亚是第一位用阿拉伯语编写犹太律法和宗教书籍的重要的拉比权威，光是这一语言学上的事实就显示出他给犹太智力生活带来了多大变革。萨阿迪亚实际上是一类新型拉比的代表，他不仅发展了犹太律法及布道传统，还探究了当时犹太传统以外的更广泛的智力关切。

犹太人通常说所在地的语言，穆斯林征服伊拉克后，犹太人和当地其他居民一样，渐渐不说亚兰语而改说阿拉伯语。在伊斯兰扩张时期，阿拉伯语从一个边缘部落的语言转变成一个伟大的世界性文化的语言。阿拉伯学者接触到印度、波斯、希腊的古老文明，汲取外来智慧，将之融入阿拉伯半岛本土的文学传统；他们把用古代语言特别是希腊语写作的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勤加钻研，并用新的方法发挥书中的理念，尝试将它们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文学传统相协调。这种智力酝酿过程造就出见多识广的学者阶层，它主要由穆斯林组成，但也包括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犹太人，他们拥有共同的哲学和科学传承，这为相互

理解奠定广泛基础，使来自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敌视的教派和社群的成员可以和衷共济。广义说来，他们共同的知识基础是希腊科学和哲学，而共同的语言是阿拉伯语。

萨阿迪亚精通阿拉伯语言和文学，有机会接触这种新的广阔多元的智力生活的潮流，他是第一位尝试用这种视野系统地重新思考犹太传统的重要拉比权威。这方面他只有一位先驱，即亚历山大城的斐洛，此人在1世纪就尝试用希腊哲学重新思考犹太传统。与斐洛（他用希腊语写作）一样，萨阿迪亚也用所在地的语言写作；与斐洛不同，在萨阿迪亚生活的时代，拉比犹太教久已成为犹太教的主流形式，而萨阿迪亚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拉比。部分由于他的权威，部分由于当时的文化氛围，他的作品对整个伊斯兰世界内部及其外部的犹太社群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作为第一个大量使用阿拉伯语写作的重要拉比，萨阿迪亚堪称犹太-阿拉伯语文学的奠基人。书写与犹太律法相关的著述，是拉比权威分内之事。除此之外，他还将《圣经》翻译成阿拉伯语，并撰有一本大部头的阿拉伯语《圣经》评注。鉴于《圣经》在他那个时代的拉比教育中只占据次要地位，逊于《塔木德》，这部《圣经》评注就显得非同寻常。与同类著作相比，他的《圣经》评注是第一部由一位深受哲学影响的拉比写的，而他的《信仰和意见之书》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的犹太神学论著。正是通过萨阿迪亚的这些作品，对犹太传统的哲学分析才获得正式地位。萨阿迪亚还积极与那些观点和他相左的拉比以及宗派主义者论辩，同时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写下一些论辩著作。当时犹太会堂举办宗教仪式只用希伯来语，所以他用希伯来语为犹太会堂创作诗歌，但在指导诗人们创作仪轨诗歌时，他选择阿拉伯语作为他的教科书的语言。因此，萨阿迪亚可谓将拉比犹太教阿拉伯化了：他不仅选用阿拉伯语，而且调整拉比传统以适应当时智力生活的精髓。

萨阿迪亚终生致力于融合犹太传统与通过阿拉伯语习得的希腊哲学和科学思想，这标志着一种智力潮流正在兴起，它将成为伊斯兰世界犹太人的特质，而伊斯兰此时正处于西方文明的前沿。只要伊斯兰世界保持领先地位，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拉比就会延续萨阿迪亚所开创的努力。正如穆斯林此时是西方世界智力生活的先锋一样，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

也是当时犹太世界智力生活的先锋。

在宗教论辩中，萨阿迪亚捍卫《圣经》，反驳理性主义批评家的攻击，后者曾指出经文中的自相矛盾和逻辑谬误。他和卡拉派之间的论辩更重要，卡拉派是犹太教内部一个宗教运动，其名称意为“经书之民”。这一运动由阿南·本·大卫创立于8世纪晚期的伊拉克，他宣称拉比犹太教的整个历史都是对犹太宗教原则的欺骗性歪曲，并试图推翻高昂们的权威。阿南想要恢复《圣经》作为唯一宗教权威的地位，让人人能自由独立地诠释它，只有卡拉派社群自己积累的传统才能对此有所限制。对于不受高昂权威牢牢控制的犹太社群，比如远在波斯的犹太社群，这种方法很有吸引力，但其本质却导致分裂。阿南在9世纪和10世纪的传人，如便雅悯·纳哈文地（Benjamin al-Nahawendi）和但以理·库米西（Daniel al-Qumisi，他将这一运动带到巴勒斯坦）等人，对他的学说有所修改，并发展出自己的《圣经》诠释传统，汇编出自己的教仪传统和法典，其中大部分使用的是阿拉伯语。

卡拉派信徒热衷研究《圣经》，不仅积极创作《圣经》评注，还成为研究希伯来语语法和《圣经》写本传统的先驱。正是在10世纪，《圣经》的希伯来语文本被权威性地固定下来，这即使不是卡拉派所为，起码也是在他们影响的推动下取得的成果。

卡拉派反叛拉比犹太教，并非为了弱化拉比律法的复杂和严格；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相当严格乃至奉行苦修的犹太教。尽管如此，它还是从伊斯兰统治的全境吸引到追随者，其中包括许多富人，其传播之广使它可以和拉比犹太教分庭抗礼，以致推崇《塔木德》的犹太人获得与众不同的称号“拉比派”（Rabbanite）。虽然两个群体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但双方信徒这一时期仍然通婚。不过鉴于拉比派的悠久历史以及流散领袖和学院等制度的威望，伊斯兰政府通常只承认拉比派为犹太教的权威代言人，这样，拉比派最终压制了卡拉派，但并未彻底消灭他们。卡拉派运动于12世纪在穆斯林东方衰落，但仍活跃于埃及，并持续至今。它在西班牙只是昙花一现。它在巴勒斯坦和拜占庭有一个重要社群，集中在君士坦丁堡周围；在17和18世纪，卡拉派从那里扩散到克里米亚和立陶宛，一直存续至现代。一些小的卡拉派社群在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地至今存在。

在萨阿迪亚身后，随着伊斯兰帝国分裂成一个个地区性的伊斯兰政权，随着伊拉克失去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统领地位，伊拉克犹太社群相对于其他犹太流散社群的重要性渐渐衰减。10世纪的高昂们向其他流散社群发出呼吁，要求各地提供捐助，以维持他们的机构，但到1038年，最后一位享有国际权威的高昂，即蓬贝迪塔的哈伊（Hai）也去世了。

正当伊拉克衰落之际，别的伊斯兰地区渐渐繁荣，其中就有8世纪被穆斯林征服的西班牙。这次征服把当地规模很小的犹太社群从一个特别苛待他们的政权下拯救出来（见第三章）。在伊斯兰的仁政下，当地犹太人与西班牙共同繁荣，很快摆脱拜占庭帝国的掌控。到10世纪，当地统治者僭取“哈里发”头衔，正式宣布独立，抛弃了腐朽不堪的拜占庭帝国。首都科尔多瓦（Córdoba）变成宏伟的都市，一度跻身于伊斯兰世界的伟大城市之列，不仅招徕财富，而且吸引了艺术家和学者。经济繁盛、越来越强的独特的地域身份意识和自豪感也令犹太人受益匪浅，一些犹太人就通过贸易和纺织品制造业发家致富。

10世纪中期，一位名叫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的犹太人平步青云，成为科尔多瓦哈里发的朝臣。他是首位“朝臣-拉比”，这是伊斯兰西班牙一种典型的领导人：既担任公共生活中有权有势的职位，又负责犹太社群事务。他们中的许多人深谙犹太宗教传统，有些还亲自参与伊斯兰西班牙极其活跃的文学和智力生活。哈斯达伊运用手中权力，维护伊斯兰西班牙犹太社群的利益。由于他的财富和影响力，科尔多瓦出现一个犹太作家和学者圈子。他特别鼓励希伯来语诗歌创作，赞助过两位诗人，他们的创作标志着中世纪希伯来语文学黄金时期的肇始。

用希伯来语创作的诗歌一直是犹太仪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作新的仪轨诗歌已成为经久不绝的传统（上文已提到萨阿迪亚这方面的努力），但此前没有将希伯来语用于非仪轨用途的传统。随着犹太人采纳穆斯林的礼仪和习俗，他们发现，在任何说阿拉伯语和研习阿拉伯语的地方，阿拉伯语诗歌都广受欢迎，于是他们也开始欣赏起这些诗歌来。在阿拉伯语世界，诗歌不仅用于娱乐，还作为宣传和推广的载体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受哈斯达伊赞助的诗人发挥了诗歌的这种功能，但他们使用希伯来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因为他们是为有文化的犹太贵族小众内部使用而创作的。这种对阿拉伯语文学风尚的借鉴延续了从

萨阿迪亚开始的一种趋势，也就是将犹太传统和伊斯兰世界的智力与文学潮流结合起来。不久，诗人们就用希伯来语写下阿拉伯语中大部分时髦的话题：爱情、饮酒（虽然伊斯兰教禁止饮酒，但饮酒是阿拉伯语诗歌最受青睐的主题）、友谊、个人与公共事务。虽然创作希伯来语世俗诗歌的潮流蔓延到阿拉伯语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最伟大的作品出自穆斯林西班牙的希伯来语诗人之手。

其中最有权势也最有趣的朝臣-拉比是撒母耳纳吉德[3]（993—1055或1056年），他在11世纪的格拉纳达登上高位，当时伊斯兰西班牙已经分裂成许多小王国。据传，撒母耳之所以引起宫廷注意，是因为他能在外交信函中熟练使用华丽的阿拉伯语文风。通过个人魅力和娴熟的政治手腕，他成了格拉纳达亲王不可或缺的谋臣，并一度成为这个小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他还肩负一些军事责任，因为他写过许多希伯来语诗歌，其中描述了他目睹的格拉纳达军队同塞维利亚和阿尔梅里亚（Almería）等邻国军队作战的场面。除了宫廷职责，他积极从事文学事业，撰写宗教律法和希伯来语语法的书籍，并创作了大量题材广泛的诗歌。在当地犹太社群中，他的多才多艺、温文尔雅、博闻广识和对社群的忠诚，让他逐渐被奉为楷模。穆斯林也尊重他的能力，但对他虽身为迪米却拥有控制穆斯林的权力而愤愤不平。撒母耳有能力约束这些不满，但继承他宫廷职位的儿子约瑟却没这本事。1066年，约瑟在一次针对格拉纳达犹太人的大暴动中被杀。在伊斯兰西班牙的历史上，乃至当时的整个伊斯兰世界，这场暴动属于孤立事件，因为犹太人的地位总体上相当安全。不过它也提醒人们，虽然伊斯兰教能够宽容对待犹太人，但他们终究是异类。

然而，格拉纳达大屠杀预示下个世纪将有更严重的麻烦。从1146年开始，摩洛哥的一支极端伊斯兰教派，即狂热的穆瓦希德派[4]，抵达并逐渐控制西班牙，将其领地上的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宣布为非法。这仅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二例由政府组织的反迪米运动（第一例出现在哈基姆时期，马上就会讲到），它给犹太人带来破坏和精神创伤。虽然穆瓦希德派最终放宽了相关规定，但犹太人生活受到的破坏却是永久性的，因为最成功和最有创造力的犹太社群之一从此告终。许多犹太人离开伊斯兰西班牙，逃往普罗旺斯，带去他们独特的犹太-阿拉伯传统，大大丰富

了当地原本较封闭的犹太社群的智力生活（见第五章）。

许多犹太人至少能够留在伊比利亚半岛，因为在穆瓦希德派开始迫害前，穆斯林从未彻底征服的几个北方基督教王国已经开始向穆斯林领地扩张。卡斯提尔国王就于1085年占领托莱多。新的基督教领地欢迎犹太人，许多犹太人逃去那里避难，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基督教统治反倒显得比伊斯兰教统治对犹太人更仁慈，这与一般模式相反。可惜好景不长，下一章将揭示后续发展。

在逃离穆瓦希德派迫害的科尔多瓦犹太人中，有位名叫迈蒙的法官，他的儿子今天人称迈蒙尼德（1138—1204年），此人将成为伊斯兰时代最著名的犹太人。迈蒙尼德10岁左右时，他一家人离开西班牙，先去了摩洛哥，又去了巴勒斯坦。他成年后定居埃及，在那里功成名就。

埃及早已是犹太人生活的重要中心。法蒂玛王朝[5]于公元10世纪控制埃及，建造开罗城作为首都。这个王朝的缔造者，也像西班牙的阿布德·拉赫曼（Abd　al-Rahman）那样，自封为“哈里发”，宣告独立；他主要的一位谋臣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法蒂玛王朝除埃及以外还控制巴勒斯坦，它授予治下的犹太人相当的社群自治权，犹太人因其温和统治而兴旺。在将近一个世纪中，该政权承认巴勒斯坦的拉姆勒（Ramle）拉比学院为其统治地域内最高的犹太事务权威；1071年，巴勒斯坦省被入侵的突厥人占领，一位号称“犹太人首领”的官员成了犹太人的主要权威。在喜怒无常的法蒂玛王朝统治者哈基姆（1007—1021年在位）治下，犹太社群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哈基姆采取一系列措施羞辱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子民，但他很快又撤回这些规定，故并未造成任何长久的精神创伤。1171年，即在迈蒙尼德抵达埃及之后几年，埃及落入阿尤布王朝[6]之手，该王朝的领袖就是著名的萨拉丁，他在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善待犹太人。在法蒂玛和阿尤布两个王朝的治下，都有少数犹太人在宫廷中担任要职。

在所有中世纪犹太社群中，迈蒙尼德时代的埃及犹太社群留下的文献最多，因为埃及一座犹太会堂中的戈尼萨（*geniza*）幸存至今。戈尼萨是存放废弃书籍和书面材料的储藏室。犹太人认为销毁任何写有上帝

名字的文件都是亵渎神明之举，因此有必要使用这样的储藏室，以防上帝名字本身遭到损毁。即使在不直接涉及宗教事务的著作中也会经常提到上帝，因此，保存旧著述而不销毁的惯例就被用于任何用希伯来语字母写的东西，最终造成一种舍不得丢弃任何书面材料的倾向。不再需要的书籍或文件要么埋入墓地，要么无限期存入戈尼萨。福斯塔特（Fustat）老城最初位于开罗城南面，如今已并入开罗城，那里是著名的本·以斯拉犹太会堂的所在地，会堂里面就有一间持续用到19世纪末的戈尼萨。在19世纪，这间储藏室引起欧洲藏书家注意。1897年，它被打开并被系统发掘整理，人们发现里面藏有各种文学作品的写本：《圣经》与《塔木德》的评注、答问集、诗歌、祈祷书、哲学和科学作品。它们自中世纪起就存放在那里，前所未有地拓宽了人们关于中世纪犹太人智力生活的视野。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间戈尼萨还藏有数量和种类空前的文书资料：私人及商务信件、商业合同、销售清单及提货账单、婚约、写作练习、书单、库存清单和护身符。这一发现意外地使人们能够看到10—13世纪的中世纪埃及的日常生活，不仅包括犹太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包括穆斯林的日常生活，许多细节甚至未见于伊斯兰世界的资料。这些材料数量巨大、零碎驳杂、难以辨认，由于分散在欧美各图书馆也难以获取，在被发现一个世纪后，对它们的研究仍远未完成。近期翻修的本·以斯拉犹太会堂可在开罗参观。

迈蒙尼德于1165年到达开罗，作为外来者，他必须克服当地犹太社群领袖的反对，才能在社群里获得权威地位。最终，他成为埃及的首席拉比权威，尽管还不能确定他是否拥有“犹太人首领”的头衔。但他确实享有国际声望，整个地中海世界甚至包括基督教欧洲的犹太社群都在寻求他的意见；这种威望使他与伊拉克末代高昂们产生冲突，他们认为他篡夺了他们本已被削弱的权威。他的名声不仅建立在精通宗教律法上，还因为他拥有哲学、科学和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是萨拉丁一位宰相的私人医生，每日往返于福斯塔特和开罗，照料宰相的妻妾和子女。

迈蒙尼德是萨阿迪亚所开创的那类拉比的最高典范：既是宗教律法专家，又完全参与同时代的智力生活，他的著作涵盖犹太传统和各门科学。他经久不衰的名望和权威主要来自两部大作：一部是犹太律法法典，用希伯来语写成，并按照原创的逻辑体系编排而成；另一部是用阿

拉伯语创作的哲学专著《迷途指津》，旨在让研究哲学的犹太人确信犹太传统在哲学上是合理的。后者成为中世纪犹太哲学最著名的书籍，但它用的方法对于不说阿拉伯语因而没有接触过希腊-阿拉伯哲学思想的犹太社群来说太超前。在这两部大作以外，迈蒙尼德还写有多部医学专著和一部逻辑学专著，这些都是既为非犹太人又为犹太人写的纯粹哲学著作。

阿尤布王朝从十字军手里夺回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社群再次受埃及统治，并在这一时期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它有自己的拉比学院，起初在太巴列，后来在拉姆勒，该学院曾试图和伊拉克众学院争夺权威地位。在9世纪早期，该学院的院长打算通过为流散地犹太人制订历法来恢复犹太族长的特权，但萨阿迪亚阻止了这一企图。对犹太人和穆斯林来说，巴勒斯坦仍然有点偏离主流。

对穆斯林而言，随着1099年十字军的到来，情况改变了。在将近两个世纪中，巴勒斯坦被穆斯林和基督徒反复争夺，因为基督徒想要恢复基督教对圣地的控制。基督徒成功建立起一个耶路撒冷王国，从1099年持续到1187年，他们直到1291年才被完全驱逐出巴勒斯坦。犹太人被禁止在耶路撒冷城中居住，但获许造访，在巴勒斯坦的其他十字军领土上，他们也没有受到迫害（1096年穿越欧洲的十字军却迫害过犹太人，见第五章）。他们的地位大致和十字军所占领土上的穆斯林居民一样。因此，十字军对中东犹太人没有造成直接影响。

但是，十字军开启了伊斯兰世界漫长的衰落进程，最终对伊斯兰世界犹太人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7世纪对波斯和拜占庭的迅速征服、伊斯兰领土的辽阔和富饶、拥有无数清真寺和学校的众多伟大城市、伊斯兰学者的盛名以及他们智力成果的辉煌——所有这些成就都赋予伊斯兰世界足够的自信，可以宽容臣民，让迪米安定生活。虽然这个帝国早在9世纪就开始政治分裂，但随后出现的独立和准独立国家仍长期保持强势和自信。可是现在，伊斯兰力量开始衰弱。早在十字军东征开始前，西西里岛已被诺曼人征服（1091年）。十字军入侵东方时，伊斯兰最重要的珍宝之一——西班牙逐渐落入西方的基督教征服者手中（这一过程实际上从1085年持续到1248年）。十字军还为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控制东地中海贸易开辟道路。到13世纪末，穆斯林被赶出

欧洲，北非海岸不断遭到欧洲人袭击，而蒙古人开启了穿越亚洲的长征。1258年，巴格达落入蒙古人之手，哈里发统治结束，任何对伊斯兰帝国残存的妄想一并湮灭。权势和财富的天平正倒向基督教欧洲。

对此，伊斯兰教的部分回应是转而针对它的非穆斯林臣民，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在其列。过去普遍被忽视的《欧麦尔条约》中的歧视性法令现在得到严格执行：犹太人和基督徒不得不穿上有特征的服装，他们甚至不能在城市中骑驴，教堂和犹太会堂被肆意破坏，犹太医生丧失治疗穆斯林病人的权利。犹太人和基督徒面临前所未有的骚扰和羞辱，并遭到暴民的鄙视和暴力袭击。14和15世纪，伊斯兰世界经济实力逐渐衰退，迪米的生活状况随之恶化，许多人干脆皈依伊斯兰教。这些压力带来的后果反映在这个事实中：亚历山大城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犹太人生活中心之一，但到1481年，城里只剩下60户犹太家庭。

伊斯兰法律仍然保护迪米的性命，没有发生大屠杀。蒙古人征服巴格达甚至短暂改善过迪米的状况，因为蒙古人还不是穆斯林，他们废除了“迪米”这个法律范畴。蒙古人不但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没有宗教偏见，而且需要他们的支持。一位早期的蒙古统治者甚至任命一位犹太医生兼学者为宰相。但是，犹太人的发迹有时会在穆斯林人口中引发骚乱，而当蒙古人于1295年皈依伊斯兰教后，他们以皈依者的热情恢复《欧麦尔条约》的歧视性规定。鉴于不宽容气氛普遍存在和经济萧条，伊斯兰全盛时期特有的文学和智力创造力难以为继。伊斯兰核心地区的犹太教陷入停滞。

在埃及，突厥人和切尔克斯人的马穆鲁克[7]统治者（1250—1517年）不仅歧视迪米，还歧视其他非统治阶级的穆斯林。这种情形加剧了非统治阶级穆斯林对迪米的憎恨，迪米在社会等级上本就低他们一等。将犹太人和基督徒区别于穆斯林，并将他们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规定被不断更新和巧妙扩大，导致一种敌视“非信士”的氛围出现，这在伊斯兰扩张时期是不可思议的。

黄金时代的诗歌

穆斯林西班牙的犹太贵族与同时代阿拉伯贵族的生活作风非常相似。他们的宅邸有花园，用来举办户外夜间酒会，招待其他贵族。人们在聚会上背诵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诗歌，有时伴着乐器吟唱。并非所有犹太人都认为这么做是恰当的。一位参与者的矛盾心态在杜纳什·本·拉布拉特的一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此诗热情洋溢地描述了10世纪在科尔多瓦举办的一次聚会，但也表达出诗人列席时的歉疚。

传来一声呼唤：“醒醒！
破晓时请将美酒痛饮。
在玫瑰和香樟中铺排
一场终生难忘的宴请。

在石榴树丛
和低矮的银莲花丛中，
藤蔓舒展叶片
棕榈树向天高耸。

那里歌者悦耳地哼唱
应和鼓声的激荡，
那里六弦琴乐音如诉
应和喷泉飞溅的沙响。

在每棵高高的树冠
果实垂吊得沉甸甸。
所有的鸟儿都欣喜
欢歌在树荫之间。

白鸽咕咕的声音
听着像爱的歌吟。
她的伴侣在上空鸣叫——
那些啁啾婉转的灵禽。

我们要躺进花园一醉方酣

头戴玫瑰花环。
赶走愁楚和恐惧
我们要作乐与寻欢。

我们要将美食欣飨，
我们要狂饮佳酿，
就像巨灵大快朵颐，
淋漓酣畅。

等到第一缕曙光照耀
我将拿起屠刀
宰杀牝牛的幼犊；将
牡羊、小牛、奶牛变作佳肴。

氤氲着馥郁的芬芳，
在那些熏香烟柱的中央，
让我们等候末日，
欢度时光。”

我对他斥责：“住口！
你怎能兀自饱喝美酒
当锡安山正落入
未受割礼者之手。

你的言语像个笨蛋！
懒散已是你的习惯。
上帝最后将来审判
你必受罚，因你愚顽。

《托拉》是上帝的喜悦
在你眼中却轻描淡写，
而锡安高山已颓圮，
任狐狸肆虐。

我们岂能置若罔闻

或者欢举酒樽，
当所有人正唾弃
并鄙视我们？”

杜纳什·本·拉布拉特作，雷蒙德·谢德林译，摘自《葡萄酒、女人和死亡：中世纪希伯来语诗歌论美好生活》（费城：犹太出版社，1986年），第41—42页。

犹太人生活的恶化在非洲西北部并不明显。穆瓦希德王朝的狂热在12世纪一平息，歧视性法令的执行就不再严格。当时分布在今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犹太社群安享平定，从1391年开始，犹太人从邻近的基督教西班牙逃来避难（见第五章），人口涌入带来活力。难民中不少是学者和拉比，他们复兴了该地区的智力生活。这股移民潮也对摩洛哥的犹太人生活产生有利影响。在这里，从1286—1465年统治菲斯（Fez）的马林王朝(8)比穆斯林臣民更宽容迪米，甚至让犹太人当朝臣。但普通民众难以容忍迪米，这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已经司空见惯。大约在1438年，鉴于多起针对菲斯犹太人的骚乱引发很大社会动荡，为了保护犹太人，一个名为“犹太区”（mellah）的有围墙的区域被专门划分出来。这种模式在摩洛哥各地反复出现，犹太人和广大民众逐渐隔离。设立犹太区，初衷是提供保护，但最终将犹太人孤立。犹太区也不总是能提供有效的保护。1465年，一位犹太人被任命为宰相，整个王国发生一系列屠杀事件，这是研究执政者和民众对犹太人态度迥异的绝佳案例。

犹太-阿拉伯语言和文学

除了拉迪诺语和意第绪语两个重要的例外，流散地犹太人一般讲所处环境的语言。因此，在穆斯林征服之后，当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时，他们的行为举止变得和非犹太人邻居完全一样，并逐渐把传统语言——亚兰语、希腊语、柏柏尔语和拉丁语——换成阿拉伯语。不久，他们开始用阿拉伯语写作，到10世纪，诞生了犹太-阿拉伯语文学。

犹太人写阿拉伯语时，通常使用希伯来文字母，而非阿拉伯文字母。原因可能是他们运用起希伯来文字母表最自如。在早先的时代，教育总是始于宗教教育。对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首先要学会阅读希伯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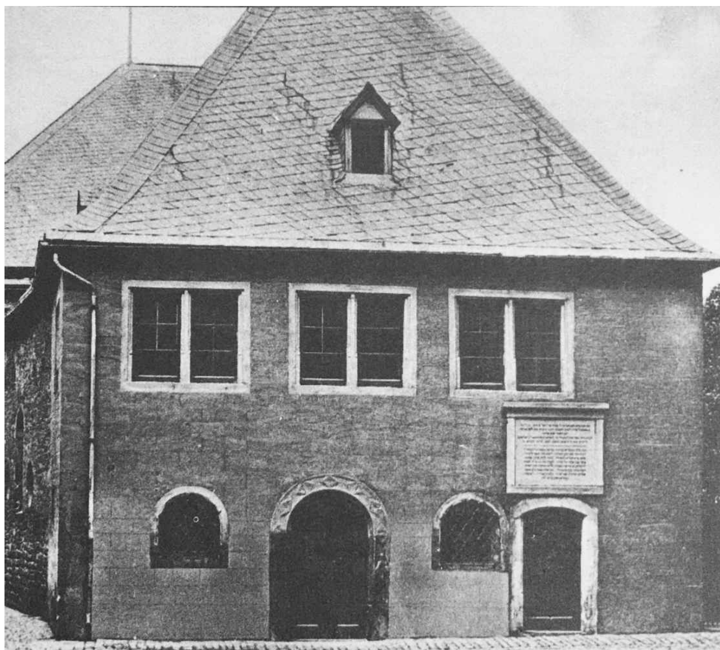
文，因此很多犹太人具有希伯来文读写能力。他们往往通晓阿拉伯文的字母，可以用它为非犹太读者写作，但如果与犹太同胞交流，就没有理由再费力使用阿拉伯文。

犹太-阿拉伯语文学包括神学、哲学、希伯来语语法著作，《圣经》各卷的评注，对宗教律法的拉比裁决。另外也有关于医学和天文学等科学主题的犹太-阿拉伯语书籍。甚至有一本犹太-阿拉伯语的书专门讲如何创作希伯来语诗歌。

然而，大量犹太-阿拉伯语著述不属于文学范畴。戈尼萨（见正文）保存的材料中包含许多信件、货单和其他日常书写，这些都以日常事务中使用的阿拉伯语方言写就。这些文书弥足珍贵，让我们一窥中世纪地中海世界普通百姓的生活，想象中世纪人的音容笑貌。

中世纪以后，许多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常常被迫生活在封闭的社群中，犹太-阿拉伯语才真正发展成专门的犹太方言。流行的宗教书籍都用这种方言写就，此外还有关于《圣经》人物生平的诗歌，以及供婚礼和其他公共活动使用的宗教歌曲。

到15世纪下半叶，始自十字军东征的中东及犹太史上的变革进程结束。这一地区出现一股新势力，把衰败的旧政权扫地出门，代之以一个新兴的、生机勃勃的伊斯兰国家。这股新势力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这是包括蒙古人在内的一系列中亚入侵者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在横扫小亚细亚后，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这是伊斯兰教从7世纪起就觊觎的珍宝。他们继而在1517年占领巴勒斯坦和埃及，随后夺取伊拉克和北非海岸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征服结束了拜占庭1000多年的历史。至此，犹太人已经被驱逐出西班牙和西欧大部分地区；1502年，什叶派萨非（Safavid）王朝[9]在波斯出现，使那里原先重要的犹太社群被边缘化。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发迹将为犹太人在新崛起的伊斯兰世界中重新繁荣提供机会。



沃尔姆斯的犹太会堂，俗称拉熹会堂，建于11世纪。毁于“碎玻璃之夜”（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夜间），后于1961年重建。照片，版权方为弗兰克·达姆施泰特。纽约犹太博物馆提供。

(1) 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阿拉伯帝国第二个世袭王朝，中国史籍中称之为黑衣大食。于750年取代倭马亚王朝，后被蒙古人所灭。在该王朝统治时期，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达于极盛。——校者注

(2) “雅各的荣耀”这个术语取自《诗篇》47:5，“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基督教《圣经》则为《诗篇》47:4）。——校者注

(3) 纳吉德（Nagid）像“拉比”“高昂”一样是头衔，领导人之意。——校者注

(4) 属于北非柏柏尔人，在北非及西班牙南部建立伊斯兰王朝（1121—1269年），西班牙语称阿尔摩哈德（Almohads）王朝，后被马林王朝取代。——校者注

(5) 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北非伊斯兰王朝，中国史籍称之为绿衣大食。——校者注

(6) 阿尤布王朝（1171—约1259年），统治埃及、叙利亚、也门的伊斯兰王朝，由库尔德人建立。——校者注

(7) 马穆鲁克（Mamluk）本意为“奴隶”，原先是服务于阿尤布王朝的奴隶兵，后逐渐成为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祖居北高加索一带，来到埃及，主要是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为抵抗十字军从高加索和中亚买来的奴隶。——校者注

(8) 马林王朝（1244—1465年），北非柏柏尔人建立的伊斯兰王朝，取代了穆瓦希德王朝。——校者注

(9) 萨非王朝，1501—1736年统治伊朗的王朝，我国明朝称之为巴喇西。——校者注

第五章　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

9世纪至1500年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起源

古代罗马有过一个重要的犹太社群，犹太人第一次进入西欧其他地区看来是在公元1世纪，他们当时追随罗马人的定居路线。因此，从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开始，西班牙（本章将单列一节讨论）、普罗旺斯和高卢各地就出现犹太人的踪迹。但是，在罗马时代，犹太人似乎没有在这些地方建立持续的定居点，可能只有西班牙除外。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西欧犹太社群位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在1091年前，这个区域一直受拜占庭帝国统治。从9世纪开始，这个犹太社群就足够重要，它在巴里（Bari）、奥里亚（Oria）和奥特兰托（Otranto）开办学院，研究拉比律法，还培养出仪轨诗作家，他们的一些作品至今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传诵。这些诗人的作品保留了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一世（Basil I）在874年和罗曼努斯一世勒卡佩努斯（Romanus I Lecapenus）在943年迫害犹太人的记忆。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哈扎尔人皈依犹太教	约740	
	768	法兰克人查理大帝
巴西尔一世迫害拜占庭犹太人	874	
基辅罗斯攻灭哈扎尔人	965	
卡隆尼姆斯家族迁往美因茨	约1000	
犹太人开始在英格兰定居	1066	“征服者”威廉
十字军在莱茵兰屠杀犹太人	1096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拉熹逝世	1105	
诺里奇血祭诽谤	1144	
十字军再次在莱茵兰屠杀犹太人	1147	

	1152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
布洛瓦犹太社群被毁	1171	
	1179	第三次拉特兰会议
	1189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犹太人在约克遭屠杀	1190	
	1198	英诺森三世成为教宗
	1209	阿尔比派十字军
	1215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大宪章》
迈蒙尼德的著作在蒙彼利埃遭焚烧	1232	
法国西部发生迫害犹太人事件	1236	
《塔木德》在巴黎遭焚烧	1242	
	1243—1254	教宗英诺森四世
	1252—1284	西班牙“智者”阿方索
林肯发生血祭诽谤	1255	
巴塞罗那大辩论	1263	
特鲁瓦犹太人受火刑	1288	
英格兰驱逐犹太人	1290	
《佐哈尔》作者摩西·德·莱昂逝世	1305	
法国驱逐犹太人	1306	
	1309—1377	教宗迁居阿维尼翁
法国召回犹太人	1315	
犹太人第二次遭法国驱逐	1322	
	1348—1351	黑死病
法国召回犹太人	1359	
西班牙发生多起屠杀及大规模改宗	1391	
犹太人最后一次遭法国驱逐	1394	
托尔托萨大辩论	1413—1414	
教宗下令审查《塔木德》	1415	
	1431	圣女贞德遭受火刑
	1453	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占
	1457	古腾堡印制出现存的第一本印刷书
	1469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促

		成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联合
意大利特伦托发生血祭诽谤	1475	
	1480	西班牙建立宗教裁判所
西班牙驱逐犹太人	1492	征服格拉纳达 发现美洲
葡萄牙大批犹太人被强制改宗	1497	

法兰克的君主，特别是查理大帝（768—814年在位）、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及其继任者，都鼓励意大利犹太人移居普罗旺斯和莱茵兰。他们渴望自己的领地上也有商人社群，这样便能在一个经济完全依赖农业的地区发展贸易。这一时期，在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城镇，比如科隆、美因茨、沃尔姆斯和施派尔（Speyer），犹太社群建立并兴盛，成为西欧和中欧永久犹太人定居点的核心。这一地区在希伯来语里叫阿什肯纳兹，此地犹太人叫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阿什肯纳兹犹太文化是如何传播到东欧和美洲的，它如今已是这些地方的犹太教主导形式。）

早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起源时期，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一种特质，它日后将对他们与非犹太世界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统治者将犹太人作为门客引入西欧，是因为他们拥有商业和贸易的技能。他们既非地主，又非农民，不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一部分，其法律地位直接依赖于国王、男爵或主教。这使他们在封建的欧洲成了异类，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一个人的地位由土地决定。犹太人有时被授予封地，如在狮心王理查统治时期的法国南部和英格兰，但总的说来，凡是在封建等级盛行的地方，犹太人要么从未拥有过土地，要么早晚被赶出土地。

这种特殊地位为犹太人和欧洲民众之间持久的社会与经济差异奠定基础；再经过宗教差异的强化，它使犹太人即使在太平日子也会遭人反感，而在困苦时期更成为憎恨的对象。这种地位赋予犹太人一些特权，但也使犹太人成为贵族、神职人员和暴民之间权力更迭的棋子。领主就算光明磊落，也未必能长久保护他们；贪财的领主会利用犹太人对他的依赖来敲诈勒索；而贫困的领主会为了侵占财产而干脆将他们驱逐。

犹太人脱离土地的进一步后果是，他们集中在城镇，主要从事商业

和手工业。这似乎有利，因为他们获得了农民所没有的经济机会。但是，随着中世纪城市的发展，他们逐渐被文化和数量上占支配地位的基督徒逐出这些领域，先是被排除在手工业之外，接着被排挤出最体面的商业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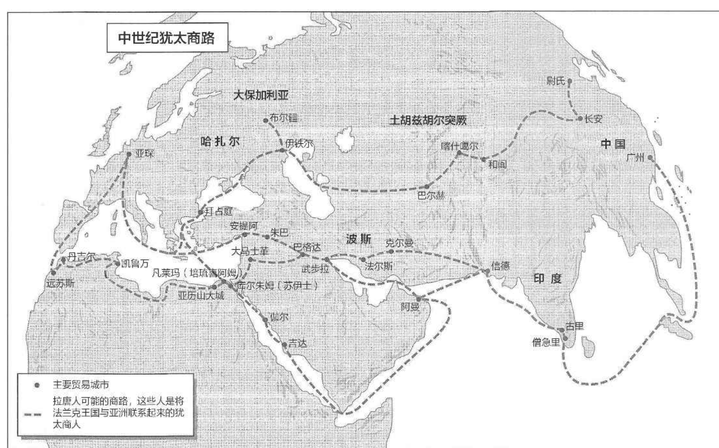
然而，犹太人特殊地位造成的后果，在整个西欧和中欧只是逐渐地、不均衡地出现。在查理大帝和虔诚者路易的时代，犹太人虽然在社会、政治和宗教上不同于邻人，但还没有受到抨击。他们兴旺繁荣，在地理上向东扩散至中欧，向西扩散至法国和英格兰。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个名为卡隆尼姆斯（Kalonymus）的拉比家族从意大利的卢卡（Lucca）迁至美因茨，美因茨便有了拉比学院。与见多识广的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世界相比，阿什肯纳兹犹太世界的学术更局限于《塔木德》和犹太律法；这里的智力氛围不像培养出萨阿迪亚的伊拉克那样有利于跨文化的融合。但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专心致志地研究《塔木德》，自有其成效卓著的独到之处。这里出现的最著名的作品是所罗门·以撒（俗称拉熹，1040—1105年）撰写的《塔木德》评注，阿拉伯语世界的犹太人写不出这种作品，它至今仍是《塔木德》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

这一时期的《塔木德》研究还不是现代《塔木德》研究那样的纯学术活动。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都拥有半自治地位，这意味着犹太法庭对犹太人的商业活动有完全的仲裁权，因此，作为律法权威的拉比是商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角色。所有犹太社群都有统一的法律制度，再加上一种共同书面语言即希伯来文的存在，就大大简化了他们之间的交易程序，使他们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优势。

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关系相对稳定，一直保持到将近11世纪末才出现危机，基督徒这时计划发动十字军东征，要从穆斯林手里拯救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迹，尤其是圣墓。这股针对遥远异教徒的宗教狂热也被引向犹太人，因为正如一些基督徒所说："我们在这里要向圣地的异教徒开战，然而我们中间就有异教徒。"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暴徒于1096年春开始向东横扫欧洲，他们最早的受害者中就有莱茵兰社群的犹太人。地方领主和教会当局基本上还是努力履行保护犹太门客的法律义务，但面对暴徒猛烈的袭击，他们力不从心，结果出现大规模屠杀和强迫受洗。

为避免落入基督教暴徒之手，许多犹太人自杀，男人们先杀死妻儿再自裁。这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第一次遭受重创，但还有许多苦难在等着他们。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各有其恐怖之处。在英格兰，约克的犹太人于1190年集体自杀，以免落入第三次十字军士兵之手。

敌视犹太人此时成为欧洲平民的普遍态度。这种敌视部分出于惧怕。在迷信又不识字的中世纪欧洲一般农民眼中，犹太人有着奇特的习俗、异常的宗教实践和神秘的希伯来语祷文，他们不仅是社会和经济上的局外人，还是用巫术加害人类和上帝的古怪术士，甚至可能是魔鬼的代理人。这种态度在血祭诽谤中表达得最充分。血祭诽谤是一种广泛流传的信念，认为犹太人定期杀害非犹太人，特别是儿童，把他们的鲜血用于巫术或宗教仪式，尤其会在逾越节这样做。血祭诽谤早在希腊化时代已出现，当时异教徒用它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但它在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发展出最充分、最具破坏性的形式。对于基督徒来说，弥撒是主要的宗教仪式，在弥撒中，他们被告知，酒和面包变成基督的血和身体。牧师经常教导，犹太人用邪恶的行为让救世主流血。有这些印象作背景，盲目轻信的群众自然会想象：犹太人举办邪恶的涉及血液的宗教仪式，来反制弥撒。同样有谣传说，犹太人盗取圣餐仪式用的圣饼[1]，把针插在上面，并用其他方法玷污它们，借此折磨耶稣。有时，犹太人受到指控，说他们利用圣饼举行邪恶的巫术仪式。



第一次完整的血祭指控是在1144年对英格兰诺里奇的犹太人提出的。犹太人被指控在复活节前抓获一名叫威廉的基督教儿童，在耶稣受

难日将他绞死，这是对耶稣被折磨和钉上十字架的重演。据说，他们举行这种仪式，是要履行全世界犹太人之间所谓的一个约定，即每年杀害一名基督教儿童。因此，诺里奇的犹太人遭到屠杀。此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也受到类似指控。这种指控后来又发生特别阴险的转变，人们开始普遍相信犹太人用被害基督教儿童的血来制作逾越节的无酵饼（*matzot*，在逾越节8天节期中代替面包的薄饼）。这些指控细节各异，结果却相似：整户犹太家庭有时是整个犹太社群都遭杀害，而且常常是被活活烧死。最有名的案例发生在格洛斯特（Gloucester，1168年）、布洛瓦（Blois，1171年）、维也纳（1181年）、萨拉戈萨（Saragossa，1182年）、富尔达（Fulda，1235年）、林肯（Lincoln，1255年，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有一篇虚构的血祭诽谤故事，其中提到林肯的血祭诽谤）、慕尼黑（1286年）、特伦托（Trent，1475年）以及阿维拉（Avila，1491年）。最后这个案例以“拉瓜迪亚的圣童事件”闻名，它是西班牙那些为驱逐犹太人而发起运动的人捏造的，政治后果极端严重。

中世纪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不相信血祭诽谤，而在这一时期见多识广的伊斯兰世界，血祭诽谤和犹太人作为魔鬼盟友的形象还闻所未闻。基督教君主和高层神职人员都尽其所能，保护犹太人免受这种奇怪的指控。在1235年富尔达的血祭诽谤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成立委员会，调查此事；委员们正确指出，指控犹太人为宗教仪式或其他目的而喝人血实属荒唐，因为犹太宗教律法甚至禁止食用带血点的鸡蛋。1249年，教宗英诺森四世谴责血祭诽谤。但教区牧师和布道的修士不断煽动听众，让他们相信犹太人要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负责，并相信犹太人仍然伺机重演此事。因此，血祭诽谤无法消除，并继续出现，甚至到近现代都有。（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它是如何于1840年在伊斯兰世界出现的，并在第七章看到它是如何在晚至1913年的沙皇俄国死灰复燃的。）

若干历史进程导致12和13世纪西欧与中欧的犹太人状况进一步恶化。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威尼斯等意大利共和国垄断了地中海贸易，削弱了欧洲犹太人的利用价值。在许多城市中，制造业、手工业和商业已由行会势力控制。行会是各行业的专业组织，不仅管理行业行为和成员

的职业生活，而且管控他们的社会和宗教生活，因此通常将犹太人排除在外。意大利北部各邦国犹太人的经济地位相对好些。但在这一时期，教宗权力增强，以致教会对犹太人的控制不断收紧，并不断立法限制他们与世俗君主、教会和基督徒个人的关系。

在教宗控制的领土上，教宗的犹太人政策的宗旨是沿袭旧原则，即应该允许犹太人生活在贫穷和羞辱中，但他们的性命和财产要受到保护。教宗登基时都会颁布教令，重申这些保证，但条款会有所不同。例如，英诺森三世在1199年重申犹太人特权时便补充了一项条款：如果基督徒债务人加入十字军东征，犹太人债主不得讨要贷款。这一时期强势的教宗会利用偶尔召开的大公会议来颁布影响犹太人的法令。1179年召开的第三次拉特兰会议是重要的里程碑，它恢复了一些长期忽视的针对犹太人的限制，其中有些被用来促成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社会分离：犹太人不得雇用基督徒仆人和员工；基督徒不得住在犹太人街区；如果基督徒和犹太人同时作证，那么接受基督徒的证词，而不接受犹太人的证词。1215年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在隔离犹太人方面迈出决定性一步，发明了令人厌恶的犹太人标记，给每个犹太人贴上丢脸的弃儿标签。它还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禁止他们在复活节和其他特定的圣日公开露面。

这两次大公会议都颁布了商业法规，导致犹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下降。第三次拉特兰会议的裁决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禁止基督徒之间收取贷款利息。这项禁令不适用于借钱给基督徒的犹太人，整个放债行业实际上被抛给犹太人，而此刻正值犹太人被排挤在其他经济机会之外的过程接近完成之时。禁止收取利息并没有消除贷款需求，贷款不但是穷人的生命线，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动战争更是必不可少。正是这种净化基督徒高利贷行为的尝试，将犹太人变成中世纪欧洲令人憎恶的典当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限制犹太人贷款的利息数额，还规定如果基督徒债务人的财产被犹太债权人罚没，后者必须继续向教会缴纳这项财产的什一税。所有这些立法的最终结果是，到13世纪末，犹太人陷入贫困，他们变为一个由小摊贩、旧货商和典当商组成的阶层。

教宗英诺森三世决心强化教会的统治地位，遂向朗格多克（Languedoc）和普罗旺斯的异端教派清洁派（Catharites）与瓦勒度派

（Waldensians）发动战争。为了帮助铲除这些异端，他创办宗教裁判所，从15世纪下半叶起，它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英诺森三世还授权创建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2)]；多明我会被赋予的特别职责是起诉异端，向非正统教众传播正统基督教。在未来几个世纪，这两个修会都会与犹太人作斗争，煽动基督徒反对犹太人。

13世纪还有人试图破坏作为一个宗教体系的犹太教的努力。一些有学问的犹太人在皈依基督教后，提请基督教学者留意《塔木德》。《塔木德》被认为冒犯了基督教，因为《塔木德》在耶稣死后很久才被汇编成书，这样，在基督徒看来，它的存在就暗示：犹太人在犹太教早就被基督教取代后仍在宣布犹太教是正确的。《塔木德》还包含一些贬损耶稣和基督教的段落。1233年，教宗格列高利四世正式谴责《塔木德》。1242年，在犹太教叛教者尼古拉斯·多宁（Nicolas Donin）的煽动下，《塔木德》遭到公开审判，所有能找到的《塔木德》都被焚毁。1263年，阿拉贡国王组织公开辩论，旨在让犹太人相信，他们基于《塔木德》和相关拉比文献的宗教是虚假的（见下文）。

1232年，多明我会在蒙彼利埃焚烧迈蒙尼德的著作。这一事件部分起因于普罗旺斯犹太社群内部的文化冲突。不到一个世纪以前，说阿拉伯语的犹太难民逃出穆瓦希德派控制的西班牙，将其世俗作风和渊博的哲学训练引入普罗旺斯。这些新思想让许多普罗旺斯犹太人着迷，但其他人则捍卫自己眼中的老传统。迈蒙尼德那些哲学观念超前的作品引发争议（并持续到下个世纪，还牵扯进西班牙）；传统派向多明我会告发这些作品，虽然多明我会是负责铲除基督教异端的，但这些犹太人觉得大概也能指望他们来辨识犹太教异端。

将犹太人渐渐逐出整个西欧的缓慢而痛苦的进程从此开始。

在英格兰，爱德华一世于1275年宣布，欠犹太人的所有债务无效，并禁止犹太人放贷，从而剥夺了他们剩下的寥寥无几的谋生来源之一。他囚禁犹太社群领袖，索要巨额赎金；一旦赎金到手，他就在1290年把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四个世纪后，英国才会重新接受犹太人。

在法国，“美男子”腓力于1306年效仿爱德华的先例，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再将他们驱逐出境。下任君主允许他们返回，但在1320年，一场

名为“牧羊人十字军东征”的自发群众运动将一些犹太社群摧毁。次年，5000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据说是因为他们向井中投毒。到1322年，整个法国的犹太人所剩无几。犹太人最终于1394年被驱逐出法国。

被逐出法国后，许多犹太人来到普罗旺斯，此地当时还不属于法国。12世纪从西班牙来的难民已让普罗旺斯成为犹太智力生活的重要中心，在这里，阿什肯纳兹式的《塔木德》研究与犹太-阿拉伯式的哲学研究及文学活动相结合。在12和13世纪，它孕育出卡巴拉，这种神秘主义将成为犹太智力生活中的一股主要力量，它首先传到西班牙，最后传到世界各地。但在1481年，普罗旺斯归属法国，当地犹太社群逐渐被迫流亡。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普罗旺斯犹太人在自己国土的一块飞地里找到避难所。普罗旺斯的维奈辛（Venaissin）郡和阿维尼翁城自13世纪初以来一直是教宗的财产，1309—1377年，好几位教宗就住在阿维尼翁。作为教会法律的首要权威，这一时期的教宗严格执行教会政策，保护犹太人的最低生存权。普罗旺斯犹太社群于是被塞到阿维尼翁及邻近几个城镇，并在那里经过几个世纪形成自己的特征和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

1348—1351年，黑死病让欧洲遍布恐惧和毁灭，欧洲三分之一人口死去，不分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惊慌失措的民众陷入极端宗教狂热，以此减轻对黑死病的恐惧。在歇斯底里的气氛中，谣言四起，说犹太人向水井投毒导致瘟疫。犹太社群，尤其是中欧的那些，一个接一个地被包围、摧毁或驱逐。就像前任教宗在血祭诽谤中所做的那样，教宗克雷芒四世一再试图破除犹太人是罪魁祸首的荒谬指控，因为他们和基督徒一样染病身亡，但大众执迷不悟，一心想要犹太人的命。犹太人虽然又逐渐回来，但生活受到限制，充满痛苦和动荡。在15世纪，他们被逐出中欧的日耳曼诸国。规模最大、最令人震惊的驱逐事件发生在15世纪末的西班牙（稍后讨论）。

与此同时，在欧洲东南端，拜占庭中心地带——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犹太人继续忍受着残酷的、反犹的基督教政权，他们已不同于巴勒斯坦和埃及的犹太同胞，因为基督教政权加在后者身上的枷锁已

经随着穆斯林征服而去除。这个社群幸存下来，后来被称为罗马尼奥特（Romaniot）犹太社群。查士丁尼二世于692年颁布法令，进一步限制他们与基督徒交往。最成功的拜占庭犹太社群不在东方，而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本章开头已经描述过。大约从726—843年，一场破坏圣像的争论震动拜占庭帝国，引发大众的反犹情绪；帝国中一些人试图把圣像从基督教崇拜中消除，他们的对手就指控他们受犹太人操纵，因为犹太信仰不容忍任何偶像，这一指控让犹太人遭到暴力袭击。

这首诗节选自美因茨的以利亚撒写的一首诗，此人是中世纪日耳曼一位伟大的拉比，他的妻子和儿女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之后遭杀害。

……让我说说我的大女儿贝蕾特。
她年方十三，像新娘般羞涩；
她跟着妈妈学会所有祷文和圣歌——
虔诚、可爱、聪慧又温和。
这漂亮的姑娘把母亲奉为楷模，
晚上为我铺床，还帮我把鞋脱。
手脚麻利，为人诚实，我的贝蕾特；
敬奉上帝，纺纱，缝纫又做绣活。
虔诚、无瑕，还总是善意满心窝——
她会安安静静，坐着倾听，当我把《托拉》解说……
在基色娄月[3]二十日晚上，她和妈妈、妹妹一起罹祸。
我当时正在餐桌前安坐——
两头魔鬼来到，在我面前把她们宰割——
又伤了我的门徒、我儿和我。

再让我说说我的小女儿。
她已经每晚能念施玛[4]——只会开头几行。
六岁的她已经纺纱、缝纫，
还刺绣，用她的歌声逗我开心。
呜呼我的妻子，呜呼我的女儿们！
我呜咽，我悲痛——我的罪孽让我把恶果吞！
我的儿女们——全都丧身！

哀哉我那虔诚的爱人！
哀哉我儿，我女，我哀悼他们……
但是您，上帝，是公正的，而我羞愧难禁。
上帝是正义的，我是有罪的人。
无论您施予我什么，我都感激您，
把我的赞歌唱给您，
屈我的膝盖，向您顶礼躬身。

上文已提到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一世和更残酷的罗曼努斯一世的迫害，这迫使许多拜占庭犹太人逃到哈扎尔[5]。这个好战的小王国是在7世纪由一支名为哈扎尔人的异教突厥人建立的，位于里海和黑海以北地区，首都在伏尔加河上的伊铁尔（Atil）。不寻常的是，这个王国的统治者和整个统治阶级在740年左右皈依犹太教。拜占庭统治者尽最大努力想要摧毁哈扎尔王国，但又担心王国内的少数基督徒遭到报复，不敢用力过猛。哈扎尔王国的存在给全世界犹太人带来莫大的慰藉；这意味着，虽然他们失去巴勒斯坦的故土，虽然他们作为少数民族在伊斯兰世界只是被容忍，而在基督教世界则受尽迫害，但上帝没有遗忘他们，还给了他们一块地方，让他们当家做主。哈扎尔王国的消息在10世纪传到西班牙，当地犹太社群的领袖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见第四章）开始和当时的哈扎尔国王约瑟通信。正是在这一时期，哈扎尔王国的影响力达到巅峰，但在965年，它遭到崛起的基辅罗斯的沉重打击。它在12世纪仍然存在，此后遂销声匿迹。

基督教西班牙的犹太人

我们已经探讨过犹太社群在伊斯兰西班牙的非凡成功，还看到12世纪40年代穆瓦希德派的到来如何终结了他们最繁荣昌盛的时代。穆斯林从未控制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始终控制着一些地区，特别是东北部的巴塞罗那周围地区和西北部的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到11世纪后期，这些基督教小王国开始向南扩张；1085年，托莱多被卡斯提尔的阿方索六世征服，这是西班牙基督教化漫长进程中的第一件大事。到1248年，这一进程实际上已完成，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落入基督教手中，只有格拉纳达及其领地除外。直到1492年，这里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穆斯林王国。

基督教统治在西班牙的扩张给犹太人带来机会。他们了解这里的风土民情，会讲这里的语言——阿拉伯语，他们中的许多人熟悉行政管理，在税务和财政领域经验丰富。新的基督教统治者急需熟练的行政人员，来帮助他们管控伺机推翻他们统治的当地人口。穆斯林可能会向邻近的伊斯兰国家求援，以恢复穆斯林控制；而犹太人除了统治者，没有可以求援的对象。于是，基督教世界其他地方犹太人的生活模式也在基督教西班牙确立：犹太人是统治者的门客，可以指望统治者保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民众伤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安排对西班牙犹太人奏效了，基督教王国仿佛一片乐土。此外，面对教宗的要求，西班牙的基督教统治者的反应往往相当独立，他们经常拒不执行罗马关于犹太人待遇的规定。



基督教收复失地运动之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主要犹太社群

在基督教的西班牙，犹太人还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阿拉伯语仍然是高雅文化的语言，是了解希腊科学和哲学的钥匙，因为古人的书籍只有通过阿拉伯语或希伯来语译本才能了解。犹太学者和基督教学者的共存，使西班牙成为研究古代作品的中心和翻译相关书籍的中心。犹太人与说拉丁语的教士合作翻译。犹太学者一边大声朗读希腊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一边翻译成卡斯提尔语，而基督教学者会将这位犹太人口述的卡斯提尔语译文用拉丁语写下来。或者，犹太人在翻译时用希伯来语译本作为底本，而这个希伯来语译本又是根据希腊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翻译的。作为文艺复兴的先声，此类活动是将希腊著作传入西方说拉丁语的修道院和大学的重要途径。卡斯提尔的阿方索十世（史称“智者”阿方索，1252—1284年在位）尤其鼓励开展这类活动，赞助过许多文化和科学项目。阿方索的谋士中就有犹太人朝臣，他的门客中还有犹太天文学家。

基督教西班牙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是阿拉贡，当地犹太社群比较保守，处境也不太有利。拥有重要犹太社群的巴塞罗那从未阿拉伯化，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一直和法国南部维持重要联系，因而更像其他基督教欧洲地区，当地犹太人的外貌也更接近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该地区此

时充当沟通阿什肯纳兹和西班牙犹太人的桥梁，学者们在位于“普罗旺斯”（就犹太文化而言，这不仅包括普罗旺斯本身，还包括法国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纳博讷（Narbonne）或吕内勒（Lunel）和巴塞罗那以北的赫罗纳（Gerona）之间来来往往。赫罗纳在13世纪有一所重要的宗教学院，其《塔木德》研究以阿什肯纳兹方式进行，而发源于普罗旺斯的卡巴拉（见上文）就是经由这里传播到西班牙其他地方的。该学院有一位领袖，名为摩西·本·纳赫曼拉比（又称作纳赫马尼德，1194—1270年），他是著名的《塔木德》学者兼神秘主义者。在13世纪的普罗旺斯和西班牙，曾几次爆发关于迈蒙尼德作品以及是否允许哲学研究的争论，纳赫马尼德本人虽然反对迈蒙尼德的一些哲学见解，但他在这些争论中试图充当和事佬。他的弟子兼继任者所罗门·阿德列特（约1235—1310年）则几乎禁绝了哲学研究。

在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当地犹太人开始面临改宗的压力。在多明我会修士和巴勃罗·克里斯蒂亚尼（Pablo Christiani）这位犹太教叛教者的诱导下，詹姆斯一世在1263年亲自主持两个宗教之间的辩论，纳赫马尼德拉比代表犹太教辩论。对他来说，这件差事很危险，因为他反驳基督教教义的任何话都能被解读为侮辱基督教。虽然事后连国王都承认纳赫马尼德表现得体，但这位拉比还是被迫逃亡，最终在耶路撒冷逝世。耶路撒冷那座据说是他建造的犹太会堂至今屹立不倒。

在卡斯提尔，犹太智力生活保留了与卓越的阿拉伯传统的联系，但也自然而然地从基督教环境吸收养分。在这里，卡巴拉成为宗教和智力生活的重要领域，成就了经典作品《佐哈尔》，这是汇编神秘主义论述的巨著，包括卡斯提尔学者摩西·德·莱昂（约1240—1305年）撰写的神秘主义的《托拉》评注；《佐哈尔》直到16世纪才真正获得广泛传播。

就连开明国王阿方索十世也在他的法典《七编法》（*Siete Partidas*）中列入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制定的严苛的反犹条款，他在执政末期与犹太谋臣翻脸，囚禁和杀害了一些人，又用苛捐杂税几乎毁掉托莱多的犹太社群。在他身后，卡斯提尔犹太人的地位逐渐恶化，尽管他们的生活在14世纪上半叶大体还算稳定。犹太人仍然接到皇家任命，尤其在财政和税收领域；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例子是撒母耳·哈列维，他和佩德罗一世（号称“残暴者”）关系密切；他在托莱多建造美丽的犹太会堂，

这是西班牙屈指可数的几座留存至今的中世纪犹太会堂之一。

《佐哈尔》

虽然《佐哈尔》是最有影响力的犹太神秘主义经典著作，但它只代表犹太教几千年来所采取的几种不同神秘主义形式中的一种。它实际上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整套丛书，包括神秘主义的《圣经》评注和主要写于13世纪最后三十几年的神秘主义著述。这些书的内容相互交织，有时一本书的内容突然中断，换成另一本书的内容，然后再回到这本书上；有时两本不同的书的一部分以分栏的形式并列出现，或者一本书的内容作为插页出现在另一本书上。

《佐哈尔》的主要作者是摩西·德·莱昂，他用亚兰语写作，这是《塔木德》和其他一些犹太古籍所用的语言，但犹太人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停止使用。如此匠心独运，是因为摩西·德·莱昂不想让此书看上去是他个人的创作，而像是由他发现的古籍。他宣称作者是西缅·巴尔·约海（Simeon bar Yohai），一位公元2世纪擅长行奇迹的拉比，这一说法虽饱受质疑，但一直盛行到20世纪。尽管如此，《佐哈尔》中蕴含的一些传统可能要远远早于13世纪。

《佐哈尔》用一种非系统化但一以贯之的方式详尽阐述了一种理念：《托拉》的每个词都指向上帝在宇宙中显现的许许多多的方面之一。上帝本尊隐而不显、不可触及，但是祂内在存在的不同方面采取了显现的形式，这些显现叫“塞菲洛”（*sefirot*）。这些塞菲洛如同人的四肢，相互关联，因此上帝将自己显现在此世的时候，就仿佛某种神人。但这些塞菲洛的自身特性和相互联系一直在转换和变化，这些变化决定宇宙进程。《托拉》中的词的真正含义是指塞菲洛的各种方面；因此《托拉》不仅仅是故事和律法的汇编，更是一种神性的蓝图，或者甚至是神的一个神秘的名字。塞菲洛的交互作用决定世上生命的进程，但反过来，人类的行为也会影响塞菲洛，并因此影响上帝。引发创世的一次原生灾变扰乱了上帝的完美，而人类的目的是要通过正确履行仪式和过圣洁的生活来恢复上帝的完美。因此，人类和上帝以某种互相依赖的方式共存。

不过，在整个14世纪，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在西班牙一直活跃，他们

的布道大大败坏了民众眼中的犹太人形象。1348年，西班牙也像欧洲其他地区那样遭到黑死病袭击，犹太人成为暴民歇斯底里的发泄对象，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推波助澜。1391年，多明我会一个修道士慷慨激昂的反犹布道引发针对塞维利亚犹太社群的暴力袭击；暴力活动很快蔓延到西班牙各地，导致数千名犹太人遇害（既是出于宗教狂热又是为了谋财害命）或被迫改宗。许多人从城市逃往乡下，或干脆逃出国，跑到北非，进而丰富了北非既有犹太社群的文化生活。但歇斯底里的气氛产生了最突出、最不寻常的一个结果，即犹太人在1391年大规模皈依基督教，这在犹太史上前所未有。

西班牙犹太人本已漫长而痛苦的没落由此加速，最终在一个世纪后灭绝。由于逼迫改宗的压力持续不断，除了占多数的基督徒和占少数的犹太人外，还出现第三种社群，它由新基督徒或曰改宗者（*conversos*）组成。这个团体持续扩大，许多人变成虔诚的基督徒，一两代人后，他们的后代可能对自身犹太血统只剩模糊的记忆。还有些人虽已完全基督教化，但仍和他们未改宗的家族保持某种联系，或继续遵守一些犹太习俗，可能仅仅是出于习惯、迷信或者对自身过去仍有一丝念想。

改宗为许多犹太人打开生路。有些人甚至成为杰出的教士。所罗门·哈列维（Solomon Halevi）拉比以“圣母玛利亚的保罗”(Pablo de Santa María)之名当上布尔戈斯（Burgos）主教。洛尔卡的约书亚（Joshua of Lorca）以“神圣信仰的哲罗姆”(Gerónimo de Santa Fé)之名向僭称教宗（antipope）本笃十三世进言，说服他在托尔托萨（Tortosa）举行一场辩论。阿拉贡的詹姆士一世发起的巴塞罗那辩论尚有学术气氛，相形之下，这次辩论却是一场长达一年的羞辱人的高声训斥。1413—1414年，一大批修道士向阿拉贡的拉比和犹太社群领袖发表演说，称弥赛亚已经降临，且已被犹太教文本证实，而犹太教代表答辩时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几乎无能为力，只能听任局面一边倒。这场闹剧的结果是，不少参与辩论的犹太人干脆放弃并改宗，犹太社群士气低迷，而这正是辩论组织者期待的。

在西班牙犹太人的最后一个世纪里，犹太社群的数量和财富都在减少，在西班牙社会中不再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新基督徒却无所不在，在宫廷和教会中占据着以前没机会获得的位置。原先对犹太人的反感，

现在转到这些人身上。民众开始指责他们，说他们改宗完全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控制整个国家，说那些保留部分犹太教习俗的人是在虚情假意地信仰基督教，说那些和其犹太家庭保持关系的人是在倒退回犹太教。整个改宗者阶层被视为潜在敌人，想要推翻基督教；只有老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新基督徒不过是伪装的犹太人。这种思想随着“血统纯正”这一概念的出现而染上种族色彩，民众开始把这个概念用作社会接受的标准。到15世纪末，紧张气氛再度高涨，但这次更多是针对改宗者而不是犹太人。

正是改宗者问题促使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宗教裁判所引进西班牙。1469年，这两人的联姻促成卡斯提尔和阿拉贡联合，西班牙王国由此诞生。两人决心把统治拓展到格拉纳达，这里是伊斯兰统治地区的前哨，尚未被基督教征服，征服格拉纳达就能从宗教上统一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宗教裁判所是教会侦察和起诉异端的调查机构，而教会从未宣布犹太教本身非法，因此犹太人并非宗教裁判所关注的对象，但新基督徒会因为基督教信仰不真诚、退回犹太教或其他离经叛道之举的嫌疑，而被告发给宗教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于1480年引入西班牙。（它直到1547年才在葡萄牙完全建立。）它最终扩展到新大陆的西班牙领地；难以置信的是，它在葡萄牙一直持续到1821年，而在西班牙直到1834年才被完全废除。基督徒被告发给宗教裁判所，要么是因为奉行犹太习俗，要么是因为行为举止不够虔诚。一旦抓获，被告往往受到严刑拷问；如果认罪，就要求他们告发亲友。被告极少能够获释，即使有，通常也落得身体垮掉和一文不名的下场。被判有罪和拒绝忏悔的人将被活活烧死；悔罪者被处以羞辱的赎罪苦行，常常沦落得穷困潦倒。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如果能在最后时刻忏悔，可以免受火刑，而改用绞刑。

这一体制本来就腐败不堪。教会有很大动力起诉嫌疑人，因为一旦定罪，便要罚没财产。对想要清除异己的任何有地位的人来说，宗教裁判所也是有用的工具，只要在宗教审判官耳边嘀咕一句，就能把人抓走、搞垮或害死。为了迎合自己的道德标准，教会小心谨慎，避免亲手执行死刑，而是将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交给政府官员处决。政府官员通常会举办公开火刑（auto-da-fé[6]），其精心安排、激动人心的盛大场

面令平民和贵族都趋之若鹜。

因此，宗教裁判所官方并不关心犹太人。但是，在将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尤其是从葡萄牙驱逐以后，它起诉的许多新基督徒实际上是秘密犹太人，这些人接受洗礼是为了能够留下，但他们继续秘密奉行犹太教习俗。这些秘密犹太人叫“马拉诺”（Marranos，据说来源于西班牙语单词，意思是“猪”）。

即使在宗教裁判所建立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宫廷里仍有两位犹太人顾问兼财政家，即以撒·阿巴伯内尔先生和亚伯拉罕·希奈尔（Abraham Seneor）先生。1492年，就在征服格拉纳达后不久，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决定驱逐犹太人，两人竭力劝阻；尽管如此，驱逐令还是于3月31日签发，到8月1日，犹太人踏上西班牙领土即被视为非法。有些犹太人成了秘密犹太人，许多人逃亡海外，还有许多人越过边境逃到纳瓦拉（Navarre）或葡萄牙。在葡萄牙，犹太教直到1496年才被宣布为非法，但葡萄牙的驱逐不如西班牙决绝。当犹太人试图离开葡萄牙时，国王出面阻止，于1497年3月19日强制他们全体接受洗礼。但是，宗教裁判所在葡萄牙建立得很慢，获得全权的速度更慢，所以在葡萄牙做秘密犹太人比在西班牙更安全、更容易，因此葡萄牙的新基督徒和马拉诺与犹太教的联系保持得更长久。在接下来两章中，我们会发现，许多葡萄牙的马拉诺在其他地方重新加入犹太人的行列。

就这样，中世纪所有犹太社群中最伟大的一个风流云散。西班牙犹太人继承了一种长期延续的文化，它在许多方面有别于中世纪欧洲其他地区犹太人的文化。在基督教征服之前，他们具有独特的阿拉伯色彩，随着西班牙文化和身份意识在中世纪晚期逐渐成形，他们和基督徒一起变成西班牙人。出于对自身独特性的自觉和自豪，他们自称为塞法迪犹太人，这出自西班牙的希伯来语名称塞法拉（*Sepharad*）[7]；他们在特定的流散社群中保留了自己的独特性，这些社群的命运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



犹太商人。一位居住在奥斯曼土耳其的波斯裔犹太绅士素描像；他的希伯来语名为末底改（Mordecai），土耳其语名为穆拉德（Murad）。素描照片，版权方为苏珊·考夫曼。美国犹太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 圣餐用的圣饼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校者注

(2) 这两个修会又常常译作“方济会”和“道明会”。——校者注

(3) 基色娄月（Kislev）是希伯来历法三月，大致相当于西历的11—12月。——校者注

(4) 施玛（shema），犹太教的主要祈祷文，得名于其核心祷文“以色列啊，你要听（shema）！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申命记》6:4）。——校者注

(5) 又译作“可萨汗国”（Khazaria）。——校者注

(6) 字面意思为“信仰之举”。——校者注

(7) 见《俄巴底亚书》1:20。“阿什肯纳兹”在《圣经》中出自《创世记》10:3。——校者注

第六章　奥斯曼帝国和中东的犹太人

1453—1948年

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出境对犹太人生活影响深远，远远不止改变了1492年后被迫离开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家庭的命运。渐渐地，犹太人不仅被逐出伊比利亚，而且被逐出西班牙的其他领地，包括西西里岛、撒丁岛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在16世纪，某个地方有时会接纳这些难民，但最终还是将他们再次赶走。出于对宗教裁判所的恐惧，留在伊比利亚特别是葡萄牙的马拉诺，在整个16和17世纪不断离开伊比利亚半岛。这是人口不断流动的一个时期，马拉诺的流动引出一系列问题：挽救一些人的财富，接济另一些穷人，为他们找到新家，帮他们融入既有犹太社群，解决他们因当过基督徒而造成的宗教问题，等等。简言之，马拉诺问题主宰了地中海世界的犹太人生活，稍后又在尼德兰成为长期存在的问题（见第七章）。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1453	奥斯曼土耳其夺下君士坦丁堡
西班牙犹太人开始大批迁往土耳其	1492	
	1498	瓦斯科·达·伽马发现通往印度的航线
奥斯曼土耳其占领巴勒斯坦	1516	
	1517	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埃及
	1520—1566	土耳其苏丹苏莱曼大帝在位
苏莱曼大帝修建的耶路撒冷城墙竣工，至今仍屹立不倒	1542	
宗教裁判所在葡萄牙全面运作	1547	
约瑟·纳西成为纳克索斯公爵	1566	塞里姆二世成为土耳其苏丹
以撒·卢里亚驻采法特	1569—1572	
波斯犹太人被迫皈依伊斯兰	1622	

教		
	1639	奥斯曼土耳其从波斯夺取伊拉克
沙巴塔·泽维宣称自己是弥赛亚	1665	
	1683	奥斯曼土耳其围困维也纳
	1798—1801	拿破仑占领埃及，攻占巴勒斯坦未果
	1821	希腊独立战争
	1830	法国征服阿尔及尔和摩洛哥
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占领巴勒斯坦	1831	
奥斯曼帝国设立大拉比职位	1836	
犹太人被授予土耳其公民身份	1839	土耳其西化改革
大马士革血祭诽谤	1840	
土耳其人在耶路撒冷任命第一位大拉比	1841	
	1854—1856	俄罗斯、土耳其、法国、英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
突尼斯宪法授予犹太人完全公民权	1857	
世界犹太人联盟在巴黎建立	1860	
摩西·蒙蒂菲奥里访问摩洛哥	1863	
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成为法国公民	1870	
	1908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
萨洛尼卡大火	1917	
	1923	奥斯曼帝国变成现代土耳其
	1932	伊拉克独立
	1945	阿拉伯联盟成立
中东各地爆发反犹暴力活动	1947	

尽管西班牙犹太人正在经历艰难的最后一个世纪，但东地中海地区正经历的变化将使他们能够作为流亡社群重新组织起来，再度繁荣昌盛。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一个半世纪前出现在中亚，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终结了拜占庭帝国；他们很快又控制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接下来是伊拉克和北非大部分地区。奥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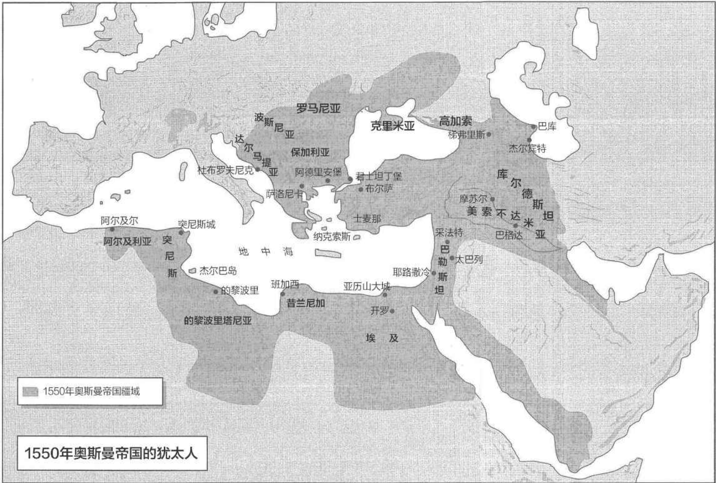
曼帝国为萧条分裂的中东注入新活力，成为基督教欧洲有力的竞争者和对手，而欧洲的近代国家此时才刚刚诞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它首先接管旧拜占庭帝国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和中东大部分说阿拉伯语的犹太社群；当西班牙犹太人大祸临头时，它欣然欢迎这些说西班牙语的流亡者。苏丹认为犹太流亡者是他们不断扩张的国家的经济资产，这个国家虽然军事和农业技艺发达，但缺乏商业经验、国际联系和语言技能，而所有这些恰好是西班牙流亡者可以提供的。据说，苏丹巴耶济德二世（Bayazid II）曾对斐迪南被誉为精明的统治者而大惑不解，因为他逐出犹太人，令自己国家陷入贫困，却肥了敌人。

只要奥斯曼帝国在一系列英明统治者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它就给予臣民相当大的宗教自由。在伊斯兰中东漫长的衰落时期，用来羞辱迪米的歧视性规定这时遭到忽视，犹太人只要缴纳特别的迪米税，就享有自治。地方当局偶尔虐待犹太人，但总的说来，奥斯曼统治在16世纪中期如日中天，西班牙犹太人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西班牙犹太人流亡者很快就控制了奥斯曼帝国既有的犹太社群。并非所有的新来者都是塞法迪犹太人，奥斯曼帝国也吸引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是倚仗数量优势和对西班牙传统的自豪，塞法迪犹太人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并赋予它独特的西班牙色彩。这些变化伴随着社群间的冲突而出现。重要的塞法迪社群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埃迪尔内（Edirne）、士麦那和其他许多城市；在其中一些城市，尤其是萨洛尼卡，塞法迪犹太人不仅统治着当地犹太社群，而且左右着整个城市生活。原有的塞法迪犹太难民由于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难民加入，人口不断增加。而后，意大利犹太难民又加入进来，因为驱逐范围在不断扩大，先是扩大到意大利的西班牙属地，1569年又波及意大利的大部分教宗领地。

奥斯曼犹太人有个特征非常显著，即西班牙语在犹太社群的事务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西班牙，犹太人没有专用语言；他们和邻居讲基本相同的方言，但谈话一旦涉及犹太习俗和使用一些犹太的表达方式，他们就会夹杂希伯来语术语。在奥斯曼帝国，他们加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等许多宗教与语言群体相对和谐地在一些大城市中共同生活，就像在君士坦丁堡那样。这里没有压力改说某种通用语言。

犹太人自然就在新的定居点继续讲西班牙语，奥斯曼犹太人就被当作说西班牙语的社群。塞法迪犹太人还把他们的语言带到奥斯曼帝国征服的阿拉伯语领土上，比如巴勒斯坦、埃及和伊拉克，但在这些语言较单一的地区，许多犹太人继续讲阿拉伯语。后来，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西班牙语发展出自己的特点，和故乡日新月异的西班牙语相比，它显得有点古旧，并且夹杂着一些源自土耳其语和希腊语的词汇，最终演化成一种独特的犹太语言，名为“犹代默语”（Judezmo，意为“犹太的”）或“拉迪诺语”（Ladino，意为“拉丁的”）。这种语言至今仍有人使用，不过会说的人越来越少，主要是在以色列。塞法迪犹太人对西班牙文化的珍视和自豪，反映在他们继续追踪西班牙的文学发展上，西班牙文学本身在16世纪进入黄金时期。当时的西班牙语作品开始在东方出现希伯来语译本，就证实了这种关联。



1550年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

和君士坦丁堡一样，萨洛尼卡也是塞法迪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大都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萨洛尼卡一直是主要的犹太中心，但它最繁荣的时期是在16世纪。就像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城市一样，萨洛尼卡的犹太社群实际上由许多不同的小社群组成。巴伐利亚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15世纪加入最初的罗马尼奥特犹太人社群，接踵而来的是被逐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和北非的犹太人。每个团体都建有社群，以原籍所在地——西西里岛、卡拉布里亚（Calabria）、马略卡岛（Mallorca）、里斯本等——命名，都有各自的犹太会堂，并为成员提供一整套社群服务。必要时，这些社群协同工作，共同发布法令。各社

群的拉比有时也发布联合裁决，比如在1514年他们宣布，在涉及离婚和嫁娶的律法中，马拉诺应该被视为完全的犹太人。萨洛尼卡犹太人从事国际贸易、珠宝制作、纺织，以及羊毛与丝绸的染色工作。萨洛尼卡犹太人开办奥斯曼帝国第一家印刷社，当地学者创作了大量拉比答问集、诗歌、科学作品和卡巴拉著述，甚至还有一本希伯来语、卡斯提尔语、犹太-希腊语的三语对照版《圣经》。除了名为叶施瓦（yeshivas）的普通经学院，他们还建了一所歌唱学校，以及一所讲授医学、自然科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学校，将全面培养学者的文艺复兴理想吸收进培养有学问的拉比的传统理想中去。这种渊博的智力趣味迥异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塔木德》的心无旁骛，是塞法迪犹太人在其巅峰期的典型追求，也与他们的祖先即伊斯兰西班牙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如出一辙。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环境既有利于犹太人个人，也有利于社群。塞法迪犹太人富有且国际化，他们的关系网络遍布整个地中海地区，他们可能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尼德兰甚至法国都有马拉诺亲属，可以顺利开展商业和外交活动。犹太人对政府特别有用，部分是因为人脉和语言技能，还有一个传统的原因，即他们忠实可靠：就连最雄心勃勃的犹太贵族也不会攫取权力，也不存在一个犹太国家可以让他们出卖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在与帝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西班牙打交道时，犹太人特别有用，尽管他们对西班牙及其语言非常熟悉，但他们丝毫不可能对一个残暴对待过他们的政权保持忠心。到16世纪中叶，许多犹太人已经身居高位，获得影响力，当上医生、金融家、外交官和政治家。塞法迪犹太权贵阶层重新出现在奥斯曼帝国，而且规模更大，这种模式在西班牙的伊斯兰和基督教两个时期都出现过，这些富庶的、有国际视野的犹太人在公众生活中占据显赫地位，同时还深入参与犹太社群事务。

这个时代最有权势的塞法迪犹太权贵是格拉西娅·纳西夫人（约1510—1569年）和她的侄子约瑟·纳西先生（1524—1579年）。格拉西娅夫人生于葡萄牙的一个西班牙犹太家庭，祖上可能是在1492年逃到葡萄牙的，并和其他难民一起被强制改宗（见第五章），然后成了马拉诺。她嫁给一个在安特卫普有人脉的马拉诺商人。丈夫死后，她和家人离开葡萄牙，先后去了英格兰、低地诸国[1]和意大利，她在意大利公开恢复犹太教信仰。在此期间，她从事大量商业活动，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

五世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提供贷款。同时，她还为想要逃离葡萄牙的马拉诺提供援助。在威尼斯，她被亲妹妹告发到宗教裁判所，不得不逃往伊斯坦布尔，1553年，她和她的资本在那里受到苏丹苏莱曼大帝的欢迎。

她的马拉诺侄子若奥（João）和她一起离开葡萄牙，他是皇家医官的儿子。离开葡萄牙后，他继续在鲁汶求学，后来接手安特卫普的家族生意。他年轻时就引起当时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的注意，包括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和未来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他能够动用奥斯曼宫廷中的人脉，确保苏丹支持格拉西娅夫人从威尼斯获释。次年，他在伊斯坦布尔与她会合，也重新信奉犹太教，更名为约瑟·纳西。

在伊斯坦布尔，格拉西娅夫人继续帮助马拉诺，并试图推翻宗教裁判所，还资助犹太学者，建立犹太宗教机构。她代表犹太人民做的最雄心勃勃的一件事，是在1556年试图组织奥斯曼帝国全体犹太人来抵制安科纳（Ancona）城，以惩罚此城在准许24位马拉诺回归犹太教之后又背信弃义，将他们烧死。如果抵制成功，将对该城造成毁灭性打击，但犹太人因利益冲突无法团结一致，终究落败。

约瑟在塞里姆皇子与他的兄弟巴耶济德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支持塞里姆，这位皇子即位当上塞里姆二世后，约瑟就成了他最亲近的谋士之一。虽然约瑟作为犹太人不能担任任何正式的宫廷职务，但塞里姆却赐予约瑟崇高的头衔和广泛的权力，封他为纳克索斯岛（Naxos）及周边群岛的公爵，后又加封为安德罗斯岛（Andros）伯爵。此前，苏丹曾把在太巴列的一些权利让予格拉西娅夫人，而约瑟已经获得这份权利转让的延长期，因此他实际上也是太巴列及其周围地区的领主。约瑟试图把太巴列变成羊毛和丝绸生产中心，希望以此助益当地和帝国的经济。他从意大利各教宗国引进桑树和犹太难民来种植和培养，令该地区短暂繁荣。但是约瑟本人从未到访此地，这个经济发展计划无疾而终。

约瑟为太巴列所作的规划可能是一项更大规划的核心部分，即在巴勒斯坦建立避难所，解决马拉诺问题。他曾协助格拉西娅夫人保护马拉诺，试图诱使威尼斯城将一个岛屿作为马拉诺的避难所。后来，土耳其人因为塞浦路斯岛同威尼斯开战，约瑟得到承诺，一旦土耳其获胜，就

让他成为该岛的国王。他可能有过利用该岛实施马拉诺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的想法。但是，1571年，土耳其人在勒班陀（Lepanto）战败，他的事业便风光不再。

太巴列的短暂繁荣只是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后，巴勒斯坦和埃及犹太社群经历的普遍复兴中的一个例子。这些贫穷萧条的社群，就像马穆鲁克统治下的所有犹太社群一样（见第四章），由于西班牙犹太难民的涌入而突然生机焕发。加沙、希伯仑和阿卡（Acre）复兴了，耶路撒冷也是如此，至今环绕耶路撒冷老城的巨大城墙就始建于1537年，还有我们刚刚提过的太巴列的短暂繁荣。但在复兴的巴勒斯坦犹太社群中，采法特最为重要，它位于上加利利，以前从来不是犹太人生活的主要中心，这时却变为犹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中心之一。

1492年的动荡既有政治后果，又有宗教后果，因为它促使许多犹太人深入反思犹太人处境的意义，并导致神秘主义宗教思想的强化。许多虔诚的犹太人被吸引到采法特的各个学院，那里的核心人物是以撒·卢里亚拉比（人称“狮子”［Ari］[(2)]）。他创造了研读西班牙伟大的神秘主义经典《佐哈尔》的一种新方法，试图把犹太人所受的苦难解释为与神的本性密切相关的宇宙事件，把犹太教的仪式解释为救赎的上帝本人和实现弥赛亚时代的一种手段。他的门徒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奥斯曼帝国各地，以及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地方。采法特的卡巴拉仪式和祈祷文也随着卢里亚的思想传播到犹太世界的其他地方，融入当地的犹太仪轨，甚至为非神秘主义者接受；这些仪式中的一些沿用至今，在常见的祈祷书里仍能找到。主流犹太教对这些创新的接纳程度可从以下例子判断：约瑟·卡罗拉比（1488—1575年）是卢里亚的同事，是权威犹太法典的作者，连他都相信神灵显现。

在驱逐浪潮之后，与这类末世论冥想如影随形的是弥赛亚运动。在16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大卫·卢本尼的江湖骗子出现在意大利和葡萄牙。他自称是消失的古以色列支派的王子，说这些支派如今生活在埃塞俄比亚，自己受上帝委派，前来从土耳其人手里解放圣地。在葡萄牙，他赢得众多马拉诺信徒，包括所罗门·莫尔科。他们一起前往意大利，设法见到教宗克雷芒七世，试图说服他组建一支马拉诺军队；莫尔科险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后来，他们又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见到查理

五世，显然想敦促他号召犹太人与土耳其人作战。这一次，莫尔科没能逃脱；他在曼图亚（Mantua）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火刑柱上，而卢本尼则被送回西班牙，很可能于1538年死于那里举行的一场公开火刑。

17世纪以沙巴塔·泽维为核心的弥赛亚运动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场。泽维是卡巴拉主义者，1626年生于士麦那。当时流言四起，说弥赛亚将于1648年降临；在这类预言破产和乌克兰发生赫梅利尼茨基迫害之祸（见第七章）后，泽维开始相信自己就是众所期待的弥赛亚。在赢得一些追随者后，他举行了一些奇怪的仪式，当众念出禁止言说的上帝之名，于是被革除教籍。他云游四方，足迹踏遍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开罗和耶路撒冷，聚起信众，其中包括神秘兮兮的加沙的拿单，此人把沙巴塔主义打造成一场大众运动。1665年，泽维在士麦那宣布1666年将是弥赛亚降临之年。整个奥斯曼帝国甚至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都向他欢呼；重要的拉比和称职的社群领袖，无论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是塞法迪犹太人，都把他当回事。他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想要废黜苏丹，开启弥赛亚时代，但不出所料，才到加利波利（Gallipoli），他就被捕入狱。犹太人蜂拥而至，向他致敬，并等待他发出向圣地进发的信号。但苏丹决定终止他的妄自尊大，给出两条路任他选，要么改宗，要么死亡。沙巴塔·泽维皈依了伊斯兰教。

沙巴塔·泽维的叛教打击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欧洲的犹太社群的士气。加沙的拿单试图挽救这种局面，宣称这只是泽维的弥赛亚计划的一部分，他必须下降到黑暗世界，才能在那里战胜邪恶力量；许多犹太人把这种拯救承诺当成救命稻草，告诉自己泽维的叛教只是一种策略。即使沙巴塔·泽维在1676年死后，加沙的拿单仍试图保持这场运动的活力，坚称沙巴塔·泽维被吸入“天光”，隐遁于更高领域。这种说法使该运动得以续命，特别是在土耳其、意大利和波兰。沙巴塔在土耳其的许多信徒追随他改宗，一边等待他的回归，一边公开信奉伊斯兰教而暗地信仰犹太教；这一团体叫转信派（Dönmeh），在现代土耳其仍然存在。在18世纪，一位名叫雅各·弗兰克的波兰犹太人复兴了这场运动，他自称是沙巴塔·泽维转世，并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前布道，宣讲一种混合《佐哈尔》、基督教和穆斯林思想的奇谈怪论，而且反对犹太律法。但总的说来，沙巴塔运动的垮台造成士气低落，犹太社群陷入长期分裂，

或支持或反对沙巴塔派。

奥斯曼帝国犹太人低落的士气，与这个帝国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衰退相伴相生。早在16世纪末，中央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就开始削弱。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苏丹对犹太人表现出诚意，但这种诚意从穆拉德三世执政时期（1574—1595年）开始减少，他是第一位对犹太人执行歧视性规定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他向犹太社群勒索钱财，威胁要将他们统统杀掉，然后取消这道命令，换取贿赂。

随着17世纪的发展，这些消极趋势进一步恶化。经济萧条使大多数人穷困潦倒；中央政府控制不力，地方当局则肆无忌惮地掠夺，所有少数民族都饱受欺凌，毫无安全可言。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未能征服维也纳，随后相继失去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导致士气低迷。伊斯兰社会向内发展，失去早先引以为豪的世界主义，宗教上则变得更加保守。在阿拉伯国家，执政的土耳其人鄙视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人的回应是把自己受到的鄙视发泄在迪米身上，宗教紧张情绪随之高涨。在许多地方，犹太人实际上失去了法律保护。限制犹太会堂修建和数量的法规重新生效，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只得改在私人住宅举行宗教仪式。恶劣的社会环境一直持续到19世纪。

采法特

采法特是以色列上加利利山区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现在的居民为艺术家和极端虔诚的信徒，前者可能倾心于这片风景和小镇的古雅，而后者则为当地密集的著名神秘主义者的坟墓所吸引。

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前，采法特的犹太人人口很少。1492年以后，特别是在奥斯曼土耳其从马穆鲁克手里夺得巴勒斯坦以后，难民开始涌入。当时，耶路撒冷的条件对这些人不太有利，但加利利的城镇却比较宜居，在16世纪，不少学者和神秘主义者来此安家办学。其中有一位名叫约瑟·卡罗的西班牙拉比，来采法特之前，他在萨洛尼卡度过大半生。他编撰的宗教法典《备好的餐桌》至今被正统派犹太人奉为圭臬。但除此以外，他还是神秘主义者，他有一本日记，记录《密释纳》在夜间向他显灵，监督和指导他的精神生活。另一位迁居采法特的学者兼神秘主义者是所罗门·阿卡贝兹，他写了一首颂歌，把安息日比作新娘，至今每逢周五晚上仍在世界各地犹太会堂里唱诵。卡罗在采法特的门徒是摩西·高杜维洛，他娶阿卡贝兹的妹妹为妻。他为采法特虔信者所组织的神秘主义修会制订生活规则，要求成员每天结对会面，讨论他们的精神生活，每周五也要会面，讨论前一周的行为举止；他们需要在每顿饭前忏悔自己的罪；彼此交流时要说希伯来语。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采法特变为一块世外桃源，支配这里的是学术、祈祷，以及非传统的极端苦修行为，如午夜守夜和延长禁食。

许多故事讲述了神秘主义者虔诚的英勇之举。有一则说的是约瑟·德拉雷纳，他用神秘主义学识引诱撒旦进入他设下的圈套。正当他即将摧毁撒旦并开启弥赛亚纪元之际，他失手让敌人逃脱，世界从此一直处于堕落的状态。

在这些神秘主义人物中，最浪漫的是以撒·卢里亚拉比，人称狮子，他是采法特为数寥寥的具有阿什肯纳兹血统的神秘主义者。他在开罗度过青年时代，据说他在那里的老师是先知以利亚本人。移居采法特后，他广纳门徒，成了一系列民间传说的主人公。据说他是超人，面庞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他精通所有科学知识，听得懂树木、鸟类和天使的语言。据说，他通过观察就能说出一个人的灵魂在来到此世以前经历了什

么轮回，以及他此世的使命又是什么，能说出牲畜、昆虫、鸟类和石头里寄居着过往时代的什么恶灵。他知晓过去与未来，还指导人们怎样为前世的罪孽赎罪。卢里亚死于1572年，卡罗死于1575年，阿卡贝兹死于1584年；此后，采法特作为犹太人宗教生活中心的重要性开始落后于耶路撒冷。但它从未失去神秘的光环。

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由盛转衰还有一个原因：16世纪以后，从伊比利亚逃来的难民减少，荷兰和意大利这时成为他们更理想的目标。难民减少使帝国的犹太人失去能够恢复元气的新鲜血液，还削弱了他们和西欧的联系，而西欧正在迅速扩张和现代化。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在贸易领域的优势逐渐输给希腊人，在银行业的优势又逐渐输给亚美尼亚人。到18世纪末，大部分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和毗邻的伊斯兰领土上的犹太人已陷入贫穷与落后。

尽管条件如此不利，一些犹太人仍然能够发迹，这多亏了“协议”（capitulations）制度。“协议”是指一些条约，其目的是允许建立便于国际贸易的商业殖民地；这些条约是与在奥斯曼帝国有商业利益的外国谈判达成的，允许这些国家在帝国对自己的国民拥有治外法权。犹太人和基督徒在这些殖民地业务中是不可或缺的中间人，获得外国保护和某些税收豁免，一些犹太人因而取得与欧洲国家建立联系的优势。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制度更有利于受俄国保护的希腊正教徒和亚美尼亚商人，以及受法国保护的法国天主教徒，因为欧洲大国倾向于把生意交给自己的教友。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既标志着欧洲基督教国家开始大大加强干预，又标志着奥斯曼帝国转变成现代中东的漫长进程的开启。这一进程将对该地区的犹太人产生深远影响。

一些欧洲大国觉察到奥斯曼帝国的衰弱，担心它一旦崩溃，会打乱欧洲均势，于是向帝国施压，要求它改革。这些改革旨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确保国内各民族的权利；其中一些改革对犹太人的地位产生广泛影响。1839年，帝国将公民平等权扩展到非穆斯林。1856年，帝国颁布法令，不能再在官方文件中恶言谩骂非穆斯林。最后，在1876年，它将完整的公民权授予奥斯曼帝国全体臣民。这是对过去的重大突破，

因为在伊斯兰领地上，一个人的地位总是由宗教和宗教社群的成员资格决定的。但源自西方的公民权是个新概念，无法立即在整个帝国生效，尤其是在帝国的各阿拉伯省份里。

加强中央控制力的措施也影响到犹太人。犹太社群的权力有所下降，因为既然犹太人正式成为帝国公民，拉比法庭的仲裁权就会削弱。另一方面，中央拉比权威机构大拉比司（希伯来语为*hakham bashi*，这一机构曾短暂存在于16世纪）成立了，而宗教社群被安排进所谓的米勒特（millet）制，即每个非穆斯林宗教社群都成为官方承认的自治体，由指定的社群领袖代表自治体成员向国家负责。这些制度旨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但实际效果是将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和官方承认部分给予非穆斯林宗教社群。迪米缴纳的特别税也遭废除，非穆斯林进入地方顾问委员会。

北非有大量犹太社群，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北非的控制松动，当地犹太人的法律地位也相应发生改变，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随后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建立保护国。法国很快将阿尔及利亚同化，在发布一系列偏袒当地犹太人的措施后，于1870年授予他们法国公民的权利。突尼斯的穆斯林统治者有点西化，法国还没有在突尼斯建立保护国之前，他们就已经对犹太人实行较自由的官方政策；但由于穆斯林人口反对，犹太人只能继续作为宗教社群成员而不是作为公民生活。大多数突尼斯犹太人更希望得到法国公民身份而不是突尼斯公民身份，但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成为可能。

不过在摩洛哥，对犹太人的极端虐待引起西欧的关注。在欧洲代表团的施压下，摩洛哥苏丹做出含糊的改善承诺，但代表团一离开，他便撤回承诺。这里刚宣布成立法国保护国，菲斯就发生屠杀犹太人事件。摩洛哥犹太人从未获得法国公民身份，但在保护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

埃及在官方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省，但在19世纪几任埃及帕夏（pashas）的统治下，它表现得相当独立。犹太人的人身安全和物质生活随着国家发展而改善，埃及的现代化比邻国更迅速。但只是在英国占领埃及后，当地犹太人才在1882年实现完全的公民平等。

在叙利亚，宗教社群之间的紧张情绪始终高涨，但在紧张局势中首当其冲的，却是人数更多、更显眼的基督徒。另一方面，叙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一样憎恨犹太人，正是他们把欧洲特有的反犹主义引入这一地区。中东的穆斯林蔑视非穆斯林，无礼地对待他们，但直到19世纪，他们才听说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制造的将犹太人妖魔化的神话。1840年，第一起严重的血祭诽谤出现在中东，这就是大马士革事件。一名犹太理发师受到指控，说他杀害了一位基督教修士，将鲜血用于逾越节。为此，犹太儿童和大马士革犹太社群的领导人被监禁，一些人受不了酷刑，屈打成招。罗得岛、贝鲁特和士麦那发生骚乱，穆斯林加入基督徒袭击犹太人的行列。法国领事支持这一指控，叙利亚犹太人呼吁国外犹太社群提供援助，这一事件很快升级为国际事件，与西欧列强在中东的利益相交织。英国代表犹太人出面干涉，派摩西·蒙蒂菲奥里前往这一地区，他是极其富有的英国塞法迪犹太人慈善家。经过棘手的谈判，他设法从苏丹那里得到一份谴责血祭诽谤的声明。

也门犹太人的处境和摩洛哥犹太人一样悲惨，但在19世纪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当时也门法治崩溃，所有非穆斯林都容易受到剥削、敲诈和袭击。他们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中，完全受歧视，以色列国一建立，整个社群就彻底移居以色列。在伊拉克，犹太人的处境非常糟糕，以致沙逊等巴格达富裕家族都逃到了印度或澳大利亚。(3)

在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教于16世纪成为国教，这对犹太人尤其不利，因为神职人员几乎拥有无限权力，所有非穆斯林被定义为仪式上不洁净。直到19世纪末，在西方思想的影响和西方机构的压力下，他们的地位才略有改善。

在19世纪，中东犹太人逐渐变得更加西方化和城市化。犹太人被吸引到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大城市，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传统生活模式开始瓦解。随着年轻人接受欧洲服饰和文化模式，代沟出现，女性开始离家和参与文化生活。世界犹太人联盟为中东犹太人的现代化推波助澜，它于1860年在巴黎成立，致力于全世界犹太人的解放、福利和进步，尤其是在中东的法国领土上。为此，它建立了遍布奥斯曼帝国和北非的学校系统，宗教和世俗教育并重，用希伯来语和法语教学，还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所农业学校。联盟的学校讲授世俗和宗教科目，让修习的犹太人

获得文化优势，这与基督徒在西方基督教教派建立的教会学校中获得的文化优势是相同的。虽然许多犹太人继续把孩子送进传统宗教学校，但联盟的学校还是打造出了一批西方化的、富裕的中东犹太人。

在这个世纪里，犹太人的法律地位、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都在缓慢提高，但他们和穆斯林大众的关系却没有起色。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犹太人欢迎西方化，视之为摆脱压迫、贫穷和落后的通道，而穆斯林视之为殖民主义和剥削。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拒绝犹太人保有最低限度的尊严，待以诋毁和蔑视的态度，现在他们认为犹太人对西方利益的欢迎是背信弃义。穆斯林一直身陷贫困的泥潭，痛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成功。因此，中东犹太人的法律和经济地位的改善实际上有损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人身安全。

从1821年希腊起义开始，巴尔干各地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为摆脱奥斯曼帝国而斗争，引发巨大民族冲突（到20世纪末，这仍是该地区一个灾难性问题）。希腊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相继起义，每次都会杀害犹太人，而一旦他们实现独立，即使西方施压也无法保证犹太人的安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1917年，萨洛尼卡城的犹太人区被烧毁后，希腊政府拒绝犹太人重新入住他们的老区，并出台其他针对他们的歧视性法令。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个动荡萧条的时期，塞法迪文化仍然生机勃勃，法语、土耳其语和拉迪诺语的犹太报纸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与奥斯曼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拉迪诺文化欣欣向荣，尤其在小说、民间诗歌和音乐领域蓬勃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身为法国公民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为法国英勇作战，但不是法国公民的突尼斯犹太人就不愿战斗，更何况突尼斯的法国官僚中还有反犹主义。在英国当局不情愿的支持下，巴勒斯坦和英国的犹太人组织起犹太人军团，帮助英国对抗土耳其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奥斯曼帝国的残余势力，1923年，它变成土耳其，领土以安纳托利亚为主体。作为一个政教严格分离的现代政权，土耳其给予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所有公民平等权利和宗教自由。中东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远没有这么幸运。尽管这些国家大多为欧洲列强所控制，

但战前影响犹太人生活的模式和潮流影响依旧，只因国家不同而各有差异。恰在战前成为法国保护国的摩洛哥，是少数几个犹太人状况有所改善的国家之一，但该国官方仍将他们归类为迪米。在其他地方，形势恶化了，因为甚嚣尘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让中东犹太人的处境日益艰难。

阿拉伯民族主义想要建立不受欧洲影响的阿拉伯国家，其公民资格将以阿拉伯身份和伊斯兰宗教为基础。这场运动具有显著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特征，犹太人普遍视之为威胁。在一些国家，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试图把自己定位成“阿拉伯犹太人”，但收效甚微。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领伊拉克后，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恳求这位救星不要恢复阿拉伯政府，或至少给予他们英国公民身份。在英国委任统治伊拉克期间，犹太人和基督徒可以担任公职，有位犹太人甚至当上内阁部长；但1932年伊拉克独立以后，非穆斯林就不可能再担任政府职务。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亲法派势力造成社会分化，犹太人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在个人生活方面倾向于彻底的同化。埃及比大部分中东国家更西方化和国际化，受泛阿拉伯民族情绪的影响也较轻，因此，埃及犹太人能参与公众生活，一些人还加入民族主义政党，甚至在议会中任职。但总的说来，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利益更依赖西方列强而非阿拉伯国家。

对有些中东犹太人来说，民族身份问题的出路是西方化。这一路径受到无处不在的世界犹太人联盟的鼓励，它的方案是通过吸收法国文化来实现自我完善。彻底的西方化最自然地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身上，他们拥有法国公民的法律地位，可以自视为法国人并追求同化，这一路径也受许多法国本土犹太人的青睐。和法国本土主张同化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并不总是能被非犹太人接受为法国人，还不得不面对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的特别敌意。似非而是的是，他们对这种敌意的反应是更加热切地拥抱法国身份。

许多中东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中找到出路。作为一场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将犹太人重组为一个民族国家，并在巴勒斯坦建国。这场运动于19世纪末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兴起（详见第十章），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对许多中东犹太人有着天然的感召力。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相比，中东犹太人与以色列地一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部分是因为

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离以色列地更近的地方，部分是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大部分中东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处于同一政治与文化领域。19世纪早期，塞法迪犹太人开始在巴勒斯坦定居，成为工匠、企业家和农业殖民地开发者。19世纪后期，来自也门和布哈拉等地的非塞法迪中东犹太人加入进来。这些移民活动独立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为后者直到19世纪末才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初起。

埃及犹太人成立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巴勒斯坦犹太难民来到邻近的埃及，引发更激烈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摩洛哥犹太人较少西化，宗教上也更传统，他们虽然热情拥护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但颇具影响力的世界犹太人联盟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中东犹太人的状况又一知半解，这些都使犹太复国主义在摩洛哥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自然不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普遍倾向于同化进法国人身份。犹太复国主义在突尼斯比较成功。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犹太复国主义一开始势头强劲，尤其是在巴勒斯坦犹太难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抵达那里以后。犹太复国主义在伊拉克的组织结构发展缓慢，伊拉克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既有得势而保守的犹太商人阶层、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世界犹太人联盟，又有正在崛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这样，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不得不保持低调。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阿拉伯民族主义首先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接着在其他国家兴起，再加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本身的欧洲取向，导致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在中东地区渐渐偃旗息鼓。

从1929年起，犹太复国主义引起的紧张局势变得严峻，耶路撒冷当年发生暴乱，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注意，导致对巴勒斯坦犹太人提出激烈而广泛的指控。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犹太建国意愿的冲突日益加剧。中东人民与西方殖民列强的紧张关系由此升级，导致中东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效仿欧洲法西斯主义，发生险恶转向。纳粹德国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是有吸引力的典范，既因为它敌视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活跃于中东的首要殖民大国，还因为它提供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典范。欧洲法西斯主义带有恶毒的反犹主义基因，它基于基督教妖魔化犹太人的传统，酝酿出一则神话，说犹太人有国际阴谋，企图控制世界。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反犹经典《锡

安长老会纪要》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不含它的反阿拉伯段落）的阿拉伯语译本已经开始流通（前一书见第八章，后一书见第九章）。到30年代末，蓄意毁坏犹太人财产已经司空见惯，犹太人在中东许多国家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让关系正常化，犹太社群领袖否定犹太复国主义；埃及犹太人领袖强调自己对埃及怀有爱国热情，试图把埃及宣传为犹太-阿拉伯和平协作的典范。但是，在历史巨轮推动下产生的一系列事件面前，这些努力只是螳臂当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入侵巴尔干半岛，那里的犹太人生活就此告终，因为德国人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是坚定无情的。（巴尔干半岛和包括萨洛尼卡的希腊犹太人的命运，见第九章。）在战争中，埃及和也门的犹太社群相对来说安然无恙，但伊拉克犹太人的情况急剧恶化，在1941年巴格达犹太人遭到屠杀之后尤其如此。

在北非，突尼斯犹太人受到德国的直接控制，但德国占领时间太短，没来得及像在占领欧洲后那样实施灭绝。尽管阿尔及利亚有法国人反犹的历史，尽管摩洛哥犹太人遭到歧视，但西北非犹太人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利益在同盟国一方，法国在1940年向德国投降对他们是沉重打击。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落入维希政府的控制。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被剥夺他们钟爱的法国公民身份，维希政权的反犹法律被严格执行到西北非所有犹太人身上。法国维希政府关于犹太人的法律没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个法国保护国实施。或许令人惊讶的是，摩洛哥苏丹宣布自己反对这些反犹法律，据说他曾试图向法国当局上诉，声援摩洛哥犹太人。这些地区在1942年和1943年获得解放，但没有立刻给犹太人带来解脱，因为维希政府的官员在许多情况下仍控制着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大部分中东犹太人相信，继续希望与当地人口保持正常关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也使他们对欧洲列强不再抱有幻想，他们以前曾指望欧洲列强提供帮助。这促使犹太复国主义在该地区年轻人中蓬勃发展。但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继续走向对抗。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多起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人的暴乱。1947年11月，当联合国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治理的时候，暴力浪潮席卷中东。只有摩洛哥幸免于难。

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摩洛哥除外）的生活终结。利比亚和也门的犹太社群很快彻底走空，犹太人口大多移居以色列。伊拉克犹太社群紧随其后而去。许多叙利亚犹太人搬到黎巴嫩，因为黎巴嫩是个相对国际化和宽容的多民族国家，另有许多叙利亚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在埃及，下层犹太人去了以色列，而一些富人则前往欧洲或美国，但大多数中上阶层留了下来，对他们来说，情况确实变得正常些了。摩洛哥的大量犹太人也来到以色列，但主要不是因为受到压迫，而是出于由以色列战胜阿拉伯联盟而引发的纯粹的弥赛亚狂热。现代世俗国家土耳其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犹太人这时依旧欣欣向荣，但人数已大为减少。

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东的犹太社群已无足轻重。

早期希伯来文印刷

现代活字排印术（typography）的发明传统上可追溯到1440年。第一批印有日期的希伯来文书籍出现在1475年的意大利，但早在十年前，罗马就出现犹太人印刷商。大部分早期希伯来文印刷书籍产自意大利，但希伯来文印刷社在15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有。1492年，遭驱逐的犹太难民把他们的活字模从伊比利亚带到摩洛哥、意大利和土耳其，印刷术在这些地方出现。

奥斯曼统治者禁止穆斯林从事印刷，认为这是颠覆破坏的根源。他们允许犹太人从事印刷，只要他们不使用阿拉伯文活字，当时的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共用这种字体。（土耳其语的印刷迟至1727年才合法。）1493年，西班牙犹太难民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家印刷社，并从那里把印刷术传播到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城市和埃及。约瑟·纳西先生是印刷业的重要赞助人，他的遗孀在君士坦丁堡维持着一家印刷社。

在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仍然是希伯来文印刷的主要中心，有两家相互竞争的重要公司：革舜·松奇诺（Gershom Soncino）公司和但以理·邦贝格（Daniel Bomberg）公司，后者由威尼斯一位专营希伯来文书籍的基督教印刷商开办。松奇诺在1527年把业务转移到奥斯曼帝国；正是

邦贝格在1520—1523年间印制出第一套全本《塔木德》，堪称不朽功业。教宗尤利乌斯三世在1553年下令，烧毁所有找得到的《塔木德》版本，并禁止出版任何新版本，意大利的希伯来文出版经历了暂时的衰退，但威尼斯很快复兴，成为印制希伯来文书籍的主要中心之一。



建于1882年的佛罗伦萨犹太会堂内部。照片，版权方为苏珊·考夫曼。美国犹太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 低地诸国指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校者注

(2) “Ari”还是“神圣的拉比以撒”一语的首字母缩写词。——校者注

(3) 可参看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校者注

第七章　西欧犹太人
1500—1900年

大约从1500年开始，欧洲社会及其智力生活发生变化，对犹太人影响深远。欧洲经济体系的扩张带来犹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几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放债，但这个先前遭鄙视的行业现在转变成受人尊敬的投资领域。在17世纪，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崛起，财政上的权宜之计成为比宗教更重要的宽容标准。近代早期还为逐渐打破教会对智力生活的垄断奠定了基础，这是先通过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再通过启蒙运动实现的，正是启蒙运动瓦解了宗教上歧视犹太人的神学基础。在这一时期后半段，政治思想也发生变化，犹太人有可能被视为国家的个体公民，而不是称为犹太社群的共同体的成员。这些变化只有到1700年以后才充分表现出来，但其基础是在近代早期奠定的。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1510—1520	鲁希林与佩弗科恩论战
威尼斯设立犹太人隔都	1516	
	1517	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
	1523—1584	教宗克雷芒七世
葡萄牙设立宗教裁判所	1531	
所罗门·莫尔科被烧死	1532	
	1544	路德攻击犹太人
	1545	特伦托会议开始
犹太人遭各教宗国驱逐	1569	
罗马发生焚烧《塔木德》事件	1553	
对希伯来文书籍的审查开始	1554	
现存的第一份四地委员会法案	1580	
	1581	尼德兰从西班牙独立
马拉诺在阿姆斯特丹定居	1590	
	1618—1648	三十年战争
	1649	英格兰清教徒革命
玛拿西·本·以色列到达伦敦	1655	

斯宾诺莎被革除教籍	1656	
	1689	洛克为争取对犹太人的宗教宽容辩护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瑟夫二世发布“宽容法令”	1782	
摩西·门德尔松逝世	1786	
	1789	法国大革命
法国授予犹太人公民权	1791	
法国的犹太名人会议及犹太教公会	1806	神圣罗马帝国灭亡
	1814—1815	维也纳会议
汉堡圣殿开放	1818	
嗨噗！嗨噗！骚乱	1819	
德意志犹太人向美国大规模移民开始	1836	
摩西·蒙蒂菲奥里获封爵士	1837	
	1848	欧洲多个国家爆发革命
世界犹太人联盟在巴黎成立	1860	
罗马隔都被废弃	1870	
	1870—1871	普法战争
德雷福斯事件开始	1893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犹太人可以从事的职业范围大大缩小，除了放债几乎干不了别的，而且通常只经营小规模的典当和旧货交易。这种限制让一些犹太人能够积累资本，使他们精于理财和投资。驱逐和强迫移民让犹太家庭与社群的成员散布整个西方世界，令犹太人获得跨国关系，而这很容易转化成商业人脉。最后，尽管阿什肯纳兹和塞法迪犹太人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但同为外来者的身份、同样信奉少数派宗教、共同的书面语言希伯来文，这些因素有利于他们充当中间人，协调基督教欧洲和伊斯兰中东之间的商业联系。因此，虽然16世纪初全世界犹太人都境况悲惨，但他们经济恢复的基础已经存在。

迫害和驱逐的浪潮始于十字军东征，逐渐驱使中欧犹太人向东前往波兰和立陶宛，这在13和14世纪尤其显著，但是，欧洲犹太人重心转往东欧的大规模迁徙直到15世纪后期才出现。这种迁徙既是西欧加紧排拒

的产物，又是东欧统治者持欢迎态度的结果。奥斯曼苏丹曾鼓励逃亡中的塞法迪犹太人去其领土定居，因为他们教育水平高、技能丰富、国际商业联系广。出于相似原因，波兰的国王和贵族也鼓励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其领土上定居。

15世纪的波兰（当时与立陶宛合在一起）是一个主要的欧洲大国，但它缺乏管理大庄园和长途贸易的人力与专业知识。这方面需求在东部尤其强烈，波兰贵族在那里拥有大片土地和数千村庄，但他们不愿亲自管理，甚至不愿去居住。犹太人充当这些贵族的管家，成了他们在当地人口中的代理，这是上文提到的生活模式的变种：犹太人和领主之间有特殊关系，他们与民众一起生活，但不是民众的一部分。到1600年，犹太人已经定居在整个地区，从事手工业、农业、贸易、税款包收和租税收集。在中欧和西欧，他们几乎被完全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但他们在东欧的波兰和立陶宛找到一片常态化的乐土，这和塞法迪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情况异曲同工。

和塞法迪犹太人一样，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把家乡语言带到新家。和其他中世纪犹太人一样，德意志犹太人一直讲所处环境的语言，但他们来到波兰后，既不属于统治者又不属于农民阶层，大多生活在自己人圈子中，不使用邻居的语言。保留德语进一步表明他们融入东欧人口的程度较小。犹太人说的德语已经混合了一些希伯来语词汇；在东欧，它逐渐吸收斯拉夫语元素，越来越不像德语，以致有了自己的名字，叫意第绪语。就像拉迪诺语和犹太-阿拉伯语一样，意第绪语也用希伯来文字母书写。

由于经济条件改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可以更自由地发展智力生活；他们将大部分智力投入传统的《塔木德》学术，使之获得巨大声望。卢布林、波兹南、克拉科夫的重要学院蓬勃发展，而利沃夫和卢布林的贸易大集市成为这些学院重要的招生中心。直到最近，近乎全身心地投入《塔木德》学术，仍然是阿什肯纳兹宗教实践的标志。

随着数量激增，犹太社群在东欧获得广泛自治权，这在四地委员会中体现得最充分，它相当于一个规范东欧犹太人生活的犹太议会。该机构是有拉比代表参与的世俗团体，通过一个区域组织网络监管了数千社

群，从1580年到18世纪早期有效管理着东欧犹太人。其威望使它的裁决甚至能对西欧犹太社群产生影响，因为西欧没有类似规模的组织。

东欧犹太人在1648年遭受严重挫折，东乌克兰的哥萨克人得到乌克兰农民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持，在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1595—1657年）的领导下反叛波兰人。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屠杀波兰贵族和天主教神职人员，他们对犹太人特别凶残，因为犹太人是令人憎恨的收税者，是农民耕种的庄园土地的管家。有时，犹太人被要求皈依基督教以获取生路，他们会像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祖先那样，杀死自己和全家来殉教。在恐怖的屠杀和暴行中，这场叛乱向西、向北蔓延，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1655年俄罗斯和瑞典入侵立陶宛才结束。犹太人每次都是受害者。由于屠杀和由此引起的向西欧的回迁，波兰犹太人口锐减。波兰犹太人到17世纪末才恢复元气，但士气低迷。东欧犹太人对沙巴塔·泽维及其弥赛亚运动（见第六章）的狂热，可能就是这次创伤造成的；后来泽维叛教的消息是更沉重的打击。

在中欧，14和15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复兴了对古代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教会教义的影响。有些人把注意力转向《圣经》的希伯来语文本、犹太人的《圣经》评注，以及后来的犹太著述，特别是卡巴拉。因此，希伯来语和拉丁语、希腊语一起被纳入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学术。基督徒认同犹太教文本的一个奇怪例子发生在1513年，为维护《塔木德》，基督教学者约翰内斯·鲁希林居然在教会法庭上和一个名叫佩弗科恩（Pfefferkorn）的前犹太人起了争执，因为后者想要查没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塔木德》书册。鲁希林的声望使希伯来语研究在基督教学者中受到尊敬。但鲁希林仍抱持中世纪教会对犹太人的否定态度，而其他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则认为过度发展希伯来语学术会威胁到基督教。因此，虽然人文主义加深了基督教学者对犹太传统的认识，但没有给犹太人生活带来直接的有益影响。

马丁·路德在1517年发起宗教改革，不但没有鼓励基督教宽容犹太教，反倒加剧了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反犹态度。在运动早期，路德把教会对犹太人的迫害囊括进他对教会的批评，以为通过攻击教宗和推崇《圣经》权威，就能争取犹太人加入基督教。但事与愿违后，他转而开始攻

击犹太人，将他们比作“令人作呕的害虫”，敦促基督徒敌视他们，并赞同将他们逐出德意志各州。

面对改革派的挑战，教会做出反宗教改革的回应（这里不妨把反宗教改革追溯到1545年召开的特伦托会议），这是更大的倒退。正如上文所见，教会的官方政策给予犹太人微薄的宽容，中世纪的教宗作为这一政策的执行者，通常是保护犹太人的。16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秉持人文主义精神的教宗特别偏袒犹太人，许多意大利主要城市的统治家族也如此，比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曼图亚的贡扎加（Gonzaga）家族、佛莱拉（Ferrara）的埃斯特（Este）家族等。而现在，教宗为了重新夺回对基督教世界的控制，开始打击一切宗教越轨者，犹太人也包括在内。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特伦托会议并未专门处理犹太人问题，但1541年成立的耶稣会却发起咄咄逼人的运动，让犹太人皈依。1555年，教会给意大利犹太人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当时教宗保禄四世下令，将罗马和其他教宗领地的犹太人隔离进带有围墙的犹太人居民区，即牢笼一般的隔都（ghetto），所有城镇的犹太人都必须住在那里，隔都的大门每天从日落到日出都会上锁。小镇上的隔都可能只是一条拥挤脏乱的街道，两头各有一扇大门。意大利第一个隔都于1516年在威尼斯建立，后来的所有隔都都沿用这一名称（“隔都”一词在威尼斯方言里的意思是“铸造厂”，这是威尼斯最初为限制犹太人而指定的居民区的名称）。意大利以外的一些城镇已经有带围墙的犹太居民区，尤以法兰克福为著。隔都现在成了犹太人生活的标志，起初在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教宗领地，然后出现在大部分意大利主要城市。建造隔都一直持续到1732年。

在反宗教改革的反动气氛下，宗教裁判所现在盯上从伊比利亚逃到意大利并回归犹太教的马拉诺；意大利不再安全，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逃往奥斯曼帝国，正如第六章所说；我们在那章还提到教宗撤回对安科纳的马拉诺的保护，造成血腥后果。教宗领地上的犹太人必须佩戴区别身份的标记和黄帽，他们被禁止拥有房产，还被驱逐出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小城镇。意大利印刷的大量希伯来文书籍受到强制审查。

但是，即使反宗教改革的严格限制也没能阻止意大利犹太人生活和

文化的欣欣向荣。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犹太人已变成一个相当多样化的群体。最初的拜占庭意大利犹太人（见第五章）此时遍布整个半岛，不同的移民群体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包括13和14世纪逃避迫害与驱逐的德意志犹太人，15世纪末被逐出伊比利亚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16世纪为寻求贸易机会而向西转移的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最后这个群体叫黎凡特犹太人，是半岛上继意大利、阿什肯纳兹、塞法迪之后的第四个犹太人群体。在稍大的城镇里，所有四个群体都保持各自的身份；在威尼斯的隔都，人们至今仍可参观古老的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和黎凡特犹太会堂。最后，在整个16世纪，马拉诺持续从伊比利亚半岛迁来。

像在中欧那样，意大利犹太人基本上被逐出手工业和商人行会，主要靠典当业和与近东的贸易为生，不过并没有统一的模式，犹太人在许多地方仍可从事不同行业。但通常，某个地方有犹太社群，完全是因为这里需要犹太人从事典当业。为了给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地方政府经常给个别犹太人颁发名为康多塔（*condotta*）的契约，允许他们在规定年限内住在某地，条件是必须在那里开典当行。有些地方设立基督教慈善贷款协会，就是想把犹太人排挤出典当业，或诱使他们降低利率。但在许多城镇，犹太典当行和慈善贷款协会和睦共处，相安无事。



康多塔制度还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在需要资本投入的大城市，整个社群的犹太人都会获得康多塔，以满足大规模项目的资金需求。（这就是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的背景。）契约需要定期更新，每次更新时会由犹太社群和地方当局谈判，议定条款。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生活有个特点最有趣：即使被赶进隔都，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这个多姿多彩时代的礼仪、品位、智力活动和消遣方式。就像西班牙的希伯来语黄金时代那样，希伯来语诗歌既是娱乐方式，又是社会和社群生活的载体。但在意大利，犹太人还用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写诗。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品味，意大利犹太人将布道发展成一种正式的演说；犹太布道者将布道文汇编出版，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音乐家特别是弦乐师比比皆是，合唱音乐大大发展，甚至犹太会堂里都能听到；所罗门·德罗西（Salomone de'Rossi）既为曼图亚宫廷创作世俗音乐，又为犹太会堂谱写经文歌。犹大·索莫

（Judah Sommo）创作出第一部希伯来语戏剧。年轻人组织赛会，拉比们不得不就新事物辩论：是否允许在安息日踢球，是否允许犹太人打网球——因为网球比赛也是打赌的场合，而打赌可能是一种禁忌的赌博形式。用纸牌和骰子赌博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利昂·德·摩德纳（Leone de Modena）拉比是17世纪初威尼斯最伟大的布道师之一，他就沉溺此道，不能自拔，曾在回忆录里追悔莫及。然而，尽管参与世俗娱乐和大众文学，但意大利犹太社群的教育基础，仍然是犹太传统的基本著作——《圣经》及其评注和《塔木德》及其评注，以及理性哲学传统的经典，还有《佐哈尔》和其他卡巴拉主义作品。

犹太女商人

虽然格拉西娅夫人是近代早期最有权势的犹太女性，但她并非当时唯一在商业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女性。另一位杰出的模范是本温尼达·阿巴伯内尔，她是伟大的拉比兼朝臣以撒·阿巴伯内尔先生的侄女，本书正文已提到这位拉比曾努力调停与天主教皇室的关系。1492年，身为贵族的阿巴伯内尔家族逃出西班牙，定居那不勒斯。在那里，本温尼达嫁给表兄撒母耳·阿巴伯内尔，他是以撒先生之子，当时已成为那不勒斯国王的一位财政家。本温尼达受过良好教育，甚至做过埃莉诺拉（Eleonora）的家庭教师，埃莉诺拉是西班牙摄政王之女，后来成为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一位公爵之妻。

本温尼达是她丈夫银行事业活跃的合伙人。撒母耳在遗嘱中不顾继承人必须是儿子的犹太律法传统，指定本温尼达为总继承人，让她掌管家族生意。撒母耳解释说，做此决定，是因为他的财富来自她的巨额嫁妆，那是他的创业资本，而且把家业和生意交给她比交给儿子更让他放心。撒母耳只给诸子和三个女儿留下定额遗赠，并规定由本温尼达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转交。

到1547年撒母耳去世时，犹太人已被逐出那不勒斯，他们全家定居在佛莱拉。当年，本温尼达和佛罗伦萨公爵谈成几份银行业合同，公爵许可她和她的一个儿子在托斯卡纳地区诸城镇中开办连锁银行。她和埃莉诺拉的关系一如既往，和其他西班牙贵族一样，她有时会出现在佛罗伦萨的公爵府邸。

意大利的多数犹太妇女和多数基督教妇女一样，都穷困卑微，在家从事丝绸纺织和羊毛加工。但也有一个中产阶级，其中包括像吉内芙拉·布拉妮丝这样的女性，她们住在佛罗伦萨的隔都。佛罗伦萨丝绸行会接纳了吉内芙拉，不是作为卑微的丝绸纺纱工，而是作为丝绸生产商。在她1574年的遗嘱中，她给佛罗伦萨犹太社群留下遗赠，用于教导贫穷的犹太男孩；接济十名犹太贫民；为八名犹太女孩制备嫁妆；还要装饰犹太会堂，“花20枚金币置办一座银质烛台和一袭约柜帷幔，犹太人要承诺以吾名称呼两者”。

16世纪后期，西欧对犹太人越来越友好。1579年，低地诸国摆脱天主教西班牙的控制，获得宗教自由。次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在搜寻秘密犹太人方面原先敷衍了事，此时一下严格起来。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新基督徒和马拉诺从葡萄牙流向阿姆斯特丹，西班牙马拉诺后来也跑到这里。因此，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最繁盛的时期一度得名“荷兰的耶路撒冷”，因为当地犹太人非常多，他们的生活非常丰富。17世纪中叶，德意志犹太人加入塞法迪犹太人，两个社群并肩存在，但塞法迪犹太人赋予这个社群特殊的色彩。许多到达阿姆斯特丹的马拉诺是医生、律师、政府官员和教士；这些知识分子在荷兰找到天然的家园，荷兰在经济大发展时期也是人文主义的中心。犹太人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商业技能和人脉，他们积极参与荷兰的经济扩张。犹太商人在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投资，还远赴苏里南、库拉索岛与荷属巴西。（荷属巴西将成为第一批纽约犹太移民的来源地，见第八章。）到17世纪后期，阿姆斯特丹犹太人获许建造新犹太会堂。一座宏伟的葡萄牙人犹太会堂于1675年落成，是当时阿姆斯特丹最优美的建筑之一，至今仍可参观。

近代新智力思潮对荷兰犹太人生活的影响比对许多其他犹太社群的影响更大。在17世纪后期，荷兰是异端宗教思想、哲学自由思想和智识蓬勃发展的中心。荷兰犹太社群组织（即“马阿麦德”［*mahamad*］）倾向于推行严格的社群纪律，试图控制社群成员出版书籍，但无法阻止犹太人阅读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书刊。马阿麦德的僵化管理与17世纪荷兰典型的宗教宽松气氛格格不入，因此出现令人不安的反抗案例。乌列·达·科斯塔的例子令人心酸，他是葡萄牙新基督徒，回归犹太教并逃到阿姆

斯特丹，加入当地犹太社群。但他在葡萄牙时就对宗教产生怀疑。在阿姆斯特丹，他因自由之思想被当地的马阿麦德革除教籍。他两次恳求与社群和解；他在第二次被勒令忏悔时，受尽羞辱，忏悔过后就自尽身亡。

更重要的例子是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年）。他受过完整的拉比教育，进而研读迈蒙尼德等伟大的中世纪犹太哲学家作品，再研究笛卡尔等近现代哲学家。他加入了一个哲学圈子，其中许多成员和当时的众多思想家一样，完全拒绝把神的启示作为知识的来源，坚持理性至上。由于这些观念意味着否认整个犹太传统的神圣权威，斯宾诺莎在1656年被革除教籍。斯宾诺莎接着写出《神学政治论》，书中包含对犹太教的根本性批判，由此隐含着对基督教的批判。此书陈述了哲学上的自然神论[(1)]，影响巨大，斯宾诺莎的著作在犹太人和基督徒中是检验异端的试金石。

16世纪末，繁荣的汉堡城也开始欢迎犹太人，尤其是塞法迪犹太人。16世纪90年代，12户葡萄牙马拉诺家庭来到汉堡，打算从事贸易。他们起初受到欢迎，但后来他们的犹太身份暴露，基督教神职人员就想驱逐他们。但是，他们的存在被认为十分有益，汉堡参议院允许他们留下。这个社群繁荣发展，尤其是在17世纪，当时西班牙将贸易从阿姆斯特丹转向汉堡的政策赋予它很大的贸易优势；汉堡一度拥有欧洲第二大塞法迪犹太社群。在17世纪中叶以前，德意志犹太人基本上被排斥在汉堡外。

17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重新接纳犹太人，但并未公然推翻1290年的驱逐令。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起，英国就有少量马拉诺；她的医生就是一名马拉诺，后因涉嫌向她投毒而被处决，此事轰动一时。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1625—1649年），马拉诺的数量和经济实力都有所增长，于是出现对其是否宽容的问题。1649年的清教徒革命为宽容铺平道路，因为清教徒推崇《旧约》，同时也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犹太人的商业对国家有利。另一方面，神职阶层担心犹太人会危害基督教，商人也惧怕来自犹太人的竞争。1650年，阿姆斯特丹的玛拿西·本·以色列拉比（1604—1657年）向英国议会请愿，希望允许犹太人进入英国并能公开信奉犹太教；1655年，他亲自来到英国，向政府递交请愿书。克

伦威尔做出非正式保证，允许伦敦有小规模的塞法迪犹太社群。查理二世还确认了对犹太人进入英国的授权，深信他们能给整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比保护英国商人阶层免受竞争更重要。到17世纪末，犹太人可以在英国公开活动。

1618—1648年，蹂躏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实际上促进了中欧犹太社群的发展。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需要巨额资金支撑战争。犹太商人有能力筹集现金，统治者向他们借钱还有一个好处：往往可以用廉价的特许和特权偿还，比如在原来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居住或做生意的权利。这种情况在战争发展到瑞典人入侵德意志时愈发常见；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的君主都不顾民众态度，纯粹出于自身利益而向犹太人借款，并授予他们居住特权。这样，中欧犹太社群的数量和经济地位都得到增长。

三十年战争标志着犹太人开始广泛参与国家财政和大规模军备供应。战争结束后出现许多德意志小邦国，这时出现第一批“宫廷犹太人”，他们都是富人，财力足以满足这些小邦国君主的需求；在18世纪中期以前，宫廷犹太人是欧洲令人瞩目的存在。他们作为财政家和顾问被带到说德语的小宫廷，但职能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直到他们变得不可或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财政事务中，荷兰和汉堡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成了重要人物，哪怕这些国家特别敌视犹太人。宫廷犹太人经常被免除犹太人往往必须忍受的限制；他们能得到头衔和荣誉，有时甚至能和主人一起参与社交活动。但有时，一旦他们失去利用价值，就会被基督徒主人抛弃，他们显然还是基督徒民众的“眼中钉”。宫廷犹太人的活动有个明显特征：他们都是犹太社群内部事务的领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善社群成员的状况，保护犹太人免受攻击。

宫廷犹太人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撒母耳·奥本海默（1630—1703年），他获得融资，负责组织向奥地利军队分发补给，这支军队在17世纪70年代与法国作战，又在1683年保卫遭到奥斯曼土耳其围困的维也纳。1700年，一群暴徒冲进他的住宅，毁掉账目，事后政府拒绝偿还欠债，致使他破产身亡。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参孙·韦特海默（1658—1728年），他资助了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友的军事行动，在171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的加冕典礼上，他被赐予一条金链。

这一时期的犹太大众仍然穷苦，许多人在中欧和东欧四处游荡，靠当小贩、乞丐甚至土匪来谋生。这些流民给当地犹太社群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给慈善资源造成负担。不过，到18世纪，在犹太个人经济实力增强和西欧智力氛围改变的共同作用下，西欧对犹太人的态度开始改善。怀疑论、自然神论和其他启蒙哲学打破基督教对西方智力生活的垄断，评价犹太教和犹太人状况不用再背负神学谴责的负担（虽然狄德罗、伏尔泰等个别启蒙运动的领袖仍然轻蔑地将犹太教视为迷信、蒙昧的体系，认为犹太人无知且排外）。关于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新概念出现了，按照这些概念，国家逐渐被视为由受单独一套法律管辖的个体公民组成，而不再是由自治或半自治实体（包括犹太社群）组成的网络。这些原则并没有立即完全生效，但就已经实施的程度而言，它们有利于作为个体的犹太人，使他们得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

与此同时，这些趋势虽然有利于犹太人个人，但容易削弱犹太社群。提供给个人的机会弱化了社群的控制，许多犹太人对自由做出的反应，是疏远或彻底抛弃犹太社群和犹太传统，以获取法国、德国或其他国籍身份。个体离心力量和社群向心需求之间形成的冲突，成为近现代犹太教的典型问题。

在一个充斥新政治理论的时代，许多知识分子转而关注社会中的犹太人问题，许多思想家设想，犹太人如果经过适当教育，可以为国家体制吸纳。比如，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就渴望“改进”犹太人，使他们对社会更有用，并让他们为接受完整的公民权做好准备——如果他们当之无愧的话。1782年，他多少减轻了他们的税务负担，又采取措施鼓励他们接受社会和语言同化。他的方法看上去可能相当自命不凡，但比起以前那种认为犹太人只配生活在痛苦中的态度来说，已经大有改观。18世纪几位开明的君主采纳了这种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方法，但通常只是口惠而实不至。

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托兰德提出的方法更积极，他在1714年指出，只要授予犹太人公民权利，就能把他们变成更有用、更有生产力的公民。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也持这种观点，作为同情犹太人的德国启蒙运动人士之一，他指出犹太人尽管在宗教和社会上与众不同，但只要他们是人类，就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他关于犹太人的思考受到摩西·门德尔

松（1729—1786年）的影响。门德尔松是德国犹太哲学家，能游刃有余地在犹太世界和启蒙运动世界之间穿梭。门德尔松精通当时的哲学，在当时的智力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也想拯救犹太教，把它作为一种智力体系认真对待。他用启蒙运动的精神重新阐述犹太教的基本思想，认为犹太教绝非堕落的宗教，实际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理想。门德尔松的作品和人格给许多有影响力的非犹太思想家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认为他身上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一个观念，即全人类所共有的理性力量甚至可以使一个落后的民族变得文明开化。

门德尔松为“改进”犹太同胞而努力贡献力量，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来为他们提供一个正确使用德文的范本，他用希伯来文字母印制他的译文，以便他们能够完全读懂。他还影响了一代犹太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希伯来文杂志和书籍向犹太大众传播启蒙思想和现代思想。这些作家史称“启蒙者”（希伯来语为*maskilim*）。

经过最初的犹豫，法国大革命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如果他们愿意适应法国人的文化习俗，放弃在整个中世纪保持的集体身份，就可以享受法国人的全部公民权利。拿破仑对这种立场稍事修改。1806年，他召开犹太名人会议，后又召集一个基本上由拉比参加的犹太教公会，来对名人会议的决议予以宗教认可。该犹太教公会就许多事务做出规定，其中包括：犹太人有宗教义务将自己出生或定居的国家视为祖国，确认法国犹太人热爱其他法国人，谴责高利贷，宣布法国法庭优先于犹太法庭。由此取消了犹太人集体地位的原则后，犹太教公会休会。

这是犹太教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因为第一次有一群犹太人正式定义自己是一种宗教而不是一个民族。由此奠定平等对待犹太人的基础后，拿破仑部分恢复了中世纪体制，成立了一个中枢机构来集体代表犹太人，并监督实施他为犹太人制订的计划。最后，拿破仑建立隶属于宗教部的地区协会（consistories），以监督法国犹太人生活。

拿破仑后来又推行一些歧视犹太人的法律，实际扭转了将犹太人作为帝国公民平等对待的立场；此外，犹太人获得公民身份并没有改变法国人憎恶犹太人的传统，尤其是对阿尔萨斯说德语的犹太人的憎恶。不

过，拿破仑还是被犹太人视为伟大的解放者，整个19世纪，法国犹太人的法律地位不断提高。这对法国西南部领土上的塞法迪犹太人来说尤其有利，他们大多是几个世纪前从毗邻的西班牙逃来的马拉诺的后裔，在文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法国。

法国犹太人的解放扩展到意大利和拿破仑在征服战争中占领的德国领土，并最终在1812年勉强扩展到普鲁士的犹太人。但随着拿破仑帝国崩溃，回潮出现。维也纳会议拒绝批准犹太人在帝国统治下获得的权利，1819年还发生名为“嗨噗！嗨噗！骚乱”的反犹暴动。犹太人积极参与1848年席卷欧洲的自由主义革命，但革命失败再次阻碍全面解放的进程。直到19世纪下半叶，犹太人才在中欧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在意大利，这是随着19世纪60年代国家统一而获得的；在奥匈帝国，是通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在1867年颁布宪法后获得的；在德国，经过起起伏伏，直到1871年德国统一和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不久才获得。在英国，这一进程远没那么旷日持久；19世纪早期，犹太人除了不能担任公职，实际上已享有英国人的所有权利，就连这一差别也在1858年随着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在下议院入座而消失。(2)

摆脱桎梏后，欧洲犹太人迅速像欧洲大众那样实现人口增长和物质进步。他们的人数此时已远远超过中东犹太人，后者的故事上一章已经讲过。随着社会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大量犹太人开始从事新职业，或把传统职业规模做大。犹太人从小贩变成店主再变成商人，从《塔木德》学者变成律师、医生甚至德国的教师（但他们仍然极少能获得大学教授职位）。不到几十年，他们就离开隔都，加入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少数人跟随17世纪宫廷犹太人的脚步，就像他们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所做的那样，为国家提供贷款和承销债券，大获成功。这类代表有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的佩雷拉（Pereiras）家族、普鲁士的布莱希罗德（Bleichroeders）家族。巴伐利亚的犹太地产所有者希尔施男爵还出资修建铁路。

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愿意把犹太人当作公民同胞加以接受，被同化的犹太人不得不一再面对这一事实。反犹情绪根深蒂固，甚至在开明的法国社会的知识分子领袖中也是如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案件就是例子。德雷福斯是法军的犹太人高级军官，1893年被控犯有叛国罪，作为

罪证的文件后来被证实系伪造。这起案件和法国军方的欲盖弥彰受到国际瞩目，尤其是在小说家埃米尔·左拉和阿纳托尔·法郎士干涉后。他们呼吁全世界关注法国军事体制对待德雷福斯的不公正。德雷福斯终获平反，但他已在魔鬼岛流放地服刑了五年。

犹太人地位的急剧变化对社群内部生活影响深远。既然犹太人不再是犹太社群的臣民而是自愿成员，许多人选择脱离社群的控制。有些人甚至皈依基督教，部分是为了给他们触手可及的机会铺平道路，部分仅仅是为了顺应社会主流。但就连许多没有如此极端的人也疏远犹太社群，对宗教仪式敷衍了事，优先考虑欧洲教育而不是犹太教育。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决定；既然犹太教的地位已从民族身份降到宗教身份，它就无法维持真正被这个时代的世俗文化或基督教灵性所吸引的人的忠诚。在另一些情况下，背离传统只是冷漠的产物，因为世上已没有什么能再强迫人们遵守传统。

开明的犹太教领袖试图改革宗教，抵制这些破坏性走向。他们深受支持政治解放的论点的影响，意在把犹太教重建为一种宗教和伦理体系，看起来就像德国的新教；他们希望尽可能减少犹太身份中的民族成分、与犹太身份有关的仪式，以及任何可能把犹太人视为迷信的外国人的宗教行为。在实践层面上，他们改造犹太会堂的仪式，使之更庄严、更合乎理性，并开始用德语布道甚至诵读祈祷文。他们改称犹太会堂为“圣殿”，这是专门留给耶路撒冷圣殿用的词，以表明他们放弃了古老的弥赛亚梦想，即梦想有朝一日为重新团聚的犹太民族重建被罗马摧毁的圣殿。激进的改革家希望废除所有妨碍与非犹太人融合的宗教屏障，如饮食法和禁止与异族通婚的规定。第一所改革派犹太会堂是1818年建立的汉堡圣殿，它发行了一本基于葡萄牙犹太教仪式的改革派祈祷书，其中包括德语而非希伯来语的祈祷文。

犹太学术中一个新的历史学派出现，也促进了犹太宗教传统的现代化，其方法是详细研究和记录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仪式、传统与教义所经历的变化。这种方法为进一步变革提供了历史先例，因为它表明并非所有的仪式都同等神圣，同时它还提供了历史标准，用以证明哪些要素在犹太传统中是真正恒常的，因而也不太容易改变。这股潮流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是亚伯拉罕·盖格（Abraham Geiger，1810—1874年），这位

拉比兼历史学家有点激进，但知识极其渊博。

犹太会堂仪式的变化在德国和奥地利犹太社群中引起很大争议，为此19世纪中叶召开了几次德国拉比会议，试图确定改革原则。但是无法达成一致，结果是正统派和改革派会众在德语国家并存，1840年后在伦敦也是如此。但就连正统派也在参孙·拉斐尔·希尔施（Samson Raphael Hirsch，1808—1888年）等人的领导下逐渐改变，他努力为犹太传统寻找新的智力基础。在撒迦利亚·弗兰克尔（Zacharias Frankel，1801—1875年）与改革派决裂后，出现中间立场。和改革派一样，弗兰克尔也否定传统宗教教义的字面真理，但他的不同在于，他不否定传统宗教仪式所表达的犹太身份中的民族成分。他成了保守派犹太教的思想奠基者，这是第三股趋势，但它直到下个世纪才在美国成为一股重要力量。

罗斯柴尔德家族

罗斯柴尔德这个著名的金融家和慈善家家族之名，源于16世纪挂在法兰克福家族宅邸前的红色盾牌（德语为*roter Schild*）。这个家族在18世纪脱颖而出，当时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引起未来德意志诸侯国黑森-卡塞尔的统治者威廉九世的注意，他是这位统治者的钱币和古董收藏品的供应商。威廉是欧洲最大一笔财富的继承人，梅耶·阿姆谢尔赢得威廉的信任，逐渐增加他在威廉的金融交易中的份额。拿破仑在耶拿获胜（1806年）后，威廉被流放，他把大部分财产托付给梅耶在伦敦的儿子拿单，拿单在为威廉购买债券和保护其利益的过程中自己也发了财，成为伦敦股票交易的中心人物。他借钱给英国政府，资助正在西班牙与法国人作战的威灵顿的军队。他有个兄弟雅各（也叫詹姆斯），定居在巴黎，雅各帮助拿单把这笔巨款成功经法国心脏地带运到西班牙。与此同时，老父亲和长子阿姆谢尔·梅耶则留在法兰克福，另外有两个兄弟所罗门和卡尔分别在维也纳与那不勒斯经营家族生意。

在整个19世纪，主要的罗斯柴尔德企业分属三个商行，分别由梅耶·阿姆谢尔（德国）和他的儿子内森（伦敦）、詹姆斯（巴黎）创办。这三个商行都代表各自政府经营着庞大的金融企业，资助本国的犹太人机构，并为常规慈善机构提供资金。罗斯柴尔德五兄弟的许多后代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通婚，彼此往往有业务联系。尽管外界常常误解，但德

国、法国、英国的三个罗斯柴尔德商行实际上是独立运营的。

德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犹太教改革的争论中支持正统派社群，他们法兰克福的祖宅在“嗨噗！嗨噗！骚乱”和1848年革命中遭到攻击。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该支的领袖是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在促成德国统一的普奥战争中，他站在普鲁士一方；他被选入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后被任命为普鲁士上议院议员。这一支到1901年消亡。法国这支率先开发铁路。它积极支持法国犹太社群的活动，其成员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为巴勒斯坦早期犹太人定居点提供了关键资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沦陷时期，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全都逃脱了德国人对该家族的追捕；一位成员加入“自由法国”组织，在战争结束时是戴高乐政府在巴黎的军事长官的副官。英国商行在创始人拿单去世后，由莱昂内尔·拿单·罗斯柴尔德领导，他在1847年成为英国国会第一位犹太人议员，而他的儿子拿单尼尔是上议院第一位犹太人议员。虽然拿单尼尔没有犹太复国主义倾向，但他的儿子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却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在争取《贝尔福宣言》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些人仍在支持犹太人的事业，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对犹太事务的参与总体上已经减少；向非犹太世界同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对其他犹太人的影响是相似的。



安息日东欧犹太小镇上的犹太人。《安息日》，利奥波德·皮提秋斯基（Leopold Pitichowski）作。照片，版权方为苏珊·考夫曼。美国犹太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 自然神论认为神创造世界，但不干涉人类的生活。——校者注

(2) 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在1847年当选英国下议院第一位犹太人议员，但因为阻力重重，直到1858年才得以在下议院入座。——校者注

第八章　东欧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 1770—1940年

东欧

东欧犹太人的状况远远落后于西欧犹太人。

18世纪70年代，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瓜分波兰，波兰庞大犹太人口中的大部分落入俄国，而在此之前，俄国一直将犹太人排除在外。为了控制这一庞大的“异教徒”人口，俄国只许犹太人在原有的居住地居住，并在刚从土耳其吞并而俄国人又想殖民的一些领土上居住。这一地区被称为“栅栏区”。这一限制经过修修补补，一直持续到俄国革命。180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犹太人法令》，承诺了“最大的自由，最小的限制”。它允许犹太人进入俄国学校，允许犹太人开办自己的学校，只要这些学校用俄语、波兰语或德语开办即可。但它禁止犹太人在乡村居住或租用土地，禁止他们向农民出售酒精饮料。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1447	波兰与立陶宛合并
	1518	对波兰农奴的管辖权从国王转给拥有土地的贵族
对波兰犹太人的管辖权从国王转给贵族	1539	
四地委员会出现	1580	
赫麦尔尼茨基大屠杀	1648	
第一批犹太人到达纽约	1654	
	1655	波兰卷入俄国-瑞典战争
东欧犹太人受到沙巴塔运动影响	1665	
以色列·巴阿尔·谢姆逝世	1760	
四地委员会终止	1764	
波兰东部的犹太人落入俄国统治；维尔纳的拉比们将哈	1772	第一次瓜分波兰

西德主义信徒革除教籍		
	1776	美国独立
俄国行会接纳犹太商人	1778	
俄国犹太人从农村被驱逐到城镇	1782	
	1789	法国大革命；《美国宪法》通过
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俄国犹太人定居的栅栏区	1791	美国通过《人权法案》
	1795	第三次瓜分波兰，波兰全境分割完毕
	1812	拿破仑入侵俄国
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成立改革派会众	1824	
俄国下令设立“儿童营”	1842	
	1848	欧洲革命促使说德语的犹太人大批移民美国
	1861—1865	美国内战
敖德萨集体迫害	1871	
美国希伯来会众协进会成立	1873	
犹太人从东欧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开始	1881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暗杀
基希涅夫集体迫害	1903	
犹太人向美国移民达到高峰	1906—1909	
俄国的贝里斯审判	1911—1913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	俄国革命
犹太人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结束	1924	
	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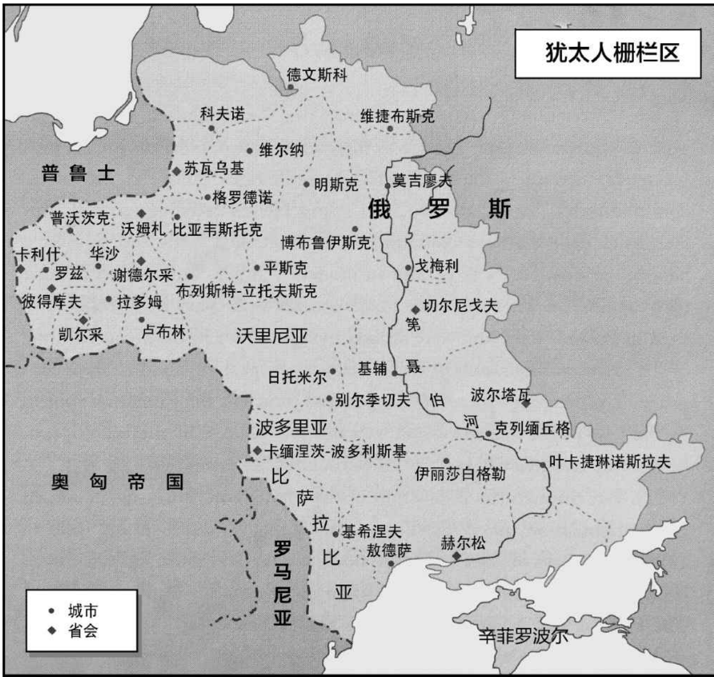
后来，俄国采取措施将犹太人全部逐出乡村，与农民隔离；犹太人先是被约束在栅栏区的有限领地内，接着被塞进城镇。这一驱逐带来犹太集市小镇的扩张，这些小镇在意第绪语里叫“施泰托”（*shtetls*），其经济以集市为中心，各类店主、工匠、小贩熙熙攘攘，东欧庞大犹太人口中的大部分就住在这些小镇上。只有少数犹太人能够作为大商人进入俄国，而城市犹太无产阶级的出现则很缓慢。

拿破仑战败后，亚历山大自命不凡的开明专制让位于维也纳会议所传达出的反动态度，他对犹太人的压制愈发严厉。他的继任者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忽然想到清除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的办法：用军队作为工具，把犹太人同化进普通民众。他规定了服兵役的犹太男青年的配额。正常情况下，年满18岁后要服役25年，但犹太儿童12岁就从家中被带走，在名为“儿童营”（Cantonist battalion）的特殊部队接受训练，年满18岁后再开始正常服役。在受训期间，想方设法让他们皈依俄罗斯东正教。这项法令让犹太社群痛苦不堪，因为负责执行法令的社群领袖自然会保护自家孩子，而用穷人的孩子凑满配额。

另一个同化犹太青年的措施是为犹太人建立包含宗教与世俗课程的现代学校，但目的是让他们更接近基督徒，削弱他们对传统信仰的依恋。大部分犹太人察觉到课程背后的同化动机，因此这些学校从未受到广泛欢迎，但其少数毕业生日后在俄国成为犹太知识分子阶层的核心。历任沙皇还采取其他措施鼓励同化，他们奖励同化程度高的犹太人，惩罚其他人。

但即使在犹太社群内部，也有人看到将教育制度和犹太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好处。在摩西·门德尔松及其弟子的影响下，犹太启蒙运动发端于德国，又经过加利西亚（Galicia）传到东欧。加利西亚位于波兰南部，在波兰被瓜分后落入奥地利手中。与栅栏区的犹太人相比，伦贝格（Lemberg）和布罗迪（Brody）等大城市中的犹太人与德国语言文化的接触更密切，虽然他们是严格的正统派，但有些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知识，并用希伯来语讲授这些知识，使东欧犹太青年一窥现代文学与科学。对于数千名犹太经学院的学生来说，这类书籍不啻是一扇通往激动人心但又有点危险的新世界的窗户，经学院学生虽然精通希伯来语，但思想却受传统课程的局限而显得僵化。村里的自由思想者和被抓到把一本希伯来语小说夹在对开本《塔木德》中的经学院男孩，成了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19世纪中期的希伯来语教材、小说和诗歌为现代希伯来语文学奠定基础，也为希伯来语在世纪末作为口语的复兴奠定基础。在19世纪的后三十几年，意第绪语也成为现代文学语言，特别是通过沙洛姆·阿布拉莫维奇（Shalom Abramowitsch，1835—1917年）和肖洛姆·拉比诺维茨（Sholem Rabinovitz，1859—1916年）的作品，前者的笔名

是门捷列·默克尔·塞福里姆（Mendele Mokher Seforim）[(1)]，后者的笔名是肖洛姆·阿莱汉姆（Sholem Aleichem）[(2)]。



东欧犹太大众没有被席卷西欧犹太人的宗教改革所影响，但他们当中也出现几股宗教潮流。在18世纪，哈西德主义兴起，这是一场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群众性宗教运动。以色列·巴阿尔·谢姆（约1700—1760年）创立的哈西德主义最先席卷乌克兰，然后横扫其他斯拉夫领土，它是对推崇《塔木德》所产生的过度理智倾向的纠正，这种倾向已主宰了东欧犹太人的虔诚。哈西德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植根于卡巴拉，但在实践层面却迎合普通人，强调欣喜若狂的崇拜，及以理想化的天真为形式的宗教表达。其领导人是魅力非凡的拉比，叫“柴迪克”（*zaddikim*）；他们在犹太小镇建立法庭，接受信众的效忠与示敬，这些信众常常远道而来，像朝圣者那样寻求灵感、建议，或只为得到祝福。一些柴迪克自称能够创造奇迹，或者有传言说他们能这样做；许多柴迪克被信众当作皇室一样对待，获得可观的财富。

意第绪语

意第绪语本质上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从西欧带来的一种德语方言，从中世纪起，这些犹太人的中心就逐渐东移。因为阿什肯纳兹社群本身起源于意大利语和法语地区，所以这种德语方言总包含一些罗曼语单词和语音，其中有些在现代意第绪语中还能找到。但是，意第绪语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要等到犹太人在波希米亚和波兰先后接触斯拉夫人以后。在阿什肯纳兹犹太移民东渐之际，原先住在这些地方的犹太人说一种犹太-斯拉夫语，这种语言逐渐消失（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后，犹太难民分批涌入巴尔干地区，他们说的西班牙语逐渐替代了当地犹太人说的罗马尼奥特语）。不过，移民和原住犹太人口的相互交流，使意第绪语中包含许多斯拉夫语成分。1500—1700年，随着东欧犹太人日益脱离德语区，他们的语言也越来越独特。意第绪语中的希伯来语和亚兰语成分在数量与重要性上有所增加，相关词汇不光与宗教有关，还被用来表达各种日常活动。这类成分总是出现在犹太人的交谈中；它们在广为研读的宗教文本如《圣经》及其评注、《塔木德》及其评注中随处可见，这些著作不仅涉及宗教主题，而且探讨日常生活。

大约在1700年以后，留在德语世界的犹太人在语言上倾向于向普通德语同化，因此西方的意第绪语逐渐消失。在东欧，到19世纪中叶，一种现代化的意第绪语文学开始出现，意第绪语出版业也应运而生；最终，用意第绪语授课的学校建立起来了，将意第绪语用作正规工作语言的犹太社会和行政机构也纷纷成立。但是，赞成犹太人融入欧洲生活的社会力量不看好意第绪语，就像他们也不看好犹太身份的其他方面一样。在20世纪早期，大部分城市中的东欧犹太人改说俄语或波兰语，虽然重要的说意第绪语的机构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在城市中存在。在犹太小镇中，意第绪语一直是犹太人的主要语言，但这里的犹太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减少，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消灭。苏联一度鼓励发展意第绪语文化，作为苏联众多民族语言之一和新兴犹太无产阶级文化的载体，但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转而反对意第绪语和其他形式的犹太人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大量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及其文化机构。从1948年开始，苏联积极打压犹太文化，这里的意第绪语文化告终。

在1880—1924年间，数目庞大的东欧移民将意第绪语大规模带到美国。虽然这些移民对家乡的犹太小镇满怀乡愁，但他们更渴望抓住美国提供的机会，而不是保护母语文化，他们鼓励子女掌握英语，不惜忍受代沟的痛苦。虽然大部分人会把子女送到午后课堂接受犹太教育，但这些孩子所接受的教育，通常只是父母在犹太小镇里接受的犹太教育的缩水版，着重教授用希伯来语念诵祈祷文和研读《托拉》。希伯来语也以牺牲意第绪语为代价在犹太教育中获得地位，因为它在巴勒斯坦复兴为口语；美国犹太儿童如果学过任何犹太语言，基本上都是学的希伯来语。到第三代时，东欧犹太移民的后裔只认得少量意第绪语单词。

在美国以外，以色列、阿根廷和加拿大还有小规模的世俗意第绪语出版业和剧院。只在一个社群里，意第绪语继续作为日常语言蓬勃发展，这就是极端正统派犹太社群，尤其是在纽约和耶路撒冷的这种社群中。意第绪语学术研究在德国大学中广泛开展，它被认为是对中世纪德语的重要见证。在美国，对意第绪语的研究和文献整理受到意第绪语科学研究所（YIVO）的特别支持，这是一个科学研究意第绪语的组织，1925年在维尔纳成立，从1940年以来一直以纽约为中心开展活动。

哈西德主义遭到立陶宛一众伟大的学者-拉比的严厉攻击，这些人以维尔纳的以利亚（1720—1797年）为首。东欧犹太经学院的领袖正确地察觉到，哈西德主义是对其自身权威和领导地位的攻击。哈西德主义信徒被反对者（希伯来语为*Mitnaggedim*）革除教籍，双方有时向政府当局互相告发。虽然哈西德主义最初是个不太正统的运动，它在面对19世纪的现代化趋势时，却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势力，近来作为犹太教中最显眼的传统势力再次出现。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促成集体迫害（pogroms），尤其是在乌克兰，随后在反动的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下，更多压制犹太人的规定出台。1882年5月的法规可谓政府官方反犹政策的集大成者，它将犹太人驱逐出乡村，并把他们限制在栅栏区的城镇中。但这时已有许多杰出犹太商人和专业人士获准定居莫斯科，在那里建起一个重要社群，并建造了一座精美的犹太会堂，名为合唱会堂，屹立至今。1891年，整个犹太社群被逐出莫斯科，合唱会堂被封。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

（1894—1917年），俄国反动派以反犹主义为武器，与解放专制政权的进步势力作斗争。反动派炮制出诽谤性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伪作声称可以证明犹太人玩弄国际阴谋，想要夺取世界权力。

大约从1880年起，犹太人开始离开俄国，大批向西半球移民。这次外迁持续了40多年，一些特定的事件促成了这一外迁运动，如1881—1882年的集体迫害、1891年的专横法令、1903—1907年俄国的政治剧变等。但受迫害不是外迁的主要原因，因为大量犹太人也从罗马尼亚和奥匈帝国东部离开，那里远比在沙皇统治下安全。贫困才是主要原因。俄国犹太人的数量已经增长到580万，但仍被排除在俄国工业重镇和农业生产之外。人口过剩，经济机会渺茫，大量犹太人陷入痛苦绝望之中。阿根廷和加拿大等国人口稀少，有致富机会，也欢迎移民，但美国更强大、更富裕，机会遍地；此外，美国还有宗教自由的强大传统和一个成功的犹太社群。美国成了东欧弃儿的首选目的地。

没有离开的犹太人尝试了其他办法。一些人皈依基督教，这个办法不尽如人意，它不仅意味着切断家族联系，而且皈依后并不能在俄国东正教社会里获得社会认同。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宗教歧视转向种族歧视。

对一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有吸引力的解决办法。许多犹太人作为劳工从犹太小镇搬到城市，他们在一些城市成了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员。当时工作条件恶劣，他们和非犹太工人一起受到左翼政治思想的影响。许多犹太人加入激进团体，寻求用国际主义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希望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会使民族身份无关紧要。有些人成功完成这一转变，但许多人要么没能放弃犹太身份，要么受到集体迫害事件的刺激，恢复了犹太身份。1897年，俄国和波兰犹太工人联盟（Bund）成立；它后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下属机构，代表党内的犹太人势力。由于坚持犹太人的民族-文化自治，该联盟于1903年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继续运作，成立自卫组织来抵抗集体迫害，并促进教育和文化活动。

哈西德主义大师

东欧犹太教最具特色的一个发展是柴迪克的出现，他们是哈西德运

动的宗教领袖。这类领袖的典范是以色列·巴阿尔·谢姆，一位广受欢迎的治疗师。他开巫术配方、造护身符、念咒语，引领追随者做欣喜若狂的祈祷，提供实践和精神方面的指导。许多人相信他有超自然的能力，能见凡人所不见。他的一些追随者在东欧不同的犹太小镇自立门户，其中许多人建立的宗教社群长期存在，由他们的后代和门徒领导。这些社群各自的特色通常源于创始人的个性和教导。每个社群都有经过世代传承形成的知识体系，包括创始大师的格言和教诲、他的生平和轶事（有时包括神迹故事）、宗教乐曲（通常没有歌词）以及该社群独有的宗教仪式。这些社群中有许多在成立200年后仍然存在。

巴阿尔·谢姆的主要弟子是缅济热茨的多夫·贝尔（Dov Baer of Mezhirech，俗称“传道者”）和波罗诺耶的雅各·约瑟（Jacob Joseph of Polonnoye）。多夫·贝尔是《塔木德》学者和神秘主义者；他因极端苦修行为而染病，前往巴阿尔·谢姆处求医，从此留下做了弟子，后来成了他的传人。雅各·约瑟阐述了一套关于柴迪克角色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柴迪克就像人体的头或眼睛，他的社群成员就像脚；社群是鲜活的有机体，所有部件都发挥关键作用，以实现对上帝的真正忠诚，但柴迪克的责任是对其他人施加影响，其他人的责任是毫无保留地信奉他。

巴阿尔·谢姆的另一位弟子利亚迪的史努尔·扎尔曼（Shneur Zalman of Lyady）把哈西德主义带到立陶宛。他被当地正统派领袖告发到政府，后在圣彼得堡以叛国嫌疑受审，但被无罪释放。他获释的日子直到今天仍被他所创立的宗教运动的追随者庆祝，这一运动今天通常叫卢巴维奇派（Lubavitch）哈西德主义。在过去20年里，卢巴维奇派在纽约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复兴。别尔季切夫的利未·以撒（Levi Isaac of Berdichev）是极受欢迎的柴迪克，他比其他柴迪克更加强调欣喜若狂的祈祷的重要性；他的名气来自他的意第绪语祈祷文，其中他为犹太人的苦难而责备上帝。为了争取犹太人支持哈西德主义，他和他的追随者四处旅行。

其他大师的号召力要小得多。巴阿尔·谢姆之孙——布拉斯拉夫的纳赫曼（Nahman of Bratslav），持一种激进的柴迪克观念，相当于说他本人身上包含弥赛亚的灵魂，而他的一位后代将真正成为弥赛亚。为传授这一理念和其他神秘主义教义，他讲过不少故事，如今被当作文学杰

作。但纳赫曼此人喜怒无常，复杂而矛盾。他要求追随者定期向他忏悔；与其他柴迪克不同，他不是在每个安息日和节日都接待追随者，而只在一年中接待几次。他在乌克兰的陵墓长久以来一直是这派追随者的朝圣地，特别是在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后。科茨克的梅纳赫姆·孟德尔（Menahem Mendel of Kotzk）宣扬一种灵性完美的教义，他这方面的信念是如此毫不妥协，以致对弟子大发雷霆。最终，他将自己锁进书房边的一间密室，虽然他的追随者可以去那里集会，但在此后20年，几乎没有人见过他。

犹太复国主义，或者说一种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是另一种普遍的解决办法。我们将把它留到第十章作为以色列国的历史背景来讨论。

沙皇政权的衰落伴随着犹太人地位的持续恶化。1903年，基希涅夫（Kishinev）发生重大集体迫害。1905年10月17日，沙皇发表宣言组建立宪政府，次日，300多个城市出现持续一周的右翼发动的集体迫害。1911年，在政府支持下，连血祭诽谤也死灰复燃。一名基督教男孩在基辅被发现遭到谋杀；虽然警方已经知道凶手及其动机，但一位名叫孟德尔·贝里斯的犹太人还是受到指控，说他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谋杀男孩，贝里斯先入狱两年再受审。对贝里斯的指控引发全世界的强烈抗议，就像大马士革血祭诽谤（见第六章）和德雷福斯事件（见第七章）那样。尽管法官想方设法妨碍辩护，但贝里斯还是被一个由公正的农民组成的陪审团宣告无罪。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犹太人被迫迁出交战区（为了给战事腾出地方，不得不废除栅栏区），许多犹太小镇在战争中被摧毁。

因此，犹太人对沙皇退位和1917年临时政府的建立持欢迎态度，并视之为奇迹，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似乎即将卸除。不过，当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掌权后，全国各地出现骇人听闻的集体迫害，尤其是在1918年和1919年的乌克兰；唯一没有迫害犹太人的武装团体是布尔什维克红军，它实际上还惩罚了一些行凶者。犹太人开始视红军为保护者，一些人加入共产党，并不是为了献身于共产主义，而是出自某种不能再坐以待毙的犹太行动主义。布尔什维克解散了形形

色色的犹太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想在政治上继续活跃的成员只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设立了自己的犹太支部。共产党及其犹太支部着手瓦解犹太宗教，并将犹太社群纳入新的无产阶级社群。

这种尝试演变成一场犹太内战，说意第绪语的犹太共产党人把矛头指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说希伯来语的人（希伯来语被谴责为精英的资产阶级语言，相形之下，意第绪语被推崇为大众的无产阶级语言）和信教者。但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党调整方向，鼓励苏联境内各种民族文化发展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坚持用当地语言开展政府和党的活动。党的资源向苏联境内众多民族团体的文化组织开放，其结果之一是国家支持的意第绪语文化的繁荣。意第绪语书籍和报纸开始出现，一些非俄籍意第绪语作家移民到苏联，希望参与这场复兴，但为时已晚。意第绪语读者年事已高，年轻人更喜欢俄语，因为俄国社会似乎机会更多。俄国犹太人和他们的美国表亲一样，乐于为现代世界而抛弃犹太小镇。

这种对个体文化的新兴趣与让留在犹太小镇的贫穷犹太人恢复元气的愿望一拍即合，催生出创办犹太人农业殖民地的想法。这将使犹太人能够在符合社会主义理念的合作定居点谋生，同时还允许他们过世俗化的犹太生活。犹太人曾在20世纪初试验过农业殖民地。此时更开辟出许多新殖民地，但并不大成功，当它们在1928年被集体化时，许多犹太人弃之而去。不过就在这一年，一个最浮夸的此类实验被付诸实施，显然是斯大林本人提议的：在比罗比詹（Birobidzhan）建起一个大规模犹太人定居点。这块面积和比利时相当的远东领土被标榜为“犹太土地”，暗示如果试验成功，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犹太共和国。1934年，该地区被宣布为“犹太人自治区”。但比罗比詹生活艰苦，没有吸引到大批犹太人口。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政策再次转向，开始反对各色民族文化，包括犹太文化。党内犹太支部的领导人被指控有民族主义倾向，遭到清洗。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的指导下开始的密集工业化为城市创造出工作岗位。大量犹太人趁机大幅改善生活，但也在此过程中将残存的传统生活抛弃。他们生活在非犹太人中间，渴望提升自己，故将俄国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尽管苏联和美国有许多不同，但犹

太人在两国的发展趋势是类似的：随着犹太人在文化上渐渐适应，许多人进入职业阶层、文化领域，甚至军队；他们自然也和非犹太人通婚。但在苏联，犹太机构所剩无几，而且国家排斥任何宗教。在这种形势下，犹太人的宗教、文化甚至身份都开始蒸发。

与此同时，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成为独立国家，许多东欧犹太人因而没有受到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直接影响。波兰起初保障境内少数民族团体的权利；但几个因素交相作用，导致旧的反犹主义模式得以延续，甚至加剧。波兰军队在1920年进入乌克兰，犹太人村庄遭到袭击，仿佛它们是军事目标。在整个20年代，在经济上歧视犹太人的论调威胁要将他们排除在国家经济生活之外，其理论根据是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养活“本地人”或犹太人中的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犹太人主导的产业被国有化，犹太人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政策带来痛苦，但在波兰城市中，仍存在一个稳固的犹太中产阶级，他们说波兰语，穿西服，享受着舒适生活。在这一时期，以意第绪语电影、戏剧和文学为载体的犹太文化有过短暂繁荣。

美国

直到19世纪末，东欧一直是犹太人口和文化的主要中心，但犹太人在1880年前后开始从欧洲向美国大规模迁移，逐渐使美国犹太社群变成占主导地位的流散社群。

当东欧的大规模移民潮兴起时，美国已经有了成熟的犹太社群。第一批犹太人定居者来自荷兰在巴西的殖民地累西腓（Recife），是23名塞法迪犹太人难民，他们于1654年到达新阿姆斯特丹，此前葡萄牙人刚从荷兰人手里夺取累西腓。在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的罗德岛殖民地有过一个短期存在的犹太社群，位于新港。它于18世纪50年代重建，1763年建造的美观的新港犹太会堂现在是国家纪念馆。在18世纪，一位皈依基督教清教的犹太人在哈佛大学教授希伯来语，他撰写过一本希伯来语语法书，这是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使用希伯来语字体的书籍。到18世纪中叶，新港、纽约、费城、查尔斯顿和萨凡纳（Savannah）都拥有犹太社群。到美国革命时，各殖民地大约已有2000名犹太人，大部分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塞法迪犹太人的习俗更盛行。不过他们的宗教知识水平不高，面临的同化压力很大。

大部分犹太定居者支持美国革命，大约一百人参加作战，新港的亚伦·洛佩兹（Aaron Lopez）和费城的哈伊姆·萨罗门（Haym Salomon）这两人还参与战争融资。萨罗门此前已因间谍和破坏活动被英国人判处死刑。在战争期间，他预支给大陆会议20万美元军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他一直未能收回这笔钱，死时倾家荡产。1789年通过的联邦宪法取消了公务员的宗教测试和宣誓，使犹太人可以担任联邦职务（但各州只是逐渐取消这种宣誓；在新罕布什尔州，公开自己犹太身份的人直到1868年仍不能在州政府任职）。第一修正案的通过意味着政教分离，对犹太人来说，这赋予他们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平等。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批来自巴伐利亚说德语的犹太移民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的犹太移民使美国犹太人口大大增加；一些人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政治难民，但大多数是被美国廉价土地和新兴城市吸引的小贩与牲口贩子。这些犹太人和美国既有犹太人的显著区别在

于，他们的文化适应程度要低很多，而行为和宗教态度要传统很多。他们也不同于当时大部分欧洲非犹太移民，因为他们带来贸易经验，愿意在零售贸易迅速扩张的时代所产生的对商业技能的需求中获益。德裔犹太小贩扎堆聚集在城市中的德语街区（比如纽约的下东区），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远至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安家立业，为掘金者服务。在纽约，他们很快从推车小贩变成商店业主。

到美国内战时，美国各地包括中西部和南部，都有小型的犹太社群。这些城镇里的许多犹太人成了大商人。犹太人的世俗组织生活也开始出现，1843年，圣约之子会成立，它相当于犹太人的共济会和独立共济会（Independent Order of Odd Fellows）。之后，其他慈善组织、社会团体和兄弟会纷纷成立。犹太会堂也陆续建成，部分是出于虔诚，部分是作为与旧大陆的纽带。大多数犹太会堂最初照搬欧洲正统派犹太会堂的崇拜方式，后渐渐调整，变得更加美国化：取消男女分座，引进管风琴，还在仪式中使用一些英语。1824年，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成立了一个改革派会众，很快，纽约的以马内利圣殿也有了改革派会众。这些改革派会众努力发展一种符合美国社会环境的风格和仪式，以反映犹太人并非外来者，而是社会的正式成员，哪怕会以违背传统观点和做法为代价。

改革派犹太教的一个重要代言人是以撒·梅耶·怀斯（1819—1900年），他在奥尔巴尼当过拉比，时间不长，然后在辛辛那提一所犹太会堂当拉比，将改革派仪式引入这所会堂。在这一职位上，他精力充沛地为犹太人事业奔走，毕生致力于完全实现犹太人在美国生活的正常化。怀斯创办了周报《古以色列人》（*The Israelite*）。他试图把美国犹太宗教机构统一在自己麾下，但面对以撒·李瑟（Isaac Leeser）领导的宗教右翼和大卫·埃因霍恩（David Einhorn）领导的宗教左翼的联合反对，他很快败下阵来。

在美国内战中，犹太人通常与邻居站在同一边，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只有两位拉比公开站在强烈要求废奴的立场上，他们是费城的正统派拉比萨巴托·莫莱斯（Sabato Morais）和巴尔的摩的改革派拉比大卫·埃因霍恩。

战后，犹太人继续兴旺发达，主要从事零售业；他们普遍经营服装生意，拥有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百货商场。只有少数人从事金融业，但犹太人在这个领域还不太突出。尽管已很繁荣，但犹太人仍然不能获得非犹太社会的接受。新犹太中产阶级的成员也有与上一代努力奋斗的犹太小贩同样的需要：创建自己的社会机构，包括社交俱乐部和慈善组织，以抗衡继续排斥他们的这类机构。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慈善组织向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提供援助。

但来自中欧的移民仍在抵达。到1880年，说德语的犹太人和改革派犹太教主宰了美国犹太人，以致改革派犹太教成为美国犹太教的同义词，而美国改革派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彻底的改革派犹太教。在上次尝试失败后，怀斯这次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改革派犹太教，在1873年创建了美国希伯来会众协进会（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在1875年创办一所神学院——希伯来联合学院。改革派运动的原则是在1885年《匹兹堡纲领》中确立的，它几乎全盘否定犹太人的传统仪式和民族抱负，试图把犹太教重新定义为一股促进社会正义的力量。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东欧移民潮是犹太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它从根本上永久改变了美国犹太人的特质。到1918年，美国犹太社群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美国从1924年开始关闭大门，它的犹太人口此时已增长到450万。

这股移民潮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国所有主要城市都有人口稠密的犹太区，尤其在较老的贫民区里。这些移民大多是来自俄国的贫困犹太人，他们当工人，许多人从事服装业，这很快成为一个独特的犹太行业。在生产服装的血汗工厂，残酷的工作条件令犹太人投身于劳工运动；随着世纪之交服装生产越来越工业化，以及1906年俄国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后社会主义犹太工人联盟（Bund）的领袖来到美国，工会主义得到加强。

犹太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促使意第绪语文化活动激增。意第绪语报纸、剧场、讲座涌现，后来又有意第绪语广播节目，甚至有意第绪语音乐出版商。意第绪语文化活动在内容上主要是世俗的，但满怀对故土风

情的乡愁。它由意第绪语出版界和犹太劳工运动尤其是“工人圈”（Workmen's Circle）组织促成，并为参加者提供社会福利。一些同乡会（*landsmanshaftn*）也向移民提供帮助；数百座小犹太会堂纷纷落成，为移民服务。但是，这个多姿多彩的时期很快就在文化适应的进程中落幕，这再自然不过了，因为犹太人在美国没有抱团生存的传统，再者美国对大部分少数群体几乎没有设置任何法律障碍。移民的孩子以最快的速度美国化，大都离开移民街区，把对故土的乡愁抛在脑后。但是，这段移民时期给纽约等大城市的特征留下印记，它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仍清晰可见，并保留至今。

富裕的德裔犹太人努力成为美国人，并获得非犹太人承认，在他们看来，东欧同胞的到来造成问题。新来者来自欧洲落后地区；他们贫穷，勉强算是受过教育，虽然有英文读写能力，但不会说英语。德裔犹太人担心，这些“古怪”的同胞不但会成为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还会引起反犹主义，在此之前，美国的反犹主义充其量不过是非犹太人的势利，以及将犹太人排斥在俱乐部、私立学校和兄弟会外而已。不仅如此，这两类犹太人的人生观也显著有别：德裔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完全的美国人，只在宗教上和其他美国人不同（他们能否说服非犹太人相信这点则另当别论），但东欧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习惯了充当不同化的少数派，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异乡的异客。东欧的犹太性包括宗教实践，但没有被宗教实践所定义，因为即使在大多数人放弃或大幅减少宗教实践后，他们仍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凝聚力的群体。与德裔犹太人相比，他们非常熟悉犹太传统，但对欧洲上层文化相当陌生，也没有德裔犹太人那种要让非犹太人接受的抱负。

德裔犹太人担负起帮助移民安家和美国化的责任，部分是因为不想让公众看移民的笑话从而危及自身地位，但部分也是因为德裔犹太人确实觉得与新来者同气连枝，尽管存在许多差异。他们建起一个慈善和教育机构的网络，援助贫困群体，帮助他们找工作；在许多城市，这些慈善机构联合成犹太慈善联盟，共同募集和分配资金。（这些联盟至今仍在，并在美国犹太人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还和自由派合作，开展了一项有效的政治运动，维护移民政策的开放。然而，这两个群体

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因为俄裔人感到德裔人颐指气使。随着俄裔犹太人数量的增长及其经济状况获得改善，他们开始为美国犹太人定下一个完全不同于德裔犹太人的基调。

一些犹太领袖担心，由于文化适应步伐过快，年轻一代正受到激进社会学说和物质主义的双重诱惑。纽约的美国犹太神学院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后在所罗门·谢克特的领导下于1902年重组，目的是为现代说英语的拉比提供培训，使他们能够吸引第一代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犹太人。谢克特是杰出的犹太教学者，曾在剑桥大学教授拉比文献。作为宗教领袖，他努力建立各种机构，传播撒迦利亚·弗兰克尔曾在德国提倡的那种自由化但经得起史学检验的犹太教。于是，继改革派犹太教和由移民建立的各种正统派机构之后，保守派犹太教成了与它们并驾齐驱的第三个宗教运动。这个运动走中间路线，对第二代美国犹太人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故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它是美国这三个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移民时期建立的另一个重要教育机构是叶施瓦大学，其中还包括一所小学和一所拉比神学院，1928年以后还增加了一所提供世俗研究和传统《塔木德》教育的学院。叶施瓦大学一直是正统派犹太教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尽管正统派不如改革派和保守派犹太教那样组织集中，而且在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城市中还存在许多也被称为“叶施瓦”的小型传统经学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裔犹太移民向老资格的德裔犹太人发起挑战，争夺对美国犹太人事务的领导权。联合分配委员会的成立旨在救济困在俄国与同盟国交战区（即世界犹太人的主要人口中心，在以前的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在这个组织中，尽管德裔犹太人是主要的资金提供者，但东欧裔代表却能与他们平起平坐。为了接替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工作，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被组织起来，因为前者的总部设在柏林，而战乱让它陷于瘫痪。除该运动的主席、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以外，德裔犹太人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坚信犹太教仅仅是一种宗教，这就使基本上都是亲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东欧裔犹太人在世界犹太人事务上有了发言权。东欧裔犹太人开始占据上风，特别是在美国犹太代表大会里。这个组织试图创建一个总机构，美国犹

太人可以通过它协调犹太人政策。在1918年春季举行的该大会的代表选举中，东欧裔犹太人取得主导权，促使一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获得通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治转向孤立主义，1919—1921年的“红色恐慌”让外国人成了“心怀叵测”的代名词。犹太人尤其成为被敌视的目标，部分是因为犹太人在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团体中确实表现突出。汽车业大亨亨利·福特以白纸黑字公开攻击犹太人，说他们是劣等种族，参与了企图控制世界文明的大阴谋；他甚至在他的公司报纸上重新刊登《锡安长老会纪要》。三K党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获得广泛政治权利，把犹太人同黑人及天主教徒一起当作打击目标。种族主义政府官员也炮制数据，证明犹太人、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在智力与道德上劣于北欧移民。这些敌视导致1924年《约翰逊法案》出台，从而把所有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缩减成涓涓细流，美国犹太史上一个重要时期随之结束。

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时期，移民子女开始进入白领职业，虽然大多数进入商业领域，尤其是服装贸易和房地产业。他们在许多行业中仍然受歧视，比如医学和牙医。尽管犹太人擅长金融业的观点很流行，但在这一时期，一个犹太人几乎不可能拥有或受雇于银行，在保险公司进入管理层同样不可能。（不过，还是有几家犹太人的投资银行。）犹太人还被排除在律师事务所和零售连锁店之外。20年代早期，在常青藤联盟大学就读的犹太学生人数显著增加，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等大学就实行配额制，减少犹太人的入学人数。医学院分配给犹太人的名额少得可怜，许多犹太学生被迫去意大利学医。不过，纽约有择优录取的免费大学教育，纽约城市学院为数千犹太人提供教育机会，帮助他们进入职业生涯；因此，从事体力劳动的犹太人逐渐减少。犹太人也被吸引到智力和艺术行业，如出版、娱乐和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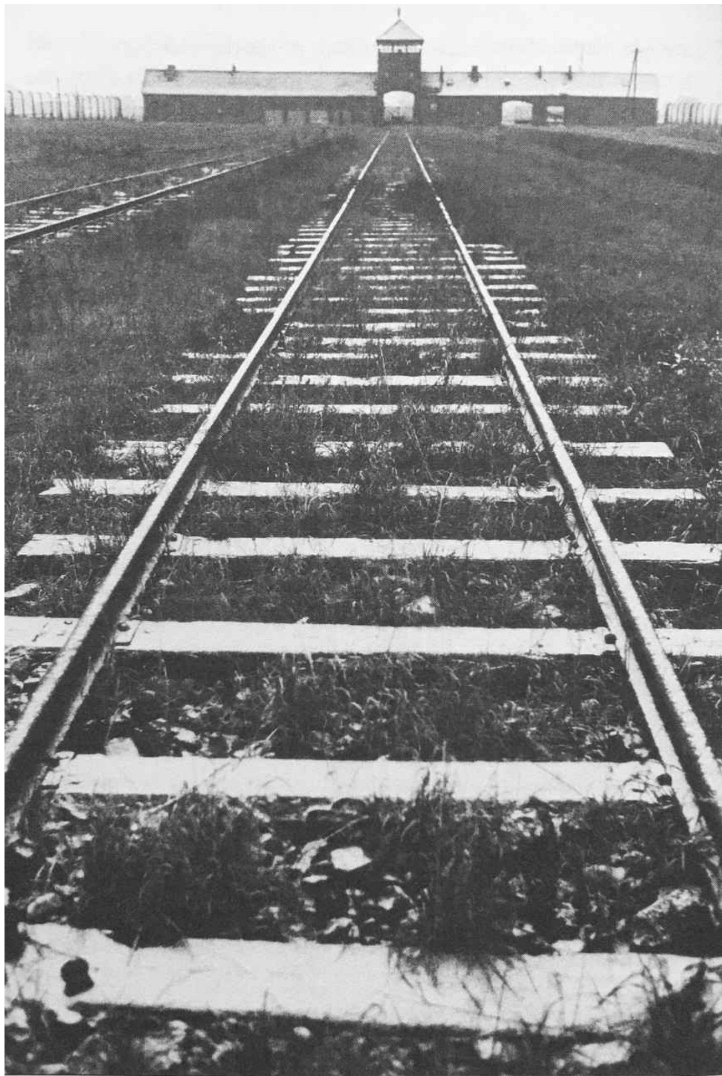
始于1929年股市崩盘的大萧条给犹太慈善机构带来压力。它还造成令人担忧的反犹主义的抬头，部分表现为就业方面对犹太人越来越歧视。天主教神父查尔斯·考哥林（Charles Coughlin）在他的广播节目中定期向工人阶级选民抨击犹太人，在德国纳粹崛起的背景下，这让犹太人感到非常不安。但犹太人继续在商业和职业上取得成功。罗斯福新政

形成一个择优录取的官僚体系，提供数千岗位，联邦政府成为不歧视犹太人的主要美国雇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东欧裔犹太人的宠儿，因为他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并拒绝反犹主义。

1933年后，犹太人在德国的地位恶化，这把大约33000名德国犹太人赶到美国。其中包括科学家（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知识分子；他们的调整适应往往艰难，主要是因为美国自身正在经历经济困难。但他们很快就在美国智力和科学生活的许多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有效地把德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从欧洲赶到美国。

美国流散社群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犹太社群。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到，巴比伦犹太人如何迅速从一个流亡社群（即一个意识到自己的外来性并积极希望返回家园的社群），转变成一个流散社群（即一个被给予返回家园的机会但决定留下，并对返回者感到强烈亲情与责任的社群）。流散社群一般被当作更大社会中的外来团体，其成员与其他犹太流散社群的联系要比他们与非犹太人国民的联系更紧密，他们更多地活在遥远的犹太过去和对犹太未来的憧憬中，而不是活在当下。启蒙运动提供的解决方法是解散这个团体，而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相反的解决方法，即重建犹太人的民族国家。然而，美国是建立在全体公民平等基础之上的国家，且主要由新移民组成，这里出现了一种新型流散社群。在这里，犹太人可以成为更大社会的完全参与者，同时又保持对全世界犹太人的忠诚，并维持规范内部事务的志愿机构。移民本人可能远远未能完全融入美国社会，但下一代完全融入的可能性则容易想象，本人成功或孩子成功的许多例子强化了他们融入的雄心。因此，在美国流散社群中，犹太人可以第一次既能积极当犹太人，又不觉得自己身处流散地。

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在美国找到家园。他们忍受背井离乡和颠沛流离的精神创伤，却极大地改善了生活。许多人在一生中从食不果腹迈向飞黄腾达，从一个把他们当成可恨的外国人的世界来到一片保证他们作为完整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土地。他们甚至可以展望更美好的未来。不过，尚有几百万犹太人留在欧洲，而且即将灰飞烟灭。



通向奥斯威辛的最后一段铁轨。照片，版权方为莎莉·索姆斯，由约翰·帕内尔为本书翻拍。纽约犹太博物馆提供。

(1) 字面意思是“书商门捷列”。——校者注

(2) 字面意思是“愿你平安”，为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中的问候语。——校者注

第九章　纳粹屠犹

1938—1945年间，欧洲大陆上的千年犹太史以大屠杀告终。这场浩劫的规模超出人类想象，永久改变了全世界犹太人的面貌。

19世纪，德国犹太人被赋予公民权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欣然接受德国的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文化适应所提供的机遇几乎不可抗拒。就连情愿与犹太过去保留联系的人，也看到德国文化与德国经济体系的优越，遂采纳西欧生活方式，将德国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1870—1871年，在普鲁士和法国交战期间，犹太人与其他德国人并肩战斗，对自己的德国公民身份倍感自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德国犹太士兵荣获铁十字勋章，对他们个人和家族来说，这不仅是对英勇作战的认可，更是忠于祖国的证据。

然而，如果说犹太人对更大社会的态度有了深刻变化，这个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却鲜有起色。多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疑心重重地视犹太人为异类，基督教神职人员在布道中反反复复说他们是杀害救世主的凶手，他们还被当作恶棍，要为所有不幸负责。人们没有特别的理由去消除这份根深蒂固的遗俗，遂听之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社会面临战败国的压力，欧洲基督徒对犹太人一贯以来的厌恶又浮出水面，其方式和强度是德国犹太人完全始料未及的，他们自以为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德国社会。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1889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
	1925—1927	希特勒《我的奋斗》出版
	1932	富兰克林·罗斯福任美国总统
德国发生抵制犹太人运动	1933	希特勒成为总理
《纽伦堡法案》	1935	
碎玻璃之夜；意大利的种族立法	1938	奥地利被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遭瓜分
匈牙利犹太人丧失公民权；波兰集体迫害	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入侵波兰

法国维希政权推行歧视犹太人法律；波兰设立隔都	1940	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
犹太人被禁止迁出德国；海乌姆诺（Chelmno）设立第一所死亡营	1941	
	1942	万湖会议
大批犹太人被运到奥斯威辛	1942—1944	
丹麦犹太人偷渡至瑞典；德国宣布肃清犹太人	1943	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败，德国在北非战败，意大利投降
匈牙利犹太人遭灭绝	1944	诺曼底登陆
集中营被解放	1945	德国投降
	1946	纽伦堡审判开始

一战后德国的环境有助于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抬头。战败蒙羞以及获胜协约国的索赔压榨造成的经济危机，使许多德国人敌视外部世界。战后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也致使人心惶惶，许多人担心不久前刚推翻俄国政权的共产主义革命会出现在德国。为了回应这些态度，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始出现。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组织和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通常简称“纳粹”）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在希特勒职业生涯初期，犹太人就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声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不是德国人民的过错，而是因为犹太人背信弃义。他还指责犹太人掀起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称他们正在德国谋划一场类似的革命。除了这些政治观点，他还散布一种伪科学的种族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德国人及其他北欧人属于高级人种“雅利安人”，在容貌、体力、智力上都出类拔萃，堪称优等种族。其他民族属于劣等种族，可按等级排列：雅利安人之下是地中海人，地中海人之下是斯拉夫人，而处在最底部的，是排在黑人之后的犹太人，他们天生就是腐蚀和摧毁文明的犯罪种族。希特勒声称，犹太人和德国人通婚是为了削弱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犹太人参军是为了当内奸，犹太人写书是为了腐蚀德国的智力生活，犹太人当艺术家是为了用颓废的污秽污染德国，犹太人渗透进商业公司是为了摧毁这些公司和德国工人。最重要的是，犹太人策划了这场经济危机。不过，希特勒说日耳曼人终究不可战胜，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比其他人种优越，生来就注定统治

世界。

希特勒在他早期政治宣言《我的奋斗》（1925—1927年）中写道：只有摧毁犹太人，才能迎来德国的复兴。因此，从一开始，消灭犹太人就是希特勒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他能够吸引德国大众的原因之一。他的口号是“犹太人是我们的灾星”。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把希特勒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对犹太人的战争”，是不无道理的。

纳粹党不是通过革命或政变上台的，希特勒也没有“夺取政权”。希特勒能赢得大批追随者，是因为他所散布的包括威胁犹太人在内的暴力言论广受欢迎，而这些追随者够多够强，足以使他成为在1919—1933年间统治德国的民主政体（一般称为魏玛共和国）中的玩家。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通过合乎宪法的途径成为总理，在同年3月5日举行的选举中，纳粹党又以44%的选票获得对政府的控制权，得以贯彻他的政治纲领。

在纳粹执政的最初几年，政府的政策是破坏犹太人的生计，逼迫他们离开德国。选举刚结束，在1933年4月1日，该政策就以全国抵制犹太商业和专业机构的形式生效，这项政策对政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4月7日，犹太人被清除出公务员队伍。4月11日，“非雅利安人”（定义是至少有一位犹太祖父母的人）的法律范畴设立，这是为了加速犹太人与德国社会其他成员的隔离。随着时间推移，适用于“非雅利安人”的法律纷纷获得通过。各行各业的就业大门对“非雅利安人”一扇扇关上。最后，犹太儿童也被赶出学校。

犹太人很快成为纳粹民兵和政府官员任意施暴、胡乱逮捕和当众羞辱的对象。“犹太人免进”的警示牌出现在工商企业、咖啡馆、体育场馆和旅游度假地，甚至公园长椅也分设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专座。战争纪念碑上的犹太人名字被抹去，威胁犹太人的海报随处可见。这一阶段迫害的顶点是1935年《纽伦堡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还强制推行其他限制与规定。

与此同时，集中营开始建造。1933年建在达豪的集中营是最早的一批之一。它最初用来关押“政治犯”或“危险分子”，如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同性恋者，以及一些被认为具

有潜在危险的犹太人，如作家、记者和律师。1936年，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接管集中营，他们有权拘留任何人。随后，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又新建起两座集中营。次年，犹太人开始被关进集中营，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在这些压迫之下，许多犹太人离开德国，但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流。并非所有德国犹太人都有国外关系，允许他们进入另一个国家，也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有移民的经济条件，而且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对移民有严格限制。此外，大多数犹太人难以相信反犹政策能够持续，或者希特勒这样的怪物能够长期控制一个现代而先进的国家。大多数犹太人觉得自己完全是德国人，以为德国同胞迟早会清醒，要么推翻纳粹政府，要么逼其改弦更张。令他们灰心的是，他们发觉大多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困境无动于衷，不愿冒险反对官方政策，或者他们实际上赞同政府的反犹政策，尽管和犹太人有个人友谊或长期交往。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受反犹法律影响的人甚至都算不上是犹太人。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德国犹太人已完全同化，他们与非犹太人通婚，改信基督教，放弃与有组织的犹太社群的一切联系。更多犹太人虽然没这么极端，但也试图将生活中的犹太成分降到最低限度。但对非雅利安人的严格定义意味着，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孙辈也被算作犹太人，哪怕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有犹太血统。在中世纪，犹太人一般可以通过改宗自救，但《纽伦堡法案》逼迫犹太人移民，否则无法自保。

1938年3月，当德国吞并奥地利时，在德奥两国民众势不可挡的热情之下，奥地利基督徒自发攻击和羞辱奥地利犹太人。此外，新的官方措施也被用来对付犹太人；德国在当年晚些时候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并于1939年占领整个捷克，之后也采取了类似做法。但是，真正为犹太人在德国的生活敲响丧钟的事件发生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夜晚，史称“碎玻璃之夜”。是夜，德国全境的犹太商户和会堂遭到打砸破坏，许多犹太人沦为一场全国范围的集体迫害的受害者。政府声称，这次事件系民众自发，目的是报复一名犹太人在巴黎谋杀一名德国政府官员，但它实际上由政府特工周密策划和协调实施。政府处理得好像是犹太人自己引起破坏的一样。德国犹太社群被处以10亿马克的罚款，新反犹法规被强制实施，犹太儿童遭学校开除，大批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不

过，在这一阶段，如果犹太人能拿到签证，获准进入其他国家，仍可以从集中营获释。



1937—1941年纳粹屠犹前夜的欧洲犹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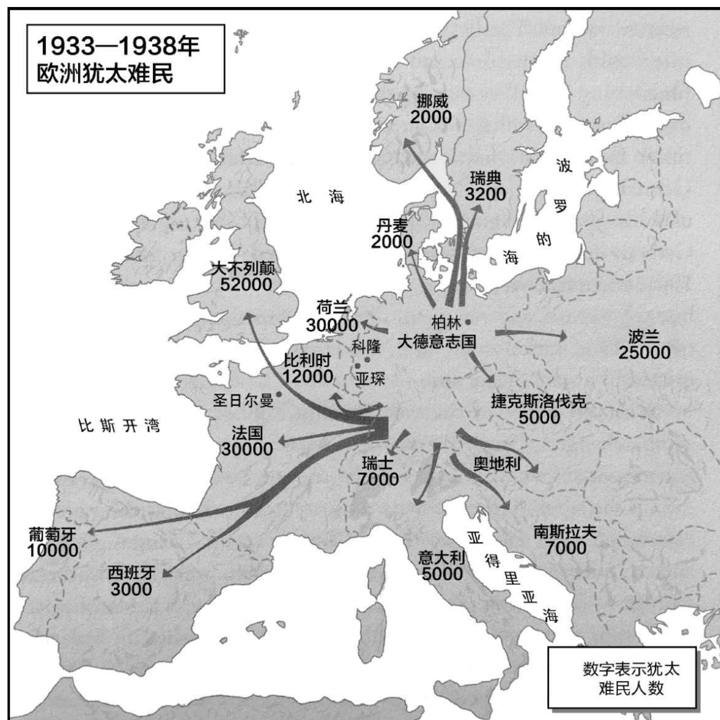
“碎玻璃之夜”事件后，德国犹太人的文化与经济生活彻底走到尽头。现在没有人再怀疑逃离德国的必要性。许多犹太人匆忙廉价抛售产业，外国领事馆前排起申请签证的长队。为了尽快驱逐犹太人，德国政府先在维也纳，后在布拉格和柏林设立移民中心，简化移民手续，加速犹太人外迁和对犹太人财产的侵占。政府想用大量犹太移民压垮邻国，从而激发邻国的反犹情绪。可是即使犹太人已经陷入绝境，几乎没有国家愿意放松移民限制，控制巴勒斯坦的英国还在此时减少了那里接收移民的配额（见第十章）。可怕的情景出现了，不少船只满载着有时甚至带着合法移民证件的犹太难民，从一个又一个港口被遣返，不得不驶回欧洲的犹太人屠场。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从此无法再逃离欧洲，但德国试图将犹太人驱逐到邻国的政策一直持续到1941年末，那时已禁止向外移民，对德国犹太人的政策已变成谋杀。

但在东欧，对犹太人的蓄意谋杀已经开始。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时，波兰是世界上犹太人口最集中的国家，也是犹太宗教与文化生活的主要中心。占领波兰后，德国人实施适用于德国境内的反犹规定与限制，但实施力度要大很多。犹太人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折磨和枪杀，到1939年底，超过25万犹太人被害身亡。德国人高度重视对波兰犹太人的镇压和毁灭，有时甚至将其看得比军事利益更重要。在铁路交通发达的城市，比如罗兹、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他们建立隔都，把这些城市和数千个村庄中的犹太人塞进隔都；在隔都外非法逗留的犹太人一经发现，即遭处决。德国人命令犹太人佩戴黄色六芒星，以便于辨认。他们侵占犹太人的产业，强迫隔都居民做苦力，特别是干诸如修路之类与战事有关的重活，还让他们挨饿和受虐待。

犹太隔都由听命于德国人的犹太理事会（Jewish councils）管理，这种安排表面上延续了犹太人半自治的传统模式，也因此有助于制造一切如常的假象。但是，德国人设立犹太理事会，最终目的是要实施自己的计划。随着战争的进行，犹太理事会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它们并不是为绝望的隔都居民提供组织援助，而是满足德国人的需求。这些需求变本加厉，让理事会的理事进退两难。

在战争初期，隔都内的犹太人尚能得到国外犹太救济组织的援助，被征召的犹太劳工还能拿到配给。较大的隔都有时组织得相当好，在拥挤、贫穷、疾病和普遍的虚幻气氛中，慈善组织、学校、医疗服务机构尽可能地发挥作用。个别犹太人有时发现，通过贿赂和合作能获得德国警卫的特殊照顾。但是，管理隔都生活的规定不断收紧，德国人的要求不断增加，到1941年底，从外界接收食物包裹遭到禁止，饥饿、疾病和死亡率于是便显著攀升。官方规定的食物配给每天只有1100卡路里，隔都里的犹太居民饿得奄奄一息。



随着战争的开始，集中营的功能发生变化。以前只是用它们关押威胁政权的敌对分子或敌对嫌疑人，现在则用它们剥削囚犯的劳动力。集中营还用来执行集体灭绝：有项安乐死计划是杀害精神病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在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女子集中营，还有一项计划是将怀孕的犹太妇女用毒气毒死。因此，抓进集中营的犯人越来越多，波兰的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马伊达内克（Majdanek）和索比堡（Sobibor）建造了新的集中营。从1941年开始，几座集中营增设焚尸炉，处理囚犯尸体，操作焚尸炉的也是囚犯，他们遭定期处决，以防焚尸炉的内幕外泄。

德国人在1940年入侵法国后，把非法国籍犹太难民从德占区驱逐到维希傀儡政府所控制的地区。维希政府配合贯彻反犹政策的力度超出纳粹的期望。它禁止犹太人参与公开活动，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还设立由法国人管理的集中营，非法国籍犹太人从这里被运到东部杀害，但法国籍犹太人受到保护，免于驱逐出境。相形之下，在法国沦陷区，巴黎附近的德朗西（Drancy）建有一座集中营，许多法国籍犹太人从那里被运往奥斯威辛。德国于1942年底占领法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犹太人便涌

入由意大利占领的小块地区。德国人在1943年入侵意大利后，这些犹太人只能坐以待毙。

在其他被占领的国家，对德国的反犹政策是否合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合作，各国差异很大。在荷兰，对犹太人的迫害激怒了公众并引起总罢工，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教会领袖号召大家抵制，许多荷兰基督徒藏匿犹太人。但大多数荷兰犹太人还是被送往集中营。包括国王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丹麦基督徒保护丹麦犹太人，设法将他们用渡轮运过海峡，送到瑞典，拯救了几乎整个丹麦犹太社群。保加利亚人也拒绝与德国人合作，保加利亚犹太人因此躲过一劫。

意大利虽然是德国盟友，也处在一个官方反犹的法西斯政权的控制下，但在其整个参战期间都没有配合“对犹太人的战争”。它颁布反犹立法，也适时地设立了集中营，但在围捕犹太人方面只是敷衍了事，且意大利集中营里的待遇也比较人道。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以后，意大利犹太人才真正开始遭受厄运。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居住着大多数当地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德国人将他们围捕并送进死亡营。即便如此，许多犹太人还是得到非犹太朋友的保护。天主教的许多机构，如男、女修道院甚至梵蒂冈，都暗中抵制德国法令，藏匿犹太人。但是，教宗庇护十二世从未抗议德国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西方世界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在当时的缄默，直到今天仍被视为一大憾事。

上述情况还不算太糟。在其他国家，如罗马尼亚，德国的占领助长了长期流行的反犹主义，导致它成为消灭犹太人的得力帮凶。匈牙利只要保持独立，就不会驱逐犹太人，尽管它在战争中站在德国一边；但在战争后期，德国入侵匈牙利后，匈牙利警方、当地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反犹的“箭十字”（Arrow Cross）运动也开始协助驱逐匈牙利犹太人。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希腊，犹太人（主要是塞法迪犹太人）的毁灭几乎是彻底的。希腊犹太人的毁灭终结了萨洛尼卡的犹太社群，这是历史上塞法迪犹太人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见第六章）。

1941年6月，德国人入侵苏联，成立特别的机动杀人小分队（或称“别动队”［*Einsatzgruppen*］），负责在德国控制的广阔新领土上谋杀

苏联人民委员（commissars）、共产党员、游击队员、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别动队可以处决平民百姓而丝毫不受掣肘，并与武装部队协同作战。他们肆虐于东欧乡间，围捕小镇上的犹太人，用机枪扫射、溺毙或用汽车尾气窒息犹太人。乌克兰、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的辅军往往热衷参与杀戮。最臭名昭著的这类行动发生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Babi Yar），1941年9月29日至30日，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在那里杀害了约3.3万名犹太人。

入侵苏联后不久，德国人决定要“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即系统消灭欧洲所有犹太人。阿道夫·艾希曼被授权启动这一计划。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奥斯威辛集中营变成一个主要的死亡营。1942年1月，所有相关的军政代表在柏林郊区的万湖集会，以明确这一灭绝政策，并协调决议的执行。虽然这只被当成普通行动，但其实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因为欧洲仍有大约1100万犹太人需要转移、安置、杀害和处理。抽调如此大规模的人力、物资和运力，与一个无助而分散的少数族群作战，而且又要多线作战，并要控制许多满怀敌意的占领区，足见纳粹德国执着于犹太人问题的疯狂程度。

艾希曼选择波兰作为灭绝中心，既因为这里是犹太人口的主要中心，又因为当地居民有着古老而根深蒂固的反犹传统，可以指望他们合作。欧洲所有犹太人都要用货车车厢运到罗兹、里加、明斯克和科夫诺（Kovno）的犹太隔都，再从那里与当地犹太人一起转运到波兰几座集中营。隔都中的犹太理事会负责按照规定配额定期交出犹太人。运输条件极端严酷，大量犹太人甚至没有抵达集中营就死在途中。所有被判定为没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抵达后即遭处决，其余的则在劳役中累死，或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被杀害。

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已在试验机械化的大规模杀戮，以取代苏联境内别动队那种效率较低的作业。六所集中营现在已成为死亡营，那里的囚犯被一氧化碳或氢氰酸气体毒杀。1942年夏，集中营里引入伪装成淋浴室的毒气室系统，毒气室里使用法本（I. G. Farben）公司生产的杀虫剂齐克隆B（Zyklon B）。这种新手段能在四五分钟内毒杀七八百人，另有数千人无辜地等待轮到他们获准“淋浴”。负责运尸的囚犯在火化前从尸体上收走金牙、戒指和头发；之后，骨灰被加工成肥料，衣服经熏蒸

消毒再回收利用。1943年底，苏联部队逼近，纳粹被迫放弃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的集中营，但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毒气行刑一直持续到1944年11月。

役使集中营囚犯劳动，是为了维持必要的工业生产，以保障战事进行和后方供应。法本、克虏伯（Krupp）、蒂森（Thyssen）、弗利克（Flick）和西门子几大公司（它们至今仍然是德国主要的工业公司）控制了这种奴隶劳动，这些公司的劳动力中约有40%来自集中营。使用囚犯效益很高，因为囚犯得不到什么食物，几乎没有医疗服务，可以一直工作到死，再由别人顶替。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平均只能活9个月。

即便已经有传言将驱逐犹太人的真正目的传回隔都，隔都里对驱逐的抵制仍然很少。饥饿而消沉的犹太人很容易逆来顺受。一旦出现抵制，主要是由年轻人，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体所为。隔都的犹太高层通常不支持抵制活动，因为必然会招致报复。最著名的起义发生在华沙隔都。早在1942年，一个犹太战斗组织就在那里成立，并设法将武器走私进隔都；该组织还和波兰抵抗运动接触，但未能实现合作。在1943年1月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犹太人杀死20名德国人。这鼓舞了隔都士气，为更大规模的行动赢得支持；同时也引起波兰抵抗运动的注意，他们同意向犹太人出售武器。德国人决定肃清隔都。他们于4月19日抵达，犹太人奋起还击，德国人不得不烧毁隔都，镇压起义。这次抵抗持续了五周。虽说可能只是一种无望的反抗姿态，但华沙犹太青年的战斗精神激励了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其他隔都和一些死亡营也相继出现起义。

1942—1943年，随着东欧的犹太隔都和村庄遭到肃清，犹太人成群结队逃入密林，以游击队员的身份作战，他们或加入苏联游击队，或自己组织游击队。犹太游击队的处境不如苏联游击队有利，因为这种非法游击队只有得到当地民众的协助才能生存，但在东欧，农村群众一向对犹太人怀有敌意，就连非犹太的游击队也往往不愿与他们合作。不过，仍有大约2万名犹太人参与游击行动，破坏警察局、杀害纳粹卫兵、炸毁列车、用手雷炸瘫坦克。

战争接近尾声之际，苏联军队穿越波兰，那里的集中营不得不拆

除，囚犯也被迫撤离。这一次，没有人提供运输工具。犹太人和其他囚犯只能在毫无给养的情况下向西徒步走到德国，因此，仅仅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就有大约25万犹太人在这些死亡行军中丧生。战争快结束时，苏联和美国的士兵解放了剩余的集中营，集中营囚犯的状况让他们目瞪口呆。大多数犹太人在战后依旧艰难度日，往往要在流离失所者的收容营里长期逗留。战争结束后，许多东欧犹太人踏上返乡之路，却在一系列集体迫害中惨遭杀害，凶手是波兰和乌克兰的城镇居民，这些劫后余生的东欧民众把怨愤都发泄到传统替罪羊即犹太人身上。

尽管许多资源本可以用来抵御同盟国的攻势，德国还是把它们耗费在“对犹太人的战争”上，几乎一直持续到德国投降为止。虽然德国在与同盟国的战争中遭受重创，但它在“对犹太人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战争结束时，德国几乎没有犹太人了，而东欧这个世界犹太人的中心已化为墓地，那里的犹太机构四分五裂，那里的犹太居民或死或散。欧洲的犹太人生活已经走到尽头。

华沙隔都

1939年9月德国人占领华沙时，华沙只有不到40万犹太人。1940年，一堵围墙拔地而起，将840英亩的土地圈作隔都。到11月中旬，所有犹太人被勒令住在墙内，墙外有德国和波兰警察看守，墙内有犹太民兵把守；没有许可证，任何人不得出入隔都。德国人会不时改动围墙位置以缩小隔都面积，还一度把隔都分割成两个独立区域，由一座人行天桥连接。他们又把华沙周边地区的15万犹太难民塞进隔都，直到人口密度达到13人挤一间房，而无家可归者只得在饥寒交迫中奄奄一息地挤满街头。

在围墙内，与其他隔都一样，华沙犹太人由一个犹太理事会（Judenrat）管理，负责提供条件允许的社会服务，并按德国人的要求行事。在束手无望的境况下，华沙隔都由亚当·捷尼亚科夫领导，这位工程师是睿智而勤勉的管理者。捷尼亚科夫那本内容丰富的日记本是从战争中幸存的寥寥几本日记中的一本，我们关于华沙隔都的大部分信息就来自他的日记。捷尼亚科夫竭尽所能，改善隔都的生活条件，平衡争夺稀缺资源的各种群体的需求。德国人后来要求他配合，将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他因此而自杀（1942年7月23日）。

尽管困难重重，华沙隔都仍勉强维持着一座城市的功能。非法作坊以及一个运进原料并运出产品的走私体系维持着基本生活所需（非法进口食物实际上是隔都居民赖以生存的手段，因为法律允许的每日食物配额每人不到1100卡路里）。施食处不但分发食物，还充当非法的世俗、宗教和职业学校的掩护，提供技术、医疗和科学培训。尽管犹太会堂被关闭，公共礼拜遭禁止，但礼拜仪式仍在私下举行，《塔木德》学院仍在秘密运作。有时甚至还有营业的咖啡馆和歌舞厅。地下组织仍在印制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波兰语的非法期刊。

正是这些地下组织领导的抵抗活动，最终升级成一场著名的起义。这些地下组织的政治承诺各不相同，有时甚至相互敌对。但面对始于1942年7月的第一波大规模驱逐，它们决定成立犹太战斗组织（ZOB）以协调行动。该机构包括大多数地下组织，其中一些能够从波兰地下组织或黑市获得武器。犹太战斗组织建立了生产手榴弹和炸弹的秘密车

间，并通过一个由掩体和地下通道组成的网络进行联络。始于1943年1月的第二波驱逐引发了为期4天的街头巷战，这是在德占波兰发生的首起此类事件。德国人的反应是实行24小时宵禁。隔都生活这时陷入停顿；犹太理事会瘫痪，社会机构停止运作。但是，在末底改·阿涅莱维奇的领导下，犹太战斗组织继续为武装抵抗做准备，以便驱逐恢复时有所行动。

1943年4月19日，德国人返回隔都，遇到激烈抵抗，不得不撤退。他们更换指挥官，卷土重来。再次遇到坚决抵抗后，德国人以烧毁隔都应对。虽然隔都内已经十户九空，但地下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8日犹太战斗组织在米拉（Mila）街的总部失守，阿涅莱维奇遇害。一些武装抵抗持续到6月。部分战斗人员逃脱后组建了一支以阿涅莱维奇命名的游击队。5月16日，德国人炸毁特罗马卡（Tlomacka）街上的犹太大会堂，庆祝华沙隔都毁灭。



20世纪40年代以色列的游行场面。照片，版权方为大卫·鲁宾格/科比斯。

第十章　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的起源

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致使意大利和德国各自统一，又以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瓦解为代价，在巴尔干和东欧催生出一些独立国家。欧洲犹太人仍在为自己面临的困境寻求解决办法：在东欧，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被接受的外来团体；在西欧，虽然他们已经取得充分的公民身份和权利，但反犹主义势头不减。一次次民族复兴运动为犹太人树立潜在榜样。适用于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模式，说不定也适用于犹太人。

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被所有国家视为“欧洲病夫”，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夺走它的一些领土。许多犹太人开始构想建立一个国家实体来恢复正常生活，以此解决犹太人问题。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摩西·赫斯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	1862	
佩塔提克瓦建立	1878	
埃利泽·本-耶胡达到达巴勒斯坦；俄国南部发生集体迫害	1881	
平斯克出版《自我解放》；“比卢”运动出现；里雄莱锡安建立	1882	
赫茨尔出版《犹太国》	1896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1897	
第二次阿利亚运动	1902	
赫茨尔逝世	1904	
特拉维夫建立	1909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人占领耶路撒冷	1917	俄国革命
第三次阿利亚运动	1919—1923	
英国委任统治开始；耶路撒	1920	

冷发生阿拉伯人骚乱		
赫伯特·撒母耳任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	1920—1925	
魏茨曼任第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主席	1921	
第四次阿利亚运动	1924—1932	
丘吉尔的白皮书	1922	
希伯来大学开张	1925	
耶路撒冷发生阿拉伯人骚乱；希伯仑和采法特发生屠杀事件	1929	
伊尔贡成立	1931	
第五次阿利亚运动	1933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阿拉伯人骚乱	1936	
皮尔委员会提案分割巴勒斯坦	1937	
麦克唐纳的白皮书	1939	
	1939—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
雅博廷斯基逝世	1940	
帕尔马赫组织成立	1941	
修正派袭击英国人；犹太旅成立	1944	
非法移民问题加剧并与英国人抗争	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修正派在大卫王酒店制造爆炸	1946	
联合国投票分割巴勒斯坦	1947	

鉴于犹太人近两千年来一直梦想返回以色列地，建立犹太国家的首选地点自然就是那里。巴勒斯坦已经有可观的犹太人口，其中有西班牙的塞法迪难民的后裔、中东国家近来移民的后裔，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受各种宗教运动影响而从欧洲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后裔。在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前，那里的犹太人口不断增长，到1860年，犹太人开始在耶路撒冷城墙外新建居住区，这些街区如今已成闹市区。虽然生活方式仍旧遵循传统的宗教和经济模式，但人们对建立农业定居点产生兴趣，特别是在1870年世界犹太人联盟创办一所农业学校以后。

摩西·赫斯的《罗马与耶路撒冷》首次明确表达了建立犹太国家的希

望，此书于1862年在德国出版。东欧的利奥·平斯克吸收这一理念，写出《自我解放》（1882年）；一些希伯来语媒体作家如埃利泽·本-耶胡达（见下文）也接受这个理念。然而，正是1881年俄国的集体迫害（见第八章）才直接催生出一些统称为“热爱锡安”（*Hibbat zion*）运动的犹太民族主义组织。这一运动起源于东欧犹太人，大部分东欧犹太人已经对融入主流社会感到绝望，正因如此，东欧的犹太教育、传统生活、民族凝聚力都异常强大。在这些组织中，第一个组团向巴勒斯坦移民的组织是“比卢”运动（得名于《圣经》中一句规劝“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的首字母缩写）。

西欧犹太人总体上仍坚持融入非犹太社会的解放理想，并不完全沉浸于犹太传统，他们对犹太民族主义要么冷眼旁观，要么积极反对，不过他们也承认这或许能解决东欧同胞的问题。然而，把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转变成一场国际运动的，却是一名同化了的匈牙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年）似乎不太可能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他是生活在维也纳的作家和记者，对犹太教几乎一无所知，倒是很推崇法国，视之为具有进步与启蒙思想的国度。作为维也纳一家报社驻巴黎的通讯员，他对德雷福斯事件暴露的法国反犹主义深感震惊，遂将余生致力于寻求犹太人问题的全球解决方案。他在著作《犹太国》（1896年）中力主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在小说《新故土》（1902年）中预言这个国家能够取得的社会及技术成就。虽然他在西欧犹太人中知音寥寥，但东欧犹太人却对他推崇备至。

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组织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会议的高潮是达成了一项决议，声称“犹太复国主义立志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受公法保障的民族家园”。赫茨尔想让奥斯曼苏丹批准他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未果后转而与英国谈判，希望英国同意在乌干达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这一计划暴露出赫茨尔的想法与东欧犹太大众的民族感情大相径庭，他们愤怒的反应一度削弱了他的领导权。但英国最终退出谈判，赫茨尔又恢复在巴勒斯坦创建犹太国家的计划，毕竟那里是犹太人的发祥地，是他们一直魂牵梦绕的归宿。

与此同时，“比卢”的移民加入自15世纪奥斯曼征服以来就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各色犹太人的行列。他们想要建立农业殖民地，为未来的犹太

人定居点打下基础，同时也为所有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迈出重要一步。他们满怀理想主义，但缺乏必要的实际技能，若非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给予大量财政援助，他们肯定会失败的。

与犹太民族主义一同兴起的，是希伯来语作为口语的复兴，这是犹太民族在现代取得的杰出的集体文化成就。希伯来语作为口语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没人再讲，但在犹太历史上仍作为书面语言广泛使用。与基督教世界的拉丁语不同，对希伯来语的了解并不限于神职人员或富裕的精英阶层。为了适应缺乏正常国家制度的现实，犹太教早就规定，终生坚持用《圣经》最初所用的语言学习《圣经》和拉比传统是所有犹太人的宗教义务。不光神职人员，所有犹太成年男子每天都要朗诵复杂冗长的希伯来语祈祷文。大多数犹太人的学校教育以学习希伯来语开蒙，继而记诵长篇希伯来语文本。因此，自古以来，在传统犹太社群里，即使文化程度较低者也保留着大量被动习得的希伯来语知识。正因为希伯来语知识在东欧犹太人中相当普及，犹太“启蒙者”才能在18世纪晚期使用希伯来语，向东欧犹太大众传授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等现代学科。我们看到，到19世纪中期，希伯来语已用于诗歌和小说创作。

作为现代欧洲人，赫茨尔一度设想犹太国家的语言是德语或俄语，但鉴于语言在当时兴起的各种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过更传统教育的东欧犹太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自然转向希伯来语。希伯来语运动的推动者是埃利泽·本-耶胡达（1858—1922年），他一生致力于恢复犹太人民的故国和语言。1881年，他搬到巴勒斯坦，告诉妻子从此只用希伯来语和她交流，遂开始了他复兴希伯来语的奋斗。在语音上，他采用巴勒斯坦当时广泛流行的塞法迪发音，这至今仍是希伯来口语的基础。

希伯来语复兴

现代犹太人最辉煌的集体成就，甚至可能比以色列建国更卓著，就是复兴希伯来语。从来没有其他语言可以像这样在长时间不说后还能复兴。

19世纪后期，东欧充满理想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受希伯来语的强烈吸引，把这门语言视为自己努力重建的民族身份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还使用希伯来语，强使自己与东欧犹太小镇中基于意第绪语的文化决裂。他们认为，在让犹太人重新成为故土上劳动与耕耘的民族的尝试中，复兴希伯来语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产物。这也与将巴勒斯坦作为所有流散社群的犹太人共同家园的概念相符；希伯来语可能只是书面语言，但它是所有犹太人唯一的共同语言。这一事实也反映了19世纪耶路撒冷的真实情况，说阿拉伯语、意第绪语和拉迪诺语的犹太人在该城混居，他们经常用共通的书面语言希伯来语进行口头交流。

在19世纪后期，希伯来语有几种发音传统并存，它们部分可追溯至古代，部分受当时犹太人所说希伯来语口语的影响。在复兴希伯来语的早期，耶路撒冷有大量中东犹太人，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所普遍使用的希伯来语发音（被不准确地称为塞法迪发音）就占据上风。但是，从20世纪早期开始，成批到达的阿什肯纳兹移民无法掌握某些对习惯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而言很容易的发音。因此，现已成为标准希伯来语的塞法迪发音，实际上是阿什肯纳兹、塞法迪和中东发音特点的综合体。

希伯来语复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找到词汇，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表达在常见的古代文本中阙如的现代概念。为了应对这类问题，1890年成立了希伯来语委员会（后于1953年由希伯来语学术院接替），它从《塔木德》和中世纪希伯来语文学中搜寻植物、工具、服装和家具等领域的词汇。委员会还创造新词。这门语言的结构有利于这项工作。像其他闪族语言的词汇那样，希伯来语词汇通常由三个辅音词根构成。元音、前缀和后缀根据相当规则的模式来修饰这些词根。一旦需要一个词表达某个古代不存在的新事物，往往可以找到一个古代词根，再利用这些标准模式之一，造出一个新词。

例如，表达铁路列车的单词就是从古词根r-k-b中提炼出来的，它出现在包含骑术概念的词语中。《圣经》中有动词*rakhav*（骑）及名词*rekhev*和*merkava*（战车），《塔木德》中有动词*hirkiv*（连接），于是现代希伯来语有了*rakevet*（火车）。在某些情况下，说希伯来语的人只是借用外来词汇，如表达学院的*akademya*和大学的*universita*。有时外来词已被新造的希伯来语单词替代，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informatsya*（信息）就已让位给*meda*，它是用普通的意为“知道”的希伯来语词根新造的，而且更符合常见的希伯来语名词结构。有时会从外语中挪用动词，再套上希伯来语的动词模式，比如*tilfen*（打电话）和*gilven*（激励）就有很自然的希伯来语“感觉”，尽管它们都源自外语词根（分别来自英语的“to telephone”和“to galvanize”）。希伯来语学术院仍继续就拼写、发音、语法和词汇等问题辩论与裁决，并且不时发行词典，为专门领域提供语言学指导。

虽然希伯来口语已有几个世纪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它是天然纽带，一头连接着巴勒斯坦当时占多数的塞法迪犹太人，另一头连接着随早期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的到来而不断增加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因为希伯来语是一个有着不同方言的民族所共有的传统语言。本-耶胡达将希伯来语作为世界犹太人联盟设在耶路撒冷的学校的教学语言之一，又出版希伯来语报纸和期刊讨论犹太话题与一般话题，并根据需要创造出许多希伯来语词汇。他耗时多年编纂了一部长达17卷的希伯来语历史辞典（他去世后才出版），虽然其中有些部分今天已显过时，但它仍是最全面的希伯来语辞典。他还成立希伯来语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这是今天以色列国家语用仲裁机构——希伯来语学术院的前身。在前无古人的发展中，本-耶胡达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经过反复辩论和争议，希伯来语终被采用为新生犹太人家园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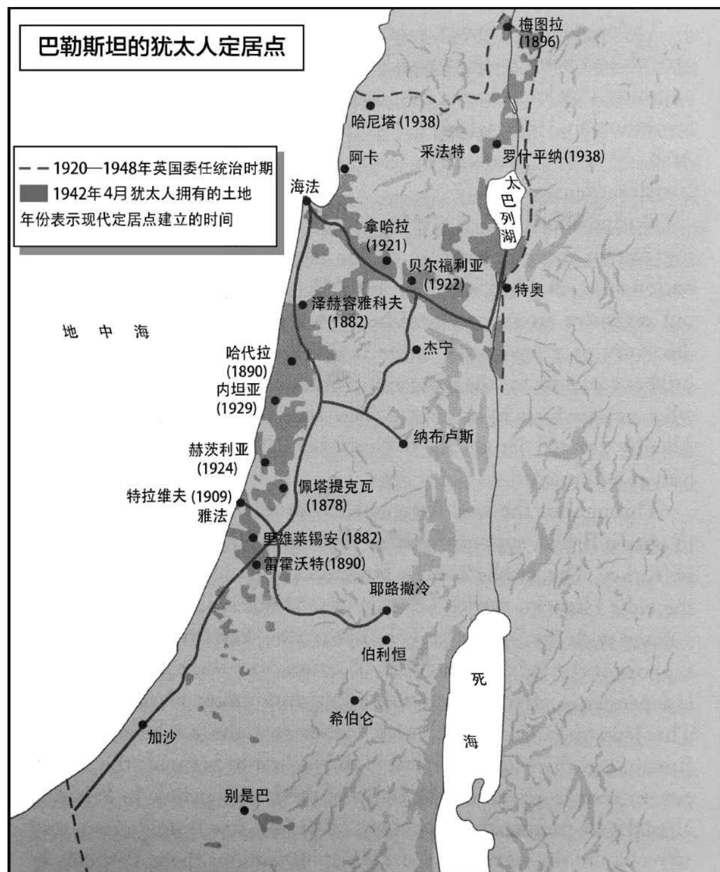
第二波移民潮持续了十年，它是由1903年俄国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共同促成的。这些移民大多是理想主义的先锋，致力于社会主义，以及将希伯来语变成犹太人的日常语言。他们的代言人是A.D.戈登，他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宣扬以下理念：只有通过劳动的有益力量和回归自然，犹太人才能复兴。这些移民发展出以色列特有的农业组织：集体定居点（kibbutz，基布兹）和合作定居点

（moshav，莫沙夫）。从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产生出一些政党，它们后来联合成马帕伊（Mapai）党，即当今以色列工党的前身。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以色列建国后（1948年后），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领导人都来自这些政党：如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第二任总统伊扎克·本-兹维。1909年，第一座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在巴勒斯坦建立，如今已是以色列的大都会。

犹太人口的增长和犹太农业定居点的扩张导致当地阿拉伯人的反对相应加剧；在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后，这种反对与日俱增，有组织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出现。犹太人定居点的安全形势江河日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对英作战。由于担心阿拉伯和犹太的民族主义者煽动暴乱，土耳其在巴勒斯坦的总督贾马尔（Jamal）帕夏大肆抓捕和驱逐许多犹太定居者。他以破获了一个效力于英国的犹太间谍组织为借口，迫害犹太定居者，而不问他们是否支持间谍活动。1917年12月，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犹太人把他当作解放者夹道欢迎。

在整个一战期间，阿拉伯和犹太的领导人一直在牺牲土耳其的利益，争取英国对各自民族抱负的支持。哈希姆家族是以侯赛因酋长（emir）为首的阿拉伯权贵家族，它对土耳其开展破坏活动（由人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T.E.劳伦斯与英国协调），以支持英国的战争行动；作为回报，他们得到承诺，可以在战后实现阿拉伯独立，建立一个哈希姆家族统治的王国。犹太人组织犹太军团代表英国作战，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费尽心思，努力说服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地区解放后承认当地犹太人的权利，允许自由移民，并承认那里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合法地位。哈伊姆·魏茨曼在这项工作中卓有成效，他是化学家，因发现合成丙酮的方法而对战争做出重大贡献。这些努力在1917年终于换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的正式宣言：“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就在艾伦比将军解放耶路撒冷前一个月，《贝尔福宣言》受到全世界犹太人的热烈欢迎。但英国对犹太人和哈希姆家族分别做出的承诺相互冲突，为未来几十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埋下祸根。



战后，英国从新成立的国际联盟那里得到包括约旦河两岸在内的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委任统治的目的是执行《贝尔福宣言》，同时保障这一地区其他群体的权利。委任统治当局成立了犹太代办处，它将与委任统治当局合作，通过鼓励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来创建犹太民族家园。犹太代办处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由魏茨曼领导）密切合作，实为英国控制下的犹太准政府。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犹太代办处由工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导。

但在战后交割中，哈希姆家族建立一个独立阿拉伯王国的要求被忽视了。为了部分满足哈希姆家族，英国分割巴勒斯坦，成立外约旦酋长国（emirate），将之授予哈希姆家族阿卜杜拉酋长，而他的弟弟费萨尔（Faisal）此前已被英国人拥立为伊拉克国王。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废除《贝尔福宣言》，并在1921年发动暴乱。甚至早在正式授权英国建立委任统治之前的漫长谈判期间，已经有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定居

点，迫使英国人暂停犹太移民。犹太人为了反击，组建犹太营，但英国当局不允许他们行动，犹太营只得解散。这一经历向犹太领导层表明，有必要建立一支独立但秘密的军事力量，即哈加纳。哈加纳导致英国重新定义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许诺，削减承诺给犹太人的领土，并答应阿拉伯人限制犹太移民。英国很快就放弃了修订《贝尔福宣言》的尝试，但这一系列事件确立起英国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的政策模式，因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在西巴勒斯坦的存在越来越反对，在极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阿明·侯赛尼被任命为耶路撒冷穆夫提（穆斯林教法权威）之后，情况更加恶化。

战后出现了第三波犹太移民潮，主要由来自波兰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先锋”（*halutsim*）组成，他们投身于农业和体力劳动，疏浚沼泽，建立集体定居点（基布兹），推动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始于1925年的第四波移民潮并非受意识形态影响，而是由逃避波兰反犹主义的难民组成。这一时期在巴勒斯坦成立了一批犹太机构，如哈加纳（防卫组织），希伯来工人总工会（Histadrut）以及希伯来大学。在这十年里，以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为首的右翼运动“修正主义者”也在壮大，他们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分庭抗礼。在20世纪30年代，雅博廷斯基领导的修正派和逐渐被大卫·本-古里安掌控的工党之间的矛盾日益白热化。最后，修正主义者退出哈加纳，转而建立一支独立的修正派军事力量，即伊尔贡。

阿拉伯人越来越反对犹太人的存在。这种反对有许多理由。当地贫困的阿拉伯农民（*fellahin*）住在一些大家族拥有的土地上，这些家族生怕现状有任何改变，他们尤其担心涌入巴勒斯坦的西方犹太人会输入欧洲政治制度，给农民带来代议制政府的理念。在巴勒斯坦普通阿拉伯人看来，犹太移民不像是想要在历史家园上重建民族身份的古代中东人的后代，而更像是又一次入侵的西方殖民者。以伊斯兰教的观点来看，犹太人的日益增多改变了该地区的宗教面貌，而犹太人争取主权的诉求，又冒犯了伊斯兰教认为迪米只配恭顺屈从的观点。最后，阿拉伯人听命于奥斯曼帝国达四个世纪之久，如今又处在英国控制下，他们此时正在发展自己的民族主义抱负。1929年，侯赛尼穆夫提的煽动性宣传激起严重暴乱，在耶路撒冷、采法特，特别是在希伯仑，造成多人死伤。为了

安抚阿拉伯人，英国人暂停了犹太人移民。

但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迫害造成犹太人不断向巴勒斯坦移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愈发紧张。以英法为一方和以德意为另一方之间的对抗也日益升级，巴勒斯坦本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正如第六章所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视德国为天然盟友，可以与其联合反抗令人憎恨的英法殖民政权，而德国纳粹政府的官方反犹政策，正好道出阿拉伯人怨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心声。随着欧洲战云密布，英国人急于安抚阿拉伯人，以免危及自己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因为那里不仅有重要港口海法，而且靠近苏伊士运河。这些考虑使英国人的天平越来越向阿拉伯人倾斜，犹太人的分量越来越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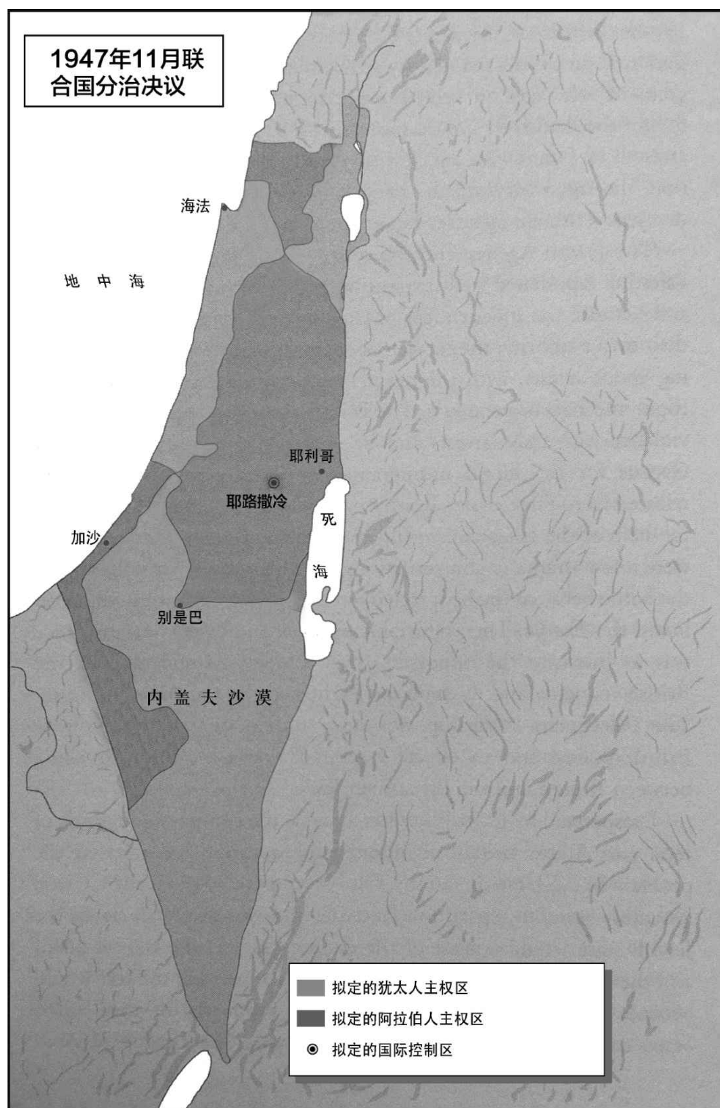
在侯赛尼穆夫提的领导下，阿拉伯高等委员会于1936年成立，并在轴心国的支持下发动宣传运动，导致阿拉伯人多次攻击犹太人定居点。英国人起初袖手旁观，但当阿拉伯人开始攻击英国驻军时，英国人便允许哈加纳公开活动，甚至派一名军官来训练哈加纳。暴力活动一直持续到1939年，而与此同时，英国人决定修改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由英国政府授权研究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问题的皮尔委员会得出结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的民族抱负不可调和，应该再次分割巴勒斯坦。新计划是建立一个由沿海地带、加利利和耶斯列山谷组成的犹太国家，一个由中部山区和内盖夫组成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一个包含耶路撒冷、雅法和拿撒勒的英国飞地。犹太人对于是否支持该计划意见不一，工党大多表示赞成，而修正派强烈反对。阿拉伯人对此则完全拒绝。1937年阿拉伯人再次掀起暴力事件，随后阿拉伯人甚至拒绝参加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出席的分治问题会议，使英国人确信该计划无法执行。因此，英国人在1939年发表臭名昭著的白皮书，严格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实际上废除了《贝尔福宣言》。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但它并没有达到阻止阿拉伯人支持轴心国的目的，二战在同年晚些时候爆发，整个巴勒斯坦问题退居幕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治处境艰难。尽管英国显然已成为敌人，但犹太人必须与之合作，以打败德国人，否则德国人的胜利将彻底结束犹太人的历史。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犹太人仍希望通过与英国积极合作，为战后创造有利条件。许多巴勒斯坦犹太人

为英国而战；犹太旅在1944年成立，它的旗帜上有一颗黄色的大卫星。然而，1942年德国军队在利比亚战败后，犹太人和英国政府的关系再度恶化；英国限制犹太人获取武器，并将从欧洲向巴勒斯坦运送犹太难民的船只遣返。其中好几艘船沉没，数百人丧生。

战争结束时，欧洲难民营中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的困境，使所有人相信有必要开放巴勒斯坦以接受犹太移民，唯独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无动于衷。导致英国在战前偏袒阿拉伯人的地缘政治因素此时仍然有效，只不过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取代德国，成为英国的对手和阿拉伯人的后台。满载着难民的船只摇摇欲坠地从欧洲抵达巴勒斯坦，但英国人要么将它们遣返，要么拦截在公海上。修正派向委任统治政府宣战，开始实施破坏计划；而一个更极端的组织即斯特恩帮，则通过政治暗杀与英国人斗争。1946年6月，数千名犹太人被捕，犹太人的武器被收缴；作为报复，伊尔贡炸毁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许多政府机构在那里设有办事处。

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的其他官方犹太机构与这种极端主义划清界限，既出于道德及策略的考量，也因为修正派的单独行动威胁到他们的权威；他们协助英国人展开抓捕，导致犹太左翼和右翼关系破裂。英国当局以大规模抓捕来回应暴力活动，并在塞浦路斯为非法移民设立拘留营，这些非法移民当时刚从德国死亡集中营获释。在哈加纳的帮助下，有些难民船逃脱英国的封锁；出现了几次戏剧性的对抗，其中最著名的是蓬头垢面的难民和登上“出埃及号”轮船的英军之间的战斗。不出所料，英国的强硬态度甚至让犹太温和派都变得更加反对英国的委任统治，并使犹太左翼和右翼重归于好。巴勒斯坦的领导层此时团结一致反对英国的政策，英国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实际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没有能力调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恼羞成怒的英国决定撒手不管，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重新划分为两个主权国家：犹太人的国家由加利利东部、沿海平原和内盖夫组成，耶路撒冷由国际共管，其余部分将成为阿拉伯国家。这一动议得到美国的支持，还出乎意料地得到苏联的拥护。1945年在开罗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事务为己任，宣布将用武力抵制分治。英国宣布将不会协助实施这项决议。分治计划的执行工作便留给巴勒斯坦犹太人和全世界犹太人。英国委任统治结束的日期定在1948年5月14日星期五。就在这一天，犹太代

办处负责人大卫·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告，一个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建立，这就是以色列国。

但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已经打响。



马萨德（Massad）营里的棒球赛，该营是20世纪5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的希伯来语夏令营。裁判员身后是英语和希伯来语对照的棒球术语表，供比赛时随时参考。照片，版权方为莉娃·舒尔辛格、施罗莫·舒尔辛格。美国犹太人历史博物馆(费城)提供。

第十一章　1948年后的犹太人

以色列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关于分割巴勒斯坦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投票刚结束，周边国家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就开始涌入巴勒斯坦，攻击犹太人定居点。虽然英国拒绝调停，并继续解除犹太人的武装，但犹太人设法维持了对建有犹太人定居点的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的控制。1948年5月14日，当以色列宣布独立，最后一批英军撤离后，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的军队便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支援下，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鉴于这七个阿拉伯国家的规模和地理优势，以色列似乎毫无胜算。但到1949年3月停战时，以色列已经控制加利利、海岸地带、内盖夫、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以及西耶路撒冷——这比分治计划所划归的领土还要大。约旦占领约旦河以西的山地（现称为约旦河西岸，原是打算留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的）和东耶路撒冷（原是打算国际共管的），包括被奥斯曼帝国城墙包围的老城。

年表

犹太历史	时间	世界历史
以色列宣布独立；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	1948	
第一届克奈塞特召开，本-古里安任总理；与阿拉伯国家签订停火协议	1949	
也门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49—1950	
伊拉克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50—1951	
魏茨曼逝世；与德国达成赔偿协议	1952	埃及革命使迦玛尔·纳赛尔掌权
	1953	斯大林逝世
摩西·夏里特任总理；摩洛哥犹太人大批外迁	1954—1955	
西奈战役	1956	

艾希曼被押送至以色列	1960	
	1962	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
	1963	约翰·F.肯尼迪遇刺身亡
	1964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
	1965	美国进攻越南
六日战争；耶路撒冷统一	1967	匈牙利革命
埃及和以色列间的消耗战开始；果尔达·梅厄任总理	1969	
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被杀	1972	
赎罪日战争	1973	
利库德集团取代工党成为执政党；贝京任总理；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	1977	
《戴维营协议》	1978	
	1981	萨达特遇刺身亡
黎巴嫩战争	1982	
贝京辞职；沙米尔任总理	1983	
因提法达运动开始	1987	
	1988	侯赛因国王宣布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巴勒斯坦人宣布建国
马德里会议	1991	苏联解体
工党重新执政；拉宾任总理	1992	
《奥斯陆协议》；与巴解组织签署意向书	1993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创立
与约旦签订和约	1994	
拉宾遇刺；佩雷斯任总理	1995	
利库德集团赢得大选；内塔尼亚胡任总理	1996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举行首次选举

原先住在以色列新控制区的许多阿拉伯平民逃离家园，或许是应阿拉伯军队或以色列军队的要求，或许只是出于害怕战争的暴力。其间，至少在代尔亚辛（Deir Yassin）村发生一起暴行，以色列军队在该村屠杀平民，造成更多难民逃亡。阿拉伯领导人向难民保证，阿拉伯国家会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战斗，让他们重返家园；阿拉伯国家没有吸收难民，而是将他们安置在难民营，这些难民营日后满是挥之不去的贫穷与

绝望，一代代难民在那里滋长着他们对以色列的仇恨。

与此同时，以色列开始了建国进程。1949年1月举行大选，成立议会（名为“克奈塞特”［Knesset］）和第一届政府，大卫·本-古里安任总理，哈伊姆·魏茨曼任总统。鉴于耶路撒冷在犹太史上古老而重要的地位，它被定为以色列首都，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当时对此拒绝承认。

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犹太人担心与这个犹太国的联系会在本国受到敌视，纷纷逃往以色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欧洲犹太难民也逃到以色列，以色列国内很快出现大量难民。以色列议会颁布《回归法》，使犹太人移民有权立即、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虽然迫切需要人力，但随之而来的人口爆炸给这个年轻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困难，特别是考虑到这些移民来自多个国家，在文化和技术水平上差异悬殊。

虽然以色列吸收的人均移民数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但它同时要应对持续紧张的政局。在独立战争后，阿拉伯国家从未做出和平承诺。约旦和埃及为继续斗争而培养名为费达因（*fedayeen*，意为“自我牺牲者”）的游击团伙，对以色列境内的小目标实施伏击。阿拉伯国家不但抵制以色列，而且抵制与以色列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停靠以色列港口的航运公司。以色列飞机不得飞越阿拉伯领空，访问过以色列或持以色列护照的旅客不得进入阿拉伯国家。埃及对以色列关闭了苏伊士运河，并封锁通往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Eilat）的航道。约旦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的圣地（它们大部分位于约旦占领区），并有计划地亵渎这些圣地。阿拉伯国家不但拒绝承认以色列，甚至拒绝提及其国名；几十年来，阿拉伯媒体称以色列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

冷战期间，中东成为美国与苏联博弈的几个地区之一。苏联向阿拉伯世界提供武器，把这里变成它的势力范围，苏联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尤其紧密。埃及领导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是泛阿拉伯主义者，积极主张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与扩张。在苏联的鼓动下，埃及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并加紧通过费达因突袭以色列。1956年10月29日，英法两国密谋与以色列一起攻打埃及。以色列军队占领西奈半岛，并在一周内重创埃及军队；然后，英法两国以隔离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为借口，进

驻这一地区，夺回苏伊士运河。面对国际社会对英、法、以三国的愤怒谴责，以色列放弃西奈半岛，换取联合国关于埃以边境安全和埃及解除对埃拉特封锁的保证（但以色列仍然不能使用苏伊士运河）。不过，鉴于冷战时期联合国夹在美苏之间的尴尬地位，这些保证几乎没有什么效力，以色列仍不断遭受攻击。

尽管如此，随后将近十年里，以色列还是享有相对的安宁，可以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和社会发展，并继续吸收来自阿拉伯世界、共产主义国家、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非的移民。1959年，以色列与联邦德国正式建交，联邦德国同意在以色列经济领域投资数百万美元，作为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迫害犹太人罪行的赔款。许多在迫害中饱受摧残的以色列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和解，但本-古里安力排众议，接受赔款。这些资金极大地促进了以色列新经济的发展。

1960年，以色列安全部门在阿根廷抓获阿道夫·艾希曼，他是对组织灭绝欧洲犹太人计划负主要责任的纳粹官员，以色列再次直面纳粹屠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这向全世界揭露了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犯下的暴行，同时提醒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多么至关重要。1962年，艾希曼因反人类罪被绞死，根据以色列法律，这是唯一可判处死刑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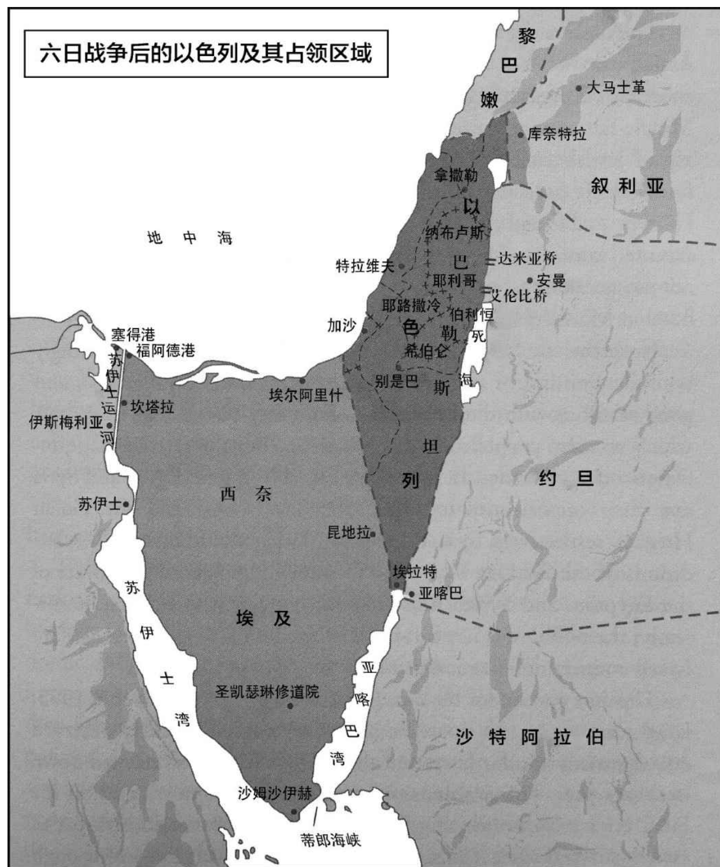
苏联继续扶植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叙利亚和埃及。1967年，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受苏联鼓动，埃及总统纳赛尔试图借机清算和以色列的旧账。埃及和叙利亚指责以色列在其北部边境为发动袭击作军事动员。纳赛尔在西奈半岛集结军队，驱逐联合国应急部队，并封锁通往埃拉特的航道。由于确信埃及能够获胜，约旦国王侯赛因把他的军队交给埃及指挥，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

面对这些战争准备，以及埃及、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见下文）意图攻占以色列并屠杀犹太人的嗜血宣言，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先发制人，在三个小时内摧毁整个埃及空军，随后仅用三天就攻占加沙地带和整个西奈半岛。当约旦进攻耶路撒冷时，以色列军队的回应是占领耶路撒冷老城、东耶路撒冷和整个约旦河西岸。为了应对叙利亚的持续炮击，以色列夺取战略要地戈兰高地，它一直是叙利亚炮击地势较低

的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阵地。短短六天内，以色列一举吞并东耶路撒冷，占领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

整个国家都为在这场大捷中战胜了所有挑战以色列生存权的势力并收复了耶路撒冷剩下的圣地而欢欣鼓舞。以色列确信，攻占这些领土就获得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换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最终解决自1947年开始的敌对行动。但阿拉伯国家不仅仍旧拒绝接受以色列的存在，而且要求以色列退回1947年分治决议（当时阿拉伯人自己反对这一决议）规定的边界，他们还拒绝签署和约，哪怕是基于分治决议规定的边界的和约。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断断续续的军事对抗一直持续到1972年，这一时期史称“消耗战”。更不祥的是，以色列占领和统治了一片拥有125万阿拉伯人的土地，这是一枚后患无穷的定时炸弹。但在那个举国欢庆的时刻，几乎无人对此有足够的先见之明。

迄今为止，以色列一直在和周边国家作战，这些国家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名义上代表阿拉伯民族主义而战，但没有一个国家顾及仍住在巴勒斯坦或挤在难民营中的阿拉伯同胞的利益。随着以色列征服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有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成为该地区的一支活跃力量。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简称“巴解组织”）在约旦成立，它由众多巴勒斯坦阿拉伯组织构成。1968年，巴解组织通过一个宪章，号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以色列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尊严，摧毁以色列，并在其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



这些组织中最活跃的是法塔赫，其领导人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他在1967年战争后成为巴解组织的主席。巴解组织在以色列境内和中东以外协调有组织的激进主义活动，多次策划劫机事件，并在世界各地炸毁犹太设施。侯赛因国王视巴解组织为破坏稳定的因素，用血腥的清洗将它驱逐出约旦。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建立新基地，在那里接连不断地策划和实施劫持、绑架和杀戮。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以色列奥运会运动员在他们下榻的酒店里被谋杀。

然而，以色列在1967年后进入繁荣期，经济快速发展，形势似乎无限乐观。苏联的移民、与欧洲共同体的良好关系和大众旅游业都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相对的安宁也令军方更加松懈。埃及和叙利亚看到各自夺回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的机会，计划发动突袭来扭转1967年六日战争的结果。以色列情报部门了解到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动员情况，但没能做出正确评估；公众毫不知情，直到突袭当天，以色列才仓促动员应

战。

突袭的日期选在1973年10月6日，正值赎罪日。这是一个宗教节日，连许多世俗犹太人都会遵守，因此，突袭让以色列猝不及防，不得不去犹太会堂召集士兵。以色列北部和西奈半岛同时遭受的攻击破坏力极强，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自1948年以来最严重的威胁。尽管落尽下风，被迫在两条战线上都后撤，以色列仍苦苦支撑。苏联大规模空运物资，支援埃及和叙利亚，而美国针锋相对，通过军事空运援助以色列。以色列很快重整旗鼓，突破叙利亚防线，朝大马士革方向进军。在西奈半岛，以色列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埃及纵深达25英里，然后美国和苏联达成停火协议。尽管在人力和物力方面远远不如对手，但以色列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优势，不过这次胜利没有带来欢乐。

这次突袭给以色列社会留下持久的创伤。一些最出色的领导人失去公众信任。民众对国防能力的信心受到打击，对真正的和平条约永远是那么触不可及心生怨怼。这种情绪随着巴解组织的激进主义活动越来越多，以及北部城镇不断受到袭击而加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巴解组织成员劫持法航客机，改飞到乌干达的恩德培市。在约拿单·内塔尼亚胡（其弟弟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率领下，一支以色列突击队在一次大胆而仓促的突击行动中攻克机场，将人质解救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袭击中牺牲，很快成为国家英烈。

这一时期困扰以色列的其他问题包括：国际支持急剧减少，最终导致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属于种族主义；经济困难；移民减少；来自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移民心生怨恨，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支配的以色列政治文化生活所排斥；工党腐败引发愤怒；最重要的是，民众发现以色列所经历的一切艰辛并没有促成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这种不满在1977年大选中引发政治革命：利库德集团击败工党第一次掌权。利库德集团是从前修正派的传人，是建国以来一直在野的反对派，其领导人是前伊尔贡领袖梅纳赫姆·贝京。

1977年11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举世震惊；不久，受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鼓励，以色列和埃

及开启和谈，卡特总统在1978年组织戴维营会议，帮助双方打破僵局。以色列同意将整个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以换取埃及的正式承认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贝京和萨达特能够达成协议，要归功于埃及的经济困难、冷战的发展、萨达特的个性和卡特的坚持。

贝京之所以能够在以色列国内赢得支持，向埃及做出必要让步，恰恰因为他是久负盛名的强硬派。不过，两位领导人在开展谈判时都冒了风险，特别是萨达特，他在谈判过程中疏远了整个阿拉伯世界；1981年，他在阅兵时被一名穆斯林狂热分子刺杀。多年来，尽管世事变迁，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发展出一种“冷和平”，并维持至今。

次年，贝京发起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非自卫反击的军事行动。当时，包括巴解组织、叙利亚、黎巴嫩基督徒、黎巴嫩穆斯林在内的许多派别在黎巴嫩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贝京和他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做出决定，要将巴解组织的游击队赶出他们在黎巴嫩南部的根据地，从而结束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袭扰。这一目标很快实现，还在黎巴嫩南部设立了一个安全区，但沙龙乘胜追击，一直将以色列部队推进到贝鲁特，将巴解组织的军事力量围困在城中。沙龙准许黎巴嫩基督徒袭击以色列把守的萨布拉（Sabra）和沙提拉（Shatila）巴勒斯坦难民营，并屠杀居民，以色列国内外舆论对此怒不可遏。

黎巴嫩战争的确成功摧毁了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基础设施，导致它流亡到突尼斯，但这场战争却加强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地位，还使以色列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甚至在以色列国内引起相当大的愤慨，因为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的军队正在承受和制造重大伤亡，而得到的政治回报却少得可怜。直到1985年，以色列才在另一位总理的领导下从黎巴嫩抽身。黎巴嫩战争的失败摧垮了贝京的精神，他漫长的政治生涯落幕；1983年妻子去世后，他便辞职了。

20世纪80年代，伊朗支持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运动真主党崛起，引发新一轮极端暴力活动，从北方对以色列实施的游击行动性质上发生改变。但自1987年起，巴勒斯坦民众开始主导局面，当时加沙地带的一场自发暴乱蔓延到整个以色列占领地区，普遍抗议以色列的统治。远在突

尼斯的巴解组织设法控制了这次起义（它在阿拉伯语里叫“因提法达”），并在几周后组织“团结日”，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在这一天游行示威，表达对因提法达的同情。随后，有组织的罢工、游行示威和民间抗议活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反对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尽管以色列采取严厉报复行动，但暴力活动持续不断。儿童及青少年向以色列军队投掷石块的场景成了因提法达梦魇般的象征，以色列士兵并不比这些袭击者年长多少，他们卡在还击的本能和射杀儿童的恐惧之间，不知所措。

多年的动荡接踵而至，为了惩罚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以色列实行宵禁，拆除激进分子的房屋，长期关闭约旦河西岸的学校和大学，还实施大规模监禁，所有这些导致暴力行为变本加厉。1988年，约旦国王侯赛因正式宣布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同年晚些时候，阿拉法特宣布，他准备接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并存；但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立场僵硬，不为任何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和谈的外部压力所动，他不仅拒绝承认巴解组织，而且积极鼓励在占领地区建设犹太人定居点，从而大大加剧了紧张局势。

1991年，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总统布什为促成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谈判而做出巨大努力。先在马德里后在华盛顿召开的系列会议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代表来说是一次突破，双方第一次面对面交流，但以色列只与阿拉伯各国政府协商，仍然拒绝承认巴解组织作为谈判对手的资格。

1992年，伊扎克·拉宾领导的工党政府执政后，出现了突破的可能性。因提法达对双方的破坏性越来越大，致使以色列社会日趋两极分化：一方深信，只有承认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享有某种自治，才有和平；另一方则同样深信，这么做不是自杀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或者两者皆是。拉宾是独立战争和六日战争的英雄，曾是强硬派将领，以关注以色列的安全闻名。他得出结论，因提法达对以色列人生活造成的损害大于以色列控制占领区所获得的利益。拉宾接受了与巴解组织对话的原则，部分是由于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的倡议。当美国发起的谈判在华盛顿缓慢进行时，另一组秘密谈判于1992年和1993年在奥斯陆举行。结果就是《联合原则声明》，这是1993年9月13日在白宫草

坪上举行的激动人心的仪式上签署的，以色列第一次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言人。《奥斯陆协议》制订出一个分阶段的进程，先是以色列从占领区撤出，然后巴勒斯坦人以一个名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实体逐步接管控制权；而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棘手问题和其他细节则留待后续谈判解决。比尔·克林顿总统、拉宾、阿拉法特握手言欢，此情此景令人想起1978年贝京、萨达特、卡特之间的历史性握手，一个新时代仿佛从此开启。

《奥斯陆协议》在以色列和中东引发一波乐观情绪。长期以来，约旦默默期待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时它就与以色列签署了和约，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开始解冻。和平前景也鼓励外国在这一地区投资。不过，许多人还是觉得被该协议出卖了。许多巴勒斯坦人愤愤不平，他们感到协议给予他们的不是国家地位，而只是一个模糊的巴勒斯坦实体的分阶段自治。有些人对亚西尔·阿拉法特的领导权产生不满。伊斯兰基要主义者，特别是极端主义的哈马斯组织的成员，拒绝承认任何犹太国家的合法性，也拒绝承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因为这个机构恰恰是靠承认以色列而得以存在的。许多以色列人无法接受一个前激进组织居然获得体面的新地位，更何况当初成立该组织的宗旨是要摧毁犹太国家和杀害犹太人口。许多正统派犹太人不能忍受丧失圣地任何一部分主权的想法。极端主义暴力活动持续不断，阻碍了最终解决问题的势头。

1995年11月4日，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化为泡影，当天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一场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结束时，伊扎克·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拉宾是唯一有威望要求公众支持和平进程的公众人物。虽然他的继任者西蒙·佩雷斯同样致力于与巴勒斯坦和解，但面对持续不断的武装袭击，他未能保住公众对和平进程的支持。1996年2月和3月，巴勒斯坦人发动的一系列自杀式爆炸袭击让工党政府倒台，利库德集团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新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口号是“要和平也要安全”，他推迟执行《奥斯陆协议》的重要部分，并且有计划地加强正统派犹太定居者在占领区和东耶路撒冷的地位。

巴以关系明显的螺旋式下降已成常态。哈马斯招募和训练巴勒斯坦年轻人，实施自杀式袭击或其他破坏活动，造成以色列人丧生。以色列

领导人责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没能按照《奥斯陆协议》的规定制止这些活动，并不定期地关闭占领区居民进入以色列领土的通道。这确实减少了暴力活动，但也造成巴勒斯坦经济的严重恶化，加剧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仇恨。巴勒斯坦人还迁怒于巴解组织，致使极端基要主义运动哈马斯渔翁得利。

利库德政府对约旦河西岸的正统派犹太定居者和东耶路撒冷犹太人新建项目的持续支持，是对巴勒斯坦人的不断挑衅。此外，还发生了多起正统派犹太人对穆斯林的暴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起发生在希伯仑。1994年，一名正统派犹太定居者杀害了29名正在先祖墓地（the Tomb of the Patriarchs）前祈祷的阿拉伯人。每一起事件都使对方的强硬派势力得以加强。

在以色列建国50年，同时也是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101年后，以色列成为一个强大、现代、民主、繁荣的国家。这个事实彻底驳倒了以色列能否建成或者能否长久存在的质疑，这类质疑声在1967年以前不绝于耳。现在不确定的是以色列未来的前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远远未能尘埃落定，而且似乎正进入一种漫长而棘手的暴力状态。在以色列人中，世俗与信教的人正两极分化，由此威胁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构想，即以色列应该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各色犹太人都可以一起和谐地生活。但以色列的建国基础是稳固的。

美国犹太社群

到以色列独立时，世界犹太人的分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欧洲，保存完整的主要犹太社群只在英国和瑞士存在；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已经少得不再重要，数百万人已被屠杀，另有数百万人逃离。在中东，大部分犹太社群正在急速消亡。以色列犹太人虽然在增长，但仍然相当弱小，其人口增长先是受制于英国排斥性的移民政策，后来又被本国的安全问题和糟糕的经济状况拖了后腿。西半球的犹太社群当时占主导地位。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东欧的大规模移民在拉丁美洲（特别是阿根廷和墨西哥）和加拿大建起重要的犹太社群，而这些社群的规模现在又因战争难民的涌入而扩大。但是，美国的犹太社群才是犹太人口的主要中心。

正是在西方国家中最开放的美国，犹太人最显著地面临着现代性所带来的大问题：在美国社会中，个人生活不是由社群而是由个人抱负塑造的，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共同的美国文化，就很容易为非犹太人接受，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又压倒大多数其他的价值体系，在这些背景下，如何保持鲜活的犹太身份？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性是如何消磨19世纪西欧犹太社群的凝聚力和削弱犹太身份意识的，但这个问题在美国更加尖锐，因为美国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不太受传统约束。美国社会也存在对犹太人的轻蔑，在社会顶层和底层中尤甚，但保护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们的大量移民与犹太人移民差不多同时来到美国）的法律同样适用于犹太人，而这里的反犹主义完全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恶毒，因为中世纪的反犹传统在欧洲国家从未绝迹。在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犹太人能被宽容多久，而是犹太身份和犹太文化能维持多久。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第二代美国犹太人已经成年，传统的观念和行为越来越为老年人所专属。随着美国人搬往郊区居住，城市中的犹太街区日渐衰落；犹太移民会堂、意第绪语报纸和意第绪语剧院逐渐减少甚至关张，犹太身份在大多数犹太人的生活中失去中心地位。甚至反犹主义都消失了，因为第三代和第四代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共同生活，越来越多地相互通婚，美国犹太人变得与其

他美国白人无异。偶尔发生的亵渎犹太会堂的事件都会令人震惊，因为这实在不符合美国的特点。自二战以来，美国就坚定地承诺要保障少数群体的自由，并为此感到自豪。犹太人在美国的生活如此舒心，似乎他们可能会和其他美国人融为一体，最终消失。

以色列建国给美国犹太人带来巨大的自豪感。他们慷慨地在财政和政治上支援以色列，这两种支援对于以色列的生存都不可或缺。但美国犹太人很少移民以色列。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和局势动荡的阿根廷，许多犹太人要么移居以色列，要么参与以移民为导向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但美国犹太人没有离开美国的动机。只有极少数理想主义者才会考虑放弃战后美国的繁荣，来到这个物质贫乏、充满不安全感的新生国家。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仅仅意味着支援以色列，这让以色列人感到绝望，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忍受艰难险阻。以色列发展出具有自己风格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美国犹太人越来越美国化，这两个最重要的犹太社群在社会层面渐行渐远。以色列建国初期，两国犹太人很少互访，这种发展趋势还不明显。但即使差异已变得不容忽视，它也没有削弱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热情支持。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犹太人保持犹太身份的方式是加入犹太会堂（主要是保守派或改革派的犹太会堂），并向犹太慈善机构网络和以色列捐款。加入犹太会堂并不意味着严格遵守犹太教规定；大多数会众的参与动机主要是群体忠诚和民族凝聚力，而不是宗教。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身为犹太人意味着主要和犹太人交往，奉行犹太新年和逾越节的部分宗教仪式，奉行用在割礼、婚礼、成年礼（越来越向女性开放）、葬礼和父母逝世周年纪念（*yahrzeit*）等人生大事上的宗教仪式。在第二代美国犹太人中，对这些宗教仪式非常熟悉或真正感到舒服的人已经很罕见。每周两到三个下午，数百万犹太儿童去犹太会堂开办的希伯来学校上课，但其中没什么人能掌握哪怕最基本的会堂技能或家庭仪式。

然而，大量犹太人还是通过犹太会堂、犹太社群中心和一个复杂的组织网络而与犹太社群建立联系。这个网络负责为犹太教育、慈善事业和以色列筹资。大部分城市有一个犹太慈善机构联盟，负责共同筹资和分配资金。这些联盟又组成犹太联盟委员会（Council of Jewish

Federations）和福利基金会（Welfare Funds），该基金会已成为美国犹太人的主要决策机构之一。另一个有影响的组织是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团会议（Conference of the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它有时充当美国犹太人的代言人。但是，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所有美国犹太人，这与非犹太人经常假设的情况相反。

在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中产阶级青年反抗成年一代的权威时，许多犹太青年也积极反对一切犹太行为和传统价值观，（不无道理地）认为父母身上残留的犹太宗教成分只不过是另一种空洞的循规蹈矩，他们也这样指责整个美国社会。这种反叛有其政治因素。反抗越南战争的一代人把以色列的生存之战解释为军国主义，把以色列的存在解释为殖民主义；在60年代中期，以色列是美国犹太人的骄傲，还受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推崇，现在它也像美国那样被贴上“军工综合体”的污名标签。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左派与旧左派不同，明显亲阿拉伯而排斥犹太复国主义，其信徒中有不少犹太知识分子。到70年代和80年代，这些“花样儿童”开始成家立业，犹太身份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与此同时，两个发展态势给犹太复兴带来些许希望。在成千上万被青年文化席卷的犹太人中，有一小部分人受过的犹太教育比普通美国犹太中产阶级受过的这类教育更多。他们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参加过犹太教育夏令营的青年。波士顿和纽约出现了一些犹太青年小团体，其成员把青年文化的风格和一些理念糅合进犹太传统，特别是哈西德主义的传统。正是本着青年文化的精神，他们抨击传统犹太体制，特别是大型的、缺乏人情味的郊区犹太会堂。此外，在以色列打完六日战争，刚刚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和西奈半岛后，他们就谴责老辈犹太人盲目支持以色列的对外政策。与许多漠不关心的犹太青年不同，这些小团体成员对犹太事务消息灵通并深入参与其中，他们渴望夺取领导地位，因为他们觉得当权派不如自己道德高尚，也不像自己这么尽忠职守。

不出所料，犹太当权派对这些年轻人严厉痛斥，指责他们打破犹太社群试图向外部世界呈现统一阵线的传统，尤其在他们发起反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游行之后。一些叛逆者最终投靠当权派，成了拉比、

教员或犹太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将以前不显著的新颖成分引入美国的犹太教育和宗教生活：更多地强调灵性价值；渴望在犹太传统中独辟蹊径，以发掘资源，构建更加多姿多彩、引人入胜的犹太人生活；领略犹太传统中的异域情调；能够即兴发挥。这些人对犹太会堂生活产生小但重要的影响，他们推动成立哈夫罗特（*havurot*），这是一种团契，既可以存在于大型会众中，又可以独立存在。哈夫罗特为渴望加入的人提供的犹太社群生活要更富热情但又不是正统派的，而它所提供的会堂仪式则更具实验性。他们还在争取女性加入犹太神职人员的运动中产生影响，这一运动随着1972年莎莉·普丽桑德（Sally Priesand）被希伯来联合学院任命为首位女拉比而结出硕果。到1989年，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神学院都在培养女性拉比和领祷人了。

另一个发展态势是正统派令人意外的复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难民中，一些来自东欧的哈西德主义信徒的残部，一些在远东熬过战争岁月，另一些从集中营里劫后余生。这些移民加入已经存在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信奉哈西德主义的小团体，发展成庞大而繁荣的社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似乎只是一群来自异邦的遗老遗少。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个在二战前已经来到布鲁克林的卢巴维奇派哈西德突然引起公众注意，因为他们发起国际运动，旨在争取全世界犹太人信奉正统派犹太教，特别是信奉他们所倡导的那种形式。

卢巴维奇运动在梅纳赫姆·孟德尔·施内尔松的领导下，以老练的手法和高度的献身精神组织起来，它出人意料地充分利用现代广告技术，宣扬一种大多数美国犹太人觉得稀奇古怪的宗教风格。卢巴维奇派传教士被派往美国各主要人口中心，以及世界各地的大部分犹太人聚居中心，他们在那里与远离传统的犹太人建立联系，争取让这些人遵守简单的宗教仪式，比如在周五晚上点蜡烛。卢巴维奇派的年轻使者把名为“诫命车”的厢式送货车停在美国各主要城市的闹市区，或停在大学校园附近，车上大声播放着犹太传统音乐，然后和长相像犹太人的路人搭讪，哄骗他们行犹太宗教仪式。犹太当权派正投入数百万美元，试图解决让美国犹太大众重新接受犹太教育的问题，他们对这个来自布鲁克林、奉行蒙昧主义的拉比获得的成功与影响感到惊讶。卢巴维奇派实际上没有从同化中挽救多少犹太人，也没有把很多犹太人变成卢巴维奇派信徒。但

是，这位人们口中的“卢巴维奇大师”（Lubavitcher Rebbe）在广告和电视上的现身，以及他的使者在街头巷尾的出没，都引人注目，为宗教正统思想注入活力。在20世纪80年代，卢巴维奇运动试图通过宗教仪式团结全世界犹太人，为即将来临的弥赛亚做准备。有传言说施内尔松本人就是弥赛亚，但他直到1994年去世从未自称是弥赛亚。

卢巴维奇运动并非正统派复兴的唯一例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公众对所有行为与道德问题的共识已经瓦解，许多美国人，无论基督徒还是犹太人，都转向传统宗教寻求安全感。这一趋势可能是卢巴维奇运动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也无疑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犹太人，尤其是在纽约地区，会被一种“正常的”或“现代的”正统派犹太教所吸引。这些“悔改者”（*baale teshuva*）通常在普通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已经在文化上适应美国，但转而要严格遵守宗教规定。与哈西德主义不同，他们的职业属于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有医生、律师、商人、会计、大学教师、股票经纪人、记者等。他们的穿着与普通中产阶级无异，也过着典型的美国式消费生活，但他们严格遵守宗教传统，努力接受良好的传统犹太教育，还让他们的孩子接受这种教育，为此他们把孩子送到正统派开办的走读学校，而非公立学校。有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排斥犹太人或限制犹太雇员的数量，但如今在工作会议上却能看到戴传统犹太小帽的合伙人。这一趋势得到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社会鼓励民族区别的大形势的支持，而与战后几十年鼓励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倾向正好相反。

在美国，这些年轻的“现代正统派”人数很少。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以色列拥有更适合过完全的犹太人生活的环境，因此移民去了那里。在以色列，他们容易认同政治右派，支持强硬派与阿拉伯人谈判；许多人甚至在以色列占领区定居，自视为新一代先锋，肩负着将“犹太”领土从非犹太人手中拯救出来的使命。

目前，美国犹太人中也出现两极分化，不过这种情况与以色列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大量美国犹太人仍然属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犹太会堂。保守派运动意识到，从移民时代开始的每周仅在下午开放几小时的希伯来学校传统已经失败，未能培养出一个对自己历史和传统有足够认识的犹太社群，也未能阻止同化，因此他们已加紧实施教育计划，开始建设

一个由走读学校组成的网络。但是，参加自由主义运动的犹太人数量正在减少；相应地，对犹太志愿组织网络的捐助（这是美国犹太社群的标志性特征）也在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持依旧很强，但犹太身份在普通犹太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总体上在减弱。然而，在人数减少的同时，改革派和保守派运动都变得越来越传统，而正统派的财富积累和政治权力有了长足发展，这得益于美国赞成对少数群体区别对待的大趋势。可以想象，也许一个世纪以后，美国犹太人将由一群数量不多但非常遵循传统的犹太人组成。

其他流散社群

美国犹太社群是最大的流散社群，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犹太社群；事实上，可以肯定地说，每个发达国家都有犹太人。在西半球，加拿大和阿根廷引人瞩目，那里的犹太人数量多，宗教和世俗的犹太机构都运转良好。墨西哥也有一个重要的犹太社群。在东半球的南部，重要的犹太社群分布在南非和澳大利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后，犹太人的生活正在欧洲慢慢复苏。当然，英国和瑞士的犹太社群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在欧洲大陆，尽管阿尔萨斯-洛林的旧犹太社群遭到摧毁，但法国犹太社群仍是最大的，其人口得到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犹太移民的补充。这次移民潮不时引起反犹主义的爆发，而来自相同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则受到法国仇外情绪的冲击。虽然犹太人在战前几十年一直在不声不响地进入西班牙，但直到1968年，他们才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获准组建社群；今天，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南部几座城市都有活跃的犹太社群。

令人惊讶的是，德国出现了规模小但组织良好的犹太社群，其成员是战后返回的犹太人、从美国或以色列前来做生意的犹太人，以及来自苏联谋求改善生活的犹太人。1990年两德统一以后，德国政府邀请俄罗斯犹太人到德国定居，并做出诚恳努力，保护新生的犹太小社群免遭反犹主义骚扰，至今仍诚意十足（虽然德国的排外主义矛头现已指向土耳其移民）。波兰虽然在一个世纪以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犹太人生活中心，但如今犹太人口已寥寥无几，不过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还有一些小规模有组织的社群。

在战争结束时，苏联有多达300万犹太人。尽管苏联犹太社群经历了前面章节提到的文化衰退，但他们的生活状况还不错，直到1948年，压迫时期才开始。1952年，最重要的几位意第绪语作家遭处决。这场迫害的高潮是所谓的“医生阴谋”，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逮捕莫斯科的犹太医生，指控他们犯有医疗暗杀罪；这些医生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才获释。斯大林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机构继续保持关闭，犹太人的宗教行为受到严格限制，犹太人上大学和在敏感职位工作的机会也受到严

格限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少数犹太人获准离开苏联，前往以色列与家人团聚。

2017年犹太人口估算

国家或地区	总人口	犹太人口
以色列	8631900	6451000
美国	323900000	5700000
法国	64640000	456000
加拿大	36200000	390000
英国	65800000	289500
阿根廷	43600000	180500
俄罗斯	144300000	176000
德国	82600000	116500
澳大利亚	24100000	113200
巴西	206100000	93800
南非	55700000	69300
乌克兰	42700000	53000
匈牙利	9800000	47500
墨西哥	128600000	40000
荷兰	17000000	29800
比利时	11300000	29300
意大利	60600000	27300
瑞士	8400000	18700
智利	18200000	18300
乌拉圭	3500000	16900
土耳其	79500000	15300
瑞典	9900000	15000
西班牙	43300000	11800
白俄罗斯	9500000	10000
巴拿马	4000000	10000
罗马尼亚	19800000	9200
奥地利	8800000	9000
伊朗	79500000	8500
阿塞拜疆	9800000	8100
委内瑞拉	31000000	7600
新西兰	4700000	7500
丹麦	5700000	6400
印度	1328900000	5000
拉脱维亚	2000000	4800

希腊	10800000	4200
捷克共和国	10600000	3900
乌兹别克斯坦	31900000	3400
摩尔多瓦	3600000	3400
波兰	38400000	3200
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	1409600000	2800
哈萨克斯坦	17800000	2800
斯洛伐克	5400000	2600
立陶宛	2900000	2600
哥斯达黎加	4900000	2500
哥伦比亚	48800000	2200
摩洛哥	34700000	2200
保加利亚	7100000	2000
爱沙尼亚	1300000	2000
秘鲁	31500000	1900
克罗地亚	4200000	1700
格鲁吉亚	4000000	1700
爱尔兰	4700000	1600
波多黎各	3500000	1500
塞尔维亚	7100000	1400
芬兰	5500000	1300
挪威	5200000	1300
突尼斯	11300000	1100
日本	125300000	1000
巴拉圭	7000000	1000
危地马拉	16600000	900
新加坡	5600000	900
厄瓜多尔	16500000	600
葡萄牙	10300000	600
卢森堡	600000	600
直布罗陀	30000	600
古巴	11200000	500
玻利维亚	11000000	500
波斯尼亚	3500000	500
吉尔吉斯斯坦	6100000	400
维尔京群岛	110000	400
肯尼亚	45400000	300
巴哈马群岛	400000	300
荷属安地列斯群岛	365000	300

泰国	65300000	200
也门	25200000	200
津巴布韦	16000000	200
土库曼斯坦	5400000	200
牙买加	2700000	200
苏里南	500000	200
尼日利亚	186500000	100
菲律宾	102600000	100
埃塞俄比亚	101700000	100
埃及	93500000	100
刚果	79800000	100
韩国	50800000	100
叙利亚	17200000	100
多米尼加	10600000	100
萨尔瓦多	6400000	100
纳米比亚	2500000	100
博茨瓦纳	2200000	100
斯洛文尼亚	2100000	100
马其顿	2100000	100

注：以上数据源于阿诺德·达什夫斯基（Arnold Dashefsky）等编的《2017美国犹太人年鉴》（纽约：美国犹太人委员会，2017年）。根据其说明，数据准确度因国家或地区而异。——译者按

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获胜，打击了苏联亲阿拉伯的外交政策，苏联政府随后发起充满恶意的反以运动。与此同时，这场胜利也让苏联犹太人倍感自豪，向以色列移民的申请人数显著增加。但要取得出境签证困难重重，往往需要经历多年等待、失业和警方的刁难。在此期间，各种外国犹太组织在苏联开展地下教育活动，将祈祷书和宗教物品走私入境，试图让苏联犹太人保留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以色列鼓励这种移民，这是增加本国人口的途径；美国的犹太社群加紧活动向苏联施压，要求放宽对犹太人移民的禁令。1971年，许多犹太人开始收到出境签证；大多数人更愿意去美国，但有许多人定居以色列。1971年后，更多人获准离开。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下，移民限制更加放宽，尤其在1989年后。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移民如洪水般外流。大部分犹太人去了以色列，在那里，他们的数量多到改变了以色列的人口结构。他们已成立一个政党，专门代表自己的利益；其领导人是纳坦·夏兰斯基，他

是苏联犹太人，曾因代表犹太移民积极活动而在西伯利亚监狱关押多年。

跋语　犹太人的前景

在许多方面，犹太人现在的状况比自古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好。流亡问题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多个世纪以来定义着犹太史，并决定了犹太教的性质。实际上，这个犹太问题找到不止一种，而是两种解决方法。

如今已有一个犹太国家，犹太人又可以用公民身份重新定义犹太身份。作为以色列人，犹太人可以说本国语言，庆祝本国节日，并和具有相似历史背景的国人一起生活在遥远的犹太过去所留下的历史遗址上。他不用固守任何传统的信仰或行为，仍能被当作犹太人。对这样的犹太人来说，宗教只是本国文化的众多方面之一；如果愿意，他可以奉行犹太宗教的实践，也可以像大多数以色列人那样选择放弃，而这不会损害他的犹太性。

以色列的生活还没有完全正常化，以色列和这一地区巴勒斯坦人的关系问题尚未解决，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仍对它怀有敌意，但以色列已不再是战争前线，而它在上一代人那里还是。它如今经济繁荣，表现出非凡的智力活力，尤其在科学、技术和文学领域。全世界对以色列极富创造力的人才求贤若渴，许多人因此离开以色列，但他们不断被新移民的子女和新一代同样合格的后继者所取代。因此，以色列已成为一种世界资源，其影响与它的体量不成比例。现代希伯来语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文学语言；希伯来语书籍的译本在美国和欧洲随处可得，在非犹太人中引发的兴趣比在流散地犹太人中还要大，这说明犹太文学不再局限于反映犹太人的内部问题，而已成为整个世界的一部分。

对于流散地犹太人来说，如今在一个非犹太国家做犹太裔公民，比整个犹太史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容易，也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体保障所有公民的公民权利，而不问宗教信仰。反犹主义在社会顶层和底层也许尚未清除，政府官员也不总是按照最优的官方原则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但在西方民主国家，犹太人是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正式公民。在许多国家，他们组织良好，繁荣昌盛。只要他们选择保留自己的传统和社群结构，几乎不会遇到困难。美国有强大的犹太机构；犹太研究已经在世俗大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犹太人有时会惊讶地

发现，他们的内部事务会在非犹太人中引起很大的同情和兴趣。

流散地犹太人的主要问题是，既然他们有了离开犹太社群的自由，他们就很容易离开这个社群。美国犹太教一直倾向于把自己更多地定义为一种宗教，而不是一种民族身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性渐渐下降，犹太会堂门可罗雀，在大多数美国犹太人那里，除了一些食物偏好和姓氏，犹太传统已所剩无几。但是近年来，宗教复兴和民族声望的恢复在美国普遍出现，美国犹太人中间也出现宗教热情的回归。谁也说不准这一事态发展将走向何方。50年前，人们一致认为，正统派没法在现代社会中幸存。但现在它却欣欣向荣，不是因为大批犹太人加入正统派犹太会堂，而是因为少数人变得极为投入，并且培养出许多受过良好犹太传统教育的大家庭。即使大多数犹太人会被同化，仍会留下一个核心人群，他们热切依恋着犹太传承，同时又过着表面上和非犹太人邻居没有太大不同的生活。

不久以前——尚在本书作者的有生之年内——欧洲犹太人化为灰烬，当时世界虽大，却无犹太难民栖身之处；美国犹太人尽管兴旺发达，但似乎即将没入同化，犹太身份除了用来缅怀死去的旧世界，已空空如也。如今，犹太人拥有一个在文化和智力上生生不息的民族家园，既可以积极参与犹太生活，又能够成为任何文明国家的正式公民，而且有许多途径做犹太人：文化的、宗教的、智力的或者组织的。虽说以色列和流散地的犹太人都面临挑战，但这仍然是犹太史上一段最好的时光。

致谢

我谨向以下朋友和同事表示感谢，他们阅读并评论了本书涉及其专业领域的内容：美国犹太神学院的斯蒂芬·盖勒教授和大卫·菲什曼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克·科恩、哥伦比亚大学的亚瑟·戈伦、密歇根大学的斯蒂芬妮·西格蒙德。盖勒教授还起草了第一章中关于早期希伯来文铭文的补充说明。西格蒙德教授起草了第七章中关于从事商业活动的犹太妇女的补充说明。我的女儿达利亚·谢德林为第十一章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的妻子贾妮斯·迈耶森最早向我提出撰写一部犹太人简史的想法，并以她惯常的热情，从始至终关心本书的写作。马克·科恩教授从本书写作的早期阶段起就对我鼓励有加。

我非常高兴地将本书献给两位为了犹太教育而一同默默奉献了一生的人。

犹太史书目

通论

Barnavi,Eli, ed. *A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Jewish People: From the Time of the Patriarch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埃利·巴尔纳维主编：《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记〉到二十一世纪》，刘精忠等译，黄民兴校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Ben Sasson, H. H., ed.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Ben Sasson, H.H., and S. Ettinger, eds. *Jewish Society through the Ages.*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1971.

Biale, David, ed. *Cultures of the Jews: A New Histor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2.

Encyclopaedia Judaica. Second edition, 22 vols. New York: Thomson Gale/ Macmillan, 2006.

Finkelstein, Louis, ed. *The Jew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0.

Gilbert, M. *The Routledge Atlas of Jewish History*. Six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马丁·吉尔伯特：《犹太史图录》，徐新、孔德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根据1993年第五版译出。）

Gribetz, Judah, et al. *Timetables of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Hallo, William W., et al., eds. *Heritage*：*Civilization and the Jews.* New York: Praeger, 1984.

Schwartz, Leo. *Great Ages and Ideas of the Jewish Peop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Yerushalmi, Yosef Hayim. *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第一章　古以色列人的起源和王国

Aharoni, Yohanan, and Michael Avi-Yona. *The Macmillan Bible Atlas.* New York: Macmillan, 1977.

Bright, John. *A History of Israel.* Fourth edition.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0.（约翰·布莱特：《旧约历史》，周南翼、张悦等译，罗宇芳审校，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

Finkelstein, Israel, and Neil Silverman. *The Bible Unearthed: Archaeology's New Vision of Ancient Israel and the Origin of its Sacred Texts.*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Miller, J. Maxwell, and John H. Hayes.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 Second edition.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Shanks, Hershel. *Ancient Israel.* Englewood Cliffs, N.J.: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1988.

第二章　犹地亚和流散的起源

Bickerman, Elias J. *From Ezra to the Last of the Maccabee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2.

Cohen, Shaye J. *D.From the Maccabees to the Mishnah.* Third edition.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4.（沙亚·科亨：《古典时代犹太教导论》，郑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中译本根据第二版译出。）

Modrzejewsky, J. Mélèze. *The Jews of Egypt from Ramses II to Emperor Hadrian.* Philadelphia and Jerusalem: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5.

Schäfer,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Schäfer, Peter. *Judeophobia: Attitudes toward the Jew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Schürer, Emil.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Rev. and ed. G. Vermes and F. Millar. 4 vol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73-1987.

Tcherikover, Victor.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the Jew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59.（维克多·切利科夫：《希腊化文明与犹太人》，石敏敏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Vermes, Geza. *The Complete Dead Sea Scrolls in English.* Seventh edition. London: Penguin, 2012.

第三章　罗马治下的巴勒斯坦和萨珊治下的巴比伦

Avi-Yonah, Michael. *The Jews under Roman and Byzantine Ru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lestine from the Bar Kokhba War to the Arab Conquest.* Jerusalem: The Magnes Press, The Hebrew University, 1984.

Cohen, Shaye J. D.*From the Maccabees to the Mishnah.* Third edition.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4.（沙亚·科亨：《古典时代犹太教导论》，郑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中译本根据第二版译出。）

Cohen, Shaye J. D., and S. Frerichs, eds. *Diasporas in Antiquity.*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3.

Levine, Lee I. *The Ancient Synagogue: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Modrzejewsky, J. Mélèze. *The Jews of Egypt from Ramses* II *to Emperor Hadrian.* Philadelphia and Jerusalem: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5.

Neusner, Jacob. *There We Sat Down.* Nashville, Tenn.: Abingdon Press, 1971.

Schiffman, Lawrence H.*Reclaiming the Dead Sea Scrolls: The History of Judaism, the Background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Lost Library of Qumr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chürer, Emil.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Rev. and ed. G. Vermes and F. Millar. 4 vol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73-1987.

Simon, Marcel. *Verus Israel: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Roman Empire* (135-425). Trans. H. McKeat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第四章　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

Ashtor, Eliahu. *The Jews of Moslem Spain.* 2 vol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2.

Cohen, Mark R. *Under Crescent &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Revised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Gerber, Jane S. *The Jews of Spai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Goitein, S. D. *Jews and Arabs: Their Contacts through the Ages.* New York: Schocken, 1974.

Hirschberg, H. Z. *History of the Jews in North Africa.* 2 vols. Leiden: Brill, 1974-1980.

Lewis, Bernard. *The Jews of Isla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Meddeb, Abdelwahab, and Benjamin Stora, eds. *A History of Jewish-Muslim Relations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Stillman, Nor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79.

第五章　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

Baer, Yitzhak.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ristian Spain.* Trans. Louis Scheffman et al. 2 vol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61- 1966.

Berger, David. *The Jewish-Christian Debat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79.

Gerber, Jane S. *The Jews of Spai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Marcus, Jacob Rader.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 315-1791*. Revised edition. Cincinnati: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1999.

Parkes, J. *The Conflict of the Church and the Synagogu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ermon Press, 1974.

Parkes, J.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Communit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ermon Press, 1976.

Stow, Kenneth. *Alienated Minority: The Jews of Medieval Latin Eur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第六章　奥斯曼帝国和中东的犹太人

BenBassa, E., and Aron Rodrique. *Sephardi Jewry: A History of the Judeo-Spanish Community, 14th to 20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Chouraqui, André N. *Between East and West: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North Afric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68.

Gerber, Jane S. *The Jews of Spai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Hirschberg, H. Z. *History of the Jews in North Africa.* 2 vols. Leiden: Brill, 1974-1980.

Lewis, Bernard. *The Jews of Isla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Meddeb, Abdelwahab, and Benjamin Stora, eds. *A History of Jewish-Muslim Relations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Roth, Cecil. *The House of Nasi: Doña Graci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8.

Roth, Cecil. *The House of Nasi: The Duke of Naxo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8.

Stillman, Nor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in Modern Time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1.

第七章　西欧犹太人

Bonfil, Robert. *Jewish Life in Renaissance Italy.* Trans. Anthony Oldcor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Elon, Amos. *The Pity of It All: A Portrait of the German-Jewish Epoch, 1743-1933*.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13.

Israel, Jonathan. *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550-1750*. Third edition. Oxford: 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 1997.

Katz, Jacob. *Tradition and Crisis: Jewish Society at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 Bernard Dov Cooperm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3.

Mendez-Flohr, Paul, and Jehuda Reinharz, eds.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Meyer, Michael.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Jew*.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

Netanyahu, Benzion. *The Origins of the Inquisition in Fifteenth-Century Spai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Roth, Cecil. *A History of the Marranos*.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Hermon Press, 1974.

Sachar, Howard M. *The Course of Modern Jewish History*. New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Weinryb, B. D. *The Jews of Poland*.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73.

第八章　东欧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

Baron, Salo W.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Schocken, 1987.

Gitelman, Zvi. *A Century of Ambivalence: The Jews of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881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8.

Hertzberg, Arthur. *The Jews i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Karp, Abraham J. *Haven and Home: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New York: Schocken, 1985.

Marcus, Jacob R. *The Jew in the American World: A Source Book.*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achar, Howard M. *The Course of Modern Jewish History*. New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Sarna, Jonathan D. *American Judaism: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乔纳森·D. 萨纳：《美国犹太教史》，胡浩译，徐新校，大象出版社，2009年。）

第九章　纳粹屠犹

Bauer, Yehuda. *The Holocau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Dawidowicz, Lucy S.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Second edition. Ardmore, Pa.: Seth Press, 1986.

Frienländer, Saul.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1939.* New York: HaperCollins, 1997.

Frienländer, Saul.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 New York: HaperCollins, 2007.（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卢彦名等译，徐新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

Gilbert, Martin. *The Macmillan Atlas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Hilberg, Rau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3 vols. New York and London: Holmes & Meier, 1985.

第十章　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的起源

Gordis, Daniel. *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New York: Ecco, 2016.（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王戎译，宋立宏校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Hertzberg, Arthur, ed. *The Zionist Ide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9.

Laquer, W.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Schocken, 1989.（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徐方、阎瑞松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Near, Henry. *The Kibbutz Movement: Origins and Growth, 1909-39.* Auckland, New Zea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awel, Ernst. *The Labyrinth of Exile: A Life of Theodor Herz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9.

Sachar, Howard M.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0.

第十一章　1948年后的犹太人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nd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Gitelman, Zvi. *A Century of Ambivalence: The Jews of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881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8.

Gordis, Daniel. 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New York: Ecco, 2016.（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王戎译，宋立宏校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Heilman, Samuel. *Portrait of American Jews: The La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Nadell, Pamela S. *America's Jewish Women: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oday*. New York: Norton, 2019.

Sachar, Howard M. *Diaspora: An Inquiry into the Contemporary Jewish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5.

Sachar, Howard M.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0.

Sarna, Jonathan D. *American Judaism: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乔纳森·D. 萨纳：《美国犹太教史》，胡浩译，徐新校，大象出版社，2009年。）

Sklare, Marshall. *American Jews: A Reader*. New York: Behrman House, 1983.

Wasserstein, Bernard. *Vanishing Diaspora: The Jews in Europe since 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ertheimer, Jack. *The New American Judaism: How Jews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Toda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索引

A

Abrabanel, Benvenida 本温尼达·阿巴伯内尔

Abrabanel, Isaac 以撒·阿巴伯内尔

Abraham 亚伯拉罕

Absalom 押沙龙

Adret, Solomon 所罗门·阿德列特

Africa 非洲

agriculture 农业

Ahab 亚哈

Ahaz 亚哈斯

Alexander Jannaeus 亚历山大·雅拿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map of empire of ~ 帝国地图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

Alfonso X (the Wise)智者阿方索十世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al-Hakim 哈基姆

Alkabetz, Solomon 所罗门·阿卡贝兹

Allenby, Edmund 埃德蒙·艾伦比

Alliance Israelite Universelle 世界犹太人联盟

Almohads 穆瓦希德人（阿尔摩哈德人）

America 美国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美国犹太代表大会

Amorites (West Semites)亚摩利人（西闪米特人）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Anan ben David 阿南·本·大卫

Anielewicz, Mordecai 末底改·阿涅莱维奇

Antiochus III (the Great)安条克三世（大帝）

Antiochus Ⅳ Epiphanes 安条克四世“神显”

Antony, Marc 马克·安东尼

Apiru (Habiru)阿毗鲁人（哈比鲁人）

Arab Higher Committee 阿拉伯高等委员会

Arabia 阿拉伯半岛

Arabic language 阿拉伯语

Arabs 阿拉伯人

attacks on Israel by ~ 袭击以色列

nationalism of ~ 的民族主义

and partitioning of Palestine ~ 和巴勒斯坦分治

Arafat, Yasir 亚西尔·阿拉法特

Aragon 阿拉贡

Arameans 亚兰人

Argentina 阿根廷

Aristobulus I亚利多布一世

Ashkenazim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Assyria, Assyrians 亚述，亚述人

Athaliah 亚他利雅

Augustine, Saint 圣奥古斯丁

Augustus (Octavian)奥古斯都（屋大维）

Auschwitz 奥斯威辛

Australia 澳大利亚

Austria 奥地利

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

Ayyubid dynasty 阿尤布王朝

B

Babylonia, Babylonians 巴比伦，巴比伦人

Baer, Dov 多夫·贝尔

Baghdad 巴格达

Balfour Declaration 《贝尔福宣言》

Balkans 巴尔干

Barcelona 巴塞罗那

Begin, Menachem 梅纳赫姆·贝京

Beilis, Mendel 孟德尔·贝里斯

Ben Ezra synagogue 本·以斯拉犹太会堂

Ben-Gurion, David 大卫·本-古里安

Ben-Yehuda, Eliezer 埃利泽·本-耶胡达

Ben-Zvi, Yizhak 伊扎克·本-兹维

Beth Sheean 贝斯·希安

Bible 《圣经》

- Karaites and 卡拉派和
- midrash and 米德拉什和
- Old Testament 《旧约》
- Saadia and 萨阿迪亚和
- *see also* Torah 另见《托拉》

Bilu movement “比卢”运动

Birobidzhan 比罗比詹

Black Death 黑死病

Blanis, Ginevra 吉内芙拉·布拉妮丝

blood libel 血祭诽谤

B'nai B'rith 圣约之子会

Bomberg, Daniel 但以理·邦贝格

Britan, *see* England 不列颠，见英国

Bulgaria 保加利亚

Bush, George 乔治·布什

businesswomen 女商人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国

C

Caligula 卡利古拉

Camp Massad 马萨营

Canaan, Canaanites 迦南地，迦南人

Canada 加拿大

capitulations 协议制度

Caro, Joseph 约瑟·卡罗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

Castile 卡斯提尔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Chmielnicki, Bogdan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Choral Synagogue 合唱会堂

Chosroes II 库思老二世（《旧唐书》作“库萨和”）

Christianity, Christians 基督教，基督徒

blood libel and 血祭诽谤和

conversion to 改宗

Crusades of ~ 十字军

Islam and 伊斯兰教和

in medieval Europe 中世纪欧洲的

Reformation in ~ 的宗教改革

in Spain 西班牙

circumcision 割礼

Civil War 美国内战

Claudius 克劳狄

Clement IV, Pope 教宗克雷芒四世

Clement VII, Pope 教宗克雷芒七世

Cleopatra 克利欧佩特拉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

Coele-Syria 克伊勒-叙利亚

cold war 冷战

colleges 学院

Communism 共产主义

concentration camps 集中营

Auschwitz 奥斯威辛

Congress of Vienna 维也纳会议

Constantine I 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rdovero, Moses 摩西·高杜维洛

Costa, Uriel da 乌列·达·科斯塔

Coughlin, Charles 查尔斯·考哥林

Council of the Four Lands 四地委员会

Counter 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court Jews 宫廷犹太人

courtier-rabbis 朝臣-拉比

Cromwell, Oliver 奥利弗·克伦威尔

Crusades 十字军

Cyprus 塞浦路斯

Cyrus 居鲁士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Czerniakow, Adam 亚当·捷尼亚科夫

D

Dachau 达豪

Damascus Affair 大马士革事件

Dark Ages 黑暗时代

David 大卫

map of kingdom of ~ 王国地图

De la Reina, Joseph 约瑟·德拉雷纳

Dead Sea Scrolls 死海古卷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原则声明》

Depression, Great 大萧条

Diaspora 流散

estimated Jewish population per country in 2017 2017年各国犹太人口估算

D önmeh 转信派

Dreyfus, Alfred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Dunash ben Labrat 杜纳什·本·拉布拉特

E

education 教育

Edward I爱德华一世

Egypt 埃及

Soviet Union and 苏联和

Eichmann, Adolf 阿道夫·艾希曼

Eleazar of Mainz 美因茨的以利亚撒

Elephantine 象岛

Elisha 以利沙

England 英国

Palestine and 巴勒斯坦和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Essenes 爱色尼派

Europe 欧洲

Black Death in ~ 的黑死病

Dark Ages in ~ 的黑暗时代

eastern 东欧

Jewish refugees in ~ 的犹太难民

Jews expelled from 遭 ~ 驱逐的犹太人

mass immigration to U.S. from eastern 从东欧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

medieval 中世纪的

Thirty Years' War in ~ 三十年战争

western 西欧

Exodus 《出埃及记》

Ezra 以斯拉

F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Fatah 法塔赫

fedayeen 费达因

Ferdinand 斐迪南

“final solution ”“最终解决”

First Zionist Congress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Flaccus 弗拉库斯

Florence, synagogue of 佛罗伦萨犹太会堂

Ford, Henrry 亨利·福特

France 法国

anit-Semitism in ~ 的反犹主义

German invasion of 德国入侵

Revolution in ~ 大革命

Frank, Jacob 雅各·弗兰克

Frederick II 腓特烈二世

G

Galilee 加利利

Gaza Strip 加沙地带

geniza 戈尼萨

geonim 高昂

German Jews, in U.S.美国德裔犹太人

Germany 德国

Nazi 纳粹

West 西德

ghettos 隔都

German 德国

in Italy 意大利

Warsaw 华沙

Golan Heights 戈兰高地

Gorbachev, Mikhail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Gordon, A. D. A.D.戈登

Granada 格拉纳达

Greece 希腊

Greek (Hellenic) culture 希腊文化

anti-Semitism and 反犹主义和

Gregory I格里高利一世

Gregory IX格列高利九世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The(Maimonides)《迷途指津》（迈蒙尼德）

gymnasium 体育场

H

Habiru (Apiru)哈比鲁人（阿毗鲁人）

Hadrian 哈德良

Haganah 哈加纳

Hagiographa 圣录

Halevi, Samuel 撒母耳·哈列维

Hamas 哈马斯

Hamburg 汉堡

Hanukkah 光明节

Hasdai Ibn Shaprut 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

Hashemites 哈希姆家族

Hasidism 哈西德主义

Lubavitch 卢巴维奇派

Hasmonean dynasty 哈斯摩尼王朝

Hebrew language 希伯来语

books in ~ 语书籍

spoken, revival of ~ 口语复活

Hebrew Language Academy 希伯来语学术院

Hebrew Language Committee 希伯来语委员会

Hebron 希伯仑

Hellenic culture, *see* Greek culture 见希腊文化

Heraclius 希拉克略

Herod Agrippa 希律·阿格里帕

Herod Antipas 希律·安提帕

Herod the Great 大希律王

Herzl, Theodor 西奥多·赫茨尔

Hess, Moses 摩西·赫斯

Hezbollah 真主党

Hezekiah 希西家

Hillel 希列

Hillel II希列二世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olland 荷兰

Holocaust 纳粹大屠杀

map of European Jewry on eve of ~ 前夜的欧洲犹太人分布

see also concentration camps 另见集中营

Hoshea 何细亚

Humanism 人文主义

Hungary 匈牙利

Hussein II侯赛因二世

Hyrcanus, John 约翰·许尔堪

I

Iberian Peninsula 伊比利亚半岛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移民限制

India 印度

Innocent III, Pope 教宗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IV, Pope 教宗英诺森四世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

Inscriptions 铭文

Intifada 因提法达

Iran 伊朗

Iraq 伊拉克

Irgun 伊尔贡

Isaac 以撒

Isaac, Levi 利未·以撒

Isabella 伊莎贝拉

Islam, Muslims 伊斯兰教，穆斯林

Crusades and 十字军和

dhimmis and 迪米和

Shiite 什叶派

Israel (northern tribes)以色列（北方各支派）

Israel Baal Shem 以色列·巴阿尔·谢姆

Israel, State of 以色列国

establishment of ~ 的建立

Jewish population in (2017) ~ 犹太人口（2017年）

parade in ~ 游行

in Six-Day War ~ 在六日战争中

war of Independence in ~ 独立战争

Israelites 古以色列人

Twelve tribes of ~ 的十二支派

Italy 意大利

ghettos in ~ 隔都

Jewish population in (2017) ~ 犹太人口（2017年）

main Jewish communities of ~ 主要犹太社群

in 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J

Jabotinsky,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

Jacob 雅各

Jannaeus, Alexander 亚历山大·雅拿

Jehoahaz 约哈斯

Jehoiachin 约雅斤

Jehoiakim 约雅敬

Jeroboam 耶罗波安

Jeroboam II 耶罗波安二世

Jerusalem 耶路撒冷

fall of ~ 沦陷

modern-day 现代

Temple in ~ 圣殿

Jesuit Order 耶稣会

Jesus 耶稣

Jewish Agency 犹太代办处

Jewish Brigade 犹太旅

Jewish Fighting Organization 犹太战斗组织

Jewish Merchant 犹太商人

Jewish revolts 犹太起义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 美国犹太神学院

Jezebel 耶洗别

Johanan ben Zakkai 约哈南·本·扎卡伊

John Hyrcanus 约翰·许尔堪

Johnson Act 《约翰逊法案》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联合分配委员会

Jordan 约旦

Joseph 约瑟

Joseph II约瑟夫二世

Joseph, Jacob 雅各·约瑟

Joshua (Jason)约书亚（耶孙）

Josiah 约西亚

Judah 犹大

Judah the Maccabee 犹大·马卡比

Judah the Patriarch 族长犹大

Judaism 犹太教

American Reform 美国改革派

Christianity and, *see* Christianity, Christians 基督教与～，另见基督教、基督

教徒

Conservative 保守派

conversion to 改宗

Enlightenment and 启蒙运动和

Hasidic 哈西德

Islam and, *see* Islam, Muslims 伊斯兰教和～，见伊斯兰教，穆斯林

Karaite 卡拉派

Lubavitch 卢巴维奇派

Orthodox 正统派

pagans and 异教徒和

as persecuted religion ~ 作为受迫害的宗教

Rabbanite 拉比派

rabbinic 拉比

reformed 改革派

as religion rather than national identity ~ 作为宗教而非民族身份

Judea 犹地亚

population deported from 迁离 ~ 的人口

Judeo-Arabic literature 犹太-阿拉伯语文学

Judezmo 犹代默语

Julian the Apostate 叛教者尤利安

Julius III, Pope 教宗尤利乌斯三世

Justinian I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II查士丁尼二世

K

kabbalah 卡巴拉

Karaites 卡拉派

Khazaria 哈扎尔

Knesset 克奈塞特（以色列国议会）

Kokhba, Bar (Simon bar Kosiba)巴尔·科赫巴（西蒙·巴尔·科西巴）

Kristallnacht 碎玻璃之夜

Ku Klux Klan 三K党

L

Labor Zionists 劳工犹太主义复国者

Ladino (Judezmo)拉迪诺语（犹代默语）

landowing 土地所有

Lateran Councils 拉特兰会议

League of Arab States 阿拉伯国家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Lebanon 黎巴嫩

Lebanon War 黎巴嫩战争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

Levantine Jews 黎凡特犹太人

Libya 利比亚

Likud party 利库德集团

Lithuania 立陶宛

loaning of money 贷款

Lubavitch Hasidim 卢巴维奇派哈西德

Luria, Isaac (the Ari)以撒·卢里亚（狮子）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M

Maimonides 迈蒙尼德

Mameluk 马穆鲁克

Marranos 马拉诺

Mattathias 玛他提亚

Mein Kampf (Hitler)《我的奋斗》(希特勒)

Menasseh Ben Israel 玛拿西·本·以色列

Mendel, Menahem 梅纳赫姆·孟德尔

Mendelssohn, Moses 摩西·门德尔松

Menelaus 梅涅劳斯

menorah 七枝烛台

Merinid dynasty 马林王朝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messianic movements 弥赛亚运动

Mexico 墨西哥

Middle Ages 中世纪

Middle East 中东

midrash 米德拉什

Mishnah 《密释纳》

Molcho, Solomon 所罗门·莫尔科

moneylending 放贷

Mongols 蒙古人

Montefiore, Moses 摩西·蒙蒂菲奥里

Morocco 摩洛哥

Moses 摩西

Moses de Leon 摩西·德·莱昂

Muhammad 穆罕默德

Murad III穆拉德三世

Muslims, *see* Islam, Musilims 穆斯林，见伊斯兰教、穆斯林

N

Nahman of Bratslav 布拉斯拉夫的纳赫曼

Nahmanides (Moses ben Nahman)纳赫马尼德（摩西·本·纳赫曼）

Napoleon 拿破仑

Nasi, Gracia 格拉西娅·纳西

Nasi, Joseph 约瑟·纳西

Nasser, Gamal Abdel 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

Nathan of Gaza 加沙的拿单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Arab 阿拉伯

Palestinian 巴勒斯坦

Nazi Germany 纳粹德国

Nebuchadnezzar 尼布甲尼撒

Negev Desert 内盖夫沙漠

Nehemiah 尼希米

Netanyahu, Benjamin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Netanyahu, Yonatan 约拿单·内塔尼亚胡

Netherlands 尼德兰

New York 纽约

Nuremberg Laws 《纽伦堡法案》

O

Omri 暗利

Oppenheimer, Samuel 撒母耳·奥本海默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P

Pact of Umar 《欧麦尔条约》

pagans 异教徒

Palestine 巴勒斯坦

Jewish Settlement in ~ 犹太人定居点

partitioning of ~ 分治

violence in ~ 暴力活动

Zionism and 犹太复国主义与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

Palestinian Authority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papacy 教廷

Parthian Empire 帕提亚帝国

Passover 逾越节

patriarchs 犹太族长

Paul 保罗

Paul IV, Pope 教宗保禄四世

pawnbroking 典当业

Peel Commission 皮尔委员会

Peres, Shimon 西蒙·佩雷斯

Persian Empire 波斯帝国

Pharisees 法利赛派

Philip the Fair “美男子”腓力

Philistines 非利士人

Philo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的斐洛

Pilate, Pontius 本丢·彼拉多

Pinsker, Leon 利奥·平斯克

Pitichowski, Leopold 利奥波德·皮提秋斯基

Pius XII, Pope 教宗庇护十二世

piyyut 皮尤特

poetry 诗歌

Poland 波兰

- concentration camps in ~ 集中营
- German invasion of 德国入侵
- Jewish population in (2017) ~ 犹太人口（2017年）
- Partitioning of 瓜分
- resistance in ~ 的抵抗

popes 教宗

Portugal 葡萄牙

Prophets 先知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锡安长老会纪要》

Provence 普罗旺斯

Prussia 普鲁士

Ptolemid dynasty 托勒密王朝

Pumbedita 蓬贝迪塔

Puritans 清教徒

Q

Quran 《古兰经》

R

rabbinic Judaism 拉比犹太教

rabbis 拉比

courtier-朝臣-

grand 大

women as 女性

zaddikim 柴迪克

Rabin, Yitzhak 伊扎克·拉宾

Ramses II拉美西斯二世

Rashi 拉熹

Rashi-Synagogure 拉熹犹太会堂

Red Scare 红色恐慌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refugees, in Europe 在欧洲的难民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Reubeni, David 大卫·卢本尼

Reuchlin, Johannes 约翰内斯·鲁希林

Revisionists 修正派

revolts 起义

Revolutionary War 美国革命战争

Roman Empire, Romans 罗马帝国，罗马人

anti-Semitism and 反犹主义与

collapse of ~ 的崩溃

Jews under, map of ~ 统治下的犹太人分布图

Roosevelt, Franklin D.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Rothschild family 罗斯柴尔德家族

Rumania 罗马尼亚

Russia 俄国

Bolshevik revolution in ~ 布尔什维克革命

Jewish population in (2017) ~ 犹太人口（2017年）

Pale of Settlement in ~ 栅栏区

pogroms in ~ 的集体迫害

see also Soviet Union 另见苏联

S

Saadia ben Joseph 萨阿迪亚·本·约瑟

Sadat, Anwar 安瓦尔·萨达特

Sadducees 撒都该派

Safed 采法特

Salonika 萨洛尼卡

Samaria 撒玛利亚

Samaritans 撒玛利亚人

Samuel the Nagid 撒母耳·纳吉德

Sanhedrin 犹太教公会

Sardinia 撒丁岛

Sassanid Empire 萨珊帝国

Saul 扫罗

Schechter, Solomon 所罗门·谢克特

Schneerson, Menahem Mendel 梅纳赫姆·孟德尔·施内尔松

sefirot 赛菲洛

Seleucid dynasty 塞琉古王朝

Selim II塞里姆二世

Sennacherib 西拿基立

Sephardim 塞法迪犹太人

Serbia 塞尔维亚

Sethos I塞索斯一世

Shabbetai, Zevi 沙巴塔·泽维

Shamir, Yitzhak 伊扎克·沙米尔

Sharansky, Natan 纳坦·夏兰斯基

Sharon, Ariel 阿里埃勒·沙龙

Shepherd's Crusade 牧羊人十字军

shtetls 犹太小镇

Sicily 西西里

Sinai 西奈

Sisebut 西塞巴特

Six-Day War 六日战争

slavery 奴隶制

socialism 社会主义

Solomon 所罗门

map of kingdom of ~ 王国地图

Soviet Union 苏联

Jewish population in former (2017) 前 ~ 的犹太人口（2017年）

German invasion of 德国入侵

Spain 西班牙

Jewish exiles from 遭 ~ 驱逐的犹太人

Jewish population in (2017) ~ 犹太人口(2017年)

Spinoza, Benedict 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Stern gang 斯特恩帮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Switzerland 瑞士

synagogues 犹太会堂

Ben Ezra 本·以斯拉

Choral 合唱

Dura Europos 杜拉-欧罗普斯

of Florence 佛罗伦萨

havurot and 哈夫罗特和

in Worms 沃尔姆斯

Syria 叙利亚

Syria-Palestina 叙利亚-巴勒斯坦

T

Tacitus 塔西佗

Talmud 《塔木德》

Babylonian 巴比伦

Christianity and 基督教与

Palestinian 巴勒斯坦

printing of ~ 印制

Tel Aviv 特拉维夫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Tiberias 太巴列

Tiglath-pileser III 提革拉毗列色三世

timelines 年表

Toland, John 约翰·托兰德

Toledo 托莱多

Torah 《托拉》

Zohar and 《佐哈尔》与

trade 贸易

routes of ~ 路线

Tunisia 突尼斯

Turkey 土耳其

Tyre 推罗

U

Uganda 乌干达

Ukraine 乌克兰

United Kingdom 英国

see also England 另见英格兰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Palestine partitioned by 巴勒斯坦被 ~ 分割

United States 美国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in ~ 的移民限制

Jewish population in (2017) ~ 的犹太人口（2017年）

universities 大学

Uzziah 乌西雅王

V

Venice 威尼斯

Vespasian 韦斯巴芗

W

Wailing Wall 哭墙

War of Attrition 消耗战

War of Independence 独立战争

Warsaw Ghetto 华沙隔都

Weizmann, Chaim 哈伊姆·魏茨曼

Wertheimer, Samson 参孙·韦特海默

West Bank 约旦河西岸

West Semites (Amorites)西闪米特人（亚摩利人）

White Paper 白皮书

Wise, Isaac Mayer 以撒·梅耶·怀斯

women 女性

in business ~ 商人

in clergy ~ 神职人员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战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Y

Yahweh 耶和华

Yemen 也门

Yeshiva University 叶施瓦大学

Yiddish 意第绪语

Yom Kippur attack 赎罪日攻击

Z

zaddik, zaddikim 柴迪克

Zalman, Shneur 史努尔·扎尔曼

Zealots 奋锐党

Zedekiah 西底家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

Labor 工党

Revisionist 修正派

Zohar 《佐哈尔》

译后记

当这本《犹太人三千年简史》译稿终于完成的时候，我心中却未有丝毫的如释重负，因为这虽然是我的第二本译作，却只能算是我学术征途上的一声发令枪而已。我的求学道路可谓曲折离奇，蹭蹬至奔四才跟从宋立宏老师攻读博士，开始了在南京大学的研修。眼看年将不惑，心中所惑却未见收敛地与日俱增起来，其中之一便是造化之奇妙。许多年前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书时，曾涉猎过海外华人史，于是第一次接触到“流散”（Diaspora）这个概念。仔细一查，此词原本专指犹太人的流散，不由得心中一动：犹太人和海外华人在流散模式上确实有许多可以比较的异同，岂不值得研究？可惜其时我的专业是汉学，没有余力再去探讨比较文化之类宏大的专题了，只能作罢。殊不知当时的灵光一现，竟成了我如今学术生涯的一颗种子。

时隔多年，我竟真的步入犹太研究领域，才发现这实在是一片风景独特的广阔天地：既有耶路撒冷古城般的浑厚凝重，也有特拉维夫海滩般的时尚活泼；既有奥斯威辛集中营般的阴冷肃杀，也有安息日家宴般的惬意温馨。这些都让我对未来的学术道路充满期待与憧憬，也让我对犹太文化、犹太人有了更深的体悟。

犹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在实践层面贯彻“全球化”理念的族群，这既是犹太人的生存策略，也是犹太人繁荣兴盛的秘诀。不过，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非犹太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往往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是各种反犹色彩的偏见、诋毁、诽谤甚至迫害；要么言犹太必称优秀，继而盲目地推崇……这种或棒杀或捧杀的态度，无助于我们从犹太人现象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当然，要避免武断的评价，首先需要对犹太人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恰好，《犹太人三千年简史》在这个越来越讲究简约高效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洞察数千年犹太文明史的理想平台——篇幅适中，脉络清晰，语言简洁，本书也正是我在治学伊始不可或缺的参考。由此我萌发了译介的念头。

将本书推荐给我的，正是我的恩师宋立宏教授。他不仅在翻译阶段从专业和语言两方面给了我许多宝贵意见，还花费大量时间亲自对我的

译稿逐字逐句进行了校订，以惊人的细致和渊博纠正了原译稿中的诸多讹误与疏漏，不但工作量远超我这个译者，还让本以为译文尚佳的我深刻认识到自己在学术上的差距。作为学生的我，唯有努力学习和研究，才能报答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栽培。

此外，还要感谢在我茫然时为我迷途指津的南京大学萧玲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松年教授。更要感谢一直对我寄予殷切期望和关爱的侯惠勤教授、徐新教授、洪修平教授、孙亦平教授、周矩敏教授等众多先生。当然，也要感谢我的父母在我求学之路上无怨无悔的理解与支持。所憾者，目前只有这一本译作聊以为酬，末学小子还当自强不息，以更多成果答谢诸位师长。

张鋆良

2019年1月27日

于姑苏桃花坞

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2016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

[以色列] 丹尼尔·戈迪斯 著

王戎 译

宋立宏 校译

以色列

一个民族的重生

浙江人民出版社

以色列

一个民族的重生

[以色列] 丹尼尔·哥迪斯——著

王戎——译

宋立宏——校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以）丹尼尔·戈迪斯著；王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9

书名原文：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ISBN 978-7-213-08798-1

Ⅰ．①以…　Ⅱ．①丹…②王…　Ⅲ．①以色列 - 历史　Ⅳ．①K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9212号

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by Daniel Gordis

Copyright © 2016 by Daniel Gord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 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地图审图号：GS（2018）4239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8-66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以色列］丹尼尔·戈迪斯　著

王　戎　译　宋立宏　校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丛书策划：王利波

责任编辑：汪　芳

责任校对：姚建国　张谷年　朱志萍

封面设计：张泮俭　张庆锋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16.5

字　　数：378千字

插　　页：15

版　　次：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8798-1

定　　价：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引言

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

禁止眼目不要流泪，

因你所做之工必有赏赐……

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耶利米书》31:16—17

我感到，人的生命应该深深扎根于故土某处，它可以在那里获得这种温柔而亲切的爱：爱那里的大地，爱那里人们的劳作，爱萦绕在那里的各种声响和乡音，爱可以将早年的家园从日后博闻广识中清晰区分开的一切；每当历历在目的往事涌上心头，就会交织着思慕之情。

——乔治·艾略特《丹尼尔·德隆达》

文前彩插



图1　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摄于1924年他从柏林移居以色列地的前夜。



图2　西奥多·赫茨尔最有名的一张照片。1901年由犹太艺术家Ephraim Moses Lilien在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期间拍摄，照片上赫茨尔站在巴塞尔的三国王（Drei Könige）酒店房间的阳台上，思考着犹太国的建国大业。

Altneuland

Roman

von

Theodor Herzl

Wenn Ihr wollt,
Ist es kein Märchen



Leipzig
Hermann Seemann Nachfolger.

3

图3 《新故土》初版（莱比锡，1902年）扉页，上有著名的题词：“如果你渴望它，它就不是梦想。”



图4 阿哈德·哈姆于1922年1月移居特拉维夫。

建设家园，发展农业：建设伊休夫和在土地上耕作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精神。



图5　1932年人们在农田里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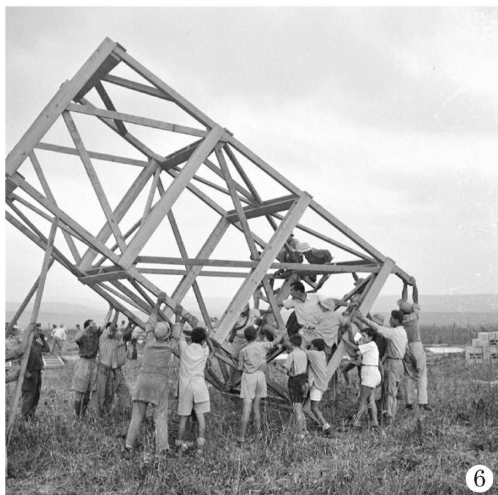


图6　人们在安装观察哨和防御栅栏。



图7　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和世俗犹太人会面。

复兴希伯来语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个重要工程。希伯来语作家广受尊重，成为代表民族的声音。



图8 “学习希伯来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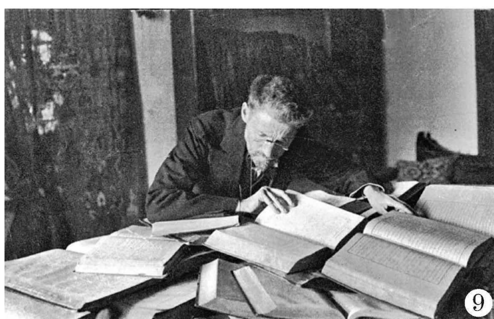


图9 埋首书堆的埃利泽·本 - 耶胡达。

新犹太人的形象：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强调要创造“新犹太人”。不同于欧洲犹太人，“新犹太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海报展现了肌肉发达的“新犹太人”，塑造了他们在土地上劳动和保卫家园的形象。



图10 “参军入伍！”



图11 “拯救民族和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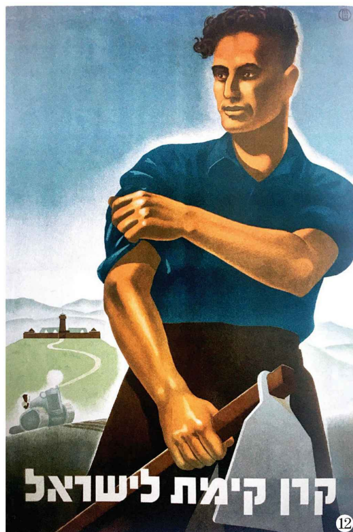


图12　20世纪30年代犹太国民基金的海报，一位拓荒者撸起袖子在以色列地从事建设。



图13　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右二）和他的作家朋友，左一是196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格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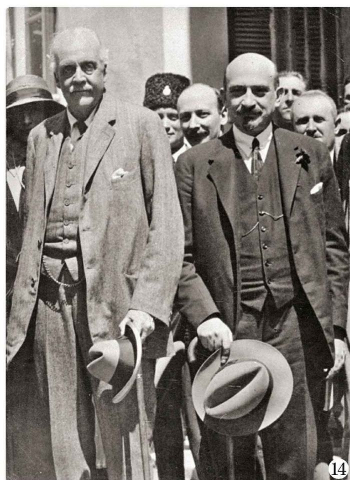


图14　哈伊姆·魏茨曼博士和亚瑟·贝尔福勋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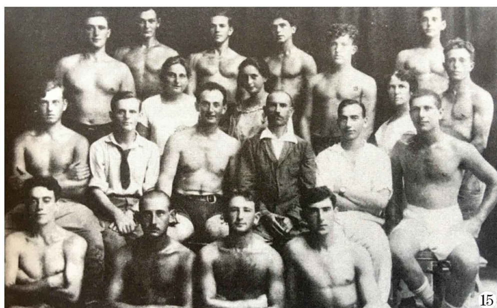


图15　哈加纳第一届指挥官培训班1921年在特拉维夫和Kfar Gil'adi举行。中间穿夹克的是教官Elimelek Zelikovitz，典型的新犹太人。



图16　“泽夫·雅博廷斯基回到祖国”海报，1964年。1964年7月7日，根据雅博廷斯基1935年的遗嘱，并得到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的批准（见本书第198页脚注），雅博廷斯基夫妇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耶路撒冷。这张海报具体列出了下葬队伍停留的地点和时间，供送葬的民众瞻仰。



חיים ארלוזורוב נרצח

אחים בכאב,

הועד הפועל

图17　1933年6月18日《达瓦尔》报首页的头条新闻《哈伊姆·阿罗佐罗夫遇刺》。



图18　1932年春天在特拉维夫举行的第一届马卡比运动会的海报。这是犹太世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吸引了21个国家的犹太运动员和数千游客，不少人后来作为非法移民留了下来。



图19　以色列最重要的民间舞蹈霍拉（Hora）舞，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恩哈罗德（Ein Harod）基布兹。



图20　1944年犹太工人总工会的海报，画面上刀形的“以色列地”地图将1939年的“白皮书”劈成两半。

非法移民：犹太人不顾英国的限制政策移民巴勒斯坦。早期非法移民非常关键，不但拯救了很多从欧洲逃亡的犹太人，还为以色列建国奠定了人口基础。



图21　英国士兵严密监视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靠岸。



图22　一艘移民船被拖上岸。



图23　难民乘船抵达。



图24　1947年11月29日夜晚，特拉维夫街头的人群欢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

以色列独立被认为是犹太历史上最具开创性的时刻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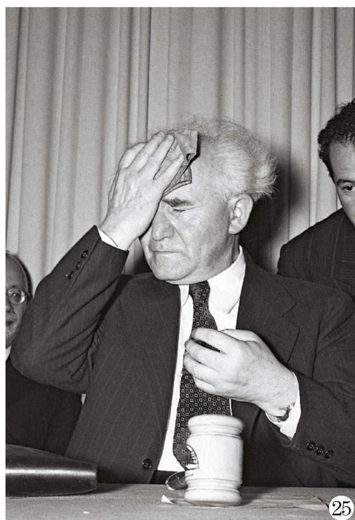


图25　1948年5月，即将宣布以色列建国的大卫·本 - 古里安。



图26　1948年5月14日，在特拉维夫博物馆，本 - 古里安站在赫茨尔的画像下宣读以色列《独立宣言》。



图27　1950年贝京领导的赫鲁特党出版的海报，上面的文字是“记住阿尔塔莱纳号及其武器和战士”。



图28　1949年3月，最早抵达Umm Rashrash（今埃拉特[Eilat]，以色列最南端通往红海的出海口）的帕尔马赫战士发现这里没有国旗，便即兴用蓝墨水在一块布上画出国旗并升起。



图29　1964年上映的电影《萨拉赫·沙巴提》，以法莲·基翁导演，是以色列第一部获得国际声誉的电影。



图30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抵达以色列。



图31　1967年6月7日，戈伦拉比在西墙前吹羊角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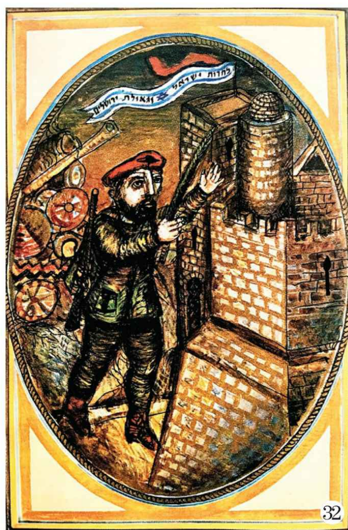


图32　1968年的《哈加达》插图。《哈加达》是犹太人逾越节的宗教礼仪用书，纪念的是圣经中希伯来奴隶摆脱埃及法老的奴役，整本书的主题是救赎。这页插图来自1968年耶路撒冷《哈加达》，它赋予六日战争的胜利和东、西耶路撒冷的统一以宗教含义：传统插图上这里一般是骑着驴子的弥赛亚来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前，象征最终救赎的到来；但此处一位以色列空降兵背着枪支，手持象征胜利的棕榈枝，来到耶路撒冷老城的雅法城门前，城门上插着以色列国旗，上面的文字是“以色列的自由，耶路撒冷的救赎”。



图33　“达扬和沙龙又笑了”，摄于1973年战争期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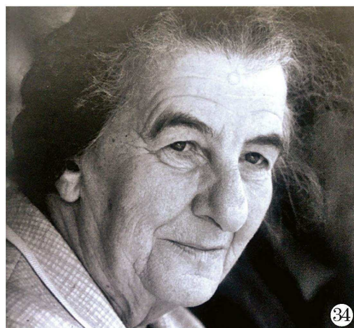


图34　梅厄夫人。



图35　2011年，耶路撒冷穆斯拉拉（Musrara）区（即黑豹运动发源地）一条小巷以“他们不是好人”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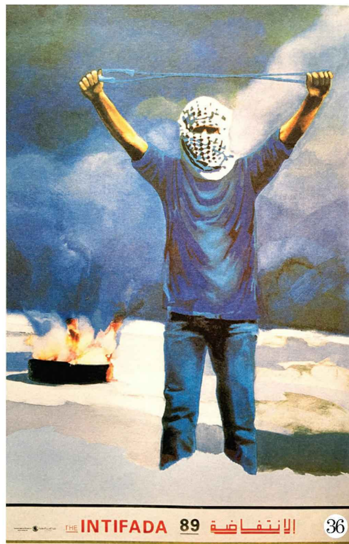


图36　“1989年因提法达”，巴勒斯坦无名艺术家创作的海报。一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手举弹弓，背后是燃烧的车胎。烧车胎是用来在游行和骚乱时干扰以色列士兵的视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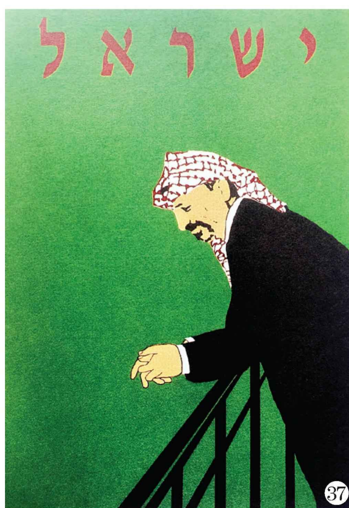


图37　“以色列”。以色列艺术家Iris Dishon于1988年为以色列建国40年而作的海报。构图取自赫茨尔在巴塞尔的一幅著名照片（见图2），海报所用的赭、黑、绿三色取自巴勒斯坦的旗帜。



图38 “妈妈”。以色列艺术家David Tartakover作于1988年的海报。一位在占领土地上巡逻的以色列士兵路过一位阿拉伯妇女，两人对视的一瞬间，他可能想到自己的妈妈，而她可能在想自己的儿子。

以色列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依靠来自全世界的犹太移民建立起来的犹太国家。



图39 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将也门犹太人运送到以色列的“魔毯行动”。



图40　1991年5月，将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运送到以色列的“所罗门行动”。



图4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极端正统派在耶路撒冷发起的示威游行规模越来越大。他们主要抗议违反安息日教规、在极端正统派居住区附近设立世俗机构、考古挖掘和要求他们服兵役的议案。



图42　伊扎克·拉宾及其实现和平的伙伴约旦国王侯赛因。



图43　阿里埃勒·沙龙长期以来是人们心中的战士和政治家，但在他自己心中，他只是一个农民。



图44　贝京欢迎越南难民，1980年。

佳评推荐

和以色列这个国家一样，丹尼尔·戈迪斯写的《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充满勇气、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作品。本书讲述了以色列建国至今令人惊叹的故事。任何人，只要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感兴趣，都会在这部持论公允、叙事平衡和众所急需的书中发现深刻的见解。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作者

以色列是谁？它从何而来？为什么犹太国将继续存在，且必须继续存在？戈迪斯精准地抓住了这些问题的本质。有人曾问我："关于以色列，如果只读一本书，应该读哪本？"现在我已有了答案。

——克林顿总统的中东特别协调员丹迪斯·罗斯
《失去的和平：争取中东和平的内幕》作者

丹尼尔·戈迪斯写下了一部极具启发性的历史，在其中，他不仅通过政治家和战士，还通过艺术家、作家和诗人来讲述以色列的故事。戈迪斯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的灵魂，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在地球上最受憎恨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受喜爱的国家之一。

——约西·克莱因·哈勒维
《像梦想家一样：统一耶路撒冷但分裂国家的以色列空降兵》作者

以色列史可以说是现代以来最伟大的故事，以简洁而有力的方式陈述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丹尼尔·戈迪斯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用丰富的文字和深刻的见解充满激情地呈现了以色列的历史。他这本书会让对犹太国感兴趣的人爱不释手，还会成为学者、学生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文献。

——以色列前驻美国大使迈克尔·奥伦
《六日战争：1967年6月及其对现代中东的塑造》作者

关于以色列国取得的胜利和经历的磨难，终于有了一部情感细腻、

文笔优美、立场公正的作品。

——洛杉矶西奈圣殿拉比戴维·沃尔普
《大卫：分裂的心》《令失败有意义》作者

这本书用精彩、易读、细腻和睿智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故事，任何想弄清楚世界上这个复杂角落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埃默里大学教授底波拉·莉丝黛
《否认：大屠杀历史的审判》作者

在丹尼尔·戈迪斯编织的这张关于以色列史的美丽挂毯中，我们能看到创建新型犹太社会是一项多么令人佩服的复杂工程。《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很好地提醒我们：凭借新的语言、世俗的文化和无与伦比的成就，以色列当之无愧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

——塔利娅·卡尔纳
《莫斯科酒店》《耶路撒冷少女》作者

丹尼尔·戈迪斯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小说家的写作才华于一身。他探究整个以色列历史，解释了20世纪犹太国的重建为何及如何彻底改变了犹太历史，让复杂的历史事件变得明了易懂。《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本真正重要的书。

——约瑟夫·特拉兴金拉比
《犹太文学》《犹太伦理学准则》《拉比》作者

戈迪斯在事件的叙述中融入了他对历史的判断，巧妙使用了文学文献，介绍了以色列形成期的关键人物，对以色列的历史、政治，特别是其灵魂，进行了深人思考。《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活力四射、思路清晰、充满智慧的作品。

——伊兰·特洛恩
以色列研究学会主席

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
——中译本序

以色列是众所瞩目的国家。无论在当代全球政治变局，还是千年世界文化格局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的特殊位置都无须赘言。关于以色列的中文书越来越多，不少还是以色列人写的。我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再来组织翻译一本关于以色列的书？

本书是以色列通史，原著出版于2016年。我国上一本以色列通史译著的原著出版于2002年（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这十几年来，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起义（“因提法达”）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隔阂愈益加深。和平既然无望，以色列人开始更多地向内看，以往被巴以冲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遭驱逐而移民以色列，这些东方犹太人（Mizrachim）的体征、文化与习俗迥异于欧洲裔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欧洲白种犹太移民建国前就来到巴勒斯坦，此时大权在握的他们免不了歧视和剥削东方犹太人，让后者心生怨恨。进入21世纪后，东方犹太人的后代不仅在人数上早已赶超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政治势力举足轻重，文化影响也正在扩大。虔诚的东方犹太人不仅与世俗化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矛盾重重，更与约100万来自前苏联的几乎没有任何信仰的犹太移民判若油水。由此产生的政治、文化斗争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大多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虽然世俗化了，但他们中仍有一小部分所谓的哈瑞迪人（Haredim）顽强抵制现代世俗文明，以独特的服饰和自成一体的居住区刻意与世俗世界划清界限，力主犹太教自古以来的神圣启示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弃。其中有些人更坚持神权政治或异族统治的理念，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大业为渎神的洪水猛兽，他们反对以色列政府，其不遗余力的程度，即使与巴勒斯坦人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色列建国时，哈瑞迪人的数量微不足道，政府便网开一面，免除了他们的兵役。但近年来，由于高生育率，以及部分东方犹太人的加入，哈瑞迪人口迅速攀升，政治和经济势力已不可小觑。他们的拒服兵役以及他们的世界观造成了以色列社会的严重分化。

与哈瑞迪人相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人数更少。黑皮肤使他们的犹太身份广受质疑，或明或暗的种族歧视令他们长期沉沦于社会底层。近年来，他们以暴乱为形式的反抗不时见诸报端。

以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不仅根植于不同的籍贯和文化传统，也来自于不同的现实主张。对于1967年以后约旦河西岸涌现的犹太定居点，有的以色列人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屏障；有的坚持认为去那里定居只是重新回到圣经时代神的“应许之地”；有的则警告，一旦把那里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纳入统治，犹太国的犹太性就会瓦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最有利于国家利益，捍卫自己立场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故而这个问题不仅是巴以和谈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还是以色列国内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戈迪斯此书写于这类内部矛盾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视野之际，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这是有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之处。因此，本书并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战争史、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再加犹太移民史，而毋宁说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作者想谱写的，不是以军乐为主的铜管乐，而是多声部的交响乐；作者想捕捉的，与其说是政治事件、军事行动、谈判桌、协议内容、营救策略，不如说是这些东西背后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观念。

戈迪斯此书也写于巴以冲突调和无望之际。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以色列学者根据以色列和英国的解密档案，陆续写出了一批实证性著作，挑战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叙事，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要讲述以色列的故事，就不得不面对两种深刻对立并仍在交锋的叙事：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一场犹太人发起的殖民运动——就像这批“新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s）所主张的，还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就像传统观点所坚持的？相应地，以色列国有没有扮演殖民压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这种争论多少可以视为对巴以冲突延伸进学术领域的折射，哪怕争论双方基本是以色列人。

戈迪斯对这场争论的态度，书后的引用文献就有反映。就“新历史学家”的旗手而言，对于主张巴勒斯坦人的视角不能忽视、中文世界也有译介的艾兰·佩普（Ilan Pappe），他只引用了一篇论文，还是转引自他人文章。对于写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巨著、认为以色列在绿线之外的殖民活动是构成巴以和谈主要障碍的阿维·施莱姆（Avi Shlaim），他没有引。他倒是大量引用了“新历史学家”一语的发明者本尼·莫里斯

（Benny Morris）的观点，但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莫里斯已经戏剧性地从政治左翼转向了政治右翼——这也是不少以色列人思想转变的一个缩影。

当然，不同于新历史学家，戈迪斯对以色列的社会与文化更有兴趣；而较之传统叙事，他更在意追溯“犹太国”的观念史，在裁剪史料时更偏好表现以色列人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事件，因而更善于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民意，更擅长捕捉以色列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戈迪斯在很多人眼中属于温和的保守派，他大体上似乎在走中间路线：既不回避以色列的恶行，也不吝于赞美它的善举。毫无疑问，关于以色列的过去，争论永远不会结束。但如何记忆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现实，也包含了如何塑造未来的设想，这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戈迪斯1959年生于纽约市一个犹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是美国保守派犹太教的领袖和著名学者，叔叔是当今美国犹太社团的领袖拉比之一。他儿童时代就在以色列生活过几年，后来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39岁时举家移民以色列，目前任教于耶路撒冷的沙勒姆学院（Shalem College），这是以色列第一所按照美国常青藤学府办学模式打造的强调研读经典著作的博雅学院。这种背景使他迥异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现代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者。他在观察以色列时，既有那份能够入乎其内的谙熟，又有一份出乎其外的超然。但最突出之处，恐怕仍在于他对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有着不同的理解。

以色列的建国之父们对犹太传统的继承有高度的选择性。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在圣经时代的祖先说希伯来语，建立过统一强盛的国家，因而是现代犹太国的光辉典范。相形之下，在随后近两千年的时光中，犹太人被驱逐出“应许之地”，流散到世界各地，日常生活里不再说希伯来语，政治上则碌碌无为，心甘情愿受异族统治，就算屡遭欺凌，却一直逆来顺受，最终像温顺的羔羊一般任由纳粹屠杀。因此，后圣经时代的犹太传统——包括这一时期形成的犹太教圣典比如《塔木德》——统统是需要抛弃的糟粕。很多建国之父移民巴勒斯坦后就更改姓氏，把带有后圣经时代犹太传统特色的姓氏改成希伯来语化的姓氏，以示与流散生活的决裂。推崇“应许之地”的圣经传统而否定流散地的犹太传统，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社会根深蒂固的标志性特征。受此影响，犹太复国主义者致力于塑造新犹太人：他们不是传统犹太拉比那种苍白、文弱、阴柔的书生，而应当是晒得黝黑、魁梧挺拔、坚韧自信乃至有点粗野的拓荒者。这类新犹太人最典型、最成功的代表就是基布兹中的农民。

戈迪斯从小接受的传统犹太教育是以学习《塔木德》为核心的，他自然无法接受对流散地犹太传统的全盘否定。他在书中就提醒读者注意，基布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文化，但即便在其鼎盛时期，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7%左右。与犹太复国主义竭力宣传的价值观相反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后选择住进城市。

有意思的是，否认流散地的意识形态似乎也渗透进我国对以色列的译介中。基布兹文化向来在我国被当作最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国人最喜欢通过基布兹来理解以色列，但基布兹今天更像是受到保护的活化石，虽说是一块仍能吸引络绎不绝访客的活化石。中文世界最受欢迎的以色列作家无疑是阿摩司·奥兹（Amos Oz），他恰恰是基布兹文化的典型化身，奥兹几乎所有的作品有了中译本，连他编选的基布兹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都有中译本。我们甚至还有因染上肺结核而被赶出基布兹的女诗人拉亥尔的诗集的中译本。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Bialik）诗集的中译本。比亚利克的诗歌创作在他51岁移民巴勒斯坦前就已基本停止，移民后他定居于特拉维夫——早在建国前，这里就取代耶路撒冷，成了当地犹太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如何对待流散地的犹太传统，显然是戈迪斯评骘历史人物的一颗重要砝码。本 - 古里安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对潜在机遇的判断和发展趋势的感觉都超越了同僚，一直是公认的国父级别的人物。但值得玩味的是，戈迪斯不时拿本 - 古里安的头号政敌贝京与他对比，抑本 - 古里安而扬贝京的语气颇为醒目，似乎暗示贝京才代表了以色列历史的分水岭。贝京不仅通过结束本 - 古里安政党的专政而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态，通过与埃及实现和平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际环境，他还改变了犹太国的犹太性。贝京从未换过自己的姓氏，从不否认自己扎根于流散地的犹太灵魂。他团结东方犹太人，又为哈瑞迪人走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解读不能不说是基于当下现实对以色列历史的一种反思，毕竟，耶路撒冷近年来落成的贝京纪念中心和特拉维夫不起眼的本 - 古里安故居在外观上就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这种解读还多少带有复兴传统犹太教来替代早期建国之父们推崇的那种世俗化的圣经传统，以凝聚各方共识，防止以色列社会进一步分裂的用意。

在本书副标题“一个民族的重生”中，“民族”一词的原文是“nation”。与“people”这个在中文里也常常译作“民族”的词相比，nation更强调构成民族的人彼此之间在语言、历史、文化、出生或居住

地方面的共同点，而不包含人种（ethnography）因素的考量。1882年，正当东欧犹太人掀起第一次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之际，法国著名学者勒南（Ernest Renan）发表了后来成为经典的演讲《何谓民族？》（What is a Nation？）。按照勒南的定义，“民族是灵魂和精神原则”，其成分是过去和现在的两样密不可分之物，“一是共同拥有一份丰厚的记忆遗产；一是当前的一致，即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欲望，一种把未经割舍接受来的重要传统长久保存的意愿”。勒南明确把宗教排除在构成民族的成分之外，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宗教已退入私人领域，不再是动员社会的充分力量。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犹太教影响以色列公共领域的趋势渐渐抬头。面对分裂的、多样化的以色列社会，戈迪斯所希冀的这种既是宗教又是民族运动的犹太教能否成为以色列社会的黏合剂，抑或只是用来掩盖内部矛盾的白噪声，仍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的，毕竟以色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是高度世俗化的。

本书还着意呈现现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诗歌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电影、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代希伯来诗人往往有圣经时代先知的那种自觉意识，既是以色列社会的代言人或批判者，又代表了以色列社会的良知。至于大众文化，让我个人兴味盎然的是书中关于20世纪60年代摇滚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的部分，真想不到这位世俗天王的许多近亲如今已转变成了哈瑞迪人。多年前，在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学习班（ulpan）上，老师放了一首他的歌，一点不摇滚，是根据比亚利克的诗谱写的。我后来知道这或许是比亚利克传颂最广的诗篇：

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
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
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在仁慈的黄昏时分，
向你说说我痛苦的秘密：
人说，青春世上有——
我的青春何在？

再向你告白一个秘密：
我的灵魂为火焰烧焚；

人说，爱，世上有——
什么是爱？

星星将我骗害，
梦境业已不再；
如今世上，我一无所有，
什么都无。

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
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
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仿佛是寻求母爱的弃儿在喃喃自语；又像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比亚利克幼年丧父，母亲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将他交给祖父抚养；或许还是这位民族诗人用诗歌表达他在演讲中说过的意思：犹太民族思慕“应许之地”就好比游子渴望与久别的母亲重逢。全诗点缀着来自犹太祈祷书和神秘主义传统的典故，神圣的字词镶嵌在肉欲的意象上，梦境消散，祈祷又得不到回应，诗人的灵魂就这样低徊在拥有与失去之间、幻灭与怀念之间、信仰与不信之间、个人与民族之间、流散与回归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或许只有处在这种中间状态才会诞生诗歌？——直至什么都“无”，而在比亚利克所熟稔的犹太神秘主义传统里，“无”是一切有的起点。

我的合作者王戎先生因手术之故，以六指敲出译稿，此书对他很有纪念意义。高霞、关蕊、杨炯也为中译本贡献了智慧。

我个人在感佩之余，愿意用中译本纪念初闻艾因施坦此曲的那一刻。

宋立宏
2018年1月
于南京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所

目 录

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中译本序
序言　一个壮观的人类故事
第一章　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第二章　故土某处
第三章　是对话而不是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世纪之交时的分歧
第四章　梦想实现的曙光
第五章　《贝尔福宣言》：英帝国支持犹太国
第六章　无处可去，即使能离开
第七章　伊休夫抵抗英国统治，阿拉伯人反对分治决议
第八章　独立：国家诞生
第九章　从建国之梦到建国之路
第十章　以色列登上国际舞台
第十一章　以色列直面大屠杀
第十二章　改变国家命运的六日战争
第十三章　占领成为重负
第十四章　赎罪日战争："构想"心态破裂
第十五章　革命中的革命：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和复仇
第十六章　效法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
第十七章　和平进程陷入僵局
第十八章　犹太国的犹太复兴
结语　《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世纪后的犹太"民族家园"
致谢
附录1　人物简介
附录2　非英文术语释义
附录3　以色列《独立宣言》
附录4　以色列总理、总统和美国总统对应表
附录5　以色列政党及其分化组合
附录6　延伸阅读
注释
引用文献
索引
返回总目录

序言

一个壮观的人类故事

在以色列，要做现实主义者的话，你必须相信奇迹。

——以色列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1]

1898年，马克·吐温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写道："俄国制定了驱赶犹太人的法律，西班牙在400年前决定驱逐犹太人，几个世纪后奥地利做出同样的决定。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几乎在每个时代……都限制犹太人的活动。犹太人被禁止从事一个又一个行业，到最后几乎无事可做。犹太人不能务农，不能当律师，不能为非犹太人行医治病，不能从事手工业。甚至连高等学府和科学专科学校都不得不对这个可怕的对手紧闭大门。"[2]

但马克·吐温提到，有位犹太人提出了一个策略，能让犹太人告别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迎接更美好的未来。"你们听说过西奥多·赫茨尔的计划吗？他想让全世界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政府。当然，我认为他们会保留苏丹对巴勒斯坦的宗主权。在去年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世界各地的犹太代表团齐聚一堂，这个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马克·吐温的语气表明，他赞赏犹太人取得的成就，同情他们目前在欧洲的困境，甚至多少能理解他们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愿望。但他也表达了顾虑："我不是苏丹，我也不是要反对；但如果把全世界最狡猾的大脑集中到这里建立一个自由国家……我认为最好还是阻止他们。让这个种族发现自己的力量可不是件好事。别让赛马知道自己的力量，否则我们再也没法骑了。"

马克·吐温大概想不到自己是多么有先见之明。这篇文章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50年后，以色列建国。这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有史以来最非凡的人类故事之一。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后，能够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取得如此成就，达到如此高度。过去一百年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有时听起来像神话，但都是真实的。

以色列的故事，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一千多年来坚持梦想的故事，是一个在深渊边缘徘徊的民族最终实现救赎的故事，是一个国家创造奇迹、开创未来的故事。公元70年，犹太人被罗马人驱逐出犹地亚，两千年来，他们一直梦想回到这片先祖的土地。在每日的礼拜仪式上，他们总要时时提及耶路撒冷，请求上帝准许他们回到锡安。不管在哪里祷告，他们都会面朝耶路撒冷。逾越节晚餐仪式的末尾，他们会一起说“明年耶路撒冷见”。离开锡安是迫不得已，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能重回故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小拨犹太人开始移民巴勒斯坦，他们中有的人认为欧洲即将掀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浪潮；有的人移民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当时欧洲民族主义兴起，他们认为犹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国家。但悲哀的是，让这一理想变成现实的，不是犹太人的祷告，而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一幕幕恐怖场景。

尽管英国1917年颁布的《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观念，但进展缓慢，随后英国人对犹太人的立场由模糊转为敌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阻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沉重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刚刚燃起的建国希望。紧接着，从1939年到1945年，纳粹分子屠杀了波兰90%的犹太人，而战前的波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团，总人口达到330万。全部算下来，纳粹屠杀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这场种族灭绝前所未有，它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人们认识到犹太人需要一处属于自己的地方。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建设各种建国前的机构，并最终赶走了英国人。1948年5月，以色列国诞生。

建国初期，以色列非常困难，这个刚成立的国家财政储备匮乏，基础设施薄弱，而且还需要在短时间内吸收比当时人口还多的大量移民。犹太国建立后，许多国家开始驱逐本国的犹太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北非、伊朗、伊拉克等地来到以色列。遭遇过惨痛经历后，15万纳粹大屠杀的难民也来到以色列边境。以色列当时除了少量无法耕种的沼泽地，大部分地区是荒芜的沙漠。由于自然资源贫瘠和资金短缺，国家没有太多办法解决这么多人吃住，开始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制。刚刚建国几年，这个国家就濒于财政崩溃。

但以色列人没有自暴自弃，部分原因是他们无处可去。美国犹太人长期对犹太国这个观念持暧昧态度，但他们这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以

色列提供了急需的财政资源。加上德国人支付的大屠杀赔款，以色列逐渐从贫困和羸弱中走出来。以色列建设了公路等基础设施，发展了制造业，修建了国家输水系统和大量住房。通过不断展现自己的实力，以色列不但发展成地区强国，还在世界舞台上同美国、英国、法国一道谋划复杂的国际合作。建国20年后，由于以色列的成功及其对犹太人形象的重塑，苏联犹太人开始要求移民以色列。又过了几十年，以色列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甚至是西方羡慕的对象，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公司比整个欧洲大陆的公司还多。

以色列的快速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个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还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制度，到2000年时已生产出几十种在国际上获奖的葡萄酒。这个国家在几十年前只有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电视台，现在则拥有数不清的频道，以色列电影还入围奥斯卡奖。这个国家接收了许多被一些人当作被动和无助的典型的大屠杀幸存者，如今已成为军事大国。这个自古以来视学习为神圣使命的民族将该传统带到新生的国家，孕育出非凡成果，赢得多项诺贝尔奖，为诸多研究领域设立了国际标准。

以色列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故事，也是一场革命的故事。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致力于改变犹太人现状的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让犹太人获得重生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很多方面，犹太复国主义是对古老犹太教的反叛。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欧洲犹太人在历史上不断受攻击，长期被边缘化，欧洲当然要谴责，但犹太人自己也有责任。犹太人不应该随时甘愿充当受害者。不管生活在哪里，他们总以为那里是自己的家，直到东道国驱逐或谋杀他们。1290年英国驱逐犹太人，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然后就是席卷欧洲的反犹主义暴力活动。更让犹太复国主义者难以接受的是，在整个过程中，犹太人一直被动、软弱、充满恐惧，他们不曾尝试保护自己，不曾争取历史的主动权，而是挤在一块继续研读古老而神圣的经文。

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认为这正是急需改变的，他们的革命热情超乎人们的想象。犹太复国主义在很多方面试图切断犹太人和历史的联系。为了迫切追求全新的犹太身份，他们不惜更改姓氏。以色列最早的四位总理就是如此。大卫·本－古里安出生时叫大卫·格鲁恩，摩西·夏里特出生时叫摩西·谢尔托克，列维·艾希科尔的本名是列维·什科尔尼克，果尔达·梅厄（以色列第一位女总理）以前叫果尔达·梅耶森。更换姓氏是

和过去“告别”的一种方式。他们需要新的犹太世界观、新的犹太体格、新的犹太家园以及新的犹太名字。他们要创造“新犹太人”，让犹太民族实现重生。

以色列国的确出现了新犹太人，确切地说是出现了很多种新犹太人。以色列有一点很有趣：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止讨论犹太教与犹太人的现状和未来。这类讨论有时礼貌而克制，有时却会演变成以色列多条政治阵线上的激战。尽管争吵激烈，犹太复国主义总能在这条阵线上获胜，令人敬佩地获胜。今天的犹太人不再是当年生活在欧洲的胆小怕事之辈，毫无疑问，犹太复国主义创造了全新的犹太人。

犹太复国主义也是一场革命，它改变了犹太人没有家园的事实。面对20世纪中期欧洲爆发的种族灭绝的仇恨，许多犹太人无处可逃。美国和加拿大关闭了国门，英国人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许多载有犹太难民的船只无法靠岸。这些帮助犹太人逃离欧洲大屠杀的船只有时不得不返回欧洲，或被敌方舰艇故意击沉，仅仅因为无人想要“多余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决心改变犹太人无家可归的事实，以色列的建国实现了这一梦想。

经历了多个世纪的流亡之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复兴先祖时代的繁荣文化，让犹太人说自己的语言，掌握自己的命运。犹太人像他们的祈祷书中所说的那样分散在“大地的四个角落”，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他们能重新聚集在一起。上千年的流亡让希伯来语这种曾经的日常用语成为神圣的宗教语言，犹太复国主义要让这种几乎死去的语言重获新生。犹太人要像其他民族一样创造自己的音乐、艺术、文学和诗歌。他们既要创造高雅文化，也要创造大众文化。犹太人要生活在先祖们熟悉的城市中，行走在圣经中的祖先安居乐业的土地上。犹太领导人将制定战争、和平、经济、医疗和移民等方面的政策。犹太复国主义不但实现了这些理想，还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以色列如何反映了犹太民族的重生，本书要讲述的故事中就有这方面内容。

当然，并非所有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都能实现。西奥多·赫茨尔和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等人认为，犹太人能给中东地区带来进步，因而能够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们相信并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不和任何其他民族发生冲突。可惜，这个想法过于天真。早在建国前几十年，犹太人就一直处在一场激烈而痛苦的冲突中，很遗憾，这场冲突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

作为现代以色列国家的总设计师，西奥多·赫茨尔还认为，一旦犹太

人有了自己的国家，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就将成为历史。这个想法也过于天真。在某种程度上，以色列让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变得更为复杂，也让欧洲犹太人的境地变得更加尴尬。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的起起伏伏也是以色列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会作详细探讨。

以色列是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地方。这里既有诸多宗教圣地，又有热闹的酒吧和精彩的音乐表演（有人会说这是亵渎神灵）。这里在某些方面非常传统，但在其他方面又非常现代。这里居住着逃避现代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同时又是世界科技的中心。这里既居住着拥有不同肤色和种族背景、说不同语言的世俗犹太人和犹太教徒，又聚集了不少非犹太人。以色列吸收的移民（这里是全世界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大多来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但以色列是非常成功的民主国家。虽然在面积和人口上都只能算作袖珍国家，但以色列和它的故事向来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这个犹太国家，不明白它的活力和复杂性所在，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

虽然以色列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部单卷本著作像本书这样，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和平衡的观点，面向大众介绍以色列的故事。当然，目前不乏介绍以色列历史的优秀的单卷本著作，但其篇幅通常是本书的两三倍，很难得到普通读者的青睐。更长的篇幅能够深入探讨本书匆匆提到甚至没有提到的问题，但并不利于把以色列的整体“故事”讲好。

很多书只讲述发生了什么，却没有解释发生的原因，也没有厘清不同的故事情节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以色列对于我们理解全球事务太重要了。所以本书讲述了犹太国这种“观念”的来龙去脉，让读者明白这个观念源于何处、如何传承以及如何从梦想变为现实的。

本书在介绍发生了什么的同时，将着重解释发生的原因。犹太人从哪里得到去巴勒斯坦建国的观念？全世界有那么多地方，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偏偏要选择巴勒斯坦？国际社会何时开始支持这个观念？为什么会支持？多半是来自非民主国家的人怎样建立起一个民主国家，而且一路下来运行得令人赞赏？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许多问题上总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吵个不停？为什么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团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以色列的未来将会如何？

本书也会叙述许多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们的国家。美国人讲起美国故事，一定会讲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夜间骑马报信、乔治·华盛顿强渡冰封的特拉华河和英勇感人的阿拉莫（Alamo）守卫战；同样，以色列人也有自己的历史故事。这些记忆是理解以色列人心态的关键，从中我们能够明白他们看待自己的历史和国家的方式，也能够明白世界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本书将为大家讲述以色列民族记忆中最重要的故事。

本书还将介绍在历史背后的这个顽强、热情和独特的民族。为了控制篇幅，书中对许多以色列历史事件的描述非常简略。比如在谈到以色列的战争时，将只讨论以色列为什么会打这场战争、战争过程的主要环节及其对以色列的社会和国际地位的影响。别的书记录了以色列在每场战争中的军功，但本书志不在此。

有些主题，本书几乎没有涉及。比如，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史引人入胜，但是除了拯救以色列经济的德国赔款和以色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高科技产业，本书没有把重点放在以色列经济上。同样，这部简史也没有提到其他许多事件和人物。

以色列情况复杂，任何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篇幅较短之作，都只能是对它的一种解读。即便是一些看似“客观的”事实也存在激烈的分歧，关键人物的动机和意图就更难分析了。

此外，什么是对以色列合理的“叙事”同样存在争论。没有任何两个人在写作一本书时会使用同样的方式。对以色列的成就应该给予多大的肯定？如何指出以色列犯下的错误和令人失望的地方？如何取舍内容？如何分析某些人物的决策和选择？如何通过统一连贯的视角把这些内容串联在一起？对于以上这些问题，读者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我在对待各种立场时如履薄冰，尽可能用我相信的可靠史实来讲述这个故事。我想展现的以色列历史不是史实的罗列，而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既提到以色列的成就，也提到它的过失；既谈及它非凡的过往，也谈及它令人忧虑的未来；既有它的善举，也有它的恶行。任何宏伟的故事都包含众多角色，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来来往往，起起伏伏，有时能成就伟业，有时又犯下失误。这个故事中的角色不仅包括个人，还包括组织、政党、国家等。我尽可能以生动活泼和公平合理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讲述了这个小国是如何从一个古老观念变成现实的历史。这个国家奇迹般地渡过重重难关，但仍然面临强大的敌人（有人说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和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一个民族

在付出巨大代价后重获新生的故事，一个复杂、富有戏剧性和悲伤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惊叹和鼓舞人心的故事，它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现在是时候开始讲故事了，让我们一起来理解事情的经过，以及更为重要的，事情发生的原因。

第一章
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鸟颂》

他将成为代表一代犹太人的声音，从这位诗人痛苦的灵魂中，可以看到整个民族经历的痛苦。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9岁时就发表了《鸟颂》，毫无疑问，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犹太诗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犹太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表现了19世纪末犹太民族的绝望和伤感，也展现了犹太人对那个从未见过的民族家园的强烈渴望。

这位诗人对一只从锡安（当时叫巴勒斯坦）归来的小鸟说："我的灵魂多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他问小鸟在那个美好的地方人们怎样生活。"上帝怜悯锡安吗？""赫尔蒙山上的露珠是否如珍珠般晶莹剔透？""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这些诗句并非真的是诗人的疑问，而是犹太人对大洋彼岸先祖之地的渴望。比亚利克和那一代犹太人都相信那块土地有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家园。

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艰难困苦。俄国犹太人大多只能生活在被称为"栅栏区"（the Pale of Settlement）的指定区域。在政府和当地管理者的纵容下，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不断加剧。俄国以前也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pogroms），但19世纪末迫害的强度和规模都前所未有。19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爆发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1871年敖德萨发生同样的事件。犹太人明白，他们所面对的，是毫无理由的仇恨，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欧洲的反犹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东欧，反犹主义主要源于犹太人杀死了耶稣这一神学观点。(1)在科学更发达的中欧和西欧，种族理论得以发展。欧洲种族主义者声称，犹太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宗教，而在于他们的种族。即使皈依基督教也不能"修复"犹太人。1879年，一个名叫威廉·马尔的德国人不但反对犹太人通过同化融入德国社会，还创造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一术语，来表达人们（包括他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1]

暴力远非欧洲人蔑视犹太人的唯一方式。19世纪80年代，俄国政府对进入学校和大学的犹太人数量做出严格限定。当局想方设法找犹太人的麻烦，1891—1892年俄国警察从莫斯科驱逐了两万多名犹太人。[2]在欧洲大陆，不管犹太人走到哪，当地人都对他们充满鄙夷，百般刁难。

许多犹太人认为现代性将带来一个理性和包容的时代，他们的处境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俄国犹太小说家佩雷兹（彼得）·斯摩棱斯金（1842 - 1885）提醒犹太人保持现实主义态度，他说："不要相信那些声称这是一个充满智慧和仁爱的年代的人，不要轻信那些赞美这个时代公平和正直的人，这些都是谎言！"[3]

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意识到，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只会变得更加艰难。许多人选择离开。1882—1914年，大约250万名犹太人离开东欧，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奥地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5年间，有大约130万名犹太人离开俄国。[4]他们大多来到美国，20世纪建立起繁荣的美国犹太社团。其中有一小部分人来到巴勒斯坦。

正是在这样令人绝望的氛围中，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于1873年诞生了。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他被严格遵守教规的祖父抚养大，接受了传统犹太教育。13岁前他在犹太儿童宗教学校（*heder*）学习，17岁前在日托米尔经学院（Zhitomir Yeshiva）学习。然而，和许多同时代的犹太年轻人一样（许多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作家和领导人的人同样如此），比亚利克醉心于西方文化，支持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旨在改革犹太教对传统和集体主义的过分倚重，将一种更具理性、分析性、智性和个性的生活方式引入犹太社会。

哈斯卡拉运动不只是一场知识分子运动，其中也包含社会和民族议程。哈斯卡拉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犹太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从狭小的隔都生活中走出来，"提高犹太人的自信，恢复他们的尊严，唤醒他们的情感，复苏他们对美的感受力，改变长期孤立和隔绝造成的思想僵化"[5]。

比亚利克了解到哈斯卡拉运动，还是在来到一所新的犹太经学院后。为了用更现代的方法学习传统犹太教，比亚利克来到位于立陶宛瓦洛任（Volozhin）的一所举世闻名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被哈斯卡拉运动所吸引，成为"以色列的永恒"（*Netzach Israel*）组织的成员。

这是一个致力于融合犹太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和正统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学生组织。

1891年，比亚利克离开瓦洛任，来到敖德萨，这里当时是俄国南部的现代犹太文化中心。[2]在这期间，他深受当地知识分子圈的影响，并于1892年发表了《鸟颂》。

不久，为了不让祖父知道他“逃学”去了敖德萨，他回到日托米尔，但发现祖父和哥哥都已奄奄一息，家中绝望的气氛很能反映当时其他犹太人的境遇。他们去世后，比亚利克在波兰南部小镇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教希伯来语，这份工作让他非常痛苦，但也很有收获，因为正是在这期间，他笔耕不辍，不久便被公认为世上最有才华的犹太诗人之一。

他的诗并非只用于表达犹太人的苦楚。比亚利克1898年发表的《聚会锡安》（*Mikra'ei Zion*）一诗，就表达了犹太人的希望，而非绝望。这首诗是为了纪念1897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而写。他在其中满怀希望地写道：“虽然救赎还没有到来，但我们的救世主还活着；这个伟大的时刻即将来临。”

这突如其来的希望从何而来？比亚利克看到即将到来的“这个伟大的时刻”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发生在巴塞尔的历史事件如此重要？还有，这个救世主是谁？

英国、美国、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区、俄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197名代表来到瑞士巴塞尔，参加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他们感到自己在创造历史。

距离罗马毁灭第二圣殿、驱逐犹地亚犹太人已过去将近两千年。1897年8月，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再次汇集在一起，试图重新成为历史的主人。响应赫茨尔的号召，犹太人结束了一千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相互隔绝的状态，第一次像古犹太民族那样声称：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他们要做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人，而非看客。

那天，着装优雅的代表们从挂有巨大大卫星的入口走进会场，大卫星下用德语写着“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ZIONISTENKONGRESS*）。代表们使用世界各国的语言聊天。他们大多为男士，也有女代表。有富人，也有穷人。现场的空气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力量。大家落座后，木槌敲响三声，大会正式开始。会议首先

对控制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表达了形式上的赞赏。然后，来自罗马尼亚雅西（Jassy）的“锡安热爱者”（*Hovevei Zion*）(3)资深成员和复国主义大会高级代表卡尔·利佩博士站起身来，他按照犹太传统遮住头，在许多在场者的哭泣声中，念出传统的“你赐予我们生命”（*shehecheyahu*）的祈祷文：“上帝啊，祝福你，是你赐予我们生命，保存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

接着，会议主持者西奥多·赫茨尔开始用德语发表讲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来到这是为了奠定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基石。”[6]

在赫茨尔生活和工作的西欧，建立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观念要比在东欧更富有争议。不同于比亚利克所生活的东欧，西欧犹太人仍然相信反犹主义运动将成为历史。毕竟，以前犹太人被迫生活在隔都，而隔都的围墙此时已被推倒，犹太人涌入欧洲大陆的各个城市，很快成为欧洲的精英。他们在欧洲社会教育、文化和经济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表面看来，他们的生活比一个世纪前确实好了很多：

> 在1800年，中欧和西欧的文化史可以完全不提犹太民族或某个犹太人……在欧洲政治界、文化界和研究与科学领域找不到一个响当当的犹太人……但到1900年时，这一情况完全改变，这时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人在经济、政治、科学和艺术等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7]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限制和反犹主义后，犹太人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确实令人惊异。他们成为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著名科学家，成为重要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领导人。

虽然进步巨大，但西欧犹太人仍无法摆脱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如果说东欧犹太人经常被当作革命分子的替罪羊，西欧犹太人则被指责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比如在德国，犹太人虽然不到总人口的1%，但犹太人很快成为社会各个行业的位高权重者和精英，特别是在金融业和政治圈。

德国人开始对他们充满怨恨，到处都能感受到强烈的反犹情绪。基于刻板印象，报纸、书籍和杂志开始严厉批判贪婪腐败的犹太资本家，这后来成了20世纪中期实施种族灭绝的那些政权的官方立场。1873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德国中产阶级指责犹太人应当为这场危机负责。虽然“贵族跟任何人一样贪婪，但人们大多相信关于犹太人的神话，贵族仍然是

伟大的政治家、英勇的战士和忠诚的公务员。金融危机后，民众的愤怒并没有指向这些权贵以及由他们控制的政府，而是指向犹太人”[8]。

在西欧，恰恰是因为犹太人对现代性的支持和他们在职业和文化上取得的成就重新招来了人们的反感。犹太人希望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已经一去不返，但哪知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像一个水位不断升高的巨大水库，随时有溃堤的风险，对此犹太人无能为力。

西奥多·赫茨尔成年之时，西欧正处在这种让犹太人既充满希望又无比绝望的时代。赫茨尔1860年出生于佩斯（后来佩斯和布达合并为布达佩斯），18岁时随家人迁居维也纳。在这里他接触到欧洲社会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和比亚利克一样，他也被这些深深吸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往像那些作家一样出名。他和比亚利克一样笔耕不辍。他热爱艺术，对戏剧情有独钟，但父母和导师担心这个爱好不能让他谋生，因此鼓励他学法律。于是，赫茨尔在维也纳大学注册登记。

刚上大学时，赫茨尔读到欧根·卡尔·杜林所著《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2）一书。杜林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这本书中提出，解放欧洲犹太人并将他们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对欧洲不利，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追随者甚至宣称要让犹太人回到隔都生活。

令赫茨尔深感不安的是，杜林并非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徒，赫茨尔认为：“不可否认，杜林拥有出众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如果连他都能作出这样的言论，那无知的大众会做什么？”[9]

讽刺的是，正是杜林这位著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和恶毒的反犹主义者让赫茨尔开始全身心研究“犹太人问题”。在回忆自己从何时起对犹太人及其在欧洲的未来这个问题感兴趣时，赫茨尔在日记中写道：“这显然始于读杜林的书。”[10]

其实，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他后来回忆说，小时候他一位老师在解释“异教徒”（heathen）这个词的含义时是这样解答的：“偶像崇拜者、穆斯林和犹太人。”[11]在维也纳大学，赫茨尔申请加入致力于知性对话和辩论的学生社团莱斯哈雷（*Lesehalle*）。1881年3月的一次“讨论”发展为一起恶性反犹主义事件，该团体因此被解散。这一事件并没有让赫茨尔放弃社团活动，后来他又加入了维也纳的德国民族主义学生联谊会艾比亚（Albia）。然而他发现，即使在这里，这所汇聚欧洲知识精英的大学也明显是反犹的。他加入两年后，几位联谊会兄

弟参加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哀悼活动，并将哀悼活动变为一次反犹主义集会。[12]为了表达抗议，赫茨尔申请退出这一联谊会，一开始遭到其他成员拒绝，后来他们又找其他理由将赫茨尔赶出联谊会。

赫茨尔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犹太建国问题很可能是在匈牙利议会，这后来成为他毕生的事业。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国家反犹党创始人吉奥佐·伊斯托奇（Győző Istóczy）提出了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犹太人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去那里生活。[13]“犹太人，去巴勒斯坦！”成为匈牙利反犹主义运动的口号。讽刺的是，伊斯托奇提出的口号后来竟然成为赫茨尔的口号。

伊斯托奇充满仇恨地要求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这是否真的影响到赫茨尔，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在赫茨尔事业的开展过程中总能遇到反犹主义。离开维也纳后，赫茨尔来到巴黎，为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巴黎分社写稿，成为一位知名作家。在巴黎，他报道过一起关于巴拿马运河资金的丑闻，几个犹太金融家被指控犯有贿赂和腐败罪。比这个案情更让赫茨尔惊讶的是，这些犹太人的家人竟多为法国政界和军界的知名人物，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当作典型的都市犹太人，民众认为他们拿淳朴、忠诚的法国公民的血汗钱来投机倒把。[14]

在奥地利，赫茨尔已经目睹了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反犹主义的兴起，而欧洲顶尖大学的精英并没有站出来反对。如今在法国，他发现即使是民主制度和共和政府也拿反犹主义没办法。

和比亚利克一样，赫茨尔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1894年秋天，经过短短两周的高强度工作，赫茨尔完成了剧本《新隔都》，第一次塑造出明显具有犹太特性的角色，并公开讨论了“犹太人问题”。这部剧本并没有使用多么高明的艺术手法，而是直白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欧洲解放了犹太人，但犹太人实际上仍然生活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隔都中，时刻承受着需要证明自己清白的压力。[15]即使在看似得到解放的西欧，犹太人如果不能自证清白，仍然会被当作罪人。

但事态很快就恶化了。正当赫茨尔埋头写作《新隔都》时，法国又爆发了一起丑闻。法国犹太裔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指控将法国机密泄露给德国人。法国当时没完没了地发生着革命，德雷福斯案的审判成为政党政治的牺牲品。在明显有失公正的情况下，德雷福斯被宣判有罪并剥夺军衔。对此，埃米尔·左拉（法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发表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公开信《我控诉》，指责政府公

然持有反犹主义偏见，并不公正地将德雷福斯关入监狱。

一般认为，德雷福斯审判让赫茨尔开始思考如何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但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不这么看。赫茨尔的确在他的专栏中提到德雷福斯曾对狱警说：“你看，我是私人恩怨的受害者，我遭到迫害仅仅因为我是犹太人。”[16]但德雷福斯的犹太人属性并不是赫茨尔这篇报道的重点。

讽刺的是，赫茨尔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功，竟是源于一次彻底失败的会面。赫茨尔曾找到著名金融家和慈善家莫里斯·德·赫希男爵，希望他能支持建立犹太国的激进观念。赫希很为东欧犹太人的未来担忧，但他已经有了另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男爵以前就认为巴勒斯坦方案不可行，所以已经着手资助一些俄国犹太人前往阿根廷。赫茨尔想改变赫希的想法，但他给出的理由不够有说服力，最后只得两手空空地离开。为了下次能做得更好，赫茨尔决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文字，把他想对赫希说的话写出来。

赫茨尔没有气馁，带着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他开始向另一个经常做慈善事业的犹太家族寻求帮助，这就是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说服他们，赫茨尔把已写出来的文字进一步发展为一本内容详细、结构合理的计划书，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犹太国》一书的雏形。

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犹太国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个国家的地点还没有确定，可能在阿根廷，也可能在巴勒斯坦。不同于赫希，赫茨尔认为这个方案非常可行，犹太人拥有国家对各方都有利。

他相信，犹太人生活在犹太国后不但不会受到反犹主义的迫害，犹太国的存在还能终结全世界的反犹主义。赫茨尔提出：“犹太人的离开不会给东道国带来经济混乱、危机或迫害。他们离开的国家将迎来繁荣。”至于犹太国，“它开始的那一天就是反犹主义结束的那一天”[17]。建国并非天方夜谭，他毫不掩饰地说，犹太人的教育程度远高于许多其他建立主权国家的民族。如果其他民族可以获得革命的成功，犹太人也能做到。

出于同样的原因，赫茨尔认为犹太人建国的运动不会遇到太多阻碍。国际社会将支持这个想法，因为许多国家也“饱受犹太人问题之苦”。他写道：

>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既不荒谬，也并非不现实。我们这个时代就已经有许多民族实现了这一进程，这些民族的主体不是中产阶级，他们比我们更贫穷，教育程度比我们更低，实力比我们更弱。饱受反犹主义之苦的各国政府都会很愿意帮助我们获得梦寐以求的主权。[18]

他认为世界各地存在的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需要找到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解决方案。

> 我认为我明白反犹主义这一高度复杂的运动。虽然我是从犹太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但我的观点不包含任何恐惧或仇恨的成分……我认为犹太人问题不是社会或宗教问题，虽然它经常以这样的形式呈现。犹太人问题本质上是民族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它当作国际政治问题来讨论，只有通过同全世界文明国家协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19]

但犹太人散居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看上去并不是一个整体，这该如何解释？赫茨尔说，人们不应该被这种分散的状态迷惑。“我们是一个民族（people），我们只有一个民族。”[20]他坚持认为，其他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也不例外。

赫茨尔是在欣喜若狂的状态下写的这本书。当谈到写书经过时，他说：“我当时完全投入到写书中，决心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写完，因为书中提出的理想似乎过于宏伟，但有几周的时间我每天沉浸其中，不能自拔。”[21]

读到这本书的人同样难以自拔。《犹太国》这本只有100页左右的小册子让赫茨尔成为犹太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4)1896年2月出版后，这本书轰动了世界，被不断印刷，不断翻译成其他语言，成为现代犹太作品中阅读最多、流通最广的一本书。“仅在1896年，这本书就出现了英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俄语和法语版本。他在书中的提议让许多学生热血沸腾。《犹太国》让赫茨尔一夜之间从一个孤零零的声音变为一个国际运动的领导人。”[22]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当时着实是令人惊叹的提议。这本书出版后，几乎整个犹太世界都相信：犹太人需要一个国家，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国家。

虽然西奥多·赫茨尔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发起者，但在他以前很久就有人表达过类似的观点。1853年，在赫茨尔《犹太国》出版前40年，亚伯拉罕·玛普出版了第一部现代希伯来语小说。和比亚利克一样，玛普也出生于传统犹太家庭，但长大后对欧洲文化非常着迷。玛普的小说《锡安之恋》的背景设在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具体说是先知以赛亚时期的以色列。这本小说不仅是个感人的故事，还重新勾起了犹太人对先祖们家园的美好回忆，“表达了整个民族在内心深处对一种更充实、更丰富的生活的向往”[23]。这本书拨动了犹太人的心弦，卖得特别好。随着玛普的出现，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了萌芽的迹象。

摩西·赫斯（1812—1875）的作品吸引力更大。赫斯出生于德国，从小由当传统犹太教拉比的祖父抚养大（又和比亚利克一样）。赫斯最崇拜的人是荷兰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这位哲学家背叛了犹太教，成为泛神主义者。后来，思想激进的赫斯开始支持社会主义，甚至娶了一位工人阶级的天主教徒为妻，进一步拉开了自己和传统犹太教之间的距离。[24]

但赫斯很快发现，即使放弃犹太教、拥护社会主义并和天主教徒结婚，还是无法改变自己成为欧洲反犹主义受害者的命运。他写道：“就算改变宗教也不能减轻犹太人承受的德国反犹主义的压力。德国人恨犹太人的宗教，但更恨他们的种族。他们讨厌犹太教中的独特信仰，但更讨厌犹太人与众不同的鼻子。”[25]

1862年，赫斯写下《罗马和耶路撒冷》，[26]他在书中提出，欧洲永远不会欢迎犹太人。他写道：“我们在其他民族中一直被当作陌生人。他们可能会容忍我们的存在，甚至解放我们，但是，只要我们遵循‘哪里好哪里是家乡’（*ubi bene ibi patria*）的原则苟且生活下去，不去复兴我们伟大的民族记忆，我们就永远无法得到他们的尊重。”[27]犹太人应该回到巴勒斯坦，回到这片他们上千年来魂牵梦萦、不断提及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罗马和耶路撒冷》现在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史上一份重要文本，但赫斯在世时，这本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犹太人并不关心欧洲犹太人的未来，自然也不会认真对待这本书。[28]赫茨尔写完《犹太国》后才第一次读到《罗马和耶路撒冷》，他写道：“我们想尝试的一切，他的书中都有。”[29]所以一位研究这一运动的伟大历史学家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场“诞生了两次的运动”[30]。

赫斯的《罗马和耶路撒冷》并不是唯一一本在赫茨尔前注定成为经

典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品。另一本书的作者是列奥·平斯克，他1821年出生于俄国一个深受哈斯卡拉运动影响的家庭。作为最早到敖德萨上大学的犹太人之一，平斯克起初学的是法律，但他很快意识到，由于存在针对犹太人的就业名额限定，他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和法律相关的工作，于是他改行当了医生。

和其他人一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运动让平斯克投身于公共生活。1871年发生在敖德萨的集体迫害和1881年更大规模的攻击潮让平斯克非常震惊。他最终得出结论：犹太人永远无法被东道国接受。他写道：“对活人来说，犹太人是死人；对当地人来说，犹太人是外来者和流浪者；对有产者来说，犹太人是乞丐；对穷人来说，犹太人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爱国者来说，犹太人是没有祖国的人；对社会各阶级的人来说，犹太人是令人憎恶的竞争对手。”[31]1881年集体迫害发生后一年，他写下《自我解放》一书，书的副标题是“一个俄国犹太人对同胞的忠告”。书中他敦促犹太人重新建国，实现独立自主。

与赫斯的作品不同，平斯克的作品受到一些关注。出版两年后，他参与了“锡安热爱者”组织的建立工作，这是最早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欧洲组织之一。然而，他发现单靠这个组织远远不够，犹太人需要一个领袖。他写道：“我们或许缺少一个像摩西这样天才般的领袖。但历史不会经常给一个民族这样的杰出领路人。如果我们能明确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明确知道建立属于自己家园的必要性，我们当中一定会有一群精力充沛、受人尊重的人站出来领导这项事业，这个团队的力量将不亚于一个伟大的领袖，带领我们走出屈辱和迫害的历史。”[32]

平斯克在想象的似乎就是赫茨尔。

犹太复国主义早期发展缓慢，影响有限。不同于以前的书，赫茨尔的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世界，让许多人兴奋不已。1896年3月初，也就是《犹太国》刚刚问世几周后，有人建议赫茨尔举办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赫茨尔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还全身心投入到大会的筹备当中。一位参与过大会早期准备工作的人说：“为了准备这次会议，赫茨尔忘记了大会以外的整个世界。他把全部精力用于筹备工作的各项细节，亲力亲为，毫不马虎。他不但发号施令，还监督各项号令的执行情况。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他都保持着柔和的声音和友好的微笑，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得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人能违抗或反对他。”[33]

为了办成一次高规格的大会，准备工作持续了将近18个月。他要让

这场在1897年8月29日开幕的盛会仅通过富丽堂皇的形式就能令大家明白，一场盛大空前的政治运动诞生了。他要求所有参会的男士（会议也邀请了女代表）一律穿正装，系白色领带。在参会人员中，马克思·诺尔道可能是和赫茨尔关系最密切的战友，他在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前就已经在国际知识分子圈享有声誉。但当看到他穿着便装来到会场时，赫茨尔直接要求他回酒店换上规定的服装。

有人认为赫茨尔在这些细节上的要求太过苛刻，甚至有些好笑，但赫茨尔真正的目的绝非制造戏剧效果。“我需要一些形式来让代表和全世界看到我们同平凡决裂的决心，让他们明白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汇聚于此，并将宣布一项崇高而美好的计划。”[34]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虽然在形式上有些浮华，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许多思想也不够成熟，但还是取得了巨大胜利。与会者被深深吸引，完全投身于这个精神严肃的计划，即便是长达几个小时的演讲，大家也能耐心听完。[35]

大会最突出的成就是清晰界定了这个新成立组织的目标。通过几天时间对文件具体文字的激烈讨论，大会起草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最终形成了这样的文字：

> 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被公众承认，受法律保障的犹太人之家……
>
>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会设想以下几种方法：
>
> 1．促使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前往巴勒斯坦定居。
>
> 2．在遵守各国法律的情况下，通过合适的地方机构和总机构将全体犹太人组织起来。
>
> 3．加强犹太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
>
> 4．为获得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所需要的政府允诺采取准备措施。[36]

在获得解放后，许多欧洲犹太人有了接受欧洲教育的机会，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参加会议的兹维·赫尔曼·沙皮拉教授会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并将其融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中。因此，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一场富有文化气息的运动，是传统犹太教和欧洲启蒙运动碰撞的产物。它既是犹太人在绝望中

的孤注一掷，也体现了犹太人对永恒的追求。在探索政治解决方案的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没有放弃教育和写作。

大会确定了犹太国的国歌。1878年创作的《希望》（国歌选用部分，比原诗要简略很多）是一首用一句话写成的国歌：

只要心灵深处，

尚存犹太人的渴望，

眺望东方的眼睛，

注视着锡安山冈，

我们还没有失去，

两千年的希望，

做一个自由的民族，

屹立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之上。(5)

大会还讨论了其他问题。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提出了设立犹太国民基金（最初目的是购买和开发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土地）的想法。大会还成立了许多委员会和管理机构，为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高效推进奠定了组织基础。

赫茨尔一丝不苟地筹划了每个细节，倾注全力确保它实现。大会结束后，他欣然离开会场。几周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不会轻易公开这句话，但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巴塞尔大会，那就是：'在巴塞尔，我成立了犹太国。'如果我现在大声说这句话，全世界都会笑我，但也许5年后，或更确定地说，50年后，每个人都会承认我这句话是对的。"[37]

备受鼓舞的赫茨尔更加坚定了他对这项事业的信念。不久后，他第一次来到巴勒斯坦。他并不是专程来看这片犹太人先祖的土地的（在他心中也是犹太人潜在建国地之一(6)），而是对当时最关键的政治人物开展游说。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几位苏丹代表正在访问圣地，赫茨尔认为和他们见面是获得政治支持的最佳方法。[38]

德国皇帝绝非犹太人的天然盟友。一位参加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会后写信给德国皇帝，详细汇报了这次会议提出的目标。看到这封信后，德国皇帝在空白处批示："让这些犹太佬（kikes）赶紧走人，去巴勒斯坦吧，越早越好。我不会挡他们的路。"[39]但德国

皇帝对犹太人的反感阻止不了赫茨尔去见他。只要和他的目标一致，只要能推进建立犹太国的进程，哪怕同反犹主义者合作，赫茨尔也不介意。

在赫茨尔看来，这片土地虽然贫瘠，但存在无限的潜能。他在著名乌托邦小说《新故土》中写到了这一点。这本1902年出版的小说和同时代的乌托邦小说风格相似，描绘了一个未来的犹太国。小说讲述了一个同化的犹太人和一个非犹太人同伴的旅行，他们在一个遥远的小岛上被困了许多年，最后来到巴勒斯坦，发现了一个刚刚重新建立的犹太国。赫茨尔描写了一个田园诗般的社会。曾经的沙漠变得繁花似锦，赫茨尔在巴勒斯坦亲眼见到的破败社区成为一座座现代化城市。不同信仰的人们在这里和睦相处，以各自的方式举行宗教仪式，人们之间没有任何紧张的气氛。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到处是知识分子、发明家、作家和高尚的政治家。

这是对巴勒斯坦不切实际的想象，但可能因为欧洲的生活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许多读者被这本书中的景象所吸引：

> 这座圣城弥漫着安息日特有的平静与祥和气氛，往日让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感到厌恶的肮脏之物、嘈杂之音和难闻之味都不复存在。以前，在最终到达圣地前，他们不得不忍受许多不堪入目的景象。现在，一切已大为不同……土地得到精心维护，街道铺设得非常漂亮……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福利机构、医院和诊所毗邻而立。在大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和平宫殿，世界各地的和平爱好者和科学家在这里举办国际会议，因为耶路撒冷已成为人类最崇高追求的家园：为了信仰、爱和知识。[40]

得到改善的不仅仅是耶路撒冷，犹太家园的建立还解决了欧洲的犹太人问题：

> 沃尔特博士……打算描述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对留在欧洲的犹太人产生的影响。他一定会说，对他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既有利于移民的犹太人，也有利于留在欧洲的犹太人。[41]

这是个大胆的梦想，在很多方面不切实际。但很快，它竟然变得非常可行。欧洲犹太人的生活越绝望，他们就越倾向于想象一个不同于当下的世界。赫斯、平斯克和后来的比亚利克都是如此。然而，是西奥多·

赫茨尔将这股激情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他当然明白，实现这个梦想绝非易事，但他从未怀疑过这个梦想能实现。他想告诉读者的话其实很简单，正如他在《新故土》精炼的题词中所说：“如果你渴望它，它就不是梦想。”[42]

(1) 这一指控最早出现在《马太福音》27：24 - 25中：“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中文翻译参考（圣经）和合本]

(2) “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指的是在以色列地重建犹太民族家园的运动。该词由当时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拿单·伯恩鲍姆创造，1890年4月1日，他在他办的期刊《自我解放》的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这个词。1892年1月，他第一次在公开演讲中用到这个词。（Lawrence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6], p.13.）

(3) 严格意义上说，这个组织的名称是“锡安之爱”（*Hibat Zion*），成员才被称作“锡安热爱者”。但后来这两个词被混用，“锡安热爱者”也可以指该组织。

(4) 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肖宪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校注

(5) 《希望》（*Hatikvah*）不同于许多其他国家的国歌。大多数国歌（包括美国国歌《星条旗》、法国国歌《马赛曲》，甚至《国际歌》）都会提到战争和冲突，但《希望》没有。而且《希望》还是不多的一首用小调谱写的国歌，其悲伤的旋律无法在阅兵时演奏。

(6) 1896年赫茨尔写《犹太国》时并不确定这个国家建在哪里，他写道：“有两个可以考虑的地方：巴勒斯坦和阿根廷。”（参见Theodor Herzl, *The J ewish Stat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9], p.64）6年后，即1902年，在写《新故土》时，赫茨尔才明确指出这个国家应该建在巴勒斯坦。

第二章
故土某处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诗篇》126篇

人们常说，1897年从世界各地汇聚在巴塞尔参加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立者。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参与者开启了犹太复国主义这项政治运动，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渴望回到先祖在以色列地家园的梦想——早已存在。这个梦想和犹太民族一样古老。

一个民族只有在先祖生活过的土地上才能繁荣兴旺，在其他地方则难以实现，这一点并非只有犹太人明白。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前二十多年，乔治·艾略特（玛丽·安·伊万斯的笔名）就谈到了一个民族爱一块土地所能产生的力量，虽然其中并没有提到犹太民族。(1)

> 我感到，人的生命应该深深扎根于故土某处，它可以在那里获得这种温柔而亲切的爱：爱那里的大地，爱那里人们的劳作，爱萦绕在那里的各种声响和乡音，爱可以将早年的家园从日后博闻广识中清晰区分开的一切；每当历历在目的往事涌上心头，就会交织着思慕之情。[1]

要理解今天以色列的梦想、成就、遗憾以及以色列人应对各种挑战的方式，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犹太人长久以来讲述的关于自己的古老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以色列地（Eretz Israel, the Land of Israel）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

圣经让犹太人对锡安的记忆也“交织着思慕之情”，他们把这本书视为“民族日记”。对犹太教徒来说，圣经是神启的话语，里面充满了教导他们如何生活的诫命。对世俗犹太人来说，圣经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不管怎样，所有犹太人都认为圣经讲述的是关于他们民族的故

事：他们爱过什么，在哪里生活，如何取得胜利，什么时候失败了。这是一个关于他们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故事的中心就是以色列地，西奥多·赫茨尔如今敦促他们回归到这块土地。这本“日记”向他们暗示，这个故事的中心如果没了这块土地，也就没了犹太家族和犹太民族。

以色列地从一开始就是犹太民族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描述犹太民族诞生时，圣经写道：“耶和华对亚伯兰(2)说：‘你要离开本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2]亚伯兰听从了上帝的话，不久耶和华又对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3]所以，在犹太人故事一开始就出现了“应许之地”这一概念。

这块土地自始至终都是这个民族故事的核心。亚伯拉罕将迦南（当时的称呼）作为自己的家，有时（特别是饥荒时）为了确保生存，他和子孙们也会迁到邻近地区。《创世记》（摩西五经中第一部经典，五部经典合称《托拉》）讲述的就是关于这块土地的故事，里面提到犹太人如何在这里建造城市、购买坟地以及划分家族土地，还讲到他们如何离开这片土地，然后又回到这里。《创世记》大体上可以理解为亚伯拉罕复杂的家族史，但同样，上帝应许给他生活的这片土地在故事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创世记》之后是《出埃及记》，这时，亚伯拉罕的后人不再只是一个家族，而成为一个民族。他们被称为以色列人（Israelites）。他们受困于埃及，沦为法老的奴隶。法老知道不可能永远把以色列人留下来当奴隶，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回到故土。法老对他的人民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方去了。”[4]所以，法老一开始就明白，以色列人反抗并不是为了夺取他的王位，而是为了回家。他意识到故乡对一个民族拥有神奇的吸引力，人们为了回到先祖之地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后来果然如此。一位新的领导人站了出来，决心结束犹太人被人奴役的命运。摩西带领犹太人挣脱枷锁，离开埃及。《托拉》接下来叙述了古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走过的漫长道路，圣经说他们在沙漠中走了40年，其间经历了饥渴、战争、怀疑甚至叛乱。几千年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明白，《托拉》想告诉人们，通往自由的道路必然漫长而艰辛。在《约书亚记》中，古以色列人最终回到了亚伯拉罕曾经走过的这块土地，但回家从来就不容易，这一点历史已经清楚揭示了。

圣经中关于建立民族家园还表达了一个观点：即使回到了故土，留在故土也很难。圣经记载，这块土地不但已被7个不同的民族占据，还面临外部威胁。[5]这里战乱不断，以色列人尝试过的几种政治领导模式相继失败。为了留下而进行的长期征战让以色列人精疲力竭，最后，12个支派一致要求推选一名国王来领导整个民族。

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国王扫罗性格上有严重缺陷，很快被年轻的大卫取代。这位矮小而低调的国王成长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军事指挥官，建立起稳定的君主制和庞大的帝国（参见地图1）。虽然大卫也有缺陷（比如他有时很无情），但在圣经中他不但有远见、有能力，还非常虔诚；作为领袖，他被描绘得近乎完美，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能达到的极致莫过于此。难怪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一位代表在描写赫茨尔的非凡气度时写道：

> 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位杰出而高贵的人，他有着国王的气质和体形，从他深邃的双眼中能读出一种肃穆的庄严和莫名的悲伤……这一定是大卫家族的子嗣，从死者中间复活，全身上下充满着传奇、幻想和华美的色彩。[6]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似乎有种神奇和伟大：所有与会者感到他们正在复兴以前的荣耀，这种荣耀犹太人曾经实现过——在以色列地上。

大卫将王国交给了儿子所罗门。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圣殿，这成为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中心。以色列人在这里祭祀，每年三次来到这里朝圣。耶路撒冷和圣殿实际上成了以色列人的首都。圣殿山不仅成为犹太人的圣地，因为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都位于此，还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圣地。对于基督徒而言，耶稣在这里布道，反对圣殿中的腐败，并驱赶兑换银钱之人。对于穆斯林而言，穆罕默德在此登霄，为纪念这一事件，公元691—692年他们在此修建了阿克萨清真寺和金顶清真寺。

所罗门大兴土木，耗资巨大，为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不得不提高赋税。结果各支派怨声载道，北部的支派更是认为所罗门偏袒南部支派。虽然出现政治动乱，但所罗门勉强维持了联盟的统一。他的儿子罗波安显然没有父亲的政治才能。公元前928年，统一王国分裂成两个相互间经常发生冲突的王国，北部的以色列王国（由十二个支派中的十个支派组成）和南部的犹大王国（由十二支派中的两个支派组成）。[3]

接下来圣经谈到另一个犹太人经常讲述的主题：分裂的危险。王国的分裂意味着灾难，北部王国深受权力斗争之苦，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19个王朝。更糟糕的是，两个独立王国之间还经常发生战争。

另一个当今以色列人面临的重大威胁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中也有涉及，这一区域的王国自古以来就被强敌环绕。北部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亚述帝国（参见地图1），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严重威胁到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众多国家，包括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除了亚述帝国，同样在北部构成威胁的还有亚兰（Aram）。东部的巴比伦帝国也经常加入战争。南部强大的埃及帝国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任何一个帝国要想控制这一区域，首先需要征服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可以说，这两个犹太王国的命运已被注定：不管哪个帝国获胜，它们终将成为被征服的对象。

这也是以色列看待当下外部安全威胁的方式。很早以前，中东这个地区就错综复杂，为了生存下来，必须不断斗争。

面对困境，古以色列人的两个王国千方百计维持自身生存，它们和其他国家建立联盟或进贡关系，但长远看来这些策略并没有多大作用。它们的故事充满无数波折，各种和约与较量比比皆是，两个王国逐渐走向衰落。因为相互内斗并受到周边强大军队的威胁，两个王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公元前733年到公元前732年，亚述国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Tiglath-PileserIII）吞并加利利和外约旦地区后，驱逐了大量当地居民，开创了中东大规模驱逐人口的先河，这一策略一直沿用至今。对以色列人而言，成为驱逐的对象对他们的宗教生活产生了多重影响。在那之前，以色列人身份首先体现为对具体支派的认同，但支派身份衍生自土地归属。一旦他们从故土流放出去，支派身份就很难维系。

因为环境的突变由不得他们选择，犹太人被迫重新思考犹太身份的意义。在后来的几千年里，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要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面临类似的挑战。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被流放的十个支派下落如何。流亡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对哪个民族而言，强制移民都非常危险，20世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深受其害。消失的十个支派的下落人们不得而知，但根据圣经的记载，南部犹大王国的两个支派幸存了下来，发展成为后来的犹太民族。

南部王国南北受敌，剩下两个支派如何生存下去仍然是一个难题。亚述帝国的军事实力衰落，但巴比伦帝国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南方的埃及帝国依旧强大，对犹大王国虎视眈眈。犹大王国领导人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让王国的形势变得更为严峻。犹大国王误以为巴比伦帝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决定停止进贡，愤怒的巴比伦人于公元前598年入侵犹大王国，杀掉国王，将圣殿洗劫一空，大约一万人沦为奴隶（大多数为士兵和工匠）。为了摧毁犹大王国的民族意志，巴比伦国王使用了亚述国王驱逐当地居民的手段。

后来，犹大王国的人反抗巴比伦统治，新的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再次带兵入侵。这一次，为了根除犹太人造反的可能性，巴比伦人不但采用驱逐的老办法，还摧毁了犹太人在以色列地的精神中心：公元前586年，所罗门圣殿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

和以色列王国一样，犹大王国也不复存在，犹太人独立的历史告一段落，流散巴比伦的历史开始。从那以后，犹太民族再也没有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生活在以色列地。

祭祀仪式和祭司领导体制是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核心，圣殿被毁意味着祭祀仪式和祭司权力消亡，这本可能导致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结束。但凭借过人的社会学和宗教学才华，以色列人的领袖请求追随者们不要把这视为终结，而要在灾难面前保持希望。

亲眼看见耶路撒冷陷落的先知耶利米在流散期间发表了对未来的预言，他认为冷酷无情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犹太民族将灭亡，他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7]耶利米不但告诫人们要充满希望，还要保持耐心。犹太人和上帝间立下的契约仍然有效，但他们需要等待，等待更为强大的力量带领他们回到锡安。

圣经先知哈拿尼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巴比伦人只能统治两年，而不是70年。他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接受流散生活。不同于耶利米，他认为犹太人可以更早回到自己的家园。

耶利米和哈拿尼雅之间关于犹太人是适应流散生活还是尽快回到家园的争论一直存在于犹太人生活中。比如，赫茨尔急于创造一个犹太国，而反对他的宗教势力则主张将犹太人的命运交给上帝。以色列早期领导人希望全世界犹太人都回归以色列，而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坚持认

为犹太人在先祖之地以外已经找到了美国这个理想的家园。

巴比伦之囚持续了几十年，在这期间，他们回到故土锡安的愿望从未消失。身处流散地的以色列人一直心怀故土。《诗篇》137篇就反映了许多犹太人的世界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8]他们不但哭泣，还梦想回到故土。《诗篇》中另一段文字没有提到眼泪，而是表现了犹太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9]

犹太人长期诵读《诗篇》中这节文字，虽然他们没有看到过这片土地，知道自己可能活不到回归的那一天，对于魂牵梦萦的这个地方也并不了解，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这是犹太民族必将实现的梦想，犹太人终将回到自己的家园。只要那一天还没有到来，锡安之梦就仍然是犹太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支柱。

在希伯来圣经的末尾，公元前539年战胜巴比伦的波斯王居鲁士让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回到故土重建圣殿。“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耶路撒冷去]。”[10]我们不知道流散社团中哪些人选择了回到锡安，但人数显然不多。[11](4)

然而，圣经所编织的故事没有关注那些选择留在流散地的人，而是强调居鲁士的规劝——是时候回家了。犹太人的民族故事从上帝要亚伯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即去以色列地）开始，以“可以上[耶路撒冷去]”而结束。

意味深长的是，圣经故事始于对家园的应许，而止于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地。圣经故事讲述的这个民族从未放弃过回家的许诺。

那些遵循居鲁士指令，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发现这里动荡不安，这种乱象一直持续至今。最终，返回这里的这一小部分人重建了圣殿，尽管它最初只是对第一圣殿的草草模仿。第二圣殿矗立了600年左右，但在此期间犹太人并非一直拥有主权。

波斯帝国衰落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此地。希腊人的统治手段非常严厉，宗教自由被严重限制，虽然许多犹太人接受了古希腊文化，但正如后来犹太历史中反复出现的那样，一小部分人坚决抵抗外族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他们认为仅仅生活在先祖之地是不够的，只有坚持犹太核心观念、信仰和义务，生活在这里才真正有意义。

面对希腊人对犹太宗教自由的限制，犹太抵抗组织开始武装反抗，这也是自大卫王以来犹太人最强有力的一次军事行动。公元前164年，马卡比家族(5)的一群犹太人发动反对希腊人的起义，推翻了希腊人的统治，400多年来犹太人第一次在以色列地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犹太国。每年的光明节（Hanukkah），犹太人都会庆祝这次伟大的胜利。

犹太人的独立只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犹地亚成为罗马帝国的附庸国。刚开始，生活还可以忍受，由于罗马远离犹地亚，罗马领导人并不关心生活在以色列地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以色列人大多时候实行自治，虽然和那个年代其他被征服民族一样，他们必须缴纳沉重的赋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的统治变得越来越暴虐，他们不但增加税收，还逐渐剥夺犹太人的宗教自治。公元6年，罗马人开始直接统治犹地亚，结束了犹太人对主权抱有的幻想。

渴望主权的犹太人再次发动反叛。一小群所谓的奋锐党人（Zealots）主张对罗马人发动军事起义。公元66年起义爆发，最初罗马人节节败退，但罗马帝国毕竟是军事强国，犹太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公元70年，罗马人兵临耶路撒冷城下，整座城市被罗马军队包围，任何人无法进出，城内粮食告罄，饥荒出现。很快，罗马人冲破耶路撒冷城墙，将这座城市洗劫一空，烧毁第二圣殿。罗马人屠杀了大量犹太

居民，流放了这一地区剩下的犹太人，开启了犹太人持续了两千年之久的流散。

第二圣殿时期走到尽头，耶路撒冷陷落。但不愿向罗马人屈服的决心非常强烈，零零星星的反抗仍在继续，其中坚持时间最久的是马萨达要塞（死海西岸一座建有防御工事的山丘）的奋锐党人，他们的事迹家喻户晓。其实，守卫在那的犹太人也知道，面对强大的罗马军队没有任何胜算。在重重包围之下，他们没有留给罗马人屠杀他们的机会，而是选择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其中几个人杀死了几乎所有的妇女、儿童和男人，最后一个人选择了自杀。马萨达上有将近一千名犹太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两名妇女和五个孩子。[12]

同罗马人的鏖战让犹太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对于这段历史，我们的了解主要来自历史学家约瑟福斯的记录。据他记载，数十万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死去，还有许多人沦为奴隶或被迫在罗马矿山劳动。

令人惊讶的是，即便这样彻底的失败也没有让犹太人放弃在先祖之地上追求主权的愿望。公元130年，也就是第二圣殿被毁60年后，罗马皇帝哈德良宣布重建耶路撒冷，为了割断这座城市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他将其改名为伊利亚·卡皮托林那（Aelia Capitolina），并计划在这里建立异教祭坛。此外，他把这一地区改称为叙利亚·巴勒斯坦那（Syria Palestina），这也是今天巴勒斯坦名字的来历。

由于罗马皇帝的挑衅行为，在年迈的阿齐瓦（Akiva）拉比的支持下，西蒙·巴尔·科赫巴开始策划新的起义，数十万犹太战士加入他麾下。起义于公元132年爆发，和公元66年的起义一样，犹太人在初期获得了一些胜利，巴尔·科赫巴攻下了耶路撒冷和大量其他领土，在所到之处建立起犹太人的自治统治。现代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带有“以色列的救赎”“以色列的自由”“耶路撒冷的自由”等希伯来语铭文的钱币，它们就是巴尔·科赫巴短暂独立时期留下来的文物。[13]

和以前的起义一样，罗马帝国在军事上享有绝对优势。哈德良打败了巴尔·科赫巴和他的战士们，迫使他们撤退到耶路撒冷南部一个叫作贝塔尔（Betar）的城市。公元135年，罗马军队消灭了这里的残余势力，平息了长达三年的起义。据古代史料记载，约58万人被杀，还有很多人被卖到奴隶市场。

犹地亚第三次陷落。犹太人的主权再次结束。这一次，犹太人没有在70年后卷土重来，也没有在60年后再次发动起义。这一次，是彻底完

了。

在接下来的两千年（确切说是1762年），犹太人一直没有获得过政治自治权，他们生活在其他民族的统治下，有时受到礼遇，有时备受欺凌。这一时期犹太人几乎没有认真尝试过恢复政治主权，直到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在巴塞尔组织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赫茨尔呼吁犹太人恢复古代以色列的辉煌，结束漫长的、腐蚀人心的流散。犹太人不应该继续生活在异国他乡，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而应该把历史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1897年赫茨尔站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发表演讲时，犹太人回归故土的梦想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千年。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如果从未见过这片先祖之地，他们如何长时间保持对这里的记忆？用乔治·艾略特的话说，如果从未在那生活过，从未去过，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去，他们如何能清晰地区分出“早年的家园”？

虽然没去过以色列地，但犹太人会周期性回忆和想象他们民族的历史，在巴塞尔畅想未来建国也不例外。犹太传统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宗教仪式和节日上让历史得以重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和思维中，以色列地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每日三次的祷告时，他们会面朝耶路撒冷。上千年来，犹太人都会在犹太历埃波（Av）月的第九日禁食，因为这一天被认为是两次圣殿被毁的日子。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波兰，犹太人饭后祷告时会诵读道：“赞美你，上帝，你以仁慈重建了耶路撒冷。”在逾越节晚餐祷告词结束时，不管是在非洲还是欧洲，在也门还是伊拉克，全世界犹太人都会唱“明年耶路撒冷见”。在犹太婚礼上，新郎会故意打碎一只酒杯，提醒在场者即使在欢乐时刻也不能忘记耶路撒冷被毁的历史。让一代代犹太人记住锡安（耶路撒冷）之梦的还有几十上百种宗教仪式，即使从未见过这个地方，他们也绝不会忘记。

这种保存犹太记忆的策略，就是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的《鸟颂》会在犹太人中产生强烈共鸣的原因。诗中的字句是全新的，但所表达的思想却非常古老。在某种程度上，比亚利克只是在重复耶利米、哈拿尼雅和《诗篇》中已经说过的话：犹太人可能生活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只有一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家。

古老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新的活力。19世纪末欧洲人开始强烈排斥犹太人，民族主义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许多犹太人意识到欧洲很快将没有容身之地，他们本能地知道，在欧洲之外有一个属于他们

的家园。不管是宗教人士还是世俗人士，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东欧犹太人还是西欧犹太人，他们都在对锡安的憧憬中长大，对于赫茨尔的《犹太国》中所提出的梦想再熟悉不过。赫茨尔的思想之所以能迅速传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并非一个全新的思想，它只是激活了犹太人千年来的梦想。

所以，一位参加巴塞尔会议的代表作出如下评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说："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坐在会场，仿佛在见证神迹一般。坦白说，难道我们看到的不是神迹吗？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代表们鼓掌叫好，挥舞着手帕，一直持续了15分钟。"[14]毕竟，对于那些对欧洲已经失去信心的犹太人，对于那些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新的希望和梦想的犹太人，赫茨尔就是第一次被命令"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的亚伯拉罕，就是带领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的摩西，就是让犹太主权获得新生的大卫，就是坚持认为改变历史的时机已到的巴尔·科赫巴。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赫茨尔激活了犹太人古老的梦想，重新点燃了民族复兴的希望，让犹太人敢于畅想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这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只是将一个古老的梦想重新点燃。

(1) 以下这段引文出自乔治·艾略特最后一本小说《丹尼尔·德隆达》（1876），小说对比了英国贵族的道德败坏和犹太民族主义者富有献身精神的热诚。今天耶路撒冷有条街道以乔治·艾略特命名。——校注

(2) 他的名字在《创世记》17：5改为亚伯拉罕。"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3) 犹大王国的领土进入罗马时期后叫"犹地亚"（Judea）。——校注

(4) 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和基督徒的《旧约》虽然内容一样，但在章节划分和各卷的编排顺序上有所不同。希伯来圣经以《历代志下》收尾，而《旧约》以《玛拉基书》作结。——校注

(5) "马卡比"的意思是"锤子"。——校注

第三章

是对话而不是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世纪之交时的分歧

只要犹太人还因为民族身份而经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自尊心受到伤害，财产被剥夺，那么基希涅夫惨案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让我们拯救那些还能被拯救的人！

——1903年西奥多·赫茨尔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

1949年，丘吉尔感慨万分地回忆道："进入20世纪时，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整个帝国乃至全世界都充满了希望，看到19世纪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后期）自由主义的进步，1900年时大多数人感到未来一片光明，日子会越来越好。"[2]

世纪之交的许多犹太人也和后来的丘吉尔一样乐观。丘吉尔提到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理应给欧洲犹太人带来新的机会，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也预示着犹太人即将加入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前途一片光明。

但刚刚迈入20世纪，就爆发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许无情摧毁，许多犹太人感到非常震惊。在俄国，首先给犹太人当头一棒的是《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出版。这本书虚构了一本会议"记录"，指控犹太人试图通过操纵媒体和全球经济来控制世界。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广为传播。

很快，俄国人对犹太人的敌意从语言攻击发展为暴力袭击，其中最让犹太人惊讶的是1903年发生在基希涅夫的集体迫害，这一恐怖事件发生在4月19日复活节星期日：

> 刚开始年轻人开始驱赶楚夫林斯基（Chuflinskii）广场上的犹太人，后来，借着节日的气氛，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加入进来。当天下午，大概有25支人数在30—50人之间的队伍冲入比萨拉比亚首府的犹太区，男性青少年带头砸房屋和商店的玻璃，皇家学校和市内的宗教学院的学生们拿起铁棍和斧头紧随其后，强盗们也加入进

来，掠夺和毁坏财产。当地警察没有干预，秘密警察局局长拉文达（Levendal）还鼓励这些行为……坐在马车里行驶在街上时，东正教主教雅科夫（Iakov）还祝福那些大多为摩尔多瓦人的攻击者。[3]

当暴徒们发现政府不会干预，事态就进一步恶化，接下来的事情简直惨不忍睹：

> 当晚人们开始实施谋杀和屠杀……5万犹太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成为这些野蛮行为的受害者……一名两岁男孩还活着时舌头便被割掉……迈耶·韦斯曼（Meyer Weissman）小时候有一只眼睛失明，为了让暴徒饶他一命，他交出60卢布，暴徒首领收钱后不但砸掉了他的小杂货店，还挖掉了他的另一只眼睛，并对他说："这样你再也看不到基督徒孩子了。"有的犹太人脑部被打入钢钉，身体被切成两半，肚子剖开后被塞进羽毛。妇女和女孩惨遭强奸，有的人还被切掉乳房。[4]

恐怖事件不断升级，后来《圣彼得堡宣言报》（*St. Petersburgskiye Vedomosti*）报道说，上层阶级的人"淡定地走在街上，目睹这些惨状而完全无动于衷"[5]。直到内务部部长给总督发电报，要求他阻止屠杀后，军队才出动，4月21日上午开始戒严。

犹太人死伤惨重，集体迫害导致34名男性（包括两名婴儿）和7名女性遇害，后来又有8人死于重伤。财产损失也非常严重。一名在集体迫害后赶到现场的记者说，当地的非犹太人没有表现出"遗憾和悔恨"[6]。

集体迫害发生后，敖德萨犹太历史委员会派纳赫曼·比亚利克去基希涅夫采访幸存者，对事件进行报道。派给比亚利克这项任务是顺理成章的，在10年前发表《鸟颂》后，他声名鹊起。1901年他出版一本诗集后，被公认为当时最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同样擅长写作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泽夫·雅博廷斯基曾说："比亚利克是现代文学界中唯一一位用诗歌塑造了一代人灵魂的诗人。"[7]

在基希涅夫的所见所闻让比亚利克震惊不已，为此他创作了史诗《屠杀之城》。他在诗中不仅对犯下抢劫、强奸和谋杀罪的暴徒发火，还令人惊异地对犹太人发火。在这首复杂长诗的中间部分，他描述了发生在一户人家地下室的场景，一群哥萨克人残忍地轮奸了一群犹太女

人，而犹太男人却懦弱地躲在酒桶后，不敢站出来制止。比亚利克充满讽刺地将这些男人称为“马卡比之子”，以此说明欧洲犹太人身上出了问题。

比亚利克还将怒火发向犹太传统。袭击过后，这些男人从惨遭蹂躏、奄奄一息的妻子身上跨过，跑去请教拉比：“我的妻子还能跟我同房吗？”[8]

比亚利克几乎咆哮着质问：“这就是你们所担心的？”你们所爱的人惨遭强奸，伤痕累累地躺在地上，而你们关心的却是在犹太教律法上还能否与妻子同房？你们还有人性吗？你们都成了什么？

比亚利克的描述是否属实并不重要，他毕竟是一位诗人，不是历史学家。重要的是他想表达的惊恐之情，对欧洲人的所作所为和犹太人的无所作为的惊恐。在他看来，犹太人这种被动的态度是犹太传统的产物。

比亚利克指出，犹太人上千年的流散不但剥夺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还腐蚀了他们的感知能力。换言之，流散生活毁掉了犹太人。犹太传统中的律法体系在历史上曾帮助他们在混乱的世界里获得了纯净而神圣的空间，但现在却禁锢了犹太人的灵魂，让他们对真正重要的事情漠不关心。总而言之，他认为犹太传统是一颗摧毁犹太人人性的毒瘤。

所以，对比亚利克和许多同时代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的意义不仅在于创造一个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避难所，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只有回到自己的土地才能创造“新犹太人”。他认为重新打造古老马卡比家族的时机已经来临，犹太民族应当获得重生。

因为基希涅夫事件而发生深刻转变的远不止比亚利克一人。在赫茨尔看来，基希涅夫事件再一次证明犹太人迫切需要自己的家园，不管这个家园在哪里。赫茨尔很早前就思考过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国的可行性。现在，由于同奥斯曼帝国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他开始考虑在巴勒斯坦之外的建国方案。

在1903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赫茨尔提到了基希涅夫事件，他说，基希涅夫不是一次事件，也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状态。他说：“只要犹太人还因为民族身份而经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自尊心受到伤害，财产被剥夺，那么基希涅夫惨案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让我们拯救那些还能被拯救的人！”[9]他在给马克思·诺尔

道的信中提到，他们应该接受英国关于犹太人在东非建国的提议。他提醒诺尔道说：“这是唯一的提议……总之，我们必须抓住眼前这个政治机会。”[10]

这个“政治机会”是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在赫茨尔的政治施压下，他提议犹太人不应该坚持回归巴勒斯坦，而应该在东非寻找一块领土。赫茨尔立即将乌干达方案（实际上此地位于今天的肯尼亚，当时是乌干达保护国的一部分[11]）提交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对于这一计划的争论非常激烈，支持者给出的理由是，乌干达不会成为犹太人的最终目的地，而是回到巴勒斯坦先祖之地前的短暂落足点。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人士的代表本应坚持在以色列地建国，但这时却同赫茨尔一样认为当前形势紧迫，他们投票赞成了这一计划。(1)

但反对者的力量更为强大，谁愿意在某处安家后马上又离开？许多犹太人宁可不去乌干达；许多人担心，一旦人们来到乌干达，即使时机到来，他们也不会再去巴勒斯坦。乌干达方案会让回归巴勒斯坦的计划偏离先前的轨道，对他们而言，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为犹太人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更是为了在先祖之地重建家园；甚至许多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对这块土地没有宗教意义上的情感）也反对这一方案，坚持认为“哪怕放弃锡安一个小时都是可怕的歪理邪说”[12]；部分俄国代表也强烈反对在东非建立犹太国的方案，“其中有些人就来自基希涅夫”[13]，按理说他们应该最迫切希望找到一处犹太人的避难所。

赫茨尔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无法控制的风暴，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分裂，由此造成的损害，赫茨尔短期内无能为力。

犹太复国主义者纷纷卷入激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人们逐渐淡忘了在乌干达建国的想法，仍不断有新问题涌现出来。这时已逐渐清晰的是，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是犹太人未来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恰恰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人们存在严重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从这个角度看，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一场运动，更是一场纷繁复杂、充满争论的对话。

大家很明白，因分歧而走向全面对立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大会决定回避乌干达方案，只对方案的可行性投票表决，即使这样也激怒了许多代表。投票结束后，带头反对该方案的耶希尔·塔希利诺（Yechiel Tschlenow）愤怒地冲出会场，另外128名代表随他一起离开。

会后，赫茨尔感到非常沮丧。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俄国犹太人的悲惨境地让他痛心疾首，自己的提议又让他苦心经营的复国主义大会分崩离析。1904年春天，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战术错误，作为补救措施，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常务会议上表示："我们的方案只能落实在巴勒斯坦。"[14]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和解会议"。

正如赫茨尔所预料的一样，在1905年7月召开的第七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乌干达方案最终被否决。但他没能参加这次会议，1904年7月3日，年仅40岁的赫茨尔因心力衰竭去世。

赫茨尔年轻时就知道自己心脏有问题，但为了实现拯救犹太民族的梦想，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惜奉献出了生命。犹太人不会忘记他做出的牺牲，是他让犹太历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一位学者这样评说："维也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葬礼。"[15]参加了赫茨尔葬礼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则这样写道：

> 七月的那一天很奇怪，所有亲眼看见这一场景的人都将终生难忘。突然，每个车站、每列火车、每个地区、每个港口都有人不分昼夜赶到这里，人数达几千人之多。西欧、东欧、俄国、土耳其甚至偏远村庄的犹太人都涌入这座城市，他们脸上留着听到噩耗后的惊恐表情，这个长期以来被反对者和闲言碎语者经常误传的消息终于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向人们揭晓：这一伟大运动的领袖已与世长辞。维也纳这座城市突然明白，这位死去的人不是普通的作家或诗人，而是一位改变人们思想的巨擘，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整个民族心头一阵剧痛，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人凭借一己之力描绘了一幅雄伟壮阔的蓝图，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无穷的勇气和无尽的希望。[16]

犹太民族已有几百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伟人。

基希涅夫事件并非只影响到赫茨尔和比亚利克这两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事件爆发后，阿谢尔·兹维·金兹伯格写道："我满脑子都是基希涅夫暴力杀人事件，无法思考任何其他事情。"他也认为犹太人需要改变，他说："五百万人相互推卸责任，面对屠杀者时主动伸出脖子，哭喊求救，却从来没有尝试过捍卫自己的荣誉与生命，这是他们的耻辱。"[17]

阿谢尔·兹维·金兹伯格1856年（比赫茨尔年长四岁）出生于乌克

兰，大家更熟悉的是他的笔名阿哈德·哈姆。他成长于虔诚的哈西德教派家庭，家人们希望他也能成为一名虔诚的哈西德教徒。但和比亚利克等人一样，阿哈德·哈姆被知识分子的世界所吸引，欧洲和哈斯卡拉运动为他提供了认识这一世界的理想平台。这似乎成了普遍现象：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都出生在正统派家庭，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离开了传统犹太世界。在这些人的领导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方面包含丰富的犹太元素，另一方面又包含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小浸染的传统的反抗，成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2)

不同于那些和犹太传统世界彻底决裂的人，阿哈德·哈姆对塑造他人格的宗教世界充满眷恋之情。据说他父亲禁止他继续读异教徒的书，否则不得进入父亲的图书馆。有一次，为了不让父亲知道他在读异族文献，阿哈德·哈姆情急之下竟然烧掉了一本书，[18]他不愿意被驱逐出父亲那装满犹太经典的图书馆。

出于对父亲的服从，他还同意娶犹太教徒为妻，14岁时就和一位出自哈西德派名门望族的女人订婚。虽然阿哈德·哈姆不喜欢她，[19]但有趣的是，他们的结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父亲由于生活困难而病倒（这是许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共同经历）后，阿哈德·哈姆来到他心之所向的犹太启蒙运动中心敖德萨，这是俄国唯一一个允许犹太人生活的城市，聚集了大量犹太知识分子，产生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伟大思想家。

阿哈德·哈姆沉浸在敖德萨这片犹太文化的浓郁氛围中，但不同于许多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他内心深处对哈西德世界的审美方式情有独钟，1888年在一篇名为《残破的书稿》的文章中，他罕见地表达了这种矛盾的情感：

> 在那些漫漫冬夜，当我和其他启蒙知识分子们坐在一起，桌上不但有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还有扑克牌，我内心很喜悦，表情看上去也很快乐，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这时，我面前会突然出现一张破旧的桌子，桌脚已经损坏，桌上摆满了残破但神圣的书籍，虽然积满了灰尘，但这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书。借着微弱的烛光，我独自坐在那儿一本接一本地读，虽然字体很小，但我毫不在意……整个世界变得像伊甸园一样美好。[20]

他虽然选择了离开哈西德教派的世界，但仍不加掩饰地深爱着那个

世界，这使他有别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犹太人最需要的不是主权，犹太人内在的精神性能够将他们和非犹太人区分开来，异教徒的民族主义是基于权力，然而犹太教则认为，精神的力量能够战胜物质的力量。他当时写道："不以民族文化为依托的政治理想容易诱惑我们放弃对崇高精神的追求，让我们趋向于寻找一条从物质力量和政治优势中获取荣耀的道路，这会切断将我们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21]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应该专注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精神中心，而不是国家。

赫茨尔对犹太国的设想缺少犹太特色，这让阿哈德·哈姆恼怒。他说："如果犹太民族生活在一个沉溺于毫无意义的权力交易的小国中，除了国民是犹太先祖的后裔，这个犹太国和其他国家毫无区别，那还不如让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消失。"[22]

阿哈德·哈姆知道赫茨尔试图拯救犹太民族，但他认为赫茨尔的计划存在严重问题：

> 他不但没有考虑文化因素，他的政治风格也严重偏离了犹太历史的轨迹：他教化民众（阿哈德·哈姆立刻谴责他是在煽动民众），承诺人们能立即获得救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以前那些号称自己是弥赛亚的骗子……他甚至指责赫茨尔在传播异端邪说。[23]

阿哈德·哈姆给出了不同的提议，他认为犹太人不应当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而应当建立一个由犹太世界精英人士组成的"聚集地"，这个精神中心能够丰富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精神生活。[24]几千年前，圣经时期的先知以赛亚曾满怀信心地宣称："训诲必出于锡安。"[25]阿哈德·哈姆显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应该应验先知的这一预言。

在他看来，犹太人不应该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锡安一地。他并不看重主权，故而能够接受不同类型的犹太教在不同地方各自繁荣的想法。他相信犹太人可以在美国实现繁荣，他自问自答地说："去以色列地还是去美国？答案是，美国和以色列地都可以，犹太人问题的经济方面需要在美国解决，但理想方面……只能在以色列地解决。"[26]

1902年赫茨尔出版了《新故土》，他和阿哈德·哈姆（当时对赫茨尔批判最严厉的人）之间的争论白热化。但一年后发生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让一向反感政治的阿哈德·哈姆作出让步。这时大家都意识到，犹太人需要搁置争议，一起寻找逃离欧洲的办法。然而，阿哈德·哈姆从来没有

放弃过对赫茨尔建立犹太国的反对，他坚信建国对犹太人来说是个巨大的错误。

两人之间的论争以阿哈德·哈姆的失败告终，犹太复国主义最终实现了建国，但他的思想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影响深远，至今犹存。

在阿哈德·哈姆最早的拥护者中，有一群来自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他们成立了布里特沙洛姆（*Brit Shalom*，“和平契约”之意）。该组织的目的是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主要方法是呼吁犹太人放弃建国。其成员相信，犹太国的存在注定永远要和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发生冲突，建立一个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组成的国家更符合犹太人利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完全可以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个社区和睦相处。

这个组织的规模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人，但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它的规模。其中著名的成员包括曾在犹太代办处身居高位的经济学家阿瑟·鲁宾、哲学家马丁·布伯和著名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哥舒姆·肖勒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虽然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但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支持者还有美国改革派拉比与和平主义者犹大·马格内斯，他塑造了希伯来大学的文化（他是该大学第一任名誉校长，后来成为校长），进而影响到很多代以色列学生和学者的思想。后来几代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也深受阿哈德·哈姆的影响。阿哈德·哈姆的追随者尤其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经常大声质疑，认为建国方案是一个战略性错误，无形中将犹太人引入歧途。

不管是主张建国还是反对建国的方案，有一点是相同的，方案制定者都希望大量犹太人来到奥斯曼帝国管辖的这个省，这一点在当时看来希望十分渺茫。

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马克思·诺尔道是一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后投入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他出生于佩斯一个正统派家庭，曾当过德国自由主义报纸《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驻巴黎记者，一度告别了犹太世界，成为一名德国知识分子。为了拉开与犹太遗产的距离，他不惜将本姓“苏德菲尔德”（Südfeld）改掉。

诺尔道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基希涅夫事件。早在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他就主张创造“肌肉型犹太人”（*Muskeljuden*）。他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迫切希望建立的犹太国应当拥有新的犹太人，他们强壮有力，犹太经学院对他们而言只是遥远的记忆。

长久以来我们让自己的肉体坏死，更确切地说，我们利用别人来杀死我们的肉体。看一看隔都里、教堂墓地中和中世纪欧洲道路边堆放的无数犹太人尸体就可以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多么成功……在狭窄的犹太街道上，我们瘦弱的躯干忘记了如何舞蹈，在没有阳光的昏暗房间里我们胆怯地眨眼，长期的迫害让我们不敢大声说话，只敢窃窃私语，只有在临死前我们的殉道者才敢在刽子手面前大声喊出最后的祷告语……让我们抛弃这些传统，再次成为身体强健有力、眼睛炯炯有神的人。[27]

并非只有诺尔道一人主张犹太复国主义应当让新时期的犹太人拥有强健体魄。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中，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对弗拉基米尔·泽夫·雅博廷斯基的冲击格外大。[28]雅博廷斯基（后来他把“泽夫”用作自己的第一个名字(3)）1880年出生于敖德萨，是一名多少被同化的世俗犹太人。他年轻时做过记者，在俄国和欧洲当海外通讯员。

得知基希涅夫集体迫害的消息时，雅博廷斯基正在敖德萨给犹太文学协会做关于平斯克《自我解放》的演讲，这个消息虽然让他感到震惊，但并不完全意外。这次屠杀前，关于集体迫害的传言已经在散播，雅博廷斯基和其他人已着手搜集枪支，并向人们解释自卫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后来，雅博廷斯基和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激化，特别是当他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这两个先后反对他们实现建国目标的力量前表现得过于软弱和被动时。他希望“修正”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在获取土地和建立国家上妥协与渐进的方法。为此，他创立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分裂出来。

理论上，修正派和主流犹太复国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两者都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定居点，犹太人有权动用武装力量，犹太人能够自由向巴勒斯坦移民，而且都主张这一切应当通过同英国外交协商来实现”。两者都认可在圣经中描述的整片以色列地上（包括约旦河两岸）定居。他们唯一的区别在于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使用武力的意愿。

雅博廷斯基着手在俄国全境建立以青年为主体的犹太自卫组织。几年后，在1923年，雅博廷斯基成立了修正派青年运动贝塔尔，这正是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坚守到最后的要塞的名称。贝塔尔的目的是讲授军事战术，强健欧洲犹太青年的体魄。雅博廷斯基在《贝塔尔的思

想》一文中解释说，该组织的目标——

> 非常简单，但也非常艰难：为了更快更好地建立犹太国，该组织负责培养民族所需的新犹太人……现在之所以存在困难，就是因为现在的犹太人既不正常也不“健康”，长期的流散阻碍了对正常和健康公民的培养。[29]

贝塔尔组织遍布整个欧洲，在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巴勒斯坦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在短短10年内，该组织成员就扩展到7万人。

不同于阿哈德·哈姆和布里特沙洛姆，雅博廷斯基绝非和平主义者。他提醒人们，犹太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巴勒斯坦。许多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常常觉得军事实力和使用武力多少违背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精神；但雅博廷斯基和追随他的修正派成员则认为，当命运需要犹太人使用武力时，绝不能手软。

他们认为，命运周期性地要求犹太人使用武力。令人悲哀的是，历史将证明雅博廷斯基及其追随者确有先见之明。

如果说诺尔道和雅博廷斯基认为强健的体魄是塑造新犹太人的关键，其他人则对强健体魄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定义。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俄国革命的失败让许多人出于意识形态的激励而移民巴勒斯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亚伦·大卫·戈登（人们总是称他为A.D.戈登）。[30]作为阿哈德·哈姆哲学的支持者，戈登后来成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他也认为应该培养新的犹太人，但在他看来，新犹太人不需要摈弃传统，不需要从其他世俗文明那儿汲取养料，也不需要拥有多么强壮的身体。新犹太人产生于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过程中。

戈登出生于乌克兰小城波多利亚（Podolia），位于现在摩尔多瓦边境上。戈登早年负责管理一位富裕亲戚的房产。1904年，47岁的他不顾劝阻来到巴勒斯坦，把所有的钱财留给妻子和两个孩子，计划不久后把他们也接过来。他先前一直从事白领工作，虽然身体羸弱，年纪不小，仍毅然决然地来到这片土地，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他成功了。不管是在加利利湖（Galilee）附近的佩塔提克瓦（Petach Tikvah）的酒厂，还是最后在德加尼亚（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的第一个基布兹(4)），他一直辛苦劳作，直到用尽最后的体力。1921年他已经病得很重，但继

续劳动，最后和赫茨尔一样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戈登为伊休夫(5)和后来的以色列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他创立的基布兹运动。他培养的新犹太人都相信“劳动的宗教”：

> 劳动是将人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只有通过劳动才算真正拥有了这块土地；此外，劳动还是创造民族文化的基础。这正是我们所没有的，而且我们意识不到这点。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国家，没有活的民族语言，没有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充满活力的文化不能远离生活，而应当全方位地拥抱生活……包括农业、建筑、修路在内，所有的工作、技能和生产行为都是文化的一部分，真正是文化的基础和实质。[31]

戈登认为，犹太人应该回归大自然，用双手在土地上劳作。但长久以来犹太人靠脑力劳动为生，这种生活方式扭曲了他们的灵魂（对于这一点，比亚利克和阿哈德·哈姆肯定都赞同）。在戈登看来，土地是改变这一点的关键，应当让犹太人回归体力劳动的生活。他说：“劳动让我们痛苦，但劳动能够治愈我们的顽疾。”[32]

戈登的观点对最早几十年来到巴勒斯坦生活的犹太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样说并不夸张。早期基布兹运动以务农为主，犹太人以农民的形象重新在这片土地上定居（虽然，即使在人数最多的时候，务农的犹太人比例也很低），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戈登思想的体现。建国前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以从事在某些人眼中枯燥的劳动为荣，也反映了戈登的影响。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有人宣扬“希伯来劳动”（*avodah ivrit*），和戈登一样，他们认为长满老茧、带有以色列地泥土的双手中能够产生真正的犹太精神。

比亚利克和阿哈德·哈姆从来没有失去对犹太经典与传统犹太世界的热爱，这浸润了他们各自的写作。但还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仅是要改变犹太教，更要彻底摆脱犹太教，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俄国学者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他最著名的观点是犹太复国主义应当彻底反叛犹太教。[33]犹太人应当将自己从犹太传统、历史和宗教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重塑。他说：“我们要么做最后一批犹太人，要么做第一批希伯来人。”[34]

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中有这么多人反对传统犹太教，因此，传统犹太世界中的很多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犹太复国主义

者中也有教徒，但对许多其他犹太教徒而言，宗教义务是他们不加入这一运动的外在理由。

这些理由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巴比伦塔木德》(6)中有一段经常被讨论的章节，其中提到以色列和世界其他民族立的三个誓言：世界其他民族发誓不会过度压迫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发誓不使用武力进入以色列地，也不反抗世界上的其他民族。[35]

千百年来，犹太人认为不能主动回到先祖之地，除非得到上帝的指引。个中缘由，主要就在于这短短几行经文。大多数人明白，回到那片土地必定要使用武力，这将违背他们的誓言。讽刺的是，包括布里特沙洛姆部分成员在内的世俗和平主义者也像宗教人士那样，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武力。

其实这些誓言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宗教人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经过千百年的流散，犹太人认为世界只存在两种状态：流散和救赎。[36]这很像耶利米的预言：当造物主说时间已到，犹太人就能回到那片土地。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许多犹太人（特别是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认为继续流散、等待上帝救赎是他们的宗教义务，犹太复国主义试图将历史和犹太人的命运掌握在人的手里，这违背了犹太教的本质。此外，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非但是极端的世俗人士，甚至还具有狂热的反宗教倾向，这让宗教人士更加不能接受这一运动。他们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划清界限。

然而，还有一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不像极端正统派教徒那样在原则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介意犹太人自己掌握历史的命运，但他们对犹太复兴的展望和世俗的主流观点还是存在差别。早在19世纪晚期，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开始萌芽，但形成体系还是在1902年以后，这一年召开的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点是犹太文化。同年，第一个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米兹腊希（Mizrachi）诞生。成立该组织的宗教人士主张，光靠文化根本维系不了犹太教，信仰上帝和遵守诫命历来是犹太人精神生活的核心。自从西奈山上得到《托拉》以来，遵守犹太律法就是犹太人生存下来的关键，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只有把宗教作为核心，犹太复国主义才有意义。

1904年，米兹腊希在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会，基希涅夫事件在前一年爆发，赫茨尔在同一年去世。虽然仍然势单力薄，但在大会上他们既驳斥了东欧宗教人士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反对，也谴责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反宗教元素。这支力量

顽强地坚持下来，虽然在1967年以前一直处在相对边缘的地位，但之后突然成为一支将永久改变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重要力量。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出一系列无法达成和解的争论。有的人（如赫茨尔）寻求建国，而有的人（如阿哈德·哈姆）坚持认为建国会导致精神的堕落，犹太人应该建立的是一个精神中心。有的人（如比亚利克）视宗教为残害犹太人的毒瘤（虽然比亚利克一直对犹太宗教经典情有独钟），而有的人（如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觉得宗教是维系犹太民族唯一的希望。有的人一直无视阿拉伯人问题，似乎在他们看来巴勒斯坦根本就没有阿拉伯人；有的人（如赫茨尔）大同小异地希望犹太人将给这一地区带来的进步可以赢得阿拉伯邻居的尊重与赞美；还有的人（如雅博廷斯基）认为这些观点过于天真，如果犹太人不愿战斗，锡安就没有未来。有的人（如诺尔道）设想犹太人如果拥有强健的体魄就能拯救自己，而有的人（如A.D.戈登）主张身体的意义在于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运动，但同时也是相互冲突的梦想的集合。

实现犹太国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早在建国前几十年，人们对于如何建国已经存在严重分歧。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成功建国，但这些观念不同、相互对抗的团体将继续存在于这个匆匆宣布独立的国家当中。尽管意见相左，但这些人不得不一起生活，一起去爱，一起上战场，一起建设这个国家，甚至一起去死。在某种程度上，当今以色列动荡而分裂的政治生态正是早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冲突的延续。犹太国建立后，犹太人才开始学习如何在一起生活。正如著名希伯来语作家和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约瑟夫·布伦纳所说，犹太复国主义“还没来得及生根就不得不先把枝干给长出来”[37]。

(1) 乌干达并不是巴勒斯坦之外唯一一个拟定建国地，急于寻找家园的犹太人还考虑过其他地方。19世纪初犹太人还提出在纽约州的格兰德岛（Grand Island）建国。在随后几十年被提到用于建立犹太国的地方还有东非的瓦辛基苏郡（Uasin Gishu, 1903—1905）、安哥拉的本格拉（Benguela）高原（1907—1914）、马达加斯加岛（1933—1942）、塔斯马尼亚的戴维（Davey）港（1940—1945）和苏里南（1938—1948）。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人们才停止寻找新犹太家园的地点。（Adam Rovner, *In the Shadow of Zion: Promised Lands Before Israel* [New York: NYU Press, 2014].）

(2) 遵循这种宗教和思想发展轨迹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家数量多得惊人，包括将在本书中讨论到的马克思·诺尔道、A.D.戈登、埃利泽·本 - 耶胡达、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阿哈德·哈姆、哈伊姆·魏茨曼、约瑟夫·布伦纳、贝尔·卡茨纳尔逊（Berl Katznelson）等人。

(3) “弗拉基米尔”（Vladimir）是个俄国名，而“泽夫”（Ze'ev）是个犹太名。——校注

(4) 基布兹是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集体社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建国最初几十年，基布兹是最具以色列特色的组织。严格意义上说，德加尼亚是第一个克武察（*kevutza*），克武察的规模一般比基布兹小。但现在人们普遍称德加尼亚是第一个基布兹。

(5) 希伯来语“定居区”的意思，这个词也指以色列建国前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团。“新伊休夫”指移民潮期间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老伊休夫”指此前就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6) 《巴比伦塔木德》是大概在公元2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由流散到巴比伦的犹太社团创作的。这是圣经之后最重要的犹太教著作。直到今天，全世界传统犹太人还在学习这部鸿篇巨作（传统版本有20卷）。

第四章

梦想实现的曙光

土地和语言，没有这两者，犹太人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

——埃利泽·本 - 耶胡达[1]

在19世纪最后10年，当赫茨尔用德语写作时，英语世界最有名的犹太作家是伊斯雷尔·赞格威尔。这位小说家和剧作家（他还积极参与了维护妇女权益的运动）虽出生于传统犹太家庭，但也离开了传统犹太世界，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早年许多文章将巴勒斯坦描绘成“荒野”、“布满石头的荒芜之地”、“废弃的家园”和一片“已经沦为废墟”的土地。[2]但他关于巴勒斯坦最著名的表述还是“一块没有民族的土地，等待着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3]。

这个表述当然不全对，却也不全错。巴勒斯坦当时已经有人居住，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欧洲人的预想完全不同。虽然奥斯曼帝国从1517年开始就控制了巴勒斯坦，但并没有发展这一地区：

> 松散地分布在贝鲁特省和叙利亚省之间，19世纪早期巴勒斯坦的行政管理体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几个世纪来土耳其人对这里不闻不问，管理十分混乱。当地帕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当地40万居民（1840年数据）常年生活在贝都因强盗团伙的恐惧下。贸易基本上没有。[4]

虽然管理混乱，民众缺少身份认同，但这片土地并非荒无人烟，而是生活着几十万人，其中大部分为阿拉伯人。[5]大部分时间，他们分布在这一地区七八百个村庄里，过着乡村生活。他们大多数是封建制度下为土地所有者出卖劳动力的佃农，但也有人生活在加沙、希伯伦、海法等城镇。虽然阿拉伯民族认同还没有形成，但已经可以感到两个民族间的敌对情绪。早在1891年，一些富有的阿拉伯人就对奥斯曼当局施压，要求他们阻止犹太难民在巴勒斯坦定居，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该地区的“阿拉伯属性”将被改变。[6]

19世纪70年代末，大约有2.7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他们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大部分人口为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很贫穷，但非常虔诚。他们和社团外的人联系很少，主要经济来源依赖哈卢卡制度（*halukka*，“分配”之意），这项制度从流散地收集钱财，发放给学者、寡妇、孤儿和其他需要经济支持的犹太人。当地犹太人过着一种脱离现代社会的简单生活，但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这种生活方式习以为常。

谁也没有想到，改变巴勒斯坦简单生活方式的居然是欧洲的反犹主义。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许多人逃离欧洲，部分犹太人选择移民巴勒斯坦。

在乌托邦小说《新故土》中，赫茨尔描绘了犹太人如何促进巴勒斯坦的发展。他相信阿拉伯人会张开双臂欢迎犹太人的到来。不知是过于理想化还是过于天真，赞格威尔也认为欧洲犹太人的到来对每个人都有好处。1903年在一篇名为《锡安，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文章中，他说，犹太人将重新获得这片土地，把它建成现代化的繁华之地，这样一来，欧洲犹太人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当地居民也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

但欧洲犹太人将在这遇到他们当时基本无法理解的一种文化：

> 如果认为苏丹及其政府在按照欧洲人所理解的政府和行政体制管理这片区域，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在奥斯曼帝国，部落、宗族、教派和城镇才是当地人最为认同的政治实体，这让欧洲人感到非常不解，欧洲人现代公民和国籍的概念在奥斯曼政治环境下根本不适用。[7]

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欧洲带来的民族和公民的概念将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已有的部落、宗族等当地体系产生冲突。同样，欧洲犹太人发现自己和那些在巴勒斯坦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犹太人也关系紧张。那些犹太人不但反对现代性，还反对将现代元素带到中东的欧洲犹太人。可以说，当地人和外来者对国家和社会抱有的不同理念、对荣誉和记忆的不同感受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难以沟通，成为后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长期冲突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犹太移民潮中来到新伊休夫的人，大多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这些犹太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逃到巴勒斯坦，和当时逃到北美的几百万犹太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大多是俄国人，想远离暗无天日的欧

洲，找个地方过简单安稳的生活。当然，他们其中也有人一心为犹太人的未来着想，希望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全新的犹太社会，不少人还希望这个新社会能够体现当时在俄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1883年去世，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他们觉得新的犹太生活只有在先祖之地巴勒斯坦才能实现。

第一次犹太移民潮也称为第一次阿利亚(1)，它开始于1882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03年。这一时期，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后来叫以色列）的各种海外组织开始形成，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团体都成立于1882年：一个是在平斯克帮助下成立的“锡安热爱者”，另一个是一小群大学生（“比卢伊姆”）组成的“比卢”(2)。后者虽然人数很少，取得的成就也不大，但因为充满激情而成为传奇，盖代拉（Gedera）就是他们当年建立的定居点。

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量涌入引起了当地犹太人（旧伊休夫）的警惕。旧伊休夫犹太人信仰虔诚，只听从自己的拉比。新伊休夫的意识形态极端世俗，在旧伊休夫眼中几乎就是异类，甚至是对神的亵渎。

伊休夫中至少有一位核心人物希望弥合两个群体之间的分歧，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库克拉比出生于1865年，1904年（赫茨尔去世那年）移民巴勒斯坦时已经是一名广受尊敬的学者。作为虔诚的正统派犹太教徒，他当然不认可新伊休夫反对宗教和极端世俗的生活方式与哲学，但他也不愿意全盘否定他们。比亚利克等人对传统犹太教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它对犹太人造成不良影响，对此库克拉比当然不同意，但他也承认犹太传统生活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他认为“许多年轻人之所以不尊重权威，是因为他们的视野超越了权威，而宗教人士没能提供与他们的道德激情相匹配的教育，这是他们困惑、痛苦和愤世嫉俗的根源。他们的反抗恰恰说明他们‘渴望思想和理性，并想拥有更为丰富和鲜活的体验’”[8]。不同于同一时代大多数拉比，库克拉比不愿意简单地把新伊休夫视为叛教者，他认为这些拓荒者“心中充满了爱、正义和力量，拉比的任务是让这些人重新认识自我。精神领袖们不应当压制这些年轻人，而应该用他们最不屑（哪怕有理由不屑）的《托拉》来赋予他们力量”[9]。

通过库克拉比的不懈努力，人们找到了一座连接这两个看似完全不同世界的桥梁。库克表面上非常传统，和那些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无是处的老派犹太人简直一模一样。但不同于那些拉比，库克为拓荒者和

新伊休夫的思想热情所倾倒。“有一次走过田野时，他突然指着远处说：‘看啊，一头犹太牛！’还有一次，在前往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的路上，他对一位旅伴说：‘我愿意亲吻这片土地上的每块石头，甚至路上的骡子。’”[10]

1935年去世时，库克拉比留下了一笔深邃的思想财富，有人希望可以用它来为不同的社团搭桥——这些沟通工作绝大多数仍未展开。一代人过后，他的儿子兹维·耶胡达·库克将成为以色列最有激情的理论家，在一些人看来，这个儿子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复活希伯来语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另一个革命运动。如果说西奥多·赫茨尔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之父，阿哈德·哈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精神方面的开先河者，那么埃利泽·帕尔曼（后来改名为埃利泽·本 - 耶胡达，意思是“犹大之子埃利泽”）就是现代希伯来语之父。犹太复国主义包含很多方面，它让犹太人重新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让一个古老国家重新屹立于世界。由于本-耶胡达的努力，希伯来语这个犹太人最早用来定义自己身份的圣经语言也得到复活。

本 - 耶胡达的成长背景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以及哈斯卡拉运动的知识分子非常相似。他也出生于正统犹太教家庭，后来发现自己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更感兴趣。他没有像比亚利克那样成为诗人，让他着迷的是如何让古老的希伯来语适用于现代散文和日常对话。他曾经在巴黎大学学习，在那里见证了法语对法国民族主义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认为犹太民族主义也需要自己的语言。1880年，他在给未来妻子底波拉的信中写道：“我已决定……为了拥有我们自己的土地，过上自己的政治生活，我们需要共同的语言，这就是希伯来语。但我们不需要拉比和犹太学者所使用的希伯来语，而必须创造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现代希伯来语。”[11]

1881年，本 - 耶胡达和妻子来到以色列地后，他们家只说希伯来语，孩子们也不例外。他们不允许孩子和其他人说任何其他语言，由于基本上没有其他人说希伯来语，他们的孩子只能和家人说话。从这个角度看，同赫茨尔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比，本 - 耶胡达的革命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

逐渐，本 - 耶胡达在这场语言战斗中找到志同道合者。他和一小群希伯来语爱好者们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希伯来语文学作品。作家人数少，但社会影响力极大；在这种氛围下，他们不但被视为艺术家，更代

表着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声音。

本 - 耶胡达的革命热情还表现在他邀请无数女性在他创办的各种期刊上发表希伯来语作品。他认为，女性在这方面能发挥独特的作用，能够“让已死、遭人遗忘、古老、单调、死板的希伯来语变得富有感情、温柔、灵活、微妙”[12]。伊休夫远远不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但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了允许女性投票和竞选的决议，伊休夫也早早有了舞文弄墨的女性。

虽然伊休夫的知识精英们热情高涨，但对于普通犹太移民来说，希伯来语并没有那么重要（赫茨尔甚至怀疑希伯来语能否成为犹太国的语言[13]）。早期来到巴勒斯坦的拓荒者们面临诸多困难，对掌握这门语言缺少热情情有可原。大多数人更愿意使用东欧犹太社团的意第绪语，雅法上演的意第绪语戏剧总能吸引很多观众，他们能轻松地听懂戏剧，更好地享受闲暇时光。在语言问题上，革命精英和普通大众出现分歧，希伯来语作家一心创造高雅文化，移民急需在艰苦的体力劳动后得到放松，不愿再费脑力。

除了普通大众缺乏热情，本 - 耶胡达和他的同伴们还要面对另一个障碍。对犹太教徒来说，复活希伯来语和犹太复国主义同样错误，希伯来语是圣经、《密释纳》（第一部最重要的拉比文献）和祈祷书使用的神圣语言，他们认为犹太人在日常事务中使用希伯来语是亵渎这种神圣语言。本 - 耶胡达创造新希伯来语词汇遭到他们无情的批评，他们向他的办公室扔石头，向奥斯曼政府举报他，本 - 耶胡达还因此坐了一段时间牢。后来，宗教领袖将他逐出犹太教。1891年，本 - 耶胡达第一任妻子底波拉死于肺结核，宗教人士不同意将她埋葬在阿什肯纳兹[3]犹太人的公墓。底波拉死后，本 - 耶胡达娶妻子的妹妹为妻。

宗教社团对本 - 耶胡达的攻击有自己的逻辑。实际上，和比亚利克等人一样，本 - 耶胡达明确表示，犹太复国主义是对耶路撒冷宗教人士所代表的那个犹太世界的反抗。乌干达事件后，他写道：

> 这些“锡安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那些支持在乌干达建国的人背弃了我们的整个历史，这种说法太拙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些自己背弃历史的人居然指责别人背弃历史！我可以告诉大家，唯一没有背弃历史的人是“罪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耶路撒冷反对本 - 耶胡达的宗教人士]，我们每个人都背弃了历史，这正是我们的光荣和伟大之处！[14]

从许多方面说，本 - 耶胡达是位独行者，不但宗教人士奚落他，一些致力于复活希伯来语的人也瞧不起他，甚至“包括阿哈德·哈姆和比亚利克在内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也认为他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语言机器，虽然他们都没有他那种白手创造希伯来语词汇的能力”[15]。

但本 - 耶胡达逐渐在伊休夫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正统派犹太机构先是没能阻止欧洲犹太人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现在又没能阻止希伯来语的复兴。本 - 耶胡达不但复活了这门语言，还让整个民族开始说这门语言。1922年12月他在耶路撒冷去世，大约三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伊休夫官方为他哀悼了三天。

就像欧洲一样，在巴勒斯坦，文学也将成为犹太人畅想未来的平台。很快，希伯来语文学成为犹太人想象新家园的途径，人们通过这一媒介表达犹太复国主义生活中的矛盾与分歧。作家和诗人在塑造伊休夫和以色列建国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将扮演核心角色。

伊休夫最早的希伯来语文学作品出自泽夫·雅维茨之笔，他于1887年移民巴勒斯坦。他发现那些移民没有努力重塑犹太人身份，为此惴惴不安，于是提笔讨伐这些人，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移民来巴勒斯坦应该出于革命激情。在一篇小说中，他对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犹太人：一种是流散地犹太人，他称之为“游客”；另一种是拓荒者，他称之为“居民”。[16]他的偏好不言而喻。流散地犹太人穿得过于正式，身体虚弱，一心贪图享乐，只在意自己的容貌，他的“胡须被精心修剪，嘴唇上还留有八字胡……他把提包放在大腿上，手上拿着弯曲的手杖和有褶裥花边的太阳伞……但是他看上去绵软无力，脸色苍白”[17]。

在雅维茨的小说中，流散地犹太人怕弄脏裤子，不愿和拓荒者中的男女老少一起坐在地上欣赏美景。不同于“游客”，“居民”接地气又积极向上，他穿着阿拉伯风格的简装，手拿自卫的武器（而不是手杖），骑着白马。他健康、自信，对生活充满激情。他是比亚利克所说的新犹太人，遇到集体迫害绝不会躲在酒桶后。这位新犹太人决心与充当受害者的历史决裂，将命运的主导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多亏了雅维茨，对新犹太人的文学讨论从欧洲移到巴勒斯坦，从流散地移到蓬勃发展的伊休夫。

除了雅维茨，对伊休夫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还有很多，另一位闻名伊休夫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作家是撒母耳·约瑟夫（沙伊）·恰奇克斯，他是库克拉比家的常客。和许多新伊休夫成员一样，他对流散地的犹太教

传统怒不可遏；但和许多人一样，他一生深爱着犹太经典，不愿意放弃这笔宝贵的财富。在恰奇克斯看来，库克拉比指明了一条将两者结合起来的道路，在认识库克后不久，他创作了短篇小说《弃妇》（*Agunot*），讲述了一群因丈夫拒绝宗教离婚而囚禁在不幸婚姻中的女人。他用新取的笔名沙伊·阿格农发表了这一作品。[18]1966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人。

在雅维茨笔下，“接地气”的拓荒者在新家园的泥尘中过得很舒坦，但亲身经历这种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点莽撞的年轻人带着丰富的理想来到巴勒斯坦，但他们没有任何农业技能。他们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定居点的乌托邦理想几乎立刻就破灭了，不得不想尽办法寻找一切可得的经济资助。

和几十年后以色列建国后的情况一样，伊休夫所需的大部分资助来自流散地犹太人，其中最著名的慈善家是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男爵捐出大量财产用于购买定居者所需的一切，包括房屋、设备和牲畜等，人们很快称他为“那位捐助者”。截至世纪之交，他捐助的资金总额达到600万美元，按现在的价值计算相当于1.5亿美元。

罗斯柴尔德还被称为“莫沙夫教父”(4)，他派欧洲农业专家到巴勒斯坦帮助新移民，并在那里购买总面积达到200平方英里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了约40个村庄。从最北部的梅图拉（Metulla）到南部的马兹凯雷特巴特亚（Mazkeret Batya，即以革伦[Ekron]）都有罗斯柴尔德资助的社区。此外，里雄莱锡安、罗什平纳（Rosh Pina）、奇科隆雅科夫（Zichron Yaakov）等这类如今重要的城镇也得到他的资助。因此，他的资助对象不仅包括各种形式的农业社区（莫沙夫和基布兹），还包括城镇。仅1880—1895年间，在他的资助下就建立了30多个这类社区。截至1937年，巴勒斯坦大约有160个村庄，罗斯柴尔德资助了其中三分之一（参见地图2）。

犹太人购买土地虽然合法，但引起了奥斯曼帝国和当地阿拉伯人的警惕，他们知道犹太人想在巴勒斯坦获得立足之地，奥斯曼帝国开始限制犹太人活动。早在比卢成员到达巴勒斯坦前，当地土耳其官员就宣布禁止敖德萨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这个政策显然是针对比卢成员，因为该组织位于敖德萨）。1856年，奥斯曼帝国通过了允许外国人在帝国内购买土地的法律，但1881年奥斯曼政府开始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购买土地，这条禁令一直持续到帝国解体。同年，奥斯曼政府还宣布，允许犹太人移民奥斯曼帝国，但巴勒斯坦除外。

这些禁令没能阻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中央政府对外国人购买土地的立场很模糊，态度还不断变化；法律法规在表述上也不清晰，能够作出不同的解读；奥斯曼帝国各级行政体系非常腐败，普遍收受贿赂”。也就是说，犹太人仍然可以通过合法手段购买土地。[19]伊休夫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旧伊休夫的犹太人精通阿拉伯语，对奥斯曼文化和政府也了如指掌。通过这些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够巧妙地利用奥斯曼腐败的官僚体系。连赫茨尔也不能免俗，他就不得不通过贿赂获得面见苏丹的机会。

没有罗斯柴尔德的资助，伊休夫这些新团体可能根本无法生存下来，但罗斯柴尔德和拓荒先驱们经常发生矛盾，年轻的移民者充满理想主义热情，他们认为使用罗斯柴尔德的财富影响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实现。从罗斯柴尔德的角度看，许多劳动者似乎感觉这些资助是他们应得的，这让他很失望。当他派当地管理者监督这些人时，年轻的移民就更无法接受了，他们认为自己好不容易逃离了资产阶级的剥削，这些人的魔爪现在又伸到他们的新家园。

几十年后，以色列和流散地资助者们也存在这样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外交政策和宗教多元性问题上，流散地犹太人（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最善意的行为有时也让以色列人非常反感，认为“富裕的流散地犹太人胡乱干预”。

第一次阿利亚总共将两三万犹太人带到巴勒斯坦，但其中60%—90%的人几年后又选择了离开。对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移民来说，来到先祖之地后的生活既振奋人心，又令人沮丧，他们带着宏伟的计划来到这儿，结果得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来之前，很多移民想象这里是沐浴着阳光的宁静之处，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反差太大，当他们踏上这片土地，看到脏乱的雅法港散发着恶臭，拥挤的人群中不时有人随地吐痰，他们第一次明白，新家园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许多人选择了离开，留下来的人也发现他们的梦想和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也让他们很失望，特别是1903年乌干达方案被提出来后，他们不禁问自己，如果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在乎巴勒斯坦，甚至准备放弃这片土地，那他们在此辛苦劳动的意义何在？

虽然充满自我怀疑，但早期拓荒者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成功。他们没有明确意识到，正是他们的努力为将来的移民铺好了道路，为社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未来这些地方都将成为以色列的村庄和城市。可能最重

要的是，他们是最早将赫茨尔的愿景转变为现实的人。

在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及乌干达方案提出和否决后不久，第二次阿利亚（1904—1914）开始。在此期间，有大约4万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地，他们大多来自东欧。这次移民潮对巴勒斯坦正在蓬勃发展的犹太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在加利利湖以南建立了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5)建立了第一个犹太自卫组织，还在雅法郊区建立了日后的特拉维夫。这批移民将成为以色列好几代人的榜样。这一时期，许多伊休夫领导人还将成为建国早期重要的政界和军界人物。

同先前的移民一样，这些先驱的生活也很困难，他们也充满怀疑。同第一次阿利亚一样，第二次阿利亚期间，人们也在文学作品中生动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困难。

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是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他出生在乌克兰小镇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曾在波切普（Pochep）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其他人一样，他对世俗文化深感兴趣，特别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但战争中断了他的学术发展道路，1901—1904年他在沙皇军队中服役，日俄战争爆发后逃到伦敦，在那一直生活到1908年。伦敦的生活也没有给他安定感，1909年他移民巴勒斯坦。在这里，他引领了新一波现代希伯来语文学，成为伊休夫著名知识分子之一。

布伦纳富有激情，但思想复杂。他矛盾的心态很能代表随后几十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特点：他积极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同时是个没完没了的悲观主义者。他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创立新的希伯来文化，有时又觉得他自己虽然怀抱理想，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他说，流散只是被转移到以色列地而已。[20]

在很多方面，他是“饱受折磨的希伯来文学的世俗的圣人”[21]。布伦纳是欧洲宗教世界的产物，却又被启蒙运动深深吸引。他这种人正是库克拉比苦苦寻找的，库克拉比试图让这类人接受他的新宗教观。

但和伊休夫早期作家与思想家一样，虽然内心充满了痛苦的挣扎，但布伦纳并没有成为库克拉比的信徒，他“像一位没有情感的苦行者，对犹太人面临的困境和所处时代的精神危机拥有非常透彻的洞察，这使他不可能倒向库克拉比对他及其同代人的反叛和渴望所持有的神秘的神正论见解。”他这样评论库克拉比：“有时，在库克拉比关于咆哮而沸腾的民族灵魂的某些话语中，人们能感受到他像是一个被暴风雨卷起波澜的

水洼。”[22]

这就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所处的时代，一群充满激情的灵魂迫切希望犹太民族得到重生，他们痛苦地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传统的旧世界，另一个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新世界。决心创造新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撞上了残酷的现实，旧伊休夫和新伊休夫同在，探索者和建设者并存。这是美好而动荡的时代，既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也潜伏着许多危险。

犹太复国主义将要建立的国家对这类张力也会有很多反映。

布伦纳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时非常悲观，在1911年一篇名为《精神病》（*Atzabim*）的短篇小说中，他明确表达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未来的担忧，主角对叙事者讲述了他到巴勒斯坦的经历，思考这到底有没有意义。主人公最早从乌克兰来到纽约，在一家缝扣子的血汗工厂工作，为了追求美好的未来，他坐船来到巴勒斯坦，但他发现这里的生活依旧辛苦，唯一的区别是以前缝扣子，现在摘橘子。此前，锡安是个美丽的梦想，现在看来，这只是不理智的冲动，是“犹太人精神病”发作的症状。

并非只有布伦纳一人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前景。作为第二次阿利亚的移民，大卫·本－古里安（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感到第一次阿利亚的移民已经向现实妥协。他说：“第一次阿利亚的先驱成为投机倒把者，他们利用民族的希望和年轻人的理想赚钱，将流散地的偶像带到了即将得以重建的圣殿，这些‘偶像崇拜’是对建国理想的玷污。”[23]本－古里安这话说得有些重，也不尽客观，但它体现了犹太人深刻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国也善于这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

布伦纳虽然思想复杂，但他可能是第二次阿利亚中最大的文化偶像，他的作品仍被奉为经典，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如果他活得更久些，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就，但在1921年的雅法暴乱中，他被阿拉伯暴徒杀害。

第二次阿利亚留下了两笔对犹太国影响深远的遗产：一是现代希伯来语的复活与全面使用，二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标志性制度基布兹的诞生。

基布兹运动主要靠犹太国民基金从奥斯曼帝国购买的土地而蓬勃发

展起来，它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理想，强调集体责任和A.D.戈登提出的在土地上劳动的观念。从俄国带来的集体主义原则成为早期移民为以色列国家精神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在基布兹，平等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的东西都由集体成员共同分享与承担，包括食物、利润和守护领土的责任。在基布兹的集体主义原则面前，连核心家庭也变得次要了；孩子由集体而不是由父母抚养，他们睡在基布兹的儿童之家而不是父母家。

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丰富的集体生活体现了先驱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理念。晚上，所有基布兹成员会聚集在餐厅，讨论公共事务和基布兹思想。大多数基布兹明显是世俗的，其成员相信，通过体力劳动，他们能够成为比亚利克、戈登等许多人在几十年前描绘过的新犹太人。

当然，基布兹也为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付出了代价。基布兹运动早期受到俄国革命的启发和影响，但后来由于斯大林的行为，共产主义形象不再那么完美，面对这些问题，基布兹内部出现分歧。许多夫妻由于政治观点相左而分开，许多家庭因此破裂，而受害者是无辜的孩子。

早期基布兹运动还出现了另一个连后来以色列社会也无法逃避的问题：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很多革命运动会面临这个冲突，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例外。在以色列民间，最能体现这种冲突的是拉亥尔·布劳斯坦·塞拉，她的笔名是“女诗人拉亥尔”（Rachel HaMishoreret）。

大家都称她拉亥尔，她年轻时移民巴勒斯坦。1919年，29岁的拉亥尔来到德加尼亚的基布兹，抵达后不久就患上肺结核，可能是此前在俄国旅行时感染上的病毒。考虑到其他成员的健康，基布兹强迫她离开。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四处漂泊，生活拮据，1931年病逝于疗养院。虽然早早离开了人世，但直到今天，她的诗歌还在以色列学校中传颂，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她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对基布兹生活的怀念和被集体匆匆抛弃的痛苦。[24]她最著名的诗歌《也许》表达了她对基布兹的眷恋之情，将近一个世纪后，这首诗还经常被以色列人诵读：(6)

也许从来不是如此。

也许

我从来没有很早醒来就下地

额角汗津津地去劳作。

也从来没有在收获季节

那漫长、灼热的日子

站在装满稼禾的货车顶上，

放开喉咙高歌一曲。

也从来没有洗澡净身

在加利利湖那平静

湛蓝的湖水中。

啊，我的加利利湖啊，

你是否真在那里？还是我在做梦？[25]

那些献身集体事业的人就不能从集体中获取一些回报？集体就那么重要？难道新犹太人对保护个人——哪怕这样做会危及集体——就没有一点责任？

拉亥尔的诗歌让人同时注意到这种理想主义激情的丰厚和危险。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先驱性建国精神的体现，基布兹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迅速发展。集体主义理念和国家理念逐渐融为一体，密不可分，“1934年，一个年轻拓荒者离开基布兹只是背叛了朋友和组织，但1937—1939年，他这样做会觉得自己还背叛了国家”[26]。

虽然发展势头很好，但实际上伊休夫只有一小部分加入基布兹，即便在基布兹运动的顶峰时期，1947年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到伊休夫人口总数的7%。虽然人数不多，但该运动对后来以色列社会的影响非常大。[27]许多以色列领导人都来自基布兹，没有生活在基布兹的人也认为基布兹代表着这个国家开拓进取的精神。许多基布兹有意建在危险的边境地区，后来在以色列的长期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基布兹中也因此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20世纪60年代，生活在基布兹的以色列人只占全国人口的4%，但有15%的议员来自基布兹。在六日战争中，“基布兹成员的伤亡率接近全国平均伤亡率的五倍，将近五分之一的阵亡士兵来自基布兹，将近三分之一的阵亡军官是基布兹成员”[28]。如果以色列在建国后几十年存在一个制造爱国主义精神的“工厂”，那么这个工厂非基布兹莫属。

很多新移民对于创造犹太模式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充满热情，但也

有人非常怀念欧洲的城市生活。少部分人住进已有的阿拉伯城市，但那里的居民区中东特色过于强烈，和他们已经习惯的欧洲生活完全不同。面对这个问题，约60位谦逊的专业人士决定在雅法北部建立第一个“犹太郊区”。不同于古老的港口城市雅法，他们希望建造“一个‘干净、漂亮和健康的地方’。如果从欧洲的隔都跑出来再住进中东的隔都，那似乎不对劲，简直有点‘反犹太复国主义’了”[29]。

1909年，特拉维夫诞生。“特拉维夫”是赫茨尔乌托邦小说《新故土》的希伯来语翻译。(7)对这个几十年后将成为世界级城市的郊区，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它建成“农庄，而是……一座城市，效仿了许多他们熟悉的欧洲城市。有人想把它建成巴勒斯坦的敖德萨，还有人想把它建成地中海边的维也纳”[30]。人们希望特拉维夫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高雅文化的沃土，比亚利克和当时许多著名的作家都选择在这里安家。复活希伯来语的计划也在这里奏效，“到1930年，市政学校中有超过1.3万名儿童能说希伯来语”[31]。

特拉维夫最终成了“第一座说希伯来语的城市”，现在听起来平淡无奇。但任何地方的任何一座城市能够成为“说希伯来语的城市”，其实都是有时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副产品，也是第二次阿利亚中充满理想主义热情的移民的功劳。本－耶胡达的成功在于：

> 得到了具有钢铁意志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支持，特别是第二次阿利亚期间的移民。客观地说，让这些平时说意第绪语或俄语的犹太人在家里和田野中使用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苦不堪言，他们本能地想在劳动之余好好放松。但就像面对巴勒斯坦生活中其他困难一样，他们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大多数投身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农民和工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本－耶胡达的观点：除了汗水和鲜血，一个民族同样需要自己的语言。[32]

文学在伊休夫也得到发展。这里涌现出知识阶层、出版行业和如饥似渴的读者，在这个地区堪称前所未有。特拉维夫（连同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学精英）很快变为“第二个莱比锡”，莱比锡是欧洲的希伯来语出版中心。[33]复兴希伯来语不再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激情鼓舞的理想主义者的事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和巴勒斯坦希伯来语教师联盟创始人梅纳赫姆·乌什金评论说：

> 儿童在乡村学校能学到多少基本语法知识……能学到多少历史

和科学知识并不重要。但他们必须学会这些：成为强壮、健康的村民，热爱周围环境，热爱体力活，以及最重要的是成为全身心热爱希伯来语和犹太民族的村民。[34]

伊休夫在文化上的追求远远不止于希伯来语和特拉维夫。在1897年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兹维·赫尔曼·沙皮拉敦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大学，让教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中之重。1903年伊休夫成立教师协会，这明确表明教育将在伊休夫和后来的犹太国中发挥核心作用。

几十年后，以色列将诞生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并获得“创业国度”的美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千年来犹太人对教育的强调，而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倚重教育。

头两次阿利亚中的理想主义者和普通移民给伊休夫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很多人最终离开了巴勒斯坦，而留下来的人生活困苦，但正是这些留下来的人建立了最早的犹太定居点，发起了基布兹运动，复活了希伯来语，建成了第一座说希伯来语的城市特拉维夫，后来还成立了用“新”语言表演节目的剧院，出版了各种书籍。

这些是为实现赫茨尔和阿哈德·哈姆的梦想而迈出的第一步。虽然通往建国的道路还很漫长，但犹太人已经开始建造基础设施，这最终会创造出赫茨尔急切渴望建立的那个国家。这第一步还让人想起阿哈德·哈姆关于巴勒斯坦应该成为犹太人的文化中心的信念，因为除了建造基础设施和为政治主权奠定基础，犹太人几千年来第一次可以看到、听到和感受到什么是犹太社会。它意味着有自己的语言、文学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自古罗马人流放犹太人以来，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帮助下，犹太人第一次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重生的犹太民族的模样。

(1) 每次移民潮叫一次“阿利亚”（*aliyah*，复数为*aliyot*），希伯来语字面意思是“上升者”。因为犹太宗教经典中总是把去以色列地表达为“上升”去以色列地。

(2) 比卢（*Bilu*）是希伯来语中“雅各之家，让我们上行”的简写。希伯来语为*“beit ya'akov lechu ve-nelcha*”。（以赛亚书2：5）

(3) “阿什肯纳兹”指欧洲裔犹太人。而“塞法迪人”或“米兹腊希人”指的是来自东方（主要是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中译本下文将“米兹腊希人”译为“东方犹太人”。]

(4) 莫沙夫是以色列合作社制的农业社区。

(5) 不同于许多传统拉比，库克拉比有时会来到完全世俗化的社区为那些被当地阿拉伯人谋杀的犹太人主持葬礼。库克曾和其他人在海法附近的梅哈维亚（Merhavia）为两位犹太人主持葬礼，其中一名死者是来自德加尼亚的摩西·巴尔斯基，他在为朋友撒母耳·达扬拿药时遇害。为了纪念他，撒母耳给他第一个孩子（也是最早出生在德加尼亚基布兹的孩子之一）取名为摩西·达扬。（Yehudah Mirsky, *Rav Kook: Mystic in a Time of Revolution*[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p.84.）

(6) 高秋福译：《百年心声：现代希伯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2—43页。另参车兆和译：《似花还似非花：拉亥尔诗选》，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页。——校注

(7) “特尔”（*tel*）指的是很多代人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和不断修建房屋留下的山丘。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生活过的地方会形成一个土堆，通过对土堆不同文化层的发掘，考古学家可以发现每代人生活的特点。在这个词语中，“特尔”代表的是历史。“阿维夫”（*aviv*）在希伯来语中是春天的意思。“特尔”和“阿维夫”合在一起（连读后成了“特拉维夫”），就捕捉到了赫茨尔书名中“新故土”（*Altneuland*）的那层意思。

第五章
《贝尔福宣言》：英帝国支持犹太国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

——《贝尔福宣言》，1917年

伊休夫的生活在不断改善，但欧洲却笼罩在灾难的阴霾下。这个世纪将发生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浩劫。20世纪上半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约八千万到一亿战士和平民死亡，战后斯大林还将杀害两千多万人。

泽夫·雅博廷斯基是最早预料到这场灾难的人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说："两到三个世界大国将展开一场极具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所有现代技术将被疯狂地使用……死伤人数将非常惊人，直接、间接和预料不到的经济损失将成为无法计算的天文数字。"[1]

不少人明白，不管这场灾难以什么形式发生，都将持续很长时间。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说："整个欧洲的灯火将熄灭，我们有生之年无法看到灯火被重新点亮。"[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奥斯曼帝国是否会失去对中东的控制，如果失去，英国是否会控制中东。面对不明朗的政局，犹太复国主义内部很快出现分歧。马克思·诺尔道坚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但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判断有多么荒谬，刚刚被任命为埃及前线总司令的杰马尔帕夏（Djemal Pasha）在奥斯曼帝国参战几周后就亮出了自己的反犹立场，他解散了工党领导人本－古里安和伊扎克·本－兹维建立的亲奥斯曼帝国的犹太军事组织，关闭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团结报》（*Ha'achdut*），还宣布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土耳其的敌人，一旦捕获，可以立即处决。

本－古里安一开始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寄希望于奥斯曼帝国。当土耳其人开始驱逐特拉维夫的犹太人时，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开

始效忠英国。雅博廷斯基等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寻求英国的支持更符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利益，只要奥斯曼帝国继续在中东统治，犹太国的梦想就无法实现。[3]雅博廷斯基迫切希望奥斯曼帝国解体，也坚信这一天会到来。英国同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等国即将开战，雅博廷斯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开始对英国政治领导人展开游说，让他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如果我们不表明态度，再两面讨好，最后会全盘皆输。我们必须支持协约国，用我们的犹太战士帮助协约国征服以色列地。”[4]

杰马尔帕夏将大量犹太人驱逐出巴勒斯坦，其中一部分人被遣送到埃及的加巴里（Gabbari）军营，雅博廷斯基就在其中。正是在加巴里，雅博廷斯基第一次见到了约瑟夫·特伦佩尔多。特伦佩尔多1880年出生于高加索，1904年日俄战争中帮助俄国人作战，失去了左臂。沙皇曾五次亲自向他授勋，表彰他的英勇，他最终成为第二位俄国军队中的犹太军官。1912年他离开俄国来到巴勒斯坦，在加利利湖旁的农田劳动。1914年，杰马尔帕夏将他和其他几千人驱逐出境。

这时，英国人正在寻找一位能够指挥犹太军队同土耳其人作战的军官。曾在南非参加英布战争的约翰·亨利·帕特森中校恰好来到埃及。帕特森是一位爱尔兰新教徒，对犹太历史非常熟悉，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充满同情，他得到了这个职位。最终，他同雅博廷斯基、特伦佩尔多一起组建了锡安骡马队（Zion Mule Corps）。

锡安骡马队是一千八百年前巴尔·科赫巴发动对罗马人起义以来第一支由犹太人组成、在犹太旗帜下战斗的军队，它重新唤醒了古老的犹太自豪感。锡安骡马队中有几位成员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的核心人物。由于杰马尔帕夏的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居然两千年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这颇有讽刺意味。

特伦佩尔多1920年在守卫特尔哈伊（Tel Hai）定居点的战斗中牺牲，据传他在临死前说：“没关系，为国牺牲是光荣的。”三年后，雅博廷斯基创立贝塔尔组织，取这个名字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巴尔·科赫巴最后的据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特伦佩尔多。(1)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知道奥斯曼帝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怀有敌意，但他们中很多人认为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冲突中站队非明智之举。这些人在中立国家丹麦的哥本哈根建立了一个联络办公室。另一些人则对英国将在战争胜利后得到巴勒斯坦十分有信心，因而不遗余力地

和伦敦建立联系。

要完成这项任务，没有人比哈伊姆·魏茨曼更合适，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1874年出生于平斯克附近的一个叫作莫塔尔（Motal）的村庄（位于今天的白俄罗斯，当时属于俄国）。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样，他也成长于俄国传统犹太家庭，后来被欧洲的知识界所吸引。他智商过人，思想自由。他的一位启蒙老师说过：“他要么成为天才，要么改信基督教。”[5]

魏茨曼先后在德国和瑞士学习化学，1899年在瑞士弗里堡大学拿到有机化学博士学位。虽然没有参加1897年巴塞尔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当时他想参加），但他出席了后来所有的会议，迅速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早期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提倡在巴勒斯坦建立高等学府，希伯来大学的创建就有他的功劳。他还致力于建立一所专门研究科学技术的大学，其结果是1912年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成立。此外，他还是1934年成立的魏茨曼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研究所后来蜚声世界。

1904年，魏茨曼到曼彻斯特大学担任高级讲师，两年后正是在这里，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成为议员的亚瑟·贝尔福。贝尔福原先支持乌干达方案，他非常欣赏魏茨曼。魏茨曼通过私人关系让贝尔福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

1916年，魏茨曼成为英国海军实验室主任，因工作从曼彻斯特搬到伦敦。他在研究中发展了丙酮的制造方法，丙酮是海军使用的无烟炸药的关键成分。这一发现为英国在战争中取胜做出了重大贡献，魏茨曼因此受到广泛赞誉，他也得以用自己的新地位来接近英国权要，这是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只能梦想的。

奥斯曼帝国大势已去，英国和法国虽然还没有获得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已经开始考虑如何瓜分中东。

1915年底，两国召开了一系列表明各自诉求的会议。英国派出的代表是马克·赛克斯，他是天主教徒，曾研究过中东国情，1903年到巴勒斯坦度过蜜月，他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在外交部工作。法国派出的代表是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他也是职业外交人员，同英国谈判时他是法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赛克斯以前就提出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管理的建议，但是并没有明确界定这片区域的边界。赛克斯和皮科最终达成《小亚细亚协定》，也称为《赛克斯-皮科协定》。根据该协定，法国

将控制现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由于印度对英帝国非常重要，英国需要获得通向苏伊士运河（参见地图6）的自由通道（这也是1956年以色列西奈战役爆发的重要原因），所以英国将控制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沿海地带，包括现在的约旦、伊拉克南部、海法港、阿卡（Acre）港和整个内盖夫沙漠。根据协定，巴勒斯坦西部、加利利湖南部和加沙北部由国际共管。[6]协定还包含关于耶路撒冷那些圣地的条款，协定建议将它们交由国际监督和管理。

赛克斯和皮科既没有考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利益，也没有考虑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利益，所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于这一协定都厌恶。两个外国势力还没有赢得战争就私自将中东瓜分，这让阿拉伯人勃然大怒。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和侯赛因·本·阿里（麦加谢里夫）以前的讨论中，麦克马洪敦促阿拉伯人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他试图让阿里相信，英国不但希望巴勒斯坦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还致力于建立一个从北部的叙利亚向南延伸到也门的阿拉伯国。在阿拉伯人看来，《赛克斯 - 皮科协定》公然违背了英国先前的承诺，英国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

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样不高兴。法国人一向反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英法共同控制这一区域不利于犹太人实现他们的目标。魏茨曼等犹太复国主义者更希望巴勒斯坦单独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他们认为英国向来“给殖民地（白种）臣民更多自由，任何帝国在这方面都比不上英国”，而法国“一心想让殖民地臣民变为法国公民，抹杀他们的民族认同”[7]。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让英国控制巴勒斯坦，但历史会让他们失望地发现，英国人后来根本不像魏茨曼等人想象的那样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亲眼看到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从1915年开始，妇女和儿童被遣送到叙利亚沙漠，在长途行走中死去，接下来大量强壮男性被迫从事强制劳动，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人的死亡人数达到150万。这让伊休夫非常担心：如果奥斯曼土耳其人可以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种族灭绝，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做同样的事？

一小群犹太人决定主动摆脱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亚伦松家族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小型间谍网络，其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包括亚伦·亚伦松、他的姐妹萨拉和丽芙卡，以及丽芙卡的未婚夫阿夫沙洛姆·费恩

伯格（Avshalom　Feinberg）。亚伦·亚伦松是一位农学家，因在加利利地区发现了一种古代小麦品种而小有名气。这个团体自称为“尼里”[2]。

那时，当地出现蝗灾，土耳其人委派亚伦·亚伦松负责控制灾情，这让他获得权限，可以进出该地区的政府办公室和军事设施，他将搜集来的大量情报提供给英国。刚开始英国人还心存疑虑，但后来发现亚伦松很有利用价值。他留在开罗，负责与英国人接头，他的姐妹及兄弟亚历山大和费恩伯格（除了这些核心成员，据不同的估计，该组织还有20—60名成员）负责间谍网络的日常事务。

尼里最主要的活动是为英国提供奥斯曼帝国防御工事、军队驻地、铁路线和水源的信息，方便英国人制订偷袭计划。每两周尼里会将窃取的情报通过密码和信号灯的形式发送给停靠在阿特利特（Atlit，位于海法港南边）岸边的一艘英国海军快艇。后来这艘船没有再回来，他们开始用信鸽传递情报。

正是信鸽葬送了这个组织。1917年9月，土耳其人截获了一只携带密信的鸽子，奥斯曼帝国得到间谍网络的证据。截至1917年秋天，几乎所有尼里组织成员被捕，其中部分人在饱经折磨后出卖了其他成员。部分人被判处死刑，一人在大马士革被公开处以绞刑。

28岁的萨拉在奇科隆雅科夫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她找借口要回趟家换掉身上沾满血的衣服。为了不让自己招供，她拿起藏在家中的手枪向自己嘴里开了一枪，几天后死去。

尼里的行动恐怕没有对战争结果产生太大影响。但尼里的事迹和萨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伊休夫广为传颂，犹太人将外国势力（首先是奥斯曼帝国，几十年后是英国）赶出巴勒斯坦的决心和勇气由此可见一斑。

在伦敦，哈伊姆·魏茨曼继续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奔走游说。他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没有官方职务，很多人认为他我行我素，不受纪律约束。但不管是否如此，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近距离接触英国高官，利用各种手段解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合理性。

这不是简单的任务。英国外交部大多数人是研究阿拉伯文化的，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拥有巴勒斯坦的理由更充分，从更务实的角度考虑，英国也不愿意激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怨。[8]但事情突然出现转机，1916年大卫·劳合·乔治当选英国首相。赫茨尔就乌干达问题谈判时，劳

合·乔治曾担任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律师，他和赫茨尔都承认巴勒斯坦和犹太人自古以来的联系，都认为相对于阿拉伯人，犹太人能让这片土地得到更好的发展。他说："世界四大国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不管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和现在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的70万阿拉伯人的欲望和偏见相比，犹太复国主义扎根于这片土地上的悠久历史中，有客观的现实需要，未来也能为这片土地带来更深刻的变化。我认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是正确的。"[9]

意识到劳合·乔治的上台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魏茨曼迅速接近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他还同英国外交部有影响力的外交官赛克斯建立了联系，他称赛克斯是"我们最伟大的发现"[10]。

支持和反对力量都在积极行动。正当魏茨曼努力推进他的计划时，一些英国犹太议员继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们担心这会掀起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浪潮，如果阿拉伯人被激怒，出现反犹主义浪潮可能性会变得更大。赛克斯和其他英国外交官员则努力说服其他政府官员让犹太人合法获得巴勒斯坦。

魏茨曼最终获胜。他取得了他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以书信为形式的《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贝尔福宣言》是对魏茨曼"在丙酮制造上所做的重要工作的奖励"[11]。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给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3)写了这封信：

>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
> 我愉快地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将下述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志向表示同情的宣言转交给您，这个宣言已经呈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
>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也不能伤害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
>
> 若您能把宣言的内容通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向您表示感谢。
>
> 亚瑟·詹姆士·贝尔福谨启[12]

距离赫茨尔1897年在巴塞尔建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仅20年，全世界

最大的帝国就承认并开始支持这一运动，还承诺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如果赫茨尔没有在13年前去世，这个消息一定会让他感到震惊。

虽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是一份非常模糊的文件，它说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但并没有提到犹太国，没有提供建立“民族家园”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更没有解释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如何能不侵犯“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宣言没有提供任何地图或定义来界定“巴勒斯坦”的范围。最后，这份文件没有提到的事实是，在宣言发表时巴勒斯坦仍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虽然英国人有信心很快能控制这里，但当时他们根本就拿不出巴勒斯坦。

不过，对于上面提到的部分问题，我们起码能找到一些模糊的答案。在英国政治领导人中间，确实有在犹太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建国的意思。[13]预期的犹太国领土显然很大。约20年后，1937年的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指出：“要建立的犹太民族家园的土地在《贝尔福宣言》发表时，被理解为历史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这意味着包括约旦河两岸，相当于今天的以色列和约旦（参见地图3）。

至于英国还未控制巴勒斯坦的事实，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已不可避免，而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英国将很快获得巴勒斯坦。果然，《贝尔福宣言》公布六周后，埃德蒙·艾伦比将军指挥的埃及远征军赶走了耶路撒冷的奥斯曼帝国守军。数百名群众和同英国并肩作战争夺耶路撒冷的战士站在街道两边，目睹了英军隆重的庆祝仪式。出于对圣城的尊重，艾伦比将军步行从雅法门走进耶路撒冷老城。[14]

英国人获得了巴勒斯坦——他们当初可是承诺要把这里给犹太人的。在接下来的31年里，他们将管理这块犹太人祖先的土地，直到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

伊休夫在继续壮大。191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决定，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大学，且在五年内开始建设。[15]1918年7月24日，《贝尔福宣言》宣布不到一年，数千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斯科普斯（Scopus）山参加希伯来大学的奠基仪式。思想生活从一开始就在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国处于核心地位。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口又可以重新在全球自由流动，欧洲出现了新一轮反犹主义高潮，在俄国的武装冲突中，10万—20万犹

太人被杀害，这引发了新一轮的巴勒斯坦移民潮。第三次阿利亚（1919—1923）中有3.5万人来到巴勒斯坦。亲眼看见战争让欧洲变得满目疮痍后，第三次阿利亚成员积极建设建国前的机构，正是这些机构保证以色列最终能够顺利建国，实现犹太人的主权。这批移民也是《贝尔福宣言》后第一批来到巴勒斯坦的人，他们明白自己的事业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这批移民的涌入帮助犹太人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技术进步，在水资源技术上取得的成就尤为重要。水是这一地区的稀缺资源，实际上，这一时期英国限制犹太人移民的理由就是声称当地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16]因此，对水资源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伊休夫领导人明白，他们不仅要为已经到来的移民提供充足的水资源，还要向英国和全世界证明这片土地能够接受更多的移民，远远超过英国给出的人数。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1880—1914年，犹太复国主义者购买的土地主要集中在西部从海法到雅法的沿海平原，以及东部的耶斯列（Jezreel）和约旦河谷地。这些土地多为荒无人烟的沼泽地。他们建立的第一座村庄佩塔提克瓦就暴发过疟疾疫情，导致俄国的移民－拓荒者不得不离开。同样因为疟疾，哈代拉（Hadera）刚建成的20年里超过半数的居民死去。[17]但这并没有让移民退缩，两年后他们又回到佩塔提克瓦，抽掉沼泽地的水，在土地上发展农业，将这里建成盛产橘子的果园。大卫·本－古里安在佩塔提克瓦橘子园工作时还感染过疟疾。

基布兹在排干沼泽地和消灭疾病的工作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请来埃及工人帮助犹太人为沼泽地排水，消除这里的疟疾，在他们的帮助下，基布兹成员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当移民们不断开拓土地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也展现出过人的眼光，他们购买了许多当时看似无法居住的沼泽地，有时不惜重金。面对质疑，曾担任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秘书，后来成为犹太国民基金负责人的梅纳赫姆·乌什金认为，在买地问题上，再高的价格也划算。他说："巴勒斯坦的地价年年在攀升，如果我们现在不买，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买。"[18]

改造土地的工作进展迅速。1938年，美国农业部派土壤专家沃尔特·克雷·罗德民对欧洲、北非和巴勒斯坦进行调研，他发现与犹太人到来之前相比，伊休夫大幅提高了当地水利技术。罗德民为犹太人取得的成就

感到“惊讶”，说这是他此行在全世界看到的“最值得称道”的农业复垦工程。[19](4)

这一时期伊休夫还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机构。1920年4月19日，经选举产生了“代表大会”（*Ase fat Hanivharim*），这相当于英控巴勒斯坦时期犹太人的议会组织。代表大会中共有314个席位（这也是犹太历史上议员人数最多的时候），延续了赫茨尔时期管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管理方法，政党通过选票获得相应席位，比如，一个政党能获得30%的选票，就可以在代表大会中获得30%的席位。

1920年选举中没有任何政党得到大部分选票，事实上，不管是伊休夫代表大会还是独立后取代代表大会的以色列议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获得过大多数选票。在1920年的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的工党也只得到70个席位，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成为伊休夫准政府的议会机构。

伊休夫是如何形成民主传统的？大多数伊休夫移民来自非民主国家，不管是俄国和波兰的犹太人，还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都没有在民主政体下生活过。犹太教也没有明显的民主传统，圣经时期的国王并非通过选举产生，塔木德时期的拉比虽然不是王朝的产物，但也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那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为何会有追求民主的愿望？

犹太社团追求民主的传统起源于流散时期。从先祖之地被驱逐到欧洲各地后，他们重新建设自己的社团体系。1580—1764年，位于波兰卢布林（Lublin）的四土地委员会是大波兰、小波兰、鲁塞尼亚（Ruthenia）和沃利尼亚（Volhynia）的犹太权力中心，这个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税收、处理同外族社团关系等事务。除了四土地委员会，分布在欧洲各个犹太社团、规模更小的地方委员会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沿袭了这种方式。到20世纪早期，犹太人选举、立法、收税的历史已经有350年。[20]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传统在完全没有民主环境的巴勒斯坦得到坚持。1948年犹太国建立后，这一制度还改变了来自没有民主积淀国家的移民。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有100个新的国家成立（主要是因为各帝国的解体），以色列是少数几个从建国伊始就采取民主体制并一直坚持下来的国家。

1920年4月，就在巴勒斯坦选举产生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同一天，伊

休夫的命运在意大利的小镇圣雷莫（San Remo）也被提上议事议程。在圣雷莫会议上，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商讨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他们没有画出具体的地图，而是就总体原则达成一致意见。对伊休夫而言，4月25日召开的圣雷莫会议最重要一点在于，与会代表承认了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将其写入会议决议，还正式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进行委任统治。

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不再只是英国人的政策，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共同立场。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此非常愤慨，他们用暴力回应，这种反应模式后来频繁出现。1920年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暴乱中，6名犹太人被杀，一些人受伤。1921年雅法发生的暴乱迅速扩散，最后有40多名犹太人死亡，其中包括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

讽刺的是，这些暴乱导致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的产生。早在几十年前，犹太人就建立了自己的防卫组织，1907年成立的秘密安保组织巴尔-吉奥拉（Bar-Giora）是最早的防卫组织之一。和其他类似组织一样，巴尔-吉奥拉是一群犹太人组成的提供有偿安保服务的组织，他们曾为塞杰拉（Sejera，今天叫伊兰尼亚[Ilaniya]）提供安保，本-古里安刚到巴勒斯坦时就在这个定居点的农田里干活。两年后，也就是在1909年，巴尔-吉奥拉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的防卫组织哈绍莫（Hashomer，“守卫者”之意），哈绍莫的覆盖面更广，为犹太人和他们的村庄提供安全保障。这是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提供有组织的防御的首次尝试。

哈绍莫成员计划取代犹太农场的阿拉伯护卫人员，他们还雄心勃勃地计划将人员安排到乌克兰的哥萨克村庄，以取代那里的护卫人员，但这个计划落空了。[21]阿拉伯暴力袭击活动当时在不断蔓延。意识到英国人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后，伊休夫领导人在1921年创立了用于保护犹太农场和村庄的哈加纳（Haganah，“防御”之意），该组织的职责还包括预防和抵抗袭击活动。在最初成立的几年内，哈加纳组织松散，作用有限。

虽然伊休夫在不断提高防御能力，但在外交上却遇到重挫。1921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刚过去四年，将宣言写入决议的圣雷莫会议结束刚过去一年，被任命为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此前一直被当作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朋友）在没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盟友商量的情况下，重新绘制了中东地图。[22]他在本属于巴勒斯坦的约旦河东岸成立了

一个新的国家——外约旦（后来称为约旦）。[23]

面对《贝尔福宣言》和圣雷莫会议取得的成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认为委任统治地的版图就是未来犹太国的版图，但突然间四分之三的领土被生生拿走，犹太国的面积将远远小于他们先前的预期。他们当时不知道，未来以色列的领土还会继续缩小。

正当丘吉尔在分割委任统治地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为犹太移民的涌入和国际社会对犹太人建国的支持而对伊休夫发起了新一轮攻击。这让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措手不及，他们以前并没有充分考虑阿拉伯人的抵抗运动。阿哈德·哈姆对这一疏忽直言不讳："我们以前把阿拉伯人看作生活在沙漠里的原始人，是像驴一样愚蠢的民族，既看不到又无法理解身边的事情。但这个判断大错特错。"[24]

阿哈德·哈姆从不主张建国，他或许有理由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和平相处抱有希望。但对于那些全力寻求建国的人而言，和阿拉伯人关系的恶化是凶兆。对于两个民族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没有人比泽夫·雅博廷斯基表达得更为直接，1923年他写了《铁墙》和《铁墙之外》两本小册子，主张不能低估阿拉伯人。他们和其他民族一样，同自己生活的土地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写道：

> 我们当中的和平贩子试图让我们相信阿拉伯人很愚蠢，我们可以通过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来欺骗他们，他们还试图让我们以为阿拉伯人很腐败，只需要给一些文化和经济上的好处，他们就会放弃巴勒斯坦。我坚决认为这些关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文化上，他们落后我们五百年，没有我们所拥有的毅力和决心。但他们和我们一样善于分析人的心理，多个世纪的唇枪舌剑将他们的大脑锤炼得和我们一样敏锐。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目标有多么单纯，用甜言蜜语缓和紧张气氛，哄他们开心，但是他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就像我们知道他们不想要什么一样。同我们一样，他们也深爱着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就像阿兹特克人深爱古墨西哥、印第安人热爱在他们的大草原上驰骋一样。[25]

雅博廷斯基说，阿拉伯人绝不会主动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达成任何协议。如果想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犹太复国主义者必须用铁墙对抗阿拉伯人的暴力：

> 这并不是说不能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但他们绝不会主动达成协议。只要阿拉伯人认为有希望赶走我们，他们就不会放弃，任何甜言蜜语和物质诱惑都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只有当他们发现没有任何希望赶走我们，无法在铁墙上打开缺口时，他们才会在关键问题上妥协。只有到那时，他们才会抛弃他们喜欢走极端的领导人，才会抛弃这些领导人“永不放弃！”的口号。[26]

雅博廷斯基又说：“达成协议的唯一方法就是铁墙，我们要在巴勒斯坦拥有不会屈服于阿拉伯压力的强大力量。换句话说，为了在未来达成协议，现在我们要抛弃任何达成协议的想法。”[27]这席话几十年后成为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的指导精神。

很遗憾，历史证明雅博廷斯基有先见之明。没多久，新的暴力袭击爆发，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团被完全摧毁。

耶路撒冷圣殿山的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了几个月。1928年9月，犹太人按照犹太传统临时将西墙(5)划分为两块区域，以便男女教徒在赎罪日分开祷告。作为回应，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下令限制犹太人在西墙活动，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这种煽动行为后来反复出现。[28]

阿拉伯人当中开始流传犹太人对圣殿山（阿拉伯语直译为“高贵圣所”，犹太人称之为圣殿山）有阴谋的谣言，还传播了金顶清真寺被损坏的虚假图片，(6)穆斯林领导人称这些“损坏”是犹太人造成的。[29]1929年8月23日，一群阿拉伯青年朝希伯伦犹太经学院的学生扔石头。当天晚些时候，一位名叫什穆埃尔·罗森霍尔茨（Shmuel Rosenholtz）的犹太男青年独自一人前往犹太经学院，阿拉伯人冲进经学院将其杀害，在他之后还有几十人在这场暴乱中丧生。

第二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早上，挥舞着木棍、刀子和斧头的阿拉伯暴徒将希伯伦犹太居民区包围，阿拉伯妇女和儿童朝犹太人扔石头，男人们则冲进去洗劫犹太人家庭，摧毁犹太人财产。许多犹太人受到惊吓，躲进当地拉比家中，阿拉伯暴徒前来和拉比谈判，他们声称如果他能交出所有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本地的中东犹太人社团将被赦免。拉比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被当场杀害。希伯伦暴乱很快蔓延到其他地区，一共有133名犹太人死亡，其中67人死于希伯伦。[30]几百名犹太人在阿拉伯邻居的保护下逃过一劫，为了救他们，有的阿拉伯人承受了巨大的风险。[31]但最终，这个400年前由西班牙犹太难民建成的希伯伦犹太社

团被彻底摧毁，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犹太社团之一。[32]

基希涅夫惨案从欧洲来到了巴勒斯坦。

面对1929年的阿拉伯人暴乱和整个希伯伦犹太社团被屠杀的悲惨事实，伊休夫开始发展准军事能力。哈加纳一边购买外国军火，一边自主生产武器。哈加纳最终形成20个分支机构，有2.5万名男女志愿者。在较短时间内，哈加纳就从未经训练的军事组织发展成组织良好的地下武装力量。犹太军队开始形成。

当时，哈加纳奉行“克制”（*havlagah*）政策。哈加纳战士只负责保卫犹太居民区。他们尽一切可能避免袭击，在袭击活动出现前不采取任何行动。[33]

随着阿拉伯人袭击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暴力活动增多，“克制”政策越来越受争议。雅博廷斯基在《铁墙》中写道，犹太复国主义应该以暴制暴，伊休夫面临的情况似乎说明他的观点是对的。1931年，一群深受雅博廷斯基思想影响的战士从哈加纳中分裂出来，组建了自己的军事派别。面对阿拉伯人的袭击，他们不再坐以待毙，而是向敌人发起战争。这个组织刚开始叫作哈加纳B，后来改名为“国家军事组织”（Irgun Tzva'i Leumi），一般就叫伊尔贡。(7)刚开始，大部分伊尔贡成员是雅博廷斯基修正派运动和贝塔尔的成员；雅博廷斯基从被英国人驱逐出巴勒斯坦一直到他1940年去世，都是伊尔贡象征性的最高领袖。

伊尔贡对待使用武力的态度和哈加纳不同。《希望》是包括哈加纳在内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选定的国歌，歌词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战争，但贝塔尔的国歌则反映了雅博廷斯基及其在伊休夫与以色列政治中的追随者的观点和立场，强调在必要时通过战争来拯救犹太民族：

面对每一个阻挠，

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

仍能点燃一团烈火，

升腾起反抗的火焰，

因为沉默是尘土。

为了隐藏的荣耀，

奉献热血与精神，

去死，或者去占领

约德法(8)、马萨达和贝塔尔高地。

当伊休夫的犹太人逐渐学会保卫自己时，欧洲犹太人却变得越来越无助，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惨烈的一场战争即将在欧洲爆发，其残忍程度让基希涅夫和希伯伦事件都黯然失色。犹太民族即将进入犹太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时期。

(1) 贝塔尔（Betar）也是“约瑟夫·特伦佩尔多盟约”（Brit Yosef Trumpeldor）的首字母缩写。

(2) 尼里（Nili）是圣经经文“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Netzach Yisrael Lo Yeshaker）的首字母缩写。（《撒母耳记上》15：29）

(3) 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分支的家族成员，他并不是资助早期伊休夫移民的那位罗斯柴尔德。

(4) 罗德民后来将这些发现写入《应许之地巴勒斯坦》一书中，这本书非常畅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去世时桌上就摆着这本书，这很可能是罗斯福总统生前阅读的最后一本书。（Seth M. Siegel, *Let There Be Water: Israel's Solution for a Water-Starved World*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5], p.30.）

(5) 即基督教传统中所说的“哭墙”。——校注

(6) 巴以冲突出现后，经常会有犹太人占领圣殿山或破坏清真寺的传言，从一开始这些传言就被证明是虚构的。1929年，正是在这类传言的煽动下，阿拉伯人清洗了希伯伦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犹太社团，这一事件成为巴以冲突的起点。2000年，当时担任议员的阿里埃勒·沙龙访问圣殿山，他提前公布了访问计划，没有违法，也没有进入清真寺，但亚西尔·阿拉法特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因提法达，它从2002年持续到2004年，让几千人丧生。2015年，有谣言说以色列计划改变圣殿山现状，对去那里祷告的人进行限定，这一煽动行为再次引发阿拉伯人的袭击潮，阿拉伯人用匕首捅、用枪射、开车压犹太人。

(7) 伊尔贡（Irgun）也称为“埃策尔”（Etzel）——这是希伯来语“国家军事组织”（Irgun Tzva'i Leumi）的首字母缩写。

(8) 约德法（Yodfat），古名为Jodapata，公元1世纪犹太人起义反抗罗马时的北方战场。——校注

第六章

无处可去，即使能离开

我们将和英国一起同希特勒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

——大卫·本 - 古里安，1939年

1925年，希特勒出版了《我的奋斗》。他在书中说，犹太人试图控制整个世界，一旦实现，他们将毁灭人类。“如果……犹太人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他们的皇冠便将成为为人类送葬的花圈，地球又将像千万年前一样变得空无一人，运行于太空之中。”

希特勒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犹太人的阴谋：

> 犹太复国主义试图让全世界认为，犹太人兴起的民族意识只是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他们只是用新办法欺骗头脑简单的非犹太人。他们丝毫不打算在巴勒斯坦建国和生活，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诈骗组织的中心。[1]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3月举行了选举，纳粹党仍然是德国国会的第一大党。鉴于希特勒在10年前出版了《我的奋斗》，德国人都明白他们将这个人选上台意味着什么。大卫·本 - 古里安预言道：“国家仇恨、压迫、独裁和对自由的拒绝将得到加强，犹太人将成为第一批受害者。”[2]

大卫·本 - 古里安以前叫大卫·格鲁恩，1886年出生于小城普仑斯克（Plonsk，今天位于波兰，但当时属于俄国）。和许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他成长于一个接受了世俗教育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家庭。他小时候父亲经常在家里举行“锡安热爱者”会议。亚伯拉罕·玛普对锡安充满向往之情的圣经题材的小说《锡安之恋》，也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他在圣经中找到了建立犹太国的道德基础。在他们的影响下，年轻的格鲁恩成为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17岁时，格鲁恩得知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居然讨论乌

干达方案，他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考虑放弃在先祖之地建国感到无比愤慨。意识到建立犹太国更需要行动，而不是语言，年轻的格鲁恩决定移民巴勒斯坦。

1906年9月7日，格鲁恩终于来到赫茨尔在《新故土》中描写的雅法港，接着他来到佩塔提克瓦的橘子园工作。他深信建立犹太国需要从体力劳动做起（受A.D.戈登的影响），后来又在加利利地区几个农场工作过。1910年，他迁到耶路撒冷，成为锡安工人党官方刊物《团结》（*Achdut*）的编委会成员。他在这份刊物上用新取的希伯来化的姓氏“本 - 古里安”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当时奥斯曼帝国还控制着巴勒斯坦，本 - 古里安认为如果想当伊休夫领导人，需要拥有土耳其教育背景。1911年，他离开巴勒斯坦，去土耳其学习法律（没有修完学位），后来又到美国传播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参加了在那举行的锡安工人党会议。在纽约生活期间，他遇见了波拉·曼维斯（Paula Munweis），1917年两人结婚，后来生下一儿两女。

《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本 - 古里安转而支持英国人，他加入了英军的犹太军团，和英国人一起在巴勒斯坦战役中对土耳其人作战。虽然一直保持和锡安工人党的合作关系，但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劳工团结党（*Achdut Ha'avoda*），该党大部分成员为锡安工人党分裂出来的思想左倾的成员。1921年，本 - 古里安成为犹太工人总工会（伊休夫的工会组织）秘书。他领导该组织13年，稳固地确立了他在伊休夫高层领导人中的地位。当他在1933年预言欧洲即将发生灾难时，人们已普遍认为他代表着伊休夫最权威的声音。

欧洲大难临头，这在伊休夫中引发复杂的情绪。这应验了当初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对未来的担忧，他们对历史准确的判断一方面当然让他们更加认可自己当初离开欧洲的选择，但另一方面，这些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意识到自己必须不遗余力地帮助欧洲犹太人。

有的人认为，经济抵制手段能够改变希特勒政权越来越具反犹主义倾向的政策，虽然当时还没有开始屠杀犹太人。雅博廷斯基设想，如果能够形成给德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犹太统一战线，德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利，甚至进一步推进犹太人解放。[3]

然而，伊休夫中许多人反对抵制德国的计划，认为同纳粹德国直接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伊休夫担心抵制会激怒德国人，让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更困难。他们还认为谈判能促使德国政府让更多的德国犹太

人移民伊休夫。

关于抵制政策的争论引发了伊休夫历史上最离奇的事件之一，直到今天还很有神秘色彩。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当时是犹太代办处政治部门负责人，实际上还履行该组织外长的职责。为了逃离集体迫害，1924年他携家人从乌克兰来到特拉维夫，在来的路上他在德国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儿拿到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

在德国时，他和一个名为玛格达·里切尔（Magda Ritschel）的女人发生婚外情，这个女人后来的丈夫就是纳粹政府臭名昭著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1933年6月，已经成为伊休夫高层领导人的阿罗佐罗夫回到德国同德国人谈判，显然，他是通过以前的情妇才和重要官员建立起联系的。[4]他在德国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哈瓦拉协议》（*Ha'avarah*，《转移协议》），这项协议试图保证德国犹太人不用上交财产就能顺利离开德国。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可以将自己的资金放在一个和巴勒斯坦银行有金融业务关系的基金会，这些银行用这些资金购买德国商品，海运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商人购买这些商品，再把货款交还给从德国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5]这似乎对每个人都有利，德国人摆脱了他们厌恶的犹太人，犹太人可以在离开德国时保留住部分资产，巴勒斯坦能够进口到迫切需要的德国商品。大约两万名德国人加入了这一计划，三千万美元的资金从德国转移到伊休夫。

然而，随着德国不断加大对犹太人的打击力度，该协议饱受争议，许多人认为这是阿罗佐罗夫和魔鬼达成的协议。虽然本－古里安拥护这一协议，认为它不但能够促进伊休夫的经济，还能增加移民的数量。但其他人主张抵制德国，而《哈瓦拉协议》严重影响到抵制运动的效果。雅博廷斯基对该协议大加批判，认为这是破坏德国经济孤立的鲁莽之举。修正派运动的报纸《人民阵线》（*HazitHa'am*）在1933年6月16日的专栏上谴责了阿罗佐罗夫的协议，威胁说犹太民族“将明白应当如何回应这一令人作呕的法案”，这篇文章还指名道姓提到了阿罗佐罗夫。[6]

就在当天晚上，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和妻子西玛（Sima）来到特拉维夫海滩散步，黑暗中突然出现两名男子，一人拿着手电筒照阿罗佐罗夫的脸，另一人对他开枪射击。阿罗佐罗夫立即被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后死在手术台上。

雅博廷斯基的修正派迅即被指责为幕后主谋。两天后，修正派组织贝塔尔成员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被捕，根据西玛的指认，他就是那天持手电筒的人。后来另外两人也被抓获，一人是共犯，一人是开枪者。左

翼人士谴责雅博廷斯基不但为这些人“提供”了枪支，还是这一行动的策划者。雅博廷斯基则极力为被捕的三人辩护，刚开始斯塔夫斯基被定罪并判处死刑，但因为巴勒斯坦英国上诉法院的改判，他于1934年7月获释。

没有任何一个凶手被判刑，阿罗佐罗夫刺杀案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这种犹太人因为政见不同而自相残杀的事件在犹太国还会发生。

正如一些伊休夫成员所料，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大量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时阿拉伯人的暴力运动已经平息，伊休夫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完善，巴勒斯坦的生活也慢慢变得没有以前那么艰难。由于美国限制移民入境（苏联也是如此，但当时几乎没有犹太人愿意去那里），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成为犹太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当时的犹太代办处一方面资金匮乏，另一方面迫于委任统治政府施加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限制进入巴勒斯坦的移民数量。移民需要“证明”才能成行，有时人们会不择手段获取“证明”，有人指责代办处只接收有钱人和有可能支持本－古里安政治观点的人。移民成为一个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第四次阿利亚（1924—1929）主要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波兰移民，而现在，来到巴勒斯坦的第五次阿利亚（1932—1936）的移民被认为是家境富裕、接受过良好教育但急于逃离欧洲的德国人。可实际上，和前几次阿利亚一样，第五次阿利亚中的大多数移民还是来自中东欧，但不同于之前，这次移民潮的移民人数大幅增长。1934年，人们已经明白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只会越来越严厉，这一年有4.2万人来到以色列地，刷新了伊休夫单年接收移民的最高纪录，不断增长的人口为以色列的建国奠定了基础。

当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写《屠杀之城》时，他和读者们都没有想到欧洲将会陷入如此黑暗的时代。1921年比亚利克最终离开俄国来到德国，1924年移民巴勒斯坦。来到巴勒斯坦的比亚利克投入到公共事务中，发表作品的数量远不如以前，但他仍然代表着那一代人的声音。1934年夏天，比亚利克去维也纳做前列腺手术，手术失败，他于当年7月4日去世。

特拉维夫整座城市都在为这位伊休夫的桂冠诗人哀悼，到处张贴有通知葬礼时间的巨大海报。中东的夏天炎热难耐，但就像1922年埃利泽·

本－耶胡达的葬礼一样，数千人走上街道游行，其中既有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既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有东方犹太人，既有特拉维夫人，也有巴勒斯坦其他地方赶来的人。几乎每栋楼上都挂着缠有黑色丝带的蓝白旗。比亚利克的棺材在当地公墓下葬，他右边是阿哈德·哈姆的墓地，左边是哈伊姆·阿罗佐罗夫的墓地。政治家（阿罗佐罗夫）、诗人（比亚利克）和哲学家（阿哈德·哈姆）被埋葬在一起，这既体现了犹太复国主义深厚的文化渊源，也体现了犹太社会来自不同领域的力量在关键时刻汇聚到一起形成合力的特点。

1935年，纳粹政府通过《纽伦堡法案》，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规定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不能通婚或发生婚外性关系。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人数再创新高，1935年移民人数达到6.1万。1933—1936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从234967人增长到384078人，犹太人在当地的人口比例从五分之一上升到将近三分之一。

文化和知识界也呈现爆发式发展，伊休夫发生着变化。很快，这种变化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宗教和世俗的融合、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的融合，以及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融合。

一种犹太民间文化开始产生。在20世纪20年代，特拉维夫在普珥节举行以斯帖女王选美大赛。[7]为了融洽民族内部关系，大赛有意让参赛选手中既有东方犹太人，又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不仅是一场选美大赛，官员们还想借此选拔一位伊休夫的非官方代言人。在伊休夫宗教势力的施压下，大赛在1929年停办了，但不可否认，在欧洲的影响下伊休夫正在变化；巴勒斯坦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再也不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阿利亚移民所看到的那片荒芜之地。

1932年，伊休夫开始举办每年为期9天的马卡比运动会，来自全世界的犹太男女在体操、篮球、田径、游泳、网球等项目上同场竞技，这项赛事也包含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诺尔道“肌肉型犹太人”观念和阿哈德·哈姆将巴勒斯坦建成犹太人文化中心的理想都促成了这项赛事的诞生。此外，伊休夫还希望让犹太人来巴勒斯坦参加比赛能够带来更多的移民。

包括舞台舞蹈和民间舞蹈在内的舞蹈艺术成为伊休夫生活的支柱。舞台舞蹈家可以参加全民舞蹈比赛，民间舞蹈家可以在1944年开始举办的达利亚舞蹈节上展示风采。[8]最开始这只是伊休夫内部的比赛，但这项赛事几十年来对犹太复国主义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色列民间舞

蹈”直到今天还是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核心特色。“20世纪40年代，以色列民间舞蹈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新犹太人的重要标志。”民间舞蹈是“以色列身份的重要符号，也是以色列文化向全世界最重要、最成功的输出之一”[9]。

伊休夫中的思想生活和经济生活也经历了深刻改变。德国移民的到来大幅增加了希伯来大学学生的数量。银行业和金融业也得到发展。德国犹太人和中产阶级波兰犹太人带来大量财产，巴勒斯坦很快开始出现百货商店和高档咖啡馆。《哈瓦拉协议》（阿罗佐罗夫显然因此而遇刺）也让大量资金流入伊休夫。很多阿拉伯人愿意将地产变现，犹太人用这些钱从当地阿拉伯人手上购买了更多土地。

然而，对伊休夫而言的巨大进步却让阿拉伯人感到深刻的混乱。随着越来越多犹太移民的到来，多数当地居民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变。阿拉伯人的挫折感再一次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1936年4月15日，阿拉伯人在图尔卡姆（Tulkarm，在今天的约旦河西岸，内塔尼亚[Netanya]以东）附近对3名犹太司机开枪，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5天后抢救无效死亡，只有一人活了下来。两天后，一群来自极端团伙的犹太人在佩塔提克瓦开枪杀害两名生活在棚屋的阿拉伯人。当天，在上述那名犹太受害者葬礼举办的同时，犹太人举行了反对阿拉伯人和英国人的抗议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一名阿拉伯人和一名保护他的警官遭殴打，一些犹太人还袭击了给人刷皮鞋的阿拉伯男孩和阿拉伯小商贩。阿拉伯人展开了反击，4月19日，一些失业农民和流动工人冲入雅法城，杀害了9名犹太人，另有6人受伤。雅法很快陷入混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相互追杀。几千名犹太人逃到特拉维夫。

1936—1939年的阿拉伯起义爆发。

阿拉伯社团再次采用暴力手段限制犹太移民和伊休夫的发展。在起义过程中，暴力活动接连不断，阿拉伯人烧掉了犹太人开发的农田和栽种的果园，摧毁了犹太人的商店，还袭击了不少私人住宅。为了破坏伊休夫的经济，阿拉伯社团举行了罢工，但适得其反，犹太商店和工厂趁机填补了真空，阿拉伯人的罢工反而无意中促进了伊休夫犹太经济的发展。

虽然经济可能有所发展，但伊休夫对于阿拉伯人持续的暴力运动深感担忧。以前认为可以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的犹太人现在疑虑丛生。为了表明犹太人不会放弃建国的梦想，伊休夫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更多的村

庄。

阿拉伯人的起义没有打击到犹太人的士气，阿拉伯人转而利用这一机会向英国人提出要求。双方在耶路撒冷谈判，阿拉伯人要求英国政府彻底禁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禁止土地买卖，呼吁建立阿拉伯人占多数的政府。即使在谈判期间，暴力活动还在继续。

阿拉伯起义也针对英国人。一开始，英国人对阿拉伯人的暴力活动无情镇压。他们追捕穆夫提，将雅法部分地区夷为平地。但经过谈判，他们改变了策略，为了避免暴力活动继续，让这块动荡的地区恢复平静，英国人开始试图安抚阿拉伯人。1936年中期，他们建议将下半年犹太移民的数量限制为4500人。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有6.1万名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英国人提出每年犹太移民的数量限制在9000人，这相当于减少了85%的犹太移民。但令人惊讶的是，阿拉伯人竟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坚决要求没有任何移民进入。

暴力活动仍在继续。英国政府希望暴力活动能够自我平息，不愿意损害英国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故而采取了克制政策。但这一政策完全失败了。起义爆发6个月后，200名阿拉伯人、80名犹太人和28名英国人遇难，英国人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

首先，英国向巴勒斯坦派出了更多军队，向犹太人提供武器用于自卫，实施宵禁，安排夜间巡逻。他们知道单纯依靠这些短期措施还不够，为了探索长期解决方案，英国政府成立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威廉·罗伯特·韦尔斯利·皮尔勋爵负责，所以也称为皮尔委员会），调查巴勒斯坦局势，提出解决方案。

1936年11月，皮尔委员会到达巴勒斯坦，他们调查了这一区域，广泛听取了犹太和阿拉伯代表的意见。1937年7月7日，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404页的调查报告，提出了解决计划，其中还包括详细地图（《贝尔福宣言》不包括地图）。皮尔委员会建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存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双方声称对同一块土地拥有权利，两个民族共同治理这片土地的可能性很小，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分治（参见地图4）。

皮尔是第一个提出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的人。报告建议，犹太人获得从北部罗什哈尼卡拉（Rosh Hanikrah）到南部贝尔图维亚（Be'er Tuvia）的滨海平原、加利利地区、耶斯列谷地和约旦河谷地，除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仍然由委任统治政府控制，剩下区域都归阿拉伯人。这一方案让巴勒斯坦成立的阿拉伯国和外约旦连在一起。委员会还呼吁这

两个地区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人口转移，从而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社团分离。许多年后，人口转移仍然是该地区极具争议的问题。

皮尔建议分给犹太国的土地远比犹太复国主义者预计的少，虽然贝尔福没有定义“巴勒斯坦”，但皮尔委员会承认：“要建立的犹太民族家园的土地在《贝尔福宣言》发表时被理解为历史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10]这片地区包括今天的加沙、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整个今天的约旦。皮尔建议只将其中很少一部分土地分给犹太人，只占全部领土的20%，而70%—75%的土地被分给阿拉伯人。[11]

包括雅博廷斯基及其追随者在内的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为他们眼中的英国人对《贝尔福宣言》的背弃愤怒异常。他们也感到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在丘吉尔于1921年独立外约旦后，他们又要放弃更多的土地。

犹太人再次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乌里·茨维·格林伯格是当时著名诗人之一，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哈西德派家庭，1923年，27岁的他在波兰集体迫害中逃过一劫，来到巴勒斯坦。1929年希伯伦暴乱后，他的政治立场变得强硬起来，最终加入雅博廷斯基的修正派运动。他对于皮尔瓜分巴勒斯坦的计划提出强烈反对。

1936年，正当皮尔委员会在撰写这份报告时，他创作了《一个真理，而不是两个》一诗。模仿拉比文献中比比皆是的“我们的拉比教导”这一套语，他写道：

> 你们的拉比教导，再过几代人，弥赛亚将到来，
> 不用炮火，不用流血，犹地亚将重新崛起……
> 而我说：如果你们这一代人裹足不前，
> 不用自己的双手和拳头去闯出结果……
> 那么不管多少代，弥赛亚都不会到来，
> 犹地亚都不会崛起。[12]

格林伯格在这首诗后面提醒人们，“血债血还”是非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共同原则。为了让犹地亚崛起，犹太人必须投入战斗。这成了部分以色列领导人所支持的精神立场，甚至几十年后仍是如此。

虽然许多人同意雅博廷斯基的观点，但实际上，犹太人中反对皮尔计划的人并不多。魏茨曼和本 - 古里安都主张犹太人支持皮尔提出的分治计划。本 - 古里安说：“赫茨尔如果在世，只要将文件中一小部分巴勒

斯坦给犹太人，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接受，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并全力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犹太国。当然，他也不会承诺以后的犹太国仅仅局限于这一地区。”[13]本－古里安的话似乎在提醒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考虑到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仅过去40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样，魏茨曼也指出，虽然皮尔委员会在报告中用于犹太人建国的土地远比他们预想的小，但是这仍然意味着赫茨尔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他言简意赅地说，犹太人“不接受才傻，就算只给他们桌布那么大一块地”[14]。

1937年8月，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二十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皮尔的分治建议。与会者并不关心报告的具体细节，他们关心的是即将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事在几年前还无法想象。

犹太社团接受了皮尔的建议，但阿拉伯人断然拒绝。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显然支持这一计划，因为它能够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加入他的王国，获得更多耕地，但由于阿拉伯民众极力反对，阿卜杜拉也无能为力。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后来成为纳粹分子的支持者）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他的立场决定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无法通过这一计划。

为了反对皮尔，阿拉伯人又掀起了一轮针对犹太人和英国人的暴力潮，这几乎已经成为他们固定的行为模式。这一次的受害者包括英国官员刘易斯·安德鲁斯，他当时负责安排皮尔委员会在巴勒斯坦的所有行程，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在9月26日前往教堂的路上被枪杀。

到1937年10月中旬，暴力活动比一年前更为猛烈。居民区、公交车、犹太平民、英国巡逻队都成为袭击对象。利达（Lydda）的新机场被焚烧，石油管道遭损坏。大部分公共交通中断了，由于道路两旁埋有地雷和炸弹，英国禁止人们夜间出行。英国人还增派驻军，对暴力行动的参与者处以死刑，后来他们经常使用死刑这一手段。但这些措施都未收到明显效果。

巴勒斯坦日益陷入战争。

同一时期，欧洲的局势进一步恶化。1938年2月，本－古里安说：“德国正在吞并奥地利，明天就会轮到捷克斯洛伐克。”[15]他的预测准得离奇。几个月后的1938年11月，欧洲大国一致同意德国将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领土吞并（德国人称之为苏台德区）。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

解释说，他默许德国入侵是为了维持和平；但本-古里安明白，绥靖政策只会助长德国的嚣张气焰。他在写给巴勒斯坦自卫组织负责人埃利亚胡·戈洛姆（Eliyahu Golomb）的信中写道："我认为现在是欧洲最黑暗的时刻，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和平解决'后，谁能保证下个受害者不是我们？"[16]

正如本-古里安所料，西方更倾向于对阿拉伯领导人妥协，而不是保护犹太人。12月，伊休夫提交给英国一份提议，建议拯救德国的犹太儿童，将他们带到巴勒斯坦。同时，穆夫提要求委任统治政府释放关押在塞舌尔群岛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成员，理由是这些人可以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代表团成员访问伦敦。阿拉伯人要求释放的人并无生命危险，但英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却拒绝了伊休夫拯救一万名犹太儿童的请求。[17]

纳粹政府长期的反犹宣传和歧视性法令在1938年11月9日和10日显示出后果，当一位精神失常的犹太人在巴黎杀害一名德国官员后，出于仇恨，德国和奥地利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暴力活动。两国的许多犹太人家庭、犹太会堂和商店被毁。267个犹太会堂被烧，7500家犹太人开的商店沦为废墟。根据上级指示，只有当非犹太人的房屋受到火灾威胁才需要出动消防人员。纳粹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肆无忌惮地冲到犹太人家中袭击平民，许多妇女被强奸，有的妇女不惜选择自杀。2.6万名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很多人不久后在那死于折磨。这场袭击活动史称"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它让犹太人再次体验到几十年前的集体迫害。这次事件可以视作纳粹大屠杀（Holocaust）的起点。

一个月后，也就是12月，伊休夫讨论了这一事件，第一次使用了希伯来语"朔阿"（*shoah*）一词。[18](1)这个词来自圣经的《西番雅书》，先知预言"那日，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19]。使用这个很少用到的圣经词汇，说明他们和雅博廷斯基与赫茨尔一样，预料到这将是一次空前的灾难，他们感觉到犹太历史即将永远被改变。

5个月后，1939年5月，英国发表了一份白皮书（政府官方文件的泛称），接受了阿拉伯人在1936年起义后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当时的欧洲正在成为几百万犹太人的坟墓，但英国竟然在这个时候规定，未来5年，到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数量不能超过7.5万人，超过这一数字必须经过阿拉伯人的同意。这份白皮书还规定许多地方的土地不能卖给犹太人，并承诺10年后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独立国家。

令人惊讶的是，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否决了英国人的这份白皮书，称10年的过渡期对犹太人有利。对于犹太社团而言，限制移民意味着欧洲犹太人无处逃离，巴勒斯坦也无法拥有建国所需要的人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会堂和公众集会上抗议这一政策。一些犹太军事组织在泽夫·雅博廷斯基的鼓舞下，不顾哈加纳和英国人的合作，炸毁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部分政府建筑，还袭击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英国基础设施，包括电力设施与广播和电话的通信线路。他们反对哈加纳的克制政策，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他们还创立了地下报纸和广播。这时，伊休夫也意识到需要改变策略，开始支持非法移民，帮助更多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伊休夫已经不再对英国人在《贝尔福宣言》中许下的承诺抱任何希望。22年前，贝尔福勋爵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但是没有足够的移民，这个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当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受到希特勒威胁时，英国人对纳粹政府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关心犹太人的命运。

第二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939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哈伊姆·魏茨曼在闭幕式发言中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大会结束。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我们能够幸免于难，继续这项事业，谁知道呢——浓密的黑暗之后兴许会出现一道新光，将我们照亮。”[20]听众闻之落泪。[21]

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希望，而1939年大会后却是一片死寂。一周后的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多数参加第二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欧洲代表没有活到大战结束。

英国和德国开战让伊休夫陷入窘境。英国限制移民进入巴勒斯坦，是伊休夫的敌人，但英国又在同纳粹分子作战。伊休夫何去何从呢？本-古里安的名言成为伊休夫的官方立场：“我们将和英国一起同希特勒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22]

三艘难民船的经历清晰地体现了当时全世界犹太人的处境。第一艘是“圣路易斯”号客轮。1939年5月，载有937名乘客的“圣路易斯”号客轮从汉堡出发前往古巴，乘客大多数是“碎玻璃之夜”事件后购买了合法的古巴签证逃离德国的犹太人。轮船到达目的地后，古巴总统费德里科·拉雷多·布鲁（Federico Laredo Brú）拒绝他们入境，船长德国人古斯塔夫·

施罗德（Gustav Shroder）并不是犹太人，但他决心为每一位乘客找到自己的家园，开展了为期数周的谈判。然而，美国和加拿大都拒绝提供庇护，施罗德不得不对其他欧洲国家开展游说，最终，荷兰同意接收181人，法国同意接收224人，英国同意接收228人，比利时同意接收214人，剩下的人施罗德也无能为力。没想到离开欧洲一个多月后，这艘客轮又启程驶回欧洲，6月中旬靠岸。随着战局的变化，这些接收国家大多成为纳粹势力范围，这些乘客离美国海岸曾只有90英里的距离，但现在又回到了纳粹的魔爪下。到战争结束，乘客中有254人成为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刚好超过总人数四分之一。[23]

第二艘船的目的地不是古巴，而是巴勒斯坦。1940年11月，载有1730名德国难民的"大西洋"号客轮从罗马尼亚驶抵海法湾。委任统治政府不允许他们进入巴勒斯坦，要求另一艘"帕特利亚"（*Patria*）号客轮将他们运送到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犹太军事抵抗运动成员为了阻止轮船起航，在"帕特利亚"号客轮上安放炸药，但第二天早上第一批非法移民被带上"帕特利亚"号后，炸弹威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直接将船炸沉，超过250人被淹死。英国人最后将剩下的难民送到海法附近阿特利特的拘留营。

第三艘船是"斯特鲁马"（*Struma*）号难民船，这艘船1941年12月16日载着769名犹太难民从罗马尼亚出发前往巴勒斯坦，本来几天时间即可到达，但由于引擎故障，船只被迫停靠伊斯坦布尔港口。土耳其政府拒绝临时收容难民，他们不得不在船上生活了两个月，这艘船上只有四个洗手池、一个净水龙头和八个没有卫生纸的厕所位。船上也没有配备救生圈。[24]犹太代办处请求英国政府允许这些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临时入境后再将他们带到毛里求斯，但遭到英国人拒绝。1942年2月24日，土耳其人要求"斯特鲁马"号离开港口，他们将船拖到黑海。没有引擎，这艘船只能漂在黑海上。当时一艘苏联潜艇接到密令，击沉所有航行在黑海上的敌方和中立国船只（以防原材料被运到纳粹德国），遂使用鱼雷将"斯特鲁马"号击沉。[25]船上的男女老少几乎全部遇难，只有一人幸存。

"圣路易斯"号、"大西洋"号和"斯特鲁马"号三艘船的遭遇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一点：犹太人无处逃离，赫茨尔梦想的和贝尔福承诺的犹太国对犹太人而言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建立犹太国眼下事关生死。

2.7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加入英军。但与此同时，伊休夫坚决抵制那份白皮书中限制移民的政策。为了帮助欧洲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哈加

纳成立了专门帮助非法移民的“移民组织B”（*Mossad le-Aliyah Bet*）。该组织购买船只，雇佣船员，集合潜在移民，将他们带到这个有待建成的国家后，还安排人员协助他们躲藏。这一行动总体上成功了，但也有失败的一面，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指出：“1934—1938年，大约4万名犹太人非法进入巴勒斯坦，截至1939年9月又有9000人进入。但在接下来6年中，也就是在犹太人最需要庇护的时候，只有不足1.6万人移民。”[26]

许多非法移民（希伯来语中叫作“马阿皮里姆”(2)）虽然到达巴勒斯坦，但是很快被英国人抓住，被送到拘留营。最大的拘留营位于阿特利特，恰恰是当年代表英国的尼里间谍组织活动的地方。

为了阻止非法移民，英国一方面对非法船只的驶离国进行外交施压。另一方面，作为惩罚，他们大幅削减移民指标，给出的理由很荒唐，声称轴心国间谍有可能掺入犹太难民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共持续了39个月，在最初19个月中，英国人没有批准一名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

但这些手段无法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英国人于是开始诉诸武力，海岸警卫队对非法船只开火，将船上的难民送到拘留营。拘留营起初设在毛里求斯，后来设在离巴勒斯坦很近的塞浦路斯（只有不到300英里距离）。英国人有意让拘留营的生活非常艰苦，最初建立这些拘留营，就是想“让东欧的潜在犹太移民引以为戒”[27]。英国人的拘留营和德国人的集中营区别明显，但两者都把犹太人关在铁丝网后的营地，这是悲剧性的历史巧合。

伊休夫全力帮助同盟国，部分阿拉伯人则开始效忠于轴心国，认为英国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帮凶，是英国挫败了1936—1939年的阿拉伯起义。1936年被英国赶出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于1941年逃到德国，帮助纳粹分子在中东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得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宣布将训练犹太军团并送往前线的计划后，穆夫提写信给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建议他在德国建立一支伊斯兰军队。

英国人并没有因为穆夫提的提议而放弃计划，而是积极训练犹太士兵。1943年，由伊休夫男青年组成的犹太军团正式并入英军，前往北非同意大利军队作战。在大战期间，一共有将近3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在英军中服役，日后哈加纳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许多重要军官在这一时期接

受了英国的训练。

虽然实现了军事合作，但英国许多政策在犹太人看来仍然非常武断，不考虑他们的感受。比如英国禁止犹太人在西墙吹羊角号（shofar），禁止犹太人将《托拉》卷轴带到这个两千年来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3)

为了坚持原则，维护民族尊严，有的犹太人勇敢地和这些政策作对。1930年神圣的赎罪日上，摩西·西格尔（Moshe Segal，伊尔贡的创始人之一）就不顾英国人的禁令，在西墙前吹响了羊角号。当时正是日落时分，根据犹太传统，日落时赎罪日的禁食结束。虽然他因这一举动被捕入狱，但犹太人的抵抗行为没有停息。到1947年前，每年的赎罪日上都有犹太男子把羊角号带到西墙，不顾英国人的警告和巡逻队伍的监视，吹响羊角号。这些人有的成功逃跑，但大多数人被逮捕。1967年6月，以色列赶走约旦人，占领耶路撒冷老城后，犹太人才第一次能够安心地站在他们的圣地吹羊角号，再也不用担心被骚扰或监禁。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纳粹分子开始有计划地清洗欧洲犹太人。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将犹太男女老少集中起来射杀，短短几小时就能灭绝整个犹太社区的居民。几个月内，几十万犹太人被屠杀。

同年，哈加纳建立突击部队帕尔马赫。(4)一开始，帕尔马赫是一支准备抵抗德国入侵巴勒斯坦的精锐部队，吸收了伊休夫最优秀的男女，1942—1943年还得到过英国的专门训练。成立之初，帕尔马赫只有100人。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时，这支精锐部队已经有2100名训练有素的战士，另外还有1000人也完成了训练，随时可以被召回这支部队。[28]这些人将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中坚力量。

1942年1月，纳粹党高级官员在万湖（Wannsee）开会，大会通过了纳粹领导人在欧洲新的行动方案：德国人将把犹太人集中到波兰的灭绝营，在那里用毒气杀死他们再烧掉。截至1942年，已有100万俄国犹太人和数十万波兰犹太人被屠杀，接下来的4年，还有500万人将被屠杀。大战结束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遇害。波兰曾是全世界犹太人的中心，600年来一直拥有繁荣的犹太社团，大战结束后，90%的波兰犹太人被谋杀。在这方面，希特勒赢得了战争。

希特勒的军事力量早已不再局限于欧洲。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1942年带兵打到埃及的阿拉曼（El Alamein），伊休夫相信他们接下来就会进攻巴勒斯坦。面对德国人可能发动的入侵，伊休夫领导人计划占

领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要塞（他们认为一旦纳粹入侵，英国人会放弃委任统治），炸毁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进行最后的抵抗。

纳粹的暴行和伊休夫的恐惧改变了伊休夫对欧洲犹太人的态度。几年前，1938年12月（“碎玻璃之夜”事件后一个月）本－古里安曾说：“如果存在两种拯救方案，一是把所有的德国（犹太）儿童转移到英国，还有一个是将其中一半人转移到巴勒斯坦，我会选择后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计算这些儿童的数量，更要计算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命运。”[29]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似乎是第一位的，远比拯救欧洲犹太人来得紧迫。

现在，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连本－古里安这样死心塌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开始批评伊休夫对待灾难自以为是的态度，让人们警惕“伊休夫主义”（Yishuvism）的不良影响，他造出这个词来形容伊休夫只考虑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狭隘心态。[30]他明白，伊休夫和欧洲犹太人同气相连，巴勒斯坦犹太人不应该有任何优越感。他还说：“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将敲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丧钟。”[31]但伊休夫这时已做不了什么了。

1942年5月6日，英国战时内阁正式宣布“将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面对这一局势，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在纽约的比尔特莫（Biltmore）酒店召开犹太复国主义特别会议，会上全世界犹太人决心不管有没有英国人的支持都要建立犹太国。参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再相信英国，犹太代办处应该取代委任统治政府成为巴勒斯坦的执行机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新的政治纲领就是结束所有针对移民的限制，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Jewish Commonwealth）。

发生在欧洲的恐怖场景让犹太人变得空前团结，半个世纪的辩论都没能做到这一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官方政策，其目标就是创建一个犹太国。[32]

(1) “朔阿”（*shoah*）是“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对应用语，字面意思是“毁灭、消灭”。——校注

(2) “马阿皮里姆”（*ma'apilim*）一词来自圣经。在《民数记》中，摩西劝告以色列人不要进入这片土地，“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力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前面”。（《民数记》14：42—43）但以色列人急于回到故土，没有听从摩西的话：“他们却擅敢上山顶去。”（《民数记》14：44）此词来自原文的“擅敢上山顶”（*va-ya'apilu*），将圣经术语用于无畏的非法移民，就强调了这些人在返回故土，因而是在延续古老而神圣的故事。

(3) 现在的西墙是被罗马人摧毁的耶路撒冷第二圣殿残留下来的一段外墙。两千年

来，这面墙是犹太人心中的圣地，他们经常来这祷告。

(4) 帕尔马赫（Palmach）是希伯来语“突击队”（*Pelugot Machatze*）的首字母缩写。

第七章

伊休夫抵抗英国统治，阿拉伯人反对分治决议

在革命战争中，双方都使用武力……自由战士必须武装自己，否则将在一夜之间被击溃。

——梅纳赫姆·贝京《反抗》[1]

1942年11月22日，犹太代办处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一次专门讨论欧洲犹太人问题的会议。次日，大会发表了一份官方宣言，声称纳粹为了达到灭绝犹太民族的目的，正在有计划地谋杀犹太人。

伊休夫内一些年轻人立刻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拯救欧洲犹太人。参会人中有一位耶希埃尔·卡迪沙伊，他是正在英军服役的伊休夫犹太战士，刚从位于埃及伊斯梅利亚（Ismailia）的军事基地回来休几天假。

据卡迪沙伊后来回忆，[2]会议期间突然走进来一位穿着短裤、戴着眼镜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身材矮小精壮，安静地坐在一旁。在讨论过程中，这位迟到者站起来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如果想拯救波兰犹太人，只有一个办法。只要欧洲犹太人知道无处可去，他们就没有动力逃离波兰。他还指出，希特勒的势力还没有危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还有机会得救。

不知道看什么书，关注公众号：三秋君
备用公众号：三秋菌　　网址：sanqiu.cc


微信搜一搜

三秋君
获取更多精品书籍，漫画，杂志

这位年轻人接着说，要想解救这些欧洲犹太人，英国必须让巴勒斯

坦向犹太移民开放，而要想让英国人解除对海岸线的封锁，犹太人必须大规模使用武力。如果想拯救欧洲犹太人，伊休夫就得向巴勒斯坦的英国人发起进攻。说完这席话，他坐了下来。

这次会议并没有达成任何决议，但卡迪沙伊很欣赏这位年轻人的勇气。离场时他问一位朋友，刚才发言的人是谁，朋友告诉他："他是波兰贝塔尔组织的领导人，曾被苏联人关押，出狱后刚来到这。他叫[梅纳赫姆·]贝京。"

犹太人即将发动对英国人的起义。

让人有点惊讶的是，伊休夫很少讨论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伊休夫领导人后来因此受到批评。梅纳赫姆·贝京那种充满向往的谈话只是偶尔能听到，但实际上，伊休夫做不了什么。那类谈话中有个计划是将犹太人空降到欧洲搜集情报，寻找幸存者，并帮助英国对抗纳粹分子。

这些空降兵中最有名的是汉娜·西纳什。西纳什出生于匈牙利，1939年高中毕业后移民巴勒斯坦，很快成为一名哈加纳成员。1944年3月，她空降到南斯拉夫，希望从那里进入匈牙利。她的目的是帮助匈牙利那些即将被驱逐到奥斯维辛死亡营的犹太人。德国人在匈牙利边界将她逮捕。在狱中她惨遭折磨，1944年底在布达佩斯遭处决。很快，她和萨拉·亚伦松一样成为犹太民族的英雄，在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中受到传颂。1950年，她的遗体被带回以色列，同雅博廷斯基和以色列几位总理一起埋葬在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

然而，不管在欧洲还是巴勒斯坦，这些行动虽然英勇，但对于身处困境的犹太人而言远远不够。在欧洲，纳粹分子正在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伊休夫同时与阿拉伯人和英国人战斗。许多英国高级将领毫不掩饰他们对犹太人的鄙视。英军在巴勒斯坦的总司令伊夫林·巴克（Evelyn Barker）将军就常常在给情人的信中表达他对犹太人的厌恶，有封信这样写道："我恨透了他们……我们为什么害怕说出我们恨他们？我们应该让这个民族知道我们的想法，这个令人生厌的民族！"[3]

一些伊休夫成员对英国人也充满厌恶。到巴勒斯坦不久，梅纳赫姆·贝京就被要求担任伊尔贡的领导人。他满口答应下来，很快，他不顾伊休夫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在他看来，对犹太人而言，英国人是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大敌人。贝京吹响了"反抗"英国人的号角。

伊尔贡喜欢使用武力，对英国人的仇视也更公开，但伊尔贡并非伊休夫最极端的地下组织。1940年7月，从伊尔贡分裂出来的另一个组织更为极端。该组织领导人亚伯拉罕·斯特恩写过不少诗歌，他常在作品中表达对以色列地深沉的爱恋。斯特恩本来计划到意大利读博士学位，但他认为犹太人在赶走英国人解放巴勒斯坦的事业上做得不够，就放弃了学术追求，成立了一个更为好战的组织。

几十位伊尔贡成员追随斯特恩，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地下武装，取名为“以色列自由战士”（*Lochamei Cherut Yisrael*），其希伯来语首字母缩称“莱希”（Lechi）是这个组织最广为人知的名称（该组织的反对者又称他们为“斯特恩帮”）。英国正在同纳粹作战，伊尔贡对于是否应该同英国全面开战一直犹豫不决，而莱希认为英国人是伊休夫更大的敌人，因此对英国人发动了激烈的游击战，主要表现为一些小规模行动，包括暗杀英国军官和政府官员。(1)1942年2月，在英军一场大规模搜捕行动中，斯特恩死于枪战。

1944年11月6日，正当汉娜·西纳什在布达佩斯被处决时，莱希的一次行动惹怒了整个伊休夫。[4]两名莱希成员埃利亚胡·贝特－祖里（Eliyahu Bet-Zuri）和埃利亚胡·哈基姆（Eliyahu Hakim）将负责中东事务的英国国务大臣莫因（Moyne）勋爵在其开罗的家门口刺杀。他们还杀害了莫因勋爵的司机。任务完成后，他们很快被愤怒的群众围住，最后被判处绞刑。在审判期间，这两位埃利亚胡声称，他们刺杀莫因勋爵的原因是他反对犹太人移民，这是对犹太民族的犯罪行为，这当然不能说服英国法庭。莱希成员在这次行动中连司机也不放过，让许多伊休夫成员认为莱希不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而是一帮杀手。

伊休夫领导人越来越担心犹太极端准军事组织会让英国人迁怒于整个伊休夫。经过本－古里安批准，哈加纳决定取缔其他准军事组织。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这一段时期被称为“狩猎季”），帕尔马赫中的一支特种部队开始负责搜查伊尔贡和莱希成员，抓到后立即将他们交给英国人，哪怕非常清楚英国人会对他们处以绞刑。贝京反抗英国人的行动并没有因此有所收敛，但他同时也拒绝同哈加纳作战。本－古里安似乎没有像贝京一样感到不安。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安妮塔·沙皮拉后来评论说：“‘狩猎季’并不是本－古里安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他从未对此表达过悔意。”[5]

在欧洲，同盟国与纳粹的战争取得了进展。1945年5月8日，德国人

无条件投降，4个月后的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6000万人死于这场大战（占1940年全球人口的3%），其中包括死于大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占犹太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几年后在反思这场浩劫时，本-古里安说："如果（皮尔委员会提议的）分治决议能得以执行，我们民族的历史将完全不同，这600万人大部分会来到以色列，逃过被杀害的命运。"[6]

战后英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冷战的威胁无处不在，阿拉伯石油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为了避免引发阿拉伯人的反抗，英国工党政府没有改变白皮书的政策，也并没有像《贝尔福宣言》所承诺的那样着手建立犹太国。

并非只有英国人反感犹太人，到处弥漫着对犹太人的敌意。在安置难民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将犹太难民和德国难民放在同一个难民营，当犹太人提出不愿意和刚刚还迫害他们的人待在一起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挖苦地回复说，将犹太人和德国人分开才会让德国的种族主义政策阴魂不散。

也并非每个美国领导人都同情犹太人。1945年，乔治·S.巴顿将军在日记中写道："[其他人]认为难民是人，但其实不是，特别是那些比动物还低贱的犹太人。"[7]巴顿曾带着他的指挥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去参观犹太难民为了过赎罪日而临时修建的一座犹太会堂，他回忆说："我们走进那个犹太会堂，看到里面挤满了我所见过的最肮脏的一群人。当然，我一开始就接触了这些人，看看他们的相貌和举止，他们居然好意思声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模样创造出来的，真是让人匪夷所思。"[8]

这些难民虽然在大屠杀中逃过一劫，但身体已经非常羸弱，迫切希望移民到其他国家。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犹太难民的民意调查，96.8%的人想去巴勒斯坦。美国要求英国停止移民限制，放开土地买卖，让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但美国自己在战争期间禁止犹太人入境，这个要求没有说服力，遭到英国拒绝。

战后伊休夫开始大量接收非法移民。1945—1948年，为了拯救幸存下来的欧洲犹太人，伊休夫帮助许多想努力活下去的犹太人非法进入巴勒斯坦。这些伊休夫成员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在海边迎接大大小小的难民船，带难民上岸，再赶紧将他们藏起来。

但还是有很多人被英国人抓到。这些大屠杀幸存者好不容易来到巴

勒斯坦，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英国人的监狱。为了消毒，英国人让他们脱衣冲洗，这勾起他们惨痛的回忆。

1945年6月26日，在纽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本－古里安宣称，如果英国人坚持白皮书政策，伊休夫将别无选择，不得不“经常使用残酷的武力”[9]。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联合成立由本－古里安领导的“希伯来抵抗运动”（*Tnu'at Hameri Haivri*），联合采用统一战略对付英国人，攻击“战略要害，破坏基础设施和英国委任统治赖以存在的权力象征”。哈加纳对所有行动拥有否决权。

希伯来抵抗运动最成功的袭击发生在1946年6月16日和17日。11起经过统一协调的军事行动摧毁了大量道路和铁路桥，让海法的铁路系统陷入瘫痪，巴勒斯坦完全同邻国隔绝，英国运送物资和士兵的交通线全部中断。这些袭击对英国委任统治政府造成的损失超过40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笔巨大数额。

12天后，英国展开报复行动。在阿加莎（Agatha）行动（伊休夫称之为“黑色安息日”）中，英国将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拉马特甘（Ramat Gan）、海法和内塔尼亚几座城市完全封锁，约1.7万名英军加入这场搜索武装分子、非法武器和有牵连的文件证据的行动。他们一共抓获了2700名犹太人，其中包括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本－古里安当时在巴黎，逃过一劫。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被大量逮捕，而欧洲犹太人仍在被杀害。“黑色安息日”5天后，1946年7月4日，波兰凯尔采（Kielce）的150—200名大屠杀犹太幸存者（其中一部分是凯尔采人，他们从其他地方回到故乡，还有一部分是正好路过）遭到袭击，这是战后的第一起集体迫害。在这次暴徒袭击中（从一开始就有波兰军队和警察的参与），42名犹太人被杀，还有人被殴打或被石头砸伤。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集体迫害又回到了欧洲。战后的波兰对犹太人而言仍然不安全。

基希涅夫惨案并没有成为历史。

下一场袭击的消息很快传开。即将爆发袭击的24小时内，5000名犹太人离开家园，来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希望能从这前往巴勒斯坦。但他们在进入奥地利的同盟国占领区之前，就被英国人拦了下来。

大量欧洲难民无处可去。伊休夫的领导人又大多被关进监狱。英国还获得大量犹太代办处的文件，其中部分文件可以成为起诉伊休夫领导

人的证据。该地区变得空前混乱，战争一触即发。

伊休夫领导人得到消息，称英国人通过“黑色安息日”获取的大部分文件保存在著名的大卫王酒店。伊休夫有把握相信，这些文件足以让英国人逮捕甚至处决不少伊休夫领导人，包括果尔达·梅厄。[10]为了报复英军的镇压和销毁有牵连的证据，伊尔贡建议袭击该酒店。1938年以来，这座酒店的南翼一直是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总部（酒店其他部分正常营业）。

1946年7月1日，当时哈加纳负责人摩西·斯奈给梅纳赫姆·贝京一份密件，授权他组织爆炸袭击。由伊尔贡轰炸大卫王酒店，哈加纳和莱希则负责袭击其他建筑。但后来哈加纳和莱希放弃了这一计划，就在原定袭击日前两天，魏茨曼要求斯奈阻止伊尔贡执行这一计划，否则自己将退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伊休夫将随之分裂。斯奈将爆炸袭击时间推迟了几次。伊尔贡领导人发现哈加纳临阵退缩后，决定一意孤行。

大卫王酒店定期会收到装满牛奶的大锡罐。7月22日，7个装满TNT炸药的大牛奶罐被放置在建筑中的关键部位，引爆炸弹前20分钟，一位伊尔贡成员打电话到大卫王酒店，用英语和希伯来语发出袭击警告，但工作人员没有理会。伊尔贡还打电话提醒法国领事馆和《巴勒斯坦邮报》，但同样没有引起重视。

下午12点37分，他们引爆了炸弹，巨大的爆炸相当于建筑被一枚500千克的空袭炸弹直接击中。许多人当场死亡，几十人被掩埋在废墟下。这次袭击导致91人死亡，其中28人为英国人，42人为阿拉伯人，17人为犹太人，包括一名执行爆炸任务的伊尔贡成员。死者中还有两个美国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希腊人。

不出所料，这次袭击激起了公愤。美国和英国报纸强烈谴责这次袭击行为，预言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将遭受挫折。犹太代办处也谴责爆炸袭击，全然不顾这次行动事先得到伊休夫领导人批准这个关键事实。包括本－古里安在内的哈加纳成员矢口否认与袭击有任何瓜葛，这是谎话。这次袭击的影响非常大，希伯来抵抗运动因此名存实亡。伊尔贡和莱希继续单独行动，经常不接受哈加纳领导。

1946年12月9日，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发生5个月后，第二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举行，会场就在近50年前赫茨尔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同一个地方。由于发生了爆炸案，大会

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对付英国——是使用武力呢，还是等待英国改变自己的立场。这场讨论有点像圣经时代耶利米和哈拿尼雅之间的争论。魏茨曼说，恐怖主义是“身体中的毒瘤”，使用“非犹太手段”来建立犹太国违背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初衷。他在演讲末尾还引用了耶利米的话：“我希望我能拥有火焰一般的舌头和先知们的力量告诉你们，我们不能重蹈巴比伦和埃及的覆辙……‘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11]

魏茨曼的恳求让本－古里安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已经失去建立犹太国的勇气，他一气之下离开会场，回到房间，这也是赫茨尔住过的房间。在其他代表的请求之下，他才没有离开巴塞尔。黎明时分，大会就伊休夫是否使用更大暴力手段反抗英国的问题进行投票。最终，171票支持，154票反对，本－古里安以微弱的优势胜出。

30年来魏茨曼一直拥有影响力，但这一次，他所呼吁的克制不仅失败了，他自己还失去了以前一些支持者的敬佩。他一生献给了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战争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儿子是英军的战斗机飞行员，飞机被击落后遇难。这次会议后，魏茨曼仍然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事务中的关键人物，正是他日后说服哈里·杜鲁门总统承认以色列国，但不可否认，他的形象和地位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已大打折扣。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不得不减少海外开支。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在中东，维持委任统治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英国有大约10万军队驻扎在巴勒斯坦（占英帝国总军力的十分之一），当地军人和居民的比例是1：18。[12]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未来犹太国的领土，伊休夫领导人竭尽所能创造更多的既定事实。1946年10月6日（赎罪日禁食刚结束），犹太代办处一夜之间在内盖夫沙漠北部成立了11个新的定居点。这些犹太定居点都位于皮尔委员会报告中分给犹太国的领土之外。他们相信，通过创造这些既定事实，这些土地在未来的分治决议中有可能成为犹太国的领土。

伊休夫需要快速行动的直觉被证明有先见之明。1946年7月大卫王酒店爆炸案过去之后6个月，英国于1947年1月22日宣布将巴勒斯坦的命运和建立犹太国事宜交给联合国。

1947年5月15日，联合国成立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该委员会由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主要负责完成英国人未能完成的任务：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阿拉伯人立即宣布，他们将抵制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和讨论。6月2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抵达巴勒斯坦，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

欧洲当时还有数十万大屠杀幸存者没有找到归宿，非法移民行动正加速进行。就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另一艘载有无家可归犹太人的船上了新闻头条。这艘船是“出埃及”号。这一次，英国人仍然不允许船上的人在巴勒斯坦上岸。

“出埃及”号轮船从热那亚开出，船上超载着德国和波兰的犹太难民。它于1947年7月到达巴勒斯坦，同英国皇家海军短暂交火后，船上三名大屠杀幸存者丧生，所有乘客被英国人赶下船，转移到“帝国竞争者”号轮船上，不同于先前很多难民的命运，这艘船的目的地不是塞浦路斯，而是欧洲。

这让幸存者们感到无比绝望。在奥布里·埃班（后来改名为阿巴·埃班，担任过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国大使）的劝说下，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来到现场，目睹了难民转移的场景。埃班后来在文章中说，到达现场时，他们看到“英国士兵对这些死亡营幸存下来的人使用步枪枪托、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男女老少被强行赶到囚犯船上，被关在甲板下的笼子里，驶离巴勒斯坦水域”[13]。当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回到耶路撒冷时，对于亲眼看到的英国人的残忍行为，“他们震惊得脸色苍白”[14]。

关于英国撤军后犹太人如何防御阿拉伯人进攻的问题，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听取了伊休夫领导人的建议，还跟哈加纳成员秘密会晤。1947年9月1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正式提交了一份巴以分治的建议书。根据这份文件，耶路撒冷仍然由国际共管（参见地图5）；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计划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国家的领土还是比他们预期的要小，但至少比皮尔委员会划分给犹太人的领土大了不少。皮尔委员会报告将20%的巴勒斯坦划分给犹太人，80%划分给阿拉伯人。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则将55%的巴勒斯坦划分给犹太人，阿拉伯人只得到45%。虽然犹太人区域大多为沙漠，但该方案无疑更有利于犹太人，而对阿拉伯人来说是挫败。

然而，最让犹太人担心的是拟建的两个国家的人口平衡问题。在联

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建议成立犹太国的地区，犹太人的人数为49.8万，阿拉伯人数为40.7万。[15]在拟定建立阿拉伯国的地区，阿拉伯人数为72.5万，犹太人数只有1万。[16]考虑到阿拉伯人的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周边国家的阿拉伯人也可能进入即将成立的阿拉伯国，犹太人担心一旦阿拉伯人接受这一计划，在一代人时间内，整个巴勒斯坦区都将成为阿拉伯人的地盘。但就像当年皮尔委员会的结局一样，犹太代办处接受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的建议，而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拒绝接受。

1947年时，联合国刚成立两年，只有56个成员方。在1947年11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讨论181号议案，该议案只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建议的基础上稍事修改。一开始，美国没有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乔治·马歇尔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长期采取坚定反对犹太人独立的立场。更让伊休夫感到棘手的是，就在联合国大会计划进行投票的前一天，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报告建议杜鲁门总统不要支持犹太人。该报告指出，犹太国没有足够的军事自卫能力，一旦独立，犹太国同阿拉伯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将被卷入这场冲突。中央情报局预测“犹太人坚持不了两年”[17]。

但总统没有听从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建议，不但在分治决议上投了赞成票，还对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施加压力。[18]

苏联很早就表明了将支持犹太人独立的立场。苏联人相信犹太国很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英国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象征在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中蒙受的耻辱无疑让苏联人幸灾乐祸），积极支持犹太人建国。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说：“犹太人历史上长期和巴勒斯坦有着紧密的联系……犹太人在大战中承受的苦难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所以，犹太民族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剥夺他们这一权利有失公平。”[19]

虽然同时得到苏联和美国两个大国的支持，但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担心他们无法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联合国大会投票原定于周三进行，也就是11月26日。犹太代办处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包括海地、利比里亚、菲律宾在内国家的工作。这时帮助来自乌拉圭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兹·法布拉格特（Rodriguez　Fabraget），他在大会上用阻挠手段将投票时间延期到感恩节后，[20]这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争取到一天时间来游说几个关键国家。埃班等人不分昼夜地工作，深夜给各国代表打电话，向他们解释犹太人的处境，恳求他们能够帮助犹太人实现两千年来建立第一个犹太共和国的梦想。[21]

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继续讨论分治问题，全世界犹太人都守在收音机前，密切关注着大会结果，他们迫切希望犹太民族在大屠杀的恐怖经历后能够获得新生。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伊休夫的犹太人此时心连心，等待着民族命运被彻底改变。不出所料，苏联和美国投了赞成票，曾经统治巴勒斯坦的英国投弃权票。但没有料到的是，11月25日17个表示投弃权票的国家中有7个国家最终投了赞成票。[22]阻挠手段成功了，最终，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通过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方案》。

犹太人终于将拥有自己的国家。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时，赫茨尔曾在日记上写道："虽然我不会轻易公开这句话，但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巴塞尔大会，那就是：'在巴塞尔，我成立了犹太国。'如果我现在大声说这句话，全世界都会笑我，但也许5年后，或更确定地说，50年后，每个人都会承认我这句话是对的。"[23]整整50年后的1947年，赫茨尔大胆的梦想即将成真。

全世界的犹太人相互拥抱，喜极而泣。在巴勒斯坦，犹太会堂开放到深夜，供人们来做感恩祷告。数十万犹太人走上街头尽情舞蹈。有人回忆说，第二天上午"北部的犹太集体农场还燃烧着熊熊篝火，特拉维夫许多大型咖啡厅免费为客人提供香槟……有的犹太人嘲笑正在特拉维夫街道巡逻的英国军队，但也有人给他们递了红酒"[24]。

阿摩司·奥兹将成长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已多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他在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回忆了当晚的场景。他当时只有8岁，骑在父亲肩膀上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在庆祝。凌晨三四点回家后，他没有换掉身上的脏衣服就爬上了床。不一会儿，父亲来到他的床边，不是责备儿子没有换衣服，而是对他说，自己小时候在波兰上学时，有一次其他学生把他的裤子抢走了，奥兹的爷爷来到学校理论，男女学生又一起打了爷爷一顿，把他的裤子也拿走了。这是充满耻辱的回忆。

奥兹的父亲在1947年11月30日凌晨告诉他："本来，你也可能在上学时或在大街上蒙受这样的耻辱……但从今往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你不再会因为是犹太人而受人欺负……再也不会！从今晚开始这一切都永远结束了！"[25]

最后奥兹写道："我睡意蒙眬地伸手抚摸他的脸，我摸到的不是眼镜，而是眼泪。在那晚之前，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哭过，之后也没有，哪怕是在母亲去世时。"[26]

伊休夫中并非所有人都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畅想中。梅纳赫姆·贝京没有跳舞，因为他知道战争即将来临。阿拉伯人使用暴力来回应犹太人移民和皮尔委员会报告，他认为这一次也不会例外。贝京的宿敌大卫·本－古里安同样如此，他后来回忆说："我不能跳舞，我知道我们面临一场战争，我们许多最优秀的年轻人将在这场战争中牺牲。"[27]

最能表达伊休夫对未来判断的是拿单·奥尔特曼创作的《银盘》一诗。(2)奥尔特曼1910年出生于华沙，1925年和家人来到巴勒斯坦。1941年时，他已被公认为是伊休夫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逐渐取代比亚利克，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桂冠诗人。他在1947年12月26日写下《银盘》，当时距联合国大会投票结束还不到一个月，魏茨曼刚说过一句话："国家不会被盛在银盘里送给一个民族。"[28]

在《银盘》中，奥尔特曼将这个等待建国的民族比作圣经时代在西奈山上等待上帝授予《托拉》的以色列人。奥尔特曼说，伊休夫在等待"唯一的奇迹"，正当犹太民族等待之际，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缓步默默走向人群。两人几乎快走不动了。犹太民族惊讶地看着这对浑身沾满土和血的男女，问他们是谁。男孩和女孩回答："我们是将犹太国带给你们的银盘。"说完就倒下了。诗歌结束。

暴力流血事件已经开始，奥尔特曼用诗歌提醒犹太民族，更大的代价仍在后面。他还表达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观点：有待建成的国家是新的西奈山，即将获得独立的犹太国将创造新的犹太人，这也是比亚利克半个世纪前在《屠杀之城》中所呼吁的。

奥尔特曼暗示人们，一种世俗的犹太教将作为"新的宗教"成为这个国家的非官方宗教。对传统犹太人而言，当犹太民族聚在一起等待"唯一的奇迹"时，这个奇迹是从西奈山上得到《托拉》的启示。但在奥尔特曼看来，"唯一的奇迹"是建立犹太国。在圣经中，当犹太民族准备接受《托拉》时，摩西要求男子不得亲近女子。[29]在《银盘》中，那对男女彼此不分离，甚至难以区分。《托拉》要求男女在西奈山脚下分开，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根本不接受这一点。在《托拉》中，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在得到启示前要洗净衣服，[30]在奥尔特曼的诗中，男孩和女孩即使浑身是土也没有去洗。

奥尔特曼在告诉大家，要想拯救犹太人，就不能怕脏。洁净和神圣不能保证犹太人的生存，要想活下去，年轻的男女必须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

伊休夫开始匆匆备战。相对于其他邻国的领导人，外约旦阿卜杜拉国王长期以来和伊休夫保持较好的关系，本－古里安联系上他，（徒然地）希望外约旦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英国还没有离开巴勒斯坦，哈加纳严格意义上仍是非法武装组织，但面对紧迫的形势，哈加纳成立了四个旅，建立了秘密武器库，并招募了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经验的犹太战士。塞浦路斯的犹太难民也接受了哈加纳战士的训练，他们使用的是当地木匠做的木质步枪。

几个月来，阿拉伯人零零星星的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联合国投票结束后，正如人们所料，双方间正式爆发战争。这场一直持续到1949年初的战争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7年11月联合国投票开始，到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时结束。这一时期，哈加纳与其他犹太军事组织同组织松散的当地阿拉伯战士和其他国家的阿拉伯非正规部队作战。不同于正规部队间的战争，这一阶段更像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内战。第二阶段从1948年5月开始，到1949年初结束。建国后的以色列拥有了一支正规军，而他们的对手也成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埃及五个国家的正规军。

联合国投票的第二天，就有阿拉伯人对开往哈达萨医院的犹太救护车开枪，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同一天晚些时候，一群阿拉伯人用机枪向一辆从内塔尼亚开往耶路撒冷的载客巴士射击，还向它投掷手榴弹，这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这次事件造成五名犹太人死亡，其中还有一位前往婚礼现场的新娘。持续五个半月的独立战争第一阶段由此揭开序幕。

英国人还没有离开巴勒斯坦，理论上有责任维持当地秩序，但他们没有阻止阿拉伯人的暴力行动。阿拉伯人攻击一群犹太人后，哈加纳一个排的兵力赶来保护犹太人，英国人将哈加纳成员挡在街道外，不让他们阻止阿拉伯人的暴行。白皮书政策如今已经没有意义，但英国人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政策，阻止运输“非法”移民的船只靠岸。

犹太人的策略也没有发生变化，哈加纳仍然坚持“克制”政策，仅对参与袭击的阿拉伯人进行报复。伊尔贡和莱希则加大了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行动力度，这导致双方陷入相互袭击和报复的恶性循环，仅6周时间，就有1069名阿拉伯人、769名犹太人和123名英国人死亡。

本－古里安要求他的武装力量即使面对阿拉伯人的袭击也不能放弃土地，伊休夫大体做到了这点，但也有例外。损失最惨烈且最有名的是古什埃齐翁（Gush Etzion）遇袭，古什埃齐翁是四个定居点的集合名称，它位于耶路撒冷南部希伯伦山区。在1948年的头两周，这四个定居

点（埃齐翁村[Kfar Etzion]、马苏奥特伊扎克[Massuot Yitzhak]、恩特祖里[Ein Tzurim]和雷瓦迪姆[Revadim]）被围攻。在穆夫提的堂弟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Abdel-Kader al-Husseini）的带领下，1000名阿拉伯村民将这四个定居点中几百名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已经撤离）包围起来。犹太人的武装非常有限，阿拉伯人方面则有几百名妇女和儿童加入战斗，他们大多带着空箱子，准备抢劫犹太人留下的财产。1月14日，犹太守卫者击退了阿拉伯人一轮进攻，150名阿拉伯村民阵亡。但犹太人本来有限的弹药消耗殆尽，包围仍在持续。

1948年1月16日，第一轮进攻结束后两天，犹太人派出一支援救队伍前往古什埃齐翁，这支队伍由35人组成，大多为希伯来大学的优等生。由于从哈尔图夫（Hartuv，现在是贝特谢梅什[Beit Shemesh]市附近一个工业区）出发的时间晚于原计划，他们无法得到夜色的掩护，而且当时也没有无线电等通信设备。

这支车队（又称为“拉美德黑”[Lamed Heh]，这是希伯来语中第三和第五个字母的音译，代表35这个数字）从未到达古什埃齐翁。据说，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个阿拉伯牧羊人，他们要么杀掉他，要么承受位置暴露的风险。那个牧羊人发誓不会告密，于是他们放走了他。几十年后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一大早，古什埃齐翁西边山区特祖里夫（Tzurif）村的两名阿拉伯妇女在找柴火，撞见了两名帕尔马赫成员，她们尖叫着跑回村子去。士兵没有杀她们。[31]

不管哪个版本是真的，他们的位置被暴露，这35位年轻人还没来得及将补给物资带到古什埃齐翁就遭遇埋伏，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被肢解，有的根本无法辨认。

完全失去和伊休夫的联系，面对强大的阿拉伯军团，古什埃齐翁的犹太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1948年5月13日，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前一天，在坚守了几个月后，古什埃齐翁陷落。活下来的人不得不投降，获胜的阿拉伯人将许多投降的犹太人杀害。

古什埃齐翁的陷落沉重打击了伊休夫的士气。就在独立前一天，即将成立的犹太国已经丧失了一块领土，还损失了一部分优秀的年轻人。

即使在战争期间，诗人也在听着伊休夫的声音。哈伊姆·古里的诗让这35人的牺牲很快成为建国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建国后在以色列人中也家喻户晓。哈伊姆·古里是伊休夫的另一位重要诗人，1923年出生于特拉维夫。这首写给这35人的诗名为《这里埋有我们的身体》，古里借用他

们的声音写道："看啊，这里埋有我们的身体，排成长长的一列。我们的容颜已改。眼中流露着死亡。无法呼吸。"[32]

古里的诗并非关于死亡，而是关于建国的信仰和实现建国的决心。诗中的男子富有象征意义地问道："你们现在会埋葬我们吗？""我们将重生，像以前一样再次站立……因为我们体内还充满生命力，血管内的血液还在流淌。"对于建国需要付出的牺牲，这名男子在描述自己如何死去的时候写道："我们没有背叛。看啊，枪就在我们身边，里面弹药已尽……弹夹尚有余温，我们一步步走过的土地染着鲜血。"

古里的诗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拉美德黑战士的牺牲激发了伊休夫的士气。哈加纳抛弃了"克制"政策。从此以后，袭击犹太人的村庄将受到报复。战事升级，平民和士兵的死亡人数猛增，几乎所有居民的生活都受到战争的影响。本－古里安儿时的同伴什洛莫·拉维（Shlomo Lavi）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积极分子，后来成为以色列议员。在这场战斗中，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死于加利利地区和内盖夫沙漠。[33]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三个地下武装组织都在积极行动，但大多数时候它们之间缺少相互协调。为了不让英国人发现（对伊尔贡和莱希而言还不能让哈加纳发现）他们搜集的军火，每个武装组织都秘密藏匿了大量枪支、手榴弹、子弹等武器装备，用于同英国或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战。这些秘密武器藏匿点被称为"slicks"（词源不详，可能来自希伯来语"移动"一词的词根），城市、莫沙夫和基布兹的仓库中遍布这种武器藏匿点，有的位于地下，有的甚至在水库下面。[34]

截至1948年，伊休夫有1500多个这种武器藏匿点。有的专家说，这里几乎每个基布兹和莫沙夫都有这样的藏匿点。哈加纳最大的藏匿点和主要的弹药来源地是一个地下弹药工厂（现在叫阿亚龙[Ayalon]工厂），建在雷霍沃特（Rehovot）旁的一个基布兹中。1945—1948年，这个工厂位于营业的洗衣房和面包房地下，由一群年轻的帕尔马赫成员运营，它生产了200万发9毫米口径子弹，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所有知道藏匿点位置的人都发誓保密，有的人几十年后才过世，但至死闭口不提此事。有的武器藏匿点在建设新工程时才偶然被发现，有的可能永远不为人知。

随着战事的恶化，国际舆论开始变化。美国国务院要求杜鲁门总统改变立场，有的人甚至呼吁联合国就分治决议重新投票。对犹太人而

言，获得美国总统的支持至关重要。1948年2月，魏茨曼来到美国寻求他对分治决议的支持，但杜鲁门总统拒绝接见他。无奈之下，美国犹太领导人找到杜鲁门的犹太好友艾迪·雅各布森，杜鲁门和雅各布森在几十年前合开了一间男子服饰用品店，私交一直很好。

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当时美国重要的犹太组织）主席弗兰克·古德曼（Frank Goldman）打电话给雅各布森，请求由他出面调停。雅各布森给总统写信，但杜鲁门仍然不为所动。他在回信中说，魏茨曼告诉不了他什么新的内容。雅各布森于3月13日亲自来到华盛顿，作为杜鲁门多年的好友，他得以从侧门进入白宫。在椭圆形办公室外等待总统接见时，有人提醒雅各布森，不要在会谈期间谈及巴勒斯坦问题。

让杜鲁门感到生气的是，这恰恰是雅各布森要谈的事。总统严厉批评了他，但雅各布森没有退让。他指着杜鲁门办公室里摆放的安德鲁·杰克逊(3)的雕像，对这位多年的好友说："哈里，这一直以来是你生命中的英雄……在我心中也有这样一位英雄，虽然从未谋面，但我认为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犹太人，他就是哈伊姆·魏茨曼。"雅各布森接着说："他已经病得很重，身体虚弱，但为了自己民族的事业，仍然不远万里来见你，而你却拒绝接见他，仅仅因为几位美国犹太领导人得罪过你……哈里，这不像是你的作风，我本以为你可以就事论事。"

雅各布森后来回忆说，他说完这番话后，两人沉默了"像有几个世纪那么久"。直到杜鲁门对雅各布森说："你赢了，你这个狗娘养的光头。我同意见他。"计划成功了。魏茨曼以前就见过杜鲁门，总统评价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这次见面，他说服了杜鲁门。

194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耶路撒冷被大雪覆盖。从1948年2月起，阿拉伯军队封锁了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犹太居民无法得到食品和弹药补给，阿拉伯狙击手经常从远处射杀排队领取食物和水的犹太人，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北部的战斗也很激烈。1月10日，位于叙利亚的阿拉伯解放军派出900人的军队进攻距离叙以边界只有200码的索尔德村（Kfar Szold）。犹太守卫人员准备充分，阿拉伯进攻者伤亡惨重，最终撤退。

但是在争夺道路的战争中，伊休夫处于劣势，耶路撒冷因此岌岌可危。面对阿拉伯人势如破竹的攻势，犹太人士气低落。国外分析家认为，如果犹太人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都打不过，守不住联合国分给他们

的领土，和阿拉伯国家军队作战就更没有希望了。美国国务院开始制订托管计划，代替以前建立犹太国的分治决议。杜鲁门的顾问告诉他，犹太人要输掉这场战争，并惨遭屠杀，杜鲁门的立场开始动摇。

建立犹太国的机会两千年一遇，伊休夫眼看就要错过，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改变颓势。

1948年3月，本－古里安命令哈加纳“获得对希伯来国领土的控制权，守住边界”，开始执行“D计划”（Plan Dalet）。根据这一计划，如果阿拉伯村庄位于战略要冲，具有关键的通信作用，或可能被用作敌方基地，哈加纳可以摧毁这些村庄的敌军，将敌方平民赶到国界线以外。当然，只有在敌方存在抵抗行为时才使用武力，如果不做抵抗，他们可以留在村庄接受犹太人的管理。但大多数阿拉伯人不愿接受犹太人的统治，选择了逃跑。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时，大约有30万阿拉伯人离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由此产生，直到今天也无法解决。

一群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以色列学者（常和以色列政治左翼过从甚密）认为，本－古里安作出这一决定，既有领土上的考虑，也有人口上的考虑。他们声称，本－古里安明白，联合国分治决议将造成的人口平衡，从长远来看是犹太国无法维持的。建立民主的犹太国，必须保证犹太人口占绝对优势。这些历史学家认为，“D计划”等措施的目的，主要就是赶走大量阿拉伯人，这和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主流犹太历史学家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会选择逃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已经提前逃跑了，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步步紧逼的犹太军队的恐惧。直到今天，这些导致巴勒斯坦难民外逃的决策和行为，仍然是独立战争中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包括海法市长阿巴·胡西（Abba Hushy）在内的一些犹太领导人，鼓励甚至恳求阿拉伯居民留在他们以前和犹太人共同生活与工作的城市。但他们没有听从胡西的劝告，而是步已经逃离海法的阿拉伯领导人的后尘，选择了离开（他们当时可能只是逃避有可能发生的暴力行动，打算等风头过后再回来）。

对于这一正在展开的人道主义灾难，伊休夫没有漠视，有的领导人明确表达了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同情。果尔达·梅厄取代摩西·谢尔托克（Moshe Shertok），成为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门领导人。她看到海法的阿拉伯居民弃城而逃后，在5月6日说：“我看到孩子、妇女和老弱病

残者都在设法离开，我走进他们的房屋，有的桌上还摆着咖啡和烧饼（pita），这让我不禁想起当年许多犹太村庄[中的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离家园]的场景。”[35]阿拉伯人因为拒绝分治决议而发动了这场战争，但不得不承认，战争给阿拉伯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总体上看，战局对犹太人并不利。善于把握时机并深谙战略哲学的本-古里安明白，如果不能立刻改变战争局势，犹太人将失去一切。[36]阿拉伯人控制了大多数道路；耶路撒冷成为一座孤岛，急需食品和其他物资的供给。犹太人眼看就要输掉这场战争。

更糟糕的是，美国正在考虑收回对分治决议的支持，将巴勒斯坦交由国际托管。本-古里安知道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他命令哈加纳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势。在1948年4月的“拿雄行动”（Operation Nachshon）中，本-古里安派出1500名士兵打通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扭转了战争局势。

借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捷克斯洛伐克是为数不多的不顾国际武器禁运的国家之一），犹太军队攻占了太巴列（Tiberias）、采法特（Safed）和极具战略意义的海法港。本-古里安抓住时机，改变了战争走向。

除了对犹太军队有时强迫阿拉伯居民离开家园的合理指控，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还指出战争期间犹太军队的“残暴因素”，[37]他指控犹太军队在独立战争中犯下了许多残忍的暴行，包括强奸和谋杀。这些指控大多已被当代学者彻底地反驳掉。

最重要的例子是发生在阿拉伯村庄代尔亚辛（Deir Yassin）的激烈战斗，这一事件充满争议，直到今天还经常被以色列的敌人提起。1948年3月22日，阿拉伯军队成功将耶路撒冷同城外所有其他犹太定居点隔离开来。哈加纳集结了三倍于以往行动的兵力，出动1500人组成加强排，实施“拿雄行动”。伊尔贡和莱希为了减轻耶路撒冷承受的压力，决定占领代尔亚辛村，阿拉伯军队正在从这座村庄对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射击。代尔亚辛村属于耶路撒冷西边阿拉伯人还没有放弃的最后一批村庄。参与行动的伊尔贡战士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装备也很差，几乎没有实战能力，但以色列估计在这座村庄不会遇到实质性的抵抗行为。

攻占村庄的行动开始于4月9日，一辆装有扬声器的卡车开到村庄，要求村民离开或投降。但卡车还没靠近村庄就动不了了，伊尔贡和莱希

成员之间的联络设备也出现问题，他们遇到的抵抗也远远超出想象。情急之下，这些缺乏实战经验的战士向阿拉伯房屋内投掷手榴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最初的数据显示有250人死亡，有人还声称犹太战士强奸了村民。

伊尔贡承认当时的死亡人数很多，但坚持认为死亡人数接近100人，并矢口否认强奸指控。但没有人听他们的辩解，因为这些指控对多方有利。哈加纳利用这一事件指责伊尔贡不负责任的谋杀行为；阿拉伯人利用这一事件向国际社会证明犹太人的屠杀行为，坚定其他阿拉伯国家参战的决心；整个伊休夫包括本－古里安在内利用这一事件来加剧阿拉伯人的恐惧心理，让阿拉伯人逃离犹太领土正是本－古里安想要看到的事情。

是否真的存在种族灭绝或强奸行为？后来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学者一致认为根本不存在强奸行为，伊尔贡给出的死亡人数最接近事实。[38]哈加纳和阿拉伯人都故意夸大了死亡人数。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激战，死伤惨烈，但并不存在蓄意谋杀平民的行为。

但当时阿拉伯人没有客观描述这一事件，而声称这是一次恐怖的屠杀事件，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因此逃离家园，成为难民。直到今天，他们还利用代尔亚辛事件来证明以色列“诞生于罪恶之中”。

1948年5月10日，化装成阿拉伯妇女的果尔达来到约旦，会见了阿卜杜拉国王，梅厄知道阿拉伯国家马上就要加入战争，一旦进入这一阶段，战争将带来更多的死伤。她请求阿卜杜拉国王不要进攻新生的犹太国，以色列和约旦可以成为盟友。但阿卜杜拉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自己的判断，他告诉果尔达自己很可能没有选择，只能参战。接着，他要求梅厄不要着急宣布犹太国的独立。她对国王说：“我们已经等了两千年，这算着急吗？”

果尔达明白，建国远远不只是为了主权，而是为了确保犹太民族的未来。犹太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这件事情不许失败，只能成功。

但国王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当她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梅厄对阿卜杜拉说：“如果除了刚才那席话，你不能再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战争将不可避免，而我们会赢。以后我们也许还会见面，那时，战争已经结束，犹太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39]

(1) 犹太地下武装确实存在莱希这样比伊尔贡更滥用武力的极端组织，但英国有时也会使用非常恐怖的措施，手段之残忍比这些英国试图消灭的组织有过之而无不及。臭名昭著的罗伊·法伦（Roy Farran）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罗伊·法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英军欧洲战场一名少校，后来被派到巴勒斯坦，帮助建立一个从伊尔贡和莱希战士那里获取情报的秘密英国团队。1947年5月6日，法伦的手下绑架了正在发放伊尔贡传单的16岁男孩亚历山大·鲁波维茨（Alexander Rubowitz）。多年后，人们才发现鲁波维茨在关押期间虽然被严刑拷打，但拒绝透露情报。法伦在审讯中用石头砸他的头，导致他死亡。犹太人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找到鲁波维茨的尸体。一年后，出于报复，莱希成员向法伦在英国的住宅寄了一个炸弹包裹，但打开包裹的不是法伦，而是他的兄弟雷克斯，后者当场死亡。罗伊·法伦后来迁往加拿大，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和政治家，1971—1979年担任阿尔伯塔省立法委员会成员。（Bruce Hoffman, *Anonymous Soldiers: The Struggle for Israel*：1917—1947[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pp.422 ff.）

(2) 中译文见高秋福译：《百年心声：现代希伯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0—62页。——校注

(3)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民主党创建者之一。——校注

第八章

独立：国家诞生

根据我们自然的和历史的权利……我们宣告在以色列故土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国。

——以色列《独立宣言》

1917年，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从雅法门进入耶路撒冷老城宣告英国对巴勒斯坦统治的开始。30年后的1948年5月14日，海法港降下最后一面英国国旗，标志着委任统治的结束。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被成立不久的伊休夫屈辱地赶出了巴勒斯坦。就像当年和马卡比家族作战的希腊人一样，英国人严重低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战争到底的决心。

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对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英国人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充满希望，但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从《贝尔福宣言》的支持转变为1939年白皮书的敌视，进而发展到完全敌对的关系。英军指挥官伊夫林·巴克在巴勒斯坦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这片土地上撒尿。[1]

虽然犹太人和英国人最后成为对手，但巴勒斯坦已经远比英国人接管时发达。英国人建立起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允许伊休夫成立和发展了后来成为国家关键部门的各种机构。虽然后来英国限制犹太移民的进入，但在英国人统治期间，伊休夫的人口翻了10倍，从5.6万人发展到60万人左右，为建立一个小型国家奠定了人口基础。

英国人终于要离开了。由西奥多·赫茨尔提出、得到贝尔福勋爵支持但后来受到英国阻碍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本－古里安这位善于把握历史大势的天才明白，伊休夫面对的机会一旦错失或许再不可得，他坚决反对任何推迟建国的建议。哈里·杜鲁门承诺支持以色列建国，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念。(1)但伊休夫一些成员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建国意味着战争，而伊休夫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他们还担心，不管伊休夫是否愿意承认，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对以色列无法抵抗阿拉伯军队的判断是有道理的，犹太人应当耐心等待宣布建国的时机。

本 - 古里安清楚犹太人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并承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承受领土和人员上的惨烈损失，伊休夫的民众也将承受巨大的冲击。"[2]但他坚持认为，如果犹太人希望获得主权，机会"要么就在现在，要么永远没了"。莫迪凯·本托夫（Mordecai Bentov）是犹太代办处派往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后来写道："房间里坐着10位犹太人，他们要做出犹太人两千年来最重要的决定。"[3]在犹地亚陷落两千年后，1948年5月12日，犹太民族执行委员会（the People's Administration）在特拉维夫以6票赞成、4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宣布建立犹太国的决议。

1948年5月14日周五，犹太代表大会成员挤在特拉维夫博物馆聚会。由于担心阿拉伯人实施爆炸袭击，举行典礼的消息很晚才公布，一天前才发出正式邀请函。但消息泄露了，典礼开始前，数百人已经在博物馆门外翘首等待。

由于大厅空间不够大，有的受邀者只能站在门外，受邀演奏国歌的巴勒斯坦爱乐乐团不得不临时挪到二楼。会议准备得非常仓促，大家忙得不可开交，但每个人都明白这一天的意义。本 - 古里安的助理泽夫·沙里夫（Ze'ev Sharef）回忆说："那天我们各司其职，仿佛置身梦境……弥赛亚已经到来，接受异族奴役的日子结束了。"[4]

现场的布置有意模仿51年前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会场。在移民巴勒斯坦42年后，本 - 古里安站在发言台上，头上方挂着一幅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巨大画像。

一到下午4点钟，在摄影师连续不断的闪光灯的映射下，全体与会代表起立演唱《希望》。[5]

> 本 - 古里安，这位62岁，身高5英尺3英寸的实用主义者有着磐石般坚定的信仰，他一生都在为自己和犹太民族积累权力，目的就是恢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权。1906年，一位阿拉伯码头工人将（来自波兰的）他从小船上背到巴勒斯坦的岸上，几十年后，本 - 古里安宣读了以色列《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的序言很长，其中提到犹太民族诞生于以色列地。在以色列地，犹太民族创造了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文化。流散各地的犹太人矢志不渝地希望返回故土。接下来，本 - 古里安用颤抖但坚定的声音宣布："根据我们自然的和历史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大会决议，我们宣告

在以色列故土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国。”[6](2)

本－古里安读完《独立宣言》后，从被包围的耶路撒冷赶来参加签字仪式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米兹腊希党领导人耶胡达·莱伯·费希曼－迈蒙念诵了“你赐予我们生命”（*shehecheyanu*）的祝福祈祷。和1897年在巴塞尔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卡尔·利佩博士一样，他念道：“上帝啊，祝福你，宇宙之主，是你赐予我们生命，保存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7]

与会代表又唱了一遍《希望》，然后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已经成立。大会结束。”仪式虽然只持续了32分钟，但揭开了犹太历史新的篇章，罗马人攻破耶路撒冷后，持续了两千年的流亡生涯终于结束，犹太人在先祖之地重新获得主权。

虽然包含念诵祈祷文“你赐予我们生命”这一环节，但整个仪式世俗特色鲜明。和50年前的赫茨尔一样，本－古里安在仪式上没有头戴基帕帽。半个世纪前，赫茨尔那一代人呼吁创造新犹太人。从建国仪式的各种细节中可以发现，新犹太人已经出现，正是他们在建立一个拥有主权的犹太国。

以色列《独立宣言》不是一份神学文件，而是一份历史文件。美国《独立宣言》提到“上帝”“造物主”等词，以色列《独立宣言》中完全没有提到上帝。宗教人士希望《独立宣言》是份显而易见的宗教文本，为了照顾他们的情绪，原文中写道：“怀着对以色列磐石的信念，我们在国家临时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为宣言签名作证。”但这句话故意用了模糊的措辞。对于宗教人士来说，“以色列磐石”这个传统术语指的总是上帝。[8]（迈蒙拉比在自己签名的上方加上了意为“蒙上帝恩典”的三个希伯来字母。[9]）但对世俗人士来说，国家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以色列磐石”指的是犹太历史、犹太人的勇气以及新获得的犹太人的自卫能力。(3)

宣言虽然没有提及上帝，但其中充满了历史。它言及犹太民族在以色列地的诞生，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辉煌历史，以及犹太人20世纪经历的惨重灾难。本－古里安热爱圣经，认为这本“书中之书”可以为刚刚成立的犹太国指引方向；宣言中反映了这点，承诺以色列“将把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自由、正义与和平原则作为立国基础”。

但《独立宣言》不是一份不切实际的文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诞生起就密切关注风云变化的世界形势，《独立宣言》也体现了犹太复国

主义者对当时历史环境的深刻理解。宣言明确提到战争已经爆发。本-古里安似乎已经预见到世界对犹太人以及刚刚成立的以色列的同情不会持续太久，宣言强调联合国181号决议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效应。原文中“以色列国将向散居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敞开移居的大门”明确意味着英国的白皮书政策已经失效。虽然战争已经爆发，但宣言还是向以色列的敌人提出和平的建议：“我们向所有邻邦及其人民伸出和平、和睦、友邦之手，敦请他们与已经在自己故土上独立的犹太民族以互助精神合作。”

宣言的文本复杂而微妙。它强调平等，承诺“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呼吁“生活在以色列地的阿拉伯居民”能够“维护和平，并在享有平等公民权利的基础上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出他们的力量”。但与此同时，宣言也强调犹太传统的伦理基础将在新成立的犹太国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犹太国将成为犹太民族的避风港，但同时也会“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以造福所有居民”。

既要保证国家鲜明的犹太性，又要保证非犹太人的权利，这绝非易事。直到今天，以色列关于如何平衡犹太性和民主性的争论还在持续。

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犹太人来自各个不同的派别，既有左翼的共产主义者，也有右翼极端正统教派组织以色列联盟（Agudath Yisrael）的成员。在1897年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这些组织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但在犹太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表现出空前的团结，搁置了争议。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不管是面对巨大的机会还是严重的危机，犹太人总能在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关键时刻搁置重大分歧，共同面对挑战。

早在1898年巴塞尔的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女性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治体系的正式成员（在这方面远远早于欧洲政府），她们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伊休夫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巨大作用。有两位女性在《独立宣言》上签名：果尔达·梅厄（后来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理）和蕾切尔·卡根-科恩（资深的女性权益和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活动家）。

本-古里安的政治对手、领导伊尔贡的梅纳赫姆·贝京没有参加这一仪式（莱希领导人伊扎克·沙米尔如果在以色列应该也不会被邀请，但他当时被英国人流放到境外，受到关押），这并不让人意外。在本-古里安看来，贝京和雅博廷斯基一样让他感到厌恶，《独立宣言》是本-古里安塑造以色列建国叙事的核心组成部分，他尽可能不让贝京或伊尔贡

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哈伊姆·魏茨曼当时在国外，也没能签字，回国后本－古里安拒绝让他补签，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本－古里安始终不忘个人恩怨。

这个新成立国家的名字也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4)关于这个国家的名字，一开始有好几个选项，但最终选定为以色列，这是圣经时代的雅各和天使角力后获得的名称。“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10]没有谁可以想到比这更合适的名字。

特拉维夫博物馆外的人群欣喜若狂，但领导阶层并没有心情庆祝。本－古里安在日记中写道：“全国到处是欢庆的人群，充满着喜悦的氛围，但就像11月29日一样，我如同身处欢庆人群中的哀悼者。”[11]他对西蒙·佩雷斯（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和总统）说：“今天每个人都高兴。明天就有流血。”[12]

第二天独立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在这期间，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实现两次停火，因此这一阶段的战争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月的战斗最为惨烈，以色列共阵亡了876名战士和将近300名平民。哈加纳（很快将改组为以色列国防军）面对的是约旦、埃及、黎巴嫩、伊拉克和叙利亚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他们还得到苏丹、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援。本－古里安总是用圣经叙事的眼光看待新生的犹太国，他认为埃及和叙利亚是以色列极为关键的敌人。战争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飞机需要轰炸和摧毁安曼，然后飞越约旦，攻陷叙利亚。我们还要轰炸赛得港、亚历山大和开罗。这样我们才能结束这场战争，为当年与埃及、亚述和亚兰作战的我们的祖先报仇。”[13]

虽然他这些理想很高远，但战争初期进展并不顺利。在北部，以色列要面对装备精良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军队。南部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埃及军队正迅速向内盖夫沙漠推进，很快就能向以色列总参谋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发动空袭。后来成为总参谋长的伊加尔·雅丁当时是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部长，他回忆说：

> 我意识到……整个北部可能沦陷，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在南部，埃及军队正朝特拉维夫推进。耶路撒冷被封锁，伊拉克军队在对以色列中部施压。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几代人的梦想就要破灭。[14]

本－古里安也意识到未来几天的战事将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他在5月19日即宣布独立后五天说："我们在和时间赛跑。如果再能坚持两周，我们就能赢。"[15]

虽然四面受敌，但早在5月19日，本－古里安还是敦促伊加尔·雅丁进攻耶路撒冷，但雅丁担心哈加纳还没有做好准备。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耶路撒冷既不属于犹太国也不属于阿拉伯国，将受国际保护。但大家心里明白，这不大可行。联合国没有实际权力，世界大国对落实分治决议不感兴趣，无论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都对将这座城市交由国际共管不感兴趣。如果存在强烈的国际压力，犹太人可能会同意这一方案，但阿拉伯人一定会拒绝，就像以前拒绝皮尔委员会方案和其他分治方案一样。

争夺这座城市的战争随之打响。耶路撒冷城内的阿拉伯人面临物资匮乏，为了支援他们，阿拉伯军团开始向耶路撒冷推进。本－古里安决心让以色列人赶走他们。

问题是如何去耶路撒冷。要想控制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以色列人首先必须占领拉特伦（Latrun），这是位于耶路撒冷以西15英里处的一个高地（现在以色列装甲部队纪念馆就位于此）。本－古里安命令新组建的哈加纳第七旅来执行任务。但雅丁反对，他指出到前线参加拉特伦战斗的士兵基本没有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许多人连水壶都没有。雅丁恳请本－古里安能认清这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这些士兵许多来自纳粹的死亡营，然后被送到塞浦路斯的拘留营，不久前才在巴勒斯坦登陆，如今却要让这些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人拿起落后的武器加入战斗。本－古里安表示理解，但不为所动，拉特伦第一场战斗在5月24日打响。

正如雅丁所料，这场战斗惨不忍睹，以色列军队被击退。时任排长的阿里埃勒·沙龙（赎罪日战争中的英雄，后来的以色列总理）在这场战斗中负伤。6月1日，以色列军队对拉特伦发起新一轮进攻，但再次失败。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以色列军队阵亡139人，其他人认为实际死亡人数更高。

正如雅丁进一步所料，拉特伦将作为"大屠杀幸存者抛洒鲜血之地"被人们记住。[16]这样的悲剧不只发生在拉特伦。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超过10万犹太人应征加入以色列国防军，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许多为国捐躯者是来自欧洲的大屠杀幸存者。"[17]不少人刚刚来就牺牲了，他们的墓碑上没有名字，成为捍卫这个国家的无名英雄。后

来，在如何对待大屠杀幸存者的问题上，以色列社会还将经受类似的考验。考虑到这些无名英雄目睹了欧洲的灾难，可以说他们的死亡见证了他们的信念：建立犹太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自己的幸存。

拉特伦军事行动失败刚过几天，以色列遭受了另一次沉重的打击。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阿拉伯军团在英国指挥官的带领下攻陷了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区。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拉宾眼睁睁地看着犹太居民挥着白旗向阿拉伯军团投降，他们的脸上刻着深深的失落。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后，犹太人被流放，同样的悲剧在公元70年罗马人攻占耶路撒冷后再次发生。现在，和两千年前一样，犹太人又背上自己少得可怜的行囊，含泪离开耶路撒冷。和以前的征服者一样，约旦人对这座城市毫不留情，犹太会堂被用作马厩，犹太人的墓碑被用来修建厕所。19年后，犹太人才能再次触摸西墙，回到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做祷告。

哈加纳放弃攻占拉特伦，开辟了一条被称为“滇缅公路”（这条通道的主要目的是为耶路撒冷犹太人运送物资，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被日本占领的中国运送物资一样）的通道。绝望中在一条古老道路基础上奋力修建“滇缅公路”，既反映了伊休夫时期出其不意的地下作战思想，又体现了如今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特色。需求乃创新之母，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明白，如果不能打通连接耶路撒冷的道路，将有更多犹太人死去，战争期间犹太人在许多方面展现了创新和勤奋，比如，在修建“滇缅公路”方面：

> 利用推土机、拖拉机和人力，工程师几乎不可思议地开辟出一条通往果园尽头峭壁的行道，再开辟出峭壁下通往山谷的道路。夜晚，在约旦的炮轰下，可以看到似乎不真实的一幕：几百名运输工背着食品和补给走下山，那里等着他们的是卡车、吉普车，甚至骡子。由于急需向耶路撒冷输送牛肉，这条道上甚至有人赶着牛群在上面走。[18]

利用这条替代性的通道，当时年仅26岁的伊扎克·拉宾指挥着哈雷尔（Harel）旅，不但将物资运送到城内，还守住了西耶路撒冷，但他们最后没能夺回耶路撒冷老城。

展现犹太人创造力的，远不止修建“滇缅公路”。战争中大部分时期缺乏重型武器，伊休夫使用了一种名为戴维德卡（Davidka）的3英寸口

径自制迫击炮。这种武器击中目标的概率很低，还经常发射出哑弹。[19]但它也有妙处，因为一旦爆炸，不管偏离目标多远，炸弹都会发出刺眼的亮光和巨大的声响，在当地阿拉伯民众中引起恐慌。[20]戴维德卡在攻打耶路撒冷和采法特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许多当地人要么逃跑，要么迅速投降。在5月6日到9日的采法特战斗中，戴维德卡的巨大声响让当地阿拉伯人以为犹太人在使用“原子弹”。“一架战场上空的哈加纳侦察机提供报告说：‘数千名难民徒步向梅龙（Meirun）方向逃亡。’许多阿拉伯人居民区一夜之间成为‘鬼城’。”[21]

以色列空军也运用了类似策略。地勤人员除了装载炸弹，还把从基地和附近搜集来的许多空瓶子装载到飞机上，他们听说这些瓶子在下降时发出的巨大哨音在地面人员听来就像炸弹坠落一般，这一策略对敌方起到了震慑作用。

然而，这个羽翼未丰的犹太国在武器上仍处劣势，艰难地维持着战局，伤亡也非常惨重。以色列在国外购买的重型武器还没有运到。埃及掌握着制空权。刚刚宣布独立的以色列命悬一线。

为了停止流血冲突，国际社会试图干预。5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双方立即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委派瑞典外交官福克·伯纳多特伯爵调停双方停火事宜。

伯纳多特是个有意思的人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瑞典红十字会负责人的他拯救了数千名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他还同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内的纳粹高级领导人会面，寻找终止冲突的秘密途径。他在巴勒斯坦战事最酣时受命出任调停官。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位“热心的瑞典贵族，‘乐观，……急于行动’，是一位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堂吉诃德”[22]。他勇敢接受了这个没有人完成过的任务，计划首先实现停火，然后寻求长久的和平方案。

一方面由于伯纳多特的政治斡旋，另一方面由于参战各国已力不从心，战争双方同意停火。原计划从6月1日开始停火，但落实停火远比想象的复杂，因此又推迟了10天，于6月11日正式停火。

根据停火条约，“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将接受包括武器和军事人员在内的全面禁运”[23]。但双方都没有遵守这一协定。阿拉伯国家加强了作战部队的实力，停火期间还不时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则在停火期间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购进了大量军火。伊休夫还接受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物资，包括“2.5万把步枪、5000挺机关枪、5000万发子

弹”[24]。讽刺的是，其中竟然有德国1945年5月以前出厂的毛瑟（Mauser）枪和MG机枪，上面还有纳粹党徽的标记（志愿飞行员的服装上也有）。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枪，竟然落到犹太人手里，成为他们开启犹太史新篇章的工具。[25]

从海外运送来的不仅是武器。战争初期以色列没有军用飞机，飞行员也很少。[26]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却有几百架编余的飞机，也有为美国战斗过的犹太飞行员。以色列开展了秘密工作，寻找这些飞行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高度同化，但纳粹大屠杀唤醒了一些飞行员对犹太同胞的责任感。少数人甚至不顾美国法律，协助购买了美国的编余飞机，将飞机飞到欧洲，再飞到以色列。就像印有纳粹党徽的步枪一样，这些飞行员后来穿的二手军装上也缝着纳粹空军的标志。

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建有生产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战斗机的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飞机的生产并未停止。有些美国飞行员开着这种飞机飞到以色列参加战斗。

几乎是刚到以色列，就有人告诉这些美国人，埃及军队离特拉维夫只有6英里的距离，如果不立即发动空袭，第二天早上他们将在特拉维夫看到一万埃及大军。[27]于是他们立即驾着原始的单引擎飞机起飞，执行第一次轰炸任务，迅速改变了战局。由于他们的轰炸，伊拉克军队不得不原地待命，停止了向以色列方向的行军。[28]

全世界一共有大约3500人自愿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有趣的是，其中很多并非犹太人。大约有190名志愿者在以色列空军服役，[29]有几名飞行员在空袭行动中牺牲。战争结束后，大多数美国人返回自己的祖国。也有一些人认为以色列才是他们的家，便留了下来，成为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飞行员，或者在以色列飞机工业领域工作。

本尼·莫里斯认为，除了军事上的作用，这些志愿者还让以色列人明白，虽然他们人数不占优势，但并非孤军奋战。[30]犹太人的命运和大屠杀时期已大为不同，这极大提高了整个国家的士气。

迫切需要重整军备导致战争期间发生了一起潜在破坏性极大的事件。5月26日，本－古里安结束了哈加纳的“秘密地位”，在一页仅仅打了20行字的备忘录中宣布在哈加纳基础上成立以色列的官方军队：以色列国防军。这份备忘录还要求其他武装团体停止活动。此时国家体系已逐渐成形，凭借强大的个人权力，这位开国总理还在备忘录中写道：“所有符合这一命令的行为都视为合法，即使有违现行法律中的其他指

示。”[31]

根据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之间达成的协议，所有伊尔贡成员将加入新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伊尔贡的武器装备和武器生产设施将交给国防军。军队的旅级建制中不设伊尔贡单位，且伊尔贡停止独立采购行为。本－古里安明白，要想成为合法的国家，以色列不能拥有互相竞争的民兵组织。

贝京理解并同意让伊尔贡停止作为以色列国一个独特军事单位存在。但部分伊尔贡战士还在受到围攻的耶路撒冷作战，耶路撒冷此时严格意义上还不算以色列领土，因此不受将伊尔贡收编进国防军协议的限制。当时耶路撒冷弹药告急，贝京更关心的是为耶路撒冷的伊尔贡成员提供弹药，并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耶路撒冷。

但是贝京当时并不知道，一向同贝京存在分歧的伊尔贡美国分支购买了一艘旧船，将之命名为“阿尔塔莱纳”号（意大利语“跷跷板”的意思，这是雅博廷斯基当记者时的笔名）。这艘船后来在法国靠岸，法国为了制衡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向犹太人捐赠了价值1.5亿法郎的军火（按现在的市值相当于5亿多美元）。[32]装载到“阿尔塔莱纳”号上的武器包括5000把步枪、250把布伦（Bren）枪、500万发子弹、50个“巴祖卡”（bazooka）火箭筒和10辆履带式轻型装甲车。除了武器装备，登船的还有940名移民（许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和包括耶希埃尔·卡迪沙伊在内的伊尔贡成员。这艘船原计划于5月14日到达巴勒斯坦，但后来推迟到6月11日才出发，正赶上停火协议和武器禁运生效的日期。

贝京服从停火协议，当时并不知道这艘船已经出发。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船只已经接近以色列的领海。贝京连忙联系船长埃利亚胡·兰金（Eliyahu Lankin），命令他不要进入以色列领海，但通信设备出现故障。发现已无法让船只调头后，贝京将此事汇报给本－古里安。

本－古里安明白，船只靠岸将违反停火协议，但他也不想放弃此时急需的武器。6月20日到达以色列海岸后，这艘船只被要求驶往特拉维夫以北的维特金（Vitkin）村，他们认为在那也许不会被联合国观察员看到。但直到这时，关于如何处理这些军火，本－古里安和贝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贝京同意将大部分军火交给以色列国防军，但要求把20%的军火留给坚守在耶路撒冷抗击约旦军队的伊尔贡战士，本－古里安断然拒绝。本－古里安认为，即使将一小部分军火分给伊尔贡（哪怕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伊尔贡成员），也会影响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合法性，

让伊尔贡成为一支军队中的军队。

关于这艘船的消息很快散播开来，更有传闻说贝京要在维特金村的海岸现身。贝京此时在地下活动，一直接受贝京指挥的伊尔贡战士见主心切，就舍弃自己所属的军营，前往维特金村。本-古里安本来就对贝京有疑心，伊尔贡战士的离去越发让他肯定贝京图谋不轨。次日，他召开内阁会议，对部长们说，贝京直到“阿尔塔莱纳”号开到海上才告诉他这一计划（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本-古里安这时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长期以来对贝京的不信任，他对内阁说：

> 不能有两个国家，也不能有两支军队。贝京先生不能为所欲为。我们必须决定到底是授权他这一行为，还是终止他的分裂活动。如果他不妥协，我们将对他开火。[33]

军队总参谋长伊斯雷尔·加利利（Yisrael　Galili）命令以色列国防军飞行员向货船扫射。这些飞行员很多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飞行员，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他们拒绝接受命令，他们说：“我们来这是为犹太人作战，而不是同犹太人作战。”[34]

这时贝京已经登上货船，他要求伊尔贡成员利用夜色的掩护开始卸货。国防军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交出所有武器，但他没有做出回应；他后来表示最后通牒完全不切实际，因为根本没有留给他时间做出回应。

哈加纳部队和忠于伊尔贡的人员交火。“阿尔塔莱纳”号货船离开海岸，朝南边的特拉维夫驶去，却在海边搁浅了，无法移动——这一切都落入酒店客人、在海边玩耍的人、记者和联合国观察员的视线。突然，岸上的帕尔马赫战士（帕尔马赫最敌视伊尔贡，帕尔马赫的指挥官中就有伊扎克·拉宾）开始朝“阿尔塔莱纳”号货轮开枪，伊尔贡战士还击，犹太人和犹太人打了起来，刚刚成立不到五周，犹太国就处在内战爆发边缘。

装满军火的船只还遭到炮击，在整个过程中，贝京命令下属不得还击。被击中后，船上的军火开始爆炸。此时仍在船上的贝京下令弃船，虽然他想坚守在船上直到最后，但下属强行把他带到岸上，其间许多人朝他的方向开火，在场的人都认为哈加纳成员想杀掉贝京。贝京刚下船不久，船上剩余的军火就将整艘船引爆。在场的以色列国防军战士万万没有想到，刚刚建国就会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纷纷跳到水中去营救船

上的乘客。

岸上的战斗仍在继续，哈加纳成员和伊尔贡成员相互射击，这场犹太人的内战从地中海转移到了特拉维夫街道，双方都有死伤。但贝京此前已要求伊尔贡成员不得向犹太人开火，双方都明白此时的以色列根本经不起一场内战的消耗。交火最终停止。

算上维特金村的战斗，军队方面以色列国防军有3人死亡，伊尔贡有16人死亡。全部死者中有一人是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他曾因1933年谋杀哈伊姆·阿罗佐罗夫而被指控，但后来获得赦免。斯塔夫斯基当时是“阿尔塔莱纳”号上的一名乘客，他就死在15年前阿罗佐罗夫遇刺的特拉维夫海滩的离岸不远处。

贝京通过广播向伊尔贡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演讲。他在演讲中重申伊尔贡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反复提醒伊尔贡成员：“不要对自己的兄弟动手，哪怕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说，犹太人不能打犹太人，因为“希伯来武器不能用来攻击希伯来战士”。他几乎是咆哮着喊道：“大敌当前，我们决不能陷入内战！”

本-古里安非常恼火，拒绝让死去的伊尔贡成员埋葬在特拉维夫。

有人批评贝京将这些武器运送到以色列，也有人称赞他在终止这场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狩猎季”中也拒绝对哈加纳作战）。后来，贝京说他对以色列最大的贡献就是避免了一场全面内战的爆发。事后，本-古里安也理直气壮，声称自己让国家避免了一场武装叛乱。他在谈话中多次说击沉“阿尔塔莱纳”号的大炮非常神圣，“如果第三圣殿建成，这门大炮应该摆到圣殿旁”[35]。

1965年，在政府调查“阿尔塔莱纳”号事件后，本-古里安才承认“我当时有可能弄错了”[36]。

在以色列的民族叙事中，“阿尔塔莱纳”号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明白，要建立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所有军队应当置于政治家的领导下。多年后，看到巴勒斯坦民选官员无法驾驭巴勒斯坦多个武装派别，以色列人会说：“巴勒斯坦人还没有经历他们的‘阿尔塔莱纳’号事件。”

战争下一阶段开始于1948年7月8日（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停火结束）。这一阶段只持续了短短10天，但出现了不少极具争议的时刻，包括一次至今仍被时常讨论的战斗。

利达争夺战非常能体现以色列独立战争乃至整个以色列历史“相互冲

突的叙事方式”。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后来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写道：“历史上的重大战争往往会成为史学上的重大战争。”[37]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引发过如此激烈的“史学战争”，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为什么会有这一现象？奥伦指出：“关于阿以关系的争论之所以异常激烈，是因为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的利益太多。敌对双方的矛盾不像在大学里争夺书架那么简单，而是在一些深刻影响到几百万人生活的问题上较量，这些问题包括以色列安全、巴勒斯坦难民权利、耶路撒冷未来归属等。”[38]这也不单纯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较量。在以色列内部有一群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学者，总想推翻以色列对这场冲突的主流叙事。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正如他们的代表人物以色列人艾兰·佩普（Ilan Pappe）所言，他们的目的是“重新思考在过去地理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寻求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39]。

这场围绕历史展开的战争也是关于以色列合法性和以色列未来的战争。不难理解，独立战争中的许多事件，特别是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量离开以色列的因素（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敏感和充满争议的问题），成为不同学派历史学家之间较量的关键战场。

利达就是这样一个战场。1948年夏天，面对约旦军队的进攻，耶路撒冷岌岌可危，本－古里安决定再打通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军队高层认为首先应当占领利达，这座阿拉伯城市(5)位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拥有约两万居民。战争爆发以来，由于许多阿拉伯人逃离了原来居住的城镇，利达的人口激增，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在此驻扎了一个125人的步兵连，这些军人和部分当地武装分子联合起来，做好了同以色列国防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以色列发动的“丹尼行动”（Operation Dani）拉开了战斗的序幕。7月11日，以色列军队对利达发起进攻，但遭到反击，以色列无法完全控制这一区域。夜晚，以色列又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占领了此城的大清真寺和圣乔治教堂。以色列国防军要求民众集中到清真寺和教堂，很快，这两座建筑人满为患。根据大多数记录，以色列军队后来允许阿拉伯妇女和儿童离开。

整座城市大概有300名以色列战士，阿拉伯军团已撤到当地警察局内并设置起路障，双方形成对峙局面。第二天，几辆阿拉伯军团的车突然冲入市内，车上的人持枪四处扫射。当地武装分子也加入战斗，从许多建筑中朝以色列人开枪。有些冷枪来自市内一座小清真寺，占据清真

寺顶部的阿拉伯狙击手构成致命威胁。以色列士兵接到终结阿拉伯军队火力的命令，在随后的战斗中，以军向清真寺发射了反坦克榴弹。虽然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录存在不同版本，但无疑死伤众多。

直到今天，关于战争具体进程、清真寺内外阿拉伯人的死亡人数和死者中平民的人数仍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指责了以色列国防军在利达的所作所为，一位著名的以色列作者在总结这派观点时指出："当天正午，在短短30分钟内，超过200名平民不幸遇害。"[40]他还表示应当为此负责的，不仅仅是在场的战士，他们身后的那场运动也脱不了干系，"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酿成了这场发生在利达山谷的人类灾难"[41]。

许多历史学家明确驳斥了这些修正主义者得出的结论。2014年，一位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在仔细研读了利达战斗的档案材料后指出，为了推翻以色列的叙事，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置证据于不顾，得出的结论偏离了事实。利达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修正主义者给出的数据，死者大多为作战人员，双方都有死伤，并没有出现新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屠杀行为。[42]

本尼·莫里斯也曾是新历史学家，他对以色列传统叙事持强烈批判态度，在描述这一事件时他也用了"屠杀"一词。但他同时指出，利达事件必须放在战争的大背景下来理解，需要考虑以色列和阿拉伯作战人员的行为方式。他说：

> 利达事件并不能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为方式。1948年以前，犹太复国主义者主要通过购买而非强占的方式获得阿拉伯领土，壮大他们的事业。反倒是阿拉伯人周期性地屠杀犹太人，比如1929年的希伯伦事件和采法特事件。1948年战争中最早出现的暴力事件也是阿拉伯人所为：1947年12月30日，海法炼油厂的39名犹太工人被阿拉伯人杀害。
>
> 不可否认，犹太人继而实施了不少暴行；长期的内战激发了战士的复仇心理，让他们变得更残暴。但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暴行，是因为以色列人占领了400多座阿拉伯城市和村庄，而巴勒斯坦人几乎连一个犹太居民点都没有攻下（即便占领也不是单独凭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力量）。1948年5月13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约旦阿拉伯军团的帮助下占领了埃齐翁村后，就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屠杀。[43]

独立战争是一场残忍的战争，对阿拉伯人而言它事关荣誉，对犹太人而言它事关生存。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有野蛮行径。莫里斯指出，野蛮行径在犹太人那里是例外，但在阿拉伯人那里是规则。

利达战争结束后，剩余的阿拉伯军队撤退。以色列国防军和当地阿拉伯领导人达成协议，当地居民将离开，向东迁移。和这场战争中许多其他战斗一样，许多难民排成长队离开家园。犹太考古学家施马亚·古特曼目睹了大批离去的难民，他回忆说：

> 大量居民挨个走着……女人头上顶着装满东西的盒子和布袋，母亲拉着孩子。不时能听到以色列人鸣枪警告。偶尔你可以在人群中看到某位年轻人锐利的目光，仿佛在说："我们没有投降，我们还会回来打你。"[44]

这一时期，难民的队伍随处可见，这些不幸者中既有阿拉伯人，也有犹太人。犹太人被赶出耶路撒冷老城，数十万的阿拉伯人离开了以色列北部。不久，生活在北非的几十万犹太人也将成为难民，他们中有的是被赶走的，有的是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暴力威胁而选择离开。最终有70万犹太人离开阿拉伯国家，来到刚刚成立的以色列。总而言之，这一时期许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大规模人口迁移产生的民愤将在几十年后让这一地区变得动荡不安。

1948年11月19日，拿单·奥尔特曼在犹太工人总工会报纸《达瓦尔报》（*Davar*）上发表了一首诗，名为《关于那一切》（*Al Zot*）。这首诗没有提到某个具体事件，有可能暗指利达事件（但当时利达战斗已经过去几个月，他应当不会等这么长的时间才做出反应），也可能指某个没有明说的事件，又或者只是泛泛地表达对战争丑恶的感觉。他在诗中写了吉普车上一位"幼狮般活络筋骨"的年轻男子。一对沿街走的年迈夫妇看到他后，出于恐惧，转身面向街边墙壁。年轻人笑着自言自语："我要试试这把枪。"接下来奥尔特曼写道："老头刚用手抱住头，他的鲜血就染红了那面墙。"虽然不知道奥尔特曼描述的是哪一次军事行动，但我们确切知道以色列领导人的反应。本-古里安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感谢奥尔特曼。当时还在战争期间，本-古里安一读到这首诗，就给诗人写了一封信：

> 尊敬的奥尔特曼先生：

祝贺你在《达瓦尔报》刚发表的那首具有道德力量和感染力的作品。你发出了能代表人类良知的声音，这种声音纯洁而忠诚。如果我们心中没有这种良知，就配不上目前取得的成就……我请求你允许以色列国防部加印10万份你的作品，发放到每一位以色列战士手中，在我们的军队中，没有任何武器拥有你的作品那样巨大的威力。

充满欣赏和感谢之情

大卫·本－古里安

战争双方都有许多人死去。但以色列社会当时表现出的强迫性的自我批判倾向，后来发展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建国之初，以色列社会就具有高度反思能力。诗人和政治家都认为，要想对得起以色列刚刚取得的独立，就必须反映出传统的价值观，犹太国的梦想正是来自这些价值观。这种自我批判的声音在随后几十年将变为以色列的一个长处。

凭借第一次停火期间引进的武器和生存下去的坚定信念，以色列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巩固了战局。这时联合国又开始协调停火事宜，经过10天鏖战，7月19日第二次停火生效。

和第一次停火一样，双方还是在一阵犹豫后才同意停火，并利用停火加强各自军备，修建防御工事。在积极准备下一轮战斗时，以色列人已经感到战争局面发生了改变，这场冲突不久能结束，他们将获得胜利。怀着喜悦的心情，他们甚至于7月27日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一次阅兵，后来这成为每年的传统。[45]

阿拉伯人开始意识到摧毁以色列的战争已经失败，于是把目光转向一个新问题：阿拉伯难民的命运。

独立战争期间，大约有70万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本尼·莫里斯指出了阿拉伯人离开家园的不同原因。在雅法、海法和其他大城镇，阿拉伯领导人的离开是导致城市社会解体的主要原因。在另一些地方，关于以色列暴行的谣言让阿拉伯人相信只有逃跑才能活下来。还有些地方的阿拉伯人的确是被以色列人赶走的。连本尼·莫里斯也明白本－古里安当时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他的责任是建立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犹太国，他“对人口问题有理解，明白需要建立一个没有太多阿拉伯人的犹太国”[46]。除此之外，犹太国无法继续存在。

战争结束时，这70万巴勒斯坦难民（几乎与即将被迫逃离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的人数相当）来到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加沙寻求庇护。阿拉伯人给伯纳多特伯爵施压，他当时仍在代表联合国为交战双方调停，要求他将阿拉伯难民问题当作任何解决冲突方案的核心。

以色列人宣称，只要阿拉伯人还试图消灭犹太国，就拒绝讨论难民问题。阿拉伯人针锋相对，提出只有在难民问题解决后才会进行和平谈判。解决难民问题不是谈判的目标，而是谈判的前提。这意味着难民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在以色列看来，黎巴嫩和叙利亚（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约旦）并没有真正试图解决难民问题，而是将其作为自己口袋中的一张王牌。他们未来同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谈判时将用到这个“筹码”——但即使到那时，只要以色列还存在，他们就决意不停止冲突。

伯纳多特伯爵开始对犹太人施压，要求以色列允许难民回归，并建议以色列放弃内盖夫沙漠、耶路撒冷、海法港（交由国际共管）和利达国际机场（现在是以色列最大的本-古里安机场）等地。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看来，伯纳多特根本不是公正的仲裁者，很多人甚至认为他已经完全是个敌人，站到了以色列的敌人一边。

1948年9月17日，4名莱希成员决定用他们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穿上以色列国防军的军装，在西耶路撒冷暗杀了伯纳多特，当时他手里还拿着没有发表的解决方案。国际社会的谴责随之潮涌而来，本-古里安恼羞成怒。签署过《独立宣言》的交通部部长大卫·雷梅兹（David Remez）说：“自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来，我们还没受过这么大的指责。”[47]这一事件坚定了本-古里安清剿剩余伊尔贡和莱希成员的决心。为了终止恐怖主义行为，他要求内阁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包括不经审判就行政拘留的权力。犹太地下武装尽管在赶走英国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

本-古里安明白战争再拖下去对他不利。他已经动员了以色列一半成年男性加入军队，部分女性也在服役，这场冲突不能再这样无休无止了。但在分治决议划分给以色列的土地上还有叙利亚、埃及和约旦的军队，为了赶走他们，本-古里安命令国防军控制以色列全境，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到10月底，以色列北部的叙利亚和阿拉伯解放军被驱逐出境。到1949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赶走了内盖夫沙漠的埃及军队，甚至占领了部分在分治决议中没有划分给以色列的领土，但埃及军队仍然控制着加

沙地带。约旦人也急于摆脱战争，他们私下同以色列达成协议，限制双方战斗规模，确保约旦人获得约旦河西岸。不再需要更多战役了。战争基本结束。

本-古里安手下有些将军希望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这一机会为以色列建立一道安全可靠的天然边界，但本-古里安不同意。他有几个考虑。他相信，控制更多数量的阿拉伯平民是以色列首先需要避免的。那些留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已经让本-古里安很担心了，他们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已经留在以色列境内，而这些人同境外敌人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当时没有像家人那样选择逃亡。本-古里安无法设想他们会忠于这个新成立的国家。

本-古里安还担心占领更多的领土会招致美国的反对。此外，没有占领约旦河西岸，还因为本-古里安有新的难题需要考虑，正如安妮塔·沙皮拉所说，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吸引和吸收大量移民这一重大任务”[48]。

阿拉伯人不愿意和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因为，就算撇开他们不承认以色列这点不谈，和以色列签订任何协议，就意味着他们承认消灭犹太国的战争已经失败。然而他们没有选择，埃及、黎巴嫩、约旦分别于1949年2月24日、3月23日和4月3日同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最后叙利亚也于1949年7月20日在停火协议上签字。

不同于美国国务院的预测，以色列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以色列付出了沉重代价，大约6000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四分之一为平民，死亡人数占新国家犹太人口的将近百分之一。500位女性在战争中死去，其中108人来自军队。[49]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死亡人数也占到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在比例上同以色列基本持平。

这场冲突最大的失败者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将这段历史称为“大灾难”（Nakba），70万人因为战争沦为难民，几千人死去。这些数字让人触目惊心。

不可否认，这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离开家园令人悲痛。这其中以色列人无疑负有责任。但与此同时，那些难民接收国造成了真正的人类悲剧，为了挑起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谴责，他们故意让这些难民无家可归，一直生活在难民营。保持这些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身份成为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埃及等国在未来阿以冲突中的王牌。

对待无家可归的同胞，以色列的做法截然不同。几十万犹太人同样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境，他们在以色列靠岸后，犹太国就给予他们公民身份。巴勒斯坦人被嘲讽和利用，犹太人却得到同胞的关爱，满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两种不同的对待也决定了两者不同的未来。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投票通过分治决议。此后不到两年时间，以色列宣布独立，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战胜了首先挑起战争的阿拉伯邻国，还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本-古里安此人，什么都可以，就是与天真绝缘。他知道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无法接受犹太国的存在，还会联合起来再次进攻以色列。最终，这场战争注定会卷土重来。

但现在，总理暂时忘记了战争，转而关注其他方面。是时候建设国家了。

(1) 杜鲁门认为自己对以色列的建立功不可没。几年后，他的老友艾迪·雅各布森在介绍这位前总统时说，他“曾为以色列建国提供了帮助”。杜鲁门回答：“什么叫‘提供了帮助’？我就是居鲁士。”在希伯来圣经末尾的经文（《历代志下》36：22—23）中，波斯王居鲁士要生活在波斯王国的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John B. Judis, “Seeds of Doubt: Harry Truman's Concerns about Israel and Palestine Were Prescient—and Forgotten,” *New Republic*（January 16, 2014），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6215/was-harry-truman-zionist.）

(2) 《独立宣言》的全文参见本书附录3。

(3) 并非所有《独立宣言》的签署者都在周五上午来到特拉维夫。耶路撒冷被阿拉伯人包围，全国的公路也很危险。许多人是几天后在安全的场所签的字。

(4) 5月14日宣布建国前，伊休夫领导人专门开会讨论国家的名字。有人提出沿用古犹太王国的名称，称之为“犹大”。但历史上犹大国的大部分领土不在分治决议划分给犹太人的范围内，这个名字没有被采纳。会上还有人提出“锡安”、“萨布拉”（Tzabr[Sabra]）等名。但后来有人提出“以色列”，在投票中这个名字以7票赞成、3票反对得以通过。最早建议将国名定为“以色列”的人不是本-古里安，而是犹太裔加利西亚人作家以撒·佩恩霍夫（Isaac Pernhoff）。1896年，他在一篇回应赫茨尔的文章中预测这个国家建国时将取名为以色列国。（Elon Gilad, “Why Is Israel Called Israel?” *Ha'aretz* [April 20,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652699.）

(5) “利达”（Lydda）今已改成希伯来圣经中的名字“罗德”（Lod）。——校注

第九章

从建国之梦到建国之路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出埃及记》19：3—4

1949年1月25日对这个刚刚独立8个月的国家来说庄严而神圣，这时战争已基本结束，以色列在这天举行了第一次全国选举。

两千年来犹太人没有主权，每个人都明白选举的意义是多么重大。摩西·耶库蒂尔·阿尔伯特是一位极端正统派的拉比，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担任耶路撒冷多个犹太社区的领导人（mukhtar）。

> 早上5点35分，我和妻子、弟弟西蒙·莱布拉比、姐夫内塔内尔拉比和儿子多夫都醒了。喝完咖啡后，为了迎接这个伟大而神圣的日子，我们穿上了安息日的服饰，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篇》118：24）自两千年前开始流散以来，甚至从上帝创世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如此喜悦的一天，今天我们可以为犹太国投票……"上帝啊，祝福你，是你让我们活下来，保护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1]

喝完咖啡，阿尔伯特拿上他的以色列公民身份证前往投票现场。那里早上6点开始工作。"一路上我都非常开心，仿佛是在欢庆托拉节(1)上抱着《托拉》卷轴跳舞（*hakafos*）一样，我这样激动，仅仅是因为手里拿着以色列身份证。那天早上我的喜悦之情真是无穷无尽。"

阿尔伯特第一个到达现场，等待了几分钟后，他拿到一张印有数字1的投票卡。

> 我感到这是我生命中最神圣的一刻，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未曾体验过。我们三人中只有我在有生之年有幸见证了这神圣而纯粹的时刻。"我是幸运和蒙福的！"念完"你赐予我们生命"（*shehecheyanu*）的祝福祈祷文后，我将装有投票卡的信封投进

票箱。[2]

平日里阿尔伯特拉比每天第一件事是晨祷，但这天他投完票后才回家做祷告。

并非只有阿尔伯特一人这么激动。在特拉维夫，几乎整座城市的人都兴奋地来到投票现场，人们显得很有耐心，预先派到某个交通要道的警察和救护车向总部报告无事可做。[3]在内塔尼亚，等待投票的人群有序地排成长队，还唱起了《希望》，这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歌曲，现在成为犹太国的国歌。

一共有440095人参加了这次投票，占到符合投票资格人数的87%。几天后投票结果公布，不出所料，大卫·本-古里安领导的马帕伊党（Mapai）获得36%的票数，成为第一大党，获得以色列立宪会议120个席位中的46席。几周后，立宪会议成为克奈塞特（Knesset），即以色列议会。(2)

以色列第一届议会建立在广泛基础上，其中既有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既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它包括46名马帕伊党议员、代表拿撒勒民主人士名单（Democratic List of Nazareth）的2名阿拉伯议员、16名联合宗教阵线（United Religious Front）的议员、5名进步党议员和4名塞法迪名单（Sephardi List）议员。作为第一大党马帕伊党的领袖，大卫·本-古里安成为总理，兼任国防部部长。(1)他拒绝共产主义政党和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赫鲁特（“自由”）党进入联合政府，认为这两股力量会对这个新成立国家的价值观产生不利影响。

以色列的建国者们知道，他们能有今天，离不开一位先驱的努力，虽然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大选几个月后，1949年8月17日，西奥多·赫茨尔的遗体被接回以色列，埋葬在现在的赫茨尔山国家公墓。赫茨尔的骨灰由64辆汽车组成的车队运送，车队从特拉维夫驶往首都(2)时，数千人走在车队后，路两边站着更多的民众。这支庞大的游行队伍首先来到1898年赫茨尔和德皇威廉会面的密克维以色列（Mikveh Israel），随后来到赫茨尔在巴勒斯坦度过第一夜的里雄莱锡安，赫茨尔只访问过巴勒斯坦一次。在前往首都的路上，总共有20万人来到现场表达对赫茨尔的敬意，占到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4]在耶路撒冷，灵柩停放妥当后，约两万人排成长队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包括内阁和议会的全体成员以及6000名受邀者。赫茨尔的棺材上挂着380个蓝白色小袋子，里面装着全以色列各个定居点的泥土。[5]最后他在首都的山顶长

眠，从这里他可以俯瞰自己梦想建立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新成立的国家需要一面国旗。几十年前，赫茨尔在《犹太国》中写道："我建议采用白色旗帜，上面有七颗金星。白底象征我们纯净的新生活，星星象征工作日中七小时黄金时间。"[6]但赫茨尔这个想法没有被采纳。1948年10月，以色列选用19世纪9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旗帜作为国旗，白色背景下有一颗浅蓝色大卫星，在大卫星上下各有一条水平方向的浅蓝色条纹。设计者想通过这两条蓝色条纹让人想到犹太祈祷披巾（*tallit*）。从国旗设计就能看出，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建立一个极度世俗的新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回避宗教因素。

以色列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2月14日召开。当时还没有办公场所，会议便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犹太代办处召开。大会讨论的第一项议程是任命哈伊姆·魏茨曼为国家总统。三十年前，正是他说服贝尔福勋爵发表《贝尔福宣言》。虽然以色列总统基本上是荣誉性职位，但魏茨曼的个人影响力令这个职位受人敬重。一当选，他立即在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

半个世纪前，西奥多·赫茨尔在《犹太国》中提出，犹太人家园的复兴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榜样。他写道："我们在这里为自身创造的福利将产生强大影响，会造福全人类。"[7]现在，赫茨尔所梦想的国家已然建成，魏茨曼也希望犹太人取得的成就能够鼓舞世界其他地方受压迫的民族。

> 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即将离开拂晓时分的临时政权，迈入阳光普照下的民主政权……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伟大的日子，但我们不可过于骄傲。此时此刻，我们希望将这个充满希望、鼓舞人心的消息从圣城的这里传到所有受压迫和所有为自由与平等而奋斗的人们那里。[8]

接下来，魏茨曼谈到"世界各国数十万的犹太同胞，他们即将回到敞开怀抱迎接他们的以色列"[9]。他说："我们祈愿能有更多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扎根，和我们肩并肩地建设这个国家，让我们这块贫瘠的土地再次变得富饶。"[10]

一年后，在1950年7月5日，议会制定并通过了最能代表以色列国家性质的《回归法》，赋予所有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权利。当时的另一项

法律让犹太移民踏上这片国土时自动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雇工之死》一诗中写道：“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不得不去那里时，那里不得不接纳你。”[11]对犹太人而言，犹太国如今就是这样一个家。因为这个家的存在，再也不会有成千上万犹太人因无人接收而住在欧洲的难民营中，再也不会有载着犹太人的船只穿越大洋寻找停泊之处。《回归法》宣告犹太人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时代已经结束。

迫于阿拉伯人的压力，1939年英国的白皮书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移民是建国的前提，将移民非法化意味着白皮书撤回了《贝尔福宣言》中许下的承诺。《回归法》取消了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所有限制，废除了1939年英国的白皮书。

《回归法》还是对纳粹政府《纽伦堡法案》的象征性推翻。在那个法案中，纳粹分子规定祖父母中有一人为犹太人的人，就被视为犹太人。《回归法》几乎使用了同样的界定方式。(3)以色列议会通过这种方式向世人宣告：“只要你的犹太性足以招致纳粹分子的杀害，你就能得到以色列国的保护。”

犹太人以前所未有之势移民到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从1948年5月15日到1949年底，70个国家不下686739名犹太人来到以色列，这个人数几乎和建国时以色列的人口相等，成为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以色列在吸收移民方面创造了现代史上一个奇迹：

> 战争期间有10万新移民来到以色列，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移民数量。这预示了接下来的事情。在建国后的42个月中，月均移民数达到1.6万，总人数达到69万，短短3年时间，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就翻了一倍。在任何其他移民国家，从未听说过这种移民人数超过原有居民的现象。[12]

以色列一直是一个在移民的努力下不断发展的国家。(4)1948年，全世界只有6%的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6%，几乎占到全世界犹太人的一半。

他们中许多人来自北非的阿拉伯国家。1948年，大约有7.5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埃及，但就在这一年，埃及开始逮捕犹太人，强征他们的财产。开罗的犹太区遭到炸弹袭击，犹太人被迫离开埃及。1956年，埃及又驱逐了2.5万名犹太人。1967年的迫害让更多犹太人选择移民，当地

犹太人的人数下降到2500人。到20世纪70年代，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只剩下几百人。

1948年，利比亚有3.8万名犹太人。纳粹军队占领班加西（Benghazi）后，对当地犹太人施加集体迫害。纳粹分子离开后，当地人继续迫害犹太人，3万名犹太人选择逃亡，其中多数人在1949年离境。1951年利比亚独立后，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更多犹太人选择离开。1967年六日战争后，当地又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此后利比亚为数不多的犹太人也离开了这个国家。

1948年，摩洛哥的犹太居民多达26.5万人。以色列独立后，犹太人除了成为暴乱的袭击对象，在经济上也遭到抵制。截至1958年，6.5万名犹太人离开摩洛哥。1963年，又有10万名犹太人离开家园。截至1968年，生活在摩洛哥的犹太人只剩下最后5万人。类似情况还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突尼斯和也门。许多长期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社团不复存在。在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90%的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后十年内离开了。[13]1948—1951年的短短3年内，生活在伊斯兰国家超过37%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14]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非阿拉伯国家。保加利亚几乎所有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1991年共产主义解体后，阿尔巴尼亚几乎所有犹太人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对犹太人而言，进入以色列虽然已经不是问题，但离开东道国变得越来越困难。伊拉克政府最初规定，只要犹太人放弃伊拉克公民权，就可以离开。政府预计有1万—4万名犹太人离开，但最后移民人数超过12万，几乎占到伊拉克犹太总人口的90%。这让政府非常震惊和难堪，立即着手冻结犹太人的资产，（从1951年开始）还禁止犹太家庭携带财产出国。几乎一夜之间，这些移民从伊拉克上层社会的富人变为身无分文的以色列新移民。

由于伊拉克犹太人移民变得越来越危险，以色列发动了“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2500年前在居鲁士统治时期，正是以斯拉和尼希米带领巴比伦犹太人回到犹地亚。为了让伊拉克犹太人尽早回归以色列，大拉比不顾犹太教的标准规定，破例允许飞机在安息日运送这些移民。

本－古里安深知，新成立的以色列面临极其严峻的经济困难，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内他不愿让财政考虑影响到政策，其中就包括移民。以色列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大规模移民带来的人力资本。不管移民

来自哪里，他都要接收，即使这么多移民会给以色列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主持犹太代办处财政工作的列维·艾希科尔（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三任总理）表达了对大规模移民的担忧，他说："我们连帐篷都没有，他们来到这里只能睡大街。"[15]但本-古里安决心已定，以色列将接收每一个想要来以色列的犹太人。

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以色列执行了多次史诗般的移民营救行动。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的"魔毯行动"几乎将也门所有的犹太人空运到以色列。(5)也门犹太人在上飞机前，艰难地跋涉到事先指定的集结点，从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租赁的DC-4"空中霸王"运输机再将他们送到以色列。[16]以色列还在集合点安排了医疗人员，帮助也门犹太人做好长途飞行的准备。其中一次大规模空运就运送了45640人，这些运输机内的座椅全被拆卸，每架飞机每次能运送500—600人。另有3275名犹太人从红海边的海港城市亚丁（Aden）被空运到以色列。果尔达·梅厄后来回忆：

> 有时我会来到利达机场，看一架架来自亚丁的飞机降落。乘客们看上去非常疲惫，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让我惊叹不已。我问其中一位留胡子的老人："以前见过飞机吗？"他回答说没有。"那你在空中的时候不害怕吗？"我又追问。他坚定地说："不害怕。这都在圣经的《以赛亚书》中写到过，'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6)"我站在飞机场听他将整段经文背了下来，他面带喜悦，因为先知的预言应验了，也因为旅程结束了。[17]

许多移民到达以色列时需要接受紧急医疗救助，也门的3000名儿童身体状态非常差，[18]几百人死在了路上。

虽然他们已经来到以色列，但国家并没有为数十万新移民准备住房。政府没有经济实力为移民提供食物、医疗、就业等基本需求。建国早期，许多人已经对本-古里安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怨恨有加，如果不了解这点，就无法理解接下来几十年里以色列国的政治，包括本-古里安的政党最后的失势。

一开始，移民住在临时营地里，但随着人数的增加，这些营地的条件很快变得让人无法忍受。海法附近一个临时营地的负责人对以色列政府不能为移民提供好的条件而感到悲痛，他这样描述移民的生活：

> 这些移民被锁在营区，周围围有铁丝网，还有武装警察守卫。

他们住在英国军队留下的用木头和石头搭建的房子里，里面在不同时期都非常拥挤，甚至达到了相当残忍的程度。他们每日三餐要排很长的队领取食物，看病和办理海关手续的队伍就更长了，经常绵延几公里。为了上洗手间，移民有时要等上几个小时，厕所由于用的人太多都堵住了。营地的水有时不够用，经常停电，每到夜晚营地就一片漆黑。[19]

政府急于改善移民的生活条件，从1950年开始建设永久性住房，但以色列当时面临的挑战太多，这些住房没有按时建成。于是以色列修建了过渡营（*ma'abarot*），这里的条件好于以前的临时营地，政府计划在“真正”的房屋建好前让新移民临时住在这里。

很快，过渡营的条件变得和临时营地一样糟糕，过渡营还成为许多移民的永久性住处。许多年后，有的过渡营发展成小型城市，而且大多为以色列欠发达的城市。生活在过渡营的主要是（来自中东的）东方犹太人，过渡营成为滋生民众不满情绪的温床，这些人数越来越多、对政府越来越不满的东方犹太人后来发展成工党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即使资源有限，本-古里安不惜投入大量资源的另一个领域是儿童义务教育。教育一直是犹太人社团生活的基础，也是早期历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一个关注点。伊休夫建立了10多个教育机构，他们明白要想实现国家的繁荣，必须着重发展教育。1949年，以色列议会颁布了最早的法律之一《义务教育法》，为所有5—13岁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对于犹太儿童，国家沿用了三个并存的学校体系：普通学校体系，政治上奉行社会主义的学校体系（不久后取消），以及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学校体系。此外，又成立了极端正统派的学校体系。国家还对已有的阿拉伯教育体系进行管理。

1948年以前，阿拉伯儿童主要去英国政府运营的公立学校和各种宗教机构运营的私立学校上学。截至1948年，只有30%的阿拉伯儿童上学（主要是小学）。整个巴勒斯坦区只有10所阿拉伯高中。由于《义务教育法》同样适用于阿拉伯儿童，以色列彻底改变了当地阿拉伯教育资源不足的局面。[20]

几十年前，赫茨尔极富预见性地写道：“一旦犹太人真的回到家园，第二天就会发现，多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在不同国家生活了许多个世纪，受到当地国民的影响，因而彼此不同。”[21]赫茨尔说得没错。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不但影响到以色列社会的形成和

政治的演变，还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突。

这种冲突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踏上以色列国土时就体现出来。在“帕姆克莱森特”号运输船上，匈牙利女孩经常穿着比基尼在甲板上晒太阳，让摩洛哥男人感到震惊和难堪，在他们以前生活的社区，女性从不穿得这么暴露。

即便同样来自中东地区、被统称为“东方犹太人”的人，彼此之间差别也很大。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

> 来自伊拉克的大多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受过教育的精英；库尔德斯坦的移民几乎目不识丁；埃及犹太人认为自己属于“欧洲”犹太社团，他们中既有商业精英，也有共产党成立者；也门犹太人主要是工匠和商贩，他们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主要出于弥赛亚情怀。[22]

这些犹太人虽然各不相同，但普遍遇到欧洲移民颐指气使的对待。欧洲移民早于他们来到巴勒斯坦建立伊休夫，现在又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这并不涉及种族主义，和肤色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文化精英主义的体现。这些人发自内心地认为欧洲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如果可以向所有人传授欧洲精英文化，那对这个新生国家将再好不过了。

大多数东方犹太人给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带来的财富很少，这当然不利于欧洲移民改变对他们的看法。有些人在移民前长期在东道国过着贫困的生活，还有些人被东道国驱逐前就被剥夺了财产。即使有的人想方设法带来一些资产，国家还是常常以为这些北非国家或伊拉克的犹太移民赤贫如洗。

本 - 古里安虽然全力支持犹太人移民，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精英主义的倾向，他写道：

> 流散地的犹太社团不复存在[意思是说，诸如保加利亚和伊拉克的犹太人全都移民到以色列，致使当地犹太社团消失]，这些移民来到以色列，并不构成一个民族，而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一些缺乏语言、教育、根基、传统或民族梦想的人间渣滓。……将这些渣滓转变成一个文明、独立、有理想的民族（nation）……绝非易事，会遇到的困难和吸收移民时在经济上面临的挑战一样艰巨。[23]

为了让国家的文化尽可能先进，本 - 古里安甚至提议对东方犹太人

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孩子分开教育，进不同的学校，他担心如果不这样做，以色列将成为“黎凡特”，“退化”成“像阿拉伯国家”一样落后。[24]

为了不让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孩子“退化”成东方犹太人孩子那样，虽然没有成文规定，许多新成立的社区执行了隔离政策。新居民需要通过批准才能住进来，而刚移民来的许多东方犹太人无法通过批准，理由是他们“不适合这个社区”。[25]

以色列早期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为后来政治生态的剧烈变化埋下了伏笔，连许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承认这不是以色列历史上光彩的部分。演艺界著名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意识到，虽然国家在经济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但在对待新犹太移民的问题上实在是不尽如人意，和以前的承诺相距甚远。在以色列流行文化中，讨论这个问题最著名的作品是1964年上映的电影《萨拉赫·沙巴提》（*Sallah Shabati*），导演是讽刺作家以法莲·基翁（Efraim Kishon），他本人是匈牙利移民和大屠杀幸存者，曾被关在索比堡（Sobibor）集中营。有意思的是，这成为以色列第一部得到国际认可的影片，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萨拉赫·沙巴提（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一个东方犹太人名字，同时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在希伯来语中是“对不起我来了”[*selichah she-bati*]的意思）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来到以色列后，很快被送到过渡营。面对艰难的生活条件和他无法理解的欧洲文化，萨拉赫·沙巴提试图理解他在以色列的新生活的意义。影片滑稽地表现了他的矛盾心态：既要谋生，又要恢复他在先前国家（应该来自也门，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也门人的名字）所拥有的尊严。

这部影片因为深刻揭露了以色列社会存在的问题而取得成功。影片还暗示基布兹没有完全向移民敞开大门，这引发许多基布兹成员的不满，他们大概从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萨拉赫·沙巴提》提醒以色列人，把犹太人弄到以色列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对于这些将犹太国当作家园的人今后的生活，国家还有更多的义务和责任。

大量的移民给本-古里安从截然不同的民众中锻造出一个国家带来挑战。他决心让不同背景的犹太人不但服从国家的政治权威，还接受国家在道德和文化建设上的中心地位。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服从新成立的国家，没有任何事情比国家更重要。他说：“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实体、框架、政权、国际地位、主权或军队。如果国家没有成为人民内心、灵魂和意识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存在。国家是一种将所有

公民连接在一起的精神意识和责任感。”[26]他试图在以色列实现“国家主义”（本－古里安为此创造了*mamlachtiyut*一词，这个希伯来语词汇很难在英文中找到完全对应的翻译，大概可以理解为“国家主义”[statism]或“国家意识”[state consciousness]）。

本－古里安决心建立以国家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框架下，他的才华和独裁倾向都得到充分体现。凭借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智慧，他带领以色列人投入到国家体制和文化的建设中。几十年前他领导过的犹太工人总工会成为一个负责工人权利、教育、医疗甚至部分银行业务的强大组织。在许多工人看来，本－古里安政府主要通过犹太工人总工会来照顾他们，一位体力劳动者多年后指出：“宗教人士认为上帝在保护他们，我知道一直在照顾我的是犹太工人总工会。”[27]

与此同时，新上任的总理不但认为建设国家是当务之急，还认为只有自己能胜任这一角色，许多他不认可的计划遭到搁置。比如，以色列的《独立宣言》规定议会最迟于1948年10月1日正式签署宪法。但本－古里安知道，一部宪法所创造的司法体制会让部分法律失效，会巩固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的地位，在这一选举制度下任何党派都难以获得多数选票，宪法还能通过多种方式限制总理的权力。(7)长远看来，他赞成总理的角色将由标准的民主限制来管理，但眼下他需要得到不受限制的权力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8)所以他推迟了宪法的制定，以至于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没有一部宪法。

帕尔马赫是伊休夫最精锐的军事单位，本－古里安担心它和政治左翼势力的联系过于密切，为了打造一支没有政治属性、绝对服从于国家的职业化军队，他于1948年9月解散了帕尔马赫，这让许多人非常失望，他们感到本－古里安取缔了伊休夫最伟大的机构之一。

本－古里安实际上还禁止人们看电视，不允许成立政府电视台。曾担任过哈加纳高层领导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伊加尔·雅丁建议通过电视来教育新移民，让电视成为凝聚人心的媒介，但本－古里安没有退让，他认为电视传播的低俗文化对整个社会没有好处。(9)此外，政府还通过以色列广播局和军队电台这两个受政府控制的单位来实现对全国无线电广播的管控。

以色列的新闻报刊业非常活跃，但本－古里安也对其施压。他明确告诉新闻界，如果和政府合作就可以得到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消息，有的消息甚至来自总理本人。[28]但媒体经常严厉批评本－古里安，这种批判政治精英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作为回应，本－古里安也利用他的权

力极力影响一些特定新闻的报道方式。

本－古里安推行“国家主义”政策的方式非常生硬。最能体现人们对于这一政策感受的，是一项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让也门移民深信不疑的指控。许多人声称，1949—1952年，政府将许多也门移民在过渡营生下的孩子送给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家庭抚养。[29]政府先后成立了三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这项指控，但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迟至2001年，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还调查了800多起婴儿失踪案，其中750起案件中的婴儿被判定死亡，剩下的56起失踪案至今没有着落。[30]但许多以色列人（包括也门犹太人家庭）还是认为，政府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环境”。不管真相如何，这项指控很能反映在国家成立早期以色列社会底层人士的切身感受。

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政策显然走向了极端，以色列社会此后一直在努力解决该政策造成的许多后果。但本－古里安当时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他缔造了犹太国，如今不得不建设这个国家，但在这些刚刚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人们长期形成的认知中，政府是一个侵犯和欺骗个人的实体。那些来自中东的犹太人存在这样的认识不难理解，但即便是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或以色列的犹太人，对以前国家的政府也没有好感，委任统治时期伊休夫的犹太人对英国政府同样充满敌对情绪。本－古里安很清楚，在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群基础上建立和谐、稳定、团结的民主社会是一项艰巨任务。他有时的确操之过急，但也展现出先见之明和过人的才华。考虑到以色列社会当时将要面临的严峻考验，恐怕正是本－古里安有时以高压方式执意打造出的这个以忠于国家和政府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才有可能让羽翼未丰的以色列幸存下来。

另一个让本－古里安感到非常棘手的人群是宗教人士。在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建国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欧洲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拒绝加入这一运动，反对建国。有的宗教领导人从神学理论出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干预上帝的行为，虔诚的犹太人应该等待上帝来结束他们的流散生活，而不是主动回到巴勒斯坦。还有人对犹太复国主义中明显的世俗主义倾向深恶痛绝。这些犹太人称自己为哈瑞迪人，(10)并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专门反对与犹太复国主义相关的一切。他们驱逐持不同政见的异己者，有的家庭因此妻离子散。哈瑞迪领导人明令禁止人们回归巴勒斯坦，认为这是对犹太教的背叛。

但希特勒改变了这一切。大屠杀结束后，许多哈瑞迪社团被摧毁，有的完全消失了。几十万哈瑞迪犹太人被谋杀、毒死或烧死。虽然他们

仍然反感伊休夫，认为其极端世俗的理念会误导人心，但哈瑞迪人不得不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欧洲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立场开始变化，从强烈反对变为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模糊态度。他们继续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世俗倾向，将马帕伊党比作希腊统治时期接受希腊文化的犹太人。他们还相信本-古里安要针对他们发动一场意识形态战争。如果不作出反击，国家将把下一代培养成缺少宗教传统（甚至反对宗教传统）的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将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很不情愿地参与了以色列政治，签署了《独立宣言》。他们本想在建国后远离政治，但考虑到这样一来自己无法影响到以色列的政策和国家的属性，他们对政治的参与越来越多。

在对待哈瑞迪人方面，本-古里安没有长远计划，他深信这些人极端正统的生活方式只是欧洲犹太社团生活的残余，过不了多久就会自行消失。急于维持自己政治地位的本-古里安不愿意再发动一场政治战争，他同意继续维持他在1947年和宗教人士达成的协议：安息日将成为全国休息日，政府和军队的厨房必须符合犹太教规，包括结婚、离婚、改宗等涉及个人身份的事务由宗教法律管理，宗教人士能够保持教育上的独立性。

政治能让奇奇怪怪的人成为盟友。本-古里安很不信任政治左翼人士和共产主义者，也不愿意让梅纳赫姆·贝京的赫鲁特党（*Herut*）加入联合政府，这样他就没什么选择，不得不同第三大政党联合宗教阵线组阁，这个党其实又由两个犹太复国主义宗教政党和两个非犹太复国主义宗教政党组成。哈瑞迪人利用这一政治优势（即他们可以通过退出联合政府让议会提前举行选举），不但建立了独立的宗教学校体系（这些学校基本不讲授跟宗教无关的内容），还让自己的孩子免服兵役，这样他们到了参军年龄就可以继续在犹太经学院学习，不用接触在服兵役期间肯定会遇到的世俗犹太人。

本-古里安关于哈瑞迪人会消失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们的人数快速增长，很快成为以色列一股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政治上他们能同时对左翼和右翼政党施加强大的压力，但他们拒绝让自己的议员担任部长（偶尔有例外），这样一来当政府做出违反犹太教规的决定时他们不用承担责任。

本-古里安最明显的错误正是同意免除哈瑞迪人的兵役。当时每年

只有400人免除兵役；但到2010年，利用这一理由免除兵役的哈瑞迪人达到每年6.25万人，增长了150倍，而同一时期以色列人口仅增长了12倍。[31]

独立战争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为1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他们大多生活在内盖夫沙漠（主要是贝都因人）和加利利被称为“小三角”的地区（约以停火协议中约旦转给以色列的土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和英国统治时期，这些阿拉伯人就缺少有效的领导体制，加上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当地阿拉伯领导人的逃亡，留下来的阿拉伯人大多很贫困，教育程度较低，缺乏领导能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导阶层的逃亡和以色列阿拉伯人几十年后陷入的困境有着直接联系。

以色列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是很大的挑战。《独立宣言》承诺所有以色列人“享有平等公民权利以及在各种临时和永久的国家机关中拥有相应代表权”，这种理想无疑得到了本-古里安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以色列领导人知道，阿拉伯人是成为生活在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的难民，还是成为新成立国家的以色列公民，取决于他们当时是否选择逃亡，完全是历史偶然性决定的。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阿拉伯人一直不用服兵役，直到1954年，政府决定征召阿拉伯人入伍。当媒体公布这一计划后，大约有6万阿拉伯人申请加入以色列国防军，[32]但国家最终没敢落实这一计划。以色列阿拉伯人真的会愿意同绿线以外的敌人作战吗？这些敌人中就有他们的家人。出于这一担忧，政府从未大规模向阿拉伯人征兵。当然，不同阶段的原因不尽相同。建国初期，大多数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忠诚抱有疑虑，但后来几乎没什么阿拉伯人愿意服役。

相比于征兵问题，以色列对以色列阿拉伯人忠诚度的怀疑所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很多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生活在敌国的阿拉伯人一样仇视这个新生国家，这些人可靠吗？他们会不会成为或已经成为威胁以色列的第五纵队？出于这些顾虑，本-古里安对以色列阿拉伯人实行军事管理。这是个讽刺的决定，因为以色列所采用的军事管理方法正是在当年英国针对伊休夫的《委任统治防御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军事管理下，以色列阿拉伯人由军事法庭审判，他们的行动受限（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村庄），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在国家中心地区找到工作。他们的初等教育也受到影响，因为在军事管理下，谁能在阿拉伯学校教书由安全部门决定，老师的教学能力并非录用的决定因素。[33]除了参加共产党，以色列阿拉伯人基本没有参与犹太人

的政党。[34]

随着以色列安全形势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担心阿拉伯人成为内部的第五纵队，包括梅纳赫姆·贝京（本－古里安仍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应当结束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军事管理。迟至1966年，在相对温和的列维·艾希科尔担任总理期间，这一管理体制才被正式废除。(11)

军事管理是以色列面对威胁采用的权宜之计，但对以色列阿拉伯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改变了他们对国家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几十年后以色列的政治和政策。

至少让本－古里安感到惊讶的是，正当“流散地万民回归”的古老梦想奇迹般地成为现实时，(12)有一个犹太社团却不为所动。几十万犹太人从难以生存的欧洲和阿拉伯国家来到以色列，但在美国的500多万犹太人中只有不到2000人移民以色列。

本－古里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对此深恶痛绝。建国多年后，他悻悻说道：“几百年来，犹太人在祷告时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拥有自己的国家？谁也没想过这个吓人的问题：我们有了国家后能否找到同胞？”[35]建国后，许多生活在危险地区和难以生存地区的犹太人来到以色列，但许多已经在流散地过上舒适生活的人并没有回来。

本－古里安将美国犹太人比作在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可以回到以色列但却选择留在流散地的那些犹太人，但美国犹太人并不觉得他们处于流散状态。两千年来犹太人都没有生活在锡安，这已经成为犹太人生活的常态。本－古里安凭什么觉得他们有义务放弃安稳而繁荣的生活，去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国家？

虽然许多美国犹太人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过流散生活，有的知名美国犹太人甚至反对建立犹太国的观念。美国犹太教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是当时一个全国性的犹太组织，其主要议程就是反对以色列建国；该组织不仅从事恶毒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甚至在分治决议悬而未决时帮阿拉伯发言者准备在联合国的发言稿。

然而，大多数犹太团体没有这么极端，即使它们对建国会对犹太教和美国犹太人的地位造成的影响态度暧昧。美国犹太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或许是当时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美国

犹太社团组织，它不反对建立犹太国的观念，更没有采取行动加以反对，但它也不希望以色列成为犹太世界的中心。美国犹太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劳斯坦曾对该组织成员说，美国犹太委员会支持1947年分治决议，主要是因为犹太国能够解决一个人口问题。他说：在分治决议的通过上，“我们配合，是因为我们相信[犹太国]是拯救几十万欧洲犹太幸存者最务实的解决办法”[36]。换言之，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国意味着犹太民族的重生，而许多美国犹太教领导人要么反对建立犹太国的观念，要么认为这只是安置欧洲无家可归犹太人的办法。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算是美国最忠于犹太事业的知名人物了，但即使是他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逾越节晚餐上对庆祝者说：“基于我对犹太教本质的理解，我不太接受建立一个拥有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的犹太国的观念。”他感到历史已经改变了犹太人：“我担心犹太教会受到来自内部的伤害，特别是发展狭隘犹太民族主义带来的伤害。我们不再是马卡比时代的犹太人了。”[37]以色列的建国也没怎么改变他的观点，他告诉朋友：“不管是出于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的考虑，我从来不认为建国是个好观念。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战斗下去。”[38]这番话显然算不上是鼓舞人心的支持。

以色列建国后，雅各·布劳斯坦明确告诉本－古里安，美国犹太社团的领导层不会容忍以色列的越界行为。在一份重要的表明立场的文件中，他写道：

> 大多数美国犹太人，无论老少，也无论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热爱他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美国在我们的父辈需要时迎接了他们的到来。在美国的自由体制下，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获得了几个世纪来未曾有过的自由和安全感。和所有其他在这里登陆的受压迫群体一样，我们已经真正成了美国人。
>
> 我们强烈反对视美国犹太人为流散群体的观点。美国犹太人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和美国的未来紧密相连。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也不需要其他选择。[39]

布劳斯坦提醒以色列，美国不是流散地，让美国犹太人移民犹太国的请求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至于本－古里安（和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将以色列视为犹太世界唯一中心和全世界犹太人唯一代言人的观点，布劳斯坦也针锋相对：

犹太世界没有唯一的代言人，不管那位所谓的代言人想做什么。[40]

布劳斯坦的话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所持观点的直接攻击。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自己代表着全世界犹太人的声音。纳粹分子灭绝了波兰犹太社团后，美国犹太人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意义最重大的犹太社团，但恰恰是他们让以色列放弃这样的想法。在移民问题上，布劳斯坦的观点也非常明确：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多是因为无处可去。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不为所动。

美国犹太人后来的言论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观点至今没有太大变化。美国犹太人从来没有大规模移民以色列，选择移民的大多为正统派教徒，这些人只占美国犹太人的10%。剩下90%的美国犹太人几乎没有产生在统计数据上有意义的向以色列的移民。

20世纪60年代末（六日战争以后）和70年代初，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态度大有升温，支持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认同的重要支柱。但随后，以色列在美国犹太认同中占据的核心地位又开始弱化。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巴以冲突的持续以及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担忧不断侵蚀着他们对以色列的热情。建国初期让本-古里安焦头烂额的问题在几代人后再次出现。

虽然对美国犹太人很失望，但本-古里安继续推进吸收移民的工作，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人口如此少的国家成功接收如此多移民的先例。当初建立的过渡营最终遭拆除，东方犹太人逐渐在以色列社会站稳脚跟，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军事管理也宣告结束。在这些来自世界各地、既贫穷又不识字的犹太乌合之众中，本-古里安建设起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移民人数相对于原有居民是“任何一个移民国家闻所未闻的”，并且能从大多来自非民主国家的移民中锻造出一个民主国家，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令人惊叹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家中，以色列是为数不多几个坚持至今的本质上民主的国家之一。[41]

随后几十年，在以色列生活仍将复杂而危险，但大多数以色列人——甚至包括不少世俗人士——仍然相信，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们取得的成功太令人惊讶，看上去仿佛冥冥中自有帮助似的。人们也不会忘记，如果没有大卫·本-古里安这位才华横溢与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他们

的国家就不会诞生。他不仅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可圈可点，是一位克服重重困难将赫茨尔的梦想变成现实的伟人。

(1) 欢庆托拉节（Simchat Torah）是犹太历中一年最欢乐的节日，犹太人在这天庆祝他们得到《托拉》。在传统犹太社团，人们会围成圈跳舞，然后围着《托拉》卷轴转7圈。这种舞蹈称为“哈卡弗特”（*hakafot*）或“哈卡弗斯”（*hakafos*）。

(2) 从技术意义上讲，立宪会议的目的是制定宪法，这个任务完成后就要解散。但立宪会议宣称自己是立法机构，推迟了宪法制定。

克奈塞特（这是塔木德时期犹太立法机构的名称，原意为“大聚会”）有120个席位，采用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比例代表制。一个政党如果能获得四分之一选票，就能得到克奈塞特中30个席位。但由于存在许多互相竞争的政党，大多数政党无法获得足够的选票，总理只能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直到组阁政党的席位超过席位总数的半数，达到61个。每个政党往往持不同政见，所以联合组阁的政党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分歧。小党会威胁退出联合执政，以此限制总理的权力，以色列建国以来政府体制长期不稳定也源于此。

(1) 以色列总理有权保留部分内阁部长职位，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把这些职位分配给其他部长。本－古里安不是唯一一个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总理，后来的列维·艾希科尔和伊扎克·拉宾同样如此。有的总理会同时担任其他部长职务。

(2) 以色列视耶路撒冷为首都，虽然没有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译注

(3) 传统犹太教律法只将母亲是犹太人或完成改宗程序的人定义为犹太人。《回归法》对犹太人的定义不是根据传统犹太教律法，而是根据《纽伦堡法案》。

(4) 截至2015年，以色列人口已较1948年建国时翻了10倍。据估计，同一时期全世界流散地犹太人的数量从1050万下降到780万。

(5) 埃及对所有以色列船只封锁了苏伊士运河，所以无法走海路。

(6) 这次行动的官方名称是“鹰翅之上”，但俗称为“魔毯”。“鹰翅之上”实际上不出自《以赛亚书》，而来自《出埃及记》（19：4）：“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7) 反对党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也对制定宪法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宪法将巩固本－古里安执政党的地位，对反对党不利。此外，贝京还担心本－古里安政府通过的宪法会让世俗力量和反宗教力量变得更强大，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发展方向。

(8) 本－古里安和后来的总理都没有制定宪法，但以色列有一系列《基本法》，具有实际宪法的作用。但《独立宣言》中承诺的宪法从未得到签署。

(9) 1960年在摩西·夏里特担任总理期间以色列才开始有电视行业。

(10) “哈瑞迪”一词出现在《以赛亚书》（66：5）中，意思是“在上帝面前颤抖的人”。

(11) 艾希科尔是一位被人们评价过低的总理。实际上，他改变了许多本－古里安的政策和规定。比如，本－古里安不允许在思想上影响了梅纳赫姆·贝京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雅博廷斯基埋葬在以色列。1964年，在艾希科尔执政期间，雅博廷

斯基夫妇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的国家公墓。（Shmuel Katz, *Lone Wolf: A Biography of Vladimir[Ze'ev]Jabotinsky* [Fort Lee, NJ: Barricade Books, 1995], p.1790.）

(12) “流散地万民回归”是犹太民族有一天将重新聚集在先祖之地的理念，这是犹太人千年来的民族叙事的核心成分，也是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圣经在记叙犹太人流散之前就提到了“回归”的承诺：“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申命记》30：3 - 4）

第十章
以色列登上国际舞台

面对阿拉伯人的仇视，我们绝不能退缩，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的双手随时可能沾满我们的鲜血。我们不能转移目光，以防自己双手松弛。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主动武装自己，变得强大而不屈，以防对手将我们手中的剑击落，置我们于死地。

——1956年摩西·达扬在罗伊·罗特伯格葬礼上的悼词

委任统治时期发生过多起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但英国官员（只要他们愿意）总能找到并惩治袭击者。但在签订停战协定后的中东，袭击者常常从约旦或埃及越境发动袭击再退回那里，以色列想抓获他们就变得越来越难。委任统治时期，维持这一地区的治安是英国的责任，也符合英国的利益，但英国人离开后，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不愿像英国那样维持当地的治安。阿拉伯人潜入以色列境内无人照看的耕地种植（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抢劫边境的村庄，发动经常造成人员死伤的暴力袭击，然后又穿越边境回到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的阿拉伯官员一般不会惩治这些肇事者。

到1953年，以色列建国已经有五年，独立战争也已过去四年，但以色列公民仍然经常遭到从约旦和埃及过来的巴勒斯坦人的袭击。这些袭击手段残忍，次数增多，在独立战争后三年里，每年都有几千起越境和袭击事件发生。[1]

1953年10月13日，32岁的苏珊·卡尼亚斯（Susan Kanias）和她三个幼子正在耶胡德（Yehud）的家中熟睡，这座小镇位于罗德（Lod，以前叫利达）以北，靠近以色列版图最狭窄的部分。西临地中海，东靠停火线，中间只有9英里距离，耶胡德就正好夹在海岸线和边界线中间，离停火线不到5英里距离，因而和其他许多村庄一样很容易遇袭。趁着夜色，一伙巴勒斯坦越境者闯入她家，向屋内投掷了一枚手榴弹，苏珊和两个孩子当场死亡，一个孩子受伤。

类似的谋杀案件还有很多。1951—1956年，几百名以色列人被潜入境内的“费达因”（*fedayeen*，阿拉伯语“自我牺牲者”之意）杀害，受

伤者更多。[2]但这次不同于以往，卡尼亚斯家遇袭后，以前不知如何应对这类袭击的以色列国防军此时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有些以色列人属于“行动派”，就像1923年提出“铁墙”理论的雅博廷斯基一样，这些人一直认为要想让阿拉伯邻国严肃对待越境者，以色列只有回击，而且是强有力的回击。1953年初，以色列国防军开始训练一支开展快速报复行动的精锐部队，这些强硬分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边境的安宁。他们成立了由阿里埃勒·沙龙指挥的101部队，成员大多为经过精心挑选的志愿者，许多人在独立前曾在哈加纳精锐部队帕尔马赫服役。

这支部队的训练非常严格，训练科目包括“越境侦察，和敌方巡逻人员与村庄站岗人员的战斗……急行军……搏击，柔道，各种武器的使用以及蓄意破坏的训练”[3]。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完成未来的任务，指挥官还在训练中加入了实战内容。

苏珊·卡尼亚斯和她的孩子遇害的当晚，101部队立即得到反击的命令。战士们越过停火线，来到约旦河西岸边境一个名为凯比亚（Qibya）的阿拉伯村庄：

> 以色列国防军的主力部队……准备了约700千克爆破炸药。工兵在便携式手电筒的光线下安装炸弹，摧毁了45栋房屋，整个过程中没有遇到约旦军队的阻挠。将近3小时的爆破行动从12点30分持续到凌晨3点20分。军队没有检查房屋内是否有居民，有的居民躲在了地窖里和阁楼上。军队相信行动进行到这一步，房屋内已经没有（活）人。在占领村庄和爆破阶段，总共有50—60名居民死亡……两三天后，约旦人在搜索完废墟后宣布这次行动造成69（或70）名平民死亡，其中大多为妇女和儿童。[4]

组建101部队是以色列应对新挑战的方式，这种挑战在未来几十年将一直存在。以色列周边分布的全是热衷于使用暴力手段的敌对国，这些邻国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还宣誓未来也不会承认，这意味着要想生存下来，以色列必须投入巨大财力和精力维持一支比敌军更强大的军队。101部队就在这种思想下应运而生。面临持续的生存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创造了一支战斗力空前的军队，从此拥有了世界一流水平的特种部队。

这些报复行动蓄意使用了残暴手段，意在明确表明以色列不会容忍针对以色列无辜公民的袭击，报复行动的地点选在以色列境外，其间会杀害一些无辜的阿拉伯人。

一些志愿加入101部队的战士虽然身经百战，也无法接受这些残忍的行动。一些人因为凯比亚行动而受到精神创伤，还有人拒绝加入行动，其中包括曾经在独立战争期间执行过无数袭击任务的帕尔马赫成员。一位战士回忆起这次行动时不断问自己：“这些尖叫和哭泣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吗？这些农民（*fellahin*）能对我们犯什么罪？战争太残酷了，大家普遍情绪低落，没人说话，都很沉默，独自承受着一切。”[5]

一个世纪以来，以色列饱经战乱，(1)许多以色列人在思考如何平衡生存与道德的关系，生存下去诚然重要，但他们也试图建立一个拥有道德标准的社会，这种深刻的反思已经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传统。

反思的声音早在独立战争时就已出现。战争刚结束，S.伊扎尔（这是笔名，真名是伊扎尔·斯米兰斯基）就出版了《赫贝赫泽》（*Khirbet Khizeh*），这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想捕捉战争后期以色列军队对一个阿拉伯村庄所采取的行动在道德上的复杂性。小说情节进展缓慢，叙事者像是在迷雾中审视这个世界，又像是在梦境中。逐渐地，叙事者意识到被赶出家园的阿拉伯人所承受的苦难：“我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突然对一切有了不同的理解，更准确地说，一切都指向流散。这就是流散，流散就是这样，流散看上去就是这样。”[6]

伊扎尔绝不是在质疑以色列的合法性，也没有怀疑以色列人为独立战争作战的意义。和后来许多以色列男女作家一样，他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只关注自己的损失，也要看看作战另一方的损失。（以色列人当然明白，如果敌人也有这种反思，这一地区这些年来很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在小说末尾，一位叫摩西的战士对叙事者说：“我们的移民将来到这个‘沦为废墟的村庄’[这是阿拉伯语‘Khirbet'的意思]，这个村庄的名字我过会再讲，他们会占下这块地，在上面耕种，把它建成美丽的地方。”小说的叙事者讽刺挖苦了A.D.戈登的“犹太人在土地上劳动”的梦想和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理念：

> 太好了，我们将在这建房子，吸收移民。如何吸收？我们将在这开合作商店，建学校，可能还会修一座犹太会堂。这里还会有辩论各种事情的政党。人们在这耕地、播种和收获，取得伟大的成就。希伯来赫泽村（Hebrew Khizeh）万岁！到那时，谁还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被我们清理和占领的沦为废墟的赫泽村（Khirbet Khizeh）？我们来了，射了，烧了；我们将这里炸掉，将当地人驱

逐和流放。[7]

伊扎尔提出的批评非常严厉，但同样重要的是，他的书没有遭到冷遇，作者也没有被以色列社会遗弃。相反，《赫贝赫泽》成为以色列的畅销书，1964年还被收入以色列高中教材。[8]S.伊扎尔多次被选为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自我批判仍将是以色列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并非每个人都觉得101部队和凯比亚行动难以接受。有些战士认为这非常必要，虽说在道德层面上很复杂。被摩西·达扬称为“巴尔·科赫巴以来我们最伟大的战士”[9]的梅厄·哈尔-齐昂是101部队极具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他曾说：“我们的行动不包含对阿拉伯人的仇恨，也没有任何仇恨的因素。在我们受命做的每件事中，我们都能看到保卫[以色列的]生存的必要性。”[10]在以色列国防军找到有效应对措施之前，几百名无辜的以色列人被杀害。哈尔-齐昂、阿里埃勒·沙龙和101其他成员代表着诺尔道和比亚利克主张培养的新犹太人，哈尔-齐昂等人大声宣称：“不能再发生基希涅夫事件！”成立犹太国，就意味着犹太人不再仅仅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死去。

凯比亚村行动让阿里埃勒·沙龙进入公众视野，他是一位英勇而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也是以色列一位很难做出简单评价的争议性人物。沙龙（这是他后来希伯来语化的姓氏）出生于1928年，在特拉维夫旁名为马拉尔（Malal）村的莫沙夫（合作农庄）长大。母亲维拉和父亲撒母耳·施恩内曼（Samuil Scheinerman）都是来自俄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很特立独行的人，把花生和红薯等农庄其他人眼中难以成活的作物种活了。大家叫他阿里克（Arik），他和妹妹都上过高中，这在集体主义农庄的人看来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在阿里克小时候，父母就让他明白力量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在他13岁的成人礼上，父亲送给他一把精雕细琢的匕首，这个礼物很特别，父亲想告诉他的道理很明显。[11]在伊休夫出生和长大的新犹太人应该说希伯来语，拥有强壮身体，决意用长老茧的双手掌握自己的命运。阿里克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袭击凯比亚村的行动也体现了这种世界观。沙龙创立了101部队，带队袭击了凯比亚村，对此他从不后悔。许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得到的命令非常明确。凯比亚村将成为一个教训。我要给阿拉伯地方军造成尽可能多的伤亡。”[12]沙龙深信必要的报复行动有效而合法。

和自己深爱的这个国家一样，沙龙的一生中似乎没有连贯的政策，不时会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选择。但他认为自己的原则从未变过：以色列的生存取决于实力和智慧。生存意味着在不同时期要使用不同的政策。有时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不管他们藏在哪里；有时又需要减少损失，放弃以色列先前控制的土地。这些事沙龙都做过，他还做过更多的事。几十年后，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谴责沙龙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纵容黎巴嫩基督徒屠杀穆斯林。这过去多年之后，沙龙当选总理并于2005年一手策划和实施了加沙撤离计划。

凯比亚事件后，全世界都谴责以色列，美国犹太社团也不例外。[13]但本－古里安不为所动。当天晚上，他把沙龙叫来讨论这一事件。据沙龙回忆，本－古里安当时说："我不在意世界如何看待凯比亚事件，我在意的是这一地区如何看待它，后者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此生存。"[14]以色列国防军最显赫的"行动派"摩西·达扬从全世界对凯比亚事件的强烈谴责中得出另一个结论："阿拉伯和其他民族都可以这样做，但犹太人或以色列这样做却得不到原谅。"[15]

达扬极力主张实施报复行动。1953年12月，就在凯比亚事件几个月后，达扬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以色列政策的走向再清楚不过了。达扬是在以色列最早成立的基布兹中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新犹太人的典型代表。1941年在帕尔马赫服役期间，他在协助英军入侵法属叙利亚的行动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从那以后一直戴着他标志性的眼罩。

成为以色列这支年轻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后，达扬着手改组以色列国防军的结构，调整国防军的战略。他让能力最强、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从总部机关下到作战部队，要求指挥官必须拥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这如今仍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特点）。看到独立战争中以色列承受的巨大损失，并意识到以色列和邻国的冲突并未结束，他决心让敌方杀害以色列人的成本高到他们难以承受。他决心将以色列国防军打造成中东最令人生畏的军队。

和以色列一样，敌人也在调整策略。潜入以色列的阿拉伯袭击者从个人演变为拥有武装、经过训练的费达因分子，他们得到来自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和保障，特别是埃及军队。

位于加沙边境旁的纳哈尔奥兹（Nachal　Oz）基布兹经常成为攻击目标。1956年4月29日，这个基布兹21岁的罗伊·罗特伯格（Roi

Rotberg）正骑马在田野里巡逻，他经常看到加沙人来偷粮食，这一天他又在田野里看到一群阿拉伯人，便赶紧骑马过去驱赶他们，但没想到这是个圈套，他走近这些“农民”后，一群费达因分子突然出现，开枪将他打死，还把尸体带到加沙残忍地肢解。

巧合的是，就在几天前，达扬还见过罗伊·罗特伯格。他参加了葬礼，读了一份简短的悼词（只有238个词），后来达扬和许多以色列人在解释以色列和邻国之间旷日持久、成本高昂的战争不可避免时，常常会引用悼词中经典的语句。达扬在悼词中提醒听众，阿拉伯人的憎恨和暴行并不意外，他说：“我们不要一味谴责这些凶手。我们为什么要抱怨他们仇视我们？80年来，他们在加沙的难民营亲眼看到我们将他们先祖生活的土地和村庄建设成我们的家园。”[16]

以色列的存在让阿拉伯人感到愤怒，因此，达扬提醒听众和全国人民，以色列人应该时刻做好投入战争的准备。在演讲中，他通过大量引用圣经典故提醒听众，为这块土地战斗并非新鲜事，早在几千年前犹太人就是如此。达扬还说：“面对成千上万阿拉伯人的仇视，我们绝不能退缩，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的双手随时可能沾满我们的鲜血。我们不能转移目光，以防自己双手松弛。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这是我们的选择——主动武装自己，变得强大而不屈，以防对手将我们手中的剑击落，置我们于死地。”[17]

这种观点不但是达扬的指导原则，也是他帮助建立的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指导原则。

正当以色列在为不可避免的长期冲突做准备时，埃及也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政治转变。1952年，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s Movement）发动军变，驱逐了当时统治埃及的法鲁克（Farouk）国王。纳赛尔决心肃清殖民主义在埃及的残余势力，他认为这窒息了阿拉伯世界，使之无法发挥真实的潜力。这位新埃及领导人决心建立一个全新的由他领导的阿拉伯世界。

以色列在纳赛尔的世界观和计划中有独特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纳赛尔视以色列和以色列人为该地区殖民主义的最新体现。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埃及也有利用价值，这个敌人的破坏力能让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纳赛尔告诫人们：“阿拉伯团结一致是成功复仇的前提。”[18]

独立战争失利以来，阿拉伯世界一直在等待机会复仇，希望在“第二

轮打击”中消灭犹太国。约旦高级官员阿兹米·纳沙希比（Azmi Nashashibi）早在1949年4月就宣布：“巴勒斯坦的战争迟早会再次爆发。”阿拉伯领导人对美国记者肯尼斯·比尔拜（Kenneth Bilby）说，就算这场冲突持续一百年，“复仇之日终将到来”[19]。纳赛尔联合阿拉伯人向犹太人报仇的号召得到广泛响应。1956年，本－古里安警告以色列人战事已近，在4月的一次演讲中，他说以色列将经历比1948年更严峻的考验。

在尼罗河上修建阿斯旺大坝，是纳赛尔的阿拉伯复兴计划的重要内容。他希望通过修建大坝重振埃及，这项雄心万丈的工程需要大量资金，纳赛尔从美国和英国大举借贷。当时处于冷战时期，纳赛尔还巧妙利用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不但接受了西方的经济援助，还向苏联请求更多资助。他甚至承认了共产主义的中国，这在西方看来属于公然挑衅行为。

埃及还扩充军备，建立起比埃及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军火库。1955年8月，在苏联的安排下，捷克斯洛伐克同埃及完成了一笔军火大单。（这深具讽刺意味，因为独立战争中许多以色列战士使用的武器就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埃及从捷克购买了包括坦克、轰炸机、战斗机在内价值3.2亿美元的武器，通过这笔交易，苏联在中东打造了一个军事大国，打破了地区均势。

为了惩罚埃及的军火交易，并对埃及承认中国作出回应，美国宣布不再资助阿斯旺大坝工程，英国随后作出同样决定。但这正是纳赛尔想要的结果。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大量聚集的民众前发表演讲，要美国人“在愤怒中窒息”[20]。随后摊出王牌，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参见地图6），运河收入将用于修建阿斯旺大坝。纳赛尔立刻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

这个消息让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无比愤怒。运河1869年竣工后，已成为英国不可或缺的水路，纳赛尔对运河的控制冲击到英国和法国的利益。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英法股东也因为资产被“盗走”而怒不可遏。如果纳赛尔的目的是打击控制埃及的殖民主义者的威风，那他完全成功了。

1956年夏天，纳赛尔继续对抗西方，他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政治野心演变成了军事野心。以色列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纳赛尔的军购让埃及成为可怕的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岌岌可危。法国也越发警觉。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法国担心在阿拉伯世界地位日益提高的埃及会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先进的捷克武器如果落入阿尔及利

亚“分裂分子”手中，对法国人来说将是灾难。

除了英法两国，埃及的强硬让以色列领导人也越来越担心。随着埃及军力的提升，很多人开始怀疑以色列能否生存下来。纳赛尔并没有掩饰他购买这些武器的原因：这些苏联的新式武器能够帮助他消灭犹太国。

以色列人对大屠杀记忆犹新，不敢轻视来自埃及的威胁。数十万以色列人志愿挖掘战壕。有的人将自己不多的积蓄和珍爱的珠宝捐给国家购买军火。(2)许多学生甚至把午饭钱捐了出来。

但这时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和1948年时已大不相同。建国后不到十年，法国和英国（不久以前还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对犹太地下组织成员处以绞刑）都视以色列为潜在的军事合作伙伴。50年代初为了巩固双边关系，法国和以色列举行了一系列会晤。1955年10月25日，取代本－古里安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摩西·夏里特访问巴黎（本－古里安几年之后再次成为总理），法国总统埃德加·富尔对夏里特说：“我一直是以色列的朋友，但现在法国之所以要帮助以色列，不是出于友谊，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考虑。”[21]

一年后的1956年10月，三国秘密达成《色佛尔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以色列将对纳赛尔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一天内打到苏伊士运河，这时法国和英国会呼吁双方停止敌对行为，要求埃及向国际航运开放运河。英法还会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到运河以东几英里外，但根据协议，以色列可以不服从，英法的要求只是给国际社会看的。

以色列虽然要派出地面部队作战，但能从协议中得到不少好处。同法国建立合作关系表明这个小国不再孤军作战，从国际棋盘上一枚棋子成为一名棋手。根据协议，以色列能在英法军队的空中掩护下通过军事行动解除埃及的威胁，以色列还能获得这两个欧洲国家在国际上的支持。此外，法国还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这些武器在10月上旬被运送到以色列。

当时担任国防部总干事的西蒙·佩雷斯在同法国的军火协议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武器在海法港秘密交接时，他带上多年前写过《银盘》的拿单·奥尔特曼来到现场。这位诗人看到此景，深有感触，写下了《有一天这会被谈起》一诗。[22]“昨晚我梦到钢铁，许多钢铁，全新的钢铁。”他在诗中写到运送武器的码头搬运工，“这些人背着装满弹药的箱子，弹药箱和铁链碰撞，发出清亮之音”。在奥尔特曼看来，这些人不

是普通的码头搬运工，“当他们的双脚踏上陆地的那一瞬间，他们成为犹太人的力量的象征”。

奥尔特曼的语调和以前完全不同，他描写的不再是“有待建成的国家”，而是“犹太人的力量”。

犹太人的军火来得非常及时。为了支持费达因分子，纳赛尔已经把埃及军队开进加沙地带。西蒙·佩雷斯回忆说：“当时以色列人认为纳赛尔随时可能发动进攻。”[23]

1956年10月29日，正当以色列紧张筹备后来称作西奈战役（Sinai Campaign）的战争时，国内又发生了一起悲剧。建国八年来，以色列阿拉伯人一直生活在军事统治下，犹太人对他们的戒备心很强。由于同埃及开战在即，以色列宣布和约旦交界的“小三角”地区所有阿拉伯村庄于下午5点钟进入戒严状态，其中包括卡西姆村（Kfar Kassem）。

这个消息在戒严开始前几分钟才公布，因此大多数阿拉伯劳工没有及时接到通知。大多数碰到以色列军队的阿拉伯工人被放行，但50多名来自卡西姆村的劳工在5点钟后收工回家时，遇到国防军的巡逻队，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杀死了47人，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这是建国以来针对阿拉伯人规模最大的屠杀。

几名以色列军官被捕，后来还被定罪，但不久后全部被释放。本-古里安称这一事件为“可怕的暴行”[24]，许多以色列官员多年后深刻忏悔了这一屠杀行为。2006年10月，以色列教育部部长余莉·塔米尔（Yuli Tamir）要求全国学校纪念卡西姆村屠杀，反思是否应该听从明显违反道德标准的命令。2007年12月，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在穆斯林古尔邦节期间访问卡西姆村，请求这一罪行能够得到当地阿拉伯人的原谅。他在仪式上说：“这里曾发生过可怖的事件，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抱歉。”2014年10月，以色列第十任总统鲁文·里夫林成为第一位参加每年一度的卡西姆村纪念仪式的以色列总统。

这一事件对以色列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还体现在法律上。审判期间，以色列法院第一次讨论到在什么情况下以色列安全人员可以不服从明显违法的命令，哪怕是顶头上司下的命令。本雅明·哈利维法官（他单独审理的这一案件）写道：“所有明显违法的命令有个显著特征，这些命令上方都应该飘着一面黑色旗帜，上面警告：‘禁止执行！’”哈利维裁决中“明显违法的命令”成为以色列人在讨论战争行为是否道德时经常会用到的表达。

10月29日下午5点（正当卡西姆村开始戒严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开进西奈。在迅速切断了西奈半岛埃及空军和主要陆军基地之间的所有通信联系后，以色列空降兵在阿里埃勒·沙龙的带领下悄悄空降在西奈半岛的米特拉（Mitla）山口，这是通往苏伊士运河道路的一处要塞。10月30日，空降兵部队穿过广阔的沙漠地区，轻松占领了三个埃及军事基地，来到离运河不到50千米的地方。

10月30日，英国政府向以色列和埃及发布之前秘密制定的最后通牒，要求双方撤出苏伊士运河，此举实际上是要求埃及在宣布运河收归国有后放弃对此地的控制权。根据计划，以军没有撤离，埃及也拒绝答应最后通牒中提出的要求。第二天，英国和法国的战机轰炸了埃及机场，但随后六天时间，在地面同埃及作战的只有以色列军队，英法军队没有出现。

最终，为了避免这次有所节制的军事冲突升级为地区战争，美国要求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撤军。苏联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当时苏联刚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在此过程中杀害了几千名匈牙利人，因此在道德层面缺少国际影响力。尽管如此，美苏利益的合流仍意味着，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不得不退让。

为了不让加沙地带再次成为进攻以色列的大本营，以军没有撤出西奈半岛。最后，美国同意以色列在得到安全保证后再撤出该地区。美国承诺以色列，只要以色列同意“彻底而快速地撤离”在这场军事行动中迅速占领的地区，美国不但将确保以色列获得蒂朗海峡（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狭窄通道，参见地图6）的“通航权”，还保证以色列未来在该地区拥有“捍卫自己权利的自由”。

没过多久，美国就不得不兑现这一承诺。

在英国方面，首相艾登试图销毁英国秘密策划这一行动的证据，但无济于事。以色列和法国都有秘密协定的副本，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艾登引咎辞职。

这场战争于10月29日爆发，11月7日结束。以色列有231名战士在战争中死亡，另有900多名战士受伤。埃及的死亡人数在1500—3000人之间，大约有5000人受伤。

西奈战役持续时间虽短，但意义深远。通过这场战争，以色列不但恢复了蒂朗海峡的通航权，还从不久前怀疑它没能力生存下去的国家那里赢得了国际保证。对以色列公民而言，建国八年来，他们深受“越境

者”之苦，这场战争让他们重新获得了安全感和自信心。迈克尔·奥伦称西奈战役为“以色列第二场独立战争”[25]。以色列国防军在不到100小时的时间里占领西奈半岛，不但向世界证明了这支军队的实力，还为以色列赢得了十年的平静。中东出现了一个新的军事强国。

西奈战役后，大卫·本－古里安越来越发现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复杂程度超出许多人的预料。他对以美关系的担忧不无理由。分治决议以前，美国国务院曾向正在讨论以色列边界划分的联合国建议，要联合国重新划分边界，将更多领土划给阿拉伯人。1953年，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提议“将一定数量的阿拉伯难民遣送回‘当前以色列控制地区’”。一些以色列人认为，“当前以色列控制地区”这样的措辞说明杜勒斯不相信以色列能长期存在。埃及和捷克签订军火销售协议后，虽然以色列百般请求，但美国拒绝通过向以色列卖军火来恢复中东的均势（这也是以色列从法国买军火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对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说，向以色列卖军火没有意义，因为170万犹太人不可能打得过4000万阿拉伯人。”[26]

西奈战役后，美国（和苏联）通过联合国谴责英法和以色列挑起战争。美国的谴责可能只是象征性惩罚，但以色列还是派外交部部长果尔达·梅厄到联合国为以色列辩解，机智过人的梅厄夫人挖苦说：

> 区别对待可以舒舒服服地决定。阿拉伯国家可以单方面享有“战争权”，以色列却要单方面履行维持和平的责任。但敌对行为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多年来，以色列饱受这种骇人听闻的另眼相待，最终不堪重负，只能想办法自救，摆脱四面受敌的威胁，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27]

果尔达·梅厄受本－古里安之托到联合国为以色列辩护时，早已因为为犹太国事业做出的贡献而声名显赫。果尔达·马波维奇（婚后从丈夫姓，改姓梅耶森）1898年出生于基辅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家庭，她不久随家人迁到平斯克，梅厄的姐姐（赫茨尔去世后，她整整两年只穿黑色衣服）经常邀请犹太复国主义者到家中聚会，年轻的果尔达喜欢坐在煤炉旁听他们谈话。1906年，八岁的她随家人移居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Milwaukee）。

在一次讨论基布兹运动和A.D.戈登思想的客厅会议中，梅厄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莫里斯，他们决定移民巴勒斯坦，开始了他们吵吵闹闹、

基本无爱的婚姻。

> 我想我是一次在城市里游行时，意识到移民巴勒斯坦不能再拖了……面对彼得留拉（Petlyura）的暴行，密尔沃基游行无济于事，移民巴勒斯坦才是最有意义的回应。犹太人必须再次拥有自己的土地，我必须投入这项事业，不是通过演讲和筹款，而是到那里生活和工作。[28]

她和丈夫1922年离开美国。1956年，她已经成为马帕伊党的高层领导，被大卫·本－古里安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和许多早于她移民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样，抵达巴勒斯坦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希伯来语姓氏，将梅耶森改为梅厄。

西奈战役结束后不久，当着外交部官员的面，她朗读了赫茨尔经典小说《新故土》中的一段话：

> 在当今世界各国，仍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只有犹太人能完全理解其深刻的悲剧性。这就是非洲人问题。让我回忆一下当年悲惨的奴隶贸易，因为他们是黑人，非洲人像家畜一样被拐走，沦为囚犯，最后被卖掉。他们的孩子在异国他乡长大，因为肤色原因成为歧视和欺负的对象。虽然很可能遭人讥笑，但我还是提议：我目睹了犹太同胞的自我救赎，我希望能帮助非洲人得到救赎。[29]

读完这段话，她对外交部人员说，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实现赫茨尔的想法。当时许多非洲国家宣布独立，梅厄认为非洲国家和以色列有许多相似的经历："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经过多年斗争才获得自由；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将努力捍卫和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我们一样，没有人会将主权盛在银盘里送给他们。"[30]

梅厄希望以色列为非洲国家提供科技、农业技术上的支持，由于经历了相似的历史，以色列还能为非洲国家提供长期受压迫民族实现复兴的模式。她希望犹太人实现重生并建国的故事不但能激励犹太人，还能鼓舞世界其他民族。

短期内以色列便和几个非洲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利用自己擅长的农业技术、灌溉技术等科技帮助这些国家提高了农业产量。但从长远看，果尔达的想法过于天真。这些新成立的非洲国家很快联合成一个团体，成为以色列在联合国的最大敌人之一。以色列之前的示好并没有改

变这一点。

在国内，以色列正在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军队。正如达扬在罗伊·罗特伯格葬礼上所说的，这场冲突不会马上结束，为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和以色列公民的安全，以色列开始发展各种威慑性军事能力。但与此同时，以色列还确立了一种自我反思和对军事行为进行司法监督的文化，军事命令明确受到道德的约束。

国际上，以色列成为国际政治和战争的参与者，以色列还致力于运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其他国家。

这个国家如今羽翼渐丰，也不那么脆弱了；以色列人在思考以色列生存问题的同时，还开始展望这个国家的未来。但他们很快将发现，在营造美好的未来前，他们先要直面犹太民族漫长历史上一段最痛苦的时期。

(1) 许多人把1929年毁掉当地犹太社团的希伯伦暴乱当作巴以冲突的开端。90年后，以色列仍然困在这场冲突中，敌人中既有巴勒斯坦人，也有其他穆斯林团体，不少团体（巴勒斯坦组织方面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国家方面包括伊朗）宣称永远不会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2) 捐赠珠宝的概念在圣经叙事中也有出现，影响了许多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修建会幕时，摩西让人们捐出自己的财产，圣经中写道："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钏，带来献给耶和华。"（《出埃及记》35：22）

第十一章
以色列直面大屠杀

这是一部关于奥斯维辛星球的历史……这座星球上的居民没有名字，没有父母，也没有孩子……他们不在那出生，也不在那繁衍后代……根据这个世界的法则，他们没有死去，也算不上活着。

——耶西勒·德－努尔在艾希曼审判上的证词[1]

1960年5月23日下午4点，议会召开全体会议，会场座无虚席。本－古里安总理将向全国宣布一个重大消息。全场人紧张地等待着总理发言。

本－古里安走到发言台上说道：

> 我在此通知全体议会成员，不久前纳粹政府主要战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安全部门发现。他和其他纳粹领导人一起制定并执行了灭绝600万欧洲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阿道夫·艾希曼已经被以色列逮捕，近期将根据《纳粹分子及其同谋审判法》审判。[2]

宣布完这个消息，本－古里安走下发言台，离开会场。

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努力理解这则消息的重大意义。以色列能通过审判这个灭绝欧洲犹太人的策划者而索取哪怕一丁点正义吗？对于几百万被谋杀、虐待、毒死甚至活活烧死和掩埋的犹太人，对于100万被纳粹屠杀机器残忍杀害的儿童，这场审判能实现一点惩罚吗？对于那些死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对于当时在场者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父母配偶乃至组成以色列社会的数百万人，这次审判算是一种交代吗？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党卫军一名中校，是大屠杀的策划者之一，也是让最终解决方案在万湖会议上得以通过的关键人物。被捕时，他是在世的纳粹最高级别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大部分时间用假身份生活在阿根廷。摩萨德（以色列安全机构之一）发现他后将其逮捕，并秘密从阿根廷带回以色列。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就像63年前西奥多·赫茨尔在巴塞尔赢得了长达十分钟的掌声一样，议会全体会议现场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不难预料，世界大部分地区对这一事件不会报以掌声。世界各地的谴责潮涌而来。庇护纳粹分子而不害臊的阿根廷官员声称，以色列的行为属于“一个受全世界谴责的政权所采取的典型手段”[3]。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32号决议，宣称以色列侵犯了阿根廷主权，并警告今后再有类似的行为将会破坏国际和平。美国、法国、英国和苏联也谴责了以色列。

阿根廷政府对这一事件表态后，阿根廷民众对当地犹太人发动了反犹主义袭击。《华盛顿邮报》和《纽约邮报》发表了批评以色列的文章，《基督科学箴言报》认为以色列“裁决以色列境外对犹太人犯下的罪，同纳粹分子声称德国出生的人及其后代不管身处哪里都忠诚于德国是一样的逻辑”[4]。《时代周刊》暗示本－古里安的行为属于“逆向种族主义”[5]。

受寻求正义的鼓动，以色列不顾国际上的反对声音，继续推进审判。本－古里安这样做，有教育民众的目的。在以色列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一直逃避对大屠杀的讨论，总理认为现在应该让全体民众正视这个问题，他说：“以色列年轻人应该了解1933年到1945年欧洲犹太人的真实历史。”[6]

这起犯罪行为发生在另一个大陆，当时以色列还没有建国，犯罪行为中的谋杀者从第三方国家抓来，但以色列勇敢地受理了这一案件，对象征纳粹政权的阿道夫·艾希曼进行了审判。这一次，看押犯人的是犹太人，而不是纳粹分子；这一次，再也没有犹太人被关在铁丝网里，被告人是一位坐在防护玻璃笼里的纳粹分子；这一次，法官是犹太人，法庭位于犹太国的首都耶路撒冷。

艾希曼审判让以色列社会第一次公开讨论这场暴行中恐怖的细节与噩梦，许多以色列人是经历过欧洲炼狱的幸存者，每天背负着这些噩梦。当然，纳粹的屠杀行为以前也影响过以色列的政策。在本－古里安在议会宣布这则重磅消息将近十年前的1951年，以色列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就开始讨论大屠杀赔款事宜。战后的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1951年9月27日表示，德国已经“做好准备，与犹太人代表和以色列代表一同讨论赔款方案”[7]。

以色列将同德国政府对话的消息，让已经主动不参与政治的梅纳赫

姆·贝京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他当时已退出公众视野，至少短期内是如此。当本－古里安宣布将在议会提交关于接受赔款的议案，贝京长期以来的战友们立刻请他出马，他们相信贝京（当时仍然是议员）是发声的不二人选，只有他才能解释同德国人达成任何协议都是荒谬的。他们还明白，赔款问题能让贝京有机会重新加入政治论战，这次他不是作为本－古里安不屑一顾的对手，而是代表全体犹太人反对本－古里安违背犹太人历史义务、有损犹太人尊严的行为。

贝京的父母兄弟都死于纳粹分子之手，他对本－古里安及以色列准备接受德国赔款的想法发起了无情的攻击。他愤怒地指出，任何一个有尊严的犹太人都不会考虑和德国人谈判。[8]

在随后的辩论中，贝京说："他们[政府]马上要和德国人签订协议，他们将承认德国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群用獠牙撕咬、吞食我们民族的恶狼。"[9]

作为当时全国最出色的演说家，贝京广泛激起了以色列社会的情绪。全国主要报纸之一《晚报》（*Ma'ariv*）发表了一幅漫画，画中一名德国人拿着一袋沾满鲜血的钱袋交给一个以色列人。1951年12月《自由报》（*Herut*，即贝京所属政党的报纸）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一个被焚的孩子能让我们拿到多少赔款？》

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本－古里安对此予以反驳。他认为犹太国只有实现经济繁荣才能获得国际认可，犹太人要赢得尊严有很多方法。本－古里安清楚，当时以色列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政府不得不实行食品配给制，缺少建设国家的重型机械，犹太国急需住房安置几十万来到以色列的贫困移民。如果德国人的钱能让以色列国更稳定，这不失为索取正义的一种方式。

1952年1月7日是议会就这一议案投票的日期，这场空前尖锐的全国性争论在这一天白热化。那是个寒冷的冬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锡安广场，抗议几百英尺外议会对这一提案的讨论。贝京不到投票时间拒绝进入议会会场，他用从未有过的语气在人群前发表演讲，称本－古里安为"那个当下是总理的疯子"，这个"当下"包含了多种可能的内涵。

然后贝京开始威胁政府。"绝不能和德国谈判，否则我们不惜付出生命。我们死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为了阻止这个提案，我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还提到，在"阿尔塔莱纳"号事件那天，他不准手下开火，但

这一次他对支持者说："这场战争事关生死，今天我将下令：流血！"[10]

曾经在"阿尔塔莱纳"号事件中避免了一场内战爆发的人，突然威胁要挑起内战。

本-古里安既不信服贝京的言辞，也不担心他的威胁。在他看来，贝京不过是在煽动民意，这个波兰犹太人不适合站在议会发言台上，因为以色列已是一个由新犹太人而不是老欧洲犹太人组成的国家。抛开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不说，他们看待犹太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贝京认为如果犹太国抛弃犹太民族记忆，抹杀犹太历史的神圣感，犹太国将失去灵魂和存在下去的意义。但本-古里安认为犹太国应当朝前看，承认欧洲那段可怖的历史，但要从这段历史中走出来。本-古里安在大屠杀爆发前就离开了欧洲，贝京所怀念的流散犹太人正是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在史诗《屠杀之城》中描写的孱弱而可怜的犹太人，而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创造出了更优秀的犹太人。

议会辩论很激烈，会场外开始出现暴力活动。部分跟随贝京沿着本-耶胡达街(1)从锡安广场来到议会会场附近的支持者开始朝窗户扔石头，突如其来的碎玻璃之声打断了议会的讨论，警察为驱散人群使用了催泪瓦斯，刺鼻的味道飘到了会场，会议被迫暂时中止。后来会议继续进行，和大多数人所预料的一样，1月9日的投票以60票支持、51票反对通过了同德国谈判的提案。贝京承认自己失败了，但由于他在大会上和会场外发表煽动性言论，以色列议会禁止他在未来三个月参加议会活动。

和本-古里安判断的一样，德国赔款和其他来自国外的援助，让以色列经济得以恢复。政府用这些资金改善了住房条件，建立了一支舰队和一条国内航线，修建了公路和通信系统，建立了电力网络。德国赔款还被用于修建以色列的全国输水系统（National Water Carrier），这项工程帮助以色列将水资源输送到干旱地区，让那里变得适于居住。这在干旱的中东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作为一个小国，以色列人均花费在这项工程上的费用，不但是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的6倍（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还"远远高于胡佛水坝和金门大桥等美国标志性公共建设工程"的开支。[11]在投入人力最多的阶段，以色列每14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中就有1人参与这项工程，从事挖水渠、铺设管道、焊接等工作。[12]这项工程的费用占到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更何况在当时经济薄弱的以色列。如果没有德国赔款，这项工程不大可能完成。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超过了德国和日本。[13]除了经济，德国赔款还产生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多年来，大屠杀幸存者和以色列社会都回避谈论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欧洲的事情。对幸存者而言，这段回忆过于痛苦。对以色列社会而言，这个话题会让人们想起伊休夫当年没能帮助欧洲犹太人，同时想到以色列试图摆脱的那种作为受害者的欧洲犹太人的形象。

在接受德国赔款后，以色列人拒绝面对大屠杀话题的态度首次出现变化。大卫·本－古里安的政治对手梅纳赫姆·贝京扮演了捍卫以色列犹太人良知的角色。关于德国赔款的争论让贝京有机会成为以色列犹太灵魂和神圣的犹太记忆的代言人，无论它们多么令人痛苦。

这不但为本－古里安领导的马帕伊党下台埋下伏笔，也成为基布兹发展的转折点。在那之前，许多基布兹一律禁止任何私人财产。一切财产由基布兹成员共同拥有，包括成员的亲友送来的衣服和礼物。甚至连孩子也不由父母抚养，他们从出生起就住在基布兹的儿童之家。

德国赔款让基布兹的这条政策也发生改变。生活在基布兹的幸存者认为，自己能得到赔款，是因为经历过难以形容的苦难，他们忽然拒绝将这些钱交给集体，让那些没有经历大屠杀的人使用。他们坚持认为，有些财产不能共有。在某些基布兹，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比议会会场上的争论还要激烈。

一些基布兹在这个问题上同个人达成妥协，成员可以保留部分赔款，剩下一部分则成为集体资金。基布兹这一机构还将在以色列存在很长时间，但基布兹绝对平均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几十年后，基布兹开始私有化进程，取消公共财产制度，有人不无讽刺地发现，是德国赔款最早动摇了以色列这一标志性的社会主义机构。[14]

德国赔款让以色列第一次严肃对待大屠杀，几年后扣人心弦的鲁道夫·卡斯特纳审判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1955年6月，一位名叫马尔基尔·格鲁恩瓦尔德的古怪的大屠杀幸存者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针对大战期间担任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救援委员会负责人的卡斯特纳，控诉他在1944年和德国人做交易。通过后来被人们称为“物资换生命”的交易，卡斯特纳交给德国人多辆卡车，德国人则答应不把一列装着犹太人的火车开往奥斯维辛，大约1700人因此获救，其中包括卡斯特纳的家人和其他花重金购买火车上位置的犹太富人。这项交易完全公开，人们知道得救的犹太人中还包括孤儿和哈西德人。除了拯救这些犹太

人，卡斯特纳还安排许多犹太人去劳动营，而不是死亡营奥斯维辛。匈牙利犹太人大多把他看成那段黑暗时期一位伟大的英雄。

但其他人对他远远没有好感。他们说卡斯特纳当时只是为了救自己的家人。在纳粹统治下，他一直过得很好，但最奇怪的是，对于那些他没能拯救的犹太人，他没有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他们说卡斯特纳可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将成千上万犹太人致死的共谋。

战后，卡斯特纳移民到以色列，开始与本-古里安的马帕伊党合作，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镁光灯之外。格鲁恩瓦尔德指控卡斯特纳是50万匈牙利犹太人的“间接谋杀者”，其中58人是格鲁恩瓦尔德的家人。这时的卡斯特纳已是以色列工业与贸易部的高官。为了维护名誉，政府决定指控格鲁恩瓦尔德犯有诽谤罪。

虽然年事已高，没有资源，但格鲁恩瓦尔德不愿不战而败，他聘请了律师撒母耳·塔米尔（Shmuel Tamir）。这位律师来自贝京的赫鲁特党，他不但制定了高明的法庭策略，还表现出过人的辩护才能，成功改变了审判的走向。塔米尔辩护说格鲁恩瓦尔德是正确的，卡斯特纳犯有通敌罪。这样，卡斯特纳——连带着照顾他的政府——就不得不针对这一指控进行抗辩。

法庭最终宣判格鲁恩瓦尔德无罪，是卡斯特纳“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卡斯特纳因为被公开羞辱而避世隐居。虽然最高法院最终改判，但为时已晚。1957年3月4日，卡斯特纳在特拉维夫家门口被泽夫·埃克斯坦暗杀。[15](2)和1933年阿罗佐罗夫谋杀案相似，卡斯特纳成为因同德国人达成交换协议而被杀的第二位知名犹太人。但不同于阿罗佐罗夫谋杀案，这次暗杀发生在独立后的以色列，是犹太国第一起犹太人出于政治原因谋杀犹太人的事件，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最后一次。

跟德国赔款一样，卡斯特纳审判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谴责卡斯特纳时，法官无意中强化了这种观点：能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多少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否则，为什么几百万犹太人都死了，唯独他们却活了下来？

讽刺的是，公众对大屠杀的关注反而让一些幸存者更不愿意谈论自身经历。他们只能独自承受心中的痛苦，这种封闭的心态让这个群体显得更“不合群”。101部队的指挥官和后来的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曾回忆自己早年的基布兹生活，其中这样描述幸存者的世界：

幸存者之间有自己的沟通方式，其他人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之间有时因为难言之隐不说话，有时又不惜为对方付出自己的生命。基布兹本应是充满信任的地方。谁能与这些人推心置腹？[16]

在公众看来，纳粹大屠杀对以色列的发展还产生了另一个重大影响。1955年，大卫·本-古里安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他意识到阿以冲突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走向难以预测，他不愿仅依靠西方，他认为以色列应该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英国和苏联拥有核武器，而以色列连晶体管收音机都生产不出来。一个人口不到200万、缺少科技能力的小国想拥有核武器，本-古里安的顾问中有的觉得这是异想天开，有的认为这个想法很糟糕。但对总理而言，阿以冲突和由纳粹大屠杀带来的脆弱感是发展核武器的决定因素。以色列的存在就是要终结犹太人的脆弱感，无论为此要做什么。

后来在讨论核能力对以色列的重要性时，果尔达·梅厄没有提到纳粹大屠杀，而是谈到她童年时经历的集体迫害。她将以色列的核能力称为“秘密果酱”（*varenye*），东欧犹太人会将这些果酱藏起来，一旦发生集体迫害，他们就靠这些果酱为生，直到威胁解除。

1956年，本-古里安派西蒙·佩雷斯来到巴黎，试图说服法国人帮助以色列发展核能力（当时法国正在发展核武器计划）。法国国内当时反阿拉伯情绪强烈（特别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法国人对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维希政府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也感到愧疚，因此答应了以色列的请求。(3)此外，当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深陷泥潭，殖民主义日薄西山，法国希望通过同以色列合作来维持在中东的影响力。法国承诺向以色列派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提供用于分离钚的设备和导弹技术。在法国帮助下，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从大屠杀阴影中走出来，但正如以色列富有洞见的记者和评论家阿里·沙维特指出的，最早知道这一计划的少数几个人意识到，犹太人将在历史上第一次具备灭绝其他民族的能力。[17]

1960年，美国得知法国正在帮助以色列建立核反应堆。1961年初，致力于推进核不扩散的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他对以色列的核计划深表担忧。后来，美国和以色列签订协议，以色列承诺从1962年起允许美国官员每年访问一次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地迪莫纳（Dimona）。但

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没有发现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证据。美国人的疑心越来越重，以色列就把迪莫纳的设施藏得越来越深。以色列人修建了用于迷惑美国人的控制室，还封住了迪莫纳地下设施的入口，甚至在一些建筑旁撒上鸽子粪，制造这些建筑常年无人使用的假象。

虽然以色列逃过了这些检查，但造假终非长久之计。1 969年，果尔达·梅厄和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达成协议，以色列将继续开展核武器计划，但永远不会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这样一来，以色列能获得安全感，不用担心再发生大屠杀那样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与此同时又不会刺激阿拉伯世界发展核武器。

德国赔款、卡斯特纳审判、以色列发展用于自卫的核武器计划（虽然只有少数以色列精英知道）——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艾希曼被捕了。这让以色列人喜出望外，但国际社会却传来谴责之声。美国犹太人的心态非常矛盾，艾希曼被捕几乎打破了十年前本－古里安和布劳斯坦达成的脆弱协议。因为不想让以色列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代言人，美国犹太委员会认为艾希曼的审判不应在以色列举行，有的成员还同果尔达·梅厄见面，表达他们对以色列即将举行审判的不满。更让以色列官员气愤的是，美国犹太委员会的领袖竟然说艾希曼犯下的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不仅仅是反犹太人的罪行”，如果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将有损这个事实。[18]

被这些观点惹怒的本－古里安在多个公开场合发表批评意见，针对美国犹太委员会的指责，本－古里安在12月的《纽约时报》上发文指出：

> 我听到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人们指出，以色列审判艾希曼虽然合法，但不合情理，因为艾希曼犯下的罪行过于严重，属于反人类和违背人类良知的罪行，而不是反犹太人的罪行。这种话只有具有自卑情结的犹太人和不认为犹太人属于人类的人才说得出口。[19]

本－古里安提到的“反人类的罪行”就是在含蓄地抨击美国犹太委员会，指责后者谈起反人类罪能比谈起反犹太民族罪获得更大的宽慰。(4)

本－古里安的怒火不仅发向美国犹太委员会，还发向美国犹太人，他指责他们不重视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经历的苦难，他说：“美国犹太人的犹太教正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只有盲人才看不到美国犹太教的消亡之日。”那些没有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面临死亡之吻，他们逐渐……坠

入同化的深渊”[20]。本 - 古里安这些言论显然违背了十年前和布劳斯坦达成协议的精神。他知道布劳斯坦会勃然大怒，但他毫不介意。

经过最大努力，布劳斯坦才没有同以色列决裂，但一些无法挽回的伤害已经产生。就像德国赔款戏剧性地改变了基布兹在创立之初形成的精神特质一样，谁也没有想到，一名纳粹分子的被捕，居然会再次伤及以色列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审判在耶路撒冷举行。

这场审判勾起了人们对几个世纪来犹太历史的回忆。公诉人指控艾希曼像法老和哈曼一样，是犹太人众多敌人中的一个。(5)这场审判的关键不在于通过几位幸存者的证词让人们了解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而是将纳粹分子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罪行公之于众。出庭作证者当中，有的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艾希曼有过交集。但这场审判也听取了多位没见过艾希曼的幸存者的证词，他们在证人席上讲述这场战争的恐怖、自己痛苦的遭遇和纳粹分子对欧洲犹太人造成的巨大伤害。有些观察者反对这种安排，但总检察长吉迪恩·霍斯纳（Gideon Hausner）坚持这样做，他认为检察官员的最终职责是要为大屠杀“找到正确的历史位置”[21]。

通过这场审判，以色列年轻人接受了一场本 - 古里安认为他们所需要的教育。所有细节都在审判上得以呈现。证人们详细描述了他们目睹的男女老少被残忍杀害的场景。有位证人描述了她孩子是如何在她怀中被纳粹分子杀害的。另一位证人说几千名法国儿童被赶到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他们离开了父母，没有任何成年人监护。“许多孩子在半夜醒来会大声呼喊父母的名字。还有的孩子由于年龄太小，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22]这些孩子后来“挣扎着、尖叫着”[23]被遣送到奥斯维辛，在那被谋杀和焚烧。

有位证人朗读了她丈夫寄给她和孩子的最后一封信：“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我即将出发，开始一段漫漫旅程……不管等待我的是怎样的命运，我都接受。我不想让你们悲伤，但我真的希望能再次和你们一起生活。但愿上帝能让我实现这个愿望。”[24]这位女士情绪失控，无法继续读下去，她把信递给在场的一位律师，让他来读，但这位律师也几乎没能读下去。

来自比尔克瑙（Birkenau）的犯人说，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被“送到左边”，这意味着她们将进入毒气室。因为女儿当时穿着一件红色外套，他

回忆说："远处的红点告诉我，妻女就在那里，但那个红点变得越来越小……"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们。[25]

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证词，大概来自耶西勒·德－努尔，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奥斯维辛囚犯曾用笔名"卡－蔡特尼克135633"进行创作，(6)这场审判后，许多以色列人才知道这位作家的真实身份。德－努尔的证词对奥斯维辛的世界做了使人入迷的描述，这里实际上是个不同的星球，他称之为"废墟的星球"。

但他的发言很快变得古怪而混乱，说着说着就晕倒了。[26]看到警察跑到证人席抢救的画面，许多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以色列人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大屠杀的恐怖。

就像1947年11月等待联合国分治决议的投票结果一样，审判期间所有以色列人守在收音机前，证人们讲述的恐怖经历听得他们目瞪口呆。可以说，正是这些证词给予几千名生活在以色列的大屠杀幸存者讨论这些经历的"许可"。这在以前难以想象。以色列重视的是能够自卫的"新犹太人"，手臂上烙有囚号、身心都不堪一击的幸存者恰恰是以色列人试图忘记和超越的。他们常常对比大屠杀幸存者与新犹太人，伊休夫所产生的那种强壮的新犹太人才能用军事力量赶走英国人，击退阿拉伯人。人们的用词很能反映出态度，"在大屠杀中被杀的人一般叫'消亡'，而在巴勒斯坦的战争中战死的犹太人叫'阵亡'"[27]。

以色列著名记者和政治家汤米·拉皮德（他的儿子亚伊尔·拉皮德也是一名受人尊重的记者，还是未来党[*Yesh Atid*]的创始人）是布达佩斯隔都的幸存者，他回忆起伊休夫资深成员责难幸存者的场景。他说："他们问幸存者：'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像绵羊那样温顺？'他们是拿起武器自卫的上等犹太人，而我们是面对德国灭绝行动毫无抵抗的次等犹太佬（Yids）。"[28]更糟糕的是，一些在伊休夫出生和长大的犹太人会不痛不痒地谈起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尸体所做的事情，比如纳粹分子用尸体做肥皂。拉皮德回忆说：

> 当时有个厨子……是奥斯维辛幸存者，手臂上文有蓝色的囚号。那里的长工叫他"肥皂"，因为人人都知道纳粹用尸体脂肪做肥皂的计划。每当他们说："肥皂，午餐吃什么？"他就苦笑一下，然后给他们的盘子盛食物。[29]

艾希曼的审判改变了这一情况。公诉人没有回避幸存者为什么不反

抗这个问题。但有一个辛酸的时刻让这类问题显得苍白无力。证人贝斯基（Beisky）详述了在1.5万名犯人的注视下，一个小男孩怎样被举到椅子上接受绞刑。绞索套意外地断了，可怜的男孩痛苦地哭泣，开始求饶。党卫军士兵再次下达绞刑命令。审判现场的一位律师显得颇为无情，问这位证人，当时上万旁观的囚犯为什么没有反应。这位证人接着说：

> 我无法形容这种……交织着惊吓的恐怖……我们附近还有一个关押波兰人的集中营，关押了1000名波兰人……离营地100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但在我印象里，没有一个波兰人逃跑。波兰人还有自己的家，如果犹太人逃跑，能逃哪里去？我们身上穿着……染有黄色条纹的衣服，他们在我们头顶……还理掉四厘米宽的一长条头发。假设当时这1.5万人能在没有任何武装的情况下离开营地，他们能去哪？又能做什么？[30]

1943年，以色列尚未建国，纳粹暴行的消息开始传到伊休夫，出生在乌克兰的希伯来语作家哈伊姆·哈扎兹出版了短篇小说《演说》。(7)小说的主人公名叫约德科（“约德科”[Yudke]在希伯来语中是“耶胡达”[Yehudah]的昵称，相当于英语中[含“背叛”之意的]“犹大”[Judah]），这位基布兹成员平常沉默寡言，但一天晚上他突然发表了一席成为经典的演讲：

> 我想说，我反对犹太历史……我们从来没有创造过自己的历史，非犹太人在帮我们创造历史……历史里都有些什么？压迫、诽谤、迫害和殉难。我绝不允许我们的孩子学习这样的犹太历史，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自己先辈经历的耻辱？我会对他们说：“孩子们，自从我们离开自己的土地，流散到他乡，我们就成为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下课，出去踢球吧。”[31]

虽然这一刻来得有些晚，但艾希曼的审判让以色列社会明白，约德科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犹太人能脱离犹太历史而存在。新犹太人试图开始一段全新的犹太历史，但这场审判告诉以色列社会，只有拥抱历史，不管历史有时多么令人痛苦，犹太人的生活才能继续。

法庭最终对艾希曼判以死刑。（巧合的是，审判卡西姆村屠杀的法官本雅明·哈利维也是审判艾希曼的三位法官之一。）1962年5月31日，

被捕两年后，艾希曼被处以绞刑。为了不让他的墓地被人朝拜，他的骨灰火化后被洒在以色列领海之外。艾希曼不但是谋杀犯，是犹太民族具有心灵象征意义的敌人，还是犹太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民事法庭判处死刑并被执行的人。(8)

大屠杀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伊休夫时期和建国早年历史的事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伊休夫的新犹太人试图创造出的犹太人形象迥异于欧洲那些痛苦无助、惨遭折磨的犹太人。现在，新犹太人已经成为现实。以色列人可以更丰满地讲述他们自己和他们民族的故事了。

对于这个年轻的国家而言，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但这让一代不熟悉大屠杀的以色列人更清楚地看到，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多么重要。

(1) 从街道名称也能看到以色列普遍存在的深刻历史感。许多街道以圣经时代、拉比时代和现代的犹太学者、作家、英雄、节日命名。以色列许多城市有以希伯来语之父命名的本－耶胡达街。

(2) 泽夫·埃克斯坦（Ze'ev Eckstein）曾是一名负责监视（仅仅是监视）极右翼分子的辛贝特（Shin Bet）特工，但在此过程中他接受了极右翼思想，成为他们的一员。因为谋杀卡斯特纳，他在监狱中服役7年，谋杀案过去将近60年后，埃克斯坦出版了自传《被毯》，他在其中写道："我今天不会这样做。我不会开枪。这一点毫无疑问。"（Elad Zeret, "Kastner's Killer: I Would Never Have Shot Him Today," *Ynetnews.com*[October 29,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85767,00.html.）

(3) 以色列获得核武器还有一段同美国犹太人有关的花边故事。萨尔曼·夏皮罗（Zalman Shapiro）是美国一位化学家、发明家和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创建了核材料与设备公司（NUMEC）。该公司1965年一份清单中有200—600磅铀不翼而飞，有人便指控夏皮罗从事间谍活动，将这些核材料转移到了以色列。《参孙选择：以色列核武库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作者认为夏皮罗没有过错，并引用了一位首席调查员的话："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能证明夏皮罗有罪。"夏皮罗从未被起诉，但关于美国犹太人参与了以色列核计划的传言一直让他的生活不得安宁。很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鉴于他为以色列安全做出的贡献，他是一位被人们忽视的英雄。（Seymour Hersh, *The Samson Option: Israel's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p.243，250，252，255.）

(4) 本－古里安的话是以色列领导人对美国犹太人诸多批评中的一部分。在这里，他批评他们强调美国的普遍性而不是以色列的特殊性。在其他的批评中，以色列领导人指出美国犹太人其他方面的过失。迈克尔·奥伦结束了自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的任期后，曾在回忆录《盟友：我的美以分歧之旅》中写道："我要指责美国犹太人犯下了最自恋的一种罪：不感恩。"（Michael Oren, *Ally: My Journey Across the American-Israeli Divi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267.）

(5) 这两人是圣经故事中试图消灭犹太人的典型恶人。法老下令将所有以色列人男婴扔到尼罗河里。（《出埃及记》1：22）。哈曼出现在《以斯帖记》中，他曾对国王说："有一种民……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以斯帖记》3：8 - 9）

(6) 德 - 努尔的本名和笔名都有特殊的含义。他在欧洲出生时名叫耶西勒·费纳（Yehiel Feiner），同许多来到以色列的欧洲人一样，他也改了姓氏，新的姓氏德 - 努尔（De-Nur）在阿拉米语中意为"出自烈火"。他的笔名"卡 - 蔡特尼克135633"（Ka-Tsetnik 135633）中的"卡 - 蔡特尼克"是德语"集中营里的人"（*Konzentrationslager*）的简写，"135633"是他的囚号。

(7) 中译文见徐新主编：《现代希伯来小说选》，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103—126页。——校注

(8) 1948年6月30日，以色列宣布建国六周后，独立战争还在进行中，一位名叫梅厄·塔比安斯基（Meir Tabiansky）的国防军军官被军事法庭错误地指控犯有间谍罪，判处死刑后当场执行。但枪毙他之后又改判他无罪。（Shabtai Teveth, *Ben Gurion's Spy: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Scandal That Shaped Modern Isra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pp.31—54.）

第十二章
改变国家命运的六日战争

我深爱的一切就在脚下……古老的以色列地，我青春的家园，之前被分裂的另一半祖国。

——以色列诗人哈伊姆·古里写于六日战争后

截至1967年，犹太国不但抵挡住建国之初敌国的猛烈进攻，吸收了100多万移民，[1]还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国家在政治、文化等领域迅速形成了特色。毫无疑问，未来还有很多挑战需要面对，但建国19年后，以色列的情况远远好于1947年11月联合国投票时人们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想象。

然而，耶路撒冷此时还处于分裂状态。独立战争期间，年轻的以色列国防军没能守住东耶路撒冷和老城，让约旦人给占去。在将近20年内，由煤渣砖块和铁丝网组成的一道墙穿过犹太国首都的心脏地带。就算以色列政府准备接受它，对许多犹太人，尤其是对宗教人士（当然不局限于宗教人士）而言，这道墙就仿佛是一道拒绝愈合的伤口。

1967年独立日快到时，耶路撒冷市长泰迪·科勒克要求创作出一批关于耶路撒冷的歌曲，能够在第二届以色列歌曲节由国家电台播出。此前，以色列很少有诗人和作曲家写关于耶路撒冷的歌曲。世纪之交以来创作的几首相关歌曲中，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分裂状态，也没有提到犹太人无法靠近西墙，连老城都进不去。

科勒克向包括作曲家拿俄米·舍莫尔在内的五人发出邀请，请他们创作关于耶路撒冷的流行歌曲，但由于涉及的主题很复杂，这五人都谢绝了。但最后舍莫尔改变态度，写了首歌，名为《金色的耶路撒冷》。

歌词第一节写道："沉睡的树丛和石垣，为梦羁绊，这座孤零零的城市，心中横亘着一道墙。"[2]接下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副歌部分：

耶路撒冷，黄金之城；
何等明亮，青铜之城；
我愿如琴，将你歌颂。[3]

这首歌曲最早由年轻女高音歌唱家舒丽·拿单（Shuli Natan）演唱，立刻流行开来，电台几乎不停地广播，这位本来无人知晓的歌唱家一夜成名。一位对以色列深具洞察力的评论家说："以色列人一直在压抑他们对另一半耶路撒冷的思念。现在，他们跟着舒丽·拿单一起歌唱，为首都的分裂哀伤。"[4]和以色列一样，耶路撒冷现在也有了属于自己的颂歌。

宗教团体对耶路撒冷的分裂尤为伤心绝望。犹太人无法访问耶路撒冷古老圣殿被毁后唯一留存的西墙。两千年来一直有犹太人在这祷告，虽然人数不多。独立战争中，以色列失去耶路撒冷老城，希伯伦和其他犹太教圣地也在敌军控制下，犹太国境内几乎没有任何一处传统犹太教圣地，这也颇具讽刺意味。

在拿俄米·舍莫尔歌曲播出前一天，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他的父亲就是致力于促进不同犹太人之间交流的神秘主义者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向学生们讲述了19年前联合国投票那天他的个人经历。和大卫·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一样，他也无法庆祝，但出于不同的原因：

> 全国人民涌上街头欢庆……但我没有出门加入庆祝的队伍，反而独坐家中，心情沉重。最初几小时，我无法平静，上帝在先知书中的话竟然没有实现，这简直是噩耗。先知书中说，"他们分取了我的土地！"……但我们的希伯伦在哪里？难道忘了吗？我们的示剑[纳布卢斯]在哪里？难道我们忘了吗？耶利哥（Jericho）在哪里？难道我们忘了吗？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又在哪里？这每一寸神的土地都在哪里？我们有割让一厘米的权利吗？神不许！……那一刻，我的全身无法动弹，如同受伤、被切成碎片一般。我无法庆祝。"他们分取了我的土地！"他们分割了神的土地！……我不能出门跳舞庆祝，这就是19年前的情况。[5]

据在场者说，听到这席话，他的"学生陷入沉默。他们从未看过拉比如此悲伤，如此愤慨"[6]。他们在想，拉比到底想和他们说什么？

这一地区的局势已经日趋紧张。叙利亚宣布将从上游引走以色列国家输水工程35%的水源。以色列表示这无异于战争行为，但叙利亚继续推进引水工程。随后两国在边境爆发冲突，叙利亚朝以色列村庄开火，以色列则攻击了叙利亚人用在引水工程中的大型挖土设备。

1967年春天，该地区外的国家还有意煽风点火。苏联通知埃及和叙

利亚代表，以色列向北调集了12个旅的兵力，做好了进攻准备。艾希科尔指出苏联情报有误，甚至邀请苏联驻以色列大使楚卡钦（Dmitri Chucakhin）和他一起去北部亲眼看一看（楚卡钦拒绝了邀请）。美国也坚持认为苏联情报完全有误，但叙利亚人相信了苏联。通过将以色列准备发动战争的消息告诉叙利亚和埃及，苏联实际上在为一场战争点火。

几周后的5月15日，以色列举行了每年一度的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每年在不同地方举行，1967年计划在耶路撒冷举行。[(1)]阅兵总是为了展示大量军事装备，体现军事实力。但1949年约以停战协议限制了以色列能开进耶路撒冷的坦克数量，为了不违反协议，参加阅兵的以色列装甲部队数量明显少于往年。苏联的警告已经让埃及和叙利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参加阅兵的坦克数量之少似乎进一步证实，以色列为了备战把坦克部署在了其他地方。

在阅兵过程中，一位以色列官员将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的一张纸条递给国防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拉宾又将纸条递给总理艾希科尔。[(2)]纸条上说，埃及装甲车已经进入西奈半岛。艾希科尔和拉宾选择保持克制，但就在那一天，情报部门不断传来新的消息，内容一条比一条紧急。这个本应举国欢庆的日子一下充满了凶兆。

以色列领导人不知该如何应对。一方面，他们知道纳赛尔一向喜欢炫耀军事实力，可能不是真的想打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埃及和叙利亚几个月前已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色列本来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或小规模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危机，但希望很快破灭，开罗的广播声称："我们的军队已经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7]5月15日，在阿拉伯国家纪念1948年战争失利的日子（和以色列阅兵在同一天），纳赛尔宣布："兄弟们，做好巴勒斯坦最后一战的准备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8]期待已久的灭亡以色列的"下一轮"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

接下来的三周被以色列称为"哈姆塔纳"（*hamtanah*，希伯来语"等待"之意），这是以色列史上最紧张的一段时间。埃及在西奈半岛部署了5个师的兵力，每个师有1.5万人、100辆坦克、150辆装甲车和包括苏联大炮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

有学者认为纳赛尔当时已下定决心开战，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他为重建阿拉伯民族自尊心而摆出的姿态，只是后来事态失控了。不管埃及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在以色列人看来他就是要发动战争。5月16日，纳赛

尔采取进一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1957年以来（1956年西奈战役以后），联合国紧急部队在沿加沙和沙姆沙伊赫（Sharm al-Sheikh，这是位于西奈半岛最南端的一片地区）的国际边界线上建了几十个观察站，部署了几千人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任务是防止阿拉伯人潜入以色列，并保证埃及不会封锁蒂朗海峡（参见地图6）。但现在，大量埃及军队已经涌入西奈半岛。

接下来，纳赛尔做出明显的交战行为，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将联合国部队撤出这一地区。以色列以为吴丹起码会做出形式上的反对。可吴丹立刻答应了纳赛尔的要求，甚至都没有通知联合国大会。5月19日，联合国人员全部撤离。显然，联合国并不能保护以色列不受攻击。

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决定，如果埃及封锁蒂朗海峡（以色列最南端城市埃拉特[Eilat]通往红海的出海口，是以色列同东方的重要商业通道），[9]以色列将视之为宣战行为（以色列可以名正言顺地开战）。两天后，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短短8天时间内，埃及抹杀了以色列在1956年西奈战役中获得的所有外交成果。

这时外交战线最为关键。当时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是阿巴·埃班。埃班1915年出生于开普敦，婴儿时就随家人迁居伦敦，后来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古典学和东方语言。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青年联合会的活动，并成为该组织期刊的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班和哈伊姆·魏茨曼一起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工作，后来还成为英军情报部门军官，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服役。

1947年，埃班被任命为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联络官，他在此时把名字改为希伯来语化的“阿巴”。后来他同时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1959年，他回到以色列后当选为议员。1966年，他开始了为期8年的外交部部长生涯。

埃班才华横溢，能言善辩，是以色列不可多得的代言人。（多年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对埃班说：“我认为你是当今世界口才最好的演讲者。”）面对紧张的地区局势，他急忙来到法国。在11年前的西奈战役中，法国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并一直是以色列重要的军备供应国。但埃班出发时就担心这种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不久前，法国外交部总司长埃尔韦·阿尔方（Hervé Alphand）表示：“法国对‘以色列生存权’的承认和法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之间并不矛盾。”[10]以色列人都明

白，阿尔方只不过嘴上说说“以色列生存权”，实际在意的却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友谊”。

埃班同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会谈，证实了他先前的担忧是正确的。夏尔·戴高乐坚持认为，应当由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共同解决中东地区危机。但这个要求显然不现实，因为不存在让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何况苏联在一旁煽风点火，不会致力于外交解决。戴高乐还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开火”。埃班指出封锁蒂朗海峡构成交战理由，戴高乐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法国领导人根本不在乎埃及的封锁行为对以色列经济产生的影响。埃班提醒他，1956年法国曾许下承诺，一旦遭到埃及封锁，法国将认可以色列的作战权。戴高乐若无其事地说：如今是1967年，而不是1956年。

对法国失望后，埃班前往伦敦，同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会面。在伦敦，他得到了一定支持。威尔逊告诉他，英国内阁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一定不能让封锁政策得逞”[11]。

1957年，为了让以色列离开西奈半岛，美国承诺，如果埃及再次封锁蒂朗海峡，美国承认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离开伦敦来到美国后，埃班同林登·约翰逊的会谈让他失望。约翰逊同意埃及封锁蒂朗海峡属于“非法”行为，但他告诉埃班，美国正在制订“红海赛舟”（Red Sea Regatta）计划，准备让40个海洋大国派出国际船队穿越蒂朗海峡，维护国际海事权，确保蒂朗海峡自由通行。

埃班心神不宁地离开会场。以色列处在生死关头，而约翰逊显然忙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大可能落实“红海赛舟”计划。和戴高乐一样，约翰逊也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发动进攻。这位美国总统说：“只要不一意孤行，以色列就不会孤立无援。”

这和1957年美国许下的承诺相距甚远。同法国一样，美国也违背了当初的诺言。

埃班在国际社会东奔西走，没有取得太多成果。以色列国内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国家领导人面临一个关键选择：是按照美国的要求继续等待，还是先发制人、占据上风。列维·艾希科尔认为以色列应该等待，他说：“首先发动战争在政治、外交乃至道德上都说不过去。我们必须保持克制，让军队再等一周、两周或更长时间……我们必须表现得足够成熟，才能经受住这场考验。”[12]

5月27日，内阁投票决定保持克制，继续等待。5月28日，艾希科尔发表广播演讲，试图让民众保持冷静。他说，以色列仍然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

但他的演讲彻底失败了。总理的英文稿撰写人耶胡达·阿夫纳回忆说：

> 演讲过程中不断出现他翻稿子的声音，伴着反反复复的“呃，呃”，似乎艾希科尔不知道自己念到哪了，又像是他不明白稿子上新加上去的“负责任的决策”“共同目的”等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断断续续地演讲下去，不断出现“呃，呃”……收听他讲话的以色列人民本来就担惊受怕，他讲得越不流利，就显得他越没主见和惶恐，虽然他在演讲末尾向大家保证，一旦受到攻击，以色列知道如何保护自己。[13]

这次失败的广播讲话后来被称为“结巴演讲”。阿夫纳还说：“突然，整个国家显得非常无助，就像没了领导人一样。以色列的敌人幸灾乐祸，而战壕中的以色列战士愤怒地摔掉收音机，流下失望的眼泪。”[14]《国土报》一位著名专栏作家写道：“如果一个经历过大屠杀的民族还会信他的话，让自己再次涉险，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15]

艾希科尔出现这种状况是有原因的。他本来计划在家里把讲话录下来，但他审稿太迟，等他改完后，演讲稿上满是删除符号、批注和箭头。后来演播室通知他已经来不及提前录音，总理只好拿着涂满修改、不好辨认的稿子到现场念。

但覆水难收，公众对他的信任已不复存在。有人呼吁他下台，还有人建议由本－古里安担任临时总理。《国土报》另一位专栏作家第二天写道：

> 如果我们相信艾希科尔在此紧要关头确有能力驾驭国家这艘巨轮，我们愿意追随他。但昨晚他发表广播讲话后，我们已不再相信。现在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让本－古里安担任总理，摩西·达扬担任国防部部长，艾希科尔只需负责国内事务。[16]

军方对总理按兵不动的决定深感失望。时任步兵旅指挥官的阿里埃勒·沙龙将军正处在事业上升期，他认为等待下去是个战略错误：

今天我们亲手放下了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即敌人对我们的恐惧。我们本来有实力摧毁埃及军队，但如果在自由通行问题上退让，我们就打开了通往以色列毁灭的大门。无论如何，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未来将付出更高的代价。……以色列人民已经做好准备，去发动一场正义的战争，去战斗，去付出代价。现在的问题不仅关乎自由通行，还关乎以色列人民的生存。[17]

5月19日，约旦国王侯赛因飞到开罗会见纳赛尔。纳赛尔拿出埃及同叙利亚一年前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侯赛因说："再给我一份同样的文件，把里面的叙利亚全部换成约旦，事情就成了。"[18]

以色列在建立和维护同约旦的关系上投入很大。独立战争期间，双方虽然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发生冲突，但双边关系没有完全破裂。19年来，虽然许多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潜入以色列发动袭击，但约以边境总体来说还算安宁。但现在，面对难以承受的压力，约旦国王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参战。约旦还和叙利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这意味着以色列可能要同时面对叙利亚、约旦和埃及在三条战线上的进攻。一天后，同1948年时一样，伊拉克部队来到埃及，急切准备加入战斗。

与此同时，美国几乎无所作为。美国没有组织船队突破蒂朗海峡的封锁，而以色列已经没有时间等下去了。美国和英国号召其他国家站在他们这边，但几乎没有国家响应。约翰逊宣布，他已经看不到任何解决危机的办法。美国此时深陷越南战争，白宫不愿在另一场军事冲突中投入宝贵的政治资本，径直拒绝了以色列在导弹、坦克和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上的请求。

从法国传来的消息更加糟糕。戴高乐曾告诉埃班，首先开火的国家将遭到武器禁运。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战争还没爆发，他就禁止将武器卖给以色列。显然，他判断以色列无法打赢阿拉伯人，他准备利用这一机会恢复法国同伊斯兰世界的长期关系。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拉宾因为压力太大而病倒。他几乎吃不下饭，每天抽约70根烟，喝大量咖啡——然后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症状。民众此时已经非常紧张，如果得知最高军事指挥官在大战前精神崩溃，只会进一步陷入恐慌。所以拉宾对外宣称自己"尼古丁中毒"[19]。拉宾的医生更诚实，称之为"急性焦虑症"。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对以色列社会的观察一向深刻，他指出："以色列当时面临的不是普通战争，这场战争关系到以色列的生存和犹太人主权梦想的终结，巨大的责任压垮了拉

宾。”[20]

拉宾只休息了一天，接受治疗后，又回到了军营。

以色列当时最主要的盟友是世界犹太人。一听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欧洲和美国犹太人都明白这次危机非同小可。大屠杀期间美国犹太人做得不够，他们不愿再犯同样的历史错误。他们开始为以色列捐钱，组织集会，对华盛顿施加政治压力。

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支持以色列的集会有15万人参加，成为美国犹太人组织的规模最大的集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这时已经存在，但十年后才真正具有影响力，成为美国犹太人在国会山最重要的游说集团。）[21]犹太求助联合会（United Jewish Appeal）的“紧急募捐”筹集了3.07亿美元。正当全世界犹太人担心以色列能否抵抗住阿拉伯国家进攻时，美国犹太人行动了起来，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美许多犹太人捐出了大量财产，为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俄亥俄州比奇伍德（Beachwood）的一对夫妇将他们装修房子的资金全部捐给以色列。[22]

但阿拉伯世界也觉醒了。5月26日，纳赛尔宣布：“我们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消灭以色列。”[23]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keiri）在1957—1962年曾担任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在战争爆发前，他宣称：“这场战争后，没一个犹太人能活下来。”[24]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许多民众聚集在大街上高喊“让犹太人去死”“把犹太人赶进大海”等口号。[25]

赫茨尔和比亚利克时代的欧洲来到了中东。就在21年前，奥斯维辛的焚尸炉每天焚烧几千名犹太人；就在5年前，艾希曼审判让以色列人再次感受到大屠杀的恐怖。而此刻，阿拉伯世界也开始故意使用与大屠杀有关的意象。在埃及报纸的一幅漫画中，一只手持刀捅进一颗大卫星的心脏，底下的签名为“尼罗河石油和肥皂公司”——显然在影射纳粹分子用犹太人的尸体做肥皂。

以色列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拉比们在全国各地划出准备用作集体公墓的土地。拉马特甘的体育场被征用为可以埋葬4万人的墓地。酒店全部停业，准备用作急救站。学校改建成防空洞，每天举行防空演习。人们还制订计划，准备将以色列儿童送到欧洲避难，这不禁让人想到1938—1940年将许多犹太儿童送到相对安全处（大多数送到了英国）的“儿

童转移”（Kindertransport）计划。以色列情报机构向艾希科尔汇报，说西奈半岛发现了埃及的毒气设备，但以色列防毒面具库存严重不足。艾希科尔用意第绪语（他年轻时在欧洲说的语言）小声说道：“即将血流成河。”甚至出现了黑色幽默——以色列人开玩笑，说以色列唯一的国际机场打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最后离开者，请关灯。”[26]

到6月1日，约翰逊帮助以色列打开海上通道的“红海赛舟”计划显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搁浅了。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被问道，美国是否会约束以色列，不让它首先开火。腊斯克回答：“我不认为我们有职责约束任何人。”[27]以色列有了可以进攻的第一个信号。[28]

在国内，艾希科尔明白民心不稳，而政府这时最重要的是要能显示出团结一致。他建立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团结政府”（unity government），让反对党领导人进入内阁，包括长期被本-古里安在政治上边缘化的梅纳赫姆·贝京。团结政府大大提高了贝京在以色列政坛的地位。

应众人要求，摩西·达扬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达扬当时并非艾希科尔领导的工党的成员，而是本-古里安领导的拉菲党（Rafi）成员。以色列民众从未见过团结政府，精神紧张的他们为达扬的上任拍手称快。

让贝京的同事感到意外的是，贝京居然建议本-古里安在危机期间担任总理一职。虽然本-古里安没有答应，但他改变了对贝京的看法，两人的关系得以改善。他后来说：“如果我以前就像现在这样了解贝京，历史的面貌会不同。”[29]

1967年6月1日周四，团结政府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第二天和总参谋部、国防委员会成员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军的地下作战中心会面。在周五的会议上，以色列政府决定首先发动战争。6月3日周六，包括沙龙、拉宾、叶沙雅胡·加维什（Yeshayahu Gavish）在内的几位将军向政府提交了作战计划，达扬说第二天的内阁会议将授权军队行动。

周日，在持续7小时的会议上，达扬向内阁提交了作战计划。当时的形势已非常严峻：埃及在西奈半岛至少有10万兵力和900辆坦克；在北部，叙利亚有7.5万兵力和400辆坦克；约旦有3.2万兵力和300辆坦克。总共算下来，以色列要面对20.7万敌军和1600辆坦克。如果动员全部预备役部队，以色列的军力能达到26.4万人，但只有800辆坦克。以

色列的飞机数量更不容乐观，阿拉伯国家共有700架飞机，以色列只有300架。

达扬认为，只要立刻发动进攻，以色列就能够赢得战争。他请求内阁批准第一轮军事行动，另外又要求由他和艾希科尔单独决定行动时间。内阁最终以12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对埃及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由达扬和拉宾决定行动时间。

特拉维夫以南12英里处，是地中海沿岸小城雷霍沃特，附近泰勒诺夫（Tel Nof）空军基地驻扎着第55空降旅。6月5日早上7点10分，空降旅的士兵惊奇地发现几十架飞机从这起飞，向南超低空飞行。90分钟后，它们又飞了回来。除了这里的士兵，几乎没人能看到这一幕。

7点30分，200架以色列喷气式战斗机飞往埃及，准备袭击。以色列知道，这个时间点埃及飞行员正在吃早饭，飞机无人看管。这次行动极其冒险，几乎全部以色列飞机加入了攻击编队，国内只留12架飞机保卫领空安全。为了躲避埃及雷达，执行空袭任务的飞机飞得极低，有时离地面只有15米，极险。一位空降兵后来回忆说，飞机飞得特别低，他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一架。

为了不暴露位置，所有飞行员不得使用无线电通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使用无线电求救。如果遇到无法独自解决的危险情况，只能让飞机在大海上坠毁。

约旦雷达发现了以色列飞机，但由于埃及在没有通知约旦的情况下更换了频率代码，约旦无法向埃及发出警告。这是个致命的错误。长达3个小时的多轮进攻（以色列飞机飞回基地加油和装弹后继续飞往埃及）后，以色列摧毁了几百架埃及飞机，三分之一的埃及飞行员被炸死，13个基地无法正常使用，23个雷达站和防空设施被摧毁。埃及空军基本上全军覆没。

以色列损失了17架飞机，牺牲了5名飞行员。其中一架飞机受损后飞到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地迪莫纳的上空。由于飞行员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地面，以色列自己发射了“霍克”防空导弹将之击落。

上午10点35分，第一架飞机起飞3个小时后，伊扎克·拉宾收到一份简报：“埃及空军已不复存在。”[30]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以色列将承受不少损失，但在得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以色列国防军的领导们已经明白，在战火全面爆发前，以色列已基本赢得这场战争。

以色列人联络上约旦国王侯赛因，请求他不要加入冲突。虽然当时约旦已经向以色列开火，但以色列人承诺只要约旦不再开火，以色列将继续接受两国1949年签订的停战协议。然而，侯赛因可能真的相信埃及在这场冲突中像纳赛尔断言的那样乐观，同时也担心不参战会引发民众的愤怒，他命令约旦军队越过了停火线，空军也进入待命状态。

上午11点50分，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空军对以色列发起进攻，但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以色列空军不但击落和赶走了全部敌机，还炸毁了约旦和叙利亚的空军基地。6月5日这天，以色列共摧毁了400多架阿拉伯飞机，赢得战争的制空权。

在地面，以色列军队切断了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的联系。第二天，以色列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沙姆沙伊赫，解除了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

6月5日，在前往自己宣誓就职典礼的路上，梅纳赫姆·贝京听到来自约旦的炮火声。他没有感觉到危险，而是看到了机会。当内阁成员在一个摆满旧家具和清洁工具的地下室开会时（此前有炮弹落在议会大楼前的草地上，于是内阁将开会地点改到这），贝京建议以色列充分利用侯赛因加入冲突的机会收复耶路撒冷老城。艾希科尔担心这场战斗的代价会很高，贝京则像往常一样将冲突放在犹太历史的背景下审视。他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约旦军队不堪一击，而我们的军队就在老城城门下。我们的士兵几乎能看到西墙。我们怎么能不让他们进去？这是历史给我们的绝佳机会，如果不抓住，后人不会原谅我们。”[31]

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指挥部命令两个营的兵力“冲过将东西耶路撒冷隔开的障碍，穿越雷区和战壕，到达斯科普斯山”。这些战士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占领老城，“抹去1948年的耻辱”[32]。第二天，空降兵乘坐大巴进入耶路撒冷。虽然他们可以听到城市另一边的轰炸声，但1948年以来由以色列控制并成为首都的西耶路撒冷静如止水。这份平静让他们既感动，又有点窘迫。战士们唱起三周前风靡全国的拿俄米·舍莫尔创作的歌曲，划破了平静：“耶路撒冷，黄金之城；何等明亮，青铜之城；我愿如琴，将你歌颂。”这些“琴”不知道他们即将投入一场恶战。

以色列出师不利。由于情报有误，以色列首先进攻老城外一个约旦军队的据点，这个地方现在叫弹药山。以色列相信以军人数是约旦守军的三倍，但约旦部署在那的军力远远多于以色列的判断。战斗从6月6日凌晨2点30分持续到早上6点30分。迈克尔·奥伦在描述战斗结果时写

道："以色列的尖兵分队全军覆没。三辆谢尔曼坦克中一辆被击毁。约旦军队躲在战壕里，其他两辆谢尔曼坦克无法将炮管调到这么低的角度射击。为了避免误伤自己，以军无法请求炮兵火力支援。空降兵的背包太宽，不能在敌方战壕里自由穿行，只能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前进。"[33]这是阿以冲突中最血腥的战斗之一，在4小时的战斗中，以色列损失了35名战士，约旦有71名战士丧生。

尽管如此，第二天早上4点30分，以色列士兵经过一夜鏖战，还是进入老城外的无人区，几小时后控制了老城城墙外所有阿拉伯区。以色列士兵蹲下来，等待内阁的决定和命令。上午9点15分，时任第55空降旅指挥官的莫塔·古尔（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终于得到命令："立即进入并占领老城。"

> 莫塔坐在地上，端详着城墙围绕的老城。那个早晨晴朗、凉快，阳光照上他的背。圣殿山上金色和银色的穹顶在他眼前闪光。他闭上眼睛，似乎在祈祷。他即将步入这块犹太人的圣地，仿佛与大卫王走在一起，他曾经征服耶路撒冷，将它作为自己的首都；与犹大·马卡比走在一起，在圣殿遭到希腊人的亵渎后，他来此清洁了圣殿；与巴尔·科赫巴走在一起，他和罗马人奋力一搏，最后输掉了争夺耶路撒冷的战争。在随后许多个世纪里，犹太人被迫离开这里，只留下无法抹去的回忆。现在，这片圣地又从梦想中走了出来，在触手可及处熠熠生辉。[34]

古尔命令他的空降部队从狮门进入老城。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冲进老城城门，来到圣殿山。莫塔·古尔拿起无线电发报机，发出了一句后来在以色列广为传颂的话："圣殿山已经在我们手上。"

仅在三周前，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还悲痛地喊："我的耶路撒冷在哪里？"这把当时在场的学生震住了。现在，他随着刚刚占领老城的空降兵从圣殿山走到西墙前。在场的还有国防军大拉比什洛莫·戈伦（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大拉比）。戈伦手里拿着羊角号和《托拉》，被抬到另一人的肩上。但他情绪太激动了，没能吹响传统的羊角号。一位吹过小号的士兵让戈伦把羊角号递给他，由他吹响了羊角号。上一次在这里吹响羊角号的，还是不顾英国禁令的伊尔贡成员，他们一吹完就得逃跑，现在已经没有逃跑的必要。几千年后，犹太人终于再次控制了西墙和圣殿山。

到6月7日，战争爆发不到两天，埃及和约旦军队已被击溃。纳赛尔下令全军撤退。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在停火协议上签字，因为他想在停火协议中加入一条类似1956年那样的条款，要求以色列撤离西奈半岛。但借用戴高乐的话，如今是1967年而不是1956年，以色列不会答应。纳赛尔明白已经完全没有希望收复失去的领土后，才于6月8日午夜接受了停火协议。

正当南部和中部作战正酣之际，国防军领导人已经在激烈讨论如何在北部采取行动了。达扬和艾希科尔反对占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认为叙利亚军队没有越境意图，将战火燃烧到北部，可能成为苏联干预这场战争的借口。

但其他人不同意。6月8日，以色列北部战线指挥官大卫·埃拉扎尔找到艾希科尔，试图说服他占领戈兰高地。他提醒总理，多年来，以色列北部的居民经常遭到叙利亚军队炮击，长期担心叙利亚人潜入境内。每当遭到叙利亚军队炮击，以色列人只能躲进防空洞，出来后发现房子被炸毁，公共建筑被损坏，农田燃起熊熊烈火。他们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担心自己，担心孩子，每天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现在有机会一劳永逸地解除威胁，让以色列北部的生活重归安宁。



地图1　约公元前**1100**年大卫王时期的犹太王国

大卫王是古代以色列人的第二位国王，他将犹太人零散的支派扩展为一个王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在中东建立犹太国能够实现犹太民族回到先祖之地的梦想。19世纪末形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只是将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梦想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参见第2章。



地图2　1914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巴勒斯坦的犹太城镇和村庄分布

19世纪末，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犹太人开始大量移民巴勒斯坦。当时控制这一地区的奥斯曼帝国试图限制犹太人移民，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犹太人还是建立了许多社团。这些社团有的发展成基布兹（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的产物），有的按照欧洲模式建立起现代城市如特拉维夫等。参见第4章。



地图3　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

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地。1917年发表的《贝尔福宣言》中，英国声称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没有明确划定“民族家园”的范围。1937年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暗示“民族家园”包括约旦河两岸。1948年宣布建国的以色列只包含英国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部分领土。参见第5章。



地图4　1937年皮尔委员会方案

1936年英国委派皮尔委员会到巴勒斯坦解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持续升级的冲突。1937年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第一次提出分治（“两国方案”的最早版本），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伊休夫勉强接受了这一提议，但阿拉伯领导人拒绝接受。参见第6章。



地图5　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

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建议将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国和阿拉伯国。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81号分治决议。虽然划分给犹太人的领土只占委任统治地的12%，但犹太人接受了这一决议，而阿拉伯领导人再次拒绝并在第二天发起战争，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独立战争。参见第7章。



地图6　1967年六日战争后的以色列

1967年6月，面对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的战争威胁，以色列空军先发制人，在战争爆发前摧毁了埃及几乎所有的空军力量。在六天的闪电战中，以色列将领土扩大了三倍多，占领了42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包括埃及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多年后，1967年战前边界将成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和巴勒斯坦最终建国后同以色列的参考边界。参见第12章。



地图7　阿隆方案

1970年，伊加尔·阿隆就1967年占领的土地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谷一批定居点，这些领土能够起到战争预警作用，提早发现来自东面的进攻。约旦河西岸其他领土归还巴勒斯坦人或约旦。虽然该方案没有成为以色列正式文件，约旦也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但很多以色列定居点在约旦河谷得以建成。在“阿隆方案”之后，几十年来出台了多个划分约旦河西岸的提议。参见第13章。



地图8　1993年《奥斯陆协议》

《奥斯陆协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协议规定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分阶段获得巴勒斯坦领土的管控权。A区在协议制定后就交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B区由巴以双方共管，C区由以色列单独控制。但几年后，随着伊扎克·拉宾总理的遇刺和巴勒斯坦暴力运动的兴起，《奥斯陆协议》最终失败。参见第16章。

注：本书地图皆源自原书插图。

部长级国防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埃拉扎尔的申述，以及拉宾关于占领北部山区的作战计划。达扬听后还是无动于衷，他仍然担心

北部军事行动可能让苏联介入战争。那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弄错船只所属国，在埃及海岸轰炸了美国海军的“自由”号，34名美国船员遇难，171人受伤，船只受到重创。当时正值美以关系的灾难性时刻，美国人对以色列愤怒至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让苏联加入战争，自然是轻率的。

会后，拉宾打电话给埃拉扎尔，告诉了他委员会的讨论结果。埃拉扎尔感到失望，认为政府依旧不对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居民负责。他后来抱怨说：“在给我们造成这么多麻烦，又是炮轰又是骚扰后，现在还让这些自负的混账东西留在山顶上继续对我们作威作福？如果以色列国不能保护我们，我们至少有知情权，他们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不属于这个国家，没资格得到军队的保护。他们应该让我们逃离家园，结束这段噩梦！”[35]

凌晨两点钟，军事指挥官已经筋疲力尽，便散了会，上床休息。但早上6点，达扬醒来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打电话给中央司令部，从那得知虽然以色列军队还没有向北发动进攻，但驻扎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军队已经溃不成军。6点45分，达扬直接打电话给埃拉扎尔，命令他立即对戈兰高地发动进攻。[36]拉宾得知这一消息后，赶紧打电话给埃拉扎尔，提醒他中央司令部对戈兰高地的判断完全错了。他说：“叙利亚军队根本没有崩溃。你得做好准备，他们会拼尽全力，顽强抵抗。”[37]

拉宾判断得没错，这场战斗很激烈，以色列损失惨重：115名士兵阵亡，306人受伤。但叙利亚伤亡更严重，6月9日晚上，以色列已经占据上风，叙利亚的防线在崩溃。(3)

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开往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西40英里处的库奈特拉（Kuneitra），攻占下这座城市后，叙利亚同意签订停火协议。6月10日下午6点30分，六日战争基本结束。

这场战争非常短暂，只持续了132小时。以色列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埃及死亡人数在1万—1.5万之间，5000多人失踪，几千人受伤。约旦损失了700名士兵，6000人失踪或受伤。在北部战线，450名叙利亚人死亡，将近2000人失踪或受伤。埃及军队只剩15%的军事硬件完好无损。以色列损失了679名士兵（后来有的以色列数据将死亡人数定为约800人），2567人受伤。(4)

这场战争大幅改变了以色列的领土。战争期间，以色列一共占领了4.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领土较战前翻了3倍多（参见地图6）。[38]以色

列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俨然成了另一个国家。已经对犹太人无法去这些地方习以为常的哈伊姆·古里在六日战争后说："我感觉已经死去，又醒来，复活了。"分裂的国家终于统一了。"我深爱的一切就在脚下，这片无主之地像梦境般呈现。古老的以色列地，我青春的家园，之前被分裂的另一半祖国。"[39]

独立战争期间，有大约70万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来到附近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拒绝他们成为公民，让他们成为永久性难民）。六日战争再一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发现自己不再生活在约旦统治下，而是回到以色列控制下。在1967年，大约125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们的命运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

和1948年战争后一样，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新历史学家"学派）对六日战争的解读也和主流叙事不同。有的声称，1948年本－古里安不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决策，一直让好战的帕尔马赫成员深感不满，正是这些人挑起了六日战争。比如，以色列犹太裔政治专栏作家哈伊姆·哈内格比写道："必须记住，在1967年，军队的指挥官们仍是当年的帕尔马赫成员，他们热切希望利用六日战争来实现1948年未实现的事情：接管巴勒斯坦人剩下的领土，通过征服的力量，建立真正的大以色列。"[40]他们中还有人认为，是经济失败导致战争爆发，政府希望通过战争转移人们对高失业率的关注。"1964年以来，不断升级的冲突是'不必要的'，因为阿以冲突并不是这场战争的根源。这些年来，以色列一直在放弃它的社会原则，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影响，采用武力是……某种战略选择。"[41]

这些年来已日益清楚的是，这类观点听起来雄辩滔滔，但并不符合历史。战争发生30年后，那一时期的文件已被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解密（阿拉伯国家的档案仍在封存，其解密遥遥无期）。通过阅读这些文件，我们能够相对客观地还原当年的外交史，正如迈克尔·奥伦在其权威之作《六日战争》中所写："以色列不顾一切试图避免战争，直到战争前夜，还在尝试各种可能避免战争的途径。"[42]

枪声停息、威胁解除后，以色列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氛围中。犹太国不但生存下来，还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这一次，以色列被法国人背叛、被美国人拒绝、被苏联人威胁，但孤军作战的以色列在战争中大获全胜。过去那群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的地下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一支高

度职业化的军队。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犹太人不用生活在危险中，可以肆无忌惮欺负犹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敌人一拿起武器犹太人就害怕地退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犹太人再也不用担心下一场大屠杀就在眼前。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曾梦想犹太人在先祖之地享有主权，这一天终于到来。

为此感到兴奋的不仅是以色列人。在苏联犹太人看来，以色列犹太人的形象和他们从小认识的犹太人形象完全不同，他们突然为自己是犹太人而骄傲。[43]此后，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美国犹太人也很兴奋，六日战争后的一年，1.6万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超过建国以来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总数。[44]

就在空降兵为占领耶路撒冷老城而欢庆时，拿俄米·舍莫尔正在西奈半岛，准备为那里的战士演出。这时，她从广播里听到耶路撒冷的战士正在唱她的歌《金色的耶路撒冷》，她在歌词中把耶路撒冷描述成一座“孤零零的城市，心中横亘着一道墙”，她意识到六日战争后，这句歌词已经不合时宜。于是她将一位战士的背当作桌子，迅速写下新的歌词：

我们重新回到水井旁
回到这里的市集和广场
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
又传来羊角号的声响
天空中仿佛闪耀着千百个太阳
连石缝里也沐浴着金光
我们[这一次]路过耶利哥
去观赏死海的波浪[45](5)

犹太复国主义者长久以来梦想安全、自信、自豪和国际赞赏，这个梦终于实现。

但并不持久。

(1) 由于成本过高，1968年后以色列不再每年举行阅兵仪式。最后一次阅兵在1973年，当时是为了纪念建国25周年。

(2) 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认为，拉宾和艾希科尔在阅兵前一天就得知埃及军队进入了西奈半岛。第二天参观阅兵期间，他们不断收到新的情况通报。（Michael Oren, *Six Days of War: June*1967*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61—63.）

(3) 艾利·科恩（Eli Cohen）是以色列具有传奇色彩的间谍，如果没有他，以色列攻打戈兰高地的损失会更大。科恩1924年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1947年加入埃及军队。以色列建国后，当时在大学学习的科恩经常被穆斯林兄弟会骚扰。和其他犹太家庭一样，他家也移民到以色列。由于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科恩当上间谍。1961—1965年担任叙利亚国防部部长顾问，为以色列提供大量关于叙利亚的关键情报。他的身份泄露后被判处死刑，1965年5月在大马士革一个公共广场被处以绞刑。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能迅速占领戈兰高地，离不开科恩提供的情报。

(4) 和1948年一样，以色列的胜利给流散地的犹太人带来了灾难。在埃及、也门、黎巴嫩、突尼斯和摩洛哥，愤怒的暴徒袭击犹太人，烧毁犹太会堂。发生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的集体迫害导致18名犹太人死亡，25名犹太人受伤。埃及4000名犹太人中有800人被捕。大约7000名犹太人被阿拉伯国家驱逐，他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几乎再没什么财产。（Michael Oren, *Six Days of War*，p.307.）

(5) 以色列人六日战争前也能去死海，但需要先向南到贝尔谢巴（Beersheba），再从阿拉德（Arad）穿越沙漠来到死海，从耶路撒冷开车出发需要好几个小时。现在，从东耶路撒冷经过耶利哥前往死海，开车只需要大约半个小时。

第十三章

占领成为重负

耶路撒冷属于我，但让我感到陌生……

生活在那的也是陌生人……

他们一直生活在那，我才是陌生人。

——阿摩司·奥兹写于六日战争后

拿俄米·舍莫尔在歌词中写道："我们重新回到水井旁，回到这里的市集和广场，[回到]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确如歌中所唱，犹太人重新回到这里。东、西耶路撒冷间的那道墙已不复存在，圣殿山下的西墙又回到犹太人的怀抱。自大约两千年前罗马人毁灭圣殿以来，第一次有大量犹太人来到西墙前。

他们用手触摸墙上的石块，徜徉于古老的集市，终于能够亲眼看见这个千年来魂牵梦萦、但过去19年来无法靠近的地方。"推着婴儿车的女人，包着头巾的老妇，戴着檐帽的基布兹成员，裹着祈祷巾戴着哈西德毛帽、黑色大檐帽或针织基帕帽的正统派教徒来到这里……陌生人之间会相互一笑，似乎在说：我们站到了故事的最后。"[1]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欢庆之余，人们也感觉怪怪的，占领似乎不像欢庆者想象的那样简单。但不管怎样，在这场许多人认为这个年轻国家将灭亡的战争中，以色列克服了各种难以逾越的困难。以色列人回到了圣经时代的土地，回到了多个世纪来犹太人只能在宗教经典中读到的地方。

但拿俄米·舍莫尔在歌词中提到的市集并非无人居住。阿摩司·奥兹（他父亲在1947年11月那个夜晚曾对他说犹太历史将永远改变）感到，历史的浪潮正再次发生改变，在西奈半岛服兵役的他，一休假就来到耶路撒冷。走在大街上，他发出这样的感慨：

> 耶路撒冷属于我，但让我感到陌生……这座城市有人居住。生活在那的也是陌生人：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他们一直生活在那，我才是陌生人……他们的眼神恨我。他们希望我死。我是受诅咒的

陌生人……我拿着冲锋枪走在街上，俨然成了儿时噩梦中的人物：一个身在异乡的异客。[2]

战后，他很快在工党《达瓦尔报》的专栏中写道："占领即使不可避免，也是腐化堕落的。"在后来几十年里，他同以色列小说家大卫·格罗斯曼等人一起对这个观点进行深入阐释。(1)

从摄于六日战争前的西墙黑白照中能看到，西墙前是一条拥挤的小巷，连几百个人都容纳不下。政府料到六日战争后会有几千犹太国公民涌到犹太教最神圣的这个地方来欢庆。小巷旁有个脏乱的棚户区，叫穆格拉比（Mughrabi）区。1948年，135户无家可归的难民搬到这儿长住。6月10日晚上，得到高层批准后，军队要求穆格拉比区的阿拉伯人立即离开，他们计划在此建立一个能够容纳大量人口的广场。很快，军队的推土机开始清除这些房屋，疏通通往西墙的道路。负责清空穆格拉比区的指挥官后来回忆说："要求在此居住的人离开，是我下达过的最艰难的命令……当你[在战场上]下令'开火'，只需要本能，不用多想。但在这儿，你不得不下达的命令会伤及无辜。"[3]

一些学者认为，穆格拉比区(2)的行动很能体现以色列当时草率而仓促的决策，其中有些决策随后几十年塑造了以色列的发展。6月10日拆除该区前，以色列没有展开如何对待占领区大量城镇和社区的全国性讨论。但以色列人很快明白，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人对占领的土地和人口作出的决策，将给以色列带来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同六日战争试图解除的威胁一样事关生死。

战后的变化让全体以色列人无比兴奋。在宗教人士看来，以色列能如此戏剧性地逃过一劫，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一定得到了上帝的帮助。有人认为这场战争说明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到来。上帝一定是听到了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痛苦的呼喊。这股宗教热情将助燃一场运动，它很快就会永久改变以色列。

世俗犹太人同样心潮澎湃。和以前一样，以色列诗人用诗歌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激动心情。拿单·奥尔特曼一向善于用脍炙人口的诗歌记录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已经成为犹太民族的声音。

但从1967年到1970年去世，奥尔特曼备受争议，因为他以笔作为武器，为战后以色列的鹰派代言。鹰派认为占领约旦河西岸后，以色列就收复了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地。奥尔特曼说："以色列不能做出任何让

步，尤其不能放弃这个‘民族的摇篮’。这场胜利最大的意义，是它消除了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地之间的区别。……此后，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地。”[4]

众所周知，奥尔特曼是世俗犹太人。[5]虽然保留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后来成为宗教团体的主张，但不要忘记，从19世纪末起，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建设家园。早期移民大多是来自俄国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在海外资助者的帮助下，他们从愿意出售土地的阿拉伯人手上买地。1947年，阿拉伯人对伊休夫发动进攻，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49年，在此期间以色列占领了更多的土地。独立战争后，在20世纪50年代开发这些土地，自然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迈出的下一步。

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这些新土地怀有如此热情，尚有另一层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典型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续乏力。在六日战争前的六年中，全国只成立了十个新的莫沙夫或基布兹。建设集体主义农庄的，大多是欧洲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犹太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大多死于希特勒的毒气室，这类移民数量大幅减少。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急需注入新的激情。

世俗犹太复国主义激情的减弱带来了真空，从而为宗教人士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新的领导者、成为以色列建国后第三个十年的领袖创造了机会。犹太复国主义以前具有明显的世俗特点，还试图培养新犹太人，故而遭到犹太宗教人士的攻击。但六日战争后，一些宗教领导人试图领导这场重新获得活力的运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战争前，库克拉比表达了他对以色列地被分裂的悲痛之情；战争后，他突然摇身一变，像一位活在当代的圣经先知那样历数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荣耀：

> 这位拉比站在铺着一面以色列国旗的诵经台后发表讲话。诵经台上既有宗教经典，也有代表世俗力量的以色列国旗，兹维·耶胡达似乎想通过这种摆放方式告诉人们：这面国旗和我身后包裹《托拉》柜子的丝绒布一样神圣。……拉比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和盛气凌人的语气警告全世界不要干预上帝的计划，也不要夺走以色列解放的这片土地。他还说，以色列民主选举出的政府也无权从占领土地上撤离。[6]

库克拉比认为自己有权提醒政府有权做什么和无权做什么，他这种

自信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发出危险信号。但大多数以色列人完全没注意到。

当然，并非每位宗教人士都持这种观点。正统派犹太教徒耶沙亚胡·雷博维茨教授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以色列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雷博维茨认为1967年6月胜利后，主要宗教义务是拯救以色列的灵魂，要做到这一点，以色列需要从占领土地上撤出，这样以色列人就不会强行统治异族人。

战争结束三年后，他给以色列十二年级的学生写了封信，信中总结了他从1967年停火以来反复强调的观点：

> 我主张立即从居住有125万阿拉伯人的占领土地撤离，这与和平没有任何关系。我总是说“离开”，而不是说“归还”，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归还给谁。归还给侯赛因？法塔赫？纳赛尔？还是当地居民？我们离开后，阿拉伯人会对这片土地做什么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管这些事。我们应该在犹太国修建防御工事，保卫这个国家。如果我们不能有尊严地离开——即在理解犹太民族和国家的真正需求后主动离开，那么美国人和苏联人会逼迫我们狼狈地撤离。要明白，我对“占领土地”问题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生活在那的125万阿拉伯人，我并非关心他们，而是关心犹太民族和犹太国。目前已经有30万阿拉伯人生活在以色列境内，如果以色列还要管理占领土地上的阿拉伯人，以色列无法成为犹太人的国家，犹太民族将岌岌可危，我们在国家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体系也将遭到破坏。[7]

雷博维茨石破天惊的观点遭到许多宗教人士的反对。其中就有参与解放老城和圣殿山行动的空降兵哈南·波拉特。他走到西墙，目睹那些被严重风化的神圣石头，喃喃说道：“我们在续写圣经新的篇章。”[8]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长期以来就是属于年轻人的革命。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才19岁。指挥哈雷尔旅的伊扎克·拉宾虽然只有26岁，但在争夺耶路撒冷的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同样，怀着满腔热血和十足的干劲，年仅24岁的哈南·波拉特等人也发起了一场改变以色列的运动。

哈南·波拉特1943年出生于耶路撒冷附近犹地亚山上的埃齐翁村，这里当时是一个成立不久的宗教基布兹。波拉特很早就体验过流亡的滋

味。1948年5月13日，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前一天，埃齐翁村成为独立战争中最早被阿拉伯人攻陷的基布兹之一，村里所有成年男性被聚集起来，然后被扫射或用手榴弹炸死。波拉特和他的朋友们能活下来，是因为基布兹的妇女和儿童已提前撤离，在耶路撒冷避难，只有成年男性留下来保卫家园。

这一带的基布兹被攻陷后，许多犹太人遇害，其中包括波拉特好朋友们的父亲，他自小就与这些人朝夕相处。当波拉特说他要拯救“父辈之地”时，他并未使用隐喻。

其他人也想拯救“父辈之地”。六日战争结束几周后，负有盛名的圣经老师约埃尔·宾 - 努恩带领学生，来到多年以来只能从书本上读到的地方：

> 手持袖珍本圣经，戴着基布兹无檐帽，约埃尔带领学生走在圣经之地，寻找圣经中写到的水井、遗迹和地形，并根据这些地点寻找古战场。他们找到亚伯拉罕从希伯伦走到耶路撒冷的路，还找到1948年帕尔马赫成员赶去支援埃齐翁村的路，两条路并存在这片土地上，就仿佛这两件事没有隔着两千年的流散一样。[9]

学生们能够亲自踏在圣经描述的山间小路上，这让宾 - 努恩能够赋予圣经一种新的生命力。在宾 - 努恩的教导下，满怀宗教热情的波拉特有了新的目标：他希望人们能够重新定居在他父辈们遇害的地方，如果这些基布兹当年没有被攻陷，这片土地如今就已经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了。

1967年9月25日，六日战争刚结束三个月，哈南·波拉特见到总理，希望政府同意以色列人重新在埃齐翁村定居。他多次提起自己和总理之间的对话，它表明以色列的政治领导人完全误解了这股重新燃起的宗教热情：

> “孩子（kinderlach），你想要什么？”艾希科尔问道，他用了意第绪语中对小孩的昵称。“我想去那儿。”哈南回答说。“孩子，如果想去，你就去啊。”哈南说：“还有十天就是犹太新年，我们都很想去我们父母祷告的地方祷告。”总理说：“喔，孩子，既然想祷告，就祷告吧。”[10]

我们无法从这段叙述中判断艾希科尔的态度，他是反对、支持还是

怀疑。“艾希科尔的评论有不同的解读，有的人说他强烈支持，也有的人说他坚决反对，但不管怎样，激进分子没有太在意他的态度。”[11]但可以确定的是，不管艾希科尔如何看待波拉特，他都严重低估了波拉特的决心。

返回古什埃齐翁，不仅是为了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生活，也不仅是为了改变以色列的地理和政治环境。波拉特和他的朋友们是为了返回自己的家园，返回他们出生的地方，返回他们父母耕种土地、修建房屋和建立社区的地方。为了守卫这里，他们的父亲献出了生命，他们的长辈因此被屠杀。如果将犹太复国主义概括为一项犹太人返回先祖之地的事业，那么对于波拉特和他的朋友们来说，他们必须返回父辈居住的地方。1948年5月，埃齐翁村和周边犹太村庄沦陷时，哈伊姆·古里写道：“我们将重生，像以前一样再次站起来。”19年后，那些死者的儿女们决定实现古里对全国人民的承诺。

艾希科尔象征性的认可正是波拉特需要的。不到两天时间，波拉特和他的朋友们（人们称他们为“埃齐翁村的孩子”）坐着破旧的卡车和大巴陆续回到基布兹的旧址。

抵达后，他们从车上卸下床垫，摆在临时搭建的铝结构棚屋里，这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将兹维·耶胡达·库克的头像挂在男宿舍里，在约旦河西岸的第一个定居点度过了第一夜。

以色列人普遍认为埃齐翁村是在耶路撒冷保卫战中被攻陷的，这在以色列集体记忆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重新有人在此定居，令各行各业的犹太人深受鼓舞。在特拉维夫，“一位即将退休的牙科医生决定卖掉自己办公室的设备，将这笔收入捐给埃齐翁村。”[12]特拉维夫大学的校长评论说：“埃齐翁村的先驱在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13]一位学生说如果能加入这里的基布兹，他宁愿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一对夫妇申请到这里的基布兹度蜜月。

随后，定居者运动声势逐渐壮大，无法回头。

截至1973年底，仅仅经过6年发展，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主要在约旦河谷）建立了17个定居点，1977年5月达到36个。1973年，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西北角（靠近拉法[Rafa]口岸）建有7个定居点，1977年达到16个。在西奈半岛内陆，1973年有3个定居点，1977年达到7个。[14]

1974年，决心在1967年占领土地上建立定居点的以色列人成立了第一个属于他们的政治实体“信仰者集团”，它后来成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信仰者集团不但是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意识形态的体现，还是对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思想的复兴。几年后，阿里埃勒·沙龙回忆说，有人问他：“信仰者集团的成员都是些什么人？”他回答说：“他们和20世纪40年代的我们差不多，只是比我们更认真。”[15]信仰者集团将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截至2012年，大约有34.1万以色列人生活在定居点。

一些以色列人想保留约旦河西岸是出于宗教和意识形态原因，但还有些人是出于安全考虑而非神学考虑。1970年，帕尔马赫创始人之一、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和移民吸收部部长的伊加尔·阿隆提议归还部分1967年占领土地，保留剩下的土地。“阿隆方案”（参见地图7）建议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谷、东耶路撒冷、古什埃齐翁和希伯伦郊区新建立的犹太居住区基亚特阿巴（Kiryat Arba）。以色列将在这些地区建立民事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除了提供住房，还能起到战争预警作用，提早发现来自东面的进攻。以色列没有计划控制的土地将交还给约旦（该方案之一），这些区域之间由高速公路连接。阿隆还提议将西奈半岛大部分地区归还埃及，但保留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这一方案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争议（虽然得到广泛讨论，但当时的以色列政府从未就此正式投票），但它遭到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拒绝，因而没有实际意义。

几十年后，大多数以色列人将明白，约旦河西岸最终无法逃避分而治之的命运（由于国际压力等原因），不可能被以色列长期单独占领，但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远比“阿隆方案”提出时复杂。截至2015年，已有几十万以色列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巴以双方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强硬和无法调和，这场冲突从政治问题演变为宗教问题，双方的宗教人士都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土地。“阿隆方案”提出得太早，当时如果能够采纳，中东历史就会大不相同了。

如何处理占领土地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最具争议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赫茨尔寻求建国，而阿哈德·哈姆认为国家是一个错误，犹太人只需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文化中心。后来，本-古里安和雅博廷斯基就如何抵抗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产生分歧。多年后，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出现争执——他们两人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犹太民族记忆在以色列政策和政治议程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现在，以色列右翼和左翼人士针锋相对，定居者和那些主张以色列应该放弃占

领土地的人剑拔弩张。和先前的争论一样，这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两个阵营的人都深爱着犹太国，都在为这个国家的繁荣而努力奋斗，但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这个国家的灵魂，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行动方针。

信仰者集团认为约旦河西岸是一片处女地，年轻的犹太人都应当来到这片圣经中描述的民族诞生之地生活。但其他以色列人看得很清楚，这里生活着约125万以色列统治下的阿拉伯人。阿隆认为这块土地能够让以色列变得更安全，雷博维茨则认为这是改变以色列属性的毒瘤。突然，以色列边境问题不再是一个安全和外交问题；它成了一个宗教问题，因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色列社会出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的对立，这一分歧直到今天也没有消除。

梅厄·阿里埃勒是一位性格内向、满头卷发、有艺术天赋的空降兵，和哈南·波拉特一样，他也参加过解放耶路撒冷老城的战斗。波拉特看到西墙时充满惊奇，梅厄的感受却截然不同。“他心想：‘我随时可能被这种想法击中：我终于来到这儿，两千年的渴望得以实现’，但梅厄·阿里埃勒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更没有觉得自己在续写圣经新的篇章。他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是犹太人吗？’”[16]极具音乐才华的他提笔改写了拿俄米·舍莫尔的歌，写下了《钢铁的耶路撒冷》。[17]

舍莫尔在歌词开头写道：“山林的气息美酒般清爽，钟声和松柏的芳香在风尘中弥荡。”阿里埃勒的《钢铁的耶路撒冷》则以“在你的黑暗中”开始：“在你的黑暗中，耶路撒冷……我们来此开拓你的疆土，驱赶敌人。”[18]

拿俄米·舍莫尔看到了犹太人返回民族诞生的先祖之地，梅厄·阿里埃勒则看到了战乱带来的痛苦。虽然歌词末尾也提到“金色的耶路撒冷”，但情感完全变了。这里不仅是金色的耶路撒冷，也是“铅一般的耶路撒冷，梦一般的耶路撒冷”。歌词最后是一句祈祷：

在你的城墙中，
愿和平永驻。

战争结束后，阿里埃勒用低成本录制了这首歌，不知怎的为以色列电台注意到，忽然之间就被反复广播。这首情绪悲伤、对拿俄米·舍莫尔略带嘲讽的歌曲大受欢迎，并非偶然。以色列即将掀起关于这场战争的大讨论。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应当如何处置？雷博维茨和波拉特提出了针

锋相对的观点，拿俄米·舍莫尔和梅厄·阿里埃勒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借用约西·克莱因·哈勒维的话，阿里埃勒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鲍勃·迪伦，唱出了他那一代以色列人的幻灭感。又过了十年，这种幻灭催生出“现在就和平”运动（the Peace Now movement）。以色列社会的音乐家和诗人总能充当新兴运动的预言者，这又是一个例子。

连一些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官也明白，这场胜利虽然伟大，但也暴露出一个软肋。伊扎克·拉宾后来说：“我们本来可以控制更大的区域。如果我们想占领开罗，埃及军队无能为力，阿曼也是一样，6月11日我们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占领大马士革。但占领更多土地并不是我们打这场仗的目的，我们占领的土地已经成为一个重负。”[19]

“重负”一词用得准。许多以色列人意识到，控制这些新占土地和统治125万阿拉伯人非常棘手。1948年阻止将军们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本-古里安这时虽已退休，但他仍然表示，以色列应该保留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但其他地方要统统放弃。在这方面，他和耶沙亚胡·雷博维茨观点一致：这事关以色列的灵魂。

以色列的士兵也改变了强硬姿态，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兵开始分享让他们内心深感不安的所见所闻。《士兵谈话》一书搜集了对参战基布兹成员的采访，其中披露了士兵们从未袒露过的心声。有的人谈到自己杀人时的痛苦和对战争的反感。还有人说，当看到和自己孩子年龄一般大的阿拉伯儿童举起双手投降，深感羞愧。

这本采访集的出版人本来认为此书反响有限，没想到卖出了10万册，对以色列市场来说这不啻是天文数字。这本书的成功和梅厄·阿里埃勒《钢铁的耶路撒冷》的流行有着同样的原因。一些以色列人已预感到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即将兴起，而以色列人自己为此推波助澜。

六日战争不但让以色列人内部出现分裂，还让战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变得空前团结。以色列的胜利让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受到重创。现在大家清楚地看到，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口口声声支持巴勒斯坦人（1948年战争逃离家园的人及其后代），但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六日战争让纳赛尔蒙受奇耻大辱，巴勒斯坦人也是一样，他们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主动权，只是大国博弈中被牺牲掉的无关紧要的棋子。许多人在1948年背井离乡，来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六日战争后，他们发现当年赶走他们的以色列人再次成为统治者。

这一变化对巴勒斯坦人的冲击非常大。1949年停火线这时已失效，19年后他们可以再次来到1948年以前他们生活的地方，这让他们的心情非常复杂，当时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 西耶路撒冷的卡塔蒙（Qatamon）和巴卡（Baqa）区的大房子在1948年前属于阿拉伯富人，他们在1948年弃房逃离后，这些大房子被犹太移民瓜分。[六日战争后]这里到处有挂着约旦车牌的汽车在马路上慢慢开，东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专程来看自己以前的房子。……美国总领事埃文·威尔逊[在电报中]写道："我们在新城住宅的客厅有架摆了19年的大钢琴，它的主人1948年匆忙离开，交给以前住这的人保管，主人现在回来索要了。"[20]

有的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人动机邪恶。格桑·卡纳法尼是当时巴勒斯坦的著名作家（和激进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的领导人），在《回到海法》（他发表的众多短篇小说之一）中，他描述了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河西岸来到海法查看他们在1948年以前住处的经历，当开车穿越以色列时，男主角对妻子说：

> 他们刚完成占领，就允许人们自由通过边境，一分钟也没浪费，这种事情在战争史上从未有过。你知道1948年4月发生的事有多么糟糕，现在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我们吗？不是！这也是战争的一部分，他们在对我们说："自己去看吧，看看我们比你们强多少，看看这些地方发展得多好。安心成为我们的奴隶吧，你们应该赞美我们。"[21]

以色列的控制也给他们带来了其他福利。一些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找到工作，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逐渐，在以色列统治下，他们还获得了更多教育机会。但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最刻骨铭心的变化还在于统治者从约旦穆斯林变为以色列犹太人，生活水平再提高也无法改变被占领的事实，结束被占领状态迟早将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民族目标。

20世纪50年代末，亚西尔·阿拉法特成立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为法塔赫。阿拉法特1929年8月出生于开罗。他的父亲来自加沙，母亲从小在耶路撒冷长大。母亲去世后，父亲把他送到耶路撒冷老城，

让他和母亲的家人一起生活。他后来又回到开罗学土木工程（学习之余还跟随穆斯林兄弟会参加了1948年战争）。西奈战役后，所有费达因分子被驱逐出境，阿拉法特此时来到科威特，和这里的巴勒斯坦难民一起生活。1959年，他成立了法塔赫。

1968年，法塔赫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英文简写为PLO，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64年成立，当时以色列还未占领约旦河西岸），并很快成为该组织的核心力量。阿拉法特的掌权不仅影响到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事跨国极端活动，全世界都深受其害。

在以色列还存在为了让两个民族和睦相处而放弃部分土地的声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不愿做出任何退让。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在其宪章中表达得非常清楚：

>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殖民主义运动，其目标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其组织结构具有种族主义和隔离主义特征，其手段和目标具有法西斯主义特点。以色列是这个破坏性运动的先锋，是殖民主义的中流砥柱，是中东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长期紧张和动乱的根源。[22]

1967年，巴勒斯坦人（以及同阿拉伯联盟和埃及关系密切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蒙受了奇耻大辱，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影响力陡增，吸引了几百万巴勒斯坦人。随着法塔赫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中最具影响的力量，阿拉法特不但成为该组织主席，还成为一位国际人物。可以说，他已经被当作巴勒斯坦人的政治领导人。

同犹太复国主义一样，除了政治上的努力，巴勒斯坦人在文学上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诗歌。达尔维什出生于西加利利地区，独立战争期间他们家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巴尔沃（al-Birwa）村。他在诗歌中运用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阿拉伯诗歌韵律，表达了巴勒斯坦人强烈的思乡之情。1964年（这一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达尔维什创作了《身份证》一诗。[23]他开篇向读者宣称：“写下来！/我是阿拉伯人！”接着表达了巴勒斯坦人在内心深处对以色列人的指控：“你们窃取了我祖先的果园，/和我开垦的土地。”巴勒斯坦人的绝望来自哪里？“你们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除了这些岩石。”然后是警告：

> 如果我饥饿，

掠夺者的肉将会成为我的食物，
当心我的饥饿，
当心我的愤怒！

达尔维什与其他巴勒斯坦作家和诗人一起发出了巴勒斯坦人寻求独立和自由的心声。他在诗中提到的愤怒非常真实，将很快成为以色列持续繁荣的最大威胁。

1967年9月1日，六日战争结束三个月后，阿拉伯联盟在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提到：

> 阿拉伯国家首脑一致同意在国际和外交领域联合起来，消除侵略行为造成的后果，确保以色列从6月5日以来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这一过程必须在阿拉伯国家共同遵守的框架下进行，即对以色列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坚决维护巴勒斯坦人在自己国家的权利。[24]

对以色列实行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原则”成为阿拉伯世界一个响亮的口号。

以色列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但犹太国同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结束。不仅如此，这场胜利还激起了新的冲突——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双方都用意识形态上的热情回应这一深刻变化。以色列方面出现了致力于定居点运动的信仰者集团，巴勒斯坦方面则被激发出追求民族主义事业的斗志和灭亡犹太国的决心。

正是由于1967年这场胜利，犹太国有了一个新的敌人，这个敌人的力量将不断壮大，对犹太国的未来影响深远。

(1) 虽然以色列有许多公众人物和普通民众反对占领，但也有以色列人认为这在法律上不算“占领”。2012年，以色列前最高法院法官埃德蒙·莱维（Edmund Levy）主持的一份报告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之前不存在主权实体，尤其考虑到约旦放弃了对这片领土的所有权，以色列拥有获得这些领土的主权的法律基础。（Amb. Alan Baker, “The Legal Basis of Israel's Rights in the Disputed Territories,” http://jcpa.org/ten-basic-points-summarizing-israels-rightsin-judea-and-samaria/.）

(2) 穆格拉比区一直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争议的焦点。早在1929年，两个民族间就犹太人访问西墙的问题出现激烈争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呼吁限制犹太人前往西墙。作为回应，伊休夫阿什肯纳兹大拉比亚伯拉罕·以撒·库克号召犹太人清

除穆格拉比区。当时并没有人采取行动，但他的建议在1967年成为现实。（Hillel Cohen, *Year Zero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1929[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xvii.）

第十四章
赎罪日战争："构想"心态破裂

你承诺有和平……你承诺会遵守承诺。

——以色列歌曲《73年冬天》

1973年春天，结束了在华盛顿的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五年的任期后，伊扎克·拉宾回到以色列，他发现这个国家已经变了。"回家后我发现以色列变得自信，甚至有点沾沾自喜，这与一个远离战争可能性的国家是相称的。"[1]

六日战争前几周，以色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怀疑，到处弥漫着绝望情绪。但战后几年又进入了一段非常自信的时期。以色列似乎迈出毁灭的阴影，早期以色列人紧张不安的流散心态如今仿佛只是犹太历史的残留。

后来，以色列人将这种新的民族心态称为"*conceptzia*"，即"构想"，这种心态在军队高层和情报系统表现得尤为明显。普通民众和高层领导都深信国防军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在六天的闪电战中，埃及军队遭到犹太国的快速毁灭，恢复军力还需要多年。同样，他们觉得叙利亚也会吸取教训，不会贸然进攻以色列北部边境。他们宣称，多亏了国防军，以色列无懈可击。

以色列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在建国早年，军事领导人谈及自己的成就时态度谦逊，民众也普遍认为"这是他们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但现在，国防军的将军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被奉为英雄，有的将军利用战后获得的影响力开始从政，动摇了本－古里安坚持的军政分离政策。从1948年到六日战争，担任总理的大卫·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和列维·艾希科尔三位政治家没有任何军队背景。但后来，以色列不少总理曾是将军或战功显赫的战士。

本－古里安、A.D.戈登和果尔达·梅厄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的作风艰苦朴素，这在新任领导人身上逐渐消失。以色列早期领导人从不追求物质享受，即使身居高位也住在布置简单的小公寓。这一传统没能坚持下来。新的以色列领导人开始住得好——非常之好。

伊扎克·拉宾说得没错，以色列变得和以前不同了。

正是在这种新的心态下，1973年春天的独立日，以色列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这也将是最后一次。

尽管有炫耀军力的行为和战无不胜的心态，但当时的以色列并不安宁。在西奈半岛，以色列和埃及军队仍在“眼对眼”[2]——双方能清楚看见彼此，中间仅隔着一条窄窄的运河。以色列开始修建巴 - 列夫防线（以国防军总参谋长哈伊姆·巴 - 列夫[Chaim Bar-Lev]将军的名字命名）。没人真的认为这条防线能阻挡埃及军队大规模入侵，但支持者认为一旦埃及发动进攻，这条防线能提供早期预警，为增援部队的到来争取时间。

从一开始，就有以色列军官对巴 - 列夫防线提出异议。时任南方司令部指挥官的阿里埃勒·沙龙认为，修建巴 - 列夫防线是危险之举，它会给以色列人营造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他后来用一向自信的口吻说道：“我一早就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其他将军和前任总参谋长]是错的。巴 - 列夫防线注定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四年后果然如此。”[3]但当时军队高层有这种担忧的人并不多，防线得以继续修建。一些人觉得，巴 - 列夫防线就是以色列南方边境坚不可摧的象征。

当以色列修建防御工事时，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姿态越来越咄咄逼人。为了表明有决心收复六日战争失去的西奈半岛，纳赛尔多次向西奈半岛发动有限的炮击和小规模入侵。这些行动没有奏效，纳赛尔于是在1969年3月8日发起新一轮攻势，后来被称为“消耗战”。

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的消耗战一般在以色列武装冲突史上被略过不提。停火最终达成后，两国边界没有任何改变，但双方损失都很大。学者们对于具体死伤人数尚存在争议，以色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给出的以色列死亡人数为921人，其中694人为战士，剩下为平民。战争期间以色列还损失了20多架飞机和一艘驱逐舰。

和以往所有战争一样，阿拉伯方面的伤亡更惨重。本尼·莫里斯认为，埃及军人和平民的死亡人数达到1万人。在战斗最激烈的阶段，埃及平均每天有300名战士阵亡。[4]此外，埃及还损失了大约100架飞机和几艘海军舰艇。最能体现埃及损失惨重的，是埃及总参谋长也在阵亡名单之列。

1970年4月，埃及总统纳赛尔邀请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议会

（World Zionist Congress，这是1897年赫茨尔在巴塞尔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以来负责组织大会的常设机构）主席纳胡姆·古德曼去埃及，讨论终止冲突的方案。总理果尔达·梅厄认为这是圈套，给古德曼施压，希望他不去。[5]一些以色列人公开对果尔达提出抗议，怀疑以色列没有为终止暴力做出应有努力。1970年4月28日，58名高中生联名给梅厄写信表达异议，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原谅的违反集体主义精神的行为。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和很多人都想知道，如果政府的政策总是错过和平的机会，我们如何打赢这场没有尽头也没有意义的战争？"[6]反对果尔达·梅厄的骚乱开始出现。

谁也没想到，一封简单的来信（至今仍叫作"十二年级学生的信"）能在全国范围产生如此大影响。这封信表明，以色列的集体主义精神（本－古里安"国家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解体。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和平运动随之兴起，以色列民众通过这一运动质疑政府外交政策的诚意和动机。

几个月后，埃及总统纳赛尔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离开人世前，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知道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已经失败，他没有像自己承诺的那样将以色列人赶入大海，他领导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也失去势头。可以说，他的死亡象征着埃及领导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终结。

就在泛阿拉伯主义消亡之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正在觉醒。以色列独立和巴勒斯坦"大灾难"以来，阿拉伯国家一直声称巴勒斯坦事业是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重点，但他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巴勒斯坦人中的活动家已经意识到，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们明白，要想在这项事业上取得进展，收复1967年被占土地，只能依靠自己。

亚西尔·阿拉法特成为这项事业的领导者。他不但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的愿望变成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还开创了巴勒斯坦在全世界开展暴力活动的先河。后来，阿拉法特的暴力袭击不仅针对以色列平民，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成为他的攻击目标。

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5年初，法塔赫枪手开始潜入以色列境内，发动更具杀伤力的袭击。1965年5月，袭击规模不断升级，以色列一辆农场卡车、一辆化学品运输车和一个基布兹的居民遭到枪击，多人受伤。1967年6月至1971年3月，类似袭击接连不断，造成以色列大量人员死伤。

从一开始，阿拉法特就明确表示，回到1967年边界是远远不够的，巴勒斯坦人心中有更宏伟的目标。阿拉法特说："我们不关心1967年6月发生了什么，对消除六月那场战争的后果也不在意。巴勒斯坦革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赶走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解放我们的土地。"

巴勒斯坦人的暴力革命还扩展到海外。他们劫持了多架航班。1970年2月21日，瑞士航空公司一架飞机被他们劫持，机上4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害，其中包括17名以色列公民。就在同一天，巴勒斯坦人袭击了慕尼黑一座敬老院，7位犹太老人被杀。

虽然阿拉法特因为袭击活动遭到国际社会痛斥，但他达到了目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得到了国际关注和同情，最终让以色列在外交上陷入被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先打击阿拉法特的竟然是阿拉伯国家。1948年独立战争和后来的六日战争中，有几十万巴勒斯坦人逃到约旦。1970年，约旦成为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重要的大本营。随着实力的壮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干预约旦哈希姆家族的统治，在短短3个月内，巴解组织武装分子两次试图刺杀侯赛因国王。为了推翻哈希姆王朝，巴解组织还在约旦领土上发动攻击，其中包括把3架班机劫持到约旦，再在电视直播时炸毁飞机。

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的侯赛因国王发动了名为"黑九月"的血腥镇压活动。这场战争始于1970年9月，终于1971年7月，实际上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军队之间的内战。在这10个月中，大约2000名巴解组织战士被杀，几千名非战斗人员死亡。约旦陷入混乱，叙利亚准备以拯救巴勒斯坦人为名入侵约旦。为了保护约旦，以色列在戈兰高地集结大量坦克，大马士革随时可能陷落，叙利亚不得不放弃这次行动。

侯赛因保住了自己的王国，但他无意中造成了另一个中东国家的毁灭。被约旦赶出境外后，巴解组织领导人和几千名战士逃亡到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穆斯林和基督徒长期生活在微妙而紧张的政治框架中，到1975年，黎巴嫩出现平民骚乱，内战随后全面爆发。这个曾经有"中东巴黎"美誉的国家终将化为一片废墟，主要由于阿拉法特的所作所为，黎巴嫩作为一个正常运转国家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随着冷战加剧，美国和苏联都把中东（特别是埃及）看成扩大自身影响的关键地区。纳赛尔去世后，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成为继任者。苏

联把埃及和萨达特置于其翼下，但萨达特非常反感苏联对埃及内政的干涉，驱逐了国内的苏联顾问。

以色列和美国都认为萨达特犯下了战略性错误，失去了一个重要盟友。但这位埃及领导人远比他们想象的聪明，他知道苏联担心埃及对以色列发动战争，苏联是埃及的支持者，如果埃及再次失败，将严重影响苏联形象。不管对萨达特多不满意，苏联人都不能坐视他失败。

为了“惩罚”埃及，苏联加大了对叙利亚的援助，提供了大量坦克、飞机和地对空导弹。一夜之间，叙利亚成为全世界人均武器拥有量最多的阿拉伯国家。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个坏消息，因为在叙利亚执政的复兴社会党致力于“消除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行动的一切踪迹”[7]。苏联人也知道不能放弃埃及。尽管对萨达特不满，他们还是向埃及提供了战斗机、坦克、反坦克导弹、地对空导弹和能够威胁以色列主要城市的“飞毛腿”导弹。

这正是萨达特想要的结果。突然之间，中东的均势被打破，远远超出许多以色列人愿意承认的程度。大多数以色列人没有意识到地区形势正在迅速变化，而“构想”心态成为他们最大的累赘。

萨达特决心恢复埃及人的民族尊严。1973年3月，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达成协议，共同进攻以色列。协议中没有太多细节，因为两个国家对这场战争期望不同。叙利亚仍然希望摧毁以色列，但萨达特只希望鼓舞埃及人民的士气，在一定程度上洗清1967年战败的耻辱。对他而言，如果埃及军队能够占领苏伊士运河东岸的阵地，冲破具有象征意义的巴－列夫防线，这场战争就算胜利了。为了限制以色列空军的作用，埃及军队计划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部署苏联提供的地对空导弹，渡过运河的部队只停留在地对空导弹12千米的保护范围以内。

在备战的同时，萨达特或许也在寻求政治解决方案。1971年初，萨达特向以色列提议，如果以色列军队撤到距离苏伊士运河40千米以外，双方可以达成临时协议。果尔达·梅厄当时对以色列的安全形势非常自信，也不相信萨达特真想实现和平，所以断然拒绝了提议。[8]

1972年底，不为大多数以色列人所知的是，萨达特任命资深外交官哈菲兹·伊斯梅尔为国家安全顾问，并安排伊斯梅尔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举行秘密会谈。埃及表示，只要以色列同意归还1967年占领的埃及领土，埃及愿意停止冲突，并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973年，基辛格和伊斯梅尔会晤了两次，[9]但埃及的建议没有产生实质性结果，原因不得而知。有学者认为，伊斯梅尔“乐意……和以色列达成和解，只要归还土地，两国就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10]。还有的学者提出假设：萨达特已决心通过战争重振埃及士气，伊斯梅尔的活动或许只是用来转移人们注意力的。[11]不管真实原因如何，这个提议没有受到重视。

以色列方也有人抛出各种提议。以色列国防部部长摩西·达扬试图寻求经济解决方案，他自信地认为，如果以色列军队撤出苏伊士运河东岸，埃及允许以色列使用苏伊士运河，双方就可以避免战争。[12]以色列政府和埃及政府对达扬的提议都没什么兴趣，这一计划最终被搁置。以色列人似乎并不担心战争，认定埃及不敢开战。

1973年春天和夏天，埃及军队沿着以色列南部边界开展军事演习，由于抱着“构想”心态，以色列最高指挥部认为这是常规演习，但事实并非如此。埃及早已做好了越过运河的准备，举行军事演习，是为了让以色列国防军放松对南部边界的警惕。随后以色列情报部门搜集到埃及将发动进攻的证据，但最高指挥部没有正确解读这些信息。当时以色列人似乎都沉浸在以色列战无不胜的错觉中，国防军对埃及武装力量不屑一顾，以至于有的领导人要么把埃及会发动进攻当作无稽之谈，要么相信以色列强大的情报体系会为他们提供足够的预警时间，这样即使埃军发动进攻，也会被击退。

5月，埃及军队进入高级戒备状态后，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达多”）动员了部分国防军预备役人员，财政开支巨大。不久，埃及取消戒备，很多人认为达多反应过度。这样，国防军的将军们下一次再碰到这种情况，就不会轻易早早动员预备役人员了。

9月底，侯赛因国王秘密访问耶路撒冷，他告诉梅厄总理，埃及和叙利亚即将发动进攻。[13]会后，梅厄非常紧张，但高级指挥官们消除了她的疑虑。以色列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0月初，以色列情报系统收到摩萨德高级特工阿什拉夫·马尔万的情报，马尔万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女婿，也是以色列间谍。他警告以色列人，埃及正在计划进攻，很可能以军事演习作为幌子。但遗憾的是，这份情报根本没有被送到总理办公室。[14]

10月1日，以色列南方司令部的本雅明·西曼·托夫中尉向上级领导大卫·格达里亚（David　Gedaliah）中校提交了报告，说埃及军队在运河西

岸的部署表明他们不是在演习，而是准备发动进攻。两天后他再次提交报告，强调埃及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格达里亚既没有和别人提起这些报告，也没有将其写进提交给总司令部的南方司令部情报汇总中。西曼·托夫写的报告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10月4日和5日，苏联顾问携家眷离开埃及和叙利亚，但以色列对这样重要的迹象依旧视而不见。在这期间，从对埃及和叙利亚的航拍图中，发现了比以往更多的坦克、步兵单位和地对空导弹，但以色列还是按兵不动。10月5日中午12点30分，位于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收到一份紧急电报，马尔万在电报中再次警告战争即将爆发，他要求直接和摩萨德负责人兹维·扎米尔（Zvi Zamir）将军通话。接通电话后，他告诉扎米尔，战争将在第二天的赎罪日（10月6日）爆发，这是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一天。但马尔万说战争将在日落时分爆发，这一点并不正确。

周五，即赎罪日前夜，以色列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在会上，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艾利·泽拉（Eli Zeira）将军对政府表示，他掌握了确凿证据，埃及军队将在第二天下午6点发起进攻。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立刻要求政府批准空军发动和1967年6月类似的空袭行动。果尔达·梅厄没有同意。亨利·基辛格曾要求以色列不要首先开火，否则后果严重，当时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的伊扎克·拉宾已经答应过这一要求。梅厄和达扬都不愿失去美国的同情与援助，拒绝先发制人。为了不让以色列显得像侵略者，他们还拒绝了军方提出的全军动员请求，只同意小部分动员。他们倒是同意，一旦第二天爆发战争，只有果尔达·梅厄有权动员预备役部队。

赎罪日时的以色列往往异常安静。法律规定，这一天所有商店都得停业，路上几乎没有车，孩子们有时会到空旷的高速公路上骑自行车。虽然是个宗教节日，但大多数世俗犹太人也会过赎罪日，平常不守教规的人这一天也会禁食25小时，平常不去犹太会堂的犹太人这天也会去那待一段时间。这天是安静的，无比宁静，人们在这种静谧中各自反思人生。

1973年10月6日下午两点，防空警报声划破了全国的宁静。对耶路撒冷人来说，这是六日战争结束后第一次听到防空警报。以色列人急忙打开收音机，一开始什么都听不到，因为大多数电台在赎罪日停止播音。但那些没有关掉收音机的人们很快听到了最不想听到的消息：“这不

是虚假警报，警报再次响起后，所有人必须进入防空洞！”播完这则新闻，收音机传出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这首曲子因让人想到葬礼音乐而著名。

一小时后，下午三点半左右，广播中发布了另一则消息：“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发动进攻，局部动员令已下达。”防空警报一次次响起，在全国，赎罪日的平静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成千上万以色列人惊恐地跑向防空洞。下午四点，道路上的汽车多了起来，车上标志显示，这些车将士兵送往前线。广播通知所有无关车辆不要上路。加油站重新开始运营，节日停运的公共交通系统恢复运转，医院中所有非紧急病人出院回家，为战争伤员腾出床位。听到最后这则广播后，公众明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态已经非常严重。

一些家庭的父子、兄弟被同时召到部队。很快，广播播音员播报了一条大家最担心的消息：“埃及人渡过苏伊士运河，已经到达东岸。”下午五点，民众得知“叙利亚飞机正在加利利上空同以色列战机展开激烈的空战”。根据指示，民众为窗户、镜子和相框镜面贴上胶布，防止遭到轰炸时飞溅的玻璃造成二次伤害。

不久后，以色列人终于听到总理的声音。她对全国人民说，就在内阁讨论如何应对阿拉伯国家可能发动进攻时，埃及和叙利亚从地面和空中突然开火。实际情况远比梅厄所说的严重。总理没有告诉民众，战争爆发后15分钟内，240架埃及战斗机飞越运河，为地面部队提供掩护；战争爆发后1分钟内，2000名埃及士兵向以方发射了1万枚炮弹。密集的炮火持续了53分钟。[15]运河东岸的以色列守军只有436人，其中很多是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的新移民。总理也没有告诉民众，1400辆叙利亚坦克正从戈兰高地冲向加利利地区，以色列只有57辆坦克抵抗叙利亚600辆坦克组成的先头部队。只要通过这条防线，叙利亚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开向以色列腹地。

当天晚上，摩西·达扬再次用行动证明，即使战争爆发后，很多人还抱着“构想”心态。他预测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只会有“几十人”，不会是几百人。至于戈兰高地，他说：“我认为这天对我们而言并不糟糕。”晚上8点，广播播报了戈兰高地所有妇女和儿童撤离的消息，这和1948年5月古什埃齐翁被约旦人攻陷前的情况一模一样。

午夜时，以色列动员了20万预备役人员，很多人直接到战场报到。抵达营区时，他们发现留给他们的，尽是受损或无法使用的装备和维护不佳的坦克。阿里埃勒·沙龙的传记作者说：“这不是一支准备打仗的部

队，而是一支松懈、堕落和过于自信的部队。”[16]这些装备不良的预备役战士将面对30万叙利亚军队和85万埃及军队。同1948年和1967年一样，伊拉克再次参战，派出了1.4万名士兵。黎巴嫩每天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国防军和对手的军力对比达到1：6。

1973年，刚刚诞生25年的犹太国第三次面临生死战。在战争第一阶段，以色列一直处于守势，以色列人对战争的结果茫然无知，而这一切似乎没有尽头。

这场战争持续了16天，头5天对以色列而言犹如噩梦；战争中以色列一半的损失就发生在这几天。除了极少几次反击，国防军一直在抵抗，以色列的战士们很迷茫。阿里埃勒·沙龙在10月7日视察一个基地后指出：“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们从未经历过。这些战士从小在胜利中长大……这一代人从来没尝过失败的滋味。现在他们非常震惊……怎么可能是[埃及军队]在向前开进，而我们被打败了？”[17]

形势非常危急。在战争头两天，以色列损失了10%的飞机，国防军前线某装甲师损失了半数以上的坦克。象征以色列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也被冲破。

到10月8日，以色列部署在西奈半岛的290辆坦克中有180辆被击毁，达扬这时意识到自己先前满不在乎的过度自信是多么荒谬，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语调绝望，让听众很震惊。梅厄得知达扬要去谈可能发生的“第三圣殿毁灭”，就禁止达扬接受那次电视采访。[18]

果尔达·梅厄向尼克松总统寻求帮助，甚至暗示他以色列有亡国的危险。虽然以色列情况危急，但尼克松没有马上采取行动。(1)在电视讲话中，梅厄总理向约旦呼吁，不要犯1967年那样付出沉重代价的错误。当时以色列和约旦之间颇多合作，她相信就算约旦参战，也不会表现得很积极。至于美国援助，她能做的只有等待。

10月10日是战争爆发的第五天，总理在电视上向全体民众发表讲话。她谴责了苏联，正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埃及和叙利亚才让以色列蒙受如此沉重的损失。“叙利亚和埃及军人手里的武器全都来自苏联。”[19]

尼克松也意识到，以色列在打的不仅是一场地区性战争，也是一场两个超级大国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区域外大国将在这场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总统指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除了激光制导炸弹以外，要确保以色列能够得到所有它需要的武器装备，只要以色列能用以色列航空公

司的飞机运送这些武器装备。[20]有些报告认为，尼克松这样做，不仅是因为美国越来越希望以色列继续存在，还因为他通过一些报告得知，以色列为了自保，已把罩在核武器上的罩子拿掉了。[21]

10月8日在西奈半岛展开的一次反击中，以色列国防军遭到重创，总参谋部明白，要想避免灾难出现，以色列必须立刻改变战争走向。国防军领导人制定了“先北后南”的策略：首先扭转北部叙利亚军队势如破竹的攻势，南部军队暂时维持守势。这一策略起作用了。两天后（10月10日），以军将叙利亚军队赶出了四天前哈菲兹·阿萨德总统下令突破的边境线。10月11日，以色列炮兵火力已经覆盖到大马士革郊区。随后，以色列空军轰炸了位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国防部大楼。[22]达扬这时已不像几天前那样悲观，他说：“叙利亚人必须明白，大马士革通向以色列的路同时也是以色列通向大马士革的路。”[23]

以色列在北部反客为主，这让超级大国紧张起来。苏联警告以色列离大马士革距离太近。10月11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告诉基辛格，为了保护叙利亚，苏联空军已进入戒备状态，苏联军舰正在开往叙利亚沿海城市的路上。两天后（10月13日），理查德·尼克松命令美国飞机帮助以色列空运军事物资。

北部威胁解除后，以色列开始集中兵力对付南部的埃及军队。10月14日，埃及军队犯下严重的战术错误，在发动新攻势时，他们的地面部队离开了地对空导弹的保护区，暴露在以色列空军的打击范围内。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埃及损失了250辆坦克，以色列只损失了20辆坦克。南部战局开始扭转。

以色列乘胜追击。10月15日，在阿里埃勒·沙龙将军指挥下，以色列军队试图渡过苏伊士运河。这场战斗尽管非常惨烈（仅在这一场战斗中以色列就阵亡了300人，将近六日战争死亡人数的一半），但第一支部队渡过了运河。接下来一周内，国防军主力部队也通过运河，占领了运河西岸地区。10月19日，苏联和美国分别对埃及和以色列施压，呼吁双方停火。但以色列北部和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

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338号决议，要求双方在下午6点52分停火。6点50分，以色列广播宣布以色列将接受停火条件。

但战斗仍在持续。10月24日凌晨两点，埃及第三军团被以色列国防军包围，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埃及和叙利亚这才同意停火。下午1点，停火协议正式生效，战争基本结束。

在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以色列国防军表现英勇。在空战中，以色列空军击落了277架阿拉伯国家战斗机，自己只损失了6架飞机（46：1）。阿拉伯国家一共损失了432架飞机，以色列损失了102架。阿拉伯国家的人员伤亡惨重，共有8258人死亡，19540人受伤。一些以色列人认为，阿拉伯国家的实际伤亡是这一数字的两倍，死亡人数应该达到1.5万人（其中1.1万为埃及人），受伤人数达到3.5万人（其中2.5万为埃及人）。[24]

以色列失去了2656名战士，7250人受伤。这一数据虽然远低于阿拉伯人，却是1967年死伤人数的三倍多。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比1967年战争长，但以色列处境并没有发生变化。战争爆发前，以色列人犯下许多严重错误，战争带来的巨大伤亡让以色列人难以接受。许多以色列人对土地、和平和战争抱有的设想破灭。尽管以色列人有理由再次对前线战士充满信心，但对领导阶层就不那么有信心了。和平变得越来越无望，很多人不再相信有什么“最后的战争”。正如伊加尔·雅丁在战后所说：“这是以色列第一场父亲孩子并肩作战的战争，我们从未想过会有这种事。作为父亲，我们当年打仗，就是为了孩子将来不用上战场。”[25]

以色列人对盟国的信任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右翼人士中，很多人永远不会原谅基辛格推迟运送以色列当时急需的武器装备的做法。法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并向他们提供武器，几乎无人感到意外。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后，许多欧洲国家抛弃以色列，倒向阿拉伯国家，但以色列人没想到英国通过对该地区实施武器禁运也这样干。后来英国为了培训埃及直升机飞行员而自破禁运。以色列提出抗议后，英国给出的答复是，英国已经将培训地点从中东前线改为英国本土，以色列见好就收吧。此外，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和以色列断交，其中不少国家得到过以色列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石油再次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因素。战争进行到10月17日时，为了惩罚美国等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阿拉伯国家开始实施石油禁运，此举严重冲击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以色列再次成为国际阴谋的靶心。石油输出国组织（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地位显著上升，在后来几十年一直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以色列人的“构想”心态终于被深深的忧虑取代。他们对国家领导人缺乏信心，也明白以色列国防军并非坚不可摧。已经习惯扮演胜利者角色的以色列，逐渐痛苦地接受这场战争带来的惨重损失。媒体公布了以

色列战俘的镜头，这种画面让以色列人不习惯，也令他们恐惧。画面上还有被炸毁的以色列坦克和死去的国防军战士。贝特哈西塔（Beit Hashita）基布兹有11名年轻成员战死。电视上播出了送葬场景，11辆军用吉普车组成一支送葬车队，每辆车上摆着一具用以色列国旗覆盖的棺材，这种画面让许多观众受不了。

这种痛苦也是许多基布兹成员无法承受的。基布兹悄然发生了变化，建国那一代人对世俗主义的坚持、对宗教的彻底排斥开始解体。虽然当时体现得还不明显，但世俗、自信和不在乎宗教传统的新犹太人形象将要在以色列退潮，人们转而开始在前辈看不起的领域中寻找生活的意义。

1967年创作《金色的耶路撒冷》的拿俄米·舍莫尔再次用作品证明了她惊人的预见。1973年战争前，她将披头士的《顺其自然》（*Let It Be*）改编为希伯来语歌曲。战争过后，她修改了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虽然副歌部分仍保留了《顺其自然》的旋律。这首歌将以色列人的悲伤表达得淋漓尽致，引起全国轰动，至今流行。[26]她写道："地平线上仍有一片白帆，但处在密布的乌云下。"这首歌既有披头士的风格，也带有1973年以色列的特色，她写道：

我们所有的渴望，顺其自然吧，
请让一切顺其自然，顺其自然，
我们所有的渴望，顺其自然吧。

全国人民的悲痛之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1995年独立日上，以色列人第一次听到并将成为以色列经典歌曲的《73年冬天》。这首歌开头写道："我们是73年冬天的孩子。"这些孩子唱道，他们的父母"在战争结束的拂晓时分梦到我们"。这些孩子明白，生出他们是一种绝望的行为，也是父母最后的希望："当你们用爱的力量怀上我们，在73年冬天，/你们要让被战争掳走的一切填充你们的身体。"[27]

而父母则早早许下承诺，"你们承诺要不惜一切代价，为我们把我们的敌人转化为爱人"。但整整一代人之后，这个承诺未能兑现。歌曲的副歌部分直击心灵，直到今天，仍让唱的人深有感触：

你承诺有和平，
你承诺家园里有春天和花朵，
你承诺会遵守承诺，

你承诺有和平鸽。

1995年这首歌出现时，赎罪日战争已经结束20多年，但和平鸽没有飞来。仍在持续的战争让这个国家的内心千疮百孔。赎罪日也因为这场战争而不再是以前那个宗教意义上的赎罪日了。每年在这个用于反省和忏悔的宗教节日上，人们都会想起当年以色列人的无能、悲伤、损失和幻灭。

可以说，赎罪日战争将以色列灵魂的一部分击得粉碎，再也无法复原。

此外，这场战争政治影响深远。早在1973年11月13日，梅纳赫姆·贝京就在议会上批评果尔达·梅厄和政府在战争中无能。几十年来，贝京身处以色列政治边缘，他现在得到越来越多以色列人的认可。但对独霸政坛的工党打击更大的，是调查战争爆发原因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该委员会1973年11月21日成立，1974年4月1日发表的调查报告认为，以色列军队高层犯下了许多错误，但基本没有追究政府的责任。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情报部门负责人艾利·泽拉将军和南方司令部司令撒母耳·葛农（Shmuel Gonen）三位军方高级将领引咎辞职。葛农辞职后立即离开以色列，余生在非洲度过，61岁时死于心脏病突发。战争结束不到三年，大卫·埃拉扎尔于1976年4月也死于心脏病，年仅51岁。

虽然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对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手下留情，但这反而让这些政治领导人的处境变得更糟。他们似乎得到了免受追责的“特许”，这让公众感到愤怒和恶心，许多人强烈要求这些人辞职。

民众发起的和平抗议活动也出现了。最著名的是莫蒂·阿什肯纳泽独自一人来到耶路撒冷的总理府前抗议，横幅上写着：“奶奶[果尔达·梅厄总理的绰号]，你的国防部部长很失败，你3000名孙儿孙女因此丧生。”[28]这场战争前，对一名民选高官这样说话是难以想象的，但民众现在顾不了了。在推迟到1973年12月的选举中，工党仍然获胜。但1974年4月，果尔达·梅厄辞职，接替她的是伊扎克·拉宾。拉宾的票数少于梅厄第一任期获得的票数，而民众仍气得发抖，他所领导的这个政党即将失去在以色列政坛的统治地位。

拉宾的上台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他是第一位出生在20世纪的以色列总理，第一位出生在以色列地的总理，第一位只接受过以色列教育的总理，也是第一位有过军旅生涯的总理。以色列人已经做好准备，迎接

这类新领导人。[29]

美国犹太人察觉到这种变化，其中一些人认为，1967年以来，以色列过度自信和好斗，如今能有所收敛让他们舒了口气。几位美国犹太领导人评论道："和一个不那么以色列的以色列打交道，让我们感到愉快。"[30]在美国，雅各·布劳斯坦和大卫·本－古里安的观点长期以来各有拥趸，布劳斯坦的观点此时重新占据上风。

1973年12月，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从几个月前战争的悲痛中走出来，又一个噩耗传来：大卫·本－古里安去世。本－古里安已经和病魔斗争了很长时间，人们并非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但鉴于以色列人刚刚经历的创伤，国父般的人物这时去世，仍然是痛苦的打击。

本－古里安有专制倾向，从政时间可能也有点过长。他出生于欧洲，年少时就出于理想主义情怀来到巴勒斯坦，在果园摘过橘子，建立了工会，成为伊休夫政治领袖。在英国统治的混乱年代，本－古里安审时度势，巧妙地让伊休夫得以壮大。他缔造了许多建国前的机构，最终成功建国。他拥有超强的把握历史时机的能力，知道何时应该耐心等待，何时应该迅速出击。他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宣布建国，因为他明白这样的历史机会不会再有。

他虽然不是军人，但在独立战争中展现出过人的勇气和卓越的谋略，让这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国家渡过危机。如果说是赫茨尔赋予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生命，那么大卫·本－古里安就是以色列国生命的赋予者。以色列第五任总统伊扎克·纳冯（Yitzhak Navon）坚信，本－古里安是两千年前"第二圣殿毁灭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31]。但现在，他已与世长辞。

一场让以色列人心力交瘁的战争刚刚结束，他们又在电视上看到大卫·本－古里安的葬礼。一位以色列作家说："他们像是在观看自己的葬礼。"[32]

这场战争以灾难开始，它粉碎了以色列人的"构想"心态。但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中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叙利亚坦克突破以色列北部防线后，民众虽然惊恐万分，但没有逃亡。军方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早期犯了许多错误，但面对巨大压力，军队重整旗鼓，调整战略，最后再一次展现了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由于军队高层的错误，成百上千的战士献出了生命，但活下来的战士一直坚守前线，既没有逃跑，

也没有投降。虽然没有听到达扬对总理说的“第三圣殿”（重生的犹太共和国）摇摇欲坠的言论，但他们能感觉到他们快要失去一切。以色列不会在他们的注视下倒塌。

和以往一样，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也发挥了作用。在民众的监督下，军队高层领导和国家领导人都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了代价。

以色列军队在战争后期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以军包围了埃及第三军团，可以将之歼灭。在北部，以色列装甲部队停在可以攻入大马士革的地方。在遇到突袭、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以色列实现了惊天逆转。实际上，赎罪日战争成为以色列最后一次同敌军正规部队的较量。[33]虽然战争爆发前和战争初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以色列国防军让阿拉伯邻国明白，同以色列正面交锋是自取灭亡，没有胜算。

尽管如此，以色列并没有“获胜”，像以前人们习惯看到的那样。几年后，什洛莫·加齐特（1974—1979年任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承认，赎罪日战争中没有胜利者。[34]他相信，军事上的僵局让双方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达成和平协定。

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在战场上失利后，以色列的敌人在其他领域向以色列发起进攻。巴勒斯坦人多年来试图在外交上孤立以色列。如今，欧洲国家害怕阿拉伯再次实施石油禁运，屈服于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压力，这让他们对以色列的外交斗争变得格外有效。1974年11月，亚西尔·阿拉法特被邀请到联合国发表讲话，在后来被称为《橄榄枝和手枪》的演讲中，他没有谈到和以色列实现和平，而是谈到“犹太人入侵巴勒斯坦”。他的演讲既有威胁使用暴力的意味，也影射了和平：“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我再说一遍，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话毕，满场掌声。

为了回应掌声，阿拉法特双手紧扣，举过头顶，露出他腰带上的手枪皮套。阿拉法特显然有意把枪套带到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的现场，以此含蓄地威胁要继续使用武力，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观众们鼓掌。阿拉法特向以色列的生存权宣战，但联合国报之以全场欢呼和站立鼓掌。仅一年后，联合国大会批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联合国观察员。

联合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攻势不断取得进展。1975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72票赞成、35票反对（和32票弃权）通过了3379号决议，确认“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美国对该决议投了反对

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对这一提案提出强烈谴责："联合国将要把反犹主义变成国际法。"莫伊尼汉还发表了他那段著名的言论："[美国]……不承认，不遵守，也永远不会默许这个臭名昭著的决议……一大股邪恶的力量被释放进这个世界。"[35]

连莫伊尼汉也想不到，将犹太国非法化的国际势力将迅速蔓延开来。虽然不用面对敌人的正规部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变得更不安全。在许多方面，犹太国即将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

(1) 多年后人们发现，尼克松对犹太人非常反感。他的得力助手亨利·基辛格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复杂态度是出了名的。耶胡达·阿夫纳大使后来写道，犹太人身份让基辛格"神经衰弱"。在2010年公布的尼克松录音带中，可以听到基辛格对总统说："就算苏联人把犹太人关进毒气室也不关美国的事。"（Yehuda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p.269; Gil Troy, "Happy Birthday, Mr. Kissinger," May 23, 2013, *Tablet*,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news-and-politics/132819/happy-birthday-mr-kissinger#xCoSwz6BrWoHxhzI.99.）

第十五章

革命中的革命：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和复仇

我们不再是任何人眼中胆小怕事的犹太人。……那个时代已结束。……如果不愿自我牺牲，奥斯维辛将再次出现。如果自卫必须付出代价，那我们就付！

——总理梅纳赫姆·贝京[1]

20世纪70年代，和政治、文化和公共生活领域的情况一样，活跃在以色列乐坛的大多是阿什肯纳兹人，即祖籍欧洲的白种犹太人，在几次阿利亚移民运动和建国以前，他们就确立了在巴勒斯坦的主导地位。拿俄米·舍莫尔的父母来自维尔纽斯（Vilna）。60年代以色列无可争议的摇滚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1939年出生于伊休夫，他的父母也来自欧洲。1973年第一届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 competition）中代表以色列参赛的是著名歌手伊兰尼特，她的父母移民自波兰。1974年代表以色列在欧洲歌唱大赛上演唱《我将生命献给她》（*Natati Lah Chayai*）的，是当时风靡全国的蜂巢乐队（*Kaveret*），这个欢快搞笑的乐队也由五名白人（阿什肯纳兹人）男歌手组成，这首歌曲至今脍炙人口。

以色列广播很少播放东方犹太人创作和表演的音乐，唱片公司也不感兴趣。业内人士认为，东方犹太人充满中东情调的音乐听上去古怪而陌生，更像阿拉伯人的音乐。比亚利克和奥尔特曼等人希望犹太国能培养新犹太人，但东方犹太人的形象、口音以及他们表达犹太身份的方式和新犹太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东方犹太人在社会各领域都居边缘地位，乐坛只是这个普遍现象的反映罢了。

磁带的发明和迅速普及才大大改变了乐坛格局。70年代初，被录音室拒之门外的东方犹太人音乐家开始用磁带传播自己的作品，这最早发生在特拉维夫，后来又出现在别处。这种音乐具有北非和中东风格，有点离经叛道，很快得名“磁带音乐”（*muzikat hakasetot*），(1)并很快改变了以色列乐坛的面貌。东方犹太人的音乐钻进了以色列人的生活。佐哈尔·阿尔戈夫（Zohar Argov，他的父母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也门）

等音乐家通过“磁带音乐”革命一举成名，[2]变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70年代兴起的东方犹太人革命，不仅影响了音乐行业，以色列政治生态也因此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上东方犹太人长期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阿拉伯人统治下，他们在东道国施压或驱赶下来到以色列。大多数人的财产被东道国政府剥夺，沦为以色列社会中的穷人。接收这些移民时，以色列经济低迷，能够用于改善东方犹太人生活条件的资源极为有限。

犹太国吸收了所有的东方犹太人移民，赋予他们公民身份，为他们提供教育和基本住房。但政府把他们大多安置在偏远的过渡营。就像当年把一贯具有军事训练传统的基布兹设立在边境地区可以保卫国家一样，政府在远离国家中心的边缘地区设立过渡营也有国家利益的考虑：可以防止以色列对这些地区的拥有在未来出现争议。

不难理解，在东方犹太人看来，被安置在远离国家中心地带的过渡营，意味着他们在以色列社会处于边缘地位，如果不采取行动，永远翻不了身。早期移民比较服从政府安排，但他们的孩子深感国家不公，对国家的不满成为东方犹太人身份的重要特征，驱使他们在70年代初建立自己的组织。1971年，一个名为“黑豹党”（根据美国同名团体得名）的团体和总理果尔达·梅厄会面，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会后，梅厄给出的唯一评论是“他们不是好人”[3]。马帕伊党的领导层遥不可及，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和随后果尔达·梅厄的辞职进一步强化了东方犹太人的这种感觉。

梅厄的继任者伊扎克·拉宾的执政时间也不长。1977年，以色列媒体揭露拉宾的妻子利亚拥有一个（在拉宾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期间办理的）海外银行账户，上面存款虽然不多，但这属于以色列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以色列民众为此气愤、恼怒和沮丧，在国家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工党领导人一再表现出的无能、腐败和遥不可及让他们忍无可忍。和梅厄一样，拉宾也辞职了。

以色列为变化做好了准备。

梅纳赫姆·贝京从1949年第一次大选以来，一直被边缘化在反对党（除了六日战争开始时短暂加入过团结政府）。截至1977年，他29年的政治生涯并无多大建树。作为泽夫·雅博廷斯基的追随者，贝京主要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后的十年建立起自己（或好或坏）的名声。

成为伊尔贡领导人后，他宣布对英国发动起义。他策划了大卫王酒店爆炸，这是促使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的关键原因。在“阿尔塔莱纳”号事件中，贝京在避免全面内战爆发中也起了关键作用。虽然他输掉了围绕德国赔款问题展开的政治斗争，但这让他在许多以色列人心目中成为以色列灵魂——犹太性的守护者。

大卫·本－古里安不断把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贴在贝京身上，这甚至影响到美国犹太人对贝京的看法。1948年他出访美国前，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汉娜·阿伦特在内的知名美国犹太人给《纽约时报》写联名信，信中也称他为法西斯主义者，说贝京“宣扬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大杂烩”[4]。

到1977年，贝京仍没有完全摆脱这类指责，但很多以色列人已经意识到，他并不像对手描述的那样简单。正是他极力呼吁结束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军事统治。[5]1965年以色列议会再次调查“阿尔塔莱纳”号事件时，有人提出本－古里安试图谋杀贝京，[6]而调查结果显示贝京在事件中并没有什么过错。

在担任反对党领导人的这些年里，贝京同东方犹太人建立起关系。他多次提醒这些人，他领导的伊尔贡当中就有很多战士来自突尼斯、也门、叙利亚、阿根廷、南非、伊拉克、波斯和其他非欧洲犹太社团：

> 伊尔贡各个部门都有来自不同犹太社团和不同阶级的成员。……我们这里堪称犹太国小熔炉。我们从不问出身，只看重忠诚和能力。东方犹太社团的成员在伊尔贡就像在家里一般快乐。没人对他们摆出居高临下的愚蠢姿态，这也有助于他们摆脱任何无端的自卑感。[7]

他注意到，与在议会中不同，东方犹太人在伊尔贡身居高位。

有人可能会推想，贝京西装革履、“一本正经”的波兰犹太绅士形象在东方犹太人看来欧洲特征明显，他们会像反感工党一样反感他。但讽刺的是，贝京的波兰背景给以色列北非移民留下了好印象。20世纪50年代初，贝京访问过渡营时（访问期间他称呼生活在那的东方犹太人为“我的兄弟姐妹们”），过渡营的居民注意到他的着装非常正式，他的黑色西装和其他伊休夫领导人的着装格格不入，他们认为这表明贝京尊重他们；相形之下，本－古里安来访时经常穿着T恤和短裤，分明看不起他们。贝京将东方犹太人心中的怒火化为政治资本。早在1959年，他就在

听众大多为东方犹太人的一次演讲中说，本－古里安将以色列分裂为一个“阿什肯纳兹主义和非阿什肯纳兹主义”判然有别的国家。[8]

赎罪日战争、梅厄和拉宾分别因阿格拉纳特委员会与经济丑闻辞职以及东方犹太人长期对政府的不满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就促成了贝京的“完美风暴”。在1977年5月的选举日，以色列有史以来首次举行投票后的民意调查，其结果震惊了全国，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赢得43个席位，工党联盟（本－古里安的经过改组的马帕伊党）只获得32个席位（比上届选举少了三分之一席位）。梅纳赫姆·贝京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八次选举失利后在第九次获胜的总理。[9]

以色列新闻主播哈伊姆·雅文（Chaim　Yavin）称利库德集团这一胜利为“大逆转”（*Mahapach*）。（在希伯来语中，该词词根和“革命”[*mahapeicha*]一词相同）。许多以色列人（特别是东方犹太人选民）兴奋地走上街头，高呼贝京的名字。以色列出现了一位新的加冕王子。这不但是贝京的胜利，东方犹太人也认为这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感到自己终于在规划国家的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阿什肯纳兹精英则目瞪口呆。这些以色列人从小在本－古里安的统治下长大，对他充满崇敬，无法想象由其他政党来领导这个国家。一位敏锐的评论家分析道：“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政党建立起国家，接收了数百万东方犹太人移民，怎么可能会有人反对它？工党在大选中的失利让他们非常吃惊。”[10]

选举日当天，结果出来后，记者们争先恐后将话筒伸到贝京面前，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会说什么。尽管并不严格遵守教规，但贝京总是随身带着基帕帽，他这时戴上帽子，诵读了祈祷文“你赐予我们生命”，犹太人在取得成就和好运时就会诵读这段祈祷文。以色列人在政府高官身上从未见过此景。1948年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建国时，根本没戴过基帕帽。另一位记者在欢庆的人群中问贝京，他会是拥有什么风格的总理，面对这个怪问题，贝京思考片刻后回答：“一个好犹太人应当有的风格。”[11]

对贝京这句话，以色列人虽然有不同的理解，但人们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好犹太人”。同一年，广受观众喜爱的喜剧演员和著名导演乌里·佐哈尔第一次在他主持的电视游戏节目中戴基帕帽。[12]以色列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宗教正重新进入以色列人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在马帕伊党执政将近30年后，政权顺利地从马帕伊党转到利库德集团手中，没起任何争端，贝京成为政府的领导者。这体现了以色列人对民主制度的坚定持守，令人印象深刻。

贝京政府首先处理的，不是东方犹太人问题，而是和平问题。多年来，亨利·基辛格在以色列和埃及间展开“穿梭外交”，让双方同意了两个撤军协议，即赎罪日战争结束后撤回各自驻扎在边境的军队。但这些举措虽然结束了上一场冲突，却无法保证下一场冲突就不会发生。

以色列大选后几个月，在一系列秘密沟通（有的是通过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失败后，1977年11月9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埃及议会脱稿讲话时宣布：以色列“将对我对你们说的话感到诧异：为了让埃及战士不再受伤，什么困难我都在所不辞，我愿意去世界尽头，甚至愿意去他们家，去以色列议会，同他们辩论”[13]。

贝京几乎在第一时间回应了萨达特的精心策划，他在针对埃及人的广播讲话中邀请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仅8天后，让许多以色列人难以置信的是，萨达特的飞机降落在了特拉维夫。贝京亲自站在飞机的舷梯下迎接萨达特，见面后两人在为萨达特一行准备的红地毯上相互拥抱。以色列国旗和埃及国旗一起在微风中飘扬。接下来几分钟，萨达特终于见到了之前耳熟能详的以色列领导集体。这位曾经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人正站在以色列的国土上，受到热烈欢迎。萨达特被引见给摩西·达扬和伊扎克·拉宾，这两人带领以色列人在1967年获得大胜，又被引见给果尔达·梅厄，她在1973年击败他。

拉宾后来回忆说，萨达特当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这里见的人都是他以前的生死对手，在短短几秒钟内，他总能够对每个人说出最正确的话。”[14]以色列公民通过电视密切关注他的来访，他们也对萨达特印象深刻。“以色列民众欣喜若狂。如果说萨达特想让他们相信他的和平意图，那他来以色列这个惊人姿态就已经赢得了他们。”[15]

第二天，萨达特成为第一个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的阿拉伯领导人。他提出了实现和平的五个条件：以色列完全撤回1967年边界，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保障本地区所有国家和平相处及边界安全，承诺未来不使用武力，结束中东的敌对状态。

萨达特要求过高，谈判过程艰难而激烈，进展缓慢。吉米·卡特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也加入谈判，成为埃以双方的调解者。贝京和萨达特还算相互尊重（他们的关系经历过起起落落），但贝京和卡特的关系极糟。

卡特将贝京和萨达特邀请到戴维营，认为那里的田园风光有助于推动谈判进程，但谈判还是差点崩溃。贝京和萨达特一度针锋相对，几乎没有眼神交流。卡特称贝京为“精神变态”[16]，但贝京认为美国要求以色列做出的让步过大，而卡特对这些让步有意麻木不仁。贝京打算离开戴维营。

最终，各方还是缩小了分歧。贝京放弃了西奈半岛，但保留了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他没有答应萨达特让他将约旦河西岸交给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声称不想在和一个敌人签订和平协议的同时为另一个敌人创造国家。这位埃及总统收回了西奈半岛，成为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第一位阿拉伯国家首脑，但也出卖了巴勒斯坦人。

1978年9月28日下午3点左右，经过激烈辩论，以色列议会以84票赞成、19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戴维营和平协议》。贝京当年被英国列为头号恐怖分子，如今却让以色列和它最强大的敌人实现了和平。根据协议，以色列同意撤出六日战争占领的西奈半岛，虽然这场战争并非以色列人挑起，并让以色列失去了数千人的生命。萨达特曾有意同以色列谈判，但被梅厄的左倾政府拒绝了；对于还记得此事的人来说，此举是惊人的。

为了实现和平，以色列不惜放弃土地，这样的事以后还会发生。

以色列人注意到，做出放弃土地决定的竟然是右翼总理，而且还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右翼总理。之所以会如此，部分原因在于议会政治。如果左翼势力试图放弃土地，右翼势力必然站出来反对。但如果是右翼势力提出这一建议，（一向更倾向于为和平达成妥协的）左翼势力却不得不支持。不无讽刺的是，右翼势力看来才是未来实现和平的关键。当然，埃以和平协议的签署也离不开贝京的个人因素，他比先前许多总理更果断，一看到机会极少犹豫。

不久，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贝京和萨达特诺贝尔和平奖。然而，由于推动和以色列实现和平，萨达特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众矢之的。（埃及被逐出阿拉伯国家联盟，位于开罗的该组织总部被关闭。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学习的埃及留学生也被驱逐出境。）萨达特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没有参加1978年12月10日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当时谈判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也不愿让人看到他和贝京在一起），而是派他的女婿到现场领奖。

以色列政党间的嫌隙仍旧。果尔达·梅厄和本-古里安一样，本能地

对贝京心存厌恶。一向机智过人的她评论道，贝京不应该拿诺贝尔奖，而应该拿奥斯卡奖。[17]贝京在奥斯陆领奖时，梅厄去世。

虽然没有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但萨达特的谨慎还是没能让他逃过一劫。1980年，以色列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宣布整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外界认为以色列这是要吞并东耶路撒冷。中东阿拉伯民众对萨达特变得更为不满。1951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也因为被怀疑考虑和以色列开展和平谈判而被阿拉伯人谋杀。历史总有惊人的巧合。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参加纪念“十月战争”（埃及人称赎罪日战争为十月战争）埃军渡过苏伊士运河的阅兵仪式上，安瓦尔·萨达特被自己军队的士兵枪杀。[18]

以色列境内也有反对和怨恨。1978年《戴维营和平协议》签订时，生活在西奈半岛的犹太居民就向议会抗议，反对以色列从该地区撤出。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发生在加沙边境由世俗人士建立的小城亚米特（Yamit）。1982年4月，萨达特遇刺不久，这座小城的撤离工作就开始了。虽然大多数居民愿意接受赔款，平静离开，但有的人拒绝抛弃家园。[19]他们爬到屋顶上，以色列国防军战士不得不使用高压水枪，才把他们赶下来。有一伙极端分子将自己关进亚米特的一座地堡，声称如果军队驱赶，他们就炸掉地堡自杀。贝京没有对这些人妥协。最终，政府彻底拆除了这个定居点，包括定居者在那修建的温室和果园。这些被改造出来的沃土瞬间又成为荒漠。

虽然撤离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但以色列公民和以色列战士扭打在一起的场面还是给这个国家蒙上了阴影。25年后，当以色列2005年撤出加沙时，这样的场景将再度上演。但这两次撤离行动其实也展现了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也体现了军方和定居者的克制。在两次行动前，都有人悲观地预测将出现暴力冲突。然而，尽管很多人因为离开家园而伤心欲绝，但没有人在这两次行动中受重伤。

同时，以色列人凭直觉能感到，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出，更加暴力的场面将会出现。

虽然利库德集团不是宗教政党，但该党许多领导人和选民与信仰者集团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后者是积极开拓定居点建设的宗教 - 民族主义组织。许多以色列人越来越对早期拓荒者的革命热情冷嘲热讽，信仰者集团的成员却认为自己在继承早期拓荒者的传统，继续在犹太先祖之地建设，以色列通过一场本无意发起的自卫战争占领了这里。

很多年前，贝京就认可定居点运动。1974年，信仰者集团成员申请建立埃隆莫雷赫（Elon Moreh），这是早期定居点之一。和许多其他定居点（包括希伯伦的定居点）的最初阶段一样，申请虽然遭到政府拒绝，但这里的定居者仍继续开发。最终，在多次要求无效后，左翼政府默认了已经建成的定居点。

新占领土地上的定居点问题或许是当时最易造成不和的政治问题。工党政府对此不明确表态，主要是想回避。定居者则利用政府的模糊态度在土地上创造既成事实。相形之下，贝京决心让定居点运动继续发展，在原则上给予政策支持，而不仅仅是作为政治权宜之策。1977年5月，大选结束两天后，贝京和阿里埃勒·沙龙来到埃隆莫雷赫定居点的临时营地，贝京表示："很快就会出现更多的埃隆莫雷赫。"[20]

跟随在身后的记者问刚刚当选的总理，他如此支持定居点运动，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以色列会吞并约旦河西岸，贝京大声斥责：

> 我们不用"吞并"这个词。你可以吞并其他国家的土地，但不能吞并自己的土地。再说，什么叫"约旦河西岸"？从今往后，全世界要习惯这片土地在圣经时期的名字："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用这些词对你们来说就这么难吗？[21]

贝京的上台给以色列带来了新的理念。他担任总理期间，定居点的数量翻了一倍。由于定居点的数量后来在以色列右翼政府执政时期继续增长，也由于以色列右翼始终不遗余力地维护定居点运动的合法性，国际社会后来把定居点当作以色列政治右翼的发明，但这一观点并不正确。贝京上台时已经有75个定居点，都建于果尔达·梅厄和伊扎克·拉宾政府执政时期。不管土地是买来的，还是以色列从无意寻求的冲突中占领的，在这片土地上定居，既不是左翼政党的政策，也不是右翼政党的政策。从一开始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精神的核心支柱。

犹太人就是这样在建设自己的国家。很多以色列人找不到理由放弃这种意识形态，既然它一开始就成全了这个国家。让政治右翼显得不同的，是它在表述这种主张时理直气壮，毫无愧悔。

虽然以色列同埃及实现了和平（哪怕只能算"冷"和平），但新的威胁不断涌现。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扬言要"用血流成河淹死"犹太国。[22]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伊拉克在法国人的积极帮助下开始建立核反应堆。法国曾帮助以色列在迪莫纳建立核反应堆，现在他们又在帮助一个

试图消灭以色列的国家。刚刚上任的贝京表示，绝不能让一心灭亡犹太国的侯赛因获得核武器。

1978年8月，贝京召开了第一次讨论伊拉克核设施应对方案的秘密内阁会议，这种会议一共召开了10多次。军事行动的风险很大，外交领域也不容乐观。以色列人明白，一旦发动进攻，美国为了顾及自己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必然谴责以色列，让以色列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因为美国国务院一直迟至1980年都在反复声称："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伊拉克试图获得核爆炸物。"[23]军事上摧毁伊拉克核设施的行动非常危险，飞行员需要穿越敌对国，长途飞行1200英里，为了不被雷达发现，全程只能超低空飞行（事实上，有几名飞行员在这次任务的训练中牺牲）。

但贝京认为这次行动无疑意义重大。犹太人民流散了两千年才得以重建民族家园，决不能再次遭受灭顶之灾。

1981年6月7日，8架以色列战斗机向东朝伊拉克方向飞去，一路未被发现，到达目标点后投下炸弹；位于奥斯拉克（Osirak）的伊拉克核反应堆被彻底摧毁，而所有飞机安全返回以色列。这次袭击虽然是以色列军事史上的光辉时刻，但马上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而持久的谴责。不出所料，法国人怒不可遏，但以色列政府还受到美国国内的密集批评。袭击行动两天后，《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谴责这次袭击是"不可原谅和目光短浅的入侵行为"[24]。文章还影射贝京早年策划的行动，声称这位以色列总理"采用了他最弱小的敌人的惯用伎俩：恐怖主义。他用自己强烈的受害者心态为入侵找借口"[25]。《洛杉矶时报》的约瑟夫·克拉夫特将这次行动和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等同起来，认为"美国人应该勇敢地指出，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和梅纳赫姆·贝京看起来都倾向于使用恐怖主义手段"[26]。

美国起初也谴责了以色列的行动，得到美国的赞成票后，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487号决议，裁定该袭击"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行为准则"[27]。但10年后，1991年在伊拉克执行"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的美国已经改变了当初的立场。美国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寄给以色列人一张显示奥斯拉克核反应堆残骸的卫星照片，并在上面写道：

> 向大卫·伊夫里（David Ivri）将军致以感谢和感激，他1981年出色地终止了伊拉克的核计划，这让我们完成"沙漠风暴行动"容易

多了。

美国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28]

袭击伊拉克没有影响到以色列同埃及的和平协定。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核反应堆已成废墟，埃以继续保持和平状态。每个人心里都明白，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其实没有他表现的那样愤怒。这次袭击获得了不折不扣的成功。

以色列开始有了一种名为“贝京学说”的政策，它不能容忍敌方发展或拥有任何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这项政策在贝京退出政治舞台后仍长期存在。[29]

以色列用行动证明，对于承认其生存权的国家，以色列可以与之和平相处，而对于试图摧毁它的国家，以色列定会报复。但这时犹太国面临的新挑战，并不来自正规军，而是来自激进组织，特别是来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威胁。

自1970年9月约旦国王侯赛因将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逐出约旦后，巴解组织开始把黎巴嫩（位于以色列北部）当作发动对以行动的大本营（参见地图6）。黎巴嫩曾是中东繁荣的国家，但这时深陷内战，许多派别加入战争，其中包括根基牢固的基督教马龙派、黎巴嫩穆斯林、叙利亚人和德鲁兹人。黎巴嫩内部矛盾尖锐，国家的解体和混乱使之成为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发动暴力袭击的绝佳场所。

“激进主义”对以色列来说并不新鲜。巴解组织起初采用最能吸引注意力的袭击方式，许多袭击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1972年9月对慕尼黑奥运会发动的袭击。激进分子来自“黑九月”组织，他们冲进奥运村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劫持了以色列运动员。德国的特种部队没能成功解救人质，经过交火，11名以色列人遇害。(2)这一事件对以色列人冲击极大，大屠杀已经过去30年，全世界通过电视直播再次目睹犹太人惨遭杀害，而且地点还是德国。

1976年夏天，慕尼黑袭击4年后，巴勒斯坦和德国激进分子将法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劫持到乌干达恩德培（Entebbe），100多名人质大多数为犹太人，其中大多为以色列人。这次解救人质行动堪称经典，成为以色列人的传奇故事。7月4日，以色列特种部队飞到恩德培，成功解救了人质（有3人在交火中丧生）。这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约拿单·内塔尼

亚胡（日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哥哥）是唯一一名阵亡的突击队员，由于拯救行动大胆而成功，英勇就义的他立刻成为以色列人的英雄。

以色列国内也出现骚乱。这些年来，以色列阿拉伯人开始有组织地向政府要求更高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待遇。1976年3月，以色列政府宣布计划，打算没收一大片土地划分给包括卡米埃勒（Carmiel，位于海法和加利利湖中间的一座以色列小城）在内的三座城市，这块地中有阿拉伯人的地。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看来，政府不断剥夺他们长期拥有的土地，更突显了他们只是二等公民。3月30日，成千上万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上街抗议。土地计划是引发抗议的导火索，但从抗议的规模就能看出，抗议活动也是以色列阿拉伯人长期以来不满情绪的爆发。抗议活动变得越来越暴力，阿拉伯人在街道上点燃轮胎，封堵道路，并向军队投掷石头（有人说还有燃烧弹）。对于接下来发生的骚乱，人们说法不一，但有6名没有拿武器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被以色列武装击毙。很多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这是1956年卡西姆村屠杀事件的重演，并改变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自我认知。他们注意到，以色列的犹太人经常组织抗议政府的活动，但从来不会遭到军人和警察的枪击。这一天被称为“1976年土地日”，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历史中能够勾起痛苦回忆的标志性事件。

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抗议示威中很少携带武器，但以色列境外的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手段极为残暴。阿拉法特改变了策略，他以黎巴嫩南部为基地，不断向以色列平民发射火箭弹，目的是要让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越境袭击和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变得越来越频繁，躲进防空洞几乎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常态，这让北部以色列人有一种被敌人包围的强烈感觉。截至1982年，超过1.5万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黎巴嫩南部活动，从这里向北一直延伸到贝鲁特，此区域逐渐被称为“法塔赫的土地”[30]。

1978年3月11日，贝京刚当选总理不久，一个由11人组成的激进分子团伙从海路潜入以色列境内，在沿海公路上劫持了一辆开往特拉维夫的公交车，杀害了38名以色列人，71人受伤。《时代周刊》称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31]。作为回击，以色列发起“利塔尼行动”（Operation Litani），迫使巴解组织匆匆撤退到贝鲁特，但并没有动摇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根基。这次事件早早释放出一个信号：以色列很难用军事手段战胜激进组织。

针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仍在继续，火箭弹也没有间断。每当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飞来，北部城镇的居民就跑向防空洞。以色列儿童在地下室度过了很多个夜晚，满是惊恐。海边公路的袭击让以色列第一次出兵黎巴嫩，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在伦敦针对犹太人的另一次袭击，加速了以色列第二次出兵黎巴嫩。

1982年6月3日，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在伦敦朝以色列驻英国大使什洛莫·阿尔戈夫开枪。(3)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积怨已深，对什洛莫·阿尔戈夫的袭击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贝京和雅博廷斯基一样，非常看重“哈达尔”（*hadar*）观念（把尊严看作犹太人生活之核心的观念），想到以色列儿童夜复一夜只能躲在防空洞担惊受怕，就令他愤愤不平、无法忍受。这让人联想到欧洲犹太人曾经的生活，也违背了犹太人建国的初衷。就像比亚利克早在《屠杀之城》中表达过类似的困惑一样，贝京也问道，为什么犹太人甘愿受袭而不去自卫：

> 我们不再是任何人眼中胆小怕事的犹太人，不会再等待美国人或联合国来救我们。那个时代已结束。我们必须勇敢地保卫自己。如果不愿自我牺牲，奥斯维辛将再次出现。如果自卫必须付出代价，那我们就付！没错，战争意味着流血，意味着有人将失去亲人，有人将成为孤儿，这想起来确实很糟糕。此刻，我们在加利利地区的同胞正在流血，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去保护他们。怎能对别无选择的事情心存疑虑？[32]

贝京的计划非常冒险。他和许多以色列人希望，如果基督徒能控制黎巴嫩，就不会再有射向以色列的火箭弹。此外，贝京还希望，如果以色列能帮助黎巴嫩长枪党（1936年由黎巴嫩基督徒创立的准军事组织）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对付他的宿敌黎巴嫩穆斯林，作为回报，以色列也许能够和黎巴嫩签订和平协定。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杰马耶勒能否最终获胜，但这不是以色列能控制的。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发动“加利利和平行动”。行动初期，以色列赶走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战士。但行动很快偏离了原计划，阿里埃勒·沙龙带领部队远远越过了内阁规定的40千米纵深处，这也是贝京向里根总统承诺的入侵范围。不久，以色列国防军包围了贝鲁特，以色列入侵他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以色列的伤亡人数也很多，200多名战士阵亡，超过1000人受伤。许多以色列人认为这是第一场由以色列主动发起的战争，而非被动应战。

黎巴嫩正在成为以色列的越南。

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也受到损害。阿拉法特尽管蒙受损失，却拒绝离开贝鲁特，他定期出现在西方电视上，一同展示的还有巴勒斯坦伤残儿童和被轰炸后冒起浓烟的巴勒斯坦人房屋。以色列入侵贝鲁特被媒体大肆宣传，在无数国际观众眼中，阿拉法特忽然成了英雄，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拯救者。

但在军事上，面对以色列的强大火力，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毫无还手之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重要机构设在贝鲁特西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内，以色列军队无情地轰炸了这里，并取得成功。1982年8月12日，阿拉法特终于妥协。继1971年被逐出约旦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又被迫离开黎巴嫩。8月21—30日，大约9000名巴解组织战士（和6000名叙利亚战士）被护送出贝鲁特。阿拉法特则在部分战士的陪伴下，乘船前往突尼斯。

黎巴嫩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偏离计划，行动结果同样出人意料。1982年9月14日，阿拉法特刚刚离开贝鲁特不到一个月，一名叙利亚特工对黎巴嫩长枪党总部实施了爆炸袭击，27人遇害，其中包括巴希尔·杰马耶勒。以色列失去了同黎巴嫩实现和平的希望，黎巴嫩基督徒也失去了他们敬仰的领导人。以色列政府的战略部署完全被打乱。

黎巴嫩的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杰马耶勒之死引起的混乱，让阿里埃勒·沙龙看到机会，沙龙主张以色列趁机占领贝鲁特西南边缘人口密集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他认为那些没有离开黎巴嫩的巴解组织战士仍把那里用作基地。

沙龙告诉内阁，他计划清除萨布拉（Sabra）难民营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他没有提到第二个难民营沙提拉（Shatila）的名字。他强调说，基督教长枪党“会留下来用‘他们的方法’行动”[33]。他保证以色列人不会参战。

9月16日夜晚，以色列国防军几个师的兵力封锁了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的周边地区。在国防军的掩护下，试图为杰马耶勒报仇的基督徒长枪党武装进入难民营，遭到巴解组织穆斯林武装的顽强抵抗，但基督徒武装很快占据压倒性优势。他们长期对穆斯林怀有敌意，杰马耶勒之死更是让他们怒不可遏，基督徒武装开始对平民开枪，在三天时间里屠杀了大量巴勒斯坦穆斯林。战斗结束后，“一批批二三十岁的年轻男性被要求靠墙站，手脚被绑，然后像黑帮处决一样在密集的机枪扫射中倒

下”[34]。大约有700—800名男女老幼死于这场屠杀。

1982年9月26日，无数人走上特拉维夫街头，向政府抗议军队这一行为，要求对这场屠杀展开司法调查，呼吁“杀人犯沙龙”和“杀人犯贝京”辞职。国家陷入一场深刻的危机，贝京成立了卡汉（Kahan）调查委员会，调查以色列是否要为屠杀负责。

这次屠杀事件深刻改变了美国年轻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看法。他们1967年以来对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不复存在。美国一位重要的犹太社会运动家说：“这是耻辱的时刻。……我想我们失去了很多年轻人的支持。……一个国家无法通过这样的行为来激励年轻犹太人热爱以色列，除非他是狂热分子。”[35]以色列和美国年轻犹太人的关系日后还将出现更严重的裂痕。

经过四个月审议，调查委员会宣布了结果，虽然以色列对萨布拉和沙提拉的屠杀不负直接责任，但阿里埃勒·沙龙对此事件负有“个人责任”：

> 国防部部长不顾屠杀风险的行为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他深入参与了这场战争，和长枪党的接触也时常由他负责照管。当他决定国防军不参与行动，而让长枪党单独进入难民营时，如果他不知道这个决定将产生后来确实产生了的灾难，那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完全不考虑将会发生什么。[36]

内阁接受了卡汉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沙龙怨愤地辞掉国防部部长职务，但仍然留在政府中担任“不管部长”，不负责任何具体部门的工作。此时的沙龙在政治上蒙受羞辱，遭到不少人痛恨。谁也想不到20年后，这个好勇斗狠的人将成为以色列总理，并策划了以色列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一次领土撤离行动。

以色列在黎巴嫩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维持着一定数量的军队，直到2000年，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才把军队撤回以色列。当军队离开黎巴嫩时，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在将近20年里，以色列在黎巴嫩没什么收获，还伤了几百名战士。长期驻扎黎巴嫩令许多以色列人一直对国家满腹牢骚，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更是让他们良心不安。马蒂·弗里德曼是以色列国防军战士，在以色列撤军前夕曾驻扎在黎巴嫩，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记者和作家，他在文章中生动而准确地捕捉到以色列当时的状态：

1982年来到黎巴嫩的以色列步履轻盈，对未来充满各种美好的想象，虽然许多计划并不明智，还执行得很差。……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入侵[黎巴嫩]是为了彻底改变我们周边的环境。……一切都出于这个想法：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命运将由我们来塑造。但我们很多人逐渐明白……我们错了……中东从来不按照我们的意愿变化和发展，未来也不会。[37]

以色列电影也捕捉到这个国家出现的各种矛盾心态。1986年的《来自西顿的两根手指》（*Two Fingers from Sidon*）记录了以色列撤军前驻扎在黎巴嫩的士兵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国防军在黎巴嫩所处的危险，并涉及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2007年上映的影片《波弗特》（*Beaufort*）取名自黎巴嫩山区一个以色列前哨，这部电影自我批判的力度更大，描述了撤军前驻扎在黎巴嫩的一群士兵的生活，在表现士兵心中的恐惧和撤军前他们要面对的道德难题的同时，又传达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战争结束遥遥无期和战争彻底无用的感觉。

但最能体现以色列对黎巴嫩战争持续反思的电影，还得数2008年上映的以色列影片《和巴什尔共舞》（*Waltz with Bashir*）。这部电影讲述了导演阿里·福尔曼自己的故事。1982年，年仅19岁的福尔曼是一名步兵。2006年，他的一位战友跟他说自己经常做那场战争的噩梦，但福尔曼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和其他战友见面后，福尔曼终于回忆起，他曾参加行动向难民营发射照明弹，黎巴嫩长枪党正是借着这些照明弹在难民营实施屠杀。[38]他这才明白，由于感到此举和亲手屠杀一样有罪，他将这方面的记忆封锁起来了。

这是以色列一向存在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的继续。上文提到的小说《赫贝赫泽》对一些以色列士兵在独立战争中的行为提出了质疑，这本书不但畅销全国，还入选一些高中的课本。同样，《和巴什尔共舞》也被上万以色列人观看。以色列社会一直在思考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以及在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中扮演的角色，这成为一个不断被人们讨论和分析的话题。在一场他们无法结束的冲突中，以色列人是否在走向歧途？每当他们思考这个问题时，黎巴嫩战争都不可回避。

这部电影在黎巴嫩遭禁。[39]

贝京的身体此时已经不佳，这场战争令他意志消沉，而妻子的去世更是让他感到无比孤独。卡汉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交几个月后，贝京便辞掉总理职务，回到家中。从辞职到1992年去世的10年里，除了悼念亡

妻和看医生，他几乎足不出户。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担任莱希领导人的伊扎克·沙米尔取代这位前伊尔贡领导人，成为以色列新任总理。

贝京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态，还将新的宗教感情变成以色列人热议的话题。他自己并不刻意遵守教规，但他从不掩饰对犹太传统的热爱和尊重。曾担任部长的丹·梅里多尔（Dan Meridor）说："他像犹太人那样说话。"[40]几十年后，以色列社会将以贝京都难以想象的方式开始"像犹太人那样说话"。

然而，黎巴嫩战争是梅纳赫姆·贝京政治遗产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贝京入侵黎巴嫩的理由很充分，但这场战争让以色列陷入泥潭。最终，黎巴嫩无法正常运行。暴力活动（以色列深度参与了这些暴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力真空逐渐将这个国家变成真主党的基地，对以色列构成更严峻的武装威胁。这些威胁当初可以避免吗？我们不得而知。是贝京自己做出关键决策，还是阿里埃勒·沙龙误导了他？这仍然是一个有激烈争论的问题，连贝京政府当时的成员也莫衷一是。

贝京执政时期，以色列的发展并不顺，但这是一个重要时期。以色列同最强大的敌人埃及实现了和平；以色列用实际行动表明，它无法容忍敌对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色列还向世界证明，为了保护公民正常生活的权利，不让儿童睡在防空洞，国家不惜使用武力发动战争，哪怕这种战争最终会招致以色列人的反对。

在社会领域，利库德集团带领以色列进入一段更强调自由资本主义的时期，但这一政策也出了岔子。以色列的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450%。[41]受经济衰退影响最大的还是东方犹太人，[42]但是，贝京执政时期的以色列承认了以前没有公正对待部分移民，这样，以色列人在他任期结束后变得更团结了。

这一时期最重要之处，大概还是工党几十年来在以色列一党执政的霸权地位被打破。长期被边缘化的右翼政党结束了工党对国家政治和政策的垄断。普通以色列人如今有了在规划国家未来方面的更多选择。很多时候，以色列选民投谁的票，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感到受支持或者被孤立。在接下来几十年，随着国际社会逐渐抛弃这个国家，许多以色列人通过强硬的方式寻求安全感。以色列人有安全感时，会更关注社会问题，也更愿意为和平做出牺牲；而当他们感觉受到威胁时，就会本能地给那些他们认为能保护他们的人投票。这个简单的事实将在未来改变中东的命运。

(1) 几乎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区，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开始用录音带传播他具有颠覆性的反西方（和反伊朗君主）的布道，为1979年伊朗革命做准备。

(2) 2015年，在慕尼黑事件过去40多年后，《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公布了几十年前得到的资料。资料显示，这些运动员在遇害前惨遭殴打和折磨，一名人质当着同伴的面遭枪击，流血致死，而同伴们都被绑住，无法救他。至少一名人质被阉割，而且很可能是在活着的时候遭此酷刑。1903年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中，俄国人不但杀害犹太人，还割下女性的乳房。这种杀害和折磨犹太人的行为在四分之三个世纪后再次发生。（“Horrifying Details of Murder of Athletes in Munich Revealed：‘They Were Tortured in Front of Their Friends,’” http://www.ynet.co.il/articles/0，7340，L-4733681，00.html[Hebrew]；see also Sam Borden, “Long-Hidden Details Reveal Cruelty of 1972 Munich Attack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2,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12/02/sports/long-hidden-details-reveal-cruelty-of-1972-munich-attackers.html.）

(3) 虽然击中头部，但阿尔戈夫没有死亡。他昏迷了3个月，醒来后回到以色列。由于双目永久性失明，他一直住在康复医院。住院21年后，2003年阿尔戈夫去世，享年73岁。

第十六章

效法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

我们将像没有恐怖袭击一样继续和平进程，并像没有和平进程一样打击恐怖主义。

——总理伊扎克·拉宾

贝京当选总理结束了工党几十年的统治。不同于以前的总理，贝京非常重视犹太传统。但最能体现宗教重新进入公共领域的，还是阿里耶·德里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

德里一家是摩洛哥移民，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获胜后，阿拉伯国家再次像独立战争之后那样转而对付境内的犹太人，德里一家于是移民以色列。初到以色列，德里一家非常贫穷，但他们持守传统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德里相信，以色列主流社会没有给包括他家人在内的移民公平的机会，才华过人的德里便开始从政。他的擢升速度惊人。1985年，年仅26岁时已成为内务部部长身边的顾问，29岁时成为以色列内务部部长。以色列一位著名记者评论他是“新时代以色列最振奋人心和最有前途的人物”[1]。虽然90年代的一连串丑闻导致他下台，但当他（暂时）离开公众视野时，以色列政治已留下了他深深的烙印。

1984年，正当阿里耶·德里青云直上时，俄巴底亚·约瑟拉比卸任了以色列塞法迪大拉比一职。(1)约瑟拉比是犹太教律法方面的天才，就各种律法疑难问题做出过许多精辟的裁决。他还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擅长对非正统派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任何时候他所不认可的人冷言相讥。利用他在东方犹太人内部的强大影响力，俄巴底亚拉比（Rav Ovadia，追随者们都这样称呼他）建立了沙斯党。(2)这个名字来自“塞法迪守卫者”（*Shomrei Sefarad*）的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意思是“守卫《托拉》的塞法迪人”。但它也是个双关语，在希伯来语中还可以理解为“塞法迪人的守卫者”。

事实上，东方犹太人正是这样看沙斯党的，即沙斯党是他们的守卫者。沙斯党正统派宗教特色毫不含糊，强调对传统的坚持，也致力于解

决东方犹太人在社会福利和教育上的需求。即使宗教上不太虔诚的东方犹太人也拥护这个政党。东方犹太人不用再支持具有明显世俗倾向的利库德集团，他们如今有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沙斯党，这个党看起来宗教特色鲜明，政治上也成功。

阿里耶·德里是沙斯党的公共代言人，深具个人魅力和政治敏锐性，沙斯党支持率和影响力因此迅速上升。1984年，刚成立的沙斯党在议会中只获得4个席位。1999年，就在德里被判处贪污罪（最终因此入狱）这一年，沙斯党获得了13%的票数，一举夺下议会中的17个席位。

沙斯党的崛起让人们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历史有了新的解读，对它未来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设想。德里在解释自己理念和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区别时，毫不掩饰地挖苦后者：

> 现在，世俗的以色列人害怕沙斯党会改变这个国家的世俗特征。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们根本不是。他们从事的是异端运动。他们认为我们的父母是落后的原始人，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他们把我们的父母安置在条件恶劣的偏远城镇和村庄，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毫无用处的教育。现在，我们站了出来，要维护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害怕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迫害我们。这种迫害既是种族上的，又是宗教上的。但他们越羞辱我们，我们越壮大。我们将改变以色列国的特征。[2]沙斯党没有放弃这一承诺。

当宗教在以色列公共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时，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中东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以色列的邻国。

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拉伯世界还没有完全从泛阿拉伯主义这一世俗梦想的失败中走出来。这一时期最能吸引追随者的阿拉伯领导人呼吁人们将信仰寄托在伊斯兰革命上，只有通过这一事业才能恢复阿拉伯世界昔日的荣光。几十年来，通过强权政治统治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被严重削弱（特别是埃及的萨达特政权），寻求新道路的时机已经成熟。1979年，伊朗通过革命让阿亚图拉们掌权，这对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斯兰主义迅速填补了中东的权力真空。[3]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成为中东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组织。在阿拉伯世界许多地方，穆斯林兄弟会建立起有效的体系，向民众提供世俗政府没能提供的重要社会服务。[3]在提供福利的同时，这

些社会服务组织还有效地传播了高度传统主义的宗教思想，这很快反映在阿拉伯国家的大街小巷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戴传统穆斯林头巾希贾布（hijab），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留象征宗教虔诚的胡子。六日战争结束20年后，伊斯兰教再次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以色列人放眼所及，到处可见新成立的伊斯兰教机构。

经济陷入困境也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穆斯林转变宗教态度的原因。在许多方面，以色列人的统治改善了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六日战争后的1967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加沙地带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从80美元上升到1700美元。同一时期，约旦河西岸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3倍。巴勒斯坦被占土地上的汽车数量翻了10倍。1967年，加沙地带只有18%的家庭能得到电力供应，但1981年加沙地带并入以色列电网后，这一比例上升到89%。

但以色列的统治没有让加沙地带所有居民脱贫。加沙人口密集，拥挤不堪，街道上到处流着未经处理的污水，许多家庭没有自来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令生活更加艰难，在人满为患、脏乱不堪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情况尤其严重。

包括泛阿拉伯主义在内的各种运动，让巴勒斯坦难民一次次失望而归。这时出现的伊斯兰运动，群众基础深厚，组织者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疾苦，向他们描绘了美好的未来，得到巴勒斯坦人的深切认同。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力和权力迅速发展，拥有了越来越多宗教上虔诚的追随者。

不无讽刺的是，以色列开明的政策也助长了穆斯林基要主义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传播。六日战争以前，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没有大学，为了发展当地温和的政治势力，以色列鼓励发展高等教育，七所大学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得以建成。但这一政策适得其反，这些大学成为极端伊斯兰运动的温床。一开始，以色列错误地认为这些都是纯宗教运动，不包含任何政治目的。这一误判后来让以色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88年，哈马斯成立。对该组织的追随者而言，他们的核心宗教义务就是将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全境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他们认为“从河流（约旦河）到大海（地中海）”的土地属于穆斯林的“瓦克夫”（*waqf*）。[(4)]他们宣誓对以色列发动“吉哈德”（jihad，圣战）。

哈马斯成立时所制定的宪章在内容和语调上公然反犹，其用语和《锡安长老会纪要》等纳粹德国宣传材料如出一辙。熟悉20世纪历史的人都不会对《哈马斯宪章》中的语言和要旨感到陌生：

> 今天的目标是巴勒斯坦，明天的就可能是另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深不可测，在吞并巴勒斯坦后，他们会继续向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扩张。当他们将占领土地彻底消化后，会继续扩张。《锡安长老会纪要》中介绍了他们的阴谋，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了书中的话。[4]

哈马斯认为，犹太人“为了统治全世界，建立了联合国和安理会”[5]。犹太人应该为几乎所有国际战争负责，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态度更值得注意，《哈马斯宪章》在绪论部分承诺，“以色列会继续壮大和发展，直到伊斯兰教将其消灭，就像它消灭了它那些先行者那样”。

纳赛尔已经去世。以色列的军事优势足以有效应对来自叙利亚的任何威胁。泛阿拉伯主义已成为历史。但以色列要再次面对决心消灭它的另一个敌人。

1987年12月9日，在加沙地带一起交通事故中，一名以色列司机驾驶的卡车压死了四名阿拉伯工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阿拉伯人长期压抑的怨愤一触即发，他们走上街头使用暴力手段。和以色列军队对峙的阿拉伯青年从一开始的数百人发展到数千人，他们不断朝军队与平民投掷石块和燃烧弹。接下来是总罢工，就算店主不愿意停业，在暴徒的恐吓下也只好关门。这场突如其来的抵抗运动被称为“因提法达”（*intifada*）。在阿拉伯语中，“因提法达”是“抖落”的意思，就像狗甩掉身上的水一样，巴勒斯坦人用这个词来比喻他们试图甩掉以色列人的统治。这场运动让以色列在军事上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这场抵抗运动很早以前就有爆发的征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色列就开始应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暴力活动，这和以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犹太人发动的有针对性的袭击完全不同。刚开始，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扔掷石块、用刀捅人、燃烧轮胎。这些行为没有引起以色列安全部门足够的重视。1987年12月的事件爆发后，以色列领导人发现这是先前从未碰到过的难题，不知如何应对。巴勒斯坦哲学教授和公共知识分子萨利·努赛贝赫（Sari Nusseibeh）将这次起义比喻为火山爆发，他

说：“火山爆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旦时机成熟，火山中的岩浆就会以惊人的方式喷发。[6]

以色列士兵从未在战场上和拿着石头的青少年交手，这并非以色列国防军精锐部队可以轻易识别和清除的敌人。以色列年轻男女们面对的是一群愤怒而绝望的平民，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的武器仅仅是石头和燃烧弹。以色列的科技优势在这个新战场上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作战地点突然变成人口稠密的平民区，作战工具主要是橡皮子弹、催泪瓦斯和警棍，偶尔也会使用更具杀伤力的武器。有的国防军官员说，拉宾命令军队“打断他们的手和腿”[7]。但这种方法也不起作用，愤恨和绝望太深了。

几十年来，以色列的占领和六日战争的失利让巴勒斯坦人心生怨恨，因提法达正是怨恨的剧烈爆发。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正面交锋中，双方都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占领土地上的学校大多被征用为起义活动的指挥中心，学生们常年无法正常上课。一位希伯来大学犯罪学教授记录道：“1987—1988学年，约旦河西岸的小学生201个上学日中有175日因为学校强制关门而取消。”[8]除了学校被强制关门，包括宵禁、封路和搜查等行动也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的正常生活，进一步激化了巴勒斯坦人的愤怒情绪，暴力活动不断升级。

约旦发生的变化让这一地区变得更加复杂。在六日战争中，由于侯赛因加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战争，约旦失去了约旦河西岸，但约旦王室一直没有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约旦议会中仍有西岸来的巴勒斯坦代表；数千名约旦公务员仍在约旦河西岸工作，部分工资由安曼发放。

然而，侯赛因的约旦王国由占人口少数的哈希姆家族统治，占人口多数的巴勒斯坦人是明显的二等公民，成为“心怀不满的大多数”[9]。国王最不愿意看到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动越过约旦河，蔓延到约旦的中心地带，威胁到他的政权。由于因提法达，1988年7月，约旦宣布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10]

只要想到约旦有一天会重新收回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就会多处下注，不敢公开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为后者仍然是约旦的宿敌。但是，约旦退出角逐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便无可争议地成为最能代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利益的组织。以色列当初从未计划要占领约旦河西岸，如今以色列却由于没有负责任的一方接管这块土地而无法终止对

这里的占领，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以色列的政治困境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因提法达（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因提法达）让以色列社会接受了一次从未经历过的挑战，十八九岁的士兵们是听着国防军的英勇事迹长大的，这支军队打败了邪恶的敌人，捍卫了以色列的荣誉。但他们自己的军旅生涯却没那么风光，他们感觉更像是在维持治安，管理敌方的平民。一位以色列记者用“射击和哭泣”（*yorim v'bochim*）[11]来表达这代人的幻灭。一位预备役军官悲伤地说道：“18岁的年轻人问我在占领土地上服役是不是很恐怖。我告诉他们，最让我害怕的是我自己，我害怕自己成为恶人，害怕自己陷入艰难的选择。这片丛林有着独特的法则。”[12]

因提法达的目的达到了。现在，以色列人不但思考长期占领对巴勒斯坦人产生的影响，还开始担心充当占领者角色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孩子以及对他们的人性产生的影响。许多人开始明白以色列正统派哲学家耶沙亚胡·雷博维茨早在1967年发出的警告：“以色列必须‘将自己从统治另一个民族的诅咒中解放出来’”，如果它不想“给整个犹太民族带来灾难的话”[13]。

因提法达还沉重打击了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约西·克莱因·哈勒维指出，当看到巴勒斯坦人的愤怒，许多以色列人开始明白，只要以色列还控制加沙、约旦河西岸以及生活在那儿的几百万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就是天方夜谭。六日战争后，以色列普遍存在“开化式”占领的思想，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赫茨尔的《新故土》，它认为犹太人的到来能给这一地区带来进步，因此理应受到阿拉伯人的欢迎；随着约旦河西岸的愤怒在燃烧，这种思想也着火了。巴勒斯坦人用写在墙上的标语告诉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不可小觑。在随后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识到，以色列迟早将从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撤出。

这一时期，欧洲也发生了剧变。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以色列成立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就夹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博弈中间。美苏关系对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的阿以战争影响深远。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美国在联合国投了赞成票。虽然美以关系随后经历过艰难时期，但在苏联解体前，美国被认为是以色列的保护国，而苏联是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者。随着苏联解体，阿拉伯人急需寻找新的靠山。欧洲国家此后将逐渐在阿以冲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苏联解体还深刻改变了以色列国内的人口构成。犹太国将要接受建国以来最大一批移民的涌入。苏联犹太人并非一夜之间来到以色列，美国犹太人从中做了大量工作。斯大林上台后，苏联犹太人受到政府的强压。政府试图扼杀犹太传统教育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几乎所有能体现犹太身份的事物都沦为打击对象。在70年间，斯大林和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弱化了苏联犹太人的犹太性，降低了他们对犹太教的熟悉程度，但即便如此，苏联犹太人仍然希望回归以色列，和同胞一起生活。1967年，苏联犹太人看到以色列犹太人打破了千年来的受害者形象，给何为犹太人树立起新的典范，他们的回归愿望变得更加强烈。

苏联的大门是关闭的，解放苏联犹太人成为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的重要任务。包括“学生为苏联犹太人斗争”（Student Struggle for Soviet Jewry）在内的组织机构和包括1974年美国贸易法《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用于惩罚限制移民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政治努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游行示威活动也对苏联政府施加了压力，不少无畏的美国犹太人还申请并得到了苏联签证，他们给苏联犹太人送去书籍、音乐和其他教育与宗教材料，以此鼓舞他们的士气，加强他们的教育。

慢慢地，苏联的大门开启了。1970年，只有992人从苏联移民以色列；1980年，这一数字达到7570；1990年，达到185227。这次移民潮直到2000年才结束，总共有100万苏联犹太人来到犹太国，大大改变了以色列的面貌。

和许多先前的移民一样，刚刚抵达以色列时，苏联移民也没什么钱，急需政府帮助。以色列的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许多在苏联拥有高度专业技能的移民，在以色列不得不干体力活。由于人多，分布又相对集中，他们发行有自己的报纸和杂志。这导致其他以色列人对苏联犹太人不满，指责他们不愿意融入以色列社会。

这批移民和东方犹太移民差别很大。虽然他们也经过一段时间才融入以色列社会，但他们在许多方面属于西方移民，不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其中有工程师和医生，还有人擅长艺术，尤其是音乐。苏联犹太人很快融入以色列的科学界和艺术界，不但为这些领域输送了大量人才，还扩大了以色列社会在教育和文化服务上的需求。

苏联移民的公共代表人物是拿单·夏兰斯基。他曾经是前苏联犹太人中一名“被禁移民者”（refusenik）。因为申请移民以色列，他被强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为美国国防情报局充当间谍，为此在狱中服刑了9

年。在美国总统里根的施压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释放了拿单·夏兰斯基。移民以色列后，他成为蜚声国际的人权活动家，是犹太人勇气的象征。1996年，他成立了专门维护俄罗斯移民利益的政党，名为以色列阿利亚党（*Yisrael Ba-Aliyah*，“阿利亚”在希伯来语中既有移民之意，也有上升之意，所以这个名称可同时理解为“移民以色列”或“以色列崛起”），这让他在议会中占据显要地位。后来，随着俄罗斯移民对建立自己政党需求的下降，他退出了政党政治，但仍然是以色列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是仍然健在的犹太民族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试图去犹太国寻求庇护、梦想在这开始新生活的，不只是苏联犹太人。内战和饥荒的肆虐让埃塞俄比亚人民不聊生，世界犹太人尤其关心埃塞俄比亚犹太社团的命运。35年前，以色列国防军通过“魔毯行动”将也门犹太人安全运送到以色列，现在，视全世界犹太人安危为己任的以色列政府开始考虑营救埃塞俄比亚犹太人。

早在1984年，以色列就派社会活动家和摩萨德特工到苏丹，将数千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秘密带到以色列，但埃塞俄比亚还有很多犹太人。1991年，埃塞俄比亚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地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

1991年5月，以色列发动了大胆的“所罗门行动”，将经过改装的C-130运输机（“大力神”运输机）降落在内战中的埃塞俄比亚狭窄的跑道上。为了尽可能装载更多的人，飞机座椅被拆除，最多时一架飞机上挤了1100人。这些移民极度贫穷，一些衣物和简单的炊具就是全部家当。有些人身体已经非常虚弱，飞机降落在以色列后，在停机坪等待的救护车将其中140人直接送到医院治疗。短短36小时内，35架以色列空军C-130运输机和以色列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将14325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运送到以色列。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虽然也是犹太人后裔（他们的起源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他们和那些不顾生命危险开飞机去营救他们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上千年来，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和生活在巴比伦、巴勒斯坦、欧洲和北非的犹太人没有任何来往。他们秉持了一种古老的犹太生活方式，这和以色列人自认为“纯正的”犹太教截然不同。任何犹太发展或犹太传统如果其历史不足两千年，这些新移民就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塔木德》，这是他们流散出以色列地之后才出现的。普珥节和光明节进入犹太历是在他们与其他犹太人隔绝后产生的。

他们对大屠杀或犹太人过去两千年以来经历的其他事件一无所知，因为这些都发生在他们流散到非洲以后。他们说的语言不是希伯来语，而是阿姆哈拉语（Amharic）。可以说，刚刚到来时，以色列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现代国家，现代文明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电、自来水和现代科技（由于气温较低，有人试图在飞机上生火），这些对他们都是挑战。

这次移民行动和以色列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悲哀的是，许多埃塞俄比亚人沦为以色列下层阶级，以色列还出现过针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事件。他们的孩子要经过几十年努力，才在以色列社会、经济、教育和军事领域有所建树。但与此同时，以色列确实拯救了上万人的埃塞俄比亚犹太社团，将他们带到了以色列。当白种人驾着载有黑人移民的飞机降落在机场，以色列向全世界证明，犹太国拯救犹太人的使命超越了种族和肤色。

毫无疑问，以色列存在种族歧视，偶尔还会出现严重的种族主义的案例。但总体而言，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遇到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差异，这也是全世界移民面对的挑战。他们的犹太教与以色列的宗教文化差别太大。虽然他们的外貌、语言和行为方式与已经生活在这儿的犹太人不同，虽说他们要融入以色列社会确实艰难，但以色列人深信接收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是绝对正确的。他们也属于犹太民族，而拯救这个民族正是以色列存在的全部意义。

让人感到讽刺和悲哀的是，不管是埃塞俄比亚移民还是俄罗斯移民，以色列的拉比总署对他们是否真正是犹太人却不确定。就俄罗斯移民而言，他们中许多人根据犹太律法（*halakhah*）确实不能算犹太人。苏联犹太社团和非犹太人通婚现象很普遍。有数据显示，依据《回归法》（不同于传统犹太律法，《回归法》采用的是纳粹德国定义犹太人的方法，即祖父母当中有一人为犹太人就算是犹太人），来到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中，只有25%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犹太人。虽然没有明确说新移民不是犹太人，但拉比总署在这些人改宗加入犹太教的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这遭到包括正统派拉比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14]

埃塞俄比亚人的情况更糟糕。塞法迪大拉比最早裁定这些埃塞俄比亚人（他称他们为法拉沙人[*Falashas*]，这是对这个群体另一个常见的称呼[5]）属于犹太人。1973年，早在大批埃塞俄比亚移民抵达以色列前，俄巴底亚·约瑟拉比就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中说：

> 我因此得出结论，法拉沙人是向南迁到埃塞俄比亚的以色列支派的后裔，毫无疑问，先前提到的圣人们已经证明他们[法拉沙人]属于这一支派……基于以上可靠的证人和证据……和我个人的意见，我判定法拉沙人为犹太人。[15]

相形之下，阿什肯纳兹大拉比什洛莫·戈伦（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做出过很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宗教裁决）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很保守。1981年前，他在文章中甚至从未暗示过他认为这些移民属于犹太人。[16]

1990年8月，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美国和以西方国家为主组成的多国部队与侯赛因开战。为了报复美国，1991年1月，侯赛因向以色列发射了多枚导弹。以色列领导人从来不愿意在以色列人民遭到袭击时无所作为，但这一次以色列无能为力，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坚称他不能容忍以色列卷入这场战争（美国没有向以色列空军提供确保以色列军用飞机不会被友军火力击中的暗号代码）。当时以色列总统伊扎克·沙米尔建国前是莱希的领导人，他在使用武力保护犹太人上从不犹豫，但面对美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他只能按兵不动。

以色列人带着大量食物和防毒面具（因为担心侯赛因像入侵伊朗时那样使用化学武器）躲进防空洞，他们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等待这场战争结束。除了防毒面具，许多婴儿床也装上了防毒设备。人们对侯赛因充满恐惧。虽然能够理解政府采取的实用主义政策（为了保证以色列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爱国者导弹），但他们也感到惊愕，没想到在基希涅夫事件将近一个世纪后，犹太人再次躲了起来，犹太男人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比亚利克在他最著名的一首诗歌《论杀戮》中，(6)表达了目睹犹太人被杀戮后他对上帝的愤怒。在这首诗最脍炙人口的一句中，比亚利克高呼："如果还有什么正义，就让它出现吧！"他无法忍受犹太人长期作为受害者的状态。一个世纪已经过去，特拉维夫遭到导弹袭击后，国防军却按兵不动，一位以色列政治评论家写道："如果还有什么国防军，就让它立即出现吧！"几乎无人不知这句话的来历。

早在赎罪日战争时，什洛莫·加齐特（20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就指出，埃以之间的战争已经陷入僵局，谁也无法成为赢家。80年代以来，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战争更是如此，没有任何

一方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或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识到双方必须谈判。

最早同埃及实现和平的是利库德集团领导下的右翼政府，最早同意和巴勒斯坦人间接对话的也是他们。1991年10月，伊扎克·沙米尔担任总理期间，以色列官员和来自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的代表团在西班牙会面，史称马德里和平会议。由于当时以色列法律仍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定义为恐怖组织，以色列拒绝和该组织直接对话。作为妥协，以色列同意让约旦河西岸和约旦的不属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巴勒斯坦代表加入约旦代表团。有史以来，以色列人第一次和巴勒斯坦人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

马德里和平会议的目的，并不是达成某种协议，而是启动双边谈判。就此而论，会议成功了，巴以双方开始展开对话，同巴勒斯坦实现和平列入以色列的议事日程。在1992年的大选中，以色列人将选票投给了最有可能帮助他们实现和平的总理伊扎克·拉宾。拉宾参加过独立战争和1967年战争中许多关键的行动，以色列人相信他能理解他们的安全需要。虽然曾因为丑闻而辞职，但以色列人现在希望他能回来，如果他帮助以色列达成同巴勒斯坦的和平协议，以色列人的生活就能回归正常。

在就职演讲上，拉宾认为犹太人的处境已经起了变化，现在以色列人可以为实现和平而做出一定牺牲：

> 我们不再是一个“独居的民族”，“全世界都和我们作对”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摆脱近半个世纪以来禁锢着我们的孤立感。……我们深信可以实现和平，必须实现和平，和平一定会来。诗人萨乌尔·切尔尼霍夫斯基（Shaul Tchernikovsky）曾写道：“我相信未来。哪怕遥远，各民族间和平相处、相互祝福的一天终将到来。”我愿相信，这一天离我们不再遥远。[17]

1993年初，以色列废除了禁止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的法律。第二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开始在挪威奥斯陆秘密谈判。双方就《奥斯陆第一阶段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协议，这成为后来《奥斯陆协议》的一部分。

该协议制定了一项最多长达五年的安排，这期间巴以双方将就永久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协议为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做准备，该机构将负责管理巴勒斯坦控制的地区。以色列军队将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

区部分撤出。

1993年8月，西蒙·佩雷斯访问奥斯陆，秘密签署了这份协议。根据协议中“相互承认”的条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宣布放弃对犹太国使用武力。以色列则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允许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数十万名战士从国外回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1995年9月，双方又签署了《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将约旦河西岸分为A、B、C三个区域（参见地图8），分别由巴勒斯坦单独控制、巴以双方共管和以色列单独控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协议都没有承诺保证巴勒斯坦人建国，但协议框架最终打算要达到这个目的。1993年，阿拉法特、拉宾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共同出现在白宫前的大草坪上，随着拉宾和阿拉法特相互握手，中东似乎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持强硬立场的穆斯林认为《奥斯陆协议》离经叛道。以色列没有权利生活在阿拉伯土地上，坚决抵制和以色列达成任何协议。因此，《奥斯陆协议》不但没有迎来和平，还再度引发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的更尖锐的暴力活动，而且这次远比因提法达时期的暴力活动更加致命。为了挫败协议，哈马斯和其他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平民发动多起自杀性爆炸事件，造成特拉维夫和包括耶路撒冷等位于绿线（1949年停火线）内城市大量人员伤亡。1994—1996年，死于武装袭击的以色列人数超过了建国以来所有武装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18]但阿拉法特很少在公开场合谴责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即便将他们逮捕，也会等国际社会视线转移后释放。许多以色列人认为，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腰配枪套发表“橄榄枝”演讲的阿拉法特只是在欺骗世人。和平谈判进入如此关键的阶段，阿拉法特理应用阿拉伯语让巴勒斯坦人停止暴力行动，但他不愿意这样做。

接下来，一起犹太人恐怖袭击活动让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得更紧张。1994年2月25日，从美国移民以色列的犹太教徒巴鲁克·戈登斯坦携带武器走进希伯伦的先祖墓地(7)，朝正在祷告的穆斯林开枪扫射，29名巴勒斯坦朝拜者当场死亡，最后他自己也被愤怒的群众杀死。

希伯伦再次成了火药桶。1929年，正是在希伯伦的暴乱中，阿拉伯人不但杀害多名犹太人，还摧毁了那里的犹太社团，揭开了中东地区巴以武装冲突的序幕。1967年六日战争后，一群犹太青年移居到希伯伦，在绿线外建立了第一批定居点中的一个。现在，地区局势紧张，《奥斯

陆协议》前途未卜，希伯伦又发生了屠杀，而且是在先祖墓地。只不过这一次凶手是犹太人，而正在祷告的穆斯林是受害者。

戈登斯坦的攻击让以色列人毛骨悚然，犹太宗教领导人纷纷谴责他。但伤害已经造成了。阿拉伯暴力袭击持续升级，整个地区陷入混乱。有消息人士说，由于这些激进主义活动，连拉宾私下里也在考虑放弃《奥斯陆协议》。多年后，在2008年，国防部前部长摩西·亚阿龙（Moshe Ya'alon，昵称为“博吉”[Bogie]）透露，拉宾曾对他说，作为总理他“打算‘纠正’《奥斯陆协议》，因为阿拉法特已不值得信任”[19]。2010年，在接受以色列一家知名报纸的采访时，拉宾的女儿达莉娅·拉宾说道：“许多和父亲关系很近的人告诉我，就在遇刺前夜，他还在考虑终止奥斯陆进程，因为当时恐袭非常猖獗，他意识到阿拉法特没有信守诺言。”[20]

无论他个人怎么看，也无论他私下里多担忧，拉宾在公众场合没有灰心丧气。本-古里安决心要让伊休夫像没有战争一样反对白皮书，并像没有白皮书一样参战。拉宾将这句话改了改，宣称：“我们将像没有恐怖袭击一样继续和平进程，并像没有和平进程一样打击恐怖主义。”[21]虽然对阿拉法特耍两面派感到愤怒，但以色列继续落实《奥斯陆协议》中规定的义务。1994年5月，协议的细节敲定9天后，以色列国防军撤出了耶利哥和加沙地带绝大部分地区。接着，以色列国防军开始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大城市与领土撤离。

和平进程在别处取得了进展。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为了结束双方交战状态开始谈判。侯赛因已经宣布放弃约旦河西岸的主权（他不想要这里，这只会让本来人数就少的哈希姆统治阶级在约旦人口中所占比例进一步下降），解决不了的争议在两国之间已不复存在。时任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前往约旦和侯赛因国王会面，他说道：“飞到这只花了15分钟……但这15分钟飞越了46年的仇恨与战争。”[22]

1994年10月，以色列和约旦签订和平协议。两国此前已经就边界划定、水资源分配权等问题达成一致，如今双方完全互相承认了。至此，以色列已和两个邻国实现了和平。1951年7月，侯赛因祖父阿卜杜拉一世国王因为考虑和以色列人实现和平而被巴勒斯坦人谋杀，侯赛因当时还年轻，而且就在谋杀现场目睹了这一幕；这项成就对他而言不仅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也有深刻的个人意义。

与阿拉法特达成的“协议”不但没有带来和平，反而造成更多“恐

怖”袭击，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对此深感惊恐，认为以色列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有些以色列人从神学角度看问题：以色列地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土地，任何协议如果要他们放弃哪怕一小块地，那它就是离经叛道。以色列犹太人的极右翼政治和宗教势力对拉宾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在他们组织的集会上，拉宾的照片被涂抹成犹太人的宿敌希特勒。少数极端的拉比说拉宾是“罗德夫”（*rodef*，“取人命的人”）和“伯盖德”（*boged*，“叛徒”），根据犹太律法，这两个罪名是死罪。日后当上总理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昵称为“毕比”[Bibi]）曾在耶路撒冷市中心集会上发表演讲，被人拍到他当时就站在一个写着“处死拉宾”的标语的上方（他很可能没注意到）。

很多以色列人担心煽动再不控制会导致灾难。62年前，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在特拉维夫海边被刺杀，看到拉宾危险的处境，哈伊姆·阿罗佐罗夫的儿子为以色列一家报纸的专栏撰文，请求全国人民保持冷静。他认为他的父亲就因为当时的煽动而被谋杀，而现在以色列的情况和他父亲死前如出一辙。他写道：“右翼领导人必须停止煽动，必须告诉追随者，再煽动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否则，这些领导人要承担所有的后果，就像当年谋杀阿罗佐罗夫时一样。”[23]

拉宾虽然私下里已经对《奥斯陆协议》疑虑丛丛，但他在公开场合继续支持。为了向以色列和全世界表达以色列将执行和阿拉法特签订的协议，1995年11月4日，他和西蒙·佩雷斯呼吁民众前往特拉维夫，举行一次大规模和平集会。许多以色列人响应号召，据统计，那天到场人数为15万，实际参加人数可能更高。[24]拉宾在演讲中对成千上万仍然相信有可能和平的民众说道：

> 我从军27年，因为没有和平机会，战斗了很长时间。但我相信，和平机会现在来了，而且机会很大。为了在场的各位，以及没有在场的其他民众，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始终相信，大多数人想要和平，并为了和平愿意承担风险。你们能前来参加这次活动，已经证明我们是一个渴望和平、反对暴力的民族，我相信那些没到现场的人也是一样。
>
> 暴力侵蚀着以色列民主的根基。暴力必须受到谴责，必须受到孤立。暴力不是以色列的出路。民主国家可以有不同观点，但最终决定必须通过民主选举做出，1992年的选举让我们有权做今天在做的事，继续这项事业。[25]

演讲结束后，拉宾和集会人群一道唱起已成为和平阵营主题曲的《和平之歌》（*Shir La-Shalom*），这首歌副歌部分的歌声响彻整个特拉维夫广场：

> 不要只说这天终将到来，
> 而要去实现它。
> 这个梦想并非遥不可及，
> 在城市的所有广场上，
> 让我们呼唤和平！[26]

就在拉宾前往登车地点准备离开时，25岁的巴伊兰大学信教的法律系学生伊格尔·阿米尔绕过保镖，对总理连开三枪。拉宾被紧急送往医院。以色列全国人民屏息凝视，焦虑地等待抢救结果。

不久，拉宾的同事艾坦·哈伯（Etan Haber）走出伊车洛夫（Ichilov）医院，拉宾刚刚在此动了手术。他向惊恐万分的民众读了一段简短的声明，许多以色列人至今都能将它背下来：

> 以色列政府以震惊和悲痛的心情宣布，总理兼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今晚在特拉维夫被一名凶手刺杀身亡。愿他安息。

这个年轻的国家多灾多难，从未经历过和平，一下又要面对这个它根本无法想象的恐惧。深深的羞耻如同乌云笼罩在以色列上空，久久不散。数千民众自发返回广场，来到刚才集会之处，再次唱起当晚早些时候唱的那首歌，而以色列已不是刚才那个以色列了。几千人在街道上哭泣。语言无法表达此时此刻的绝望，三五成群的年轻以色列人在全国街道边点上无数根蜡烛。起初不知所措的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悲剧，每个以色列人都是悲剧中的一员，和平之梦已灭，国将不国。人们抱在一起，唯有哭泣。

他们坐在那，盯着摇曳的烛光，边唱边哭。他们希望从朋友的拥抱中找到些许安慰，希望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有一天还能通过某种方式康复。他们祷告，因为仍然希望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与此同时，他们哀悼，因为害怕到手的东西会沦为泡影——这个小国的发展超乎所有人意料，复国的愿景使之最终建国，而他们的祖父祖母历经艰辛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重获犹太新生，但这一切都可能随拉宾的遇刺而与他们渐行渐远。

(1) 尽管犹太人按照族性（ethnicity）可以划分为三大类：阿什肯纳兹人、塞法迪人和米兹腊希人[本书又译作“东方犹太人”]，但宗教传统（religious traditions）一般只被划分为阿什肯纳兹人的和塞法迪人的。这两个群体各有一个大拉比。塞法迪人和米兹腊希人虽然有区别，但经常可以混用。

(2) 俄巴底亚直到去世时还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众多拥护者。2013年他去世时，大约80万人（以色列当时人口也只有800万，其中约600万是犹太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这么多人当然没法进入公墓，但街道和高速公路上挤满了朝他下葬处方向行进的人群，人们以此象征性地参加他的葬礼。

(3) 1979年发生了两件震动中东的大事：埃以和平协定和伊朗革命。前者代表务实的外交政策，后者代表宗教纯粹主义和政教合一的趋势。哪种趋势将在中东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最近几十年来的问题。

(4) “瓦克夫”（*waqf*），伊斯兰教法术语，意为“保留”“留置”。特指“保留”安拉对人世间一切财富的所有权；或“留置”部分土地、产业，奉献于弘扬“主道”的事业。——校注

(5)*Falashas*是阿姆哈拉语，意思是“外地人”，埃塞俄比亚黑犹太人自称为“以色列之家”（Beta Israel）。——校注

(6) 高秋福译：《百年心声：现代希伯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0 - 12页。——校注

(7) 先祖墓地（Cave of the Patriarchs）对犹太人和穆斯林而言都是圣地。犹太传统认为这里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埋葬处。和犹太人一样，穆斯林也在这里举行宗教仪式，为此于公元6世纪在此修建了一座清真寺。

第十七章
和平进程陷入僵局

我是个失败者，这都是拜你所赐。

——比尔·克林顿致亚西尔·阿拉法特

拉宾下葬前，100万人走过棺材，向遗体告别。80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葬礼，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对这些政要发表演讲时说："我从没想过这一刻，没想到我会失去一位如此重要的兄弟、同事和朋友。"他说拉宾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和军人"。"虽然他来自敌对方，但我们相互尊重。我结识他，因为我和他都意识到，我们应该跨越分歧的鸿沟，开展真诚的对话，增进相互间认识，为我们各自的后代留下一笔他们应得的遗产。"[1]

侯赛因国王离开演讲台时，人们看到他在颤抖。多年前，他的祖父因为追求和平而被谋杀，拉宾的去世是历史的重演，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人们不禁要问，总有人不惜一切代价阻碍和平的实现，中东是否会在暗无天日的战乱中一直沉沦下去？

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来到以色列参加葬礼。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到现场，他甚至下令让整个美国降半旗哀悼拉宾。[2]发表完悼词后，克林顿朝着拉宾遗体的方向，边向这位倒下的战士和追求和平者鞠躬致敬，边轻声用希伯来语和英语说："再见了，朋友。"这一幕永远铭刻在以色列人的记忆中。

西蒙·佩雷斯长期以来是拉宾工党领导人位置的激烈竞争者。拉宾死后，佩雷斯成为代总理。第二天，他拒绝坐在拉宾位于总理办公室的座位上。他深知，以色列社会出现巨大裂痕，谁也无法真正取代拉宾的位置。但年轻时就在本-古里安等开国元勋身边工作的佩雷斯也明白，此时此刻，需要有人站出来领导国家，让以色列社会走出阴霾。然而，以色列社会真的可以走出这片阴霾吗？谁心里都没底。

西蒙·佩雷斯什么都见过。1923年出生于波兰的维什涅瓦（Wiszniew，现在属于白俄罗斯），他早年的名字是西蒙·佩尔斯基

（Szymon Perski）。1934年，他随家人移民巴勒斯坦，1947年加入哈加纳，负责人事管理和武器采购，这项工作他一直做到独立战争早期。建国后，除了担任议员，佩雷斯先后在多个重要岗位工作，包括外交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1984—1986年，他担任过总理。拉宾去世后，身为代总理的佩雷斯决心完成拉宾的和平事业，继续推进《奥斯陆协议》的落实。1995年11月和12月，以色列国防军从希伯伦以外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各大城市撤出，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在这次选举中，阿拉法特当选为主席，他领导的法塔赫赢得巴勒斯坦委员会多数席位。巴勒斯坦人似乎朝建国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但在此期间，巴勒斯坦人的袭击活动仍在继续，袭击的次数和造成的伤亡甚至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3]《奥斯陆协议》失败的事实已经越来越难以掩盖。佩雷斯说："我们没有得到感谢，我们得到的是炸弹。"[4]佩雷斯宣布以色列提前6个月举行大选，右翼人士刺杀拉宾让以色列人厌恶，佩雷斯认为自己可以毫无悬念地当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确，民意调查也显示，他的支持率远远高于利库德党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改变了选举的结果。短短9天内，在特拉维夫和亚实基伦（Ashkelon）这两座以色列中心城市的两起暴力袭击中，将近60名以色列人丧命。取代拉宾担任总理仅7个月后，佩雷斯就被愤怒而惊恐的以色列人用选票赶下台。

安全始终是以色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每当暴力袭击加剧，他们就会将选票投给右翼政党；1996年的选举也不例外，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取代佩雷斯成为以色列总理。上台后，内塔尼亚胡履行了以色列政府之前的承诺（根据1995年的巴以和平协定，也称为《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重新部署在希伯伦的军队，希伯伦已是以色列控制的约旦河西岸最后一座城市。在美国施压下，1998年内塔尼亚胡又签订了《怀伊河备忘录》（Wye River Memorandum），旨在恢复实施已陷入僵局的《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

但从一开始，内塔尼亚胡就认为《奥斯陆协议》是以色列做出的一个错误决定。在三年执政期间，他殚精竭虑，避免《奥斯陆协议》可能给以色列带来的危险。但在下一轮选举中，以色列人想要一个中间人物，于是又向左摇摆，选出埃胡德·巴拉克担任以色列总理。

巴拉克是战功卓越的军人，他在竞选时提出了三点承诺。首先，他承诺将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政府先前一直不知如何从这场战争

中脱身；其次，他承诺让以色列和叙利亚实现和平；最后，虽然人们越来越怀疑《奥斯陆协议》，但巴拉克仍然承诺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

有些以色列领导人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将巴拉克前两个承诺结合起来：如果可以同叙利亚签订和平协议，那么以色列就可以通过与叙利亚协调而撤出黎巴嫩。但实际上，叙利亚乐意看到以色列武装继续留在黎巴嫩，这样他们能通过真主党这个代理人来打击以色列军队。[5]叙利亚外交部部长甚至声称，如果以色列不经叙利亚同意就撤军，将被叙利亚视为“战争行为”。以色列一位著名记者就此评论道：“这种心理扭曲即使按照当地标准也是令人难忘的。”[6]

这样，巴拉克要想将以色列带出黎巴嫩，除了单方面撤军，别无选择。2000年5月24日，他这样做了。当时服役于黎巴嫩的国防军战士大多出生于1982年前后，以色列就在这一年最早入侵黎巴嫩。

这并非以色列最后一次面对阿拉伯暴力活动选择单方面撤离。后来的事实证明，每当以色列做出这样的选择，都会被阿拉伯极端分子利用。截至2000年，真主党用行动证明，他们能对全世界最专业的一支军队实施致命的暴力行为：1985年（黎巴嫩战争主要作战阶段结束后）到1997年之间，200多名以色列战士阵亡，750多人受伤。以军撤出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地位得以巩固。在以军越过边境回到以色列的前夜，真主党副总书记将当晚形容为“巴勒斯坦人胜利的曙光”，“他们也可以通过抵抗和殉难来获得解放”，他承诺“在黎巴嫩取得的胜利可以复制到巴勒斯坦”。[7]

从黎巴嫩撤军的诺言实现后，巴拉克将注意力转向巴勒斯坦问题。5月撤军结束不久，2000年夏天，埃胡德·巴拉克、亚西尔·阿拉法特和比尔·克林顿在戴维营开始谈判。22年前正是在这里，贝京与萨达特在卡特的协调下达成埃以和平协议。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多年来最棘手的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回归、耶路撒冷归属和巴勒斯坦国边界划分）都被拿到谈判桌上。巴拉克决心同巴勒斯坦人达成一份全面协议。为了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巴拉克向阿拉法特提供约旦河西岸92%的土地和耶路撒冷部分地区。但让以色列谈判团队惊讶的是，阿拉法特及其团队竟然拒绝考虑这一方案。起初，《奥斯陆协议》的签订引发巴勒斯坦暴力袭击的升级；现在，以色列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阿拉法特会觉得慷慨的解决方案，就算阿拉法特仍不满意，这个方案也可以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但阿拉法特断然拒绝了。

巴勒斯坦的毫不妥协让克林顿也困惑不解。

戴维营和谈宣告失败，参会者不欢而散。回到以色列的巴拉克政治处境非常不利，右翼人士因为他在戴维营的让步过大而愤怒，左翼人士则对他的空手而归失望。回到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却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巴勒斯坦人认为他经受住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威逼利诱，向世界表明如果不能满足巴勒斯坦人对耶路撒冷、边界和难民回归方面的全部要求，他们不会做出任何妥协。阿拉法特希望他的人民看到他的意志是坚定的，他一直忠于人民的理想。

美国外交家和作家丹尼斯·罗斯参与了几十年来的中东和谈，曾担任比尔·克林顿的中东特使。他后来写道："巴拉克和克林顿都准备为达成协议而做需要做的事，两人迎接了挑战，谁都没有回避复杂而危险的历史和宗教问题。能这样说阿拉法特吗？很遗憾，不能。"[8]

以色列的分析人士和历史学家，甚至包括那些长期和左翼政治势力关系密切的历史学家，都清楚阿拉法特的用意。[9]只要谈判继续拖延下去，国际社会便认为这位曾经的战士在追求和平。一旦签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就会期待他治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他不得不对这个国家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阿拉法特根本不愿意迈出这一步。

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刚过去六个月，戴维营和谈刚结束两个多月，反对党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决定去圣殿山看看。作为一名以色列公民，他完全有权参观圣殿山，但有些人认为这是挑衅之举。其他人宣称沙龙此举是为了告诉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对东耶路撒冷和老城的主权。也许还有人在想，沙龙知道阿拉法特必然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他要在政府做出进一步妥协前，让以色列人看穿阿拉法特的行为方式。

不管到底出于什么动机，沙龙"事先显然得知，以色列情报机构告诉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部长什洛莫·本－阿米，沙龙访问圣殿山不会引起联合暴力。约旦河西岸安全预防部门负责人巴勒斯坦人贾布里勒·拉米（Jibril　Rajoub）的话也间接确认了情报机构的判断。拉米告诉本－阿米，沙龙可以访问圣地，但基于安全考虑不要进入清真寺"[10]。

沙龙没有进入清真寺，2000年9月28日，在数百名以色列警察的保护下，他登上了圣殿山。第二天，两万名巴勒斯坦人来到圣殿山示威，以色列军队在与巴勒斯坦人对峙中使用了小型轻武器，让暴乱进一步升

级。在当天的冲突中，7名巴勒斯坦暴徒被击毙，300名巴勒斯坦人和70名以色列警察受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在电视讲话中发表了强烈的反以言论，在广播讲话中号召人们发动“吉哈德”（这个穆斯林宗教用语专指针对非穆斯林的宗教战争）。

几天内，在阿拉法特及其安全部队的纵容和煽动下，冲突迅速蔓延到全国。以色列安全部门认为阿拉法特为发动起义蓄谋已久，沙龙登上圣殿山只不过为他提供了借口。

这场冲突持续了四年之久，后来称为“第二次因提法达”。冲突之初发生的一些事件颇有象征意义。9月30日，一支法国电视拍摄团队在加沙拍下了令人恐惧的一幕：12岁的穆罕默德·杜拉（Mohammad al-Dura）虽然有父亲的奋力保护，还是被残忍杀害。以色列坚持认为国防军没有杀害这名男孩（后来证明这的确不是国防军所为），但这一事件让巴勒斯坦民众无比愤怒。此事发生后不到两周，有两名以色列预备役战士驾车前往驻地报到，但在路口拐错弯，误入了巴勒斯坦城市拉马拉。他们很快被当地民众包围，然后被残忍杀害。一名激进分子站在窗前，向欢呼的巴勒斯坦群众举起沾满鲜血的双手，这张照片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看到此景，以色列人再次感到巴勒斯坦人的目的不是建国，而是杀害犹太人。[1]

这次因提法达远远不像第一次因提法达那样属于大规模群众起义，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使用了武器和自杀性爆炸手段，因而比第一次因提法达更具杀伤力。[11]冲突还蔓延到以色列阿拉伯人那里，特别是在阿拉伯人密集的加利利地区。有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攻击了犹太人的财产、汽车、定居点和各种机构。以色列的犹太人也展开了反击，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混居的城市，许多清真寺、阿拉伯人商店和居民区遭到袭击。[12]2000年10月，在一次示威活动中，以色列警察和阿拉伯暴徒发生冲突，现场一度失控，阿拉伯人开始投掷石块和火焰炸弹，用弹弓射击钢珠，有的人还用真枪射击。以色列警察也使用了实弹，10月的短短几天内，13名以色列阿拉伯人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击毙。[13]这一冲突后来称为“2000年十月事件”。负责调查此事的奥尔（Or）调查委员会发现，以色列警察对暴力冲突准备不足，有时反应过激。

2000年十月事件和1956年卡西姆村事件不同。在十月事件中，阿拉伯人使用了武力。但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看来，这两个事件有联系。和1956年卡西姆村事件和1976年土地日事件一样，十月事件再次证明他们永远是二等公民，不如犹太人受重视。哈瑞迪人在抗议政府时也会在

马路上点燃轮胎并使用轻微的暴力，但以色列安全部队从来不会朝他们开枪。

沙龙去圣殿山和2000年十月事件中阿拉伯人的死亡进一步加剧了暴力活动。到处有人投掷燃烧弹，焚烧公交车。阿拉伯纵火者还在森林里放火，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攻击方式。犹太移民潮兴起以来，植树造林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工程。在过去一个世纪，犹太国民基金在这里种植了2.5亿棵树。[14]树木不但能够改良土壤，还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以色列地变为沃土的决心。但纵火者恰恰要毁掉这种进步。

随着暴力的延续，克林顿总统为了挽救和平进程，做出了最后努力。2000年12月底，他提出了名为“克林顿参数”的方案。根据他的建议，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将包括约旦河西岸94%—96%的土地（虽然方案中没有提到加沙，但克林顿在2001年1月指出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包括加沙地带）。分布在犹太人口占优势地区的定居点可以并入以色列，这样，以色列就能并入大约80%的定居者。克林顿建议根据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比例将东耶路撒冷划分为巴勒斯坦区和犹太区。为了减少以色列在安全上的顾虑，克林顿提议在约旦河谷地临时驻扎国际部队和以色列部队，并在此建立长期存在的“预警站”。巴勒斯坦难民只能返回巴勒斯坦，不能进入以色列本土。

严格来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同意了克林顿的方案。但克林顿后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写道：“阿拉法特说他有保留地接受这个方案。但与以色列不同，阿拉法特的保留意见不在方案之内，至少在难民和西墙的问题上是如此。但他答应过在我离任前实现和平，所以我认为他接受方案时的态度是认真的。”[15]

就在克林顿即将离任前，阿拉法特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他说克林顿是位伟人。克林顿总统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不是伟人。我是个失败者，这都是拜你所赐。”[16]在总统任上的最后一天，克林顿还提醒乔治·布什和科林·鲍威尔，不要相信阿拉法特将对他们说的任何一个字。他告诉他们，相信阿拉法特是“他担任总统期间犯下的最大错误”[17]。克林顿让阿拉法特和拉宾实现了那次著名的握手，但离开白宫时，他没能解决巴以冲突。

和平进程危在旦夕，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没有减弱，以色列的气氛令人绝望。以色列人已经无法继续忍受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戴维营和谈失败后，阿拉法特毫不妥协，但巴拉克继续让步。失去议会的支持后，

巴拉克不得不宣布在2001年2月提前举行大选。2000年十月事件让以色列阿拉伯人抵制选举，这进一步削弱了左翼政党的力量。果然，巴拉克输掉选举，取代他的是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不同于巴拉克，沙龙认为和巴勒斯坦人没完没了的谈判是毫无意义的政治作秀，他对此毫无兴趣。他认为阿拉法特根本不想达成协议，以色列必须明白这一点。

和平进程彻底失败。意识到这点，让许多以色列人非常痛苦，就像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他们从“构想”心态中醒来那样痛苦。以色列《独立宣言》中宣称以色列“向所有邻邦及其人民伸出手，致力于和平与睦邻友好”，许多以色列人从小就相信战争双方有一天会放下武器，让中东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正是怀着这种想法，以色列先后同埃及和约旦实现了和平。但巴勒斯坦人似乎一心只想看到以色列从世界版图上消失。长期以来认为让步是实现和平唯一途径的左翼政治势力已经疲惫不堪，他们伤心地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被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们想起扫罗王的首领押尼珥（Abner）提出的那个问题：“刀剑岂可永远杀人？”[18]在深切的失望和担忧中，他们发现对此没法给出否定回答。

2001年，1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于自杀性炸弹袭击，几十人死于其他袭击方式。巴勒斯坦人越来越无所顾忌。为了造成更大伤亡，他们开始攻击人口更密集的地点。2001年夏天，一名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特拉维夫海滩的舞厅将自己引爆，21名以色列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俄国移民家庭的10多岁的女孩。100多人在这次袭击中受伤。两个月后，耶路撒冷市中心最繁华地带一家比萨饼店遭到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130人受伤，15人死亡，其中半数死者为儿童。

大多数暴力袭击者来自约旦河西岸。更让以色列人难以接受的是，巴勒斯坦警察和法塔赫的坦齐姆（*tanzim*）部队参与了多起枪击事件；法塔赫人员还实施了自杀性爆炸袭击，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事件加重了以色列民众对阿拉法特、法塔赫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敌意，很多人开始认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根本没有实现和平的伙伴。

2002年逾越节前夜，大约250名宾客聚集在海滨城市内塔尼亚的公园酒店，共同享用传统的逾越节晚餐。一名化装成妇女模样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混过酒店安保人员的检查，随后引爆了一个大当量炸弹，巨大的爆炸造成28人死亡，约140人受伤，包括20人重伤，其中两人因为伤势过重死亡。有几对夫妇在爆炸中死去，有一人已经90岁高龄。一对父

女也在爆炸中一起遇难。

这场袭击让沙龙下定决心进行反击。不久，以色列发动了“防御之盾行动”，这是六日战争以来在约旦河西岸发动的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旨在摧毁位于巴勒斯坦主要城市的激进组织基地。实际上，在这次行动后，以色列重新控制了1995年根据《奥斯陆协议》交还给巴勒斯坦人的城市。

以色列并未就此止步。为了制止暴力袭击进一步伤害以色列公民，2002年9月，政府决定修建隔离墙，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隔离开。隔离墙耗时5年建成，长达480英里（虽然一直没有完全竣工）。北部隔离墙修建完成后，从约旦河西岸那块地区潜入以色列被彻底阻止。隔离墙的效果毋庸置疑，但给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以色列为此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但以色列领导人不为所动，继续推进隔离墙的建设。截至2004年12月，自杀性爆炸事件已下降了84%。

2000年9月至2004年9月，巴以冲突导致以色列10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达到2700人。同样蒙受损失的还有以色列和平阵营。几十年来，以色列左翼人士提倡“土地换和平”原则，他们坚信，只要以色列交还1967年占领的大部分土地，巴勒斯坦人就会和以色列人实现和平。但巴拉克向阿拉法特让步带来的结果却是另一次因提法达，这证明左翼人士的想法天真而危险。很多以色列人认为，就算阿拉法特对巴拉克的方案不满意，也可以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下去，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发起新一轮暴力活动，这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激进分子，永远不会转变为一名政治家。在这一过程中，以色列左翼阵营成为最大的牺牲品。

本尼·莫里斯多年来是政治左翼的代表人物，他精准总结了以色列人的处境和立场。他称阿拉法特是个“积习难改的骗子”，还得出这个悲观结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可能永远无法和平共处。以色列公众都对本尼·莫里斯观点的转变困惑不解，他解释说：

> 我没有做大脑移植手术，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谣言，至少我现在不打算做这个手术。然而，我对当下的中东危机及其主要参与者的看法，在过去两年发生了剧变。我的感觉有点像那些在匈牙利的西方游客，俄国坦克在1956年粗暴地开入布达佩斯，他们在那一刻忽然惊醒了。[19]

许多人和莫里斯一样悲观，包括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布什后来说："阿拉法特欺骗了我。我不会再相信他。实际上，我没打算再和他说话。2002年春天我已经得出结论：只要阿拉法特还执政，就不可能实现和平。"[20]

在1923年出版的《铁墙》中，泽夫·雅博廷斯基提出，除非阿拉伯人明白以色列人绝不会妥协，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停止冲突。历史以悲惨的方式证明了雅博廷斯基观点的正确性。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后来认为，2000—2004年，以色列人大多转变为政治中立派，他们一方面同意左翼的观点，认为巴勒斯坦建国对以色列至关重要，只有这样以色列才可以不用再管理几百万巴勒斯坦人。但同时他们也同意右翼的观点，认为巴勒斯坦建国会让以色列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21]以色列人已不知如何是好。

2004年11月11日，75岁的亚西尔·阿拉法特生病没多久就去世了。接替他的是马哈茂德·阿巴斯（又称为阿布·马赞）。2003年3月，阿拉法特任命阿巴斯为总理（巴勒斯坦以前没有总理这一职位）。但由于阿拉法特不让他参与任何实质性事务，他无奈之下选择辞职。但现在他取代了阿拉法特的位置。

阿巴斯1935年出生于采法特，1948年战争时逃离家乡，先后在开罗和莫斯科接受教育。他在莫斯科写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另一边：纳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关系》，文中提出，犹太复国主义者严重夸大了死于纳粹分子之手的犹太人数量，600万犹太人被杀是个"异想天开的谎言"[22]。阿巴斯是1959年法塔赫的创始成员，还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巴勒斯坦谈判团队成员。[23]

以色列右翼人士不断拿阿巴斯当年的博士论文说事，但其他以色列人认为阿巴斯的当选带来了新希望。这位主张谈判、反对暴力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否开启中东新的篇章？

和巴勒斯坦一样，以色列国内也出现新变化。2003年在赫兹利亚（Herzliya）的一次会议上，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宣布，他决定从加沙单方面撤出国防军，并清除这一区域所有犹太定居点。2004年4月14日，沙龙给乔治·布什总统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结论是，当前的巴勒斯坦根本不存在能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寻求和解方案的对象。这种僵局不利于实现美国和以色列共同的目标，为了减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我决定启动逐步撤军进程。"[24]

34年来，加沙一直有犹太定居点。截至2004年，有8800名犹太人生活在加沙，周边则生活着100万巴勒斯坦人。犹太人控制区占加沙地带面积的五分之一。但以色列保护这几千人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多年来有几万以色列军人在加沙服役。尽管如此，在过去5年中仍有124名以色列人在加沙被害。沙龙认为，既然不能通过谈判撤离加沙，以色列只能单方面撤离。

沙龙被普遍视为典型的鹰派，现在却决定以色列应当撤离加沙，这出乎很多人意料。他所在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成员也深感失望。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沙龙公开辩论，他认为离开加沙会让以色列更加危险。哈马斯立即用行动支持了内塔尼亚胡的观点，开始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仅2004年，哈马斯就发射了882枚迫击炮弹和276枚卡桑（Kassam）火箭。

和面对暴力仍然达成《奥斯陆协议》的拉宾一样，沙龙也没有让火箭弹改变自己的计划。为了表达自己反对这一政策，内塔尼亚胡于8月17日辞掉财政部部长职务。加沙的定居者更是认为，沙龙的决策是对选民的背叛。竞选时沙龙曾表示不会从加沙撤离，但现在出尔反尔。“犹太人不能驱逐犹太人”成为定居者的口号。他们写请愿书，组织示威和抗议活动，甚至用绝食抗议。政府一方面安抚，承诺给每个家庭发放赔偿金；另一方面施压，声称那些拒绝撤离的民众将被送到监狱。

为了顺利撤走加沙的定居者，推平他们的房屋和其他设施，参与行动的1.4万名警察和国防军战士就如何应对定居者的过激行为接受了特别训练。2005年8月的撤离过程总体而言比较顺利，虽然定居者向士兵扔石头和油漆瓶，但没有人使用武器。还有的定居者为了不被士兵带走，用路障将自己的房屋围住。

从19世纪末最早的阿利亚开始，犹太人就在这儿购买土地，建设家园。作为最富激情的一群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者们不相信犹太国会将他们驱赶出家园。在加沙一个叫尼夫德卡里姆（Neve Dekalim）定居点的犹太会堂，一位21岁以色列人告诉记者：“这座建筑是我们生活的象征。我不相信国防军会闯进这里把我们带走。”她判断错了。

撤离行动过程中，没有人严重受伤，也没有人死亡。士兵们挨家挨户地通知出发时间到了。加沙夏天炎热，士兵们还给撤离的定居者发放饮用水。有的战士和民众拥抱在一起痛哭，还有的士兵和定居者一起祷告。

单边撤离行动让许多人想起历史上另一事件。梅纳赫姆·贝京常说，他政治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在1948年6月“阿尔塔莱纳”号事件中避免了内战爆发。在加沙，以色列社会再次展现出成熟的一面，军队对这次行动周密部署，被迫离开家园的犹太人也表现得非常克制和体面。

阿里埃勒·沙龙在竞选时承诺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撤离，当他决定撤离时也没有举行公投，整个过程让以色列人感到非常不符合民主原则，但没有人用极端暴力的方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法制得以维护。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这是悲痛的一天，但对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而言，这也是值得骄傲的一天。

加沙行动顺利完成后，沙龙下个目标是让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离。为了减少政治阻力，2005年他离开利库德集团，组建了自己的前进党（*Kadima Yisrael*，“前进，以色列！”之意），党员多为劳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中持中间立场的成员。但撤出加沙四个月后，沙龙突发中风，陷入昏迷。这位人称“推土机”的勇士倒下了。(2)

沙龙的接任者是耶路撒冷前市长埃胡德·奥尔默特，他上任总理职位后，宣布要将大部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归还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同于以往的诸位总理，奥尔默特认为，巴以双方可以在解决谈判中的棘手问题之前建立巴勒斯坦国。他说：“如果巴勒斯坦人能放弃激进主义路线，停止针对以色列公民的战争，那么可以在双方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就基于临时边界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巴勒斯坦国。剩下的问题两国可通过谈判逐步解决。”[25]

就在奥尔默特发表这一声明当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举行选举，宣誓灭亡以色列的哈马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26]但由于巴勒斯坦选举制度的原因和法塔赫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哈马斯获得议会大多数席位，选票上微弱的优势最终转化为压倒性的政治胜利。

大选获胜后，哈马斯官员重申他们不承认以色列，也不会同以色列谈判。正当以色列提议让巴勒斯坦提前建国时，巴勒斯坦人将一个决心灭亡以色列、拒绝停止冲突的政府选上台。和平进程的希望之光最后熄灭。2009年，埃胡德·奥尔默特因贪污罪指控而辞职，他的和平计划和他的政治生涯一起宣告结束。(3)

和平谈判再次以失败告终，这后来成为一个固定模式，但冲突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再次需要适应新的战争形式。第一次因提法达爆发

后，一直和正规部队作战的以色列国防军发现自己的对手成了巴勒斯坦民众，对手使用的武器大多数时候并非枪炮，而是石块。但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国防军再次需要学习如何对付激进组织，但这些组织的行为方式不同于几十年来和他们交手的激进组织，而是和正规部队越来越像。

北部需要应对的激进组织是真主党，西南部是哈马斯。这两个激进组织都试图消灭以色列，攻击以色列平民，不断向边境附近的人口密集区域发射火箭弹。有时，这些袭击和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导致冲突升级，引发激烈交战行为。

2006年6月25日，利用在以色列和加沙边境修建的地道，哈马斯在边境地区将正在执行任务的下士吉拉德·沙利特绑架。[4]哈马斯绑架人质所表现出的大胆和军事能力让以色列人大为震惊。2006年7月12日，真主党战士向正在边境巡逻的两辆以色列军队车辆发射了两枚反坦克导弹，3名以色列士兵当场死亡。更糟糕的是，真主党在这次行动中又绑架了两名士兵，在试图营救人质的过程中，又有5名以色列士兵阵亡。

真主党要求用被俘士兵交还囚犯（当时以色列不知道这两名士兵已经死亡），但遭到以色列拒绝。为了削弱真主党的实力，以色列国防军攻击了真主党的军事目标和黎巴嫩的民用设施，包括贝鲁特的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国际机场。但在几周的激烈交火中，真主党顽强抵抗，虽然其军事实力明显逊于国防军，但在初期抵挡住了国防军的进攻。这次激烈冲突后来称为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它体现了非对称战争这种较新的作战样式，在这种战争中，有关平民死伤的舆论有效限制了实力占优的民主国家。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超过1000名黎巴嫩人和165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对黎巴嫩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在大约一个月时间里，双方展开猛烈对攻，随着地面部队的推进，以色列最终占据上风，但在联合国的施压和调停下，以色列被迫接受停火。

哈马斯虽然在议会中赢得胜利，但法塔赫并没有交出权力。2007年6月，哈马斯发动武装政变，炸毁了位于汗尤尼斯（Khan Yunis）市的法塔赫指挥部，赶走了建筑中的法塔赫成员，夺取了加沙控制权，这让阿巴斯颜面扫地，深受打击。

从那以后，每隔一两年，哈马斯就会连续几周或几个月向以色列城市发射数百上千枚火箭弹，让以色列南部民众无法正常生活。以色列人希望政府能保护他们，因此，每当出现这种情况，以色列都会报复，有

时军事冲突会发展为全面战争。大多数情况下，以色列空军会对哈马斯进行惩罚性打击，但有两次以色列决定派出地面部队。由于哈马斯想阻止以色列国防军深入加沙，并试图对以色列人造成尽可能大的伤亡，恶战接踵而至。每一轮战争都会有数百名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以色列军人和平民死亡——但巴勒斯坦方的伤亡远高于以色列方。然而，双方都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果。一次又一次，双方都会接受停火，等待下一轮冲突的到来。

很多以色列人意识到，这些短暂的战争有个共同点，即以色列无法在这些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不管是同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是同加沙的哈马斯，战争虽然惨烈，但双方都没有获得任何战略成果。真主党和哈马斯无法让以色列投降、撤军，无法改变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也无法摧毁这些激进组织的网络，更无法确保他们不会再次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事实上，以色列人发现，自从1973年以来，以色列就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赢过一场战争。的确，在2002年“防御之盾行动”中，国防军表现出色，短时间内就结束了战斗，但几十年来，以色列再没有像1967年那样大获全胜，他们的敌人比以前更加顽强和凶残。

在这些冲突中，随着以色列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以色列人还发现了以色列社会的另一个变化。20世纪60年代，基布兹是培养军官的摇篮，基布兹成员在战争中承受了和他们所占人口比例不相符的伤亡，但现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社团（national religious community）取代了基布兹的角色。截至2010年，这类宗教社团虽然不到以色列人口的10%，但他们在作战部队中的比例却达到25%—30%。同样，军官培训课程的毕业生中，这类宗教社团的人员也越来越多，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6%。[27]如今，以色列的军队领导人和以色列最有爱国热情的那部分人中，有很多来自这个独特的社会群体。

虽然深陷于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中，但以色列在另一个领域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政府资金短缺，无力为来自北非和其他地区几十万移民提供足够的住房和食品。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色列已成为一个科技强国。

建国60年来，以色列的经济总量翻了50倍。[28]2008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1%，领先世界大多数国家。[29]以色列的工程师、研发中心和初创公司的密度居世界第一。[30]同年，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超过整个欧洲大陆在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总和。[31]以色列人均风险投资额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32]。

如此惊人的成就得益于多方面因素。俄罗斯犹太移民功不可没。俄罗斯移民中，数万人拥有高学历，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初到以色列时艰苦的生活条件。以色列一位著名政策专家指出：“移民不怕一切重来，他们天生是冒险者，每个移民国家都是创业的国度。”[33]以色列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现在，这个政策开始给国家带来红利。俄罗斯移民融入了教育、军队、社会和经济等领域，给这个年轻的国家注入了巨大活力。

以色列能成为“创业的国度”还有其他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研制“狮”式战斗机的项目因美国国会施压而终止，[34]大约1500名以色列高级工程师突然失业。他们中很多人走上了创业之路，促成以色列成为科技强国。科技产业给以色列社会带来大量财富，以色列成为全球投资人和发明家最青睐的国家之一。[35]

然而，在国际社会看来，以色列并不是“创业的国度”，而是应当被排斥的国家。激进主义没能帮助巴勒斯坦人达到目的，他们开始实施新的策略：让以色列在国际社会非法化。这对以色列而言并不新鲜。早在1975年，联合国就通过一项决议，声称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现在，许多其他组织也加入到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行列，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以色列都诞生于罪恶之中，没有生存的权利。

联合国及其分支组织成为这场战争的主战场。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成为一个明显具有反以色列倾向的平台。本 - 古里安称联合国是一出“荒诞派戏剧”[36]。阿巴·埃班先后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国大使，说话一向简练而雄辩，他这样评论联合国：“如果阿尔及利亚提交一份决议声称地球是平的，而且是以色列把地球压平的，这个决议将以164票赞成、13票反对和26票弃权得以通过。”[37]

到2000年时，联合国连这点面子工程也基本顾不上了。虽然1991年12月联合国撤销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决议，但这种观念仍然存在。2001年和2009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会议就裁定：犹太复国主义属于殖民主义，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以色列诞生于罪恶的“种族清洗”[38]。会议上还发放了《锡安长老会纪要》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39]

2003—2012年，联合国提交了314个关于以色列的提案，40%获得

通过。关于以色列的提案数量是其他国家的6倍，排在以色列后面的国家是苏丹。[40]2013年底，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齐夫·埃尔金（Ze'ev Elkin）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103个关于单个国家的决议中，有43个（占42%）决议谴责以色列。[41]仅在2013年3月的会议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通过了6个批评以色列的决议，关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决议总共只有4个。[42]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紧急会议中大多数议题也与以色列有关。[43]但在这期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没有就达尔富尔冲突或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侵犯人权行为通过任何决议。[44]

有些观察者明白事理，敢为以色列说话。当联合国强烈谴责以色列2014年对哈马斯发动的战争并要求以色列对平民的死亡负责时，英国退役上校和前英国驻阿富汗部队指挥官理查德·肯普做出回应。他在《纽约时报》一篇社论中提醒读者，到底谁应当为没完没了的冲突负责。联合国谴责“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并封锁加沙”[45]，但联合国明白事情并非如此。肯普提醒读者，10年前以色列从加沙撤离，但哈马斯利用这一机会将冲突升级。肯普写道：“去年夏天的冲突因为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火箭袭击事件而急剧升级，这是哈马斯挑衅行为的延续。”

有人指责以色列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肯普把以色列国防军的行为与其他国家的军队做了对比：

> 他们应当听一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E. Dempsey）将军的观点。去年11月，邓普西指出，以色列国防军为了减少平民伤亡，采取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措施。最近，美国、德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11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加沙冲突调查团也这样认为。我有幸成为调查团成员之一，在我们提交给戴维斯法官的报告中写道：“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军队像以色列国防军一样在去年夏天的行动中采取大量措施保护平民。”[46]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甚至也对联合国提出强烈抗议。萨曼莎·鲍尔平常算不上是热心支持以色列的政治家，但她也承认联合国的做法有失公正：

>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成员国利用安理会、联合国大会甚至神秘的联合国委员会对以色列政策进行批判，这些批判已经超出合法范

围，旨在将以色列国非法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长期讨论的国家……不是使用毒气杀害本国人民的叙利亚，而是以色列。这种偏见所针对的，不仅仅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还包括这个国家所代表的观念。[47]

犹太复国主义一直以来既是一种观念，也是具体的以色列建国运动。鲍尔的话准确地描述了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所遭到的攻击。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建立犹太国的观念。1947年11月，在联合国分治决议的投票上，国际社会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但70年后，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改变了立场，人们所反对的并不是犹太国的行为，而是犹太人应当拥有自己国家的观念。

联合国撤销反犹决议，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偏见。显然，如果现在联合国再就以色列建国问题举行投票，这一提议几乎不可能像1947年11月时那样获得通过。

联合国并非唯一的战场。许多看似公正的人权组织也专门针对以色列，对以色列采用明显的双重标准。“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维护那些人权遭到侵犯的人，1978年罗伯特·伯恩斯坦创立了这一组织。2009年，罗伯特·伯恩斯坦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谴责这个由他一手创立的组织：

以色列经常遭到哈马斯和真主党的袭击，这些组织打击以色列平民，并把自己的平民用作人体盾牌。人权观察组织对这场冲突的立场不够公正。……人权观察组织的领导知道，哈马斯和真主党专门挑选人口密集地区发动战争，故意将居民区变为战场。他们也知道，越来越多先进的武器正流入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用于发动新一轮袭击。他们还知道，是武装冲突剥夺了巴勒斯坦人追求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可能。但作为长期以来的受害者，以色列却遭到人权观察组织严厉的批评。[48]

这种双重标准并不少见。众多组织、媒体和欧洲政府形成一股谴责犹太国的强大力量，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专门针对以色列，否认犹太国的生存权和犹太民族的自决权，并将以色列妖魔化”。这股力量在不断壮大。[49]

很多情况下，为了掩盖对犹太国这一观念的否认，这些组织宣称自己致力于结束以色列对其他民族土地的占领。2005年，正当以色列从加

沙撤出时，“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诞生。该运动呼吁抵制以色列，除非以色列结束1967年以来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赋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平等的公民权，让1948年逃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代（现在已经有几百万人）回归家园。以色列不可能接收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这将让犹太人成为以色列的少数民族），还能继续保持国家的犹太性与民主性。因此它的真正目的是灭亡以色列。

这是非常高明的策略。通过使用对美国犹太人而言极具说服力的人权理论，“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和其他组织让许多年轻的美国犹太人对犹太国产生怀疑，令他们觉得以色列在某个重要方面背叛了犹太教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很久以来确保了犹太教是世上一种进步力量。

但更有经验的观察家理解这背后的运作。2004年6月（当时“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尚未诞生），联合国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以反犹主义为主题的研讨会。在会上，一位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和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今，反犹主义像病毒一样寄生在联合国当中。反犹主义者在联合国谴责以色列，将以色列妖魔化，将犹太国的敌人神圣化，否认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指责以色列所做的自卫和反击，还拒绝指认攻击者。”[50]欧洲的反犹主义也在抬头，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许多欧洲犹太人对这种局势并不陌生，2015年西欧移民以色列的人数再创历史新高，[51]许多犹太人再次选择了逃离。

对以色列政府而言，更迫在眉睫的心头之患是核武器技术的扩散，尤其是那些试图灭亡以色列的政府发展核武器。2007年，以色列的“贝京学说”再次受到考验，以色列得到了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旁建造核反应堆的确凿证据。同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协调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下令对叙利亚核设施实施秘密军事打击，以色列空军摧毁了这些设施，没有给叙利亚任何反击的机会。[52]

在伊朗，“贝京学说”受到的考验更严峻。2006年4月，伊朗宣布已提炼出浓缩铀，这是制造出核武器的关键一步。同年，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内贾德坚决表示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53]。他的想法成为伊朗的长期政策。2012年，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哈桑·费罗扎巴迪（Hassan Firouzabadi）声称：“伊朗将坚决贯彻彻底灭亡以色列的政策。”[54]而伊朗距以色列的距离比伊拉克更远。为了避免遭到以色列空袭，伊朗将核设施修建在地下很深的地方，以色列轰炸机和其他武器对此无能为力。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继续贯彻“贝京学说”，他声称，如果国际社会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将单独发起行动。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不愿使用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也不同意以色列单独发起行动，更没有向以色列提供完成这次行动的武器，而是让伊朗在核武器研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让600万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承受着被伊朗核武器灭绝的风险。(5)2015年3月，世界主要大国和组织（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和欧盟）代表及伊朗代表在瑞士洛桑就框架协议举行谈判，该协议试图通过部分解除几十年来对伊朗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换取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2015年7月14日，谈判各方最终签署了一份名为《全面联合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的框架协议。

这份协议没有要求伊朗拆除大量已经建成的核设施，而且协议所强加的限制只有10年有效期。反对这一协议的立法者注意到，该协议建立在信任伊朗的基础上，因此是鲁莽的。多年来跟以色列有隔阂的共和党成员亨利·基辛格也在同前国务卿乔治·舒尔兹（George Shultz）共同撰写的文章中表示，西方世界犯了一个可怕的战略错误，放弃了道德上的责任：

> 相对于伊朗，战争的威胁对西方的限制力更大。伊朗认为自己同意谈判本身就是一种妥协，西方则认为必须达成协议。每当谈判陷入僵局，西方就会提出新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伊朗不断推进核计划。根据官方判断，伊朗人只需2—3个月时间，就能制造出核武器……历史不会帮助我们，历史只帮助那些尝试帮助自己的人。[55]

各行各业的以色列人都认为此乃不祥之兆。美国表面上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两国在这一关键政策上出现严重分歧。让以色列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似乎在为一个决心通过获得核武器来灭亡以色列的国家扫清前进障碍。有的人认为，这代表美以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向，以色列陷入了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孤立无援之境。当时担任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的迈克尔·奥伦写道：“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同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我们的生死问题谈判时，我们的盟友甚至都没通知我们一声。”[56]

可以说，即使那些不相信伊朗会用核武器攻击以色列的以色列人也明白，伊朗一旦具备这种能力，中东地区的游戏规则将被改变。约西·克

莱因·哈勒维最善于捕捉以色列人的心态，他指出，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最终决策将决定建国是否真的能够改变犹太人的命运。

他说："如果甘心承受来自核武器的威胁，犹太国将失去为犹太历史代言的权利。"[57]

(1) 这名抵抗组织成员名叫阿兹·萨尔哈（Aziz Salha），后来被以色列政府逮捕，因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但2011年，作为交换囚犯计划的一部分，在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被哈马斯释放后，他也被以色列释放。

(2) 沙龙昏迷了将近9年，一直没有苏醒。他于2014年1月11日去世。

(3) 2016年2月，经过漫长的司法过程，奥尔默特成为以色列第一位进监狱的总理。2007年7月，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也因强奸下属而辞职，2011年12月定罪后入狱。和卡察夫住同一个牢房的，是以色列劳工与社会福利部前部长什洛莫·贝尼兹里（Shlomo Benizri），他因诈骗罪入狱。以色列总共有几十位前部长、议员和政府官员犯有诈骗等罪名，这严重侵蚀了本-古里安建国时在《独立宣言》中提到的社会理想。虽然以色列的司法系统能将国家最高级别的官员绳之以法，但没能阻止以色列社会中的腐败现象。

(4) 沙利特被劫持了5年，2011年10月18日获释，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了约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许多袭击过以色列人的激进分子。

(5) 600万是一个能够勾起以色列犹太人痛苦回忆的数字。这正是在上一场种族清洗中犹太人的死亡人数，现在，生活在以色列的600万犹太人再次成为他国的目标。

第十八章
犹太国的犹太复兴

那股沁香仍在拨动我的心弦……打开通向代代传承的古老诗篇的大门。

——以色列音乐家拉米·克莱恩斯坦歌曲《小礼物》[1]

2013年初，第十九届议会选举结束。根据惯例，新当选的议员要当着全体议会成员的面发表演讲。在这届选举中，新成立的未来党（全名为“拥有未来”[*Yesh Atid*]党）异军突起，该党领导人是英俊而睿智的亚伊尔·拉皮德。他从政前是以色列广受欢迎的电视记者和作家；他父亲是大屠杀幸存者，也是一位强烈反对宗教的议员。亚伊尔·拉皮德带领未来党进入内阁，并提交了一份具有折中主义特色的议员名单，名单中许多人没有担任过民选官员，其中有男有女，有哈瑞迪人，有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有东方犹太人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有新移民，也有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2](1)拉皮德制定这份名单，部分考虑是想打破以色列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隔阂。露丝·卡尔德龙是未来党的议员之一。

轮到卡尔德龙发言时，她拿起一册《塔木德》走上演讲台，说道：“尊敬的议长和议会成员，我手中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正是它让我有机会作为一名新议员在以色列议会发言。”[3]

接下来，卡尔德龙介绍了自己的家庭背景，她的个人成长史和大多数其他议员似乎大同小异：

> 祖父并没有传给我一套《塔木德》。我出生和成长于特拉维夫一个古雅的犹太社区。我的父亲摩西·卡尔德龙生在保加利亚，年轻时移民到这片土地。经历过早期的战乱后，他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农业，独立战争爆发后立即参军，参加了保卫古什埃齐翁的行动。……我的母亲生在德国，她是犹太人、左撇子、红发，集这三种[当时的]不幸于一身，十几岁时就移民来这儿了，在英国对耶路撒冷的围攻中，她认识了我的父亲。

她的故事刚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家庭史，但其实不是。她接着用细节告诉大家，这种故事到她这代人就结束了。

> 我在一个具有强烈犹太色彩和复国主义色彩的家庭中长大，我的家庭融合了世俗、传统和宗教元素，结合了阿什肯纳兹和塞法迪犹太文化，我们既支持[修正派的]贝塔尔，也支持[社会主义的]青年卫士，在六七十年代这些都是以色列社会的主流文化。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我接受的是“从塔纳赫到帕尔马赫”的公共教育，[2]我对《密释纳》《塔木德》及卡巴拉和哈西德教义一点不熟悉。10多岁时，我已经感到自己缺了些什么。拿俄米·舍莫尔歌颂了获得解放的、新的以色列身份，这固然美好，但少了点什么。我需要深度；我词汇贫乏，不足以表达我的想法；过去、史诗、英雄、地点、戏剧和故事——这些统统缺乏。
>
> 建国那一代教育家创造出新希伯来人[即新犹太人]，他们实现了梦想，成为一个个勇敢、务实、肤色黝黑的战士。但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一种空虚，我真切感受到了空虚。一直以来，我不知如何填补这种空虚，直到我读到《塔木德》。我被书中的语言、幽默、深邃的思维、论辩的风格，以及它的务实、人性和成熟所折服，我终于找到了一生的挚爱。

卡尔德龙演讲开头的自我介绍绝非为了满足他人的好奇心。她在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确获得了成功，但过于成功。犹太复国主义创造出新犹太人，但这些人无人指引，成为“历史的孤儿”[4]。犹太复国主义“治愈”了犹太人，但也把他们过度治愈了。犹太复国主义急于创造出在哥萨克人袭击基希涅夫时不会躲在酒桶后的新犹太人，但也割裂了犹太人和犹太传统之间的联系，一两代人后，年轻的以色列人对自己民族的传统几乎一无所知。著名以色列作家和翻译家希勒尔·哈尔金（Hillel Halkin）称他们为“说希伯来语的异族人”。现在，年轻以色列人渴望获得生活的意义，迫切想追寻民族的根源，试图重新同那些被犹太复国主义剥夺的文化建立联系。

卡尔德龙指出这不只是她的个人愿望。很多人和她一样，希望同传统文化建立联系，为了满足这方面需求，许多机构应运而生。她和其他人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创立“希伯来文化之家”，为不同性别的宗教和世俗人士一起学习犹太宗教经典提供一个平台。

世俗以色列人开始学习这些伟大的著作，再次拥抱犹太传统，而这

种传统正是本-古里安、奥尔特曼和比亚利克劝以色列人远离的（不无讽刺的是，这三人都熟悉并时常引用犹太经典文本）。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坐到一块学习，宗教人士发现并不能把世俗人士简单视为“叛教者”，他们对宗教经典也有独到的见解，而这在传统宗教场合听不到，能让年轻宗教人士也觉得受益匪浅。

虽然这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现象，但越来越多以色列人开始怀疑，犹太国是否会像拿单·奥尔特曼在《银盘》中所暗示的那样，能取代代表了几千年犹太传统的西奈山。事实上，他们感到，如果失去了西奈山，失去了蕴含在经典犹太著述中独特的犹太精神，犹太国家和主权将变得毫无意义。

最初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已经褪色。在许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治愈犹太人的运动，能够拯救被宗教囚禁的犹太人，让他们摆脱犹太经学院书架上的故纸堆。有一段时间，完全没有信仰宗教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最感到自豪。亚伊尔·拉皮德的父亲汤米·拉皮德曾同一个极端正统派教徒一起上电视节目。在节目中，拉皮德说自己不信上帝存在，他回忆说：“在这期节目上，某个极端正统派的政客愤怒地向我吼：‘如果你不信上帝，那谁来认定你是犹太人？’我吼回去：‘希特勒。’演播厅顿时鸦雀无声。”[5]

拉皮德的回答或许比一般人尖锐，但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确很排斥传统犹太教。所以，卡尔德龙手持《塔木德》走上演讲台对全体议员发表的演讲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她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出来的新犹太人，却渴望重新获得老犹太人的部分身份。

犹太复国主义的正宗意识形态开始出现裂缝。裂缝不仅在人数不多但逐渐壮大的以色列年轻知识精英的身上可以看到，在以色列摇滚乐坛上也能看到。以色列“摇滚乐之父”阿里克·艾因施坦从小在极其世俗的特拉维夫长大，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上大多数摇滚艺人没有多大区别。喜剧演员和电影导演乌里·佐哈尔是艾因施坦的好友，两人同为以色列世俗文艺界的代表人物。1977年，佐哈尔告别娱乐圈，住进极端正统派社团，成了一名犹太教拉比。

此时，艾因施坦同妻子阿隆娜的婚姻也走到尽头。阿隆娜来自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家庭，父亲是以色列空军最早一批飞行员，光这一点就足以让她成为以色列世俗社会中的贵族。她的祖父母是伊斯雷尔·肖哈特和曼娅·肖哈特。祖母曾参加沙皇俄国的革命运动，在第二次阿利亚中同

丈夫来到巴勒斯坦。这种经历也构成标准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

同艾因施坦离婚后，阿隆娜也转向宗教，成为极端正统派教徒。后来，阿里克和阿隆娜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乌里·佐哈尔最大的两个儿子，这四人都是极端正统派教徒。这个故事听起来八卦，但阿里克·艾因施坦作为以色列一代摇滚乐天王，本来非常世俗，他身边这么多家人从世俗精英转变为极端正统派宗教人士，很能反映出以色列社会生活中的变化。

类似于阿里克·艾因施坦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回归宗教成为许多以色列音乐家的标志特征。艾提（以斯帖）·安克丽1990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能从你眼中看到它》，一举成名，这张唱片在以色列创造了双白金销量，她被评为当年以色列最佳女歌手。2001年，她开始慢慢遵守犹太教教规。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中，她用音乐演绎了中世纪犹太诗人和哲学家犹大·哈列维拉比的诗歌。

作为第一个“以色列音乐世家”，巴奈（Banai）家族最能体现以色列人向宗教靠近的趋势。该家族第一代艺术家约西·巴奈和加夫里·巴奈都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第二代艺术家埃胡德·巴奈和尤瓦尔·巴奈（表兄弟）在各自乐队中将东西方元素融入以色列文化，表明以色列人试图在外来文化中追求精神满足。20世纪90年代，同样是表兄弟的埃胡德和伊维塔则明显将犹太教元素带入音乐。这个家族几代艺术家的精神探索之旅代表了以色列人的心路历程。

网络上和书店里也能发现这种变化。YNet是以色列最主要的新闻网站（由世俗的日报《最新消息》[*Yediot Achronot*]创办），该网站频繁更新的页面经常刊登犹太教方面的文章。2005年，以色列教授马尔卡·沙凯德出版了《我会永远将你吟唱：现代希伯来语诗歌中的圣经》一书。这本以色列现代诗歌选集展现了和圣经的对话，篇幅超过1000页。[6]内容虽然是以色列人几十年来创作的诗歌，但由于追溯了以色列人与圣经的持续对话，反映出圣经在以色列文化生活中无处不在，故而迎合了有这方面需要的市场，大受欢迎。

米卡·古德曼是以色列备受欢迎的老师和年轻公共知识分子，他最早出版的三本书分别探讨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犹大·哈列维拉比中世纪经典著作《库萨里》、圣经中的《申命记》。这些主题似乎不会引起大众关注。但没想到，三本书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以色列人购买、阅读和思考这类书，但这些主题其祖父母辈不会在交谈中涉及。

在电影业，主流电影开始用一种仍然批判却不失同情的眼光审视传

统犹太世界，长期以来，世俗的以色列对这种世界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冷嘲热讽。1999年上映的《卡多什》（*Kadosh*，希伯来语中“神圣”之意），关注了世俗世界在看待极端正统派教徒的生活时所抱有的狭隘和不屑，影片对此既有批判，又有几分理解。2012年上映的《填补空白》（*Fill the Void*）聚焦圣经中的利未婚习俗对一个极端正统派家庭的影响。女主角是一位年轻女孩，她姐姐在分娩中死去，于是她不得不嫁给姐夫。[(3)]2014年的《离婚证明》（*Get*）探讨了犹太男性在离婚时可以对妻子施加的权力，以色列政府将婚姻交给犹太宗教法庭负责，所以会产生这种权力。这类题材的电影迅速增多，但知名度最高的，可能还是2011年上映的《脚注》，这部电影审视了一对父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两人都是《塔木德》教授，父亲只对乏人问津的《塔木德》文本的高深字句感兴趣，儿子则因为寻找《塔木德》文本的当代意义而吸引了大批学生，这让父亲难以接受，他认为儿子的方法在学术上不够严肃。这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既真实反映了以色列学术界的现状，又清楚表明露丝·卡尔德龙这代年轻人之所以向往《塔木德》，并不是要从事科学的学术研究，而是希望借助犹太文本开启寻找生活意义的旅程。

这种变化甚至在以色列最重要的主流知识分子身上也有鲜明体现。2003年，露丝·加维森教授（以色列著名法哲学家，后来被提名为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和雅科夫·米丹拉比（著名的埃齐翁山犹太经学院的领导人之一）发表了《加维森和米丹公约》，这份“协议”由以色列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共同拟就，内容是如何让以色列既能在公共空间表现出明显的犹太性，又能尊重个人权利。公约涉及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犹太人身份、婚姻、安息日、西墙和国防军等。他们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比如双方一致同意，所有想结婚的人需要在民事部门登记，但任何宗教仪式将是非强制性的；安息日是以色列的公共休息日，但餐厅、娱乐场所与部分杂货店、加油站和药店可以正常营业，此外，安息日还应该有替代性的公共交通。

加维森长期以来是活跃的以色列左翼人士（她曾是以色列民权协会的领导人，还积极组织各种学术活动），是一位不守犹太教规的女性，但连她也认为如果缺少犹太核心内容，这个国家无法长久生存。她的努力体现了以色列出现的两个趋势：一是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试图消除隔阂、寻求共同点的趋势，二是以色列人试图从犹太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活意义的趋势。她认为，如果以色列不是民主国家，就会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而如果这个国家不具有明显的犹太性，就将失去存在的理由。她坚持认为，以色列政府在政策上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确保国家的生存，

还得确保这个国家能包容犹太认同的有效遗产……唯其如此，以色列人才会对犹太历史和犹太文本感兴趣。只有拥有这样的遗产，生活在以色列的公众才会继续支持这个既有民主性又有犹太性的国家”[7]。

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为打破隔阂而携手努力的例子还有很多。许多年轻的犹太教徒急切地与年轻的世俗人士接触，而除了接触，世俗人士还想从宗教人士那里学习宗教经典，这是“从塔纳赫到帕尔马赫”的世俗教育未能提供的内容。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一种为期一年的课程，对象是高中毕业后尚未服役的学生。不少教育机构有意让参军前的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一起学习。每年有几千人报名参加这些课程，远远超过教育机构的接收能力。

当然，以色列社会仍然复杂而异质。大约100万前苏联的犹太人在移民以色列时深深怀疑宗教，至今仍是如此。他们的孩子有不少人根据犹太律法不能算是犹太人（因为母亲不是犹太人），但这些人在服役时利用军队提供的机会皈依了犹太教。

俄罗斯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同样在政治上倾向于右翼立场，但俄罗斯犹太人不像东方犹太人那样本能地坚持宗教传统。特拉维夫仍然是高度世俗的城市，和以色列大部分地方截然不同，以至于它有时被称为“特拉维夫国”。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多个以色列，宗教在每一个以色列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即便存在地区差异，人们还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感受到一些变化：以色列社会越来越接受被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抛弃的犹太传统；与前几代人不同，新一代以色列人开始注重自己的精神需求。

建国后不到五十年，建国元勋们摈弃的宗教传统正在重新返回以色列生活的核心。以色列——尤其是建国之初形成的意识形态——正在发生巨变。这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变化是东方犹太人在社会、文化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东方犹太人对待犹太教的方式向来不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那样观念僵硬，现在世俗犹太人开始受东方犹太人世界观的影响。东方犹太人比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更“佩服”拉比，但不会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那样“顺从”拉比。以色列一位著名哲学家指出，对东方犹太人而言，犹太人和犹太传统的关系与其说体现为“顺服”（obedience，这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传统所强调的核心），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为“忠诚”（loyalty）。[8]东方犹太人认为，即使不严格遵守全套犹太教律法，也可以成为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这种对待宗教的方式，就有可能让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亲近犹太传

统，对犹太传统心生尊敬和忠诚，而不是害怕成为“宗教人士”，许多从小在世俗世界成长起来的以色列人仍然很反感“宗教人士”这个标签。

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人已经厌倦了历史的重负，不愿将自己的生活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审视。早在1943年，哈伊姆·哈扎兹就在短篇小说《演说》中表达了他对犹太历史的否定。几十年后，这种观点在以色列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另一方面，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忘却历史，也没有抛弃自己的民族记忆。考古学深受全国人民喜爱，包括伊加尔·雅丁在内的考古学家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看看以色列街道的名称，就能发现民族记忆对以色列人而言有多么神圣。在以色列，找不到百老汇大街或九十六号大街，所有街道的名字都和这些有关：圣经、《塔木德》中的人名，犹太历史上的名人，圣经时代的地名或花名（这种花一定只存在于以色列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名字，犹太历史和以色列历史上的重要日子等。

但是，经过两三代人之后，现在的以色列人不再像前辈那样希望在历史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激情在他们身上逐渐淡去。取代拿单·奥尔特曼（他于1970年去世；1934年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去世后，拿单·奥尔特曼成为他的接班人）成为以色列头号诗人的耶胡达·阿米亥，经常说自己希望摆脱历史和民族叙事的负担。在他最著名的诗歌《游客》中，主人公拿着两个沉重的篮子，碰到一群跟着导游的游客。导游指着他对游客说：“在那人脑袋的右边，有座罗马时期的拱门。看，就在他脑袋的右边。”

但这个人，这个活生生的人难道就没有古老的石头重要？主人公（也就是阿米亥）说道：“若要实现救赎，导游应该对他们说：‘你们看到那个罗马时期的拱门了吗？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拱门附近，左下方一点，坐着个男人，他刚为家人买了水果和蔬菜。’”[9]

以色列人在寻找新的救赎方式，这种救赎并不来自战场上的勇气，也不来自强烈的意识形态热情，而是来自简单的、人性的生活。很多以色列人正在从几千年来塑造犹太民族的宗教经典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救赎。

以色列人重新开始探索生活意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已经意识到短期内根本看不到和平的希望。赎罪日战争后，以色列人从“构想”心态中走了出来。以色列著名歌手叶霍拉姆·加翁（Yehoram　Gaon）在一首歌的副歌部分唱道：“我向你保证，我的小姑娘，这将是最后一场战争。”然而，2000年底，随着第二次因提法达的爆发，没有以色列人再

相信存在“最后一场战争”。这场冲突就算不会永存，也会持续很长时间。赫茨尔在《新故土》中描绘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犹太国友好相处的美好画面，觉得繁荣的犹太国受所有人欢迎，现在看来这实在太幼稚了。当以色列人在追求长久和平的事业上不再有任何激情，他们自然会把注意力投向别处。

虽然有些以色列人越来越对自身的宗教根源感兴趣，但就在这时，以色列社会中许多人也开始担心犹太国的其他宗教现象。拉比总署成立和发展于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如今人们对这一机构越来越不满。随着哈瑞迪人日益迈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他们能够确保在拉比总署担任大拉比的人要么来自极端正统教派，要么立场与极端正统教派非常接近。进入21世纪后，有的大拉比因滥用资金而遭起诉，有的大拉比甚至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他们反对现代性，拒绝接受改变，排斥和嘲讽一切非正统形式的犹太教。由于大多数生活在海外的犹太人不是正统派教徒，这些以色列大拉比还疏远了大量流散地犹太人。2016年，一位正统派的拉比撰文指出，拉比总署的处境堪忧，文章引用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1%的以色列人对拉比总署不满，65%的人主张干脆废除这一机构。[10]

哈瑞迪世界虽然内部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他们让犹太人生存下去的策略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各个派别存在根本矛盾。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消除流散犹太人的无所作为、让犹太人自己掌握历史为己任，哈瑞迪世界则认为犹太生活只有在流散地才能达到最纯粹的状态。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创造新犹太人，哈瑞迪人则欣赏“老”犹太人，视之为最“正宗”的犹太人，他们希望恢复宗教生活的中心地位，哪怕这意味着逼迫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以色列人就范。犹太复国主义认为犹太人强大起来就可以平等地与非犹太世界交往，哈瑞迪世界则对外邦人世界充满怀疑和恐惧，只愿独善其身，同那个外在世界接触得越少越好。

1963年，本－古里安已经意识到免除哈瑞迪学生服兵役是个错误的决定。他在给当时总理艾希科尔的信中写道：“我免除了犹太宗教学生的兵役。当时他们人少，但现在人数越来越多。如果这些人不受控制，将影响到国家的权威。”[11]

本－古里安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他犯下的这个错误有多么严重，受到威胁的绝不仅是国家的权威。2014年，哈瑞迪人占到以色列人口总数的15%，这一比例还在上升。平均每个哈瑞迪女性会生6.2个孩子，而其他

犹太人只生2.4个孩子。[12]大多数哈瑞迪男孩在14岁时就不再接受世俗教育，他们难以适应就业市场，对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2010年，时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广受爱戴的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提出警告，如果不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以色列的哈瑞迪人口将让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无法持续”[13]。

有意思的是，虽然以色列人深切担心哈瑞迪人对民主制度（许多哈瑞迪人偏爱神权统治或者非犹太人统治）、世俗民权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他们也被哈瑞迪虔诚的宗教生活所吸引。这一点也在流行文化中得以体现。一部关于哈瑞迪人的电视剧风靡全国，每播出一集都会在社交网络上引发热议。这部电视剧名为《谢迪塞尔》（*Shtisel*），讲述了同名的哈瑞迪家庭的故事。几十年来，世俗犹太人对哈瑞迪人的生活没有兴趣，甚至感到厌恶。《谢迪塞尔》用关爱和理解的视角描绘了哈瑞迪人的生活方式，以色列普通大众虽然对此还是抗拒，但觉得它也有迷人之处。一位编剧指出：“这是第一部展现哈瑞迪人如何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子孙的电视作品。”[14]许多特拉维夫人在看过这部电视剧后，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炫耀从中学到的几句意第绪语。

哈瑞迪人和其他以色列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仍未结束，但妨碍他们沟通的壁垒正在破裂。以色列人在许多不久之前还不可想象的地方寻求生活的意义。

不管哈瑞迪人可能会给以色列民主制度和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什么挑战，犹太国还有更为极端的宗教组织。《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几十年，一群民族主义极端分子来到约旦河西岸（即以色列人常说的“犹地亚和撒玛利亚”，这是圣经时期的称呼）建立定居点。这些所谓的“山顶青年”受到信仰者集团世界观的影响，但他们认为即使是信仰者集团中的核心人员也非常无所作为，对国家和政府太过敬重。他们的目的不仅是要确保犹太人对“整个以色列地”的主权，还希望建立一个以犹太律法为法律的君主国。在他们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太年轻，根本不能成为犹太民族宏伟叙事的一部分。该组织一位成员对采访者说：“我不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要寻找“更接近民族根源的东西”[15]。哪怕是泽夫·雅博廷斯基等人强硬的论调也不能让这些年轻人满意。他们在寻找更激烈的理论武装自己。这就是耶沙亚胡·雷博维茨所预言的如果以色列不撤出约旦河西岸将会发生的可怕事情。

他们在伊扎克·金斯博格拉比那里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理论。伊扎克·

金斯博格拉比在《蒙福的男人》（*Barukh Ha-Gever*）一书中为巴鲁克·戈登斯坦的行为辩解：1994年，正是戈登斯坦的袭击导致希伯伦2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25人受伤。这本书的书名是个双关语，既可以理解为“蒙福的男人”也可以理解为“巴鲁克是个男人”，这也成为后犹太复国主义时代倾向于使用暴力的“山顶青年”的口号。

金斯博格的两位崇拜者在2009年合著了《国王的律法》（*Torat Ha-Melekh*）一书，书中最臭名昭著（和最恶心）的观点是杀害巴勒斯坦儿童是合法的，“因为他们长大后会伤害我们”[16]。该书还认为圣经中“不可杀人”的诫命说的是不可杀犹太人。这本书的语调和内容让一些犹太团体感到震惊，他们向以色列最高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禁止发行此书，并指控两名作者犯有煽动罪。[17]但以色列一直保护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最高法院认为这本书虽然具有煽动性，但并没有明确召唤人们采取某种行动，因此无法禁。后来几届政府就像无法控制哈瑞迪人权力变大一样，也无法遏制这种影响虽小但极丑陋的现象。没有一个杰出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曾预料到，重新赋予犹太人力量的复国主义思想会孕育出如此丑恶、危险和具有种族偏见的孽枝。这股力量不管有多弱小，以色列都得直面。

尽管这些发展令人担忧，但总体而言，犹太教在犹太国的发展是正派的、生机勃勃的、呈现复兴之势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过去120年、以色列建国将近70年后，阿哈德·哈姆的梦想基本实现。以色列在犹太文化上再次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创造力和探索力。1897年，阿哈德·哈姆做梦也想不到将来会出现一个人口800万、其中四分之三为犹太人的国家。在犹太复国主义早期，谁也想不到将有一个独立主权的世俗国家，其中开设了数千所库克拉比所梦想的犹太经学院；在这个国家的书店里摆满了书，而那些书大多用埃利泽·本 - 耶胡达复活的希伯来语写成。

赫茨尔的理想是让犹太人建国，阿哈德·哈姆的愿景是让以色列成为伟大的精神中心。两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的理想竟然交融在了一起。如果以色列不是一个民族 - 国家（nation-state），它无法成为它正在成为的犹太精神中心。没有赫茨尔的成功，阿哈德·哈姆的梦想也无法实现。

而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识到，只有当生活在以色列的新犹太人扎根于民族传统，赫茨尔建立的主权国家才有意义。没有阿哈德·哈姆，赫茨尔的以色列只是一个政治实体而已，这对以色列人而言是远远不够

的。

西奥多·赫茨尔和阿哈德·哈姆，这两人性格截然不同，对犹太人的未来也抱有完全对立的愿景。但《贝尔福宣言》过去一个世纪后，以色列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不再相信他们必须在这两种愿景中选择一种。只有让两种愿景结合起来同时实现，才能最终创造出精神丰富、情感细腻的新犹太人。

(1) 拉皮德的名单中还包括30年来以色列议会第一位美国议员。这涉及以色列政治中一个有趣而奇怪的现象，以色列的俄罗斯移民和北非移民都积极参与政治（如来自俄罗斯的拿单·夏兰斯基和阿维格多·利伯曼，来自北非的阿里耶·德里），但数千美国犹太移民基本不参政——除了果尔达·梅厄这位显著的例外。（http://www.jpost.com/Israel-News/Politics-And-Diplomacy/Dov-Lipman-to-head-WZO-department-437000.）

(2) “塔纳赫”（Tanach）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圣经”。“从塔纳赫到帕尔马赫”是一个押韵的术语，在以色列指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种决心，即他们决心忽视从圣经时期到伊休夫兴起（和哈加纳的突击部队“帕尔马赫”成立）之间形成的所有犹太传统。

(3) 根据圣经中利未婚的规定，死后无子嗣的男子的兄弟要娶他兄弟的寡妇为妻，这位寡妇必须嫁给已故丈夫的兄弟，以延续已故丈夫家里的香火；这对新夫妇婚后产下的长子算作已故兄弟的长子。这一制度旨在保证死者拥有子嗣。参见《申命记》（25：5—6）。

结语

《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世纪后的犹太“民族家园”

但我们还在这里……在这片海岸坚守，在这片海岸生活。无论怎样，我们就在这里。

——阿里·沙维特《我的应许之地》[1]

1917年《贝尔福宣言》中写道：“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一个世纪之后，“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在以色列地成为现实，在这里安家的犹太人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安家的犹太人都多。

通往建国的道路曲曲折折，建设国家的任务也并不容易。1929年，阿拉伯暴徒短短几天内就摧毁了在希伯伦生活了几个世纪的犹太社团，从那以后，该地区陷入漫长的冲突，至今看不到结束的希望。双方都有数千人死去。十多年后，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被纳粹分子及其帮凶谋杀。波兰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团，但那里90%的犹太人遭杀害。在纳粹大屠杀期间，在欧洲国家和北非、伊拉克、伊朗、也门等阿拉伯国家中，数百万犹太人流离失所。悲剧不仅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几十万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和1967年的冲突中也被迫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家园。

这个新建立的“民族家园”多次走到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后，大卫·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没有像其他以色列人那样走上大街欢庆，他们知道，战争已经爆发，而结果未明。这场战争牺牲掉新国家1%的犹太公民——这对任何社会都是沉重的打击。(1)20世纪50年代早期，随着数十万移民纷纷在以色列靠岸，食品和住房资源严重短缺，国家濒于崩溃。1967年，纳赛尔向阿拉伯世界承诺，将屠杀犹太人，以色列在备战过程中挖了数千个坟墓，谁也不知道犹太国能否逃过此劫。1973年，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出现严重误判，埃及大军渡过苏伊士运河，叙利亚坦克随时可能突破加利利地区。当萨达姆·侯赛因修建核设施时，以色列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将其摧

毁。除此以外，战争和因提法达、经济抵制和恐怖主义、大量移民的吸收和内部社会不平等问题，都让以色列接受了严峻考验，可以说，每一次考验都威胁到新成立的犹太国能否生存。

然而，以色列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欣欣向荣。最早汇集在这片土地的定居者势单力薄，只能靠海外慈善家的资助生活，但现在他们发展为一个拥有800万人口的现代国家，其中600万为犹太人。在以色列迎来第68个独立日之际，以色列人口已是1948年人口的10倍，[2]单单这一数字就能够说明以色列取得的成就。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实现了复兴。荣获普利策奖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评论说，在三千年前就存在的诸民族中，只有犹太人还生活在当时的土地上，说着当时的语言，奉守当时的宗教。[3]可以说，犹太民族回归先祖之地，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故事。

是什么造就了这份坚毅和决心？为什么犹太人成功了而其他许多民族失败了？这其中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就像果尔达·梅厄所言，在于“犹太人拥有一件秘密武器：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4]。

以色列建国的故事在许多方面同犹太民族重生的故事一样伟大。这个国家既古老又现代，既扎根于历史又决心开辟新径。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默精辟地总结了犹太人在以色列取得的成就：“如果某个地方在赎罪日陷于停顿，只需要让一群犹太人去那儿，让他们说圣经时代的语言，按犹太（阴）历安排作息，用先祖时代的石头建造城市，创造无与伦比的希伯来语诗歌和文学以及犹太学术和学问——这样，你就有了延续性。”[5]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向犹太人许下了各种承诺，有的实现了，有的却没有。

在《犹太国》中，西奥多·赫茨尔断言，一旦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国家，欧洲的反犹主义就会消亡。很不幸，事实证明这一判断过于天真。如今，欧洲的反犹主义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法国犹太人正在逃离欧洲。犹太人警觉地发现，欧洲极左翼和右翼法西斯阵营中都有反犹主义政党。

然而，赫茨尔不曾料到，犹太国已对流散地犹太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犹太教的内涵远远不只是以色列，但最能触动流散地犹太人神经的还是以色列。只有以色列才能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大多数犹太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属于私人领域，而且不同教派

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太大，以至于不同犹太社团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但是，一旦流散地犹太人思考和辩论犹太国所发生的事，他们就会摒弃分歧走到一起，对犹太教的讨论就会离开私人领域而步入公共领域。雅各·布劳斯坦没有料到，流散地犹太人虽然同意他关于美国犹太人不处在流散状态的观点，但在所有犹太问题中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以色列。所以，赫茨尔并不是全错了，犹太国确实已经改变了流散地的犹太生活。

在《新故土》中，赫茨尔还描绘了回到先祖之地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和平相处的美好愿景。这部分成为现实。虽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但以色列阿拉伯人在职业、学术、社会和经济等领域不断取得进步，他们成为外科医生、工程师、律师和最高法院成员。贝都因女性在以色列大学学习医学。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地位问题很复杂，而犹太国同生活在以色列之外的阿拉伯人的关系更加复杂。以色列和邻国之间的冲突仍在持续，短期内难以找到解决方法。国际社会和以色列人都失去了终止这场冲突的信心。以色列人相信，对约旦河西岸土地的占领已证明耶沙亚胡·雷博维茨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担心这种占领已把以色列人变成他们不想成为的人。而与此同时，许多以色列人不知道现阶段还能有什么其他替代方案。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希望结束占领，但调查结果同时也显示，基于现状，大多数以色列人不愿意承受放弃土地带来的安全风险。占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所有问题仍然是当今以色列人的心头之痛。

犹太复国主义梦想在其他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远远超出了犹太民族的想象。埃利泽·本－耶胡达希望犹太人能重新说希伯来语，但他没想到希伯来语会成为几百万人的母语，没想到希伯来语作家能成为举世闻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也没有想到以色列书店会摆满用一个半世纪前几乎无人知晓的语言写成的书。

以色列《独立宣言》中提到希伯来语绝非偶然，这门古老语言的复活象征着传统犹太生活和犹太民族在犹太国的复兴，这种成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复制。

A.D.戈登敦促犹太人回到这片土地劳作，他认为只有当犹太人用先祖之家的泥土弄脏自己，犹太民族才能复兴。他们照做了。即使在以色列成为高科技国家后，以色列人骨子里仍然是农民。以色列的水利灌溉技术全球领先。徒步在以色列地旅行仍然是男女老少热衷的运动。每逢节假日，以色列的国家公园往往人山人海。在过去100年，以色列人在

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5亿棵树，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在21世纪初的森林面积超过100年前，以色列就是其中之一。[6]以色列人可能不像戈登预想的那样直接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不久前大多数犹太人还无法进入的土地。

比亚利克、诺尔道和雅博廷斯基都希望犹太人不再成为受害者，这一点以色列也做到了。今天的以色列仍在同恐怖主义作战，仍然担心伊朗获得核武器，但在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里，以色列击退了敌人所有的进攻，还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之一。今天的以色列人不再是比亚利克在《屠杀之城》中谴责的犹太人。

武力使用向来是复杂的道德难题，特别是对故意设在平民中的武装设施使用武力。以色列没有逃避这些难题，虽然有时会因此陷入被动。这方面尽管存在争议，但肯普上校指出了关键一点：以色列国防军比世界上其他军队采取了更多措施来避免平民伤亡。[7]大多数以色列人虽然对这场冲突忧心忡忡，但仍为国防军对人道主义原则的坚持感到自豪。

阿哈德·哈姆在以色列地精神再生的梦想也实现了。以色列人正在重新拥抱犹太传统，阅读民族经典文本，这会让当年的大卫·本 - 古里安感到震惊。在以色列，作家和诗人的名字家喻户晓，许多重要社会活动家本身是著名小说家，诗人和作家的头像还印在纸币上，而且，每当以色列人希望有人向当权者说真话，他们常常去找作家。

赫茨尔不仅向《新故土》的读者承诺了一个犹太人的避难所，还承诺了一个能发展和繁荣的犹太国。这个梦想也得以实现。这个小国面积差不多和新泽西州相同，人口和洛杉矶相近，却拥有全球领先的医疗技术。在2015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希伯来大学排第67位，以色列理工学院（相当于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学院）排第77位，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排在第101—105位之间，特拉维夫大学排在第151—200位之间。[8](2)犹太传统一直倚重教育，尚未建国时，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就有人提议在伊休夫建立大学。建国后，长期以来对教育和学术的重视，让以色列人取得了非凡成就，在科学、经济和文学等领域获得多个诺贝尔奖。

赫茨尔的愿景中还提到，犹太国将向全世界分享其进步和科技成果，这一点以色列也做到了。1977年梅纳赫姆·贝京上台后，第一个举措就是下令营救几十艘载有越南人的船只，这些船淡水耗尽，无助地漂浮在公海上，其他国家的船都无情地从旁边驶过。以色列接收了他们，让他们加入了以色列国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对以色列并不友好，但他后

来在评论贝京的决定时说道："这是充满同情和体恤的行为，贝京及其政府认识到家园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对于那些以相同方式表达个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这也典型地体现了以色列人自身的奋斗历史。"[9]

贝京的决定的确扎根于犹太人的历史，就像赫茨尔预言过的那样。在回应卡特时，贝京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受迫害，遭羞辱，最终肉体被毁灭。所以，我当选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以色列地为这些人提供庇护，这是自然而然的事。"[10]在后来的岁月里，以色列参加了多次自然灾害的人道主义救援，且常常是在当地最早搭建起最大急救医院的国家。

赫茨尔创办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遵循民主原则，以色列继承了这一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了大约100个国家（大多因帝国解体而成立），以色列是其中为数不多的选择了民主道路并不间断坚持到今天的国家之一。

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以色列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是民主国家中唯一一个从建国伊始女性就可以服兵役的国家。以色列还是最早选举产生女性总理和女性最高法院院长的民主国家之一。

以色列人仍然有许多事情要担心，也知道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需改进，但大多数人自豪地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不仅如此，不少非以色列人也这样看。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是位什叶派穆斯林，1945年出生于黎巴嫩南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地区。1991年他回忆说：

> 我生活的村庄坐落在高高的山脊上，每天晚上能看到以色列村庄梅图拉的探照灯，那道灯光让童年的我感到非常好奇。祖父说，那道灯光来自犹太人的土地。……在靠近边境那空旷而荒凉的郊外，可以看见犹太人的土地，甚至能听见铁丝网后他们的交谈声。[11]

那些声音无法满足阿贾米的好奇心，多年后他亲身来到犹太国。在总结自己所见所闻时，他写道：

> 在一片荒凉而狭小的土地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起一个持久的国家。它有军事实力，但并不穷兵黩武。它接收了一批批难民，

> 再把他们塑造成公民。它为信仰保留了空间，但仍然是个世俗国家。面对长期围堵，它仍然坚持民主精神。阿拉伯人本可以从这种经历中学到东西，但他们因恐惧望而却步。[12]

对于犹太国所取得的成就，很难找到比这更精炼的总结了。

未来会怎样？以色列人明白他们没有答案。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

1947年，拿单·奥尔特曼写了《夏日争执》一诗，其中用不同的女人来刻画不同类型的以色列人。谁会成为以色列人？他们会是怎样的人？又拥有怎样的未来？

> 从西顿到非利士，那里的城市会如何？
>
> 暴风会给它们带来雷雨吗？嘘！别争了！
>
> 未来的女人正在房里穿衣打扮，
>
> 谁都不许通过锁眼偷看！[13]

在以色列生活，就意味着没有可以窥视未来的锁眼。虽然以色列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过去的经历多少能提供一些启示。《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世纪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取得了累累硕果。

不管处境何其艰难，伊休夫和后来的犹太国总能出乎意料地获取胜利。

大多数以色列人相信，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们和他们仍然年轻的国家都能设法克服。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以色列人最根本的责任是确保以色列繁荣。1948年他们经不起失败，现在他们同样经不起失败。风险太大了，以色列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以色列体现了一场仍在展开的丰富对话，体现了一个业已实现的宏大观念。一旦失败，他们不仅会失去自己与父辈祖辈携手创造和培育的奇迹般的国家，更将失去成立犹太国所要拯救的犹太民族的未来。

(1) 在今天的美国，1%的数字意味着320万美国人在战争中死去。

(2)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阿拉伯世界的产油国根本不缺建立一流大学的资金，但伊斯兰国家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前250名。在这份排名中，这些国家中排名最靠前的大学

是排在第266位的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石油与矿业大学，接下来是排在第350位的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

致谢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帮助和鼓励，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以色列第一所博雅学院沙勒姆学院是理想的工作场所。正是在学院许多教职员工的帮助下，本书才得以完成。感谢丹尼尔·波利萨尔、塞思·戈尔茨坦和伊多·赫维罗尼，在我们一起建立这所学院的过程中能够理解我抽出大量时间写书。

我很难想到有谁能像丹一样支持同事的工作。丹仔细阅读了本书书稿，修改了许多细节，就本书的语调和涵盖内容提出了宝贵建议，纠正了多处错误。他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时间和从一开始给予我的鼓励令我感动。丹知识面广，能力强，还乐于助人，这也是沙勒姆学院的人都敬重他的原因。

感谢在我写书期间担任沙勒姆学院董事会主席的尤迪·列维、大卫·梅塞尔和亚伊尔·沙米尔以及董事会成员，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理解和鼓励。

没有几位朋友无私的资助，本书也无法写成。保罗·E.辛格基金会的特里·卡塞尔和保罗·辛格最早开始支持这一项目，他们的慷慨解囊让这本书得以出版。雅各布森家族基金会的乔纳森·雅各布森和乔安娜·雅各布森也给予了我一笔资助。罗伯特·赫尔特拉比和弗吉尼亚·拜耳资助过我之前出版的书，他们也同意负担本书的费用。感谢他们的友情资助。几年前，我有幸成为沙勒姆学院的科勒特研究员，感谢科勒特基金会的资助和安妮塔·弗里德曼和杰弗里·法伯对我的赏识。

许多朋友、同事、学者和家人帮我搜索文献，并提供了我本来无法找到的材料。在这方面，我要感谢丽娜·巴丁、梅纳赫姆·本·萨森、马克·布雷特勒、塞尔吉奥·德拉佩戈拉、埃琳娜·戈迪斯、巴里·莱文菲尔德、萨曼莎·马戈利斯、大卫·马特洛、马修·米勒、本尼·莫里斯、法尼娅·奥兹·萨尔茨伯格、利·萨纳、安妮塔·沙皮拉、阿里埃勒·谢特里特、约西·西格尔、肯·斯特恩、纳瓦·温克勒、雅各·赖特。大卫·布鲁默尔也在团队中工作了几个月时间，感谢他为这项研究做出的贡献。阿里·霍夫曼在哈佛大学读博期间，抽出了几乎一个夏天的时间研读书稿，感谢他的建议和意

见。感谢以色列国家档案馆首席档案员雅科夫·罗佐维克和犹太复国主义中央档案馆的盖伊·贾摩为我提供的帮助。

在写作过程中，以色列几位思想领袖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们深刻的见解丰富了本书内容。在这方面，我要感谢露丝·卡尔德龙、米卡·古德曼、丹尼尔·哈特曼、阿维·卡茨曼、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和索尔·辛格。

一些家人和朋友也读过后期书稿，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大大提高了终稿的质量。马丁·克雷默和塞思·戈尔茨坦分别在不同阶段读到书稿，并对书稿仔细标注，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部分朋友和同事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我要感谢丹尼尔·邦纳、约拿单·戈迪斯、约西·克莱因·哈勒维、乔·雅各布森、特里·卡塞尔、塞思·卡拉曼、杰·莱夫科维茨、杰弗里·斯沃茨、伊兰·特洛恩和丽萨·沃勒克。卡洛琳·赫塞尔是犹太图书业的传奇人物，多年来她是我的导师和好友，总能给我带来很多写作的灵感。她也多次阅读本书书稿，感谢她对此书提出的诸多建议和长期以来对我的鼓励。

上述读者有些人很不赞同本书的语调。虽然有的人认为本书立场没什么问题，但有的人认为我在一些地方对以色列的批评过于严厉，也有人认为我在某些应该更严厉批判的地方对以色列过于“宽容”。这类书都有这种问题，研究以色列的方法或语调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本书最终反映的是我对以色列的看法和我对这个复杂国家的解读。

但我还是在上述读者和朋友建议的基础上改进了本书语调，使之更细致入微。感谢他们的付出、智慧和诚恳。当然，本书在语调和内容上还存在的不足或错误，都由我负责。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同出版经纪人理查德·派恩的合作关系，让我心存感激的，不仅是他的专业精神和我俩的友谊，还包括二十多年来他为我提供的睿智建议。感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旗下Ecco出版社整个团队出色完成这项工作。感谢我的编辑艾玛·加纳斯基和副发行人米丽亚姆·帕克在编辑文稿、图片和地图中付出的辛劳。本书的地图实用而美观，这都是乔·勒莫尼耶的功劳。感谢高级设计经理Suet Chong对本书封面的设计和对地图与图片的排版。感谢劳里·麦基对本书细心的编排。

许多年前，我和艾莉舍瓦在科罗拉多州山顶有幸结识了大卫·柴科夫和艾伦·柴科夫夫妇。此后我们成为家人一样亲近的朋友。我们好几个夏天来到他们家度假，暂时逃离在以色列生活的压力。本书开篇就是在他

们家湖边优美的房子里写的，他们让我感觉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大卫的母亲巴伊拉是多伦多著名的教育家，特别热爱以色列，我们在那几个夏天聊天时，她经常会谈起对以色列早年岁月的怀念。我在本书扉页提到她的名字，以表达我对整个柴科夫家族的感谢。

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刚到耶路撒冷时平夏斯·罗佐维克和桑迪·罗佐维克对我们家的帮助。不管多少年过去，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他们家的感激之情。

书中希伯来圣经的译文参考的是《塔纳赫：基于希伯来语文本的犹太出版协会新译本》，但我经常对引文有所修改。

从这个项目一开始，我便有幸拥有两位出色的研究助理，蕾切尔·格林斯潘和阿莉·梅尔·费厄斯坦。在写作本书的第二年，蕾切尔成为主要研究员。她到耶路撒冷市政府工作后，阿莉接手。为了完成本书，她连续工作了好几个月，完成了大量工作。她们俩都勤劳而聪明，富有责任感，写作出色。

蕾切尔和阿莉协助拟定了本书结构，做了大量编辑工作，包括制作参考文献、注释，获取图片使用权等。我们三人有许多共同点，我们都在美国东海岸长大和接受教育，然后都选择移民以色列。但我们也存在很多差异，我们的政治观点和对宗教的亲近程度不尽相同，这决定了我们对书中提到的事件和时代拥有不同的立场。在将近两年时间里，我们在一起切磋，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并不断锤炼对方的观点。本书每一页都能体现蕾切尔和阿莉的智慧和道德影响，我不但对她们的贡献表示感激，也很怀念和她们一起工作的快乐时光。

写作本书期间，我的家庭悲欣交集。开始不久，我父亲就病倒了，几个月后离开人世。在这悲痛的一年，艾莉舍瓦和孩子们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感谢他们对我和我父亲不离不弃的爱和照顾。多年来，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塔利亚、阿维夏伊、阿维和米卡）明白如何按照自己的原则和信仰生活，艾莉舍瓦下定决心带领全家来以色列生活。我相信孩子们已经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为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而感到幸福。后来艾莉舍瓦又开始负责照顾我的母亲，再次为孩子们树立了无私奉献的榜样。

艾莉舍瓦对以色列及其历史非常熟悉，她的许多见解充实了本书内容。她还是才华横溢的编辑，注重细节和文体，及时纠正了书中不少错

误。在许多人帮我审稿后，她还能提出很多明智的建议，让书中无数章节得以改进。对于她所做的一切，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她的爱同样如此。

父亲离开人世前一周，他有幸看到自己第一个重孙女的出生，本书就是献给她的。写书的过程也是艾拉探索这个陌生世界的过程。我时常告诉自己，她是我们家族多个世纪来第一个出生在以色列地的孩子，每当念及此，我就感到非常开心。她虽然年纪很小，但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我在扉页上引用圣经经文（《撒迦利亚书》2：14）作为题词献给她，在此我将这段经文改写如下以祝福她：愿我们家第一位“锡安的女儿”一生享有巨大的欢乐、宏大的梦想、深切的满足，愿她一生热爱自己的民族。

耶路撒冷

2016年5月

犹太历5776年以珥月5日，正值第68个以色列独立日

附录1
人物简介

亚伦松家庭（亚伦和萨拉）：亚伦和萨拉兄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了为英国提供情报的“尼里”间谍组织。奥斯曼帝国最终发现了这个组织，监禁、折磨和杀害了很多成员。亚伦和萨拉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心中的英雄和榜样。

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布·马赞）：马哈茂德·阿巴斯曾被亚西尔·阿拉法特任命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第一任总理，并在《奥斯陆协议》的谈判中担任巴勒斯坦方谈判代表。阿拉法特死后，他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阿哈德·哈姆（阿谢尔·兹维·金兹伯格）：著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阿哈德·哈姆反对赫茨尔的建国方案，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精神中心。

阿萨德，哈菲兹：1971—2000年担任叙利亚总统。1973年和安瓦尔·萨达特一起对以色列发动赎罪日战争，1996年仍拒绝同以色列实现和平。

侯赛因，阿卜杜拉一世：1946—1951年担任外约旦（1949年更名为约旦）国王。相对于其他阿拉伯领导人，阿卜杜拉国王同伊休夫和后来以色列领导人保持了较好的关系。1951年因为考虑同以色列实现和平而被暗杀。

侯赛尼，哈吉·阿明：1921—1937年担任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作为阿拉伯最高委员会领导人，他千方百计阻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限制犹太人建立定居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帮助纳粹德国在伊斯兰世界进行舆论宣传。

阿隆，伊加尔：帕尔马赫创立者、以色列政治家和以色列国防军将军。阿隆曾提出计划，将1967年占领的土地部分吞并、部分归还约旦，但未能实施。

阿拉法特，亚西尔：阿拉法特20世纪50年代成立法塔赫，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被认为是巴勒斯坦人的政治领袖。他在以色列

和世界其他地方策划过多起武装袭击，虽然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但后来又拒绝同以色列实现和平。

阿里埃勒，梅厄：1967年参与夺取耶路撒冷老城行动的一名国防军战士，后来成为以色列著名音乐家，他在歌曲中表达了以色列人对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反感。他的成名作是那首在拿俄米·舍莫尔《金色的耶路撒冷》基础上改编的《钢铁的耶路撒冷》。

阿罗佐罗夫，哈伊姆：曾担任犹太代办处政治局局长。阿罗佐罗夫发起了《哈瓦拉协议》（《转移协议》），帮助犹太人将资金转移到巴勒斯坦，同时为德国商品开拓巴勒斯坦市场。阿罗佐罗夫同纳粹分子的谈判让伊休夫许多人非常愤怒。1933年他被暗杀。

贝尔福，亚瑟：英国外交大臣。在任期间，贝尔福在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信中宣布："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建立犹太国的观念第一次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巴尔·科赫巴（西蒙·巴尔·科赫巴）：罗马人毁灭第二圣殿62年后，巴尔·科赫巴于公元132年对罗马皇帝发动起义。135年，巴尔·科赫巴的军队被强大的罗马军队击溃。巴尔·科赫巴成为犹太人反抗外来侵略的象征。

巴拉克，埃胡德：前国防军将军，1999—2001年担任以色列总理。2000年他将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并同克林顿、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举行和平谈判。

贝京，梅纳赫姆：对英国人起义期间担任伊尔贡领导人，1948—1977年担任反对党领导人，之后被选为以色列总理。他执政期间以色列同埃及实现了和平，轰炸了伊拉克奥斯拉克核电厂，还入侵了黎巴嫩。

本-古里安，大卫（大卫·格鲁恩）：1906年移民巴勒斯坦后，本-古里安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最终成为伊休夫最高领导人。1948年他宣布以色列独立，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本-耶胡达，埃利泽（埃利泽·帕尔曼）：希伯来语之父。本-耶胡达认为希伯来语的复活是犹太文化在以色列地复兴的前提。

别尔季切夫斯基，米嘉·约瑟夫：俄国犹太学者。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对犹太教的反抗。他的名言是："我们要么做最后一批犹太人，要么做第一批希伯来人。"

伯纳多特，福克：瑞典外交官。独立战争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委派

他就停火事宜进行调停，后来被犹太地下武装组织暗杀。

比亚利克，哈伊姆·纳赫曼：世界著名犹太诗人，他通过诗歌表达了以色列人回归故土的渴望，成为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声音。1934年，数千人在特拉维夫参加了他的葬礼。

布劳斯坦，雅各：美国犹太委员会主席。布劳斯坦身上体现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矛盾态度。他认为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并不处在流散状态，以色列不能将自己当作犹太生活的中心，因此同本-古里安存在严重的观念冲突。

布劳斯坦，拉亥尔·塞拉（女诗人拉亥尔）：移民巴勒斯坦后，拉亥尔加入了德加尼亚基布兹，患上肺结核后被赶出基布兹。一个世纪后她创作的诗歌仍然深受喜爱。

布伦纳，约瑟夫·哈伊姆：第二次阿利亚时期最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布伦纳的创作关注早期伊休夫生活中的斗争。他在雅法的阿拉伯人暴乱中被杀。

居鲁士，波斯国王：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战胜巴比伦后，居鲁士国王允许当时流亡异地的犹太人回归故土，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达尔维什，马哈茂德：巴勒斯坦诗人，写了许多关于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的作品，表达了巴勒斯坦人对回归家园的渴望。

达扬，摩西：哈加纳成员，1953年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任以色列国防军总指挥，赎罪日战争期间任国防部部长。

德里，阿里耶：以色列东方犹太人中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作为沙斯党领导人之一，德里成为以色列政坛的风云人物，但后来因为贪污丑闻而受到冲击。

埃班，阿巴：以色列外交官和政治家。埃班曾在多个职位上工作，包括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1967年担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期间，埃班在战争爆发前不懈地为以色列争取国际支持。

艾希曼，阿道夫：策划万湖会议和提出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政府领导人之一。1960年在阿根廷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逮捕，后来被定罪。他是以色列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

埃拉扎尔，大卫（达多）：以色列高级军事将领。在六日战争中，埃拉扎尔对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有过军功。赎罪日战争期间担任以色列

国防军总参谋长，根据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调查报告，埃拉扎尔在战争中犯下多项过失，因此被剥夺总参谋长职位。

艾希科尔，列维：1963—1969年担任以色列第三任总理，1969年去世。六日战争前许多以色列人对他失去信心，他成为第一位建立全国“团结政府”的总理。

杰马耶勒，巴希尔：黎巴嫩基督徒长枪党组织的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一度希望，杰马耶勒的武装力量在以色列的帮助下能控制黎巴嫩，结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南部的统治地位。杰马耶勒被杀后，贝京的计划落空。

戈登斯坦，巴鲁克：从美国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教徒。1994年2月，他在希伯伦的先祖墓地杀害了29名正在做祷告的巴勒斯坦人。大多数以色列人和世界犹太人厌恶他，但一小部分极端分子视他为英雄。

戈登，亚伦·大卫（A.D.戈登）：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戈登认为犹太人只有在土地上劳动才能实现救赎。这种思想对塑造新犹太人的形象影响巨大，这些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劳动，并构成基布兹运动的灵魂。

戈伦，什洛莫拉比：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国防军的拉比。国防军占领耶路撒冷老城后，戈伦手拿羊角号和《托拉》卷轴来到圣殿山。他后来成为以色列大拉比。尽管他精通犹太律法，并做出不少有勇气的裁决，但他在认可埃塞俄比亚移民的犹太人身份上拖拖拉拉。

古里，哈伊姆：以色列作家。古里用诗歌记录了以色列历史上许多关键事件，比如拉美德黑事件和六日战争。

格林伯格，乌里·茨维：伊休夫的重要诗人，雅博廷斯基修正派运动的追随者。

哈拿尼雅：名气不大的圣经时代的先知。哈拿尼雅预言，犹太人会提前得到救赎，而耶利米认为这种救赎会来得很迟。他的观点在那些否认犹太人应该忍受流散生活的犹太人那里很有市场。（参见耶利米）

赫茨尔，西奥多：犹太复国主义之父。《犹太国》一书出版后一举成名。一年后，他组织世界各地犹太人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掀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赫斯，摩西：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和作家。1862年在《罗马和耶路撒冷》中提出建立犹太国的想法。这本书和赫茨尔的《犹太国》非

常相似，但没有得到重视。

侯赛因，伊本·塔拉勒：约旦国王，1952—1999年在位。1967年侯赛因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但1973年他警告以色列可能会遭到阿拉伯国家进攻，并尽他最大可能不参与这场战争。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侯赛因还在伊扎克·拉宾的葬礼上发表了动人的悼词。

雅博廷斯基，泽夫（弗拉基米尔）：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创始人。雅博廷斯基认为，在建立和维持犹太国的过程中，必须敢于使用武力。他是以色列政治右翼的先驱，对梅纳赫姆·贝京影响很大。

耶利米：圣经中犹太人流散巴比伦时期的著名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太人将在外流散70年后回到故土。他劝告犹太人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参见哈拿尼雅）

卡迪沙伊，耶希埃尔：伊尔贡战士。卡迪沙伊是梅纳赫姆·贝京的密友和政治心腹。他是“阿尔塔莱纳”号上的乘客，但躲过了这次事件，没有受伤。

卡斯特纳，鲁道夫：大屠杀期间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救援委员会的领导人。1944年，他同德国人达成用卡车交换犹太人的协议。马尔基尔·格鲁恩瓦尔德声称他是“间接谋杀者”后，卡斯特纳起诉格鲁恩瓦尔德诽谤，但格鲁恩瓦尔德被判无罪，卡斯特纳受到公开羞辱。事后遭暗杀。

基辛格，亨利：美国外交家。1969—1975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1973—1977年担任国务卿。中东战争期间他为白宫建言献策，后来试图通过谈判实现中东和平。

库克，亚伯拉罕·以撒，拉比：犹太学者和犹太神秘主义教徒。库克拉比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支持巴勒斯坦的世俗开拓者的宗教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伊休夫的大拉比。

库克，兹维·耶胡达，拉比：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的儿子。他领导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入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的核心。他的意识形态是信仰者集团定居点运动的思想基石。

拉皮德，汤米：以色列记者、政治家和大屠杀幸存者。1999—2006年担任以色列议员。他还是知名作家和电视工作者，在政治上激烈反对极端正统教派的政党。

拉皮德，亚伊尔：汤米·拉皮德的儿子。亚伊尔也是记者和政治家，他成立了中间路线的未来党。

雷博维茨，耶沙亚胡：以色列信奉正统派的公共知识分子。雷博维茨极力主张撤离六日战争占领的土地，预言统治另一个民族会导致以色列的毁灭。

劳合·乔治，大卫：1916—1922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同情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支持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

玛普，亚伯拉罕：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1853年，玛普写了第一本希伯来语小说《锡安之恋》。这本畅销书的背景设在圣经时期的以色列地，包括大卫·本－古里安在内的很多人深受此书鼓舞。

梅厄，果尔达（果尔达·梅耶森）：犹太工人总工会政治部和犹太代办处政治部领导人。梅厄在担任议员期间曾出任劳工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1969年成为第一位女性总理，1974年辞职。

纳赛尔，迦玛尔·阿卜杜尔：1956—1970年去世期间担任埃及总统。作为泛阿拉伯主义领导人，纳赛尔试图团结阿拉伯人民消灭以色列。他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导致1956年西奈战役的爆发。1967年，他的挑衅引发六日战争。

内塔尼亚胡，本雅明：利库德集团领导人。1996—1999年担任总理，2009年再次当选总理。很多人认为他的政治思想受到雅博廷斯基和贝京的影响。

诺尔道，马克思：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政治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一，西奥多·赫茨尔的重要政治伙伴。他提出培养身强力壮的新犹太人。

奥尔默特，埃胡德：以色列政治家。2006—2009年，他取代沙龙担任以色列总理。本想继续推进沙龙的撤离政策，但因为丑闻下台。他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进监狱的总理。

奥兹，阿摩司：以色列著名小说家和以色列左翼人士代表人物。

佩雷斯，西蒙：以色列政治家和外交家。佩雷斯拥有多个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两度担任总理，2007—2014年担任以色列总统。他在以色列发展核武器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还参与了《奥斯陆协议》的谈判。

平斯克，列奥：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1882年写作《自我解放》一书，鼓励犹太人追求独立和建国。1882年，平斯克建立了“锡安热爱者”组织，这是最早出现的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欧洲组织之

一。

波拉特，哈南：六日战争期间的一名空降兵，参加了收复耶路撒冷老城的行动。波拉特还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与友人于1967年在古什埃齐翁建立了最早的定居点。

拉宾，伊扎克：以色列将军和政治家，曾参加过帕尔马赫和以色列国防军的战争，六日战争期间成为国防军的总参谋长。1974—1977年担任总理，1992年再次成为总理。拉宾执政期间同约旦实现了和平，签署了《奥斯陆协议》。1995年11月被刺杀。

罗斯柴尔德，埃德蒙男爵：人称“众所周知的捐助者”，早期伊休夫几乎靠他一个人的捐助得以维持。虽然他在巴勒斯坦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但许多新移民反感他，认为他干预开拓者的工作。

罗特伯格，罗伊：诸多被阿拉伯越境者杀害的以色列人之一。这些越境者叫作“费达因”（阿拉伯语中“自我牺牲者”的意思）。罗特伯格之所以留名，是因为摩西·达扬在他葬礼上的悼词，达扬在悼词中说以色列和邻国的冲突必将旷日长久、代价高昂。

萨达特，安瓦尔：埃及总统。1970年纳赛尔死后上台，1981年被刺杀。他1973年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但1978年同贝京签订和平协定。

西纳什，汉娜：以色列的民族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志愿成为英军空降兵，空降在南斯拉夫。被德国人逮捕入狱，惨遭折磨后被处决。

沙米尔，伊扎克：以色列政治家。曾担任莱希的领导人。1983—1984年、1986—1992年两次代表利库德集团担任总理。

夏兰斯基，拿单：全世界犹太人心目中的英雄和人权活动家。夏兰斯基曾因被诬陷为间谍而被苏联政府关押了9年，出狱后移民以色列，成为日益壮大的俄罗斯移民的政治代言人。

夏里特，摩西：1954—1955年担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理。

沙龙，阿里埃勒：以色列将军和政治家。沙龙几乎参加了以色列所有的重大战争，退伍后加入利库德集团。2001—2006年担任总理，在此期间成立前进党，并将以色列人从加沙撤离。

舍莫尔，拿俄米：深受以色列人喜爱的以色列音乐家和词作家。她最著名的两首歌分别是创作于六日战争两周前的《金色的耶路撒冷》和赎罪日战争后的《顺其自然》。

斯塔夫斯基，亚伯拉罕：贝塔尔成员。斯塔夫斯基是刺杀发起《转移协议》的哈伊姆·阿罗佐罗夫的凶手之一，他一开始被定罪，但后来被无罪释放。死于“阿尔塔莱纳”号事件。

斯特恩，亚伯拉罕：前伊尔贡成员。1940年，斯特恩离开伊尔贡，成立了自己的地下武装莱希。1942年，英国人在残忍的搜捕行动中将其杀害。

特伦佩尔多，约瑟夫：战争英雄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特伦佩尔多帮助组建了伊休夫最早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锡安骡马队。1920年，他在保卫特尔哈伊的战斗中牺牲。

魏茨曼，哈伊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和以色列第一任总统。他在《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希伯来大学的建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还成立了魏茨曼科学研究所。

雅丁，伊加尔：以色列考古学家、将军和政治家。独立战争期间他是哈加纳作战部部长，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第二任总参谋长。

雅维茨，泽夫：1887年移民巴勒斯坦后，雅维茨在这里出版了第一本现代希伯来语小说。因为同罗斯柴尔德男爵产生矛盾，他后来离开了巴勒斯坦。

伊扎尔，**S**（伊扎尔·斯米兰斯基）：以色列作家。在小说《赫贝赫泽》中，伊扎尔描写了1948年战争中以色列军队给巴勒斯坦人造成的伤害。此书被选入以色列中学教材，伊扎尔多次当选以色列议员。

约瑟，俄巴底亚，拉比：犹太律法方面的天才和受以色列东方犹太人欢迎的拉比。他在塞法迪犹太人大拉比的任期结束后成立了沙斯党，这是第一个代表东方犹太人利益的政党。

赞格威尔，伊斯雷尔：小说家、剧作家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他最早提出巴勒斯坦是“一块没有民族的土地，等待着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和赫茨尔一样，赞格威尔也认为犹太人从欧洲大量移民巴勒斯坦能够同时造福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

附录2
非英文术语释义

阿利亚（*aliyah*）：希伯来语动词“上升”的动名词形式，指移民以色列。在历史上用来指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潮，如第一次阿利亚或前苏联犹太人的阿利亚。

阿什肯纳兹（*Ashkenazi*）：指主要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在中东欧建立社团，形成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甚至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意第绪语。

比卢伊姆（*Biluim*）：比卢（*Bilu*）是希伯来语中“雅各之家，让我们上行”的简写，比卢伊姆是比卢的复数形式，指第一次阿利亚中移民巴勒斯坦的一群俄国学生。

布里特沙洛姆（*Brit Shalom*）：希伯来语，“和平契约”的意思。布里特沙洛姆是巴勒斯坦一群知识分子于1925年成立的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和平的组织。他们认为只要犹太人放弃追求民族主权就能实现和平。

康塞普奇亚（*conceptzia*）：希伯来语词汇，来自英文“构想”（conception）一词。专指在1967年六日战争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战无不胜的自大心态。

埃雷兹以色列（*Eretz Israel*）：希伯来语，“以色列地”的意思。

费达因（*Fedayeen*）：阿拉伯语，“自我牺牲者”的意思。一般指20世纪50年代攻击以色列的阿拉伯敢死队员。这些人自诩为自由战士，经常穿越约以和埃以边境，袭击以色列村庄和城镇。

费拉欣（*Fellahin*）：阿拉伯语，“农民”或“劳动者”的意思。

古什埃穆尼姆（*Gush Emunim*）：希伯来语，“信仰者集团”的意思。信仰者集团成立于1974年，致力于在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修建定居点。

哈瓦拉（*ha'avarah*）：希伯来语，“转移”的意思。指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和纳粹分子达成的《转移协议》，通过德国政府一系列复杂的安

排，该协议能够让德国犹太人将财产转移到巴勒斯坦。

哈加纳（*Haganah*）：希伯来语，“防御”的意思。哈加纳于1921年由伊休夫领导人建立，最初用于保护犹太农场和村庄，抵抗和防止阿拉伯人入侵。后来发展为以色列国防军。

哈拉哈（*Halakhah*）：“犹太教律法”的意思。

哈姆塔纳（*Hamtanah*）：希伯来语，“等待时期”的意思。专指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前的三周，在这期间，以色列领导人知道同阿拉伯邻国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国家做了最坏的打算，酒店被改为医院，停车场被修成公墓。

哈努卡（*Hanukkah*）：纪念公元前164年马卡比起义军赶走希腊人的犹太节日。这个节日持续8天，许多人会在节日期间点燃犹太教烛台。

哈瑞迪人（*Haredim*）：希伯来语，“颤抖者”的意思。指极端正统教派的犹太教徒。哈瑞迪人大多对犹太国持反对或矛盾的态度，现在他们成为以色列一股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哈绍莫（*Hashomer*）：希伯来语，“守卫者”的意思。伊休夫最早成立的保护犹太人和犹太村庄的防御性组织。

哈西德（*Hasid*）：来自希伯来语“仁爱”（*Hesed*）一词。哈西德教派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一支，18世纪成立于东欧，这个教派的成员叫哈西德。

哈斯卡拉（*Haskalah*）：犹太启蒙运动。该运动在西欧从18世纪末持续到19世纪末。哈斯卡拉知识分子试图将启蒙观念融入犹太教，让犹太人拥抱世俗世界，这些观念对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哈提克瓦（*Hatikvah*）：希伯来语，“希望”的意思。这是以色列国歌的名字，写于1878年。

赫鲁特（*Herut*）：希伯来语，“自由”的意思。这是梅纳赫姆·贝京1948年建立的政党的名字。它后来和其他政党合并成利库德集团。

希斯达德鲁特（*Histadrut*）：犹太工人总工会。伊休夫的首要工会。后来成为以色列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霍夫维锡安（*Hovevei Zion*）：希伯来语，“锡安热爱者”的意思。这

是在欧洲最早成立的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组织之一。在第一次阿利亚中，许多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东欧犹太人就是通过该组织来到巴勒斯坦。

因提法达（*intifada*）：阿拉伯语，“摆脱”“抖落”的意思。指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对以色列人发动的大起义。第一次因提法达发生在1987—1991年，第二次因提法达发生在2000—2004年。

伊尔贡（*Irgun*）：希伯来语，“组织”的意思，全名为“国家军事组织”（*Irgun Tsva'i Leumi*）。伊尔贡是一个地下武装组织，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为“埃策尔”（*Etzel*）。伊尔贡成立于1931年，当时成员主要为深受雅博廷斯基影响、对哈加纳的克制政策不满的哈加纳成员。独立战争期间，伊尔贡被编入以色列国防军，但在此之前，伊尔贡一直是一支独立的作战力量。

基布兹（*kibbutz*）：基布兹最早是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集体社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建国最初几十年，基布兹是最具以色列特色的组织。但即便在鼎盛时期，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7%左右。

基帕（*kippah*）：希伯来语，指仅能盖住头顶的“无沿便帽”。传统上由犹太男子佩戴。

克奈塞特（*Knesset*）：以色列议会。克奈塞特有120个席位，沿用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使用的比例代表制。第一届克奈塞特于1949年选举产生。

科特尔（*Kotel*）：希伯来语，“墙”的意思。指西墙（哭墙），这是第二圣殿唯一残留下来的一段墙体。这里既是犹太人的圣地，也是犹太教不同的教派产生冲突的战场。

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德语，意为“碎玻璃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和10日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被集体迫害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许多犹太商店和犹太会堂被烧毁，犹太人伤亡惨重。

莱希（*Lechi*）：希伯来语，“以色列自由的战士”（*Lochamei Cherut Yisrael*）的首字母缩写。指1940年由亚伯拉罕·斯特恩建立的一支地下武装力量。斯特恩本来是伊尔贡成员，后来同该组织决裂，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

利库德（*Likud*）：希伯来语，“巩固”的意思，专指“利库德集团”。该政党1973年由梅纳赫姆·贝京和其他右翼政党领导人建立。1977年在

贝京领导下第一次成为以色列的执政党。

马巴罗特（*ma'abarot*）：过渡营。独立战争后，大量新移民来到以色列，被临时安排在过渡营里。建立过渡营，是为了改变之前难民营恶劣的住宿环境，在“真正”的房屋建成前让移民暂时居住的。但过渡营的条件很快变得和难民营一样差。

马阿皮里姆（*ma'apilim*）：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对那些不顾英国封锁来到伊休夫的非法移民的希伯来语称呼。有的非法移民定居下来，有的则被英国人逮捕，关押到拘留营。

马姆拉赫提尤特（*mamlachtiyut*）：译为“国家主义”或“国家意识”差不多与希伯来原文最接近。指本-古里安试图让国家成为以色列文化和政策之核心的运动。

马帕伊（*Mapai*）：“以色列地工人党”的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马帕伊党是一个左翼世俗政党，1968年，和另一个左翼小政党合并成为以色列工党。1948—1977年，马帕伊党和工党先后一直是以色列的执政党。

米兹腊希（*Mizrachi*）：指罗马人攻陷耶路撒冷后流散到东方（主要在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许多世纪来，他们形成了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译本又译成“东方犹太人”]

莫沙夫（*moshav*）：希伯来语，“村庄”或“定居点”的意思。莫沙夫是以色列合作社制的农业社区。很多莫沙夫由早期阿利亚移民建立。

摩萨德（*Mossad*）：希伯来语，“机构”的意思。摩萨德是以色列的国家情报机构。

纳克巴（*Nakba*）：阿拉伯语，“浩劫”的意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用这个词指代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

帕尔马赫（*Palmach*）：希伯来语中“突击队”的首字母缩写。1941年成立，是哈加纳中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由英军训练，最初目的是迎击德国军队对巴勒斯坦可能的入侵。这支部队中有许多伊休夫优秀的战士。

锡安工人党（*Poalei Zion*）：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工人在东欧各地建立的组织。

“狩猎季”（*Saison*）：法语，“季节”的意思，又译作“狩猎季”。指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哈加纳精锐部队搜查伊尔贡和莱希成员的行

动。被捕的成员被哈加纳交给英国人。

塞法迪（*Sephardi*）：希伯来语中“西班牙”的形容词形式。塞法迪人指在罗马时期的流散之后定居在伊比利亚和西班牙的犹太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社团，形成了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沙斯党（*Shas*）：一句圣经经文的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可译为“塞法迪守卫者”。1984年，曾任塞法迪大拉比的俄巴底亚·约瑟拉比成立了代表东方犹太人利益的沙斯党。

舍亥赫雅努（*Shehecheyanu*）：希伯来语，“你赐予我们生命”的意思。在人生转折点等重要时刻念诵的犹太祝福祷告。犹太人在其中向上帝表达感恩之情，感谢上帝保全我们，活到此刻。

朔阿（*Shoah*）：取自《西番雅书》的圣经用语，“浩劫”的意思。现代希伯来语用这个词指代纳粹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来自古希腊语）。

朔法尔（*shofar*）：用公羊角制作的古老犹太礼器。犹太人常常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结束时在犹太会堂吹响朔法尔。[中译本又译作“羊角号”]

西奈山（*Sinai*）：圣经中上帝向犹太民族启示《托拉》的地方。

什泰特勒（*shtetl*）：意第绪语，指有大量犹太人生活其中的小村庄或小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类犹太村镇主要分布在中东欧。

塔木德（*Talmud*）：拉比犹太教的核心经典文本。由巴比伦流散犹太社团创作于大约公元200年到公元500年间。这是圣经之后最重要的犹太教著作，直到今天仍是全世界传统犹太人学习的首要宗教文本。

托拉（*Torah*）：犹太人对《摩西五经》（圣经中从《创世记》到《申命记》的五章）的传统称呼。《托拉》讲述了犹太民族的诞生，以及从埃及人奴役下回到应许之地的经历。

叶施瓦（*yeshiva*）：犹太经学院，男性犹太教徒学习宗教的主要场所，主要学习内容是《巴比伦塔木德》。

意第绪语（*Yiddish*）：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德语、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基础上创造的语言。意第绪语是许多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不少重要领导人）的母语。

伊休夫（*Yishuv*）：希伯来语，“定居区”的意思。一般指以色列建

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伊休夫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是以色列国的雏形。

赎罪日（*Yom Kippur*）：犹太历中最神圣的一天。赎罪日主要用于自我反省，这一天需要禁食25小时，犹太人要到犹太会堂祈祷。

附录3

以色列《独立宣言》

1948年5月14日（犹太历5708年以珥月5日）发表于特拉维夫

犹太民族是在以色列地[(1)]形成的。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的精神、宗教和民族特性得到了塑造；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曾过着自由而独立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创造了一种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文化，并把永恒的圣经奉献给了世界。

在被暴力驱逐出以色列故土后，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故土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地希望返回故土，在那里重新获得政治自由，从没有为此停止过祈祷。

基于这一历史和传统联系，世世代代的犹太人为加强他们与古老家园的联系一直奋斗不息。在最近的几代人中，他们大批地返回以色列故土。无论是作为拓荒者和保卫者的老兵，还是作为突破封锁的新抵达者，这些犹太人使荒地变成了良田，复活了希伯来语，兴建了城市与村庄，并创建了一个具有自身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的社会。他们希望和平，但也做好了保卫自身的准备。他们为该地区所有居民带来了进步的佳音，并决心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在西奥多·赫茨尔建立犹太国思想的鼓舞下，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于犹太历5657年（公元1897年）召开，并公开宣布：犹太民族具有在自己的国土上恢复自己国家的权利。

这一权利为1917年11月2日的《贝尔福宣言》所承认，后来又为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所肯定。而委任统治就是对犹太民族与以色列故土的历史联系，以及对犹太民族有权在那里重建民族家园要求给予的国际承认。

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导致欧洲几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的大屠杀再一次表明，为解决犹太民族无家可归和缺乏主权这一问题，有必要重新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将对所有犹太人敞开大门，并且确保犹太民族在国际大家庭中享有平等的地位。

尽管面对种种艰难困苦和危险，在可怕的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

欧洲犹太人，与其他国家中的犹太人一道，从未放弃回归以色列故土的努力，从未放弃在其民族土地上享有尊严、自由和诚实劳动、生活的权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色列故土的犹太人全力以赴，参加了爱好自由人民反对罪恶纳粹势力的斗争。他们以自己战士的鲜血，以自己对战争胜利的贡献，赢得了创立联合国诸民族一员的权利。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要求在以色列故土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决议，并号召这一地区的人民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贯彻这项决议。联合国对犹太民族建立自己国家合法权利的承认是不容改变的。

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在自己的主权国家里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是犹太民族的自然权利。

为此，我们，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以色列故土的犹太人民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英国委任统治结束之日，在这里集会，根据我们自然的和历史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大会决议，宣告在以色列故土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国。

我们决定：从今天午夜，犹太历5708年以珥月6日，即1948年5月15日零时委任统治结束之时起到根据宪法产生的国家机关接管政权为止（不迟于1948年10月1日），全国委员会将行使国家临时委员会的职权，它的执行机关——全国行政委员会将行使犹太人国家临时政府的职权。这一犹太人国家取名为以色列国。

以色列国将向散居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敞开移居的大门，将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以造福所有的居民。

以色列国将把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自由、正义与和平原则作为立国基础，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将保证宗教、信仰、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将保证保护所有宗教的圣地，并将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

以色列国准备同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和代表合作，履行1947年11月29日大会决议，并且为建立整个以色列地的经济一体化而努力。

我们请求联合国协助犹太民族建立他们的国家，并接纳以色列加入国际大家庭。

尽管几个月来我们一直遭到猛烈的攻击，我们仍号召生活在以色列

地的阿拉伯居民起来维护和平，并在享有平等公民权利以及在各种临时和永久的国家机关中拥有相应代表权的基础上，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出他们的力量。

我们向所有邻邦及其人民伸出和平、和睦、友邦之手，敦请他们与已经在自己故土上独立的犹太民族以互助精神合作。以色列国准备在为整个中东的进步而共同努力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号召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团结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周围，协助我们完成移居和重建的使命，并同我们一道为实现世代以来的梦想——重振以色列——而奋斗。

怀着对以色列磐石的信念，我们在今天，在安息日的前夕，在犹太历5708年以珥月5日，即1948年5月14日，在祖国的土地上，在特拉维夫城，在国家临时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为宣言签名作证。

大卫·本 - 古里安

雷切尔·科恩

亚伦·基斯林

丹尼尔·奥斯特

卡尔曼·卡哈纳拉比

摩西·科罗德尼

莫迪凯·本托夫

埃利泽·卡普兰

伊扎克·本·兹维

萨阿迪亚·科巴西

亚伯拉罕·卡兹内尔森

埃利亚胡·伯里格纳

伊扎克·梅厄·莱文拉比

菲利克斯·罗森布鲁斯

弗里兹·伯恩斯坦

大卫·雷梅兹

沃尔夫·戈尔德拉比

梅厄·大卫·洛文斯坦

伯尔·莱普特

梅厄·格拉波维斯基

莫迪凯·沙特纳

伊扎克·格伦鲍姆

兹维·卢瑞尔

本·锡安·斯特恩伯格

亚伯拉罕·格拉诺夫斯基博士

果尔达·梅耶森

贝克霍尔·施特里特

纳彻姆·尼尔

摩西·沙皮拉

埃利亚胡·多布金

兹维·西格尔

摩西·谢尔托克

梅厄·维尔纳 - 科夫纳

耶胡达·莱伯·哈科恩·费希曼拉比

泽拉克·沃哈弗提

赫茨尔·瓦尔迪

大卫·茨维·平卡斯

(1) 《独立宣言》的翻译来自以色列官网，但作者对部分细节进行了修改。翻译原稿中的“以色列国”，作者都改成“以色列地”，因为《独立宣言》在使用这个词时想表达的意思不是以色列的国土，而是犹太民族的先祖之地。修改后更便于读者理解。

附录4

以色列总理、总统和美国总统对应表

年份	以色列总理	美国总统	以色列总统
1948	大卫·本-古里安 1948.5.14— 1954.1.26	哈里·S. 杜鲁门 1945.4.12— 1953.1.20	哈伊姆·魏茨曼 1949.2.17— 1952.11.9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1953.1.20— 1961.1.20	伊扎克·本-兹维 1952.12.16— 1963.4.23
1954	摩西·夏里特 1954.1.26— 1955.11.3		
1955			
1956	大卫·本-古里安 1955.11.3— 1963.6.26		
1957			
1958			
1959			
1960			

续表1

年份	以色列总理	美国总统	以色列总统
1961	大卫·本—古里安 1955.11.3— 1963.6.26	约翰·F. 肯尼迪 1961.1.20— 1963.11.22	伊扎克·本—兹维 1952.12.16— 1963.4.23
1962			
1963			
1964	列维·艾希科尔 1963.6.26— 1969.2.26	林登·B. 约翰逊 1963.11.22— 1969.1.20	扎勒曼·夏扎尔 1963.5.21— 1973.5.2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注：1969年2月26日到3月7日伊加尔·阿隆担任代总理。 果尔达·梅厄 1969.3.17— 1974.6.3	理查德·尼克松 1969.1.20— 1974.8.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伊弗雷姆·卡齐尔 1973.5.24— 1978.5.29
1975	伊扎克·拉宾 1974.6.3— 1977.6.20	杰拉尔德·福特 1974.8.9— 1977.1.20	
1976			
1977		吉米·卡特 1977.1.20— 1981.1.20	
1978	梅纳赫姆·贝京 1977.6.20— 1983.10.10		
1979			伊扎克·纳冯 1978.5.29— 1983.5.5
1980			
1981		罗纳德·里根 1981.1.20— 1989.1.20	
1982			
1983			

续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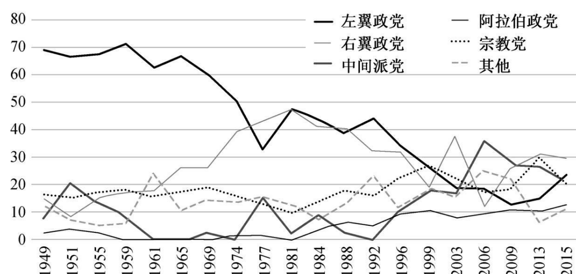
年份	以色列总理	美国总统	以色列总统
1984	伊扎克·沙米尔 1983.10.10— 1984.9.13	罗纳德·里根 1981.1.20— 1989.1.20	哈伊姆·赫尔佐格 1983.5.5— 1993.5.13
1985	西蒙·佩雷斯 1984.9.13— 1986.10.20		
1986			
1987	伊扎克·沙米尔 1986.10.20— 1992.7.13		
1988			
1989			
1990		乔治·H.W.布什 1989.1.20— 1993.1.20	
1991			
1992			
1993	伊扎克·拉宾 1992.7.13— 1995.11.4		
1994		比尔·克林顿 1993.1.20— 2001.1.20	埃泽尔·魏茨曼 1993.5.13— 2000.7.13
1995			
1996	注：1995年11月4日到11月22日佩雷斯担任代总理。 西蒙·佩雷斯 1995.11.22— 1996.6.18		
1997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1996.6.18— 1999.7.6		
1998			
1999			
2000	埃胡德·巴拉克 1999.7.6— 2001.3.7		
2001		乔治·W.布什 2001.1.20— 2009.1.20	摩西·卡察夫 2001.8.1— 2007.7.1

续表3

<table>
<tr><th>年份</th><th>以色列总理</th><th>美国总统</th><th>以色列总统</th></tr>
<tr><td>2002</td><td rowspan="5">阿里埃勒·沙龙
2001.3.7—
2006.4.14

注：2006 年 1 月 4 日沙龙中风陷入昏迷，奥尔默特担任代总理。</td><td rowspan="7">乔治·W. 布什
2001.1.20—
2009.1.20</td><td rowspan="6">摩西·卡察夫
2001.8.1—
2007.7.1</td></tr>
<tr><td>2003</td></tr>
<tr><td>2004</td></tr>
<tr><td>2005</td></tr>
<tr><td>2006</td></tr>
<tr><td>2007</td><td rowspan="3">埃胡德·奥尔默特
2006.4.14—
2009.3.31</td></tr>
<tr><td>2008</td><td rowspan="7">西蒙·佩雷斯
2007.7.15—
2014.7.24</td></tr>
<tr><td>2009</td><td rowspan="8">巴拉克·奥巴马
2009.1.20—</td></tr>
<tr><td>2010</td><td rowspan="7">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2009.3.31—</td></tr>
<tr><td>2011</td></tr>
<tr><td>2012</td></tr>
<tr><td>2013</td></tr>
<tr><td>2014</td></tr>
<tr><td>2015</td><td rowspan="2">鲁文·里夫林
2014.7.24—</td></tr>
<tr><td>2016</td></tr>
</table>

附录5
以色列政党及其分化组合



以色列政党分化组合频繁，不断有新的政党诞生和旧的政党消亡，因此很难准确地跟踪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权力走势。人们有时用工党指代左翼政党，用利库德集团指代右翼政党，但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也经历了分化组合的过程，其中涉及一些本书提到过的政党。

右翼政党

赫鲁特：1948—1965年（梅纳赫姆·贝京建立的政党）

加哈尔集团：1965—1973年（由赫鲁特党和自由党合并而成）

利库德集团：1973年至今（由加哈尔集团、自由中心、国家党和大以色列运动合并而成）

左翼政党

马帕伊党：1948—1968年（大卫·本 - 古里安建立的政党）

工党联盟：1965—1968年（由马帕伊党和劳工联盟合并而成），本 - 古里安离开马帕伊党成立了拉菲党

以色列工党：1968—2014年（由工党联盟和拉菲党合并而成）

一个以色列：1991—2001年（以色列工党、桥党、梅玛德党合并而成，梅玛德党是一个温和的宗教政党）

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2014年至今（以色列工党和运动党合并而成，运动党是2014年由齐皮·利夫尼成立的新政党）

附录6

延伸阅读

本书只对以色列历史的总体情况加以勾勒。书中提到的每个事件、话题和人物都可以继续探索。关于书中谈到的问题，许多出色的著作有更详尽的讨论。

想了解更多推荐书目和网上参考资料，参见我的网站http://danielgordis.org/books/israel-concise-history-nation-reborn/。

注释

序言

[1] 1956年2月3日，本 - 古里安在CBS电视台上接受爱德华·R·默罗采访时发表的这一言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4Oo75OQmHAw[Last viewed on March 15，2016].

[2] Mark Twain, “Concerning the Jews,” *Harper's Magazine*, March 1898.

第一章

[1] Lawrence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6), p.16.

[2] Robert M. Seltzer, *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1980), p.632.

[3] Yaacov Shavit and Jehuda Reinharz, *Glorious*, *Accursed Europe*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88.

[4]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p.60.

[5] David Patterson, “Introduction,” in Abraham Mapu, trans. Joseph Marymount, *The Love of Zion & Other Writings* (Israel: Toby Press, 2006), p. xvi.

[6] AlexBein, trans. Maurice Samuel, *Theodor Herzl*: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0), p.232.

[7] Shlomo Avineri, trans. Haim Watzman, *Herzl*: *Theodor Herzl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Jewish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8), p.33.

[8] Amos Elon, *The Pity of It All*: *A Portrait of the German-Jewish Epoch* 1743—1933 (New York: Picador, 2002), p.213.

[9] Bein, trans. Samuel, *Theodor Herzl*, p.37.

[10] Avineri, trans. Watzman, *Herzl*, p.85 (quoting Herzl's diary) .

[11] Bein, trans. Samuel, *Theodor Herzl*, p.19.

[12]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p.84—85.

[13]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author and David Matlow, of Toronto, Canada. See also Raphael Patai, *The Jews of Hungary*: *History*, *Culture*, *Psycholog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47.

[14] Avineri, trans. Watzman, *Herzl*, pp.61—62.

[15] Ibid., p.78.

[16] Ibid., p.69.

[17] Theodor Herzl, *The Jewish Stat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9), p.47.

[18] Ibid., pp.92—93.

[19] Ibid., p.76.

[20] Ibid.

[21]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pp.99—100.

[22] Avineri, trans. Watzman, *Herzl*, p.116.

[23] Patterson, “Introduction,” in Mapu, trans. Marymount, *The Love of Zion*, p. xiv.

[24]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赫斯的妻子西比尔·佩希当过妓女，赫斯因为男性长期欺负贫困女性而娶她为妻，以此作为为男性赎罪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佩希的个人背景，学术界目前已出现了争议。

[25] MosesHess, *The Revival of Israel*: *Rome and Jerusalem*, *the Last Nationalist Ques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 p.x.

[26]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赫斯书名中的“罗马”指的是罗马共和国。事实上，赫斯宣称，犹太人应当效仿近代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开展犹太民族运动。参见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p.6。

[27] Eric Cohen, “The Spirit of Jewish Conservatism,” *Mosaic* (April 6, 2015), http://mosaicmagazine.com/essay/2015/04/the-spirit-of-jewish-cons-ervatism/ [Last viewed April 6, 2015].

[28]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p.54.

[29] Ibid., p.53.

[30] Arthur Hertzberg, ed., *The Zionist Ide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p.32.

[31] Ibid., p.188.

[32] Ibid., p.195.

[33] Bein, trans. Samuel, *Theodor Herzl*, p.226.

[34] Ibid., p.230.

[35] Ze'ev Tzahor, “Chaim Arlosoroff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Rise of Nazism,”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46, No.3/4 (Summer-Autumn 1984), p.322.

[36]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p.86.

[37] Avineri, trans. Watzman, *Herzl*, p.141.

[38] Ibid., p.1.

[39]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p.83.

[40] Theodor Herzl, *Old New Land*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7), p.248.

[41] Ibid., p.174.

[42] Avineri, trans. Watzman, *Herzl*, p.167.

第二章

[1] George Eliot, *Daniel Deronda*, introduction by Edmund White, notes by Dr. Hugh Osborn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2), page 15.《丹尼尔·德隆达》最早由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出版社于1876年2月至9月分8部分出版。1878年12月重新出版，书中讨论犹太生活和习俗的章节被修改。

[2] Genesis 12: 1.

[3] Genesis 12: 7.

[4] Exodus 1：9—10.对这句话人们有不同的解读。犹太出版协会（JPS）版圣经翻译成“从此地上升”，显然是参考了Ehrlich在*Mikrah Kifshuto*中的观点。《巴比伦塔木德》（Sotah 11a）认为法老想表达的是犹太人将“获得相对于本国的优势”，但这种理解离经文字面意思太远，理解成“离开这地区了”能够呼应《创世记》中提到的犹太人流散到此地的经文，因此这种简单的翻译方法更可取。

[5] Deuteronomy 7: 1.

[6] Alex Bein, trans. Maurice Samuel, *Theodor Herzl: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0), p.232.

[7] Jeremiah 29: 5—6.

[8] Psalms 137: 1.

[9] Psalms 126: 1—6.

[10] II Chronicles 36: 23.

[11] J. Maxwell Miller and John H. Hayes,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p.509.

[12] Jerome Murphy-O'Connor and Barry Cunliffe, *The Holy Land: An Oxford Archaeological Guide*, 5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378—381.

[13] Hayim Ben-Sasson, ed.,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332.

[14] Bein, trans. Samuel, *Theodor Herzl*, p.232.

第三章

[1] Monty Noam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Modern Judaism*, Vol.24, No.3 (2004), p.199.除非另有标注，本章中关于基希涅夫事件的内容皆参考此文。

[2] Winston Churchill, “MIT Mid-Century Convocation, March 31, 1949,” *MITInstitute Archives*, https://libraries.mit.edu/archives/exhibits/midcentury/mid-cent-churchill.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3]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p.187.

[4] Ibid.

[5] Ibid., p.188.

[6] Ibid.

[7] Ibid., p.211.

[8] David G. Roskies, ed., *The Literature of Destruction*: *Jewish Responses to Catastrophe*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88), p.162.

[9]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p.199.

[10] Ibid.

[11] Lawrence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6), p.97.

[12] Shlomo Avineri, trans. Haim Watzman, *Herzl*: *Theodor Herzl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Jewish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8), p.241.

[13]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p.199.

[14] Avineri, trans. Watzman, *Herzl*, p.245.

[15] Ibid., p.259.

[16] Ella Florsheim, “Giving Herzl His Due,” *Azure*, No.21 (Summer 5765/2005), p.21, http://azure.org.il/include/print.php?id=182[Last viewed May 1, 2016].

[17]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p.194.

[18] Steven J.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11.

[19] Ibid., p.14.

[20] Ibid., pp.18—19.

[21] AhadHa'am, “The Jewish State and the Jewish Problem,” in Arthur Hertzberg, *The Zionist Ide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p.268.

[22]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127.

[23]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p.129.

[24] Arthur Hertzberg, ed., *The Zionist Ide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pp.54—55.

[25] Isaiah 2: 3.

[26] Alan Dowty, “Much Ado About Little: Ahad Ha' Am's 'Truth from Eretz Yisrael,' Zionism, and the Arabs,” *Israel Studies*, Vol.5, No.2 (Fall 2000), p.161 (quoting Ahad Ha'am) . Italics added.

[27] Max Nordau, “Jewry of Muscle,” in Paul Mendes-Flohr and Yehuda Reinharz,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547—548.

[28]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p.209.

[29] Ze'ev (Vladimir) Jabotinsky, “The Basis of the Betarian Viewpoint Consists of One Idea: The Jewish State: The Ideology of Betar,”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http://www.wzo.org.il/index.php?dir=site&page=articles&op=item&cs=3360&langpage=eng&category=3122&mode viewed December 7, 2015].

[30] Raymond P. Scheindlin, *A Short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From Legendary Times to Modern Statehoo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4.

[31] A. D. Gordon, “Logic for the Future (1910),” in Hertzberg, *The Zionist Idea*, p.373.

[32] Yehudah Mirsky, *Rav Kook*: *Mystic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65.

[33] Hertzberg, *The Zionist Idea*, pp.291—292.

[34] Micah Joseph Berdyczewski, “Wrecking and Building,” in Hertzberg, *The Zionist Idea*, p.293.

[35] Babylonian Talmud, Ketubbot 111a.

[36] Alan Nadler, “Piety and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Satmar Rebbe,” *Judaism*, Vol.31 (Spring 1982), p.40.

[37] Alan Lelchuk and Gershon Shaked, *8 Great Hebrew Short Novels* (New Milford, CT: Toby Press, 2012),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1029.

第四章

[1] 这句话被很多人引用过，包括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参见http://www.pmo.gov.il/English/MediaCenter/Speeches/Pages/speech040105.aspx。

[2] Hani A. Faris, “Israel Zangwill's Challenge to Zionism,”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4, No.3 (Spring 1975), p.81.

[3] Ibid.

[4]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23.

[5]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8.

[6] Benny Morris, 1948: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

[7] 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9), p.36.

[8] Yehudah Mirsky, *Rav Kook: Mystic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59.

[9] Ibid., pp.59—60.

[10] Ibid., p.50.

[11]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p.82.

[12] Yaffah Berlovitz, *Inventing a Land, Inventing a People* (Tel Aviv: Hotza'at HaKibbutz HaMeuchad, 1996), p.55[In Hebrew].

[13] Theodor Herzl, trans. I. M. Lask, *The Jewish State* (Tel Aviv: M. Newman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34.

[14] Mirsky, *Rav Kook*, p.54.

[15] Ibid., pp.53—54.

[16] Berlovitz, *Inventing a Land*, pp.18—19.

[17] Ibid., p.20.

[18] Mirsky, *Rav Kook*, p.66.

[19] Ruth Kark, “Changing Patterns of Landown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Palestine: The European Influenc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10, No.4 (1984), pp.357—384.

[20] Nurit Govrin, *Roots and Tops: The Imprint of the First Aliyah in Hebrew Literature* (Tel Aviv: Papyrus and Tel Aviv University, 1981), p.43[In Hebrew].

[21] Mirsky, *Rav Kook*, p.68.

[22] Ibid., pp.68—69.

[23]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46.

[24] Tali Asher, “The Growing Silence of the Poetess Rachel,” in Ruth Kark, Margarit Shilo, and Galit Hasan-Rokem, eds., *Jewish Women in Pre-State Israel: Life History, Politics, and Culture*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45.

[25] Rachel Bluwstein, “Perhaps,”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Vol.3, Nos.3 and 4 (1996), http://www.pij.org/details.php?id=536[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26] S. Ilan Troen, *Imagining Zion: Dreams, Designs, and Realities in a Century of Jewish Settlemen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358—1361.

[27] Ibid., Locations 1368—1369.

[28] Tom Segev, 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 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p.442.

[29] Troen, *Imagining Zion*, Location 1541.

[30] Ibid., Location 1566.

[31] Ibid., Location 1609.

[32]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p.83.

[33] Troen, *Imagining Zion*, Location 1609.

[34]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24.

第五章

[1] Shmuel Katz, *Lone Wolf: A Biography of Vladimir (Ze'ev) Jabotinsky* (Fort Lee, NJ: Barricade Books, 1995), p.136.

[2] Edward Grey, Viscount of Fallodon, *Twenty-Five Years 1892—1916*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25), p.20.

[3] 赫茨尔在世时，雅博廷斯基也曾向土耳其统治阶级提出建立犹太国的方案，但土耳其人因为担心“更多非穆斯林力量进入中东会成为欧洲干预此地的理由”，拒绝了雅博廷斯基的提议。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A History*（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2.

[4] Katz, *Lone Wolf*, p.177.

[5] 引用自哈伊姆·魏茨曼在雷霍沃特故居的展览，现在那里成为一个博物馆。

[6]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71.

[7] 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2), p.197.

[8] John Bew, “The Tragic Cycle: Western 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Statesman* (August 21, 2014), http://www.newstatesman.com/world-affairs/2014/08/tragic-cycle-western-powers-and-middle-east[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9]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73.

[10] Cecil Bloom, “Sir Mark Sykes: British Diplomat and a Convert to Zionism,” *Jewish Historical Studies*, Vol.43 (2011), p.142.

[11]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p.186.许多人都持这一观点，但并非每个人都认为丙酮和《贝尔福宣言》有关系，有的学者认为这只是民间传说。

[12] Arthur James Balfour, “Balfour Declaration” (1917), *The Avalon Project*,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balfour.asp[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13]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73.

[14] Eitan Bar Yosef, “The Last Crusade? British Propaganda and the Palestine Campaign, 1917—1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36, No.1 (January 2001), p.100.

[15] 1914年，伊休夫就购买了斯科普斯山的土地，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伯来大学到1918年才开始动工修建。

[16] Seth M. Siegel, *Let There Be Water*: *Israel's Solution for a Water-Starved World*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5), p.22.

[17]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9.

[18] Ibid., pp.45—46.

[19] Siegel, *Let There Be Water*, p.28.

[20] Shlomo Avineri, lecture at the Shazar Center in Jerusalem on December 30, 2014.

[21]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Ben-Gurion*: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8.

[22] Michael Makovsky, *Churchill's Promised Land*: *Zionism and Statecraf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1463.

[23] Martin Gilbert, *Churchill and the Jews*: *A Lifelong Friendship* (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p.50.

[24] Tom Segev, trans. Haim Watzman,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0), p.104.

[25]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186.

[26] Ze'ev Jabotinsky, “The Iron Wall,”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Zionism/ironwall.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27] Ibid.

[28] Hillel Cohen, *Year Zero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29*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xvii.

[29] Jeffrey Goldberg, "The Paranoid, Supremacist, Roots of the Stabbing Intifada," *Atlantic* (October 16,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10/the-roots-of-the-palestinian-uprising-against-israel/410944/[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30]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p.375.

[31]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2481.

[32]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210.

[33]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36.

第六章

[1]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Boring, OR: CPA Book Publisher, 2000), p.184.

[2] Tuvia Friling, trans. Ora Cummings, *Arrows in the Dark*: *David Ben-Gurion, the Yishuv Leadership, and Rescue Attempts during the Holocaust*, VolumeI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5), p.16.

[3] Hava Eshkoli-Wagman, "Yishuv Zionism: Its Attitude to Nazism and the Third Reich Reconsidered," *Modern Judaism*, Vol.19, No.1 (February 1999), p.26.

[4] Colin Shindler, "Zionist History's Murder Mystery," *Jewish Chronicle Online* (June 16, 2013), http://www.thejc.com/comment-and-debate/comment/108596/zionist-historys-murder-mystery[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5] Tom Segev, trans. Haim Watzman, *The Seventh Million*: *The Israeli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Henry Holt, 1991), p.21.

[6] Ibid., p.25.

[7] Nina S. Spiegel, *Embodying Hebrew Cultur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2.

[8] Ibid., p.135.

[9] Ibid., p.7.

[10] Abba Hillel Silver, Moshe Shertok, and Chaim Weizmann,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October 1947," p.7. Copy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11] Benny Morris, *One State, Two States*: *Resolving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523.

[12] Translation of Uri Zvi Greenberg, “One Truth and Not Two,” is from Neta Stahl, “Jesus and the Pharisees Through the Eyes of TwoHebrew Writers: A Contrarian Perspective,” *Hebrew Studies*, Vol.56, No.1 (December 11, 2015) .

[13]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231.

[14] Ibid., p.232.

[15] Friling, trans. Cummings, *Arrows in the Dark*, p.19.

[16] Ibid.

[17]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219.

[18] Dina Porat, *The Blue and the Yellow Stars of David*: *The Zionist Leadership in Palestine and the Holocaust, 1939—1945*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

[19] Zephaniah 1: 15.

[20]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p.226.

[21] Jack L. Schwartzwald, *Nine Lives of Israel*: *A Nation's History Through the Lives of Its Foremost Leader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2), p.33.

[22]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101.

[23] Mike Lanchin, “*SSSt Louis*: The Ship of Jewish Refugees Nobody Wanted,” *BBC World Service* (May 13, 2014),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27373131[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24] Alan Guggenheim and Adam Guggenheim, “Doomed from the Start,” *Naval History*, Vol.18, No.1 (February 2004), pp.46—51.

[25] Douglas Frantz and Catherine Collins, *Death on the Black S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Struma*and World War II's Holocaust at Sea*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3), p.254.

[26]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4035—4037.

[27] Geneviève Pitot, trans. Donna Edouard, *The Story of the Jewish Detainees in Mauritius 1940—1945*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p.129.

[28]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151.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p.22, suggests numbers slightly lower.

[29] Segev, trans. Watzman, *The Seventh Million*, p.22.

[30] Friling, trans. Cummings, *Arrows in the Dark*, p.47.

[31]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pp.162—163.

[32]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112.

第七章

[1] Menachem Begin, trans. Samuel Katz, *The Revolt* (1951; reprint Bnei Brak, Israel: Steimatzky, 2007), pp.59—60.

[2]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pril 18, 2013.

[3] Bruce Hoffman, *Anonymous Soldiers*: *The Struggle for Israel*: *1917—194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p.333.

[4] 关于这一事件有不同的记录。马丁·吉尔伯特（*Israel*：*A History*[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pp.118—119）认为莫因6日被杀，西纳什4日被杀。但其他的历史记录认为西纳什死在莫因被刺杀的前一天，因此两个事件存在因果关系。

[5]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Ben-Gurion*: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38.

[6] Lawrence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6), p.120.

[7] Eric Lichtblau, "Surviving the Nazis, Only to Be Jailed by Americ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2/08/sunday-review/surviving-the-nazis-only-to-be-jailed-by-america.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8] Ibid.

[9]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121.

[10] Yehuda Avne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on October 24, 2012.

[11]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p.138—139.

[12] Hoffman, *Anonymous Soldiers*, p.379.

[13]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145.

[14] Ibid.

[15] 不同学者给出的数据略有不同，柯林·辛德勒认为犹太人为528000人，阿拉伯人为397000人。Colin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2nd e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p.45.

[16]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149.

[17] "CIA Report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p.18. Copy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18] David McCullough, *Tru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1804—11836.

[19]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150.

[20] iCenter, "The Story of a Vote, Nov.29, 1947," *iCenter* (November 4, 2012),

http://www.theicenter.org/voice/story-vote-nov-29-1947.

[21] 对于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录也存在不同版本：阿巴·埃班在自传中说，投票日期在11月26日（周二）和11月27日（周三）分别因为申请和阻挠而被推迟，周四是感恩节，因此最终投票日期为11月29日（周五）。埃班的传记作家Asaf Siniver说投票日期原计划在周三，但最终推迟到周六。安妮塔·沙皮拉在书中说是周五举行的投票，本尼·莫里斯说是在周六。

[22] Asaf Siniver, *Abba Eban*: *A B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Overlook Duckworth, 2015), p.91.

[23] Shlomo Avineri, trans. Haim Watzman, *Herzl*: *Theodor Herzl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Jewish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8), p.141 (quoting Herzl's diary) .

[24] A. A. P., "U. N. O. Passes Palestine Partition Plan," *Morning Herald* (December 1, 1947), http://trove.nla.gov.au/ndp/del/article/134238148[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25] Amos Oz, trans. Nicholas de Lange, *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 (Orlando: Harcourt, 2004), p.359.

[26] Ibid.

[27] Michael Bar-Zohar, trans. Peretz Kidron, *Ben-Gurion*: *A Biography*, *The New Millennium Edition* (Israel: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13),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3028.

[28] Daniel Gordis, *Saving Israel*: *How the Jewish People Can Win a War That May Never End* (Hoboken, NJ: Wiley, 2009), p.170.*Ha'aretz*attributed this language to Weizmann on December 15, 1947, just two weeks after the United Nations voted to partition Palestine.

[29] Exodus 19: 15.

[30] Exodus 19: 10.

[31] Nadav Shragai, "The Legend of Ambushed Palmach Squad '35,'" *Ha'aretz* (April 27, 2009), http://www.haaretz.com/the-legend-of-ambushed-palmach-squad-35-1.274876[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第一个版本是本 - 古里安几天后在马帕伊党悼念这一事件的发言中提到的，本 - 古里安的信息来源显然是一位可能出现在现场但没有参与屠杀的阿拉伯人。第二个版本是61年后约卡南·本 - 雅科夫提供的，他出生在埃齐翁村，在这场战争中他失去了父母。

[32] Tamar S. Drukker, "'I Am a Civil War': The Poetry of Haim Gouri," in Hugh Kennedy, ed., *Warfare and Poetr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 B. Tauris, 2013), pp.242—243.

[33] Mati Alon, *Holocaust and Redemption* (Victoria, BC: Trafford Publishing, 2013), p.168.

[34] Yossi Melman, "Jews, Just Like Arabs, Hid Weapons in Immoral Places,"

Ha'aretz (January 27, 2011) .

[35]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61.

[36] Ibid., pp.157—158.

[37]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6208.

[38] 本尼·莫里斯是国际知名的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写了大量指责以色列过度使用军力的文章。但他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对国防军犯有强奸罪的指控站不住脚。多数当代历史学家认为死亡人数在100—120人之间。阿拉伯历史学家也改变了先前的看法，1987年，两位来自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Birzeit大学的学者在对当事人采访基础上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当时的死亡人数为107人，报告中没有提到强奸行为。报告内容和贝京的判断基本一致。Cf. Benny Morris, “The Historiography of Deir Yassin,”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Politics*，*Society*，*Culture*，Vol.24，No.1 (August 2006), p.87. See also my more detailed summary of the battle and the ways in which it was used by various parties in*Menachem Begin*：*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Chapter 6, “Deadly Road to Jerusalem.”

[39]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p.179—180.

第八章

[1] Bruce Hoffman, *Anonymous Soldiers*: *The Struggle for Israel*: *1917—194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8282.

[2] Ariel Feldestein, “One Meeting—Many Descriptions: The Resolu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Israel Studies Forum*, Vol.23, No.2 (Winter 2008), p.104.

[3] Ibid.

[4] Benny Morris, 1948: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77.

[5] Ibid., p.178.

[6] “Israel'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948,” *Avalon Project*,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israel.asp[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7]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80.

[8] II Samuel 23: 3.

[9] Yehudah Mirsky, “What Is a Nation-State For?” *Marginalia* (March 11, 2015), http://marginalia.lareviewofbooks.org/nation-state-yehudah-mirsky/ [Lastviewed December 7, 2015].

[10] Genesis 32: 28.

[11]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64.

[12] Amira Lam, "Peres Recall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e Didn't Have Time to Celebrate," *Ynetnews.com* (December 21,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606090,00.html.

[13]*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3 at 29: 25.

[14]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192.

[15] Morris, *1948*, p.237.

[16]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65.

[17] Colin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55.

[18]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p.207—208.

[19] Morris, *1948*, p.142.

[20] Ibid., p.159.

[21] Ibid.

[22] Ibid., p.365.

[23] Ibid., p.266.

[24] Ibid., p.268.

[25] 阿亚龙博物馆的展览上提到了捷克武器上的纳粹标志，这一点在本尼·莫里斯给作者的邮件中得到证实。他写道："来自捷克的武器是德国标准的毛瑟枪和MG机枪。其中大量印有纳粹标志，可能是1945年5月为德国生产的武器。（捷克生产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也是同样情况）"E-mail, dated May 1, 2016,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26] See, forexample, Eliezer Cohen, trans. Yonatan Gordis, *Israel's Best Defense*: *The First Full Story of the Israeli Air Force* (New York: Orion Books, 1993), pp.7—60. See also*Above and Beyond* (Playmount Productions and Katahdin Productions, produced by Nancy Spielberg, 2015) at 15: 20.

[27]*Above and Beyond*at 38: 20.

[28]*Above and Beyond*at 43: 00.

[29]*Above and Beyond*at 50: 40.

[30]*Above and Beyond*at 51: 30.

[31] 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Photograph of the memorandum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32] Jerold S. Auerbach, *Brothers at War*: *Israel and the Tragedy of the*Altalena (New

Orleans: Quid Pro Books, 2011), p.50.

[33] Yehuda Lapidot, trans. Chaya Galai, “The *Altalena* Affair,” *Etzel*, http://www.etzel.org.il/english/ac20.htm[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34] Zvi Harry Hurwitz, *Begin*: *His Life*, *Words*, *and Deeds*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2004), p.27.

[35] Avi Shilon, trans. Danielle Zilberberg and Yoram Sharett, *Menachem Begin*: *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30.

[36] Auerbach, *Brothers at War*, p.109.

[37] Michael Oren,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Azure* (Spring 5759/1999), p.47.

[38] Ibid.

[39] Ilan Pappe, “A Post-Zionist Critique of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Part II: The Media,” in*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Spring 1997), pp.37—43, cited in Oren,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p.48.

[40]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p.108.

[41] Ibid., p.132.

[42] See Martin Kramer, “What Happened at Lydda,” *Mosaic* (July 1, 2014), http://mosaicmagazine.com/essay/2014/07/what-happened-at-lydda/.

[43] Benny Morris, “Zionism's 'Black Boxes,'” *Mosaic* (July 13, 2014), http://mosaicmagazine.com/response/2014/07/zionisms-black-boxes/[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44]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218.

[45] NadavMan, “1st IDF Parade from Behind the Lens,” *Ynetnews.com* (December 13, 2008),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3637748,00.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46] Ari Shavit,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 Interview with Benny Morris,” *Ha'aretz* (January 8, 2004), http://www.haaretz.com/survival-of-the-fttest-1.61345[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47] Shilon, trans. Zilberberg and Sharett, *Menachem Begin*: *A Life*, p.137.

[48]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72.

[49] Morris, *1948*, p.406.

第九章

[1] Pinhas Alpert and Dotan Goren, eds., *Diary of a Muchtar in Jerusalem*: *The*

History of the Beit Yisrael Neighborhood and its Surroundings in the Writings of Rabbi Moshe Yekutiel Alpert (1938—1952) (Ramat Gan, Israel: Bar Il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73—174[In Hebrew].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Vered Kellner, “Longings and Disappointments: A Voter in Exile in New York,” *Ha'aretz* (January 18, 2013), http://www.haaretz.com/opinion/longings-and-disappointments-a-voter-in-exile-in-new-york.premium-1.494743[Last viewed August 5, 2016].

[2] Vered Kellner, “Longings and Disappointments: A Voter in Exile in New York,” *Ha'aretz* (January 18, 2013), online at http://www.haaretz.com/opinion/longings-and-disappointments-a-voter-in-exile-in-new-york.premium-1.494743[Lastviewed August 5, 2016].

[3]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Israel to Vote Today in First National Elections; Campaign Reaches High Peak” (January 25, 1949), http://www.jta.org/1949/01/25/archive/israel-to-vote-today-in-first-national-elections-campaign-reaches-high-peak[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4]*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21 at 00: 35.

[5] “Moving Ceremony Marks Reburial of Herzl's Remains; Israeli Cabinet in Full Attendance,”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http://www.jta.org/1949/08/18/archive/moving-ceremony-marks-reburial-of-herzls-remains-israeli-cabinet-in-full-attendance.

[6] Theodor Herzl, trans. I. M. Lask, *The Jewish State* (Tel Aviv: M. Newman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37.

[7] Ibid., p.151.

[8] JTA, “Of Weizmann's Address Opening Session of Israeli Constituent Assembly” (February 15, 1949), http://www.jta.org/1949/02/15/archive/of-chaim-weizmanns-address-opening-session-of-israeli-constituent-assembly[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9] Ibid.

[10] Ibid.

[11] Robert Frost, “The Death of the Hired Man” (North of Boston, 1915), *Bartleby.com*, http://www.bartleby.com/118/3.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12]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08.

[13] “Displacement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1948—2012,” *Justice for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http://www.justiceforjews.com/main_facts.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14] Colin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4.

[15]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History*, KindleEdition, Locations 5437—5443.

[16]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p.93.

[17] Golda Meir, *My Lif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75), pp.250—251.

[18] Esther Meir-Glitzenstein, “Operation Magic Carpet: 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the Magical Immigration of Yemenite Jews to Israel,” *Israel Studies*, Vol.16, No.3 (Fall 2011), p.150.

[19]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5453.

[20]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ifty Years of Education in the State of Israel,” http://www.mfa.gov.il/mfa/aboutisrael/israelat50/pages/fifty%20years%20of%20education%20in%20the%20state%20of%20israel.aspx.

[21] Herzl, trans. Lask, *The Jewish State*, p.16.

[22]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p.94.

[23]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231.

[24] Seth J. Frantzman, “David Ben-Gurion, Israel's Segregationist Founder,” *Forward* (May 18, 2015), http://forward.com/opinion/israel/308306/ben-gurion-israels-segregationist-founder/[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5] Ibid.

[26] Nir Kedar, “Ben-Gurion's Mamlakhtiyut: Etym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oots,” *Israel Studies*, Vol.7, No.3 (Fall 2002), p.129.

[27]*Tekumah*, Episode 17 at 12: 00.

[28]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99.

[29] Tamara Traubman, “A Mystery That Defes Solution,” *Ha'aretz* (November 5, 200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news/a-mystery-that-defes-solution-1.73913[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30] Moshe Reinfeld, “State Commission: Missing Yemenite Babies Not Kidnapped,” *Ha'aretz* (November 4, 2001), http://www.haaretz.com/news/state-commission-missing-yemenite-babies-not-kidnapped-1.73778[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31] “15, 000% Growth in Army Exemptions for Yeshiva Students since 1948,” Hiddush website, http://hiddush.org/article-2338-0-15000Growth_in_army_exemptions_for_yeshiva_students_since1948.aspx[viewed December 9, 2015].

[32]*Tekumah*, Episode 11 at 31: 45.

[33]*Tekumah*, Episode 11 at 20: 15.

[34]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97.

[35] David Ben-Gurion, *Like Stars and Dust*: *Essays from Israel's Government Year Book* (Ramat Gan, Israel: Masada Press, 1976), p.147. The translation from the Hebrew by the author. This passage also appears in my*Saving Israel*: *How the Jewish People Can Win a War That May Never End* (Hoboken, NJ: Wiley, 2009), p.154.

[36] Jacob Blaustein, "The Voice of Reason: Address by Jacob Blaustein, President,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t the Meeting of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April 29, 1950,"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rchives*, http://www.ajcarchives.org/AJC_DATA/Files/507.PDF, p.11.[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Italics in original, p.9.

[37]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07), p.520.

[38] Ibid.

[39] Blaustein, "The Voice of Reason," p.11. Italics original.

[40] Ibid., p.10. Italics original.

[41]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79.

第十章

[1]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74.

[2] 关于以色列人死亡人数存在很大争议。马丁·吉尔伯特认为967名以色列人死于这些袭击。（Martin Gilbert, *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58.）但本尼·莫里斯说这个数字"纯粹是胡说"。（Benny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Arab Infiltration*, *Israeli Retaliation*, *and the Countdown to the Suez Wa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1.）保守估计有几百人。

[3] Morris, *Israel'sBorderWars*, *1949—1956*, KindleEdition, Locations 3037—3049.

[4] Ibid., Locations 3123—3128.

[5]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p.289—290.

[6] S. Yizhar, trans. Nicolas de Lange and Yaacob Dweck, *Khirbet Khizeh*: *ANove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100.

[7] Ibid., pp.103—104.

[8] Noah Efron, "The Price of Return," *Ha'aretz* (November 23, 2008), http://www.haaretz.com/news/the-price-of-return-1.25803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9] Robert Slater, *Warrior Statesman*: *The Life of Moshe Day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149.

[10]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Locations 3037—3049.

[11] David Landau, *Arik*: *The Life of Ariel Shar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p.7.

[12]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292.

[13] Zvi Ganin, *An Uneasy Relationship*: *American Jewish Leadership and Israel, 1948—1957*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90—191.

[14] Landau, *Arik*, pp.26—27.

[15]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Locations 3293—3299.

[16] Translation from Mitch Ginsburg, "When Moshe Dayan Delivered the Defning Speech of Zionism," *Times of Israel* (April 26,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when-moshe-dayan-delivered-the-defning-speech-of-zionism/[Last viewed on May 8, 2016]. See also Aluf Benn, "Doomed to Fight" (May 9, 2011), *Ha'aretz*, http://www.haaretz.com/weekend/week-s-end/doomed-to-fght-1.360698[Lastviewed December 8, 2015].

[17] Ginsburg, "When Moshe Dayan Delivered the Defning Speech of Zionism." See also Chemi Shalev, "Moshe Dayan's Enduring Gaza Eulogy: This Is the Fate of Our Generation," *Ha'aretz* (July 20, 2014), http://www.haaretz.com/blogs/west-of-eden/.premium-1.606258[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8]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Locations 208—213.

[19] Ibid.

[20]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486.

[21] Ibid., p.487.

[22]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315.

[23] Ibid., p.317.

[24]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Location 7962.

[25] Michael B. Oren, "The Second War of Independence," *Azure*, No.27 (Winter 5767/2007) .

[26]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p.483.

[27]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p.326—327.

[28] Golda Meir, *My Lif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75), p.59.

[29] Yehuda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822—1829.

[30] Ibid.

第十一章

[1] David Mikics, “Holocaust Pulp Fiction,” *Tablet Magazine* (April 19, 2012),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arts-and-culture/books/97160/ka-tzetnik.

[2] Deborah E.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1), p.3.

[3] Ibid., pp.21—22.

[4] Ibid., pp.24—25.

[5] Ibid., p.29.

[6]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337.

[7] George Lavy, *Germany and Israel*: *Moral Debt and National Interest*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7.

[8] Menachem Begin, *White Nights*: *The Story of a Prisoner in Russi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9), p.265.

[9]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104.

[10]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280.

[11] Seth M. Siegel, *Let There Be Water*: *Israel's Solution for a Water-Starved World*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5), p.40.

[12] Seth M. Siegel, “50 Years Later, National Water Carrier Still an Inspiration,” *Ynetnews.com* (September 6,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28200,00.html[Last viewed on May 10, 2016].

[13] *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17 at 20: 15.

[14] Assaf Inbari, *HaBaita* (Tel Aviv: Yediyot Sefarim, 2009), pp.169—170, 178[Translations by Daniel Gordis].

[15] Elad Zeret, “Kastner's Killer: I Would Never Have Shot Him Today,” *Ynetnews.com* (October 29,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85767,00.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6] Yossi Klein Halevi, *Like Dreamers*: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Paratroopers Who Reunited Jerusalem and Divided a N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p.42.

[17]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pp.179—180.

[18]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p.34.

[19] David Ben-Gurion, "The Eichmann Case as Seen by Ben-Gurio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1960), http://timesmachine.nytimes.com/timesmachine/1960/12/18/99904385.html?pageNumber=182[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0]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p.36.

[21] Ibid., p.53.

[22] Ibid., p.78.

[23] Ibid.

[24] Ibid., pp.97—98.

[25] Ibid.

[26] "Planet Auschwitz" (filmed testimony of Yehiel De-Nur at Eichmann tri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0T9tZiKYl4.

[27] Oz Almog, *The Sab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84.

[28] Yair Lapid, trans. Evan Fallenberg, *Memories After My Death*: *The Joseph* (*Tommy*) *Lapid Story* (London: Elliott & Thompson Limited, 2011), pp.131—132.

[29] Ibid.

[30]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pp.80—81.

[31] Haim Hazaz, *The Sermon and Other Stories* (Jerusalem: Toby Press, 2005), p.237.

第十二章

[1] Jewish Agency, "The Massive Immigration," http://www.jewishagency.org/he/historical-aliyah/content/22097[Last viewed December 10, 2015][In Hebrew].

[2] 这首歌有很多翻译版本，这里是作者自己的译文。

[3] 2004年，拿俄米·舍莫尔临终前承认这首歌的旋律取自一首巴斯克摇篮曲。Tom Segev, "In Letter, Naomi Shemer Admitted Lifting'Jerusalem of Gold'Tune," *Ha'aretz* (May 5, 2005), http://www.haaretz.com/news/in-letter-naomi-shemer-admitted-lifting-jerusalem-of-gold-tune-1.157851[Last viewed December 8，2015].

[4] Yossi Klein Halevi, *Like Dreamers*: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Paratroopers Who Reunited Jerusalem and Divided a N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p.58.

[5] Ibid., p.31.

[6] Ibid., p.34.

[7] Michael B. Oren, *Six Days of War: June1967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3.

[8] Ibid.

[9] Ibid., p.368.

[10] Abba Eban, *Abba Eban: An Autobiography* (Lexington, MA: Plunkett Lake Press, 2015),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7223.

[11] Ibid., Location 7352.

[12] Oren, *Six Days of War*, p.133.

[13] Yehuda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p.148.

[14] Ibid.

[15] Oren, *Six Days of War*, p.132.

[16]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p.148.

[17] Oren, *Six Days of War*, p.134.

[18]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377.

[19] Avraham Avi-hai, “The POSTman Knocks Twice: Yitzhak Rabin, Man of Contradictions,”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11, 2014), http://www.jpost.com/Opinion/The-POSTman-Knocks-Twice-Yitzhak-Rabin-man-of-contradictions-375134[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20] Halevi, *Like Dreamers*, p.57.

[21] Samuel G. Freedman, *Jew vs. Je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merican Jew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p.164. Michael Oren, *Power, Faith, and Fantasy: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W.W. Norton, 2007), p.536.

[22] Ibid., p.319.

[23]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373.

[24]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98.

[25]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p.135.

[26] Tom Segev, trans. Jessica Cohen, *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5), p.15.我对此处希伯来语的英译略有修改。

[27]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378.

[28] 对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具体内容有不同的记录，读者可以比较沙皮拉、奥伦和吉尔伯特对该事件记录的差异。本书参考的是迈克尔·奥伦的版本。

[29]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126.

[30] Oren, *Six Days of War*, p.176.

[31]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pp.156—158.

[32] Halevi, *Like Dreamers*, p.69.

[33] Oren, *Six Days of War*, p.222.

[34] Ibid., p.88.

[35]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391.

[36] Ibid., p.392.

[37] Ibid.

[38] Oren, *Six Days of War*, p.307.

[39]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1967—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p.2.

[40] Michael Oren,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Azure* (Spring 5759/1999), p.49.

[41] Ibid., p.50.

[42] Ibid., p.51.

[43] *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19 at 20: 35.

[44] *Tekumah*, Episode 20 at 25: 45.

[45] Halevi, *Like Dreamers*, p.98.

第十三章

[1] Yossi Klein Halevi, *Like Dreamers: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Paratroopers Who Reunited Jerusalem and Divided a N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p.111.

[2]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1967—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p.86.

[3] Ibid., p.43.

[4] Ibid., p.85.

[5] Tsur Ehrlich, "Nathan the Wise," *Azure*, No.28 (Spring 5767/2007), http://azure.org.il/include/print.php?id=44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6] Halevi, *Like Dreamers*, p.119.

[7] Translation of Leibowitz's letter, which is reproduced on numerous websites,

by the author.

[8] Halevi, *Like Dreamers*, p.94.

[9] Ibid., p.152.

[10] Ibid., pp.140—142.

[11]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p.113.

[12] Halevi, *Like Dreamers*, pp.145—146.

[13] Ibid.

[14]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p.335.

[15]*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14 at 4: 50.

[16] Halevi, *Like Dreamers*, pp.96—97.

[17] Ibid., p.101.

[18] 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19]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393.

[20]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pp.61—62.

[21] Ghassan Kanafani, *Palestine's Children*: *Returning toHaifa and Other Stor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p.151.

[22] 网上有哈马斯宪章不同的翻译版本，本书参考的是犹太虚拟图书馆（Jewish Virtual Library）的译本。

[23] Mahmoud Darwish, “Identity Card,” http://www.barghouti.com/poets/darwish/bitaqa.asp.

[24] “The Khartoum Resolutio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Israel (September 1, 1967), http://www.mfa.gov.il/mfa/foreignpolicy/peace/guide/pages/the%20khartoum%20resolutions.aspx[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第十四章

[1]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423.

[2]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744.

[3] David Landau, *Arik*: *The Life of Ariel Shar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p.75.

[4] Ze'ev Schiff, *A History of the Israeli Army*: *1874 to the Present* (London: Macmillan, 1985), p.246.

[5]*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9 at 36: 20.

[6]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7794—7795.

[7]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p.748.

[8]*Tekumah*, Episode 9 at 43: 18.

[9] William B. Quandt, *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1967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5), p.101.

[10] "Kissinger and Ismail Conduct Secret Meetings," Center for Israel Education, http://israeled.org/kissinger-ismail-conduct-secret-meetings/[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1] Quandt, *Peace Process*, p.455.

[12] Mordechai Bar-On, *Moshe Dayan*: *Israel's Controversial Hero*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56.

[13]*Tekumah*, Episode 10 at 8: 07.

[14] Mitch Ginsburg, "Mossad's Tip-Off Ahead of Yom Kippur War Did Not Reach Prime Minister, Newly Released Papers Show," *Times of Israel* (September 20, 2012), http://www.timesofisrael.com/newly-released-papers-detail-depth-of-mishandling-of-yom-kippur-war-warnings/[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5]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432.

[16] Landau, *Arik*, p.98.

[17]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p.416.

[18]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330.

[19]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440.

[20] Herbert Druks, *The Uncertain Alliance*: *The U. S. and Israel from Kennedy to the Peace Proces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p.113.

[21] Amir Oren, "CIA Report on Yom Kippur War: Israel Had Nuclear Arsenal," *Ha'aretz* (February 13, 2013),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cia-report-on-yom-kippur-war-israel-had-nuclear-arsenal.premium-1.501101[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2]*Tekumah*, Episode 10 at 32: 00.

[23]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442.

[24] Abraham Rabinovich, *The Yom Kippur War*: *The Epic Encounte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4), p.497.

[25]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460.

[26] Motti Regev and Edwin Seroussi, *Popular Music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Isra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67.

[27] Translation from the Hebrew by the author.

[28] Rabinovich, *The Yom Kippur War*, p.499.

[29] Robert Slater, *Rabin*: 20*Years After* (Israel: KIP-Kotari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

[30]*Tekumah*, Episode 20 at 37: 55.

[31]*Tekumah*, Episode 7 at 45: 30.

[32] Assaf Inbari, *HaBaita* (Tel Aviv: Yediyot Sefarim, 2009), p.242[Translations by Daniel Gordis].

[33] 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算是例外，以色列军队和叙利亚军队进行了正面交锋，但没有发展成为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34]*Tekumah*, Episode 13 at 11: 40.

[35] Gil Troy, *Moynihan's Moment*: *America's Fight Against Zionism as Ra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8.

第十五章

[1] Yehuda Avner, *The PrimeMinisters*: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p.606.

[2] Ben Shalev, “Zohar Argov's Flower That Launched a Million Cassettes,” *Ha'aretz* (May 4, 2012), http://www.haaretz.com/weekend/week-s-end/zohar-argov-s-flower-that-launched-a-million-cassettes-1.42823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3] Nir Hasson, “Jerusalem Neighborhood to Name Streets in Honor of Mizrahi Black Panthers,” *Ha'aretz* (June 14, 2011), http://www.haaretz.com/jerusalem-neighborhood-to-name-streets-in-honor-of-mizrahi-black-panthers-1.369313[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4] Albert Einstein, “New Palestine Poetry: Visit of Menachem Begin and Aims of Political Movement Discusse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48), https://archive.org/details/AlbertEinstein Letter To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48.

[5] 在第五届议会上，贝京提出应该逐步解除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生活区的军事法。他认为该法律侵犯了个人自由权，也违反了以色列国家的属性。他强调：“一个自由国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军事指挥官管理军人，平民管理平民。”Avi Shilon, trans. Danielle Zilberberg and Yoram Sharett, *Menachem Begin*：*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1.

[6]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88.

[7] Menachem Begin, trans. Shmuel Katz, ed. Ivan M. Greenberg, *The Revolt*: *Story of the Irgun* (Bnei-Brak, Israel: Steimatzky Group, 1952), p.78.

[8] Ned Temko, *To Win or to Die*: *A Personal Portrait of Menachem Begi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7), p.146.

[9]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57.

[10] Assaf Inbari, *HaBaita* (Tel Aviv: Yediyot Sefarim, 2009), p.248[Translations by Daniel Gordis].

[11] Israeli Broadcasting Authority (IBA), May 30, 1977. The Hebrew can be translated, equally correctly, either as “in the style of a good Jew,” or “in a good Jewish style.”

[12] Benjamin Beit Halachmi, *Despair and Deliverance*: *Private Salvation in Contemporary Israe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55.

[13] Gordis, *Menachem Begin*, p.159.

[14]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489.

[15]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367.

[16] Gordis, *Menachem Begin*, p.171.

[17] Ofer Grosbard, *Menachem Begin*: *The Absent Leader* (Haifa: Strategic Research and Policy Center, National Defense College, IDF, 2007), p.271.

[18] Mohamed Fadel Fahmy, “30 Years Later, Questions Remain Over Sadat Killing, Peace with Israel,” CNN (October 7, 2011), http://edition.cnn.com/2011/10/06/world/meast/egypt-sadat-assassination/[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9] 讽刺的是，大多数反对者都不是加沙居民。

[20]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1967—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p.361.

[21] Temko, *To Win or to Die*, p.198.

[22] Hal Brands and David Palkki, “Saddam, Israel, and the Bomb: Nuclear Alarmism Justifi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1 (Summer 2011), p.133.

[23] Ibid., p.146.

[24] “Israel's Illusion,” *New York Times* (June 9, 1981), http://www.nytimes.com/1981/06/09/opinion/israel-s-illusion.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5] Gordis, *Menachem Begin*, p.192.

[26] Joseph Kraft, “For Begin, the End? He Should Be Voted Out for Raid That Further Isolates Israel,”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1, 1981) .

[27]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87 (1981),”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36/a36r027.htm[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8] Moshe Fuksman-Sha'al, ed., trans. Ruchie Avital, “Dick Cheney Letter to Menachem Begin,” *Israel's Strike Against the Iraqi Nuclear Reactor*7*June*1981 (Jerusalem: Menachem Begin Heritage Center, 2003), p.77.

[29] Dan Raviv and Yossi Melman, *Spies Against Armageddon*: *The Mossad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rael: Yediot Ahronoth Books, 2012), p.334.

[30] Gadi Bloom and Nir Hefez, *Ariel Sharon*: *A Lif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p.213.

[31] “Middle East: A Sabbath of Terror,” *Time* (March 20, 1978),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19454,00.html.

[32]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p.606.

[33] Temko, *To Win or to Die*, pp.283—284.

[34] Thomas L.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9), p.162.

[35]*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20 at 45: 50. The speaker was Letty Cottin Pogrebin, editor of*Ms.*Magazine.

[36] Gadi Bloom and Nir Hefez, *Ariel Sharon*: *A Lif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pp.246—247.

[37] Matti Friedman, *Pumpkin Flowers*: *A Soldier's Story* (Chapel Hill, NC: Algonquin, 2016), p.188.

[38] 不少人提到以色列发射了照明弹，比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参见Thomas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p.161。

[39] Nirit Anderman, “Israeli Film on Lebanon War 'Waltz with Bashir' Shown in Beirut,” *Ha'aretz* (January 21, 2009), http://www.haaretz.com/news/israeli-film-on-lebanon-war-waltz-with-bashir-shown-in-beirut-1.268524[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40] Dan Merido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anuary 2, 2013.

[41] Michael B. Oren, *Ally*: *My Journey Across the American-Israeli Divi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27.

[42] Shilon, trans. Zilberberg and Sharett, *Menachem Begin*: *A Life*, pp.374—375.

第十六章

[1]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p.276.

[2] Ibid., p.278.

[3] Nathan Brown, Amr Hamzawy, and Marina Ottaway, “Islamist Movements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the Arab World: Exploring the Gray Zones,” *Carnegie Papers*, No.67 (March 2006),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67.Brown.FINAL.pdf [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4] The Hamas Charter is widely available online. See, for example, http://www.acpr.org.il/resources/hamascharter.html.

[5]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3929—13937.

[6]*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18 at 3: 50.

[7]*Tekumah*, Episode 18 at 16: 25.

[8]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p.533—534.

[9]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Location 6313.

[10] Ibid., Locations 14578—14596. See also http://www.nytimes.com/1988/08/01/world/hussein-surrenders-claims-west-bank-plo-us-peace-plan-jeo-pardy-internal-ten-sions.html.

[11]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Locations 14501—14503.

[12]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p.538—539.

[13] Joel Greenberg, “Yeshayahu Leibowitz, 91, Iconoclastic Israeli Think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1994), http://www.nytimes.com/1994/08/19/obituaries/yeshayahu-leibowitz-91-iconoclastic-israeli-thinker.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4] David Ellenson and Daniel Gordis, ed. Aron Rodrigue and Steven J. Zipperstein, *Pledges of Jewish Allegiance: Conversion, Law, and Policymaking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Orthodox Respons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51—158.

[15] Howard M. Lenhoff and Jerry L. Weaver, *Black Jews, Jews, and Other Heroes: How Grassroots Activism Led to the Rescue of the Ethiopian Jews*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House, 2007), pp.42—43.

[16]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p.144—145.

[17]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552.

[18] Jeff Jacoby, “Would Rabin Have Pulled the Plug on a 'Peace Process' That Failed?” *Boston Globe* (October 22, 2015), http://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0/22/would-rabin-have-pulled-plug-peace-process-that-fai-led/fgHF1Y8bkh7leSbtgHfleL/story.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9] Moshe Ya'alon, *The Longer Shorter Way* (Tel Aviv: Yedioth Ahronoth Books and Chemed Books, 2007) .p.82[In Hebrew]. Also discussed in English in David M. Weinberg, “Yitzhak Rabin Was 'Close to Stopping the Oslo Process,'”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7, 2013), http://www.jpost.com/Opinion/Columnists/Yitzhak-Rabin-was-close-to-stopping-the-Oslo-process-329064.

[20] Weinberg, “Yitzhak Rabin Was 'Close to Stopping the Oslo Process.'”

[21]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p.569—570.

[22] Ibid., p.572.

[23] Ibid., p.584.

[24]*Tekumah*, Episode 22 at 00: 20.

[25] Ibid., p.587.

[26] Ibid.

第十七章

[1] King Hussein's eulogy at Rabin's funeral, November 6, 1995. Transcript available at http://www.mfa.gov.il/mfa/mfa-archive/1995/pages/rabin%20funeral-%20eulogy%20by%20king%20hussein.aspx.

[2] “Clinton to Lead U. S. Delegation,” CNN (November 5, 1995), http://edition.cnn.com/WORLD/9511/rabin/clinton/index.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3] Jeff Jacoby, “Would Rabin Have Pulled the Plug on a 'Peace Process' That Failed?” *Boston Globe* (October 22, 2015), http://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0/22/would-rabin-have-pulled-plug-peace-process-that-fai-led/fgHF1Y8bkh7leSbtgHfleL/story.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4]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593.

[5] Matti Friedman, *Pumpkin Flowers* (Chapel Hill: Algonquin Books, 2016), p.155.

[6] Ibid.

[7] Ibid., p.181.

[8] “Dennis Ross and Gidi Grinstein, Reply by 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0, 2001),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1/sep/20/camp-david-an-exchange/[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9] 对于谈判崩溃的原因，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在以色列人中，有些学者也不接受Ross-Barak的解释，而是认为巴拉克负有责任。

[10] Colin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83.

[11]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5878—15883.

[12] Dan Rabinowitz, "October 2000, Revisited," *Ha'aretz* (October 19, 2004),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opinion/october-2000-revisited-1.137855[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3] Jack Khoury, "Israeli Arabs Mark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October 2000 Riots," *Ha'aretz* (January10,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678344[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4] Jewish National Fund, Tree Planting Center, http://www.jnf.org/support/tree-planting-center/.

[15] Bill Clinton, *My Life* (New York: Vintage Press, 2005), p.946.

[16] Ibid., pp.296—297.

[17] Dennis Ross, *Doomed to Succeed: The U. S. -Israel Relationships from Truman to Obam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p.297.

[18] II Samuel 2: 26.

[19] Benny Morris, "Peace? No Chance," *Guardian* (February 21, 2002),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2/feb/21/israel2[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20] Ross, *Doomed to Succeed*, p.312.

[21] Interview between Rachel Greenspan and Yossi KleinHalevi, December 15, 2015.

[22] Benny Morris, "Exposing Abbas," *National Interest* (May 19, 2011),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exposing-abbas-5335[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23]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627.

[24]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PM Sharon and President Bu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Israel website (April 14, 2004), http://www.mfa.gov.il/mfa/foreignpolicy/peace/mfadocuments/pages/exchange%20of%20letters%20sharon-bush%2014-apr-2004.aspx[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25]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637.

[26] Ibid., p.638.

[27] Yagil Levy, *The Hierarchy of Military Death*, Open University of Israel (Lisbon, April 14—19, 2009), https://ecpr.eu/Filestore/PaperProposal/2cfd87af-cab2-4374-b84d-eb03fbbc3cd1.pdf.11.

[28]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Twelve, 2012), p.15.

[29] The World Bank, "GDP Growth (annual%),"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page=1.

[30] Senor and Singer, *Start-Up Nation*, p.11.

[31] Ibid., pp.11, 13.

[32] Ibid., pp.11—12.

[33] Ibid., p.129.

[34] Ibid., p.181.

[35] Ibid., p.182.

[36] Manfred Gerstenfel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Delegitimization of Israel and the Jews, and the Growth of New Anti-Semitism* (Jerusalem: JCPA, 2015), p.250.

[37] Daniel Freedman, "The World's Deadly Obsession with Israel," *Forbes* (June 24, 2010), http://www.forbes.com/2010/06/23/israel-hamas-middle-east-opinions-columnists-daniel-freedman.html.

[38] Gerstenfel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pp.13—14.

[39] Joshua Muravchik, "Muslims and Terror: The Real Story," *Commentary* (February 1, 2015),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muslims-and-terror-the-real-story-1/[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40] "Human Rights Actions," *Human Rights Voices*, http://www.humanrightsvoices.org/EYEontheUN/priorities/actions/body/?ua=1&ya=1&sa=1&tp=1[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41] Michal Navoth, "Israel'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Is There Hope for Chang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ffairs*, No.601 (May—June 2014), http://jcpa.org/article/israels-relationship-un-human-rights-council/[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42] Irwin Cotler, "Israel and the United Nations," *Jerusalem Post* (August 15, 2013), http://www.jpost.com/Opinion/Op-Ed-Contributors/Israel-and-the-United-Nations-323252[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43] Gerstenfel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p.254.

[44] Ibid.

[45] Richard Kemp, “The U. N.'s Gaza Report Is Flawed and Dangerous,” http://www.nytimes.com/2015/06/26/opinion/the-uns-gaza-report-is-flawed-and-dangerous.html.

[46] Ibid.

[47] Samantha Power, *Remarks at the Israel Middle East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Building a More Model UN,”* transcript (February 15, 2016), http://usun.state.gov/remarks/7138[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48] Robert L. Bernstein, “Rights Watchdog, Lost in the Midea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1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0/20/opinion/20bernstein.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49] The Forward and Nathan Guttman, “Want to Delegitimize Israel? Be Careful Who You Mess With,” *Ha'aretz* (April 13, 2010), http://www.haaretz.com/news/want-to-delegitimize-israel-be-careful-who-you-mess-with-1.284184[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50] Gerstenfel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p.252.

[51] Aron Heller, “Western Europe Jewish Migration to Israel Hits All-Time High,” AssociatedPress (January14, 2016),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164bbc1445aa42fc883ee85e4439523a/western-europe-jewish-migration-israel-hits-all-time-high[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52] David Makovsky, “The Silent Strike: How Israel Bombed a Syrian Nuclear Installation and Kept It Secret,” *New Yorker* (September 17, 2012),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2/09/17/the-silent-strike[LastviewedJanuary10, 2016].

[53]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635.

[54] “PM Says Iran's Chief of Staff Vowed Sunday to Eliminate Israel,” *Times of Israel* (May 21, 2012), http://www.timesofisrael.com/pm-says-irans-chief-of-staff-vowed-sunday-to-eliminate-israe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55] Henry Kissinger and George P. Shultz, “The Iran Deal and Its Consequence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7,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iran-deal-and-its-consequences-1428447582[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56] Michael B. Oren, *Ally*: *My Journey Across the American-Israeli Divi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360.

[57] Ibid., p.183.

第十八章

[1] Rami Kleinstein, “Small Gifts,” on the album of the same name. First verse. Translation is mine.

[2] “Israel Election Updates Yesh Atid to Announce Openly Gay Candidate,” *Ha'aretz* (January 26,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elections/1.639040[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3] This translation of Calderon's speech is taken from Ruth Calderon, “The Heritage of All Israel,” *Jewish Week* (February 14, 2013), http://www.thejewishweek.com/editorial-opinion/opinion/heritage-all-israel#tz8I4YxxRBluZ53i.99[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4] The phrase is Paul Cowan's. Paul Cowan, *An Orphan in History*: *One Man's Triumphant Search for His Jewish Roots* (Woodstock, VT: Jewish Lights Publishing, 2002) .

[5] Yair Lapid, trans. Evan Fallenberg, *Memories After My Death*: *The Joseph* (*Tommy*) *Lapid Story* (London: Elliott & Thompson Limited, 2011), p.23.

[6] Malka Shaked, *I'll Play You Forever*: *The Bible in Modern Hebrew Poetry* (Tel Aviv: Yediot Achronot, 2005) .

[7] Ruth Gavison, “No 'Israeliness' Instead of 'Jewishness,'” *Liberal Magazine*, Vol.15 (January2015), http://theliberal.co.il/ruth-gavison-israeliness-instead-jewishness/[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8] Meir Buzaglo, *Safa La-Ne'emanim*[Hebrew].*A Language for the Faithful*: *Reflection on Tradition* (Tel Aviv and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and Mandel Foundation, 2009) .

[9] Robert Alter, ed., *The Poetry of Yehuda Amichai*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p.299.

[10] Elli Fischer, “Why I Defy the Israeli Chief Rabbinate,” *Jewish Review of Books* (Winter 2016), https://jewishreviewofbooks.com/articles/1917/why-i-defy-the-israeli-chief-rabbinate/.

[11] Akiva Eldar, “Border Control Getting in a State Over the UN Vote,” *Ha'aretz* (September13, 201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features/border-control-getting-in-a-state-over-the-un-vote-1.384135[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12] “Israel's Haredi Population: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Myers-JDC-Brookdale (October 2015), http://brookdale.jdc.org.il/_Uploads/dbsAttachedFiles/Israels-Haredi-Population-2015-10-FINAL.pdf[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3] Gwen Ackerman and Alisa Odenheimer, “Israel Prosperity Seen Unsustainable as Haredim Refuse to Work,” *Bloomberg Business* (August 2, 2010),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0-08-01/israel-prosperity-seen-unsustainable-as-haredim-refusal-to-work-takes-tol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4] Jessica Steinberg, “TVshow 'Shtisel' Subtly Changes Ultra-Orthodox Perceptions,”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13,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tv-show-shtisel-subtly-changes-ultra-orthodox-perceptions/[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15] Noah Feldman, “Violence in the Name of the Messiah,” *Bloomberg View* (November 1, 2015), http://www.bloombergview.com/articles/2015-11-01/violence-in-the-name-of-the-messiah[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6] The Forward and Daniel Estrin, “The King's Torah: A Rabbinic Text or a Call to Terror?” *Ha'aretz* (January 22, 2010), http://www.haaretz.com/jewish/2.209/the-king-s-torah-a-rabbinic-text-or-a-call-to-terror-1.261930[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7] Jeremy Sharon, “'Torat Hamelech' Authors Will Not Be Indicted,” *Jerusalem Post* (May 28, 2012),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A-G-Torat-Hamelech-authors-will-not-be-indicted[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结语

[1]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p.419.

[2] “Israel Turns 68 with 8.5 Million People, 10 Times More Than in 1948,” *Times of Israel* (May 9,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turns-68-with-8-5-million-people-10-times-more-than-in-1948/.

[3] Barbara Tuchman, “Israel: Land of Unlimited Impossibilities,” in*Practicing History*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1), p.134.

[4]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Biden: The Endur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March 11, 2010),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vice-president-biden-enduring-partnership-between-united-states-and-israe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5] Charles Krauthammer, “At Last, Zion,” *Jewish Ideas Daily* (September 21, 2012), http://www.jewishideasdaily.com/5057/features/at-last-zion/[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6] Jewish National Fund, “Forestry & Green Innovations,” http://www.jnf.org/work-we-do/our-projects/forestry-ecology/[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7] Richard Kemp, “The U. N.'s Gaza Report Is Flawed and Dangerous,” *New York Times* (June 25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5/06/26/opinion/the-uns-gaza-report-is-flawed-and-dangerous.html; Samantha Power, *Remarks at theIsrael*

Middle East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Building a More Model UN," transcript (February 15, 2016), http://usun.state.gov/remarks/7138[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8]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2015,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ARWU2015.html[Last viewed August 10, 2016].

[9] "Speech by Jimmy Carter on White House Lawn, Washington, D. C., July 19, 1977." Cited in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143.

[10] "Speech by Menachem Begin on White House Lawn, Washington, D. C., July 19, 1977." Cited in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143.

[11] Martin Kramer, "Fouad Ajami Goes to Israel," *Mosaic* (January 8, 2015), http://mosaicmagazine.com/observation/2015/01/fouad-ajami-goes-to-israel/ [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12] Fouad Ajami, "A Reality Check as Israel Turns 60,"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7, 2008), http://www.usnews.com/opinion/fajami/articles/2008/05/07/a-reality-check-as-israel-turns-60[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13] Tsur Ehrlich, "Nathan the Wise," *Azure*, No.28 (Spring 5767/2007), p.77, http://azure.org.il/include/print.php?id=445[Last viewed May 1, 2016].

引用文献

A. A. P. “U. N. O. Passes Palestine Partition Plan.” *Morning Herald* (December 1, 1947), http://trove.nla.gov.au/ndp/del/article/134238148[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About the Organization.” HaShomer HaHadash website, http://www.shomer-israel.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0&Itemid=62[Translation by Daniel Gordis][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Above and Beyond. Playmount Productions and Katahdin Productions, produced by Nancy Spielberg, 2015.

Ackerman, Gwen, and Alisa Odenheimer. “Israel Prosperity Seen Unsustainable as Haredim Refuse to Work.” *Bloomberg Business* (August 2, 2010),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0-08-01/israel-prosperity-seen-unsustainable-as-haredim-refusal-to-work-takes-tol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Ahad Ha'am. “The Jewish State and the Jewish Problem.” In*The Zionist Idea*, ed. Arthur Hertzberg.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Ajami, Fouad. “A Reality Check as Israel Turns 60.”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7, 2008), http://www.usnews.com/opinion/fajami/articles/2008/05/07/a-reality-check-as-israel-turns-60[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Almog, Oz. *The Sab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Alon, Mati. *Holocaust and Redemption.* Victoria, BC: Trafford Publishing, 2013.

Alpert, Pinhas, and Goren Dotan, eds. *Diary of a Muchtar in Jerusalem: The History of the Beit Yisrael Neighborhood and its Surroundings in the Writings of Rabbi Moshe Yekutiel Alpert* (*1938—1952*). (Ramat

Gan, Israel: Bar Il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In Hebrew].

Alter, Robert, ed. *The Poetry of Yehuda Amichai.*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Anderman, Nirit. “Israeli Film on Lebanon War 'Waltz with Bashir'Shown in Beirut.” *Ha'aretz* (January21, 2009), http://www.haaretz.com/news/israeli-film-on-lebanon-war-waltz-with-bashir-shown-in-beirut-1.268524[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Asher, Tali. “The Growing Silence of the Poetess Rachel.” In*Jewish Women in Pre-State Israel*: *Life History*, *Politics*, *and Culture*, ed. Ruth Kark, Margarit Shilo, and Galit Hasan-Rokem.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Auerbach, Jerold S. *Brothers at War*: *Israel and the Tragedy of the*Altalena. New Orleans: Quid Pro Books, 2011.

Avi-hai, Avraham. “The POSTman Knocks Twice: Yitzhak Rabin, Man of Contradictions.”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11, 2014), http://www.jpost.com/Opinion/The-POSTman-Knocks-Twice-Yitzhak-Rabin-man-of-contradictions-375134[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Avineri, Shlomo, trans. Haim Watzman. *Herzl*: *Theodor Herzl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Jewish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8.

Avner, Yehuda. *The Prime Ministers*: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Baker, Amb. Alan. “The Legal Basis of Israel's Rights in the Disputed Territories.”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January 8, 2013), http://jcpa.org/ten-basic-points-summarizing-israels-rights-in-judea-and-samaria/[Last viewed May 1, 2016].

Balfour, Arthur James. “Balfour Declaration.” *Avalon Project* (1917),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balfour.asp[Last viewed May 1, 2016].

Bar-On, Mordechai. *Moshe Dayan*: *Israel's Controversial Hero.*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Bar-Zohar, Michael, trans. Peretz Kidron. *Ben-Gurion: A Biography, The New Millennium Edition.* Israel: Weidenfeld Nicolson, 2013.

Begin, Menachem. *White Nights: The Story of a Prisoner in Russi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9.

Begin, Menachem, trans. Samuel Katz, ed. Ivan M. Greenberg. *The Revolt: Story of the Irgun.* Bnei-Brak, Israel: Steimatzky Group, 1952.

Bein, Alex, trans. Maurice Samuel. *Theodor Herzl: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0.

Ben-Gurion, David. “The Eichmann Case as Seen by Ben-Gurio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1960), http://timesmachine.nytimes.com/timesmachine/1960/12/18/99904385.html?pageNumber=182[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Ben-Gurion, David. *Like Stars and Dust: Essays from Israel's Government Year Book.* Ramat Gan, Israel: Masada Press, 1976.

Benn, Aluf. “Doomed to Fight.” *Ha'aretz* (May 9, 2011), http://www.haaretz.com/weekend/week-s-end/doomed-to-fight-1.360698[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Ben Hurin, Yitzhak. “Horrifying Details of Murder of Athletes in Munich Revealed: 'They Were Tortured in Front of Their Friends.'” *Ynet. co. il* (December 1, 2015), http://www.ynet.co.il/articles/0,7340,L-4733681,00.html[Last viewed May 1, 2016].

Ben-Sasson, Hayim, ed. *A History of theJewish Peop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Berdyczewski, Micah Joseph. “Wrecking and Building.” In*The Zionist Idea*, ed. Arthur Hertzberg.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Berlovitz, Yaffah. *Inventing aLand, Inventing aPeople.* TelAviv: Hotza'at HaKibbutz HaMeuchad, 1996.

Bernstein, Robert L. “Rights Watchdog, Lost in the Midea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2009), http://

www.nytimes.com/2009/10/20/opinion/20bernstein.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Bew, John. "The Tragic Cycle: Western 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Statesman* (August 21, 2014), http://www.newstatesman.com/world-affairs/2014/08/tragic-cycle-western-powers-and-middle-east[Last viewed May 1, 2016].

Biden, Joe.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Biden: The Endur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March 11, 2010),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vice-president-biden-enduring-partnership-between-united-states-and-israe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Billings, Lee. " 'Beyond: Our Future in Space,' by Chris Impey."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5/03/books/review/beyond-our-future-in-space-by-chris-impey.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Bishop, Patrick. *The Reckoning*: *Death and Intrigue in the Promised Land, A True Detective Sto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4.

Blaustein, Jacob. "The Voice of Reason: Address by Jacob Blaustein, President,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t the Meeting of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April 29, 1950,"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rchives*, http://www.ajcarchives.org/AJC_DATA/Files/507.PDF[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Bloom, Cecil. "Sir Mark Sykes: British Diplomat and a Convert to Zionism." *Jewis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43 (2011).

Bloom, Gadi, and NirHefez. *Ariel Sharon*: *A Lif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Bluwstein, Rachel. "Perhaps."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Vol. 3, Nos. 3and 4 (1996), http://www.pij.org/details.php?id=536[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Borden, Sam. "Long-Hidden Details Reveal Cruelty of 1972 Munich

Attack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12/02/sports/long-hidden-details-reveal-cruelty-of-1972-munich-attackers.html.

Brands, Hal, and David Palkki. "Saddam, Israel, and the Bomb: Nuclear Alarmism Justif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Summer 2011).

Brown, Nathan, Amr Hamzawy, and Marina Ottaway. "Islamist Movements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the Arab World: Exploring the Gray Zones." *Carnegie Papers*, No. 67 (March 2006),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67.Brown.FINAL.pdf[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Buzaglo, Meir. *Safa La-Ne'emanim*[Hebrew]. *A Language for the Faith ful*: *Reflection on Tradition.* Tel Aviv and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and Mandel Foundation, 2009.

Calderon, Ruth. "The Heritage of All Israel." *Jewish Week* (February 14, 2013), http://www.thejewishweek.com/editorial-opinion/opinion/heritage-all-israel#tz8I4-YxxRBluZ53i.99[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Churchill, Winston. "MIT Mid-Century Convocation, March 31, 1949." *MIT Institute Archives*, https://libraries.mit.edu/archives/exhibits/midcentury/mid-cent-churchill.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CIA Report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Copy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Clinton to Lead U. S. Delegation." CNN (November 5, 1995), http://edition.cnn.com/WORLD/9511/rabin/clinton/index.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Clinton, Bill. *My Life.* New York: Vintage Press, 2005.

Cohel, Eric. "The Spirit of Jewish Conservatism." *Mosaic*, http://mosaicmagazine.com/essay/2015/04/the-spirit-of-jewish-conservatism/.

Cohen, Eliezer, trans. Yonatan Gordis. *Israel's Best Defense*: *The First*

Full Story of the Israeli Air Force. New York: Orion Books, 1993.

Cohen, Hillel, trans. Haim Watzman. *Year Zero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29.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5.

Cotler, Irwin. “Israel and the United Nations.” *Jerusalem Post* (August 15, 2013), http://www.jpost.com/Opinion/Op-Ed-Contributors/Israel-and-the-United-Nations-323252[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Cowan, Paul. *An Orphan in History*: *One Man's Triumphant Search for His Jewish Roots.* Woodstock, VT: Jewish Lights Publishing, 2002.

Cunliffe, Barry, and Jerome Murphy-O'Connor. *The Holy Land*: *An Oxford Archaeological Guide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7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Darwish, Mahmoud. “Identity Card,” 1964. http://www.barghouti.com/poets/darwish/bitaqa.asp[Last viewed May 1, 2016].

David, Assaf, and Asaf Siniver, eds. “Jordan's War That Never Was.” In*The Yom KippurWar*: *Politics*, *Legacy*, *Diplomacy*.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3.

“Dennis Ross and Gidi Grinstein, Reply by 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0, 2001),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1/sep/20/camp-david-an-exchange/[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Dermer, Ron. “Israeli Ambassador: The Four Major Problems with the Iran Deal.” *Washington Post* (July 14,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a-bad-deal-today-a-worse-deal-tomorrow/2015/07/14/5d34ba00-2a39-11e5-a250-42bd812efc09_story.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Displacement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1948—2012.” *Justice for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http://www.justiceforjews.com/main_facts.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Dowty, Alan. “Much Ado About Little: Ahad Ha'Am's 'Truth from Eretz Yisrael,' Zionism, and the Arabs.” *Israel Studies*, Vol. 5, No. 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Drukker, Tamar S. “ 'I Am a Civil War' : The Poetry of Haim Gouri.” In*Warfare and Poetry in the Middle East*, ed. Hugh Kennedy. London: I. B. Tauris, 2013.

Druks, Herbert. *The Uncertain Alliance*: *The U. S. and Israel from Kennedy to the Peace Proces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Dunstan, Simon. *The Yom Kippur War*: *The Arab-Israeli War of*1973.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7.

Eban, Abba. *Abba Eban*: *An Autobiography*. Lexington, MA: Plunkett Lake Press, 2015.

Efron, Noah. “The Price of Return.” *Ha'aretz* (November 23, 2008), http://www.haaretz.com/news/the-price-of-return-1.25803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Eglash, Ruth. “Ten Years On, Pain of Dolphinarium Bombing Still Strong.” *Jerusalem Post* (May 29, 2011),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Ten-years-on-pain-of-Dolphinarium-bombing-still-strong[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Ehrlich, Tsur. “Nathan the Wise.” *Azure*, No. 28 (Spring 5767/2007), http://azure.org.il/include/print.php?id=445.

Eldar, Akiva. “Border Control Getting in a State Over the UN Vote.” *Ha'aretz* (September 13, 201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features/border-control-getting-in-a-state-over-the-un-vote-1.384135[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Eliot, George. *Daniel Deronda.* Introduction by Edmund White, Notes by Dr. Hugh Osborn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2.

Ellenson, David, and Daniel Gordis. *Pledges of Jewish Allegiance*: *Conversion, Law, and Policymaking in Nineteenth-and Twentieth-Century Orthodox Responsa.* Stanford Studies in Jewish History and Culture, edited by Aron Rodrigue and Steven J. Zipperstei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Elon, Amos. *The Pity of It All*: *A Portrait of the German-Jewish Epoch*

1743—1933. New York: Picador, 2002.

Epstein, Lawrence. *The Dream of Zi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6.

Eshkoli-Wagman, Hava. “Yishuv Zionism: Its Attitude to Nazism and the Third Reich Reconsidered.” *Modern Judaism*, Vol. 19, No. 1 (February 1999).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PM Sharon and President Bu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Israel website (April14, 2004), http://www.mfa.gov.il/mfa/foreignpolicy/peace/mfadocuments/pages/exchange%20of%20letters%20sharonbush%2014-apr-2004.aspx[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Fahmy, Mohamed Fadel. “30 Years Later, Questions Remain Over Sadat Killing, Peace with Israel.” CNN (October 7, 2011), http://edition.cnn.com/2011/10/06/world/meast/egypt-sadat-assassination/[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Fallows, James. “Who Shot Muhammed Al-Dura.” *Atlantic* (June 2003),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3/06/who-shot-mohammed-al-dura/302735/[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Faris, Hani A. “Israel Zangwill's Challenge to Zionism.”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4, No. 3 (1975).

Feldestein, Ariel. “One Meeting—Many Descriptions: The Resolu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Israel Studies Forum*, Vol. 23, No. 2 (Winter 2008), p. 104.

Feldman, Noah. “Violence in the Name of the Messiah.” *Bloomberg View* (November 1, 2015), http://www.bloombergview.com/articles/2015-11-01/violence-in-the-name-of-the-messiah[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5, 000%Growth in Army Exemptions for Yeshiva Students Since 1948.” Hiddush (February 8, 2012), http://hiddush.org/article-2338-0-15000_Growth_in_army_exemptions_for_yeshiva_students_s viewed December 9, 2015].

Fischer, Elli. “Why I Defy the Israeli Chief Rabbinate.” *Jewish Review of Books* (Winter2016), https://jewishreviewofbooks.com/articles/1917/why-i-defy-the-israeli-chief-rabbinate/.

Florsheim, Ella. “Giving Herzl His Due.” *Azure*, No. 21 (Summer 5765/2005).

“Forestry & Green Innovations.” Jewish National Fund, http://www.jnf.org/work-we-do/our-projects/forestry-ecology/[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The Forward and Daniel Estrin. “The King's Torah: A Rabbinic Text or a Call to Terror?” *Ha'aretz* (January 22, 2010), http://www.haaretz.com/jewish/2.209/the-king-s-torah-a-rabbinic-text-or-a-call-to-terror-1.261930[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The Forward and Nathan Guttman. “Want to Delegitimize Israel? Be Careful Who You Mess With.” *Ha'aretz* (April 13, 2010), http://www.haaretz.com/news/want-to-delegitimize-israel-be-careful-who-you-mess-with-1.284184[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Frantz, Douglas, and Catherine Collins. *Death on the Black S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Struma*and World War II's Holocaust at Sea*.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3.

Frantzman, Seth J. “David Ben-Gurion, Israel's Segregationist Founder.” *Forward* (May18, 2015), http://forward.com/opinion/israel/308306/ben-gurion-israels-segregationist-founder/[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Freedman, Daniel. “The World's Deadly Obsession with Israel.” *Forbes* (June 24, 2010), http://www.forbes.com/2010/06/23/israel-hamas-middle-east-opinions-columnists-daniel-freedman.html.

Freedman, Samuel G. *Jew vs. Je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merican Jew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Friedman, Matti. “Mizrahi Nation.” *Mosaic* (June 1, 2014), http://mosaicmagazine.com/essay/2014/06/mizrahi-nation/[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Friedman, Matti. *Pumpkin Flowers.* Chapel Hill, NC: Algonquin Books,

2016.

Friedman, Thomas L.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9.

Friling, Tuvia, trans. Ora Cummings. *Arrows in the Dark*: *David Ben-Gurion, the Yishuv Leadership, and Rescue Attempts During the Holocaust*, Volume I.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5.

Fromkin, David.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9.

Frost, Robert. “The Death of the Hired Man.” (North of Boston, 1915), *Bartleby. com*, http://www.bartleby.com/118/3.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Fuksman-Sha'al, Moshe, ed., trans. Ruchie Avital. “Dick Cheney Letter to Menachem Begin.” *Israel's Strike Against the Iraqi Nuclear Reactor 7 June 1981*. Jerusalem: Menachem Begin Heritage Center, 2003.

Ganin, Zvi. *An Uneasy Relationship*: *American Jewish Leadership and Israel, 1948—1957*.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Gavison, Ruth. “No 'Israeliness' instead of 'Jewishness.'” *Liberal Magazine*, Vol. 15 (January 2015), http://theliberal.co.il/ruth-gavison-israeliness-instead-jewishness/[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GDP Growth (annual%).”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page=1.

Gerstenfeld, Manfre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Delegitimization of Israel and the Jews*, *and the Growth of New Anti-Semitism.* Jerusalem: JCPA, 2015.

Gilad, Elon. “Why Is Israel Called Israel?” *Ha'aretz* (April 20,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652699.

Gilbert, Martin. *Churchill and the Jews*: *A Lifelong Friendship.* 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Gilbert, Martin.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Gilbert, Martin. *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Ginor, Zvia Ben-Yoseph. " 'Meteor-Yid' : Abba Kovner's Poetic Confrontation with Jewish History." *Judaism*, Vol. 48, No. 1 (Winter 1999).

Ginsburg, Mitch. "Mossad's Tip-Off Ahead of Yom Kippur War Did Not Reach Prime Minister, Newly Released Papers Show." *Times of Israel* (September 20, 2012), http://www.timesofisrael.com/newly-released-papers-detail-depth-of-mishandling-of-yom-kippur-war-warnings/[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Ginsburg, Mitch. "When Moshe Dayan Delivered the Defning Speech of Zionism," *Times of Israel* (April 26,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when-moshe-dayan-delivered-the-defining-speech-of-zionism/.

Goldberg, Jeffrey. "The Paranoid, Supremacist, Roots of the Stabbing Intifada." *Atlantic* (October 16,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10/the-roots-of-the-palestinian-uprising-against-israel/410944/.

Gorali, Moshe. "How God and Democracy Were Left Out." *Ha'aretz* (May 5, 2003),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features/how-god-and-democracy-were-left-out-1.11023[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Gordis, Daniel.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Gordis, Daniel. *Saving Israel: How the Jewish People Can Win a War That May Never End.* Hoboken, NJ: Wiley, 2010.

Gordon, A. D. "Logic for the Future (1910)." In*The Zionist Idea*, ed. Arthur Hertzberg.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Govrin, Nurit. *Roots andTops: The Imprint of the First Aliyah in Hebrew Literature.* Tel Aviv: Papyrus and Tel Aviv University, 1981. [In

Hebrew].

Grayzel, Solom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7.

Greenberg, Joel. “Yeshayahu Leibowitz, 91, Iconoclastic Israeli Thinker.” *New York Times* (August19, 1994), http://www.nytimes.com/1994/08/19/obituaries/yeshayahu-leibowitz-91-iconoclastic-israeli-thinker.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Greenberg, Uri Zvi, trans. Neta Stahl. “One Truth and Not Two.” In “Jesus and the Pharisees Through the Eyes of Two Hebrew Writers: A Contrarian Perspective.” *Hebrew Studies*, Vol. 56, No. 1 (December 11, 2015).

Grey, Edward, 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 *Twenty-Five Years 1892—1916.*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25.

Groenberg, Gershom. *The Accidental Empire*: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1967—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Grosbard, Ofer. *Menachem Begin*: *The Absent Leader.* Haifa: Strategic Research and Policy Center, National Defense College, IDF, 2007.

Guggenheim, Alan, and Adam Guggenheim. “Doomed from the Start.” *NavalHistory*, Vol. 18, No. 1 (February 2004).

Halachmi, Benjamin Beit. *Despair and Deliverance*: *Private Salvation in Contemporary Israe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Halevi, Efraim. “Introduction.” In*The Millions That Changed the Middle East*: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USSR*, ed. Lily Galili and Roman Bronfman, http://matarbooks.co.il/printbook.php?book=1808&nav=4[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In Hebrew].

Halevi, Yossi Klein. *Like Dreamers*: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Paratroopers Who Reunited Jerusalem and Divided a N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Halkin, Hillel. *Jabotinsky*: *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Hartman, Ben. “ 'Gov't' Failed Gaza Evacuees.” *Jerusalem Post* (June 16, 2010), http://www.jpost.com/Israel/Govt-failed-Gaza-evacuees[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Hasson, Nir. “Jerusalem Neighborhood to Name Streets in Honor of Mizrahi Black Panthers.” *Ha'aretz* (June14, 2011), http://www.haaretz.com/jerusalem-neighborhood-to-name-streets-in-honor-of-mizrahi-black-panthers-1.369313[Lastviewed March 23, 2016].

Hazaz, Haim. *The Sermon and Other Stories.* Jerusalem: Toby Press, 2005.

Hazony, Yoram.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Heller, Aron. “Western Europe Jewish Migration to Israel Hits All-Time High.”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4, 2016),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164bbc1445aa42fc883ee85e4439523a/western-europe-jewish-migration-israel-hits-all-time-high[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Helm, Sarah. “Yemeni Jews Describe Their Holocaust: Sarah Helm in Yehud Reports on Claims That Israelis Stole 4, 500 Children from Immigrants.” *Independent* (October 23, 2011),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yemeni-jews-describe-their-holocaust-sarah-helm-in-yehud-reports-on-claims-that-israelis-stole-4500-children-from-immigrants-1370515.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Hersh, Seymour. *The Samson Option*: *Israel's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Hertzberg, Arthur. *The Zionist Ide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Herzl, Theodor. *Old New Land.*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7.

Herzl, Theodor, trans. I. M. Lask. *The Jewish State.* Tel Aviv: M.

Newman Publishing House, 1954.

Hess, Moses. *The Revival of Israel*: *Rome and Jerusalem, the Last Nationalist Question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

Hitler, Adolf. *Mein Kampf.* Boring, OR: CPA Book Publisher, 2000.

Hoffman, Bruce. *Anonymous Soldiers*: *The Struggle for Israel*: *1917—194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Hoffman, Gil Stern. "Dov Lipman to Direct WZO Department."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2, 2015), http://www.jpost.com/Israel-News/Politics-And-Diplomacy/Dov-Lipman-to-head-WZO-department-437000.

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Cambridge Edition, 1769.

Holtzman, Avner. "A New Truth from the Land of Israel: On the New Self Awareness in Second Aliyah Literature." In*The Second Aliyah*: *Studies*, ed. Israel Bartel. Jerusalem: Yad Yitzhak Ben-Zvi, 1997. [In Hebrew].

"Human Rights Actions." *Human Rights Voices*, http://www.humanrightsvoices.org/EYEontheUN/priorities/actions/body/?ua=1&ya=1&sa=1&tp=1[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Hurwitz, ZviHarry. *Begin*: *His Life*, *Words*, *and Deeds.*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2004.

iCenter, "The Story of a Vote: Nov. 29, 1947." *iCenter* (November 1, 2012), http://www.theicenter.org/voice/story-vote-nov-29-1947[Last viewed May 1, 2016].

IDF Spokesman and Israel Police. "Gaza Strip Evacuation."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7, 2005), http://www.mfa.gov.il/mfa/pressroom/2005/pages/start%20of%20gaza%20strip%20evacuation%2017-aug-2005.aspx[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Inbari, Assaf. *HaBaita.* Tel Aviv: Yediyot Sefarim, 2009. [Translations by Daniel Gordis].

Isaacson, Walter.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07.

"Israel'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948." *Avalon Project*,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israel.asp[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Israel's Haredi Population: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Myers-JDCBrookdale (October 2015), http://brookdale.jdc.org.il/_Uploads/dbsAttachedFiles/Israels-Haredi-Population-2015-10-FINAL.pdf[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Israel's Illusion." *New York Times* (June 9, 1981), http://www.nytimes.com/1981/06/09/opinion/israel-s-illusion.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Israel Turns 68 with 8. 5 Million People, 10 Times More Than in 1948." *Times of Israel* (May 9,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turns-68-with-8-5-million-people-10-times-more-than-in-1948/.

Jabotinsky, Ze'ev (Vladimir). "The Basis of the Betarian Viewpoint Consists of One Idea: The Jewish State: The Ideology of Betar."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http://www.wzo.org.il/index.php?dir=site&page=articles&op=item&cs=3360&langpage=eng&category viewed December 7, 2015].

Jabotinsky, Ze'ev (Vladimir). "The Iron Wall."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Zionism/ironwall.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Jacoby, Jeff. "Would Rabin Have Pulled the Plug on a 'Peace Process' That Failed?" *Boston Globe* (October 22, 2015), http://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0/22/would-rabin-have-pulled-plug-peace-process-that-fai-led/fgHF1Y8bkh7leSbtgHfleL/story.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Jewish Agency. "BeBayit BeYachad: Shiputz Mo'adon Olim BeBeit Brodsky." http://www.jewishagency.org/he/blog/7606/article/11706[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In Hebrew].

Johnson, Paul. *A Hi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88.

JTA. “Israel to Vote Today in First National Elections; Campaign Reaches High Peak.” (January 25, 1949), http://www.jta.org/1949/01/25/archive/israel-to-vote-today-in-first-national-elections-campaign-reaches-high-peak[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JTA. “Of Weizmann's Address Opening Session of Israeli Constituent Assembly.” (February 15, 1949), http://www.jta.org/1949/02/15/archive/of-chaim-weizmanns-address-opening-session-of-israeli-constituent-assembly[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Judis, John B. “Seeds of Doubt: Harry Truman's Concerns About Israel and Palestine Were Prescient—And Forgotten.” *New Republic* (January 16, 2014), 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6215/was-harry-truman-zionist.

Kanafani, Ghassan. *Palestine's Children*: *Returning to Haifa and Other Stor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Kark, Ruth. “Changing Patterns of Landown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Palestine: The European Influenc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10, No. 4 (1984).

Katz, Shmuel. *Lone Wolf*: *A Biography of Vladimir* (*Ze'ev*) *Jabotinsky.* Fort Lee, NJ: Barricade Books, 1995.

Kaya, Furkan. “Minority Policies of Turkey and Wealth Tax of 1942.” Yeditepe University (February 12, 2014), http://mpra.ub.uni-muenchen.de/53617/1/MPRA_paper_53617.pdf.

Kedar, Nir. “Ben-Gurion's Mamlakhtiyut: Etym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oots.” *Israel Studies*, Vol. 7, No. 3 (Fall 2002).

Kellner, Vered. “Longings and Disappointments: A Voter in Exile in New York.” *Ha'aretz* (January18, 2003), http://www.haaretz.com/misc/iphone-article/longings-and-disappointments-a-voter-in-exile-in-new-

york.premium-1.494743[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Kemp, Richard. “The U. N.'s Gaza Report Is Flawed and Dangerous.” *New York Times* (June 25,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6/26/opinion/the-uns-gaza-report-is-flawed-and-dangerous.html.

Kershner, Isabel. “Israel to Phase Out Religious Exemptions.”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3/13/world/middleeast/israel-restricts-exemptions-from-military-service.html?_r=0[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The Khartoum Resolutio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Israel (September 1, 1967), http://www.mfa.gov.il/mfa/foreignpolicy/peace/guide/pages/the%20khartoum%20resolutions.aspx[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Khoury, Jack. “Israeli Arabs Mark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October 2000 Riots.” *Ha'aretz* (January 10,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678344[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King James Bible Online, 2016. http://www.kingjamesbibleonline.org.

“Kissinger and Ismail Conduct Secret Meetings.” *Center for Israel Education*, http://israeled.org/kissinger-ismail-conduct-secret-meetings/[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Kissinger, Henry, and George P. Shultz. “The Iran Deal and Its Consequence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7,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iran-deal-and-its-consequences-1428447582[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Kraft, Joseph. “For Begin, the End? He Should Be Voted Out for Raid That Further Isolates Israel.”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1, 1981).

Kramer, Martin. “Fouad Ajami Goes to Israel.” *Mosaic* (January 8, 2015), http://mosaicmagazine.com/observation/2015/01/fouad-ajami-goes-to-israel/[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Kramer, Martin. “What Happened at Lydda.” *Mosaic* (July 1, 2014),

http://mosaicmagazine.com/essay/2014/07/what-happened-at-lydda/[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Krauthammer, Charles. “At Last, Zion.” *Jewish Ideas Daily* (September 21, 2012), http://www.jewishideasdaily.com/5057/features/at-last-zion/[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Lam, Amira. “Peres Recall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e Didn't Have Time to Celebrate.” *Ynetnews. com* (December 21,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606090,00.html[Last viewed May 1, 2016].

Lanchin, Mike. “*SSSt Louis*: The Ship of Jewish Refugees Nobody Wanted.” *BBC World Service* (May 13, 2014),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27373131[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Landau, David. *Arik*: *The Life of Ariel Shar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Lapid, Yair, trans. Evan Fallenberg. *Memories After My Death*: *The Joseph* (*Tommy*) *Lapid Story*. London: Elliott & Thompson Limited, 2011.

Lapidot, Yehuda, trans. Chaya Galai. “The*Altalena*Affair.” *Etzel*, http://www.etzel.org.il/english/ac20.htm[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Lapin, Yaakov. “Katsav Entering Prison: 'You're Burying a Man Alive.'”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8, 2011),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Katsav-entering-prison-Youre-burying-a-man-alive[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Laqueur, Walte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Lavy, George. *Germany and Israel*: *Moral Debt and National Interest.* London: Frank Cass, 1996.

Lazaroff, Tovah. “2012 Settler Population Grew Almost Three Times as Fast as National Rate.”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7, 2013),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2012-West-Bank-settler-

population-growing-almost-three-times-as-fast-as-national-rate-326309[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Lelchuk, Alan, and Gershon Shaked. *8 Great Hebrew Short Novels.* New Milford, CT: Toby Press, 2012.

Lenhoff, Howard M., and Jerry L. Weaver. *Black Jews, Jews, and Other Heroes: How Grassroots Activism Led to the Rescue of the Ethiopian Jews.*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House, 2007.

Levy, Yagil. *The Hierarchy of Military Death.* Open University of Israel (Lisbon, April 14—19, 2009), https://ecpr.eu/Filestore/PaperProposal/2cfd87af-cab2-4374-b84d-eb03fbbc3cd1.pdf[Last viewed May 1, 2016].

Lichtblau, Eric. "Surviving the Nazis, Only to Be Jailed by Americ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2/08/sunday-review/surviving-the-nazis-only-to-be-jailed-by-america.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Lipstadt, Deborah E. *The Eichmann Tria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1.

Lis, Jonathan, and Yarden Skop. "Israel Election Updates Yesh Atid to Announce Openly Gay Candidate." *Ha'aretz* (January 26,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elections/1.639040[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Little, Douglas. *American Orient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 London: I. B. Tauris, 2002.

Lord, Amnon. "Intelligence Failure or Paralysis."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24, No. 3—4 (Fall 2012).

Makovsky, David. "The Silent Strike: How Israel Bombed a Syrian Nuclear Installation and Kept It Secret." *New Yorker* (September 17, 2012),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2/09/17/the-silent-strike[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Makovsky, David. *Churchill's Promised Land: Zionism and Statecraf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n, Nadav. “1st IDF Parade from Behind the Lens.” *Ynetnews. com* (December 13, 2008),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3637748,00.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Mapu, Abraham, trans. Joseph Marymount. *The Love of Zion & Other Writings.* Israel: Toby Press, 2006.

“The Massive Immigration.” Jewish Agency website, http://www.jewishagency.org/he/historical-aliyah/content/22097[Last viewed December 10, 2015][In Hebrew].

McCullough, David. *Tru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Meir, Golda. *My Lif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75.

Meir-Glitzenstein, Esther. “Operation Magic Carpet: 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the Magical Immigration of Yemenite Jews to Israel.” *Israel Studies*, Vol. 16, No. 3 (Fall 2011).

Melman, Yossi. “Jews, Just Like Arabs, Hid Weapons in Immoral Places.” *Ha'aretz* (January 27, 201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features/jews-just-like-arabs-hid-weapons-in-immoral-places-1.339432.

Mendes-Flohr, Paul, and Yehuda Reinharz.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Menendez Delivers Remarks on Iran Nuclear Deal at Seton Hall University's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b Menendez for New Jersey (August 18, 2015), http://www.menendez.senate.gov/news-and-events/press/menendez-delivers-remarks-on-iran-nuclear-deal-at-seton-hall-universitys-school-of-diplomac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Middle East: A Sabbath of Terror.” *Time* (March 20, 1978),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19454,00.html.

Mikics, David. “Holocaust Pulp Fiction.” *Tablet* (April 19, 2012),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arts-and-culture/

books/97160/ka-tzetnik[Last viewed March23, 2015]

Miller, J. Maxwell, and John H. Hayes.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Mintz, Alan. “Kishinev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oftests*, Vol. 25, No. 1—2. (Winter/Spring 2005).

Mirsky, Yehudah. “What Is a Nation-State For?” *Marginalia* (March 11, 2015), http://marginalia.lareviewofbooks.org/nation-state-yehudah-mirsky/[Last viewed May 1, 2016].

Mirsky, Yehudah. *Rav Kook*: *Mystic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Mizrahi World Movement. “The First Ever Israeli Elections.” http://mizrachi.org/the-first-ever-israeli-elections/[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Morris, Benny. “Exposing Abbas.” *National Interest* (May 19, 2011),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exposing-abbas-5335[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Morris, Benny. “The Historiography of Deir Yassin.”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Vol. 24, No. 1 (August 2006).

Morris, Benny. “Peace? No Chance.” *Guardian* (February 21, 2002),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2/feb/21/israel2[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Morris, Benny. “ Zionism's 'Black Boxes' .” *Mosaic* (July13, 2014), http://mosaicmagazine.com/response/2014/07/zionisms-black-boxes/[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Morris, Benny. *1948*: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Morris, Benny. *Israel's Border Wars1949—1956*: *Arab Infiltration*, *Israeli Retaliation*, *and the Countdown to theSuez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Morris, Benny. *One State*, *Two States*: *Resolving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Morris, Benny.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Morris, Benny. *The Road to Jerusalem: Glubb Pasha, Palestine, and the Jews.* London: I. B. Tauris, 2003.

"Moving Ceremony Marks Reburial of Herzl's Remains; Israeli Cabinet in Full Attendance,"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August 18, 1949), http://www.jta.org/1949/08/18/archive/moving-ceremony-marks-reburial-of-herzls-remains-israeli-cabinet-in-full-attendance.

Muravchik, Joshua. "Muslims and Terror: The Real Story." *Commentary* (February 1, 2015),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muslims-and-terror-the-real-story-1/[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Nadler, Alan. "Piety and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Satmar Rebbe." *Judaism*, Vol. 31 (1982).

Navoth, Michal. "Israel'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Is There Hope for Chang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ffairs*, No. 601 (May—June 2014), http://jcpa.org/article/israels-relationship-un-human-rights-council/[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Nordau, Max. "Jewry of Muscle." In*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2nd ed., edited by Paul Mendes-Flohr and Yehuda Reinhar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Oren, Amir. "CIA Report on Yom Kippur War: Israel Had Nuclear Arsenal." *Ha'aretz* (February 13, 2013),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cia-report-on-yom-kippur-war-israel-had-nuclear-arsenal.premium-1.501101[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Oren, Michael B.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Azure*, No. 7 (Spring 5759/1999).

Oren, Michael B. "The Second War of Independence." *Azure*, No. 27 (Winter 5767/2006).

Oren, Michael B. *Ally: My Journey Across the American-Israeli Divi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Oren, Michael B. *Power, Faith, and Fantasy: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W. W. Norton, 2007.

Oren, Michael B.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Oz, Amos, trans. Nicholas de Lange. *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 Orlando: Harcourt, 2004.

Pappe, Ilan. “A Post-Zionist Critique of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Part II: The Media.” in*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Spring 1997), pp. 37—43, cited in Michael Oren,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Azure*, No. 7 (Spring 5759/1999), p. 48.

Parker, RichardBordeaux, ed. *The OctoberWar: A Retrospective.* Gain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Patai, Raphael. *The Jews of Hungary: History, Culture, Psycholog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atterson, David. “Introduction.” In*The Love of Zion & Other Writings*, ed. Abraham Mapu, trans. Joseph Marymount. Israel: Toby Press, 2006.

Penkower, Monty Noam.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Modern Judaism*, Vol. 24, No. 3 (2004).

Peres, Shimon, in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Landau. *Ben-Gurion: A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11.

Persico, Tomer. “The Privatization of Religion and the Sanctifcation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Collapse of Zionist Collectivism.” *Akdamut*, No. 30 (February 2015).

Pianko, Noam. *Zionism and the Roads Not Taken: Rawidowicz, Kaplan, Koh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iper, Franciszek. “Gas Chambers and Crematoria.” Jerusalem: Yad Vashem: The Holocaust Martyrs'and Heroes'Remembrance Authority, 2008.

Pitot, Geneviève, trans. Donna Edouard. *The Story of the Jewish Detainees in Mauritius 1940—1945*.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Planet Auschwitz." Testimony of Yehiel De-Nur at Eichmann tri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0T9tZiKYl4[Last viewed May 1, 2016].

"PM Says Iran's Chief of Staff Vowed Sunday to Eliminate Israel." *Times of Israel* (May 21, 2012), http://www.timesofisrael.com/pm-says-irans-chief-of-staff-vowed-sunday-to-eliminate-israel/ [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Porat, Dina. *The Blue and the Yellow Stars of David*: *The Zionist Leadership in Palestine and the Holocaust, 1939—1945*.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ower, Samantha. *Remarks at the Israel Middle East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Building a More Model UN.* " Transcript (February 15, 2016), http://usun.state.gov/remarks/7138[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Quandt, William B. *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5.

Rabinovich, Abraham. *The Yom Kippur War*: *The Epic Encounte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4.

Rabinowitz, Dan. "October 2000, Revisited." *Ha'aretz* (October 19, 2004),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opinion/october-2000-revisited-1.137855[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Raviv, Dan, and Yossi Melman. *Spies Against Armageddon*: *The Mossad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rael: Yediot Ahronoth Books, 2012.

Regev, Motti, and Edwin Seroussi. *Popular Music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Isra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Reinfeld, Moshe. "State Commission: Missing Yemenite Babies Not Kidnapped." *Ha'aretz Service* (November 4, 2001), http://

www.haaretz.com/news/state-commission-missing-yemenite-babies-not-kidnapped-1.73778[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Rosenberg, Yair. “Watch Orthodox Rabbi Benny Lau's Powerful Denunciation of Homophobia Justified in the Name of God.” *Tablet* (August 3, 2015), http://www.tabletmag.com/scroll/192649/watch-orthodox-rabbi-benny-laus-powerful-denunciation-of-homophobia-justified-in-the-name-of-god[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Roskies, DavidG., ed. *The Literature of Destruction*: *Jewish Responses to Catastrophe.*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88.

Ross, Dennis. *Doomed to Succeed*: *The U. S. -Israel Relationships from Truman to Obam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Rovner, Adam. *In the Shadows of Zion*: *Promised Lands Before Israel.*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Sachar, Howard M.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Samuel, Maurice, trans. *The New Palestine*, Vol. 8, No. 13 (March 27, 1925). Reproduced by Hebrew University in 2015 as commemorative issue. Copy on file with author.

Scheindlin, Raymond P.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From Legendary Times to Modern Statehoo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chiff, Ze'ev. *A History of the Israeli Army*: *1874 to the Present.* London: Macmillan, 1985.

Schneer, Jonathan.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2.

Schwartzwald, Jack L. *Nine Lives of Israel*: *A Nation's History Through the Lives of Its Foremost Leader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2.

Segev, Tom. “In Letter, Naomi Shemer Admitted Lifting 'Jerusalem of Gold' Tune.” *Ha'aretz* (May 5, 2005), http://www.haaretz.com/news/in-letter-naomi-shemer-admitted-lifting-jerusalem-of-gold-

tune-1.157851[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Segev, Tom, trans. Haim Watzman.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0.

Segev, Tom, trans. Haim Watzman. *The Seventh Million*: *The Israeli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Henry Holt, 1991.

Segev, Tom, trans. Jessica Cohen. *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5.

Seltzer, Robert M. *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1980.

Senor, Dan, and Saul Singer. *Start-Up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Twelve, 2012.

Shaked, Malka. *I'll Play You Forever*: *The Bible in Modern Hebrew Poetry.* Tel Aviv: Yediot Achronot, 2005.

Shalev, Ben. "Zohar Argov's Flower That Launched a Million Cassettes." *Ha'aretz* (May 4, 2012), http://www.haaretz.com/weekend/week-s-end/zohar-argov-s-flower-that-launched-a-million-cassettes-1.42823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Shalev, Chemi. "Moshe Dayan's Enduring Gaza Eulogy: This Is the Fate of Our Generation." *Ha'aretz* (July 20, 2014), http://www.haaretz.com/blogs/west-of-eden/.premium-1.606258[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Shalev, Chemi. "Sharon's Gaza Disengagement Was a Necessary Act of Self-Preservation." *Ha'aretz* (July 29,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667443[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Shapira, Anita, trans. Anthony Berris. *Ben-Gurion*: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Shapira, Anita.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Sharon, Jeremy. " 'Torat Hamelech'Authors Will Not Be Indicted." *Jerusalem Post* (May 28, 2012), http://www.jpost.com/National-

News/A-G-Torat-Hamelech-authors-will-not-be-indicted[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Shavit, Ari. *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Shavit, Ari.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 Interview with Benny Morris.” *Ha'aretz* (January 8, 2004), http://www.haaretz.com/survival-of-the-fittest-1.61345[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Shavit, Yaacov, and Jehuda Reinharz. *Glorious, Accursed Europe.*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Shilon, Avi, trans. Danielle Zilberberg and Yoram Sharett. *Menachem Begin: 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Shimoni, Gideon. *The Zionist Ideolog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1995.

Shindler, Colin. “Zionist History's Murder Mystery.” *Jewish Chronicle Online* (June 16, 2013), http://www.thejc.com/comment-and-debate/comment/108596/zionist-historys-murder-mystery[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Shindler, Colin. *A Historyof ModernIsrael*,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hmuel Gonen, 73, An Ex-Israeli Genera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 1991), http://www.nytimes.com/1991/10/02/obituaries/shmuel-gonen-73-an-ex-israeli-general.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Shragai, Nadav. “The Legend of Ambushed Palmach Squad '35.'” *Ha'aretz* (April 27, 2009), http://www.haaretz.com/the-legend-of-ambushed-palmach-squad-35-1.274876.

Shtull-Trauring, Asaf. “Hebrew University Climbs to 57th Place on Global Ranking List.” *Ha'aretz* (August 18, 201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news/hebrew-university-climbs-to-57th-place-on-global-ranking-list-1.379203[Last viewed November 20, 2011].

Siegel, Seth M. *Let There Be Water: Israel's Solution for a Water-Starved World.*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5.

Siegel, Seth M. “50Years Later, National Water Carrier Still an Inspiration.” *Ynetnews. com* (September 6,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28200,00.html[Last viewed May 1, 2016].

Silver, Abba Hillel, Moshe Shertok, and Chaim Weizmann.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October 1947.” Copy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Silver, Eric. *Begin: The Haunted Prophe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Siniver, Asaf. *Abba Eban: A Biography.* New Yorkand London: Overlook Duckworth, 2015.

Slater, Robert. *Rabin: 20 Years After.* Israel: KIP Kotari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Slater, Robert. *Warrior Statesman: The Life of Moshe Day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Solnit, Rebecca. “Easy Chair: The War of the World.” *Harper's Magazine* (February 2015).

Spiegel, Nina S. *Embodying Hebrew Cultur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teinberg, Jessica. “TV Show 'Shtisel' Subtly Changes Ultra-Orthodox Perceptions.”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13,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tv-show-shtisel-subtly-changes-ultra-orthodox-perceptions/[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Tekumah. [Hebrew]*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Channel 1, first broadcast 1998.

Temko, Ned. *To Win or to Die: A Personal Portrait of Menachem Begi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7.

Teveth, Shabtai. *Ben Gurion's Spy: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Scandal That Shaped Modern Isra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Traubman, Tamara. “A Mystery That Defies Solution.” *Ha'aretz*

(November 5, 200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news/a-mystery-that-defies-solution-1.73913[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Troen, S. Ilan. *Imagining Zion: Dreams, Designs, and Realities in a Century of Jewish Settlemen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Troy, Gil. “Happy Birthday, Mr. Kissinger.” *Tablet* (May 23, 2013),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news-and-politics/132819/happy-birthday-mr-kissinger#xCoSwz6BrWoHxhzI.99[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Troy, Gil. *Moynihan's Moment: America's Fight Against Zionism as Ra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Tuchman, Barbara. “Israel: Land of Unlimited Impossibilities.” In*Practicing History.*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1.

Twain, Mark. “Concerning the Jews.” *Harper's Magazine*, Vol. 99 (March 1898).

Tzahor, Ze'ev. “Chaim Arlosoroff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Rise of Nazism.”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46, No. 3—4 (Summer-Autumn 1984).

UN Refugee Agency.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2000: Fifty Years of Humanitarian Action” (January 1, 2000), http://www.unhcr.org/3ebf9bab0.pdf[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87 (1981).”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36/a36r027.htm[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Weinberg, David M. “Yitzhak Rabin Was 'Close to Stopping the Oslo Process.'”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7, 2013), http://www.jpost.com/Opinion/Columnists/Yitzhak-Rabin-was-close-to-stopping-the-Oslo-process-329064[LastviewedMarch 23, 2016].

Winer, Stuart. “Uproar as Ethiopia-Born MK Denied Chance to Give Blood.”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11, 2013), http://www.timesofisrael.com/uproar-as-ethiopian-mk-denied-chance-

to-give-blood/[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Ya'alon, Moshe. *The Longer Shorter Way*. Tel Aviv: Yedioth Ahronoth Books and Chemed Books, 2007.

Yizhar, S., trans. Nicolas de Lange and Yaacob Dweck. *Khirbet Khizeh*: *A Nove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Yosef, Eitan Bar. “The Last Crusade? British Propaganda and the Palestine Campaign, 1917—1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6, No. 1 (January 2001).

Zeret, Elad. “Kastner's Killer: I Would Never Have Shot Him Today.” *Ynetnews. com* (October 29,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85767,00.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Zipperstein, Steven J.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索引

Aaronsohn, Sarah萨拉·亚伦松

Abbas, Mahmoud “Abu Mazen”马哈茂德·阿巴斯（阿布·马赞）

Abdullah I, King of Jordan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

Agranat Commission阿格拉纳特委员会

“Agunot”（Czaczkes）《弃妇》（恰奇克斯）

Ahad Ha'am（Asher Zvi Ginzberg）阿哈德·哈姆（阿谢尔·兹维·金兹伯格）

and spiritual center in Palestine ~ 和位于巴勒斯坦的精神中心

Ajami, Fouad福阿德·阿贾米

Allenby, Edmund埃德蒙·艾伦比

Allon, Yigal伊加尔·阿隆

Ally（Oren）《盟友》（奥伦）

Alpert, Moshe Yekutiel摩西·耶库蒂尔·阿尔伯特

Alphand, Hervé埃尔韦·阿尔方

Altalena affair”阿尔塔莱纳”号事件

Alterman, Natan拿单·奥尔特曼

Altneuland（Herzl）《新故土》（赫茨尔）

Amichai, Yehuda耶胡达·阿米亥

Amir, Yigal伊加尔·阿米尔

Andrews, Lewis刘易斯·安德鲁斯

Ankri, Etti（Esther）艾提（以斯帖）·安克丽

Arafat, Yasser亚西尔·阿拉法特

intifadas and因提法达和 ~

peace negotiations and和平谈判和～

Argov, Shlomo什洛莫·阿尔戈夫

Ariel, Meir梅厄·阿里埃勒

Arlosoroff, Chaim哈伊姆·阿罗佐罗夫

Ashkenazi, Motti莫蒂·阿什肯纳泽

Assad, Hafez al-哈菲兹·阿萨德

“Assemblies of Zion, The”（“*Mikra'ei Zion*”），（Bialik）《聚会锡安》（比亚利克）

Austria奥地利

Auto-Emancipation（Pinsker）《自我解放》（平斯克）

Avner, Yehuda，耶胡达·阿夫纳

Babylonia巴比伦

Balfour Declaration《贝尔福宣言》

Barak, Ehud埃胡德·巴拉克

Bar-Giora巴尔 - 吉奥拉

Barker, Evelyn伊夫林·巴克

Bar Kokhba, Simeon西蒙·巴尔·科赫巴

Beaufort《波弗特》

Begin, Menachem梅纳赫姆·贝京

Ben-Gurion's relationship with本 - 古里安和～的关系

German reparations and德国赔款和～

and invasion of Lebanon～和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Israeli Arabs and以色列阿拉伯人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peace negotiations and和平谈判和～

political Right and政治右翼和～
as prime minister担任总理的～
Saison and"狩猎季"和～
settler movement and定居点运动和～
Ben-Gurion, David（David Gruen）大卫·本 - 古里安（大卫·格鲁恩）
American Jews and美国犹太人和～
Begin's relationship with梅纳赫姆·贝京和～的关系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and education in Israel～和以色列教育
Eichmann and艾希曼和～
German reparations and德国赔款和～
Israeli finances and以色列经济和～
Israeli independence and以色列独立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和巴勒斯坦分治
physical appearance of～的外貌
as prime minister担任总理的～
statism of～的国家主义
world wars and世界大战和～
Ben-Yehuda, Eliezer（Eliezer Perlman）埃利泽·本 - 耶胡达（埃利泽·帕尔曼）
and rebirth of Hebrew～和希伯来语复活
Berdyczewski, Micha Josef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
Bernadotte, Folke福克·伯纳多特

Bernstein, Robert罗伯特·伯恩斯坦

Betar贝塔尔

“Beyond the Iron Wall”（Jabotinsky）《铁墙之外》（雅博廷斯基）

Bialik, Chaim Nachman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

death of ~ 的去世

Jewish tradition and犹太传统和 ~

Kishinev pogrom and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 ~

poetry of ~ 的诗歌

Zionism and犹太复国主义和 ~

bin Ali, Hussein侯赛因·本·阿里

Bin-Nun, Yoel约埃尔·宾 - 努恩

Birnbaum, Nathan拿单·伯恩鲍姆

Black Sabbath黑色安息日

Blaustein, Jacob雅各·布劳斯坦

Blessed Is the Man/Barukh HaGever（Ginsburgh）《蒙福的男人》（金斯博格）

Bluwstein Sela, Rachel（Rachelthe Poetess）拉亥尔·布劳斯坦·塞拉（女诗人拉亥尔）

Brenner, Yosef Chaim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

Burma Road滇缅公路

Bush, George W.乔治·W.布什

Calderon, Ruth露丝·卡尔德龙

Camp David戴维营

Carter, Jimmy吉米·卡特

Christians基督徒

Churchill, Winston温斯顿·丘吉尔

“City of Slaughter, The”（Bialik）《屠杀之城》（比亚利克）

Clinton, Bill比尔·克林顿

Cohen, Eli艾里·科恩

Council of Four Lands四土地委员会

Cyrus II, King of Persia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

Czaczkes, Shmuel Yosef（Shai）撒母耳·约瑟夫（沙伊）·恰奇克斯

Czechoslovakia捷克斯洛伐克

Dalet, Plan D计划

Dalia Festival达利亚舞蹈节

Dani, Operation丹尼行动

Darwish, Mahmoud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Dayan, Moshe摩西·达扬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Israeli-Egyptian negotiations and以色列埃及谈判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Rotberg eulogized by～在罗特伯格葬礼上的悼词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sraeli以色列《独立宣言》

Defensive Shield, Operation防御之盾行动

Degania德加尼亚

De Gaulle, Charles夏尔·戴高乐

Deir Yassin代尔亚辛村

De-Nur, Yechiel耶西勒·德－努尔

Deri, Aryeh阿里耶·德里

Djemal Pasha杰马尔帕夏

Dreyfus, Alfred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Dühring, Karl卡尔·杜林

Eban, Abba阿巴·埃班

Eden, Anthony安东尼·艾登

Egypt埃及

in ancient times古代 ~

Czech arms deals with ~ 和捷克的军火交易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

Israeli negotiations with以色列与 ~ 谈判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 ~ 和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

Nasser's leadership and纳赛尔的领导和 ~

Soviet relations with ~ 和苏联关系

Suez crisis and苏伊士运河危机和 ~

and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Israel ~ 和以色列占领土地

Eichmann, Adolf阿道夫·艾希曼

Einstein, Albert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instein, Arik阿里克·艾因施坦

Eisenhower, Dwight D.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Elazar, David “Dado”大卫（达多）·埃拉扎尔

Eliot, George乔治·艾略特

Eshkol, Levi，列维·艾希科尔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s prime minister担任总理的 ~

Ethiopia埃塞俄比亚

Farran, Roy罗伊·法伦

Fatah法塔赫

founding of, ~ 的成立

Hamas' parliamentary success and哈马斯议会胜利和 ~

Fill the Void《填补空白》

First Temple第一圣殿

Fishman-Maimon, Yehuda Leib耶胡达·莱伯·费希曼 - 迈蒙

Folman, Ari阿里·福尔曼

Footnote《脚注》

“For This”/*Al Zot*（Alterman）《关于那一切》（奥尔特曼）

France法国

    Eichmann and艾希曼和 ~

    Israeli arms deals with以色列和 ~ 军火交易

    Israeli nuclear program and以色列核计划和 ~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Jews of ~ 犹太人

    Suez crisis and苏伊士运河危机和 ~

    Sykes-Picot and《赛克斯 - 皮克协议》和 ~

Friedman, Matti马蒂·弗里德曼

Gavison, Ruth露丝·加维森

Gaza加沙

    economy of ~ 经济

    intifadas and因提法达和 ~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

    Israeli occupation of以色列对 ~ 的占领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巴以谈判和 ~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Israeli withdrawal from以色列撤出 ~

    settler movement in ~ 的定居点运动

Gazit, Shlomo什洛莫·加齐特

Gedaliah, David大卫·格达里亚

Gemayel, Bashir巴希尔·杰马耶勒

Georges-Picot, Fran ç ois弗朗索瓦·乔治 - 皮科

Germany德国

anti-Semitism in ~ 反犹主义

Eichmannand艾希曼和 ~

Holocaust reparations of ~ 对大屠杀的赔款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Jewish boycott of犹太人对 ~ 的抵制

Jews of ~ 犹太人

Kasztner case and卡斯特纳案和 ~

Nazis and纳粹分子和 ~

Transfer Agreement and《转移协定》和 ~

and violence against Jews ~ 和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

West西德

world wars and世界大战和 ~

Get《离婚证明》

Ginsburgh, Yitzchak伊扎克·金斯博格

Golan Heights戈兰高地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

Goldstein, Baruch巴鲁克·戈登斯坦

Goodman, Micah米卡·古德曼

Gordon, Aaron David（A.D. Gordan）亚伦·大卫·戈登（A.D.戈登）

kibbutzim and基布兹和 ~

working the land and在土地上劳作的理念和 ~

Goren, Shlomo什洛莫·戈伦

Gouri, Haim哈伊姆·古里

Greek Empire希腊帝国

Greenberg, Uri Zvi乌里·茨维·格林伯格

Gromyko, Andrei安德烈·葛罗米柯

Gruenwald, Malkiel马尔基尔·格鲁恩瓦尔德

Gur, Motta莫塔·古尔

Gush Emunim信仰者集团

Gutman, Shmarya施马亚·古特曼

Hadrian, Emperor of Rome罗马皇帝哈德良

Haganah哈加纳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Saison and”狩猎季”和～

Haifa海法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Ha-Levi, Yehudah犹大·哈列维

Halevi, Yossi Klein约西·克莱因·哈勒维

Halevy, Benjamin本雅明·哈利维

Hamas哈马斯

Israeli wars with以色列和～的战争

Hanegbi, Haim哈伊姆·哈内格比

Haredim哈瑞迪

Har-Zion, Meir梅厄·哈尔 - 齐昂

“Hatikvah”《希望》

Hazaz, Haim哈伊姆·哈扎兹

Hebrew希伯来语

Bialik and比亚利克和～

literature～文学

rebirth of ~的复活
Tel Aviv and特拉维夫和~
Hebron希伯伦
Arab resistance and violence in ~的阿拉伯人暴力抵抗运动
“Here Lie Our Bodies”（Gouri）《这里埋有我们的身体》（古里）
Herzl, Theodor西奥多·赫茨尔
anti-Semitism and反犹主义和~
books written by ~的作品
comparisons between Ben-Yehuda and ~和本 - 耶胡达的比较
comparisons between Bialik and ~和比亚利克的比较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death of ~去世
and divisions in Zionist community ~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
and dream of return to Zion ~和回到锡安的梦想
funeral of ~葬礼
on Jewish question ~讨论犹太问题
Kishinev pogrom and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
and launch of Zionism ~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 ~和巴勒斯坦分治
renown of ~的声望
Zionist aspirations and犹太复国主义理想~
Zionist congresses and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和~
Hess, Moses摩西·赫斯
Hezbollah真主党
Himmler, Heinrich海因里希·希姆莱
Hirsch, Baron Maurice de莫里斯·德·赫希男爵
Hitler, Adolf阿道夫·希特勒

Holocaust大屠杀

Eichmann and艾希曼和 ~

German reparations and德国赔款和 ~

Israeli nuclear program and以色列核计划和 ~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Kasztner case and斯特纳案和 ~

survivors of ~ 幸存者

Human Rights Watch人权观察

Hungary匈牙利

Jews of ~ 犹太人

Hussein, Saddam萨达姆·侯赛因

Hussein bin Talal, King of Jordan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

Husseini, Haj Amin al-哈吉·阿明·侯赛尼

“Idea of Betar, The”（Jabotinsky）《贝塔尔的思想》（雅博廷斯基）

“Identity Card”（Darwish）《身份证》（达尔维什）

Ilanit伊兰尼特

I'll Play You Forever（Shaked）《我会永远将你吟唱》（沙凯德）

intifadas因提法达

Iran伊朗

Jews of ~ 犹太人

nuclear program of ~ 核计划

Iraq伊拉克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 ~ 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Jews of ~ 犹太人

nuclear program of ~ 核计划

Irgun伊尔贡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Iron Wall, The”（Jabotinsky）《铁墙》（雅博廷斯基）

Ismail, Hafez哈菲兹·伊斯梅尔

Israel, Land of以色列地

Bible on圣经对～的记录

Jewish immigration to犹太人移民～

kings of～的国王

Zionist congresses and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和～

Israel, State of以色列国

accomplishments of～的成就

agriculture in～农业

Arab citizens of～阿拉伯公民

arms purchases of～军购

confidence of～信心

constitution of～宪法

corruptionin～腐败现象

creation of～建国

cultural clashes in～的文化冲突

as democracy～民主制度

demographics of～人口

economy of～经济

education in～教育

Egyptian negotiations with～和埃及谈判

Eichmann and艾希曼和～

film industry of～电影行业

flag of ~ 国旗
food shortages in ~ 食品短缺
forestationof ~ 植树造林运动
future of ~ 的未来
generational shift in新一代 ~ 人的变化
Green Line in ~ 绿线
housing in ~ 住房
Independence Day in ~ 独立日
independence of ~ 独立
infiltration and clashes on borders of ~ 潜入边境和边境冲突
infrastructure of ~ 基础设施
international delegitimization of国际社会针对 ~ 的非法化运动
intifadas in ~ 的因提法达
Jewish immigration to犹太人向 ~ 的移民
Jordanian negotiations with约旦和 ~ 谈判
kibbutzimand基布兹和 ~
living conditions in ~ 生活条件
media in ~ 媒体
military of ~ 军事
missile attacks on针对 ~ 的导弹袭击
movie industry of ~ 电影
musicscene of ~ 音乐
naming of ~ 的名称
national anthem of ~ 国歌
national elections in ~ 全国选举
nuclear program of ~ 核计划
nuclear threats to ~ 承受的核威胁

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with巴以和谈
peace movement in ~ 的和平运动
political Right of ~ 政治右翼势力
racism in ~ 种族主义
religious community of ~ 宗教社团
and rise of Nasser ~ 和纳赛尔的崛起
sadness in ~ 的悲情
secularism of ~ 的世俗主义
self-reflective society of ~ 社会自我反省的倾向
settler movement in ~ 定居点运动
spies of ~ 间谍
statism of ~ 国家主义
street names in ~ 街道名称
Suez crisis and苏伊士运河危机和 ~
technology industries in ~ 科技产业
territorial withdrawals of ~ 领土撤离
territories acquired and occupied by ~ 获得和占领的土地
U.S. relations with美国和 ~ 关系
wars of ~ 的战争
water issues of ~ 水资源问题
Israel Defense Forces（IDF）以色列国防军
intifadas and因提法达和 ~
and invasion of Lebanon ~ 和入侵黎巴嫩
Israeli Arabs and以色列阿拉伯人和 ~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
Israeli confidence and以色列自信和 ~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nd Israeli withdrawal from Gaza ~ 和以色列撤出加沙
refugee camp massacre and难民营屠杀事件和 ~
Unit 101of ~ 的101部队
Israelites古代以色列人
rebellions against Romans of ~ 反抗罗马的起义
tribes of ~ 支派
“It Will One Day Be Told” (Alterman) 《有一天这会被谈起》 (奥尔特曼)
Jabotinsky, Vladimir Ze'ev弗拉基米尔·泽夫·雅博廷斯基
and Arab resistance and violence ~ 和阿拉伯人暴力抵抗运动
Kishinev pogrom and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 ~
on willingness to fight ~ 关于战斗意愿的理论
world wars and世界大战和 ~
writing of ~ 作品
Jacobson, Eddie艾迪·雅各布森
Jaffa雅法
Jerusalem耶路撒冷
and Arab resistance and violence ~ 和阿拉伯人暴力抵抗运动
conquests of占领 ~
and creation of Jewish state ~ 和犹太国的建立
division of ~ 的划分
East东 ~
education in ~ 的教育
Eichmannand艾希曼和 ~
First Temple and第一圣殿和 ~
Independence Day in ~ 独立日
Israeli independence and以色列独立和 ~

Israeli occupation of以色列占领～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巴以和谈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Mughrabi Quarter of～穆格拉比区
national elections in～的全国选举
Old City of～老城
parades in～游行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和巴勒斯坦分治
West西～
Western Wall of～西墙
“Jerusalem of Gold”《金色的耶路撒冷》
Jewish Agency犹太代办处
Jewish National Fund犹太国民基金
Jewish State, The（Herzl）《犹太国》（赫茨尔）
Jews, Judaism犹太人，犹太教
in ancient times古～
anti-Semitism and反犹主义和～
creating state for为～建国
definitions of～的定义
Diaspora流散
and dream of return to Zion～和回到锡安的梦想
education and教育和～
exiles and evictions of～流散和被驱逐
in future～的未来
intermarriages of～的通婚
liturgy and holidays of～中的宗教仪式和节日
of modern Israelis现代以色列人的～

nationalism of ~ 的民族主义
physical appearance of ~ 的外貌
rebirth of ~ 的重生
refugee ships of ~ 的难民船
secular and religious世俗 ~ 和犹太教徒
self-defense of ~ 的自卫
traditions and culture of ~ 的传统和文化
violence against针对 ~ 的暴力活动
Johnson, Lyndon林登·约翰逊
Jordan约旦
Israeli negotiations with以色列和 ~ 的谈判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nd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Israel ~ 和以色列占领土地

Kadishai, Yechiel耶希埃尔·卡迪沙伊
Kafr Kassem massacre卡西姆村屠杀
Kanafani, Ghassan格桑·卡纳法尼
Kanias, Susan苏珊·卡尼亚斯
Kasztner, Rudolf鲁道夫·卡斯特纳
Katzav, Moshe摩西·卡察夫
Kemp, Richard理查德·肯普
Kfar Etzion埃齐翁村
Khirbet Khizeh（Yizhar）《赫贝赫泽》（伊扎尔）
kibbutzim基布兹
collectivization of ~ 的集体主义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nd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Israel ~ 和以色列占领土地

King David Hotel大卫王酒店

Kishinev pogrom基希涅夫集体迫害

Kissinger, Henry亨利·基辛格

Kollek, Teddy泰迪·科勒克

Kook, Abraham Isaac亚伯拉罕·以撒·库克

Kook, Zvi Yehuda兹维·耶胡达·库克

Kraft, Joseph约瑟夫·克拉夫特

Krauthammer, Charles查尔斯·克劳默

Lapid, Tommy汤米·拉皮德

Lapid, Yair亚伊尔·拉皮德

Law of Return《回归法》

Law of the King, The/Torat HaMelekh（Ginsburgh）《国王的律法》（金斯博格）

Lebanon黎巴嫩

civil war in ~ 内战

Israeli invasion of以色列入侵 ~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Israeli withdrawal from以色列撤出 ~

Lechi莱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 ~ 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Leibowitz, Yeshayahu耶沙亚胡·雷博维茨

Lippe, Karl卡尔·利佩

Lloyd George, David大卫·劳合·乔治

Love of Zion, The（Mapu）《锡安之恋》（玛普）

"Lovers of Zion"（Hovevei Zion）锡安热爱者

Lowdermilk, Walter Clay沃尔特·克雷·罗德民

Lydda利达

Maccabees马卡比

Maccabiah games马卡比运动会

Mapai Party马帕伊党

McMahon, Sir Henry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Madrid Conference马德里和会

Magic Carpet, Operation魔毯行动

Magnes, Judah犹大·马格内斯

Mapu, Avraham亚伯拉罕·玛普

Marr, Wilhelm威廉·马尔

Marwan, Ashraf阿什拉夫·马尔万

Medan, Yaakov雅科夫·米丹

Mein Kampf（Hitler）《我的奋斗》（希特勒）

Meir, Golda（Golda Meyerson）果尔达·梅厄（果尔达·梅耶森）

birth and childhood of ~ 的出生和童年

Israeli nuclear program and以色列核计划和 ~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 ~ 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as prime minister担任总理的 ~

resignation of ~ 辞职

Mizrachim东方犹太人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 ~ 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music of ~ 音乐

politics and政治和 ~

Morris, Benny本尼·莫里斯

Moyne, Lord莫因勋爵

Moynihan, Daniel Patrick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Munich Olympics慕尼黑奥运会

Muslim Brotherhood穆斯林兄弟会

Muslims穆斯林

education and教育和～

Lebanese civil war and黎巴嫩内战和～

Nasser, Gamal Abdel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Suez crisis and苏伊士运河危机和～

Negev内盖夫

“Nerves”/“Atzabim”（Brenner）《精神病》（布伦纳）

Netanyahu, Benjamin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New Ghetto, The（Herzl）《新隔都》（赫茨尔）

new historians新历史学家

Nili尼里

Nixon, Richard理查德·尼克松

Nordau, Max马克思·诺尔道

Obama, Barack巴拉克·奥巴马

October 2000 Events（October Ignition）2000年十月事件（十月暴乱）

oil石油

Olmert, Ehud埃胡德·奥尔默特

“One Truth and Not Two”（Greenberg）《一个真理，而不是两个》（格林伯格）

“On the Slaughter”（Bialik）《论杀戮》（比亚利克）

Oren, Michael迈克尔·奥伦

Oslo Accords《奥斯陆协议》

“Other Side, The”（Abbas）《另一边》（阿巴斯）

Ottoman Empire奥斯曼帝国

conflict between British and英国和 ~ 的冲突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

demiseof ~ 的衰落

Jewish deportations and驱逐犹太人和 ~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 ~ 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Palestinian land purchases and巴勒斯坦土地购买和 ~

Oz, Amos阿摩司·奥兹

Palestine, Palestinians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

agriculture in ~ 农业

and Arab resistance and violence ~ 和阿拉伯人暴力抵抗运动

as British Mandate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 ~

British-Ottoman conflict and英国奥斯曼帝国冲突和 ~

British withdrawal from英国撤出 ~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

as cultural and spiritual center作为文化与精神中心的 ~

delegitimizing Israel and以色列非法化运动和 ~

democratic impulse in ~ 的民主倾向

and divisions in Zionist community ~ 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

economy of ~ 经济

education in ~ 教育

German boycott and德国的抵制和 ~

Hebrew literature and希伯来语文学和 ~

Herzl's trip to赫茨尔访问～

history of～历史

illegal immigration to～非法移民

infrastructure of～基础设施

intifadas and因提法达和～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Israeli-Egyptian negotiations and以色列埃及谈判和～

Israeli independence and以色列独立和～

and Israeli invasion of Lebanon, ～和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Israeli-Jordanian negotiations and以色列约旦谈判和～

Israeli negotiations with以色列和～的和谈

Israeli occupation of以色列对～的占领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Jewish immigration to犹太人向～的移民

Jewish land purchases in犹太人在～的土地购买

Jewish population of～的犹太人

Jewish refugee ships and犹太难民船和～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 in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和～

Jewish self-defense in犹太人在～的自卫

Jews deported from犹太人被驱逐出～

kibbutzim and基布兹和～

nationalism in～的民族主义

Old and New Yishuv in～的老伊休夫和新伊休夫

partition of～的划分

and rebirth of Hebrew～和希伯来语复活

refugees of～难民

resistance and violence of～抵抗运动和暴力活动

statehood issue of ~ 建国问题
Sykes-Picot and《赛克斯 - 皮克协议》和 ~
and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Israel ~ 和以色列占领土地
water issues in ~ 水资源问题
World War II and第二次世界大战和 ~
see also Balfour Declaration参见《贝尔福宣言》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Israeli negotiations with以色列和 ~ 的谈判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Peel Commission）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皮尔委员会）
Palmach帕尔马赫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Patterson, John Henry约翰·亨利·帕特森
Patton, George S.乔治·S.巴顿
Peace for the Galilee, Operation加利利和平行动
Peres, Shimon西蒙·佩雷斯
“Perhaps”（Bluwstein Sela）《也许》（布劳斯坦·塞拉）
Pinsker, Leon列奥·平斯克
Poalei Zion锡安工人党
Poland波兰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 ~ 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Jews of ~ 犹太人
and violence against Jews ~ 和针对犹太人暴力活动
Porat, Hanan哈南·波拉特
Power, Samantha萨曼莎·鲍尔
Protocols of Sèvres《色佛尔协议》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The《锡安长老会纪要》

Qibya凯比亚

Queen Esther Beauty Pageant以斯帖女王选美大赛

Rabin, Yitzhak伊扎克·拉宾

assassination of ~ 遇刺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巴以和谈和 ~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s prime minister担任总理的 ~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

Romania罗马尼亚

Rome and Jerusalem（Hess）《罗马和耶路撒冷》（赫斯）

Rotberg, Roi罗伊·罗特伯格

Rothschild family罗斯柴尔德家族

Russia俄国、俄罗斯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 ~ 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Jews of ~ 犹太人

pogroms in ~ 集体迫害

Sabra and Shatila萨布拉和沙提拉

Sadat, Anwar安瓦尔·萨达特

Saison”狩猎季”

Sallah Shabati萨拉赫·沙巴提

Second Temple第二圣殿

Senesh, Chanah汉娜·西纳什

“Sermon, The”（Hazaz）《演说》（哈扎兹）

Shaked, Malka马尔卡·沙凯德

Shamir, Yitzhak伊扎克·沙米尔

Shapira, Anita安妮塔·沙皮拉

Shapira, Zvi Hermann兹维·赫尔曼·沙皮拉

Sharansky, Natan拿单·夏兰斯基

Sharett, Moshe摩西·夏里特

Sharon, Ariel阿里埃勒·沙龙

and invasion of Lebanon ~ 和入侵黎巴嫩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nd Israeli withdrawal from Gaza ~ 和以色列撤出加沙

as prime minister担任总理的 ~

settler movement and定居点运动和 ~

Temple Mount visit of ~ 访问圣殿山

Shemer, Naomi拿俄米·舍莫尔

Shtisel《谢迪塞尔》

“Silver Platter, The”（Alterman）《银盘》（奥尔特曼）

Siman Tov, Benjamin本雅明·西曼·托夫

Sinai西奈半岛

Bar-Lev Line in ~ 的巴 - 列夫防线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Israeli withdrawal from以色列撤出 ~

settler movement in ~ 定居点运动

Sinai Campaign西奈行动

Six-Day War六日战争

combat in ~ 中的战斗

diplomacy and外交和 ~

end of ~ 的结束

euphoria after ~ 后以色列人的喜悦

Golan Heights in ~ 中的戈兰高地

Israeli confidence and以色列的信心和～

Straits of Tiran in～的蒂朗海峡

territories acquired in～占领的土地

total casualties in～伤亡

Smolenskin, Peretz（Peter）佩雷兹（彼得）·斯摩棱斯金

Sneh, Moshe摩西·斯奈

Soldiers Talk《士兵谈话》

Solomon, Operation所罗门行动

"Song to Peace, A"（"Shir LaShalom"）《和平之歌》

Soviet Union苏联

collapse of～解体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Egyptian relations with～埃及关系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和以色列移民

Stavsky, Avraham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

Stern, Avraham亚伯拉罕·斯特恩

Straits of Tiran蒂朗海峡

Sudan苏丹

Suez Canal苏伊士运河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Summer Quarrel"（Alterman）《夏日争执》（奥尔特曼）

Sykes-Picot Agreement《赛克斯－皮科协定》

Syria叙利亚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Jews of～犹太人

nuclear program of ~ 核计划

Soviet military aid to苏联对 ~ 的军事援助

“Tattered Manuscript, A”/“Ketavim Balim”（Ahad Ha'am）《残破的书稿》（阿哈德·哈姆）

Tel Aviv特拉维夫

birth of ~ 的建立

Israeli independence and以色列独立和 ~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巴以和谈和 ~

Israeli wars and，色列战争和 ~

modern Israelis and现代以色列人和 ~

Temple Mount圣殿山

“To the Bird”/“El Hatzippor”（Bialik）《鸟颂》（比亚利克）

“Tourist”（Amichai）《游客》（阿米亥）

Truman, Harry哈里·杜鲁门

Trumpeldor, Joseph约瑟夫·特伦佩尔多

Tuchman, Barbara巴巴拉·塔奇曼

Twain, Mark马克·吐温

Two Fingers from Sidon《来自西顿的两根手指》，346

United Kingdom英国

and Arab resistance and violence ~ 和阿拉伯人暴力抵抗运动

Balfour Declaration and《贝尔福宣言》和 ~

conflict between Ottomans and奥斯曼帝国和 ~ 冲突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 ~ 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Jewish revolt against犹太人反抗 ~ 的起义

Palestine as Mandate of巴勒斯坦 ~ 委任统治
Sykes-Picot and《赛克斯 - 皮克协议》和 ~
violence against针对 ~ 的暴力活动
withdrawal from Palestine of ~ 撤出巴勒斯坦
world wars and世界大战和 ~
United Nations联合国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
delegitimizing Israel and以色列非法化运动和 ~
Israeli independence and以色列独立和 ~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 ~ 和巴勒斯坦分治
United States美国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
delegitimizing Israel and以色列非法化运动和 ~
Eichmannand艾希曼和 ~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巴以和谈和 ~
Israeli relations with ~ 以色列关系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Jewish immigration to犹太人移民 ~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 ~ 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 ~ 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Jews of ~ 犹太人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 ~ 和巴勒斯坦分治
Rabin's funeral and拉宾葬礼和 ~ ，
Ussishkin, Menachem梅纳赫姆·乌什金

Waltz with Bashir《和巴什尔共舞》

War of Attrition消耗战

War of Independence独立战争

*Altalena*affair in ~ 的“阿尔塔莱纳”号事件

end of ~ 的结束

Jerusalem and耶路撒冷和 ~

peace negotiations and armistice in ~ 时期的和平谈判和停火协议

total casualties in ~ 伤亡

Weizmann, Chaim哈伊姆·魏茨曼

Balfour Declaration and《贝尔福宣言》和 ~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 ~ 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 ~ 和巴勒斯坦分治

West Bank约旦河西岸

economy of ~ 经济

intifada in ~ 因提法达

Israeli occupation of以色列对 ~ 的占领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巴以和谈和 ~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Israeli withdrawal from以色列撤出 ~

settler movement and定居点运动和 ~

“Winter'73”《73年冬天》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战

Eichmann and艾希曼和 ~

and violence against Jews ~ 和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

Yadin, Yigal伊加尔·雅丁

Yavetz, Ze'ev泽夫·雅维茨

Yemen也门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 ~ 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Jews of ~ 犹太人

Yizhar, S.（Yizhar Smilansky）S.伊扎尔（伊扎尔·斯米兰斯基）

Yom Kippur War赎罪日战争

Yosef, Ovadia俄巴底亚·约瑟

Zangwill, Israel伊斯雷尔·赞格威尔

“Zion, Whence Cometh My Help?”（Zangwill）《锡安，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赞格威尔）

Zionists犹太复国主义者

anthem of ~ 歌曲

anti-Zionists and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 ~

and Arab resistance and violence ~ 和阿拉伯人暴力抵抗运动

classic ~ 经典著作

congresses of ~ 代表大会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

delegitimizing Israel and以色列非法化运动和 ~

divisions in ~ 运动的内部分歧

and dream of return to Zion ~ 和回到锡安的梦想

Israeli independence and以色列独立和 ~

Israelites and以色列人和 ~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 ~ 和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 ~ 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Kishinev pogrom and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 ~

Labor劳工 ~
mission and aspirations of ~ 的奋斗目标
modern Israelis and现代以色列人和 ~
origins and launch of ~ 的起源和兴起
Palestinian land purchases and巴勒斯坦土地购买和 ~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 ~ 和巴勒斯坦分治
PLO on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于 ~ 的看法
as political movement作为政治运动的 ~
and rebirth of Hebrew ~ 和希伯来语复活
religious宗教 ~
Revisionist修正派 ~
secularism of ~ 的世俗性
settler movement and定居点运动和 ~
and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Israel ~ 和以色列占领土地
world wars and世界大战和 ~
Zohar, Uri乌里·佐哈尔
Zweig, Stefan斯蒂芬·茨威格

无规则游戏

GAME WITHOUT RULE



[美] 塔米姆·安萨利 著
钟鹰翔 译
朱永彪 审校

THE OFTEN

阿富汗

INTERRUPTED

屡被中断

HISTORY OF

的历史

AFGHANISTAN

浙江人民出版社

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

【美】塔米姆·安萨利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言

当今的世界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将会走向哪里，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思考者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应该努力回应、解答的问题。出版者应该成为文明的瞭望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活，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新。出版“好望角”书系，正是我们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解答读者灵魂之惑、精神之惑、道路之惑的尝试和努力。

本书系所选书目经专家团队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好望角”，让读者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打开新的视野，突破一隅之见。当然，书中的局限和偏见在所难免，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非洲南部“好望角”本名“风暴角”，海浪汹涌，风暴不断。1488年2月，当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的船队抵达这片海域时，恰风和日丽，船员们惊异地凝望着这个隐藏了许多个世纪的壮美岬角，随船历史学家巴若斯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海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佳评推荐

《无规则游戏》是关于阿富汗历史最动人、最有感染力和最富有洞见的作品。作者叙事技巧高超，着眼细节，他通过阿富汗人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国家常被世人忽略的历史，印度河和乌浒河之间这片土地上两个多世纪的种种故事：战争、革命、宫闱斗争，都在书中一一得到呈现。任何关心阿富汗命运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它会告诉你阿富汗局势动荡不安的真实原因。

——拉吉夫·钱德拉塞卡兰《小美国：阿富汗战争中的战争》作者

安萨利讲述了两个多世纪的阿富汗历史，带领我们走过荒僻的草原和残酷无情的戈壁，见识一个充满血性的民族。他驳斥了“帝国坟场”的论断，认为正是雅利安人、蒙古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外族的入侵，成就了今日不屈不挠的阿富汗。安萨利认为，现代入侵者之所以屡战屡败，其致命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片土地上的种种内部矛盾。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干涉，是对阿富汗国家建设的严重干扰，导致这个几乎与美国同时形成的国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国家建设之路。

——《中东日报》

安萨利擅长用非常随意轻松的语言论证自己的观点，而这丝毫不破坏叙事的严谨。他深入历史语境和还原文化的能力，令人眼前一亮。几个世纪之前的人、事、物，经他之手变得栩栩如生。读者若对阿富汗或中亚历史抱有兴趣，绝对不可错过本书。

——《出版人周刊》重点推荐

安萨利将超凡的学识与高超的叙事技巧揉捏一处的能力令人叹服。他出生于阿富汗，尽管16岁时离开了那里，但他从未停止收集阿富汗的故事。他以大师级的文笔将其进行加工，知道何时应该脱离宏大叙事而专注细节，从而勾勒出当地赤贫村民的生活气息。他始终将重点放在阿富汗，间或穿插论述外国势力。作者关于阿富汗领导人人格魅力的描写尤其精彩，他结合与此相关的斗争、外国干涉，生动讲述了一段动荡的阿富汗历史。

——《爱尔兰时报》

本书给人如春风拂面般的阅读体验，作者讲述了几个世纪以来阿富汗动荡的历史，也讲述了这个国家当今的军事纠葛。作为喀布尔本地人，作者对阿富汗有序、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以及陷入困境的游牧部群有着深刻理解……他生动论述了阿富汗如何应对过去与现在的各种难题，这部分内容有着很高的战略意义。

——《科克斯书评》

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报道令人眼花缭乱，来自旧金山的记者兼作家塔米姆·安萨利认为，人们对于这场战争仍有许多误解。在书中，他重点论述了塑造当今局势的历史事件。

——《圣何塞信使报》

安萨利以叙事大师的超凡自信，从阿富汗人的角度，娓娓讲述阿富汗的发展历程，这是一种微妙而又复杂的历史叙事……作者对于故土的深情与对未来的乐观情绪跃然纸上。

——《书单》

作为阿富汗裔美国人，安萨利是讲述这个故事的不二人选。通过他的锐利笔锋，读者可以了解他那战乱频仍的祖国。随着2014年北约部队逐渐撤出，了解阿富汗已刻不容缓，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地理杂志》

中译本序

2012年，塔米姆·安萨利先生的《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一书在美国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并颇受好评，已被视为了解阿富汗的必读书籍之一。

安萨利是阿富汗裔美国人、美国知名作家，尽管兴趣广泛，从事过多种工作，但他长期关注阿富汗问题，对阿富汗有着特殊的情结，出版的多部著作大多与阿富汗相关，因此对塔米姆·安萨利来说，写作《无规则游戏》，更像是在娓娓讲述阿富汗故事。

本书对1747年到最近几年的阿富汗历史进行了梳理，尽管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更像是带有个人体验和历史记忆色彩的国家画像，充满了“传闻”“秘闻”，但安萨利强大的叙事能力和卓越的文字功底，以及对大量一手素材的掌握，使得本书不仅免于野史之嫌，而且完全可以和正史著作相媲美，同时又比正史著作更加生动精彩，有很强的可读性。

安萨利敏锐地洞察到了阿富汗国家和社会的两面性，通过他活泼的语言，读者可以轻松掌握阿富汗的全貌。安萨利认为，阿富汗得以维持统一的原因之一是：外部的干涉和入侵，激发并一再刺激了阿富汗的国家认同。同样，关于阿富汗中央政府为何一直相对无能，部落、宗教势力为何如此强大、顽固的原因，也可以在书中得到答案。安萨利对德奥班德派的描述也非常生动、详细，这对研究教派和极端主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阿曼努拉的改革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如何与当时的阿富汗格格不入，阿曼努拉又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泥潭的论述详细且生动，这足以弥补之前类似著作在这段历史叙述方面相对模糊或生硬的不足。

通过《无规则游戏》，我们还可以依稀想象当年苏军在阿富汗的窘境，也可以想象出戈尔巴乔夫负责任的撤军方式，和奥巴马、特朗普想要的撤军方式并无分毫差别。安萨利通过“布兹卡谢”游戏来说明阿富汗的悲哀处境，但他在文末也指出，“无规则”背后也有“规则”。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两个有意思的观点：一是他直截了当地在序言中指出，阿富汗不是“帝国坟场”，因为历史上曾有多个国家或势力征服了这里；二是他认为塔利班事实上从未真正想制止罂粟的种植，只是因为大量种植导致价格下跌，才在个别年份控制了罂粟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虽然这些观点不占据主流，但无疑是正确的。

以上问题，都非常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阿富汗复杂的历史、当下的乱象，以及看起来仍遥不可及的平静未来。

《无规则游戏》中的近代阿富汗还可能会让中国读者产生些许错觉，尤其是会有近代阿富汗与近代中国有几分相似的联想。事实上，近代的东方国家确实面临过相似的内外困境，如阿曼努拉夫妇1927年欧洲之行在阿富汗国内遭遇的非议，与半个世纪前郭嵩焘的遭遇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阿曼努拉下台逾30年后，竟然还有边远村民向其问好……塔拉基和阿明的关系，也会让中国读者唏嘘不已。

通过本书可以发现，阿富汗历史的主题其实不是阿富汗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历史，而是阿富汗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对决的历史，其结果往往以改革发起者和推动者的流血失败而告终，这最终造就了今天的阿富汗。

当然，书中也有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关于苏联人埋设地雷的说法，可能是因为作者更多地受到了当时西方的反苏宣传的影响。事实上，阿富汗遗留至今的地雷主要出自“圣战士”之手，内战期间，阿富汗人自己埋下的地雷更是难以计数。由此可见，冷战时期的各种片面宣传造成的影响有多深远。

在阿富汗的前景问题上，本人可谓是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作为阿富汗裔美国人，安萨利先生在悲观的同时，比我要乐观许多，他仍对阿富汗充满希望，甚至对矿业救国抱有很大期许。

正如塔米姆·安萨利所说，“阿富汗的历史屡被中断，也在不断重新开始，这个国家还在整合，未来如何，谁也无法下定论。”相信看过本书的读者，会对阿富汗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相对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是我为本书作中译本序的主要原因之一。

阿富汗是中国的20个邻国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长期以来，国人对阿富汗知之甚少，也没有太多兴趣对其进行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出版本书是需要勇气的，也是具有远见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策划“好望角”书系，并关注阿富汗，选择出版《无规则游戏》，令我个人非常钦佩，因此斗胆为本书作中译本序。

朱永彪

2018年10月

前言

过去的200年间，阿富汗先后五次遭遇外敌干涉，好些世界强权与地区强国都曾试图侵略、占领、征服或控制这片土地。每次侵略，都让侵略者付出了沉重代价。奇怪的是，每一次干涉，仿佛都出自同样的原因；每一次外敌来犯，也都延续着一贯的套路——汹汹而来、悻悻而走，似乎都不知道前车之覆乃是后车之鉴。

1839年，英国殖民者第一次侵入阿富汗。初次接触的回忆相当不堪。40多年过后，同样的入侵者，犯下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错误。前辈的痛苦教训，后人却一点不曾汲取。又过了40年，英国人第三次踏进同一条河流。60年后，苏联军队也在阿富汗栽了跟头。如今，阿富汗的土地上驻扎着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故事似乎一直在循环往复。

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健忘呢？

由此，我想起了一段亲身经历。数年前，我有幸前往哈萨克斯坦宣传自己的作品。拙作内容关乎世界历史，我想通过伊斯兰的视角审视世事的变迁。所到之处，读者提出的问题无一例外都与阿富汗有关——这也难怪，我虽是美国公民，却在阿富汗出生和长大。我在哈萨克斯坦逗留期间，美国军队正在造访我幼时的家园，而且他们陷入了战争的攻坚阶段。此外，哈萨克斯坦的读者朋友对于阿富汗也怀有一份独特的记忆。他们的国家曾是苏联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战争，也许我的读者之中不乏亲历者与见证人。

提到阿富汗，读者们总爱问个不停。他们想知道我如何看待美苏两国对阿富汗政局的干涉。这个问题，我曾在美国遭遇过无数次。每一次，我都会给出相同的答案：两次入侵都给阿富汗带去了沉重的灾难。苏联人无法自拔的深渊，如今又困住了美国人。开战之前，美国政府奉行实用主义，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干涉的理由；之后，却又受困于政治因素而无法迅速抽身离去。每蹉跎一点时间，美国政府就要付出更多的生命与金钱，而且他们并不知道原因何在。美国能够控制城市，却无法平息那些自以为在捍卫伊斯兰教的人发起的农村叛乱。

我的回答，读者们并不满意。有一位读者反复追问，还觉得我刚才那番话太过粗浅。我没能给出他想要的答案。最后，我不得不向他摊牌：“我觉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您一定早已成竹在胸。您觉得我忽略了

什么？”

“您一直在强调两场战争的相同点。”读者有些怨言，“对于差异却避而不谈。”

“哦，您觉得两者有何差异呢？不妨指教。”

“嗯，您不会不知道，我们当年出兵阿富汗，是受到了对方的邀请。阿富汗国内有难，所以才向邻居求援。那一次，我们不但出动了作战部队，还派遣专家顾问，帮扶阿富汗的进步势力。而贵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径。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当时，我只能摇头叹息。“您刚才的话是认真的吗？您当真觉得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是为了吊民伐罪？贵国军队当时的任务是要帮助进步力量打击反动派？其实，您的看法倒显示了苏、美之间的又一个共同点。很多美国人说起阿富汗战争，也会像您一样义正词严：阿富汗有难，美国军队千里驰援；美军来到这里不为攻城略地，只为消灭暴政。而且，我们美国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帮助阿富汗人生产和生活。”

问答之间，我产生了一点灵感。内外视角的差别，确实能让同一个故事生出不同的观感。从内部看，各支外国势力及其干涉意图实在大同小异。在战火纷飞的乡下，唯有那些反抗势力最能悟出美、苏、英之间的差异所在。

从外部看，阿富汗仿佛从未变迁，它面临的挑战一如从前，依旧崎岖的山脉、蒸腾的沙漠和无尽的草原。这里的人民向来悍勇不驯，还有着虔心宗教、仇视外族的名声。部落，是他们永恒的归宿。头巾、胡须、长袍、弯刀与马匹是部落习气的象征。每一个部落成员都必须拥有这些东西，否则，他就不属于这里。如此严格的会员准入制度，远远早于重金属音乐同好会，比起当代男士必须遵奉的着装守则也要悠久得多。

事实上，阿富汗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历史上，这个国家总是朝着某一目标蜿蜒前行，尽管途中总被外来干预打断。那么，抛开路上的种种蹉跎，阿富汗人的故事还能剩下些什么呢？

“布兹卡谢”（Buzkash）这种马背叼羊游戏，似乎只见于阿富汗及中亚的草原上。游戏中，大家各自骑上马匹，瞄准地上的山羊尸体发起攻击。骑手一旦抓获猎物，就要朝场地两端狂奔；只要马儿跃过端线，他就能够获胜。不过，幸运儿的身旁总会你追我赶地聚起一众人马。大

家不停扭打撕扯，只为夺取那件战利品。比赛没有队伍，参与其中的选手都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战。参赛人数也从来没有具体规定。除了端线，场地内外并无明显区分，甚至没有负责掌控全局、研判形势的裁判。这种游戏并无犯规一说，自然也不需要有人维护规则。要想约束选手的行为，只能依靠传统习俗以及乡规民约，而且需要参赛者相互之间形成一种自觉。那些需要明文保护方才愿意上场参赛的人，根本就不会收到竞逐的邀请。

200多年前的阿富汗社会，就好像一场轰轰烈烈的布兹卡谢。而后，阿富汗历史的主题一直围绕着两个问题：这种游戏需不需要一点规则？何种规则最为适合？当然，阿富汗这片土地不仅被用于布兹卡谢，这个地方还成了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口中那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竞技场。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世界强权纷纷加入。就像所有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一样，这也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它本身与阿富汗问题无关，其利益关系是全球性的。阿富汗不幸卷入其中，只是因为它正好位于混战的前沿而已。

两场不相干的游戏在一个场地举行，玩家难免磕磕碰碰，双方的命运也由此交织到了一起。自19世纪早期以来，太多类似的故事曾在这里上演。一场游戏会影响另一场游戏，并使其更为复杂。但是，大国间的博弈绝不能与阿富汗内部的竞逐混为一谈，那样一来，只会让历史的面目混淆不清。

大国干预阿富汗的故事确实引人入胜，不过，阿富汗也有自己的故事。一场干预自有生发起落，不同的侵略者则在来往更替。不过，他们并非阿富汗这个故事的主角，他们只是搅乱了故事的发展。每次外部势力造访，故事都得从头再来，此前的情节发展悉数毁于一旦。同样一个故事，被人屡屡搅局，也难怪那些搅局者总会吞下同样的苦果。

“帝国坟场”一类的论调，笔者不想重复。介入阿富汗事态的大国势力似乎总会一败涂地。这里地形复杂、人民善战，这对征服者而言确实是特殊的挑战。如此想法看似智慧超然，实则大错特错。历史上，阿富汗沦于外敌铁蹄之下的情况实在不知凡几。3000—4000年前，雅利安人（Aryans）便征服了这片土地。因此，这里才会被人叫作“雅利安人的国家”（Ariana）。后来，“雅利安人的国家”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阿富汗人以波斯语（阿富汗官方称之为达里语，近90%的阿富汗人将达里语作为第二语言）为通用语言，正是出于这层关系。后来，希腊人又成了这里的征服者，他们建立的希腊王国延续了200多年。时至今日，

在阿富汗的一些地方，偶尔还能见到金发碧眼的希腊征服者后裔。佛教徒也一度成为这里的主宰，独一无二的希腊式佛教艺术由此在阿富汗起源并走向繁荣。

如今，99%的阿富汗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显然，这是阿拉伯人征服阿富汗留下的一项遗产。突厥人更是隔三岔五就会吞并此地。横扫而过的蒙古大军，把阿富汗化为了一片鬼域。阿富汗是“帝国坟场”，但不是蒙古帝国的坟场。15世纪，喀布尔还曾沦为一名突厥军阀的领地。此人后来南下印度，开创了莫卧儿帝国。种种事例表明，阿富汗这片土地并非不可征服，只是所有成功的征服者现在都被称为“阿富汗人”。

早期的征服活动塑造了现在的阿富汗。本书讲述的是阿富汗最近200余年的故事。其间，西方强权想要主宰这个国家，阿富汗人先后五次（次数取决于读者对“战争”的概念）与之交战。阿富汗的故事与大国干涉的故事交相勾连，仿佛同一个故事的两条叙事线。它们互不隶属，却又相互影响。唯有站在世界的高度，才能解释阿富汗为何屡遭侵略，而侵略者却无法遂愿，其原因可能就在这个国家的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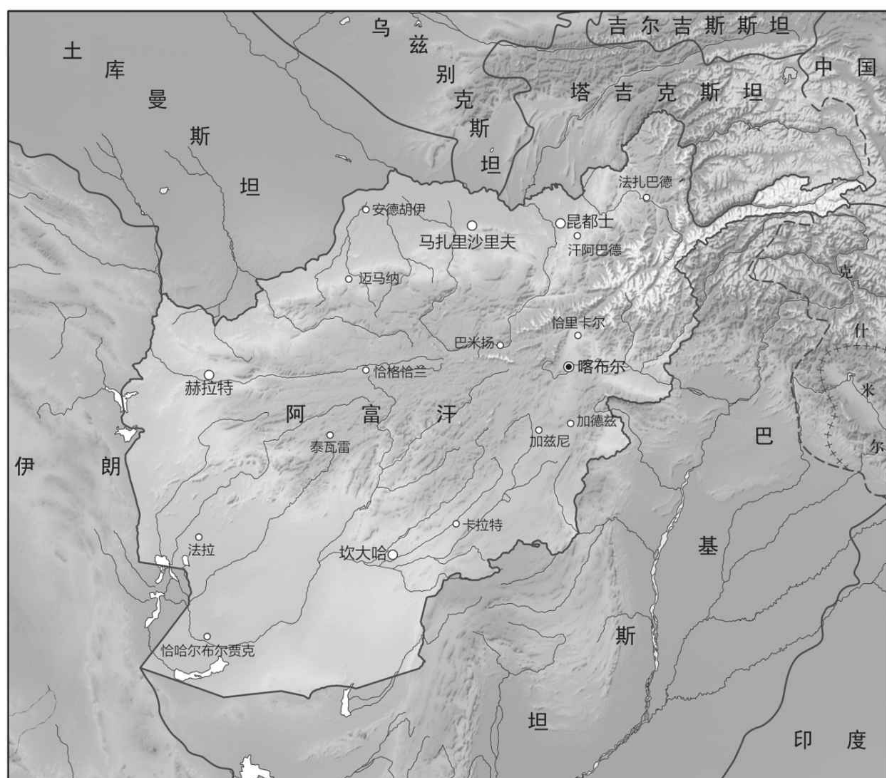
接下来，笔者将带领大家深入阿富汗内部，好好看看这个国家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是很长，阿富汗几乎和美国一样年轻。内有顽疾，外有持续不断的干涉，才让这个国家步履蹒跚、求存艰难。故事的开头，要从一个名叫艾哈迈德·沙阿的男子说起。

目 录

出版者言
佳评推荐
中译本序
前言
第一部分　阿富汗的建国
第1章　国父
第2章　艾哈迈德·沙阿的帝国
第3章　隔壁的法兰奇人
第4章　熊与狮之间
第5章　奥克兰的蠢行
第6章　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回归
第7章　短暂的黄金岁月
第8章　第二次英阿战争
第二部分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第9章　铁血时代
第10章　新的开始
第11章　崇尚变革的君王
第12章　王法还是教法？
第13章　王朝分崩离析
第三部分　喀布尔的规则
第14章　风暴之后
第15章　不结盟国家
第16章　不要停滞，要发展
第17章　民主的时代
第18章　左翼兴起
第19章　改弦更张
第20章　苏联入侵
第四部分　旧阿富汗的爆发
第21章　穆贾希丁
第22章　冷战的最后阶段
第23章　从恐怖到混乱
第24章　走出难民营
第25章　塔利班对战穆贾希丁
第26章　“基地”组织

第27章　美国参与其中
第五部分　乱象依旧
第28章　波恩计划
第29章　喀布尔之春
第30章　源源不断的麻烦
第31章　毒品与腐败
第32章　塔利班
第33章　临界点
第34章　增兵阿富汗
第35章　希望之光
大画景
致谢
人物对照表
术语释义
注释
参考文献
原书索引
返回总目录

第一部分　阿富汗的建国



阿富汗

第1章　国父

乔治·华盛顿登上北美政治舞台的时候，遥远的中亚与南亚之间，一个帝国正在形成。帝国的主人艾哈迈德·沙阿（Ahmad　Shah）是位部落首领，日后的阿富汗人都会把他尊为“国父”（Baba）。因为，大家追根溯源，觉得此人才是他们国家的初代君主。

艾哈迈德确实是个大人物。他块头很大，还长着一张宽颊大脸；一双杏仁眼颇具部落特色，同时又带着几分浪漫豪情。艾哈迈德16岁时，波斯国王纳迪尔·阿夫沙尔（Nadir　Afshar）已对他赏识有加。纳迪尔出身草莽，性情残暴，一心想要重现波斯帝国的荣光，一度还差点如愿以偿。他曾经远征印度，并把著名的孔雀宝座（Peacock　Throne）掠夺回国。攻伐期间，艾哈迈德一直伴在国王左右，取得了对方的信任。纳迪尔把手下一支4000多人组成的精锐骑兵托付给了这个部落青年。要知道，当时的艾哈迈德不过十来岁。

1747年的某天夜里，波斯军队发生哗变，纳迪尔被自己的亲信大臣杀死。而后的一夜混乱不堪，各位将领忙着争权夺位，普通士兵则在尽情抢掠。和国王一道出征的后宫妃嫔，自然成了乱兵垂涎的战利品。据说，艾哈迈德当时正在王室女眷下榻处当差值守，他凭借一人之勇，打退了好些前来骚扰的醉汉。最终，他成功守护了一屋子的女性，并召集手下突出重围，踏上了回家的行程。

这个故事来自笔者小时候在历史课堂上的见闻。故事听起来有些虚假，不过，史书确有记载。那个晚上，一个体貌特征神似艾哈迈德的人逃出了纷纷扰扰的波斯军营，国王生前攒下的大批财宝被此人劫掠一空。黄金、宝石自不必说，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光之山”（Koh-i-Noor）也落到了他的手中（如今，这件珍宝是英国王室的藏品，被陈列在伦敦塔供人观瞻）。

那个时候，艾哈迈德的乡亲父老正在蓄积力量、图谋变革。历史上，普什图人从未得到真正的统一。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结成部落，互相攻伐。眼看纳迪尔的波斯帝国行将崩溃，普什图的各部首领意识到必须选出一位共主，带领大家暂时团结起来共克时艰。出于这个目的，各大部落决定会盟坎大哈。每逢这种支尔格大会议（Loya jirga），主要部落的一众头面人物都要出席。为了帮助头领作出正确选择，德高望重

的学者、法官和教士也将列席旁听。一些作家认为，该地区的其他重要族裔，比如塔吉克人、哈扎拉人和乌兹别克人，也会派出代表参加。艾哈迈德也是与会人士之一，只不过，会上的他总是沉默不语。这也难怪，当时艾哈迈德只有25岁。按照地区传统，他作为后生晚辈，必须行事谨慎，服从长者的意愿。

会议开了9天，各部长老争论不休，没人愿意退让，把王位让与他人。最后，一位年迈的、很有威望的托钵僧走下会场，一手指向了年轻的艾哈迈德。“他就是你们的王。看啊，他拥有众人所没有的贵气与王者之气。”艾哈迈德本人谦恭异常，他婉言表示，自己资历不够，难堪大任。托钵僧却把一顶麦草编成的王冠戴在了艾哈迈德的头上。那一刻，艾哈迈德仿佛焕发了领袖的神采。各部长老都立即拜服于他，他们觉得，这位谦谦后生的身上确有与众不同的英雄气概。

就这样，艾哈迈德得以称王。

对此故事，我们大可提出质疑。长老们臣服于一个小辈，显然不只因为后者的领袖魅力。那个时候的艾哈迈德本就实力雄厚，他有一支忠心耿耿的铁骑可供差遣，还掌握了波斯国王留下的大笔财富。不过，虚构的故事反映了普什图文化有趣的方面，这使艾哈迈德的晋升合法化。即使强如艾哈迈德，他也需要宗教老者的支持、部落领袖的选票。此外，他的谦逊态度也让他显得卓尔不群。雄厚的实力、宗教的肯定、出众的人品，艾哈迈德三者兼具，终于得到“沙阿”的头衔。年轻的艾哈迈德成了所有普什图人及其当地盟友和部下的王。[1]

普什图人聚居区北至兴都库什山脉，向南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河谷。他们的人口有4000万左右，虽不及西班牙，却比加州略多。他们的主要语言是普什图语，这门语言和波斯语有些相近（可能和葡萄牙语与意大利语之间的关系有得一比）。他们的文化也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关于普什图人的起源问题，学界尚无定论，普什图人的传说故事将其起源追溯到古以色列遗失的部落。不过，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两三千年，这个地方确是他们的家园无疑。

普什图人的社会生活要靠部落制度维系运转。当然，大大小小的部落、子部落、氏族与大家庭，也造成了普什图社会的分裂局面。每个家族都会攀附某位英雄作为始祖。各位读者只要注意姓氏末尾的“扎伊”（-zai），就能大致了解某个普什图人的血脉传承，就像苏格兰人姓氏当中的“麦克”（Mac-）。艾哈迈德出自萨多扎伊（Sadozai）家族。顾名思

义，他和他的族人拥有一位名叫“萨多”（Sado）的男性祖先。萨多有何丰功伟绩，史册上未见记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他忙着开枝散叶，后世子孙才有生生不息的机会。巴拉克扎伊（Barakzai）与萨多扎伊同为望族，其祖巴拉克同样籍籍无名。但是，两族人民都还记得，他们的祖先乃是一对血亲兄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不同氏族组成部落，部落又组成松散庞大的部落联盟。萨多扎伊和巴拉克扎伊同属阿卜达利（Abdali）部，也就是说，他们来自一个更遥远的祖先，名叫阿卜达勒（Abdal）。

吉尔扎伊（Ghilzai）部和阿卜达利部互为世仇。与阿卜达利部一样，吉尔扎伊部也是根系庞杂、人口众多。他们都以坎大哈为根据地，不断南进拓展。吉尔扎伊部的领地位于东面，阿卜达利部则占据了西部。几个世纪以来，吉尔扎伊部一直掌握着普什图部落社会的主导权。对此，阿卜达利部很是不满。15世纪时，吉尔扎伊部在印度北部建立了德里苏丹国。18世纪30年代，他们曾短暂统治伊朗。到了1747年，大局仍在吉尔扎伊部的掌控之中。可是，一场支尔格会议却把艾哈迈德推上了国王的宝座，部落社会的权力天平开始朝着阿卜达利部倾斜。

面对各部长老，艾哈迈德态度谦卑。登基之后，他却自封为“杜尔-依兰-杜兰”，意即“珍珠中的珍珠”（Durri-i-Durran）。后来，国王声望渐长，他的那些部落同胞争相攀附，不少阿卜达利部人都自称出自“杜兰尼”（Durranis）一族。这个源自“珍珠”的词汇，仿佛真是自带光环。到了后来，阿卜达利人个个自称“杜兰尼人”，祖先的真正名号反而湮灭在了史海深处。

如上的一切都是后话。初登大宝的艾哈迈德根基尚浅，族人也并不那么以他为荣。故而，他这个国王有名无实，倒更像是个部落联盟的召集人。只是由于危局来临，大家才把他推上王位，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艾哈迈德的王位难以长久。正如普什图古谚所说：“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我的陌生人。当没有外人时，我对付我的兄弟。”艾哈迈德能够称王，不过是因为外敌当前，北方的突厥军队、西方的波斯军队，都叫一众部落长老坐立难安。待到局势缓和，联盟就会重新分裂成不同的部落，部落再分裂成氏族，氏族变成大家庭，而大家庭才是普什图文化的基本单位。

这是艾哈迈德这个国王面临的最大挑战。他领导下的“国家”由大家庭组成，每个大家庭都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事实上，每个家庭中的男性也自视为国王。的确，传统赋予每个人一个角色、一个等级：男人

在上，女人在下，年长意味着拥有尊位，官富子弟也比平民的儿子要高贵……

然而，除了这些准则之外，普什图部族社会还有一种独特的立身原则：男人的地位并不取决于他所担任的职位或这些职位所拥有的权力，直截了当笼络人心，才是步步进阶的保证。身居高位的人，一定有真本事让属下服膺。他们赢得这种尊重，是因为其在政治游戏中获得的经验。在这个游戏中，才干是有意义的，但不是一切；继承下来的声望固然重要，但并不代表一切；雄辩的口才、亲切的举止、盟友关系、姻亲背景，都是有意义的，但又不是必然的。这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王权的更替。国王总像流水一般换来换去，觊觎王位的野心家也是层出不穷。小小的疏失、无意的惊扰、笨拙的举止、不雅的言行，都有可能成为对手利用的契机。

家人相处的道理，总能用于解释家族之间的关系，家族关系又能为氏族和部落的生存竞争提供借鉴。在这个部族社会，一切权力都来自私人关系。错综复杂的家族政治和这些关系网络交织在一起。干涉部落内部事务只会让国王大伤面子，甚至还会害他失去权位。因此，即便是艾哈迈德这样的酋长也无法命令他的近亲，他的每项命令都必须经过大家讨论，方能施行。

艾哈迈德能够得势，少不了身边一群人的追随与拱卫。至于地方上那些实力派，国王则许以权力与高位，换取他们对他的忠诚。君臣之间就像家人，家人之间的关系，外人自然无法买断。权力的秘密总在折磨入侵的外敌，他们总在扶植傀儡，试图达到代治的目的，却浑然不知一个官位在阿富汗并不代表相应的权力。

艾哈迈德很清楚，唯有养战自重，他才能保住盟主的位置，他的子民也会因为战争而团结一心。他的先祖曾经远征印度、大肆劫掠，他决定效仿。印度人大多是印度教徒，他们的信仰包含了偶像崇拜的成分。艾哈迈德和他的百姓则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反对以物配主，他们认为摧毁偶像越是得力，就越能得到安拉的赐福。艾哈迈德·沙阿在印度破坏神庙、打砸神像，自然收获了不少福气。

劫掠，还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神像之上，往往饰有珍珠和宝石；神庙之内，还有黄金等其他稀罕玩意儿。一场对印战争，总能满载而归。腰包鼓鼓的艾哈迈德因此有了收买人心的更多本钱；那些人接受了国王的好处，自然就得登上国王的战车。艾哈迈德·沙阿一生征战无数，他的疆土越来越广，原有的地盘也愈发巩固。

艾哈迈德作战英勇。不过，臣民对他的爱戴并不仅仅缘于他的武功。作为普什图部落的一员，国王也得和臣下一样慷慨大方。为此，他不惜金钱，频频赐宴；又打开国库，救济穷困。他总是摆出一副乐善好施的模样。诚然，朝廷的大小事务都在国父的掌控之中。不过，艾哈迈德也得满足属下的自尊与骄傲。唯有谦逊的君王，方能拥有强大的力量。雄辩，也是普什图社会颇为看重的一大才能。艾哈迈德在这方面是一等一的好手。国王御制的沙场诗篇，至今仍为后人所传诵（可惜，艾哈迈德的诗作精髓，译笔实在难以传神）。[2]

总之，敌人对艾哈迈德忌恨入骨，但在臣下的眼中，国王却是智慧、老练、公正的象征。他非但没有专制，还成立了9名顾问组成的委员会帮助他执政。这些顾问出自不同的部落，是各部的首领，所有内政事务都须经过顾问委员会讨论方能敲定。他对部落势力百般讨好，也换来了他们的耿耿忠心。

普什图瓦里（Pushtoonwali）是普什图人遵守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要求普什图人慷慨待客，甚至在必要时牺牲财富和生产；提倡恩怨必报、血亲复仇，要誓死捍卫家中女性的纯洁；要求普什图人宽恕敌人等。

其实，阿富汗的其他民族也遵守着同样的守则。虽然普什图人在这方面堪称表率，不过，哈扎拉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也未落人后。大家都要为客人倾其所有，都觉得家门荣誉与女眷的贞操息息相关。未婚女性一旦失节，更是罪莫大焉。艾哈迈德对普什图社会多加规范，对于其他民族也未曾放纵。普什图人与少数民族之间自然存在文化差异，但是，在艾哈迈德这个普什图人的统治下，大家相处得还算融洽。国家一派和谐，与艾哈迈德对地方势力的宽纵有关。身为国主，自然需要收缴税款。不过，艾哈迈德并未横征暴敛。他将各族臣民征召入伍，与其说这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做法，不如说是分享战利品的方式。

艾哈迈德·沙阿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全盛时期，帝国疆域西及伊朗东部，东至印度河畔。这等业绩，先辈也曾数次企及。早在11世纪，加兹尼王朝苏丹马赫迈德（Mahmoud）就已出兵南下。他劫掠的那些神庙，艾哈迈德日后也会造访。16世纪的时候，莫卧儿帝国的开国皇帝曾在帕尼帕特（Panipat）赢下关键的一仗。同样的地方，200年后又迎来了艾哈迈德的武装。



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帝国的位置和范围

众多雄主之中，艾哈迈德也有那么一点不同：唯有他能让普什图部族团结在一起。吉尔扎伊部与杜兰尼部的关系被他妙手修复，巴拉克扎伊与萨多扎伊两大家族也重归于好。他甚至搭起了一座桥梁，让普什图人与少数族裔和平共处。说波斯语的塔吉克人、信仰什叶派的哈扎拉人与隶属突厥语族的乌兹别克人，都对他俯首称臣。阿富汗北部的土库曼人、伊朗境内的波斯人，也成了帝国的一部分。大家对这位伟大帝王都深感服膺。各族杂处的军队中，隐隐约约的国家意识正在慢慢萌生。在艾哈迈德·沙阿国父军队中并肩作战的各民族，开始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一种阿富汗意识。[3]这就是为什么在艾哈迈德统治的时代，这片古称“亚里安那”（Ariana），后又改名“呼罗珊”（Khurasan）的土地，开始被人叫作“阿富汗”。

第2章　艾哈迈德·沙阿的帝国

如果以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概念为标准，那么艾哈迈德·沙阿统治的地域很难称作国家。因为国家必须具备以下要素：一定的领土、连续成形的边界、人人遵守的法律和民众用于交易的统一货币。回到艾哈迈德时代的阿富汗，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恐怕并不存在，在这个地方，每个人的权力范围都相当有限。这里的地势太不平坦，居民又系属多个族群，要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实在太不容易。更不要说当时根本没有便捷的通信手段，交通工具也十分原始。艾哈迈德的帝国看起来广袤，却没有明确的疆域。一座座的城镇与要塞分布在农村地区，唯有在城市方能感受到帝国的威严。

帝国虽有疆界，不过，帝国的疆界并非划线为界，而是以地域作为国与国的区隔地带。帝国的每座城市都由一个强人统治，邻近的乡村地区也得听从城中强人的差遣。不过，强人一旦离开城市，权力即会大大削弱。他的威望就像磁铁一般，随着距离远近而递减递增。作为大城，喀布尔就是帝国权力的一极。南疆名邑坎大哈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不过，喀布尔与坎大哈之间的广大区域，两座城市的领主都是鞭长莫及、无力管治。

地方豪强的权势虽不如大城领主，却更加直接有效。所谓地方豪强，可能只是邻近城镇的一位领主，也可能是周围某个村子的头人。到了某些偏远地区，一位地主也能自命豪强。只要能够私设武装，并把亲戚佃户聚拢一处，他完全可以在那里称霸称王。帝国的国情就是如此。国王的权势大小，完全取决于他从臣下那里获取税款的多寡。要想巩固统治，君主还得和地方豪强友好相处。只要某地乐于纳税又肯向君主称臣，就可以被视为帝国的一部分。当然，君主总会将富庶的中心地带恩赏给最为忠心的臣子。这类人往往是王亲国戚，如亲王、王子或王孙之类。

众多城邑当中，要数赫拉特、坎大哈和喀布尔最能代表阿富汗。当然，南部的白沙瓦与北方的马扎里沙里夫的战略意义同样不可小觑。无论这片土地落入谁的统治，这五座城市往往都会作为帝国的一部分而被纳入其统治。其中的四座城市仍是今天阿富汗的一部分，白沙瓦已经成为他国领土。白沙瓦的失陷，一直是阿富汗人的历史隐痛。时至今日，围绕此地的种种问题仍在不断发酵。

在艾哈迈德·沙阿那个时代，阿富汗的城市格局与中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每座城市都有城墙，有一到多个城门。城市越大，城墙越高，城门的数目也越多。喀布尔这样的大城市就有五处城门，它们面向不同的方向。五条道路由城门而出，一条通往坎大哈，一条直指白沙瓦，另外几条也各自承担通衢使命。进入城中，道路变得宽阔，从各个方向延伸到市中心。所有的林荫大道都通向大巴扎（Grand Bazaar）。这里的摊贩店铺多如迷宫，商品琳琅满目：既有本地的手工艺品，也有邻近国家输入的现代制造物。大巴扎的一旁，喀布尔河流淌而过。河道两边，正好立着一道谷口。大巴扎北面的山坡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民居。河流对岸，巴拉希萨尔（Bala Hissar）王宫坐落在一片山岬上。王宫四周的山峰上矗立着厚厚的黑色城墙，巨大的塔楼上点缀着小窗户。人们常把大巴扎和周边的民居称为“朔尔巴扎”（Shor Bazaar），意为喧闹市集。这个名字所言不虚，此地确实热闹非凡，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最为生动的烟火气息。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风情。在坎大哈的市中心，可以看到密集的清真寺建筑群，周围是驻军。这个普什图文化的故都一直是座保守的宗教城市，也是主要部落的首都。

赫拉特的中心又有另一派景象。此地向来人文荟萃、重视教育，一直以来就是重要的艺术、文学和学术之都。因此，城市中央是学校和神社。赫拉特还是波斯细密画第一人贝哈扎德（Behzad）的故乡，著名的苏菲派诗人贾米（Jami）和安萨利（Ansary）也曾在此安居。(1)

马扎里沙里夫意为“神圣的陵园”。城市中央的确建有一座巨大的陵墓，被部分阿富汗人认为是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埋葬地。对于什叶派穆斯林而言，阿里是最受尊敬的人物，其陵墓有着无与伦比的宗教意义。不管谁统治这里，都会对其进行美化与修葺。长此以往，陵墓才达到了今天的规模。马扎里沙里夫市民庆祝新年的方式也是阿富汗的一绝，其中的某些典礼活动，可以追溯到琐罗亚斯德教盛行的年代。[1]

几百年来，阿富汗走出过无数个自命王者的人物，他们统治的区域通常都会包括上述的一到几座城市。其实，他们的大部分臣民并不生活在城市，而是住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阿富汗农村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了解乡村地区的社会结构，才能了解阿富汗的过去与未来。迄今为止，乡村地区的种种事态，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阿富汗的主要城市

阿富汗历史学家穆罕默德·阿里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阿富汗的乡村共和国（village republic）发展到了最经典的形式。[2]数千个这样的村庄分布在阿富汗的丘陵和平原上，每个村庄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和经济单位。它们有的深居山间，有的位于幽谷，雪峰之下的河水之滨，也是它们自由生长的领地。几乎每个村庄的中心都有一座卡拉（qala），许多卡拉的四角还耸立着坚固的塔楼。

乡村社会当中，婚姻对象相对有限，一番嫁娶之后，几乎人人都算得上血脉相连。但他们追认各自的祖先，记录血缘，以此区分你我。大家族内部自然也有等级制度，最有特权的家庭和他们的仆役、穷苦亲戚生活在卡拉，其他人围住在卡拉周围。大片的田地将家族领地分割开来，两个家族领地之间通常有一天以上的距离。田地上方的斜坡用于放牧羊群，其中以绵羊居多，山羊的数目则要少一些。[3]

在阿富汗，少有人家蓄养畜牛，毕竟这种牲口实在太难伺候。不多的畜牛则被圈养在家中作为奶源，肉食的情况实在少之又少。放羊是男人的活计，照料奶牛则由女性承担。为了应付耕地的重活，大多数农家

都配有耕牛。至于交通，大家基本靠走路。只有路程过于遥远，才会骑上毛驴。同时，驴子还负责搬运重物，比如木材、砖石、麦穗等。任何人力难及的东西，都需要驴子来承担。骡子不太多见，但也有人饲养。山区之中，马倒是真正的稀罕物。蓄养马匹的花销，一般人根本负担不起，还是驴子实用得多。北疆的辽阔草原，才是万马奔腾的王国。

阿里认为，这些小小的社会单位都可以被视作“乡村共和国”，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统治者。宗族的族长是村里的首领。有些宗族地位更高，因此他们的族长和首领更有权威。但他们的权威更像是家长，而不是王，这正说明了艾哈迈德·沙阿的真实身份：家长中的大家长。正因如此，大家才会称他为“国父”。

在当地，最重要的宗法领袖是可汗（Khan），他们构成了阿富汗的封建领主阶层，其地位是世袭的。每个村庄通常还有一位马利克（mailk），一个正式的首领。马利克基本是选举产生的，但马利克的父亲可能也担任过马利克，或至少是可汗。村庄一旦遭遇危机，主要的可汗协助马利克作出决策。很多时候，马利克往往由当地最大的可汗兼任。

正式的决策由村中最重要的人物组成支尔格（达里语地区称为“舒拉”），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作出。支尔格是常设的议事机构，但并非定期召开，只有出现问题时才会召开。支尔格无法通过简单的表决作出决定，而是必须讨论到所有成员都达成共识。这是解除未来冲突的一种方式，因为简单投票作出的决定，可能使多数人获得胜利而少数人闷闷不乐，任何这样的不满都会在看似无关的情况下爆发。因此，大家必须在支尔格上达成一致意见。传统上，支尔格的每个成员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支尔格一旦作出决定，所有成员都不能再有异议。

马利克由支尔格选举产生。不过，他的权威与他从声望、家资和社会地位中获得的非正式权威是分不开的。所谓选举，不过是公推一位声望最高的人物而已。乡村的规模实在太小，成员之间太过熟悉，一切内部事务都可以约定俗成。马利克确实有一些正式的职责：他要负责处理与外部势力的关系，他们可能是邻近城镇的强人、部落首领，甚至还有国王（如果有的话）。有时候，村庄需要直接向国王缴纳实物税。征税的职责自然需要马利克出面完成，所得的物品则会转交给国王派出的代理人。[4]

除了马利克，每个村庄还至少拥有一名毛拉（mullah）。毛拉是伊斯兰教的基层神职人员，他们不是“圣人”，拥有妻子、儿女，可能也拥

有土地，参加战争，他们并不比村里其他任何人更圣洁。他们只是粗通文墨，读过几遍《古兰经》，知晓一些宗教法规而已。他们监督人一生中有关宗教的各种仪式。例如，孩子降生，毛拉会被召唤，他要对着婴儿轻轻念诵《古兰经》。如此一来，孩子才会被正式认作穆斯林。村里的丧仪，毛拉也不能缺席。棺椁下葬的时候，需要他在一旁祈祷；安葬完毕，毛拉还得带领人们念诵《古兰经》，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意。婚姻大事也需要毛拉在场。婚礼自不待言，双方家长议定合同的时候，毛拉也须在一旁相陪——请别吃惊，在阿富汗的乡村社会，婚姻绝非男女爱情的结果，而更像是家族间的一笔生意。

祷告的时候，特别是早晨和日落的时候，毛拉会登上宣礼塔（如果没有宣礼塔，毛拉会站在一处显眼的屋顶），高声祷唱宣礼词，提醒人们祷告时间到了。规模稍大的村庄，则会安排一位宣礼人（muezzin）协助毛拉。可想而知，这位宣礼员一定中气十足、嗓音洪亮。

每个村庄都有类似清真寺的地方，那是礼拜五聚礼、日常昏礼、传统节日及支尔格大会的聚集地，也是旅行者的落脚地。看管清真寺也是毛拉的职责之一，但并不是每位毛拉都有自己的清真寺需要照看。有幸驻寺的毛拉被称为伊玛目（imam）。人们聚集礼拜的时候，伊玛目要负责领拜，他站在前面，保持着和大家一样的姿势，朝向麦加方向鞠躬祷告，伊玛目高声诵读《古兰经》，其他人则轻声地念诵。整个礼拜仪式由伊玛目负责调控，他会适时高喊“真主伟大”（Allahu Akbar），提醒大家适时地端立、跪坐、俯卧和鞠躬。总之，毛拉就像宗教机械师，他在一个充满宗教信仰的世界里照顾着日常生活的细节，在这里，宗教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除此之外，毛拉其实并没有什么独特地位可言。

其实，很多阿富汗人想象中的毛拉，往往是一些喜欢恶作剧的无赖之徒，因为毛拉·纳斯鲁丁（Mullah Nasruddin）的传说实在太过深入人心。纳斯鲁丁是个虚构人物，也是各种幽默民间轶事的主角。一次，邻居想要借纳斯鲁丁家的驴，纳斯鲁丁却满心不愿意。为此，他只能信口雌黄：“不好意思，我家的驴昨晚已经死了。”不巧的是，屋后的驴正好嘶鸣起来。“这是什么声音？”邻居问道，“亲爱的毛拉，你家的驴肯定活得好好的，我刚才明明听见它在叫。”“那又怎么样？”纳斯鲁丁面不改色，“你是相信一头驴的话，还是愿意相信毛拉？”

另一种漫游乡村世界的人物是达拉克（dalak），他们负责处理日常生活中许多不太愉快但必要的细节。达拉克虽非宗教人物，但他们的日常工作却与宗教息息相关。男孩小时候都要例行割礼，达拉克就是那个

操刀的人。达拉克还从事拔牙、理发等各种个人服务。他们居无定所，在一个个家庭之间辗转借住，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食物也来自人家的馈赠。乡村社会（大多数阿富汗人的生活环境）有严格的公私领域之分。公共世界只有男性，家庭则属于私人领域，个中情况外人难得一窥究竟，唯有达拉克可以在公私领域之间游走穿梭。他们知道每个家庭的私密细节，因为他们处理的是最私人的事情。各种闲言碎语，他们没少听闻，并总能毫不吝惜地再将其传扬出去。因此，达拉克也算是乡村社会的新闻媒介。哪户人家有女待字闺中，哪户人家的男孩已到了婚娶的年纪，这类消息达拉克最是清楚不过。因此，他们还能替人做媒。由于达拉克常常走村串乡，掌握的资源比起一般媒人更为广泛，所以许多人家也乐得让他们做媒，从中撮合。[5]

对于各种专业人物，乡村社会也分出等级，排好了座次。达拉克与毛拉同样居于最低等级。在他们之上，还有好些更受敬重的人物。米拉布（mirab，水资源仲裁人）便是其中之一。村庄之间若是出现与水相关的纠葛，须由他们出面调停解难，其话语权很不一般。阿富汗干旱少雨，沙漠广布，水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地位最高的是大毛拉（mawlawi，宗教学者），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物，深得众人爱戴。卡兹（qazi，法官）是最杰出的宗教人物，但并不是每个村庄都有一位卡兹。家庭内部纠纷全由家长调解，家族内部的纠纷由部族处理，村庄之间出现诸如谋杀或盗窃之类的案件，则交由支尔格解决。卡兹有资格裁决复杂的案件，因为他们作为学者和虔诚的教徒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有些公案可能涉及对某些法律问题进行微妙的宗教解释，卡兹处理起来也会觉得力有不逮。遇上这种情况，他可以与穆夫提（mufti）进行磋商。穆夫提是声誉极高的宗教学者，由于深得民众信任，他们拥有签发法特瓦（fatwa，对教法的解释）的权力。这并不是对特定条件的判决，而是对法律作出裁决。由此可见，这里的法律来自宗教经典和古代圣徒的神学著作，而并非出自政府意志，也不是来自任何民选机构、政党、豪强、军阀，任何个人都无力改变法律的内容。统治者想要获取合法地位，必须得到穆夫提与卡兹的支持，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系统。

生活在乡村，货币不是必需品，村民之间甚至无须以物易物，这里的伦常关系冲淡了劳动交易。毕竟一个村子里，人人都互为亲戚——父与子、舅与甥、叔公与侄孙，亲戚之间总有一些必须承担的相互义务。

[6]身处其中，每个人都要安守本分，同时，也能享受亲人提供的庇护。晚辈要孝敬长辈，年轻女性得服从家中年长的女性。

女性掌握着某些领域的控制权，男性通常不进行干涉。采购食物、管教孩子的事情由女性定夺。她们还要代表家族议定婚约，为了礼金讨价还价。不过，总体而言，男性的地位凌驾于女性之上。即便是在女人掌控的领域，最终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在乡村共和国里，有领主，有臣民，人们身在其中，各安其位，每个人按照社会的期望做事，同时也被赋予相应的权利。

阿富汗的村庄几乎都能自给自足。他们自己生产粮食，制作木工，缝制鞋子，给马匹钉上马蹄掌（如果有马的话）。女性们纺纱织布做衣服，在自家的院子里烹煮食物、烘烤馕饼——每户人家都有烤炉，因此，女性大可不必为此抛头露面。她们还会将鲜奶发酵成黄油或干酪，将酸奶干燥后制成令人垂涎的克鲁特（q'root）。妇女们还会想尽办法储藏蔬菜与肉干用于过冬。杏仁、核桃与水果干搅拌在一起，就成了男人外出旅行的口粮。男人在外面从事繁重的工作：挖水渠、修水坝、分配水源、耕种收割等。村中来了陌生客人，他们也要前往照应。如果有战斗（事实上经常有），男人就会去参加战斗。

村庄虽然大体上自治，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一个村庄的人认识其他村庄的人，邻近的村庄里，大多也有熟人居住。有时候，村民还会带上酸酱之类的农产品，骑着毛驴前往附近更大的城镇。他们要用这些东西换取现金，以购买火柴、汤勺、化妆品一类的精巧工业品。在城镇的市集上，他们能听到外面世界的种种消息。然而，外面世界的人与事不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太大影响，对村民来说，总督只是一个故事。至于国王，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大家只是模模糊糊有些印象：一个硬汉带着军队在遥远的地方征战。国王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近乎为零。当然，倘若国王御驾亲临，大家还是会对他毕恭毕敬。不过，国王总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很快，国王又会成为传说，成为人们的谈资。“我见过国王，没错！当时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像那匹马一样真实！”

不过，村民即便足不出户，也有和游牧部族打交道的机会。游牧民约占总人口的10%或更多。他们虽是少数，却是拥有成千上万人的少数。他们过着迁徙的生活，遍布各地，操波斯语的居民叫他们“库奇”（kuchi），即移动的人。普什图语人称他们为“波文达”（powinda）。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各地游走、迁徙，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他们会在合适的地方停留几天，或者说最多几个星期，然后继续上

路。[7]

小的游牧营地可能有10顶帐篷，大的营地则可能多达50顶，他们可能会有数百只羊和数十头骆驼。牧民视牲畜如珍宝，从来都是小心伺候，几乎寸步不离。无论驻足还是迁徙，他们都要带上所有牲畜一同来去。因此，每个游牧部落都有自己的狗，牧民的狗并非优雅的阿富汗猎犬，它们大多形如马士提夫犬，块头足有拉布拉多的两倍大，而且体壮头宽，下颚似斗牛犬。我还在阿富汗生活的时候，几乎没人注意过游牧犬的独特性，人们只是觉得它们是可怕的杂种狗。不过，既然这些看家狗的外貌如此相似，我倒觉得它们可能系属一种有待发现的纯种犬。小时候在喀布尔，我可没少遭它们的惊吓。游牧犬到了主人身边，立即变得恭顺异常，不是跟着畜群一溜小跑，就是守在帐篷之外寸步不离。由于它们的存在，外人大多不愿踏进游牧民的营地。

游牧部族过着危险的生活方式。由于总在外国领土上游走，他们常会遭到其他游牧民族，或是以打家劫舍为生的部群的袭击。在古老的阿富汗，特别是在北方，这样的劫掠者多不胜数。各位读者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盗匪偏要盯上一无所有的游牧民？奥秘与牲畜有关。的确，这些带蹄的生物都是宝贵的财产，而且游牧部族当中还有女人。为了保护女性，游牧部群采取的方法和拓荒时代（pioneer days）历经千辛万苦穿越北美大平原的先驱差不多。在方阵之中，男人守在外面，妇女、儿童围在中间。不同的是，美国人有火车，游牧民则只能策马前行。在下马扎营的时候，妇女、儿童的帐篷也位于营地中心，男人的居所则设在外围，而且男性还得时刻警惕敌人来犯。凡是有人接近，都会被拦下质询，直到弄清身份和来意为止。

游牧部群一旦进入一个村庄的领地，双方往往会爆发冲突。双方都有牲畜需要放牧，自然都需要牧场。村民们自然理直气壮，毕竟他们首先来到这里，这是他们的地盘。眼见如此一群外人赶着几百头羊浩荡而来，一下子就占据了整片山坡，村民的心里肯定很不高兴。

当然，这不能说是游牧民与村民之间处于战争状态。事实上，如果上溯几代，很多农耕民的祖先也曾过着游牧生活；而有些游牧民原来也是一些定居耕种的农民，因为干旱之类的天灾降临，他们的耕地变得荒芜，这才过起游牧生活。不过，既然祖先也曾四处迁徙，他们倒是乐呵呵地接受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甚至觉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要好过天天种地。游牧部落与城镇居民是一种脆弱的共生关系，这一点对游牧民尤其重要。比起农民，游牧民无法做到自给自足。诚然，他们可以

制作食物，但他们不得不进城，在集市上讨价还价，购买器皿、金属制品以及缝制帐篷的布料。此外，他们还得向农民换取蔬菜、水果以及面粉，毕竟阿富汗人三餐都离不开面包、馕饼。当然，游牧民带来的奶制品、肉干、兽皮、刺绣、珍珠和其他轻便的手工艺品，也得到了城镇与乡村居民的欢迎。

因此，游牧民即便过着游牧生活，也不意味着与世隔离。他们属于部落，并受到部落体系的约束，有些游牧部群和定居村民之间甚至系出同源。他们中也有毛拉，也有指定的卡兹作为宗教法官。村民敬仰的宗教学者，也得到他们的崇敬。游牧部群与定居村民之间的区别在于距离：村民终其一生，可能都局限在家乡附近的20英里区域。游牧部群一年走过的路，可能就有几百英里之多。他们的足迹南至印度，向北则跨过了阿姆河，他们几乎不知道“边界”这个词的含义。出身游牧部群的人可能保守顽固、生性多疑，但是，他一定也见过世面，甚至会说三种以上的语言。但国王并不喜欢这些到处游荡的子民。国王想要弄清他们的具体人口都十分困难，更别提向他们征收税款了。而且，他们还会时不时地洗劫朝廷和领主的财产，甚至加入反叛军队与国王作战。正因如此，对待游牧部群，国王从来不敢怠慢。

尽管除了征税之外，艾哈迈德国王在臣民的生活之中没有一点存在感，不过，他们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种联系。臣民如果觉得自己含冤在身，又在支尔格大会和卡兹那里求告无门，他可以向国王请愿为自己主持公道。毕竟，除了教法，还有王法。传统的教法基于宗教教义，以及一些原本属于流俗后来被误认为带有宗教属性的规矩。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代表了几代人的共识。而王法则源自王公大臣的智慧或者怪癖，王法的解释权掌握在国王的手里。

艾哈迈德拥有军事权，他的裁决自然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威性。不过，任何寻求国王正义的人都是在冒险，因为国王的裁决是不能更改的，而且可能是武断的。要想上达天听，需要历经漫长的过程。国王只有一个，他的官僚队伍有限。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等来国王的裁定。如此一来，臣民自然不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打搅艾哈迈德。实际上，由于没有熟人打通关节，一般臣民从来不会向国王求助。因此，只有可汗和其他权贵才会选择这条路。对于乡村地区的普通百姓而言，贤明的国王好过愚昧的国王，仁君比暴君更受欢迎。不过，即便改朝换代，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诚如阿富汗的一则谚语所言：“院子里的一条好狗，比首都的好国王更有用。”[8]

(1) 这位安萨利与笔者并非同宗同源，因此谈不上是亲戚。

第3章　隔壁的法兰奇人

关于艾哈迈德·沙阿是不是阿富汗的第一位国王这个问题，尚具争议，但不容置辩的事实在于，他确是从这里走出的最后一位征服者。他和之前的许多征服者一样，集结部落武装，在中亚与南亚之间开疆拓土。当他死的时候，邻近地区的地缘环境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新的势力开进了这片区域，这些势力是当地战士在公开战斗中无法击败的，有些人把他们叫作“法兰奇”（Farangi）［这个单词乃是“法兰克”（Frank）在波斯语中的变体］。7个世纪以前，法兰克人走出欧洲，袭击了圣城耶路撒冷。正是他们的行动，引发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抵抗“十字军”的战争。从那时起，法兰奇便成了对欧洲人的通称。艾哈迈德逝世的时候，帝国边界的那一侧已经有不少法兰奇人定居。

当地人称他们为“因格雷齐”（Engrayzee），也就是波斯语和普什图语中的“英格兰人”。早在150多年前，英格兰人就已来到印度。1613年，英国人在印度海岸设立了第一个通商据点。建立据点并非出自政府行为，而是寄托了东印度公司一众股东的发财梦。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正式合并，形成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此后，印度不再只有英格兰人，移民来自整个不列颠。当时，这些移民大多从事商贸活动，他们得到莫卧儿帝国的批准，得以在几个小岛栖身，并默默地操持着自己的生意。

当时，在印度的欧洲商团可不止不列颠一家，每一家商团都想从贸易当中赚取好处。为此，他们经常互相攻伐。不过，战争只在欧洲人之间进行，印度当地势力从未卷入其中。最初，英、法联手驱逐了葡萄牙人。而后，英、法商团又开始互相攻伐。1743年，艾哈迈德还未登上王座，英、法军队已在印度东海岸开战。这只是当时全球冲突的前线。在欧洲，这场冲突被称为七年战争，在北美，即是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63年，印度的战事终于有了结果，英国人大获全胜。此后，法国人虽然还能在印度定居，不过得“接受英国的保护”。

对法战争期间，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征服印度，因为他们并不想要统治印度，他们的主要利益全在商业上。那时，英国政府还未向印度次大陆派驻任何官员，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存在仍局限于东印度公司。严格意义上来讲，东印度公司属于私人企业，尽管它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充分支持，并充当了英国利益的代理人。因此，东印度公司只管

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最大利润，而这个目标与英国政府的利益诉求不谋而合。

1756年，英、印双方在贸易港口加尔各答爆发冲突。莫卧儿帝国驻孟加拉省的总督纳瓦布（Nawab）下令逮捕了一批英国公民，并将他们关进一间小牢房。他们在狱中的容身之地实在逼仄难受，为此，欧洲媒体还发明了一个全新词汇——“加尔各答黑洞”（Black Holes of Calcutta）。只在小小的黑洞中待了一天，就有不少人丧了命。恶行很快传到了东印度公司设在本地治理（Pondicherry）的总部。盛怒之下，东印度公司决定教训一下纳瓦布。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率领一支小型武装，北上袭击了加尔各答，纳瓦布的势力一触即溃。在克莱武的扶植下，纳瓦布的侄子接替了叔叔的职务。这次军事冒险被英方称为“普拉西战役”（battle of Plassey）。其实，这谈不上是一场战役，倒更像是一种行政程序。此前，英国人浑然不知，孟加拉的大局早已落入己方的掌控。经此一役，他们才恍然醒悟。殖民活动的起点已经无法考证，不过，普拉西一役过后，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和印度的任何其他地方愈发为所欲为，类似的军事冒险也越来越多。

“加尔各答黑洞”事件爆发的同一年，艾哈迈德·沙阿的军队正在德里大肆劫掠。那一刻，阿富汗的国势似乎还要强过大英帝国。后者不过推翻了一位总督，艾哈迈德却直接废黜了莫卧儿帝国的皇帝，扶植了一位听话的傀儡。正当英国人在印度东部展示赤裸裸的权力时，艾哈迈德·沙阿直接占据了印度西部的大片领土。简单的事实表明，英、阿两股势力即将展开对决。

英国与阿富汗确实将会产生不小的纠葛。不过，一切都是后话。从加尔各答到德里，起码有1000英里的距离。从德里出发西行，还要走过500英里才能到达艾哈迈德的家乡坎大哈。阿富汗与英国之间没有交集，也没有理由发生冲突。

“加尔各答黑洞”事件过后的数年间，英国人在孟加拉的统治日渐稳固。同时，英国也在大力向西拓展势力。当时，莫卧儿帝国已经分崩离析，肢解成了一个个独立的邦国。英国人步步为营，一一控制了这些邦国，分而治之。如有需要，英国殖民者会对其实行直接统治；有时候，他们会扶植地方势力代行统治，自己则身居幕后进行操控。

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代管活动，英国政府渐生不满。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横征暴敛，几乎危及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可是，印度又是如此重要而不容失去。英国政府决心对印度实施直接统治。1773年，英属北美

殖民地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英国政府派了一名总督来到印度履职。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仍在次大陆运转，不过，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正式拉开了帷幕。尽管殖民政府的总督经由议会提名任命，其作出的决定也须经议会批准，但他在印度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拥有一整套内阁班子辅助左右，帮他制订外交政策。

1772年，艾哈迈德·沙阿因罹患颌骨癌而离世。这一年，马萨诸塞州的爱国者正在筹建“茶党”，这不仅是对英国政府的反抗，也是对东印度公司的反抗。没错，这家公司在印度与北美都曾开展业务。那个时候的阿富汗，还是一个庞大的帝国。疆土从现代伊朗的心脏地带延伸到印度洋，东北部的克什米尔也被纳入其中。在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是仅次于奥斯曼帝国的第二大强国。

但是，随着艾哈迈德的离世，第二强国也行将崩溃。此前数年，艾哈迈德一直卧病在床，无法理政。他一撒手人寰，阿富汗便由盛转衰。这时的英国殖民者正在步步紧逼。不过，阿富汗的衰落与当时的英国人毫无干系，内部因素才是帝国衰微的根源。这是一个王朝帝国，这是一种本质上就不稳定的政治形式，毕竟王朝的兴衰起落完全系于统治者的个人才能。艾哈迈德·沙阿即便再伟大，也无奈儿子能力平庸。他的孙辈就更加不堪了，为了夺取王位，互相残杀，打成一片。短短30年里，王位便六易其主。持续的内乱，演变成了普什图两大家族之间的血腥内战。这与英国的玫瑰战争颇为相似。当年，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曾进行过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

玫瑰战争之后，亨利七世登基为王。他开创了都铎王朝，其作为使他在很多方面被认为是英格兰的缔造者。阿富汗版的“玫瑰战争”之中，同样走出了一位杰出君主，阿富汗人至今仍敬称他为多斯特·穆罕默德大王（Dost Mohammed the Great）。内战期间，艾哈迈德的孙子要么失明，要么死去，要么流亡国外。当然，这些孽债大多是他们互相残害所致。1826年，多斯特·穆罕默德自立为埃米尔（amir）(1)，开启了巴拉克宰王朝。他虽非艾哈迈德·沙阿的直系后裔，却也和国父一族血脉相连。毕竟，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样来自杜兰尼部，也是一颗“珍珠”。

多斯特·穆罕默德体形瘦长，蓄着长长的胡须，他有着黑黑的眼珠、高大的体格。少年时代，多斯特·穆罕默德曾经放浪形骸、沉溺酒精。不过，他很快回归正途成熟了起来，成为一位外表严厉但言语温和的君主。与国王有过接触的人，都觉得他是位完美的绅士。[1]显然，一位历经内战并最终获胜的人，本性不会太过谦和温柔。如果情势需要，多

斯特·穆罕默德从不吝惜雷霆手段。当然，在王室与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中，国王还是一如既往地优雅得体。

多斯特·穆罕默德着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并定都喀布尔，他将在此对国家实行统治，这也将成为阿富汗历史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力，仿佛都要对这项工作加以阻挠和破坏。我们的阿富汗故事正是从多斯特·穆罕默德开始讲起。

新君施政不过几年，国内的秩序便稳定下来。对此，广大臣民感激不尽。农民终于可以回归家园继续耕作，游牧部群也重新开始迁徙放牧。女人们在家中料理花园、安排政治婚姻；男人们则溜进市场闲逛取乐，和一干朋友大扯闲篇。贸易已经恢复，骆驼商队再次出发，他们穿过兴都库什山口，前往印度河平原，用羊毛、兽皮、亚麻籽油、青金石、华丽的地毯和马匹、骆驼等牲畜，换取大米、茶叶、香料、棉花和其他令人垂涎的货物。[2]

在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治理下，艾哈迈德·沙阿帝国的核心部分已经收复。可是，多斯特大王对此并不满足，因为他还没收复整个帝国。马什哈德（Mashad）易于人手，国王倒还能够容忍，毕竟那座城池本来就在波斯的势力范围之内。可是，国王也失去了印度河沿岸的丰沃土地以及白沙瓦城。夺取领地的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甚至不是穆斯林，而是个锡克教徒！要知道，白沙瓦及其附近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普什图人，白沙瓦更是阿富汗国王长期以来的冬都。同为普什图人的阿富汗统治者，不能不觉得心痛万分。于是，多斯特·穆罕默德决心要用一战之功夺回白沙瓦。但他的雄心反而让他一度跌落王位，由此生成的裂痕，不但他再也无力补救，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作祟。

(1) 埃米尔：原意为“受命的人”“掌权者”，是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呼。——编者注

第4章　熊与狮之间

多斯特·穆罕默德崛起前的阿富汗内战时期（约1792—1826），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整个18世纪，欧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期。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短短100多年里，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船队几乎把五洲四海游了个遍。他们抵达了遥远的彼岸，并在那里开拓出殖民地，建立了贸易据点。不过，随着殖民活动的深入，欧洲列强之间渐渐生出嫌隙。为了争夺万里之遥的殖民地，他们之间时常爆发战争。与此同时，在整个西欧文化中，科学正在取代宗教的地位，成为理解自然的一种方法。技术革新由此不断涌现，蒸汽机、铁路、机械化工厂以及大规模生产等技术变革，都具有深刻的经济与政治意义。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场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之一。法国人推翻王室，推翻了依靠土地生存的贵族。资产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是未来政治精英的代表。欧洲各国的保守势力试图颠覆这一全新的秩序。不过，保守派的反攻倒算都被革命派一一击退。战争中，走出了一位全新的征服者，一个小记者出身的士兵——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并不满足于捍卫法国，他带领法军主动出击，征服了德国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此外，拿破仑还扶植了一些温顺的保护国，如西班牙和意大利等。

然而，拿破仑一生征战，面对英国人却始终未有胜绩。他试图远征俄罗斯，最终也因灾难而不得不选择放弃。滑铁卢惨败过后，他被逐荒岛，孤独而终。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国际政治的面貌，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强权。英国的权势主要来自强大的海军。论海上实力，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英国匹敌。拿破仑战争印证了海上力量是称霸全球的一大关键。

技术变革则是又一关键。在这方面，英国同样执天下之牛耳。这个国家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率先利用蒸汽动力完成了大规模生产改造。蒸汽动力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英国虽是岛国，却拥有无与伦比的资源优势，它的殖民地遍布全球。若把殖民地比作房产，英国拥有的印度定然是其中最为昂贵的那一间。有了强大的海军、领先的技术以及可供支配的印度资源，大不列颠的国力几乎让所有对手难望其项背。

拿破仑战争同样刺激了另一个国家的野心，那就是沙皇俄国。沙俄给了拿破仑致命一击，拿破仑的雄师劲旅在进军莫斯科的途中沦丧殆尽。沙皇俄国在很多方面与英国完全相反。英国很小，俄罗斯却广袤无垠；英国技术先进，沙俄却寒酸得几近原始；英国拥有一个规模不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是一个“店主民族”，[1]而沙皇俄国根本不存在中产阶级，一小撮的贵族统治着数百万的农奴阶层，两个阶层甚至说着不同的语言。

长期以来，沙俄一直在向东扩张，越过乌拉尔山，向中亚挺进。不过，沙俄的殖民势力并没有扩张到远方。这个缘于它与英国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沙俄几乎是个内陆国家。其北面的海岸线虽然漫长，却因濒临北冰洋，绝大多数时候海面完全冰封无法航行。沙俄在黑海有港口，但是黑海本身就被陆地包围，唯有达达尼尔海峡的小小豁口可供远洋通行。在海权时代，一个强国有志于争霸全球，自然需要通达四洋的良港。

沙俄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向东扩张，而后南下夺取阿富汗。那样一来，俄国人就可以在阿拉伯海上设立港口。由此出发，他们面前便只剩下浩瀚无边的海洋了。这个目标当然值得奋斗。现在，沙俄的光明前途上，只剩下阿富汗这块阻路的石头了。

俄罗斯向印度洋的扩张，英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毕竟那样一来，印度边境会多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对于英国人而言，一两个港口并不值得顾惜；但印度一旦失陷，大英帝国的财富和国力将有枯竭之忧。所以，英国当然要保卫印度！沙俄的扩张图谋必须得到遏制！于是，两大强权围绕中亚的主导权，开始了一场你争我夺的较量。鲁德亚德·吉卜林(1)在其小说《基姆》（*Kim*）里，把英、俄间的这场较量称为“大博弈”。但对即将变得残酷血腥的斗争来说，“博弈”的说法多少有些轻佻。

1831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对印度河上游流域进行考察。这项任务落在了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布尔内斯（Alexander Burnes）身上。这个年轻人溯流直上，穿过阿富汗，到了布哈拉（Bukhara）(2)，又造访了古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几座城市。布尔内斯的任务是考察所经地区的商机。他初到东方，又向往冒险生活，因此，他满怀热情地写下了一本旅行日记。日记中，布尔内斯以记录者的眼光审视旅途中的细微变化，途中看到的风景与听到的言论都在他的笔下鲜活动人。



“大博弈”形势下的阿富汗

布尔内斯的第一站是卢迪亚纳（Ludhiana）。在这里，他见到了阿富汗的两位前国王——舒贾·沙阿（Shah Shuja）和泽曼·沙阿（Shah Zeman）。[2]两人同是艾哈迈德·沙阿的孙子，更是兄弟关系。两人都做过一段时间的短命君王。泽曼·沙阿下台之时，还被继任者刺瞎了双眼，以确保他不再有复辟之力。此人正是舒贾，他让自己的兄长失去了视力。前尘往事如过眼云烟，两人现在生活在一起，带着悲凉互相陪伴。

对于阿富汗人，布尔内斯总是不吝赞美之词。显然，这里的人民让

他很有好感，他甚至生出了一点敬佩。面对曾经的君主，他也想说些好话。至少，他觉得两人都有王者威仪。不过，他描述的那幅场景却让人感觉非常黑暗：失明的哥哥表情阴郁吓人，纨绔子弟模样的舒贾则一直悲悲戚戚。舒贾穿着一件粉红色短上衣，帽子上坠有流苏与祖母绿。他体型肥胖而且脾气很坏，总在喋喋不休，抱怨命运不公。被废黜之后，舒贾逃到了白沙瓦，向占据此地的锡克王公兰吉特·辛格寻求庇护。为了活命，他甘愿把“光之山”献给辛格。这颗钻石是舒贾逃走之前从国库偷拿出来的。没想到对方收下钻石后，却把他投入了地牢。

舒贾挖了条地道通往下水道，最终逃出了白沙瓦。在他短暂统治期间，他和英国人一直关系不错。他甚至签订条约，把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控制权割让给了英方。此举为舒贾带来了后福，英国人觉得，此人日后还有利用价值。于是，英国人批给他一处房产和一笔津贴，足够容下他那几百名妃嫔（和他的哥哥泽曼），并维持一大班人的生计。但是，舒贾对此还不满意。他表示，自己志在统治一个国家。布尔内斯告诉舒贾，信德省还有不少友人仍对他念念不忘。舒贾对布尔内斯的宽慰不屑一顾：“哦，那样的朋友比敌人更糟糕，他们什么也帮不了我。”[3]最终，布尔内斯不得不承认，舒贾实在没有统御国家的能力。

告别兄弟俩，布尔内斯拜访了兰吉特·辛格的王宫。奢华的宫殿里金光闪闪，到处都是奇珍异宝。这里的主人是个军阀头子，沉溺于酒色，而且是个瘾君子。不过，他倒也十分虔诚。为此，他还特地念诵了一段锡克教经典《阿底格兰特》（*Granth*）。经典用十层布包着，而且每层的颜色都不相同，最外面那层是黄色的。兰吉特的王宫每天都要更换陈设，且每日的陈设在色调上须保持一致。布尔内斯造访那天的颜色是黄色。他看到的每个人都是一身黄色衣装，戴着黄色头巾。房中摆放的鲜花也是黄色的，就连花园里放养的鸟儿也是黄灿灿的。读罢经文，兰吉特·辛格骄傲地拿出那颗“光之山”请布尔内斯一同品鉴。按照布尔内斯的说法，钻石“足有半个鸡蛋大小”。[4]

继续旅程的布尔内斯等人转道西北，来到白沙瓦。此地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普什图人。[5]城市虽在兰吉特·辛格的统治下，总督却由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兄弟苏尔坦·穆罕默德（Sultan Mohammed）担任。这位普什图领主亲临城门迎接布尔内斯一行，布尔内斯记得，主人的衬衫裁剪得体，还衬着孔雀的翎毛。

布尔内斯本以为苏尔坦性情可能相当怪诞，没想到白沙瓦的这位头号人物举止得体、有教养，简直就是一位绅士。那天，布尔内斯和他的

朋友们得到了和这位杜兰尼酋长共进晚餐的机会。菜品是酸汤炖羊羔、烤米饼配柑橘片以及蜜饯、鲜果和果子露的甜食。布尔内斯觉得，阿富汗人善于交际、见多识广、幽默风趣，而且他们对人毫无偏见。苏尔坦·穆罕默德多次提到欧洲，而且没有任何恶意，他表示，“每个国家都各有风俗”。[6]布尔内斯注意到，白沙瓦领主就在自己的城市里自由地走动，没有警卫，他的身边只有亲戚与仆役，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地位上的尊卑之别。

离开白沙瓦，布尔内斯一行继续沿着喀布尔河行进。1831年4月底，他们来到了多斯特·穆罕默德的首都。布尔内斯说，这座城市异常熙攘和喧嚣。下午如果两个人肩并肩走在大街上，必须大声说话才能让对方听到。喀布尔河把城市一分为二，河畔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林荫树。城中果园数不胜数，空气中弥漫着果子的芬芳，是桑葚、杏、梨和榅桲的味道。喀布尔的风气虽然还算开放，但并没有酒精。曾经沉溺杯中物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早已“改过自新”，他下令彻底禁绝了酒精饮料。城中的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现在离开了，他们大多以酿酒、卖酒为生，多斯特·穆罕默德的酒精禁令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多斯特·穆罕默德设宴款待了布尔内斯。宴会地点陈设朴素、干净整洁，唯一的装饰是一条华美的地毯。[7]几人席地而坐，用手抓食。布尔内斯发现，阿富汗的埃米尔虽然少言寡语，但让人印象深刻。他向客人提出的那些问题充满了智慧：欧洲有几位君主？关系如何？英国政府如何征税、募兵？埃米尔从布尔内斯那里了解到，英属印度的部队当中征召了不少当地人作为步兵。国王又问他们是否对喀布尔也有类似的企图，英国产品的价格为何如此低廉。布尔内斯向他介绍了蒸汽机，多斯特·穆罕默德对此非常感兴趣。

布尔内斯似乎很得主人欢心。这也难怪，布尔内斯是个热情、聪慧、迷人的年轻人，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和波斯语。布尔内斯不但通晓当地语言，还读过阿拉伯语写成的苏菲派诗作。布尔内斯的访问，可能有助于阿富汗与英国开启一段亲善关系，至少多斯特·穆罕默德觉得两国可以和平相处。

布尔内斯出版了一本有关他伟大冒险的书，这本书在伦敦畅销一时，布尔内斯也成了城中的风云人物。达官贵人纷纷发来邀请函，请他去府上赴宴畅谈。交际场合中，布尔内斯总喜欢戴上头巾，穿着各种东方式样的服装。因此，大家都叫他“布哈拉来的布尔内斯”。他的另一个雅号则是“东方的伊斯坎德尔”。“伊斯坎德尔”（Iskander）是波斯语中

对希腊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的称呼。毕竟，布尔内斯去到的地方是如此偏远，难得一见，难怪英国公众对此表示惊奇。

当然，也有好些人对那些地方并不陌生。布尔内斯足迹所至之地，他们也曾去过，他们甚至就一直住在那里。他们感兴趣的异国风情来自布尔内斯本人，而且，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地处“偏僻”。要知道，巴尔赫、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等北部城市，都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商路荒废之前，这里曾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贸易通道，是连接中国、欧洲及印度的枢纽。那时候，这些城市的居民常常奔赴印度寻求商机。当然，作为一个穆斯林聚居地，踏上麦加朝圣之路的人同样很多。总之，他们并非闭塞的蛮夷，反倒是欧洲，似乎很少有人踏足。世界上如果真有一个遥远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恐怕就在那里！

多斯特·穆罕默德和兰吉特·辛格曾经数次兵戎相见。多斯特·穆罕默德一心想通过战争夺回白沙瓦。征战中，他虽未尝败绩，但是也没有取胜。白沙瓦仍在锡克人的掌控之中。为了打破僵局，多斯特·穆罕默德自觉需要一点外力相助。于是，他开始环顾周边寻觅盟友。

很快，他就有了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似乎同样可行，但也都暗藏危机。其中一个选择是统治印度次大陆的英属印度。英国何以统治印度？多斯特·穆罕默德并不清楚。他只知道，英国本土远在万里之外，而且驻印英军人数也不算太多——不，应该说英国只派出了几个军人，其中大多数还是军官，士兵基本来自印度本土。事实上，英国在印度有两支这样的部队：其中一支直接听命于英女王，被称为“女王部队”（多斯特·穆罕默德不免吃惊，大不列颠的君主竟然是个女人！）；另一支军队则受东印度公司差遣。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渗透印度次大陆的开路先锋，这组人马被称作“约翰军团”。虽然各为其主，两支军队却又经常合作。英国军队中，九成以上都是印度人，但是英国人却控制了印度。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力量，但没人知道它的运行奥秘和组织结构，只知道它规模庞大、战力过人。

另一个选择是与俄国结盟。多斯特·穆罕默德知道，俄罗斯的国王叫作沙皇。和英国一样，他的国都遥在远方。但即便如此，他的势力仍能扩张到中亚，他的部队跨越千里，就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疆之外。沙俄军队跨越高加索，已经征服了阿塞拜疆。他们还穿过里海，抵达了咸海沿岸，沙皇的军队越来越近了。事实上，沙俄军队甚至为波斯国王效力，袭击了阿富汗控制的赫拉特，那次攻击失败了，但它让多斯特·穆罕默德

认识到了俄国人的实力。于是，他又有了一个潜在伙伴。

与沙俄结盟，无疑是与虎谋皮。沙皇军队可能是个好帮手，但就怕他们到时候太过投入。不过，转而向英国求助，也有同样的风险。于是，多斯特·穆罕默德想到了第三条出路：用一种力量对抗另一种力量，利用一方的势力把另一方驱逐出阿富汗的领土。但如此一来，又有谁能帮他收复白沙瓦，他又将如何重建艾哈迈德·沙阿的帝国呢？

思来想去，多斯特·穆罕默德较为倾向英国人。尽管英、俄两国兵力雄厚，也都存在反噬的可能，不过，国王觉得英国人似乎没有那么热衷于扩张。而且，那个叫亚历山大·布尔内斯的苏格兰年轻人，曾在1831年给多斯特·穆罕默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此外，英属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Lord Aukland）曾向多斯特大王发来亲笔信，相当直接地向他保证："我的朋友……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绝非女王政府所愿所为。"[8]虽然这封信是对阿富汗请兵求援、合力攻打兰吉特·辛格的拒绝，不过，多斯特·穆罕默德认为，既然英国政府无意干涉他国内政，那对阿富汗来说，英国会是个可靠的盟友。

1837年的一天，多斯特·穆罕默德收获了一则好消息：奥克兰勋爵派出的一支贸易使团行将抵达喀布尔，为首的正是亚历山大·布尔内斯！国王对客人表示欢迎，并盛情款待了布尔内斯一行。那一次，排场极为奢华。阿富汗方面为了尽到地主之谊，真是费尽了心思。表面上，布尔内斯此行是为东印度公司寻找商机。因此，他没有权力谈判任何形式的协议。临行前，奥克兰勋爵召见了布尔内斯，他叮嘱布尔内斯在王宫里尽量拖延，以了解沙俄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但强调，绝不能向阿富汗埃米尔许诺任何援助事宜，也绝对不要问及他的任何计划或心愿。总之，布尔内斯这次其实是怀着一份谍报使命而来。

就算是刺探情报的任务，也无须布尔内斯太过挂心。因为奥克兰勋爵正在听取一位资深外交政策专家的意见，此人名叫威廉·海伊·麦克纳顿（William Hay Mcnaghten）。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活跃着一群麦卡锡主义分子。麦克纳顿和麦卡锡分子一样草木皆兵，他觉得自己的身边到处都有"熊"迹，大英帝国在从中亚到东欧的漫长战线上与沙俄形成了对立之势。作为中亚事务专家，麦克纳顿认为这种威胁主要集中在中亚。他甚至预见了俄国人的最终目标——吞并印度！

与友好的多斯特·穆罕默德结成强有力的同盟对抗沙俄，或许是阻止沙俄扩张的一个好办法。不过，麦克纳顿和奥克兰并不信任多斯特大王

——没错，这就是他们对这位阿富汗君主的称呼。他们认为多斯特·穆罕默德实力太强，很难引为盟友。毕竟实力越强，就越容易生出二心。

无论是在宫廷宴会上，还是随后的私下会面，布尔内斯都谨慎小心。对于白沙瓦、军事援助、盟约以及英阿友谊等话题，他只字未提。多斯特·穆罕默德意识到，布尔内斯将在不做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返回印度。

就在这时，一位自称伊万·维特克维奇（Ivan Vitkevich）的陌生人到来了。他自称沙皇特使，和多斯特·穆罕默德有事相商。其实，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维特克维奇的真实身份。不久之后，沙俄的外交部长声称并不认识此人。沙皇也出面表示，维特克维奇并非自己的特使。当然，这对君臣公开否认，可能只是想要保守秘密。伊万·维特克维奇可能是个间谍，也可能是个冒险家，一个自由外交家，试图通过与多斯特·穆罕默德达成一项协议来取悦沙皇，谋得晋升。

不过，伊万·维特克维奇还真和多斯特·穆罕默德见了一面。维特克维奇表示，国王不妨和沙俄皇室缔结一种亲密关系。他并不是鼓励双方和亲，所谓亲密关系，是指两国的邦交。当然，维特克维奇并非是要怂恿阿富汗与沙俄联手侵入印度，他不过是希望俄国派出几名外交官在喀布尔常驻……而后，一支部队将顺带驻扎到阿富汗首都，以便保护外交使团的安全……

关于这次会谈，多斯特·穆罕默德并没有隐瞒的打算，相反，他巴不得布尔内斯尽快知悉个中细节。因此，国王一五一十地向布尔内斯作了转述。其实，多斯特·穆罕默德愿意接见维特克维奇，不过是想借此给英方施加压力，并迫使他们采取行动。他和“熊”打打闹闹，只是为了撩拨“狮子”的醋意。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向心爱的白沙瓦进军。

阿富汗国王会晤俄国使者的消息在英属印度引起了轩然大波，麦克纳顿为此恼羞成怒，多斯特大王如他想象中的一般狡诈。奥克兰勋爵甚至发去了一封问罪信警告埃米尔：“未经我方许可……请勿要再与波斯及俄国密切来往，请勿随意接见对方来使。”[9]与两年前相比，奥克兰仿佛变了个人。那个时候，他还信誓旦旦表示，“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绝非女王政府所愿所为。”

即便到了这个地步，多斯特·穆罕默德也不愿疏远英国人，他甚至还惦记着对方能够答应结盟。于是，他在给奥克兰的回信中没有提醒对方

自己是一个主权国王，而是希望奥克兰勋爵把他的条款写下来，特别是关于白沙瓦的条款。

条款？殖民当局的一众高官顿时紧张起来。多斯特大王为什么就这样服软了？他到底打着什么主意？麦克纳顿觉得，多斯特·穆罕默德已经投靠沙俄成了傀儡。因此，英国应当迅速出兵推翻他的统治。而且，有一个现成的国王继任者——舒贾。此人当时就在英属印度靠英国的“养老金”过活。考虑到王权的合法性，舒贾确实是合适的人选，他是国父的孙子，还一度登上王位（1803—1809）。在那个血腥的年代，王位更替频繁，刺杀行动层出不穷，兄弟之间甚至发生了剜眼的惨祸。舒贾也是在乱局之中忙于厮杀的一分子。

多斯特·穆罕默德确在耍弄两面手段。眼见英方迟迟没有回信，他便再次召见了维特克维奇。好吧，英国人终于抓住了阿富汗国王的把柄。奥克兰决定实施所谓的“前进政策”。他不会坐以待毙，他要直接介入阿富汗的局势，制造一些事端。很快，奥克兰勋爵签署了《西姆拉宣言》（*the Simla Manifesto*），公开宣布：每一条事关政策和正义，引导总督支持舒贾及其复辟事业的意见……通过这些可对阿富汗的自由、商贸安全、人民的团结和幸福进行合理的展望。[10]此后的170多年，《西姆拉宣言》中的内容还会反复被提及：英国人来阿富汗并非为了征服，而是“为了确保阿富汗独立与领土完整”。使命一旦完成，英军就会撤离。

(1) 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他凭借小说《基姆》获诺贝尔文学奖。——编者注

(2) 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城市，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编者注

第5章　奥克兰的蠢行

1838年的最后几个月，奥克兰召集了一支军队，总人数达3.18万人，其中包括兰吉特·辛格派出助阵的锡克军队。[1]到了12月，大军行至奎达。1839年3月，坎大哈不战而降。当年夏天，英军一路东进，向着喀布尔步步进逼。加尼兹是一座防御工事极为坚固的城池，英军在此受到了阻碍。阿富汗方面觉得，在坚不可摧的城墙面前，英军会败退而去。

一个炎热的7月天，英军开到了加兹尼城下。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守军打开城门投降。城中的阿富汗人拒绝了。几个晚上过去了。一天，英国人趁着暮色发起攻势，顿时大炮轰鸣，士卒高喊，子弹迸射而出，但这只是一阵佯攻。阿富人匆匆起身迎敌，却让另一侧城池完全空虚。此前，炮兵亨利·杜兰德早已潜到城墙下，并在那里埋好了炸药。爆炸过后，英军有了入城的豁口。很快，加兹尼城完全落入了英国人的控制。

加兹尼失守的消息传来，喀布尔朝野震惊。多斯特·穆罕默德弃城而逃，逃往北方向他的亲戚布哈拉埃米尔寻求庇护。不过，这位亲戚早已被英国人买通。投奔而来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反而被投入了监狱。数百英里之外的南方，英军不费一枪一弹便挺进了喀布尔。舒贾再次登上王位，英国人让他在巴拉希萨尔宫暂住。这是一座令人敬畏的堡垒宫殿，高高耸立在狮门山（Lions-Gate　Mountain）的一侧，俯视着整个喀布尔。宫门之下，除了喀布尔河，还有喧闹无比的市集朔尔巴扎。

很快，多斯特大王逃出牢笼，他又招揽了一批乌兹别克人为自己效力。英国军队出城迎敌，却在喀布尔北部的科希斯坦山口遭遇惨败。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多斯特·穆罕默德和他的部队盘踞山中，和英军打着游击战，英国人不堪其扰，只得撤回喀布尔城中。就在英国人似乎即将失败的时候，一件怪事发生了。多斯特·穆罕默德带着一名随从来到英军营地，表示向英方投诚。个中原因，没人知道。但您可以肯定，狡猾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另有计划。无论如何，多斯特·穆罕默德“退休”到了印度，住进了舒贾腾出的地方，靠领取英国“退休金”过活。

英国人承诺舒贾一旦复辟成功，会立即撤离，但他们决定推迟撤离。一方面，舒贾的种种行为实在不似人君，大多数时间都在后宫厮

混。他的妻妾实在太多，甚至超过了800人。[2]与此同时，国内各地动乱频仍。虽不是真正的叛乱，只是各种犯罪活动，但因为数量多，因此足以干扰日常生活。但这并不意外，因为喀布尔有数不胜数的“坏种子”——暴徒和黑帮。一些暴徒可能是收了穆罕默德扎伊家族的钱财，潜入首都有意施行破坏。因此，所谓的犯罪，也可能是政治阴谋。一些“坏种子”可能是沙俄间谍。局势日益失控，英方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他们需要采取措施，帮助舒贾安定局面。

为此，英国方面派出了一支顾问团。麦克纳顿以女王陛下在喀布尔的特使身份主持工作，并同意担任国王的首席顾问。在他的主持之下，阿富汗建立起了行政系统，招募了一支军队，并新建了一支警察部队。

顾问团中，亚历山大·布尔内斯算是二号人物。作为一名政治代理人，他的工作就是发现阴谋，粉碎阴谋。当时，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阿克巴（Akbar）正躲在北部某地煽动叛乱。为了防止他率军南下，英军专门在巴米扬山谷的隘口筑起了一座要塞，又在坎大哈等城市派驻了军队。整个阿富汗都在英方的重兵监管之下，除了一点犯罪活动，完全无须担心局势生变。

多斯特·穆罕默德还有个姐姐。英方觉得，公主无力构成威胁，所以对她未加管束。哪曾想到，弟弟一逃，姐姐就只身前往北方，徒步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呼吁阿富汗人为捍卫信仰而与英国人作战。受宠若惊的村民自然要为贵客张罗盛宴。可是，公主威胁道，倘若大家不拿起武器反抗，她就一直不吃不喝。因此，公主所到之处，人们纷纷宣誓效忠，捍卫尊严。[3]

对阿富汗的征服实在太过容易，想来甚至有些不可思议。但英国人并不单靠武力来控制这个国家，他们的金钱攻势击垮了多斯特大王（至少殖民当局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决定拿出一笔钱，以保证白沙瓦到喀布尔的道路通畅平安。这些金钱全部流进了吉尔扎伊部族的口袋，因为道路正好从吉尔扎伊部族的聚居区域穿过。有人觉得，吉尔扎伊部族收了钱之后就会派兵守护道路。事实上，他们收了钱却按兵不动，对于道路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也好，至少当地没有引发动乱，英属印度和喀布尔之间还能畅通无碍。只要道路通畅，加尔各答就可以慢慢将这片蛮荒之地纳入其治下。

几个月内，喀布尔的英国人越来越多。除了英国官吏和印度随员，他们的家属、情妇和仆役也来到了阿富汗。一个整洁的英国小社区在喀布尔兴起。英国人带来的殖民新风吹过兴都库什山来到了喀布尔，阿富

汗人第一次见识到了许多新奇玩意儿：华丽的家居、精美的玻璃器皿、各种西洋乐器、葡萄酒、蒸馏酒、法国酒，还有雪茄和香烟。晚餐之前，英国人会舒舒服服地来上一杯威士忌，饭后再吞云吐雾，美哉乐哉！[4]

英国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作“营地”，它沿科希斯坦大道延伸了近一英里，这里有生活区、办公楼和营房，还有一大片英式庭院。一堵城墙圈起了整片区域，但它并无任何防御功能。毕竟，营区两边就是高耸的山地。一些官员在这个区域外另觅居所，亚历山大·布尔内斯的家就安在了喧闹市集的附近。

在他们的住所和营地里，英国人努力营造家的感觉，他们举办舞会和茶会，组织板球和马球比赛，一些女性甚至组织了业余戏剧表演。营地外面，阿富汗人从高处的山坡上俯视英国人的一举一动，他们感到大惑不解。这些法兰奇人来到阿富汗居住生活，阿富汗人却和他们毫无交集可言。

不幸的是，英国人从未让阿富汗真正安定下来。坎大哈的局势一直动乱纷纷，城市之间的道路总不那么安全。在波伦山口（Bolan Pass），几个身份不明的俾路支人袭击了史密斯太太。她虽然带了一名卫士，但也没能逃过劫难。喀布尔山口临近首都，但是詹金斯中尉和他的几十名手下却在这里惨遭杀害。即使到了城中，也不能脱离危险。斯图尔特上尉在城里被一个年轻人刺伤了脸。事后，英国人一直没能找到这名凶犯。[5]

各种反叛活动愈演愈烈，麦克纳顿却在信中吹嘘局势太平。他在写给加尔各答的信中说，“阿富汗形势一片大好”。至于布尔内斯，也乐得让上司继续报喜不报忧。毕竟阿富汗局势一旦稳定下来，麦克纳顿即会另得重用。作为副手的布尔内斯，会顺理成章地接替特使一职。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不料，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阿克巴，却突然出现在了与喀布尔相去不远的巴米扬，这时，阿富汗人都要尊称他一声“瓦济尔·阿克巴·汗”（Wazir Akbar Khan）。“瓦济尔”又称“维齐尔”（Vizier），即是宰相之意。宰相是国王的左膀右臂、首席执行官，是王国权力的核心。当时，阿克巴虽只有20岁出头，却已经是出了名的骁勇善战。画像中，阿克巴总是身穿铁甲，头戴尖尖的战盔。他月亮般的脸上有一种天真无邪的神气，眼神之中的杀气却说明此人的心性并不单纯。阿克巴曾和兰吉

特·辛格交战数次，他的无畏和嗜血让对手胆寒。在反叛喧嚣的科希斯坦，阿克巴的威名传来，酋长们纷纷追随其后举事。

1839年，威洛比·科顿（Willoghby Cotton）将军率领英军进入喀布尔。1841年初，将军任满回到印度，需要任命新的驻阿英军最高统帅。接替威洛比·科顿的空缺，威廉·埃尔芬斯通并不情愿，也并未主动请缨前来阿富汗解困救急。埃尔芬斯通有过辉煌的战绩，但那已经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老皇历了。25年过去，当年的英雄已经是个风湿病人，肩膀酸痛，行动迟缓。但是，埃尔芬斯通还是像忠诚的士兵那样坦然接受了使命。

与此同时，英国议会觉得阿富汗只是一个销金窟，特别是自特派团入驻以来，大英帝国已经在那里花费了太多钱财。既然阿富汗的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还要加大投入呢？吉尔扎伊部何德何能，需要向其支付如此巨额的费用？他们看起来温顺无害，根本无须安抚。于是，议会停止了对吉尔扎伊部族的补贴。

没想到，吉尔扎伊部立即宣布反叛。由于阿克巴的积极活动，科希斯坦走向全面叛乱，甚至在喀布尔，阿富汗人也开始蠢蠢欲动。其他地方的武装暴乱层出不穷，大有燎原之势。可是，驻阿英军的指挥棒却握在一个老弱病夫的手中。英国政府担心，阿富汗的局势即将失控。

麦克纳顿倒是颇为乐观。那年8月底，他写信给印度的一位同事，说“从丹（Dan）到比尔示巴（Beersheba），阿富汗处处宁静安好。”[6]11月1日，一位阿富汗随从找到布尔内斯，表示喀布尔很有可能发生暴乱。布尔内斯不以为然，他表示只要自己接过麦克纳顿的职位，一切都会好起来。[7]

显然，布尔内斯并非对局势毫无察觉，不过，他和他的同事们很有可能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毕竟，阿富汗之乱并不在于街头的偷抢拐骗，也不是科希斯坦的部落武装。英国人的麻烦和阿富汗女性有关。在当地人看来，有些英国男性一直想和阿富汗女性建立“亲密关系”。“亲密”这个字眼，可能有些不当，而且大多数英国男士还算绅士得体。如果是在伦敦，他们的行为不会引起任何争议。在那里，礼貌的绅士主动结识亲切的淑女，是社交场合当中再常见不过的。不过，伦敦的礼貌举止到了喀布尔，可能就是冒犯和不敬。按照阿富汗人的社交规矩，年轻男子可不会把同龄女性带到房间角落，然后和她彬彬有礼地交谈。女孩的父兄发现，这些英国男青年不但和自己的女儿或者妹妹相谈甚欢，还会

时不时伸出手去，拍拍女孩的肩膀或者手臂。

更别提，英国使团中真有一些人可能涉嫌不轨行径。有谣言称，某些职位较低的英国士兵可能曲解了“前进政策”。对于这段历史，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兼外交家弗雷泽-泰勒所言：“需要乃发明之母；有需求的人，则会成为混血儿之父。”[8]数十年后，一名英国士兵这样为同伴当年的荒唐行径辩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远离家乡、远离异性，孤独之中自然会有追求异性之心，而且“阿富汗女性真是太过主动了”。[9]

这种说法，笔者难以置信，那可是在1841年。当时，受人尊敬的喀布尔女性可不会“太过主动”。在私下里，阿富汗女性可以挑逗和调情，她们的言语可能尤其撩人。不过，身在当时的阿富汗，每个人都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不能逾越的。当然，大家也不会当面挑明——这就是文化的魔力。可以想见，1841年的喀布尔，社交场合中时时面临尴尬的局面。无意之间，客人就得罪了主人，主人又坚持认为，客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们自己刚才的行为有违礼仪。

但也不都是无辜的。一次，阿富汗酋长阿卜杜拉·汗去某位英国军官的住处拜访，其间，他偶然瞥见隔壁房间里女子的身影——竟然就是自己的情妇！她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一个陌生男人的住处！盛怒之下，阿卜杜拉·汗找到亚历山大·布尔内斯反映情况，布尔内斯表示会立即彻查。不过，事情终究没有结果。也许布尔内斯有心纠错，但世事变迁太过迅疾，容不得他有所作为。[10]

11月2日，即布尔内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第二天，他的住处突然被人包围。来人抓住布尔内斯并把他狠狠折磨了一番，这就是英国人玩弄阿富汗女性的代价。可怜的布尔内斯，他对阿富汗文化评价很高，而且他也很喜欢阿富汗人。在书中，他对阿富汗的喜爱表露无遗，他觉得阿富汗人也愿意接纳自己，毕竟他通晓阿富汗人的主要语言。可是，布尔内斯也喜欢女人。他是大胆的冒险家，外貌英俊且又足智多谋。他曾是伦敦社交场合的红人，因此他很有信心：没有女人能够抵抗自己的魅力。遭到袭击的那天，布尔内斯的府上还有好几个女人。严格意义上说，她们是克什米尔人，并非阿富汗人，但愤怒的人群已经失去了理智。

布尔内斯走到二楼窗口，想要安抚闹事人群，他表示自己可以支付一笔巨款作为赔罪。可是，外界早有传言，布尔内斯家中有大量黄金。这样一来，对方反而更加起劲，双方开始互相推搡。布尔内斯的护卫朝天鸣枪示警，直接导致抗议人群化身凶恶的暴民，骚乱开始了。待到事

态平息，“布哈拉的布尔内斯”“东方的伊斯坎德尔”已经咽了气。[11]

消息传到英国人的营地，大家立即恐慌起来，高级官员无不觉得应该尽快离开这个国家。麦克纳顿还想以钱为饵，驱使一些部落首领加入英方阵营。但是，暴乱早已不可收拾，喀布尔附近的两座军营先后失陷。情况紧急，麦克纳顿只得向他心目中的阿富汗人的领袖寻求帮助。在他看来，瓦济尔·阿克巴·汗堪能担起领袖的职责。

可惜，阿克巴的名望还没有这么崇高。当时，阿富汗并不存在一位全民领袖。多斯特·穆罕默德倒台之后，阿富汗的局面已经注定不会太平。好几位酋长都有很高的威望，但没有一位拥有无可争议的最高地位。因此，英国人想要讲和，却找不到和谈对象。阿克巴也许深得民心，可是，他的威望主要来自战功。一旦阿克巴和英国人达成协议，他的光辉形象就会黯淡下去，从而削弱他达成协议的能力。各大部族的首领正在为了最高权位争来夺去。身处当时的情形，谁最能给英国人带去重创，谁就最有可能登上高位，和谈则等于自行退赛。因此，英国人苦苦求和，却始终没人答应。

最终，阿克巴还是开出了自己的条件：他可以保证英方人员的安全，不过，英国方面得向他支付一笔津贴，并以摄政的位置相许，来年夏天之前，英国使团必须离境。其实，阿克巴的保证并无实际效力。也许，阿克巴也很清楚这一点：他是杜兰尼部的一员，与控制阿印边界的吉尔扎伊部互为世仇，即便他下了命令，吉尔扎伊部族也根本不可能从命。这点情况麦克纳顿本该明了，可是，英国人实在急于求和，阿克巴愿意伸出援手，已让他们感激不尽了。麦克纳顿立即表示，愿与阿富汗的各位实力派人物举行和谈，时间就定在圣诞节前的两天。

还有几个星期，和议就要进行，可是英国方面却昏招迭出。首先，麦克纳顿致信坎大哈的诺特将军，请他赶快率领大军赶往喀布尔。麦克纳顿在信中毫不避讳地表示，他会拖住阿富汗人，直到诺特率军赶来。那样一来，他们就能一起击溃叛军。不知何故，这封信竟落到了阿富汗人的手里。

麦克纳顿的女婿约翰·康诺利（John Connolly）在一封密信中提议，提供一万卢比作为悬赏，索取各位酋长的项上人头。这封信也落到了阿富汗人手中。[1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件的内容不仅激怒了名单上的酋长，也激怒了那些未列入名单的酋长，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外，意味着康诺利不认可其实力。

与此同时，阿卜杜拉·汗也捅了麦克纳顿一刀。本来，阿卜杜拉也接受了英国人的讲和条件，但是，他眼看时局有变，干脆将英国人给自己的交易条件告诉了其他酋长。阿卜杜拉表示，这些就是英国人试图离间阿富汗人的铁证。其他酋长随即披露，英国人也在试图贿赂他们。

1841年12月23日，一群英国官员和一群阿富汗酋长在一处空旷的场地碰了面。此地远离双方各自的要塞，正好适合公平谈判。此前的一系列图谋算计、阳奉阴违和深切敌意，让双方都积压了一肚子怨气。谈判没多久，便宣告破裂。麦克纳顿和阿克巴等人甚至直接厮杀起来。有人——可能就是阿克巴本人——一下子结果了麦克纳顿的性命。很快，暴乱的阿富汗人砍掉了麦克纳顿的头颅，并将其插上旗杆，竖在河边示众。

麦克纳顿和布尔内斯现在都死了，英国人只得依靠埃尔芬斯通将军主持大局。骇人的事件吓得这位老人几乎手足无措。驻地之外，喀布尔已经陷入大规模的、无组织的暴乱。英国人只能蜷缩在营地，苦苦思索对策。也许，他们可以杀出营地，冲到城市的那头，去高地之上的巴拉希萨尔宫，向国王寻求庇护。不过，天知道舒贾会不会开门援助。近来的几个星期，住在巴拉希萨尔宫的傀儡国王舒贾发现形势有变。于是，他顺应时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反对英国的阿富汗爱国者，表示要和英军对抗到底。

没办法，英国人只得选择另一条路，这也是一条疯狂之路。他们打算弃城而去，然后一路朝英属印度奔去。1月，他们就能徒步穿越兴都库什山口。1月6日，大部队出发了。其中，军人只有4500人，家眷、随从、杂役等则有12000余人——喀布尔英印社区的全体成员都在逃亡的队伍之中。[13]他们大约需要走上60英里才能脱离困境，这还只是直线距离，途中数不胜数的蜿蜒曲折并未计入里程之中。这条路万分艰险，峡谷之中的一些羊肠小道根本算不得路，“丝绸峡谷”（Silk　Gorge）因为陡峭崖壁间如丝线般纤细的空间而得名。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许多人因为寒冷天气而一病不起，一些人则死在了吉尔扎伊武士的弯刀之下，好些人则沦为俘虏，耽误良久才恢复自由。最终，撤离喀布尔的那群人中，仅有一个人活着走到了贾拉拉巴德。从这位名叫布莱顿的军医口中，全世界才知道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接下来的9个月，英国人一边舔舐伤口，一边总结教训。其间，舒贾遭人暗杀，舒贾众多儿子中的一个曾短暂称王，不过，最终还是逃往

了印度。舒贾的一名卫士从王族中揪出一个小字辈，给他扣上了王冠。傀儡一上台，便向英国人发出邀请，并保证他们在阿富汗随时都会受到欢迎。那年秋天，波洛克将军和诺特将军率领的两支部队进入喀布尔，他们决心要在这座城市“留下一些难以磨灭的报复痕迹”。

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两位将军把任务交给了总工程师阿伯特。阿伯特接到的命令是摧毁喀布尔的商业中心大巴扎。根据命令，阿伯特要把整个集市付之一炬，但不能殃及附近的社区，也不能破坏国王和英军的驻所。他们只给阿伯特几天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任务紧急。阿伯特思来想去，发现除了火药和火柴，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于是，一场大火殃及了周边的大片建筑。英军冲上大街，摧毁了他们所能破坏的一切。不少市民趁乱闹事，大肆哄抢，想要发上一笔灾难财。这场灾难也成了另一些人暗中报仇的好机会。“那个疯狂的时候，灾难就像一双无情的手，它打倒敌人，却也害了朋友。”提起当年的惨祸，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凯耶（John Kaye）如是说，这时距离火灾已有十年之久。不过，凯耶也表示：

> 想一想那些军人的愤怒与委屈，想一想他们的几千名兄弟和同胞在阿富汗边境惨遭杀害的经历，想一想我们遭受的羞辱以及敌人的各种暴行，那些军人实在无法忍耐，也无力控制自己的愤怒。罪孽的城市就在眼前，那些士兵怎么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那一刻，大家本就应该不管不顾地疯狂一把。[14]

大火吞噬了喀布尔的大片城区，毁掉了许多人的家园，也葬送了无数生命。而后，英国人降下巴拉希萨尔宫上空的米字旗，开始撤出这个地区。1842年10月11日，英军全体撤离，也带走了他们扶植的王室残余——舒贾的子嗣与亲戚，也包括那位失明的泽曼。

回到印度，波洛克和诺特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英印当局为他们的归来鸣放礼炮，随后又组织了盛大的游行。此时，奥克兰勋爵已经丢了官位，新总督根据《西姆拉宣言》签署了新的文件，解释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 此前，英印政府派军越过兴都库什山，驱逐了一位被认为敌视英国利益的阿富汗酋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被认为尊重英国利益且深受人民爱戴的新领导人。[15]

这份文件没有明确是谁“声称”多斯特·穆罕默德敌视英国利益，也不清楚是谁“认为”舒贾深受爱戴。事实证明，结果正好相反。多斯特·穆罕默德没有敌视英国，而舒贾根本不得民心。英国政府决定纠正错误，恢复多斯特·穆罕默德的王位。这则文件的结论是：

> 悖逆当地民意而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有违英国政府的一贯原则……阿富汗人民的任何选择，英印政府都乐意接受并予以承认。[16]

第6章　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回归

伟大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得胜回来了。他被囚印度期间，阿富汗人发起一场又一场抗争，打击了英国人——这是多斯特·穆罕默德所期待的。相形之下，多斯特·穆罕默德比英国人更胜一筹。如今，骄傲而不可战胜的人民，要用歌声与鲜花欢迎王者归来——嗯，至少在阿富汗的历史课本上，多斯特·穆罕默德就是这样光荣回归的。

当然，事实和课本的描述不太一样。回到阿富汗之前，多斯特·穆罕默德曾和英属印度总督有过一次会面，双方达成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与舒贾签下的并无区别，这也是战前多斯特·穆罕默德一直渴望与英国人签署的协议。他承诺绝不允许俄国或波斯使者进入喀布尔，不与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打交道。如有第三方人员来到喀布尔向他发出诱惑，阿富汗国王将会第一时间向英印当局通风报信。[1]

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意放弃对阿富汗五大城市中三个城市的所有权。他将以喀布尔为首都，统治喀布尔以北、阿姆河以南的区域（马扎里沙里夫纳入其统治范围），以及喀布尔以南贾拉拉巴德以外的区域，但不包括白沙瓦。坎大哈和赫拉特则将作为自治省，由其部族中的反对派进行统治。白沙瓦仍将留在锡克人的手中。可想而知，多斯特·穆罕默德为此肯定咬碎了牙齿。不过，他仍然接受了英国人的一切要求。

他为何如此大方呢？因为多斯特·穆罕默德的诸多让步，换来了英国人的一系列承诺。英方向多斯特大王保证：国王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统治他的领地，英国不会派出任何特使。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多斯特·穆罕默德还能从英国方面获得一笔津贴。虽然给出了种种优惠，英国政府倒也不算战争的输家，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阿富汗作为缓冲国，将遏制沙俄的扩张势头；阿富汗一分为三，内部纷争将使其再无余力觊觎印度；失去了开伯尔山口以东平原上的白沙瓦，阿富汗人将很难染指英属印度的领土。

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瓦济尔·阿克巴·汗，如今已是阿富汗人心中的战神。英军撤离之后，喀布尔一直由他和几位部落首领负责驻防。一小撮部落首领请求阿克巴登基为王，他们无不认为，除了阿克巴，国内再无人选能够担此重任。不过，阿克巴拒绝了他们，他是孝子，而不是篡位者，让他废黜自己的父亲是不可想象的。的确，在历史上，儿子有

时会废黜父亲，但这在阿富汗不常发生。阿克巴视父亲有如高山一样伟岸，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在阿富汗历史学家霍巴尔（Ghobar）看来，当时的阿富汗统治者白白错失了一次收复失地的机遇。[2] 英国人立足未稳，兰吉特·辛格也垂垂老矣，其统治下的人民为远离英国人的魔掌，倾向于和他们的阿富汗亲属结盟。一个真正的阿富汗民族主义者本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恢复印度河沿岸从克什米尔到信德那些失落的故土，甚至如今的巴基斯坦的很大一部分也会是阿富汗的一部分。显然，那些曾经击败英国势力的革命者，无一不想完成这样一份伟大的使命。他们需要领袖的一声令下，而领袖又对瓦济尔·阿克巴·汗寄予希望，但王子只会听从父亲的命令。

多斯特·穆罕默德重登王位后，很快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反抗英国的军阀势力。洛加尔省的阿明曾在抗英斗争中和阿克巴并肩作战，而且他还曾将王冠献给阿克巴。多斯特·穆罕默德再度掌权后，阿明被捕下狱，他生命的最后15年，是在巴拉希萨尔城堡下的地牢之中度过的。[3]

战争中，穆罕默德·沙阿·吉尔扎伊（Mohammed Shah Ghilzai）的威名大震，英国人为之深深忌惮。穆罕默德·沙阿·吉尔扎伊在喀布尔拥有自己的领地，是一位有实力的领主。在战争结束后，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手下袭击了他，他和家人被带到喀布尔东南山区的一个偏远地区，过着与世隔绝的流亡生活。

苏尔坦·穆罕默德（Sultan Mohammed）是另一位令人畏惧的战争首领，他被流放到坎大哈。不过，国王仍然不放心，这个危险的家伙似乎还没有撤到足够安全的地方。埃米尔命令苏尔坦·穆罕默德继续往西走，最终到达了伊朗。此后，他和多斯特大王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此人仍会在阿富汗的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这样，在战争中得势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国王的罢免和驱逐。他们的领地被剥夺，官职被削去，有人被迫远走他乡，有人身陷囹圄，有人甚至不幸丧命。国王虽然放弃了坎大哈、赫拉特和白沙瓦，但是，在他能够控制的领地里，已经没人能向他发起挑战。

毫无疑问，多斯特·穆罕默德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时势需要他拿起武器，他也能够勇敢投入战斗。但是，他并不擅长战争，他擅用政治手腕——在这方面，他是个才华横溢、冷血的现实主义者。当年，英军还未开到喀布尔，他便已经匆匆出逃。那不是因为他是懦弱怯战之辈，

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精明的幸存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他一贯的信仰。如今，他已重掌国政，虽然地盘大为缩水，但他欣然接受。他并不喜欢山河破碎的感觉，只是暂时忍受现状，他认为等待时机是最好的选择。

如此一来，多斯特·穆罕默德又该如何治理手下的这片领土呢？那个时候，他仍是个部落领袖，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统治者。他缺乏议会的辅佐，也没有内阁可以分担职责，甚至无法向大臣问政求计。政府日常工作主要掌握在一个叫作阿加西的副手手中，此人承担着仆人和首相的双重角色，就如欧洲君主政体中的知名人物张伯伦。[4]

话又说回来，多斯特大王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官吏，因为他的朝廷职权有限，没有太多的管理工作。现代政府的诸多职责或提供的服务，当时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完全无须挂心。

例如，朝廷没有警察部队，地方安全保障由部落与村社负责；朝廷也不用兴办教育，教书育人由伊斯兰神职人员中最低级别的毛拉负责，而培训和任命毛拉与政府无关。有人可能以为，毛拉是自发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想要成为毛拉的男孩从毛拉那里学会了阅读，得到了宗教上的指点，并帮助毛拉或者伊玛目处理一些琐碎事务，比如打扫清真寺、给蓄水池加水等。当他们渐渐地得到伊玛目的赏识，会负责做更重要的事。直到有一天，有人需要一个毛拉，而年长的毛拉分不开身，才会让自己的学徒去代替，久而久之，学徒就正式成为毛拉了。

除了国王和官吏的个人判决外，这里也没有像样的世俗法庭。非宗教人士之中，唯有国王及其重臣拥有审判权。支尔格会议可以帮助裁决地方上的纠纷，其中的成员大多是当地的乡绅和头人。有些不涉及社区的个人纠纷可以支付一笔费用请毛拉来论断。乡村之外，法律掌握在高级神职人员手中，他们依据沙里亚法作出裁决。这些法官不需要政府的批准，他们普遍由自治的宗教机构选出，并受其管理和控制。他们的资质不由朝廷审定，教士制度完全建立在民间的土壤之中。每一步晋级，朝廷方面都无从置喙。

当然，国王要负责抵御外侮。中亚草原上的游牧势力常常南下劫掠，西方的波斯军队也是个严重的威胁。国王确实提供了一些安全保障，如驱逐盗匪，保证商路安全，镇压可能引发战争的反叛。政府还督促市场执行严格的度量衡标准，在城市颁布了一些法律，国王的军队还拥有国内重大事件的最终裁决权。

军队是国王的力量来源，有了军队，他才能向地方征收税款。征收所得，大部分用于维持王室生活和军费开支。其中，修筑桥梁道路、采买军需物资、整修神殿与新建清真寺，都是增加国王威信的必要举措。由此而来的浩大工程自然需要征调大量的民夫，不过，大多数阿富汗人都任劳任怨。约翰·肯尼迪总统一定非常羡慕多斯特·穆罕默德，因为多斯特大王的臣下从来不问国王能为自己做些什么，而总是为了国王倾其所有。

国王需要每个行省有一名忠诚的总督，以确保没有人反抗王权。在多斯特·穆罕默德统治第一个时期，也就是英国入侵之前，他任命他的兄弟作为各省总督。不过，事实证明，兄弟之情并不可靠。再度掌权之后，他转而相信自己的儿子们。普什图人有句谚语：“在部落里，你最好有个大家族；在家族之中，你最好能有很多兄弟；在兄弟之间，你最好能有很多儿子。”多斯特·穆罕默德也许并非人丁最为兴旺的那一个，但是，他绝对是个竞争者，14房妻室给他诞下了56个孩子（100年后，他的直系后代已经多达7000余人）。[5]

多斯特·穆罕默德在世时，已经子孙满堂。众多的子嗣，正好可以占据重要的职位。他的长子是巴达赫尚省总督，次子则负责巴尔赫省的大小事务，哈扎拉贾特等地的要职，也一一派给其他儿子，每个儿子都担起了一份守土之责。为了维持境内的安全与稳定，他们必须组建军队；为了给旗下的将士提供薪饷，各位王子拥有征税的权力。因此，每一位总督都近乎是半独立的藩王。但是，多斯特·穆罕默德知道如何管住他的儿子们，让他们对自己俯首帖耳。同时，国王还要一边仔细应承英国人，一边小心翼翼地与沙俄周旋。外国势力对其统治施加的限制，他不得不接受。不过，他可以对他的儿子们行使绝对的权力。[6]阿富汗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家族企业；与其说是穆罕默德扎伊家族统治着这个国家，不如说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所有者。

诸多王子之中，唯有一人未获封地。其实，此人才是王子之中的翘楚，他声名显赫、英勇无畏、深孚众望，他就是阿克巴·汗。多斯特·穆罕默德把他立为王储，并让他留在了自己身边。阿克巴十分精明能干，做一省总督实在有些大材小用。多斯特·穆罕默德需要阿克巴在身边提供有关国家事务的建议，而且，阿克巴既有名望，又具帅才，能帮助国王指挥战役。

瓦齐尔·阿克巴·汗确实胸怀大志，他一心想要收复白沙瓦。而后，他还将以此为起点，把整个信德地区纳入版图，更不用说克什米尔了。总

之，年轻的王储想要重现艾哈迈德·沙阿的帝国荣光。不过，英国人不会让他达成愿望。按照英国人的打算，白沙瓦将永远与阿富汗分离。多斯特·穆罕默德不会违背他与英国人签署的协议，所以儿子的志愿，自然不是父亲的打算。

一次，喀布尔南部某省发生部落起义，阿克巴受命前往平定。没想到，王储一到城外，叛军便打开城门，向他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我们并没有背叛您，也没有背叛您的父亲。我们只想夺回白沙瓦！带我们去战斗吧！"[7]

阿克巴写信给他父亲，请求他重新考虑。他告诉国王，人们想要战争。"请您下令作战吧！"阿克巴向多斯特·穆罕默德请愿。

阿克巴的请求，被多斯特·穆罕默德严词驳回，他要求阿克巴立即班师回朝，北方的一件重要任务，需要阿克巴前去执行。于是，忠诚的阿克巴遵循王命，赶往北方的巴尔赫省。途中，王子突然一病不起，可能是疟疾。为了救治儿子，国王特地派出了自己的御医。这位来自印度的医生专门研究"希腊医学"。该学派认为，疾病都是空气、土、火、水四大元素不调之故，可以通过泻药、膏剂、草药和放血疗法，帮助病人祛除病灶、恢复平衡。御医用一种通常有毒的草药治疗阿克巴。很不幸，毒药就是毒药，医生只能表示遗憾。看来，真主对于王子的命运已有安排。就这样，阿克巴死在了路上，死因并非疾病本身，而是他接受的治疗。他的尸体被安葬在了马扎里沙里夫。多斯特·穆罕默德虽然痛失爱子，但自此之后，却无须担心阿克巴抢班夺权了。

阿克巴的死，并未削弱埃米尔的政府，毕竟多斯特·穆罕默德膝下的儿子比他治下的行省还要多。那个时候阿富汗的"行省"和阿富汗这个"国家"一样，并不具备完全的现代意义。阿富汗的国家边界十分模糊，行省与行省之间的区隔也并非那么清楚。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区域。阿富汗中部的高地被称作哈扎拉贾特，因这里的主要居民是蒙古裔的哈扎拉人而得名"哈扎拉人的土地"。再往北的巴尔赫省曾在阿富汗最古老的城市巴尔赫的统治下，13世纪时被蒙古大军摧毁。此外，巴达赫尚、迈马纳、卡塔干、卢格尔、楠格哈尔等地，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登记为地理上的不同地区。为方便起见，我把它们称作"行省"。

1855年，坎大哈与赫尔曼德自治区的14名封建领主引发了一场纷争，其实，他们都是亲戚关系，因此，所有人在坎大哈都有亲人。每个人都在觊觎着别人的土地，并由此开启了一场争执不下的战争。但战争终归未能解决问题。交战的领主们召开了支尔格大会，试图议定和平方

案，但会谈无果。看来，他们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腕才行。于是，14名领主联名上书多斯特·穆罕默德，他们表示，倘若多斯特·穆罕默德能够保证他们的财产权，维护和平，就接受他为他们的国王。虽然和英国人有约在先，绝不攻击坎大哈，但这并不是攻击，而是受到了邀请。多斯特·穆罕默德欣然接受了各位领主的请愿。就这样，多斯特·穆罕默德在不违反与英国协议的情况下，收复了他放弃的三大城市之一。[8]

1857年，一伙印度士兵把枪口对准了英国军官，反对英国统治的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多斯特·穆罕默德的诸位大臣立即劝他出兵白沙瓦，他们觉得收复故土的时机就在当下，毕竟兰吉特·辛格刚刚去世，锡克人的势力趋于衰微，英国人则自顾不暇。不过，国王拒绝背弃与英国人的和约。虽然他也认为时机已到，却坚决不愿出兵白沙瓦。在那个时代的阿富汗人之中，大概只有多斯特·穆罕默德认清了事实：兴兵白沙瓦就是枉费血汗和金钱。虽然英国势力无力染指开伯尔山口以西的土地，但是，到了开伯尔以东的平原，他们的优势实在明显。哪怕阿富汗能获得一时的胜利，控制白沙瓦，但英国人一旦平定印度民族大起义，就会立即展开反击，夺回白沙瓦。对于阿富汗国王而言，按兵不动反倒是一张王牌。只要他摆出隐忍的姿态，英国人反而会时刻有所忌惮。多斯特·穆罕默德趁着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当口，和英国方面展开秘密谈判。国王承诺不会出兵白沙瓦，但是英国人必须允许他有一天武力夺回赫拉特。困境中的英国人接受了他的条件，心满意足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把协议放进口袋里，等待“有朝一日”的到来。

1861年，15年前被多斯特·穆罕默德流放伊朗的苏尔坦·穆罕默德率领军队杀回了赫拉特。苏尔坦宣称，自己比多斯特·穆罕默德更有资格成为阿富汗国王。对此，他很有底气。毕竟他已经认定，伊朗是他的后盾，沙俄也默许了他的野心，而且，苏尔坦认为英国人定然不会纵容多斯特·穆罕默德发兵赫拉特，自己这次应该是胜券在握的。

苏尔坦·穆罕默德并不知道多斯特大王与英国人之间的密约，其中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军队开进赫拉特时，英国人并未进行阻止。事实上，英国人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伊朗政府“干涉阿富汗内政”。俄国方面对于苏尔坦的默许，并没能落实到金钱与武器方面。事实证明，这只是空谈。就这样，苏尔坦·穆罕默德反而成了孤家寡人。

1862年，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军队包围赫拉特城，围城行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其实，交战双方亲缘深厚（这种现象在阿富汗内战中并不鲜见），苏尔坦·穆罕默德是国王的女婿，围城期间，他的夫人，也就是多

斯特大王的千金不幸离世。双方的敌对行动一时间都停止了，以便两人都能参加葬礼。[9]多斯特·穆罕默德离城而去后，围城行动继续。

最终，苏尔坦·穆罕默德死于压力和痛苦，多斯特大王终于夺回赫拉特。4月的那一天，当他骑着马穿过城门时，他一定是志得意满。回首往事，他一定感到兴奋又害怕。他是21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可谓前途黯淡，他在内战中一步步上升到主宰地位，结果却把他的国家输给了英国人。之后，他又死而复生般地回来了，开始苦心经营，一点一点地重建他的王国。

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一生征程就这样走到了终点，他的任务完成得还算圆满，现代阿富汗的疆域和边界得到奠定。他是这片领土上每一个人的国王，从最卑微的农民到强大的可汗。要不是痛失白沙瓦，他本可以安度晚年。重新夺回赫拉特之后，他很快就一病不起。6个星期后，70岁的多斯特大王与世长辞。

第7章　短暂的黄金岁月

阿富汗的大部分君主，都没能和平顺利地将手中的权力交接给继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与先辈不同的是，他培养了一个接班人。他死之前，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希尔·阿里（Sher　Ali）立为王储，并让他参与对赫拉特的围攻。当这位伟人去世时，希尔·阿里守在了父亲的病榻前。而后，他被拥立为王。不过，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希尔·阿里又和自己的兄弟们鏖战了整整9年。其间，他一度差点失去王位。最终，他获得了权力，局势得到稳定。希尔·阿里继承父亲的遗志，试图建立一个不受外国势力干涉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

1863年，希尔·阿里初登大宝的时候，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在他的宫廷中工作，这是一个神秘、雄辩、机智的人，名叫贾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uddin-i-Afghan）。很难清楚界定他的身份，教师？演说家？政治哲学家？改革派？革命者？他确实教书、演讲、阐述政治理论，并激励了伊斯兰世界的革命运动。但是，他从未著书立说，没有创立过系统的哲学，没有建立过学校、政党，他的目标也并非始终如一。在封建的阿富汗，他寻求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土耳其和伊朗，他敦促民众推翻集权统治。在埃及和印度一类的欧洲殖民地，他提倡民族主义。在北非，欧洲人任意将其划分为毫无意义的国家单位，贾马鲁丁呼吁以泛伊斯兰统一体取代民族主义。中亚的突厥斯坦被俄国人分成不同的国家，贾马鲁丁在这里的主张和北非相似。

其实，贾马鲁丁家族是王室的远房亲戚。其家族在喀布尔东北部的山区小城阿萨达巴德（Asadabad）拥有土地，但由于一些争议，他们被迫在伊朗流亡了一段时间。[1]他们在伊朗的定居点也叫阿萨达巴德，因此，一些伊朗人至今还觉得，这家人自称“来自阿富汗的贾马鲁丁”，其实是在掩盖身份。实际上，他们都是如假包换的伊朗人，甚至以逊尼派穆斯林身份掩盖自己真正的什叶派身份。无论真相如何，贾马鲁丁的事业始于喀布尔，他出任多斯特·穆罕默德诸位王子的宫廷教师，其中一位学生就是希尔·阿里。

希尔·阿里即位后不久，贾马鲁丁来到国王身边，呈上了一份详细的计划。这是一份旨在帮助阿富汗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计划。不久之后，贾马鲁丁不告而别，离开了阿富汗。贾马鲁丁之后的人生都在伊斯兰世界奔走，他一边救济穷人，一边打击既得利益阶层。有生之

年，他没再重返故土，直到逝世后很多年，祖国迎回了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喀布尔大学的校园里。

贾马鲁丁的强国计划，直到希尔·阿里击败所有兄弟后，方才着手实施。这时，已经到了1868年。希尔·阿里播下的种子，会成长为另一个阿富汗，终有一天，它会和传统社会形成掎角之势。

希尔·阿里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邮政系统。喀布尔是全国的邮政中心，在主要省级城镇设立分支机构。从理论上讲，任何两个阿富汗人之间都可以通信。当然，前提是他们都得身居主要城镇，而且必须识文断字。一封邮件可能要历经数月才能抵达，不过，希尔·阿里的尝试，代表着阿富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邮政网络让阿富汗朝着统一国家的方向迈进。

新国王对税法也作了一番改革，改善了私营企业的环境。新法允许商人投资商业和工业企业，这使得少数人能通过商业头脑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获得财富和权力。这无疑将会瓦解封建社会的生存根基。

以前的国王没有内阁，他们的股肱重臣通常由王亲国戚担任。希尔·阿里组建了一个正式的政府，内阁成员包括首相、财政大臣、宫廷侍卫长及负责外交、内政和军事的专门官员。后宫的意见决定了内阁的人选，其中，希尔·阿里的妻子密尔蒙·阿伊莎（Mirmon Ayesha）的看法最为重要。[2]同时，国王还邀请12位学者组成咨议机构，研究政府和国家面临的问题，并向国王提出有效建议。这项改革促进了一个阶层的诞生，即日后所谓的技术官僚，他们正是在此时登上了阿富汗的历史舞台。

在希尔·阿里统治期间，支尔格大会成了常设机构，这大概可以被视为阿富汗议会的雏形，尽管它的职能纯粹是咨询性的。阿富汗的第一届议会始于1865年，由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代表组成。会上，希尔·阿里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关乎他一位谋反的兄长，国王想知道应当如何处理。“镇压！镇压！”随着全场激昂的高喊声，希尔·阿里决定发兵坎大哈。最终，他在战场上击败了自己的兄弟。[3]

这表明他是一位勇者，但你不会从照片中看出这一点。当时，照相技术刚刚诞生，希尔·阿里成了第一位留下照片的阿富汗国王。他看起来性格沉稳，蓄着浓密的胡子，嘴唇噘起，鼻子弯曲，一双沉思的眼睛看上去有些忧郁。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卡拉库尔羊皮帽，像倒置的蜂窝，但看起来比听起来更时尚。

希尔·阿里的形象在东欧拥挤的钟表铺里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如果不

当国王，希尔·阿里也许会和机器或者其他设备相伴一生。的确，在10年黄金期间，他设法克服困难，进口了不少工具和机器，并在他的宫殿里摆弄这些设备。巴拉希萨尔宫里有一台平板印刷机，国王借此办起了阿富汗的第一份报纸。这是一份16页的小报，名为《太阳报》。他感兴趣的主题，特别是军事问题，会印刷成册，分发给手下的军官。[4]

希尔·阿里有一支常备军，约5.6万人。[5]他认为士兵就该像照片中西方军队的样子。因此，他无法容忍士兵继续穿着各自的衣服上阵打仗。灯笼裤与头巾被一律禁止，国王为他的士兵设计并颁发制服，要求全体官兵统一穿戴。唯有如此，大家才能整齐划一，看起来像欧洲国家的军队。因此，这支在首都效力国王的部队和过去为国王效力的部落武装是不同的。不过，部落武装仍然存在，他们不是职业兵，他们只有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才会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国家现在有了两支武装力量：一支是政府的，一支是人民的（或者简单地说，是人民）。

此前，已有好些阿富汗人去印度参加英国军队。希尔·阿里吸引一些人回来训练他的军队，教他们如何列队行进、使用武器、指挥战斗及其他项目的演习。希尔·阿里还开办了阿富汗第一批军工厂。如此一来，终有一天他能摆脱对国外武器的依赖。

国王甚至认为，如果阿富汗再次遭到大国干涉，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进行有力还击。希尔·阿里命令军队不得在城市驻扎，实行军民分离政策，因为军民混住容易造成摩擦（有时双方甚至会大打出手）。为此，国王在喀布尔北部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军事城市，叫舍普尔（Sherpoor），专供军人居住。这个项目在5年内征调了6000名劳工、1000名木匠和无数的能工巧匠。[6]不过，这座城市并未完工，因为到了19世纪70年代，一度沉寂的外部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英、俄又开始制造麻烦，这些麻烦让阿富汗故事这一简短篇章画上了句号，阿富汗平静的黄金岁月也走到了尽头。

第8章　第二次英阿战争

1878年，欧洲列强之间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辅佐下，将中欧的德语邦国合并组成了统一的国家。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介入了英、法、俄三国旷日持久的争霸局面。俾斯麦宣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俾斯麦的目标直指法国，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三世那打过蜡的胡须两边飞翘，一直延伸到两颊。他那滔滔不绝的吹嘘在铁血政策前将变得不堪一击。

确实如此。俾斯麦耍弄手腕，引诱法军主动开战。普鲁士军队突破边境，轻松瓦解了法国人的防线。而后，他又通过和约，攫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地区盛产铁矿石，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德国由此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开始环顾世界，寻找海外殖民地。

然而，法国战败让英国迎来了进一步扩展的契机。当时，英国占领了全球23%的土地，算上殖民地人口，世界上1/4的人口都是大英帝国的臣民。[1]英国本土仅有世界2%的人口，但其工业产值却达到全球总产值的45%。当时，英国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5倍，俄罗斯的155倍。[2]大英帝国的国力让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相形见绌。不过，崛起的德国却可能动摇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德国的崛起也让沙俄大惊失色。当时的沙俄虽然领土广阔，却落后原始，没有现成的港口，因此，沙俄在全球争夺殖民地的浪潮中步履蹒跚。20年前，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遇惨败。随后的条约阻止了沙俄对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削弱了沙俄海军在黑海的军事存在。如今，俄国人试图卷土重来。黑海上的港口正在重建，如果不能进入巴尔干半岛，那么沙俄将沿着传统方向向东扩张。奥斯曼帝国行将灭亡，欧洲列强虎视眈眈，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Levant），欧洲列强之间的争夺被称作“东方问题”；在高加索以东的中亚地区，“大博弈”再次上演。

1865年，沙俄军队占领塔什干。两年之后，古城布哈拉也落入俄军之手。次年，他们的势力进一步拓展到撒马尔罕。1873年，希瓦汗国被迫接受沙俄“保护”。这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委婉说辞。三年后，随着浩罕

汗国沦为“保护国”，沙俄的势力已经扩张到阿姆河沿岸地区。如今，雄心勃勃的沙俄和虎视眈眈的英国之间，仅有阿富汗这一缓冲带。作为一个小国，这样的地缘环境真是糟糕。

希尔·阿里在阿富汗的统治稳定下来的同时，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率领的自由党在英国执政。自由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一点和19世纪的美国共和党颇为相近。他们对可能导致动荡的海外冒险保持警惕，因为那可能危及英国的商业利益。至于殖民地事务，自由党人秉持“得过且过、维持现状”的原则。在奥克兰之后的几十年，一个含糊不清、自治的阿富汗在很好地服务于英国的利益。因此，格拉德斯通认为维持现状是最好的。他的印度总督诺斯布鲁克勋爵（Lord Northbrook）和首相意见一致。

不过，1874年的选举让英国政坛变了天。以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为首的保守党获得胜利上台组阁。作为上流社会的代言人，保守党以大英帝国和女王的荣耀为名，大肆鼓吹海外军事冒险，以扩大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力，争取更多选票。迪斯雷利政府用利顿勋爵（Lord Lytton）取代了诺斯布鲁克。和奥克兰一样，利顿勋爵也是“前进政策”的坚决拥护者。

迪斯雷利政府认为，一个自命中立的缓冲国居于印度河和乌浒河之间，似乎还不足以抵御俄国的威胁。希尔·阿里的态度尤其让他们难以心安。他们怀疑，到了紧要关头，希尔·阿里能否阻止俄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毕竟沙皇看起来咄咄逼人。于是，迪斯雷利政府决心在沙俄将阿富汗变成其另一个“保护国”之前，把阿富汗牢牢控制在手中。“前进政策”的新篇章始于英国人干涉阿富汗的王位继承人问题。当时，希尔·阿里已经指定阿卜杜拉（Abdullah）作为王储。另一个儿子亚库布（Yaqub）曾经造反作乱，自然不受希尔·阿里的待见。国王不但讨厌亚库布，甚至还把他囚禁了起来。

当希尔·阿里收到利顿勋爵命令他废黜阿卜杜拉、改立亚库布的信时，可想而知希尔·阿里当时的沮丧。英国人为何钟情亚库布？信中并未明确。也许，他们曾和亚库布有过私下接触，王子的谈吐和思想让英方觉得孺子可教。

这封信还警告希尔·阿里，千万不要指望俄国人的帮助，正如利顿勋爵在信中所说：“在俄国的军队到来之前，我们会向你的国家投入一支军队。”信中还说，如果国王是友好的，英国会对他进行保护。如若不然，英方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其统治。[3] 信的结尾，利顿告知希尔·阿

里，一位特使将前来与国王商谈相关事宜。

希尔·阿里自然不会待见英国人颐指气使的态度，这叫他忍无可忍。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看来已经过去。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回信告诉英国人，他更愿意自己决定接班人问题，而且不打算接待英国特使，相反，他将派使者到加尔各答，双方可以就任何问题展开协商。

当希尔·阿里的特使到达加尔各答，得到的并不是一场谈判，而是英方列出的诸多条款：英国特使长驻喀布尔，由英国控制阿富汗边境；英国公民可以在阿富汗境内自由来去，受英国法律保护，而不受阿富汗的法律约束；英国商人可以在阿富汗境内自由贸易。希尔·阿里若能答应如上条件，英方就允许其自行选定王储。而且，英国政府还给他和他的继承人一笔丰厚补贴，并向阿富汗提供抵抗沙俄势力所需的顾问和军事援助。

英国人开出的条件，叫国王大为恼怒。希尔·阿里可不像多斯特·穆罕默德那般圆滑，他立即口述了一封回信，大意如下："不！我会坚决捍卫阿富汗的主权，哪怕流干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不幸的是，沙皇俄国正在阿富汗北部集结，就在希尔·阿里告诉英国人不能进入阿富汗的时候，一个俄国外交"代表团"却径自跨过阿姆河向着喀布尔前发。希尔·阿里频繁警告对方立即停止前进，打道回府。俄国人却对此置若罔闻。他们不但进了城，还在那里住了下来，甚至进宫面见了希尔·阿里。俄国人说，"我们是来交朋友的"。

那个时候，国王正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他最喜爱的儿子、心爱的王储阿卜杜拉因病不幸身亡。王室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希尔·阿里一向看重亲情，爱子故去，让他备受打击。他独自一人待在宫中舔舐伤口，丢下朝政完全不理。有人再次见到国王时，发现他眼圈红肿，显然是刚刚哭过好几场。这时，利顿勋爵的又一封书信递到国王手中，他希望希尔·阿里做好接待驻喀布尔英国使团的准备。国王下令阻止英国人入境。于是，当一小队英国外交官及护卫队抵达阿富汗边境时，边境指挥官却对他们下了逐客令。"我只是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才对你们如此客气。否则，我会立即杀了你们。"[4]

虽然英国使团遇阻返回，但希尔·阿里此举让他们怒不可遏。很快，利顿勋爵就向国王发来了问罪信，希望希尔·阿里道歉。可是，对方只是装聋作哑，没有回信。利顿便集结了军队准备开展行动。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英印当局曾经派出2.5万人赴阿参战。那次战事给了英国人一个深刻教训：区区一支孤军，不足以奠定胜局。于是，他们召集了三支部

队，规模是第一次英阿战争投入人数的3倍。

此时的希尔·阿里感到痛苦不堪。俄国人不请自来，英国人再次入侵，王储不幸离他而去，除了亚库布这个可恨的逆子，他无人可以托付王位，希尔·阿里决定投靠俄国人。但前往沙俄面见沙皇之前，他得先释放亚库布，并将国家托付与他。对此，希尔·阿里别无选择。英国人一路攻城略地，已经开进开伯尔口、波伦山口、库拉姆山谷，虽然阿富汗军队在三个地方都抵挡住了，但不知能坚持多久。

希尔·阿里来到阿姆河边，沙俄却不允许他入境，毕竟大国关系远比阿富汗这个国家来得重要。沙皇掂量再三，觉得这并不是正面对抗英国的最佳时机。于是，沙皇无视希尔·阿里的请求，任凭他被围困在阿富汗。可怜的希尔·阿里当即便一病不起。他发起了高烧，不吃不喝。医生劝他补充能量，他完全置之不理。逃亡中，他受了腿伤，却又拒绝接受任何治疗。伤口日趋恶化，国王却只想听之任之。几周以后，亲切和蔼的希尔·阿里国王在凄惨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时，他只有54岁。

亚库布成了阿富汗的埃米尔。他的行为有力地表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亚库布要求军队放弃抵抗，让英国人和平地进入阿富汗。他自己则前往南部小镇甘达马克。在这里，他和英国代表签署了“友好条约”，即《甘达马克条约》。条约确认割让东部和东南部领土给英国，并接受英国使团长驻喀布尔。英国人想让希尔·阿里答应的种种条件，都在他儿子的手中实现了。

很快，一个英国“外交”使团动身前往喀布尔，为首的特使名叫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他是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英国首相，与希特勒签订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议》的张伯伦首相的先祖。与张伯伦同行的是英国派驻阿富汗的全权政治代表路易·拿破仑·卡瓦格纳里（Louis Napoleon Cavagnari）。他有法国、爱尔兰和意大利的血统，是大英帝国的忠臣。卡瓦格纳里蓄着浓密的胡须，看上去颇有学者气质，但也有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让人想起与他同名的法国总统。此前，卡瓦格纳里参与过多次外交斡旋，因此，他自觉拥有足够的能力去对付普什图人，并吹嘘自己了解他们。卡瓦格纳里认为，如果软硬兼施，普什图人是可以被控制的。如果对方变得好斗，那么就必须对他们展现英方坚定不移的军事勇气，因为这是最能让普什图人折服的。卡瓦格纳里自信，他的勇气足以折服所有普什图人。

约翰·劳伦斯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当他得知卡瓦格纳里的使命和他那番夸夸其谈的吹嘘时，他说：“他们都将被杀死。”[5]

卡瓦格纳里一行骑着大象进入喀布尔城，他们坐在镀金的象轿里，向街道两边的民众挥手致意，好像他们是受到邀请来到这里的。不过，阿富汗人没有任何回应。为了营造节日气氛，安抚臣民，亚库布表示，为庆祝英国贵客到来，朝廷将减税，而且一次性补齐军队的欠饷。不过，民愤依旧，只要国王的承诺没有兑现，他们就不会相信。

巴拉希萨尔宫脚下的一片区域，成了卡瓦格纳里等人的落脚点。就像40年前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营地一样，这个大院的一侧是高山，敌人可以从那里直接向院子里射击。不过，卡瓦格纳里等人毫不在意，他们觉得这一次自己并非不请而来，因此无须考虑安全问题。

当然，如果国王愿意兑现承诺，阿富汗人民倒也乐意热情迎客。亚库布表现得尤为热情。卡瓦格纳里等人日复一日地受到邀请，前往巴拉希萨尔宫和王室成员、大臣一起宴饮。国王的一众亲属、朝臣也都敞开大门邀请英国客人前往做客。卡瓦格纳里的一名部下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表示，国王坚持动用公帑为我们的军队支付薪饷，就连我们的马匹也得到了国王的照顾。国王真是个好人。他又小心补充道："但是，他的臣民可就没那么热情了。显然，一般百姓还不适应我们的存在。"[6]

与此同时，亚库布和他的军队闹起了矛盾。朝廷一直拖欠薪饷，军人为此很是不满。要知道，国王可是有言在先，表示要为军队补发薪饷的。亚库布说目前资金不足，大家应当耐心一些，但是，朝廷明明又能拿出大把金钱，去博得英国人的欢心和愉悦。流言蜚语很快传遍了军营。后来，不只是士兵，一般百姓也受到感染，对国王和英国客人怨声载道。不过，卡瓦格纳里并不在意，毕竟他自认为很了解普什图人，他说"会吠的狗不咬人！"[7]

亚库布的民望确实不高。这一点，卡瓦格纳里也看在眼里。为此，他有些忧心。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会是件好事，他向加尔各答的上级保证，一个弱势的国王将无法号召人民为其效命。如此一来，他更会一心一意遵守与英国的约定。

1879年9月2日，卡瓦格纳里致信英印当局："喀布尔大使馆一切顺利。"[8]这样的字句仿佛带有不祥之兆。38年前，麦克纳顿写给印度友人的信中宣称，"从丹（Dan）到比尔示巴（Beersheba）一切安宁"。几个月后，麦克纳顿便身首异处了。卡瓦格纳里更在写信的第二天就丢了性命。

当时，阿富汗军队的欠饷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一位阿富汗将军告诉

士兵去和卡瓦格纳里谈欠饷问题，因为“他有很多钱”。于是，部队浩浩荡荡地奔往英国使团的驻地。驻地大门并未向他们敞开，他们便强行闯了进去。在那里，他们开始大肆掠夺，马匹、马鞍和一切其他能得手的东西，都成了抢掠的战利品。如果没能得到现金，就用实物相抵。后来，数以千计的平民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对于英国人，喀布尔的百姓积怨久矣。这一次，他们正好可以发泄情绪。

没办法，卡瓦格纳里只得向国王求援。他想提醒对方，首都正在发生严重骚乱，他必须有所作为。可是，亚库布也是抓耳挠腮、心绪烦乱，他一边流泪，一边告诉英国来使：为了阻止骚乱，他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可是，单凭他一人，又怎能阻拦汹汹的闹事人群呢？

自知援兵无望到来，卡瓦格纳里只得爬上驻地的房顶，向围拢而来的人群施压。他觉得自己的冷静和勇气，也许能够换来普什图人的畏惧，毕竟对方一向赞赏英勇的品质。可是，阿富汗人全然没有理会。卡瓦格纳里命令部队开火。此举真是大错特错，起义人数实在太多，他们将英国人围困在里面，无处可逃。英国的外交官和军队虽然奋勇作战，但终究是徒劳。几个小时后，阿富汗人就把他们都消灭了。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莫德·戴弗（Maud Diver）(1)和其他人的说法，英国人以惊人的勇气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仍然无一生还。当然，笔者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如何走漏的。英国人的遭遇传进王宫，亚库布的毛拉当即感到不寒而栗。整个城市瞬间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中。“那时，我就知道，英国人的部队已经在路上了。”[9]

没错，英国军队已经开拔阿富汗。此前阿富汗人曾经与之交手的三支武装，如今又开进了昔日的战场。由于亚库布早前的步步退让，其中一支英军离开驻地之后，很快就逼近了喀布尔。军队的首领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Roberts）来自爱尔兰，他体形清瘦，留着一脸大胡子，总是一脸坚毅强硬的表情，冷冷的目光叫人不寒而栗。罗伯茨治军严格，自律不辍。正因如此，他赢得了部下的忠诚，他们亲切地称之为“鲍勃斯”（Bobs）。

很快，鲍勃斯的威名再次因为他英雄般的表现得到了同伴们的称赞。鲍勃斯率军赶到时，大批部落武装已经集结在喀布尔近郊，对首都形成拱卫之势。罗伯茨轻松突破防线，冲进了喀布尔，并很快控制了这座城市。

于是，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置亚库布？他还能继续担任

一国之君吗？不少人认为，当年国王一边与英国人达成协议，一边又和各地的酋长密谋，卡瓦格纳里的死和他脱不了干系。那么，英国人是否就此认为他是个“坏傀儡”，并顺道终结他的政治生命呢？毕竟，一个“坏傀儡”似乎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

亚库布倒是及时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他来到罗伯茨面前，请求免去他的国王职位：“您也看到了，我的这些子民，有谁能辖制他们？我情愿在英军驻地割草，也不愿做阿富汗的埃米尔了。”[10]就这样，亚库布得到了豁免，他被送往印度幽禁。这似乎是阿富汗国王的一贯命运。巴拉希萨尔宫上空飘扬着英国国旗，下一位傀儡确立之前，英国政府不得不对阿富汗实施直接统治。

罗伯茨成了阿富汗的实际统治者，他对阿富汗展开了报复性的惩罚。喀布尔的反英暴动，似乎每个市民都参与了，因此他们统统得付出代价。亚库布的朝廷官员对英国人保护不力，因此纷纷被投入监狱。涉嫌策动叛乱的人更被大肆围捕和绞杀，他们的尸体被悬挂在城中最为醒目的场合以儆效尤。英国军队开进乡村，捣毁堡垒，烧毁村庄，迫使涉嫌与叛军勾结或支持叛乱的部族首领投降。

如此雷霆手段让麦克格雷戈上校（Colonel Macgregor）深感不安。“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震慑作用，只会激怒阿富汗人。如此一来，英国人只会成为阿富汗的敌人。”[11]

此言不虚。面对暴行，阿富汗人并未退缩。对于英国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怒火中烧。乡村里的神职人员，对宗教权威有些许要求的人，都开始鼓吹伊斯兰教正在遭受异教徒的攻击，呼吁阿富汗人起来捍卫信仰，抵御异教徒的攻击。穆什基·阿拉姆（Mushk-i-Alam）曾经参与第一次英阿战争，他的名号意为“宇宙之芬芳”，正是从战争当中得来的。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穆什基驻守兴都库什山口。在那里，他见识了英国使团全军覆没的惨况。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不再年轻。英阿战事再起的时候，穆什基差不多已是90岁的老翁了。不过，追随者们抬着他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他到处发表演说，呼吁人们奋起抵抗。“要知道，法兰奇人可是吃猪肉的！”他厉声警告同胞。猪肉在伊斯兰教是完全被禁止的，许多穆斯林甚至不会用手触碰。阿拉姆的讲话振聋发聩，听罢他的演讲，大家回到家中，无不磨枪霍霍、准备战斗。

希尔·阿里那支欧式军队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他们身着统一的军装，队列整齐，服从指挥，可是到了战场上，他们一触即溃。很快，这支部队逃得不剩一人。英国人现在面对的是部落游击队，他们是农民

和游牧民。对他们而言，战斗绝非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穆罕默德·詹（Mohammed Jan）旗下就聚起了两万多人。[12]村民们为他的部队提供粮食和情报，使他能够伺机而动，对英军实施打击。而后，游击队又依靠村民的掩护，退回山区。

虽然穆罕默德·詹势力最大，但也只是众多部落武装中的一支。部落武装几乎在每一次激战中都击溃了阿富汗部队，但是，这些被击溃的军队很快就消失不见了，英国人甚至找不到谈判的对象。一次，梅西（Massey）军官遭到伏击，罗伯茨因解救这名军官陷入了阿富汗人的包围圈。面对汹涌而来的阿富汗人，鲍勃斯拼死抵抗，他知道援兵正从贾拉拉巴德赶来，只要他们抵达战场，对手就会遭遇灭顶之灾。一个寒冷的夜晚，援兵终于赶到。可是，围困他的阿富汗军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全都回家去了。经过一年战斗，英军取得了十多场战斗的胜利，英国人赢得了他们枪支所及的每一块阿富汗领土的管辖权，但仍未能有效控制这片土地。

1880年1月，英印当局陷入了困局。显然，阿富汗人并非不可战胜，在战场上，英方部队是常胜之旅。但即便如此，也难以阻挡阿富汗人继续战斗。英国人虽然可以赢得战争，却无法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英印当局的宝贵资源在迅速流失，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一个无底洞。于是，殖民政府的官员提议让穆罕默德扎伊家族重新掌管阿富汗，将阿富汗分割成几个部分，然后交给不同的王室成员。英国便可借机将内战的烂摊子留给俄国人，全身而退。

1880年夏天，希尔·阿里的其中一个儿子阿尤布（Ayub）率领手下的8000名士兵杀出赫拉特，直指坎大哈。7月27日，阿尤布所率部队和英国人在坎大哈以西平原迈万德（Maiwand）遭遇，对2万英军展开了“大清洗”。在英国，“迈万德”成了阿富汗剽悍善战的同义词。西方人因《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华生大夫在这里受伤而知道这场战役，那是在他回到英国和夏洛克·福尔摩斯一起在贝克街221B号探案之前。

可以想见，迈万德一役成了阿富汗人的民族骄傲，据此虚构的英雄故事在这个国家广为流传。迈万德战争期间，阿富汗军队的阵线一度面临崩溃的危险。关键时刻，17岁的姑娘马拉赖（Malalai）站了出来，她高举旗帜，鼓舞男同胞血战到底。最终，姑娘牺牲了，但她的鼓舞却扭转了整个战局。马拉赖由此成了阿富汗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她就是阿富汗的圣女贞德。阿富汗的第一所女校就是因她而得名。

迈万德战役的英雄事迹一言难尽。但是，大名鼎鼎的罗伯茨勋爵

（在阿富汗人看来是臭名昭著）闻讯立即从喀布尔赶来，阿尤布的部队最终被击溃，英军占领了坎大哈。迈万德一役也许是阿富汗人取得的关键性胜利，但它不过是更大规模战争的一部分，阿富汗人最终还是输掉了战争。

话又说回来，迈万德和坎大哈战役的成败，并不足以改变第二次英阿战争的格局。这场战争很难说谁负谁胜。迈万德大捷，让阿尤布赢得了阿富汗人民的热切钦佩，但他并未因此在阿富汗历史上有更多作为。当时，他的侄子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 Rahman）正向喀布尔进军，这就是日后的“铁腕埃米尔”。19世纪60年代，因为涉嫌谋反而遭到希尔·阿里的驱逐，他和父亲一起流亡阿富汗北部。英阿战争一打响，阿卜杜尔·拉赫曼就回来了。

此时，英国人已经一心想把政权交还给穆罕默德扎伊家族。阿卜杜尔·拉赫曼似乎是一个上好的人选。他手段强硬，足以统御全国；也足够精明，可以和英国人达成良好的默契。他是“多斯特大王”的众多子孙之一。这意味着他的血统是王室的，他也有继承王位的合法性。于是，英国人将阿卜杜尔·拉赫曼请进喀布尔城。经过一番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英国人把这个国家交给了他。

英国人的条件是：不允许俄罗斯人进入阿富汗，阿富汗不能和英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打交道，等等。阿卜杜尔·拉赫曼对一切要求都签字应允，他只想让英国人赶快离去。

不过，阿卜杜尔·拉赫曼也提出了他的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在阿富汗境内，他拥有绝对的权力，英方不能干涉。对于他的条件，英国人巴不得立即答应。阿富汗的内部问题，他们才懒得关心。协约达成后，英国人松了一口气，撤出了他们的军队。因此，很难说谁赢得了这场战争。双方都得到了一些东西，但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论如何，阿富汗已经整合成为一个国家，一度被英国粗暴打乱的故事，如今可以重新开始了。

(1) 莫德·戴弗（1867—1945）：英属印度作家，著有著名传记《赫拉特英雄：边境传奇》。

第二部分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阿富汗获得其现代名称时，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地理名词，甚至连边界都尚未敲定。这里民族众多，一个民族中还有数不胜数的部落和氏族，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国王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对于臣民的生活并不能施加太多管治。他只是名义上统治着王国。

相互竞争的酋长们总在为了霸权而战。但这些小规模的战事结果，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太重要。当强大的国王出现时，他们会投入战事，开疆拓土，向外扩张是阿富汗国王的主要作为。

英国势力的介入，改变了游戏的规则。对于阿富汗人而言，这帮外来客是一群真正文化上的“他者”。作为个体，英国人和阿富汗人相处得还算融洽，但作为两种文化，两者没有融合的倾向。当英国入侵者进入阿富汗，他们与阿富汗人的区别就像油倒进水里一样。阿富汗人抵抗英国人，反映的不是统治者的政策，而是阿富汗民众面对他们中的外来者的本能反应。通过战争，阿富汗人终于找到了彼此之间的相同点：我们都不是英国人。

英军尚未撤离，阿富汗统治者的基本任务已经发生改变。他们不再追求广袤的疆域，转而开始清点手中的“财产”，消除全境范围内一切有可能独立于王权的地方势力。多斯特·穆罕默德及其子孙都致力于此，而且干得卓有成效。到了1879年，阿富汗有了明确的边界，喀布尔的首都地位也得以奠定。坎大哈、赫拉特或马扎里沙里夫不再是能与中央王权分庭抗礼的权力城邦。

一个联合的阿富汗让英国人受到了刺激。于是，他们第二次挥师入侵。不过，英国人虽然再次推翻了喀布尔王权，却又一次搅起了阿富汗部族社会里潜藏着的蛮荒之力。因此，英国人再次被迫撤离。不是因为他们的战败，而是因为他们无法统治阿富汗。此外，英国人再次激发了阿富汗人之间的认同感，同时也强化了使阿富汗四分五裂的离心倾向。当一个新的强人登上王位后，他明白巩固边界和恢复喀布尔的首都地位是不够的。他必须组建更加强有力的政府，从而影响并控制其治下的所有臣民。但是，一直以来，臣民眼中只有家，没有国。他们只服膺于宗

教和传统，听命于部落和氏族。对于这样的国家，王权又该如何行使日常权力呢？这个问题困扰阿富汗的统治者达半个世纪之久，并将阿富汗分裂成了两个文化世界。

第9章　铁血时代

英国人走了，阿富汗又迎来了一位雄主。以往的几个世纪，阿富汗这片土地上走出过许多纵横中亚和南亚的征服者。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方方面面都和这些先辈很是相似，他的才略几乎可与国父艾哈迈德·沙阿相提并论。借以时势，阿卜杜尔·拉赫曼本可以缔造一个从伊朗到德里的不甚稳固的帝国。当然，可以想见的是，他撒手人寰的那天，也是帝国分崩离析之日。

如此一番伟业，阿卜杜尔·拉赫曼却无缘成就。大国和强权已经为阿富汗国王划定了活动疆界，叫他再难逾越半步。既然无力开拓领土，他只能深耕自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于是，他把一腔雄心壮志都施展在了阿富汗境内。他无法容忍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遍布全国的自治村庄也不合他的心意。他要扫清这一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阿卜杜尔·拉赫曼是阿富汗历史上最强硬的人物之一。年岁尚幼，他的暴虐性情便已显露无遗。他的祖父是多斯特大王，父亲是阿富汗北部大省巴尔赫的总督，可想而知，未来国王的童年生活当然极度优渥。在巴尔赫，他的家庭拥有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力，他享有一切特权。

有一天，阿卜杜尔·拉赫曼想知道他的小口径枪是否足以杀死一个人，于是，他举枪射向自己的侍从。侍从当场倒毙，阿卜杜尔·拉赫曼却在一旁哈哈大笑。那时，他不过十二三岁。如此一桩命案实在太过荒唐，即使他的父亲也无法全然包庇。就这样，阿卜杜尔·拉赫曼被送进了监狱。不过，只为测试武器就敢取人性命，倒也说明他的确胆识过人。一年之后，父亲便恢复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自由身。17岁的时候，阿卜杜尔·拉赫曼还被委以重任，成了父亲手下的一名重要指挥官。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因举兵反对希尔·阿里失败遭到流放，阿卜杜尔·拉赫曼也随父亲在阿姆河以北地区过起了流亡生活。这位昔日的王子、未来的国王过了几年很是潦倒的日子。他放下王室的身段，转而干起古董商的生意。他靠在市场上买卖古董和考古奥秘度日。四分之一的收入用于维持生计，剩下的则积攒起来，作为东山再起的本钱。阿卜杜尔·拉赫曼苦苦等候东山再起的一天。[1]

1893年，距离他从英国人手中接管阿富汗已有13年，这位“铁腕埃米尔”即将接待一支来自印度的英国使团。阿卜杜尔·拉赫曼在登基之初

曾和英国人谈过一笔交易。这一次，双方将正式确定这份协议。使团本应由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Roberts）将军率领，但是，阿卜杜尔·拉赫曼却对英方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异议。第二次英阿战争，罗伯茨起了主导作用，阿富汗人无不恨他入骨，阿卜杜尔·拉赫曼也容不下这样一个谈判对象，他表示，纵然王权坚硬如铁，也无力压制臣民的怒火。于是，英方临时换人，改派英印当局的外交部长马蒂摩尔·杜兰德。[2]

这是一次两人会议。杜兰德只身前来，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左右也没有顾问，地方长老、民意代表更是不见踪影。会谈中，这位英国外交官提出了关于阿富汗南部边界的建议，阿富汗国王表示接受。那次谈判的结果一直贻害至今。杜兰德大手一挥，就把普什图人的聚居区一分为二。他这一笔是如此随意，甚至丝毫未曾考虑所在区域的地貌和环境。如果你到了那里，除非有人告诉你，否则你不知道这条线在哪里。“杜兰德线”（Durand Line）两侧的村庄住着同一个部落的成员。对他们而言，界线那一头往往就是自家亲戚的住地。那么，杜兰德是如何决定这条线的呢？其实，这条线标志着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混战线。杜兰德线是英国在不被击退的情况下推进阿富汗领土的最远处。因此，它肯定是一个长期冲突的地方。它埋下了阿富汗因失去白沙瓦而产生的怨恨火种，由此而来的种种政治争端将持续久远。

然而，为了实现他的最终目标，阿卜杜尔·拉赫曼需要一片确定的领土，以实施绝对的统治。因此，阿卜杜尔·拉赫曼接受了杜兰德线。其实，任何能将世界其他地方排除在外的提议都能得到埃米尔的认可。国界一经确定，便立即遭到封禁。此后，少有阿富汗人能够得到出国游历的机会，而外人也基本无法进入阿富汗，埃米尔的政府还对输入的工业品、信息严加控制。为了更有效地将他的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他颁布法令，禁止在其境内修建铁路。阿卜杜尔·拉赫曼切断了阿富汗与现代文明的联系，阿富汗境内了无一丝现代风气。不过，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天赐良机，可以大展宏图了。

宏图大展之前，阿卜杜尔·拉赫曼还有几块心病亟待祛除。迈万德的英雄阿尤布最让他惴惴不安。阿尤布的民望实在太高，在埃米尔看来，此人断不可留。终于，阿卜杜尔·拉赫曼和阿尤布兵戎相见。战事终了，国王获得胜利，一位强敌就此倒下。



杜兰德线的位置

依斯哈克（Ishaq）和阿尤布同是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堂兄弟，也需要小心提防。依斯哈克是阿富汗北部的实力派，他虽不像阿尤布那样战功赫赫，但因为精明善治、公正严谨而深得属下和子民的拥戴。阿卜杜尔·拉赫曼自然容不下他。这一次，国王主动兴师问罪，不善战事的依斯哈克没有正面应战就逃亡国外了。就这样，阿卜杜尔·拉赫曼又为自己祛除了一大敌手。那么，接下来的“铁腕埃米尔”又有何作为呢？

不多久，孟格尔（Mangal）部举族叛乱，结果遭到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平定。而后，吉尔扎伊部的叛乱也被他镇压下去。阿卜杜尔·拉赫曼在位期间，打了40场部族战争并获得全胜。当然，几十场胜仗还不能叫国王完全安心，他要这些手下败将彻底失去反抗的能力。于是，随着阿卜杜尔·拉赫曼的一声令下，很多民族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居地。如此一

来，他们便要和盟友分离，转而去和曾经的对手做邻居。由于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安排，比邻的两个部落之间往往存在很深的猜忌。同样的政策，亚述人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实行过；几十年后，斯大林也会实施这一政策。由此，整个普什图部落一路由南转迁来到北方，数以千计的家庭被迫从北方大草原南迁到喀布尔以南地区。阿卜杜尔·拉赫曼的专制政策确也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副作用：它将阿富汗各民族融合在一起，鼓励他们融入一个单一的政体。

对于大多数国王来说，21年内打赢40场战争足以耗尽一位王者的心力，还有多少时间来完成其他事情？但对阿卜杜尔·拉赫曼来说，如上种种战绩不过是他政治生涯的冰山一角而已。埃米尔征服普什图部落的同时，也让一个国家得到了重建。曾几何时，阿富汗境内的行省和政区不过就是部落势力范围的代名词，一个区域往往为一个部族所占据；不同区域之间的区别，往往在于住民的部族身份。这样的行政区划，倒是符合部族社会的生态。可想而知，各地区的封疆大吏当然要由当地主要部族的首领担任。

这样一番局面并不合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心意。在他治下，行省的数量大为增加，行省下面的行政区划更是多得犹如雨后春笋。而且，他还有意确定边界，以跨越部落的领土。如此一来，各位封疆大吏治下的子民便不再是一族同胞，而过去一个部落的专属领地也被划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地方长官再也无法利用部族亲缘进行串联和勾结；普通臣民在听命于部落长老的同时，还得接受地区官员的管辖。这是两个独立而不相关的系统。

为了增加地方官员的权威，阿卜杜尔·拉赫曼可谓不遗余力。这些人都由他亲自任命，相较于基层的部落长老，更加容易掌控。毕竟，无论他的官员攫取多少权力，他仍然可以随时将其撤换，甚至直接剥夺他们的权柄。但他对可汗或部落长老不能这样做。

话又说回来，被任命到某个省级办公室的官员总会有机会扩充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如果埃米尔不对其密切监视的话。试问，国王一个人哪里看得住如此众多的官员？事实上，阿卜杜尔·拉赫曼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情报系统，有相当多人为他服务。他的情报机构无人能及，并影响至今，成了阿富汗政治的永久特征。

有了情报机构的效力，国王可以随意操控地方官吏的命运。埃米尔可以在他认为必要时羞辱和降职他的总督，他还经常罢免他的宫廷事务官，声称有人指控其贪污。为了洗脱嫌疑，大臣须拟好陈情表，公布家

中的种种账目，以证明自己并未挪用国库、损公肥私。可是，哪有一个人的自白书能够毫无瑕疵，找不出哪怕一点矛盾之处呢。要知道，一笔记录不清的钱款、一件来历不明的器物、一点似是而非的小错误，都足以叫一个人不得翻身。他将因此丢掉官职，没收财产，最终落得名誉扫地的下场。当然，声名狼藉的官员可以指望国王法外开恩，以保全自由。可是，国王的恩典常常十分有限，若是能以活罪抵偿死罪，已经算好运了。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偶尔有之，久而久之，大家便都噤若寒蝉了。一次，一位大臣得到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赏识，即将接受一份要职。此人是国王的老朋友，他听到升迁的消息，立即收拾了家中所有财物，放上马车，奔赴王宫面见国王。

“你这是何意？”国王见到老朋友的所为，不禁皱了皱眉头。

“国王陛下，”大臣说：“我知道您一旦任命一个人担任要职，他的命运就是在几年内失去一切。我现在提前交出全家的财产，免得您日后费事劳神。”[3]阿卜杜尔·拉赫曼看在他们友谊的分上，才饶了这犯上的大臣一命。

埃米尔在他的宫廷里保留着大量官僚机构，其中有不少都属于“古兰巴洽”（Ghulam Bacha），意即“童仆”（slave boys）。几百年来，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传统赋予“奴仆”这个词一种特殊含义。这些童仆自幼便脱离了原生家庭，宫廷才是他们长大成人、接受教育的地方。君主将童仆打造成为一个特权阶层，把一些重要官职托付给他们。这些官奴的权力完全得自君主的授意，而不像一般官僚那样拥有民意基础等其他权力来源。在阿富汗，要数“埃米尔的孩子”（amir-zada）最为得宠。后来，这一称谓缩写成“米尔扎”（mirza）。

阿卜杜尔·拉赫曼有一支米尔扎军团。他安排他们进入内阁，指挥军队。国王给他们荣华富贵，允许他们享受奢华、优雅的生活，而且还坚持这样做，毕竟这些童仆就是他这个伟大君王的化身。因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以一袭锦衣、身跨名马的形象示人。不过，这些人养尊处优惯了，难免会生出二心。埃米尔也总在猜忌这些近臣。他花了很多精力，派出不少探子，专门监视这群童仆的动向。对此，他那个绰号“波波·古尔”（Bobo Gul）的宠妃哈丽玛很是不解，她觉得既然信不过童仆，国王大可一杀了之。

“不管用的。”国王说，“我不相信任何人。”[4]

哈丽玛不仅是埃米尔最喜欢的妻子，还是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统治

者，她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人们说全天下都怕阿卜杜尔·拉赫曼，而阿卜杜尔·拉赫曼只对波波·古尔服软。哈丽玛为埃米尔执行外交任务，与部落首领和敌对指挥官谈判。她的女仆受过使用枪支的训练，她有自己的保镖队伍，核心是女战士。[5]

阿富汗需要一支常备的职业军队——在这一点上，希尔·阿里和阿卜杜尔·拉赫曼这对叔侄的看法完全一致。面对外来侵略者，部落武装确实可以实施有效抵抗。但是，国王需要一支效忠自己的亲兵，如此他才能够打压那个他不好明说的对手，也就是他的人民。即位三年，埃米尔的雇佣兵就达到了4.3万人之众。到1887年，国王的部队扩大到6万人。1890年，阿卜杜尔·拉赫曼已然成为一支10万大军的最高指挥。他的麾下兵种齐全，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各个师团都配有一名毛拉。神职人员的主要职责是宣讲，他要让各位将士相信，如果他们临阵脱逃，伊斯兰世界就将遭遇灾难，而逃兵会堕入火狱，永远不得超生。[6]

枪械，曾是埃米尔幼年时期的爱好（出乎意料吧！）。称王之后，这点爱好升级成了激情。一次，一位法国工程师献上一台望远镜，想要博得国王的欢心。他把望远镜对准天空，对国王说：“陛下，通过这台仪器，您可以观赏月亮。”

“月亮和我有什么关系？”阿卜杜尔·拉赫曼咆哮道，“如果你那杆玩意儿能够射出子弹，我可能会有点兴趣。”[7]

国王军队的装备主要来自英国。同时，他在喀布尔及周围设立了军械厂。在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巅峰时期，平均下来，阿富汗生产的枪支数量几乎可以和欧洲任何一个强国等量齐观。如果国王愿意，足以使全国的成年男性每人手中至少有一支步枪。[8]当然，阿卜杜尔·拉赫曼不会把枪支交到别人手里，除了他的军队。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生征战无数，他的对手几乎都是自己的穆斯林臣民，不过，他却又以信仰的捍卫者自居。阿富汗历任国王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意愿。没有各位长老在支尔格会议上的支持，艾哈迈德·沙阿无法登上权力的巅峰。不过，阿卜杜尔·拉赫曼并不觉得自己的王权合法性来自人民。17世纪的欧洲，“君权神授”思想十分盛行，阿卜杜尔·拉赫曼认为其权威来自上帝。他通过挥舞伊斯兰旗帜，就可以指控反对他统治的人反叛上帝。

为了宣扬他的宗教主张，阿卜杜尔·拉赫曼执行了最严格的正统法律和最保守的宗教法律。国王的手下豢养了一群穆赫塔西卜，其职责相当

于道德监察官。穆赫塔西卜的活动地点并非清真寺，他们在大街上巡视，保证每位妇女都面纱遮脸，确认每位男性都能按时祷告。倘若有人在斋月期间进食，一定会遭到穆赫塔西卜的鞭笞。他们甚至惩罚在公共场合讲粗话的人。显然，这是出自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授意。通过与极端的社会保守派结盟，阿卜杜尔·拉赫曼将自己定位在他想要攻击和击败的阶层——长老和毛拉——的右边。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直在打压国内的传统势力，他竭尽全力，意图用自己的权威取代长老的权威。其实，这也是“铁腕埃米尔”最为宏伟的一项抱负。对了，这里所谓的长老，是指各地的酋长、马利克、可汗和家长。他们都是各自地盘上有威望的人，其尊贵地位不但根基深厚，而且由来已久。他们的权威来自与其一起生活并直接与之打交道的人。这样一个阶层自然很难控制，更别说被连根拔起。因为长老们只有当地的隶属关系，他们不属于更大的组织，不能通过打败其领导人来瓦解这个阶层。阿卜杜尔·拉赫曼想要消灭他们，必须与之一一开战并将其击败。因此，埃米尔的敌人并非一个政治实体，甚至不是一种政治制度，他是在对一个国家长久以来的文化开战。征服这些部落与征服成千上万的部落长老相比，毫无意义。就他获得的成功而言，这是他取得的最惊人的成就了。

按照“铁腕埃米尔”的命令，每个村落、每座城镇、每个城市的社区都必须选出一名代表，负责与政府接洽。这样的代表被称为卡兰塔（kalantar）。国王还任命了一大批自己的官员担任警察局长（kotwal），负责监察地方事务。

卡兰塔的职责可不是为民请命。他们要收缴税款，在自己的辖区内推行国王那一套严苛的教法；报告他们听到的反政府言论、对抗王权的行为、可疑的活动迹象，无论他们发现了什么，都必须向所在区域的警察局长一五一十地报告。从本质上说，卡兰塔实际在为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情报系统添砖加瓦。

卡兰塔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在于记录辖区内居民的详细信息，居民的姓名、身份、住址和财产等，他们都要心里有数。每个阿富汗人都得到了一张编号的身份牌，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们的信息。没有官方许可，臣民不能随意离开家乡。签发旅行许可证正是卡兰塔的权力。当然，没有警察局长的批准，卡兰塔即便发出许可证，最后也会沦为一张废纸。

卡兰塔的工资是由政府发放的，埃米尔对其兼施“胡萝卜＋大棒”的双重手段。卡兰塔因为工作得力而得到奖励，也就是胡萝卜；但是，如

果没有完成任务，或者有意包庇谋反的邻居或亲戚，国王便会举起惩戒的大棒，让他们丢掉身家性命。

埃米尔给每位卡兰塔、警察局长都定了“指标”。在指标的压力下，他们需要按时定量举报逃税分子、骗子、盗贼、杀人犯，以及各种各样的违法者。如果没有完成指标，国王可不会因此觉得那个地区政通人和、治安良好；相反，只能说明官员渎职怠工，其薪金将会遭到罚没。如果辖区内发生劫案，而案犯又没能按时缉拿归案，那么官员必须自掏腰包，弥补受害者的损失。

警察局长的日子也不好过。如果有人在纳税上作弊却没有发现，警察局长就会遭到惩罚，至少他们需以薪水相抵。当然，更多的事务官无法拿钱赎罪，只能乖乖地去蹲监狱。敢谤议国王的人一旦落网，通常会落得两种下场：要么被处以割舌酷刑，要么把嘴巴用针线缝上。对待那些谋逆者，国王会把他们关进铁制的囚笼，吊在路边示众，直至饿死。同样的惩罚，有时也会施加到劫匪或其他犯人的身上。严刑峻法之下，阿卜杜尔·拉赫曼也有了吹嘘的底气。他曾向来访的英国使节表示：贵国的犯罪率实在太高，相较而言，阿富汗简直是个升平世界。[9] 在他统治期间，这可能是真的。

犯下重罪的人，往往会遭受极其严酷的刑罚，比如，国王会把谋逆者绑在炮口上，活活把人炮轰成碎片。（在这方面，阿卜杜尔·拉赫曼并不算先驱。英国殖民者早已利用类似的办法，惩治那些反抗的印度士兵。）粉身碎骨的可怕场面叫人头皮发麻，遭此厄运的人会很快倒毙。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另一项发明，更为残忍恐怖。一种名为“黑井”（Siah Chah）的酷刑到底是怎样的，还是留待各位读者自行去想象吧。

埃米尔遇到的另一个难以打破的阶层，是毛拉和其他神职人员。同样地，这个阶层的权力来自社会共识、习惯和传统。阿卜杜尔·拉赫曼没法通过破坏他们的组织来制服他们，因为他们并无组织可言；他也不能捣毁他们的总部、抓捕他们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并不效力于特定的机构，更没有领袖。所以，他用另一种方式打击他们，即向他们支付薪金。

并不是每一个自称毛拉的人都能得到国王的薪酬。只有那些按规矩行事，并让警察局长相信他们忠诚的人才会得到薪水。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这笔钱，大多数毛拉都选择接受。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反对国王：他不反对伊斯兰教，从未推动任何有违阿富汗文化的社会变革。事实上，国王宣称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虔诚和正统。面对这样一位王者，毛拉们怎么

会反对呢？

一旦他们开始依靠政府的钱生活，国王便拥有了他们。他可以施加条件，而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他要求毛拉必须证明他们真正了解自己的宗教（这个要求相当合理）。国王特地派出一支考核队伍到全国巡查，考核各地毛拉的知识水平。相关的试题由国王和高级神学家设计。结果是，近九成的毛拉都吃了瘪。当然，阿富汗人的宗教观本来就很独特。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中，掺杂了不少传统立法、乡规民约和传统习俗，即便他们能够阅读，可供阅读的书籍也少得可怜。

在证明毛拉的无知之后，埃米尔颁布了一项规定：毛拉必须通过考试，取得相应资质后，方可担任神职。没有许可证的毛拉无法得到工资，敢无证上岗的毛拉会遭到严惩。然而，出于对子民的同情，对上帝意愿的崇敬，埃米尔建立宗教学校，人们可以在那里学习所需的知识，以便为考试做好准备；此外，国王还在喀布尔开办神学院并亲任督学，学生无须参加考试，只要完成学业便可拿到执照。阿富汗以外的一些著名伊斯兰大学的文凭也被接受为宗教能力的证明。

全国的毛拉被阿卜杜尔·拉赫曼管得服服帖帖，卡兹和穆夫提也得服从国王的差遣。阿卜杜尔·拉赫曼特意提拔了一名宗教法官进入内阁。此人掌管阿富汗的教法事务，其权威凌驾于所有卡兹之上。同时，埃米尔还组织学者对伊斯兰各派法理学进行研究和整理。逊尼派穆斯林承认四种学派的法理学，也就是四种不同的教法解释，并认为他们都是正统的。虽然其原则上相似，但在细节上则千差万别。委员会审议多时，最终决定尊奉哈纳斐派（Hanafi）作为国家的立法基础。于是，阿富汗有了一套国家法律。哈纳斐派之外的派别从此失去了对教法的解释权。

当然，不是每个神职人员都乐于顺应王权。但是，反抗的人不是被迫出走他国，就是锒铛入狱。横遭虐待、死于非命的例子也不少见。埃米尔虽对神职人员多有弹压，却仍然宣称自己是信仰的捍卫者，他甚至以“最忠诚的穆斯林”自居。如此一来，他才可以把“胸怀异志”和“背弃信仰”的帽子扣在反对者的头上。毕竟，有哪位忠于真主的毛拉会忤逆他这位无比虔诚的君主呢？

埃米尔的制度有赖于数量庞大的政府雇员，他们都拿着薪水：士兵、毛拉、探子、卡兰塔、警察局长、省长和地方官员，还有喀布尔那帮“王的男孩”。因而，阿卜杜尔·拉赫曼对于钱财的渴望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位前任国王。阿富汗人身上的苛捐杂税又因此沉重了几分。除土地税、牲畜税之外，还有树木税、种植税和收获税、所得税和营业税、贸

易税和旅行税。商业活动也逃不过税收，不但卖家需要按时交税，买家也得承受同等负担。新婚夫妇必须小心，因为埃米尔设立了婚姻税；如果你死了，嗯，这也是征税的，这笔钱落到了你的家人身上。一切都能成为国王榨取金钱的由头。待到统治末年，阿卜杜尔·拉赫曼的税收收入，几乎达到了希尔·阿里的四倍。

国王需索无度，手下自然要尽力征缴。卡兰塔、警察局长、乡村执法者、探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此才能确保每个人缴纳他们“所欠”的税款。阿卜杜尔·拉赫曼担心，其手下很可能和百姓勾结欺骗他。于是，他组建了一个间谍网络来监视他的间谍们。国王的特务人数众多，报备的事务也从来不少。因为无论国王的手段多么强硬，总是有人选择揭竿而起，毕竟他们是阿富汗人。

特务不过是政务部这个恐怖体系的一部分。内政大臣米尔·苏尔坦专门负责夜间抓捕。每到晚上，大家都担心苏尔坦及其手下会突然“造访”。谁会成为苏尔坦的目标？没人知道。有哪些人已经沦为内政部的阶下囚？同样无人知晓。他们获罪的原因、入狱后的命运，更是一个未解之谜。人们发现，身边总有面孔不断消失，总有熟人落得没籍除名、不知所终的境地。

终于，因为米尔·苏尔坦制造的冤孽实在太多，就连包括王储在内的最高法院官员也认为他应该收敛。这一次，国王倒是顺应民意。于是，米尔·苏尔坦不再是国王的得力助手，反而成了可怜的替罪羊。在法庭上，这名穷凶极恶的酷吏努力辩驳，为自己洗脱罪名。埃米尔告诉各位法官：“在座的各位必须清楚，此人夺取了6万人的性命！他呈上的死刑命令当中，我本人只应允了15或20起死刑。剩下那些都是此人为泄私愤而一手炮制的冤案。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屠夫应当如何处置，相信各位自有公论！”[10]

国王的意思，各位法官心知肚明。最终，米尔·苏尔坦被判公开绞刑。国王为民除害，似乎可以收获人民的爱戴。其实，对于苏尔坦的死，百姓们固然鼓舞欢腾，不过，每个人也都清楚，真正的暴君到底是谁。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残忍暴虐，从他设立的监狱就可见一斑。他的每处宫殿之下，都设有一处地牢。喀布尔城的中心地带，有一座德玛赞监狱，可以关押9000名囚犯，监狱数量不断增加，（根据一些报道）一度有7万人被监禁在喀布尔，已占到喀布尔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11]异见人士，贪污受贿的官吏，偷逃税款、散布谣言之徒以及涉嫌悖逆的商贩，无论年龄和性别，也无关出身高低，任何人都有可能沦为国王的囚

犯。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生征战无数，其中最惨烈的一役不是针对其他普什图部落，而是针对其境内的其他民族。哈扎拉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并以波斯语为通用语言。论及源流，这个民族是蒙古后裔，生活在阿富汗中部。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之前，哈扎拉人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不过，埃米尔无法容忍任何不服他教化的势力。为了迫使哈扎拉人就范，他派出自己的军队，又征召了一些部落武装，进军哈扎拉贾特（Hazarajat，即哈扎拉人的土地）的武装足有10万人之众，而哈扎拉部落全员不过34万人。[12]哈扎拉人的抵抗异常激烈，战争分外血腥。最后，哈扎拉政权惨遭倾覆。埃米尔曾短暂地使奴隶制合法化，但仅限于哈扎拉人。由此，许多哈扎拉人被拉到市场公开贩卖，贵族之间甚至兴起了一股赠奴的潮流风气，几个哈扎拉儿童就可以表示“真挚的谢意”。

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最后一场战役把他带到了喀布尔东北部的偏远山区。这里的人们长期以来信奉万物有灵论，惯用木制雕像装点墓园，因此那个地方被称为“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意即“异教徒之地”。卡菲里斯坦的五处山谷和众多的侧壁峡谷是如此狭窄和崎岖，以至于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没有人能够征服这里。埃米尔在六个月内便征服了此地。他将卡菲里斯坦更名为“努里斯坦”（Nuristan），意为“开化之地”。此役之后，境内的最后一块领土也归于阿卜杜尔·拉赫曼的管治之下。很快，“开化之地”遍布卡兰塔和毛拉，变得和其他地方毫无差异。

想当年，“国父”艾哈迈德·沙阿也曾创下一番功业，并成为阿富汗各大部落的公认领袖。但这无法满足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胃口，他不甘心只做个部落酋长，他要成为真正的王者。要达成目标，就必定得改变阿富汗这个社会。埃米尔的目标几乎已经达成。他逝世之前，阿富汗有了一个中央政府，它的官僚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它的权力，并将其影响带给每一个人。

但是，阿卜杜尔·拉赫曼到底没有成功。他没能让阿富汗拂去旧貌，换上新颜。他想创造一个单一、完整、同质的新社会，但只创造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双重世界。一方面，毛拉、马利克、村庄、部落社会中的可汗和首领，仍深深扎根于阿富汗土地上；另一方面，阿卜杜尔·拉赫曼播下的新制度种子在生根发芽：以喀布尔为中心的中央及其附属机构的神经向全国各地延伸，其代理人和管理者遍布全国，新旧两套政治体系由此呈掎角之势。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完全属于其中的一个社会。许多为中央政府工

作的人有不少乡下亲戚，有人出身封建领地，后来进入城市，并成了政府官僚体制的一部分。私人生活中，阿富汗社会的二元对立不那么清晰，相关的情况并非一言两语能够说清。

阿富汗，还是那个阿富汗。乡村社会仍很封闭，国王的代理人无法进入乡村的中心地带，他们无法进入家族大院，无法进入隐秘的家庭世界，而这构成了阿富汗人生活的主体。“铁腕埃米尔”只是引发了一场斗争。斗争的一方由中央政府、城市精英阶级领导，他们较为开明，渴望进步；他们的对手则倾向保守，多是乡村地区的传统领袖。双方的角力不但左右了国家的命运，而且企图干预阿富汗局势的外国势力也会受其影响，这种影响将贯穿整个20世纪。

第10章　新的开始

1901年，阿卜杜尔·拉赫曼与世长辞。死讯如同飓风席卷过阿富汗大地之后，只留下一片静寂。而后，王储哈比布拉（Habibullah）和平地继承了王位，噢，他真是一位好命君主。他的父亲采用雷霆手段扫除了障碍，继任的他除了享受之外没别的事情可做了。

哈比布拉确实非常放浪。他是个老饕，在位期间，他的体重因此大涨。他喜欢运动，尤其是骑马和打猎。这点爱好倒是让他免受了肥胖之苦。他还是个好色之徒，娶了教法所允许的几个妻子后，仍不满足，继续纳妾。他的后宫规模放在一百年前舒贾那个时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哈比布拉可是生活在20世纪，就连国王身边的近臣也觉得他的作为招人厌恶。况且，哈比布拉不单想要纳妾，还时时刻刻惦记着别人的女儿和妻子。每到周三，国王都要大摆筵席，邀请各位大臣带着妻子和女儿进宫赴宴。这种“女士之夜”（Lady’s Night）的背后藏有何种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一次，一位大臣拒绝了哈比布拉的宴请，他表示，自己愿毫无保留地为君主服务，但他的妻子可没有这个打算！为此，国王赏了他一记狠狠的耳光。[1]

哈比布拉是个暴君，他会毫无由头地惩罚一个人。哈比布拉没有什么远大理想，这一点和他的父亲毫不相像。阿卜杜尔·拉赫曼想要重塑这个国家，让历史按照他的意愿发展，所以他把村庄、部落、民族、国家都肢解了，以实现他的抱负。父亲的遗志，儿子未曾继承。哈比布拉只想纵情享乐，他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脾气暴躁的大男孩，如此过分的特权以致让他忘了国王的本职。他可能会打一个惹恼他的人，但不会去故意伤害任何人。毕竟，他才没有那个闲工夫！如果有时间，哈比布拉宁愿美餐一顿，然后躲进后宫逍遥快活。

哈比布拉统治时期，阿富汗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他父亲当政的21年间，实在过于严酷。当然，在先王的励精图治和百姓的苦干下，国家的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这位“铁腕埃米尔”将阿富汗巩固为一个可以阻止英、俄入侵的缓冲国。有了这段铁血时期，朝廷的政令畅通了不少，国王的权力也不再是镜花水月。新君如若胸怀大志，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创建一番功业。

偏偏哈比布拉胸无大志，不想追求什么功业。当然，他倒也不是完

全无所作为。1904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比比亚（Habibia）学校成立，这是阿富汗第一所世俗中学。阿富汗有不少宗教神学院，但哈比比亚这种世俗学校却是新生事物。入读这里的男孩需要学习数学、地理、英语、乌尔都语，可以接触绘画、历史、土耳其语及各种科学。有朝一日，一个崭新的精英阶层将会从哈比比亚的校门走出，他们的所学所知，足以发展和管理阿富汗，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希尔·阿里曾委托12名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提供建议。如今，哈比比亚培养了许多专家，如果国王需要的话，他们会提供建议。

此外，哈比布拉还从国外带回了不少新鲜玩意。当然，他引进这些东西大多不是为了享乐，就是出于好奇。访问英属印度时，他见识了电话机。那个时候，电话算得上是新发明。他带回了几部电话机。1908年，喀布尔和其他几个重要城市已经形成一个小小的电话网络。同一时期，连接阿富汗各大城市的电报网开始成型。1910年，喀布尔近郊的水电站动工了。很快，首都的精英阶层至少每晚都能享受一段有电灯的时光。国王购买的汽车，也让权贵们趋之若鹜。[2]哈比布拉想要以车会友，自然需要场地。于是，随着他的一声令下，王宫周围多出了几条公路。

取得这些发展其实大部分要归功于埃米尔雇用的一位金融专家。此人名叫穆罕默德·侯赛因（Mohammed Hussein），他和王室没有关系，精通经商之道，擅长财务管理，哈比布拉将他提拔为穆斯陶菲（mustaufi，会计和财政主管）。没过多久，侯赛因就成了国王的亲信。手握财政大权的他，在阿富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3]

穆斯陶菲要将阿卜杜尔·拉赫曼新征服的地区纳入其统治，并将这些地区的人民纳入合理的税收制度。上任伊始，侯赛因巡视了哈扎拉贾特。这里本是哈扎拉人的故乡，后被纳入“铁腕埃米尔”的治下。战争期间，当地人民饱受蹂躏。穆斯陶菲此行，是为了了解此地到底能为朝廷奉献多少税款。我对他的这次哈扎拉贾特之行略知一二，是因为我的祖父艾因努丁是穆斯陶菲的私人医生。侯赛因出巡期间，祖父一路随行，还治愈了某个地方的村长。为表谢意，对方送祖父一个哈扎拉女孩。虽然当时奴隶制已属非法，但所拥有的奴隶仍可买卖赠送。女孩最终成了祖父的第四任妻子，两人共育有5个儿子，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

现在的阿富汗相对和平安全（当然，胆敢招惹国王的人仍会陷入险境）。不少在阿卜杜尔·拉赫曼时期逃离的人回来了。其中有一个人很快就成了埃米尔的首席顾问，他的5个儿子也都成为朝廷的栋梁。长兄纳

迪尔是他们之中的领导，是个严肃、魁梧的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和他的四个兄弟在英属印度长大，自幼接受英式教育。五个人的举止都是那么优雅得体，身材健硕。他们还都很沉静，总是跟着纳迪尔的指挥棒在行动。他们和埃米尔是亲戚，但只是远亲。两支血脉在多斯特·穆罕默德之前的一代就已分开。回国之后，兄弟五人很快得到了哈比布拉的信任。纳迪尔成了禁军统领，其他兄弟则成了封疆大吏。他们的妹妹尤利娅·贾娜卜（Ulya Janab）嫁给哈比布拉之后，他们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喜欢西式服装的尤利娅是位才女，她创作了不少诗歌，而且通晓多门外语。她去世前，正在将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二位继承人奥马尔的传记从乌尔都语译成达里语。1932年，她的哥哥帮她出版了这本书。

回来的另一个人是马哈茂德·塔尔齐（Mahmoud Tarzi）。此人回国之后，曾经掀起过一场政治风暴。去国期间，塔尔齐一家一直在奥斯曼帝国定居。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掀起的革命风暴，让年幼的塔尔齐兴奋不已。青年土耳其党人发起了一系列的运动，他们呼吁摒弃陈腐、停滞的过去，拥抱崭新的未来。并不是所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都是青年。“青年”不代表他们的年龄，而是代表他们的态度。

塔尔齐将土耳其的这股风潮带到了阿富汗，他成了宫廷里的常客。穆斯林激进现代主义者贾马鲁丁·阿富汗尼给了塔尔齐莫大的影响，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贾马鲁丁曾是多斯特·穆罕默德委任的宫廷教师，当年，他为希尔·阿里起草了一份现代化蓝图。塔尔齐相信他可以通过塑造国王的思想来改变这个国家，他和他的偶像一样，以教师的身份登上了阿富汗的历史舞台。哈比布拉的好几个儿子都接受塔尔齐的教育，塔尔齐希望他们中的一位能够继承大统。他教授的知识并不局限于书写、计算。根据他的计划，他们应当好好认识阿富汗以外的广阔世界，并对国家的未来抱有期望。

哈比布拉将塔尔齐视为亲信，同时，穆斯陶菲和塔尔齐的关系也很亲近，其儿子哈利卢拉（Khalilulah）也是塔尔齐的学生。日后，哈利卢拉将成为阿富汗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现代诗人。70多年以后，回想起幼时的求学经历，这位伟大诗人仍记忆犹新。有一天，他在老师的书房玩耍，偶然被老师的几本译作所吸引。他全神贯注地读完了《海底两万里》《环游世界八十天》《神秘岛》和《天空之旅》，这些都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s）的小说。[4]

塔尔齐不仅是翻译家，他还是个作家。他出生于文学家庭，“塔尔齐”这个词在达里语中有“文体学家”之意，原本是其祖先所用的笔名，后

来成了姓氏。早在多斯特·穆罕默德时期，塔尔齐家就已经有了文名。马哈茂德·塔尔齐没有辜负家学，在当时的诗坛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比起鲁米（Rumi）、贾米、哈菲兹（Hafez）和安萨利（Ansary）等前辈诗人，塔尔齐的作品别有一番新风气。他确实使用了古典形式，遵循了古典韵律，但他不再单调地吟咏爱情和美酒，也不沉迷于飞蛾扑火般的意象之中难以自拔——要知道，老一辈诗人常常以此暗喻人类对真主的尊奉。塔尔齐把自己的浪漫情怀挥洒到了其他地方，他歌颂过电线和疫苗的威力，也曾对柏油路诗兴大发。[5]

塔尔齐创办的《新闻之光》（*Seraj-ul-Akhbar*）是阿富汗最著名的报纸。《新闻之光》异常关注世界局势。科技进步、文化革新，也是报纸的一大主题。《新闻之光》涉猎的内容十分广泛，从电波理论、天气预报到微生物学及其病理，从法国大革命的得失到制宪理论和相关的政治哲学，就连心理学的最新发现，读者也可通过塔尔齐等人的讲述而知晓一二。《新闻之光》上刊载的各种信息，让人应接不暇。塔尔齐的妻子阿斯玛·丽斯蒂亚（Asma Restya）也是阿富汗新闻事业的一名先驱。在她的主持下，阿富汗有了第一份女性报纸。不过，这份报纸只局限在城市精英之间传播。[6]

20世纪初，喀布尔的年轻人逐渐成熟，他们渴望听到这样的想法，渴望了解，并随时准备进入这个从未想象过的广阔世界。塔尔齐等人的观点和思想让这些“青年阿富汗党人”很是受用。对于外面的广阔天地，他们十分好奇；未来那些无法预料的日子，更是让他们心生向往。年轻人总是拥有这样的能量，它会在某些时候、某个地点，以某种特殊的强度爆发。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喀布尔似乎就处于那样一个时间和地点。对于喀布尔的年轻人而言，他们的城市堪比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阿拔斯时代的巴格达、美第奇家族治下的佛罗伦萨及爵士时代的巴黎。至于塔尔齐，则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他是点燃火焰的那根火柴。

塔尔齐的身边聚集着一批青年贵族门生，他们都对他十分崇拜。当然，没人比埃米尔的第三个儿子阿曼努拉（Amanullah）更崇敬塔尔齐。阿曼努拉还娶了塔尔齐那美丽且多才多艺的女儿索拉娅。

那个年代，塔尔齐和他的追随者们风头很盛。不过，他们不是宫廷里唯一的活跃派。国王的兄弟纳斯鲁拉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潮流。纳斯鲁拉是狂热的正统穆斯林，他鄙视兄弟的懒惰和淫荡。不过，他并没有出面反对。纳斯鲁拉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和志趣，却没能登上父亲留下的

那个位置。为此，纳斯鲁拉自然有些懊丧，却也忍受了现实。阿卜杜尔·拉赫曼主政期间，曾经打倒了不少神职人员，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作为儿子的纳斯鲁拉，却和他们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纳斯鲁拉知道，他们既没有被打垮，也没有被拉拢，他们仍在塑造乡村的公众舆论与民众的热情和影响。阿富汗乡村好像一片汪洋，而朝廷及其走卒不过是海浪上的飞沫。对此，纳斯鲁拉再清楚不过。于是，他主动和保守的神职人员交好，并多次暗示自己是他们在宫廷中的朋友。神职人员自然得投桃报李，要对亲王无限忠诚。纳斯鲁拉不喜欢英国人，这种厌恶源自宗教情绪。为此，他甚至主张发动一场战争，与英国人公开决裂。那时，阿富汗的外交权仍然掌握在英方手中，但纳斯鲁拉已摆出一副最深刻的保守姿态。[7]

表面上，纳斯鲁拉不担任任何公职。事实上，他在阿富汗权势滔天。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手下说，他可以把哈比布拉丢在一边。不过，他并未这么做，因为他没有必要这么做，他可以等待时机成熟。虽然哈比布拉已把长子立为王储，不过，这个叫埃纳亚图拉（Enayatullah）的年轻人软弱无能，看起来实在不似人君。

那个时候，阿富汗正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当时，所谓的欧洲大战（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拉开帷幕。阿富汗应该站在哪一边？纳斯鲁拉和塔尔齐一致认为，阿富汗应该向英国宣战。只不过，纳斯鲁拉的建议是出于宗教原因，塔尔齐的反英倾向则源自反帝热情。[8]但国王哈比布拉觉得，阿富汗应该宣布中立。显然，国王要比两位近臣棋高一招。阿富汗和沙俄比邻而居，又是英国的“保护国”，两大帝国所在的协约国阵营，哈比布拉朝廷自然开罪不起；另一边的轴心国(1)成员中，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富汗不能向伊斯兰世界中的头号大国宣战。毕竟，当时仍有不少阿富汗人把土耳其苏丹当作哈里发（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万一两国兵戎相见，朝廷的面子多少有些过不去。

英国人知道中立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英方清楚，阿富汗人可以越过杜兰德线，加入“印度”军队，为己效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近70万名印度人奔赴欧洲为英国效力。其中1/3是穆斯林，超过80%来自印、阿边界或阿富汗本土，也就是说，许多人是阿富汗人。[9]许多阿富汗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埃米尔哈比布拉以阿富汗为英国取得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为由，要求参加巴黎和会。但印度总督认为这样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10]

接下来，各位读者将会见识阿富汗历史上的一桩奇案。若论诡异程

度，这起真实的案件恐怕还要胜过侦探小说。事情发生在1919年2月。巴黎和会刚刚开幕，远在阿富汗的哈比布拉则准备外出打猎。一般而言，2月可不是出猎的好时节。虽然山区仍是白雪皑皑，但热爱冒险的国王还是欣然前往。不过，侯赛因却没有这样的兴致。于是，他中途脱队，在贾拉拉巴德停驻下来。哈比布拉则继续赶路。国王走后不久，侯赛因收到一封密报（有人亲眼所见，并向笔者作了转述）。读罢信件，侯赛因脸色大变。他立即手书一封，让信使速速转呈国王御览。他特地嘱咐信使骑上黑马，穿上黑衫，如此一来，国王才能一眼得见。信使倒是按时完成了任务，但是，哈比布拉忙于取乐，那封手书被他扔到一边，未曾启封。

当晚，国王用过晚餐后，乘兴回到营帐准备就寝。餐点由御厨掌勺，主菜是烤肉，辅以几道小菜。营帐外，禁军首领纳迪尔正带队巡逻。帐中除了哈比布拉，还有亲王纳斯鲁拉。营帐四周都有卫兵站岗，门口是上校雷扎。国王照例在三名仆役陪同下进入大帐休息，其中两人负责按摩松骨，另一人则负责说书。[11]

没过多久，哈比布拉进入了梦乡，仆役退出大帐。但是，没走几步，他们就听到一声巨响。随后，只见一个黑影正要闯出门外。雷扎一手抓住那人的胳膊，却未能看清他的身份。禁军首领纳迪尔和亲王纳斯鲁拉闻讯赶来。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早就知晓今晚有事会发生。一片混乱当中，那个神秘人挣脱束缚，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后，他再也没有现身。事后有人声称，因为纳迪尔和纳斯鲁拉有意包庇，才让刺客得以逃脱，这场刺杀本就是两人的阴谋。而哈比布拉则早就断了气。一颗子弹不偏不倚，穿透了他的心脏。显然，刺客一早已埋伏在营帐中。为什么守卫如此疏忽，竟然没有发现刺客的行踪？这样一起谋杀事件，会不会有王族贵胄或者高官牵涉其中？

次日，纳斯鲁拉迅疾赶回贾拉拉巴德，并宣布自立为王。哈比布拉的长子、王储埃纳亚图拉一向性格温和，他不曾提出异议，并对新君宣誓效忠。国王的次子在几天前就借口公务繁忙离开了狩猎的大部队。国王遇刺当日，他本该在喀布尔，但在回程途中，因身体不适，在某处村舍耽搁了一段时间。那么，他是如何得知父亲被杀的噩耗的呢？一定是赶往喀布尔传递国王遇害消息的信使经过了王子正在养病的地方。

哈比布拉的死讯在喀布尔炸开了锅，大家都不知所措，唯有热衷改革的三王子阿曼努拉临危不乱，他似乎对当下的局面早有预料。没过多久，财政大权便落入了他的掌控之中，他还接管了军队的指挥权。阿曼

努拉宣布军队大幅加薪，以确保军队的忠诚，并承诺要犒赏众位将士。他召集喀布尔的名流贵胄，发表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演说，他拔出佩剑，发誓“把杀害我父亲的凶手绳之以法之前，这把剑绝不回鞘！”[12]

星期五，纳斯鲁拉来到贾拉拉巴德的清真寺，吃惊地听到以“埃米尔阿曼努拉”名义宣读的布道令。没多久，阿曼努拉的亲兵逮捕了纳斯鲁拉，指控他谋杀哈比布拉。而后，先王的高级顾问先后入狱，那些可能妨碍阿曼努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遭到了审判。哈利卢拉的父亲侯赛因也在阿曼努拉的名单中，那一年，哈利卢拉12岁。目击者看到阿曼努拉拿出一封信，大概是穆斯陶菲给先王的那份手书。显然，信中的内容为穆斯陶菲招来了灾难。阿曼努拉让侯赛因作出解释，侯赛因声嘶力竭地怒斥：“你才是杀人凶手！是你谋害了自己的父亲！”[13]

阿曼努拉下令立即将穆斯陶菲拖到花园吊死。行刑人是来自北方的普通农民。当其中一人把绳索套在穆斯陶菲脖子上的时候，手还有些颤抖。侯赛因嘲笑道：“被吊在这里的人是我，你在那里抖什么？来吧，年轻人，吊死我好了。等你们离开这里，记得告诉全世界，这起冤案是阿曼努拉一手炮制的。”[14]

对于阿富汗的统治者来说，暴力的结果并不罕见，但大多数人是在战争中丧生或战败后被处死的。哈比布拉被谋杀，成了一桩公案。谁是幕后主使，谁策划了刺杀行动？杀人者是何身份？没有人知道。早年间的一些“安乐椅神探”（armchair detectives），都把嫌疑指向纳斯鲁拉和纳迪尔，毕竟，前者有动机，后者有机会。机缘之下，两人很有可能串通一气。话又说回来，尽管阿曼努拉大肆宣扬要追捕杀手，但他打击的人不像是杀父仇人，倒更像他的政敌。由此一来，阿曼努拉自然也有悖逆的嫌疑。

当然，当时没有人对阿曼努拉表示怀疑，因为他是国王。所有的闲言碎语都集中到了纳迪尔的身上。后来，阿曼努拉跌下宝座，纳迪尔成了国王，舆论又将矛头指向阿曼努拉。总之，这一谜团与嫌疑人的政治命运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没有人知道真相的原因。但这已超出了我们的故事范围，不作多述。

(1) 原文有误，应为“同盟国”。——译者注

第11章　崇尚变革的君王

阿曼努拉这般做派的君主，阿富汗人还是第一次得见。民间流传着新君的一段往事。阿曼努拉还是王子的时候，他曾经穿着农民的衣装走街串巷，和市井民众打成一片。传说听上去有些无稽，但对我来说却有一种真实感，毕竟阿曼努拉的个性便是如此。[1]在他之前，阿富汗的国王和英国人走得很近，这不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心意。王室拿着英国人的补贴，用他们提供的武器控制自己的臣民，是地方部落和广大民众，而不是王室奋起抵抗，才换来了两次抗英战争中的那些胜利。阿富汗的精英阶层把英国人当成处得来的伙伴；而街头的市井小民却憎恨这群外来客，希望他们快点离开。在这个问题上，阿曼努拉和民众看法一致。

阿曼努拉的授业恩师塔尔齐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老师的思想，得到了学生的全盘接受。即使阿曼努拉对追求民族独立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热忱，但他仍可以喊着“独立”的口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无论动机如何，1919年，初登大宝的阿曼努拉立即宣布阿富汗摆脱英国的控制，实现“完全自主”。阿曼努拉的举动颇让英国人感到意外，谁能想到，阿富汗的国王竟然拒绝表示臣服！

为表独立之志，阿曼努拉特地致信英属印度总督。他在信中表示，“独立自主的阿富汗”愿与英国缔结新约，建立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这意味着英、阿两国是平等的关系。[2]英军最高统帅对阿曼努拉的这番天真言论嗤之以鼻，根本懒得有所回应。

不久，又一封喀布尔来信摆在了殖民当局面前。这一次，阿曼努拉宣布阿富汗已建立外交部，部长由马哈茂德·塔尔齐担任。一直以来，阿富汗的外交事务都在英印当局的操控之下。多斯特·穆罕默德以降的各位阿富汗国王，无不对此表示认同。正因如此，阿曼努拉这种自命不凡的行为几乎算得上挑衅。不过，英印殖民当局仍然决定不予理会。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美国、法国、波斯、日本、土耳其和俄罗斯政府先后接到阿曼努拉的照会。如此一来，阿富汗建立外交部的事情便成了举世皆知的国际新闻。殖民当局似乎应当忍无可忍，但是，英国人对待阿曼努拉就像对待木箱里“吱吱”作声的老鼠。

自然，阿曼努拉还得制造一点更大的动静。1919年4月13日，他的机会终于来了。那天，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爆发要求印度独立的示威

游行。虽然游行的人群并无暴力举动，但英军将领雷吉纳尔德·戴尔（Reginald Dyer）还是下令向示威者开枪。十分钟的暴力屠杀，造成379人丧命，超过1200人受伤。[3]阿曼努拉抓住机会，号召民众向英国殖民者发起“圣战”。国王的命令得到了众多普什图部落的热烈响应，英、阿边境地区很快陷入混乱，第三次英阿战争打响。

人们常说的第三次阿英战争，其实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阿曼努拉任命纳迪尔·汗（Nadir Khan）为总司令，派他和另外两名将军向边界的英国驻所发起进攻。其间，双方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但没有领土易手。

英国方面表现得很克制，他们担心战局一旦扩大，又会演变成一场部落大起义。部落起义，可是英国人最大的噩梦。于是，英国人想要速战速决。为此，他们用上了一件当时最新的武器——英国飞机使用炸弹对贾拉拉巴德市实施了空中打击。受惊的当地居民纷纷撤离，一夜之间，贾拉拉巴德人去城空，变成了一座鬼城。

不久，两架英国战机（像《花生漫画》里史努比狗狗的那台座驾差不多）向喀布尔投下了炸弹。虽然那场空袭未造成重大伤亡，但是，空袭带来的严重后果却长久地萦绕在喀布尔市民的心头。即便事情过去了40余年，当年的噩梦还是挥之不去。有一次，我的父亲需要填写文件中的个人信息，于是向祖母咨询自己的出生日期（阿富汗当时尚未普及西式历法，人们也没有庆祝生日的习惯，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实属正常）。出乎父亲的意料，祖母确切地记得他的生日。她记得儿子周岁那天，英军正在空袭喀布尔。因此，我的父亲出生于喀布尔大空袭的前一年。

空袭的效果立竿见影，殖民当局很快收到了阿曼努拉的来信。国王表示，诉诸武力无助于消除分歧，他建议双方不妨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谈判，这才是文明国家解决纠纷的应有方式。但英国人根本懒得回应。这本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羞辱，但阿曼努拉利用了这一点：他要求和平，而英国人甚至不予理会，有违普什图人一贯的行为准则。国王的臣民也很愤怒，他们想不到这帮“法兰奇”竟然如此野蛮！相比起来，阿曼努拉就是个碰了壁的和平主义者。阿曼努拉通过呼吁追求民族独立成了民族英雄，通过号召“圣战”，又让他赢得了虔心卫教的名声，现在他通过呼吁和平而遭冷落，获得了殉道者的光环。一场风波过去，他的民望已经登峰造极。

与此同时，边境上的一座英军要塞落入了纳迪尔的包围圈。除了朝

廷的正规军，1.2万余名部落出身的义兵乡勇也在助阵剿敌。[4]他们的枪械实在原始，为此，那头的英军很是嘲笑了一番。不曾想，纳迪尔切断了英国人的水源，英国人自然再也笑不出来了。

对于英方而言，坏消息还不止于此。阿曼努拉掀起的反英浪潮在边境地区的阿富汗人中间蔓延，殖民当局又一向担心部落起义。当时，边境地区的部落蠢蠢欲动。英国人可不想和这些部落同时开战。1919年，大英帝国尚在大战后的恢复期。于是，英国人接受了阿曼努拉的和谈动议。双方特使在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会晤。英方选择和谈，不是慑于阿富汗军队的勇武，而是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

就这样，第三次英阿战争宣告结束。其间，双方发生过几次小规模冲突，造成少量伤亡，有四五枚炸弹落到了两座城市。虽然规模不大，但英国人觉得足够了，因为这让阿富汗人恢复了理智，阿曼努拉已在修书乞降。那么，阿富汗需要承受怎样的惩罚呢？对此，伦敦的诸位官员意见并不一致。不少人觉得，英国应当借机直接占领阿富汗。可是，巴黎和会刚刚落幕，伍德罗·威尔逊那震惊整个西方世界的“十四点原则”言犹在耳，关于“民族自决”、尊重弱小国家利益的讨论满天飞。直接接管阿富汗看起来并不酷，即使这样做，也必须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进行。[5]和谈开始之前，英国政府内部对此已经达成了共识。

来到拉瓦尔品第谈判的阿富汗代表意气风发，仿佛他们是战胜的一方。英方谈判代表团由汉密尔顿·格兰特（Hamilton Grant）率领。英国人企图对阿富汗代表团进行一些羞辱，有意挑起矛盾，却都被阿方代表阿里·艾哈迈德（Ali Ahmad）巧妙反驳。阿里·艾哈迈德可谓举止得体、表现亮眼，他的巧舌如簧和诡辩技巧派上了用场。谈判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几个月的口舌交锋下来，英国人总算从艾哈迈德的嘴里探得了阿富汗国王的底线：在外交上保持独立。这点要求立即得到了英方的首肯。但签订协议的那天，事情又起了波折。阿里·艾哈迈德要求，文书中提及阿曼努拉的地方，都应以“殿下”相称，因为“埃米尔”之称实在不成敬意。对此，格兰特自然不答应。他说，“殿下”这一尊称乃是英王乔治五世的专属荣誉。格兰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文书中删去两国君主的提法，条约以“英国政府”和“阿富汗独立政府”的名义签署。英国代表满心以为，如上提议保全了大英帝国的尊严，其实，此举正中了阿富汗人的下怀。此前，英、阿之间的每项条约都是两国君主之间的私人协议，国王一旦去世，所有的承诺就化为泡影，这份条约则成了两国政府间的协定，无论谁统治这个国家，都要遵守，而且条约还用了“独立政府”一

词。

此次谈判，艾哈迈德还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应他的要求，格兰特提供了一份单独文件，代表英国政府承认阿富汗的主权国家地位，放弃对阿富汗的外交控制。对此，格兰特的解释是：“自由不过是一件新鲜的玩具。”他向上司表示：“阿富汗对此爱不释手，非常兴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玩具坏了，他们会来找我们修补。反正他们只在乎自主之名，并不在意名头之下的实质。”[6]

此后的一件事情让英国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为了操办独立庆典，阿曼努拉征用了喀布尔的一间大清真寺。阿富汗取得独立自由的那一刻，英国代表团自然不能错过，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也派代表前来观礼。这时，英国人恍然大悟，阿曼努拉对这个新玩具可能是认真的，但木已成舟。到1921年11月21日，英、阿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时，阿曼努拉朝廷已先后与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友好条约。

当然，也有那么一个国家让阿富汗人碰了钉子。1922年，阿富汗代表团来到纽约。没想到，国王与美国建交的愿望却被同期而至的一个可笑冒险家搅了局。这位老妇自称法蒂玛·苏塔娜公主（“princess”Fatima Sultana），是舒贾的后裔，一袭珠光宝气的打扮，充满西达·贝拉式的异国情调，与纽约人印象中的神秘东方甚是契合。她的珠宝包括一颗特别大的钻石：“光之海”（Darya-i-Noor）。“公主”的身边还有一个自称“埃及王储”的流氓。这样的人物，各位读者应该在马克·吐温的小说里见识过，只不过，他们的舞台不在密西西比河的竹筏上，而是在纽约。

更糟糕的是，这两个诈骗艺术家成了韦茅斯这个美国骗子的牺牲品。韦茅斯自称在美国海军部供职，能把法蒂玛公主介绍给总统认识。事实上，他是在打“光之海”的主意。突然冒出的两个阿富汗外交代表团，叫纽约的各大媒体都难辨真伪。不过，他们选择了更有趣的法蒂玛和她的随从。每天“公主”和她的钻石总会在报纸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思（Charles Evans）从英国得知，阿富汗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根本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最终，真正的阿富汗代表团一无所获。法蒂玛的钻石则落入韦茅斯的口袋。后来，因为欠账过多，她被酒店扫地出门。

尽管美国对此不屑一顾，但是，阿富汗取得独立已是既成事实。列代先王信誓旦旦想要实现的目标，就这样在阿曼努拉的手中得以成真。如此伟大的成就，是通过外交和谈判而不是战争取得的。那时，阿曼努

拉拥有比大多数统治者更多的政治资本，百姓对他拥戴万分，国王也爱惜百姓。国王习惯于晚上把城里的显要人物召集在一个大礼堂，畅谈阿富汗的发展前景。阿曼努拉觉得，天赐良机正摆在国家的面前。他巡视全国，在坎大哈及其他城市召开会议，向普通民众发表演说。他希望国民重视教育，毕竟下一代肩负着阿富汗的未来。国王表示，孩子们必须识文断字，养成学习的习惯。唯有如此，阿富汗才能造出自己的飞机，拥有完备的电力系统和路政设施。他还提到，倘若妇女毫无贡献，国家何谈进步？因此，阿曼努拉希望男性让自己的妻女接受教育，并善待妻子。阿曼努拉说，善待妻子是先知的教诲。先知说，人人平等，男女也是如此。阿曼努拉希望臣民记住这一点。

阿富汗的专制君主之中，阿曼努拉的作风最为开明。即便只是惺惺作态，他的虚情假意也足够感动臣民。毕竟，他屈尊纡贵和民众当面交流，他愿意放下身段和普通人握手，他甚至能够倾听臣下的陈情诉苦。一次，阿曼努拉来到南部边境考察，执意要与一帮在此作业的筑路工人会面谈话。当地地形崎岖，施工难度很大，工人基本来自社会最底层。国王拥抱了他们，并向他们的辛勤工作致以谢意。访问期间，阿曼努拉身边没有任何保镖。列代先王看重的官民之防，他似乎并不在意。“整个国家都在为我保驾护航。”阿曼努拉说。

回到喀布尔，阿曼努拉摇身一变，成了高贵宴会的男主人。他的妻子（也就是塔尔齐的女儿）索拉娅在一旁作陪。阿曼努拉和男宾高谈阔论之时，索拉娅也会召集到场的女士，发表同样慷慨动人的讲话。这对夫妇以启蒙先驱自居。他们觉得，自己的演讲能把人民引向光明的未来。对于宗教事务，阿曼努拉夫妇并不看重，世俗生活才叫他们万分向往。毕竟，世俗化才是西方世界强大力量的来源。

第12章　王法还是教法？

1923年，阿曼努拉昭告全国，推行新宪法，这部新法是国王自掌权以来的心血结晶。他称之为“尼扎姆纳马”（*Nizamnama*），也就是“秩序之书”。这部法典是阿曼努拉的新鲜发明。他借鉴了凯末尔在土耳其主持的改革。而凯末尔又从瑞士、法国和意大利的法典当中得益良多。阿曼努拉的立法之举在阿富汗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广大神职人员认为，人类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如此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属于真主。而且真主早就已经颁布法律约束人间的生活，任何人为的规矩都不应凌驾于沙里亚法之上。

阿曼努拉并未称他的法典将取代沙里亚法，他没有提及沙里亚法。“秩序之书”的种种条文，和国王制定法律的举动一样具有革命性，其中的某些法条令人兴奋，但也有些令人不安。

阿曼努拉的法典禁止酷刑，禁止强行进入私人住宅，政府公职人员也要遵守。新法赋予公民检举贪腐官吏的权利。求告无门的下层民众可以直接向国王提出申诉。此外，法典废除了奴隶制。对于以上法条，阿曼努拉的臣民莫不表示欢迎。

可惜，“秩序之书”的内容不仅如此。神职人员发现，法典白纸黑字写明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没人知道阿曼努拉所谓的宗教自由限度何在。显然，他绝不容许穆斯林自行脱教——如此行为严重违背沙里亚法，阿曼努拉恐怕没有反对沙里亚法的勇气。那么，他所谓的宗教自由有何意义呢？难道他是想把《古兰经》和《圣训集》的解释权下放给每位穆斯林？但即便如此，他也会把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神职人员都开罪一遍。要知道，教士阶层在阿富汗可是树大根深、难以撼动。

在新宪法规定下，童婚成了一种犯罪行为。阿曼努拉规定，18岁以下的女子不得与人婚配，男性的法定婚龄是22岁。关于彩礼，新法也有一番规定。过去，男方需要向女方支付一定的彩礼，方能迎娶新妇过门，具体金额由双方家长商定。在阿曼努拉等改革者看来，此等行为无异于卖女牟利。不过，国王并未彻底废除这种习俗，只是规定了彩礼的上限。如此一来，男人至多花费29卢比，便可迎娶一位妻子。几房妻室加在一起，礼金也不会超过1万卢比。[1]

女性的头巾、面纱和罩袍也是新法关注的一大问题。按照伊斯兰教

法，面对家人之外的男性，女性须用面纱遮住脸部。阿富汗的罩袍令（purdah）以严苛闻名于世。在公共场合，女性需要穿着一种名为“却德里”（chadri）或者“布卡”（burqa）的罩袍，从头到脚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下眼部位置的一小块网纱供女性看到外面世界。阿曼努拉的新法规定，罩袍不再是女性外出的必穿衣物，男人也无权要求她们穿戴。即便是丈夫也无权要求妻子穿戴。如果女性愿意穿着，法律不会干涉。这样的规定，简直就像一场革命。

法律之外，国王还向国民提了不少建议。伊斯兰教允许男人拥有四名妻子，前提是丈夫必须对每位妻子都平等相待。阿曼努拉指出，除了先知本人，没有哪个男人能把一碗水端平。因此，他认为《古兰经》其实反对一夫多妻。阿曼努拉本人也只有一位妻子。他表示，男人拥有一个妻子已经足够了。(1)

此外，“秩序之书”禁止鞋匠制作老式的翘头旁遮普风格的鞋子，这是大多数阿富汗男性的用鞋。从此，阿富汗制鞋商只能制作西式鞋子。蓄须人士不能为政府工作，他们必须刮脸修面，方能继续担任政府公职。官员上班必须着西装，打领带，戴有帽檐的帽子，而不能穿戴头巾、长衬衫和灯笼裤。

可想而知，新法一经面世，就会在社会上造成爆炸般的轰动效应。对此，国王和王后倒是不太担心。他们觉得，阿富汗人需要时间接受教化，臣民们只需学习。有鉴于此，阿曼努拉在全国各地大办学校，而且这些学校不仅仅招收男生。在这个崭新的阿富汗，女性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虽然第一批学校不是男女同校制，不过，男女学生一起读书已经成为趋势。阿曼努拉之前，阿富汗已经有一所高中，那是他父亲哈比布拉的政绩。阿曼努拉登基后，又主持开办了三所同等规模的学校。每所高中都会教授一门外语，而且到了高年级，所有自然科学的课程都通过欧洲语言讲授。加兹（Ghazi）和哈比比亚（Habibia）中学用英语教学，内贾特高中（Nejat）用德语教学，埃斯特格拉尔高中（Istiqlal）用法语教学。毕业于这些学校的男生，可前往法国、英国和美国继续深造。他们所学的知识，是国王夫妇实现新阿富汗愿景所需的必备技能。

在纳迪尔和他的兄弟看来，国王的新法既是灾难，也暗藏机遇。第三次英阿战争中，纳迪尔身处前线，冲锋陷阵。其间，他和南方的部落首领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他可不想因为国王的新法而和这些朋友断了联系，继而失去乡村势力对他的支持。不过，纳迪尔为人精明，他并未对新法提出高声的非议。阿曼努拉毕竟还是一国之君，纳迪尔不好驳了国

王的面子。但在私底下，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态度。纳迪尔对英国人大献殷勤，声称自己对英国的制度、风物甚是倾慕，认为阿曼努拉国王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是受苏联影响的产物。相较之下，他更愿与英方交好。后来，纳迪尔得到一个外交职务前往巴黎赴任。如此一来，他可以一边保持安全距离，一边观察阿富汗局势的走向。

阿曼努拉推动的改革深受塔尔齐的教导和影响。不过，眼见国王如此激进，塔尔齐生出了一丝不安。塔尔齐建议国王，改革不妨缓行。但阿曼努拉和索拉娅却不以为然。在这方面，国王和王后都有一点青年人的脾气。在他们的心目中，塔尔齐曾在过去引领一时的风气，如今却已经有些落后守旧。不过，岳父的一点教导，国王倒是牢记在心。塔尔齐曾经谏言阿曼努拉借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改革。当年，凯末尔大刀阔斧改革之前，先掌握了军权。塔尔齐建议阿曼努拉，不要让改革先于军事准备。

君王应当掌控军权。对于这一点，翁婿两人看法相同。于是，阿曼努拉恢复了祖父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哈什特-纳法里”（hasht-nafari）制度。根据该制度，每8名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人得去服兵役。

阿曼努拉的改革走得太远了。城市之外，宗教领袖已经在鼓吹国王成了异教徒，他建立军队是想策划阴谋，实现他的异教徒意志。他会闯进各家各户，强行摘掉妇女的面纱。接下来，天晓得阿曼努拉还会做出什么事情。1924年，杜兰德线附近爆发部落叛乱。不过，事情很快平息下去。当时，朝廷的军备远远强于叛军，而且国王也尚未失去大多数部落的支持。[2]但是，胜利过后，阿曼努拉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阿曼努拉的困境关乎阿富汗境内最有权势的宗教人士。他们是兄弟，被称作“朔尔巴扎的哈兹拉特”（Hazrat of Shor Bazaar），意为喧闹市集走出的圣人。唯有最受尊敬的宗教人士才能被授予“哈兹拉特”的尊衔，他们的学识也因此得到承认。同时，哈兹拉特拥有很强的权势和号召力。诸位信徒不仅追随他们，甚至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

哈兹拉特兄弟来自穆贾杰迪（Mujaddedi）家族，即“新来者”。一开始，他们是阿曼努拉的支持者，其长兄亲自把皇冠戴在了阿曼努拉头上，并于1919年在清真寺宣布他为国王。不过，长兄在叛乱开始时便去世了。弟弟舍尔·阿迦·穆贾杰迪（Sher Agha Mujaddedi）反对国王的改革，不再支持阿曼努拉。事实上，他是煽动那场暴乱的帮凶。

尽管如此，阿曼努拉却不能把舍尔·阿迦逮捕下狱，因为这不是某个

在山区传教的与世隔绝的毛拉。相反，舍尔·阿迦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宗教人物，在这个国家，人们对宗教的态度比对任何其他事情都要认真。人们对舍尔·阿迦抱有高度的敬意，甚至容不得舍尔·阿迦遭受非议，更别提指控他犯有叛国罪。即便是国王，也不能。于是，阿曼努拉召见了舍尔·阿迦，并暗示他去另一个国家可能会更舒适。舍尔·阿迦领会了国王的暗示，来到印度，落脚在德奥班德（Deobande）附近。

事后看来，舍尔·阿迦的出走，在阿富汗的未来之路上埋下了灾难的种子。德奥班德有一所著名的神学院，那里兴起了一场德奥班德运动。几个世纪以来，德奥班德神学院走出来的人活跃在印度的穆斯林中，鼓吹伊斯兰教应当回归“本来的模样”，即公元7世纪麦加和麦地那实行的形式。这不仅是一场宗教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德奥班德学派认为，伊斯兰教已为社会提供一个全面的指导，穆斯林有责任建立一个受沙里亚法指导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安拉的法律是唯一的法律。

他们认为，要想达成目标，穆斯林必须摒除异教徒的影响。欧洲帝国主义殖民者带来的种种事物，自然受他们唾弃，先知及其伙伴的朴素作风，方才值得他们学习和追随。各位读者可能据此以为，德奥班德学派一定都是坚定的反英分子。事实上，至少在那个年代，德奥班德学派更关注的是他们自己倒退的兄弟，特别是穆斯林现代主义者。为了打击这群“近敌”（奥萨马·本·拉登后来称之为世俗穆斯林），德奥班德学派准备与英国达成协议。他们相信，除去“近敌”之后，才能着手对付那些远方的祸患。阿曼努拉的所有作为，都是德奥班德学派反对的；德奥班德学派的主张，又正是阿曼努拉一心摒弃的东西。

为了平息叛乱，阿曼努拉被迫取消了他的改革，以求得部落的支持。不过，事态一经平息，国王又开始实行“秩序之书”。与此同时，舍尔·阿迦·穆贾杰迪和阿富汗的亲近盟友保持着密切联系。不少德奥班德学派人士带着情报，在杜兰德线两侧来回穿梭。由此，阿富汗多地的神职人员和部落首领在哈兹拉特的煽动下，起来反对国王的统治。阿曼努拉已经背弃信仰、沦为“卡菲尔”（kafir）的言论在疯传，阿富汗阴谋论者认为，英国秘密煽动并支持了这场有腐蚀性的行动。

1927年，阿曼努拉又做了一件史无先例的事情。虽然国内局势并不稳定，但他仍执意前往欧洲进行访问。他将国事托付摄政处理，自己则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经印度前往孟买。在那里，阿曼努拉和索拉娅登上海轮前往埃及。途中，王后换下了沉重的阿富汗面纱，新的面纱只遮掩了脸的下半边。当她戴着这张面纱抵达开罗时，狗仔队拍下了她的照片。

在埃及，阿曼努拉夫妇受到了热烈欢迎。大家视阿富汗国王是以弱敌强的英雄。伊斯兰世界的众多君主之中，唯有他让国家摆脱了欧洲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独立。埃及人民的热情引起了欧洲媒体的关注，一场阿曼努拉旋风在西方席卷开来。

阿曼努拉夫妇在东方也引起了轰动。阿曼努拉访问了埃及拥有千年历史的伊斯兰古老高等学府爱兹哈尔大学（Al-Azhar），这里走出过无数的穆斯林神学家、学者和圣人。阿曼努拉来此访问，却并没有换上传统的穆斯林服装。他身着一袭鸽子灰西装，戴着礼帽而不是头巾，在清真寺里祈祷。对此，在场的学者和教士又是皱眉，又是咋舌。远在阿富汗的一众政敌，倒是有些幸灾乐祸。

离开埃及之后，阿曼努拉夫妇驾临意大利。当地记者无不觉得，阿富汗国王的优雅风度，比身为东道主的维克多·埃曼努埃尔（Victor Emmanuel）国王要胜出许多。索拉娅彻底摘下了面纱，她的美貌倾倒一片。媒体把这对夫妇吹捧成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为了尽到地主之谊，意大利政府可谓是费尽心思。摄影记者手中的相机快门更是一刻也未曾消停。

之后，阿曼努拉和索拉娅来到法国，在这里出现了更热烈的人群。法国人绝不允许自己输给意大利！阿曼努拉夫妇乘坐的列车抵达巴黎车站的时候，法国总统已在月台上恭候。索拉娅走上站台时，总统先生低头鞠躬，握住索拉娅的手，殷勤地把嘴唇贴在她的手背上。这一幕，自然没有逃过无处不在的摄影镜头。

新闻界都为索拉娅着迷。他们注意到，“索拉娅”听起来像sourire，法语中是“微笑”的意思。出席国宴的王后换上了巴黎定制的时装，相当高级得体。在那个摩登的年代，索拉娅并未选择短裙，但是，当晚的那件晚礼服还是让她香肩半露，她戴的小面纱十分轻薄，只遮住了下半边脸。法国人民又一次发出赞叹，阿富汗王后的扮相美丽且神秘，摩登又不失异国风情。

没过多久，德国人民也迎来了一睹风采的机会。身处现代的各位读者要想体会当时的那种激情，不妨联想一下摇滚乐巨星巡演欧洲时的场景。德国东道主不希望在风格上与意大利、法国相提并论，苦苦思索该为不喝啤酒、不吃猪肉香肠的客人提供什么。为了周全礼数，德国政府颇费了一番心思。最终，他们决定用贸易订单、经济援助及各种贵重礼物来弥补差距。阿曼努拉还接受了几架飞机、一批卡车以及好些工业机械。阿曼努拉想要建设一家肥皂工厂，德国立即表示全力支持。一家德

国公司与阿富汗达成贸易协议，提出在未来三年，每年从阿富汗采购价值83万卢比的青金石。[3]

阿曼努拉的欧洲之行超越了政治的范畴。当然，“超越”一词可能并不贴切。这不是真正的政治，而是娱乐。回首世界媒体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那个年代的大众传媒已不再专注于沉重的国政事务，转而为公众提供各种乐子。阿曼努拉的到来，正好可以促进报纸的销量。待阿富汗国王和王后离去，媒体会忘掉先前的热情，而去发掘其他新奇有趣的卖点。当然，阿曼努拉和索拉娅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只记得，到访的每个国家（包括英国）都在竞相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无论他走到哪里，阿曼努拉都能收获一堆礼物和援助。他怎能不开始认为，即使在这一巅峰时刻，他可能也低估了自己。

不过，欧洲各国的民众确实非常欢迎这对王室佳偶。摄影记者的镜头记录了他们的风采，相关影像登上报纸杂志，甚至漂洋过海，从欧洲传播到了印度。国王夫妇旅欧期间的所作所为，自然也被德奥班德学派看在眼里。哈兹拉特派人把那些照片送到了阿富汗。

一张张王后的露肩照片，在阿富汗的山区传播开来。满脸胡须、戴着头巾的老男人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些照片，美丽的王后半裸着身子和外国男人坐在一起，还露出了半张脸！薄纱下的半张脸也是若隐若现，如此招摇，显然是为了撩拨那些浪荡的看客。她甚至大大方方伸出手去，供人抚摸和亲吻！她的丈夫居然对此熟视无睹！国王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如何能够容忍妻子如此丢脸卖乖？阿曼努拉到底是国王还是皮条客？

照片风波之后，又一则骇人的新闻传进了山区。国王在德国获得了好些机器，并准备在喀布尔筹建一家肥皂工厂。肥皂的原料就是穆斯林的肉体——对此，各位政敌深信不疑。传说国王会把国内的老者集中处决，将尸体熬煮成蜡，制成肥皂，然后销售到英属印度乃至欧洲（类似的传说至今都有市场）。

阿曼努拉的欧洲之行还剩下最后一站——莫斯科。面对阿富汗国王的到访，当时的苏联政府有些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们也想热情待客，从而不被资本主义国家抢了风头；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又怎能逢迎一位封建君主呢？不过，苏联政府还是为接待阿曼努拉找到了一点理由。他们记得，阿曼努拉的改革举措曾经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阿曼努拉是亚洲的进步领袖，并称赞他是自己的兄弟。所以，对阿曼努拉小题大做应该不会违反正确路线。于是，

在几名外交官的带领下，阿曼努拉夫妇参加了各种公开活动。他们的车队驶过大街的时候，得到了几万名群众的热烈欢迎。虽然这里的晚宴不如巴黎那么光鲜亮丽，但是苏联方面也向国王表达了提供军事援助和开展经贸合作的真诚意愿。可以想见，大陆那一头的大英帝国的诸位官员，肯定已经气得咬牙切齿了。

就在那时，身在法国的纳迪尔似乎察觉到了英国人的心思，找到驻尼斯的英国领事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想让英国人知道，他仍然存在，他在阿富汗还有势力，他愿意提供帮助，也不知道纳迪尔有没有对英国人的“贡献”表示感谢，毕竟双方曾是生死较量的对手。

最后，阿曼努拉取道伊朗回到阿富汗。综观全球各国的历史，也很少见到如此意气风发的君主。国王亲自驾车驶入国境，同行的王后戴着轻薄的面纱。回国的第一站是赫拉特。阿曼努拉召集了城里的知名人士，带着孩子般的兴奋，向他们讲述他这次伟大的旅行。他甚至保证，假以时日，赫拉特会像巴黎一样光彩夺目，但首先要荡涤旧的东西，他嘲笑宗教圣地加祖尔噶（Gazurgah）。此地乃是11世纪的苏菲派诗人胡瓦贾·阿卜杜拉·安萨利（Khwadja Abdullah Ansary）死后的长眠之处。这是一处神圣的避难所，无论是国王、军阀，还是任何政府官员，都不敢闯入此地捉拿任何人。但是，阿曼努拉称那是一堆胡说八道的迷信。他决定将圣殿夷为平地，并在那里建一些有用的东西，也许是一家医院，[4]也许是肥皂厂？

回到国内的阿曼努拉，好心情渐渐消去了大半。相比欧洲，这里的一切都如此落后，心中不觉有些丧气。行至坎大哈，他已经转忧虑为愤怒。当整座城市都展现出迎接游子归家的热情时，却遭到他的一顿冷言训斥。他批评人们压迫家中的女人，而且傲慢懒惰，如此一来，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改善，除非他们全力以赴，努力工作，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阿富汗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活，一切都要向欧洲看齐。

改造阿富汗社会的工作势在必行。不过，这对夫妇显然是在做梦。他们举办了一次宴会，要求宾客换上路易十六时代的宫廷礼服。首都的一些公园，是国王特设的“无罩袍街区”。一天，阿曼努拉在一处无罩袍街区撞见一位穿着罩袍的妇女，他勃然大怒，当即命令妇女脱下罩袍，他甚至把罩袍付之一炬。那位女性只好赤身露体跑回了家。[5]

秋天到了，阿曼努拉的妥协也已近极限。他宣布自己将不再宽容国

民的旧俗和陋习，“秩序之书”将完全施行。自此，新法严禁蓄须，不得穿戴传统的头巾，否则将会遭到重罚。接受教育是每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即便女孩也不能偏废。此外，一百余名男性被派往欧洲留学，宗教考试让位于学术资格考试。他还给了10名女性留学的机会，虽然只是去土耳其，只学习助产术。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阿曼努拉在会见喀布尔女界名流时，发表了特别演说：在座各位女士，你们的丈夫如果哪天起了再娶之心，你们可以杀了他，我非常乐意提供武器。

当年10月，阿曼努拉召集首都的600位知名人士，发表了长达5天的演说。国王的演讲着实震撼人心。为了保证索拉娅王后等一众女性能够列席旁听，会场中央还围起了一片专门区域。当国王宣布，其实宗教并未规定妇女必须佩戴面纱时，会议达到了高潮。那是戏剧性的一刻，只见索拉娅王后站起身来，扯下了脸上的轻纱。王后的举动激励了好几位勇敢的女性，她们甚至一鼓作气，脱下了罩袍。[6]

(1) 阿曼努拉没有提及他的第一任妻子，两人是包办婚姻，但未办理离婚手续。

第13章　王朝分崩离析

阿曼努拉回銮之时，喀布尔以北的科希斯坦闹出了新的乱子。一名传奇的塔吉克土匪正在这片山区出没横行，人称巴洽·萨考（Bachey Saqao），意即“挑水夫之子”。阿富汗的城乡间，有不少挑着羊皮水袋卖水的萨考［读者可联系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营房谣》（Gunga Din）］。运水者是最卑微的街头小贩。萨考出身山区，体格强壮得好似一座山丘，萨考的名字因为他那骇人听闻的力量而闻名。一次，白沙瓦发生一起盗窃案，某户人家的一只大号铁制保险箱不翼而飞。警察很快把矛头指向了萨考，因为只有他具备这般神力。

萨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暴徒。他十分狡猾，特别擅长从天罗地网中脱身而去。阿富汗的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他像佐罗那样挫败警察的故事。据说有一次，警察已经把他堵在了一间屋子里。情急之下，萨考决意险中求生。他放了把火，然后趁着烟雾弥漫中的混乱逃走了。[1]在很多人的眼里，萨考是罗宾汉一样的人物，他行侠仗义，劫富济贫，高利贷者、商人是萨考的目标，为穆罕默德扎伊贵族服务的政府官员更是其首要目标。所得的金钱被萨考分给穷苦的乡亲，当然，他本人也从中渔利不少。[2]

一开始，萨考还只是个独行大盗。慢慢地，他的身边就聚起了一伙人，后又演变成为私人武装，萨考的声望也在与日俱增。再加上他旗下的这支精悍武装，朝廷眼里的萨考不再只是一个劫匪，而是政治上的威胁。特别是萨考已经表示，自己效忠于国内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在喀布尔与异教徒作战。

一次，萨考洗劫了朝廷的一支运输队，“挑水夫之子”收获颇丰。阿曼努拉终于坐不住了，他打算和这个土匪谈条件，希望对方能够归顺朝廷。国王的邀约让萨考受宠若惊，而且，国王还许了他一个将军的头衔。萨考不愿错过招安的机会，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在朝廷的委任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虽然萨考目不识丁。

与此同时，一个看似更严重的问题爆发了。1928年的最后几个月，喀布尔南部强大的辛瓦里（Shinwari）部落突然发难，部落武装把贾拉拉巴德围得水泄不通，连接喀布尔和白沙瓦的贸易通路因此横遭切断。而后，蓄力已久的地方势力蜂拥起兵，一场反对阿曼努拉的武装暴乱席

卷开来。国王当即下令，所有部队开赴南方打击叛军。阿曼努拉觉得，他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平息乱局。

阿曼努拉的决策真是大错特错。他致电负责与萨考谈判的省级官员，电话里两个人狠狠嘲笑了那个无知的土匪，说他竟然相信国王会任命他为将军，真是愚不可及！谁能想到，命运却和国王开了一个玩笑。他与臣下的对话并非通过专线进行，他口中的“无知劫匪”人脉广布，电话室里有他的眼线。就这样，国王的真实想法，萨考听了个一清二楚。幡然醒悟的匪徒很快召集人马，宣布他们要向喀布尔进军。[3]

喀布尔是阿富汗的第一大城市，萨考的部队不过几百人。一般而言，这是无法取胜的，萨考的行动无疑愚蠢而又鲁莽。但是，在那个当口，喀布尔正处于不设防的状态。所有军队都已经开拔南部，电话和电报线路被全部切断。朝廷纵有万千精兵，也无法立即返回勤王。

军事学院是前往喀布尔的必经之地。虽然大多数师生已经提前逃走，但仍有18名学员（其中包括我的叔父穆扎法鲁丁，当时他才十几岁）驻守此地。他们从一个窗户跑到另一个窗户开枪，愚弄了萨考，不明就里的萨考误以为学校里有重兵驻守。为了避免遭遇伏击，萨考所率人马不得不放慢了前进的脚步。没过多久，萨考就回过了神。但是，阿曼努拉已有足够的时间逃离险境，他那已有身孕的妻子、妹妹，还有一众王子、公主、亲族乘飞机来到了暂时安全的坎大哈。

萨考重新开始了对喀布尔的进攻。稍稍定下心神的国王发布了一则悬赏令，鼓励国民夺取反贼的人头。岂料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阿曼努拉发现另一则悬赏公告已在城中散播得铺天盖地，上面写着萨考为夺取国王的项上人头，愿意出更多的赏金。阿曼努拉这才意识到，这个“挑水夫之子”有一批追随者，对方的黑手一早就伸进了自己的地盘。

屋漏偏逢连夜雨，南方叛军的最后通牒也递到了阿曼努拉的面前。他们提出了社会保守派所尊崇的那一套要求：恢复罩袍，政府不得干预婚姻事务，降低税收，保证沙里亚法作为阿富汗唯一法律的地位。除此之外，叛军希望国王以身作则，办好以下几件事情：和王后索拉娅离婚，把岳父塔尔齐关进监狱，将塔尔齐的家人驱逐出阿富汗。唯有如此，他们才能继续奉他为王。

叛军还有最后一个奇怪的要求，国王必须驱逐除英国人以外的阿富汗领土上的所有外国使节。正是这个要求，引起了阿曼努拉支持者的怀疑。不少人都觉得，英国人担心在无休止的大国博弈中落了下风，所以

才导演了这出闹剧。兴兵闹事的普什图部落、煽风点火的德奥班德分子，还有那位出自朔尔巴扎的哈兹拉特，都是伦敦操控下的棋子。

面对质疑，英国政府矢口否认。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怀疑英国人的清白。看一看当时英方高层之间的往来通信，就会发现他们确实对此一无所知。那场起义完全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他们也没有任何应对之策。但还有一个可疑的情况，为阴谋论者提供了一点理据。一个名叫劳伦斯（T. E. Lawrence）的英国人，当时正在白沙瓦开展活动，化名肖（T. E. Shaw），这就是著名的英国情报人员，“阿拉伯的劳伦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此人策划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起义。虽然他在白沙瓦很可能与阿富汗无关，不过，劳伦斯在白沙瓦的具体作为至今仍是一个谜。

部落叛军发出的最后通牒击垮了阿曼努拉的精神防线。那个时候，他已经众叛亲离。即便身边的私人卫队，他也不敢完全托付信任。曾几何时，他信誓旦旦地表示：“整个国家都在为我保驾护航！”这样的豪言壮语，如今想来不免有些令人唏嘘。1929年的那个冬日，阿曼努拉悲惨地投降了。他冒着大雪走上大街，穿的既不是传统服装，也不是王室的长袍大氅，他甚至没有选择西服，而只是披了一件普通步兵穿用的单调灰色制服。他在城市的街道上找了一个种植观赏植物的平台，站在上面，开始面对路过的民众作可悲的演讲。他放弃了为之奋斗的一切，不再容许女性接受教育，关闭宗教学校之外的一切学校，任命一批毛拉入阁参政，废除“秩序之书”，宣布沙里亚法为国家法律。阿曼努拉还表现出了对多妻制度的赞许，说他之前搞错了。为了表示自己所言非虚，阿曼努拉回宫后娶了19岁的表妹阿利亚。

但一切为时已晚。萨考继续进攻，阿曼努拉只得继续败退。1929年1月中旬，他开着自己的劳斯莱斯汽车，一路向西撤退。阿曼努拉原本打算以加兹尼、坎大哈和赫拉特为据点徐图反抗，可是，当他举起王旗，却无人响应。没办法，他和岳父、妻子只得出国避难。塔尔齐回到了土耳其，阿曼努拉与索拉娅则去了意大利。他们的朋友维克多·埃曼努埃尔国王愿意为他们提供庇护。由于走得匆忙，阿曼努拉没能携带任何财产，除了一点身为国王的经验，他甚至不具备任何专业技能。可惜，当时的欧洲也不缺国王。阿曼努拉只得靠做家具维持生计，他的日子过得非常惨淡。1960年，阿曼努拉去世，死时的他贫病交加。31年的流亡生涯，阿富汗对他不闻不问。斯人离去，祖国那边也没有传来半点吊唁之意。

那边，萨考和他的农民军已经成为王宫的新主人。据称，宫里的豪华家具让乡巴佬们目瞪口呆，他们误把夜壶当成盛汤的器皿，吃了散落在地上的水果，并试图将种子吐到窗外，然而惊讶地发现种子反弹回来了，因为萨考等人从没有见过玻璃窗。如上的笑话叫笔者也难辨真假。也许，只是喀布尔城中老于世故的一些人成心编派这些农民而已。[4]

叛军背后的宗教巨头舍尔·阿迦仍在印度。其实，近来的变故让舍尔·阿迦也吃惊不小。他的弟弟古尔·阿迦（Gul Agha）倒是动了野心，一直劝说哥哥自立为王。舍尔·阿迦会见了萨考，赞颂对方为国锄奸的功绩。萨考以阿富汗新埃米尔的身份，承诺要给他奖励。

萨考表示，自己一定和阿曼努拉大不相同，他感激哈兹拉特的支持。为此，他在政府中留了好些高官厚职。在他登基为王的那天，大家知道了他的真名——哈比布拉（Habibullah），萨考与阿曼努拉的父亲竟然同名。为了把他和第一个哈比布拉区别开来，他被称为“哈比布拉·卡拉卡尼”，卡拉坎（Kalakan）是他的家乡。

其实，萨考的举止并不粗鲁。他思维敏锐，而且坦率幽默。过去，他掠夺了不少钱财，但是，他从未据富自傲，也不像其他军阀那样虚情假意。他非常坦率地告诉喀布尔人民，自己不会读书写字，因此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任命的内阁成员中，有好几位是阿曼努拉的大臣。他还保证了英国公使馆的安全，他从没和他们争吵过。[5]

一介匪徒忽然成王，萨考的头脑不免有些发昏。他需要争取民心，以他能想到的简单方式。他一声令下，废除了所有税收，除伊斯兰教法规定的慈善募捐外。在他的家乡，人们对政府的诉求就是不征税！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朝廷需要收入。这笔钱财，他打算向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寄生阶层收取，即富商、高利贷者和政府官吏。萨考长期混迹民间，他非常清楚，百姓早就对这些人深恶痛绝。榨取钱财的差事，被他托付给了几个亲近的手下。这些人敲骨吸髓的本事很大，使出了折磨、恐吓和杀戮的新手段。通过这些手段榨取了一些钱财，不过还是难以满足萨考的胃口。[6]

新的社会立法方案也在同一时间得以实施，和阿曼努拉的改革基本就是两个极端。萨考取缔女性的受教育权利，规定她们必须穿戴布卡。女性公开外出，须有男性陪护左右。即便身着罩袍，也不可以独自出行。至于男性，则必须蓄须，佩戴头巾，身穿西服或戴帽子的人将被殴打或罚款，或是直接落得个人财两失的命运。

从1929年1月到10月，“挑水夫之子”试图统治阿富汗。其实，教士和部落首领的愿望，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他尽量用宗教的外衣把自己裹得紧紧的。不过，一旦他成为国王，这一切就都不重要了。他的民族出身和农民身份让很多人都不大高兴。萨考是塔吉克人，而且出身最低贱的苦力阶层，和任何贵胄王家都搭不上关系。这样一个人居然能够成为国王，可想而知，普什图部落的各位首领一定满怀怨愤。

时机已然成熟，阿富汗的马基雅维利自然应当出手了。阿曼努拉刚刚倒台，穆萨希班兄弟中最年长的纳迪尔就从巴黎赶到了白沙瓦。在这里，他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列宁当年从芬兰取道回国，见识的场景也不过如此。接下来的几个月，纳迪尔和南部的诸位酋长取得了联系，这些地方上的实力派都是纳迪尔在1919年对英战争中结识的。纳迪尔一再表示，当年正是自己英勇奋战，才让阿富汗取得了独立，阿曼努拉的贡献则被他抛到了一边。历史在他的口中被巧妙改写。纳迪尔正是部落一直在寻找的人选：他倾向保守又立有战功，和英国人关系良好，又拥有与多斯特·穆罕默德一脉相承的王室血统。

没过多久，穆萨希班兄弟率领部落人马开到了喀布尔城下，他们很快又和萨考碰了面。萨考以为穆萨希班兄弟打算和自己议定城下之盟，于是亲自前来谈判。没想到，萨考掉进了纳迪尔的陷阱，这名匪徒就这样被吊死在王宫的院子里。阿富汗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就此告终。

随后，纳迪尔召集各部长老召开了一次支尔格大会，就像当初批准艾哈迈德·沙阿为王那样。会上，纳迪尔称他此次回国并非图谋王位，而是要拯救国民脱离水深火热的境地。阿曼努拉的支持者以为纳迪尔会迎回阿曼努拉。没想到被废国王的名字，他根本没有提及。纳迪尔说他会效忠国家所选择的国王。

就在那个时候，会场里响起了（似乎是自愿的）请纳迪尔为王的呼声，他们恳请纳迪尔接受王冠。纳迪尔一再表示婉拒，但第三次呼声响起时，他说，自己将服从国家的意志，心怀谦卑地接下国家元首与绝对统治者的重担。[7]

因此，在1929年行将结束，纽约股市崩盘，西方经济陷入大萧条前的两周，阿富汗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第三部分　喀布尔的规则

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阿富汗长达21年。事实证明，这段时期是阿富汗历史的转折点。他确定了这个国家的疆界，更重要的是，他与英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阻止外部势力进入，阿富汗得到了喘息的空间。他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完全由他直接控制、以喀布尔为权力中心的国家。然后，他创造了另一个阿富汗，与旧有的那个阿富汗形成了对立。埃米尔领导下的阿富汗，是一个由城市、省、区、省长、市长、监察员、官僚、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国家供养的神职人员、庞大的间谍系统和国家军队组成的矩阵。在这张大网下，古老的阿富汗继续生存和呼吸，农民和封建领主、部落首领和乡村教士、游牧部族及部落酋长、自治的乡村和部落游击队组成了一个有机网络。

新旧世界壁垒分明，并走向分化。首都的精英阶层拥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并因此吸收了不少新鲜玩意：思想、梦想和时尚。不少人甚至雄心大发，既然西方如此强大，阿富汗为何不采纳他们的新技术、新科学和新思想，从而也能享受西方社会的繁荣、富强、舒适和便利呢？

但另一个阿富汗，那个封建领主、部落首领和保守神职人员的农村世界，抵制了这种拉力。他们没有开眼看过世界，自然不可能接受他者的文化。他们对于英国人及其文化万分警惕，小心翼翼地接受了旧的价值观，享受着独自实践自己方式的奢侈。就这样，阿富汗内部开始了一场拔河角力。一头是喀布尔，另一头则是那个旧的阿富汗。双方都竭尽全力，想把国家拉上自己的轨道，形势时有逆转。阿曼努拉的改革，标志着一个令人震惊的极端转变。然而，巴洽·萨考带来的反击十分强劲，混乱过去，国家满目疮痍。即便秩序恢复，新王朝的工作已被切断，新的统治者也面临巨大的问题：阿富汗社会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西方列强仍然虎视眈眈，统治阶级仍然渴望将这个国家推向现代世界。如果他们重视的事情发生任何改变，那个旧的阿富汗仍有可能揭竿而起。引导国家走过困难重重的坎坷道路，成为接下来半个世纪阿富汗统治者的基本任务，而这促进了喀布尔的统治。

第14章　风暴之后

初登王位的纳迪尔，看起来是当年的“铁腕埃米尔”的翻版。他自称是旧制度的拥护者，誓言要维护传统的部落社会，捍卫赋予他个体和意志的信仰。纳迪尔的花言巧语使神职人员和封建领主认为，他会拨乱反正，阿曼努拉的一切革命都将被彻底清除。在纳迪尔的治下，女性再次遭到禁锢，不能轻易走出家门，宗教警察又开始在街上巡逻。如上两项措施，仿佛让阿富汗人回到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下的铁血年代。纳迪尔确认了封建地主的财产，并承认哈纳纳斐派沙里亚法的权威。纳迪尔宣布，任何裁决都不能取代它，任何法典都不能与之相违背。[1]

尽管表面如此，但纳迪尔和他的兄弟都是现代主义者。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和阿曼努拉的看法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大概只在实现理想的手段。纳迪尔的关键词是谨慎。他崇尚变革，但希望这种变化悄无声息、易于操控。阿曼努拉的倾覆，足以给他提供前车之鉴。阿富汗的保守势力如此强大，随时可能聚众生事、击垮王权。农村、封建世界是那只狗，而城市不过是尾巴。对此，兄弟几人最清楚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同神职人员及部落长老翻脸，而是把他们当作伙伴对待，而后抓住机会，慢慢削弱他们的权力。

纳迪尔并没有做太多这方面的工作，他的国王生涯不过四年。如此短暂的岁月，坐稳位置尚嫌不够，又何谈宏图伟业呢。那个时候，阿曼努拉的不少追随者都觉得纳迪尔不但谋权篡位，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恰希（Charkhi）家族和阿曼努拉关系匪浅，是纳迪尔最大的威胁。纳迪尔以一种阿卜杜尔·拉赫曼时代以来罕见的残暴手段摧毁了他们。他那无情的手段，颇有阿曼努拉父亲的风格。恰希家族的长老先是遭到囚禁，而后未经审判便处决了他们。其他成员则被人殴打致死，纳迪尔旁观了整个过程。[2]

阿曼努拉的支持者自然要展开报复。没过多久，纳迪尔的一位兄弟在德国遇刺身亡，凶手是一位阿富汗留学生。六个月后，纳迪尔本人也遭遇噩运。那一天，纳迪尔到一所高中为学业精进的优秀学生颁奖。我的父亲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他还在读十年级。另一位获奖者是在恰希家族长大的男孩。有一天，父亲和那男孩放学后一起踢足球，男孩吹嘘说，他很快就会有一记被历史记住的射门。父亲还以为同学是在谈论足球。没想到，第二天，他就目睹了同学走出队列、枪杀国王的全过程。

国王的三个幸存兄弟对此展开了报复，恰希家族的所有成年男子均遭处决，女眷和孩子被投入监狱。[3]如上短短的两句话已让人不忍听闻，事件背后的种种细节更叫人惨不忍闻。直到1934年，冲突才结束，阿富汗陷入了通常被委婉描述为“稳定”的残酷平静中。

纳迪尔横死之后，阿富汗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时的阿富汗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纳迪尔被刺之后，他的一干亲戚却不曾起来野蛮地争权夺利，将这个国家分裂，部落势力老老实实的，其他民族也没有试图分裂出去。取而代之的是纳迪尔19岁的儿子查希尔·沙阿（Zahir Shah）。加冕礼上，三位叔父宣誓要对国王忠诚。当然，实际的权力都掌握在年纪最大的叔父手里，他担任首相一职，另外两位叔叔则占据了国防大臣和外交部长的要害位子。其他亲戚和亲密伙伴则在政府的其他部门各有安置。接下来的44年里，阿富汗的真正统治者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像机器一样运转良好的家庭。一位首相下台，会有另一位执政家庭的成员取代上台，即使这些变化反映了幕后的权力斗争，但从外部看并不明显。在公众看来，这个家庭在私人会议中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决定，向世界展示了其天衣无缝的一面。

是的，查希尔·沙阿是个有名无实的领袖，但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物，是一个执政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臣民都觉得，查希尔国王气度雍容，颇有君王风范。掌握权力意味着杀戮、破坏和折磨，这些恐怖的事情都发生了，但是，臣民眼中的国王可亲可敬，所有那些黑幕似乎和他毫不相干。人们总是看到他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军装，或是一套完美无瑕的西装。即便有他穿着传统服装的照片，我也没见过。他的肖像出现在每一个公共办公室的墙上，或是每一本小学课本的扉页。国王不断老去，肖像却永远是他年轻时的样子。查希尔·沙阿35岁左右的时候，肖像就不再随年龄增长变化了。实际上，国王渐渐白了头发，谢了顶，一道道皱纹爬上了脸庞，但画像中的他却永远那样年轻有活力。

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阿富汗偶有几次部落叛乱，都被穆萨希班家族平定了。朝廷的武装军备精良、实力强大，任何地方势力都不能与之匹敌。更重要的是，即便某个部落举族反叛，其他地方势力仍然和朝廷站在一起。穆萨希班家族虽然残暴，政治手腕却很高超。他们懂得阿富汗文化的微妙之处，使用外交手段和武力把国家团结在一起。一次，一位异见分子发表檄文，猛烈抨击穆萨希班家族的统治，他还对阿曼努拉时代怀念不已。没过多久，此人就没了声音。他的生命应该终结在了某座秘密监狱。阿卜杜尔·拉赫曼那密不透风的特务网络和警察系统在纳迪

尔的手中得以复兴。一旦感到威胁，朝廷从不吝惜采用恐怖手段。

在很大程度上，穆萨希班家族的残暴镇压、优雅文化和内政外交相结合，使阿富汗从30年代至60年代后期维持了相当平静的局面。

乡村又回到了过去，阿曼努拉的革命痕迹被扫荡得一干二净。虽然政府的官吏仍在各地坚守，各项税款也是征收不辍，但他们或多或少保留了农村的权力结构，对部落长老、教士谦恭有礼，部落的自治权力也得到了保全，还允许游牧民不受边界约束自由出入国境。

最重要的是，政府放弃了对家族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每个家族都是一个城堡，这是官方的态度。只要家长愿意，完全可以为尚在婴儿期的儿子指认一门娃娃亲，即便对方是堂兄弟家尚未出生的女儿，等女孩长到青春期，他们便能如愿以偿。政府不会提出异议。那些想在家中痛饮威士忌的人，只要不去公共场合招摇过市、被人闻到酒气，政府才不会予以理会。当然，他们所在的家族可能会予以处罚，但政府完全不关心人们在家里做了什么。简而言之，新王朝不仅尊重，而且加强了阿富汗传统文化中公私之间的区隔。

穆萨希班朝廷的君主制是一种暴政，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这是为西化发展服务的暴政。一方面，朝廷对国民思想严加禁锢，极力安抚保守的乡绅和教士阶层；另一方面，穆萨希班朝廷一开始就已朝着梦想迈开脚步，哪怕步履蹒跚，国家好歹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纳迪尔死之前，就已经拟好了一部宪法。法典内容趋于保守，它赋予王室绝对的控制权，使神职人员和大地主的权力合法化。不过，颁行宪法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它树立了一种观念：即便贵为王者，也受法律约束。

一个类似议会的国家委员会或舒拉·米利（Shura-i-Milli）也是纳迪尔的遗产。这个机构的部分成员由王室任命，其他成员虽在名义上经过选举，实际也出自支持王室的选区。虽然该机构的职责仅限于盖橡皮图章，即签发朝廷已经决定的指令。不过，它至少植入了民主的形式，一个在日后可以填充实质内容的外壳（多年以后，议会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阿曼努拉倒台之初，他建立的大多数学校都被穆萨希班朝廷强制关闭。而后，这些学校又慢慢恢复招生。阿曼努拉统治期间，全国学生的总人数曾经达到8.3万人。纳迪尔统治时期，这个数字一度降到4.5万人，[4]但至少皇室培养了现代教育是一件好事的观念。的确，学生必

须修习《古兰经》，诵读伊斯兰经典，还要接触神学和阿拉伯语。这减少了神职人员可能提出的任何抱怨。与此同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欧洲语言，以及地理、绘画和世界历史，也是学生的必修课，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世俗课程体系。

政府还专门开办了一些面向女童的小学。到了后来，保守势力的气焰有所收敛，其中的一所小学得以升格成为女子高中。为了纪念迈万德（Maiwand）之战中的那位巾帼英雄，女子高中还以“马拉赖”为名。女中既收贵族小姐，也向寒门小户的女儿开放。眼见马拉赖高中没有引发什么争议，政府又着手筹建第二所女校——扎尔胡娜高中，之后又开设了更多的女子高中。

这些学校培养了阿富汗妇女运动的领导人，而后，她们走上历史舞台发光发热，影响了40余年。1965年，成为卫生部长的科布拉·努尔扎伊（Kobra Noorzai）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她也是阿富汗女性中进入内阁担任职务的第一人。另一位明星学员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Massouma Esmatey-Wardak）曾担任教育部长。她撰写的《阿富汗女性在阿富汗社会中的地位与身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

阿曼努拉时期，政府每年都会遴选4至5名最优秀、最聪明的高中毕业生，送他们前往欧洲、美国的大学深造。纳迪尔上台之后，恢复了这一政策，只是阿曼努拉的先驱作用再也没人提起了。

我的伯父纳吉姆丁（Najmuddin）就是第二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他就读于塔夫茨大学，成了一名牙医。他回到阿富汗执业以后，因为那些显贵顾客实在难以伺候，从不按预约时间就诊，颐指气使，命令他必须随叫随到，伯父一气之下，关了诊所，退休了。最后，为了不浪费对他的教育投资，政府聘他为教育顾问。到了全新的岗位上，伯父为公办学校编写教科书，并把《大英百科全书》译成了波斯语和普什图语。

塔吉克裔学者哈玛德·安瓦尔（Hammad Anwar）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公派留学生。此人作风颇为新潮，归国之时，他带回了一位美国妻子。安瓦尔的夫人不受约束，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而且拒绝穿罩袍。为此，安瓦尔和王室发生了巨大冲突。事到最后，出于安全考虑，夫妇二人离开了阿富汗。这一去，安瓦尔再也没有回来。政府的又一笔教育投资打了水漂。[5]

纳迪尔遇刺事件，一度让王室对学生很是忌惮。为此，政府的奖学

金计划暂停了好些年。直到1937年，5名来自喀布尔各高中的拔尖学子再次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根据他们学习的外语，政府安排他们分别前往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我的父亲毕业于哈比比亚，精通英语，他和4名同学被送到了美国。临行之前，首相对他们提出了警告：不许和美国女人搞在一起。父亲违反了禁令，他在芝加哥和我的母亲结婚了。为了爱情，父亲到底付出了代价。政府取消了他的奖学金，而且命他回国。母亲和父亲一起来到了阿富汗。此后的20年，他们一起生活在阿富汗。父亲的4位同学中，有两人娶了美国妻子，还有一人和同在美国留学的印度女子结为夫妇。他们都和自己的外国妻子回到了阿富汗。眼见木已成舟，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决定忽略这些婚姻带来的破坏，他们进入政府担任公职，为国家发展尽心尽力。通过放宽与外国人的婚姻限制，政府从奖学金计划中收到了回报，国家朝着20世纪的世界向前迈进了小小的一步。

1932年，在法国的帮助下，阿富汗有了第一家医学院。这是喀布尔大学的最早萌芽。而后的10年里，留学生纷纷归来，成为大学的顶梁柱。学校在医学院的基础上，开设新的科系。一座囊括科学、工程等诸多学科的学府开始形成。我父亲是文学院院长，教授心理学和教育学。就这样，喀布尔大学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校机构。

在政府看来，高中教育不仅是培养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适当的教育还能整合人心，让国民团结起来。政府规定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学校里的孩子必须学习这种语言。虽然那个时候一大半的阿富汗公民并不会说普什图语，之所以选择普什图语，是因为它是统治家族最初使用的语言，它帮助统治者巩固了与南部和东南部强大的农村部落的联系，而这些部落只会说普什图语。其实，王室精英成员在喀布尔长大成人，达里语才是他们的惯用语言。那所谓的母语，他们还得去学校学习。正因如此，宪法将达里语定为第二语言，达里语是大多数阿富汗人实际使用的语言。

每到夏末，阿富汗会迎来它的“独立日”（Jeshyn-i-Istiqlal）。这个节日由阿曼努拉创设。穆萨希班家族统治阿富汗后，将“独立日”作为培养国家意识的工具，恢复了庆典活动。节庆长达一个星期，政府会组织许多娱乐活动，举国庆祝。其中最盛大的活动在喀布尔举行。每年8月，全国各地的人群纷纷涌向首都朝圣。节日的现场，随处可见查希尔·沙阿的海报，还有他父亲纳迪尔·沙阿的照片，那是一位严肃的、看起来像学者的形象，他为国家带来了独立和尊严，是祖国之父、民族英雄。

至于阿曼努拉，却不再被人提及，在这里看不到他的肖像，好像这个人物从来不曾存在过。事实上，阿曼努拉当时生活在意大利的某个地方，以做家具为生。时光荏苒，他渐渐地消失在了阿富汗人的集体记忆中。

喀布尔电台是阿曼努拉的另一项创举，新政府让电台恢复了服务。重新开张的喀布尔电台向每一个能获得收音机的国民播放音乐，电台还成了政府的宣传工具（以新闻的形式）。农村的阿富汗人也为拥有电台这样的现代物件骄傲不已。当然，阿曼努拉的开创性贡献，大家已经绝口不提，这成了新政府的荣光。

哈比布拉和阿曼努拉统治时期，阿富汗已经出现几个资本主义企业家，到了穆萨希班时代，他们得以进一步壮大。阿卜杜勒·马吉德·扎卜里（Abdul Majid Zabuli）本是一个棉花商人，后来成了棉花大亨。他还垄断了国内的食用油贸易，获得了运输专营权，积累了巨额资本，开办了自己的银行，从而有了发展私人工业的本钱。20世纪40年代，阿富汗的企业家兴办工厂，加工棉花，制造纺织品等。当然，这些新兴产业都操控在政府手中，毕竟开厂兴业需要政府的批文；要获得批文，就得打通各种关系中的重重关节；想要打通关系，就需要削减皇室成员的利润份额——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无论如何，阿富汗的一小部分工业发展在那个时期开始了。

1946年，阿富汗与美国正式建交。外交大臣哈比卜·塔尔齐（Habib Tarzi）向美国杜鲁门总统递交了国书。阿富汗还成了联合国的一员。同年，塔尔齐来到旧金山，参观了莫里逊·努德森（Morrison Knudsen）公司总部，这是一家工程和建筑公司，横卧在科罗拉多河谷的胡佛水坝，便是莫里逊·努德森公司的建筑成就。前来参观的塔尔齐，正怀抱着一项大胆的建坝计划。

当时的阿富汗政府现金充裕。二战期间，由于严守中立，阿富汗的坚果、水果和食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印度，为其军队提供补给。卡拉库尔羊皮热卖一时，这是一种用于制作轰炸机飞行员夹克的皮毛。当时，参战各国实行战时经济，他们没有出口产品，只能通过现金支付。阿富汗朝廷赚得多，花得少。待到战事结束，阿富汗便有了强大的购买力。

对于这笔巨款的用途，政府是有打算的。阿富汗的第一大河赫尔曼德河流经国内最广袤的平原。如果能将河水引济到干涸的平原地带，大片的荒漠即会变成千顷良田，使之开花结果。在这方面，加利福尼亚州早有成功先例。他们建造了胡佛水坝，利用科罗拉多河水灌溉帝国谷，把沙漠变成了肥沃的农业区。

现在，塔尔齐想知道努德森公司是否会考虑接受聘请，在阿富汗修建几座大坝和运河网，阿富汗政府愿意出资1000万美元。对于这番提议，努德森公司非常有兴趣。双方组建了联合公司，即MKA公司。美国工程师、菲律宾建筑师和阿富汗的行政人员搬到赫尔曼德河谷开始工作。阿富汗政府建造了查因杰尔（Chainjeer）和拉什卡加赫（Lashkargah）两座小城，为他们提供住所。

二战结束初期，乐观情绪在喀布尔和阿富汗的各大城市弥漫。巨大的变化摆在面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可恶的大英帝国已经崩溃，世界上最强大的美、苏两国结成了反希特勒联盟，并取得了胜利。有了这样两个大国的共同努力，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一定会到来，阿富汗可能是这一切的一部分。

首相哈希姆（Hashim）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物，与乐观的时代精神实在不相合。因此，哈希姆下台，首相职位改由善良温和的弟弟马哈茂德（Mahmoud）接任。把一个兄弟换成另一个兄弟，不会引发任何乱子。这不是政变，也不是政权更迭，这是一次公关行动，这个家族决定向全国展示一张不同的面孔。马哈茂德颁行了不少改革措施：言路大为放宽，一批政治犯重获自由，并组织了新的议会选举。如此一来，议会将不再是一枚橡皮图章。王室任命上议院成员，下院成员则由人民经过公平、自由和可信的选举产生。当然，所谓公平自由的选举仅仅是理论。

1949年，新议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胡须满腮、头戴头巾的保守派占据了不少议席。但是，一个新兴的西方现代主义阶层同样不可小觑。议院当中，他们的代表有四五十人。其中的一些人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相信王室所说的议会拥有真正的权力和责任，他们召集内阁成员到下议院说明预算，他们在贪污腐败、裙带关系一类的敏感问题上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内阁大臣个个出身高贵，他们不是和王族血脉相连，就是国王的亲信，面对如此无礼的责问和质疑，他们当然老大不高兴了。

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仅在议会上发声，他们还办私人出版物，在上面自由发表言论。政府不由得警觉起来。要知道政府标榜的“言论自由”，可不意味着出言无忌，而是人们应该自由地、以他们想要的方式赞美王室。可是，在这些出版物中，王室看到了危险政党的前兆和令人担忧的政治野心。

1953年，赫尔曼德工程出了麻烦。工期大有拖延之势，开销也到了不可承受的境地。毕竟，修筑水坝所需的每一件设备都需要从国外引

进。当地的路政设施又落后至极，要把设备运抵工地，实在是费时又费力。所以在项目开始前，只得先修路。最初的1000万美元已近告罄，但几乎没有成果。同时，美国专家和当地行政官员之间还存在配合问题，他们正在就管辖范围问题展开争论。赫尔曼德工程的混乱，反映了喀布尔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事实证明，温和的马哈茂德不起作用，仍然要实施坚韧、有纪律的统治。王室政策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变，马哈茂德的“阿富汗之春”被证明是错误的。

新的策略，需要新的面孔。王室也发生了代际更替，父辈已经走完他们的路，是时候将接力棒传给下一代了。家族年轻一代有一个候选人——国王本人。查希尔·沙阿早已成熟稳重，再也不是当年的孩子。可是，他不能做王室需要他做的事。近20年来，他一直以宽厚慈爱的形象示人。如果国王摇身一变成为大独裁者，开始钳制言路、逮捕政敌，那么谁又能接替他留下的仁君角色呢？不，国王必须继续他的工作：欣赏音乐、支持艺术、打猎出游，这些工作更适合他的性情。最终，接力棒，或者我应该称之为警棍，交到了国王的堂兄弟达乌德（Sardar Daoud）和纳伊姆（Sardar Na’eem）的手里。

达乌德和纳伊姆都曾赴法国留学。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又得到叔叔哈希姆·汗（Hashim Khan）的有意栽培。纳伊姆曾在外交和经济部门工作多年，达乌德则被赋予军事和政治等权力。现在，他们就像一个摔跤球队，开始分管这个国家。

纳伊姆体形瘦长，长着一张马脸，有一个鹰钩鼻子。他穿着西服，看上去优雅贵气。他的声音很悦耳，钟爱美食、古典音乐，对于东西方的诗歌也很了解。健谈儒雅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坚韧机敏的心。他的优雅和外交天赋，使他有能力应对阿富汗四周环伺的强邻。正因如此，纳伊姆被委以重任，担任国家的外交部长。

达乌德是个身材魁梧的壮汉。他嘴唇很厚，浓眉大眼，秃顶脑袋如子弹。年岁见长之后，达乌德养成了佩戴墨镜的习惯。黑超加上光头，让他与特利·萨瓦利斯1[(1)]（Telly Savalas）更加接近。从外表一看便知，这是个强势人物。作为内政部长，处理本国内政要比和全世界打交道困难许多。达乌德还是国防大臣，拥有军事指挥权。同样，作为首相，他要把持全局。

国王查希尔·沙阿未曾改变，他依旧保持着绅士形象，端坐在劳斯莱斯后座，亲切地向人们挥手致意。

达乌德和纳伊姆上台之后，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充满美好的时代结束了。1949年的自由议会被解散，那些敢把王亲国戚叫来问话的国民议会议员全都丢了工作，前任首相任内兴起的私人出版物被关闭，那些热情呼吁世俗改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投进了监狱。喀布尔大学教授穆罕默德·霍巴尔（Mohammed Ghobar）曾在《历史进程中的阿富汗》一书里忠实讲述了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统治家族的严酷手段。而后，霍巴尔因书获罪，被流放到西南部荒漠的小镇，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艰难度日——阿富汗版本的“流亡到西伯利亚”。[6]一些人就这样消失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下的恐怖日子。

不过，达乌德、纳伊姆和查希尔·沙阿三人想要的不仅是权力，他们想要改变一切。他们都曾开眼看过世界，清楚阿富汗之外世界人们的生活。绝对权力是强大的，问题是它统治着什么。是默默无名的农民、封建领主、游牧民族和宗教“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只字不识，他们统治着连一根针都生产不出来的国家，更不用说汽车了。他们想要统治一个富裕而发达的国家。

尽管达乌德专制冷酷，但他也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主义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有不少这样的强人型现代主义者。伊朗的巴列维国王（Shah Reza Pahlevi）和埃及总统纳赛尔（Gemal Abdul Nasser）就是其中的代表。达乌德年轻时，与一个名为“觉醒的青年”（Wikh-i-Zalmayan）的组织有联系，拥抱现代主义、民族主义，认为发展是好的，教育是必要的，过时的习俗应该摒弃，妇女应该解放，外国影响应该被抵制，发展本国工业，总之，阿富汗是阿富汗人的。如今，达乌德已经手握大权，他打算不遗余力地把理想付诸实践，推向极致。[7]

然而，发展资金是一个问题。在一个农牧业国家，又从何募得如此庞大的一笔资金呢？前景似乎让人绝望。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国境外，那里集结了各种力量——该地区正在成为冷战的一个关键舞台。这场全球的权力斗争在20世纪后期占据了主导地位。

(1) 特利·萨瓦利斯（1922—1994）：美国电视与电影演员、歌星、喜剧演员，以光头造型闻名，美国电视艾美奖得主。

第15章　不结盟国家

冷战序幕拉开的时候，热战其实还未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各大盟国都感觉胜局已定，他们开始为本国在战后的地位问题争论不休。罗斯福和斯大林先后在德黑兰与雅尔塔会晤，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但是为时已晚，已无法阻止即将到来的一切。那个时候，英、美军队正从西线进入德国，东线的斯大林也取得了同样的战绩。当他们最终会师柏林时，苏联已经控制了整个东欧，从保加利亚到波罗的海之滨，都是苏联的卫星国。西方阵营担心斯大林打算效仿希特勒，想要征服世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让西方的忧虑进一步加重。然而，美国及其盟友无法通过发动战争来阻止苏联，因为双方都有核弹，而且很快就会拥有热核武器，这些武器能够终结地球上的人类。

美国战后的第一任总统杜鲁门对共产党政权的突然扩张作出了回应，这一政策被称为“遏制”。美国及其盟友扶植了一批敌视共产主义、亲近西方的国家，以隔离苏联的影响。为此，美国的外交官们拼凑了一些军事联盟。在西方，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东方，有（较弱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中东地区，有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土耳其和伊拉克是该组织的成员国。不久，新建国的巴基斯坦相继加入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成了反苏链条上的关键一环。有了巴基斯坦的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北约”连成一线，再加上美国的东亚盟友日本等国，西方阵营对共产主义国家形成了包围。[1]

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愿意在两大阵营之间选边站。摆脱英国统治的印度，迎来了国大党执政的年代，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独立。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不结盟主张，呼吁不结盟国家联合自强，这一主张后来发展成了“不结盟运动”，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先后宣布中立，他们得以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灵活游走。“不结盟”的构想，得到了阿富汗的热情拥抱。

冷战从来不乏“热点”。在朝鲜半岛、越南及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两大阵营都在挑选各自的代理人，驱使他们为各自的利益操戈相向。[2]冷战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不结盟”国家进行“和平”渗透，在这些国家中，每一方都试图把另一方挤出去。这些不结盟国家成了秘密间谍、宣传战、援助战角力的舞台。

在阿富汗，这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国家正好位于两大阵营的交锋前沿。当时，阿富汗领导人面临三个选择：要么投入苏联的怀抱，要么被哄骗加入“自由世界”，再就是保持中立。那么，阿富汗的前途到底何在呢？答案和一个古老的话题息息相关——地缘，地缘，还是地缘。阿富汗毗邻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又是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连接。阿富汗一旦选择依附苏联，苏联就有可能以阿富汗为跳板进占巴基斯坦，如此一来，就相当于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围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美国不会让阿富汗继续“赤化”。

于是，美国和19世纪的大英帝国形成了战略上的默契：阿富汗绝对不容失手，要阻止这个国家成为北方强国进攻印度（或者至少是现在的巴基斯坦部分）的平台。当达乌德与纳伊姆放眼世界时，他们在冷战中看到了机遇。

赫尔曼德河谷上的那座水坝，是美国发挥影响的关键。这项工程规模巨大，耗资良多，是阿富汗历史上最雄心勃勃、引人注目的发展项目。如果工程失败了，美国的面子自然不大好看。其实，喀布尔中央政府的声誉也和工程息息相关。就这样，一项工程让美、阿有了共同的利益。阿富汗故事发展与冷战息息相关。

达乌德一上台，便下令组建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局，负责该工程一切事务（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为模型）。虽然最初的1000万美元早已消耗一空，但美国现在投入了相当于原来2倍的资金。达乌德组建了一个管理团队，领导人阿卜杜勒·卡尤姆（Abdul Kayeum）博士是我父亲的好友。1938年，5名来自哈比比亚高中的毕业生前往美国留学深造，卡尤姆博士便是其中之一。父亲作为卡尤姆博士的助手来到工程现场，此外，还有几十名受过西方教育的阿富汗人在工程局中任职。

在美国方面，赫尔曼德河谷是国际合作署［后更名为国际开发署（AID）］的一个项目，这是美国利用发展援助实现冷战目标的主要工具。美国方面派出工程师、地质学家、土壤科学家等专家来到阿富汗西南部，与当地的官员合作共事。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局的局长被提拔至内阁部长的级别。工程局的中枢神经、政府建造的拉什卡尔加小城，则成了阿富汗人所说的“小美国”。虽然“小美国”被杜兰尼和吉尔扎伊普什图部落——阿富汗最保守的势力包围，不过，拉什卡尔加的房屋一改阿富汗的建筑传统，没有建造围墙。“小美国”里面，游泳池、俱乐部、现代化医院、公立学校一应俱全。从该地区村庄挑选出来的孩子在那里接受世俗教育（尽管宗教仍是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的核心包括两座水坝的建设，一座在赫尔曼德河上，另一座则位于赫尔曼德河的最大支流阿尔甘达卜河（Arghandab River）上。在水坝的下游，工程人员还规划了一个运河网络，配有水闸、机械化水闸和其他技术发明。水流沿着运河河道，便可以达到引济荒漠的目的。接受灌溉的区域——政府经营的试验性农场，很少将水输送到现有的田地。在试验农场，部落居民学会了用拖拉机和化肥种植从美国进口的新作物种子。

朝廷建造的模范城镇在运河网络地区像蘑菇般冒出来。纳迪·阿里（Nadi Ali）和马尔贾赫（Marjah）这样的小镇，其特色是整洁的平房、厚厚的墙壁和圆形屋顶，以保持凉爽。要知道，这在酷热气候地区是非常必要的。这里的房子都配有现代化的水电设施，小花园是每个房子的标配，房子之间有很好的碎石路。

这片土地上的生民大多是季节性迁徙的游牧民，现在政府不允许他们到处迁徙，要求牧民迁入“模范城镇”，并从事农业生产。每户人家都能分得一块土地，这些土地距离定居点有一到两天的脚程。

水坝造成的影响不止于此。这两座美国建造的大型水坝被改造成水力发电厂，产生的电力足以造福阿富汗的西南地区，包括大城市坎大哈。

阿尔甘达卜水坝全长1740英尺，坐落在坎大哈附近。赫尔曼德河上的那座水利工程则与城市相距甚远，建在上游很远的山区中叫卡加开伊（Kajakai）的地方。第一次建成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坝之一，它的后面形成了一个32英里长的水库。[3] MKA在水坝下游几英里处，在一处陡峭斜坡上，建了一个小小的村庄，供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居住。建筑以石头和混凝土为材质，其坚实耐用的程度远超当地传统民居。整个村庄看上去像意大利的休闲胜地。这里约有100余栋房子，每栋楼都有一到两间卧室，厨房配备了现代电器，还有西式家居床、沙发、椅子、桌子等。

水坝建成后，所有的专家都撤走了。卡加开伊只剩下一户人家——来自意大利的科列加（Corriega）夫妇。科列加先生是一名工程师，驻守此地是要看管水电设施。由于通常每天只需下坝检查一次仪表，因此，科列加先生拥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制作各类手工艺品。科列加先生是位高超的金属工，卡加开伊的每座房子都安装了锻铁栏杆或其他装置。这里每条街道的尽头都立着装饰性的灯柱，而且形态不一。此外，他还煞费苦心地收集了数吨五颜六色的鹅卵石，并按形状和大小进行分类，

然后用它们铺成人行道和步道，用绿的、红的、黑的、白的和其他颜色的石材呈现花纹和几何图形。到了后来，这个村庄似乎再也没有美化的余地，于是他又打造出一艘豪华远洋客轮的比例模型。透过舷窗，甚至可以看见房间里的小床和小衣橱。

可惜，科列加的精心雕饰没有几个人能够亲眼得见，少有的几个观众也是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局的官员。每年的开斋节，局里的官员会和家人从拉什卡尔加来到卡加开伊度过为期3天的假期。剩下的362天，科列加夫妇住在一座鬼城里。

高达300多英尺的混凝土突然堵住了河流，住在附近的阿富汗人作何感想？据我所知，没人问过他们。

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让苏联感到沮丧，尤其在苏联先行一步的情况下。早在1950年，苏联就和阿富汗达成易货协议，苏联将用石油和天然气换取阿富汗的羊毛和棉花。两年后，斯大林政府提议向阿富汗提供水泥，并签署了协议。苏联人满心以为，通过一揽子的援助，他们买下了阿富汗。

但是，不讲信义的阿富汗政府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打算。1953年，斯大林去世，阿富汗的最高权力易手。达乌德掌权，之后美国援助涌入了赫尔曼德河谷工程。苏联人绝不可能放弃。即使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混乱中，苏方仍向达乌德施加新的恩惠，在喀布尔兴建一座规模庞大的面包厂（名为“西洛”[(1)]）。此外，他们还打算增加援助，帮助阿富汗北部的纺织产业扩大规模。

然而，这还不够，因为此时西方列强已经深入阿富汗教育系统。喀布尔各大高中的课程体系，就是德国、法国、美国规划的，阿富汗学生还学习他们的语言。综观全国，却没有一所以俄语为教学语言的高中，学习俄语的阿富汗人寥寥无几，也很难在这里看到俄语出版物。与此同时，喀布尔大学正在与哥伦比亚大学、怀俄明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等美国学校建立伙伴关系。这些学校还派出学者、教授来阿富汗担任教职。赴美留学的学生队伍也呈壮大之势，涉及农业技术工程、医学、公共管理等多个领域。教育是文化，文化是意识形态。在阿富汗，苏联人花费的真金白银远远超过美国，却失去了阿富汗人的心和思想。

为了挽回局面，1955年，继任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喀布尔。阿富汗政府筹备了盛大的迎宾礼，准备组织群众夹道相迎、沿街喝彩。

然而，与保守的宗教机构有关联的几个人却对此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因为赫鲁晓夫是自豪的无神论者，政府却为他如此大费周章，待若上宾。年轻的激进分子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Subghatullah Mujaddedi）试图组织反对赫鲁晓夫的示威活动，但他被关进了监狱，直到苏联人安全离开。西卜加图拉与为推翻阿曼努拉立下大功的哈兹拉特是亲戚关系。假以时日，西卜加图拉将成为阿富汗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50年代中期，他还只是当局眼中一个天真的讨厌鬼。西卜加图拉在狱中的时候，赫鲁晓夫和达乌德在王宫签署了一份协议，苏联将向阿富汗提供1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援助。如此慷慨的援助，在阿富汗历史上前所未见。

美国也不甘落后，促成了一项协议，帮助阿富汗建立一家国有航空公司“亚里安那”（Ariana），公司部分股权由泛美航空公司持有。达乌德也请求美国的军事援助，但这与美国的冷战政策相违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敌对的邻邦，其原因可追溯到多斯特·穆罕默德那个时代。可是，美国和巴基斯坦是亲密的盟友，巴基斯坦通过连接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美国的遏制链条上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环，美国万万不敢忽视。正是由于巴基斯坦桥头堡般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没有应允达乌德在武器问题上的请求。毕竟这会激怒巴基斯坦，破坏联盟关系。

美国政府的顾虑给了苏联人可乘之机。苏联很快承诺，愿向达乌德提供坦克、米格战机、喷气式轰炸机、直升机，及足够装备一支十万大军的小型武器。苏方还将帮助阿富汗建立三座空军基地，其中一座大型空军基地位于喀布尔北部的巴格拉姆（Bagram），另外两座基地位于阿富汗北部。

美国尽其所能对抗苏联的这些行动。他们不仅出资改善喀布尔机场，还将在坎大哈建造一座全新的空港。根据美方的规划，坎大哈机场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机场之一。美国专家还希望坎大哈机场能成为长途货运飞机的加油站，从而使阿富汗成为一个繁荣的国际商业中心。过去的几个世纪，阿富汗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巴尔赫就曾是陆路商队的中转站。机场跑道等级很高，可以服务比当时任何机型都大的飞机（对今天使用该机场的大型美国军用飞机来说是完美的）。

苏联当局很快作出回应。一大批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受命对阿富汗境内的油气资源进行勘探。他们在阿富汗北部探得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并铺设了天然气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为阿富汗北部城市服务的发电站。此前，苏联帮助在阿富汗的北部建立了不少工厂，天然气资源正好支持

当地工业的发展。毗邻阿富汗北部的苏联中亚地区，也在天然气管线的照顾范围内。此外，苏联还出手整顿了阿富汗的通信设施，长达600多英里的电话和电报线路在各地铺设开来。

1959年，两个超级大国的慷慨程度真是让人震惊，以致艾森豪威尔总统觉得访问喀布尔是值得的。赫鲁晓夫之后，阿富汗又迎来了一位大人物。访问期间，美国总统与阿富汗商人阿卜杜勒·马吉德·扎里布握手的举动让民众十分吃惊，那一刻，家资亿万的富豪似乎和王亲国戚同等尊贵。艾森豪威尔的这次访问为阿富汗带来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捐赠和贷款，并有一项重要的基建项目得以开启：修筑一条喀布尔与坎大哈之间的柏油路，其中包括穿越沿途无数河流所需的桥梁。

然而，说到援建道路，美国只能说是在追赶。苏联正在建造一条更重要、更雄心勃勃的公路，这条公路从喀布尔通往该国北部边境，其中包括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萨郎隧道，全长2英里，海拔11100英尺。这是一条坚固的道路，可以承受坦克的重量。事实上，它能承受的重量比阿富汗当时拥有的任何坦克都大（倒是20多年后，苏军的钢铁洪流体验了一把道路的舒适感觉，堪称完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美、苏在阿富汗实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在地球上一些最困难的地形上修建了超过1200英里的优质柏油路，建立起了连接阿富汗主要城市的公路网络。[4]可以想见，达乌德和纳伊姆该多么喜欢这场冷战啊！

(1) 营业之初，西洛的生意相当惨淡，主要生产百吉饼，但阿富汗人更喜欢本国那种拖鞋形状的扁形全麦面包。不过，随着口味的改变，西洛至今仍在运转。

第16章　不要停滞，要发展

阿富汗的基建形势如火如荼，文化与社会改革也取得了进展，王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妇女解放问题，以及为妇女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开辟道路。阿曼努拉的革命因为妇女问题失败了，纳迪尔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让步。

达乌德自有一套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他的举措并不激进，先通过一些小举措来试水。1957年，喀布尔电台开始播放女歌手的音乐，电台里也有了女播音员。政府并没有反对，这可被视为批准。也没有引发骚乱，保守派认为女人只要不被看见，她们的声音可以被听见。当年晚些时候，亚洲妇女大会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举行。达乌德让阿富汗妇女代表团前往参会。1958年，在政府获得父母同意书后，40名穿着罩袍的女工得以入职一家国营制陶厂，与男性一起工作，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而后，朝廷终于向前迈出了大胆的一步。1959年8月，独立日假期的第二天，王室成员在包厢里观看常规的阅兵仪式，但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王室女性没有穿罩袍！一张张贵妇的芳容，就那样展现在公众面前，人们第一次见到了哈麦拉王后、比勒吉斯公主的容貌。达乌德妻子扎米娜·贝古姆（Zamina　Begum）的脸，同样被看了个一清二楚。想知道这在阿富汗引发多大的震动，联想一下美利坚的第一夫人赤裸上身出席总统国情咨文演讲时的情景就可以了。更别提，此事实在来得突然。王室没有发布任何关于这一举动的公告，也没有通过任何法律，就毫无征兆地这么做了。

这一次，宗教机构很快作出了回应。国内几位最有权势的神职人员联名上书达乌德，表示了震惊，他们希望达乌德能把国家带回沙里亚法规定的正轨上。达乌德回信说，他非常希望能按照教法的要求去做，但他翻遍了《古兰经》，也未找到先知强制执行罩袍的只言片语。达乌德谦称自己学识有限，恳请学者们到首都来，把相关段落找出来给他看。然后，他们带着书来了。他们仔细钻研着，却没有任何发现，怒火中烧。最后，他们无法提供无可争论的圣经支持。

既然如此，达乌德宣布：王室女性将不再穿着罩袍，其他的女性也无须继续穿着。当然，王室并不打算强制其他女性怎么穿着，每个家庭都可以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只是，王室将会遵从伊斯兰教法的规定：

不穿戴罩袍。

之后，不少勇敢的平民女性也这么做了。科布拉·努尔扎伊（Kobra Noorzai）作为女学校督学，她从事工作时并没有戴面纱。还有扎尔胡娜女校的校长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要知道，朝廷并未明确发布反对罩袍令。这些女性是冒着生命危险这么做的，但正是她们对阿富汗女性在公共事务上拥有一席之地的主张，才使王室的政策得以实现。

每个人都为暴乱做好了准备，但一切都风平浪静。王室的“赌博”获得了成功。虽然达乌德多次表示，政府不会强迫人们遵从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但政府官员不得不允许家中的女性在公开场合露面。当年晚些时候，女孩开始在拉什卡尔加的公立高中上学（第一个是我姐姐贝丽卡）。男女同校在阿富汗实现。更重要的是，她们没有穿罩袍，而是穿灰色的制服，一条黑色的长袖连衣裙，搭配黑色长袜、白色头巾。1978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电视新闻里，不少女性活动家身上的服装和当年的阿富汗女校服如出一辙。我的几位美国友人见此情景，对霍梅尼革命强加给伊朗女性的压迫嗤之以鼻。那一刻，我不禁想到了近20年前的阿富汗，那些在公共场合那样穿着的阿富汗女性是如何做出令人震惊的女性解放的革命姿态的。

脱下罩袍，阿富汗女性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但是，她们的活动没有获得太多的支持。王室将女性从基于性别的权利剥夺中解放出来，只迈了一小步。罩袍仍然未被禁止，男人仍然拥有摆布女性命运的权力，可以合法迎娶四位妻子；父亲为了敲诈大笔金钱，有权把未满青春期的女儿许配给富有的老人。而且，王室没有把罩袍倡议与更广泛的计划联系起来。毕竟，改革力度越大，越有可能遭遇风险。

哪曾想到，如此细微的一步，也招来了麻烦。坎大哈一个名为“赤脚男孩”（paylucha）的帮派打算对该地区不戴面纱的妇女和外国工人下黑手。美方承建的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就在坎大哈附近，因此不少外国人聚集到了那里。阴谋很快传到达乌德那里。达乌德部署坦克进行镇压，日落之前，暴乱便被平定，且没有爆发更多的抗议活动。当时的阿富汗民智渐开，罩袍一事，人们已经不像以往那般坚持。某些毛拉的所作所为，倒像是在阻碍社会进步。他们甚至和黑帮流氓勾结，阴谋作乱，对于民众的性命安危毫不顾惜，这引起了公众的不满。达乌德就这样利用此事，让保守派败坏了自己的信誉。

王室的步伐虽然不太大，但他们开启了一扇门，变革随之缓缓到来。接下来的5年里，阿富汗女性仿佛走完了5个世纪的进程。她们终于

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并在教师、护士甚至医生的岗位上发挥作用。政府部门、工厂和私营商业机构中，也出现了女性职员的身影。亚里安那航空公司开始雇用女性乘务员。喀布尔电台的女播音已经成为常态，大家不但可以欣赏女歌手的歌声，还能听到女性播报的新闻。随着晶体管收音机的普及，阿富汗各城镇的人们已经习惯听陌生女人的声音，这对阿富汗男性来说是一种陌生的经历。

1963年，喀布尔已经拥有6家电影院，其中的3家放映欧美电影，其余3家则放映印度电影，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宝莱坞电影。尽管宝莱坞电影已是出了名的循规蹈矩，接吻一类的镜头从来难得一见，不过，那里面有未经遮掩的女人面孔，有女人唱歌、说话的影像，女人穿着展现身体的紧身衣跳舞！阿富汗的其他城市也有了电影院。

冷战仍在继续，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资助了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还推动了随后的社会进步。如此一来，反而给王室带来了挑战。现代化的浪潮滚滚而来，君主的绝对权力自然会遭受冲击。过去，政府里的关键职位都为王亲国戚所把持，这是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但现代化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和官僚系统，这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维持运转。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没有任何一个家族能胜任其所有关键岗位。因此，政府不得不打破王室圈子，面向平民招揽贤才。

政府求贤若渴，从欧美学成归来的专业人才也越来越多。一方面，王室需要这些专业人士发挥才智，促进社会建设；另一方面，又不想让他们掌握政权，但这是没有希望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官僚和行政人员拥有事实上的权力，无论这些权力是否合法。阿富汗的教师、技术人员和金融专家的人数不断积累，远远超过了王室及相关部落贵族。他们发展成了一个全新的阶层，一个足以挑战王朝的技术官僚阶层。

对于这个新兴阶层，王室抱有很大的戒心，但也离不开他们，因为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属于一个家族，几千人去对抗数百万人。所以必须创造各种途径，实现更广泛的（也许不是普遍的）政治参与。一批经过挑选的非王室成员确实已在参与国家治理，社会的进步的确给了技术官僚跻身精英阶层的机会。

与此同时，阿富汗故事和冷战之间出现了分歧。杜兰德线——那根老毛刺，制造了很多麻烦。白沙瓦这个地方，一直被阿富汗人所挂念。从多斯特·穆罕默德那个年代起，普什图部族就在不断进言，希望重新征服白沙瓦，夺回失地。这个愿望仅限于普什图人，其他民族并不在意，但他们的想法并不重要，阿富汗的政权从来都把持在普什图人的手里。

多斯特·穆罕默德以来，阿富汗的历代国王都不得不照顾同胞的情绪，至少，他们的言辞强硬，信誓旦旦要把所有的普什图人统一到一个国家之下。不过，为了保住王位，每一位国王都必须被迫接受强加的东部边界，因为他们需要金钱、枪支和大国的保护。

1947年，一个重大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个故事的面貌。当时，英国势力正在慢慢撤出印度次大陆，国大党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似乎就要开花结果。在长期追求独立的斗争中，穆斯林独立运动脱离了甘地领导的国大党领导的主流运动，这个由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为穆斯林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人通过支持成立两个独立的国家来解决纷争，英属印度由此一分为二：印度教徒组成的世俗国家名叫印度，穆斯林则会得到一个名为“巴基斯坦”的家园。

巴基斯坦的建国让一个古老的问题重新被提及。既然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可以独立建国，那么，杜兰德线以东的普什图人又当如何寻求自己的前途呢？巴基斯坦的建国会不会是阿富汗的一次契机——迎回沦落异国的同胞，收复失落多年的故土？英国人决定正视这一问题，于是在英属印度的普什图人聚居区举行了全民公投，要求人们选择更愿意加入哪个国家，印度还是巴基斯坦？

印度还是巴基斯坦，难道就只有这两个选择吗？

是的，那就是唯二的选择。大多数人叹了口气，投票赞成加入巴基斯坦。部分民众完全抵制公投，“都不是”。不愿加入任何国家的普什图人不在少数，他们希望独立建国，组建独立的“普什图斯坦”。那么，“普什图斯坦”和阿富汗如何相处呢？他们会组成联盟吗？又或者成为阿富汗的一个自治省？

如上问题太过遥远，自然没人关心。1947年，阿富汗政府简单地认为，在没有详细说明的情况下，宣布支持普什图斯坦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阿富汗政府表态，“普什图斯坦问题”尘埃落定之前，反对巴基斯坦加入联合国。哪怕巴基斯坦建国已成事实，阿富汗政府仍在暗中支持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分裂主义运动。

普什图独立运动的领袖阿卜杜勒·加法尔·汗（Khan Abdul Ghaffar Khan）是杰出的和平主义者，被称作“边境地区的甘地”。阿富汗政府让他来到喀布尔定居，通过喀布尔电台向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发表充满激情的讲演。[1]巴基斯坦展开报复，一家“自由阿富汗电台”在奎达（Quetta）设立，阿富汗境内的普什图居民不断收到另一侧“兄弟”的邀

请，敦促他们脱离阿富汗，加入巴基斯坦。

尽管加法尔·汗主张非暴力，但是他的宣讲却诱发了武装冲突。电波来往间的唇枪舌剑，演变成为实实在在的枪林弹雨，造成人员伤亡。巴基斯坦前后三次封锁两国边界，只为炫耀它对内陆国家的影响力。

相关冲突甚嚣尘上的时候，正值达乌德执政初期。达乌德本就是个狂热的普什图民族主义者，他应该支持这一事业，因为普什图民族主义者是他执政的基础。即便他没有这样的诉求，也会为了争取民心而一意孤行。由此可见，即使是拥有绝对的权力，政治家也得讨好自己的支持者。因此，达乌德开始谈论有史以来最强硬的反巴基斯坦普什图主义。

与此同时，达乌德向美国请求军事援助却遭到了拒绝。对于美方而言，人口上亿的巴基斯坦比1200万人口的阿富汗更具战略价值。华盛顿担心，普什图人的独立愿望可能会危及其盟友——巴基斯坦这个大杂烩国家的生存。毕竟建国不久的巴基斯坦已被分成了两个互不相连的部分。东巴基斯坦很快会分裂，成为孟加拉国；印度声称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普什图斯坦”若实现，信德省（Sind）的一部分及俾路支省（Baluchistan）可能追随而去。如此一来，偌大的一个巴基斯坦岂不只剩下一个旁遮普（Punjab）？如此一个小国求得生存尚且不易，即便幸存下来，又怎能承担起连接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纽带作用，如何作为该地区唯一的力量抗衡不结盟、偏左的印度？正因如此，美国绝对不能放弃巴基斯坦。无论如何，这个国家的生存必须得到保障。因此，美国的外交官试图劝说达乌德接受杜兰德线。



普什图人聚居区

“普什图斯坦”的梦想始终在达乌德的心头回荡。不过，他也未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1960年，达乌德决定要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于是阿富汗单方面关闭了两国边界。综观达乌德的执政生涯，这个决定真是愚蠢之极。边界一关，双边贸易立即陷于停滞，边界地区的游牧民无法自由来去，城市里大小商店的货架变得空空如也。一个内陆国家，为什么要切断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难道达乌德当真以为如此举动能让巴基斯坦感到压力？反正世界各地的观察家们挠破头也不理解达乌德的决定。达乌德这是在向巴基斯坦以死相逼吗？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活活憋死自己。对此，巴基斯坦政府只是笑而不语。惊慌失措的美国政府将150多名技术顾问撤离阿富汗，并警告达乌德收敛他的小孩子脾气。

不过，达乌德不肯让步，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一般都难得认错服软，相反，达乌德指望苏联来为他摆脱困境。达乌德的请求得到了苏联

的热情回应。边界关闭之前，卡车每天载着上千吨阿富汗出产的葡萄，开赴巴基斯坦的港口城市卡拉奇。现在，苏联以飞机作为运输工具，倒也运走了几百吨葡萄。有传言说，其实苏联并不想要这些水果，苏联本就有不少葡萄产地，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引进一批外国货来打压本国产品。可是，达乌德的面子又不能不给。无奈之下，苏联人只得把阿富汗葡萄倒进咸海。[2]不过，只要能让阿富汗政府投入己方阵营，其他事情都不在话下。总之，达乌德的蠢行让阿、苏两国关系变得十分紧密。美国人看在眼里，怒在心里，却没有一点阻挠之力。

不过，王室可不希望和苏联走得太近，不结盟仍是阿富汗的国策。如果达乌德让不结盟国策变得困难，那他必须下台。1963年的这场外交风波，让查希尔国王下了决心。国王亲自出面，撤掉了达乌德的首相职位，他感谢堂兄多年来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希望他退休之后生活愉快。查希尔国王宣布亲任首相一职。

第17章　民主的时代

达乌德下台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要知道，达乌德可是主动请辞的。试问，哪位强人能在军队、警察、情报及特务系统尽数听命于己的情况下主动放弃权力？我想不出第二个例子。作为一个在阿富汗长大的孩子，我并不喜欢达乌德，他是我的噩梦，我向你保证，他是个可怕的人。不过，回首往事，我也得承认，达乌德有他的伟大之处。毕竟，他让妇女摘下了面纱，后来他还和平交出权力，避免国家陷入喋血境地。尽管他的主要动机可能不是他的国家，而是为了家族利益。显然，家族政治、幕后交易和未公开的压力，让他作出了辞职的决定。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他大权在握，他有了选择，他选择了辞职。

接下来发生了更加不同寻常的事件。国王决定削弱自己和王室的权力，他下令制定一部新宪法，对王权进行限制，赋予人民更多权利。综观阿富汗历史，这样的事真可谓史无前例。(1)

一开始，大家都非常怀疑，人们说这不过是马哈茂德虚假的“阿富汗之春”的重演。政府假借取消审查制度、举行选举来打击潜在的异己，待政敌的人头纷纷落地，一切又将回归高压统治的老路。

可是，人们都错了，国王是认真的。他不仅要求达乌德辞职，还解散了整个内阁。接下来，一名技术官僚被任命为首相。在查希尔国王的支持下，新首相组织了新内阁。新内阁成员中，没有一人拥有王室背景，其中两人甚至不是普什图人。他们所处的时代确实在改变。

久居囹圄的政治犯得到释放。在监狱长大的恰希家族成员不曾想到，他们还能重见天日。历史学家霍巴尔（Ghobar）结束了长达10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喀布尔大学继续从事教职。

在查希尔国王批准下，新首相和内阁任命了一个由学者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制定新宪法——一部真正的宪法。该委员会共有7人，我的叔父纳吉姆丁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甚是离经叛道，虽然学习医科，却从未正经执业。另外还设有一个咨询委员会，作为磋商机构。前文提到的杰出女性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和科布拉·努尔扎伊都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另一位成员莎菲卡·齐亚耶（Shafiqa　Ziaie）后来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但不担任部长职务。也就是说，齐亚耶虽然参与内阁会议和政府决策，但不具体管理某个部门。拟订宪法草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

终获得批准也耗费了数月，最终出台的宪法着实震撼了整个阿富汗。

根据新宪法，阿富汗将建立一个真正的议会，议员通过真正的选举产生。同时，议会是阿富汗的立法机关。

宪法明确限制君主的权力，国王将变成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那样的象征性君主。

新宪法第二十四条最令人震惊。

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王室成员和国王的近亲都不得在议会、内阁、最高法院任职，也不得加入任何党派。

天呐！

我写到此处的时候，还是目瞪口呆的。人类历史上，何曾有过这种事情？请不要以美利坚合众国为例：北美殖民地天高皇帝远，为了摆脱大洋彼岸的王权束缚，美国人可是经过了八年苦战。法国大革命也不能算。法国从绝对专制到极端民主，是通过血腥革命和恐怖统治才实现的。可是在阿富汗，这种变化一夜之间发生。主持这场变革的，还是曾经的专制君主。

当时的喀布尔人，都不敢相信民主已经成真。大家在茫然中走来走去，等待美梦化为泡影，等待达乌德挥舞斧头突然出现。不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达乌德在喀布尔过起了平静的退休生活，十足是个安享晚年的老绅士。他只是观察事态发展，与朋友私下讨论，而不公开发表意见。平民内阁开始运作，选举也顺利进行，最终有4名女性获选。由此形成的新一届议会开始顺利履职。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办报纸，在政府没有反对的情况下，涌现出了更多出版物。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边界重新开放，货物得以流通。各大商店的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不仅有本地产品，还能买到荷兰巧克力、法国香水、意大利面条、坦噶尼喀咸牛肉、挪威沙丁鱼罐头、瑞士手表、法国钢笔、德国相机、英国自行车和美国唱片。[1]

在外交上，1963年的“天鹅绒革命”（the Velvet Revolution）将阿富汗重新归位于它原来的位置——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夹缝中，坚定走不结盟的外交路线，不抗拒两边的“勾搭”，对双方提供的各种馈赠更是一应笑纳。

那个时候，外界送来的大礼包可谓接连不断。德国人为喀布尔大学建造了现代化的校园。苏联方面慷慨解囊，建起了60多栋现代公寓大

楼，配有完备的水电设施。这是一个带遮阳行道、商店和娱乐设施的住宅开发项目。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银行、现代化高级酒店、百货商店等不断入驻，城市里还有了现代化的公共汽车，这些都是拜冷战时期阿富汗的“追求者”所赐。除了老城区，喀布尔的街道都铺上了沥青，人行道路也成了标配和时兴。驴和骆驼不再经常进城，卡车和轿车变得普及起来。主要的河流上建起了巨大的水力发电厂，它照亮了喀布尔的夜晚，照亮了每晚喧嚣的婚礼宫殿，照亮了遍布主干道的现代西式餐厅和咖啡馆。市中心新开了不少书店和音像店。茶室、冰激凌店和烤肉店多得有如雨后春笋。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新兴的中产阶级会驱车前往近郊的风光胜地，如度假小镇帕赫曼（Paghman），卡尔哈（Qargha）水库也是大家喜爱的度假选择，那里有一家俯瞰水面的大型露天咖啡馆。

每到夏末，会迎来阿富汗的独立纪念日。独立日的庆典活动本就是阿富汗人狂欢的上佳时机。现在，庆典变得更加隆重。每年，政府会将举行庆典的广场周围布置得张灯结彩，充满了节日气氛。

在这个节日里，会举行阿富汗的传统体育项目“布兹卡谢”。这是一场残酷的马术比赛，骑手们为抢夺一只山羊的尸体进行搏斗，他们需将山羊拖过球门线。传统上，布兹卡谢属于个人之争，这些参赛队伍代表各自的省份。操场中心的人工湖畔还会大放烟火，政府部门赞助了露天茶室，乐队在这里演奏，人们可以免费聆听知名歌星的演唱。半古典歌唱家萨拉罕格（Sarang）曾经在此献唱，流行明星艾哈迈德·查希尔（Ahmad　Zahir）更是在这里大放异彩。他弹着电风琴唱情歌的神采迷倒了万千少女。那些情歌歌词是数百年前波斯的古典诗人写的。美术馆里，展出了现代阿富汗画家带有些许野兽派色彩的风景画。

更重要的是，独立日还为贸易博览会创造了契机，也是冷战各国较量的“战场”。各国纷纷设立展馆，展示自己的商品。阿富汗人涌进展馆，大开眼界。美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和苏联，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从摩托车、收音机、电动打蛋器、冰激凌机、唱片机到鞋子、帽子等各种机器制造的时尚物品，应有尽有，还在不断增多。

展馆附近，还有各国自设的剧场，观众可以欣赏到花样百出的异国演出，有来自美国的艾灵顿乐队爵士乐表演、中国传统京剧，还有来自莫斯科的马戏团表演，那些空中飞人、杂耍高手在钢丝上辗转腾挪，表演高难度动作。两大阵营都在竭尽全力争取东道主的芳心。“来吧，做我们的盟友吧！”这可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资金和技术援助源源不断地涌入，用于建设阿富汗的公路网。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可以在一天内驾驶汽车从巴基斯坦边境穿过喀布尔，直抵苏联边境。苏联援助的萨朗隧道则是途中的必经之地。

大量的外国人使喀布尔人口激增。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家庭条件相当不好，他们拥挤在公寓或小房子里，有时甚至是两三户人家同住。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集市上采购当地物品，与阿富汗人手忙脚乱地挤在一起。

在喀布尔，美国人和西欧人同样随处可见。不过，他们自有他们的生活空间，和阿富汗人几乎互不相干，就像19世纪来到喀布尔的英国人一样。他们在物资供应所购买的商品全部来自各自国家。不过，60年代中期“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涌入阿富汗，他们与阿富汗人有密切的生活和工作联系，不仅是在喀布尔，他们还深入边远城镇，担任教职，参与医护工作，还有不少人投身到了阿富汗的农业振兴事业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一无专业经验，二又缺乏真正的技术，他们对于阿富汗社会发展的贡献相当有限。不过，这一张张来自美国的面孔十分和蔼可亲，至少，“和平队”促进了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也促进了美国的冷战事业）。

20世纪60年代，世界革命形势风云激荡。到1967年，激进浪潮更是达到了巅峰，嬉皮士开始涌入阿富汗。2[(2)]这些人就像现代社会中的游牧民，他们从欧洲开始流浪，经伊朗进入阿富汗，经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然后一路向印度奔去。他们喜欢阿富汗的一切：这里的大麻劲头十足，人民友善平和。阿富汗有严格的社会规定，不过，至少在最开始接触外国人的时候，他们对他人的标准是豁达包容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亚历山大·布尔内斯写于19世纪30年代的阿富汗见闻，足以为此提供例证）。

“嬉皮之路”上的阿富汗人在这群新的外来者身上发现了商机。聪明的商家很快发现，嬉皮士口口声声说要体验生活，但他们毕竟来自欧美国家，又怎么会挤进烟馆，和本地人一起吞云吐雾呢？当时的阿富汗，大麻虽早已合法，但声名狼藉。任何人都可以吸，不过，真正沉溺其中的阿富汗人，是一些白天辛勤的苦力、经常挨更守夜的司机以及浪荡江湖的暴徒和恶棍。相形之下，上层人士更喜欢酒精。尽管饮酒违反教义，不过，也许正因如此，上层人士才会趋之若鹜。因此，阿富汗的“创业者”们为嬉皮士创造了一个浪漫的梦想，他们建立了酒吧和俱乐部，在这里，嬉皮士们可以获得他们想象中的阿富汗体验。[2]为了保证这一

点，商家还对本地客人进行特别筛选，拒绝接待地痞流氓、贩夫走卒，允许入内的阿富汗人必定地位较高、受过教育。当然，和商家熟识的关系户也能加入这种毒品俱乐部。正因如此，嬉皮士们都很热爱阿富汗。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周到而可爱。不过，正如“和平队”志愿者为西方国家塑造了形象，嬉皮士也是如此。当他们的数量寥寥，像一股细流时，并不会给阿富汗带来多大麻烦；但一旦他们变成洪流，这一形象就会在阿富汗人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1969年，阿富汗的城市结构正在经历迅速、激烈的变化，尤其是喀布尔。当时，城里的许多人（包括女孩）都接受过高中教育，进入高校继续深造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她们大多入读师范学校或医学院，阿富汗的女医生、女教师因此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的阿富汗，男女同校已成常态。男女同学之间开始了谨慎的约会。当然，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约会，阿富汗的风气还不至于如此开放。男孩和女孩们会在公共场合相见，然后进行双向选择，再让各自的家庭出面安排婚姻。这些爱情的婚姻会让两群互不相识的人参加婚礼，他们来自新娘和新郎的家庭。这为参与其中的青年男女提供了另一个场所，让他们单独约会，安排自己的婚姻。

与此同时，喀布尔的女士开始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不仅展露容颜，还露出了手臂、腿，甚至是乳沟。西方的时尚风潮也在技术官僚阶层的下一代之间流传开来。迷你裙和低胸衬衫，她们已经习以为常。夜店越开越多，啤酒和威士忌一类的东西，也不再仅向外国客人开放销售。对于酒精，阿富汗人愈加适应。城市当中，不会有人对饮酒提出异议。前文提到过的那位科列加先生，也从卡加开伊搬到了喀布尔。毕竟，首都是个大都会，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更好地行销自家酿造的葡萄酒。总之，如果文化也是一片阵地，冷战双方已经在阿富汗分出了高下。这一次，西方阵营取得了一场完胜，他们的流行音乐、蓝色牛仔裤和超短裙在喀布尔随处可见。不过，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美国和他的盟友却一步步败下阵来。美方寄予厚望的赫尔曼德河水电站非但没能撑起华盛顿的面子，反倒成了不可承受的负担。工程开启之前，没人做过足够的土壤研究，新的灌溉方式反倒加重了土壤中的盐碱成分，使大部分土地无法耕种，寸草难生。

此外，没有人研究过水坝与运河修建带来的社会影响，受到工程影响的一干村民本就在调查人员的考虑之外，自然不会有人苦口婆心向当地人介绍大坝的功能和意义。人类学家路易·杜普利（Louis Dupree）曾

经指出，阿尔甘达卜大坝落成之后，距离大坝20英里的村民仍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茫然无知。[3]

卡贾卡伊大坝完工之后，大坝下游仍有一些事务需要处理。于是，我父亲开着一辆路虎汽车前往那里的几个偏远村子。附近地势崎岖，甚至没有像样的公路。在一个地方，前来迎接他的村民询问阿曼努拉国王的健康状况。当时，距阿曼努拉下台已逾30年了，相关的消息却一点也未曾吹进这处偏远山区。上游那座宏伟的水坝，村民同样毫无察觉。他们只是觉得，河道的水文状况变得有些奇怪。有时候，河水湍急异常，水量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村民那套古老的水资源管理系统根本无法处理这些令人费解的新型水资源情况，村里的土地被淹，粮食歉收，村民陷入了饥馑的境地。

河流突然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变化，这破坏了围绕水资源管理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传统。过去，米拉布受人敬仰，由他来组织与水利相关的工作，并裁决水源纠纷。上游的大坝一拦，他们在村里的地位一落千丈，这种权威的侵蚀还产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后果。

与此同时，模范城镇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府本来指望不同民族的人聚居在一起，能够相互理解、互相融合。可是，大家到底没有找出一条共存之道，相关的冲突倒是层出不穷。一些新城镇的居民受够了，他们离开模范城镇，重新过起了游牧生活。

在新灌溉区，为给大型试验农场项目腾出空间，许多居民被迫迁出了他们的农场。后来，一些农民想回到自己的农场，但政府不允许这么做，这导致相关的矛盾不断积聚。

至于坎大哈机场，整个想法都落空了。设计建设的机场是为了能给螺旋桨飞机提供完美的服务。但机场建成时，正是螺旋桨飞机被淘汰、新兴的喷气式飞机兴起之时。而且，机场的油泵无法正常工作，长途货运飞机自然不会把坎大哈机场作为加油站。飞机络绎不绝的情景从未在此出现，坎大哈空港虽然摩登气派、规模宏大，却始终门可罗雀。

一些发展项目已成功完成，但只限于较大的城镇，农村并未获益。沿着任何一条神奇的现代高速公路去往任何一个方向，都会通向不知电力为何物的村庄。村子里的人没听过“冷战”这个词，至于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他们也只是从其他村民那里听来的，而这些“报道”已经被不认同的“记者”歪曲了。

这就是那个旧有的阿富汗。阿卜杜尔·拉赫曼曾试图摧毁，让阿曼努

拉跌下王位的旧阿富汗仍然存在，而且绝大多数阿富汗人仍属于这里。更重要的是，旧的阿富汗和喀布尔政府及其技术官僚居住与管理的城市阿富汗，还在日益疏离、渐行渐远。

(1) 即便是阿曼努拉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也丝毫未曾削弱王室的权力。

(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阿富汗的“黄金时代”，长发披肩、身着奇装异服的放浪青年沿着“嬉皮之路”，一路穿越欧洲、土耳其、伊朗，来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编者注

第18章　左翼兴起

达乌德在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后，开始派人前往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接受军事训练。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数百名受过良好教育、具备管理才能和掌握技术的西方留学生回国，数百名留学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军事训练的留学生也回来了，他们训练有素，已做好进入军队的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求学期间，他们不仅收获了军事知识，还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看待祖国前途和个人命运的角度由此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史观，阿富汗尚处于向前工业社会过渡的封建社会阶段。而他们是阿富汗迈向工业文明的开路先锋，要消除所有关于天堂和地狱的胡言乱语，把阿富汗打造成天国乐园，工人的天国乐园。

随着时间推移，马列主义思想从军营传到了喀布尔大学。大学毕业生走上教师岗位，又把共产主义思想带进了中学课堂。当时的喀布尔工作机会十分有限，许多大学生只能远走他乡，到各地的公立学校从事教职；年轻军官则被派到全国各地驻防，共产主义思想由此播撒到了阿富汗地方社会。在喀布尔，不少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秘密结成学习小组，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每个小组的成员不过10—12人。在议会时代，其成员也只有几十人，但他们的思想在不断传播。

1965年，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30多名代表齐聚在记者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nmmed Taraki）的家中。塔拉基因写过一些说教小说及有关阿富汗工人和农民的小说，从而在苏联引起了一些关注。塔拉基出身贫穷的普什图家庭，通过就读公办学校晋升成为技术官僚。他还曾经前往美国，在阿富汗大使馆当过一阵子助手。他的一部小说被翻译成俄语，并受到苏联读者的欢迎，称赞他是“阿富汗的高尔基”。1965年，塔拉基已是两鬓添霜的老人，而与会者大多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塔拉基由此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毕竟在阿富汗这个社会，年长即等于权力。

然而，会上有那么一位人物并不服气。此人名叫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时年36岁的他虽然华发未生，但在一众大学毕业生当中也算得上半个长者。求学期间，卡尔迈勒曾经组织过多场反政府学生运动，并因此招来了一段长达四年的牢狱之灾。正是由于这段经历，卡尔迈勒在喀布尔的激进分子当中闯出了名声。在达乌德的黑狱

中，他的狱友——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向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出狱之后，卡尔迈勒继续求学，取得法学学位。与此同时，他这个拥有特殊牢狱经历又富有领袖魅力的大龄学生，在年轻的同龄人中拉起了一支规模不小的拥趸队伍。1965年，卡尔迈勒已经离开校园，但左翼学生运动仍和他有很多联系。

30多名参会者连夜决定成立一个政党，角逐即将到来的国民议会选举。这个政党就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PDPA）。那天晚上的这些与会者，不仅是党的领导人，也是党的大多数成员。他们中的半数出身普什图农村家庭，来自那个旧的阿富汗，通过公立学校得以进入新的阿富汗。剩下的那部分党员出身城市。塔拉基是第一个群体的代表，他的父亲是个牧羊人，其先祖是游牧民。第二个群体的代表则是卡尔迈勒，他的父亲是个将军，与达乌德来往密切。

选举结果出来了，卡尔迈勒为代表的群体几乎全部成功当选，塔拉基的团队则无一人当选。不过，新兴的人民民主党到底是在阿富汗政坛有了一席之地。议会开幕那天，一帮学生涌进了会场，他们的抗议行动让不少人对学生运动心生反感。学生们觉得，各位议员并非真正的民意代表，而且大多有贪污与结党营私之嫌，他们要求一年前国王任命的首相及内阁集体请辞。会场里嘘声阵阵，议员的讲话频频遭到打断。显然，这是人民民主党策划的一次示威。一片喧闹中，大厅里的一名议员突然站起身来。此人身着衬衫袖子的便服，看起来像学生，他就是卡尔迈勒。示威者安静下来，给了卡尔迈勒发号施令的光环。他开始了一番慷慨陈词，痛陈国家面临的困境和农民的悲惨遭遇时，卡尔迈勒相当动情，好些反对派议员听了都为之落泪。卡尔迈勒讲话期间，每个人都在认真聆听。当他坐回议席，会场又开始喧闹起来，议会不得不休会。[1]

接下来的几天，学生们仍在议院中抗议。没办法，议会只得动用警力，把一干学生逐出大楼。但是，抗议活动还在继续，只不过把阵地转移到了街头。四面八方的学生还在源源不断地加入示威人群，能有机会成为这历史性时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十分兴奋。至于抗议游行有何目的，又有什么打紧呢。

游行仍在继续，官方渐渐难以容忍。1965年10月25日，当局授意警方出马驱赶示威人群。警方开了三枪，造成三人不幸身亡，其中两人是学生，还有一人是围观者。在很多人的心中，阿富汗可能就是政坛暴

力的代名词，区区三条人命是小事。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这桩惨案一直被阿富汗人铭记至今，大家都不会忘记，那天是阿富汗历8月的第三天。此后的十多年里，这一天不仅仅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还是那场运动的象征。

1965年，示威游行进一步升级成一场罢工。喀布尔大学的学生发动罢课，还把一封请愿书递到了副校长（碰巧是我父亲）手里，请求政府彻查整起事件，惩罚下令向学生开枪的人。如若这样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将让大学今年内无法再复课。

示威活动已经导致第一任首相被迫辞职，继任者哈希姆·麦万德瓦尔（Hashim Maiwandwal）接受了请愿书，承诺会进行调查。最终，一位默默无闻的大学老师被指控，罪名模棱两可，实际上调查并没有结果。街头流言称，国王的堂兄、喀布尔驻军司令阿卜杜勒·瓦里（Abdul Wali）嫌疑最大。如果真是这样，调查毫无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阿卜杜勒·卡尤姆（Abdul Kayeum）因为“八三事件”辞去了内政大臣的要职并流亡海外，人们认为，无论他是否真的要对此事负责，他都应该承担责任。

到底谁应该为“八三事件”负责呢？时至今日，没人清楚问题的答案。事实上，这可能并不重要。当年的喀布尔就像一个火药桶，“八三事件”不过是导火索。此后的十年里，每逢阿富汗历的8月3日，广大学生都会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学生激进分子会等同“左翼”，或至少是“自由派”。在喀布尔，这两个词并不是同义的。在这里，富有煽动性的校园激进分子都是宗教激进主义者。大学里的神学教授是这类学生的带头人，其中最知名的参与者要数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和阿卜杜勒·拉苏勒·赛义夫（Abdul Rasool Sayyaf）。两人是校友，都曾在埃及著名的伊斯兰神学院爱兹哈尔大学就读。一帮留苏学生为阿富汗带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拉巴尼与赛义夫则带回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旨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应当生活在统一的哈里发国，摒弃民主、人文主义之类的西方思想。拉巴尼和赛义夫认可穆斯林兄弟会建设一个完全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国家的愿景。

在众多的学生追随者中，有两位活跃的学生：塔吉克人艾哈迈德·马苏德（Ahmad Massoud）和普什图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希克马蒂亚尔是个凶残狡诈的人物，他一

开始是共产党员，但最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和他的同伴们抗议喀布尔的社会变革，在学校里跟踪不戴面纱的女性，将硫酸泼向她们的脸。[2]

阿富汗的学生激进分子从一开始就两极分化。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统一的领导，左派和右派都分裂成许多派别，反映了潜在的种族、部落和个人冲突，因敌对产生的分裂愈演愈烈。1965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正式成立。一开始，全党不过30人。经过两年的发展，党员发展到35人。35人的小团体却很快一分为二，由于塔拉基和卡尔迈勒政见不合，他们各自拥有12—15人的追随者。他们通过所创办的报纸发声，抨击政府，指责王室，视另一派为政敌。塔拉基及其追随者创办党报《人民》（*Khalq*），因此被称为“人民派”，其成员来自农村。卡尔迈勒所代表的一派因为机关报《旗帜》（*Parcham*）而得名“旗帜派”。旗帜派由城市技术官僚组成，有些人嘲笑他们是阿富汗皇家共产党（The Royal Communist Party of Afghanistan）。两大派别对立严重，几乎无法共存，其中甚至有更小的左翼团体分离出来，他们是更特殊的种族亚族或领袖。[3]

不幸的是，在“新民主”的十年里，达乌德邀请他精心挑选的左翼人士到他家中进行私下会面，试探他们的派别、忠诚度和思想，并以阿富汗的传统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联盟网络。达乌德在年轻军官中寻找朋友和同盟是很自然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旗帜派。他们团结在这位曾经的强人周围完全是可能的，当年，正是达乌德的政策，他们才得以前往苏联留学，变得训练有素、思想激进。60年代末期，喀布尔充满了活力，来自西方的嬉皮士蜂拥进来，夜店与派对的喧闹声响彻整个喀布尔。工厂越来越多，工人阶级队伍逐步壮大，学校教育逐渐普及。学生们常常因为课业上的要求（如更宽松的考核）而罢课，工人要求雇主缩短工时、提高薪酬而罢工。仅在1968年夏天，阿富汗就出现了15次学生大罢课和25次工人大罢工。与此同时，军队里的下级军官也在小声说着“革命”，大学和清真寺里的宗教学生都在妖魔化“世界末日”——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喀布尔的活力麻木了人们的感觉，但寻欢作乐的背后却隐藏着麻烦。沿着任何一条公路或从政府哨所步行几个小时，就会来到那个古老的阿富汗，乡村世界和游牧部族里的毛拉、马利克、汗仍在沿着自己的轨道隆隆前行。

1973年，查希尔·沙阿前往意大利度假。他的堂兄达乌德趁机发动政

变，夺取了国家的控制权。行动十分迅速，几乎未发生流血事件。这很可能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政变，达乌德把至少一辆劳斯莱斯轿车送去了意大利。如果你能得到它，这是一次不错的政变。核心的王室成员可能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对国家的最大威胁，必须进行遏制。达乌德已为这天做了许久的准备。他一废黜查希尔国王，就宣布自己任阿富汗的首任总统。你也许会质疑达乌德的合法性，毕竟这世上哪有自封的总统。不过，政治进步并非一日之功，美利坚合众国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也许，他只是觉得“国王”的称呼听起来过时了，“总统”这个头衔要摩登许多。

达乌德倚仗旗帜派重登权力巅峰，不过，他并不是人民民主党党员。局势一稳定，他立即着手排挤左翼盟友，把一些人降职，把另一些人提拔到无关紧要的位置，并派遣许多人到国外担任大使。阿富汗与苏联永恒的友谊被达乌德反复强调，但是，他同时又在拉拢美国的地区盟友。他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和伊朗国王礼萨汗。阿里·布托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总是穿着一身萨维尔街出品的考究西装；礼萨汗则是美国在伊朗的“钢铁侠”。三位领导人计划组建一个地区贸易联盟，并考虑签署一份集体安全条约，修建一条联通三国的铁路。苏联远远地关注着这次会谈，警钟开始敲响。

打压左派的同时，达乌德也不准备对右翼人士手软。当拉巴尼、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等伊斯兰主义者蓄谋叛乱时，达乌德镇压了他们。无奈之下，拉巴尼等人只得逃往巴基斯坦。

再度上台的达乌德保留了自己的一贯强硬作风。他用国家暴力机器镇压政敌，用从德国订购的新刑具恢复权力。[4]但是，总统很快发现，自己的铁腕手段并不足以把整个国家牢牢攥紧，社会的各个阶层似乎都要和他分道扬镳。1978年4月，两名身份不明的持枪歹徒暗杀了颇受欢迎的左派领袖米尔·阿克巴·胡贝尔（Mir Akbar Khyber）。胡贝尔之死引发喀布尔持续数天的示威活动。达乌德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内的安全隐患。在一次迅疾的行动中，几乎所有他认识的左派领导人都被逮捕下狱，尤其是人民派的各位领导。只不过达乌德行动还是不够迅疾，人民派的干将之一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事前就听到了风声，他设法让他的小儿子带着消息到人民派各位地下工作者那里，告诉他们发动政变。显然，人民民主党早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只是在等待时机。

逮捕行动刚过一两天，坦克部队的指挥官求见达乌德总统，带来的消息让达乌德大感震惊。来人声称，他得到消息，一个很大的阴谋正在

酝酿中，阴谋者计划在4月27日行动。他请总统下达指示，坦克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并将坦克部队部署在喀布尔市中心的王宫周围。

4月27日清晨，天气晴朗。整个上午，街道平静如常，难道是一场虚惊？中午12点了，近郊的山顶上传来一声隆隆的炮声。没什么好担心的，每天中午，那个地方都会鸣放礼炮计时，喀布尔市民可以据此对时。但是，那天的一声炮响，听来意味深长。果然，炮声刚落，塔克的炮塔旋转过来，对准了王宫。达乌德恍然大悟，难怪那名军官知道今天有事发生，他也参与其中，是人民派的一分子。

装甲部队当前，达乌德已经无路可逃，他退到被围宫殿的最深处。所有的家人和亲信都应召来到他的跟前。达乌德表示，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自行离开，他不会轻视他们，毕竟这已是最后的生机。不过，没有人离开。

宫外，枪声密集作响。护卫宫殿的2000名精锐禁军和叛军展开了激战。而后，几架战斗机掠过低空，朝着王宫猛烈开火。事后有人指出，这些飞机并非来自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而是来自塔什干（Tashkent），苏联人正是从那一刻起介入了阿富汗局势。不过，据我了解，尚无依据证明这一点。无论如何，对方把王宫驻防的禁军全部杀了。人民派冲入王宫，与达乌德及其家人展开正面冲突，双方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杀。达乌德拿着枪倒下了。那场政变导致达乌德及其18—30名家眷遭到杀害。不过，达乌德的名声实在骇人，哪怕他已经成为一具尸体，叛军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秘密将达乌德的尸体装上卡车，运往某处无名地点草草掩埋。他们没有透露达乌德的葬身之处，也从未提及涉事人员的具体身份。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达乌德的恐惧。30年后，其中的一名涉事者还记得那个地点，他带着一批官员发掘了达乌德的骸骨。(1)一代强人终于得以迁葬安息。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1978年4月27日，达乌德和他的全部家人死于政变，2000多名卫兵在那次政变中丧生，多斯特·穆罕默德家族走到了尽头。

(1) 2008年，达乌德及其家人遗体被发现。此时，距离1978年达乌德死于政变已过去了30年。——编者注

第19章　改弦更张

从理论上讲，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了阿富汗的执政党。但在实践中，它面临着与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样的挑战，他们必须巩固喀布尔的权力，以让广大乡村地区服膺，虎视眈眈的外国势力，也需要他们积极应对。政变之后的几天里，新政权的武装在喀布尔四处搜捕王室的漏网之鱼。能够逃出阿富汗的王亲国戚，全都已经走得一干二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民民主党官员通过喀布尔电台，宣布大局已在“革命委员会”的控制中。然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个委员会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而后，民众从电台得知，空军中尉阿卜杜勒·卡迪尔（Abdul Qadir）掌握了权力。对于卡迪尔，大部分阿富汗人觉得很陌生。这场政变来得太突然，连胜利的一方都不知道谁是赢家，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事情弄清楚。

记者穆罕默德·塔拉基成了总统、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总书记，他还是各种组织的领袖。总之，塔拉基几乎包揽了一切可能的尊衔。师范大学的前校长哈菲佐拉·阿明，则成了新政权的二号人物。

新内阁完全由人民民主党党员组成。人民派和旗帜派各占一半席位，似乎形成了力量平衡。不过，各种机要位置都为人民派所把持，并很快摆脱了旗帜派。就连卡尔迈勒也被派往东欧担任大使。两派的矛盾很快公开白热化，他们偶尔会进行西部式的疯狂枪战。最终，旗帜派纷纷败走，人民派成了最高统治者。

长期以来，人民民主党都在地下活动。尽管旗帜派参与政变、帮助达乌德重夺权柄的时候，有好些党员身份公开了，不过，大多数党员仍然是秘密的。因此，在政变后，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党员身份。

随着人民民主党的自信与日俱增，即使是级别较低的官员也开始有些跋扈起来。在整个行政系统中，就连政府高官也开始遇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尊重、不服从或随意被下属嘲笑的事件。军官们开始意识到，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指挥系统，下士可能凌驾于上校。大家不知道谁可以信任，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招来灾难，噤声不言才是最好的选择，恐惧在城中蔓延。这时，一个组织开始像海怪一样在技术官僚阶层兴起：人民民主党。这些年，人民民主党的各派别和分支一直在他们的秘密会议中制定“方案”。掌握政权后，曾经的秘密方案终于可以大大

方方投入实践。虽然没有一点治国理政的具体经验，但新政府信心满满，他们开始依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颁布法令。

从理论上看，新政府的大多数法令颇具进步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例如，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新法禁止父亲支配女儿、丈夫支配妻子，礼金与童婚也被视为非法——这与阿曼努拉试图颁布的措施相同。新法令规定为女性开设扫盲班，并规定为新母亲提供长达270天的带薪产假。

新法虽好，但范围非常有限，很难惠及喀布尔之外的任何地区。这也难怪，人民民主党的党员来自心怀不满的技术官僚阶层，而非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由于村民们没有立即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谨慎观望。随后，政府出台了一项对村民有重要影响的法令：取消农民欠地主的所有债务，宣布以土地作为抵押的高利贷非法。你知道这为什么听起来很高尚吗？过去，地主通过借贷巧立名目，将当地的穷人、亲戚和仆人牢牢束缚在农奴般的奴役之下。虽然伊斯兰教法明文禁止债权人谋取利息，不过，地主仍有办法规避教法向穷人放高利贷。不少毛拉也和地主沆瀣一气，成了盘剥农民的帮凶。农民难以偿还高额利息，不得不把土地抵押给地主。人民民主党政权觉得，取消债务能一举消灭这一罪恶，就像用斧子砍头一样。[1]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意。穷人举债通常为了两件大事：年轻男子娶妻需要一大笔钱，家里有人亡故得筹巨款办丧礼。既然新法严禁高利贷，地主和富商干脆收紧钱袋分文不借。如此一来，年轻人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除非变得富有，从而导致性和情感上的挫败感不断累积。

就连体面的白喜事也成了富贵人家的专利，穷苦百姓的身后事只能寒酸可怜，就连中等富裕家庭也为葬礼不周而苦恼不已。想想吧，家中老人故去，儿女却只能接待少数吊唁者，只能为他们提供寒酸的食物。按照阿富汗人的观念，如此寒酸的丧礼无异于辱没家门。[2]为满足传统社会诸多关键需求而建立的社会机制被一应废止，但是，人民民主党又没有建立新的机制来满足这一需求。封建领主倒是抓住机会大肆蛊惑人心，本就牢骚满腹的劳苦大众对新政府的新政策更加心怀怨愤，身无分文的穷人们觉得，政府的所作所为妨碍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在将其逼入绝境。

人民民主党还为个人拥有土地的面积规定了上限。按照新法，每个人名下的土地不得超过60公顷（148英亩）。新法实施的第一年，政府

便从各大地主手中收回了近80万公顷土地，所获土地被分给了13.2万户农民家庭。政府还宣布，下一年将把100万户家庭组成4500个农业合作社。[3]政府愿望虽好，却是重蹈了之前的覆辙——在美国受教育的赫尔曼德工程的管理者曾强迫不同民族的游牧民聚居在“模范城镇”。人民民主党认为，他们可以用行政命令创造一个人为的新单位——合作社，取代源自部落和村庄的群体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合作）。

阿富汗气候干旱，没有水的滋润和灌溉，田地即便均分到户，也无法促进生产，水的管理需要复杂的合作。几百年来，乡村地区的阿富汗人摸索出了一套找水、取水和驭水的传统办法。他们开凿井渠、壕沟，还在地下开辟了密密麻麻的坎儿井。这些传统的水利设施并不先进，却绝对行之有效。但这需要得到相应部落社会角色的支持，并与宗教、民间传统交织在一起。

如今，原本完备的系统已经全部崩溃。新政府的新规定好似一枚莫洛托夫鸡尾酒(1)，炸毁了这个完备的组织体系。在阿富汗，绝大多数地主并非身居城市、敲骨吸髓的食利阶层（当然，类似的人物也有不少）。相反，他们控制着大片土地，是当地的酋长，当地人也把这些土地视为酋长们的土地。当大片土地被分配给数百个家庭，这些家庭却没有建立起合作的社会机制，因此也无法通过合作来管理他们的水资源。为了抢夺灌溉资源，家庭之间争斗不休。到头来，没有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水源。我的表弟马扎尔当时在阿富汗居住，他记得，当时许多农民来到首都向政府投诉，说在新法实施之后，他们的土地每天得到的供水不足30秒。换在以前，同等份额的土地可以养活土地上所有居民，现在却无法养活任何一个家庭。现在虽然人人平等，却都饱受饥饿之苦。

水源之争导致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十分紧张，而且传统观念与宗教习俗根深蒂固，就连改革的不少受益者都觉得，自己获得的土地本就该是地主的产业。为此，他们甚至有些心怀愧疚。土地改革之后作物歉收，饥荒接踵而来，有关水源的争端看起来永无休止。农民们还非常担心自己会受到土改这宗“罪孽”的拖累，在死后堕入地狱。再加上礼金不足造成的婚事不遂，又让不少男性感到雄风受挫。重重困难之下，民怨自然沸腾。人民民主党那套说辞完全无法平息民愤，一项项旨在推进社会公平的施政措施，反倒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人民派政权却不觉得危机将至，因为他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阿富汗社会进行了严格分析：因为他们站在多数人一边，领导人民打倒那一

小撮剥削阶级，那就一定会获得斗争的最终胜利。对此，政府很有信心。可是，阿富汗农民并未认识到什么阶级利益，民族出身、部落关系与宗教信仰才是他们认同的起源。他们觉得，自己和地主并非阶级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亲戚。即便抛开这层血缘关系不讲，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相互羁绊，几个世纪的家族史、人际交往和情感上的相互义务与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有人说，“可汗”（khan）这个词起源于“桌布”（distar-khwan），就是指为别人安排宴会的人。[4]

菲茨杰拉德问海明威：你知道有钱人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海明威说：他们就是有钱一点而已。在阿富汗，这样的回答确实站得住脚。在宗教的教导下，农民安然接受了寄人篱下的地位，文化让他们相信，其命运会因为“好人”的慷慨而改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是部族社会的基础。农民从成为更大部落的一部分而获得一些满足感。其实，即便在美国，职员在谈到自己效劳的公司时，不也总以“我们”相称吗？身在强势多金的大企业，好些职员甚至感觉与有荣焉，仿佛劳资双方并非一层雇佣关系那么简单。想到这一点，当年阿富汗农民对于领主的忠诚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农民和领主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两周领取一次薪水、圣诞节补贴一点奖金那么简单。它还源自往代人对葬礼、婚礼、拉马丹斋戒和开斋节的共同记忆，由此带来的忠诚情感会更加强烈。

接济穷人并非领主的法律义务（而且好些领主确实为富不仁），不过，宗教传统鼓励乐善好施，慷慨会促进威望，因此，领主们也会时不时表现得慷慨一点。这点恩惠叫农民们感激不已。他们不愿疏远领主，以免被冷落。不过，人民民主党认为，农民完全无须如此谨慎逢迎。领主所谓的善行，不值得他们如此感恩戴德。相反，农民应该仇视领主，农民分配领主的土地是合理合法的，他们大可不必感到惭愧，更不用担心领主不再开恩施舍，毕竟政府会照管农民的生活。

游牧民族是阿富汗的重要组成部分，占阿富汗总人口的12%—15%。[5] 游牧民与定居的农耕民有着明显的认同差异。不过，大家并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否源自“阶级”。同一部落中，所谓“阶级利益”应该如何体现？不同的部落，所属的“阶级”是否也有差异呢？

部落控制的领地上，酋长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利益：他们用来走私的路线、多斯特·穆罕默德以来政府发放的补贴，以及用来捍卫自身利益的枪支。这些人会融入一个由“阶级利益”定义的框架吗？

尽管民主决策机制根植于每个村落和宗族，但是，不同的村庄和部落之间，很少有民主决策的经验。人民民主党政权希望血缘、历史、人

际关系不再成为部落联盟之间的权力来源，新政权建构的这个框架，其中的附属关系基于政策，但这是徒劳的。

一个正常运作的中央政府可能已经采取措施阻止接二连三的灾难了，不过，人民派政府是启思东警察（Keystone Kops）那样的革命军政府，他们不闹出悲剧才是可笑的。

人民派驱逐旗帜派之后，开启了一场残酷的内部清洗。“亲中分子”难逃厄运，其他小型左翼政党也遭到严厉打击。人民民主党执政初期，曾经大赦政治犯。事后看来，他们似乎只是想要腾出牢房，为内斗失败的一方找个合适的落脚点。

大多数人认为，政变让苏联方面也始料未及，虽然苏方早就希望阿富汗“革命”。人民民主党上台执政，苏联人自然乐见其成，但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如此天赐良机，苏联人自然不能错过。于是，他们派出“顾问”来到阿富汗，指导人民派政府。顾问的人数越来越多，仅喀布尔一地，苏联的军事、技术顾问便达到5000多人。几乎每位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军事指挥官，都能配备一名苏联“顾问”。

人民派初掌政权，手腕还不够强硬，一支高效的特务队伍似乎有助于政府施政。新生的人民派政权在克格勃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政府分支：秘密警察。其间，国内政局几经动荡，这个情报机构几易其名，最终被称为“卡德”（KhAD）。时至今日，这个恐怖的名字仍让阿富汗人闻之头皮发麻、胆战心惊。

人民派把大批敌人、对手、朋友、熟人关进了监狱，同时，他们也在竭力笼络人心。他们觉得，赢得人民爱戴和尊重的最主要办法，就是弘扬塔拉基同志的伟人风范。喀布尔的大街小巷遍布塔拉基的巨幅海报与宣传画，塔拉基被称赞是“东方的天才”“伟大的导师”。[6]塔拉基的家乡远在加兹尼省，他的童年故居已被辟为圣地。屋外红旗招展，彩灯闪烁。步入屋内，参观者可以了解塔拉基的早年生活，看一看他曾经睡觉的床、使用过的简陋餐具。

政变之前，塔拉基把家安在了喀布尔的一处中产阶级社区。他搬去王宫居住后，此地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屋内的一切都成了展品。这里有伟人曾经伏案写作的书桌，桌上有一瓶墨水、一支笔，那是塔拉基伟大思想的见证。他的鞋子与短裤，他坐在上面思考的椅子，也被展出供人观瞻。馆内的向导会绘声绘色地告诉游客，塔拉基正是坐在这把椅子上，悟出了革命的种种真理。伟大导师的小说及其他著作是阿富汗作家

联盟的研究课题，塔拉基的情感小说成了那个时代小说的范本，这是一些充满说教意味的虚构小说。[7]

奇怪的是，这场华丽的运动并非塔拉基本人发起，哈菲佐拉·阿明才是这场造神运动的总指挥。对于分配给塔拉基的每一个头衔，阿明总会给予自己相应的荣誉。塔拉基是“伟大的导师”，阿明就是“伟大导师的忠实学生”。提到这层师生关系，阿明有过一番颇为精妙的比喻：塔拉基如果是一根手指，那他就是手指上的指甲盖。因此，他这个学生将永远与伟大导师血肉相连、形影不离。

其实，阿明和塔拉基的交情远谈不上亲密。阿明心狠手辣、狡黠多智，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操纵者，行使着实际权力。至于塔拉基，不过是一个智力平平、学业不精的书呆子，他只是权力的象征。阿明并不是唯一能控制塔拉基的人，他不过是其中之一。这样看来，塔拉基与其说是领袖，不如说是大家都争相要坐上去的椅子。

竞争者中，阿明最有优势。他在党内人脉最广，政敌的把柄他多有掌握，他也最有组织头脑，正是他将人民派的成员扩大到军队，从而比旗帜派更深地渗透到军中。而且，他曾为人民民主党领导的革命立下大功。1978年4月27日，几乎党内的所有领袖都遭到了达乌德政府的逮捕。幸好阿明反应迅速，当机立断发动袭击，局势方才得以扭转。若不是阿明指挥若定，人民民主党可能已经覆灭。

诸多优势之外，阿明也面临一重隐患。苏联方面对他这个二号统帅并不信任。苏方属意的领袖另有他人，那就是卡尔迈勒。如果卡尔迈勒无法上位，塔拉基倒也勉强可以接受。早就有人指出，阿明一直在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输送情报。可能出于这个传言，苏联方面才对阿明如此冷淡。其实，阿富汗本就是国际谍战的角力焦点，身处其中的各位政客，恐怕谁都难逃“间谍”的嫌疑。不过，阿明的个人经历似乎又印证了他的美国间谍身份。60年代中期，他曾在美国留学，还是当地阿富汗学生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阿富汗学生联合会似乎和中情局有些往来。1967年，《壁垒》（*Ramparts*）杂志曾经刊文披露过一桩秘闻，一个名叫“亚洲基金”的半政府组织曾向阿富汗学生联合会提供金钱，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亚洲基金”的幕后金主。

传言可能是假的。[8]不过，苏联方面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阿明不希望阿富汗被纳入苏联阵营，成为其名下的附属。他希望阿富汗像南斯拉夫，或至少像阿尔巴尼亚那样，作为强硬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不结盟的国策。如此一来，他才能给自己和国家留出一些自主空间。

可是，阿明想得轻松，苏联人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1979年2月14日，喀布尔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事件的缘由，也许就和阿明与苏联人之间的冲突有关。当时，距离政变已经过去9个多月。情人节当天，一伙武装分子劫持了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阿道夫·杜布斯（Adolph　Dubs）。没错，即便人民民主党已经执掌政权，美国政府也没有选择与之断交。美方仍然希望在阿富汗保留一些影响。阿明的不结盟意愿激起了美国人的这种希望。据称，劫持案的元凶来自一个“左派中的左派”（chupi-i-chup）的团体（类似的团体其实不在少数，只是成员寥寥，很难称得上“党派”）。几名绑匪出此计策，据说是为了迫使政府释放身陷牢狱的自家领导人。不过，如果他们真的怀此目的，为什么要针对美国大使下手呢？要知道，美国政府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没有任何影响力。想要当局服软，绑架苏联大使似乎更有效，毕竟这是一个充当苏联代理人的政权。

此外，一般的绑匪会将人质藏匿在隐蔽处再提出要求，这几位劫持者却偏偏把美国大使带到了喀布尔酒店！在喀布尔，要数这座酒店规模最大、名声最响，而且，它就位于城市中心，是在阿富汗工作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下榻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安保措施十分完善，绑匪一旦入内，插翅也难逃。不管他们冒险的结果如何，总之，这是一个奇怪的决定。

美国大使馆向阿富汗政府提出和绑匪直接接触，因为他们知道怎么通过言语来击垮绑匪，救出人质。不过，人民民主党政府一口回绝了美国人的要求——这是克格勃专家的建议。阿方声明，解救人质一事应由阿方全权负责。他们确实快速组织人马展开了营救。一个突击小队冲进了绑匪所在的房间，一通扫射之后，房间里包括人质在内的所有人都被打死。短短的几分钟，问题都解决了。

不出所料，美国大使馆关闭，美国断绝了与阿富汗的外交关系，阿明的自主梦想走到了尽头。阿富汗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依赖苏联的援助和保护。神秘的阿道夫·杜布斯事件，使阿富汗进一步接近成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接下来的一个月，阿富汗境内再次发生绑架事件。一群叛军在赫拉特绑架并杀害了9名苏联专家。事后不久，几架军机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起飞，轰炸了赫拉特。城市的三分之一被夷为平地，死难者人数更是多得叫人心惊。很多观点认为，赫拉特空袭共造成25000人死亡（不过，苏联和一些左翼作家坚称这一数字不超过

800人）。[9]

赫拉特城内尸横遍野，苏联方面却一再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阿明瞅准这个能树立自己令人生畏的执行者威望的机会站了出来，表示赫拉特事件是他的命令。与此同时，白沙瓦的一批阿富汗流亡者也在为绑架杀害苏联人的“功绩”而争论不休。喀布尔大学的知名学者拉巴尼声称，该事件由他一人策划，正因如此，当局才会血腥报复。拉巴尼的对手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抗议说，不是拉巴尼，而是他组织了导致这种破坏的行动。总之，他们都在争先恐后地要为大屠杀负责。

与此同时，宗教激进主义使整个地区对阿富汗共产党政权的好感度越来越低。与阿富汗的政变不同，邻国伊朗经历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最终，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他国，霍梅尼开始统治伊朗。这场巨变发生于1978年，它标志着一场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巴基斯坦的宗教极端分子也已夺取政权。1977年，阿里·布托涉嫌贿选的丑闻被曝光，反动宗教组织立即借机发难，所掀起的抗议大潮卷走了布托手中的权力。伊斯兰派军方领导人齐亚·哈克成了巴基斯坦的新总统。哈克一上台，立即对布托进行了审判，判他有罪。在全世界惊愕目光的注视之下，阿里·布托被判绞刑。巴基斯坦的世俗化改革就此走到了尽头。

人民民主党上台之前，喀布尔也曾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大本营。如今，他们全都移居到了巴基斯坦。齐亚·哈克看到了机遇，他觉得可以通过扶植这帮人，来削弱阿富汗这个令人头痛的强邻。

阿富汗国内的局势同样也不平静。努里斯坦（Nuristan）一带的农村地区不断爆发新的叛乱，阿明和塔拉基只得一次又一次地“请求”苏联增加各种军事援助。很快，军事顾问已经不能满足阿富汗当局的要求。于是，整编整队的苏联陆军与空降师开始介入阿富汗政局。

即便苏联方面出手相助，人民民主党仍在节节败退。苏联政府觉得，一切乱象都与阿明息息相关。在苏联看来，阿明有三大罪，完全不可饶恕：第一，此人性情暴虐。由于他施政不当，才煽动了阿富汗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仇恨情绪。第二，此人毫无指挥才能。他煽动叛乱，却又无力平息。其三，不服从命令。总之，苏联人已经认定，塔拉基固然愚钝，却也好过刚愎自用的阿明。1979年夏末，塔拉基受邀前往古巴，参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会议。返程途中，塔拉基被告知请他前往莫斯科会晤。在克里姆林宫，塔拉基接到暗杀阿明的指示——在阿明靠近飞机时，伺机将其打死。暗杀之事非同小可，苏联方面也足够谨慎。克里姆林宫的会晤，只有塔拉基一人获准参加。不料，塔拉基身边的随扈

当中，早有阿明埋下的暗桩，他们在塔拉基的西装口袋中装了窃听器，苏联人的一切密谋都在阿明的掌握当中。

离开莫斯科之前，塔拉基已经通知他在喀布尔的四个亲信做好准备，命令他们在机场杀死阿明。然而，当塔拉基的飞机飞至首都上空，飞机却并没有立即着陆，而是盘旋空中、绕来绕去。塔拉基的四名手下按时来到机场，环顾四周，却不见机场工作人员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阿明的枪手。显然，这里就是一处陷阱，四名杀手倒成了猎物。就在塔拉基的座驾开始缓缓降落时，阿明现身了。他走下自己那台白色大众汽车，对四名杀手笑脸相迎。然后，他又迎向塔拉基。整个过程，阿明不卑不亢，神色难掩轻慢。两人握手时，阿明向那四个人点点头，并对塔拉基说："您还是让他们先走吧！"

一场暗杀阴谋被挫败了。接下来，塔拉基和他那四名杀手又应怎么办呢？五个人秘密碰了头，都显得很是心焦。他们必须赶快除掉阿明，否则，苏联人那边可不好交代。思来想去，塔拉基决定宴请阿明共进午餐。他们计划提前在王宫的马桶上绑一枚定时炸弹。一旦阿明进入洗手间，便锁上门，启动炸弹。随着"嘭"的一声，心头大患就解除了。

厕所炸弹这样的圈套，显然难不倒狡猾的阿明。他提前两个小时来到宴会现场，这时，塔拉基的四个亲信还在手忙脚乱地准备炸弹。伟大的导师和两个卫兵站在楼梯上，看到自己那位忠诚的学生走上楼梯时，当机立断，命令身边的卫兵开火。突袭迅速夺去了阿明随从的性命。不过，阿明从台阶上滚下来，他拔出手枪，奋力还击。就这样，阿明且战且退，朝着自己的座驾逃去。

阿明得救了，他又搬来部队回到王宫。那天之后，塔拉基再也没在公开场合露面。据政府报纸报道，他病了。三周之后，官方发布了一则只有四行字的短讯：伟大导师塔拉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死于自然原因，从今以后，他的职务将由他忠诚的学生阿明承担。[10]

苏联一向担心阿明会出尔反尔，这种担心随着一场政变而成了现实。手握大权的阿明立即决定和苏联划清界限。他派出代表前往几个重要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进行访问。阿明此举，显然是想拓展外交空间。同时，他也在加紧平定叛乱。阿明为此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一场国内争端，他就采取了刑侦、镇压、折磨乃至空袭等手段。阿明觉得，唯有如此，他才能摆脱对苏联的军事依赖。不过，尽管他费尽心力，武装叛乱的形势却日益严峻。

苏联方面觉得，如果放任阿明继续执政，阿富汗的局势迟早会变得无法收拾。一旦人民民主党倒台，美国人可能会展开报复。1978年，美国已经失去了伊朗国王这个重要盟友，阿富汗也许会成为伊朗的替补。如上种种可能，叫苏联人再也无法袖手旁观。苏联的不少高层都觉得，应将阿富汗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就像苏联曾在1956年军事介入匈牙利局势，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预那样。

当年10月，一个苏方代表团来到阿富汗进行访问。代表团由60多名高级军官和一名俄罗斯高级将领组成。他们此行怀着一个不便透露的目的——侦察阿富汗地形。据此，苏方可以作出判断，入侵阿富汗到底可不可行。侦察一圈之后，总参谋部还是难下决定。他们觉得，当下似乎并非出兵的最好时机。当时的苏联仍在勃列日涅夫的铁腕掌控下，腕力虽还强劲，手臂却不住地在颤抖，指挥这只手臂的大脑更是有些不听使唤、稀里糊涂。总之，勃列日涅夫已然年老体弱。到明年，他就将一病不起。在那之后的两年，苏联将由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掌舵，幕后那些穿着黑大衣、戴着紫貂帽的官僚们则在为最高权力展开激烈斗争。但即便阿富汗幅员狭小、经济贫弱，在这种情况下入侵恐怕也不是时候。

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编写的一份文件显示，入侵阿富汗的决定直到入侵开始前的13天才最后作出。[11] 此时，零星的苏军部队才慢慢开拔前往塔吉克斯坦。一支8万多人的预备役部队就此集结起来，他们被称为“第四十军”，也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主力。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他们的家乡与阿富汗接壤。如此安排，还暗含苏方高层的一番苦心。如果苏军与阿富汗人语言相通、容貌相似，那么他们一定心心相通，阿富汗的百姓应该不至于对这些不速之客特别反感吧？可是，参谋总部的将军们这次却打错了算盘。阿富汗是个多民族国家，其中又以普什图人人数最多，无论文化还是语言，普什图人甚至都不是阿富汗北部突厥人的近亲。

第四十军的指挥官名叫伊万·帕夫洛夫斯基（Ivan Pavlovsky）。11年前，他曾挥师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武装终止了“布拉格之春”。苏联高层对帕夫洛夫斯基寄予很高的期望，既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能取得成功，那么阿富汗应该也不在话下。两个国家似乎差不多，东欧的战略经验自然适用于阿富汗：采取雷霆手段，镇压所有敌人和潜在的异己，让坦克部队在街上巡逻几个星期，待一切恢复平静，再扶植一个亲苏政府重建秩序。苏联人的计划就是如此简单而想当然。

1979年12月下旬，第四十军在边境集结。圣诞节的前一天，一支空

降兵部队在喀布尔附近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着陆，军队悄无声息地进入城市，在街上呈扇形排列，城中的军事要塞与政府机关都被占领。与此同时，第四十军的工程兵先遣队正在阿姆河上搭设浮桥。跨过这条宽阔的水带，就是阿富汗的北疆。12月27日，桥梁终于完工，苏军的大部队正式踏上了阿富汗的领土。当时，那支部队的士兵并不知道他们真正的任务。此前他们曾经接到通知，边境地区有一股“匪徒”已经破坏了和平。因此，他们以为此行的目的地就在边境地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部队很快接到最新命令，要他们沿着高速公路开赴喀布尔！他们脚下的这条通衢大道，正是20年苏联赠予阿富汗的礼物。

12月28日，喀布尔被苏军完全占领。打头阵的空降部队第一时间就将总统府置于控制之下。苏联人的突然袭击对阿明自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他也不知如何应对。喀布尔城外的广大农村居民对他和他的政党恨之入骨，因此他无法向他们寻求帮助。他也不能指望城市居民支持他，因为这些人无不惧他三分，鄙视他所在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在党内，有一半的干部属于旗帜派，和阿明所在的人民派不共戴天，旗帜派上下隐忍已久，一直试图反击。既然如此，阿明只能依靠人民派的战友。可是，他们都很清楚，阿明就是杀害塔拉基的凶手。虽然不少人都觉得塔拉基酸腐无能、难堪大任，但曾经的伟大导师到底也有一帮忠实的拥趸。即便是身边的亲信随从，阿明也无法完全信任，他只能把自己这条命托付给苏联人指派的“保镖”。这些“保镖”来自苏联的反恐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Spetsnaz），他们受过专业严格的训练，是个闻之令人胆战心惊的组织。和苏军一样，来到阿富汗的阿尔法小组也身负使命。当其他部队走街串巷的时候，特种兵也开始了忙碌。就这样，苏军的大部队开进喀布尔时，阿明已经死了。事后，苏联方面对阿明的死因进行了调查。相关的报告汗牛充栋，但其死因却仍不清楚。有些报告认为，阿明是死于枪杀；也有调查者指出，阿明似乎有遭遇窒息的痕迹。不过大家一致认为，阿明咽气之前，似乎已经身中剧毒。

按照苏联人的说辞，阿明是死于阿富汗野心家的谋杀。苏联人不得不这么说，以证明他们是被邀请才进入阿富汗的。不管阿明是怎样的人，不管他是怎么得到权力的，当苏联人到来的时候，他是阿富汗的国家元首，是唯一能向苏联发出邀请的人。苏联人第一次通过邀请进入阿富汗，就是为了杀害东道主的事实，自然不能公之于众。

经过苏方安排，旗帜派的领袖卡尔迈勒成了阿富汗的新总统。苏军入侵之前，卡尔迈勒一直避居在苏联。他选择出走他国，也是由于党内

的派系斗争太过激烈。苏联人的一种说法是，正是卡尔迈勒提出请求，他们才会来到阿富汗。简而言之，他们是被一个不在阿富汗（直到苏联把他带进来）的人“邀请”到阿富汗的。他们总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1)　一种土制燃烧弹的别称。——编者注

第20章　苏联入侵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台之后，人民民主党政权也准备重整旗鼓。肃清乡村地区的反叛势力，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些穆斯林反政府组织通常被称为“穆贾希丁”（mujahideen），即“进行圣战的人”，或“圣战者”。苏联入侵之前，“穆贾希丁”仍以常规部队的形式运作，并未转入游击斗争。他们与政府军进行激烈的枪战，势均力敌，政府军的装备虽然精良，但并没有好出太多。

苏联人的到来，让这场对峙彻底失衡。装备方面，苏军的优势实在过于明显。他们出动的坦克、战机和大炮，很快就把“圣战”武装逼入了绝境。不到几个星期，“圣战”武装似乎就无力反击了。当然，比起当年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圣战”武装的抵抗还要持久一些。城市里，秘密警察加紧活动，任何涉嫌反政府的人都遭到了逮捕。哪怕只是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也会被带到喀布尔的普里恰希（Pul-i-Charkhi）监狱。每天晚上，都有大批嫌疑犯遭到秘密处决。

2月22日的一起事件，实实在在地震撼了苏联人。当天，喀布尔的居民在院子里、屋顶上高喊“真主伟大”（Auah-u-Akbar）。喀布尔的每个角落都在发出这样的呼喊，苏联人根本无力阻止。况且，当时正值夜晚，城市没有配备探照灯，由于苏联占领军和当地居民杂居共处，轰炸与炮击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苏联人试图通过发射火箭弹来掩盖鼎沸的人声，但人们的声音更大了，反而淹没了火箭弹的声音，就连邻近的村庄也听到了城里的动静。于是，村民也加入其中。一整晚，喀布尔及其近郊，“真主伟大”的呼喊声始终未绝。当然，如上的行为并不足以证明参与者的宗教热情。他们选择如此表态，只是因为这句话实在通俗易懂、人尽皆知。唯有高喊“真主伟大”，他们才能向占领者表明一种态度：我们是阿富汗人，我们反对你和你的傀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苏联占领军面临的麻烦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真主伟大”的呼喊声余音未了，喀布尔各大学校的学生又涌上街头举行抗议。前来平息事态的警察和一群女性示威者正面相遇。女性示威者对他们又是嘲笑，又是唾骂，直指这帮警察不是男人。她们甚至摘下头巾，套在警察的头上。一些警察并未粗暴对待她们，反而倒戈相向，

成了各位女性的支持者。不久，中学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后来，示威人群中甚至出现了不少孩子摇旗呐喊的身影。面对他们，警察自然不好随意使用暴力。但是，当局豢养了好些流氓走狗，即便游行群众只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一位名叫娜希德的女学生，便成了屠刀下的牺牲品。在一次游行活动中，娜希德走在人群的最前方。身边的同学纷纷中枪倒下，她仍毫不畏惧。那一刻，娜希德甚至单膝跪地，把遇害同伴抱在怀中。最终，一枚子弹夺去了娜希德的生命。她成了大家心目中抵抗运动的象征。过去，阿富汗也曾有过类似的女中豪杰。迈万德之战中的马拉赖面对入侵的英军，也是一样的英勇。人们视娜希德为新时代的马拉赖。

这时，负责平定农村的苏军发现，打败和驱散“圣战者”的军队并没有解决问题。“圣战”武装退入山区，反倒加大了苏军清剿的难度。他们的藏身之处地形崎岖，大大小小的村庄分布在无边无尽的山野里。每一个村落都是“圣战”武装的根据地，“圣战者”们自觉是在捍卫信仰，要驱逐不信神、不信主的可怕敌人。他们的队伍化整为零，成员超过100人的武装已经算是大型的，更多的是20人左右的小部队。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反苏力量都有20人的规模。抵御这场侵略，不一定要是任何组织的一部分，单枪匹马照样可以对苏联人造成打击。喀布尔的事件已经给苏联人提了个醒：没有秘密集会，不用有人提出行动纲领，只要一声“真主伟大”，就能引起阿富汗人的集体反应。这好像就是一种使命感，早已渗透进阿富汗人的灵魂，从而产生一种智力上模糊但情感上强烈的群体意图、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即“我们”团结起来，与庞大的邪恶势力作斗争。

有了这种情绪，任何团体，无论有组织的成年男性，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构想出一种使命，通过谋划计策，向入侵者发动进攻。他们只管自己行动，不用考虑什么大局。而且，敌人在这里很容易辨认，毫无隐蔽的余地。

没错，敌人根本无从隐匿，苏联人个个长着外国脸，其盟友的穿着也足够惹眼：西装、衬衫、军便帽，这些玩意儿明显属于城里人。到了游击战场上，它们就是敌人的象征。偏远山区的反抗武装也很好辨认，他们穿着长长的衬衫、肥肥的裤子，戴着头巾，他们视谋杀为高尚的爱国行为，而非犯罪。

敌人不但惹眼，而且总会自己送上门来。政府不断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向人们宣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人民民主党政府将为他们做什

么。每个村子都建立了委员会，政府寄望该机构能够发挥作用，在管控地方局势的同时，也能推进苏联的发展项目。苏联人及其附庸政权满心以为，随着农村的形势安定下来，发展项目开始取得成果，村里一旦通电、通路，村民一旦能够享受外界的商品和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所有反抗活动都将偃旗息鼓。有了丰厚的物质生活，农民就会认识到革命的种种好处，就会理解并拥抱这场革命。

但是，政府派出的工作队总是由几名苏联顾问、一名或多名秘密警察、一些内政官员（掌管警察与监狱）、几名人民民主党的干部以及政府雇用的一两位毛拉或穆斯林学者组成。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人不可避免地看上去像装模作样的走狗。工作队也很明白，这里的人民并不欢迎自己。于是，每次工作队入村工作，都要带上十几个卫兵。

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工作队也就那么回事。这些人一看就是远道而来，他们的衣着跟可恶的侵略者别无二致，荷枪实弹的士兵与他们如影随形，装甲车保护着他们开进村庄。而后，他们会找到村里的长老，招呼大家听取讲话，宣传政府要为村民造福。第一件福利，就是让村里的女性接受教育。讲话的时候，村里的所有女性都要到场。工作队将对她们进行现场筛选，挑出适合的人接受教育。

教育问题之外，工作队还很热心土地改革。村中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他们总要在第一时间予以掌握。随后，地主们会被通知，政府已经剥夺他们的一切资产，他们的土地将被分给农民。曾经的农民成了土地的新主人，而原来的地主则要为农民打工。就这样，土改就算完成了。

男人为什么要掀起战争？阿富汗的一则谚语回答了这个问题：为钱，为地，为女人！话虽粗鄙，倒也不是没有道理。村民们怀疑政府领着外国人涌进村庄也是怀着这样的目的，天晓得村里的女性会接受怎样的“教育”。

工作队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们原本以为，落后的乡村会在一夜之间进步起来。哪曾想到，工作队却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冲突。武器落后的村民自然成了斗争的输家，横死的人因此不在少数。可是，工作队还得开展工作，还得要求村民“让家中的女人接受教育！”[1]他们的帮扶对象，很有可能在冲突中失去了亲人。因此，工作队离开之后，“圣战”武装很快就能夺回局面。在他们的煽动下，村民们纷纷昂起斗志，他们要赶走这帮外国来的恶魔，为亲人报仇，夺回失去的土地。

同时，在乡村地区活动的苏军也发现，他们似乎陷入了一场必输的战争。战争极度血腥，那些支离破碎、不成规模的部队（对方的人数实在少得可怜，几乎不能称之为“部队”）总能占得先机，他们从不与苏军正面冲突，唯有遇上有利时机、进入有利地形时，才会选择出击。

苏联军官彼得罗夫少校的遭遇很能说明当时的战况。1982年3月，彼得罗夫受命前往一个叫作舍尔汗卡勒（Sherkhankel）的乡村附近，那里隐匿着40名“圣战分子”，他的任务就是全歼敌人。彼得罗夫打算趁着夜色发动突袭。其间，炮火会为他及其手下提供掩护，会有四架直升机飞抵现场助阵。行动那天，彼得罗夫一伙盯上了一队人马，他们觉得这些人即是“圣战”武装无疑。他们一路追击，走上一条小路。路的一侧是一堵泥墙，另一侧是水渠。显然，彼得罗夫被诱进了埋伏圈。但他们并未察觉，也没有半点畏惧。他以为对方的武器非常落后，持有的步枪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不料，手榴弹突然爆炸，机关枪和火箭炮的声音渐次响起。“圣战者”从墙洞后面突然发起攻击。几分钟过去，大惊失色的彼得罗夫才稳定心神，决定予以还击。可是，一转眼，“圣战”武装就钻进了地下灌溉水渠或山洞，消失得无踪无影。苏联士兵只得不停地朝岩石和泥土射击。[2]其实，从1879—1880年，英国军队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苏联人本该从历史中汲取一点教训——阿富汗人一向神出鬼没。

在阿富汗战场，苏联军队空有精良装备，却奈何不了对手。他们对这里的地形一无所知，很多地方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苏军的坦克与装甲车无法进入。没办法，坦克部队只能留守城市，穿梭巡逻。所谓的车载炮台，同样不适合山地作战。喷气式战斗机倒是可以精确锁定敌人的方位，不过，对方的移动速度实在太快，飞机无法瞄准，更别提火力打击。藏在深山中的游击队甚至总结出了一套规避空袭的有效战法：任何细微动静都会惊扰山间的飞禽，当看到远处的鸟儿成群飞起时，便意味着苏军的侦察机即将到来。收到信息的穆贾希丁会舒舒服服躲进山洞，让风尘仆仆赶来的苏联人扑个空。[3]

苏军发现，“雌鹿”武装直升机大概是唯一真正有用的军事装备，它们可以飞进峡谷，悬停在山谷上空，机上的苏军一旦发现“圣战者”的踪迹，便可以伺机打击。问题在于，不少“圣战”武装也有了苏制武器。这些武器要么来自被俘或战死的苏联人，要么拆自苏方的坦克。此外，境外的盟友也在向他们提供军事装备。苏制机枪的射程足以覆盖300码，为求安全，直升机只能与之保持安全距离，这使“雌鹿”的威力大减。

退一万步讲，即便苏军及其代理人控制了深山与荒漠，也不意味着大局已定。唯有彻底消灭“圣战”武装，他们才能彻底安心。可是，赢下一场战斗容易，要想把所有“圣战者”逼入绝境，却是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几乎所有的“圣战士”都来自乡村地区。从外貌上看，他们无异于普通农民，举枪战斗并非他们的全职工作。放下武器，他们仍过着耕耘田地、放牧羊群的普通生活，也会费尽心思筹备婚礼，反正喜事的风头绝不能让隔壁村的表亲抢了去。

过活之余，“圣战士”会不时出击，他们时不时就能干掉那么一两个侵略者，而后，又一头躲进附近的村庄，消失得无影无踪。那里的亲戚朋友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掩护。也许在工作队的宣讲场合，他们也曾驻足聆听。待敌人的大部队离去，他们又会拿出武器，杀死政府派驻村里的代理人。

“圣战者”中的大多数和外部世界几乎没有联系。因此，政府无法通过切断其与外界的补给线来打败他们。他们的后盾往往就是自己的家庭。不少村民虽和他们非亲非故，却乐于收留他们、保护他们。毕竟，他们和村民同气连枝，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圣战者”不用担忧后勤问题，苏联军队可没有这个便利。苏军的补给线路常常遭到“圣战士”的重点打击，桥梁遭到破坏。“圣战者”还会守在通衢大道的一边，等待苏联人的补给车队自投罗网。小规模的伏击战中，他们总在暗地躲藏，让苏联人的车队无所遁形。这场战斗是不平等的，苏联人要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

最后，苏联的军事决策者做出了决定命运的决定——剥夺“圣战者”的后勤优势，切断“圣战者”与人民的联系，把人民赶出农村，这在他们看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此，这场可怕的战争进入了最为恐怖的阶段，一个永远不应从耻辱的历史中消失的阶段。苏联人采取各种手段，人为地减少农村人口，他们对乡村地区进行密集轰炸，让战斗机在田地上空飞来飞去，散布地雷，使大部分土地难以耕种，甚至无法耕种。他们在空中扫射牲畜，把它们击成碎片，他们觉得，如此一来，“圣战”武装便拿不到任何补给了。这也顺便迫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样一来，苏联可以用装甲车和大炮控制他们。当然，如果这些乡下人逃往他国成为难民，苏联人也算达到了目的。1985年的战事尤为血腥。到当年底，已经造成约100万阿富汗人丧生，另有600万阿富汗人背井离乡成为难民，他们大多逃到了伊朗或者巴基斯坦。

大多数的阿富汗家庭并未举家出逃，敌人的残暴激起了人民的义愤，他们决心抗争到底，直至流干最后一滴血。有战斗力的适龄男性会把家人护送到国外的难民营，然后折回家乡继续战斗。无数个阿富汗家庭就此离散，整个国家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阿富汗人向来崇尚阳刚，男孩小小年纪就被教育要隐忍顽强。父兄的体罚责打，算是铸就男儿本色的必修课程。真正的阿富汗孩子，应该对此一笑置之。亲人的一顿严厉鞭笞，是关爱的体现。男孩甚至应该感恩戴德，感谢长辈给了他们一次长大成人的机会。

阳刚，并非粗暴的代名词。在正常的教育环境下，阿富汗的男孩除了保持勇敢坚韧的品质，还得学会为家族争光，有辱门风的事情，他们绝对不能做。尊重长辈，怜惜幼子，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好多阿富汗男性都喜欢和自己的孩子腻在一起，爱抚、亲昵，丝毫不觉得有损面子。身为男人，还得不顾一切地保护家中女性——在这方面，阿富汗男性甚至有些过分踊跃。按照阿富汗文化，完美的男性应该拥有救济穷困、帮扶弱小的慷慨品质和阳刚的男子气概。

抗苏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男性奔赴战场。他们告别亲人，脱离了原来的乡村环境。身边不再有父母妻儿，同伴都是年纪相仿的大老爷们。战争异常血腥，耳濡目染之下，阿富汗整整一代男性的心理渐渐变异，阿富汗的民族性格也开始发生扭曲。在笔者看来，那场战争的一大恶果正在于此。

遍布全国的地雷也在戕害阿富汗人的身体。苏联人挖空心思，设计了一种新型武器。它看上去像玩具，内里却暗藏玄机。其中的炸药虽不会致死，却足以带来终身残疾。苏联人放出这种东西，主要是想吸引孩子的注意。他们如此苦心孤诣，不过是为了拖住阿富汗全民抗战的步伐。毕竟，孩子一旦死去，大人会将其就地掩埋，然后继续前进。但是，一般家庭都不忍抛弃残疾的孩子，由于行动不便，他们的脚步会被拖住。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难民营，精疲力竭的一家之主没准会选择留在他乡，而不是回国抗战。从纯科学的角度考虑，这些类似玩具的地雷是解决军事问题的聪明办法。

如今的阿富汗境内，还留有不少地雷。种下地雷的人，大多是生活在苏联某个破败地区的中年男子，而发明这一“科学”方案的人，大部分已自然死亡，不在人世了。[(1)]

(1) 事实上，阿富汗境内遗留至今的地雷主要出自“圣战士”之手，内战期间，地雷成了各种武装斗争的杀伤性武器，被不加区分地投放到阿富汗各地。地雷数量之大、分布之广，使阿

富汗成了当今世界上受到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编者注

第四部分　旧阿富汗的爆发

多斯特·穆罕默德开创的事业几经转手，又轮到纳迪尔一家继承。阿卜杜尔·拉赫曼和阿曼努拉曾经为之耗尽心力，奋斗一生，却收效甚微。而后的穆萨希班兄弟自然变得更加审慎，通过雷霆手段，让这个列强环伺的国家巩固在一个全能中央的统治下。喀布尔的统治精英把发展视为一切的关键。冷战期间，中央政府坚持战略不结盟，如此一来，东、西两大阵营都能为阿富汗提供资源，中央政府才有修公路、建学校、设邮局、架构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本钱。果不其然，所有这些从首都开始的发展，使喀布尔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无论其规模、实力，还是文化优势，喀布尔都已经把国内的其他城市远远甩在了后面，其他城市加在一起，也难以和首都匹敌。如火如荼的基础建设，催生了一个强大的新技术官僚阶层，他们的出现，对旧贵族阶层形成了挑战。前者拥有的技能和知识，胜过后者仰仗的宗教背景和部落出身。喀布尔成了阿富汗农村的帝国存在，中央政府建立的各种制度，对阿富汗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挑战。新喀布尔与旧阿富汗之间的拉锯战，变成了现代与传统、国际主义与狭隘主义、世俗法律与沙里亚法、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城市价值观与乡村价值观之间的较量。纳迪尔·沙阿王朝似乎注定要成功，古老的阿富汗正在节节败退，失去动力。

不过，旧势力并没有放弃抵抗。新旧两股力量渐行渐远，矛盾在步步加深。阿富汗社会看似稳定，不过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平衡不是稳定，终有一天，对垒中的一方会败退而去。重重矛盾之下，失衡的那一刻便意味着天崩地坼。在城市阵营内部，激进分子竭力反对温和派，以推动更大力度、更快速度的世俗化改革。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夺取政权，并非贫与富的决战，也不是农民对地主的革命，而是城市精英阶层内部关于如何追求喀布尔帝国长期目标的一次暴动。

然而，真正的冲突不在喀布尔内部，而在喀布尔和农村之间，双方的决战还未到来。苏联人闯入阿富汗，是为了防止美国人的干涉。但他们不必为此费心，阿富汗新兴的左派可能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全球对抗势力中的一方，但他们的对手却感觉不到与任何一方的联系，这些都不是美国利益或理想的代言人。在国内，这些人是古老阿富汗的象征，历经阿卜杜尔·拉赫曼等几代君王的剿杀，仍然屹立不

倒。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代表着全球政治中的一个新因素——伊斯兰革命派。总之，阿富汗的国内冲突和冷战没有多大关系，这场冲突只是阿曼努拉和萨考那个时代，乃至更久以前一场悬而未决的阿富汗争端的爆发。苏联人的介入，打破了过去140年来精心设计的平衡，为被喀布尔的现代化改造压制的势力打开了大门。

第21章　穆贾希丁

有人说，唯有面对外国侵略者，阿富汗人才会团结一致，但这只是一种不理性的刻板印象。苏军入侵不到一年，就已有80多个抵抗组织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展开活动。[1]这些抵抗组织大小不同，政治倾向也存在一定差异，有些来自自由主义左派，有些则出自传统的民族主义阵营。但是，大多数抵抗组织都打着捍卫伊斯兰的大旗进行战斗。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把阿富汗的抵抗力量称为“穆贾希丁”。

既然大多数抵抗组织拥有一致的目标，对抗同一个敌人，他们为什么选择各自为战，而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各位读者没准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些组织的凝聚力并非源于意识形态的立场或某种思想，而是基于领袖的个人号召力和他们的盟友。组织之间你争我夺，各个领导人都想攫取这场抵抗运动的指挥权。不过，他们都不想接受别人的领导，不愿和其他组织合并。在阿富汗的文化传统当中，领导地位仍然要回到相关的人际关系网络上来，在艾哈迈德·沙阿那个年代就是如此，即使到了1985年，也仍是如此，人民民主党和穆贾希丁也要这样做。

当然，白沙瓦聚集了80多个抵抗组织，并不代表阿富汗国内就有相应的80余支武装。白沙瓦的大多数组织都是独立的实体，如果有联系，也只是和阿富汗国内武装有微弱的联系，也许有几百个，也许多达数千个。总之，白沙瓦的组织和阿富汗国内武装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恩惠和交易基础之上的。

恩惠？交易？没错，白沙瓦的“圣战”组织领袖本质上是集资者，他们从世界各地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金钱和武器。某些组织的金主远在沙特阿拉伯，有些则依靠伊朗过活。北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革命党，也是不少“圣战者”仰仗的资源所在。

而且，从一开始，就有少量金钱和枪支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流出，只不过这一类赞助并不会直接交到“圣战者”的手里，而是流向巴基斯坦政府，后者再把援助物资分配给他们喜欢的人。正因如此，大大小小的“圣战”领袖必须竭力讨好巴基斯坦政府，只有如此，才能分得一杯羹。

负责分配援助物资的职能部门是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ISI）。表面上看，三军情报局不过是巴基斯坦军队下属的间谍机构。与陆军或空

军相比，三军情报局掌握了军内的大小机密，它虽是一个很小的组织，但是，作为各军事部门之间的联络人，加上巨额的西方援助，三军情报局权势滔天。对于这笔巨额资金，三军情报局完全可以自行支配，不会有任何部门提出异议，更不必对其作出的选择负责。巴基斯坦政治体制内的这个秘密集团之所以能在穷凶极恶的阿富汗武装分子中获得制高点，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一支最为凶恶的军阀。

金钱、武器一旦到手，身在白沙瓦的“圣战”首领会立刻招兵买马，在阿富汗组建起一支武装。只有拥有稳定资源的领导人，才能拥有稳定的追随者。得到金钱、武器的武装分子，则会为了问鼎全国而继续征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入侵者面对的敌人，并非某一派别的政治势力，也不是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苏联人只是稀里糊涂地闯进了阿富汗特有的纷乱世界之中。

“圣战者”希望有一天能统治的国家，不仅已经四分五裂，甚至涣散到了原子状态。农业和制造业几近崩溃，除了走私宝石、军火和毒品交易，国民经济如同一潭死水。阿富汗人只能指望外国援助来求得苟活，城市依靠苏联人的金钱，乡村地区则生存在阿拉伯势力和西方世界的羽翼之下。其实，大多数西方援助没能抵达阿富汗的第一线。三军情报局的诸位官员妙手空空，用西方人的援助填满了自家的钱袋。该组织好像一个国中之国，滚滚而来的战争财让白沙瓦的“圣战”领袖也获益良多。阿富汗百姓得到的，却只有无尽的战争和暴力。

在白沙瓦，诸位首领不但要讨取三军情报局的欢心，还要争夺拥趸的爱戴。大家兴兵造反的目的，都是“保卫伊斯兰”。在这种情况下，标榜“温和中正”的组织可没有什么竞争力。大家无不觉得，“温和中正”之类的说辞，更像是战斗乏力、信仰不坚定和意志薄弱的表现。要想从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众多武装中“最虔诚”的。不少“圣战者”都把建立“伊斯兰国”当作终极的奋斗目标。其他人只能作出更强硬的表态，试图把对手的豪言壮语贬斥得好像无神论者的呓语。经过这样一番竞争，“圣战者”的整体倾向自然愈发极端。早早闯出名声的宗教极端分子最能得到手下的拥护，也最容易得到三军情报局的青睐。

三军情报局虽然拥有广泛的资源，但并非所有援助都通过它来提供。阿富汗境内的什叶派武装大多听从伊朗的指挥，曾在19世纪遭到残暴“清洗”的哈扎拉人，是阿富汗什叶派武装的主体。面对苏联入侵者，哈扎拉人坚决抵抗。但是，他们不愿与逊尼派主导的白沙瓦武装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沙特阿拉伯也绕过三军情报局，与阿富汗境内一些武装建

立了直接联系。埃及政府也拥有自己的跟班。就连巴基斯坦的老对手印度，也在扶植自己的代理人。

就这样，反苏战争代表了外部世界的重重矛盾和生死斗争。这些冲突加剧了阿富汗国内原本就存在的种族、宗教和语言分歧，让他们之间的敌对状态进一步加深。不了解阿富汗历史的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阿富汗国内各民族都将彼此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其实，他们错了。苏联入侵之前，种族之分、教派之别，从未酿成太大的惨祸。“铁腕埃米尔”对哈扎拉人的迫害是一个例外。长久以来，不同民族杂居共处的经历，早就让他们学会了共存与包容，并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敌意自然存在，部落纷争也在所难免，不过，纷争只是战士之间的个人对决，他们的房屋、田园、牧畜和家人从不会受到牵连。苏联的入侵和阿富汗的反应，打破了群体间古老的默契，并为即将到来的野蛮种族战争埋下了祸根。

侵略军与抵抗者不断拉锯，重组了阿富汗原有的社会结构。我在第二章提到的“乡村共和”，在苏联入侵之前，它或多或少还是完整的。土地所有者、部落首领及村中的马利克等世俗长老是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土地、财富、武器，还拥有争权夺利的意志。他们和神职人员合作，但后者起从属作用，只负责批准他们的决定。

战争扭转了这一局面。[2]如今，当越来越多的“圣战者”在阿富汗寻找合作伙伴时，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神职人员身上。这一阶级以牺牲世俗长老为代价，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土地被烧焦、经济被摧毁，苏联军队地毯式的空袭，不仅让几百万人陷于离乱，乡绅仰仗的部落体系也在轰炸中一溃到底。此外，战火中走出了一个全新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权力建立在战争技能上，而不是部落关系、血统等。

一开始，没人觉得阿富汗的抵抗力量能与苏联抗衡。面对强大的苏军，“圣战”武装落后得像一帮原始人。战争的结果难道还有悬念？假如阿富汗人还想抓住一线战机，他们就必须团结起来——所有的国际问题专家都给出了这样的建议。殊不知，各自为战才是“圣战”武装的力量所在。苏联方面遭遇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个时候的英国军队也有同样的烦恼。其实，强如英国、苏联这样的大国，不是奈何不了弱小国家阿富汗。迈万德之战，虽然阿富汗人曾经克敌制胜，在喀布尔与贾拉拉巴德之间的兴都库什山口，他们也击退了英国入侵者，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战争将阿富汗社会分解成数以千计的单位，每个单位都要和英国（现在是苏联）人死战到底。因此，英国（以及现在的苏联）人无

法将他们一一打败，也没有人能代表这个国家与他们谈判，因为谁都不会默许有人治理国家。

四分五裂的局面给苏联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阿富汗则承受了更大的灾难。自1826年以来，多斯特·穆罕默德等历代君王取得的统一成就，在短短的一年里就化为了泡影。阿克巴·纳鲁兹的父亲曾在查希尔·沙阿时代担任议长，经历了国家从统一到分裂的跌宕年代，对于国家的前景，他悲观地说："阿富汗要想恢复到50年前的样子，我看还需要50年的时间。"[3]

在众多的"圣战"领袖中，有十几人是杰出的，有两人则特别引人注目：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这两个人都是年轻人，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见证了查希尔·沙阿执政最后十年的喧嚣与狂暴。

马苏德来自潘杰希尔，是塔吉克人。从人口数量上看，阿富汗的塔吉克人仅次于普什图人。但是，长期以来，塔吉克人毫无政治影响可言。马苏德的父亲是一名技术官僚。由于工作调动，举家移居喀布尔。马苏德来到法国人兴建的埃斯特格拉尔高中求学。学校的一旁就是王宫，在劫难逃的达乌德在那里作了最后的生死搏斗。我和马苏德是中学校友，我读十一年级的时候，他还是个六年级学生。正因如此，我当时从没注意过这位小学弟。高中毕业之后，马苏德进入苏联建造的工学院。不过，他是如此热衷政治，以至于未能完成学业。

到马苏德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他已不仅仅是一名虔诚的政治化的穆斯林了，他还经常抨击同学不遵守教规。他看不惯有人在斋戒期间进食，也见不得有人不按时进行礼拜，他已经改变了以往阿富汗人那种随和的态度。[4]他不仅是穆斯林，还是伊斯兰主义者。

不过，比起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还算是温和派。希克马蒂亚尔原是一名反叛分子，曾从军事学院转至喀布尔大学。后来，他也因为关心政治而没有完成学业。在校期间，希克马蒂亚尔选读过一阵子工程课程，这使他后来自称"工程师古勒卜丁"。有人说，希克马蒂亚尔是作为一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开始职业生涯的。对此，他本人及其追随者坚决否认。无论他早年间的思想倾向如何，在政坛闯出名声的希克马蒂亚尔是个宗教激进分子。1972年，他涉嫌谋害一名同学而被捕入狱。然而，没过几年，一位想讨好宗教激进势力的总理释放了他。于是，希克马蒂亚尔重获自由，前往巴基斯坦这一安全地带。

马苏德加入了一个名为"伊斯兰促进会"（Jamiat-i-Islam）的宗教党

派，该组织由喀布尔大学的神学教授拉巴尼一手创立。后来，马苏德虽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但他仍自称是“协会的一员”，拉巴尼才是马苏德心目中的领袖。希克马蒂亚尔原本也是该协会的一分子，后来，他自立门户，创建了“伊斯兰党”（Hezb-i-Islam）。这“一党一会”成了随后几年阿富汗暴力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两大角色。

1975年，当达乌德领导一个共产党内阁管理这个国家时，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与拉巴尼等伊斯兰主义者试图在潘杰希尔武装起事。但密谋未能成功，所有人不得不流亡巴基斯坦。此后五年，他们一直在巴基斯坦，直到苏联坦克开入阿富汗，他们知道机会来了。

马苏德回到家乡潘杰希尔后，很快组织了一批人马开始抵抗苏军。拉巴尼仍然坐镇白沙瓦，负责为协会笼络资源。武装头目回到国内组织斗争，政治领袖则在国外活动，马苏德与拉巴尼倒真是这种合作关系的典范。

希克马蒂亚尔主要的活动地点仍是巴基斯坦，只有形势需要，他才会回到阿富汗与手下并肩作战。“工程师古勒卜丁”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游说官员、筹措资金与获取政治资源上。虽然他大部分时间并非身处阿富汗，但其影响力又触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

在激进学生中，马苏德的表现并不出众。他不善演讲，组织游行也非他的专长。正因如此，他才把协会的领导位置让给拉巴尼吧。后来的山里游击作战，倒是让马苏德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事实证明，马苏德在军事方面天资卓越，几乎能和切·格瓦拉(1)、毛泽东相提并论。很快，他就被崇拜者冠以“潘杰希尔雄狮”（潘杰希尔本就是“五头狮子”之意）之名。他不仅能设下埋伏，击落直升机，还有组织平民生活的天赋，他一手拿着枪，一手枕着头管理着他的社区。马苏德摸索出了一条与苏联侵略者的相处之道。白天，对方战机出动时，山里的百姓会上山躲藏；待苏军撤离，大家又会回家过各自的生活，他们还会趁着夜色犁地、播种，照料其他农活。

马苏德也想把所有的游击武装团结在一起。为此，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牵头组织了一个监督委员会。鼎盛时期，有130多个游击武装挂靠在委员会的名下。不过，马苏德毕竟是个塔吉克人，民族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他的身份自然无法服众，占人口多数的普什图势力与马苏德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5]

马苏德激发了他的追随者们近乎宗教膜拜的忠诚。我曾和马苏德的

亲密助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有过一次谈话，我问他对马苏德的印象。他回忆起马苏德在历经与苏联人艰难杀戮的一天后，回到家里与孩子们玩耍时所散发的温柔。这样的故事是传说，是后人创造的英雄神话，真实的人与事可能要复杂许多。

希克马蒂亚尔是马苏德的一大劲敌。希克马蒂亚尔并不具备马苏德的领袖魅力，他也不是一个游击战士，这不是他的专长。希克马蒂亚尔过去是（显然现在仍是）杰出的组织者，具有非凡的政治头脑。我预感多斯特·穆罕默德也是这样的人。马苏德转战山间的时候，希克马蒂亚尔在竭力拉拢三军情报局的各位官员，这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三军情报局拨出的金钱、军备，有四分之三流入了希克马蒂亚尔的口袋。希克马蒂亚尔用这笔援助，将伊斯兰党打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间（虽然基本上是普什图人）的游击队网络。阿富汗的每个地区都有伊斯兰党武装人员和特工。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难民营里，希克马蒂亚尔派出的人总在招兵买马。每个在战乱中长大成人、慢慢变得麻木残忍的阿富汗男性，都有可能成为希克马蒂亚尔旗下的一名走卒。

无论是马苏德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在和苏联人及其傀儡政权展开血战。之后，同一阵线的两大势力也交上了火。抗苏战争期间，希克马蒂亚尔武装经常寻衅其他“圣战”武装。有一次，他们差点要了马苏德的命。大家清楚地知道，两位领袖彻底决裂的那一天即将到来。

(1)　切·格瓦拉（1928—1967）：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是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编者注

第22章　冷战的最后阶段

苏联入侵激起了阿富汗各派势力的强烈反应，伊朗的世界末日革命，布托政府的垮台和伊斯兰主义在巴基斯坦的胜利，阿拉伯世界反政府、反西方的秘密伊斯兰革命组织和政党在崛起。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局势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对决。在伊斯兰世界，不仅思想家和活动家，就连集市上的普通百姓都把当前的历史重新定义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较量。

相比之下，在西方，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观察家仍然从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角度来看待全球问题。两大阵营都具备核打击能力，因此，双方都不能直接诉诸武力。他们要想在世界各地施加影响，只能通过冷战的方式。第三世界时常爆发的代理人战争，正是双方你争我夺导致的后果。

冷战到了1980年，西方阵营觉得己方形势不妙。当时，美国的经济情况实在糟糕，承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同时，经济发展却陷于停滞。此外，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按照此前的经济观点，高通胀、高停滞与高失业率绝不可能同时出现。与此同时，油价一路飙升，就像坐上了火箭。危局当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却束手无策，他只是干巴巴地恳请国民节俭一些。当时的情况，需要每个人勒紧裤腰带。悲观情绪在全国迅速蔓延，迫使总统发表电视讲话。面对电视观众，卡特承认，美国正在经历困境。[1]

在古巴，卡斯特罗的权位还是那样稳固。美国中央情报局用尽计策，也没能把他整下台。中美洲的左翼游击武装不但控制了尼加拉瓜，还在萨尔瓦多取得了节节胜利。在欧洲，喧嚣一时的团结工会遭到苏联的强力镇压，活动转入低潮。新鲜出炉的SS-20导弹，将整个西欧纳入了苏联的核打击范围。在中东，美国失去了伊朗国王这个最强硬的盟友。更糟糕的是，一群年轻的伊朗激进分子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控制了52名外交官。一个超级大国，何曾遭遇过如此频繁的羞辱？没过多久，苏联的介入又导致了阿富汗政权的更迭。难道对手真是不可抵挡？

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卡特政府作出回应：苏联攫取控制海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作对美国根本利益的威胁，美国将采取必要手

段。这就是所谓的“卡特主义”。也就是说，吉米·卡特只打算守住波斯湾这一阵线，承认了阿富汗。

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1]却觉得危局之中暗藏转机。在他看来，阿富汗已让苏联泥足深陷，它会耗尽苏联的心血和财力（当年，美国不也在越南触了同样的霉头），有了阿富汗的战事，美国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苏联付出不小的代价。对此，布热津斯基很有信心。当然，他并不希望美国对此投入过多，毕竟他可不敢指望阿富汗能战胜强大的苏联。只要美国暗中扶持阿富汗，尽可能拖慢苏军那不可阻挡的胜利进程，让苏联在稳赢的这场战役中尽可能付出大的代价就可以了。

回想起来，1980年的苏联为什么会让世界如此恐惧和敬畏，是很难理解的。诚然，美国在当时已经疲态尽显，不过，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却在垂死挣扎。一方面，国内的官僚体制已经僵化不堪，甚至连它自己的官员都在鄙视它；另一方面，指令性计划经济除了生产巨型武器和工业设备，无法生产其他消费品，苏联人民梦寐以求的汽车和电视，似乎只有“自由世界”才能供应。

最糟糕的是，政府没有充满活力的理想来弥补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共产主义曾经履行了这一职责，但如今，即使在共产主义世界，它也失去了号召力，甚至没有了激励共产党人的力量。年老多病的勃列日涅夫早就无力问政，但却无法摆脱，即便哪一天他撒手人寰，政治体制内也找不出合适的接班人。1982年，勃列日涅夫结束任期，权力移交给了原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关于安德罗波夫，外界知之甚少。此人同样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上任不过15个月就去世了。继任者契尔年科更是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局官员，而且他和前两任一样老病交加。不到一年，契尔年科死在了任上。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冷战赢家，一个即将称霸全球的大国。

即便如此，苏联的威胁仍让美国感到不安。罗纳德·里根能够赢得1980年总统大选，和他牛仔般好斗的姿态密切相关。里根甚至多次出言攻击苏联，为冷战对手贴上“邪恶帝国”的标签。他宣称自己不会像吉米·卡特那般束手束脚，而要和苏联大干一场。阿富汗（和伊朗）也是里根手中的一把利剑，就此展开的层层诘问，让卡特简直无力招架。阿富汗战争对里根尤其有利，它已经成为里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右翼“反共”老战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右翼政治家虽然对伊斯兰主义知之甚少，却称赞阿富汗的“圣战者”是光荣的自由战士，视他们为“反共产主义者”。

入主白宫的里根，亟须用实际行动把竞选承诺一一兑现。在这方

面，里根还真不是作秀。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是为了占据冷战的上风。为此，里根不惜采用核对抗的手段。他在联邦德国境内部署的潘兴导弹，直指莫斯科。对于苏联方面发出的高声质问，他只是微笑以对。里根甚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也许美国可以打造一个全新的防御体系，让苏联的导弹完全瘫痪。他的这个战略防御计划就是众所周知的“星球大战”计划，让一众战略专家闻之心惊。由于“相互摧毁”原则的存在，两大阵营才会陷入僵局，世界和平因此有了保证。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自然没人敢轻启战端。假如美国在防御方面棋高一着，里根就可以选择主动出击，攻打苏联。倘若苏联当局觉得对手已经占据优势，没准会先发制人实施打击。里根冷笑了一声，估计他会冒这个险。

“星球大战”计划也许不可行，不过，对峙的原则在于料敌从宽，苏联人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研制新的核武器。不知不觉中，双方展开了一场军备竞赛。

“星球大战”计划有些抽象，即使对那些赞成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为了支持他的强硬立场，里根不得不在美苏对抗中坚持到底，其中之一是尼加拉瓜，另一个是阿富汗。

对里根政府而言，尼加拉瓜比阿富汗更为迫切。在该国境内，美国一手扶植了反政府游击队（Contras）。游击队表现颇为出色，一度推翻了桑迪尼斯塔主导的政府。当然，里根政府也向阿富汗的“圣战者”提供了许多方便。虽然马苏德等人得到的金钱、装备，加起来不过价值几千万美元，但比起一毛不拔的卡特时代，“圣战”武装的境况好了许多。

冷战总能适时影响阿富汗的局势。1985年，苏联这艘巨舰迎来了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舵手——戈尔巴乔夫。不过，他接手的这艘巨舰已经出现沉没的先兆。为了应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政府投入大量金钱，国家财政几近枯竭。戈尔巴乔夫深知，如若不对军事与战争支出加以控制，苏联的国运恐怕将此终结。他因此推出了好些全新措施：“新经济政策”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纳市场要素；“新思维”的推行，让苏联国民也享受到了有限度的言论自由。对于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措，西方大加称赞，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

戈尔巴乔夫还和里根就缓和核紧张局势进行了会晤，并取得一些实质进展。两大阵营由此有了一次真正的喘息之机。会谈之后，里根在国内赢得一片赞誉，戈尔巴乔夫也收获了诸多好评，人们称他是和平的缔造者（除了右翼福音派基督徒，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额头上的胎记表明他“反对基督教”）。[3]

戈尔巴乔夫的有些作为确实值得称颂。不过，此人的大胆举措却给阿富汗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戈尔巴乔夫认为，入侵阿富汗简直是大错特错，阿富汗就像套在苏联脖子上的一根绳索。为此，他迫不及待想要从中逃脱。但他并没有撤军停战的打算，而是要求军方不惜代价，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当年的尼克松不也想在越南“光荣撤退”[4]吗？戈尔巴乔夫想从阿富汗撤军，但他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那个时候，苏联正在和美国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因此他不能表现得软弱无力。

打那以后，苏联军队明显加大了空袭力度。在狭窄的山谷间来回上下穿梭，直升机上的机枪对准平民的次数明显增多。戈尔巴乔夫上任第一年，也是战争最为血腥恐怖的一年。这一年，苏军参谋部制订屠杀计划，要把阿富汗的广袤乡村辟为无人区。那个古老的阿富汗在地毯式的空中打击下彻底解体。所谓的“乡村共和”，就此成为历史。同一年，逃亡伊朗、巴基斯坦的难民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600万人。而战争开始时，阿富汗的总人口不过2000万人。全世界的难民中，阿富汗难民占了大半。摧毁阿富汗的凶手，并非一个势大力强、莽撞无知的新兴国家，而是一个风雨飘摇的超级大国，它把阿富汗的局势搅得一片混乱。

阿富汗的战事还在不断升级，隔岸观火的美国人却从局势中看到了阿富汗取得真正胜利的可能性。于是，国会参议员戈登·亨弗莱、众议员唐·里特等人开始为阿富汗事业游说。里根总统任命了一位阿富汗事务顾问，此人是阿富汗侨民，名叫扎勒米·哈利勒扎德，在贝鲁特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查理·威尔森也认为援阿之事可行，与国会和中情局的盟友一道，成功将美国对阿富汗“圣战”武装的（秘密）援助增加两倍。在威尔森的游说下，沙特阿拉伯政府决定拨出一笔同等价值的援助。到1987年，“圣战”武装每年可以从美国方面获取10亿美元的援助。当然，这笔援助还要通过三军情报局获得。此外，沙特阿拉伯还有10亿美元的援助。

除了金钱和武器，威尔森等人还给了“圣战”武装一个重要建议。通过实地勘察，议员们发现了苏军的一道软肋，抵抗组织可以加以利用，穷追猛打。为此，“圣战者”只需要一件方便带进山区的武器，就能随时向苏军的直升机展开射击。

可惜，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如此便携且威力十足的武器。于是，威尔森联合中情局内所谓的“阿富汗别动队”，矢志要为“圣战”武装打造一件实战利器。以色列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埃及政府则在运输方面打开绿灯。最终，著名的“毒刺”（Stinger）便携式防空导弹得以问世。这种

导弹有长长的炮筒，可以根据热成像原理追踪目标。发射的时候，只需两个人固定炮筒，另一个人负责瞄准、开火即可。“毒刺”导弹虽谈不上十分先进，但足以威胁苏军。

1986年9月25日，“毒刺”导弹第一次被用于实战。伊斯兰党的军事指挥官阿卜杜勒·哈法尔（他自称“工程师哈法尔”）瞄准贾拉拉巴德机场的一架苏联直升机，发射了“毒刺”导弹。战争一打响，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虽然苏联的空中打击仍在继续，许多人死于空袭，但其经济意义是决定性的。据三军情报局披露，截至1987年，阿富汗抵抗组织发射的“毒刺”导弹，每天都能命中1—2架苏联战机。一枚“毒刺”导弹，花费不到4万美元，而苏联军用直升机的身价却高达1000万美元。美国中情局向“圣战”武装提供了500多枚“毒刺”导弹（一说2500枚）。另外，英国产的类似武器也在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5]从经济角度而言，这场战争对于摇摇欲坠的苏联实在太不划算，一次就损失了1000万美元，还是败给只有大把猎枪装备的游击队。没办法，戈尔巴乔夫只得选择撤军，越快越好，战果、面子只能统统抛之脑后。

苏联撤军的第一步，就是撤掉卡尔迈勒。此人施政无方，督战不力，已经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继任者是秘密警察部队的头目纳吉布拉。此人体格魁梧，肌肉发达，像一位举重运动员，外号“公牛”。纳吉布拉上任之后，也有一番改革亟待推行：首先，他不再执着于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其次，他要和“圣战”武装展开谈判，争取组建联合政府；他还得收买人心，拉起一支声势足够大的拥趸队伍。以上目标达成后，苏联人方能安心离去。

为了维持局面，纳吉布拉可谓竭尽全力，所有能够缓和局势的手段都被他使了一遍。秘密警察的名声实在太臭，纳吉布拉将其更名为“武装警察”（WAD）。每个人都清楚，总统此举纯属换汤不换药。在纳吉布拉统治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更名为“阿富汗祖国党”，但却没人高唱爱国歌曲。纳吉布拉主持颁布了新宪法，宣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改为“阿富汗共和国”，伊斯兰教为国教，保障所有公民的自由。但没有人相信他。纳吉布拉还拨出专款，修建了不少清真寺与神学院。他呼吁反对派放下武器，与政府达成和解，还在议会中为“圣战”武装领导人留出位置。他甚至说，如果某些条件得到满足，他将辞职。

放在十年前，这个计划可能奏效。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血腥记忆早就关上了和解的大门。阿富汗人如何能够相信，残忍阴鸷的秘密警察局局长是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会致力于重建阿富汗的价值观。“圣战”武

装清洗了枪支，开始向城市进军。

战争之初，联合国就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呼吁交战方重回谈判桌。数年来，多个国家派出代表参与斡旋，却总是毫无成效。1987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苏联自来年起，将从阿富汗前线分批撤军，阿富汗的内部事务将交由阿富汗人自行处理。如此决定，尚不知是福还是祸。同时，苏联希望美国和巴基斯坦作出以下保证：承认现有边界，美国不再向阿富汗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及经济援助；苏联撤军之后，任何国家不得干涉阿富汗的国内局势。苏方提出的要求并未收获切实的承诺，但是，戈尔巴乔夫已没有多余的精力迫使美方作出承诺，毕竟当时的苏联已经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1988年，第一批苏联军队从阿富汗回国。那一年，苏军在慢慢撤出。与此同时，无论从苏联自身出发，还是站在全球高度，一些更为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在苏联境内，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爆发群众运动，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都遭受了严重挑战。而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三国人民先后走上大街抗议示威。风雨飘摇的苏联行将崩溃。

1989年2月，鲍利斯·格罗莫夫上校踏上铁尔梅兹（Termez）大桥(2)，穿过阿姆河，回到乌兹别克斯坦。他是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苏联军人。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关注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消息，因为东欧剧变更加牵动人心。同一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吹响了这场剧变的前奏。访波期间，这位苏联领导人公然否定勃列日涅夫坚持的“有限主权”原则。他表示，任何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苏联都将不再干涉。东欧诸国就此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团结工会立即行动起来，迫使政府举行选举。最终，波兰选举以团结工会大获全胜而告终。匈牙利紧随其后，不仅进行议会选举，还将国名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共和国”。大量人口从民主德国涌向联邦德国，政府虽然试图阻止，却根本无能为力。态度强硬的埃里希·昂纳克不得不辞去总书记一职。当年11月，大批东柏林市民聚集到柏林墙边，开始拆除这堵将国家一分为二的隔离墙。那一刻标志着冷战和苏联的终结。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在如此短暂的瞬间便走到了尽头，历史上似乎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1989年前夕，苏联的所有卫星国都摆脱苏联控制。1990年，苏联境内的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1991年，俄罗斯宣布独立。“苏联”正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毕竟在此之后，它已经不剩什么了。

(1)　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鹰派战略政治理论家。——编者注

(2) 铁尔梅兹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苏尔汉河州首府，位于阿姆河口北岸，是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交通要道，与阿富汗有大桥相连，是1979—1989年苏联进军阿富汗的主要陆上通道。——编者注

第23章　从恐怖到混乱

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使纳吉布拉成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他仍在努力与“圣战者”达成妥协，但他却在玩一副疯狂八人牌扑克。随着苏联撤军，纳吉布拉没了靠山。还好，苏联人留下的各种武器装备十分精良，还够他支撑好一阵子。喀布尔的城防工事也还算牢靠，虽然“圣战”武装在步步逼近，但纳吉布拉政权尚能维持。就这样，一年又五个月过去了。

正如喀布尔大学经济学家沙姆斯博士指出的那样，[1]当时阿富汗境内有近30万名武装人员，这些人不仅久经战事，而且个个有武器傍身。其中，政府军有10多万人，另外的18万余人则隶属各个“圣战”武装。同时，阿富汗还是一个巨大的军火库，喷气式轰炸机、坦克、重型火炮应有尽有，1000余枚“毒刺”导弹[2]还未开封，机关枪更是泛滥成灾。平均下来，每个阿富汗人都能分到一挺。各派势力囤积的弹药，更是足以支持多年的内战。如果纳吉布拉与“圣战”武装真能组成联合政府，当时的阿富汗可以一跃成为地区第一大军事强国。

当然，如上假设完全不可能成立。纳吉布拉早已形同困兽，但对手仍然没有放弃进攻，反而有大批政府军倒戈相向，投入对方阵营。最为严重的一次叛变发生在1992年4月。纳吉布拉的盟友之一、乌兹别克军官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与塔吉克军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联合作战。人民民主党上台之前，杜斯塔姆一直在工会担任领导人。1978年政变过后，他投身军旅。此后，杜斯塔姆官运亨通，一路高升，他把大批乌兹别克同胞招至麾下，这些人对他忠心耿耿。政府军中，就此出现了一支杜斯塔姆的私人武装。反苏战争末期，这支私人武装已经发展到3万余人。另有数字表明，当时杜斯塔姆武装的规模超过了5万人（当然，这些人表面上还属于政府军）[3]。杜斯塔姆之后的经历表明，他既不是人民派，也非旗帜派。他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范畴，只是个首鼠两端、嗜酒如命的世俗海盗，他信奉宗教现实主义，只为求得生存。

在1992年这个关键时刻，纳吉布拉与“圣战”武装僵持不下，杜斯塔姆看到了他的机会。于是，他选择改换门庭。他这一去，大大削弱了纳吉布拉的有生力量。4月底，已有成千上万的游击队涌到喀布尔周围的山上扎下营寨，喀布尔行将陷落。不过，也没有哪支武装能够独力掌控这座城市，山上的游击队少说也来自11个派别。

1992年4月16日晚，马苏德拿起卫星电话，拨通了希克马蒂亚尔的号码。他们的这场对话被录了下来，这段刺耳的录音至今仍在互联网上传播。[4]马苏德对希克马蒂亚尔说："我们应该谈一谈，我很担心这个周日会闹出乱子。大家都想进城，个个不甘落后。如此一来，我怕局面会乱。所以，我想和你坐下来好好谈谈。让我们想出一些办法，组建一个可接受的政府，然后举行选举。事不宜迟，最好现在就采取这些步骤，而不至于走到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步。如果你同意，不妨这个星期天就……"

希克马蒂亚尔打断了马苏德："目前这个状况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只要局势稳定，我和我的追随者及所有"圣战士"都会按兵不动。我们现在大概不会采取侵略行动。"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马苏德说，"我们无所作为，情况会更加糟糕。我和我的兄弟并不害怕。一切取决于你和你的追随者……"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希克马蒂亚尔再次打断，"我的意图，你刚才不也听到了吗？"

"看来你决定在星期天进攻喀布尔了？那么，我是否应该有所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保护喀布尔的男女老少。"马苏德大声说道，"我们还要保护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保护这些流离失所、前途未卜的人民。我告诉你，尽我的能力保护这些人不受任何形式的攻击是我的责任。"

随后是一段忙音，一场对话就此结束。

第二天，"圣战"武装集体开入喀布尔。纳吉布拉带上兄弟和司机，朝机场方向逃去。纳吉布拉事先和联合国方面取得了联系，联合国提供了一架飞机，可以送他们前往印度。不料，纳吉布拉的计划早已被杜斯塔姆知晓，杜斯塔姆下令封锁机场。当天，没有航班可以离境。

看到前方设有路障，纳吉布拉命令调转车头，来到了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在这里，他们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许可。联合国的决定，"圣战"武装表示尊重。只要纳吉布拉等人待在联合国大楼，他们就是安全的。于是，接下来的四年里，纳吉布拉等人一直在大楼里，寸步不出。这样的避难和蹲监狱差不多，差别可能就在于，这里可以点外卖，看一

些宝来坞电影。

“圣战者”还在巴基斯坦时，已就组建阿富汗临时政府（AIG）制定了一个松散计划。根据计划，将由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出任总统，他是白沙瓦七个主要伊斯兰政党中最小政党的领袖。两个月后，拉巴尼继任总统。四个月后，拉巴尼辞职，举行全国大选。西方媒体心目中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代表马苏德，则会出任临时政府的国防部长（确属机要职位）。党派无论大小，只要在白沙瓦占据一席之地，都会得到至少一个内阁席位。希克马蒂亚尔则是政府总理的不二人选。

希克马蒂亚尔并未领情。他觉得总理一职未免太过屈才。要知道，他所领导的伊斯兰党是第一大政党。希克马蒂亚尔甚至认为，整个政府都该由他和他的党派来领导。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也不能容忍希克马蒂亚尔成为次要角色，因为此人是他们操控阿富汗的关键人物。因此，阿富汗的最高职位一定要由希克马蒂亚尔担任。

拉巴尼接任总统之后，希克马蒂亚尔勉强接受了总理职位。不过，他仍然不愿来到喀布尔。他说，如果内阁有事相商，请大家到城郊的住处见他。

事实证明，马苏德的预料没有错，动乱随即爆发。但应该指出的是，马苏德也是阿富汗动乱局势的一大根源。正是他和伊斯兰统一党（Hezb-i-Wahdat）之间的纠葛，导致喀布尔一度陷入混乱。伊斯兰统一党是一个包括哈扎拉人在内的什叶派团体组成的超级大团体，当它占领喀布尔的西南部（哈扎拉人的主要聚居区）时，马苏德采取了行动。他和阿拉伯支持的普什图军阀阿卜杜勒·拉苏勒·赛义夫（Abdul Rasool Sayyaf）结成同盟。赛义夫占领了哈扎拉人的西南领土，马苏德则占据了哈扎拉人的东北区域。如此一来，两派军阀正好对哈扎拉人形成了夹击。

哈扎拉人进行了激烈的反击，由此而来的后果相当骇人，抢劫、强奸与谋杀的暴行在枪战和轰炸中愈演愈烈。我的堂姐扎希达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那个时候，她正住在喀布尔的西郊。有一天，一群哈扎拉人突然闯进她家，宣布把那里征为要塞。堂姐一家只得离家出逃，前往我叔叔阿塞夫位于市中心的房子。那个时候，叔叔已经流亡美国，留下来的房子正好能容纳扎希达一家。

搬家之后，堂姐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但是，她和家人仍能隐约听到远处的枪声。后来，枪声似乎越来越近，次数也越来越多，但具体方位

无法确定。她预感战争即将一触即发。不过，她和家人又不敢立即逃走，毕竟那样太危险了。她甚至有些后悔，怪自己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一走了之。还好，堂姐和她的家人当时选择留在家中。那个时候，外面早已经陷入战乱。有几发子弹打入庭院，迫击炮打坏了她家的墙壁。那时，他们即便想要逃离，也已经无路可走了。

但随后的炮弹开始打在窗户上。他们不得不躲进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食物只有生洋葱和土豆，没有水。因此，每天晚上，扎希达的丈夫要在夜幕的掩护下到院子里的井中取水。一天晚上，他在院子里被一枚弹片击中。他流着鲜血一步一步爬回储藏室。还好伤势并不太重，扎希达用酒精棉为他清理伤口。那次事故让堂姐下了离开的决心。“继续留在这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于是，她戴上她所有的珠宝，那是阿富汗女性的便携财产，一家人把所有的钱款捆在一起。枪声一平息，他们就出了门。街上到处是尸体，在街区的尽头，他们看到一个哈扎拉少年，一手拿香烟，一手握着机关枪。他每吸一口烟，就会朝山上开一枪。一口烟，一发子弹，不间断地重复着。他每开一次枪，马苏德武装就会予以回应，进行还击。

堂姐高声喊叫那个少年，请他稍停片刻。如此一来，她和家人才能安全通过。少年耸了耸肩，答应了。就这样，扎希达一家才来到了河边。他们沿着河畔，走到了一个稍微安全的街区，那里的一位熟人收留了他们。

对生活在1992—1996年间喀布尔的人们而言，扎希达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从新闻可知，那个时期喀布尔的局势并不稳定。延绵不绝的战火之中，间或有短暂的和平。但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屠杀：超过6万人因为冲突而丧生，30多万人逃往农村，最终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这是对尚未逃出国境的难民的称呼。反复无常的杜斯塔姆在战斗中不断转换阵营。战争期间，他犯下了累累血债。哈扎拉人常常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不过，他们也常常以暴制暴，以血洗血。无论是赛义夫还是马苏德，参与内战的每一方都双手沾满鲜血，与暴行脱不开关系。

然而，所有人都认为，最严重、最不可原谅的流血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工程师”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在喀布尔一站稳脚跟，希克马蒂亚尔就把势力扩张到喀布尔附近几英里的郊外，并用火箭弹无情地袭击城市。1992年8月10—11日，希克马蒂亚尔武装向喀布尔发射了上千枚火箭弹，他声称自己的每次攻击都有“特定目标”。但是，他领导的

武装人员根本不具备精准瞄准火箭的技术，他的辩解显然并不成立。即便希克马蒂亚尔能瞄准目标，在距城市几英里的据点开火，又何从知道炸弹有没有准确击中目标。有几天，这些火箭弹以每分钟两三枚的频率降临喀布尔市区，无边的战火之下，大量房屋受损，无辜丧命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阿富汗的乡村已被苏联人彻底摧毁，如今，阿富汗人又亲手摧毁了自己的城市。“圣战”武装互相攻伐，导致半个喀布尔遭到破坏。另一座城市坎大哈，也成了武装割据之地。内战是一场种族战争，它带来的仇恨因此更加难以消弭。对于夺走亲人性命的凶手，很少有人清楚其具体身份。于是，他们就把这种仇恨记在某个民族的账上。

当大屠杀撕裂城市时，军阀们正在为巩固农村的领地而战斗，数以百计的人划出了属于他们的半主权领地。残破的道路上设有无数的检查站，任何通行的路人都得向拦路设卡的军阀缴纳过路费；商店里本就稀少的商品，其价格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购买力。贫穷和饥饿就像疾病，随着战争蔓延开来，笼罩着整个国家。这些都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遗产。

第24章　走出难民营

1989年，苏联人前脚刚走，美国方面就急不可耐地呼唤盟友。大家匆匆召开会议，试图安排人民民主党下台之后的阿富汗。一个稳定的阿富汗，符合与会各国的共同利益。会议能否促成和平？答案尚不可知。不过，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至少真心诚意，他们希望和巴基斯坦以及众多“圣战”武装建立合作，保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很可惜，没过多久，阿富汗就不再是华盛顿的外交重点。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美国政府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了其他地区。阿富汗曾是冷战的战场，但是，冷战已近尾声，纠结此地，似乎也没了意义。虽然冷战正式结束还要等到两年之后的那个冬天，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已颓态尽显，它已经在事实上结束了。苏联解体是90年代初的政治地震，其余震影响了之后十年的西方政治决策。1991年，有人曾向布什总统报告喀布尔附近又出现了新的冲突。对此，布什相当惊讶：“阿富汗还在打仗？”[1]仿佛一切冲突都已随着苏联一起没入历史的尘埃。

事实上，对美国来说，阿富汗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麻烦的种子早在苏阿战争时就已埋下。在此期间，有近350万阿富汗人流亡巴基斯坦，逃往伊朗的人数也差不多。难民们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难民营，如白沙瓦附近的沙姆沙图（Shamshatoo）和奎达附近的哈扎拉镇（Hazara Town）。这些难民营都位于城郊，如此一来，难民才不至于妨碍城市居民。难民不被允许找工作，毕竟巴基斯坦政府不想因此导致本地人大量失业；难民也不被允许创业，因为这会对巴基斯坦人形成竞争，巴基斯坦政府希望他们老老实实地蜷缩在难民营里。那里虽没有空袭之忧，但也没有建立新生活的希望。食物和水由联合国提供，食物包括油、面粉、糖、盐和茶。难民们什么都不用做。

一般来说，这些营地都被铁丝网包围着，身居其中，难免会产生坐牢的感觉。营地门口，巴基斯坦军方派了专人把守。2002年，我曾经参观过几座难民营，没想到里面有大量的未成年人。在纳斯尔·巴赫（Nasir Bagh）难民营，我和不少孩子聊过天，他们几乎都拥有10—12个兄弟姐妹。负责难民营事务的官员告诉我，营地里四分之三的难民年纪都不满15岁。血气方刚的年纪却被困在封闭的营地之中，焦躁不安的情绪无处宣泄，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在周边建立记忆。

孩子们要想逃离沉闷的日子，可以进入宗教学校。这样的学校有数以百计，由巴基斯坦神职人员建立，由强大的右翼伊斯兰政党控制，如与三军情报局关系密切的“伊斯兰神学者协会”（Jamiati-Ulama-Islam）。此外，沙特阿拉伯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以在这些学校推广瓦哈比教义。瓦哈比派运动源自18世纪，以追求“纯净的伊斯兰”著称。后来，瓦哈比派在沙特阿拉伯的宗教界占据主流地位，并通过联姻等手段，同该国的统治精英建立了密切联系。几十年来，瓦哈比派发展迅速，正是得益于沙特政府的大力支持。瓦哈比派并不想在非穆斯林中发展追随者，他们希望让穆斯林皈依瓦哈比式的伊斯兰信仰。巴基斯坦官方提供的记录显示，仅在邻近边境的18个地区，就有2000多所宗教学校，总招生人数接近22万人。[2]未被列入统计的数量想必更惊人。

阿富汗男孩能够免费进入宗教学校，他们还能得到食宿，只要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老师。进入宗教学校，这些孩子便和外界断了联系。除了老师，他们无从了解新闻、获取信息。而且，这些老师的教学内容似乎不仅关乎宗教。一位官员向巴基斯坦总理提交的报告指出，大约有100所宗教学校在向学生传授作战技能。实际的数字可能远不止这些。[3]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老师面对众多的难民学生，不过是在夸夸其谈。他们告诉那些睁大眼睛的男孩，历史上唯一一次完美的世界，存在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有生之年，整个社会都严格遵守安拉的法律，这种服从让他们百战百胜、无往不利，毕竟没有力量能和安拉抗衡。这不是胡言乱语，几乎是穆斯林叙事的核心，其中的内容足以令大家如痴如醉、深信不疑。

近年来，好些势力在伊斯兰世界宣扬这样的思想：末日即将来临，安拉的子民将和魔鬼的信徒展开决战。难民营、宗教学校，正是此种论调的重要阵地。宗教老师们信誓旦旦，战斗一旦开启，一个完美的世界将降临人间。是的，如果穆斯林能像先知引导的麦地那民众那样生活——按照确切的法律与规则——世界就会得救。那些正在经历世界上最糟糕童年的男孩渐渐有了自信，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使命竟然是拯救世界！

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总会有一些争论。显然，他们培养了塔利班的未来骨干，但他们知道这一点吗？他们是不是有意识地建立了一支军队，以便让他们日后回到阿富汗展开行动呢？根据公开的记录，我们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即便巴基斯坦方面早有精心盘算，它

也从来没有摆上台面。

可以肯定的是，巴基斯坦政府确实很想控制阿富汗。地区中的冲突、对峙及力量对比，让巴基斯坦不得不对本地区小心关注。同时，世界各国也各怀心思，闯进了阿富汗。这里再一次成了国际力量角逐的战场。

克林顿总统第一届任期内，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从来没在公开场合提到过阿富汗。[4]他的外交重点大多放在了东欧。苏联解体之后，东欧风云激荡，各种武装冲突来势猛烈且持续不断。旧有制度约束形成的原定局面，由于新兴国家的建立而分崩离析。塞尔维亚人大战克罗地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纠缠不清，马其顿人反击塞尔维亚人的同时，又遭遇了科索沃人的挑战。当每个群体都试图将领土上的其他群体排除在外时，“种族清洗”一词就进入了人类耻辱的字典，难怪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在东欧。

但苏联解体后的余震波及了东部边境，其影响同样重大，尽管起初这些事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年，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不安地加入了苏联。苏联解体后，它们忆起了久远的历史经验，加盟苏联之前的种种经历，开始受到当地人的重视。

除了塔吉克斯坦，中亚其他四国的主要居民都是突厥语系民族，他们自古以来就在此定居。有那么一段时期，这几个国家（包括塔吉克斯坦）曾是伊斯兰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联解体之后，原来的党员干部摇身一变，成了新国家的统治者。他们不再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实行统治，而开始凸显自己的崇高地位。全国各地遍布他们的海报与塑像，全国人民得把他们的生日当作民族节日来庆祝。政坛新贵希望个人崇拜能够取代原有的意识形态，从而主导人民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重新崛起，这是一种本土的精神观念，能提供有凝聚力的社会意义。

后苏联时代的中亚处于这样的文化变迁中，借由文化上的渊源，许多国家都想在此施加政治影响力，土耳其对此很感兴趣。但伊朗开始感到不安，毕竟，历史上的几大帝国都曾将土耳其草原和伊朗纳入统治，波斯不过是一个被征服的行省，而帝国的征服者就是土耳其人。

最重要的是，巴基斯坦看到了中亚重组的可能性。该国历史不长，却危机四伏，它夹在敌对的阿富汗与印度之间，夹缝中求生存的巴基斯坦只能寄望在中亚打开局面。随着苏联的解体，整个中亚重归伊斯兰的

怀抱。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的基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前提，它为巴基斯坦提供了社会凝聚力。同样地，无论土耳其和伊朗作何感想，古代的贸易、交通和征服，已经以中亚为中心向南北剧烈扩张开来，正如其之前往东西方发展一样，尽管这意味着南亚平原上的城市会沦为中亚骑兵南下劫掠的目标。因此，巴基斯坦和中亚有一种历史联系，而伊斯兰可能是文化溶剂，可以将它们再次融合到一起。

中亚地区以逊尼派教徒为主，巴基斯坦亦然。相形之下，信奉什叶派的伊朗很难在中亚地区发挥真正的影响。毕竟，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纠葛已经持续了14个世纪。至于土耳其，实在相距遥远。如果巴基斯坦能够建立与中亚的贸易联系，它可能会建立一个由伊斯兰堡指挥的松散的逊尼派穆斯林共荣圈。届时，它将在平等的条件下对抗印度和伊朗，巴基斯坦将会成为该地区的第一强国，坐上伊斯兰世界的头把交椅。

愿景固然美好，现实却有一大障碍，那就是阿富汗。巴基斯坦要想联结中亚，阿富汗是无论如何都难以绕开的。那该对此做些什么呢？

苏联解体，不仅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格局。在冷战正式结束之前，新一轮战争已经打响，政治学家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 Klare）(1)称之为“资源战争”。

争夺的核心资源就是石油。20世纪70年代，石油政治已经抬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突然宣布石油减产，此举是为了报复西方工业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短短一年内，油价翻了三番，西方经济由此进入了衰退期。1974年的石油危机给世人提了个醒，石油实在重要。至冷战结束前夕，世界人口增长了近10亿，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在不断推进，世界各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在节节攀升。[5]

1990年，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悍然入侵科威特，从而控制了世界第二（一说第三）大石油资源，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可能还有伊朗）。而后，萨达姆又在科威特边境大量陈兵，沙特阿拉伯似乎也在他的劫掠计划之中。以伊拉克军队的规模，达成目的并不困难。

不过，沙特阿拉伯的财富不仅限于石油，它还有美国这个重量级的盟友。对于萨达姆的侵略行径，布什总统表示：“此风绝不可长。”而后，他更是牵头组织了一支由38个国家组成的联军，要对萨达姆进行惩戒。多国部队的行动得到了联合国的批准。近85万人的多国部队开赴沙特阿拉伯，随时准备应对萨达姆的军事冒险。[6]海湾战争从1991年1月17日打响，历时42天。战争期间，伊拉克承受了8.5万吨炸药的袭击。

[7]很快，萨达姆的部队溃不成军，只能向巴格达方向撤退而去。途中，他们还得躲避多国部队的空中打击。最终，多国部队付出了358人死伤的代价，而伊拉克军队的阵亡人数接近10万人。[8]美国总统布什随后突然宣布停火，海湾战争因而并未触及萨达姆的统治根基。

第一次海湾战争加深了人们对资源的认识：海湾国家（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产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石油，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工业世界扣为人质。世界要想稳定，油气资源必须多元化。随着石油供应的减少，由此而来的竞争也将愈发激烈，主要的工业强国不得不从战略上考虑寻找新的石油资源。

20世纪90年代，专家预测世界上50%的石油资源都位于波斯湾地区。不过，该地区的储量虽大，却也在迅速开采。里海盆地则是位居其后的全球第二大富油产区，而且该地区很大程度上尚属一片处女地。[9]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都是里海沿岸国家。这几个国家正是土耳其、伊朗与巴基斯坦念念不忘的中亚盟友。波斯湾的石油资源在日益减少，里海地区的战略价值自不待言。

里海盆地虽有资源，但西方工业家又当如何获取呢？有三种方案。方案一，修建一条直通西欧的油气管道。不过，这条管道必须经过苏联数千英里的土地，俄罗斯势必会趁机征收巨额关税。此外，还会经过局势动荡的东欧各国，也须向沿线国家缴纳税费。万一局势生变，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方案一未获认可。



规划中的输油管道

方案二，通过输油管道将里海的石油输送到波斯湾沿岸港口，再通过油轮运往欧美国家。可是，按照该方案，大部分管道将位于伊朗境内。如此一来，伊朗岂不有了左右西方国家命运的能力？时至今日，美、伊两国还处于对立状态，眼见伊朗得势，美国政府万万不能接受。

第三种方案是架设一条从土库曼斯坦直通阿拉伯海沿岸的管道，在巴基斯坦的沿海港口（比如卡拉奇）将里海的石油资源通过油轮运输出去。该方案立即得到了美方的首肯，毕竟巴基斯坦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伙伴。巴基斯坦政府更是坚决支持。其实，巴基斯坦倒没有考虑经济因素，他们只是觉得，如此一来，本国的国际地位将会大大提升，而且管道两头的逊尼派穆斯林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热络，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将一直延伸到吉尔吉斯斯坦，相关的前景实在可期！

不过，方案三也并非皆大欢喜，问题在于，这条线路必须经过阿富汗。

只要想到阿富汗境内遍布地雷、局势混乱，输油管道要想从中安然通过，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我想说有点痴人说梦。但是，相较另外两种方案，阿富汗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毕竟，一个国家有再大的麻烦似乎都好解决。总之，巴基斯坦在稳定和控制阿富汗方面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于是，三军情报局有了一个新任务，即保证输油管道在阿富汗的安全。希克马蒂亚尔在巴基斯坦的计划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巴基斯坦将竭尽全力，让他当上阿富汗毫无争议的头号人物。

但是，希克马蒂亚尔却让巴基斯坦失望了。首先，他的军事才能远不如马苏德，即便他对喀布尔发射了无数的火箭弹实施空袭，也没能让他挺近喀布尔哪怕一步。他没有容人的雅量，其他“圣战”领袖都不想加入他主导的政府。他还习惯出尔反尔，刚拟订的停火协议，转身就撕毁。而且，希克马蒂亚尔毫无民意基础，由他担任国家领袖，实在难以服众。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其他军阀也好不到哪里去。苏联撤军之后，军阀的名声都在迅速恶化。事实上，穆贾希丁正在作为一个整体丧失作为救世祖的信誉。历经劫掠、强暴、杀戮与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大家都认清了“圣战者”的真实面目。

巴基斯坦方面开始传出质疑声，不少官员都觉得三军情报局所托非人。反对者中，就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前陆军将领纳斯鲁拉·巴布尔。就连三军情报局内部，大家的信念也在动摇。于是，三军情报局开始挑选其他代言人。找来找去，他们注意到了坎大哈的一个小团体。

那是在1994年，这些激进分子还不叫“塔利班”或其他任何组织，说他们是“有组织的”，似乎都有些夸张。他们并不是一个团体，不过是一起上过战场、聚到一起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中有一位年纪稍长的人，叫作毛拉·奥马尔。他们尊敬奥马尔，并帮助他采取大胆行动，以保护当地人民不受流氓的侵害。

当时，奥马尔大约30岁。他十几岁时就加入了伊斯兰党的一个分裂组织，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战斗。在与苏联人的战斗中，他失去了左眼。[(2)]不过，这点伤势足够让他引以为荣。苏军撤离之后，奥马尔把武器交还上级。而后，他进入宗教学校学习宗教，从那时起大家称他“毛拉”。

像许多阿富汗人一样，奥马尔也对他以前的战友很失望。在他看来，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信仰，按照沙里亚法，他们都是应受惩戒的犯人。他的激愤态度得到不少同龄人的认可，年轻一代也对他五体投地。这些人都和宗教学校有所联系，要么是曾在那里求学，要么就是在读的学生。阿拉伯语中，学生被称为“塔利布”（Talib），一群学生就是“塔利班”（Taliban）。所以，这个词起初并不是政党或运动的名称，只是描述了奥马尔及其同伴的学生身份。

奥马尔的“传奇”始于1994年的一个夜晚。那晚，先知穆罕默德托梦给他，先知不但解下披风相送，还鼓励他要为拯救穆斯林而战。过了几天，奥马尔听闻一名军阀绑架了两个姑娘，并把她们关起来供自己和手下淫乐之用，奥马尔立即号召兄弟准备行动。最终，他们不但救出了被掳女子，还把涉事的军阀吊死在了坦克炮台上。奥马尔觉得，此举足以警示恶人，他也因此成了替天行道的好汉。

上面这则故事堪称“传奇”。一般来说，所谓传奇，大多是杜撰出来的。那个年代，我听过太多类似豪杰的故事，其中的情节与人物大同小异。显然，塔利班分子有意借传说为自己装点门面。传说中的他们行侠仗义又虔心宗教，而且远离腐败政治的影响。不得不说，当时的老百姓对此很是买账，塔利班的表现确实要比一般军阀好许多。

即使这些故事是虚构的，但这些年轻人一定做了一些事来打动当地人，否则巴基斯坦政客也不会注意到他们。三军情报局派驻赫拉特的官员伊玛目上校很快和奥马尔搭上了线。不久，双方就建立了联系。巴基斯坦驻坎大哈的总领事（也是一名三军情报局官员）提供了帮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巴布尔对此表示默许。[10]而后，据说内政部直接执掌的边境兵团开始向奥马尔的手下提供军事训练。到当年10月，塔利班的武装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只待考验的到来。

巴布尔命令一支满载诱人商品的卡车队穿越阿富汗前往土库曼斯坦，他想借此了解一下阿富汗的国内环境，看车队能否通过军阀割据的阿富汗，抵达目的地。如果车队一路顺利，那么一条纵贯南北的贸易路线就在眼前，巴基斯坦的各类商品可以顺道北上，中亚的石油也能找到南下的出口。

车队行至坎大哈，遭遇一伙武装分子的阻截，物资被洗劫一空。抢劫案发生不久，附近的山里冲出一队人马，约有200人，武器装备十分精良。双方的交锋持续了整整两天。最终，匪首被吊死，货物得以归还原主。[11]没错，这又是塔利班的一次义举。不过，部分目击者发现，

闻风而来的塔利班分子当中，不少人操着一口乌尔都语。这是巴基斯坦的国语，并不是阿富汗人的语言。当然，大家也只是心生疑窦，并未多加考虑。总之，由于奥马尔等人的英勇奋战，巴基斯坦才不至于蒙受损失。这样的局面，巴布尔自然很满意，他决定为塔利班提供更多有利条件。塔利班的发展，与巴基斯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塔利班很快摆脱了巴基斯坦的影响，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才是塔利班真正的“传奇”岁月。

这些传说得以迅速传播开来，是因为塔利班分子确实做了他们声称会做的事。他们曾宣称要重建邻近地区的秩序。后来，经过塔利班的清剿，坎大哈与边境之间的道路上再也没了军阀私设的检查站，商人们不用再缴纳高额的通行费。由此，坎大哈的商品变得丰富起来，价格也趋于合理。

当月晚些时候，塔利班分子又在边境地区查抄了一处军火库，军火库的主人，想来应该是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大约800车枪支和弹药。[12]愤世嫉俗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些全都是巴基斯坦的安排，他们只是把礼物放在那里，待塔利班分子前去领取。

两个月不到，塔利班有了飞机、汽车、坦克、直升机、大炮、先进的无线电通信设备、枪支弹药和金钱。巴基斯坦方面对这些勇敢的年轻人的迅速进展感到震惊，而且他们否认在支持和武装塔利班。按照巴基斯坦政府发言人的说法，塔利班劫掠了本该属于“圣战”武装的辎重，或是从加入他们的指挥官那里获得了这些物资。[13]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官员打开了难民营的大门，让数千名新兵越过边界加入塔利班。

1994年11月，塔利班决定占领坎大哈。他们的行动异常顺利，阿富汗的第二大城市很快易主。全国范围内，要数坎大哈遭受战争蹂躏的程度最为严重。长期以来，当地民众在恐惧中苟且偷生，对于暴力，他们深感厌倦，“圣战士”所激起的民愤更是高涨。自命虔诚纯粹的塔利班分子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奥马尔打着安拉的旗号，宣称要扫除一切军阀势力，恢复国家秩序，并确立沙里亚法的统治地位。每个人都在期盼救世主的降临，奥马尔仿佛带着拯救世界的使命，难怪大家会对他寄予厚望。

坎大哈一役，给了塔利班极大的信心。他们一鼓作气，先后拿下加兹尼、瓦尔达克和洛加尔。一时间，奥马尔仿佛统帅着一支无敌之师。1995年9月，塔利班已经逼近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此地的军阀伊

斯梅尔·汗和马苏德互为盟友。敌军当前，伊斯梅尔·汗选择逃亡伊朗。“安拉的武装”（Army of God）未放一枪，就占领了赫拉特。

6个月前，塔利班还默默无闻，如今，他们控制了阿富汗34个省中的9个。他们日益增加的神秘感和民众对“圣战者”的普遍仇恨，促成了塔利班的成功。当然，他们还有一件利器：大量的金钱。塔利班只需付钱给军阀，他们便会放弃抵抗。奥马尔清楚，大部分军阀都是为了钱才参与进来的。但是，一帮青年学生哪来的滚滚财源呢？好些批评家认为，奥马尔的背后肯定有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对于这样的指控，巴基斯坦官员表现得非常吃惊。无论如何，在第一年里，塔利班的承诺正在步步成为现实。他们每占领一地，就会遣散军阀武装，并悉数收缴他们的武器。奥马尔占领下的区域，安全形势仍然脆弱，不过，人们的生活得以稍稍安定。

就在塔利班征服阿富汗西部的同时，他们也在朝阿富汗东部进军。塔利班出动了好些“丰田”牌的全地形皮卡车，车辆都是崭新的，只需稍加改装，在后厢上搭配机枪与床铺，一台皮卡就能变身成为战地利器。有了汽车，塔利班行军神速，就像几百年前蒙古人的流动骑兵。塔利班的目标直指喀布尔。塔利班现在要进军喀布尔了，那不仅是首都，还是比六大城市总和还大的第一大城市。

1995年9月，塔利班征服赫拉特的同时，另一支部队抵达了喀布尔郊区。面对塔利班武装，希克马蒂亚尔厉声警告塔利班最好远离他的要塞，否则，他会给他们上一堂军事课。希克马蒂亚尔还提出接管塔利班军队，成为他们的老板。荒谬的是，就在他发出警告、提出条件的时候，其手下纷纷投奔塔利班而去。他想向巴基斯坦求援，却发现他们不再支持他了。希克马蒂亚尔只能低三下四地去投靠马苏德，以寻求安全保证（不久，希克马蒂亚尔就背叛了马苏德）。

在“潘杰希尔雄狮”那里，塔利班第一次吃了败仗。但是，奥马尔从不担心人员问题。他只需发出招募志愿者的呼吁，就会有大批青年离开宗教学校，走出难民营，投到他的帐下成为新兵。途中，他们需要穿越两国边界，巴基斯坦自然不会设置障碍，早早就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塔利班再次包围了喀布尔。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不断展开空袭，喀布尔城中的半数居民被迫逃离家园，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住进难民营。

(1) 迈克尔·克莱尔：全球安全专家和防御分析家，是研究全球冲突的权威，著有《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石油政治学》。——编者注

(2) 关于奥马尔哪只眼睛受伤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编者注

第25章　塔利班对战穆贾希丁

1996年4月，喀布尔之围还在继续，大约有1000名乡村神职人员聚集在坎大哈，他们称赞毛拉·奥马尔是“穆民的埃米尔”（意为“信徒的领袖”）。这是先知的第二位继承人（也叫奥马尔）所采用的头衔。塔利班的这个奥马尔就这样与伊斯兰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人物“平起平坐”了。为了防止有人忽略这层象征意义，他举着一件声称是先知的披风来到公共场合。这是坎大哈清真寺中最珍贵的文物，民众少有机会能够看到，不过，既然奥马尔想要实现政治野心，清真寺倒也乐于提供帮助。

毛拉·奥马尔地位高贵，甚至超越了国王。追随者相信，奥马尔是先知的副手，是受安拉之托来到人间，就像先知穆罕默德的直接继承人——事实上，他对科学、地理、数学和经济学一窍不通，只会说普什图语，他甚至很可能连一张报纸都未曾读过。

第一次对喀布尔的围攻以失败告终，不过，塔利班在秋天卷土重来。他们出动了400多辆坦克，喷气式飞机、直升机和重型火炮也参与其中——这对于一个由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领导的学生军队来说，还真不错。杜斯塔姆旗下的5万雄兵并未遭遇太大折损，但是，这位乌兹别克军阀觉得喀布尔不宜久留，他打算前往北方，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半独立领地。马苏德的部队也在对手的劝降之下大为削弱，军队人数从原来的3.5万人锐减至1万人。[1]塔利班包围了这座城市，每天都对其展开扫射。最后，马苏德觉得应当保存实力，来日再战。于是，他带领部队撤出喀布尔，一路退回到喀布尔以北60英里外的潘杰希尔谷地。

1996年9月26日，喀布尔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城中已经变了天。街上到处是蓄着大胡子持枪巡逻的年轻人，他们眼窝凹陷，头上戴着笨重的黑色头巾。对于喀布尔人民来说，这不是政权更迭，而是占领。眼前这些征服者和蓝眼睛的俄罗斯人一样陌生。先前那些军阀，比如马苏德、拉巴尼、赛义夫、希克马蒂亚尔和穆贾杰迪，至少是六七十年代动乱中的风云人物，大家都认识他们。

相比之下，塔利班分子来自西南沙漠和横跨巴基斯坦边境山区的普什图农村家庭，他们来自另一个阿富汗，那个被“铁腕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征服，但未被同化的阿富汗。其实，喀布尔与乡村地区的隔阂由来已久，双方早就有了巨大的文化鸿沟。更何况，这些年轻的塔利班分

子并非来自和平安宁的乡村，他们来自边境地区的难民营，父辈曾经享受过的传统阿富汗生活，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2]

塔利班信奉与“圣战者”组织相同的教义，但更加保守。在每一点上，他们都来得更加粗暴、简单、极端。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拥有更纯粹的信仰。塔利班无意再讨论什么对阿富汗最好，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沙里亚法。他们是来执行法律的（根据他们的理解），没有妥协，没有偏差。这无疑是所有塔利班分子所坚信的。

进入喀布尔的第一天，塔利班就诱杀了前总统纳吉布拉及其兄弟。他们引诱其离开联合国大楼，经历一番折磨后，将其殴打致死，并肢解了尸体，将纳吉布拉等人的尸体悬挂在阿里亚那广场的灯柱上，成了士兵练习枪法的靶子。

暴行背后的用意非常明显，他们并没有对世界舆论无动于衷。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又要大费周章地把纳吉布拉等人诱骗出联合国大楼呢？是什么让这些狂热分子对侵犯联合国权威的外交后果敏感呢？答案也许是，他们并不知道。在这群乌合之众的背后，站着一批经验丰富的、与巴基斯坦有联系的军事战略家，也许正是这些幕后军师策划了这次行动。[3]

但是，巴基斯坦政府的高级官员为什么会对塔利班把社会秩序强加给阿富汗感兴趣？为什么要关心阿富汗女性是否戴面纱、阿富汗男孩是否追风筝？其实，阿富汗的国内局势，巴基斯坦政府并不关心。只要塔利班有利于巴基斯坦的全球利益，伊斯兰堡的官员对阿富汗的内部事务并不关心。

可是，塔利班并不只是巴基斯坦博弈的工具，他们还有自己的“宏图大计”，与巴基斯坦的需要和愿望是分开的。塔利班一有了政府的雏形，就宣布了他们的计划。

直到此时，阿富汗人才发现，塔利班强加的安全措施会让他们失去什么。女性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她们不能外出工作或上学。总之，女性不能离开他们的“营地”，除非穿戴从头盖到脚的罩袍。女性上街，身边得有男性陪同，同时，这位男性必须是她们的丈夫或至亲。出租车不得搭载未穿戴罩袍或无人陪同的女性，商店也严禁向这类女性出售任何物品。反正走出家门的女性不能显示出哪怕一点人类特征，如果她们胆敢露出肌肤，就会被当场鞭笞。

伊斯兰教法中所列的刑事处罚将完全按照规定执行。盗窃犯会被剁

去手，有时甚至是脚。医生们被要求放下手中的病人，去进行这些手术。凶杀案受害者的亲属可以被邀去亲手射杀凶手，被指控通奸的女性将被公开处以石刑——用石头砸死。至少有一次，这是在城市的主要体育场进行的，那里原本是人们观看足球比赛或其他娱乐活动的地方。长时间的控辩交锋、对质举证，被视作弊政，判决要迅速作出，要当场执行。

塔利班严禁音乐、电影与摄影，一切表演艺术都在禁止之列。剧院变成了清真寺，音像店被焚毁。电视仍然提供了一种娱乐，但不是节目，而是电视机本身。电视机被搬到大街上，任凭塔利班分子开枪扫射，将其打成一堆碎片。任何带有赌博色彩的东西都是非法的，因此，风筝比赛被禁止，足球与国际象棋遭到严厉打击，因为很多人可能在这上面下注。过去，许多人家都有喂养鸽子或其他鸟类的习惯，如今，他们也不得不放弃爱好，因为塔利班严禁蓄养宠物。

庆祝任何非伊斯兰节日（如阿富汗独立日或新年）都被视为犯罪。无论男女都得按照伊斯兰教法穿着，传统的部落服装，如长衬衫、灯笼裤、男性头巾、女性头巾，符合教法规定；西式服装都是非法的，塔利班禁止任何人穿着西式服饰。男人不得留长发，但必须蓄须。任何违反着装守则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祈祷也是强制性的，若不按时祈祷，也会遭到政府的惩罚。

如上种种倒行逆施，似乎前所未见。其实，在阿富汗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出现。巴洽·萨考推翻阿曼努拉之后，也曾出台一样的法令。历史似乎进入了循环。

塔利班执政期间，至少有两名男子因为逃避祷告而被从二楼窗户扔出去。修面剃须之类的轻微违法行为，也会被鞭笞。所有的惩罚工作，都由一个名为“恶习与美德部”（该机构的正式名称其实更长，但几乎没有人使用它）的机构负责施行。此外，该机构还承担部分外交和国防事务。其实，当年的“铁腕埃米尔”也曾设立过一个同名机构，但并不是常设机构，而且他的本意是处理政务。但在塔利班时期，“促进道德”和“防治恶习”成了国家的核心目标。

虽然塔利班自称代表最纯粹的伊斯兰，但他们是一个压倒性的普什图政党，他们的民族、种族、宗教仇恨主要针对什叶派哈扎拉人。塔利班上台之初，他们对哈扎拉人社区进行扫荡，哈扎拉成年男性与男孩被充作壮丁，在威逼之下去为塔利班卖命。敢于反抗的人，都被杀了。久经苦难的哈扎拉人，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塔利班政权对待

哈扎拉人的种种作为和世界其他地区被称作“种族清洗”的做法并无区别。

然而，在最初的几个月乃至最初的几年，面对塔利班的累累恶行，世界各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使世界多数国家保持中立的原因，是石油政治。事实上，石油是整个塔利班戏剧的子叙事。为了保证输油管道安全无碍，巴基斯坦政府才会对塔利班进行支持，西方石油公司也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早在1991年，阿根廷规模较小的布里达斯（Bridas）石油公司董事长卡洛斯·布尔格罗尼就来到土库曼斯坦，寻求获得对该国石油和天然气的所有权。他会见了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提出修建一条横贯阿富汗的输油管道的第一份方案，并与阿富汗的军阀进行了谈判。事实上，布尔格罗尼相信他的工程会为阿富汗带来和平。

巴基斯坦的政治掮客与布尔格罗尼串通，尽管双方的逻辑正好相反。巴基斯坦认为，唯有阿富汗局势稳定，输油管道方可实现。因此，当务之急便是不惜任何代价结束战乱、奠定和平，而这个任务非塔利班不能完成。

布里达斯公司的代表和塔利班进行了磋商，也会见了其他军阀。阿根廷人是在两面下注。1996年初，布尔格罗尼同拉巴尼政府草签了一项三年协议。布里达斯公司负责修建输油管道，拉巴尼政府则负责施工区域的安全。可是，拉巴尼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他仅占有喀布尔一地，而就在那一年，这唯一的地盘也没能得到保全。布尔格罗尼与拉巴尼的协议就此成了一纸空文。

铺设中亚输油管道的方案，美国的石油公司一开始并不看好。可是，眼见布里达斯公司有所进展，美国人开始有了兴趣。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优尼科公司反应最快，他们的代表专程前往土库曼斯坦会见尼亚佐夫总统。尼亚佐夫随后表示，当年和布里达斯公司签署的那份协议“并不成熟”，既然优尼科公司有意愿合作，他愿意撕毁旧约，与美国公司重新谈判。

对于布里达斯公司而言，优尼科这个对手的能量非同小可。该公司与美国共和党关系匪浅，其朋友包括亨利·基辛格、亚历山大·海格，以及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阿富汗事务顾问哈利勒扎德。如今，优尼科公司似乎能够借助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的力量来达成目的。哈利勒扎德、卡尔扎伊及美国共和党的新保守派一致认为，美国应该支持塔利班，因为他们可以发展成一支稳定的力量。哈利勒扎德预言，塔利班将会发展成沙特阿拉伯那样的政权，而不会成为另一个伊朗，成为美国的

敌人。[4]当布里达斯还在与“圣战”武装谈判时，优尼科公司已经选择了塔利班。

优尼科发起竞购后，美国的军方、情报与外交界的多名官员积极介入。这些官员与不少巴基斯坦政府官员交往颇深，有了他们的牵线搭桥，巴基斯坦极有可能转变态度。美国政府更是乐见美国公司获得里海的石油大单。不过，华盛顿当局也不是没有安全方面的顾虑，他们担心工程期间或输油管道投入使用之后在当地工作的美国公民的安全问题。对此，巴基斯坦方面请美国政府放心，并表示塔利班已经占领阿富汗大部领土，不久之后整个国家都将归于统一。唯有塔利班，才有结束战争、创造稳定商业环境的能力。

有了这层关系，西方国家对塔利班的纵容无视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立场是，阿富汗政府的国内政策只是阿富汗人的私事，西方人对此不该滥加干涉。况且，阿富汗问题专家已经打了包票：塔利班会成为又一个沙特阿拉伯。美国人不一定要喜欢沙特阿拉伯的生活方式才和他们做生意，他们是理性的人。对美国而言，真正的顾虑在于塔利班是否真能稳定阿富汗。哈利勒扎德对此表示肯定。美国国务院认为应该相信哈利勒扎德，毕竟他生在阿富汗，成长在阿富汗，还有谁能比他更了解阿富汗的国情？

美国并没有像一些批评人士后来指责的那样，直接创建了塔利班或向其提供资金。他们只是继续资助其盟友巴基斯坦，无视巴基斯坦政府对塔利班的支持。美国也采纳了巴基斯坦的建议，不再支持马苏德及其盟友。事实上，美国试图确保马苏德得不到任何西方援助。

不过，马苏德远没有到彻底败亡的境地。塔利班占领了喀布尔，马苏德的部队也在潘杰希尔重整旗鼓。1996年11月，马苏德召集多名前抵抗苏联组织的领导人，组成“解放阿富汗联合阵线”（United Front for the Salvation of Afghanistan），其中包括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阿富汗中部的哈扎拉武装、东北部的塔吉克什叶派武装，以及几乎所有其他非普什图少数民族代表、南方的几个普什图“温和派”。这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多民族的政治实体。

我之所以称它为实体，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政党，而且是一个政府。“北方联盟”(1)（后来的称呼）追求阿富汗的完全独立，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一切外国势力都不得干涉阿富汗，寻求建立一个现代化、多民族的伊斯兰国家。塔利班的极端主义为北方联盟更自由地解释伊斯兰教

创造了争取信誉的空间。

经过一致推举，拉巴尼成为北方联盟的总统，马苏德为国防部长。为了寻求巴基斯坦以外国家的军事支持，拉巴尼访问了邻国，他获得了印度和伊朗的支持，就连俄罗斯政府也对北方联盟表示支持。俄罗斯不想塔利班式的宗教激进主义蔓延到本国，伊朗则对塔利班强烈的反什叶派姿态表示担忧，印度则将阿富汗视为其与巴基斯坦斗争的筹码。

而后的四年多时间里，塔利班先后数次进攻北方联盟，地盘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双方在同一区域不断拉锯，交替来去。1997年春天，塔利班武装占领北方主要城市马扎里沙里夫，聚居此地的哈扎拉人立即遭了殃。塔利班学识丰富的神职人员支持种族清洗，理由是哈扎拉人根本不是穆斯林。他们认为，杀死一个哈扎拉人能够得到一次进入天堂的机会，只要这不是他荣誉的唯一善行。

巴基斯坦政府选择这个时机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紧随其后予以承认，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及联合国则没有表态。总的来说，世界各国对塔利班的态度还是那样模棱两可。在此期间，优尼科公司倒在积极活动，塔利班的几名高层应邀前往达拉斯商谈输油管道问题。塔利班在华盛顿开设了办事处以开展业务，而华盛顿的“好心人”则聘请了一家公关公司，负责提升塔利班在美国的形象。

(1) 拉巴尼、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势力集中在阿富汗东北部，杜斯塔姆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运动集中在西北部，哈利利领导的伊斯兰统一党集中在中北部，故而从地理上称之为“北方联盟”。——编者注

第26章　“基地”组织

其实，伊斯兰世界早就具备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条件。从巴基斯坦到摩洛哥，几乎每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都有一个由警察力量支撑的威权政府。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不断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获得枪支和金钱，以帮助他们维持统治，激进的反西方情绪一直在高涨。社会虽在发展，贫富差距却因此不断扩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财富上，还反映在西化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统治的大众之间的文化鸿沟上。自阿卜杜尔·拉赫曼时代起，这道鸿沟就已形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

冷战期间，一些穆斯林不满者拥护共产主义，仅仅是因为如此作为可以得到强大苏联的资助。马克思主义从来没在伊斯兰世界真正扎根。东欧剧变之后，苏联再也无法提供金钱和军备，于是，伊斯兰革命者转向根植于伊斯兰土壤的斗争哲学，这就是伊斯兰主义。阿富汗成了伊斯兰主义的纽带，因为它的反苏独立战争吸引了阿拉伯世界成千上万的激进分子。他们以激进分子的身份来到这里，以坚定的革命者身份离开，暴力倾向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这一代“圣战”老兵，就是众所周知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Arab Afghans）。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这样一位思想极端的阿拉伯青年。他的父亲原籍也门，是一位富商。其家族和沙特王室关系密切，在沙特阿拉伯也算得上是一大豪门。本·拉登有50多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十七。家族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循规蹈矩的富家子弟，但本·拉登走上了另一条路，相对家人放荡不羁的言行，他追求极端的“虔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加入了成千上万涌向阿富汗的阿拉伯空想家的行列。在那里，他用财富支持“圣战”，这让他很快就结交了不少当地朋友。他还多次奔赴前线参加战斗，大家对他自然又多了几分敬意，尽管他的军事功绩远不及后来传说的那般神奇。后来，本·拉登在白沙瓦为在这里的阿拉伯激进分子设立了招待所，他们可以从这里冲向战场，回来后洗个澡，美餐一顿。这个地方就是本·拉登打造的一处“基地”（al Qaeda）。1988年，随着阿富汗战事结束和阿拉伯裔阿富汗人的回国，“基地”组织成了他新成立组织的名称，该组织致力于为阿拉伯激进势力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推翻各自国家的政权。

回到沙特阿拉伯的本·拉登志得意满，阿富汗的光荣经历让他有些自

我膨胀。那个时候，萨达姆·侯赛因刚刚挥师入侵科威特，伊拉克军队距离沙特阿拉伯本土越来越近。危急关头，本·拉登主动请缨，希望由他领导一支阿拉伯裔阿富汗人组成的军队对抗萨达姆。他的这番豪言壮语并未得到沙特政府的重视。沙特政府不把“圣战英雄”放在眼里，显然有些令人难堪。而后，沙特政府乞援美国的行为，更在这些“圣战英雄”的伤口上撒了把盐。眼见政府大开国门邀请美军进来，本·拉登痛心疾首，他对王室大加挞伐。沙特政府也毫不客气，立即宣布将他驱逐出境。

本·拉登来到苏丹，继续公开抨击沙特王室。最终，沙特政府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那时，他正忙于建立“基地”组织，研究恐怖主义的政治可能性，即利用其组织的弱点（人数、资源和地盘的匮乏），通过让个人破坏者和自杀式袭击者偷偷进入“敌国”领土，对平民进行可怕的屠杀。1995年11月，他的阴谋第一次付诸实践。几名“基地”成员潜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美国人社区实施恐怖袭击，爆炸导致十几名美国工程师及助理死亡。

事后，美国中情局很快就认定本·拉登乃是罪魁祸首。美国政府还向苏丹政府施压，迫使其交出本·拉登。苏丹政府只能要求本·拉登离境。1996年，本·拉登回到阿富汗。

反苏战争期间，本·拉登结识了几位三军情报局的重要人物。回到阿富汗，他和他们的关系再次亲近起来。那个时候，塔利班武装正在阿富汗各地扩张，本·拉登支持的300万美元，帮助他们收买了喀布尔以南的军阀，这使本·拉登成了塔利班最喜欢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之一。五个月后，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本·拉登深感振奋，因为塔利班拥护他信奉的一切，本·拉登宣称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穆斯林政权。

塔利班的盟友在贾拉拉巴德市附近，一个叫托拉博拉（Tora Bora）的地方，为本·拉登提供了一个遍布灌溉渠道的地盘。为了改造这里，本·拉登很是破费了一番。当然，他不光自掏腰包，世界各地的瓦哈比派也向他提供了不少支持，他将这里的洞穴改造成一个可怕的地下军事基地。毛拉·奥马尔喜欢本·拉登的所作所为，在靠近边境城市霍斯特南部的边境地区给了本·拉登更多土地。这里就是恐怖分子的“西点军校”（West Point），本·拉登在此建立了一系列武装训练营，全球各地的宗教极端分子可以在这里学习美国海豹突击队与陆军游骑兵的特种作战技能。

塔利班还向本·拉登提供了一处位于坎大哈郊区的大院，一座塔尔纳克农庄，这里成了“基地”组织的总部所在。本·拉登的妻子儿女也来到阿

富汗与他一起生活。他和他的同伙正是在这里策划了那些震惊全球的恐怖试验。

1998年2月23日，本·拉登及同伙发表了一份放肆的声明，公开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宣战。两年前，本·拉登发表过一篇类似的声明，但由于篇幅冗长，语无伦次，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篇声明更简短、更大胆。他引用《古兰经》中（关于打击异教徒）的段落，列举了对犹太人和“十字军”的不满，并发布教令，号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以各种方式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无论平民还是军人。

本·拉登称他的声明是一种法特瓦（即教令）。教令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暗杀命令或宣战书，而是一种宗教裁决，涉及现有判例未涵盖的案件。面对前所未有的问题，宗教机构必须决定伊斯兰教法如何适用于这种情况，这种裁决为日益增多的伊斯兰教法提供了新的先例。因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因此，只有最高的宗教机构才可以发布教令。本·拉登显然不是这样的权威，毕竟他从未接受宗教教育，在正统的伊斯兰学者中没有地位，他不过是个热心“圣战”的有钱人而已。

不过，伊斯兰教并无教皇一类的人物，也没有等级森严的教会体系，没有人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教令的认证来自大家的共识，提出的教令若能获得大众认可，自然就有了效力。这样看来，本·拉登似乎有发布教令的权力，而且他有追随者，至少一些穆斯林接受了他强加的“宗教责任”。

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这是一个好时机，让他们退一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们本可以研究什么是“圣战主义”（Jihadism），源自何处，吸引了谁，为什么吸引他们，以及它是如何进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文化的。除了思考这些问题，他们本有机会联络一些穆斯林中值得信赖的宗教知识分子，破除本·拉登等“圣战主义”者的蛊惑。他们本可以察觉伊斯兰探究“圣战主义”者及其对手是如何与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潜流交织在一起的，以便拟定对策，远离实际危机的上游。最后，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如何区分长期存在的地方冲突和全球冲突，并分别处理他们。

但美国策决者走了另一条路，缩小了研究范围，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因素，他们全都未曾考虑，而是单纯地把伊斯兰主义作为军事问题加以关注。而且，相应的军事行动往往只指向一个人——奥萨马·本·拉登。美国政府认为，压制此人将解除威胁。

当然，追踪本·拉登并非没有意义，他确实极度危险，而且在恐怖分子当中极具威信。克林顿总统认识到了本·拉登的破坏性，强调要留心此人。但是，应该由哪个部门展开行动，又该如何行动？既然没人清楚，就只能一齐上阵。众多情报部门都在为追捕本·拉登而劳神费力，时不时爆出的相关新闻证明，情报部门并非徒劳无功。他们破获了不少劫机谜案，也在很多地方发现了恐怖分子布下的炸弹。可是，一个不知规模的恐怖组织，居然要向整个西方发起挑战！如此言论，倒真是前所未闻。那么，这到底应由哪个部门负责呢？中情局、国防部、国土安全局、联邦调查局，陆军或是海军的情报部门，又或者应先由海军陆战队打个头阵？克林顿任命了一位白宫反恐“沙皇”来协调所有反恐力量，此人名叫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克林顿还授予他内阁级别。可是，克拉克只是在本已喧嚣的反恐声浪上，添了几声鼓噪而已。

国务院横插一杠，让事态愈发复杂。副国务卿托马斯·皮克林等人认为，若要阿富汗的局势稳定，阿富汗总统只能由南方的普什图人担任，美国政府千万不能错判形势。在皮克林看来，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奥马尔正是这样一位候选人。在皮克林看来，美国应当让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全国政权，即便要对本·拉登动手，也不能妨碍塔利班。对于巴基斯坦，美国国务院也在全力维护。毕竟，巴基斯坦是美国在该地区不可或缺的盟友。20世纪80年代，正是巴基斯坦从中配合，美国的援助物质才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圣战”武装的手中；冷战期间，巴基斯坦也一直追随美国，起到了反苏桥头堡的重要作用。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美国不能抛开盟友单独作战，无论美国政府要对本·拉登做什么，都最好不要触动巴基斯坦的敏感神经。

不幸的是，本·拉登不但与塔利班打得火热，还得到了巴基斯坦的安全保证，巴基斯坦又与塔利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改变战场”的情况下，把本·拉登从混乱的局面中抽离出来，实施打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反恐政策却缩到了一种狭隘的执念上。

中情局策划了一个抓捕行动。他们准备派专人潜入阿富汗，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本·拉登绑架出境。这个任务看似简单，毕竟人人都知道本·拉登就在塔尔纳克农庄。此地与世隔绝，被沙漠与灌木包围。中情局30人的抓捕小队打算趁着夜色，通过井渠潜入本·拉登的老巢，绑架拉登后乘直升机撤离。

抓捕小队本来已经准备行动，但在关键时刻，克林顿临阵退缩了。

1980年的伊朗人质危机，卡特曾做过相似的决策，但由于一场沙尘暴，冒险救援未能成功，卡特的政治生命也因此走到了尽头。克林顿在一张塔尔纳克的卫星照片中看到一个空荡荡的儿童秋千，于是，他想到了最坏的情况：万一行动失败，本·拉登逃脱，而孩子们被杀了，那会怎么样？克林顿承受不起失败带来的后果，于是下令终止抓捕行动。

中情局很失望，但是，他们很快制定了二号方案。这一次，美方打算通过空袭，直接除掉本·拉登。本·拉登及其同伙在霍斯特训练营的时候，就是下手的最佳时机。但在最后一刻，克林顿再次退缩了。他得到情报，训练营中没有本·拉登及其同伙，而是阿联酋的王室成员，每年他们都要来这里猎鹰。克林顿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试图杀死本·拉登，却误杀了阿联酋王室，那样一来，他将面临严重的指控，所以他取消了行动。（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指责克林顿优柔寡断。当时，他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事实证明，那次行动不会把本·拉登怎么样，反而会导致盟国王室成员死于非命，由此而来的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同时，本·拉登也一直在策划他的下一步恐怖行动。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都有本·拉登的特工在行动，他决定是时候让他们中的一些人采取行动了。1998年8月8日上午10点30分，几名“基地”组织成员驾驶装满炸弹的卡车，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的大使馆。那次恐怖袭击导致213人当场丧生，4000多名伤者中，有300多人不治身亡。受害者中，有12名美国公民。9分钟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也成了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袭击导致11名当地群众死亡，85人受伤。

面对如此严重的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应该立即作出强有力的应对，但是，那个时候的克林顿因为几桩政治丑闻而有些自顾不暇。早在克林顿成为总统之前，他和妻子因为参与白水房地产开发生意而赔了钱。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他的对手要求对此进行调查，国会任命特别检察官肯·斯塔尔（Ken Starr）调查此案。斯塔尔像维克多·雨果笔下的沙威那样坚韧不拔，他无法确定克林顿与白水公司的指控是否成立，但在调查过程中，一名叫宝拉·琼斯的女性对总统提起了诉讼，琼斯表示，克林顿担任州长期间，曾多次对自己实施性侵。

琼斯的指控最终被驳回，不过，该事件已被斯塔尔纳入调查。他发现克林顿和白宫里一位叫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实习生最近有性关系的迹象。经过斯塔尔的不懈追查，最终还原了事实的全部细节。克林顿曾经一边办公，一边接受莱温斯基的口头性服务，地点竟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斯塔尔将调查结果中最露骨的细节透露给了媒体，引起全美国

的热议。当时，正是非洲那两场恐怖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星期。爆炸发生当日，莱温斯基女士正在向大陪审团就她与总统的性行为作证。8月17日，克林顿出现在电视上，承认自己的性犯罪行为。之后，他从电视台直接奔赴会场，与情报专家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应对之策。克林顿下令在8月20日，向霍斯特附近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发射60枚“战斧”巡航导弹，并向据称正在制造化学武器的一家苏丹化工厂发射了十几枚巡航导弹。

那次行动一共耗资5500万美元，不过，没有一名“基地”组织的重要人物因此丧生。这倒也不奇怪，导弹袭击之前的几个小时，本·拉登便已安全撤离。行动前一天，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已经得到消息。至于苏丹的化工厂，“基地”组织的宣传人员声称那是一家生产阿司匹林的工厂。这一说法仍有争议，但在当时，观念占据了主导权，塔利班打赢了这场战争。

克林顿从他这次果断的行动中得到的是嘲笑，丑闻缠身的总统发动空袭，难道真是为了国家安全？大多数选民对此表示怀疑。从专栏作家到深夜电视喜剧演员一致认为，这一切与克林顿和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有关。这让人们想起了1997年上映的《摇尾狗》（*Wag the Dog*），电影里虚构的总统为了掩盖性丑闻，选择对阿尔巴尼亚动武。

本·拉登倒成了大赢家，他从他的目标选民那里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不满的穆斯林被他的“圣战主义”所吸引，他那冠冕堂皇的“教令”表示，他不希望被认为是甘比尼兄弟和“豺狼”卡洛斯的同类，而应与克林顿、叶利钦等国家政要齐名。为了打击本·拉登，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甚至出动军队，用上了战争中才会派上用场的先进武器。本·拉登不仅还活着，很快他还发布了关于他胜利的录像带。在巴基斯坦，一时间出现了两本奉承本·拉登的传记，并很快成为畅销书（在美国，非虚构类图书畅销榜上有一本关于戴安娜王妃的书，另一本是关于莱温斯基的）。

那年秋天，国会开始讨论弹劾克林顿在性生活上的撒谎问题。如此一来，克林顿自然三心二意，更没了武力解决本·拉登问题的精力。而且事实证明，军事手段并没有奏效。于是，美国政府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塔利班逮捕本·拉登，并将本·拉登移送美国受审。美国的这种试探只会刺激塔利班的自负感，他们欣喜若狂地拒绝了。本·拉登是他们的客人，普什图瓦里要求他们用生命保护客人。塔利班表示对本·拉登的行踪一无所知。

而后，美国政府又转向巴基斯坦寻求帮助。克林顿向巴基斯坦总理

谢里夫发出呼吁，要求他帮助美国抓捕本·拉登。谢里夫虽然出口应承，却又表示此事的结果不敢保证。谢里夫还向克林顿抱怨，巴基斯坦军方没有合适的装备，且缺乏专业技能，抓捕本·拉登谈何容易。于是，中情局给了谢里夫所需的资金、物资和顾问，用于组建这样一支突击队。但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不是去追击本·拉登，而是塔利班的敌人。1999年，他们杀害了著名反塔利班军阀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的妻儿。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哈克虽是普什图人，却并不支持塔利班，他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事实上，巴基斯坦政府已不再能够帮助美国，即使他们有心相助。因为这个时候的塔利班，已经不再受制于巴基斯坦。当巴基斯坦决定扶持塔利班的时候，其考虑的是自己的地区和全球利益，他们想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政权，通过它控制阿富汗的外交，至于塔利班如何处理内政，巴基斯坦政府无意干涉。

千算万算，巴基斯坦政府却忽略了一种可能。他们不曾想到，塔利班对本国心怀不满的穆斯林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而且，塔利班不仅是宗教激进分子，他们还是普什图沙文主义者。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有数百万，他们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关系向来是有争议的。他们没有预料到这些作风强硬、久经战斗考验、激进的普什图沙文主义者，有能力与巴基斯坦社会中强大的、潜在的叛逆分子建立紧密的联系。他们与巴基斯坦境内的宗教激进党派、游走在杜兰德线两侧的走私黑帮、在贫民群体中影响巨大的宗教学校与清真寺、谴责世俗价值观的乡村教士、边境城市的市井商贩、瓦济里斯坦等地的部落酋长关系密切。这也难怪，毕竟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共享同一种文化。

当年，巴基斯坦将塔利班送到了阿富汗。如今，塔利班主义从边境渗透回来，扰乱了巴基斯坦社会。到1999年，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已经意识到他们制造了一个怪物，但为时已晚。两国的边界正在消失，从卡拉奇到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领土上充斥着塔利班主义。军方和三军情报局的中低层人员是忠于塔利班的，结果是，这些组织的高层不敢命令下属对抗塔利班，因为害怕下属抗命不遵，而一旦下级意识到可以违抗上级命令而不受惩罚，那么所有的赌注就都落空了。

第27章　美国参与其中

1999年初，克林顿团队挫败总统弹劾案，克林顿得以走完剩下的总统任期。不过，克林顿到底是被丑闻束住了手脚，就连民主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戈尔也被牵连，选情一度告急。因为美国女性在选举中拥有极强的话语权，她们心中的民主党形象已经变得相当不堪。民主党必须努力扭转局面。首先，白宫得转变对待塔利班的态度。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美国的女权活动家已经有所了解。正当克林顿因为“拉链门事件”遭口诛笔伐时，喀布尔的沙里亚电台（Radio Sharia）自豪地宣布，每天都有数百名女性因在公开场合露出手或脸而在街上被毒打。

一个名为“女权主义者领导联盟”（Feminist Majority）的组织开始尽其所能地宣传有关塔利班的信息，为大家揭开了塔利班的真实面目。喜剧演员杰伊·雷诺（Jay Leno）的妻子梅维思·雷诺（Mavis）发起了捐款项目。为了深刻揭露塔利班的种种恶行，该组织通过电子邮件报道塔利班社会政策的残酷事实，这封电子邮件是第一批迅速传播的电子邮件之一，“性别隔离”一词由此进入美国的政治良知中。

如果这些女权主义者的努力旨在羞辱塔利班，使其改变政策，那她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奥马尔的统治十分稳固，一帮美国女人作何感想，他完全无须理会。但女权主义者的目标确实也很重要，她们纠察了优尼科公司的美国办事处，还在那里向西方各国政府与企业发出警告：与塔利班打交道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优尼科搁置了输油管道计划（尽管优尼科公司否认此事与女性抗议有关），美国政府方面也显示出转变的迹象。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发表了批评塔利班的声明。1999年，联合国作出对塔利班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

至于塔利班，倒不能说无动于衷，他们表现得变本加厉。奥马尔先是签发“教令”，要求所有印度教徒佩戴黄色标志，这让人想起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在马扎里沙里夫，一名涉嫌通奸的妇女惨遭石刑。在体育场里，成千上万的男性观众仿佛庆祝胜利一般朝那名女性投掷石头。奥马尔通过展示肌肉，向巴基斯坦总理传递了一个简短信息：现在开始“一步步”执行“伊斯兰法律”，否则“他的国家可能会不稳定”。

塔利班士兵用炸药摧毁了阿富汗中部巴米扬山谷里世界最大的雕塑，这是一千多年前刻在悬崖上的两尊巨大立佛。在塔利班的所有行动

中，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上最广泛的关注和谴责。奥马尔对此颇为困惑，他问大家在哭什么，他说："我们不过就是在炸石头。"[1]

尽管美国对塔利班日渐疏远，但仍与北方联盟保持距离，反对马苏德的理由一如从前。美国国务院仍然觉得唯有普什图人才能领导阿富汗，而北方联盟中有太多人不是普什图人。更何况现在出身杜兰尼部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已经加入马苏德的阵营，因为奥马尔刺杀了他的父亲。此外，贾拉拉巴德的实力派、吉尔扎伊部的长老哈吉·卡迪尔（Hajj Qadir）也追随兄长阿卜杜勒·哈克加入了马苏德的北方联盟。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哈扎拉武装首领卡里姆·哈利利及占据赫拉特的伊斯梅尔·汗等人也先后加入，可见北方联盟是一个广泛的联盟。美国之所以反对马苏德，可能是由于马苏德与伊朗关系密切。毕竟，敌人的朋友，只能是敌人。

尽管如此，美国的战略家还是看到了北方联盟的一些价值。联盟一旦溃散，塔利班将更无动力交出本·拉登，只要北方联盟继续战斗，塔利班随时可能为了获取支持而同美国政府谈判。于是，中情局开始向马苏德的组织提供援助。金钱、武器虽不足以让它发展壮大，但足够维持其生存。中情局还暗示马苏德，如果能生擒本·拉登，并将其安全移交，美国政府将提供更多帮助。

这是一个愚蠢的要求。按照当时的形势，生擒本·拉登已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更不可行。马苏德毕竟是一位穆斯林领袖，与本·拉登争夺同样的民心。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战场上杀死本·拉登，这无损他的声誉，但若是在美国要求下抓捕本·拉登，并将其移送美国进行司法处置，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傀儡，失去阿富汗穆斯林的拥戴。既然如此，他与美国的合作也就没了意义。

美国总统大选渐渐临近，克林顿任期即将结束。提到阿富汗政策，虽然克林顿及其幕僚一向短视，但布什政府却根本无视这个国家及其带来的问题。克林顿政府一心只想抓捕本·拉登，而布什团队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本·拉登，更不用说他带来的风暴了。2000年大选期间，有人问乔治·布什对塔利班的看法。当时，布什还以为塔利班是个摇滚乐队。[2]布什的外交政策专家赖斯对塔利班不屑一顾，称其为伊朗的走卒，要知道，双方根本不共戴天。布什政府承诺会制定一个总体方案，但他们不想对个别威胁大惊小怪。"我厌倦了打苍蝇。"面对赖斯，布什总统如此表示。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承认恐怖主义问题严重，但"时机尚未成熟"。[3]

乔治·布什及其团队是具有不同全球视野的新保守主义者，施政重点将发生重大转变。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唯我独尊的地位，让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又称新自由主义者）萌生了新的想法。他们无不觉得，美国正面临一次天赐良机——与其说是机遇，毋宁说是使命——美国应当发挥超群的国力，改变世界。为此，美国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在一切地区推行美式价值观；扶持民主政权，组织民主选举；打破一切贸易壁垒，缩小政府职能，让世界各国效仿美国，施行自由的经济政策。新保守派认为，干预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出的药方，但明显不大成功，现在是时候看看私人资本从所有限制中解放出来后能做些什么了。

碰巧的是，刚刚过去的十年，科学技术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相形之下，工业革命看上去就像石器时代。当“圣战”武装将喀布尔夷为平地的时候，计算机及其影响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塔利班进军喀布尔时，个人电脑已经开始进入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家庭，电子邮件问世，使邮政服务变得过时。1989年还没有手机，此时变得只有磁带大小，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再也无须依赖固定电话。互联网在飞速发展，一个调制解调器就能连接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可以访问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息世界，而塔利班正把阿富汗拽回公元7世纪。

新技术和新保守主义的愿景与日益增长的全球化趋势相吻合，大型公司可以以任何方式将其业务进行跨国分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薪资要求较低，生产正转移到中国、印度、东南亚与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企业的行政职能在基础设施发达、生活舒适的西欧、美国集聚，财政和会计职能则正在转移到税收较轻的“主权”国家。

阿富汗与这些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它和索马里及其他“失败国家”一样，似乎与这些发展进步无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星球上，最先进的部分和最落后的部分之间的巨大差距即将达到引爆点。

2000年，美国大选陷入僵局。当年底，当两位候选人就“绞刑”问题展开辩论时，德国汉堡的圣城清真寺里的阿拉伯学生正在为宗教激进分子、阿富汗“圣战”老兵扎马尔（Zammer）唱彩。扎马尔的四名学生，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齐阿德·扎拉赫（Ziad Jarrah）、马尔万·舍卜希（Marwan al-Shebhi）和拉姆齐·比纳勒希卜（Ramzi Binalshibh）前往阿富汗与“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人会面，并提出了一项计划：劫持飞机作为自杀式恐怖袭击的武器。本·拉登饶有兴趣地听

着。

2001年夏天，马苏德前往法国访问，那是他唯一的一次外访经历。马苏德此行是受到一名比利时外交官的邀请，就“基地”组织的危害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在那里，他告诉各位议员，阿富汗其实正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塔利班不过是巴基斯坦的前驱部队。在马苏德看来，塔利班控制的区域，已经成了恐怖主义的武装训练营，从这里走出的恐怖分子，将对西方世界进行破坏。为此，西方国家应当引起重视，并对自己及其盟友进行支持，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马苏德的讲话，大家礼貌性地报以掌声。

那一次，马苏德一无所获。回到阿富汗，他与其盟友还在不断失去阵地。塔利班咄咄逼人，北方联盟仅能掌握阿富汗东北部的一隅。就这一点立足之地，他们还得竭力苦战方能维持。那年夏天，马苏德在住所的露台上读着古典波斯诗集，度过了许多个炎热的夜晚。当时，他的须发已经略微灰白，背部疼痛的老毛病也在时时折磨着他，一生的事业仿佛就要走到终点。不过，马苏德并未放弃希望，他认为形势即将转变。塔利班宣扬的那种“教法”残忍无知，终归会让广大穆斯林心生反感。总有一天，大家会迷途知返，回归中正理性的信仰之路。相信到那个时候，阿富汗会迎来繁荣摩登的新时代，它会向世界展示伊斯兰的公正、优雅与民主，成为万国仰慕的典范。只要他把信息传达给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就能引发潮流的逆转，他需要冲破塔利班、巴基斯坦与美国的重重封锁。

因此，当马苏德收到伦敦一家电视台的采访邀约时，他很高兴。对方表示会派出两名记者，前往阿富汗拜会他。马苏德的普什图盟友赛义夫已经作出保证，此事并无问题，两位记者也都确有其人。赛义夫也是纵横一方的军阀，他的支持者是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那一次，也不知他是无心之失，还是蓄意谋害马苏德。总之，马苏德决定接受采访。

9月9日，卡里姆·图扎尼和卡塞姆·巴卡里两名“记者”敲响了马苏德的家门，采访在装饰简单的住所里进行。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过去，马苏德似乎放松了警惕，“摄影记者”趁机引爆了摄像机中暗藏的炸药，其本人当场倒毙，而马苏德也被炸得血肉模糊，马苏德的助手、著名诗人哈利利（Khallili）的儿子身负重伤，另一名“记者”跳窗逃离了现场。当然，他没能逃出马苏德武装的掌心，大家一拥而上，将凶手痛殴至死。如此行为，引发了一些怀疑：为什么不活捉凶手，从而揪出幕后主使？这也许是马苏德武装中的内鬼在杀人灭口，那又是何人所为？中情局、

三军情报局、“基地”组织，还是其他组织派来的人？

对于这种阴谋论，我觉得可笑。凶徒竟然深入马苏德的总部，杀死了这位神话中的英雄，行凶地点竟然就在马苏德的宅邸。那一刻，这场刺杀一定在马苏德的追随者中激起了盲目的愤怒。对于接下来的暴力事件，我们无须解释，如果凶手活着走出来，人们反而会怀疑其中有鬼。

马苏德遇害之后两天，一则新闻震惊了世界。22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撞向纽约的世贸中心大楼，一架撞向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还有一架飞机在匹兹堡附近坠毁，共造成约3000人遇难。“9·11”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伤在历史上前所未见。值得一提的是，那年夏天，其中的4名恐怖分子曾在本·拉登设在阿富汗的武装训练营受训。

“9·11”恐怖袭击的消息传到阿富汗，好些塔利班高层人物都为之欢欣鼓舞。虽然他们并不清楚真凶的身份，但是，美国是敌人，敌人受难，他们自然心情不错。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政权将会因此倾覆，毕竟华盛顿与喀布尔相距遥远，美国人能做什么？[4]

绝大多数喀布尔人并不这么认为。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视美国为压倒一切的力量，不等布什发表讲话，他们便有了风雨欲来的预感。“9·11”事件发生后不过几天（《纽约时报》报道，几个小时内）[5]，美国就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2001年10月7日，美国人终于动手了。从停泊在波斯湾的军舰上发出的“战斧”巡航导弹，精准击中了阿富汗境内的目标，英、美联军的远程轰炸机聚集在阿富汗上空。这个不幸的国家再次遭到严重的空中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全球新闻媒体对这些袭击进行了跟踪报道，并以动画形式加以说明。电视观众看到的是一条从阿拉伯海射出的箭流，目标直指代表阿富汗城市的小圆圈，那里的爆炸图标反复绽放。

新闻播音员还在画面下配了文字，但不懂英语的人并不知道在说什么。数百万穆斯林只看到阿富汗在饱受摧残，遍地都是爆炸，爆炸，爆炸。

同一时刻，本·拉登正在发表严肃的视频讲话，他身着庄重的白色长袍，还引用《古兰经》的诗句。有了互联网的支持，全球观众都能实时观看本·拉登的讲话。他说的是阿拉伯语，绝大多数穆斯林其实不会说阿拉伯语，就像他们不会说英语一样，他们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他们

理解图像。通过视频画面，人们了解到，本·拉登谈到了先知穆罕默德是如何从一个凡夫俗子成为安拉在人间的代表，这是穆斯林想象中最振奋的一幕。简言之，战场之外，媒体领域也在进行激烈的交锋。战场上，西方国家大获全胜；但在舆论战场，本·拉登似乎占了上风。毕竟，他只是想挑起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并趁机自命为领袖。

几个星期过去了，阿富汗境内几乎所有的目标都被美国军队从空中清理了一遍。而后，美方转变策略，分别从两个方向推进：其一，鼓励北方联盟发起反击，并承诺为其提供掩护与支援；其二，正式警告巴基斯坦，要求其不得继续偏袒塔利班。

这一次，美国人动了真格。经济与外交政策双管齐下，巴基斯坦的态度终于有所转变。其实，华盛顿方面一早就有能力掌控局面，不知为何，他们却要耽搁如此长的时间。失去了巴基斯坦的支持，塔利班变得一事无成。北方联盟则在西方的军事支持下，步步挺进，势不可挡。

11月8日，巴基斯坦政府命令塔利班撤走其设在卡拉奇的领事馆，塔利班派驻卡拉奇的领事人员立即离境。三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塔利班的领导人逃出了喀布尔。次日，喀布尔已经成了无主之城。纵使北方联盟星夜兼程，其先头部队也在几十英里之外。不过，他们不能继续行进了。美国军方有令，“国际社会”（也就是美国政府）对阿富汗的前途尚无打算，因此，所有军队都要原地待命。或许1992年的乱局让美国学到了一点教训。他们勒令各派军队止步，可能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又或是巴基斯坦和美国讨价还价，成功说服美国保住了其代理人的地位。塔利班出逃前的一周，媒体上就有人根据形势猜测，其实有两种塔利班：一种秉性邪恶，不但欺压妇女，还与本·拉登沆瀣一气；另一种则正直保守，是阿富汗传统的捍卫者。

北方联盟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马苏德的几个亲信手里。美国的命令，他们并不打算遵守。此外，他们也不想与“正直保守”的塔利班进行谈判。他们知道，唯有拿下喀布尔，才能拥有对国家未来的发言权，否则他们就只能靠边站。于是，11月13日，许多曾经相互交战的“圣战者”政党组成的军队回到了他们五年前放弃的城市。这一次，盟友之间没有争执，更没有火并，反复无常的希克马蒂亚尔并未出现在联盟的队伍里。喀布尔人民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人们涌上街头庆祝，狂欢的氛围笼罩着整座城市。这不足为奇，每个人都觉得战争结束了，美国拯救了阿富汗！

12月7日，距离空袭阿富汗开始已逾两个月，奥马尔及其同伙逃离

了他们的真正据点坎大哈，逃窜到巴、阿边境地区。他们对这里实在太过熟悉，抗苏战争时期，他们曾作为难民儿童生活在这里，他们悄无声息地就能融入人群，彻底消失。

第五部分　乱象依旧

表面上看，阿富汗人拿起武器驱逐苏联侵略军，是在进行一场万众一心的爱国解放战争。事实上，战争并未显示团结，倒是反映了阿富汗社会的二元对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不仅是苏联的傀儡，还是城市阶级的代言人。“圣战”武装也不仅是“反共”的自由战士，他们的背后还有保守的乡村势力作支撑。反苏战争和20世纪20年代的那场争夺区别不大。当年，保守势力赶走了阿曼努拉。几十年后，他们再一次击垮了革新阶层，阿富汗文化中关于妇女问题的争论再次甚嚣尘上。这是一场世俗的现代冲击与伊斯兰之间的战争。

自从一位普什图战士建立这个国家以来，普什图人在阿富汗政治中就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反苏战争打破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格局，它把各民族间的权力关系问题摆到了桌面上。马苏德不仅与苏联作战，他也为塔吉克人而战。哈扎拉人以哈扎拉人的身份战斗，乌兹别克人以乌兹别克人的身份战斗。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是普什图人对其他民族的胜利。即便在普什图社会内部，那场战争也带来了变迁。曾经显贵的杜兰尼部风光不再，聚居杜兰德线南部的普什图人成了领导。有了这场胜利，旧的阿富汗似乎决定性地打败了新的阿富汗，农村部队打败了城市，阿富汗妇女解放被赋予的权利被永久剥夺，阿曼努拉的革命性改革走到了尽头。

事实上，多斯特·穆罕默德家族建立的一切都成了废墟，喀布尔不再是这个国家唯一无可置疑的首都。坎大哈成了塔利班的据点，赫拉特再次成为割据势力的中心，马扎里沙里夫更是成了独立小王国的都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落入了军阀之手，南部和东南部的边界正在消失。一个旧有的问题再次被提出：这样的阿富汗还是一个国家吗？

但是，“基地”组织以此作为据点制造了“9·11”事件，把美国卷入了阿富汗的故事。塔利班很快被推翻，但这对阿富汗意味着什么？喀布尔的中央政权能否回归？流亡的城市精英能否重返家园？技术官僚会不会再次崛起？阿富汗能否回到拥有民主宪政政府的中央集权现代民族国家的轨道上？这些都是阿富汗人现在面临的问题。

第28章　波恩计划

2001年12月，联合国在德国召开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不少代表应邀来到德国，讨论阿富汗的前途问题。大战之后的和平会议一般都是战胜国颐指气使，对战败者发号施令，战败方甚至都不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主要是为保证战胜各方能够和平共处，与会代表都是在反苏战争中崛起的军阀势力。2001年12月召开的波恩会议，本该在苏联撤军后的1992年召开。多年以后，当年的参战各方再次聚到一起（唯一的例外就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毕竟这个党派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代表们虽然以个人身份参加会议，但可分为四大阵营。其一是北方联盟，他们是阿富汗北方的少数民族政党代表。其二是“白沙瓦组织”（the Peshawar group），以普什图的“圣战”武装为主，他们在巴基斯坦活动频繁，并在该国具备一定政治影响力。其三是“塞浦路斯集团”（the Cyprus group）[(1)]，以伊朗为后台，包括哈扎拉人和赫拉特人，比如伊斯梅尔·汗。最后是“罗马组织”（the Rome group），是前国王查希尔的盟友、同伙和支持者，是城市精英的代表。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曾在西方生活多年，代表了寓居欧美的阿富汗侨民的希望。对他们来说，这些人将带领国家走向未来。

会议上，南部和东南部乡村地区的普什图人被排除在外。这也难怪，阿富汗的南部是塔利班的勃兴之地，就连美国人也觉得，一旦当地的普什图势力加入会谈，塔利班很可能不费一枪一弹便能重夺政权。问题在于，被排除在外的普什图人占阿富汗人口的多数，将他们排除在外，无助于阿富汗局势的进步和稳定。当时，吉尔扎伊部和杜兰尼部不断交恶，双边关系几乎倒退回了艾哈迈德·沙阿时代。两个部落所在的区域正是阿富汗的那道创口——杜兰德线附近。当地居民无法参会，鸿沟就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同时，普什图部落的缺席与失位，还将在北方各大城市和落后的南方部落之间产生更大的裂痕。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并不完备的会议，阿富汗的前途将因此蒙上阴影。

不过，与会各方代表当时都怀抱乐观情绪。在西方的主导下，他们制订了一个四步计划：

一、联合组建一个临时政府，过渡期为6个月。

二、召开支尔格大会议，也就是大国民会议，组成临时政府，过渡期为2年，并选举产生一名足以服众的政府首脑。

三、在两年的过渡期内，一个由博学的阿富汗人组成的委员会将起草一部新的宪法。

四、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确立代议制民主政体。

这个计划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与会代表想当然地为计划假设了一个终点，他们满心以为，有了宪法的保证，总统大选与议会选举都将顺利举行。虽然宪法还未成形，但既然总统与议会都会各司其职，那么起草宪法的工作也会顺利进行。对于一个战后百废待兴的国家，波恩计划也许是完美的。不过，阿富汗的纷争远没有真正停止，长期存在的对立纷争不断把这个国家拉上各自想要的发展轨道：农村与城市、变革与保守、新与旧、国家官僚与部落关系、世俗与宗教、国家军队与私人武装、以喀布尔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与一个没有任何中心的由乡村共和组成的混乱宇宙，以及古老的阿富汗与阿卜杜尔·拉赫曼创造的阿富汗等。阿富汗的历史就像一个钟摆，近几十年来，钟摆的每一次摆动，都将这个国家推向了另一个极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一度将阿富汗推向一个极端，建立了一个世俗化的威权政府，但没能延续下来；塔利班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推行教士与军阀掌控的极端宗教保守主义。

如上的矛盾，波恩会议自然未能解决。不过，国际社会决定搭一把手，让阿富汗回归世俗化的方向，一系列重大援助即将展开。对于阿富汗的前途，与会各方也达成了共识：未来的阿富汗应该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其政治制度将遵循西方价值观运行。对此结果，不少阿富汗人深感欣慰，包括笔者在内。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时期，正值现代化蔚然成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这一代人的努力呼吁，西方世界才注意到苏联入侵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大多数美国公众总能记得那么几个来自阿富汗的名人，他们和我一样，对波恩计划充满期待。

波恩计划代表了阿富汗技术官僚和贵族的回归，标志着阿富汗这个屡被中断的“项目”又重启了。它发端于多斯特·穆罕默德时期，由阿卜杜尔·拉赫曼发展壮大，阿曼努拉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致。毫无疑问，对手会重新集结并展开反击，因为在阿富汗问题上，钟摆永远不会停止，哪怕一方暂时得胜，也不能阻止对方展开反击。

波恩会议圆满结束。在美国的组织与强势推进下，阿富汗成立了临时政府，哈米德·卡尔扎伊当选为总统。此人虽无政治经验，却是美国政

府属意的人选。卡尔扎伊的好些亲戚都在美国定居，美国第一家著名的阿富汗餐厅，就是他的兄弟马哈茂德创立的。旧金山的赫尔曼德餐厅，便是马哈茂德旗下的产业之一，它赢得了《美食杂志》（*Courmet Magazine*）[(2)]的赞誉。卡尔扎伊的朋友哈利勒扎德曾是里根总统的阿富汗事务顾问，通过这层关系，卡尔扎伊和美国共和党的众多官员有了交情。正是这些人的全力推举，布什方能当选总统。据说，卡尔扎伊曾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达拉斯的优尼科公司奔走呼吁。不过，他本人对此坚决否认，他与优尼科公司的关系到底如何，外人实在难以知晓。卡尔扎伊为人精明，了解全球商业热点所在，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相信他不会在外交场合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卡尔扎伊也有一些优势，如传统的阿富汗部落声望。他是普什图人，他的父亲是波帕扎伊部落的首领。波帕扎伊是主要的（杜兰尼）普什图部落，也是坎大哈的主要部落。阿富汗各大城市之中，坎大哈算得上是最主要的普什图人聚居地。一开始，卡尔扎伊和塔利班走得很近。后来，老卡尔扎伊被塔利班暗杀，从而使哈米德·卡尔扎伊成了反塔利班的坚定支持者。

诚然，卡尔扎伊在阿富汗没有什么忠诚的支持者，但这也意味着不存在死敌。抗苏战争期间，他鲜有建树，而曾经的抗苏英雄，后来大多因为内战而身败名裂。卡尔扎伊没有追随者，没有死敌，没有污点，似乎是理想的总统人选，毕竟，新兴的阿富汗应该和伤心的过去彻底告别。

然而，北方联盟的势力仍然不可小觑，那个时候，喀布尔仍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因此，北方联盟占据了内阁中最关键的三席——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与外交部长，分别由马苏德的三员干将法希姆将军、尤努斯·卡努尼将军及名字非常好的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担任。

和谈会议一般在战事结束后召开，波恩会议召开时，阿富汗战事未曾结束。事实上，它在战场形势白热化前就召开了。当阿富汗代表前往德国时，美国特种部队和北方联盟的战士正在向东南边境的托拉博拉洞穴建筑群发起进攻，美国军队朝里面发射了燃烧弹，焚烧了里面所有人，但本·拉登不知何故逃脱了。

北方联盟部队继续在阿富汗北部与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圣战分子”的核心部队作战，后者中有数百人被捕，但大多数人后来在越狱未遂中被杀。另有7000多名塔利班分子与“基地”组织成员被困在北方，但在美国支持下，巴基斯坦方面出动飞机，运走了其中的数千名阿拉伯人与巴基

斯坦人。北方联盟本已将敌人逼入绝境，最终却扑了个空。[1]

托拉博拉一役以后，战火又烧到了沙希科特的山谷里。正是在这个地方，驻阿美军第一次遭遇了重大伤亡。一架直升机不幸失事，导致8名士兵身亡。当时我正在白沙瓦的一家宾馆里，通过屋里的大屏幕卫星电视了解到事件的来龙去脉。房间里的电视频道有五六十个，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到半岛电视台，再到当地的新闻频道，几乎都对这场战役投入了百分之百的关注，取代了日常的板球和足球比赛节目。

一个最近跨越边境来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村民坐在我身旁，敬畏地盯着电视问道："这些伟大的将军是谁？"

"这些人不是将军，只是普通的士兵。"我告诉他。

他感到迷惑不解："我们村每天都有人被杀。有时候，一天就有十几人丧生，但从没有上过新闻。你肯定搞错了吧！这些人里面肯定有什么重要人物。"

沙希科特的塔利班分子抵抗得尤为激烈。不过，一周之后，他们仍然没逃过败亡的命运。3月18日，美军司令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宣布主要战斗已经结束，美国取得了胜利。看来，阿富汗这片"帝国的坟场"也没有那么邪性，美国人轻轻松松就征服了这里。当然，仍有数千名美军会在边境"扫荡"塔利班残余。现在，波恩计划可以实施了。

支尔格大会定于6月召开。按照美国人的安排，大会将会非常顺利。前国王查希尔已经表示，他不会试图复辟。作为交换，北方联盟的领袖拉巴尼也声称无意竞逐任何职位。如此一来，总统一职只为卡尔扎伊虚位以待。温文尔雅的国际人士哈米德·卡尔扎伊即将成为阿富汗过渡政府的总统。

本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支尔格大会之前的那个星期，却又闹出了一些乱子。查希尔国王的一位孙子向媒体表示，其实国王殿下本想为阿富汗作出更大的贡献。第二天，喀布尔的墙上贴满了拉巴尼的海报，发出了不寒而栗的信号，如果查希尔参选，他会奉陪到底。如此一来，喀布尔街头可能会喋血一片，相关的剧情，在1992年就已经上演过。哈利勒扎德出面平息事态，并且成功了。查希尔称他被误解了，拉巴尼的海报也消失了。6月11日，支尔格大会如期开幕，进展顺利。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但一切实在太过顺利了。真正的支尔格大会通常要持续数天，大家

为了一点利益不断争辩、不断妥协。会议结果从来都是未知的，而最后作出的决定则代表了一个实际的、来之不易的共识。可是，这次会议尚未开幕，结果就已明了。大家都知道美国人选择了卡尔扎伊，他就一定能够当选。美其名曰支尔格大会，其实不过是一场政治秀。

既然是大选，形式自然要完备。除卡尔扎伊之外，他们还安排了另外两位候选人。其中一人是女权主义活动家玛苏达·贾拉尔（Masooda Jalal），她在会上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妇女权益。出于礼貌，一些代表用选票支持她。另一位候选人是诗人纳代（Nedai），他表示要为阿富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为流程需要，他也获得了一些选票。回首往事，纳代说，他早就知道无望当选，但是，仅有一名候选人的民主选举实在不像话，正因如此，他才自告奋勇“陪跑”，这么做只是为了帮助建立民主。这是一种非常勇敢的姿态，真的。

时至今日，阿富汗人都在纳闷美国人为什么要百般排挤前国王查希尔，要知道，他是全国唯一可信的和解象征。曾经的喀布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沙姆斯告诉我，当年他若有机会角逐总统宝座，就会宣布全力支持美国的干预行动，然后告诉议会，一旦当选，会把所有权力移交给议会真正需要的前国王。沙姆斯认为自己的这番表态会带来大量的支持，将压倒美国支持卡尔扎伊的计划。他的计划虽然听起来很狡猾，不过，沙姆斯和政治圈根本沾不上边，更别提进入支尔格大会，竞选总统。支尔格大会已经确立了卡尔扎伊的合法地位，其程序就如把艾哈迈德·沙阿推上王位一般。按理说，大家都该对卡尔扎伊的权威毫无疑义，可是，许多阿富汗人认为，美国人操纵下的议会根本不能算数，猜忌的种子在那次会议上已经种下。

根据波恩计划，卡尔扎伊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宪法。2003年12月，宪法草案成形。随后，政府再次召开支尔格会议审议宪法草案。这一次，美国人倒没有多加干涉，会场变得混乱。来自西部边境省份的年轻女代表马拉赖·乔亚甚至站起来，指责身边这些大胡子老头都是军阀与战犯，认为这些人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而不是堂而皇之地参与国政，对阿富汗的未来指手画脚。对方也不示弱，连连叫着“妓女”，把乔亚赶了下去。

接下来的一个月，国内各派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宪法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为求妥协，最终的定稿自然问题很多，不少条款语焉不详，有些地方又过分烦琐。例如，宣布前国王查希尔为“国父”，但这一规定很快就随着这位老人的去世而变得毫无意义。宪法多次宣布阿富汗是一

个“伊斯兰共和国”，禁止任何与伊斯兰教法相抵触的法律，它明确规定，男女都是自由的，保障女性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工作权和（免费的）受教育权。这些都与阿曼努拉时代的问题遥相呼应，还试图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

根据宪法，阿富汗议会分上、下两院，下院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上院则由总统亲自任命。总统任期五年，同一个人最多只能连任两届。除非总统认为国家需要，有必要继续执政，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连任两届以上。

总统与议会都可以制定法律，但如果议会不批准，总统提出的法律就不能颁布施行，除非总统认为这是为了国家利益绝对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这样做。

新宪法出台的时候，我问了在加州的阿富汗朋友对此有何看法。阿拉美达一所大学的行政人员穆斯塔法·博帕尔表示：“如果能够带来十年的和平，我会很高兴的。我只要十年。”看来，大家对宪法的要求实在不高。

其实，阿富汗的真正问题不是宪法能否提供适当的机制，而是阿富汗人是否会接受宪法。电影制作人塔玛拉·古尔德（Tamara Gould）拍摄纪录片《国家的地狱》（*A Hell of a Nation*）期间，曾就宪法问题采访当地一名男子。达里语中，“宪法”与“基本法”乃是同一个词。男子摇了摇头，“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基本法？”他笑道，“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基本法就是沙里亚法。”此言一出，其他人都“咯咯”地笑了起来。是啊，基本法，阿富汗早已有之，这些外国人为什么还要多此一问呢？

尽管如此，波恩计划一开始还算顺利，2004年秋天的总统选举非常成功。选举前，联合国曾经请了不少当地人为选举造势，进行选民登记。宣传团队中有不少妇女，她们深入偏僻的乡村，去和那里的人们解释什么是选举。我的堂姐扎希达曾与一个团队一起工作，农村女性对于选举的高昂热情让她印象深刻。她记得，有位妇女激动地说：“我要让我丈夫多拿一些选票，能拿多少就拿多少！选举那天，我什么都不做，就要不断投票。”

最终，登记的选民超过1200万人，其中的75万人来自巴基斯坦的难民营。当时阿富汗的人口有3000万，其中57%是未成年人（按照选举法，未满18周岁不能参与投票）。因此，1200万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不错了。最终，四分之三的登记选民完成了投票。这个数字似乎有些夸张，

毕竟在美国，一半的登记选民能够出现在投票站就不错了，一场大雨更会浇得投票站门庭冷清。阿富汗总统大选期间，联合国观察员并未发现舞弊现象。每一个投票点外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就连身着罩袍的妇女也在静静等待，准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那一次，共有18人进入最后一轮角逐。其中有世俗化倾向的塔吉克诗人佩德拉姆，也有伊斯兰保守主义者艾哈迈德·艾哈迈德扎伊，此人外号“工程师”，是位大学教授。卡尔扎伊在第一次支尔格会议上的竞选对手玛苏达·贾拉尔再次参选，她宣称：“苦难的国家需要母亲与医生来拯救。本人既是医生，又身为人母。”

那次大选很少有竞选活动，因为只有哈米德·卡尔扎伊有资源派遣他的团队到全国各地。塔利班的残余势力试图破坏选举，他们伏击了一辆公共汽车，杀死了车上所有持有选票的人。尽管如此，选举那天，仍有900多万人前往投票站，那一刻，大家都无所畏惧。

大多数选民目不识丁，自然不清楚选票上那些名字分别是谁。为了减轻困扰，允许候选人在他们的照片一旁附上一个图标，以表达他们代表的东西。候选人若希望选民知道他是一位支持现代教育的进步人士，就附上一枚书本形状的记号。如果候选人希望人们知道他是虔诚的保守派，把《古兰经》看得高于生命，也可以标上相应的记号让选民了解。

由此可见，大多数选民并非心中已有心仪的总统人选，他们出现在投票站，只是为了支持选举本身。从这个角度看，这次选举非常成功。

几个月后的议会选举却没有这么顺利。较之大选，议员舞弊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更多的暴力事件在选举前期、期间和后期爆发。不过，议会制度到底得到了奠定。到2005年初，波恩计划的四步都已走完，即便悲观主义者也相信阿富汗即将腾飞。

但是，想要走出苦海又谈何容易。阿富汗历经连年的战争与无序，早就已经满目疮痍。不少阿富汗人已经从苦难的岁月中悟出了苟存乱世的“真理”：相信枪，别相信邻居。大家也已经习惯投靠血缘相近的军阀，在他们的保护下抱团取暖。战乱一日不停，波恩计划就不会起到任何效果。从第一次支尔格大会结束的那一刻起，这个国家就一直游走在秩序与混乱之间。唯有秩序得到奠定，大家才可以安享和平；只有大多数人都放下武器，放眼长远，社会方能恢复秩序。可是，绝大多数人不会安心追求长期目标，除非他们相信未来是稳定的。如果明天有炸弹会落到房顶上，修缮房子是没用的。

阿富汗的重建者们必须尽快让社会恢复常态，唯有如此，才能让阿富汗人对波恩计划保持信心。哪怕乐观者只有一小部分，他们也算达到了目的。如此一来，外国投资者才能从日后的繁荣稳定中受益。因此，必须有人作出表率，只要一部分学校复课，一部分商店再次开门迎客，一些人再次找到工作，波恩计划就不至于遭遇信任危机。慢慢地，大家就会跟随潮流，继续追求和平生活，波恩计划的前景也会变得更加乐观，社会大众才不至于错过这趟重建的列车，整个社会才有可能恢复如初。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和平与秩序抱有期待。至少，波恩计划下的社会局面，他们并不乐见。如果喀布尔的命令能对全国的每个地区、每个村庄都产生约束力，整个国家将会更加太平，大多数百姓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但是，中央集权的加强，也会让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大伤元气。中央与地方之争，并不仅限于阿卜杜尔·拉赫曼那个时代。自命毛拉的无赖、部落的首领、支尔格会议选出的头人，都曾利用乱局巩固势力，国家恢复和平，反倒有损他们的利益。如果西方价值观深入每个家庭，那么作为一个阶级的男性恐怕将失去在家庭中凌驾于女性的某些权力。对女性而言，未受教育的年长女性过去还能凭借年长占据尊位，新观念之下，她们的主导权将让给年轻一代，毕竟后者大多受过教育，还有自己的事业，对于外部世界也更加适应。如此看来，波恩计划对每个人都是利害攸关的。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那些走下战场的男性。他们无家可归，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长大成人。他们可能出身贫困，但是战场不论出身，也无关背景，只看战果，因此，那些好勇斗狠的人就变得突出了。而且，一旦阿富汗人开始相互争斗，决定等级高低的不仅是战斗能力，毕竟善战的人有很多。因此，从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战士，往往是不顾底线、残忍暴虐的亡命徒。

战争好似一把筛子，无用的品质将被残酷洗刷。战场中的人往往没有同情心，也不会拥有什么骑士精神。唯有毫不顾忌地行使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才能在无序的社会中赢得先机。同时，家族的解体、亲人的离散，也让这些人挣脱了文化与道德的束缚。无法无天的环境之下，自然没人能够惩戒他们的恶行。抗苏战争期间的游击队指挥官，后来大多蜕变成了暴虐的军阀，他们造成的混乱局面，为塔利班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塔利班的统治严酷至极，不过，也有一些人因此受益。一时间，国内又多出了一大批自命的毛拉。阿富汗现在到处都是指挥官、毛

拉和军阀。严酷的教法统治下，只有这三类人才有机会大显身手，甚至称霸一方。波恩计划一旦实现，他们的辉煌过去只会沦为负担，甚至可能会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因此，对他们而言，社会一定不能恢复安定。

2004年的总统大选，吸引了900万人前来投票。人心思定，和平才是阿富汗的主流意见。但是，比起蠢蠢欲动的军阀，建设者们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区区一点进步，实在不足以唤醒民众的信心，持之以恒才有可能迎来转机。医院开业、桥梁奠基、学校复课、学生毕业，缓缓汇流，才有可能填满干涸的希望之池。问题在于，这一池希望之水不知道何时才能蓄满。

相比之下，意图破坏的无赖只需要小小的动作，就能达到让人绝望的目的。他们只要炸毁一家医院，焚毁一所学校，用自杀式人肉炸弹搅乱一次毕业典礼，人们心中的恐惧都会被无限放大，化作凄厉的惨叫。破坏者清楚，一点挑衅足以让人拿起武器进行对抗，选择以暴制暴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战争与和平的天平随时可能失衡，就看哪一方先突破临界点。

阻止阿富汗在喀布尔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对巴基斯坦来说也是利害攸关的。塔利班早已渗透进巴基斯坦，从斯瓦特山区到俾路支的部落叛军以伊斯兰教法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名义，纷纷组织起各自的武装，发动了针对伊斯兰堡政府的叛乱。巴基斯坦自然希望这股危险洪流快点转回到喀布尔，远离伊斯兰堡，而这可以通过派遣特工进行破坏来实现。

边境地区还活跃着各种帮派，他们有的主营走私，有的通过毒品敛财，有的则贩卖军火，还有的什么都做。所有帮派都在与塔利班形成合力，而且它们的武装在不断扩大。总之，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横亘在阿富汗通往和平的道路上，他们阻碍了新的中央政府发号施令，也阻挡了城市中的西化思潮，饱受战乱的普通百姓、归国创业的技术官僚深受其害，国际社会的良好愿望可能因此化为泡影，美国政府付出的金钱与军力将难以得到回报。

(1)　原文the Cypress group有误，应为the Cyprus group。——编者注

(2)　美国历史上最经典的美食杂志，2009年停刊。——编者注

第29章　喀布尔之春

一开始，波恩计划颇具势头。2002年1月，德国波恩会议刚结束，几个发达国家的代表就齐聚日本东京，商讨阿富汗的前途问题。与会代表都想知道，让阿富汗回归正常国家轨道，国际社会需要花费多少金钱。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被抛来抛去，100亿美元、150亿美元、200亿美元……

美国总统布什的心里也有一笔账，他认为解决阿富汗问题，美国可以借鉴此前的“马歇尔计划”。提到马歇尔计划，阿富汗的城市阶层绝对不会陌生。战后欧洲经济的复苏，还得感谢杜鲁门总统的这一大手笔。当年，美国政府付出很多，收获也不少，苏联的扩张势头得到遏制，投资带来的回报更让美国大发横财。马歇尔计划的成功，让布什政府看到了在阿富汗推行类似计划的可能，通过援助让阿富汗恢复元气。如此一来，美国在中亚的核心地带将拥有一个忠诚、繁荣的穆斯林盟友，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得到保障。同时，宗教激进主义也将得到有效遏制。

到了夏天，马歇尔计划已在阿富汗被炒得火热，每个人都在畅想自己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那年，我搭乘飞机从印度前往喀布尔，同机的一位乘客告诉我，他要开一家化妆品工厂。这个人并非来自加州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而是一个从未到过比印度德里更远地方的店主。我还记得他的模样：一脸黑胡子，穿着一件过膝的衬衫、一条肥大的灯笼裤，头上还戴着头巾。路透社记者镜头下的塔利班分子，就是这副样子。

“您打算在阿富汗开化妆品工厂？”我有些惊讶。

“没错，我想开一家化妆品工厂。”他表示，“塔利班下台了，全国的女人自然不会继续被关在家里，美容用品肯定大有市场。我的表兄已经从迪拜进口了一大批口红，就等着轻轻松松地数钱了。但要我说，口红这种东西何必进口，我们完全可以自产自销嘛。”

回到老家我才发现，几乎每位乡亲都有一个发财的梦想。马歇尔计划援助的资金，他们已经想好了用途。在战争爆发之前，凿井是一门广受欢迎的小本生意。有了马歇尔计划支持，他们觉得可以把生意做大。当时，阿富汗已经连续七年遭遇旱情，他们认为只要水井落成，田地里立即可以长出葡萄。著名的侯赛尼提子一旦卖到喀布尔，就能带来可观的收益。

我还结识了年轻的卡尼什卡·纳瓦比。塔利班时期，他一直避居白沙瓦，其间，他成了“阿富汗重建与节能协会”的一员。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总部远在瑞典。纳瓦比回国，是希望将协会的一些发明作商业推广。其中，有一种便携式的水力发电机，正好适用于那些尚未通电的村庄。其实，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从中受益。村里只需一挂从山巅飞流直下的瀑布，人们就能享受电力带来的方便。除了阿富汗，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村庄拥有这等风景。发电机产生的能量可以满足附近居民的用电需求，用于发电的水还能继续灌溉田地，相关的好处真是不胜枚举！纳瓦比所在的协会还有另外两种发明，一种是犹如两个锅盖天线的巨型太阳能暖炉，一种是可以从牛粪中提取沼气的装置，这些东西都有在农村地区畅销的潜力。

东京会议最后决定，阿富汗所需的重建资金应在250亿美元左右。阿富汗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他们表示，100亿美元就已经足够。不想，参加会议的国家却只愿出资30亿美元。不过，这个数目仍比之前估计的多。一年前，阿富汗可没人想到会有这种结果。况且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援助滚滚而来。[1]

仲夏的喀布尔一派乐观景象，微风当中弥漫着水泥带来的重建气息。侨民正在回流，无论医生、金融专才、管理者还是工程师，都觉得祖国大有希望。加州弗里蒙特是亚洲之外最大的阿富汗侨民聚居地，战争结束后，舍尔扎伊博士回到祖国。此后，他被委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职位。阿史拉夫·哈尼教授也告别了霍普金斯大学，作为著名的政治学者和经济学人，哈尼一度被认为将在科菲·安南之后接任联合国秘书长。此次回国，他将被委以新政府财政部长的重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转眼已是年底，东京会议承诺的30亿美元到账不到一半。但对于当时的阿富汗而言，即使10亿美元也犹如久旱之后降下的甘霖。归国侨民纷纷开始索回他们在喀布尔的房产，虽然大部分房屋已成瓦砾，但好在地皮仍在，他们还能重建家园。一些侨民拥有建筑或者规划方面的专业背景，在他们的帮助下，政府制订了城市的重建与整修计划。根据计划，喀布尔的下水管道、路灯设施、给水系统都会整修一新，每家每户都会通电。总之，大都市所需的一切基础建设都在规划之中。而且，由于喀布尔早已不再繁华，所有的工程都能快速推进。内战期间，喀布尔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建筑与设施完全损毁，塔利班上台之后，却没有进行任何整修。规划者认为，与其慢慢修复，不如再造一个喀布尔，北郊的农田和沙漠正好可以作为新址。

许多生活在欧美的阿富汗人带着少量的资金回到阿富汗，执行他们理想的发展项目。穆罕默德·汗·哈罗提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定居多年，毕业于拉什卡尔加的一所高中，我刚好也在那里就读过。哈罗提出身游牧民家庭，后来，他和家人在政府的引导下进入一个叫纳迪·阿里（Nadi Ali）的“模范城镇”定居。他后来成了医生，并移民美国，他在美国的生活很是优渥，不过，他还是选择回归故里，投身“绿村学校”（Green Village Schools）的建设。其实，早在塔利班统治时期，哈罗提就已经开始行动，塔利班官员还对他大加赞赏，而且允许他招收女生。当然，哈罗提绝不能对此大加声张。塔利班倒台之后，哈罗提彻底放开手脚，“绿村学校”越建越多，还吸引不少志愿者前来协助办学。

霍斯特省是本·拉登长期经营的一大地盘，这里的“基地”组织树大根深。即便如此，也有人愿意寻梦而来。哈法尔·拉坎瓦尔曾是人民民主党政权的一名官员。20世纪80年代，他逃往美国，后来在明尼阿波利斯从事社区工作。塔利班政权倾覆之后，拉坎瓦尔来到霍斯特兴办学校，启动资金来自美国人的捐款，不过，他也得到了当地人的鼎力支持。拉坎瓦尔把男女同校当作立校之本。他的家乡就在霍斯特附近，属于那种典型的乡村共和。拉坎瓦尔的善举，当然是为了报答家乡的桑梓之情。

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始捐资办学。2003年初，我参加了一个与伊朗电影导演马赫马勒巴夫（Makhmalbaf）有关的组织发起的募捐活动，该组织规划在阿富汗建设一批私立学校。我并不清楚学校建成后将从哪里获得运营资金，也不知道这些学校将要设置的课程以及学校负责人的身份。不过，学校将会同时招收男女学生。历经塔利班时代的禁锢之后，大家都明白女性解放的趋势不可阻挡。阿富汗境内每多一所学校和一家企业，阿富汗的女性就多了一点挣脱束缚的可能。

喀布尔大学从未完全关闭。塔利班时期，它备受摧残，神职人员将它变成了一间发育不良的伊斯兰学校。人民民主党时期，大学遭到政府的强力干预，课程中因此多了不少左翼教条思想。如今，学校重启全日制四年高等教育，学术的尊严得以慢慢恢复。秋天到来前，校园里已经有几千名学生，而且近四成是女性。喀布尔大学不仅开设应用技术、医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还有文学、历史和美术等课程。我曾参观过学校的美术学院，发现那里既有伊斯兰装饰艺术的专门课程，也有学生在练习素描与风景画。换在塔利班时代，后者纯属异教淫物，是大逆不道的。

城市里再次响起了音乐。有些人仍在使用老式的晶体管收音机，有

些人已经换上了最新的播放工具，如今人们可以津津有味地欣赏音乐了。喀布尔电台（塔利班时期被称为“沙里亚电台”）得以恢复，又播放起了流行音乐，沉寂已久的流行歌手再次受到听众的追捧。我特别喜欢歌手迪尔·阿迦（Dil Agha）的欢快歌曲《最亲爱的喀布尔》（*Kabul Jan*）。在我看来，迪尔·阿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最深的故乡情。

走在喀布尔，耳畔还会不时传来久违的老歌。其实，人们对艾哈迈德·扎希尔等人的经典旋律一直念念不忘，他的那些歌曲卡带还是大家的必备珍藏。哪怕在塔利班时代，人们也会趁着夜深人静、门户紧闭的时候，拿出磁带，放进收音机，调低音量，慢慢回味。现在，人们总算能好好欣赏音乐了。大街上，你会看到人们戴着随身听耳机听音乐，他们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打着节拍。

这些歌曲无论新旧，几乎都是从巴基斯坦传进来的，那里的一些难民从未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喀布尔市中心靠近河边的大巴扎旧址，可以找到另外一种乐子。161年前，英国人把大巴扎烧成了废墟。如今，这里又是一派热火朝天的买卖景象。商铺鳞次栉比，多得就像迷宫。其中，售卖录音带和录像带的生意尤为火爆，施瓦辛格的片子销量相当可观。当然，要说最受欢迎的影片，还数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其实，当时那些小摊所在的地方正是喀布尔河的河床（2002年以来的连年干旱，导致喀布尔河几近断流），因此，人们也把这里叫作“泰坦尼克市场”（如果河水涨起来，所有摊位都会没入水底）。

国家剧院（Kabul Nindari）再次开门迎客。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剧院每逢独立日便会上演一些原创戏剧。后来，由于塔利班政权禁止人们庆祝世俗节日（哪怕是庆祝阿富汗独立），剧院变得门庭冷清。古尔·马卡依（Gul Makai）曾是这里的一位小童星，如今，人到中年的她结束流亡生活，回国担负起了复兴剧院的重任。作为主管，马卡依的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招聘演员，排练剧目。几年过去，剧院已经创作了十几部新剧，并完成了200多场演出。[2]一个马戏团开始在阿富汗各地巡演，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另一家剧团别出心裁，不但把莎士比亚《爱的徒劳》译作达里语，还将故事背景嫁接到了现代阿富汗，他们的创意收获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亚洲基金会赞助了一个名为“阿富汗媒体与文化中心”的项目。最终，他们推出了一部名为《面纱下的阿富汗》（*Afghan Unveiled*）的电影。由于亚洲基金会的资助，14名年轻的阿富汗女性接受了如何使用摄像机、做记者的培训。随后，她们走南闯北，深入城市、乡村采访妇

女。那部影片非常精彩，不仅因为素材本身，还与女记者们的故事相关。影片的质量自然也属上乘。唯有女性记者才能深入女性的生活世界，毕竟，无论阿富汗的风气如何开放，也没有哪个家庭会允许陌生男人进入私人空间。随着影片的问世，阿富汗人的家庭生活第一次为外人所知。而且，14名女性都是塔利班时代的过来人，都有困守家中的经历，她们甚至一度忘了家门口街角的模样。没想到，如今她们能够去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和霍斯特这些远方的城市，和陌生人聊天接触，了解各地同胞的生活。通过这段经历，她们都找到了自我。[3]

20世纪60年代末，阿富汗的电影业在喀布尔缓慢起步。国立的喀布尔电影公司曾经辟出专馆，保存与阿富汗相关的一切影像资料。藏品当中，只有40部电影是本土出产的（其中大部分是纪录片与短片）。内战爆发，让本就举步维艰的电影业遭遇了灭顶之灾。塔利班又遣人把展馆里的2000部电影焚毁，一切能找到的摄影器材也被捣毁。所幸展馆的工作人员在一面墙壁后藏了1000多部电影拷贝与一些设备，[4]塔利班垮台之后，它们才重见天日，仪器再次派上用场。依靠日本方面的援助资金，喀布尔电影公司重建了基础设施。像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毕业生亚马·拉希米（Rama Rahimi）这样的外籍人士，在喀布尔大学开办了一个暑期班，为40名热切的学生讲授电影课程。

这时，喀布尔电影公司的导演萨迪克·巴尔马克（Saddiq Barmaq）也在筹备拍摄电影《奥萨马》（*Osama*）。这可不是一部讲述奥萨马·本·拉登生平的影片，主人公是一位年轻女性，她乔装改名，以一个叫“奥萨马”的男子身份生活在残酷的塔利班时代。后来，她的身份惨遭揭穿，并被一个毛拉强占为己有。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了广泛赞誉并获奖，为其他电影的制作铺平了道路。比如霍拉斯·山萨布（Horace Shansab）的《佐雷哈的秘密》（*Zoleikha*），完全是在阿富汗拍摄完成的，这部影片在世界多地的电影节上广受好评。

巴米扬大佛已被塔利班摧毁。现在，喀布尔大学的几名教授提议，重建其中的一座佛像，保持另一尊佛像的现状，以作为这场文化劫难的庄重纪念。这项提议引发了不少争议。正当阿富汗国内议论纷纷的时候，旅法阿富汗考古学家泽马利亚莱·塔尔齐（Zemaryalai Tarzi）宣布，巴米扬山谷的某处洞穴中有一尊更大的卧佛。他的结论是基于对古代旅行者文献的研究，研究表明，卧佛比最大的立佛还要大三倍。此后的每年夏天，塔尔齐都会带领团队前往巴米扬寻找卧佛（他们最近搁置了这项工作，因为当地局势仍不太平，某些野蛮之徒倘若得知佛像的所

在地，巴米扬会再次迎来一场悲剧）。

喀布尔博物馆本身就充满了故事。1978年，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小型博物院，收藏了大量犍陀罗时代的艺术品。那个年代，佛教与希腊美学互相融合，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希腊式佛教艺术。人民民主党执政时期，一些干部伙同苏联人从博物馆盗取文物，拿到国际黑市交易。内战期间，博物馆的建筑又遭到战火的摧残。20世纪90年代末期，塔利班分子闯进博物馆，剩余的文物悉数被毁。如今，博物馆工作人员将文物残片放在基座上展览，并在一旁配上文物损毁前的照片，博物馆成了塔利班文化野蛮的证明。

幸运的是，2004年4月，博物馆馆长奥马拉·马苏迪对外披露，15年前，他和同事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他们在一个秘密的地下室里藏了2000多件博物馆中最珍贵的文物。地下室被打开的那一刻，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者前来参观，还进行了电视转播，就像发现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一样。这批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中，后来有数百件作为“阿富汗黄金”（The Gold of Afghanistan）特展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

这些文物大多是金银制品，并镶嵌有宝石、半宝石，极具魅力。如此重大的发现，已经足够令人振奋，但实际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文物的背后还有一个伟大的文明。从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100年间，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们在生产精致的金银碗和烧瓶。同一时间，正处于最后一批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正在建造金字塔，阿卡德的萨尔贡大帝正在打造第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始建于公元前300年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阿伊哈努姆（Al Khanum）经过考古人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希腊文物，如青铜大力神像，以及一块描绘自然女神西布莉乘坐波斯战车的银盘。

在基督时期，阿富汗北部的游牧民族已经掌握了较高的手工艺品制作水平，其艺术风格深受波斯、希腊、罗马、中国、印度和西伯利亚等的影响，如镶嵌着绿松石的便携式黄金王冠、一只游牧民族公主穿的薄金拖鞋。

考古人员曾在巴格拉姆发现两处密室，并从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的部分珍宝被列入“阿富汗黄金”特展。考古学家一度认为，这些密室里一定藏有国王的珍宝。事后证明，这些是古代商人的仓库，一些商人把买卖物品存放在那里，如罗马统治时代的埃及玻璃烧瓶、叙利亚的青铜雕像、中国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塑、绘有希腊神话的吊坠、讲述佛陀生平的牌匾，以及描绘胸部丰满的女神与跳舞的印度教神祇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雕塑。新闻学教授乔尔·布林克利（Joel Brinkley）最近评价阿

富汗是世界上最野蛮、最原始的民族，他甚至断言："阿富汗人就像狼蛛，他们会吃掉幼崽。"[5]当人们站在这些文物面前，反思马苏迪馆长及其同事为保护和保存这些文物所冒的风险时，会对布林克利的这番言论感到厌恶。阿富汗的苦难并非阿富汗人和狼蛛的基因相似，而是由于持续数十年的灾难性悲剧。阿富汗的黑暗时代似乎已经过去，阿富汗人正踌躇满志地准备迎接下一个文明时代的到来，他们的前景会一片光明吗？

不幸的是，阿富汗的马歇尔计划从未实现。成千上万实施小规模计划的人们翘首企盼，也没能等来点燃梦想的创业启动金。规模更大的私营企业迅速崛起，不少归国侨民都掌握了一笔资金。此外，他们在国内人脉活络、关系密切，可以为银行、手机公司和电视台等企业筹集资金。阿富汗这个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似乎即将直接步入后工业化阶段。过去阿富汗甚至没有铁路，如今正在建设覆盖每个城市的航空服务（这是政府的承诺）；一个没有固定电话的地方，已经迈入了手机时代；一个没有办法让国家的邮政正常运转的地方，现在却有了互联网，几乎每个阿富汗人都可以注册一个电子邮箱。

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使国家间的边界变得模糊。阿富汗这个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在新浪潮的冲击之下，一个"后国家社会"正在出现。总部在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印度、伊朗、荷兰、澳大利亚、德国和加拿大等国的企业，都把触角伸进了这片土地，他们的力量塑造了阿富汗人的生活，政府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也许，只有当这些跨国公司或国际机构需要一点行政资源的时候，阿富汗政府才会发挥作用。

第30章　源源不断的麻烦

局势并不乐观，城市建设者面临一系列艰巨的挑战，单单一个难民问题就已足够让他们头痛。这些难民是当年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村人，他们逃出战场之后，大多蜷缩在巴基斯坦或伊朗的难民营中（那些受过教育、拥有资源和技术，而得以前往西方发达国家重新建立新生活的阿富汗人，我更愿意称之为“流亡者”）。到2002年，阿富汗的难民人数已达世界之最，位居第二的柬埔寨，其难民人数远低于阿富汗。600多万难民急不可待地想要重返家园，暂时收留这些难民的国家也巴不得他们赶快离开。

但是，故国早就变了模样。亡命他乡之前，不少难民靠牧羊为生，如今即便回归故园，他们也无法重操旧业。家中的牲畜早在苏联军队的狂轰滥炸下损失大半，剩下的也因为主人疲于奔命而离散殆尽。

水果和坚果曾是阿富汗农民的重要经济作物。阿富汗的葡萄干一度占到世界市场的10%，包括葡萄干麦片中所用的葡萄干。[1]无花果、石榴、梨、杏仁、核桃、桑葚、瓜类，也为国家创造了可观的收益。在水果和坚果种植方面，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可谓一对竞争对手。战争期间，巴基斯坦人购买了不少阿富汗的裸根果树，特别是开心果。如今，果园荒废，要想完全恢复昔日的生产，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阿富汗曾经盛产小麦与棉花，但如今既没有种子，也没有水源，重振农业，谈何容易。连年的干旱，再加上原来的水利设施已经遭到彻底摧毁，纵贯地下的坎儿井不是已经积满泥沙，就是被轰炸得不成样子，倒成了“圣战”武装的藏身之地（阿富汗人住进洞穴的消息您一定有所耳闻，这些洞穴通常就是前面提到的坎儿井，经过水泥浇筑加固，用于军事目的）。

原来的耕地，现在遍布地雷，没有哪个国家的地雷数量能与阿富汗相提并论。埋下一颗地雷，只需3美元，但要将其排除，成本可能达到1000美元。[2]如此一笔巨款，阿富汗的普通农民当然支付不起。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企图用肉眼找出田间地头埋藏着的致命威胁，然后予以排除。可是地雷的颜色近于土壤，稍不注意就会忽略过去。有时候，他们可能和地雷发生“亲密接触”，轻则残废，重则当场毙命，阿富汗几乎每天都会有儿童因为地雷爆炸落下残疾。农民要想恢复生产，必须得

先清理地雷，相关事宜不但劳神费力，而且随时可能夺人性命。如此一来，种植业在阿富汗实在前途暗淡。

正因如此，一些回国的难民并未回到家乡。他们辗转来到城市，想在那里谋职求生，可是，城里的工作也不太多。不少难民因为找不到容身之地，只能住进废弃的无主房屋，危楼倒塌之后的断壁残垣也成了他们的避难所。这些难民多是寡妇和孤儿。大街上，随处可见这些失去丈夫的女性，她们穿着蓝色罩袍，一边号哭，一边乞讨，只求路人能够赏赐一点零钱。遇上一个穿戴整齐的过客，她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几乎到了死缠烂打的地步。要想不受叨扰，只能加快脚步，绕道而行。孩子们在街上到处寻找垃圾桶，翻找里面值钱的东西，废旧金属和鞋子都是他们的目标。

当然，战后的城市里不仅有无助的寡妇、失怙的孩子，还有流亡西方的人，他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这些人大多拥有一技之长，希望发挥自己的所学，帮助国家重获新生。很快，他们就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不过，这些人在西方生活多年，早就习惯了国外的舒适与安全，而他们的员工是一直在国内担惊受怕、艰难过活的人。因此，双方免不了会生出重重矛盾。在员工看来，老板不过就是一群“给狗洗澡的人”，他们虽然现在颐指气使，但在国外不过是曾经低声下气地为阔气的外国佬的宠物洗澡的（穆斯林认为狗是一种不洁的动物）。如此讥讽虽然可能出于醋意，但仍然体现了不少人的真实看法。他们认为自己虽在国内受苦，却也不至于为生活低头，而那些跑到国外的人虽然发了财，却要对异教徒假意逢迎。

西方的自由和平活动家认为，教育与重建是治好阿富汗痼疾的良方，是取代军事力量的道德选择。这种观点在2002年也许还能成立，毕竟那个时候的阿富汗看起来复兴可期，全国上下充满创业的活力，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项目，大规模的小额贷款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不同。

小额贷款主要来自国外，外国投资者为有意创业的阿富汗个人或团体提出的小项目提供贷款或捐款，让阿富汗人设计和管理他们认为合适的项目，如深井、口红工厂等。例如，一个名叫“阿富汗为了明天”（Afghanistan-4-Tomorrow）的组织，开发了一种在农村地区使用的手动设备，它能将木棍、茎、麦秆之类的农业废弃物压成耐燃的燃料砖块。在一个几乎没有薪柴的国家，这样的设备犹如雪中送炭，而且一些家庭还可以用它来制作燃料卖钱。

小额贷款本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比起投入10亿美元督造三座大型

工程一类的投资计划，50万名创业者各分得5000美元的方案似乎更加合理。2002年，1美元可兑换45000阿富汗尼，5000美元着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然，这样的贷款难免带来浪费。有些“创业者”可能只是诈骗犯，而创业计划也并非个个都能成功。不过，小额贷款更为可控，涉及的项目也更贴近民生。即便项目失败，也会有少量资金渗透到当地经济中，从而带来一些直接的好处，人们将利用熟悉的技术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可是，这些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首先，阿富汗的基础设施水平根本无法承担发放小额贷款的任务，想要建立一支相关的人员队伍更非一日可期。其次，捐赠者付出大量金钱，却不能从投资中获得回报。再者，由于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资金的具体去向难以掌控，恐怕没有人愿意掏钱资助这种项目。最后，大多数潜在的捐赠者，包括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并不仅仅希望阿富汗恢复如初，他们更想看到一场变革。因此，重建资金仍然来自世界各国政府，这些资金被投向外国规划的大型工程，其目的是让阿富汗脱胎换骨。

美国方面其实并不积极，因为执政党在帮助任何一个被摧毁的国家恢复其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方面持有矛盾的态度。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曾斥责“国家建设”，并表示，如若当选，他绝对不会参与任何国家的建设。他把阿富汗战争看作一次纯粹的军事行动，只要能够推翻塔利班、杀死本·拉登，一切使命便告完成。阿富汗可能会受到伤害，但重建阿富汗并非美国的工作。布什政府的思路就是如此。

当年晚些时候，大多数驻阿美军在阿富汗南部与西南部按兵不动。第二年，相关态势也没有改变。当时，美军总数为5200人，他们的驻地靠近巴基斯坦。按照布什的打算，美军在快速肃清塔利班残余后，将撤军回国，之后阿富汗的国防任务将交由国际维和部队承担，土耳其与德国会派军参与维和行动（不久，维和行动便由北约接手）。

但是，美国对阿富汗的干预使快速撤军变得不切实际。每一场战争都需要公众的支持以及一个正义的理由。对于“9·11”事件，美国公众深感义愤，政府出兵阿富汗的决定，他们也在高声叫好。可是，一场正义之战似乎不该只是为了宣泄仇恨。塔利班对妇女的迫害给了美国人一个理由，美国官方将阿富汗战争定义为“反恐战争”。从情感上讲，“解放阿富汗女性”似乎更加师出有名。阿富汗妇女问题并非塔利班一手造成，而与阿富汗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要想彻底解决，只能依靠阿富汗人自己的努力。现在战争结束了，在美军撤离前，阿富汗女性的处境至少应该

有所改善。但是，本·拉登并没有落网，这场战争到头来很有可能落得一场空。

阿富汗战事尚未结束，布什政府又开启了另一场战争。这一次，美国的目标是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这场战争完全由新保守主义者的教条而起。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应当通过军事行动推翻暴政，并借此推广美式民主，为世界造福。怀抱这样的愿望，布什下令10万美军开赴伊拉克战场。英国也派出了7.5万人的军队。由36个国家组成的“自愿联盟”（Willing of Good），共有2.7万人参战（其中，冰岛派兵2人）。萨达姆显然不是对手，不过，美国承诺的民主、幸福、繁荣也如空中楼阁，从未在伊拉克实现。

2003年过半的时候，伊拉克的情况糟糕到了极点。既然伊拉克成了“失败国家”，那么阿富汗无论如何也得坚强幸福起来。布什政府原本认为，推翻塔利班后，阿富汗会自愈。可是，到2003年底，美国政府却不得不接过重建阿富汗的任务。至少，他们要保证一部分阿富汗女性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保证民主政体得到巩固，让阿富汗出现恢复的迹象。

2002—2003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开支达到350亿美元。[3]相较之下，用于人道主义和紧急援助的规划资金仅有8亿美元，而用于长期重建的项目资金不到这一数字的十分之一（约6400万美元）。直到2004年，重建和发展项目的资金才开始有所增加。[4]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在向阿富汗提供帮助。其中一些资金直接由捐助国政府部门提供，大多数资金则来自政府雇佣的私人公司或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属于私人性质，需要依靠公众捐款和私人捐助维持运营，美国一般称之为非营利机构。在阿富汗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中，既有“和平之根”（Roots for Peace）这种致力于排除地雷的组织，也有自冷战初期以来一直在亚洲从事发展工作，服务于美国外交战略的“亚洲基金会”。许多非政府组织规模不大，成员多是本地人，他们在巨大的困难中斗争。2003年以前，喀布尔的300多家非政府组织聘请的员工有近万人。到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6万人。[5]

事实上，77%的重建资金完全绕开了阿富汗政府。200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资金通过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和外国政府直接投入到重建中，而不是通过阿富汗政府。[6]所以，重建计划再成功（有些项目确实收入颇丰），也无助于阿富汗新政府树立威信。许多阿富汗人甚至觉得，政府就是局外人，根本毫无用处。

外国规划的这些建设项目理论上可能是合理的，但事实上，这些项目是被他人的利益所驱使的，而且很多项目匆匆上马，根本没有经过认真论证（2004年，布什与卡尔扎伊都面临连任竞选，个中因素显然影响了某些项目的时间表），执行也很不到位。

阿富汗北部一条连接萨尔普勒省（Sar-e-pul）与希比尔甘市（Shiberghan）的公路，反映了阿富汗重建面临的一大问题。公路建成后，可以大大缩短两地往来的时间，对贸易有巨大推动作用，相关的构想应是很好的。不过，沿线居民却少有机会前往省会，汽车一类的交通工具在农村也远未普及，他们即便进城，通常也是步行，由驴子驮运货物。因此，更好的路况也无助于缩短村民的脚程。不过，新的公路总比村民们几十年来修建、维护的土路要好，那种土路一到夏天，不是尘埃漫卷，就是一片泥泞。

为了保持路面干燥，公路采用填石路基。但是，由于前期的调查工作太过仓促，设计方根本没有综合考虑道路的整体坡度，造成某些路段又高又陡，像一道水坝，而一些必要的位置甚至没有涵洞，导致水在地势低洼处汇聚，变成了水池。村民担心水会使土壤变得松软，从而导致他们的棚屋倒塌。于是，他们扛上工具，在公路上挖出一道又一道的排水沟。这就破坏了公路的全部用途，因为这些水沟让汽车难以跨越。警察逮捕了“破坏”公路的村民。[7]这条公路确实在农民和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可是这个政府似乎并不想为阿富汗人做主。

早期美国人试图进行的最大、最有魄力的重建工程，是对坎大哈到喀布尔的公路进行全面整修。战争期间，坎大哈－喀布尔公路已经破败不堪，路面必须完全整修。坎大哈与喀布尔是阿富汗的两座主要城市，人员、商贸来往异常频繁。工程完成后，两地间的通行时间可以缩短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工程造价不菲，而且同其他由美方提议、主导的重建项目一样，坎大哈－喀布尔公路的大部分预算都花在了美国，毕竟这些工程必须经过美国国会审批，国会议员又必须为各自的选区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发展。若不如此，他们可能会输掉下一次大选。因此，远在阿富汗的公路所需的物资与设备却必须在美国采购，唯有如此，美国的技术工程人员才能从中受益。[8]

阿富汗没有坎大哈－喀布尔公路重建所需的相关专家。这部分工作只能委托给美国的咨询机构，咨询机构把任务派给下级承包商，下级承包商再去寻找更下级的承包商。如此一来，66%的阿富汗重建资金其实都进了美国账户。这不是腐败，这是民主。但在另一头的阿富汗人看

来，这很像在阿富汗普遍被贴上腐败标签的做法。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有部分资金的确到达了阿富汗，而且以阿富汗的标准来看，数目还不小，不过，其中的部分被支付给了在现场工作的外国专家。这些技术专家要求在阿富汗工作的薪水至少要与他们在本国私营单位所能得到的工资相当，这是合理的。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这里工作呢？阿富汗的工作确实涉及实实在在的风险，因此，只有提供比他们在国内更好的待遇，才能招聘到有才干的专业人士。坎大哈－喀布尔公路工程的技术顾问与工程人员，每年收入都可以达到10万乃至20万美元。此外，任何人不得强迫他们进入没有安保措施的环境施工作业。况且，阿富汗警察没有能力提供这种安全，他们的能力和忠诚都是不确定的。路易·伯杰集团（Louis Berger）一类的私人建筑公司，更愿意聘请黑水（Blackwater）或者环球安全（Global Security）等私人安保公司的精良保镖。如此一来，每天的安保费用就能达到1000美元，一年下来，一名保镖的费用就高达25万美元。

达里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大多数美国专家对此一窍不通。而美方投资的那些民用工程所在地区更常用的是普什图语，对阿富汗的这种官方语言，大家更是两眼一抹黑。因此，翻译成了工作的必需。除了负责传递信息，优秀的翻译还能为美国人化解一些文化难题。此外，翻译人员的英语能力必须达到母语水平。因此，新保守主义者首选的援助机构——私营承包商，大多选择聘请移居海外的阿富汗人。经过面试，他们可以为阿富汗境内的建筑公司、非政府机构、政府办事处与美国军方提供翻译服务。

一天，一家上述这样公司的招聘人员突然打来电话，让我大吃一惊。我表示自己不会普什图语，而这是那份工作需要掌握的语言。没想到，对方请我放宽心，说："您的普什图语已经很好了。"她的安慰反而让我大惑不解。要知道，本人的普什图语水平仅限于会表达"我不会普什图语"的意思而已。

然而，对方请我先了解相关的待遇再考虑是否拒绝：这份工作每年的总收入达20多万美元，其中80%免税，福利费和差旅费一应报销，而且吃住所需都由美国陆军包管（这是那份工作的独有福利）。我的不少亲戚朋友都接受了类似的工作机会，因此我清楚对方所言不虚。

因此，当一名技术专家来到乡下时，都会带着他的保镖与翻译随行，其座驾一般都是价值10万美元的装甲防弹车。总之，每个在阿富汗各地漫游的专业团队都要花去近100万美元。[9] 而从事体力劳动的阿富

汗人则只能拿到40—70美元的周薪。百万美元的工头，使唤日薪只有5—10美元的碎石工人，这无疑是在自找麻烦。

当然，按照当地标准，10美元的日薪已经算是高收入，如果这条路没有经过他们的家乡，这些工人每天的所得将会远低于此。工程一旦结束，许多工人就会立即失业，这等幸运将会降临到其他地区。为了保住工作，很多阿富汗人会趁着夜色，拿着工具，把白天的工作成果破坏殆尽，相关的责任完全可推到塔利班的头上。也难怪这条公路的造价如此昂贵。

尽管不少援助阿富汗的重建资金未离开捐赠国就已被抽走，但是，仍有大量资金涌入了阿富汗市场。相比本国孱弱的经济，外来资本的规模过于庞大，由此带来的问题始料未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作为更加重了这种经济疾病。非政府组织的总部大多在国外，派驻喀布尔的工作人员也多是一些心怀理想的热血人士，他们是真心实意在为这个国家的利益着想。如果在本国企业工作，他们的收入可能要比为阿富汗奔走呼吁高得多，不过，他们仍然愿意坚守在那里，哪怕收入少得可怜，只能达到他们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另外，有些人虽然薪酬丰厚，但也是应得的，毕竟他们要冒着危险，前往局势不明地区为孩子接种疫苗。在那些地方，随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也有不少外国人来到阿富汗是为了更好的待遇，他们会选择私营企业而不是非政府组织。

最重要的是，现在喀布尔到处都是腰包很鼓的外国人，但他们几乎没有消费的地方，因此，只要阿富汗人能够提供任何产品或服务，他们可以立即买单。讨价还价实在没有必要，毕竟他们的薪水比起当地普通人高出许多。因此，有房屋出租的阿富汗人可以随意开价，由此而来的后果就是顶级房产的租金大涨。慈善家詹姆斯·里奇（James Ritchie）之所以有兴趣帮助阿富汗人，是因为他小时候曾跟随从事援建工作的父母生活在喀布尔。塔利班倒台之后，他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办事处。一开始，每月租金为200美元，五年之后，租金已经涨到了3000美元。

租金上涨，可不仅仅针对外国人，喀布尔的每个居民都得承受。与此同时，房价也在攀升。喀布尔的房价一度接近加州水平。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其他行业也出现了通货膨胀。奢侈的需求，意味着消费者愿意花大价钱采购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要最新鲜、最流行、质量最好的！——由此，鞋、面包和其他物品的价格一应上涨。无论外国人、阿富汗暴发户，还是普通百姓，都在承受物价飞涨带来的后果。

滚滚而来的现金流并非源于阿富汗经济的改善，也不是来自新产业的出现、贸易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因此，人们的收入并未提高，唯有非政府组织、国际公司和外国政府机构聘请的阿富汗人可以从中受益。正因如此，有些获得医学文凭的人宁可放弃医师执业，也要去给外国人开车，因为给外国人当司机要比医生挣得多。

不过，大多数城市居民仍然生活在旧经济中，仍是原来的工资水平。教师、警察和公务员每月的工资仍只有30—50美元，高级官员的月薪也不过数百美元，而不是几千美元。一般的上班族，月收入可能只有警察或教师的一半，除非他们的老板从事走私活动。

新旧经济之间的落差因为外来资金（及毒枭的黑钱）的涌入而进一步扩大，阿富汗社会结构因此受到极大侵蚀。基层腐败大行其道，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病。原本只卖10阿富汗尼的邮票，邮局工作人员却堂而皇之地以20阿富汗尼的价格出售。个中差价，自然都被他们中饱私囊了。[11]毕竟，他们也要谋生。警察来到事故现场，不管是目击者、旁观者，还是路人，都有可能收到警察的罚单。负责处理各种文书的官员拥有一种权力，那就是放慢速度的权力。如果没有收到小费，也就是通常说的行贿，那他们肯定会行使权力。没办法，他们也有苦衷啊！这些人也需要每天按时上班。可是，阿富汗的油价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每加仑4美元。

第31章　毒品与腐败

与此同时，农民们找到了合适的营生，他们可以种植鸦片。比起其他作物，鸦片有许多优点。它很耐旱，可以在任何温暖的地方种植，即使没有任何灌溉系统。而且，长期储存也不会影响鸦片液的纯度，即便市面上出现价格波动，也不用急于抛售。经过提纯，鸦片就能成为海洛因，海洛因很轻，容易运输。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价格。如果种植葡萄或者小麦，农民们得先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地雷，辟出大片耕地，他们的孩子也有可能受其连累。辛辛苦苦得来的收获即便全部售出，所得的金钱可能还抵不上一点点鸦片。鸦片售价高昂，农民们只需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就足以养家糊口。

商业化种植鸦片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但在这方面，阿富汗人有着丰富的经验。鸦片曾是塔利班政权的一大财源，为了增加收入，自然需要农民扩大生产。为此，塔利班派了许多“顾问”对农民进行指导。他们会把如何种植鸦片、切割球茎、正确引流汁液和提纯胶质的知识传授给农民。他们还派出执法者，迫使顽固的农民放弃其他作物去种植鸦片。截至1999年，阿富汗鸦片已经充斥国际市场。后来，因为鸦片产量过多，导致售价暴跌，塔利班又适时推出禁种政策使价格回升。他们的手段与石油输出国通过减产而控制油价的方法如出一辙（这造成了一种持久但错误的观念，即塔利班至少反对毒品）。[1]塔利班末期，鸦片产量确实得到控制，但是，他们传授的技能，阿富汗农民却并没有放弃。

将非法产品推向市场同样需要特殊的技能，这方面的能力阿富汗人同样具备，因为走私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早年间，阿富汗的走私贩子曾把中东的金条走私到中国，从迪拜走私汽车到巴基斯坦。如此一来，他们可以逃过政府关税以及边界地区的腐败官员。偷运金条的经验，可以随时转变为走私毒品的能力。

行业的发展兴盛离不开相应的人才队伍。加州硅谷电子工业的蓬勃发展，有赖于斯坦福和伯克利等学府培养的计算机工程师，这类人才是电子工业最需要的专业队伍。走私贩毒最需要的则是经验丰富的武装分子，在这方面，阿富汗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5年的战争，造就了一代具备如此技能的人。战争结束后，这些人需要工作。即便没有毒品产业，他们也会采取其他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毒品产业促进了阿富汗的和平。

同时，毒品产业还带来了人们收入的提高，它迅速催生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种植鸦片的农民位于产业链末端。种植鸦片，他们可以养家糊口，不过生活仍然贫困。位居中游的则是那些负责贩运毒品的人。他们把毒品运到伊朗或巴基斯坦，而后再输入中亚国家（从那里装船运往俄罗斯）。这类人倒是能够发家致富，不过随时有生命危险，而且他们发现，真正的老板另有其人。那些人聪明狡猾，掌握着组织复杂企业、管理偏远工人队伍和跟踪财务状况所需的技能。这些毒枭在赫拉特、坎大哈和喀布尔建立据点，贩毒所得的资金被他们投入其他生意。这些生意大多是合法的，比如航空、通信、银行、运输、建筑和房地产。我曾经谈到海外归侨的投资热点也是这些领域。但请别误会，我可不是暗指归侨就是毒枭，我只是想说，繁荣的喀布尔一切都相互交织，当然，这些都是金钱带来的。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阿富汗的重建应当主要依靠私人企业，而不应受琐碎的法规约束，这样的国家愿景正在发挥作用：阿富汗的经济在增长！钱很伟大！每个人都很高兴，除了众多的穷人和瘾君子，而且后者的人数很快便超过了100万，这个数字远比伊朗要多。吸毒之风很快风靡中亚北部各国，随后波及俄罗斯，土耳其和欧洲也没能幸免。利润越高，风险自然越大。为了争夺路线与地盘，毒枭组建武装，互相攻伐，受害的百姓不计其数。因为毒品仍属非法，毒枭为求安全，只能向政府官员、警察行贿。于是，后者向他们大开绿灯，毒品由此成了政府腐败的催化剂，上至内阁官员，下至最低级别的边防警员，无不有所沾染。

阿富汗毒品交易的主要受害者是伊朗。为了阻截阿富汗毒品走私贸易，伊朗官方在两国边境驻扎了几十万军队，还修建了一条600英里长的防线。不过，毒贩可以用金钱或毒品开路。驻扎在边境的伊朗士兵放弃缉毒本职，转而成了毒品产业中的一环，还有不少人则沾染上了毒瘾。毒品渗透到了阿富汗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的结构因此大为改变。[2]其实，因为普遍存在的腐败案件，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已经受到侵蚀，大型腐败案件及相关指控让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以矿业部长易卜拉欣·阿德勒为例，他的工作是与外国企业就阿富汗的矿产权利进行谈判。2008年，他将一处铜矿批给了一家国外公司，售价不过35亿美元。《华盛顿邮报》披露，阿德勒向对方索取了近3000万美元作为回扣。这项指控出自一位美国官员之口，而官员的信息则来自一份军方情报。报告称，双方在迪拜的一家酒店完成了这次交易。阿德勒否认了该项指控，而且他也从未因此被起诉。为求避嫌，总统卡尔扎伊还是解除了阿德勒的职务。

一开始，政府为阿德勒安排了另一项工作，即协助完成霍里（Ghori）水泥厂的私有化工作。面对众多竞标者，阿德勒耍弄起了拖延手段，直到投标时间已经迫在眉睫，他才提出竞标条件：有意者需向有关部门提供2500万美元现金。时间紧迫，唯有一家公司在短时间内凑齐了钱，这家公司就是马哈茂德·卡尔扎伊的阿富汗投资公司。马哈茂德的兄弟正是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他在保镖的簇拥下，亲自把装着巨款的密码箱带到了阿德勒的办公室。[3]接手水泥厂后，阿富汗投资公司承诺要把每月的水泥产量从4万吨增加到300万吨。[4]

那么，马哈茂德·卡尔扎伊如何能够筹集到这么一笔巨款？原来，是国内最大的私人银行向他提供了贷款。巧合的是，马哈茂德·卡尔扎伊就是银行的股东之一。喀布尔银行拥有两名创始人，舍尔·汗·法尔努德与哈利卢拉·菲罗兹。前者出身贫困，苏联干涉时期曾赴莫斯科求学。20世纪90年代，他以职业扑克玩家的身份游走世界各地，比赛的总奖金达到60万美元。菲罗兹作为法尔努德的副手，曾是马苏德武装的一员。当时，菲罗兹通过宝石生意为马苏德筹备军饷，相关的钱款达到上百万美元。与此同时，他也在从事塔利班的洗钱活动。这点秘密，马苏德后来有所察觉，菲罗兹随即遭到解职。

这么两位人物何德何能，居然可以成为一家10亿级银行的主管？

这样的时局下，两人所拥有的本领才是最有用的。他们有本事、有人脉，能够和政界人物及其家属搭上关系，他们向马哈茂德·卡尔扎伊提供了600万美元贷款，其实和他当年用于购买银行股份的金钱正好相等。总统的兄弟其实只是拿走了自己的钱。银行的另一位股东阿卜杜勒·哈辛（Abdul Haseen）同样来头不小，此人是副总统法希姆将军同父异母的兄弟。马苏德遇害之后，法希姆一度成为北方联盟的领导人。美国入侵之后，指定了好几位实力派人物作为新政府的顶梁柱，法希姆就是其中之一。

法希姆利用职权，帮助哈辛走上了腾达之路。在法希姆的筹谋下，哈辛获得了一份为北约新的基地和美国大使馆提供混凝土的订单。赚取的第一桶金，被哈辛用于建设购物中心。这座购物中心高达多层，容纳了许多珠宝店。中心位于城市中央，法希姆只用了极小的代价，便得到了那块地皮。这桩生意绝对合法，待价而沽还是免费相送，一切都由原来的主人定夺。显然，主人觉得关系大过金钱。购物中心得到的巨额利润被哈辛用于更多的投资，包括一家私人保卫公司。驻阿富汗的许多外国政府机构都需要哈辛的公司提供安保服务，就连美国中情局设在喀布

尔的基地也在该公司的保护之下。喀布尔银行也是哈辛的投资之一。作为股东，他轻松借到了一亿美元。由此，哈辛可以开展更多的商业冒险，也能进入迪拜的房地产市场。

帕米尔航空公司的一些股东也持有喀布尔银行的股份。航空公司的创办人哈吉·扎比·舍卡尼据称是一名毒枭。喀布尔航空公司同属私营企业，其创立者是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的干儿子。国有的亚里安那航空公司在新的竞争者夹击下，经营状况举步维艰。公司主管纳迪尔·阿塔什博士不得不启动私有化方案。其间，阿塔什惊讶地发现，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由政府高官及其商界亲信收购。[5]而后，阿塔什被卷入了一场反贪风暴。调查者扎比乌拉·艾斯玛泰和他一样系属归侨。据称，阿塔什曾经借由购买飞机，从波音公司获取了600万美元回扣。但最后调查无果，阿塔什也没有吃官司。他逃出阿富汗后，还写书喊冤，声称艾斯玛泰才是一个大贪污犯。他走后，艾斯玛泰确实接手了亚里安那航空公司，不过，他不久就去世了，死因不明。2011年，另一名检察官再次提起诉讼，并对阿塔什及其两名助手发出了通缉令。[6]

阿塔什潜逃的时候，总检察长还是阿卜杜勒·贾巴尔·撒巴特，此人惯于知法犯法，并因此丢了官职（撒巴特后被绑架，本书面世时，仍下落不明）。“9·11”事件爆发后，撒巴特还是美国政府对外宣传喉舌“美国之音”的一名小职员，其间，他曾前往关塔那摩监狱进行采访。一番调查下来，撒巴特对监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此，美、英方面对他赏识有加，并向卡尔扎伊总统举荐他担任总检察长。撒巴特这种“犯罪克星中的明星”，似乎也该得到重用。上任之后，撒巴特屡屡利用职权打击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他为对手安插的罪名是贪污。撒巴特在任期间，也是喀布尔机场走私活动的高发期。据称，喀布尔银行与帕米尔航空公司勾结，前者提供金钱，后者负责偷运，每天运出的钱款高达1000万美元。撒巴特忙于打击其他罪案，对于这些犯罪情况自然无暇理会。刚刚调任喀布尔的时候，撒巴特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总检察长的权位让他的财富大为增加，很快，他就在喀布尔的高级社区置办了产业。[7]近来，美国国务院的好些专家开设课程，旨在帮助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员提高人际交往能力。[8]对此，笔者不禁感到可笑，因为阿富汗政府官员的人际交往能力实在无须请教他人。

除马哈茂德之外，总统的另一个兄弟艾哈迈德·瓦里·卡尔扎伊也是政商界的一大人物。艾哈迈德·瓦里的地盘位于坎大哈，表面上看，他只是当地议会的议长，但是，当地人很清楚，艾哈迈德·瓦里控制着警察部

队，并对市长发号施令。任何人想在坎大哈投资兴业，必须拜会总统的这位兄弟。没有艾哈迈德·瓦里从中撮合，任何投资都将无果而终。中情局还为艾哈迈德·瓦里提供金钱，请他组织一支武装在坎大哈附近负责防卫。长期以来，中情局都想为坎大哈增加一重安全保障，这种工作自然只能交给信得过的人。人脉广布的艾哈迈德·瓦里·卡尔扎伊得到了中情局的信任。据称，即使是坎大哈附近最为凶恶的毒枭，遇上艾哈迈德·瓦里也得敬让三分。[9]

我之所以用“据称”一词，是因为关于艾哈迈德·瓦里的种种传说并未得到证实。2011年底，艾哈迈德·瓦里遇刺身亡。调查称，这场谋杀源于口角之争，纯属一次激情犯罪，与政治、毒品毫无关系。其实，贪腐政治（corruptocracy）——这个单词尚属近来的发明——能在阿富汗甚嚣尘上，不能诿过于军阀或战争，艾哈迈德·瓦里之类的权力掮客才是问题的根源。

腐败并不足以形容阿富汗当前的环境。无论是总统的兄弟，还是阿德勒这样的矿业部长，这些权力掮客堂而皇之地参与商业经营，其实并不违反阿富汗生意场上的规矩。这些规矩与西方的规则有所不同，这里的商业关系必须经由人际关系建立，而政府的统治则建立在抽象的概念之上。

一个人如果随身携带装有2500万美元现金的密码箱，肯定会被指控为犯罪分子。2010年，阿富汗媒体披露，总统卡尔扎伊每个月从伊朗那里得到一笔总额高达数千万欧元的赞助，顿时全国上下一片哗然。[10]媒体反复强调了对方装运钱款的方式，竟然是塑料袋！卡尔扎伊的助手把这些钱款当作行李，一路运到了喀布尔。在美国，这样的行径似乎应是罪犯所为，而罪犯恐怕也不会这样冒险。不过，这里不是美国，而是阿富汗。在阿富汗这个饱受摧残的社会，从前（也许现在依然如此）人们选择将钱装进密码箱，由保镖护送着随身携带，而不是将钱存进银行。

裙带关系、结党营私，是阿富汗政治腐败的主要形式。在位的人各显其能，都在争取荫庇子孙、提携亲友。在阿富汗，提携亲友不但合法，而且被视为荣誉，甚至是一种责任。一个阿富汗人，应该得到全体家人的鼎力支持，不论外界有何非议，家人都会对他不离不弃。一个人不去帮助家人，难道应该扶助那些陌生人吗？面对家人也不愿伸出援手，简直就是奇耻大辱！阿富汗的新贵阶层，无不在政府当中安插自己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得到亲人的扶助，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政府不

就该是这种作用吗？几代人之前，大部分阿富汗人不是过着游牧生活，就是生活在穷苦的农村。艰难的环境里，帮扶亲人的道德准则已经植入了阿富汗人的基因，即便过上城市生活，传统仍然发挥作用。因此，成亿资金涌入这个破败的国家并非什么好事。新保守主义者奉行这样的理念：尽力谋求私利的人能更好地服务公众利益，传统与这样的理念交织在一起，催生了阿富汗惊人的腐败现象。

当然，新保守主义者并不认为自由市场会在自然状态下发生，而是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法律下达之后，人们才能在规矩下各安其位。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是，如果企业都能尽力渔利而又不逾规矩，那么优胜劣汰的法则就能成立，赢得竞争的人必定是才学出众之人。

其实，新保守主义者的逻辑有一个严重的破绽，如果两个竞争对手的才学同样出众，资金也一样雄厚，那么显然那个敢于破坏规则的人更容易获得胜利。这些人并非罪犯，只是拥有一点胆气而已。破坏规则，自然也可能涉及犯罪，对此，他们并不害怕，而且也愿意承担风险，毕竟法律并不一定会实施制裁。喀布尔银行的两位创始人无疑就是这样的赌徒，一个扑克玩家，一个宝石贩子，就这样开始了一段传奇。当然，这类赌徒大多已经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同样涉案的政府官员并未受到惩罚，甚至没有被起诉。随着贪腐政治的到来，阿富汗重建工作渐渐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第32章　塔利班

在城市之外，麻烦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在土壤中萌芽，但美国干预初期所引发的普遍乐观情绪，创造了一种反对暴力的环境，因此，这些种子在秘密中悄悄萌发。记者克里斯托弗·鲁伊特和博尔罕·尤努斯讲述了穆拉·法鲁克的一个故事。法鲁克住在加兹尼省乡下，曾在宗教学校学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名塔利班成员。塔利班被驱逐，激起了法鲁克的愤怒，他决定闹出一点动静，向世界宣告塔利班仍在斗争，而且他们准备奋斗到底，直至把血流干。2002年底，法鲁克找到友人阿卜杜勒·阿哈德。后者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比法鲁克更具斗争经验。法鲁克想要立即举事，阿哈德表示反对："现在时机未到……人民还不会跟从我们。"因为"人民"（大多数阿富汗人）都还对美国寄予厚望，觉得美国人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1]

阿哈德与法鲁克一直在耐心等待，他们觉得局势迟早生变。机会果然来了。战后重建失败，仅是变局到来的原因之一。2002年夏天，第一次支尔格会议召开的那一段时间，飞临赫尔曼德省的美军战机误把一处婚礼现场的喧嚣声当成了叛乱分子的行动。其实，宾客们只是在朝天放枪表示庆祝，那是当地的习俗。但悲剧还是发生了。轰炸之下，47人不幸丧生，死者之中，包括不少妇女、儿童。此外，事故还造成117人受伤。事情水落石出之后，喀布尔的美军官员不得不真诚道歉。那次事故给阿富汗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我在喀布尔还是听到了不少宽容的声音。有人表示，当时的情况过于混乱，也十分紧急，美军犯错在所难免。只要吸取教训，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他们愿意继续信任美国人。

当年底，阿富汗人的观感却发生了转变。大家觉得，美军的各种暴行似乎已经成为习惯。美军接管苏联援建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后，把它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阿富汗人不能随意接近，更别说进入其中。少数进去过的人表示，基地内已经建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美国城，城中到处是夜店、影院、饭店和商店（这些描述有些太过夸张）。巴格拉姆不但驻有军人，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承包商。为了维持基地运转，美国人投资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基地附近的阿富汗人并未因此受益。毕竟，基地所需的物资全数从国外空运进来，就算是牛肉，美国人也更喜欢澳大利亚产品。有人甚至谣传，美国人在基地里养猪。

美军在巴格拉姆基地中设立的一座监狱，其恶名堪与关塔那摩监狱

相提并论。任何阿富汗人只要被美军特种部队或情报人员怀疑为恐怖分子，就可能被押往此地接受调查。附近地区的拘留营地当中，巴格拉姆监狱的规模最大。狱中聘有好些人，负责对囚犯进行审讯，这些人除了来自军方，还有一些是美国政府雇佣的私人承包商。美军承认存在冤枉无辜的情况，虽然无辜的人得到了释放，但此前一定经受了相关审讯。据亲历者回忆，巴格拉姆监狱中的囚犯常常遭到殴打，狱卒还会使用枷锁、头套限制囚犯的自由，囚徒甚至会被罚站数天。一名出租车司机遭遇殴打的时候，总会痛苦地大喊："哎呀，真主！"审讯人员据此认为他可能有宗教极端倾向，并因此加紧用刑，最终，司机不幸惨死。事后证明，他和塔利班并无关联。[2]巴格拉姆的故事和关塔那摩的恐怖传说一模一样，阿富汗社会无不人心惶惶。

卡尔扎伊政府很快建立了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民警察部队。军警自然有助于恢复秩序，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可能也将随之结束。但是，他们的上岗实在太仓促。几万名毫无作战经验的男性匆匆提枪上阵，他们要和最凶恶的极端分子作斗争，却没有人能够提供指导，而且很多强力机关的人员还会仗势欺人。加兹尼省的布料商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就遭遇了类似的不公。一次生意，国家情报局的一位军官想向他索取极低的折扣，卡里姆并未应允。结果，对方立即指控他与"基地"组织勾结，并把他抓进了监狱。卡里姆在狱中饱受毒打，最终他只能付出1万卢比贿款，才得以出狱，而他的生意因为耽误了一年而荒废了。[3]

卡里姆的遭遇并不稀奇，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更糟糕的是，新政府的军警部门几乎被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把持，因为他们也是得胜一方的主力军。这些军警大多来自北部，但多驻扎于乱象频起的阿富汗南部。南部是普什图人的聚居地，如此安排不免让人产生误会——政府在有意扶植少数族裔迫害普什图人，这样的误会可不利于阿富汗社会的安定团结。

怨恨一旦生成，关于新政府种种不堪行径的谣言自会不胫而走。从喀布尔回来的人说，"喀布尔大街上到处是乱扔的酒瓶"，乡下的一位毛拉在周五的祈祷仪式上，痛心讲述了喀布尔大街上男女恬不知耻当街苟且，而民众对此置若罔闻的骇人见闻。他痛心地表示，喀布尔已经堕落，就快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了。甚至有谣言说，美军性侵关在巴格拉姆的老者。当时，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的虐囚秘照已被公诸天下，即便身处阿富汗农村，人们也能看见照片上骇人的场面：美国女兵用狗链锁住一名穆斯林男子的脖子，迫使他在狱中裸体爬行，好像遛狗一般，旁边还

有好些赤身裸体的男人被迫叠在一起，活似一堆木头。有了这样的新闻，村民自然对内容相似的谣言深信不疑。

2003年8月，法鲁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只要一点火，马上就能呈燎原之势。那么，法鲁克及其追随者打算在哪里打响第一枪呢？他们的目标并非巡逻的军队，也不是美军的兵营，他们甚至不打算袭击政府机构，他们杀害了两名红新月会（即伊斯兰国家的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法鲁克的暴行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不过，法鲁克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才不想赢得民心，他只想出名。虽然大家都对法鲁克指责纷纷，但这反倒让大家都认识了这个人。红新月会人员的惨死，让法鲁克的小团伙出了名，人们由此知道了这个魔鬼的存在。

几个月后，两名枪手骑着摩托车射杀了29岁的法国人贝蒂纳·格瓦斯拉尔（Bettina Goislard）。她是联合国的一名工作人员，帮助安置流离失所者（阿富汗国内难民），她的不懈努力惠及了5万多人。她的工作充满善意，深受爱戴。当地人民愤怒了，他们抓住凶手，并狠狠殴打了一顿。随后，凶手被移送司法机关，听候法律的制裁。你可能认为当地人的这一反应会导致法鲁克和他的组织重新考虑他们的策略，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认为非常正确，没有创伤的日子就是在支持喀布尔政府及其外国支持者的事业；任何可怕的残暴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都能迫使大家放弃幻想，不再期待未来，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卡尔扎伊的统治。法鲁克认为，要想驱逐外国势力，暂时的战争与苦难是一种历史必然。等傀儡政权垮台，外敌离境，他们可以重建秩序，恢复法律。当然，那是塔利班统治下的秩序与法律。

美国、北约和卡尔扎伊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为法鲁克的事业作出了贡献。格瓦斯拉尔遇害之后一个月，北约战机对一处房屋发动空袭。据称，那是塔利班领导人的藏身之地，不过，屋内的住民却是9个孩子与一些无辜平民，他们和塔利班毫无关系。这一行为引起了与杀害格瓦斯拉尔同样的反感，并激起了人们一种道德上的对等感：塔利班杀害了无辜的慈善工作者，美国及其盟友正在杀害无辜的儿童，两者有什么区别？

每当美国误杀平民时，它会承认错误，受害者家属也会得到赔偿。不过，赔偿本身就是一种有问题的做法。在阿富汗普什图部落，对于谋杀案件存在一种独特的处理法则。有些时候，只要案犯一家愿意用金钱赔偿受害者家庭，案件可以就此了结。我觉得，一些美国人可能因此产生了严重误解，觉得误杀事件可以通过交易而轻松摆平。在华盛顿特区

的一次培训会议上，我结识了一位认真的研究员，他告诉我，据他的分析，在伊拉克发生类似案例的补偿标准是多少，又问我阿富汗“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但对非正常死亡的赔偿并不是一种“现价交易”，这是管理部落互动的复杂社会机制的一部分。这种特殊的机制是为另一种机制所引发的无休止的血亲复仇提供的免责条款，即深深感到有义务为自己的亲属受到的伤害报仇，每一个解决方案都是一定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复杂谈判。美国人也许会觉得，既然对方已经接受了赔偿，那么一切仇恨也就一笔勾销了。事实上，这些钱可能只会使阿富汗人对其亲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国政权杀害的不满情绪更加复杂。

2004年7月，阿富汗警方查封了一座私人监狱。监狱位于喀布尔的某处住宅区，狱长叫作杰克·伊德马。此人原在美军特种部队服役，后来成了警方口中的恶棍。伊德马还有两个帮凶，一个叫布伦特·本内特，一个叫爱德华·卡拉巴略。在拷打虐待方面，本内特是伊德马的好帮手。卡拉巴略的职责是用摄像机记录“犯人”刑讯的过程。三人被捕时，那里正关押着8名阿富汗男子，他们被吊在半空中。几天来，伊德马和本内特一直在对他们进行“审讯”，天知道伊德马等人想要套出什么样的情报。美国否认与伊德马有任何关系，但这是在监狱曝光前的一两周开始的，这表明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伊德马在做什么（他们也可能只是觉得伊德马古怪、令人讨厌）。[4]

地处农村地区的安达尔是穆拉·法鲁克的家乡。卡尔扎伊政府正努力在像安达尔这样的地方建立一个正常的行政机构。它任命了各区的省长，配备了警察，设立了市政中心和法院，以完善政府职能。许多非政府组织也进入安达尔和其他类似地区，以恢复供水系统、建立保健诊所，并为当地百姓提供其他亟须的生活服务。

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不遗余力，叛乱分子却想方设法予以破坏。他们并不想和卡尔扎伊政府硬碰硬，更不愿意和外国军队正面冲突。每一个袭击目标，他们都要精挑细选。他们一次只针对一个人下手，就像恶狼玩弄猎物一般玩弄着喀布尔政府和美军。有时候，他们会把目标指向政府官员，更多的时候，受害者是那些与政府合作的平民。只要他们对卡尔扎伊统治下的安定生活表现出向往，就可能遭到杀害。政府也许可以派出军警保护一片区域、一个城镇，也许能够守护一个街区、一栋大楼。但是，政府能够保证每一个平民、每一个官员都能得到如此周到的安全保护吗？显然不能。既然有了漏洞，对手也就有了可乘之机。

阿卜杜勒·哈基姆正是这样一位受害者。他住在加兹尼省，和警察存在合作关系。哈基姆并非位高权重的人物，只是因为工作需要，他才和警察有所接触。法鲁克写信警告哈基姆，勒令他立即辞职，还在哈基姆家的外墙上写满了威胁语，警告他不那么做的严重后果。对方恐吓再三，哈基姆仍不为所动。于是，法鲁克决定出手给他一点教训。一天，哈基姆刚从部队退役回家的长子，就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被不明分子暗杀了。几周后，哈基姆的小儿子又遭到逮捕（其实是绑架），之后，被指控为“美国间谍”而遭到处决。哈基姆不得不接受教训，选择退缩。[5]

当一家私人建筑公司试图修建一条穿越法鲁克管辖地区的公路时，工程反复遭到法鲁克一伙的破坏。他是在借此发出警告：他并不反对修路，只是反对未经他允许在其所在地区工作的外来者。于是，私营企业与非政府组织进入当地之前，都要主动和法鲁克取得联系，并获得他的批准，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而且这样的做法并不会损失什么，安全也因此有了保证。那么，大家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外来者寻求穆拉·法鲁克许可他们在他的地区工作时，他们倾向于承认法鲁克是那个地区的统治者。

其实，穆拉·法鲁克并不重要，毕竟他势单力薄，影响有限。不过，在美国干预的几年里，阿富汗涌现了数百个类似的人物。他们是自主行动的参与者——但也可以说，他们不是。他们的亲戚认识和他们一样的人，从而与另一些人建立关系，达成协议，做出合作安排。渐渐地，穆拉·法鲁克一类的小人物合并成庞大的组织，他们要听从上级指示。这种领导威望是通过传统渠道获得的，而且基于成员之间的相互义务，这种义务源自多年以来同甘共苦的经历，以及部落与家庭联系中产生的对等义务。

其中，最大的网络是阿富汗东南部贾拉鲁丁·哈卡尼领导的网络。抗苏战争期间，他就已经闯出了名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哈卡尼曾经从中情局那里获得大量金钱与武器装备。当然，这些资助是为了帮助他打击苏联人。第一届“圣战者”政府时期，他担任司法部长（那时卡尔扎伊是外交部的副部长）。塔利班倒台之后，哈卡尼声称自己是塔利班的一员，并开始与西方国家部队作战。哈卡尼声称奥马尔是自己的精神领袖，他得到奥马尔的任命，成了东南地区的“军事指挥官”。作为哈卡尼武装的二号人物，其儿子塞拉吉·哈卡尼是个极其残忍的暴徒，惯用自杀式爆炸和斩首等手段。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也从伊朗回来了，现在的他简直就是旧时代的活化石。过去，中情局和三军情报局都对希克马蒂亚尔宠爱有加，但他表示自己加入了塔利班。希克马蒂亚尔虽然自称塔利班，但仍然领导着伊斯兰党。他所谓的“塔利班”，其实是指自己的武装。哈卡尼占据了东南地区，希克马蒂亚尔虽没有任何成片的地盘，但他所拥有的“孤岛”却遍布全国，他在其他人的领地上建立了小小飞地。希克马蒂亚尔由此再次登上了阿富汗的政治舞台。

毛拉·奥马尔依靠曾经的威望在奎达重整旗鼓。这座城市位于阿巴边境的巴基斯坦一侧。在这里，奥马尔设立了舒拉（Shura）。名义上讲，阿富汗国内的一切反叛活动，都要听从奥马尔的指挥，但他从不公开露面，他的所有讲话都由发言人发布。当然，他的这些代言人常常互相矛盾，发言人到底是在自说自话，还是在传达领袖旨意，根本无从得知。显然，奥马尔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特别指定了两名官方代言人——扎比乌拉·马扎希德和哈尼夫·亨思福斯。当然，这个消息也出自发言人之口。据两人所说，唯有他们的话才能代表奥马尔的意愿。[6]不过，两位发言人从来不现身，他们总是通过电话与媒体进行接触，没有人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也许，这两位发言人并非真有其人，而只是两个假名。很多叛乱分子都可以用他们的名号自行发声，如此一来，外界实在无从得知哪一次声明才是来自奥马尔。

当然，这不重要，因为奥马尔已经不是反政府武装的实际领导人，他只是一个符号，代表一众势力。如果奥马尔亲自指挥反击，确实会拉起一支庞大的拥趸队伍，但是，他也一定会结下不少仇敌，毕竟政治斗争中，无法让每个人都心服口服。因此，奥马尔选择置身事外，对具体的事务概不过问。由此一来，他反倒成了一个传奇，有心人大可以打着他的旗号做着自己的勾当。两派虽然互相攻伐，却都可能自称是奥马尔的亲传弟子。显然，名义上的称呼与具体的行为和目的其实毫无关系。

奎达舒拉也许没有统御全国的权力，但是，阿富汗南部的大部分叛乱大概还在奥马尔等人的指挥之下。当然，笔者只是猜测，因为奎达舒拉的实际权力备受质疑。虽然阿富汗各地的叛乱分子都声称是在奎达舒拉的领导下，但他们却又在各行其是。有时候，叛乱武装之间确实存在合作，但有时候他们又为了地盘与毒品线路而互相倾轧。

叛乱武装的头目之一毛拉·阿合塔尔·奥斯曼尼掌握着庞大的走私生意，是塔利班重要的税收来源。2007年，他在北约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他的死亡可能和另一名武装头目毛拉·达杜拉有关，达杜拉故意向北约泄

密，透露了奥斯曼尼的行踪。达杜拉其人残忍无比、臭名远扬，就连盟友及其手下也要惧他三分。大家都把达杜拉称作“屠夫”（据说他喜欢用斧头砍人头）。又有人说，达杜拉手下的小头目多达几百人（小头目又各自统辖一批更小的武装团伙）。后来，达杜拉被英国特种部队击毙，可能是在他的行动被奎达舒拉内部敌对毒枭泄露给北约之后。[7]达杜拉死后，他的兄弟曼苏尔接管了他留下的庞大组织。由于毛拉·巴拉杜尔的告密，曼苏尔被巴基斯坦特工逮捕。巴拉杜尔在奎达舒拉有很高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巴拉杜尔是塔利班的二号人物（2011年，巴拉杜尔被三军情报局逮捕，但在9个月后获释）。

阿富汗境内的所有叛乱都被媒体归咎于塔利班，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我认为，一个组织并不足以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浪。1996年，塔利班第一次横扫阿富汗南部时，它是一个大致符合这一说法的组织。不过，在美国介入之后，一切被称为“塔利班”的新叛乱逐渐形成。如今的塔利班，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既有毒贩，也有宗教激进分子，还包括一些外国的“圣战者”。甚至抗苏战争时期的抵抗组织，也在挥舞着塔利班的大旗。

《伦敦时报》的汤姆·柯格兰（Tom Coghlan）提供了一个例子。2006年6月18日，一辆载有卡尔扎伊政府官员埃米尔·达多及其随员的汽车在坎大哈附近遭遇袭击，导致达多的兄弟被杀。而后，坎大哈地区暴力事件不断，到那天结束时，达多的40多名亲属遭到杀害。那么，这一系列惨案是塔利班策划的吗？

嗯，算是吧。塔利班接管之前，埃米尔·达多已是坎大哈地区的实力派。奥马尔的塔利班能够得势，还要感谢达多这类军阀的残暴行径。美国干预之后，达多等军阀再次得势。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卡尔扎伊政府无法与他们全面对抗。最终，好些军阀还得到了新政府的任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担任正式官员。

达多所在部落还和同一地区的另外两个部落处于敌对状态。其实，三大部落的宿怨由来已久。现在，他们仍在为了争夺毒品线路而互相攻伐。由于达多身居高位，他所在的部落自然占得了先机。对此，敌对部落早就积压了一腔怨气。[8]

正是由于积怨太深，这场仇杀很快就席卷了坎大哈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人民起义，仇视埃米尔·达多的人都在选择以武力泄愤。同时，这也是反对中央政权的地方起义，是三个部落之间长期不和的一段插曲，是一场争夺毒品和金钱的战斗，还是总部位于巴基斯坦的奎达舒

拉在重新控制坎大哈的运动中所遭受的打击。因此，将这场战斗追溯到塔利班是正确的，但一旦人们解构了“塔利班”这个词，这样做的意义就没有了。

2005年，反政府暴力愈演愈烈。不过，在此期间，政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民选总统开始履职，民选议会开始运作，喀布尔涌现出不少新公司，各大城市都开起了豪华酒店。如喀布尔新建的五星级塞莱娜酒店，为世界各地的商务人士在阿富汗提供一流的住宿。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和赫拉特等地的外国人多了一些口福。他们外出就餐不仅有烤肉串和烤肉之类的阿富汗菜，还可以吃到泰国菜、意大利菜等各种美食。2005年，一位刚从阿富汗回来的美国人告诉我，当地局势已经大有好转，“街上连啤酒也有得卖！”这一点，让他惊掉了下巴。购物者可以前往喀布尔一家类似加州的圣莫尼卡购物中心的商场，在瓦济尔·阿克巴·汗这样的高档社区，有一家西式超市可供外国人采购物品。

喀布尔政府各部的顾问开始整理全国错综复杂的土地所有权档案，并将其数字化。如此一来，流亡者终于可以有理有据地索回自家的财产了。此前，每一次政权更迭，新官员会趁机霸占房产与土地，并伪造文件以支持他们的不正当行为。

喀布尔大学新设了研究特定学术专题的学科和研究所。阿富汗的一家研究机构着手收集历史档案并将其数字化，他们将这些文献上传网络，世界各地的学者因此有了研究阿富汗的第一手资料。喀布尔还开办了一所私立大学，虽然学费不低，但也不愁生源，部分阿富汗人的消费能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新宪法承诺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尽管仍会不时爆出一些钳制言论的事件，不过媒体确实进入了繁荣时代。私人报纸、杂志与电台相继出现。一个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流亡者家庭还建立了著名的TOLO（日出）电视台，亚里安那和沙姆沙德等电视台也先后开播。至于一般的独立广播电台，更是举不胜举。

流亡者、非政府组织、外国政府和阿富汗政府继续在全国的城市、城镇和农村地区推动教育。大家一致认为，教育是实施重建的百年大计。“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的2002年，在洛杉矶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女士与我接洽，她说：“如果阿富汗人都能接受教育就好了。”我问她阿富汗人应该在哪些方面接受教育，她双手一摊，黯然表示：“所有方面！”

第33章　临界点

转眼2005年就快走完了，混乱与秩序的竞赛仍然不分上下。桥梁遭到轰炸，诊所不断被毁，无辜平民死于非命。与此同时，桥梁也在不断新建，手机得到普及，新开了好多学校，甚至边远乡村的人们也开始参与大选。2006年，混乱局面进一步扩大。漫不经心的观察家和政策专家都认为，这一年将是一个转折点。对于塔利班分子而言，2006年的目标是学校，他们将对学校实施袭击。

许多人认为学校是必需的。所有父母都希望子女接受教育，这种想法的前提是人们对教育的意义存在普遍共识。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工具，当一种战争倾向的思潮大行其道，建造一所学校就是一种战争行为。在阿富汗，当心地善良的人们来到农村地区兴办教育，战乱地区因此多了好些不设防的建筑——学校，里面塞满了最脆弱的目标——儿童。2006年，塔利班叛乱分子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

此前，他们还不敢对学校下手。那个时候，他们不想得罪人民，不愿随意突破底线，毕竟他们还想有朝一日重新统治全国。但是，2002—2005年，激进主义的宣传攻势不断袭来，塔利班分子也渐渐放开了顾忌。奎达舒拉出言偏激，巴基斯坦那些伊斯兰学校同样在大打心理战，他们要在民众中间制造“学校恐惧症”。目不识丁的父母得知了一个骇人的消息：孩子一旦进入西方人办的学校，长大了肯定背弃伊斯兰信仰。其实，类似的手段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已不鲜见。当时，农村公立学校的孩子成了“共产主义者”，并驾驶着苏联战机轰炸自己的祖国。如今，宣传机器再次开动起来：喀布尔的大街上满是空了一半的威士忌酒瓶，市集里到处售卖色情影片，政府唆使年轻女孩半裸着上街到处游荡，美国飞机源源不断地把猪肉运进巴格拉姆基地，而造成这一切的人，正在诱骗家长让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

当人们都在为学校问题而惶惶不安时，塔利班分子针对学校发动了袭击。2005年12月中旬，赫尔曼德省的一名教师在学校门口惨遭杀害。次月，扎布尔省的一名高中教师惨遭斩首。同月，坎大哈、赫尔曼德和拉合曼三地都有学校遭到焚毁。接下来的几个月，教师横遭虐待的事件愈发常见，打砸、焚烧和毁坏学校的事件屡见不鲜。[1]哈法尔·拉坎瓦尔设在霍斯特省的学校便遭遇了一场劫难。反政府武装把校内所有的课桌集中在一间教室，而后纵火焚毁。在纳迪·阿里小镇，哈罗提的“绿色

乡村学校”陷入了塔利班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一年之内，南部和东南部便有200多所学校被迫关闭。无论如何，家长都不希望孩子处于斗争的前线。于是，没人愿意上学了。

针对学校的恐怖袭击驱散了希望之光，一时间，未来又变得血腥起来。在南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武装叛乱活动急剧增加。2007年，赫尔曼德省共发生了751起袭击、谋杀和越狱之类的暴力事件。

2007年，看来是困难的一年，但下一年的形势还要更加糟糕，驱动叛乱的态度仿佛嗜肉细菌感染一般蔓延开来。我所说的“态度”，是一种普遍的感觉，即攻击任何与外国项目有关的人都是值得称赞的。政府官员及来自美国、北约、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员等都该统统被消灭，没有任何区别。

塔利班运动不再是一盘散沙，国外的理论家与奎达舒拉提供的那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溶剂和黏合剂，给了“异质”运动一种团结感，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男子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即他们是谁，他们在为什么而战。这种感觉更容易被唤起，因为它来自传统的部落和宗教，无论阿富汗农村的社会体制以及农村群众有何分歧，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观念。

叛乱分子当中，哈卡尼、曼苏尔、希克马蒂亚尔和毛拉·图尔（黑毛拉）等所在的组织规模最大，他们的旗下有多支武装协同作战，同时，他们与巴基斯坦方面保持着联系。在巴基斯坦，类似的塔利班叛乱组织正在形成，如斯瓦特山区的贝图拉·马哈苏德及其家人领导的武装。情况和反苏战争时期几乎一样，叛乱组织的头目负责筹措资金、管理资金、提供军备。

他们下面有一群战场上的作战指挥及专业的武装分子和全职杀手，他们的职责唯有叛乱。这些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农民那里讨取食物、寻求庇护。时机一旦成熟，他们就会对目标发起攻击。事成之后，这些人会撤回巴基斯坦休整，补充军需。

除了这些以战争为职业的武装人员，塔利班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阿富汗各地的乡村当中，无数业余战士跃跃欲试，只需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在家乡投入叛乱。当然，他们的活动地点仅限于家乡附近。平日里，这些人不是务农，就是在干其他农村活计。除非有明确的举事意图，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本业。奎达舒拉一旦发出号召，这些人就会

群起响应。

所谓叛乱，莫过于谋杀、暗杀和小型游击战这几种手段。他们的目标虽然人员众多、钱财充裕，武器军备也要精良得多，但是，面对叛乱分子的作战手法，政府军与美国人空有多重优势，根本无处施展。有时候，塔利班分子会聚起100人左右的队伍，向警察局及其他关键部门发起挑战。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从不恋战，几小时内，所有叛乱分子都会撤得一干二净，待到北约部队赶来，他们已经没了踪迹。[2]这些人看起来就像农民，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是普通农民而已。过去，苏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在更久以前，英国人的麻烦也大致如此。

2008年，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已经组成了“影子政府”。有权有势的武装首领被任命为“影子市长”“影子警长”“影子区长”和“影子省长”。这些“影子官员”是否实际掌权，我们并不清楚。不过，塔利班有了这一套完整的班子，阿富汗的百姓似乎也有了另一种选择：除波恩计划扶植的新政府之外，还有塔利班政权。后者似乎随时可以夺权，将卡尔扎伊及其外国朋友驱逐出境。

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发展了一套替代政府司法系统的司法体系。[3]塔利班的流动法庭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巡游（就像古代英格兰的巡回法庭），他们不必听从上头的指挥，这些“法庭”建立在已有的司法系统基础上，并且已经发展了15个世纪。法律非常具体，关于法律的书籍汗牛充栋，那些在学术上享有声望的人——名字中包含大毛拉、穆夫提和卡兹的人——都可以主张根据沙里亚法行使权力。就此而言，任何被称为毛拉的人都可以这样做，尽管从技术上讲，毛拉并没有足够的学识立法或者判决。在紧要关头，即使是一个哈吉（hajji，至少去麦加朝圣过一次的人）也可以说自己有资格主持正义。如果人们接受判决，他就拥有其所声称的权威，因为这就是伊斯兰教在基层的运作方式。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法官都知道伊斯兰教法，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固有的判断和习俗。

塔利班分子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地区的民众因此陷入了两难，他们如有诉讼需要，恐怕都要掂量再三。新政府开设的法庭确实是一种选择，但是选择了政府，就得准备贿赂法官。很多时候，判决结果和双方提供的贿款多寡息息相关。如果不愿意，他们也可以等塔利班“巡回法庭”的到来。

似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都更愿意相信塔利班。首先，求助政府可能

为他们带来杀身之祸。而且，即便政府的法官清廉刚正，政府的判决也可能有失偏颇，毕竟政府提倡的法律制度一向罔顾农村地区的礼俗、传统与部落关系，对于农村人口也是多有偏见。例如，一名男子给了远亲一定数量的鸦片来交换他12岁的女儿，他的亲戚卖了鸦片还钱，但因为女孩反对而没有交出女儿。塔利班的“法官”肯定会对原告表示理解；相反，一个诚实、正直的政府法官会按照喀布尔政府颁布的法律行事，可能会说：“你把女儿卖给这个人？用鸦片来交换？好了，别喊冤了，你们都给我蹲监狱去吧！”

叛乱无疑荼毒了乡村社会的生态，很多地区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外人根本无法涉足。2007年，联合国派专员来到邻近巴基斯坦的帕克蒂卡省（Paktika）调查当地人民对新政府的观感。可是，他们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在很多地方，即便是联合国人员也会遭到袭击。

战火也悄悄地蔓延到了城市。巴格兰的一间糖果工厂遭遇自杀式袭击，造成75人死亡。2008年1月，4名持枪歹徒潜入喀布尔的塞莱娜酒店放置炸弹，杀害了一名警卫。最终，有两名枪手死亡，两人被抓获。这次恐怖行动惊人的不是死亡数量，而是目标，要知道，商务旅客来到喀布尔多在塞莱娜酒店下榻。一个月后，坎大哈再次发生人体炸弹袭击。自杀式袭击者混进观看斗狗的人群，最终约有100人遇难。7月，有人驾驶汽车炸弹冲入印度大使馆，造成58人死亡，其中多数为阿富汗平民。媒体猜测塔利班应该对此负责，但在我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此时，塔利班历经摸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敛财手段，即对所有利润征收10%的税。农民是被压榨的主要对象，当时，阿富汗的农产品中，唯有鸦片最有价值。在很多鸦片生产地，鸦片已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其本身已经成了货币。人们随身携带鸦片作为现金，用于交换布料、杂货等常用消费品。[4]当然，鸦片之所以经历如此转变，是因其具有货币所需的一切属性：它不易损毁（主要是因为大家不舍得损毁），可以精确计量，价值得到广泛认可，而且产量相当有限（拥有鸦片的唯一途径是生产鸦片或参与其贸易体系）。作为一种上佳的货币替代品，鸦片甚至稳定了整个社会经济。

就这样，塔利班分子有了税收制度、影子行政系统、快速发展的（移动的）司法系统和（模拟的）货币。塔利班似乎可以宣称自己是卡尔扎伊政府的替代者，至少在各省是这样。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明显的机制来实际管理一个国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拥有的是使阿富汗无法治理的力量。

因此，塔利班叛乱对北约和美国构成了挑战，正如20世纪80年代“圣战”武装对苏联人构成挑战，以及一个世纪之前英国人面对阿富汗部落的挑战一样。英国放弃了击败他们那个时代叛乱的努力，只要一找到能把领导权交出去的人，他们就会抽身离去。这个人既强硬到可以统治这个国家，又足够精明，可以在国际和战略上充当英国的合作伙伴。如果美国能找到一个像阿卜杜尔·拉赫曼这样的强势领导人，那么它也会这么做。可是，阿富汗政坛上似乎没人能够担起这个角色。

第34章　增兵阿富汗

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贝拉克·奥巴马一再强调，他一旦入主白宫，将从伊拉克撤军，所有部队将会转赴阿富汗执行任务。我知道很多人将奥巴马的这番竞选言论当作一场政治秀，从而让他自己看起来和麦凯恩一样强硬。既然麦凯恩面对恐怖主义如此强硬，奥巴马自然不能落于人后。他们认为，奥巴马倘若当上总统，美国将结束所有的对外军事行动。

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奥巴马是认真的。上台之前，奥巴马已经有了四点清晰的认识。其一，阿富汗比伊拉克重要。其次，阿富汗战争并非一场简简单单的清场行动，而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其三，美军及其盟友正在输掉这场战争。最后，美国要从这里撤出，但阿富汗这间屋子已经着火，倘若置之不理，整个社区将会承受池鱼之祸，问题解决之前，美军不能撤离。

奥巴马是第一位揭露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战争中所扮演的不忠角色的美国总统，他还承认，问题的核心正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不断侵蚀的边界。事实上，奥巴马和他的顾问团已经把这一地区当作一个单独的实体，把它和两个国家分开考虑，称之为“阿富巴”（Af-Pak）。种种迹象显示，奥巴马是正确的，他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很好。那么，奥巴马打算如何解决阿富汗问题呢？

奥巴马决定派遣更多军队，这并不完全违背之前的对阿政策。布什执政期间，驻阿美军人数就在不断上升。以下是布什政府时期驻阿美军的人数统计：[1]

2002 年	5200 人	2006 年	20400 人
2003 年	10400 人	2007 年	23700 人
2004 年	15200 人	2008 年	30100 人
2005 年	19100 人		

明眼人都能看出，驻阿美军从未减少。这些数字还仅是美军的人数，同样身涉战地提供支援服务的私人安保人员并未统计在内。事实上，其人数也在稳步增多，至2008年12月，相关数字达到了71555人。

[2]

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队在北约的指挥下，作为国际维和部队为阿富汗提供安全保障。2006年，联军指挥权正式移交北约。同一时期，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几乎每个北约成员都在向阿富汗增兵。例如，英国已向该地区派出了5000人规模的部队。

奥巴马第一届任期内，北约各成员国（包括美国）驻阿富汗的军事人员共计5.6万人。加上军中的各种承包商，这个数字达到12.7万人。事实上，这个数字尚且小于实际数量。阿富汗境内还有一支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私人安保公司（这并非美军聘请的饮食、洗衣和设备维护人员），他们参与军事任务并只对雇主负责，他们接受金钱，提供安保服务。阿富汗战争期间，近100家公司开展了有针对性的业务，它们雇请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了4万人。

综上所述，奥巴马的增兵过程并非那么令人吃惊，而只是政策的延续。布什政府时期，军队规模虽然有所扩大，但是美国政府需要不断释放信号，给人留下阿富汗局势不断好转、一切尽在掌控中的印象。因此，增兵的幅度并不那么明显。

奥巴马上台之后，调子有所改变。他断言，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真正的敌人在“阿富巴”，后者才是他的政策重心。宣誓就职后不久，奥巴马就下令往阿富汗增兵1.7万人。这个数字不禁让我想到1842年逃出喀布尔的英国移民人数，两者大致相当，当年，英国人在兴都库什山口遭遇了惨绝人寰的不幸。随后，奥巴马又下令4000人的部队开赴阿富汗。

布什任命的驻阿美军指挥官也被奥巴马解职，改派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rystal）。麦克里斯特尔不是那种在华盛顿溜须拍马、油腔滑调的人，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餐之前先跑上数英里，堪称战士中的战士、汉子中的汉子。据报道，他的手下对他十分敬佩，因为麦克里斯特尔对自己的要求甚于他对手下的要求。伊拉克战争期间，在他指挥下，联军除掉了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大家都期待他在阿富汗再创奇迹，消灭本·拉登。

在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麦克里斯特尔向国会表示，他的对阿政策将和以前大不一样，他称之为“反叛乱行动”（Counterinsurgency）。这意味着他将集中精力把阿富汗人民带到美国一边，给当地人提供一个好的政府和安全感，他将通过正面打击塔利班来达到这一目的。坎大哈、赫尔曼德省以及邻近地区是打击的重点，他要扫荡与控制塔利班势力，

并引导当地百姓安居乐业。麦克里斯特尔还表示，自己的成功不在恐怖分子被消灭的数量，而与阿富汗人民的安全感息息相关。他将实施严格的交战规则，确保今后误杀平民的事件不再发生。然而，他警告说，这种方略一开始可能导致美国付出更大牺牲，因为可能会让没有防弹衣保护的美国士兵和阿富汗人面对面地互动，而这些阿富汗人随时可能杀害美方人员。麦克里斯特尔希望美国公众做好准备，坚持到底。

麦克里斯特尔的策略遭到副总统拜登的反对，相较而言，拜登更喜欢指向精确的“反恐战略”（Counterterrorism）。拜登希望撤出大部分战斗部队，减少美军参与一线任务的次数，只留下部分特种精锐，随时留意、跟踪并伺机消灭武装分子。如此一来，绝大多数阿富汗人都不会和美军直接接触，美军也不必同阿富汗人太过亲近，对方的反美情绪也将缓和一些，美国方面的伤亡人数也会减少许多。那样一来，美国公众也不用成天嚷嚷着反对战争了，美国政府在阿富汗的战略压力可以因此变小，相关的各种事宜也可以慢慢处理。

拜登还认为，无人机是个好东西。只消一个游戏机一般的遥控手柄，人们就能远远地操纵这种飞行器。地面上的目标也能被及时消灭。有了无人机，美军的伤亡率有望进一步降低。

两项策略都深得奥巴马的认可。于是，他又给麦克里斯特尔批了3万人的部队，同时，派遣了更多的特战部队。此后，拘捕塔利班分子的行动在步步加紧。北约部队常常采用夜间袭击的方式，对疑似塔利班分子进行抓捕。他们会趁夜深人静、无人防备的时候，突然造访嫌疑人的住所。在那之前，他们尽量不发出任何警告。行动时，作战小组却又尽量夸大抓捕的动静。特战人员穿着防弹服，带着夜视镜冲入房间，抓上嫌疑人后将其带离。当然，受假情报所害，很多受惊被捕的人其实完全无辜，但是，误抓的次数并不太多。即便抓捕行动扑了个空，也能对塔利班分子的身边人，如妻子、儿女、亲戚和其他友人形成威慑，对方可能因此悬崖勒马而不再选择继续对抗。

比斯米拉·易克巴（Bismillah　Iqbal）作为驻阿美军的随军翻译，向我讲述了夜袭的情况：

> 白天不能去，因为太容易暴露行踪，对方一旦发现是美军，肯定会立即用武力还击。即便好不容易摸到门口，他们也已经找好退路，逃得一干二净。晚上，一切都会不一样。闯进屋内，黑暗中地板上到处都有人在休息，还有少年儿童。没人辨得出美军的模样，

也不知道闯入者有何目的。离开之前，作战人员可以随意锁定目标。有一次，我记得房间角落里缩着一个人影。那是个孩子，应该才10岁。之前他睡得很香，现在则醒了，仿佛陷入了梦魇。每个人都戴着夜视镜，我们的模样他绝对看不清。我不敢想自己在他心中到底是什么形象。那天被美军拖走的人肯定和他有亲密的关系，也许，那人就是孩子的父亲，或者是大哥，我不知道。女人哭天抢地，孩子失声尖叫，婴儿大声啼哭，那个场景，你绝对不敢相信。我看见那个孩子眼睛发亮，渗出了一道寒光。当时我就想，迟早这个孩子也会加入叛乱。

奥巴马执政以来，驻阿美军极大加强了对无人机的依赖。2008年，驻阿美军先后35次出动无人机进行攻击。奥巴马上任第一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140次，一共造成200多人死亡。因此，一个问题不可避免被提出来：死者到底是何身份？美国与北约方面再三表示，死者都是恐怖分子。但是，遭遇无人机打击的村民往往说，他们和叛乱组织毫无关系。无人机的到来，只是一场无妄之灾。双方各执一词，至于真相，可能介乎他们的说辞之间。

因为奥巴马有言在先，“阿富巴”地区是问题的核心。因此，无人机经常向巴基斯坦一侧的目标发射火箭弹。这激怒了巴基斯坦各界人士，迫使巴基斯坦政府向美方表示抗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基斯坦一边抗议美军的无人机行动，一边又从美国采购了不少同等型号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都被巴基斯坦用于打击反政府武装，他们的行动区域正是“阿富巴”地区，而巴基斯坦政府却还在对美国使用无人机进行抨击。[3]

2009年底，美国与北约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反暴乱”行动。在阿富汗（及“阿富巴”）地区，美方行动以“反恐”为主。当时，北约各国驻阿富汗的作战人数已经达到10万人之多，此外，还有10.7万名私人承包商。私人承包商中，外籍人员有2.6万人（其余的8.1万人为阿富汗人，他们或为美军效力，或服务于某个北约成员国）。如此一来，美国及其盟友派出的兵力已经超过当年苏联巅峰时期的派兵人数。即便如此，叛乱活动仍在继续蔓延。

2010年，美军在马尔贾展开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清剿行动。马尔贾距赫尔曼德省的省会城市拉什卡尔加20英里，麦克里斯特尔认为，马尔贾就是反政府武装的据点，攻克此地会让塔利班遭受重创。那一次的战况非常激烈，结果也在意料之中。不到一周，北约部队便告大获全胜。

塔利班分子死的死，逃的逃，面对麦克里斯特尔的部队，所谓的塔利班政府完全不堪一击。很快，马尔贾的学校开始复课，诊所得以重新开业，警察也恢复了日常巡逻，基础建设得以重启，生活似乎变得美好起来。

但美好生活当中，仍有那么一点缺憾。零星的暴力活动还在城市及郊区不断出现。这些活动算不得战斗，甚至够不上武装袭击的程度，倒更像是有人作奸犯科，只需当地警察出手，事态就能得到平息。但是，暴力事件仍在持续。希尔夫人在《阿富汗蒙难记》(1)中的种种描述，和1841年英国人在喀布尔的遭遇是如此相似。几个月后，就连麦克里斯特尔也表示，马尔贾成了“不断流血的溃疡”。他的话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不过倒也不算错误。对于北约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的军队无法区分被打击的目标和被保护的对象。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唯有深入阿富汗社会的内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区别，而且即便身在其中，相关的界限仍然可能相当模糊。[4]

麦克里斯特尔战功卓著，不过，一次不当发言断送了他的前途。2010年7月，麦克里斯特尔接受《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的采访，他公然表达了对奥巴马总统的蔑视。[5]他说，奥巴马会见自己的军事指挥官的时候，一直有些“畏手畏脚”。对于副总统拜登，麦克里斯特尔更是难掩轻蔑之意。他假装不知道拜登的名字，并允许他的手下暗示自己拜登（Biden）的名字可能是“咬我”（bite）。于是，麦克里斯特尔被调回华盛顿，接受军事礼节再教育。他的职位由传奇人物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接任。

传统观点认为，彼得雷乌斯是美国增兵伊朗的推手。所谓增兵，是指在短期内大量增加作战部队的行为。彼得雷乌斯支持麦克里斯特尔在据点打击塔利班的策略，但他放弃了严格的交战规则，认为遵守这些规则更多是违反规则。彼得雷乌斯说，自己不能平白让属下身陷险境。接任那天，北约部队的空袭行动再次造成平民伤亡。39名死难者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当年秋天，彼得雷乌斯决定发动一场比马尔贾更大的战役，他决定征服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这里也是塔利班的诞生地。

一开始，双方的冲突并不算大，而且集中在坎大哈的郊区。美军战机朝一个叫塔洛克·科拉切的小村投下了25吨炸弹，村庄被夷为平地（村民得到北约方面的提前通知已被疏散，官方称此次行动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6]两个月的战斗过去，美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很不幸，马尔贾战役的成果却已经丧失殆尽，阿富汗北部的暴乱又有抬头之

势。

2011年4月25日，坎大哈发生的一起严重事件，让大家对北约的控制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那一天，800多名囚犯集体逃出了当地最大的一座监狱。此前，他们花费数月时间打通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如此明显的行为，却没有人注意到。当天，狱中800多人花了4个小时才全部逃离，也没有人察觉。他们从监狱对面的院子出来，而后搭乘汽车去了更远的地方，有一些人则是通过出租车逃亡的。直到人去楼空，狱中的警报才迟迟响起。[7]

2011年5月2日，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这本该是阿富汗局势的转折点，因为自2001年美军进入阿富汗以来，抓捕本·拉登、挫败“基地”组织是这场战争的公开目的。塔利班之所以介入，是因为他们怂恿了本·拉登。美方把大多数阿富汗人定义为“战争的受益者”。2001年，本·拉登离奇失踪，阿富汗的这场反恐战争似乎失去了一个胜利标志。当时，塔利班已经垮台，喀布尔也被攻占，唯有逮捕本·拉登，消灭“基地”组织，才算真正的战果。布什的对手不会主动说一声“我们投降了”，因为其对手并非一个国家、组织或固定实体，美军是要和一种环境战斗，与一种意识形态交锋。这种意识形态源自贫困、武力、仇恨、羞辱与侵略，并且已经深入伊斯兰世界的土壤之中。美军每发动一次镇压行动，阿富汗人被羞辱的感觉就会增加，仇恨的怒火也会更加旺盛。美国人的胜利越多，战争就越激烈；战争越激烈，怒火也会越旺盛。长期以来，“基地”组织及其“圣战”理念已经和阿富汗历史的主题结合在了一起。摩登的喀布尔和保守的落后乡村之间的交锋，又多了“圣战”的元素。这种冲突，美国与北约无力解决。相反，他们对于阿富汗社会的帮助，被许多阿富汗人视作对阿富汗文化的侮辱。

2011年5月之前，奥巴马政府一直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而不敢从阿富汗贸然撤军。那样一来，无异于接受败局，进而不可避免地遭到政敌的大加挞伐。转机就在5月到来了。当一小撮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冲入距离巴基斯坦军事学院不到一英里的阿伯塔巴德的一个大院击毙本·拉登时，他们达到了战争的目的，美国似乎可以宣告得胜，而后撤军走人。可惜，一切为时已晚。美国政府已经在阿富汗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奥巴马一心计划为阿富汗新政府训练一支警察部队与国家军队，从而尽快将权力移交出去，可是，这个计划再也难以如愿进行。

本·拉登死后，阿富汗的反政府势力又有进一步壮大之势。2011年6月，枪手与自杀式人体炸弹冲入喀布尔的洲际酒店。当时，一些外国代

表正在酒店参会，讨论阿富汗的前途问题。混乱持续了5个小时才平息。9月，塔利班分子又在喀布尔制造事端。他们向美国大使馆发射了火箭弹，并在城市多个地方制造了自杀式炸弹袭击，喀布尔经历了整整一天的乱局。一周之后，北方联盟领导人拉巴尼遇刺身亡。此前，卡尔扎伊曾委派拉巴尼组建“和平委员会”，负责与塔利班进行谈判。2012年4月，喀布尔再遭连环袭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一个月后，“和平委员会”的又一名领导被杀。事态似乎永远得不到平息。

凶兆还在不断涌现，不少警察与军人也加入了塔利班的阵营。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潜入国防部并引爆了炸弹。2012年，身着警察制服的杀手谋杀了两名美国军人，地点就在有高度戒备的内政部。两起惨案都并非凶手一时起意。有人为此精心谋划，就是要让凶案成为“他们的一部分”。那么，到底是塔利班分子身着制服故意制造混乱，还是他们一早就已渗透进了北约军队与警察部队呢？情况很难判断。此后，政府禁止裁缝制作军装，以免反政府势力再有可乘之机。

叛乱愈演愈烈，而美国与北约部队还在不断用犯罪和错误手段火上浇油，这让阿富汗人生出了遭受西方侵略的愤怒感觉。2011年夏天，美军“斯特瑞克”旅（Stryker Brigade）的“狙击手小组”成员被送上法庭。这些狙击手把杀害阿富汗平民当成了军旅生活的调剂，他们甚至砍下死者的手指和其他身体部位来炫耀自己的战绩。如上细节，都在法庭上得到披露。2012年的一则录像资料同样令人发指。视频中，4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公然朝阿富汗平民的尸体小便。录像放上Youtube网站后，引发轩然大波。2月，巴格拉姆基地的美军又在垃圾堆里焚烧《古兰经》。一年之前，佛罗里达州的一名神父也曾做出侮辱与烧毁伊斯兰经典的行为，其蓄意挑衅的行为在阿富汗引发了严重的骚乱。2012年3月，一名美国士兵在坎大哈横冲直撞，杀害了16名阿富汗平民。

对于美军的暴行，美国总统候选人纽特·金里奇立即发表声明，美国应该尽快撤军，因为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阿富汗文化”。[8]他的这一声明证实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所有这些军队及战争的目的，就是想“从根本上改变阿富汗文化”。

(1) 希尔夫人原名佛罗伦萨·温奇（1790—1853），丈夫是罗伯特·亨利·希尔将军。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希尔夫人与众多英军士兵、妇女、儿童被俘，在被关押的9个月里，她每天写日记记录在狱中的经历。1843年，她出版了《阿富汗蒙难记》，这是一部关于第一次英阿战争的经典作品。——编者注

第35章　希望之光

这些事态的发展可能使阿富汗看上去毫无希望。无论塔利班是谁，他们都在前进，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将阿富汗拖入20世纪90年代末的黑暗与蒙昧中……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然而，这种判断可能为时过早。其实，抵御黑暗的力量也在变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巨额资金正面临着威胁。2010年7月，麦克里斯特尔遭到解职。同时，《纽约时报》的一则重磅好消息开始与所有来自这个不幸国家的可怕战争报道竞相吸人眼球。报道称，阿富汗的地下有未曾发掘的矿藏，价值达1万亿美元！这份报告基于2009年五角大楼对阿富汗进行的地质勘探。说是新闻，其实并不新鲜。亚历山大大帝就曾提及这里的铜，马可·波罗也知道此地矿藏丰富。至于矿业救国的论调，我早在1978年就已经听说。当时，人民民主党政府矿业部的一位官员来到亚洲基金会访问，我正好在那里工作。此后，苏联人也曾在阿富汗四处寻找。可是，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大家都低估了阿富汗的矿藏潜力。

阿富汗的梅斯·艾纳克（Mes　Aynak）拥有世界第二大未开发的铜矿，拥有亚洲最大的未开发高品铜矿石储量（之一）。黄金、宝石、钴、磷、钡、锶与铀等资源，阿富汗境内也是一应俱全。这里的天然气储量同样惊人，甚至还有少量石油。

当然，稀土资源才是阿富汗各类地下宝藏中最吸引人的，稀土包括锂、镧、铈、钕及其他13种稀有金属。说来惭愧，家乡的这些宝物，我是从未听闻。稀土其实并不比锡矿更加罕见。不过，它们在土壤与岩石中的成分过于稀少，要想获得足够多的稀土并用于商业开发，并非一件易事。不过，今天提取它的努力是值得的。没有稀土，光纤、计算机显示器、硬盘、手机电池、笔记本电脑电池、节能灯、太阳能转化电池、混合动力汽车引擎和卫星通信工具等是不可能的，智能炸弹、无人机、精密导弹、激光武器、信号干扰设备和雷达等高科技军事设备的控制系统，同样离不开稀土。谁掌握了这些技术，谁就可能在下个世纪获得话语权，保持繁荣。稀土资源在未来的重要性，恐怕将和石油资源在当代的重要程度等量齐观。因此，开发稀土自然有利可图，而蕴藏着丰富稀土矿藏的阿富汗正处于几大强国的争夺前沿。

中国拥有世界上已知最大的稀土储量，达3600万吨，俄罗斯则以1900万吨位居第二，储量第三的美国是1300万吨。阿富汗的稀土储量尚未探明。不过，美国军事地质学家认为，仅在赫尔曼德河河谷不到一平方英里的地下，就有150万吨稀土。即便这是阿富汗的全部稀土储量，也足以令人激动，毕竟这个国家幅员并不辽阔，而且真实储量很有可能更为可观。不过，现在还很难说，因为稀土矿藏就在坎大哈和赫尔曼德省，而这些地区因为反政府武装活动频繁，相关的地质勘探并未完全展开。

这是巧合吗？

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请您原谅，笔者有时也是阴谋论者。因为现代科技的需要，稀土资源得到了世人的重视。坎大哈和赫尔曼德省的居民历来好斗剽悍，远早于使稀土成为宝藏的技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一直站在一座宝库上，不过，他们迟早会发现。

资源丰富是个利好条件，但也令人喜忧参半。也许，阿富汗会因为丰富的矿藏而迎来技术革命，他们会对资源善加利用，把觊觎本国的外国势力拒之门外，由此而来的丰厚回报，也能得到合理的利用。财富不应仅仅施惠于一小部分人，而应让整个社会都受益。可想而知，外国公司将是开发矿藏的主力军。通过地契与租约，阿富汗也可能有所收获。当然，收获的前提是公平公正的政治与社会机制，唯有如此，财富才能无所争议地发挥作用。可惜，大国势力的窥视之下，阿富汗总是备受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此一来，这种机制可能无法在强权争夺的高压下得到真正发展。

阿富汗的丰富资源在国际上引起了激烈的竞逐。目前看来，中国是最大的赢家。在《纽约时报》报道阿富汗铜矿消息的前一年，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以35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阿富汗的一处铜矿所有权。2011年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阿富汗国有瓦坦公司组成合资公司，双方将共同开发阿富汗境内的油气资源。未来十年，阿富汗政府每年可以从工程的土地使用费和税收中获益50亿美元。

总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纽蒙特矿业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黄金制造商，为了阿富汗的铁矿石资源，该公司曾经参与阿富汗主要铁矿项目的投标。不过，7家印度企业组成的联合体成了最后的赢家。印度方面准备拿出70亿—110亿美元，用于铁矿的开发。与此同时，英国、伊朗和土耳其的有关企业，也像饥饿的秃鹫一样围绕着阿富汗的其他矿藏资源，争相和阿富汗公司组成合资公司，开发黄金、铀、钴等矿藏。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未向阿富汗派出过一兵一卒，也没有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上花过一分钱，然而，他们正在赢得阿富汗诸多矿藏资源的使用权，他们在那里缺乏军事存在正成为竞争优势。中冶集团签订艾纳克铜矿合同的时候，还提出了其他丰厚的条件。中冶集团将在铜矿所在的地区兴建学校、公路、宗教场所，以及一座400兆瓦的火力发电站。铜矿开发还涉及一系列移民问题，中冶集团拨出专款，请村民在合适的地点新建家园。原有的村舍则会因为矿区作业而荒废。如此一来，村民不但有了新家，而且还得到一份不错的生计。至少，中方的承诺是诚意满满的。

碰巧的是，法国与阿富汗的一些考古学家也在附近有了重大发现——一座建于公元前7世纪的佛教寺庙。可想而知，出土的文物珍宝又会让喀布尔博物馆的展品丰富起来。但是，铜矿开采会对文物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中方原计划于2011年开始动工，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后，中国公司决定推迟三年再动工。因此，考古学家有了挖掘文物的时间。由于工程至少需要推迟三年，中方因此蒙受了不少经济损失。而且考古学家表示，工程可能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无论如何，中国公司推迟工期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受到了广泛好评。

过去，阿富汗一条铁路也没有。多亏了矿藏的发现，国内很快就建起了三条铁路，而且将来可能还有更多铁路铺设在阿富汗大地上。中国公司将承建一条从北方通往喀布尔南部洛加尔省的铁路，用于运输艾纳克出产的铜矿。印度方面也需要为哈吉加克铁矿寻找对外通道。他们规划的铁路始于喀布尔西部的巴米扬省，一直连接到伊朗境内的恰赫巴哈尔港。经由这些铁路，阿富汗的其他矿藏资源也可以行销国内外。2012年，从乌兹别克斯坦到马扎里沙里夫的铁路已经建成通车。除了货运，这条铁路也担起了客运的职责。

作为巴尔赫省省会，马扎里沙里夫的经济发展迅猛，当地的叛乱活动也因此转入低潮。土耳其商人投资兴建的食品工厂出产了大量食用油和罐头食品，除了出口，也惠及阿富汗国内的消费者。同时，巴尔赫省的纺织与成衣产业已粗具规模，甚至有了一家摩托车装配厂。

叛乱活动虽时有发生，但商机也在增多。阿富汗企业家兴办的公司（总部位于迪拜）已和百事可乐达成协议，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百事可乐产品在阿富汗的代理权。另一家与阿联酋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的阿富汗公司，则准备投资1亿美元在阿富汗开发3G电信业务。公司估计，3G网络一旦投入使用，用户能够再增加600万人。“9·11”事件以来，阿

富汗的电信运营商已有三家，手机用户超过百万，其中一家运营商推出的手机银行业务，更是极大促进了商贸活动，人们可以在拥有手机信号的任何地方开展业务。

虽然数百万阿富汗人仍陷于赤贫，不过，喀布尔等城市正在腾飞。看一看新富阶层迎婿嫁女的阵势，就知道大量金钱在流动。对于阿富汗人而言，婚丧礼俗一定要讲究派头，因为这关乎家族的荣誉。以前，很多年轻男子无法结婚成家，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财大操大办，毕竟那样一来反而有损家族名望。

大户人家过去的婚礼非常热闹风光，但比起近些年来各种喜事的显赫排场，也会显得相形见绌。通常情况下，如今的一场婚礼，来宾人数起码数以百计。权势人物（权力寻租已经取代领兵割据，成为阿富汗上层人士的主要营生）为子女操办人生大事，前来道贺的宾客更是可能突破2000人。即便一般的家庭，也喜欢大操大办，有些家庭甚至为了一场婚礼而走到破产的边缘。

大办婚礼自然有其益处，至少可以大大地刺激经济。开办婚庆公司因此成了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人们喜欢在宫殿般的豪华场所举办奢华的婚宴，仅在喀布尔一地，便有80多处这样的场所。[1]一场婚礼可能会把一些人的腰包榨干，也可能让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婚庆产业还给妇女提供了就业良机，一些女性甚至借此开办了自己的生意。美容行业方兴未艾，毕竟有钱人都乐得花钱，把自家的妻子和女儿打扮得光彩夺目。这样一来，婚礼上他也会有面子一些。款式新潮俏丽的女式长袍总是很受欢迎，女性设计师也凭借自己的巧手裁剪而获得巨大的成功。豪华的婚宴自然也挽救了餐饮业，租赁漂亮碗碟，同样可以赚上一笔。在现代喀布尔，音乐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工作。

事实上，婚宴过于奢靡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政府甚至有意出台法律予以限制，但是没有任何效果。不管法律怎么规定，总会有人为了炫耀成功而不惜钱财。

伊德里斯·艾哈迈德·拉赫曼尼是一位工程开发师。2001年“9·11”事件前夕，他曾深入阿富汗乡村并辗转多地，与大量村民有过密切接触。他还记得，一旦偏离公路，就会进入一片落后原始的地区。那里的乡村没有水电设施、邮政服务，也没有电话，村民无法了解外面世界的最新进展，对喀布尔的时局也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巴基斯坦、巴黎、美国的皮奥里亚发生了什么。2010年，拉赫曼尼再次以研究者的身份造访这些地区，他发现那里已经没了与世隔绝的村子，阿富汗的乡村社会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短短十年的变化大过千年的漫长变迁。拉赫曼尼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拉赫曼尼将这一变化部分归功于电视。他足迹所至的每个乡村，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而且还配备了卫星天线。电视与天线通常放在市政厅的所在地，每到晚上，村民们就会聚在一起观看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

那么村里的用电从何而来呢？拉赫曼尼发现，村民们已经用上了燃气发电机。中国制造的发电机价格低廉，每个村子都能负担得起。那么，他们的天然气又来自哪里呢？拉赫曼尼说，每隔几天，村中长老便会吩咐年轻人驾驶摩托车，前往邻近的集市购买液化气。中国和伊朗生产的这种价格低廉的代步工具，每个村子都能买得起几辆。[2]而且，太阳能电池板正在那里得到广泛使用。偏僻的乡村居民如何能负担得起太阳能电池板、摩托车、发电机，以及时时需要补充的液化气呢？拉赫曼尼并未言明。但是，答案似乎很明确，阿富汗各地的农民都在生产一种颇受欢迎的商品——鸦片，这种商品可是行销全球的硬通货。

塔利班控制下的毒贩通过把毒品走私到国外销售，来达到资助塔利班的目的。他们到乡村收购鸦片并不一定通过现金支付，他们常常用各种新鲜玩意作为鸦片的抵偿。于是，村民们用上了手机、电视机、摩托车、越野车和电脑。[3]一方面，塔利班的种种作为确实在把阿富汗拽回7世纪的落后境地；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把现代科技传播到全国各地，从而无意中促进了信息流动和文化影响在阿富汗农村地区的传播，而这最终将葬送塔利班的“大局”。村民们已经爱上了电视，电视节目来自世界各地，这一切还得感谢卫星天线。拉赫曼尼甚至发现，有些村民看得津津有味的东西，竟是盗版的HBO电视剧！这个消息虽然无从证实，但是我相信真有其事。

即便村民只能接触本国节目，也足以达到开阔眼界的目的。《阿富汗偶像》（*Afghan Idol*）一类的真人秀，他们绝对前所未见。显然，这是阿富汗版的《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选手面对评委表演才艺，每轮比赛过去，都有人淘汰、有人晋级，人员不断减少，最后会产生一位冠军。节目开始第一年，就有两名女性歌手进入了决赛。其中，出身赫拉特的塞塔拉着实成了风云人物。决赛中，她不但没有佩戴头巾，而且载歌载舞（并不是阿富汗人熟悉的那种婚庆舞蹈，而是左右扭动脖子，手臂蜿蜒如蛇，眼光闪烁挑逗）。面对全国观众，塞塔拉扭腰摆臀，跳了一曲迪斯科。放在美国，她的表现只能算中规中矩，并无挑

逗之意，但是，在阿富汗，如此举动却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死亡威胁成了国际新闻，加强了经常与阿富汗联系在一起的倒退野蛮的主题，但对我来说，大新闻是女性在这个节目中，通过竞争进入决赛。更值得一提的是，参赛选手包括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最后的冠军由电视观众手机投票决定。第一季比赛的冠军是个哈扎拉人，他的民族出身并没有引起争议。

看到《阿富汗偶像》大受欢迎，阳光电视台又制作了阿富汗版《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2010年，电视剧《此地的秘密》（*The Secrets of This House*）在阳光电视台开播。电视剧全程在喀布尔完成制作，编剧阿提克·拉希米（Atiq Rahimi）曾经多次获得各类奖项的肯定。他离开法国回到喀布尔，就是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4]同年，阳光电视台还播出了讲述警察生活的《飞鹰四号》（*Eagle Four*）。该剧得到美国大使馆的鼎力支持，剧情与阿富汗国家警察的一个反恐小分队有关，主人公出生入死打击犯罪，而且他们的行动自由自在，很少考虑规则。故事基本就是基弗·萨瑟兰（Kiefer Sutherland）《二十四小时》（Vehicle 24）的翻版，只不过“飞鹰四号”是个男女搭配的组合。当然，这一点只是主创人员的美好愿望。事实上，阿富汗直到2010年才有第一名女性警员，同年，阿富汗国民军也迎来了第一名女兵。2012年，笔者在阿富汗期间，曾经收看过一档关于绑架的真人秀节目。那个时候，阿富汗国内的绑架案件频发。节目中既有演员的事后讲述，也有纪录片中的真实影像资料。

艺术品市场也在加速回暖。2011年，策展人拉明·贾韦德带着30幅先锋画作前往美国巡回展览。画作全部出自阿富汗艺术家之手。“绿松石山基金会”（Turquoise Mountain Foundation）由英国作家罗瑞·斯图尔特（Rory Stewart）创办，不过负责团队却由清一色的阿富汗人组成。在他们的帮助下，年长的手工艺人和青年学徒两两结对，使阿富汗民间手工艺的传承得到了保障。舍林·帕夏（Shireen Pasha）的纪录片电影《慢点，慢点，泥土和莲花》（*Slowly, Slowly, Mud and Lotus*）对这些工匠及他们的工作有惊人的呈现。[5]2011年，“绿松石山基金会”又开启了一项旨在保护喀布尔老城街区的计划，并筹措资金，修葺城中迷宫般的楼宇和窄巷。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战火摧残，老城几乎面目全非。阿富汗仅剩的几位传统艺术大师，将和学徒一起投入重建工作，他们的专业涉及木雕、制陶、瓦工和金属工艺等。

阿富汗的电影产业大有欣欣向荣之势。德国籍阿富汗人布尔汗·库尔

班尼（Burhan Qurbanni）导演的《沙哈达》（*Shahada*）入围柏林电影节。两个月后，索尼娅·纳赛里·科尔（Sonia Nassery Cole）执导的《黑天鹅》（*Black Swan*）在喀布尔亚里安那电影院上映，影片是在阿富汗拍摄完成的。《黑天鹅》讲述了一个喀布尔家庭经营一间咖啡馆，并举办诗歌朗诵会的艰辛历程。这部电影还遭受了一个悲惨的打击，反动派绑架了女主角，并砍掉了她的脚，以惩罚她所谓的对宗教不忠。最终，科尔不得不选择自导自演。

音乐界的几位巨星也结束了流亡生涯。鼓手阿西夫·穆罕默德（Asif Mohammed）和歌手法尔哈德·达丽雅（Farhad Darya）先后回到祖国。国家博物馆修葺一新。在企业界的资助下，喀布尔又多了一座国家体育馆。2012年伦敦奥运会，阿富汗也派出了代表团参赛。田径选手塔哈米娜·科希斯坦尼（Tahmina Kohistani）带着头巾参加了女子100米的角逐，罗胡拉·尼克帕伊（Rohullah Nikpai）再续2008年的辉煌，获得一枚跆拳道项目的铜牌。

阿富汗的历史也许悲剧不断，不过，这个国家从来不乏喜剧明星。阿曼努拉·穆贾杰迪（Amanullah Mujaddedi）就是阿富汗的安迪·考夫曼。一天，他像过去的军阀一样，在公路上设置了一个检查站。不过，阿曼努拉·穆贾杰迪并非想要诈取买路钱，而是向路过的司机送钱。对方的错愕反应，就是他想要的喜剧效果。穆贾杰迪还在构想一个“圣战痞子”的角色。根据他绘出的草图，人物身着金色长袍，戴着墨镜，身边总有几个穿着罩袍、摇来晃去的女性。显然，他是在讽刺阿富汗的宗教极端分子。如此作为，堪称“讽刺喜剧”的大胆尝试。您可能觉得这样的人物一定出身激进的文化家庭，其实，阿曼努拉·穆贾杰迪的叔叔，乃是抗苏战争时期的七大“圣战”武装首领之一的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是一位保守派。

总之，竞争并未结束。乡村地区的保守派还在向城市步步进逼。他们时不时派出的人体炸弹会混进人群密集的市场和街区，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惨案；他们还会不遗余力地要把国家拖离现代化的轨道。但是，进步人士也予以了有力的还击，大家齐心协力，要把阿富汗引向未知的未来，让人们看到广阔的外部世界。

资金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国家，贪污腐败仍然触目惊心，社会充满活力，导弹、炸弹、炮火仍在威胁和平，歌手还在歌唱，喜剧仍在上演，阿富汗的历史屡被中断，也在不断重新开始，这个国家还在整合，未来如何，谁也无法下定论。

大画景

谈古而不论今，这是本书的主旨。时事瞬息万变，自然不好妄下断言。但是，本书行到结尾，我也想谈一谈今天的阿富汗。毕竟，“今天”代表了阿富汗历史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由来已久，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对阿富汗来说，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问题。阿富汗是一个中间地带，是列强之间为争夺比阿富汗更大的赌注而苦苦挣扎的地方。在古代，突厥、波斯与印度文明在此交汇，他们都对阿富汗有所影响，但阿富汗却又那么与众不同。人民在此不断融合，但这片土地从来不是波斯的边疆，也未变成印度北部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介入阿富汗的大国势力不断变化，争夺从未停止，但阿富汗却从未消失。阿富汗非但没有被融合，反而不断从入侵者那里吸收各种因素，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有别于邻国和入侵者的实体。

2002年，最初的塔利班被推翻后不久，我37年来第一次回到喀布尔。我一路北行，游历了大片乡村，一直到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曾经的据点潘杰希尔山谷。当时，首都的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区域被夷为平地，北郊的平原上还有战火的硝烟。我发现，阿富汗还是那个我离开时的阿富汗。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潘杰希尔河畔走走停停。几分钟后，我发现周围都是牧羊人和农民。他们会从我们身边走过，看看我们是谁，并给我们带来了热茶和新鲜的桑葚。每到一地，都有陌生人主动攀谈。他们常常说起他们的故事，也会天南海北地随意聊天。类似的际遇实在太多，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谈话内容。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遭受了难以置信的破坏，但是其文化在死亡和时间面前还是那样冷静和漠然。这里的人们还是那么乐于交际，不管哪个国王在位，阿富汗的老百姓都会热情得有点咄咄逼人。

为了争取男女平等，阿富汗人曾经付出过太多血的代价。不过，这个国家仍是一片公私分明的世界。公共世界几乎完全属于男人，女人仍然要远离陌生人的视线，只能生活在高墙大院之内。不过，作为一个阿富汗人，我可以证明，至少在我的家族和家庭里，女性仍像以往那样充满力量、健谈而有活力。

2012年，我再次回到阿富汗。我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虽然仍有许多事情没有改变。2002年的喀布尔街头一片混乱，被破坏的建筑随处可见。2012年，喀布尔的秩序也没好到哪里去，只不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成了混乱街景的根源。2002年，几乎没有人有电话。2012年，虽然没有固定电话，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很多人甚至有两部手机。在我上一次访问中，虽然城市里几乎看不到有人骑驴，但在乡下有不少人在骑。现在仍可以在农村看到驴子，但骑驴拉货的农村人运送的物品可能变成了电脑。

2002年，喀布尔约有35万居民，这里的汽车很多，但（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交通信号灯，城市的交通状况自然很不乐观，但大家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2012年，喀布尔的人口已达数百万，具体有多少，众说纷纭。根据美联社的估计，大概是300万人。喀布尔的很多人认为有500万，也有些人估计是1000万。然而，正如我所说的，许多方面仍没有改变。这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仍然缺乏交通信号灯，交通拥堵仍旧无解，但似乎依旧没人关心。他们只是一边等车，一边用手机做生意。“今天我们不被堵在这里，也会被堵在其他地方，有什么好着急的？”一个人耸了耸肩，补充道，“一切听从真主的安排！”

阿富汗的乡野一如既往地古老而宁静。驶出喀布尔100多英里，我们进入了一处看似没有人烟的山谷。我们停下来换了一个轮胎。一个白发苍苍的当地人从我们根本看不见的村庄走过来，邀请我们上门喝茶。城市里的人可没有这等闲情，那种从容不迫的平静感已经让位于金钱和科技引发的疯狂喧嚣。然而，这只是阿富汗人性格中的一个方面。这个社会也一直是一个比拼人际关系的丛林竞技场，掌握权力的人可以恣意妄为。从艾哈迈德·沙阿时代开始，这个情况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时至今日，十年前的喀布尔人所藐视的那些交通规则，大家仍然觉得只是一种不合国情的舶来品。有人笑言，在喀布尔开车就像玩布兹卡谢。司机们随意变道，只要瞅准一个空当，甚至会驶入对方车道，逆向行驶。您可能认为这里毫无秩序。

您如果这么想，或许也有失偏颇。如果真的没有规则，街上每天的车祸数量会多达成千上万起，但我看到的是上千次的险些碰撞，没有一次真的碰撞。车辆非常之多，刮擦相撞的情况却从未发生。外国人眼中这些规则可能并不明显，但对阿富人来说，它真实存在，并理解这种规则。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也是如此。

阿富汗人的规则很难辨析、领悟，部分原因是那里拥有不止一套规

则。当阿富汗在18世纪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时，它可能就有一种一贯的文化，虽然它在不断演变，但它是在一个连贯的框架内发展变化的。

随后，这个国家经历了来自欧洲的一系列入侵，引发了一系列的相互冲突。阿富汗人民的凝聚力来源于传统的部落和伊斯兰价值观，人们希望政府不遗余力地尊重和捍卫这些价值观，希望政府能对自己的生活少一些管束。不过，阿富汗的统治者也不能简单地顺从，因为周边总有两个或更多装备精良的西方巨人在竞争，而阿富汗就在他们混战的战线上。每一方都想进入这个空间，都想与阿富汗合作成功，他们都觉得自己能为阿富汗带来文化上的进步、物质上的改善，各方都乐于和阿富汗领导人打交道，只要他们在欧洲人熟悉的文化基础上运作。

阿富汗的统治者试图在内外之间进行周旋，但这使他们陷入了双重困境。想要确立地位，他们必须谋求当时最强大的外国势力的支持。但是，没有一个阿富汗人能够在没有本国最强大的力量支持下长期统治这个国家。在外部强权看来，阿富汗的统治者必须为己服务，内部势力却又要求统治者摆出力拒外敌的姿态。成功的国王总得学会两面平衡，表面上声称自己是保守的社会传统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拥护者，实则在暗中追求现代化。

如今的阿富汗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不过，内外势力对于卡尔扎伊政府都心怀疑虑。阿富汗人觉得卡尔扎伊不断妥协，总在答应美国人的各种条件；卡尔扎伊的各项政策，美国政府看在眼里，认为阿富汗在开倒车。美国人甚至担心，卡尔扎伊会和塔利班沆瀣一气。其实，任何人只要坐上卡尔扎伊的位置，都会表现得如此“精神分裂”。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无能的表现，他的矛盾表现只是阿富汗社会图景当中各类矛盾的集中体现而已。

大国之间的交锋，导致人们对阿富汗的民族性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每一支外国势力都觉得自己是在干预“一个国家”，其实，他们每每横插一杠，不过是加入了一场阿富汗人关于国家认同的内部斗争。每一支干涉力量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们总要扶植代理人，帮助自己统辖整个阿富汗。但由于傀儡的权力得自国外，因此，阿富汗传统社会对于喀布尔中央政权的信任度在一路走低。外国势力原本觉得，只需抓住把手，就能握住阿富汗这把瓷壶，没想到瓷壶破裂，他们的手里只剩下一个把手。舒贾·沙阿和亚库布·汗就是英印当局的把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穆罕默德·塔拉基则被苏联人握在手中。他们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其代

理人的角色相似。至于卡尔扎伊，则是新时代的代理人，只不过他无须顾及英国或者苏联的命令，只需听命于美国和北约而已。

外国干涉，不仅削弱了傀儡政权的执政能力，也破坏了喀布尔在阿富汗的权威。中央权威涣散，导致地方割据势力纷争而起。最终，入侵者都陷入了难以收拾的乱局。这种乱局消耗了他们的资源，以致其没有时间和力量来实现干预最初的目的。问题不在于统一团结的阿富汗不可征服，而是分裂内乱的阿富汗让征服者无力管制，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外国干涉势力想要重建中央权威，却总是无能为力，毕竟，能够团结阿富汗的只有阿富汗人自己，这取决于阿富汗文化内部矛盾的解决。只有当外国势力从这个他们无力控制的国家撤出，阿富汗的城市（或农村）统治阶层重新掌权，阿富汗才能重新迎来团结的局面。驱逐外敌一定会使新政府的威望高企，阿富汗历史的钟摆也会从分裂转向中央集权。在新政府的努力下，国家将整合各民族和团体，形成统一的合力。

阿富汗的每届政府都在进行这样的努力，因为外国势力总在干涉阿富汗的局势，没有哪个政府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社会分崩离析。

一旦获得阿富汗人的信任，新的统治者就会着手推进两件事：表面上，他们要秉持不结盟的原则；暗地里，则要和外部势力达成谨慎的妥协。而且，他们要让阿富汗的文化传统融入整个世界潮流。后一项任务，尤其需要他们谨慎操作，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身败名裂，失去权位。

同样的情况会再次发生，无论是华盛顿属意的人选获得阿富汗的统治权，还是塔利班分子席卷城市、确立统治。面对大国干预的持续威胁，喀布尔中央政权渐渐习惯向外看，并倾向于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如果塔利班分子夺取政权，他们很快也会生出同样的迫切心态。这种向外看齐的心态和对某种形式的现代性追求很快会显现出来。

面对阿富汗，世界列强有两个选择：要么征服这片土地，要么秉持公正立场，促进阿富汗社会达成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阿富汗在文化和政治上建立起主权国家的和解，最符合所有各方的利益。我之所以说“讽刺”，是因为阿富汗一旦获得主权，它将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这将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由此一来，大国可能宁愿彻底征服这个国家。可是，这一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那么，外部势力到底想要一个中立的阿富汗，还是一个俯首帖耳、四分五裂的傀儡政府呢？

奠定民主、消除腐败、解放妇女，皆非美国在阿富汗面临的主要难

题，这些问题应由阿富汗人处理。对美国政府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放手。华盛顿当局必须让阿富汗政府学会自立，但又不至于落入其他国家的掌控。这样的局面并非美国或者北约能够单独掌握，因为任何关心周边利益的国家，都有可能介入其中。因此，各方必须达成一致，确保“中亚瑞士”阿富汗的永久中立地位。

一旦外部压力减弱，阿富汗人就能着手解决国内的文化矛盾。这条道路注定布满荆棘。但是，希望并非那么渺茫。虽然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世界的冲突由来已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条鸿沟正在渐渐缩小。十年前，我在阿富汗的家乡还没有像样的路政设施，虽然这个小村就在喀布尔不远处的郊区。要想到达那里，得适时脱离公路，沿着那个方向一路翻山越岭，步行、骑驴或搭乘汽车。不过，这些已成历史。如今，我的那些亲戚正在忙着对他们一直耕种的土地进行确权，因为无主的土地即将被政府征收。笔者老家所在的德叶海亚（Deh Yahya）村，将来会成为首都新区的一部分。

2012年，我偶然结识一位普什图司机。他来自瓦尔达克农村，不过已来喀布尔谋生多年。听说我在为阿富汗写作，他立即表示要为父老乡亲发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可能觉得，阿富汗人只知道互相杀戮、互相伤害，但那不是事实！看看我吧，难道我不是个温柔可爱、行为得体的男人吗？”（没错，司机先生的确是我见过最温柔可爱、行为得体的人）他还说，“政府已经修好了路。以前，从我家到喀布尔需要4个小时，现在45分钟就够了。母亲一旦身体欠安，我可以迅速带她到喀布尔的医院。所以，你觉得我们会反对修路吗？我们农村人不会反对修建道路，也绝对支持兴办医院。我们只想和平地生活，就像一直以来那样平平安安地生活。”

那一次，我还去了巴米扬。矗立在那里的大佛已经被塔利班摧毁。上一次来到此地，我只有2岁。对于庄严的佛像，我已经毫无印象，只能通过旧日留影进行缅怀。我们沿着谷地，一路走进巴米扬省的腹地。道路两旁的所见所闻，并未让我生出太多陌生感。附近的巴扎和我幼时的记忆没有太大差异。对我而言，这里就像喀布尔的德赫布里（Dehbouri）市集，窄窄的街道两边，密布各类小商铺，肉店的吊钩上挂着各种新鲜肉类，水果和蔬菜被高高地堆着，火柴、电池、铅笔、睫毛膏、玩具等物品也能在这里找到。店里的老板和顾客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街上的小贩在高声叫卖，为手中的货物寻找销路。人群当中，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坐在高脚凳上，身前还有一方小桌。有那么

一瞬间，我觉得他是个达拉克。从前，村民需要剃头或者行割礼，就会请他们。

他当然不是达拉克，这种工作早就没了。我走近一看，才发现他身边有好些现代玩意儿。桌边立着一个手提箱大小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板的一头连着一个12伏的汽车电池，用于支持笔记本电脑的运行，笔记本电脑可以通过无线信号连接互联网。即便身处阿富汗中部农村，他仍可以从喀布尔或印度的网站上下载歌曲。他的生意非常有利可图。所有的歌曲都经过电子调制，虽然风格现代，但明显源自20世纪50年代我在喀布尔电台听到的那种音乐。这种音乐源于山区的民间音乐，可以追溯到12世纪乃至更久以前，就像美国的乡村音乐可以追溯到阿巴拉契亚的蓝草音乐，英国乡村音乐可以追溯至都铎王朝时代，摇滚乐也可以通过密西西比三角洲的蓝调找到非洲这个源头。

这就是阿富汗。在这里，21世纪与12世纪紧密相连，不过，其文化与历史的漩涡冲击终将汇成一条新的巨流。站在大佛曾经凝望的巴米扬集市，我突然生出一种感觉：周围的一切并不代表过去和现在，也许它们象征着未来，它们正从阿富汗历史的沼泽中升起。我无法想象它最终的形态，只是突然觉得，阿富汗就像一个实验室。数个世纪以来，无数势力席卷过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充满了矛盾——我们的星球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阿富汗能成功地将国内的众多民族融合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整体，那么，也许这个星球也会有希望。

致谢

本书写作期间，我曾和多位友人有过恳切交流，在此，我要感谢他们的悉心指点和不吝赐教，也要感谢他们对拙作提出的种种建议，他们是阿克巴·纳鲁兹、哈法尔·拉坎瓦尔、比斯米拉·易克巴、亚尔达·艾斯玛泰、呼麦拉·吉尔扎伊、伊德里斯·拉赫曼尼、安瓦尔·雷扎伊、阿卜杜勒·海伊、巴希尔·沙哈瓦兹、查希尔·安萨利与莎菲卡·安萨利夫妇、法里德·安萨利与萨曼·安萨利夫妇、阿合塔尔·贾迈勒·安萨利、法兹鲁丁、纳吉布拉·赛德克、瓦希德·奥马尔、扎马莱克·沙利兹、卡西姆·加尔德兹等人。感谢乔伊·奎克的大力支持。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亲爱的妻子黛博拉·克兰特。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我的书稿，与我仔细探讨其中的得失。每个作家都需要一双慧眼，而我的慧眼就是我的妻子。此外，还要感谢伯克利奥谢终身学习研究院的苏珊·霍夫曼女士、我的经纪人卡罗尔·曼对本书的支持，感谢编辑老师丽莎·考夫曼的仔细审校与勘误。

人物对照表

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普什图“圣战”领袖，2001年遭塔利班杀害。

阿卜杜勒·马吉德·扎卜里（Abdul Majid Zabuli）：阿富汗企业家，国家银行的创始人。

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乌兹别克军阀，曾是人民民主党政权军事将领，后加入“圣战”组织。

阿卜杜勒·拉苏勒·赛义夫（Abdul Rasool Sayyaf）：著名的伊斯兰主义者，“圣战”组织的主要领袖。

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高级助手，2004年、2009年两度参选阿富汗总统。

艾哈迈德·沙阿国父（Ahmad Shah Baba）：萨多扎伊家族族长、阿富汗的缔造者，开创了杜兰尼王朝，1747—1773年统治阿富汗，被尊为阿富汗的“国父”。

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ad Shah Masoud）：阿富汗抵抗运动的军事领导人，1994—1996年担任国防部长。

艾哈迈德·查希尔（Ahmad Zahir）：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富汗最有影响力的歌手，有“阿富汗的猫王”之称。

亚历山大·布尔内斯（Alexandre Burnes）：1839—1841年，麦克纳顿派驻喀布尔的政治代理人。

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l Rahman）、“铁腕埃米尔”（the Iron Amir）：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孙子，希尔·阿里的侄子，1880—1901年统治阿富汗。

阿曼努拉（Amanullah）：哈比布拉之子，阿卜杜尔·拉赫曼之孙，1919—1929年统治阿富汗。

哈比布拉（Habibullah）：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儿子和继承人，1901—1919年统治阿富汗。

希尔·阿里（Sher Ali）：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和继承人，1863—1866年、1868—1879年两度统治阿富汗。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人民民主党“旗帜派”领袖，1980—1986年担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

巴洽·萨考（Bachey Saqao）、哈比布拉·卡拉卡尼（Habibullah Kalakani）：塔吉克土匪，1929年2月推翻阿曼努拉统治，曾短暂统治阿富汗（至1929年9月）。

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喀布尔大学教授，伊斯兰促进会主席，1994—1996年任阿富汗总统。2011年遇刺身亡。

洽希家族（Charkhi）：阿曼努拉的坚定盟友，阿曼努拉倒台后，遭到穆萨希班家族的强势镇压。

多斯特·穆罕默德大王（Dost Muhammed the Great）：穆罕默德扎伊家族出身的第一位国王，1826—1839年、1843—1863年两度在位。

杜兰尼部（Durrani）：自1747年出身杜兰尼部的艾哈迈德·沙阿成为阿富汗的国王以来，一直到1978年，阿富汗的统治者全都出自杜兰尼部（除巴洽·萨考短暂统治期间）。

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 Roberts）：1878—1880年第二次英阿战争的英军将领。

吉尔扎伊部（Gilzai）：阿富汗的主要部落势力，与杜兰尼部长期对立。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宗教激进分子，伊斯兰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

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人民民主党“人民派”领袖，塔拉基的助手，1978年政变的策划者。1979年9—12月任阿富汗总统。

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2004—2014年任阿富汗总统。

哈希姆·汗（Hashim Khan）：纳迪尔国王的弟弟，1933—1946年担任阿富汗首相。

朔尔巴扎的哈兹拉特（Hazrats of Shor Bazaar）：穆贾杰迪家族受人尊敬的成员。

伊斯兰党（Hezb-i-Islam）：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创建和领导的政党。

三军情报局（ISI）：巴基斯坦的军事情报机构，美国正是通过该组

织向阿富汗境内的“圣战”组织输送武器与金钱。

伊万·维特克维奇（Ivan　Vitkevich）：自称“沙皇特使”的俄国特工，1837—1838年在喀布尔从事间谍活动。

贾拉鲁丁·哈卡尼（Jalaludin　Haqqani）：20世纪80年代的“圣战”领袖之一，2002年后加入塔利班。

贾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uddin-i-Afghan）：伊斯兰现代主义激进知识分子，希尔·阿里的宫廷老师。

伊斯兰促进会（Jamiat-i-Islam）：布尔汉努丁·拉巴尼与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所领导的伊斯兰政党。

人民派（Khalq）：1967年人民民主党分裂后的一大派别。

奥克兰勋爵（Lord　Aukland）：1836—1842年任印度总督。1838年，发动第一次对阿富汗战争。

利顿勋爵（Lord　Lytton）：1876—1880年任印度总督。1878年，发动第二次对阿富汗战争。

路易·拿破仑·卡瓦格纳里（Louis Napoleon Cavagnari）：1879年英国驻喀布尔使团的全权政治代表。

马哈茂德·塔尔齐（Mahmoud　Tarzi）：哈比布拉国王时期杰出的现代主义者。

马拉赖（Malalai）：她在迈万德战役中鼓舞士气，团结阿富汗人打败了英军，是阿富汗杰出的女英雄。

马拉赖·乔亚（Malalai　Joya）：女权主义者，2004年当选阿富汗国会议员。

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Massouma　Esmatey-Wardak）：阿富汗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1979—1990年担任阿富汗妇女理事会主席。

穆罕默德扎伊家族（Mohammedzai）：多斯特·穆罕默德所在家族，杜兰尼部的一个分支。1826—1978年，阿富汗处于穆罕默德扎伊家族的统治下。

穆贾杰迪家族（Mujaddedis）：阿富汗望族、宗教世家。

穆贾希丁（Mujahideen）：20世纪80年代与苏联作战的伊斯兰抵抗组织。

毛拉·阿合塔尔·奥斯曼尼（Mullah Aktar Osmani）：赫尔曼德省著名的塔利班分子和毒枭，2007年被北约击毙。

毛拉·巴拉杜尔（Mullah Baradur）：阿富汗南部主要的塔利班分子，2010年被巴基斯坦逮捕和监禁。

毛拉·达杜拉（Mullah Dadullah）：阿富汗南部与塔利班有关联的叛乱武装头目，2007年被杀。

毛拉·法鲁克（Mullah Farooq）：2002年以来，活跃在加兹尼省的叛乱武装首领。

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塔利班的“独眼”神秘领袖。

穆萨希班家族（Musahibbans）：多斯特·穆罕默德兄弟的后裔，1929—1978年统治阿富汗。

纳迪尔·沙阿（Nadir Shah）：穆萨希班家族的大家长，1929—1933年任阿富汗国王。在他的领导下，阿富汗赢得了第三次英阿战争的胜利。

“公牛”纳吉布拉（Najibullah the Ox）：隶属人民民主党“旗帜派”，秘密警察头目，1988—1992年任阿富汗总统。

纳斯鲁拉·巴布尔（Naseerullah Babar）：贝娜齐尔·布托政府的内政部长，是塔利班的支持者。

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领导的反塔利班军事政治联盟。

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uhammed Taraki）：人民民主党“人民派”领袖，1978—1979年任阿富汗总统。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极端恐怖分子，“基地”组织的创始人。

旗帜派（Parcham）：1967年，人民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另一大派别。

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PDPA）：阿富汗主要的共产主义政党，成立于1965年。

卡西姆·法希姆（Qasim Fahim）：马苏德死后的北方联盟领袖。

索拉娅王后（Queen Soraya）：塔尔齐之女、阿曼努拉之妻，阿富

汗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

奎达舒拉（Quetta Shura）：2002年以来，效忠于毛拉·奥马尔的塔利班领导人在巴基斯坦奎达组成的军事组织。

萨多扎伊家族（Sadozai）：艾哈迈德·沙阿所在的家族，隶属于杜兰尼部。萨多扎伊家族的统治从1747年延续到1826年。

萨达尔·阿尤布（Sardar Ayub）：希尔·阿里之子，曾在迈万德之战中大败英军。

萨达尔·达乌德（Sardar Daoud）：纳迪尔·沙阿的侄子，1953—1963年任阿富汗首相，1973—1978年任阿富汗总统。

萨达尔·纳伊姆（Sardar Na'eem）：纳迪尔·沙阿的侄子，1953—1963年任阿富汗外交大臣。

沙阿·马哈茂德（Shah Mahmoud）：纳迪尔国王的兄长，1950—1953年任阿富汗首相。

沙阿·舒贾（Shah Shuja）：艾哈迈德·沙阿的孙子，两度登上王位（1803—1809年，1839—1842年）。1839年，他在英国扶持下重登王位。

舍尔·阿迦·穆贾杰迪（Sher Agha Mujadeddi）：20世纪20年代阿曼努拉改革的主要反对者。

萨迪克·巴尔马克（Siddiq Barmaq）：阿富汗电影导演，导演了电影《奥萨马》。

瓦济尔·阿克巴·汗（Wazir Akbar Khan）：多斯特·穆罕默德之子，1839—1842年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担任阿富汗军事指挥官。

威廉·海伊·麦克纳顿（William Hay Mcnaghten）：1839—1842年任英国驻喀布尔代表团特使。

亚库布·汗（Yaqub Khan）：希尔·阿里之子，在英国人的扶植下成为阿富汗国王。

查希尔·沙阿（Zahir Shah）：纳迪尔之子，1929—1973年任阿富汗国王。

扎勒米·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zad）：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家、外交官，曾任里根政府、布什政府的阿富汗事务顾问。

术语释义

巴德玛什（Badmash）：流氓、暴徒。

巴拉希萨尔（Bala Hissar）：俯瞰喀布尔的城堡和宫殿建筑群。

布兹卡谢（Buzkashi）：阿富汗马术运动，骑手围绕一只山羊尸体进行争夺，把山羊尸体移到目标位置即为获胜。

却德里（chad'ri）：阿富汗女性在公开场合穿着的覆盖全身的罩袍，又称“布卡”（burqa）。

达拉克（dalak）：流动的乡村理发师和牙医。

德奥班德主义（Deobandism）：诞生于印度德奥班德神学院的宗教激进主义运动。

尔德节（Eid）：伊斯兰教的两大节日之一。

法兰奇人（Farangi）：指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是阿富汗人对“法兰克”（Frank）一词的讹误。

法特瓦（fatwa）：权威教法学家作出的教法判例或教法新解。

古兰巴洽（ghulam bacha）：即童仆，他们从小脱离原生家庭在宫廷长大，是国王的勤杂工。

哈兹拉特（hazrat）：重要宗教人物的尊称。

希兹卜（Hezb）：政党。

伊玛目（imam）：主持穆斯林祈祷和管理清真寺的人，也是对伊斯兰法学权威的尊称。

杰辛（Jeshyn）：阿富汗庆典之一，后特指阿富汗独立日庆典，每年夏天举行。人民民主党时期曾一度废止。

圣战（jihad）：为保卫伊斯兰或伊斯兰社会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圣战主义（jihadism）：一种把“圣战”作为穆斯林首要责任的宗教激进主义运动。

支尔格（jirga）：阿富汗传统部族首领大会。

卡菲尔（kafir）：异教徒。

坎儿井（kahrez）：地下灌溉渠道。

卡兰塔（kalantar）：地方选举产生的国家代理人，负责向国王报告地方事务。

汗（khan）：封建领主、大地主。

科希斯坦（kohistan）：位于喀布尔北部，字面意思是“山地”。

警察局长（kotwal）：内政部官员，负责监察地方事务。

库奇（kuchi）：游牧部落，字面意思是“移动的人”。

支尔格大会（loya jirga）：阿富汗传统部族首领大会，是讨论决定重大国事的机构。

马德拉萨（madrassa）：伊斯兰学校、神学院。

马利克（malik）：乡村头人。

大毛拉（mawlawi）：杰出的宗教学者。

梅斯·艾纳克（Mes Aymak）：位于喀布尔南部，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米拉布（mirab）：乡村长老，负责处理水源纠纷。

米尔扎（mirza）：该词汇是“埃米尔·扎达”（Amir zada）和“埃米尔的孩子”（Amir’s child）的缩写，他们是直接对国王负责的特权阶层，米尔扎通常从古兰巴洽中发展。

宣礼人（muezzin）：在清真寺宣礼塔上报告祷告时间的人。

穆夫提（mufti）：向法官提供法律解释的伊斯兰教法权威。

穆赫塔西卜（muhtahib）：负责强制执行伊斯兰教法的道德警察。

穆贾希德（mujahid）：参加“圣战”的人，通常指伊斯兰游击队。

穆贾希丁（mujahideen）：“圣战”组织。

毛拉（mullah）：主持穆斯林日常生活的神学家。

穆斯陶菲（mustaufi）：财政大臣或财务主管。

秩序之书（Nizamnama）：阿富汗20世纪20年代颁布的世俗法典。

赤脚男孩（Paylucha）：一个坎大哈街头帮派，后来更名为“穆贾

希丁”。

深闺制度（purdah）：把女性与非近亲男性隔离的做法。

普什图瓦里（Pustoonwali）：传统普什图社会的不成文守则，它要求普什图人庇护路人，热情待客，慷慨解囊，捍卫女性亲属的纯洁，提倡恩怨必报和血亲复仇。

克鲁特（q’root）：阿富汗料理中常用的一种干酪。

卡拉（qala）：封建领主的乡村碉堡，有时供整个家族居住。

卡兹（qazi）：法官。

拉马丹（Ramadhan）：穆斯林的斋月。

沙里亚（Shari’a）：即伊斯兰教法，伊斯兰学者数个世纪以来制定的涵盖民事、刑事、宗教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穆斯林行为准则。

舒拉（shura）：伊斯兰术语，即“委员会”。

塔利班（Taliban）：起源于巴基斯坦阿富汗人难民营的宗教极端组织，字面意思是“学生的组织”。

瓦济尔（wazir）：又作“维齐尔”，宫廷大臣或宰相。

觉醒的青年（Wikh-i-Zalmayan）：20世纪40年代拥抱现代主义和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学生激进组织。

注释

第1章

1 . Pohand Abdul Hayy Habibi, *Tarikh-i-Mukhtasar-i Afghanistan* [Concise History of Afghanistan] (Arlington, VA: Association of Afghan Refugees, 1989), 256–257.

2 . Mohammed Ali,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Kabul: Mohammed Ali, 1964), 217–220.

3 . Saira Shah, "'Afghaniyat' Is Alive and Well in Afghanistan," *Guardian*, April 7, 2011,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apr/07/afghanistan-nation-building-alive-well.

第2章

1 . Hasan Kawun Kakar,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the Afghan Response, 1979–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35–140.

2 . Ali,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198–199.

3 . This picture of the *qala* comes partly from conversations with Akbar Nowruz, whose family had a qala in Logar.

4 . See the discussion of Afghan society in Hasan Kawun Kak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The Reign of Amir 'Abdal-Rahman Kha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 50–66.

5 . Description of *dalak* drawn heavily from Akbar Nowroz's accounts plus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dalaks of my day.

6 . Ali,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199.

7 . Kak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124–126.

8 . *Zarb-ul Masal-ha*, Afghan proverbs collected by Dr. Ja'far Taheri, 129.

第3章

1 . This description of Dost Mohammed comes, in part, from Alexander Burnes, *Travels into Bokhara: Being the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India to Cabool, Tartary, and Persia* (Philadelphia: E. L. Carey and A. Hart, 1835), 2:23.

2 . Mir Ghulam Mohammed Ghobar describes Afghan trade goods, in *Afghanistan Dar Maseer-i-Tareekh, Juld-i Awal*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ume 1] (Kabul: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1967), 573, although he claims the economy suffered under Dost Mohammed. Fraser-Tytler has a more complimentary view of his reign. W. K. Fraser-Tytler, *Afghanistan: A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entral and South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127.

第4章

1 . The phrase appears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bk. 4, chap. 7, pt. 3. Smith actually qualifies the description by describing England as “a nation whose government is influenced by shopkeepers.” The book can be found at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3300/3300-h/3300-h.htm#2HCH0027.

2 . Burnes, *Travels into Bokhara*, 1:127.

3 . Ibid., 1:128.

4 . Ibid., 1:178.

5 . Ibid., 1:210–217.

6 . Ibid., 1:234.

7 . Ibid., 2:15–17.

8 . Quoted in Ben Macintyre,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The First American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2004), 201.

9 . Quoted in Karl Ernest Meyer and Shareen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85.

10 . Quoted by Fraser-Tytler, *Afghanistan*, 110.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manifesto, see Abdul Hakim Tabibi, *Afghanistan: A Nation in Love with Freedom* (Cedar Rapids, IA: Igram Press, 1985), 144–148.

第5章

1 . See Terence Blackburn, *The Extermination of a British Army: The Retreat from Kabul* (New Delhi: APH, 2008), ix–x, for a detailed breakdown.

2 . Jules Stewart, *Crimson Snow: Britain's First Disaster in Afghanistan*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ress, 2008), 78, refers to eight hundred wives. Lady Florentia Sale, in her *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Franklin, TN: Tantallon Press, 200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43), 48, refers to the king' s womenfolk, including wives, daughters, and serving maids, as numbering in the eight hundreds.

3 . Mohan Lal, Hindu interpreter for the British, reported this information but didn't mention the woman's name. His report was quoted by M. Saeed, *Women in Afghan History*, http://www.scribd.com/doc/30234527/Women-in-Afghan-History, 13.

4 . Louis Dupree, *Afghanist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384. Fraser-Tytler, *Afghanistan*, 114.

5 . Sale, *Journal*, 6–20.

6 . Dupree, *Afghanistan*, 382–383, quoting John William Kaye, *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ird Edition* (London, 1874), 2:130.

7 . Stewart, *Crimson Snow*, 102–103.

8 . Fraser-Tytler, *Afghanistan*, 114.

9 . I found this diary on the Internet, but unfortunately it has vanished now. I am, however, amused to see that the phrase "frighteningly willing" made its way into the Afghan Chamber of Commerce's account of the First Anglo-Afghan war here: http://www.

afghanchamber.com/history/englishinvation.htm. They must have seen the same diary as I.

10 . David Loyn, *InAfghanist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35–46.

11 . Macintyre, *Man WhoWould Be King*, 259–260.

12 . Dupree, *Afghanistan*, 386.

13 . Ibid., 389.

14 . John William Kaye, *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368–370.

15 . Ibid., 376.

16 . Ibid.

第6章

1 . Ghobar, *Afghanistan Dar Maseer-i-Tareekh,* vol. 1, 573.

2 . Ibid., 587–588.

3 . Ibid., 573.

4 . Ibid.

5 . Ibid.

6 . Habibi, *Tarikh-i-Mukhtasar-i Afghanistan*, 290.

7 . Ghobar, *Afghanistan dar Maseeri Tarikh*, vol. 1, 547.

8 . Ibid., 583.

9 . Ibid., 588.

第7章

1 . Abdul Hakim Tabibi, *The Politicial Struggles of Syed Jamaluddin al-Afghani* (Kabul: Muassisa Intasharat Baihaqi, 1977). Also see Jamil Ahmad, “Jamaluddin Afghani,”http://www.renaissance.com.pk/julletf94.html. For the Iranian-origins argument, see Nikki Keddie,

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 A Political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2 . Saeed, *Women in Afghan History*, 15.

3 . Ghobar, *Afghanistan Dar Maseer-i-Tareekh*, vol. 1, 594–595.

4 . Habibi, *Tarikh-i-Mukhtasar-i Afghanistan*, 291–293.

5 . Ghobar, *Afghanistan Dar Maseer-i-Tareekh*, vol. 1, 595–596.

6 . Ibid., 594. Sherpoor is within the city limits of today's Kabul.

第8章

1 . Niall Fergusson, *Colossus,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15.

2 .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151.

3 . Maud Diver, *Kabul to Kandahar* (London: Peter Davies, 1935), 21.

4 . Ibid., 29.

5 . Ibid., 48.

6 . Ibid., 54.

7 . Ibid., 55.

8 . Ibid., 58.

9 . Ibid., 61.

10 . Ibid., 94.

11 . Ibid., 98.

12 . Ibid., 100.

第9章

1 . Kak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3–6.

2 . Habibi, *Tarikh-i-Mukhtasar-i Afghanistan*.

3 . Kak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48.

4 . Ibid., 13.

5 . Ibid., 16; also mentioned in Saeed, *Women in Afghan History*, 17. The story of female bodyguards comes from a conversation with Bob Darr/Abdul Hayy, author of *Spy of the Heart*.

6 . Kak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98–100.

7 . Ibid., 105.

8 . Ibid., 103–105.

9 . Ibid., 40.

10 . Ibid., 35.

11 . Ibid., 38–39.

12 . Ibid., xxiii.

第10章

1 . Ghobar,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 2, 19–23.

2 . Rameen Moshref, "The Life and Times of Amir Habibullah," *Afghanistan Online*, http://www.afghan-web.com/bios/detail/dhabib.html. See also Dupree,*Afghanistan*, 408–409.

3 . Khalili, *Yawd-dasht hai Ustad Kahlili* [Memoirs of Master Khalili] (As told to his daughter Marie) (Herndon, VA: Marie and Mohammed Afzal Nassiri, 2010), 25–27.

4 . Ibid., 37–38.

5 . Senzil Nawid, "Political Advocacy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fghan Persian Poetry," *Afghanistan Studies Journal* 3 (1992): 5–15.

6 . Saeed, *Afghan Women in History*, 19.

7 . 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3), 11.

8 . Ludwig W. Adamec, *Afghanistan, 1900–1923: A Diplomatic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95.

9 . 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20–21.

10 . Ibid., 20.

11 . Khalili, *Yawd-dasht hai Ustad Kahlili*, 28–31.

12 . Ibid., 32.

13 . Ibid., 36.

14 . Ibid.

第11章

1 . 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23.

2 . Ibid., 37.

3 . Ibid., 43.

4 . Ibid., 61.

5 . Ibid., 73.

6 . Ibid.

第12章

1 . 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188.

2 . Sana Haroon, *Frontier of Faith: Islam in the Indo-Afghan Border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7–119.

3 . 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346.

4 . Khalili, *Yawd-dasht hai Ustad Kahlili*, 55–59.

5 . 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378.

6 . Ibid., 377–379, 403–405.

第13章

1 . 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416–417. Also see Saqao's "own" accounts of his exploits in his supposed autobiography: Habibullah Kalakani, *My Life from Brigand to King* (London: Octagon Press, 1990), 54–59, 66–68, 71–82.

2 . For a discussion of Saqao's image, see Ludwig Adamec, "The Two Faces of Habibullah Kalakani," *Afghanistan Studies Journal* 2 (1990–1991): 85–90.

3 . 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425–426, 435–437. Saqao's autobiography gives an amusingly different account of this episode. Kalakani, *Brigand to King*, 115–116, 118–120.

4 . 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480. These stories were still being told when I was growing up in Kabul twenty-five years later. The poet *Khalili's* memoir gives a far more admiring picture of Bacha (59–60, 71–82), as does his biography of Amir Habibullah Kalakani.

5 . Khalili, *Yawd-dasht hai Ustad Kahlili*, 71–73. 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438.

6 . Kalakani, *Brigand to King*, 158–180.

7 . M. H. Anwar, *Memories of Afghanistan*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04), 127–129.

第14章

1 . Anwar, *Memories of Afghanistan*, 131–132.

2 . Ghobar,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 2, 96–97.

3 . Khaled Siddiq Charkhi recount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harkhi elders and the subsequent fate of surviving family members in *From My Memories: Memoirs of Political Imprisonment from Childhood in Afghanistan*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10). See 1–37.

4 . Ghobar,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 2, 68.

5 . Anwar, *Memories of Afghanistan*, 200–201, 212–215, 228, 225–226, 262–277.

6 . Ghobar,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 2, 151–161.

7 . Amin Saikal, *Modern Afghanistan: A History of Struggle and Survival* (New York: I. B. Taurus, 2004), 114–115.

第15章

1 . Dupree, *Afghanistan*, 510.

2 . When Mao Tse-tung invented the term “Third World,” he meant to label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the “first world,” the developed second-tier powers such as France and Germany the “second world,” and all the un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he third world. In common usage, First World came to mean the Capitalist West, Second World the Soviet-led Communist countries, and Third World everybody else.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terms has remained ambiguous.

3 . Dimensions from Dupree, *Afghanistan*, 483.

4 . Ibid., 513–522.

第16章

1 . I remember hearing these speeche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m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growing up in Kabul.

2 . Dupree, *Afghanistan*, 546–548.

第17章

1 . Dupree, *Afghanistan* 549.

2 . From private conversations with Nasser Hosseini, former ambassador to France, Mazar Ansary, and others.

3 . Dupree, *Afghanistan*, 501.

第18章

1 . Raja Anwar, *The Tragedy of Afghanistan: A First-Hand Account* (London: Verso, 1988), 45.

2 . Bashir Sakhawerz, author of the novel *The Snake Charmer*, described these events to me in July 2011; so did Ghulam Ebadi, author of an unpublished memoir, “In Quest of Khalil,” which I was editing when he unexpectedly passed away.

3 . Anwar, *Tragedy of Afghanistan*, 39–45.

4 . Mentioned by Khaled Hosseini, who heard it from his father’s associates in the government.

第19章

1 . Conversation with Ghaffar Lakanwall, former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in the Karmal government, August 16, 2005.

2 . Ibid.

3 . *Kabul Times*, page 1, August 9, 1979.

4 . Conversation with Idrees Ahmad Rahmani, June 17, 2011.

5 . Anwar, *Tragedy of Afghanistan*, 129, cites a 1978–1979 survey that claims 2.5 million Afghans—one out of every six—were nomadic or seminomadic at that time.

6 . Fred Halliday, “The War and Revolution in Afghanistan,” *New Left Review*, no. 119 (January–February, 1980): 31.

7 . Anwar, *Tragedy of Afghanistan*, 179–180.

8 . My cousin Farid, who was studying in New York at the same time as Amin, recollects Amin’s fruitless but sincere attempt to recruit him into the Afghan Communist Party.

9 . Kakar, among others, gives the twenty-five thousand figure in his book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the Afghan Response, 1979-1982*. Anwar, *Tragedy of Afghanistan*, 156–157, gives the eight hundred number.

10 . See Anwar, *Tragedy of Afghanistan*, 166–173,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debacle.

11 . The Russian General Staff, *The Soviet-Afghan War: How a Superpower Fought and Los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15.

第20章

1 . Conversation in the summer of 2002 with Malia Zulfiqar, former minister of women's affairs in the Amin government, who resigned (and then defected)because she was required to take part in episodes like this.

2 . Russian General Staff, *Soviet-Afghan War*, 21–22.

3 . This detail comes from Mahtab Mujaddedi, who fought in Afghanistan as a Mujahid in the eighties.

第21章

1 . Kakar, *Afghanistan*, 80.

2 . Ibid., 138.

3 . I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4 . Chronicled in Ghulam Ebadi's unpublished personal essay "The Prince and the Lion."

5 . From Abdullah Qazi, "Biography: Ahmad Shah Massoud," *Afghanistan Online,* http://www.afghan-web.com/bios/yest/asmasood.html, 2001, updated 2007.

第22章

1 . In the nationwide speech delivered on July 15, 1979, Carter used the phrase "crisis of confidence," but his advisor Patrick Caddell had used the word "malaise" in his memo to Carter about the address, which became known ever after as Carter's "malaise" speech.

2 . Reagan first evoked the phrase in a speech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March 8, 1983, in Orlando, Florida.

3 . If you don't believe me, just Google "Gorbachev, birthmark, anti-Christ."

4 . Nixon used variations of this phrase in his campaign speeches leading to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972 and explicitly in a speech on January 23, 1973, describing the Paris Peace Accords his negotiators had just signed with the North Vietnamese.

5 . Kamal Matinuddin, *The Taliban Phenomenon: Afghanistan 1994–1997*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3. Steve Coll, *Ghost Wars* (New York: Penguin, 2004), puts the number distributed by the CIA at twenty-three hundred, 337.

第23章

1 . I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July 2, 2002.

2 . Coll, *Ghost Wars*, 337, says six hundred remained in Afghan hands in 1996.

3 . Mark Urban, *War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241–243.

4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_Kp21GGccE.

第24章

1 . Peter Tomsen, *The Wars of Afghanista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17.

2 . Matinuddin, *Taliban Phenomenon*, 18.

3 . Ibid., 20.

4 . Ahma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Yale Note Be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8.

5 . 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762181.html.

6 . For a complete list of countries in the coalition and their troop contributions, see http://www.cryan.com/war/AlliedForces.html.

7 . Various sources, such as BBC news reports, http://news.bbc.co.uk/2/shared/spl/hi/ middle_east/02/iraq_events/html/desert_storm.stm.

8 .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45404) official count of Americans killed in this war is 147. CNN (http://articles.cnn.com/2003-04-17/world/sprj.irq.casualties_1_combat-deathscasualties-coalition-deaths?_s=PM:WORLD) set total coalition casualties at 358.For casualties on the Iraqi side, see http://www.cryan. com/war/AlliedForces .html. The accuracy of this count is open to discussion since official US Defense Department sources avoid estimating Iraqi casualties, as discussed by John Heidenrich, "The Gulf War: How Many Iraqis Died?" *Foreign Policy*, no. 90 (Spring 1993): 108–125.

9 . Michael Klare,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1), 2–3; also see CIA estimates of oil reserves worldwide at https://www.cia. 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78 rank.html.

10 . Matinuddin, *Taliban Phenomenon*, 65–66.

11 . Michael Griffin, *Reaping the Whirlwind: The Taliban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London: Pluto Press, 2001), 36–37.

12 . Ibid., 40.

13 . Matinuddin, *Taliban Phenomenon*, 49–50. According to US State Department cables, however, US intelligence believed Pakistan directly funded and armed the Taliban. See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227/index.htm#15#15.

第25章

1 . Matinuddin, *Taliban Phenomenon*, 87.

2 . For a full picture, see Abdul Salam Zaeef, *My Life with the*

Taliban, ed.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and Felix Kueh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 Tomsen, *Wars of Afghanistan*, 20.

4 . Ibid., 17.

第27章

1 . Coll, *Ghost Wars*, 548.

2 . Ibid., 538.

3 . Ibid., 543.

4 . Zaeef, *My Life with the Taliban*, 141–143.

5 .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1/06/22/world/asia/afghanistan-war-timeline. html.

第28章

1 . Ahmad Rashi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ilure of Nation Building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Viking, 2008), 90–93.

第29章

1 . This data is collected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including Lydia's Poole's report to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t 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 org/wpcontent/uploads/2011/02/gha-Afghanistan-2011-major-resource-flows.pdf. Also see GAO report found at http://www.gao.gov/new.items/d05742.pdf.

2 . Interviewed in the movie *DefyingSilence* by Stacia Teele and Ed Robbins.

3 . http://www.pbs.org/independentlens/afghanistanunveiled/film.html.

4 . http://old.bfi.org.uk/sightandsound/feature/242.

5 . Joel Brinkley, "Pity Afghanistan's Childre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vember 6, 2011.

第30章

1 . Gayle Lemmon, "Raisins Give Hope to Afghan Farmer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2010.

2 . This statistic was cited by a speaker at a September 2003 fund-raising event in Marin County for Roots for Peace, an NGO dedicated to removing land mines from war-torn areas and planting grapevines in the clear soil.

3 . 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933935.html.

4 . General Accountability Office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July 2005,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Despite Some Progress, Deteriorating Security and Other Obstacles Continue to Threaten Achievement of U.S. Goals* (Washington, DC: GAO, 2005), http://www.gao.gov/new.items/d05742.pdf.

5 . Tomsen, *Wars of Afghanistan*, 640; and Sayid Sattar Langary, *Women from Afghanistan in Diaspora*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10), xii.

6 . Lydia Poole, *Afghanistan: Tracking Major Resource Flows*, *2002–2010* (Wells, UK: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1/02/gha-Afghanistan-2011-major-resource-flows.pdf.

7 . Fariba Nawa, "Deconstructing the Reconstruction: A Corpwatch Investigative Report," http://www.corpwatch.org/article.php?id=14076, 15.

8 . Afghan Amabassador Tayeb Jawad (in a speech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April 2007) claimed that two-thirds of the money allocated to aid in Afghanistan was banked in America. See also Matthew Nasuti, "America's 'Phantom Aid' to Afghanistan,"

Atlantic Free Press, November 4, 2009, http://atlanticfreepress.com/news/1/12194-americas-qphantom-aidq-to-afghanistan.html.

9 . A June 2011 Majority Staff Report to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estimated that posting one US civilian in Afghanistan costs half a million dollars, excluding security expenses and salary. *Evaluating U.S. Foreign Assistance to Afghanista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 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 SPRT%20112-21.pdf, 7.

10 . Conversation with James Ritchie, June 14, 2006.

11 . Conversation with Wahid Mohmand, 2006.

第31章

1 . Fariba Nawa, *Opium Nation*: *Child Brides, Drug Lords, and One Woman's Journey Through Afghanista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1), 100–101. See also Gretchen Peters, "The Taliban and the Opium Trade," in Antonio Giustozzi, ed.,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

2 . Nawa, *Opium Nation*, 142–144.

3 . Joshua Partlow, "Afghan Minister Accused of Taking Brib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8,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1/17/AR2009111704198_2.html?sid=ST2009111800831.

4 . Jonathan Landay, "Factory, Coal Mine Show Connections Matter Most in Afghan Business," *McClatchy Newspapers, Washington Bureau*, November 14, 2010, http://www.mcclatchydc.com/2010/11/14/v-print/103393/afghan-business-model-connections.html.

5 . Dr. Nadir Atash, *Turbulence*: *The Tumultuous Journey of One Man's Quest for Chang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Planetpix Productions, 2009), 188–189.

6 . Ben Farmer, "Karzai Under Pressure After Investigations

Target 15 Officials on Corruption Charges," *Telegraph*, November 23, 2009,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 worldnews/asia/ afghanistan/6636999/Karzai-under-pressure-after-investigations-target-15-officials-on-corruption-charges.html.

7 . Arthur Kent, "West's Afghan Mission Undone by Farcical Spy vs. Spy Bribes," *Sky Reporter*, August 31, 2010, http:// skyreporter.com/blog/page/2/20 100830_01/.

8 . Conversation with Humaira Ghilzai, January 2, 2012.

9 . Jonathan Steele, "US Convinced Karzai Half-Brother Is Corrupt, WikiLeaks Cables Say," *Guardian*, December 2, 2010, http:// www.guardian.co.uk/world/2010/dec/02/us-karzai-half-brother-wikileaks; see also Dexter Filkins, Mark Mazzetti, and James Risen, "Brother of Afghan Leader Said to Be Paid by C.I.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0/28/world/ asia/28intel.html?_r=1.

10 . Dexter Filkins, "Iran Is Said to Give Top Karzai Aide Cash by the Bagfu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10, http:// www.nytimes.com/2010/10/24/world/asia/24afghan.html? pagewanted=all.

第32章

1 . Christopher Reuter and Borhan Younus, "The Return of the Taliban in Andar District,"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101, 105.

2 . Tim Golden, "In U.S. Report, Brutal Details of 2 Afghan Inmates' Deaths," *New York Times*, May 20, 2005, http:// www.nytimes.com/2005/05/20/international/asia/20abuse. html? pagewanted=all. Also see Carlotta Gall, "U.S. Examines Death of Afghan in Custody / Pathologist Described It as a Homicid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ch 3, 2003, A-5, http://www.sfgate.com/cgi-bin/article.cgi?f=/c/a/2003/03/04/MN204728. DTL#ixzz1dtkZHw3U.

3 . Reuter and Younus, “Return of the Taliban,” 102–103.

4 . Duncan Campbell and Kitty Logan, “The Man Who Thinks He’s George Clooney. A Story of Today’s Kabul,” *Guardian*, July 9, 2004.

5 . Reuter and Younus, “Return of the Taliban,” 109–110.

6 . Joanna Nathan, “Reading the Taliban,”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25–26.

7 . Peters, “The Taliban and the Opium Trade,”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13–14.

8 . Tom Coghlan, “The Taliban in Helmand: An Oral History,”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119–120.

第33章

1 . “UNICEF Alarmed as Attacks on Afghan Schools Rise,” *Unicef News*, http://www. unicef.org/infobycountry/media_35196.html. See also Carlotta Gall, “Taliban Behead High School Teacher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06, http://www. nytimes.com/2006/01/04/international/asia/04cnd-afghanistan.html.

2 . See, for example, Abdul Awaal Zabulwal, “Taliban in Zabul: A Witness Account,”184–186, and David Kilcullen, “Taliban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Kunar,” 238–240, both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3 . Mohammed Osman Tariq Elias, “The Resurgence of the Taliban in Kabul, Loar, and Wardak,”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50–52.

4 . Nawa, *Opium Nation*, 176.

第34章

1 . Amy Belasco, *Troop Level in the Afghan and Iraq Wars*, FY2001–1012 (Washington, DC: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uly 2,

2009), http://www .fas.org/sgp/crs/natsec/R40682. pdf.

2 . Moshe Schwartz and Joyprada Swain,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Washington, DC: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y 13, 2011), http:// www.fas.org/sgp/crs/natsec/ R40764.pdf.

3 . Quoting an English language radio station in Islamabad. “U.S. to Provide 85 Drones for Pakistan,” Xinhua News Agency, April 22, 2011, http://www .afghanistannewscenter. com/news/2011/april/ apr222011.html#16.

4 . Sayyaf, a leading Mujahideen commander, and Amin, the Communist president, were related by marriage: their wives were sisters. In my village, some men were affiliated with Hezb-i-Islam while their cousins fought for Parcham.

5 . David Hastings, “The Runaway General: The *Rolling Stone* Profile of Stanley McChrystal That Changed History,” *Rolling Stone*, June 22, 2010, http://www.rollingstone. com/politics/news/the-runaway-general-20100622.

6 . Spencer Ackerman, “25 Tons of Bombs Wipe Afghan Town Off Map,” *Wired*, January 19, 2011, http://www.wired.com/ dangerroom/2011/01/25-tons-of-bombs-wipes-afghan-town-off-the-map/.

7 . Taimour Shah and Alyssa Rubin, “Taliban Proudly Describes Secrets of Great Escape,” *Sydney Morning Herald*, April 27, 2011.

8 . Geneva Sands, “Gingrich: ‘I Don’t See a Path Ahead’ for Reform in Afghanistan,”*Hill*, March 13, 2012, http://thehill.com/ video/campaign/215749-gingrich-i-dont-see-a-path-ahead-for-reform-in-afghanistan-.

第35章

1 . Kirk Semple, “Big Weddings Bring Afghans Joy, Debt,” *New YorkTimes*, January 14,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1/14/ world/asia/14weddings.html?pagewanted＝all.

2 . Conversation with Rahmani, now doing his doctoral studies at UCLA, June 17, 2011.

3 . Peters, “The Taliban and the Opium Trade,” 9.

4 . Elizabeth Rubin, “Studio Kabul,” *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 October 24, 2010, 40.

5 . http://www.imdb.com/title/tt1506942/.

参考文献

Ackerman, Spencer. “25 Tons of Bombs Wipe Afghan Town Off Map.”*Wired*, January 19, 2011. www.wired.com/dangerroom/2011/01/25-tons-of-bombs-wipes-afghan-town-off-the-map/.

Adamec, Ludwig W. *Afghanistan, 1900–1923: A Diplomatic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Afghanistan’s Foreign Affairs to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Relations with the USSR, Germany, and Britain*.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4.

——. “The Two Faces of Habibullah Kalakani.” *Afghanistan Studies Journal* 2 (1990–1991): 85–90.

Ahmad, Jamil. “Jamaluddin Afghani.” www.renaissance.com.pk/julletf94.

Ali, Mohamm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Kabul: Mohammed Ali, 1964.

Anwar, M. H. *Memories of Afghanistan*.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04.

Anwar, Raja, *The Tragedy of Afghanistan: A First-Hand Account*. London: Verso, 1988.

Arnold, Anthony.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in Perspective*. Palo Alto,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1.

——. *Afghanistan’s Two-Party Communism*.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3.

Atash, Nadir. *Turbulence: The Tumultuous Journey of One Man’s Quest for Chang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Planetpix, 2009.

Belasco, Amy. *Troop Level in the Afghan and Iraq Wars, FY2001–1012*. Washington, DC: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09. www.fas.org/sgp/crs/natsec/R40682.pdf.

Blackburn, Terence. *The Extermination of a British Army: The Retreat from Kabul*. New Delhi: APH, 2008.

Burnes, Alexander. *Travels into Bokhara: Being the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India to Cabool, Tartary, and Persia*. 2 vols. Philadelphia: E. L.Carey and A. Hart, 1835.

Campbell, Duncan, and Kitty Logan. "The Man Who Thinks He's George

Clooney. A Story of Today's Kabul." *Guardian*, July 9, 2004.

Charkhi, Khaled Siddiq. *From My Memories: Memoirs of Political Imprisonment from Childhood in Afghanistan*. Bloomington, IN:Author-House, 2010.

Chayes, Sarah. *The Punishment of Virtue: Inside Afghanistan after the Talib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Coll, Steve. *Ghost War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Cooley, John K. *Unholy Wars: Afghanistan, 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99.

Coghlan, Tom. "The Taliban in Helmand: An Oral History."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119–154.

Darr, Abdul Hayy Robert. *The Spy of the Heart*. Louisville, KY: Fons Vitae, 2006.

Diver, Maud. *Kabul to Kandahar*. London: Peter Davies, 1935.

Dupree, Louis. *Afghanist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Edwards, Lucy Morgan. *The Afghan Solution: The Inside Story of Abdul Haq, the CIA and How Western Hubris Lost Afghanistan*. London:Pluto Press, 2011.

Elias, Barbara, ed. *Pakistan: "The Taliban's Godfathe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27*. Washington, D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2007.

Elias, Mohammed Osman Tariq. "The Resurgence of the Taliban in Kabul, Logar, and Wardak."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43–56.

"The English in Afghanistan." *North American Review* 55, no. 116 (July 1842): 45–72.

Farmer, Ben. "Karzai Under Pressure After Investigations Target 15 Officials on Corruption Charges." *Telegraph,* November 23, 2009. 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afghanistan/6636999/Karzai-under-pressure-after-investigations-target-15-officials-on-corruption-charges.

Fergusson, Niall. *Colossus: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 New York:Penguin Books, 2004.

Ferris, John. "Invading Afghanistan, 1838–2006: Politics and Pacification."*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9, no. 1 (Fall 2006).www.jmss.org/jmss/index.php/jmss/article/view/119/131.

Filkins, Dexter. "Iran Is Said to Give Top Karzai Aide Cash by the Bagful."*New York Times,*October 23, 2010. www.nytimes.com/2010/10/24/world/asia/24afghan?pagewanted=all.

Filkins, Dexter, Mark Mazzetti, and James Risen. "Brother of Afghan Leader Said to Be Paid by C.I.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2009.www.nytimes.com/2009/10/28/world/ asia/28intel?_r=1.

Forbes, Archibald. *The Afghan Wars*. New York: Scribner, 1892. Reprint, Kessinger, 2004.

Fraser-Tytler, W. K. *Afghanistan: A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entral and South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Gall, Carlotta. "Taliban Behead High School Teacher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06. www.nytimes.com/2006/01/04/international/asia/04cnd-afghanistan.

———."U.S. examines death of Afghan in custody / Pathologist Described It as a Homicid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ch 3,2003, A-5. www.sfgate.com/cgi-bin/ article.cgi?f=/c/

a/2003/03/04/MN 204728.DTL#ixzz1dtkZHw3U.

Gandhi, Sajit, ed. *The September 11th Sourcebooks*. Vol. 8, *The Taliban File*. Washington, DC: The GWU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2003.

Ghaus, Abdul Samad. *The Fall of Afghanistan: An Insider's Account*. Washington, DC: Pergamon-Brassey, 1988.

Ghobar, Mir Ghulam Mohammed. *Afghanistan Dar Maseer-i-Tareekh, Juld-i Awal.*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ume 1].Kabul: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1967.

——.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 2. Translated by Sherief Fayez. Alexandria, VA: Hashmat Gobar, 2001.

Girardet, Edward. *The Soviet Wa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6.

Giustozzi, Antonio, ed.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Gohari, M. J. *The Taliban: Ascent to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Golden, Tim. "In U.S. Report, Brutal Details of 2 Afghan Inmates'Deaths."*New York Times*, May 20, 2005. www.nytimes.com/2005/05/20/international/asia/20abuse?pagewanted=all.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Despite Some Progress, Deteriorating Security and Other Obstacles Continue to Threaten Achievement of U.S. Goals*. Washington, DC: GAO, 2005.

Griffin, Michael. *Reaping the Whirlwind: The Taliban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London: Pluto Press, 2001.

Gross, Nassrine Abubakr, ed. *Qassarikh-i-Malalai ya Khaterat-e Awaleen Leesa-ye Dokhtaran-e Afghanistan* [Memories of Malalai, the First Girls' School in Afhganistan]. Falls Church, VA: KabulTec, 1998.

Habibi, Pohand Abdul Hayy. *Tarikh-i-Mukhtasar-i Afghanistan* [Concise History of Afghanistan]. Arlington, VA: Association of Afghan Refugees, 1989.

Hafvenstein, Joel. *Opium Season: A Year on the Afghan Frontier*.

Guilford, CT: Lyons Press, 2007.

Halliday, Fred. “Revolution in Afghanistan.” *New Left Review*, no. 112(November–December 1978): 3–44.

——. *Soviet Policy in the Arc of Crisi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1981.

——. “The War and Revolution in Afghanistan.” *New Left Review*, no. 119 (January–

February 1980): 20–41.

Haroon, Sana. *Frontier of Faith: Islam in the Indo-Afghan Border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Hastings, David. “The Runaway General: The *Rolling Stone* Profile of Stanley McChrystal That Changed History.” *Rolling Stone*, June 22, 2010. 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 news/the-runaway-general-20100622.

Heidenrich, John. “The Gulf War: How Many Iraqis Died?” *Foreign Policy,*no. 90 (Spring 1993): 108–125.

Jones, Ann. *Kabul in Winter: Life Without Peac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Joya, Malalai. *A Woman Among Warlords.* New York, Scribner, 2009.

Kakar, Hasan Kawun.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the Afghan Response, 1979–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The Reign of Amir ’Abd al-Rahman Kha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

Kalakani, Habibullah. *My Life from Brigand to King*. London: Octagon Press, 1990.

Kaplan, Robert D. *Soldiers of God: With the Mujahidin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0.

Kaye, John William. *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3 vols. London:Richard Bentley, 1858.

Keddie, Nikki. *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 A Political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Kent, Arthur. "West's Afghan Mission Undone by Farcical Spy vs. Spy Bribes." *Sky Reporter*, August 31, 2010. http://skyreporter.com/blog/page/2/20100830_01/.

Khalili, Khalilullah. *Yawd-dasht hai Ustad Kahlili* [*Memoirs of Master Kahlili*] (As told to his daughter Marie). Herndon, VA: Marie and

Mohammed Afzal Nassiri, 2010.

Kilcullen, David. "Taliban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Kunar."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231–246.

Lal, Mohan. *Life of the Amir Dost Mohammed Khan of Kabul*. London: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6.

Landay, Jonathan. "Factory, Coal Mine Show Connections Matter Most in Afghan Business."*McClatchy Newspapers, Washington Bureau,*Nov. 14, 2010. www.mcclatchydc. com/2010/11/14/v-print/103393/afghan-business-model-connections.

Langary, Sayid Sattar. *Women from Afghanistan in Diaspora*.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12.

Loyn, David.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MacEachin, Douglas. *Predicting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Record*. Langley, VA: CSI Publications, 2007.

Macintyre, Ben.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The First American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2004.

Majority Staff Report to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Evaluating U.S. Foreign Assistance to Afghanista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 7. www.foreign.senate. gov/imo/media/doc/SPRT%20112-21.pdf.

Matinuddin, Kamal. *The Taliban Phenomenon: Afghanistan 1994–199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eyer, Karl Ernest, and Shareen Blair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Basic Books, 2006.

Moshref, Rameen. "The Life and Times of Amir Habibullah." *Afghanistan Online*. www. afghan-web.com/bios/detail/dhabib.

Nathan, Joanna. "Reading the Taliban."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23–42.

Nasuti, Matthew. "America's 'Phantom Aid' to Afghanistan." *Atlantic Free Press*, November 4, 2009. http://atlanticfreepress.com/news/1/12194-americas-qphantom-aidq-to-afghanistan.

Nawa, Fariba. "Deconstructing the Reconstruction: A Corpwatch Investigative Report."www.corpwatch.org/article.php?id=14076.

——. *Opium Nation: Child Brides, Drug Lords, and One Woman's Journey Through Afghanista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1.

Nawid, Senzil. "Political Advocacy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fghan Persian Poetry."*Afghanistan Studies Journal* 3 (1992): 5–17.

Noelle, Christine. *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The Reign of Amir Dost Mohammed Khan*. London: Curzon Press, 1997.

Overby, Paul. *Getting Out of Afghanistan*. New York: Foothills Press, 2012.

——. *Holy Blood: An Inside View of the Afghan War*.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Partlow, Joshua. "Afghan Minister Accused of Taking Brib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8, 2009.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1/17/AR2009111704 198_2?sid=ST2009111800831.

Peters, Gretchen. "The Taliban and the Opium Trade."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7–22.

Poole, Lydia. *Afghanistan: Tracking Major Resource Flows, 2002–2010*.

Wells, UK: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

Qazi, Abdullah. "Biography: Ahmad Shah Massoud." *Afghanistan Online*. www.afghanweb.com/bios/yest/asmasood, 2001, updated 2007.

Rashid, Ahma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ilure of Nation Building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Viking, 2008.

———.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Yale Note Be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euter, Christopher, and Borhan Younus. "The Return of the Taliban in Andar District."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101–118.

Robson, Brian. *The Road to Kabul: The Second Afghan War 1878 to 1881*. Gloucestershire, UK: History Press, 2008.

Rotberg, Robert, ed. *Building a New Afghanistan*. Cambridge: World Peace Foundation; an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07.

Rubin, Elizabeth. "In the Land of the Taliba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22, 2006, 86–94.

———. "Studio Kabul."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24, 2010, 40.Russian General Staff. *The Soviet-Afghan War: How a Superpower Fought and Los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Sadeed, Suraya. *Forbidden Lessons in a Kabul Guesthouse*. New York: Hyperion, 2011.

Saikal, Amin. *Modern Afghanistan: A History of Struggle and Survival*. New York: I. B. Taurus, 2004.

Sale, Florentia. *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Franklin, TN: Tantallon Press, 200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43.

Sands, Geneva. "Gingrich: 'I Don't See a Path Ahead' for Reform in

Afghanistan.” *Hill*, March 13, 2012. www.thehill.com/video/campaign/215749-gingrich-i-dont-see-a-path-ahead-for-reform-in-afghanistan.

Savranskaya, Svetlana, ed. *Afghanistan, Lessons from the Last War: The Soviet Experience in Afghanistan: Russian Documents and Memoir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 21*. Washington, DC: GeorgeWashington Universit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2001.

Savranskaya, Svetlana, and Thomas Blanton, ed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72, Afghanistan and the Soviet Withdrawal, 20 Years Later*. Washington, D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2009.

Schwartz, Moshe, and Joyprada Swain.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Washington, DC: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y 13, 2011. www.fas.org.

Semple, Kirk. “Big Weddings Bring Afghans Joy, Debt.” *New York Times*,January 14, 2008. www.nytimes.com/2008/01/14/world/asia/14weddings?pagewanted=ala.

Shah, Saira. “‘Afghaniyat’ Is Alive and Well in Afghanistan.” *Guardian*, April 7, 2011. www. 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apr/07.

Shah, Taimour, and Alyssa Rubin. “Taliban Proudly Describes Secrets of Great Escape.”*Sydney Morning Herald*, April 27, 2011.

Shalizi, Abdussattar. *Afghanistan: Ancient Land with Modern Ways*. Kabul: Ministry of Planning, 1964.

Steele, Jonathan. “US Convinced Karzai Half-Brother Is Corrupt, Wiki - Leaks Cables Say.”

Guardian, December 2, 2010. www.guardian. co.uk/world/2010/dec/02/us-karzai-half-brother-wikileaks.

Stewart, Jules. *Crimson Snow: Britain’s First Disaster in Afghanistan*.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ress, 2008.

Stewart, Rhea Talley. *Fire in Afghanist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3.

Tabibi, Abdul Hakim. *Afghanistan: A Nation in Love with Freedom*. Cedar Rapids, IA: Igram Press, 1985.

——. *Talashhayi Siyasi Sayyed Jamaluddin Afghani*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of Sayid Jamal ad-Din Afghani]. Kabul: Muassisa Intasharat Baihaqi, 1355/1977.

Taheri, Mohammed Ja'far. *Zarb'ul Masal-ha* [Proverbs]. Arlington, VA: Asghar Taheri, 1389/1991.

Tomsen, Peter. *The Wars of Afghanista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UNICEF Alarmed as Attacks on Afghan Schools Rise." *Unicef News*. www.unicef.org/ infobycountry/media_35196.

Urban, Mark. *War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U.S. to Provide 85 Drones for Pakistan." *Xinhua News Agency*, April 22, 2011. www. afghanistannewscenter.com/news/2011/ april.Zabulwal, Abdul Awaal. "Taliban in Zabul: A Witness Account."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179–190.

Zaeef, Abdul Salam. *My Life with the Taliban*, edited by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and Felix Kueh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原书索引

Abdali confederation, 11–12

Abdullah Abdullah, 209, 270

Abdullah Khan (son of Sher Ali), 75–76

Abdu’Rahman

    builds spy network, security services, 91–94, 97, 137

    centralizes Afghan government, 93–99, 133

    consolidates village republics, 87

    controls religious leaders, 93–96

    formalizes agreements with British, 83, 88, 133

    death of, 101

Abu Ghraib, 309

Adel, Ibrahim, 301–302

Afghan culture. *See* Culture of Afghanistan

Afghan Interim Government (AIG), 221, 339

Afghan National Army (ANA), 308–309, 330–331

Afghan National Police (ANP), 308–309, 330–331

Afghan Star television program, 339

Afghan Student Association, 186

Afghanistan

    cities bombed in retribution for 9/11, 260–261

    daunting problems of postBonn era, 275–278, 289

    dynastic empire under Ahmad Shah, 17, 31–32

    as family business under Mohammedzais, 63–66

    independence recognized by GB, world, 114–116

mineral wealth, 333–336

modern borders established (1879), 67, 86

modernization programs, 70, 104, 155–158

as nexus for Islamism, 245

nonaligned during Cold War, 148, 162, 165, 201

opposes Pakistan state over Peshawar issue, 159–161

reconstruction (*se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Soviet invasion/depopulation/with-drawal, 190–200, 214, 217

Taliban takes control of Mujahideen-held provinces, 235–236

culture (*see* Culture of Afghanistan)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Ghobar), 145

Afghanistan Unveiled film, 283–284

Afghans-4-Tomorrow, 291

Afghan–Soviet War, 190–200, 203–209, 214–218, 265

Af-Pak policies of Obama, 323–325, 327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149–150

Ahad, Abdul, 307

Ahmad Khan. *See* Ahmad Shah

Ahmad Shah

as young man, early reign, 9–13

as patriarch of patriarchs, 21

sacks India, 13, 31

unites Pushtoons and ethnic groups, 14–15

death of, 31–32

Ahmad Shah Baba. *See* Ahmad Shah

Airports, 153, 170

Akbar (son of Dost Mohammed).

See Akbar Khan, Wazir
Akbar Khan, Wazir
as young man of war, 48–51
as Dost Mohammed's heir, 60–61, 63
leads Afghan rebellion against British, 53–55
death of, 64
Al Qaeda
origins, 246
bombs embassies in Nairobi and Tanzania, 250–252
Bush's perspective, 257
considers airplanes as suicide bombs, 259
trains for 9/11 attacks, 260, 267
implications of bin Laden's death, 329–330
Al-Azhar University, 122, 174
Albright, Madeleine, 256
Alcohol consumption, 40, 169, 316
Alexander the Great, 40, 98–99, 333
Ali, Mohammed, 20
Ali Ahmad, 114
Allah-u-Akbar demonstration against Soviets, 193–195
Amanullah
succeeds Habibullah, 105, 108–109
attains independence from GB, 111–116
implements revolutionary reforms, 117–120, 125, 265
travels to Europe, 121–124
overthrown by bandit Saqao, 129–130
dies in exile in Italy, 130

vanishes from collective Afghan memory, 141

loyalists strike at Nadir, 135

American Idol television program, 339

Amin, Hafizullah

conflicts with Soviets, 185–187

leads coup against Daoud (1978), 177

reduces dependence on Soviets, 189

second in command in Khalq regime, 179

murdered by Soviets during invasion, 191–192

Amin of Logar, 60–61

Andropov, Yuri, 213

Anglo-Afghan War, First (1839–1842), 47–57, 61

Anglo-Afghan War, Second(1878–1880), 75–83

Anglo-Afghan War, Third (1919), 112

Ansary, Aman (father of author)birth, youth, 103, 112–113, 136

education abroad, marriage, 140

on Kabul University faculty, administration, 140, 173–174

on HVA project, 149, 169

Ansary, Khwadja Abdullah, 19, 125

Arab Afghans, 245–247

Arghandab Dam, 150, 169

Ariana, 4, 15

Ariana Airlines, 152, 157, 303

Ariana TV, 317

Article 24 of the constitution, 164–165

Arts return to Afghanistan, 340–342

Asef (author's uncle), 222

Asia Foundation, 186, 283–284, 293, 333

Asian Women's Conference in Ceylon, 155

Asma Restya, 105

Asmatey, Zabiullah, 303

Atash, Nadir, 303

Ataturk, 117, 120

Auckland, Lord (George Eden), 42–44, 45, 47

Ayatollah Khomeini, 187–188

Ayub, 82–83, 90

Babar, Naseerullah, 233–235

Bagram airbase/detention center, 153, 191, 308, 309, 331

Bala Hissar palace, 18, 47, 56, 78

Bamiyan valley, 49, 256, 285, 349–350

Barakzais clan, 11, 15

Bhutto, Zulfiqar Ali, 176, 188

Biden, Joe, 325–326, 328

Bin Laden, Osama

allied to, funds, Taliban, 247

as Arab Afghan, 246

bombings of 1998, 250–251

focused on by US policy makers, 249

issues fatwa, 247–248

videotape, 261

significance of his death, 329–330

Bismarck, Otto von, 73

Black Hole of Calcutta, 30–31

Black Swan movie, 340

Blackwater private security, 296

Bollywood movies, 158, 221

Bombings. *See* Suicide bombings; *specific incidents*

Bonaparte, Napoleon. *See* Napoleon

Bonn Conference (2001), 267–275

Brezhnev, Leonid, 190, 213, 217

Bridas oil company, 241–242

Britain. *See* Great Britain

British Empire. *See* Great Britain

British invasions of Afghanistan.

    See Anglo-Afghan wars

Brzezinski, Zbigniew, 212

Buddha sculptures destroyed, 256, 285

Buddhism, 4

Buddhist monastery at Mes Aynak, 336

Bulgheroni, Carlos, 241–242

Burnes, Alexander, 38–53

Burqa, 118, 125, 131. *See also* Chad'ri

Bush, George H. W., 225

Bush, George W.

    disregards bin Laden, Taliban, 257

    increases troops,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323–324

    invades Iraq, 230

    sees Afghan intervention as purely military, 292–293

Buzkashi games, 3, 166, 345

Capitalism. *See* Entrepreneurships

Carter, Jimmy, 211, 212, 250

Cavagnari, Louis Napoleon, 77–80

Cell phones, 258, 287, 336–337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Amin’s rumored association, 186

increases secret US funding for

Mujahideen, 215–216

Pakistan funding helps bin Laden, 252–253

pays Ahmad Wali Karzai for

paramilitary, 304

plans to kill bin Laden, 247, 250

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CENTO), 148, 153, 161

Chad’ri, 118, 131, 239. *See also* Burqa

Chad’ri initiative, 155–157

Chamberlain, Neville, 77–78

Charkhi family, 135–136, 164

Chernenko, Konstantin, 213

China

awarded copper concession, with kickback, 301, 335–336

Communist insurgents take over (1949), 147

produces cheap generators for villages, 338

CIA. *Se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ties

disconnected from old Afghanistan, 170

flooded with homeless people, 290 *See also* Kabul

Civil wars, 32, 66, 82, 224, 284, 340

Clinton, Bill

strikes retaliate for embassy bombings, 251

struggles with bin Laden menace, 249–250, 257

Coghlan, Tom, 315

Cold War

background, 147–149

HVA used to promote US goals, 149–153

US and Soviet vie to supportAfghanistan, 158–159, 165–167

bipolar competition ends, 211–214, 218

Cole, Sonia Nassery, 340

Communism

and Amin's PDPA, 188

ideology filters through military, universities, 171, 282

indoctrination offends villagers, 195–196

not good fit for Muslims, 245

Soviet empire ends, 212–213, 228–229

See also Marxism-Leninism;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Constitution of Afghanistan

under Nadir (1931), 138, 140

rewritten by commoner cabinet (1963), 163

of Bonn commission (2003), 272–273

Copper, 301, 333, 335–336

Corriega, Mr. (HVA engineer), 149–153, 169

Corruption

banned under Amanullah's code, 117

of foreign development projects, 295
as nepotism, 143, 304–305
small-scale becomes endemic, 298
throughout government, 301–305
Corruptocracy, 304, 305
Counterinsurgency approach, 325, 327
Counterterrorism approach, 249, 325–326, 327
Coups, 177, 178
Culture of Afghanistan
and Alexander Burnes, 51–53
change intended by foreign interventions, 330–331
generosity, charity, revered, 14, 183, 199
helping kin, 305
as macho, 199
and Musahibban, 137–138
nature of leadership, 13, 94, 203
resolving contradictions, 343–347, 350
revealed through museum artifacts, 285–286
roles of women, 25, 168–169, 265
Czechoslovakia, 190, 193

Dado, Amir, 315
Dadullah, Mullah, 314
Dalaks, 23–24, 349
Daoud, Sardar background, 144–145
as anti-Pakistan Pushtoon nationalist, 160–163
receives aid from both Soviet Union and US, 149–154

moves women's emancipation forward, 155–158
deposes king, declares himself president, 175
killed by PDPA coup (1978), 177–178
Daoud's Folly, 160–162
Dari language as lingua franca, 4, 104, 140, 283, 296
Darya-i-Noor diamond, 115
Dehmazang prison, 98
Demonstrations
both leftists and radical Islamists, 173–177
signal collapse of Soviet empire, 217
against Soviet invasion, 193–195
topple Bhutto in Pakistan, 188
Deobandism, 121, 123
Depopulation of Afghanistan by Soviets, 198–200
Development
aid funds don't reach villages, 170
flourishes alongside violence, 336–337
generated from both sides in Cold War, 201
industrial, 141
as priority for Daoud, 145
Disraeli, Benjamin, 75
Dogs, 26, 290, 321
Dost Mohammed Khan introduced, 32–33, 39–40
Afghan consolidation set back by Soviet invasion, 206–207
battles for, seeks alliance over, Peshawar, 40, 43–44
outwaits GB in India (1839–1842), 47–48
regains Herat, 66

regains Kandahar, 65
restored to throne with concessions, subsidy, 59–61
government of second reign, 62–66
death of, 67
dynasty ends with coup against Daoud, 177–178
Dostum, Rashid
cedes Kabul to Taliban (1996), 237–238
with Northern Alliance, 243, 256
switches to join Massoud against Najibullah, 219–223
Drone attacks, 326, 327
Drug addiction, 301
Drug lords/drug mafias, 278, 300, 315. *See also* Opium
Dubs, Adolph, kidnapping, 186–187
Dupree, Louis, 169
Durand, Henry, 47
Durand, Mortimer, 88
Durand Line
crossed to fight in WWI, 106
Peshawar issue reopened, 159–162
straddled by Pushtoons, 265, 268
used by Abdu-Rahman for isolation, 89–90
Durrani Pushtoons
background, 12
conflict, reconciled, with Ghilzais, 15, 53, 268
and Dost Mohammed, 32
Hamid Karzai, 256, 270
Durri-i-Durran. *See* Ahmad Shah

Dyer, Reginald, 112

Eagle Four television program, 339

East India Trading Company background, 29–31

army in India, 41–42

and explorer Burnes, 38

Eastern Europ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217–218, 228–229

Economy (domestic)

development flourishes along-side

violence, 336–337

disparity with foreign reconstruction money, 297

with opium as currency, 321–322

Education

under Amanullah, 119

girls attend classes unveiled, 156–157

under Habibullah, 102

in model towns of HVA, 149–150

under the Musahibban family, 138–141

new schools built, 281–282

provided by mullahs, 22–23, 62

Taliban burns schools, kills children, 317–318

See also Kabul University; Universities Egypt, 122, 205

Einuddin (author's grandfather), 103

Eisenhower, Dwight D., 153–154

Elections

under Musahibban family, 143

of Zahir Shah's velvet revolution, 165
presidential (2004), 274–275, 315
parliamentary (2005), 315
Electric services and power stations, 102, 153, 166, 280, 338
Elphinstone, William, 51, 54
Enayatullah (son of Habibullah), 106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39
England. *See* Great Britain
Engrayzee, 29
Entertainment
abolished under Taliban, 240
under Habibullah, Amanullah, 101
Jeshyn festival, 140–141, 155, 166–167
movies, 158, 283–285
Entrepreneurships
along hippie route, 167–168
build National Sports Museum, 340
energized in 2002, 291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41
laws enabling, 70–71
need microlending, 291
as neoconservative vision, 301, 305
of women, 337
Esmatey-Wardak, Massouma, 139, 156, 164
Ethnic cleansing, 228, 241
Ethnic groups
accommodations broken by Soviet invasion, 205–206

under Ahmad Shah, 15
of army, police, conflict with Pushtoon society, 309
battle each other in Mujahideen civil war, 224
forced to work together in HVA towns,170, 181
formed into Northern Alliance, 243
represented in new TV programs, 339
Exiles
escape from Soviets, Taliban, 269
return to establish enterprises, arts, 280–281, 283, 287
as urban elite, 266, 267, 290

Fahim, Qasim (General), 270, 302
Farangi, 29–50, 81, 113
Farooq, Mullah, 307, 309–310, 312
Farsi language, 4, 15, 26, 139
Fatwas
of bin Laden, 248, 252
of mufti, 24
of Mullah Omar, 256
Feminist Majority, 255
Feminists
Afghan activists, 157, 272
in the United States, 255–256
Films and documentaries (Afghan), 273–274, 283–285, 339–340
Foreign interventions, 1–5, 346–348.
See also United States vention
Foreign Ministry of Afghanistan, 112, 144, 281

Forward Policy, 45, 52, 75

France, 30, 73

Fraser-Tytler, W. K., 52

Freedom of speech, 143

French Revolution, 35–36, 165

Frontier Gandhi (Khan Abdul Ghaffar Khan), 160

GB. *See* Great Britain

Gender apartheid, 255

Genocide. *See* Depopulation of
 Afghanistan by Soviets; Ethnic
 cleansing Germany, 73–74, 123, 165

Ghazni city, 47, 235

Ghilzai, Mohammed Shah, 61

Ghilzai Pushtoons
 background, 11–12
 conflict, reconciled, with Durrani Pushtoons, 15, 268
 crushed by Abdu'Rahman, 88–90
 lead anti-British insurgency, 53–55
 politician Taraki, 172
 radical Islamist Hekmatyar, 175
 subsidized by GB, cut, 49, 51

Ghobar, Mir Ghulam Mohammad, 60, 145, 164

Gingrich, Newt, 331

Global Security, 296

Globalization, 258

Goislard, Bettina, 310

The Gold of Afghanistan, 285–286

Gorbachev, Mikhail, 214–217

Gould, Tamara, 273

Government

    builds HVA model towns, farms, 142, 149

    centralized under Abdu’Rahman, 93–99

    constitution, parliament, created, 138

    independence declared in Rawalpin-ditreaty, 114–115

Khalq regime in post-coup era, 179–185

    under kings, emperors, 61–63

    modernization programs, 69–72, 158, 346

    as nationalistic under Amanullah, 111–116

    undermined by foreign interventions, 347

Grand Bazaar of Kabul, 18, 55, 283

Grapes, 162, 280, 289

Great Britain (GB)

Anglo-Afghan wars, 47–57, 75–83, 112

    confronts Russia in central Asia, 43

    as European and global power, 29–31, 35–36, 73–74

    forced to pull out of Afghanistan, 53–56, 83

    life in Kabul after Dost reign, 47–50

    and overthrow of Amanullah, 129

    treaty with Dost Mohammed, 59–60, 65–66

    treaty with Shah Shuja, 38

    treaty with Yaqub Khan, 77

The Great Game, 3, 37, 74, 129, 239

Great Indian Mutiny (1857), 65

Greco-Buddhist art style, 4, 285

Green Village Schools, 281, 318

Guantanamo, 303, 308

Guerilla warfare

of Anglo-Afghan wars, 48, 81–82

commander/warlord/mullah terms, 277

fall of Kabul (1992), 220–224

tactics of Mujahideen against Soviets, 196–199, 208–209

uses surface-to-air missiles, 215–216

See also Mujahideen

Gul Agha, 130

Gulf War (first), 230

Habibia School, 102, 140

Habibullah (son of Abdu'Rahman)

background, 101–102

influenced by Hussein, Musahibban, Tarzi, 103–106

assassinated, 107–108

Habibullah Kalakani. *See* Saqao, Bachey

Hafizullah Amin. *See* Amin, Hafizullah Hakim, Abdul, 312

Hanafi School of Law, 96

Haqqani, Jalaluddin, 313, 319

Haseen, Abdul, 302–303

Hashim Khan, 142, 144

Hashish, 167–168

Hazarajat, 65, 98, 103

Hazaras

autonomy crushed under Abdu'Rahman, 98
battle for Kabul, 222–223
post-Iron Amir, 103
resist Soviets, supported by Iran, 205
as Shi'a Mongolian ethnic group, 15, 65, 98, 205
suffer ethnic cleansing by Taliban, 241, 243–244
Hazrats of Shor Bazaar, 117, 120–121, 123, 129, 130, 152
Hekmatyar, Gulbuddin
bombs Kabul, 219–223
fails to satisfy Pakistan, 232–233
forced to join Massoud to resist Taliban, 236
in Pakistan, 177
as prime minister in Islamist interim government, 221–222
as radical Islamist extremist, 175, 177, 207–209
as Taliban network commander, 313, 319
Helmand Valley Authority (HVA)
described, 142, 149–151
troubles, 143
as liability, 169
Henry VII, king of England, 32
Herat city
conquered by Taliban, 235–236
as early power center, 18–19, 42
retaken by Dost Mohammed, 66, 69
Hezb-i-Islam (Party of Islam), 208, 209, 233, 235
Hindu Kush mountains, 11, 33, 49, 53, 55, 81, 206
Hindus

carry yellow IDs, 256
Marathas routed by Ahmad Shah, 13, 15
Hippies, 167–168, 175
Hungary, 190, 193, 218
Hussein, Mohammed, 103, 108
HVA. *See* Helmand Valley Authority Idema, Jack, 311

IDP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223, 236
Imams, 23
India
Amritsar demonstrators massacred, 112
controlled by GB, 29–31
Great Mutiny, 65
iron development, 335
as nonaligned, left-leaning, nation, 148, 161
partitioned to create Muslim Pakistan, 159–162
sacked by Ahmad Shah, 13, 31
Indian Embassy car bombing(2008), 321
Indus River, 15, 33, 38, 60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funded by Soviets, 152, 154
funded by US, 154
roads and streets, 166–167, 294–295
Insurgencies
against British (1841), 187
against PDPA in rural areas, 188
See also Talibanist insurgents Intellectuals
(liberal and modernist) emerge under Zahir Shah, 164–165

as Marxist-Leninist dissidents, 171–172
during Musahibban family reigns, 143, 145
publish publications, 143, 165
religious, 248
Internet, 258, 287, 316, 349–350
Interrogation methods
of Mustauffi Hussein by Amanullah, 108
at Bagram detention center, 308
of Idema and Bennet, 311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disburses Western funds to
Mujahideen, 204–205, 215–216 sponsors, supports, Hekmatyar
for Pakistan take over, 209, 221–222, 232–233
as Taliban loyalists, 254
works with Mullah Omar, 234
Iqbal, Bismillah, 326–327
Iran
aids Northern Alliance blocking anti-Shi'a Taliban, 243, 256
backs Sultan Ahmad, 66
gives aid to Shi'a Hazaras, 205
included in feudal Afghan territory, 31
Islamic Revolution, 157, 187–188
after Soviet collapse, 228–229
refugees' destination during Soviet depopulation, 199, 215, 225
as victim of Afghan drug trade, 301
Iraq, invasion of, 230
Iron Amir. *See* Abdu'Rahman

ISI. *Se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lamism

Deobandi school, 121

as political program, 245

US chooses to view as military problem, 249

See also Radical Islamism

Ismail Khan, 235–236, 256, 267

Jalal, Masooda, 272, 274

Jalalabad, 55, 107–108, 112, 128, 216

Jalali, Robina, 340

Jamaluddin-i-Afghan, 69–70, 104

Jamiat-i-Islam (Islamic Society), 208

Jeshyn-i-Istiqlal (Festival of Independence), 140–141, 166–167

Jihadism, 248, 252, 279, 330

Jirgas (village councils), 21–22, 62

Jones, Paula, 251

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Sale), 328

Joya, Malalai, 273

Kabul

bombed, burned, looted, by British, 55 –56, 112–113

as center for dealings with outside world, 133

of Dost Mohammed, 32, 39–40

as early power center, 17–18

established as single capital, 86

under siege by Mujahideen factions, 222–223

taken by GB (1839), 47–48

conquered by Taliban, 236, 237, 247
with booming economy, 337, 344
weakened by interventions, 347
Kabul Bank, 302–303, 305
Kabul Museum, 285–286, 336
Kabul Nindari national theater, 283
Kabul University
academic respectability restored, 282, 316
with both leftist and radical Islamist activists, 171–174
early history, 140
with US partner universities, 152
Kabul-Kandahar road project, 295–297
Kafiristan, 98–99
Kajakai dam and town, 150–151, 169
Kalantars of Abdu'Rahman, 94–97
KAM airline, 303
Kandahar
bombed by US forces, 329
conquered by Taliban, 235
as early power center, 17–18
overthrown by GB, 47, 83
prisoners escape, 329
reduced to rubble by Mujahideen, 224
as seat of Taliban power, 262–263, 265
Kandahar/Helmand region, 65
Karmal, Babrak

background, 172–173
installed as president by invading Soviets, 192
replaced by Soviets with Najibullah, 216
sent to Eastern Europe by PDPA, 179
Karzai, Ahmad Wali, 304
Karzai, Hamid
creates untrained army and police forces, 308–309
implicated in corruption, 303–304
as interim chairman, president, 269–270
with neoconservative US allies, 242
in Northern Alliance, 256
Karzai, Hamid (*continued*)
receives payments from Iran, 304
in contradictory position, 346
Karzai, Mahmoud, 302
Kaye, John, 56
Kayeum, Abdul, 149, 174
KhAD, 184, 193, 216
Khalillulah (son of Mohammed Hussein),104, 108
Khalilzad, Zalmay, 215, 242, 270, 272
Khalq political party/regime, 175, 177–180, 182
Kharoti, Mohammed Khan, 281, 318
Khomeini, Ayatollah, 157, 187
Khost co-ed school, 282, 318
Khost terrorist training camps, 247, 251, 282
Khrushchev, Nikita, 152
Khyber, Mir Akbar, 177

Kim (Kipling), 37

Kipling, Rudyard, 3, 37

Klare, Michael, 229–230

Koh-i-Noor diamond, 10, 38, 39

Kotwals of Abdu'Rahman, 94–97

Lakanwal, Ghafar, 282, 318

Land ownership decrees, 181–182, 196

Landmines

    appear to be children's toys, 200, 299

    cause farms to be uncultivatable, 290

    planted by Soviet Union, 198

Roots for Peace NGO, 293

Languages. *See* Dari; Farsi; Persian;

Pushto languages

Lashkargah town, 142, 149, 151, 156–157, 281

Lawrence, T. E. (Lawrence of Arabia), 129

Laws

Amanullah's *Nizamnama* legal code, 117–125

local conflicts settled by jirgas, 62

Shari'a, 117, 273–274

    as Talibanist mobile courts, 320–321

    traditional vs. king's law, 28

Leno, Mavis, 255

Lewinsky, Monica, 251

Lion of Panjsher. *See* Massoud, Ahmad Shah

Logar, 235

Louis Berger Group, 296

Louis-Napoleon III, 73

Loya jirga (grand assembly)

ratifies Nadir, 132

selects Ahmad Shah as king, 10–11, 93

for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Bonn Project), 268, 272, 275

Lytton, Lord (Edward Bulwer), 76–77

Macnaghten, William Hay, 43–44, 48–51, 53–54, 79

Madrassas

in Afghanistan, 102

and Mullah Omar, 233

in Pakistan, controlled by radical

Islamists, 226–227

Mafias (trucking, drug, smuggling, gunrunning), 253, 278, 315

Mahmoud (Ghaznavid sultan), 15

Maiwand battle, 82–83, 139, 194, 206

Maiwandwal Hashim, 174

Malalai, 82–83, 138–139, 194

Maliks as headmen, 21–22

Marjah town, 150, 327–329

Marriage

bride prices, 118, 157, 180

to foreigners, 139, 140

for love, 168

underage, 118, 137–138, 180

Marshall Plan for Afghanistan, 279–281, 287

Marxism-Leninism, 171–172, 175, 184, 245

Mashad, Iran, 33
Massoud, Ahmad Shah
battles Hazara Mujahideen, 222–223
brings down Najibullah, 219–221
forms multiethnic Northern
Alliance, 243, 256
leaves Kabul to Taliban (1996), 238
as politicized Muslim, military genius, 175, 177, 207
warns Europe of al Qaeda dangers, 259
assassinated, 259–260
Massoudi, Omara, 285, 286
Mawlawis, 24
Mazar (author's cousin), 182
Mazar-i-Sharif
as early religious and power center, 18, 19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336
Shi'a Hazaras massacred, 243–244
woman charged with adultery stoned, 256
McChrystal, Stanley, 325–328
Mes Aynak, 333, 335–336
Microlending, 291
Military
Abdu'Rahman's troops, armaments, 92–93
Amanullah attempts to strengthen, 119–120
disunity tied to anti-Soviet resistance strength, 206
Sher Ali's national army, 72
Military aid

provided by Soviets, 153
received by Amanullah, 111, 124
US war-related vs. reconstruction dollars, 293–294
Mineral wealth, 333–336
Mir Sultan, 97–98
Mirabs (water arbitrators), 24, 169
Mirzas of Abdu'Rahman, 92, 97
Missiles, 212, 213, 215–216, 251
Moghul Empire, 15, 29–31, 252
Mohammedzais clan, 32, 48, 63, 82
Mongol conquest of Afghanistan, 4, 65, 236
Morality police, 93–94
Morrison Knudson Afghanistan (MKA), 141–142
Muftis, 24, 96, 320
Mujaddedi, Amanullah, 340–341
Mujahideen resistance against Soviets
warriors annihilated when Soviets invade, 193
aid flows from West through
Pakistan ISI, 204, 214
attack Soviets from tactical advantages, 195–197
receive Stingers from CIA, 215–216
Mujahideen (after Soviet withdrawal) take Kabul from Najibullah, 219–221
factions reduce Kabul to rubble, 224
forfeit credibility, 233
as Peshawar group at Bonn Conference, 267
replaced by Taliban, 235–236

Mullahs

controlled by Abdu'Rahman, 95–96

described, 22–23

provide education, local rulings, 62

Musahibban family

introduced, 103–104

implements dam projects, 142

replaces Amanullah, murders Saqao, 131–132

some reforms of Amanullah reinstated, 138–141

women appear in public unveiled, 155–157

rules Afghanistan for 44 years, 135–145, 155–178

See also Daoud, Sardar; Nadir Shah;

Zahir Shah

Music (Afghan), 155, 166, 240, 282–283, 337, 350

Muslim Brotherhood, 174

Muzafaruddin (author's uncle), 128

Nadi Ali town, 150, 281, 318

Nadir Afshar, 9

Nadir Khan. *See* Nadir Shah

Nadir Shah

introduced, 103–104

allies with GB, 118, 124

Nadir Shah (*continued*)

and assassination of Habibullah, 107–108

commander in Third AngloAfghan War, 112–113

replaces Amanullah/Saqao, 131–132

resumes Dost Mohammed's project, 135–136, 201
assassinated, 139–140
Na'eem, Sardar, 144–145
Naheed, 194
Najibullah (Najib)
installed as ruler by Soviets, 216–217
takes political asylum in UN building, 221
tortured, murdered, by Taliban, 238–239
Najmuddin (author's uncle), 139, 164
Napoleon, 35–36
Napoleonic Wars, 36, 51
Narcotics industry, 300–301
Nasrullah, 105–108
National Museum, 340
National Sports Museum in Kabul, 340
NATO
formation, 147–148
air strikes kill civilians, 307–308, 310–311, 328
attacks Talibanist network
leaders/smugglers, 314, 319
night raids, 326
Nedai, 272
Nehru, Jawaharlal, 148
Neoconservatives
lead to massive corruption, 305
as the power of private capital/military, 293, 301
prefer private contractors for aid delivery, 296

promote US social values, freemarket
capitalism, 257–258
support Taliban as stabilizingforce, 242
Nepotism, 143, 173, 304–305
NGO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Andar, 325–326
attacked by insurgents, 311–312
foreign support bypasses Afghan government, 292–293
outside money undermines economy, 297–298
push for schools, 316
Nicaragua, 212, 214
9/11. *See* September 11, 2001
Niyazov, Saparmurat Atayevich, 241–242
Nizamnama by Amanullah, 19, 117–125
Nomads
introduced, 26–28
forced to settle, farm, in model towns, 150, 170, 181, 281
produce ancient precious artifacts, 286
roam freely under Musahibban family, 137
Nonalignment
Amin’s vision, 186
generates resources from Cold War, 201
as Musahibban family policy, 162
Nehru’s third bloc notion, 148
as strong Afghan position (1963), 165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ee NGOs
Noorzai, Kobra, 139, 156, 164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See* NATO
Northbrook, Lord (Francis Baring), 74–75
Northern Alliance
created by Massoud, 243, 256
in interim government posts, 270
loses ground to Taliban, 259
not fully accepted by US, 256–257
post-9/11, takes over government, 261–262
represented at Bonn Conference, 267
Nott, General, 54, 55–56
Nowrouz, Akbar, 207
Nuclear weapons an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147, 211, 213–214
Nuristan, 99, 188

Obama, Barack
Af-Pak policies, 323–330
drone use increases, 327
replaces McChrystal with
Petraeus, 328
suspected Taliban arrests
increase, 326
US/NATO crimes and blunders, 331
Oil and natural gas development built by Soviets, 153
joint venture with China, 335
and neutral view of Taliban atrocities, 241

workers' security, 242
Oil pipeline proposal from
Turkmenistan to Pakistan
Bridas and Unocal compete, 241–242
politics of, 231–233, 234
Old Afghanistan
defeats the City through Taliban, 265
increasingly disconnected from urban life, 133–134, 170
pressured by modern Kabul, 201–202
shifts to cleric leadership due to war, 206
Olympic Games, 340
Omar, Mullah
acclaimed Mohammed's deputy on earth, 237
flees Kandahar, 262
issues oppressive restrictions, 239, 255–256
organizes early Taliban, 233–236
as spiritual commander of Taliban, 313–314
supported by bin Laden, 247
Opium
as currency, 321–322, 338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market, 300
as viable crop for devastated farms, 299
Osmani, Mullah Akhtar, 314
Ottoman Empire, 32, 74, 104, 106, 129
Pakistan
destination for Afghan

Islamists, 177, 188

drones attack, are deployed, 327

links CENTO, SEATO, to contain

Communism, 148, 153

and oil pipeline politics, 231–233

opposes autonomous Afghan government, 277

receives, distributes, aid from West, 204, 214

refugee camps, 199, 209, 225–226

supports bin Laden, Talibanist networks, 227, 234–236, 239, 249–250, 319

loses control of Taliban, 253–254

post-9/11, cuts support of Taliban, 261–262

Pamir Airlines, 303

Panjsher Valley, 207, 208, 238, 243, 343

Parcham political party

created by Marxist-Leninist urban elite, 175–176

installed by invading Soviets, 192

overpowered by Khalq, 179–180

shoots anti-Soviet demonstrators, 194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107

Parliament

created from advisory jirga of Sher Ali, 71

under Musahibban family, 143, 144–145

National Council created by Nadir, 138

Parliament (*continued*)

PDPA students disrupt proceedings (1965), 173

reformed (1963), 165

designed by Bonn project, 273–275
Pasha, Shireen, 340
Pastoral nomads. *See* Nomads
PDPA. *Se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Peace Corps volunteers, 167, 168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PDPA)
conducts 1978 coup, 177–180
created by Marxist-Leninists, 172–173, 175
farm land redistribution proves disastrous, 181–182
renamed Fatherland Party, 216
requests Soviet weapons to fight insurgents, 188
Pepsi, 336
Persian Empire, 4, 9–10
Persian language, 4, 11, 49, 98
Persian poetry, 166, 259
Peshawar
held by Ranjit Singh, 41–42
issue reopens upon creation of Pakistan, 159
Mujahideen assemble against
Soviets, 203–204
as negotiating point for Dost–GB, 64–66
as Pushtoon power center, 18, 33, 39
Petraeus, David, 328–329
Plassey battle, India, 30
Police. *See* Afghan National Police Pollock, General, 54, 56
Polygamy versus monogamy, 118, 124–125, 130, 157

Popal, Mustafa, 273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Afghan Women in Afghan Society (Esmatey-Wardak), 139

Postal system, 70, 258, 287, 298

Private enterprises

foreign contractors, subcontractors, 295, 308, 324, 327

sabotaged by Talibanists, 312

started by returning exiles, 287

See also Entrepreneurships

Propaganda war of Talibanists, 317–318

Publications

freedom of press (2005–2006), 316

of liberal intellectuals, 143

Purdah

liberalized under Amanullah, 118

oppressive restrictions by Taliban, 239

prohibitions restored under Saqao, 129

Pushto language, 11, 139, 140, 237, 296

Pushtoon people

advocate for Peshawar,

Pushtoonistan, 159–162

culture and history, 11–15, 18

select Ahmad Shah as king, 10

of Taliban's origins, 241, 267–268

Pushtoonistan, 160–162

Pushtoonwali code, 14, 113, 252

Qadir, Hajji, 256

Qazis (village judges), 24, 96

Quetta Shura directs Talibanists, 313–315, 317–318, 319

Qur'an burned by US troops, 331

Qurbanni, Burhan, 340

Rabbani, Burhanuddin

agrees to not bid for government office, 271

claims to instigate Herat uprising, 187

forms Jamiat-i-Islam, 208

as president in Islamist interim government, 221–222

as president of Northern Alliance, 243

as radical Islamist activist, 174, 177

killed by Talibanist insurgents, 331

Radical Islamism

emerges, coalescing around leaders, 203–204

inhospitable for Communists in region, 187

represented by Hekmatyar, 177

rises in Pakistan, 188

university students, 174

See also Talibanist insurgents Radio

Kabul, 141, 155, 157–158, 160, 179, 282–283, 350

Radio Shari'a, 255, 350

Rahmani, Idrees Ahmad, 337–339

Railroads, 336

Ramparts magazine, 186

Ranjit Singh, 33, 38–42, 47, 50, 60, 65

Rare earth minerals, 333–334

Reagan, Ronald, 213–214, 215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funds, projects, required, 280, 291
road projects, 294–297
US spending, 293–294
corruption rises, 305
as failed effort, 307
Refugee camps during Soviet depopulation, 199, 209, 225–227
Refugees
boys recruited from madrassas for Taliban, 236–237, 238
flee Kabul as IDPs, 223, 236
population swells to 6 million, 215
return to destroyed countryside, landmines, 289–290
vote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2004), 274
Relief workers killed, 309–310, 318
Religious freedom, 117–118
Republican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242
Resource wars, 229–230
Reuter, Christoph, 307
Reza Shah Pahlevi (Shah of Iran), 145, 176, 187–188, 189, 212
Rice, Condoleezza, 257
Ritchie, James, 297
Roads and highways, 102, 140, 166–167, 294–297
Roberts, Frederick, 80, 82, 83, 88
Rolling Stone magazine, 328
Rumsfeld, Donald, 257
Rural life. *See* Village republics of Afghanistan

Russia

aids Northern Alliance to block fundamentalism, 243

conflicts with GB to dominate central Asia, 36–37

czar seeks India through Afghan territory, 41–45

discusses trade deals with Amanullah, 124

threatens Afghan borders, 74–77

Sabet, Abdul Jaber, 303–304

Saddam Hussein, 230

Sadozais clan, 11, 15

Salang Tunnel, 154, 167

Sale, Florentia, Lady, 328

Saqao, Bachey (Water Carrier's Son), 127–132

Saudi Arabia

aids anti-Soviet resistance, 205

funds madrassas to promote

Wahhabi, 226–227

matches US funding for Mujahideen, 215

royals reject bin Laden, 246

Saddam Hussein threatens invasion, 230

Saudi Arabia US compound bombing, 246

Sayyaf, Abdul Rasool, 174, 222, 260

SEATO. *See* 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

The Secrets of This House television program, 339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s

provided by villages, tribes, 62

secret police force in Khalq regime, 184
spy network of Abdu'Rahman, 91–94, 97
spy network of Musahibban family, 137
See also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Sehum-i-Aqrab (the third of Aqrab), 173
September 11, 2001, 259, 260, 292
Seraj-ul-Akhbar newspaper, 105
Serena Hotel in Kabul, 315–316, 321
Setara, 339
Shah Mahmoud, 142–143, 164
Shah of Iran. *See* Reza Shah Pahlevi
Shah Shuja
British install as Afghan monarch, 38–48
switches to oppose British, 54
assassinated, 55
Shah Zeman, 38, 56
Shahada film, 340
Shams, Dr., 219, 272
Shansab, Horace, 284–285
Shari'a
clerics fail to find veiling practices, 156
enforcement as Taliban mission, 235
fatwas, 248
as God-given law, 117, 320
Hanafi version, 96, 135
for jurisprudence beyond village level, 62
Sharif, Nawaz, 251, 252

Sher Agha Mujaddedi, 120, 121, 130
Sher Ali
as Dost Mohammed’s successor, 69
fails to handle Russian threat, GB invasion, 75–77
modernization program, 69–72, 104
Shi’a Islam
Hazaras, 205, 241, 244
Iranian, 229, 243
Mazar-i-Sharif shrine, 19
Shuja Shah. *See* Shah Shuja
Sikhs and Sikh religion, 33, 39, 41, 47, 60, 65
Simla Manifesto, 45
Slave boys, 92
Slavery, 98, 117
Slowly, Slowly, Mud and Lotus
documentary, 340
Smuggling
of gold, gems, raw currency, 204, 300, 303
tied to Taliban, 300–301, 314, 338
by tribal chiefs, 183
Smuggling mafias, 253, 278
Soap factory, 123, 124
Soraya, 105, 116, 121–125, 130
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 148, 153, 161
Soviet Union
bombs Herat, 187

Cold War competition with US, 151–153, 165–166
Daoud's Folly, 162
Dubs kidnapping, 186–187
    invades Afghanistan (1979), 190–200
KGB, 184, 213
Khalq regime, 184
depopulates rural Afghanistan, 198–200, 215
    collapses, withdraws from
Afghanistan (1989–1990), 211–218
Soviet Union occupation compared to US involvement, 1–2
Stalin, Joseph, 90, 147, 151–152
Stinger missiles, 216, 219
Strikes of students and workers, 173, 176, 177
Stryker Brigade kill team, 331
Student activism, 173–176
Subghatullah, Mujaddedi early activism, 152, 187
    role in Islamist interim government, 221, 341
Sudan, 246–247
Sufi poetry, 19, 40, 125
Suicide bombings, 246, 250–251, 277, 321, 330, 341
Sultan Ahmad, 61, 66
Sultana, Fatima, 115
Sultans of Delhi, 12
Sunni Islam, 229, 231

Tajik ethnic group
Bachey Saqao, 127, 131

culture, 14

Hammad Anwar, 139

Islamist Massoud, 175, 207, 209

Tajikstan, 190, 228

Taliban

conquers Kandahar, Ghazni, Herat, Kabul, 235–238

criminalizes women, nonIslamic behavior, 239–240, 255–256

establishes opium as currency, controls

production, 299–300, 321–322

inadvertently brings technology to villages, 338–339

kills potential voters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274

massacres Shi'a Hazaras, 243–244

Mullah Omar as original organizer, 233–234

recognized as Afghan government(1997), 243–244

supported by Pakistan, 241

trusted, supported, by US, 242, 249

Talibanist insurgents

attack, terrorize, individuals, 309–312

burn schools, kill children, teachers, 317–318

coalesce into networks, 312–314, 319

operations directed by Quetta Shura,313–315, 317–318, 319

with power to make Afghanistan ungovernable, 322

seem to strengthen after bin Laden's death, 330–331

Taraki, Nur Mohammed

as Khalq regime president, 179, 184–185

leftist activist, 172

dies after attempting to kill Amin, 188–189

Tarnak Farms, 247

Tarzi, Habib, 141–142

Tarzi, Mahmoud

as Amanullah's mentor, 111–112, 119–120

driven from Afghanistan by Saqao, 129–130

Tarzi, Zemaryalai, 285

Taxation

under Abdu'Rahman, 94–95, 97

abolished by Saqao, 131

improving private enterprise, 70–71

under kings, governors, 22, 62

by Taliban, 314

Technocracy class, 71, 158–159, 164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services, 128, 153, 287, 344

Television (Afghan), 240, 280, 285, 287, 316, 338–339

Terrorism

al Qaeda proposes airplanes as suicide bombs, 259

bin Laden's early methods, 246

bombings of 1998, 250–251

events of 9/11, 260

killers dressed in Afghan uniforms, 330–331

training camps, 247, 251, 282

US jurisdiction in question, 249

See also Suicide bombings

3-G telecom services, 336

Titanic movie/video, 283

Tokyo Conference (2002), 279–280

TOLO (Sunrise) TV station, 317, 339
Tora Bora cave complex, 247, 270
Translators for reconstruction work, 296
Treaty of Gundamak (1879), 77
Treaty of Rawalpindi (1921), 113–115
Tribal rebellions, 120–121, 128–130, 137
Truman, Harry S., 141, 147, 279
Turkey, 4, 228–229
Turkmenistan, 228, 231, 234, 241–242, 347

Ulya Janab, 103–104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 230, 244, 250
United Nations
    and Afghan refugees, 226
Afghanistan becomes member, 141
    approves US invasion of Iraq, 230
    asylum for Najibullah violated by Taliban, 221, 238–239
    economic sanctions on Taliban, 256
Soviet–Afghanistan peace talks, 217
United States Embassy bombing in Kenya, 250–251
United States Embassy bombing in Tanzania, 250–251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Kabul, 186–187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Tehran hostage crisis, 212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Abu Ghraib, 309
    kills civilians by mistake, 307–308, 310–311
    new Talibanist insurgencies take shape, 312, 314–315

regarded as purely military by Bush, 292
violence in Afghanistan increases, 308
weakens Afghan central authority, 346–347
United States Marines desecration of corpses, 331
United States Special Forces, 270, 308, 311, 325–326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249
Universities
demonstrations, 173–174, 194–195
overseas programs, 125, 139–140, 158, 171
women allowed to attend, 157, 168
Unocal oil company, 241–242, 244, 256, 270
Urban elite, 99, 105, 133, 202, 266, 267

Veiling practices, 126, 156–157, 283–284
Verne, Jules, novels, 104
Village republics of Afghanistan
Abdu'Rahman tries to consolidate, 87, 99
culture, social structure, 20–28
destroyed by Soviet depopulation, bombing, 198–206, 215
impacted by HVA dams, irrigation, 169–170
Mujahideen replace secular elders with clerics, 206
vs. new Afghanistan, 134, 269
as old Afghanistan, 133, 176
Vitkevich, Ivan Victorovich, 43–44

Wag the Dog movie, 252
Wahhabi sect of Saudi Arabia, 226–227, 247, 260
Wardak, 235

Water Carrier's Son. *See* Saqao, Bachey

Water management of rural

Afghanistan, 24, 169–170, 181–182, 280

Weddings as economic stimuli, 337

Whitewater investigation, 250–251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339

Wilson, Charlie, 215–216

Women

accepted into police, army, ranks, 339

attend university, enter professions, 157, 168, 281–282

girls schools, 138–139, 156–157

in nomadic culture, 26–27

and offensive behavior by British men, 51–53

oppressed by Taliban, 239–240, 255–256

PDPA improves status, 180

progress under Daoud's reforms, 155–158

roles in rural areas, 25

stalked, acid thrown in faces, 175

World War I, 106

World WarII, 142, 147

Wrongful death compensation, 310–311

Yaqub Khan, 75–79, 80–81

Young Turks, 104, 145

Younus, Borhan, 307

Zabuli, Abdul Majid, 141

Zaheda (author's cousin), 222–223, 274

Zahir, Ahmad, 166, 283

Zahir Shah

and Bonn project, 267, 271–273

as figurehead king for Musahi-bban family, 136–137, 141, 144–145

disempowers himself with new constitution, 162–165

deposed by Daoud, exiled to Italy, 176

Ziaie, Shafiqa, 164

Zoleikha’s Secret film, 284–285

《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大西洋月刊》年度好书

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一部讲述阿拉伯人希望与失望的流畅动人的历史。——《卫报》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

1516年至今

The Arabs: A History



[英] 尤金·罗根 著
廉超群 李海鹏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英）尤金·罗根　著
廉超群　李海鹏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714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英）尤金·罗根著；廉超群，李海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7

ISBN 978-7-213-09245-9

Ⅰ．①征…　Ⅱ．①尤…②廉…③李…　Ⅲ．①阿拉伯人民族历史研究　Ⅳ．①K37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6365号

Copyright © 2009 Eugene Rog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地图审图号：GS（2019）1668号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英］尤金·罗根　著　廉超群　李海鹏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丛书策划：王利波

营销编辑：陈雯怡

责任编辑：汪　芳

责任校对：朱　妍

责任印务：程　琳

封面设计：张庆锋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23.625

字　　数：567千字

插　　页：6

版　　次：201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245-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图1和图2分别是在1516—1517年间征服马木鲁克帝国阿拉伯领土的奥斯曼素丹塞利姆一世和在1519年将北非沿海地区纳入奥斯曼统治的巴巴里海盗海伊尔丁·巴巴罗萨。这两幅基于想象的佛罗伦萨绘画，大约是在两人去世后的1550年左右完成的。1613—1618年德鲁兹王法赫尔丁二世流亡佛罗伦萨期间，这两幅画可能是他见到的美第奇家族藏品的一部分。



图3　这名19世纪大马士革理发师做生意的方式，同他一个世纪前的同行理发师艾哈迈德·布戴伊里相同。



图4　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国军队在金字塔之战（1798年7月21日）中大败统治埃及的马木鲁克埃米尔们，成功进入开罗。这幅画是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1775—1848）在1806年基于战场速写完成的。勒热纳描绘了马木鲁克骑兵和训练有素的法国步兵间不对等的冲突。用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的话说，法军“枪声不断，震耳欲聋”。



图5　这幅乔治·伊曼纽尔·奥皮茨（1775—1841）创作的作品描绘了1831年阿卡城门外，年迈的黎巴嫩山统治者埃米尔巴希尔·谢哈卜二世（中间持手杖而立者）向埃及将军易卜拉欣帕夏（马背上）效忠。易卜拉欣是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之子，他在围攻阿卡6个月后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塞，完成了对叙利亚的征服。



图6　医生、编年史家米哈伊勒·米舍卡目睹了1831—1832年埃及人对阿卡的围攻，并汇报给统治黎巴嫩山的谢哈卜家族。米舍卡后来担任大马士革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1860年大马士革屠杀中，他和家人在暴徒的暴力中幸存。在19世纪70年代初米舍卡晚年阶段，邦菲斯创作了这幅肖像画。



图7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是一名出生于卡瓦拉的阿尔巴尼亚人，于1805—1847年间统治埃及，建立了一个覆盖苏丹、希贾兹、大叙利亚和克里特岛的帝国。1840年，他让路易·夏尔·奥古斯特·库代（1790—1873）给他画了这幅坐着的肖像画。同年，他的军队被英国-奥斯曼联军赶出叙利亚。他建立的王朝统治埃及到1952年。



图8　1832年起，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领导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统治的运动，直到1847年他最终向奥马勒公爵投降。法国艺术家奥古斯特·雷吉斯（1813—1880）描绘了这次投降的场面。阿卜杜·卡迪尔因其坚决的抵抗而在法国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他受到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的隆重接见，随后被光荣地流放到奥斯曼领土上，并享有法国的津贴。他在大马士革定居，在该城1860年的屠杀中拯救了许多基督徒。



图9　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之子埃米尔费萨尔的肖像照。他是1916—1918年反抗奥斯曼人的阿拉伯大起义中阿拉伯军队的首领。1918年2月28日，保罗·卡斯泰尔诺运用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摄影技术在红海亚喀巴港拍摄了这张照片。1920年，费萨尔成为叙利亚国王，同年被法国人罢黜，1921年加冕为伊拉克国王。



图10　1918年3月28日，费萨尔阿拉伯军队的一群贝都因士兵在棕榈树丛中。保罗·卡斯泰尔诺的这张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照片记录了一些男子的脸，他们参与袭击了希贾兹铁路和麦加与大马士革间的奥斯曼沙漠要塞。英国军官T．E．劳伦斯，即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在他的经典之作《智慧七柱》中颂扬了这些袭击。



图11　法国第一任常驻摩洛哥将军路易-赫伯特·利奥泰元帅的肖像照。他是一个创新型的统治者，他那富有同情心的帝国统治方式影响了日后法国对叙利亚的殖民治理。利奥泰的统治被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领导的里夫战争（1921—1926）破坏。乔治·舍瓦利耶在1927年拍摄了这张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照片，此时利奥泰已经离开摩洛哥两年。



图12　1925年，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在摩洛哥抗击法国人的这些激动人心的画面，激发了阿拉伯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者。以北里夫地区的山中要塞为基地，阿卜杜·卡里姆带领他的柏柏尔非正规军先后击败了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直到1926年欧洲联军包围并击败了里夫人。在这张平版印刷画中，拥有现代战机和火炮的法国人在阿卜杜·卡里姆领导的摩洛哥骑兵的紧逼下节节败退，头顶上方的伊斯兰旗帜上写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图13　法国驻叙利亚首任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将军的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肖像照，1919年10月3日摄于贝鲁特，拍摄者是奥古斯特·莱昂。古罗曾任利奥泰在摩洛哥时的助手，尝试应用利奥泰的多项措施来支持法国对叙利亚的统治，但失败了。他的分而治

之的策略最终在叙利亚激起了一场从1925年持续至1927年的全国性的反叛。这场反叛最终被镇压。



图14　1919年11月22日，法国统治下的贝鲁特。法国三色旗装点着奥斯曼钟楼和主行政中心的阳台，军队在底下的阅兵广场上扎营。虽然一些黎巴嫩人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积极寻求法国的委任统治，但他们希望法国扮演一个更无私的角色，来帮助他们建立独立国家所必需的机构。



图15　1925年，被法国炮火摧毁的大马士革。1925年10月，大马士革人起义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起义者涌入阿兹姆宫，试图俘获法国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法国统治当局清空了这座宫殿，将火炮对准周边的街区，轰炸了48小时。一名目击者记录道，在大马士革，“毁灭性的炮弹和大火吞噬了600多座最美的房屋”。照片的前部就是阿兹姆宫的废墟。



图16　萨阿德·扎格卢勒和埃及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结束在马耳他的流放后回国。1919年3月8日，扎格卢勒被捕，激起埃及全国的民族主义示威。民众的压力迫使英国收回其政策，允许扎格卢勒和代表团成员回开罗，并作为埃及的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但代表团的努力是徒劳的：列强早已承认英国为埃及的保护国。照片上，扎格卢勒被安排坐在中间，握着手杖。他的右边是伊斯玛仪·西德基，两人后来分道扬镳，西德基成为埃及“自由化时代”的反面人物。



图17　1919年，妇女首次参与埃及的国家政治，登上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这份法国周刊描绘了英国骑警注视下一众男性中间一群蒙头蔽面的女性，以大力宣扬“埃及的女性示威”。胡达·沙拉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她的丈夫阿里与扎格卢勒一同被流放。



图18　在这张1928年摄于吉达的照片中间戴着眼镜、高出身边众顾问一头的人是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赫曼·费萨尔·阿勒·沙特，在西方更多以伊本·沙特而闻名，他是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创建者。他在1925年征服希贾兹的哈希姆王国之后，获得了“纳季德素丹兼希贾兹国王”的称号。1932年，伊本·沙特将他的王国重新命名为沙特阿拉伯，使之成为唯一一个以统治家族命名的现代国家。



图19　法乌齐·盖伍格吉（中间）与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的领导人在一起。盖伍格吉参加了阿拉伯人反抗欧洲统治最有名的几次起义，包括叙利亚的麦赛伦战役（1920）、叙利亚起义（1925—1927）、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和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军事政变（1941）。二战期间，他在纳粹德国避难，躲避英国人的追捕。二战后的1947—1948年，他回到巴勒斯坦，领导阿拉伯解放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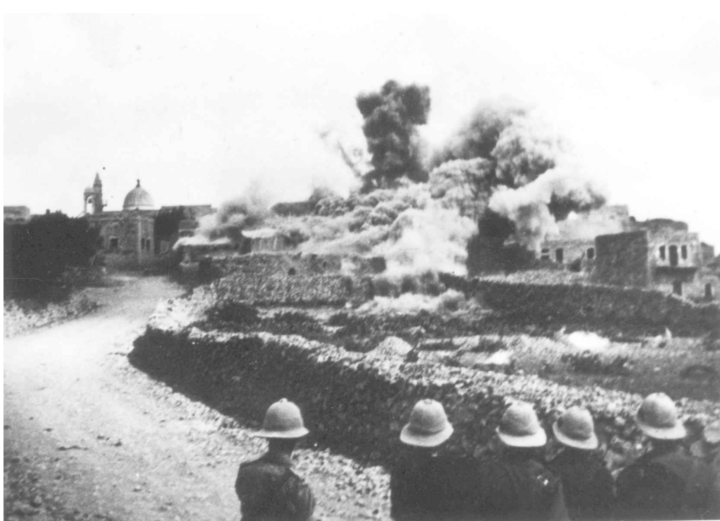


图20　惩戒性惩罚：英国军队摧毁了被怀疑支持1936—1939年阿拉伯起义的村民的房屋。这种未走常规程序而进行的集体惩罚，其合法性来自英国统治当局为打击阿拉伯起义而通过的一系列紧急法规。1936—1940年间，大约有2000所房屋被毁。



图21　1943年8月17日，叙利亚议会召开。在1941年7月自由法国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后，叙利亚人投票选举出了他们首个独立政府。民族联盟获得了明显的多数，在第一届议会会议（如照片中所示）中，该党派领导人舒克里·古瓦特里当选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



图22　1945年5月29日，叙利亚议会一片狼藉。尽管法国做出了保证，但戴高乐的政府无意承认叙利亚的完全独立，拒绝将该国军队的控制权移交总统古瓦特里的政府。1945年5月，当叙利亚人起身进行民族主义示威时，法国人突袭了议会，向政府机关开火，并炮轰大马士革的住宅区，试图将他们的权威强加在不情愿的叙利亚人身上，但他们的尝试失败了。1946年4月，最后一名法国士兵撤离叙利亚。

1948年为巴勒斯坦而战



图23　这张摆拍的宣传照展现了一群集合了常规军和非常规军的士兵，在一名头戴缠头的穆斯林宗教人士的指挥下，保卫耶路撒冷城墙，抵御犹太人的进攻。



图24　事实上，巴勒斯坦战士在1948年没有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由于缺乏装备和训练，没有人拥有能与1948年他们所面对的犹太部队相匹敌的战斗经验。更糟糕的是，他们低估了对手。5月14日，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后，他们被犹太部队彻底击败。



图25　1952年7月在埃及掌权后不久的埃及自由军官们。51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坐在桌后）是平均年龄34岁的年轻自由军官中的老政治家。1954年，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中校（坐在纳吉布右边）软禁纳吉布并就任总统。站在纳吉布右边的是纳赛尔的得力助手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少校。埃及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中校安瓦尔·萨达特坐在左数第四位。



图26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即将登上那架将他们送向被俘命运的摩洛哥客机。1956年10月22日，法国战机拦截了这架原本飞往突尼斯的DC-3飞机，并迫使该机在阿尔及利亚城市奥兰降落。艾哈迈德·本·贝拉、穆罕默德·黑德尔和霍辛·艾耶特·艾哈迈德（从左至右）被捕并被关押至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摩洛哥素丹穆罕默德五世之子穆莱哈桑王子（后来的哈桑二世国王，照片中身着制服）为这些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者送行。

1958年黎巴嫩内战



图27　1958年7月，在抵制总理拉希德·卡拉米、总统福阿德·谢哈卜新政府的民众抗议活动中，很多前总统卡米勒·夏蒙的基督徒妇女支持者走上街头，用扫帚柄来骚扰黎巴嫩政府军的士兵。据称有很多妇女在冲突中受伤。



图28　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爆发后，总统夏蒙以压制“共产主义颠覆”为由寻求美国支持，黎巴嫩也成为唯一一个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条款的国家。3天之内就有约600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海岸线登陆，他们的一举一动引发了贝鲁特居民的密切关注。在10月25日未发一枪一弹而悄然撤离前，这支部队的数量已增至1.5万人，还保有第六舰队和舰载飞机的支持。［原标题：好奇的黎巴嫩人观看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休息……］



图29　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上校是1958年7月推翻哈希姆王室的伊拉克革命的领导人之一。7月14日，阿里夫成功占领伊拉克国家广播电台，向震惊的伊拉克民众宣布了国王费萨尔二世的死讯以及共和国建立的消息，伊拉克人民全力支持革命。图中阿里夫正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向聚集的支持者发表讲话，阐述新政府的目标和改革计划。随后在1963年，阿里夫又推翻了总统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从而成为伊拉克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1967年6月战争



图30　1967年6月5日清晨，以色列空军向埃及、约旦、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突袭，从而掀开了1967年6月战争的帷幕。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内，以色列人

摧毁了埃及85%的战斗机，使其空军基地完全瘫痪。在取得了空中优势后，以色列地面部队横扫西奈、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彻底击溃了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军队。图中是以色列士兵正在西奈的一处空军基地检查被摧毁的埃及战机。



图31　1967年6月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迫使超过30万名巴勒斯坦人逃往位于约旦河东岸寻求避难。战争期间，连接约旦河东西两岸的道路、桥梁遭到彻底破坏，这也使得难民们的逃亡之路更加凶险。很多新难民仅带着少量可携带的财产就踏上了逃亡之路。

巴勒斯坦劫持事件



图32　莱拉·哈立德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成员。1969年，她成功劫持了环球航空公司一架由罗马飞往大马士革的飞机，最终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被安全释放。其第二次行动针对一架以色列客机，但被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安保人员挫败，她的同伴被

当场击毙，她本人则被制服，并在飞机紧急迫降伦敦后被英国警方逮捕。作为犯人交换计划的一部分，莱拉·哈立德于1970年10月1日被英国政府释放。



图33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控制了约旦首都安曼以东道森机场的一条废弃跑道，并宣布将其重新命名为“革命机场”。1970年9月6日至9日，“人阵”先后将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客机、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客机以及一架瑞士航空客机劫持至“革命机场”。9月12日，在清空机上全部310名人员后，3架被劫客机全部被炸毁。这次行动成功地吸引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但也驱使侯赛因国王在1970—1971年血腥的“黑九月”战争中将巴勒斯坦运动彻底清除出约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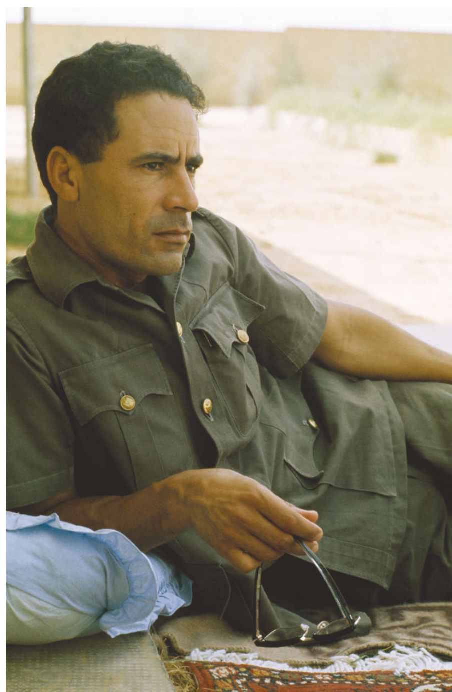


图34　年轻上尉穆阿迈尔·卡扎菲于1969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利比亚王室，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民众国”。1970年，他宣布将利比亚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声称政府将垄断国内石油资源的生产、标价和利润。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追随其步伐，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全球经济影响力。



图35　1973年10月6日下午，埃及军队跨越苏伊士运河，成功突破了以色列人沿巴列夫防线所布置的坚固的沙筑工事防御体系。由于是在犹太人的赎罪日发动袭击，埃及人打得以色列人措手不及，在进攻发起后仅几分钟之内就成功地在1967年6月战争中失去的西奈领土上升起了本国国旗。这也是阿拉伯世界在长达20年的战争状态中首次在战场上击败这个犹太国家。



图36　经过一周的激烈战斗，以色列人重整旗鼓，开始向叙利亚和埃及发动攻势。他们利用埃及人10月6日以水枪在巴列夫防线防御工事上打开的缺口横渡苏伊士运河，包

围了位于运河西岸的埃及军队。结果战场上两国陷入僵持，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则将这一军事僵局转化为政治优势。



图37　在1973年10月激战正酣之际，阿拉伯产油国动用了其石油武器，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美国因其对以色列战备工作的支持，面临着阿拉伯世界的全面石油禁运。1973年1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对阿拉伯国家的巡回访问期间，呼吁沙特国王费萨尔解除沙特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但并未取得成功。1974年3月，阿拉伯产油国才最终解除了石油禁运。



图38　在1974年11月13日受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期间，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享受了国家元首级别的待遇。以色列代表团从其前排座位上集体退场，以示抗议。“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他在座无虚席的大厅中说道，“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



图39　1975—1976年黎巴嫩内战期间，整片整片的贝鲁特街区因内战暴力而被夷为平地。然而，这仅仅是一场延续长达15年的冲突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黎巴嫩国内没有一块土地能够幸免。

1981年10月6日安瓦尔·萨达特遇刺



图40　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遇刺身亡。萨达特为庆祝作为其总统任期高光时刻的1973年战争，每年都坚持全身戎装地出席10月6日的阅兵仪式。1979年后，埃及因打破阿拉伯内部阵线、与以色列单独签署和平协议而遭到孤立，一年一度的阅兵式对萨达特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图为1981年埃及总统乘坐一辆豪华敞篷轿

车，参加他的最后一次10月6日阅兵。



图41　阅兵式意料之中的沉闷突然被打破：一辆炮兵卡车突然脱离车队，车上的武装人员向检阅台开火。萨达特总统几乎当场死亡，刺杀者是一名叫哈立德·伊斯兰布里的伊斯兰主义者。他高喊道："我杀死了法老，我不怕死。"



图42　发生在萨布拉、沙蒂拉难民营的暴行，迫使美国、法国和意大利部队返回黎巴嫩。尽管是作为维和部队进入黎巴嫩，但为了支持总统艾敏·杰马耶勒政府，他们却被迫卷入了黎巴嫩的战斗。1983年10月23日，一系列经过精心协调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将法国和美国营地夷为平地，瞬间就炸死了241名美军士兵和58名法国伞兵部队军人。图中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在其位于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总部的废墟中开展救援行动。



图43　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什叶派发展为一支新兴的力量。他们与1983年针对法国和美国军队总部的袭击以及一系列针对黎境内以色列部队的毁灭性袭击关系密切。1985年，在伊朗支持下一个名为真主党的新组织悄然成立。作为一支民兵力量，真主党的活动使得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阵地难以维持，最终迫使以色列于2000年单方面撤军。图为1989年什叶派宗教人士在贝鲁特西区领导真主党成员举行阿舒拉节庆祝活动。



图44　为了将巴解组织战士逐出黎巴嫩首都，1982年7月以色列人对贝鲁特西区进行了围攻，也让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经历了一轮前所未有的暴力。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介入下，以色列人才于8月解除了对贝鲁特的包围。根据调解结果，巴解组织战斗人员将在一支由美国、法国、意大利的维和人员组成的国际部队的监督下完成撤离。



图45　1982年8月22日，巴勒斯坦战士登上卡车驶往不远处的贝鲁特港，在那里他们将登船开启流亡之旅。自从1970—1971年巴解组织被逐出约旦以来，贝鲁特就一直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武装斗争的中心。巴勒斯坦战士宣称在抵制以色列人围攻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他们是在巴勒斯坦旗帜和阿拉法特的画像之下，携带着武器撤离贝鲁特的。



图46　在1948年战争中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至今仍居住在难民营内。这些难民成为黎巴嫩基督徒民兵组织易于袭击的目标，后者指责巴勒斯坦人应为黎巴嫩内战期间几次最严重的暴力冲突负责。1982年9月，在多国部队撤离贝鲁特、马龙派总统巴希尔·杰马耶勒遭暗杀身亡后，基督徒民兵在以色列人的掩护下进入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进行了疯狂屠杀。图中为屠杀刚刚结束后一位幸存者走在萨布拉难民营的瓦砾边。



图47　1991年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击退了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在遭受长达数周的空袭之后，伊拉克军队在地面战斗开始前夕点燃了科威特国内700口油井，打响了对科威特及其支持者的环境和经济战。



图48　伊拉克军队急于在惨烈的地面战争开始前撤离科威特，征用了大量卡车和汽车。在科威特向北通往伊拉克的80号高速公路上，数以千计的伊拉克车辆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被美国战机击毁，这条公路也因此被称为“死亡公路”。过度的杀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也迫使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1991年2月28日终止了“沙漠风暴”行动。



图49　解放科威特带来了一个计划之外的结果：巴以之间开启了第一次有意义的和平进程。在挪威外交部的支持下开展的秘密“二轨外交”，最终促成巴以双方于1993年9月13日签署《奥斯陆协议》。签署当日，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协调下，多年的对手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在白宫实现历史性握手。

出版者言

当今的世界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将会走向哪里，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思考者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应该努力回应、解答的问题。出版者应该成为文明的瞭望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活，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新。出版“好望角”书系，正是我们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解答读者灵魂之惑、精神之惑、道路之惑的尝试和努力。

本书系所选书目经专家团队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好望角”，让读者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打开新的视野，突破一隅之见。当然，书中的局限和偏见在所难免，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非洲南部“好望角”本名“风暴角”，海浪汹涌，风暴不断。1488年2月，当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的船队抵达这片海域时，恰风和日丽，船员们惊异地凝望着这个隐藏了许多个世纪的壮美岬角，随船历史学家巴若斯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海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佳评推荐

该书叙事堪称杰出、动人、华丽，随处可见光彩夺目的人物刻画、妙趣横生的旁白和权威睿智的学术洞见，当今世界的很多重要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西蒙·S．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金融时报》

本书以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世界作为起点，从地缘政治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角度出发，深度梳理五百年来阿拉伯人从摆脱外族奴役到建立主权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探究当今阿拉伯世界诸多困境的历史成因，谈古论今，视野开阔，行文朴实，雅俗共赏，尤其是选用史料丰富生动，构思独具特色，加之译者专业功底和语言能力俱佳，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目前学界难得一见的好书。

——中东史研究专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哈全安

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一部讲述阿拉伯人希望与失望的流畅动人的历史。

——《卫报》

极其生动和权威……他是运用阿拉伯资料的大师。

——马克思·黑斯廷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杰作……必读。

——安东尼·萨廷，《旁观者》

一部精心创作的历史杰作。如果你想了解现代阿拉伯人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本书是最佳选择。

——基什维尔·福克纳，《前景》

这是研究这个复杂而有争议地区的一块学术里程碑。西方学者关于中东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大多秉持外部视角。罗根……使用了大量阿拉伯语材料，从阿拉伯人自己的视角讲述阿拉伯人的历史。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尤金·罗根是讲述这个故事最有天赋的编年史家。

——阿维·施莱姆，《铁墙：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作者

关注大国之间的博弈和事件的发展过程，将阿拉伯历史置于现代语境之中。

——《经济学人》年度好书

尤金·罗根书写了一部权威而广博的历史。

——弗朗西斯·罗宾逊，《时代周刊文学副刊》

展现了西方的干涉和腐败的本土领导如何剥夺了阿拉伯世界的权利，且使其自我倾轧。

——乔治·彭德尔，《金融时报》年度好书

尤金·罗根要讲述的历史是血腥的、多样的、动人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段历史通常是大家不熟悉的……这是一本必读指南，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怀恨在心。

——迈克尔·派伊，《苏格兰人报》

［故事］引人入胜，讲述精彩绝伦……一直以来，阿拉伯人努力争取西方更平等的对待，但仍未成功，在这个大背景下分析［阿以冲突］，是本书最为突出的价值……堪称历史书写的典范。

——《经济学人》

他做到了一个凡人能做到的客观公正……若想对这一地区晚近的历史有一个清晰、高效、可靠的了解，本书必不可少。

——斯蒂芬·豪，《新人文主义者》

扣人心弦。

——迈克尔·克里根，《苏格兰人报》年度好书

一部有趣、优雅的作品，对这个多元民族的观察令人耳目一新。在美国，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性格常被严重误解（若非主动歪曲的话）。读一读，你会了解到很多。

——斯蒂芬·M．沃尔特，《外交政策》网站

［罗根］提供了一个棱镜，透过它，西方的普通读者可以看到五个世纪的喧嚣与狂热、混乱与困境……罗根学识渊博，极富人情味，他一直在全力呈现东西方之间大量的共同点。

——《大西洋月刊》

这项广博的研究在连贯叙事和细节呈现间取得了平衡，具有可读性和说服力。因此，罗根的作品当与希提和侯拉尼的早期经典相媲美。

——《外交事务》

罗根以一种既不草率又不激烈的方式，基于阿拉伯人自己的经历，勾勒了五百年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惊人的壮举……［罗根］能够收集并整合如此丰富的信息来展示各方的人性善恶，同时既不屈从也不接受传统观念，这是真正了不起的。希望美国的决策者能人手一册，并好好做笔记。

——《达拉斯新闻晨报》

一部文采斐然的宏大叙事作品，书写乐观与绝望……对广大读者来说，罗根的这部作品生动且富于感召力，兼具时效性和启发性。他通过一个个阿拉伯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和政治领袖的声音来讲述历史，提供了一个当下亟需的内部视角，同阿拉伯世界在媒体中的刻板形象构成微妙的反差。此外，对于阿拉伯世界与其历史上的“他者”——欧洲、西方和以色列间那些充满争议却又常被简单化的关系，本书揭示了一些不为人熟知且令人不安的事实。这本著作本身已十分引人入胜，又因其

同全球事务的相关性而为人们的思考提供了营养。

——《BBC历史杂志》

极具可读性……本书取材于日记、回忆录和报纸中的亲历者的叙述，这一叙述同许多西方历史学家所写的不同，它充满阿拉伯人报道和反思这些动荡事件的声音……本书的优点之一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就这一时期的历史而言，几乎没有其他历史学家试图去覆盖整个阿拉伯语世界。

——安娜·亚历山大，《社会主义评论》

第一手的故事、生动的叙述、出色的研究。

——玛丽·罗素，《爱尔兰时报》

阅读这样一本重要的新书让人愉悦，这本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写的，他介绍了一个地区的背景，这个地区在未来的几年中将越来越受人关注……罗根讲的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有关权力的故事，我们很难不被字里行间的激情打动……罗根的历史是有深度的。他为与他同时代的人们贡献了杰出的作品。

——马克·艾伦，《碑铭》

中译本序

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了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文件称："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源远流长"，已延续了2000多年。

很明显，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对追随者说："求知哪怕远至中国。"他的继任者奥斯曼·本·阿凡（Uthman Ibn Affan，644—656年在位）曾向唐朝派遣使节。801年，被阿拔斯王朝俘虏的旅行家杜环回到中国后曾撰文描述巴格达。15世纪初，著名的航海家郑和航行到过阿拉伯半岛。显然，阿拉伯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跨越了千年。

然而，在现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相对较新。经过几个世纪有限的交流，阿拉伯国家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与中国建立关系。从1956年5月同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建交开始，到1990年7月与沙特互派大使，中国用了34年的时间才与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0世纪下半叶，中阿关系的目标和成就依然不太显著。

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强国，在阿拉伯世界具有巨大影响力。阿拉伯世界已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2005—2014年间，双边贸易增长了500%。自2014年以来，中国对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出口都超过了美国。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宣布，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将在未来得到更显著的发展。

因此，我这本阿拉伯近现代史的著作在中国出版，适逢其时。随着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参与越来越深入，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将希望获得世界上更多的关于这个迷人地区的信息。历史是理解世界任何地方的必要起点。

我承认，当初写本书时，我并没有顾及中国读者。本书最初是我在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在纽约和华盛顿发动袭击后为西方读者写的。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对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做出回应，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发动了反恐战争。2001年和2003年以美国为首发动的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似乎证实了文明之间存在冲突，这对世界的稳定是有害的，并有可能加剧美国在“9·11”袭击后面临的安全威胁。

21世纪初，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因彼此误解而愈演愈烈。美国人开始将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对他们的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在反恐战争中奉行的政策，使西方成为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人民的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

作为一名在阿拉伯世界生活了10多年、研究这个地区40多年的西方学者，我觉得我有责任分享我的知识和经验，以帮助弥合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鸿沟。我想，于我而言，最佳的方式是为普通读者写一部历史，这部历史将采用过去5个世纪种种事件的阿拉伯亲历者的记述来记录阿拉伯人的现代历程，即阿拉伯人眼中的现代世界的历史。

在写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我试图展现外部势力如何对阿拉伯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奥斯曼时代即将结束时，英国和法国在该地区发挥了主导作用。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帝国时代开启，直至1971年英国从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撤出才结束。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前，美国和苏联就已经将中东拖入了冷战的分裂政治，1946—1991年，阿拉伯人一直处于超级大国的控制之下。自苏联解体以来，阿拉伯世界一直处于美国的单极势力之下。这使得进入21世纪以来的岁月成为阿拉伯现代史上最痛苦的时期。痛苦的经历鼓励阿拉伯人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以平衡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力。对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来说，中国就是解决之道。

20世纪，中国与中东的交往始终有别于其他世界大国。1949年，从自己的革命经历中走出来的人民共和国，积极推动反帝和民族解放运动。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并不试图将中东拖入冷战的分裂政治。相反，通过万隆会议，中国寻求推动一种替代冷战的不结盟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中东各国的领导人和人民非常有吸引力。

1956年5月，从埃及开始，阿拉伯国家开始与这个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有6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互派大使，其中既有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等革命共和国，也有也门和摩

洛哥等更为保守的君主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东和北非的其他国家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较为保守的阿拉伯海湾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在1984—1990年间也完成了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全面建交。

因此，在中东，中国是一个新的力量。中国来到这一地区时，既没有困扰欧洲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帝国遗产，也没有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庇护关系。然而，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影响力几乎肯定会改变其参与该地区事务的性质。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投资在使其参与中东经济的同时，也会使其参与中东政治。因此，对中东感兴趣的学者和决策者，将通过尽可能多地阅读该地区的历史而受益。为避免历史的错误重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特别有意义。

在我与中国大学的学术交流中，中国学者对当代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经济的认知水平让我印象深刻。我也注意到中国学者给这一地区的研究引入了不同的观点，挑战了西方学界的许多假设。因此，我相信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的交流可以增进我们彼此对这个共同感兴趣的地区的认识。我希望西方读者能够通过翻译了解更多关于阿拉伯近现代史的中国学术研究，并希望我们能基于中国档案了解更多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交流互动的历史。

我非常自豪和高兴地看到，我这部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著作能通过该领域的优秀学者——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的助理教授廉超群博士和李海鹏博士的优秀译本介绍给中国读者。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这一项目的倾情投入。同时，也非常感谢天津师范大学哈全安教授通读译稿，并对个别之处进行修改和完善。这些学者慷慨地贡献了他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深刻认识，使我能够同中国读者分享我对阿拉伯历史的思考。

尤金·罗根

2018年11月于牛津

目录

出版者言
佳评推荐
中译本序
序言
第一章　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
第二章　阿拉伯人挑战奥斯曼统治
第三章　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帝国
第四章　改革的危险
第五章　第一波殖民主义：北非
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第七章　大英帝国在中东
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第九章　巴勒斯坦灾难及其后果
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第十四章　冷战之后
第十五章　21世纪的阿拉伯人
致谢
图片版权许可
注释
原书索引
返回总目录

序言

菲达·哈姆迪（Fayda Hamdy）是在牢房里得知突尼斯总统下台的。这一天是2011年1月14日，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已经统治突尼斯超过23年了。为推翻这个强人，哈姆迪扮演了不小的角色，虽然她不敢向狱友承认这一点。哈姆迪是小城西迪布济德的市政巡视员，她被指控侮辱了一名街头小贩，后者的自焚在突尼斯激起全国范围的示威游行，并最终引发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一系列群众性运动，统称“阿拉伯之春”。

西迪布济德是突尼斯一个被游客和政府忽视的省内小城。4周前，2010年12月17日，菲达·哈姆迪在她家乡的菜市场里转悠。她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身着正式的蓝色制服，她的肩章和肩章上的条纹显示着她的权威。两名男同事陪伴着她。大多数无牌小贩会在巡视员接近时逃离，但26岁的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齐齐（Mohamed Bouazizi）拒绝让步。哈姆迪认识布瓦齐齐，且已经警告过他不要在市场附近无证销售水果。12月17日，布瓦齐齐坚持不走，指责巡视员骚扰、腐败。争吵升级，双方大吵大闹，布瓦齐齐护着他的推车，巡视员没收了这个年轻人的货物。

巡视员和布瓦齐齐间的这场致命的混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定论。年轻小贩的朋友和家人坚持认为，菲达·哈姆迪侮辱并掌掴穆罕默德·布瓦齐齐——“这在中东社会是一种严重侮辱”，随后命令同事没收了他的水果和秤。菲达·哈姆迪否认曾向这个街头小贩伸出过手，她声称，当巡视员没收他的货物时，“布瓦齐齐袭击了我们，割伤了我的手指”。细节很重要，因为布瓦齐齐的反应如此极端，以至于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和他不相干的人都难以解释他后来的行为。[1]

同巡视员的对抗让布瓦齐齐满心愤怒。对抗结束后，布瓦齐齐立即向西迪布济德市政办公室讨要说法，但没有得到同情的倾听，反而又遭到了殴打的羞辱。他转而去往市长办公室，但后者拒绝接待他。在那一刻，有根弦“啪”的一声断了。他的姐姐巴斯玛·布瓦齐齐解释说：“我弟弟的经历，从没收他的水果推车到被一个女人侮辱和扇耳光……足以让

他失去理智，特别是在所有市政官员都拒绝与他见面，他无法抱怨这种虐待行为之后。”

此刻已是中午，市长办公室周围的街道上挤满了市民，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往衣服上浇油漆稀释剂，点燃了自己。旁观者中，有人拍下了这一可怕的场景，有人急忙上前试图扑灭布瓦齐齐身上的火焰，他身上的烧伤面积达90%。他昏倒了，被送往附近城镇本阿鲁斯的医院。

布瓦齐齐孤注一掷的自焚行为让西迪布济德的市民们震惊。他们和他一样感受到了不公，普通民众在勉强维持生计，而政府似乎在与他们作对。当天下午，布瓦齐齐的朋友和家人在市长办公室外他自焚的地方举行了一次自发的示威。他们朝铁门扔硬币，喊着："这是给你的贿赂！"警察用警棍驱散愤怒的群众，但第二天，更多的示威者卷土重来。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并向人群开枪。两人被警察击中，伤重不治。此时，布瓦齐齐的病情也恶化了。

西迪布济德抗议的消息传到了首都突尼斯城，由毕业生、专业人士和受过教育的失业者组成的躁动不安的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了布瓦齐齐的苦难经历。他们将布瓦齐齐接纳为他们的一员，假称他是一名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尽管他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但他帮助支付他姐妹上大学的学费），沦落到靠售卖蔬果来满足生活需求。他们在脸书上建了一个小组，布瓦齐齐的故事极速传开了。阿拉伯卫星电视频道半岛台的一名记者获知了这个故事。政府控制下的突尼斯媒体没有报道西迪布济德发生的麻烦事，但半岛台报道了。西迪布济德的弱势群体起身行使他们反抗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权利，这一故事每晚在半岛台的网络中播出，传播给了全球的阿拉伯收视者。

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自焚，激起公众舆论反对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治下突尼斯的每一处不公：腐败、权力滥用、对普通民众处境漠不关心、经济发展未能给青年人提供机会。突尼斯的抗议运动激发起对这类问题十分熟悉的阿拉伯世界的公民，他们通过电视关注事态的发展。已掌权23年的本·阿里一筹莫展。示威扩散到卡塞林、塔莱、布尔吉巴营等其他穷困的内陆城市，最终在突尼斯城爆发。

突尼斯各城市持续升级的紧张局势迫使本·阿里做出回应。12月28

日，布瓦齐齐自焚11天后，突尼斯总统造访了这名濒死之人的病房。政府控制的突尼斯媒体，一直以来轻描淡写地报道全国各地的示威，这回却在黄金时段报道了总统的探视。报纸和电视上充斥着这样的画面：本·阿里满心关切地询问照料布瓦齐齐的医生——布瓦齐齐此时已失去意识，烧伤的身体裹在纱布中。本·阿里将布瓦齐齐的家人请到总统府，承诺他将尽一切所能挽救他们儿子的生命。他下令逮捕菲达·哈姆迪，这名被指控掌掴布瓦齐齐、刺激后者自焚的市政巡视员。

2011年1月4日，布瓦齐齐伤重不治。突尼斯的抗议者们宣布这名街头小贩为烈士，那位市政巡视员成为本·阿里政权的替罪羊。她同普通囚犯一起被关押在加夫萨，她对布瓦齐齐的死负有责任，公众对此大加斥责，因此律师们拒绝担任她的代理。哈姆迪向狱友们隐瞒了身份，自称是一名教师，因“掌掴一个小男孩”而入狱。她后来承认：“我害怕告诉他们真相。”[2]

1月前两周，示威蔓延到突尼斯的所有主要城镇。警察使用暴力回应，导致200人死亡，另有数百人受伤。但突尼斯的职业军队拒绝代表本·阿里的政权进行干预。当本·阿里意识到他不再享有军队的忠诚且没有任何让步举措可以安抚示威者时，便于2011年1月14日退下总统职位逃往沙特，此举震惊了他的国家和整个阿拉伯世界。菲达·哈姆迪同狱友一起在电视上关注着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突尼斯人民实现了看上去不可能实现的成就：通过民众抗议，他们推翻了阿拉伯世界一个根深蒂固的统治者。

突尼斯“革命”的影响震荡着阿拉伯世界各处。总统们和国王们紧张地关注着公民的行动把他们的同行赶下台。本·阿里是一个“终身总统”，但他不是唯一的。利比亚的统治者穆阿迈尔·卡扎菲、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埃及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分别于1969年、1978年和1981年掌权，他们都培养一个儿子接班。1970年起由阿萨德家族统治的叙利亚成为第一个完成世袭继承的阿拉伯共和国；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在他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后登上总统位。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分析家预测，如果一个根深蒂固的统治者可以在突尼斯下台，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也可能如此。[3]

生活在阿拉伯世界各专制政权下的人们对突尼斯人经历的挫败与压迫感同身受。2005年6月被暗杀的黎巴嫩记者萨米尔·卡希尔（Samir Kassir），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多年，就诊断出一种“阿拉伯痼疾”(Arab malaise)。他指出：“在当下做阿拉伯人并不好受。有些人感受着迫害，有些人则自我厌恶，一种深深的不安漫布阿拉伯世界。”这一不安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传遍阿拉伯世界，最终在2011年爆发。[4]

早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埃及公民就已动员起来要求变革。2004年，一群活动家组成埃及变革运动，称作“基法亚”（Kifaya，意为“够了”）。该运动抗议穆巴拉克延续其对埃及的统治且培养其子贾马勒（Gamal）继任总统。同样在2004年，埃及议会独立议员艾曼·努尔（Ayman Nour）组建明日党（Ghad Party）。在2005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大胆挑战穆巴拉克，让公众浮想联翩，但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遭到了选举腐败的可疑指控，获罪入狱3年。2008年，更年轻的、掌握计算机技术的政权反对者发起“4·6青年运动”，其脸书页面支持工人维权。年末，该运动成员已达数万之众，包括许多之前从未参与政治活动的人。

2011年以前的埃及草根运动，无论是否吸引了更年轻一代，都无法撼动穆巴拉克政权。2010年12月结束的议会选举被广泛谴责为埃及史上最腐败的选举，其中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获得了超过80%的席位。民众普遍认为，年迈的穆巴拉克正通过操纵顺从的议会为其子贾马勒的继位铺路。大部分埃及人对政治充满幻灭，他们选择抵制选举，拒绝给新的立法机构提供任何一点民众授权。在选举过后两个月，埃及人又从抵制转向积极呼吁推翻穆巴拉克政权。

受突尼斯人鼓舞，埃及的活动分子于2011年1月25日在开罗中心的解放广场组织起一场民众示威。示威者涌进广场，人数之众前所未见，达数十万人。以“1·25运动”著称的抗议浪潮席卷埃及其他主要城市，如亚历山大、苏伊士、伊斯梅利亚和曼苏拉，波及尼罗河三角洲和上埃及，从而使全国陷于停滞。

18天内，埃及的“革命”运动挑战穆巴拉克政权并取得胜利，让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政府使用了肮脏的手段，释放监禁的罪犯制造恐怖与

混乱。便衣警察扮作支持穆巴拉克的反示威群体，袭击解放广场的示威者。总统的手下甚至极尽表演之能事，对抗议者发动马、驼袭击。示威过程中，超过800人遇害，数千人受伤。但抗议者们以坚定的决心抵抗住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每一次恐吓，抗议者的人数持续增长。整个过程中，埃及军队拒绝支持政府，宣布抗议者的诉求合法。

同先于他下台的本·阿里一样，穆巴拉克认识到，没有军队的支持，他的位置是不稳固的。考虑到穆巴拉克本人是埃及的前空军司令，军队的沉默让人惊讶。2011年2月11日，埃及总统下台，解放广场欢声雷动，埃及举国欢腾。掌权约30年的侯斯尼·穆巴拉克曾被认为是不可击败的，他的下台证明，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将会从突尼斯和埃及传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

2月15日，示威在班加西爆发，标志着反抗穆阿迈尔·卡扎菲41年独裁统治的利比亚“革命”开始。同月，示威者在萨拿、亚丁和塔伊兹（Ta‘iz）国际通行的阿拉伯语拉丁转写系统用左半圆符“ʿ”表示阿拉伯语字母“ع”（浊咽擦音［ʕ］），用右半圆符“ʾ”表示阿拉伯语字母“ء”（声门塞音［ʔ］），这两个符号有时会分别简化为左单引号和右单引号。本书的英文原版采用了更为简便的处理方式，即将两个符号统一为右单引号，目的是尽可能降低非专业读者的阅读障碍。对中译本的读者来说，考虑到非专业读者可以直接略过拉丁转写的专有名词和术语，而专业读者则有了解原词的形态与拼法的需求，因此译者在译本的拉丁转写词中用左、右单引号对上述两字母进行区分。——译者注集结，要求也门统治者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下台。2月14日，示威者涌入麦纳麦的珍珠广场（Pearl Roundabout），将“阿拉伯之春”引入巴林。3月，叙利亚南部城镇德拉的非暴力示威引来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严酷政权的暴力镇压，开启了“阿拉伯之春”最为悲剧性的一章。

待到菲达·哈姆迪出狱时，突尼斯和阿拉伯世界整体已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哈姆迪最终在她的亲属中找到了一名代理律师，在2011年4月19日的一次庭审中洗脱了所有的指控。她被释放时，突尼斯已走出了穆罕默德·布瓦齐齐之死的一系列悲剧事件，正憧憬着本·阿里政权被推翻后的新政治时期，也在应对这一时期的挑战。她回到西迪布济德，继续供职于市政部门，但她不再巡视市场。她换下制服和贝雷帽，换上平民服

装，包上伊斯兰头巾。她的新装束体现了一个从军事威权主义转向伊斯兰民主实验的阿拉伯世界。[5]

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震惊了世界。在威权统治者治下稳定了几十年后，阿拉伯世界的各国被看似前所未有的急剧与戏剧性变化席卷。这就好像阿拉伯政治的地壳板块从地质时间转向现实时间。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历史是最好的向导——这是经常被政治分析者忽视的简单事实。在西方，低估历史对当下的价值再常见不过。正如政治评论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所写：“当美国人用‘这是历史’来评价某事物时，他们的意思是此事物（与当下）毫不相干。”[6]这个观点大错特错。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与知识分子若想了解“阿拉伯之春”的根源，应对2011年后阿拉伯世界面对的严峻挑战，需要更关注历史。

在现代，阿拉伯各民族一直绞尽脑汁应对内部与外部的重大挑战。他们寻求脱离外部势力的控制，推动变革，建立较少专制、对公民更为负责的政府。这些是阿拉伯现代史的大主题，决定了本书的书写方式。

对于他们的历史，特别是伊斯兰教产生后5个世纪，也即公元7—12世纪的历史，阿拉伯人极为自豪。这是伊斯兰帝国的黄金时代，基于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的诸帝国主导了世界事务。可以说，在伊斯兰兴起之初的几个世纪，阿拉伯人被界定为一个在阿拉伯半岛各部落之间共享一种语言（阿拉伯语）的民族，其中大多数人共同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回望伊斯兰初期，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视之为一个逝去的时代，其间阿拉伯人统治着世界。伊斯兰主义者特别响应这一说法，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最贴近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之时最强大。

11世纪末起，外来入侵者糟蹋了伊斯兰的土地。1099年，在血腥围困之后，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开启了十字军王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外族统治。1258年，蒙古人洗劫阿拔斯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当地居民的鲜血染红了底格里斯河。1492年，天主教收复失地运动（Catholic Reconquista）逐走了伊比利亚半岛最后的穆斯林。但开罗在马木鲁克苏丹国的统治（1250—1517）下，依然是伊斯兰权力的基地，该政权的统治范围包括当今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

和沙特的红海诸省。

只有在16世纪奥斯曼征服之后，阿拉伯人才开始被外国都城统治。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 the Conqueror）占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将该城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自此开始从那里统治他们日益壮大的帝国。伊斯坦布尔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横亘欧洲和亚洲，在两大洲都分布着街区。奥斯曼的伊斯坦布尔，尽管是逊尼派穆斯林帝国的首都，但却远离阿拉伯世界——距大马士革1500千米（940英里）、距巴格达2200千米（1375英里）、陆上距开罗3800千米（2375英里）。此外，奥斯曼帝国的行政语言是土耳其语，而非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对现代的探索是在他族统治下开始的。

过去的5个世纪内，奥斯曼人统治了阿拉伯人4个世纪。随着时间的延展，帝国在经历变化，统治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奥斯曼人的统治并不太苛刻：阿拉伯人必须承认素丹的权威，遵守他的法律和真主的法律（sharia，“沙里亚”，即伊斯兰法）。非穆斯林少数群体可以在社群领袖的领导下，依照自己的宗教法律，自行管理，只需向国家缴纳人头税。总的来说，在这个当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帝国内，阿拉伯人平静地看待他们的地位，即一个伊斯兰帝国中的穆斯林。

18世纪，统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达到权力的顶峰，但在1699年遭受了第一次领土丧失，欧洲的敌手们夺取了克罗地亚、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乌克兰的波多利亚省。这个现金流干涸的帝国开始拍卖政府职位和行省农业地产作为税收来源。这让边远省份的强人们积聚了大量土地，从中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与权力挑战奥斯曼政府的权威。18世纪下半叶，一批这样的本地领袖对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发起了严峻挑战。

到19世纪，奥斯曼人开启了一个重大改革阶段，旨在平息帝国内部的挑战，遏制欧洲邻国的威胁。这个改革时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统治模式，反映了源自欧洲的有关公民的新思想。奥斯曼改革试图在行政、兵役和税收等领域建立所有公民间的权利和义务平等，对土耳其人和阿拉

伯人一视同仁。他们推动构建一个新的认同——奥斯曼主义，试图跨越奥斯曼社会各种民族与宗教分野。改革并没能保护奥斯曼人免受欧洲的侵蚀，但确实让帝国加强了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在民族主义侵蚀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位置之际，诸阿拉伯行省变得益发重要。

但那些启发了奥斯曼改革的思想，也同样带来了关于民族与社群的新观念，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人心中催生了不满，不满其自身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他们开始对奥斯曼人的统治恼怒不满，日益指责后者使阿拉伯人自12世纪起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对比过去的辉煌与当下在奥斯曼帝国内的卑微屈膝，以及这个帝国在更为强大的欧洲邻国面前的节节败退，阿拉伯世界中的许多人呼吁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推行改革，并期盼阿拉伯独立。

1918年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覆灭，对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是开启独立与民族荣耀新纪元的分水岭。他们希冀在奥斯曼帝国的灰烬上复活一个伟大的阿拉伯王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其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呼吁民族自决，这让他们振作不已。但他们将面对苦涩的失望，因为他们会发现新的世界秩序不是基于威尔逊的原则而是欧洲的规则。[7]

英、法利用1919年的巴黎和会将现代国家体系施于阿拉伯世界，除了阿拉伯半岛中南部，所有阿拉伯地区都陷入了某种殖民统治。在刚刚脱离奥斯曼统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国人给予这两个殖民地共和形式的政府。而英国人则赋予他们的阿拉伯领地伊拉克和约旦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君主立宪。巴勒斯坦是唯一的例外，在那里，英国人不顾本地居民的反对而承诺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破坏了建立民族政府的所有努力。

殖民势力给每个新阿拉伯国家确定了首都，作为政府驻地，并向统治者施压，要求制定宪法、组建民选议会。边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人为设定的，由相邻国家协商确定，但常伴有争执。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这些举措，认为它们分裂且削弱了阿拉伯民族，后者只有通过更广泛的阿拉伯统一才能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即成为受人尊敬的世界性力量。但是，根据欧洲的规则，只有获得承认的民族国家才是合法的政

治实体，这与是否拥有帝国的历史根源并不相干。

殖民时代的一个长期遗产是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伊拉克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间的矛盾。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阿拉伯国家开始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两种民族主义间的分歧已成为永久性的。其中的问题是，大部分阿拉伯公民相信，基于殖民主义所创制的政治体的、更小范围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不合法的。对于那些期待阿拉伯人在20世纪重振雄风的人来说，只有更广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才能有如下前景：动员起足够多的民众、团结一致，这对于恢复阿拉伯人在当今各国中应有的位置而言是必需的。殖民经历让阿拉伯人成为一群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社群，对于这样的结局，阿拉伯人一直深感失望。

二战撼动了欧洲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战后的岁月是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亚洲与非洲各国从殖民统治者手中获得独立，而独立往往需要借助武力。20世纪下半叶，美国和苏联成为主导性的大国。两国之间的对抗被称为冷战，将界定一个新的时代。

莫斯科和华盛顿为争夺全球统治权而进行激烈竞争。美国和苏联都试图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东由此成为超级大国对抗的几个竞技场之一。尽管已进入民族独立时期，但阿拉伯世界的回旋空间依然受到外部规则即冷战规则的限制，时长近半个世纪（1945—1990）。

冷战的规则很直接：一国可以成为美国或苏联的盟友，但不能同时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总的来说，阿拉伯人民对美国的反共产主义与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的政府试图通过不结盟运动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但徒劳无功。最终，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被迫站队。

那些进入苏联势力范围的阿拉伯国家自称“进步国家”，但西方则称他们为“极端国家”。这些国家包括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过革命的每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利比亚。而那

些选择站在西方这边的阿拉伯国家——自由共和制的突尼斯和黎巴嫩以及保守君主制的摩洛哥、约旦、沙特和海湾国家，则被进步的阿拉伯国家称为“反动国家”，被西方认为是“温和国家”。这样就形成了超级大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庇护关系，阿拉伯国家从超级大国那里获得军火来发展军队、获得援助来发展经济。

只要两个超级大国存在，这个体系就能维持相互制衡。苏联和美国都不敢在该地区发起单边行动，担心激起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敌对回应。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府官员生活在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之中，日夜操劳，防止中东点燃这样的大战之火。阿拉伯领导人也知道如何游走于超级大国之间，他们以倒向敌对阵营来威胁庇护国，以获得更多的军火和发展援助。尽管如此，到冷战结束时，阿拉伯人十分清楚，他们离冷战初所希望实现的那种程度的独立、发展和尊严依然遥远。随着苏联的解体，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对之更为不利。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冷战结束。对阿拉伯人而言，这个单极化的时代始于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苏联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领导的打击克里姆林宫昔日盟友伊拉克的战争时，格局已然确定。冷战期间的稳定状态被一个不受限制的美国力量主导的时代取代，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担心出现最坏的状况。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政策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各任总统推行了非常不同的政策。对于苏联解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来说，冷战结束意味着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开始。一直到比尔·克林顿，国际主义与接触战略一直是美国政策的特征。2000年，乔治·沃克·布什当选后，新保守派上台，美国转向单边主义。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到袭击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并最终发展成针对伊斯兰世界、以阿拉伯人为主要嫌疑人的反恐战争。巴拉克·奥巴马试图撤销布什政府的许多政策，削减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此过程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主导的单边主义时代的规则，被证明是自现代以来对阿拉伯世界最为不利的。没有其他强国来限制美国的权力，阿拉伯各国政府发现

他们正面临切切实实的入侵和政权更迭的威胁。将“9·11”之后的几年描述为阿拉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毫不夸张，“阿拉伯之春”不过是一个简短而悲剧性的中断。萨米尔·卡希尔在2004年观察到的，今天依然成立：“在当下做阿拉伯人并不好受。”

过去200年，阿拉伯人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从外部势力获得独立而奋斗。同时，阿拉伯各国人民也在试图限制本国统治者的专制权力。“阿拉伯之春”不过是阿拉伯人为实现问责政府和法治社会而进行的世纪斗争的最新一章。

到18世纪末，专制主义已是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常态。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只有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做到了用选举议会限制王权。1789年之后，西方国家开始普遍推行宪法：1789年在美国，1791年在波兰和法国，1814年在挪威，1831年在比利时。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产生了：法律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臣民获得了具有更高法律地位的公民地位。

在19世纪的第一个25年访问欧洲的阿拉伯人，归来后会着迷于他们在巴黎和伦敦所接触到的新政治思想。埃及宗教学者里法阿·塔赫塔维（Rifa‘a al-Tahtawi）1831年从巴黎归国后，将1814年法国宪章的全部74条翻译成阿拉伯语。生活在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Ali）的专制统治之下，塔赫塔维对于法国宪法对国王的限制和对公民的保护大为惊叹。突尼斯改革家海伊尔丁·突尼西（Khayr al-Din al-Tunisi）受塔赫塔维作品的启发，主张推行宪法，限制突尼斯总督的专横统治。突尼斯和埃及分别于1861年和1882年推行宪法，这两个最早立宪的阿拉伯国家也是最先经历“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下一波宪政改革同一战之后欧洲的殖民统治的开启同步。1923年的埃及宪法、1925年的伊拉克宪法、1926年的黎巴嫩宪法和1930年的叙利亚宪章，都显示了阿拉伯人基于合法政府和法治、为谋求从殖民统治中独立而做的努力。尽管这些宪法赋予阿拉伯国家以选举的、多党制的立法机构，但殖民当局竭尽全力破坏阿拉伯人的主权。自由宪政受到损

害，成为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

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以色列痛击阿拉伯国家，控制了巴勒斯坦托管国78%的土地作为新生的犹太国家。战争失败后，阿拉伯自由主义遭到否定。缺乏战备让爱国军官同他们的国王或总统心生隔阂；以色列这个新生国家的军队，被阿拉伯的宣传机器贬斥为“犹太黑帮”，败于这样的军队，削弱了阿拉伯公民对新近独立的阿拉伯各国政府的信心。阿拉伯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叙利亚（1949）、埃及（1952）、伊拉克（1958）、也门（1962）和利比亚（1969）的军事政变扶持果敢的行动派人士掌权，统领由技术专家官员组成的政府。这些军事政权既是（国家）民族主义的，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它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军事强盛、独立于外部势力的新时代。作为回报，这些新的军事统治者要求他们的公民绝对服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社会契约，阿拉伯公民自愿停止他们为限制专制统治而付出的努力，来换取政府的承诺，满足他们的需求。

进入21世纪，这一既有的阿拉伯社会契约被违背了。到2000年，除了富裕的石油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无力兑现承诺。一个愈发明显的趋势是：只有该地区统治者的一小部分朋友和家人才能从经济机遇中获益。贫富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加深，引人担忧。阿拉伯各国并不处理公民合法的抱怨，反而以更加高压的方式回应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更糟糕的是，这些高压式的政权通过世袭继承积极维持他们家族对政治的掌控，年迈的总统们培养他们的儿子接班。不仅阿拉伯社会契约被破坏，而且这些失败的政权还有可能让自己屹立不倒。

2011年，阿拉伯各国人民站起来，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试图重新制约统治者。开罗城中心的一个标语牌上这样写道：“人民不应该害怕政府，政府应该害怕人民。”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没能持续。强人重新掌权——只有突尼斯是个例外，2010年12月菲达·哈姆迪和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致命冲突使这场运动首先在那里爆发。此后在那个国家形成的脆弱的宪政秩序，是将成为未来阿拉伯社会秩序的预兆，还是“阿拉伯之春”一个独特的成功案例，目前尚不得而知。

一味强调阿拉伯历史上的各种冲突是错误的，因为这湮没了阿拉伯世界引人入胜之处。作为一名毕生研究中东的学生，我被阿拉伯历史吸引是由于其丰富与多元。我在贝鲁特和开罗度过童年，之后在美国上大学时，我对中东产生了兴趣。我在大学里学习了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以便能阅读阿拉伯历史的原始材料。在细读宫廷记录和编年史、档案文献和手稿、日记和回忆录的过程中，阿拉伯历史让我既熟悉又陌生，这深深吸引了我。

阿拉伯世界在过去5个世纪所经历的种种，与全球其他人所经历的相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革命、工业化、城乡移民、为妇女权益而斗争，所有这些人类现代历史的宏大主题都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呈现。但又有许多元素让阿拉伯人不同：他们城市的样貌、他们的音乐和诗歌、他们作为伊斯兰教“选民”的特殊地位（《古兰经》中对真主用阿拉伯语向人类降下最后的启示，强调了不下10次）以及他们对于民族社群的概念——从摩洛哥延伸至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人是多元的，但又由一个基于语言和历史的共同认同维系在一起，这让他们愈加有吸引力。他们是一个民族，同时也是许多民族。从摩洛哥到埃及，跨越北非的游历者会发现方言、书法、景观、建筑、饮食、统治方式、经济活动的类型都在发生万花筒似的改变。如果这个旅行者继续穿越西奈半岛，进入肥沃的新月地带，他会注意到在巴勒斯坦和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伊拉克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差异。从伊拉克向南进入海湾国家，阿拉伯世界展现出邻国伊朗的影响。阿曼和也门则反映出东非和南亚的影响。所有这些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但他们都认为自己被共同的阿拉伯历史所维系。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试图通过均衡叙述北非、埃及、肥沃的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的历史经历，来合理地处理阿拉伯历史的多元性。与此同时，我也试图展示这些地区历史之间的联系。例如，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如何影响了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以及对法国在摩洛哥统治的反叛如何影响了对法国在叙利亚统治的反叛。不可避免的是，在叙述中一些国家占据了过多的篇幅，而另一些国家则被遗憾地忽视了，对此我很抱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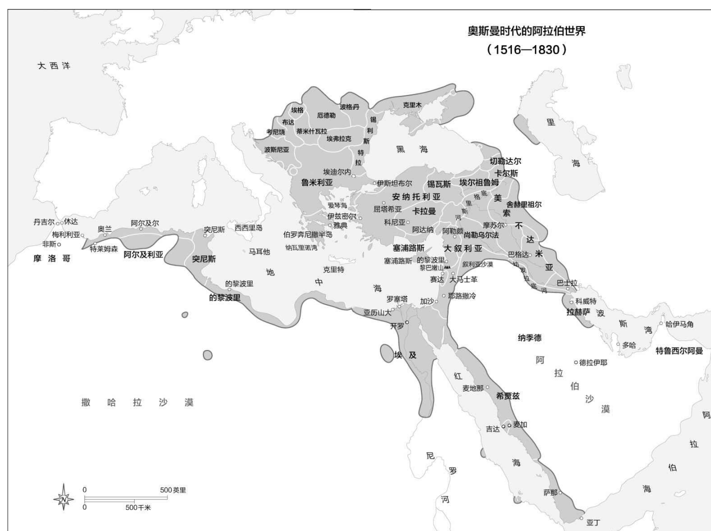
我参考了各种各样的阿拉伯资料，使用了生活在阿拉伯动荡岁月中的亲历者的叙述：从早年间的编年史，到大量来自知识分子、记者、政客、诗人、小说家、出名的与平凡的人的记录。在我看来，偏向使用阿拉伯资料来书写阿拉伯人的历史是非常自然的，正如偏向使用俄罗斯的资料来书写俄国人的历史那样。一些外国权威人物，如政治家、外交官、传教士和旅行者，都有关于阿拉伯历史的洞见值得分享。但我相信，如果西方读者能够读到阿拉伯人对他们所生存时代的描述，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阿拉伯历史，则读者们对该历史会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章　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

夏日骄阳炙烤着艾什赖弗·冈素·奥乌里（al-Ashraf Qansuh al-Ghawri）。这位马木鲁克（Mamluk）王朝的第49任素丹，正在检阅即将出征的军队。自1250年建立王朝以来，马木鲁克人一直统治着这个当时最古老、最强盛的伊斯兰国家。这个以开罗为首都的帝国，覆盖了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年逾古稀的冈素，已执政15年。此时，他正在帝国的最北端，叙利亚阿勒颇城外的达比格草原（Marj Dabiq），应对马木鲁克史上最大的威胁。而他即将失利，这次失利将触发马木鲁克帝国的覆灭，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阿拉伯世界铺平道路。检阅的这一天，是1516年8月24日。

冈素头戴轻型缠头，以抵御叙利亚沙漠上的烈日。他身披象征王室威严的蓝色斗篷，肩负战斧，驾着阿拉比亚战马，检阅军队。但凡有战事，马木鲁克素丹往往亲自领兵出征，并带着大部分政府官员随军征战。这就好比美国总统带领半数内阁成员、众参两院领导人、最高法院法官、主教与拉比们，同军官与士兵一起戎装出战。

马木鲁克军队的将领们，同4位大法官一起，站在素丹的红色旌旗下。他们的右侧，是帝国的精神领袖，哈里发穆台瓦基勒三世（al-Mutawakkil III）。他站在自己的旌旗下，同样戴着轻型缠头，身披斗篷，肩负战斧。40名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头绑黄色丝绸包裹的《古兰经》抄本，围绕着冈素。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是绿色、红色和黑色旌旗下，各神秘主义苏非教派的领袖。



两万名马木鲁克士兵在平原上集结，这一壮观的场景，定会让当时身处其中的冈素和他的随从们赞赏有加，信心满满。“马木鲁克”，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被拥有的”或“奴隶”，指一个精英奴隶士兵阶层。来自欧亚草原和高加索基督教地区的年幼男子，被带至开罗。在那里，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接受军事训练，远离家人与故乡，并全身心地忠于他们的主人——包括拥有他们的人和教育他们的人。在接受最高水准的军事训练，并被灌输对宗教与国家的无限忠诚之后，成年的马木鲁克会被赋予自由，并跻身统治精英阶层。他们是近身肉搏战中的终极斗士，曾经战胜过中世纪最强大的军队。1249年，马木鲁克人击败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的十字军。1260年，他们将蒙古军队逐出阿拉伯人的领土。1291年，他们驱走了伊斯兰世界最后的十字军。

集结的马木鲁克军队呈现出壮观的景象。士兵们身披色彩鲜亮的丝质战袍，他们的头盔和铠甲采用当时最高水准的工艺，他们的武器由高强度的钢铁制成，并镶嵌黄金。外在的华美，是骑士精神的要素之一，也是渴求胜利的勇士们彰显自信的标志。

战场的另一端，奥斯曼素丹手下久经沙场的战士们对马木鲁克人虎视眈眈。奥斯曼帝国源自13世纪同基督教拜占庭帝国进行“圣战”的一个突厥穆斯林小王国，地处安纳托利亚（现代土耳其的亚洲领土）。14—15世纪，奥斯曼人兼并了其他突厥王国，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领土。1453年，奥斯曼帝国第七任素丹穆罕默德二世

（Mehmed Ⅱ）成功攻占君士坦丁堡，完成对拜占庭帝国的征服，这是之前所有穆斯林政权都未曾做到过的。在此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以“征服者”闻名于世。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穆罕默德二世的继任者们雄心不减，继续为他们的帝国开疆拓土。1516年的这一天，冈素将要同塞利姆一世（Selim Ⅰ，1512—1520年在位）作战，他是奥斯曼帝国第九任素丹，外号“冷酷者”。

冈素在他的北部边境展示军事实力，但与之矛盾的是，他原本打算借此来避免战争。奥斯曼帝国与波斯萨法维帝国相互敌对。萨法维人统治的地区在现今的伊朗，他们同奥斯曼人一样说突厥语，可能是库尔德民族的一支。他们那位魅力超凡的领袖，伊斯玛仪沙(1)（Shah Ismail，1501—1524年在位），下令立什叶派伊斯兰教为萨法维帝国的官方宗教，这将他置于同奉行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之中。[1]1514—1515年间，奥斯曼人和萨法维人因争夺东安纳托利亚爆发战争，前者取得了胜利。萨法维人急切寻求同马木鲁克人联盟以抵抗来自奥斯曼人的威胁。冈素并不特别支持萨法维人，但他想要维持地区的势力均衡，希望部署在叙利亚北部的强大马木鲁克军队可以将奥斯曼人的扩张之心限制在安纳托利亚，将波斯留给萨法维人，将阿拉伯世界留给马木鲁克人。马木鲁克的军事部署对奥斯曼帝国的侧翼构成了战略威胁。同冈素的预期相悖的是，为规避两线作战的风险，奥斯曼素丹暂时停止同萨法维人的敌对，专心对付马木鲁克人。

马木鲁克人派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奥斯曼军队的规模要大得多，训练有素的骑兵和步兵总人数多达马木鲁克军队的3倍。根据当时历史纪年学家的估计，塞利姆的军队总人数为6万人。同对手相比，奥斯曼人还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马木鲁克人的老式军队倚重士兵的个人作战能力，而奥斯曼人则派出一支装备火枪的现代火药步兵团。马木鲁克人固守中世纪的军事理念，而奥斯曼人则代表着16世纪战争的现代面貌。同通过赤手肉搏赢得个人荣誉相比，作风顽强、经验丰富的奥斯曼士兵对取胜后获得的战利品更感兴趣。

两军在达比格草原交战，奥斯曼的火枪重创马木鲁克的骑士军团。

在奥斯曼军队的攻击下，马木鲁克军队的右翼溃败，左翼叛逃。左翼的指挥官是阿勒颇城的长官，他是一名马木鲁克，名叫海伊尔贝伊（Khair Bey）。事后发现，早在交战前，海伊尔就已经和奥斯曼人结盟，转而效忠“冷酷者”塞利姆。海伊尔的背叛给奥斯曼人在战斗开始不久就送去了胜利。

马木鲁克素丹冈素·奥乌里惊恐地看着他的军队在他周围溃散。战场上尘土飞扬、浓烟滚滚，两军都几乎无法看见对方。冈素不再相信他的士兵们能获胜，他转向他的宗教顾问们，催促他们祈求胜利。一名马木鲁克军官意识到局势的不可逆转，他取下并叠好素丹的旗旗，对冈素说：“素丹啊我们的主人，奥斯曼人已经击败了我们，您去阿勒颇自救避难吧！”当领会到军官所说属实时，素丹突然中风，半身动弹不得。他试图跨上他的马，却摔了下来，当场死亡。四散奔逃的随从们抛弃了素丹，他的尸体再也未曾找到过，仿佛大地裂开，吞噬了这位坠落的马木鲁克的身体。

待到硝烟散去，这场屠杀的恐怖景象全部显现出来。马木鲁克编年史家伊本·伊耶斯（Ibn Iyas）这样写道：“这是一段暴怒的时间，使婴儿白头，将铁融化。”战场上尸横遍野，濒死的人与马在呻吟，获胜的奥斯曼人急切地劫掠倒下的敌手，迅速终结了呻吟。他们留下“无首的尸身和布满尘土、面貌狰狞的头颅”，任凭乌鸦和野狗吞食。[2]对马木鲁克人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失败，这次打击让他们的帝国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达比格草原之战的胜利让奥斯曼人成为叙利亚的主人。“冷酷者”塞利姆进入阿勒颇，未遭到任何抵抗。他又继续兵不血刃，占领大马士革。9月14日，战斗结束后约三周，战败的消息传到开罗。幸存的马木鲁克将领们集聚开罗，选出了新一任素丹。他们选择冈素的副手艾什赖弗·图曼贝伊（al-Ashraf Tumanbay）继任。图曼贝伊是最后一位马木鲁克素丹，他的统治只维持了三个半月。

“冷酷者”塞利姆从大马士革写信给图曼贝伊，给了他两个选择：投降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可继续统治埃及；抵抗则面临彻底的毁

灭。读信时，图曼贝伊因害怕而哭泣，因为他不能选择投降。恐惧开始笼罩马木鲁克素丹的士兵与臣民。为了维持纪律与秩序，图曼贝伊发布公告，禁止出售葡萄酒、啤酒和大麻，违者以死刑论处。但编年史家称，焦虑不安的开罗居民对素丹的命令置若罔闻，面对迫近的入侵威胁，他们从毒品和酒精中寻找慰藉。[3]当奥斯曼人攻陷沿海城市加沙、屠戮千人的消息传来，恐怖的气息笼罩整个开罗城。1517年1月，奥斯曼军队进入埃及，向马木鲁克帝国的首都进发。

1月22日，塞利姆抵达开罗北郊。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图曼贝伊的士兵们毫无斗志，许多部队没有报到履职。城市传令官被派往开罗的大街小巷，威胁说要把每个逃兵绞死在他自家门前。通过这种方式，图曼贝伊集结了他所能集结的所有士兵，骑兵、步兵和贝都因人非正规军，总计大约2万人。吸取达比格草原之战的教训，图曼贝伊解除了骑士制度对火器的禁令，给大批士兵配备了火枪。他还准备了100辆装备轻型火炮的战车来对抗入侵者。开罗的男男女女来到战场上为军队呐喊，为胜利祷告。这支没有军饷、缺乏自信、基本靠不住的马木鲁克军队，在战斗日来临时，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非为胜利而战。

1517年1月23日，战斗打响。“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伊本·伊耶斯写道，“只要一提起它，就足以让人心生恐惧并失去理智。”战鼓擂响，马木鲁克骑兵跨上战马，驰向战场。他们遭遇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奥斯曼军队，“像蝗虫一样涌来”。伊本·伊耶斯称，接下来的战斗要比先前的达比格草原失利更糟糕，土耳其人“像乌云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他们的枪声震耳欲聋，他们的进攻击搏挽裂”。不到1小时，马木鲁克的防御者们伤亡惨重，全线撤退。图曼贝伊并没能比他的大多数将领坚持战斗更久，他退了下来，发誓择日再战。[4]

胜利的奥斯曼军队袭击了开罗，对这座城市进行了3天的洗劫。无助的平民听任入侵的军队摆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和财产被洗劫。面对奥斯曼士兵的暴虐，开罗民众唯一的庇护是奥斯曼素丹本人，他们竭尽全力讨好新主人。清真寺中，传统上以马木鲁克素丹之名进行的周五聚礼，变为向塞利姆素丹致敬，这是承认王权的传统方式之一。布道者们缓慢而庄重地念道：“真主保佑素丹，两陆与两海之王的儿子、统率两军的征服者、两伊拉克的素丹、两圣城的仆人、胜利的国王塞利

姆沙。两世的主啊，请赐予他永远的胜利。”“冷酷者”塞利姆接受了开罗的臣服，他指示他的大臣们宣布大赦并恢复安全秩序。

在击败马木鲁克军队近两周后，塞利姆素丹进入开罗城。这是大多数开罗居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瞻仰他们的新主人。伊本·伊耶斯生动地描绘了这位奥斯曼征服者：

> 当素丹穿过城市时，所有的民众都为他欢呼。据说他肤色白皙，下巴刮得干干净净。他大鼻大眼，身材短小，戴着小缠头。他举止轻浮而不安分，在骑行时不时左顾右盼。据称他当时约40岁。他没有以往素丹们的威严。他秉性邪恶，嗜血，暴躁，不能忍受别人的顶撞。[5]

马木鲁克素丹逃亡期间，塞利姆在开罗坐卧难安。奥斯曼人知道，只要图曼贝伊活着，他的支持者就会谋划他的复辟。只有他公开死亡，才能使这些希望彻底破灭。1517年4月，“冷酷者”塞利姆获得了这个机会，贝都因部落成员背叛了逃亡的图曼贝伊，将他交给了奥斯曼人。塞利姆强迫图曼贝伊在开罗城中游街示众，以确凿无疑地告诉人们这就是那位被罢黜的马木鲁克素丹。游街结束于开罗的一个主要城门祖韦拉门（Bab　Zuwayla）。在那里，刽子手们将图曼贝伊拉出来，在惊恐万分的人群面前绞死了他。行刑时，绞绳断了，据说断了两次，这似乎表明神明非常不情愿允可弑君。“当他的灵魂终于屈服，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大叫，”编年史家如此记载，从而记录下公众在见证这一前所未有的场面时的震惊与恐惧。“过去我们从未目睹过在祖韦拉门下绞杀埃及素丹的场面，从来没有！”[6]

对塞利姆素丹来说，图曼贝伊的死值得庆祝。随着马木鲁克王朝的覆灭，塞利姆完成了对马木鲁克帝国的征服，并将他们所有的财富、土地和荣耀都转到了他自己的王朝。在将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省纳入奥斯曼帝国之后，他现在可以荣归伊斯坦布尔了。希贾兹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意义非凡。穆斯林相信，正是在这里，在麦加城，真主第一次向先知穆罕默德降示《古兰经》，而正是在临近的麦地那，先知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团。现在，塞利姆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仆人与保护者添加到素丹的君王头衔上，赋予素丹以宗教合法性。

这些成就向世人昭示，塞利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的素丹。

在离开开罗之前，塞利姆要求看一部著名的埃及皮影戏，这是一种在照亮的幕布上投出剪影来表演的偶人戏。他只身独坐欣赏着剧中的场景。皮影大师制作了一个祖韦拉门的模型和一个图曼贝伊素丹被绞死那一刻的形象。当演到绳子断了两次时，这位奥斯曼素丹“觉得这场面很有趣。他给了这位艺术家200第纳尔和一件丝绒的荣誉斗篷。‘当我们出发去伊斯坦布尔时，跟我们一起走吧，让我的儿子也看看这个场景。’塞利姆对他说”。[7]他的儿子苏莱曼将在3年后继承奥斯曼王位和塞利姆从马木鲁克人手中征服的一切。

奥斯曼人征服马木鲁克帝国是阿拉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马木鲁克剑士和奥斯曼枪手之间致命的兵器冲突标志着阿拉伯世界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的开始。奥斯曼人的征服还意味着，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阿拉伯世界第一次被一个非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统治。公元661—750年间，伍麦叶王朝，伊斯兰教的第一个王朝，在大马士革统治着他们快速扩张的帝国。750—1258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在巴格达统治着当时最伟大的穆斯林帝国。建于969年的开罗，在1250年马木鲁克王朝兴起之前，曾是至少四个王朝的首都。从1517年起，阿拉伯人将通过外国首都制定的规则来商议他们的国际地位，这一政治现实将被证明是现代阿拉伯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尽管很多人因“冷酷者”塞利姆的血腥征服而担惊受怕，但事实证明，从马木鲁克向奥斯曼统治的过渡要比他们所预想的顺利。13世纪以来，阿拉伯人一直被讲突厥语的外族人统治，奥斯曼人同马木鲁克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个帝国的精英都是基督教奴隶出身。两个帝国都是官僚国家，都遵守宗教法，并都建立强大的军队保护伊斯兰领土免受外部威胁。此外，现在谈论反对“外国”统治的独特的阿拉伯身份认同为时尚早。在民族主义时代之前，身份认同同个体的部落或城镇出身相关。若阿拉伯人有更为宽泛的身份认同，则更有可能基于宗教而不是种族。大多数阿拉伯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对他们来说，奥斯曼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统治者。对当时的人们而言，行政中心从阿拉伯世界迁至横跨欧洲和

亚洲大陆的伊斯坦布尔，似乎并不成问题。

看起来，阿拉伯人是从务实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从马木鲁克向奥斯曼统治的转变的。他们更关心法律、秩序和合理的税收，而非思考被土耳其人统治意味着什么。埃及历史学家阿卜杜·拉赫曼·哲拜尔提（‘Abd al-Rahman al-Jabarti）在19世纪初就对奥斯曼早期的统治表达了尊重：

> 奥斯曼人在其统治开始阶段是正统哈里发以来伊斯兰社团最好的统治者之一。[8]他们是最强大的宗教捍卫者和非信徒的反对者，因此，他们通过攻城拔寨扩大领土，这是真主赐予他们及其副手的。他们控制了地球上最宜居的地区。四面八方的王国向他们俯首称臣。他们不忽视国家，而是保卫其领土和边疆。他们坚持举行伊斯兰仪式……尊崇宗教领袖，支持维护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并通过遵守伊斯兰法律和惯例来维护司法的规则与原则。他们的统治是稳固的，他们的控制是持久的，国王们敬畏他们，自由民和奴隶们都服从他们。[9]

叙利亚的村民和市民并不为马木鲁克帝国的覆灭而哀悼。伊本·伊耶斯讲道，饱受过度征税和专横统治之苦的阿勒颇居民，阻止从达比格草原败退的马木鲁克人进入阿勒颇城，并且“用比奥斯曼人更糟的方式对待他们”。当“冷酷者”塞利姆进入阿勒颇城时，“城里点灯庆祝，集市上烛光闪耀，为他祈祷的声音不绝于耳，人们欢欣鼓舞”，庆祝摆脱了之前马木鲁克的统治。[10]根据大马士革编年史家穆罕默德·本·突伦（Muhammad ibn Tulun，1475—1546）的记载，大马士革人也对政治统治者的更迭无动于衷。他对马木鲁克统治末期的描述总是提及税收的无度、官员的贪婪、中央政府的无能、马木鲁克埃米尔肆无忌惮的野心、乡村地区安全的缺乏以及治理不善造成的经济困境。[11]相比之下，伊本·突伦赞赏奥斯曼人的统治，后者给大马士革省带来了法律、秩序和正常的税负。

相较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马木鲁克帝国的覆灭可能更为显著地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腹地位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

首都伊斯坦布尔横跨帝国的欧洲和亚洲行省。阿拉伯世界远离奥斯曼帝国的中心，阿拉伯民族为帝国不同族裔的人口增添了新鲜血液。阿拉伯人本身是一个多元的民族，他们共同的阿拉伯语分化成多种方言。从阿拉伯半岛穿越肥沃的新月地带到北非，方言之间越来越不能相通。尽管当时（一如现在）大多数阿拉伯人同奥斯曼土耳其人一样是逊尼派穆斯林，但也有相当规模的少数群体，包括伊斯兰教的分支派别、基督徒和犹太人。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也十分多样，不同的阿拉伯地区都有各自独特的烹饪、建筑和音乐传统。历史也分裂了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产生后的数个世纪中，不同的地区曾被不同的王朝统治。阿拉伯世界的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地理疆域、文化和人口结构。

如何为他们新获得的阿拉伯领土设计切实可行的行政架构，是奥斯曼人面对的一个实际挑战。阿拉伯人并入奥斯曼帝国时，帝国正迅速向波斯、黑海地区和巴尔干地区扩张。帝国政府为新领土培训和任命合格行政官员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帝国疆域的迅速扩张。只有那些最接近奥斯曼帝国腹地的地区，比如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才处于标准的奥斯曼统治之下。离安纳托利亚越远，奥斯曼人就越努力维持原有的政治秩序，从而确保这些地区实现最顺利的政治过渡。奥斯曼人是实用主义者，而非空想家，相较于将他们自己的方式强加于阿拉伯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在这些新的领土上维护法律和秩序，并定期收取合理的税收。因此，在征服之后的初期阶段，奥斯曼人采用多样的方式统治诸阿拉伯行省，并实行广泛的自治。

在叙利亚和埃及，奥斯曼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在马木鲁克行政人员中组建一个忠诚的政府。只有马木鲁克人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替奥斯曼人统治叙利亚与埃及。然而，奥斯曼人不能指望马木鲁克人的忠诚。奥斯曼统治的第一个10年，爆发了一系列暴力叛乱，马木鲁克的一些要人试图脱离奥斯曼帝国，恢复马木鲁克对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

在征服马木鲁克帝国后的头几年里，奥斯曼人基本上保全了前朝的机构，让马木鲁克埃米尔(或称“长官”)掌管。他们以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开罗三大城市为中心，将前马木鲁克的领土划分为三个行省。阿勒颇

是第一个完全由奥斯曼人统治的行省，一名奥斯曼人被任命为阿勒颇的总督。该省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民众并不知道，奥斯曼人的征服将开启阿勒颇历史上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那个时代，阿勒颇将成为亚洲和地中海之间一个重要的陆上贸易中心。虽然距离海岸约50英里，但阿勒颇吸引了荷兰、英国和法国的黎凡特公司开设办事处，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12]当威廉·莎士比亚让《麦克白》中第一个出场的女巫谈论一名水手的妻子时，她说“她的丈夫是‘猛虎号’的船长，到阿勒颇去了”，环球剧场的观众都知道她在说什么。

塞利姆素丹选择马木鲁克人担任大马士革和开罗的总督。他任命的两位总督差别很大。他指定詹比尔迪·加萨里（Janbirdi al-Ghazali）任大马士革的总督。在马木鲁克时期，詹比尔迪是叙利亚的一名总督，曾在达比格之战中英勇抗击奥斯曼人。他率领马木鲁克军队袭击了塞利姆在加沙的部队，并负伤。之后带着余部撤回开罗，协助图曼贝伊守卫开罗。

很明显，塞利姆赞赏詹比尔迪对他的马木鲁克君主所表现出的正直和忠诚，并希望他能将这份忠诚献给他的奥斯曼新主人。1518年2月，塞利姆授予詹比尔迪马木鲁克时期大马士革总督所拥有的一切职权，作为交换，詹比尔迪每年纳贡23万第纳尔。[13]将如此多的权力移交给一人却不加制衡，显然是有风险的。

在开罗，塞利姆选择马木鲁克时期的阿勒颇总督海伊尔贝伊任总督。在达比格草原之战前，海伊尔贝伊曾与塞利姆通信，向这位奥斯曼素丹效忠。在达比格草原之战中，他弃阵而去，将阵地留给了奥斯曼人。后来，他被图曼贝伊逮捕，关入开罗的监狱。塞利姆攻占开罗后，释放了海伊尔贝伊，并表彰了这位阿勒颇前总督的贡献。然而，塞利姆从未忘记海伊尔贝伊背叛了他的前马木鲁克君主。根据伊本·伊耶斯的记载，塞利姆曾用他的名字玩文字游戏，称他为“海因贝伊”（Khain Bey），即“叛徒阁下”。[14]

塞利姆素丹在世时，这些行政安排并没有受到质疑。1520年10月，消息传来，塞利姆驾崩，年轻的苏莱曼王子登上奥斯曼王位。继任奥斯

曼王位后，新素丹苏莱曼面临着阿拉伯行省的一连串叛乱。一些马木鲁克人认为，他们效忠的是作为征服者的塞利姆素丹，而非他的王朝。

第一次马木鲁克起义爆发在大马士革。詹比尔迪·加萨里试图恢复马木鲁克帝国，并宣布自己为素丹，王号“最尊贵的王”（al-Malik al-Ashraf）。他穿戴马木鲁克的服饰和轻型缠头，禁止大马士革人穿戴奥斯曼服饰。他禁止清真寺的布道者以苏莱曼素丹的名义念诵周五聚礼的祷文。他开始将奥斯曼士兵和官员驱逐出叙利亚，的黎波里、霍姆斯和哈马都支持他。他组建了一支军队，准备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回阿勒颇。[15]

阿勒颇人民仍然忠于奥斯曼素丹国。他们哀悼塞利姆的死，并以苏莱曼的名义念诵周五聚礼的祷文。当总督得知叛军迫近，他开始加强阿勒颇的防御。12月，詹比尔迪的部队包围了这座城市。叛军炮击阿勒颇城门，将燃烧的弩箭射过城墙，但守军修复了破损的城墙，挡住了詹比尔迪的部队。在围城15天后，大马士革人撤退了。在围困过程中，大约200名阿勒颇居民以及一些士兵被打死。[16]

眼见反叛受挫，詹比尔迪回到大马士革巩固自己的地位并集结部队。1521年2月，他前往大马士革郊区与一支奥斯曼军队作战。詹比尔迪的军队很快被击溃，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恐慌席卷了大马士革。詹比尔迪企图脱离奥斯曼帝国并重建马木鲁克统治，但却徒劳无果。由于支持詹比尔迪，大马士革人失去了和平服从奥斯曼统治所能带来的好处。

刚刚击败詹比尔迪的军队现在开始洗劫大马士革城。根据伊本·突伦的记载，有3000多人被杀，城镇街区和邻近村庄被劫掠，妇女和儿童被俘虏。詹比尔迪的头颅和1000名阵亡士兵的耳朵被当作战利品送到伊斯坦布尔。[17]马木鲁克人对大马士革的影响就此终结。此后，大马士革将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奥斯曼总督直接统治。

在埃及，奥斯曼人的统治反复受到挑战。虽然塞利姆质疑开罗马木鲁克总督的诚信，称他为“叛徒阁下”，但海伊尔贝伊在1522年去世前一直维持着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统治秩序。奥斯曼当局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任命了一位新的总督来取代他。1523年5月，两名来自埃及中部的地

方官员利用这段空位期发动了一场叛乱，并得到一些马木鲁克人和贝都因首领的支持。埃及的奥斯曼驻军迅速镇压了叛乱，许多马木鲁克叛乱分子随后被监禁或处死。

接下来的挑战来自新任命的奥斯曼总督本人。艾哈迈德帕夏（Ahmad Pasha）渴望成为一名伟大的维齐尔，即奥斯曼政府的首相。仅获埃及总督的任命让他颇为失望，为满足自己的野心，他试图自立为埃及的独立统治者。他于1523年9月抵达开罗，此后不久，就开始解除开罗奥斯曼驻军的武装，并将大批步兵遣回伊斯坦布尔。他释放了因参加去年起义而被监禁的马木鲁克人和贝都因人。随后，艾哈迈德帕夏宣布自己为素丹，并命令他的支持者杀死城堡中残余的奥斯曼部从。和詹比尔迪一样，他要求周五聚礼的布道者以他的名义念诵祷文，并下令铸造刻有他名字的钱币。然而，他的反叛是短暂的。他的对手攻打他，迫使他撤退到乡下。1524年3月，他在那里被捕并斩首。伊斯坦布尔向开罗派遣了一位新的总督，明确指示他终结马木鲁克的势力，将埃及更为全面地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此后，苏莱曼素丹证明了他完全有能力赢得阿拉伯臣民的忠诚。直到他统治结束，再没有威胁奥斯曼人统治的叛乱发生。

在塞利姆完成征服后的10年内，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已稳定地处于奥斯曼统治之下。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是整个帝国的决策者和立法者的家园。统治集团的顶层是素丹，他享有绝对君权，他的话就是令状。他住在托普卡珀宫（Topkapi Palace），在高墙后面俯瞰皇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从宫殿的城墙向山下走，在一组宏伟的大门后面，是大维齐尔和他的大臣们的办公地。这个内阁中枢以其最独特的特点——大门而闻名。在土耳其语中，该中枢被称作“*Bab-i Ali*”，即“高门”。这个词在法语中被译作“*La Sublime Port*”（高大的门），又被英译成“Sublime Porte”（高大的门），或简称“the Porte”（门）。奥斯曼宫廷和内阁这两大机构为各阿拉伯行省乃至整个帝国制定了新的统治规则。

奥斯曼人的统治带来了新的治理实践。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统

治是一种封建主义形式，中央政府将土地授予军事指挥官们。获得该职位的人负责监督司法的运转，并从他的土地上征税。他用他的土地收益供养一定数量的骑兵，并向中央财政缴纳一笔固定数额的税款。与欧洲的封建主义不同，奥斯曼制度不是世袭的，因此没有产生一个与素丹的权力相抗衡的贵族阶层。这一制度非常适合迅速扩张的帝国，因为开疆拓土的速度超过了国家培养训练有素的官员来管理领土的能力。官员们负责簿记，盘点帝国的财富。他们编制了详细的税务登记，罗列了各行省中每一个村庄应纳税的人、家庭、田地和收入的数量。这些登记理应每30年更新一次，但在16世纪期间，国家开始忽视簿记。到17世纪，这种做法就完全消失了。[18]

叙利亚新设立的奥斯曼行省——阿勒颇、大马士革，以及后来的沿海省份的黎波里（位于今黎巴嫩），被划分为较小的行政单位，由军事指挥官负责管理。行省总督被授予最大的封地，作为回报，总督需要为素丹的征战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并向素丹的国库缴纳固定额度的税收。行省的军事指挥官被授予了第二大的封地，较低级别的指挥官所获封地的大小取决于他们的军衔以及他们预计为素丹的军事行动提供军队的数量。[19]这一经过调整的封建制度并未在埃及实行，对埃及的统治继续在奥斯曼总督和马木鲁克军事指挥官之间不稳定的伙伴关系中进行。

各阿拉伯行省的行政人员由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任命，他们往往来自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地区。同马木鲁克人一样，奥斯曼人也运行着自己的奴隶征募制度，来源地主要是他们治下的各巴尔干行省。每年一度的征募将年轻的基督教男孩从他们的村庄中带走，这在土耳其语中叫作“*devshirme*”，意为“男孩征募”。男孩们被送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接受训练，为帝国服务。身体健壮的男孩被送去接受军事训练，以加入精锐的禁卫军步兵团。头脑聪慧的男孩则被送去宫廷接受训练，以在宫廷或官僚机构中从事文职工作。

以现代标准衡量，男童征募看上去是不折不扣的野蛮行为：孩童成为奴隶，在远离家人的环境中成长，并被强制皈依伊斯兰教。然而，在当时，这是在一个流动性相当有限的社会中向上流动的唯一手段。通过男孩征募，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将军或大维齐尔。事实上，奥斯曼军队和政府的精英队伍基本上只在征募的男孩中选录。大多数阿拉伯人是自

由出生的穆斯林，他们被排除在这种征募之外，这意味着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权力精英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20]

苏莱曼二世素丹统治时期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在法律上界定了奥斯曼行省的行政架构。在西方，他以“大帝”（the Magnificent）闻名，而在本国，则以土耳其语外号“立法者”著称。在苏莱曼死后两个多世纪，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对他实行的法律和行政改革的功劳大加赞赏：“立法者苏莱曼素丹确立了政府管理原则，完成了帝国的构建，并划分了各行省。他在黑暗中闪耀，燃起宗教的光辉，扑灭异教徒的火焰。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国家（即埃及）一直是他们帝国的一部分，也一直服从奥斯曼人的统治。”[21]行政法则以一份名为“法典”的宪法文件的形式被送往各行省。各行省的法典明确了总督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并以白纸黑字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当时，它代表了政府问责制度的最高水平。

第一部行省法典起草于1525年艾哈迈德帕夏叛乱之后。苏莱曼二世素丹的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担负着恢复奥斯曼素丹对埃及统治的使命，引入法典是这一使命的核心部分。这部法典非常综合，规定了直到村庄级别的行政框架。它明确了公职人员在保障治安、维护灌溉系统和征税方面的责任。关于土地调查、慈善捐赠、谷仓维护和海港管理，法典也都有明确的规定。这部法典甚至规定总督应该多久与他的行省资政委员见一次面（每周4次，就像伊斯坦布尔的帝国资政会议一样）。[22]

为了执行法律，奥斯曼行政长官需要守纪、可靠的部队。各省总督指挥的部队由奥斯曼正规军和本地征募的非正规军组成。部队中的精英是禁卫军，他们的指挥官是伊斯坦布尔直接任命的。像大马士革这样的城市，会有一支由500—1000名禁卫军组成的步兵来维持当地秩序。还有一些骑兵部队，由该省的财政收入来供养。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档案，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间，阿勒颇、的黎波里和大马士革三省共有8000多名骑兵。[23]这些正规军得到了本地征募的步兵和北非雇佣军的协助。

司法是除总督和军队之外，奥斯曼统治体系的第三个要素。伊斯坦布尔中央政府向各行省省会派遣一名大法官统领伊斯兰法庭。虽然基督徒和犹太人有权在他们自己社区的宗教法庭上解决内部纠纷，但许多人

选择在穆斯林法庭申诉或记录交易。所有伊斯坦布尔颁布的皇家法令都会在法庭上公开宣读并登记在册。除刑事案件外，法院还为争议各方提供仲裁，担任记录商业合同和土地交换的公证人，并登记人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结婚和离婚、寡妇和孤儿的安置以及死者个人财产的分配等。所有案件和交易都被正式登记在法院的档案中，许多记录留存至今，是了解奥斯曼帝国城镇日常生活的宝贵资料。

苏莱曼二世被证明是奥斯曼帝国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在长达46年（1520—1566）的统治期间，他完成了他父亲开启的对阿拉伯世界的征服。1533—1538年，他从波斯萨法维帝国手中夺取了巴格达和巴士拉。那里的逊尼派民众遭受了什叶派萨法维人的多年迫害，他们视奥斯曼军队为解放者。对伊拉克的征服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都有重要意义。苏莱曼二世巩固了他的帝国，将古老的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纳入麾下，并阻止了什叶派教义向逊尼派地区的扩张。

16世纪30—40年代，苏莱曼二世的部队从埃及向南推进，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地区。1525—1574年，在西地中海地区，苏莱曼将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北非沿海地区以朝贡附属国的形式纳入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到16世纪末，除了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之外的阿拉伯半岛中部和摩洛哥素丹国，阿拉伯世界的其余地区都在帝国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

每一块阿拉伯土地都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特定的情况下，带着不同的历史和行政背景，并入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在每一个阿拉伯行省的统治故事都是独特的，深受这些行省并入帝国时所处状况的影响。

奥斯曼征服北非更多通过海盗行为而非传统战争实现。当然，一方眼中的海盗对另一方来说是海军上将。16世纪，在英国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中，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的海盗行为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作为伊丽莎白一世王国的骑士和她最受信任的顾问之一，人们几乎不会将他和众所周知的海上强盗形象挂上钩。海伊尔丁

（Khayr al-Din）也是如此。他是奥斯曼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上将之一，因红胡子而被同时代的欧洲人称为“巴巴罗萨”（Barbarossa）。对西班牙人来说，他是一个无情的海盗、地中海航运的祸害，他把数千名战斗中被俘的基督教水手卖为奴隶。对北非沿海地区居民来说，他是一名神圣的战士，对西班牙占领者发动“圣战”，他所获得的战利品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奥斯曼人来说，他是他们中土生土长的一员，大约在1466年出生于土耳其海岸附近的爱琴海的米蒂利尼岛。

16世纪初，西地中海是基督教和穆斯林军队之间激烈冲突的战场。1492年，格拉纳达沦陷，西班牙完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结束了穆斯林对西班牙近8个世纪的统治（711—1492）。在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自主改宗迅速转变成强制皈依，面对这样的形势，大多数伊比利亚穆斯林离开家园到北非寻求庇护。这些被称为摩里斯科人的穆斯林难民从未忘记自己的家园，也从未原谅西班牙。西班牙的君主，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Aragon），无情地将“圣战”推向地中海对岸、摩里斯科人藏身的各穆斯林王国。从摩洛哥到利比亚，他们沿着北非海岸线建立了一系列堡垒殖民地，或称“要塞”，并迫使内陆城镇的地方首领向西班牙纳贡。其中两处殖民地，摩洛哥海岸线上的休达和梅利利亚至今仍是西班牙的属地。

西班牙的侵略扩张几乎没有遭到北非穆斯林小国的反对。基于非斯（在今摩洛哥）、特莱姆森（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三个地方王朝统治着西北非。它们向西班牙君主纳贡，不敢向控制其主要港口和码头的西班牙要塞发起任何挑战。穆斯林统治者与西班牙侵略者的合作让他们失去了臣民的信任。很快，当地的狂热分子开始组织自己的部队来反抗入侵者。由于要塞是通过海上补给的，西班牙的船只比坚固的堡垒本身更易受到攻击。当地的水手武装了船只，在海上开展“圣战”，在西方，这些人被称为“巴巴里海盗”（Barbary corsairs，“巴巴里”可能源自古希腊语，指“野蛮人”，更可能源自对北非土著柏柏尔人的指称）。当这些海盗从他们攻击的西班牙船只上掠夺财物、奴役船员时，他们视他们的战争为同基督教侵略者的宗教冲突。对西班牙人的大胆攻击使这些海盗成为当地的英雄，并赢得了沿岸阿拉伯和柏柏尔居民的支持。

海伊尔丁是最著名的巴巴里海盗。他追随兄长阿鲁吉（‘Aruj），后

者在阿尔及尔以东的小港吉吉里建立了一个独立小政权。阿鲁吉沿着阿尔及利亚向西扩张其势力范围，并于1517年占领特莱姆森。第二年，他试图守卫特莱姆森失败，被西班牙人杀害。海伊尔丁认识到，巴巴里海盗若想守住他们的地盘、对抗强大的西班牙帝国，需要一个强大盟友的支持。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他把巴巴里海盗的“圣战”发展成一个成功的战争机器。

1519年，海伊尔丁派遣一名使者，携带礼品和一封阿尔及尔人民的请愿书赴奥斯曼宫廷，请求塞利姆素丹提供保护，并提出将他们自己置于素丹的统治之下。当时“冷酷者”塞利姆行将就木，他同意将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带纳入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他让海伊尔丁的使者带着一面奥斯曼旗帜和2000名禁卫军回去复命。世界上最伟大的穆斯林帝国开始同西班牙舰队交战，这给西地中海的均势带来了决定性的改变。

同奥斯曼人新立盟约，巴巴里海盗备受鼓舞，他们将战线扩展到了北非沿海以外地区。海伊尔丁和他的将领们攻击了位于意大利、西班牙和爱琴海诸岛的目标。16世纪20年代，他像在海上航行的罗宾逊一样，劫持欧洲的粮船，向遭受干旱、物资短缺的阿尔及利亚沿海居民派发粮食。他的船只将摩里斯科人从西班牙救出，将他们带回他控制的城镇定居，并让他们加入他同西班牙的战斗。

然而，海伊尔丁和他的部下最出名的是他们对西班牙船只的攻击。他们击沉桨帆船，释放穆斯林奴隶，缴获数十艘敌舰。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沿海地区，“巴巴罗萨”这一名字引起了人们的恐惧，这是有理有据的。海伊尔丁的部下俘虏的基督徒达数千人，他们将其中的贵族扣下以赚取高额赎金，将平民卖为奴隶。这给穆斯林海盗们带来了一种浪漫的正义感：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前曾被西班牙人俘虏，并被卖为桨帆船上的奴隶。

西班牙海军需要一名海军上将来与海伊尔丁对垒。1528年，皇帝查尔斯五世（Charles V）雇佣著名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1466—1560），让他率军与海伊尔丁交战。多里亚是热那亚人，他养着一支舰队为欧洲的君主们提供租用服务。由此看来，他同海伊尔丁一样是一名海盗。

多里亚是一位伟大的海军上将，但海伊尔丁更伟大。在他们18年的地中海对决中，多里亚很少能胜过他的奥斯曼对手。他们在1530年的第一次相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529年，经过短暂的围困，海伊尔丁的军队攻占了阿尔及尔湾的西班牙要塞。西班牙的战俘沦为奴隶，被驱使去拆除堡垒，而堡垒的石头被用来建造防波堤，以保护阿尔及尔港。失去战略要塞的查尔斯五世暴跳如雷，紧急召集了一个国务会议。安德烈亚·多里亚建议袭击阿尔及尔西侧的歇尔谢尔港。1530年，多里亚的军队在歇尔谢尔附近登陆，释放了数百名基督徒奴隶，但却遭到居住在这个城镇中的摩里斯科人的顽强抵抗，他们正急切地渴望同西班牙人一战。海伊尔丁派遣了一支救援部队。为避免同更庞大的奥斯曼舰队交战，多里亚撤回了他的战船，将西班牙士兵遗弃在歇尔谢尔。坚持抵抗的西班牙士兵被杀，投降者则沦为奴隶。海伊尔丁羞辱了西班牙人两次，从而稳固了他在阿尔及尔的地位。

这名巴巴罗萨也提升了他在素丹眼中的地位。1532年，他受邀赴伊斯坦布尔会见苏莱曼大帝。他带着一支由44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出发，一路上蹂躏了热那亚和西西里的沿海地区，夺取、劫掠并焚毁了18艘基督教船只。最后，他抵达伊斯坦布尔，素丹邀请他到皇宫觐见。他被引领到素丹面前，跪下亲吻地面，等待他君主的命令。苏莱曼命令他的海军上将起身，封他为奥斯曼海军的统帅，或称卡普丹帕夏（Kapudan Pasha），及海洋诸省的总督。在伊斯坦布尔逗留期间，海伊尔丁居住在皇宫内，定期同素丹会面，讨论海军战略。作为宠爱重臣的最高象征，苏莱曼在一次宫廷庆典上将一枚金质勋章钉在海伊尔丁的缠头上，以表达对这位卡普丹帕夏的感激，感谢他为奥斯曼帝国拓展北非疆土、打败敌对的西班牙。[24]

从伊斯坦布尔回来后，海伊尔丁开始筹划他的下一次重大战役：征服突尼斯。他组建了一支近1万人的远征军，于1534年8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突尼斯。奥斯曼人控制了从突尼斯到阿尔及尔的北非沿海地区，查尔斯五世在西地中海的海上霸权摇摇欲坠。安德烈亚·多里亚建议西班牙皇帝将海盗们从突尼斯逐走。查尔斯同意了，并亲自随舰队出征。他写道：“桨帆船、盖伦帆船、克拉克帆船、小帆船、轮船、双轨船以及其他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载着由约2.4万名士兵和1.5万匹马组成的西班

牙、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军队驶向突尼斯。“出发时我们［请求］造物主的帮助和指引……在神的佑助和恩惠下，我们将给巴巴罗萨以看上去最有效、最致命的打击。”[25]

当这支庞大的无敌舰队接近突尼斯时，海伊尔丁心知自己无法抵抗，便撤回了他的部队。突尼斯落入西班牙军队手中。查尔斯五世在他寄回国内的信中称，西班牙军队释放了2万名基督徒奴隶。阿拉伯历史记录称，西班牙人在洗劫突尼斯的过程中杀害了至少同样多的当地居民。从战略上讲，征服突尼斯让西班牙人牢牢掌控了通往西地中海的门户西西里海峡。仅存的穆斯林据点就是阿尔及尔了。

1541年，西班牙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围攻，试图攻占阿尔及尔并一劳永逸地击败海伊尔丁。一支由65艘桨帆船和400多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载着3.6万名士兵和围城器械，于10月中旬启航。阿尔及利亚编年史家赛义德·穆拉德（Sayyid Murad）写道：“这支舰队覆盖了整个海面，但我无法数清所有的舰船，因为它们数量太庞大了。”为了对抗西班牙人，巴巴里海盗集结了1500名奥斯曼禁卫军、6000名摩里斯科人和数百名非正规军。面对一支人数超过自己军队3倍还不止的入侵部队，海伊尔丁看起来处于绝境之中。他的一位将领试图提振军队的士气，说道：“基督徒的舰队确实是巨大的……但别忘了安拉会在穆斯林抗击他们宗教的敌人时给予帮助。”[26]他的话在那位本地编年史家看来，是具有预言性的。

在西班牙入侵前夕，天气突变，狂风把西班牙的舰船吹上了岩石海岸。那些安全到达岸边的士兵被暴雨淋得湿透，火药也被水浸湿了。在这种情况下，守卫者的剑和箭被证明是更有效的武器。在150艘舰船失踪和1.2万人被杀或被俘的情况下，浑身湿透、士气低落的西班牙人被迫撤退。巴巴里海盗取得了对西班牙人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一劳永逸地巩固了他们在北非的地位。这是海伊尔丁最伟大的胜利，这之后阿尔及尔每年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直至奥斯曼统治结束。

5年后的1546年，海伊尔丁·巴巴罗萨逝世，享年80岁。他成功确保了奥斯曼帝国对北非沿海地区的控制（尽管对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的最终征服是由他的继任者在16世纪稍晚时期完成的）。奥斯曼帝国对北非的

统治不同于其他阿拉伯领土，更多地体现了这块土地的海盗传统。在海伊尔丁死后的几十年里，伊斯坦布尔任命的总督、奥斯曼舰队上将和奥斯曼禁卫军首领之间相互制衡。在17世纪，在阿尔及尔定居并成为永久居民的禁卫军首领成为阿尔及尔的总督，并通过政务委员会（或称“迪万”，*diwan*）进行统治。1671年，权力再次发生转移。舰队上将任命一名当地统治者，称号“德伊”（*dey*），取代禁卫军首领进行统治。在一段时期内，伊斯坦布尔继续任命帕夏，即总督，但帕夏的权力是象征性的，德伊握有实权。1710年开始，德伊也担任帕夏的职务，伊斯坦布尔对北非的控制也越来越弱，德伊们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作为回报，他们每年仅向帝国中央政府缴纳一小笔贡金。

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在西地中海的争夺结束后很久，奥斯曼中央政府依然非常满意阿尔及尔的德伊们代其统治北非沿海地区。巴巴里海盗控制的沿海地区因距离伊斯坦布尔太远而无法被直接管理，也因人口稀少而无法负担更为复杂的治理体系的开销，因此，该地区成为奥斯曼人选择与当地精英合作统治的阿拉伯行省中的典型。这使得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帝国国库几无损失的情况下，对具有战略价值的穆斯林地区宣示主权，并获得少量收入。这一安排也符合阿尔及尔德伊们的利益，使他们在同地中海地区海上强国的交往中，既享有奥斯曼人的保护，又享有高度自治。这一让德伊们和奥斯曼人同时受益的安排一直持续到19世纪——至此，两者都无力抵抗欧洲殖民北非新纪元的开启。

东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自治制度。长期以来，黎巴嫩山区为逃避受迫害的非正统宗教社团提供庇护。其中两个社团——马龙派和德鲁兹派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系统。虽然黎巴嫩高地(以黎巴嫩山著称)与大叙利亚其他地区一样，于1516年“冷酷者”塞利姆征服时期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但帝国的中央政府倾向于让当地居民在自己的山寨中自治。

7世纪末，马龙派为逃避当时拜占庭帝国中敌对基督教派的迫害，到黎巴嫩北部山区寻求庇护。他们是中世纪十字军的支持者，此后与梵蒂冈关系密切。1584年，罗马开设了一所马龙派学院，向最有天赋的年

轻马龙派教徒传授神学，这巩固了马龙派教徒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联系。

德鲁兹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开罗，当时一群持有异见的什叶派穆斯林因遭受迫害而逃离埃及。在孤立的黎巴嫩南部山区，他们的信仰发展出一种独特而高度神秘的新形式。德鲁兹派既是一个宗教团体，也是一个政治团体。在马龙派基督徒的充分参与下，德鲁兹人开始掌控黎巴嫩山的政治秩序。德鲁兹埃米尔，也即德鲁兹王，统治着一个等级森严的德鲁兹和基督教世袭贵族体系，其中每一个世袭贵族都属于黎巴嫩山的某一特定地区。

当奥斯曼帝国将黎巴嫩山纳入统治范围时，奥斯曼素丹们选择保留该地区特定的封建秩序，仅要求德鲁兹王承认素丹的权威，每年向他纳贡。因为德鲁兹人内部分化严重，不足以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构成威胁，所以这种模式运作良好。但随着埃米尔法赫尔丁二世（Amir Fakhr al-Din II）的崛起，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

黎巴嫩山之王法赫尔丁二世（约1572—1635）像是马基雅维利书中的一个人物。他的统治方式不同于奥斯曼帝国的其他统治者，更接近于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法赫尔丁将暴力与狡诈相结合，扩大他控制的领土，并持续掌权数十年。他甚至任命他自己的御用历史学家为后人记载下他执政期间的丰功伟绩。[27]

1591年，法赫尔丁在父亲被敌对的赛义法（Sayfa）家族暗杀后开始掌权。赛义法家族是一个库尔德家族，基于沿海城市的黎波里（不要与同名的利比亚城市混淆）统治黎巴嫩北部。在随后的30年内，德鲁兹王法赫尔丁为两重动机所驱使，一是向赛义法家族复仇，二是扩张他自己家族的统治范围。同时，法赫尔丁同奥斯曼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按时足额缴纳他的领地所承担的税款。他前往大马士革，大方地向总督穆拉德帕夏（Murad Pasha）赠送礼物和金钱，后者后来被提升为伊斯坦布尔的大维齐尔。借助这些往来关系，法赫尔丁成功地将他的统治区域扩展到了南部港口城市赛达、贝鲁特城和沿海平原、黎巴嫩山北部地区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到1607年，这位德鲁兹王已经牢牢控制了现代黎巴嫩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巴勒斯坦北部的部分地区。[28]

随着他所统治的这个小国家的发展壮大，法赫尔丁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他所控制的领土已经远远超出了自治的黎巴嫩山，进入了完全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区。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引发了伊斯坦布尔的政界和法赫尔丁本地竞争对手的忧虑。为保护自己免受奥斯曼帝国的阴谋之害，这位马基雅维利式的德鲁兹王于1608年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签订了联盟条约。美第奇家族给法赫尔丁提供枪支并协助他建造防御工事，以换取在竞争激烈的黎凡特贸易中的特权地位。

法赫尔丁同托斯卡纳缔盟的消息让人恐慌不安。在随后的几年内，黎巴嫩和托斯卡纳关系的深化让奥斯曼人越发忧心忡忡。当法赫尔丁的朋友穆拉德帕夏的大维齐尔之位被敌对的纳苏哈帕夏（Nasuh Pasha）取代时，法赫尔丁在伊斯坦布尔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1613年，素丹决定采取行动，派一支军队去推翻法赫尔丁并除掉他的德鲁兹小国。奥斯曼海军舰船被派去封锁黎巴嫩港口，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这位德鲁兹王逃跑，另一方面也是为阻止托斯卡纳的船只前来协助。法赫尔丁巧妙地避开了攻击者，用贿赂的方式绕过了奥斯曼舰船。法赫尔丁雇用了两艘法国的盖伦帆船和一艘佛兰德船，在一名顾问和一些侍从的陪同下，去往托斯卡纳。[29]

从赛达到里窝那，法赫尔丁航行了53天，终于到达了托斯卡纳的领土。他5年的流亡经历代表了一个罕见的历史时刻。在那时，阿拉伯和欧洲的君王们平等会面并且带着敬意看待彼此的风俗习惯。法赫尔丁和他的侍从们目睹了美第奇宫廷的运转、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状况以及当地人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德鲁兹王被亲眼看到的一切迷住了，从普通佛罗伦萨人的日常家居用品到美第奇家族杰出的艺术收藏，包括奥斯曼帝国杰出人物的画像。他参观了佛罗伦萨大教堂，登上了乔托钟楼，爬上了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设计的著名穹顶。后者是前一个世纪建成的，是当时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一。[30]然而，尽管法赫尔丁在佛罗伦萨目睹了许多奇迹，但他却从未怀疑过他自己国家文化的优越性，也从未怀疑过奥斯曼帝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1618年，法赫尔丁回到了他的故土。他审慎地选择了回归的时机：奥斯曼人又一次同波斯人交战，对他的回归视而不见。在法赫尔丁离开的5年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奥斯曼当局将他家族的统治范围压缩

至黎巴嫩山南半部舒夫的德鲁兹区，德鲁兹社团分裂成多个敌对派别，这将确保不会有某个家族获得法赫尔丁曾享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

很快，法赫尔丁就挫败了奥斯曼中央政府和地区竞争对手的计划。从他回归的那一刻起，这位德鲁兹王就重建了他对黎巴嫩山人民和领土的权威，旨在重建他的个人帝国，从北部的拉塔基亚港向南覆盖整个黎巴嫩高地，直到巴勒斯坦并越过约旦河。在过去，法赫尔丁通过获得奥斯曼当局的许可来确保他的所得。而这一次，他在统治疆域上的拓展对奥斯曼中央政府构成了直接挑战。他相信他的战士能够击败奥斯曼人可能部署的任何军队。在随后的5年中，法赫尔丁在对抗奥斯曼当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胆。

1623年11月，法赫尔丁的军队在昂杰尔之战中击败了来自大马士革的奥斯曼军队，俘虏了大马士革总督穆斯塔法帕夏（Mustafa Pasha）。至此，法赫尔丁的权力达到顶峰。[31]德鲁兹军队带着他们的囚徒大马士革总督沿着贝卡谷地追击敌人直到巴勒贝克。在军队包围巴勒贝克时，法赫尔丁接待了一个来自大马士革的要人代表团，他们就释放他们的总督前来谈判。在之后的12天内，这位德鲁兹埃米尔一直拖着谈判的进程，直到确保他的每一个领土目标都实现，才释放他的囚徒。

1629年，奥斯曼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结束，伊斯坦布尔再次将注意力转向黎巴嫩山叛逆的德鲁兹王，此时他已将他控制下的疆域向东延伸入叙利亚沙漠，向北延伸到安纳托利亚。1631年，法赫尔丁做出了一次傲慢的举动，拒绝一支奥斯曼军队在“他的”领土上过冬。从那时起，奥斯曼人下定决心要除去这名不顺从的封臣。

年迈的法赫尔丁也面临着来自其他群体的挑战——贝都因部落、他的宿敌的黎波里的赛义法家族以及同他竞争的德鲁兹家族。在素丹穆拉德四世（Murad IV）强有力的领导下，奥斯曼人抓住了法赫尔丁日益被孤立的时机，于1633年从大马士革派遣了一支部队去推翻这位德鲁兹领袖。也许法赫尔丁的支持者在多年不断的战斗后已疲惫不堪，又或许他们正在对他的判断力失去信心，因为他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违逆伊斯坦布尔的命令。当奥斯曼军队逼近时，德鲁兹的战士们拒绝了他们领袖的战斗号召，让他和他的儿子们自己去对抗奥斯曼军队。

逃亡的德鲁兹王躲在德鲁兹腹地深处舒夫的山洞里。奥斯曼将领们一路追踪，进入高地，点起火用烟把他从藏身之处逼了出来。法赫尔丁和他的儿子们被抓获，并被带到伊斯坦布尔，于1635年处决。这终结了一份非凡的事业，也消除了阿拉伯世界对奥斯曼统治的重大威胁。

在清除了法赫尔丁后，奥斯曼人乐于恢复黎巴嫩山的本地政治制度。为占据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设计的政府体系不适合当地多样化的基督徒和德鲁兹人口，但只要当地统治者愿意进入奥斯曼的体系，帝国中央政府非常愿意接受各阿拉伯行省的多样性。黎巴嫩的封建秩序将一直持续到19世纪，其间没有再给伊斯坦布尔带来麻烦。

塞利姆二世完成征服后的一个世纪里，埃及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政治秩序。虽然他们的统治王朝已经被摧毁，但马木鲁克人作为一个军事阶层幸存，仍然是奥斯曼时期埃及统治精英的核心。他们保全了家族，继续引入征召来的年轻奴隶来更新他们的军队，维护他们的军事传统。由于无法根除马木鲁克人，奥斯曼人别无选择，只能把他们纳入埃及的行政机构。

早在17世纪，马木鲁克贝伊们就开始在奥斯曼治下的埃及担任主要行政职位。马木鲁克人被赋予财政权和对每年前往麦加的朝觐队伍的管理权。他们被任命为阿拉伯半岛希贾兹行省的总督，实际垄断行省的行政事务。这些职位带来了声望，更重要的是，这些职位的获得者得以控制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17世纪，马木鲁克贝伊们还占据了埃及的一些最高军事职位，这让他们同从伊斯坦布尔派来的奥斯曼总督和军官形成了直接竞争的局面。奥斯曼中央政府忙于应对帝国欧洲边境更为紧迫的威胁，对于埃及这个富饶的行省，它更关心的是维持秩序、确保经常性税收制度正常运转，而不是如何调整奥斯曼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与马木鲁克人之间的权力平衡。在埃及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中，总督们只能自行应对。

马木鲁克大家族之间的对抗导致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对奥斯曼人和马木鲁克人来说，开罗的政治变得变幻莫测。17世纪形成的两个主要派

别是法卡里派（Faqari）和卡西米派（Qasimi）。法卡里派与奥斯曼骑兵联系紧密，他们以白色为标志，以石榴为象征。卡西米派同埃及本土军队联系紧密，他们以红色为标志，并以圆盘为象征。每个派别都有自己的贝都因盟友。这些派别的起源只留存于传说中，但可以明确的是，到17世纪末，派别分化已经完全形成。

奥斯曼的总督们试图操纵派系对抗来压制马木鲁克人。这给处于不利地位的马木鲁克派别以推翻奥斯曼总督的切实动机。在编年史家艾哈迈德·凯特胡德·德木尔德什（Ahmad Katkhuda al-Damurdashi，他自己是一名马木鲁克军官）的编年史所覆盖的1688—1755年期间，不同的马木鲁克派别成功罢免了埃及34位奥斯曼总督中的8位。

马木鲁克人拥有比奥斯曼总督更大的权势，这一点在1729年派系斗争的阴谋中显露无遗。法卡里派的首领宰因·法卡尔（Zayn al-Faqar）召集一群军官，计划对敌对的卡西米派发动一场军事行动。宰因·法卡尔对他的手下说："我们会要求总督给这次征战提供500袋钱，如果他同意，他可以继续担任总督；如果他不同意，我们会罢免他。"法卡里派派代表团去见奥斯曼总督，后者拒绝支付用于攻击卡西米派的军事行动开销。宰因·法卡尔暴跳如雷，他对随从说："我们不会接受皮条客做我们的总督。走！我们去把他罢免了。"法卡里派未经任何授权，自作主张做了决定。他们仅仅给伊斯坦布尔去了一封信，通知帝国中央政府奥斯曼总督已被罢免，并已任命一名代理总督代行总督职权。随后，这一派马木鲁克人用武力强迫他们任命的代理总督用苏伊士港海关的收入作为攻击卡西米派军事行动的经费。这笔支出以防御开罗的名义被合理化。[32]

马木鲁克人对他们的竞争对手使用了非同寻常的暴力。卡西米派非常清楚地知道，法卡里派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对抗以占得先机。1730年，卡西米派派了一名刺客去刺杀敌对派别的首领宰因·法卡尔。这名刺客是法卡里派的叛徒，曾因与法卡里派发生冲突而转投卡西米派。这次，他乔装成一名警察，假装逮捕了一个宰因·法卡尔的敌人。"把他带到这儿来。"宰因·法卡尔下令，想要面对面见见他的敌人。"他来了。"刺客回答道，然后用手枪射中了宰因·法卡尔的心脏，后者立刻毙

命。[33]随后，刺客和他的同谋冲出法卡里派首领的家逃脱，沿途打死了几个人。这是一场大规模血仇的开端。

法卡里派任命穆罕默德·卡塔米什贝伊（Muhammad Bey Qatamish）为他们的新首领。穆罕默德贝伊已晋升到马木鲁克的最高级别，获得了“城市首领”的头衔。作为对宰因·法卡尔遭暗杀的回应，穆罕默德贝伊下令消灭所有同卡西米派有关联的马木鲁克人。“你们当中有卡西米派的间谍。”穆罕默德贝伊指着他侍从中一个不走运的人警告说。在这名男子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之前，穆罕默德贝伊的军官们将他拖到桌子底下，砍掉了他的头。这是为宰因·法卡尔之死复仇的行动中杀害的第一人。在1730年的屠戮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杀。

穆罕默德贝伊向宰因·法卡尔任命的代理总督求助，声称参与谋杀法卡里派首领的有373人，并获得了处决他们的授权。对他而言，这是授权清除卡西米派。德木尔德什记载：“穆罕默德·卡塔米什贝伊屠戮了整个卡西米派，除了那些……逃到乡村的人。他甚至把还未到青春期的马木鲁克少年从他们的居所带走，送到尼罗河中的一个小岛上集体杀戮，并把尸体投入河中。”穆罕默德贝伊消灭了所有卡西米派的家族，发誓再也不让该派在开罗立足。[34]

事实证明，消灭卡西米派要比穆罕默德贝伊设想的困难得多。1736年，卡西米派回归，同法卡里派算旧账。他们得到了奥斯曼总督白基尔帕夏（Bakir Pasha）的协助。白基尔帕夏之前就担任过埃及总督，但被法卡里派罢免，不得不提前结束任期。他自然是卡西米派的盟友。白基尔帕夏邀请穆罕默德贝伊和法卡里派的其他重要的马木鲁克人赴会，一群卡西米派人带着手枪和剑埋伏在会场。穆罕默德贝伊一到，卡西米派人就现身，击中了这名法卡里派首领的胃部，并屠杀了他的将领们。总之，他们杀害了开罗10位最有权势的人，并将他们的头颅堆在城里一座主要清真寺里示众。[35]综合各种记录，这是奥斯曼埃及历史上最严重的屠杀之一。[36]

多年的派系斗争使法卡里派和卡西米派都无力维持在开罗的领导地位。这两个敌对的派别被一个叫作卡兹杜厄里（Qazdughli）的马木鲁克家族推翻，在18世纪余下的时间内，该家族一直掌控奥斯曼埃及。随

着该家族的崛起，极端的派系暴力冲突减少了，给这个饱受冲突蹂躏的城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就奥斯曼人而言，他们从未全面掌控富裕但不守规矩的埃及行省。奥斯曼埃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直到“冷酷者”塞利姆征服马木鲁克埃及数个世纪后，各马木鲁克家族依然拥有比伊斯坦布尔任命的总督更大的政治权力。在埃及，就像在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一样，奥斯曼的统治适应了当地政治。

在征服马木鲁克帝国两个世纪之后，奥斯曼人成功地将他们的帝国从北非扩展到了阿拉伯半岛南部。整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许多情况下，奥斯曼人不愿或无法在各阿拉伯行省建立标准化的政府，而选择与本地精英合作统治。各阿拉伯行省同伊斯坦布尔的关系可能差异很大，各省的行政架构也千差万别，但它们毫无疑问都是同一个帝国的组成部分。这种多样性对当时多民族和多教派的帝国来说是很常见的，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也是如此。

18世纪中叶前，奥斯曼人对这一多样性的掌控多多少少是成功的。他们面临过挑战，特别是来自黎巴嫩山和埃及的挑战，但他们使用多种策略，成功地确立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确保没有任何地方领袖对帝国的中心地位构成持久威胁。然而，18世纪后半叶，该中心与处于边缘地位的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生了变化。新的地方领袖崛起，他们开始整合军力，寻求自治，公然违抗奥斯曼帝国的制度。他们往往同帝国在欧洲的敌对势力合作。这些新兴的地方领袖对奥斯曼政权构成了实质性挑战，将在19世纪危及帝国的生存。

(1) 沙(Shah)，君主称号，源自波斯语，被借入奥斯曼土耳其语。——译者注

第二章　阿拉伯人挑战奥斯曼统治

理发师知道城里发生的一切，因为他每天都在同各行各业的人交谈。从理发师艾哈迈德·布戴伊里（Ahmad al-Budayri）日记的记载来看，他非常健谈，且对18世纪中叶大马士革的政治和社会了如指掌。他日记中所涉及的话题都是各地理发店交谈中常见的话题，包括本地的政治、高昂的生活成本、天气以及人们对世风日下的抱怨。

除了他日记所载的内容，我们对大马士革理发师布戴伊里的生活知之甚少。他太卑微了，不足以被列入当时的人物传记，也即奥斯曼时期的名人录。他的日记因此更加引人注目。对18世纪的商人而言，有读写能力本不常见，更不用说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的想法了。他很少谈论自己，更愿意写别人的事。我们不知道他何时出生、何时离世，但很明显，他写作这部从1741年持续到1762年的日记时是一个成年人。布戴伊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属于一个神秘的苏非教团。他已婚，有孩子，但没有提过他的家庭生活。他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提到将他引入行的老师时充满敬佩，也回忆了那些他给理过发的杰出人士。

这名大马士革的理发师是奥斯曼帝国忠诚的臣民。1754年，他写道，大马士革人得知素丹马哈穆德一世（Mahmud I，1730—1754年在位）离世，震惊不已。他也记录了已故素丹之子奥斯曼三世（Osman III，1754—1757年在位）登基时公众的庆祝活动。当时的大马士革“装点得比公众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漂亮”。他祈祷道：“愿真主保佑这个奥斯曼国家直到时间的尽头。阿敏(1)！”1

理发师为奥斯曼国家的延续而祈祷，理由充分。根据奥斯曼人的治国理念，好的统治是四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一平衡可被理解为一个“公正的循环”（circle of equity）。首先，国家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行使其权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巨大的财富，而税收是国家唯一的常规财富来源。为了征税，国家必须促进国民生活的繁荣。为了国民生活的繁荣，国家必须维护法律的公正，这就回到了国家的责任上来，从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当时大多数奥斯曼政治分析者在解释政治混乱时往往会归咎于对上述四要素中某一要素的忽视。从

布戴伊里所见证的18世纪中叶大马士革的状况来看，他确信奥斯曼帝国已陷入严重的困境。官员腐败，军纪松弛，物价高涨，政府权威的衰退损害了公共道德。

可以说，问题的根源在大马士革的总督们。在布戴伊里生活的时代，大马士革并没有按照帝国惯例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替素丹统治，而是由一个本地贵族王朝统治。执政的阿兹姆家族在17世纪通过敛聚叙利亚中部城镇哈马周围的大量耕地而发家致富。后来，他们到大马士革定居，成为城中财富与权势的拥有者。1724—1783年，5名阿兹姆家族成员统治过大马士革，共统治了45年。同时，还有几名阿兹姆家族成员受命统治赛达、的黎波里和阿勒颇等行省。综合来看，统治叙利亚各省的是18世纪各阿拉伯行省涌现的地方领导力量中一个较为显赫的代表。

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相较于奥斯曼官僚，阿拉伯人更愿意接受同胞的统治。然而，18世纪的奥斯曼官僚依然是素丹的仆人，理论上完全忠于帝国，行使统治职权时不带私利。相比之下，阿兹姆家族的统治者们明显考虑个人和家庭利益，身居高位时，他们借机敛财并建设自己的王朝，这一切都以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为代价。“公正的循环”被打破，诸事开始崩坏。

布戴伊里详细讨论了阿兹姆统治大马士革的长处和短处。他日记所覆盖的时段，大部分是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As‘ad Pasha al-Azm）统治时期。他在位14年（1743—1757），是奥斯曼时期所有大马士革总督中任期最长的。这名理发师对艾斯阿德帕夏极尽溢美之词，但也提出了不少批评。他谴责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掠夺大马士革的财富，并认为他们应对军队的混乱和公德的崩坏负责。

在阿兹姆家族的统治下，军队已经从一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纪律严明的部队，堕落为一群目无法纪的乌合之众。大马士革的禁卫军分为两个群体——伊斯坦布尔派遣的帝国部队（*kapikullari*）和大马士革本地的禁卫军（*yerliyye*）。此外，还有一些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北非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不同的军团经常发生冲突，给城市的和平带来了严峻

挑战。1756年，在帝国禁卫军和大马士革本地禁卫军的冲突中，阿玛拉区的居民因支持前者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报复，后者将整个阿玛拉区的住宅和商店付之一炬。[2]布戴伊里记录了多件士兵袭击甚至杀害大马士革居民而完全不受惩罚的事件。在极度焦虑时期，市民的反应是锁闭店铺，把自己关在家里，这让城市的经济生活陷入停顿。这位理发师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安全部队”对普通大马士革居民生命和财产构成的威胁。

布戴伊里还认为，阿兹姆家族应对大马士革长期居高不下的食品价格负责。他声称，他们不仅没有监管市场、确保定价的公平，而且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实际上还滥用职权来囤积粮食，人为制造粮食短缺以最大化个人利益。有一次，大饼价格下跌，艾斯阿德帕夏派他的仆从向饼铺施压，要求他们提高价格以保护小麦市场，而小麦市场是他家族财富的来源。[3]

在日记中，布戴伊里愤怒谴责阿兹姆家族总督聚敛财富，而大马士革的普通百姓却在挨饿。艾斯阿德帕夏在大马士革中心建的宫殿，是他滥用权力的体现，这座宫殿如今依然矗立城中。该项目用上了城里所有的建筑材料和所有训练有素的石匠与工匠，推高了普通大马士革人所需承担的建造成本。艾斯阿德帕夏命令宫殿的建造者们从城里的老房子和老建筑中剥去珍贵的建筑材料，不顾房屋主人的利益和房屋的历史价值。这个项目是艾斯阿德帕夏贪婪的明证。布戴伊里提到，艾斯阿德帕夏在宫殿的“地板下、水井中、天花板上、蓄水池中，甚至厕所里”，为他巨大的个人财富建了无数藏匿处。[4]

布戴伊里认为，军纪的崩坏，加上阿兹姆家族总督的贪婪，已导致公共道德的严重恶化。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获得合法性，是因为它有能力推广伊斯兰价值观，且维持必要的机构，让臣民在逊尼派伊斯兰准则下生活。公共道德的崩坏因而成为国家权威崩塌的显著标志。

在布戴伊里看来，城市里娼妓横行最能说明城市公共道德水准的下滑。大马士革是一个保守的城市，良家女子遮住头发，穿着端庄，很少有机会与自己家庭之外的男性交往。大马士革的妓女们丝毫不遵循这些规矩。这名理发师经常抱怨醉酒的妓女，与同样醉酒的士兵作乐狂欢，

裸露着面庞和头发，大步穿行于大马士革的街道和市场。大马士革的总督几次试图禁止卖淫活动，但都没有效果。在城中驻军的鼓动下，妓女们拒绝服从命令。

大马士革的老百姓似乎开始接受，甚至欣赏城里的妓女。18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赛勒姆恩的年轻、美丽的女子完完全全地吸引了大马士革人，她的名字在当地的俚语中成了时尚和美丽的代名词。特别时髦的裙子会被称作“赛勒姆恩裙”，新奇的珠宝会被叫作“赛勒姆恩饰品”。

赛勒姆恩是一个藐视权威的鲁莽的年轻女子。她的行径让人联想起比才的卡门。1744年的一个下午，赛勒姆恩在大马士革城中心与一位法官相遇。她喝醉了，还带着刀。法官的侍从朝她喊叫，要求她让道。赛勒姆恩嘲笑他们，挥刀向法官冲去，法官的手下竟然几乎无法控制住她。法官让当局逮捕了她，当局以暴行为由处决了她。随后，一名城市传令官被派往大马士革街头，传令杀死所有妓女。许多妇女逃走了，另一些则躲藏了起来。[5]

事实证明，禁令是短暂的，大马士革的妓女们很快又回到了街头，抛头露面，无拘无束。1748年，理发师写道：“在那些日子里，腐败加剧，真主的奴仆们遭受迫害，妓女数量激增，日日夜夜都充斥着市场。”他描述了为纪念当地一位圣人而举行的妓女游行，大马士革民众看上去对这种亵渎宗教价值观的活动坦然接受，这让他倍感愤怒。一个妓女爱上了一个生病的年轻土耳其士兵。她发誓，如果她的情人恢复健康，她将进行一次祈祷，向圣人表示敬意。士兵康复后，她履行了她的誓言：

> 她和同她一样罪孽深重的姑娘们一起，排成一种队列行进。她们手捧蜡烛和香炉穿过集市。这群女子唱着歌，敲着鼓，不遮面纱，长发披肩。人们看着她们却并未反对。只有正直的人们在高声呼喊：“真主至大！”[6]

这次游行结束后不久，市政府再次试图禁止卖淫。城中各区的负责人被告知要举报任何可疑的人，并派城市传令官去敦促妇女正确佩戴面

纱。然而，在这些新令发布后的几天里，理发师称："我们看到这些女子又在街巷和市场里行走，她们的行为举止依然如故。"到这时，总督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决定不再试图驱逐这些厚颜无耻的妓女，转而向她们征税。

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滥用职权，牺牲人民的利益来致富，但他们不能遏制邪恶，也不能控制名义上由他们指挥的士兵。大马士革的理发师深感沮丧。一个由这样的人统治的国家能够长久吗？

到18世纪中叶，奥斯曼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从表面上看，奥斯曼帝国成功地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了他们的帝国。奥斯曼人用了两个世纪，将统治范围从阿拉伯半岛最南端延伸到非洲西北部摩洛哥的边境。阿拉伯人普遍接受奥斯曼素丹为他们的合法君主。每周五，他们都以素丹的名义礼拜，为素丹的战争贡献士兵，还向素丹的代理人交税。绝大多数的阿拉伯臣民，如那些在农村耕种土地的人，以及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与商人，都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社会契约。他们所期望的回报是他们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对伊斯兰价值观的维护。

然而，一个重要的变化正在阿拉伯世界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最初的几个世纪中，阿拉伯人，作为自由民出生的穆斯林，被排除在高级职位之外，这些职位，是留给那些通过"男孩征募"招来的奴隶精英们的。但是，到18世纪中叶，地方的显贵们升入了行省行政体系的最高级，并被授予了"帕夏"称号。大马士革阿兹姆家族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埃及经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山到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都是如此。在阿拉伯世界，地方领袖崛起，伊斯坦布尔的影响下降，因为更多的税收被用于地方军队和地方长官的建设工程。这一现象在许多阿拉伯行省蔓延，从而带来一种累积效应，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在18世纪下半叶，地方领袖的快速壮大使得多个阿拉伯行省开始反抗伊斯坦布尔的统治。

各阿拉伯行省地方领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从马木鲁克家族族长到

部落领袖再到城市显贵。驱使他们的是勃勃的雄心，而不是对奥斯曼人某一具体做事方式的不满。他们拥有共同类型的财富：他们毫无例外都是大地主，利用奥斯曼土地政策的变化获得了大量地产；他们终生拥有这些地产，在某些情况下还把这些地产传给了他们的子女。他们把自己地产上的收益从政府的金库转移出来，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建造豪华的宫殿，并维持自己的军队来加强权势。伊斯坦布尔的损失转化成各阿拉伯行省地方经济的真正收益，地方领袖得以将庇护网络扩展至工匠和民兵，以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权力。

这样的地方领袖并不是各阿拉伯行省独有的，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也出现了类似的地方领袖，但对伊斯坦布尔来说，阿拉伯世界并不是最核心的，无论我们如何去理解“核心”所指。相较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奥斯曼人更少依靠各阿拉伯行省的收入和军队。此外，阿拉伯世界离伊斯坦布尔更远，中央政府不愿动用军队和资源镇压小规模叛乱。伊斯坦布尔更关心的是来自维也纳和莫斯科的挑战，而不是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地方领袖带来的麻烦。

一直到18世纪，欧洲邻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都要比各阿拉伯行省可能形成的威胁大得多。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抵御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征服。1683年，奥斯曼人兵临维也纳城门。1699年，奥地利人击败奥斯曼人，并通过《卡洛维茨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获得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波兰部分地区，这是奥斯曼人遭受的第一次领土损失。俄罗斯彼得大帝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向奥斯曼人施压。与这种重大程度的威胁相比，巴格达或大马士革的地方领袖们根本不值得考虑。

奥斯曼被欧洲军队击败，让帝国范围内的地方挑战者更加大胆。随着地方领袖势力的日益壮大，被派往各阿拉伯行省的奥斯曼官员逐渐失去了阿拉伯臣民的尊重和服从。政府官员也失去了对素丹驻军的控制，后者变得无法无天，并与地方军队和地方领袖的民兵发生冲突。军中的违逆进而损害了伊斯兰法官和学者的权威，他们传统上是公共秩序的守护者。在奥斯曼人治理无效的地方，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地方领袖来保障他们的安全。在巴士拉，一名当地的基督教商人写道：“人们敬畏阿拉伯人的首领而非奥斯曼人。”[7]

一个国家一旦失去臣民尊重就有麻烦了。编年史家阿卜杜·拉赫曼·哲拜尔提在分析18世纪奥斯曼帝国对埃及马木鲁克人的统治缘何崩溃时说："如果这个时代可以在瓶子里小便，当时的医生们就会知道它得了什么病。"[8]地方领袖的崛起是奥斯曼人疾病的核心，只有通过强力重塑国家权威才能治疗。帝国的中央政府面临一个两难处境，只有确保帝国的欧洲边境足够稳定，才能腾出必要的资源来应对各阿拉伯行省的挑战。

各地地方统治的性质差异很大，给伊斯坦布尔的权威构成了多样化的挑战。大致说来，那些最靠近奥斯曼中心的行省是最温和的。诸如黎巴嫩山的谢哈卜家族、大马士革的阿兹姆家族和摩苏尔的加利利家族等一些显赫家族建立了忠于奥斯曼统治的王朝，但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要求最大化的自治。[9]在更南的巴格达、巴勒斯坦和埃及，出现了一些马木鲁克领袖，他们试图扩大领土范围，直接挑战奥斯曼政府。阿拉伯半岛中部形成的沙特-瓦哈比联盟对奥斯曼政府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因为它控制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阻止了一年一度的奥斯曼朝觐车队到达圣城。相比之下，更偏远的行省，如阿尔及尔、突尼斯和也门，心甘情愿继续成为奥斯曼素丹的属国，每年向素丹纳贡，以换取全面的自治。

这些地方领袖的活动尚未构成一场阿拉伯运动。他们中许多人并不属于阿拉伯民族，好些人也不说阿拉伯语。在18世纪下半叶，奥斯曼统治的挑战者还只是雄心勃勃的个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很少关心他们统治下的阿拉伯人民。他们相互隔绝，对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几乎没有构成威胁。然而，当他们携手合作，像埃及的马木鲁克人与巴勒斯坦北部的一位地方领袖结盟那样，他们就有能力征服全部奥斯曼行省。

20世纪，中东因石油而扬名四方。但在18世纪，是棉花给东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极大的财富。欧洲对棉花的需求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兰开夏的纺织厂的棉花主要来自西印度群岛和美洲殖民地，而法国的大部分棉花进口则依赖奥斯曼市场。18世纪，纺织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工业革命，欧洲对棉花的需求猛增。法国从东地中海地区进口的棉花增加至原来的5倍多，从1700年的210万千克增加到1789年的近1100万千克。[10]最受欧洲市场喜爱的棉花是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生产的。加利利

棉花所创造的财富足以满足当地一位世袭统治者的雄心，使他强大到足以挑战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的统治。

这位加利利的强人是扎希尔·欧麦尔（Zahir al-'Umar，约1690—1775）。扎希尔是宰伊德尼部落（the Zaydanis）的首领，这是一个17世纪起在加利利定居的贝都因部落，控制了萨法德和提比利亚之间的大片农田。他们与大马士革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并开始通过控制加利利的棉花种植园来积累可观的家族财富。扎希尔是加利利宰伊德尼部落的第三代首领。尽管他在西方并不特别出名，但他在阿拉伯世界声名远播达数个世纪。鉴于他与奥斯曼总督们对抗的历史，他经常被描述为阿拉伯或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这是不合时宜的。到他去世时，他已经是传奇人物了，也有了两部几乎是同时代人给他写的传记。

扎希尔漫长而非凡的生涯始于18世纪30年代，那时他与一个贝都因部落结盟，攻占了当时还不过是一个小村庄的提比利亚。他确保赛达总督正式任命他为加利利地区的征税官，从而巩固了他的所得。他开始在提比利亚筑城防御，并组建了一支由大约200名骑兵组成的小型民兵队伍。

以提比利亚为基地，扎希尔和他的家族开始将他们的控制范围扩展到巴勒斯坦北部肥沃的平原和高地，命令佃农们在他们的土地上种满棉花。他给他的兄弟们分配领土，让他们代为管理。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小王国，并变得愈加强大。他控制的领土越多，获得的棉花收入就越多，这使他能够扩大军队，让进一步扩张领土成为可能。

到1740年，扎希尔已成为巴勒斯坦北部最有权势的领袖。在打败纳布卢斯的军阀和控制拿撒勒后，他控制了巴勒斯坦和大马士革之间的贸易，这进一步增加了他的财富和资源。

宰伊德尼王国的快速发展致使扎希尔·欧麦尔同大马士革总督产生冲突。总督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满足每年去麦加朝觐的车队的需求并提供费用。扎希尔现在控制的土地，其税收历来是专门用于支付朝觐车队费用的。扎希尔抢在大马士革总督之前获得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北部的税收，这让朝觐车队陷入资金危机。当伊斯坦布尔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素丹命令大马士革总督苏莱曼·阿兹姆帕夏（Sulayman Pasha al-Azm）

抓捕和处决扎希尔，并摧毁他在提比利亚周围的防御工事。

大马士革的理发师布戴伊里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道，1742年，苏莱曼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从大马士革出发去推翻扎希尔。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也派出士兵并送来包括火炮和地雷在内的重型武器去摧毁扎希尔和他的防御工事。苏莱曼帕夏还从黎巴嫩山、纳布卢斯、耶路撒冷以及邻近的贝都因部落招募志愿兵，这些人都视扎希尔·欧麦尔为对手，很高兴有机会击败他。

苏莱曼帕夏围攻了提比利亚3个多月，但扎希尔的部队没有屈服。他的兄弟将粮食和军需品走私越过奥斯曼防线，在他的帮助下，扎希尔成功地抵抗住了军力远胜于他的部队。大马士革的总督很恼火，他设法拦截一些往提比利亚走私食物的宰伊德尼人，砍下他们的头作为战利品送到伊斯坦布尔。然而，苏莱曼帕夏没能取得那个大战利品，3个月后，他被迫返回大马士革，为赴麦加朝觐做准备。苏莱曼帕夏不愿承认失败，他散布谣言说，他解除了对提比利亚的围困，是出于同情该镇手无寸铁的平民。他还声称绑架了扎希尔的一个儿子作为人质，要求扎希尔承诺将他征收的税款还给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理发师一五一十地记录下了这些谣言，并补充了一句免责声明："我们还听到了故事的另一版本，只有真主知道事情的真相。"[11]

1743年，苏莱曼帕夏朝觐归来，立即同扎希尔·欧麦尔在提比利亚重开战火。同上一次一样，在伊斯坦布尔和巴勒斯坦地区那些怨愤不平的扎希尔邻近势力的支持下，他再次调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提比利亚的居民又一次做好了经受严重围困的准备。但第二次围攻并未发生。在前往提比利亚的途中，苏莱曼·阿兹姆帕夏在海边小城阿卡停了下来，在那里他因高烧离世。他的尸体被带回大马士革埋葬，部队被解散。扎希尔·欧麦尔得以不受干扰地去实现他自己的雄心壮志。[12]

18世纪40—60年代，扎希尔的统治没有受到挑战，他的权力迅猛扩张。赛达总督的兵力绝对无法同扎希尔相匹配，大马士革的新任总督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听任提比利亚的统治者自行发展。在伊斯坦布尔，扎希尔谋得了一些位高权重者的支持，保护他免遭帝国中央政府的关注。

扎希尔利用他相对独立的优势，将他的统治从提比利亚延伸到沿海

城市阿卡，后者当时已是棉花贸易的主要港口。他再三要求赛达总督授予他收益丰厚的阿卡征税权，但却一直遭到拒绝。最终，在1746年，他占领了阿卡并宣称自己是征税官。在18世纪40年代，他在阿卡筑城防御，在城中建了自己的基地，从而拥有对棉花贸易从农田到市场的控制权。大马士革法国棉花商的书信显示，他们对扎希尔·欧麦尔非常不满，说他变得“太强大，太富有了……对我们不利”。[13]到18世纪50年代，扎希尔给他出售的棉花定价。当法国人试图迫使扎希尔接受他们的条件时，他禁止加利利的棉农们将棉花卖给法国人，逼迫他们重回谈判桌，并接受他的条件。

尽管扎希尔·欧麦尔多次同奥斯曼政府对抗，但他一直在试图获得官方承认。他是最终想进入统治集团的反叛者。他努力去获得像阿兹姆家族在大马士革那样的地位：帕夏的官僚级别和赛达的总督位置。为此，他每次反叛之后都忠实地纳税。然而，在他在位期间，扎希尔的地位不过是赛达总督下属的征税官。这让这位加利利的强人倍感沮丧。1768—1774年间，同俄国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奥斯曼帝国，为保证扎希尔的忠诚，以折中的方式回应他的要求。1768年，帝国中央政府承认他为“阿卡的谢赫，拿撒勒、提比利亚和萨法德的埃米尔和全加利利的谢赫”。[14]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头衔，不足以满足扎希尔的雄心。

经过近20年的相对和平，扎希尔再次面临来自奥斯曼行省政府的威胁。1770年，大马士革新总督试图终结扎希尔对巴勒斯坦北部的统治。奥斯曼帕夏（‘Uthman Pasha）设法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的黎波里和赛达的总督，并与黎巴嫩山德鲁兹社团结盟，反对扎希尔。纳布卢斯的贵族们也渴望看到他们好战的北方邻居的末日。突然，扎希尔发现自己被敌对势力包围了。

在与奥斯曼帕夏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扎希尔只能通过与另一位地方领袖合作才能生存下来。唯一强大到足以抗衡大马士革和赛达联军的地区势力是开罗的马木鲁克统治者，一位名叫阿里贝伊（‘Àli Bey）的杰出领袖。扎希尔和阿里贝伊的联合带来了当时阿拉伯行省对伊斯坦布尔统治的最大挑战。

马木鲁克领袖阿里贝伊有许多外号。有些同时期的人称他为“精灵阿里”，就好像他能用魔法来实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一样。他的土耳其语外号是布鲁特·卡潘（*Bulut Kapan*），意为“捕云者”，这是因为他镇压贝都因人，奥斯曼人认为贝都因人比云更难抓到。他最著名的外号是“伟大的阿里贝伊”，事实上，在1760—1775年之间，他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奥斯曼埃及史上任何一位马木鲁克。

1743年，15岁的阿里贝伊来到埃及，在占领导地位的马木鲁克家族卡兹杜厄里家族做军事奴隶。他一路攀升，在1755年他主人去世时获得了自由并晋升到了贝伊。贝伊是马木鲁克的最高级别，贝伊们的领袖是“城市首领”。1760年，阿里贝伊成为领袖，此后，除了一些短暂的中断，他一直掌权，直到1773年去世。

阿里贝伊是军阀，擅长借助恐惧赢得尊敬。他的同时代人、伟大的埃及历史学家哲拜尔提将他描述为“一个强大、固执、雄心勃勃、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满足的人。他不苟言笑，只对严肃的事情上心”。[15]据说他会给来面见他的人带来生理影响：“他如此使人心生敬畏以至于有人因敬畏他而死去，许多人会因为他在场而颤抖。”[16]他镇压对手毫不留情，从不效忠任何人。而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他也没赢得其他人对他的忠诚。他打破马木鲁克家族内部关系的束缚，像消灭敌对马木鲁克家族那样打击自己家族内部的马木鲁克人。

阿里贝伊是马木鲁克帝国覆灭之后第一个凭一己之力统治埃及的人。他获取埃及的土地收入，控制所有对外贸易，并向欧洲商人群体索取大量资金，毫不夸张地说，他垄断了埃及的财富。他向本地基督教和犹太社团强索财物，并拒绝向伊斯坦布尔缴纳全部税款。阿里贝伊的财富使他得以扩大军力。在打破埃及既有的马木鲁克派系格局之后，阿里贝伊开始建立自己的马木鲁克家族。他购买并训练了自己的奴隶，他们是他唯一能信任的人。他的家族在鼎盛时期约有3000名马木鲁克，其中许多人曾是数以万计的庞大军队的将领。

在确立了对埃及的绝对控制之后，阿里贝伊寻求完全脱离奥斯曼统治而独立。受前朝马木鲁克人启发，他试图在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重建他们的帝国。据哲拜尔提说，阿里贝伊热衷于阅读伊斯兰历史，曾给

他的仆从们讲解为何奥斯曼人对埃及的统治根本是不合法的。他认为："埃及的国王——素丹拜伯尔斯（Baybars）和素丹盖拉温（Qalawun）以及他们的子孙和我们一样都是马木鲁克人。奥斯曼人利用老百姓的表里不一，用武力夺去了这个国家。"[17]这里暗含的意思是，通过武力夺取的土地可以合法地通过武力夺回。

阿里贝伊的第一个目标是伊斯坦布尔派驻埃及维护法律的总督和军队。总督们很早就放弃了统治埃及的企图，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相互竞争的马木鲁克家族。总督们试图做到的是通过举行权力仪式和征收国库划定的税额来维护伊斯坦布尔对埃及名义上的统治权。由于自身实力不足，总督们试图让敌对的马木鲁克家族互相对抗。但这在阿里贝伊的统治下已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消灭了竞争对手，没有人能挑战他的统治。现在，阿里贝伊罢免总督和军官，有传言说他甚至毒杀他们而不受惩罚。奥斯曼人在这个富裕却叛逆的埃及行省的利益已经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威胁。

接下来，阿里贝伊出兵反抗奥斯曼帝国，公然谋求领土扩张。哲拜尔提写道："他不满足于真主赋予他的对上、下埃及这个过去的国王们和法老们引以为傲的王国的统治权，他的贪婪刺激他去扩张王国的领土。"[18]阿里贝伊首先在1769年占领了临红海的希贾兹省，该省曾是马木鲁克帝国的一部分。在取得这一成功之后，他开始用他的名字而不是当时在位的奥斯曼素丹的名字来铸造钱币，这表明他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权的反叛。阿里贝伊已经开始了他恢复前马木鲁克帝国的计划。而奥斯曼人正陷于同俄国的战争中，无力阻止他。

1770年，当阿里贝伊反抗奥斯曼帝国正如火如荼之际，扎希尔·欧麦尔第一次联系阿里贝伊，提出联合反抗大马士革总督。这个时机再好不过。当时的一名编年史家记载道："当阿里贝伊收到这个信息时，他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他最大的愿望。他决心反抗奥斯曼政府，并将自己的统治范围从埃及的阿里什延伸到巴格达。"[19]阿里贝伊与扎希尔·欧麦尔缔结了盟约，并同意推翻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总督。

阿里贝伊致函素丹的死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寻求她的帮

助，以对抗奥斯曼帝国，这加剧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危机。他要求叶卡捷琳娜派出舰船和骑兵将奥斯曼人赶出大叙利亚，作为回报，他承诺帮助俄国人攻占波斯南部。尽管女皇拒绝派出骑兵，但她同意让当时正在地中海巡游的俄罗斯舰队助阵。阿里贝伊的背叛并没有逃过奥斯曼政府的注意。然而，奥斯曼人在黑海和东欧被俄军围困，无法阻止阿里贝伊。

同叶卡捷琳娜和扎希尔结盟让阿里贝伊备受鼓舞，他开始动员他的部队。他召集了一支约2万人的军队，由他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伊斯玛仪贝伊（Isma‘il Bey）带领，入侵叙利亚。1770年11月，马木鲁克部队横扫加沙，又经过4个月的围攻，占领了雅法港。扎希尔带领他的部下加入伊斯玛仪贝伊的部队，并陪同马木鲁克军穿越巴勒斯坦。他们穿过约旦河谷，沿着沙漠的边缘向东，往朝觐路行进。随后，叛军急速朝大马士革迈进，企图从奥斯曼总督手中夺取这座城市。他们一直行进到大马士革以南的村庄穆宰伊里卜，此地距离大马士革一日行程。

伊斯玛仪贝伊进入穆宰伊里卜，直面大马士革总督，后者完全丧失了战斗的意愿。那时正是朝觐季，虔诚的穆斯林正在履行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要从大马士革到麦加，进行危险的沙漠之旅。总督奥斯曼帕夏正在履行朝觐统领的职责。伊斯玛仪贝伊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比大多数马木鲁克人接受过更多的宗教教育。在朝觐季攻击总督是反伊斯兰教的罪行。在没有任何警告和解释的情况下，伊斯玛仪贝伊命令他的士兵从穆宰伊里卜撤退，返回雅法。扎希尔·欧麦尔对此震惊不已，但他的抗议无效。在1770—1771年这个冬季的剩余时间里，叛乱完全停止。

阿里贝伊一定会对伊斯玛仪贝伊大发雷霆。1771年5月，他向叙利亚派遣了第二支部队，统帅是穆罕默德贝伊（Muhammad Bey），外号“艾布·宰海卜”（Abu al-Dhahab），意为“黄金之父”。他的外号得自一次赤裸裸的炫耀：当阿里贝伊将他晋升到贝伊并赋予他自由身时，他向站立在城堡和市中心之间的街道两旁的人群抛洒金币。这是一次公共关系的成功之举，让穆罕默德贝伊家喻户晓。

穆罕默德贝伊率领3.5万名士兵出发。他们横扫了巴勒斯坦南部，在雅法同伊斯玛仪贝伊指挥的军队汇合。两贝伊的马木鲁克联军势不可挡。他们穿过巴勒斯坦，在一次小规模战斗后，于6月将奥斯曼总督赶

出了大马士革。马木鲁克人现在控制了埃及、希贾兹和大马士革。阿里贝伊几乎已经实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重建马木鲁克帝国的愿望。

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没给任何警告和解释，穆罕默德贝伊率军离开大马士革，返回开罗。这次的问题又出在虔诚的马木鲁克将军伊斯玛仪贝伊。马木鲁克的将领们刚控制大马士革，伊斯玛仪贝伊向穆罕默德贝伊发难，指责后者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不仅冒犯了素丹，也冒犯了他们的宗教。在为阿里贝伊效劳之前，伊斯玛仪贝伊曾在伊斯坦布尔待过一段时间，他对素丹作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的领袖充满敬意。他警告穆罕默德贝伊说，奥斯曼帝国不会允许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在今世不受惩罚，真主也会在后世追究他们的责任。“因为反叛素丹确实是魔鬼的阴谋。”伊斯玛仪贝伊警告穆罕默德贝伊。

伊斯玛仪贝伊的警告引起了穆罕默德贝伊的焦虑，还激发了后者的野心。他认为，阿里贝伊同俄国女皇签订了反对素丹的协议，这背离了伊斯兰教的道路。他提出：“现在，伊斯兰法允许任何穆斯林诛杀［阿里贝伊］而不受惩罚，并占有他的后宫和财富。”[20]伊斯玛仪贝伊从本质上推断：穆罕默德贝伊会因反叛他的主人而得到真主和素丹的宽恕，也会获得阿里贝伊对埃及的统治权。伊斯玛仪贝伊的观点得到了支持，现在，阿里贝伊最信赖的两名将领正率领一支庞大的马木鲁克军队返回埃及，决心推翻他们的前主人。

马木鲁克人征服并迅速放弃大马士革所带来的冲击在东地中海地区产生回响。当时的一名编年史家惊呼：“大马士革人完全被这件奇事震惊了。”扎希尔和他的盟友们也是如此。当马木鲁克军队进攻大马士革时，扎希尔占领了赛达，并在雅法部署了一支2000人的驻军。由于过度扩张，他现在失去了他最重要的盟友，冒着单独面对奥斯曼人的愤怒的风险。至于阿里贝伊，他意识到他已经无力回天。他只能召集一些象征性的支持者，但这些人在同穆罕默德贝伊率领的军队进行小规模战斗后也四散奔逃了。1772年，阿里贝伊逃离埃及，同扎希尔一起在阿卡避难。

随着阿里贝伊逃离埃及，他建立新马木鲁克帝国的梦想破灭了。穆罕默德贝伊自立为埃及的统治者，并派伊斯玛仪贝伊前往伊斯坦布尔，为他争取埃及和叙利亚两省总督的职位。穆罕默德贝伊不做帝国梦，而

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框架内寻求认可。

阿里贝伊急于夺回王位，在还没来得及调集规模足够大的军队去对付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强大的马木鲁克家族的情况下，他仓促行动。1773年3月，他率领一支小部队向开罗进发，为恢复他的王国做无望的努力。穆罕默德贝伊的军队与他交战，彻底击溃了他的部队。阿里贝伊受伤被俘。穆罕默德贝伊把他的主人带回开罗，将他软禁在自己家里。一周之后，阿里贝伊去世。谣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称这是一场谋杀。“只有真主知道他究竟如何死去。”编年史家哲拜尔提总结道。[21]

阿里贝伊的死对扎希尔来说是一场灾难。他现在很老了，已经80多岁了，而当时的预期寿命只有他岁数的一半。他没有地区盟友，且已公然背叛了他的奥斯曼君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扎希尔仍在寻求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认。由于奥斯曼人深陷与俄国的战争，并渴望确保麻烦重生的叙利亚行省的和平，扎希尔毕生的抱负似乎即将实现。1774年，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总督告诉他，他将被任命为赛达的总督，统领巴勒斯坦北部和外约旦的部分地区。

但伊斯坦布尔确认扎希尔总督任命的皇家法令从未下达。1774年7月，素丹与俄国签订和平条约，结束了长达6年的战争。他没有心情去奖励那些与他的敌手俄国结盟的叛徒。素丹没有发出晋升令，而是派穆罕默德贝伊率一支马木鲁克军队去推翻这位老迈的巴勒斯坦强人。1775年5月，埃及军队占领了雅法，屠杀了当地居民。恐慌蔓延到扎希尔控制下的其他城镇。月末前，扎希尔的政府和大部分民众逃离了阿卡。6月初，穆罕默德贝伊占领了阿卡。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穆罕默德贝伊，这位矍铄、健壮的埃及马木鲁克统治者刚一占领阿卡就病倒了。1775年6月10日，他突然死于高烧。几天后，扎希尔收复了他的城市，在经历埃及占领带来的恐慌后恢复了城市的秩序。但事实证明，扎希尔的解救是短暂的。奥斯曼帝国派海军上将哈桑帕夏（Hasan Pasha）带着15艘舰船出战，要求扎希尔臣服并补缴税款。扎希尔没有抵抗。他对大臣们说：“我是个老人，我再也没有战斗的勇气了。”厌倦了战争的大臣们附和道：“我们是穆斯林，服从素丹。对于信奉独一真主的穆斯林来说，不允许以任何形式与素丹作

战。”[22]

扎希尔的和平退隐计划被他自己的家人破坏了。他同意带着家人和仆从从阿卡撤出，投奔他在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盟友。但他的儿子奥斯曼（‘Uthman）背叛了他，他怀疑父亲假装撤退，一旦有机会就重新掌权，就像他一次又一次所做的那样。奥斯曼拜访在扎希尔手下效力多年的北非将领艾哈迈德·阿加·德尼兹利（Ahmad Agha al-Denizli），透露他的父亲正要逃离阿卡。“如果你想成为［上将］哈桑帕夏最喜欢的人，那就把真主的旨意施于我的父亲吧，因为他在外面，和他的家人单独在一起。”德尼兹利召集了一群北非雇佣军，伺机伏击扎希尔。

刺客们不得不设下圈套去抓住那个难以捉摸的老谢赫。在距阿卡城门外15分钟路程处，扎希尔注意到他的一个妃子不见了，家人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这不是抛弃人的时候。”老谢赫责骂道，然后骑马回去找那个被抛弃的女人。他在德尼兹利的小分队藏身处附近找到了她，伸手拉她上马。年龄和焦虑坏了事。86岁的扎希尔被年轻女子从坐骑上拉下来，倒在地上。刺客们跳了出来，用匕首击倒了老人。德尼兹利拔剑砍下扎希尔的头，以此作为战利品献给奥斯曼海军上将哈桑帕夏。

如果说德尼兹利希望通过这一举动赢得哈桑帕夏的好感，他将会非常失望。奥斯曼海军上将让他的部下清洗扎希尔的头颅，然后把它放在椅子上，凝视着这位年迈谢赫干枯的脸。海军上将转向德尼兹利说：“如果我不能替扎希尔向你报仇，真主是不会原谅我的！”[23]他立马命令手下把德尼兹利带走，勒死他，把他的尸体扔到海里。

扎希尔·欧麦尔和伟大的阿里贝伊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经受住了统治阿拉伯世界250年来最严重的内部挑战。两位地方领袖同基督教势力结盟，集埃及和巴勒斯坦两个富裕地区的财力，共同反对素丹的政府。阿里贝伊差点重建囊括叙利亚、埃及和希贾兹的古马木鲁克帝国，并置于他个人的统治之下。但即便在这关键时刻，奥斯曼人仍然对阿拉伯领土上反叛的臣民施加了巨大的影响。马木鲁克将领伊斯玛仪贝伊和穆罕默德贝伊，虽然跨过叛乱的门槛，但在触及合法性的底线时撤回了脚步，转而寻求帝国中央政府的承认。用伊斯玛仪贝伊的话来

讲，大多数地方领袖仍然认为“反叛素丹是魔鬼的阴谋”。

扎希尔·欧麦尔和阿里贝伊的倒台并不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地方统治者的终结。马木鲁克人继续主宰着埃及的政治生活，尽管在阿里贝伊和穆罕默德贝伊离世之后，再没出现过单独的统治者。各马木鲁克家族又回复到派系斗争状态，这让埃及在18世纪余下的日子里动荡不安。奥斯曼人重新确立了他们对各叙利亚行省的控制，并任命强人担任大马士革、赛达和的黎波里的总督。更偏远的地方，如黎巴嫩山、巴格达和摩苏尔，仍然由本地领袖统治，但没有人试图直接挑战伊斯坦布尔的统治。

阿拉伯世界对奥斯曼统治的下一个真正挑战出现在帝国边界之外阿拉伯半岛的中部。这是一场因其清教式的意识形态而更具威胁的运动，将在从伊拉克经由叙利亚沙漠到希贾兹的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弧形区域内威胁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与扎希尔·欧麦尔和阿里贝伊不同，这场运动的领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如今的中东和西方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就是瓦哈比改革运动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于1703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Najd）地区的绿洲小镇欧叶伊奈的一个学者家庭。他年轻时到处旅行，在巴士拉和麦地那进行宗教学习。他接受了伊斯兰教四大教法传统中最保守的罕百里学派的训练，并深受14世纪神学家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影响。伊本·泰米叶主张恢复先知和他最初的继任者们（即哈里发）时期的穆斯林社团。他谴责一切与苏非主义有关的神秘主义做法，认为这些做法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带着明确的信念和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的雄心回到家乡纳季德。

起初，这位热情洋溢的青年改革者得到了他家乡统治者的支持。然而，他的观点很快就引起了争议。当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下令以通奸罪公开处决一名妇女时，附近城镇的首领和欧叶伊奈的主要贸易伙伴感到惊骇并开始警觉。这不是欧叶伊奈居民所熟悉和践行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们向统治者施压，要求处死这个激进的神学家，但统治者却选择了放逐伊本·阿卜杜·瓦哈卜。

这位带着危险思想流亡在外的年轻神学家并没有走得很远。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受到了临近绿洲迪尔伊叶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沙特（Muhammad ibn Sa‘ud）的欢迎。现代沙特人把他们第一王国的建立时间定于1744—1745年间的这次历史性会面，当时两人达成一致，沙特统治者和他的后人将奉行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所宣扬的修正过的伊斯兰教。《迪尔伊叶协议》确立了这场运动的基本原则，后来被称为瓦哈比主义。

该运动初始时期，瓦哈比派被外界广泛误解。他们被描述为一个新的教派，并被指控持有非正统的信仰。恰恰相反，他们的信仰是极端正统的，呼吁回归先知和他的继任哈里发们的原初伊斯兰教。瓦哈比派试图以《古兰经》降示后的第三世纪为界，认定之后伊斯兰教的发展是“有害的标新立异”并明令禁止。

瓦哈比主义最重要的信条是真主独一无二的属性，也即他们所说的“认主独一”。用任何其他低于真主的生命体同真主匹配，都被谴责为多神崇拜（阿拉伯语为“*shirk*”）。这是因为，一旦有人相信真主有伙伴或代理，那他信仰的就不止一个神。同许多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一些重大变化。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中形成了许多与瓦哈比主义所奉行的绝对的认主独一论相悖的制度。

例如，在阿拉伯世界，圣人崇拜很普遍，从先知穆罕默德的门徒到身份更低的本地村庄的圣人，都有自己的圣墓或圣树。（这些圣地至今仍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得到保存和维护。）瓦哈比派反对穆斯林向圣人祈祷以代替他们向真主说情，因为这损害了真主的独一性。他们认为，向杰出的穆斯林表达敬意，应该以他们为楷模行事而不应敬拜他们的坟墓。因此，圣墓和纪念圣人诞辰的年度朝圣活动成为瓦哈比派早期的攻击目标。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曾亲手砍倒圣树，推倒圣墓。摧毁圣墓这种对伊斯兰教中最受尊崇的人物的大不敬行为，让主流的逊尼派穆斯林社会震惊万分。

除了憎恶圣人崇拜外，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特别不能容忍与苏非主义

有关的神秘主义做法和信仰。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有很多种形式，从行乞苦修到著名的德尔维希旋转舞。从把斋到吟诵、从舞蹈到自焚，苏非派使用多种技巧来达到同造物主神秘结合的狂喜。苏非主义是奥斯曼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各苏非教团定期举行礼拜仪式。一些教团建造精美的道堂，吸引社会精英，另一些教团则呼吁彻底禁欲，抛弃世俗的一切。某些行业和职业与特定的苏非教团相关联。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宗教制度会与奥斯曼社会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瓦哈比派认为，所有参与苏非主义活动的人都是多神崇拜者，因为他们渴望与造物主建立神秘的联合。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

瓦哈比派将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很大一块视为多神崇拜，从而使自己走上了与帝国冲突的道路。尽管正统伊斯兰教规定容忍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其他一神信仰，但却绝对不能容忍多神崇拜或多神信仰。事实上，所有优秀的穆斯林都有责任让多神崇拜者认识到他们信仰的错误，并将他们带上伊斯兰教的正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穆斯林就有责任参加“圣战”打击和消灭多神崇拜。瓦哈比主义将苏非主义和圣人崇拜等主流宗教行为定性为多神崇拜，这直接挑战了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合法性。

只要瓦哈比运动局限在奥斯曼帝国边界之外的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地区，奥斯曼人就不会重视它带来的挑战。从1744年到1765年穆罕默德·本·沙特去世期间，瓦哈比运动的扩张仅限于纳季德中部的绿洲城镇。直到18世纪80年代末，瓦哈比主义才扩散到伊拉克南部和希贾兹的奥斯曼帝国边境。

在18世纪90年代，奥斯曼人注意到阿拉伯行省面临的新威胁，并敦促巴格达总督采取行动。巴格达的帕夏尽可能地推迟派他的军队进入阿拉伯半岛的敌对地区。1798年，他终于召集了一支1万人的军队与瓦哈比派作战。奥斯曼军队在瓦哈比地区表现不佳，他们很快被包围，被迫与沙特将领沙特·本·阿卜杜·阿齐兹（Sa‘ud ibn ‘Abd al- ‘Aziz）进行停火谈判。瓦哈比派同意停火，但不承诺今后会一直认可奥斯曼伊拉克的城镇和村庄。巴格达的帕夏对此感到忧虑重重。

1802年，瓦哈比派第一次将他们的“圣战”推进到奥斯曼领土，他们袭击了伊拉克南部圣地卡尔巴拉。卡尔巴拉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中占有特

殊地位，因为公元680年，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侯赛因·本·阿里（Husayn ibn ‘Ali）就是在这里被伍麦叶哈里发的军队杀害的。殉难的侯赛因被尊为什叶派伊斯兰教12位永无过失的领袖（即伊玛目）中的第三位，而建在他陵墓遗址上的清真寺装有镀金圆顶，十分奢华。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到这位伊玛目的陵墓献礼敬拜，而这恰恰是瓦哈比派最厌恶的圣人崇拜。

瓦哈比派对卡尔巴拉的袭击非常残酷，令人胆寒。编年史家伊本·比什尔（Ibn Bishr）给出了同时代人对这场大屠杀的描述：

> 穆斯林［即瓦哈比派］包围并突袭了卡尔巴拉。他们杀害了市场和房子里的大部分人。他们摧毁了侯赛因陵墓上的圆顶。他们把在陵墓内部和周边看到的东西都拿走了，包括饰有绿宝石、蓝宝石和珍珠的墓罩。他们洗劫了城里所有的东西——财物、武器、衣服、布料、黄金、白银和珍贵的书籍。他们的战利品不计其数。他们在那里只待了一个上午，午后就带着所有的战利品离开了。在卡尔巴拉有近2000人被杀。[24]

屠杀、亵渎侯赛因的陵墓和清真寺以及劫掠城镇，塑造了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公众口中的暴力名声。残暴袭击圣地并杀害那么多手无寸铁的男女和儿童在奥斯曼世界引起了广泛的憎恶。伊拉克南部、叙利亚东部及希贾兹地区城镇和乡村的居民向奥斯曼政府求助，以抵御这一严重威胁。

面对瓦哈比派的挑战，奥斯曼人困难重重。这场改革运动的根据地在阿拉伯半岛中部，位于奥斯曼帝国最偏远的阿拉伯行省之外。奥斯曼军队须从安纳托利亚行军数月，才能到达纳季德的边境。正如巴格达总督所发现的那样，在瓦哈比派自己的地盘上同他们作战非常困难。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仅仅保证庞大军队的食物和水供给，对奥斯曼人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奥斯曼政府发现自己无力遏制瓦哈比派的威胁。

接下来，瓦哈比派袭击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给奥斯曼帝国合法性的核心以重重一击。1803年3月，沙特将领沙特·本·阿布杜·阿齐兹向希贾兹进发，于4月进入麦加城。他的军队没有遇到抵抗，也保证不使用暴力。他们先向麦加的居民解释了他们的信仰，然后实施了他们

的新法：禁止穿丝绸衣服和吸烟，摧毁圣墓，拆毁建筑上的圆顶。在占领两大圣城几个月后，瓦哈比派退回纳季德。直到1806年，瓦哈比派才决定将希贾兹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剥离出来，并入他们迅速扩张的国家。

一旦瓦哈比派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朝觐者就不再被允许进入伊斯兰教的圣城来完成朝觐功课。来自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奥斯曼帝国官方朝觐团中都有一顶由骆驼负载的驮轿（*mahmal*），装饰华美，里面安放着覆盖克尔白(Ka‘ba)天房的幔帐。天房位于麦加清真寺的中央，内有神圣的宝石。驮轿中还有《古兰经》抄本和大量珠宝。敲鼓吹号的乐手们围绕着驮轿。使用音乐、装饰克尔白天房以及以奢华敬神都触犯了瓦哈比派的禁令，他们拒绝驮轿进入麦加，破坏了几个世纪以来逊尼派穆斯林对麦加最神圣圣地的礼敬。

一名曾在1806年陪同埃及朝觐团的军官，把他同瓦哈比派接触的经历告诉了编年史家哲拜尔提：

> 瓦哈比人指着驮轿问他：“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需要你们如此崇敬？”
>
> 他回答说：“这是一个自古以来被遵循的习俗。这是一个象征，也是朝觐者聚集的标志。”
>
> 瓦哈比人说：“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也别带这些东西来了。如果你再带来，我就把它砸碎。”[25]

1807年，一支不带驮轿和乐师的叙利亚朝觐团试图进入麦加，但仍遭到拒绝。不管有没有驮轿，瓦哈比派都认为奥斯曼穆斯林不比多神教徒好多少，因此拒绝他们进入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

素丹帝王头衔中最重要的部分，强调他是信仰的捍卫者和希贾兹圣城的守护者。瓦哈比派吞并希贾兹并禁止奥斯曼朝觐团进入，蔑视了奥斯曼政府守护其领土的世俗权力和素丹作为伊斯兰教最神圣城市守护者的宗教合法性。威胁已严重到无以复加。若奥斯曼人无法应对这一挑战并重申其权威，他们将无法生存。

尽管奥斯曼人很快就将瓦哈比派贬斥为沙漠中野蛮的贝都因人，但他们知道挫败这场运动将非常困难。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现代战争表明，大国在阿拉伯半岛征战会面临巨大的后勤问题。部队不得不用舰船运送，并在酷热的陆地上长途跋涉，补给线长而脆弱。他们被迫在瓦哈比派的地盘上作战。瓦哈比派是狂热的，深信他们是在践行真主的意志。因此，总会有奥斯曼士兵被瓦哈比派强有力的宣教感染而投入敌方阵营的风险。

从伊斯坦布尔向希贾兹派远征军不太可能。对于这样的远征，奥斯曼人缺乏财力和军事资源。他们转而一再要求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的总督出兵。巴格达总督正在他的南部地区继续抵御瓦哈比派的袭击，尚未能成功击退袭击者。大马士革的总督库尔德人坎吉·优素福帕夏（Kanj Yusuf Pasha）向伊斯坦布尔承诺重新打通朝觐路线，但他没有资源去兑现这一承诺。正如叙利亚编年史家米哈伊勒·米舍卡（Mikhayil Mishaqa）所言，坎吉·优素福帕夏“既无法派出足够的士兵，也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弹药，以将瓦哈比派赶出希贾兹，因为［从大马士革出发］，这将是一场40天行程的远征，将穿过炙热的沙地，沿途也没有食物和水补给他们及其坐骑”。26

只有一个人能够调动必要的军力，并证明有足够的能力击败瓦哈比派，为奥斯曼帝国收复希贾兹。1805年以来，埃及一直由一位能力非凡的总督统治。然而，天赋和雄心可以让他应对瓦哈比派的挑战，但很快又会让他转而对抗奥斯曼政府。确实，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将行省领导人挑战伊斯坦布尔对阿拉伯行省统治的危险趋势带向顶峰。事实证明，穆罕默德·阿里强大到足以威胁奥斯曼王朝本身。

(1) 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使用的“阿门”同源，源自阿拉米语。——译者注

第三章　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帝国

1798年6月，英国舰船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埃及海岸。一个登陆队划船上岸，当时还很不起眼的亚历山大城的总督和地方显贵们接待了他们。英国人警告他们说法国即将入侵，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总督愤慨地说：“这是素丹的土地，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无权得到它，让我们自己处理吧！”[1]一个像法国这样的次等国家将要威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或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可能会向另一个次等国家英国求助，这类说法显然冒犯了亚历山大的显贵们。英国人划着船回到他们的高桅帆船上，撤走了。当时，没有人再进一步考虑这件事。

亚历山大城的人民在7月1日早上醒来，发现他们的港口满布军舰，他们的海岸被入侵。拿破仑·波拿巴率领一支大规模的部队到来，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第一支进入中东的欧洲军队。由于军力和火力都不及对手，没过几小时，亚历山大就投降了。法国人站稳了脚跟，继续向开罗进发。

马木鲁克骑兵在开罗南郊与法国军队正面相遇。英勇的马木鲁克人拔出剑，向法国侵略者发起进攻，仿佛1516年马木鲁克人在达比格草原大战奥斯曼人的场面重现。但马木鲁克人甚至没能进入攻击距离。法国人排着紧密队形向前推进，一排排步兵的步枪持续轰鸣，一批批马木鲁克骑兵倒地阵亡。一位同时代的埃及编年史家记录道：“空气浓黑，满布火药、烟尘和风裹挟来的尘土。枪声不断，震耳欲聋，人们觉得地在晃动，天在崩塌。”[2]据埃及目击者说，战斗在45分钟内结束。拿破仑军队占领了毫无防备的开罗，恐慌席卷街巷。

在接下来的3年里，埃及人民直接接触到了法国人的风俗习惯、启蒙运动的思想和工业革命的技术。拿破仑曾打算在埃及建立永久政权，这意味着要用法国统治的好处来赢得埃及人民的心。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有67名学者随法国步兵前来，他们肩负双重使命：研究埃及，并用法国文明的优越性感染埃及人。随着法国大革命思想的自由传播，占领埃及成为法国最初的“文明化使命”。

阿布杜·拉赫曼·哲拜尔提（1754—1824）是这次占领的重要目击者，他是一名知识分子和神学家，能够接触到法国和埃及社会的最高阶层。哲拜尔提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法国的占领，详细描述了埃及人同法国人及其革命思想和令人震惊的技术的碰撞。

法国革命思想与埃及穆斯林价值观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法国人认为具有普世性的启蒙运动价值观，对许多埃及人来说是非常令人反感的。他们既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也是虔诚的穆斯林。从拿破仑第一次向埃及人民宣布“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只有智慧、才干和美德才能使他们彼此不同”时，就可以看出这种世界观上的差异。

拿破仑的声明非但没有引起谋求解放的共鸣，反而令人深感沮丧。哲拜尔提逐行批驳了这篇声明，拒绝了拿破仑所吹嘘的大多数“普世”价值观。他将拿破仑宣称的人人平等贬斥为“谎言和蠢话”，并总结道：“你看，他们是物质主义者，否认真主的所有属性，他们遵循的信条将人的理性变得至高无上，人们随心所欲对世事做出评判。”[3]哲拜尔提的言论反映了埃及大多数穆斯林的观念，他们拒绝人类理性凌驾于天启的宗教之上。

如果说法国人不能说服埃及人接受启蒙运动的思想，但他们仍然相信法国的技术会打动当地人。拿破仑的学者给埃及带来了一批新巧的事物。1798年11月，法国人举行蒙哥尔费（Montgolfier）热气球发射仪式。他们在开罗周围张贴告示，邀请市民见证飞行的奇迹。哲拜尔提听到法国人就他们的飞行器给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说法，“人们可以坐在里面，前往遥远的国度采集信息、发送消息”，于是他亲自去见证这项技术的展示。

看着平台上那只装饰着法国红、白、蓝三色的蔫蔫的气球，哲拜尔提满是怀疑。法国人点燃了蒙哥尔费热气球的火芯，让气球充满热空气直到起飞。人群惊愕得喘不过气来，法国人显然乐意见到这样的反应。一切似乎进展顺利，直到气球失去了它的火芯。没有了热空气，蒙哥尔费热气球垮了，坠落在地面上。热气球坠毁让开罗的观众恢复了对法国技术的蔑视。哲拜尔提不屑一顾地写道：“很明显，这就像仆人们为节日和婚礼做的风筝。”[4]当地人并没有被打动。

法国人没有意识到埃及人固有的骄傲和被外国占领的屈辱感。拿破仑的声明似乎是呼吁埃及人感恩，但鲜有埃及穆斯林会认可法国人或他们的制度——至少不会当着法国人的面承认。贝托莱先生（Monsieur Bertholet, 1748—1822）的化学演示就是一例。

哲拜尔提是开罗法国研究院的常客，这次演示他又出席了。他坦诚地记录下他对所目睹的化学和物理学成就的惊讶。他写道："我在［研究院］看到的最神奇的事情之一是：一位助手拿起一个装满蒸馏液体的瓶子，倒了一点到杯子里，然后他又从另一个瓶子里倒了些东西。这两种液体沸腾了，冒出五颜六色的烟，直到烟消失，杯子里的液体都干了，变成了一块黄色的石头。他把石头倒出来，放在架子上。那是一块干石头，我们拿在手里查看。"液体转化为固体之后，他又演示了气体的易燃性和纯钠的挥发性。当"用锤子轻轻地"敲击时，钠发出"像卡宾枪一样可怕的声音"。当哲拜尔提和他的埃及同胞们被砰砰的炸裂声惊得瞠目结舌时，他对法国学者们的欢乐愤恨不已。

重头戏是用莱顿瓶来演示电的特性，莱顿瓶是1746年研制出来的静电发生器。"如果一个人一手握引线……一手接触这个旋转的玻璃瓶的底部……他的身体会颤抖，他的骨架会震动，他的肩胛骨会发出嘎嘎声，他的前臂会立即抖动起来。任何人，即使是一千人或更多，只要接触过他、他的衣服或与他相连的事物，就会有同样的体验。"

毫无疑问，现场观看演示的埃及人对他们所见到的景象印象深刻，但他们尽力不表现出惊讶。一名目睹化学演示的拿破仑的助手日后写道："液体转化、电的骚动和流电实验等所有的奇迹完全没有让他们感到惊讶。"他说，演示结束后，一名穆斯林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一切都很好，但它们能做到让我同时在这里和摩洛哥吗？"贝托莱耸了耸肩，以示回答。这位谢赫说："啊，好吧，他毕竟不是个足够出色的巫师。"[5]对此，哲拜尔提不能苟同，私下里他在他的书房里反思这些演示："他们的［研究院］里有奇怪的东西、装置和设备，获得的成果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的。"[6]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的真正原因是地缘战略，而非文化因素。法

国在18世纪后半叶的主要对手是英国。这两个欧洲海洋强国在多地争夺霸权，包括美洲、加勒比、非洲和印度。英国和法国的商业公司在印度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霸权争夺战，双方不得不通过7年战争（1756—1763）才分出胜负。当时英国打败了法国并取得了对次大陆的霸权，但法国从未接受过它在印度的失败。

1792年法国大革命战争爆发后，英法两国又恢复了敌对状态。拿破仑重回印度，以期寻找损害英国利益的方法。通过占领埃及，他希望统治东地中海，并关闭通往印度的战略性的海陆线路，这条线路从地中海通过埃及到红海和印度洋。英国人得知拿破仑正在土伦集结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怀疑他将对埃及采取行动。于是，霍雷肖·纳尔逊上将（Admiral Horatio Nelson）率领一支强大的海军中队前往拦截法国舰队。实际上，他们一直追击到埃及，在那里他们与亚历山大总督进行了短暂而令人沮丧的会面。纳尔逊撤出他的舰队，去东地中海的其他地方搜寻拿破仑。

法国人成功地躲避了皇家海军，拿破仑的军队迅速征服了埃及。然而，纳尔逊的中队在一个月后赶上了法国舰队，并于8月1日在尼罗河战役中成功地击沉或夺取了所有法国军舰，只有2艘军舰幸免。拿破仑的旗舰“东方号”在战斗中被炸，形成了一个壮观的火球，照亮了夜空。在尼罗河战役中，法军折损了1700多人。

英国对法国舰队的胜利宣告了拿破仑远征的失败。法军2万人被困在埃及，无法与法国通信。这次失败严重打击了埃及法军的士气。1799年8月，拿破仑突然抛下他的军队，返回法国，同年11月他在法国夺取政权，这加剧了埃及法军的孤立感。

拿破仑逃离后，埃及的法军无所事事。拿破仑的继任者与奥斯曼人就法军从埃及全部撤离进行谈判。1800年1月，法国人和奥斯曼人达成了协议，但他们的计划被英国人破坏了，后者不希望看到一支庞大而富有经验的法军重新加入拿破仑的军团，从而在其他战线上与英国作战。1801年，英国议会批准进行军事远征，以确保法国在埃及投降。远征军于1801年3月抵达亚历山大，同奥斯曼人联合对开罗实行两边夹击。法国人于1801年6月和8月分别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投降。之后，他们登上了

英国和奥斯曼的船只，被运回法国，结束了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

法国对埃及的占领只持续了3年。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段令人着迷的时期，其间埃及人和法国人在彼此身上都找到了值得钦佩和谴责之处。在这次接触中，双方都受了伤。1801年夏天，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联军的驱赶下，从开罗撤出的法国人不再是自信的革命新秩序的代言人。相反，他们因战争和疾病而减员，他们的士气因困在埃及数年得不到救助而低落。许多法国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娶了埃及妻子——虽然这并不是对他们占领下的人民屈尊俯就的表现。但是埃及人的自信也因被占领的经历而动摇。面对法国人及其思想和技术，埃及人的优越感遭到了打击。

*

法国人的离去在埃及留下了权力真空。为期3年的占领破坏了马木鲁克人在开罗和下埃及的权力基础。奥斯曼人想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各马木鲁克家族的重建——法国人离开了，对奥斯曼人来说，这是对叛乱的埃及行省重塑权威的绝佳时机。英国人担心拿破仑会试图夺回埃及，于是决心留下强大的威慑力量。就保卫埃及抵御法国未来的攻击而言，英国人对马木鲁克人比对奥斯曼人更有信心，因此他们努力复苏最强大的马木鲁克家族。他们向奥斯曼人施压，要求赦免那些开始重建各自家族和恢复势力的最核心的马木鲁克贝伊。奥斯曼人不得不违背对自己更有利的判断，遵从英国的意愿。

1803年，英国远征军刚一离开，奥斯曼人就采用自己的方案解决埃及问题。帝国中央政府命令开罗的总督消灭马木鲁克贝伊，并将他们的财富充入国库。[7]然而，马木鲁克人已经恢复元气，足以抵抗奥斯曼人的攻击。奥斯曼人和马木鲁克人随即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从而延长了饱受战争折磨的开罗平民的苦难生活。混乱的局势下，一名奥斯曼军官冒了出来，控制了与马木鲁克人的冲突，并赢得了公众支持来统治埃及。事实上，他很快就会成为埃及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Ali）。

穆罕默德·阿里（1770—1849）是阿尔巴尼亚人，生于马其顿的卡瓦拉，在埃及的奥斯曼军队里统领一支由6000人组成的强大而桀骜难驯的阿尔巴尼亚分遣队。1803—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通过不断变化的联盟关系强化了他的个人权力，牺牲了奥斯曼总督、其他奥斯曼兵团的统领和主要马木鲁克贝伊的利益。他公开寻求开罗显贵们的支持，这些人在经历了由法国人和奥斯曼人5年内先后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之后，变得益发躁动不安。到1805年，这位阿尔巴尼亚分遣队的统领已成为一名有能力在开罗拥立国王的人，但他自己也渴望成为国王。

穆罕默德·阿里的活动并未逃脱奥斯曼当局的注意。这位阿尔巴尼亚人的统领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但他有天分和雄心，可以为帝国所用。阿拉伯半岛的局势依然严峻。1802年，瓦哈比派袭击了伊拉克的奥斯曼帝国领土，并于1803年控制了圣城麦加。这些伊斯兰改革者对来自开罗和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朝觐团施加压力，并威胁要完全禁止他们进入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就像他们在1806年以后所做的那样）。对素丹来说，这种局面是难以忍受的，因为他通过他的帝王头衔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最神圣城市的守护者。1805年，开罗的显贵们首次请求伊斯坦布尔任命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帝国中央政府却决定任命他为阿拉伯半岛希贾兹行省的总督，并委派给他粉碎瓦哈比运动的危险任务。

作为希贾兹的候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被晋升为帕夏，这使他有资格担任奥斯曼行省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了希贾兹总督的任命，但仅仅是为了头衔。他对挪到这个红海行省任新职毫无兴趣。相反，他与开罗文职显贵中的盟友密谋向奥斯曼人施加压力，要求任命他为埃及总督。显贵们相信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阿尔巴尼亚士兵能够给开罗带来秩序。他们还有一种错觉，认为穆罕默德·阿里会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心怀感激，进而允许显贵们操控这位他们任命的总督。他们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减轻政府对开罗的商人和工匠所施加的税负，以重振该省的经济活力，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但是穆罕默德·阿里另有计划。

1805年5月，开罗市民起来抗议奥斯曼总督胡尔希德·艾哈迈德帕夏（Khurshid Ahmad Pasha）。在经历了多年的动荡、暴力、过度征税和不公正之后，开罗的普通民众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他们关闭店铺以示抗议，并要求奥斯曼人任命他们选择的总督。经历过这些动荡时代的

哲拜尔提描述了开罗各清真寺头戴缠头的谢赫们领导的大规模示威，年轻的男性在示威队伍里高呼口号，反对残暴的帕夏和奥斯曼制度的不公。暴民们来到穆罕默德·阿里的家。

穆罕默德·阿里问：“你们想让谁当总督？”

人们回答：“我们只接受你。根据我们的标准，你将成为我们的总督，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公正、善良的人。”

穆罕默德·阿里谦逊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暴民们坚持。在表达了不情愿之后，这位狡猾的阿尔巴尼亚人假装人们说服了自己。然后，领头的显贵们给他准备了一件毛皮披风和一件仪式长袍，就地给他举行了加冕仪式。这是前所未有的：开罗人民将他们自己选择的总督强加于奥斯曼帝国。

在任总督胡尔希德·艾哈迈德帕夏对此不以为然。他反驳道：“我是素丹任命的，我不会因农民的命令而被免职，只有在帝国政府的命令下才能让我离开城堡。”[8]开罗的平民围困了城堡里被罢免的总督一个多月，直到1805年6月18日，伊斯坦布尔发布命令确认了人民对总督的选择。现在，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的主人。

被任命为埃及总督是一回事——自1517年奥斯曼人征服埃及以来，已有数十人获得了这一头衔，而实际统治埃及则是另一回事。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确立了对该行省的掌控，这是之前和之后的总督们都没能做到的。他成功地垄断了埃及的财富，并用财政收入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他依靠军队扩大了统治疆域，使埃及成为帝国的中心。但穆罕默德·阿里和伟大的阿里贝伊不一样。后者是一名马木鲁克，梦想着重建马木鲁克帝国；而前者是一个奥斯曼人，试图主宰奥斯曼帝国。

穆罕默德·阿里也是一位创新者，他借鉴欧洲的思想和技术，使埃及走上了一条改革之路，他的做法后来为奥斯曼人所效仿。他在中东建立了第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他实施了欧洲之外最早的工业化项目之一，运用工业革命的技术为他的军队生产武器和织物。他向欧洲各国首都派遣了教育代表团，并设立了翻译局出版欧洲书籍和技术手册的阿拉

伯语版本。他与欧洲列强建立了直接联系，后者视他为独立的君主，而非奥斯曼素丹的总督。到统治结束时，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成功确立了他的家族对埃及和苏丹的世袭统治。他的王朝将统治埃及直到1952年革命推翻君主制。

虽然奥斯曼中央政府已将穆罕默德·阿里的任命从希贾兹转到开罗，但仍然期望他来发动一场反对瓦哈比派的战役，以恢复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权威。这位新总督找了许多借口来忽视伊斯坦布尔的命令。他是在混乱中上台的，他知道，若他不能让开罗的公众和奥斯曼士兵服从的话，他也会倒台。

穆罕默德·阿里的阿尔巴尼亚士兵给他提供了独立的权力基础，帮助他在开罗使用武力获得控制权。支离破碎的各马木鲁克家族是他的第一个目标，他追打他们一直到上埃及。这位帕夏很快发现，这样的战役代价不菲，且光靠士兵不足以控制埃及，他也需要财政支持。农业是该省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埃及五分之一的农田被捐出以支持伊斯兰机构，其余五分之四则以包税的方式承包给各马木鲁克家族和其他大地主，几乎没给开罗的财库带来任何收益。为了掌控埃及的收入，穆罕默德·阿里必须控制埃及的土地。

通过建立对埃及土地直接征税的制度，穆罕默德·阿里获得了控制埃及所需的资源。在此过程中，他破坏了反对他的马木鲁克人和支持他的开罗显贵们的财政基础，剥夺了宗教学者自主获得的收入，地主们发现他们得依赖他们原本希望控制的总督。总的来说，穆罕默德·阿里先花了6年时间巩固了他在埃及的地位，然后才接受素丹的委托，在阿拉伯半岛发动针对瓦哈比派的军事行动。

1811年3月，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儿子图苏帕夏（Tussun Pasha）领导针对瓦哈比派的军事行动。这将是穆罕默德·阿里第一次在埃及境外行动。在把一大部分军队派往国外之前，他希望确保埃及的和平与稳定。他为图苏举行了授衔仪式，并邀请了开罗所有的重要人士参加，包

括最有权势的马木鲁克贝伊们。在与穆罕默德·阿里政府多年敌对之后，贝伊们将这一邀请视为和解的姿态。显然，他们认为，总督会发现在马木鲁克的支持下统治要比继续反对他们容易得多。几乎所有的贝伊都接受了邀请，身着盛装来到开罗城堡参加仪式。如果说有哪个贝伊有疑虑的话，那么几乎所有马木鲁克首领都出席的事实一定给了他们某种安全感。此外，什么样的人会违反待客的规矩而对他的客人背信弃义呢？

授衔仪式结束后，马木鲁克们组成正式的巡游队列穿过城堡。当他们穿过一条通道时，两头的大门突然关上了。还没等困惑不已的贝伊们明白发生了什么，士兵们突然从墙头冒出来向他们开火。多年的战斗让士兵们十分仇恨马木鲁克人，他们兴致勃勃地执行任务，从墙头跳下去刺杀了那些贝伊。哲拜尔提记录道："士兵们狂怒地屠杀埃米尔们并抢夺他们的衣物，带着恨意，他们一个都没有放过。"士兵们杀死了马木鲁克贝伊们及其打扮起来陪同巡游的随行人员，后者大多数是开罗的普通民众。"这些人喊叫着求救。有人叫着：'我不是士兵，也不是马木鲁克。'另一个人喊着：'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然而，士兵们毫不在意这些尖叫和哀求。"[9]

然后，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横冲直撞地穿过了这座城市。他们拖出任何被怀疑是马木鲁克的人，把他们带回城堡斩首。穆罕默德·阿里在向伊斯坦布尔提交的报告中称，共有24名贝伊和40名他们的手下被杀，他送去了死者的首级和耳朵来支持他的说法。[10]但哲拜尔提的描述表明，暴力的范围要广得多。

城堡里的屠杀是对开罗马木鲁克人的最后一击。他们在开罗生存了近六个世纪，挺过了"冷酷者"塞利姆的征服和拿破仑的入侵，但却几乎被穆罕默德·阿里消灭殆尽。少数幸存的马木鲁克人留在了上埃及，他们知道开罗的统治者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权力，他们没法再挑战他。穆罕默德·阿里确信国内不再有对他统治的任何挑战，现在他可以派军队去阿拉伯半岛，去赢得奥斯曼素丹的感激。

事实证明，瓦哈比战役极大地消耗了穆罕默德·阿里统治的埃及的资源。战场离本土很远，通信和补给线又长又脆弱，图苏帕夏被迫在恶劣的环境中、在敌人的地盘上作战。1812年，瓦哈比派利用他们熟悉乡村环境的优势，把埃及军队引入一条狭窄的小路，大败这支8000人的军队。许多士气低落的阿尔巴尼亚军官退出了战场，返回开罗，导致图苏人手不足。穆罕默德·阿里向吉达派遣了增援部队，次年，图苏成功地占领了麦加和麦地那。1813年，穆罕默德·阿里亲自陪同朝觐团，并把圣城的钥匙送交伊斯坦布尔的素丹，作为素丹恢复对伊斯兰教诞生地的统治权的象征。但是这些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埃及军队损失了8000人，埃及财政支出了17万袋钱（相当于1820年的670万美元）。[11]而瓦哈比派并没有被完全击败，他们只是在埃及军队进攻之前撤退了，且一定会回来。

图苏率领的埃及军队和阿卜杜拉·本·沙特（Abdullah ibn Saud）率领的瓦哈比军队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直到1815年双方才达成休战。回到开罗，图苏感染了瘟疫，回家几天后就去世了。图苏的死讯传回阿拉伯半岛时，阿卜杜拉·本·沙特打破休战协定，袭击了埃及的营地。穆罕默德·阿里任命他的长子易卜拉欣（Ibrahim）为埃及军队统帅。这是易卜拉欣帕夏辉煌的军事生涯的开始，他将成为穆罕默德·阿里的大元帅。

1817年初，易卜拉欣帕夏在阿拉伯半岛接任统帅，对瓦哈比派展开无情的打击。他首先确保埃及对红海希贾兹行省的控制，然后将瓦哈比派逐回阿拉伯半岛中部的纳季德。尽管纳季德已经位于奥斯曼帝国领土之外，但易卜拉欣帕夏决心一劳永逸地消除瓦哈比派的威胁，一直将他的敌人赶回他们的首都迪尔伊叶。在那里，双方进行了一场长达6个月的激烈的消耗战。城墙内的瓦哈比派，在埃及人的围困下，慢慢地缺水缺粮，而埃及军队因疾病和阿拉伯半岛中部致命的夏季高温而遭受重大损失。最终，埃及人获胜，1818年9月瓦哈比派投降，他们知道自己将面临彻底的灭亡。

根据穆罕默德·阿里的命令，埃及军队摧毁了迪尔伊叶，并将瓦哈比运动的所有领导者送往开罗囚禁。穆罕默德·阿里知道，通过镇压让奥斯曼素丹政权合法性遭受长达16年质疑的运动，他赢得了素丹马哈穆德二世（Sultan Mahmud II）的青睐。此外，他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战役中

获胜，这是其他奥斯曼总督或将领没有做到过的。阿卜杜拉·本·沙特和瓦哈比政权的其他领导者从开罗被送往伊斯坦布尔，接受素丹的审判。

马哈穆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将处决瓦哈比运动领导者变成了一个国家庆典。他召集高级政府官员、外国大使和帝国的重要人士到托普卡珀宫观礼。3名罪犯——军队统帅阿卜杜拉·本·沙特、首相和瓦哈比运动的精神领袖被戴上重链，因犯下反宗教和反国家罪接受公开审判。审讯结束后，素丹判处3人死刑。阿卜杜拉·本·沙特在阿亚索菲亚清真寺正门前被斩首，首相在王宫正门前被处决，精神领袖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大市场内被砍头。他们的尸首被拿去示众，头塞在胳膊下，示众3日后，尸首抛入大海。[12]

随着法国军队被驱逐出埃及和瓦哈比运动的失败，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可能有理由相信，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经受住了最严峻的挑战。然而，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的埃及总督本人将对马哈穆德二世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瓦哈比派攻击的是帝国的边缘地区，虽然该地区就信仰而言非常重要，但边缘终究是边缘，而穆罕默德·阿里将对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和统治王朝本身构成挑战。

*

为了表彰易卜拉欣为奥斯曼帝国击败瓦哈比派，马哈穆德二世将穆罕默德·阿里的这个儿子晋升为帕夏，并任命他为希贾兹总督。红海行省希贾兹就以这种方式成为穆罕默德·阿里帝国的第一块新增领土。此后，埃及财政将获得吉达港的海关收入。吉达是红海贸易中的重要港口，也是每年前往麦加朝觐的门户，因此，吉达海关的收入相当可观。

1820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入侵苏丹，大大巩固了埃及对红海的控制。他在尼罗河上游为他的军队寻找新的奴隶士兵来源，同时也希望在苏丹找到神话中的金矿，以充实他的财库。暴行破坏了这次在苏丹的军事行动。喀土穆以北尼罗河边辛迪地区的统治者杀害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伊斯玛仪（Ismail），埃及远征军采取报复行动，杀害了3万名当地居民。黄金从未出现，苏丹人宁愿死也不愿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服役。数千名被俘的服兵役者在从家中被带走时满心沮丧，他们染上了病，在前往埃及训练营的长途跋涉中丧命。1820—1824年间被奴役的2

万名苏丹人中，到1824年只有3000人幸存。[13]苏丹战役（1820—1822）真正让埃及受益的是商业和领土。将苏丹纳入埃及帝国后，穆罕默德·阿里将他控制的土地面积扩大了一倍，并控制了红海贸易。埃及对苏丹的霸权将持续136年，直到1956年苏丹重获独立。

埃及军队新兵短缺让穆罕默德·阿里严重受限。阿拉伯半岛和苏丹的战事，以及士兵年事的增长，使他最初的阿尔巴尼亚军队的实力大打折扣。到苏丹战役时，穆罕默德·阿里军队中幸存的阿尔巴尼亚人已经在埃及待了20年。奥斯曼人于1810年禁止从高加索向埃及输出军事奴隶，以防止马木鲁克复兴并遏制穆罕默德·阿里本人的野心。奥斯曼帝国也不愿意派任何帝国的士兵去为穆罕默德·阿里服务，因为欧洲的前线还需要他们。缺少外部的新兵资源，埃及总督不得不回过头来依靠自己的民众。

在奥斯曼帝国的世界里，建立一支国家军队——一支从工人和农民中征募士兵的军队，仍然是新鲜事物。士兵是由奴隶构成的军事阶层。在17和18世纪，奥斯曼帝国著名的步兵军团，也就是所谓的禁卫军，调整了他们的征兵方式，不再实行“男孩征募”。士兵们娶妻生子，并让他们的儿子加入禁卫军，但有别于其他人群的军事阶层的概念依然存在。农民们被认为过于被动、缺乏活力而不适合服兵役。

18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在同欧洲军队作战时失利，这让素丹对帝国步兵的战斗力渐生疑虑。他们邀请退役的普鲁士和法国军官到伊斯坦布尔介绍现代欧洲的作战方法，如阵形组合、刺刀冲锋和移动火炮的使用。18世纪末，素丹塞利姆三世（1780—1807年在位）建立了一支新的奥斯曼军队，士兵征募自安纳托利亚的农民，身着欧式马裤，由西方军官训练。他称这支新军为“尼扎米·杰地德”（*Nizam-i Cedid*），即“新制”部队，该部队的士兵被称为尼扎米兵。

1801年，素丹塞利姆三世向埃及派了一支4000人的尼扎米军团，穆罕默德·阿里得以亲眼见证军团的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一名同时代的奥斯曼人记录道，派到埃及的尼扎米军团“勇敢地与异教徒作战，连续击败他们的入侵，未见也未听闻任何一名士兵脱逃”。[14]尼扎米军团对强大的禁卫军构成的直接威胁甚于任何一支欧洲军队。尼扎米军是“新制”，意味着禁卫军是“旧制”，但后者不会在仍有能力保护自己利益的情况下

接受裁减。1807年，禁卫军叛变，推翻了塞利姆三世，解散了尼扎米军。虽然奥斯曼帝国的首次国家军队试验以不幸的结局告终，但它仍为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一个可在埃及复制的模式。

而拿破仑的军队给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第二个参考模式。法国的全民兵役带来了一支大规模公民军队，在精明能干的指挥官的带领下，具有征服各大陆的能力。然而，穆罕默德·阿里认为埃及人民是臣民，而不是公民，他从来没有像法国的革命将领那样，试图用振奋人心的意识形态口号来鼓动他的军队。他建设埃及的新制军队，除了决定延请法国军事专家来训练他征募的军队外，效仿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尼扎米军的先例。1822年，他委托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塞韦斯上校（Colonel Sèves）——一名在埃及被称为苏莱曼·阿加（Sulayman Agha）的皈依伊斯兰教的法国人，来组织和训练一支完全从埃及农民中征召的尼扎米军。一年之内，他就组建了一支3万人的部队。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该部队的人数达到13万。

埃及尼扎米军的组建并非一蹴而就。埃及农民担心他们的农场和家人的福利，他们对家园和村庄十分依恋，导致服兵役成为一种真正的折磨。当征兵队逼近时，有些农民逃离他们的村庄以躲避征兵。另一些人则故意割下手指或打掉一只眼睛，使自己残疾，以便以此获得豁免。各地都起来反抗征兵，1824年，上埃及估计有3万名农民造反。即便被迫服兵役，也有许多农民逃走。只有通过严厉的惩罚，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才能迫使埃及农民参军。令人吃惊的是，这支不情不愿的军队在战场上却非常成功。在希腊，这支军队接受了第一次考验。

1821年，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诸省爆发了民族主义起义。这次起义是秘密社团“友谊社”（Filiki Etairia）的成员发起的，该社成立于1814年，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希腊国。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是一个独特的社群，维系这个社群的是他们的语言、东正教信仰和共同的历史，从古典时期一直到希腊化的拜占庭帝国。作为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公开的民族主义起义，希腊战争带来的危险要比18世纪地方领袖的叛乱严重得多。以前的叛乱仅由领袖个人的野心推动，而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能够激励全体人民起来反抗奥斯曼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1821年3月，起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希腊中部、马其顿、爱琴海诸岛和克里特岛。奥斯曼人发现他们同时在几条战线上进行阵地战，于是向穆罕默德·阿里求助。1824年，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率领一支由1.7万名新近训练好的步兵、700名骑兵和4个炮兵连组成的埃及军队向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发。由于他麾下所有的士兵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这是我们第一次谈论真正的埃及军队。

埃及人在希腊战争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新组建的尼扎米军证明了他们的英勇无畏。在征服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后，易卜拉欣帕夏被授予这些行省的总督职位，进而将穆罕默德·阿里的帝国从红海扩大到爱琴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军队在打击希腊人的战场上表现得越好，素丹和他的政府就越担心。埃及人正在镇压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叛乱，并在扩大开罗控制的领土。如果穆罕默德·阿里也起来反叛的话，很难说奥斯曼人能抵挡住他的军队。

埃及的胜利和希腊的苦难也在欧洲各国首都引发关注。希腊战争吸引了英国和法国知识精英的注意力。当古典世界的城市变成现代战场时，欧洲支持希腊的团体大声疾呼，要求他们的政府干预，以保护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免受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和埃及人的伤害。1823年，诗人拜伦勋爵航行到迈索隆吉翁支持独立运动，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希腊问题的关注。1824年4月，拜伦因发烧去世，这使他成为希腊独立事业的烈士，虽然他并没有死在奥斯曼士兵手中。拜伦死后，公众要求欧洲干预的呼声倍增。

英国和法国政府容易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但更关注更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因素。法国同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发展了特殊的关系。相应地，这位埃及总督为他的军队聘请法国军事顾问，依靠法国工程师满足工业和公共设施建设的需求，还派学生到法国接受高级训练。法国渴望保持与埃及的特殊关系，以此扩大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埃及向希腊的扩张让巴黎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在东地中海地区看到埃及比法国更强大，这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对英国政府来说，情况更为明确。看着巴黎在埃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伦敦日益担忧。自拿破仑入侵以来，英国一直试图阻止法国统治埃

及和通往印度的海陆通道。拿破仑时代的大陆战争也给英国留下了创伤，英国担心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上谋求影响力可能会再次引发列强之间的冲突。因此，英国政府致力于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以维护欧洲的和平。很明显，奥斯曼帝国无法依靠自身留住希腊，英国也不希望看到埃及伤害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并将势力扩展至巴尔干半岛。因此，帮助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实现更大的自治，确保奥斯曼和埃及军队撤出争议领土，最符合英国的利益。

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的希腊战役中毫无收获。这场战争大大损耗了他的财库。他的尼扎米新军在希腊被过度使用。奥斯曼人对他的猜疑与日俱增，很明显，奥斯曼人正尽其所能耗尽他的军队和财库。到1827年夏天，欧洲列强已明确表示反对埃及在希腊的地位，并集结了一支英法联合舰队，迫使奥斯曼帝国和埃及撤军。埃及总督最不希望的事情是与欧洲列强在战场上交战。1827年10月，穆罕默德·阿里给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政治代理人的信中说道："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无法站出来对抗欧洲人，［如果我们这么做，］那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整个舰队沉没，多达3万至4万人阵亡。"虽然穆罕默德·阿里为自己的陆军和海军感到骄傲，但他知道他们不是英国和法国的对手。他写道："尽管我们是军人，但我们只具备基础的技战术水平，欧洲人在这方面远远领先我们，并已将他们［关于战争］的理论付诸实践。"[15]

尽管穆罕默德·阿里对可能发生的灾难有着清晰的认识，但他还是将海军投入了这次战斗，派遣舰队前往希腊。奥斯曼人不愿承认希腊独立，素丹决定戳穿欧洲列强虚张声势的幌子，选择无视他们的联合舰队。但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湾困住了埃及船只，并在1827年10月20日的交战中，4小时内击沉了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几乎全部78艘舰船。超过3000名埃及人和奥斯曼人在战斗中丧生，而进攻的联合舰队中约有200人阵亡。

穆罕默德·阿里对他的损失暴跳如雷，并要求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对他海军的损失负责。此外，埃及人发现自己处于拿破仑在尼罗河战役后所处的状况：成千上万的士兵被困，没有船只能够补给他们或接他们回国。穆罕默德·阿里直接与英国谈判，达成休战协议，并在没有同素丹商量的情况下将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和埃及军队从希腊接回埃及。马哈穆德

二世被总督的违逆抗命激怒了，但是穆罕默德·阿里不再寻求素丹的支持。他忠心耿耿侍奉君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从此往后，穆罕默德·阿里将牺牲素丹的利益，追求自己的目标。

纳瓦里诺战役也是希腊独立战争的转折点。1828年，在法国远征军的协助下，希腊战士将奥斯曼军队赶出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中部。同年12月，英国、法国和俄国三国政府会晤，同意建立独立的希腊王国，然后将他们的方案强加于奥斯曼帝国。经过3年多的谈判，希腊王国终于在1832年5月的伦敦会议上成立。

在希腊经历溃败之后，穆罕默德·阿里把目光投向了叙利亚。自1811年他首次同意领导反对瓦哈比派的军事运动以来，他就一直渴望统治叙利亚。1811年，他向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请愿，要求统治叙利亚。1818年战胜瓦哈比派后，他又再次请愿。奥斯曼人两次都回绝了他，不想让他们的埃及总督变得太强大而不再为中央政府效劳。当伊斯坦布尔要求埃及驰援希腊时，中央政府提出有望将叙利亚交给穆罕默德·阿里。在纳瓦里诺折损了他的舰队之后，埃及总督要求兑现承诺，但索求无果。中央政府认为，经历这次损失，穆罕默德·阿里已被大大削弱，无须再去赢得他的好感。

穆罕默德·阿里意识到，中央政府从未打算把叙利亚让给他。他也知道奥斯曼人没有力量阻止他夺取领土。易卜拉欣帕夏和他的军队一回到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就开始组建新舰队，并重新装备他的军队，准备入侵叙利亚。他同英国和法国接触，以获得两国对他勃勃雄心的支持。法国对与埃及达成协议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英国继续反对一切对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威胁。穆罕默德·阿里毫不气馁，继续备战。1831年11月，易卜拉欣帕夏开始率军入侵叙利亚。

现在，埃及军队同奥斯曼帝国交战了。易卜拉欣帕夏率领3万名士兵迅速征服了巴勒斯坦。到11月底，他的军队已经到达北部要塞阿卡。当有关埃及行动的报告送达伊斯坦布尔时，素丹派了一名特使去说服穆罕默德·阿里停止进攻，但没有效果。帝国中央政府随即要求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总督们组建军队去击退埃及入侵者。埃及军队正围攻阿卡，这

个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这给了总督们6个月的短暂时机。

虽然奥斯曼人准备击退埃及军队的入侵，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一些地方领袖在面对来自埃及的新威胁时，选择支持易卜拉欣帕夏，以维护自身的地位。埃及军队到达阿卡时，黎巴嫩山的统治者埃米尔巴希尔二世（Amir Bashir II）同易卜拉欣帕夏缔结盟约。埃米尔巴希尔所在的统治家族——谢哈卜家族的一名成员派亲信幕僚米哈伊勒·米舍卡去观察埃及对阿卡的围攻，并向黎巴嫩山的统治者们汇报。

米舍卡在阿卡观察埃及军队的行动近3周。他刚到达就目睹了埃及海军和奥斯曼守军在阿卡进行的激烈战斗。穆罕默德·阿里投入22艘军舰围攻，向阿卡城堡发射了7万多发炮弹。守军顽强抵抗，并在激烈的交火中成功地让许多军舰失去了战斗力。米舍卡写道，炮火从早晨持续到日落，“在火药的烟尘中，阿卡隐匿不见了”。根据米舍卡的资料，埃及派出了8个步兵团（1.8万人）、8个骑兵团（4000人）和2000名贝都因非正规军攻击守卫阿卡的“3000名勇敢善战的士兵”。看到阿卡坚固的海堤和保护城墙的防御工事，米舍卡警告他的雇主们围攻将是一场持久战。

埃及人连续攻打了阿卡要塞6个月。到1832年5月，城堡坚不可摧的城墙已经损坏到足以让易卜拉欣帕夏集结步兵攻入城堡的地步。他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回想起他们在阿拉伯半岛和希腊所取得的胜利。易卜拉欣帕夏警告他们，开弓没有回头箭，“大炮会跟在他们身后，轰炸任何没有攻占城墙就回撤的战士”。在夹杂着威胁的鼓励言语的演讲后，易卜拉欣帕夏带领他的部下攻向残损不堪的阿卡城墙。他们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壁垒，迫使幸存的守军投降。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阿卡守军只剩下350人。[16]

占领阿卡后，易卜拉欣帕夏向大马士革进发。大马士革城的奥斯曼总督动员1万名平民进行防御。易卜拉欣帕夏知道，未受过训练的平民无法同专业军队作战，他命令部队向这些参与防御的平民脑袋上方开火，吓得他们四散奔逃。确实，枪声足以驱散大马士革人。总督撤离，加入北方的奥斯曼军队。埃及人进入大马士革，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易卜拉欣帕夏命令他的士兵尊重市民和他们的财产，并宣布大赦全部大马

士革人。他打算统治叙利亚人民，所以不想同他们产生隔阂。

易卜拉欣帕夏为大马士革任命了一个执政委员会，随后继续他对叙利亚的无情征服。这位埃及将领把一些大马士革的重要人士带在身边，以防止市民在他离开后造反。米哈伊勒·米舍卡又一次追踪了埃及的军事行动，为黎巴嫩山的统治者们收集情报。当埃及人从大马士革出发时，他统计了他们的人数："1.1万名步兵，2000名正规骑兵，3000名［贝都因］骑兵"，总共有1.6万人，加上43门大炮和3000头运送补给和物资的骆驼。他们行进到叙利亚中部的霍姆斯，在那里又有6000名埃及士兵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7月8日，埃及人在霍姆斯附近同奥斯曼人进行了争夺叙利亚控制权的第一场大战。米舍卡写道："场面令人激情澎湃。当埃及正规军到达战场时，他们遇到了数量更多的土耳其正规军。日落前一小时，双方爆发激烈的战斗，枪声炮火持续不断。"在山顶上观战的米舍卡无法判断战斗的走向。"那是可怕的一小时，其间地狱各门都打开了。日落时分，枪声停歇，只留下大炮轰鸣，直到日落后一个半小时，才重回寂静。"直到那时，他才知道埃及人在霍姆斯战役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奥斯曼将领们匆忙抛弃了营地，开始逃亡。"食物还留在火上炙烤，医药箱、成卷的敷料和［给死者的］裹尸布、大量的毛皮和受奖时穿的披风以及许多物资都留了下来。"17

不知疲倦的易卜拉欣帕夏并没有在霍姆斯逗留。取胜一天后，他率军向北去往阿勒颇，以完成对叙利亚的征服。和大马士革一样，阿勒颇没有反抗埃及军队就投降了，易卜拉欣帕夏留下一个新政府，代表埃及统治这座城市。奥斯曼帝国的总督早已撤离，加入了一支庞大的奥斯曼军队，其中包括霍姆斯战役中幸存的部队。7月29日，奥斯曼人在亚历山大勒塔附近的贝伦村（时属阿勒颇行省，现位于土耳其）与埃及军队交战。埃及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依然重创奥斯曼军队直至接受后者投降。随后，易卜拉欣帕夏率军前往阿达纳港，那里有埃及的舰船，给精疲力竭的军队提供补给。易卜拉欣帕夏给开罗发去了详细记录埃及胜绩的战报，等待他父亲下一步的命令。

而穆罕默德·阿里从战争转向谈判，试图通过素丹的法令或欧洲的干

预来确保他在叙利亚的所得。就奥斯曼人而言，他们不愿意向叛变的埃及总督割让任何利益。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即首相）穆罕默德·拉希德帕夏不承认穆罕默德·阿里在叙利亚的地位，并开始组建一支8万多人的庞大军队，试图将埃及人从土耳其海岸和整个叙利亚赶走。而易卜拉欣帕夏在重组军队和补给军需之后，于1832年10月进入安纳托利亚中部，以对抗奥斯曼人的威胁。当月，他占领了科尼亚城，并在此备战。

埃及军队将不得不在能想象到的最恶劣的环境中作战。习惯了夏季沙漠的炎热和尼罗河畔温和冬季的埃及军队，发现自己身处冬季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漫天暴雪和零下冰封之中。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些被迫应征入伍的士兵仍被证明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尽管人数少于对手，但他们在科尼亚战役（1832年12月21日）中大胜奥斯曼军队。埃及人甚至抓到并囚禁了大维齐尔，这极大地加强了他们在谈判中的筹码。

素丹一听到军队战败和大维齐尔被俘的消息就屈服了，答应了穆罕默德·阿里提出的大部分领土要求。在科尼亚战败后，素丹失去了所有军事选择，他现在直面一支驻扎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屈塔希亚镇的埃及军队，距离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只有200千米（124英里）。为了确保埃及军队完全撤出安纳托利亚，马哈穆德二世重立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他在入侵叙利亚后被剥夺了头衔，并被宣布为叛徒），并将希贾兹、克里特岛、阿卡、大马士革、的黎波里和阿勒颇等省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帕夏，同时赋予阿达纳港的征税权。1833年5月，在俄罗斯和法国的斡旋下，《屈塔希亚合约》签订，上述战果得到了确认。

《屈塔希亚合约》签订后，易卜拉欣帕夏将他的部队撤回叙利亚和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没有实现他所渴望的独立。奥斯曼帝国把他牢牢地束缚在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他已经把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阿拉伯行省都置于他的家族统治之下，建立了一个埃及帝国，在19世纪3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与奥斯曼帝国相抗衡。

埃及对叙利亚的统治很不受欢迎。新的税收给社会各阶层——从最贫穷的工人到最富有的商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地领袖被剥夺了传统权力，被隔绝在统治阶层之外。米舍卡记录道：“当埃及人开始改变宗

族习俗，对民众征收比他们习惯支付的更多的税时，人们开始鄙视他们，希望再次回到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因此表现出反叛的迹象。”埃及人的反应是解除叙利亚人的武装并将他们征召入伍，这反而激起了更剧烈的反抗。米舍卡解释说：“士兵没有期满后获得自由、回归家庭的固定的服役期限，相反，服役期像地狱一样长久。”[18]许多年轻人为了躲避征兵而逃跑，这进一步损害了当地的经济生产力。叛乱从叙利亚沿海的阿拉维山区蔓延到黎巴嫩山和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地区，再到巴勒斯坦高地的纳布卢斯。1834—1839年，易卜拉欣帕夏发现他的军队一直忙于镇压不断升级的叛乱。

穆罕默德·阿里没有被叙利亚乡村的民众动乱所吓倒，他把叙利亚看作是他的埃及帝国的永久领土。他坚持不懈地争取欧洲对他计划的支持：脱离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独立王国。1838年5月，他告知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和欧洲列强，他决意建立自己的王国，提出向奥斯曼人支付300万英镑（合1500万美元）的脱离费。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对此发出了严厉警告：“这位［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必将会发现，英国将同奥斯曼帝国素丹一起要求纠正如此骇人听闻的针对素丹的错误行为，以防止土耳其帝国被肢解。”[19]就连穆罕默德·阿里的法国盟友也警告他，不要采取可能导致他与素丹和欧洲对抗的举措。

得到欧洲的支持，奥斯曼人倍感振奋，决定立即对穆罕默德·阿里采取行动。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再次组建了一支远征军。自从1826年暴力解散禁卫军以来，马哈穆德大力建设新的奥斯曼尼扎米军。他的高级军官向他保证，这支德国人训练的步兵要强于埃及军队，后者在连续5年镇压叙利亚民众叛乱后已疲惫不堪。1839年6月24日，奥斯曼军队行进到阿勒颇附近的叙利亚边境，袭击了易卜拉欣帕夏的部队。与所有人的预期相反，埃及人在尼济普之战（Battle of Nezib）中击溃了奥斯曼人，造成后者大规模伤亡，并俘虏了1万多人。

素丹马哈穆德二世没能收到军队被击败的消息。由于素丹患了肺结核，健康状况已经恶化了好几个月，6月30日，他在得知尼济普惨败之前就去世了。他尚处青春期的儿子素丹阿布杜·迈吉德一世（Abdulmecid I，1839—1861年在位）继位，他年轻、缺乏经验，无力安抚帝国将领们的紧张情绪。奥斯曼舰队的海军上将艾哈迈德·费夫齐

帕夏（Ahmed Fevzi Pasha）带领他的整个海军横渡地中海，投奔穆罕默德·阿里麾下。这位海军上将担心，俄国有可能像他所预料的那样介入奥斯曼政局、扶持年轻的素丹，一旦如此，舰队可能会落入俄国的控制之下。他也相信穆罕默德·阿里是最有能力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袖；相较于乳臭未干的王储，刚健有力的叛乱者会成为更好的素丹。恐慌在伊斯坦布尔蔓延。年轻的素丹面临着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大的内部威胁，却没有陆军或海军来保护他。

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动荡同样忧心忡忡。英国担心俄国会利用权力真空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确保其黑海舰队可以进入地中海。这将冲击英国数十年来旨在遏制俄国黑海舰队并拒绝其进入温水港口的政策，该政策维持了对英国有利的海上力量均衡。此外，法国有意使其盟友埃及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英国希望能挫败法国的这一图谋。英国领导了一个由欧洲列强组成的联盟（法国没有参加）来介入这场危机，旨在支持奥斯曼王朝，迫使穆罕默德·阿里从土耳其和叙利亚撤出。

谈判持续了一年，穆罕默德·阿里试图利用他在尼济普的胜利来获得更多的领土和主权特权，而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则要求埃及从叙利亚撤军。1840年7月，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组成的欧洲联盟提出让穆罕默德·阿里终身统治大马士革，让他的家族世袭统治埃及，条件是他的士兵立即撤出叙利亚其他地区。这是他们的最终提案，同时英国和奥地利舰队已在东地中海集结准备采取行动。穆罕默德·阿里相信自己拥有法国的支持，拒绝了这一提案。

盟军舰队在英国海军上将内皮尔（Napier）的指挥下迫近港口城市贝鲁特，并于9月11日炮轰埃及的阵地。英国利用当地特工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各地散发传单，呼吁当地人民起来反抗埃及人。大叙利亚地区的人们过去曾经起来反抗过，很乐意再来一次。与此同时，盟军舰队从贝鲁特开往阿卡，力争把埃及人赶出城堡。埃及人原以为他们能抵挡住任何攻击，但根据米哈伊勒·米舍卡的记录，英国、奥地利和奥斯曼联合舰队用了3小时20分钟就攻克了这座城堡。埃及人刚刚收到的火药露天堆放在城堡的中心，而盟军舰船的一枚炮弹引爆了火药，“爆炸出其不意，阿卡城内的士兵四散奔逃，无人继续留守”。[20]欧洲和奥斯曼军队夺回了

阿卡，并控制了整个叙利亚海岸。

易卜拉欣帕夏发现他的位置越来越不稳固。海路被切断，他无法补给他的部队，而这些部队正不断受到当地居民的骚扰。他率军从土耳其和叙利亚各地撤回到大马士革。1841年1月，约7万名士兵在大马士革集结，易卜拉欣帕夏开始从叙利亚沿陆路有序撤回埃及。

埃及的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但第二次埃及危机对奥斯曼帝国生存构成的挑战需要正式解决。一项协议在伦敦达成，奥斯曼人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和苏丹的终身统治，并确立他的家族对埃及的世袭统治，而穆罕默德·阿里承认奥斯曼素丹是他的宗主，并同意每年向帝国中央政府支付一笔款项，以表示他对帝国的顺从和忠诚。

英国还希望确保东地中海地区的纷争不再威胁欧洲的和平。而防止欧洲列强因在黎凡特地区争夺战略优势而发生冲突的最佳保障，是确保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这是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一直以来的重点关切。在1840年《伦敦公约》的一份秘密附件中，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政府正式承诺“不寻求领土扩张，不寻求排他性影响力，不为其臣民谋取任何他国臣民无法公平获得的商业利益”。[21]这一克己的条约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近40年的保护，使其免受欧洲对其领土的图谋之害。

*

从1805年到1841年，穆罕默德·阿里的雄心壮志经历了一个循环。他升为总督，成为埃及的主人。一旦他在埃及站稳了脚跟并增加了财政收入，他就开始建设现代军队。随后，他将自己的领土范围从苏丹和红海沿岸的希贾兹一度扩大到包括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叙利亚。但外部干涉剥夺了他的战果，到1841年，他的势力范围又缩回到埃及和苏丹。埃及将拥有自己的政府，将制定自己的法律，但仍将受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的约束。虽然埃及人可以铸造自己的钱币，但他们的金币和银币上都须印有素丹的名字，而埃及统治者的名字则只能印在价值低廉的铜币上。埃及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士兵人数不能超过1.8万人，这与埃及之前部署的10万至20万人的庞大军队相去甚远。穆罕默德·阿里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但他曾经的雄心更大。

穆罕默德·阿里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饱受失望与疾病困扰。这位帕夏已进入风烛残年，当他的军队从叙利亚回来时，他已经71岁了。他日渐被他的儿子易卜拉欣疏远。在叙利亚战役期间，父子俩通过宫廷官员沟通。两人都与疾病作斗争，易卜拉欣被送到欧洲治疗结核病，而穆罕默德·阿里因服用治疗痢疾的硝酸银而开始丧失思维能力。1847年，素丹意识到穆罕默德·阿里不再具有足够的统治能力，于是任命易卜拉欣帕夏接替。6个月后，易卜拉欣去世。那时，穆罕默德·阿里早已远离了人们的视线。王位传给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阿巴斯（Abbas）。1849年8月2日，穆罕默德·阿里去世，阿巴斯主持了他的葬礼。

地方领袖的时代结束了。在剥夺了埃及人对克里特岛、叙利亚各省和希贾兹的统治权后，奥斯曼政府小心翼翼地派自己人担任这些行省的总督。大马士革的阿兹姆家族，就像摩苏尔的加利利家族一样，失去了他们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统治的城市。黎巴嫩山自治政府因谢哈卜家族与埃及政府勾结而被推翻。在黎巴嫩山，奥斯曼人也试图任命自己的总督，但这将带来爆炸性的后果，使黎巴嫩走上教派冲突的道路。谋求脱离奥斯曼政府的地方自治让阿拉伯世界的劳动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遭受了战争、通货膨胀、政治动荡和雄心勃勃的地方领袖治下无数的不公正待遇。现在，他们想要和平与稳定。

奥斯曼人也想结束对他们统治的内部挑战。在被外国威胁以及与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所困扰的同时，他们看到了放任阿拉伯行省自行其是的风险：“伟大的阿里贝伊”同扎希尔· 欧麦尔的联盟威胁到了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瓦哈比派蹂躏了伊拉克南部，并夺取了奥斯曼统治下的希贾兹；穆罕默德·阿里利用埃及的财富建立了军队，并掌控他自己的帝国，从而威胁奥斯曼帝国的生存。如果没有欧洲列强的干预，穆罕默德·阿里可能已在第二次埃及危机中推翻了奥斯曼帝国。这些经历使奥斯曼政府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不是对已有的政府机构进行温和的修补，而是对古老的统治机器进行彻底检修。

奥斯曼人意识到，他们无法依靠自身来改革他们的帝国。他们需要

利用使他们的竞争对手欧洲变得强大的那些思想和技术。奥斯曼的政治家们注意到穆罕默德·阿里如何成功地利用现代欧洲思想和技术建设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向欧洲派遣代表团、引进欧洲的工业和军事技术，以及在各级军事和官僚机构中聘用欧洲技术顾问，这些举措极大地帮助了穆罕默德·阿里成就功业。

奥斯曼帝国与欧洲邻国的关系正进入一个复杂的新时代。欧洲将成为榜样，成为军事和技术领域的典范。但欧洲也是一个威胁，既是觊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好战者，也是危险的新意识形态的源头，因此必须与之保持距离。奥斯曼改革者面临如下挑战：如何在不损害自身文化完整性和价值观的情况下采纳欧洲的理念和技术。

奥斯曼帝国无法对欧洲的进步视而不见。在19世纪，欧洲已经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奥斯曼帝国被迫按照欧洲规则行事的趋势日益显著。

第四章　改革的危险

1826年4月13日，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宗教学者靠近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法国帆船“鳟鱼号”（*La　Truite*）。他是里法阿·塔赫塔维，身着开罗古老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创建于969年）的学者长袍和头巾，正步向通往帆船的舷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踏出埃及的土地。他受命前往法国，担任穆罕默德·阿里派往欧洲的第一个教育代表团的随团阿訇。5年后，他才回到他的祖国。

上船后，塔赫塔维审视着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面庞。他们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总共有44名男子，年龄从15岁到37岁不等。塔赫塔维（1801—1873）当时24岁。[(1)]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埃及代表团，但实际上只有18名成员是土生土长的说阿拉伯语的人。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说土耳其语，反映了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多样性，而埃及仍然是该帝国的一部分。其中，有土耳其人、切尔克斯人、希腊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些人是埃及总督挑选去学习欧洲语言和科学的，回国后，他们将用在法国学到的知识改造他们的祖国。

塔赫塔维出生于一个上埃及小村庄的著名法官和神学家家族，16岁起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神学。他是一位有天赋的学者，曾任爱资哈尔的教员。1824年，他获得公职，在欧式尼扎米新军的一个步兵师中担任阿訇。依靠这一任职，加上他靠山的支持，塔赫塔维被选中履行前往巴黎的重要使命。这是一个可以成就一个人事业的任命。

塔赫塔维随身带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用来记录他对法国的印象。他对每一处细节都颇感兴趣：法国人如何盖房子、谋生活和信宗教，如何运作交通与金融，男性与女性如何交往，如何穿戴与跳舞，如何家装与摆桌子。写作时，塔赫塔维既带着好奇与尊重，也带着客观的批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人游历中东并将他们所见的异国的风俗习惯著述成书。如今，第一次有一个埃及人扭转了局面，书写这个叫作法国的陌生而奇异的国度。[1]

塔赫塔维对法国的反思充满了矛盾。作为一名穆斯林和埃及奥斯曼

人，他对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的优越性充满信心。他认为法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地方，那里“没有一个穆斯林定居”，而法国人自己则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然而，他的亲眼观察丝毫没让他怀疑欧洲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优越性。他回忆道：“法国拥有伊斯兰诸王国所缺乏的一切，说真的，在［法国］居住期间，我为此感到悲哀。”[2]塔赫塔维认为，有一道鸿沟将他的读者们同西方科学分隔开。欧洲天文学家已证明地球是圆的，他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从而让人可以稍许感知到这道鸿沟的所指。他意识到伊斯兰世界在科学上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并认为伊斯兰世界有义务和权利恢复这一学问，因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进步是建立在中世纪伊斯兰教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奥斯曼帝国借鉴欧洲的现代技术进步不过是西方偿还对伊斯兰科学欠下的债。[3]

对埃及人眼中的法国缘何成为它在19世纪20年代的样貌，塔赫塔维的书中充满了十分有趣的思考，而他对政治改革最重要的贡献，则是他对宪政的分析。他翻译了1814年法国宪章的所有74条，并撰文详细分析了该宪章的要点。[4]塔赫塔维相信这部宪章保有法国进步的秘密。他对他的精英读者们解释说，“我们录下这部宪章，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智慧如何决定了公正和公平是王国文明与臣民康乐的因素，以及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如何由此引导，实现国家富强、知识增长、财富积累、安居乐业”。

塔赫塔维对宪政的赞扬在当时是勇敢的。这些是危险的新思想，没有伊斯兰传统的根基。正如他承认的那样，法国宪章的大部分原则“既不能在《古兰经》中也不能在先知的逊奈［行为］中找到”。他可能会害怕其他穆斯林宗教人士对这些危险的革新做出反应，但更大的风险是惹恼他的统治者。毕竟，宪章同样适用于君主和他的臣民，并要求权力在君主和民选立法机构间分配。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完全专制的政权，而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代议制政府的概念或对君主权力的限制，会被大多数奥斯曼精英视为颠覆性的异端邪说。

这位改革派宗教学者着迷于法国宪章如何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强化精英的控制。最打动塔赫塔维的宪章条款中，就有主张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所有公民“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有资格担任任何职务”的条款。他认为，这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将鼓励“人们不

断学习”，以“到达比他们所居更高的位置”，从而防止他们的文明陷于停滞。塔赫塔维又一次行走于危险的边缘。在像奥斯曼埃及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会被他那个时代的精英们视为一个危险的概念。

塔赫塔维更进一步赞扬了法国的言论自由权。他解释说，宪章鼓励“每个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知识和情感”。他接着说道，一般法国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媒介是一种叫作“刊”或“报”的事物。这将是塔赫塔维的许多读者第一次听说报纸，当时报纸在阿拉伯语世界还不为人所知。他解释说，无论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普通人，都可以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他强调了平民有机会使用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因为即使是一个卑微的人也可能会想到一些重要人物没有想到的事情”。然而，真正触动这位宗教学者的是新闻媒体具有让人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力量。“当某人做了一件伟大或可鄙的事情时，记者们会记录下来，让要人和平民都知晓，这样可以鼓励做好事的人，让做可鄙之事的人改过。”

塔赫塔维对奥斯曼政治惯例最为大胆的违反在于，他详细并心怀赞赏地讲述了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X）的七月革命。逊尼派穆斯林的政治思想主张，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臣民有义务服从统治者，哪怕统治者专横跋扈。法国人民在查理十世暂停宪章并“羞辱了保障法国人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时起来反对他们的国王，目睹这场政治动荡的塔赫塔维显然站在法国人民这边。为了恢复君主的绝对权力，查理十世无视议会代表，禁止公众批评国王及其内阁，并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当人们武装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者时，这名埃及宗教学者选择支持他们。塔赫塔维对七月革命的详尽分析格外引人注目，盖因其含蓄地支持人民有权推翻君主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5]

在巴黎度过了5年难忘的时光后，塔赫塔维于1831年回到埃及，他对法国的印象尚留在他的笔记本上。因法语流利，他获得了一个高级别任命，负责建立一个政府翻译局，主要为穆罕默德·阿里诸项改革所必需的欧洲技术手册提供阿拉伯语版本。在忙于建立翻译局的同时，塔赫塔维抽出时间修改了他的巴黎笔记，准备出版。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因刊载危险政治思想而受惩罚，他在序言中对穆罕默德·阿里大肆颂

扬。最终的成果完全是一部杰作，于1834年以阿拉伯语发表，随即被翻译成土耳其文。塔赫塔维的作品，通过对欧洲科技进步的清晰阐述，以及对启蒙运动政治哲学的分析，成为19世纪奥斯曼和阿拉伯改革时期的开先河之作。

*

19世纪期间，奥斯曼人及其阿拉伯公民与欧洲的互动日益增多，迫使中东人民认识到，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欧洲已经超过了他们。尽管大多数奥斯曼人仍然相信他们所处的世界在文化上更为优越，但他们的改革者认为，有必要掌握欧洲的思想和技术，否则，欧洲就会掌控他们。

奥斯曼人及其在埃及和突尼斯的自治属国开始改革他们的军队。他们很快意识到，为了支持现代化军队的开支，必须扩大国家的收入基础。因此，行政与经济领域也开始效仿欧洲的做法，以期带来经济繁荣与税收增长。欧洲资本家为他们的产品和机械寻找海外市场，在他们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欧洲技术被奥斯曼及其自治属国引进。素丹及突尼斯、开罗总督热衷于利用电报、轮船和铁路等现代欧洲技术，作为进步和发展的外在标志。然而，这些技术是昂贵的，随着伊斯坦布尔、开罗和突尼斯受过教育的精英们越来越担心他们的统治者挥霍无度，他们开始呼唤改革议程中缺失的宪法和议会。

改革的每一阶段都是为了在体制上加强奥斯曼帝国及其阿拉伯属国的实力，保护它们免受欧洲的入侵。对此，改革者们要失望了，因为在改革期间，奥斯曼世界越来越容易受到欧洲的渗透。起先是欧洲通过领事施压、贸易和资本投资施行的非正式控制，之后，随着突尼斯、奥斯曼政府和埃及先后未能兑现向外国债权人许下的资金承诺，欧洲的正式控制开始了。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始于1839年第二次埃及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去世，他尚处青春期的儿子阿卜杜·迈吉德一世继位，这并不是宣布一项激进改革计划的好时机。然而，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军

队迫近的威胁下，奥斯曼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欧洲的善意。为了确保欧洲对其领土和主权的保障，奥斯曼政府认为需要向欧洲列强表明，奥斯曼帝国是现代国家共同体中负责任的一员，能够遵循欧洲的治国标准。此外，曾在马哈穆德二世统治下工作的改革者，决心巩固在已故素丹任内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并促使他的继任者承诺继续推动改革。

这两个动机将塑造奥斯曼改革时代的特征：在公共关系上摆出姿态以赢取欧洲的支持，同时，真诚地投入改革以确保帝国在内外威胁下继续生存。1839年11月3日，奥斯曼外交大臣穆斯塔法·拉希德帕夏（Mustafa Reshid Pasha）代表阿卜杜·迈吉德一世，在伊斯坦布尔向受邀的奥斯曼和外国政要宣读改革法令。在那一天，奥斯曼进入了行政改革期。1839—1876年，奥斯曼帝国将奉行君主立宪制，拥有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这一时期被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字面义为“重新组织”）。

坦齐马特有三个重大里程碑：1839年改革法令、重申并延展1839年改革计划的1856年改革法令、1876年宪法。1839年和1856年的法令反映了奥斯曼改革者借鉴西方政治思想的程度。第一份法令提出了一个温和的三点改革计划：确保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的绝对安全”；建立“常规的税收评估制度”；改革兵役制度，实行定期征兵和固定服役期限。[6]

1856年法令重申了1839年提出的改革，并将改革进程扩大到法庭和刑罚制度。身体刑罚将得到遏制，酷刑将被废除。该法令试图规范帝国财政，公开年度预算，接受公众监督。同时，还呼吁金融体系现代化，建立现代银行体系，“以创造用来扩大财富来源的资金”，这是通过在帝国内部投资诸如修建道路、开凿运河等公共工程实现的。该法令总结道：“为实现这些目标，应当寻求利用欧洲科学、技术和资金的途径，并逐步践行。”[7]

然而，仅仅通过重大法令来回顾坦齐马特，还无法全面了解1839—1876年期间所推行的改革。19世纪中叶，奥斯曼国家和社会的主要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为了改革税基，确保未来的繁荣，政府开始定期进行

人口普查，并引入新的土地登记制度，以个人所有制取代包税制，这更符合西方的私有财产概念。省级行政机构经历了彻底改革，形成了从诸如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等省会向下一直到村级的常规政府体系。

这些变革需要数千名受过现代技术教育的新官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国家建立了仿效欧洲课程体系的新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校网络，以培训公职人员。同样，帝国的法律经历了法典化，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调和伊斯兰法与西方法典，从而使奥斯曼法律制度更符合欧洲法律的规范。

若改革只在较高层的政府展开，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就不会对坦齐马特感兴趣。在19世纪50和60年代，改革开始触及个人生活。国家想方设法将奥斯曼臣民的名字登记在册，但由于害怕税收和征兵，臣民们抵制政府的这一做法。家长们不送孩子上公立学校，因为他们担心，登记入学最终会把孩子送入军队。城镇居民尽可能地躲避人口普查官员，农民们尽可能地逃避土地登记。然而，随着官僚机构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帝国的臣民不得不屈从这项现代政府势在必行的举措：保持对国家居民及其财产的准确记录。

素丹同样受到了改革进程的影响，程度不亚于他的臣民。奥斯曼素丹的绝对权力被侵蚀，政治重心从素丹的宫殿转移到了帝国中央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大臣会议在政府中承担主要的立法和行政职责，大维齐尔成为政府首脑。素丹的角色被削减为仪式性与象征性的国家元首。1876年颁布的宪法将这一变革推向高潮，尽管素丹依然手握大权，但该宪法通过建立议会扩大了政治参与范围。此后37年中，奥斯曼专制主义被君主立宪制取代。

任何重大的改革计划都隐含风险，尤其是在外国思想介入的情况下。保守的奥斯曼穆斯林谴责坦齐马特将非伊斯兰的标新立异的做法引入国家和社会。事实证明，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地位变化，在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的奥斯曼社会中，他们一直是非穆斯林的少数群体。

在19世纪，欧洲列强越来越多地以少数民族权利为借口干涉奥斯曼帝国的事务。俄国为东正教提供保护，这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基督教群体。法国长期以来与黎巴嫩山的马龙派教会保持着特殊关系，并在19世纪对奥斯曼帝国所有天主教群体提供正式庇护。英国人与该地区的任何教会都没有历史联系。尽管如此，英国代表了犹太人、德鲁兹人以及聚集在阿拉伯世界新教传教士周围的少数皈依者的利益。只要奥斯曼帝国占据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欧洲列强就会用一切手段干涉奥斯曼事务。少数群体权利问题为列强提供了大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奥斯曼人的机会。这样做，有时会给欧洲人和奥斯曼人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851—1852年的“圣地争端”表明大国干涉会给各方都带来危险。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修士们在各自对巴勒斯坦基督教各圣地的权利和特权上存在分歧。作为回应，法国和俄国向伊斯坦布尔施压，要求给予他们各自庇护的群体以特权。奥斯曼人首先屈服于法国的压力，将伯利恒圣诞教堂的钥匙交给了天主教徒。俄国人决心为希腊东正教徒争取更大的权益，以免在法国人面前丢脸。但在奥斯曼帝国向俄国做出类似让步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派了一艘先进的螺旋桨战舰，沿着达达尼尔海峡，将法国大使送到伊斯坦布尔，并威胁称，如果奥斯曼政府不撤销给予受俄国庇护的东正教徒的特权，法国将轰炸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营地。当奥斯曼人向法国人屈服时，俄国人威胁要发动战争。1853年秋开始的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恶化成1854—1855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和法国同沙俄间爆发暴力冲突，超过30万人丧生，更多人受伤。欧洲以奥斯曼帝国少数群体的名义进行干涉，后果过于严重，奥斯曼政府不允许这种做法继续下去。

在1839年改革法令中，奥斯曼人做了一次不积极的尝试，试图收回对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管辖主动权。素丹在他的诏令（*firman*）中说：“我们崇高的素丹国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臣民将毫无例外地享受我们帝国给予的特权。”显然，如果要说服欧洲列强，不再需要他们的干预来保障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利益，那素丹和他的行政机构就需要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做出更强有力的声明。奥斯曼政府面临的问题是，推行教派平等政策必须得到本国穆斯林多数派的同意。《古兰经》明确区分伊斯兰教和另两种一神信仰，该区分已载入伊斯兰法。在许多信众

看来，若奥斯曼政府无视该区分，这将违背真主的经书与律法。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奥斯曼政府决定冒着激发国内公众愤怒的风险，阻止欧洲以帝国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名义进一步干涉。1856年改革法令的颁布日期的选择，配合了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该法令的大部分条款涉及奥斯曼帝国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权利与责任。法令首次规定，所有奥斯曼臣民，不论信奉何种宗教，一律平等。“任何因宗教、语言或种族而使我帝国臣民中某一群体比另一群体地位低下的区分或指称，都将从行政条例中永远抹去。”该法令进一步承诺，所有奥斯曼臣民，不分宗教和民族，都有机会上学、获得政府工作和征召入伍。

改革进程早已因其欧化的倾向而引起争议。但1856年法令颁布之前的各项改革都没有直接违背《古兰经》。穆斯林视《古兰经》为真主的原话，也是真主永恒的话语。违背《古兰经》就是违背真主，因此，毫不奇怪，在帝国的城市里宣读1856年法令激起了虔诚穆斯林的愤怒。大马士革的一位奥斯曼法官在他1856年的日记中写道：“法庭宣读了这份法令，赋予了基督徒完全的平等，准许了平等、自由和其他违反永恒的伊斯兰法的做法……它是落在所有穆斯林［头上］的灰尘。我们请求真主让宗教更强大，让穆斯林取得胜利。”[8]奥斯曼臣民立即明白了这一改革的重要性。

坦齐马特改革正在把奥斯曼帝国带入危险的境地。由于政府颁布的改革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改革进程有可能引发对政府权威的反叛和民众之间的暴力。

奥斯曼人并不是最早颁布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平等法令的穆斯林统治者。早在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就已经做到了。但他颁布这部更早的法令，是希望在不分教派的平等基础上面向所有埃及人征税和征兵，而不是考虑解放少数群体。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大叙利亚期间，推行平等原则，虔诚的穆斯林们无疑提出了反对，但穆罕默德·阿里强大到足以镇住他的批评者并贯彻他的意志。看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奥斯曼人很可能认为他们可以遵循他的先例，而不会引发内乱。

埃及的占领还让欧洲的商业打入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行省。贝鲁特成为东地中海的一个重要港口，商人们得以进入像大马士革这样的内陆城市的新市场，这些城市过去是对西方商人关闭的。欧洲商人开始依赖当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他们的中间人，担任翻译和代理。个别基督徒和犹太人通过与欧洲贸易和领事活动的联系而变得富有，许多人接受了欧洲公民身份，并因此获得了奥斯曼法律的豁免。

19世纪40年代，大叙利亚的穆斯林群体已经对一些阿拉伯基督徒和犹太人享有的特权产生了怨恨，这种怨恨是非常危险的。教派之间微妙的平衡正在被外部力量打破。几代人以来，阿拉伯各省第一次出现了教派间的暴力冲突。1840年，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被指控在宗教仪式上谋杀了一名天主教牧师，随后受到当局的暴力镇压。[9]1850年10月，教派冲突在阿勒颇爆发。一个穆斯林群体袭击了城中富有的基督徒少数群体，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样的事件在阿勒颇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出穆斯林商人的怨恨，他们的生意受到损害，而他们的基督徒邻居则通过与欧洲的商业往来而变得富有。[10]

更大的麻烦正在黎巴嫩山酝酿。19世纪30年代埃及的占领导致当地统治秩序崩溃，挑起了与埃及人结盟的马龙派和抵抗埃及人的德鲁兹人之间的不和。埃及人撤退后，德鲁兹人回到黎巴嫩山，发现在他们离去时马龙派已变得富有和强大。德鲁兹人在逃离埃及统治时放弃的土地已被马龙派占有。教派间的差异，导致1841年爆发教派冲突。这场冲突在接下来的20年里时断时续，英国支持德鲁兹人而法国支持马龙派，更是给冲突火上浇油。

奥斯曼人试图利用埃及军队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更大程度地掌控黎巴嫩山。他们设置了一个双总督省，一名马龙派总督掌管北部地区，一名德鲁兹总督掌管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以南地区，以取代17世纪末以来统治黎巴嫩山但已声名扫地的谢哈卜政权。这一教派分治在黎巴嫩山的地理和人口方面都没有根据，因为两个地区都有马龙派和德鲁兹人。因此，设置双总督省只会加剧两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更糟糕的是，马龙派还经历着内部分裂，统治家族、农民和神职人员之间的深刻分歧在农民起义过程中爆发，而起义又加剧了紧张局势。到1860年，随着德鲁兹人和马龙派各自组建武装备战，黎巴嫩山已经成了火药桶。

1860年5月27日，一支3000人的基督徒部队从扎赫勒镇向德鲁兹腹地挺进，为遭受袭击的基督徒村民报仇。他们在临近艾因德拉村的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上遇到了约600人的德鲁兹小型部队。德鲁兹人大败基督徒并继续进击，洗劫了一些基督徒村庄。艾因德拉战役标志着一场毁灭性战争的开始。马龙派基督徒节节败退，德鲁兹人以今天被称为种族清洗的方式蹂躏基督徒的城镇和村庄。目击者称，高地村庄的街道上血流成河。

在3周内，德鲁兹人占领了黎巴嫩山南部和整个贝卡谷地。位于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以北的扎赫勒镇是最后一个被攻陷的基督教据点。6月18日，德鲁兹人袭击并占领了扎赫勒，杀死了守军，并迫使其居民逃离。黎巴嫩的基督教势力被彻底摧毁，德鲁兹人取得了完全掌控。至少200个村庄被洗劫，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被杀、受伤或无家可归。[11]

黎巴嫩山事件加剧了整个大叙利亚教派之间的紧张局势。颁布1856年改革法令和确立不同信仰的奥斯曼公民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已经让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多位大马士革编年史家都注意到了基督徒获得法律权利后的变化。基督徒不再承认穆斯林一贯享有的特权，穿着的服饰开始使用一些先前只有穆斯林才能用的颜色。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一位愤怒的穆斯林要人写道："当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争吵时，无论后者如何辱骂他，他都会以同样的甚至更多的脏话回骂。"[12]大马士革的穆斯林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一名基督徒要人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米哈伊勒·米舍卡是黎巴嫩山人，在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期间，他曾为执政的谢哈卜家族效力。此后，他移居大马士革，在那里，他被任命为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当时美国的势力还相对较弱。他写道："当帝国开始在其臣民中推行改革和无关宗教信仰的平等原则时，无知的基督徒过度解读了平等，他们认为小人物不必屈从大人物，位低者不必尊重位高者。事实上，他们认为卑微的基督徒与尊贵的穆斯林可以平起平坐。"[13]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公然藐视古老的惯例，无意间加剧了教派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招致灭顶之灾。

大马士革的穆斯林社群对黎巴嫩山的血腥事件感到非常满意。他们认为，黎巴嫩的基督徒行为傲慢，激怒了德鲁兹人，这种看法是有一定

道理的。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很高兴看到基督徒落败，对于流血杀戮，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悔恨。米舍卡记录道，当他们听闻扎赫勒陷落的消息，“大马士革充满了欢腾和庆祝，你还以为帝国已经征服了俄国”。面对城里的穆斯林日益增长的敌意，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

扎赫勒陷落后，德鲁兹武装开始袭击大马士革腹地的基督教村庄。基督徒农民逃离了毫无保护的村庄，躲到相对安全的大马士革城墙内。大马士革基督教区的街道上挤满了这些基督徒难民。米舍卡称，他们“睡在教堂周围的小巷里，以地为床，以天为盖”。在日渐敌视基督徒的人眼中，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成了日益增长的反基督徒情绪的宣泄对象。他们的脆弱和贫穷降低了他们做人的资格。他们指望着基督徒同胞和奥斯曼总督来庇护他们免受伤害。

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总督艾哈迈德帕夏并不是城中基督徒社群的朋友。米舍卡作为领事官员同总督往来频繁，他确信总督正刻意给教派间的紧张关系推波助澜。米舍卡解释说，艾哈迈德帕夏认为，1856年改革以来，基督徒已逾越了他们应处的地位，并故意逃避与他们新获得的权利相匹配的义务，特别是纳税义务。尽管大马士革的穆斯林人口4倍于基督徒，但艾哈迈德帕夏还是装备上大炮来“保护”清真寺免受基督徒袭击，用以加剧穆斯林的恐慌情绪。通过这样的措施，艾哈迈德帕夏促使大马士革穆斯林相信他们正面临遭受基督徒袭击的威胁。

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艾哈迈德帕夏下令制造一场旨在挑起暴乱的示威游行。1860年7月10日，他让一群因犯下伤害基督徒罪行而入狱的穆斯林囚犯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街道上游街示众，表面上是为了教训他们。不出所料，一群愤怒的穆斯林聚集在这些人的周围，打破了枷锁，放走了他们。穆斯林被这样无端羞辱的场面，只会强化这样一种公共认知：1856年法令颁布以来，基督徒已逾越了他们应处的地位。愤怒的民众转向基督徒街区，决心给他们一个教训。黎巴嫩山就近发生的事件仍然历历在目，受这些事件启发，屠戮似乎已成为这些民众眼中的合理方案。

米舍卡发现自己卷入了他早就预料到的暴力中。他描述了愤怒的民

众如何砸开他家的大门，涌入他家中。他带着他最小的几个孩子从后门逃走，希望到穆斯林邻居的房子里避难。道路的每一处转角，都有愤怒的民众堵路。为了引开他们，米舍卡扔出几把硬币，当人们争先恐后争抢他的钱时，他就带着孩子跑了。用这个计策，他三次躲过了暴徒，但最后他发现他被一伙儿疯狂的人挡住了。

> 我无处可逃。他们围上来要扒下我的衣服并杀我。我的儿子和女儿在尖叫："杀了我们，不要杀我们的父亲！"一个恶棍一斧头砍在我女儿头上，他会为此付出代价的。另一个恶棍在距离我六步远的地方向我开枪，没打中，但我的右太阳穴被斧子击伤了，我的右肋、右脸和右臂也被一棍子击伤了。我周围围了好多人，开枪时不打到别人是不可能的。

米舍卡被那伙人俘虏了。他与家人分离，被带着穿过偏僻的小巷到一位官员的家中。但毕竟，米舍卡是一名外国领事。一位穆斯林邻居给这位遭受虐待的基督徒朋友提供了避难所，让他和他的家人团聚。他的全家，包括被愤怒的民众砍倒的小女儿，都奇迹般地在屠杀中幸存下来。

只有那些找到安全避难场所的基督徒才逃过了这场屠杀。还有一些基督徒被一些穆斯林要人救了下来，为首的是流亡在外的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英雄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Abd　al-Qadir）。他和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逃难的基督徒，并为他们提供庇护。其他基督徒则躲在英国和普鲁士领事馆的有限空间里，领事馆的警卫们成功地挡住了暴徒。大部分幸存者躲在并不安全的大马士革城堡里，担心士兵们可能会随时让暴民进入。虽然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基督徒确实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但没能找到避难所的数千人在3天的屠杀中遭受了暴徒们可怖的暴力。

米舍卡在事后提交给美国驻贝鲁特领事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屠杀造成的人员和财物损失。他声称，至少有5000名基督徒在暴力事件中丧生，占原先2万人基督徒社群的四分之一。约有400名妇女被绑架和强奸，许多妇女因此怀孕，其中包括米舍卡家里的一名佣人。财物损失十分严重。超过1500所房屋被夷为平地，基督徒拥有的商店全都被洗劫，

基督徒区约200家商店付之一炬。教堂、学校和修道院被劫掠并破坏。[14]基督徒区因偷窃、故意破坏和纵火而遭到大面积毁坏，这是这座城市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教派冲突。

奥斯曼政府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公民之间确立法律上的平等，主要是为了防止欧洲列强干涉其内政。但随后在黎巴嫩山和大马士革发生的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事件，有可能招致欧洲大规模的干涉。获悉屠杀事件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政府立即派出了一支由法国贵族查理·德·博福尔·德奥普尔将军（General Charles de Beaufort d'Hautpoul）率领的远征军，他曾在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叙利亚期间担任埃军顾问。德·博福尔的任务是防止进一步的流血事件，并将暴力侵害该地区基督徒的肇事者绳之以法。

奥斯曼帝国必须迅速行动。他们派出了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之一，奥斯曼改革的设计师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法国远征军抵达叙利亚海岸之前恢复秩序。福阿德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使命。他启动了一个军事法庭，严惩所有破坏秩序的责任人。大马士革总督因未能阻止屠杀而被判处死刑。上至贵族，下至最贫穷的城市工人，有数十名穆斯林在大马士革街头被公开绞死。数十名奥斯曼士兵因擅自脱离队伍、参与谋杀和抢劫而被火枪队处决。数百名大马士革人被流放或戴枷游街后被处以长期监禁，服繁重劳役。

政府设立委员会处理基督徒索赔损坏和被盗财产事宜。穆斯林街区被清空，为无家可归的基督徒提供临时住所。国家雇佣石匠，重建损毁的基督徒街区。总的来说，奥斯曼官员预想了欧洲列强可能提出的每一项不满，并在欧洲人有机会干涉之前就采取行动。当德·博福尔将军抵达黎巴嫩海岸时，福阿德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他再三感谢法国人提供协助，并在黎巴嫩海岸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营地，那里远离任何人口聚集地，士兵们可以在那里随时待命，以备不时之需。但需求从未出现，法国人在一年之内就撤走了他们的部队。奥斯曼帝国安然度过了这场危机，他们的主权完好无损。

奥斯曼人从1860年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重要的教训。他们再也不会采取公然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改革措施。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当废奴运动和英国政府联合起来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要求废除奴隶制时，帝国政府表示反对。《古兰经》的经文鼓励奴隶主善待奴隶，允许他们结婚，并赋予他们自由身，但没有提及废除奴隶制。素丹怎么能宣布真主之书所允许的事非法呢？为了应对英国的压力，中央政府同意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古兰经》对此并无规定。1880年，中央政府签署了《英国-奥斯曼协定》以禁止黑奴贸易。这是一种妥协，目的是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而不是遏制奴隶制。[15]

奥斯曼人还认识到，需要在改革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以赢得公众对坦齐马特的支持。扩张官僚机构是为了更有效地向普通民众征税，更高效地征召他们服西式兵役，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所有旨在使奥斯曼帝国更符合欧洲政治思想和实践的法律变革，都与普通奥斯曼人格格不入。为了鼓励臣民接受这些陌生的变革，奥斯曼政府需要在推动本土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福利上给予更多的投入。诸如煤气照明、蒸汽动力轮渡和有轨电车等大型项目，可以提升公众对素丹政府的自豪感与信心，可能会为改革派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为避免改革进程带来更多的动荡，帝国中央政府需要对奥斯曼社会和经济做出切实可见的贡献。

19世纪下半叶，政府在帝国各地的建筑项目和公共工程上大量投入。帝国的两个属国——埃及和突尼斯，享有足够的自主权来推行自己的发展计划。在汲取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之后，奥斯曼世界开始在狂热的消费热潮中获取欧洲的工业技术。19世纪晚期，随着奥斯曼世界被引入全球经济，工业商品和产品以日益多样化的形式进入阿拉伯市场。

*

在19世纪，埃及引领着现代化的行动。穆罕默德·阿里在工业和技术方面大力投入，尽管他的项目总是考虑军队建设。投入建设埃及民用基础设施的重任落在了他的继任者身上。

阿巴斯帕夏（Abbas Pasha，1848—1854年在位）批准给予一家英国公司修建亚历山大和开罗间铁路的特许权，这是一个低调的开端。特许权协议是政府鼓励私营公司在其管辖领域进行重大投资的标准合同。

特许权的条款将规定投资者和政府在固定期限内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特许权的条件越优厚，就越容易吸引企业家到自己的国家来。然而，如果政府希望企业为自己的国库创造一些利润，就必须谨慎行事，不要向外国人做出太多让步。随着南美、非洲和亚洲各国政府争相谋求新技术，实业家们开始讨价还价。阿巴斯帕夏是个保守的人，他不愿对外国投资者做出太多承诺。

埃及的下一任统治者萨义德帕夏（Said Pasha，1854—1863年在位）致力于实施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之间铺设了第二条铁路，并特许修建了一条从开罗到苏伊士的新线路，完成了地中海和通往印度洋的红海之间海路的陆上连接。他促成了欧洲和埃及的伙伴关系，将蒸汽机船引入尼罗河和红海。然而，1856年萨义德给予他前导师法国人费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的特许权是其他项目无法匹敌的：修建一条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水上通道，即苏伊士运河。这是19世纪埃及最大的发展项目，也是对国库的最大消耗。

授予特许权本身并不需要国库开支。如果埃及的特许权持有者建立的所有企业都成功了，投资者和政府都会从中获利。遗憾的是，许多企业都面临高风险并最终失败。这对于希望通过投资欧洲技术来振兴国内经济的东道国政府而言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损失还会加剧，因为欧洲国家的领事们在他们的公民投资失败时还会索要赔偿。

每个领事都记下其他国家领事得到的赔偿，并试图得到更多的赔偿，因为这关乎民族自豪感。因此，当尼罗河航运公司破产时，埃及国库不得不向欧洲股东赔偿34万英镑。[16]就个人索赔而言，奥地利人创造了新的基准，他们的领事设法从埃及政府那里榨取了70万法郎，理由是28箱蚕茧因苏伊士开往开罗的火车晚点发车而损坏，显然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据说，萨义德中断了与一位欧洲商人的会面，要求仆人关上窗户。他打趣道：“如果这位先生感冒了，我得花1万英镑。”[17]

苏伊士运河工程带来了数目最大的赔款账单。英国曾反对法国修建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计划。鉴于其在印度的帝国，英国将不可避免地比任何其他海上强国更依赖这条运河。让一家法国公司控制这条战略水道是英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无权阻止埃及政府针对其主权领土发

出特许权，但他们可以反对特许权的条款。具体来说，英国反对埃及承诺提供免费劳动力来挖掘运河，认为这等同于奴隶制，并要求废除赋予苏伊士运河公司运河沿岸土地开发权的条款，认为这是一项殖民计划。埃及政府过于依赖同英国的友好关系，无法拒绝英国的反对意见，因此通知苏伊士运河公司，希望重新谈判1856年那份最初特许权的主要条款。该公司将争端移交给法国政府，以捍卫其作为特许权持有者的权利，抵御来自英国的压力。

萨义德的继任者伊斯玛仪帕夏（Ismail Pasha，1863—1879年在位）继承了这场争端，不得不接受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仲裁，后者并不是一个无利害关系的中立方。1864年，拿破仑三世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埃及政府向苏伊士运河公司支付3800万法郎以补偿不能使用免费劳工的损失，并另外支付3000万法郎补偿将要归还给埃及的运河沿岸土地。此外，他还找其他借口向埃及政府再额外征收1600万法郎，使赔偿总额达到约8400万法郎（1864年，约合336万英镑或 3350万美元），这个数额是空前的。[18]

尽管在发展项目上遭受重大损失，埃及政府仍然对其经济前景保持乐观。埃及最重要的出口作物是欧洲纺织业者所珍爱的长绒棉。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美国棉花的供应减少。1861—1865年间，棉花价格翻了两番。埃及的棉花年收入急剧增加，从19世纪50年代初的100万英镑上升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1150万英镑。随着棉花收入进入埃及国库，伊斯玛仪帕夏相信他可以在兑现对苏伊士运河公司承诺的同时，仍然可以雄心勃勃地开发新项目。

伊斯玛仪渴望把埃及变成一个强国，也希望自己作为埃及统治者得到更多认可。1867年，他征得奥斯曼的许可，将他的总督头衔“帕夏”改为“赫迪威”（*khedive*），这是一个更显赫的波斯头衔，意为“总督”。身为赫迪威，伊斯玛仪试图效仿巴黎重塑他的首都开罗。着眼于1869年的苏伊士运河通航庆典，伊斯玛仪开启了开罗迅速而彻底的转变之路。旧开罗和尼罗河之间建起了现代化的街区，欧式风格的建筑排列在宽阔、笔直的街道上。尼罗河上建了一座新桥，伊斯玛仪在尼罗河的主岛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新宫殿（埃及政府破产后被改作宾馆）。街道铺砌平整，安上了煤气路灯。景观建筑师们将埃兹贝基亚等过去尼罗河泛滥形

成的洼地改造成带有咖啡馆和步行道的公共花园。一座国家剧院和一座歌剧院也建了起来。[19]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Verdi）受委托写了一部埃及主题的歌剧，为歌剧院揭幕，但他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完成了《阿伊达》，歌剧院先在《弄臣》的旋律中揭幕了。这一波建设热潮随着1869年11月法国皇后尤金妮亚到访庆祝苏伊士运河通航而达到顶峰。

伊斯玛仪争取确保埃及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骇人的开支就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尽管诸项庆典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新开罗是一个建立在借款之上的面子工程，伊斯玛仪的政府已经时日无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埃及实施发展计划，是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掌控而获得独立。然而，埃及政府每给出一项特许权都让自己更容易受到欧洲的侵蚀。不仅埃及如此，北非另一个国家也在推行雄心勃勃的改革和发展项目过程中加大了对欧洲的依赖。

突尼斯和埃及一样，在奥斯曼帝国里享有充分自治，在19世纪建设自己的发展项目。突尼斯政府被称为摄政政府，自18世纪初以来一直由侯赛因王朝领导。巴巴里海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1830年起，摄政政府禁止一切海盗行为，努力通过工业和贸易发展经济。

1837—1855年，突尼斯由一位名叫艾哈迈德贝伊（Ahmad Bey）的改革家统治。艾哈迈德贝伊深受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影响，他在突尼斯创建了一支尼扎米军队，并开办了一所军事学院，发展了新军所需武器与制服的支持产业。在新军受训的军人中，有一位年轻的马木鲁克名叫海伊尔丁，他将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最终将担任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的首相。

海伊尔丁是从奴隶上升到政治权力顶峰的那类马木鲁克中的最后一人。在写给自己孩子的自传中，海伊尔丁就成为马木鲁克的感受发表了珍贵的见解：“尽管我确知我是切尔克斯人，但我对我的国家和父母没有确切的记忆。我一定是在某次战争或迁徙时与家人分离的，从此永远失去了他们的踪迹。”海伊尔丁做过多次努力，但未能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他写道：“我对童年的最早记忆是在伊斯坦布尔，1839年我在那里开始为突尼斯贝伊效力。”[20]

在学习阿拉伯语和接受伊斯兰教育后，海伊尔丁加入了军队，接受

法国军官的训练。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军官，在突尼斯，他仅用了14年就晋升为将军，成为最顶层的军官，随后步入政坛。海伊尔丁熟谙法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广泛游历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他亲身感受了欧洲的进步，这让他坚定支持坦齐马特改革，支持借鉴欧洲的经验和技术来充分发挥伊斯兰国家的潜力。1867年，他出版了一本颇有政治影响力的阿拉伯语小册子，阐释了他的观点。两年后，该书的法语译本授权出版。

海伊尔丁对他改革纲领的阐释，既面向怀疑伊斯兰世界现代适应能力的欧洲听众，也面向拒绝外来新生事物的穆斯林听众，后者认为新生事物违背了伊斯兰教派及其价值观。这里，海伊尔丁立足于埃及的改革倡导者塔赫塔维率先提出的观点（海伊尔丁读过并赞赏塔赫塔维讨论法国的书）：穆斯林借用现代欧洲科学不过是欧洲偿还欠中世纪伊斯兰科学的债。[21]而这一观点将被19世纪以后的穆斯林改革家越来越多地提及。

尽管海伊尔丁在倡导政治和经济改革时心直口快、毫无保留，但在财政上他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希望看到突尼斯发展其经济基础，以支撑使用现代技术的开支。他认为，政府应该投资建厂，将本国的经济作物加工成商品来满足本地市场需求。他遗憾地表示，突尼斯劳动者将原棉、丝绸和羊毛“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欧洲人，待欧洲人短时间内加工成［成品布］后，又以好几倍的价钱买回来”。[22]他指出，由突尼斯的工厂来纺织突尼斯的棉纤维并生产面料供国内消费要好得多。这样的话，国家将不断繁荣，政府就能够投入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样完善的财政管理需要有才智的政府。带着越来越深的不安，海伊尔丁眼睁睁地看着突尼斯统治者们的面子工程和糟糕投资把国家带上破产之路。

突尼斯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相较于埃及投入的项目，突尼斯用于改革的支出并不算大。艾哈迈德贝伊统治期间最大的支出都同尼扎米军有关。艾哈迈德贝伊想要维持一支2.6万人的步兵队伍，为此，他从法国引入了所有必要的技术和劳动力来发展相关的支持产业，包括兵工厂、铸造厂、生产制服的纺织厂、生产马鞍和靴子的皮革厂等。然而，就像埃及的伊斯玛仪帕夏一样，艾哈迈德贝伊也有他的面子工程。他最为浪费的一次挥霍，是在距首都突尼斯城西南10英里的穆罕默迪亚建造

被他称为突尼斯凡尔赛宫的宫殿群。随着支出日益超出突尼斯的财力，艾哈迈德贝伊被迫削减他的雄心。他最终放弃了多家新工厂，损失巨大。

艾哈迈德贝伊的继任者继续推进改革，公共项目的支出居高不下，资源却日益减少。1859年政府铺设了一条电报线以改善通信，并修建了一条引水渠为突尼斯城提供淡水。一家英国公司获得特许权，修建一条22英里长的铁路，将突尼斯城与拉古莱特港和海滨城镇马尔萨连接起来。煤气照明被引入突尼斯城，城里的街道也被铺砌平整。[23]就像埃及的伊斯玛仪帕夏一样，突尼斯的统治者想要赋予他们的首都以欧洲现代化的所有外在标志。

改革正以不同的速度在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行省进行。作为帝国中心，伊斯坦布尔对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各省负有责任，必须确保所有省会城市都在发展。政府承担了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城建项目，建造新市场、政府办公场所和学校。此外，政府还在帝国的许多主要城市引入了煤气照明、有轨电车以及现代生活的其他外在标志。

奥斯曼帝国还给予欧洲公司建造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它们对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贝鲁特的港口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它们在黑海和马尔马拉海建立了轮船公司。1856年，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在土耳其修建第一条铁路的特许权，这条从伊兹密尔港到艾登的农业腹地的铁路长130千米（81英里）。一家法国公司获得了修建第二条铁路的特许权，这条从士麦那到卡萨巴的铁路长93千米（58英里），建于1863—1865年间。铁路线的延长让政府从铁路中获得的收益大幅增长，这鼓励了对安纳托利亚地区铁路的进一步投资。坦齐马特时代还建了一些工业企业，发现并开采了一些煤矿和其他矿场。然而，成功企业的利润被失败企业的亏损抵消，奥斯曼投资欧洲技术的回报永远无法赶上投资新技术的成本。

不计后果的政府开支让奥斯曼帝国和北非各地的改革者们忧心忡忡。欧洲技术的引进带来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发展非但没有使这些国家强大和独立，反而让中东地区的各政府变得贫穷和弱小，更易遭到欧洲的干涉。海伊尔丁在谈论突尼斯时称："显然，超出这个王国承受能力的过度开支是专断统治的结果，而节约是王国走向繁荣安康的途径。要做到节约，就要控制坦齐马特范畴下的所有开支。"[24]海伊尔丁认为，若要发展项目取得成果，政府必须量入为出。专断统治和过度开支正在破坏坦齐马特改革。

对于像海伊尔丁这样的改革派思想家来说，解决政府开支过度和统治专断的办法在于宪法改革与代议制政府。塔赫塔维对法国宪法的分析在19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清晰的回应。在宪政统治下，国家会繁荣昌盛，人民的知识会增加，他们的财富会增长，他们的心会得到满足。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

而1861年的突尼斯宪法远远没有达到改革者的期望。宪法文本借鉴了奥斯曼帝国1839年和1856年的改革法令，没有限制贝伊的行政权力，保留了后者任命和解除大臣职务的权力。但宪法确实要求成立代表议会，即由统治者提名的60名议员组成的大议会（Grand Council）。被任命为大议会议长的海伊尔丁，很快就大失所望，因为大议会在限制贝伊的过度行为上权力有限。他承认，艾哈迈德贝伊和他的首相成立大议会的目的只是为了给他们的决定提供橡皮图章，因此，他在1863年提请辞职。促使他辞职的导火索是政府决定签订第一份外国贷款合同，海伊尔丁预测这将把这个他移居的国家带向"毁灭"。[25]

埃及宪政运动也勃兴于19世纪60年代。许多改革者追随塔赫塔维的分析思路，认为宪政是欧洲强大和繁荣的基础，也是埃及自身改革中缺失的一环。然而，正如在突尼斯那样，统治者不同意，就不可能有改变。埃及总督伊斯玛仪帕夏在1866年要求成立第一届代表协商议会。议会由75名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任期3年。同突尼斯的贝伊一样，埃及的统治者试图通过组建议会来将地主权贵牵扯进他那些有争议的金融政策中，议会的作用仅限于咨商（代表们不能制定埃及法律）。尽管该议会是统治者的产物，但却成为埃及精英对统治者及其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的论坛，标志着更广泛地参与国家事务的开始。[26]

东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宪政运动发生在奥斯曼土耳其。19世纪60年代末，土耳其一些主要知识分子在巴黎和伦敦集会，他们与欧洲的自由主义者聚在一起，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宪政、人民主权和代表人民的民选议会的要求。他们被称为奥斯曼青年党，他们就奥斯曼社会的贫困和国家的财政状况批评政府。青年党人抱怨奥斯曼帝国日益依赖欧洲列强，抱怨外国干涉奥斯曼事务，并将土耳其的问题完全归咎于素丹及其政府不负责任的政策。青年党人出版报纸，并游说外国政府支持他们的事业。即便如此，他们也承认，只有素丹同意，变革才能到来。19世纪土耳其大知识分子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告诫他的青年党人同伴："奥斯曼民族忠于其奥斯曼统治者，除非（素丹）真有意愿，否则我们什么也做不了。"[27]青年党于1871年解散，但后来又回到伊斯坦布尔游说，在那里得到了改革派政府官员的支持。1876年，奥斯曼宪法颁布，第一届奥斯曼议会召开，奥斯曼青年党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如果突尼斯、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希望通过宪政改革来避免经济崩溃，他们会大失所望。早期的宪政运动过于尊重权威，没有对统治者加以约束。他们似乎希望突尼斯的贝伊、开罗的帕夏或伊斯坦布尔的素丹会自愿接受约束，并做出开明仁慈之举，同代表议会分享权力。但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期望。贝伊、帕夏和素丹都像以前一样继续统治，他们不受限制，任意挥霍，直至政府破产。

*

对中东独立最大的威胁不是欧洲的军队，而是欧洲的银行。奥斯曼改革者对接受欧洲贷款所要面临的风险感到恐惧。1852年，素丹阿卜杜·迈吉德向法国寻求资金时，一位顾问把他拉到一边，强烈反对这笔贷款："您的父亲［马哈穆德二世］曾与俄国人打过两场仗，经历过多次战役。他身负多重压力，但他没向国外借过钱。您统治下的领土平安无事。如果借钱的话，人们会怎么说呢？"这位顾问接着说："哪怕只借5比索，这个国家都会陷入困境。因为一旦借贷，就没有尽头了。［这个国家］会负债累累，不可自拔。"阿卜杜·迈吉德被说服了，他取消了贷款，但两年后他将再次求助欧洲的债权人。[28]

海伊尔丁不愿成为突尼斯第一笔外国贷款的责任方，1863年，他选择辞去突尼斯大议会议长职务。他日后辛酸地描述了导致1869年突尼斯破产的政策。“在耗尽了摄政国的所有资源之后，［首相］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就自弃于借贷的毁灭之路……之前从不欠任何人分毫的突尼斯，背负上了政府从欧洲借来的2.4亿比索［合600万英镑或3900万美元］的债务。”[29]根据海伊尔丁的估计，在整个改革时期，突尼斯的国家年收入一直稳定在2000万比索左右。7年来，年均支出比收入多170%。结果，突尼斯的主权被移交给国际金融委员会。

接下来宣布破产的是奥斯曼中央政府，时间是1875年。20年间，奥斯曼帝国共签了16笔外国贷款，总额近2.2亿英镑（合12.1亿美元）。每贷一次款，奥斯曼经济就会更深地陷入欧洲的经济控制之中。在给越来越多心生怀疑的投资者提供优惠之后，在支付了在欧洲市场发行债券所需的佣金和费用之后，奥斯曼政府只拿到了1.16亿英镑（合6.3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偿还帝国的债务（约1900万英镑合1.045亿美元用于偿还本金，超过6600万英镑合3.63亿美元用于支付利息）。这样一来，2.2亿英镑中只剩下4100万英镑（合2.255亿美元）[(2)]可供奥斯曼人用于经济投资。正如阿卜杜·迈吉德的顾问所预测的那样，奥斯曼帝国债台高筑，陷入了困境。

接下来的6年里，奥斯曼人经历了与俄国的又一场灾难性战争（1877—1878）带来的混乱。1878年的《柏林条约》结束了战争，也坐实了领土的损失。奥斯曼人最终在1881年同欧洲债权人达成了协议，成立奥斯曼公共债务管理局。管理局由七人理事会领导，代表了主要的债券持有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和奥斯曼帝国[(3)]）。管理局的主席由法国人和英国人轮流担任。奥斯曼帝国的所有经济部门都受管理局控制。来自食盐专营税、渔税、丝绸什一税、印花税、宗教税的收入和几个奥斯曼行省部分年度上缴款被专门用于偿还债务。利润丰厚的烟草贸易也受管理局管辖，但很快，一个专门的机构成立了，监管并垄断烟草的购买和销售。管理局取得了对整个奥斯曼帝国财政的巨大控制权，欧洲列强不仅用它来控制素丹政府的行动，还将铁路、矿业和公共工程等奥斯曼帝国的经济部门向欧洲公司开放。[30]

埃及是最后一个宣布破产的中东国家，时间是1876年。但如果早一点宣布破产的话，政府的处境会好不少。埃及的状况同奥斯曼帝国惊人地相似。1862—1873年，埃及共签了8笔外国贷款，总额为6850万英镑（合3.7675亿美元），扣除提供优惠的支出后，仅剩4700万英镑（合2.585亿美元），其中约3600万英镑（合1.98亿美元）用于支付外国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因此，6850万英镑的贷款中，埃及政府仅获得约1100万英镑（合6050万美元）用于投资经济。

筹集资金偿还债务越来越困难，赫迪威伊斯玛仪开始出售埃及政府的资产。据估计，他在国内借债约2800万英镑（合1.54亿美元）。1872年，埃及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提前6年缴纳土地税的土地所有者未来永久享有土地税50%的折扣。这一孤注一掷的措施也未能阻止财政的崩溃。1875年，总督决定以400万英镑（合2200万美元）的价格将政府持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卖给英国政府，但这只收回了政府投入开凿运河的1600万英镑（合8800万美元）资金的四分之一。1876年4月，失去了重要资产的国库试图推迟支付国债利息。这相当于宣布破产，世界各国的追讨人像瘟疫一样降临埃及。

1876—1880年，埃及的财政由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的专家负责，他们的首要关切是外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同伊斯坦布尔一样，一个正式委员会成立了。一项项不切实际的方案接踵而来，给埃及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每一项方案中，外国经济顾问都设法更深入地参与埃及的财政管理。

1878年，两名欧洲委员被“邀请”加入总督的内阁，宣告欧洲已牢固确立对埃及的控制。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里弗斯·威尔逊（Charles Rivers Wilson）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法国人埃内斯特-加布里埃尔·德·布利尼埃（Ernest-Gabriel de Blignières）被任命为公共工程大臣。1879年，当赫迪威伊斯玛仪试图在一次内阁改组中罢免威尔逊和德·布利尼埃时，欧洲开始显示对埃及的影响力。英法两国政府向奥斯曼素丹施压，要求罢免“他的”埃及总督。一夜之间，倔强顽抗的伊斯玛仪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他更加顺从的儿子陶菲克（Tawfiq）。[31]

随着突尼斯、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破产，中东的改革进程兜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点。改革运动的初衷是加强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防止外部干涉，结果却让欧洲进一步掌控中东各国。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控制发展成直接的殖民统治，整个北非被日益强大的欧洲各帝国瓜分。

(1) 塔赫塔维出生于1801年10月15日，至1826年4月13日，未满25周岁，故此处为24岁。——编者注

(2) 根据计算，应为3100万英镑（合1.705亿美元）。——编者注

(3) 奥斯曼帝国的债券持有国包括其自身，是因为帝国内有持有国债的个人，此处的“奥斯曼帝国”代表的是私人债权人群体。——编者注

第五章　第一波殖民主义：北非

欧洲早已打下殖民阿拉伯世界的基础，但欧洲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主义活动，直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才轰轰烈烈地开始。如上一章所述，欧洲技术的传播和让资金短缺的中东各国政府超越自身财力、过度开支的金融安排，扩大了欧洲在奥斯曼帝国各地——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力。奥斯曼帝国及其北非自治行省的破产，为欧洲实行更为直接的控制扫清了阻力。

欧洲在北非的利益不断扩大，相应地，它们也更有动力开展彻底的帝国统治。到19世纪80年代，欧洲列强更加关心维护它们在南地中海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1840年的所谓“自我否定协定”不过是一纸空文，瓜分北非的大幕随即拉开。1881年，法国将突尼斯纳入统治范围。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1911年，意大利占据利比亚。1912年，欧洲列强同意摩洛哥（唯一一个一直独立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北非国家）成为法国和西班牙的被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直接统治了整个北非。

欧洲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主义活动源自北非，有许多原因。北非的各阿拉伯行省远离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中心，脱离伊斯坦布尔、实现自治的趋向在18和19世纪愈发明显。中东大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各阿拉伯行省，更靠近奥斯曼帝国的腹地，并在19世纪的改革（1839—1876）过程中被更紧密地纳入伊斯坦布尔的统治。当突尼斯和埃及等地成为奥斯曼帝国属国时，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依然是帝国不可或缺的行省。出现单一的统治家族，领导日益独立的政府，这些强化北非自治的新发展使北非国家更容易被欧洲占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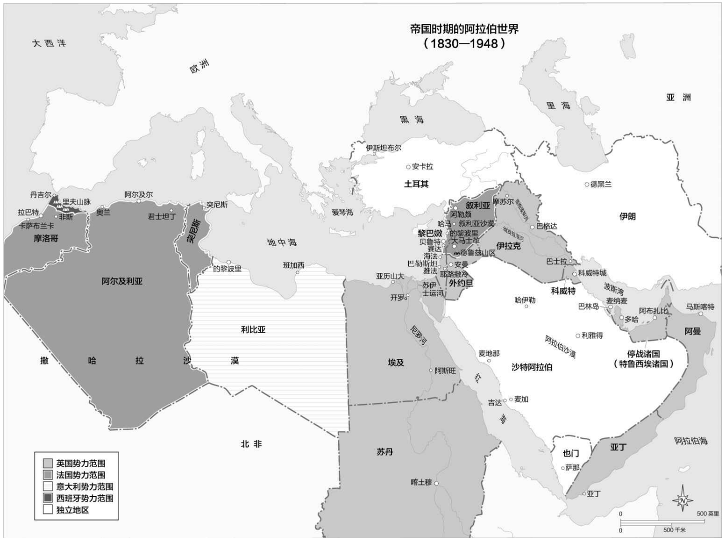
此外，北非各国离南欧国家相对较近，特别是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这也让北非国家更贴近欧洲的势力范围：接受军事援助、工业商品和金融资本。北非是奥斯曼帝国的遥远边疆，但却是欧洲的近邻。19世纪末，当欧洲在新的一波帝国主义浪潮中越过自己的边界时，近邻首当其冲是很自然的事。

欧洲国家殖民北非还有一个原因：先例。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长期统治为其实现对突尼斯和摩洛哥的野心提供了重要先例，也为意大利对利比亚实行帝国主义统治提供了借口。如果1827年促使法国入侵阿尔及尔的历史契机没有出现的话，对北非大部分地区的瓜分也许就不会发生。

*

像突尼斯一样，阿尔及尔摄政国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但统治阿尔及尔的总督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享有很大自治权。统治精英是募自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军人，他们组建行政委员会，选举他们的领袖，或称“德伊”。德伊同欧洲各国政府有直接往来。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正式批准选举出来的德伊，并要求阿尔及尔纳贡。唯一派驻阿尔及尔的奥斯曼官员是伊斯兰法庭的法官。除此之外，素丹对阿尔及尔的权威完全是仪式性的。

阿尔及尔的德伊们利用他们的自治权，单独与欧洲建立商业和政治关系，不受伊斯坦布尔的控制。但是，缺少奥斯曼帝国的背后支持，德伊们对他们的欧洲贸易伙伴几无影响力。1793—1798年，德伊们以赊账的方式为法国在意大利和埃及的军事行动提供军粮，他们一再要求法国政府付款，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数十年过去了，法国一直没有支付欠款，这笔交易逐渐成为两国间摩擦的根源。



到1827年，在阿尔及利亚德伊侯赛因帕夏（Husayn Pasha，1818—1830年在位）多次向法国政府去信催讨欠款无果后，德伊同法国领事皮埃尔·德瓦尔（Pierre Deval）的关系即将破裂。在同德瓦尔私下会面时，侯赛因帕夏大发雷霆，用蝇拂打了法国领事。

在向各自的上级提交的报告中，德瓦尔和侯赛因帕夏就这次会面给出了不同的说法。[1]德瓦尔对法国外交大臣称，当他去宫殿拜见侯赛因帕夏时，发现这位德伊正处于焦躁的状态。

侯赛因帕夏质问道："你的大臣为什么不回复我写给他的信？"德瓦尔称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道："我将在收到回信后亲自呈递给您。"根据德瓦尔的说法，德伊就在这一刻爆发了："'为什么他不直接回信呢？我是乡巴佬吗？是浑身沾满泥巴的人吗？是赤脚流浪汉吗？你这个恶人、异教徒、拜偶像的人！'然后，他起身离座，握着蝇拂的手柄，重重击打了我身体三下，命我退下。"

阿拉伯的蝇拂由一束马尾毛发嵌入手柄制成。人们一时无法明白如何用这样的工具来"重重击打"。然而，法国领事坚称法国的荣誉受到了威胁。他递交给外交大臣的报告是这样结尾的："若阁下不愿给予此事件以严重而公开的关注，那至少请允许我辞职。"

在给奥斯曼帝国首相的报告中，德伊承认用蝇拂打了德瓦尔，但这是遭到挑衅之后的回应。他解释说，他曾三次写信给法国，要求对方支付欠款，但连礼节性的回复都没有收到。他"特意用礼貌的方式、友好的态度"向法国领事提出此事。

> "为什么我写给你们［即法国］政府的信没有得到答复？"领事固执而傲慢地用冒犯性的言辞回答说："法国国王和政府可以不对你给他们的信做出答复。"他胆敢亵渎穆斯林的宗教，蔑视陛下［素丹］作为世界保护者的荣誉。我无法忍受这种侮辱，这种侮辱超出了所有可以忍受的限度，我只能依靠穆斯林特有的勇气，用我卑微的手握着的蝇拂轻打了他两三下。

无论这两种相互不一致的说法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可以确定的是，1827年，法国人并不打算偿还30年前欠下的债，阿尔及利亚人也不

愿意免债。蝇拂事件后，法国要求赔偿对法国荣誉造成的损害，而阿尔及利亚人则继续坚持要求法国偿还长期拖欠的债款。这场争端使双方走向冲突，阿尔及利亚人拒绝让步，法国人也没有退路。

法国人针对德伊的“侮辱”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阿尔及利亚人向法国国旗鸣枪敬礼，但遭到了德伊的拒绝。法国人随后对阿尔及尔港实施了封锁，这对马赛商人造成的伤害要大于阿尔及利亚海盗，后者驾着快船可以轻易通过列着长队执行封锁的法国舰船。在经历了两年的僵持之后，法国试图寻求一个挽回面子的解决方案，便派了一名外交官与德伊谈判。阿尔及利亚人向外交官的主舰发了几枚炮弹，阻止谈判者上岸。在阿尔及利亚经历的尴尬让正处于困境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的政府十分难堪。

查理十世（1824—1830年在位）面临着内外交困。他试图恢复一些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力，让时间倒流到革命前的时代。1830年，他中止宪法（里法阿·塔赫塔维在他研究法国的书中详细描述过），带来了危机。他的首相朱尔·德·波利尼亚克亲王（Prince Jules de Polignac）提出，海外军事行动可以为国王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但波利尼亚克也承认，对于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地中海势力均衡的举措，法国必须应对其他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的反对。他派大使前往伦敦和欧洲其他宫廷，向他们解释，即将入侵阿尔及利亚是为了彻底摧毁海盗，完全废除奴役基督徒的奴隶制，并终止欧洲国家为保航运安全而向这个摄政国纳贡。波利尼亚克希望，这一维护普遍利益的说法可以赢得国际社会对法国入侵阿尔及尔的支持。

1830年6月，由3.7万名士兵组成的法国远征军在阿尔及尔西部登陆。远征军很快击败了德伊的军队，并于7月4日进入阿尔及尔城。这一胜利不足以拯救查理十世，月末他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被推翻。当时旅居巴黎的埃及学者里法阿·塔赫塔维记录道，比起征服阿尔及尔，法国人更满足于推翻不得人心的国王。他认为，征服阿尔及尔的“动机似是而非”。[2]尽管如此，法国在波旁王朝垮台后仍占据阿尔及尔，这是查理十世平庸统治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产之一。1830年7月5日，侯赛因帕夏投降，结束了阿尔及利亚300年的奥斯曼历史，开启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132年的统治。

虽然法军在阿尔及尔击败了土耳其驻军，但这场胜利并没有让他们控制整个国家。只要法国人将他们的野心限定在主要的沿海城镇，他们就不太可能在阿尔及利亚遇到有组织的抵抗。欧洲列强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北非海岸的战略港口。法国在1830年7月占领阿尔及尔和1831年1月占领奥兰，同西班牙在休达和梅利利亚(现在仍是西班牙的领地)设要塞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法国人并不满足于占领主要城镇，他们希望执行“有限占领”政策，殖民富饶的沿海平原，引入法国定居者。这是一项势必会激起阿尔及利亚本地居民敌意的政策。

阿尔及利亚人口由彼此隔绝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后者是一个非阿拉伯民族，在7世纪的伊斯兰征服后皈依伊斯兰教。柏柏尔人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分布在北非，主要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与阿尔及尔德伊们的统治保持独立，并抵制土耳其驻军试图征税或将奥斯曼统治扩展到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和奥兰等主要城市之外的企图。因此，对于摄政国的覆灭，他们毫不悲伤。但这并不意味着，相较于土耳其人的统治，阿尔及利亚乡村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会更顺从法国人。

当法国人开始殖民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平原时，当地部落就组织反抗，反抗运动始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奥兰附近。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求助于苏非教团（神秘的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他们往往兼具宗教合法性和高贵血统，这一血统将教团成员同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联系在一起。各苏非教团都有遍布阿尔及利亚的分会网络，要求成员向分会领袖效忠。该网络自然就成为发起反抗运动的组织框架。

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卡迪里耶教团（Qadiriyya Order）是最强大的苏非教团之一。教团的首领是一位名叫穆希丁（Muhi al-Din）的长者。当地几个主要部落向穆希丁请愿，请他接受素丹的头衔，领导阿尔及利亚西部的阿拉伯人对法国发动“圣战”。当他以年老体衰为由拒绝的时候，这些部落提名他的儿子阿卜杜·卡迪尔（1808—1883），后者已在攻击法国人时证明了他的英勇无畏。

1832年11月，24岁的阿卜杜·卡迪尔被奉为埃米尔，担任反法部落

联盟的首领，开启了中东近代史上最为杰出的职业生涯之一。此后15年内，阿卜杜·卡迪尔团结阿尔及利亚人民展开了反抗法国占领的持久抵抗运动。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都是一个传奇。

对法国人来说，阿卜杜·卡迪尔是“高贵的阿拉伯人”的终极典范，是一个萨拉丁式的人物，他的宗教信仰和个人品质使他的保家卫国、反抗外国军事入侵的动机无可非议。在战斗中，他勇敢而大胆，采用游击战式的作战方式，多次率领小规模军队战胜法军，当时的法军比曾击溃埃及马木鲁克的军队更先进。他的英雄业绩被法军征战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记录员、浪漫主义画家霍勒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1789—1863）用绚丽的油画描绘了下来。维克多·雨果用“*le beau soldat, le beau prêtre*”这样的诗句赞颂他，字面意思为“英俊的战士，英俊的教士”。

对于他的阿拉伯追随者来说，阿卜杜·卡迪尔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即谢里夫），也是一个主要苏非教团中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因而具有宗教合法性。他们向他宣誓效忠，得到的回报是战胜强大的敌军。阿卜杜·卡迪尔的英雄业绩令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同时代人兴奋不已，他是捍卫伊斯兰世界不受外国侵略者侵犯的“信士的长官”。

阿卜杜·卡迪尔指挥作战极富才智。一次，法国人获取了一些他的文件，他们惊讶地发现，他可靠地掌握了有关法国众议院辩论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情报。他了解这场战争在法国公众舆论中是多么不得人心，也知道法国政府正面临同阿尔及利亚起义者妥协的压力。[3]掌握这些情报后，阿卜杜·卡迪尔推动战事向驱使法国寻求和平的方向发展。

他两次迫使法国将领按他的条件缔结和平条约，承认他的主权，并明确法国控制区的边界。第一份条约是在1834年2月同路易·德米歇尔（Louis Desmichels）将军达成的;第二份是相互承认主权的《塔夫纳条约》，是在1837年5月同罗贝尔·比若（Robert Bugeaud）将军缔结的。后一条约承认阿卜杜·卡迪尔拥有对阿尔及利亚超过三分之二土地的主权。[4]由于双方都有扩张的野心，两份条约都很快失效了。

阿卜杜·卡迪尔和法国人都想将东部城市君士坦丁纳入各自的统治之下。法国人认为君士坦丁远在1837年条约中承认的阿卜杜·卡迪尔政权所

辖领土之外。阿尔及利亚人则反驳道，这份条约明确规定了法控地区的边界，法国人侵占君士坦丁即是违约。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立场又一次不可调和。阿卜杜·卡迪尔指责法国人食言，并重启战斗。1839年11月3日，他写信给法国总督：

> 当时我们处于和平状态，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之间的界限已经明确划定……［现在］你发布［声明］称，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之间的所有地区都不再听我的号令。和约破裂是你造成的。但是，为了不让你指责我背约，我警告你，我将重启战斗。你好好准备吧，并警告你们的旅人以及所有住在孤立无援处的人！一句话，你采取一切你认为必要的防备措施吧！[5]

阿卜杜·卡迪尔的军队袭击了阿尔及尔东部米蒂贾平原上易受攻击的法国农业殖民地。他们杀害并打伤了数百名定居者，将他们的家园付之一炬，这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巴黎政府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么撤出，要么下决心完全占领阿尔及利亚。巴黎选择了后者，派出了比若将军率领的庞大的作战部队，要让反抗法国统治的阿尔及利亚势力彻底“屈服”。

比若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阿尔及利亚取得全面胜利。阿尔及利亚人组织有序、斗志高昂。阿卜杜·卡迪尔将他的阿尔及利亚政权划分为8个省，每个省设一名省长，领导各级行政单位直至部落层级。省长定期领取俸禄，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并为国家收税。阿卜杜·卡迪尔还任命法官，执行伊斯兰法。他的统治并不张扬，在伊斯兰法的约束下运作，鼓励农民和部落成员纳税。

阿尔及利亚政府从税收中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战场上颇为高效的志愿部队。根据阿卜杜·卡迪尔自己的估计，他的部队有8000名常规步兵、2000名骑兵和240名配备20门大炮的炮兵，平均分布在8个省。这些机动部队能够采用经典的游击战术去骚扰法军，而一旦法军人数多到足以压制他们时便撤退。

阿卜杜·卡迪尔还沿着高原的山脊建了一批要塞城镇，法军反攻时他的军队可入内躲避。1848年，阿卜杜·卡迪尔在土伦向俘获他的法国人解释了他的战略：“我确信，战争已经重新开始，我将被迫放弃所有的内陆

中心城镇给你们［即法国人］，但你们不可能推进到撒哈拉，因为你们的交通工具会拖累并阻止你们前进到这么远的地方。”[6]

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的策略是把法国人引到内陆，在那里入侵者会因战线拉得过长而被孤立，更易被击败。阿卜杜·卡迪尔在要塞城镇塔格迪姆特警告一名法国囚犯：“你将病死在我们的山里，而那些疾病带不走的人，我的骑兵将用子弹处死他们。”[7]由于他的政府和防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组织得要好，阿卜杜·卡迪尔相信他将再次战胜法国人。

然而，阿卜杜·卡迪尔没有预料到法国会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使用非同寻常的暴力。比若将军在阿尔及利亚内陆地区使用了焦土策略——烧毁村庄、赶走牲畜、破坏农田、推倒果园，以此削弱民众对阿卜杜·卡迪尔反抗运动的支持。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杀害，军官们被告知不留俘虏。阿卜杜·卡迪尔的手下但凡有想要投降的，一律被砍倒。各部落和村庄开始反对阿卜杜·卡迪尔，避免因支持他而遭到厄运。法军的举措还摧毁了乡村经济，削减了阿卜杜·卡迪尔的税收收入。

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的猛烈攻击下震惊无措，民众对阿卜杜·卡迪尔抵抗运动的支持开始瓦解。战士们的家人开始害怕遭到阿尔及利亚同胞的袭击，阿卜杜·卡迪尔建了一个巨大的营地，叫作“齐马拉”（*zimala*），将所有战士的家人，包括妻儿与老人，都带了进来。阿卜杜·卡迪尔的齐马拉是一个拥有不少于6万人口的移动城市。他声称：“当一个阿拉伯人失去了与家人的联系后，他有时会花上两天时间才能［在人群中］找到他们。”齐马拉的规模之大可见一斑。齐马拉也是阿卜杜·卡迪尔军队的移动支持部队，内有制械师、制鞍师、裁缝等他的团队所需要的所有工匠。

法军迫切希望打击阿卜杜·卡迪尔手下战士们的士气和阿尔及利亚军队的支持基地，齐马拉自然成为法军的首要攻击目标。由于很好地掌握了法军的位置且熟悉地形，阿卜杜·卡迪尔得以在冲突的头3年里保证齐马拉的安全。然而，1843年5月，营地的位置被出卖，法国军队攻击了齐马拉。阿卜杜·卡迪尔和他的部下得知这次袭击时，为时已晚，已来不及救援。后来他对俘获他的法国人说：“如果当时我在场，毫无疑问，我们会为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而战，会向你们展示一个伟大的日子。但是真

主不愿如此，我3天后才得知这件不幸的事，太迟了！”[8]

法军对齐马拉的袭击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据阿卜杜·卡迪尔估计，法国人杀了这个移动营地十分之一的人口。失去长辈与妻儿，严重打击了部队的士气。这次袭击也让阿卜杜·卡迪尔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他失去了大部分资产。之后，他抗击法国的战斗开始走向尾声。阿卜杜·卡迪尔和他的部队不断后撤，1843年11月，这位阿尔及利亚将领带着他的追随者流亡到摩洛哥。

在接下来的4年里，阿卜杜·卡迪尔集结他的部队在阿尔及利亚攻击法国，然后退入摩洛哥境内逃避追捕。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拉赫曼（Moulay Abd al-Rahman）并不愿卷入阿尔及利亚冲突。然而，由于窝藏敌人，法国攻击了靠近阿尔及利亚边界的摩洛哥城镇乌季达，并派海军炮轰丹吉尔港和摩加多尔港。1844年9月，法国和摩洛哥政府签署了一项恢复友好关系的条约，明确宣布阿卜杜·卡迪尔在摩洛哥帝国全境是逃犯。[9]安全的庇护所被剥夺，同物资基地的联系被切断，阿卜杜·卡迪尔的抗法斗争愈发艰难，1847年12月，他向法国人投降。

法国庆祝阿卜杜·卡迪尔战败，认为他们战胜了一个重要对手。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的一位传记作者（和崇拜者）讽刺地说：“让我们想一想，七年的战斗和十万人组成的世上最强的军队才摧毁了埃米尔［小国君王］用两年零五个月建立起来的军队，这真让人难以置信啊！”[10]这场战争给阿尔及利亚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平民伤亡人数估计有数十万。

法国人将阿卜杜·卡迪尔送到法国，把他和他的家人监禁在一起。阿卜杜·卡迪尔多少是个名人，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政府想利用这名囚徒的声望，准备高调赦免他。但1848年革命爆发，路易·菲利普被推翻，这一计划被打乱了。在巴黎政权更迭的政治动荡中，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被遗忘了。直到1852年，新总统路易·拿破仑（后来加冕为拿破仑三世皇帝）才恢复了阿卜杜·卡迪尔的自由。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受邀作为路易·拿破仑的贵宾乘坐白色战马巡游巴黎，并与总统一起检阅法国军队。他从未被允许返回阿尔及利亚，但法国人给了他终身养老金和一艘轮船，让他自己选择流放地。阿卜杜·卡迪尔起航前往奥斯曼领地，并在大马士革定

居下来，在那里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和他的家人被接纳进大马士革精英家族圈，他后来在当地的教派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阿卜杜·卡迪尔专心投入学术和伊斯兰神秘主义。1883年，他在大马士革去世。

战胜阿卜杜·卡迪尔仅仅是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法国继续向南扩展其殖民范围。到1847年，已有将近11万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定居。第二年，定居者群体赢得了选举法国议会议员的权利。1870年，拥有近25万法国定居者的阿尔及利亚正式并入法国，非欧洲裔的居民成为法国的国民（非公民）。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之外，在整个中东地区没有任何定居者殖民主义能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

*

除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暴力的帝国主义战争外，从1840年的《伦敦黎凡特绥靖公约》（London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Levant）到1878年的《柏林条约》，欧洲列强遵守了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承诺。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对北非的正式殖民又开始了。

1840—1881年，欧洲和奥斯曼帝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主义这个源自欧洲的新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民族主义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19世纪期间以不同的程度在欧洲传播。希腊是一个早期的皈依者，在经历了10年的战争之后，于1830年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经过几十年的统一运动逐渐形成国家形态，到19世纪70年代初才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奥匈帝国内部也开始面临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挑战，奥斯曼帝国在东欧的领土走上同样的道路只是时间问题。

19世纪30年代，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保加利亚、马其顿这些巴尔干半岛国家开始谋求从奥斯曼帝国独立。欧洲列强给予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支持，支持他们摆脱土耳其的“枷锁”。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提出了支持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的动议。俄国政府全力支持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徒和斯拉夫同胞。奥

地利人希望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黑山的分离主义运动中获益，借机损害奥斯曼人的利益，并扩大自身的领土（但在这一过程中，引入了1914年致其自身覆灭并触发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些外部支持增加了巴尔干民族主义者与奥斯曼国斗争的勇气。1875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大规模叛乱。第二年，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发动起义反抗奥斯曼人。保加利亚的冲突毁坏了乡村地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村庄陷入了民族主义战士与奥斯曼士兵之间的暴力冲突。欧洲的报纸对保加利亚穆斯林更高的伤亡人数视而不见，而将对基督徒的屠戮称作“保加利亚恐怖”大肆宣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的起义让奥斯曼帝国陷入困境。1876年7月，塞尔维亚的米兰王子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国也跟着支持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行动。

通常来说，英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干预。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支持奥斯曼帝国，作为遏制俄国对欧洲大陆野心的缓冲。然而，迪斯雷利发现他被公众舆论束缚住了。暴行及媒体对此的报道使他的亲土耳其政策名声扫地，也使他更易受到自由党对手威廉·格莱斯顿的挖苦。1876年，格莱斯顿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小册子，题为《保加利亚恐怖和东方问题》（*The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他在书中用大段生动而激烈的言辞谴责土耳其人是“人类中反人类的典型”。他的小书主张将奥斯曼人从他们的欧洲行省里全部驱逐出去。他写道：“现在，能让土耳其人结束凌辱行径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让他们自己滚蛋。”格莱斯顿更顺应民意，迪斯雷利和英国政府被迫放弃对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支持。

既然不必再维持土耳其对其行省主权的原则，欧洲列强就开始考虑肢解奥斯曼帝国。欧洲批评人士提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带来一个稳定的、可以独立生存的国家。他们指出，1875年奥斯曼帝国的破产进一步证明土耳其是“欧洲病夫”。与其如此，不如商议在欧洲列强之间重新分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德国提议瓜分奥斯曼帝国，让奥地利和俄罗斯分割巴尔干地区，把叙利亚分给法国，把埃及和地中海主要岛屿分给英国。英国对此十分震惊，迅速提议于1876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巴尔干危机和俄土冲突。

外交努力赢得了回旋的时间，但那些好战的大国却执意要发动战争，动荡的局势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机会。1877年4月，俄国再次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同时从帝国的东西两侧入侵。俄军迅速攻入东安纳托利亚，并穿过巴尔干半岛，造成奥斯曼守军重大伤亡。1878年初，俄军横扫保加利亚和色雷斯，向伊斯坦布尔挺进，奥斯曼军队的防线崩溃。为避免首都沦陷，奥斯曼帝国被迫无条件投降。

在被俄国彻底击败之后，奥斯曼帝国对1878年柏林会议强加给它们的条款几乎没有发言权。欧洲列强抛弃长期以来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做法，开始了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第一次分割。在柏林会议期间，保加利亚获得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自治权，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实际上被奥地利占领。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获得完全独立。俄国在东安纳托利亚获得了大量领土。这些安排迫使奥斯曼帝国交出了五分之二的领土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一半是穆斯林）。[11]

英国人无法阻止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便决心在柏林会议开始之前确保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疆域内的战略利益。作为一个海上强国，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在东地中海建一个海军基地来监督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保证其畅通无阻。塞浦路斯岛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个需求。相较于这片岛屿，四面楚歌的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更需要一个盟友，因此，他在柏林会议前夕以塞浦路斯为交换条件，与英国缔结了防御同盟条约。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要求，将对奥斯曼帝国的分割从巴尔干扩大到北非。德国同意英国获取塞浦路斯，但两国都承认需要对法国做出补偿，以维持地中海的势力均衡。他们同意将突尼斯“提供”给法国，以巩固其北非帝国，并维护同阿尔及利亚交界地区的安全。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吞并法国阿尔萨斯-洛林省的德国也很乐意送出这份礼物，以修复同巴黎的关系。只有意大利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它在突尼斯有大量定居者和投资，其他大国不以为意，建议意大利转而考虑利比亚（1911年，意大利确实这么做了）。

法国人获准占领突尼斯，但找不到理由对这个顺从的北非国家采取

敌对行动。突尼斯政府自1869年破产以来同法国金融顾问进行了充分合作以偿还外债。1879年，法国政府首次提出在突尼斯建一个被保护国，但统治者穆罕默德·萨迪克贝伊（Muhammad al-Sadiq Bey，1859—1882年在位）委婉地拒绝了将他的国家交付外来帝国统治的提议。

法国的公共舆论反对殖民行为，这进一步加大了阻力。大多数人认为，法国为获取阿尔及利亚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几乎没有人支持法国继续在北非扩张。在内缺乏公众支持，在外缺少借口，法国政府将突尼斯并入其北非帝国的努力受阻。与此同时，意大利利用法国人的迟滞不前扩大在突尼斯的势力范围。在突尼斯，意大利的定居者社群规模远超法国。法意间的对抗最终促使法国人采取行动。

法国人必须找到入侵突尼斯的理由。1880年，一名法国投机商人违反了特许权协议，他费尽千辛万苦，却被突尼斯人驱逐出境。法国领事提出抗议，向贝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赔偿这名法国人，并惩罚对驱逐这名无力偿债者负有责任的突尼斯官员。这次羞辱当然不能同1827年阿尔及利亚的蝇拂事件相提并论，但粗暴对待一名法国国民被认为足以动员一支入侵部队来挽回国家荣誉。突尼斯的统治者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理智，他接受了法国的所有无理要求，从而清除了法国入侵的借口。部队撤回了军营，等待入侵突尼斯的更好时机。

1881年3月，有消息称一群部落成员在一次袭击中从突尼斯越境进入了阿尔及利亚，法军再次集结。虽然贝伊提出赔偿损失和惩罚部落成员，但法国人坚持要自己采取行动。一支法国骑兵支队越过突尼斯边界，绕过犯下过失的部落的领地，直奔突尼斯城。4月，他们在突尼斯首都同一支海上部队会合。面对法国的陆路和海路入侵，穆罕默德·萨迪克贝伊于同年5月12日与法国签订条约，在事实上切断了他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并将主权割让给了法国。突尼斯经历的改革和破产让欧洲对它的非正式控制变为完全的帝国主义统治。

当法国人忙于将突尼斯并入他们的北非帝国时，动乱正在埃及东部酝酿。如上一章所述，埃及的改革和破产引来欧洲对其财政与政府管理的干预。欧洲列强采取的措施非但没有助其恢复秩序，反而破坏了埃及国内政治的稳定，催生了一场强大的反对运动，威胁到了赫迪威的统

治。原先是英法协调行动，以加强赫迪威的统治，结果却是英国在1882年意外占领了埃及。

*

埃及的新任赫迪威陶菲克帕夏（1879—1892年在位），被夹在欧洲的诉求和本国社会强大的利益集团之间。他是突然登上总督宝座的。他的前任（和父亲）赫迪威伊斯玛仪因阻碍英法人士对埃及财政的控制，在英法施压游说下，被奥斯曼素丹罢免。因此，陶菲克帕夏深知不能绕过欧洲列强。然而，顺应英法的要求，却让他在埃及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为偿还埃及外债而实施的经济紧缩政策激怒了大地主和城市精英，他们越来越直言不讳地反对赫迪威的蠹政。

埃及的精英们拥有一个政治平台，那就是1866年伊斯玛仪帕夏建的早期议会，叫作代议议会。精英们在议会中的代言人开始要求：议会行使国家预算批准权，内阁对议会负有更大责任，制定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来限制赫迪威的权力。面对这些要求，陶菲克帕夏既无权也不愿做出让步，便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于1879年中止了议会。作为回应，土地精英们开始支持埃及军队中日益壮大的反对运动。

埃及破产后实施的紧缩政策严重打击了埃及军队，特别是军中的埃及人。军中说土耳其语的精英军官和说阿拉伯语的本土埃及人之间分歧严重。这些讲土耳其语的军官，被称为突厥-切尔克斯人，源自成为军事阶层的马木鲁克人。他们同赫迪威的家族和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人都有紧密联系。他们看不起土生土长的埃及人，轻蔑地称他们为农民士兵。埃及财政的掌控者宣布大幅裁军后，突厥-切尔克斯军官为保护自身利益，将裁减配额强加于埃及本土军人。埃及军官团结一致捍卫自身利益，准备动员起来反抗不公平的裁减。一名最高级别的埃及军官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Colonel Ahmad Urabi, 1841—1911）领导了这次反抗运动。

艾哈迈德·欧拉比是第一批进入军官队伍的本土埃及人。他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一个村庄。1854年，他放弃了在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的学业，进入萨义德帕夏开办的新型军事学院。欧拉比相信他和同辈的突厥-切尔克斯人一样有资格成为军官。他声称他的父系和母系都源自先

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在穆斯林眼中，这是非常显赫的血统，没有一个马木鲁克能与之匹敌，因为后者都是皈依伊斯兰教的高加索基督徒军事奴隶。欧拉比才华横溢、胸怀大志，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以反抗者而非军士的身份青史留名。的确，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反抗事件促使英国于1882年占领埃及。

欧拉比在他的回忆录中理想化地将军中的制度描述为举贤任能制，即晋升通过考核决定，“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会被晋升到适当的级别”。[12]显然，欧拉比在考核中表现出色。1854—1860年，他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埃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上校，当时年仅19岁。欧拉比对萨义德帕夏忠心耿耿，这位总督将军官集团向本土埃及人开放。

1863年伊斯玛仪帕夏继位后，这位新任总督又恢复了传统的偏见，在军队中给予说土耳其语的军官更多特权。此后，裙带关系与民族成分取代才能，成为军中晋升的依据。雄心勃勃的欧拉比撞上了突厥-切尔克斯精英设置的玻璃天花板。伊斯玛仪（1863—1879年在位）统治的整整16年内，欧拉比没有得到一次晋升。这一经历让他对军中的上级军官和埃及的总督心生怨愤。

伊斯玛仪掌权后，欧拉比同突厥-切尔克斯精英的冲突几乎立即就开始了。欧拉比被安排在切尔克斯将军胡斯鲁帕夏（Khusru Pasha）帐下，他抱怨道：“他盲目地偏袒自己的族人，当他发现我是血统纯正的［埃及］国民时，我存在于军团中就让他非常苦恼。他想方设法把我开除出军团，这样就可以把我的职位安排给马木鲁克子弟了。”[13]

当欧拉比被送到负责晋升的考核委员会时，胡斯鲁帕夏的机会来了。这个机构确保士兵靠才能而非关系晋升。胡斯鲁帕夏命令欧拉比伪造考试成绩，以提拔一名切尔克斯人。欧拉比拒绝了，于是这名将军就向军事大臣宣称欧拉比不服军令。这个案子一直呈送到赫迪威伊斯玛仪处，欧拉比被暂时解除军职，转到文官部门。1867年，欧拉比获得了赫迪威的赦免，直到1870年春才重新以先前的上校军衔全职回军队服役。但他依然对他的突厥-切尔克斯上级和所遭遇的不公怀有深深的怨恨。

19世纪70年代是埃及军队受挫的年代。欧拉比参加了灾难性的阿比西尼亚战役，赫迪威伊斯玛仪发动此战役是为了试图将埃及的帝国统治

扩展到现今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领土。1876年3月，阿比西尼亚国王约翰取得了对埃军的决定性胜利，将入侵者赶出了他的领土。在外遭受了重大伤亡和军事耻辱的军队回到国内，士气低落，但还得面对1876年国家破产后的遣散。这是掌控财政的欧洲人强制推行的一项经济政策，埃及军队将要从1.5万人削减到仅7000人的象征性兵力，2500名军官的薪水将减半。1879年1月，欧拉比奉命将他的兵团从罗塞塔调到开罗，准备遣散。

欧拉比抵达开罗时，发现全城都是等待遣散的埃及士兵和军官。大有前途的军旅生涯突然结束，失业即将到来，面对这一状况，男人们群情激愤。1879年2月18日，一群埃及军校学员和军官在财政部外举行示威，抗议不公平的裁减。当首相努巴尔帕夏和英籍财政大臣查尔斯·里弗斯·威尔逊爵士从政府内出来时，愤怒的官员粗暴地对待了这两名政客。当时没有参加抗议的欧拉比后来向一名支持他的英国人讲述说："他们发现努巴尔正登上马车，便袭击了他，拔他胡子，扇他耳光。"[14]

军人的骚乱正合赫迪威伊斯玛仪的胃口，因此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怀疑，这位总督参与组织了这次示威。伊斯玛仪想要摆脱他内阁中的法籍和英籍大臣，并希望在预算上拥有更大的支配权。他认为，欧洲财政顾问实施的严格紧缩政策正在破坏埃及国内的政治稳定，损害了埃及偿还外国债务的能力。军人示威结束后第二天，伊斯玛仪接受了努巴尔混合内阁的辞职。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并不打算纵容赫迪威重掌权力。1879年6月，伊斯玛仪被废黜。

赫迪威伊斯玛仪下台让欧拉比和其他埃及军官们长舒一口气。然而，在他的继任者陶菲克帕夏的领导下，埃及军官的地位反而恶化了。新任军事大臣奥斯曼·里夫奇帕夏（Uthman Rifqi Pasha）是一名突厥-切尔克斯人，他撤去了一些埃及本土军官的职务，代之以他的族人。1881年1月，欧拉比得知他和一些同僚即将在他称为马木鲁克复辟的行动中被解职。"切尔克斯高、低级别的军官定期在胡斯鲁帕夏［欧拉比之前的上司］的家中聚会，颂扬马木鲁克国家的历史，奥斯曼·里夫奇帕夏也出席……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收复埃及和埃及的一切财富，就像他们的马木鲁克前辈那样。"[15]

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决定采取行动。他们起草了一份给赫迪威陶菲克的请愿书，陈述他们的不满和要求。1881年1月的这份请愿书标志着欧拉比参与国家政治的开始，开启了军人干政的危险先例，这将在整个20世纪的阿拉伯历史中重演。

欧拉比和他的埃及军官们有三个主要目标：扩大埃及军队的规模，撤销财政掌控者强加给军队的裁员额度；修改条例，确立军人之间不分种族和宗教，一律平等；任命埃及本土军官担任军事大臣。欧拉比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即平等与偏好埃及本土大臣之间的矛盾。

欧拉比他们的要求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来说是革命性的。首相利雅得帕夏（Riyad　Pasha）收到军官们的请愿书时，公开威胁他们："这份请愿书极具破坏性，它比你们先前一位同事提交的请愿书还要危险，他后来被派到了苏丹。"[16]当时，苏丹相当于埃及的西伯利亚。但埃及军官拒绝撤回请愿书，并要求提请赫迪威关注。

收到欧拉比的请愿书后，赫迪威召集最高级军官到阿比丁宫开紧急会议。他们要求以煽动叛乱罪逮捕欧拉比和另两名军官，并同意组建特别军事法庭来审判他们。第二天，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被召唤到军事部，当场被要求交出武器投降。在前往设在军事部内的监狱的路上，这些埃及人经过了两排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切尔克斯军官。在牢房门口，老克星胡斯鲁帕夏奚落了他们。欧拉比愤恨地回忆道："他站在牢房外奚落我们，说我们是'［只适合］以摘果子为业的农民'。"[17]

欧拉比和他同僚被捕，在埃及军中引发兵变。1881年2月，赫迪威卫队的两支小队袭击了军事部。军事大臣和其他切尔克斯人逃离了大楼。士兵们将欧拉比和他的军官们从牢房中释放出来，带着他们回到阿比丁宫，在那里他们喧闹地示威，向赫迪威陶菲克效忠。士兵们一直待在阿比丁广场，直到那位不得人心的军事大臣奥斯曼·里夫奇被解职，由一个他们选择的人接替。赫迪威还下令修改军事条例，以满足士兵们在薪酬和服役期限方面的要求。

示威随后结束，部队返回军营。虽然重归平静，但这次事件已经改变了埃及政治。欧拉比逐渐成为一名广受欢迎的领袖，而军队迫使赫迪

威和他的政府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被解散的代议议会中的大地主和城市精英们极其关注军队的成功。他们认识到，若想让不情不愿的赫迪威接受他们的自由主义宪政改革，同军队合作，成功的机会更大。1881年2—9月，埃及军官、大地主、议会议员、记者和宗教学者组成了一个不同背景的联盟，自称“祖国党”。正如伊斯兰改革家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Shaykh Muhammad Abduh）向一位英国观察家解释的那样，这是“长达数月的遍及所有阶层的重大政治活动。［欧拉比的］行动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声望，让他得以同祖国党的文职党员建立联系……正是我们提出了重新要求制宪的想法”。[18]

这个联盟的成员都有各自的目标和不满。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埃及人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以“埃及为埃及人”为口号，相互支持，更好地促进彼此的事业。对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来说，宪法代表着对赫迪威及其政府的约束，保护他们免受随意的报复；宪法还强化了他们作为埃及人民利益捍卫者的角色，而不仅仅是狭隘的军人利益捍卫者。

在当时的欧洲观察者看来，这个不断壮大的改革联盟看上去像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欧拉比和改革者们完全认可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自治行省的地位。欧拉比经常向赫迪威和奥斯曼素丹宣誓效忠，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也曾授予他勋章。改革者们反对欧洲大臣和顾问控制埃及政治与经济，反对突厥-切尔克斯人统治军队和内阁。当示威者走上街头高喊“埃及为埃及人”时，这是呼吁摆脱欧洲人和切尔克斯人的干涉，而不是要求民族独立。

然而，欧洲人没有认识到这一区别，他们将埃及军队的行动解释为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认为这场运动将威胁到他们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英国和法国开始讨论应对欧拉比威胁的最佳方式。

赫迪威关注着反对运动的兴起，对此越来越担忧。欧洲列强已经削减了他的权力，将欧洲官员强行安排进他的政府，并控制了埃及一半的预算。现在，他自己的臣民试图通过颁布宪法和重开议会来进一步钳制

他。陶菲克被孤立了。他只能依靠突厥-切尔克斯精英的支持。1881年7月，陶菲克解散了改革派内阁，并任命他的妹夫达乌德·耶根帕夏（Dawud Pasha Yegen）为军事大臣，欧拉比称他是一个“无知、愚蠢、邪恶的人”。

作为回应，军官们在赫迪威宫殿外的阿比丁广场又组织起示威。1881年9月9日上午，欧拉比通知赫迪威：“我们将把所有在开罗的士兵带到阿比丁广场，在当天下午4点向赫迪威殿下提出我们的要求。”[19]陶菲克帕夏担心发生新一轮兵变，便同首相以及美国参谋长斯通帕夏（Stone Pasha）一起，尝试鼓动阿比丁军营与城堡中仍忠于他的驻军起来反抗欧拉比，但没有成功。欧拉比比赫迪威赢得了更多埃及军人的忠诚。

陶菲克被迫在阿比丁宫前接见欧拉比，身后只有侍从和外国领事。军官们向赫迪威提出了他们的要求：组建由立宪改革者谢里夫帕夏（Sharif Pasha）领导的新内阁，重新召开议会，将部队编制扩大到1.8万人。陶菲克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军方和他们的文官支持者们掌控了局面。

赫迪威屈服于改革派的压力，重新召开了议会。1882年1月，议员们提交了一份宪法草案，供赫迪威审议。宪法于2月颁布，改革派内阁成立，艾哈迈德·欧拉比任军事大臣。1863年以来一直没有获得晋升的欧拉比上校最终推翻了突厥-切尔克斯人的等级制度，掌控了埃及军队。

毫无疑问，埃及军官利用这个机会与马木鲁克人清算旧账。前军事大臣奥斯曼·里夫奇帕夏被指控密谋刺杀欧拉比，他手下50名军官都被判犯有阴谋罪，他们全都是突厥-切尔克斯人。许多被关押者受到酷刑，欧拉比对此是知情的。他后来透露说：“我从来没有去监狱看过他们遭受酷刑或虐待，我从来没有接近过他们。”[20]

陶菲克在开罗日益被孤立，这让巴黎和伦敦政府忧心忡忡。赫迪威对改革运动的每一次让步都削弱了他的权威和列强对埃及经济的影响。英国和法国担心赫迪威的让步会引发埃及的政治混乱。欧拉比进入政府

丝毫无助于缓解欧洲的担忧。欧拉比迫使新首相马哈穆德·萨米·巴鲁迪（Mahmud Sami al-Barudi）解除政府中欧洲官员的职务。对于保守的欧洲大国来说，这些变化太大、太快，难以接受。欧拉比运动看起来像一场革命，英国和法国于是采取行动来支持摇摇欲坠的赫迪威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加剧了陶菲克的孤立，并提高了欧拉比的地位。

1882年1月，英国和法国政府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被称为《甘必大照会》（Gambetta Note），以求恢复赫迪威的权威。对于这两个以外交技巧为傲的国家，人们可能会抱有更多的期待。英法两国希望，通过保证“共同努力”来应对对埃及秩序的一切内部和外部的威胁，这样可能会“避免赫迪威政府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那种肯定会使英法两国联合起来应对的危险”。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旨在保护陶菲克帕夏不受自己人民伤害的遮遮掩掩的恐吓，更能削弱这位赫迪威的地位了。

发布《甘必大照会》后，欧洲要求将欧拉比逐出内阁。不受欢迎的欧洲列强试图推翻欧拉比，这反而大大增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相比之下，陶菲克变得更加孤立。欧拉比指责陶菲克帕夏代表欧洲利益行事，背叛了自己的国家。首相和大多数内阁成员都辞职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组建新政府。欧拉比仍然在职，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在这位最受欢迎和最有权力的大臣的控制之下。在试图罢免欧拉比的过程中，欧洲列强无意中让他控制了埃及政府。

局势升级让英法两国求诸炮舰外交。1882年5月，英法两国派出一支联合海军中队前往埃及。这种武力展示让陶菲克帕夏的位置岌岌可危。5月31日，他离开开罗前往亚历山大的拉斯埃丁宫，这样可以离英法舰船的保护更近一些。至此，埃及实际上由两人统治：得到合法认可的国家元首赫迪威陶菲克，他被限制在亚历山大的宫殿里；人民领袖艾哈迈德·欧拉比，他是开罗代理政府的首脑。

欧洲军舰沿着埃及海岸巡航，1882年6月11日，埃及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成暴力冲突。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埃及马夫间的街头斗殴演变成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夺去了50多人的生命。此外，还有数百人受伤，数千人因房屋和工作场所被毁而穷困潦倒。欧洲媒体大肆渲染

亚历山大骚乱是对基督徒和欧洲人的屠杀，并向英国和法国政府施压，要求对埃及秩序的崩溃做出强硬回应。

欧拉比知道，反欧骚乱很可能会招致英国和法国的干涉。他甚至怀疑赫迪威陶菲克煽动暴乱以促成外国干预，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指控。欧拉比向亚历山大派了1.2万名士兵去恢复秩序，同时加强该城的防御，以应对欧洲可能的回应。欧拉比让埃及进入战备状态，并向支持他的大地主们求助，要求从农民中征募士兵来加强武装部队。欧拉比的政府还征收紧急税来获取抵御欧洲攻击的财政资源。

果不其然，英国舰队司令比彻姆·西摩爵士（Sir Beauchamp Seymour）发布了一系列措辞不断升级的最后通牒，威胁说，若亚历山大的海上防御不拆除，就轰炸该城。埃及军队毫不畏惧地着手加强亚历山大港的防御工事，扩建了沿海的堡垒，建造了火枪发射台，以应对欧洲舰船的威胁。欧洲人和埃及人都不愿让步，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这次军事威胁出现了一个不曾预见的状况：在英法付出几个月协调一致的努力后，法国舰队撤出了。法国政府受其宪法的约束，在与任何国家发生战争之前必须取得议会批准。法国在1870年惨败于德国，又花了很大代价在1871年征服阿尔及利亚、在1881年占领突尼斯，尚在恢复中。法国国库消耗过度，议会不愿卷入任何新的外国纠纷。7月5日，法国政府向英国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并从亚历山大撤走了舰船。

现在，英国面临一个重大决定：要么退让，要么继续。英国不想占领埃及。一个统治者声名狼藉、军队叛变造反的破产国家对任何帝国来说都不具吸引力。此外，英国在埃及的存在将打破白厅[(1)]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的欧洲势力均衡。更成问题的是退出的策略：英国军队一旦进入埃及，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撤出？考虑到英国的目标是确保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和让埃及偿还欠英国债权人的债务，军事行动的风险似乎大于收益。

然而，退让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如果向次发达国家的叛逆军官退让，那就不会自认为“大”了。西摩上将得到了政府的批准，7月11日，他向亚历山大的防御工事和城市开火。到日落时，亚历山大已陷入火海，埃及军队正在撤退。7月14日，一支

英军占领了亚历山大。这不仅仅开启了一场战争，也开启了英国对埃及长达近四分之三世纪的占领。

1882年6—9月，艾哈迈德·欧拉比既是起义政府的首脑，也是埃及抗击英国的总司令。欧拉比因勇敢抵抗外国入侵者而获得了城市与乡村的广泛支持。赫迪威在亚历山大的宫殿内闭门不出，许多王室的王子、侍从和妇女都支持欧拉比，为战备贡献金钱、粮食和马匹。[21]他继续得到土地精英、城市商人和宗教机构的全力支持。欧拉比的支持者们竭尽全力支持即将到来的战争，但专业部队的规模和信心不足以与英国抗衡，农民志愿军缺乏纪律和训练，无法在炮火下坚守自己的阵地。尽管欧拉比的手下人数激增，但胜利的机会依然渺茫。

英国人对欧拉比非正规军的顽强抵抗感到惊讶。加内特·沃尔斯利爵士（Sir Garnet Wolseley）率领一支2万人的作战部队在盛夏抵达亚历山大。他率军从亚历山大出发去攻占开罗，但却遭遇了欧拉比的埃及守军的抵抗，被拖延了5周之久，迫使英国放弃了这一计划。沃尔斯利回到亚历山大，将他的部下运送到苏伊士运河地区。1882年9月初，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力量占领了该地区。在运河地区，沃尔斯利得到了来自英属印度的增援，之后他准备向西朝开罗进军。在英军离开之前，欧拉比成功发动突袭，造成入侵者大量伤亡，并在敌军人数占优的情况下撤离。埃军撤到东部沙漠中的泰勒凯比尔——位于运河和三角洲正中间，保护开罗不受入侵。还没等埃及人建起合适的防御工事，沃尔斯利的军队就发动了进攻。9月13日黎明时分，英军行进到距埃及防线不到300码(274米)处，在日出时对守军发动了刺刀突袭。战斗在1小时内结束，精疲力竭的埃及军队最终败给了英国军队。入侵部队通往开罗的道路已经没有障碍。

艾哈迈德·欧拉比的起义政府同泰勒凯比尔的防御工事一起垮塌了。两天后，欧拉比在开罗被捕。他和他的同僚们以叛国罪受审，被判有罪。他们的死刑判罚被减为终身流放，流放地是英国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赫迪威陶菲克恢复了王位，但再没完全恢复统治权。由于英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英国的顾问被派往各级政府。埃及的真正统治

者是英国常驻代表伊夫林·巴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他后来获得了伯爵爵位，被封为克罗默伯爵（Lord Cromer）。

对欧拉比的评价褒贬不一。他的运动失败后，许多人批评他挑起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为本土埃及人的权利挺身而出时得到了广泛支持。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中有王室女性。欧拉比的律师A. M. 布罗德利（A. M. Broadley）记录了与一位公主的谈话，她充满热情地说，她们都“从一开始就偷偷支持欧拉比，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心只为埃及人谋福祉……在我们看来，欧拉比是一个拯救者，我们对他充满了热情”。[22] 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女纳兹莉公主（Princess Nazli）的视野更宽宏，她这样分析欧拉比的诉求：

> 欧拉比是第一位让欧洲人服从他的埃及大臣。在他的时代里，至少穆斯林是高昂着头的，而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不敢违反律令……现在，没有人能维持法纪了。警察只管埃及人，欧洲人随心所欲。[23]

欧拉比被流放了18年，直到1901年，陶菲克的继承人赫迪威阿巴斯二世（Khedive Abbas II，1892—1914年在位）准许他返回故土。埃及政府正式豁免了他，他向赫迪威宣誓效忠，放弃一切政治活动。新一代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希望他支持他们对英国占领的反抗，但欧拉比信守诺言，远离政治。他已经老了，只想在他心爱的埃及度过余生。他的眼睛牢牢地盯着过去，而不是未来。生命中的最后10年，他读了所有描述欧拉比起义的书籍和报纸，将自己从各项罪行指控中开脱出来。[24]他写了许多自传文章，广泛传送给埃及国内外的作家。

他在1911年离世，尽管他百般努力，但有两项指控在他死后几十年内依然玷污着他的名声：应对挑起英国占领埃及负责，背叛埃及合法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只有当新一代的年轻埃及上校们在1952年革命中，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之后，欧拉比才得以恢复名誉，并被迎入埃及民族英雄的“万神殿”。

*

英国的占领所引发的动荡超出了埃及的边界。看到他们的对手英国在埃及开启了长久的帝国统治，法国的不安变成了敌意。拿破仑时代以来，埃及一直是法国的一个重要附庸国。埃及人聘用法国的军事顾问，派最大的教育代表团去巴黎，并引进法国的工业技术；此外，苏伊士运河本身就由一家法国公司控制着。法国拒绝接受失去埃及的事实，想尽一切办法与“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算账。法国人复仇的方式是谋取非洲的战略领土，这一方面是为了重振他们的帝国荣耀，另一方面是为了对英国的海外利益施压。“争夺非洲”的行动随即展开，英国和法国当先，葡萄牙、德国和意大利紧随其后，在非洲的版图上染上各自帝国的颜色。

1882—1904年，英法之间的殖民竞争引发两国严重对抗。这场竞争最糟糕的时刻在1898年，当时两个帝国为了争夺苏丹境内一段孤立的尼罗河水域，几乎爆发战争。双方都不愿对抗升级从而导致公开冲突。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一块土地让与法国，以补偿英国对埃及的控制，这样才能恢复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势力均衡。鉴于法国已拥有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成为显而易见的选择。[25]

问题是法国并不是在摩洛哥有利益的唯一的欧洲大国。西班牙在地中海沿岸拥有殖民地，英国人享有重大的贸易利益，德国对于维护自身利益也愈发强硬。还有一个问题是，摩洛哥享有独立的国家地位已有数个世纪，既不对外扩张，也不招来入侵。1902年，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ile　Delcassé）阐述了他的战略：他有意“区分国际问题与法国-摩洛哥之间的问题，致力于依次同各国解决前一类问题来获得解决［摩洛哥问题］的充分自由”。[26]此后10年里，法国依次与各个欧洲大国谈判，为统治摩洛哥做准备。

在摩洛哥利益最少的是意大利，因此德尔卡塞首先与罗马谈判，并于1902年达成协议，承认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利益，以换取意大利支持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

同英国的谈判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英国希望维护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不愿任何海上力量挑战皇家海军对直布罗陀海峡的统治。但英国也真心诚意地希望解决与法国的殖民分歧。1904年4月，英法达成《挚诚

协定》（*Entente Cordiale*），成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新起点。根据协定条款，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不会要求“确定英国占领埃及的时限”。英国则承认法国作为“大片领土与摩洛哥接壤的大国”这一战略地位，并承诺不妨碍法国采取行动“维护摩洛哥的秩序，并为该国提供一切行政、经济、财政和军事改革所需的协助”。[27]

随后，法国迅速让西班牙同意其未来对摩洛哥的占领。法国将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划入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消除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忧虑。以此为基础，法国和西班牙于1904年10月达成协议。

法国人已基本上解决了“国际问题”，为殖民摩洛哥铺平了道路。现在，除了德国，其他欧洲大国都已首肯。德尔卡塞曾希望在摩洛哥问题上绕过德国，毕竟，德意志帝国从未扩张到地中海。此外，德尔卡塞知道德国会要求法国承认其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以换取德国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但这超出了法国为得到德国同意而愿意付出的代价。然而，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政府拒绝被绕过。德国正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一个帝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拥有领地，摩洛哥将成为德法之间的竞争点。

德国人开始公开宣称他们在摩洛哥的利益诉求，迫使法国坐到谈判桌前。1905年3月，德国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亲王（Prince Bernhard von Bülow）安排德皇威廉二世去丹吉尔拜会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拉赫曼。访问期间，德皇表示，尊重摩洛哥主权和德国在摩洛哥素丹治下领土上的利益。这给法国实现对摩洛哥的野心设置了第一个障碍。德国的这一外交手段迫使法国与其谈判，1906年1月，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召开，重新讨论“摩洛哥问题”。

这次有11个国家参加的会议表面上是为了帮助摩洛哥素丹，为他的政府制订一个改革计划。而实际上，法国希望利用这次会议赢得欧洲各国更广泛的支持，并向德国施压，使其放弃反对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尽管德国尽最大努力使与会者反对法国，但3个与会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已经同意法国对摩洛哥的领土要求，德国政府被迫让步。1909年，德国终于承认法国在维护摩洛哥安全上发挥着特殊作用。

法国在欧洲列强同意其殖民摩洛哥后，将注意力转移到法摩关系上。自1511年以来，摩洛哥的谢里夫们一直独立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国家统治，未曾中断过。然而，1860年起，欧洲列强越来越多地干涉这个古老的素丹国。在穆莱哈桑（Moulay Hasan，1873—1894年在位）统治时期，摩洛哥也经历了一系列国家主导的改革。改革的动机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即通过采用欧洲的技术和思想来阻止欧洲的渗透。改革的结果可想而知，即欧洲的渗透更进一步，国库因高昂的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而空虚。

继承改革派素丹穆莱哈桑的是14岁的穆莱阿卜杜·阿齐兹（Moulay Abd al-Aziz，1894—1908年在位），后者尚不成熟，缺乏经验，无力带领摩洛哥与欧洲列强的野心周旋，以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和独立。法国正在积极利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模糊的边界，以阻止部落袭击为借口，派兵进入摩洛哥领土。在侵蚀摩洛哥领土的同时，法国还让素丹的政府深陷公共借贷。1904年，法国通过谈判，促成了一笔巴黎多家银行提供的6250万法郎（合1250万美元）的贷款，进一步加深了法国对摩洛哥的经济渗透。

摩洛哥人对法国不断扩大在摩势力感到不满，他们开始攻击外国商店企业。而法国采取的报复行为是占领摩洛哥的城镇。最臭名昭著的是，1907年在一家法国工厂遭到暴力袭击后，法国从海上炮轰卡萨布兰卡，并用5000人的兵力占领了这座城市。随着法国进一步侵蚀摩洛哥，民众开始对他们的素丹失去信心。他的兄长穆莱阿卜杜·哈菲兹（Moulay Abd al-Hafiz）发动叛变，迫使素丹于1908年退位并寻求法国的保护。

叛变成功后，穆莱阿卜杜·哈菲兹（1907—1912年在位）继承王位。然而，与他的兄弟相比，阿卜杜·哈菲兹也未能更有效地阻止欧洲的入侵。这位素丹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友是德国，德国于1911年7月派一艘炮艇前往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为阻止法国在摩洛哥扩张做最后努力。阿加迪尔危机最终以摩洛哥付出代价而告终。法国同意将法属刚果内的领土割让给德国，作为回报，德皇(威廉二世)政府默许了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

1912年3月，法国完成了对摩洛哥的占领，穆莱阿卜杜·哈菲兹签署了《非斯条约》，摩洛哥成为法国的被保护国。尽管谢里夫们仍在王位上(事实上，现任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是他们的直系后裔)，但在接下来的44年里，对摩洛哥的正式控制权移交给了法兰西帝国。法国终于可以原谅英国占领埃及了。

*

利比亚是北非最后一块仍由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的领土，到法国将摩洛哥纳为被保护国时，意大利已经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争夺对利比亚的控制权。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这两个利比亚行省，尽管名义上从16世纪起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组成部分，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被帝国直接控制。奥斯曼中央政府对利比亚的统治只是点到为止。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这两个省会都是驻防城镇，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仅限于维持和平所需的少数官员和士兵。

然而，在法国占领突尼斯和英国占领埃及之后，奥斯曼帝国越来越重视利比亚行省的战略价值。1908年土耳其青年党革命后，新的一批民族主义者执掌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政府开始采取积极措施，限制意大利侵蚀利比亚，阻止意大利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购买土地或拥有工厂。奥斯曼人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他们在北非的最后一块地盘，在面对欧洲的帝国主义野心时失守。

几十年来，其他欧洲大国一直许诺把利比亚让与意大利，正如英国、德国和法国分别在1878年、1888年和1902年所做的那样。现在，这些欧洲国家希望意大利能找到一个和平的方式将利比亚纳入其领土。相反，意大利人选择用枪炮打开利比亚的大门。1911年9月29日，意大利以本国臣民在利比亚行省内遭虐待为借口，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在利比亚的奥斯曼人对入侵者展开了顽强抵抗，因此意大利人决定将战火引向奥斯曼帝国的腹地。1912年2月，意大利军舰炮轰贝鲁特，4月攻击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奥斯曼阵地，并在四五月间占领了罗德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其他岛屿，严重破坏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平衡。

其他欧洲大国迅速采取外交行动遏制战略平衡的破坏，担心意大利人可能在动荡的巴尔干地区引发战争（事实上，意大利人一直在给反抗

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煽风点火）。意大利非常希望通过欧洲的会议体系来解决利比亚问题。意大利军队受困于来自小规模土耳其驻军和利比亚本地民众的强烈抵抗，未能将控制范围从沿海扩展到内陆。

以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北非领土为代价，和平得以恢复。欧洲国家充当了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调停者，双方于1912年10月缔结正式和平条约，利比亚被纳入意大利的帝国统治。然而，即使在奥斯曼军队撤离后，意大利人仍面临着来自利比亚人的持续抵抗。利比亚人坚持反抗外国统治，反抗斗争在20世纪30年代依然持续。

*

到1912年底，从直布罗陀海峡到苏伊士运河，整个北非海岸都处于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其中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这两个国家被直接殖民统治。突尼斯、埃及和摩洛哥是被保护国，英法通过当地的世袭王朝间接统治。欧洲的规则取代了奥斯曼帝国的规则，这给北非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大量的帝国历史是从高层政治和国际外交的角度书写的。然而，对于北非人民来说，帝国主义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有一个人的经历可以揭示这些变化对他所处的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艾哈迈德·艾敏（Ahmad Amin，1886—1954）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在英国占领埃及4年后出生于开罗，在英国撤离2年后去世。他只了解殖民时期的埃及。在爱资哈尔接受教育和在职业生涯早期担任学校教师的过程中，他接触了许多他那个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他见到了一些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改革者，目睹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政党的出现。他见证了埃及的妇女从面纱和闺阁的隔离中走出来，进入公共生活。他在自传中对这些纷乱的变化进行了反思，这本自传写于他成功的大学教授和文人生涯的尾声。[28]

青年艾哈迈德成长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他同他的伊斯兰学者父亲间的代沟令人震惊。他的父亲经历了爱资哈尔的学术训练，达到了在伊玛目沙斐仪清真寺带领礼拜的要求，是一个生活在伊斯兰时代的人。艾哈迈德一代深受新思想和新事物的影响，譬如报纸，记者在其中发挥了塑造公众舆论的关键作用。

艾哈迈德·艾敏在青年时期担任学校老师时开始阅读报纸，他经常光顾一家为顾客提供报纸的咖啡馆。正如艾敏所说，每份报纸都有公开的政治倾向。艾敏通常选择一份保守的、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报纸，这符合他个人的价值观，尽管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的报纸也都很熟悉。

印刷机于19世纪20年代被引入埃及，是最早进口到中东的工业产品之一。穆罕默德·阿里最早派出的技术代表团中，有一个被派往意大利米兰学习印刷机的知识和技术。不久之后，埃及政府开始出版官方邸报，这是第一份用阿拉伯语出版的刊物。邸报的主要目标是“改进尊贵的省长们及其他负责管理［公共］事务和利益的杰出官员们的工作”。[29]1842—1850年，里法阿·塔赫塔维，也即那本著名的巴黎研究著作的作者，担任这份官方报纸的主编，该报的阿拉伯语名是《埃及时事》。

又过了几十年，私人企业家才开始创办报纸，尽管许多这样的报纸都受到政府的间接管控。因为印刷量太小，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报纸是无法生存的。最早的阿拉伯语报纸之一《新闻》（*al-Jawa'ib*）从1861年起由私人在伊斯坦布尔出版，但几个月后就陷入财政困境。素丹阿卜杜·阿齐兹接管了这份新生的报纸。出版方告知读者说：“法令已经颁布，从现在起，《新闻》的支出由［奥斯曼帝国］财政部承担并由帝国出版社印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宣誓效忠于我们的主人——伟大的素丹。”[30]尽管新闻自由受到限制，但《新闻》还是极具影响力，所覆盖的阿拉伯语读者群从摩洛哥一直到东非和印度洋地区。其他报纸很快也就陆续面世。

贝鲁特和开罗开始成为阿拉伯世界主要的新闻和出版中心，而且至今仍然如此。19世纪中叶的黎巴嫩正处于一场重大的文学复兴之中，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纳达”（*nahda*），即“复兴”。穆斯林和基督教知识分子，在（通常是传教士所有的）印刷机的力量的鼓舞下，积极投身字典和百科全书编撰，并出版各种版本的阿拉伯文学和思想的伟大经典之作。

“纳达”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是重新发现知识和重新定义文化的

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人开始与他们在奥斯曼帝国之前的辉煌过去建立联系。这场运动包容了所有讲阿拉伯语的民族，不分教派与地区，并播下了一颗思想的种子，这一思想将对阿拉伯政治产生巨大影响：阿拉伯人是一个由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决定的民族。在1860年黎巴嫩山和大马士革发生暴力冲突之后，这一积极的新观点对弥合教派间的深刻分歧尤为重要。对这类思想的传播，报纸发挥了关键作用。“纳达”的一位杰出领导者布特鲁斯·布斯塔尼（Butrus al-Bustani）在1859年宣称，报纸是“教育公众最重要的工具之一”。[31]到19世纪70年代末，贝鲁特因拥有至少25种报纸和时事期刊而自豪。

然而，此时奥斯曼政府开始对报刊施加新的控制，并在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期间（1876—1909）发展为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从叙利亚与黎巴嫩迁到埃及，在那里赫迪威对报刊施加的限制要少得多。这一迁徙标志着埃及和亚历山大私人报刊业的开始。19世纪最后25年，有160多种阿拉伯语报纸和期刊在埃及创办。[32]如今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报纸之一《金字塔报》，是由19世纪70年代初从贝鲁特迁到亚历山大的塞利姆·塔格拉和比沙拉·塔格拉兄弟创办的。与许多同时期刊登文化和科学主题文章的报纸不同，《金字塔报》从1876年8月5日的第一期起就是一份真正的新闻报纸。塔格拉兄弟利用亚历山大的电报局订阅了路透社的新闻电报服务。当用不上电报、仍需依靠邮寄的贝鲁特报刊滞后数月报道国外新闻时，《金字塔报》的国内外新闻报道已实现事件发生后几天甚至几小时的报道时效。

埃及报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赫迪威们试图加大国家对这个新兴媒体的控制力度。埃及政府关闭了那些被认为持“过分”政治立场的报纸。1876年，埃及破产，欧洲干涉埃及的政治事务，记者们活跃于支持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的改革派联盟。1881年，政府做出回应，实施一项严格的新闻法，开创了限制新闻自由的危险先例。

英国占领期间，新闻限制放宽了，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克罗默伯爵不再援引1881年的新闻法。他持续资助那些支持英国对埃及立场的报纸，如英语报纸《埃及公报》（*Egyptian Gazette*）和阿拉伯语报纸《穆格塔姆》（*Al-Muqattam*），但也没有对公开批评他政府的报纸采取任何行动。克罗默认识到，报纸只在很小的文化精英圈子中传播，新闻自

由是一个有效的压力阀，可以让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发泄怒气。

这就是艾哈迈德·艾敏在20世纪初所遇到的报刊出版的世界。这是一个阿拉伯的媒体，由欧洲的技术发展而来，以最大的跨度表达多种多样的观点，从虔诚主义到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

艾哈迈德·艾敏时代的报纸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把“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单位，一个基于特定领土、拥有自治愿望的社群，这个想法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产物。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经过19世纪，这个想法在中东扎下了根。19世纪初，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还都不赞成民族主义，因为它与巴尔干地区寻求脱离奥斯曼帝国（通常在欧洲支持下）的基督教社群联系在一起。埃及和北非的士兵响应素丹的号召，参加了从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反对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的战争。

然而，随着北非从奥斯曼世界的版图中被抹去和欧洲殖民统治的到来，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国统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确实，帝国主义为北非民族主义的兴起贡献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边界，界定了需要被解放的国家领土；二是共同的敌人，以他们为斗争对象来团结民众开展共同的解放斗争。

仅仅抵抗外国占领而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构成民族主义。无论是阿卜杜·卡迪尔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还是欧拉比在埃及的反抗，都不能被视为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背后支撑，一旦军队被击败，领袖被流放，就不会有任何政治运动来继续推动从外国统治下获得独立。

直到欧洲人占领北非，民族的自我定义进程才真正开始。成为埃及人、利比亚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或摩洛哥人意味着什么？对大部分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些民族标签并不对应任何有意义的身份。如果被问到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来自哪里，人们或者会用本地的身份来自称，如某个城镇（亚历山大人）或某个部落，至多是某个地区（卡比利亚山区），或者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大的社群比如穆斯林“乌玛”即“社

团”的一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内，只有埃及经历了严重的民族主义躁动。为解决穆斯林被欧洲基督徒统治这一矛盾，改革派穆斯林宗教人士开始策划伊斯兰对帝国主义的回应。与此同时，另一批受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影响的改革者也制定了世俗民族主义的纲领。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和世俗民族主义者都对阿拉伯思想产生了影响，并激起了后来勃兴于伊斯兰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

有两个人决定了19世纪末关于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辩论的走向：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al-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 1839—1897）和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Shaykh Muhammad Abduh, 1849—1905）。两人合作提出了一项伊斯兰改革方案，该方案直到20世纪还影响着伊斯兰世界和民族主义发展的走向。

阿富汗尼是一位不知停歇的思想家，他周游伊斯兰世界和欧洲，激励着他所到之处的追随者并警醒当地统治者。1871—1879年，他在埃及度过了8年，在影响深远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讲学。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学者，但本性上他是政治鼓动者。他在印度、阿富汗和伊斯兰布尔游历时，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威胁之大和伊斯兰国家首脑应对这一威胁之无能让他刻骨铭心。阿富汗尼的政治哲学，其核心关切并不是埃及、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者所关注的如何使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变得强大和成功。相反，他认为，如果现代穆斯林遵照他们的宗教原则生活，他们的国家将恢复以前的实力，并成功应对来自欧洲的外部威胁。[33]

尽管阿富汗尼确信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是完全兼容的，但他依然认为穆斯林需要革新他们的宗教以面对当今的问题。同所有虔诚的穆斯林一样，他相信《古兰经》的教义是永恒的，在任何时代都同样有效。过时的是对《古兰经》的解释，这是一门在11世纪被伊斯兰学者蓄意冻结的学科，目的是防止异见和分裂。19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修习神学所用的书籍同12世纪的学者一样。显然，需要对《古兰经》进行新的解释，让伊斯兰教的规定与时俱进，以应对19世纪的挑战——这些挑战是中世纪

的神学家未曾预见过的。阿富汗尼希望基于革新后的伊斯兰原则制定宪法，用宪法约束穆斯林统治者，明确限制他们的权力，推动全球穆斯林社团以泛伊斯兰的形式团结行动。这些激进的新思想在爱资哈尔感染了才华横溢的一代年轻学者，其中包括民族主义者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Ahmad Lutfi al-Sayyid ）和萨阿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以及伟大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

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村庄的阿布笃，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是伊斯兰学者，做过记者和法官，最终以埃及大穆夫提的身份结束职业生涯，这是埃及最高级别的宗教官员。他为著名的《金字塔报》撰稿，同塔赫塔维一样，也做过埃及政府邸报的编辑。1882年，他是艾哈迈德·欧拉比的支持者之一，为此费尽心力，并因此被英国人流放到贝鲁特。

流亡期间，阿布笃前往西欧，在巴黎与阿富汗尼会面，与他一起创办了一份改革派期刊，呼吁以伊斯兰的方式回应西方帝国主义。基于阿富汗尼提出的原则，阿布笃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返回埃及后发布了一份更为严格的行动纲领。

阿布笃呼唤一个更进步的伊斯兰教，但与之矛盾的是，他认为这样一个伊斯兰教应以最早的穆斯林社团，也即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们为榜样。这个社团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萨拉菲”（*salaf*），意为“先辈”。阿布笃因此成为后来被称为萨拉菲主义的新改革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如今，萨拉菲主义这个词与乌萨马·本·拉登和反西方的穆斯林激进主义中最激进的派别联系在一起。而在阿布笃的时代，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唤起伊斯兰教的先辈，阿布笃回溯历史去倾听那个黄金时代。那时，穆斯林“正确地”信奉他们的宗教，并因此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穆斯林统治整个地中海并深入南亚长达四个世纪。此后，他认为，伊斯兰思想僵化了。神秘主义悄然渗入，理性主义逐渐衰落，整个伊斯兰社团都陷入对法律的盲目尊崇之中。只有剥除这些附着在伊斯兰教之上的积淀，乌玛才能回归先辈们纯粹而理性的行为方式，才能恢复曾使伊斯兰世界主导世界文明的活力。

艾哈迈德·艾敏在爱资哈尔求学期间，必须得克服羞怯才能去上伟大

的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课。他对阿布笃教学的回忆生动展现了这位伊斯兰改革者施于他的学生们的影响。“我上了两堂课，听到了他那美妙的声音，看到了他那令人尊敬的样貌，从他那里认识到了我从我的爱资哈尔谢赫们那里所认识不到的东西。”穆罕默德·阿布笃经常在他的教学中提及他的改革主张。艾敏回忆道：“他时不时地岔开话题去讨论穆斯林的状况、他们不诚实的行径以及纠正之方。”[34]

随着埃及进入民族主义时代，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笃将伊斯兰教作为民族身份的组成部分。阿布笃和他的追随者们关心穆斯林社会的状况，他们开始围绕民族斗争和社会改革展开讨论。

在关于“穆斯林的状况”的讨论中，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追随者开始主张改变穆斯林社会中妇女的地位。自拿破仑入侵时第一次与欧洲人接触以来，埃及知识分子面对着一种截然不同的两性关系模式，但他们并不赞同。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对法国男性施于埃及妇女的影响感到震惊。他满心不赞成地记录道：“法国的地方行政人员同穿着如法国妇女的穆斯林妻子走上街头，对地方事务和现行法规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女人们给指示、下禁令。”[35]这对于哲拜尔提的认知中男人给指示、下禁令的世界来说，简直是自然秩序的颠倒。

30年后，塔赫塔维在巴黎观察两性关系时，也抱怨这种“自然秩序”的颠倒。他写道：“这里的男人是女人的奴隶，无论女人漂亮与否，男人都听从女人的指挥。”[36]哲拜尔提和塔赫塔维来自这样一个社会，那里体面的女性都被限制在家中单独的区域，在层层衣服和面纱的遮掩下轻快地穿过公共场所，不留下任何身份的印记。在艾哈迈德·艾敏的童年时期，开罗的情形仍然如此。艾敏形容他的母亲和姐妹们“蒙着面纱，从来只隔着面纱看别人和被别人看”。[37]

19世纪90年代，埃及改革者开始主张改变妇女的角色，其中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律师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1863—1908），他认为为民族独立斗争做准备须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开始。

卡西姆·艾敏（与艾哈迈德·艾敏并无亲属关系）生于特权阶层家庭。

他的父亲是土耳其人，在迁居埃及前，曾任奥斯曼帝国总督，并获得帕夏头衔。卡西姆上了埃及最好的私立学校，又继续在开罗和蒙彼利埃学习法律。1885年，他回到埃及，很快就进入了以穆罕默德·阿布笃为中心的改革派圈子。

当卡西姆·艾敏的同伴们就伊斯兰教和英国占领对埃及民族复兴的作用展开辩论时，他把关注重心放到了妇女地位上。1899年，他写下了他的开创性著作《解放妇女》。在这本穆斯林改革者写给穆斯林读者的书中，卡西姆·艾敏将自己的论点同谋求从帝国主义中得到解放的世俗民族主义纲领联系在一起。

埃及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工作了。1900年，埃及只有1%的女性有读写能力。[38]卡西姆·艾敏认为，未能赋予妇女权利削弱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如今，《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的作者依然秉持这一观点。用卡西姆·艾敏的话说："妇女至少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延续一个国家妇女的无知状态让该国一半人口无法为国效力，后果显然是负面的。"[39]他用古典阿拉伯语尖刻地批评道：

> 我们的妇女世世代代一直屈从于强权统治，受制于强大的男性专制。另一方面，男人们只愿意接受：妇女只适合为男人服务并遵循男人的意愿。男人们当着妇女的面把她们关在机会的大门外，阻止她们自力更生。这样一来，妇女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妻子或妓女。[40]

卡西姆·艾敏将欧美妇女权利的进步和妇女对西方文明的贡献同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相对不发达进行了对比。他认为："穆斯林妇女的弱势地位是阻碍我们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前进的最大障碍。"[41]然后，他把妇女地位与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为了改善国家的状况，我们必须改善妇女的状况。"[42]

《解放妇女》在改革者、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谴责艾敏的书颠覆了社会结构，而宗教学者则指责他破坏了真主的秩序。次年，卡西姆·艾敏出版了续篇《新女性》回应对他的批评。在续篇中，他没再使用宗教论调，而是从进化论、自然权利和进步的角度来支持妇女权利。

卡西姆·艾敏的作品并没有达到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的期望。这是男人之间的争论，争论的是该给女性哪些好处。艾敏呼吁改善埃及社会中妇女的教育状况和总体地位，但他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要求男女完全平等。然而，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区而言，他对妇女权益的推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作品所激起的争论引发了变革。他的动议将在此后20年内被埃及精英妇女接受，她们加入民族主义运动并开始要求她们自己的权利。

19世纪末，在关于民族认同、伊斯兰改革和如性别平等等社会问题的大辩论的影响下，一种独特的埃及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决定早期埃及民族主义走向的两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和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fa Kamil）。

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1872—1963）是一位乡村名流之子，他上了一所现代中学，并于1889年进入法学院。尽管他被公认是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弟子，但他并没有优先将宗教作为民族复兴的基础。他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将埃及视作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之一。他与那些将阿拉伯人、奥斯曼人或泛伊斯兰的理想作为首要拥护对象的人不同。他是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圈子所创建的人民党的创始成员，他也在他编辑的《报纸》（*al-Jarida*）上写文章，依托前一种身份，通过后一个平台，他宣扬一种理想，即拥有自然自治权的埃及民族。

卢特菲·赛义德反对英国人和赫迪威的两种专制统治，认为他们剥夺了埃及人民建立合法政府的机会。但他也承认英国统治带来的健全管理和财政规范是有益的。他还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谋求从英国独立出来是不现实的，因为英国在埃及有既得利益，也有充足的军力来维护这些利益。相反，卢特菲·赛义德认为，埃及人民应该利用英国来改变埃及政府，迫使赫迪威接受宪法，并建立本国人的统治机构——立法委员会和省议会。

艾哈迈德·艾敏是卢特菲·赛义德《报纸》编辑部的常客，埃及民族主义者会聚在那里讨论当时的热点话题。艾哈迈德·艾敏在那里接受了社会

和政治教育，“感谢我们的卢特菲［·赛义德］教授和其他人的讲座，感谢让我有机会接触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43]

卢特菲·赛义德代表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温和派，愿意与帝国主义合作，使埃及达到能够实现独立的标准。埃及民族主义还有一个更激进的派别，代表人物是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同卢特菲·赛义德一样，他也接受了现代法学教育，是在埃及和法国完成的。他是祖国党的创始成员。在法国期间，卡米勒与一些法国民族主义思想家保持联系，他们对英帝国主义的敌视丝毫不亚于这个埃及青年。卡米勒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回到他的祖国，鼓动终结英国的占领。1900年，他创办了《旗帜报》（*al-Liwa'*），为新生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声音。

卡米勒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也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年轻人。他在学生间和街头上动员，为民族主义运动争取到了广泛支持。有一段时间，他还得到了赫迪威阿巴斯·希勒米二世（Abbas II Hilmi，1892—1914年在位）的秘密支持，赫迪威希望利用民族主义运动对英国施加压力。然而，年轻的宗教学者艾哈迈德·艾敏起初并没有被卡米勒的激进民族主义所打动，他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化、不理性。[44]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初埃及民族主义者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英国人几乎没做什么能激起埃及人民反抗的事情。尽管埃及人民对外国统治这个理念感到不满，但英国人带来了规范治理、社会稳定和低税收。很少有埃及人接触过英国占领者，后者是一群冷漠而独立的人，不习惯与埃及的普通民众交往。因此，尽管埃及人不喜欢被英国统治，但英国也没有做出什么举动来激起他们谋求脱离已经安然接受的殖民统治。

直到发生丁沙威事件（Dinshaway Incident）。

1906年，一支英国狩猎队进入尼罗河三角洲丁沙威村打鸽子。愤怒的村民包围了英国人，阻止他们射杀他们养来作食物的鸽子。在随后的争执中，一名英国军官受伤并在寻求救援时死亡。当时克罗默伯爵不在埃及，他的临时代理们做出了过度反应。英国士兵逮捕了村里52名男子

并召集了一个特别法庭，埃及公众通过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丁沙威事件后，艾哈迈德·艾敏的政治倾向和阅读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准确地记得那一天是1906年6月27日，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亚历山大的一个屋顶露台上用晚餐。“报纸送来了，我们读到丁沙威有4人被判处死刑，2人被判终身劳役，1人被判15年监禁，6人被判7年监禁，5人被判鞭笞50下。我们［悲痛不已］，宴会变成了葬礼，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哭了。”[45]艾敏称，此后他在当地的咖啡店里只读穆斯塔法·卡米勒的激进民族主义报纸。

像艾敏这样转投民族主义的情况，埃及各地比比皆是。报纸把悲剧传递给城里人，民间诗人创作的控诉丁沙威悲剧和英国统治不公的歌谣，在乡间传唱。

埃及最终恢复了平静，但丁沙威没有被遗忘，英国人也没有被原谅。1906年，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已经夯实。然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发现，他们面对的大英帝国正寻求继续扩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范围，并不打算撤退。事实上，埃及和中东其他地区的英国时间才刚刚开始。

(1) 白厅是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在这条街及其附近设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等一些英国政府机关。因此，人们常用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编者注

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开始在奥斯曼帝国诸阿拉伯行省兴起。奥斯曼人治下近四个世纪之后，帝国内的阿拉伯民众起初甚至难以想象自身可以组建一个独立的国家。究竟何为一个阿拉伯国家？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为一些彼此冲突的概念而争论不休：一些人构想一个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王国；另一些人则渴望在阿拉伯世界不同地区，如大叙利亚或伊拉克建立自己的国家。作为时代的先行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还面临着奥斯曼当局为警示效尤者而采取的压制措施。那些决意追求政治理想的人也因而被迫流亡海外：一些人寓居巴黎，其思想受到欧洲民族主义者的滋养；其他人则流亡开罗，在那里受到伊斯兰改革者以及鼓动反英活动的世俗民族主义者的影响。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阿拉伯人对奥斯曼统治的幻灭感开始更加普遍。青年土耳其党人是一群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迫使奥斯曼素丹恢复1876年宪法并重新召开议会而煽动革命。青年土耳其党人采取的措施起初受到了帝国内阿拉伯臣民的广泛支持，他们相信青年土耳其党人将推动奥斯曼统治的自由化。然而，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伊斯坦布尔新政府决心通过更加严格地执行奥斯曼统治来强化对诸阿拉伯行省的控制。

青年土耳其党人引入了一系列他们自视为中央集权化、但被许多阿拉伯人视为压制性的措施。特别是，他们在阿拉伯行省的学校和公共行政部门推广使用土耳其语作为帝国的官方语言，而非阿拉伯语。这一措施疏远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家，对后者而言，阿拉伯语构成了其民族认同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强加的这些政策本来旨在强化阿拉伯人对帝国的忠诚，然而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至20世纪10年代，阿拉伯知识分子和军官团体开始组建秘密的民族主义社团，寻求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统治而实现独立。一些民族主义者开始通过欧洲各国的地方领事馆与欧洲列强建立通信联系，希望确保实现其目标所需的外部支持。

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面临着几乎无法跨越的困难。奥斯曼国家无处不在，对非法政治活动采取了无情的镇压。那些寻求阿拉伯地区独立的人缺乏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过去，诸如穆罕默德·阿里这样的阿拉伯行省地方强人尚能起兵击败奥斯曼军队，但这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如果说19世纪奥斯曼帝国改革取得了些许成就，那就是强化了中央政府，使得阿拉伯行省更加顺从于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要想动摇奥斯曼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掌控显然需要某种巨变。

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提供这样一场巨变。

*

1914年11月，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奥斯曼人本希望避免的战争。在经历了1911年与意大利人争夺利比亚、爱琴海岛屿的战争，以及1912年、1913年与巴尔干诸国间两场毁灭性的战争后，奥斯曼帝国已然疲于应对战事。1914年夏，当又一场欧洲大战阴云笼罩之际，奥斯曼政府希望能够置身事外，与英国或法国达成一项防御性的盟约。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愿许下任何威胁到其协约国盟友俄国利益的有约束力的承诺，而后者的领土野心则是奥斯曼帝国的心头大患。

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是德国的狂热崇拜者。他相信德国作为唯一对中东地区不怀领土野心的欧洲国家，是值得信赖的。俄、法、英三国过去就曾以奥斯曼人的利益为代价扩张其帝国，如今可能还会试图这样做。恩维尔深为德国的军事技术所折服，因而强烈鼓吹只有德国有能力为奥斯曼人提供保护，以抵抗欧洲对奥斯曼领土进一步的侵蚀。恩维尔本人领导了与德国政府间的秘密谈判，并于1914年8月2日，即欧战爆发后不久与德国缔结了一项联盟条约。该条约许诺德国向奥斯曼帝国提供军事顾问、战争物资以及财政援助，作为回报，奥斯曼政府将站在同盟国一方正式宣战。

德国人希望利用奥斯曼素丹作为哈里发（即全球穆斯林社群的领袖）名义上的影响力，来煽动反对英、法的“圣战”。考虑到英、法在南亚和北非殖民地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德国的战争策划者坚信这样一场“圣战”运动将对敌方的战备工作产生毁灭性的影响。1914年11月11日

奥斯曼政府最终向协约国宣战之时，素丹即号召全球的穆斯林加入针对英、俄、法三国的“圣战”。对于关注日常生活诉求远多于欧洲战场局势的全球穆斯林信众而言，素丹的“圣战”呼吁收效甚微，然而这一口号引发了巴黎和伦敦的深切关注。战争爆发一段时间后，英国和法国战略家开始积极寻求高层穆斯林官员对其战备工作的支持，以便制衡素丹-哈里发“圣战”口号的威胁。

再次卷入战争后，奥斯曼当局开始严厉打压任何疑似怀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人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尤其受到压制。青年土耳其党政府3位首脑之一的哲马勒帕夏（Cemal　Pasha）亲自接管了大叙利亚地区，领导了对当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依据从法国领事馆没收的涉及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一些最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文件，哲马勒指控数十名叙利亚、黎巴嫩人犯有叛国罪。1915年，他在黎巴嫩山建立军事法庭，该法庭当年即判处数十人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执行绞刑，数百人长期监禁，数千人流放。这些残酷的惩罚措施为哲马勒帕夏赢得了“赛法哈”即屠夫的绰号，也说服了更多的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帝国而寻求独立。

然而，战争年月的苦难影响到了阿拉伯行省的每个人，而绝非仅限于那些卷入非法政治活动的异议人士。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奥斯曼军队征召入伍，几年里很多人负伤、死于疾病或在战场上被杀。农民们失去了他们的粮食和牲畜，作为对此的补偿，政府征购军官则向他们支付新印制的毫无价值的纸币。雨水的匮乏和蝗灾更令农民们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了一场严重的饥荒。其间，黎巴嫩山和叙利亚沿海地区近50万人死于非命。

但令欧洲列强意想不到的是，奥斯曼人表现为一个顽强的盟友：战争之初，奥斯曼军队向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阵地发动过攻势；1915年，他们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击败了法国、英国和英联邦的部队；1916年，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成功俘获了印度远征军；1916—1918年，他们在希贾兹铁路沿线遏制住了一场阿拉伯起义；直至1918年秋，他们都能迫使英国人为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而奋战。

在那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战备工作彻底崩溃。英国部队完成了对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的征服，而对叙利亚的征服是在其阿拉伯大起义盟友的支持下完成的。奥斯曼人撤退至安纳托利亚地区，自此未再踏入阿拉伯人的土地。1918年10月，最后一支土耳其部队从阿勒颇以北的边境地区撤出，这一地点正接近于402年前“冷酷者”塞利姆一世开始其对阿拉伯世界征服的起点。奥斯曼人对阿拉伯领土长达4个世纪的统治戛然而止。

当战败的奥斯曼人撤出其阿拉伯行省之际，很少有人哀叹他们的离去。随着奥斯曼统治的结束，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进入了一个政治活动密集期。他们将奥斯曼的统治视为4个世纪的压迫与停滞，对阿拉伯世界重新崛起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景而兴奋不已。同时，他们又意识到欧洲殖民主义所构成的威胁。在通过报纸了解到法国统治下的北非以及英国统治下的埃及的困苦境遇后，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外国控制。在1918年10月至1920年7月这一短暂而令人兴奋的时期内，阿拉伯世界的独立似乎已近在咫尺，而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正是获胜的协约国成员的领土野心。

*

奥斯曼人刚一决定站在德国一边卷入世界大战，协约国就开始筹划战后帝国领土的分割。1915年3月，俄国人首先提出要求，通知其协约国盟友，他们计划战后吞并伊斯坦布尔以及连接俄国黑海沿岸与地中海的海峡地区。法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同时制订了本国吞并西里西亚（土耳其东南海岸，包括亚历山大勒塔、阿达纳等城市）和大叙利亚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代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约旦）的计划，后者包括位于巴勒斯坦的圣地。

考虑到盟友的要求，英国被迫权衡本国在奥斯曼领土内的战略利益。1915年4月8日，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召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可能的情形。这个跨部门的委员会以其主席莫里斯·德·本森爵士（Sir Maurice de Bunsen）的名字命名，旨在“通过调整土耳其亚洲部分的现状以及相应增加帝国投入，来确保英帝国在未来的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1915年6月底，德·本森委员会递交了其研究结

果。根据这份报告，在奥斯曼帝国最终解体的情况下，英国应寻求保持波斯湾从科威特到停战诸国（即现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区域作为帝国排他性势力范围的地位；此外，英国应寻求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包括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并以铁路线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地中海港口海法之间建立起一座路桥，以确保帝国通信。[1]令人震惊的是，最终的战后解决方案与德·本森委员会的建议高度吻合——尤其是考虑到英国与其战时盟友随后达成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许诺。

1915—1917年，英国人就战后奥斯曼阿拉伯领土的分割问题共达成了三项相互独立的协议：与麦加谢里夫的协议许诺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一份欧洲条约旨在在英、法之间分割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协议则许诺后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战后英国外交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即调和上述在很多方面相互矛盾的承诺。

第一项许诺涉及范围最广。德·本森报告发布后不久，英国战争大臣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责成驻开罗的英国官员，与麦加的谢里夫——奥斯曼政府任命的伊斯兰圣城中的最高宗教权威商谈结盟事宜。当时尚值战争初期，英国人担心奥斯曼素丹的“圣战”呼声真的会产生德国人所希望的影响，即一场可能导致英国殖民地瘫痪的伊斯兰世界大起义。英国人希望通过一项由阿拉伯世界最高宗教官员发起的“圣战”宣言反制奥斯曼人，本质上即挑动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对抗奥斯曼人。这样一场阿拉伯起义将开辟一条打击德国东部盟友的内部战线。

1915年夏，英国和英联邦部队受到奥斯曼、德国联军在加里波利顽强抵抗的钳制而亟须援助。同年7月，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Sharif Husayn ibn ‘Ali）开始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取得联系，并一直持续至1916年3月。在长达8个月的通信中，麦克马洪许诺英国将承认一个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哈希姆家族统治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作为交换，哈希姆人将领导阿拉伯人起义反抗奥斯曼统治。英国许诺向阿拉伯起义提供资金、枪支和粮食的支持。

侯赛因和麦克马洪的大多数谈判都聚焦于假定中的阿拉伯王国的边

界问题。谢里夫侯赛因在领土方面要求十分明确：全部叙利亚，即从位于西奈的埃及边境直至土耳其境内的西里西亚和陶鲁斯山脉；全部美索不达米亚，直至波斯边境地区；以及除英国在亚丁殖民地外的全部阿拉伯半岛。

在1915年10月24日的著名信件中，麦克马洪爵士确认了谢里夫侯赛因提出的边界要求，除去两点例外：第一，他排除了西里西亚以及“位于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地区以西的叙利亚领土”，因为法国对上述领土提出利益要求；第二，他坚持英国对巴格达、巴士拉两省的要求，一个英国-阿拉伯联合行政机构将负责该地区的管理。麦克马洪向侯赛因保证说：“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英国已做好承认麦加谢里夫要求范围内所有地区阿拉伯人独立的准备。”侯赛因则勉强接受了上述修订，但警告说：“战争结束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将向你要求……现在我们在贝鲁特及其沿岸留给法国的地区。”[2]

基于与英国达成的这些共识，谢里夫侯赛因于1916年6月5日正式号召发动反对奥斯曼人统治的阿拉伯起义。阿拉伯大起义始于对希贾兹地区奥斯曼政府机构的攻击。6月12日，麦加被哈希姆军队控制。4天后，红海港口城市吉达宣布投降。位于麦地那的较大的奥斯曼军营最初抵抗住了阿拉伯叛军的攻击，并通过希贾兹铁路重新完成补给。为迫使麦地那投降进而完全控制希贾兹地区，哈希姆人决心切断这条通向大马士革的关键通信线路。他们北上破坏了叙利亚荒漠中较易受攻击地区长达1300千米（810英里）的铁路。正是在这次行动中，T.E.劳伦斯（T. E. Lawrence）声名鹊起，他在涵洞和栈桥布置炸药来破坏驶往麦地那的火车。

1917年7月，阿拉伯军队在谢里夫侯赛因之子埃米尔费萨尔（Amir Faysal）的领导下占领位于亚喀巴港（在今约旦）的奥斯曼堡垒。费萨尔在亚喀巴建立指挥部，以此为中心遥控其部队对马安、塔菲拉等地奥斯曼要塞的骚扰，同时继续对希贾兹铁路发动持续攻击。然而，阿拉伯军队始终未能打破奥斯曼人的防御进而占领马安镇。此外，他们还遭遇到与奥斯曼人结盟的阿拉伯部落和城镇居民的抵抗。

在附近的卡拉克镇，部落民众和城镇居民组建了一支约500人的民

兵组织，于1917年7月17日开始“狂热地开枪射击以对抗费萨尔和他的部队”。卡拉克的志愿军与哈希姆人领导的部队奋战3小时，在杀害9名阿拉伯军队成员、俘获两匹战马后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小插曲也揭示了阿拉伯大起义在奥斯曼人和哈希姆人的支持者之间所引发的对本地忠诚的分裂。1917年8月，英国和法国情报部门一致承认外约旦诸部落仍牢牢忠实于奥斯曼阵营。[3]可见，谢里夫侯赛因的反向“圣战”并未赢得阿拉伯人整体的支持。

然而，哈希姆人在马安却遭遇了奥斯曼人的顽强抵抗。面对着在一块不时怀有敌意的土地上作战的风险，哈希姆人于1918年8月迅速向北行进至绿洲城镇艾兹赖格。阿拉伯军队以这个新基地为起点，扩充至约8000人，并开始与位于巴勒斯坦的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的军队合作，向大马士革发动钳形攻势。随着1918年10月2日大马士革的陷落，阿拉伯大起义取得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谢里夫侯赛因也期待着英国兑现其承诺。

英国为处置奥斯曼领土而缔结的第二项战时协议也是最复杂的一项。尽管三个战时盟友尚未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但英国已意识到法国和俄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野心。因此，在麦克马洪仍在与谢里夫侯赛因谈判的同时，英、法两国政府即派遣代表就战后奥斯曼领土分割的事宜达成了一项正式协议。法国方面的代表是前驻贝鲁特总领事查尔斯·弗朗索瓦·乔治-皮科（Charles François Georges-Picot），英国方面代表是基钦纳勋爵中东事务顾问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双方于1916年初达成协议，后俄国同意在此协议签字，条件是其领土要求得到英、法的认可。

最终的协定，即后来众所周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于1916年10月正式签署。这一协定以红、蓝两色阴影重画了中东地区的地图：红色区域代表巴格达和巴士拉，在该地区英国有权“按照其意愿建立直接或间接的管理或控制”；蓝色部分包括西里西亚和叙利亚沿海地区，在该地区法国享有同样的特权；以棕色阴影标注的巴勒斯坦是一个例外，作为一个“国际共管”的区域处理，其最终地位仍有待确认。此外，英国还宣

称对从伊拉克中部的基尔库克横跨阿拉比亚北部直至加沙的区域享有非正式控制权，法国的非正式控制区则覆盖从摩苏尔到阿勒颇再到大马士革的广阔三角区域。[4]该协议还确认了俄国对安纳托利亚东部所要求领土的边界。

《赛克斯-皮科协定》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还要多。英国稍后即后悔给予法国对摩苏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托管权，且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国际化的设想也有所改变。此外，《赛克斯-皮科协定》完全没有尊重侯赛因-麦克马洪沟通的精神抑或文本。用一位巴勒斯坦观察家的话来说，这一协定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两面三刀行为”。[5]

在英国政府所有的战时承诺中，第三项承诺经证明是最持久的。在欧洲和俄国数个世纪的反犹主义运动后，一群欧洲犹太思想家就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梦想达成共识。1882年起，一波又一波的犹太移民为逃避俄国反犹主义的迫害而移民，其中很小的一个少数群体定居巴勒斯坦，总共两三万人。1882—1903年，第一波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定居在巴勒斯坦城市地区，仅有约3000人定居在沿海平原和北部卡梅尔山地区的一系列农业殖民地中，这一群体受到摩西·蒙蒂菲奥里、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等欧洲犹太慈善家的支持。

1896年，这一运动因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里程碑式的著作《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一书的出版而加速发展。赫茨尔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记者，他大力倡导一种新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传播，即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1897年夏，赫茨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期间正式建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确定宗旨，即“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创建一个公法治理下的家园”。[6]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需要为其计划争取国际支持。随着一战的爆发，该组织总部由柏林迁至伦敦。该组织的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是一位化学教授，其研究成果对战备的贡献（他的一项发现可直接应用于炮兵弹壳的制造）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英国政府最高层。魏茨曼正是利用其个人关系寻求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式支持。[7]两年多后，经过对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

的积极游说，魏茨曼终于取得了他所寻求的担保。在一封日期显示为1917年11月2日的信件中，贝尔福向魏茨曼报告说：

> 英王陛下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并将尽全力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便利。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民族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或犹太人在其他任何国家已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8]

这样一项笼统的声明显然已深入考虑到英国的利益：贝尔福曾对战争内阁表示，通过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诉求的支持，“我们将有能力在俄国和美国发动极为有效的宣传攻势”，在这两个国家“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此外，《贝尔福宣言》发布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投桃报李，开始为将巴勒斯坦置于英国统治之下而开展游说，从而解决了英国对于《赛克斯-皮科协议》的一大疑虑，因为原协议将巴勒斯坦置于界定不明的国际共管之下。

真相大白的时刻终于在1917年12月到来，这一刻英国被迫面对其相互冲突的许诺。《贝尔福宣言》是一则公开声明，在英国政府中可公开讨论；《赛克斯-皮科协定》则不同，乃是由协约国三方秘密签订的。1917年10月俄国革命后，为揭示沙皇政府秘密外交的罪行，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公开俄外交部的机密文件，其中便包括构成《赛克斯-皮科协定》的通信记录。关于肢解奥斯曼帝国秘密协定的消息首先传到伊斯坦布尔，随后才传至阿拉伯世界。奥斯曼人和德国人一致将之视为一个离间哈希姆家族与英国人之间关系的良机。

在巴勒斯坦正遭受英军围困的奥斯曼人，迅速抓住英国人背信弃义的契机向哈希姆家族做出和解的姿态。1917年12月4日，奥斯曼指挥官哲马勒帕夏在贝鲁特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就英国人出卖阿拉伯人做了详尽阐述：

> 假使英国人许诺谢里夫侯赛因的解放并非完全是幻影或妄想，假使他的独立梦想无论多么遥远都有些许实现的可能，我都愿承认希贾兹起义有一丝一毫的合理性。然而，英国人的真实意图现在暴

露了，这些意图并未隐匿多久便大白于天下。谢里夫侯赛因也将……自取其辱，这一耻辱正是他以伊斯兰哈里发（即奥斯曼素丹）授予他的尊严换取屈服于英国人的奴役状态的恶果。[9]

哲马勒帕夏向哈希姆家族提出慷慨的条件，希望后者能放弃与英国的盟友关系，重回奥斯曼帝国的怀抱。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抉择，谢里夫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仍选择维持与英国的盟友关系，以寄希望于脱离奥斯曼人实现独立。但阿拉伯人对英国许诺的信任却遭到了动摇，而他们的怀疑确实有理有据：从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到《赛克斯-皮科协定》再到《贝尔福宣言》，英国政府已经将大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绝大部分地区许诺给了至少两方，将巴勒斯坦至少许诺给了三方。

为了向阿拉伯盟友再次确认其善意，英、法于1918年11月，即奥斯曼人最终撤出阿拉伯领土之后，发布了一则缓和性的声明。在这份联合声明中，两国将其在阿拉伯领土上的战争目标设定为“长久以来受土耳其人压迫的各民族完全、明确的解放，建立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后者的权威来源于本地居民的主动倡议和自由选择”。[10]英国人和法国人为让阿拉伯人确信他们的行为别无他求而煞费苦心。这类言不由衷的声明在短期内平复了阿拉伯公众的不满，但对隐藏在肢解协定之下的英、法帝国利益却影响甚微。

随着大战的结束，胜利的协约国开始着手于一项艰难的任务，即在一个为战争所困扰的世界恢复秩序——当然是协约国眼中的秩序。在亟待解决的战后事务的冗长清单中，缺乏耐心的阿拉伯领导人们被告知要耐心等待。调解者将首先处理他们关切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才会转向英国战时许诺所造成的利益冲突。

*

1919年1—6月，获胜的协约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了超过100次会议，以向他们击败的敌国——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强加自己的条款。历史上首次有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为了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而离开美国。英国总理大卫·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

梭主导了会议日程的制定。英、法、美与意大利一起构成四国委员会，将主导巴黎和会大部分决议的制定。经过这场长达4年的“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英、法两国决心利用巴黎和会来确定德国不会再次崛起并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他们将利用这次会议重新划定欧、亚、非三洲的地图，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他们将以战败国的领土和殖民地财产来褒奖自身在战场上的努力。

作为1919年巴黎和会的调解人之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讲话中所体现出的理想主义精神，令全世界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人民都欢欣鼓舞。1918年1月8日，在大会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威尔逊阐明了指导美国战后政策的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他宣称要结束“征服与扩张的时代”，肯定了在殖民地事务中本地人口的利益应与帝国诉求享有同等的重要性。威尔逊在其第十二点原则中论及阿拉伯人的愿望，保证后者将享有“绝对不受干涉的自主发展的机会”。对于阿拉伯世界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与美国这一崛起中的超级大国的首次遭遇，后者在20世纪剩余的岁月中都将主导国际事务。当整个世界都齐聚巴黎商讨和平的条款之时，阿拉伯人则将伍德罗·威尔逊视为他们诉求的旗手。

出席巴黎和会的阿拉伯代表成员中就包括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人埃米尔费萨尔。费萨尔（1883—1933）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塔伊夫高原地区，是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1908—1917年在任）的第三子。费萨尔的大部分童年时光在伊斯坦布尔度过，在那里他接受了奥斯曼式的教育。1913年，作为希贾兹港口城市吉达的代表当选为奥斯曼议会议员。1916年，费萨尔首次访问大马士革，并为哲马勒帕夏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镇压措施所震惊。在大马士革期间，费萨尔会见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社团的多名成员，后来则在1916—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的地面指挥中扮演了领导角色。

1918年奥斯曼军队撤出阿拉伯行省后，埃米尔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建立了一个阿拉伯政府，其目标即兑现英国人支持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承诺。凡尔赛和会期间，费萨尔试图巩固自己在叙利亚的地位，并迫使英国人在兑现其他战时承诺之前，履行对其父亲在1915—1916年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所做出的承诺。他与《贝尔福宣言》达成了妥协，甚至在1919年1月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签署一项协议，同意

在盟军满足关于阿拉伯王国剩余要求的条件下，将巴勒斯坦割让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如果哈希姆家族关于阿拉伯王国的要求“哪怕出现最微小的修改或偏离”，费萨尔都声称，“我将完全不受当前协议任何条款的束缚”，[11]这是他在与魏茨曼签署协议的末尾写明的。费萨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有义务遵守与魏茨曼的协议。

1919年1月，费萨尔向巴黎和会最高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详述阿拉伯人诉求的备忘录。他力主现实，甚至降低了他的父亲3年前在与麦克马洪通信中提出的很多原始要求。在这份备忘录中，费萨尔提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是最终将所有阿拉伯人联合为一个民族国家”。他提出这一要求是基于阿拉伯人的种族和语言统一性，基于战前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所宣称的诉求，以及阿拉伯人对盟军战时工作的贡献。他承认不同的阿拉伯地区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差异巨大”，不可能立刻将这些地区整合为一个国家。因此，他只寻求大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叙利亚和外约旦）和阿拉伯半岛西部省份希贾兹立即且完全的独立；为调解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接受外国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并为保证英国在油田的利益，接受外国介入美索不达米亚；宣布也门以及阿拉伯半岛中部省份纳季德（其统治者沙特家族已经与英国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不在阿拉伯王国的范围之内。但他仍坚持着“最终将这些地区统一在一个主权政府之下”的承诺。在结论部分，费萨尔表示：“如果我们的独立获得认可，本地人的能力得以确立，种族、语言和利益的天然影响很快就会将我们结合为一个民族。”[12]

一个统一阿拉伯国家的图景显然是盟军最不愿看到的。费萨尔在巴黎的出现使得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时陷入窘境，他要求前者信守诺言，同时又妨碍后者实现其帝国野心。美国为英、法、哈希姆人三方摆脱这一尴尬境遇提供了一条出路：威尔逊提议组建一个多国调查委员会以亲自查明叙利亚民众的真实意愿。对威尔逊而言，这一委员会将为民族自决提供一个先例，将其“十四点原则”诉诸实践；对英、法而言，真相调查委员会可将对哈希姆家族要求的讨论推迟至几个月之后，其间两国将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阿拉伯领土。费萨尔对这一提议信以为真，感谢威尔逊给予阿拉伯人表达“他们对自己民族未来的愿望和理想”的机会。[13]

事后看来，美国主导的“金-克瑞恩调查委员会”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英、法两国政府拒绝派遣官员参与这次调研，导致实际上只有美国参与，因而也削弱了该委员会作为一个多国代表团的有效性。英、法两国无意受委员会调查结果的限制，因而也不愿让本国外交官参与这一程序。然而，《金-克瑞恩报告》却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文件，用其作者的话来说，“对当前叙利亚国内政治观点（提供了）一份相当准确的分析”，为洞见从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统治更替的这一短暂时期内叙利亚乡村和城镇社群的希冀与忧惧，提供了难得的资料。[14]

1919年3月，威尔逊总统任命奥伯林学院校长亨利·丘吉尔·金（Henry Churchill King）和芝加哥商人查尔斯·R.克瑞恩（Charles R. Crane）为调查委员会负责人。两人都对中东有着广泛的了解：金是一位圣经历史学者，克瑞恩则自1878年以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到处旅行。带着会见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当地代表和报告阿拉伯民众诉求的任务，美国人于1919年5月正式启程前往叙利亚。事实证明，金-克瑞恩代表团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真相调查小组，两人在大叙利亚地区的停留在当地触发了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波及的叙利亚人口范围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

埃米尔费萨尔两手空空地回到叙利亚。面对追随者，他将即将到来的金-克瑞恩调查委员会向其追随者描绘为实现叙利亚民族诉求的一项有利的进展和重要一步。他向大叙利亚各地的显贵人士发表了一次讲话，简要介绍了自己（在巴黎和会上）的经历。他当然不能告诉他们全部事实：关于他是如何被迫等待，如何被巴黎和会上的调解人羞辱，后者似乎决心为维护本国在大叙利亚的帝国利益而拒绝他的要求。现在既然已回到阿拉伯领土之上，用自己的母语向支持者讲话，他便反过头来蔑视欧洲人。“我前往……在巴黎举行的和会以阐明我们应得的权利，”他解释道，“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西方人对于阿拉伯人所知甚少，其信息全部来源于《一千零一夜》的传说。”从很多方面来讲，费萨尔所言不虚。除少数专家以外，英国和法国的普通政治家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了解极其有限。“很自然，他们的这种无知让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解释一些简单的事实。”费萨尔解释说。

俯视着支持者的面容，费萨尔不能承认自己的失败，这些支持者不

停地打断他的讲话来宣誓忠诚。但当他宣称盟国已然在原则上承认阿拉伯民族的独立时，他确实言过其实了。他尝试将金-克瑞恩代表团描述为大国对阿拉伯人诉求认可的某种延伸，表示："国际委员会将要求你们以自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因为当前各民族只有在获得其他民族认可的情况下才愿统治他人。"[15]

受到费萨尔讲话的鼓舞，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开始全力将叙利亚民众团结在一个统一的行动纲领之下：阿拉伯政府发放布祷词，以便周五聚礼时在叙利亚全国各地清真寺宣读；各种政治、文化协会被广泛征召，以准备提交给金-克瑞恩委员会的请愿书；村庄和城镇街区的头领则被动员起来，鼓励普通民众热情回应委员会的调查。短时间内印制了大量传单，在叙城镇和村庄中发放，对于不熟悉民族主义政治的民众而言，这些传单以口号的形式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资源。例如，一份传单用粗体的阿拉伯语和英语写道，"我们要求绝对的独立"；另一份则用括号标注出较长文本中的民族主义口号，鼓励全体叙利亚人保卫他们的自由：

> 别让任何人误导你们出卖你们祖辈的土地，否则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会诅咒你们。自由地生活吧，从压迫的枷锁下解放自己！寻求你们自己的利益，按如下阐明你们的要求：
>
> 第一，要求不附加任何限制、条件、保护或托管的（完全的政治独立）；
>
> 第二，不接受对你们父辈的土地和祖国的任何分裂，换句话说（叙利亚整体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
> 第三，要求划清你们国家的边界，即北起陶鲁斯山脉，南至西奈荒漠，西至地中海；
>
> 第四，寻求其他被解放阿拉伯领土的独立和（与叙利亚的）统一；
>
> 第五，如有必要，在保证不损害我们国家完全的政治独立的前提下，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持；
>
> 第六，抗议国联第二十二条关于规定对寻求独立的民族实行托

管必要性的条款；

第七，彻底拒绝任何国家对我们的土地提出任何历史性的或优先性的权利要求。

（签字）一位了解情况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16]

即便在阿拉伯语原文中，这份声明的语言都显生涩，但其传达的信息却是毫不含糊的。在当地社群准备会见金-克瑞恩代表团期间，这些要求在他们提交的请愿书、高唱的口号以及在标牌和条幅上书写的标语中反复出现。

在充分调动叙利亚公众舆论之后，费萨尔和他的顾问们召开了一次临时议会，以便向国际调查委员会传达叙利亚民众的观点。哈希姆人足够了解欧洲的治国之术，意识到根据其规则，一国民众需通过一个民选议会来表达其合法诉求。他们依据奥斯曼人的选举程序从叙利亚内陆城镇中选举代表。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鉴于英、法的占领，当局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他们被迫诉诸其他办法。[17]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显贵家族与部落的重要成员被邀请前往大马士革参加叙利亚全国议会。近100名代表被选举或受邀参加这次议会，但只有69名成员准时到达大马士革并参与大会议程。他们争分夺秒地工作，目标就是在金-克瑞恩委员会到达大马士革之前达成一项民族诉求声明。

1919年6月10日，金-克瑞恩代表团到达雅法，在随后6周的时间内走访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外约旦和黎巴嫩的城镇与村庄。委员会成员对他们行程中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记录。他们在超过40个城镇和乡村市集举行了会谈，会见了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442名代表，包括市政和行政委员会成员、村庄首领、部落谢赫等；他们会见了农民、商人以及来自10多个基督教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犹太人、德鲁兹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代表；他们还会见了8个不同的女性代表团，惊叹于“女性在东方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扮演的全新角色”。走访期间，他们共收集了1863份请愿书、91079个签名——代表了大叙利亚地区总人口（据他们估计，约有320万人）的近3%。在打探大叙利亚地区舆情方面，代表团

已经做得非常彻底了。

6月25日，金和克瑞恩到达大马士革。埃米尔费萨尔政府的一名大臣优素福·哈基姆（Yusif al-Hakim）回忆道：

> 他们对王宫和政府首脑进行了正式访问，然后回到住地，在那里新闻界人士成为迎接他们的第一批人员。他们简要地向记者表示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是评估（大叙利亚）人民对他们未来政治的意愿，以及依据威尔逊总统之前的声明，他们愿选择哪个国家作为一定时期内的托管国，以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18]

7月2日，叙利亚议会向代表团递交了一份包含十点内容的决议，并强调这份决议代表了叙利亚人民和埃米尔费萨尔政府两方的观点。[19]决议显示出起草者对国际事务惊人的熟悉程度：文本中充满了对威尔逊总统的言论以及《国联宪章》的引用，同时又大量援引英国战时外交中相互冲突的承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金和克瑞恩表示该决议是他们行程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文件。

在这份决议中，叙利亚议会成员要求叙利亚在其地理边界内的完全政治独立，这一边界保证其国家与土耳其、伊拉克、纳季德、希贾兹、埃及相分离；他们要求以埃米尔费萨尔为国王，在国内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并完全拒绝《国联宪章》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委任统治条款。他们声称阿拉伯人在天赋方面并不逊色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等民族，后者在脱离奥斯曼帝国后全部获得了完全独立，并无类似的欧洲托管。叙利亚代表表示完全愿意接受一个仅限于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托管方，且最信任由美国来履行这一角色，“相信美利坚民族离任何殖民化的想法距离最远，且对我们的国家不抱有政治野心”。如果美国拒绝承担这一责任，叙利亚人民愿意接受英国的委任统治，但拒绝法国扮演任何角色。决议同时也呼吁当时处于英国占领之下的伊拉克的独立。

叙利亚议会强烈反对战时秘密外交。在一段对《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尖锐抨击中，决议写道：“威尔逊总统制定的谴责秘密协议的基本原则，迫使我们最严正地抗议任何意图分裂我们叙利亚祖国的协议，反对任何旨在于叙利亚南部地区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的私人交

易；有鉴于此，我们要求完全废除这些公约和协定。”他们排除了任何将黎巴嫩或巴勒斯坦分裂出叙利亚王国的企图，坚决拒绝与其国家利益相抵触的犹太复国主义方案：“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叙利亚南部地区即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共同体的主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向我们国家任何地区移民，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所有权。从民族、经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是一个巨大威胁。”

叙利亚议会的这份决议有一种道义上的愤慨。事实上，叙利亚临时政府中的很多成员都曾在阿拉伯大起义期间与埃米尔费萨尔并肩战斗；他们坚信作为英、法的战时盟友，他们曾为奥斯曼战线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1918年10月2日，费萨尔和他的阿拉伯军进入大马士革，将后者从奥斯曼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坚信基于战场上赢得的权利，叙利亚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叙利亚议会仅期待其战时盟友践行基本的公正，“以便我们的政治权利有所增益而不是减少，因为我们为自由、独立的事业已付出了如此多的鲜血”。

在叙利亚停留6周后，1919年8月金和克瑞恩转往伊斯坦布尔，开始起草报告。委员会成员对他们所收集的所有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提交给巴黎和会的建议中，两人总体上认可了叙利亚议会的决议。他们呼吁建立一个单一、完整的叙利亚国，一个以埃米尔费萨尔为国王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建议将叙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有限的时期内置于一个托管国的统治之下，托管国优先考虑美国（英国可作为第二选择），由后者向前者提供支持；敦促对犹太复国主义方案进行重要调整，限制犹太移民的规模。两人论辩说《贝尔福宣言》的两项承诺，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和同时又尊重“巴勒斯坦既有非犹太社群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根本无法调和。《金-克瑞恩报告》指出：“委员会与犹太代表的会谈反复显示，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寄希望于通过不同的购买手段，完全占有当前巴勒斯坦非犹太居民的不动产。”[20]毫不令人惊奇，委员会发现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口中90%都“强烈反对整个犹太复国主义方案”，委员会接收到的全部请愿书中72%都旨在抗议犹太复国主义。

1919年8月底，委员会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巴黎的美国代表团。尽管不了解报告的内情，埃米尔费萨尔已然无法要求更多了。然而，对欧洲人而言，《金-克瑞恩报告》是一份令人为难的文件。这份报告在被递交

给巴黎和会秘书处之后就被束之高阁，短期内无人问津，3年后才被公之于众。而到那时，英、法两国已经按当时看来更符合本国利益的方式完成了对阿拉伯世界的瓜分。

英国宣布将于1919年11月1日从叙利亚、黎巴嫩撤军，将当地的统治权移交给法国军方。面对迫在眉睫的法国占领，叙利亚议会决定先发制人：基于递交给金-克瑞恩委员会的决议，议会成员拟定了一份独立宣言，并于1920年3月8日在大马士革市政厅正式宣读。费萨尔被宣布为包括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国国王。

英、法两国政府拒绝承认叙利亚独立宣言。当法国人着手准备占领大马士革，推翻其战时盟友而如今已是国王的埃米尔费萨尔之际，英国人则视若无睹。由于未能兑现其独立承诺，费萨尔在国内也日益孤立，因而仅能聚集一小支部队来对抗由黎巴嫩向叙利亚进发的法军。显然，大马士革人并不认为费萨尔的事业值得为之牺牲。

1920年7月24日黎明，一队约2000人组成的阿拉伯志愿军聚集在一个名为汗·麦赛伦的废弃驿站，该地位于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上的一个险要的隘口。他们面对的则是一支由身穿法军制服的殖民士兵组成的奇怪纵队——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士兵在法国军官的指挥下被派来确保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来自北非殖民地的穆斯林士兵为效忠其殖民者主人而甘愿在叙利亚对抗阿拉伯穆斯林非正规军，这样一个事实也反映出法兰西帝国的力量。身为叙利亚临时政府成员，同时又是一位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赛提阿·侯斯里（Sati　al-Husri）当时在大马士革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如此记录对“麦赛伦之日”的回忆：

> 战斗的细节开始缓慢传回。尽管我基于对我们军队和法军装备的了解，对胜利不抱任何希望，但为了军队的荣誉，还是幻想战斗的结果能尽可能晚一分揭晓。然而，10点钟时我们接到消息，说军队已经被击败，战线也已经溃败。［军事大臣、军队总指挥］优素福·阿兹迈（Yusuf　al-Azmah）据称力战身亡。我说，不，他是在麦赛伦自杀殉国的，是一位真正的烈士！[21]

法军在横扫麦赛伦的抵抗者后进入大马士革，也开启了一段长达26年的悲惨的殖民占领。然而，麦赛伦战役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叙利亚的疆域。对阿拉伯人而言，这场不大的战役不仅标志着英国对其战时承诺的背叛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倡导的民族自决理念的破产，也表明英、法殖民利益最终压倒了几百万阿拉伯人的希冀和愿望。当欧洲人试图在中东强加其民族国家体系，将一个渴望统一的民族分割肢解并违背其意愿地置于外国统治之下的时候，麦赛伦就等同为原罪。战后解决方案所制造的全新阿拉伯国家及其边界体系表现出惊人的持久性，其一手制造的问题也同样如此。

*

埃及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同样相信他们在巴黎和会上能够从英国获得独立。受到威尔逊“十四点原则”误导，埃及政界误以为巴黎和会将开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帝国的时代将被一个通过践行民族自决原则而产生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所取代。同时，与英国的盟友哈希姆家族类似，埃及人相信他们在战争中为英国人而遭受的苦难足以为他们赢得独立的地位。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在埃及已维持了36年的帝国统治。1914年12月，英国以“勾结国王的敌人”为由废黜赫迪威阿巴斯二世（当时身处伊斯坦布尔），单方面宣布埃及为被保护国。自此，埃及不再是一个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其统治者也不再是奥斯曼总督。被废黜的赫迪威被他的叔叔，即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最年长的成员侯赛因·卡米勒（Husayn Kamil）取代，后者则开始使用素丹这一新的称号。通过支持这位埃及素丹，英国人意在削弱奥斯曼素丹的影响力，正如他们希望通过谢里夫侯赛因反对奥斯曼人的起义来破坏奥斯曼素丹反抗英法的“圣战”呼声。这一策略对埃及穆斯林乃至更广阔的穆斯林群体影响甚微，穆斯林民众继续尊崇奥斯曼素丹作为哈里发即全球伊斯兰社群领袖的地位。

战争打响后，埃及支持英国战备的负担主要落在埃及劳动人民的身上：粮食以战备的名义被强行征收；农民被征召进入劳工队伍，以便为西部战线提供后勤支持。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降低了所有人的生活水

平，很多埃及人陷入贫困。开罗和亚历山大充斥着英国和英联邦的士兵，这些士兵在埃及集合并受训，随后再被派往加里波利和巴勒斯坦的前线参战。外国士兵的涌入引发了他们与本地人口间的紧张关系，在埃及人看来，更多英国人的到来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更少的自由。

随着战争临近尾声，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口号在尼罗河谷地区迅速传播。埃及人坚信，基于他们对这场与己无关的战争的重大贡献，他们已然赢得了自决的权利。1918年11月13日，即一战结束的停火协议签署后仅两天，一个由埃及重要政治人物组成的代表团便拜访了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Sir Reginald Wingate），要求实现他们国家的完全独立。代表团由萨阿德·扎格卢勒领导，他受训于爱资哈尔，是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追随者，当时担任埃及教育部部长、立法议会副主席。作为战前人民党的一名成员，扎格卢勒已成为反对英国在埃及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陪伴他的还有另外两位民族主义者，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Abd al-Aziz Fahmi）和阿里·沙拉维（Ali Sha‘rawi）。

温盖特接见了代表团，但在听取其要求后当即就表示拒绝。他不仅禁止埃及人向巴黎和会派遣代表团以陈述其要求，还拒绝承认扎格卢勒作为埃及民族诉求代言人的角色。毕竟，并没有人选举扎格卢勒作为埃及的代言人。

埃及代表团并没有被温盖特的严词拒绝所吓倒。扎格卢勒和他的同事们告别高级专员后，即开始为确保自身作为埃及民族诉求代言人的权限而奔波。他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允许扎格卢勒及其代表团前往巴黎，并在巴黎和会上陈述埃及的情况，正如埃米尔费萨尔代表叙利亚一样。政治活动家寻访埃及各地以争取民众签名支持。尽管受到英国官员阻挠，部分已签名的请愿书被没收，但民族主义者仍然成功地为扎格卢勒的运动寻求到可观的民众支持。大量的请愿书复印件被送往地方民选机构、省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地方显贵，短时间内成千上万的签名涌入发起者手中。[22]

埃及各地的民众一致支持萨阿德·扎格卢勒的事业，迫不及待地希望在巴黎和会上确保埃及脱离英国而独立。随着该运动声势日涨，英国人

曾尝试通过将埃及问题与巴黎和会脱钩的方式来终止民族主义者的煽动活动。温盖特宣布，关于埃及地位的任何变动都被英王政府视为“一个帝国内部的而非国际性质的问题”。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帝国内部问题，扎格卢勒及其同事必须在白厅与英国政府讨论其诉求，而非在巴黎向全世界陈诉埃及的情况。英国当局向扎格卢勒发出直接警告，要求他停止煽动活动，但后者对英国人的警告置若罔闻。1919年3月8日，扎格卢勒及其主要同事最终被捕，随后被流放至马耳他岛。这一举措在埃及激起了全国性暴动，也标志着1919年埃及革命的开端。

萨阿德·扎格卢勒及其同事的被捕在埃及民众中引发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应。整个国家陷入骚乱，自发和有组织的叛乱由城镇中心传播至农村地区，牵动了埃及社会的各个阶层。示威活动于3月9日正式开始，当时一群学生发动骚乱，大肆破坏铁路、电车、路灯杆等在他们看来与英国统治相关的基础设施。反英示威活动和英国部队的镇压给双方都造成多人死伤。

古老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院成为起义的一个中心。英国军队于3月13日逮捕了爱资哈尔的部分师生，随后，英国驻埃及安全主管约瑟夫·麦克弗森（Joseph McPherson）走访了这座清真寺以便观察政治煽动的情况。尽管为伪装自己而头戴一顶土耳其毡帽，麦克弗森还是感受到了身边埃及人不友善的目光。清真寺前的人群是如此拥挤，以至于他根本无法通过清真寺的正门。但即便在视野受限的位置，他仍能看到一位宗教长老“站在一堆石头上面，对数百名听众长篇大论，告诫听众为了摧毁暴虐者、打破其枷锁，他们必须视死如归，同时许诺那些为这一神圣事业而牺牲的‘烈士’将进入天堂”。麦克弗森亲眼看到中央革命委员会为在农村地区发动叛乱而筹集善款。[23]

农村社群同样攻击被他们视为与英国统治有联系的事物，战时用于储存与运输所征收粮食的仓库和铁路设施、保证行政人员间有效通信的电报线路遭到破坏。在城市中，工人阶级发动劳工行动，埃及国家铁路和开罗电车工人相继罢工。英国驻埃及安全主管麦克弗森对从中小学生到街头清洁工等暴动参与者进行了分类，并对此表示鄙视：“街头咆哮的

疯子、暂时摆脱束缚发表拗口演讲的妇女、顽童和各种地痞流氓都高喊着粗俗的打油诗，以表达对倒台暴君的蔑视。”

埃及人对1919年的记忆则完全不同。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他们第一次参与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们因同一个信念而团结在一起——埃及人应当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统治自己的国家。这也是阿拉伯历史中第一次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其间民族主义领袖得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广大民众的全力支持。

同样是在1919年，埃及妇女首次登上民族政治的舞台，其领袖是一位名叫胡达·沙拉维（Huda Sha‘rawi，1879—1947）的女性。胡达是一位切尔克斯母亲和一位年长的埃及显贵的女儿，出生在一个享有特权但又封闭的家庭环境之中。她生长在一个开罗精英家族的女眷居室之中，从小身边便簇拥着女人、孩子和阉人。在其回忆录中，她写到了两位母亲：一位是他父亲的第一任妻子，被她称为“大娘”;另一位是她的生母。她爱自己的两位母亲，但对大娘尤其感到亲近，因为“当人们仅仅因为我弟弟是一个男孩而偏爱他时，（她能）理解我的感受”。[24]

孩童年代，胡达就不满自己接受的教育少于弟弟的现实。作为一名勤奋的学生，她甚至强迫她的家庭教师给她带来语法书籍，以便学习如何正确地诵读《古兰经》。“带走你的书吧，”负责照看孩子们的阉人一次对家庭教师说，“小姐不需要语法，因为她不会成为一名法官！”胡达当时很沮丧，“我开始变得郁郁寡欢，荒废自己的学业。我讨厌自己是一个女孩，因为这使我无法获得我所追求的教育。后来，女性的身份成为横亘在我本人与所有渴求的自由之间的一道障碍”。[25]

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胡达就沮丧地得知自己将成为一位年长的堂兄阿里·沙拉维帕夏的第二任妻子。“我被要嫁给堂兄的想法深深困扰，因为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位值得敬畏的父亲或长兄。一想到他的妻子和3个比我还要年长的女儿，我就更加心烦意乱。他的女儿们曾经打趣我说：‘日安，继母大人！’”[26]她像“一名被判了刑的罪犯接受处决”那样走上了自己的婚床。毫不奇怪，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婚后不久两人便分居。这样的分居生活持续了7年，这段时间也使胡达有机会走向成熟并发展自己的兴趣。之后，她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开始扮演其作为一位

有影响的名人妻子的新角色。

与丈夫分居的几年成为胡达·沙拉维实现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她开始为妇女组织各种公共活动，例如，邀请法国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克莱芒（Marguerite Clement）在埃及大学举行讲座，后者在讲座中比较了东方和西方女性的生活，还探讨了戴面纱等社会习俗。胡达将这第一次讲座发展为一个常规的系列讲座，这使得埃及女性开始有机会抒发心声。后期演讲人中包括埃及女权主义者麦莱克·赫夫尼·纳绥夫（Malak Hifni Nasif, 1886—1918），埃及第一位公开呼吁妇女解放的女性。[27]1914年4月，胡达召开会议，筹备建立埃及妇女知识协会。这一文学社团笼络了阿拉伯世界女性文学的部分先驱，包括黎巴嫩作家梅伊·齐雅黛（Mai Ziyada）以及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女性刊物之一的创始人莱比白·哈希姆（Labiba Hashim）。

这些活动也标志着埃及独特的妇女运动的开端，而胡达的后半生都将致力于这一事业。各类讲座、妇女会议拓宽了精英阶层妇女对开罗文化活动的参与范围，为妇女在不寻求丈夫首肯的情况下聚会并探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如此有限的成就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规定两性不同角色的社会习俗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要挑战像男女隔离这样在阿拉伯和奥斯曼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习俗，显然需要一场革命。

事实证明，1919年起义既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1919年春，当时严格的社会鸿沟遭到挑战，并被短暂地弥合。民族主义斗争为妇女在埃及成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机会，开创了一个持久的女权主义运动，并成为一种遗产。在更加个人化的层面，上述事件帮助阿里·沙拉维帕夏与其妻子胡达实现了和解，将他们的婚姻转变为一个因民族主义事业而凝聚在一起的政治同盟。

阿里·沙拉维帕夏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可追溯至1918年萨阿德·扎格卢勒与英国高级专员雷吉纳德·温盖特的决定性会晤，沙拉维帕夏也是参与者之一。与扎格卢勒一道，沙拉维帕夏是后来被称为华夫脱党（即“代表团”）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创始人之一。该政党寻求在巴黎和会期间代表埃及的诉求。扎格卢勒被流放后，沙拉维帕夏继任为该党领导

人。革命期间，阿里·沙拉维帕夏与其妻子胡达的关系经历了戏剧性转变：他坚持向胡达通报政局发展的各个方面，以便在他被捕的情况下，后者可填补他留下的政治真空；此外，他们意识到妇女的某些行为可享有豁免权，因为为避免引发众怒，英国当局尚不敢逮捕妇女或向妇女开火。

华夫脱党迅速利用上述优势，动员妇女参与民族主义事业。第一次妇女游行发生在3月16日，即革命爆发后一周。写有白色阿拉伯语和法语口号的黑色标语牌已然备好，黑与白都是哀悼的颜色。随后示威者聚集在开罗市中心，准备向美国公使馆行进，似乎要声明伍德罗·威尔逊在其“十四点原则”中所许诺的民族自决权。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英国部队挡住了女性示威者的道路。“他们用机关枪封锁了街道，”胡达·沙拉维写道，“迫使我们以及在两旁组成纵队的学生停了下来。我已经下定决心，游行必须继续下去。我继续向前走，一个英国士兵用枪指着我，但我仍从他身边走过。当时一位妇女试图把我拉回来，我就大声喊道：‘让我死吧，这样埃及就有了她自己的伊迪丝·卡维尔［一位英国护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射杀，立即成为烈士］！’”经过3小时的对峙，游行队伍和平解散。后续很多示威活动接踵而至。

埃及妇女直面英国统治者的象征性力量鼓舞着全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旦走出了深闺，埃及妇女便开始以更大的能量和热情投身于公共生活：她们为穷人筹集资金，去医院慰问伤员，经常冒着极大风险参与集会和抗议活动。同时，妇女们开始跨越阶级的界限，精英阶层的妇女与劳动阶层的妇女分享着共同的事业。胡达特别指出，民族主义运动期间6位劳工阶层妇女的死亡成为“全国沉痛哀悼活动的焦点”。妇女们尽其所能鼓励公务人员罢工，经常守候在政府机关之外，鼓励工人们以罢工的形式反抗英国人。当1919年底英国政府派遣以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赴埃之际，埃及妇女组织了新一轮示威活动，并起草了一份决议以示抗议。她们开始举行民众集会，来自各个阶层的几百名妇女参与其中。

1919年底，胡达·沙拉维和她的同事们通过组建华夫脱党女性中央委员会，巩固了已取得的女性主义成就。该组织也是阿拉伯世界首个女性政治机构，胡达则当选为主席。1923年，胡达与同伴共同创办了埃及女

权主义联盟。同年，当她和同伴们从罗马一次女权主义者会议归来时，她们在开罗火车站公开揭掉了面纱，打破了女性禁闭的习俗。埃及女权主义运动的生命力远远超过了1919年的革命时刻。

华夫脱党争取埃及独立的斗争仅取得了部分的胜利。尽管扎格卢勒及其同僚最终迫使英国允许他们代表埃及出席巴黎和会，但当他们到达巴黎时却得知美国代表团刚刚发布了一项声明，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地位。威尔逊总统慷慨陈词所带来的希望现在已烟消云散。埃及人被迫在伦敦和英国人直接展开谈判，而不是作为战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在巴黎确保自身独立。

1919—1922年，英国人和华夫脱党之间的谈判时断时续，不时被民众骚乱打断。最后，埃及民族主义者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就仅是名义上的独立。基于维护埃及国内秩序的考虑，1922年2月28日英国单方面宣布保护国地位的结束，承认埃及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四个“对英帝国利益至关重要的”核心领域仍受制于英国：帝国通信安全，保护埃及免遭外部侵略，保护外国利益和少数群体权利，以及苏丹。通过以上条文，双方实际上都承认了独立的有限性：英国仍可保留其军事基地，控制苏伊士运河，其干涉埃及内政的频率几乎与保护国时期一样高。在之后的32年中，埃及和英国仍将为限定这种殖民关系而陷入常规的谈判之中，前者寻求其主权完整，后者则竭力维护帝国秩序。

*

埃及的事态进展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受到密切的关注，在伊拉克尤其如此。一战期间，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三个原奥斯曼帝国行省被英国占领。尽管英国人曾多次向伊拉克人民保证他们将享受自治，但他们拒绝埃及人独立地位的做法确实为伊拉克人的忧虑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一战爆发后，驻印度的英国军队占领了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并确保了对整个省份的控制。英国人决心要保护其通往帝国在印度领地的波斯湾门户免受奥斯曼人的德国盟友的染指。占领巴士拉后，英军向北

推进以对抗奥斯曼第六集团军。1915年11月，英军已推进至距巴格达不足50英里的区域，在那里遭遇了兵力占优的奥斯曼军队。英国人被逼退至库特，在那里遭受奥斯曼人长达4个月的围困，最终于1916年4月向土耳其人投降。至此，奥斯曼人已经取得了两次针对英国入侵军队的重大胜利——一次在加里波利，一次在美索不达米亚。然而，英国人重启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最终于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又于1918年夏末在基尔库克击败奥斯曼第六集团军。1918年11月，英军又占领了摩苏尔省，尽管根据停火协议条款，后者并不在划归英国占领的领土范围之内。至此，英国已完成了1915年《德·本森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计划。

事实证明，相比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政治秩序，军事征服美索不达米亚要简单得多——1918年即是，2003年也是如此。三个行省的居民，包括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穆斯林，在目标和意愿方面分歧严重。在要求三省合并为一个称为伊拉克的独立国家并置于君主立宪政体之下等方面，美索不达米亚的不同社群基本能达成一致，但关于英国在这个新国家中应扮演何种角色，各方则观点不一。一些大地主和富商更看重稳定和经济增长而非完全独立，因而公开支持英国统治；一些之前曾在阿拉伯大起义中追随埃米尔费萨尔的伊拉克军官，则将英国视为逊尼派政治主导地位的保证；但大多数伊拉克人都拒绝外国干涉其内部事务。

占领美索不达米亚之初，英国人曾再次向伊拉克人民确保其善意。1918年11月，英法联合宣言在伊拉克当地媒体中得到了广泛报道，该宣言承诺联军支持通过自决程序在阿拉伯地区“建立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这一宣言也使很多伊拉克人确信欧洲人无意向他们强加一套殖民主义解决方案。总部位于纳杰夫的《独立报》（*al-Istiqlal*）写道：“英、法两国关于帮助我们实现完全独立与自由的声明令人感到振奋。”[28]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关于伊拉克自治的承诺并未取得任何明显进展，伊拉克人的疑虑开始增加。英国人似乎忙于在当地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帮助伊拉克人建立政府。1919年2月，一群伊拉克人要求

英国当局允许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以确保其民族独立要求获得承认，但英国当局断然拒绝。当伊拉克人要求英国人详细阐述其对伊拉克政治未来的方案时，又无法获得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

事实上，英国人对于如何最有效地统治伊拉克有两派观点。一派以统领英国驻伊拉克当局的民事专员阿诺德·威尔逊爵士（Sir Arnold Wilson）为代表，主张效仿英属印度的模式，寻求在伊拉克建立直接殖民统治。他甚至鼓励从印度向美索不达米亚稳定地输入移民，作为在后者建立殖民行政机构的现成劳动力。另一派以驻巴格达的东方事务秘书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为代表，认为与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合作最符合英国的利益。贝尔认为一个伊拉克的哈希姆王国将为非正式的帝国统治提供理想的构架，对英国政府而言成本低得多，与新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发生冲突的风险也低得多。伊拉克人不知道该相信谁——是貌似支持他们愿望的贝尔，还是她的上司、坚持英国对伊拉克统治的阿诺德·威尔逊爵士？[29]

至1920年，伊拉克人已确信英国人蓄意将其国家纳入殖民统治之下。他们从远方见证了1919年埃及革命；他们越来越担忧地看到英国人抛弃了大马士革的费萨尔政府，从叙利亚、黎巴嫩撤军，从而为法国殖民占领铺平了道路。看上去英、法两国蓄意拒绝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并在两国间瓜分其领土，当然他们确实这么做了。

1920年4月，国际联盟将伊拉克作为正式托管地委托给英国，伊拉克人的怀疑最终得到证实。伊拉克人始终将托管地作为帝国主义一种改头换面的说法而加以反对，他们开始动员起来全力阻挠英国的计划。反对派由一个新的组织——伊拉克独立卫士领导，该组织1919年首先出现在什叶派社群之中。“卫士”要求伊拉克完全独立以及英国完全撤军，因而吸引了大量逊尼派支持者。为了避免英国当局干预，他们轮流在什叶派和逊尼派清真寺中举行会谈。伊拉克不同穆斯林社群间的这次合作是史无前例的，也为一个超越宗教边界的伊拉克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伊拉克第一波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示威活动采取和平的形式。1920年5月，部分什叶派宗教人士、部落长老以及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在巴格达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英国政府当即对一切和平示威活动采取镇压的

策略，逮捕了那些涉嫌煽动反英活动的领导人。在英国镇压下，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被逐出巴格达，被迫在外省城镇和村庄中继续其反抗活动。

1920年6月底，在纳杰夫和库法两圣城什叶派宗教人士的支持下，伊拉克大起义正式爆发。英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逮捕了最重要的什叶派宗教学者阿亚图拉设拉齐（Ayatollah al-Shirazi）的儿子。作为回应，设拉齐发布了一则“法特瓦”（fatwa），即法律意见，鼓励反抗外国占领的反叛。因担心危机进一步激化，巴格达的英国当局逮捕了多名他们认定参与鼓动骚乱的什叶派活动人士和部落首领。可想而知，这样的镇压手段很快将起初的和平反抗转变为暴力对抗。

伊拉克的抵抗运动具有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特点。运动领导层为一般行动制定了指导方针，并通过本地印刷机构印制发放。一份1920年7月在巴格达印制的传单规定了对抗的原则：“每位部落首领必须确保全体部落成员理解本次起义的目标，即要求伊拉克的完全独立。”[30]起义的部落民众被教导以“独立”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他们要确保本方控制之下所有城镇和村庄的正常行政运转；妥善看管英国和印度战俘；最重要的，他们要保留从英军俘获的所有武器、弹药和装备，因为这些补给“都属于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手段”。

最初，起义在3个省份同时爆发，尽管冲突的主要区域集中于巴格达与巴士拉之间的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成为运动的中心。在这些地区，英国人被迫撤军，起义军则控制了城镇和村庄，建立起地方政府，成功收取税收并维持秩序。尽管英国人成功确保首都内未发生重要的起义，但巴格达周边地区都迅速被起义军控制。1920年8月，巴格达东北部多个部落发动大规模反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控制了巴古拜和迪亚拉河以北的其他城镇。另一次主要的起义发生在巴格达以西的费卢杰。[31]英国人紧急调动其他部队来增援守军，随后发动报复性的反击。

面对着这样一场全国性的起义，英国人别无他法，只得强化他们在伊拉克过于分散的兵力，以便重新夺回对这块新托管地的控制权。来自印度的新增部队将驻伊英军总数由1920年7月的6万增至同年10月的超过10万。9—10月，英国人借助压倒性的兵力，动用重型火炮和飞机轰

炸等手段，完成了对伊拉克的再征服：9月初，他们重新攻克费卢杰，对当地部落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9月底，他们又转向迪亚拉河谷地区的部落，进而向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推进。纳杰夫的一位记者描绘了英军的猛烈攻势："他们攻击并烧毁部落谢赫的房屋，房屋连同一切财产都付之一炬。他们杀害了大量民众，屠戮马匹和牲畜。"英国人冷酷无情地追捕起义者，拒绝一切形式的谈判。"（英国）军官只想将我们赶尽杀绝，或者送上法庭，"这位记者继续写道，"我们同意他们的停战请求，他们却违背协定；我们从他们手中攻陷一片地区后允许他们全副武装地撤退，他们却背信弃义地攻击我们。近些天来，很多人口密集的城镇遭到严重破坏，血流成河；神圣的宗教崇拜场所遭到侵犯，让人痛心不已。"[32]

10月底，随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投降，大起义最终告一段落。起义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据英国政府估计，英国和印度士兵死伤超过2200人，伊拉克方面则高达约8450人。[33]对伊拉克人民的财产损失则缺乏相关的估算。

1920年大起义在伊拉克被称为"1920年革命"，它在伊拉克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神话谱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堪比1776年美国革命对美国历史的影响。二者与其说是社会革命，不如说是反抗外国占领者的民众起义；二者都标志着两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尽管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对1920年伊拉克起义缺乏了解，但一代又一代的伊拉克学童正是听着民族主义英雄如何在费卢杰、巴古拜、纳杰夫等城镇对抗外国军队和帝国主义的事迹长大的，这些故事相当于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伊拉克版本。

*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构成了阿拉伯现代历史中诸多最重要的阶段之一。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长达四个世纪的统治最终落下帷幕。同时代的阿拉伯人中很少有人能想象一个没有奥斯曼人的世界。通过更加精巧的官僚机构以及铁路、电报等基础设施，通过向更多的阿拉伯臣民提供在扩大的学校系统中获得奥斯曼教育的机会，19世纪的奥斯曼改革实际上扩大了伊斯坦布尔中央政府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至20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可能会感到与奥斯曼世界的联

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紧密。

1908年以来，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治下，阿拉伯人与奥斯曼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强化。当时奥斯曼人已经失去了巴尔干地区几乎所有的欧洲省份。青年土耳其党人继承的是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帝国，因而竭尽全力强化伊斯坦布尔对阿拉伯省份的控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策可能疏远了一部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却成功地使得阿拉伯独立看起来成为一个更加遥不可及的目标。

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受独立统治愿望的驱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进入了一个热情高涨的活动期。在1918—1920年间一个短暂、兴奋的时期，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希贾兹的政治领袖相信他们即将步入一个独立的新时代。他们求助于巴黎和会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所承诺的全新世界秩序，以便确认自己的雄心。然而无一例外，他们都将感到失望。

阿拉伯人面临的新时代实际上将由欧洲殖民主义而非阿拉伯独立所形塑。欧洲列强确立了他们的战略需求，并通过战后和平进程解决了他们内部的所有分歧。法国将叙利亚、黎巴嫩并入了其在北非的阿拉伯属地，英国则成为埃及、巴勒斯坦、外约旦及伊拉克的主人。尽管对特定的边界还会做少量修正，但欧洲列强大体上划定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中东国家的边界（巴勒斯坦是一个重要的例外）。阿拉伯人从未认同这一根本性的不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剩余岁月中，他们将为追求长期企盼的独立地位而与其殖民主展开斗争。

第七章　大英帝国在中东

战后解决方案授予英国对伊拉克、外约旦、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之时，英帝国已经在阿拉伯世界活动了一个世纪之久。19世纪初，英属东印度公司为打击现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迦和哈伊马角的海上部落对商船运输日益严重的威胁，被迫卷入凶险的波斯湾水域。波斯湾是连接东地中海与印度的关键陆海纽带，因此英国人决心终止该地区的海盗行为。正是在征服被他们称为“海盗海岸”地区的过程中，英国人将波斯湾转变成了一个英国内湖。

关于英国对沙迦和哈伊马角地区卡西米部落联盟不满的记录可追溯至1797年。当时，东印度公司将针对英国、奥斯曼、阿拉伯船队的一系列袭击归咎于卡西米人。1809年9月，东印度公司向“海盗海岸”派遣了一支由16艘船舰组成的惩戒性远征军，舰队按照指示袭击了哈伊马角的城镇，焚毁了卡西米劫掠者的船只和店铺。1809年11月至1810年1月，英国舰队严重破坏了哈伊马角和另外4个卡西米港口，共焚毁60艘较大的船只和43艘较小的船只，追缴据称被窃的财物约2万英镑，随后才启程返航。但由于未能和卡西米人达成一项正式协议，英国人在波斯湾的运输船只仍将继续面临后者的袭击。[1]

英国第一次远征后的5年内，卡西米人已经重建了他们的舰队，重新开始海上劫掠活动。为压制卡西米人，第二支英国远征军于1819年从孟买启航。借助两倍于前且集中于哈伊马角的兵力，第二次远征不仅成功捕获并烧毁了卡西米人的大多数船只，且实现了第一次远征未能实现的目标，即达成政治解决方案。1820年1月8日，阿布扎比、迪拜、阿治曼、乌姆盖万、巴林以及控制着沙迦和哈伊马角的卡西米家族签署了一项总体协议，保证完全、永久性地停止对英国船只的一切袭击行为，并接受一套通用的海事规则；作为回报，他们将获许在波斯湾及印度洋的所有英国港口从事贸易。通过赋予这些海上酋长国使用英国控制下港口的权利，这一协议为相关各方维护在公海和沿岸海域和平提供了经济刺激。1853年，上述条款在《永久协议》（Perpetual　Treaty）中再次得到确认，此协议将海湾各国之间的海上敌对行为列为非法。“海盗海

岸”的微型国家也因其与英国以及彼此之间达成的协议，而被称为停战诸国。

该协议也标志着19世纪“英治和平”（*Pax Britannicus*）的开端，整个波斯湾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保护领地。通过与独立酋长国统治者达成的一系列双边协议，英国人深化了对波斯湾的控制。1880年，巴林酋长与英国达成了一项协议，保证“在未经英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避免与英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或政府开展谈判或签署任何性质的协议”，从而将本国的对外关系实质上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随后英国又与其他波斯湾酋长国达成了类似的协议。[2]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甚至更进一步从海湾统治者那里获得“不让渡契约”，即后者保证“除英国政府外，不向第三方割让、出售、抵押或允许占领其领土的任何部分”。[3]自19世纪70年代起，奥斯曼帝国就寻求拓展对波斯湾地区的主权控制。英国采取上述措施，正是为了确保英国对这一通往其印度殖民帝国的战略性海路的主导权，免受奥斯曼帝国或任何欧洲对手的威胁。1899年和1916年，科威特和卡塔尔为抵制奥斯曼扩张主义又分别寻求英国保护，从而加入了英国在海湾的“受保护领地”。

20世纪，英国对石油日益增长的依赖进一步提升了波斯湾的重要性。随着1907年皇家海军由燃煤转向燃油，波斯湾的阿拉伯酋长国在英帝国的布局中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战略角色。1913年，当时担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要求下议院正视英国对石油的全新依赖局面。他解释道：“1907年，完全依赖石油的第一支远洋驱逐舰船队正式建立；自那之后的每一年，都有一支新的‘仅限石油’的驱逐舰船队建造完毕。”他指出，至1913年皇家海军中已有约100艘石油动力的新型船舰。[4]这使得英国在波斯湾的首要关切由贸易和与印度间的通信，拓展至对新的石油战略利益的考虑。

1908年5月，波斯湾地区的首个重要储油区在伊朗中部被发现。地质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也能发掘出体量可供出口的石油储藏。英国开始与海湾酋长国缔结一系列涉及独家石油开发权的协议。1913年10月，科威特统治者给予英国特许权，保证只允许英王政府批准的个人或公司在其境内勘探石油。1914年5月14日，英国与巴林统治者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至一战前夕，石油勘探以及商业和帝国通

信等因素，已使波斯湾成为对大英帝国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区域。1915年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就将“我们在波斯湾的特殊和首要地位”界定为“我国在东方政策的一条核心原则”。[5]

1913年，一个新的阿拉伯国家突然在“英治和平”下的波斯湾地区崛起。沙特家族（其18世纪的联盟曾在自伊拉克至麦加、麦地那两圣城的广大区域对奥斯曼统治构成挑战，直至1818年被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击败）重建了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后人的盟友关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沙特-瓦哈比联盟。联盟首领是一位名叫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赫曼·费萨尔·阿勒·沙特（Abd al-Aziz ibn Abd al-Rahman al-Faysal Al Sa‘ud，1880—1953）的富有个人魅力的年轻领袖，在西方更多以伊本·沙特（Ibn Saud）的名字闻名。

1902年，伊本·沙特的势力开始崛起，当时他率领其追随者战胜了多年的宿敌拉希迪（Rashidi）部族，从而控制了阿拉比亚中部的绿洲城市利雅德。他的战斗部队以伊赫万（阿拉伯语意为“兄弟”）之名闻名，是一群寻求将瓦哈比主义对伊斯兰的严厉阐释强加给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狂热信徒。每当他们征服一个拒绝其宗教信仰的城镇，他们还可通过宗教层面许可的劫掠行为赢得回报。信仰与物质回报的刺激相结合，使得伊赫万成为半岛上最强大的战斗力量。伊本·沙特宣布利雅德为其首都。在之后的11年内，通过对伊赫万的有效部署，伊本·沙特将其控制下的领土由阿拉比亚内陆拓展至波斯湾地区。

1913年，伊本·沙特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征服了阿拉比亚东部的哈萨地区。1871年，奥斯曼政府曾试图将这一孤立的阿拉比亚地区（即今天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纳入帝国版图，以便拓展其对波斯湾的影响，这一设想显然受到英国人的坚决抵制。至1913年，奥斯曼人几乎已完全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行政管理，沙特人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了该地区主要城镇侯夫弗，进而成为阿拉伯海湾诸国中新的主导性力量。

面对这一新崛起的、强大的海湾统治者，1915年底英国与伊本·沙特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承认了伊本·沙特的领导权，并将其控制下的阿拉比亚中部和东部纳入英国的保护范围；作为回报，沙特家族承诺在未经英国许可的情况下，不与其他外部势力签订条约或向其出售领土，并

避免针对其他海湾国家的一切侵略行动。该协议在本质上将伊本·沙特的领土变成了又一个休战国家。签订该协议后，英国向伊本·沙特支付了2万英镑，并给予5000英镑的月俸和大量的步枪与机关枪，这批武器被设想用来对付一战中站在德国一方反对英国的奥斯曼人及其阿拉伯盟友。

然而，伊本·沙特无意在阿拉比亚对抗奥斯曼人，相反他利用英国人的资金和武器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些目标越来越指向伊斯兰教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所在的红海省份希贾兹。在这一地区，沙特人的野心与英国人的另一个盟友——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发生了冲突，后者在1915年秋已与英国人达成了战时盟友关系。与伊本·沙特相似，谢里夫侯赛因也希望统治整个阿拉比亚；通过在1916年6月发动反对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后者希望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在阿拉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实现其野心。然而，由于在与奥斯曼人的战斗中战线拉得过长——其部队分布在一条长达1300千米（810英里）的荒漠地带，谢里夫侯赛因的家乡希贾兹省反而容易受到伊本·沙特部队的攻击。广阔的阿拉伯半岛也难以容下两位统治者的雄心，1916—1918年，平衡开始向有利于伊本·沙特的方向倾斜。

随着阿拉伯大起义的爆发，当谢里夫侯赛因于1916年10月宣布自己为“阿拉伯诸国的国王”之时，沙特人与哈希姆人之间的冲突已变得不可避免。即便是曾许诺他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英国盟友，在麦加谢里夫之外也只愿承认他为“希贾兹的国王”。伊本·沙特不太可能认可这位自封的侯赛因国王之主张的有效性。

整个一战期间，英国一直尝试在两个阿拉伯盟友之间维持和平，将他们的精力集中到同奥斯曼人作战上。然而，就在奥斯曼人战败前几个月，沙特人-哈希姆人围绕支配权的争斗最终爆发为公开冲突。两位沙漠君主间一批引人注目的未公开的通信反映了这种竞争关系，两人的火气也随着1918年夏日的热气而上涨。

当哈希姆人的部队在希贾兹铁路沿线全力与奥斯曼人作战之际，侯赛因国王越来越关注于一些报告，这些报告称沙特统治者正向那些最近宣誓效忠瓦哈比事业的部落发放武器。毫无疑问，这些正是英国人之前

提供给伊本·沙特的武器，哈希姆统治者则越来越担心这些英国武器会被用来对付自己的部队。1918年2月，侯赛因致信责难伊本·沙特，在信中写道："难道［瓦哈比］部落民众相信真主会认为他们对伊斯兰民众的敌意行为是无辜的？伊斯兰民众只信任真主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侯赛因警告他的对手，武装穆斯林来对抗穆斯林同胞是一种违背真主的宗教的做法。[6]

伊本·沙特被侯赛因的信激怒了。毕竟，纳季德发生的一切与麦加的谢里夫毫无关系。而伊本·沙特的回应在1918年5月再次引发了谢里夫侯赛因的激烈反应。如果伊本·沙特的行为还仅限于阿拉比亚中部的纳季德省，哈希姆人可能也不会如此担忧。但沙特统治者近期却赢得了侯赛因国王的一位总督的忠诚，这人名叫哈立德·本·鲁瓦伊（Khalid ibn Luway），掌管着纳季德-希贾兹边境的绿洲城镇胡尔迈。对此，老国王抱怨道："没有必要欺骗哈立德·本·鲁瓦伊，或对他使用花招和伎俩。"[7]

绿洲城市胡尔迈位于两位阿拉伯敌对统治者领土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人口约5000人，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定居点。尽管曾身为麦加谢里夫的臣属，胡尔迈的统治者哈立德却在1918年宣布接受瓦哈比派的教义，将其城镇置于伊本·沙特的统治之下，同时将该地区的税款由麦加转向沙特人的国库。侯赛因国王之子埃米尔阿卜杜拉（Amir Abdullah）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哈立德"滥杀无辜，甚至将自己的兄弟处死，仅因后者不接受他的宗教信条。他长期迫害任何不追随瓦哈比运动的亲哈希姆部落"。[8]侯赛因国王试图劝说这位任性的地方长官浪子回头，但无济于事。

胡尔迈争议引发了哈希姆人和沙特人之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918年6月侯赛因国王派遣了一支超过2600人的步兵和骑兵部队，希望重新夺回胡尔迈，但却发现该城镇得到伊本·沙特麾下伊赫万战士的增援。[9]哈希姆部队在两场独立的战役中惨遭沙特人的杀戮。英国人担心其阿拉伯盟友在奥斯曼人被击败前就忙于自相残杀，急忙向伊本·沙特施压，要求后者与侯赛因国王和解。

受到其战士在胡尔迈胜利的鼓舞，1918年8月伊本·沙特向侯赛因发出了一封居高临下的信件。沙特领导人利用头衔称谓来确认地理上的势

力范围：在自称“纳季德、哈萨、卡提夫及其属地的埃米尔”的同时，伊本·沙特仅承认谢里夫侯赛因为“麦加的埃米尔”，既不是像谢里夫侯赛因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称其为“阿拉伯土地的国王”，甚至也不是英国所承认的“希贾兹的国王”。他在信中有意完全避免提及希贾兹，仿佛这一广阔的红海省份的主权归属尚有待确认。

伊本·沙特承认收到了侯赛因国王5月7日的来信，但对信件内容有所保留，因为“您的信件中所表达的某些内容并不合适”。他同样承认英国人施压让他们弥合分歧，对此他解释说，反抗奥斯曼人的战役正达到一个关键阶段，因而“争端对所有人都是有害的”。但他不可能对哈希姆人之前的挑衅行为无动于衷。为此，他写道：“毫无疑问，阁下将怀疑我在胡尔迈人的事务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但他坚称哈希姆人自己应为胡尔迈长官的叛变以及该地居民追寻瓦哈比派事业而负责。“我一直对他们保持约束，”他继续写道，“直到你的军队两次前来讨伐他们。”这是指哈希姆人在胡尔迈的两次战斗。“而后真主所先定的就发生了”，他得意地暗指沙特人击败哈希姆军队的事实。[10]

展望未来，伊本·沙特提议基于现状与哈希姆人达成休战：胡尔迈将仍由沙特人控制；侯赛因国王将致信该绿洲城镇的长官，向他确认哈希姆人与沙特人之间并无分歧；伊本·沙特和侯赛因国王将在其追随者之间维护和平，保证纳季德和希贾兹的部落遵守这一休战。事后来看，这已经是侯赛因能从沙特人那里取得的最佳条件了，即在相互承认领土和边境的前提下，哈希姆人则仍可维持对希贾兹的控制。

侯赛因国王甚至没有考虑伊本·沙特开出的条件：他将信件原封不动地送回，告诉信使：“伊本·沙特无权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我们也无权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与寻求休战相反，1918年8月侯赛因国王又派遣了一支部队前往胡尔迈，试图恢复对该绿洲的主权。他指派自己最信任的指挥官之一谢里夫沙基尔·本·宰德（Sharif Shakir bin Zayd）来指挥这次远征，并向后者担保他已经调动了足够多的骆驼和补给，“以便你能大展身手”。[11]然而，沙基尔的远征军甚至还没有到达双方争议的绿洲就被沙特人的军队轻松击退了。

屡次败给伊本·沙特的军队让侯赛因国王恼羞成怒，他命自己的儿子

埃米尔阿卜杜拉再次领军讨伐胡尔迈。阿卜杜拉本人并不赞成这样一场战争。在1919年1月守城将领最终投降之前，阿卜杜拉和他的士兵一直在围困奥斯曼人在麦地那的驻防部队。经过多年与奥斯曼人的战斗，他的部队已经身心俱疲。此外，他也认识到瓦哈比士兵是一群狂热的武士。他曾写道："瓦哈比派的战士急切地想进入天堂。根据他的信仰，如果他（在战场上）被杀，他就能永居其中。"[12]但阿卜杜拉又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1919年5月，他接受了任务，率部出发与瓦哈比人作战。

在与沙特人的最后这场战役中，哈希姆军队最初取得了部分胜利。在向胡尔迈进发的途中，阿卜杜拉于1919年5月占领了之前已宣誓效忠伊本·沙特的绿洲城镇图拉巴。阿卜杜拉非但没有寻求绿洲内3000名居民的善意，反而允许其部下洗劫这座反叛的城镇。毫无疑问，他意图拿图拉巴作为例子，警告其他边境绿洲不要倒向沙特人。然而，阿卜杜拉部下的行为反而强化了图拉巴居民对伊本·沙特的忠诚。当埃米尔阿卜杜拉还在图拉巴之时，城中某些居民已经发出消息向伊本·沙特求援。阿卜杜拉则从图拉巴致信沙特领导人，希望能够借对这座绿洲的征服，确保以更有利于哈希姆人的方式与伊本·沙特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沙特的战士们却无意与哈希姆人达成和解。鉴于之前已经击败了遭遇的每一支哈希姆部队，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逆转埃米尔阿卜杜拉的军队。约4000名伊赫万战士从三面包围了图拉巴，他们在黎明时刻向阿卜杜拉的阵地发起攻击，几乎完全歼灭了后者的部队。根据阿卜杜拉的叙述，整支部队1350名战士中仅有153人保全了性命。"我本人能幸免于难也是一个奇迹。"他后来回忆道。阿卜杜拉和他的堂弟谢里夫沙基尔·本·宰德从帐篷的后面逃离了战场，但都负了伤。[13]

这场战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绿洲内的血腥屠杀。图拉巴战役表明瓦哈比人才是阿拉伯半岛上主导性的力量，而哈希姆人在希贾兹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埃米尔阿卜杜拉回忆道："那场战役后，进入了一个不安和焦虑的时期，焦虑的对象包括我们的运动、我们的国家乃至国王本人的命运。"事实上，他的父亲侯赛因国王似乎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回到总部后，我发现父亲身体欠佳且精神紧张，"阿卜杜拉写道，"他现在脾气很差，健忘而且多疑。他已经失去了他敏锐的反应速度和健全的判断力。"[14]

英国人也对战役的结果感到吃惊，很多英国人之前低估了伊本·沙特军队的战斗力。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沙特盟友压倒哈希姆盟友，从而打破他们在阿拉比亚精心布置的力量平衡。英国驻吉达的常驻代表（或英属印度政治局管理之下的首席殖民行政官）于1918年7月致信伊本·沙特，要求他立即撤离两绿洲城镇，在双方就边界纠纷达成一致前确保图拉巴、胡尔迈为中立区域。“如果你在收到来信后拒不撤退，”常驻代表警告道，“英王政府将默认之前与你达成的协议无效，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制止你的敌对行为。”[15]伊本·沙特遵循了英国人的要求，命令其部队撤回利雅德。

为恢复阿拉比亚的力量平衡，英国人同样需要与希贾兹的哈希姆人达成一项正式协议。当年谢里夫侯赛因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之间的通信曾建立某种战时盟友关系，但这并不构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如英国与海湾统治者包括伊本·沙特签署的那种。在缺少正式协议的情况下，英国没有理由保护其哈希姆盟友免遭沙特人的侵犯。在阿拉比亚，英国人情愿看到很多国家彼此制衡，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横跨红海和波斯湾的主导性力量的崛起。因此，将哈希姆人作为防范势力日长的沙特国家的缓冲力量，对维护大英帝国利益而言是一条便宜之计。

随着一战趋于尾声，英国政府急切地希望与侯赛因国王及其哈希姆家族达成一项正式的联盟条约。为此，他们专门派遣T.E.劳伦斯上校，即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与侯赛因展开会谈，劳伦斯在阿拉伯大起义期间曾充当英国与哈希姆家族之间的联络人。

1921年7—9月，劳伦斯劝说侯赛因国王签署一项协议，承认战后解决方案的新现实，但徒劳无获。侯赛因拒绝接受战后中东解决方案的几乎所有要点，认为这是英国对他本人承诺的背叛：他拒绝将其王国限定在希贾兹；反对将他的儿子费萨尔国王逐出大马士革，反对在叙利亚建立法国委任统治；拒绝英国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当时包括外约旦）的委任统治；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政策。1923年，英国人为达成协议做出最后一次努力，但愤愤不平的老国王仍然拒绝签字。结果，他恰恰在伊本·沙特开始对希贾兹的军事征服前失去了英国的保护。

1924年7月，伊本·沙特在利雅德召集部下指挥官，开始计划对希贾

兹的征服。他们首先向靠近麦加的山城塔伊夫（Taif）发起攻击，以便试探英国的反应。9月，伊赫万占领塔伊夫，并洗劫该城达3天之久。塔伊夫的城镇居民抵抗了瓦哈比人的进攻，后者则十分残暴地加以回应：据估计约400人在战斗中被杀，很多人逃离该城。塔伊夫的陷落在整个希贾兹地区引发了一波震动。全省的显贵代表在吉达举行集会，要求侯赛因国王退位。他们认为伊本·沙特袭击希贾兹是出于对侯赛因国王的敌意，因而更换君主可能会使沙特改变策略。10月6日，老迈的国王顺从了人民的意愿，宣布他的儿子阿里继任为国王，随后流亡海外。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让伊本·沙特停下前进的脚步。

1924年10月中旬，伊赫万占领了圣城麦加。他们未受到任何抵抗，也避免了对城内居民采取任何暴力措施。伊本·沙特派使者试探英国对其占领塔伊夫、麦加的反应，在确认后者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后，才继续进发以完成对希贾兹的征服。1925年1月，他包围了吉达港和圣城麦地那，哈希姆人坚守了近一整年。1925年12月22日，阿里国王将其王国移交给伊本·沙特，随后跟随其父亲开始流亡生涯。

征服希贾兹后，伊本·沙特被拥护为“纳季德素丹兼希贾兹国王”，其控制下的广阔领土使伊本·沙特不同于停战诸国的其他海湾统治者。英国承认了其地位的变化，于1927年与阿卜杜·阿齐兹国王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承认其完全的独立与主权，且不含有休战诸国所接受的关于对外关系的任何限制。伊本·沙特继续扩张其治下的领土，并于1932年将其王国更名为沙特阿拉伯。

伊本·沙特不仅在阿拉伯半岛绝大多数领土上建立了王权，而且在不受英帝国任何形式干涉的情况下维持了独立地位。在这一方面，他也受益于英国人的一个重大误判：他们不相信在沙特阿拉伯领土内有任何石油。

*

流亡国外的希贾兹国王侯赛因有理由认为自己被英国人背叛了：英国人非但没有履行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对哈希姆家族的书面承诺，当法国人1920年将他的儿子费萨尔国王逐出叙利亚，沙特人1925年将他的长子阿里国王逐出希贾兹时，也同样袖手旁观。

对英国而言，他们对自己履行对战时盟友承诺的情况也并不完全满意，因而也在寻找某种方式来部分地补偿他们的许诺，尽管做不到完全补偿。正如时任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1921年6月向下议院所解释的，“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外约旦都强烈倾向于推行我所称的‘谢里夫方案’，埃米尔费萨尔目前正前往前一地区，而后一地区已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控制之下”。[16]通过将侯赛因的儿子扶上英国托管地的王位，丘吉尔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补偿英国对哈希姆家族未竟承诺的同时，为英国在其阿拉伯领地提供忠诚可靠的统治者。

英国在中东的所有帝国领地中，外约旦被证明是最容易统治的。然而，外约旦这一新国家的开端却并不顺利。外约旦领土面积大致相当于印第安纳州或匈牙利，但人口仅约为35万人，主要由城镇居民、居住在俯瞰约旦河谷的高地上的农村居民以及迁徙于沙漠与荒漠之间的游牧部落民构成。该地区自给自足的经济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产品为基础的，这些产品仅能为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提供适度的税基。外约旦的政治也相当原始：整个国家分为不同的地区，每一地区有本地的领袖集团，其政治视野是非常地域化的。每年仅15万英镑的英国津贴在这一地区就大有作用。

鉴于其自身条件，英国人起初并未将外约旦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块领土最初是作为巴勒斯坦托管地的一部分被授予英国的，而将外约旦从巴勒斯坦中分离出来的决定成型于1923年，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英国希望将《贝尔福宣言》所承诺的一个犹太民族家园限定在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上；另一方面，英国希望将埃米尔阿卜杜拉的领土野心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1920年11月，埃米尔阿卜杜拉不请自来地首次进入外约旦地区。他身边围绕着一群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是来自他兄弟费萨尔在大马士革那个已不复存在的阿拉伯王国的政治难民。阿卜杜拉宣称他将率领阿拉伯志愿军从法国人手中解放叙利亚，恢复其兄弟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合法王位（阿卜杜拉则觊觎伊拉克的王位）。英国政府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外约旦成为针对法国在叙利亚委任统治的敌对活动的发射台。英国

官员急于在事态完全失控之前处理这一情况。

1921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和T.E.劳伦斯邀请埃米尔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谈，从这一刻起他们提升了后者在大英帝国整个中东地区方案中的地位。费萨尔永远不会再返回大马士革，后者已牢牢地被法国人控制；相反，他将成为伊拉克的国王。他们能向阿卜杜拉提供的，最多就是扶植他成为一个全新的外约旦国的首脑。作为一个内陆国（当时外约旦领土尚不包括红海港口亚喀巴），外约旦显然无法满足阿卜杜拉的野心，但丘吉尔提议说如果阿卜杜拉能够在外约旦维持和平，并与法国人建立良好关系，后者在未来的某天可能会邀请他代他们统治大马士革。[17]尽管成功的希望不大，但阿卜杜拉还是同意了上述提议，"谢里夫方案"在外约旦变为英帝国的现实。

当1921年埃米尔阿卜杜拉在外约旦建立首任政府之时，他大量依赖那些曾在大马士革为其胞弟费萨尔效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英国人和外约旦本地居民同样都厌恶阿卜杜拉的这批随从：英国人将之视为煽动叛乱、惹是生非的破坏分子，他们针对驻叙法国人的袭击让人头疼不已；对外约旦人来说，这些后来组建新政党独立（*Istiqlal*）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代表着一群外来精英，这些人以本地居民的利益为代价垄断了政府和官僚机构。

独立党人在外约旦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是一位名叫奥代·古苏斯（Awda al-Qusus，1877—1943）的本地法官。奥代是一名来自外约旦南部城镇卡拉克的基督徒，一战前曾在奥斯曼司法系统中任职。他能说一口熟练的土耳其语，又从卫理公会传教士那里学会了少量英语，曾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到处旅行，与高级政府官员合作。奥代坚信埃米尔阿卜杜拉在组建政府时应当选用像他本人那样真正关心这个新国家福祉的外约旦本地人，他对独立党人最大的反对意见在于后者只关心解放大马士革。古苏斯嘲讽地评论说，独立党宪章第一条就是"为改善叙利亚的状况牺牲外约旦及其人民"。[18]当然，他在独立党手中所遭受的迫害只会进一步强化这个观点。

古苏斯在其为本地报纸撰写的文章中公开批评独立党人。他指控政府的大臣们腐败，在阿卜杜拉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挪用国库资金。当

地的外约旦民众拒绝向一个被视为挥霍本国有限资金的“外来”政府纳税，以此回应法官的批评。1921年6月，外约旦北部村庄的居民宣布罢税，并迅速升级为一场严重的叛乱。英国人被迫动用皇家空军的飞机进行轰炸，以便平息叛乱。

1921年抗税反叛后，埃米尔阿卜杜拉政府和外约旦本地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古苏斯定期与一群从事专业技术职业的城镇居民举行会面，谴责阿卜杜拉政府中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这些外约旦的异议人士就政府管理不善的情况交换意见，公开讨论改革的必要性。当1923年夏阿卜杜拉面临一次大规模的部落叛乱之时，独立党人指控古苏斯和城镇异议人士煽动了叛乱，并催促阿卜杜拉镇压他们的国内反对者。1923年9月6日夜里，警察撞开了奥代·古苏斯法官的家门，将他带走。

之后的7个月里，古苏斯都没能再回家。埃米尔下令剥夺了他的公职，并将其流放至邻近的希贾兹王国（当时还在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之下）。和他一起被流放的还有4位外约旦本地居民：一位军官、一个切尔克斯人、一位穆斯林宗教人士，还有一位名叫穆斯塔法·瓦合比·泰勒（Mustafa Wahbi al-Tall）的农村显贵，泰勒未来将被公认为外约旦的民族诗人。5人被指控组建了一个旨在推翻埃米尔阿卜杜拉的政府并以外约旦本地人取而代之的“秘密社团”。他们还被诬告与阿德旺（Adwan）部落的头领结盟，鼓励后者发动部落叛乱以服务于他们的政变。最终的罪名是叛国罪，这项罪名的严重性也体现在古苏斯及其同伴所遭受的残酷待遇之中。

当这5个人到达安曼火车站、搭上流亡的火车之时，他们还斗志昂扬。诗人穆斯塔法·瓦合比唱着民族主义的歌曲，挑动民众的反抗情绪。“在真主和历史之前，归来！”他大喊道。这几位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将面临的严峻考验。他们到达马安之后，被送进了古堡地下室的一间阴臭潮湿的牢房。马安现为约旦的一座城市，当时只是希贾兹边境地区的一个小镇。此情此景之下，古苏斯也不禁抓住他的警卫大吼道：“你们不怕神的报应吗？这种地方牲口都没法住，何况是人！”

警卫及其长官也感到窘迫，他们知道这些囚犯是一些体面的人，所有的社会和文化规范都要求他们善待委托给他们照料的人。但他们又是

军人，不得不服从命令。结果，他们对犯人的态度在显著的善意和极大的残酷之间剧烈摇摆：好的时候，可以为他们寻找干净的床铺，提供茶和伴侣；坏的时候，为让他们在政府编造的罪状上画押不惜动用酷刑。那些下令刑讯逼供的官员当然来自埃米尔阿卜杜拉的外国随从。古苏斯和他的同伴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正式起诉“密谋反对埃米尔阁下的政府，意图通过武装叛变推翻政府”。[19]随后他们被送进了希贾兹的监狱，先是在亚喀巴，随后是在吉达。

1924年3月，侯赛因国王自称哈里发而宣布大赦，这些流放者才被允许返回祖国。作为根除奥斯曼素丹影响的最后举措，新任土耳其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不久前刚刚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已经从希贾兹流亡海外的侯赛因国王迅速为哈希姆家族夺取了这一尊贵的头衔。作为国家重要场合的惯例，释放囚犯也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牢狱的考验终于告一段落，5名犯人作为头等舱贵宾被送上一艘由吉达开往埃及港口苏伊士的汽轮，随后启程前往外约旦。古苏斯向侯赛因国王发了一封电报致谢，并祝贺后者（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启用哈里发的称谓。他迅速收到这位流亡君主的回电，后者祝福古苏斯平安、迅速地返回祖国，因为他“正需要像您这样对祖国怀有热爱和忠诚、真正忠于伟大的哈希姆家族的人士”。老国王究竟是语含讥讽，还是温和地劝勉这些政治犯捐弃前嫌，以便在未来表现得更加忠诚呢？事实真相是，古苏斯之前从未对埃米尔阿卜杜拉表示不忠，他反对的仅仅是被埃米尔置于外约旦本地人之上、把持着政府要职的独立党人。

奥代·古苏斯可能不知道，英国殖民当局和他怀有同样的忧虑。古苏斯从希贾兹返回约旦后不久，英国驻安曼常驻代表查尔斯·考克斯（Charles Cox）中校就邀请他来访。考克斯让这位法官解释了自己被捕入狱的原因，表示认同他对埃米尔阿卜杜拉政府的观点。考克斯对他们的会谈做了详细记录，向古苏斯致谢，并亲自将他送出官邸。

1924年8月，考克斯向埃米尔阿卜杜拉转交了一份来自英国驻巴勒斯坦执行高级专员吉尔伯特·克莱顿爵士（Sir Gilbert Clayton）的最后通牒。在这封信中，克莱顿警告阿卜杜拉，英国政府对约旦当局“在财政方面的违规操作、毫无节制的挥霍”以及允许外约旦成为其邻国叙利亚动

荡焦点的做法“深感不满”；要求阿卜杜拉以书面的形式承诺对其政府进行改革的6项举措，其中第一项就是在5天之内驱逐独立党的领导人物。[20]阿卜杜拉根本不敢拒绝，因为为支撑这一最后通牒，英国人已经向安曼派遣了400名骑兵，向北部城镇伊尔比德（Irbid）派遣了300名士兵。担心英国人会像扶植自己上台那样迅速赶自己下台，埃米尔阿卜杜拉签署了这份最后通牒。

在这次对抗之后，埃米尔阿卜杜拉驱逐了“不想要的”独立党人，改革了政府财政，吸收外约旦本地人进入其行政机构。奥代·古苏斯重新进入外约旦司法机构中任职，1931年升至总检察长的职位。一旦决定与外约旦的精英共命运，埃米尔阿卜杜拉很快便取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忠诚。直到1946年独立，外约旦一直是保持和平、稳定的殖民地典范，对英国纳税人的负担也极其轻微。

*

尽管外约旦是英国中东领地中最易管理的国家，但在一段时期内伊拉克才被视为最成功的托管地。1921年费萨尔国王被扶植上台，1924年选举产生了制宪会议，一份调控英、伊两国关系的条约也在同年晚些时候得到批准。至1930年，英国在伊拉克已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立宪制君主政体，其作为托管国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两国重新商谈了一项新协议，也为伊拉克在1932年的独立铺平了道路。国联承认了伊拉克的独立，并批准这一新国家加入其行列，伊拉克也成为在国联26年历史中转变为正式成员国的唯一一个被托管国。至此，伊拉克成为英法统治下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羡慕的对象，其成就也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者奋斗的目标：独立地位以及国联成员国身份。

在英国引领年轻的伊拉克王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一成功的表象之后，隐藏着一番截然不同的现实。很多伊拉克人从未接受英国在他们国家的地位，他们的反抗并未随1920年起义失败而结束，而是继续困扰着英国在伊拉克的计划，直至委任统治结束。尽管费萨尔在很多方面是一位受欢迎的国王，但对英国人的依赖削弱了他本人在国内的地位。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将费萨尔视为英国影响的延伸，在谴责其殖民主义主人的同时，也对国王提出严厉的批评。

1921年6月费萨尔抵达伊拉克后，英国人开始全力将他们的候选人扶植上王位。一些本地竞争者也想加入竞选，但都遭遇了英国人的强硬抵制。一位觊觎王位的巴士拉名流赛义德塔里卜·纳基卜（Sayyid Talib al-Naqib）仅仅与英国高级专员的妻子考克斯女士共进了一杯茶，在回家的路上就遭到逮捕，随后被流放至锡兰。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及其属下为费萨尔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巡游，以便后者能在关于伊拉克王位候选人的全国公投之前，走访伊拉克全国的城镇和部落。据各方面的记述，费萨尔很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遍访全国各地，会见国内各社群代表并赢取了他们的忠诚。即便没有英国的干预，也许他也能赢得大多数伊拉克人的支持进而成为他们的国王，但英国人却做得滴水不漏。英国驻巴格达的东方秘书格特鲁德·贝尔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她“再也不会参与创立国王的事情了，因为这种事实在费心劳神”。[21]

1921年8月23日，费萨尔被加冕为伊拉克国王。考虑到巴格达夏日惊人的酷热，加冕仪式被订在一大清早最凉爽的时间举行。超过1500名客人受邀参加加冕典礼。一位来自摩苏尔的显贵苏莱曼·法伊迪（Sulayman al-Faydi）描绘了加冕典礼的“巨大排场……上千名客人参加观礼，通往大典的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22]费萨尔站在礼台中央，两侧围绕着英国高级专员和伊拉克内阁成员。内阁秘书起身宣读了高级专员珀西爵士关于公投结果的声明，费萨尔以96%的得票率当选国王。在场的嘉宾以及显要人物一齐起身向费萨尔国王致敬，同时伴随着《天佑女王》的旋律，伊拉克国旗被缓缓升起。当时，伊拉克人尚未谱写好自己的国歌。[23]英国国歌的旋律也仅能强化费萨尔是英国人选择的国王这样一种信念，而他确实也是如此。

费萨尔和他属下臣民的蜜月期是短暂的。大多数伊拉克人相信费萨尔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期待着他领导国家摆脱英国统治。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费萨尔加冕之际，还是巴格达一座什叶派神学院学生的穆罕默德·马赫迪·古拜（Muhammad Mahdi Kubba），在其回忆录中捕捉到了当时民众的心情。他解释说，英国人“收买了埃米尔费萨尔，将他扶植为伊拉克国王，然后责成他来执行他们的政策。最初，伊拉克人欢迎费萨

尔的登基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作为政府首脑能为国家独立和主权开辟一个新的时代”。的确，一些重要显贵是以费萨尔维护伊拉克的主权和独立为条件，才向后者宣誓效忠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宗教学者、同时身兼古拜所在的巴格达神学院的阿亚图拉马赫迪·赫里希（Mahdi al-Khalisi），正是这样一位心存疑虑者古拜所在的巴格达神学院院长的阿亚图拉。在学校为欢迎费萨尔国王而举行的集会上，古拜亲眼见证了赫里希对国王的效忠承诺：“赫里希为国王祷告……然后拉住他的手说道：‘我们效忠于您，伊拉克的国王，只要您公正地进行统治、政府保持宪政议会制度，并且不将伊拉克卷入任何外国承诺。’”[24]费萨尔国王承诺说将尽力而为，表示他来到伊拉克就是为了服务于伊拉克人民。费萨尔完全清楚他不可能在独立于英国的情况下统治伊拉克：正如国联所规定的那样，他必须在英国的监护下进行统治，直至后者认为时机成熟从而承认伊拉克独立。此外，作为一名外来者，他在伊拉克的盟友仅限于在阿拉伯大起义以及短命的叙利亚王国期间一直追随于他的少数几名军官。因此，在成功巩固自己的位置之前，为了能生存下去，费萨尔尚需要英国的支持。对费萨尔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英国的依赖削弱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对他的支持；反讽的是，这种依赖也削弱了他赢取本国人民忠诚的能力，直到1933年他去世为止。

费萨尔的困境在1922年开始显露出来。当时英国起草了一份协议来限定其在伊拉克的地位。这份《英伊协议》丝毫不掩饰英国在经济、外交、法律领域对（伊拉克）哈希姆王国的主导地位。协议规定：“伊拉克国王同意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接受英王政府通过其高级专员在一切涉及国际问题、财政义务及英王政府利益的重要议题方面所提出的建议。”[25]最能揭示英国人意图的是协议的期限——20年，在那之后将回顾协议的履行情况，根据“签订协议各方”的观点决定协议是否延长或终止。这套方案显然旨在寻求英国长期殖民统治，而非伊拉克独立。

协议草案在伊拉克国内遭到广泛谴责。甚至费萨尔国王本人也谨慎地鼓励人们反对该协议，一方面是因为协议对他作为国王的权力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他本人远离英国的帝国政策。一些政府大臣则辞职以示抗议。内阁不愿为这样一份有争议的文件承担责任，坚持要求召开一次立宪会议来批准该协议。英国人同意举行选举，但同样希望

保证选举产生的议会能顺利批准他们的协议。民族主义政治家认识到立宪会议只能成为批准这项维持英国长期控制的协议的橡皮图章，因而既反对协议，又反对选举。

费萨尔的公信力因协议危机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在另一次神学院学生和教师的集会上，阿亚图拉赫里希（Ayatollah al-Khalisi）表示："我们对费萨尔当选伊拉克国王宣誓效忠是有条件的。"阿亚图拉拖长了声音强调："但他并没有满足这些条件，因此，我们或者伊拉克人民也不再对他负有忠诚的义务。"赫里希与民族主义反对派站在了一起，开始发布"法特瓦"（伊斯兰司法判例），宣布协议无效，并禁止所有人参与立宪议会选举，声称参与选举"等同于一种反宗教的行为，是协助不信道者统治穆斯林的一个步骤"。[26]宗教人士与世俗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了一场针对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的抵制运动。

最终，英国人被迫诉诸武力来强加他们的协议：英国当局宣布禁止一切示威活动，赫里希及其反对派领袖遭到逮捕和流放，政府出动皇家空军轰炸了幼发拉底河中游举行抗议活动的部落民起义者。反对派得到压制后，英国当局继续举行选举。尽管有法特瓦和民族主义者的抵制，选举仍然顺利进行。1924年3月，立宪会议正式召开以讨论批准协议的议题。

1924年3—10月，立宪会议多次举行，并就协议条款展开热烈的讨论。最终，协议以微弱的优势得到批准。尽管在伊拉克民众中仍然非常不得人心，但这一协议确实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议会批准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和一部选举法，从而为国内的君主立宪制和多党制民主奠定了基础。然而，英国人确保协议通过的方式，使得立宪议会制政府的机构蒙上了与帝国主子共谋的污点，最终将削弱伊拉克的民主。在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看来，新国家并非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个将伊拉克人置于英国统治之下的制度工具。

假如英国人认为《英伊协议》通过后一切就会运转顺利，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实际上，2003年英、美两国的战争策划者本来可以从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的经验中吸取很多相关教训的。

在这个由三个差异巨大的奥斯曼行省合并而成的全新伊拉克国家中，不同地区和社群间的裂痕很快浮现出来。问题立即反映在组建作为独立主权国家核心机构之一的国民军队的过程中。费萨尔国王身边围绕的是一些自阿拉伯大起义时期就在他身边效力的军人，这些人热切地期望在伊拉克建立一支军队，通过国民军役服务将库尔德人、逊尼派、什叶派团结在一起。然而，面对什叶派和库尔德社群的积极反对，这个计划很快便告搁浅。这两个社群反对强制兵役制，正如他们反对在其看来给予阿拉伯逊尼派少数群体超出其人口比例权力的任何政府倡议。

尤其是库尔德人，他们对伊拉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认同构成一个特殊挑战。与（阿拉伯）逊尼派和什叶派不同，库尔德人在族裔层面并非阿拉伯人，他们不满于政府将伊拉克塑造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努力，认为这一做法否认了库尔德人的独立族裔认同。一些库尔德人并不抵制政府所声称的阿拉伯属性，但同时将此作为要求在库尔德人占绝对多数的伊拉克北部地区实现更大自治权的一个借口。

某些时候，唯一能将伊拉克民众团结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对英国人存在的反对。费萨尔国王已经对其臣民感到绝望。1933年去世前，这位伊拉克首任国王在一封绝密备忘录中评论道：“我要满怀悲痛地承认，至今为止还没有什么伊拉克人民，只有无法想象的人群的集合；这些人没有任何爱国理想，却被灌输了宗教传统和荒谬的观念；没有任何共同的联系纽带，听信谗言，倾向混乱，随时准备起来反抗一切形式的政府。”[27]

对英国人来说，维护伊拉克国内秩序的代价很快就超过了维持英国委任统治的利益。1930年，英国重估了他们在伊拉克的地位：通过1928年《红线协议》，他们已然确保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利益，该协议赋予英国在土耳其（伊拉克）石油公司47.5%的股份，而法、美两国分别只获得23.75%；他们已在伊拉克建立起一个友好而软弱的政府，在一位“可靠的”国王领导之下，来保护英国的利益。驻伊英国官员越来越确信通过协议而非继续直接统治，他们能更好地确保其战略利益。

1930年6月，英、伊政府签署了一项新协议以取代争议重重的1922年《英伊协议》。这一新协议规定：英国大使将在外国驻伊代表中享有首要地位；皇家空军将保留在伊拉克的两个空军基地；英国部队也将保

留在伊拉克的过境权；伊拉克军方在训练和武器弹药补给方面，则将继续依赖英国。尽管仍然不是完全的独立，但该协议已经足以确保伊拉克加入国联。新协议同样满足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要求，后者希望将协议作为实现独立的第一步。

1930年《特惠同盟协议》批准后，英国人和伊拉克人一致同意终止委任统治状态。1932年10月3日，伊拉克加入国联，被认可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然而，这仍是一种模糊的独立状态，因为英国文职和军事官员继续享有的广泛影响，与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并不相容。英国的这种非正式控制也将削弱哈希姆王朝的合法性，直至该王朝在1958年被最终推翻。

*

埃及民族主义者满怀艳羡地关注着伊拉克人取得的成就。尽管1930年《英伊协议》与1922年《英埃协议》（承认了埃及名义上的独立地位）并无本质差异，但伊拉克人已经确保英国提名其加入国联，那一仅对独立国家开放的俱乐部。这一成就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者衡量自身成功的标准。作为拥有最悠久民族主义运动传统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本应该成为领导（阿拉伯世界）摆脱欧洲殖民统治、实现独立的领路人，或者说，至少埃及政治精英是这样认为的。整个20世纪30年代，埃及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面临着摆脱英国统治、实现独立这一来自民众不断增长的压力。

两次大战之间，埃及达到了阿拉伯世界现代历史上多党制民主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程度：1923年宪法将政治多元主义、两院制立法机构的定期选举、男性普选权、新闻自由等制度引入了埃及，多个新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选举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投票，记者在工作中享有相当的自由。

然而，人们记住这个自由的时代更多的是因为其分裂的派系主义，而不是作为埃及政治的黄金时代。三个独立的权力集团在埃及争夺主导地位：英国人、国王以及通过议会行事的华夫脱党。三方之间的对抗与争夺对埃及政治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为保护其王权免遭议会的监督，福阿德国王（King Fuad，1917—1936年在位）对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

的敌意甚至超过了对英国人；华夫脱党则在反对英国人以争取独立与提升议会权力以制衡国王之间摇摆不定；英国人在华夫脱党当政时就联合国王削弱华夫脱党，在华夫脱党失势时则联合议会削弱国王。埃及政治精英则是一个暴躁易怒的群体，其内部争斗常常被国王和英国人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在脱离英国赢得独立方面始终进展缓慢就不足为奇了。

1924年，埃及人历史上第一次参加投票。1919年民族主义运动的英雄萨阿德·扎格卢勒（1859—1927）所领导的华夫脱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众议院所有席位中的90%。福阿德国王提名扎格卢勒为首相并邀请他组阁，后者于1924年3月正式就职。受到选举结果中所体现的民众支持的鼓舞，扎格卢勒立即与英国人就埃及的完全独立展开谈判，而完全独立地位仅受1922年协议中四个“保留要点”的限制：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英国在埃及驻军的权利；保留外国司法特权，即所谓治外法权；以及英国在苏丹的主导地位。

苏丹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埃及人首次征服苏丹。被马赫迪起义（1881—1885）驱逐出苏丹领土后，埃及人联合英国人在19世纪90年代末再次征服苏丹。1899年，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共治”的殖民主义新形式，从而允许英国在埃及人的协助下将苏丹纳入其殖民帝国。自那时起，英国和埃及就宣称苏丹事实上为自己所有。埃及民族主义者拒绝英国人在1922年协议中宣称的对苏丹的绝对决定权，要求维护“尼罗河谷的统一”。与四个“保留要点”中的其他议题相比，苏丹议题在埃及人和英国人之间引发了最严重的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在1924年11月19日酿成暴力行为：在英-埃联属苏丹总督李·斯塔克爵士（Sir Lee Stack）开车经过开罗市区时，一伙埃及民族主义者射杀了他。震惊之余，英国政府将这一暗杀事件作为确保其在苏丹目标的借口：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艾伦比勋爵（Lord Allenby）向埃及首相扎格卢勒递交了一份惩罚性的七点通牒，其中就包括对苏丹现状的调整。但扎格卢勒拒绝接受英国对苏丹的要求（撤出所有埃及士兵，允许尼罗河水用于一个英国农业项目的灌溉），艾伦比便命令苏丹政府无视埃及首相的反对而强制执行英国的要求。扎格卢勒已

无法维持其在国内的地位，最终于11月24日递交了辞呈。福阿德国王任命一位保皇党人组阁，解散议会，从而有效地将华夫脱党中的民族主义者边缘化。看着英国人和国王以华夫脱党为牺牲品各自提升其权力，扎格卢勒曾做出如下的著名评论："那几发射出的子弹瞄准的不是李·斯塔克爵士的胸膛，而是我的。"[28]事实上，扎格卢勒之后再未掌权，最终于1927年8月23日去世，享年68岁。扎格卢勒将被一些次要人物取代，他们的派系斗争和内斗也将削弱公众对其政治领袖的信心。

如果说华夫脱党的萨阿德·扎格卢勒是埃及自由时代的英雄，那么伊斯玛仪·西德基（Ismail Sidqi）就是同一时代的大反派。西德基是1919年赴巴黎和会的华夫脱代表团成员之一，返回埃及后却与扎格卢勒吵翻，最终被开除出党。他是授予埃及有限独立地位的1922年协议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扎格卢勒则一直坚决反对这一协议。西德基越是失去扎格卢勒的恩宠，就越是受到福阿德国王的尊敬。1930年，西德基和国王因一个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即摧毁新领袖穆斯塔法·纳哈斯（Mustafa al-Nahhas）领导下的华夫脱党。

在1929年一场摧枯拉朽式的选举胜利后，华夫脱党于1930年1月再次执政，在前一年的选举中，这个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全部235个议席中的212个。国王邀请纳哈斯组阁，基于在选举中被授予的权力，纳哈斯开始与英国外交大臣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就埃及独立的遥远梦想展开新一轮谈判。3月31日至5月8日，埃、英双方进行了广泛会谈，但双方在苏丹问题上陷入死结：英国坚持将关于埃及独立的讨论与苏丹的未来分离，埃及人则拒绝放弃苏丹版图的独立。英、埃谈判的失败为华夫脱党的政敌——国王和敌对政党呼吁重新组阁提供了一个机会。1930年6月，纳哈斯政府递交了辞呈。

1930年夏，国王和英国人达成了一致：政府必须置于"一双安全的手"的管理之下。西德基就是那位明显的候选人。

国王的侍从在西德基位于开罗的绅士俱乐部拜访了他，以试探他是否有意愿组建一个少数内阁。"我为国王陛下对我的信任感到万分荣幸，"西德基回答说，"但如果他真的要在这个关键时刻任命我，我希望

告知国王陛下，我的政策将从零开始，我将根据我对宪法以及政府稳定需要的理解来重组议会生活。”[29]

西德基的答复进一步加深了国王对他的欣赏。西德基已然公开表达过对自由民主的敌意，谴责“1923年宪法所赋予的议会独裁，尤其表现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他希望将政府从宪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与国王合作通过法令进行统治。国王派他的侍从通知西德基，说“对他的政策非常满意”，愿意邀请他组阁。

1930年6月，西德基首次执掌政府，就借助独揽3个大臣职位的方式巩固其对政府的控制——除了首相一职，他还控制了财政部和内政部。福阿德国王和西德基共同合作，最终解散了议会，推迟了选举，并起草了一份授予国王更大权力的新宪法。在之后的3年内，埃及的议会民主被推翻，国家受皇家敕令的统治。

西德基丝毫不掩饰其强人政治倾向以及他对民主程序的蔑视。他在回忆录中透露道，1930年6月底，“我必然会解散议会，以便启动我所计划的重组进程”。当纳哈斯及其同事为抗议议会被暂停而号召民众示威时，西德基毫不犹豫地镇压了这场运动，并在采取行动前解释说：“我不会等到反对派的运动发展为一场内战。”他派遣军队驱散了示威队伍，暴力冲突接踵而至——在皇家敕令宣布终止议会活动后的3天内，仅在亚历山大就有25名示威者被杀，近400人受伤。西德基带着杂耍剧中留着弯翘胡子的反派人物的做派，继续说道：“不幸的是，在开罗、亚历山大和一些农村城镇发生了令人心痛的事件。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维护秩序，阻止闹事者扰乱公共秩序、违反法律。”[30]英国人同时警告了首相西德基和民族主义领袖纳哈斯，但并未介入这样一场可能使埃及人偏离追求英国人统治下更大自由的斗争。

西德基论证其政治哲学合法性的理由是，在经济困难时期领导人不可能仅通过和平与命令就能实现繁荣进步。1929年经济崩溃触发了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对埃及经济已然造成冲击。面对经济破坏，西德基将华夫脱党及其倡导的大众政治视为对公共秩序的巨大威胁。1930年10月，西德基引入一部新宪法，在削弱华夫脱党的同时强化了国王的权力：新宪法将议席数量由235个减少至150个；将国王提名的参议员比例

由40%提升至60%，仅留少数席位由公众选举产生，从而加强了国王对上议院的控制；新宪法还限制了普选权，用一个更复杂的两阶段选举程序代替了之前的直选制，其中提高了第一轮选举投票人的年龄要求，对第二轮选举投票人的财产资格和教育水平又做出了限制。这些措施显然旨在削弱普通民众在投票中的影响力（华夫脱党依赖的主要支持来源），将选举权威集中在有产精英手中。鉴于议会会期由6个月缩短至5个月，立法机构的权力遭到削弱，国王推迟法案的权力则得到拓展。

新宪法带有如此明显的强人统治色彩，以至于遭到各个政治派别的政治家以及普通民众的一致反对。媒体对西德基和1930年宪法提出批评时，西德基则干脆取缔了这些报纸，逮捕了相关记者，甚至那些最初支持西德基的人也发现其报纸遭到查封。记者们则以印刷地下传单的方式予以还击，这些传单对西德基的威权政府及其威权宪法进行了猛烈攻击。

1931年，随着新宪法条文所规定的议会选举的临近，西德基也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尽管这位政治独行侠过去一直规避政党隶属身份，但西德基深知他需要一个政党的支撑来确保议会多数。他将新政党命名为人民党——这种颠倒黑白的命名方式简直可以媲美乔治·奥威尔的《1984》了！西德基从自由宪政党以及王室自身的团结党中吸收了一些有野心的叛逃者，他们都来自精英，而不是人民。该党的纲领许诺“支持宪政秩序”“维护人民的主权”，并拥护“国王的权力”（福阿德国王确实慧眼独具），为反对派媒体中的讽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31]由于华夫脱党和自由宪政党都宣布抵制1931年5月的议会选举，西德基的人民党取得了绝对多数席位。他的威权改革距离成功似乎已近在咫尺。

但西德基最终还是失败了。他的威权改革激起了真正的“人民党”——华夫脱党以及其他主要政党的反对。媒体也拒绝保持沉默，持续发动猛烈攻击，挑动民众反对西德基政府。随着民众对西德基政府的批评声音日益尖锐，埃及国内安全局势也开始恶化。过去，西德基一直以保证法律和秩序来论证其威权统治的合法性。面对逐渐失控的局势，英国人开始向国王施压迫使他组建新政府，以便恢复民众的信任、遏制政治暴力。西德基的革命已然熄火，现在就要彻底失败了。1933年9月，国王解除了西德基的首相职务。后者虽然下台但并没有出局，直至1950

年去世前一直都是埃及国内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

福阿德国王曾短暂地尝试进行直接统治：他废除了西德基的1930年宪法，但却没有恢复更早的1923年宪法，而是代之以国王敕令；解散了1931年民选议会，却没有举行新的选举。国王在一个未明确说明的过渡期内总揽了埃及国内一切权力。无须说明，这些措施在恢复民众对埃及政府信任方面也不会更加成功，不久福阿德国王就面临英国人和华夫脱党要求恢复1923年宪法、筹备新选举的压力。1935年12月12日，福阿德国王最终妥协，宣布恢复1923年宪法。

1936年，英国人、王室、华夫脱党之间的僵局最终被打破。同年4月，福阿德国王去世，他英俊的儿子法鲁克（Faruq）继位。5月，议会选举如期举行，华夫脱党再次赢得了议会多数。华夫脱党重新掌权和法鲁克国王的加冕这两个最新的事态发展，在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乐观情绪，仿佛一场“开罗之春”。与之相应的是，英国人对重启两国关系的谈判又重新持开放态度：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以及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使得确保埃及对英国地位的认可再次成为一个迫切的议题；德国和意大利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宣传，在埃及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青年埃及党等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甚至公开拥护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

为对抗上述威胁，1936年3月英国高级专员迈尔斯·兰普森爵士（Sir Miles Lampson）在开罗开启了新一轮谈判。最终，一个囊括埃及所有政党的代表团与英国政府达成一项新协议，并于1936年8月正式签署生效。这项新的《特惠同盟协议》扩展了埃及的主权和独立范围，尽管与伊拉克的协议类似，该文件也保证了英国享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地位，且有权保留其军事基地。协议同样将苏丹置于英国控制之下。但这些收获已足以确保埃及于1937年，即伊拉克加入5年之后，加入国联，进而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唯一加入这一国际组织的国家。然而，协议中的种种妥协以及长达20年的期限，实际上也将埃及人实现完全独立的梦想排除在政治视野之外。

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使得很多埃及人对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政党政治彻底感到幻灭。尽管埃及人拒绝了西德基的威权统治，但他们对华夫

脱党取得的成果也从未感到满意。1922年扎格卢勒就曾承诺使埃及摆脱英国人的统治，1936年纳哈斯又做出了同样的许诺，但这一遥遥无期的独立承诺却还要等一代人的时间才最终得以实现。

*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为正式确立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地位，国联发布了一份委托文件，将《贝尔福宣言》的条款写入了其序言部分。与战后其他的托管地不同，英国人在巴勒斯坦既要在本地居民中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国家，同时又要为全世界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对其他托管地而言，相关大国仅被责成在一个新兴国家中建立自治的机制。

《贝尔福宣言》是一个导向社群冲突的方案。鉴于巴勒斯坦极为有限的资源，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同时又不损害本地非犹太居民的民事和宗教权利，这样的想法根本就不切实际。委任统治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一边是高度组织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另一边则是在英国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殖民主义双重威胁下新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将成为英帝国在中东最惨痛的失败，而这一失败也将使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冲突与暴力，直至今日。

巴勒斯坦是古老土地上的一个新国家，由几个奥斯曼行省的土地拼凑而成，仅仅是为了帝国的方便。起初设计的巴勒斯坦托管国横跨约旦河，由地中海经由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广阔荒漠地区，直至伊拉克边界。1923年，约旦河以东的地区被正式从巴勒斯坦托管国中分离出来，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统治下构成了独立的外约旦国。同年，英国人还将戈兰高地的一部分割让给了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至此，巴勒斯坦已经缩小为一个领土面积不及比利时、大体与马里兰州相当的国家。

1923年时，巴勒斯坦的人口构成已经相当多元。巴勒斯坦是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的共同圣地，数个世纪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朝圣者。1882年起，一波新的来访者开始到来，但他们并非朝圣者，而是

定居者。受迫于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之下沙皇俄国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同时受到一种新的强大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的吸引，数千名来自东欧和俄国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寻求避难。他们进入的这个社会中，穆斯林是占总人口85%的多数群体，而基督徒是约占总人口9%的少数群体。此外，还有一个本地犹太社群：1882年，原住的“伊休夫”（Yishuv，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称谓）不超过本地人口的3%，居住在4个犹太教教育的中心城镇，即耶路撒冷、希伯伦、太巴列和萨法德。[32]

一战前，犹太定居者在两波不同的移民潮期间到达巴勒斯坦。第一次阿利亚，即犹太移民潮，在1882—1903年期间进入巴勒斯坦，使得本地伊休夫的规模翻倍，由2.4万人增至5万人。第二次阿利亚期间（1904—1914），犹太社群扩大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至1914年巴勒斯坦犹太人总数据估计已达8.5万。[33]

1882年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日益关切地注视着犹太移民的增长。19世纪90年代，阿拉伯媒体开始谴责犹太复国主义；20世纪最初几年，重要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则公开批评这一运动。1909年，一项旨在停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法案起草完毕。1911年，奥斯曼议会两次讨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议题，但最终未能通过任何法案。[34]

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布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成为英国的官方政策，阿拉伯人的这种担忧也进一步加剧。金-克瑞恩委员会在1919年6月深入走访巴勒斯坦各地期间，迅速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请愿书淹没。“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情绪在巴勒斯坦尤其强烈，”代表团成员在其报告中写道，“全部260封请愿书中有222封（85.3%）都宣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这是该地区就一个议题的表态所达到的最高比例。”

来自巴勒斯坦的信号是明确的：本地的阿拉伯居民多年来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也绝不接受英国人在其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然而，英国和国际社会对这一信号却置若罔闻，仍然在未咨询或考虑民众意愿的情况下就决定了巴勒斯坦的未来。和平手段既已失败，绝望的民众很快转向暴力。

自委任统治伊始，犹太移民和土地收购行为就在巴勒斯坦激起了越

来越严重的紧张局势。阿拉伯民众既反对英国统治，又反对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设想，因而将犹太社群的扩张视为对其政治诉求的直接威胁。此外，犹太人的土地收购行为不可避免地导致阿拉伯农民被赶出其作为佃农世代耕种的土地。

1919—1921年，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陡然增速，其间超过1.85万名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涌入巴勒斯坦。1920年在耶路撒冷，1921年在雅法，相继爆发大规模骚乱，造成95名犹太人、64名阿拉伯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922—1929年，大约7万名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抵达巴勒斯坦。同一时期，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耶斯列谷地（Jezreel Valley）购买了24万公顷土地。大规模的移民加上土地收购成为下一轮暴力的导火索：1929年，耶路撒冷、希伯伦、萨法德、雅法等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造成133名犹太人、116名阿拉伯人死亡。[35]

每次暴力事件之后，英国当局的调查都会出台旨在缓解巴勒斯坦多数人口恐慌情绪的新政策。1922年7月即第一波骚乱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试图安抚阿拉伯人的担忧，即巴勒斯坦将变成“犹太人的，一如英格兰是英格兰人的”。他强调《贝尔福宣言》的条款并未“考虑将巴勒斯坦整体转变为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而是认为这样一个民族家园应当建在巴勒斯坦”。[36]与之相似，1929年严重的骚乱也导致了一批新的报告和建议：1930年《肖报告》（*Shaw Report*）将犹太移民和土地收购视为巴勒斯坦局势动荡的首要原因，呼吁限制犹太移民以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随后于1930年10月发布的《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同样呼吁限制犹太人移民和土地购买。

每当英国政府发布一份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诉求持同情立场的白皮书，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就开始对伦敦与耶路撒冷的权力部门进行游说，以便推翻这些对其目标不利的政策。通过向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少数派政府施压，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地迫使前者否认了《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哈伊姆·魏茨曼及其顾问几乎为麦克唐纳起草了这封签署于1931年2月13日的信函。在这封信函中，麦克唐纳肯定英国政府“不会制定或考虑任何暂停或禁止犹太人移民的政策”，也不会阻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获得土地。麦克唐纳的信函彻底打破了阿拉伯人改善其现状的愿望，因而也被阿拉伯人

称为“黑色信函”（与白皮书相对）。

此时，一个恶性循环已将巴勒斯坦拖入持续暴力的泥潭：不断增加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和土地收购激起了社群冲突，迫使英国尝试对犹太民族家园加以限制，随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又通过政治手段推翻这些限制。只要这一进程持续如故，在巴勒斯坦建立自治政府机构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巴勒斯坦人不希望将英国委任统治及其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合法化；英国人不愿将比例代表权授予敌视其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多数人口，更不用说自治权；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全力迎合委任统治中能够推进其民族目标的每一个方面。每一轮暴力之后，困难都进一步加剧。

领导权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了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所面临的困境。耶路撒冷的两大领袖家族——侯赛尼家族和纳沙什比家族，围绕巴勒斯坦阿拉伯政治的主导权展开激烈争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充分利用两大家族之间的裂痕。1920年，巴勒斯坦的显贵代表建立了由穆萨·卡齐姆·侯赛尼（Musa Kazim al-Husayni）领导的“阿拉伯执行机构”，以便向英国当局呈递其要求；第二个代表机构“最高穆斯林委员会”则在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Hajj Amin al-Husayni）的领导之下。纳沙什比家族则坚决抵制上述侯赛尼家族主导的机构，尝试与英国人进行直接接触。鉴于领导权分裂的局面，巴勒斯坦人在与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中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

至1929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层的缺陷鼓励一批新的角色登上民族政治的舞台。与1919年的埃及相似，民族主义为（巴勒斯坦）妇女首次参与公共生活开启了一扇窗口。精英阶层妇女受到胡达·沙拉维和华夫脱党妇女协会的启发，为回应当年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于1929年10月在耶路撒冷召开了第一次阿拉伯妇女大会。来自巴勒斯坦穆斯林和基督徒社群的200名妇女参加了大会，并在会议期间通过了三项决议：第一，呼吁废除《贝尔福宣言》；第二，强调巴勒斯坦人组建民族政府的权利，所有社群根据人口比例获得代表权；第三，发展巴勒斯坦民族工业。“大会呼吁每个阿拉伯人在与犹太人的经济来往中，除土地外一概不买，除土地外无所不卖。”[37]

随后，与会代表开始与传统决裂。巴勒斯坦社会不赞成妇女在公共场所同男性来往，而她们则反其道而行之，决定拜访英国高级专员约翰·钱瑟勒爵士（Sir John Chancellor），以便递交上述决议。钱瑟勒接见了代表团，承诺将她们的意见传达给伦敦，以便供政府负责巴勒斯坦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参考。与钱瑟勒的会谈结束后，代表团返回仍在进行的大会现场，并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进一步偏离了妇女端庄得体的公认标准。示威活动转变为120辆车的游行，车队从大马士革门出发，途经耶路撒冷的主要街道，向城中的外国领事馆散发她们的决议。

大会结束后，代表们创立了具有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目标的阿拉伯妇女协会，致力于“支持阿拉伯妇女改善其地位的努力，帮助贫困人口，鼓励并推动阿拉伯民族事业”。协会专门募集资金，帮助那些在反英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袭击中遭逮捕或处决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庭。她们不断向高级专员发出请愿书和备忘录，要求宽大处理政治犯，抗议犹太人购买武器的行为，谴责英国当局迟迟无法与“阿拉伯执行机构”的领导层达成政治协议，她们与后者之间常有着密切的婚姻和家庭纽带联系。

阿拉伯妇女协会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治与英国乡绅中上层女性文化的一种奇妙混合体。协会成员以她们丈夫的名字相互称呼，如卡齐姆·侯赛尼帕夏夫人、奥尼·阿卜杜·哈迪夫人等。她们通常在下午茶的时间会面并商讨大计。与1919年的埃及相似，妇女参与民族运动同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口才雄辩的女性为新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增添了一股有力的呼声。在1933年该协会的第二次公开示威活动中，奥尼·阿卜杜·哈迪夫人就曾这样斥责艾伦比勋爵：“阿拉伯女性在过去15年内已经见识了英国人是如何违背对她们的诺言，分裂她们的国家，并向巴勒斯坦人民强加一项政策。通过允许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该政策最终将导致阿拉伯人的覆灭，并被犹太人取代。”[38]她的信息是明确的：整个巴勒斯坦民族，不只是男性，都认定英国应为其委任统治政策负责。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精英确实以能言善辩著称，但夸夸其谈却解决不了问题。尽管他们发表了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并与英国当局多次谈

判，但犹太复国主义移民仍在飞速进行，英国人也未表现出给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独立地位的任何迹象。《帕斯菲尔德白皮书》颁布后，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速度在1929—1931年间减缓至每年5000—6000人。然而，随着1931年麦克唐纳信函对英国政府政策的反转，以及纳粹在德国的上台，一波新的大规模犹太移民开始涌入巴勒斯坦：1932年，约1万名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1933年超过了3万人；1934年超过了4.2万人；移民高潮出现在1935年，当年近6.2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1922—1935年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比重由9%猛增至27%。[39]犹太人的土地收购已然使得大量巴勒斯坦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早在几年之前，《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就已指出了这一问题，而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仅为1935年规模的一半。完全由城市精英所垄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层的失败恶果，却直接落在了农村贫困人口的肩头。

1935年，有一个人决定将巴勒斯坦农民群体的愤怒导向武装反叛。在这一过程中，他提供了点燃巴勒斯坦这个火药桶的最初火花。

伊兹丁·卡萨姆（Izz al-Din al-Qassam）出生在叙利亚，20世纪20年代为逃避法国委任统治来到巴勒斯坦寻求避难。卡萨姆是一位穆斯林宗教学者，后来成为海法港北部面向普通大众的独立清真寺的一名布道者。同时，他还担任一个民族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青年穆斯林协会”的领导人。谢赫卡萨姆利用讲经台鼓动对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反抗，其人气也因此在那些受犹太移民影响最直接的巴勒斯坦贫苦人群之中迅速飙升，他们将卡萨姆而非分裂且低效的城市显贵集团视为其领导人。

1931年麦克唐纳“黑色信函”之后，卡萨姆开始鼓动针对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武装反抗。他的这一呼吁在其清真寺的聚众中得到了热烈回应，一些人志愿加入战斗，另一些人则愿为购买枪支弹药提供资金。然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卡萨姆在1935年秋天突然失踪。他的支持者开始陷入惶恐，一些人担心他已经遭遇不幸，另一些人则怀疑他带着他们的钱逃之夭夭了。1935年，一个名叫艾克拉姆·祖阿提尔（Akram Zuaytir）的记者和一位与谢赫卡萨姆交好的石匠聊起了卡萨

姆神秘失踪的话题。祖阿提尔表示人们对卡萨姆提出这样的指控是可耻的。“我同意，兄弟，”那位匠人答道，“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躲藏起来呢？”[40]

这时，一个男子冲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告诉他们说一个阿拉伯武装团队和英国部队在杰宁上方山区发生了激烈冲突，反叛者及其杀害的警察的遗体正在被运往英军在杰宁的要塞。年轻的祖阿提尔意识到这是一条独家新闻，于是打电话通知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新闻社的社长。后者闻讯后立即动身前往杰宁，让祖阿提尔照看办公室的一切，并通知巴勒斯坦各大报纸一个重大事件正在酝酿之中。

3小时后，震惊的新闻社社长从杰宁返回，他的话短得像新闻标题一样。“重大事件，”他气喘吁吁地说道，“非常紧急的新闻。谢赫伊兹丁·卡萨姆和武装团队中的4个兄弟牺牲了。”在杰宁警察局，这位社长采访到卡萨姆团队一位幸存的受伤者。尽管后者当时极为痛苦，但还是简略地描述了卡萨姆运动的情况。

那位伤员解释说，卡萨姆1933年就建立了他的武装团体。他只招募那些愿为自己的祖国献身的虔诚穆斯林。他们筹集资金购买步枪和弹药，开始为一场武装斗争做准备，“为的就是杀死英国人和犹太人，因为这些人正在占领我们的国家”。1935年10月，卡萨姆和他的追随者秘密离开海法，引发了当天早些时候祖阿提尔和石匠所讨论的那些传闻。

卡萨姆的武装团体在拜散（Baysan）[(1)]平原遭遇了一支警察巡逻队，冲突中杀害了一名犹太中士。英国人搜索了整个山区，在从纳布卢斯通往杰宁的道路上伏击了卡萨姆的一名追随者。双方交火中，这位阿拉伯起义者被击毙。“我们听到了他牺牲的消息，”那位卡萨姆团队的幸存者解释说，“就决定在第二天清晨袭击警察。”起义者发现英军和警察的联合部队人数远远超过自己，便逃至靠近杰宁的亚巴德村附近的山洞里躲避。在皇家空军一架飞机的掩护下，英军向阿拉伯人发起攻击。枪战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结果伊兹丁·卡萨姆和另外三名同伴当场被杀，四名幸存者被俘；英国方面一名士兵被杀，两人受伤。

尽管对这些事件感到震惊，祖阿提尔首先想到的却是葬礼。根据伊斯兰文化传统，卡萨姆和他的同伴通常应当在日落前被安葬，但现在“烈

士”的遗体还在警察的扣押之下。祖阿提尔请求海法的一位同事与英国人商谈，将死者的遗体移交给其家属，以便后者为葬礼做必要的安排。英国人同意合作，但有两个条件：第一，葬礼必须在第二天早上10点钟举行；第二，葬礼的队伍必须从卡萨姆的家直接向东进入陵园，而不得进入海法市中心。英国人实在太了解事态的敏感性了，因而尽可能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祖阿提尔则恰恰相反，想方设法要确保葬礼变为一个激励巴勒斯坦人反抗英国委任统治的政治事件。在这一天的最后，他在一份伊斯兰报纸《伊斯兰社团》（*al-Jami‘a al-Islamiyya*）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齐聚海法，参加葬礼游行；他还向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直接发起挑战，追问道：“巴勒斯坦的领袖们会和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一起，在信士的陪伴下，加入一个伟大的宗教学者葬礼队伍吗？”[41]

第二天一早醒来，祖阿提尔就开始查看阿拉伯媒体的报道情况，并准备动身前往海法。“当我读到报纸上关于那场战斗的描述，读到我呼吁参加葬礼行进的号召，就想到今天将成为海法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他写道，“这是烈士之日。”他的判断很准确。数千名民众涌入海法，来参与这次全国性的哀悼。与英国人的想法正好相反，葬礼在海法市中心的清真寺举行，而葬礼队伍恰恰经过了市中心。“经过巨大的努力，烈士们的遗体从清真寺内穿过人群被抬向外面的广场。在这里，笔端已无力描绘这一场景：烈士遗体被抬到肩膀的高度，数千民众伴随着葬礼队伍行进，高喊着‘真主至大，真主至大’；妇女们则在屋顶和窗前啼哭。”哀悼者高唱着抵抗的歌曲。“然而，当遗体被举起时，一个声音高喊道：‘报仇！报仇！’数千民众也用惊雷似的声音回应道：‘报仇！报仇！’”

愤怒的民众袭击了海法市警察局，向建筑物投掷石块，并捣毁了停在外面的警车。他们还袭击了沿途遇到的每一名英军士兵和警察，尽管英国人为避免双方伤亡已提前撤离。此外，作为受痛恨的英国统治的另一标志，火车站也遭到了袭击。

整个葬礼行进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之后卡萨姆和他的同伴被正式安葬。祖阿提尔回忆说：“想象一下，这些身穿染着‘圣战’鲜血外衣的英雄烈士最终被埋葬，此情此景之下民众们会是什么感受。”此外，他还特别

指出巴勒斯坦北部地区所有市镇——阿卡、杰宁、拜散、图勒凯尔姆、纳布卢斯、海法都有代表参与了葬礼游行，“但我并没有看到（民族主义）政党的领袖们，为此他们应当受到斥责”。[42]

谢赫伊兹丁·卡萨姆的短暂起义永久地改变了巴勒斯坦政治。之前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城市显贵阶层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他们已经与英国人进行了15年谈判，却一无所获。巴勒斯坦人距离独立或自治仍遥遥无期，英国人仍牢牢地控制着一切，犹太人口按照其增长速率将很快与阿拉伯人口持平。巴勒斯坦人民需要能与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直接对抗的行动者。其结果就是为期3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而这次起义对巴勒斯坦城镇和乡村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卡萨姆反叛事件后，巴勒斯坦各政党领袖们开始尝试重新确立对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936年4月，巴勒斯坦各主要政党联合为一个新的组织，即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委员会号召全体阿拉伯工人和政府官员举行一次大罢工，同时抵制与伊休夫之间的一切经济往来。伴随大罢工，还发生了针对英国部队和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

民族主义领袖们的这一策略取得了适得其反的严重后果。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受经济抵制的负面影响要远远超过伊休夫。英国为镇压反叛又新调入了2万人的部队，还呼吁其在阿拉伯邻国的盟友劝说巴勒斯坦领导层终止大罢工。1936年10月9日，沙特、伊拉克国王与约旦、也门统治者一道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我们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子民们为避免进一步的流血冲突而下决心争取和平”。“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君主令人难以置信地表示，“我们相信你们的朋友英国的善意，后者已然表示将秉持公正。”[43]

当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回应国王们的上述声明并呼吁停止罢工时，巴勒斯坦人感到被自己的领导人以及阿拉伯同胞同时背叛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诗人艾布·萨勒曼（Abu Salman）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以其辛辣的诗句控诉了巴勒斯坦领导人和英国人支持下的阿拉伯君主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运动的出卖。

那些珍视祖国的人们啊，
快起来反抗这赤裸裸的压迫！
将祖国从暴君手中解放，
从傀儡手中解脱！
我想我们并不缺少国王，可以把人们团结在他身后。[44]

当艾布·萨勒曼强调巴勒斯坦的解放将由它的人民而不是他们的领袖来领导时，他确实说出了失望的巴勒斯坦民众的心声。

大罢工结束后，作为回应，英国又一次派遣了一个调查委员会。1937年7月7日发布的皮尔委员会的报告在整个巴勒斯坦引发了震动。在这份报告中，英国人首次承认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在于两个相互冲突、无法协调的民族主义运动间的矛盾。“在这个小国狭小的边界内，两个民族之间爆发了不可避免的冲突，”报告承认道，“约100万名阿拉伯人和40万名犹太人或公开或隐蔽地陷入了竞争，他们之间毫无共同语言。”

皮尔委员会所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分治：犹太人将在巴勒斯坦20%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包括大部分沿海地区和位于耶斯列谷地和加利利的一些最肥沃的农业用地；分给阿拉伯人的则是最贫瘠的土地——包括内盖夫沙漠和阿拉瓦谷地，以及约旦河西岸的丘陵地区和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的人口分布与分治方案的地理划分并不一致。尤其成问题的是，多数阿拉伯城镇都被划入提议中的犹太国家。为消除这种反常现象，皮尔委员会提出“人口交换”——在20世纪后半叶将被称为种族清洗——的可能性，以便移除分配给犹太人领土中的阿拉伯人口。英国人强制迁徙的提议赢得了犹太事务局主席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对整个分治方案的支持。他热情洋溢地说道，“这将给予我们一些我们之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即便是在我们维持独立权威的古典时代”，即一个由高度同质化的人口构成的“真正的犹太”国家。[45]

令阿拉伯人更加不满的是，分治方案并未设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是呼吁将阿拉伯领土并入埃米尔阿卜杜拉统治下的外约旦。巴勒斯坦人民对阿卜杜拉怀有极深的不信任感，将后者视为一个觊觎他们土地的英国代理人。对巴勒斯坦人而言，皮尔委员会的提议代表着他

们民族斗争的最坏结果，即不但未能确保自身的自治权，而且其人口将被驱散并受到不友好的外来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统治。

结果就是，犹太人接受了分治方案的条款，埃米尔阿卜杜拉与皮尔委员会达成了一致，巴勒斯坦人却与英国人和伊休夫走向了武力对抗。

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的第二阶段持续了两年，从1937年秋直至1939年。1937年9月26日，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杀害了英国在加利利的地区专员L.Y.安德鲁斯（L. Y. Andrews）。作为回应，英国当局逮捕了200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人，将很多人流放至塞舌尔，并宣布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在缺乏中央领导的情况下，起义迅速退化为一场缺乏协调的暴动而席卷了巴勒斯坦农村地区。起义者袭击英国警察、军事巡逻队和犹太定居者，刺杀英国和犹太官员，杀害了那些疑似与英国当局合作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破坏铁路、通信以及贯穿巴勒斯坦的输油管道。村民们发现自己进退维谷：起义者要求他们的支持，而英国人则惩罚一切疑似援助起义者的平民。大起义对巴勒斯坦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每次阿拉伯人针对英国人和伊休夫的袭击都招致了激烈的报复行为。英国人决心要通过军事手段镇压起义，因而再次向巴勒斯坦增派了2.5万名士兵和警察——这一数字也成为一战结束以来英军在海外最大规模的部署。他们建立军事法庭，这些法庭所执行的紧急管理章程实际上为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军事独裁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基于紧急管理章程的合法权威，英国人摧毁了所有参与袭击事件者以及所有确认或涉嫌帮助起义者的房屋。据估计，1936—1940年巴勒斯坦约2000间房屋被毁。战斗人员和无辜的平民一并被关进集中营，至1939年已有超过9000名巴勒斯坦人被关押在过度拥挤的设施内。嫌犯受到暴力审讯，由羞辱到酷刑拷打不等。7—16岁之间的少年犯遭到鞭打。1938—1939年，超过100名阿拉伯人被判处死刑，其中超过30人被执行死刑。为防止起义者在英军经过的道路上铺设地雷，巴勒斯坦人被用作人肉盾牌。[46]

英国人对武力和集体惩罚的过度使用，最终演变为滥用暴力和残酷的罪行，也使得委任统治在巴勒斯坦人的记忆中蒙上了永恒的污点。最

可耻的罪行发生在对起义者杀害英国士兵的报复中。在一个有详细档案记录的案例中，为了给在1938年9月一次触雷事件中被杀的同事报仇，英军将来自白萨村的20多名男子装入一辆汽车，用枪逼着他们驶入英国人在村庄岔路中部铺设的一大片雷区。结果所有的乘客当场被炸死，死者残缺不全的遗体被一名英国军人拍摄下来，随后村民们又被强迫将其亲属遗体埋藏在一座集体坟墓中。[47]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彻底击败了，至1939年他们中间反抗的火种已彻底熄灭。约5000人在大起义中被杀，1万人受伤；超过10%的巴勒斯坦成年男性人口不是被杀、受伤，就是遭到囚禁或流放。然而，英国人也很难说取得了胜利：他们无法长期负担镇压起义的消耗，也无力将他们的政策强加给阿拉伯人。随着欧洲战事的临近，白厅已无法承担动用如此庞大的部队来镇压一场殖民地起义。为了在麻烦不断的巴勒斯坦托管地恢复和平，英国人将1937年皮尔委员会的分治方案束之高阁，并再次召开了一次皇家委员会会议来重新审视巴勒斯坦局势。委员会再次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试图回应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诉求。

1939年白皮书是英国自始至今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供的最好方案。根据该文件中提出的新政策，未来5年内犹太移民的规模将被限定在每年不超过1.5万人，或总数不超过7.5万人。这将使伊休夫占整个巴勒斯坦人口的比重提升至35%，即成为一个规模足以照顾自身但又无力控制整个国家的少数群体。在这以后犹太移民将停止，除非得到阿拉伯人口多数的同意，但各方都承认这不太现实。根据区域的不同，犹太人土地收购将被禁止或受到严格限制。最后，10年后巴勒斯坦将在一个阿拉伯-犹太人联合政府的领导下，“以一种能够确保各个社群根本利益得到维护的方式”实现独立。[48]

无论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而言，1939年白皮书都无法令人满意。阿拉伯人拒绝上述条款，既是因为它允许犹太移民的继续流入——即使速度有所减缓，同样也因为它维护了巴勒斯坦的政治现状，并将独立又延后了10年。伊休夫拒绝了这些条件，因其在纳粹反犹暴行逐渐升级之际，宣布巴勒斯坦向犹太移民关闭了大门（1938年11月，纳粹分子在“碎玻璃之夜”中恫吓了德国犹太公民，这是欧洲迄今为止最恶劣的大屠杀事件）。此外，白皮书排除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

家的可能性，而是将伊休夫设计为未来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少数群体。

1939年，伊休夫领导层因对1939年白皮书的立场而发生分裂。大卫·本-古里安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白皮书，但他将纳粹德国视为对犹太人民福祉最大的威胁，并发誓站在英国一边反对纳粹，就像白皮书根本不存在一样。而作为对白皮书的回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极端分子——伊尔贡（Irgun）和斯特恩团伙（Stern Gang）则公开宣称英国为敌人。他们反抗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将之视为一个否认犹太人民独立地位的不合法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他们不惜采取恐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纳粹主义被根除之后，英国将发现自身面对一场犹太反叛，其声势远远大于阿拉伯人曾向英国统治发起的挑战。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对中东的控制是不可撼动的。英国部队占领了从埃及到伊拉克的阿拉伯领土，其对波斯湾的控制更是牢不可破。尽管阿拉伯世界很少有人希望受英国人的统治，但无论多不情愿，多数人都满怀敬意地看待自己的殖民领主：英国人高效、神秘、有序、技术先进、军事强大。英国确实伟大，像一座高耸于其殖民领地顶端的巨像。

20年的殖民统治却揭示了这座巨像是一座泥足巨人。在整个中东地区，英国面对着多种多样的反对声音，从温和的民族主义政治到激进的武装起义不一而足。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埃及，英国被迫就其不受欢迎的存在条件反复进行谈判。英国人向阿拉伯反对派做出的每一次妥协、每一次政策反转，都揭示了帝国权力的脆弱性。

然而，真正将英国在中东的领地转变为大英帝国脆弱软肋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威胁的升级。有些时候，上述阿拉伯殖民地似乎已经要脱离英国的控制。二战期间英国在伊拉克和埃及的所作所为，显示了其地位的脆弱性，也预兆了英国在中东主导地位的结束。

在伊拉克，英国在1941年4月1日遭遇了一场亲轴心国的政变。当时，伊拉克在一位不受欢迎的摄政王阿卜杜·伊拉亲王（Prince Abd al-Ilah, 1939—1953年在位）的统治之下，他代表年幼的费萨尔二世（King Faysal II, 1953—1958年在位）进行统治。英国人以亲纳粹倾向为由，要求广受民众拥戴的首相拉希德·阿里·凯拉尼（Rashid Ali al-Kaylani）辞职，这一要求得到摄政王阿卜杜·伊拉的支持；一些重要的伊拉克军官则支持首相。这些高层军官相信德国和意大利将赢得战争，因此与轴心国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伊拉克的利益。摄政王担心发生军事政变，便由伊拉克逃往约旦，使得拉希德·阿里和军官们掌控了政权。

拉希德·阿里在摄政王缺位的情况下继续行使政治权力，在英国政府看来已然构成政变。尽管前者竭尽全力向英国人表明伊国内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新政府（包括巴勒斯坦领袖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侯赛尼因其极端民族主义观点遭到流放，后成为拉希德·阿里的亲密顾问）的民族主义语调却强化了英国人的恐惧。英国人援引1930年《英伊协议》的条款，要求向伊拉克增派地面部队，拉希德·阿里和民族主义军官则怀疑英国人的意图因而表示反对。英国人无视反对意见，在未经伊政府官方批准的情况下就开始向伊拉克增兵。伊拉克人威胁向未经授权的英国飞机开火，英国则警告说开火将导致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骑虎难下。

1941年5月，英伊两国间爆发战争。战斗从英国在哈巴尼耶的基地外打响，持续了数日之久；随后，伊拉克军队撤退至费卢杰重新集结，以便保卫巴格达。新增的英国部队则从印度和外约旦赶来。拉希德·阿里紧急向德国和意大利求援，轴心国派来了30架飞机和一些小型武器，但受制于时间限制而未能更直接地干预。英军逼近巴格达之际，拉希德·阿里和他的政治盟友包括哈吉艾敏·侯赛尼被迫逃离伊拉克。他们责成巴格达市市长与英国人就停火进行谈判，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

1941年拉希德·阿里政府倒台后，巴格达的犹太社群成为混乱局势的首要受害者。反英情绪、对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计划的敌意同德国的反犹主义观念相叠加，酿出了阿拉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法尔胡德”（*Farhud*）。巴格达的犹太社群规模庞大，且已高度融入伊拉克社会各阶层：从精英到市场再到音乐厅——多数伊

拉克著名的演奏家都是犹太人。但在长达两天的社群暴力和流血冲突中，所有这一切都被抛诸脑后：在英国当局决定进入巴格达并恢复秩序之前，冲突已造成近200人死亡，大量犹太店铺和房屋被劫掠、毁坏。

拉希德·阿里政府倒台后，哈希姆家族重新恢复了其在伊拉克的王位。在其前殖民领主的支持下，摄政王阿卜杜·伊拉以及那些最亲英的伊拉克政客重新掌权。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被激怒了，他们声称拉希德·阿里在伊拉克民众中享有广泛支持，但显然英国人只会允许伊拉克人拥有一个经伦敦认可的领导层。在伊拉克人赢得其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仅9年后，这次（军事）干预就使得英国和哈希姆王朝在伊拉克人民眼中彻底失去了信誉。

然而，英国才是伊拉克土地上最终的失败者。曾几何时，英国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被传为佳话，而现在却只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君主，一支危险的军队，一群如此仇视英国在中东的角色以至于不惜与其轴心国敌人并肩作战的民众。

轴心国在埃及也不乏支持者。埃及民族主义者不满足于1936年《英埃协议》所达成的部分独立。英国仍对埃及内部事务施加着超出其合理范围的影响，并完全控制着苏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埃及境内涌入大量英国部队，自“独立”以来埃及政府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从属于英国。这种状况对于新一代埃及民族主义者而言已不可忍受，对英国的敌意使得他们对英国的轴心国敌人抱有好感。

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在埃及则利用本地的民族主义情感来孤立英国人。意大利人开设了一个强大的新广播电台，以便在埃及和东地中海地区推进其宣传攻势。巴里电台（Radio Bari）大肆鼓吹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与英国在埃及所强加的多党制民主的小打小闹相比，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强硬领导与法西斯军事强力的结合，对埃及民族主义者明显更有吸引力。随着德、意两国与英国开战，很多埃及人开始盼望轴心国能击败英国，从而一劳永逸地将后者逐出埃及。

1940年，随着北非战役的打响，部分埃及民族主义者相信解脱的时

刻已近在咫尺。意大利军队跨越利比亚攻击英军在埃及的阵地；在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的指挥下，经过特殊训练的德军北非军团加入了意大利人在北非的战事。至1942年冬，轴心国军队已对英国在埃及的阵地构成真正的威胁。一些埃及政治领袖，甚至包括法鲁克国王本人，似乎很愿意接受德国将英国人逐出埃及的想法。

英国不信任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埃及首相阿里·马希尔（Ali Mahir），因此在1940年6月要求后者辞职。这一干预行为揭示了英国对埃及主权与独立的完全无视，也使得英、埃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在北非战场取得主动权，英国开始试图镇压埃及国内政界轴心国势力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及国内唯一具有可靠的反法西斯资历的政党就是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1942年2月4日，英国高级专员米尔斯·兰普森爵士向法鲁克国王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他提名穆斯塔法·纳哈斯组建一个完全由华夫脱党人组成的政府，或者选择退位。为支持其通牒，兰普森甚至将英军坦克部署至法鲁克国王位于开罗市中心的阿比丁宫。

“阿比丁宫通牒”彻底打碎了运行达20年之久的英-埃政治系统，同时损害了该系统的三大支柱——国王、华夫脱党和英国人自己。法鲁克国王屈从于英国人的威胁，允许外部势力强加给自己一个政府，等同于出卖了自己的国家。很多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国王本应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英国人抗争到底。至于华夫脱党，他们曾经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赢得埃及人民的支持，这次却同意在英国人刺刀的庇护下上台执政。然而，最后通牒背后的歇斯底里，暴露了英国人面对轴心国军队在西部沙漠的进攻时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安。英国人在面对轴心国和埃及民族主义者时同时处于守势，也暴露出了其不可靠性。英国、王朝、华夫脱党三方争夺权力的格局在1942年2月彻底崩溃，在10年后即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骚动时期，这三方也将被扫除出历史舞台。

英国人进入中东之时，意在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一个在他们看来将持续千秋万代的不朽帝国。但从一开始，他们在埃及、伊拉克,特别是巴勒斯坦就遭遇了顽强的抵抗。随着民族主义反对派的兴起以及直接统治成

本的上升，英国政府尝试通过承认名义上的独立、以协议确保其战略利益的方式来调整帝国与托管地之间的关系。然而，即便对民族主义反对派的这些让步，也未能赢得阿拉伯人对英国在中东地位的认可。二战时期，英国国内的反对活动使得其在阿拉伯领地内举步维艰。意大利和德国很快就抓住英国的弱点，利用阿拉伯民族诉求来谋取轴心国的利益。随着阿拉伯世界逐渐脱离英国人的掌控，英国在中东的帝国越来越成为一个负担，而不是优势。

对英国人而言，可能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们的帝国竞争对手法国，在其阿拉伯领土上似乎也并不比自己成功多少。

(1)　从阿拉伯名，译作“拜散”；从希伯来名，译作“贝特谢安”（Beit　She'an）。——译者注

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长久以来，法国为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觊觎大叙利亚地区——大概包含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等国领土。1799年拿破仑从埃及入侵叙利亚，但其军队因在阿卡遭遇奥斯曼守军的顽强抵抗而停滞不前，最终被迫撤退。19世纪30年代，法国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入侵叙利亚，希望通过埃及盟友将法国的影响力拓展至这一地区。1840年埃及撤出叙利亚之后，法国人加强了与叙利亚本地各天主教派，特别是黎巴嫩山地区马龙派间的联系。1860年黎巴嫩山爆发德鲁兹人屠杀马龙派基督徒事件后，法国派遣了一支由6000人组成的远征军，明目张胆地对叙利亚沿海地区提出权利要求。但随着奥斯曼政府在接下来半个世纪中重新确立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法国人的诉求也再次受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为法国提供了一个确保其对叙利亚权利要求的机会。基于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状态，法国及其协约国盟友终于能够公开讨论战争胜利后奥斯曼领土的分割问题。通过马克·赛克斯爵士与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在1915—1916年间进行的密集谈判——其最终结果即《赛克斯-皮科协定》，法国终于赢得了英国对其野心的支持。在相继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殖民化之后，法国政府相信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成功统治阿拉伯人。法国人坚信，在摩洛哥运转良好的模式，对叙利亚同样适用。此外，几十年来法国已经赢得了黎巴嫩山地区马龙派基督徒社群的忠诚和支持。事实上，一战结束时，黎巴嫩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有大量选民为法国委任统治而积极游说的国家。

奥斯曼帝国后期的黎巴嫩是一块以奇怪的方式被截取出来的土地。1860年屠杀基督徒事件后，奥斯曼人和欧洲列强举行会议，商讨在西俯地中海、东瞰贝卡谷地的高地上建立一个特殊的黎巴嫩山省。奥斯曼人则维持了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海地区——包括提尔、西顿、贝鲁特、的黎波里等城市的直接行政控制。1888年，叙利亚沿海地区被重新划定为贝鲁特省。结果，黎巴嫩山的绝大部分地区与海岸线相隔离，贝鲁特省的很多地区宽度则只有几英里。

黎巴嫩山自治省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其地理条件限制。该省的领土过于狭窄贫瘠，无法维持大量的人口，因此在奥斯曼人统治的最后时期，很多黎巴嫩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机遇而被迫远离故土。据估计，1900—1914年约10万名黎巴嫩人（可能高达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离开黎巴嫩山前往埃及、西非和美洲。[1]这也是统治黎巴嫩山的12人行政理事会越来越担心的一个原因，该理事会成员按比例从该地区不同社群中选出。随着一战临近尾声，行政理事会的成员开始渴望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并寻求其长期庇护者法国的帮助来实现这一宏愿。

1918年12月9日，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举行会议，就其希望向巴黎和会陈述的内容达成一致。理事会寻求在法国监护下黎巴嫩在其“自然边界”内的完全独立。“自然边界”意味着理事会成员设想扩大黎巴嫩山的版图，将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提尔等沿海城市以及贝卡谷地东部直至东黎巴嫩山西麓的领土都纳入其中。一个在其“自然边界”之内的黎巴嫩在南北方向将以不同河流、东部以山脉、西部以地中海作为其地理框架。

黎巴嫩山的民众深知法国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倡导建立这样一个“大黎巴嫩”，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法国托管的方式来获取这块至关重要的领土。因此，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是受法国政府的正式邀请，在巴黎和会上陈述其方案。这与埃及、叙利亚等这些不合时宜的阿拉伯国家不同，后者的民族主义诉求与参会帝国的野心直接冲突，因而受到冷落和排斥。

行政理事会派遣了一支以马龙派政治领袖达伍德·阿蒙（Daoud Ammoun）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巴黎参会。[2]1919年2月15日，阿蒙在其向巴黎和会委员会的发言中陈述了黎巴嫩山的诉求：

> 我们想要一个摆脱一切奴役状态的黎巴嫩，一个能够自由追求其民族目标的黎巴嫩，一个在其自然边界内得以重建的黎巴嫩。为了能自由地生活、在和平中实现繁荣，这些条件都不可或缺。
>
> 但我们深知，由于缺少在现代生活和西方文明方面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我们只有在一个西方大国支持下才能发展我们的经济、重组我们的自由。在过去的岁月中，法国一直向我们提供保护、支

持、指引和教导，为此我们对她也怀有持久的情谊。我们希望获得法国的支持，以便完成内部重组，并保证我们的独立。[3]

显然，黎巴嫩代表团寻求的并非法国在黎巴嫩的殖民统治，而是在实现最终独立目标过程中后者的支持。然而，法国人似乎仅仅听到了他们想听的那一部分，也很乐意把黎巴嫩代表团作为论证其对黎巴嫩权利要求合法性的工具。

然而，行政理事会的发言并不能代表所有黎巴嫩人。在非洲、欧洲、美洲生活着超过10万名黎巴嫩移民，他们热切地关注着祖国的政治命运。很多黎巴嫩海外移民社团将自己视为更为广阔的叙利亚人民的成员，后一概念同样涵盖了来自巴勒斯坦、叙利亚内陆地区以及外约旦的移民。这些“叙利亚人”中包括了一些黎巴嫩最著名的文人，如神秘主义杰作《先知》的作者赫里勒·纪伯伦（Khalil Gibran）。他们将黎巴嫩视为大叙利亚独立但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呼吁叙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国的监护下实现独立。考虑到其对法国统治的支持，这些黎巴嫩的大叙利亚支持者同样受邀在巴黎和会上陈述其观点。

舒克里·加尼姆（Shukri Ghanim）是黎巴嫩海外侨民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是叙利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一个分支机构遍布巴西、美国和埃及的民族主义组织。1919年2月，加尼姆向（巴黎和会）“十人委员会”进行了陈述，呼吁建立一个在法国托管下的叙利亚国家联邦：“叙利亚必须被分为三个部分。如果算上巴勒斯坦，那就是四个部分。大黎巴嫩或腓尼基、大马士革地区和阿勒颇地区应被构建为独立、民主的国家。”但他并不相信所有叙利亚人生而平等，且带着不祥的口气预言道：“法国在那里的任务是引导、建议和平衡一切事物，还有——我们不介意对我们的同胞这样讲，他们都是明白是非的人——根据我们不同的道德健康的状况给予我们不同程度的自由。”[4]我们可能只能猜测加尼姆所谓“道德健康”所指何为，但他显然相信黎巴嫩相比叙利亚其他地区要远为先进，与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地相比更适合在法国的保护下享有完全独立。相比达伍德·阿蒙代表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所作的陈述，加尼姆的呼吁在很多方面，与法国人的想法更加一致。

然而，黎巴嫩政治中还有完全敌视法国在黎凡特地区地位的第三种

趋势。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提尔等沿海城市的逊尼派穆斯林和希腊东正教徒并不希望从叙利亚政治社会主流中被分离出去，继而在一个基督徒主导的黎巴嫩国家中被弱化为一个少数群体。这是黎巴嫩山省的亲法国政治与沿海贝鲁特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明显分歧。几个世纪的奥斯曼统治之后，贝鲁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希望成为一个更广阔的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因而全力支持大马士革的埃米尔费萨尔政府。在1919年2月面向巴黎和会“十人委员会”的发言中，费萨尔代表沿海平原的黎巴嫩人表达了政治诉求，他在1916—1918年间领导了从希贾兹到大马士革的反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在发言中，他强调黎巴嫩是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之前许诺给他父亲谢里夫侯赛因的阿拉伯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受自己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的领导，而非任何委任统治的管辖。

埃米尔费萨尔在巴黎和会上对西方列强的陈述，受到了贝鲁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广泛支持。穆罕默德·哲米勒·贝胡姆（Muhammad Jamil Bayhum）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后成为费萨尔狂热的支持者。1919年7月在金-克瑞恩代表团到来之前，贝胡姆代表贝鲁特当选为在大马士革召开的叙利亚国民议会成员。“法国当局竭尽全力阻止选举的举行，同时向选举人和候选人施压，”贝胡姆回忆道，“但他们这些劝说或强制的手段最终都是徒劳的。”[5]黎巴嫩在叙利亚国民议会中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22名代表当选。

贝胡姆满怀激动地参加了1919年6月6日正式开幕的叙利亚国民议会。代表们坚信他们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将叙利亚人民的政治意愿通过金-克瑞恩委员会传达给巴黎和会上的西方大国。他们企盼在整个大叙利亚地区建立一个在费萨尔统治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阿拉伯国家，尽可能减少或完全避免外部干预。贝胡姆笔下的大马士革充满了乐观主义和高度理想化的政治氛围，甚至将之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巴黎相媲美：“我们和来自巴勒斯坦、约旦、安条克、亚历山大勒塔、大马士革的代表一起出席了大会，所有人都希望协约国能听从我们的呼声，履行之前向我们做出的自由、独立的承诺。”[6]

贝胡姆留在大马士革参与了叙利亚国民议会的所有会议，即便在1919年7月金-克瑞恩代表团到来又离去后也没有立即离去。他不安地关

注着英国1919年10月撤离叙利亚、法国军队取而代之等进展。1919—1920年的冬季，法国开始向被孤立的埃米尔费萨尔强加愈加严苛的条款，其意图明显是分裂大叙利亚、剥夺费萨尔政府的独立地位。1920年3月，叙利亚国民议会宣布大叙利亚独立，将这一既成事实摆在欧洲列强面前，作为避免委任统治的最后一搏。叙利亚国民议会仍坚称黎巴嫩是叙利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其独立宣言中强调："我们将考虑黎巴嫩人民的所有爱国要求，在战前边界的范围内尊重其国家的自治地位，但条件是黎巴嫩远离一切外部势力的影响。"

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很快便对叙利亚国民议会的宣言提出抗议，坚称费萨尔政府无权"代表黎巴嫩发言，划定其边界，限定其独立或禁止其请求法国的合作"。[7]但黎巴嫩山的政治家也越来越担心法国的意图。1920年4月，英、法两国在圣雷莫（San Remo）会议上最终确定了奥斯曼阿拉伯行省的分割方案：黎巴嫩和叙利亚划归法国所有，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则归英国人统治。尽管很多马龙派基督徒过去曾请求法国人的技术援助和政治支持，但他们期望法国人这样做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原则，而非帝国利益的考虑。随着法国开始准备在黎巴嫩建立委任统治，法国军方管理人员也开始向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强加其政策。相应地，黎巴嫩山的政治家们则开始置疑在国家建设中寻求法国帮助的合理性。

1920年7月，11位行政理事会成员中的7位做了个惊人的180度转弯——寻求与费萨尔国王的大马士革政府达成和解。他们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呼吁叙利亚和黎巴嫩为实现完全独立而采取联合行动，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双方的领土纠纷和经济分歧。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黎巴嫩议员呼吁建立一个叙-黎联合代表团，向仍在巴黎会谈的欧洲大国陈述自己的要求。然而，法国人听到这一倡议的消息后，逮捕了去往大马士革路上的这7位议员。

部分最受尊敬的黎巴嫩政治家遭逮捕的消息在整个黎巴嫩山地区引发了震动。比沙拉·扈里（1890—1964）是一位年轻的马龙派律师，曾与法国军事管理人员保持密切合作（他后来将成为黎巴嫩独立后的首任总统）。1920年7月10日深夜，法国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将军（General Henri Gouraud）邀请扈里来他的住所商讨一个紧急事件。到达后，扈里发现古罗正在他的军官中间焦急地踱步。这位高级专员通知扈里，法

国当局刚刚逮捕了7位持不同政见的理事会成员。

“他们是叛徒，企图和埃米尔费萨尔联手，将黎巴嫩并入叙利亚，”古罗解释说，“行政理事会已经遭到解散。”

扈里震惊了，问道：“您采取这样暴力手段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古罗回答说已从这些人身上发现一封描绘其详细目标的备忘录。“在一切的一切之前，你首先是一名黎巴嫩人，”法国人对扈里说道，“您赞同他们的这种行为吗？”

由于尚未见到理事会成员备忘录的文本，扈里便谨慎地回答道：“我赞同所有追求独立的人，但我不会求助于黎巴嫩以外的任何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一位法国军官回答说。古罗告知扈里，这7名理事会成员将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受审。

对这些持异议的理事会成员的审判，疏远了法国在黎巴嫩一些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扈里惊骇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案件在两天内即审理完毕，并将庭审过程描绘为发生在“某种恐怖的氛围中”。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作为证词的一部分，黎巴嫩证人被强制要求宣誓“他们对法国的热爱”。被告人最终被处以罚款，禁止在黎巴嫩工作，并被流放至科西嘉岛。更糟糕的是，当扈里最后读到几名理事会成员备忘录的文本时，发现自己对他们的大多数目标都怀有同情之心。[8]事实上，由于这些高压的手段，法国人正在严重削弱他们在黎巴嫩的支持基础。

尽管如此，法国对这个新黎巴嫩国家的方案仍在按部就班地推进。1920年8月31日，黎巴嫩山的疆域被拓展至黎巴嫩民族主义者所要求的“自然边界”；次日，在法国的协助下，“独立的”大黎巴嫩国正式成立。但法国的协助越多，黎巴嫩享有的独立就越少。已经名存实亡的行政理事会被一个新的行政委员会所取代，委员会受一位法国长官的领导，后者则直接向法国高级专员负责。

在向黎巴嫩强加了一套全新的行政框架之后，法国政府开始根据自身对黎巴嫩社会的理解来重塑这一新国家中的政治文化。法国人将黎巴

嫩视为一个由多个宗教社群组成的脆弱混合体，而非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进而根据这一观念来塑造黎巴嫩的政治机构。依据一种被称为教派主义的体制，新成立的行政委员会的席位被分配给各个宗教社群（法语为*confessions*）。这就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说，政治职务依据人口比例分配给黎巴嫩不同的宗教团体。作为黎巴嫩天主教徒的长期庇护人，法国决心确保黎巴嫩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法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在扩大黎巴嫩领土边界的同时，又要避免将基督徒弱化为他们国家中的一个少数群体。尽管在黎巴嫩山地区基督徒占总人口的76%，但在新并入的沿海城市以及东部的贝卡和东黎巴嫩山等地区，基督徒又明显是少数群体。因而基督徒仅占大黎巴嫩人口总数的58%，考虑到不同教派出生率的差异，这一比例仍在下降。[9]法国人却无视黎巴嫩新的人口情况，继续优待受他们庇护的基督徒，在执政的行政委员会中赋予他们超出其人口比重的比例——10位基督徒代表，对应4位逊尼派、2位什叶派、1位德鲁兹派代表。

尽管法国专家们相信这一陈旧的政府体制最符合黎巴嫩的政治文化，但很多黎巴嫩知识分子却对教派主义越来越感到不安，渴望寻求一种民族身份认同。一位记者在《觉醒报》（*Le Réveil*）上写道："我们是否想成为一个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还是继续作为一个可笑的宗教团体的大杂烩，像敌对的部落一样始终相互隔离？我们必须为自己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统一的象征——一个国籍（nationality）。那枝花朵只能在一面国旗下绽放，而绝不会在教堂尖塔或宣礼塔下生长。"[10]然而，法国让独立的黎巴嫩升起的第一面国旗却是一面中间绘有一棵雪杉树的法国三色旗。从那一刻起，法国就开始在黎巴嫩显露自己的真面目。

1922年3月，古罗宣布将解散行政委员会，并以一个选举产生的代表理事会取而代之。这一举动激怒了黎巴嫩政治家，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单方面做出了这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成立的代表理事会所拥有的权限，甚至还不如之前的行政委员会。代表理事会与真正的民选立法机构相差甚远，不但被禁止讨论政治事务，且一年中召开会议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法令给予法国高级专员以立法权，后者可随意中止或解散代表理事会。即便是法国在黎巴嫩国内最狂热的支持者也感到愤怒，一位失望的亲法派移民写道："这一奴役的法令现在给法国留下了一个将协

议与友谊弃掷在士兵军靴之下的强权征服者的形象。”[11]

法国人完全不顾黎巴嫩人不断增长的反对之声，继续推动代表理事会的选举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不遗余力地确保其支持者成功当选，同时排除反对派人士。

穆罕默德·哲米勒·贝胡姆是参加1919年叙利亚国民会议的贝鲁特代表，他从原则上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并直言不讳地批评法国在黎巴嫩的行政措施。尽管他本人从未考虑参与竞选，他的密友们却说服他加入了一个反对派的竞选名单。贝胡姆会见了一名负责选举组织工作的法国官员，想试探一下当局是否反对其参与竞选。这位高提耶（Gauthier）先生向他保证，选举将是自由公正的，法国当局完全不会干预选举程序。受到高提耶这一答复的鼓舞，贝胡姆宣布加入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者竞选名单，该名单很快就在投票统计中遥遥领先。

尽管高提耶之前曾担保过，但法国当局很快就发现必须对选举程序加以干预。法国人意识到民族主义者名单的选举号召力后，马上便着手削弱相关候选人的影响力。在第一次会面数周后，高提耶就在办公室中召见了贝胡姆，以“最高当局的命令”之名明确要求后者退出竞选。贝胡姆被激怒了，当时他已经为竞选活动艰辛奋斗了一个月。高提耶却非常直接：“我们会在选举中阻止你。如果你当选了，我们也会将你强制逐出理事会。”贝胡姆拒绝让步，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法庭上面临着选举舞弊的指控。在听证会上，法官传讯了作为证人之一的高提耶。

“尊敬的先生，您是否指控贝胡姆先生向次级选民行贿，以收买选票呢？”法官问道。

“是的，是的。”高提耶回答说。

法官又转向贝胡姆，指着一个卷宗说道：“我有一大卷文件都是关于你的，全部是指控你收买选票，而这是法律所禁止的。”

贝胡姆只能徒劳地为自己辩护。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就这样持续困扰着贝胡姆，只是为了迫使他退出代表理事会的竞选。

听证会之后，贝胡姆与民族主义者竞选名单上的其他成员商讨应对

的策略。他的一位朋友是高提耶的私人医生，这位朋友提出愿意拜访这位法国官员，尝试说服后者撤销对贝胡姆的指控。让贝胡姆和他的朋友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医生在拜访高提耶之后笑着回来。原来高提耶驳回了医生为贝胡姆说情的请求，回答说："我的朋友，你对政治一无所知。我想说是贝胡姆先生本人迫使我们将他排除在议会的大门之外。我们想要的是这样：如果我们把一个杯子放在窗台上，它就要原封不动，一根头发丝的距离都不能动。"

医生一下完全理解了高提耶的意思：法国人不会容忍对他们所建立的政治机构的任何挑战，像贝胡姆这样的人则有可能将法国殖民统治的"玻璃杯"打下黎巴嫩的窗台。贝胡姆回忆道："我们所有人和这位医生一起，都为委任统治当局强加给我们国家的这条荒谬的政策而感到好笑。这就是曾许诺帮助我们实现独立的那同一个国家。"贝胡姆随后宣布放弃其候选人资格，不再参与理事会竞选。[12]

这次选举也证明法国意图将黎巴嫩作为一块殖民地来进行统治，而非帮助后者实现独立。这些举措也说服了一些曾经最有力的法国支持者，转而加入反对法国统治的黎巴嫩民族主义斗争。而这也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法兰西帝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不祥开端：如果法国在黎巴嫩都不能确保诸事顺利的话，那它在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又将如何做到呢？

*

法国殖民当局在黎巴嫩面临选举斗争的同期，在摩洛哥则面对着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1921—1926年，里夫战争同时以西班牙和法国统治为打击对象，成为阿拉伯世界到那时为止对欧洲殖民主义构成的最重大挑战。

1912年，欧洲列强默许法国将摩洛哥纳入其在北非的领地之内。同年3月，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哈菲兹（1907—1912年在位）同法国签订《非斯协议》，保留其家族在摩洛哥的统治权的同时，将绝大部分的国家主权以一种被称为"受保护领地"的殖民方式割让给了法国。原则上这意味着法国将保护摩洛哥政府不受外部威胁，实际上法国却通过素丹及其臣属实行绝对统治，即便是以间接的方式。

法国人的第一个失败就是未能维护摩洛哥的领土完整。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帝国利益可追溯至16世纪，其沿海要塞长久以来就已发展为殖民飞地（作为一个昔日帝国的遗存，休达和梅利利亚至今仍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法国不得不与西班牙商谈一项协议，以便划定两国在摩洛哥各自的"权利范围"。1912年11月，随着《马德里协议》的签订，这一程序最终完成。根据该协议条款，西班牙在摩洛哥北部和南部边缘地区拥有一个被保护国，其中北部区域包括约2万平方千米（8000平方英里）的大西洋、地中海海岸线和内陆地区，南部区域包括后来被称为西班牙撒哈拉或西撒哈拉的约2.3万平方千米（9200平方英里）的沙漠地区。此外，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港被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可以说，1912年以后摩洛哥素丹所统治的已是一个残缺不堪的国家。

尽管在沦为被保护国之前曾享受过数个世纪的独立政治地位，但摩洛哥的统治者从未成功地将其权威延伸至全国所有领土之上。长期以来，素丹对全国领土的控制都是在城市地区最有力，而在农村地区最薄弱。随着摩洛哥被纳入欧洲帝国统治之下，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士兵们发生哗变，很多人返回他们的部落，煽动农村反叛。当第一位法国总督于1912年5月到达摩洛哥履职之时，摩洛哥农村地区正陷入一片混乱。

赫伯特·利奥泰元帅（Marshal Hubert Lyautey, 1854—1934）在其执掌摩洛哥的13年间，将成为帝国治理方面最伟大的革新者之一。他到达非斯第二天，叛变的士兵及其部落支持者就对该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袭击。法国外交官在确保欧洲对本国在摩洛哥统治的支持方面显然成果有限，利奥泰对此有了切身体会。

尽管受训为一名军人，但利奥泰不希望法国重蹈在阿尔及利亚的覆辙。在武力"平定"阿尔及利亚的几十年时间里，数以万计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死于非命。利奥泰不愿强加欧洲式的行政管理方式，而是希望通过保留本地机构、与本地领袖合作来赢得摩洛哥人的支持，合作从素丹本人开始。

法国人主要通过素丹政府中被称为"迈赫赞"（*Makhzan*，字面意思为国库的土地）的机构来寻求对摩洛哥各城市的控制。为此，利奥泰对

标志着素丹主权的象征符号表现出高度的尊重，在官方场合演奏摩洛哥国歌，在公共机构悬挂摩洛哥国旗。但这种对素丹职位的尊重并不总能延伸至职位所有者身上：利奥泰上台以来的最初措施之一就是迫使执政的素丹穆莱阿卜杜·哈菲兹退位，用一位更加顺从的统治者穆莱优素福（Moulay Youssef，1912—1927年在位）来取代这位在他看来不可靠的素丹。

利奥泰对摩洛哥农村地区的控制则依靠三个本土支柱：大首领，即部落领袖；诸苏非教团，即伊斯兰神秘主义兄弟会，其地方分支网络遍布全国；以及本地的柏柏尔人。这些大首领掌控着其部落追随者的忠诚，随时有能力动员起数百名武装人员。由于在到达后不久就目睹了部落民对非斯的袭击，利奥泰深深认识到确保部落民支持对于法国统治的重要性。苏非教团代表着一种超越部落纽带之上的信仰网络，其地方分支过去就曾成为庇护异议分子、动员宗教反对派以驱逐非穆斯林侵略者的工具。利奥泰深知阿尔及利亚的苏非教团在19世纪30—40年代阿卜杜·卡迪尔对法国占领的抵抗运动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因而决心吸纳这些团体以支持其政府。柏柏尔人是一个不同于阿拉伯人、具有独立语言文化的少数群体。法国人采用一种经典的分而治之策略，试图挑动北非的柏柏尔人反对其阿拉伯邻居：1914年颁布的一则法令规定自此之后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将在法国的监管下，依据其自身法律和习俗而接受统治，从而成为一个被保护国中的被保护国。

利奥泰的治理体系并未因保留了本地机构就缺少了帝国特征。法国行政官员控制着所有的“现代”政府机构——财政、公共工程、卫生、教育、司法等，而宗教事务、宗教基金、伊斯兰法庭等机构则受摩洛哥人的管理。但利奥泰体系为本地领袖提供了一些诱导因素，来吸引他们协助而非颠覆法国殖民当局。摩洛哥的显贵们越是牵连进法国统治之中，利奥泰就越不需要在战场上寻求“平定”。利奥泰被尊为一位伟大的革新者，他对保护本地传统习俗的关注被其同时代人视为一种温情的殖民主义。

然而，即便在利奥泰体系之下，仍有很大一部分摩洛哥领土有待征服。为减少对法国军队兵源的占用，利奥泰招募并训练了一支甘愿将自己的国家交给法国人统治的摩洛哥军队。尽管也渴望完全的征服，但利

奥泰更多聚焦于摩洛哥的经济中心地区——被他戏称为“有用的摩洛哥”（*le Maroc utile*），包括那些农业、矿产和水力资源充裕的地区。

由于来自农村地区的持续抵抗，对“有用的摩洛哥”的征服进展缓慢。从1912年建立被保护国到1914年一战爆发，法国在摩洛哥的控制范围由非斯延伸至马拉喀什，包括拉巴特、卡萨布兰卡等沿海城市以及新建的盖尼特拉港——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利奥泰港。一战期间，摩洛哥的本地事务暂时被搁置，当时约3.4万名摩洛哥士兵应召参加了法国对德国的战争，为他们的帝国领主付出了惨痛的伤亡代价；利奥泰也在1916—1917年被召回，担任法国战争大臣。即便如此，利奥泰体系依旧如故，大首领被证实为法国在摩洛哥最重要的支持者。1914年8月，摩洛哥农村显贵在马拉喀什举行集会，承认他们对法国的依赖。一位重要显贵表示：“我们是法国的朋友，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会与法国休戚与共。”[13]

一战及巴黎和会结束之后，利奥泰重启对摩洛哥的征服，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抵抗。1923年，超过2.1万名法国士兵与约7000名摩洛哥反叛者展开激战。然而，利奥泰最大的挑战将来自法属保护国领土之外，来自北部西班牙属地里夫山区的柏柏尔人。他的死敌是一位地方小镇上的法官，名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Muhammad ibn Abd al-Karim al-Khattabi），更多以阿卜杜·克里姆（Abd el-Krim）的名字闻名。阿卜杜·克里姆在1921—1926年间，从他的家乡、俯瞰地中海海岸线的里夫山区，掀起了一场长达5年的大反叛，其间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士兵被杀。这场战争也被称为20世纪殖民军队在非洲所经历的最惨痛的失败。[14]

1921年夏，里夫民众（被称为里非）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冲突正式爆发。受到伊斯兰社会、宗教改革讨论的启发，阿卜杜·克里姆同时拒绝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希望在里夫建立一个独立于西班牙王国的国家。“我想让里夫成为一个像法国、西班牙一样的独立国家，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完整主权和独立的自由国家，”他解释说，“这种独立能确保我们自决和管理自身事务的完全自由，我还希望能按照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缔结这样

的协议和联盟。”[15]

作为一名拥有强大个人魅力的领袖，阿卜杜·克里姆很快招募了数千名里夫人，组建了一支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部队。里夫人在战斗中占据着双重优势：一方面，他们是为保卫自己的家乡、亲属免遭外国入侵者伤害而战斗；另一方面，他们在战斗中可利用家乡崎岖多变的山区地形。1921年7—8月，阿卜杜·克里姆的军队重创了西班牙守军，杀害约1万名士兵并俘虏了数百人。西班牙迅速派兵增援，并于1922年重新收复了阿卜杜·克里姆部队所占领的地区。然而，里夫人在与西班牙军队的对抗中继续捷报频传，成功缴获了超过2万支步枪、400支山地枪以及125架加农炮。这些武器很快就分发给了战斗人员。

这位里夫领袖通过赎金换俘虏的方式，迫使西班牙人为他的战备工作买单。1923年1月，作为释放战争开始以来里夫人俘获俘虏的条件，西班牙政府向阿卜杜·克里姆支付了超过400万比塞塔。这笔巨款资助了阿卜杜·克里姆雄心勃勃的计划，即通过反叛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1923年2月，阿卜杜·克里姆为在里夫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他接受了里夫各部落的效忠承诺，启用了里夫山区埃米尔（指挥官或统治者）这一政治头衔。作为回应，西班牙发动了又一轮攻势，企图重新夺回里夫地区。1923—1924年，里夫人连胜西班牙人，这一系列胜利在1924年秋攻克山城沙万的战斗中达到顶点。西班牙人在战场上又损失了1万名士兵。这些胜利给予了阿卜杜·克里姆和他的里夫军团更多自信而非审慎：如果击败西班牙人这么容易，击败法国人又有何不可能呢？

里夫战争在法国国内引发了深深的忧虑。在1924年6月对北部边境地区的一次巡查中，利奥泰警惕地发现西班牙军队的战败使得法国阵地很容易受到里夫人的袭击。里夫是一个贫穷的山区，在粮食进口方面严重依赖于法属区内的肥沃谷地。为了防止里夫人为保证食物需求而主动入侵，利奥泰需要强化非斯与西班牙属区之间的军事防卫。

1924年8月，利奥泰返回巴黎，向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及其政府简要汇报了阿卜杜·克里姆的反叛对法属区造成的威胁。但占领莱茵兰及在叙利亚与黎巴嫩建立行政机构已将法国的战线拉得过长，因此，法国无力提供在利奥泰看来保存法国在摩洛哥地位所需的最少人力和物力。利奥泰要求立即增派四个步兵营，但法国政府仅集结了两个。作为一个天生的保守派，利奥泰感觉他并没有得到赫里欧激进党政府的支持。当时他已年届七旬，且身体状况不佳，回到摩洛哥后已不具备必要的身体条件或者政治力量来遏制里夫人。

1925年4月，阿卜杜·克里姆挥师南下侵入法属区。他们寻求占据着里夫南部农业用地的本地部落的支持。他的指挥官会见了部落领袖，向后者解释了他们对当时情况的认识："以复兴的伊斯兰之伟大荣耀的名义，阿卜杜·克里姆——摩洛哥真正的素丹已经发起了'圣战'，目标就是驱逐异教徒，特别是法国人。"他们继续解释说，阿卜杜·克里姆的部队占领整个摩洛哥"不过是几天之内的事情"。[16]阿卜杜·克里姆本人则越来越将此运动视为一场反抗非穆斯林侵略者占领穆斯林土地的宗教战争，并公然对整个摩洛哥素丹国而不仅仅是更小的里夫共和国提出了领土要求。

就像利奥泰所担心的那样，里夫人很快便席卷了防御严重不足的北部农业地区；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法国人被迫疏散了所有的欧洲公民，并让部队从农村地区退守至非斯城。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法国人在对抗里夫人的军事行动中就失去了43个军事哨所，遭受了1500人死亡、4700人受伤的巨大损失。

6月，阿卜杜·克里姆的部队已经停驻在距离非斯城仅40千米（约25英里）的地方，这时他写信给城内著名的卡鲁因（Qarawiyyin）清真寺学府的伊斯兰学者们，试图赢得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你们和你们的同事都具有高贵的信仰，与伪善者和异教徒并无瓜葛。我要提请你们注意，不团结的摩洛哥所深陷其中的奴役状态。"他进而指控当政的素丹穆莱优素福已经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了法国人，且与腐败的官员为伍。他要求得到非斯城宗教领袖的支持，强调这是一种宗教义务。[17]

这封信论证有力，采用了合理的神学术语，并辅以《古兰经》节文

的支持，来论证“圣战”的必要性。然而，非斯城的阿拉伯学者并未因此就站到里夫的柏柏尔人一方。阿卜杜·克里姆的军队到达非斯市郊时，遭遇由利奥泰体系创造、处于法国牢固控制之下的“有用的摩洛哥”。面对这一两难选择——一方是来自里夫地区、胸怀抱负的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则是法国帝国统治所牢固建立的制度和工具，非斯的穆斯林宗教学者们显然认为利奥泰体系更为强大。

1925年6月，阿卜杜·克里姆的运动在非斯城停滞不前。如果说法国在摩洛哥农村地区统治的三大支柱是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重要部落首领以及柏柏尔人，那么当时利奥泰已经确保了其中两者的支持。“我的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阿卜杜·克里姆后来反省道，“正是宗教狂热。”考虑到他本人也曾将伊斯兰作为争取对反帝“圣战”运动支持的工具，他的这一说法显然前后并不一致。但实际上这位里夫领袖所指的是，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坚信“苏非教团的谢赫们是我最大的敌人，也是我的国家前进道路上的敌人”。此外，他在对付大首领时也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功。“起初，我想通过说服和论证的方式来赢得民众对我观点的支持，”阿卜杜·克里姆写道，“但我遭到了拥有强大影响力的重要家族的激烈反对。”除去一个例外，他解释说：“其他家族都是我的敌人。”[18]通过反对阿卜杜·克里姆，大首领和兄弟会的谢赫如利奥泰所设想的那样，支撑起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至于柏柏尔人，阿卜杜·克里姆和他的里夫战士们本身就是柏柏尔人，他们强化了利奥泰的柏柏尔分离主义政策，甚至比利奥泰本来设想的还要更进一步。毫无疑问，里夫人的柏柏尔人身份在劝阻摩洛哥阿拉伯人加入其反法斗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尽管利奥泰的殖民政府体系仍屹立不倒，但其本人却因里夫的挑战而一蹶不振。对他在巴黎的批评者而言，里夫战争波及法国的保护国，本身就意味着利奥泰寻求摩洛哥完全臣服的努力失败了。1925年7月，随着大规模援军由法国涌入摩洛哥，因数月战事和健康状况不佳而心力交瘁的利奥泰，请求另一位指挥官来协助他工作。法国政府派了一战中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菲利浦·贝当元帅前来协助。8月，贝当接管了法军在摩洛哥的军事行动指挥权。次月，利奥泰提出辞职，并于10月永久地离开了摩洛哥。

利奥泰离开后，阿卜杜·克里姆也没有坚持很久。法国、西班牙两国

军队开始合力镇压里夫反叛。里夫军队撤退至位于摩洛哥北部家乡的山区后，1925年9月开始面对法、西大规模军队的两面围困。10月，欧洲军队已经彻底包围并全面封锁了里夫山区，试图迫使后者投降。阿卜杜·克里姆提出议和，但遭到法、西的粗暴拒绝。1926年5月，一支由约12.3万名士兵组成的欧洲联军攻陷了里夫山区，里夫抵抗运动最终失败，阿卜杜·克里姆于5月26日向法国投降。随后他被流放至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直至1947年。

里夫战争失败后，法国和西班牙恢复了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再也没有受到新的本地抵抗运动的困扰。尽管里夫战争并未引发对法国或西班牙在摩洛哥统治的持续反抗，但阿卜杜·克里姆及其抵抗运动却激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者的想象力：里夫人被视为阿拉伯人的一支（而非柏柏尔人），他们领导了一场反对欧洲统治的英雄般的抵抗运动，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信仰而多次击败了欧洲人的现代军队。里夫人反抗西、法的5年反叛（1921—1926），也激励了部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后者在1925年发动了自己的反法斗争。

*

在叙利亚中部城镇哈马，一位年轻的军官从报纸报道中热切地关注着里夫战争局势的进展。法乌齐·盖伍格吉（Fawzi al-Qawuqji）曾与法国人作战。盖伍格吉的出生地的黎波里，当时已成为大黎巴嫩的一部分。作为费萨尔国王事业的支持者，他曾加入那支于1920年7月在汗·麦赛伦反抗法国殖民占领军的非正规部队。那次惨痛的失败使得盖伍格吉确信，叙利亚人在当时不可能将法国人赶走。

麦赛伦战役后仅数周，盖伍格吉就放弃理想主义而选择现实主义，进入一支法国人新建立的叙利亚部队服役，该部队叫作特别部队（*Troupes Spéciales*），或称叙利亚军团。尽管与一个外来帝国合作来管理自己的国家，但盖伍格吉对自己身穿法国军服并不感到舒服。正是在哈马军营之中，他和同伴中的民族主义者受到报纸上关于里夫战争报道的启发，将阿卜杜·克里姆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在他们的斗争中所看到的英雄主义，使我们相信阿拉伯人的这种独特的个性并没有彻底消失，”盖伍格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种对牺牲的向往在我们中间传

播。我着了魔似的关注着摩洛哥的事态发展，甚至找来了冲突地区的地图。”[19]

如果说里夫战争启发了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那么叙利亚的帝国行政人员则从利奥泰在摩洛哥的治理策略中汲取了灵感。被指派来管理叙利亚的法国官员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利奥泰“学派”的毕业生：法国首任驻叙利亚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将军，曾是利奥泰在摩洛哥的助手；其他被指派到叙利亚的重要殖民官员，也曾在利奥泰手下供职，其中就包括古罗派驻大马士革的代表卡图上校（Colonel Catroux），驻阿勒颇代表德·拉莫特将军（General de Lamothe），以及派驻在阿拉维地区的两位上校。很多低级别官员也是从摩洛哥来到叙利亚任职。因此可以预料的是，他们试图在叙利亚复制一个经过调整的利奥泰体系。[20]

自占领叙利亚伊始，法国就同时在城镇和农村地区面临民族主义者的抵抗。1919年，叙利亚西部的阿拉维山区爆发了反法起义，经过两年的时间才得到镇压。阿拉维派（Alawites），一个可追溯至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社群，仅仅希望保留其自治地位，并不妄称为民族独立而战斗。法国人通过建立一个微型国家，成功地满足了阿拉维派维持地区自治的愿望。这一微型国家以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及阿拉维山区为基础，由地方显贵与法国行政长官合作进行统治。

1919年，一次更危险的民族主义反叛在北部城市阿勒颇附近爆发。反叛领导人易卜拉欣·哈纳努（Ibrahim Hananu）是一位拥有土地的地方显贵，一战前曾在奥斯曼官僚机构中任职，后因对奥斯曼战时镇压政策感到失望，在1916—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期间志愿加入埃米尔费萨尔的军队，并参加了1919年叙利亚国民议会。在哈纳努这位实干家看来，叙利亚国民议会不过是只说不做的清谈，因此他北上回到阿勒颇，开始组织一支游击队伍以便对法国人构成实际的震慑。他发起了一场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农村暴动，1920年法国占领阿勒颇后，这一运动很快发展为一场民族主义起义。1920年夏秋之间，起义军规模迅速由800人扩大至近5000名志愿军。[21]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从邻国的土耳其人那里获得武器和资金援助，后者正在安纳托利亚南部沿海地区武装反抗法国人对该地区的短暂占领。为防止哈纳努起义在叙利亚引发一场全国规模的民族主义大起义，法国人迅速部署了军队，强化了对阿勒颇的控制。

1921年秋，哈纳努逃亡至约旦，随后被英国当局逮捕并移交给法国司法部门。法国人对哈纳努进行了审判，但很明智地宣判其无罪，避免使其成为一名烈士。当时法乌齐·盖伍格吉已经加入了叙利亚军团，对他而言，哈纳努起义的失败也印证了他的这一观点：叙利亚人目前尚无实力对抗法国人。

事实上，法国人比法乌齐·盖伍格吉设想的要更担心民族主义煽动可能带来的挑战。为应对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法国人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叙利亚分割为四个微型国家：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被设置为两个独立政府的首都，以防止叙利亚主要城市的民族主义者为共同事业而实现联手；法国人还为叙利亚地区两个拥有悠久的地区自治传统的宗教团体——叙西部的阿拉维派和南部的德鲁兹派设计了两个独立国家。法国人希望能通过利奥泰柏柏尔政策的模式，在委任统治框架内赋予阿拉维派、德鲁兹派某种既得利益，从而确保他们与城市民族主义相隔绝。法国高级专员古罗依据其在利奥泰元帅“学院”中所学得的信条，将叙利亚划分为自治区，又任命本地精英担任叙利亚各个独立地区的总督。[22]

在全力确保叙利亚德鲁兹派、阿拉维派社群善意的同时，法国当局对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领袖却毫不妥协。20世纪20年代初期，叙利亚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是阿卜杜·拉赫曼·沙哈班达尔（Abd al-Rahman Shahbandar, 1882—1940）。沙哈班达尔是一名医生，受训于贝鲁特美国大学，由于医学训练而精通英语。1919年，他曾充当金-克瑞恩代表团的导游和翻译，并与查尔斯·克瑞恩结下了私人友谊。1920年5月，他曾在费萨尔国王最后一任内阁中短期担任外交大臣，同年7月费萨尔政府倒台后流亡埃及。1921年夏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宣布大赦后，他才回到大马士革。

在回归叙利亚途中，沙哈班达尔博士重启民族主义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名为“铁拳协会”（Iron Hand Society）的秘密组织。“铁拳”集结了奥斯曼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团体的资深成员，以及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的支持者，其共同目标是将法国人逐出叙利亚。“铁拳”的行动受到法国当局的严密监控。1922年4月7日，法国人以涉嫌煽动反叛为由，逮捕了沙哈班达尔以及该运动的另外4名领导人。

法国当局的局部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异议人士的愤怒。次日，一群民族主义者利用市中心伍麦叶清真寺周五聚礼的机会，鼓动8000名聚众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当时，“铁拳”成员率领着由宗教领袖、街区强人、商人、学生等组成的复杂队伍，穿越大马士革的中央市场向城堡行进，在那里被法国安全部队强行驱散。安全部队逮捕了46名大马士革人，并造成数十人受伤。

然而，法国人的镇压措施并未能遏制抗议活动，更多的大马士革人开始响应民族主义者的号召。4月11日，以沙哈班达尔的妻子为首的40名妇女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法国当局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民族主义者发起大罢工，在法国当局审判沙哈班达尔及其他反对派领袖期间，大马士革店主们进行了长达两周的罢市。最终，法国当局通过了针对被告人的多项指控，沙哈班达尔被判处20年徒刑，其他人量刑也在5—15年之间。“铁拳”最终被击破，民族主义者的声音遭到压制，国内舆论一片死寂。但这样的情况仅持续了3年。

经过3年相对稳定的时期之后，法国自1925年开始重新审视其在叙利亚的政治安排。同时运转多个微型国家被证明过于昂贵。鉴于高级专员古罗已完成其任期，他的继任者们便宣布将阿勒颇与大马士革合并为一个国家，并为将于1925年10月举行的新的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定了日程。

经过3年的政治平稳时期，法国人放松了对叙利亚政治的严密掌控。新任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Maurice Sarrail）将军赦免了政治犯，并允许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在代表大会选举之前组建一个政党。在狱中度过两年之后，沙哈班达尔因大赦而被释放，并于1925年6月建立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机构即人民党。沙哈班达尔的政党吸引了一些最重要的大马士革精英。作为回应，法国当局也扶植了一个亲法的党派——叙利亚联盟党（Syrian Union Party）。叙利亚人担心法国会操纵选举的结果，正如后者在黎巴嫩所做的那样。然而，打乱这一政治进程的插曲却来自德鲁兹山，而非高级专员的办公室。

1921年起，法国人与德鲁兹人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发酵。1921年，利奥泰“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乔治·卡图（Georges Catroux）将军依据法国在摩洛哥柏柏尔政策的模式，起草了法国人与德鲁兹人之间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德鲁兹山将构成一个独立于大马士革的特别行政单元，拥有一位选举产生的本地长官和代表会议。换言之，山区的行政管理表面上将处于德鲁兹人的控制之下。作为交换，德鲁兹人将接受法国委任统治的条款，同意在山区派驻法国顾问并建立一个法国军营。很多德鲁兹人对协议的条款深怀疑虑，担心法国人借协议过多干涉其内部事务；绝大多数德鲁兹人则持观望立场，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判断法国人的意图。然而，随后几年的经历却没能使他们安心。

首先，法国人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即疏远了最强大的德鲁兹领袖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Sultan Pasha al-Atrash）。1921年，法国当局为削弱这位山区最强大领袖的权威，提名苏尔坦帕夏的一位次要的亲戚赛里木·艾特赖什（Salim al-Atrash）担任德鲁兹山区长官。这也为法国人与苏尔坦帕夏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1922年7月，苏尔坦帕夏的属下释放了一名法国人捕获的俘虏，作为回应，帝国政府派遣部队和战机摧毁了苏尔坦帕夏的住宅。苏尔坦帕夏不为所动，领导了一场针对法国在山区据点的游击战，战斗持续了9个月之久，直至1923年4月这位德鲁兹军阀被迫投降。法国人与这位德鲁兹领袖达成了休战，从而避免了将如此重要的一位地方领袖送上法庭的危险。但德鲁兹山名义上的长官赛里木·艾特赖什已经提交了辞呈，而在苏尔坦帕夏的反对下，没有任何一位德鲁兹领袖愿意接受山区长官这杯“毒酒”。

在缺少合适的德鲁兹派候选人的情况下，法国人打破了利奥泰体系的一条核心原则以及他们自己与德鲁兹人达成协议的条款——1923年法国当局任命一位法国军官担任山区长官。更糟糕的是，他们所任命的长官人选加布里埃勒·卡比耶（Gabriel Carbillet）上尉是一位狂热的改革派人士，他将摧毁德鲁兹山地区他所谓的“古老的封建体制”视为自己的使命，这一体制在他看来是“倒退的”。德鲁兹人对卡比耶的不满与日俱增。沙哈班达尔就不无讽刺地指出，他的很多民族主义同僚认为这位法国军官将德鲁兹人逼迫到反叛的边缘，从而推动了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发展。[23]

德鲁兹领袖们无法接受法国人对其1921年协议的公然违背，决定直接向委任统治当局进行申诉。1925年春，山区领袖组成一支代表团前往贝鲁特，试图会见高级专员并对卡比耶提出申诉。高级专员萨拉伊非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来安抚心怀不满的德鲁兹人，反而拒绝接见代表团，进而公开羞辱了这些山区重要人物。德鲁兹领袖们怒火冲天地回到山区，已然决心发动反法起义，并开始寻找合作伙伴。他们转向了城市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

1925年，民族主义运动在叙利亚全国城镇进展迅速。在大马士革，沙哈班达尔将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聚集在他的人民党之下。在哈马，法乌齐·盖伍格吉已建立了一个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政党，即真主党。在这一意义上，盖伍格吉成为最早意识到伊斯兰用以动员民众反抗外来统治的政治力量的先驱之一。盖伍格吉蓄须明志，每夜拜访哈马城内不同的清真寺，为发动起义而争取支持。他和城内的穆斯林布道者们建立了良好关系，鼓励后者在周五聚礼的布道中增添《古兰经》中号召“圣战”的段落。此外，他还从哈马部分富有的地主家庭获得了财政上的支持。1925年初，盖伍格吉派遣使者前往大马士革会见沙哈班达尔，提议在后者的人民党与哈马的真主党之间达成更好的协调。沙哈班达尔则劝阻这些来自哈马的使者，提醒说“在当前的情形下发动起义具有明显的风险，将伤害到民族的利益”。[24]同年5月，随着德鲁兹人加入民族主义事业，沙哈班达尔认为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一个可期成功的关键体量。

5月，德鲁兹领袖集团与沙哈班达尔以及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取得接触。最初在一位资深记者家中会面，双方对话主要围绕发动起义的方式而展开。沙哈班达尔向德鲁兹人简要介绍了法乌齐·盖伍格吉在哈马的活动情况，提议在一场全国性的叙利亚大起义中开辟多条反法战线。后续一系列会议都在沙哈班达尔家中举行，参与者包括艾特赖什氏族的重要成员。所有参会者秘密宣誓并签署协定，宣誓为实现民族统一和独立而全力合作。[25]当然，这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盟友关系：沙哈班达尔和他的同僚当然乐见德鲁兹人在其山区发动武装起义，因为相比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德鲁兹人在其山区内享有更高的机动性且武装更加充分；作为回报，德鲁兹人也不会单独面对法国人的军事压力——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许诺将起义传播至全国各地，同时给予德鲁兹人率先

发难所需的支持。

7月，德鲁兹人发动反法起义。苏尔坦·艾特赖什率领数千名战士向驻扎在山区第二大城镇萨勒赫德的法军发动了袭击，并于7月20日占领了该镇。次日，他的部队包围了德鲁兹山地区行政首府苏伟达（Suwayda'），使得很大一批法国行政人员和士兵陷入围困。

由于事发突然，法国人尚缺乏足够的兵力和策略来遏制德鲁兹人起义。之后的几周内，由8000至1万名志愿者组成的德鲁兹起义军击败了一支又一支被派来镇压起义的法国军队。为了防止全国性大起义这一噩梦的发生，法国高级专员萨拉伊决心在起义初期就予以镇压。他从叙利亚北部和中部调动法军与叙利亚军团的兵力，来镇压南部德鲁兹山地区的起义。8月，法国当局对大马士革所有一般的民族主义嫌犯采取打压措施，大肆逮捕，未经审判就流放了大量相关人士。沙哈班达尔和他最亲密的合作者逃离大马士革，前往德鲁兹山地区的艾特赖什家族寻求避难。尽管法国人做出最大努力，起义仍开始蔓延至其他地区。下一轮的爆发在哈马。

法乌齐·盖伍格吉已经为在哈马发动起义做好了准备，仅在等待最佳时机。在见证了以往各次反法斗争的潮起潮落后，盖伍格吉深信1925年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法国统治的各支反对力量——德鲁兹人、大马士革人以及盖伍格吉的哈马派之间的协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德鲁兹人的反叛已经对法国人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此外，盖伍格吉还关注着摩洛哥里夫战争的进展，了解到法国人在那里的情况也在恶化：“法国军队已经卷入与阿卜杜·克里姆领导下里夫地区部落的战斗而无法自拔。后者胜利的消息不断向我们传来。我们还收到消息称法国增援部队已被派往马拉喀什。”盖伍格吉意识到法国人一旦向摩洛哥增派部队，就无力再向驻叙法军增派援军。“我的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了，”他总结道，“所剩的就是执行这些准备工作。”[26]

1925年9月，盖伍格吉向德鲁兹山的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派遣使者，提议德鲁兹人进一步升级其攻势，从而将法军全部吸引至南部地区。随后，他将于10月初在哈马发动进攻。为了确保在哈马开辟第二条

反法战线，苏尔坦帕夏愿意让他的战士面对法军的激烈战斗，因而就同意了盖伍格吉的方案。

10月4日，盖伍格吉在周边贝都因部落战士和哈马城市人口的支持下，领导叙利亚军团发动兵变。他们俘虏了多名法国士兵，并将该市的行政人员围困在政府大楼内。至当日午夜，哈马市已落入起义者的控制之下。

法国人很快做出回应。尽管正如盖伍格吉料想的那样，绝大多数法国军队都在德鲁兹山作战，但法国人还有空军力量。法国人开始了一场针对城市居民区的轰炸，将哈马市中心市场的一部分夷为平地，造成约400名平民死亡，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尽管最初承诺支持盖伍格吉的运动，但哈马的显贵们也是最早脱离反抗队伍、并与法国人就停止反叛和轰炸达成一致的人。起义后仅3天，盖伍格吉及其追随者就被迫撤离至农村地区，任由法国人重新占领哈马。

未受哈马失利的影响， 盖伍格吉和他的部下继续将反叛传播至叙利亚其他城镇地区。“叙利亚土地上反叛的大门已经在我们面前敞开。通过这些演习，”盖伍格吉自诩道，“法国人的智慧和机智在阿拉伯人的智慧机智面前已然落败。”[27]

几天的时间内，起义已传播至大马士革周边的村庄。法国人试图通过展示极端暴力来遏制这场运动：整批的村庄在炮兵和飞机的轰炸下被摧毁；大马士革内陆地区近100名村民被处决，死者尸体作为可怕的战利品被运回大马士革，以便对其他起义的支持者形成震慑。可以预见的是，暴力行为引发了更多的暴力：作为对与殖民当局勾结的警告，12名为法国人服役的本地士兵残缺不全的尸体也被暴露在大马士革城门之外。

至10月18日，起义已传播至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居民不分男女大量加入抵抗运动。加入战斗的男人们依靠他们的妻子与姐妹将食品和武器偷运至其藏身之处：在一位法国士兵的注视之下，一位大马士革战士的妻子就成功地将食品和武器送到她的丈夫及其起义战友的手中。大

马士革记者希蒳·特季曼（Siham Tergeman）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法国哨兵］从未想到妇女们正在帮助叛军从屋顶逃跑，或者在罩袍或食盒掩盖之下向他们运送武器，从而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28]

对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领袖而言，起义已经成为一场“圣战”，战斗人员也就成了“圣战者”。近400名志愿军进入大马士革，成功确保了对沙古尔和米坦街区的控制，迫使法国行政官员进入城堡避难。起义军的一支分遣队甚至攻入阿兹姆宫，试图抓捕法国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将军。这座宫殿本是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As‘ad Pasha al-‘Azm）在18世纪建立的一个奢华的建筑，在法国人接管后则被改造为长官府邸。尽管萨拉伊实际上已撤离了相关街区，但一场激烈的枪战仍使这座古老的宫殿陷入火海。但这还只是故事的开始。

为了挫败大马士革的起义，法国人不惜动用蛮力。他们从城堡上用火炮对大马士革各个街区进行狂轰滥炸。大马士革民族主义领袖沙哈班达尔博士写道：“在指定的时间，这些令人憎恶的装备将它们的灰烬喷射向这座城市最美的街区。在随后的24小时内，毁灭性的炮弹和大火吞噬了600多座最美的房屋。”紧随其后的是长达数日的飞机轰炸。“轰炸从周日中午一直持续到周二傍晚，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死于碎石瓦砾之下的死者的准确数量。”沙哈班达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道。[29]据后来的估算，3天暴力期间死者人数高达1500人。

对平民人口的巨大影响迫使起义者停止了在大马士革市区内的行动。“当起义者们看到针对街区的连续轰炸使妇女儿童感到恐怖，看到空中盘旋的飞机对市内房屋不加区别地倾泻炸弹时，他们便离开了大马士革市区。”沙哈班达尔后来回忆说。尽管被逐出了哈马和大马士革，这些起义者已成功缓解了德鲁兹山的局势，3个月以来德鲁兹山一直是法军镇压首当其冲的区域。但如果法国人幻想通过在哈马和大马士革滥用暴力来遏制起义的传播，那他们肯定将感到失望。1925—1926年的冬季，随着起义传播至全国各地，法国当局已被迫将军队派送至叙利亚全国各个角落。

法国人成功镇压了叙利亚北部和中部的反叛之后，才有能力返回德鲁兹山地区。在那里，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仍领导着一场活跃的抵抗运

动。1926年4月，法国人重新占领了德鲁兹地区首府苏伟达。同年5月阿卜杜·克里姆在摩洛哥最终投降之后，法国人终于得以将大量兵力调往叙利亚。根据盖伍格吉的说法，驻叙法军增至9.5万人。叙利亚抵抗力量被法国人彻底压倒，其主要领袖流亡海外。1926年10月1日，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和阿卜杜·赖哈曼·沙哈班达尔博士跨越边境进入邻国外约旦。

在其他民族主义领袖放弃抵抗之后很久，法乌齐·盖伍格吉仍尝试继续武装斗争。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仍不知疲倦地呼吁重新起义。但叙利亚人民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动力，他们在面对法国人野蛮报复行为时变得谨慎起来。在1927年3月的最后一场战役中，盖伍格吉成功招募了一支由74名战士组成的队伍，但其中仅27人拥有马匹。他们绕开大马士革，隐藏至荒漠地区，最终被之前支持其运动的沙漠部落所出卖。凭借机智和骗局，他们才成功逃脱，撤退至外约旦，但也使自己的国家牢牢控制在法国人手中。[30]

叙利亚大起义未能从法国统治下实现独立。之后，民族主义运动领导权落入一个新的城市精英领导层手中，后者回避武装斗争，试图通过谈判和非暴力抗议的政治程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直至1936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种种努力都收效甚微。

*

尽管从摩洛哥到叙利亚，法国殖民当局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镇压叛乱，但他们至少在阿尔及利亚还有一个盛大的聚会值得期许。

此时，距1827年阿尔及利亚德伊暴怒挥动蝇拂从而决定了他国家的命运已有一个世纪。自从1830年6月法国军队首次在西迪·法鲁什登陆起，法国人已先后驱逐了奥斯曼人，击败了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镇压了多次大规模起义，最后一次起义发生在1871—1872年。至20世纪初，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地中海到撒哈拉的征服。

至20世纪20年代，已有超过80万名定居者从法国移居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不再是生活在一块外国土地之上。[31]自1848年起，阿尔及利亚就被宣布为法国领土，奥兰、阿尔及尔、君士坦丁三个省份

则被转变为法国的海外省，在巴黎的法国议会中拥有民选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们——更准确地说，是法裔阿尔及利亚人代表，因为本土阿尔及利亚人既无权投票，也不得参选国民职务——在议会中享受着远超其人口比例的影响力，作为一个集团致力于保护定居者的利益。

随着1930年百年纪念的临近，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开始抓住这一机会，向法国本土的法国人以及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展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存在的胜利和持久性。关于庆典的规划几年前就已开始。1923年12月，阿尔及利亚总督采取了第一步，下令建立一个“筹备庆祝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百年纪念项目”的委员会。法国议会批准了一项4000万法郎的预算，并授权成立一个负责组织庆典工作的委员会。最终，庆祝活动耗费超过了1亿法郎。

为了这一年，整个阿尔及利亚的面貌都发生了变化。为点缀城市和乡村，艺术家们受委托创作了众多纪念法属阿尔及利亚历史中重大里程碑事件的纪念碑；众多博物馆在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奥兰等大城市中先后落成；公共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兴建，其中包括学校、医院、孤儿院、贫民院、农业学院、专业学校，以及一个能确保百年庆典新闻传播至阿尔及利亚全国各地的世界上最大的广播站；一个大型博览会在西部港口城市奥兰举行，其空前盛况可媲美一次世界博览会；超过50次国际会议和大会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其涵盖的主题林林总总；各类体育项目、穿越撒哈拉的汽车拉力赛、帆船比赛同样被列入了日程；各城市在夜间灯火通明，重要建筑物的轮廓被电灯和精致的烟火表演所点亮。

百年庆典的象征意义最集中地体现在受委托而创作的众多纪念碑之中。在距阿尔及尔南部仅几英里的布法利克，竖立着一座宽45米、高达9米（宽约148英尺、高约30英尺）的巨型雕像，以庆祝“法国殖民天才们的不朽荣光”。雕塑家亨利·布沙尔（Henri Bouchard，位于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纪念碑的设计者） 将一小撮法国“文明的开路先锋”置于整个纪念碑的中心，为首的便是19世纪30—40年代为击败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而不惜将阿尔及利亚烧为焦土的两位军事指挥官比若将军和德·拉莫里西耶将军（General de Lamoricière）；在军人背后骄傲地站立着一群法国显贵、市长以及“模范定居者”；在雕像后部俯视上述身着制服和套装的法国人的位置，雕塑家增加了少数身着民族服饰的阿拉伯人，他们代

表着“最早一批驯顺的本地居民，其积极的忠诚使得［法国殖民］任务成为可能”。32

法国人甚至成功地将一种带有同情色彩的阿尔及利亚元素巧妙地纳入了1830年的军事记忆。旨在纪念1830年6月14日法军在西迪·法鲁什登陆的纪念碑是否会“引发本土居民的不快”？围绕这一点，法国媒体已经展开热烈讨论。百年庆典的官方历史学家梅西耶（Mercier）写道：“所有了解阿尔及利亚以及与其阿拉伯-柏柏尔人保持日常接触的人，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任何担心。”梅西耶强调，所有本土阿尔及利亚人的真实感情充分体现在部落领袖布阿齐兹·本·加纳（Bouaziz Ben Gana）的评论之中。加纳曾表示：“假如本土居民在1830年就认识法国人，他们本可以在步枪上装上鲜花，而非子弹，去迎接他们。”在这座高达10米(1)的雕像的铭文中，描绘了头戴三色帽的玛丽安向下凝视着一个恭顺的阿拉伯儿子的双眼这一场景，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100年后，法兰西共和国已赋予这个国家繁荣、文明和公正，一个心怀感恩的阿尔及利亚则向祖国致以永垂不朽的敬意。”法国人似乎希望将阿尔及利亚人刻画为其国家殖民化进程支持者的角色。33

1930年6月14日，百年庆典活动在西迪·法鲁什达到顶点。在这里，活动组织者再次试图将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描绘为一个法国-阿拉伯联合成果，活动官方称其为“对法国人口与本土人口联合的庆祝”。大量民众聚集在新的西迪·法鲁什纪念碑周围，观看阅兵式并聆听讲话。阿尔及利亚总督率领着一支由殖民官员组成的方阵。空军飞过上空，并向纪念碑周围的聚众抛撒花瓣。火炬传递手仿照奥运会的方式，从纪念碑出发跑向东部约30千米（19英里）外的阿尔及尔。

法国人的讲话不出意外地充满胜利者的口吻，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登上讲台的阿尔及利亚高层官员所做的评论。一位代表清真寺学校教职人员的宗教学者哈吉哈姆（Hadj Hamou），对他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讲授伊斯兰教的自由表示感谢。他宣称所有清真寺的聚众在对“神圣的世俗法兰西共和国的共同的爱”方面，都追随其伊马目们的引导，这是多么奇妙的自相矛盾的表述。代表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言的M.贝勒哈吉（M. Belhadj）在当天的庆典中，则强调“法国人与本地人民的深度融合”，他们已然转变为“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在同一旗帜下，同样热爱祖国母亲的单

一、独特的民族”。一位重要的阿拉伯显贵M.欧拉白（M. Ourabah）则恳求道：“教导我们，让我们上升得更高，升到你们的高度吧！让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呐喊：法国万岁，永远伟大！阿尔及利亚万岁，永远属于法国！”[34]

在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阿尔及利亚似乎正在拥抱帝国主义。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很多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精英认识到他们无法击败法国人，因此他们试图加入后者，即享有法国公民身份的充分权利——这些权利直至1930年对他们而言仍遥不可及。在接受法国统治不可避免的前提下，这些阿尔及利亚人选择了一场公民权利运动，而非民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阿尔及尔大学一名药理学学生——法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

法尔哈特·阿巴斯（1899—1985）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某小镇的一个外省行政官员和地主家庭。他在法国学校接受教育，最终认同了法国的价值观念。他最渴望的就是享有任何法国人都拥有的完整权利，但法国法律却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司法、政治权利施加了诸多严重限制。这些法律从地理层面将阿尔及利亚一分为三：欧洲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施行法国普通法；欧洲人占少数的农村社群，施行军事和民事混合统治；阿拉伯领土则完全处于军事管理之下。

相关法律还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与穆斯林之间做出明确区分。1865年法国参议院颁布法令，规定所有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为法国臣民。他们可以在军事和民事部门任职，但并非实际上的法国公民。作为被考虑授予法国公民权的条件，本土阿尔及利亚人不得不放弃其穆斯林民事地位，同意遵从法国个人身份法。考虑到婚姻、家庭、遗产分配等问题在伊斯兰法中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一条件无异于要求穆斯林放弃其信仰。因而毫不奇怪的是，在该法律施行的80年时间里，只有约2000名阿尔及利亚人申请获取法国公民权。

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不但不受法国法律的保护，还受制于一套被称为《本土居民法典》的歧视性法规。与美国南北战争后通过的旨在维持非裔美国人隔离、从属地位的《吉姆·克劳法》相似，上述法典起草于1871年最后一次重要的阿尔及利亚反法起义之后，规定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可

因部分欧洲人有权合法从事的行为而受到起诉，如批评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官员。法典中设定的绝大多数罪行都十分细碎，惩罚措施也很轻微，不超过5天的监禁或15法郎的罚款。但正因为其结果是如此微不足道，法典的内容越是能按部就班地执行。此外，该法典比其他任何司法区分都更加直接地提醒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对于法尔哈特·阿巴斯这样深受法国共和思想熏陶的人而言，这种侮辱显然难以忍受。

阿巴斯以一篇用法语写成的尖锐的批评文章作为对百年庆典的回应。这篇文章也典型地反映出法国统治一个世纪后一位阿尔及利亚青年的幻灭情绪，题为《青年阿尔及利亚人：从殖民地到行省》。阿巴斯的这篇力作不啻为一篇要求以法国共和主义的开明侧面取代当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殖民主义的雄辩的请愿书。

> 已经逝去的这个世纪是一个泪水与鲜血的世纪，而在哭泣和流血的主要是我们这些本土人民……百年庆典活动只不过是对一段痛苦过去的笨拙提醒，是某些人的富有在另一些人的贫穷面前的一种炫耀……如果新的世纪不能将这个国家的不同组成元素一视同仁、给予弱者提升其地位的手段的话，种族间的相互理解就仍将是空谈。[35]

在阿巴斯的文字中，我们听到了在西迪·法鲁什百年庆典中发言的阿尔及利亚显贵们呼声的回响——“让我们上升得更高，升到你们的高度吧！”不过阿巴斯在提出要求方面更加明确自信。

阿巴斯指出，阿尔及利亚人凭借其战时军事服务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公民权。自从1913年将强制兵役引入阿尔及利亚以来，法国就给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20万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征入伍，其中很多人再也未能返乡。关于战争中阵亡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数量，估计在2.5万至8万之间，伤者更远多于这一数字。[36]

即便在一战结束后，阿尔及利亚人仍被征召进入法国军队。阿巴斯宣称凭借1922年他在军队中的服役经历，他已经赢得了他本人的公民权。他指出，法国并不按种族、宗教区分服兵役的士兵，在法律方面也

不应有这种区分。“我们是穆斯林，同时我们也是法国人，”他继续写道，“我们是本土居民，我们也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有欧洲人和本土民族，但都是法国人。”[37]然而，在殖民主义社会及其法律之下，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在自己的国家却被降格为次等公民。“对于本土居民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街道上、咖啡馆里、日常生活最细小的交易中每日所遭受的侮辱，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理发师拒绝为他服务，旅馆拒绝为他提供住宿。”[38]

阿巴斯尤其批评了要求穆斯林放弃其个人身份的法国入籍法律。“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为何要寻求入籍？成为法国人？鉴于他的国家被宣布为法国领土，他已经是了。”写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统治者时，他反问道：“他们是希望把这个国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还是想分而治之？”对阿巴斯来说，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引导穆斯林阿尔及利亚走向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最需要的就是将同样的法律应用于所有的人。”[39]即便如此，在其作为法国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歧视的前提下，他仍坚持阿尔及利亚人保留自身宗教并使用本民族语言阿拉伯语接受教育的文化权利。

阿巴斯并非是第一个提出完整公民权诉求的人，自20世纪初青年阿尔及利亚运动就已开始推进类似的改革。他也无法为所有阿尔及利亚人代言。以阿卜杜·哈米德·本·巴迪斯（Abd al-Hamid Ben Badis, 1889—1940）为首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就断然拒绝了阿巴斯的同化思想。阿巴斯和伊本·巴迪斯之间的分歧，鲜明地体现在1936年二人在一系列社论的交锋之中。当时，法尔哈特·阿巴斯大胆提出并没有什么阿尔及利亚民族：“作为一个祖国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神话。我并没有发现它。我询问了历史，询问了逝者和今人，访问了墓地，但没有人对我谈起过它。”他指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阿尔及利亚人就是法国人。事实上，受到自己慷慨陈词的裹挟，他甚至豪言他本人就是法国（*La France, c'est moi*）。[40]“不，先生们！”伊本·巴迪斯反驳说：

> 我们仔细检查了历史的记载和当前的局势。我们发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这个共同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充满了壮举伟业；它有

自己宗教和语言的统一性；它有自己的文化、风俗和习惯，其中有好也有坏，像其他民族一样。此外，这个阿尔及利亚和穆斯林民族并不是法国：它不会知道如何成为法国；它不想成为法国；即使想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法国。

但在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方面，伊本·巴迪斯并没有比阿巴斯走得更远。阿巴斯寻求与法国人的平等，伊本·巴迪斯则希望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与法国人“分离但平等”。他要求法国人给予本土阿尔及利亚人自由、公正和平等，同时尊重他们独特的文化、阿拉伯语言和穆斯林信仰。在其文章的末尾处，伊本·巴迪斯坚称：“这个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祖国将是法国的忠实朋友。”[41]世俗同化主义者与伊斯兰改革者之间的分歧绝非不可跨越。

反讽的是，唯一一群要求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的积极分子，却来自法国的侨民工人社群。在这支多达10万人的阿尔及利亚劳工队伍中，一小撮政治活跃人士通过共产党接触到了民族主义。其领袖麦萨利·哈吉（Messali Hadj，1898—1974）于1926年在工人中建立了民族主义协会“北非之星”（*L'Étoile Nord-Africaine*）。1927年2月，麦萨利将这一新组织的章程提交给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殖民压迫联盟大会，章程中提出的要点包括：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占领军撤出阿尔及利亚；建立一支国民军队；没收定居者种植园，将农业用地重新分配给本地农民；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开展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42]该协会的要求在当时可谓公正，但又同样地脱离现实，因而在国内外的阿尔及利亚群体中仅得到了少数支持。

在20世纪30年代阿尔及利亚所有的政治活动家之中，法尔哈特·阿巴斯的影响力最大。受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法国政策制定者都广泛阅读他的著作。“我非常有兴趣地读了您的著作，”阿尔及利亚前总督莫里斯·维奥莱特（Maurice Viollette）在其1931年写给阿巴斯的信中写道，“换成是我，我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写作它。我对其中某些页面深表遗憾，但也遇到了一些真正的挑衅段落……我承认对你而言控制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也深表理解。”这种语调是居高临下的，但阿巴斯显然并不介意（他将这段引文作为颂词置于其著作的书皮上）。他明白，通过维奥莱特，他的观点将可以在法国行政当局高层中得到讨

论。

莫里斯·维奥莱特作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的任期结束并返回巴黎后，他的影响力反而进一步扩大。他被提名为法国参议院议员，1935年他提出一项议程，提议在吸取法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授予一小部分阿尔及利亚人以公民权。这部分人在法语中被称为“进化者”（*évolués*），意思是“进化程度更高者”，这是纯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着阿尔及利亚人在弃绝阿拉伯文化、拥抱更“高级”的法国价值观的过程中，由一个更低的文明状态进化到一个更高的文明状态。这种“文明化使命”正是法国人论证其帝国事业合法性的主要原则之一。在执行“文明化使命”的同时，维奥莱特在参议院辩论说，进步的穆斯林阿尔及利亚人的解放也将遏制民族主义，并推进同化。

然而，法国殖民主义游说（包括定居者代表及其在巴黎的支持者）太过强大，最终挫败了维奥莱特1935年的动议。他们担心给予有限的一小群阿尔及利亚人完整公民权将导致更大规模的解放，最终将削弱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主导地位。

1936年，维奥莱特在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中被授予一个内阁职位，其争议观点也获得了一个更有同情倾向的听众群体。人民阵线提出要在法国和其殖民地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们则很清楚维奥莱特是他们事业上的盟友。伊本·巴迪斯所领导的伊斯兰改革者决定与法尔哈特·阿巴斯的同化主义者联合起来。1936年6月，他们在阿尔及尔召开了首届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大会，宣布在不要求放弃其穆斯林民事身份的前提下，支持莫里斯·维奥莱特关于授予有限数量的亲法阿尔及利亚人以完全公民权的提议。随后，大会派遣一支代表团前往巴黎，向法国政府提交其政治要求。代表团成员受到布鲁姆和维奥莱特的接见，两人许诺将满足阿尔及利亚人的多项要求。

1936年12月底，布鲁姆和维奥莱特已经起草了一份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法案，并提交给法国议会。他们坚信《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是一项进步的立法，通过该国政治、经济精英间的合作，可一劳永逸地稳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位置。两人在该法案的前言部分写道：“在多届政府做

出如此多庄严的承诺之后，特别是在（1930年）百年庆典之际，我们不可能不意识到这样一项必要的同化工作的急迫性，这一工作将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到阿尔及利亚的道德健康。”[43]

法案限定了有资格申请法国公民权的阿尔及利亚本地穆斯林的类别。九个不同的群体得到界定，首先就是曾在法军中服役的阿尔及利亚军官、职业军士长或受勋的士兵。那些曾在法国或穆斯林学术机构中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通过竞争性考试招募的政府文职人员，同样有资格申请。当选进入商会、农业协会或财政、市政、地方理事会行政职位的本地精英，以及阿迦（agha）、头领等控制着传统职位的显贵，同样榜上有名。最后，任何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劳动奖章等法国荣誉的阿尔及利亚人，也将有资格获得完全的解放。总之，根据《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条款，在阿尔及利亚全部450万人口之中仅有不超过2.5万人有资格申请公民权。

考虑到该法案极为有限的目标，以及法案起草者维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期统治的明确意图，布鲁姆-维奥莱特改革仍遭遇到如此巨大的阻力着实令人惊奇。殖民游说集团再次采取行动，确保了法案根本未得到讨论，毋庸说投票表决。殖民地媒体猛烈攻击该法案为法国的伊斯兰化以及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终结打开了洪水闸门。

法国议会中的辩论在阿尔及利亚街头的法案支持者和反对者中间引发了骚动。本土阿尔及利亚人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以主张对公民权利的要求。阿尔及利亚的动荡则仅仅强化了保守派和殖民游说集团的论断，即问题都是由布鲁姆政府灾难性的政策导致的。法案由一个议会委员会转到另一个，却从未得到切实讨论，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市长以及民选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家纷纷罢工表示抗议。最终，殖民游说集团取得了胜利：《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于1938年最终被放弃，之前甚至从未在国民议会大厅中得到讨论的机会。

百年庆典也告一段落。尽管之前做出过众多庄严承诺，但法国政府却无法容忍同化的紧急任务。我们甚至很难估量阿尔及利亚精英幻灭之深，这些人的期望值曾被推升到新的高度，最终却因布鲁姆政府无力实现其承诺而彻底破灭。自此以后，民族主义者将成为阿尔及利亚反对派

运动中的主流；法国也不会再获得另一个百年庆典的机会——16年后两个国家将兵戎相见。

*

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曾经也希望能解决法国与其在叙利亚、黎巴嫩托管国间的分歧。多年的反对夹杂着徒劳无益的谈判之后，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开始以一种新的乐观立场来回应法国政府的变动。1936年似乎预示着一个更广阔的阿拉伯独立以及更有限的帝国控制的新时代：继1930年赋予伊拉克独立地位之后，1936年英国已接近与埃及达成一个相似的协议。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帝国问题上持进步观点的人民阵线政府将紧随英国的步伐，与叙、黎两国达成协议，使两国能够继伊拉克、埃及之后以名义上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国际联盟。

1925—1927年的大起义之后，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诉诸所谓“光荣合作”的政策，开始以非暴力和谈判的方式追求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在所有致力于实现叙利亚独立这一共同目标的政党和派系中，以富有的城市显贵为首的“民族集团”（National Bloc）成为主导性的党派联盟。1930年伊拉克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之后，该联盟也加大了其政治活动的力度。然而，面对着保守的法国殖民游说集团的持续反对，民族集团的合作策略并未取得任何成果。法国人于1933年11月提出的第一份协议远远不能满足叙利亚的独立要求，因而遭到叙利亚议会的否决。“光荣合作”开始让位于系统性的抵抗，最终在1936年初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发起的一次长达50天的大罢工中达到顶点。

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似乎对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抱有同情，同时又十分重视恢复托管国国内的和平与稳定。1936年6月上台伊始，布鲁姆政府就与叙利亚民族集团展开新的谈判。由于法国谈判者对民族主义者的很多要求做出让步，双方谈判取得飞速进展。同年9月，法国和叙利亚谈判者已经达成一项《特惠同盟协议》草案，并分别提交本国议会批准。叙利亚相信自己距离独立已近在咫尺。

鉴于叙利亚（谈判）的成功，黎巴嫩人也开始敦促法国政府起草一份类似的协议，给予黎巴嫩独立地位。1936年10月，双方正式开启谈

判。遵照叙利亚文件的模式，双方在短短25天内就达成了一项《法黎协议》草案，并分别提交巴黎和贝鲁特的议会等待批准。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对两国政府与法国达成协议的条款非常满意，大马士革和贝鲁特顺利的审批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黎巴嫩议会、叙利亚议会分别于1936年11月和12月底以全票通过的结果批准了协议。然而，与《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情形类似，法国国内的殖民游说集团在国民议会中成功阻止了任何关于1936年《叙法协议》（即《特惠同盟协议》）《法黎协议》的讨论或投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1937年6月布鲁姆政府倒台，叙利亚、黎巴嫩的独立希望也随之破灭。

1939年，随着欧洲大战再次迫近，法国议会正式拒绝批准上述协议。雪上加霜的是，法国殖民当局为确保土耳其在迫在眉睫的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正式将叙利亚西北部领土亚历山大勒塔割让给土耳其。长期以来，土耳其就以占总人口38%的土耳其少数群体的名义对该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被激怒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活动，进而引发法国当局的镇压，后者借机宣布搁置叙利亚宪法、解散议会。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并推翻其政府后，法国几乎与其在黎凡特地区的两个托管国爆发重大冲突。一个通敌的法国政府——维希政权在菲利浦·贝当元帅的领导下建立起来，而后者正是里夫战争关键时期取代利奥泰在摩洛哥职位的那位“凡尔登英雄”。在新政权之下，叙、黎两国将受一位维希高级专员亨利·邓茨（Henri Dentz）将军的统治。

英国人已然受困于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亲轴心国倾向，此时则更加将叙利亚、黎巴嫩的维希政府视为一个敌对政权。1941年5月，当高级专员邓茨允许德国人使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之时，英国迅速做出干预。联合夏尔·戴高乐将军所领导的反维希的自由法国部队，英国人于1941年6—7月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

英国人占领叙利亚后，自由法国政府许诺给予叙、黎两国完全的独立地位。在英、法入侵后迅速发布的一份公告中，乔治·卡图将军代表戴高乐将军宣布：“我到来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委任统治机制，宣告你们的自由与独立。”[44]法国宣布叙利亚、黎巴嫩独立的宣言则受到大英帝国政府

的担保。但事实证明，叙、黎两国民族主义者的庆祝活动还来得太早——自由法国政府还没有放弃在战后维持其帝国的希望。面对法国的执意反对，叙利亚、黎巴嫩两国为确保自身的独立地位都还要面临一场艰苦的战斗。

自由法国政府刚一宣布委任统治结束，黎巴嫩人就开始着手为独立做准备。1943年，黎不同宗教派别的民族主义领袖就权力分享安排达成一项口头协议，即《民族宪章》（*National Pact*）。在所有相关教派政治领袖的见证之下，黎巴嫩人自然全力支持该宪章，甚至未觉得有必要在一份官方文件中记录下其条款。根据宪章的条款，自此以后黎巴嫩的总统、总理和议长将分别由马龙派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担任；其他重要的内阁职位则将在德鲁兹派、希腊东正教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社群间分配；议会席位将以6名基督徒对应5名穆斯林（为此，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都被视为穆斯林）的比例进行分配。

《民族宪章》似乎解决了黎巴嫩不同教派间的紧张关系，促使它们在国家政治体制中都拥有一定的既得利益。然而，宪章实际上将法国人所推行的同一个“社群主义”原则神圣化，僵化地在各宗教社群之间分配权力职位，削弱黎巴嫩政治，妨碍国家实现真正的融合。在这一意义上，法国人在黎巴嫩留下了分裂的遗产，其为害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法国人统治的历史。

在解决了内部政治分歧之后，黎巴嫩的显贵们开始号召在1943年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根据黎巴嫩宪法，新当选的55名议会成员又召开会议选举共和国总统。1943年9月21日，他们选举民族主义律师比沙拉·扈里担任独立后黎巴嫩的第一任总统。

扈里正是曾担任（首任高级专员）古罗将军顾问、作为法国在黎巴嫩委任统治早期的批评者的那同一位律师。1934年，扈里与一群思路相近的政治家一起组建了“宪政集团”（Constitutional Bloc），致力于以一项《法黎协议》取代法国委任统治，他也因此在黎全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自那时起，他就一直致力于结束法国在黎巴嫩的统治。当扈里最终被提名为总统时，代表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议会内放起了白鸽。“当

最终结果被宣布时，”扈里回忆说，“我走上讲台准备发表演说。我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完全被外面的喊声和枪声淹没。尽管如此，我还是成功地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谈到我们应如何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结束黎巴嫩的孤立状态。”[45]

黎巴嫩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完全的独立，并没有预料到会面对来自法国人的任何抵制行动。自由法国政府已承诺结束委任统治，维希政权则被英国人武力逐出黎凡特地区。黎巴嫩议会开始修改宪法，剥夺法国的一切特权地位或干涉黎巴嫩事务的权利，以便进一步确认自身的独立地位。然而当自由法国政府了解到1943年11月9日黎巴嫩议会的议程时，他们立即要求会见黎巴嫩总统扈里，并警告后者，戴高乐将军将不会容忍任何调整法-黎关系的单方面措施。会谈现场气氛紧张，结束时双方并未就分歧取得解决方案。

黎巴嫩人并未特别在意法国人的警告。自由法国是一个流亡中的四分五裂的政府，黎巴嫩人相信这一政府无力阻碍他们对独立的合法诉求，且英国已为黎巴嫩的独立作担保。黎巴嫩议员们如期举行了会议，修改了宪法第一条关于将黎巴嫩边界界定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官方承认的（界限）”的内容，从而确认了他们在本国现有公认边界内的“完全主权”，上述边界在修订内容中有详细描述。他们将阿拉伯语确立为唯一的官方民族语言，将法语降至从属性的地位。此外，议员们还授权黎巴嫩总统，在议会通过的情况下缔结一切外交协议，而非法国政府。原来由国联授权给法国的一切权力和特权都从宪法中被正式删除。最后，议员们通过投票修改了宪法第五条关于国旗的设计：红、白、红的横条纹取代了法国三色旗，而雪杉树这一民族的象征仍然被装饰在国旗的中央。无论从法理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黎巴嫩都已确立了其主权地位，剩下的工作只是确保法国认可这一新秩序。

法国当局迅速果断地对黎巴嫩宪法的修订做出了回应。11月11日凌晨时分，总统扈里被破门而入的法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惊醒。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人可能是前来刺杀他的叛徒，便大喊着要求邻居报警，但没有人回应。他的房门被一位法国上尉撞开，后者手持手枪，还抓着扈里的儿子。“我不想伤害你，”这个法国人说道，“我只是执行高级专员指派的任务来逮捕你。”

“我是一个独立共和国的总统，”扈里回答说，“高级专员无权向我发号施令。”

“我会向你宣读逮捕令。”上尉回答说，随后便宣读了一份机打的声明，指控扈里阴谋颠覆委任统治政权。这位军官拒绝将逮捕令交给扈里，仅给他10分钟时间收拾行装。扈里则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着，让他心情沉重的是这些士兵都是黎巴嫩人。法国人用汽车将扈里押解到南部城镇拉什亚的城堡之中，在路上他们与另外几辆汽车会合，车上则押解着总理里亚德·苏勒哈（Riyad al-Solh）以及内阁的主要成员。当天下午，黎巴嫩政府的6名成员已被囚禁至拉什亚。

逮捕的消息传开后，立即在贝鲁特引发了激烈的示威活动。扈里的妻子加入了示威人群，以声援那些抗议其丈夫和黎巴嫩政府所遭遇不公的示威者。黎巴嫩人向英国人提出申诉，后者正是1941年7月自由法国政府宣布黎巴嫩独立时的担保人。英国政府迅速介入，迫使法国人释放了扈里总统及其他黎巴嫩政治家。黎巴嫩宪法的变动得到了保留，但法国通过对安全部队的控制仍执意维持其在黎凡特的托管国。为了确保对其军队和警察部队的控制，在之后3年的时间内黎巴嫩政府仍将与法国人展开一场持久的战役。[46]

1941年7月自由法国政府的宣言发布后，叙利亚人对实现独立前景的估计并没有黎巴嫩人那样乐观。大马士革的自由法国当局已向叙利亚政治领导层明确表示， 在保证法国在叙、黎两国利益的一系列条约达成前，法国无意承认叙利亚或黎巴嫩的独立地位。叙利亚民族集团还需要动员一次与法国人的重大对抗，以便实现其独立诉求。

民族集团领导人舒克里·古瓦特里（Shukri al-Quwwatli）出生于大马士革一个富裕的地主显贵家族。1927年古瓦特里因参与民族主义活动而被法国当局流放，1942年才返回叙利亚并担任民族集团的领导职位。1943年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古瓦特里的竞选名单作为明显多数脱颖而出，他本人则当选为总统。民族集团政府对法国采取一种和解性的政策，希望说服自由法国政府放弃增加其权威，以便确保叙利亚的独立地位。但和黎巴嫩相似，叙利亚人发现法国人不愿在国家安全部队方面做

出让步，包括国民军即所谓叙利亚军团，以及国内安全部队（Sureté Générale）。

叙利亚的古瓦特里政府与黎巴嫩的扈里政府密切合作，为其反法立场寻求国际支持。1944年冬至1945年春，大规模的反法示威游行在两国举行。当法国宣布在叙利亚政府签订协议之前不会放弃对叙国民军的控制时，叙、黎两国政府拒绝进一步谈判。

1945年5月，法国人的固执在叙利亚全国引发了广泛的示威和反法抗议活动。作为首都和全国政治的中心，大马士革成为反对派的中心。鉴于法国当局不具备足够的武装部队来维持秩序，随着局势的快速恶化和失控，法国人开始诉诸致命的武力，试图通过斩首和轰炸迫使叙利亚政府及其公民屈服。

法国人攻击的首要目标是叙利亚政府本身。哈立德·阿兹姆（Khalid al-Azm）是民族集团成员，1943年当选为叙议会议员并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1945年5月29日晚6点，他正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内与一群议员谈论当前的危机，突然听到了第一轮炮火的声音。[47]阿兹姆和他的同事们对法国推动危机升级并诉诸猛烈炮击的做法感到震惊。他们试图求救，但发现政府办公室内的所有电话线都已被掐断。阿兹姆通过信使收到消息说议会大楼已经遭到攻击并被法国部队占领，后者还杀害了那里的所有叙利亚安保人员。占领议会大楼后不久，法国士兵就在政府大厦周围安置了岗哨。他们向政府大厦开火，炸碎了玻璃。

法国人已切断了对大马士革的电力供应，夜色很快降临在这座黑暗的城市之上。政府大厦内的叙利亚政治家和他们的警卫人员用桌椅堵住了建筑物的入口，奢望以此阻止法国人进入。午夜之前，阿兹姆和他的同事们收到风声说法国人计划占领该建筑后，他们才及时从一扇后窗溜出。他们绕开法国部队，穿过大马士革的偏僻小巷，最终躲藏在阿兹姆位于大马士革老城中心的宽敞住宅之中。很快，他那宽大的庭院就挤满了超过100名避难者，包括政府部长、议会议员和警卫人员。总理哲米勒·麦尔达姆（Jamil Mardam）却愚蠢地试图使用阿兹姆的电话——电话已在法国人的监控之下，致使法国人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法国人将炮火转向阿兹姆的街区，开始了一场无情的狂轰滥炸。部长和议员们

逃到最安全的房屋内。炮火和飞机轰炸震动着他们脚下的土地，将砖石和灰泥倾泻在这些避难者身上。伴随着城市毁灭的声音，他们在恐惧和犹疑中度过了这个夜晚。

第二天，法国人为迫使叙利亚政府屈服而加大了暴力的力度。总统古瓦特里已在位于山坡上的萨利西耶（Salihiyya）郊区建立了办公室，大多数政府部长也都加入了他的队伍。阿兹姆选择与家人留守大马士革，决心与这座城市同命运。法国人的攻击愈加猛烈。他们开始向城市的住宅区发射燃烧弹，其引燃的火势迅速失控。“居民们陷入一片恐慌，他们担心整个街区都会被大火吞噬。”阿兹姆回忆说，“炮弹继续降落，消防队却不愿或无力灭火，因为法国士兵不会允许他们履行职责。”在经历了又一天的炮火轰炸后，阿兹姆决定放弃自己的家，携家人逃往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和其他政府成员所在的相对安全的郊区。

总统古瓦特里从位于萨利西耶的安全藏身处，呼吁英国官员进行干预。援引1941年叙利亚独立的保证，他正式请求英国人与法国人进行斡旋，以便后者停止对大马士革的轰炸。叙利亚总统的请求使英国获得了介入法国帝国事务的合法依据，他们成功说服了其战时盟友解除了攻势。当法国人停止进攻时，已有超过400名叙利亚人丧生，数百座私人住宅被毁，在凶猛的炮火下叙利亚议会所在的建筑被夷为平地。法国孤注一掷地试图保存其在黎凡特地区帝国的版图，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任何理由都无法说服愤怒的叙利亚人放弃其对完全独立的长期诉求。

1945年7月，法国最终承认自己的失败，同意将军事和安全部队的控制权移交给独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法国向两国强加一份协议的问题也不复存在。当1945年10月24日两国以创始成员国这个与法国平等的身份加入联合国之时，国际社会便承认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所剩的工作只是法国从黎凡特地区撤出其部队。1946年春法国军队撤离叙利亚，同年8月从贝鲁特登船回国。

大马士革一位年轻女记者希菡·特季曼记录下了1946年4月最后一名法国士兵撤出叙利亚首都的那晚大马士革举行的庆祝场景。她描述了一个欢欣鼓舞的城市，庆祝它真正独立后的第一个夜晚，这是一场“自由的

婚礼”，而大马士革本身就是那位“快乐而充满魅力的新娘”。“客人们乘着大大小小的汽车或马车赶来，火把照亮了城市的所有屋顶、旅店、过道、电线杆、麦尔季（Marje）的花园、希贾兹铁路的柱子、巴拉达河的栅栏以及所有的大街小巷。”特季曼和她的家人整夜庆祝，歌唱家和音乐家们在中央麦尔季广场为聚集的民众放声高歌。她后来回忆道：“叙利亚的独立婚礼一直持续至拂晓时分。”48

委任统治结束之际，叙利亚人的欢乐正好与法国人的愤恨形成鲜明对照。尽管仍控制着北非的阿拉伯领地，法国还是为失去在东地中海的影响力而悔恨万分。经过在贝鲁特、大马士革26年的统治，法国人却一无所成。更糟糕的是，法国人怀疑英国——其战时盟友和帝国对手，向叙利亚和黎巴嫩施以援手，乃是为了将这些黎凡特国家纳入其自身的影响范围。即便如此，1946年英国在中东的帝国同样备受压力且处于衰退之中。事实上，与英国1946年在巴勒斯坦所面临的危机相比，法国在叙利亚、黎巴嫩的困境似乎还不算棘手。

(1) 上文介绍此雕像高9米（约30英尺），故此处也应为9米。——编者注

第九章　巴勒斯坦灾难及其后果

1944年1月，巴勒斯坦的犹太极端分子向英国宣战。“在以色列土地（Eretz Israel）上，犹太人民与把我们的兄弟出卖给希特勒的英国行政当局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停火协议，”这一地下抵抗运动宣称，“我们的人民与这个政权处于战争状态，并将战斗到底。”[1]

犹太定居者与英国政府兵戎相见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正是后者将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梦想变为现实。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攻击。对犹太移民施加严格限制、呼吁在1949年实现（阿拉伯）多数统治下巴勒斯坦独立的《1939年白皮书》，已然彻底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

随着英国与纳粹德国间战争的临近，大卫·本-古里安曾承诺将帮助英军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同时又将反对白皮书的条款，就好像没有战争一样。巴勒斯坦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与本-古里安的政策保持一致，在对抗德国纳粹政权的战争中勉强支持英国一方。然而，其他更加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则将英国视为更大的威胁。他们发动了一场武装起义，公开以将英国人驱逐出巴勒斯坦作为目标。

两个犹太激进组织——伊尔贡和斯特恩团伙应为最恶劣的暴力事件负责。伊尔贡（Irgun Zvai Leumi的简称，意为“民族军事组织”）成立于1937年，建立的初衷是保护犹太定居点在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期间免遭袭击。1939年5月英国议会批准白皮书后，伊尔贡成员开始将英国视为真正的敌人。1940年6月双方敌对活动暂停之前，该组织针对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的办公室、警察站等发动了一系列炸弹袭击。英国向德国宣战后，伊尔贡领导层决定遵从本-古里安的政策，即与英国合作对抗纳粹。

伊尔贡中的一个派系却持不同意见，继续针对英国人的袭击。这个分裂团体在希伯来语中简称为“莱希”（Lehi, 全称Lohamei Herut

Yisrael，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在西方则主要以“斯特恩团伙”的名字而著称。该派系因其领导人亚伯拉罕·斯特恩（Abraham Stern）的名字而得名，斯特恩及其追随者坚信犹太民族对以色列土地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他们有责任赎回这块土地，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对斯特恩而言，《1939年白皮书》将英国定格在一个非法占领者的角色。为此，斯特恩非但没有站在英国一边反对纳粹德国，反而积极地接近纳粹，与之联合起来对抗英国人。与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类似，斯特恩希望与德国人合作将巴勒斯坦从英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尽管纳粹的反犹主义恶名在外。在斯特恩看来，纳粹德国只不过是犹太民族的一个迫害者，英国则是一个否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敌人。

1940年底，斯特恩派遣一位代表前往贝鲁特与德国官员进行会面，寻求“德国人所阐释的欧洲‘新秩序’的目标与犹太民族真正的民族愿望之间”利益的协调一致。通过他的信使，斯特恩提议动员犹太人的力量将英国逐出巴勒斯坦，以此换取犹太人由德国向巴勒斯坦不受限制的移民以及德国对犹太国家的承认。他指出这一联盟在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满足犹太人民族诉求的同时，还能在东地中海给他们的共同敌人英国以致命一击。[2]

斯特恩未曾收到第三帝国的回复。他显然错误估计了纳粹反犹主义的种族灭绝本质。由于向德国人示好，斯特恩遭到了伊尔贡和犹太事务局的严厉谴责，后者向英国人提供情报信息，协助英国人实施对莱希组织的镇压。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当时正为巴勒斯坦境内的一系列袭击和抢劫银行案件而全力追捕斯特恩团伙。1942年2月，英国军官在对特拉维夫一座公寓的突袭中击毙了斯特恩。之后随着其领导层陷入混乱，莱希组织也停止了活动。1942—1944年，随着二战激战正酣，伊休夫与英国当局也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停战协议。

1943年，伊尔贡开始重组，并主导了一场反英抵抗运动。该运动由一位精力充沛的新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 1913—1992）领导。贝京出生于波兰，早年曾加入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逃离祖国，后自愿加入一支驻苏联的波兰军队。1942年，他所在的波兰军队被派往巴勒斯坦，在那里他被招募加入伊尔贡。他迅速升至该组织的领导层，并与包括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在内的莱希组织新领导层建立了联系。两人在晚年都成为以色列总理，尽管他们早年在巴勒斯坦都是以恐怖分子的身份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持续限制，以及对纳粹死亡集中营和大屠杀内幕了解的增多，加剧了激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巴勒斯坦英国当局间的紧张关系。至1944年，伊尔贡和莱希已不愿再受制于整体休战协议，便重启了针对巴勒斯坦的英国目标的袭击。

在反抗英国人的同一斗争中，伊尔贡和莱希采用了极为不同的策略。贝京的伊尔贡主要针对英国委任统治在巴勒斯坦的办公室和通信基础设施开展袭击；相比之下，沙米尔的莱希则主要从事针对英国官员的定点暗杀袭击。1944年11月6日，莱希的两名成员在莫因勋爵（Lord Moyne）位于开罗的住宅外，暗杀了这位英国驻中东地区常驻公使，该组织也因此臭名昭著。莫因是中东地区最高级别的英国官员，且一直支持《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限制。暗杀者被埃及警方抓获，随即被处以绞刑。由于担心英国人的报复，犹太事务局及其准军事分支哈加纳（Haganah）一直有意与莱希及其所作所为保持距离。

直到二战结束后，伊尔贡、莱希、哈加纳才开始联合力量对抗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纳粹死亡集中营被解放后，大屠杀骇人听闻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伊休夫的领导人决心将种族灭绝中的犹太幸存者由欧洲的难民营迁至巴勒斯坦。他们拒绝遵守《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移民的限制，宣布发动一场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起义。1945—1946年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哈加纳与莱希和伊尔贡秘密协调行动，试图通过暴力强迫英国人改变政策。

10个月以来，哈加纳与伊尔贡、莱希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抢劫银行、袭击基础设施、绑架英国人员的行动。本-古里安领导的犹太事务局则坚决否认与上述事件有任何牵连，并对哈加纳的参与讳莫如深。但英国人却怀疑伊休夫作为一个整体合谋参与了暴力活动，因而以大规模的镇压作为回应。1946年6月29日至7月1日，超过2700名伊休夫成员被捕，其中包括多名犹太事务局领导人。英国当局还查获了犹太事务局的大批文件，将其带回当时位于大卫王酒店侧翼的英国委任统治秘书处。

对犹太事务局而言，英国查获这批文件不仅意味着一个行政问题，

因为部分文件内容证明事务局和哈加纳已卷入针对英国人的袭击。[3]一旦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发现哈加纳和犹太事务局卷入恐怖活动的证据，他们只会更加坚定决心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并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要求做出让步。从这批涉罪文件被带往委任统治秘书处那一刻起，大卫王酒店的命运就已盖棺定论。伊尔贡早已为袭击西耶路撒冷的这座高层酒店——这个巴勒斯坦民事和军事行政机构总部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但哈加纳在之前一直限制伊尔贡的行动，强调这样一种暴行将“引发英国人的极端愤怒”。7月1日英国人缴获犹太事务局文件之后，哈加纳第一时间就向伊尔贡发出命令，要求后者尽快执行针对大卫王酒店的行动。

大卫王酒店爆炸袭击的准备活动持续了3周时间。7月22日，一群伊尔贡行动人员将一批装有500磅烈性炸药的牛奶罐头安放在酒店的地下室。“送奶工”受到两名英国士兵的伏击，一场枪战随之而来。但恐怖分子已然成功设置了遥控装置，该装置将在30分钟后引爆炸药。

“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像一天，”梅纳赫姆·贝京后来写道，“12点31分，32分。发动进攻的时刻逐渐临近，半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耗尽了。12点37分……突然，整个市区似乎都在震动。”[4]

英国当局宣称他们事先未收到任何关于袭击的预警，伊尔贡则坚称他们已经对酒店和其他机构发出了电话警告。无论哪一方的说法属实，爆炸前并没有任何撤离大卫王酒店的尝试。爆炸物于午餐高峰时间在一个公共咖啡馆之下被引爆，将酒店的一侧完全炸毁，随后六层酒店轰然崩塌。爆炸共造成9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伤者中既包括英国人、阿拉伯人，也包括犹太人。

这次暴行震惊了整个世界，犹太事务局则将其称为“一群暴徒所犯下的懦弱罪行”。但英国政府非常清楚哈加纳卷入了这场恐怖袭击，并将这一点写入了大卫王酒店爆炸案仅两天之后发表的一份关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白皮书。

英国人意识到与他们战斗的不仅仅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在策略和方法方面，犹太事务局和哈加纳可能与伊尔贡和莱希有所不同，但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同一个目标，即驱逐英国人以便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

二战之后，英国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意愿继续留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不可调和：如果英国人向犹太人让步，他们担心阿拉伯人又会发起一场与1936—1939年起义相似的大起义；如果他们向阿拉伯人做出让步，现在已经很清楚犹太人会做些什么。英国人试图撮合阿拉伯和犹太领袖1946年9月在伦敦举行会谈，但因双方都拒绝参会而以失败告终。考虑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相互矛盾的建国要求，1947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一系列双边会谈也都无果而终。

英国人陷入了绝境，而《贝尔福宣言》的悖谬现在也体现得清晰无比：英国人不可能在实现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同时，不损害“巴勒斯坦既有非犹太社群的利益”。英国政府无计可施，对巴勒斯坦争端中的双方也都无力施加影响。有鉴于此，1947年2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能更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

联合国召集一个由11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 UNSCOP）。这11个国家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伊朗、荷兰、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除伊朗外，特别委员会各成员国在中东事务中并不掺杂任何特殊利益。1947年6—7月，委员会成员在巴勒斯坦度过了5周时间。其间，阿拉伯政治领袖拒绝会见特别委员会代表，犹太事务局则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提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争取后者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支持。

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还在巴勒斯坦期间，一波又一波的非法犹太移民在犹太事务局的协助下，继续乘坐废弃的汽轮由欧洲涌入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则尽全力阻止这些难民进入，其中多数难民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些船只中最著名的是“出埃及号”（*Exodus*）。该船的4500名乘客于1947年7月18日抵达海法港，但由于英国当局拒绝他们进入巴勒斯坦，被迫于第二天乘船返回法国，随后则被关押进德国集中营。英国也因其对犹太难民危机的处理，特别是“出埃及号”事件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调查期间，英国与犹太社群间的暴力仍不断升

级。1947年7月，英国当局以恐怖罪为名判处3名伊尔贡成员死刑。7月12日，伊尔贡抓获了两名英军中士克里夫·马丁（Cliff　Martin）和马文·佩斯（Marvyn　Paice），并将两人扣为人质，以防止英国当局绞死被俘的伊尔贡成员。英国人坚持执行了处决之后，伊尔贡也于7月29日将马丁和佩斯执行绞刑以作为报复。刽子手们在死者尸身上粘贴了一份指控清单，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模仿英国的法律术语：马丁和佩斯被定性为“英国间谍”，犯有“非法进入犹太人家园”“加入一支被称为占领军的英国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等“反犹太犯罪行为”。[5]更有甚者，两人身上被装上了饵雷，会在割断绳索时爆炸。这一行为旨在激起英国人最大的愤怒，从而削弱英国人继续在巴勒斯坦战斗的意志。

两名中士被绞死的新闻在整个英国都登上了头版头条。通俗小报通过“被绞死的英国人：震惊世界的图片”等大字标题激起了反犹情绪。一波反犹示威游行很快转化为骚乱，在8月的第一周席卷了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最严重的暴力活动发生在利物浦市，在5天的时间里超过300名犹太人的财产遭到破坏，88名城镇居民被警察逮捕。《犹太编年报》（*Jewish　Chronicle*）还报道了伦敦、格拉斯哥、普利茅斯等地针对犹太会堂的攻击，以及其他市镇对犹太圣殿的威胁。纳粹死亡集中营解放后仅两年，万字章和“吊死犹太人”“希特勒是对的”等标语就重新出现在英国各城市。[6]

1947年8月为联合国起草调查结果之际，特别委员会成员已非常清楚巴勒斯坦局势的复杂性。代表团成员一致呼吁结束英国委任统治，以8：3的明显多数提议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仅印度、伊朗、南斯拉夫三国反对分治设想，倾向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

英国人甚至来不及等待联合国正式讨论特别委员会的提议。“出埃及号”丑闻、英国中士被绞死、随后的反犹骚乱、特别委员会报告，这一系列前后相连的事件已完全动摇了英国继续留在巴勒斯坦的决心。1947年9月26日，英国政府宣布将单方面从巴勒斯坦撤军，并将自身的托管责任委托给联合国。英国撤军的日期被设定在1948年5月14日。

激进分子们已经实现了其第一个目标，即迫使英国人撤离巴勒斯

坦。尽管其手段受到犹太事务局的公开谴责，但伊尔贡和莱希在移除建立犹太国家进程中的一个主要障碍方面仍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为实现政治目标而诉诸恐怖策略，他们也在中东历史上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一丑陋传统也将传播至整个中东地区，直至今日。

1947年11月，特别委员会报告被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讨论。讨论的议题主要围绕委员会多数成员的提议，即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展开。分治决议将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由六部分组成的棋盘格，其中犹太区、阿拉伯区各三个，耶路撒冷处于国际共管之下。该计划将巴勒斯坦55%的领土划分给了犹太国家，包括全部加利利狭长地带直至东北部的领土、从海法到雅法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直至亚喀巴湾的亚拉巴荒漠。

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分子积极游说联合国成员，争取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以便执行分治决议和建立犹太国家的承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争取杜鲁门政府对决议支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哈里·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称自己“在白宫从未经历过像这次这样巨大的压力和宣传攻势”。[7]在最后一刻，美国政府推翻了之前的不干涉立场，积极向其他（联合国）成员施压支持分治方案。1947年11月29日，分治方案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的结果最终获得通过。

在至少部分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国际授权得到确保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朝其建国目标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阿拉伯世界整体，特别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执拗地反对分治方案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立场并不难理解。至1947年，人口超过120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犹太人口仅约60万。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人口多数的城镇——如麦法（Maifa）等都被划入了犹太国家；雅法名义上是阿拉伯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却是一块被犹太国家包围的飞地。此外，阿拉伯人拥有巴勒斯坦全部土地面积的94%，以及全国全部可耕地面积的约80%。[8]基于这些事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拒不承认联合国分裂其国家并将其中一半拱手送

人的权利。

在对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提案的回应中，耶路撒冷显贵哲马勒·侯赛尼（Jamal al-Husayni）抓住了巴勒斯坦人的挫败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案例基于国际公正的原则；是天命和历史将他们置于这块土地上，他们想要的仅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不受干扰地继续生活下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何他们自由和平地生活、依据传统发展自己国家的权利，要不断受到质疑并面对调查。”侯赛尼正是在面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委员会时发表了这番评论。他继续说道：“有一件事是毫无疑义的：保卫他们的祖国免遭一切侵略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神圣权利。”[9]

没有人幻想分治决议的执行会不经历任何波折。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不得不为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分给他们的土地而战斗，更不用提那些划分给阿拉伯国家而又被他们所觊觎的领土。对阿拉伯人而言，为阻止犹太人夺取巴勒斯坦的任何一块领土，他们就必须击败犹太人。

从分治决议宣布后的那个清晨起，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开始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而做准备——一场巴勒斯坦主权争夺者间的内战。

在6个月的时间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他们对巴勒斯坦针锋相对的权利要求而兵戎相见。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已经为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哈加纳在二战期间积累了广泛的训练和实战经验，此外他们也储备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未做好类似的准备，他们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以及阿拉伯邻国的支持。

当时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有争议的领袖是流亡中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哈吉艾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无论是在巴勒斯坦国内还是国外都引发了部分人的反对。二战期间，他因叛逃纳粹德国而遭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痛斥，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阿拉伯领导人的猜疑。在巴勒斯坦，哈吉艾敏的领导权受到多名巴勒斯坦显贵的觊觎，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在面对最大挑战时四分五裂。另一方面，

由于试图在流亡埃及期间领导巴勒斯坦人的运动，哈吉艾敏又破坏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内部以及巴勒斯坦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真正意义上一致行动的前景。

阿拉伯国家中很多也是刚刚从欧洲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内部同样分裂严重且士气不振。这些国家刚刚经历了独立后第一次外交失败，尽管激烈反对但并未能阻止联合国分治决议的通过。面对这一分割巴勒斯坦的决议，阿拉伯内部竞争也浮出水面。

自1937年首次提出以来，唯一对分治理念持支持立场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外约旦。阿卜杜拉国王（前埃米尔在1946年5月被加冕为国王）欢迎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土并入其几乎被内陆包围的王国，他对分治方案的支持也激起了巴勒斯坦政治精英的极大不满以及穆夫提哈吉艾敏的公开仇恨。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阿卜杜拉几乎完全被孤立，仅能得到在伊拉克执政的哈希姆亲族极为有限的支持。他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明确猜忌，后者担心阿卜杜拉对其国家的领土野心，这一野心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在阿拉比亚面对着哈希姆家族的对手沙特家族的长期敌意；在埃及则面临埃及国王的疑忌，后者不接受对埃及在阿拉伯事务中自封的主导地位的任何挑战。

与彼此协调行动并派遣正规军相比，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更倾向于动员非正规的志愿军，即那些决心保卫阿拉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穆兄会成员。正如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反法西斯呼声的回应一样，这些阿拉伯的“林肯旅”来到巴勒斯坦与犹太复国主义作战。他们被称为阿拉伯解放军，其最著名的将领即法乌齐·盖伍格吉。

法乌齐·盖伍格吉从未放过任何一个在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机会。他参与的每一场战役都以光荣的失败告终。1920年，法国人击败费萨尔国王的阿拉伯王国的当天，他就身处从麦赛伦撤退的阿拉伯军队之列；他在叙利亚城市哈马领导了反法起义，在1925—1927年叙利亚大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中的一名老兵；在1941年拉希德·阿里反英政变中，还曾与伊拉克军队并肩作战。当拉希德·阿里的运动被镇压后，盖伍格吉逃往纳粹德

国，在那里娶了他的德国太太，并在等待中度过了剩余的战争岁月。

盖伍格吉迫不及待地渴望从欧洲回归阿拉伯政治的舞台。德国战败后，他逃至法国。1947年2月，他和妻子使用假的身份和护照，搭上了一班飞往开罗的飞机。同年11月他抵达大马士革，在那里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款待，每月领取一份津贴。

对叙利亚政府而言，盖伍格吉绝对是天赐之缘。叙利亚人不愿让自己弱小的正规军卷入巴勒斯坦战争，因此全力支持阿拉伯解放军，而盖伍格吉正是指挥这支军队的理想人选。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享有英雄般的声誉，拥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很快，这位头发灰白的57岁指挥官就在大马士革建立营地，为这支非正规部队开始了紧张的招募工作。

1948年2月，一位名叫萨米尔·苏基（Samir Souqi）的黎巴嫩记者发表了一篇对盖伍格吉的专访，这篇访谈也生动地捕捉到战争前夕位于大马士革的总部内的氛围：

> 这位阿拉伯领导人执意将他的家改造成一个军事指挥部，身着美军制服的非正规士兵守卫在周围。每天中的任何一个小时，都有身穿现代服饰的贝都因人、农民、年轻人站在他的台阶上，要求作为志愿军加入阿拉伯解放军。他还有一个位于盖塔纳的总部，志愿者在那里接受军事训练，等待被派往巴勒斯坦。[10]

在阿拉伯联盟这一全新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框架内，阿拉伯国家希望在不派遣正规军的情况下，依靠阿拉伯解放军来打败巴勒斯坦的犹太军事力量。他们任命伊拉克将军伊斯玛仪·萨弗瓦特（Ismail Safwat）担任阿拉伯解放军总司令，责成他调动这支非正规的志愿军来执行一套协调一致的作战方案。为协调军事行动，萨弗瓦特根据总作战方案将巴勒斯坦分为三条主要战线：他任命盖伍格吉负责北部战线和地中海沿海；南部战线将由埃及统领；中部战线又称耶路撒冷战线，将在哈吉艾敏的统帅之下，后者则任命富有个人魅力的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Abd al-Qadir al-Husayni）来统领其部队。

虽然也是穆夫提所属的侯赛尼家族的成员，但阿卜杜·卡迪尔却能够超越家族派系纷争，因而深受各行各业巴勒斯坦人的尊敬。阿卜杜·卡迪

尔在开罗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曾参与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并两度受伤，其间也赢得了作战勇敢且富有领导才能的声望。与盖伍格吉类似，1941年他又参加了伊拉克的反英斗争。

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邻国的军事指挥官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武器弹药的缺乏。哈加纳中的犹太士兵曾在英军中训练超过10年，且二战期间在随英军的战斗中积累了实战经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从未有机会组建一支本土的民兵。此外，犹太事务局长期走私武器弹药进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缺乏获得武器的独立渠道。由于缺乏再补给的来源，巴勒斯坦战士们很快就会耗尽他们持有的有限弹药储备。

然而，后勤保障的缺陷并没有限制巴勒斯坦战士们的行动。针对犹太定居点的零星攻击开始于1947年11月30日，很快便从城市传播至农村地区。阿拉伯部队试图切断通往定居点的道路，从而孤立犹太村庄。1948年冬的大多数月份里，哈加纳则致力于挖好壕沟巩固阵地，力争在5月中旬英国人撤军之前确保分治方案划分给犹太国家的领土。

1948年3月下旬，犹太部队开始发起攻势。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区正处于阿拉伯部队的围困之中，哈加纳决心开辟一条补给线，以缓解耶路撒冷犹太阵地的压力。

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局势远比犹太指挥官设想的要脆弱。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领导下的巴勒斯坦战士并不具备坚守阵地的武器装备。阿拉伯人控制着战略重镇盖斯塔勒，该镇掌控着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的制高点。犹太部队向盖斯塔勒进发的同时，侯赛尼为确保其部下获得坚守阵地所需的武器于4月初紧急访问大马士革。

从一开始，侯赛尼大马士革之行的前景就因阿拉伯内部争端而暗淡无光。叙利亚政府对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怀有敌意，因而拒绝向穆夫提的表兄弟阿卜杜·卡迪尔提供任何支持。叙利亚支持的阿拉伯解放军与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本地部队之间发生激烈竞争，也进一步分裂了阿拉伯队伍。在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及阿盟领导会见期间，侯赛尼发现他本人深深卷入阿拉伯内部政治斗争而无法自拔。

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领导和将领为小事而争吵不休之时，盖斯塔勒已于4月3日被哈纳加精英部队“帕尔马赫”（Palmach）攻克。阿拉伯人尝试重新夺取该镇而失败，犹太部队则巩固了其防御工事。盖斯塔勒成为第一个被犹太部队攻克的阿拉伯城镇，这一消息令大马士革会谈中的所有人感到震惊。从这一战略要地，哈加纳对耶路撒冷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阿拉伯联盟的指挥官仍无法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仿佛仍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之中。

这时，阿拉伯解放军总司令、伊拉克裔的伊斯玛仪·萨弗瓦特将军转身对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说：“盖斯塔勒已经陷落了。你的工作就是把它夺回来，阿卜杜·卡迪尔。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告诉我们，我们会派盖伍格吉去完成这项工作。”

侯赛尼被激怒了。“给我们我刚才要求的武器，我就能夺回这个镇子。现在形势已经开始恶化，犹太人有炮兵、飞机和步兵。在没有炮兵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夺回盖斯塔勒。给我我要求的一切，我向你保证会取胜。”

“这是什么话，阿卜杜·卡迪尔，你没有大炮吗？”伊斯玛仪·萨弗瓦特反驳说。他勉强向这位巴勒斯坦指挥官保证提供大马士革所剩的枪支弹药——105杆老式步枪、21架机关枪、数量有限的弹药以及少量地雷，但要晚些时候才能交付。实际上，他们是把侯赛尼两手空空地送回了家。

侯赛尼暴怒不已，气冲冲地离开大厅并说道：“你们是叛徒。你们是罪人。历史将会铭记是你们丢了巴勒斯坦。我会夺回盖斯塔勒，我会死在我的兄弟们——‘圣战者’身边。”[11]

4月6日当晚，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就离开大马士革，在50名阿拉伯解放军志愿者的陪同下，于次日凌晨抵达耶路撒冷。经过短暂的休息后，他便率领一支由约300名巴勒斯坦战士组成的队伍向盖斯塔勒进发，还有4名英国士兵加入阿拉伯人的部队与之并肩作战。[12]

阿拉伯人对盖斯塔勒的反攻开始于4月7日午夜11点。阿拉伯军队分

成了分遣队，从三个方向向这个村庄发起了攻击。其中一个阿拉伯分遣队人员伤亡惨重，几乎用完了所有的弹药。其受伤的首领撤退后，侯赛尼率领一支小分遣队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试图在犹太军队的防线下埋藏炸药。但侯赛尼和他的下属被犹太防御者的猛烈火力完全压制，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来自附近定居点的犹太增援部队包围。

随着4月8日黎明时分的到来，侯赛尼及其部下被敌军包围的消息像野火一般在阿拉伯战士中传播开来；盖斯塔勒战役看起来必然以失败告终。然而，阿拉伯增援部队响应号召，约500名阿拉伯战士加入了围困盖斯塔勒的部队。经过一整日的鏖战，他们终于在下午晚些时候重新夺取了该镇。当阿拉伯战士在盖斯塔勒镇东部边缘地带发现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遗体时，重夺阵地的喜悦马上烟消云散。作为泄愤的方式，巴勒斯坦战士杀死了被俘的50名犹太俘虏。无论就哪一方而言，巴勒斯坦内战都将成为一场充满暴行的战争。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遗体于第二天被埋葬。上万名哀悼者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参加了他的葬礼。“人民为他而哭泣，”一位耶路撒冷本地人、专门研究1948年大灾难的历史学家阿里夫·阿里夫（Arif al-Arif）回忆道，“人们将他称为盖斯塔勒英雄。”[13]巴勒斯坦人从未从失去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损失中完全恢复过来，再没有一位本地领袖能够调动一场反抗巴勒斯坦犹太军队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因而侯赛尼之死构成了对公众士气的巨大打击。更糟糕的是，结果证明他的死亡也是徒然：士气不振的阿拉伯部队仅留下40名防御者来守卫盖斯塔勒，结果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内，犹太军队就重新夺取了该镇——这次是永久性的。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之死以及盖斯塔勒陷落的震动，很快就被4月9日针对代尔亚辛村巴勒斯坦村民的大屠杀所掩盖。这次屠杀发生在侯赛尼葬礼的同一天，在整个巴勒斯坦引发了恐惧的洪流。从那天起，巴勒斯坦人已然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代尔亚辛是一座平静的阿拉伯村庄，坐落于耶路撒冷以西，约有750名居民，其中既有农民、石匠，也有商人。村中有两座清真寺、一

所男童学校、一所女童学校及一个体育俱乐部。该村居民已经与耶路撒冷的犹太指挥官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协定，因而代尔亚辛是巴勒斯坦最不可能遭到犹太人袭击的村庄。伊尔贡和莱希对于其针对代尔亚辛村无缘无故的袭击并未做出任何说明；巴勒斯坦历史学家阿里夫·阿里夫则认为这些犹太恐怖组织之所以袭击该村，“是为了给本民族增加信心，在阿拉伯人心中制造恐慌”。[14]

针对代尔亚辛村的袭击开始于1948年4月9日黎明之前。当时该村只有85名武装人员，面对的却是一支拥有装甲车和飞机支持的犹太部队，因而恐慌迅速在村民中传播。战斗爆发之时，一位农民妇女正在给她的婴儿喂奶。“我听到了坦克和步枪的声音，闻到了烟的味道。我看着他们跑过来，每个人都对邻居大喊：‘你要是知道怎么跑就赶紧跑！’有叔伯的人就试着去叫叔伯，有妻子的人就试着去叫妻子。”她就这样怀抱着自己的儿子逃命，一直逃到邻近的艾因·卡拉姆村。[15]

尽管在艾因·卡拉姆村驻有阿拉伯解放军的部队，附近还有英国警察，却没有一个人来营救代尔亚辛村的村民。目击者称犹太袭击者将所有的阿拉伯武装抵抗者聚集在一起，然后开枪射杀。代尔亚辛事件后，巴勒斯坦编年史家阿里夫·阿里夫采访了几位该事件的幸存者，并对当天的恐怖进行了分类，详细记录了死者的姓名和死亡的情况。他详细讲述道：

> 在当天犯下的暴行中，他们杀害了哈吉贾比尔·穆斯塔法——一位90岁的老人，并将他的遗体从他家的阳台扔到街上。他们对哈吉伊斯玛仪·阿提耶——一位95岁的老人做了同样的事情，还杀死了他80岁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孙子（女）。他们杀害了一位盲人青年穆罕默德·阿里·赫里勒·穆斯塔法、前来保护他的妻子以及他们18个月大的孩子。他们还谋杀了一位正在照顾伤员的教师。[16]

当天，在代尔亚辛共有超过110名村民遇害。

根据阿里夫的叙述，如果不是一位年老的犹太指挥官下令停止的话，代尔亚辛村的屠杀还会继续升级。随后，屠杀幸存者又被强迫步行至耶路撒冷的犹太街区，“在犹太民众面前受到公开羞辱”，就好像他们是罪犯一般，最后才在哈伊·米斯马拉附近的意大利医院周围被释放。[17]

残酷地屠杀无辜村民、野蛮地羞辱幸存者，代尔亚辛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谴责。犹太事务局也谴责这一暴行，将哈加纳部队与伊尔贡、莱希的极端分子划清界限。

代尔亚辛大屠杀事件引发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大规模逃亡，这一人口流动一直持续至5月15日英国撤军。阿里夫解释说，随着屠杀消息的传开，巴勒斯坦地区民众“开始逃离他们的家园，带着各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关于犹太罪行的传闻”。巴勒斯坦政治领导层在阿拉伯媒体中公布了代尔亚辛和其他犹太人暴行的数据，却进一步加剧了恐慌。巴勒斯坦领导人显然希望利用人道主义危机来迫使阿拉伯国家干预，但他们的报道仅仅加剧了恐慌，促使村民逃离他们的家园。[18]同时代的文字记载屡屡提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城镇和村庄居民扶老携幼、抛家弃产地逃离家园，仅仅出于对代尔亚辛大屠杀再次上演的恐惧。

1948年春，巴勒斯坦人已经开始逃离他们的领土。1948年2—3月，在耶路撒冷、雅法、海法等战斗最激烈的城镇，约有7.5万名阿拉伯人逃离家园，前往相对较安全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或邻近阿拉伯国家。[19]同年4月即代尔亚辛事件之后，难民数量开始如洪流般激增。

一些巴勒斯坦人则选择以暴制暴。4月13日，即代尔亚辛大屠杀4天后，巴勒斯坦战士伏击了一支前往耶路撒冷郊区斯科普斯山的犹太医疗队。两辆救护车很清晰地标记有红十字，乘客实际上都是来自哈达萨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希伯来大学的职员。车队中共有112名乘客，仅36人幸免。

这次伏击的残忍程度体现在袭击者以胜利的姿态站在遇害者身旁所拍摄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照片之中。这些野蛮的照片在耶路撒冷的商业场所公然出售，似乎是为了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显示他们有能力摧毁犹太人的威胁。然而，这些暴行的照片却无法驱散1948年4月弥散在巴勒斯坦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失败氛围。

巴勒斯坦人的士气已然被摧毁，斯科普斯山屠杀犹太平民的事件仅仅加剧了对犹太人报复和后续暴行的恐惧。哈加纳已察觉到巴勒斯坦民

众士气的崩溃，于是依据一项被称为“D计划”的军事方案加紧了行动进程。该方案旨在毁灭或减少巴勒斯坦城镇和农村地区人口，以便为建立一个可生存下去的犹太国家创造先决条件。

4月21—23日，犹太军队攻陷海法，从而在整个巴勒斯坦掀起又一波震动。受益于港口和炼油厂，海法一直是巴勒斯坦的经济中心，阿拉伯总人口超过7万人。此外，海法还是巴勒斯坦北部的行政中心。

由于海法被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入了犹太国家，数月来犹太部队一直在计划夺取这座城市。1947年12月中旬，犹太部队首次向海法发动袭击。“袭击在城内触发了一波可怕的外迁洪流，”海法的一位市政领导人拉希德·哈吉·易卜拉欣（Rashid al-Hajj Ibrahim）写道，“一大部分人口预见到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因为犹太人的有备而来已揭示出阿拉伯人在自卫方面的准备是何等匮乏，从而也迫使后者逃离家园。”[20]作为海法全国委员会主席，哈吉·易卜拉欣与其在市政厅的同事一道致力于恢复秩序，限制本地和外来非正规军——很多是阿拉伯解放军志愿者的袭击活动。但他们的努力却徒劳无益：从当年冬季直至次年春季，阿拉伯非正规军与哈加纳战士一直在猛烈交火。至4月初，已有2万至3万居民逃离海法。

最后的猛攻始于4月21日。当英国部队撤离他们在海法的阵地时，哈加纳开始为夺取该市而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之后的48小时之内，犹太军队以源源不断的炮火向海法的阿拉伯街区发起无情的狂轰。4月23日周五清晨，犹太战机袭击了该市，“在妇女儿童中间引发了恐慌，”哈吉·易卜拉欣写道，“这一群体受到了代尔亚辛恐怖景象的极大影响。”[21]他们如潮水般涌向海滨，那里有船只等待着将惊魂未定的平民撤离海法。

哈吉·易卜拉欣详细描述了他在海法海滨所目睹的惨象。“几千名妇女、儿童和男人，在一种阿拉伯民族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混乱、恐怖状态下，奔向港口区。他们赤足裸体地从他们的房屋逃向海边，等待轮到自己前往黎巴嫩。他们丢下了自己的祖国、房屋、财产、金钱、福利和买卖，出卖了自己的尊严与心灵。”[22]至5月初，在原来超过7万人的人口中，仅有3000—4000名阿拉伯人留在海法，继续生活在犹太人的统治

之下。

一旦控制了海法，犹太军队就开始集中精力于联合国划分给犹太国家的其余沿海地区。区别于哈加纳，独立行动的伊尔贡最早发动了针对另一主要阿拉伯港口城市雅法的进攻。雅法市靠近犹太城市特拉维夫。攻势始于4月25日黎明；至4月27日，装备有3门迫击炮、20吨炸药的伊尔贡已经控制了雅法北部的曼什叶街区。在随后的3天内，伊尔贡从这一新阵地向雅法市中心区域发动了无情的轰炸。

这波进攻摧毁了雅法城镇居民的士气和抵抗的意志。仅仅是伊尔贡在发动进攻这个事实，就唤起了很多人对代尔亚辛大屠杀再度上演的恐惧。几天前海法的陷落，使得雅法剩余5万名居民中的绝大多数（至当年4月，已有约2万名居民逃至雅法市外避难）都对抵抗敌人的袭击不抱太大希望。随着居民的大规模外逃，整座城市已陷入一片恐慌。市政领导人们一方面寻找船只将城镇居民撤离至黎巴嫩，另一方面又为其他人从雅法经犹太人的防线撤退至加沙地带展开谈判。至5月13日，雅法城内仅剩下的4000—5000名阿拉伯人将他们的城市拱手让给犹太军队。

随着英国人最终完成撤军时间的迫近，犹太军队开始将其攻势聚焦于分治决议分配给犹太国家的东北部领土。5月11日，哈加纳精英部队“帕尔马赫”攻陷萨法德，一座拥有1.2万名阿拉伯人和1500名犹太人的城镇；5月12日，拥有6000名居民的城镇贝桑被攻陷，该镇居民则被驱逐至拿撒勒和外约旦。同一时期，哈加纳的军事行动还导致加利利、沿海平原、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地区村民的大规模撤离和被逐。巴勒斯坦的公路上满是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为逃避战争的恐怖而仅携带了少量可移动的财产。一位阿拉伯目击者描述了难民的悲惨境遇：“人们失魂落魄、毫无方向地逃离他们的祖国。他们既没有家，也没有钱财，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游荡中病倒、死去。他们缺衣少食，经常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山区的天气日趋寒冷，却没有任何人来关心他们的冷暖。”23

战争结束之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经确保了对沿海主要城镇和加利利狭长地带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20万至30万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家园。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原本意图在恢复和平后重返家园，但却从

未被允许返回。正如1948年6月本-古里安对他的内阁所说的："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回归。"[24]

英国委任统治的最后一天，巴勒斯坦内战也告一段落。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宣布建国，自此以后他们将被称为以色列人。战败的阿拉伯人没有国家来尊崇他们的巴勒斯坦身份，他们将所有的信任寄托在阿拉伯邻国身上。后者正在巴勒斯坦边境集结军队，等待英国人最后撤离。

正如之前承诺的那样，英国人于5月14日站完了"最后一班岗"，降下国旗登船离去，将他们在巴勒斯坦制造的一切悲剧都抛在了身后。

*

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后的第二天，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便入侵巴勒斯坦。1948年5月15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内战结束，第一次阿以战争正式开始。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五国政府都派出正规军部队，表面目的显然是要保卫巴勒斯坦、击败以色列。然而，阿拉伯联盟实际上仅仅是在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前两天即1948年5月12日，才决定出动阿拉伯各国的政府军。在军事干预之前，这些国家哪怕有最起码的相互协调和提前规划、具备丝毫的互信和共同目标，阿拉伯军队在战场上都可能占据上风。但恰恰相反，阿拉伯人进入巴勒斯坦与其说是与犹太国家作战，更多的是彼此为敌。

阿拉伯国家在第一次阿以战争前夕已然完全陷入混乱。巴勒斯坦冲突的结果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糟糕：尽管气焰嚣张，法乌齐·盖伍格吉在战场上却一败涂地，他那支训练不足、纪律涣散的部队在与哈加纳的战斗中屡战屡败；从各方面来看，阿拉伯解放军对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而言都是一个负担，而非救星，依靠阿拉伯志愿军的策略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随着英国撤军日期的临近，周边阿拉伯国家开始意识到为了阻止犹太部队占领整个巴勒斯坦，他们必须派出正规军参与作战。

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面临一个严肃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将巴勒斯坦发生的冲突视为阿拉伯人共同的事业，感觉有道德义务进行干预，并保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同胞；所有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国家联盟

的框架内协调行动这一事实，更强化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每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是以埃及人、约旦人、叙利亚人而非阿拉伯人的身份参战。他们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竞争也带到了战场之上。

1947年秋至1948年冬，阿拉伯国家联盟为讨论巴勒斯坦危机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不同新兴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趋于明显。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自身的利益关切，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真正信任其他国家。在阿拉伯兄弟间引发最大怀疑的是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后者对分治方案的支持揭示了其吞并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以扩大自身国土的野心。这一野心也使阿卜杜拉深受巴勒斯坦领袖哈吉艾敏·侯赛尼的仇视、埃及法鲁克国王的敌意以及叙利亚人的猜忌。在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正全力遏制部分军官中“亲君主国运动”的威胁，该运动支持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及其建立“大叙利亚”的呼声，即将叙利亚和外约旦并入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之下。叙利亚在随后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绝大部分都是为了遏制外约旦。阿拉伯国家最终参战与其说是为了拯救阿拉伯巴勒斯坦，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改变阿拉伯世界现有的势力均衡。

阿拉伯民众并没有意识到其领导人的这种犬儒主义，相反他们热情地支持本国政府军事介入，保卫阿拉伯巴勒斯坦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阿拉伯公众以及阿拉伯军队中的战士们深受官方辞令的鼓舞，坚信自身事业的正义性。而战败后阿拉伯公众对国内政客的幻灭，也将在“丢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世界内部引发巨大波动。

1948年5月，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还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中多数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直至1946年，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仍维持着对武装部队的控制，即便在不情愿的撤军之后，在武器弹药方面也只留下了很少的遗产。英国则垄断着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军队的武器供应，英国人小心地控制着这些半独立盟国的武器流入，以确保这些国家的政府军不会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部队构成威胁。

此外，当时阿拉伯各国军队的规模也非常有限。整个黎巴嫩军队可

能只有不超过3500名士兵，其武器装备也极为陈旧；叙利亚军队有不超过6000名士兵，且对总统古瓦特里而言，这支军队更多是一个威胁而非财富——在1947年的叙利亚，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场预谋中的军事政变的谣传。最终，叙利亚人派遣了其全部军事力量的一小半——约2500人参与了巴勒斯坦的战斗。伊拉克军队贡献了3000人。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是整个地区训练最有素、纪律最严明的军队，但战争之初，该军团也只能派出全部6000人中的4500人参加战斗。埃及拥有整个地区规模最大的军队，派遣了一支1万人的部队进入巴勒斯坦。尽管有上述种种限制，阿拉伯战争规划者却预测在11天之内就可快速战胜犹太军队。如果这个说法是真诚的话，这一数字只能证明阿拉伯方面对摆在面前的这场冲突的严肃性的估计是何等的不足。

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外约旦对巴勒斯坦冲突有着明确的政策和利益目标。阿卜杜拉国王从未满足于1921年英国人指定给他的领土。他渴望恢复其家族对大马士革的统治（因此才有建立“大叙利亚”的呼声）。自1937年起，他就开始支持巴勒斯坦分治的想法，其中阿拉伯领土将被并入其沙漠王国（因此才有穆夫提侯赛尼与阿卜杜拉国王之间的敌意）。

早在20世纪20年代，阿卜杜拉国王就与犹太事务局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期间，这些联系发展为一系列秘密谈判。1947年11月，阿卜杜拉国王与果尔达·梅耶森（Golda Meyerson，后改名为梅厄，并成为以色列总理）举行会谈，并在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之前两周就初步达成了一项初步的互不侵犯协定。（根据这一协定）阿卜杜拉将不会反对在联合国授权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作为交换，外约旦将吞并与其毗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主要是约旦河西岸地区。[25]

为执行其吞并巴勒斯坦阿拉伯部分的计划，外约旦还需要英国的同意。1948年2月，阿卜杜拉派遣其总理陶菲克·艾布·胡达（Tawfiq Abu al-Huda）前往伦敦，以争取英国人对该计划的认可；同行的还有阿拉伯军团的英国指挥官约翰·巴戈特·格拉布（John Bagot Glubb）将军（以格拉布帕夏而著称）。2月7日，总理艾布·胡达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陈述了外约旦的计划：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之时，外约旦

政府将派遣阿拉伯军团跨越边境，占领与外约旦边境相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

“这是显而易见该做的事情，”贝文回答说，“但不要侵入分配给犹太人的区域。”

“即使我们有意向，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军队这样做。”艾布·胡达回答说。贝文感谢外约旦总理，并对其关于巴勒斯坦的计划表示完全同意，实际上这为阿卜杜拉国王入侵并合并约旦河西岸地区开了绿灯。[26]

正因如此，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外约旦是唯一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何加入巴勒斯坦冲突的乱局、又有何利益诉求的一个。问题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都太清楚阿卜杜拉国王的野心，因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遏制外约旦而非保卫巴勒斯坦之上。为遏制外约旦的野心，叙利亚、埃及、沙特组建了一个未公开的集团，他们的行动明显妨碍了战斗的有效开展。尽管阿盟任命阿卜杜拉国王为阿拉伯军队总司令，但其他独立阿拉伯军队的指挥官却拒绝与他会面，更不用说接受他的任何命令了。阿卜杜拉本人就曾质疑阿盟的意图，在战争前夕向一位埃及军事代表问道：“阿盟指认我来担任阿拉伯军队的总指挥。但这项荣誉难道不应被授予埃及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吗？抑或这项任命背后的真正意图乃是在万一失败的情况下，将责任和指责全部推到我们身上？”[27]

如果说阿拉伯国家对阿卜杜拉的意图都怀有戒心的话，那么鉴于它们对巴勒斯坦领导人哈吉艾敏·侯赛尼的敌意，这些国家也不会更多地同情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因哈吉艾敏支持1941年拉希德·阿里·凯拉尼反哈希姆王室的军事政变而怀恨在心;阿卜杜拉国王和哈吉艾敏则为争夺对阿拉伯巴勒斯坦的统治权而长期不和；埃及和叙利亚仅仅给予哈吉艾敏不温不火的支持，1948年4—5月巴勒斯坦抵抗崩溃之后更是如此。

因此，阿拉伯联军参加巴勒斯坦战争的目的基本上是消极的：防止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个外来的犹太国家，防止外约旦扩张至巴勒斯坦，同时防止穆夫提侯赛尼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家。基于这样的战争目标，阿拉伯军队被决意要建立自己国家的犹太军队完全打垮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于人员、火力等因素，犹太人在战场上的优势更多是意志力的因素。犹太大卫被敌对的阿拉伯的歌利亚所包围的景象，并没有反映在阿拉伯和犹太部队的相对规模上。5月15日，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外约旦、埃及等5个阿拉伯国家全部参战，阿拉伯军队总兵力还不超过2.5万人，而当时犹太国防军（这一新兴国家军队的新称呼）总数已达到3.5万人。在战争期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派遣了增援部队，但阿拉伯人军队的规模从未赶上犹太部队，后者在7月中旬达到6.5万人，至1948年12月则达到其峰值9.6万人。[28]

以色列人需要这种数量优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由5月15日持续至6月11日停火，以色列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外约旦军队即阿拉伯军团，于5月15日凌晨跨越边境进入西岸地区。考虑到耶路撒冷在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被宣布为国际共管区，阿拉伯军团起初并不愿进入耶路撒冷，但为防止以色列人占领整座城市，他们于5月19日迅速占领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街区。同时，伊拉克军队于5月22日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北部一半领土以及纳布卢斯和杰宁的阵地，但也未向以色列军队发动攻势。埃及部队从西奈迅速推进至加沙地带和内盖夫沙漠，并挥师北上，准备与阿拉伯军团会合。叙利亚、黎巴嫩军队则侵入巴勒斯坦北部。在冲突的第一阶段，参战各方都损失惨重，但以色列的阵地也许是最脆弱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同时与多支部队作战。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战争爆发后，联合国迅速召开会议以便恢复地区和平。5月29日，联合国呼吁各方停火，6月11日正式开始生效。瑞典外交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被正式任命为阿以冲突的调解人，受委托在巴勒斯坦恢复和平。第一份停战协定为期28天，规定对整个地区实行完全的武器禁运。阿拉伯国家试图为其消耗殆尽的军队寻找武器来源，但却发现英、法、美等国都严格遵守禁运条款。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则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确保了关键的武器运输线路，并将军队规模增至超过6万人。当7月9日停火结束之际，以色列比它的对手做了更充分的重启战事的准备。

战争的第二阶段，以色列人利用兵力和弹药上的优势在各条战线上都扭转了对阿拉伯军队的战况。他们在加利利地区痛击叙利亚军队，将黎巴嫩人赶回到其边境以内。他们从阿拉伯军团手中夺取了吕大和拉马

拉，并将兵力主要集中于南部的埃及阵地。联合国为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危机深表忧虑——已有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战场，因而重新开始了紧密的外交活动，以便达成一项新的停火协议。联合国外交官发现阿拉伯国家迫不及待地支持停战，其中几个国家几乎已耗尽了弹药储备。第二轮停火于7月19日正式生效，一直持续到10月14日。

无论5月15日前阿拉伯国家可能怀有怎样的共同理念，但两个月灾难般的战争已将这些理念打得粉碎。战争开始前阿拉伯国家间的分裂已十分严重，而各国军队在前两轮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更大大加剧了已有的分歧。阿拉伯国家非但没能像阿盟策划者所乐观估计的那样取得速战速决，反而发现本国军队被卷入了一场愈发取胜无望的战争之中而无法自拔。也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发现可行的脱身的策略，阿拉伯公众正在震惊而难以置信地观望着他们的正规部队是如何被一支他们蔑称为“犹太团伙”的敌人所制服的。

阿拉伯国家拒不接受对其战备不足、缺乏协调的批评，开始相互指责。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开始攻击外约旦人：阿卜杜拉国王难道没有秘密会见犹太人吗？不正是他的英国指挥官格拉布帕夏履行了英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承诺吗？在以色列人的坚决反攻下，阿拉伯军团仍控制了西岸和阿拉伯东耶路撒冷这一事实，已然被视为约旦人背叛盟友、勾结犹太复国主义者，而非其骁勇善战的证据。这种相互指责对阿拉伯人的战备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阿拉伯国家之间越是离心离德、单打独斗，犹太军队就越容易将其军队各个击破、逐一消灭。

在3个月的停火期内，贝纳多特伯爵领导着联合国寻求阿以冲突危机解决方案的工作。9月16日，贝纳多特提出一项经过修订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阿拉伯领土将被并入外约旦，其中便包括已被以色列人占领的拉马拉和吕大，以及根据最初联合国分治决议被划分给犹太国家的内盖夫沙漠；以色列国则将包括加利利和沿海平原地带；耶路撒冷仍将处于国际共管之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迅速拒绝了贝纳多特的新方案，而他本人的外交努力也以残酷的方式戛然而止——9月17日，来自莱希团伙的恐怖分子暗杀了这位瑞典外交官。鉴于外交解

决无望，10月14日停火结束后战争又重新打响。

战争的第三阶段由1948年10月15日持续至11月5日。其间，以色列人完全征服了加利利地区，将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阿拉伯解放军全部驱逐至叙、黎领土，随后则集中全部精力打击埃及部队。以色列军队包围了被孤立的埃及部队，其空军在3周的时间内针对埃及阵地目标狂轰滥炸。

埃及在巴勒斯坦的失利将在国内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埃及军队中一支较大的分遣队在巴勒斯坦南部、加沙东北部约20英里的费卢杰村遭到围困。在数周的时间内，既无法脱身又未得到任何援兵的救援，埃及士兵感到自己被彻底出卖了。之前他们正是在训练和武器弹药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派往前线的。更具政治头脑的军官们有大量的机会来思考政治上推翻埃及王室和政府的问题。在费卢杰被围困的军官中就包括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札卡里亚·穆希丁（Zakaria Mohi El Din）和萨拉赫·塞利姆（Salah Salem），3位后来密谋推翻埃及君主制的自由军官。纳赛尔写道："我们身在巴勒斯坦作战，但我们的梦想却在埃及。"[29]由于他们在阿以战争中的经历，这些自由军官将最终把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转变为在埃及的胜利，推翻那个曾经背叛他们的政府。

阿拉伯国家继续徒劳无益地举行会谈，尝试采取一致行动来扭转败局。10月23日，阿拉伯国家首脑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集会，谈论缓解埃及军队压力的方案，但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之间的相互猜忌使得会谈未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合作。埃及人则不愿向其阿拉伯兄弟承认自己的败局，拒绝与各方协调军事行动——即便这样做本可缓解自己被围困的部队。

阿拉伯人的分裂显然对以色列人有利。12月，以色列人不仅成功地迫使埃及人全部撤出巴勒斯坦——被围困在费卢杰的埃及部队除外，实际上还侵入了埃及在西奈的领土。法鲁克国王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援引1936年《英埃协议》——这项因延续了英国在埃及影响力而饱受民族主义者鄙视的协议，请求英国介入以迫使以色列从西奈撤军。1949年1月7日，埃及与以色列达成休战协议。以色列人在内盖夫沙漠发起了最后一波攻势，夺取了南至亚喀巴湾沿海乌姆·拉什拉什的领土，后来则将

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埃拉特港。

在完成对内盖夫的征服后，全新的以色列国家最终成型，占据了原巴勒斯坦托管国全部领土的78%。外约旦仍控制着西岸地区，埃及控制着加沙地带。这两个地区也成为保留在阿拉伯人手中的最后的巴勒斯坦领土。在击败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军队，成功遏制阿拉伯军团和伊拉克军队之后，以色列人在1948年取得了一场全面胜利，也获得了向阿拉伯国家强加其条款的资本。联合国提出了一项新的停火协议，并在地中海的罗德岛上开启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间的停战谈判。以色列与埃及（2月）、黎巴嫩（3月）、外约旦（4月）和叙利亚（7月）分别达成双边停战协定。第一次阿以战争正式结束。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1948年将以“奈克白”（*al-Nakba*，灾难）的名字被永久铭记。在巴勒斯坦内战和第一次阿以战争期间，约75万名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他们涌入了黎巴嫩、叙利亚、外约旦、埃及等国以及巴勒斯坦剩余的阿拉伯领土。仅有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还保留在阿拉伯人手中。加沙地带名义上是一块自治领土，但实际上处于埃及的托管之下；约旦河西岸地区则被并入外约旦，后者现今已横跨约旦河两岸，因而更名为约旦。

第一次阿以战争结束后，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在地图上已不复存在，所剩的只有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民，或生活在外国占领之下，或处于流散之中。在之后的历史中，他们将为自身民族权利获得认可而斗争。

*

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为巴勒斯坦灾难的深重性所震惊。在这个危机的时刻，阿拉伯知识分子对于失去巴勒斯坦的原因和后果都还保持着清醒的判断。

第一次阿以战争刚刚结束，两部奠定阿拉伯人自我批判与改革基调的重要著作就已问世。第一部作品的作者康斯坦丁·祖雷克（Constantine Zurayk）于1909年生于大马士革，是20世纪最伟大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之一。祖雷克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完成本科教育，在年仅21岁时就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他一生都任职于黎巴

嫩和叙利亚的学术与公共服务机构，就阿拉伯民族主义撰写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著作。正是在其1948年8月即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发表于贝鲁特的著名短论《灾难的意义》（*Ma'nat al-Nakba*）之中，祖雷克首次将1948年战争命名为“奈克白”，即阿拉伯语中的灾难。[30]

第二部里程碑式著作的作者穆萨·阿莱米（Musa Alami）是一位巴勒斯坦显贵。阿莱米的父亲曾担任耶路撒冷市长，他本人在剑桥大学学习法律，随后进入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任职。1937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高潮期间，阿莱米毅然辞职，之前他已升至英国高级专员阿拉伯秘书及检察官的职位。辞职后，他开始私人执业，积极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阿莱米曾带着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参与1939年和1946—1947年在伦敦举行的多次会议，此外他还是阿盟成立大会上的巴勒斯坦代表。在其发表于1949年3月的文章《巴勒斯坦的教训》（*'Ibrat Filastin*）中，阿莱米反思了阿拉伯人整体失败的原因，并指出了通往民族复兴之路。[31]

两位作者都承认巴勒斯坦的丢失和以色列的建立，开启了阿拉伯历史中一个危险的新篇章。“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失败，”祖雷克警告说，“绝不是简单的挫败或者暂时的、无关痛痒的灾祸。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是阿拉伯人在其漫长历史中所经受的最严酷的考验和苦难之一，是一段以无数磨难和苦难为标志的历史。”[32]阿拉伯人应对这一新威胁的失败，将使他们在未来陷入分而治之的不幸境地，这一境遇与他们刚刚从中摆脱进而获得独立的殖民时期不无相似之处。

考虑到两人对阿拉伯人病症诊断的相似性，阿莱米和祖雷克开出相似的治疗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阿拉伯分裂的场景使两人都深刻意识到阿拉伯统一的必要性。一战后的解决方案以及英、法对阿拉伯世界的瓜分，导致阿拉伯民族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他们都强调，阿拉伯人只有通过阿拉伯的团结来挽救帝国秩序下四分五裂的局面，才能实现其作为一个民族的潜力。他们也认识到狭隘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比如埃及人或叙利亚人独立的民族主义）与他们所渴求的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间的矛盾。祖雷克承认正式的统一在短期内尚不现实，尤其考虑到新独立的各阿拉伯国家内部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长期目标之前，祖雷克首先呼吁在现有的阿拉伯国家内实现“广泛而全面

的变革”。[33]阿莱米则寄希望于一个能通过武力实现统一目标的“阿拉伯普鲁士”。[34]随着巴勒斯坦灾难后军人为登上政治舞台做好了准备，“阿拉伯普鲁士”的理想也将启发阿拉伯军队上层中的一批民族主义者。

在对巴勒斯坦灾难的回应中，阿莱米和祖雷克的呼声几乎等同于将一场阿拉伯复兴作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序曲，作为在一个现代世界中赎回巴勒斯坦、实现阿拉伯人尊严的自我救赎的先决条件。他们的著作之所以在读者中产生广泛而巨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反映了时代精神。阿拉伯民众越来越对他们的统治者感到幻灭。老一代政治精英过去曾领导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他们在与其帝国主人的联系中也受到了污染。他们在欧洲大学接受教育，讲欧洲人的语言，穿西方服饰，在殖民主义强加的机构内工作——总之，他们散发着勾结外敌的气息。他们为小得小失而争论不休，其狭隘的世界观仅局限在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他们的国家边界之内。

阿拉伯世界的政客们完全忽视了那个仍启发着如此众多民众的更广大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灾难性的表现已然揭示了他们政治的破产。也正因如此，阿莱米和祖雷克提出的补救方案，即一个由被解放的公民所组成、以统一的力量来面对现代世界诸多挑战的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才会打动许多的阿拉伯人，成为他们解决积弱现状的主要方案。巴勒斯坦的教训表明，在分裂的状况下阿拉伯人必将衰落，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希望承受现代世界的挑战。

时代在变化之中。阿拉伯统治者们因其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而受到了严重削弱。新的一代正伴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呼声而崛起，并将本国政府作为自己的首要攻击目标。

*

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惨败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彻底动摇了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稳定性。在紧接着巴勒斯坦灾难之后的数月内，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都被政治暗杀和政变的阴影所笼罩。

巴勒斯坦灾难之后，埃及国内陷入政治混乱。对一个新兴的宗教政党而言，在丢失的穆斯林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无异于对伊斯兰教的

背叛。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3月，其创始人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是一位来自苏伊士运河城市伊斯梅利亚的小学教师。班纳是一位致力于与西方影响作斗争而又富有个人魅力的改革家，他坚信西方影响正在削弱埃及的伊斯兰价值观念，强调埃及人民徘徊于欧洲启发的改革与英帝国主义之间，已然“偏离了他们信仰的目标”。[35]一场起初旨在埃及社会中复兴伊斯兰信仰的社会运动迅速发展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穆兄会的势力已足以比肩埃及国内的主要政党乃至华夫脱党。

穆兄会宣称巴勒斯坦战争为一场“圣战”，派遣了大批的志愿者营队赶赴巴勒斯坦以阻止犹太国家的建立。与阿拉伯解放军中的其他阿拉伯志愿者相似，穆兄会成员低估了犹太人的力量和组织性。备战不足的同时，他们同样没有为失败做好准备。他们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视为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并将责任归咎于阿拉伯政府，特别是埃及政府。回到埃及后，他们开始组织示威游行，指责政府，认为政府应对巴勒斯坦的失利负责。

埃及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镇压穆兄会。在1948年的最后几个月内，穆兄会被指控煽动骚乱、阴谋推翻埃及政府。总理马哈穆德·法赫米·努格拉希（Mahmud Fahmi al-Nuqrashi）宣布实行戒严法，并于1948年12月8日颁布政令宣布取缔穆兄会。该组织的资产遭到冻结，文件被查封，很多领导人也被捕入狱。

穆兄会领导人哈桑·班纳仍保持着行动自由。他试图调解自己组织中的极端分子与埃及政府间的矛盾，但种种努力都因双方固执己见而以失败告终。总理努格拉希拒绝会见班纳或对穆兄会做出任何让步。极端分子最终诉诸暴力。12月28日，这位埃及总理在进入内政部的途中遭到近距离枪杀，行凶者是一位1944年加入穆兄会的兽医学专业学生。努格拉希也成为紧接着巴勒斯坦灾难后第一位倒下的阿拉伯领导人。

埃及政府并未因努格拉希暗杀事件而逮捕哈桑·班纳。但这位穆兄会领导人并未因自己的自由而感到宽慰：他深知只要还保持着行动自由，自己就随时有遭到报复性暗杀的危险。班纳尝试与努格拉希的继任者进行谈判，但却发现所有的政府大门都向他紧闭着。他反复申明穆兄会与

试图推翻现有政治系统的一切尝试都无关，但却无济于事。

1949年2月12日，哈桑·班纳在青年穆斯林协会总部外遭枪击身亡。人们普遍认为暗杀行动是受到埃及政府的指使，且背后有王室的支持。6周之内的两起政治谋杀案将埃及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灾难引发了一次军事政变。长期以来，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就担心军队会推翻自己的统治。1949年3月30日，他的担忧终于转变为现实——军队总参谋长侯斯尼·宰伊姆上校（Colonel Husni al-Za‘im）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这次政变也被叙利亚资深政治家阿迪勒·艾尔斯兰（Adil Arslan）描述为“叙利亚近期历史中最重要也最奇怪的事件”。艾尔斯兰在其日记中进一步解释道：“普通公众欢欣鼓舞，大多数学生抓住机会上街举行示威游行，但政治精英却陷入沉默，对国家的命运走向深感焦虑。”[36]叙利亚政治精英们急切地想维护叙利亚共和国青年的民主体制，担心叙利亚滑向军人独裁。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尽管宰伊姆政府仅持续了不到150天，但这次政变却标志着军人开始登上叙利亚的政治舞台。除去几次短暂的间断时期，叙利亚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军人的控制之下。

根据叙利亚外交部部长阿迪勒·艾尔斯兰的说法，宰伊姆统治最奇怪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在叙利亚战败后极短的时间内，就愿意与以色列达成和解。1949年7月20日，侯斯尼·宰伊姆政府与以色列签订了停战协议。但在幕后，宰伊姆却希望比停战协议走得更远，即寻求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在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宰伊姆通过叙利亚停战谈判团队向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传达了一系列提议。宰伊姆提出叙利亚与以色列关系全面正常化，包括互换大使、开放边境以及与以色列的全面经济关系。

宰伊姆关于在叙利亚安置3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的提议，引起了美国和联合国官员的重视。难民问题即将成为最大的人道主义问题，同时也是解决阿以冲突中的一个关键症结，这一点已确然无疑。宰伊姆请求美国帮助开发位于幼发拉底河北部的哲齐赖地区，因而提议在这一地区安

置巴勒斯坦难民。他相信巴勒斯坦劳动力和美国资金的注入将推动其国家的现代化与经济的发展。[37]

以色列总理对宰伊姆的提议却不感兴趣。尽管受到杜鲁门政府、联合国调解人拉尔夫·邦奇博士（Dr. Ralph Bunche）以及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的大力推动，本-古里安仍拒绝会见宰伊姆或讨论后者的提议。本-古里安坚持要求叙利亚人首先签署一份停战协议。他深知宰伊姆意在调整叙利亚的边界，在叙、以两国间分割太巴列湖，对此本-古里安断然拒绝。这位以色列总理并不急于与其阿拉伯邻居达成和平协议，当然更不希望设立以土地换和平的先例。如果说本-古里安有什么担心的，那就是反映在与阿拉伯邻国停战协议中的以色列边界，无法满足这个犹太国家的需求。

由于本-古里安拒绝会见宰伊姆，美国政府便提议叙利亚、以色列两国外交部部长举行一次会谈。美国驻叙利亚大使詹姆斯·基利（James Keeley）私下向宰伊姆的外交部部长阿迪勒·艾尔斯兰提出会谈的设想。艾尔斯兰是一个拥有埃米尔称号的德鲁兹显贵家族中的标志性人物。他虽然加入了宰伊姆政府，但心中却怀有一些疑虑。在他日记的描述中，这位上校既是一位朋友，也是一个疯子。然而，他在1949年6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的基利的提议，却使他确信宰伊姆已经迷失了方向。

“为什么你想让我同意与［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谢尔托克[(1)]举行一次会谈，”艾尔斯兰向这位美国大使问道，“既然你知道我从未被犹太人的虚张声势所哄骗，也决不会向他们做出任何让步。”

“你的问题迫使我必须给你一个坦率的答复，”基利回答说，“尽管我不能随便讨论这件事，因为它还是个秘密。但我知道您是一位高贵的人，所以我也请求您守口如瓶。”

艾尔斯兰承诺保密。基利便继续说道：“是宰伊姆提出要会见本-古里安……但后者拒绝了他。所以我们（即美国政府）认为可以在叙、以两国外交部部长之间举行一次会谈。夏里特同意了，便提出了这项你刚刚拒绝的提议。”

当基利透露宰伊姆与以色列人间的秘密外交之时，震惊的艾尔斯兰

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并将这一主动示好行为解读为叙利亚总统所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美国人并没有强加自己的观点，而是起身告辞，让艾尔斯兰自己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38]

那一夜，艾尔斯兰在他的办公室里待到很晚。他召见了一位叙利亚停战协议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后者则确信宰伊姆有意会见谢尔托克本人。他曾考虑提出辞职，但最终决定坚守岗位，以便阻止以色列人实现其通过单独的和平协议离间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目标。他开始联络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警告说“一个大危险”已迫在眉睫，但又小心翼翼地避免透露事实真相。

艾尔斯兰的反应足以说明宰伊姆与叙利亚民众及政治精英的观点已然脱节到何种程度。刚刚经历一场惨痛的失败，叙利亚人绝对没有心情与以色列和解，军队尤其如此。假使宰伊姆公开他的和平计划，他在国内必将遭遇难以逾越的阻力。即便如此，今日我们也很难断然否定宰伊姆计划的价值，毕竟如此多重要的国际人物，包括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联合国调解人拉尔夫·邦奇以及很多以色列政治和情报人士，当时都为这一方案的种种优点所折服。事实上，这一故事告诉我们，正是本-古里安否决了第一次阿拉伯和平倡议。面对一个曾受到美国和联合国支持的和平方案，本-古里安却说了不。

宰伊姆在叙利亚执政的时间过于短暂，不足以将和平转化为现实。他的改革（面向以色列的和平姿态只代表其中很小一部分）疏远了原本支持他夺取权力的不同社会群体，使得他孤立无援。部分曾支持宰伊姆政变的军官现在开始预谋反对他。1949年8月14日，他们重演了3月政变中采取的措施，逮捕了政府重要领导人，控制了广播电台。6辆装甲车包围了宰伊姆的住宅，经过短暂的交火后，逮捕了这位已被废黜的总统。宰伊姆和他的总理被带到一个看守所，随后立即被处决。

逮捕并处决宰伊姆的是安东·萨阿代（Antun Sa‘ada）的一名追随者。萨阿代（1904—1949）是一名基督徒知识分子，也是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1932年，萨阿代从巴西返回他的出生地黎巴嫩，并创立了叙利亚民族社会党。作为贝鲁特美国大学的一名讲

师，他公开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及其分裂大叙利亚的企图，呼吁大叙利亚地区不同国家的合并。他的政治观点为泛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呼吁将宗教与政治分离，因此吸引了一大批对逊尼派穆斯林主导下的泛阿拉伯国家心怀疑惧的少数族裔群体。

1949年7月，安东·萨阿代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黎巴嫩政府的游击战，但其反叛为时甚短。发起战役后仅几天内，他就被叙利亚人抓获并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后者立即对萨阿代进行了审判，并于7月8日处决了这位革命未竟者。

萨阿代狂热的追随者们迅速开始谋划复仇。1951年7月16日，一名萨阿代的支持者在黎巴嫩前总理里亚德·苏勒哈（Riyad al-Sulh，他的政府处决了萨阿代）出访约旦首都安曼期间刺杀了他。

随着政变、处决、暗杀在阿拉伯国家领导层更迭中成为家常便饭，阿拉伯政治也变得越来越暴力。里亚德·苏勒哈被暗杀后仅4天，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就遇刺身亡。当时他正准备进入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参加周五聚礼，而当他遇刺时，他15岁的孙子亦即约旦未来的侯赛因国王就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之后再回顾，”侯赛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现在怀疑祖父是否对即将到来的悲剧有某种内在的直觉。”侯赛因还记得阿卜杜拉国王在遇刺当天早晨与他的一段对话。老国王的话是“如此的充满预言性，要不是今天很多健在的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再提起它们时都会犹豫再三”。侯赛因在自传中这样记录道：“‘如果哪天我要死了，我宁可被一个无名之辈一枪射在头上，’他说，‘这才是最简单的死去的方式。我宁愿这样死去，也不愿变老，成为一个负担。’”老国王将发现这一愿望实现的时间比他自己设想的还要快。

阿卜杜拉国王很清楚自己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在最新纳入其王国版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他被敌人包围着。很多巴勒斯坦人指控阿卜杜拉为扩张自己的版图而与犹太人进行交易，哈吉艾敏·侯赛尼则指责他出卖了巴勒斯坦。然而，谁也没有意料到阿拉伯政治暴力的新文化竟然触及了穆斯林最神圣的礼拜场所之一。

枪杀阿卜杜拉国王的这位“无名之辈”是一名来自耶路撒冷的裁缝学徒，名叫穆斯塔法·埃舒（Mustafa ‘Ashu）。埃舒本人更多是作为一名受

雇的枪手，而非拥有政治动机的党徒，当下即被国王的警卫击毙。一系列抓捕行动随即展开，10人被指控合谋参与了暗杀行动，尽管审判并未能揭示出幕后指使者的身份。这10人当中，4人被宣判无罪，2人在缺席情况下（都已叛逃至埃及）被判处死刑，另外4人因参与暗杀而被处以绞刑。被处决的4人中，3人都是身有犯罪记录的普通商人——一名牲畜代理人，一名屠夫，还有一名咖啡店主；第四位，穆萨·侯赛尼（Musa al-Husayni），则是穆夫提艾敏·侯赛尼的一位远房亲戚。[39]穆夫提艾敏以及埃及国王法鲁克都被怀疑资助了这次暗杀行动，但时至今日事实真相肯定已经石沉大海。最终，阿卜杜拉国王也成为巴勒斯坦灾难的另一个牺牲品。

*

在一战后对中东的分割之后，巴勒斯坦灾难成为20世纪阿拉伯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其阴影之下。

1948年战争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就是今天仍在持续中的阿以冲突。一方面，阿拉伯人拒绝接受失去巴勒斯坦的现实;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则渴望得到更多的领土。后续的阿以战争也因而变得不可避免，在过去60年内以致命的频率反复上演。

这场冲突造成的人员损失是灾难性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作为1967年进一步的领土流失以及过去60年内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在联合国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数量已由原来的75万增至现在的430万以上。在其间的几十年内，巴勒斯坦人为实现建国目标已建立了多个代表性机构，但为了追求自身目标也不惜诉诸武装斗争——从针对以色列的边境袭击，到针对以色列海外利益的恐怖袭击，从被占领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上的民众暴动与抵抗，到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尽管采取了上述策略——有人会说，正是因为采取了上述策略，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诉求至今尚未实现。

巴勒斯坦灾难对阿拉伯政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48年的失败，给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希冀和渴望蒙上了一层阴影。巴勒斯坦战败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剧烈的政治波动，与巴勒斯坦托管国接壤的四个国家深受政治暗杀、政变、革命的困扰。旧政治精英被年轻一代军人

推翻，也标志着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的到来。与两次大战之间那些接受外国教育的政治精英相比，这些军人很多来自农村，与大众政治保持着更为密切的接触。元老派政治家们在本国既有的边界内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奋斗，自由军官煽动家们则是促进泛阿拉伯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旧政权说欧洲语言，新的先锋队则说普通民众的语言。

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巴勒斯坦灾难标志着欧洲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终结。巴勒斯坦问题是欧洲制造的，欧洲解决这一问题之无力反映出二战结束后欧洲自身的衰落。 二战结束后，英、法沦为二等强国：经过多年的战争，英国经济已疲弱不堪，法国的士气在德国占领的几年内受到致命打击。两国在国内所需的重建资金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根本无暇外顾。帝国已处于衰退之中，新的势力主导了整个国际秩序。

分别于1949年、1952年、1958年在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上台的年轻军官们与英国或法国并没有联系，相反他们转向了新的世界强权——美国及其超级大国对手苏联。这是帝国时代的结束，也是冷战新时代的开端。阿拉伯人不得不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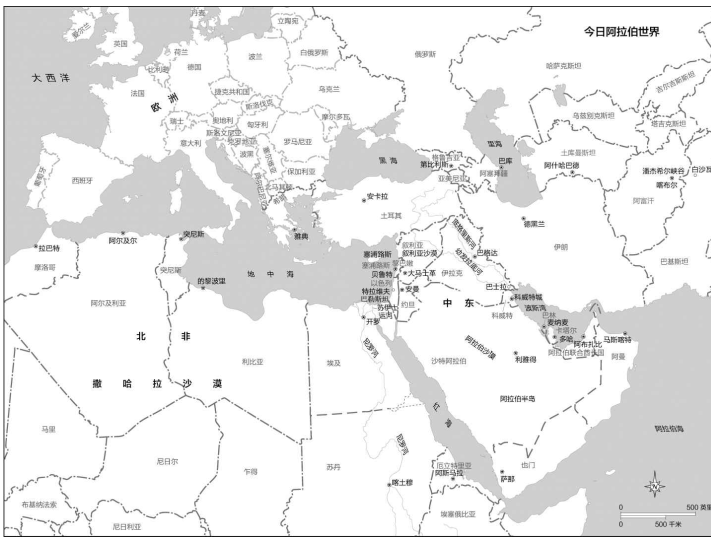
(1) 摩西·谢尔托克是摩西·夏里特的曾用名，此处引文中用的是曾用名。——编者注

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阿拉伯世界在革命的骚动中进入了冷战的新时代。两次大战之间萌芽的反帝思潮，在二战末期重新获得了活力。巴勒斯坦战争后，阿拉伯世界对英国和法国的敌对情绪非常普遍，这也使得英国在埃及、约旦和伊拉克的情况更加复杂多变。在这些国家里，英国和它扶植建立的君主国仍保持着特惠盟友关系。

由于未能与英帝国统治划清界限，老一代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他们效忠的君主们已然声名扫地。从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到共产主义者，一批新兴的激进党派竞相争夺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忠诚。军队中的年轻军官同样难免受到当时政治动荡的影响。年轻一代质疑阿拉伯王室和英国人所建立的多党议会制的合法性，反而对革命共和主义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这一时代超凡的意识形态。至20世纪40年代，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所有阿拉伯人的共同愿望，但他们还有更高的政治理想。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共同的语言、历史和基于伊斯兰过往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一文化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共享。他们想打破帝国强权为分裂阿拉伯人而划定的边界，同时基于维系阿拉伯人的深厚历史和文化纽带，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他们相信只有通过统一才能恢复阿拉伯人在世界事务中的崇高地位。正是出于这些信念，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批评本国政府的失败并要求阿拉伯统一。



在很多方面，埃及都处在这些发展的风口浪尖之上。埃及医生、女权主义知识分子纳瓦勒·萨阿达维（Nawal El Saadawi）1948年进入开罗医学院学习，当时校园里充斥着紧张的政治氛围。她在自传中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大学几乎成了持续不断的示威活动的舞台。"萨阿达维本人对民族主义政治并不陌生。她的父亲和她一起阅读报纸，谴责国王、军队阶层的腐败以及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父亲会告诉女儿说："这是一种积习难改的三重苦难，除了推翻政权之外别无解决的办法，人民必须觉醒，必须反叛。"[1]年少的萨阿达维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当她还是一名高中生时，就已经开始参与20世纪40年代末让整个开罗陷入瘫痪的民众示威活动。

示威活动反映了埃及人民对于变革的迫切心境。巴勒斯坦灾难后，埃及人对国内政党和法鲁克国王感到幻灭，也越来越无法容忍英国在埃及享有的特殊地位。战后时代是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英国人已经在埃及停留了太长时间，惹人生厌。

在巴勒斯坦战败，以及1948年12月总理努格拉希遭暗杀所造成的混乱之后，埃及政府于1950年举行选举。华夫脱党获得胜利，组建新政府并重启与英国人的谈判，目标便是自1919年以来埃及民族主义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完全独立。1950年3月至1951年10月，华夫脱党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然而19个月的谈判却未能带来任何结果。华夫脱党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协议》，英国人则拒绝承认协议的废除，因为这

一行为将使得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变为一支非法的占领部队。尽管英帝国处于收缩之中——1947年英国人已经撤离印度，但就战略重要性而言，苏伊士运河仍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块基石。

鉴于无法通过谈判达成目标，华夫脱党开始通过其他方式向英国人施压。在华夫脱政府的默许下，埃及青年开始自愿组建被称为“菲达因”（*fida'iyin*，字面意思为“准备自我牺牲的战士”）的游击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穆兄会成员、学生、农民和工人。1951年10月，游击队开始袭击运河区的英国部队和设施。英国人对这些袭击则采取了武力回击。纳瓦勒·萨阿达维的一位同学就离开医学院加入了菲达因游击队，后在反英行动中牺牲。

运河区的武装斗争在开罗激起了激烈的政治争论。萨阿达维还记得她在1951年11月参与的一场大学内的学生集会。她越来越不耐烦地听着那些学生政治家——华夫脱党人、共产主义者、穆兄会成员——故作声势、浮夸空洞的演说，这时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希勒米（Ahmed Helmi）的菲达因成员被叫上讲台。希勒米是一位自由战士，曾参加针对运河区英国占领部队的袭击。他用平静的声音向争吵不休的同学们发出呼吁。他解释说：“同志们，运河区的自由战士急需弹药和粮食补给，必须稳固补给线来保护他们。现在没有党派斗争的时间和空间了，我们需要人民的团结。”[2]萨阿达维被这位热情的青年牢牢吸引住了，后来嫁给了他。

至1952年1月，英国人已经决定动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对苏伊士运河区的控制。为防止埃及警察向菲达因提供支持，英国部队开始占领运河区内的埃及警察局。1月24日，英国人不费一枪一炮就迫使运河区内一城镇警察站的160名警察投降。眼见英国人如此轻易地占领了这座警察站，埃及政府大为尴尬，于是命令运河区内的埃及警察全力抵抗英国人的占领，“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埃及人次日就得到了机会。那天，1500名英国军人包围了伊斯梅利亚政府所在地并要求政府投降，250名负责守卫政府机关的警察拒绝投降。在随后的9小时内，英国人动用坦克和炮兵连续轰击埃及人阵地，埃及守军则奋起反抗，直至耗尽了所有的弹药。在遭受了46死、72伤的重大损失后，埃及人最终投降。

英国人发动猛攻的消息在埃及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公愤。第二天，即

1952年1月26日周六，埃及全国各行业宣布举行总罢工，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学生集聚开罗。为了抗议英国的行为，这座城市已准备好迎接一天的民众示威，但突如其来的“黑色星期六”却令埃及政府或人民始料未及。

“黑色星期六”当天，黑暗势力在开罗兴风作浪。刚开始的一系列愤怒的示威游行迅速发展为暴力活动，其间超过50名埃及人和17名外国人（包括9名英国人）被暴民杀害。在示威活动的掩护之下，煽动者和纵火者最大限度地制造混乱。埃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安瓦尔·阿卜杜·马立克（Anouar Abdel Malek）目睹了“黑色星期六”当天的事件，描述了示威者是如何津津有味地看着纵火犯将开罗市中心最富庶的街区付之一炬的。“他们看着这些人纵火却袖手旁观，因为这座华丽的都市并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那些有钱人。看着后者的财产被烈火吞噬，他们自然乐见其成。”[3]在一天之内，被暴民烧毁的资产包括1家英国俱乐部、1所犹太学校、1间穆兄会办公室、4座宾馆（包括著名的牧羊人宾馆）、4所夜总会、7家零售店以及70家其他的商业机构——包括银行、汽车展厅、机票售卖点等。[4]

1952年1月25—26日的恶劣事件也标志着埃及政治秩序的崩溃。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些在埃及史无前例的纵火事件显然是经过预谋的。在开罗，各种谣传和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共产党人指责社会党人和穆兄会成员；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旨在削弱法鲁克国王（开罗大火当晚，国王正在举行一场晚宴庆祝儿子的生日）地位的阴谋；其他人则宣称大火是由国王和英国人一手策划的，目的是推翻华夫脱党政府，任命一个对国王意愿更加顺从的过渡政府。

无论在“黑色星期六”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如何，法鲁克国王确于1月27日解散了穆斯塔法·纳哈斯领导的华夫脱党政府，任命了一系列由忠于王室的政客领衔的内阁成员。议会也于3月24日被解散，新议会的选举被无限期地推后。似乎法鲁克正追随其父亲的步伐，试图重演1930年宫廷独裁的剧本。埃及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急转直下。

归根结底，究竟何人指使了埃及纵火案（对于这一问题从未有过定论）其实并不重要。各种谣传和阴谋理论已然揭示了王室和政府所面临

的信任危机，而这一危机则预示了埃及革命的到来。

1952年，尽管在埃及很多人都在谈论革命，但只有一小撮军官真正在积极预谋推翻政府。这些人自称为“自由军官”，其领袖是一位名叫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的年轻上校。埃及王室和政府的一系列行为令举国上下大失所望，而正是这种失望情绪和满腔的热情让自由军官们团结在一起。纳赛尔和他的同僚们对自己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经历感到震惊，当时他们在缺乏充足武器的情况下就被派往战场，在数月之内遭到以色列人围困而最终战败。起初，自由军官团结在一起是为了反对英国在埃及的帝国主义行径。但很快，他们就将埃及政治体制视为完全脱离英国实现独立的主要障碍。

巴勒斯坦战争后，纳赛尔招募部分最亲信的同僚加入了一个由军人组成的秘密基层政治组织。基于为其行动争取最广阔的支持基础的考虑，纳赛尔招募的成员中既包括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Abd al-Hakim Amer）、萨拉赫·萨利姆等巴勒斯坦战争的亲历者，也包括像安瓦尔·萨达特这样与穆兄会有联系的军官，还包括像哈立德·穆希丁（Khaled Mohi El Din）这样的共产主义者。1949年秋，这些人在纳赛尔家的客厅内举行了首次会议。随着自由军官组织的扩大，新的基层组织也不断成立，但出于反侦查的考虑都彼此保持独立。每个基层组织的成员从埃及军队的不同分支中招募志同道合的军官。[5]1950年秋，自由军官组织发布了其首份传单，以便在军官群体中争取对其反帝事业的支持。[6]

“黑色星期六”事件推动了自由军官运动的转型。直至1952年1月，自由军官还只是聚焦于反帝斗争，并将对埃及政府的批评限定在官员腐败、与英国人勾结等议题。但从1952年1月起，自由军官开始公开讨论推翻法鲁克国王及其任命的保王派政府。他们将1952年11月定为政变的预定日期，并开始加快对反对派军官的招募和动员。

1951年12月，在看似无伤大雅的埃及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中，国王和自由军官之间的对抗到达了一触即发的关头。对法鲁克国王而言，军官俱乐部是反映军官对国王忠诚的晴雨表；自由军官则决定将这次选举作为对抗国王及其支持者的工具。纳赛尔及其同僚成功地说服

了广受支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将军领衔一支参选董事会的反对派名单，竞选军官俱乐部主席一职。纳吉布和反对派名单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法鲁克国王就千方百计地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最终，法鲁克国王于1952年7月亲自介入，撤销纳吉布的职务，并解散了军官俱乐部董事会。自由军官们深知，如果不能立即对国王的挑衅做出回应，他们将失去所有的信誉。正如纳赛尔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警告其他自由军官时所说的，“国王已经给了我们一记重拳；如果我们不还以颜色的话，我们的组织就会失去在军官中的信誉，没有人会再愿意加入我们”。[7]

自由军官们达成共识：如果无法采取快速并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他们所有人都要锒铛入狱。纳赛尔与自由军官中的高层政治家纳吉布将军进行了会面，策划立即发动反王室政变。“我们一致同意，埃及革命的时机现在已完全成熟。”纳吉布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国王及其内阁正在亚历山大的夏日驻地，将开罗留给军人管理。纳吉布分析道：“天气是如此湿热，以至于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能想象一场革命即将到来，因此这正是我们采取行动的理想时机。”他们决心在国王有时间任命一个新内阁之前，“在他的间谍们有时间发现我们是谁、我们做何打算之前”就采取行动。[8]

自由军官们已经到达了无路可退的境地：密谋推翻政权的风险极大，他们深知一旦失败，自己将面临叛国罪的指控。因此，他们极为仔细地检查自己的计划：同时占领广播电台和军事指挥部；动员忠于政变策划者的部队；采取措施确保公共安全，防止外国介入。在1952年7月23日政变日到来之前，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政变策划者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这也使得政变前的最后几天压力陡增。政变前夕，一位下属军官警告纳吉布将军，称后者即将因涉嫌领导一场反对政府的阴谋而被捕。纳吉布在其回忆录中承认道：“我极力掩饰自己的惊恐。”他决定在政变进行的当晚待在家里，宣称自己受到了监视，担心可能使自由军官们的计划陷入危险。[9]安瓦尔·萨达特当晚则偕同妻子去了电影院，在那里与另一位观众发生了一场热闹的争端，随后

还去警察局报了案准备起诉——对一位政变策划者而言，这显然是政变失败情况下再理想不过的不在场证据了。[10]即便是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和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他们出现在政变现场时也是身着便衣（后来他们换上了军装），这让支持者们感到惊讶不已。[11]

尽管疑虑重重，自由军官们还是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政变。叛变的军事部队包围了埃及政府军总部，在击退轻微的抵抗后，于7月23日凌晨2点占领了该机构。军队总部被占领后，支持政变的军队马上获许占领开罗的各战略性机构，而当时整座城市还在沉睡中。军队占领这些机构后，安瓦尔·萨达特来到国家广播电台，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的名义宣布了政变的成功，从而为一场经典的政变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7月23日，纳瓦勒·萨阿达维正在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凯斯尔·艾因尼医院工作。她描述了萨达特发布声明后医院内的狂喜场景。“在病房里，病人们一直在听收音机。突然，音乐被一则重要的消息打断了，该消息称军队已经接管了国家，而法鲁克已不再是国王。”病人们自发的反应让她感到震惊。“我们正站在那里，突然之间病人们高喊着‘革命万岁’冲出了病房。我可以看到他们嘴张得浑圆，在空中挥舞着手臂，破旧的衬衫在身前飘动。就好像解剖室的尸体突然间起死回生，高喊着‘革命万岁’！”事实上，甚至死者的运送也被叫停，萨阿达维就亲眼看见一支正离开医院的送葬队伍在听到这则消息后暂时停了下来。“扛着灵柩的男人将灵柩放在过道上，高喊着‘革命万岁’加入了群众的行列；前一刻还在为逝者哀号的妇女们则开始［为庆祝而］发出欢乐的尖叫。”[12]

7月23日，法鲁克国王和他的政府彻底倒台，但自由军官对于运动成功后该如何进行下一步还毫无头绪。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很显然，我们在发动革命时，对于接管政府职位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没有成为政府部长的雄心壮志，也从没有想过这些，甚至尚未制订一个明确的政府计划。”[13]他们决定邀请资深政客阿里·马希尔（Ali　Maher）组建新政府。同样，自由军官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法鲁克本人：是逮捕他，还是将他处决？纳赛尔做了明智的决定：确保法鲁克退位并允许他

流亡海外，从而避免让新政府卷入一场可能导致分裂的司法程序，或是因草率的处决而把一位不受欢迎的国王升格为殉难者。法鲁克逊位给他尚在襁褓中的幼子艾哈迈德·福阿德二世（Ahmed Fuad II），后者将受到一位摄政王的辅佐。7月26日，在21声礼炮的欢送下，他本人被纳吉布将军送上了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麦哈鲁赛号”（Mahroussa）皇家游艇。

“我向他敬礼，他也向我回敬，”纳吉布在回忆录中写道：

> 接下来是一段漫长而又尴尬的沉默。我们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
> “是您，我的陛下，迫使我们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
> 法鲁克的回答将让我困惑一生。
>
> 他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做了我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
> 我是如此吃惊，以至于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向他敬礼，其他人也如是。法鲁克向我们回敬，和我们所有人都握了手。
>
> 他说：“我希望你能好好管理军队，你知道，我的祖父一手打造了这支军队。”
>
> 我回答说：“埃及军队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
> “你的任务将会很艰难。你知道，统治埃及并非易事。”[14]

事实上，纳吉布将军并未获得多少机会来统治埃及。事实很快将表明，埃及的实际统治者是纳赛尔。

自由军官革命代表着新兴的年轻一代在埃及政治中的崛起。该运动成员的平均年龄仅34岁，51岁的纳吉布在其中已经是一位老人。所有人都是本地出生、具有农村背景的埃及人，通过军队晋升至要职——这些特点与19世纪80年代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身边的支持者极为相似。

与欧拉比相似，自由军官们对埃及王室身边那些土耳其-切尔克斯精英的特权和做作而感到愤愤不平。夺取权力后，他们最早出台的法令之一就是废除贝伊、帕夏等一切土耳其头衔。在他们看来，这些头衔是由“一位不正常的国王……（赏赐给）一些根本不配拥有它们的人”。[15]

被剥夺了头衔之后，埃及贵族接着又被剥夺了土地。自由军官们开启了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出台法律将个人持有地产的上限限定在200英亩。政府没收了王室的巨大种植园，征收了约1700个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并以30年期债券偿还。合计起来，新政府从埃及土地精英手中没收了约36.5万英亩土地，随后这些土地被分配给小土地所有者，每份地产面积不超过5英亩。尽管遭到了总理阿里·马希尔的激烈反对——马希尔代表着财富源自地产的平民精英，但土地改革方案还是得到了通过。显然，与有产贵族的意愿相比，自由军官们更看重民众的支持。1952年9月，他们成功迫使马希尔辞职。

土地改革措施为自由军官们赢得了切实可见的政治回报。尽管埃及农业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共约14.6万个家庭，而当时埃及人口达到约2150万——真正受益于1952年土地改革的措施，但土改措施却在埃及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好感。[16]在埃及民众的支持下，军人更有胆量执掌政权，在政治中扮演更直接的角色。

一旦登上政治舞台，自由军官们将证明自己是坚决果断的。1952年9月，纳吉布将军同意组建以文官为主的新政府。纳赛尔创建了一个由军人组成的委员会——革命指导委员会来监督革命的工作，表面上与政府合作，实际上与纳吉布的竞争关系不断加剧。1953年1月，作为对华夫脱党和穆兄会压力的回应，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取缔所有的政党，并将各党资产全部收归国有。作为幕后的操盘手，纳赛尔引入了一个国家扶持的全新政党，即解放联盟，宣称两次大战之间埃及国内政治的分裂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党派主义。他显然希望解放联盟能有助于动员民众支持新政权。1953年6月18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废除君主制，纳赛尔也完成了与旧秩序的彻底决裂；埃及被宣布为共和国，穆罕默德·纳吉布则被任命为首任总统。法老时期以来，埃及首次由本土出生的埃及人统治。用纳瓦勒·萨阿达维的话来说，纳吉布是“古埃及国王美尼斯以来第一位统治埃及的埃及人”。[17]

埃及共和国现在成为一个人民政府，享受着埃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萨阿达维回忆说："国内的氛围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走路时都满脸阴沉、缄默不语。现在大街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聊天、微笑，与完全陌生的人握手、互道早安，询问彼此的健康情况和近期的事件，为政权更迭而相互祝贺，讨论并试图展望未来的发展，每天都期待着变化的发生。"

对极度渴望变化的民众而言，如何满足他们的高预期是新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这并不简单，埃及新政府继承了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整个国家过度依赖农业，而农业产出又受到埃及沙漠环境的限制；在缺少开发荒漠所需水资源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扩大耕种面积。埃及工业整体上仍处于欠发展状态，1953年农业对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35%，而工业仅为13%（剩余52%的份额全部来自服务业）。[18]工业化步伐的缓慢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低水平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整体人口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创造就业的增速，这也意味着能够获得稳定工作并显著提升生活水平的埃及人越来越少。

对于他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军官们有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在尼罗河上修建一座水电大坝。工程师们将上埃及地区阿斯旺镇附近锁定为修建水坝的理想地点。这座新的阿斯旺水坝将能够储蓄足够多的水量，将全国耕作土地面积由600万英亩增加到800万—950万英亩，此外还将产生足够的电量来支持埃及的工业化，向全国提供可负担得起的生活用电。[19]但这样一个工程将耗资数亿美元，远远超出埃及自身资源的供给限度。

为了资助阿斯旺水坝、确保埃及的经济独立，执政的军官们将不得不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然而，埃及极其珍惜自己的独立地位，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实现其目标。自由军官们很快就会发现，想要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而不做出妥协是多么困难。

*

在国际舞台，埃及新政府的首要关切是确保英国完全撤军。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民族主义运动未竟的事业。

为确保英国从埃及完全撤军，1953年4月纳赛尔及其属下在美国的斡旋下与英国人展开谈判。对双方而言，这场谈判的风险都非常之高。纳赛尔深信谈判失败将意味着自由军官的倒台；在一个日益步入后殖民时代的世界中，英国则对其国际地位十分敏感。谈判不断地破裂随后又重启，整个进程拖延了16个月之久。最终，英国人与埃及人达成一项妥协方案：英国将在24个月之内从埃及撤走所有的军事人员，只在运河区内留下约1200名民事专家，其停留期限为7年的一个过渡期。显然，英国人并非无条件地完全撤离，政府对撤军延期2年、英国民事存在长达7年的让步，都成为部分埃及民族主义者指摘的对象。但这一妥协方案的独立性已足以让纳赛尔在1954年7月获得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批准。1954年10月19日，英、埃两国政府签署了解决方案。1956年6月19日，最后一名英国士兵离开了埃及。

与英国的新协议在埃及国内也面临着批评的声音。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就抓住协议中的种种缺陷向其年轻的竞争对手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纳吉布显然不再满足于傀儡的角色，而是寻求其作为总统理应享有的一切权力。纳赛尔则通过对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控制不断蚕食总统的权力。至1954年初，纳赛尔和纳吉布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某些同时代的人所描绘的“仇恨”的地步。纳吉布公开批评英国撤军协议之后，纳赛尔开始动员其忠实的追随者丑化纳吉布，煽动民意反对一位至今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

穆兄会同样抓住英国撤军不彻底的时机批评自由军官政权。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与其他政党一道于1953年被取缔，因而对新兴的军人政权已然心怀不满。1954年初纳赛尔对穆兄会的镇压，也使得他成为一个伊斯兰主义分裂团体全力刺杀的目标。这些人甚至考虑过派遣一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身藏炸药的情况下靠近纳赛尔以便将后者炸死——这也成为中东历史上最早的自杀式炸弹计划之一。但这个策略对于1954年的伊斯兰主义者似乎缺乏吸引力，因为并没有志愿者愿意执行该任务。[20]

1954年10月26日，一位名叫马哈穆德·阿卜杜·拉提夫（Mahmoud Abd al-Latif）的穆兄会成员试图用一种更加传统的方式刺杀纳赛尔。在

庆祝英国撤离协议的一次演讲中，阿卜杜·拉提夫向纳赛尔开了8枪。但前者显然是一位非常糟糕的枪手，8发子弹竟无一中的。面对身旁嗖嗖而过的子弹，纳赛尔的表现是英雄式的。他没有在枪弹下退缩，只是在短时间内中断了演讲。当他重新开始演说时，他用满腔热情感染了正在收听电台广播的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听众。纳赛尔对着麦克风高喊道："同胞们，我的血正在为你们、为埃及而流淌。我将为你们而活着，也会为你们的自由和荣耀而死去。"听众们咆哮着表示支持。"让他们来杀我吧。我完全不在乎，只要我已将自豪、荣耀和自由注入你们心中。如果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死了，你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另一个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21]

这一时刻已不能更加戏剧化了，埃及民众将纳赛尔拥戴为他们的领袖。基于新获得的声望，纳赛尔确立了自己对革命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可以放开手脚处理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以及穆兄会这两个与他争夺民众忠诚的主要竞争对手。数千名穆兄会成员被捕；1954年12月，6名成员因参与暗杀行动被处以绞刑。纳吉布因审判也受到牵连，尽管从未被指控有任何犯罪行为，11月15日纳吉布被免去了总统职务，在此后的20年内都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埃及现在有了一位无可争议的主人。从1954年底到1970年去世，纳赛尔一直担任埃及总统，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总司令。没有一位阿拉伯领导人在之前或此后能像纳赛尔一样，对阿拉伯世界施加如此大的影响，而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鲜有人可匹敌。埃及即将开始一次非同寻常的历险，一段纯粹的热血沸腾的岁月，其间一切看起来皆有可能。

与英国人达成撤军协议后，埃及政府的下一项议题就是与新建的以色列国之间未了结的恩怨。在脆弱的边界线两边，埃及和这个犹太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日趋紧张。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做出一系列尝试，以试探自由军官的意图，然而纳赛尔及其属下有意避免任何与以色列人的直接接触（1953年以色列与埃及外交人员的确在巴黎进行了秘密接触）。本-古里安得出结论，即埃及在其新军人领袖的领导下，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普鲁士，从而对以色列构成明确而现实的威胁。纳赛尔深知，他

的国家还远远缺乏必要的军事力量来遏制——更不用说对抗——这一满怀敌意的新邻居。为了对以色列构成切实的威胁，埃及需要从国外获得物资。但纳赛尔很快发现，作为提供武器装备的交换，外国政府势必会提出一定的条件，而这将削弱埃及新获得的独立地位。

纳赛尔首先转向美国人，在1952年11月向美国寻求帮助。作为回应，自由军官受邀派遣一个代表团赴美来陈述其需求——飞机、坦克、火炮和舰艇。美国人在原则上愿意提供支持，但希望埃及在处理任何武器装备订单之前，保证加入一个地区性防御条约。

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访问埃及。杜勒斯此行具有双重目的：其一是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和平协议，其二是在中东地区孤立美国的超级大国对手——苏联。与埃及政府的讨论很快转向了武器装备的主题。杜勒斯明确表示，美国仍愿意支持埃及，但条件是后者必须加入一个被称为中东防御组织的新的地区性防御条约，这一条约将使埃及与美、英达成反对苏联的正式联盟。

纳赛尔断然拒绝了杜勒斯的建议。中东防御组织为英国延长在埃及的军事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一点是任何埃及领导人都无法接受的。纳赛尔无法让杜勒斯明白的是，埃及没有理由害怕苏联的威胁，因为对埃及的真正威胁来自以色列。穆罕默德·海卡勒（Mohamed Heikal，生于1923年）是埃及很有影响力的日报《金字塔报》的主编，也是纳赛尔的心腹之一。他记得纳赛尔曾这样问杜勒斯："我怎能到我的人民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对一个手握手枪、距苏伊士运河仅60英里的杀人犯视而不见，反而担忧5000英里以外某个手持小刀的陌生人？"[22]

1954年《英埃撤军协议》签订后，埃、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在本-古里安看来，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存在，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构成了一个缓冲带，而即将到来的英国撤军则意味着灾难。1954年7月，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开始在埃及开展秘密行动，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英、美机构中安装爆炸装置。显然，他们希望在埃及和英、美之间引发一场危机，从而促使英国重新考虑其从苏伊士运河撤军的决定。[23]然而，令以色列人颇为狼狈的是，一个以色列间谍在安放爆炸装置之前即被抓获，从而导致整个链条都被曝光。在这个臭名昭著的拉冯事件（因

当时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平哈斯·拉冯而得名，后者因这一惨败而遭到指责）中，两人后来被处决，一人在狱中自杀，其他人则被判处多年徒刑。

拉冯事件曝光、以色列特工随后被处决之后，埃、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古里安于1955年2月重新出任总理，之前他已在野一年多，其间以色列政府处于鸽派总理摩西·夏里特的领导之下。1955年2月28日，本-古里安在回归伊始，就对加沙地带的埃及部队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攻击。

加沙地带是1948年战争后仅存的处于埃及人控制之下的原巴勒斯坦托管国领土，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滞留在那里。被剥夺了财产的巴勒斯坦人经常跨越加沙-以色列边境，一些人是为了从已失去的位于今以色列境内的家园里收回财产，其他人则是为了破坏那个使他们流离失所的犹太国家。1955年2月，两起类似的渗透事件为以色列政府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提供了借口。两个以色列伞兵连队跨境进入加沙，摧毁了埃及军队的地方指挥部，打死37名埃及士兵，打伤31人。以色列人已然展现了其军事优势；纳赛尔深知，如果不能为其军队提供对抗以色列人的更先进的武器，他在埃及的日子将不会长久。

埃及在加沙的失利让纳赛尔陷入了可怕的窘境。纳赛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外部军事支持，但又不能为此做出妥协。英国人和美国人则继续向纳赛尔施压，在考虑向埃及提供现代武器前，要求其加入一个地区性联盟。这两个讲英语的大国正敦促纳赛尔在一项北约支持的联盟条约——《巴格达条约》上签字。该条约是1955年2月土耳其和伊拉克就反苏联扩张达成的一项协议，同一年内，英国、巴基斯坦、伊朗也相继加入。纳赛尔极力反对《巴格达条约》，将之视为英国的阴谋，旨在延续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支持其在伊拉克的盟友哈希姆人来打压埃及自由军官。纳赛尔毫不含糊地谴责《巴格达条约》，成功地阻止了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在英、美的唆使下加入该条约。

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开始将纳赛尔视为英国中东政策每一次挫败的背后推手，下定决心要反对这位埃及领导人。在纳赛尔与艾登两人间敌意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英国向埃及军方提供先进武器已成为不可能。

*

随后，纳赛尔试探法国人能否为埃及提供武器。但由于纳赛尔支持北非民族主义运动，法国人同样对他深怀疑惧。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正在动员民众，以确保其国家脱离法国获得完全独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埃及视为典范和盟友。纳赛尔则同情北非的民族主义者，将后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视为阿拉伯世界反抗外国统治的更广阔斗争的一部分。尽管在资金和军事资源方面能提供的支持很有限，但纳赛尔非常愿意为被流放的民族主义者提供庇护，使他们得以自由地在埃及境内为独立斗争开展动员。

只要纳赛尔为北非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一个自由天堂，法国人就拒绝给他提供军事支持。当面临在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做出选择时，纳赛尔选择了前者。法国正在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这一事实也使他们更加嫉恨纳赛尔所选择的立场。

二战伊始被纳粹德国击败后，法国在北非地区的权威遭遇致命打击。亲德的维希政权派遣的士气低落的殖民官员，很难代表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对法国孱弱现状的认识也鼓舞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1942年11月，美国部队轻松击败了驻扎在摩洛哥的维希军队。两个月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见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共同酝酿发动北非战役。两人邀请摩洛哥素丹穆罕默德五世共进晚餐，其间罗斯福公开批评法国帝国主义。素丹之子哈桑，即后来继任摩洛哥王位的哈桑二世国王，也出席了晚宴。根据哈桑二世的转述，罗斯福在晚宴期间曾表示“殖民主义体系已经过时了，注定要灭亡”。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相，丘吉尔表示不敢苟同，但罗斯福却越说越来劲。根据哈桑二世的回忆，罗斯福“希望二战不久就能结束，并预见在战后，根据《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摩洛哥将自由地获得独立”。罗斯福许诺，在获得独立后，美国将向摩洛哥提供经济援助。[24]

罗斯福这番话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晚宴的餐桌。在他这次出访后两

周，一群民族主义者就起草了一份宣言，并致信美国总统，要求他支持摩洛哥独立。素丹甚至提出向德国、意大利宣战，站在协约国一方加入二战。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承诺支持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军队，而非满足摩洛哥的独立要求。1943年6月，美国将摩洛哥移交给自由法国。摩洛哥人将不得不在缺少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争取自身的独立，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摩洛哥独立运动的力量源自素丹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1944年1月，一个自称为独立党的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摩洛哥独立。独立党是公开的保皇派，其宣言提议由素丹代表摩洛哥国家与法国人进行谈判，一个前提条件是，素丹（在获得独立后）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穆罕默德五世全力支持独立党，这也推动他与法国殖民当局走向了对抗。20世纪40年代末期，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由政治精英的狭窄圈子传播至工会和城市大众，素丹越来越被殖民当局视为那条威胁着法国在北非殖民帝国的民族主义毒蛇的蛇头。

更广阔的阿拉伯世界则给予摩洛哥民族主义者道义上的支持。1947年，流亡海外的摩洛哥激进分子在开罗建立阿拉伯马格里布办公室，因而可以在不受法国干预的情况下策划政治行动，从事政治宣传。马格里布办公室从一艘法国船上解救了20世纪20年代里夫战争中的反西、反法领袖穆罕默德·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即著名的阿卜杜·克里姆，当时他正被从其流放地留尼汪岛押送回巴黎。这件事让该组织登上了头条。阿卜杜·克里姆在开罗受到了英雄般的迎接，并被提名为北非解放委员会主席。

法国人越来越担心阿拉伯民族主义潮流可能横扫其北非属地。穆罕默德五世开始极力强调摩洛哥与阿拉伯世界间的联系。1947年4月，他在丹吉尔港发表演说，谈及摩洛哥的阿拉伯纽带，对法国却未置一词。1951年，一位强硬派的法国公使向穆罕默德五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取缔独立党和逊位之间做出选择。尽管素丹向法国方面的压力做出了让步，但他仍然保有民族主义者和摩洛哥民众的全力支持，后者则开

始动员开展民众示威活动。随着工会鼓动罢工、民族主义示威活动演变为骚乱，摩洛哥国内公共秩序开始陷入瘫痪。

同一时期，民族主义示威活动在突尼斯同样风起云涌。1952年12月，法国人暗杀了一位名叫法尔哈特·哈沙德的突尼斯劳工领袖，这一事件在突尼斯、摩洛哥两国激起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法国当局对摩洛哥主要城市中爆发的骚乱采取了过激的暴力镇压方式，反而在无意中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摩洛哥作家莱拉·艾布·宰德（Leila Abouzeid）在她的自传体小说《象年》（*The Year of Elephant*）中描绘了暴力镇压引发的强烈震动。对小说的叙述者宰哈拉而言，1952年12月的暴力事件，标志着她最终决定加入民族主义地下运动。

> 早在真正加入抵抗运动之前多年，我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和当时的场景。那黑暗的一天中卡萨布兰卡发生的屠杀永远都不会被忘记。每当我想到那一天，我的身体就会感到麻痹，似乎又看到他们——来自外国［法国］军团的士兵——从我们街区附近的一个兵营中鱼贯而出，用机枪射杀行人。
>
> 枪声在我耳中回荡，妇女儿童倒下的场景不断在我脑海中重演，从何时起这样的状况就困扰着我的生活？之后我还亲眼看到很多尸体像垃圾袋一样躺在路边，但他们从未像那个可怕日子里发生的一切那样深深地震撼我……那一天我失去了对生命的热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否则生命就失去了价值。[25]

1952年12月骚乱事件后，独立党和共产党都被法国当局取缔，数百名政治活动人士遭到流放。但素丹仍是摩洛哥民族主义诉求的关键聚焦点，因此法国人也决心逼迫他退位。通过一个由忠于法国、反对穆罕默德五世的摩洛哥显贵组成的小圈子，法国人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对素丹的国内政变。一群宗教学者和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领袖确信，穆罕默德五世的民族主义政治与他们的宗教学说相抵触，进而宣布效忠于一位名为本·阿拉法（Ben Arafa）的皇室成员。法国当局要求素丹退位，后者拒不服从。1953年8月20日，素丹被法国警察逮捕，并在枪口的威胁下被迫飞离摩洛哥。在随后的两年内，穆罕默德五世都被流放在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

穆罕默德五世的流放并未能缓和摩洛哥国内的局势。既然自我表达的政治权利遭到剥夺，民族主义者开始转入地下并诉诸暴力。他们尝试暗杀多名法国殖民官员、与法国人合作的本地显贵，甚至试图推翻新素丹本·阿拉法。作为回应，法国定居者建立了名为“法国存在”（Présence Française）的恐怖组织，旨在暗杀民族主义领袖、恫吓其支持者。法国警察则掀起了恐怖统治，逮捕可疑的民族主义者，对政治犯施以酷刑。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莱拉·艾布·宰德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宰哈拉加入了抵抗运动。她的首项任务是帮助丈夫所在的秘密组织的一名成员摆脱法国警察的追捕，由卡萨布兰卡逃亡到丹吉尔的国际区。使这项任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逃亡者乃是一位法国在越南战争的老兵，曾在奠边府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宰哈拉成功地将这位抵抗运动的战友安全转移至丹吉尔的国际区。

在首次任务成功后，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为宰哈拉指派了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她领导了针对卡萨布兰卡市中心一位通敌者店铺的纵火袭击。在警察和警犬的密切追踪下，她试图从拥挤的市场中逃命。宰哈拉逃避到一处庭院中，当时这家的妇女们正在做饭。“我是一名游击战士。”她告诉她们，而这些妇女没有问任何问题就向她提供了保护。此刻置身于摩洛哥妇女的保护之下，宰哈拉开始遥想政治风云是如何改变了她本人的生命以及妇女在她祖国内的地位。“如果我的祖母起死回生，看到我向店铺纵火、传送枪支、护送男人偷渡边境，她一定会气得第二次死去。”宰哈拉回想说。[26]

1954年是北非法兰西帝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反法抗议活动不断高涨，也迫使法国当局重新考虑其对这两个保护国的立场。这两个国家名义上受本地王朝的统治——在摩洛哥是阿拉维王朝的素丹，在突尼斯是侯赛因王朝的贝伊们。法国人相信通过与民族主义者达成和解、在友好政府的统治下承认两国独立，能够更好地维护法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利益。然而，法国的帝国政策却因两个事件而陷入了混乱——在奠边府战役（1954年3—5月）决定性的失败后失去印度支那，以及1954年11月2日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爆

发。这两个事件也敲响了法兰西帝国灭亡的丧钟。

法国人并未将阿尔及利亚视为一块殖民地。与被作为保护国统治的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同，阿尔及利亚领土已然被并入了法国，并和法国本土其他地区一样被划分为省。多达100万的法国公民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其利益受到法国议会中民选代表的密切保护。无论是对法国政府还是法国人民而言，阿尔及利亚都是法国的。因此，当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正式宣战时，法国人迅速并毫无保留地做出回应。他们派遣部队来“保卫”阿尔及利亚免遭民族主义的威胁；已然因越南的失败而满怀怨恨，这些部队决心不再做出任何让步。

由于在阿尔及利亚面临着一场恶战，为减少损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政府采取果断行动，以解决与突尼斯和摩洛哥之间的关系问题。法国总理亲自前往突尼斯，要求当政的贝伊穆罕默德·艾敏八世（Muhammad VIII al-Amin, 1943—1956年在位）任命一个新政府来商谈突尼斯独立事宜。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压倒民族主义者，这位贝伊试图将国内最受欢迎的民族主义政党——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领导的新宪政党排除在新政府之外。然而至1955年3月，贝伊迫于民众要求，不得不邀请布尔吉巴参与谈判。

富有个人魅力的布尔吉巴迅速在突尼斯谈判团队中取得领导地位，并于1955年4月确保达成了自治协议。1956年3月20日，双方签署议定书，法国正式承认突尼斯独立。作为确定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原则的一个步骤，1957年7月布尔吉巴宣布废除突尼斯君主制，后者由于与法国殖民当局的合作已然遭到削弱。突尼斯共和国选举布尔吉巴为其第一任总统，他担任这一职位将达30年之久。

在摩洛哥，法国试图通过允许穆罕默德五世由马达加斯加返回摩洛哥执政来平息摩国内局势。1955年11月16日，素丹降落在摩洛哥之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两天之后，穆罕默德五世借王位节（Fête du Trône）——摩洛哥的国庆节——之机，从位于拉巴特的皇宫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宰哈拉，莱拉·艾布·宰德自传体小说中的民族主义自由斗士回忆道：“用什么语言来描述那一天呢？整个卡萨布兰卡都沉浸在由舞台、扩音器连接起来的巨大的庆典活动中。歌舞表演与演说混合在一

起，过道两旁备好了茶水，茶香随风飘溢。”宰哈拉、她的家人和朋友登上了一辆由卡萨布兰卡开往拉巴特的火车，专门去聆听素丹的讲话。她仍记得当穆罕默德和他的两个儿子出现在阳台上时迎接他们的“难以置信的欢呼声”。“那个11月18日发表的就职演说我不知听了多少次！多么精彩的演说啊！我牢牢记住了演说的内容，时至今日还能背诵出来！”

宰哈拉凭记忆复述着素丹的发言：“在这个欢乐的日子，真主给予我们双重的祝福：在漫长而悲伤的离别后再次回到我们最挚爱的祖国的祝福，以及重新与我们如此想念的人民相聚的祝福。对于人民，我们始终忠诚无二，而人民对我们的忠诚也投桃报李。”素丹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摩洛哥正是因为国王与人民相互支持才取得独立。对宰哈拉而言，11月18日事件所揭示的最重要事实，莫过于法国通过流放来离间摩洛哥君民关系的企图失败了。“［素丹］对我们心灵产生的影响是何等美妙！流亡生涯给他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正是为了素丹，摩洛哥人民才加入抵抗运动，好像他已成为一种理想或一个原则。假使法国人没有流放他，他们在摩洛哥的存在将延续更长的时间。我对此确信不疑。”[27]

1956年3月2日，摩洛哥脱离法国实现独立。

摩洛哥与突尼斯取得独立之际，阿尔及利亚已然陷入一场全面战争。事态起初只不过是一个武器装备不足、组织薄弱的小团体（据1954年11月1日的估计，有900—3000名战士）发起的反叛，但后来却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起义。其间，手无寸铁的平民，既包括定居者，也包括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常常成为滥杀滥伤的致命暴力的目标。

1955年8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以其法语首字母缩写FLN（以下简称“民阵”）而闻名——袭击了定居者村庄菲利普维尔，杀害了123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报复，法国人采取了超乎寻常的残忍手段，杀害了数千名阿尔及利亚人（法国官方数据承认1273人死亡，民阵则宣称多达1.2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杀）。[28]

菲利普维尔大屠杀坚定了民阵的决心。法国针对阿尔及利亚公民的不对等的报复措施使得大量愤怒的志愿者加入民阵，反而强化了这一组

织的力量。面对着一支拥有一个工业化国家全部资源支持的法国占领军，这次屠杀也鲜明地暴露了民阵的战略弱点。

民阵在开罗的办公室是该运动开展国际行动的重要基地，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业公开给予全力支持。正是出于孤立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迫使埃及放弃支持民阵的考虑，法国才处处设置障碍，拒绝无条件地向纳赛尔治下的埃及出售任何武器装备。一如既往，纳赛尔并不愿接受这些条件。

*

至1955年，纳赛尔已经结交了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朋友。他得到不结盟运动多位领袖的尊重，包括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考虑到埃及对外部强权的深恶痛绝，不结盟运动是埃及所能采取的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与该运动的其他成员国相似，埃及政府希望保留与美国和苏联同时保持友好关系的自由，而不愿在冷战中选边站队。该组织也为亚非国家提供了一个推进去殖民化进程的平台。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该组织的成立大会上，纳赛尔就提出了一项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决议。令法国伤心的是，这项决议获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

看到他们年轻的总统被承认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位领袖，埃及人民欣喜万分。美国人却远没有这么高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结盟政治，他的政府相信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没有什么中间立场，即在最终意义上，一个国家与美国为敌为友只能二选其一。纳赛尔拒绝加入一个反苏地区同盟的决定令美国人怒火中烧，但美国政府中仍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说服纳赛尔回心转意。不久他们就会感到失望。

西方拒绝提供纳赛尔所需的武器，这使他最终投入了共产主义阵营。他就确保军队现代武器供应的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进行了讨论，后者表示愿代表埃及向苏联提出这一问题。1955年5月，苏联驻开罗大使请求纳赛尔接见，从而开启了两国间持续了一整个夏天的谈判。

即便已转向苏联人寻求军事援助，纳赛尔仍试图维持美国人对他的支持。这位埃及总统向美国人通报了其与苏联人会谈的情况，向美国驻

埃大使表示苏联人已明确表示愿意向他提供武器，但他仍然倾向于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在穆罕默德·海卡尔看来，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开始还认为纳赛尔在虚张声势。直到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纳赛尔即将与苏联人达成一项协议，杜勒斯才派遣使者竭力阻挠协议的达成。

1955年9月，纳赛尔宣布埃及将从苏联的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获取武器，从而将一个既成事实摆在美国人面前。[29]埃及获得了275辆现代的T-34坦克以及包含有米格-15、米格-17、伊尔-28在内的200架战机，这一武器交易急剧地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势力均衡。[30]

在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个行动之后，1956年5月，埃及政府与中国正式建交，进一步疏远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考虑到埃及已经严重削弱了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传播的努力，美国决心迫使埃及改变政策。

英国人、法国人和以色列人则野心更大，想一劳永逸地推翻埃及政府。他们将纳赛尔视为一支危险的新生力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拥护者，深信他可能动员这一力量损害他们在中东的关键利益。本-古里安担心纳赛尔可能召集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发起致命一击，英国首相艾登深信纳赛尔将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剥夺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法国人则认为纳赛尔正鼓动阿尔及利亚人加紧其反法战争。为了提升本国的利益，上述每一个国家都有充分的动机来寻求推翻纳赛尔政府。

整个1956年，这三个国家都在酝酿向埃及发动战争，即那场被称为“苏伊士运河危机”（在西方）或“三方侵略”（被阿拉伯人）的惨败。

通往苏伊士运河危机之路始于阿斯旺。土地改革计划之外，阿斯旺水坝仍是自由军官的国内发展议程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因为根据预期，水坝一方面将为整个国家提供工业化所需的能源，另一方面也会大大提高灌溉农业的种植面积。

然而，埃及政府无力独立资助水坝的建设。该项目是全球最大的民事工程项目之一，其耗资可谓天文数字——估计达10亿美元，其中4亿美元必须以外汇的形式支付。1955年末，埃及政府与世界银行商谈了一

个财务方案，由后者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和英国则承诺提供剩余的2亿美元。

英、美两国政府希望利用阿斯旺水坝计划，对纳赛尔治下埃及的政治施加一定的控制。根据海卡尔的说法，美国和英国从未考虑给予埃及所需要的全部款项，仅承诺提供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这不足以保证水坝的完工，但恰好足以在工程建设期间对埃及施加影响。海卡尔说，据称，杜勒斯曾于1957年1月向沙特国王沙特表示，“他决定帮助［埃及］建设水坝，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未来10年内，该计划将把埃及与美国绑定在一起，在此期间，纳赛尔或者已然体会到与苏联合作的危险性，或者已然倒台。”[31]

美国政府还试图将提供贷款与埃及政府承诺不再从苏联购买更多武器一事相关联。美国政府虚伪地论证说，军费开支将削弱埃及支付部分水坝建设费用的能力。纳赛尔无意与苏联决裂，后者是愿意向其提供军事援助而又不预设前提条件的唯一大国。

纳赛尔已经认识到，冷战的规则排除了与苏联和美国同时保持合作的可能性。至1956年4月，他已怀疑美国将撤销对阿斯旺水坝的支持。3个月后的7月19日，艾森豪威尔果然宣布，他将撤销美国对该项目的全部资金支持。

听到美国的声明时，纳赛尔刚结束在南斯拉夫的一次会议，正在返回开罗的途中。他被彻底激怒了。艾森豪威尔径直宣布了撤销对水坝的资金支持，连向埃及提出事先警告的基本礼节都没有，更毋庸说给出解释了。纳赛尔对海卡尔说：“这不是一次撤资，这是针对政权发起的一次进攻，是号召埃及人推翻这个政权的一次邀请。”[32]

纳赛尔认为他必须快速地做出果断回应。在24小时之内，他制订了一项计划，但只有6天时间来完成他迄今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壮举。

为纪念革命胜利4周年，根据日程安排，纳赛尔将于7月26日在亚历山大发表一次重要演讲。他的主题将是阿斯旺水坝。如果西方列强拒绝帮助埃及人，他计划争辩道，埃及将自己为水坝买单，方式便是将苏伊

士运河国有化，并调用运河收入来支付水坝建设的开支。

法理上来说，只要能向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东们提供公正的补偿，埃及政府就有充分的理由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然而，考虑到该公司在法国是一家上市公司，且英国政府是其最大股东，纳赛尔深知运河的国有化将引发一场国际危机。特别是英国决心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因而会将国有化方案解读为埃及政府的又一个敌对措施。纳赛尔估计出现外部干预的概率高达80%。

假设英、法选择发动战争，纳赛尔估算，两国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集结干预所需要的军事力量。两个月的时间将给予他一个关键的缓冲期，来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整个计划听起来很像一场赌博，但纳赛尔相信，为了维护埃及独立并免遭外部势力控制，他必须孤注一掷。

纳赛尔责成一位年轻的工程师马哈穆德·优努斯上校（Colonel Mahmoud Younes）来完成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办公区的实际接管。7月26日当晚，优努斯将通过广播收听纳赛尔的演讲。如果听到纳赛尔提到行动的代码“费迪南·德·莱塞普”——苏伊士运河的设计者——之时，就立即采取行动。如果纳赛尔在演讲期间没有提到这个名字，优努斯就什么也不要做，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纳赛尔一如既往，参照提纲要点即兴发表演说，开始追溯阿斯旺水坝危机的背景。他回顾了埃及遭受帝国主义势力剥削的历史，援引苏伊士运河作为例子，还多次提到了费迪南·德·莱塞普的名字。海卡尔回忆道：“总统先生是如此担心［马哈穆德·优努斯］会听漏了，以至于他不断地重复费迪南的名字。德·莱塞普这般，德·莱塞普又那般，直到他重复了大概有10遍之久。人们也开始感到奇怪总统为何对德·莱塞普这么小题大做，因为埃及人对后者并没有什么好感。”

其实纳赛尔并没有必要担忧，因为专注的优努斯上校在听到这个名字被提起的第一时间，就关闭了收音机并开始行动。他之后曾对纳赛尔坦白说：“我很抱歉，我错过了您演讲的剩余部分。”

马哈穆德·优努斯的团队确保了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在开罗、赛德港和

苏伊士的分支办公室的控制，他本人则亲自领导了对位于伊斯梅利亚的公司总部的接管。一位陪同优努斯参与行动的同伴后来回忆说：“我们大约在晚上7点时进入伊斯梅利亚的办公区，当时办公区内除了夜班工人外并没有职员。我们叫来了高层职员——当然是外国人，因为公司决策层中并没有埃及人……他们都感到意外。”[33]一支仅仅由30位军官和民事工程师组成的队伍就完成了对公司全部3个办公区的占领。

当纳赛尔的演讲达到高潮时，苏伊士运河已然牢牢地处于埃及人的控制之下。纳赛尔对狂喜的听众说：“我们不会允许苏伊士运河成为国中之国，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是一家埃及的公司。”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纳赛尔又承诺说运河3500万英镑的收入自此以后将用于阿斯旺水坝工程的建设。“人们因激动而陷入了疯狂。”海卡尔回忆说。[34]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本-古里安的第一反应是这一事件为推翻纳赛尔提供了机会。他主动向美国提出倡议，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不置可否。本-古里安在其日记中透露道：“西方大国都感到愤怒……但恐怕他们不会做出任何回应。法国不敢单独行事，［英国首相］艾登并不是一个实干家，华盛顿将避免做出任何回应。”[35]然而，本-古里安低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纳赛尔上述举措的愤怒程度。

法国人首先做出回应。国有化事件后第二天，法国国防部部长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Maurice Bourgès-Maunoury）就致电时任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的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询问以色列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占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佩雷斯做了一个粗略的猜测：两周。随后法国部长单刀直入地问道：以色列是否愿意加入一场针对埃及的三方攻击，其中以色列的工作是夺取西奈，英、法联军将负责占领苏伊士运河区？佩雷斯本人并无权承诺以色列加入某一战争联盟，但他仍给予了法国人一个积极的答复，从而开启了将最终导致第二次阿以战争的三方共谋。

随后，法国人又向安东尼·艾登爵士提出了这一方案。根据该方案，以色列人在西奈向埃及人发动袭击，为一场旨在运河区“恢复秩序”的英、法联合军事干预提供借口。整个疯狂的方案都建立在纳赛尔政府无力挺过这样一场攻击、以色列将确保对埃以边境的控制、英法将通过这

样荒谬的途径重新确立对运河的控制等一系列预设之上，因而最集中地揭示了（三方）集体性的判断失误。

为达成这个看起来不太真实的三方联盟，三国在巴黎市郊的色佛尔举行了一次会议，参会代表包括法国外交部部长克里斯蒂安·皮诺（Christian Pineau）、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文·劳埃德（Selwyn Lloyd）和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这是一场令人不安的会谈，以色列人与英国人之间严重缺乏信任也反映出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后遗留的仇怨。然而，对纳赛尔的共同仇恨以及彻底毁灭他的决心，却将这些合谋者团结在一起。

经过48小时的激烈谈判，三方终于在1956年10月24日达成一项秘密协议。首先，以色列将入侵埃及并挑起阿以冲突，从而使经由苏伊士运河的海路交通面临瘫痪。英、法会坚决要求停火，这一要求显然不会得到回应。这时英法联盟就会出动部队进行军事干预，占领运河区。以色列外交人员对其英、法同事是如此不信任，以至于坚决要求各方签署一项书面协议，唯恐欧洲人在以色列入侵后打退堂鼓。

英国和法国都有足够的理由重新考虑它们与以色列之间的共谋。由于1948年后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拒绝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要求，法国已然招致了广泛敌视。帝国过往的历史继续困扰着英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昔日帝国强权与以色列并肩作战的选择，必然会毒害欧洲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且，想让这样一个阴谋长期维持保密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计划却变为了现实。10月29日，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在西奈展开战斗并迅速向苏伊士运河进军。次日，英、法两国向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发布了事先议定的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并将军队撤出距离苏伊士运河两岸10英里的区域。由于对发布声明时间的误判，法国人和英国人暴露了其插手危机的内幕——当英、法要求所有参战人员都撤出运河区之时，以色列距离运河还有数英里之遥。正如纳赛尔的密友穆罕默德·海卡尔推理的那样：“当以色列人只有一个装备有轻型武器的伞兵营进入西奈且距离运河尚有40英里之时，有什么理由要求双方都撤离至距运河10英里以外的区

域呢？”英、法能够预测以色列人到达运河区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也参与了袭击的策划。

随着英国与以色列合谋参与袭击的证据不断浮现——英国侦察机被发现出没在西奈上空，埃及人被迫接受了难以置信的事实。海卡尔回忆说：“纳赛尔就是无法让自己相信，像艾登这么一个自诩对中东十分了解的人，会通过与以色列一起向一个阿拉伯国家宣战，来危及英国在阿拉伯世界所有盟友的安全，以及英国自身在这一地区的地位。”[36]

眼见着苏伊士运河危机迅速展开，美国同样感到难以置信。当然，美国人并不反对类似的策略：中央情报局本身已经策划了一场推翻叙利亚政府的政变，恰恰在以色列人发动进攻的同一天执行。[37]叙利亚已接受了苏联的经济援助，而美国希望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在1956年，这样一次行动与美国的世界观完全一致。

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感到苏伊士冲突难以理解，是因为在冷战的高峰期，英、法却还像帝国强权一样行事。对美国人来说，遏制苏联扩张是唯一重要的地缘战略博弈，就像在世界其他关键地区一样，在中东也是如此。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北约盟友英国和法国，会为了一条通向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业已解体的帝国、曾经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而发动战争。艾森豪威尔同样为他的欧洲盟友在未咨询美国的情况下就发动这样一场重大军事行动而感到愤怒。假如受到咨询，美国人当然会反对发动苏伊士战争。英、法两国政府非常清楚美国人会如何回应，因而选择让华盛顿蒙在鼓里。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当时，虽然美国在叙利亚的秘密行动中断了，但匈牙利正在发生的事件让这一挫败显得无足轻重。10月23日，即以色列对埃及发动进攻前6天，匈牙利爆发革命。学生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布达佩斯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并演化为全国性的抗议。几天内，受苏联支持的旧政府倒台，改革派的伊姆雷·纳吉（Imre Nagy）领导下的一个新内阁上台，并迅速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从而实际上结束了与苏联及其盟友的军事合作。这一事件成为分隔苏联控制下东欧与西方之间铁幕的第一个裂缝，也是冷战开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

正当美国忙于在联合国框架内保护匈牙利的运动免遭苏联报复之际，美国愤怒地发现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对埃及展开军事行动。英、法干预为苏联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移视线的绝佳机遇。在10月31日对埃及空军基地实行闪电袭击之后，11月初英、法开始向运河区空降伞兵部队。苏联外交官在抓住了维护纳赛尔的埃及反抗西方侵略的道德制高点的同时，迅速在匈牙利部署部队以恢复其在东欧地区的权威。在西方最需要呈现出一个坚实的阵线来遏制苏联扩张之时，北约内部的团结却遭到削弱。艾森豪威尔将失去匈牙利的责任完全推给了英国和法国。

在埃及，面对3个装备占优的敌人，纳赛尔发现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取胜无望的战斗。在战斗开始的头几天里，他就命令部队撤出加沙和西奈，以便集中力量保卫运河区；这两个地区很快便被以色列人占领。当时，纳瓦勒·萨阿达维正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一个乡村诊所里行医。她还清楚地记得纳赛尔的讲话："在家里和街道上成千上万的收音机里回响：'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侵略者离开为止。我们绝不会投降。'"纳赛尔在面对优势兵力突如其来的袭击时表现出的不屈，再一次感染了埃及人民，人们成群结队，志愿为国效力。萨阿达维回忆说："我脱下了白大褂，穿上了军装。"

像很多埃及人一样，萨阿达维准备前往交战区去协助战备工作，然而在随后的混乱时期她并没有得到征召。因此，她只是从位于三角洲的村庄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当英、法伞兵部队于11月6日包围赛德港时，她和所有埃及人一样被吓坏了。"成千的火箭和炸弹从飞机上扔下，军舰从海面上炮击着这座城市，坦克在街道上横冲直撞，狙击手被空降到屋顶之上。"萨阿达维写道。埃及平民与他们的军队一道发起了平民的抵抗。"游击战士——大多数还非常年轻——的队伍组建成立，开始用步枪、手榴弹、燃烧弹发起战斗。"[38]共计1100名平民在运河区的战斗中死亡。

为了迫使英、法停战并撤出其部队，美国向两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然而，美国在安理会的努力却遭到英、法的阻挠，两国通过行使否决权阻碍任何限制它们苏伊士行动的决议通过。随着苏联及其盟友威胁要站在埃及一方介入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对英、法采取公然的威胁，以迫使二者接受立即停火的要求。两国受到被开除出北约的威胁，

且美国财政部警告说，将出售部分美国持有的英镑债券，迫使英国货币贬值，这一做法显然将对英国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上述威胁产生了效力。11月7日，英国和法国接受了一项联合国停火协议。至1956年12月22日，所有的英、法部队都已撤出埃及。最后的以色列部队则在1957年3月撤离埃及，并被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取代。

对埃及而言，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军事失败转变为政治胜利的经典案例。与他勇敢的言辞和反抗相比，纳赛尔并未取得任何可与之匹配的军事成就。生存下来本身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胜利，埃及人以及纳赛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广大追随者大肆庆祝，就好像纳赛尔确实击败了埃及的敌人们一样。纳赛尔知道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不再会遭遇任何挑战，埃及已经对其全部领土和资源取得了完全的主权。

对以色列人来说，苏伊士运河战争代表一次出色的军事胜利和一个政治挫败。尽管本-古里安在困窘中被迫撤出了以色列国防军通过武力占领的土地，但他再一次向阿拉伯邻国展示了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然而，以色列参与三方侵略这一事实再次强化了一个在阿拉伯世界广为传播的观点，即以色列是帝国主义政策在中东地区的延伸。

以色列与帝国主义间的联系只能使阿拉伯国家更难接受这个犹太国家，更不用说承认其合法性或与其缔结和平协议。相应地，击败以色列不仅关乎解放巴勒斯坦，更关乎中东地区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在20世纪50年代，这两个观念成为阻碍任何和平进程的强大意识形态障碍。

法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损失惨重，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受到打击，在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影响力遭到削弱。在20世纪50年代剩余的岁月中，法国放弃了阿拉伯世界，开始全力支持以色列。事实上，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伊始，法国就开始给以色列人提供武器，并帮助后者建立了核项目。1957年，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座两倍于其原先承诺容量的反应堆。

英国原本希望在阿拉伯世界维持重要的影响力，但无疑却成为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最大的输家。发动战争的决定在英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导致英国政府和外交部多名高层官员辞职。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安东尼·艾登遭受重大打击，并于1957年1月辞去了首相职务。苏伊士运河

危机对英国在中东地区地位的影响更是毁灭性的，正如海卡尔所判断的："苏伊士之后，阿拉伯领导人都不可能成为英国的朋友、纳赛尔的敌人。苏伊士让英国人丢掉了阿拉伯世界。"[39]

*

纳赛尔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把他推上了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他的反帝资历以及对阿拉伯团结的呼吁，使他成为整个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领袖。纳赛尔是通过电波向阿拉伯民众传达信息的，20世纪50年代长距离无线电广播技术与廉价的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正好相得益彰。在一个成人文盲率较高的时代，纳赛尔通过收音机可接触到相比报纸而言更为广泛的听众群体。

当时，阿拉伯世界听众最广泛、最有影响的电台是总部位于开罗的"阿拉伯人之声"。1953年建立之时，该电台主要是为了推进埃及革命的思想，后来则结合了新闻、政治和娱乐内容。通过一种共同的语言，"阿拉伯人之声"将跨越国境的阿拉伯语母语者连接在一起，推进了泛阿拉伯行动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听众们深受感染，一位同时代的人回忆道："过去人民的耳朵就像粘在了收音机上，特别是当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歌曲在广播中响起，号召阿拉伯人抬起头来保卫他们的尊严和土地免遭侵犯之时。"[40]

通过收音机，纳赛尔征服了阿拉伯世界。借助"阿拉伯人之声"电台，他得以向其他阿拉伯统治者施压，以迫使后者遵从他的规则，同时绕过阿拉伯政府首脑们直接向其公民们讲话。在一份关于1957年黎巴嫩国内局势的政治报告中，黎情报机构主管埃米尔法里德·谢哈卜（Amir Farid Chehab）写道："亲纳赛尔的政治宣传最能占据穆斯林民众的心灵，他们将他视为阿拉伯人的唯一领袖，除了他以外不在乎任何领导人，而这一切都受惠于埃及和叙利亚广播电台的影响以及纳赛尔在埃及取得的成就。"[41]

相比这位埃及总统本人的意图，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开始更多地从字面意义上接受纳赛尔关于阿拉伯统一的口号，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国家比叙利亚更加明显。

1949年侯斯尼·宰伊姆（Husni　al-Zaim）推翻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以来，叙利亚政治就陷入长期的脆弱局面。自1949年古瓦特里下台直至1955年他再次掌权，叙利亚经历了5次领导人更迭。至1957年夏末，这个国家已在政治全面解体的边缘。在一个革命动荡的年代，被夹在苏联和美国（1956年美国正策划推翻古瓦特里政府）以及阿拉伯内部争斗之间，这个国家内部也因深刻的政治分歧而发生撕裂。[42]

20世纪50年代末期，叙利亚影响力最大的两个政党是共产党和阿拉伯复兴党——更多以复兴党（Ba‘th，字面义为“复兴”）而闻名。作为一个世俗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复兴党于20世纪40年代初由米歇尔·阿弗莱克和萨拉丁·比塔尔建立，其口号是“同一个阿拉伯民族，肩负同一个永恒使命”。复兴党避而不谈单一国家内范围较小的民族国家式的民族主义，而是支持一种团结了所有阿拉伯民众的大阿拉伯民族主义。复兴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认为，阿拉伯人只有通过完全的阿拉伯统一（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成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从1919年凡尔赛方案所强加的帝国边界中解放出来），才能摆脱外部统治，从而实现完全独立，并在国内实现社会公正。40年代末期，该党的分支在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伊拉克等地迅速发展起来。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复兴主义将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50年代该党在叙利亚力量仍很薄弱。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复兴党缺乏民众支持基础。1955年叙利亚议会选举中，该党仅赢得了叙议会不足15%的席位。因此，复兴党非常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其成员在埃及的纳赛尔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持纳赛尔，一方面是出于信念上的认同——后者的反帝、泛阿拉伯宣传与他们自身的话语是如此地紧密协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纳赛尔在叙利亚的巨大影响力来助力他们自身的事业。

叙利亚共产党并不那么需要纳赛尔，因为其地位随苏联在叙利亚影响力的扩大而提升。叙利亚共产党人也因纳赛尔对埃及共产党的镇压而对后者心怀警觉。但他们同样试图受益于纳赛尔在叙利亚的广泛吸引力。

至1957年，复兴党和共产党都向纳赛尔提出叙、埃合并的提议，两

个相互竞争的政党都不惜开出更高的价码来争夺纳赛尔的支持：复兴党提出一种联邦式的合并方案，共产党则加大赌注，提议两国完全合并为一个单一国家——因为后者确信，纳赛尔将拒绝这一请求。这些提议某些程度上都具有游戏的性质，因为无论复兴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权力达成与埃及的合并。

然而，当叙利亚军队卷入合并议题后，原来的游戏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军队此前已发动了三次推翻叙利亚政府的政变，其中很多军官都是公开的复兴党人。他们被埃及军人领导下的纳赛尔政府所吸引，相信叙、埃合并将使他们成为叙利亚政治中的主导力量。1958年1月12日，在未事先告知本国政府的情况下，叙利亚总参谋长和其他13位高层军官飞往开罗与纳赛尔商讨合并事宜。在总参谋长一行前往开罗后，一位叙利亚高层军官才拜访了包括财政部部长哈立德·阿兹姆在内的内阁部长们，向他们通报了军队的行动。阿兹姆问这位军官："如果能在前往开罗之前告知政府，并与政府讨论你们的决定，不是更好吗？"

"已经发生的就无法更改了。"军官这样回答，随后便告辞离去。

作为一名出身显贵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阿兹姆曾为叙利亚摆脱法国委任统治实现独立而斗争，也经历了1945年法国人对大马士革的疯狂轰炸。他深信军队将把叙利亚带入灾难之中。他在日记中反思："如果阿卜杜·纳赛尔接受了这个提议，叙利亚将会完全消失；如果他拒绝了，军队就会占领国家机关，推翻政府和议会。"[43]

叙利亚政府决定派遣外交部部长萨拉丁·比塔尔——复兴党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前往开罗，以试探纳赛尔的想法并向内阁汇报情况。到了开罗之后，比塔尔却被卷入片刻的兴奋之中，以自封的谈判者取代了原本的观察员身份。作为叙利亚政府的官方代表，他与纳赛尔直接进行了讨论。

看到源源不断的叙利亚政客和军人飞来开罗，急于将自己的国家掷于他的脚下，纳赛尔也感到茫然不解。尽管一直提倡阿拉伯统一，但纳赛尔本人将这个词理解为阿拉伯团结，即在宗旨和目标上的统一。他从未奢望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实现正式的合并，他也承认埃及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早在革命之前，多数埃及人不

会将自身界定为阿拉伯人，而是用这一术语来指代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或者沙漠贝都因人。考虑到埃及和叙利亚并无共享的边界，而是被以色列竖起的铜墙铁壁所隔离，这一提案更是显得不太可能实现。

然而，纳赛尔也看到了与叙利亚合并将如何提升他本人的利益。作为两个主要阿拉伯国家合并后的领导人，他可以确保自身作为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领导人的地位。合并将受到埃及和叙利亚之外阿拉伯民众的巨大支持，从而强化他们对纳赛尔而非其本国领导人的忠诚。合并同样有助于向大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显示中东地区新的政治秩序正在由埃及塑造。战胜了帝国主义之后，纳赛尔现在正在设法绕开冷战。

纳赛尔接见了叙利亚来客并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完全合并，叙利亚受开罗统治，采用与埃及完全相同的统治机构；叙利亚军队将受埃及人的指挥，回归军营并完全退出政治；所有的政党都将被解散，代之以一个名为“民族联盟”（National Union）的单一国家政党，政党多元化将被等同于制造分裂的派系主义。

纳赛尔的条件对叙利亚来客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复兴党的代表们对解散政党的前景感到惊恐不已，但纳赛尔保证他们将主导民族联盟，而后者将被证明为他们塑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新国家将如此称呼——政治文化的工具。新国家的称呼有意被设计为开放式的，因为叙、埃合并将只是迈向更为广阔的阿拉伯统一——以及复兴党所渴望的阿拉伯复兴——的第一步。尽管纳赛尔设定的条件剥夺了复兴党和军队的政治权利，但这两个群体在结束开罗会谈时却仍都幻想通过与埃及的合并，对叙利亚施加主导性的影响。

经过10天的讨论，比塔尔和军官们从开罗返回叙利亚，就他们与纳赛尔达成的合并计划向叙利亚内阁做了简要介绍。哈立德·阿兹姆毫无保留地表示反对相关提议，但却发现他本人属于少数派。阿兹姆沮丧地看着叙利亚的民选领导们，仅仅出于在他看来的一阵阿拉伯民族主义冲动，就欢天喜地地将其国家来之不易的独立地位拱手送人。他嘲讽总统古瓦特里在其开场白中，用“‘阿拉伯性’‘阿拉伯人’‘荣耀’等词语来填充一次原本空洞无物的演说”。随后古瓦特里又邀请外交部部长发言。比塔尔

告诉他的同事们，他本人和纳赛尔已经同意将叙利亚和埃及完全合并为一个国家，并且提议在两国将这一议题诉诸全民公决——双方都很清楚合并在叙、埃两国都将得到公众的大力支持。

比塔尔讲完后，他的很多内阁同事都确认支持合并。“当他们都发言完毕后，”阿兹姆继续讲述道，“我提出休会，以便给在场与会者详细研究提案的机会。听到这一建议后，他们所有人看起来都很震惊。这次轮到我感到惊奇了。我无法相信，在提交给内阁这样一份几乎关涉叙利亚政治实体存亡的重要提议后，却不给予部长们充分的时间来研究相关事宜，并咨询其政党、议员和国内决策者的意见。”[44]他仅成功争取到24小时的休会时间。

阿兹姆准备了一份全面的答复，提出了一个基于两国联邦体制的妥协性合并计划。他的提案在叙利亚内阁内获得了足够的支持而被提交给开罗，然而纳赛尔并不接受任何妥协：要不就完全合并，要不就干脆作罢。这时叙利亚军队再次介入，备好了一架飞机准备护送内阁成员前往开罗签订协议。总参谋长为犹豫不定的政治家们澄清了这个问题，据说他是这样说的：“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麦宰［大马士革城外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另一条通往开罗。”[45]叙利亚政府选择了通往开罗之路，终于在1958年2月1日与埃及签订了合并协议。

这仅仅是一个革命年份的开端。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预示着一个阿拉伯统一的新时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激起了强烈的公众支持。纳赛尔的地位也达到新的高度，这一点也引发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元首的惊恐。

1958年时地位最不稳固的阿拉伯领导人也许要数年轻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了，到当年11月，他刚刚年满23岁。考虑到约旦与英国长期联系的历史，侯赛因一直是纳赛尔主义宣传机器一个特别的目标。“阿拉伯人之声”传播着对侯赛因毁灭性的批评声音，鼓动约旦人民推翻君主政体，加入现代的阿拉伯共和国的进步阵营。

为了回应上述外部压力，侯赛因国王尽其所能地与英国保持距离。他顶住了英国的压力，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1956年3月，他宣布

将一直负责其军队运转的英国军官免职，其中就包括有重要影响力的指挥官格拉布帕夏。1957年3月，他甚至就终止《英约协议》展开谈判，很可能在实际上终结英国对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影响。伴随上述措施的还有一系列与埃及和叙利亚和解的姿态，以及展示约旦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忠诚的努力。

侯赛因所做出的最勇敢的让步，是向纳赛尔主义力量开放他的政府。1956年11月，侯赛因举行了约旦历史上首次自由、公开的选举，从而使得左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议会中获得了明显多数。侯赛因甘冒风险，邀请最大政党的领袖苏莱曼·纳布勒希（Sulayman al-Nabulsi）组建了一个忠于王室的反对派政府。但这个实验只持续了不到6个月。

具有改革思想的纳布勒希政府在调和忠诚与反对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处境艰难。此外，相比国王而言，纳布勒希得到了来自约旦军队中的纳赛尔主义“自由军官”更多的忠诚和公开支持。侯赛因开始确信纳布勒希政府执政越久，他的王位就越危险，因而决定采取行动。1957年4月，侯赛因孤注一掷，以政府同情共产主义为由要求纳布勒希辞职。纳布勒希被解职后，侯赛因迅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重新确立他对国家和武装部队的控制。至4月中旬，侯赛因国王经过精心策划逮捕或流放了约旦最重要的自由军官，确保部队向他宣誓效忠。

1958年叙、埃合并后，约旦所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增大。[46]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高了他们的呼声，呼吁哈希姆政府下台，要求约旦通过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合并加入进步的阿拉伯阵营。但侯赛因本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理解更多是王朝式的，而非意识形态性的。为了缓解约旦脆弱的处境，侯赛因转向了其表兄弟费萨尔二世统治下的伊拉克。两周之内，他便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称为“阿拉伯联盟”的合并计划，并于1958年2月14日在安曼正式启动。

阿拉伯联盟是一个联邦式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保留了每一成员独立的国家地位，同时呼吁建立联合的军事指挥权和外交政策。这一新国家的首都每6个月将在安曼和巴格达之间轮换一次。这两个哈希姆王国由血缘纽带、经历过英国托管的共同历史联系在一起，甚至共享着一段边境线。

然而，阿拉伯联盟无法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相比。伊拉克和约旦的合并被视为针对纳赛尔主义威胁的一种防御性策略。考虑到伊拉克是《巴格达条约》的发起国，总理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被痛斥为当时最亲英的阿拉伯政治家，侯赛因将自身命运与伊拉克相绑定的做法，无疑使其王国面临着来自纳赛尔主义者更大的压力。

黎巴嫩是另一个在叙、埃合并后经历巨大压力的亲西方国家，1943年《民族宪章》中达成的教派分权格局开始松动。黎巴嫩穆斯林（这一类别中包括了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尤其感到愤愤不平。他们不赞成基督教马龙派总统卡米勒·夏蒙（Camille Chamoun）所奉行的亲西方政策，希望黎巴嫩更明确地向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策看齐。1958年，黎巴嫩穆斯林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基督徒。但自1932年以来，黎政府就再未批准过任何新的人口普查，这一事实也证实了穆斯林的疑虑，即基督徒拒绝承认新的人口现实。黎巴嫩穆斯林也开始质疑现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因为这一格局赋予他们的政治话语权太少了。在一个更加尊重人口比例的体系中，他们的人口规模将会赋予他们更大的话语权。他们深知，在真正的多数统治下，黎巴嫩所奉行的政策将与主导这一时代的纳赛尔主义政策相一致。

黎巴嫩穆斯林认为纳赛尔是他们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认为他是一位强大的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他将团结阿拉伯世界，结束黎巴嫩穆斯林在这个基督徒主导的国家中的从属地位。但总统夏蒙却认为纳赛尔对黎巴嫩的独立构成了直接威胁，从而为对抗外部颠覆开始寻求外国保障。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夏蒙深知他无法依靠法国或英国的支持，因而转向美国。1957年3月，夏蒙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这套信条于1957年1月首次提交给美国国会，后成为冷战在中东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扩张的一套新的政策倡议，该信条呼吁美国向中东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和军事支持，以帮助这些国家维护其民族独立。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主义授权“部署美国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地区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免遭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之下

任何国家的公然武装侵犯”。

考虑到捷克武器交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苏联与埃及关系的不断深化，在很多人看来，艾森豪威尔主义更像是一项旨在同等地遏制埃及和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政策。与《巴格达条约》一样，埃及再次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这项新政策，将之视为西方大国向阿拉伯世界强加其反苏立场却又无视阿拉伯人针对以色列诉求的又一次尝试。因此，在正式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之后，黎巴嫩总统夏蒙也就走上了一条与纳赛尔政府及其在黎巴嫩众多追随者对抗的道路。

1957年夏举行的黎巴嫩议会选举期间，各种事端开始集中爆发。在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1957年选举产生的议会将在1958年投票选举下一任黎巴嫩总统，因而利益关系重大。

选举前期，夏蒙的反对者成立了一个称为“民族阵线”的竞选集团，穆斯林、德鲁兹人和基督徒都包括在内。该阵线聚集了一批重要的政治家——的黎波里的逊尼派领袖拉希德·卡拉米（Rashid Karami），最强大的德鲁兹政治家卡迈勒·琼布拉特（Kamal Jumblatt），甚至还包括反对卡米勒·夏蒙统治的马龙派基督徒，如比什拉·扈里的宪法集团。民族阵线所代表的黎巴嫩公众的范围，远远广于身处困境的总统夏蒙的支持者。

黎巴嫩成为美国人和纳赛尔主义者争夺的战场，前者试图支持亲西方政权，后者则致力于联合阿拉伯力量反对外部干预。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美国政府担心埃及、叙利亚会支持民族阵线，削弱亲西方的夏蒙的地位。因此，美国人开始插手破坏选举活动。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巨额资金，以担负夏蒙集团内候选人选举攻势的开销。这一行动则由美国驻黎巴嫩大使本人负责，后者决心要赢得“一个99.9%亲美的议会”。身为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威尔伯·克瑞恩·埃夫兰（Wilbur Crane Eveland）曾在其与众不同的克莱斯勒·德·索托敞篷车里亲手将这些资金交付给了夏蒙，而他本人对这次行动也深表疑虑：“［黎巴嫩］总统和总理使用外国资金［贿选］时太过明目张胆，以至于两位被责成监督投票的亲政府部长在选举中途就宣布辞职。”[47]选举时的紧张局势在黎巴嫩北部引发大规模武斗，在投票期间造成多名平民死伤。

夏蒙最终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一胜利与其说是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支持，毋宁说是更大程度上证明了夏蒙政府的腐败。反对派媒体将选举结果视为夏蒙试图在议会中积聚力量以便修改黎巴嫩宪法，从而允许他本人实现总统连任的一个明证。

在议会中被排挤出去之后，部分反对派领袖开始诉诸武力，以防止夏蒙连任。1958年2—5月，爆炸和暗杀事件在首都贝鲁特和农村地区肆虐。叙、埃合并后，随着亲纳赛尔示威让位于暴力，社会秩序开始加速崩溃。

1958年5月8日，一位亲纳赛尔记者纳希卜·麦特尼遭暗杀身亡。反对派将他的死归咎于政府，民族阵线则要求夏蒙政府对这一暗杀事件负责，呼吁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以示抗议。5月10日，的黎波里首先出现武装冲突。5月12日，多支民兵武装在贝鲁特展开激战，黎巴嫩陷入内战。

黎巴嫩政府军总司令福阿德·谢哈卜（Fuad　Shihab）将军拒绝部署军队以支持声名扫地的夏蒙政府。随着局势的恶化，亲西方的夏蒙政府似乎有被纳赛尔主义者击败的危险，美国人开始准备介入黎巴嫩。

*

黎巴嫩混战的高潮时期，伊拉克记者优尼斯·白哈里（Yunis Bahri）向妻子提议，离开混乱的贝鲁特，前往相对平静的巴格达。白哈里出生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一直是对英国在中东地区帝国主义行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也是为希特勒德国所吸引的众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中的一员。二战期间，他以柏林电台阿拉伯频道播音员的身份而在阿拉伯世界闻名。“你们好，阿拉伯同胞们，这里是柏林”是他著名的电台呼号。二战结束后，他往返于贝鲁特与巴格达之间，为重要的阿拉伯报纸撰稿并担任广播播音员。如同宿命一般，1958年他接受了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的委托，播出了一系列批评纳赛尔的报道。战乱在黎巴嫩爆发后，白哈里在贝鲁特的住宅被民众抵抗力量接管，于是他告诉妻子说，为了逃避（贝鲁特的）轰炸和交火，他们应暂时返回巴格达。

“可夏天这个时候的巴格达热得像燃烧的地狱啊！”他的妻子回答

说。

“巴格达的热焰总好过贝鲁特的子弹。”他坚持说。[48]但很多情况他并不了解。

1958年7月13日，白哈里和他的妻子到达巴格达并受到热烈欢迎。当地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归来，他们在巴格达的第一晚都忙于为向他们表示敬意而举行的一系列应酬之中。第二天他们醒来，迎来的却是一场革命。

1956年以来，以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Abd al-Karim Qasim）准将和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Abd al-Salam ‘Arif）上校为首的一群军官就密谋策划推翻伊拉克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军人领导的共和国。受埃及的纳赛尔及其同僚的启发，他们也自称为“自由军官”。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激励，伊拉克自由军官谴责哈希姆王室和努里·赛义德政府过于亲英——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这是一项相当严重的指控。他们试图彻底清除英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旧秩序，创立一个伊拉克人民自己指定的新政府。他们相信只有通过一次革命性的暴力行动才能推翻现有的君主体制。

自由军官终于等到了机会。7月13日至14日的那个晚上，伊拉克政府将部分军队部署到约旦边界地区，以便增援其阿拉伯联盟的伙伴国家免遭叙利亚和埃及的威胁。从军队基地前往约旦边界的路线使得反叛军官有机会经过首都巴格达。密谋者决定当晚即调遣军队绕道前往巴格达市中心并夺取政权。

自由军官下达指令，命令那些忠诚可靠的士兵将车辆从高速公路调往首都，反叛士兵随即占领了巴格达的核心区域。一个分遣队赶往皇宫，去处决费萨尔二世以及当政的哈希姆家族的所有成员，其他人则直取高级政府官员的住宅。士兵们收到命令，可立即处决总理努里·赛义德。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带领一个分遣队去占领广播电台，以便公布革命的消息并确认自由军官对伊拉克的控制。

“这里是巴格达，”1958年7月14日凌晨时分，阿里夫在电波里拖长

了声音说道，“伊拉克共和国的广播服务。”对于正在收听的伊拉克民众而言，这是君主政体倒台的第一个信号。激动不安的阿里夫在广播间踱来踱去，焦急地等待着同谋者传来革命成功的消息。大约早上7点钟，一位身着染血的制服的军官冲进了房间，右手还拿着一把冲锋枪，他确认国王和王室已经被处决。阿里夫开始用最大的声音高喊：“真主至大！真主至大！”随后他坐在一张桌子前，写下了几行文字，之后走进电台直播间，自言自语地重复道：“真主至大，革命取得了胜利！”[49]

优尼斯·白哈里正是通过阿里夫的广播关注着关于革命的最初报道。白哈里回忆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无论是在首都之内还是首都之外，巴格达人蹲在自己家里，被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突发事件弄糊涂了。”随后，阿里夫号召民众走上街头支持革命，追剿革命的敌人。

尽管知道王室成员已经被杀，阿里夫仍然号召伊拉克人向王宫发动袭击，似乎他想让伊拉克人民也卷入弑君的罪行。此外，他还悬赏1万伊拉克第纳尔追捕努里·赛义德，后者在黎明时成功逃脱了袭击者的围捕，待到第二天被捕并被私刑处死时才发现，他化装成了一个女人。白哈里回忆道：“当巴格达人听到煽动他们去袭击王宫和努里·赛义德的官邸时，他们怀着杀戮和劫掠的欲望走出了家门。”机会来了，去洗劫传说中巴格达宫殿的惊人财富，去杀死任何挡路的人，城市贫民对此蠢蠢欲动。

白哈里走上街头，目睹了伊拉克革命。迎接他的残杀让他感到震惊：“沿着拉希德大街，血水汇成了一股急流。人们看到有人被拖在汽车尾部拖曳至死时都欢呼雀跃。我看到一群暴民在拿阿卜杜·伊拉以儆效尤。在满足了他们复仇的愿望后，他们拖着他的遗体，将之悬挂在国防部的大门之上。”群氓们拆毁了费萨尔一世以及1917年英国人首次占领巴格达时的指挥官莫德将军（General Maude）的雕像，并将英国驻巴格达使馆付诸一炬。

在集体性歇斯底里的氛围之中，任何人都可能被误认为旧政权的一分子并被私刑处死。“任何人只需要用手指一指，说‘那是［内阁部长］法迪勒·哲马利（Fadhil al-Jamali）’，群氓就会抓住这个人，绑住他的双腿，然后毫不犹豫地、残忍地将其拖曳至死，任凭这个人徒劳地嘶

喊，呼求着真主、众先知乃至所有天使和魔鬼的名字来辩解［自己被误解的身份］。”巴格达已然变得让人难以识别，“一片火光冲天、血流成河，受害者的尸首散落在大街小巷”。[50]

巴格达街头暴力横行的同时，阿里夫上校在一整天里继续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发布各种声明和命令。他下令逮捕前伊拉克内阁的所有成员，以及（伊-约）阿拉伯联盟的所有部长/大臣——无论伊拉克人还是约旦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低级别的官员也遭到指认和逮捕，从巴格达市长到警察局局长。到当天下午，他们开始传唤被怀疑同情王室的记者和播音员。优尼斯·白哈里过去曾协助过努里·赛义德，自然被列为前政府的一名同情者，在第二天也遭到逮捕。他到达国防部时，赛义德血肉模糊的尸体正好被装在一辆吉普车的后备厢里运到。

旧政权的成员像绵羊一样被集结在一起，随后被运往一座新的监狱。这座监狱位于巴格达市郊一个称为艾布·格莱布的地方，由一座旧医院改造而成。后来，艾布·格莱布监狱将作为萨达姆的酷刑室和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酷刑室而臭名昭著。白哈里在艾布·格莱布被囚禁了7个月，随后被无指控释放。1959年初，他和他的妻子回到贝鲁特，发现一个新政府已然建立，内战也接近尾声。

*

在黎巴嫩，反对派势力因伊拉克王室的倒台而欢欣鼓舞。他们相信哈希姆王室不过是英国人的傀儡，伊拉克自由军官则是纳赛尔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伊拉克亲西方政府的倒台而深感欣慰，在国内也加强了反对夏蒙政府的活动。正如夏蒙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反叛的街区，男男女女都走上街头，涌入了咖啡馆和公共场所，发狂式地载歌载舞，以伊拉克领导人的命运来威胁黎巴嫩的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在那些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独立的黎巴嫩的公民中间，一种极大的恐惧正在蔓延。”[51]

黎巴嫩国家的根基已然被内战所动摇，现在则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听到伊拉克暴力革命的消息之后仅两个小时，夏蒙就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黎巴嫩是唯一援引该信条的国家）。鉴于美国第六舰队就停驻在东地中海区域，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天就在贝鲁特登陆。

美国介入黎巴嫩是为了防止一个亲西方政府倒向纳赛尔主义势力。美国代表盟友黎巴嫩而展示的武力包括一支1.5万人的登陆部队、数十艘离岸海军舰艇，以及海军舰载飞机多达1.1万架次的飞行任务。这些军机经常在贝鲁特上空进行低空作业，恫吓交战中的黎巴嫩人。美军在贝鲁特仅停留了3个月（最后一支美国部队于10月25日撤离），未开一枪一炮就撤离了黎巴嫩。

短暂的美国占领时期，黎巴嫩恢复了政治稳定。1958年7月31日，黎巴嫩政府军总司令福阿德·谢哈卜将军当选为总统，从而平息了反对派对于夏蒙违宪延长其任期的忧虑。9月22日，夏蒙总统的任期按程序正常结束。10月，谢哈卜总统主持建立了一个囊括忠诚派与反对派成员的联合政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曾希望黎巴嫩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从而与埃及、叙利亚相绑定。但随着黎巴嫩新政府在“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的口号下呼吁民族和解，他们的这一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伊拉克革命使约旦完全陷入孤立，暴露在那些推翻了巴格达那远为强大的君主政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威胁之下。侯赛因国王的第一反应是派遣军队赴伊拉克镇压革命，恢复其家族在伊拉克的统治。但这只是一时的情感冲动而非理性的考量。即使他那战线过长、武器装备又不足的军队能够压倒更为强大的伊拉克军队，在伊拉克也找不到任何幸存的哈希姆人可以恢复王位［唯一幸存的哈希姆家族成员宰德亲王时任伊拉克驻英大使，当时与家人居住在伦敦］。

侯赛因很快就意识到其自身地位的岌岌可危——在失去了伊拉克支持的情况下，他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敌人们现在很容易就能推翻他。在召回自己部队——这些部队已然深入伊拉克境内150英里——的同时，他于7月16日向英、美发出军事援助的请求。与在黎巴嫩的情况相似，外国部队被视为防止外部干预的关键。对侯赛因而言，求助于前帝国强权显然风险巨大，毕竟后者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已然声名扫地，但孤军作战的风险更大。7月17日，英国伞兵部队和军机开始到达约旦，以遏制伊拉克革命的破坏性影响。

在冷战的高潮期，政治分析家将世界上的所有地区视为随时可能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因而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也都相信伊拉克革命将触发一场阿拉伯民族主义风暴。他们也都深信伊拉克政变是纳赛尔一手策划的，后者执意要将整个新月地带纳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版图。这一想法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美、英两国如此迅速地介入黎巴嫩和约旦来支持两国的亲西方政府。

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了埃及和伊拉克，一方面要试探纳赛尔对近期事件的立场，另一方面想弄清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准将究竟意欲何为。纳赛尔是否会将伊拉克与叙利亚、埃及合并，建立一个阿拉伯超级大国，以重新调整中东地区的势力平衡？抑或开罗和巴格达之间的传统竞争关系，将延续到共和国时期？

根据纳赛尔的亲信穆罕默德·海卡尔的说法，这位埃及总统从一开始就对伊拉克革命怀有某些疑虑。考虑到1958年时阿拉伯世界的极端不稳定，以及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的地区动荡对埃及而言只能是一个包袱。

得知巴格达发生政变时，纳赛尔正在南斯拉夫与铁托举行会谈。7月17日，他直接飞往莫斯科去会见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苏联人确信是纳赛尔精心策划了整个事件，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感到忧虑。赫鲁晓夫温和地责备纳赛尔说："坦率地讲，我们还没做好冲突的准备，我们还没有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好准备。"[52]

纳赛尔试图让苏联盟友相信，他没有插手巴格达的事件，并试图确保苏联保证（帮助埃及）抵御美国的报复。然而，赫鲁晓夫最多愿意提供的也只是联合保加利亚在土耳其边境进行军演，以期劝阻美国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部署土耳其部队。"但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不要指望更多的东西了。"赫鲁晓夫警告埃及总统说。纳赛尔则向赫鲁晓夫保证，他无意谋求将伊拉克并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关于是寻求与纳赛尔合并还是继续维持伊拉克的独立，伊拉克新政府自身也发生了分裂。伊拉克新的领导人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准将决心统治一个独立的国家，无意将国家拱手让给纳赛尔统治。他与伊拉克共产党密切合作，寻求与苏联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对于大力镇压埃及共产

党的开罗政权态度冷淡。卡西姆的副手阿里夫上校则尽力迎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伊拉克追随埃及、叙利亚而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卡西姆最终逮捕了阿里夫，将他的这位同谋送进了监狱，判处死刑但缓期执行（1963年阿里夫将发动政变，推翻并处决卡西姆）。

之后的5年中，卡西姆将领导伊拉克走上一条与埃及相互竞争而非团结一致的道路，伊拉克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在相互指责中不断恶化。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言，伊拉克未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令他们大失所望。在血腥的革命中，他们一度以为自己已经看到了将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这三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伟大中心联合起来的希望。

*

在埃及革命的推动下，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彻底的转型。20世纪50年代，埃及已跃居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纳赛尔则成为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

随着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的权力也达到顶峰。合并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冲击波，几乎推翻了邻近的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脆弱的政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则翘首期盼着约旦哈希姆王室以及黎巴嫩亲西方的基督徒政府的倒台，期待两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伊拉克革命推翻了巴格达的哈希姆王室，似乎预示着一个全新的阿拉伯秩序的到来——将埃及与新月地区联合起来，在一个团结、进步的阿拉伯超级大国中实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愿望。在一个短暂、兴奋的时刻，似乎阿拉伯世界将打破那种作为奥斯曼、殖民帝国和冷战时期标志的外部统治的循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伊拉克置身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外的决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缺少伊拉克甚至约旦或黎巴嫩并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可能带来的兴奋与动力的情况下，埃及和叙利亚被迫独立面对一项枯燥的工作，即让它们的混合国家运转起来。他们将不会取得成功。阿拉伯民族主义将发生偏转：在20世纪50年代到达成功的顶点后，纳赛尔将经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将20世纪60年代转变为挫败的10年。

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20世纪50年代，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和自由军官领导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连串看似不可能实现的胜利。“纳赛尔主义”已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表达方式。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相信，这位埃及总统胸怀一个宏大计划，来团结阿拉伯人民并领导他们进入一个独立、强盛的新时代。从叙利亚与埃及的合并中，他们看到自己的愿望已然实现。

至20世纪60年代，纳赛尔非凡的胜利进程却戛然而止。1961年，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宣告解体，埃及军队深陷也门内战的泥潭。1967年，纳赛尔率领其国家和阿拉伯盟友步入了一场与以色列的灾难性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剩余领土、埃及西奈半岛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占领，使得解放巴勒斯坦的长久许诺进一步遭遇挫败。1970年纳赛尔去世之际，阿拉伯世界在10年前的种种雄心壮志已然被消磨为一股幻灭与激愤的情绪。

20世纪60年代的经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一种激进化的影响。随着英、法帝国主义迅速成为陈年往事，阿拉伯人也发现自身被卷入冷战政治的漩涡。至60年代，阿拉伯国家已分裂为亲西方和亲苏联两个阵营。冷战对阿以冲突的影响最为显著，苏联和美国为冲突双方提供武器，使该冲突演化为一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看上去，阿拉伯人将继续经历分而治之的命运。

*

事实将证明，统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比纳赛尔预想的更具有挑战性。据传闻，两次遭到废黜的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曾告诫纳赛尔，他会发现叙利亚是“一个难以统治的国家”，并解释说：“50%的叙利亚人认为自己是民族领袖，25%的人认为自己是先知，10%的人幻想自己是真主。”[1]

叙利亚人在埃及统治下并不开心。叙利亚军官起初曾对叙、埃合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现在却痛恨埃及军官的颐指气使。当埃及土地改革计划被推行至叙利亚时，叙利亚的土地精英也被彻底激怒了。至1959年

1月，叙利亚大土地所有者已有超过100万英亩的耕地被没收，以备分配给叙利亚农民。随着政府扩大其在经济规划中的角色，并通过社会主义政令将部分公司的私人所有权移交给国家，叙利亚商人也发现自身地位受到削弱。普通叙利亚民众则因埃及官僚系统臭名昭著的文书手续而痛苦不堪。

埃及人将叙利亚政治精英排除在政府之外，以疏远他们。叙利亚社会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叙利亚政治家对于自身政党遭到解散且受制于埃及的单一国家政党深怀不满。纳赛尔任命自己的得力助手、陆军元帅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担任叙利亚地区政府的行政长官，将他在复兴党内的支持者安排到次要职位之上。为表示抗议，至1959年底，包括萨拉丁·比塔尔等埃、叙合并设计者在内的复兴党领导人已经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阁中辞职。1961年8月，纳赛尔决定完全抛开叙利亚地区政府，通过一个常驻开罗的扩大化的内阁来统治叙利亚。

1958年2月，叙利亚军队曾领导他们的国家与埃及合并，现在又是他们策划了一次政变来切断这一联系并夺回叙利亚。1961年9月28日清晨，几支叙利亚政府军分队在黎明前进入大马士革，逮捕了阿米尔元帅并控制了广播电台。叙利亚过渡政府——一个完全的文职内阁——决定驱逐阿米尔，并于9月30日命令叙境内所有埃及人员全部离境，包括约6000名士兵、5000名文职人员以及1万至2万名埃及外来劳工。

纳赛尔对叙利亚分离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他的第一反应是派遣埃及军队武力镇压叛变，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平静下来并召回军队，接受了叙利亚的分离，“以便不流阿拉伯人的血”。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纳赛尔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而备受煎熬，这是他阿拉伯统一的梦想在国际上的第一次具体体现，但在他有生之年再没有尝试追求这一梦想。”[2]

叙利亚政变后，纳赛尔最初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归咎于其反对者——约旦人、沙特人，特别是美国人。但叙利亚的分离也迫使纳赛尔对他自己的政策导向以及埃及革命的走向等尖锐问题进行思索。他从未意识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明显问题，即之前埃及是以一种准帝国的方式来统治骄傲的叙利亚人。相反，纳赛尔最终认为埃及、叙利亚合并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两国未能达到这样一个宏大的阿拉伯统一计划所必要的社会改革程度。作为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的回应，他将引入一套激进的改革方案，以便清除阿拉伯社会中的“反动”因素，为未来阿拉伯人民的一次“进步的”合并铺平道路。

1962年起，纳赛尔开始将埃及革命导向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项融合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雄心勃勃却又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埃及政府加快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业已启动的私有企业国有化的进程，目标是建立完全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1960年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已经出台了第一个苏联式的五年计划（1960—1965），为工农业经济产量的扩大设定了过于宏大的目标。在农村地区，随着新出台的法律将最高土地持有面积由200英亩降至100英亩，始于1952年的土地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被征用的土地被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埃及产业工人和农民在国家机构被给予了新的重要地位。

埃及新的政策导向被载入了1962年的《民族宪章》（National Charter）。这一文件旨在将伊斯兰、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政治工程。《民族宪章》不仅为埃及展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还为在整体上重塑阿拉伯社会设定了理想。官方的国家政党民族联盟被委以把控国家意识形态导向的重任，该党后来更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在转向阿拉伯社会主义之后，纳赛尔也放弃了颠覆冷战规则的立场，而是将自身命运与苏联相绑定，追随后者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了给未来的合并方案留有余地，纳赛尔在埃及沿用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名字。直到197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才寿终正寝，纳赛尔的继任者重新将埃及命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阿拉伯社会主义将在埃及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并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埃及的政治语言明显变得更加教条主义。阿联解体后，纳赛尔批评的首要对象是“反动派”，即那些将狭窄的国家私利置于阿拉伯民族利益之上的有产者。广而言之，那些受西方支持的国家如摩洛哥、约旦、沙特等保守君主国，以及突尼斯、黎巴嫩等自由主义共和国，都被划为“反动”国家（在西方被视为“温和”国家）。革命的阿拉伯国家都与莫

斯科结盟，追随后者的社会经济模式。这些国家在阿拉伯世界被称为“进步”国家（在西方则被归为“激进”阿拉伯国家）。起初，“进步”国家的名单十分有限——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但随着阿尔及利亚、也门、利比亚革命的胜利，这一阵营也将有所扩大。

埃及在这一轮新的地区分裂中相当孤立，因为它与新兴的“进步”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伊拉克之间关系恶劣。1962年，埃及才获得了一位重要盟友：在经历了地区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反殖民战争之后，阿尔及利亚终于脱离法国实现独立。

*

从1954年11月1日首次起义的爆发，到1962年9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持续了近8年。冲突波及了阿尔及利亚的所有地区，从城市到农村无一幸免。战争结束时，超过100万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失去了生命。

当阿尔及利亚人发起争取独立的斗争时，他们完全有理由预料会有大量人员伤亡。1945年，法国人对东部贸易城镇塞蒂夫的温和民族主义者采取的镇压措施引发骚乱（民族主义者希望在庆祝“欧洲胜利日”的游行中，将阿尔及利亚旗帜与法国国旗并排举在一起），造成40名阿尔及利亚人和欧洲人死亡。1945年5月期间，法国人对塞蒂夫示威者的过激反应，在阿尔及利亚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法国人则部署了军舰、飞机和约1万名士兵来镇压起义。冲突中约100名欧洲男性、女性和儿童被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杀害，但死于法国报复性措施的阿尔及利亚人则远远高于这一数字——法国政府承认约1500名阿尔及利亚人死亡，军方将数字提升至6000—8000人，阿尔及利亚人则宣称死亡人数高达4.5万人。法国人试图将塞蒂夫事件作为对未来民族主义活动的一个警告。但可以预见的是，法国人致命的过激反应起到了反作用，反而激励大量阿尔及利亚人接受了民族主义事业。当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再次发动反法起义时，对塞蒂夫事件的记忆仍像幽灵般困扰着他们。

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触目惊心的伤亡情况，反映出暴力报复的可怕逻辑。民族解放阵线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深信，他们必须对法国人施加恐怖行为，才能迫使殖民势力撤离他们的国家，而这一

策略必然会引发后者可怕的报复。法国人方面则并不打算撤离这块历史最悠久、幅员最辽阔的北非属地，他们坚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并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相信民族主义者是一支可以被击败的边缘性力量，那些安于现状的阿尔及利亚人中沉默的大多数则将继续法国统治下的生活。结果是，这场充满了难以言说之恐怖的野蛮战争同时撼动了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根基。

针对平民的暴行始于1955年8月“民阵”对菲利普维尔法国定居者的袭击，行动中阿尔及利亚战士共杀害了123名定居者（包括儿童）。经过了塞蒂夫的经历之后，“民阵”很清楚法国人为了复仇将发动大规模报复行动，而这些行动将在广大阿尔及利亚民众中激起对法国人的仇恨。他们的预想非常准确：为报复菲利普维尔大屠杀，法国人据称杀害了超过1200名阿尔及利亚平民；“民阵”则宣称法国人杀害了1.2万人。结果，上千名阿尔及利亚人志愿加入“民阵”。就这样至1955年底，“民阵”发起于1954年的一场小规模起义已演化为全面战争。

随着数千名民众志愿加入民族解放斗争，“民阵”通过说服与恫吓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地巩固了其对阿尔及利亚政治的控制。法国军方的挑衅性策略，促使多个阿尔及利亚政党和运动与“民阵”联合一致，法尔哈特·阿巴斯等早期民族主义者以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都在组织层面与“民阵”完成了合流。对于国内反对派，“民阵”则表现得冷酷无情。据估计，在独立战争的前3年内，“民阵”在其行动中杀害的阿尔及利亚人比法国人多6倍。至1956年7月，“民阵”已确保了其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并将这场斗争同时定位为一场独立战争和一场社会革命。

“民阵”的领导层包括6位在5个起义省份即“战区”（*wilayas*）中组织抵抗运动的国内指挥官，以及3位常驻开罗的外部领导者。1954年民族主义起义爆发以来，法国人利用其广阔的情报网络全力搜捕“民阵”的国内领导层。在行动开始的最初6个月中，法国人成功击毙了第二战区的指挥官，逮捕了第一和第四战区的领导人。在国内领导集团陷入瘫痪的情况下，抵抗运动的主导权转入外部领导集团手中。

在“民阵”的3位外部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霍辛·艾耶特·艾哈迈德（Hocine Ait Ahmed）以及穆罕默德·黑德尔（Mohamed Khider）之中，本·贝拉声望最高（他后来成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从各种意义上讲，1918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西部一个小村庄的本·贝拉，是法属阿尔及利亚之子。他的母语是法语，1936年曾作为志愿兵在法军中服役，30年代末期甚至曾在一支法国足球队中效力，受到1945年法国对塞蒂夫起义镇压的刺激才转向民族主义政治。1951年本·贝拉曾被法国当局逮捕，但成功地从阿尔及利亚的监狱中逃脱，后逃亡至突尼斯和开罗，并在开罗建立了一个“民阵”办事处。战争爆发后，本·贝拉奔走于阿拉伯各国首都之间，为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而独立的诉求筹集资金和政治支持。

1956年10月，法国人成功地将“民阵”领导层一网打尽。根据可靠的情报，法国空军拦截了一架载有本·贝拉、艾耶特·艾哈迈德、黑德尔以及“民阵”的国内领导集团总协调员穆罕默德·布迪亚夫（Mohamed Boudiaf）的摩洛哥DC-3飞机，并迫使该机降落于阿尔及利亚西部城市奥兰。上述“民阵”领导人全部被逮捕，随后被转移至法国的监狱中，并在那里度过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剩余岁月。

法国民众欢庆“民阵”领导人的被捕，仿佛这一事件标志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阿尔及利亚柏柏尔裔著名作家穆鲁德·费劳恩愤怒地表示，“民阵”领导人的被捕似乎不会有助于恢复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和平。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将［‘民阵’领导人的］被捕描述为一个伟大的胜利，乃至最终胜利的序曲。是什么的最终胜利？反叛的扑灭？叛乱的平息？还是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友谊、信心、和平的新生？”[3]透过字里行间愤怒的反讽语气，费劳恩指出无论法国人希望什么，本·贝拉及其同事的被捕只会预兆着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暴力。

本·贝拉被捕之时，暴力已然从农村传播至城市地区。1956年9月一个周日的晚上，在阿尔及尔欧洲区被引爆的3枚炸弹彻底打碎了首都相对的平静，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一场被称为阿尔及尔战役的血腥战斗的开端。“民阵”将战事推进到阿尔及尔，其精心策划的目标就是要煽动法国过度反应，从而在国内强化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同时在国外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孤立法国。自1956年秋至1957年冬，“民阵”组织了一系

列致命的恐怖袭击。作为报复，法国人则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并滥施酷刑，以便暴露“民阵”在阿尔及尔的网络。阿尔及尔战役的确吸引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法国人也确实遭遇了谴责的声音，但阿尔及利亚人为这些“成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穆鲁德·费劳恩惊恐地关注着阿尔及尔发生的暴力行为，谴责法国和“民阵”双方杀害无辜者的行为。他在1956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城里的袭击越来越多，既愚蠢又残暴。无辜者被撕成了碎片。但是哪些无辜者呢？谁又是无辜者呢？是那数十名在酒吧里喝酒的平和的欧洲人吗？还是在一辆血肉模糊的巴士边横尸街头的数十名阿拉伯人？”他以反讽的苦涩笔调反思道：“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绝望的呼喊，剧痛的叫号，极度的痛苦，如此而已，这就是和平。”[4]

“民阵”在阿尔及尔战役中动员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女性在战役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她们搬运炸弹，走私枪支，充当藏匿中的领导人之间的信使，为法国人通缉的活动分子提供庇护所。哲米莱·布希里德（Djamila Bouhired）和其他女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在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1965年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中得到了极为真实地展现。

法提哈·布希里德（Fatiha Bouhired）和她22岁的侄女哲米莱在阿尔及尔战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法提哈的丈夫是她所在的卡斯巴街区即阿尔及尔老城最早加入独立运动的先驱之一。1957年初，他被法国人逮捕，并在逃脱过程中被杀害。丈夫的死强化了布希里德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她接纳“民阵”成员在其阁楼之上运作一个秘密的炸弹作坊，她的侄女哲米莱则成为炸弹运输员之一，并负责为潜藏在卡斯巴的“民阵”活动分子之间传递信息。在巨压之下，两位女性都表现得极度镇定。一次，法提哈和哲米莱发觉士兵们马上要对她们的房子展开搜查。她们煮上咖啡，在留声机上播放古典音乐，并精心打扮起来。士兵们到达后，即被奉上新鲜的咖啡，受到两位迷人女性接待贵客般的礼遇。

“我最好奇的是，在这些美丽的眼睛背后隐藏着什么。”巡逻队的队长向哲米莱·布希里德暗示般地低语道。

“在我眼睛后面，”她一面回答，一面挑逗式地转过她的头，“是我的头发。”[5]

就这样，军官们没有进一步搜查这间屋子。

不过，警察很快就会发现哲米莱·布希里德的另外一面。1957年4月9日，哲米莱在逃脱卡斯巴一支法国巡逻队追捕时被射中了肩部，并被发现随身携带着写给萨阿迪·亚瑟夫（Saadi Yacef）和阿里·拉波安特（Ali la Pointe）——两位“民阵”高层领导，也是当时阿尔及尔的头两号通缉犯——的信件。她被带到一家医院处理了弹伤，随后直接从手术台被转移到审讯室。

在随后的17天内她遭受了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对此她在向非正规法庭的证词中都做了冷静的描述，该法庭最终却判处她死刑。但她从未屈服。在法庭上她唯一的评论就是“那些折磨我的人没有权利向一个人施加这样的凌辱，对我而言是肉体上的，对他们而言是道德上的”。[6]她的死刑判决随后被减刑为终身监禁。

侄女被捕后，法提哈·布希里德继续支持“民阵”。她在卡斯巴买了一处新房子，以便为萨阿迪·亚瑟夫和阿里·拉波安特提供一个新的庇护所。他们无法相信其他任何人。“他们在我家里才感到无拘无束，藏在别人身边就不行。”布希里德解释说。法国人通过对拘押者的酷刑折磨获得了合作者和情报人员，随着这些人渗透入“民阵”组织，卡斯巴也被不信任的氛围所撕裂。法提哈·布希里德向一位采访者透露道：“我担心那些叛徒，所以我情愿所有事都自己做：我去买东西，做他们的中间人，帮助他们转移。所有的事我都一人担当，但这样我反而感觉更自在。”

在搜捕阿尔及尔剩余的“民阵”领导人方面，法国人表现得冷酷无情。1957年7月，亚瑟夫的一个姐妹被捕。在酷刑折磨下，她供认了法提哈·布希里德在抵抗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后者与萨阿迪·亚瑟夫和一位女性炸弹手哈希拜（Hassiba）之间的联系。法国当局立即逮捕了布希里德。“他们把我带走，整夜地折磨我。”法提哈·布希里德回忆说。“亚瑟夫在哪儿？亚瑟夫在哪儿？”法国人质问她。法提哈却坚称对萨阿迪·亚瑟夫的情况毫不知情，表示哈希拜来她的住处只是代表“民阵”就丈夫的死亡向她提供经济资助。在反复的刑罚期间，她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

终于说服了法国人。法国人同意在她的家中安置间谍，以便在哈希拜下次来访时抓捕她。

即便法国间谍就在法提哈·布希里德的住处之内，阿里·拉波安特和萨阿迪·亚瑟夫仍然隐藏在老地方。这便造就了一个法国人向“民阵”秘密指挥中心提供安全保证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局面：法国士兵在一层活动之时，阿里·拉波安特就平安地藏在阁楼里。法提哈为楼下的法国间谍准备阿尔及利亚的传统菜肴库斯库斯，但在端给这些不速之客之前，总会让萨阿迪·亚瑟夫分享一部分食物。“这次先端给他们这份库斯库斯，下次我们要给他们奉上一道美味的炸弹大餐。”亚瑟夫暗中咒骂道。[7]

法提哈对于自己所扮演的法国人的假线人这一角色，并不开心，但她演的这出戏却突然落幕。1957年9月，法国人发现了亚瑟夫的藏身之处，当即逮捕了他和法提哈。她在狱中待了几个月，随后被置于软禁状态之下，日后她拒绝谈论在狱中所受的折磨。

随着“民阵”在首都所有高层领导人的牺牲或被捕，阿尔及尔之战也于1957年秋宣告结束。但更大规模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却仍在持续。

受到挫败阿尔及尔反叛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的鼓舞，法军重新发起在农村地区打破民族解放阵线的攻势。1956年末，法国人启动了一项强迫阿尔及利亚农民由其房产和农场迁徙至拘禁营的政策。阿尔及尔战役后，强制迁居的进程开始加速。成千上万的男女和儿童被聚集起来，被迫在法国人的监控下居住在集中营内，远离他们的农田和生计。因不愿忍受法国人的上述政策，很多农业工人逃亡至城市地区，聚居在贫民窟内，其他人则前往突尼斯或摩洛哥寻求避难。至1962年战争结束，已有约300万阿尔及利亚农村居民被迫迁离故土，很多人未能重返家园。

法国人还在阿尔及利亚与其邻国之间布置电围栏和地雷，关闭边境，进而防止武器、补给和战斗人员由摩洛哥和突尼斯流入阿尔及利亚，以此来孤立“民阵”。

在军事层面，至1958年法国人已经成功遏制并击退了阿尔及利亚的反叛。然而，“民阵”却在独立战争中开辟了新战线，成功地唤起国际社

会对其事业的关注。在埃及和其他“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支持下，“民阵”成功地将阿尔及利亚问题纳入1957年联合国大会的议程。次年，“民阵”宣布以其驻开罗办事处为中心成立临时流亡政府，由老一代民族主义领袖法尔哈特·阿巴斯出任总统。1958年12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受邀向中国派遣一个代表团。尽管在军事层面法国人似乎赢得了战争，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却赢得了国际关注与支持，从而有助于在政治层面孤立法国。

至1958年，就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内部分裂日益加剧。法国纳税人开始感受到战争的巨额开销：1954年驻阿尔及利亚法军只有6万人，至1956年已增至原来的9倍，达到50万人以上。[8]这样大规模的占领军只有通过征兵和延长服役年限才能得以维持，而这些措施显然不受欢迎。年轻的入伍者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恐怖难言的战争，很多人返回家乡时已经因其所见所闻而满怀惊恐，因其所作所为而深受创伤：侵犯人权，强制迁徙，摧毁民宅，以及——最丑恶的——针对男女俘虏系统性的酷刑折磨。[9]法国公共舆论也因某些报道而感到震惊，这些报道称法国士兵不惜诉诸二战期间纳粹分子用来镇压法国抵抗运动的残忍手段。在国内，让-保罗·萨特等法国重要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公开地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在国际舞台上，法国也因在一个去殖民化时代发动一场暴力的帝国战争而遭受孤立。

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和定居者社群警惕地发觉，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支持已开始动摇。1958年5月，一群法国定居者发动反叛，公开反对无作为的皮埃尔·普夫里姆林（Pierre Pflimlin）政府，怀疑后者试图与“民阵”的敌人达成妥协。他们的口号是“军队掌权”。5月13日，定居者推翻了阿尔及尔的总督办公机构，宣布在一个革命性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实现事实上的自治，精英的伞兵部队指挥官雅克·马絮（Jacques Massu）将军担任委员会主席。

驻阿尔及利亚法军对定居者的行动完全抱以同情。5月9日，驻阿法军总司令拉乌尔·萨兰（Raoul Salan）向其远在巴黎的上司发送一封长篇电报，在电文中转达了其部下对于可能导致“放弃阿尔及利亚”的“外交进程”的忧虑之情。他继续写道：“如果国家的代表们并未下定决心保留法属阿尔及利亚，那么我们的战士就是在为一场无谓的牺牲而战斗、冒

险。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对此深感困惑，因为它们对这些战士负有责任。”[10]萨兰警告说，只有为保留法属阿尔及利亚而采取果断行动才能避免一场军事政变——不仅是在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本土也同样如此。阿尔及利亚危机已经威胁到颠覆法兰西共和国本身。

定居者起义轰动了整个阿尔及尔。穆鲁德·费劳恩在5月14日的日记中，描述了这一事件引发的恐惧和不确定性：“革命的气氛。民众在家里设置路障。示威者在全市的主要交通要道上踱来踱去，街道两旁店铺紧闭。广播称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已经接管了一切，占领总督办公室并控制了广播电台。”阿尔及尔的穆斯林意识到这是一场法国人之间的、与己无关的争斗，费劳恩就对第四共和国能否顶住压力表示质疑：“从根本上说，阿尔及利亚战争会被证明是对法国的一个沉重打击，甚至是对（第四）共和国的致命打击。毫无疑问，这次打击将为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人带来解脱。”[11]

普夫里姆林政府在不久后就宣告倒台，1958年6月，二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夏尔·戴高乐将军在民众的欢呼声中重返政坛。上任后不足3个月，戴高乐就将一个新宪法诉诸全民公投，并于1958年9月建立第五共和国。

戴高乐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飞抵阿尔及尔，面对面地会见反叛的定居者群体。在阿尔及尔发表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仍将属于法国，以安抚焦躁不安的军队和定居者。“我理解你们！”戴高乐向欣喜若狂的人群再次保证道。他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纲领，通过发展工业、土地分配以及创造40万个新就业岗位，发展阿尔及利亚，使其阿拉伯公民融入法国联邦。

戴高乐的倡议显然旨在重新确保阿尔及利亚军队和定居者的支持，结束萨兰将军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统治。然而，戴高乐的言论显示了他对“民阵”战争背后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何等地缺乏理解。针对戴高乐的表态，穆鲁德·费劳恩愤慨地写道：“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根本不存在。融合？你们已经做到这一点。”戴高乐似乎有意重拾1930年首先在布鲁姆-维奥莱特方案中提出的同化理想。晚至1945年底，同化可能还有些

吸引力；但到了1958年，这一想法已然不切实际。对费劳恩来说，这就好比戴高乐在说："你是法国人，老兄。仅此而已。别再给我们添麻烦。"

面对"民阵"顽强的抵抗，戴高乐被迫与阿尔及利亚人完全独立的要求达成妥协。尽管早些时候曾做出承诺，但戴高乐彻底反转了立场，开始为他的同胞接受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做思想准备。1959年9月，他第一次提及阿尔及利亚自决，次年1月在阿尔及利亚引发定居者一轮暴力示威活动。戴高乐坚持自己的立场，1960年6月在依云首次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展开直接谈判。

定居者运动中的强硬派及其在军队中的盟友开始将戴高乐视为一名叛徒。他们组建了多个恐怖组织，如法属阿尔及利亚阵线以及臭名昭著的"秘密军组织"——更多时候以其法语首字母缩写OAS而著称，积极策划暗杀戴高乐。秘密军还在阿尔及利亚掀起一波暗杀行动，随机地对阿拉伯平民滥施暴力。

依云谈判加之公共秩序的崩溃，在阿尔及利亚定居者及军队中间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1961年1月，法国政府就阿尔及利亚自决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高达75%的民众投票支持独立。1961年4月，驻扎在阿尔及尔的外籍军团伞兵团发生叛变，抗议法国政府认可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举措。然而，法国军队仍忠于戴高乐，叛变在军队中并未获得广泛支持，仅4天后叛变首领就被迫投降。

1961年至1962年初，随着定居者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越发脆弱，秘密军进一步升级了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恐怖暴力活动。"现在看来，秘密军根本不发出警告，"1962年2月，穆鲁德·费劳恩在他最后几条报刊文字中写道，"他们在汽车、摩托车上，用手榴弹、机关枪、刀子杀人。他们袭击银行出纳员、邮局、公司……在一些懦夫的合谋和串通之下。"[12]3月15日，即《依云协议》签订前3天，秘密军枪杀了费劳恩，终结了他勇敢的理性声音。

暴力继续在阿尔及利亚肆虐的同时，"民阵"和戴高乐政府在依云的谈判中取得了稳步的进展。1962年3月18日，双方签订《依云协议》，正式授予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地位。7月1日，协议条款在阿尔及利亚被

诉诸全民公决，投票中阿尔及利亚人几乎一致赞成独立（590万人赞成，1.6万人反对）。7月3日，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为了与1830年7月5日法国占领阿尔及尔的周年纪念相一致，庆祝活动被延后两天举行。132年后，阿尔及利亚人终于将法国人逐出其领土。

每天发生的恐怖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驱使法国人大批迁离阿尔及利亚——仅1962年6月就有30万人迁离，其中很多定居者家庭已经在北非生活了几个世代。这一年年底，仅剩约3万名欧洲定居者滞留在阿尔及利亚。

但最具毁灭性的却是在民族解放阵线国内和国外领导层之间迅速爆发的激烈内斗。为了夺取权力，这些人在这个他们为之艰苦斗争、做出巨大牺牲才赢得的国家内部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对于已经厌恶了战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而言，这一切显然无法接受。阿尔及尔妇女走上街头，高喊着“7年，已经足够了”的口号，抗议她们的自由战士之间爆发的内斗。

直到1962年9月艾哈迈德·本·贝拉和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确保了对阿尔及尔的控制，内战才宣告结束。本·贝拉出任政府首脑；1963年9月在宪法获得批准后，他当选为共和国总统。3年后，布迈丁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推翻了本·贝拉，这也反映出“民阵”领导层内部派系斗争的继续。

对很多人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妇女而言，独立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胜利。在展现出巨大勇气和牺牲之后，妇女们惊恐地听到“民阵”领导人穆罕默德·黑德尔坚称妇女们应该“回到她们的库斯库斯那里去”。白雅·侯赛因，一位曾遭受酷刑折磨和多年监禁的阿尔及尔战役老兵，在反思伴随着独立而来的复杂心情时表示：

> 1962年是一个黑洞。在那之前是一场巨大的冒险，然后……你发现自己孑然一身。我不知道其他姐妹感受如何，但我脑海里并没有下一步的政治目标。1962年是最重要的慰藉，标志着战争的结束；同时它也是巨大的恐惧。在狱中，我们是如此坚信我们终将……重获自由，我们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利亚。……随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实际上没有我们参与……没有任何人想到我们

的阿尔及利亚。对我们来说，这比过去还要糟糕，因为我们已经打破了所有的禁锢，再要我们回归这一切太过艰难。1962年，一切禁锢又被重新树立起来，但却是以一种对我们而言可怕的方式。他们被拉回了原位，结果却排除了我们。[13]

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但代价是高昂的：阿尔及利亚人口遭遇了大规模的伤亡和流离失所，其规模在阿拉伯历史上前所未有；其经济受到战争的摧残以及撤离中定居者蓄意的破坏；其政治领导层为派系斗争所割裂；其社会也因对于男性和女性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建设中所应扮演角色的不同期待而发生分裂。但阿尔及利亚很快开始组建政府，并作为一个脱胎于反帝革命斗争的共和国而跻身于进步阿拉伯国家的行列。

随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纳赛尔在对抗阿拉伯“反动派”的斗争中又有了一个新的盟友。埃及——在叙利亚分离后仍保持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称呼——立志于将阿拉伯世界内的系统性改革作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铺垫。革命的阿尔及利亚因对反帝、阿拉伯认同政治、社会主义改革的强调，成为埃及的天然盟友。1964年6月，纳赛尔新的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与“民阵”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确定了两国在推进阿拉伯社会主义方面的统一立场。[14]

纳赛尔因对阿尔及利亚革命自始至终的支持而受到赞扬。他也开始远离其早期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旗手的身份，而是寻求将自身塑造为进步革命价值观的拥护者。受到自身话语的迷惑，纳赛尔本人开始向任何地区发生的阿拉伯革命运动提供无条件的支持。因此，当一群军官推翻也门王室后，纳赛尔立即表示支持。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支持也门革命，即使我们不知道谁是这场革命的策划者。”[15]

*

长期以来，也门一直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保持自治，1918年则确保了其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地位。独立后也门的第一位统治者是伊玛目叶海亚（Imam Yahya, 1869—1948），作为一个仅存于也门的什叶派小支

派宰德派的首领，叶海亚在这个国家同时扮演着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角色。20世纪20—30年代，叶海亚通过对居民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的也门北部部落领地的征服，扩大了其统治范围。

叶海亚在其统治期间，同时面临着来自沙特和英国人的压力：在北部，沙特夺取了叶海亚心目中“历史的也门”中的阿西尔和纳吉兰；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及其内陆地区自19世纪30年代起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尽管如此，叶海亚进行的征服却在这个沿地域、部落和教派界限严重分裂的社会中制造了统一的假象。在其统治之下，也门与外部世界极少交流，长期聚焦于维持其国家孤立地位的政策。

1948年，叶海亚被一位部落谢赫暗杀，其子伊玛目艾哈迈德（Imam Ahmad，1948—1962年在位）继位，也门的孤立地位也被打破。艾哈迈德素以冷酷无情著称，因在掌权过程中将其竞争对手囚禁或处决而恶名更著。为了寻求发展支持和军事援助，艾哈迈德抛弃了其父亲的仇外立场，与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艾哈迈德的王位并不巩固。1955年的一次未遂政变更加深了他对国内对手以及外部威胁的不信任，尤其是纳赛尔及其推翻“封建”政权的执着口号。总部设于埃及的“阿拉伯人之声”覆盖范围远达也门，传播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动人口号。[16]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相似，纳赛尔通过广播对民众的直接讲话使伊玛目艾哈迈德在也门饱受压力，这也成为也门、埃及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来源。

但纳赛尔并非一直对也门人怀有敌意。1956年，也门、埃及和沙特曾在吉达达成了一项反英协议。1958年，伊玛目艾哈迈德又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合并表示全力支持，并协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起加入了一个名为“阿拉伯联合国家”的联邦方案。然而，艾哈迈德反对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理念，包括国家主导下的经济以及私营公司国有化的主张。他在诗句中谴责“以禁止的方式夺取财产”，称之为“违背伊斯兰法的罪行”。[17]

艾哈迈德上述关于伊斯兰法的讲话刚好发表于1961年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后，因此激怒了纳赛尔。埃及宣布与也门断交，“阿拉伯人之声”加大了宣传的力度，鼓动也门人民推翻他们的“反动”君主。

第二年机会终于到来。1962年9月，伊玛目艾哈迈德在睡梦中去世，王国转由他的儿子伊玛目白德尔继任统治。仅一周后，白德尔就被一次军官政变推翻，也门阿拉伯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邻国沙特的支持下，也门王室的支持者向政变者发起挑战。埃及则全力支持新生的共和国及其军人统治者，在纳赛尔看来这也是阿拉伯世界进步势力与反动派之间更大斗争的一部分。

也门革命很快演变为一场也门内战，一场埃及人和沙特人之间的阿拉伯内斗，也是“进步的”共和秩序和“保守的”君主国为争夺阿拉伯世界未来而进行的一场战斗。对埃及人来说，他们的利益并未受到威胁，仅仅是混淆了政治口号和现实政治。这是纳赛尔主动选择的第一场战争，也将成为他的“越南”。

1962年9月政变后，埃及军队开始涌入也门。在未来的3年内，埃及部署在也门的总兵力由1963年底的3万人增至1965年巅峰时期的7万人，即埃及总兵力的近一半。

从一开始，埃及在也门的战争就毫无胜算。埃及人面对的是在其熟悉的地形上活动的部落游击队，超过1万名埃及士兵在5年的战争中被杀。考虑到埃及人始终无法将阵线推进到首都萨那以外较远的区域，惨重的死伤和胜利的渺茫开始严重削弱军队的士气。沙特人向保王派提供资金支持，英国人则提供隐蔽的支持，相比之下埃及人缺乏财政盈余来支持一场海外战争的巨额花销。但这些现实考虑并未左右纳赛尔的判断，他已经被其在阿拉伯世界推动革命性改革的使命所蒙蔽。他对在也门的长官说：“撤退完全不可能，那将意味着也门革命的崩溃。”[18]

纳赛尔乐于承认，他将也门战争视为“更大意义上的一次政治行动，而非军事行动”。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也门战争将影响埃及为对抗更迫切的以色列威胁所采取的军事准备工作。

*

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的10年内，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就开始为不可避免的下一轮战争而进行军备竞赛。美国开始取代法国成为以色列军

事装备的首要来源国，英国向约旦人提供武器，苏联人则武装了叙利亚和埃及。在这块对两个超级大国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苏联人不惜利用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地位来向其对手美国施压。

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都不满于现状，且不愿在现状基础上考虑和平，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是如此不甘于与以色列人和解，以至于拒绝用名字来指代这个国家，而是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1948年和1956年两次在战场上输给以色列军队后，阿拉伯人决心要一雪前耻。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每天都在提醒人们，阿拉伯人未能履行其解放巴勒斯坦的承诺。

以色列人同样决意要开战。他们担心本国在海岸线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狭窄的腰部——在某些地区宽度仅7.5英里（12千米）——会使以色列暴露在将本国拦腰截断的敌对行动之下。其次，以色列人无法接近哭墙和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社区，这些地区仍在约旦人的控制之下。叙利亚人则控制着俯瞰加利利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戈兰高地。此外，以色列人还相信随着苏联向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提供装备有最新技术的武器系统，他们的战略优势——相比其阿拉伯邻国拥有更多、更高质量的武器——将大打折扣。以色列人需要一场出色的战役来确立可防御的边界，并彻底击败阿拉伯人，以便在能保证以色列生存的前提下实现和平。

1967年春，以色列人开始抱怨巴勒斯坦潜伏者由叙利亚跨境袭击以色列，两国间紧张关系迅速升级。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都将本国军队调整到戒备状态。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威胁说如果叙利亚不停止挑衅行为，以色列将发动进攻。4月，口头威胁升级为敌对冲突，以色列战机与叙利亚空军在叙领空展开缠斗，以空军击落了6架叙利亚米格战机，其中两架在大马士革郊区坠毁。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叙利亚和以色列间的局势变得非常危险。”[19]双方敌对行为的突然升级，将整个地区拉到了战争的边缘。

在这一高度紧张的时刻，苏联却选择向埃及当局泄露一条虚假情报，声称以色列部队正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法国幻影战斗机轻而易举地击落了苏联提供给叙利亚空军的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这无疑令苏联感到痛心。埃及与叙利亚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也

就意味着如果以色列人向叙利亚开战，埃及人将被迫参战。或许苏联人想通过虚假情报来动员埃及人，以两线作战的前景来遏制以色列人。

尽管纳赛尔有准确的情报——包括航拍图片——显示事实上以色列人并未在叙利亚边境上集结兵力，但在公开场合他却表现得好像战争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也许纳赛尔希望不开一枪一炮就能宣称对以色列取得了胜利：首先散布关于叙利亚受到以色列威胁的苏联情报，然后将部队部署到以色列边境以构成震慑，最后宣布以色列部队已远离叙利亚边境，从而证明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压力下完成撤退的。无论他是如何推理的，纳赛尔继续在苏联虚假情报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命令其军队在5月16日跨越苏伊士运河，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西奈半岛一侧集结。这一误判将被证实为导向战争的第一步。

纳赛尔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对以色列人构成切实可信的威胁。考虑到手下5万人的精锐部队仍受也门战争的牵制，为集结必要的兵力，纳赛尔被迫征召了全部的预备役军人。他还需要包装自己的士兵，使他们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强大。这一方面是为了激发埃及民众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是对以色列人展现出真实的威胁。为此，纳赛尔在军队部署中安排了戏剧性的一幕：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和坦克在检阅期间横穿开罗市中心，以便享受民众的欢呼以及国际媒体的关注。“我们的部队在通往西奈的途中故意穿越开罗街头，”阿卜杜·加尼·盖迈西（Abd al-Ghani al-Gamasy）将军抱怨说，“一览无遗且所有人都看得见——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媒体报道了这些行动，而这与所有的安全原则和措施都背道而驰。”[20]

川流不息赶赴前线的士兵队伍，激起了公众对于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期待，而这场战争可能挽回阿拉伯人的尊严并解放巴勒斯坦。在纳赛尔数百万的支持者中，没有任何人对于埃及军队将带领其阿拉伯盟友战胜以色列有片刻的怀疑。然而，被派往西奈时，埃及军队却并没有明确的军事目标，似乎其庞大的规模就足以对以色列人构成恫吓。同时，正如盖迈西后来反思的，“以色列已经在最佳环境下不动声色地为战争做好准备”。以色列战略家对埃及军事部署的规模和装备了如指掌——他们不仅在之前数月的时间内搜集了详细的情报，而且在电视上也看得一清二楚。

埃及军队到达西奈后，开始与联合国紧急部队面对面地相遇。该部队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被部署到西奈半岛的，目的即维护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该部队共包括驻扎在41个观察站的4500名国际战士，这些观察站位于沿埃以边境的加沙地区以及西奈半岛南部的沙姆沙伊赫。

夹在埃及部队和以色列边境之间的联合国部队现在成了一个障碍：如果两军之间存在一个缓冲区，埃及军队如何对以色列人构成可信的威胁呢？于是埃及总参谋长致信联合国紧急部队长官，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埃以的东部边境。联合国部队长官将这一请求转达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后者回复说基于主权埃及有权利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其领土，但他仅接受联合国部队的完全撤离。吴丹表示，联合国紧急部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撤出该部队位于东部边境的部分同时又保留位于加沙地带和蒂朗海峡的维和部队将毫无意义。经过对联合国秘书长答复的慎重考虑，5月18日埃及政府最终要求联合国部队完全撤出西奈半岛。最后一支联合国部队于5月31日完成了撤离。突然之间，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不再有任何缓冲地带，两国间紧张关系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是纳赛尔的第二个误判，也让他离战争更近了一步。

联合国部队的撤离为纳赛尔制造了一个未曾预见的外交难题。1957年以来，联合国部队维持蒂朗海峡向所有船只开放，无论这些船只的国旗或目的地如何。这促成以色列在这10年之内可由其港口埃拉特向红海自由航行。联合国部队撤出后，蒂朗海峡主权重归埃及人手中，其阿拉伯邻国开始向埃及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其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或驶往埃拉特的船只通过蒂朗海峡。正如安瓦尔·萨达特回忆的，“很多阿拉伯兄弟开始批评埃及向国际特别是以色列航线开放……蒂朗海峡”。

在1967年5月激烈的气氛中，纳赛尔最终屈服于压力。他召开了一次最高执行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元帅、总理西德基·苏莱曼（Sidqi Sulayman）、议长安瓦尔·萨达特以及其他自由军官领导人。“现在我们集结在西奈半岛，”纳赛尔表示，“战争的概率是五五开。如果我们关闭［蒂朗］海峡，战争肯定100%要爆发。”纳赛尔转向他的武装部队总司令，问道：“阿卜杜·哈基姆，军队做好准备了吗？”阿米尔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领袖!我以项上人头保

证！一切都完美无缺了。”[21]

5月22日，埃及宣布禁止一切以色列船只以及驶往埃拉特的油船通过蒂朗海峡。纳赛尔对于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判断非常准确：对以色列而言，对其海路航线的威胁已然构成战争的理由。

至5月底，阿拉伯世界已经放弃了任何避免战争的努力。对于1948年、1956年两次失败的战争以及一系列小规模的袭击，阿拉伯公众仍感到愤恨心痛，因而迫不及待地盼望看到以色列受到致命一击。官方电视台对埃及部队动员情况的详尽报道，也提升了公众的预期，似乎清算的时刻已近在眼前。阿拉伯国家间开展合作，意味着以色列将同时面对三条战线的进攻。叙利亚和埃及已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5月3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也飞往开罗，将其命运与纳赛尔绑定在一起。现代化的武器、统一的意图、强有力的领导人，似乎阿拉伯人已经拥有了彻底击败以色列人所需的一切。然而在这一切虚张声势的背后，阿拉伯人比以往任何一次战争都缺乏准备。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并未吸取1948年阿以战争的教训，他们并未采取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作战计划。尽管相互间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埃、叙、约三国间并不存在军事协调，更别说击败如以色列这样一个顽强的敌人所需的战略。更糟糕的是，埃及已将其财政与军事资源浪费在也门的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之上：1967年5月，埃及武装部队仍有三分之一的兵力被牵制在也门，这就好比埃及在投入一场战争时自缚一臂。

与以色列的战争肯定是纳赛尔在1967年时最不愿看到的情况，但他已经被自己的成功所绑架。埃及人民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响应他的动员，信任他的领导。他们极为相信他的领导才能，坚信他将成为拯救者。因此，纳赛尔的公信力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都处于胜败的关头。由于他的每一次误判使得他更接近战争，他本人可用于避免战争的回旋余地已越来越小。

埃及的战争动员在以色列激发了深沉的危机感。由于越来越担心阿

拉伯敌人的包围，以色列公众指望着政府的承诺，也变得更加焦虑。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尝试所有的外交手段。以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为首的将军们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行动足够迅速，在敌军建立起巩固的阵地并协调好进攻计划之前，以军有能力击败每一支阿拉伯军队。内阁会议中分歧愈发严重：艾希科尔担心在三条战线上与埃及、叙利亚、约旦同时开战；即使是已退休的鹰派前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也对拉宾的战争动员表达了保留意见。“你已将国家引入了一种非常严峻的处境，”他温和地批评拉宾，“我们绝不能开战。我们被孤立了，你要负全责。”[22]

在关闭蒂朗海峡与战争爆发之间的两周是一段极为紧张的时期，在以色列被称为“等待期”。以色列公众担心他们国家的根本生存，对他们的总理缺乏信心，因为后者看起来过于优柔寡断。

5月底成为事态的转折点。由于在联合政府中受到孤立，艾希科尔被迫任命强硬的退役将军摩西·达扬（Moshe Dayan）进入其内阁担任国防部部长。达扬进入政府使得内阁的天秤倾向了主战派。在得到美国在战争爆发时将支持以色列的保证后，以色列内阁于6月4日举行会议，决定发动战争。将军们立即采取行动。

1967年6月5日早8点，约旦阿杰隆的一部预警雷达监测到了由以色列空军基地出发、驶往西南方向的多批战机。约旦操作人员立即向位于开罗的埃及空军防御中心以及埃及国防部传达警报信号。但他的警告却没有被听到：主接收中心值班的士兵将其收音机调到了错误的电台，国防部值班的军官则未能向部长传达这一消息。以色列在完全出其不意的优势下发动了战争。

在多批以色列战机驶向埃及领空的同时，埃军总指挥阿米尔元帅正和几名高层军官搭乘一架运输机，前往西奈检阅空军和步兵阵地。西奈的高级指挥中心负责人阿卜杜·穆哈辛·穆尔太吉（Abd al-Muhsin Murtagi）将军正在泰马达空军基地地面上等待迎接埃及军队的最高首领。他回忆说：“8点45分，以色列战机袭击了机场，摧毁了所有的埃及战机，还对跑道进行了轰炸，使之无法继续使用。”由于无法着陆，阿米尔的飞机被迫飞回了开罗，而西奈所有的空军基地都同时受到了攻击。[23]

恰恰在同一时间，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斐伊（Husayn al-Shafi'i）正陪同伊拉克总理塔希尔·叶海亚（Tahir Yahya）参观苏伊士运河区。他们于8点45分降落在法伊德机场，正赶上第一波以色列战机发动袭击。沙斐伊写道：

> 我们的飞机刚一成功着陆，两枚炸弹就在附近爆炸。我们狼狈不堪地走下飞机，在地面上躲避了起来，目睹了事态一分钟一分钟地发展。敌机以3—4架为一组，每隔10—15分钟会发动一次袭击，袭击目标主要是那些停在地面上一动不动的埃及战机。这些飞机的机翼相互连接在一起，仿佛是特别准备好，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不费吹灰之力地被摧毁一样。敌军每出动一架次，都会有一两架埃及飞机爆炸起火。[24]

代表团乘汽车返回开罗途中，每经过一处空军基地都会看见成排的烟柱滚滚升起。

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内，以色列空军取得了对埃及空军的绝对优势，歼灭了后者所有的轰炸机和85%的战斗机。雷达系统和飞机跑道也遭受重创，以至于其他战机也无法继续使用埃及领空。事实上，纳赛尔曾向阿尔及利亚政府请求借用其米格战机，之后才意识到埃及空军基地所受重创已使其无法部署这些飞机。

埃及空军完全瘫痪后，以色列继续将矛头转向约旦和叙利亚。根据6天前与纳赛尔达成的防御协议，侯赛因国王已将其军队置于埃及人的指挥之下。埃及指挥官命令约旦炮兵和空军向以色列空军基地发动进攻。规模有限的约旦空军出动了头一批架次，随后返回基地加油，但刚刚午后便遭遇了以色列战机的袭击。仅用了两个批次，以色列人便歼灭了整个约旦空军，包括飞机、跑道和基地。他们随即向叙利亚人发动袭击，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消灭了叙空军三分之二的有生力量。

一旦取得制空权之后，以色列人很快便派出几波地面部队，试图歼灭其阿拉伯敌人——埃及、约旦、叙利亚，以避免同时面临多线作战的风险。他们先从西奈动手，派遣了约7万名步兵以及700辆坦克来迎战该地区约10万兵力的埃及部队。经过6月5日的激烈战斗，以色列人占领了加沙地带的大部分地区，突破了地中海沿岸的埃及防线，在黄昏时已控

制了西奈东部的战略要冲艾布·欧维格莱。

埃及人进行了反击。次日清晨，埃及指挥官命令一个装甲旅尝试夺回艾布·欧维格莱。盖迈西将军是一位见证者。“我目睹了一个装甲旅遭到攻击。那场面真是令人心碎。以色列飞机在空中享有完全的自由，埃及坦克在白昼之下穿越空旷的沙漠，在缺乏有效防御手段的情况下成为轻松的射击目标。”[25]到下午时，埃及人已放弃了进攻。在未咨询战场指挥官的情况下，陆军元帅阿米尔贸然下令从西奈全面撤退，以便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重整部队。由于完全缺乏组织与协调，这次撤退将埃及人的败局转变为溃败。盖迈西回忆自己目睹了部队“在敌方不间断的空袭之下……以最悲惨的方式进行着撤退，米特拉山口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墓地，到处散布着尸体、起火的设备和爆炸的弹药”。[26]

既然埃及军队已经被彻底消灭，以色列人便转向约旦战线。在6月5日空袭成功后，以色列人利用其空中优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轰炸了固守约旦河西岸的约旦装甲部队。6月5日夜间，以色列继续对耶路撒冷和杰宁的约旦阵地进行联合攻击，直至黎明时分空军再次发动空袭为止。至6月6日，约旦地面部队已被围困在耶路撒冷老城之内，在杰宁的守军则准备撤离。侯赛因国王亲自赶往前线来判断战场的局势。他回忆道：“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幻影般的失败景象。路上塞满了卡车、吉普车和其他各类车辆，有的扭曲变形，有的开膛破肚，有的凹痕累累，同时还冒着烟。这座大坟墓里都是人，2—30人一组不等，一个个遍体鳞伤、筋疲力尽，绝望地试图从以色列空军的致命打击下开辟一条逃生路线。当日艳阳高照，万里无云，以色列的幻影战机群就在他们头顶上盘旋轰鸣。”[27]

侯赛因国王继续坚持抵抗，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脱离阵线而受到阿拉伯同胞的指责，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一项联合国停火协议，从而有可能保全其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地位。但停火对约旦而言来得太迟了：6月7日清晨耶路撒冷老城陷落，而在以色列人同意与约旦达成停火之前，西岸其他地区的约旦阵地也已经土崩瓦解。6月8日，叙利亚和埃及同意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却利用有利形势向叙利亚发起进攻，占领了戈兰高地。1967年6月10日，“六日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埃及的指挥官们对他们的损失感到震惊，便诉诸幻想来争取时间。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开罗官方报道称击落了161架以色列战机。[28]叙利亚人如法炮制，宣称在战斗打响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击落了61架以色列战机。一场协调一致的虚假宣传就此开始，假消息通过无线电传播，随后由政府控制的报纸转载，这让阿拉伯世界民众相信，以色列已接近于完全战败。一位埃及情报官员回忆道："我们从广播中收听有关战争的消息，整个世界都以为我们的部队已经推进到特拉维夫郊区。"[29]

至于那些阿拉伯领导人愿意承认的挫败，他们将之归咎于美国人与以色列人共谋。在战争的第一天，"阿拉伯人之声"便开始广播对美国的指控："美国是敌人。美国是以色列背后的敌对势力。阿拉伯人啊，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是生命的杀手，是嗜血的恶魔，正是美国妨碍你们消灭以色列。"[30]事实上，纳赛尔专门联系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后者在阿拉伯进步阵营中因其与英、美两国的密切联系而臭名昭著，以便在声明中协调一致，将以色列人在战场上的收益归因于英、美的共谋。在一次被以色列人破译的轻率的电话交谈中，纳赛尔为侯赛因国王的默许而欢欣鼓舞。"我会发表一份声明，"纳赛尔解释说，"你也要发表一份声明，我们会确保让叙利亚人也发表一份声明，在声明中指责美国和英国战机从其航空母舰上参与了对我们的空袭。我们会强调这一点。"[31]1956年英、法曾伙同以色列发动对埃及侵略这一事实，也增加了阴谋论谣言的可信度。

阿拉伯领导人所推动的虚假宣传攻势仅仅延缓了可怕的清算之日，在那一天，他们将不得不向本国公民揭示其失败的惨重程度：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军队和空军的完全失败，广阔阿拉伯领土——包括埃及整个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阿拉伯东耶路撒，叙利亚戈兰高地——被占领的事实。

然而，在6月的第一周，被蒙骗的阿拉伯民众仍在庆祝胜利。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欢腾的人群在组织胜利庆典，从未怀疑他们的领导人在向他们撒谎。安瓦尔·萨达特回忆了当他看到自发的游行队伍"庆祝我们的媒体每小时推出的关于莫须有的胜利的报道"时的那种绝望感："他们

在庆祝一场想象的胜利——庆祝一场实质上的失败——这一事实，使我对他们感到歉意和同情，同时对那些欺骗了他们和整个埃及的人感到深深的厌恶。”萨达特甚至不敢想象那个不可避免的真相大白的时刻，那一刻埃及人民“意识到他们被兜售的那场胜利实际上是一场可怕的灾难”。[32]

那一刻终于在6月9日来临。当日，纳赛尔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对这次“逆转”承担全部责任，并递交了辞呈。他称这场战争为“大挫折”。他坚持指控英、美与以色列人合谋，宣称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试图主导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漫长历史中的最新篇章，而现在美国成为急先锋。根据萨达特的回忆，纳赛尔表示美国“希望独自控制全世界并且‘统治’埃及。由于纳赛尔不允许这一愿望的实现，他别无选择，只有下台并交出权力”。[33]

就在广播之后，开罗的大街小巷迅速挤满了示威者。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回忆道：“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的男人、女人与儿童，被一种危机感团结为一个坚强的整体，他们协调一致，共同发声，呼吁纳赛尔留任。”接受战败的震惊对埃及人民而言已然足够困难了，他们不想在没有纳赛尔的情况下承担这一切。对埃及人而言，维护他们的领袖正是抵抗失败和外部控制的一部分——“这一次是美国而非英国”。萨达特称，连续17个小时人们拒绝离开街道，直到纳赛尔最终宣布撤销了辞呈。[34]尽管同意继续留任，纳赛尔自此再也没有从这次“大挫折”中恢复过来。

1967年战争的失利为阿拉伯政治开启了一个激进的新时代。失败的惨烈程度加之对阿拉伯民众的故意欺骗，触发了一场对阿拉伯政治领袖的信任危机。即便是拥有民众拥护的纳赛尔也未能逃脱公众的鄙夷。萨达特对其前任并不总是表现得宽宏大量，他就曾回忆，1967年战败后，“各地的民众如何嘲讽［纳赛尔］，将他视为一个笑柄”。阿拉伯巨人纳赛尔跌下神坛，这给了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片刻的喘息。过去一旦与埃及的政策有所出入，他们就要面临纳赛尔宣传机器通过“阿拉伯人之声”广播而散布的激烈攻击，现在他们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这一时刻并未延续多久，在“大挫折”之后，针对阿拉伯领导人的内部威胁迅速增长。

正如1948年战争后所发生的，民众幻想的破灭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触发了一波反对现任政府的政变和革命的浪潮：1968年，伊拉克总统阿卜杜·拉赫曼·阿里夫（Abd al-Rahman ‘Arif）被复兴党领导的政变推翻；1969年，利比亚伊德里斯国王（King Idris）被以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为首的自由军官推翻；1969年，加法尔·尼迈里（Ja‘far al-Numayri）从苏丹总统手中夺取权力；1970年，叙利亚总统努尔丁·阿塔西（Nur al-Din Atassi）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哈菲兹·阿萨德夺取政权。上述新政府无一例外地采纳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纲领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号召摧毁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并战胜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

1967年战争彻底改变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从那时起，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开始了，这一关系有多好，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敌意就有多深。双方之间的分歧必然会出现，因为彼此的地缘战略优先关切不同：美国人无法说服阿拉伯人站在自己一边对抗苏联威胁，阿拉伯人也无法让美国人认同他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看法。

1967年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领导的政府放弃了在阿以冲突中的中立地位，转而支持以色列。他们相信纳赛尔和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正把阿拉伯世界带入苏维埃阵营，他们很高兴看到他在失败中名誉扫地。而纳赛尔则开始相信自己的虚假信息，即声称美国站在以色列这边，参与了战争。最初，这只是为了转移国内批评的烟幕，但现在却逐渐演变成一种信念，即美国在新一轮帝国主义浪潮中，利用以色列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阿拉伯世界各处都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所谓的勾结来解释那场没有人能想象到的失败。因为美国在1967年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除突尼斯、黎巴嫩、科威特和沙特外，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断绝了与美国的关系。

事后来看，我们知道纳赛尔关于美国站在以色列一方参与战争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战争爆发后第四天，以色列空军和海军袭击了一艘美国侦查船“自由号”，造成34名美国军人死亡、171人受伤。以色列人从未公开解释过这次袭击，尽管很明显，他们希望通过攻击，使美国人无法监控他们在战场上的通信信号。不过，这样一次无缘无故且造成美军如此重大伤亡的袭击行为，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得到宽恕，这一事实已然反映出美、以两国间全新的特殊关系的本

质。

“六日战争”后，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立场同样明显趋于强硬。自1948年这个犹太国家成立以来，阿拉伯国家曾几次主动示好，阿拉伯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也曾有过几次秘密外交。1954年，纳赛尔曾与以色列人进行了秘密接触;1963年，侯赛因国王则与这个犹太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渠道。[35]1967年阿拉伯战败后，所有与以色列人的秘密谈判都戛然而止。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最大的纳赛尔和侯赛因都希望通过协商，与以色列达成一项战后解决方案，以收复阿拉伯领土。然而，1967年8月底至9月初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峰会所采取的强硬路线，却将二人彻底边缘化。喀土穆峰会因划定了阿拉伯外交中“三不原则”而闻名于世，即不承认犹太国家、不与以色列官员进行谈判、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不缔结和约。自此以后，阿拉伯政治的道义制高点将通过对此次峰会决议的遵循程度来衡量。

国际社会仍希望将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聚在一起，以便达成一项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当联合国于1967年11月就这一议题展开辩论时，发现阿拉伯世界就外交解决的可能性问题产生了分裂。联合国安理会于1967年11月22日一致通过的第242号决议，为基于土地换和平原则解决阿以冲突提供了法律框架。该决议呼吁“以色列军队撤出在当前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从而换取“对该地区内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以及他们在安全、公认的边境内和平生活权利的尊重和认可”。联合国第242号决议仍是后续关于阿以冲突的一系列“土地换和平”倡议的基础。

该决议获得了埃及和约旦的支持，但却未能赢得叙利亚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对这些国家来说，喀土穆峰会所制定的“三不原则”排除了第242号决议所隐含的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这是一种顽固的不妥协立场，但在1948年、1956年和1967年连续输掉三场对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只愿接受从一个强势的立场来与犹太国家展开谈判。1967年之后，这些领导人坚信阿拉伯人在目前的处境下无力展开谈判。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后外交中，巴勒斯坦人失去的东西最多。自从被驱赶出其家园以来，巴勒斯坦人在过去的20年内从未被国际社会承

认为一个拥有民族权利的独特民族。自委任统治时代以来，他们就一直被称呼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非巴勒斯坦人。194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采纳了以色列人作为民族身份，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却依旧仅仅是“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即那些在以色列国建立时选择留守其家园的人口少数，或者是“阿拉伯难民”，即那些为躲避战乱而逃亡至邻近阿拉伯国家的难民。对西方公共舆论而言，这些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或埃及的阿拉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适当的时候将被他们的接收国吸收。

1948—1967年间，作为一个政治群体的巴勒斯坦人完全消失。当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宣称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之时，国际社会中很少有人会质疑她这一明显出于自利考虑的说法。巴勒斯坦人这种缺乏民族诉求的现状也反映在1967年秋的联合国辩论之中。尽管现在我们听起来很合理，第242号决议在当时却意味着全部巴勒斯坦民族诉求的终结。“土地换和平”原则在将阿拉伯巴勒斯坦剩余狭小领土归还于埃及或约旦的监管之下的同时，将承认以色列在民族国家集团中的永久地位；之前被称为巴勒斯坦的那个国家将在地图上永远消失，而所有在1948年、1967年两次战争中作为难民被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将不再有国家。拒绝第242号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还不够，他们必须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使国际社会关注到其事业的公正性。

20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始终将他们的事业托付给阿拉伯兄弟，寄希望于通过阿拉伯人的联合行动来实现被占家园的解放。1967年阿拉伯人的集体失败，最终说服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去把握主导权。受第三世界革命者的启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团体发起了自己的武装斗争，其斗争对象不仅是以色列，还包括那些阻碍他们的阿拉伯国家。

*

20世纪50年代初，巴勒斯坦武装抵抗运动的创始人们在开罗首次会面。1952年，一位名叫亚西尔·阿拉法特（1929—2004）的工程学学生，同时也是1948年战争的亲历者，当选为开罗巴勒斯坦学生联盟主席。他正是利用这一职位激励了一代巴勒斯坦青年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身。

萨拉赫·赫莱夫（Salah Khalaf）是阿拉法特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后来以其化名艾布·伊亚德（Abu Iyad）闻名于世。1948年阿以战争期间，15岁的赫莱夫被迫从家乡雅法迁居至加沙地区。随后他又前往开罗的师范学院学习，在1951年秋巴勒斯坦学生会的一次会议上遇见了阿拉法特。“他比我年长4岁，”赫莱夫回忆说，“我立即就被他的精力、热情和事业心所吸引。”1948年灾难后，两人意见相投，都不信任阿拉伯政权。赫莱夫回忆，在纳赛尔和自由军官上台后，“一切看起来皆有可能，甚至解放巴勒斯坦也不例外”。[36]

事实证明，革命时代的埃及对巴勒斯坦政治而言是一个艰难的环境。尽管许诺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但纳赛尔政府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活动施加着严密的控制。在随后的几年内，巴勒斯坦学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散布开来，在多个国家建立了稳固的落脚点，而这些落脚点最终发展为组织化的基层团体。1957年，阿拉法特迁居至科威特，两年后赫莱夫也前往科威特与其会合。其他人，如现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穆德·阿巴斯，则在卡塔尔找到了工作。受过良好教育的巴勒斯坦人在新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将他们的资源导向了民族事业，即巴勒斯坦的解放。

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巴勒斯坦人才开始创建独立的政治组织。1959年10月，阿拉法特、赫莱夫与另外20名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在科威特举行了一系列会谈，旨在建立法塔赫。该组织的名称具有双重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Harakat Tahrir Filastin*）首字母缩写的倒置形式；另一方面，它又与阿拉伯语“征服”一词具有相同的拼写形式。该运动提倡通过武装斗争超越派系主义，实现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在随后的5年内，该组织在新成员招募和组织方面也将取得飞速的进展。法塔赫开始出版一份名为《我们的巴勒斯坦》（*Filastinuna*）的刊物来传播其观点，这份刊物的编辑哈利勒·瓦齐尔（Khalil al-Wazir，化名为艾布·吉哈德）也将成为法塔赫的官方发言人。

阿拉伯国家决定建立一个官方机构来代表巴勒斯坦人的诉求。1964年首届阿拉伯国家首脑峰会在开罗举行，峰会呼吁建立一个新组织，以便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在他们祖国的解放、命运的自决方面扮演自身的

角色”。阿拉法特及其同僚对这个被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新机构怀有强烈疑惧。在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解放组织的过程中，却没有征求巴勒斯坦人的意见。不仅如此，纳赛尔还指派律师艾哈迈德·舒盖里（Ahmad Shuqayri）来领导巴解组织，而后者在巴勒斯坦人中的威望最多也只能说有限。舒盖里出生于黎巴嫩一个混合了埃及、希贾兹、土耳其多种血统的家庭，截至1963年一直担任沙特驻联合国代表。阿拉法特和其他法塔赫积极分子深信，阿拉伯各政权建立巴解组织乃是为了控制巴勒斯坦人，而非帮助他们投身于祖国解放的事业。

起初，法塔赫试图与巴解组织合作。阿拉法特和赫莱夫在舒盖里访问科威特期间同他举行了会面，并派遣代表参加了1964年5月在巴勒斯坦举行的第一届巴勒斯坦国民大会。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受邀参会的422名代表——绝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重组为巴勒斯坦国民大会，扮演着某种流亡议会的功能。大会通过了一整套目标，这些目标在《巴勒斯坦民族宪章》（Palestinian National Charter）中被奉为金科玉律。该新组织甚至呼吁建立一支巴勒斯坦民族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解放军。法塔赫在大会上彻底被边缘化，在离开耶路撒冷时已决心要抢这个新巴勒斯坦官方机构的风头。为了抢占先机，法塔赫决定对以色列发动一次武装袭击。

法塔赫的第一次反以行动在军事层面是一次失败，但在宣传层面却大获成功。按计划，三支突击队将于1964年12月31日分别从加沙、约旦和黎巴嫩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然而，埃及、约旦和黎巴嫩政府都有意避免巴勒斯坦人激怒以色列人，深知任何敌对行动都将使他们自己的领土面临严厉的报复。埃及政府在行动开始前一周拘捕了加沙的法塔赫敢死队；黎巴嫩安全部队在第二组人马抵达黎以边境前实施逮捕；第三支队伍于1965年1月3日由约旦河西岸进入以色列境内，并在一个灌溉水泵站内安放了爆炸装置，但在爆炸前，以色列人便发现并解除了爆炸物。返回约旦境内后，这些巴勒斯坦突击队员随即被捕，一名游击队员在拒捕中被杀。法塔赫有了自己的第一位烈士，尽管值得注意的是，他是被自己的阿拉伯同胞所杀。

与法塔赫的实际军事目标相比，这些最终未成功的袭击的象征意义远为重要。1965年元旦当天，法塔赫假托“风暴”（*al-Asifa*）组织之名发

布了一条军事声明，宣称：“我们的革命先锋队破土而出，坚信武装革命才是回归和自由的途径，同时也是为了向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资助者强调，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在战场上，他们并没有死去，而且永远也不会死去。”[37]

全世界的巴勒斯坦人都因这则消息而振奋不已。“1965年1月1日，法塔赫为现代巴勒斯坦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武装斗争战士莱拉·哈立德（Leila Khaled）写道，他全家在1948年被逐出海法。对莱拉而言，上述行动象征着巴勒斯坦革命的开端，也是迈向其祖国解放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人民在流亡中度过了17年，生活在阿拉伯领导人编织的幻想之中。1965年，他们决定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而非等待真主的佑助。”[38]

在最初的18个月中，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仍是一支边缘化的力量，很容易受到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的遏制。萨拉赫·赫莱夫称，在1965年1月至1967年6月期间法塔赫共开展了“约200次突袭行动”，但他也承认这些袭击“在规模上很有限，并无法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或稳定造成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人在1967年的失败对巴勒斯坦武装斗争而言却成为解放的时刻。考虑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现处于以色列人的占领之下，而非埃及或约旦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首次有机会以被占领土地上巴勒斯坦人代表的身份发声，正如1948—1967年期间那阵。此外，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从被击败的阿拉伯国家手中获得了自由。过去，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对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派别施加着严格的限制。“六日战争”后，心怀愧疚的纳赛尔不再阻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行动自由，而是利用其已被削弱的威信向其他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施压，要求后者允许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领土上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六日战争”结束伊始，约旦成为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的首要中心。在其武装部队遭遇毁灭性打击并失去约旦河西岸地区之后，侯赛因国王开始默许法塔赫的反以行动。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在约旦河谷的卡拉迈村建立了指挥部。以色列人开始留意法塔赫的准备工作。1968年3月，法塔赫接到约旦当局警告，称以色列人即将对其位于卡拉迈的基地发动突

袭。面对实力占优的以色列军队，巴勒斯坦人决定坚守阵地、抵抗敌军，而不是提前撤退。约旦人则同意从俯瞰约旦河谷的高地上提供炮火支持。

3月21日，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色列分遣队跨越约旦河，试图摧毁法塔赫的指挥部。约1.5万名以色列步兵和装甲部队向卡拉迈村和法塔赫训练营同时发起了攻击。马哈穆德·伊萨，一位在1948年被迫迁离阿卡的难民，当时就在现场。伊萨回忆说："我们收到命令，不要介入行动的第一阶段，艾布·阿马尔［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化名］亲自过来解释说，在这样绝望的局势下，只有通过计谋，我们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他毫不费力地说服了我们。在物力方面，我们无力保卫卡拉迈。"事实上，据现在估计，当时在卡拉迈只有250名法塔赫游击队员和行政人员，以及当时以卡拉迈为基地的约80名巴勒斯坦解放军成员。伊萨继续写道："我们唯一的选择，是伏击以色列人，并且要选择正确的时机。"[39]

伊萨和他的同伴在训练营外布置好阵地，以便在日落时分发起反击。伊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白昼慢慢地逝去，卡拉迈完全消失在暮色中，只剩下废墟。很多女人、男人和儿童遭到俘虏，还有很多人死去。"以色列人在约旦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完成任务后开始撤退。这正是伊萨和他的同伴等待的时刻。

> 当（以色列）坦克从我们阵地边驶过的时刻，我们收到发起进攻的信号。无论对我还是我的同志们而言，这都是个如释重负的时刻，就好像我们已经憋气憋了太长时间。我们径直向前冲锋，但还嫌跑得不够快。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的吃惊程度，他们眼见那些本以为已经埋藏在碎石瓦砾之下的突击队员现在突然向他们冲来。灯光熄灭了。跨越约旦河的桥梁被炸毁了。坦克的履带也停止了转动。在［约旦］炮火的掩护下，一场新的战斗打响了。

在以色列人完全撤出约旦领土之前，巴勒斯坦人凭借枪榴弹和轻型武器摧毁了多辆以色列军车，并对以军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伤亡。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卡拉迈之战是为求生存、反抗强大敌军而取得的一场胜利；而当以色列人在炮火下被迫撤退之时，卡拉迈之战也成为捍卫巴勒斯坦人尊严的时刻（值得一提的是，"卡拉迈"一词在阿拉伯语

中意为尊严或尊重）。然而，尊严的代价是高昂的。尽管阿拉伯媒体报告了一些夸大的数据，但至少28名以色列人、61名约旦人和116名巴勒斯坦人在这次行动中丧生。[40]但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卡拉迈之战却被奉为巴勒斯坦人的一场彻底的胜利。自1948年以来，首次有一支阿拉伯军队在战场上直面以色列人，同时证明其敌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法塔赫成为这次战役的首要受益者。莱拉·哈立德带着某种冷静的批评口吻回忆道："阿拉伯新闻媒体夸大了这一事件，结果看来似乎离完成解放巴勒斯坦的大业都只有一步之遥了。数千名志愿者蜂拥而入，金钱和武器更是积压如山。法塔赫——一个由几百名半正规的游击队员组成的组织——在阿拉伯人眼中似乎可以与1949年10月前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相提并论了。甚至连侯赛因国王也宣称他是一名突击队员！"[41]法塔赫的创立者之一萨拉赫·赫莱夫也表示他们的办公室已然被成群的志愿者淹没，志愿加入突击队的人数在战役后头两天就达到了约5000人。相应地，法塔赫反以军事行动的次数也迅速增长：从1968年的55次行动猛增至1969年的199次，在1970年的最初8个月中更是达到了顶点——279次。[42]

民众对巴勒斯坦武装抵抗运动尤其是法塔赫的支持，掩盖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内部分裂的宗派主义和深刻的政治分歧。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催生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也导致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由游击战争走向了激进主义。

1967年战争后，巴解组织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型。艾哈迈德·舒盖里从未对广义上的巴勒斯坦运动建立起有效的领导权，最终于1967年12月辞去了巴解组织主席的职务。尽管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处于接管巴解组织的优势地位，但法塔赫的追随者还是决定维持现状，保留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所有派系的门面，而法塔赫则成为巴解组织伞状结构下的主导性政党。1969年2月，亚西尔·阿拉法特当选为巴解主席，在2004年去世前他将一直保留这一职位。

并非所有的巴勒斯坦团体都接受法塔赫的领导地位。医生出身的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 1926—2008）领导下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

阵线”（以下简称“人阵”），与法塔赫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人阵”认为基于中国和越南模式，只有在一场社会革命之后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才可能取得胜利；相比而言，法塔赫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置于首位。这位“人阵”的领导人对法塔赫不屑一顾，认为法塔赫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破产的敌对组织，并被他眼中腐败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所玷污。

法塔赫控制了巴解组织之后，“人阵”领导层决定坚持他们自己通向巴勒斯坦革命的道路，唤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议题的关注。他们脱离法塔赫，以便通过在以色列境内的游击行动来寻求武装斗争；而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高伤亡率（根据以色列数据，至1969年底已有1350名游击队员被杀，2800人被俘），这一策略看起来越来越不切实际。[43]为实现唤起对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关注的既定目标，“人阵”转而采取针对境外以色列和美国目标的高调行动。

“人阵”是参与空中劫持行为的首个巴勒斯坦组织。1968年7月，3名“人阵”突击队员劫持了一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民航飞机，并命令飞行员在阿尔及尔降落。与劫持人质相比，劫机者更愿意举办一个记者招待会，因而毫发无损地释放了所有乘客。1968年12月，卡拉迈战役的亲历者马哈穆德·伊萨在雅典清空并破坏了另一架以色列航空的飞机。他收到上级的指示要向希腊政府投降，希望对他的审判能激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从而成为向全球听众展示巴勒斯坦议题的一个平台。伊萨原原本本地执行了他的任务，劫持并清空了飞机，随后在空荡荡的机舱内引爆手雷，并向迷惑不解的希腊政府自首。

作为对巴勒斯坦袭击其客机的回应，以色列人轰炸了贝鲁特国际机场，炸毁了黎巴嫩国家航空公司中东航空的13架波音飞机。“我们感谢以色列人争得了黎巴嫩人对［巴勒斯坦］革命的支持，”莱拉·哈立德不无嘲讽地评论道，“我们也非常赞赏他们如此大胆地炸毁了那些70%—80%的股权为美国人持有的飞机！”[44]

“人阵”认为其策略正在取得成果，坚信他们已然使国际社会聚焦于巴勒斯坦议题。“整个世界最终被迫关注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阿拉伯媒体无法忽视他们，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无法掩饰这些行动。”哈立德总结道。

[45]然而在国际媒体中，巴勒斯坦人正在赢得的声誉却是“恐怖主义”，这一标签将削弱他们的运动在西方公共舆论中的合法性。

正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一样，女性在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艾米娜·宰哈布尔（Amina Dhahbour）是第一位参与劫机行动的巴勒斯坦女性，1969年2月她在苏黎世强行控制了一架以色列航空的客机。宰哈布尔的行动鼓舞了其他投身巴勒斯坦运动的女性。莱拉·哈立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新闻频道听到这则消息后，便立即转告了她的女性同胞。“几分钟之内，我们集体庆祝巴勒斯坦的解放，庆祝女性的解放。”她回忆道。[46]

哈立德当时刚刚加入“人阵”不久。她志愿提出加入特别行动小组，随后被派往安曼接受训练。1969年8月，哈立德接到了她的第一次任务。“莱拉，”她的上司们对她说，“你要去劫持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她因这项任务而兴奋不已，将之视为一次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使命。[47]她坚定地认为劫持以色列和美国飞机的策略推动了解放巴勒斯坦运动的战略目标。哈立德写道：“总体而言，我们行动的目标并非要重创敌人——因为我们缺乏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而是为了传播革命话语、恫吓敌人、动员我方群众、将巴勒斯坦议题国际化、团结进步力量，并在西方公共舆论面前凸显我们的不满，因为西方舆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引导下（对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始终无动于衷。”[48]劫持这架客机的日期将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举办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年会上发表讲话的日期一致，即1969年8月29日。

考虑到今天机场内所采取的严密安保措施，莱拉·哈立德及其同伴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竟能如此轻易地将手枪和手榴弹偷运上环球840航班，似乎让人难以置信。起飞后不久，她的同谋者强行进入驾驶舱，并宣布飞机处于一位“新机长”的指挥之下，随后莱拉便接管了飞机的指挥权。“为了展现我的可信度，我立即把手榴弹的安全扣作为纪念品送给了［飞行员］卡特机长。他礼貌地拒绝了我的礼物。我把它扔在他的脚下，开始了我的演说：‘如果你服从我的命令，一切都会平安；如果你拒不合作，你要为乘客和飞机的安全负责。’”[49]

确保了对飞机的控制之后，哈立德开始充分享受她的指挥权。她命

令飞行员飞往以色列；直接与航线中的飞行交通管制员进行对话；还强迫以色列当局以“人民阵线，自由的阿拉伯巴的勒斯坦”取代“TWA840”，作为对该航班的称呼。在3架以色列战斗机的影随之下，她迫使飞行员在她的出生地海法上空盘旋，这也是自1948年以来她首次看到这座城市。最后，她命令飞行员在大马士革降落，最终所有的乘客都被安全释放。莱拉及其同伙被叙利亚政府软禁长达45天，随后才被允许返回黎巴嫩。他们的任务取得了完满的成功，且全身而退。

20世纪60年代末是巴勒斯坦突击行动的全盛时期。法塔赫在以色列境内的活动以及人民阵线的劫机行动，引发了全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也使全球范围内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心生希望。然而，巴勒斯坦革命与其客居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迅速恶化。这种紧张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黎巴嫩和约旦。

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黎巴嫩享有相当高的公众支持率，那些不满于马龙派主导下保守政治秩序的左翼和穆斯林群体尤其如此。但黎巴嫩政府却将巴勒斯坦运动视为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一个直接威胁。1968年以色列突击队员突袭贝鲁特机场之后，黎巴嫩政府试图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严厉措施。1969年，黎巴嫩安全部队与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爆发冲突。埃及总统纳赛尔介入，最终在黎巴嫩政府与巴勒斯坦各派系之间达成一个和解方案。1969年11月的《开罗协议》为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领土内开展行动设定了基本规则，允许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黎巴嫩领土内开展活动，并承认了巴各派系对生活在黎巴嫩境内难民营的超过30万巴勒斯坦人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开罗协议》仅在黎巴嫩政府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之间提供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停战协议，在未来的6年内，该协议将逐渐趋近于崩溃的临界点。

与约旦王国的关系甚至更加不稳定。一些巴勒斯坦派系公开呼吁推翻“反动的”哈希姆王室，以便通过社会革命来动员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众。在他们看来，这样一场社会革命是解放巴勒斯坦必要的第一步。萨拉赫·赫莱夫承认游击队员应部分地为双方关系的崩溃而负责。“的确我们自己的行为并非完全一致，”他写道，“出于对自身力量和冒险行为的

自豪，突击队员（fedayeen）常常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有时甚至是傲慢，同时并没有考虑到约旦本地人的感受和利益。更严重的是他们对约旦军队的立场。他们对待后者好像对待敌人，而非潜在的盟友。”[50]巴勒斯坦各派系都深信，侯赛因国王对他们阳奉阴违，在反对巴勒斯坦事业方面与美国人甚至以色列人站在了同一边。

至1970年，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已经走上了对抗的道路。6月，“人阵”将美国驻约旦使馆第一秘书劫为人质，还劫持了安曼市内两个最大的酒店——洲际酒店和费城酒店，绑架了80多名房客。作为回应，侯赛因国王命令军队袭击了安曼多个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阵地。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周之久，直至双方达成休战，所有人质才被释放。莱拉·哈立德很后悔“人阵”没有坚持继续战斗，她在日后的回忆中表示：“我们错过了推翻侯赛因的机会，当时我们既享有民众的信任，也具备实力击败他那支四分五裂的部队。”[51]

1970年9月，“人阵”再次发难，劫持了另一架飞往雅典的飞机，并要求释放马哈穆德·伊萨。1968年袭击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民航客机的事件之后，伊萨就被关押在雅典的一间肮脏的牢房之内，完全被世人遗忘。他曾幻想的旨在让国际社会聚焦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审，在希腊从未变为现实。由于这一大胆且成功的劫持行动，“人阵”登上媒体头条，并成功迫使希腊政府释放了伊萨。

伊萨回到约旦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不到两个月，他就接到了另一项任务——他将为“人阵”的一项重大行动准备一条飞机起落跑道，这一行动计划同时劫持3架以色列和西方飞机，并将这些飞机停落在约旦荒漠地区。“人阵”希望通过上述方式占据世界媒体的头版头条，同时确立巴勒斯坦革命对约旦的权威。这是一次有意的挑衅，也是对侯赛因国王及其军队的公然挑战。伊萨开始在约旦首都安曼以东的一条被称为道森机场的废弃跑道上开展工作，该机场也因这一行动而被重新命名为“革命机场”。

1970年9月6日，“人阵”突击队员登上了美国环球航空一架由法兰克福飞往纽约的客机，以及瑞士航空一架由苏黎世飞往纽约的客机，迫使两架飞机在约旦降落。

同一天，“人阵”还指派了4名突击队员去劫持一架以色列客机，但以色列国家航空的地勤人员拒绝让两名准劫机者登机。后者转而选择劫持一家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泛美航空的飞行员以跑道长度不足以容纳体型庞大的波音747客机为由，拒绝在道森机场降落。他驾驶飞机飞往了贝鲁特，在那里“人阵”爆破小组在该机头等舱上安装了爆炸引线，随后命飞机继续飞往开罗。劫机者向乘客和机组人员声称在飞机着陆后，他们只有8分钟时间用于撤离飞机。事实上炸药在飞机着陆仅3分钟后随即引爆。值得庆幸的是，机上全部17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飞机爆炸前全部安全撤离。

另外两名“人阵”任务执行者成功地登上了以色列航空一架由阿姆斯特丹飞往纽约的航班，为首者正是环球840客机的劫机者莱拉·哈立德。鉴于自1968年起受到一系列攻击，以色列航空强化了安全措施——驾驶舱门得到加固，且每架航班都配备了空中警察。起飞后不久，莱拉和她的同伴试图控制飞机，但遭遇了空中警察和机组人员的顽强抵抗。双方共发射了14发子弹，造成一名以色列机组人员重伤、劫机者帕特里克·阿奎罗死亡（莱拉·哈立德称后者在飞机上被当场处决）。哈立德最终被制伏并解除了武器。为了输送受伤的机组人员，飞行员在伦敦紧急迫降。英国政府将阿奎罗的尸体运下飞机，并逮捕了莱拉·哈立德。“人阵”迅速做出回应，于9月9日在巴林劫持了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随后该客机在约旦“革命机场”与瑞士航空和泛美航空两架客机完成会合。

这一连环劫机案，加之在开罗被炸毁的泛美航空客机，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在空中劫持方面，1970年9月连环劫机事件直至2001年9月才被超越。考虑到约旦境内3架飞机在其掌控之下，“人阵”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释放莱拉·哈立德、被拘押在联邦德国的3名游击队员、在瑞士遭到扣押的另外3名游击队员，以及被以色列囚禁的数量不明的巴勒斯坦人。如果其要求在3天内未得到满足，被劫持的客机——机上共载有31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将全部被摧毁。事实上，由于不愿因杀害人质而疏远国际公众舆论，“人阵”不久就开始释放妇女和儿童。人质亲身经历的描述垄断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9月12日，剩余的乘客被“人阵”武装人员带下飞机，作为人质被扣押在“人阵”控制下的一所位于安曼市中心的酒店。空飞机上被安置了炸药，在一系列巨大的爆炸声

中化为乌有，而这一切都被全世界媒体的电视镜头捕捉下来。

5天后，随着约旦军队向巴勒斯坦革命正式宣战，一场更大的爆炸也接踵而至。对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军队而言，巴勒斯坦各派系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东道国的容忍范围。卡拉迈的兴奋已经让位于“黑九月”（这场将巴勒斯坦革命逐出约旦领土的战争后来被这样称呼）。“人阵”毫不掩饰其推翻约旦王室、将约旦转变为解放巴勒斯坦的发射台的意愿，而在约旦领土上发动劫机暴行的决定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塔赫谴责“人阵”的所作所为，但约旦人已不再区别对待不同的巴勒斯坦派系。在约旦已没有巴勒斯坦革命与哈希姆王室共存的空间。

“人阵”在约旦领土上开展激进暴力活动的大胆行为，彻底激怒了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军队。约旦军队中有些部门试图介入道森机场的劫机事件，但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却以杀害人质相威胁。约旦士兵被迫撤退并避免开火，等待人质危机解决后再采取行动。这种面对巴勒斯坦人威胁而毫无作为的表现让约旦士兵雄风扫地，几乎逼得他们发动一场反对国王的哗变。当时一则广为流传的趣闻称，在国王检阅装甲部队时，士兵们将女性内衣挂在他们的天线上以示抗议。“现在是我们成为女人了。”一位坦克指挥官对国王说道。[52]

9月17日，侯赛因命令他的部队采取行动。“黑九月”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战争，在10天的时间里，巴勒斯坦游击队与约旦军队激烈交火，双方冲突险些扩大为一场地区战争。作为四分五裂的中东地区一个保守君主国的首脑，侯赛因受到“进步”阿拉伯邻国的威胁，这些邻国希望站在巴勒斯坦一方介入冲突。侯赛因面对着来自伊拉克部队的严重威胁，这些军队自“六日战争”起就被部署到约旦，他的北部省份还遭到了打着巴勒斯坦解放军旗号的叙利亚坦克的实际入侵。

现在，侯赛因的军队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要同时对抗巴勒斯坦人和入侵的叙利亚军队。考虑到军队战线拉得过长，侯赛因用上了他与美国和英国的友谊，甚至寻求以色列人的援助，以保护约旦领空免遭外部袭击。但西方军事介入又可能引发苏联的回应来保护其地区盟友。纳赛尔呼吁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冲突彻底失控之前，协调出一个解决方案。

最后是纳赛尔凭借其威信才于9月28日将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国王聚

集在开罗，来解决两人之间的分歧。基于阿拉伯国家首脑协商而达成的一份协议，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同意完全停火。劫机戏码中剩余的西方人质被从酒店和“人阵”控制下的不同扣留场所释放。英国政府悄悄释放了莱拉·哈立德和多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但已造成的损失已然无法弥补——即便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也无力回天。在“黑九月”战争中，约3000名巴勒斯坦战士和平民被杀，约旦方面也遭遇了数百人的伤亡。安曼市在10天的战斗之后满目疮痍，市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则被夷为平地。

连续多日紧张的谈判让埃及总统付出了代价。1970年9月28日，在送别了侯赛因和阿拉法特之后，纳赛尔回到家中，突发严重心脏病，于当天下午5点去世。

当夜，开罗广播中断了常规节目的播放，诵读了一段庄严的《古兰经》经文。在适当的停顿之后，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宣布了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的死讯。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说：

> （这一消息）瞬间引发极大的反应。人们在深夜涌出家门，走向尼罗河岸边的广播站，只是为了探清他们刚刚听到的消息是否属实。……开始街上只能看到小股的人群，随后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涌上街头，再后来整个街道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没有人能挪动哪怕一步。广播站外一群妇女在尖叫，她们哭喊着说：“狮子死了！狮子死了！”这声哭喊在整个开罗激起了回响，随后又传遍千村万落，直到传遍整个埃及。在那一夜和随后的几天里，人们哀悼他的离世，悲痛欲绝。很快，人们开始从埃及的各个角落涌入开罗，直到整座城市人口达到1000万。政府暂时停运了火车，因为开罗已没有供人住宿的空间，食物供给也趋于短缺。但人们还是从四方赶来，无论是驾车、骑驴，还是徒步。

悲伤的情绪溢出了埃及的边境，传播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主要城市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纳赛尔身上寄托着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希望和诉求，这一点超出了其生前或身后的任何领导人。然而在纳赛尔去世之前，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然寿终正寝：叙利

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发生的阿拉伯国家内战、1967年战争的惨败以及整个巴勒斯坦土地的沦陷，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诉求构成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最终使之一蹶不振。“黑九月”事件尖锐地反映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深刻分歧。沿着冷战的阵营分野，阿拉伯国家逐渐分裂为美国盟友和苏联支持者两大阵营，似乎只有纳赛尔能超越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加深的分歧。

至1970年，阿拉伯世界彻底分裂为众多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国家。1970年之后，阿拉伯国家之间还会有一些高调的统一方案，但没有一个方案对所涉国家的完整性构成挑战，而且没有一个持续下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阿拉伯统一方案，仅是一些旨在赋予阿拉伯政府合法性的公共关系活动，因为这些政府深知阿拉伯民族主义仍对公民保有强烈的吸引力。各国政府继续对抗击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解放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共同议题施以口头支持，但却无不聚焦于自身利益。而随着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开始产出巨大的财富，并给予阿拉伯人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一股新的力量正逐渐控制中东。

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多事之秋，阿拉伯世界受到石油力量的形塑。

大自然并没有在阿拉伯国家之间均匀地分配石油资源。在伊拉克，浩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几千年来养育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但除伊拉克以外，阿拉伯世界绝大部分石油储量都分布于人口最稀少的国家：沙特、科威特、其他海湾国家，以及北非的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在埃及、叙利亚、约旦却只有象征性的发现，尚不足以满足本国能源需求。

石油在阿拉伯世界首次被发现，要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随后的40年内，西方石油公司牢牢控制着阿拉伯碳氢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阿拉伯产油国的统治者们逐渐富有起来，在20世纪50—60年代启动了一系列发展计划，以便使国内贫困人口分享到石油财富的利益。

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才将石油转变为阿拉伯世界权力的来源。全球范围内对石油依赖的增长，美国石油产量的下降，以及威胁到中东向工业世界出口石油的政治危机，这一系列因素共同造就了70年代史无前例的高油价。在这10年的进程中，阿拉伯国家逐渐从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夺回了对其国内石油以及伴随而生的权力的控制权。

在现代历史中，石油在阿拉伯人的财富与权力的界定方面超出了任何其他商品的影响力。但石油也象征着某种虚假的权力：石油产出的巨大财富使一个国家更容易遭受外部威胁；石油财富既可用于发展，又可通过军备竞赛和地区冲突而被用于毁灭。石油的作用好坏参半，但最终，在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石油没有给阿拉伯国家带来多少安定，甚至反而让整个地区动荡不宁。

20世纪初起，中东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方兴未艾。当时，石油公司与产油国之间的关系受到政府向公司发放的特许权-许可证的制约；根据

这类经营许可，石油公司将向政府支付一定的费用，以换取勘探并开发石油资源的特权。有商业利润可图的石油储量先后在伊朗（1908）和伊拉克（1927）被发现；1931年起，西方石油业人士开始将目光投向波斯湾的阿拉伯海岸。最开始，急需现金的本地统治者将开发权出售给英国和美国公司，后者则需担负石油勘探的全部风险和费用。

对于波斯湾的石油业先驱而言，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有一些公司钻探了多年，却没有一丝半点的发现。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石油从业者不断在阿拉伯半岛取得重大发现：1932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巴林发现油田；1938年，加德士公司在科威特勘探到巨大的石油储量；同样是在1938年，经过6年令人失望的勘探之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沙特东部省份终于收获了第一个重要发现。

在确实勘探到石油以后，这些公司会向其所在国支付油区土地使用费，然后将剩余的利润据为己有。阿拉伯统治者也没有怨言，因为他们并没有为石油收入付出任何劳动。石油收入很快就超过了（这些国家）国民收入中所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西方石油公司则担负着为全球市场运输并精炼阿拉伯石油的巨额费用。在阿拉伯半岛提取石油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在早年尤其如此：一方面要铺设输油管道，委托油轮来运输石油；另一方面还要建立新的炼油厂，将阿拉伯半岛的原油转化为市场上有销路的产品。在这些石油公司看来，由于是他们独自承担巨大的风险和成本，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开采这一资源，由他们完全控制其生产（开采多少石油）和销售（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制定价格）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到1950年，产油国开始越来越不满于最初特许经营权的条款。一旦石油开采、运输、精炼的基础设施到位后，石油公司就可从其投资中获得巨额利润。1949年，对沙特石油享有排他性特权的阿美石油公司——一个由4家美国公司（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德士古）组成的财团——收获的利润相当于沙特政府的3倍。更糟糕的是，阿美石油向美国联邦政府缴纳的税款也要比沙特的收入额高出约400万美元，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从沙特石油上赚的钱比沙特人还要多。[1]

海湾阿拉伯国家要求获得更多的石油利润份额，这一方面是为了支

持其越来越宏大的发展计划，一方面也是为石油资源耗尽的那一天未雨绸缪。他们的请求有先例可循：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在1943年成功地实现了与特许权拥有者对石油收益的平分。因而在石油收入的分配方面，阿拉伯国家决心达成同样的份额。1950年12月，沙特与阿美财团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平分石油收益的协议，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很快也都如法炮制。对石油收入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分配比例，也反映出双方都可接受的一种平等合作关系。但西方石油公司对任何试图打破五五分成的尝试都采取了抵制立场，担心产油国会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上风。

受益于其巨大的石油储量，阿拉伯产油国将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波斯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区。1948—1972年，中东石油日产量由110万桶猛增至1820万桶。[2]尽管产油国当时在石油收益方面与外国石油公司享有平等的份额，但后者仍控制着有关生产与定价的一切事宜。在石油开采的早期岁月，西方石油商人尚可合理地宣称，相比于阿拉伯谈判方，他们对与石油相关的地质、化学、经济学方面拥有更深入的理解。但到60年代，情况不再如此。阿拉伯产油国正派遣他们最优秀的学生前往西方顶尖大学学习地质学、石油工程和管理学。拥有高级学历的新一代阿拉伯技术官员回到他们的政府工作岗位，对于外国石油公司对其国家自然资源和国民经济所施加的权力表示强烈不满。

阿卜杜拉·图雷基（Abdullah al-Turayqi）属于最早的一批阿拉伯石油专家。图雷基于1920年出生于沙特，纳赛尔统治时期在埃及学习长达12年，在那里接受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教育。随后，他赴奥斯汀大学学习化学和地质学，最终于1948年返回沙特。1955年，他被任命为沙特石油与矿产事务管理局局长，从而成为沙特石油工业中级别最高的沙特官员。凭借这一职务，图雷基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产油国的政策制定者。他敦促阿拉伯石油商人通过集体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3]

其他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中的大多数都不愿破坏现状。由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石油开始大量涌入市场，他们面临着石油过剩的局面。如果阿拉伯国家向外国石油公司提出过多的要求，后者可能会径直选择去其他地方开采石油。毕竟，主要的石油公司都是一些全球性的巨头，在美洲、非洲和中东都握有丰富的储量。考虑到不久前刚刚从外国石油公

司手中取得了石油利润的五五分成，大多数阿拉伯产油国对于继续索求更大的份额持谨慎立场。

1959年时，英国石油公司做出了将石油标价下调10%的致命决定，阿拉伯产油国从对现状的自满中惊醒。苏联石油的过剩对国际石油价格产生了真实的压力，因而英国石油公司的这一决定仅仅反映了市场现实。但这一看似理性的决策，其问题在于，英国石油公司并未向产油国预先通知其决定。由于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双方的收入都基于石油标价，这一单方面的决定就意味着石油公司在未与产油国协商或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削减了其政府收入，亦即其国家预算。在不经意之间，英国石油公司揭示了石油公司和产油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多么地不平等。

阿拉伯产油国感到无比愤怒。在油价下调事件之后，图雷基发现其他石油部长/大臣对集体行动的想法持更加开放的立场。1959年4月，在首届阿拉伯石油大会会议间歇期间，图雷基在位于开罗市郊麦阿迪区的一个帆船俱乐部，秘密会见了来自科威特、伊朗、伊拉克的政府代表。这些阿拉伯石油从业者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维护油价并创立国有石油公司。他们的目标是打破五五分成的门槛，最终与西方石油公司达成一个六四分成的收益分配方案，从而确立对石油资源的国家主权原则。

1960年8月阿拉伯产油国进一步坚定了意志。当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犯了与英国石油公司相同的错误，单方面将石油标价下调了7%。这一举措在产油国中激起了极大愤怒，甚至让最谨慎的人士也确信，只有在确立对本国石油资源控制权的情况下，阿拉伯人才能摆脱西方石油公司的控制。图雷基又出访伊拉克，提议与委内瑞拉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石油公司。访问期间，这位沙特石油大臣提议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卡特尔组织，以保护产油国免受西方石油公司的独断行为。时任伊拉克财政部部长穆罕默德·哈迪德（Muhammad Hadid）在回忆图雷基的这次访问时表示：“伊拉克政府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并在巴格达召开了一次产油国会议，其间各国代表就建立该组织达成一致。”1960年9月14日，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委内瑞拉宣布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以欧佩克（OPEC）而闻名。[4]

至1960年，在北非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阿拉伯产油国：1956年和1959年，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分别发现了可用于商业交易储量的石油。晚进入的优势就在于北非国家可以吸取海湾阿拉伯同胞的经验教训，确保在石油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方面获得最佳的条款。

石油被首次发现时，利比亚还是一个贫穷的欠发达王国。截至1943年，利比亚领土一直处于意大利的殖民统治之下。盟军占领意大利后，控制权又转移至英、法两国手中。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块领土被联合为利比亚王国，并于1951年获得独立。鉴于战争期间在反对轴心国势力方面提供的服务，英国把利比亚王位奖赏给了强大的赛努西教团的首领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赛努西（Sayyid Muhammad Idris al-Sanussi, 1889—1983）。1951—1969年，赛义德穆罕默德以伊德里斯一世国王的身份统治着利比亚，并见证了其国家如何通过发现石油，由贫穷走向富有。

早在石油发现前的勘探阶段，利比亚人就急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石油资源。与那些将广袤领土的特许开发权出售给国际石油巨头的阿拉伯国家不同，伊德里斯国王的政府决定，一方面将目标勘探区分割为众多较小的特许开发区，另一方面有意倾向于独立的石油公司。利比亚人的理由是独立公司可用于供油的替代性来源相对较少，因而与那些在全世界作业的石油巨头相比，将有更多的动力开发利比亚原油并将之带入国际市场。他们的策略是成功的：至1965年即发现石油后仅6年，利比亚已经一跃成为非苏联世界的第六大石油出口国，占该地区全部石油出口量的10%；1969年，利比亚的石油出口量已经与沙特持平。[5]

尽管统治着一个新兴的繁荣国家，伊德里斯国王在国内却被批评为一个亲西方的保守君主。利比亚军队中一群年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军官将国王视为一名英国间谍，其首领是一位名叫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年轻上尉（1942年出生）。这些军官认为，为了使利比亚摆脱外国控制、实现完全独立，必须推翻伊德里斯国王。1969年9月1日凌晨，他们在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中推翻了利比亚王室，当时年迈的国王正在国外接受治疗。

当天早晨6点30分，在通过广播向利比亚人民发布的第一份公报中，卡扎菲正式宣布了王室的倒台以及利比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建立，他

的话里满是历史性的暗示：“利比亚人民！你们的武装部队已经推翻了这个臭名昭著的腐朽政权，一下子就点亮了漫长的黑夜。漫漫长夜中，先是意大利取代了土耳其人的统治，接着就是这个反动、腐朽的政权，这个政权不过是一张滋生勒索、分裂与阴谋的温床。”他向利比亚人民许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代中，所有人都将是自由的，都将成为兄弟；在真主的佑助下，繁荣和平等将眷顾我们所有人”。[6]

利比亚的新领导人是纳赛尔的狂热崇拜者。夺取政权伊始，卡扎菲就晋升至上校军衔（1952年埃及革命时纳赛尔的军衔），并且仿照埃及模式建立了一个“革命指导委员会”来监督新的利比亚共和国政府。“告诉纳赛尔总统，我们是为了他才发动了这场革命。”政变刚一结束卡扎菲曾这样对穆罕默德·海卡尔说道。[7]

1970年9月纳赛尔去世后，卡扎菲自封为纳赛尔的意识形态继承人。自此以后，反殖民主义和阿拉伯统一将成为利比亚外交政策的特征。利比亚新政府开始推广阿拉伯语（外语的街道名称被阿拉伯化）、强加伊斯兰教的种种限制（禁止酒精，关闭教堂），以利比亚人民的名义没收外国人所有的财产，从而推进国家经济的“利比亚化”。英国、美国军事基地被关闭，所有外国部队都被驱逐出境。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利比亚新政权接管了西方石油公司，深信后者对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代表着对利比亚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最大威胁。

石油政策方面，卡扎菲上校转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石油专家阿卜杜拉·图雷基（1962年费萨尔国王即位后，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宰基·也门尼的年轻技术官员取代图雷基，出任沙特石油大臣）。1967年，图雷基曾表示：“只有那些将石油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产油国，才有权为其主要自然资源设定公平的价格。”卡扎菲有决心打破西方石油公司对阿拉伯产油国的控制，在这方面两人可谓志同道合。[8]1970年，卡扎菲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确立利比亚对其石油资源完整主权的政策，西方石油公司则成为主要的利益受损者。

1970年1月，卡扎菲召集在利比亚作业的全部21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举行会议，以重新商定双方合同的条款。西方石油商人不安地坐在他们的椅子上。他们正在努力适应利比亚新的军人统治者。公司主管们宣

布抵制对其在利比亚经营方式的任何改动，这时卡扎菲突然对这些石油商人大发雷霆，表明他宁愿完全中断利比亚的石油生产，也不愿让其国家遭受西方利益的剥削。他警告说：“人民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生活了5000年，为了争取其合法权利，他们有能力再次在缺少石油的情况下生活几年。”在卡扎菲严厉目光的注视之下，西方石油商人坐立不安。[9]

卡扎菲强迫西方石油公司立即做出决定，并将他的价格强加给这些公司。当年4月，利比亚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幅度要求每桶石油价格上调20%（0.43美元），而当时的交易价仅为每桶2.20美元。作为答复，石油巨头埃索（埃克森公司在欧洲的隶属企业）提出每桶石油仅涨价5美分，且坚持自己的方案。考虑到其可替代的石油来源，埃索和埃克森并不受卡扎菲威胁的影响。

作为回应，利比亚人有意挤压那些稍小的独立石油公司。正如利比亚石油专家阿里·阿提嘉（Ali　Attiga）所回忆的，“利比亚政府学会了利用独立公司来提高油价，而且利用得很好”。利比亚人在选择他们的目标时是非常仔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之前完全默默无闻；依靠在利比亚沙漠中的发现，该公司竟一跃成为西方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缺少利比亚之外的其他石油来源，因而完全依赖利比亚石油来履行合同。在这一背景下，利比亚政府强令该石油公司大规模减产。随着政府强加的减产开始生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开始匆忙地寻找其他石油来源，以便履行其对欧洲消费者的承诺。但鉴于其日产量被利比亚政府由84.5万桶骤减至46.5万桶，西方石油巨头无一愿向这家脆弱的独立公司施以援手。其他石油公司同样被勒令减产，但没有一家所受的负面影响像美国西方石油公司那么严重。阿提嘉宣称：“现在，减产促成了两件事：一方面迫使独立公司接受涨价，因为这些公司并没有履行其合同所需的其他供应来源；另一方面则推动开启了一个石油供应短缺时期。”供应短缺则将向上拉动油价。[10]

利比亚的政策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年轻的卡扎菲政权也战胜了各石油公司。最后，在1970年9月签订的一份标志性的协议中，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主席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被迫接受了利比亚政府的条款，同意将利比亚石油的标价史无前例地提高30美分，达到每桶2.53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同意将石油利润中的多数让给利

比亚政府，在产油国和石油公司之间引入了一个55%对45%的全新利润分配比率，从而打破了在过去20年内得到普遍奉行的五五分成协议。在石油（开发）历史上，首次有一个产油国获得了其石油收入的多数。

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先例很快被施加到在利比亚作业的所有石油公司身上，而利比亚的先例很快被伊朗和阿拉伯产油国模仿。1971年2月，伊朗、伊拉克、沙特签订了《德黑兰协议》（Tehran Agreement），规定产油国收益的最低比率为55%，并将石油标价进一步提高了0.35美元/桶。《德黑兰协议》之后不久，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又于1971年4月进一步将地中海市场中的油价提升了0.9美元/桶。这些协议开启了两个趋势：一是产油国有规律地提高石油标价，二是石油公司所享受利润份额有规律地减少。这既标志着西方石油大亨时代的终结，也象征着阿拉伯石油酋长时代的开端。

1971年，最后一批海湾国家脱离英国保护，实现完全独立。在去殖民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风云激荡的整个时期，停战诸国仍与英国保持着特殊的协约关系。巴林、卡塔尔的独立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成立，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终结。1820年，英国在波斯湾开始其在中东的帝国扩张，一个半世纪后，这一帝国也在同一地区寿终正寝。

严格来说，海湾诸酋长国并非英国殖民地，而是通过19世纪签订的一系列协议而与英国保持着特殊关系的独立微型国家。这些酋长国长期将外交关系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作为交换，英国保护其免受外部势力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威胁。19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开始寻求拓展其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

1968年时仍有9个海湾国家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即自1946年起就作为英国驻海湾政治代理处驻地的巴林，以及卡塔尔、阿布扎比、迪拜、沙迦、哈伊马角、乌姆盖万、富查伊拉和阿治曼。英国长期利用其在海湾的特殊地位来确保英国公司取得丰厚的石油特许权，特别是在阿布扎比和迪拜，且试图继续对该地区施加超出其不断下滑的国际地位的影响力。海湾国家统治者则完全满足于现状，因为这一安排能够保护这些微型国家的生存，使其免遭沙特、伊朗等觊觎其富含石油领土的强大

邻国的威胁。

有鉴于此，实际上是英国人而非停战诸国当政的酋长们开启了海湾地区去殖民化的进程。1968年1月，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突然宣布将于1971年底之前放弃对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承诺的义务，这一表态让海湾统治者完全措手不及。英国撤出波斯湾的决定是由其国内经济困境促成的。1967年11月，为扭转贸易和国际收支逆差，威尔逊被迫将英镑贬值。在类似紧缩措施的背景下，英国政府无法再为维持其在波斯湾军事基地的开支辩护。此外，执政的工党遵照其政党文化，公开反对在撤出印度20年后仍然维持帝国的运转，这更凸显了上述经济问题。

酋长们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放走英国人——准确地说，是拒绝英国人背离协议中对保护其地区免遭外部侵略的承诺。他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沙特宣布对盛产石油的阿布扎比的绝大部分领土拥有主权，伊朗则宣布对岛国巴林以及横跨几个重要近海油田的较小岛屿拥有主权。在之后的3年中，巴林将所有的外交智慧都投入到海湾领土所有权分歧的解决之中，并大力鼓动停战诸国合并，认为这一尝试将赋予这些国家足够的体量以应付波斯湾凶险的政治风浪。

1970年，伊朗国王放弃了对巴林的领土要求。巴林的统治者谢赫伊萨·本·萨勒曼（‘Isa bin Salman）也便退出了与其他休战国家的合并谈判，并于1971年8月14日宣布其国家独立。巴林的邻国、同时也是长期对手的半岛国家卡塔尔，很快于1971年9月3日宣布独立。剩余7个国家间分歧依旧显著，但却并非是不可跨越的。随着英国撤离截止日期的临近，其中6个国家达成一致，于1971年11月25日建立阿拉伯酋长国联盟（后来改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国家是哈伊马角，该国为抗议伊朗对其两个岛屿——大小通布岛的领土要求而拒绝加入联盟。哈伊马角认定自己对争议岛屿拥有主权，认为英国有责任维护这块主权领土。英国人则认为伊朗的善意对于保全海湾国家的领土完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而为维护联盟整体的独立，情愿牺牲哈伊马角两个较小的岛屿。在英国人的协调下，沙迦和伊朗就另一个争议岛屿艾布·穆萨岛的领土划分问题达成了一

项协议。在英国人看来，类似的让步是为避免伊朗国王兴风作浪而做出的必要妥协。最终，哈伊马角也加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后者在1971年12月6日被承认为阿盟成员，3天后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撤出海湾地区的做法，却使其与两个最热衷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帝主义理想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趋紧。伊拉克宣布与英国断交，以抗议后者包庇伊朗占领阿拉伯领土——艾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利比亚则更进一步，于12月7日宣布将英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国有化，作为英国将阿拉伯领土拱手送给伊朗的惩罚。对阿拉伯石油依赖的增长使得西方很容易受到此类惩罚措施的影响，阿拉伯人也开始将石油视为达成政治目标的武器。很快，阿拉伯世界就开始考虑如何在与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的斗争中运用石油武器。

*

卡扎菲上校的石油顾问阿卜杜拉·图雷基，很早就预见到石油可能成为重塑地缘政治的有力工具。1967年6月战争后几个月，他在位于贝鲁特的巴解组织研究中心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将阿拉伯石油形容为“战场上的武器”。在给出战略性地运用石油对抗以色列盟友的合理依据后，图雷基论证说：“每个国家都有权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向敌人施压，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阿拉伯国家则拥有可用来对抗敌人的最强大经济武器之一。”他指出，阿拉伯人拥有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的58.5%以上，工业化世界在能源供应方面对阿拉伯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美、英、德、意、荷支持对手以色列的情况下，阿拉伯人为何还要继续向西方供油呢？图雷基在结论中写道：“阿拉伯人民呼吁动用石油武器，每一个阿拉伯政府都有责任满足人民的意愿。”[11]

运用石油武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图雷基比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在1967年6月战争中石油武器的效果是多么地微弱。6月6日即战争爆发当天，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举行会议，一致同意禁止向支持以色列的美、英及联邦德国三国供油。在48小时之内，沙特和利比亚完全中止了石油生产。阿拉伯石油产量锐减60%，从而向西方市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工业化世界经受住了对石油武器的第一次使用。一旦进入国

际市场后，追踪石油的目的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就使得被禁运的国家能够通过从不受禁运影响的中间商购油，绕开对直接购买的禁令。美国和其他非阿拉伯产油国扩大了产油量来弥补短缺，日本人则动用了新的“超级油轮”舰队来向全球市场运送石油。1个月之内，各工业国完全恢复了石油供应，也表明阿拉伯产油国这一姿态无效，而同时，禁运措施却使这些国家失去了关键的收入来源。至1967年8月底，战败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呼吁其产油兄弟国恢复生产，以便帮助他们担负战后重建的重担。

石油武器不仅在1967年战争中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在战争结束后还长期损害了阿拉伯经济。阿拉伯石油重返国际市场使得市场供过于求，导致油价下跌，这样石油武器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对阿拉伯国家的伤害远甚于对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然而在1967年战败后，阿拉伯军队的士气是如此低迷，以至于很多政策制定者仍相信阿拉伯世界更有可能通过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实现其反抗以色列的目标。

1967年战争的创伤带来的痼疾，对埃及的影响比对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要严重。埃及军队的惨败以及整个西奈半岛的丢失，又与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混合在一起。埃及面临一张庞大的战后重建账单，这一点又因苏伊士运河的关闭、旅游业的崩溃而雪上加霜，而后两者是埃及最重要的两大外汇来源。

1967年战争后，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前景比以色列建国以来的任何时刻都要渺茫。国际社会在埃、以两国间协调一个解决方案的努力，因双方敌对的立场而搁浅。以色列方面希望保留全部西奈半岛，将之作为迫使埃及签订一项完全的和平协议的谈判筹码。埃及政府则将收回西奈半岛作为任何和谈的先决条件。

对埃及而言，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停留的时间越久，国际社会承认以色列对埃及领土占领的可能性就越大。纳赛尔总统决心要防止以色列人将苏伊士运河转变为埃、以两国间的实际边境线，因此在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之间对以色列展开了一场未正式公布的消耗战。埃及人通过突击行动、密集炮火打击、空袭等方式，试图摧毁以色列人在苏伊士运

河沿岸的阵地。作为回应，以色列人在运河沿岸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即巴列夫防线——以时任以军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Chaim Bar-Lev）将军的名字命名，并发起了一系列深入埃及国土的空袭。

在消耗战几个月的时间里，以色列人继续证明着他们对埃及人的军事优势。埃及人缺乏有效的防空系统，使得以色列人得以自由地攻击开罗市郊以及尼罗河三角洲的城市。阿卜杜·加尼·盖迈西（Abd al-Ghani El-Gamasy）将军分析道："（敌人的）目标是迫使埃及人民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从表面上凸显政治领导层的弱势，最终迫使后者停止消耗战。这些空袭隐藏的信息是，既然埃及军队始终无法认识到战斗是徒劳无益的，就用空袭向埃及人民直接揭示这一点。"[12]

尽管以色列空袭并未推动埃及民众反对其政府，但消耗战对埃及的伤害要远大于以色列。纳赛尔逐渐对美国的调解表现出开放立场。1970年8月，作为由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推动但最终夭折的和平计划的一部分，纳赛尔同意与以色列人实现停火。但纳赛尔在次月就与世长辞，这也使得埃、以在解决分歧方面依旧前路漫漫。

纳赛尔的继任者是他的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尽管同样身为自由军官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参与了1952年革命，而且是革命指导委员会最初的成员之一，但萨达特在埃及国内外始终默默无闻。他不具备纳赛尔的个人魅力或公众吸引力，因此为了保住权力就必须证明自己。

上任伊始，萨达特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乐观。尼克松政府正在谋求与埃及的盟友苏联缓和关系。而随着超级大国间紧张关系的趋缓，诸如阿以冲突之类的地区争端在莫斯科和华盛顿议程上的紧迫性便有所下降。为此，在冲突双方为解决分歧而展现出更务实的态度之前，苏联人和美国人情愿维持现状，即阿以之间"不战不和"的政策。萨达特深知维持现状对以色列人有利。每过一年，国际社会就更加接受以色列对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控制。

为打破这一僵局，萨达特必须采取主动。他需要迫使美国人重新介入阿以冲突，敦促苏联人向埃及军队提供高科技武器，同时向以色列人

发出收复西奈的真实威胁。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不得不走向战争，但仅仅是一场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而发起的有限战争。

作为走向战争的第一步，1972年7月，萨达特将埃及国内全部2.1万名苏联军事顾问驱逐出境。这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举动，但目的是迫使美、苏两国重新介入阿以冲突。美国人开始质疑埃及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考虑将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策反至亲西方阵营的可能性。正是这一威胁刺激了苏联人，改变他们对庇护国埃及的懈怠。萨达特之前曾催促苏联领导人重新武装在“六日战争”和消耗战的几年内遭受重创的埃及军队，莫斯科却一直推诿搪塞，推迟交付武器的时间，同时拒绝提供尖端苏联武器，那是对抗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高科技武器所必需的。尽管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萨达特却有意避免切断与苏联的关系。相反，他保留了埃及与苏联的友好协议，延续了苏联部队在埃及基地的特权，从而展现了其盟友立场。事实证明，萨达特的策略极为成功。苏联在1972年12月至1973年6月期间向埃及出口的先进武器，比之前两年的总量还要多。

萨达特的下一个目标是敦促军队备战。1972年10月24日，他召集埃及武装部队的将领们在他家中开会，向他们通报了他准备向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决定。他警告这些埃军最高将领说：“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将军们惊骇万分，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对战争的准备情况比阿拉伯国家要好得多，且埃及完全依赖苏联来获得先进武器，而在向阿以冲突中的盟友提供武器方面，苏联完全落后于美国。对这些将军而言，现在完全不是谈论战争的时候。盖迈西将军也参与了这次会议，根据他的描述，随着萨达特对将军们的抗辩越来越恼怒，会议的气氛也变得“超乎寻常地激烈和不安”。“显然，会议最后，萨达特总统对于发生的一切——递交的报告、表达的观点或预测的结果都深感不快。”[13]但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次会议后，萨达特重组了其军队领导层，解除了持怀疑态度者的领导职务。盖迈西被任命为作战负责人，负责制订作战计划。

盖迈西将军决心要避免重蹈“六日战争”的覆辙。基于一手经验，他

深知1967年埃及军队对战争的准备是多么地不足，而阿拉伯军队在战事中的协调工作又是多么地匮乏。埃及战争策划者的首要任务是与叙利亚人达成协议，从两条战线向以色列人发动进攻。与埃及人在西奈的情况一样，叙利亚人决心要夺回其在戈兰高地失去的领土。为此，1973年1月他们与埃及人达成了一项绝密协议，以统一两国军队的指挥权。

接下来，战争策划者必须要确定一个发动袭击的理想日期，以便保证最大程度上的突然性。为了寻找理想的月色和潮汐条件来横渡苏伊士运河，盖迈西和他的同僚们翻遍了历书。他们考虑过犹太宗教节日以及政治日程，试图寻找一个以色列军人和公众可能有所松懈的时机。“我们发现赎罪日正好是周六；更重要的是，作为这一节日的宗教传统和惯例，赎罪日是整个一年里广播、电视停止播放节目的唯一一天。换句话说，无法通过公共渠道快速召回预备役部队。”[14]综合上述所有因素，盖迈西和他的军官们提议在1973年10月6日周六开始行动。

在盖迈西将军督促埃及军队备战的同时，萨达特访问了利雅得，试图说服沙特人动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武器——石油。萨达特于1973年8月底秘密访问沙特，向费萨尔国王简要介绍了其秘密战争计划，寻求沙特的支持与合作。萨达特必须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自1967年灾难性的经历以来，沙特人一直拒绝阿拉伯人动用石油武器的请求。

对萨达特而言，幸运的是，1973年整个世界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1967年。美国石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峰值，其后每年都在递减。沙特则取代得克萨斯成为全球石油生产的调节者，通过简单的增产就可弥补石油供应的亏空。因此，美国和其他工业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受到石油武器的冲击。据阿拉伯分析家估计，1973年时美国、日本和欧洲从阿拉伯世界进口的石油占其石油进口总量的比重分别高达约28%、44%和70%—75%。[15]作为一位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沙特国王费萨尔相信其国家可以有效地运用石油资源，许诺在埃及向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情况下支持萨达特。据称费萨尔对萨达特这样说道：“但要给我们时间，我们不想在一场只有两三天的战斗中把我们的石油当作武器，然后就不了了之，我们想看到的是一场时间长到足够动员起世界舆论的战斗。”[16]在战争结束后再动用石油武器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沙特人在1967年学到的。沙特国王希望确保下一场战争能够持续足够

长的时间，以便石油武器发挥效力。

1973年10月6日周六下午2点，随着叙利亚和埃及军队同时从北部和南部向以色列发动进攻，赎罪日战争正式爆发。尽管埃及人为保密已采取防御措施，以色列情报机构还是确信一场进攻已迫在眉睫。但他们误以为这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攻势，且将发生在日落前后。对以色列军方而言，一场全面的、两条战线的战争还只是第一个意外。

盖迈西称，在战争打响后的最初几分钟内，埃及发射了超过1万枚炮弹。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埃及突击队高喊着“真主至大”，乘小艇横渡苏伊士运河，向沙土筑成的巴列夫防线发起了猛攻。在攻克一度被视为坚不可摧的以色列阵地的过程中，埃及军队的伤亡极其微小。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两点零五分，关于战况的第一波消息已经传回了十号中心［中央指挥部］，萨达特总统和［总司令］艾哈迈德·伊斯玛仪（Ahmad Ismail）吃惊地听着，仿佛他们正在观看一场军事演习：‘任务完成……任务完成。’一切都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17]

当以色列的指挥官们听到巴列夫工事内的士兵拉响警报，宣称面对兵力占优的敌军其阵地即将失守的时候，他们同样难以置信。在赎罪日斋戒期间，这些士兵普遍放松了警惕。同时，叙利亚坦克攻克了以色列阵地，深入戈兰高地腹地。埃及和叙利亚空军也都深入以色列领空，对以境内重要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

以色列人紧急调动空军，但其战机刚一到达边境地区就遭到苏制萨姆-6导弹的拦截，以军在1967年战争中的空中霸权已一去不复返。在战争打响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以色列仅在埃及边境就损失了27架飞机，被迫将其战机控制在运河区以外15英里的区域。被派往巴列夫防线救援本方部队的以色列坦克也遭遇了类似的打击，装备有苏制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的埃及步兵击毁了多辆以色列战车。

在以色列陆、空两军都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埃及军事工程师架起了高压水泵，在真正意义上冲毁了沙筑的巴列夫防线，从而为埃及军队突破以色列防线进入西奈半岛铺平了道路。很快，运河水面上便搭建起浮

桥，以便埃及部队和战车跨越运河进入苏伊士运河东岸及西奈半岛。

战斗第一天结束时，已有约8万名埃及士兵跨越了巴列夫防线，在西奈半岛内4千米（约2.5英里）的范围内挖建了阵地。在北方战线，叙利亚军队突破了以色列人在戈兰高地的防线，在一波向太巴列湖推进的协调一致的攻势中重创了以色列坦克和战机。受益于攻其不备的效果，在战争最初的几个小时内，埃及和叙利亚几乎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以色列人则在慌乱中应对这个犹太国家建立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以色列军队重整旗帜，开始发动反攻。在48小时之内，以色列召唤和部署了预备役，一方面防卫位于西奈的阵地，另一方面则集中兵力在戈兰高地发动攻势，希望在集中军力对付规模更大的埃及军队前，首先击败叙利亚军队。作为回应，伊拉克、沙特和约旦步兵与装甲部队被派往叙利亚，以抵御以色列人在戈兰高地的反攻。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遭遇了重大伤亡，在阿以冲突迄今为止最激烈的战斗中，双方几乎耗尽了武器和弹药储备。

战争第一周接近尾声时，阿以双方都急需补给。[18]10月10日，苏联人开始向叙利亚和埃及空运武器。10月14日，美国人也开始秘密向以色列人空运武器弹药。在装备了全新的美国坦克和火炮之后，以色列人开启了一波成功的反攻，至10月16日在叙利亚战线已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则包围了埃及军队。随着以色列人不断巩固对阿拉伯敌军的优势，战事开始陷入僵局。

正是在这一时刻，阿拉伯国家决定动用石油武器。10月16日，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在科威特举行集会。鉴于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在战争最初几天的收获，他们有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自尊感。工业世界对其能源供给的依赖同样令阿拉伯供油国的领导人感到振奋，因为这意味着一旦阿拉伯人提高油价，他们就可以对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工业国施加立竿见影的惩罚。

在科威特会议的第一天，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们宣布将油价提高17%，他们甚至没有打个电话通知那些无助的西方石油公司。沙特石油大臣谢赫艾哈迈德·宰基·也门尼对一位与会代表说道：“这一刻我已经等

待了太久，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来临，我们是自己商品的主人了。”[19]这一举措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也激起了广泛的恐慌。当日结束时，石油商人已将每桶石油的标价提升至5.11美元，相比1973年6月的交易价格（2.90美元）足足上涨了70%以上。

油价飙升还只是为赢得全世界注目而打响的第一枪。次日，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概述了一系列减产和禁运的计划，以迫使工业大国修正其对阿以冲突的政策。公报写道：“所有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即刻起将分别削减其石油产量，削减比例不得低于其9月份产量的5%，在之后的每个月将维持相同的减产比例，直至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其在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且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20]

石油部长/大臣们还向友好国家确认他们将不会受到上述措施的影响。他们解释说，只有“那些向敌人以色列提供道义与物质支持的国家，会面临严厉、渐进的阿拉伯石油供应削减，直至最终完全停止供应”。考虑到美国、荷兰与以色列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两国被威胁将面临完全的禁运，“直到诸如美国、荷兰或其他任何积极支持以色列侵略者的国家改弦易辙，接受国际社会关于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占领、完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所达成的共识”。

在战场和石油市场中展现其实力之后，阿拉伯国家开辟了一条外交战线。阿拉伯产油国公布上述联合公报的当天，沙特、科威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四国外交部部长/大臣就在白宫与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举行了会谈。阿拉伯部长/大臣们发现，美国政府似乎愿意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该决议呼吁以色列撤出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换取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完全和平。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部长质问，为何第242号决议之前从未得到过执行。“基辛格非常坦诚地回答说，原因在于以色列在军事层面的绝对优势。他表示弱者没有资本进行谈判。过去阿拉伯人是弱势的一方，现在他们变得强大了。阿拉伯人取得了超出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认为有可能取得的成就。”[21]对阿拉伯人来说，似乎美国人只讲实力。

尼克松政府发现自身的处境异乎寻常地困难：既想安抚阿拉伯世界，又不想以以色列的安全为代价，但这一做法已然违背了美国人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承诺。从冷战的角度来看，美国人决心，要保证配备有美国武器的以色列压倒配备苏联武器的阿拉伯人。当以色列向美国提出紧急要求，补充即将耗尽的军火时，尼克松政府于10月18日批准法案，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价值2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美国对以色列战备工作的公然支持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产油国一个接一个地对美国实行完全禁运。阿拉伯国家石油产量下调了25%，油价突然飙升，最终于1973年12月达到每桶11.65美元的峰值。在6个月的时间内，油价涨至原来的4倍，严重扰乱了西方经济，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随着石油储备的减少，司机们开始在加油站排起长队，被迫接受对稀缺汽油资源的配给。

西方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国内民众的压力，要求结束石油禁运，而解决石油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设法解决阿以冲突。萨达特已经达成了其战略目标，迫使美国重新介入（中东）地区外交。考虑到埃及军队仍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固守阵地，国际社会将运河视为埃、以两国实际边界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埃及领导人现在开始寻找合适的时机结束战争，并巩固自己的收益。

战事拖得越长，萨达特的军事处境就越不利。到了10月的第三周，以色列已发起了攻势，以军部队深入到距开罗60英里、距大马士革仅20英里的阿拉伯领土。但以色列人也为这些收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超过2800名以色列人在战斗中死亡、超过8800人受伤——伤亡数占以色列人口的比重远高于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后者在战争中付出了8500名士兵死亡、约2万人受伤的代价。[22]

以色列的反击引发了超级大国间的新一轮紧张。随着以色列人威胁要包围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埃及第三军，苏联最高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致信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呼吁双方采取联合外交行动。否则，勃列日涅夫警告说，苏联将可能被迫单方面介入，以便保护埃及军队。面对处于警戒状态的苏联红军和海军，美国情报机构担心苏联人可能会将核威慑引入冲突地区。作为回应，美国安全官员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首次将其军队置于高度核戒备状态。经过几个小时的剑拔弩张，两个超级大国同意，合力寻求通过外交途径来结束十月战争。

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同样迫切地期待早日结束这场毁灭性的武装冲突。经过16天的激烈战斗之后，双方现在都准备放下武器。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协调停火事宜。当天，安理会通过了第338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更早的第242号决议的内容，呼吁召开和谈，通过土地换和平的方式解决阿以分歧。同年12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将处理1967年以色列占阿拉伯领土问题作为公正、持久地解决阿以冲突的第一步。

1973年12月21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在美、苏两国的联合支持下，来自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由于未能获得归还阿拉伯国家所有被占领土的保证，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拒绝出席会议。与会者中并没有巴勒斯坦代表，以色列人坚决不同意巴解组织参会，约旦人也不乐意有一个竞争对手来代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

日内瓦会议并未取得任何最终的定论。阿拉伯代表在会前并未协调一致，其发言揭示了阿拉伯阵营内部的深刻分歧。埃及人用巴勒斯坦领土来指代约旦河西岸地区，从而削弱了约旦在谈判中的地位，约旦人则感觉埃及人是在惩罚他们未参与1973年战争。约旦外交大臣萨米尔·里法伊（Samir al-Rifa‘i）要求以色列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完全撤军。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则坚持以色列绝不会退回到1967年边境线之内，并宣称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这次会议唯一重要的成果即建立了一个埃、以联合军事工作组，以便就埃、以军队在西奈实现脱离接触而进行谈判。

在这次失败的会议之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确保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达成脱离接触协议而开启了多轮密集的穿梭外交。1974年1月18日以及同年5月，埃、以双方及叙、以双方先后达成协议。通过这些协议，埃及重新获得了整个苏伊士运河东岸，在西奈的埃以边界之间则设置了一个联合国控制之下的缓冲区。叙利亚人则同样收回了1967年

失去的戈兰高地领土的一小部分，在戈兰高地的叙以边界之间同样有一支联合国缓冲部队。鉴于战争已结束而外交努力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阿拉伯产油国宣布其目标已经实现，并于1974年3月18日结束了石油禁运。

然而，并非所有的阿拉伯分析家都将1973年的一系列事件视为完美无缺的胜利，穆罕默德·海卡尔就认为埃及和阿拉伯产油国让步得太多且太早。阿拉伯人在施加石油禁运时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以色列撤出1967年6月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但他们却在未实现任何一项目标的情况下就结束了禁运。海卡尔总结道："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值得一提的只有：全世界终于看到阿拉伯人协调行动了一次，且石油——即便是笨拙地——被用作了政治武器。"[23]

尽管如此，阿拉伯世界在1973年依然取得了重要收获。阿拉伯人所展现的纪律性和目标的一致性令国际社会印象深刻，也迫使超级大国更严肃地看待阿拉伯世界。在经济层面上，1973年诸多事件使阿拉伯人完全独立于西方石油公司。用谢赫也门尼的话来说，阿拉伯产油国确立了对自己商品的控制权，在石油危机结束后迅速走向暴富——1973年危机之前油价还不到每桶3美元，而危机后的整个70年代都稳定在每桶11—13美元。西方漫画家将阿拉伯石油长老丑化为长着鹰钩鼻子、向全世界勒索钱财的贪婪形象，但西方商人们却迅速涌入了这个看似有无限资源的新兴市场。受益于油价的飙升，西方石油公司因其巨大的石油库存也从危机中牟取了巨额利润。但1973年10月的事件对规制西方石油公司与阿拉伯产油国之间关系的石油特许经营权给予了最后一击。继伊拉克和利比亚之后，科威特和沙特也收购了其国内西方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以用于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1976年，西方对阿拉伯石油施加影响的时代最终落下了帷幕。

十月战争同样是一场外交胜利。萨达特通过战争成功地打破了与以色列之间的僵局，阿拉伯人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战争还加剧了美、苏之间危险的紧张关系。现在，国际社会开始高度重视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42、第338号决议的基础上，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以冲突。

通过1973年大胆的积极行动，萨达特确保了埃及的利益，却也使得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诉求濒临绝境。尽管联合国决议支持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但这些决议在提及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时仅仅是保证“公正地解决难民问题”。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实际的流亡政府，巴解组织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或者参与新的外交方案，或者眼睁睁地看着约旦和埃及通过一个全面和平协议收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这样一个协议也将意味着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愿望的彻底终结。

*

一架直升机迅速地滑过黎明前的夜空，沿纽约东河飞向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1974年11月13日凌晨4点，这架直升机成功着陆，随后紧张的安保人员迅速将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拥入联合国大楼内的一个安全套间。由于是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到来，阿拉法特也就免除了被示威者人群围堵的烦恼。而就在同一天清晨稍晚些时候，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高举着写有“巴解组织是国际暗杀组织”“联合国成了恐怖主义论坛”等标语的横幅，抗议阿拉法特的出现。当然，这样做也使他免受暗杀者的袭击。

阿拉法特的联合国之行是巴勒斯坦政治史上达个非同寻常的年份的高潮。苏联、东方集团国家、不结盟运动国家、阿拉伯世界合力确保了巴解组织主席获邀为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发表开幕词。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向世界各国陈述巴勒斯坦人诉求的重要机会。

在联合国的亮相，同样标志着阿拉法特从游击队首领向政治家的转型，对于后一角色他的准备尚不充分。“你为什么不去？”他曾这样问作为巴勒斯坦流亡议会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主席哈立德·哈桑（Khalid al-Hasan），后者则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坚称只有阿拉法特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发声。“你是我们的主席，是我们的象征。你是巴勒斯坦先生（Mr. Palestine）。要么你去，要么就干脆不去。”[24]

这场大戏在1974年一年中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十月战争之后，这位游击队领袖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放弃

武装斗争以及与之相关的激进策略，围绕旨在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举行谈判。在过去的25年中，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在寻求解放历史上完整的巴勒斯坦领土、摧毁以色列国家等立场上几乎始终保持一致。十月战争后，阿拉法特意识到，这个已经成立25年的犹太国家不仅是中东地区的军事超级大国，而且享有美国的全力支持以及几乎整个国际社会的承认。以色列将继续在中东存在下去。

在十月战争后的外交中，阿拉法特很正确地预见到其阿拉伯邻国将最终接受这一现实，并基于第242号决议，在美、苏的支持下与以色列展开和平协议的谈判，巴勒斯坦人则将被边缘化。阿拉法特曾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问一位英国记者："第242号决议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什么？对难民的些许补偿，以及可能——我只是说可能——有少数一部分难民回归巴勒斯坦的家园。但除此之外呢？什么也没有。我们将彻底完蛋。我们巴勒斯坦人重新成为一个国家——哪怕是在我们祖国小部分的领土上——的机会将彻底失去，彻底完蛋。不再有什么巴勒斯坦民族。故事结束了。"[25]

阿拉法特的方案是勉强接受一个以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为基础的微型国家。然而，在能够期待为巴勒斯坦人实现这样一个微型国家之前，阿拉法特还有众多的障碍需要克服。

首要一个障碍就是巴勒斯坦公众的意见。阿拉法特也承认，他需要说服巴勒斯坦民众放弃他们对1948年失去的78%的巴勒斯坦国土的要求。阿拉法特解释说："当一个民族要求收回其全部土地时，领导人很难说：'不，你们只能收回30%。'"[26]

即便是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30%领土的要求，也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从1948年到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一直处于埃及政府的控制之下；约旦河西岸则在1950年被正式并入了约旦哈希姆王国的版图。尽管埃及人对于吞并加沙地带并没有兴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却决心要恢复约旦对约旦河西岸以及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城耶路撒冷东部阿拉伯区的统治。阿拉法特需要从侯赛因国王手中夺回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权。

巴解组织内部的强硬派系同样不愿承认以色列，这也意味着阿拉法

特将不得不克服他们对两国方案的反对。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和人民阵线仍然致力于以解放全巴勒斯坦为目标的武装斗争，而正是后一组织臭名昭著的劫机事件触发了1970年约旦的“黑九月”战争。如果当初阿拉法特公开承认他愿意做出妥协，以实现巴勒斯坦人有限的国家地位，那些更为激进的巴勒斯坦派别早就向他发出死亡威胁了。

最后，阿拉法特还不得不克服国际社会对于作为团体的巴解组织以及他本人作为该组织领导人的厌恶。那种炸毁飞机但安全释放人质的“仁慈”激进主义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至1974年，巴解组织早已与一系列针对欧洲和以色列平民的滔天罪行联系在一起：1969年11月一次针对以色列航空公司职员的袭击，造成1名儿童死亡、31人受伤；1970年2月，一枚空中炸弹摧毁了一架瑞士航空的客机，机上47人全部遇难；当然还有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臭名昭著的袭击事件，造成11名以色列运动员死亡。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将巴解视为一个“恐怖组织”，拒绝与其领导人会面。阿拉法特需要说服西方政策制定者，为实现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巴解组织可以放弃暴力，遵循外交途径。

阿拉法特为自己在1974年设定了很高的目标：确保巴勒斯坦民众对两国方案的支持，限制巴解组织内部的强硬派，挫败侯赛因国王对约旦河西岸的领土要求，赢得国际认可。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上述所有目标显然绝非易事。

考虑到种种限制，阿拉法特不得不缓慢推进，确保为其政策变化争取到支持者。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公开宣扬两国方案的构想，因为这牵涉到结束在巴勒斯坦民众中受到广泛支持的武装斗争。就两国方案举行谈判将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以色列，而这是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无法接受的。相反，阿拉法特在1974年2月发布的一份工作报告中，首次以“在能够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下夺回的任何土地上”建立一个“民族权力机构”的措辞，曲折地表达了其新政策。

接下来，他还必须获得作为流亡议会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对其新政策的支持。1974年6月在开罗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大会上，阿拉法特提交了一份旨在将巴解组织限定在“民族权力机构”框架内的十点方案。然而，为了确保不受巴解内部强硬派的阻挠，该方案又重新确认

了武装斗争的作用以及民族自决的权利，同时排除了对以色列任何形式的承认。大会采纳了阿拉法特的纲领，但巴勒斯坦人很清楚变化正在酝酿之中；但对其他国家而言，巴解组织看起来依然是一个致力于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组织。

若想作为流亡政府而获得承认，巴解组织显然需要以一个新的面孔出现在国际社会面前。1973年，阿拉法特任命赛义德·哈马米（Said Hammami）担任巴解驻伦敦代表。哈马米出生于港口城市雅法，1948年随家人一起被逐出巴勒斯坦，后在叙利亚长大，并在大马士革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学位。作为一名坚定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和政治温和派，哈马米很快便与英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建立了良好关系。

1973年11月，哈马米在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他写道："很多巴勒斯坦人相信，一个位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国……在任何一揽子和平计划中，都是必要的一部分。"他也成为首位提出这一方案的巴勒斯坦代表。"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而言，迈出走向和解的第一步绝非小事，而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满足各方诉求的公正和平"——这里的各方显然暗示包括以色列。该报编辑特别为这篇文章添加了一个注释，强调哈马米"与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关系非常密切"，而哈马米公开发表上述观点的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27]阿拉法特通过其驻伦敦代表，已成功地开启了一条通向西方甚至以色列的渠道。

一位名叫尤里·阿弗纳瑞（Uri Avnery）的以色列记者与和平活动家在读到哈马米的文章后感到极为振奋。阿弗纳瑞在委任统治时期移民到巴勒斯坦，20世纪30年代末期，当他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加入伊尔贡。后来，当有人指责他和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行联络时，他就会用这样的话让后者闭嘴："你没有资格和我谈论恐怖主义，我曾经是一名恐怖分子。"阿弗纳瑞曾在1948年战争中负伤，随后作为独立人士三次入选以色列议会。尽管是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弗纳瑞却一直倡导两国方案，远早于阿拉伯世界任何支持这一设想的人。梅纳赫姆·贝京曾在议会辩论中这样嘲笑他说："阿拉伯的阿弗纳瑞们在哪儿呢？"[28]读过哈

马米的文章之后，尤里·阿弗纳瑞马上意识到他找到了自己的巴勒斯坦战友。

1973年12月，哈马米为《泰晤士报》撰写了第二篇专栏文章，这一次公开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实现相互承认。“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应承认彼此为两个民族，享有一个民族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紧随这一承认之后的应是一个巴勒斯坦国、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建立。”[29]基于第二篇文章，阿弗纳瑞断定哈马米的观点肯定反映了巴解组织内部某种有意识的政策调整。一位外交官可能会发表一次轻率言论但却保全了职务，但屡犯者几乎肯定会遭到解职。只有在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支持下，哈马米才有可能提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互承认对方地位之类的提议。

阿弗纳瑞决心要与赛义德·哈马米取得联系。1973年12月参加日内瓦和平会议期间，阿弗纳瑞会见了一位《泰晤士报》记者，请求后者安排一次与巴解组织代表的会面。会面对双方而言都具有巨大的风险：在20世纪70年代激进主义暴力肆虐的大气候下，无论是巴勒斯坦派系还是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都在积极地针对敌人开展暗杀活动。但哈马米和阿弗纳瑞都愿意承担会面的风险，因为两人都确信两国方案中承载着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唯一希望。

1974年1月27日，两人在阿弗纳瑞位于伦敦的酒店中举行了第一次会面。会面中哈马米陈述了他的观点，阿弗纳瑞将其总结如下：

> 两个民族，即巴勒斯坦民族和以色列民族，都存在。
>
> 他不喜欢新的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方式。他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但他接受以色列国家存在的事实。
>
> 既然以色列国存在，它就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正如巴勒斯坦人拥有这一权利一样。当前，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案是让两国人民都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
> 他不喜欢伊扎克·拉宾，也理解以色列人没有必要喜欢亚西尔·阿拉法特。每个民族必须接受另一方选择的领导人。

我们必须在不受超级大国中任何一方干预的情况下达成和平。和平必须源于这一地区本身的人民。[30]

阿弗纳瑞则向哈马米强调以色列是其犹太公民拥有的民主政体，要想改变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他们就必须改变以色列公众的意见。日后，他回忆自己是这样同哈马米说的："一个人是无法通过文字、声明、外交准则来改变公众意见的，一个人是通过那些可以直接向每个人内心发出呼声的戏剧性事件来改变公众意见的，人们可以亲自在电视上看到、在广播中听到、在报纸标题上读到这些事件。"[31]

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在西方媒体上呼吁两国方案之外，无论是阿拉法特还是哈马米，都并没有其他办法来进一步赢取以色列公众的支持。然而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这一表态实际上象征着巴解组织政策一次重要的转向，其激进程度要比巴解组织领导层敢于公开表达的大得多。尽管阿弗纳瑞与巴解组织驻伦敦代表之间的会面继续被维持在最高机密状态，但在阿拉法特受邀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一事上，哈马米的温和信号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哈马米向西方世界展示巴解组织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人谈判以达成和解的准备。阿拉法特的联大讲话则提供了阿弗纳瑞认为的推动以色列政策转变所必需的某种"戏剧性事件"。

对阿拉法特而言，1974年的另一项重大突破发生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在拉巴特阿拉伯首脑峰会上，阿拉法特击败了其老对手约旦国王侯赛因，确保了阿拉伯世界对于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身份的认可。1974年10月29日，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对巴解组织给予了一致支持，并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在"任何被解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利。这一决议，对侯赛因国王声称代表巴勒斯坦人以及约旦对约旦河西岸地区领土主权的要求，构成了沉重打击。阿拉法特离开拉巴特时，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流亡政府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巩固。

在拉巴特大获全胜15天之后，阿拉法特为确保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利的支持而空降联合国。拥有一半巴勒斯坦血统的丽娜·塔巴

拉（Lina　Tabbara）是阿拉法特的随行人员之一，负责协助将他的讲话翻译为英语和法语。塔巴拉完全被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震慑了，她回忆说："我就紧随在亚西尔·阿拉法特后，进入了这幢玻璃建筑物的正门。除了少数礼仪上的细节之外，阿拉法特受到了国家元首级别的接待。这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顶峰、一个被剥夺了合法权利者的胜利时刻，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亲眼看到阿拉法特登上联大讲台，接受来自联合国大会长时间的起立鼓掌，这一场景激发了塔巴拉内心深处"对于拥有巴勒斯坦血统的自豪感"。[32]

阿拉法特发表了一次很长的演讲，总共101分钟。哈立德·哈桑日后回忆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团体合作——草稿，草稿，然后是更多的草稿。在确定我们已经做到万无一失之后，我们又邀请我们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对发言稿进行了最后的审阅。"[33]这是一份激动人心的演讲，一次对正义的呼声，最终意义上也是一次面向巴勒斯坦听众以及那些巴勒斯坦革命斗争支持者的演讲。演讲的宗旨并非要引导巴勒斯坦公众，或推动以色列政府改变其政策。阿拉法特在其运动内部并不享有足够的支持来暗示任何对以色列的妥协，以色列人也没有在听——为抗议巴解组织主席的出席，以色列代表抵制了阿拉法特的演讲。

在演讲中，阿拉法特并没有进一步深化哈马米关于两国方案的呼声，而是回归了其长期的"革命理想"，即在全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能够公正、平等、友爱、进步地生活在一起的民主国家"。对以色列人及其美国支持者来说，这听起来与要求毁灭犹太国家的传统呼声大同小异。更糟糕的是，阿拉法特并没有利用联合国讲台向以色列人伸出和平之手，而是以一个夸张的威胁结束了他的讲话："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我再说一遍：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34]

阿拉法特在离开大厅时又受到了一次长时间的起立鼓掌。巴解组织要求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公正与国家的呼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然而，阿拉法特更需要的是支持者，而非勇敢的姿态。仅仅两年后，当丽娜·塔巴拉再次见到阿拉法特时，这位巴解组织主席将在黎巴嫩内战中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战。

1974年，巴勒斯坦运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立德·哈桑宣称，1974年是“如此重要的一年”，当时巴解组织领导层正“致力于与以色列达成某种和解”。然而，在阿拉法特的联合国演说之后，巴以谈判却未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哈马米和阿弗纳瑞继续在伦敦举行秘密会谈，两人会定期地在报告或会面中向其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汇报双方谈话的内容。哈立德·哈桑坚持说：“无论怎样夸大哈马米工作的重要性也不过分，如果伊扎克·拉宾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对我们发出的信号做出回应，我们可能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能实现公正的和平。”[35]但阿拉法特不敢向以色列人做出任何让步，而拉宾也不可能推动建立一个他本人坚决反对的巴勒斯坦国。

1974年后，随着巴以双方各自强化其立场，哈马米和阿弗纳瑞也开始面临其社会内部极端分子越来越大的威胁。1975年12月，一个疯狂的以色列人在阿弗纳瑞位于特拉维夫的住宅附近持刀袭击了他，导致他严重受伤。1978年1月，哈马米因与以色列人的会面在其伦敦办公室内被枪杀，背后指使者是巴勒斯坦拒绝派的艾布·尼达勒组织（Abu Nidal Group）。杀手只在哈马米头上开了一枪，向他吐了一口唾沫，大声咒骂他为叛徒，随后就溜入伦敦的街道中逍遥法外。[36]

巴以和平的机遇期现在已经结束。1975年4月13日，基督徒民兵在贝鲁特市郊的艾因·鲁曼尼伏击了一辆满载着巴勒斯坦人的大巴，车上28人全部罹难。该事件也成为一场长达15年的内战的开端，这场内战将使黎巴嫩化为一片废墟，也将巴勒斯坦运动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

黎巴嫩的政治稳定随着国内人口平衡的变化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当初，法国人从其叙利亚托管国中划出了一个尽可能大的国家，以便使受其保护的基督徒能在其中构成人口多数。然而，黎巴嫩的穆斯林群体（包括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的人口增长率更高，至20世纪50年代在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基督徒（包括占主导地位的马龙派，以及希腊东正教派、亚美尼亚人、新教徒和一些更小的教派）。1932年人口普查显示，基督徒人口略多于穆斯林，而这也成为黎巴嫩最后一次官方人口统计——直至今日，黎巴嫩国内仍缺乏关于其人口构成的准确数

据。

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穆斯林人口愿意将政治主导权让给基督徒，以换取基督徒将黎巴嫩融入阿拉伯世界、远离其前殖民宗主和保护国法国的承诺。双方于1943年达成的权力分配方案是一种“社群性”或教派性的体制，其中政府最高职位被分配给黎巴嫩各个社群，如马龙派的总统、逊尼派的总理、什叶派的议长。议会席位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以6：5的比例进行分配，稍有利于基督徒。

这一权力分配方案在1958年内战中首次受到挑战。美国的干预以及1958年9月改革派总统福阿德·谢哈卜（Fuad Chehab）的当选恢复了黎巴嫩的现状，使得这一教派政治体制又维持了10年。60年代末期巴勒斯坦革命在黎巴嫩的兴起，催化了对教派体制的又一轮攻击。

巴勒斯坦人以特殊的方式打破了黎巴嫩的政治和人口平衡。1950—1975年，黎巴嫩国内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已由12.76万人增至19.7万人，然而1975年黎境内巴勒斯坦实际人口已接近35万人。[37]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难民是穆斯林。尽管他们从未被正式计入黎巴嫩人口或被给予公民权，但其在黎巴嫩境内的存在仍然意味着穆斯林人口的显著增长。1969年之前，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人长期处于政治沉寂状态。1969年，埃及总统纳赛尔代表巴勒斯坦游击队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允许巴勒斯坦游击队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黑九月”事件后，巴勒斯坦民兵被驱逐出约旦领土，黎巴嫩自此成为巴解组织活动的总部。巴勒斯坦难民营变得越来越军事化，政治上则趋于激进化。巴勒斯坦人对黎巴嫩政府的主权构成了如此大的挑战，以至于有人指责巴勒斯坦革命在黎巴嫩制造了一个国中之国。

在黎巴嫩，有很多人将1975年内战爆发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上。前总统卡米勒·夏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是最具影响力的马龙派领袖之一，在他看来，这场冲突从来就不是一场内战，“从开始到现在它都是一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战争”，而且被黎巴嫩穆斯林加以利用，以帮助他们“夺取对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38]夏蒙略去了好多事实——实际上，黎巴嫩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巴勒斯

坦人不过是一场旨在重新界定黎巴嫩政治的冲突中的催化剂。

20世纪70年代初期，黎巴嫩穆斯林、德鲁兹人、泛阿拉伯主义者及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的左翼组织联合组建了一个名为“民族运动”的政治联盟，其目标即推翻黎巴嫩陈旧的教派政体，以一人一票的世俗民主政体取而代之。该联盟的首领是黎巴嫩德鲁兹领袖卡迈勒·琼布拉特。琼布拉特1917年出生于其家族的势力中心穆赫塔拉村，早年曾在巴黎和贝鲁特耶稣会大学学习法律与哲学，1946年在其29岁时第一次进入黎巴嫩议会。他曾这样表示：“只有一个世俗的、进步的、摆脱了教派主义的黎巴嫩才有希望存在下去。”[39]在他的批评者看来，琼布拉特呼吁建立一个世俗的黎巴嫩，无非是为了争取穆斯林占多数的统治（据估计，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黎巴嫩的穆斯林、基督徒人口比例已达到55：45），并终结黎巴嫩作为中东地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对琼布拉特而言，巴勒斯坦人只是一场本质上发生在黎巴嫩人之间的战争的一个推动因素。他分析道：“如果黎巴嫩人并没有为爆发做好准备，那就不会有任何爆发。”关于黎巴嫩的属性，夏蒙和琼布拉特的分歧难以逾越。马龙派领袖夏蒙执意于要维护《民族宪章》中的权力分配方案，亦即基督徒在黎巴嫩的特权地位。琼布拉特和民族运动则要求建立一套基于平等公民权的全新秩序，而这一新秩序将有利于占黎巴嫩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围绕黎巴嫩的统治权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争夺双方都自称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一位同时代的作者将夏蒙和琼布拉特描述为“其支持者眼中的完人、反对者眼中的恶魔”“彼此之间深恶痛绝、不屑一顾，且都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官邸和执念之中”。[40]

1975年春，现状的维护者与社会革命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1975年3月，黎巴嫩南部城市赛达的穆斯林渔民举行罢工，抗议一项在他们看来可能毁掉生计的新渔业垄断。获得垄断特权的财团恰好是在卡米勒·夏蒙和其他几位马龙派商人运作之下，从而使得这个本质上来说属于企业行为的事件转变为一个教派议题。渔民发动示威游行，由马龙派主导的黎巴嫩军队奉命来镇压，民族运动则将军队的介入谴责为一支“马龙派军队”对马龙派大资本利益的保护。3月6日，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了一个左翼纳赛尔主义政党的逊尼派领袖马阿鲁夫·萨阿德（Ma‘ruf Sa‘d）。萨阿德之死在赛达引发了民众暴动，巴勒斯坦突击队

员和黎巴嫩左翼民兵成员联手，与黎巴嫩政府军发生激烈冲突。

冲突很快便由赛达蔓延到了贝鲁特。4月13日周日，一车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马龙派领袖皮埃尔·杰马耶勒（Pierre Gemayel），当时后者正准备离开教堂。杰马耶勒是黎巴嫩最大的民兵组织、右翼的马龙派长枪党的创始人，据估计该组织拥有约1.5万名武装人员。枪手当场打死三人，包括杰马耶勒的一位保镖。一心要复仇、愤怒的长枪党成员当天便伏击了一辆满载着巴勒斯坦人的巴士，当时这辆车正好路过基督徒郊区艾因·鲁曼尼，车上28名乘客全部被杀害。大屠杀的消息一传开，黎巴嫩人立刻就意识到暴力的突然升级预示着战争。第二天，没有一个人去上班，学校停课，街上也空无一人，贝鲁特人都躲在家里急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或者读报，或者听收音机，或者在间断的枪声中电话交流本地的消息。

内战爆发时，丽娜·塔巴拉正在贝鲁特工作。1974年，她曾协助亚西尔·阿拉法特翻译其讲话。在完成了联合国的任务后，塔巴拉回到黎巴嫩，继续在黎巴嫩外交部工作。在很多方面，她代表了富有而国际化的黎巴嫩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住在贝鲁特市中心最优雅的街区之一。内战爆发之际，她只有34岁，是2个女儿的母亲，一个2岁，另一个4岁。

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塔巴拉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名基督徒，实际上她是一位有着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混合血统的穆斯林。她为自己的混血身份感到自豪，在内战刚开始的几个月中拒绝选边站队。这一立场并不好维持。从一开始，黎巴嫩内战就伴随着教派谋杀和野蛮的复仇杀戮。

5月31日，经过民兵组织间7周的战斗后，贝鲁特见证了其第一次教派大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仅因宗教身份的原因就遭到杀害。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丽娜·塔巴拉，称穆斯林正在贝鲁特西区的巴舒拉街区围捕基督徒。塔巴拉的朋友称："有一个路障和一个身份检查站，基督徒必须下车，然后直接被拖进墓地。"当天有10位基督徒在贝鲁特被杀害，新闻媒体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五"，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41]

整个1975年夏天，随着居民们适应了战争强加的种种限制，贝鲁特的生活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常态。一档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定期向听众提供安全和危险路线的实时更新。节目中，听上去可靠的播音员会宣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建议您绕开这个区域，选择另一条路线。"随着1975年夏秋之交冲突的加剧，主持人的语调也变得更加急切："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是10月20日星期日，你们都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不是吗？现在你们必须赶快回家，赶快！"[42]广播警报标志着贝鲁特市中心一场新的战役的开始，敌对的民兵把该区域内两座最高的建筑物作为观测和轰炸敌人的平台：一座名为穆尔塔的未完成的摩天大厦俯视着贝鲁特的商业中心，这座建筑也成为逊尼派左翼民兵组织穆拉比吞（Murabitun）的大本营；而位于贝鲁特酒店区中心的高层建筑假日酒店则处于马龙派长枪党民兵的控制之下。

在整夜的战斗中，敌对双方从两座高楼上互射导弹和弹药，对周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1975年10月，民族运动武装——塔巴拉称之为"伊斯兰进步分子"——包围了酒店区并成功围困了马龙派军事力量。基督徒民兵最后得到了卡米勒·夏蒙的救援，后者利用其作为内政部部长的权限，在酒店区四周部署了2000人的黎巴嫩政府军，作为敌对双方之间的缓冲带。双方在11月又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但没有人对战争就此结束存在幻想。

12月，路障重新归位，对无辜者的无谓杀戮也再度重启：4名长枪党成员遭到绑架，之后发现被杀；作为报复，长枪党民兵杀害了300—400名平民，身份证显示受害者全部为穆斯林；穆斯林民兵则以牙还牙，杀害了数百名基督徒。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六"。对丽娜·塔巴拉来说，她正是在这一天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立场。"无视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横亘的鸿沟已经不再可能；在'黑色星期六'之后，一切都走得太远了。"自此，丽娜开始认同于穆斯林的事业。"我感觉仇恨的种子和复仇的欲望已经在我内心深处扎根。在那一瞬间，我真的希望穆拉比吞或者其他任何人双倍地报复长枪党人。"[43]

到1976年初，外部势力开始在黎巴嫩人的战争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数月的激烈交火消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吉普车、制服、火箭弹和炮弹，而所有这一切都相当昂贵。为此，黎巴嫩各民兵组织从武器泛滥的

邻国获取武器。石油繁荣的结果之一即中东地区军售的快速增长；诸邻国正是抓住黎巴嫩内战升级的时机，通过武装不同的民兵组织向黎巴嫩施加影响。

长期以来，苏联人和美国人一直向其地区盟友提供武器系统，很快，其他国家也进入了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欧洲制造商与美国人展开竞争，向亲西方的“温和”阿拉伯国家出售重型武器。举例来说，1968—1978年沙特的国防开支由1.71亿美元猛增至超过130亿美元。[44]随着地区大国试图影响黎巴嫩国内局势的发展，过剩的武器开始被用来补给交战中的黎巴嫩各民兵组织。丽娜·塔巴拉报道了关于沙特支持基督徒民兵组织的传闻，“因为利雅德政权出于对假想的共产党人夺权的恐惧，宁可支持伊斯兰的敌人”。[45]马龙派基督徒还从以色列人手中获取了武器弹药，以便帮助后者打击巴勒斯坦民兵组织。左倾的民族运动从苏联或伊拉克、利比亚等苏联附庸国获取武器。黎巴嫩人间的内部冲突被拖入了冷战、阿以冲突以及阿拉伯世界革命与保守政权之间对抗的泥潭。

1976年，黎巴嫩内战退化为一场种族灭绝性质的冲突，每一场屠杀都会招致报复性的残杀。1976年1月，基督徒武装占领了穆斯林棚户区卡兰提那，杀害了数百人，并用推土机将这一贫民区从地面上永久地抹去。作为报复，民族运动和巴勒斯坦武装包围了夏蒙的重要据点、贝鲁特南部沿海的基督徒城镇达穆尔。1月20日巴勒斯坦和穆斯林民兵攻陷达穆尔后，500名马龙派基督徒被杀。5个月后，马龙派武装包围了坐落于多个基督徒社区之间、遭到孤立的巴勒斯坦台勒·扎塔尔难民营。该难民营的3万名居民在经历了53天无情暴力后最终投降，其间没有任何医疗救援、饮用水，食品供应也不断减少。关于这次围攻缺乏可靠的伤亡数字，据估计约3000人死于台勒·扎塔尔。[46]总体而言，从1975年4月战争爆发到1976年10月全面敌对行动停止为止，约3万人在内战中被杀、近7万人受伤。对一个总人口只有325万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伤亡数字。[47]

黎巴嫩内战的第一阶段于1976年10月结束，其结束乃是源于一次政治危机。1976年3月，黎巴嫩议会通过了一次针对共和国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Suleiman Franjieh）的不信任投票，并要求后者辞职。弗朗吉亚表示拒绝后，卡迈勒·琼布拉特威胁发动全面战争，军队中的异见分子

开始炮轰位于贝鲁特郊区的总统府。为了保护弗朗吉亚并促成停火，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派部队进入黎巴嫩。

在叙利亚军队的保护之下，黎巴嫩议会再次举行会议，同意为解决当前政治僵局而提前举行选举。一直以来，黎巴嫩总统都是由议会成员选举产生。1976年5月，黎议员举行集会投票选举新总统。当时有两位候选人：伊利亚斯·萨尔基斯（Elias Sarkis），受到保守的基督徒和马龙派民兵组织的支持；雷蒙德·埃迪（Raymond Eddé），改革派和民族运动倾向的人选。大大出乎黎巴嫩国内穆斯林力量意料的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全力支持伊利亚斯·萨尔基斯，并确保后者战胜了埃迪。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叙利亚开始直接介入黎巴嫩政治，并通过在贝鲁特以及黎巴嫩全国战略要地部署军队来确保对该国的影响力。

通过对伊利亚斯·萨尔基斯的支持，叙利亚人实际上站在了巴勒斯坦人以及琼布拉特的民族运动的对立面。这一立场的反转着实让人感到震惊：叙利亚人一贯标榜对泛阿拉伯主义和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而在黎巴嫩他们却维护亲西方、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马龙派基督徒。对丽娜·塔巴拉来说，当她看到叙利亚军队在贝鲁特机场，“使用在苏联帮助下购买的苏制‘冰雹’地对地导弹，炮击巴勒斯坦难民营以及［穆斯林］进步力量控制下的贝鲁特区域”之时，事实真相已经再清楚不过了。[48]丽娜很快就认识到叙利亚人并不是为了支持马龙派基督徒而支持他们，而更多地是想利用他们来加大对黎巴嫩的控制。

叙利亚介入黎巴嫩引发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切，这些国家并不希望看到大马士革利用黎巴嫩国内冲突来吞并其一度繁荣的邻国。沙特国王哈立德（King Khalid，1975—1982年在位）在利雅德召开了阿拉伯国家首脑小型峰会，参会者包括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以及来自科威特、埃及、叙利亚的代表。

1976年10月18日，阿拉伯首脑们公布了黎巴嫩危机解决方案，呼吁黎巴嫩国内所有武装力量完全脱离接触，并在10天的时间内实现永久停火。阿拉伯国家将建立一支由3万人组成的维和部队，由黎巴嫩总统直接指挥。维和部队士兵将有权解除所有违反停火协议的战斗人员的武装，并没收其武器。利雅德峰会还呼吁巴解组织尊重黎巴嫩主权，撤回

到1969年《开罗协议》中划归巴勒斯坦战士活动的区域。在结尾处，峰会决议呼吁黎巴嫩所有党派为实现民族和解而举行政治对话。

尽管对叙利亚的意图怀有疑虑，但利雅德峰会决议却几乎没有削弱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掌控。考虑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愿在黎巴嫩驻扎相当数量的部队，叙利亚军队就构成了阿拉伯多国部队的主体——在派往黎巴嫩维和的3万名阿拉伯士兵中，叙利亚人占据约2.65万个名额；甚至那些来自沙特、苏丹、利比亚等国的象征性小分队也并未在黎巴嫩停留多长时间，很快就把任务完全委托给了叙利亚人。11月中，约6000名叙利亚军人在200辆坦克的支持下占领了贝鲁特。就这样，利雅德峰会决议仅仅为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提供了一件合法化的外衣。

尽管萨尔基斯总统号召黎巴嫩人“带着友爱与同胞情谊”来迎接叙利亚兄弟，但黎巴嫩穆斯林和进步党派却怀有深深的疑虑。卡迈勒·琼布拉特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他与哈菲兹·阿萨德的一段对话：“我请求您撤出派往黎巴嫩的部队，继续执行您的政治介入、您的调停、您的仲裁吧……但我一定要规劝您放弃军事手段，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卫星国。”[49]丽娜·塔巴拉惊恐地看着叙利亚军队布满了贝鲁特的大街小巷，但最让她恼火的却是“几乎每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都满意于这种状况”。

利雅德峰会后，内战爆发以来的第56次停火正式生效。如果黎巴嫩人民希望叙利亚人的占领，将在近两年的战争之后为他们带来和平，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感到失望。叙利亚进驻贝鲁特之后不久，塔巴拉就目睹了最早的汽车炸弹袭击之一，这类袭击也将成为黎巴嫩国内暴力的一个标志。她在形容眼前的惨状时写道：“幕后传来响亮的哭喊声和尖叫声。有人喊着：‘小心！这是一辆装了饵雷的汽车，可能还有一辆！’在过去的几天内，这类袭击越来越多，但没有人知道幕后黑手是谁，很多受伤严重的伤员就躺在路边。”塔巴拉回忆道，当她看到“黎巴嫩人在叙利亚和平笼罩下那种胜利的平静烟消云散”之时，感到了某种残忍的满足。[50]她和家人已经见证了足够多的鲜血和毁灭。他们将贝鲁特留给了叙利亚人，加入了成千上万的黎巴嫩海外流亡者的行列。

就国际社会而言，黎巴嫩冲突已经得到了至少是暂时性的解决。全球媒体的注意力已经从满目疮痍的黎巴嫩转向了耶路撒冷。1977年11月

20日周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将在这里向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提议结束阿以冲突。

*

1977年1月，萨达特正在其位于尼罗河上游城市阿斯旺的假日官邸内接受一位黎巴嫩记者的采访，记者突然停止了提问。当时，一股浓烟正从市中心升起。她说道："总统先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您身后发生。"萨达特转过身来，看见阿斯旺市内的火光，一群暴民正跨过尼罗河大桥向他的官邸走来。不久之前，萨达特刚刚命令深陷财政危机的埃及政府取消了对大饼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关键补贴，埃及的穷人们认为他们的生计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发起了全国性的大饼骚乱。骚乱共造成17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政府恢复补贴之后，骚乱才趋于平静。[51]

的确，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萨达特身后发生。基于十月战争中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战场上的胜利，埃及公众曾一度欢呼他为"渡河英雄"，现在他们对总统却失去了信心。萨达特并不具备纳赛尔的个人魅力或对公众的吸引力。他需要兑现其对经济繁荣的承诺，否则就要面临被废黜的风险。萨达特越来越确信，繁荣只有在美国支持以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1973年战争结束伊始，基于埃及具有说服力的军事表现以及对阿拉伯石油武器的成功运用，萨达特成功说服了美国敦促以色列从西奈部分撤军。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开启了其独特的穿梭外交，在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展开了频繁的协调谈判，最终确保了两份西奈脱离接触协议的达成（1974年1月和1975年9月）。协议将苏伊士运河以及西奈的部分油田归还给了埃及。

收复苏伊士运河是萨达特的一项重要成就，首先是因为他在纳赛尔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他成功地避免了运河转变为埃、以之间的实际边界。其次是因为，运河是财政困难的埃及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在美国的帮助下，埃及人将1967年阿以战争中被炸毁的船只残骸清除出了运河区。1975年6月5日，萨达特重新向国际航运市场开放了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水路。通过运河的第一批船队来自"黄色舰队"的14艘船

只。“黄色舰队”是一群因1967年战争而被迫滞留在“大苦湖”的国际汽轮，因花了8年时间来收集黄色灰尘而得名。尽管埃及为这些收获进行了庆祝，但《西奈协议》使以色列控制了西奈半岛（“六日战争”中埃及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的绝大多数地区，而埃及国库还在为收支相抵而苦苦挣扎。

萨达特越来越急于为其国库获得新的资金，为此他甚至不惜与阿拉伯邻国为敌，以便巩固自身的地位。出于对增加埃及收入的迫切需求，1977年夏，萨达特试图夺取隶属于利比亚的油田。根据当时的估计，利比亚每年的石油收入高达50亿美元。对一个人口还不足埃及零头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保护这些财富的军队，其规模也只有埃及的一个零头。在疯狂的机会主义想法的刺激下，萨达特将苏联向这个富裕邻国提供武器作为入侵的借口，仿佛利比亚的军火库对埃及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7月16日，萨达特从西奈的以色列前线撤回了其部队，向驻扎在西部沙漠的利比亚军队发动了进攻。埃及空军轰炸了利比亚基地，为地面部队的入侵提供了空中掩护。资深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说：“几乎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萨达特做出了误判。无论在［埃及］民众还是军队看来，撤下对付敌国以色列的部队去攻击一个阿拉伯邻国都毫无道理。”

埃及对利比亚的进攻持续了9天。埃及民众反应冷淡，华盛顿则公开反对埃及毫无理由的入侵。美国驻开罗大使明确表示，美国反对对利比亚的任何入侵，萨达特被迫做出让步。7月25日，埃及部队撤出利比亚，双方冲突就此结束。海卡尔总结道：“所以，正是1月份的食品骚乱以及搞砸了的对外冒险……导致萨达特在1977年年中得出结论，埃及必须与以色列就全新的两国关系展开谈判。”[52]如果萨达特无法增加国库收入，他就会面临更多的食品骚乱。他又无法确保从其阿拉伯兄弟手中获得资金，无论是通过说服还是强制的手段。但一旦成为与以色列缔结和平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就可能获得大量的美国发展援助并吸引可观的外国投资。考虑到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不妥协立场，这一策略具有很高的风险。但萨达特之前已经冒过很大的风险，还获得了成功。

与以色列和解的障碍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难以跨越。1977年5月，梅纳赫姆·贝京领导下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获胜，打破了以色列建国以来工党对政府的垄断。在贝京的领导下，利库德集团坚决主张在以色列于1967年6月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定居点，以保留这些土地。很难想象会有一位比这位前恐怖分子、大以色列的倡导者更顽固的谈判对象了。然而，正是贝京进行了最初的接触，通过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向埃及总统释放了一些和解信号。齐奥塞斯库劝告萨达特说："一旦工党上台、利库德集团在野，达成和平协议将不再可能；但在二者角色互换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前景还稍好。"这是因为，工党（做在野党时）阻挠与埃及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要稍小。[53]

萨达特回到埃及后，开始考虑这项不可想象的任务——直接与以色列人展开谈判，以确保一项阿以和平协议。在十月战争中，他已经展示了埃及的军事领导地位。通过引领和平，他将确立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正如1972年首次提出该话题时他的将军们反对与以色列开战一样，他知道他手下的政治家们也会抵制他的和平计划。他需要重组政治团队，引入一些更少抵制变革的新人才。他选择了一位完全的外来者来协助制订他的和平计划。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出生）是开罗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在国王时期，他的祖父曾担任过首相，他的叔叔则担任过外交大臣。加利出生于一个土地贵族家庭，1952年革命后，根据新政府的土地改革措施，其家族的农业地产被没收。

埃及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穆斯林，布特罗斯-加利本人却是一名科普特基督徒，他的妻子则出身于埃及一个显赫的犹太家族。1952年革命以来，上述身份特点曾迫使布特罗斯-加利远离埃及政治舞台。现在萨达特决定与以色列达成和解，同样的身份特点却使他成为政府公职的候选人。1977年10月25日，这位日后将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大学教授很吃惊地得知，自己在一次内阁重组中已经被任命为国务部部长。

进入政府后不久，布特罗斯-加利参加了11月9日萨达特向议会发表

的演讲。在这次演说中，萨达特首次暗示了与以色列合作的意愿。萨达特这样告诉出席的各位议员：“我已经准备好走到天涯海角，如果这样做能以任何方式保护一位埃及儿童、战士或军官免受杀戮和伤害。”谈到以色列人，他继续说道：“我已经准备好去他们的国家，甚至去以色列议会和他们会谈。”

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同样出席并聆听了萨达特的演说。布特罗斯-加利回忆说，阿拉法特“是对这些话报以热烈掌声的第一人。无论是阿拉法特、他的同事还是我本人，都没有理解总统所说的这番话的含义”。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想到萨达特真的计划于近期前往以色列。[54]然而一周之后，布特罗斯-加利完全理解了萨达特这番话的意思。副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要求他起草一份演讲提纲，“总统将于下周日在以色列发表这份讲话”。布特罗斯-加利兴奋地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一历史性事件的中心”。

正像萨达特预料的那样，他手下的很多政治家都反对他的计划：外交部部长伊斯玛仪·法赫米（Ismail Fahmi）、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部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Muhammad Riyad）双双辞职，而非陪同总统前往耶路撒冷。预计出发时间前两天，布特罗斯-加利被任命为代理外交部部长，受邀加入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总统代表团。他的朋友们劝告他不要同去。布特罗斯-加利日后回忆说：“空气中几乎可以闻到恐惧的气氛，阿拉伯媒体非常恶毒，他们写道：没有穆斯林愿意陪同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所以他选择了基督徒布特罗斯-加利，后者还有一个犹太妻子。”[55]但新上任的代理外交部部长却发现自己“受到这一巨大挑战的吸引”：他们需要打破1967年喀土穆峰会制定的禁忌，该峰会决议要求所有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协调一致，不承认犹太国家、不与以色列官员谈判、不谋求与以色列达成和平。

这位埃及总统先宣布了他的计划，然后才寻求阿拉伯各国元首的支持，这让后者大为光火。为避免与叙利亚决裂，萨达特亲自飞往大马士革，向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简要介绍了其出访以色列的计划。阿萨德立刻提醒萨达特关于阿拉伯统一立场的问题。阿萨德对他说：“安瓦尔兄弟，你总是那么性急。”他警告道：“我理解你急迫的心情，但请你也理解一下，你不能去耶路撒冷，这是一种背叛。埃及人民不会接受，阿拉伯人

民也永远不会原谅你。”[56]

然而萨达特并没有被吓到。11月19日，在布特罗斯-加利的陪同下，他登上了一架公务飞机，踏上了前往特拉维夫的45分钟的行程。布特罗斯-加利惊呼道：“我从未意识到（埃、以两国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对我来说，以色列陌生得像来自外太空的一块土地。”[57]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和敌意，这似乎是埃及人第一次将以色列视为一个真实的国家，他们的感受非常复杂。埃及资深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捕捉到了萨达特在罗德机场走下飞机的瞬间。“当电视摄像镜头伴随着他走下舷梯，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所背负的负罪感被一种参与感所取代。无论对错，萨达特在政治和身体层面的勇气是不容置疑的。他踏上了这块禁地，许多埃及人为之侧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惊骇不已。”[58]

次日即1977年11月20日周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用阿拉伯语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让布特罗斯-加利伤心的是，他煞费苦心准备的英语讲稿并未被使用）。这恰恰是尤里·阿弗纳瑞一直以来敦促巴解组织应该摆出的勇敢姿态，以便向以色列公众证明，确实存在希冀和平的阿拉伯合作伙伴。萨达特对电视摄像机的镜头说道：“请允许我从这个讲台上向以色列人民发出呼声。”他宣布： “我向你们传达来自埃及人民的和平信息，一条面向以色列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安全与和平的信息。”萨达特径直越过了以色列的立法者们，直接敦促以色列的选民“鼓励你们的领导人为和平而奋斗”。

萨达特继续对以色列议会内外的听众说道：“让我们彼此都坦诚一些，我们如何才能达成基于公正的持久和平？”萨达特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表示持久的和平必须基于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他指责以色列人：“今天在以色列宣扬的口号，完全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甚至质疑他们的去向，世界上再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口号。”他继续说道，和平也不可能在占领他国领土的情况下出现。他呼吁以色列归还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作为交换，以色列将被所有阿拉伯邻国接受和承认。萨达特强调：“正如我们真诚地寻求和平那样，我们同样真诚地欢迎你们和平、安全地生活在我们中间。”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旅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外交壮举，在以色列和其

阿拉伯邻国之间开启了首个严肃的和平进程。然而，事实证明，通往和平之路还很漫长、艰辛，且布满了风险。走到谈判桌前时，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预期极为不同。萨达特希望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领土上完全撤军，且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基础上，率领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和平。贝京则无意做出这些让步，而且他削弱了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的公信力——他在以色列议会回应萨达特时坚称："萨达特先生知道，正如在他到达耶路撒冷之前我们已经告诉他的那样，我们关于和邻国之间持久边境的立场与他有所不同。"[59]在随后的谈判中，贝京宣称，愿意将西奈半岛以及戈兰高地的绝大部分分别归还给埃及和叙利亚，以换取双边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但他断然拒绝向巴勒斯坦人做出任何让步。

以色列关于阿以全面和平协议的立场过于强硬，无法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参与。贝京执意要保留定居点，同时出于战略考量，要求保留被占的部分叙利亚和埃及领土。以色列人愿意向巴勒斯坦人做出的最大妥协，是允许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一定程度的自治。事实上，贝京一直用圣经地名朱迪亚和撒马利亚（Judea and Samaria）来称呼这两块地方。以色列人拒绝与巴解组织举行会谈，而巴勒斯坦独立或建国以及以色列归还部分耶路撒冷，更是毫无可能。以色列议会已然宣布耶路撒冷为这个犹太国家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这一声明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在开启了这一勇敢的和平倡议之后，萨达特发现自己夹在拒不妥协的阿以双方之间进退两难。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愿意追随埃及的脚步，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并未激励他们这样做。他深信与埃及达成和解符合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因为在缺少埃及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有能力对这个犹太国家构成真正的威胁。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和平仅是次要议题，他也不愿为吸引他们加入严肃的谈判做出任何妥协。在阿拉伯世界对埃及的敌意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埃及不得不单独与以色列人谈判。

为了将处境艰难的埃以和平倡议最终引向和平，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付出了巨大努力。1978年9月，卡特在位于马里兰州戴维营的总统度假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布特罗斯-加利再次作为埃及代表团成员参与了会

议。随萨达特飞往戴维营参会途中，他听着埃及总统的谈判策略，心中越来越感到担心。萨达特天真地认为他能够赢得美国公众对埃及谈判立场的支持，相信卡特总统将站在他这一边，迫使以色列为实现他本人的要求做出必要的让步。布特罗斯-加利认为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我担心美国人不会向以色列人施压，到那时萨达特将被迫做出让步。”[60]

萨达特也并不完全是错的：埃及的立场的确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卡特总统也确实向贝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后者做出让步。经过13天的艰苦谈判以及对22份草案的反复修改，卡特终于使双方达成一致。贝京同意从整个西奈（他曾计划退休后在那里安度晚年）撤军，但萨达特也被迫做出了妥协。重要的是，整份协议并未保证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利。框架文件提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设定一个5年的过渡期，规定以军撤出上述地区，同时在这两块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自治权力机构。然而，协议却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最终地位问题留待埃及、以色列、约旦及巴勒斯坦领土的民选代表通过谈判来解决。对于以色列未履行其承诺的情况，协议中也不包含任何惩罚措施。

为抗议萨达特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背叛，新任埃及外交部部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卡米勒（Muhammad Ibrahim Kamil）愤然辞职。但萨达特并没有被吓到。1978年9月17日，萨达特毅然前往华盛顿，在白宫的一次正式仪式上签署了《为实现和平协议的框架文件》（Framework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萨达特脱离阿拉伯阵营、寻求与以色列单独议和的决定，让整个阿拉伯世界惊恐不已。为应对这一危机，阿拉伯国家首脑于1978年11月在巴格达举行峰会。峰会上，阿拉伯产油国承诺在10年的时间内向埃及提供每年50亿美元的拨款，以弥补萨达特寻求与以色列议和背后可能的物质刺激因素。他们还威胁一旦萨达特与以色列缔结和约，埃及将被开除出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总部也将从开罗迁往突尼斯。

但萨达特已经走得太远，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已然无济于事。经过6个月的进一步谈判，1979年3月26日，卡特、贝京和萨达特再次回到白宫草坪上，签署了最终版本的埃以和平协议。在与以色列进行了5场战

争之后，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最终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在缺少埃及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将再也不可能在军事层面压倒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将不得不通过谈判确保自身的国家和领土诉求。阿拉伯国家将永远不具备足够的筹码来向一个顽固的以色列施压，迫使后者归还他们的土地。他们也将永远不会饶恕埃及脱离阿拉伯阵营、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确保自身领土的做法。其他阿拉伯国家认为，阿拉伯人本来可以通过集体行动，为所有人达成一份更好的和平协议。

1979年3月埃、以签订和平协议后，阿拉伯国家立即将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践，切断了与埃及的关系，埃及也将花费20多年的时间才重新完全融入阿拉伯阵营。萨达特装作满不在乎，但一贯自豪于本国在阿拉伯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的埃及人民，此刻却为自身所受到的孤立而深感痛心。1979年，他们沮丧地看着阿拉伯国家的国旗从阿盟总部以及开罗市中心使馆建筑上降下。1980年2月，埃、以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埃及人民又同样担忧地目睹了大卫之星在开罗新落成的以色列使馆上方冉冉升起。

埃及人民并不反对同以色列人议和，他们只是不想让这一和平以埃及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破坏为代价。埃、以两国现在实现了和平，但这一和平并未给任何一方的人民带来多少愉悦。

20世纪70年代末，阿以和平进程的光芒被现代中东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所掩盖。尽管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范围之外，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

1979年1月，美国支持下的伊朗国王被一场伊斯兰宗教学者领导的民众革命推翻。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冷战时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由于美国失去了其在地区影响力的一根支柱，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势力均衡。同时，伊朗革命也对油价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革命的混乱期，作为世界第二大产油国的伊朗实际上完全停止了其石油生产。在国王倒台引发的恐慌中，全球市场也经历了10年内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几乎涨至原来的3倍，每桶价格由13美元猛增至34美元。

在全世界消费者遭受损失的同时，产油国则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氢化合物出国口，也是富油国的典型代表。沙特的石油收入由1970年的12亿美元，增至1973—1974年间石油禁运高潮时期的225亿美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第二轮石油危机后，沙特的石油收入在1979年时已飙升至700亿美元，在整个70年代增长了几乎60倍。包括利比亚、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经历了相似的增长速率。沙特人则推出了阿拉伯世界最雄心勃勃的公共支出计划，年度发展开支由1970年的25亿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570亿美元。[61]

然而与其他产油国相似，沙特本身缺乏实现其发展目标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因而被迫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招募劳动力。埃及成为首要的劳动力输出国，但突尼斯、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以及无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同样也是阿拉伯劳工移民队伍中的生力军。20世纪70年代，在产油国工作的阿拉伯移民劳工由1970年的约68万人，猛增至1973年石油禁运后的130万人，据估计，至1980年已达到约300万人。这些阿拉伯劳工移民为本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1970年，埃及政府通过阿拉伯产油国的埃及劳工获得的侨汇收入为1000万美元，1974年时达到1.89亿美元，1980年时已增至约20亿美元，10年之内增长至原来的200倍。

埃及社会学家萨阿德丁·易卜拉欣（Saad Eddin Ibrahim）敏锐地指出，这种富油国和贫油国之间的劳动力与资本交换造就了一种“全新的阿拉伯社会秩序”。在一个政治分歧深刻、尖锐的时代，阿拉伯人在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却不断加深。这一新秩序具有相当的弹性来缓和阿拉伯国家间的相互敌意。当1977年夏埃及向利比亚开战时，在利比亚工作的40万埃及劳工没有一人遭到报复性的驱逐。即便在萨达特脱离阿拉伯阵营与以色列议和的情况下，这种实用主义仍然占据优势——在《戴维营协议》之后的几年内，产油国对埃及劳动力的需求继续增长。正如易卜拉欣所总结的，到20世纪70年代末，石油已经使阿拉伯世界在社会经济层面的联系比其现代历史中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62]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石油市场的范围。伊朗国王是中东地区统治时间最长的独裁君主之一，拥有该地区最强大的武装部队之

一，且享有美国的全力支持。他的倒台引起了阿拉伯政客的警觉和思考。紧张的阿拉伯统治者们开始带着更多的疑虑来审视境内的伊斯兰政党。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回忆，自己曾问一位埃及记者："伊朗革命有没有传播到埃及的风险？"后者向他保证说："伊朗革命是一种病症，不可能传播到埃及。"[63]这位记者指出，伊朗是一个什叶派国家，而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逊尼派，且埃及受到另一个伊斯兰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保护，可免遭伊朗的传染。事实很快就将证明这位记者是错的：在未来的10年内，伊斯兰政治将迅速兴起并对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位政治领袖发起挑战，而其起点正是沙特。

伊斯兰政治对沙特王国的挑战起始于1979年11月20日。当时，一个自称"阿拉伯半岛穆斯林革命者运动"的名不见经传的组织，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这一伊斯兰的神经中枢。该运动的领导人呼吁净化伊斯兰教，摒弃西方价值观，从沙特王室手中解放其国家，还指责王室伪善而腐败。僵局持续了两周以上，约1000名反叛者劫持了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最后，沙特人被迫派遣国民卫队对反叛进行了镇压。官方数据称死亡人数只有几十人，非官方的观察者则宣称有数百人在冲突中被杀。该运动的领导人被捕，随后与63名追随者一道被处决，这些追随者中很多人来自埃及、也门、科威特或其他阿拉伯国家。

当麦加大清真寺仍处于被包围之时，沙特东部省份的什叶派社群于11月27日发动了暴力示威游行。示威者高举着伊朗革命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画像，散发传单、鼓动推翻"专制的"沙特政权。沙特国民卫队的警力不堪重负，花了3天时间才扑灭了亲伊朗的示威游行，造成数十人伤亡。[64]

突然之间，即便是最富有、最强大的阿拉伯产油国在迅速崛起的政治伊斯兰力量面前都显得脆弱不堪。新一代青年正在阿拉伯世界崛起，他们已不再相信阿拉伯民族主义华而不实的空话。眼见阿拉伯国王和总统们正用腐败所得建造宫殿，并将个人权力置于阿拉伯公共利益之上，他们对本国的政治领袖不再抱有希望。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或苏联式的无神论。他们相信美国代表着一支新的帝国力量，正在阿拉伯国家之间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为推进以色列的利益而牺牲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他们从伊朗革命中学到的经验就是，伊斯兰教比所有敌人联合起来都要

强大。只要穆斯林能团结在其宗教的永恒真理之下，就能推翻统治者、对抗超级大国。在伊斯兰力量的激励下，阿拉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新时代。

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每年的10月6日，埃及武装部队都要举行阅兵式，这是纪念1973年战争的国定节日。开罗阅兵场的背景是一座现代金字塔，颇具戏剧感，这是安瓦尔·萨达特下令建造的十月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也是埃及的无名战士墓。

武装部队日的游行庆祝是萨达特总统任期的巅峰时刻，也即他成为指挥埃及军队跨越苏伊士运河的“横渡英雄”的时刻。这次的阅兵式是为了纪念1973年埃及领导阿拉伯军队打击以色列。这次打击发生在埃及与这个犹太国家单独媾和之前，媾和严重损害了埃及的地位。

萨达特竭尽全力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武装部队日的游行上，在埃及和国际媒体的注视下，他亲临游行现场。至少在这一天，他可以忽略埃及被孤立的事实：作为对《戴维营协议》的回应，其他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阿盟将总部从开罗迁至突尼斯。这些措施更坚定了埃及政府的决心，要将1973年战争的成就作为国家荣誉来庆祝。

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身穿礼服，坐在阅兵台上，身边环绕着他的内阁成员、宗教人士、外国政要和高级军官，呈现出国之大典的隆重。一排排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导弹发射器在金字塔形纪念碑和检阅台之间列队前进。一组密集的空军战斗机在头顶呼啸而过，拖着彩色的烟雾。评论员宣告：“现在炮兵来了。”此时沉闷的黄褐色卡车拉着榴弹炮驶近检阅台。

其中一辆卡车突然转向急停。一名士兵从驾驶室跳下来，向检阅台投掷了几枚眩晕手榴弹，而他的3个同伙则从平板卡车后面向聚集的政要们开火。这些叛变士兵的行动完全出乎意料，他们尽情地屠杀了30秒钟，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他们很可能一开火就射杀了萨达特。

这伙人的首领跑到检阅台前，近距离向伏地的萨达特总统开枪，直到一名总统卫兵开枪打伤了他。“我是哈立德·伊斯兰布里（Khalid al-Islambuli），”这名刺客对着一片混乱的检阅台高喊，“我杀了法老，我不怕死。”[1]

电视直播了萨达特遇刺，全世界为之震惊。一个不起眼的伊斯兰主义者，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暗杀了埃及这个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总统。伊斯兰革命的景象可能不再局限于伊朗，阿拉伯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伊斯兰主义运动，挑战世俗政府。

当哈立德·伊斯兰布里高喊“我杀了法老”时，他是在谴责萨达特，谴责他的世俗统治把人的法律凌驾于宗教之上。将伊斯兰主义者团结起来的是他们共同的信念：穆斯林社会必须按照“真主的法律”来统治，即源自《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的智慧和伊斯兰神学家的法律判例的伊斯兰法，统称“沙里亚”（sharia）。他们视自己的世俗政府为敌人，称他们的统治者为“法老”。《古兰经》和《希伯来圣经》一样，都严厉批判古埃及的法老，把他们描绘成把人的法律凌驾于神谕之上的暴君。《古兰经》中有不下79节经文谴责法老。那些更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主张用暴力对抗晚近统治阿拉伯世界的“法老们”，以此作为推翻世俗政府和以伊斯兰国取而代之的必要手段。哈立德·伊斯兰布里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将伏地的总统萨达特斥为法老，从而宣布暗杀是合法的。

并不是只有伊斯兰主义者批评萨达特。1981年10月10日，埃及为安瓦尔·萨达特举行国葬，许多国际领导人参加了葬礼，但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寥寥无几。与会者包括3位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萨达特都曾和他们密切合作过。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率领一个声势浩大的以色列代表团出席，他曾因缔结埃以和平条约而与萨达特分享了197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阿盟成员国中，只有苏丹、阿曼和索马里派代表参加了葬礼。

也许更令人震惊的是，出席总统葬礼的埃及名流也很少。资深记者和政治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对萨达特怀有不满（在刺杀发生前一个月，哈伊凯勒同一群反对派人士一起被捕入狱），他反思说：“一个在西方被视为英雄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受哀悼的人，却几乎没有同胞哀悼他。”[2]

然而，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崇拜者，都很满意对萨达特最终安息之地的选择。对于那些尊敬这位“横渡英雄”的人来说，萨达特被埋在1973年

战争纪念碑之下，面对着他被枪杀的检阅台，这是最恰当的。而萨达特的伊斯兰主义敌人对“法老”被埋葬在他金字塔的阴影下也感到满意。

伊斯兰主义者成功刺杀了埃及总统，但他们缺乏推翻埃及政府的资源和规划。副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受轻伤，被紧急护送离开阅兵场。在萨达特的死讯公布后不久，穆巴拉克被宣布就任总统。埃及安全部队逮捕了数百名嫌疑人，据称其中多人遭到酷刑。

6个月后，1982年4月，5名被告因参与刺杀萨达特而被判处死刑：哈立德·伊斯兰布里、他的3个同伙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导师阿卜杜·赛莱姆·法拉吉（‘Abd al-Salam Faraj），后者写了一本小册子，鼓吹对“非伊斯兰的”（即世俗的）阿拉伯统治者发动“圣战”。对他们的处决使刺杀萨达特的刺客们成为殉道者。20世纪80年代期间，伊斯兰主义团体继续使用暴力对抗埃及政府，企图将世俗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变成埃及伊斯兰共和国。

*

如今，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在公共生活中都发挥着显著影响，这很容易让人忘记1981年的中东是多么世俗化。阿拉伯国家中，除了最保守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西式服装比传统服饰更受欢迎，许多人无视伊斯兰禁令公开饮酒，男女在公共场合和工作场所都自由相处，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过上职业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现下的自由标志着阿拉伯人进步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些人则带着不安关注着这些新的发展，担心迅速的变化将会导致阿拉伯世界放弃其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

关于伊斯兰教和现代性的论战，在阿拉伯世界由来已久。1928年，哈桑·班纳创立穆斯林兄弟会，以抗击西方对埃及的影响和对伊斯兰价值观的侵蚀。此后几十年，穆兄会遭到越来越强硬的镇压。埃及的君主政权与纳赛尔政权分别于1948年12月和1954年宣布取缔穆兄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主义政治转入地下，世俗国家越来越多地从苏联社会主义或西方自由市场式民主中获得灵感，这削弱了伊斯兰价值观。然而，镇压让穆兄会更为坚定地反抗世俗主义，并推广他们眼中的伊斯兰价值观。

20世纪60年代，穆兄会里出现了一股激进的新潮流，引领者是一位极富个人魅力的埃及思想家，名叫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他将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改革者之一。1906年，库特卜出生在上埃及的一个村庄，20世纪20年代在开罗师范学院学习。毕业后，他供职于教育部，担任教师和督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活跃于文坛，既是一名作家，又是一名评论家。

1948年，库特卜获得两年政府奖学金，被送到美国留学。他在北科罗拉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其间也在华盛顿特区和加州的斯坦福学习过。虽然他从东到西穿行过美国，但却没有那种典型的交换学生对留学对象国的感情。1951年，库特卜在一份伊斯兰主义期刊上发表反思文章《我所见到的美国》。库特卜谴责他在美国社会体验到的物质主义的肆虐和精神价值的匮乏，厌恶他见到的道德败坏和肆无忌惮。让他尤为震惊的是美国教会里的恶习。他写道："大多数教堂都有两性共同参加的俱乐部，每个牧师都引导尽可能多的人去他的教堂，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教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在库特卜看来，这种招徕信众的做法，更适合剧院经理而不是精神领袖。

库特卜在文中讲到，一天晚上，他去参加教堂的仪式，仪式后是舞会。牧师想方设法让教堂看上去"更浪漫、更有情调"，这让他震惊不已。牧师甚至选择了一首撩人的歌曲来营造气氛，这是"一首著名的美国歌曲，叫作《但是宝贝，外面很冷》"。库特卜对这首歌曲的描述，反映出他同美国流行文化间有多深的隔阂："［这首歌］由晚上约会回来的男孩和女孩的对话构成。男孩把女孩带到他家，不让她走。女孩恳求男孩让她离开，因为夜色已浓，她的妈妈还在等她回家。但每次女孩提出一个回家的借口，男孩都会用这句歌词回答她：'但是宝贝，外面很冷！'"[3] 显然，库特卜觉得这首歌曲令人反感，而让他更为震惊的是，一个宗教人士竟然会选择这么一首不合适的歌曲来让年轻的教民们跳舞。（在他看来，宗教场所的）社会功能应该同清真寺一样，在其中两性是分开的，穿着得体与举止端庄是基本的规则。

库特卜回到埃及，看着他的同胞安然自得地崇尚着美国所体现的现代价值观，决心把他们唤醒。他提出："恐怕美国国民的素质同它在物质上的强大并不匹配，待到生命之轮转去、时间之书合上时，美国将不会

或几乎不会给将人与物甚至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道德带来任何助益。”[4]库特卜不想改变美国，而是想保护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免遭他在美国目睹的道德堕落。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1952年，赛义德·库特卜加入了穆兄会。考虑到他在出版领域的背景，他们任命他为穆兄会媒体与出版部门的负责人。这位狂热的伊斯兰主义者通过发表煽动性的文章建立起了广泛的读者群。埃及1952年革命后，库特卜同自由军官们保持良好关系。据报道，纳赛尔邀请库特卜为新的官方政党“解放大会”（Liberation Rally）起草党章。或许，纳赛尔这么做，并不是因为钦佩这位伊斯兰主义改革者，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尝试，目的是争取库特卜对这个新官方组织的支持。包括穆兄会在内的所有政党都将解散，并入该组织中。

新政权对穆兄会的善意是短暂的。1954年10月，一名穆兄会成员企图暗杀纳赛尔，之后穆兄会遭到全面镇压，库特卜也被捕了。同许多其他穆兄会成员一样，库特卜声称在被捕期间遭受了可怕的酷刑和审讯。库特卜被控颠覆活动罪，处以15年苦役。

在狱中，库特卜继续激励伊斯兰主义者。因健康状况不佳，他常常住在狱中的医院，在那里，他写下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关于伊斯兰教与政治的著作，包括一部对《古兰经》的激进评注和号召推动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的《路标》（*Milestones*）。

《路标》是库特卜对西方物质主义破产和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专制性的最强阐述。他认为，界定当今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是人为设立的，恰恰就是这种人为的属性导致了制度的失败。这些制度并没有开启科学和知识的新时代，反而造成了对神的指引蒙昧无知，或称“贾希利叶”（*jahiliyya*）。这个词在伊斯兰教中有特殊含义，指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黑暗时代。库特卜认为，20世纪的贾希利叶，“其形式是声称创造价值、立法规约集体行为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属于人，而不考虑真主的规定”。这里暗含的意思是，20世纪科技的显著进步并没有将人类带入现代，而抛弃真主永恒的旨意却将人类社会带回了7世纪。库特卜相信，这一判断对阿拉伯世界和非伊斯兰的西方同样适用。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在他看来，就是暴政。阿拉伯各国政权没有给公民带来自由和

人权，却施行了压迫和酷刑——正如他从痛苦的亲身经历中所了解到的那样。

库特卜相信，伊斯兰教作为真主对人类秩序的完美表述，是通往人类自由的唯一途径，是真正的解放神学。由此推演，唯一有效和合法的法律就是伊斯兰法所载的真主的法律。他认为，必须有一个穆斯林先锋队来恢复伊斯兰教“人类领袖”的角色。先锋队将用“宣讲和说服来革新思想和信仰”，用“物质的力量和‘圣战’来废除贾希利叶制度，这些组织和权威阻止人们改变思想与信仰，迫使他们遵循错误的道路，使他们服务于人类领主而不是全能的真主”。库特卜写作《路标》，就是为了指导引领伊斯兰价值观复兴的先锋队，通过复兴，穆斯林将再次实现个人自由并重回世界领导地位。[5]

库特卜观点的威力在于其简单与直接。他指出了一个问题——贾希利叶，并基于众多阿拉伯穆斯林所珍视的价值观，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伊斯兰解决方案。他的批评，无论对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对阿拉伯政府，都同样适用。他的回应传递出希望，而这一希望是建立在对穆斯林优越性的假设之上的：

> 状况发生了变化，穆斯林失去他们的体力并被征服；然而意识没有脱离他们，因为他们是最优越的。只要他们坚持信仰，他们就会在面对征服者时处于优越的位置。他们依然确信，这状况是暂时的，也将会过去，而信仰将逆转潮头，席卷一切。即便死亡是命中注定，他们也不会低头。所有人都会死，但对他们来说则是殉难。他们将进入花园［即天堂］，而征服者将堕入火中［即地狱］。[6]

然而，无论库特卜有多反对西方列强，他的首要斗争目标始终是阿拉伯世界的威权政府，尤其是纳赛尔政府。库特卜在注释《古兰经》中有关“掘坑的人”的经文时，几乎毫不掩饰地将之作为反映穆兄会和自由军官之间斗争的寓言。在《古兰经》的故事中，有一群信仰者因信仰而遭到谴责并被暴君们活活烧死，暴君们聚集在一起，亲眼看着这些正直的受害者死去。“愿掘坑的人们，被弃绝”（《古兰经》第85章第1—16节）。库特卜是这样注释的：迫害者，也就是那些“傲慢、凶恶、有罪、堕落的人”，目睹着殉道者的痛苦，享受着施虐者的快感。他写道：“当

这些正直的信仰者中的青年男女、小孩和老人被扔进火中时，迫害者们邪恶的快感会达到新的高度，面对血肉模糊的场景，他们会发出狂喜的叫声。”《古兰经》的故事中并没有这样逼真的场面，这或许是受到库特卜和他的穆兄会同伴在狱中所受折磨的启发。库特卜总结道，“信仰者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信仰的斗争，或是不信与信之间的斗争，或是贾希利叶与伊斯兰之间的斗争”。他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埃及政府与他头脑中的伊斯兰政权不相容。两者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964年，库特卜被释放出狱，同年，《路标》出版。他在狱中的作品增强了他的地位，他很快就同被取缔的穆兄会的同志们重新建立了联系。然而，他也一定知道，他的每一次行动都在纳赛尔秘密警察的眼皮子底下进行。这位伊斯兰主义作家因其提出的激进新思想而在伊斯兰世界声名鹊起，将在埃及国内外对埃及政府构成威胁。

库特卜的追随者们同这位改革者一样面临着监视和风险。库特卜最具影响力的弟子中有宰奈卜·安萨里（Zaynab al-Ghazali, 1917—2005），她是伊斯兰主义女性运动的先驱。年仅20岁时，她就创立了穆斯林妇女协会。她的活动受到了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关注，后者试图说服她与他刚建立的穆斯林姐妹会联合。尽管这两个伊斯兰主义女性运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安萨里成了哈桑·班纳的忠实追随者。

20世纪50年代，赛义德·库特卜尚在狱中，安萨里见了他的姐妹们，她们将当时尚未出版的《路标》部分章节的草稿给了她。她在阅读过程中得到启发，便践行库特卜在宣言中所设想的先锋队的使命——让埃及社会准备好接受伊斯兰法。正如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度过13年后才迁徙到麦地那并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团那样，库特卜的追随者准备用13年的时间把埃及社会变成一个理想的伊斯兰社会。她写道：“已经决定了，在对我们的青年、老人、妇女和儿童进行13年伊斯兰培训之后，我们展开全国民调。如果民调显示，至少有75%的信教者相信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并且深信应当建立伊斯兰国，那么我们就呼吁建立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如果民调结果反映出较低的支持率，那安萨里和她的同事们将再投入13年来改造伊斯兰社会。[7]他们的长远目标就是推翻自由军官政权，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纳赛尔和他的政府决心在伊斯兰主义做大之前消除它的威胁。

1964年底，在关押赛义德·库特卜10年后，埃及政府释放了他。宰奈卜·安萨里和库特卜的其他支持者们一起庆祝库特卜获释，并经常与他见面，当然是在埃及警方密切监视之下。许多人认为，政府释放库特卜是为了追踪与他志趣相同的伊斯兰主义者。库特卜仅仅获得了8个月的自由，1965年8月，他再次被捕，安萨里和其他相关人士一同被捕。他们被控密谋暗杀纳赛尔总统并推翻埃及政府。虽然这些被告们的长期目标肯定是以伊斯兰制度取代埃及政府，但他们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没有威胁总统生命的阴谋。

安萨里在狱中度过了6年，后来撰文记述了狱中的痛苦经历。她生动地描绘了纳赛尔主义政权施于男男女女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恐怖酷刑。入狱第一天，她就目睹了暴力："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愿去接受这样非人的迫害。我默默地看着穆兄会的成员被吊在半空，他们赤裸的身体承受着激烈的鞭打。他们中，一些人被扔给凶残的狗，任凭它们撕扯他们的身体，而另一些人则面对着墙，等待遭受酷刑。"[8]

安萨里没有幸免于这些暴行，她经历了鞭打、殴打、恶狗攻击、隔离、睡眠剥夺和定期的死亡威胁，这些都是为了获得一份供状，表明库特卜和穆兄会的其他领导人确实谋划了所谓的阴谋，但施刑者徒劳无获。在安萨里遭受了18天虐待之后，两名新被捕的年轻妇女被投入了她的牢房，她无法用自己的话来向她们描述这种恐怖，于是念诵了《古兰经》中有关"掘坑的人"的经文。念诵完毕，一名女子开始默默哭泣，而另一名则疑惑地问道："这真的发生在女性身上了吗？"[9]

1966年4月，对赛义德·库特卜及其追随者的审判开始了。包括库特卜和安萨里在内的共43名伊斯兰主义者被正式指控密谋反对埃及政权。政府公诉人以库特卜的著作为证据证明他有罪，指控他煽动暴力推翻埃及政府。1966年8月，库特卜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判有罪并判处死刑。宰奈卜·安萨里被判处25年监禁和苦役。

埃及政府处决库特卜，不仅使他成为伊斯兰主义事业的殉道者，也证实了他著作中的许多说法。库特卜死后，他的著作比他生前更具影响。他的《古兰经》评注和他的政治行动纲领《路标》，在伊斯兰世界多次重印、传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适龄新一代（伊斯兰主义者），

受库特卜有关伊斯兰复兴和正义的言论感召，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去实现他的愿景。

*

20世纪60年代，伊斯兰主义的挑战从埃及蔓延到叙利亚。穆兄会的影响和赛义德·库特卜对世俗政府的激进批评，共同在叙利亚催生了革命性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致力于推翻叙利亚那个古罗马执政官式的共和国。这场冲突将叙利亚推向内战的边缘，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并最终在叙利亚城镇哈马达到了残酷的顶峰。

穆兄会叙利亚分支的创始人是霍姆斯人穆斯塔法·西巴伊（Mustafa al-Siba'i，1915—1964）。20世纪30年代，他在埃及学习，受到了哈桑·班纳的影响。返回叙利亚后，西巴伊将诸多穆斯林青年协会网罗到一起，创建了叙利亚穆兄会。利用穆兄会的网络，他在1943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叙利亚议会的一个席位。从那时起，政治精英就不能忽视叙利亚穆兄会的实力了，虽然后者自身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叙利亚日益表现出世俗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话语。

1963年，当复兴党在叙利亚掌权时，穆斯林兄弟会发起了攻势。复兴党的政策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要求严格区分宗教和国家。对复兴党而言，形成这样的政策倾向是很自然的，因为党员的教派成分十分多样。复兴党不仅在占叙利亚人口绝大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70%）中吸纳党员，也吸引了许多基督徒，还得到阿拉维派的大力支持。阿拉维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分支，是叙利亚最大的少数族群，约占总人口的12%。在被占叙利亚人口多数的逊尼派边缘化多年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阿拉维派通过加入军队和复兴党，在叙利亚政治中获得了显要地位。

复兴党的世俗化甚至无神论的倾向，引来了穆兄会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后者自称是叙利亚的“道德多数派”。穆兄会将阿拉维派的崛起视为对叙利亚逊尼派穆斯林文化赤裸裸的威胁，其成员决心暗中颠覆政府，在必要时不惜诉诸暴力。

20世纪60年代中期，穆兄会在哈马和北部城市阿勒颇组织地下抵抗

运动。伊斯兰主义武装分子开始囤积武器，训练从叙利亚各地高中和大学征募来的年轻人。哈马最具魅力的伊玛目（清真寺中带领礼拜的人）之一谢赫麦尔旺·哈迪德（Shaykh Marwan Hadid），在征募学生加入伊斯兰主义地下运动方面尤其成功。对许多年轻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哈迪德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启发者和榜样。[10]

1970年11月16日，复兴党成员、叙利亚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将军发动政变掌权，伊斯兰主义地下组织和叙利亚政府之间的对抗已不可避免。阿萨德属于少数族群阿拉维派，是叙利亚第一位非逊尼派穆斯林领袖。他在执政初期曾努力安抚逊尼派穆斯林的敏感情绪，但无济于事。1973年颁布的新宪法第一次没有规定叙利亚总统必须是穆斯林，这重新引发了围绕宗教和国家关系的争论。这部宪法在逊尼派穆斯林的核心地区哈马引发了暴力示威。1976年4月，阿萨德决定干预黎巴嫩内战，支持马龙派基督徒，反对进步的穆斯林力量和巴勒斯坦运动，这引发了更多伊斯兰主义者的暴力活动。

阿萨德对黎巴嫩内战的干预引起了叙利亚穆斯林多数派的严重关切。自从阿萨德1970年掌权以来，许多心怀不满的逊尼派发现自己被阿拉维派主导的政府边缘化了，他们怀疑新政权是在推动一个“少数派联盟”，将统治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和黎巴嫩的马龙派捆绑在一起，以压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穆斯林多数派。政府和逊尼派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阿萨德下令镇压叙利亚穆兄会。1976年，政府逮捕了哈马激进的伊玛目谢赫麦尔旺·哈迪德。这个征募伊斯兰主义者的人立即进行了绝食抗议，并于1976年6月去世。政府坚持说，哈迪德是绝食自杀的，但是伊斯兰主义者指责政府谋杀，并发誓为他报仇。

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者花了3年时间才组织起来对阿萨德政权进行报复性打击。1979年6月，伊斯兰主义游击队袭击了阿勒颇的一所军事学院，该学院的大部分学员——320人中大约有260人来自阿拉维派。恐怖分子杀害了83名学员，他们全都属于阿拉维派。

对军事学院的袭击是穆斯林兄弟会和哈菲兹·阿萨德政权之间全面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将持续两年半，将叙利亚拖入日复一日地狱般的恐怖与反恐的拉锯之中。

叙利亚的穆兄会，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拒绝与阿萨德政权谈判或妥协。1979年年中，他们在分发给叙利亚城镇的传单中宣称："出于对伊斯兰教原则的尊重，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也不寻求推翻一个法老来让另一个法老承继。"[11]他们的话呼应了埃及的伊斯兰主义武装分子，他们同样决心用暴力推翻萨达特政府，并给予在哈马起义反抗叙利亚法老的兄弟们以道义上的支持。

由于没有和解的余地，以总统的弟弟里法阿特·阿萨德（Rifa'at al-Asad）为首的叙利亚政府中的强硬派，被赋予了用武力镇压伊斯兰主义叛乱的自由。1980年3月，叙利亚突击队乘直升机降落在阿勒颇和拉塔基亚之间的一个反叛村庄，并将全村置于军事统治之下。据官方统计，有200多名村民在这次行动中丧生。

受这次乡村行动胜利的鼓舞，叙利亚政府派出2.5万人的部队入侵阿勒颇，一年前，那里曾发生过屠杀军校学生事件。士兵们搜查了那些被认为支持伊斯兰主义叛乱的街区的每一所房子，逮捕了8000多名嫌疑人。里法阿特·阿萨德在坦克炮塔上警告镇民，他准备每天处决1000人，直到穆兄会在阿勒颇的势力被完全清洗。

1980年6月26日，穆兄会发动回击，企图暗杀总统阿萨德。武装分子在总统接待一位来访的非洲政要时向他投掷手榴弹、打响机关枪，阿萨德在保镖的保护下死里逃生。第二天，里法阿特·阿萨德派他的突击队到关押穆兄会囚犯的臭名昭著的泰德穆尔监狱，执行了可怕的报复。

年轻的阿拉维派突击队成员伊萨·易卜拉欣·法耶德（'Isa Ibrahim Fayyad）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第一次任务，他接到命令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囚犯。上午6时30分，叙利亚士兵乘直升机前往监狱。总共大约有70名突击队员，分成7队，每队被派往一个不同的牢房。法耶德和他的部下各就各位，开始工作。"他们为我们打开了牢房的大门，我们中的六七个人进去杀了里面所有的人，共有六七十众，我自己应该是射杀了15人。"牢房里回响着机关枪的射击声和垂死者"真主至大"的呼喊声。法耶德并不同情他枪下的受害者，他冷冷地回忆道："大概有550个穆兄会成员被杀了。"其他参与者估计有多达700—1100名穆兄会成员被枪杀在他们的牢房中。手无寸铁的囚犯对突击队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攻击，在混战

中打死一人，打伤两人。当突击队完成任务时，队员们必须去清洗手、脚上的血渍。[12]

在消灭泰德穆尔监狱的穆兄会成员之后，阿萨德采取主动，将穆兄会从叙利亚社会中清除出去。1980年7月7日，叙利亚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加入穆兄会是死罪。伊斯兰主义反对运动并不屈服，开始了一系列针对叙利亚知名官员的暗杀行动，其中包括阿萨德总统的一些私人朋友。

1981年4月，叙利亚政府做出回应，派遣军队进入穆兄会在哈马的据点。哈马是叙利亚第四大城市，当时有约18万人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中心。当部队到达时，镇民们并没有抵抗，以为这将是一次像过去一样的突袭，不过是突击队员把人关起来问话，恐吓几句就放了。可惜他们错了。

叙利亚军队决定拿哈马的平民开刀以儆效尤，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儿童和成人。一位目击者这样向一位西方记者描述这场屠杀："我走了几步就遇到一堆尸体，接着又是一堆，总共得有10—15堆。我走过一具又一具尸体，长时间地注视着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每堆中有15、25或30具尸体，脸部完全不可辨认了……从14岁往上，什么年纪的都有，穿着睡衣或长袍，穿着凉鞋或光脚。"[13]据估计，这次攻击的死亡人数从150人至数百人不等。政府军和伊斯兰主义者相互敌对的两年里，死亡总数已经超过2500人。

为回应军队在哈马的暴行，穆兄会以牙还牙，在叙利亚主要城镇发动针对无辜平民的武装袭击。伊斯兰主义者将战场从北部城镇阿勒颇、拉塔基亚和哈马转移到首都大马士革。8—11月间，穆兄会安放了一系列爆炸装置，让叙利亚首都大为震动。最猛烈的炸弹袭击发生在11月29日，市中心一枚巨大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200人死亡，多达500人受伤。这是到当时为止阿拉伯世界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炸弹袭击。

1981年10月，安瓦尔·萨达特遇刺身亡，恰逢阿萨德总统51岁生日，叙利亚伊斯兰主义者散发传单，威胁他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阿萨德授权他的弟弟里法阿特在穆兄会据点哈马进行一次灭绝行动，以一劳永逸地击败穆兄会。

1982年2月2日凌晨，叙利亚政府与穆兄会在其据点哈马开战。武装直升机把多队突击队员运送到城外的山上。在1981年4月政府袭击杀戮之后，市民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警觉的伊斯兰主义者听到直升机飞来的动静后迅速做出反应。穆兄会成员们高呼“真主至大”，武装反抗叙利亚政府。城中清真寺里通常用来宣礼的喇叭号召大家参加“圣战”。穆兄会领导人敦促市民将“异教徒”的阿萨德政权一劳永逸地赶下台。

黎明时分，第一批士兵撤退，伊斯兰主义斗士继续进攻，杀戮哈马的政府官员和复兴党成员。早期的成功给反叛分子带来了虚假的胜利希望，因为在第一批突击队员背后，还部署着数以万计的士兵，并有坦克和飞机支援。这场战斗，政府输不起，反叛分子也缺乏取胜的手段。

在第一周，穆兄会成功地击退了叙利亚军队的进攻。然而，政府的强大火力破坏极大，坦克和大炮夷平了整个城市的街区，将守卫者们掩埋在瓦砾之下。当哈马最终沦陷时，政府人员对幸存者进行了血腥镇压。哈马市民中，但凡有一丝支持穆兄会的嫌疑，就遭到逮捕、拷打和任意杀戮。暴力过后两个月，《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进入哈马，发现整片整片的街区都被推土机和蒸汽压路机摧毁、夷平。人员伤亡更为严重。弗里德曼报道说：“实际上，哈马一役中幸存的所有当地穆斯林领袖，从谢赫到教师再到清真寺看管人，后来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遭到了清算，大多数反政府的工会领导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4]

时至今日，没有人知道1982年2月有多少人在哈马死去。记者和分析人士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至2万之间，但里法阿特·阿萨德吹嘘杀死了3.8万人。阿萨德兄弟想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已经彻底击败了他们的对手，给了叙利亚穆兄会一次永远无法恢复元气的打击。

伊斯兰主义者和法老们的冲突带来的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埃及政府使用大范围的酷刑和选择性的处决，而叙利亚政权则进行大规模灭绝。伊斯兰主义者需要更高程度的训练、规划和纪律来推翻如此强大的对手。

叙利亚和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的经验表明，阿拉伯国家太强大了，不可能通过暗杀或颠覆来推翻。那些希望推翻世俗主义并建立伊斯兰国

的伊斯兰主义者将不得不另辟蹊径。黎巴嫩内战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良机来推动其理想的伊斯兰社会愿景的实现。1979年被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在这两处，伊斯兰主义者都将他们的斗争推向了国际舞台，将他们的打击范围扩大到了以色列、美国和苏联等地区和全球超级大国。一开始是个别国家的国内安全斗争，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球安全问题。

*

1983年10月23日星期日上午，几乎同时发生的两次爆炸震动了贝鲁特大地。几秒钟内，3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241名美国军人、58名法国伞兵、6名黎巴嫩平民和2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美国海军陆战队遭遇了自硫磺岛以来的最高单日死亡人数，法国遭遇了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的最高单日死亡人数，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则改变了黎巴嫩冲突的形态。

袭击者驾驶卡车，载着数吨烈性炸药接近目标。卡车在上午6点20分通过服务人员入口驶近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一栋坐落在贝鲁特国际机场区的混凝土建筑。他加快速度，冲破铁门而入。震惊的哨兵连上膛去阻止他的时间都没有。一名幸存者看着卡车飞驰而过，爆炸发生后，他只记得："那人开车经过时面带微笑。"[15]司机显然很高兴，因为他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兵营，毫无疑问，他相信暴力死亡将为他打开天堂之门。

剧烈的爆炸将这座建筑物从地基处切断，兵营像纸牌屋一样倒塌了。海军陆战队的地下弹药库受热爆炸，这二次爆炸再次震荡了已成废墟的大楼。

向北3英里，另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驾驶卡车进入了法国伞兵司令部所在高层大楼的地下停车场。他引爆了炸弹，夷平了整座大楼，造成了58名法国士兵死亡。爆炸发生几分钟后到达法国司令部废墟的记者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无法理解这次破坏竟然如此剧烈。"我赶到一个冒烟的爆炸坑旁，它有20英尺深、40英尺宽，边上堆放着一个大得骇人的三明治一样的物体，那是一座九层大楼……炸弹把这座九层大楼掀起并移动了20英尺。整座大楼都飞起来了。爆炸坑就是大楼原来所

在的位置。这是怎么做到的？”[16]

1983年10月23日袭击造成的破坏，对饱受战争摧残的贝鲁特来说，依然令人震惊。这些行动还反映出（袭击活动的）事先规划与执行纪律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且令人深感不安的程度。今天，我们会说这两场袭击具有基地组织的行动特征，但距离后者发动第一次袭击还有10年。

没有人确切知道谁该为袭击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伞兵负责。首要嫌疑对象是一个自称伊斯兰“圣战”的神秘新团体。1982年7月，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绑架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执行校长、美国学者大卫·道奇（David Dodge），这是该组织的早期行动之一。他们还声称对1983年4月贝鲁特市中心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炸弹袭击负责；爆炸震塌了使馆的一侧，造成6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激进的新力量活跃在黎巴嫩内战中。在拨给一家外国通讯社的匿名电话中，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该组织7月对美国大使馆的炸弹袭击，“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帝国主义的行动的组成部分”。看上去，伊朗在黎巴嫩有很危险的朋友。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发言人继续说：“我们将继续打击黎巴嫩境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包括多国部队。”10月爆炸发生后，伊斯兰“圣战”组织再次宣称负责。他们坚称：“我们是真主的战士，我们热衷于献身。我们不是伊朗人，不是叙利亚人，也不是巴勒斯坦人，我们是遵循《古兰经》原则的黎巴嫩穆斯林。”[17]

从1977年叙利亚干预到1983年自杀式爆炸事件的6年间，黎巴嫩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这场冲突在1975年爆发时是黎巴嫩各派别的内战，巴勒斯坦人牵扯其中，但到了1983年已经演变成地区冲突，吸引了叙利亚、以色列、伊朗、欧洲和美国直接参与，以及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苏联等更多国家间接参与，它们给不同的民兵组织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

战争还导致黎巴嫩各派别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重大变化。1976年，

叙利亚军队作为阿盟维和部队的一部分进入黎巴嫩。他们先支持马龙派基督徒，以防止由卡迈勒·琼布拉特领导的左翼穆斯林派系获胜。叙利亚小心维持其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迅速采取行动阻止任何派别在该国内战中取得明显胜利。这使得叙利亚相对频繁地转换结盟对象。击败左翼穆斯林民兵之后，叙利亚立马反对马龙派，转而支持新兴力量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

什叶派长期以来被政治精英边缘化，直到黎巴嫩内战爆发后才成为黎巴嫩一个独特的政治社群。到20世纪70年代，什叶派在数量上成为黎巴嫩最大的社群，尽管他们仍然是该国教派中最贫穷、最缺乏政治权利的群体。传统上，黎巴嫩什叶派社群的中心位于该国最贫穷的地区——南部地区和北部的贝卡谷地。什叶派纷纷逃离相对贫困的农村，迁至贝鲁特南部的贫民窟以寻找工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黎巴嫩什叶派教徒被吸引加入承诺推动社会改革的世俗政党，如复兴党、黎巴嫩共产党和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等。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一个具有黎巴嫩血统、个人魅力非凡的伊朗宗教学者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什叶派政党——“被剥夺者运动”（Harakat al-Mahrumin），并开始与左派政党竞争，获得黎巴嫩什叶派的支持。1975年内战爆发后，“被剥夺者运动”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阿迈勒”。

黎巴嫩内战初期，阿迈勒站在以卡迈勒·琼布拉特为首、由左翼穆斯林政党构成的“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一边。但穆萨·萨德尔很快失去了对琼布拉特领导斗争的幻想，他指责这名德鲁兹领导人把什叶派当炮灰。用萨德尔自己的话说，就是“与基督徒战斗到最后一名什叶派牺牲”。[18]阿迈勒和巴勒斯坦运动之间也关系紧张，1969年以来，后者一直把黎巴嫩南部作为抗击以色列的基地。巴勒斯坦人从黎巴嫩南部发动的行动招致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什叶派社群深受其害。不仅如此，巴勒斯坦人对黎巴嫩南部的控制也让什叶派怨恨不已。

到1976年，阿迈勒已经与琼布拉特的联盟和巴勒斯坦运动分道扬镳，转而同叙利亚合作。阿迈勒的追随者认为叙利亚是对抗巴勒斯坦在黎巴嫩南部势力的唯一力量。这开启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什叶派之间的持

久联盟，一直延续至今。

1979年伊朗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黎巴嫩的什叶派政治。数个世纪的宗教和文化纽带将黎巴嫩什叶派与伊朗维系在一起。穆萨·萨德尔本人是具有黎巴嫩血统的伊朗人，他推动的政治激进主义非常符合伊朗伊斯兰革命者的思想。

可惜萨德尔没能活着见证伊朗革命。1978年，他在去往利比亚的一次旅行中失踪，普遍认为他在那里被谋杀。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还在努力接受他们的领袖失踪这一事实之际，伊朗革命在1979年爆发了，这赋予了他们一批新的领袖，让他们得以在关键时刻团结起来。贝鲁特南部贫民窟里和巴阿勒贝克罗马遗址上的穆萨·萨德尔画像边挂上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画像。伊朗人竭尽所能激发黎巴嫩什叶派的热情，这是他们早期输出革命的一部分，旨在扩大他们在传统什叶派阿拉伯文化中心——伊拉克南部、沙特东部、巴林和黎巴嫩的影响力。借助这一网络，伊朗可以向其对手和敌人施压，特别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拉克。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迅速恶化。伊朗新政府不信任美国政府，因为后者在过去支持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ed Reza Pahlevi）。1979年11月4日，当美国政府允许被废黜的伊朗国王到美国接受治疗时（他患了癌症并已病入膏肓），一群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劫持了52名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冻结了伊朗的资产，对伊朗共和国实施了经济和政治制裁，甚至一度试图通过军事救援行动来缓解人质危机，但没有成功。美国外交官被囚禁了444天，而美国政府无能为力，备受羞辱。伊朗处心积虑打击吉米·卡特，后者的连任竞选也因人质危机而受挫。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后，美国外交官们才被释放。这一姿态并没有使里根政府对伊朗政府产生好感，人质危机所造成的损害从那以后就一直困扰着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伊朗新政权谴责美国是大撒旦，是全体穆斯林的敌人。里根及之后的美国政府给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贴上了“流氓国家”的标签，并想方设法孤立伊朗、推翻伊朗政府。

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加剧了伊朗和美国间的敌对关系，给黎巴

嫩带来了可怕的后果。1978年以来，伊拉克一直由萨达姆·侯赛因统治。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入侵了它的北方邻国。侯赛因试图利用革命期间伊朗内部的政治动荡和人质危机期间伊朗所遭遇的国际孤立，夺取伊朗领土上的争议水道和优质油田。两伊战争是迄今为止现代中东历史上最暴力的冲突，战争持续了8年（1980—1988），使用了战壕战、毒气和化学武器、空中投弹与火箭炮袭击城市中心等让人联想起世界大战的作战手段，造成大约50万至100万人丧生。

伊朗人花了两年时间才把伊拉克人赶出他们的国土，并转而发动进攻。随着战事向对伊朗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公开支持伊拉克，尽管后者与苏联关系密切。从1982年开始，里根政府开始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武器、情报和经济援助，支持后者对伊朗的战争。这加剧了伊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人利用一切机会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黎巴嫩很快成为伊美对抗的舞台。

伊朗在黎巴嫩有两个盟友——什叶派和叙利亚。伊朗和叙利亚联盟，这从很多方面看都有悖常理。叙利亚是公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世俗国家，且正与本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进行暴力斗争，因此不太可能是这个非阿拉伯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盟友。把两国维系在一起的是现实利益，主要是两国都怀有对伊拉克、以色列和美国的敌意。

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两国都实行一党制，执政党分别是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复兴党的两个敌对支派。因此，复兴党实际上破坏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统一行动和共同目标。这两个复兴党国家之间的敌意如此之深，以至于叙利亚在两伊战争期间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分道扬镳，站到伊朗一边。作为回报，伊朗向叙利亚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并在叙以冲突时提供增援。叙利亚和伊朗的联盟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将叙利亚、伊朗与黎巴嫩的什叶派联系在一起。1982年夏，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成为激活这一将对地区未来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三角关系的催化剂。

*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把黎巴嫩的冲突带入了新阶段，暴力和

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入侵黎巴嫩后，以色列开始作为黎巴嫩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卷入教派政治。以色列人将在黎巴嫩逗留超过18年，给两国带来持久的后续影响。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是由一次在英国领土进行的袭击引发的。1982年6月3日，激进团体艾布·尼达勒，即1978年杀害巴解组织驻伦敦外交官赛义德·哈马米的团体，企图在伦敦一家酒店外暗杀以色列大使史罗莫·阿尔果夫（Shlomo　Argov）。尽管艾布·尼达勒是一个以暴力对抗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叛变团体，且巴解组织已经与以色列停火一年，但以色列政府仍然以这次暗杀企图为理由，对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发动了战争。

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好战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巴解组织和叙利亚赶出黎巴嫩来重塑中东。贝京认为，黎巴嫩的基督徒是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天然盟友。自1977年上台以来，他领导的利库德政府与右翼的马龙派政党建立了日益公开的联盟（可以预想这会给叙利亚和马龙派的关系带来多么不利的影响）。[19]长枪党的民兵被送到以色列受训，以色列人向基督徒战士们提供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和制服。

贝京相信，如果巴解组织和叙利亚都被赶出黎巴嫩，以色列就能与黎巴嫩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是长枪党创始人皮埃尔·杰马耶勒之子，他将成为黎巴嫩总统。继同埃及缔结和约后，以色列若再与黎巴嫩媾和，将会孤立叙利亚，从而可以自由地吞并在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领土。利库德政府一直用圣经名称朱迪亚和撒马利亚指称西岸，出于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决心将西岸并入现代以色列国。然而，以色列政府只想要西岸的土地，而不想吸纳西岸的阿拉伯人。沙龙的解决办法是把巴勒斯坦人赶出西岸，鼓励他们推翻侯赛因国王、接管约旦来实现他们的民族愿望，当时巴勒斯坦人已占约旦人口的60%。这体现了沙龙自己津津乐道的“约旦方案”。[20]

事后看来，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只有通过军事手段和对人生命的漠视才能实现。第一步是摧毁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势力，利库德政府以伦

敦未遂的暗杀为由，发动战争。暗杀后第二天，即1982年6月4日，以色列战机和海军舰艇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西部展开猛烈的轰炸。6月6日，以色列地面部队执行“加利利和平行动”，横扫黎巴嫩边境。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接下来的10周里，以色列的入侵造成超过1.7万名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死亡，3万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以色列人将全部军事力量投到黎巴嫩。黎巴嫩城镇和城市遭到空中与海上的轰炸，以色列军队迅速穿过黎巴嫩南部去围攻贝鲁特，巴解组织总部正设在贝鲁特南郊的法哈尼。身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的冲突中，贝鲁特的居民成为无助的受害者。以色列人把巴解组织领导层作为重点目标，希望通过杀害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高级别副手来摧毁该运动。为了避免暗杀，阿拉法特被迫每天更换住所。他藏身的建筑物，一旦有消息流出，很快就成为以色列轰炸机的目标。

1974年，阿拉法特在联大演讲时的助手丽娜·塔巴拉同她的家人一起生活在贝鲁特西部的穆斯林区，他们在黎巴嫩内战的第一阶段幸存下来。但她的婚姻没能持续，于是她恢复了娘家姓，做回了丽娜·米格达迪（Lina Mikdadi）。1982年贝鲁特被围攻期间，米格达迪生活在贝鲁特西部，她亲眼看到了阿拉法特几分钟前刚离开的公寓大楼被夷为平地。“我注意到公园背后的地方，那里曾有一栋大楼……我跑过去，发现八层高的大楼消失了，人们近乎疯狂地四散奔逃，女人们嘶喊着她们孩子的名字。”[21]根据米格达迪的说法，摧毁这栋阿拉法特避过难的大楼，造成了250名平民死亡。阿拉法特手下的一位指挥官说，这次袭击让阿拉法特悲痛欲绝。阿拉法特质问：“这些被埋在废墟下的孩子犯了什么罪？他们的全部罪过，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我曾经去过几次的大楼内。”此后，阿拉法特睡在他的车里，远离住宅区。[22]

围攻持续了10周，满是无法形容的暴力。幸存者称，一天内有数百次袭击。没有避风港，也没有避难所。伤亡人数迅速上升至数万人，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结束对贝鲁特的围攻。1982年8月，暴力达到顶峰。8月12日，以色列人连续进行了11个小时的空袭，向贝鲁特西部投掷了数千吨炮弹。估计有800所房屋被毁，500人伤亡。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总统致电以色列总理贝京，说服他停止战斗。米格达迪诘问道：“里根总统，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呢？”[23]

贝京在美国的压力下让步了，里根政府促成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一项复杂的停火协议。巴解组织的战斗人员将从海上撤出贝鲁特，以军撤出后的阵地，将部署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军人组成的多国部队。

撤军计划的第一阶段进行得非常顺利。8月21日，法国军队抵达并控制贝鲁特国际机场。第二天，巴解组织的第一批部队开始从贝鲁特海港撤出。人们对即将离开的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极为关切。许多黎巴嫩人越来越敌视巴勒斯坦运动，指责巴解组织是内战的始作俑者，是他们挑起了1978年和1982年以色列的入侵。然而，当拥有一半巴勒斯坦血统的丽娜·米格达迪来到集合点，向巴勒斯坦男人们告别时，她发现许多贝鲁特西部的市民也来送行。“妇女们从没有玻璃的窗户里探出头来抛洒大米，站在半毁的阳台上挥手。看着卡车经过，她们中许多人哭了。巴勒斯坦人已经在市体育场向他们的孩子、妻子和父母告别了。”[24]

离去的巴勒斯坦战士将分散到也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苏丹和突尼斯这些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在突尼斯建立了新总部。巴解组织被逐出贝鲁特标志着一支完整的、成体系的战斗部队瓦解。8月30日，亚西尔·阿拉法特最后一个离开，他的离去意味着对贝鲁特的围攻实际上已经结束。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原计划驻留30天的多国部队认为任务已经完成，提前10天撤离了。最后一支法国特遣队于9月13日离开黎巴嫩。

撤退的巴勒斯坦战士留下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这些留下的巴勒斯坦平民全都手无寸铁。多国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这些巴勒斯坦战斗人员家属的安全，由于生活在一个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国家，他们极易受到攻击。多国部队撤走后，没有人能够保护巴勒斯坦难民营免遭各路敌对势力的攻击。

在巴解组织撤出黎巴嫩的同时，黎巴嫩议会定于8月23日举行会议，选举新总统。由于内战，自1972年以来没有举行过议会选举。议员死亡导致议员从99人减少到92人，其中只有45人实际在黎巴嫩。只有一位候选人宣布有意竞选总统：以色列盟友、来自马龙派长枪党的巴希尔·

杰马耶勒。黎巴嫩引以为豪的民主被削弱至此。然而，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务实的黎巴嫩人来说，杰马耶勒是一个公认的候选人。他与以色列和西方的关系可能会为黎巴嫩赢得些许迫切需要的和平。当杰马耶勒确认当选时，全国各地的黎巴嫩人都发自内心地欢欣鼓舞。

事实证明，巴希尔·杰马耶勒的总统任期很短暂，黎巴嫩的和平也是如此。9月14日，一枚炸弹摧毁了位于贝鲁特东部的长枪党总部，杰马耶勒遇害。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巴勒斯坦人；事实上，年轻的马龙派教徒、亲大马士革的叙利亚社会主义民族党党员哈比卜·沙尔图尼（Habib Shartouni）两天后被捕并认罪，谴责杰马耶勒是与以色列打交道的叛徒。然而，7年的内战，让长枪党民兵对巴勒斯坦人怀有深深的仇恨，他们决定去巴勒斯坦难民营为遭到暗杀的领袖复仇。

如果美、法、意多国部队能够完整履行30天的使命，他们也许能够为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必要的保护。相反，保护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是以色列军队，他们在杰马耶勒死讯宣布后立即重新占领贝鲁特。9月16日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和参谋长拉斐尔·埃坦（Raphael Eitan）授权长枪党民兵进驻巴勒斯坦难民营。随之而来的是对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屠杀。

虽然这场在萨布拉和沙蒂拉进行的屠杀是马龙派民兵执行的，但把守该地区所有入口的以色列部队为他们进入难民营大开绿灯。以色列人非常了解他们的马龙派盟友，十分清楚他们将对巴勒斯坦人构成什么样的危险。即使不确定马龙派的真实动机，但当以色列军官监听到长枪党人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后的无线电交流后，一切犹疑都消散了。一名以色列中尉听到了一名长枪党民兵和马龙派指挥官埃利·霍贝卡（Elie Hobeika）的对话。1976年1月，在巴勒斯坦人围攻基督徒要塞达穆尔时，霍贝卡失去了他的未婚妻和许多家人，他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众所周知。民兵用阿拉伯语向霍贝卡报告说，他发现了50名妇女和儿童，请示该如何处置。以色列中尉回忆说，霍贝卡在无线电里的回答是："这是你最后一次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完全知道该怎么做。"话音刚落，无线电里就传来长枪党民兵们爆发出的刺耳笑声。这位以色列中尉证实，他"明白这些妇女和儿童将被杀害"。[25]因包庇马龙派对萨布拉和沙蒂拉的巴勒斯坦人犯下的谋杀罪行，以色列武装部队，特别是阿里埃勒·沙龙，蒙上

了污点。

36小时内，在萨布拉和沙蒂拉的难民营里，长枪党人有计划地杀害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马龙派民兵穿行于营地里恶臭的小巷，杀害他们发现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28岁的贾迈勒是阿拉法特法塔赫运动的成员，巴解组织撤离后他一直留在贝鲁特，是屠杀的目击者。“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营地上空开始出现照明弹……也有飞机投下曳光弹。暗夜如白昼。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怖极了。我看到人们惊慌失措地跑向小小的沙蒂拉清真寺。他们在那里避难，它不仅是圣所，更是坚固的钢结构建筑。清真寺里有26名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些人受了重伤。”他们很可能是被霍贝卡在无线电里定下灾难命运的难民。

杀戮进行期间，长枪党人开始用推土机夷平难民营，并不时杀害躲在营地里的人。贾迈勒说：“每一个他们找到的人，都被杀害了，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杀人的方式。”老人被砍倒，年轻人被强奸并杀害，家人被迫目睹他们的挚爱被杀。以色列人估计此次屠杀有800人死亡，但巴勒斯坦红十字会报告说，有2000多人遇害。贾迈勒总结道：“他们一定是疯了，只有疯子才会做那样的事情。”谈论这次事件时，他带着些许超然的中立，把屠杀看作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他说：“他们对我们所行之事，其心理动机很清楚。我们像动物一样被困在那个营地里，我们这个样子是他们一直试图向世界展示的，也是他们想让我们自己接受的。”[26]

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的大屠杀招致全世界的广泛谴责，尤其是在以色列。那年夏天，以色列内部反对黎巴嫩战争的声音越来越大。9月25日，占总人口10%的约30万以色列人，聚集在特拉维夫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以色列在这起暴行中扮演的角色。作为回应，利库德政府被迫成立了一个官方调查委员会——卡汉委员会。1983年，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最有权势的官员——总理贝京、外交部部长伊扎克·沙米尔和参谋长埃坦将军对大屠杀负责。委员会还要求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辞职。

更为直接的反应是，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促使多国部队返回黎巴嫩，美国也再次介入来解决黎巴嫩危机。9月2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法国伞兵和意大利士兵返回贝鲁特，这对于他们所承诺的保障被驱

逐的巴解组织战士家属的安全来说，为时已晚。

上一次，多国部队被派去送走巴勒斯坦战士;这一次，他们被派去充当以色列从贝鲁特撤军后的缓冲。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不愿在与黎巴嫩缔结政治协定之前撤军。但首先，必须选举一位黎巴嫩新总统。在原计划巴希尔·杰马耶勒的就职日——9月23日，黎巴嫩议会重新召开会议，选举他的哥哥艾敏·杰马耶勒（Amin　Gemayel）任总统。虽然巴希尔曾与以色列人密切合作，但艾敏同大马士革的关系更好，没有表现出他弟弟那样与特拉维夫密切合作的热情。然而，由于他的国家近一半被以色列占领，新总统杰马耶勒别无选择，只能与贝京政府谈判。1982年12月28日，谈判开始，谈判地点在黎巴嫩以色列占领区的卡勒德和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城之间转换。接下来的5个月里，在美国官员的协助下，双方进行了35轮紧张的谈判。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花了10天时间进行穿梭外交，终于促成双方于1983年5月17日达成协议。

在阿拉伯世界，“5·17协议”被谴责为是对正义的嘲弄，在这一协议中，超级大国美国迫使弱小的黎巴嫩对入侵并破坏其国家的盟友以色列予以奖励。尽管该协议并不是以色列人最初希望的全面和平条约，但协议所体现的同以色列占领者的关系正常化依然超过了大多数黎巴嫩人所能接受的程度。协议结束了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要求黎巴嫩政府确保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安全，确保这个犹太国家免受各路敌人侵扰，这将黎巴嫩政府推向了一个艰难境地。黎巴嫩将在南部部署军队，以建立一个涵盖约占三分之一黎巴嫩领土的“安全区”，从赛达向南延伸至以色列边境。黎巴嫩政府还同意将南黎巴嫩军队纳入黎巴嫩军队。南黎巴嫩军队是以色列资助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因同入侵者勾结而声名狼藉。用一位什叶派官员的话说，这是一项“在以色列刺刀下”达成的“羞辱性协议”。[27]

叙利亚政府对“5·17协议”的条款尤为愤慨，该协议只会孤立叙利亚，改变地区的力量平衡，使之向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故意绕过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因为美国知道，他会阻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谈判。“5·17协议”没有给叙利亚人任何特权，协议第六条要求叙利亚部队全部撤出黎巴嫩，并将之作为以色列撤军的

先决条件。自首次介入黎巴嫩内战起6年内，叙利亚已在黎巴嫩投入太多的政治资本，让黎巴嫩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入以色列的势力范围是叙利亚不可接受的。

叙利亚迅速动员其在黎巴嫩的盟友拒绝“5·17协议”。反对势力开始炮击贝鲁特的基督教区，战事重启，杰马耶勒政府的软弱显露无遗。反对势力还向多国部队中的美军开火，后者所扮演的中立维和人员的角色因美国的地区政策而受到致命损害。美军还击的主要形式是美国军舰的猛烈炮火，就这样，他们从黎巴嫩冲突的局外调停人转变成深陷其中的参与者。

美国虽然是个超级大国，但在黎巴嫩却处于劣势。美国的当地盟友——被孤立的艾敏·杰马耶勒政府和以色列占领军，较之他们的敌人——苏联支持的叙利亚、伊朗和什叶派伊斯兰抵抗运动，更为脆弱。和以色列人一样，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使用压倒性的武力在黎巴嫩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在黎巴嫩的军事部署如何使这个超级大国暴露在它众多的区域敌人面前而易受攻击。

以色列的入侵，相较于那些年的其他冲突，有一突出特征，那就是它将伊斯兰主义运动带入了黎巴嫩。在埃及和叙利亚，伊斯兰主义政党因其反政府、反社会的行径受到孤立和谴责。然而，黎巴嫩冲突给伊斯兰主义运动带来了外部敌人。无论是谁，只要能将痛苦和羞辱施于美国与以色列，都将在黎巴嫩和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中获得大规模的支持。这为一个新的什叶派伊斯兰运动——一个自称为真主党的民兵组织的出现创造了完美的条件，这个运动将发展成以色列和美国的祸患。

真主党诞生于伊朗革命卫队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贝卡谷地中部城市巴勒贝克设立的训练营。数百名黎巴嫩什叶派青年涌向巴勒贝克接受宗教和政治教育以及高级军事训练。他们开始认同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开始憎恨伊朗的敌人，视其为自己的敌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主党的创立既归功于伊朗，也归功于以色列。1982年6月，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并不特别敌视以色列。1969年以

来，巴解组织抗击以色列的行动给南部居民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因此，1982年，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乐见巴解组织战士被赶走，对入侵的以色列部队，他们一开始也视作解放者。真主党二号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Naim　Qassem）回忆说："黎巴嫩南部的居民对巴勒斯坦人怀有敌意，他们对此的回应，就是用欢呼和撒米来欢迎［以色列］入侵者。"[28]

然而，贝鲁特被围困、惨重的伤亡以及以色列占领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傲慢行径，激起了什叶派对以色列的反感。伊朗的宣传更是加深了这新生的敌意，滋长了对以色列、美国和两国在黎巴嫩的共同谋划——"5·17协议"的愤怒情绪。

真主党从一开始就以勇于践行信念著称。其成员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相信伊斯兰教的要旨，并愿意为在人世践行真主的意志做出任何牺牲。他们的榜样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公元680年，侯赛因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卡尔巴拉与伍麦叶王朝统治者交战，对什叶派穆斯林来说，这依然是为反抗暴政而殉难的终极典范。伊玛目侯赛因的范例在真主党内部形成了一种殉难文化，成为对付敌人的致命武器。真主党大量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让许多分析人士试图将声称对美军和法军营地自杀式爆炸事件负责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与1982—1985年形成的萌芽阶段的真主党运动联系起来。不过，真主党自己一直否认参与了这些袭击。

反以和反美斗争只是实现更大目标的手段。真主党的最终目标是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然而，该党始终不愿意违背多元的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强加这样一个政府。真主党的领导人们在1985年2月宣布建党的公开信中宣称："我们不希望伊斯兰教像政治马龙主义现在所做的那样，靠武力统治黎巴嫩。但我们强调，我们相信伊斯兰教是一种信仰、制度、思想和统治模式，我们敦促所有人承认它，诉诸它的法律。"[29]就像埃及和叙利亚的穆兄会一样，真主党希望用真主的法取代人类的法。真主党领导人们深信，一旦伊斯兰的统治制度证明比世俗民族主义优越，绝大多数黎巴嫩人民，甚至是数量庞大的基督徒社群，都会愿意选择更为公正的真主之法。真主党领导层认为，没有什么比战胜以色列和美国更能证明伊斯兰统治的优越性了。年轻的什叶派男子愿意像他们的榜样伊玛目侯赛因那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这一目标。

1982年11月，真主党的前身伊斯兰抵抗组织在黎巴嫩组织了什叶派第一次自杀式爆炸。一名叫艾哈迈德·卡西尔（Ahmad Qasir）的年轻人发动了第一次“殉难行动”，他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撞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以军总部，造成75名以色列人死亡，多人受伤。记者罗伯特·菲斯克前往提尔调查爆炸事件。他对从这栋八层大楼的废墟中拖拽出的以色列伤亡者的人数感到震惊，但他最难以接受的是炸弹袭击的方式：“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个想法似乎难以想象。”[30]以军总部爆炸后发生的一系列袭击证实，自杀式爆炸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敌人的武器库中一种危险的新武器：1983年4月美国大使馆爆炸，1983年10月对美国和法国兵营的袭击，以及1983年11月对提尔以军总部的第二次袭击，这次又有60名以色列人遇难。

以色列情报部门很快就认识到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威胁，并立即反击，对什叶派宗教人士展开定点暗杀。但暗杀非但没有压制什叶派的抵抗，反而使暴力升级。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到1984年，［什叶派］袭击的频次如此之高，以至于每三天就有一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遇害。”[31]在那一年，什叶派民兵也采取了多种策略，开始绑架西方人，企图把外国人赶出黎巴嫩。到1985年真主党出现时，他们的敌人已经在撤退了。

什叶派起义对以色列的第一次胜利是破坏“5·17协议”。被围困的艾敏·杰马耶勒政府没能执行该协议的任何条款，签署后一年，黎巴嫩部长会议废除了这份同以色列的协议。伊斯兰抵抗组织的下一个胜利是将美国和欧洲军队赶出黎巴嫩。随着美军在黎巴嫩伤亡人数的增加，里根总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撤军压力。1984年2月，意大利和美国军队撤离黎巴嫩，最后一批法国士兵也在3月底撤离。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在黎巴嫩也越来越站不住脚，1985年1月，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内阁同意从黎巴嫩南部各中心城市撤到他们称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地方，这是沿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的狭长地带，纵深5—25千米（3—15英里）。

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最为持久的遗产。建立安全区的目的是形成一个缓冲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免受攻击。但恰恰相反，安全区为真主党和其他黎巴嫩民兵组织提供了一个射击场，用来继续打击以色列占领者。在接下来的15年里，真主党获得了来自黎巴

嫩所有教派的支持。即便未必支持他们建立一个伊斯兰国，也至少支持他们的民族抵抗运动，抗击那让人深恶痛绝的占领。

对以色列来说，1982年入侵的最终结果是换来了一个比巴解组织这个敌人更为坚定的对手。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战士不同，真主党和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

从冷战的角度来看，黎巴嫩冲突是美国在与苏联对抗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败。然而，苏联人也没有资格庆祝。他们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叛乱，吸引了越来越多虔诚的穆斯林加入阿富汗“圣战者”的行列，通过战斗来驱逐“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如果说黎巴嫩是什叶派的“圣战”学校，那么阿富汗则是新一代逊尼派穆斯林武装分子的训练场。

*

1983年，24岁的阿尔及利亚人阿卜杜拉·阿纳斯（Abdullah Anas）从他的家乡本巴迪斯村乘公共汽车前往市集城镇西迪贝勒阿巴斯，那里有一个报摊，可让他了解世界大事。[32]阿纳斯是阿尔及利亚西部伊斯兰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持续关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

阿纳斯记得，那天他买了一本科威特杂志，其中有一则宗教学者们联署的法特瓦（伊斯兰学者的法律意见）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则法特瓦宣称，支持阿富汗的“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个人责任。阿纳斯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来细细读了这则法特瓦。那一长串联署名单让他印象深刻，他们都是著名的宗教人士，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的主要穆夫提们。有一个名字特别突出：谢赫阿卜杜拉·阿扎姆（Shaykh Abdullah ‘Azzam），他的作品和布道录音带在伊斯兰主义者的圈子内流传甚广。

1941年，阿卜杜拉·阿扎姆出生于巴勒斯坦杰宁附近农村一个保守的宗教家庭。20世纪50年代中期，尚值青春期的阿扎姆就加入了穆兄会。[33]完成高中学业后，他赴大马士革大学学习伊斯兰法。1967年6月战争后的一年半内，阿扎姆在约旦河西岸反抗以色列的占领，他称之为“巴勒

斯坦圣战”。随后他前往开罗，在爱资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埃及期间，他结识了穆罕默德·库特卜（Muhammad Qutb）和艾米娜·库特卜（Amina Qutb），他们是1966年被纳赛尔政府处决的赛义德·库特卜的弟弟和妹妹。阿扎姆深受库特卜著作的影响。

阿扎姆凭借自己的学术资历，加入了位于安曼的约旦大学的伊斯兰研究系，在那里执教7年，直到他的煽动性出版物和布道让他与约旦当局发生冲突。1980年，他离开约旦前往沙特，在吉达的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大学任教。

就在阿扎姆迁去吉达之前，苏联入侵了阿富汗。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府及其苏联盟友表现出对伊斯兰的敌意，阿富汗人正“在真主的道路上”战斗。阿扎姆全力支持后者的事业，相信在阿富汗的胜利将重振伊斯兰的“圣战”精神。

正如他后来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阿扎姆认为，在阿富汗取得胜利能发动穆斯林在其他冲突地区采取行动。他是巴勒斯坦人，他认为阿富汗是未来抗击以色列的训练场。他写道：

> 别以为我们忘记了巴勒斯坦，解放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宗教信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于我们的血液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巴勒斯坦。但我确信，在阿富汗的工作，无论会带来多大的牺牲，都将重振“圣战”精神和对真主的忠诚。边界、制约与牢狱让我们无法在巴勒斯坦发动“圣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圣战”，也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祖国。无论我们处于何处，我们都必须竭尽所能，准备“圣战”。[34]

阿扎姆关于“圣战”和牺牲的理念通过他的著作与他激情四溢的布道录音广泛传播。他唤起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男子的“圣战”精神，甚至传到了如阿尔及利亚市集城镇西迪贝勒阿巴斯那样的偏远角落。

越读阿扎姆签署的法特瓦文本并权衡其论点，阿纳斯就越相信，阿富汗人反对苏联占领的斗争是所有穆斯林的责任。法特瓦中强调：“若一处穆斯林领土遇袭，‘圣战’乃居于其间与相邻地区者之个人责任。若其人数不众或缄默不为，则该责任由临近地区之人担负，如此延扩，至世

界各处。”[35]鉴于阿富汗局势的严重性，阿纳斯认为，“圣战”的责任已经落到了身处阿尔及利亚农村的他本人身上。这种想法非同寻常，因为正如阿纳斯承认的那样，他当时对阿富汗一无所知，甚至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它。

阿纳斯很快就会了解到，阿富汗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悲惨的现代历史的国家。阿富汗的人口由7个主要族群构成，其中最大的是普什图人（约占总人口的40%）和塔吉克人（30%）；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什叶派大多是少数族裔；官方语言有两种（波斯语和普什图语）。这个国家的多样性是它所处地理位置的反映，西边是伊朗，南边和东边是巴基斯坦，北边是中国和（当时属于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如此的多样性与地理位置难以给内陆国阿富汗带来多少稳定。1973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饱受政治动乱和战争的蹂躏。

苏联与阿富汗的战争源自1973年的军事政变，其间国王查希尔沙（Zahir Shah）的君主制被推翻，左倾政府掌权。1978年4月，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汗（Mohammed Daoud Khan）的共和政权又被一场暴力的共产主义政变推翻。共产主义者宣布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与苏联结盟的一党制国家，决心推行快速的社会和经济改革。阿富汗新政府公然敌视伊斯兰教，宣扬国家无神论，这在大多数具有宗教信仰的阿富汗民众间激起了广泛反对。

在苏联的支持下，共产主义政权对所有反对势力实行集权统治，逮捕并处决了数千名政治犯。然而，执政的共产主义者自己却经历派系分裂，忙于内斗。在一连串的暗杀之后，苏联在1979年平安夜干预阿富汗，派出了一支2.5万人的入侵部队，以确保首都喀布尔的安全，并立其阿富汗盟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为总统。

苏联入侵阿富汗激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干预，迫使苏联撤出。阿富汗抵抗运动得依靠自身力量击退红军，伊斯兰主义派别领导了这场战斗。他们得到了来自美国的大量秘密援助。美国严格地从冷战的角度看待这场冲突，将反共的伊斯兰主义战士视为他们打击苏联的天然盟友。美国经由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军事

物资和先进的手射防空导弹。在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了大约2亿美元的援助。罗纳德·里根进一步加大了支持力度，仅在1985年就提供了2.5亿美元的援助。[36]

巴基斯坦政府充当了美国人和阿富汗抵抗运动之间的中间人，并为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游击队）提供情报和训练设施。伊斯兰世界给予了大量财政援助，并从1983年开始招募志愿者参加阿富汗“圣战”。

在阿卜杜拉·阿扎姆领头发出招募阿拉伯志愿者赴阿富汗作战的号召时，阿卜杜拉·阿纳斯是最先回应的人之一。1983年，两人在麦加朝圣时偶然相遇。在数百万聚集在一起参加朝圣仪式的人中，阿纳斯认出了阿卜杜拉·阿扎姆独特的面孔，后者有着长长的胡须和宽大的面庞。阿纳斯走上前去介绍自己。

阿纳斯说：“我读了你和一群宗教人士发布的有关在阿富汗履行‘圣战’责任的法特瓦，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阿富汗。”

阿扎姆回答道：“这很简单。这是我在伊斯兰堡的电话号码，我将在朝觐结束后返回巴基斯坦。你到了那里之后，打电话给我，我会带你去找白沙瓦的阿富汗同事。”[37]

不到两周，阿纳斯就登上了飞往伊斯兰堡的飞机。这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从未离开过阿拉伯世界，他在巴基斯坦迷路了。他直奔公用电话，阿扎姆接听了，并请他过去吃晚饭，他松了一口气。他后来回忆道：“他用一种人性的温暖来迎接我，这种温暖触动了我。”阿扎姆欢迎阿纳斯来到他的家中，并把他介绍给参加晚餐的其他客人。“他的房子里挤满了他在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指导的学生。他让我和他待在一起，直到他去白沙瓦，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去白沙瓦，我没法见到阿富汗的同事。”

阿纳斯在阿扎姆的家做客3天。两人间的深厚友谊和政治伙伴关系就此开始，并在阿纳斯娶了阿扎姆的女儿后达到圆满。在阿扎姆的家中，阿纳斯见到了第一批响应阿扎姆号召参加阿富汗“圣战”的阿拉伯男子。1983年阿纳斯抵达时，参加阿富汗“圣战”的阿拉伯志愿者不过十几人。在他们出发前去白沙瓦之前，阿扎姆把阿纳斯介绍给了另一位阿拉

伯志愿者。

阿扎姆介绍道："我给你介绍乌萨马·本·拉登兄弟，他是一个热爱阿富汗'圣战'的沙特青年。"

阿纳斯回忆道："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话不多。谢赫阿卜杜拉解释说，乌萨马经常来伊斯兰堡拜访他。"阿纳斯并没有深入了解本·拉登，因为他们在阿富汗的不同地区活动，但他从未忘记他们的初次相见。[38]

在巴基斯坦，阿纳斯和另外两位阿拉伯志愿者一起被送入训练营。他在阿尔及利亚服过兵役，已经能熟练使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两个月后，志愿者第一次有机会进入阿富汗。

在他们离开巴基斯坦的营地加入阿富汗"圣战者"行列之前，阿扎姆向他的阿拉伯门徒们解释说，阿富汗的抵抗运动分为7个派别，其中最大的是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以普什图人为主的伊斯兰党和塔吉克人布尔汉努丁·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阿扎姆警告阿拉伯志愿者避免在阿富汗的派系斗争中站队，并将自己视为"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客人"。

然而，阿拉伯志愿者在阿富汗不同省份服务，接受特定党派的指挥，不可避免地效忠于他们所服务的人。阿纳斯自愿在北部的马扎里沙里夫省服务，受拉巴尼的伊斯兰促进会的成员指挥。这一小股阿拉伯志愿者加入了300人的武装队伍，同他们的阿富汗指挥官一起在严冬出发，步行穿越苏联控制的地盘。这段危险的旅程持续了40天。

到达马扎里沙里夫后，阿纳斯对他参与阿富汗"圣战"的初次经历感到沮丧。马扎里当地的指挥官刚刚在一次针对苏联人的自杀式行动中丧生，他的3个下属正在争夺对这个战略要镇抵抗力量的控制权。阿纳斯认识到，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在提到自己以及与他一同踏上这段征途的另两个阿拉伯人时写道："我们是年轻人，没有消息，没有培训，也没有钱。我意识到参加'圣战'需要做好比我们已经做好的更高程度［的准备］。"

抵达马扎尔后不到一个月，阿纳斯就决定远离这个"爆炸性的局

势”，尽快返回白沙瓦。他对阿富汗的第一印象是，阿富汗的问题太大，是一小批善意的志愿者所无法解决的。“伊斯兰世界势必将被动员起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阿富汗的问题比5个阿拉伯人、25个阿拉伯人或50个阿拉伯人要大得多。”他认为有必要向阿卜杜拉·阿扎姆汇报阿富汗境内的政治局势，“以便他能够向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陈述这一局势，并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寻求更多的援助”。[39]

阿纳斯在阿富汗度过的几个月间，边境城镇白沙瓦发生了重大变化。阿拉伯志愿者数量大增，从阿纳斯初到时的十几人增加到1985年初的七八十人。阿卜杜拉·阿扎姆建立了一个接待机构，来迎接响应他的号召而纷至沓来的阿拉伯人。阿扎姆对阿纳斯解释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乌萨马·本·拉登和兄弟们一起建立了服务办公室。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组织阿拉伯人参加阿富汗‘圣战’。”[40]阿扎姆认为，服务办公室是一个独立的中心，阿拉伯志愿者可以在那里见面并接受训练，而不会被卷入阿富汗人的政治分歧之中。服务办公室有3个目标：提供援助、协助改革和推广伊斯兰教。该办公室开始在阿富汗境内和巴基斯坦不断扩大的阿富汗难民营中开办学校与机构。它向因冲突而成为孤儿和寡妇的人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它积极开展宣传，吸引新成员加入阿富汗“圣战”。

作为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服务办公室出版了一份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的刊物——《圣战》（*al-Jihad*）。《圣战》的字里行间满是英雄主义和牺牲的故事，旨在激励不同年龄的穆斯林。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在该刊物上撰写文章。因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伊斯兰主义活动而被纳赛尔监禁的宰奈卜·安萨里，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接受了《圣战》的专访。尽管已经70多岁了，安萨里一点都没有失去对伊斯兰主义事业的热情。她对采访者说：“我在监狱中度过的整个时光都比不上阿富汗‘圣战’战场上的一刻。我希望我能与阿富汗的女战士生活在一起。我请求真主赋予‘圣战者’以胜利，并宽恕我们［即国际伊斯兰社群］在为阿富汗伸张正义时的不足之处。”[41]安萨里将阿富汗“圣战”理想化为“回归先知门人的时代，愿和平降临在他身上，回归正统哈里发的时代”。

《圣战》加强了对阿富汗反苏斗争的英雄主义叙述，所刊登的关于

各类奇迹的报道让人们联想起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其中有文章描述一群“圣战者”杀了700名苏联人，而己方只有7人殉难；有文章描述一名年轻人单枪匹马击落了5架苏联飞机；甚至还有文章描述来自天堂的鸟群搭起鸟幕，为“圣战者”抵御敌人的攻击。这本刊物试图向读者证明，神的干预确实存在——真主用绝境下的胜利来回报信仰。

然而，阿卜杜拉·阿纳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亲身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在他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枯燥无味的叙述中，没有什么奇迹。1985年，他返回马扎里沙里夫，在那里，他在北部潘杰希尔谷地伊斯兰促进会武装的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马苏德手下效力。马苏德是一位天生的领袖，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游击队指挥官，就像切·格瓦拉那样。他经常带着他的部队撤退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兴都库什一带，在深山的洞穴里建立基地。在其中躲避数周的惩罚性轰炸后，又从瓦砾中冒出来，重创苏军。但他的手下也遭受了苦难。有一次，马苏德带着一支队伍从一个狭窄的山谷撤退，突然遭到苏军的火箭弹袭击。阿纳斯回忆道：“不到5分钟，我们就殉难了10多人，当时的场面难以想象。”[42]阿纳斯还描述了另一场战斗，其间马苏德率领300名士兵（包括15名阿拉伯志愿者）战胜了苏联人。双方交战整整一天一夜，马苏德手下有18人丧生（包括4个阿拉伯人），另有多人受伤。[43]

阿富汗“圣战者”和阿拉伯支持者进行了一场孤注一掷的反抗超级大国的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10年的占领使苏联在人员和物资上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少有1.5万名苏联红军士兵在阿富汗阵亡，5万人在战斗中受伤。阿富汗抵抗运动用美国提供的防空导弹击落了100多架飞机和300多架直升机。到1988年底，苏联人认识到，他们无法凭借一支10万人的入侵部队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阿富汗。克里姆林宫决定止损、撤军。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支苏联部队撤出阿富汗。然而，穆斯林武装对核超级大国的这一伟大胜利，最终却令那些在阿富汗作战的志愿者感到失望。

阿富汗抵抗运动战胜了苏联，但并没有实现最终的伊斯兰主义目标，即建立一个伊斯兰国。敌人苏联刚撤出阿富汗的疆界，阿富汗各派就在权斗中相互对抗，并很快演变为内战。尽管阿卜杜拉·阿扎姆尽了最大努力，但许多阿拉伯志愿者还是循着阿富汗的派系分野站队，支持他

们各自熟悉的派别。其他人则选择离开阿富汗。对立军阀之间激烈的地盘争夺并不构成“圣战”，选择离去的人也不想与穆斯林同胞作战。

阿拉伯志愿者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的战争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事后，阿卜杜拉·阿纳斯称，阿拉伯人对阿富汗战争的贡献不过是“沧海一粟”。这群被称为“阿富汗阿拉伯人”的志愿者可能从未超过2000人，其中，阿纳斯称，“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进入了阿富汗并同‘圣战者’并肩作战”。其余的留在了白沙瓦，以“医生、司机、厨师、会计和工程师”的身份进行志愿服务。[44]

然而，阿富汗“圣战”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响应“圣战”号召的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一心要实现他们在阿富汗未能实现的理想的伊斯兰秩序。阿纳斯估计约有300名阿尔及利亚志愿者在阿富汗效力，其中许多人将返回家园，在一个新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以法语缩写FIS而为人所知）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他人则聚集在乌萨马·本·拉登周围，后者建立了一个组织，同阿卜杜拉·阿扎姆服务办公室竞争。本·拉登称他的新组织为“基地”，其阿拉伯语名称“al-Qaida”更为人所知。一些在潘杰希尔山谷与阿纳斯一起效力的阿拉伯人选择留在巴基斯坦，成为基地组织的创始成员。

那个激励阿拉伯阿富汗人的人，自己在巴基斯坦安息了。1989年11月24日，阿卜杜拉·阿扎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在走近白沙瓦的一座清真寺进行主麻日祈祷时被汽车炸弹炸死。关于谁有可能下令杀害阿卜杜拉·阿扎姆，有许多说法，但没有定论。可能是阿富汗的敌对派系，也可能是乌萨马·本·拉登的圈子，甚至还有可能是以色列人，他们认为阿扎姆是一个叫作“哈马斯”的新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

*

到1987年12月，加沙人民已在以色列占领下度过了20年。加沙地带是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带，长25英里，宽6英里，当时居住着大约62.5万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居民中四分之三是来自1948年被新生的以色列国征服的巴勒斯坦地区的难民，他们在1948—1967年期间遭受了极大的孤立。加沙人被埃及政府限制在这块孤零零的地块内，同敌对的以色列接壤，又切断了他们与所失去家园的联系。

以色列1967年的占领让加沙人重新有机会进入巴勒斯坦（历史意义上的地理名称）的其他地区，并与留在这片土地（隶属于以色列的城镇以及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其他巴勒斯坦人接触。1967年之后，加沙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繁荣。在占领下，加沙人能够在以色列找到工作，并相对容易地跨越边界来来去去。以色列人在加沙购物，以享受免税价。从许多方面来看，在以色列的统治下，加沙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然而，在占领下，没有人感到幸福，巴勒斯坦人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取得独立。当埃及1979年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时，由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解救巴勒斯坦人的希望破灭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将巴勒斯坦武装驱散到阿拉伯世界各地，由巴解组织来解放巴勒斯坦人的希望也破灭了。

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开始自己起来对抗占领。以色列政府记录了“非法行为”的升级：仅在约旦河西岸，“骚乱”从1977年的656次上升到1981年的1556次和1984年的2663次。[45]

被占领土内的抵抗引起了以色列的严厉报复：大规模逮捕、恐吓、酷刑和羞辱。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有自尊的民族，羞辱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用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阿扎姆·塔米米的话说，占领者视巴勒斯坦人为“不值得被尊重的次等人”，[46]这加剧了尊严和自尊的沦丧感。

更糟糕的是，巴勒斯坦人配合以色列的占领，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征服者的同谋。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并吸引以色列顾客到他们的商店购物，这些事实暗示他们也参与了占领。鉴于以色列人正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没收土地和建造定居点，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合作更像是通敌。正如巴勒斯坦学者和活动家萨利·努赛贝赫（Sari Nusseibeh）解释的那样：“用以色列的颜料来涂画我们反对占领的涂鸦，这样的矛盾令人难以忍受，以致（起义）爆发不可避免。”[47]

1987年12月，这种爆发终于发生了，导火索是加沙北部埃雷兹检查站附近的一起交通事故。12月8日，一辆以色列军用卡车撞上了运送巴

勒斯坦工人从以色列回家的两辆面包车，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谣言传遍整个巴勒斯坦社区，称巴勒斯坦工人的死是蓄意谋害，这加剧了被占领土上的紧张局势。葬礼于第二天举行，随后，大规模示威爆发，以色列部队用实弹驱散示威者，打死多人。

12月9日的杀戮引发的骚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整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迅速转变为一场反对以色列20年占领的民众起义。巴勒斯坦人称这场运动为“大起义”（Intifada），这是一个阿拉伯语单词，意思是“起义”和“拭去灰尘”，就好像巴勒斯坦人正通过直接对抗占领来清除几十年累积的羞辱。

大起义开始时是一系列同以色列当局的对抗，缺乏组织，不成章法。示威者摈弃使用武器，并宣布他们的运动是非暴力的，但他们投掷石块。以色列当局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回应。到1987年12月底，以色列部队已经打死了22名示威者。以色列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暴力，反而更为频繁地引发新的抗议和对抗。

大起义由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一系列自发示威发展而来，在最初几周没有核心领导。根据萨利·努赛贝赫的回忆，这是一场草根运动，其中“每个示威者都做到了自以为的最佳，让那些更为出名的领导者在后面紧紧追赶”。[48]

两个地下组织形成，领导大起义的发展方向。在约旦河西岸，巴解组织各派的地方分支机构，包括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同共产主义者联合组建了一个地下领导层，自称为“民族联合指挥部”（United National Command, UNC）。在加沙，与穆兄会有关联的伊斯兰主义者创建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其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哈马斯”更为人所知。以色列的强力镇压使这些地下领导人无法在公开场合见面或行使其权力。相反，他们各自定期印发宣传品，哈马斯有自己的系列传单，民族联合指挥部也有单独的系列公报，印发这些宣传品是为了阐明各自的目标并指导公众行动。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的宣传品包括行动呼吁与新闻简报，反映了巴解组织这样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与正在兴起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之间为控制

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而进行的日益激烈的斗争。

穆兄会是加沙地带组织最好的政治运动，也是第一个对民众起义做出反应的组织。其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Shaykh Ahmad Yassin）是一位50多岁的截瘫活动家。与许多当地的居民一样，亚辛在1948年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沙。他十几岁时在一次工伤事故中瘫痪，但他继续接受教育，成为一名学校教师和宗教领袖。他于20世纪60年代加入穆兄会，成为赛义德·库特卜的狂热崇拜者。库特卜的著作经他转载与散发，在加沙地带广为传阅，流传之广，无以复加。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建立了一个名为伊斯兰中心的慈善组织，通过该组织，他资助加沙各地兴建清真寺、学校和诊所，搭建起传播伊斯兰价值观的网络。

1987年12月9日，起义爆发当晚，亚辛召集了兄弟会领导人开会协调行动。他们决定将加沙的穆兄会改造为抵抗运动。12月14日，哈马斯诞生，并发布了他们的第一份传单。

哈马斯的新颖之处在于用严格的伊斯兰主义理念表达了巴勒斯坦人的愿望。从第一份传单起，哈马斯就表明了一个决不妥协的立场，将对抗犹太国家与拒绝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哈马斯坚称："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打倒犹太人，摧毁他们的梦想。"依循阿卜杜拉·阿扎姆关于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皆为"圣战"的观点，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者宣布，他们抵抗伊斯兰土地上的外国占领者，而不是像赛义德·库特卜所主张的那样，反抗专断的阿拉伯领导人。哈马斯在其1988年的章程中强调："一旦有敌人占领某处穆斯林土地，'圣战'就成为每个穆斯林的责任。在反抗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的斗争中，必须竖起'圣战'的旗帜。"49

再看民族联合指挥部，他们尽管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巴勒斯坦政治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但也有一些新的东西。约旦河西岸本地的活动分子在未与阿拉法特和流亡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约旦河西岸，民族联合指挥部在哈马斯的第一份传单发布后不久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份公报。萨利·努赛贝赫回忆说，这份公报是由"两名当地的巴解组织积极分子"撰写的，他们在以色列当局大规模的镇压中被捕，"在公报投放街头时已经入狱了"。该公报

呼吁举行为期3天的大罢工——完全停止被占领土的经济活动，并警告不要试图破坏罢工或与以色列人合作。

民族联合指挥部继续每隔几个星期发布通讯（仅在大起义的第一年就发布了31期），并开始在其中提出一系列要求：停止征敛土地和在被占领土上建以色列人的定居点，释放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军队撤出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这些传单鼓励人们悬挂巴勒斯坦国旗，这是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禁止的，并高呼“结束占领！”“自由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万岁！”民族联合指挥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50]大起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独立运动。

大起义的爆发完全出乎身处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层的意料。巴解组织被所有巴勒斯坦人承认为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长期以来一直垄断着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现在，主动权已从突尼斯的“外部”领导层转移到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活动的“内部”的巴解组织活动分子。这一“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别让巴解组织领导层处于明显的劣势。一夜之间，阿拉法特和他的副手们看起来像是多余的，因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自己开始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努力。

1988年1月，阿拉法特采取行动，以将大起义置于巴解组织的管辖之下。他派遣了法塔赫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之一哈利勒·瓦齐尔（Khalil al-Wazir）——他以别名艾布·吉哈德（Abu Jihad）而更为人所知——去协调突尼斯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行动。1988年1月18日，民族联合指挥部发布的第三份传单是首次由突尼斯的法塔赫领导人批准的。在几个小时内，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共分发了10万多份。被占领土的居民欣然回应来自阿拉法特的政治机器的权威声音。萨利·努赛贝赫观察到：“这就像看着音乐家从指挥那里得到指示一样。”[51]此后，大起义将由阿拉法特和他的官员来运作。

以色列政府决心阻止巴解组织利用大起义以牺牲以色列的利益为代价来谋取政治利益。1988年4月16日，以色列刺客在艾布·吉哈德位于突尼斯的家中枪杀了他，这位巴解组织官员的任务被截停了。但是，既然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巴解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突尼斯就能够继续控制参

加大起义的世俗主义力量。

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散发的传单中呼吁举行的罢工与示威继续有增无减。以色列当局曾预计这一运动将失去动力。可恰恰相反，它似乎越来越强大，对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控制构成了真正的挑战。大起义进入第三个月时，以色列当局采取了法外手段加以镇压。对于如何对待占领下的平民，早在《日内瓦公约》确立相关国际法标准之前，英国委任统治官员曾起草过《紧急条例》。参照这一条例，以色列军队采用了大规模逮捕、未经指控的拘留和拆毁房屋等集体惩罚措施。

全副武装的士兵用实弹向投掷石块的示威者开火，这个场面令国际舆论哗然，迫使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伊扎克·拉宾下令用“威慑、暴力和殴打”取代致命的火力。1988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播放了以色列士兵在纳布卢斯附近殴打巴勒斯坦青年的可怕画面，揭露出这一看似温和的政策的残暴之处。在一段尤为让人动容的片段中，一名士兵被拍到拽着一名囚犯的手臂，用一块大石头持续敲击以砸断他的骨头。[52]以色列总检察长力劝拉宾去警告他的士兵不要做这些违法行为，但以色列军队继续暴力殴打巴勒斯坦示威者。大起义的第一年，有3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殴打致死。[53]

面对以色列的暴力，巴勒斯坦人对非暴力抵抗策略的坚持引人注目。巴勒斯坦人宣称的非暴力受到以色列当局的质疑，后者指出，抗议者投掷石块、铁棒和燃烧瓶，这些投掷物会造成严重伤亡。然而，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人的对抗中从未使用枪炮，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几十年来西方舆论把巴勒斯坦人描绘成恐怖分子、把以色列描绘成被围困的大卫的形象。以色列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同往日；如今，它需要去消除自己在国际媒体上那独特的歌利亚形象。

非暴力使这次大起义成为全民参与度最高的巴勒斯坦运动。示威和非暴力抗争并不优先选择受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而是动员被占领土的全体男女老少共同进行解放斗争。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的地下传单介绍了大量抗争策略——罢工、抵制以色列商品、用家庭教育来对抗学校关闭、通过后院种植来加强粮食自给，这些举措增强了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力量，并逐渐生成了深深的共同使命感，使大起义得以继续

进行，尽管以色列进行了强力镇压。

随着大起义从1988年春季持续到夏季，世俗的民族联合指挥部同哈马斯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这两个组织都声称代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其传单中称自己为“你们的运动、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称自己是巴勒斯坦民众的领导人，“巴勒斯坦人民听从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的号召”。[54]世俗派和伊斯兰主义竞争对手相互参阅对方的传单，争夺对街头民众运动的控制权。8月18日，哈马斯在传单中呼吁发动全国性罢工。组织罢工是巴解组织宣称在被占领土上拥有的特权，因此，民族联合指挥部首次直接批评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声称“对民族阵线团结的每一次打击都相当于为敌人服务，损害起义”。

这种权势争夺掩盖了哈马斯与巴解组织之间的根本分歧：哈马斯寻求推翻犹太国家，而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希望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哈马斯认为整个巴勒斯坦都是不可剥夺的穆斯林土地，需要通过“圣战”从非穆斯林统治中解放出来。它与以色列的对抗将是长期的，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相比之下，1974年后，巴解组织倾向于两国方案。亚西尔·阿拉法特想经由大起义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建国，首都为东耶路撒冷——即便这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并将1948年失去的78%的巴勒斯坦领土拱手让给这个犹太国家。两个抵抗运动的立场无法调和，因此巴解组织继续走两国方案的道路，不再考虑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意见。

巴勒斯坦的抵抗和以色列的镇压使大起义完完全全占据了世界各国报刊的头版，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1988年6月，阿盟在阿尔及尔召开了一次紧急首脑会议，以应对大起义。巴解组织借此机会提出一份立场文件，呼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相互承认双方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哈马斯断然拒绝巴解组织的立场，并重申其关于穆斯林对整个巴勒斯坦拥有权利的主张。哈马斯领导人在8月18日的传单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伊斯兰抵抗运动在传单中坚称：“穆斯林世世代代都对巴勒斯坦拥有完全的——而不是部分的——权利，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

巴解组织没有被伊斯兰主义反对者镇住，而是继续利用大起义使其呼吁的巴以冲突两国解决方案合法化。1988年9月，巴解组织宣布计划召开一次流亡中的巴勒斯坦议会——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以巩固大起义的成果，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回归、自决和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在我国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民族权利”。[55]哈马斯再次拒绝并谴责巴解组织的立场。哈马斯在10月5日的传单上写着：“我们反对放弃哪怕是一寸我们的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浸入了圣门弟子和他们追随者的鲜血。”哈马斯坚称：“我们将继续起义，在（真主的帮助下）将我们的整个土地从犹太人的玷污中解放出来。”巴解组织和伊斯兰抵抗运动之间的对立之处再清楚不过了。

阿拉法特定于1988年11月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就是巴勒斯坦宣告在被占领土上建国。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许多人来说，11个月的大起义和以色列的暴力报复使他们筋疲力尽，建国带来了独立和结束占领的希望，这似乎是对他们所做出牺牲的充分回报，他们因此热切期盼11月的全国委员会会议。

尽管萨利·努赛贝赫对巴解组织的政策有所保留，但他认为即将宣布的独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和其他人一样，期待着帷幕揭开”。努赛贝赫提前获得了阿拉法特的讲话文本，他希望巴勒斯坦独立的宣布成为让世人铭记的时刻，他希望向“尊贵禁地”——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上的清真寺建筑群里的“成千上万人”朗读这一文本。“我想要那个正在经受占领的民族，那个正在进行大起义的民族，聚集在宇宙的中心，庆祝独立。”

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1988年11月15日，阿拉法特向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当天，以色列对被占领土和东耶路撒冷实行严厉宵禁，禁止汽车和平民上街。努赛贝赫选择无视宵禁，设法穿过偏僻的街道，来到阿克萨清真寺。在那里，一小群政治活动分子正和宗教人士们一起，踱来踱去。“我们一同走进了阿克萨清真寺。当圣墓［教堂］的钟声响起，宣礼塔发出宣告时，指定的时刻到来了，我们一起庄严地宣读了我们的独立宣言。”[56]

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上宣

读了这一宣言，这代表了巴解组织对既往政策的大幅调整。该宣言支持1947年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和犹太国家的分治计划，并批准了1967年和1973年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其中确立了归还被占土地以换取和平的原则。该宣言意味着巴解组织承诺与以色列和平共处。

自1974年巴解组织驻伦敦外交官萨义德·哈马米首次尝试提出两国方案以来，巴解组织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巴解组织不再是一个游击队组织——阿拉法特现已断然放弃了“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个人、团体和国家‘恐怖主义’”。面向国际社会，巴解组织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等待建国的临时政府。

国际社会很快给予承认。84个国家对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给予完全承认，其中包括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些欧洲、非洲和亚洲国家，以及中国和苏联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传统支持者。大多数西欧国家给予巴勒斯坦外交地位，就差完全承认独立，但美国和加拿大却完全不予承认。1989年1月中旬，巴解组织取得了另一次象征性的胜利，获得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与成员国平等发言的权利。[57]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宣言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批准。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发表书面声明，谴责这一宣言是“欺骗性的宣传活动，旨在制造一种印象：那些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领土上实施暴力行为的人是温和的，且取得了成就”。以色列内阁将宣言斥为“旨在误导世界舆论的虚假信息”。[58]

哈马斯也对这一宣言不以为然。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了一份公报，其中强调“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在巴勒斯坦所有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不仅仅在被占领土上建国：“不要听从任何试图赋予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统治巴勒斯坦土地合法性的联合国决议……因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伊斯兰民族的财产，不是联合国的财产。”[59]

无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独立宣言带来了多少振奋，都并没有给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带来任何实际利益。1988年11月15日之后，

以色列并没有表现出比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宣言宣读之前更多的放弃被占领土的意愿。在经历了一年的兴奋和期待之后，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然而，巴勒斯坦人却为这么小的成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1988年12月大起义周年时，据估计有626名巴勒斯坦人被杀，3.7万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超过3.5万名巴勒斯坦人在这一年中被捕，其中许多人在起义第二年开始时仍在牢狱之中。[60]

到1989年，大起义初期的理想主义已让位于愤世嫉俗，目标的统一已让位于宗派主义。哈马斯支持者同法塔赫成员爆发公开冲突。巴勒斯坦社会中的治安队员开始恐吓、殴打，甚至谋杀涉嫌与以色列当局勾结的巴勒斯坦同胞。公报还在发布，示威还在进行，石块还在投掷，伤亡还在增加，大起义还在继续，结局仍不明朗。这是持续了几十年的阿以冲突的最新阶段，国际社会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

20世纪80年代，一些伊斯兰运动发起武装斗争来推翻世俗统治者或击退外国侵略者。伊斯兰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法统治的伊斯兰国，他们坚信这是真主的法律。他们的灵感来自1979年伊朗革命的成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在埃及，一个分裂运动成功地刺杀了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叙利亚，穆兄会对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复兴党政府发动了内战。深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影响的黎巴嫩什叶派武装运动真主党，视美国和以色列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并试图大败两者于黎巴嫩。阿富汗的“圣战”同时针对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打击对象是苏联占领军和公开敌视伊斯兰教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伊斯兰主义者呼吁对犹太国家展开长期的“圣战”，以在伊斯兰政府的领导下使巴勒斯坦回归伊斯兰世界。真主党在迫使美国全部撤军和以色列重新部署，以及阿富汗“圣战者”在1989年迫使苏联人撤离他们的国家上取得的军事成功，并没有带来他们的理论家所希望的理想的伊斯兰国。黎巴嫩和阿富汗在外敌被迫撤退很久之后仍然深陷内战。

阿拉伯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主义者对建立伊斯兰国的最终目标采取了长期战略。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宰奈卜·安萨里提出13年的准备周期，该周期将不断反复直到绝大多数埃及人支持伊斯兰政府。哈马斯发誓要为解

放整个巴勒斯坦而斗争，“不管花多长时间”。伊斯兰国的最终胜利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需要耐心。

即便伊斯兰主义者在“真主之道上的斗争”中输掉了一些战斗，但他们仍然相信他们最终会获胜。与此同时，伊斯兰主义团体在重塑阿拉伯社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伊斯兰主义组织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兴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伊斯兰主义价值观在阿拉伯社会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子开始蓄须，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戴头巾、穿着端庄的遮体时装。伊斯兰出版物占据了书店的主要位置。世俗文化被迫退却，伊斯兰复兴方兴未艾，愈发强势，一直持续至今。

伊斯兰主义者从1989年末世界政治的重大变化中获得了勇气。冷战的种种必然如柏林墙一样迅速崩塌。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标志着美苏对抗的结束，并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许多伊斯兰主义者认为苏联政权的崩溃预示着一个新的伊斯兰时代的到来。但现实情况是，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单极世界，主导这个世界的是最后一个幸存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

第十四章　冷战之后

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对抗之后，冷战于1989年突然结束。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和改革重建政策，使苏联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1989年11月柏林墙正式被推倒时，分隔东欧和西欧的铁幕已经支离破碎。从1989年6月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落败开始，苏联集团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从匈牙利到捷克斯洛伐克，再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那年秋天递交了辞呈，而铁腕统治罗马尼亚长达22年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1989年圣诞节被革命者草草处决。

国际体系发生了变化，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制衡政治让位于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捕捉到了美苏敌对结束所带来的希望，承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对于作为冷战中心之一的阿拉伯世界来说，美国主导的新时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阿拉伯领导人再次被迫接受国际舞台上的新规则。

以推翻长期把持统治权的政府为目标的民众运动，像一个幽灵，让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感到不安，但这些国家并不哀悼这些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摩洛哥、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都信任西方，对他们来说，西方从冷战中获胜是一大幸事。

而像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左倾阿拉伯共和国，与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有更多的共同点：一党制国家、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庞大的军队和中央计划经济。齐奥塞斯库尸体的视频图像在世界各地传播，让一些阿拉伯政府极为不安。有什么能防止类似罗马尼亚的事件在巴格达或大马士革发生呢？

显然，再也不能指望苏联为其阿拉伯盟友挺身而出了。在过去的40年里，阿拉伯各共和国向苏联寻求军事装备、发展援助和外交支持，以抗衡西方的强力控制，那样的日子结束了。1989年秋季，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敦促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先进的武器，以帮助叙利亚实现与以色列间的战略对等。这位苏联总统回绝了他，他说：“任何这样的战略支

撑点都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再参与这场游戏了。”阿萨德回到大马士革，气馁万分。

巴解组织的派系也忧心忡忡。1989年10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乔治·哈巴什在访问莫斯科时批评了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他警告说：“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你会伤害我们所有人的。”资深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目睹了阿拉伯领导人的困惑：“每个人都感觉到，国际关系正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但他们仍然坚持遵循熟悉的旧规则，各方都未能正确预测新的情况。”[1]

冷战时期既有的阿拉伯冲突在美国统治的新单极时代中凸显出来。两伊战争进行了8年（1980—1988），伊拉克经济受到削弱，但仍然拥有足够的军事资源来竞争地区主导权。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冷战后世界上的第一次危机。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入侵使整个阿拉伯世界两极分化，一些国家反对外国干预，而另一些国家则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把科威特从伊拉克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科威特危机也割裂了民众与政府，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反抗美国，令人难以置信地做出将巴勒斯坦从以色列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承诺，他因而成为在阿拉伯世界广受欢迎的英雄。

要恢复阿拉伯地区的秩序，仅仅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是不够的。萨达姆·侯赛因将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与叙利亚驻军黎巴嫩、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联系在一起。在解放科威特战争之后，阿拉伯世界不得不应对已进入第15个年头的黎巴嫩内战。美国在马德里召开了自1973年日内瓦和平会议以来的第一次阿以会谈，以解决双方的分歧。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伊拉克入侵和随后被逐出科威特，究竟预示着以化解冲突为特征的新时代，还是漫长的地区争端史上的新升级，尚不清楚。

*

最早认识到冷战后的世界现实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早在1990年3月，侯赛因就警告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在今后5年里，真正的超级大国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2]

从先前冷战时期的大国角力过渡到美国主导这一新现实，伊拉克较

之其他阿拉伯共和国，条件更为优越。尽管如1972年伊拉克和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所确认的那样，伊苏关系特别密切，但8年的两伊战争（1980—1988）也缓和了美伊关系。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敌意促使里根政府支持伊拉克，以阻止伊朗取得彻底的胜利。即使在战争陷入僵局之后，华盛顿仍继续与巴格达修好。

1989年1月，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下定决心进一步改善与伊拉克的关系。同年10月，布什政府发布了一项国家安全指令，阐明了美国对波斯湾的政策，该政策高度重视加强与伊拉克的关系。指令称："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正常关系将有利于我们的长期利益，并促进海湾和中东地区的稳定。美国应该向伊拉克提出经济和政治的激励措施，以缓和其行为，并提高我们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该指令还鼓励向美国公司开放伊拉克市场："我们应该寻求机会让美国公司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并给予支持。"该指令进一步提出通过提供"非致命类型的军事援助"来增强美国对伊拉克国防体系的影响力。[3]因此，萨达姆·侯赛因认为他在冷战结束后带领他的国家度过了混乱，他这样想确实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肇因是他1978年上台后做的灾难性决策。这位伊拉克总统未遭挑衅便与伊朗开战，这场徒劳无获的战争让伊拉克损失惨重，也严重动摇了伊拉克民众对他的支持。8年的冲突，50万伊拉克人丧生，这激起伊拉克国内民众起来反对侯赛因的统治。战争延亘，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反对趋向暴力化。1982年，侯赛因在巴格达北部杜贾伊勒村的一次暗杀未遂中幸存下来。这位伊拉克总统以高压暴力回应，命令安全部队杀害近150名村民作为报复。

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各派借两伊战争来谋求自治。作为回应，伊拉克政府发动名为"战利品"（*al-Anfal*）的灭绝行动。1986—1989年，数千名伊拉克库尔德人被迫背井离乡，2000个村庄被摧毁，并有男子、妇女和儿童共计约10万人在"战利品"行动中被杀。1988年3月，伊拉克政府对哈拉布贾村使用神经毒气，杀害5000名库尔德平民，这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4]

与库尔德人一样，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社群也面临严酷镇压：任意逮捕、滥施酷刑和即刻处决，这些都是为了压制异见。在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只有身份确定的执政党复兴党成员才能获得信任和晋升。伊拉克曾经以其世俗的价值观、高识字率和两性平等著称，但到1989年已退化为一个恐怖共和国。[5]

在两伊战争结束时，萨达姆·侯赛因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是重建伊拉克支离破碎的经济，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不安分的民众。伊拉克的财富来自其巨大的石油资源。8年来，对管道和港口设施的袭击，以及将两伊冲突带至海湾地区国际航道的残酷的油轮战争，切断了伊拉克的石油命脉。由于失去了石油收入，伊拉克被迫向其海湾阿拉伯邻国借款数十亿美元，以支持战事。到1988年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欠其他海湾国家约400亿美元，偿还债务消耗了伊拉克1990年一半以上的石油收入。[6]

石油价格的稳步下降让伊拉克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还债，萨达姆·侯赛因需要油价保持在每桶25美元左右（在两伊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油价一度高达每桶35美元）。到1990年7月，看着国际油价跌至每桶14美元，他倍感绝望。此时，重归和平的海湾，能够满足全世界的石油进口需求。更糟糕的是，一些海湾国家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欧佩克的配额。科威特是违反配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科威特不服从欧佩克的配额规定，有自己的理由。早在20世纪80年代，科威特政府就已推行经济多元化：重金投资西方炼油厂，并在欧洲各地开设了数千家加油站，新品牌取名为“Q-8”，取“科威特”英语名称的谐音。科威特的原油出口越来越多地流向自己在西方的设施。科威特人向其西方炼油厂出售的原油越多，他们在欧洲市场的利润就越高。[7]这些炼油和销售渠道产生的利润率高于原油出口，使科威特免受原油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科威特更感兴趣的是原油产量最大化，而不是通过遵循欧佩克的指导方针将单桶石油价格推向最高点。

相比之下，伊拉克没有这样的外部渠道，其收入与原油价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单桶石油价格每下跌1美元，伊拉克的年收入就净损失10亿美元。在欧佩克会议上，伊拉克和科威特针锋相对，伊拉克迫切要求减产，并推高油价，而科威特则呼吁增加产量。科威特人不在意伊拉克的关切。1989年6月，科威特干脆不再受其他欧佩克成员国分配给它

的配额的约束。科威特人总共贷给了伊拉克140亿美元以支持后者同伊朗的战事，现在战争结束了，科威特人觉得有理由把自己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了。

萨达姆·侯赛因开始将伊拉克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科威特，他的回应是向这个海湾小酋长国施压并发出威胁。他呼吁科威特免除伊拉克140亿美元的债务，并为伊拉克重建再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他指责科威特从他们共有的鲁迈拉油田窃取伊拉克的石油。他还声称，科威特在两伊战争期间占领了伊拉克领土，并要求“归还”位于波斯湾端首的战略岛屿沃尔拜岛和布比延岛，用来建设伊拉克的军事设施和深水港。

侯赛因的说法虽然没什么根据，但重启了长久以来伊拉克对科威特边界和独立的挑战。在20世纪，伊拉克曾两次声称科威特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一次在1937年，另一次在1961年科威特宣布独立时。但伊拉克的阿拉伯邻国认为，这些新的主张和威胁不过是空洞的言辞而已。

但这些阿拉伯国家误判了。1990年7月，侯赛因在伊拉克与科威特的边界部署了大量部队和坦克，用行动来支持他的言辞。此时，其他阿拉伯国家才意识到，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在酝酿，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试图通过斡旋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来应对这场日益严重的危机。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安排科威特人和伊拉克人于8月1日在沙特红海港口吉达会晤。萨达姆在会晤前向阿拉伯领导人承诺，伊拉克与其诸邻国之间的所有分歧都将以“兄弟般的方式”解决。

但萨达姆·侯赛因已经下定决心要入侵科威特。7月25日，在派遣副总统前往吉达会见科威特王储之前，侯赛因要求会见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阿普丽尔·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以听取华盛顿在这场危机中的立场。格拉斯皮向这位伊拉克总统保证，美国对“像你们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纠纷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没有意见”。[8]侯赛因似乎将格拉斯皮大使的言论理解为美国不会干预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会见结束后不久，他调整了入侵计划的范围。最初，他设想有限地入侵科威特，占领上述两岛和鲁迈拉油田，而现在，他要求完全占领这个国家。在同执政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开会时，侯赛因指出，如果他让统治科威特的萨巴

赫（al-Sabah）家族继续掌管科威特的部分地区，他们将发动国际力量——特别是美国，向伊拉克施压并迫使伊拉克撤出。迅速、果断入侵，在萨巴赫家族还没来得及呼吁美国干预之前就推翻他们，这是伊拉克取得成功的最好机会。此外，如果伊拉克能完全吞并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邻国，就可以一次性地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

8月1日，当萨达姆·侯赛因派副总统前往吉达会见科威特王储时，他是在利用外交手段出其不意地实施其军事计划。伊扎特·易卜拉欣（Ezzat Ibrahim）和谢赫萨阿德·萨巴赫（Shaykh Saad al-Sabah）的这次会面进行得亲切友好，没有任何威胁迫近的迹象。两人友好分别，相约在巴格达举行下一次会面。午夜时分，当他们离开吉达时，伊拉克军队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科威特。

8月2日凌晨的几个小时内，数万名伊拉克士兵以迅猛之势进入科威特，去占领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科威特的居民最先惊觉。科威特城的一名学校行政人员吉罕·拉贾布回忆道：“8月2日早上6点，我像往常一样下了床，打开窗户，看了看外面。令我震惊的是，我听到了尖锐、短促而不连贯的枪声，不是一两声枪响，而是持续不断的枪声，且有回击。枪声传向我们旁边清真寺的墙面，引发回响。我们马上明白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科威特正在被伊拉克入侵。”[9]

电话铃声开始在阿拉伯各国首都响起。凌晨5点，法赫德国王被这个消息惊醒。前一天晚上，沙特国王刚刚在吉达给伊拉克和科威特谈判的代表送行，他几乎无法相信伊拉克军队入侵了科威特。他立即尝试联系萨达姆·侯赛因，但没有成功。他的下一个电话打给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大家都知道，后者同萨达姆走得最近。

1小时后，助手叫醒了埃及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报告说伊拉克军队已经占领了科威特埃米尔的宫殿和位于首都的主要部委。上午过半，阿拉伯各国领导人才等到了巴格达的第一个解释。萨达姆的政治特使向惊疑不定的阿拉伯各国元首解释说：“这不过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回归伊拉克而已。”[10]

国际社会正面临着冷战后的第一次危机。8月1日晚上9点，白宫得知了入侵的消息。当晚，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入侵发出强烈谴责。第二天早上，美国将此事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迅速通过了第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无条件撤出。

伊拉克军队毫不畏惧，他们冲进首都科威特城，企图抓住科威特埃米尔谢赫贾巴尔·艾哈迈德·萨巴赫（Shaykh Jabar al-Ahmad al-Sabah）及其家人。如果伊拉克人成功了，那他们就可以把埃米尔和他的家人扣为人质，对科威特有更多的控制权，以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埃米尔接到警告称伊拉克人正在行动，他带着他的家人逃到邻国沙特阿拉伯避难。

科威特王储谢赫萨阿德在结束与伊拉克副总统的吉达会晤后回国，得知入侵已经开始。他立即打电话给美国驻科威特大使，并正式请求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以击退伊拉克的入侵，然后他加入了流亡在沙特阿拉伯的王室其他成员的行列。通过这两个简单的行动——请求美国援助和自我流亡，萨巴赫家族成功地遏制了萨达姆刚开始的入侵。然而，在占领的苦难结束之前，科威特人民还将经历7个月的恐怖。

复兴社会党政权的威权主义和政治空谈让占领的最初几天看上去是乔治·奥威尔《1984》的直接呈现。伊拉克人荒谬地声称，他们进入科威特是应民众革命之邀来推翻执政的萨巴赫家族的。伊拉克政府发表的一份公报解释说："真主帮助科威特纯粹的自由人民，他们冲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并要求伟大的伊拉克人民给予兄弟般的帮助。"[11]然后，伊拉克政权建立了它所称的自由科威特临时政府。

然而，由于没有明显的科威特革命者支持伊拉克的主张，萨达姆·侯赛因政府迅速放弃了这个解放的借口，宣布吞并科威特，于8月8日宣布其为伊拉克第十九省。伊拉克人开始把科威特从地图上抹去，甚至把首都科威特城重新命名为他们自创的名字——卡齐玛。

到10月，新法令颁布，要求所有科威特人将身份证件和汽车牌照更换为伊拉克标准制式。伊拉克人拒绝向没有伊拉克证件的科威特人提供

服务，以迫使他们屈服。牛奶、糖、大米、面粉和食用油等基本食品的配给卡只发给持有伊拉克证件的人。人们必须出示伊拉克身份证才能得到医疗服务。加油站只为上了伊拉克牌照的车辆服务。然而，大多数科威特人顶住了压力，拒绝接受伊拉克公民身份，宁愿去黑市上交易必需品。[12]

入侵科威特时，伊拉克部队大肆劫掠商店、办公室和住宅，并将大部分赃物运往巴格达。看着成车的物品驶往巴格达，一名科威特官员问一名伊拉克官员："既然你说这里是伊拉克的一部分，那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后者回答说："因为没有哪个省可以比首都更好。"[13]

占领一天比一天残暴。8月底，萨达姆·侯赛因任命他臭名昭著的堂兄阿里·哈桑·马吉德（Ali Hasan al-Majid）担任科威特军事长官，他因在"战利品"行动中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战而获得了可怖的绰号"化学阿里"。科威特居民吉罕·拉贾布在日记中写道："阿里·哈桑·马吉德抵达科威特后，统治变得愈发恐怖，可能发生化学袭击的传言愈传愈烈。"有能力逃走的人都逃走了。科威特银行家穆罕默德·叶海亚表示："每个人都想着逃跑。"他描述道，沙特边境，来自科威特的车辆四排并行，绵延了30千米（约19英里）。但叶海亚选择留在科威特。[14]

伊拉克的政治系统对科威特展开全面镇压，随着镇压的深入，科威特人民起身进行非暴力反抗。吉罕·拉贾布写道："在入侵的第一周，科威特妇女决定走上街头示威抗议。"8月6日，也就是入侵4天后，爆发了第一次示威。"当时的气氛，紧张中混合着期待：就好像人们已下意识地认识到，即使是和平示威，伊拉克人也不会支持。"多达300人参加了游行，他们手持横幅、流亡的埃米尔和王储的画像以及科威特国旗。

抗议者呼喊口号，一边致敬科威特和埃米尔，一边谴责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去死！""萨达姆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后一个口号并不符合现实。前两次示威，伊拉克没有反应，但当持续的抗议进入第三天，参加的民众越来越多，与武装的伊拉克士兵正面对峙，后者直接向人群开枪。拉贾布记录道："骚乱爆发了，汽车试图疯狂地沿着公路后退，引擎轰鸣，人们尖叫着，枪声还在继续。"死伤的示威者被凌乱地丢弃在科威特市中心警察局外的地面上。"这是我们这块地区最后一次游

行，也可能是所有地区的最后一次，因为伊拉克人开枪了，导致死亡和伤残。科威特人开始明白侵略者是多么的冷酷无情。”[15]

然而，在伊拉克占领期间，非暴力抵抗活动一直持续。抵抗运动改变了策略，以避开伊拉克的枪火。9月2日，占领的第一个月以科威特人的反抗姿态结束。反抗的计划口耳相传，要求科威特城的所有居民在午夜爬上自家屋顶，高呼“真主至大”。在指定的时间，数千人加入了抗议占领的大合唱。在吉罕·拉贾布看来，这一呼喊是“对所发生的事情——入侵、紧随而来的暴行和杀戮以及在科威特多处建立的酷刑中心——的反抗和愤怒”。伊拉克士兵向屋顶鸣枪示警，以平息抗议，但科威特人民成功地让这次对占领的公然反抗持续了1小时。银行家叶海亚称：“有人说那一晚科威特重生了。”[16]

也有许多科威特人在受过枪械训练的前警察和士兵的领导下武装反抗伊拉克人。他们伏击伊拉克部队，袭击军火库。经过吉罕·拉贾布学校的道路是伊拉克军车的主要通道，因而成为反抗者多次袭击的目标。8月下旬，这条路上发生了巨大爆炸，拉贾布大为震惊，紧接着是火箭弹不成规律的暴鸣。她很快意识到，反抗者袭击了伊拉克的弹药卡车，引爆了车里运送的弹药。爆炸平息后，她才敢离开她的公寓。她发现消防车正在冲浇燃烧着的伊军卡车残骸。她在日记中写道：“除了散落的、发黑的车架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了。任何人都会被炸得无影无踪。”

这些袭击使她所在社区的居民面临严重风险，既受到袭击的影响，也受到伊拉克人的报复。她记录道：“这次袭击发生后，有几座房屋被击中，更糟糕的是，伊拉克人威胁说，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会杀了该地区所有的人。反抗者试图保护平民，让爆炸远离居民区。”[17]

对于伊拉克的威胁，科威特的居民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死亡的恶臭在这个被占领的国家弥漫。死亡直临许多科威特人的家门：伊拉克人的策略之一就是把一名被拘留者送回家，在家人面前开枪打死他。更令人恐惧的是，当局威胁说，如果尸体被移走，就会杀死死者全家。炎热的夏日，尸体经常被留置两三天，作为对那些敢于反抗者的可怖警告。

然而，尽管伊拉克努力恐吓科威特人使其屈服，但在整整7个月的占领期间，反抗有增无减。科威特解放后缴获的伊拉克情报文件证实了

吉罕·拉贾布“在长达数月的占领期间持续抵抗”的说法，这些文件记录了7个月占领期间的反抗活动。[18]

在占领初期，没有理由相信伊拉克的野心会仅限于科威特。没有一个阿拉伯海湾国家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击退伊拉克的入侵，在科威特陷落之后，美国和沙特都担心萨达姆·侯赛因可能有意占领附近的沙特油田。

布什政府认为，对萨达姆·侯赛因野心的唯一威慑是美国的大规模军力部署。美军若要发动军事行动驱逐伊拉克人，则必须获得军事基地权。在派遣任何部队之前，美国政府都需要沙特政府提出正式的军事支援请求。法赫德国王反对这么做，担心国内公众会有负面反应。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沙特对非穆斯林在其领土上驻军颇感不适。更何况，沙特人未曾受过外部帝国的控制，他们极力捍卫自己独立于西方的地位。

美国军队有可能涌入沙特，这促使沙特的伊斯兰主义者采取行动。那些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沙特人，正因战胜了苏联而志得意满，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干涉科威特。从阿富汗“圣战”归来的乌萨马·本·拉登，因其直言不讳的演说而被沙特政府软禁，这些演说借助盒式录音带广为流传。

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入侵科威特后，本·拉登致信沙特内政大臣纳瓦夫·本·阿卜杜·阿齐兹亲王（Prince Nawwaf bin Abdul Aziz），建议发动“圣战者”网络，他认为该网络极为有效地将苏联赶出了阿富汗。阿卜杜·巴里·阿特万（Abdul Bari Atwan）曾在阿富汗托拉博拉山脉的藏身之处采访过本·拉登，是为数不多的采访过他的记者之一。这位记者回忆道：“本·拉登声称他可以召集一支10万人的军队，但这封信被忽略了。”

总的来说，沙特人认为，（相较于美军进驻）伊拉克人对他们国家的稳定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此他们不顾国内反对，还是选择了美国的保护。本·拉登谴责此举是对伊斯兰教的背叛。阿特万记录道：“本·拉登告诉我，沙特政府邀请美国军队来保卫王国和解放科威特的决定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大的冲击。”

> 他不能相信沙特家族能够欢迎“异教徒”部队部署在阿拉伯半岛临近圣地［即麦加和麦地那］的土地上，这是伊斯兰教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本·拉登还担心，沙特政府在迎接美国军队进驻阿拉伯土地之后将使沙特处于外国占领之下——这完全是阿富汗事件的重演，当时喀布尔的共产主义政府邀请苏联军队进驻。正如本·拉登曾拿起武器与驻阿富汗的苏军作战那样，他现在决定拿起武器在阿拉伯半岛对抗美军。[19]

由于本·拉登的护照被沙特政府没收，他不得不利用家人与沙特王室的密切关系来获得旅行证件并永久流亡。1996年，他宣布对美国进行“圣战”，并宣布沙特王室因其“反伊斯兰教的行为”而“不属于宗教社团”。[20]然而，他同阿富汗“圣战”中的前盟友美国和沙特王室的分道扬镳源于1990年8月的事件。

科威特危机揭开了苏美国际外交合作的新篇章。安理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在不受冷战政治干扰的情况下果断采取行动。随着危机的加深，安理会在8月2日迅速通过第660号决议后的4个月里共通过了12项决议而没有遭遇否决票。8月6日，安理会对伊拉克实施贸易和经济制裁，冻结了伊拉克所有境外资产（第661号决议）;9月25日，联合国再次收紧制裁措施（第670号决议）;8月9日，安理会宣布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无效”（第662号决议）。一系列决议谴责伊拉克违反科威特的外交豁免权，并维护第三国公民离开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权利。11月29日，苏联和美国一起促成通过第678号决议，授权成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对付伊拉克，除非后者在1991年1月15日前从科威特完全撤出。中东的冷战正式结束了。

最让阿拉伯尤其是伊拉克政客感到惊讶的是苏联的立场。埃及分析人士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说：“阿拉伯世界里许多人认为，即使莫斯科在伊拉克入侵后拒绝帮助伊拉克，它也至少会保持中立。但让他们惊讶的是，苏联一次又一次地帮助美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阿拉伯世界没有考虑到的是苏联的国力已衰弱，因此注重与华盛顿保持良好关系。鉴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苏联人知道，他们要么支持

美国，要么对抗美国，但他们无法阻止美国采取行动。对抗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此苏联选择与美国合作，而让他们的前阿拉伯盟友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

阿拉伯世界迟迟不承认后冷战时代莫斯科政策导向的改变。伊拉克对联合国的决议置若罔闻，美国开始动员组建作战联盟，而阿拉伯世界仍然期待苏联能阻止美国对其盟友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恰恰相反，苏联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密切合作，起草了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海卡尔称："令阿拉伯代表们感到惊讶的是，很明显，莫斯科将允许华盛顿采取行动。"[21]

美国和苏联在处理科威特危机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但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却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四分五裂。一个阿拉伯国家入侵另一个阿拉伯国家，且外部干预在即，这引发了阿拉伯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歧。

因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而被孤立了10年的埃及，当时刚刚恢复与阿拉伯国家的正常关系，它率先组织阿拉伯国家回应科威特危机。8月10日，穆巴拉克总统召开临时阿拉伯首脑会议，这是自《戴维营协议》以来首次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伊拉克人和科威特人自入侵以来第一次面对面。那是个紧张的时刻。科威特埃米尔发表了和解讲话，试图平息伊拉克人的情绪，提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并希望接着8月1日的吉达会谈往下谈。然而，伊拉克人拒绝妥协。当埃米尔结束讲话并坐下时，伊拉克代表塔哈·亚辛·拉马丹（Taha Yassin Ramadan）抗议说："科威特已经不存在了，我不知道谢赫是基于何种身份来对我们讲话的。"[22]埃米尔气冲冲地离开大厅以示抗议。

对一些阿拉伯领导人来说，美国干预带来的威胁要比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更严重。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Chadli Benjedid）告诫大会："我们毕生都在为摆脱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而斗争，但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阿拉伯民族正……请外国人来干涉。"[23]利比亚、苏丹、约旦、也门和巴解组织的领导人都赞同本·杰迪德的关

切，他们敦促阿拉伯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解决这场危机。他们希望通过谈判，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让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以避免再次发生武装冲突和外国干涉。

在就开罗首脑会议的最后决议进行表决时，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歧显露无遗。决议谴责了伊拉克的入侵，否认了伊拉克的吞并，并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撤出科威特。决议还支持沙特阿拉伯的请求，后者要求阿拉伯国家提供军事支持，以应对伊拉克对其领土的威胁。对该决议的辩论只进行了两小时，穆巴拉克就叫停并进行表决，结果阿拉伯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10票赞成，9票反对。海卡尔写道："不到两个小时就制造了阿拉伯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形成阿拉伯解决方案的最后一个微弱的机会已经丧失。"[24]

美国政府认为，只有发出切实可信的威胁，才能迫使伊拉克人撤出科威特。他们对阿拉伯国家外交斡旋没有信心，反而开始招募阿拉伯盟友加入军事行动。第一批美军已经于8月8日在沙特阿拉伯登陆，随后，埃及和摩洛哥的部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叙利亚人是伊拉克的老对手，且自苏联撤销对他们的支持后有意同美国修好，因此，他们也倾向于加入联盟，并于9月12日确认。其他海湾国家——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也站在沙特一边，并向美国领导的联盟提供部队和设施。

萨达姆·侯赛因用行动将阿拉伯国家分裂成不可调和的阵营，接着又利用阿拉伯舆论，鼓动阿拉伯各国公民反对所在国政府。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勇于反抗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的实干家。他谴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代表石油资源丰富的科威特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另一方面却对以色列一再违反联合国要求其从阿拉伯被占领土撤军的决议视而不见。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动加大了对各阿拉伯政权的压力，他把他们说成是西方大国的走狗，牺牲阿拉伯的利益来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侯赛因公开指责阿拉伯领导人在冷战之后的新时代奉行美国的规则。阿拉伯民众团结起来支持这位拒绝向美国压力低头的领导人。摩洛哥、埃及和叙利亚爆发暴力示威，抗议他们的领导人加入联盟的决定。约旦和巴勒斯坦举行大规模集会支持伊拉克人，这让流亡的科威特人大为懊恼，多年来他们一直慷慨支持哈希姆王国和巴解组织。

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过去与伊拉克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此时，一边是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的阿拉伯舆论，一边是国际社会要求他们支持美国领导的联盟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对此他们左右为难。阿拉法特公开表示支持萨达姆·侯赛因，而约旦国王仅仅做到拒绝谴责伊拉克人，因为他在为科威特危机寻求越来越不可能实现的“阿拉伯解决方案”。由于没有谴责伊拉克人，侯赛因国王被布什政府和阿拉伯海湾领导人指责支持入侵科威特。危机过后，约旦面临着阿拉伯海湾国家和西方的孤立。然而，侯赛因国王继续获得约旦人民的支持，并凭此避免了一场很可能使他失去王位的危机。

萨达姆·侯赛因在阿拉伯街头声望正隆，但却最终作茧自缚。一旦他在诸如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或承受美国压力等问题上占据了道德高地，他就不再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他那些让阿拉伯公众群起力挺的言辞，对美国政府没什么影响力。布什政府只关注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拒绝扩大讨论范围。萨达姆·侯赛因需要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做出让步才能撤军，以保全自己的颜面，但美国不愿如此。萨达姆·侯赛因不愿按美国的规则行事，对战争的前景，他表现得越来越听天由命。

1991年1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78号决议规定的最后期限过去了，此时，美国已经组建起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准备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美军派出65万名士兵，占联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阿拉伯世界派出了约18.5万名士兵，其中，沙特派出10万名士兵，其余兵力来自埃及、叙利亚、摩洛哥、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联盟中的欧洲力量以英国和法国为首，还包括意大利和其他8个欧洲国家。总之，来自六大洲的34个国家联合起来，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世界战争。

1月15日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全世界都屏息以待。第二天，美国发动了“沙漠风暴”行动，对巴格达和伊拉克军队在科威特与伊拉克的营地展开大规模的空中轰炸。萨达姆·侯赛因毫不服软，威胁他的对手要发动“战争之母”。联军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伊拉克是否会像在安法尔战役中对库尔德人所做的那样使用生化武器。美军指挥官希望从空中击败

伊拉克，避免他们的步兵去冒毒气战的风险。

伊拉克人应对空袭的方式是向以色列和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营地发射远程飞毛腿导弹。1月18日凌晨，8枚飞毛腿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袭击了海法和特拉维夫，造成了物质损失，但没有人员伤亡。当警报响起时，以色列电台建议市民戴上防毒面具，在密封的房间里躲避，担心伊拉克人在飞毛腿导弹上安上化学弹头。

伊扎克·沙米尔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如何报复，但布什政府成功地说服了以色列人，让他们置身事外。显然，萨达姆·侯赛因希望把对科威特的战争转向波及面更广的阿以冲突，以让美国为首的联军陷入混乱。穆罕默德·海卡尔讲述了伊拉克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如何混淆了联军中阿拉伯士兵效忠的对象。当一群驻扎在沙特的埃及和叙利亚士兵听闻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时，他们高喊“真主至大”，“但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想起，他们是来打击伊拉克的。但为时已晚，7名埃及人和7名叙利亚人受到了惩罚”。[25]

伊拉克总共向以色列发射了42枚导弹，其中一些落在约旦河西岸，另一些则被爱国者导弹拦截。飞毛腿导弹带来的恐惧多于伤亡。许多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为萨达姆·侯赛因袭击以色列欢呼。大起义陷入僵局，以色列铁拳镇压，巴勒斯坦人被严格的24小时宵禁限制在家中，十分沮丧。如今，他们乐见以色列人遭到袭击，期待改变的到来。记者拍摄到巴勒斯坦人在屋顶上跳舞，为飞毛腿导弹欢呼，巴勒斯坦学者萨利·努赛贝赫对一家英国报纸解释了巴勒斯坦人的这种反应：“如果巴勒斯坦人因看到导弹从东向西飞而高兴，那是因为，象征性地说，他们在过去40年里看到的都是从西向东飞的导弹。”努赛贝赫为他的导弹言论付出了代价；几天后，他遭虚假指控并被逮捕，理由是帮助伊拉克人，引导他们用飞毛腿导弹攻击以色列目标，为此他在拉马拉的监狱中被关押了3个月。[26]

伊拉克人向沙特阿拉伯发射了46枚飞毛腿导弹，大多数被爱国者导弹拦截，但仍有一枚击中了达兰的一个当时被用作美军军营的仓库，造成2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是此次战争中造成美军伤亡人数最多的事件。

对导弹残骸的分析让美军指挥官确信，伊拉克人没有使用生化制剂。伊拉克未使用非常规武器，使联军更加大胆地将战争从空中转向地面。2月22日，美国总统布什向萨达姆·侯赛因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第二天中午前撤出科威特，否则将面临地面战争。

到2月，伊拉克及其军队已经遭受了5个多星期的前所未有的空中轰炸，其效果是那些射向以色列和沙特的粗糙的飞毛腿导弹无法比拟的。联军每天出动战机多达1000架次，使用激光制导精密武器，携带高强度弹药和巡航导弹，打击伊拉克的目标。巴格达和伊拉克南部城市遭受了大规模的轰炸，摧毁了发电站、通信设备、道路和桥梁、工厂和居民区。

关于这次“沙漠风暴”海湾战争中的平民死亡人数，没有官方统计数据，各类估计从5000—20万人不等。但毫无疑问，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平民在猛烈的轰炸中丧生或受伤。这场战争中单次伤亡最重的袭击是美国空军向巴格达阿米里亚区的一处防空洞投掷的两枚重达2000磅的“智能炸弹”，炸死了400多名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在此躲避城中猛烈轰炸的妇女和儿童。伊拉克军队也在持续的轰炸中遭受重大伤亡。到2月的第三个星期，军队士气已很低落。

伊拉克军队即将被逐出科威特，面对这一情况，伊拉克政府发动环境战，旨在惩罚科威特和邻近的海湾国家。早在1月下旬，伊拉克军队就故意将400万桶石油注入波斯湾水域，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浮油，长35英里，宽15英里（长56千米，宽24千米）。考虑到海湾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且已经历了两伊战争的多年破坏，这次浮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环境灾难。

在地面战前夕，伊拉克人炸了700口科威特油井，造成了一场大火。吉罕·拉贾布在科威特家中的屋顶上目睹了爆炸。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可以亲耳听到，伊拉克人正在引爆更多的放置在井口周围的炸药。漫天都是跳动、燃烧的红。有些火焰有规则地起落，有些则直入云霄，我想象，是它们发出了戏剧性的轰鸣声。然而，其余的火焰几乎都是活生生的：它们四处喷涌，汇成一个膨胀的、剧烈而稳定跳动的火球。”第二天早上，科威特的蓝天被700口熊熊燃烧的油井放出的浓烟遮

住了。“今天早上，整个天空都是黑色的，太阳被遮住了。”[27]

伊拉克人的环境战让地面战更为紧迫。1991年2月24日星期日清晨，地面战打响。地面战是短暂的，也是残酷的关键一战。联军涌入科威特，迫使伊拉克在100小时内全部撤离。激烈的战斗对科威特居民和伊拉克侵略者来说都是可怕的。吉罕·拉贾布描述了科威特城在油井燃烧的爆裂声和空中数百架蜂拥而至的战机的轰鸣声中，四处可闻的巨大爆炸和猛烈交火。2月26日，地面袭击发动两天后，她写道：“真是个难以置信的夜晚！炮火照亮了低空，发出炫目的白光和血红的闪烁。”

惊慌失措的伊拉克军队开始混乱无序地撤退。士兵们试图挤上往北开向伊拉克边境的卡车和吉普车，并征用了所有仍能使用的车辆（科威特人弄坏了他们自己的汽车，以阻止盗窃）。成功坐上车从科威特出发的人中，许多在穆特拉山脊遇难，这是从科威特向北通向伊拉克边界的80号公路的无遮挡路段。成千上万名伊拉克士兵乘坐军用卡车、大巴和盗取的民用车辆行驶在80号公路上，造成了大规模交通堵塞。联军飞机轰炸了撤退长龙的前方和后方，将数千辆车困在中间。在随后的屠杀中，约有2000辆车被毁。我们不清楚有多少伊拉克人设法逃离了车辆，又有多少人被打死。然而，“死亡公路”的形象却使以美国为首的联盟面临着过度使用武力甚至犯下战争罪行的指控。布什政府担心这样的暴行会破坏国际社会对他们军事行动的支持，敦促于2月28日全面停火，海湾战争就此结束。

解放的代价是高昂的。科威特人兴高采烈，庆祝恢复独立，但他们的国家已被伊拉克的入侵和战争完全摧毁。数以百计的油井被焚烧得无法操控，基础设施被摧毁，全国多处都得从头开始重建。占领和战争也重创了科威特人民，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害、流离失所或失踪。

冲突之后，更广阔的阿拉伯世界也经历着分裂和创伤。阿拉伯各国公民强烈反对他们的政府站在国际联盟一边去打击一个阿拉伯国家。加入联盟的政府排挤没有加入的。约旦、也门和巴解组织因过于支持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而受到谴责。三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湾国家的财政支持，他们为他们的立场付出了经济代价。许多阿拉伯分析人士表达了对

美国的严重不信任，以及对其在新的单极世界中的野心的忧虑。美国一心寻求军事解决，且疑似阻碍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海湾危机的努力，这使许多人相信，美国在利用这场战争谋求在海湾地区驻军，并控制该地区的石油资源。科威特解放多年后，数以千计的美国军队仍留在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这一事实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忧虑。

撤出科威特并没有给伊拉克带来任何喘息的机会。布什政府认为已经削弱了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军队的威信，便于1991年2月初鼓动伊拉克人民起来推翻他们的独裁者。美国的广播电台向伊拉克传送信息，承诺美国将支持民众起义。他们的承诺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和南部的什叶派地区都得到了响应，这些地区在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下苦不堪言。1991年3月初，两地爆发了起义。

但这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宣传成果，他们希望看到巴格达发生军事政变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的起义都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里的盟友土耳其，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以库尔德语简称PKK闻名）领导的激烈的分裂主义叛乱。土耳其反对任何可能让伊拉克库尔德人在其东部边境建国的举措。美国人自己则担心，什叶派起义成功只会加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地区影响力。

尽管美国人鼓动伊拉克人起来反抗，但他们没有向什叶派或库尔德人提供任何支持。萨达姆·侯赛因集结余部，残酷镇压叛乱，布什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据信，有数万伊拉克什叶派教徒在镇压中丧生，还有数十万库尔德人为躲避报复逃离伊拉克，前往土耳其和伊朗避难。

面对自己造成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做出回应，在伊拉克北部设立了禁飞区。美国军机在北纬36°以北地区巡逻，以保护库尔德人不受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伤害，而英国飞机在伊拉克南部上空设立禁飞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禁飞区恰恰建立了土耳其最反对的那种库尔德自治区。1992年5月，独立于萨达姆·侯赛因政府的地区议会选举举行，开始推动建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

布什政府未能通过军事手段和鼓动伊拉克国内起义将侯赛因赶下台，便重返联合国，确保通过一项决议，剥夺伊拉克拥有的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确立伊拉克支付战争赔偿的责任，并加强先前各项决议规定的经济制裁。萨达姆·侯赛因认识到，这些措施是为了煽动伊拉克人推翻他，他对此做出了蔑视的回应。他在巴格达的拉希德酒店门口铺上了布什的马赛克肖像，这样一来，所有的住客都会踩踏他对手的脸。1992年11月，侯赛因庆祝布什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布什倒台了，萨达姆仍然掌权。

美国人可以宣称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彻底的军事胜利，但政治上，他们只取得了部分胜利。萨达姆·侯赛因的幸存意味着，在这个高度动荡的地区，伊拉克仍然是一个制造不稳定的源头。而且，同布什政府的期愿相悖的是，在“沙漠风暴”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主导了地区政治。这位伊拉克领导人将伊拉克在科威特的立场，与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相提并论，迫使国际社会去应对中东一些悬而未决的冲突。

*

到20世纪80年代末，黎巴嫩的和平前景似乎从未如此遥远。黎巴嫩90%的领土处于外国占领之下，以色列控制着所谓的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叙利亚军队则控制着余下的所有地方。外国资金涌入黎巴嫩，武装了大批彼此敌对的民兵组织，这些组织间的权力斗争让黎巴嫩各大城镇满目疮痍。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战争的阴影下长大的，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机会正常谋生。一度繁荣的中东民主的典范已经沦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挣扎在叙利亚脆弱的控制下。

在黎巴嫩，国家在派别冲突的胁迫下解体，使1943年《民族宪章》规定的黎巴嫩教派政治制度的根基受到质疑。许多资深政客认为，黎巴嫩宗教与政治变化无常的关系是内战的肇因，并决心推行彻底的改革，将之视作任何和平方案的组成部分。拉希德·卡拉米（Rashid Karami）是一名逊尼派穆斯林，曾10次出任总理，长期以来，他一直呼吁对黎巴嫩政府进行重大改革，以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建立政治平等。1984—1987年，卡拉米再次担任总理，他认为，所有黎巴嫩公民，不论其信仰为何，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去竞选任何职位。内阁中的其他改革派成员也赞同卡拉米的观点。什叶派阿迈勒党主席兼司法部部长纳比赫·贝里

（Nabih　Berri）对《民族宪章》不屑一顾，称之为“一个不能修改或改进的无结果的制度”。他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28]

艾敏·杰马耶勒的6年总统任期（1982—1988）代表了黎巴嫩政治的谷底，他是改革者攻击的焦点。德鲁兹交通部部长瓦利德·琼布拉特（Walid　Jumblatt）建议，杰马耶勒应该在枪口下被赶下台。许多部长拒绝出席他主持的内阁会议，卡拉米也加入了抵制的行列。内阁停止开会，政府活动完全停滞。

1987年5月，卡拉米向杰马耶勒提交辞呈，两者的对抗升级。许多观察家认为，卡拉米辞职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1988年大选中竞选总统。这位逊尼派政治家曾在1970年尝试过一次，但被禁止参选，因为总统职位是给马龙派基督徒保留的。卡拉米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在改革派中有强大的支持者。鉴于黎巴嫩政治的崩溃，也许相较于1970年，他在1988年的机会更大。然而，他再未能有机会宣布参选。在辞去总理职务4周后，拉希德·卡拉米在他的直升机上遭遇事先安放的炸弹袭击，被暗杀身亡。虽然没有找到卡拉米的暗杀者，但他的被杀背后传递的信息大家都明白：《民族宪章》不允许谈判。

卡拉米遇刺后，被孤立的杰马耶勒总统找不到愿意担任总理的可靠的逊尼派政治家。他任命卡拉米已解散的内阁中的逊尼派教育部部长塞利姆·侯斯（Selim　al-Hoss）为代理总理。从1987年6月到1988年9月22日杰马耶勒任期结束，黎巴嫩没有正常运作的政府。1988年，黎巴嫩面临的挑战是，在交战的政治精英们无法就任何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选出一名各方都接受的新总统。

1988年，只有一位候选人竞选总统：前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公众对这位78岁的军阀没有信心。上一届任期（1970—1976）中，他没能有效地防止内战爆发。没有人相信他会在12年后更有效地实现民族和解。

缺少总统候选人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到选举当日，甚至没有足够的投票者来选举新总统。在黎巴嫩，总统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由于内战爆发以来还没有举行过议会选举，8月18日，参加1972年议会的年迈的尚在人世的议员被召集来第三次履行宪法义务。在76名老议员

中，许多人已逃离了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在国外过上了更安全的生活。在选举当日，只有38名议员出席。议会因未达到法定人数而无法继续召开，黎巴嫩没有总统了，这是该国历史上的头一遭。

根据黎巴嫩宪法，在没有民选总统的情况下，总理及其内阁有权行使行政权力，直至新总统就职。杰马耶勒的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这项宪法规定对那些致力维持政治现状的马龙派人士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黎巴嫩从来没有缺过总统，逊尼派就从未行使过行政权力。保守的马龙派教徒担心，如果侯斯接管总统职权，他势必将寻求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穆斯林）多数的统治而废除《民族宪章》。这将意味着，作为中东基督教国家的黎巴嫩就此终结。

随着杰马耶勒的任期接近尾声，9月22日午夜，马龙派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将军亲自行动。这位53岁的将军是贝鲁特南郊基督教和什叶派混合村哈拉特·胡雷克村人，他要求杰马耶勒在侯斯的看守政府获得行政权力之前解散它。奥恩将军警告杰马耶勒："总统先生，是否重新组阁，是你的宪法权利，但如果你选择后者［即不重新组阁］，我们将从午夜起认定你为叛徒。"[29]

奥恩发动政变是为了避免一场危机，但却又制造了另一场危机。作为一名马龙派基督徒，他没有资格担任总理，因为根据《民族宪章》的条款，这一职位是留给逊尼派穆斯林的。这个自称维护《民族宪章》的人实际上是在破坏黎巴嫩教派分权制度的基石。然而，在晚上11点——确切地说，是11点45分，艾敏·杰马耶勒屈服于奥恩的压力，签署了最后两项行政命令。第一项，解散塞利姆·侯斯的看守政府；第二项，任命米歇尔·奥恩将军为临时政府总理。侯斯和他的支持者们拒绝接受杰马耶勒在最后时刻发布的政令，并宣布对黎巴嫩有统治权。

一夜之间，黎巴嫩从没有政府变成了一个有两个彼此不容的政府的国家：侯斯希望在叙利亚的托管下，用有利于该国穆斯林多数群体的开放民主取代教派分权制度；奥恩则希望基于《民族宪章》重建黎巴嫩国，维护基督徒的统治地位，并完全独立于叙利亚。

两个政府相互敌对，将黎巴嫩分裂为基督教和穆斯林两个小政体。几乎没有基督徒愿意为侯斯的政府效力，也没有穆斯林愿意加入奥恩的

政府。侯斯统治着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中心地带，奥恩统治着黎巴嫩的基督教区。双方的竞争带有闹剧的色彩，两位领导人都任命了各自的军事、安全机构和公务员系统的负责人。只有黎巴嫩中央银行经受住了压力，没有分化为两套班子，但却得为两个政府的支出提供资金。

真正的危险来自外部的庇护者。侯斯政府公开力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角色，因而得到大马士革的全力支持。奥恩谴责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威胁了黎巴嫩的主权和独立，他得到了伊拉克的全力支持。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叙利亚打破了阿拉伯阵营，与伊朗站在一起，巴格达一心要与大马士革算这笔账。黎巴嫩的诸多纷争为伊拉克政府惩罚叙利亚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伊拉克政府拥有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能够向奥恩提供军事援助，支持他反抗叙利亚驻军黎巴嫩。1988年8月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加大了支持力度。

受此鼓舞，奥恩于1989年3月14日向叙利亚宣战，发动解放战争。作为回应，叙利亚军队对奥恩统治下的基督教区实施了全面封锁。双方开始重炮互击，造成黎巴嫩穆斯林区和基督教区大面积毁损，并致数万平民流离失所，这是自1982年以色列围困贝鲁特以来最猛烈的炮击。

两个月的可怖战斗和严重的平民伤亡促使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1989年5月，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召开，以应对黎巴嫩的新危机。会议授权沙特国王法赫德、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这三位阿拉伯国家元首进行斡旋，以结束暴力并着手恢复黎巴嫩的统治稳定。

这三位元首组成“三方最高委员会”，命令叙利亚遵守停火协议，并要求伊拉克停止向奥恩和黎巴嫩武装部队的民兵输送武器。“三方最高委员会”的努力起初收效甚微。叙利亚人无视“三方最高委员会”的要求，加紧轰炸遭围困的基督教区。伊拉克继续通过叙利亚的对手——马龙派控制的港口向其盟友供应军火。

1989年9月，经过6个月的战斗，“三方最高委员会”终于说服各方停火。阿拉伯各国领导人邀请黎巴嫩议员赴沙特的塔伊夫开会，以在确保中立的基础上启动民族和解进程。1972年选举产生的黎巴嫩议会议员中尚在人世者从流亡的法国、瑞士和伊拉克或从黎巴嫩的藏身之处出发，

集聚塔伊夫，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未来。62名议员出席了会议，其中一半是基督教徒，另一半是穆斯林，达到了代表黎巴嫩国做决定必需的法定人数。1989年10月1日，沙特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亲王（Prince Saud al-Faisal）召开开幕会议，他警告说："不允许失败。"

成功的到来比预期的要晚。原计划3天的会议变成了23天的马拉松大会，其成果是不折不扣的黎巴嫩第二共和国的蓝图。《塔伊夫协定》所载的黎巴嫩政治重建条款保留了《民族宪章》规定的教派分权制度的许多要素，但修改了权力分配结构，以反映黎巴嫩的人口现实。因此，议会中的席位仍然分配给不同的教派，但这种分配已从有利于基督徒的6：5调整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席位对等。议会席位从99个增加到108个，这样可以在不减少基督徒席位的情况下扩大穆斯林的席位。

改革者未能实现其首要目标，即不分宗教向所有公民开放政治职位，因为很显然，这种对教派分权制度的攻击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折中的解决办法是保留《民族宪章》规定的职位分配，但重新调整各职位的权力。总统仍由马龙派基督徒担任，但其职责被缩减为更具仪式性的"国家元首和团结象征"的角色。总理和政府（被称为部长会议）是权力重新分配的主要受益者。现在，逊尼派总理将拥有行政权力，他将主持召开政府会议，并负责政策执行。此外，虽然总理仍由总统任命，但只有议会有权罢免总理。议长是分配给什叶派穆斯林的最高职位，塔伊夫的改革也赋予了该职位一些重要的新权力，包括在任命总理方面为总统提供建议的"拥护者"角色。通过这些变化，马龙派可以声称保留了他们的关键职位，穆斯林可以声称拥有了比基督徒更多的权力。即便所有人都对《塔伊夫协定》不甚满意，但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它提供了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

奥恩的支持者试图借助《塔伊夫协定》迫使叙利亚撤出黎巴嫩，但没有成功。"三方最高委员会"发现哈菲兹·阿萨德不愿在叙利亚对黎巴嫩的立场上妥协。他们承认，如果没有叙利亚的支持，协定将毫无意义。《塔伊夫协定》正式感谢叙利亚军队过去提供的服务，承认目前驻扎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部队的合法性，并让黎、叙两国政府自行商定未来何时终止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不规定具体时刻。《塔伊夫协定》还呼吁黎、叙两国政府签署双边条约，将两国在"所有领域的特殊关系"正规

化。简而言之，该协定在法律上批准了叙利亚对黎巴嫩的立场，并将两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聚集在沙特的黎巴嫩政客们认识到他们的现实处境，接受了妥协的方案，以期在将来取得进一步的成果。《塔伊夫协定》的最终文本得到塔伊夫的黎巴嫩议员们的赞成，没有遭到反对。

在饱受战争蹂躏的黎巴嫩，《塔伊夫协定》的宣布引发了最后一轮战斗。奥恩将军所在的基督徒区，地处高原，遭受重创，在那里，他坚称自己领导的是黎巴嫩唯一的合法政府。他断然拒绝了这项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驻军提供法律掩护的协定。他发布总统令解散黎巴嫩议会，试图阻止《塔伊夫协定》的执行，但无济于事。奥恩在国内外被孤立，因为黎巴嫩人和国际社会都支持黎巴嫩的民族和解框架。

为了预先阻止奥恩发难，议员们赶回贝鲁特去批准《塔伊夫协定》。11月5日，黎巴嫩议会正式批准了这项协定，并选举64岁的议员、来自兹加尔塔的勒内·穆阿瓦德（René Moawad）为共和国总统。穆阿瓦德是北方一位受人尊敬的马龙派家族的后裔，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候选人，得到了黎巴嫩民族主义者和叙利亚人的支持。然而，穆阿瓦德有危险的敌人。在他执政的第17天，这位黎巴嫩新总统在结束黎巴嫩独立日庆祝活动回家时，被一枚威力巨大的路边炸弹炸死。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和米歇尔·奥恩都被控谋杀，但那些应对穆阿瓦德遇刺负责的人从未被绳之以法。

对穆阿瓦德的残忍谋杀有可能引发塔伊夫进程的崩溃，毫无疑问，这正是暗杀者们的用意所在。暗杀发生后48小时内，黎巴嫩议会再次召开会议，在穆阿瓦德的死亡阻碍到在塔伊夫商定的重建进程之前，选出继任者。叙利亚当局赶在黎巴嫩议员之前寻觅到了穆阿瓦德的替代者。大马士革电台宣布埃利亚斯·赫拉维（Elias Hrawi）为新总统，这发生在黎巴嫩议员对此提名人选进行投票之前。[30]阿萨德政权有意走漏消息，目的是向世人表明，在塔伊夫时代，对黎巴嫩的最终控制权仍在叙利亚手中。

赫拉维就任总统最先开展的行动之一是对付米歇尔·奥恩，此时，后者被普遍认为是背叛者和黎巴嫩政治和解的障碍。当选后第二天，赫拉维就解除了奥恩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并命令他在48小时内撤出位

于巴卜达的总统府。对赫拉维的命令，奥恩置若罔闻，他向支持他的伊拉克人寻求补给，确保通过贝鲁特附近他自己的港口接受武器、弹药和防空设备，以加固阵地，抵御外来攻击。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数以千计支持奥恩的平民在巴卜达的总统府周围安营扎寨，组成护卫奥恩的人体盾牌，这是赫拉维对付抗命违逆的奥恩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这位黎巴嫩总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89年12月，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萨米尔·贾贾（Samir Geagea）宣布支持《塔伊夫协定》，奥恩和黎巴嫩武装部队的马龙派民兵之间的对抗演变为公开冲突。同奥恩一样，贾贾的军火也是由伊拉克人补给的。1990年1月，这两个派别之间爆发了内战开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两派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部署伊拉克的火箭弹、坦克和重型火炮，完全无视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战斗持续了5个月，直到1990年5月，这两个敌对的基督教派别才在梵蒂冈的调解下实现了停火。

尽管米歇尔·奥恩面临着孤立和越来越多的反对，但他知道，至少在眼下，他与黎巴嫩武装部队的战斗阻挠了《塔伊夫协定》的进程，对此他多少有些满意。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黎巴嫩冲突的分水岭。在战争中，伊拉克再也无力武装其在黎巴嫩的支持对象。此外，萨达姆·侯赛因试图将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与地区问题的总体解决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就包括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侯赛因毫不掩饰他的企图，即将国际社会的压力转到迫使叙利亚撤出黎巴嫩这一问题上来。

叙利亚人非常擅长地区政治，不会被萨达姆·侯赛因的伎俩牵着鼻子走。哈菲兹·阿萨德利用科威特危机改善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华盛顿全力支持《塔伊夫协定》。因此，阿萨德决定全力支持落实《塔伊夫协定》框架，并将伊拉克的盟友米歇尔·奥恩视为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进行了磋商，10月11日，赫拉维总统根据《塔伊夫协定》的条款正式请求叙利亚提供军事援助，以推翻奥恩将军。两天后，叙利亚飞机开始轰炸奥恩的营地，同时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的坦克进入奥恩的部队控制的领土。不到3小时，奥恩将军投降，前往法国大使馆

寻求庇护，而他的党羽则继续战斗。激烈的战斗在8小时内结束了。10月13日，巴卜达空荡荡的总统府上空的硝烟散去，黎巴嫩人民第一次看到了战后的世界，即便它依然处于叙利亚的占领之下。

在米歇尔·奥恩败北之后，《塔伊夫协定》所设想的战后重建才真正开始。1990年11月，政府命令所有民兵组织离开首都贝鲁特。12月，军队清除了将穆斯林所在的西贝鲁特与基督徒所在的东贝鲁特分开的路障，自1984年以来，首次将这座城市统一起来。

1990年平安夜，被暗杀的改革派总理拉希德·卡拉米的弟弟欧麦尔·卡拉米（Omar Karami）宣布新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新政府有30位部长，是黎巴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阁政府，囊括了黎巴嫩几乎所有主要民兵组织的首领。这些是对冲突中最严重的暴行负有责任的军阀，但由他们来组成政府是有好处的，这很快就在政府根据《塔伊夫协定》下令解除民兵武装时显现出来。政府要求各民兵组织在1991年4月底前解散并交出武器；作为回报，政府承诺将整编那些希望在黎巴嫩军队服役的民兵。无论民兵组织的首领如何反对这一举措，他们都没有反对政府，也没有从内阁辞职。[31]

只有一支民兵获准继续其军事行动，那就是真主党。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下，真主党保留了武器，以便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反抗以色列的占领。这个什叶派民兵组织同意将其行动限制在那部分属于以色列所称的南黎巴嫩“安全区”的地区，这一地区无论如何都不属于黎巴嫩政府的管辖范围。真主党将继续其对以色列占领者的“圣战”，其手段越来越老练，破坏性也越来越大。

战争终于结束了，黎巴嫩在经历了15年的内战之后，面临着几乎难以完成的重建任务。1975—1990年，估计有10万至20万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残疾，还有数十万人被迫流亡。没有一座城市幸免于难，整块整块的街区都变成了寂静的街道，到处都是破碎的建筑物。后一波战争的难民占据了前一波战争中被遗弃的居民楼。全国许多地方的公用设施已完全瘫痪。电力供应得靠私人发电机，自来水时有时无且不健康，未经处理的污水流淌在街道上，滋养着在战争废墟中繁茂生长的植物。

黎巴嫩的社会结构也受到了同样程度的破坏。对暴行的记忆，对那

些永远不能纠正的不公的记忆，在和平宣布之后很久依然割裂着黎巴嫩的许多社群。和解、健忘和对过上正常生活的强烈驱动力结合在一起，使黎巴嫩人能够再次像一个国家一样行事。结果，有些人认为，黎巴嫩人对他们的国家的责任感变得更强了。[32]然而，黎巴嫩仍然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冲突再次爆发的威胁始终存于人们的意识中。

*

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以及美国领导解放科威特的战争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迫使美国去处理长期悬而未决的巴以冲突。美国政府承认，科威特危机给美国的阿拉伯盟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萨达姆·侯赛因频繁提到解放巴勒斯坦，虽然这很不现实，但这使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并使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遭受公众的谴责。阿拉伯各国公民认为，他们的政府已经糊涂了：他们应该为了解放巴勒斯坦去同以色列作战，而不应该为了解放科威特的财富和石油而去代表美国同伊拉克作战。

美国也受到阿拉伯媒体和舆论的广泛谴责。多年来，美国一直支持以色列，而后者却在要求其归还所占阿拉伯领土的联合国决议面前耀武扬威。1990年，以色列继续占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然而，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美国却援引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似乎这些决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占领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联合国的决议有的具有约束力，有的不具有约束力。对同为占领者的伊拉克和以色列实施了双重标准，这是不言而喻的。

萨达姆·侯赛因试图将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与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相关联，对此，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予以拒绝，但他无法否认伊拉克所提要求的逻辑性。1991年3月，伊拉克冲突刚结束，布什政府就宣布了一项新的阿以和平倡议。这是一次毫不遮掩的尝试，目的是重新掌握主动权，并表明，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美国都一样可以有效地使用其权力。

美国有意重启和平进程的消息传来，巴勒斯坦人感到些许宽慰。他们支持萨达姆·侯赛因，支持其占领科威特，但这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际社会刻意回避巴解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切断了所有对巴勒斯

坦人的资助。尽管布什政府明确表示，对于巴解组织在科威特冲突中采取的立场，他们无意奖惩，但新的和平倡议只会帮助巴勒斯坦人走出孤立。

巴勒斯坦活动家萨利·努赛贝赫在拉马拉监狱的牢房里庆祝布什的倡议。努赛贝赫因指引伊拉克飞毛腿攻击以色列目标这一表面上的指控被判入狱3个月，当1991年3月布什宣布其倡议时，他的刑期将满。美国的倡议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老乔治·布什突然发表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政策声明：‘全面和平必须以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及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为基础。’”布什接着把以色列的安全与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宣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是和平的最大障碍。努赛贝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道：“听到这些后，我在我狭小的牢房里跳起舞来。”[33]

一些巴勒斯坦人对美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努赛贝赫在比尔宰特大学的同事、巴勒斯坦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哈南·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剖析了布什声明的语言：“［布什］称将‘投入美国在战争中获得的信誉给该地区带来和平’，我们认为这是在宣扬所得到的战利品。”阿什拉维认为，整个和平倡议是美国为使中东服从其统治而做出的努力。她说：“声明称，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是根据美国的蓝图对我们的世界进行重新组织。声明称，中东和解的机会之窗正在打开。我们认为这窗户是窥视孔、长隧道或陷阱。”[34]

美国人向巴勒斯坦人表明的第一件事是，他们不会允许巴解组织在谈判中发挥任何作用。以色列政府断然拒绝参加与巴解组织的任何会晤，而美国人则有意排挤亚西尔·阿拉法特，以报复他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

1991年3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前往耶路撒冷，邀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参加和平会议，代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巴勒斯坦人认为，贝克的倡议公然企图建立另一个巴勒斯坦领导层。他们不想被牵扯进来，去破坏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国际公认地位。这些“内部”政治活动人士在同意3月

13日与贝克会面之前，给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层写信，以获得阿拉法特的正式批准。

11名巴勒斯坦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领头的是耶路撒冷人费萨尔·侯赛尼（Faisal al-Husseini）。他是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儿子，后者在1948年的盖斯塔勒战役中战死，这次战役标志着巴勒斯坦抵抗犹太复国主义的失败。费萨尔·侯赛尼是耶路撒冷最古老和最受尊敬的家族之一的后人。他也是一名忠诚的法塔赫成员，与亚西尔·阿拉法特关系密切。

侯赛尼开始发言："我们是奉巴解组织的命令来到这里的，这是我们唯一合法的领导。"

贝克回答说："你选择谁做你的领导是你自己的事。我正在寻找来自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是巴解组织成员，愿意在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及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的双边、两阶段谈判，并愿意与以色列和平相处。这个房间里有吗？"贝克看着那11个巴勒斯坦人，但并不逼迫他们。

萨伊布·阿里卡特（Saeb Erakat）说："国务卿先生，我们必须提醒你，我们是一个有尊严和自豪的民族。我们没有被打败，这也不是萨夫万帐篷。"他指的是美国人在海湾战争结束时为伊拉克投降的条件谈判而搭建的帐篷。身材魁梧的阿里卡特是英国大学培养的、纳布卢斯纳贾赫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贝克反驳道："你们支持失败的一方不是我的错，你应该告诉你的领导不要下错赌注，这太愚蠢了，这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海达尔·阿卜杜·沙菲（Haidar Abdel Shafi）说："我同意来参加这次会议只为了谈一件事：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建定居点的行动必须停止。只要定居点继续建设下去，就不会有和平进程。你可以一直从我这里听到这个观点。"阿卜杜·沙菲是加沙医学协会的医生和主席，他是被占领土的资深政治家，曾在1948—1967年加沙被埃及统治期间担任巴勒斯坦议会议长。

贝克回应说："开始谈判，定居点行动就会停止。"

巴勒斯坦活动家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他们必须先停止行动，否则我们不能进入谈判进程。"

国务卿贝克注意到，会谈的主题正在转向谈判，他已找到了一群可靠的人来代表巴勒斯坦出席和平会议。带着些许满足感，他说："现在你们在谈正事了。"[35]

第一次交流开启了美国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为期6个月的谈判，最终确定了1992年10月在马德里举行的和平会议的议程。美国人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奔走，试图调和几乎不可调和的立场，以确保会议的成功。

事实证明，与巴勒斯坦人相比，以色列政府对美国和平计划的阻碍要大得多。伊扎克·沙米尔总理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致力于保留所有占领的土地，特别是东耶路撒冷。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犹太人得到了移居以色列的自由，以色列政府决心保留对其控制的所有土地的选择权，以应对新的移民潮。以色列正在加紧建设定居点，将其领土诉求扩大到约旦河西岸，并为俄罗斯移民提供新的住处。

对巴勒斯坦谈判者来说，东耶路撒冷和定居点是红线问题：如果以色列人保留整个耶路撒冷，并允许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继续建造定居点，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巴勒斯坦人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萨利·努赛贝赫分析道："以色列人想把定居点和东耶路撒冷问题排除在外，这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在这两个问题中，我最担心东耶路撒冷问题。围绕耶路撒冷的战斗是关乎生存的战斗，这不是因为它是一座神奇的城市，而是因为它曾经是、现在也是我们文化、民族认同和记忆的中心——这一切，如果以色列人要想在他们所谓的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即西岸］任意妄为，就必须加以铲除。"努赛贝赫总结道："我确信，只要我们坚守耶路撒冷，我们就可以在任何其他地方抵抗住他们。"[36]

布什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立场表示同情，并显然对沙米尔和他的利库德政府在马德里会议之前的顽固立场感到愤怒。尽管如此，在许多方面，美国继续优先考虑以色列的要求，而非巴勒斯坦人的关切。以色列

人坚持将巴解组织完全排除在谈判进程之外，只允许巴勒斯坦人作为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的低级别合作方出席会议，东耶路撒冷的居民不得被委任参加谈判。这意味着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人，如费萨尔·侯赛尼、哈南·阿什拉维和萨利·努赛贝赫，被禁止在马德里谈判中扮演任何官方角色。作为应对，在阿拉法特的建议下，侯赛尼和阿什拉维以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成员的身份陪同阿卜杜·沙菲率领的巴勒斯坦官方代表团。

尽管有种种限制，陪同约旦人前往马德里的巴勒斯坦代表团是国际舞台上最擅言辞、最具说服力的巴勒斯坦民族愿望的代言人。哈南·阿什拉维被指定为巴勒斯坦代表团的官方发言人。阿什拉维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学习，又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了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其后回到约旦河西岸，在比尔宰特大学任教。阿什拉维是一位来自基督教家庭的杰出女性，有着出色的口才。在西方，许多人将巴勒斯坦事业同一种模式化的恐怖分子形象联系在一起，而她则完全不同。

在马德里，阿什拉维全力争取媒体的支持，让新闻报道的调子向有利于巴勒斯坦人的方向倾斜。从战略上考虑，她知道巴勒斯坦代表团通过赢得国际新闻界的支持来弥补在谈判桌上的弱势是多么重要。阿什拉维用她的足智多谋，在马德里向世人传递了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当被拒绝进入官方新闻中心时，她在公共场所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吸引了比参加马德里会议的任何一家代表团都多的记者，造成一片混乱。为了规避西班牙极度严格的安全措施，她占据了一个市政公园，在那里，摄像团队可以跳脱安全部队的限制而摆设机位。仅在一天之内，她就接受了国际各大电视网络的27次长篇采访。以色列代表团发言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努力追赶这位魅力非凡的巴勒斯坦妇女，后者正持续不断地抢以色列人的风头。

阿什拉维对马德里会议最持久的贡献，是她为海达尔·阿卜杜·沙菲起草的在1991年10月31日代表巴勒斯坦代表团发表的讲话稿。阿卜杜·沙菲举止庄重，嗓音丰富而深沉，他用尊严感满满的演讲，完美匹配了阿什拉维那文采飞扬的讲稿。他首先向与会的政要们问好，然后开始进入讲稿的核心部分，一边演说，一边用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着全球的观众。面对济济一堂的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和国际社会成员，他缓慢而

庄重地说道：“我们在马德里这座有着丰富历史脉络的城市开会，把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编织在一起。又一次，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面临挑战，去迎接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为民主、人权、自由、正义和安全等全球价值观所保护的新时代。我们从马德里开始追寻和平，把人类生命的神圣置于我们世界的中心，把我们的精力和资源从追求相互毁灭转向追求共同的繁荣、进步和幸福。”[37]阿卜杜·沙菲时刻注意着去代表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发言，无论处于流亡，还是居于被占领土。他说：“我们在这里共同寻求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其基石是巴勒斯坦的自由、巴勒斯坦人的正义和结束对所有巴勒斯坦与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共同享受和平的成果：繁荣、安全以及人的尊严和自由。”巴勒斯坦代表团开场表现十分精彩，这是他们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首次亮相。

阿卜杜·沙菲的讲话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伊斯兰主义的哈马斯运动，拒绝向两国方案妥协，它们从一开始就宣布反对参加会议。世俗的巴勒斯坦人则担心，他们的代表团可能会迫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做出与巴勒斯坦民族愿望不相符的让步。在巴勒斯坦大起义进行了4年后，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希望看到他们多年的斗争和牺牲能换来一些具体的成果。

由于巴勒斯坦人能从马德里和平会议得到的好处最多，他们的发言大多面向未来向前看。其他代表团口头上承认会议的历史意义，但实际上却借机申诉过往的冤屈。黎巴嫩代表团关注的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占领，以色列总理列举了阿拉伯人意图摧毁这个犹太国家的种种努力，叙利亚外交部部长罗列了“以色列的不人道行为”，以表明他对必须同以色列人会谈感到厌恶。

共处3天后，代表们开始剑拔弩张，闭幕发言时发生了公开争吵。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定下了辱骂的基调，他狠批叙利亚人，称自己可以“不停不歇地陈述各种事实来证明叙利亚在多大程度上理应被怀疑是世界上最暴虐、最专制的政权之一”。对于巴勒斯坦人，他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称阿卜杜·沙菲“付出了勇敢的努力去讲述他人民的苦难”，但他指

责巴勒斯坦人“歪曲历史，歪曲事实”。发言结束时，沙米尔和他的代表团一起冲出会议厅，表面上的理由是需要过犹太安息日。

阿卜杜·沙菲愤怒地回应，他对以色列代表团留下的空座说道：“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拥有合法民族权利的民族。我们不是‘领土上的居民’，不是历史的偶然产物，不是以色列扩张主义计划的障碍，不是抽象的人口问题。沙米尔先生，对这个事实，你也许想闭上眼睛，但我们就在这里，在全世界的面前，在你眼前，我们的存在是不会被否认的。”

当愤怒的叙利亚外交部部长法鲁克·沙雷（Farouk al-Shara‘a）拿出一张英国通缉伊扎克·沙米尔的告示时，会场上的相互辱骂达到了高潮。这张告示可以追溯到他加入斯特恩团伙在巴勒斯坦与英国斗争的日子。沙雷一边说，一边气势汹汹地挥舞着告示：“让我给你们看一张沙米尔的老照片，那时他32岁。”他注意到沙米尔矮小的身材，停下来讥笑着说：“165厘米。”沙雷越说越来劲，继续说道：“这张相片被四处分发是因为他被通缉了。他自己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据我所知，他承认他……在1948年参与谋杀了联合国调解人贝纳多特伯爵。他杀害了和平的调解人，却还在谈论叙利亚、黎巴嫩和恐怖主义。”[38]

沙雷冗长而激烈的批评让场面很难看，也预示着阿以和平的不祥前景。马德里会议在这不和谐的音符中结束。尽管会议正式结束了，但阿以和平谈判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入了新的阶段：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分歧，以及通过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多边谈判来解决水、环境、军备控制、难民和经济发展等全球关切的问题。马德里进程虽然最终并没有成功，但却开启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40多年冲突以来最大范围的和平谈判。

双边谈判的目的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归还被占领土换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阿以冲突。但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对这些决议的不同解释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谈判。阿拉伯国家抓住决议序言中提出的“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取领土”的原则，主张以色列完全撤出1967年6月战争期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将之作为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相反，以色列人声称，该决议只要求以色列军队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撤出——并非所有领土，只是“领土”，并坚称，以色列在与

埃及签订和平条约后，从西奈半岛撤出，这便已经履行了对第242号决议的承诺。以色列人提出，阿拉伯各方必须为了自己而谋求和平，并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以协商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解决领土问题。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双方同意就巴勒斯坦获得5年自治过渡期的条件进行谈判，过渡期结束后双方将进行最后谈判，以结束巴以冲突。但是，谈判开始后，沙米尔政府竭尽全力阻止巴勒斯坦人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并加紧建造定居点，以加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沙米尔在1992年选举失败后接受采访时证实，他的政府阻碍了谈判，旨在阻止巴勒斯坦人建国并保留约旦河西岸作为以色列定居点。“我可以进行10年的自治谈判，到时候，我们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人口将达到50万。”[39]

沙米尔政府在选举中落败，他对谈判的阻挠也走到了尽头。1992年以色列大选，左倾的工党领袖伊扎克·拉宾上台。在巴勒斯坦大起义中，拉宾授权对示威者实施身体暴力，这样的名声几乎没有理由使巴勒斯坦谈判代表相信“断骨者拉宾”能够成为“和平缔造者拉宾”。[40]

在拉宾上任的头几个月里，对于陷入僵局的双边谈判，他延续前任的做法，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1992年12月，哈马斯活动分子绑架并杀害了一名以色列边防警卫。作为报复，拉宾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下令逮捕416名嫌疑人并将他们驱逐到黎巴嫩。所有阿拉伯代表团都暂停了谈判以示抗议。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拉宾看起来比沙米尔更强硬。

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这引起了阿拉伯谈判团队的担忧。在总统竞选期间，克林顿曾明确表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因此，阿拉伯各国代表团不认为美国总统更迭对他们来说是个好兆头。虽然谈判于1993年4月恢复，但克林顿政府对谈判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在缺少美国强有力领导的情况下，马德里会议发起的框架走进了死胡同。

巴以谈判的突破来自以色列政策的改变。以色列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尤西·贝林（Yossi Beilin）确信，与巴勒斯坦人和解符合

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他们还认识到，只有与巴解组织的直接谈判才能达成和解。然而，自1986年以来，法律禁止以色列人会见巴解组织成员。到1992年，违反禁令的以色列记者和政客的人数越来越多，使得该项法律失去了意义。然而，以色列政府不能故意违反以色列的法律。拉宾对与巴解组织打交道并不抱太大热情，但他同意于1992年12月撤销禁止以色列公民与巴解组织接触的法律。

尤西·贝林给两名以色列学者耶伊尔·希尔施费尔德和罗恩·蓬达克在挪威奥斯陆与巴解组织财务主管艾哈迈德·库赖秘密会面开了绿灯。这是在挪威外交部的主持下紧张和富有成果的谈判的开始，一共进行了14次会谈。

作为调解方，挪威人不偏不倚，他们提供了中立和自由决断的土壤，把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干涉降到最小，以让双方解决分歧。挪威派出泰耶·勒厄德·拉森协助谈判，他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开始第一轮秘密外交谈判时，解释了挪威的角色。拉森强调："如果你们想和平共处，就必须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这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提供可能需要的帮助，如场地和事务性工作等。我们可以从旁协助……但仅限于此。我会在外面等待，不会干涉。只有当你们打起来了，我才会进来干涉。"拉森的幽默打破了两国代表团之间的僵局。巴解组织官员艾哈迈德·库赖回忆说："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他这话让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41]

以化名艾布·阿拉而更为人所知的库赖在同耶伊尔·希尔施费尔德教授初次见面之前，从未见过以色列人，他把多年来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相互敌对积累起来的所有恐惧与不信任摆在了谈判桌上。然而，在与世隔绝的挪威冬季，这5名男子——3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开始打破藩篱。"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更轻松了，尽管我们这边仍然对以色列人有些不信任，但我们还是开始对他们有些好感了。"在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确定了今后几轮会谈将要遵循的模式，不再围绕过去相互指责。艾布·阿拉回忆说："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和未来，试图衡量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共同点，找出在哪些方面我们可能达成一致，并评估我们在各种问题上有多大的分歧。"[42]

在短短8个月内，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闭门讨论了他们的分歧，并争取到他们政府的支持来建立一个解决这些分歧的框架。他们经历过谈判破裂，挪威人有时不得不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外交大臣约翰·约根·霍尔斯特（Johan Joergen Holst）甚至在突尼斯和特拉维夫之间进行了一些谨慎的电话外交，以帮助打破僵局。1993年8月，双方达成了一项他们愿意公开的协议。

当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宣布就巴勒斯坦在加沙和杰里科的临时自治达成协议时，全世界震惊了，当然他们也面临着可以预见的批评。看到在阿以和平进程中挪威人的成功和美国人的失败，克林顿政府颇为不悦。在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指责拉宾政府的背叛行为，并承诺在重新掌权后废除该协议。阿拉伯世界批评巴解组织打破阿拉伯阵营，与以色列达成秘密协议，而巴勒斯坦的异见团体则谴责其领导人承认以色列。

奥斯陆谈判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来说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但这位巴解组织主席已经别无选择。1993年，该组织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财政和制度崩溃。海湾石油国家断绝了对巴解组织的一切财政支持，以报复阿拉法特在海湾危机中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到1991年12月，巴解组织的预算减少了一半。数千名战斗人员和雇员被裁减或连续数月没有薪水；到1993年3月，多达三分之一的巴解组织人员根本没有收入。财政危机引发一系列腐败和管理不善的指控，使巴解组织内部产生分裂。[43] 作为一个流亡政府，巴解组织很难在这种压力下坚持很久。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有可能为巴解组织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并将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获得一个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可以向实现困难重重的两国方案迈进。

《奥斯陆协议》仅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立足点。该协议规定建立一个临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以杰里科为中心的地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些领土所得同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做出的重大让步相比，似乎微不足道。在《奥斯陆协议》宣布前夕，阿拉法特向哈南·阿什拉维透露了他的战略：“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和杰里科是巴勒斯坦同以色列脱离接触的第一步，我将对两地行使主权。我要下杰里科，是因为它会把我带到耶路撒冷，并进而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连接起来。”阿什拉维看上去并不信服。“相信我，我们很快

就会有自己的国家电话代码、邮票和电视台。这将是巴勒斯坦国的开始。”[44]

随着1993年9月13日《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在白宫草坪上签署，《加沙地带-杰里科先行自治协议》成为现实。在全球电视观众面前，伊扎克·拉宾克服了不情愿，与亚西尔·阿拉法特握手，达成了协议。艾布·阿拉回忆道：“所有的阿拉伯电视台都直播了这个仪式，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几乎不敢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45]

实际上，巴解组织和以色列达成的是一项巴勒斯坦分治计划。该协议要求以色列从杰里科和加沙地带撤出其军事行政机构，由巴勒斯坦民政管理机构取而代之，过渡期5年。协议还规定设立一个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以“按照民主原则”管理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控制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税收和旅游业。巴勒斯坦警察将为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

这项协议推迟了对最具争议的问题的讨论。耶路撒冷的未来、难民的权利、定居点的地位、边界和安全布局都将在进入过渡期3年后开始的最终地位谈判中讨论。对于最后的永久解决方案，巴勒斯坦人期望的比以色列人可能让步的更多：前者希望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全境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后者期待与非必要的阿拉伯领土脱离，在此之上形成一个去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实体。这些根本性分歧留待日后讨论。10月11日，《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在以色列议会以令人满意的多数获批，而在由80名成员组成的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则以压倒性多数（63票赞成、8票反对、9票弃权）获批。

到1994年5月，有关以色列部队撤出加沙和杰里科并在两地建立巴勒斯坦统治的技术细节已经解决。7月1日，亚西尔·阿拉法特胜利返回加沙，监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运作。9月，阿拉法特和拉宾返回华盛顿，签署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议》，称为《奥斯陆二号协议》。中东政治就此进入了“奥斯陆时代”。

《奥斯陆协议》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接受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

的程度。一旦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达成单方面协议，其他阿拉伯国家就可以自由地基于自己的利益同这个犹太国家往来，不会再冒背叛巴勒斯坦事业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阿拉伯世界已经厌倦了阿以冲突，转而以务实的态度看待以色列。约旦人首先对这个新的现实做出反应。

《奥斯陆协议》一经宣布，约旦人就立即行动。侯赛因国王认为，与以色列缔结和约是约旦摆脱自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来遭受的孤立的最佳途径。侯赛因国王相信，作为缔结和约的回报，约旦将获得美国的大量援助和国际投资。《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在白宫签署后第二天，以色列和约旦的代表在美国国务院办公室会晤，签署了双方在马德里双边谈判过程中制定的和平纲领。

1994年7月25日，侯赛因国王和拉宾总理应邀返回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初步和平协议，结束两国之间的交战状态，同意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解决所有领土争端，并承认哈希姆王室在穆斯林圣地耶路撒冷的特殊地位。同年10月26日，约旦和以色列在两国边境的阿拉巴沙漠签署最终和平条约。约旦成为继埃及之后第二个与这个犹太国家交换大使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和约旦达成的协议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与以色列建立关系铺平了道路。1994年10月，摩洛哥和以色列同意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1996年1月，突尼斯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两个国家都有较大规模的犹太少数社群，与以色列有着长期的联系。1999年11月，西北非的阿盟成员国毛里塔尼亚正式与以色列建交，并互派大使。两个阿拉伯海湾国家——阿曼苏丹国和卡塔尔分别于1996年1月和4月与以色列互建了贸易办事处。“奥斯陆时代”证明以色列得到了从北非到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的广泛接受，这让那些一直以来认为阿拉伯世界永远不可能与这个犹太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大跌眼镜。

然而，奥斯陆进程在某些地方继续遭到强烈反对，最激烈的反对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极端分子诉诸暴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1993年9月《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签署后立即发生的针对以色列人的多起致命袭击负责。以色列极端分子也加紧了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1994年

2月，巴鲁赫·戈德斯坦身穿以色列预备役部队制服进入希伯伦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向聚集在一起进行晨礼的礼拜者开火，造成29人死亡，150人受伤。随后，幸存者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了他。戈德斯坦是一名医生，居住在基尔亚特·阿尔巴。这是希伯伦附近的一个激进的定居点，在他死后，当地人在他的坟墓旁安置了一块匾额，纪念他的屠杀行为，上面写着："献给神圣的巴鲁赫·戈德斯坦，他为犹太人民、律法和以色列民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极端分子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希伯伦屠杀事件引发的愤怒导致巴勒斯坦人的袭击升级，旨在造成最大伤亡的自杀式爆炸也增多了。1994年4月，阿富拉和哈代拉公共汽车上发生的自杀式爆炸造成13人死亡。同年10月，特拉维夫也发生了一起针对公共汽车的自杀式袭击，造成22人死亡。作为回应，以色列暗杀伊斯兰主义团体的领导人。1995年10月，以色列特工在马耳他击毙了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法特希·沙卡基（Fathi Shiqaqi），并于1996年1月用植入饵雷的手机杀死了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阿亚什（Yahya 'Ayyash）。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陷入了暴力和报复的循环之中，这严重挫伤了（各方）对奥斯陆进程的信心。

一起谋杀预示了奥斯陆进程的结束。1995年11月4日，伊扎克·拉宾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举行的群众和平集会上发表讲话。这位以色列总理显然被15万张面孔构成的强大阵势所感动，对巴以和平的共同信念让这庞大的人群团结在一起。拉宾缓慢而庄重地说道："这次集会必须向以色列公众、全世界的犹太人、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地的民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以色列国希望和平，支持和平，为此我感谢你们。"[46]随后，拉宾带领人群唱了一首和平歌曲，便离开了。

一名参加集会的男子结束了和平进程。在拉宾被护送离开讲台回到他的汽车上时，一名叫伊格尔·埃米尔的以色列法律专业的学生突破保护总理的安全警戒线，开枪打死了他。在审判中，埃米尔公开承认刺杀，并解释说，他杀害拉宾是为了阻止和平进程。埃米尔深信犹太人对整个以色列土地的神圣权利，认为作为一名虔诚的犹太人，他有责任阻止任何以土地换取和平的交易。一个经受住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多次暴力行为的进程，在转瞬之间，就倒在了以色列人内部的一次暴力行

为之下。

拉宾是奥斯陆进程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直接继任者是老对手西蒙·佩雷斯。尽管佩雷斯是奥斯陆进程的设计者之一，但他并不享有公众对拉宾那样的信任。一个长期的土地换和平方案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信任，以色列选民给不了佩雷斯。

安全领域被认为是佩雷斯的薄弱环节，为了向批评者证明此言不实，他发动军事行动报复真主党;后者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营，并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导弹。1996年4月发动的“愤怒的葡萄”行动，证实了选民对佩雷斯在安全问题上的判断能力的疑虑。以色列的大规模入侵致使40万黎巴嫩平民流离失所。之后，以色列空军又轰炸了黎巴嫩南部村庄卡纳的一个联合国基地，造成102名在那里躲避袭击的难民死亡，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这一行动在美国的调解下不光彩地结束了，没有给以色列的安全带来任何明显的好处。佩雷斯在1996年5月的选举中受到了选民的惩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总理职位。

内塔尼亚胡的当选使以色列走上了与其在奥斯陆所做承诺相左的道路。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党一贯反对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尽管他确实迫于美国的压力，完成了对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的重新分割，但他那用小块土地换和平的做法使以色列完全控制了约旦河西岸71%以上的土地，并控制了其他被占领土中23%以上地块的安全事务。这与《奥斯陆二号协议》中巴勒斯坦人期望的90%的领土移交相去甚远。

内塔尼亚胡为耶路撒冷而战，他利用定居点运动制造了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他在艾布·古奈姆山建造并投入使用了6500个住房单元，建立起一个名为霍马山的新定居点，完成了以色列定居点对阿拉伯东耶路撒冷的包围。内塔尼亚胡用犹太人定居点包围耶路撒冷，是为了预先顶住压力，避免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交出1967年6月占领的耶路撒冷阿拉伯区。霍马山是不断升级的定居点政策的最新一项，这种政策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易导致巴勒斯坦人对奥斯陆进程的信心崩溃。

在执政3年后，内塔尼亚胡失去了本党的信任，在腐败丑闻的困扰下，他被迫要求在1999年5月举行新的选举。他被击败了，在另一位退役将军埃胡德·巴拉克的领导下，工党重新掌权。巴拉克的竞选承诺之一是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如果当选，将在一年内撤出所有以色列部队。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在以色列越来越不受欢迎，因为真主党的持续攻击给以色列部队造成了经常性的伤亡。

在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内塔尼亚胡后，巴拉克将从黎巴嫩撤军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然而，将权力从撤离的以色列部队平稳移交给他们在黎巴嫩南部军队中的本地代理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他们在黎巴嫩的合作者向真主党的部队投降了。以色列的单方面撤军变质为炮火下不体面的撤退，从而使真主党声称其长达18年的旨在将以色列人赶出黎巴嫩的运动取得了胜利。以色列高级军官怒不可遏，急切地等待下一次与这个什叶派民兵组织算账的机会。

一个反常的领土安排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出，除了存有争议的希巴农场，这是黎巴嫩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边界沿线22平方千米（8平方英里）的一片狭长地带。以色列至今声称它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而叙利亚和黎巴嫩则坚持认为它是黎巴嫩领土。真主党以希巴农场被占为借口，继续武装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

刚一撤出黎巴嫩，巴拉克总理就恢复了与巴解组织的谈判。鉴于以色列在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种种行动，双方之间几乎没有信任或善意。亚西尔·阿拉法特指责以色列未能履行《奥斯陆协议》规定的条约义务，并敦促巴拉克遵守临时协定中尚未履行的承诺。相比之下，巴拉克则希望直接着手讨论永久解决方案。这位以色列总理认为，与巴勒斯坦人无休止地争论临时安排的细节已经破坏了双方的谈判，他希望利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来确保达成一个永久解决方案。

比尔·克林顿邀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参加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胜地戴维营举行的首脑会议。2000年7月，三国领导人举行了为期两周的会晤，尽管提出了大胆的新想法，但在形成解决方案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第二次首脑会议于2001年1月在埃及旅游胜地塔巴举行。在

那里，以色列人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慷慨的条件；即便如此，塔巴提案仍然把构拟的巴勒斯坦国的大部分领土置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因而不能作为永久的解决方案。戴维营首脑会议和塔巴首脑会议的失败引发了尖锐的争吵与相互指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团队都错误地将失败归咎于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代表团。巴以间建立和平所必需的信任和善意已荡然无存。

奥斯陆框架是有缺陷的，但自1948年犹太国家成立以来，还没有哪个时刻能让阿以如此接近和平。奥斯陆会议的成果非常显著。以色列和巴解组织跨过了数十年的敌对状态，相互承认，并就两国方案进行了富有意义的谈判。巴勒斯坦领导人结束了突尼斯的流亡，开始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色列打破了在中东的孤立，首次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建立了正式关系，并破除了1948年以来阿盟对它的经济抵制。这些都是建立持久和平的重要基础。

不幸的是，这一进程同两个关联因素密不可分：双方之间建立互信和创造足够的经济繁荣，以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愿意做出永久解决所必需的艰难妥协。奥斯陆时期是以色列经济增长的阶段，而巴勒斯坦经济则经历了衰退和停滞。世界银行记录了奥斯陆进程那些年（巴勒斯坦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并估计到2000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每4个居民中就会有1人陷入贫困。此外，失业率高达22%。[47]1993—2000年间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巴勒斯坦人普遍对奥斯陆进程不再抱有幻想。

以色列扩建定居点的决定是破坏《奥斯陆协议》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定居点在国际法上是非法的，定居点的持续扩张违反了《奥斯陆二号协议》的规定。[48]然而，在奥斯陆进程的几年里，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张程度是1967年以来最大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者人数从1993年的24.7 万增加到2000年的37.5万，增幅52%。[49]定居点建在以色列希望保留的地区，这些地区或是靠近以色列的中心城市，或是临近重要的含水层，有利于控制约旦河西岸稀缺的水资源。巴勒斯坦人指责以色列人摈弃土地换和平原则，反而进行土地

掠夺，而和平进程的担保方美国却对此视而不见。

巴勒斯坦人对奥斯陆进程的期望，无非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全部领土上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巴勒斯坦人知道他们的立场得到了国际法的支持，并相信人口现实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立场，因为这些领土上的居民几乎全部是巴勒斯坦人。巴解组织已经逐渐承认在1948年占领了巴勒斯坦78%土地的以色列国，但它们坚守对其余22%土地的权利。建立一个可以延续的巴勒斯坦国的地域已如此之小，没有任何可以让步的空间了。

巴勒斯坦人相信，和平进程未能实现建国、财产安全或繁荣，这引发了公众的愤怒，而定居点的扩张更是火上浇油。2000年9月，愤怒的情绪达到顶点，演变成一系列暴力示威，并发展成为一场新的民众起义。同以非暴力抗争为特征的第一次大起义（1987—1993）相比，这第二次大起义确实非常暴力。

第二次大起义爆发的导火索，是2000年9月28日已升任右翼利库德集团领袖的阿里埃勒·沙龙对东耶路撒冷的访问。在戴维营首脑会议上，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提出了将东耶路撒冷交给巴勒斯坦人控制，并让耶路撒冷同时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首都的可能性。这一提议在以色列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促使巴拉克联盟的一些成员退出政府以示抗议。在这种情形下，一场新的选举势在必行。

对沙龙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制胜因素。他选择访问东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以强化其政党维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的主张，并发起他的竞选运动，把巴拉克从总理位置上赶下来。圣殿山，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尊贵禁地”，是公元70年被罗马人摧毁的犹太第二圣殿的所在地。7世纪以来，这里坐落着阿克萨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圣殿山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而言都极为重要，并因此成为一片充满政治色彩的土地。

2000年9月28日，沙龙在1500名武装警察的护送下抵达阿拉伯东耶路撒冷，并参观了“尊贵禁地”。这位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在对随行的新闻

记者发表的评论中称，他致力于维护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统治。沙龙的安保团队驱散了在场抗议的一批巴勒斯坦要人。电视摄像机拍摄到以色列警方粗暴对待阿克萨清真寺最高级别的穆斯林宗教学者。萨利·努赛贝赫回忆说："不巧，他那象征崇高宗教地位的缠头被打掉了，落进了尘土里。观众看到，这一意义非凡的穆斯林圣地的最高级别穆斯林宗教学者，光着头站在那里。"在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侮辱一位受人尊敬的穆斯林宗教学者，足以在第二天激发大批民众来到"尊贵禁地"，参加周五的聚礼。"数百名全副武装、神情紧张的［以色列］边境警察进入老城，几十万来自周边社区和村庄的穆斯林涌进城门。"

聚礼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但当愤怒的人群撤离清真寺时，一场暴力示威爆发了。青少年从禁地的建筑群向驻扎在下方西墙旁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以色列边境警察袭击了禁地的建筑群，士兵们向抗议者开火。几分钟内，8名闹事者被击毙，数十人受伤。萨利·努赛贝赫写道："'阿克萨大起义'开始了。"50

沙龙在安全问题上态度强硬，公共秩序的恶化对他有利，2001年2月，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以色列这位好战的新总理更感兴趣的是土地而不是和平，他的当选只会加剧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动荡。在新千年开始时，中东离和平越来越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

*

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些重要的转变。几十年来一直是阿拉伯政治支柱的3位领导人去世了，他们的儿子继任。在一群长期执政的统治者的领导下，中东一直停滞不前。继任将新一代人推向权力宝座，燃起了改革和变革的希望。然而，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共和制国家，都倾向于单一家族统治，这一状况阻碍了实质性的变革。

1999年2月7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与癌症长期斗争后去世。他在位近47年，是他这一代在位时间最长的阿拉伯统治者。侯赛因被国内外誉为和平缔造者，但他最后一刻更换继任者，引发了他家族和国家的动荡。侯赛因的弟弟哈桑自1965年以来一直担任王储。没有任何预警，侯赛因在去世前不到两周时解除了哈桑的职务，并任命长子阿卜杜拉为继承人。阿卜杜拉刚满37岁，相对年轻，且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军队

里度过的，几乎没有做好统治国家的准备。更糟糕的是侯赛因国王对这次换储的处理。这位垂死的君主在约旦媒体上发表了一封给哈桑亲王的冗长而愤怒的信，这封信简直就是对他弟弟的人格暗杀。许多与国王关系密切的人解释说，这封信是一项残忍但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哈桑永远不会对换储提出异议。约旦人在两周内接连经历了两次巨大冲击，一次是换储，另一次是执政多年的国王去世。许多人担心，他们这个由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接管的国家，未来岌岌可危。

5个月后，1999年7月23日，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去世，结束了他38年的统治。接替他的是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六世，他只有36岁，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一样，代表着阿拉伯国家新一代的领导人。他受过政治学和法律的训练，并在布鲁塞尔待过一段时间，熟悉欧盟的机构，他的父亲在他继任前的几年里一直在扩大他的职责范围。尽管如此，对于国内外大多数人来说，他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所有人都想知道，新国王将如何在继续执行父亲的政策和在王国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之间取得平衡。

世袭继承并不局限于阿拉伯君主制国家。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在执政近30年后去世。老阿萨德一直在训练他的儿子巴希勒（Basil）来接替他，直到巴希勒在1994年的一次车祸中不幸去世。悲痛的总统召回了他的小儿子巴沙尔（Bashar），中断后者在伦敦的眼科学业，为继任做准备。巴沙尔·阿萨德进入了叙利亚军事学院，在他父亲生命的最后6年里，他的官方职责不断扩大。巴沙尔在34岁时就职，承诺改革。尽管叙利亚许多人预计新总统将面临来自政治体制内部和他父亲在30年威权统治中树敌众多的严重挑战，但从大马士革强人到他新手儿子的权力更替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阿拉伯世界其他年迈的领导人也在培养他们的儿子接班。在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最初提拔他的儿子乌代（Uday）为法定继承人。乌代掌管着伊拉克的一家电视台和一家报社。因杀人不眨眼而臭名昭著的乌代·侯赛因在1996年的一次暗杀中身受重伤，一颗子弹留在了他的脊椎中。乌代康复无望，萨达姆·侯赛因开始提拔他的次子库赛（Qusay）继任。在利比亚，有传言称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正准备让他的儿子们继承政权。在埃及，侯斯尼·穆巴拉克正在提拔他的儿子贾马勒，并拒绝任

命副总统，这让许多人认为，到时候，贾马勒将继任总统。

然而，2000年最重要的继承发生在美国。当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儿子乔治·沃克·布什在选举团投票中获胜时，阿拉伯世界的专家们嘲笑起美国来。民众投票略微偏袒小布什的民主党对手阿尔·戈尔，且投票结果最后决定于小布什的弟弟担任州长的佛罗里达州的不良选票和颇具争议的重新计票。上述事实表明，美国人的世袭统治并不亚于阿拉伯人。

事实上，大多数阿拉伯观察家在2000年庆祝了乔治·沃克·布什的胜利。他们认为布什家族是得州的石油大亨，与阿拉伯世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阿尔·戈尔选择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乔·李伯曼（Joe　Lieberman）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后者成为美国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中的第一位犹太人，这让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认为，民主党将比共和党更亲以色列。他们选择信任布什。

新总统布什对中东不太感兴趣。他不是一个热衷外交事务的总统，他有别的优先事项。在就职前一周，布什与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会面。在简要的情报汇报中，特尼特向当选的总统介绍了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乌萨马·本·拉登和正在崛起为军事和经济强国的中国。[51]

尽管包括利比亚和叙利亚在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被认为拥有危险的武器项目，但国际社会最关心的是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1991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通过以来，伊拉克政府一直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持续压力，被要求交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该决议要求销毁所有生化武器和核武器，以及射程超过150千米（93英里）的所有弹道导弹。萨达姆·侯赛因怀疑美国人利用武器核查制度来颠覆他的政府，便去阻碍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的工作，后者于1998年从伊拉克撤出。

克林顿政府曾决心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府。他们坚持对伊拉克实行自其入侵科威特以来开始实行的严格的贸易制裁，但制裁并没有削弱侯赛因对政府的控制，反而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他们动用英国和美国的空中力量定期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空中巡逻，对伊拉克领空保持着严格的控制。1998年，克林顿政府推出《解放伊拉克法案》，承诺美国政府

投入资金，支持伊拉克政权更迭。1998年12月，在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离开伊拉克后，克林顿总统授权进行为期4天的轰炸行动，以“削弱”伊拉克生产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

小布什保留了克林顿遏制伊拉克的政策，以及据称对美国构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

同任何来自伊拉克的威胁相比，美国情报界更关心美国与乌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网络间不断加深的冲突。本·拉登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实现基地组织宣布的目标，即将美国赶出沙特和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1998年8月，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同时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22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几乎所有伤亡者都是当地公民（只有12名死者是美国公民）。本·拉登因组织这两起使馆爆炸而被列入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犯名单。2000年10月，停靠也门亚丁港的美国“科尔号”导弹驱逐舰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7名美国水手死亡，39人受伤。

基地组织攻击美国武装力量中的薄弱环节在白宫圈里引发了切实的忧虑。2001年1月，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警告布什说，本·拉登和他的网络对美国构成了“巨大”“迫近”的威胁。然而，与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不同，本·拉登的威胁是流动的、难以捉摸的。目前尚不清楚新总统可能授权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应对本·拉登的威胁。

布什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时，深信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且似乎并不特别关注本·拉登及其网络所构成的恐怖威胁。在他上任的头9个月里，布什的首要关注是中国。

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非同寻常的事件将改变布什的优先事项，并将开启美国现代史上与中东最大程度的接触，这也将是阿拉伯现代史上最为紧张的时刻。

第十五章　21世纪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感觉，公元第三个千年的最初十几年，已经像是一个世纪。在20世纪，重大的转折，一个人一辈子才经历一次：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奥斯曼时代的结束和欧洲帝国主义之下现代国家体系的引入；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既开启了阿以冲突，也开启了中东的冷战；1991年的海湾战争宣告冷战的终结和一个崭新的美国霸权时代的开始。

而这个新千年已然见证了中东两个重大转变时刻：2001年的“9·11”袭击引发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这两个转折点的到来将决定21世纪中东的面貌。我们依然生活在两者的后续发展之中。在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的压力之下，说2001年9月11日以来的岁月是阿拉伯现代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毫不夸张。

2001年9月11日，周四的早晨，恐怖主义团伙劫持了4架从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和新泽西的纽瓦克出发的喷气式客机。在40分钟内，他们驾驶两架飞机撞向曼哈顿的世贸中心双塔，第三架撞向五角大楼，这是精密计划的自杀式袭击。第四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田野里坠毁，它的目标被认为是美国国会大厦或白宫。除了19名劫机者，共有约2974人在这4次袭击中丧生：死于世贸中心的2603人，死于五角大楼的125人，以及4架飞机上的24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恐怖分子没有事先警告，也没有提出要求。他们的目标是对美国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以催生改变。尽管没有任何组织对袭击负责，但美国情报机构从一开始就怀疑乌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9·11”过后几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就确定了这19名劫机者的身份。他们都是阿拉伯穆斯林男子——15人来自沙特，两人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人来自埃及，一人来自黎巴嫩，他们都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我们只能从基地组织后来发布的声明推断自杀式劫机者心中想要推动的改变是什么：将美国赶出伊斯兰世界；动摇那里的亲西方政权，并以一个伊斯兰国取而代之。

对于这一次继日本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以来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的袭击，美国的回应是向一个基本上不知身份的敌人宣战。2001年9月20日，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发动“反恐战争”，从打击基地组织开始，“直到每一个全球性的恐怖组织都被发现、遏制和击败”。他让美国人为一场长期的、非传统的冲突做好准备，并向他们承诺，美国最终会胜利。

“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将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引向冲突之路。阿拉伯世界有很多人（当然不是全部，但依然有很多人）乐于见到美国遭难。对阿拉伯观察家而言，美国看上去对阿拉伯人的遭遇——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伊拉克人所经历的十年严酷经济制裁麻木不仁。乌萨马·本·拉登在他的公开声明中利用了这股阿拉伯人的愤怒。2001年10月，他声称：“美国人今天所尝到的滋味，同我们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我们的民族已饱尝这样的羞辱和蔑视达80多年。”[1]

本·拉登从他阿富汗山中的秘密堡垒发出的声明，极大地激化了阿拉伯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对这名基地组织领导人的崇敬之情遍布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美国本土发动这样的致命袭击，基地组织让民众印象深刻。一夜之间，本·拉登成为一个狂热崇拜的符号，他的脸部肖像成为伊斯兰反抗美国霸权的标志。对于本·拉登的观点，美国人认为不可理喻，将他斥之为彻头彻尾的祸害。

“9·11”袭击之后，美国人民惊恐、困惑、极度愤怒，他们感到在国内受到威胁，在国外也不安全。他们要求政府迅速而决定性地回击他们的敌人。布什政府的回应是：采取秘密行动打击“圣战”恐怖网络，并将美国带入两场自己选择发动的战争。这印证了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看法，即反恐战争就是反伊斯兰战争。

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始于2001年10月7日，后盾是一支联合国授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的联军。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庇护本·拉登及其组织的那个严苛的伊斯兰主义塔利班政权，逮捕基地组织领导人，摧毁其在阿富汗的训练设施。战事进行得很迅速，也基本上取得了成功。2001年11月中旬，阿富汗北方联盟及其美国盟友将塔利班赶出首都喀布尔。12月中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最后的堡垒陷落。整个过程中，美国

只使用了最小数量的地面部队。

阿富汗战争的作战过程是成功的，但被一些重大的失败搞砸了，反恐战争也由此升级。最为致命的是，乌萨马·本·拉登和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逃脱了追捕。两人逃离阿富汗，在邻国巴基斯坦重组武装，重启对美国的打击。对本·拉登的支持者来说，在美国人的打击下幸存就是足够大的胜利。

其他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俘获的基地组织成员被指认为“敌方战斗人员”，被剥夺了《日内瓦公约》和美国法律系统下战俘所享有的权利。他们被关押在美国位于古巴的一个叫作关塔那摩监狱的海外军事设施中。从2001年10月开始，有近800名囚犯被送往关塔那摩，他们全都是穆斯林。这些年来大部分被关押者被释放并免遭起诉——到2017年1月，被关押者人数下降到42人。这些人被释放后回到家中，讲述他们的经历。从羞辱到折磨，关塔那摩的虐囚行为激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阿拉伯世界的愤怒。

在阿富汗，美国人同地方首领合作，为这个饱经战事摧残的国家建立新的政治结构；自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超过20年的战乱。然而，美国人需要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上进行大量投入，以保证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新政府的稳定。但布什政府并没有这么做，到2002年，它已将精力和资源转向策划伊拉克战争，脆弱的阿富汗国无力抵挡塔利班的卷土重来。结果最初始于2001年10月的只有一小股外国地面部队参与的战争扩大为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在2011年的巅峰期，超过12万人的西方部队在打击塔利班。美国人和他的盟友们直到2014年12月才宣布结束作战，那时已有超过10万平民在战斗中丧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同基地组织的罪行毫无干系的阿富汗人民为“9·11”袭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不断扩大军事势力，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感到不安。它们对美国反恐战争不冷不热的支持让美国对一些长期的地区盟友心生疑虑，特别是沙特。本·拉登和参与“9·11”袭击的15名自杀劫机者都是沙特公民，且沙特的私人资金曾资助基地组织，这两个事实恶化了

沙美关系。其他国家也被重新审视。华盛顿认为埃及对恐怖主义心慈手软，给伊朗和伊拉克贴上了“邪恶轴心”的标签，并将叙利亚挪至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榜单的首位。

“9·11”之后，阿拉伯各国发现自己深陷不可化解的重压之中。如果他们反对美国的反恐战争，那将招致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制裁：从经济孤立到直接鼓动政权更迭。如果他们站在美国这边，他们的领土将会面临效仿本·拉登的本地“圣战”组织的攻击。2003年5—11月间，本地的伊斯兰主义者在沙特、摩洛哥和土耳其的城市中发动多起炸弹袭击，致125人死亡，近1000人受伤。2005年11月，协同炸弹袭击摧毁了约旦安曼的3座宾馆，5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大部分伤亡者是约旦人。阿拉伯世界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时举步维艰。

同样的压力，让美国与阿拉伯人疏远，却让以色列与美国走得更近。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说服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美、以两国正在面对一场共同的反恐战争。2000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其暴力程度到“9·11”袭击时已不断升级。伊斯兰主义组织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以色列平民，让布什总统相信美国和这个犹太国家正在打击共同的敌人。于是美国放任以色列采取行动，既打击它的伊斯兰主义敌手——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的真主党，也打击得到国际承认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色列充分利用美国的默许，对巴勒斯坦政府和社会发动了远超既定规模的袭击，大幅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紧张局势。

2002年6月，以色列总理沙龙下令重新占领约旦河西岸。他的理由是确保以色列的安全、避免恐怖袭击，但他显然想要孤立亚西尔·阿拉法特，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当以色列部队占领了《奥斯陆协议》以来自治的巴勒斯坦城市——伯利恒、杰宁、拉马拉、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和盖勒吉利耶，他们的攻击早已不再限于打击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2000年9月至2005年2月）共有约3200名巴勒斯坦人和950名以色列人悲惨地死去。[2]

在以色列军队竭力镇压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际，沙龙政府采取了旨在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更多土地的方式，从而加剧了同巴勒斯坦人

之间的冲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扩建定居点。2002年6月，以色列政府开始建设一座长720千米（约450英里）的高墙，显然是为了将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袭击隔绝开来。这座分隔屏障（巴勒斯坦人称之为隔离墙）深深切入约旦河西岸，实际吞并了约旦河西岸近9%的巴勒斯坦领土，对近5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生计产生了负面影响。[3]

以色列对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镇压明显拖累了美国的反恐战争。巴勒斯坦人受难的场面，经阿拉伯卫星电视实时播出后，在中东各处激起广泛愤慨。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和美国的不作为给基地组织与其他恐怖组织招兵买马创造了难得的条件。布什政府认识到，若要平息地区争端，必须促进巴以和平。

乔治·沃克·布什成为第一个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的美国总统。2002年6月24日，布什在一次重要的白宫演讲中展望了一个同以色列“和平相处、相安无事”的巴勒斯坦国的图景。然而，布什的图景要求巴勒斯坦人选举“不沾染恐怖主义的新领导人”，这是对民主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故意打击。

为了实现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的目标，布什政府与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合作。这个新的集团称作中东问题四方，就解决巴以冲突寻求国际共识。特别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认为，中东问题四方有利于平衡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因为它包含历史上更同情巴勒斯坦人愿望的国家和组织，特别是俄罗斯和联合国。

2003年4月，中东问题四方发布“中东和平路线图”，给布什的两国方案提供了方向。路线图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三阶段方案：首先呼吁巴以结束暴力冲突；然后在临时疆域内建立一个临时的巴勒斯坦国；最后，在第三阶段，巴以双方将解决边界、耶路撒冷的未来、难民地位、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定居点的未来等复杂的问题。到2005年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将相互承认，并宣告彼此间冲突结束。

对于美国的用意和路线图能否实现巴以之间公正和持久的和平，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表示怀疑。这是因为在布什的演讲和路线图发布之间的几个月内，美国于2003年3月入侵了伊拉克。

美国是基于全球反恐战争提出反对伊拉克的。布什政府称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集聚了一大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生化战剂和核武器的前身。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回应布什的担忧，将英国对伊拉克的立场同美国保持一致。白宫同时指出，侯赛因的政府同乌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存在联系，因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可能转移到该恐怖组织。布什政府提出对伊拉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防止最危险的武器落入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手中。[4]

对于布什政府的指控，阿拉伯世界并不信服。但阿拉伯各国政府错误地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可能确实拥有一个生化战剂库。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他确实使用了化学武器对付伊朗人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甚至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员汉斯·布利克斯博士也相信伊拉克确实拥有这样的武器。然而，阿拉伯各国知道伊拉克并没有参与“9·11”袭击，也高度怀疑伊斯兰主义的基地组织运动与世俗主义的伊拉克复兴党之间存在关联。萨达姆·侯赛因所领导的那类政府恰恰是乌萨马·本·拉登想要推翻的。阿拉伯世界确实不接受布什政府所说的，也怀疑美国的隐秘动机是贪图伊拉克的石油和试图控制石油资源丰富的波斯湾。

对伊拉克的入侵始于2003年3月20日，入侵遭到了国际社会和阿拉伯世界的广泛谴责。美国和紧随其后的英国在没有遭到挑衅，也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入侵了一个阿拉伯国家。面对强大的西方军队，萨达姆·侯赛因依然保持藐视的姿态。同1991年的海湾战争一样，这一姿态赢得了阿拉伯公众的广泛支持。所有22个阿盟成员国，除科威特外，都支持谴责入侵的决议，认为入侵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要求美英联军于3月23日完全撤出伊拉克领土。但是没人真的指望布什政府会理睬联合国的关切，更不用说是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了。

尽管伊拉克人发起了顽强的反抗，但未经抵抗便控制了伊拉克领空的美英联军完全压制了他们。4月9日，美国人控制了巴格达，标志着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在战争开始的三周内倒台。伊拉克人民感情复杂，他们一边庆祝推翻了遭人痛恨的独裁者，一边又怨恨美英侵略他们的国家。

推翻侯赛因的政府，让美国得以控制伊拉克。布什政府建立了一个

叫作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CPA）的统治机构。临时管理当局在2003年5月做出的两个初期决定，将战后伊拉克的混乱局面转变为反抗美国统治的武装起义。第一个决定宣布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复兴党非法，禁止前复兴党成员担任公职。第二个决定解散了50万之众的伊拉克军队和情报机构。这两项举措合在一起，被称为“去复兴党化”。

美国政府推行“去复兴党化”，以清除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拉克的有害影响，这受到了二战之后盟军驻德国占领当局的“去纳粹化”政策的启发。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自由地建立一个尊重人权的新的、民主的伊拉克国家。事实上，临时管理当局让大批全副武装的人失业，也剥夺了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政治精英同美国的新的、民主的伊拉克合作的意愿，这个国家越来越被占据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把控。反对美军占领的反叛和伊拉克社群之间的教派冲突随即到来。

伊拉克很快成为反美和反西方活动分子的征募地。新的组织出现了，比如伊拉克基地组织。这是一个同本·拉登的组织只保持名义联系的“圣战”团体，部署针对外国和本土目标的自杀式炸弹袭击。2003年8月19日，伊拉克基地组织发动针对性的炸弹袭击，致联合国驻伊拉克高级特使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和20多名下属身亡，迫使联合国关闭了驻巴格达办公室。西方人被扣为人质，并有多人惨遭杀害。军事巡逻队成为攻击的目标，攻击的方式日益复杂。一场英美鲜有人伤亡的战争变成了盟军伤亡惨重的占领。到2011年美军最终撤出为止，反叛者已经杀害了近4500名美国人和170多名英国人，并致3.2万余名外国士兵受伤。[5]

传播民主是美国反恐战争中常见的主题。布什总统和他的新保守主义顾问们认为，民主价值观和参与型政治与恐怖主义不相容。这类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2002年5月，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外交政策论坛上发表讲话时称：“要赢得反恐战争……我们必须与伊斯兰世界数亿温和与宽容的人们对话……他们渴望享受自由、民主和自由从业的福祉。”[6]2002年12月，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发起了他自己提出、后来早夭的中东伙伴关系

计划，旨在将“民主和自由市场”带给中东。[7]布什政府认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灯塔，并将掀起一股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2005年1月，当伊拉克公民投票选举国民议会以起草新宪法时，伊拉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占伊拉克总人口50%—60%的什叶派是新民主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他们中参与投票的人数众多，据报道，什叶派地区的投票率高达80%。库尔德人是一个非阿拉伯民族，在全伊拉克境内是少数群体，但在自己的省份他们占据绝对多数。他们是伊拉克新民主制度更热情的支持者，投票率高达90%。逊尼派阿拉伯人是“去复兴党化”的首要对象，他们基本上抵制了选举。逊尼派在摩苏尔的投票率低至10%。[8]

2005年12月，根据新宪法举行的选举验证了伊拉克的新政治现实。领头的什叶派集团伊拉克团结联盟获得了国民议会275个席位中的128个。库尔德联盟成为第二大集团，获得了53个席位。由逊尼派政客组成的联盟伊拉克和谐阵线以44席名列第三。库尔德领导人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被任命为伊拉克总统，什叶派政治家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被任命为总理。逊尼派阿拉伯精英们在统治了伊拉克政坛几个世纪之后失去了权力，鉴于他们的相对人口比重，他们再也不能通过票箱重掌权力。在无法通过民主手段取胜的地区，逊尼派武装分子诉诸暴力。反叛团体将目标从占领军转向他们的什叶派同胞，伊拉克陷入毁灭性的教派冲突之中。

伊拉克安全部队和美军无力遏制派别暴力。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每日在伊拉克城市的市场和清真寺发动屠杀。卫星电视将死亡与破坏的现场图像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尽管入侵以来伊拉克平民的伤亡数字存在广泛争议，但伊拉克政府估计，2003—2011年间，有10万至15万平民丧生。同阿富汗一样，在伊拉克，平民承担了反恐战争的真正代价。入侵及其后续的暴力摧毁了他们的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9]

萨达姆倒台后，什叶派崛起掌握了伊拉克的权力，这也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地区力量平衡。2003年之前，伊拉克一直是最强大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之一，也是遏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威胁的缓冲。2005年后，什

叶派领导的伊拉克被视为伊朗的盟友。以沙特和约旦为首的逊尼派邻国忧心忡忡地谈论从伊朗穿过伊拉克到叙利亚（1980年以来就是伊朗的盟友）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在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阿迈勒和真主党在国家政局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这一局势的发展将进一步破坏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稳定。

同伊拉克一样，布什政府提出的促进民主的倡议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没能取得多少成功。民众对其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不满，使得主张抵制美国的伊斯兰政党，比寻求与西方和解的温和派更具吸引力。2005年在黎巴嫩和2006年在巴勒斯坦领土举行的选举，呈现了一个有关阿拉伯世界民主的令人不安的事实：在任何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中，最有可能获胜的是那些最敌视美国的政党。

2004年11月11日，亚西尔·阿拉法特，这位巴勒斯坦民族斗争的历史性的领袖，这位被围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因并发症在巴黎一家医院逝世。布什政府坚称，尽管巴勒斯坦人哀悼阿拉法特，但他的离世为他们选举“不沾染恐怖主义”的新领导人提供了机会。2005年1月9日，巴勒斯坦人选举新总统。法塔赫领导人马哈穆德·阿巴斯以63%的绝对多数获胜，接替阿拉法特。布什政府称赞这一结果，宣布阿巴斯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则拒绝与他打交道。

2005年，沙龙宣布打算从加沙地带撤出所有的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以色列在加沙的位置非常不稳固，为保障身处140万敌对的巴勒斯坦人中8000名定居者的安全，以色列派出了数千名士兵。从加沙撤军，受到以色列军队和选民的欢迎。这也使沙龙有更大的自由去忽视路线图，并声称推进他自己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计划。但沙龙拒绝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谈判，以确保加沙顺利交接。结果当以色列人于2005年8月完成撤军时，他们造成了加沙地带危险的权力真空，给哈马斯带来了一场重要的胜利。这个伊斯兰政党自然将以色列撤军归功于自身，是他们多年的抵抗将以色列赶出了加沙。

哈马斯的实际所得之大，直到2006年1月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才体现出来。参选的两个主要政党是阿拉法特的法塔赫，由马哈穆德·阿巴斯领导，以及哈马斯，由伊斯玛仪·哈尼亚（Ismail Haniya）领导。西

方的媒体和政策制定者都预计哈马斯将获得强有力支持，而法塔赫在立法委员会中的多数席位将有所减少。然而，哈马斯成功之巨震惊了巴勒斯坦人和外国观察者。哈马斯赢得了绝对多数，获得了立法委员会132个席位中的74个，法塔赫仅保住了45个席位。巴勒斯坦领土被分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其统治机构也分裂为法塔赫控制的行政机构和哈马斯控制的议会。让局势更为复杂的是，一个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而予以正式抵制的政党，赢得了一场国际观察者眼中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组建了巴勒斯坦的下一届政府。对于美国的反恐战争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逆转。巴勒斯坦人民将为此付出代价。

哈尼亚总理领导的哈马斯新政府公开拒绝中东问题四方的政策。哈尼亚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接受武装抵抗，拒绝接受路线图的条款。因此，四方切断了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切援助。在哈马斯证明愿意以西方的方式“放弃恐怖”之前，欧盟和美国都不会支持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即使这一机构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在黎巴嫩，伊斯兰真主党因其反抗以色列和美国的政策而吸引了选民。真主党的强势让布什政府惊讶，布什政府坚持认为黎巴嫩公民在叙利亚的压迫下成功地维护了他们的民主权利，是一个典范。

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k Hariri）遇刺，引发了黎巴嫩的民主运动。哈里里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人，就在4个月前，他辞职抗议叙利亚干涉黎巴嫩政治。对他的谋杀，其暴力程度甚至震惊了饱经战火的黎巴嫩人。哈里里的车队按照每日例行的路线从议会回家，在经过海滨酒店区时，刺客引爆了1吨重的汽车炸弹。有21人与哈里里同归于尽，包括政客、保镖、司机和无辜的路人。

哈里里的儿子萨阿德（Saad）领导全国哀悼，并明确表示叙利亚是他父亲遭受暴力死亡的罪魁祸首。暗杀事件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示威，使黎巴嫩政治陷入停滞。3月14日，100万黎巴嫩人涌向贝鲁特市中心，要求叙利亚完全撤出黎巴嫩。这是第一起将同6年后的“阿拉伯之春”联系在一起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这场运动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后者指责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叙利亚政府同

意将其士兵和情报部门撤出黎巴嫩，此前叙利亚已占领黎巴嫩近30年。最后一批叙利亚军队于4月26日从黎巴嫩撤出。

2005年5月和6月，黎巴嫩公众投票选举新议会。布什政府称赞这次选举证明了美国促进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政策是正确的。以萨阿德·哈里里为首的反叙利亚联盟赢得了议会128个席位中的72个。然而，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的政治派别赢得了14个议会席位，形成了一个稳固集团，并与一群亲叙利亚政党一起，成为黎巴嫩政治中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即使在黎巴嫩，明显敌视美国的政党在投票中也表现良好。

抵抗以色列给伊斯兰主义政党带来了政治利益。事实上，只要他们坚持大胆打击犹太国家，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就可以指望得到广泛的政治支持。他们还认为，反抗以色列、解放穆斯林土地是一项宗教义务。2006年夏天，双方对以色列的袭击都升级了，给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2006年6月25日，一群哈马斯活动分子通过埃及边境附近的一条隧道，从加沙地带进入以色列，袭击了以色列军队的一个哨所。他们打死了2名士兵，打伤4人，俘虏了一名叫吉拉德·沙利特的年轻士兵，并带着他逃回加沙。6月28日，以色列士兵进入加沙，并于第二天逮捕了64名哈马斯官员，其中包括8名巴勒斯坦内阁成员和20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哈马斯的回应是向以色列发射自制火箭，以色列人则部署空军轰炸巴勒斯坦目标。11名以色列人和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2006年11月的停火前死亡。

真主党同以色列的交战引发了后者针对黎巴嫩的极其过度的回应。2006年7月12日，一群真主党战士越境进入以色列，袭击了2辆在黎以边界巡逻的吉普车。他们打死了3名士兵，打伤了2人，并俘虏了2人。这次无端的袭击引发了为期34天的冲突，其间以色列地面部队入侵了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关键的基础设施，并夷平了贝鲁特南郊整个什叶派街区，导致约100万平民流离失所。真主党战士在黎巴嫩南部山区与以色列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持续不断地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迫使数千名以色列人撤离冲突地区。

黎巴嫩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毕竟，布什政府把民主的黎巴嫩吹捧为中东的榜样，并在2005年黎巴嫩要求叙利亚撤军一事上给予了全力支持。然而，在2006年，美国不愿对以色列进行干预，甚至不愿呼吁停火。由于以色列正在打击的是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布什政府拒绝对该盟友加以限制。事实上，当对黎巴嫩的轰炸行动耗尽了以色列的军火库时，美国政府向以色列人提供了激光制导武器和集束炸弹。到8月14日34天的冲突结束时，已有1100多名黎巴嫩人和43名以色列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在战斗人员中，联合国估计有500名真主党民兵被打死，以色列军队报告有117名士兵死亡。

2006年夏季的冲突表明，美国对阿拉伯民主的支持是有限的，对以色列的支持是无限的。实际上，布什政府只会承认亲西方政党掌权的选举结果。美国会支持以色列对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各方采取的任何行动，无论这种行动多么过度。美国与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和真主党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后两者在国内的地位。伊斯兰抵抗运动非但没有因为挑起与以色列的毁灭性战争而受到谴责，反而因为反对布什、以色列和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在国内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中赢得了更大的支持。

2008年11月，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进入了一个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新时代。在上任的头100天里，这位新总统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旨在缓和7年反恐战争所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他开始裁减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并放出信号表示，巴以和平进程是第一要务。他恢复接触叙利亚和伊朗等布什政府回避的国家。

对这一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新政策的最为清晰的表述，出现在2009年6月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美国和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新开端，”奥巴马对专心听他演讲的听众们说，“必须不断努力地相互倾听、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寻求共同点。”尽管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保留自己的判断，等着看奥巴马是否言行一致，但他所传递的信息，对于这个因多年来处于反恐战争核心区而不堪重负的地区而言，是令人欣喜的宽慰。

尽管奥巴马在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在8年任期内一直与伊斯兰世界保持战争状态。在减少驻伊美军人数的同时（2011年12月，美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巴格达），他将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增加到10万人，直到2014年才宣布结束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使阿富汗战争（2001—2014）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最具争议的是，奥巴马加大了在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使用无人机发动致命袭击的力度。布什总统授权了大约50次无人机袭击，造成296名战斗人员和195名平民死亡，而奥巴马则批准了500多次无人机袭击，夺去了3040名战斗人员和数百名平民的生命。[10]奥巴马的白宫授权的最重要的定点清除行动发生在2011年5月2日，美国突击队员在乌萨马·本·拉登位于巴基斯坦阿博塔巴德的秘密营地枪杀了他，并将他海葬。“9·11”袭击后，布什总统援引了蛮荒西部（Wild West）的正义，称要缉拿本·拉登，无论他“是死是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奥巴马成功做到了这位反恐战争设计师的未竟之事。

同这名基地组织头目在与西方的冲突中所获得的突出地位相比，阿拉伯世界对本·拉登被杀缄默无声。2011年，整个地区发生的事件盖过了这场冲突，也盖过了西方的光芒。因为，随着突尼斯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和埃及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的倒台，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危险的变革时刻，这一时刻在西方被称为“阿拉伯之春”。

2011年1月的突尼斯“革命”和2月的埃及“革命”促成了“阿拉伯之春”。它们提供了一种民众反抗的语言和策略，阿拉伯世界各处纷纷效仿。最先在突尼斯出现的口号在埃及被重复使用，接着又被用于利比亚、巴林、也门和叙利亚：对那些已经失去其统治效力的强人们用命令式的口吻喊道“滚！”，以及那响彻各处的“人民想要推翻政权！”。战略上，通过社交网站进行大规模动员，让组织者绕开安全部队，让示威者占据市中心的公共空间，比如突尼斯布尔吉巴大道和开罗的解放广场，并昼夜不停地举行抗议活动，直到统治者倒台。示威的规模使阿拉伯公民有信心坚持挑战专制的统治者。阿拉伯世界各国首都的抗议者坚称，他们不再害怕他们的政府。当时的假设是，每一个发动“阿拉伯之春”起义的国家都可以重复突尼斯和埃及抗议者所取得的成功。

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同质的，普适于同一个“革命”范式，这个观点被证明是“阿拉伯之春”的谬误。很快人们就发现，穆阿迈尔·卡扎菲统治下几乎完全没有国家机构的利比亚，同受逊尼派和什叶派间教派冲突困扰的巴林完全不同，巴林又同拥有悠久地方主义历史的也门不同，而也门又同阿拉维派少数族裔统治下的叙利亚毫无相似之处。2011年经历了“革命”的6个国家，在国内的限制因素和地区大国干预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极为不同的结果：反“革命”、内战、地区冲突和跨境哈里发政权兴起。一开始的解放运动迅速恶化成困扰现代中东的最严重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

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周内，反“革命”的力量在巴林扭转了“阿拉伯之春”的走向。

巴林的年轻人关注着突尼斯和埃及的事态发展，愈来愈兴奋。他们在“巴林在线”（Bahrain Online）上进行互动，这是一个社交媒体网站，为安全、匿名地交换政治观点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聚会场所。到2011年，“巴林在线”已经拥有数十万用户。2011年1月26日，也就是埃及人聚集在解放广场的第二天，一位发帖人在“巴林在线”上建议：“让我们选择一个特定的日子，开始巴林的民众‘革命’。”读者们一致认为，2月14日是不二之选，因为这一天关联着这个岛国一度被拉高却又破灭的期望。11

10年前，即2001年2月14日，巴林政府就《国家行动宪章》举行全民公投，以改革的承诺平息多年来的政治抗议。该宪章承诺恢复选举产生的议会，强化1973年的宪法，并基于君主立宪制赋予巴林更大程度的民主。大量巴林民众支持宪章，公投结果显示，支持率达98.4%，彰显了王国内什叶派和逊尼派社群的高度团结。

《国家行动宪章》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在一年后破灭了。2002年2月14日，统治者谢赫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Shaykh Hamad bin Isa Al Khalifa，1999年起在位）发布命令，批准了一部专制的新宪法，该宪法设立了通过任命产生的上议院和几乎没有权力的民选议院。新宪法把巴林国变成了君主制，国家的统治者成了国王。反对派谴责这一举动

是宪法政变，将执政的哈利法家族的意志强加于人民。

2002—2011年间，巴林局势紧张。虽然没有该岛国官方的教派人口数据，但普遍认为什叶派是绝对多数。在该国60万公民中，什叶派占60%甚至更高，余下的是逊尼派（巴林130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巴林的许多人认为新的宪法秩序给执政的逊尼派少数带来了超过他们人口占比的收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使得对新君主制政权的反对愈演愈烈。

到2011年1月，巴林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清单很长：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利用教派主义分裂巴林人；腐败，统治精英掠夺国家财富，征敛土地；残酷镇压异见、审查制度；使用外国安全部队打压公民（没有什叶派在安全部队服役）。一位网友在“巴林在线”的一篇帖子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愤怒和沮丧。”2月14日被宣布为民众反抗政权弊病的“愤怒日”，组织者自称“2·14青年运动”。

就在侯斯尼·穆巴拉克下台两天后，巴林抗议者在“愤怒日”走上街头。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和实弹驱散人群，造成一名示威者死亡，多人受伤。第二天为倒下的示威者举行的葬礼引发了新一轮的抗议，并导致另一人死亡。人群开始从城郊和村庄向首都麦纳麦行进，前往“巴林在线”网友们指定的地点，那里是巴林版“解放广场”的理想位置：珍珠广场。

珍珠广场上竖立着为纪念1982年巴林主办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而建造的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由6张弧形风帆组成，每张风帆代表一个海合会成员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每个桅杆上都悬挂着一颗巨大的珍珠，追溯前石油时代巴林的采珠经济。珍珠广场交通便利，位置居于中心且邻近麦纳麦附近的村庄，自然成为巴林抗议者的汇聚点。

2月15日，示威者涌入珍珠广场，高喊“和平！和平！”以劝阻警察不要向他们开枪。他们呼喊口号：“人民和土地都很愤怒，我们的要求就是有约束力的宪法。”[12]他们在珍珠广场扎营了两天，直到2月17日安全部队介入强行驱赶示威者，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进一步激起了抗议者的怒火，2月19日安全部队撤离后，抗议者

立即涌回珍珠广场。他们了解，突尼斯和埃及的运动是在分别死了几十人和几百人之后才成功的。他们相信，他们也能通过牺牲获得合法的政治权利。政府的镇压使得抗议者的要求更加强硬。人民不再满足于改革，转而要求国王退位，即推翻政权。

3个多星期内，珍珠广场一直是巴林人民起义的神经中枢。抗议者们搭起了帐篷、屏风、临时厨房、医疗中心和演讲台，还为满足国际媒体报道“阿拉伯之春”的不竭需求开设了一个媒体办公室。人群持续在珍珠广场集聚，男男女女、逊尼派和什叶派、资深反对派政客和“2·14青年运动”参与者。狂欢的气氛毫不掩饰对王权的挑战。根据“阿拉伯之春”的脚本，这种对中心广场的公开占领直到政权倒台时才会结束。

哈马德国王和他的政府在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由首相哈利法·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亲王（Prince Khalifa bin Salman Al Khalifa，他自1970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非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领导的强硬派想要镇压。王储萨勒曼·本·哈马德·阿勒·哈利法（Salman bin Hamad Al Khalifa）与7个公认的反对运动进行了秘密谈判，提出了有可能让抗议者满意并解决危机的宪政改革方案。[13]巴林的海湾邻国站在了首相一边。对沙特领导人来说，巴林的起义对他们自己的统治秩序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他们认为，保守的海湾君主国中，任何一个国家发生“革命”都会威胁到所有国家的政治稳定。他们认为，在这场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抗议运动中，伊朗施加了恶性影响。沙特人推断，如果伊朗在巴林取得成功，他们将势必鼓动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伯东部省的什叶派居民发起叛乱。沙特决心在巴林“革命”和伊朗在巴林的渗透这双重威胁生根蔓延之前遏制并消除它们。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牵头进行干预，以打压珍珠广场的“革命”。3月14日，海湾国家以驻扎在沙特的海合会“半岛之盾”联合部队的名义，调动2000人的部队和150辆装甲车穿过连接沙特和巴林的25千米（15英里）长的堤道。沙特及其盟友为干预辩护，称要维护巴林主权免受伊朗威胁，这个理由也反映了这些国家自己的忧虑。哈马德国王宣布巴林进入“国家安全状态”，授权巴林政府“清空或隔离某些区域以维持安全和公共秩序”，赋予其搜查权、逮捕权以及撤销（相关人士）公

民身份和驱逐威胁公共安全的外国人的权力。[14]

在海湾盟国的支持下，巴林安全部队开始清除珍珠广场的示威者营地。政府不仅推倒了珍珠广场的临时建筑，还拆除了纪念碑，风帆和混凝土塑成的珍珠被夷为瓦砾，用卡车运走。巴林外交大臣哈立德·本·艾哈迈德·阿勒·哈利法（Khalid bin Ahmad Al Khalifa）将此次行动形容为“消除糟糕的记忆”。[15]之后，政府镇压了所有与抗议运动有关联的人士，包括大规模逮捕、涉嫌使用酷刑、组建特别安全法庭进行审判和判处重刑。巴林政权充分利用了在进入“国家安全状态”后可采取的措施。

国际社会对镇压的批评迫使哈马德国王做出让步，授权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巴林的起义和对起义的镇压。在杰出的美籍埃及裔法学教授谢里夫·巴斯尤尼（Cherif Bassiouni）领导下，该委员会对这个海湾国家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法律审查，于2011年11月发布了长达500页的详细报告。该报告记录了数百起不公正的定罪和过度的判决、多起对被拘留者数周内不得与家人或律师见面这样的“强迫失踪”控诉、60起酷刑以及5名被拘留者死于酷刑。[16]国王承诺惩罚那些虐待行为的责任人，实施改革，并努力在经历2011年严重分裂事件后实现民族和解。但是最终，巴斯尤尼报告提出的建议没有得到落实，巴林政权诉诸镇压以规避改革。

巴林政府战胜了珍珠广场的抗议者，这标志着突尼斯和埃及模式的“阿拉伯之春”终结。靠聚集足够多的人已不再能确保政权垮台。这个海湾小国向世人展示，如果一国武装部队一直忠于统治者并愿意向示威者开火，政权就能够挺过“革命”。对“革命”的逆转于2011年3月在巴林开始，于2013年7月在埃及达到高潮。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是关于公民不再恐惧他们的政府，那么反“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来恢复恐惧。反“革命”将把随后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发生的所有起义变成流血冲突。

“阿拉伯之春”是在巴林起义爆发几天后来到利比亚的。1969年以来，自诩为“兄弟领袖”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他总是拒绝接受“总统”头衔），通过残酷的镇压而非利比亚人民的首肯，长期掌握着权力。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下，利比亚人民奋起反抗统治他们41年的独裁者，揭开了2011年阿拉伯觉醒运动的暴力新篇章。

2月15日，东部城市班加西爆发示威，安全人员用武力镇压示威者，打伤数十人。利比亚活动分子效仿埃及和巴林组织者的做法，呼吁在2月17日发动“愤怒日”行动。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各地，并波及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政府大楼和警察局。安全部队对示威者使用实弹，打死80多人。卡扎菲的儿子、预计的接班人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在2月20日的一次电视广播中威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他轻蔑地对着镜头摇着手指说：“不要为84人的死亡而哭泣，因为你将为数十万人的死亡而哭泣。血流成河将近。”他谈论利比亚，就好像这是他家族的私有财产：“这个国家属于我们。”[17]

局面迅速脱离了政府的控制。卡扎菲政权的反对者将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作为他们的大本营，并于2月27日在那里成立了执政机构——国家过渡委员会。利比亚东部地区的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成员反抗政府，加入了反叛。反叛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寻求推翻卡扎菲。然而，其余大部分武装部队依然忠于政权。一开始就是武装冲突的利比亚“革命”很快演变成内战。

在反叛初期，反叛分子占了上风。他们巩固了在班加西和利比亚东部沿海地区的地位，重新竖起1969年革命之前的红、黑、绿三色带有白色伊斯兰星与新月的国旗。数以千计的平民志愿者带着与他们的纪律和训练成反比的热情，加入了反叛的军队。他们驾驶配备重型机关枪的改装皮卡车，从班加西的基地出动，占领了重要的沿海城市，包括炼油港口城市布瑞加与拉斯拉努夫。到2月底，叛乱分子已经把控制范围扩大到班加西以东的整个海岸和的黎波里附近的主要城镇，如米苏拉塔。班加西四处都张贴着强硬的标语，用粗体红字书写的“拒绝外国干涉”周围围绕着鲜明的武器图案。“利比亚人民可以自己解决。”然而，事实证明，有关卡扎菲将重蹈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覆辙的预言是不成熟的。

这位利比亚独裁者对他的统治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表现出愤怒，但毫不畏惧。他在的黎波里实施了全面打击。政权在城中心的绿色广场组织了支持卡扎菲的集会，数千名利比亚人在那里高呼口号支持“兄弟领袖”、反抗叛军。卡扎菲仍然控制着他的军队中装备最精良、训练最有素的部队。2月22日，他发表了冗长而杂乱无章的演讲，把叛军斥为“老鼠和蟑螂”，并发誓要“一寸一寸、一屋一屋、一户一户、一巷一

巷”地追捕他们。这是卡扎菲扼杀“革命”的开始。

政府军在3月头几周的几个重大战斗中与反叛者交战并击败了他们。当卡扎菲的军队接近叛军在班加西的据点时，国际社会担心大屠杀迫在眉睫。反叛者2月的强硬立场不再，叛军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干预。3月12日，阿拉伯联盟做出一项非同寻常的决定，要求联合国授权在利比亚叛军控制的地区设立禁飞区，以支持反叛者对抗被承认的政府。根据阿盟的决定，联合国安理会于3月17日通过了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全境设立禁飞区，并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

联合国的决议使利比亚“革命”国际化。北约领导的干预部队几乎即刻袭击了利比亚境内的主要目标，法国、英国和美国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拉伯空军部队的支援下，北约战机发动致命空袭，卡扎菲的部队被迫从班加西撤退。行动的主动权已经从利比亚人转移到西方人手中，而任务也从设立禁飞区转向迫使卡扎菲下台。由国际社会来寻求推翻政权，这在“阿拉伯之春”诸起义中是头一次。

2011年春夏期间，尽管北约发动了数千次袭击，但卡扎菲仍控制着政权。反对运动的重大突破出现在8月20日，一次大规模进攻突破了卡扎菲在的黎波里的防线。8月23日，在反叛者庆祝胜利之时，利比亚独裁者和他的儿子们逃离了首都。国家过渡委员会获得国际承认，成为利比亚临时政府，并承诺迅速过渡到立宪政府。烟花四射，利比亚人民公开庆祝的黎波里的解放。

然而，这场战争在攻陷首都后仍在继续。卡扎菲的效忠者继续在这名下台领袖的家乡苏尔特和效忠者的根据地巴尼瓦利德，与国家过渡委员会的部队作战。经过长时间的围困，苏尔特于2011年10月20日落入国家过渡委员会部队之手，卡扎菲和他的儿子穆塔西姆（Mutassim）在那里被捕并被用私刑处死。卡扎菲之死的恐怖视频被上传到互联网，他的尸体在曾遭受政府军数月围困的米苏拉塔被公开示众，以向利比亚人证明，这名暴君真的死了。卡扎菲是这场已导致超过1.5万人丧生的冲突中最新一名死者。

政权的垮台并没有带来新的民主秩序，而是造成了权力真空。卡扎

菲给他的人民留下了一种特殊的、缺乏制度的统治模式，这种模式使他多年来可以在权力不受制约或制衡的情况下统治。当利比亚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公民结束流亡回来助力重建祖国时，他们见到的是危险的混乱，因为有枪的人比有思想的人更容易填补权力真空。

利比亚向民主的过渡如约开始。2012年7月7日，约280万利比亚公民踊跃投票，选举设有200个席位的国民议会，以取代国家过渡委员会。然而，从一开始，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派别分歧，加上利比亚本土政治中显著的部落和地区分裂，阻碍了议会的工作。的黎波里的民选政客对部落民兵统治的省份没有控制权。到2013年8月，敌对民兵组织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它们与政府角力，争夺城镇、港口和石油设施。

2014年，受迫于不可调和的政治力量，利比亚一分为二。在国民议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伊斯兰主义派别控制了首都的黎波里和整个利比亚西部。新选出的取代国民议会的国民代表大会和总理阿卜杜拉·萨尼（Abdullah al-Thinni）为首的利比亚政府被迫流亡到利比亚东部。利比亚国民军由一名前卡扎菲麾下的将军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领导，支持利比亚东部的国民代表大会，而强大的民兵组织则力挺利比亚西部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国民议会。

利比亚的战争给这个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据估计，2011—2015年间，有2.5万人死于这场冲突，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就百姓的苦难和政治的分裂而言，利比亚“革命”与也门2011年以来的经历最为相似。

卡扎菲死后一个月，2011年11月23日，执政33年的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成为第四位倒台的阿拉伯统治者。

也门的“革命”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陷入僵局。这个国家按照先前南北分立（1990年统一）的模式呈现出内部分化，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一较为活跃的基地组织分支的根据地，并深陷也门-沙特边境什叶派胡塞社群的武装叛乱。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总统于1978—1990年统治北

也门，并于1990年成为也门联合共和国总统。同阿拉伯专制统治的做法一样，他正在培养他的儿子艾哈迈德（Ahmed）来接替他。在阿拉伯世界中处于人类发展水平最低的情况下，也门人民对父子继承的前景深感忧虑，认为这会使萨利赫的蠹政永久化。因此，也门人民采纳了2011年阿拉伯“革命”的口号，希望推翻他们的政权。

2011年2月，萨那、亚丁和塔伊兹爆发数万人之众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分子在萨那大学附近搭建了一个帐篷城，效仿开罗解放广场，称之为“变革广场”。《纽约时报》记者罗伯特·沃思（Robert Worth）回忆，变革广场上的横幅上醒目地写着“反对腐败，反对暴政，人民要求推翻政权”，广场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也门风格。“它可能是受到开罗解放广场的启发，但它显然不同：更大、更脏、更狂野。它向不同方向延伸了好几个街区，在人行道上搭起了一大堆帆布帐篷，中间还有一个大舞台，供演讲用。”[18]

随着主要军事和部落领导人加入反对派行列，对总统的支持开始瓦解。然而，也门这场以和平抗议开始的运动变得越来越暴力。3月18日，军中忠于总统的部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50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许多支持总统的人辞去了职务，加入了反对派。也门军中整支整支的部队倒戈支持示威者。国际社会也呼吁也门总统下台，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变得更加孤立。

在经历了10个月的政治动荡之后，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终于在海合会的斡旋及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支持下签署了一项协议：放弃权力并即时生效，以免于被起诉。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萨利赫于11月23日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Abed Rabbo Mansour al-Hadi）。然而，该协议远远没有满足抗议者改变政权的要求，也没有解决也门政治精英在“革命”过程中的派系分歧。活动分子希望看到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对示威者的死亡（总计近2000人）负责，他们认为，萨利赫不应该获得法律豁免。当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下台时，也门几乎没有庆祝，因为也门人依然不相信他真的放弃了权力。

也门于2012年2月举行了选举，但许多也门人质疑投票的意义，因为选票上只有一个名字：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然而，65%的选民

最终还是授权哈迪总统改革也门政府，让该国各派实现和解。哈迪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2014年1月，全国对话会议就也门新的联邦结构和新宪法的条款达成了协议。然而，政治过渡也带来了不稳定。胡塞部落在以前忠于被推翻的总统萨利赫的军队的支持下，在北部重启叛乱。许多人公开推断，萨利赫正与他担任总统时试图镇压的胡塞武装分子勾结在一起。

2014年9月，胡塞武装未经抵抗进入也门首都萨那。胡塞人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他们属于宰德派，是什叶派的一支，其领袖或伊玛目以萨那为基地，统治也门达数个世纪，直到1962年共和革命为止。从历史上看，宰德人与伊朗的主流什叶派几乎没有接触。尽管在阿拉伯半岛，宰德人是少数教派，但他们从未在也门经历过教派冲突。然而，这些历史上的区分在21世纪困扰阿拉伯世界的恶性教派主义中很容易被忽视。

在几个月不愉快的共处之后，胡塞人在2015年2月任命了一个执政委员会来接替哈迪总统，后者带着政府主要成员逃往他的家乡亚丁。哈迪不愿将权力移交给胡塞人，他仍然是国际公认的也门领导人。胡塞人向亚丁挺进，打压这位流亡的总统，但哈迪逃到沙特阿拉伯，为他倒台的政府谋求支持。沙特人对也门的危机越来越担忧，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伊朗人幕后操纵、旨在破坏阿拉伯半岛南部稳定的什叶派运动。他们决心像对待巴林那样，采取果断行动，防止伊朗在阿拉伯半岛立足。

2015年3月，沙特领导的十国联军对也门胡塞叛军发动了战争。[19]沙特海军对沿海地区实施严格海禁，防止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海上补给。与利比亚和巴林一样，最初的国内起义已演变成一场国际冲突。到2015年9月，也门政府军在其阿拉伯盟友空中力量的支持下，成功收复了亚丁。哈迪总统回到这座南部港口城市，领导一个无力的政府，这也确认了也门分为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和哈迪统治的南部。与此同时，阿拉伯联盟发起了毁灭性的空袭，将这个阿拉伯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大量居民楼和基础设施夷为平地。

2011年之后的几年里，“革命”、战争和海上禁运加在一起，造成了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到2015年底，战争使约250万也门人在境内流离失所；到2017年，战争估计已造成1万人死亡，4万人受伤。那些幸存下

来的人面临着饥荒的爆发，因为海上封锁关闭了也门的国际货运渠道，而也门90%的粮食依赖进口。比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更糟糕的是，也门退化成了两个失败国家，彼此间争斗不休。[20]

尽管事实证明，利比亚和也门的事态发展是可怖的，但“阿拉伯之春”历史上最悲惨的一章是在叙利亚展开的。

叙利亚是2011年最后爆发民众起义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当脸书活动分子首次试图在大马士革发动大规模抗议时，安全部队的人数远远超过示威者，以至于他们被吓得不敢坚持推进他们的行动。此外，2000年接替父亲哈菲兹·阿萨德担任总统的巴沙尔·阿萨德，享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公众的支持，这让他有别于其他阿拉伯统治者。他掌权了11年，相对还是一个新人，而且他仍然享有改革者的名声——尽管这并不符实。2011年春，叙利亚政权在叙利亚和约旦边境的农业城镇德拉对一群青少年的抓捕与折磨，打破了这一形象。

3月的一天，一群叛逆的年轻人在德拉的墙上写上了2011年阿拉伯“革命”的标语：“人民想要推翻政权”。这一小小的挑衅行为，在当年春天的阿拉伯世界显得平淡无奇，但叙利亚政权对它的反应，将引发一场“革命”。

对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局势发展忧虑不安的阿萨德政权，拒绝容忍最低限度的异见表达。秘密警察逮捕了15名10—15岁之间的男孩，罪名是制作异见涂鸦。他们绝望的父母向政府请愿，要求释放他们，随后发展为公开游行抗议。安全部队以实弹回应，在德拉枪杀示威者，最后同意释放被拘留的青少年以平息事态。被释放后，这些男孩身上带有明显的酷刑痕迹，他们大部分的指甲都被拔掉了。

释放德拉的受虐儿童非但没有平息局势，反而激起了愤怒。在叙利亚近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中，成千上万的市民起来反抗，推翻了所有与阿萨德政权有关的象征物。作为回应，军队加大了镇压力度，袭击了市中心一座被抗议者用作基地的清真寺，造成5人死亡。人群聚集起来埋葬死者，抗议的规模成倍增加。3月的最后一周，超过55

名德拉市民死亡。

叙利亚各地的人们都密切关注着德拉事件。在许多像德拉那样经济不景气的小镇，市民们感觉被政府遗忘了，但却因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抗议。在2011年春的“革命”氛围下，叙利亚人民鼓起勇气表达他们的异见并要求变革。他们开始组织抗议活动，给每一天都起不同的名字。萨玛尔·亚兹贝克是大马士革的一位单身母亲，她从2011年3月25日“尊严的星期五”开始写关于叙利亚“革命”的日记，从一开始就记录了伴随起义而来的激烈暴力：

> 今天，在尊严的星期五，叙利亚各大城市都爆发了示威。超过20万名示威者悼念德拉的死难者。德拉城外的全部村民都向南部的墓地行进。15人被杀。在霍姆斯有3人被杀。在拉塔基亚，有人被杀害，有人受伤……军队包围德拉，并向任何移动的生物开火。在塞奈迈因，安全部队实施大屠杀，杀了20人。[21]

事后看来，亚兹贝克对起义的支持似乎很令人惊讶，因为她是阿萨德总统所属阿拉维教派的一员。然而，在“革命”的头几个月，包括穆斯林、基督徒、阿拉维派和德鲁兹人在内的所有教派的叙利亚人共同行动要求改革。只有当“革命”演变成内战时，教派主义才开始起作用。

在叙利亚“革命”的第一阶段，抗议者是非暴力的。他们呼吁废除1963年以来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以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利和人权。他们在反对法国委任统治时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使用的旗帜下集会，该旗由绿、白、红三道横条构成，中间有三颗红星（叙利亚的官方国旗同1958—1961年间与埃及联合时使用的旗帜保持一致，由红、白、黑三道横条构成，中间是两颗绿色的星）。他们开始从小城镇发动，也呼吁大城市的同胞们高举横幅，提出改革诉求。

无论示威者多么平和，政权从一开始就开枪还击。与其他经历反“革命”的国家（巴林、利比亚和也门）一样，很大一部分军队仍然忠于总统，并被证明愿意向同胞开火。越来越多的持不同政见的士兵脱离部队，以抗议指挥官命令他们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2011年7月，一群变节的军人组建叙利亚自由军，领导反政权的武装叛乱。从非暴力到武装抗议的转变，把“革命”变成了全面的内战。

叙利亚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充分反映了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在战争的第一年结束时，联合国已经报告有5000多人在叙利亚死亡。到2012年底，这一数字上升到4万人。联合国估计，到2014年夏季，死亡人数为19.1万。而在2016年，经过5年战争之后，死亡人数已超过40万。虽然死亡人数令人震惊，但它只反映了叙利亚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中的一小部分。到2016年，冲突已使叙利亚一半以上的人口背井离乡。大约有610万叙利亚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有480万人去境外的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欧盟国家寻求避难。[22]叙利亚人民和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解释，为什么“阿拉伯之春”会走上如此严重的错误道路。

示威者和国际社会忽视了阻碍叙利亚政权倒台的一些国内制约因素。无论反对者如何辱骂，巴沙尔·阿萨德在叙利亚一直享有较大的支持。叙利亚的少数群体——阿拉维派、德鲁兹人、伊斯玛仪派和基督教徒，约占2200万总人口的25%。绝大多数叙利亚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估计占总人口的75%。少数群体中的许多人认为，巴沙尔·阿萨德和他的阿拉维派主导的政府是对抗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秩序的堡垒，在这种秩序下，少数群体会遭到歧视。阿萨德还得到了更多持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立场的逊尼派穆斯林的大力支持，他们是执政的复兴党成员。支持者中还得算上为政权奋战的所有军队和安全部队人员。考虑到叙利亚出现的内部分歧比许多外国分析人士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阿萨德的支持基础就显得更大了。

此外，与反对派相比，叙利亚政权的团结程度更高。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出现了数十个反对派民兵组织向政权发起挑战，从呼吁民主改革的公民团体，到以建立伊斯兰政权为目标的强硬派萨拉菲。这些反叛团体往往各有各的目标，为争夺地盘而相互战斗。另一方面，政权的凝聚力远超反对势力。政权受到的威胁越大，其核心就越强大。对于阿萨德政权及其支持者来说，胜利关乎生存。这场冲突已经恶化到不仅赢家通吃而且输家必亡的境地。这种对阿拉维派和复兴党人以及阿萨德政权其他关联群体进行种族灭绝式报复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阿萨德政权为何在保持权力上下了如此坚定的决心，为何宁可整个国家沦为废墟也不愿投降。

最后，随着地区和全球大国为保护自身利益进行干预，叙利亚冲突

迅速国际化。自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叙利亚政权与阿拉伯国家分道扬镳去支持伊朗以来，伊朗一直与叙利亚保持着特殊关系。德黑兰从一开始就给予阿萨德政权无条件支持，这一立场得到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的力挺。在叙利亚这场多战线的冲突中，伊朗革命卫队和真主党战士支持疲于作战的叙利亚正规军。为削弱伊朗的影响力，沙特及其海湾盟国在背后支持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民兵组织，向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土耳其为叙利亚自由军和致力于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政治派别提供了一个基地，同时派军队跨境进入叙利亚，以阻止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在对抗阿萨德政权过程中获益。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向一些特定的反对派别和民兵组织提供了有限的支持，或多或少与土耳其和海湾国家保持一致。

2015年9月，俄罗斯部署战机支持阿萨德政权，这突破了西方干预叙利亚冲突的限度。俄罗斯在叙利亚有明确的利益，因此果断采取行动保护叙利亚。叙利亚向俄罗斯提供了在地中海东部唯一的海军基地，以及一个监测中东情报的平台。叙利亚也是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中最后一个盟友。一旦阿萨德倒台，俄罗斯将失去对叙利亚所有影响力，这将大大削弱它在该地区的地位。

俄罗斯对反对派阵地的空袭为叙利亚军队提供了战略和道义上的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政府表示不会允许阿萨德政权倒台。西方列强谴责俄罗斯干预，但美国和欧洲大国都不愿意直接对抗俄罗斯，也不会把自己的军队投入叙利亚冲突之中。因此，西方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相形见绌，阿萨德政权奉行与俄罗斯和伊朗联合对抗国内反对派的战略，并让美国及其盟国应对另一个争夺对叙控制权的势力——“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产生于2003年之后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组织抗击美国占领的过程中，特别是伊拉克基地组织。在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领导下，伊拉克基地组织因对西方人和什叶派教徒使用极端暴力而出名。2006年扎卡维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将该组织重塑为“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拉克深陷逊尼派对什叶派掌控的政府的反抗之中，叙利亚处于困境的阿萨德政权正在努力维护其控制下的核心领土，“伊斯兰国”利用两国政府控制力的崩溃，给地区的国家体系带来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挑战。[23]

2011年起，“伊拉克伊斯兰国”与一支在叙利亚内战中作战的基地组织分支——2012年1月出现的努斯拉阵线结成联盟。2013年，基地组织领导人拒绝了“伊斯兰国”对努斯拉阵线的恶意收编。“伊斯兰国”运动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名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ISIS）。阿拉伯语词“沙姆”既指大马士革，也指伊斯兰早期大马士革控制的大叙利亚（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现代国家合在一起的地区）。[24]2014年6月29日，在占领伊拉克的逊尼派核心地区安巴尔省的主要城市和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后，“伊斯兰国”领导人艾布·伯克尔·巴格达迪宣布自己为哈里发，即全球逊尼派穆斯林社群的精神领袖。随后，巴格达迪的部队驾着推土机推倒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边界，宣布他们的哈里发国不再承认国家间的边界。“伊斯兰国”定都叙利亚东部城市拉卡，控制了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广阔而人烟稀少的区域。

“伊斯兰国”的出现进一步使叙利亚内战国际化。这场运动迅速以对敌人和它认定的异教徒实施极端暴力而出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斩首外国俘虏视频录像以及施于少数群体雅兹迪人的种族灭绝措施震惊了全球公众。“伊斯兰国”还成功地招募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引发了从华盛顿到北京的安全忧虑。“伊斯兰国”开始宣称对欧洲和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负责。“伊斯兰国”在亚洲和非洲的特许分支开始宣布效忠于这个自封的哈里发国。西方国家遏制“伊斯兰国”的斗争开启了反恐战争的全新篇章，这回的焦点是叙利亚和伊拉克。

叙利亚领土支离破碎，控制方有阿萨德政权、各反对派运动、东北部的库尔德人以及“伊斯兰国”。新出现的敌人分裂了交战各方：美国及其欧洲盟国集中精力打击“伊斯兰国”，土耳其越发注重遏制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而俄罗斯和伊朗则与叙利亚政权合作挫败反对派势力。多股力量的交汇解释了为什么叙利亚经受了反“革命”过程中最为暴力的冲突。

反“阿拉伯之春”的决定性篇章出现在埃及。

“1·25运动”成功推翻了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在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燃起了希望：一个公民权利和问责政府的新时代将要到来。穆巴

拉克一下台，埃及就进入了狂热的政治发展时期。埃及军方对政府实行托管，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6个月时间表来起草宪法修正案，作为选举新政府的指导。

埃及历史最悠久的反对派别穆斯林兄弟会已是该国最强大的政治组织。那些青年组织者，尽管十分高效地发动了民众抗议，但他们缺乏体制基础，也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创立了几十个政党，没有一个达到足够多的党员人数，这让更有组织的各伊斯兰主义政党主导了过渡时期的政治。那些较为世俗的埃及人怀疑穆兄会是一个秘密阴谋集团，企图将埃及变成一个伊斯兰国。为了不激起这些埃及人的警觉，穆兄会领导层承诺不寻求议会多数席位，不派候选人竞选总统。在此基础上，解放广场上的其他运动派别接纳穆兄会为埃及政治改革的建设性伙伴。

事实上，2011年11月埃及人投完票后，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40%的议会席位，居各派之首，获得第二多席位的是更为保守的伊斯兰萨拉菲主义政党光明党（Hizb al-Nur）。鉴于这个民选机构中的大多数席位都被伊斯兰主义者获得，世俗的埃及人开始担心，他们将迎来的不是一部自由主义宪法，而是一部用伊斯兰法取代埃及民法的伊斯兰主义宪章。

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竞选总统，这让穆兄会违背了早先的承诺，也让民众加深了对穆兄会真实意图的怀疑。穆尔西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工程师，也是资深的穆兄会成员。他的竞争对手是同穆巴拉克有密切关联的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对于埃及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必须在一个穆兄会成员和一个旧政权成员间做出选择，简直糟糕透顶。他们最终选择了变革而非世俗主义。2012年6月30日，穆罕默德·穆尔西宣誓就任埃及第五任总统，这是埃及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

穆尔西的总统任期仅维持了1年。他日益专制的倾向疏远了大批埃及选民。2012年11月，穆尔西发布总统令，授权自己凌驾于法院之上，自封为埃及“革命”的监护人。在他的监督下，制宪会议召开了，但科普特基督徒和世俗的埃及自由主义者退出，抗议专制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制宪会议余下的成员几乎完全是男性伊斯兰主义者，他们于2012年11月30日批准了宪法草案，并急着在12月15—22日间对草案进行全民公

投。埃及自由主义者呼吁抵制公投，结果只有33%的人参与投票。占投票者64%的多数人赞成宪法草案。12月26日，穆尔西签署总统令，宣布新宪法生效，他证实了自由主义改革者们对穆兄会劫持“革命”的担心。

2013年头几个月，反对穆尔西总统的声势越来越强。一个自称“反叛”（Tamarod）的运动发起全国范围的请愿，呼吁穆尔西下台。该运动自设目标，要在穆尔西就职一周年之际确保收到1500万个签名，但据报道，到6月29日，已有超过2200万人签名，一致要求穆尔西辞职，这已超出了既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这一数字从未得到证实，新闻报道援引了一些人，他们吹嘘自己已经签了20次请愿书甚至更多。不管是否存在潜在弄虚作假，请愿运动将自由主义者发动了起来，他们走上解放广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推翻穆尔西政权。

埃及军方抓住“反叛”运动带来的机会，干预埃及的政治动乱。许多分析者认为军队积极煽动请愿活动。从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到穆尔西当选总统，埃及一直由一个军事政权统治，每一位总统都曾经是军人：来自陆军的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安瓦尔·萨达特与来自空军的穆巴拉克。60年来，军队加深了对埃及政治和经济的控制。穆尔西政府及其穆兄会支持者对军方的利益构成了真正威胁，在埃及民主实验的乱局中，最高层军官迅速采取行动，重新控制局面并维护自身的利益。

埃及军方向穆尔西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48小时内处理埃及人民的合法关切，不然将进行军事干预。这是一个不可能得到响应的请求，穆尔西拒绝了。7月3日晚，国防部部长阿卜杜·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通过电视直播宣布解除穆尔西总统职权，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兹利·曼苏尔（Adly Mansour）临时接替。穆尔西和他的几名主要官员被逮捕并秘密关押。这是一场典型的军事政变，尽管武装部队及其支持者愤怒地否定了这个说法。在开罗和全国其他地方，埃及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颂扬军队的行动尊重了人民的合法要求，是第二次“革命”。

7月3日的政变实际上是埃及暴力反“革命”的开始。一夜之间，穆兄会从执政党变成了违禁组织，其领导人被捕或在逃。穆兄会在埃及拥有广大的支持基础，其支持者被激怒了，因为他们认为，军队违宪，非法从民主选出的总统手中夺取权力。他们聚集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清真寺

示威，采用“阿拉伯之春”的模式，即占据一个中心地点，直到人民的意愿得到尊重，可惜徒劳无获。

军队及其支持者的人数比穆兄会更多。大多数埃及人都对穆兄会未能恪守其选举前的承诺感到失望，并对穆尔西拙劣的威权主义感到惊恐。此外，埃及人普遍厌倦了“革命”的混乱。人们希望恢复正常秩序，希望经济复苏，希望回归工作岗位谋取生计——这些都是被两年“革命”的动荡打乱的生活常态。人们信任军队，因为他们相信军队能够做到令行禁止、雷厉风行。

埃及政治历史上最暴力的篇章接踵而至。2013年8月14日，在6周的抗议活动之后，军方袭击了开罗的两处穆兄会的抗议据点：拉拜阿·阿达维亚和复兴广场。安全部队用实弹攻击平民示威者，一天之内屠杀了多达1000名被废总统的支持者。[25]军方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宵禁，法律便因此暂时失去了效力。当局更猛烈地镇压穆兄会，逮捕了数千人。9月，政府宣布穆兄会非法，冻结了其资产，12月，政府宣布穆兄会是恐怖组织。法院判处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穆兄会最高精神领袖穆罕默德·巴迪阿（Mohamed Badie）和数百名级别略低的骨干人员死刑。此外，还有2万多名伊斯兰主义者被捕入狱。[26]

埃及军队清洗穆兄会势力的过程中，军队总司令阿卜杜·法塔赫·塞西将军的声望急剧上升。他的崇拜者们把他和纳赛尔相提并论，并鼓励他实现政治抱负。2014年3月，塞西辞去军中职务，得以不受限制地竞选总统。他只有一名竞争对手——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的反对派活动家哈姆丁·萨巴希（Hamdeen Sabahi）。2014年5月，塞西以96%的多数票赢得了总统选举。卸下军装的塞西无疑代表了军队重新掌控埃及政治。

埃及的反“革命”完成了。对许多人来说，2011年的“1·25运动”似乎从未发生过。阿拉伯人民不再要求公民权利和问责政府，他们放弃了对政治自由的希冀，不顾一切地寻求稳定。“革命”造成埃及和巴林的政治动荡，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升级为内战。事实证明，“革命”式变革的代价超出了阿拉伯人民的承受能力——除了突尼斯，那里上演着“阿拉伯之春”仅存的成功故事。

突尼斯是唯一一个在“阿拉伯之春”后通过谈判实现向新宪政秩序平稳政治过渡的阿拉伯国家。反对派成员与本·阿里时代官员联合组建团结政府执掌权力。2011年10月，突尼斯人涌向投票站选举制宪会议来修订突尼斯宪法。本·阿里治下非法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党（Ennahda）赢得了最多选票，达41%。同埃及穆兄会不同，突尼斯复兴党并没有试图利用从选举中获得的权力来主宰突尼斯政治。在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选择与两个中间派世俗政党合作，维持了较高程度的民族团结。起草新宪法的进程很漫长，但这是为了建立共识而不是实行胁迫。2014年1月通过的新宪法庄严载入了“革命”运动在公民权利和法治方面取得的成就。

2014年10—12月，突尼斯选民根据新的治国规则投票选举议会和总统，突尼斯向新宪政时代的过渡告一段落。这些规则是突尼斯人经过反复讨论和投票确认之后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外国势力强加的，达到了几个世纪以来围绕限制统治者专制权力而进行的斗争的目标。2014年的选举结果十分乐观。世俗派呼声党（Nidaa Tounes）赢得相对多数席位，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党获得第二多席位，两党同意组建联合政府，呼声党主席贝吉·凯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当选总统。

然而，突尼斯所取得的成就还很不稳固。突尼斯遭受了恐怖袭击，严重破坏了作为经济支柱的旅游业，而外国投资者尚未给予突尼斯足够的信任。在恐怖主义威胁得到遏制和经济增长得以恢复之前，突尼斯“革命”取得的成果仍将面临风险。然而，突尼斯脆弱的民主实验所取得的成功，符合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经历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暴力和破坏之后，阿拉伯人民势必将重申对问责政府的合法要求。对于阿拉伯人民在21世纪的希冀而言，突尼斯将成为一座灯塔。

致谢

在撰写这部阿拉伯世界的近现代史时，我有幸已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已故的阿尔伯特·侯拉尼是研究阿拉伯世界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聚集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使中东研究中心成为欧洲领先的研究现代中东的大学研究所。从我1991年成为中心成员起，已经退休的同事穆斯塔法·巴达维、德里克·霍普伍德、罗伯特·马布罗和罗杰·欧文一直是我的导师。我充分仰仗了他们对中东的深刻了解，与他们讨论了本书的论点，并硬是将各章草稿发给他们以征求意见。他们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和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中东研究中心目前的研究团队在各方面都保留了阿尔伯特·侯拉尼最初团队的魔力。在艾哈迈德·沙希、沃尔特·安布拉斯特、拉斐拉·德尔·萨托、荷马·卡忒泽安、西莉亚·克斯莱克、菲利普·罗宾斯和迈克尔·威利斯等人中，我有慷慨的朋友和同事每天都为这个项目做出贡献——每天早上在中心边喝咖啡边闲聊，推荐阅读文献和评论章节草稿。我特别感谢阿维·施莱姆，他是一位研究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波折历史的杰出而富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学家。阿维阅读了每一章，并在大学的午餐时间与我会面，给我最详细和最有建设性的反馈。他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对本书的每一部分都有影响。

我要感谢中东研究中心的档案管理员黛比·阿瑟，她慷慨地支持我对档案中丰富的私人文件和历史照片的研究。我非常感谢中东研究中心图书管理员马斯坦·埃布泰哈伊和中心管理员朱丽亚·库克。

我在牛津大学的阿拉伯近现代史课程中使用了本书稿，非常感谢机敏的学生们的反馈。我要感谢丽姆·艾布·法得勒、尼克·卡尔达赫吉和纳迪亚·奥维达特对本书研究的帮助。

在写本书的这几年里，我一直依靠家人和朋友，无论他们是否为专业人士，都来阅读并评论章节草稿。他们的鼓励和批评对本书的完成起到了比他们所想的更大的作用。我要感谢彼得·艾雷、图伊·克拉克、我的

伊拉克历史导师福拉斯·哈迪德、蒂姆·肯尼迪、迪娜·扈利、约书亚·兰迪斯、罗纳德·奈特勒、汤姆·奥尔德、最先鼓励我写作这本阿拉伯人史的托马斯·菲利普、加比·皮特伯格、塔里克·拉马丹、我的兄弟格兰特·罗根、凯文·沃特金斯和我才华横溢的妻子恩盖尔·伍兹。

我要特别感谢我最执着的读者——我的母亲玛格丽特·罗根。她一生都在研究中东，她从头到尾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章，挑出错误，没有让母爱蒙蔽她。

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多位读者来信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更正，其中许多已被这一版本采纳。我要感谢阿里·阿拉维、马克·艾伦爵士、穆扎法·H.巴拉齐、赛斯·弗兰茨曼、艾弗·卢卡斯、米歇尔·吕特法拉、弗朗西斯·罗宾森、阿扎姆·萨阿德和理查德·昂德兰。

我要感谢布洛涅-比扬古的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的塞尔日·富沙尔，他制作了阿尔伯特·卡恩收藏中卓越的早期彩色相片的副本以供出版。我也非常感谢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的维多利亚·霍格思和哈佛美术图书馆的杰夫·斯珀尔，他们为本书收录的图像提供了帮助。

如果没有我的文学经纪人费利西蒂·布莱恩的卓越才干，本书就不会问世。我特别感谢费利西蒂打破自己不为朋友代理的规矩。我将永远感激乔治·卢卡斯同意在纽约代表我，并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把我介绍给纽约的出版界。他们两人一起为本书找到了最好的出版社。

对基本书局（Basic Books），我深深地感谢我的编辑劳拉·海默特，她用幽默与洞察力，鼓励我写出了一本比我独自一人能写出来的更好的书。布兰登·普罗亚贡献了他的编辑才能，并帮助搜寻适合本书的图像。凯·玛丽亚和米歇尔·浅川拼尽全力，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文字编辑。在企鹅出版社，西蒙·温德以其深邃的学识深度参与本书的写作过程，使我受益匪浅。

在写作本书的每一刻，我的家人都是我的力量和灵感。我疯狂地承担了这个写作项目，但恩盖尔以及我俩的儿子理查德和女儿伊莎贝尔十分通情达理，谢谢你们！

图片版权许可

1.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 Christie's Images/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2.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 Christie's Images/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3. Photograph by Bonfils.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ine Arts Library, HSM

4. Chateau de Versailles, France/ Giraudo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5. Private collection/ © The Fine Art Society, London,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ine Arts Library, HSM 620

7. Chateau de Versailles, France/ Lauros/ Giraudo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8. Musée Condé, Chantilly, France/ Giraudo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9.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5488

10.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5562

11.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51046

12. Private Collection/Archives Charmet/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All bes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contact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is anonymous Moroccan work.

13.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9031

14. Frédéric Gadmer,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9747

15. Owen Tweedy Collection, PA 7/216,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6. Sir Edmund Allenby Collection, PA 5/8,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7.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France/ Archives Charmet/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18. Norman Mayers Collection album 1/40,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9. John Poole Collection 11/5/5,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0. John Poole Collection 11/4/16,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1. Sir Edward Spears Collection, Album 8/28,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2. Sir Edward Spears Collection, Album 9/75,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3. Desmond Morton Collection, 13/1/1,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4. Desmond Morton Collection, 13/1/2,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5. AP Images

26. © Bettmann/Corbis

27. © Bettmann/Corbis

28. © Bettmann/Corbis

29. © Bettmann/Corbis

30. ©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31. ©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32. © Bettmann/Corbis

33. © Bettmann/Corbis

34. © Genevieve Chauvel/Sygma/Corbis

35. © Bride Lane Library/Popperfoto/Getty Images

36. © Christian Simonpietri/Sygma/Corbis

37. © Bettmann/Corbis

38. © Bettmann/Corbis

39. © Alain DeJean/Sygma/Corbis

40. © Kevin Fleming/Corbis

41. © AFP/Getty Images

42. © Dominique Faget/epa/Corbis

43. © Gérard Rancinan/Sygma/Corbis

44. © Michel Philippot/Sygma/Corbis

45. © Françise de Mulder/Corbis

46. © Françise de Mulder/Corbis

47. © Peter Turnley/Corbis

48. © Reuters/Corbis

49. © Reuters/Corbis

注释

序言

1. 穆罕默德的姐姐巴斯玛·布瓦齐齐，转引自“Controversy over ‘the Slap’ That Brought Down a Government,” *Asharq Al-Awsat,* February 2, 2011；菲达·哈姆迪，转引自KaremYehia, “Tunisian Policewoman Who‘Slapped’ Bouazizi Says ‘I Was Scapegoated by Ben Ali,’” *Ahram Online*, December 16, 2014。另见Yasmine Ryan, “The Tragic Life of a Street Vendor: Al-Jazeera Travels to the Birthplace of Tunisia's Uprising and Speaks to Mohamed Bouazizi's Family,” AlJazeera.com, January 20, 2011；Kareem Fahim, “Slap to a Man's Pride Set Off Tumult in Tunisi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2011。

2. 菲达·哈姆迪在多次采访中就这一系列事件给出了自己的讲述，见Yehia, “Tunisian Policewoman Who ‘Slapped’ Bouazizi,”和Radhouane Addala and Richard Spencer, “I Started the Arab Spring. Now Death Is Everywhere, and Extremism Is Blooming,” *Daily Telegraph*, December 17, 2015。

3. Roger Owen, *The Rise and Fall of Arab Presidents for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Joseph Sassoon, *Anatomy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Arab Republ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4. Samir Kassir, *Being Arab* (London: Verso, 2006)， from the author's introduction.

5. 菲达·哈姆迪在以下采访中谈论自己佩戴头巾：“Interview with Fadia Hamdy ［sic］,” video posted by CorrespondentsDotOrg on YouTube, July 11, 20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eRkT5A8rQ。

6. George Will, “Take Time to Understand Mideast Asia,”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9, 2001.

7. Eugene Rogan,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2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第一章　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

1. 先知穆罕默德离世引发了伊斯兰教最早的分裂之一，因为他的追随者们在如何选择他的继承人（即哈里发）来领导穆斯林社团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一派穆斯林主张继承者须来自先知家族，并支持阿里·本·艾布·塔利卜为继承者，他是先知的堂弟和女婿，是他的近亲。这个派别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阿里党人”，“什叶”一词即源于此。然而，大多数穆斯林认为，哈里发应该是最虔诚的穆斯林，最有能力去维护“逊奈”（*sunna*），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做法和信仰，这派人后来被称为逊尼派。在伊斯兰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逊尼派一直是信仰者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特别是在阿拉伯和土耳其世界，而什叶派伊斯兰教各支则扎根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波斯和南亚。

2. 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伊耶斯（约1448—1524）的编年史《世事奇葩》（*Bada'i' al-zuhur fi waqa'i' al-duhur*）1893—1894年首次在开罗出版。关于奥斯曼征服叙利亚和埃及部分的英语节译本为W. H. Salmon, *A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of Egypt in the Year A.H. 922 (A.D. 1516)*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1)。全译本为Gaston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Chronique d'Ibn Iyâs*, vol. 2 (Paris: S.E.V.P.E.N., 1960).此处的叙述参见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41-46；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65-67。

3.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92-95;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117-120.

4.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111-113;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137-139.

5.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114-117;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140-143.

6.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171-172.

7. Ibid., p.187.

8. 正统哈里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最初四位继承者,即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他们在7世纪统治着早期的伊斯兰社团。他们之后是伍麦叶王朝（公元661—750年），定都大马士革。

9.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4), p.33.

10.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46-49;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69-72.

11. 沙姆斯丁·穆罕默德·本·阿里·本·突伦（约1485—1546）的编年史《大马士革土耳其省长的背景资料》的校订本与译本为Henri 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sous les Mamlouks et les premiers Ottomans (658—1156/1260—1744)* (Damascus: Institut Français de Damas, 1952)。

12. Bruce Masters, *The Origins of Western Economic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Mercantilism and the Islamic Economy in Aleppo, 1600—175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 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p.151.

14.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49;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72.

15. 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pp.154-157.

16. 源自伊本·朱玛（逝于1744年后）的编年史，参见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p.172。

17. 伊本·朱玛和伊本·突伦的叙述几乎相同，前者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后者的叙述，参见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pp.154-159, 171-174。

18. Amnon Cohen and Bernard Lewis, *Population and Revenue in the Towns of Palestin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3-18.

19. Muhammad Adnan Bakhit, *The Ottoman Province of Damascu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rut: Librairie du Liban, 1982), pp.91-118.

20. I. Metin Kunt, *The Sultan's Serva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ttom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1550—16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2-33.

21. Philipp and Perlman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p.33.

22. Michael Winter, *Egypti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1517—1798*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16-17.

23. Bakhit, *Ottoman Province of Damascus*, pp.105-106.

24. 赛义德·穆拉德所著《海伊尔丁帕夏征服记》（*Ghazawat-i Khayr al-Din Pasha*）为16世纪抄本，其法语节译本为Sander Rang and Ferdinand Denis, *Fondation de la régence d'Alger: Histoire de Barberousse* (Paris: J. Angé, 1837)。此处的叙述参见vol. 1, p.306。

25. John B. Wolf, *The Barbary Coast: Algeria Under the Turk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9), p.20.

26. Cited in ibid., p.27.

27. Ahmad b. Muhammad al-Khalidi al-Safadi, *Kitab tarikh al-Amir Fakhr al-Din al-Ma'ni* ［The book of history of the Amir Fakhr al-Din al-Ma'n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Asad Rustum and Fuad al-Bustani under the title *Lubnan fi 'ahd al-Amir Fakhr al-Din al-Ma'ni al-Thani* ［Lebanon in the age of Amir Fakhr al-Din II al-Ma'ni］ (Beirut: Editions St. Paul, 1936, reprinted 1985).

28. Abdul-Rahim Abu-Husayn, *Provincial Leaderships in Syria, 1575—1650* (Beirut: American University in Beirut Press, 1985) pp.81-87.

29. Al-Khalidi al-Safadi, *Amir Fakhr al-Din*, pp.17-19.

30. Ibid., pp.214-215.

31. Ibid., pp.150-154.

32. Daniel Crecelius and 'Abd al-Wahhab Bakr, trans., *Al-Damurdashi's Chronicle of Egypt, 1688—1755* (Leiden: E. J. Brill, 1991), p.286.

33. Ibid., p.291.

34. Ibid., p.296.

35. Ibid., pp.310-312.

36. Winter, *Egypti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p.24.

1. Ahmad al-Budayri al-Hallaq, *Hawadith Dimashq al-Yawmiyya* ［Daily events of Damascus］ 1741—1762 (Cairo: Egyptian Association for Historical Studies, 1959), p.184; and George M. Haddad, “The Interests of an Eighteenth Century Chronicler of Damascus,” *Der Islam* 38 (June 1963): 258-271.

2. Budayri, *Hawadith Dimashq*, p.202.

3. Ibid., p.129.

4. Ibid., p.219.

5. Ibid., p.57.

6. Ibid., p.112.

7. 转引自Albert Hourani, “The Fertile Crescen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Vision of History* (Beirut: Khayats, 1961), p.42。

8.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4), p.6.

9. 关于黎巴嫩山的谢哈卜家族，参见Kamal Salibi, *The Modern History of Leban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65)。关于摩苏尔的加利利家族，参见Dina Rizk Khoury, *State and Provincial Socie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Mosul, 1540—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Methuen, 1981), p.7.

11. Budayri, *Hawadith Dimashq*, pp.27-29.

12. Ibid., pp.42-45.

13. Amnon Cohen, *Palestin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erusalem: Magnes Press, 1973), p.15.

14. Thomas Philipp, *Acre: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alestinian City, 1730—183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6.

15. Philipp and Perlmann,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p.636. 关于伟大的阿里贝伊，参见Daniel Crecelius, *The Roots of Modern Egypt: A Study of the Regimes of ‘Àli Bey al-Kabir and Muhammad Bey Abu al-Dhahab, 1760—1775* (Minneapolis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1)。

16. Philipp and Perlmann,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p.639.

17. Ibid., p.638.

18. Ibid., p.639.

19. 这段叙述来自黎巴嫩山的埃米尔哈伊达尔·艾哈迈德·谢哈卜（1761—1835）的编年史《当世英华录》（*Al-Ghurar al-Hisan fi akhbar abna' al-zaman*）。谢哈卜的编年史由Asad Rustum 和Fuad al-Bustani校订出版，题为《谢哈卜埃米尔时代的黎巴

嫩》（*Lubnan fi ‘ahd al-umara' al-Shihabiyin*）， vol. 1 (Beirut: Editions St. Paul, 1984), p.79。

20. Shihab, *Lubnan fi ‘ahd al-umara' al-Shihabiyin*, vol. 1, pp.86-87.

21. Philipp and Perlmann,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p.639.

22. Philipp, citing Ahmad al-Shihab's *Tarikh Ahmad Pasha al-Jazzar*, in *Acre*, p.45.

23. 这段关于扎希尔·欧麦尔之死的戏剧性叙述出自米哈伊勒·萨巴厄（约1784—1816）的编年史《谢赫扎希尔·欧麦尔·齐达尼史》（*Tarikh al-Shaykh Zahir al-‘Umar al-Zaydani*）(Harisa, Lebanon: Editions St. Paul, 1935), pp. 148-158。

24. 引自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London: Saqi, 2000), p. 98。

25. Philipp and Perlmann,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4, p. 23.

26. Mikhayil Mishaqa, *Murder, Mayhem, Pillage, and Plunder: The History of Leban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Albany: SUNY Press, 1988), p. 62.

第三章　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帝国

1.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4), p.2.

2. Ibid., p.13.

3. Ibid., p.8.

4. Ibid., p.51.

5. M. de Bourienne, *Mèmoires sur Napolèon*, 2 vols. (Paris, 1831), cited in ibid., p.57, n. 63.

6.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3, pp.56-57.

7.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7. See also Darrell Dykstra,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Egypt,” in M. W. Dal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13-138.

8.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3, pp.505-506.

9. Ibid., vol. 4, pp.179-180.

10.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p.72.

11. Ibid., p.201. 一袋钱相当于500比索，19世纪20年代的兑换比率约为1美元

=12.6比索。

12. 对处决瓦哈比运动领导者的叙述来自俄国大使给奥斯曼帝国的报告,转引自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London: Saqi, 2000), p.155。

13. Khaled Fahmy, *All the Pasha's Men: Mehmed Ali, 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2.

14. Mustafa Rashid Celebi Efendi, cited in ibid., p.81.

15. Letter from Muhammad ‘Ali to his agent Najib Efendi dated October 6, 1827, translated by Fahmy in All the Pasha's Men, pp.59-60.

16. 米哈伊勒·米舍卡写于1873年的编年史《答挚爱者建议书》(al-Jawab ‘ala iqtirah al-ahbab)由Wheeler Thackston翻译出版:*Murder, Mayhem, Pillage, and Plunder: The History of the Leban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Albany: SUNY Press, 1988), pp.165-169。

17. Ibid., pp.172-174.

18. Ibid., pp.178-187.

19. Palmerston's letter of July 20, 1838, cited in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p.238.

20. Mishaqa, Murder, *Mayham, Pillage, and Plunder,* p.216.

21. London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Levant, 15-17 September 1840, reproduced in 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71-275.

第四章　改革的危险

1. 对塔赫塔维作品《披沙拣金记巴黎》(*Takhlis al-Ibriz fi Talkhis Bariz*)的完整英译和研究,见Daniel L. Newman, *An Imam in Paris: Al-Tahtawi's Visit to France (1826—1831)* (London: Saqi, 2004)。

2. Ibid., pp.99, 249.

3. Ibid., pp.105, 161.

4. 对这部宪法的分析转载于ibid., pp.194-213。

5. 塔赫塔维对1830年七月革命的分析可参见ibid., pp.303-330。

6. 1839年改革法令的译本转载于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69-271。

7. 1856年改革法令的文本转载于ibid., pp.315-318.

8. 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法官穆罕默德·萨义德·乌斯图沃奈的日记由As‘ad al-Ustuwana编辑出版,*Mashahid wa ahdath dimishqiyya fi muntasif al-qarn al-tasi‘ ‘ashar (1840—1861)*(Damascus: Dar al-Jumhuriyya, 1993), p.162。

9. Jonathan Frankel, *The Damascus Affair: “Ritual Murder,” Politics, and the Jews*

in 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Bruce Masters, "The 1850 Events in Aleppo: An Aftershock of Syria'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2 (1990): 3-20.

11. Leila Fawaz, *An Occasion for War: Civil Conflict in Lebanon and Damascus in 1860* (London: I. B. Tauris, 1994); and Ussama Makdisi, *The Culture of Sectarianism: Community, History, and Viol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Leban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2. 大马士革穆斯林要人艾布·沙特·哈希卜的回忆录引自 Kamal Salibi, "The 1860 Upheaval in Damascus as Seen by al-Sayyid Muhammad Abu'l-Su'ud al-Hasibi, Notable and Later *Naqib al-Ashraf* of the City," in William Polk and Richard Chambers, eds., *Beginning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190。

13. Wheeler Thackston Jr. 翻译了米哈伊勒·米舍卡写于1873年的历史，译本题为 *Murder, Mayhem, Pillage, and Plunder: The History of the Leban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Albany: SUNY Press, 1988), p.244。

14. 米舍卡1860年9月27日向美国驻贝鲁特领事提交的阿拉伯语报告，存于美国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国家档案馆。

15. Y. Hakan Erdem, *Slavery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Demise*, 1800—1909 (Basingstoke, UK: 1996).

16.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Methuen, 1981), p.123.

17. David Landes, *Bankers and Pashas: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Egyp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91-92.

18. Owen,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pp.126-127.

19. Janet Abu Lughod, *Cairo: 1001 Years of the City Victoriou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98-113.

20. 海伊尔丁的自传《致我的孩子》（*À mes enfants*）由M. S. Mzali和J. Pignon编辑出版："Documents sur Kheredine," *Revue Tunisienne* (1934): 177-225, 347-396，本段引文见p.183。

21. 海伊尔丁的政治著作《万国实闻录》（*Aqwam al-masalik li ma'rifat ahwal al-mamalik*）的编译本为Leon Carl Brown, *The Surest Path: The Political Treatise of a Nineteenth-Century Muslim States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2. Ibid., pp.77-78.

23. Jean Ganiage, *Les Origines du Protectorat francaise en Tunisie (1861—188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9); L. Carl Brown, *The Tunisia of Ahmad Bey (1837—185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 Lisa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198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24. 转引自Brown, *The Surest Path*, p.134。

25. Mzali and Pignon, “Documents sur Kheredine,” pp.186-187.

26.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27. Niyazi Berkes, *The Emergence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London: Routledge, 1998), p.207.

28. Ahmet Cevdet Pasha in Charles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 1800—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349-351; and Roderic Davison,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12.

29. Mzali and Pignon, “Documents sur Kheredine,” pp.189-190.

30. Owen,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pp.100-121.

31. Ibid., pp.122-152.

第五章　第一波殖民主义：北非

1. 两份报告的文本转载于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27-231。

2. Rifa‘a Rafi‘al-Tahtawi, *An Imam in Paris* (London: Saqi, 2004), pp.326-327.

3. Alexandre Bellemare, *Abd-el-Kader: Sa 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Paris: Hachette, 1863), p.120.

4. 两份条约的原始文本与英语译文转载于Raphael Danziger, *Abd al-Qadir and the Algerians: Resistance to the French and Internal Consolidati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7), pp.241-260。条约分配给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地图见ibid., pp.95-96，157-158。

5. Reproduced in Bellemare, *Abd-el-Kader*, p.260.

6. Ibid., p.223.

7. A. de France, *Abd-El-Kader's Prisoners; or Five Months' Captivity Among the Arabs*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n.d.), pp.108-110.

8. Bellemare, *Abd-el-Kader,* pp.286-289. 阿卜杜·卡迪尔之子在*Tuhfat al-za'ir fi tarikh al-Jaza'ir wa'l-Amir ‘Abd al-Qadir* (Beirut: Dar al-Yaqiza al-‘Arabiyya, 1964), pp.428-431中描写了齐马拉陷落对士兵士气的影响。

9. Tangier Conventio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Friendly Relations: France and Morocco, September 10, 1844, reproduc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pp.286-287.

10. Bellemare, *Abd-el-Kader*, p.242.

11. Stanford J. Shaw and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90-191. 注意法郎兑英镑比率为FF25 = £1, 土耳其镑兑英镑比率为£T1 = £0.909。

12. 欧拉比的自传被收入Jurji Zaydan编写的人物志《19世纪东方名人传》（*Tarajim Mashahir al-Sharq fi'l-qarn al-tasi' 'ashar*）, vol. 1 (Cairo: Dar al-Hilal, 1910), (hereafter Urabi memoirs)。

13. Ibid., p.261.

14. 1903年，欧拉比向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讲述了这些事件，后者将之收入*Secre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reprint of 1922 ed.), p.369。

15. Urabi memoirs, p.269.

16. Ibid., p.270.

17. Ibid., p.272.

18. 布伦特请穆罕默德·阿布笃评论欧拉比对这些事件的叙述，见Blunt, *Secret History*, p.376。

19. Urabi memoirs, p.274.

20. Blunt, *Secret History*, p.372.

21. A. M. Broadley, *How We Defended Arabi and His Friend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84), p.232.

22. Ibid., pp.375-376.

23. Blunt, *Secret History*, p.299.

24. *Mudhakkirat 'Urabi* [Memoirs of Urabi], vol. 1 (Cairo: Dar al-Hilal, 1954), pp.7-8.

25. 关于"争夺非洲"和法绍达事件，参见Ronald Robinson and John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2nd ed. (Houndmills, UK: Macmillan, 1981)。

26.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1, p.477.

27. Ibid., pp.508-510.

28. Ahmad Amin, *My Life*, translated by Issa Boullata (Leiden: E. J. Brill, 1978), p.59.

29. 转引自Ami Ayalon, *The Press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A 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5。

30. 转引自ibid., p.30。

31. 转引自ibid., p.31。

32. Martin Hartmann, *The Arabic Press of Egypt* (London, Luzac, 1899), pp.52-85, cited in Roger Owen, *Lord Cromer: Victorian Imperialist, Edwardian Proconsu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51.

33. Albert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13.

34. Ahmad Amin, *My Life*, pp.48-49.

35.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trans. and eds.,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4), pp.252-253.

36. Daniel L. Newman, *An Imam in Paris: Al-Tahtawi's Visit to France (1826—1831)* (London: Saqi, 2004), p.177.

37. Ahmad Amin, *My Life*, p.19.

38. Judith Tucker, *Wome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9.

39. Qasim Amin,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trans. Samiha Sidhom Peterson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at Cairo Press, 1992), p.12.

40. Ibid., p.15.

41. Ibid., p.72.

42. Ibid., p.75.

43. Ahmad Amin, *My Life*, p.90.

44. Ibid., p.60.

45. Ibid., pp.60-61.此处英译者使用了“upset”（苦恼）一词，但原阿拉伯语用词意为“悲伤”，语义更强。

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1. “De Bunsen Committee Report,” in J. C. Hurewitz, e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26-46.

2. 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转引自ibid., pp.46-56。

3. 引自卡拉克居民奥代·古苏斯未出版的回忆录，转引自Eugene Rogan,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 1851—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32-233。

4. 《赛克斯-皮科协定》转引自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60-64。

5.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8), p.248.

6.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巴塞尔纲领》转引自Paul R. Mendes-Flohr and

Jehuda Reinharz,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29。

7. 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London: Abacus, 2001)， p.44.

8. 《贝尔福宣言》转引自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101-106。

9. 哲马勒帕夏的评论载于《东方报》（*al-Sharq*），转引自Antonius, *Arab Awakening*, pp.255-256。

10. 1918年11月7日英、法两国发布的声明转引自ibid., pp.435-436;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112。

11. 费萨尔与魏茨曼的协议转引自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New York: Penguin, 1985), pp.19-20。

12. 费萨尔的备忘录转引自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130-132。

13. Harry N. Howard,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Beirut: Khayyat, 1963), p.35.

14. 《金-克瑞恩报告》首次刊载于*Editor & Publisher* 55, 27, 2nd section, December 2, 1922。他们所提建议的节略版转引自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191-199。

15. Abu Khaldun Sati'al-Husri, *The day of Maysalun: A Page from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Arabs* (Washington, DC: Middle East Institute, 1966), pp.107-108.

16. 转载于阿拉伯语版的Sati' al-Husri, *Yawm Maysalun* (Beirut: Maktabat al-Kishaf, 1947), plate 25。关于标语口号的政治功用，见James L. Gelvin, *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Los Angeles 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7. Al-Husri, *Day of Maysalun*, p.130，为巴黎美国代表团撰写的《金-克瑞恩报告》的秘密附录证实了这一点。

18. Yusif al-Hakim, *Suriyya wa'l-'ahd al-Faysali* ［Syria and the Faysali era］ (Beirut: Dar An-Nahar, 1986), p.102.

19. "Resolution of the General Syrian Congress at Damascus," reproduc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180-182.

20. "King-Crane Recommendations," in ibid., p.195.

21. Al-Husri, *Day of Maysalun*, p.79.

22. Elie Kedourie, "Sa'ad Zaghlul and the British," *St. Antony's Papers* 11, 2 (1961): 148-149.

23. 麦克弗森关于1919年革命的信件转引自Barry Carman and John McPherson, eds., *The Man Who Loved Egypt: Bimbashi McPherson* (London: Ariel Books, 1985), pp.204-221。

24. Huda Shaarawi, *Harem Years: The Memoirs of an Egyptian Feminist*, trans. and ed. Margot Badran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1986), p.34.

25. Ibid., pp.39-40.

26. Ibid., p.55.

27. Ibid., pp.92-94.

28. *Al-Istiqlal*, October 6, 1920, reproduced in Abd al-Razzaq al-Hasani, *al-'Iraq fi dawray al-ihtilal wa'l intidab* ［Iraq in the occupation and mandate eras］ (Sidon: al-'Irfan, 1935), pp.117-118.

29. Charles Tripp, *A History of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6-45.

30. Published by Shaykh Muhammad Baqr al-Shabibi in Najaf, July 30, 1920. Reproduced in al-Hasani, *al-'Iraq*, pp.167-168.

31. Ghassan R. Atiyya, *Iraq, 1908—1921: A Political Study* (Beirut: Arab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1973).

32. Muhammad Abd al-Husayn, writing in the Najaf newspaper *al-Istiqlal*, October 6, 1920, reproduced in al-Hasani, *al-'Iraq*, pp.117-118.

33. Aylmer L. Haldane, *The Insurrection in Mesopotamia, 1920*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922), p.331.

第七章　大英帝国在中东

1. Charles E. Davies, *The Blood-Red Arab Flag: An Investigation into Qasimi Piracy, 1797—1820* (Exeter: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5-8, 190. See also Sultan Muhammad al-Qasimi, *The Myth of Arab Piracy in the Gulf* (London: Croom Helm, 1986).

2. 英国与巴林谢赫的协议签订于1880年12月22日，见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Affair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32。

3. 引自巴林与英国在1892年3月13日签订的排他性协议，见ibid., p.466。

4.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ary Debates, Commons*, 5th ser., vol. 55, cols. 1465—1466, cited in ibid., p.570.

5. De Bunsen Report of June 30, 1915, reprint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28-29.

6.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s,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hereafter MECA), Philby Papers 15/5/241, letter from Sharif Husayn to Ibn Saud dated February 8, 1918.

7. MECA, Philby Papers 15/5/261, letter from Sharif Husayn to Ibn Saud dated May 7, 1918.

8.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Memoir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p.181.

9. 沙特军队在第二次胡尔迈战役（1918年6月23日至7月9日）中截获的文件显示，哈希姆军队有步兵1689人、骑兵和其他部队约900人，共2636人。MECA, Philby Papers 15/5/264.

10. MECA, Philby Papers 15/2/9 and 15/2/30, two copies of Ibn Saud's letter to Sharif Husayn dated August 14, 1918.

11. MECA, Philby Papers 15/2/276, letter from Sharif Husayn to Shakir bin Zayd dated August 29, 1918.

12. King Abdullah, *Memoirs*, p.181.

13. Ibid., p.183; Mary 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7.

14. King Abdullah, *Memoirs*, p.183.

15. 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London: Saqi, 2000), p.249.

16. 转引自Timothy J. Paris, *Britain, the Hashemites, and Arab Rule, 1920—1925* (London: Frank Cass, 2003), p.1。

17. 转引自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p.53。

18. 南部城镇卡拉克基督徒奥代·古苏斯（1877—1943）的回忆录从未出版。这里引用的所有段落都来自回忆录阿拉伯语打字稿中关于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第九章。

19. 奥代·古苏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转载了1923年11月1日的起诉书，见第63页。1924年1月9日，他在吉达收到该起诉书的副本。

20. Uriel Dan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ransjordan, 1920—1949: The Making of a Stat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4), pp.81-92.

21. 1921年7月8日信件。格特鲁德·贝尔的信件可通过纽卡斯尔大学的格特鲁德·贝尔项目网上阅览，见http://www.gerty.ncl.ac.uk/。

22. Sulayman Faydi, *Mudhakkirat* ［*Memoirs of*］ *Sulayman Faydi* (London: Saqi, 1998), pp.302-303.

23. Gertrude Bell, letter of August 28, 1921.

24. Muhammad Mahdi Kubba, *Mudhakkirati fi samim al-ahdath, 1918—1958* ［My memoirs at the center of events, 1918—1958］ (Beirut: Dar al-Tali‘a, 1965), pp.22-25.

25. 1922年协议的文本转载于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310-312。

26. Kubba, *Mudhakkirati*, pp.26-27.

27. 费萨尔的绝密备忘录转引自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25-26。

28. 扎格卢勒的评论转引自“Bitter Harvest,” *Al-Ahram Weekly Online*, October 12-18, 2000, http://weekly.ahram.org.eg/。

29. Ismail Sidqi, *Mudhakkirati* ［My memoirs］（Cairo: Madbuli, 1996), p.85.

30. Ibid., p.87. 伤亡人数来自一部持同情立场的西德基传记，Malak Badrawi, *Isma‘il Sidqi, 1875—1950: Pragmatism and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Egypt* (Richmond, UK: Curzon, 1996), p.61。

31. Sidqi, *Mudhakkirati*, p.97.

32. 奥斯曼时期的人口数据很不可靠。巴以冲突中人口统计的政治化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不可靠程度。最可靠的资料是Justin McCarthy, *The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这些数字见table 1.4D, p.10。

33. Ibid., p.224.

34. Neville J. Mandel, *The Arabs and Zionism Before World War 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Hasan Kayali, *Arabs and Young Turks: Ottomanism, Arabism, and Islamis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103-106.

35. 移民人数见McCarthy,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p.224。伤亡人数见Charles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4th ed.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1), pp.113, 130。

36. 丘吉尔的备忘录转载于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301-305。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37. Matiel E. T. Mogannam, *The Arab Woman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 (London: Herbert Joseph, 1937), pp.70-73.

38. Ibid., p.99.

39. McCarthy,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pp.34-35.

40. Akram Zuaytir, *Yawmiyat Akram Zu‘aytir: al-haraka al-wataniyya al-filastiniyya, 1935—1939* ［The diaries of Akram Zuaytir: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35—1939］（Beirut: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80), pp.27-30.

41. Ibid., p.29.

42. Ibid., pp.32-33.

43. 转引自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p.119。

44. 艾布·萨勒曼的诗转载于巴勒斯坦小说家Ghassan Kanafani，“Palestine, the 1936—1939 Revolt” (London: 1982)。

45. 本-古里安的日记转引自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London: Abacus, 2001), pp.403-404。

46. 对英国为打击阿拉伯起义而采取的这些和其他镇压措施的详细描述见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pp.415-443。另见Matthew Hughes, “The Banality of Brutality: British Armed Forces and the Repression of the Arab Revolt in Palestine, 1936—3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24 (2009)：313-354。

47. Harrie Arrigonie, *British Colonialism: 30 Years Serving Democracy or Hypocrisy* (Devon: Edward Gaskell, 1998)。本书描述了这些发生在他抵达白萨前一周的事件。Arrigonie也转载了被毁公共汽车和村民尸体的照片。阿拉伯人对这场屠杀的叙述来自Eid Haddad，他的父亲在15岁时目睹了这起暴行，但他将这次事件的发生日期定为1939年6月，见“Painful memories from Al Bassa,” http://www.palestineremembered.com。Ted Swedenburg从库威凯特村收集到了相似的叙述，见*Memories of Revolt: The 1936—1939 Rebellion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Past*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2003), pp.107-108。

48. 1939年白皮书转载于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531-538。

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1. Meir Zami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Lebanon*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15.

2. 与阿蒙同行的还有另一个马龙派教徒、一个逊尼派穆斯林、一个希腊东正教基督徒和一个德鲁兹人。Lyne Lohéac, *Daoud Ammoun et la Création de l'État libanais* (Paris: Klincksieck, 1978), p.73.

3. 阿蒙的陈述载于颇有影响力的《巴黎日报》（*Le Temps*），January 29, 1919，转载于George Samné, *La Syrie* (Paris: Editions Bossard, 1920), pp.231-232。

4. Ghanim's introduction in Samné, *La Syrie*, pp.xviii-xix.

5. Muhammad Jamil Bayhum, *Al-‘Ahd al-Mukhdaram fi Suriya wa Lubnan, 1918—1922* ［The era of transition in Syria and Lebanon］ (Beirut: Dar al-Tali'a, n.d.［1968］), p.109.

6. Ibid., p.110.

7. Lohéac, *Daoud Ammoun*, pp.84-85.

8. Bishara Khalil al-Khoury, *Haqa'iq Lubnaniyya* ［Lebanese realities］, vol. 1 (Harisa, Lebanon: Basil Brothers, 1960), p.106.

9. Lohéac, *Daoud Ammoun*, pp.91-92.

10. Alphonse Zenié, quoted in ibid., p.96.

11. Yusif Sawda, resident in Alexandria, cited in ibid., p.139.

12. Bayhum, *al-‘Ahd al-Mukhdaram*, pp.136-140.

13. Si Madani El Glaoui, cited in 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London: Hurst, 2000), p.176.

14.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p.190.

15. 被法国人逮捕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卡里姆（阿卜杜·克里姆）在拉希德·里达主编的期刊《光塔》（*al-Manar*）上发表了他的政见，见*al-Manar* 27, 1344—1345 (1926—1927)：630-634。英译本见C. R. Pennell, *A Country with a Government and a Flag: The Rif War in Morocco, 1921—1926* (Wisbech: MENAS Press, 1986), pp.256-259。

16. 转引自Pennell, *A Country with a Government*，源自阿卜杜·克里姆失败后法国人对部落民的采访，p.186。

17. Ibid., pp.189-190.

18. Ibid., pp.256-259.

19. Fawzi al-Qawuqji, *Mudhakkirat* [Memoirs of] *Fawzi al-Qawuqji*, vol. 1, 1914—1932 (Beirut: Dar al-Quds, 1975), p.81.

20. Edmund Burke III, "A Comparative View of French Native Policy in Morocco and Syria, 1912—1925," *Middle Eastern Studies* 9 (1973): 175-186.

21. Philip S.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The Politics of Arab Nationalism, 1920—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02-108.

22. Burke, "Comparative View," pp.179-180.

23. Abd al-Rahman Shahbandar, *Mudhakkirat* [Memoirs] (Beirut: Dar al-Irshad, 1967), p.154.

24. Al-Qawuqji, *Mudhakkirat*, p.84.

25. Al-Qawuqji, *Mudhakkirat*, pp.156-157.

26. Al-Qawuqji, *Mudhakkirat*, pp.86-87.

27. Ibid., p.89; Michael Provence, *The Great Syrian Revolt and the Rise of Arab Nationali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pp.95-100.

28. Siham Tergeman, *Daughter of Damascu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p.97.

29. Shahbandar, *Mudhakkirat*, pp.186-189.

30. Al-Qawuqji, *Mudhakkirat*, pp.109-112.

31.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2nd ed.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2005), p.69.

32. Gustave Mercier, *Le Centenaire de l'Algérie*, vol. 1 (Algiers: P&G Soubiron, 1931), pp.278-281.

33. Ibid., vol. 1, pp.296-300.

34. Ibid., vol. 2, pp.298-304.

35. Ferhat Abbas, *Le jeune Algérien: De la colonie vers la province* [The young Algerian: From the colony toward the province] (Paris: Editions de la Jeune Parque, 1931), p.8.

36. 根据Ruedy书中第111页的数据，有20.6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征召入伍，其中2.6万人战死，7.2万人受伤。Abbas称有25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征召入伍，其中8万人死亡；p.16。

37. Abbas, *Le jeune Algérien*, p.24.

38. Ibid., p.119.

39. Ibid., pp.91-93.

40. Claude Collot and Jean-Robert Henry, *Le Mouvement national algérien: Textes 1912—1954* [The Algerian national movement: Texts 1912—1954] (Paris: L'Harmattan, 1978), pp.66-67.

41. Ibid., pp.68-69.

42. Ibid., pp.38-39. 关于麦萨利，见Benjamin Stora, *Messali Hadj (1898—1974): pionnier du nationalism* algérien [Messali Hadj (1898—1974): Pioneer of Algerian nationalism] (Paris: L'Harmattan, 1986)。

43. 法案的全译本见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Affairs*, vol. 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504-508。

44. Al-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p.592.

45. Bishara al-Khoury, *Haqa'iq Lubnaniyya* [Lebanese realities], vol. 2 (Beirut: Awraq Lubnaniyya, 1960), pp.15-16.

46. Ibid., pp.33-52.

47. Khalid al-Azm, *Mudhakkirat* [Memoirs of] *Khalid al-'Azm*, vol. 1 (Beirut: Dar al-Muttahida, 1972), pp.294-299.

48. Tergeman, *Daughter of Damascus*, pp.97-98.

第九章　巴勒斯坦灾难及其后果

1. Communiqué of the Jewish Underground Resistance in Palestine, cited in Menachem Begin, *The Revolt* (London: W. H. Allen, 1951), pp.42-43.

2. 斯特恩的话转载于Joseph Heller, *The Stern Gang: Ideology, Politics and Terror, 1940—1949* (London: Frank Cass, 1995), pp.85-87。

3. Begin, *The Revolt*, p.215.

4. Ibid., pp.212-230.

5. *Manchester Guardian*, August 1, 1947, p.5, cited in Paul Bagon, "The Impact of the Jewish Underground upon Anglo Jewry: 1945—1947" (M.Phil. thesis, Oxford, 2003), pp.118-119.

6. *Jewish Chronicle*, August 8, 1947, p.1, cited in Bagon, "Impact of the Jewish Underground," p.122.

7. 转引自William Roger Louis,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485。

8. Charles D.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4th ed.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1) pp.190-192.

9. 转载于T. G. Fraser, *The Middle East, 1914—1979* (London: E. Arnold, 1980), pp.49-51。

10. *Al-Ahram*, February 2, 1948.

11. 卡西姆·利马维陪同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前往大马士革，向研究1948年巴勒斯坦大灾难的历史学家阿里夫·阿里夫讲述了他的经历，见al-Arif, *al-Nakba: Nakbat Bayt al-Maqdis wa'l-Firdaws al-Mafqud* ［The catastrophe: The catastrophe of Jerusalem and the lost paradise］, vol. 1 (Sidon and Beirut: al-Maktaba al-'Asriyya, 1951), pp.159-161。

12. Ibid., p.161. 阿里夫在脚注中提醒读者，另一些英国士兵加入了哈加纳的部队。

13. Ibid., p.168.

14. Ibid., pp.171-170.

15. 工厂主之子艾哈迈德·阿伊什·赫里勒和当时17岁的小农家之女阿伊莎·吉马·宰伊丹的证词，转载于Staughton Lynd, Sam Bahour, and Alice Lynd, eds., *Homeland: Oral Histories of Palestine and Palestinians* (New York: Olive Branch Press, 1994), pp.24-26。

16. Arif, *al-Nakba*, p.173。

17. Ibid., pp.173-174.

18. Ibid., pp.174-175.

19.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0.

20. Rashid al-Hajj Ibrahim, *al-Difa"an Hayfa wa qadiyyat filastin* ［The defense of Haifa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 (Beirut: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2005), p.44.

21. Ibid., p.104.

22. Ibid., pp.109-112.

23. 来自Khalil al-Sakakini，转引自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London: Abacus, 2000), p.508。

24. Morris,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p.141.

25. Avi Shlaim, *The Politics of Partitio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s, and Palestine,*

1921—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 John Bagot Glubb, *A Soldier with the Arab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p.66.

27. 转引自Fawaz Gerges, “Egypt and the 1948 War,” in Eugene Rogan and Avi Shlaim, eds., *The War for Palestin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59。

28. Avi Shlaim, “Israel and the Arab Coalition in 1948,” in ibid., p.81. 只有埃及军队在战争过程中大幅度增加了兵力，从最初的1万人增加到战争结束时的峰值4.5万人。Gerges, “Egypt and the 1948 War,” p.166.

29. Gamal Abdel Nass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Revolution* (Buffalo, NY: Economica Books, 1959), pp.28-29.

30. Constantine K. Zurayk, *The Meaning of the Disaster*, trans. R. Bayly Winder (Beirut: Khayat, 1956).

31. Musa Alami, “The Lesson of Palestine,” *Middle East Journal* 3 (October 1949): 373-405.

32. Zurayk, *Meaning of the Disaster*, p.2.

33. Ibid., p.24.

34. Alami, “Lesson of Palestine,” p.390.

35. Richard P. Mitchell,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

36. ‘Adil Arslan, *Mudhakkirat al-Amir ‘Adil Arslan* ［The memoirs of Amir ‘Adil Arslan］, vol. 2 (Beirut: Dar al-Taqaddumiya, 1983), p.806.

37. Avi Shlaim, “Husni Za‘im and the Plan to Resettle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Syria,”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5 (Summer 1986): 68-80.

38. Arslan, *Mudhakkirat*, p.846.

39. Mary 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09-213.

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1. Nawal El Saadawi, *A Daughter of Isis: The Autobiography of Nawal El Saadawi* (London: Zed Books, 2000), pp.260-261.

2. Nawal El Saadawi, *Walking Through Fire: A Life of Nawal El Saadawi* (London: Zed Books, 2002), p.33.

3. Anouar Abdel-Malek, *Egypt: Military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36.

4. Mohammed Naguib, *Egypt's Destiny* (London: Gollancz, 1955), p.101.

5. Anwar el-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London: Collins, 1978), pp.100-101.

6. Khaled Mohi El Din, *Memories of a Revolution: Egypt 1952*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5), pp.41-52.

7. Ibid., p.81.

8. Naguib, *Egypt's Destiny*, p.110.

9. Ibid., pp.112-113.

10. 萨达特在《寻找身份认同》（*In Search of Identity*）一书第107页表示，政变爆发时他正在电影院；穆希丁在《革命回忆录》（*Memories of a Revolution*）中记录了那场争吵和相关警察记录。

11. Mohi El Din, *Memories of a Revolution*, pp.103-104.

12. El Saadawi, *Walking Through Fire*, p.51.

13. 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p.121.

14. Naguib, *Egypt's Destiny*, pp.139-140.

15. Ibid., p.148.

16. Alan Richards, *Egyp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800—1980*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p.178.

17. El Saadawi, *Walking Through Fire*, pp.53-54.

18. Charles Issaw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table A.3, p.231.

19. 该数据转引自Naguib, *Egypt's Destiny*, p.168。

20. Richard P. Mitchell,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9.

21. Joel Gordon, *Nasser's Blessed Movement: Egypt's Free Officers and the July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79.

22. Mohamed Heikal, *Nasser: The Cairo Documents* (London: New English Library, 1972), p.51.

23.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112.

24. Hassan II, *The Challenge* (London, 1978), p.31，转引自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London: Hurst, 2000), p.263。

25. Leila Abouzeid, *Year of the Elephant: A Moroccan Woman's Journey Toward Independen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pp.20-21. 艾布·宰德的首部阿拉伯语小说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

26. Ibid., pp.36-38. 在这部小说英语译本的序言中，艾布·宰德写道："在整部作品中的主要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这些故事并不是我创造的，我只是简单地按事实真

相讲述了他们，而摩洛哥充满了尚未被讲述的故事。”

27. Ibid., pp.49-50.

28.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2005), p.163.

29.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pp.57-63.

30. Motti Golani, “The Historical Place of the Czech-Egyptian Arms Deal, Fall 1995,”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1 (1995): 803-827.

31.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p.68.

32. Ibid., p.74.

33. Ezzet Adel, quoted by the BBC, “The Day Nasser Nationalized the Canal,” July 21, 2006, 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5168698.stm.

34.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pp.92-95.

35. 转引自Shlaim, *The Iron Wall*, p.166。

36.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p.107.

37. 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政变密谋的细节，参见Wilbur Crane Eveland, *Ropes of Sand: America's Failur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W. W. Norton, 1980)。

38. El Saadawi, *Walking Through Fire*, pp.89-99. 伤亡数字转引自Heikal, *Cairo Documents*, p.115。

39. Heikal, *Cairo Documents*, p.118.

40. Abdullah Sennawi, quoted by Laura James, “Whose Voice? Nasser, the Arabs, and ‘Sawt al-Arab’ Radio,” *Transnational Broadcasting Studies* 16 (2006), http://www.tbsjournal.com/James.html.

41. Youmna Asseily and Ahmad Asfahani, eds., *A Face in the Crowd: The Secret Papers of Emir Farid Chehab, 1942—1972* (London: Stacey International, 2007), p.166.

42. 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07.

43. Khalid al-Azm, *Mudhakkirat* ［Memoirs of］ *Khalid al-Azm*, vol. 3 (Beirut: Dar al-Muttahida, 1972), pp.125-126.

44. Ibid., pp.127-128.

45.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p.323.

46. Avi Shlaim, *Lion of Jordan: The Life of King Hussein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Allen Lane, 2007), pp.129-152; Lawrence Tal, *Politics, the Militar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Jordan, 1955—1967* (Houndmills, UK: Macmillan, 2002), pp.43-53.

47. Eveland, *Ropes of Sand*, pp.250-253.

48. Yunis Bahri, *Mudhakkirat al-rahala Yunis Bahri sijn Abu Ghurayb ma' rijal al-'ahd al-maliki ba'd majzara Qasr al-Rihab 'am 1958 fi'l-'Iraq* ［Memoirs of the traveler Yunis Bahri in Abu Ghurayb Prison with the men of the Monarchy era after the 1958 Rihab Palace Massacre in Iraq］(Beirut: Dar al-Arabiyya li'l-Mawsu'at, 2005), p.17.

49. 这段叙述是一位目击者在艾布·格莱布监狱中向优尼斯·白哈里讲述的，见Bahri, *Mudhakkirat*, pp.131-134。

50. Ibid., pp.136-138.

51. Camille Chamoun, *La Crise au Moyen Orient* (Paris, 1963), p.423, 转引自Irene L. Gendzier, *Notes from the Mine Field: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and the Middle East, 1945—195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97-298。

52. Heikal, *Cairo Documents*, p.131.

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1. 转引自Malcolm Kerr, *The Arab Cold War: Gamal 'Abd al-Nasir and His Rivals, 1958—1970*,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1。

2. Mohamed Heikal, *Nasser: The Cairo Documents* (London: New English Library, 1972), p.187.

3. Mouloud Feraoun, *Journal 1955—1962*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2), p.156.

4. Ibid., pp.151-152.

5. 这个故事是阿尔及尔战役的另一位女性亲历者宰哈拉·德里夫讲述的，见Danièle Djamila Amrane-Minne, *Des Femmes dans la guerre d'Algérie* ［Women in the Algerian War］(Paris: Karthala, 1994), p.139。

6. Georges Arnaud and Jacques Vergès, *Pour* ［For］ *Djamila Bouhired* (Paris: Minuit, 1961), p.10. 哲米莱·布希里德是埃及导演优素福·夏因一部故事长片的主人公。

7. Amrane-Minne, *Femmes dans la guerre d'Algérie*, pp.134-135.

8. Alistair Horne, *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6), p.151.

9. 保尔·欧萨莱斯将军在其2001年出版的关于阿尔及尔战役的回忆录中，公开承认了使用酷刑的普遍程度，在法国国内也重新激起了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滥施酷刑的争议。这本书已被译为英语出版，标题为：*The Battle of the Casbah: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Algeria, 1955—1957* (New York: Enigma, 2002)。

10. Horne, *Savage War of Peace*, p.282.

11. Feraoun, *Journal*, p.274.

12. Ibid., pp.345-346.

13. Amrane-Minne, *Femmes dans la guerre d'Algérie*, pp.319-320.

14. Anouar Abdel-Malek, *Egypt: Military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287.

15. 转引自Laura M. James, *Nasser at War: Arab Images of the Enemy* (Houndmills, UK: Palgrave, 2006), p.56。

16. “毫无疑问，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门）北部的部落民……也在定期地收听开罗（的广播）。”见Paul Dresch, *A History of Modern Yem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7。

17. Ibid., p.86.

18. 转引自Mohamed Abdel Ghani El-Gamasy, *The October War: Memoirs of Field Marshal El-Gamasy of Egypt*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3), p.18。

19. Heikal, *Cairo Documents*, p.217.

20. Gamasy, *The October War*, p.28.

21. Anwar el-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London: Collins, 1978), p.172.

22.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239.

23. 转引自Gamasy, *The October War*, p.53。

24. Ibid., p.54.

25. Ibid., p.62.

26. Ibid., p.65.

27. Hussein of Jordan, *My “War” with Israel* (New York: Peter Owen, 1969), pp.89-91.

28. Michael B. Oren,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Penguin, 2003), p.178.

29. Hasan Bahgat, cited in Oren, *Six Days of War*, p.201.

30. BBC Monitoring Service, cited in ibid., p.209.

31. Ibid., p.226.

32. 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pp.175-176.

33. Ibid., p.179.

34. Ibid.

35. 关于纳赛尔（与以色列的秘密）外交，见Shlaim, *The Iron Wall*, pp.117-123；关于（约旦国王）侯赛因与以色列官员会谈的启动，见Avi Shlaim, *The Lion of Jordan: The Life of King Hussein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Allen Lane, 2007),

pp.192-201。

36. 萨拉赫·赫莱夫与埃里克·鲁洛合作，使用化名艾布·伊亚德发表了回忆录。见*My Home, My Land: A Narrative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1), pp.19-23。

37. 转引自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3。

38. Leila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3), pp.85, 88.

39. Mahmoud Issa, *Je suis un Fedayin* ［I am a Fedayin］(Paris: Stock, 1976), pp.60-62.

40. 本数据引自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Peac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78-179。

41.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p.107.

42. Abu Iyad, *My Home, My Land*, p.60.

43. Sayigh, *Armed Struggle*, p.203.

44.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p.112.

45. Ibid.

46. Ibid., p.124.

47. Ibid., p.126.

48. Ibid., pp.136-143.

49. Khalaf, *My Home, My Land*, p.76.

50.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p.174.

51. 转引自Peter Snow and David Phillips, *Leila's Hijack War* (London: Pan Books, 1970), p.41。

52. Heikal, *Cairo Documents*, pp.21-22.

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1.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446.

2. Ibid., p.500.

3. 例如，图雷基对一条阿拉伯输油管道的观点，见*Naql al-batrul al-‘arabi* ［Transport of Arab petroleum］(Cairo: League of Arab States, Institute of Arab Studies, 1961), pp.114-122。

4. Muhammad Hadid, *Mudhakkirati: al-sira‘ min ajli al-dimuqtratiyya fi'l- ‘Iraq*

［My memoirs: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Iraq］(London: Saqi, 2006), p.428; Yergin, *The Prize*, pp.518-523.

5. Yergin, *The Prize*, pp.528-529.

6. 转引自Mirella Bianco, *Gadhafi: Voice from the Desert* (London: Longman, 1975), pp.67-68。

7. Mohammed Heikal, *The Road to Ramadan* (London: Collins, 1975), p.70.

8. Abdullah al-Turayqi, *Al-bitrul al-'Arabi: Silah fi'l-ma'raka* ［Arab petroleum: A weapon in the battle］(Beirut: PLO Research Center, 1967), p.48.

9. Jonathan Bearman, *Qadhafi's Libya* (London: Zed, 1986), p.81; Frank C. Waddams, *The Libyan Oil Industry* (London: Croom Helm, 1980), p.230; Yergin, *The Prize*, p.578.

10. Ali A. Attiga, *The Arabs and the Oil Crisis, 1973—1986* (Kuwait: OAPEC, 1987), pp.9-11.

11. Al-Turayqi, *al-Bitrul al-'Arabi*, pp.7, 68.

12. Mohamed Abdel Ghani El-Gamasy, *The October War: Memoirs of Field Marshal El-Gamasy of Egypt*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3), p.114.

13. Ibid., pp.149-151.

14. Ibid., pp.180-181.

15. Riad N. El-Rayyes and Dunia Nahas, eds., *The October War: Documents, Personalities, Analyses, and Maps* (Beirut: An-Nahar, 1973), p.63.

16. 转引自Yergin, *The Prize*, p.597。哈立德·哈桑向阿兰·哈特讲述了同一故事："费萨尔说：'条件是你必须要坚持战斗很长时间，不能在几天后就要求停火。你战斗的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见*Alan Hart, Arafat: Terrorist or Peacemaker?*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84), p.370。

17. Heikal, *The Road to Ramadan*, p.40.

18. 盖迈西称，10月6日、7日分别有27架、48架以色列飞机被击落，这就意味着战争打响的最初两天共有75架以色列飞机被击落（第234页）。他宣称10月6日、7日以色列损失的坦克分别为120辆和170辆（第217、233页）。与整场战争的官方数据——以色列共损失了103架飞机和840辆坦克，阿拉伯军队损失了329架飞机和2554辆坦克——相比较，这些数字看来是可信的。见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321。

19. 转引自Yergin, *The Prize*, pp.601-606。

20. El-Rayyes and Nahas, *The October War*, pp.71-73.

21. Heikal, *Road to Ramadan*, p.234.

22. 以色列官方数据转引自Shlaim, *Iron Wall*, p.321。

23. Heikal, *Road to Ramadan*, p.275.

24. 转引自Hart, *Arafat*, p.411。

25. Ibid., p.383.

26. Ibid., p.379.

27. Uri Avnery, *My Friend, the Enemy* (London: Zed, 1986), p.35.

28. Ibid., p.52.

29. Ibid., p.36.

30. Ibid., p.43.

31. Ibid., p.44.

32. Lina Mikdadi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London: Onyx Press, 1979), pp.3-4, 116.

33. Hart, *Arafat*, p.411.

34. 阿拉法特演讲全文转载于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New York: Penguin, 1985)。

35. Hart, *Arafat*, p.392.

36. Patrick Seale, *Abu Nidal: A Gun for Hire* (London: Arrow, 1993), pp.162-163.

37. 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已登记的难民数据。正如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所指出的，登记是自愿的，因此登记难民的数量并非准确人口数据，而是少于难民实际人口数量。罗伯特·菲斯克称1975年黎巴嫩国内巴勒斯坦难民总数为35万，见*Pity the Nation: Lebanon at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3。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网站上公开的难民数据，见http://www.un.org/unrwa/publications/index.html。

38. Camille Chamoun, *Crise au Liban* ［Crisis in Lebanon］ (Beirut: 1977), pp.5-8.

39. Kamal Joumblatt, *I Speak for Lebanon* (London: Zed Press, 1982), pp.46-47.

40.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p.25.

41. Ibid., p.19.

42. Ibid., pp.20, 29.

43. Ibid., pp.53-54.

44. Saad Eddin Ibrahim, “Oil, Migration, and the New Arab Social Order,” in Malcolm Kerr and El Sayed Yasin, eds., *Rich and Poor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p.55.

45.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p.66.

46. Walid Khalidi,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Lebanon: Confront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60-62.

47. Ibid., p.104.

48.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p.114.

49. Jumblatt, *I Speak for Lebanon*, p.19.

50.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p.178.

51. 大饼骚乱发生于1977年1月18日和19日。见Mohamed Heikal, *Secret Channels: The Inside Story of Arab-Israeli Peace Negotiations*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6), p.245。

52. Ibid., pp.247-248. 关于利比亚对埃及入侵的看法，见Bearman, *Qadhafi's Libya*, pp.170-171。

53. Heikal, *Secret Channels*, pp.252-254. 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有一段相似的说法，见Anwar el-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London: Collins, 1978), p.306。

54. Boutros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pp.11-12.

55. Ibid., p.16.

56. Heikal, *Secret Channels*, p.259.

57.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p.17.

58. Heikal, *Secret Channels*, p.262.

59. Doc. 74, Statement to the Knesset by Prime Minister Begin, November 20, 1977, in *Israel's Foreign Relations: Selected Documents, vols. 4-5: 1977—1979,* 发布于以色列外交部网站：www.mfa.gov.il/MFA/Foreign＋Relations/Israels＋Foreign＋Relations＋since＋1947/1977—1979/。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60.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pp.134-135.

61. 统计数据转引自Saad Eddin Ibrahim, "Oil, Migration, and the New Arab Social Order," pp.53, 55。

62. Ibid., pp.62-65.

63.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pp.181-182, 189.

64. 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London: Saqi, 2000), pp.395-396.

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1. Gilles Kepel, *The Prophet and the Pharaoh: Muslim Extremism in Egypt* (London: Saqi, 1985), p.192.

2. Mohamed Heikal, *Autumn of Fury: The Assassination of Sadat* (London: Deutsch, 1983), pp.xi-xii.

3. Sayyid Qutb, "The America I Have Seen," in Kamal Abdel-Malek, ed., *America*

in an Arab Mirror: Images of America in Arabic Travel Litera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26-27.

4. Ibid., p.10.

5. Sayyid Qutb, *Ma'alim fi'l-tariq* ［字面意思为“路标”，英译本通常译作 *Milestones*（里程碑）］(Cairo: Maktabat Wahba, 1964). 该书有多个英译本，我所引用的版本是大马士革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出版日期不明）。此处的观点引自前言，第8-11页；第四章“沿着真主的道路进行圣战”，第55页；第七章“伊斯兰是真正的文明”，第93页。

6. Ibid., ch. 11, “The Faith Triumphant,” p.145.

7. Zaynab al-Ghazali, *Return of the Pharaoh: Memoir in Nasir's Prison* (Leicester, UK: The Islamic Foundation, n.d.), pp.40-41.

8. Ibid., pp.48-49.

9. Ibid., p.67.

10. 一名哈迪德的应召者向一名叙利亚法官讲述了他的经历，该讲述内容的法语译本转引自Olivier Carré and Gérard Michaud, *Les frères musulmans* ［The Muslim brothers］(1928—1982) (Paris: Gallimard, 1983), p.152。

11. Ibid., p.139.

12. 伊萨·易卜拉欣·法耶德在约旦被捕，被控参加了叙利亚派来杀害约旦首相的暗杀小组。他对泰德穆尔监狱屠杀事件的叙述转引自ibid., pp.147-148。

13. 《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记录了这一匿名目击者的叙述，转引自该报文章“Syrian Troops Massacre Scores of Assad's Foes,” June 25, 1981。

14. Thomas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London: Collins, 1990), p.86.

15. 转引自Robert Fisk, *Pity the Nation: Lebanon at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518。

16.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ibid., p.512。

17. 转引自ibid., pp.480, 520。

18. 转引自Augustus Richard Norton, *Hezbolla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

19. 关于马龙派和以色列的联盟，参见Kirsten E. Schulze, *Israel's Covert Diplomacy in Lebanon* (London: Macmillan, 1998), pp.104-124。

20. 关于沙龙的重构中东计划，参见Kirsten E. Schulze, *Israel's Covert Diplomacy in Lebanon* (London: Macmillan, 1998), pp.104-124。

21. Lina Mikdadi, *Surviving the Siege of Beirut: A Personal Account* (London: Onyx Press, 1983), pp.107-108.

22. Colonel Abu Attayib, *Flashback Beirut 1982* (Nicosia: Sabah Press, 1985), p.213.

23. Mikdadi, *Surviving the Siege of Beirut*, p.121.

24. Ibid., pp.132-133.

25. 引自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伊扎克·卡汉领导的“1983年贝鲁特难民营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的官方译本，第12、22页。

26. Selim Nassib with Caroline Tisdall, *Beirut: Frontline Story* (London: Pluto, 1983), pp.148-158.

27. Naim Qassem, *Hizbullah: The Story from Within* (London: Saqi, 2005), pp.92-93.

28. Ibid., pp.88-89.

29. 这份建党文件，即1985年2月16日发布的《真主党致黎巴嫩和世界上被压迫者的公开信》，全文转引自Augustus Richard Norton, *Amal and the Shi‘a: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Leban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7)，本文索引段落在第174-175页。

30. Fisk, *Pity the Nation*, p.460.

31. Norton, *Hezbollah*, p.81.

32. Abdullah Anas, *Wiladat “al-Afghan al-‘Arab”: Sirat Abdullah Anas bayn Mas‘ud wa ‘Abdullah ‘Azzam* ［The birth of the “Arab Afghans”: The autobiography of Abdullah Anas between Mas‘ud and Abdullah ‘Azzam］ (London: Saqi, 2002), p.14. 他出生于布·朱玛阿，在加入阿富汗“圣战”组织后，采用别名阿纳斯作为自己的姓氏。

33. 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简短传记见Thomas Hegghammer, “Abdallah ‘Azzam, the Imam of Jihad,” in Gilles Kepel and Jean-Pierre Milelli, eds., *Al Qaeda in Its Own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81-101。

34. Abdullah ‘Azzam, “To Every Muslim on Earth,” *Jihad* (他在阿富汗编辑的阿拉伯语刊物), March 1985, p.25.

35. Abdullah ‘Azzam, “The Defense of Muslim Territories Constitutes the First Individual Duty,” in Keppel and Milelli, pp.106-107.

36. 美国支持阿富汗“圣战者”的完整记录见Steve Coll,*Ghost Wars* (New York: Penguin, 2004)。卡特政府的援助数据在第89页，1985年的援助数据在第102页。

37. Anas, *Wiladat “al-Afghan al-‘Arab,”* p.15.

38. Ibid., pp.16-17.

39. Ibid., pp.25-29.

40. Ibid., pp.33-34.

41. Interview with Zaynab al-Ghazali, *Jihad,* December 13, 1985, pp.38-40.

42. Anas, *Wiladat “al-Afghan al-‘Arab,”* p.58.

43. Ibid., p.67.

44. Ibid., p.87.

45. Shaul Mishal and Reuben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Communiqués from the Intifada Underground*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1.

46. Azzam Tamimi, *Hamas: Unwritten Chapters* (London: Hurst, 2007), pp.11-12.

47. Sari Nusseibeh with Anthony David, *Once Upon a Country: A Palestinian Life* (London: Halban, 2007), p.265.

48. Ibid., p.269.

49. 该章程发布于1988年8月18日，此处引自art. 15。"Charter of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Hamas)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2, 4 (Summer 1993): 122-134.

50. Communiqués 1 and 2, in Mishal and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pp.53-58.

51.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272.

52. M. Cherif Bassiouni and Louise Cainkar, eds., *The Palestinian Intifada - December 9, 1987-December 8, 1988: A Record of Israeli Repression* (Chicago: Database Project on Palestinian Human Rights, 1989), pp.19-20.

53. Ibid., pp.92-94.

54. Hamas Communiqué No. 33, December 23, 1988, and UNC Communiqué No. 25, September 6, 1988, in Mishal and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pp.125-126, 255.

55. UNC Communiqué No. 25, September 6, 1988, in Mishal and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p.125.

56.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p.296-297.

57.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24.

58. 转引自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p.466。

59. Communiqué No. 33, December 23, 1988, in Mishal and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p.255.

60. Robert Hunter,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A War by Other Me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215.

第十四章　冷战之后

1. 关于阿萨德和哈巴什的原话，见Mohamed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An Arab View of the Gulf War*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2), pp.14-17。又见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 *The World Was Going Our Way: The KGB and the Battle for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pp.212-213。

2. Mohamed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pp.16-17.

3. 引自Zachary Karabell, “Backfire: U.S. Policy Toward Iraq, 1988-2 August 1990,” *Middle East Journal* (Winter 1995): 32-33.

4. Human Rights Watch, *Genocide in Iraq: The Anfal Campaign Against the Kurds*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 Human Rights Watch, 1993).

5. 1989年，伊拉克作家卡南·麦基亚用化名萨米尔·哈利勒发表了他的研究*The Republic of Fea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生动描述了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伊拉克的政治压迫。

6. Charles Tripp, *A History of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51.

7.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767.

8. 格拉斯皮和侯赛因面谈的文字转录转载于Phyllis Bennis and Michel Moushabeck, eds., *Beyond the Storm: A Gulf Crisis Reader* (New York: Olive Branch, 1991), pp.391-396。

9. Jehan S. Rajab, *Invasion Kuwait: An English Woman's Tale* (London: Radcliffe Press, 1993), p.1.

10.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pp.196-198.

11. Ibid., p.207.

12. Rajab, *Invasion Kuwait*, pp.55, 99-100.

13.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p.250.

14. Mohammed Abdulrahman Al-Yahya, *Kuwait: Fall and Rebirth*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p.86.

15. Rajab, *Invasion Kuwait*, pp.14-19.

16. Ibid., pp.73-74; Al-Yahya, *Kuwait: Fall and Rebirth*, pp.87-88.

17. Rajab, *Invasion Kuwait*, pp.43-45.

18. Ibrahim al-Marashi, “The Nineteenth Province: The Invasion of Kuwait and the 1991 Gulf War from the Iraqi Perspective” (D.Phil. thesis, Oxford, 2004), p.92.

19. Abdul Bari Atwan, *The Secret History of Al-Qa‘ida* (London: Abacus, 2006), pp.37-38.

20. “Declaration of Jihad Against the Americans Occupying the Land of the Two Holy Sanctuaries,” 转载于Gilles Kepel and Jean-Pierre Milelli, eds., *Al-Qaeda in Its Own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47-50。又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本·拉登的采访，载ibid., pp.51-52。

21.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pp.15-16.

22. Ibid., p.230.

23. Ibid.

24. Ibid., p.234.

25. Ibid., p.13.

26. Sari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A Palestinian Life* (London: Halban, 2007), p.318.

27. Rajab, *Invasion Kuwait*, p.181.

28. Theodor Hanf, *Coexistence in Wartime Lebanon: Decline of a State and Rise of a Nation* (London: I. B. Tauris, 1993), p.319.

29. Ibid., p.570.

30. Ibid., p.595.

31. Ibid., p.616.

32. Kamal Salibi, *A House of Many Mansions* (London: I. B. Tauris, 1988).

33.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337.

34. Hanan Ashrawi, *This Side of Peace: A Personal Accou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p.75.

35. Ibid., pp.82-84.

36.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342.

37. 海达尔·阿卜杜·沙菲的演讲稿全文转载于耶路撒冷媒体与传播中心网站，http://www.jmcc.org/ documents/haidarmad.htm。

38. 参加马德里会议的各代表团团长的开闭幕式发言转载于以色列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 .gov.il/MFA/Archive/。以色列历史学家认为沙米尔和斯特恩团伙的另两名领导人对贝纳多特的“谋杀负有真正的责任”，见Ilan, *Bernadotte in Palestine*, 1948 (Houndmills, UK, and London: Macmillan, 1989), p.233。

39.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p.500.

40. Ashrawi, *This Side of Peace*, p.212.

41. Ahmed Qurie (“Abu Ala”), *From Oslo to Jerusalem: The Palestinian Story of the Secret Negotiations* (London: I. B. Tauris, 2006), p.58.

42. Ibid., p.59.

43.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656-658.

44. Ashrawi, *This Side of Peace*, p.259.

45. Qurie, *From Oslo to Jerusalem*, p.279.

46.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547.

47. World Bank, “Poverty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Report No. 22312-GZ, June 18, 2001.

48. 修建新定居点违反了《奥斯陆二号协议》第31条，该条规定："在永久地位谈判取得结果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得启动或采取任何步骤改变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状况。"

49. B'tselem, the Israeli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Land Grab: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y in the West Bank," May 2002, p.8.

50. Ibid., pp.433-444.

51. Bob Woodward, *Bush at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p.35.

第十五章　21世纪的阿拉伯人

1. 乌萨马·本·拉登的这一电视讲话于2001年10月7日在半岛电视台播出。讲话的英译文本见英国广播公司网站："Bin Laden's Warning: Full Text," BBC, October 7, 2001, http:// news.bbc.co.uk/1/hi/world/south_asia/1585636.stm。

2. 该统计数字来自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转引自BBC，"Intifada Toll 2000—2005," BBC, last updated February 8, 2005, http:// 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3694350.stm。

3. 所有有关行政拘留、房屋毁损及隔离墙的统计数据均可参见"List of Topics," B'tselem.org, http:// www.btselem.org/english/list_of_Topics.asp。

4.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情报部门并不认同布什政府的评估。正如2016年《齐尔考特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联合情报委员会继续判定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的合作'不大可能'，也没有'可信证据'表明伊拉克向恐怖主义分子转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技术和专门知识。"见*Iraq Inquiry*, executive summary, paragraph 504, p.70。

5. 美军在伊拉克的伤亡数字见美国国防部网站：www.defense.gov/casualty.pdf。

6. "Bridging the Dangerous Gap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remark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Deputy Secretary Paul Wolfowitz at the World Affairs Council, Monterey, California, May 3, 2002).

7. Secretary Colin L. Powell, "The U.S.-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 Building Hope for the Years Ahead" (lecture delivered to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2).

8. Gareth Stansfield, *Iraq*, 2nd ed.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2016), pp.185-194.关于伊拉克3300万庞大人口，没有官方统计数据。201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什叶派占伊拉克总人口的比例多达60%—65%，余下的人口中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各占一半。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末的调查发现，51%的伊拉克穆斯林自称属于什叶派。

9. 非政府组织伊拉克罹难人数统计组织（Iraq Body Count）统计了媒体和官方报道的死亡人数，发表报告称2003—2011年间，共有近12万平民丧生，见"Documented Civilian Deaths from Violence," www.iraqbodycount.org/data base。联合国支持的伊拉克家庭健康调查研究小组估计，仅2003年3月至2006年6月期间，就有15.1万人死于暴力，见"Violence-Related Mortality in Iraq from 2002 to 2006,"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8 (2008): 484-493。

10. Micah Zenko, “Obama's Embrace of Drone Strikes Will Be a Lasting Legac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2016.官方报告的平民死亡人数在64—116之间，该统计遭到质疑。杰克·塞尔称有380—801名平民死于无人机轰炸，见Jack Serle, “Obama Drone Casualties Number a Fraction of Those Recorded by the Bureau,”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July 1, 2016。

11. Ala'a Shehabi and Marc Owen Jones, eds., *Bahrain's Uprising: Resistance and Repression in the Gulf* (London: Zed Books, 2015), pp.1-2.

12. Shehabi and Jones, *Bahrain's Uprising*, p.4.

13. Toby Matthiesen, *Sectarian Gulf: Bahrai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pring That Was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6-48.

14. 引自“Report of the Bahrai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originally delivered November 23, 2011, final revised version December 10, 2011, accessed online at http://www.bici.org.bh/BICIreportEN.pdf, pp.47-48。

15. Shehabi and Jones, *Bahrain's Uprising*, p.84.

16. “Report of the Bahrai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17. 转引自利比亚流亡小说家Hisham Matar的作品*The Return: Fathers, Sons and the Land in Between* (London: Penguin Viking, 2016), p.235。1990年，Matar的父亲因在政治上反对政权被利比亚安全部队绑架、关押，他在狱中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8. Robert F. Worth, *A Rage for Order: The Middle East in Turmoil, from Tahrir Square to ISI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6), p.107.

19. 这10个国家是巴林、埃及、约旦、科威特、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苏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16” (May 2016); Ahmad al-Haj, “Yemeni Civil War: 10,000 Civilians Killed and 40,000 Injured in Conflict, UN Reveals,” *Independent*, January 17, 2017.

21. Samar Yazbek, *A Woman in the Crossfire: Diaries of the Syrian Revolution* (London: Haus, 2012), p.4.

22. 人权观察在《2017年世界报告》中援引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有关伤亡和流离失所人数的说法，称截至2016年2月，已有47万人死亡，见“Syria: Events of 2016,” Human Rights Watch,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17/country-chapters/syria。

23. Jean-Pierre Filiu, *From Deep State to Islamic State: The Arab Counter-revolution and Its Jihadi Legacy* (London: Hurst, 2015); Fawaz Gerges, *ISIS: A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24. “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的阿拉伯语缩略语是“达伊什”（*Da‘ish*），而由于不确定“沙姆”的所指，西方世界既使用“ISIS”（IS in Iraq and Syria，即“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也使用“ISIL”（IS in Iraq and Levant，即“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

25. 埃及卫生部报告称在拉拜阿广场有638人死亡，人权观察称至少有817人遇害，而穆兄会称有2600人遇害。

26. Ashraf El-Sheri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 in Egypt” (paper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21, 2014).

原书索引

Abbas II, Khedive

Abbas, Ferhat

Abbas, Mahmoud

Abbas Pasha

Abbasid caliphate

Abduh, Muhammad

Abdulhamid II

Abdullah, King (formerly Amir)

Abdullah II, King

Abdulmecid I

Abouzeid, Leila

absolutism

Abu Ala (Ahmad Qurie)

Abu Dhabi

Abu Ghurayb Jail

Abu Musa

Abu Nidal Group

Abyssinian Campaign

Acheson, Dean

Acre

occupied by Muhammed Bey

siege of

Aden

Administrative Council of Mount Lebanon

Afghani, al-Sayyid Jamal al-Din al-

Afghanistan

Arab volunteers in

and Soviet Union

US war against Taliban

Aflaq, Michel

Ahmad, Imam

Ahmad Bey

Ahmad Pasha (Damascus)

Ahmad Pasha (Egypt)

Aida

Ain Rummaneh attack

Ait Ahmed, Hocine

Ajman

Al-Ahram

Al-Asifa (Fatah)

al-Istiqlal

al-Jami‘a al-Islamiyya

Al-Jazeera

al-Jihad

al-Liwa

Al-Muqattam

al-Nakba (The Disaster)

al-Qaida

al-Qaida in Iraq

al-Qai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l-Qastal

ALA

Alami, Musa

Alaoui sultans

Alawites

Aleppo

Alexandretta

Alexandria

British occupation

counterrevolution against the Arab Spring

riots

surrendered to British

Algeciras Conference

Algeria

abolition of slavery

Battle of Algiers

Code de l'Indigénat

destruction of piracy

Egyptian support for FLN

Evian negotiations

French citizenship rights

French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independence from Franc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LN)

OAS (Secret Armed Organization)

oil

Philippeville massacres

republic established
Sétif repression
Soviet influence
volunteers in Afghanistan
women's status
in WWI
Algerian Muslim Congress
Algerian War (1954-62)
Algiers
autonomy
Battle of
European trade
French occupation
as Ottoman vassals
siege of
Ali Bey
Allenby, General Lord
Amal
Amal militia
Amar, Abu

see Yasser Arafat

Amer, Field Marshal Abd al-Hakim

Amin, Ahmad

Amin, Muhammad VIII al-

Amin, Qasim

Amir, Yigal

Ammoun, Daoud

Anas, Abdullah

Anatolia

Anglo-Egyptian Evacuation Agreement

Anglo-Egyptian Treaty

Anglo-French Declaration

Anglo-Iraqi Treaty

Anglo-Jordanian Treaty

Anjar, battle of

Aoun, General Michel

Aqsa Mosque

Arab

high officials

Arab - *cont.*

journalism
language
religions
threat to Ottoman Empire
unity
volunteers in Afghanistan
Arab Higher Committee
Arab League
Arab Legion
Arab liberalism
rejection of
Arab Liberation Army (ALA)
Arab malaise
Arab Renaissance Party
see Ba‘th Party
Arab Revolt
Arab Socialist Union
Arab Spring
Bahrain
counterrevolution against

Egypt

Libya

Saudi Arabia

Syria

Tunisia

Yemen

Arab Union

Arab Women's Association

Arabi, Colonel

see Urabi

Arab-Israeli War (1948)

Arab-Israeli War (1956)

Arab-Israeli War (1967)

Arab-Israeli War (1973)

Arafat, Yasser

Aramco

Argov, Shlomo

Arguello, Patrick

Arif, Abd al-Rahman

Arif, Colonel Abd al-Salam

Arif, Arif al-

Arslan, Adil

Asad, Bashar al-

Asad, Basil al-

Asad, General Hafiz al-

Asad, Hafez al-

Asad, Rifa'at al-

Ashrawi, Hanan

Ashu, Mustafa

Asquith, Herbert

Assembly of Delegates

Aswan Dam

Atassi, Nur al-Din

Ataturk, Mustafa Kemal

Atrash, Pasha al-

Attiga, Ali

Atwan, Abdul Bari

Avnery, Uri

Ayn Dara, battle of

Ayyash, Yahya

Aziz, Abdul

Aziz, Moulay Abd al-

Aziz, Nawwaf bin Abdul

Azm, As‘ad Pasha al-

Azm, Khalid al-

Azm, Sulayman Pasha al-

Azm family

Azzam, Abdullah

Baalbek, siege of

Bab Zuwayla

Badr, Imam

Baghdad

Baghdad Pact

Baghdadi, Abu Bakr al-

Bahrain

    and Arab Spring

    constitution, 2002

    National Action Charter

Bahri, Yunis

Baker, James

Bakir Pasha

Balad, Shaykh al-

Balfour, Arthur

Balfour Declaration

Banna, Hassan al-

Barak, General Ehud

Barbarossa (Khayr al-Din)

Barbary Coast pirates/corsairs

Barber of Damascus

see Budayri

Baring, Sir Evelyn (later Lord Cromer)

Bar-Lev, General Chaim

Bar-Lev Line

Barudi, Mahmud Sami al-

Bashir II, Amir

Ba‘th Party

The Battle of Algiers

Bayhum, Muhammed Jamil

Beaufort d'Hautpoul, General Charles de

Bedouins

Begin, Menachem

Beilin, Yosse

Beirut

Airport bombing

bombarded by British

civil war (1975-76)

Israeli attacks on

and journalism

Marine barracks bombing

and Ottoman rule

PLO expelled

riots/demonstrations

sectarian massacres

see also Lebanon

Belen, battle of

Belhadj, M.

Bell, Gertrude

Ben Ali, Zine el-Abidine

Ben Arafa

Ben Badis, Abd al-Hamid

Ben Bella, Ahmed

Ben Gana, Bouaziz

Ben-Gurion, David

Benghazi

Benjedid, Chadli

Berbers

Bernadotte, Count Folke

Berri, Nabih

Bevin, Ernest

Bey, Muhammad al-Sadiq

Bin Laden, Osama

Bin Zayd, Sharif Shakir

Bitar, Salah al-Din

Black September

Black Letter

Black Saturday

Blair, Tony

Blignières, Ernest-Gabriel de

Blix, Hans

Blum, Léon

Blum-Viollette bill

BOAC

book of laws

Bouazizi, Basma

Bouazizi, Mohamed

Bouchard, Henri

Boudiaf, Mohamed

Bouhired, Djamila

Bouhired, Fatiha

Boumedienne, Houari

Bourgés-Maunoury, Maurice

Bourguiba, Habib

Boutros-Ghali, Boutros

boy levy

BP (British Petroleum)

Brezhnev, Leonid

Britain

and Alexandria

Anglo-Egyptian treaty

anti-Jewish riots

Battle of the Nile

colonial rivalry with France

condominium colonialism

and Cyprus

decline in Middle East

and Egypt

Entente Cordiale with France

Gambetta Note

and Gulf protectorates

gunboat diplomacy

and Ibn Saud

ignorance of Arab world

invasion of Iraq

and Iraq (Mesopotamia)

and Jordan

and Morocco

and oil

and Palestine

postwar plans for Ottoman Empire

RAF bombs Middle Euphrates

Red Line Agreement 239 reliance on oil

Suez Canal. *see* Suez Canal

and Suez Crisis

and Transjordan

Treaty of Preferential Alliance

in WWI

in WWII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Broadley, A.M.

Budayri, Ahmad al- (al-Hallaq)

Bugeaud, General Robert

Bulgarian Horrors

Bülow, Prince Bernhard von

Bunche, Ralph

Bush, George H.W.

Bush, George W.

Byron, Lord

Byzantine Empire

Cairo

bankruptcy

battle
Citadel massacre
counterrevolution against the Arab Spring
and journalism
Mamluks in
surrendered to British
Tahrir Square protests
Cairo Accord
CalTex
Camp David Accords (Carter era)
Camp David meetings (Clinton era)
Carbillet, Captain Gabriel
Carter, Captain (TWA)
Carter, Jimmy
Casablanca
Casablanca conference
Catherine the Great, Empress of Russia
Catroux, General Georges
Ceausescu, Nicolae
Cemal Pasha

Chamoun, Camille

Chancellor, Sir John

Charles V, Emperor

Charles X, King

Chehab, Amir Farid

Chemical Ali (Ali Hasan al-Majid)

Cherchel

Chevron

Churchill, Winston

CIA

Citadel massacre

Clayton, Sir Gilbert

Clemenceau, Georges

Clement, Marguerite

Clinton, Bill

Code de l'Indigénat

condominium colonialism

Congress of Berlin

Congress of the League against

Colonial Oppression

Constantine

Constituent Assembly

Constitutional Bloc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onstitutional reform

Consultative Council of Deputies

corporal punishment

corruption

cotton

Council of Four

Council of Ministers

Council of Ten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Cox, Lady

Cox, Lieutenant-Colonel Charles

Cox, Sir Percy

Crane, Charles R.

Crimean War

Cromer, Lord

see Baring

Crusader army (1249)

Crusaders

Cyprus

Damascus

- and Arab Spring
- under Azm rule

Damascus - *cont.*

- capture by Ibrahim Pasha
- captured by Mamluks
- corruption
- prostitution in
- riots
- sack of

Damurdashi, Ahmad Kathuda al-

Dayan, General Moshe

Dayr Yasin

de Bunsen, Sir Maurice

de Bunsen Committee

de Gaulle, General Charles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Declassé, Théophile

democracy promotion

Democrat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Denizli, Ahmad Agha al-

Dentz, General Henri

Deraa

Desmichels, General Louis

Deval, Pierre

devshirme

see boy levy

Dhahbour, Amina

Din, Khaled Mohi El

Din, Khayr al- (Barbarossa)

Din, Khayr al- (Tunisia)

Din, Muhi al-

Din, Zakaria Mohi El

Dinshaway Incident

Dir'iyya Agreement

Dir'iyya destruction

Disraeli, Benjamin

Dodge, David

Doria, Andrea

Druzes

Dubai

Dulles, John Foster

early colonialism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Eban, Abba

Eden, Anthony

Egypt

Abyssinian Campaign

administration

Alexandria riots

Ali Bey as ruler

Anglo-Egyptian treaty

anti-British strikes

Arab Socialist Union

and Arab Spring

Arab-Israeli War (1948)

Arab-Israeli War (1967)

army austerity

Assembly of Delegates

Aswan Dam

attack on Libya

as autonomous Ottoman province

Axis support in

bankruptcy

Ba‘th party

Black Saturday

bread riots

British occupation

Centr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clash with French culture

Communists

constitution of 1882

Constitution of 1923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Constitutions

Consultative Council of Deputies

counterrevolution against the Arab Spring

covert Israeli operations in

democracy

Dinshaway Incident

elections, 2011

elections, 2014

financial indemnity

foreign debt

foreign military asistance

Free Officers

French occupation

French savants in

Gambetta Note

industry

and Iraqi Revolution

and Islam

Islamic Republic campaign

Islamist trials

and Israel

January

Movement

joins League of Nations

joint British/French gunboat diplomacy

Liberation Rally

Mamluks in

military coup

Montgolfier balloon in

under Muhammad 'Ali Pasha

Muslim Brotherhood. *see* Muslim Brotherhood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ational Party

nationalism

Navarino Bay, battle of

Nile, battle of the

and Non-Aligned Movement

oil

under Ottoman rule

peasant conscription

printing presses introduced

reforms in 19th century

reforms under Muhammad 'Ali Pasha

relationship with France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

riots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s

Second Egyptian Crisis

and siege of Acre

and Soviet Union

Sudan campaign (1820-2)

Suez Canal. *see* Suez Canal

Suez Crisis. *see* Suez Crisis

support for FLN

Syria/Egypt union

Tahrir Square protests

Tamarod movement

and UAR

and United States aid

women in politics

women's rights

in WWI

and Yemen

see also Nasser; Sadat

Egyptian Feminist Union

Egyptian Gazette

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

Eisenhower, Dwight

Eisenhower Doctrine

Eitan, General Raphael

El-Al

Enver Pasha

Erakat, Saeb

Eshkol, Levi

Essebsi, Beji Caid

Esso

Ethiopia

European Colonial era

European commerce

European investment

Eveland, Wilbur Crane

Evian negotiations

Exodus

Exxon

Fahd, King

Fahmi, Ismail

Faisal II, King

Faisal, Saud al-

Fakhr al-Din

famine

Faqar, Zayn al-

Faqaris (Mamluks)

Faraj, Abd al-Salam

Farouq, King

Faruq, King

Fatah

Faud, King

Faud Pasha

Faydi, Sulayman al-

Faysal I, King (formerly Amir)

Faysal II, King

Fayyad, Isa Ibrahim

February 14 Youth Movement

Feraoun, Mouloud

Ferdinand of Aragon

Fez

Fez Convention

fida'iyin

Filastinuna

Filiki Etairia (Society of Friends)

financial indemnity

First Aliya

First Arab Women's Congress

First World War

First Zionist Congress

Fisk, Robert

FLN

see Algeri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ly-whisk incident

Ford, Gerald

Fourteen Points (Woodrow Wilson)

Framework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France

and Algeria

Algerian citizenship rights

Algerian War (1954-62) 407-18 colonial ambitions

colonial rivalry with Britain

colonialism in Middle East

Entente Cordiale with Britain

Evian negotiations

Gambetta Note

gunboat diplomacy in Egypt

ignorance of Arab world

and Indochina

and Lebanon

and Morocco

Nazi occupation

OAS (Secret Armed Organization)

opposition to Algerian War

relationship with Egypt

and Rif War

as seen by al-Tahtawi

and Suez Canal

Suez Crisis

and Syria

and Tunisia

Vichy government

Franjieh, Sulieman

Free Officers

Egypt

Iraq

Jordan

Libya

and Muslim Brotherhood

Free Syrian Army

French Charter of 1814

French Revolution

Friedman, Thomas

Fujayra

Galilee cotton

Gallipoli

Gamasy, General Abd al-Ghani El

Gambetta Note

Gaulle, Charles de

Gauthier, Monsieur (French official)

Gaza

Gaza Strip

Gaza-Jericho First plan

Geagea, General Samir

Gemayel, Amin

Gemayel, Bashir

Gemayel, Pierre

Genoa

Georges-Picot, Charles François

Germany

  and Morocco

  and Stern Gang

  in WWI

Ghanim, Shukri

Ghazali, Janbirdi al-

Ghazali, Zaynab al-

Gibran, Khalil

Gladstone, William

Glaspie, April

Glubb, General John Bagot (Glubb Pasha)

Goldstein, Baruch

Gorbachev, Mikhail

Gore, Al

Gouraud, General Henri

Great Mosque siege

Greek uprising

Guantánamo Bay Detention Camp

Guardians of Iraqi Independenc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ulf States, Western influence

Habash, George

Hached, Farhat

Hadi, Abed Rabbo Mansour al-

Hadi, Awni Abd al-

Hadid, Marwan

Hadj, Messali

Hafiz, Moulay Abd al-

Haganah

Haifa National Committee

Hakim, Yusuf al-

Hama

Hamas

Hamdy, Fayda

Hamid, Abdul II

Hamid, Abdul III

Hammami, Said

Hammer, Armand

Hamou, Hadj

Hananu, Ibrahim

Haniya, Ismail

Har Homa settlement

Haram al-Sharif (Temple Mount)

Hariri, Rafik

Hariri, Saad

Hasan, Khalid al-

Hasan, Moulay

Hasan Pasha

Hashemites

Hashim, Labiba

Hassan II, King

Heikal, Mohamed

Helmi, Ahmed

Henderson, Arthur

Hero of the Crossing

Herriot, Edouard

Herzl, Theodore 192 hijacking

Hijaz

- attacked by Wahhabis
- under Ottoman rule
- seized by Ali Bey
- seized by Ikhwan

Hijaz Railway

Hilmi II, Abbas

Hirschfeld, Yair

Hizb Allah

Hizbullah

Hobeika, Elie

Hocine, Baya

Holst, Johan Joergen

Holy Places Dispute (1851-2)

Homs, battle of

Hoss, Selim al-

Hrawi, Elias

Huda, Tawfiq Abu al-

Hugo, Victor

Hungarian Revolution

Husayn, Imam ibn Ali, Imam Husayn

Husayn, King (formerly Sharif ibn Ali)

Husayn, Kamil

Husayn Pasha

Husayni, Abd al-Qadir al-

Husayni, Hajj Amin al-

Husayni, Jamal al-

Husayni, Musa al-

Husayni, Musa Kazim al-

Husaynid beys

Husaynid Dynasty

Husayni/Nashashibi rivalry

Husayn-McMahon correspondence

Husri, Sati al-

Hussein, King

Hussein, Qusay

Hussein, Saddam

Hussein, Uday

Husseini, Faisal al-

Iberian Peninsula

    the Catholic Reconquista

Ibn Bishr

Ibn Iyas

Ibn Saud (20th century)

ibn Saud, Muhammed

Ibn Taymiyya

Ibn Tulun, Muhammed

Ibrahim, Ezzat

Ibrahim, Rashid al-Hajj

Ibrahim, Saad Eddin

Ibrahim Pasha

Ibrahimi Mosque killings

Ibrat Filastin

Idris I, King

Ikhwan

Ilah, Abd al-

inequality

Intellectual Association of Egyptian Women

Intifada

Iran

- an axis of evil
- Islamic Revolution
- oil
- threat of
- and United States

Iran-Iraq War

Iraq

- Abu Ghurayb prison
- Anglo-French Declaration
- Arab-Israeli War (1948)

an axis of evil

Ba‘th Party

bombed by RAF

British occupation

British postwar plans for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communal violence

Constituent Assembly

Constitution of 1925

de-Ba‘thification

elections, 2005

Free Officers

Iraqi Uprising (Revolution of 1920)

ISIS in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Kurds

Kurds

Iraq - *cont.*

Kuwait invasion/Gulf War (1990)

in League of Nations

military coup
nationalism
and oil
and OPEC
Red Line Agreement
Revolution
rioting
Saddam Hussein. *see* Saddam Hussein
Shiite uprising
Soviet influence
Treaty of Preferential Alliance
US invas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in WWI
Iraq Liberation Act
Iraqi Uprising (Revolution of 1920)
Irgun
Iron Hand Society
Isabella, of Castile
ISIS

Islam

and al-Tahwati

beliefs in

in Egypt

Hanbali school

and jahiliyya

in modern world

mysticism

need to update

Ottoman

and polytheism

Qur'an. *see* Qur'an

religious tolerance

rise of

and Tanzimat

Islambuli, Kalid al-

Islamic (sharia) law

Islamic Center

Islamic empires

Islamic Jihad

Islamic Resistanc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see Hamas

Islamic Revolution

Islamic Salvation Front (FIS)

Islamic State

Islamic State in Iraq

Islamists

Islamo-Progressives

Isma‘il Bey

Ismail, Shah

Ismail, General Ahmad

Ismail Pasha (later Khedive)

Israel

Arab relations established

Arab-Israeli War (1948)

Arab-Israeli War (1956)

Arab-Israeli War (1967)

Arab-Israeli War (1973)

armistice agreements with Arab states

attack on USS *Liberty*

Beirut Airport bombing

covert operations in Egypt

and Egypt

Hamas rocket attacks

invasion of Lebanon

Jordan-Israel peace treaty

missile attacks in Gulf War

occupation of Arab territory

Oslo Accords

Palestine occupation

Sadat's visit

Second Intifada

Separation Barrier

two-state solution

and United States

see also Palestine

Israeli-Lebanese Agreement

Issa, Mahmoud

Istanbul

Istiqlalis

Italy

occupies Libya

Jabarti, Abd al-Rahman al-

Jaffa massacre

jahiliyya

Jalili family

Janissaries

January 25 Movement

Jarida

Jerusalem

Jewish Agency of Palestine

Jewish Chronicle

The Jewish State

Jihad

Jihad, Abu

see Khalil al-Wazir

John, King of Abyssinia

Johnson, Lyndon

Jordan

Arab-Israeli War (1967)
Ba‘th Party
Britain in
and Egypt/Syria union
Free Officers
and Iraqi Revolution
Karamah
nationalism
oil
Oslo Accords
and Palestine
and Syria
Western influence
Jordan-Israel peace treaty
journalism
Jumblatt, Kamal
Jumblatt, Walid

Kabir, Ali Bey al-
Kader, Abdel
Kahan Commission

Kamil, Muhammad Ibrahim

Kamil, Mustafa

Kanj Yusuf Pasha

Kanuni

see Süleyman II

kanunname

Karak

Karamah

Karami, Omar

Karami, Rashid

Karbala, attacked by Wahhabis

Karmal, Babrak

Karzai, Hamid

Kassir, Samir

Kaylani, Rashid Ali al-

Keeley, James

Kemal, Namik

Khair Bey

Khalaf, Salah

Khaled, Leila

Khalid, King

Khalifa, Shaykh Hamad bin Isa A

Khalisi, Ayatollah al-

Khan, Mohammed Daoud

Khan Maysalun

Khartoum Summit

Khattabi, Muhammad Abd al-Krim al-

Khider, Mohamed

Khomeini, Ayatollah

Khoury, Bishara al-

Khurshid Ahmad Pasha

see Ahmad Pasha (Egypt)

Khusru Pasha

King, Henry Churchill

King David Hotel bombing

King-Crane Commission

King-Crane Report

Kissinger, Henry

Kitchener, Lord

Konya

Krim, Abd el-

Kristallnacht

Kubba, Muhammed Mahd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

Kurds

Kuwait

invasion

Lamoricière, General de

Lamothe, General de

Lampson, Sir Miles

Larsen, Terje Roed

Latif, Mahmoud Abd al-

Lavon, Pinhas

Lavon Affair

Lawrence, Colonel T.E.

Le Réveil

League of Nations

Lebanon

Amal militia

and Arab Unity

Ba‘th Party

colonial rul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Constitution of 1926

Constitutional Bloc

Constitutional change

Druze community

Eisenhower Doctrine

elections, 2005

elections, 2006

independence

internal disputes

and Iraq

Israel invades South Lebanon

Israeli invasion

joins United Nations

Maronite community

National Front

National Pact

nationalism

and Ottoman Empire

regional conflict

riots/demonstrations

Second Republic

secular parties

Shiites

South Lebanon Security Zone

and Syria

Taif Accord

troika

see also Arab-Israeli Wars; Beirut

Lehi

see Palestine

Lesseps, Ferdinand de

L'Étoile Nord-Africaine

Liberal Constitutional Party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Liberation Party

Liberation Rally

Libya

and Arab Spring

attack by Egypt

Free Officers

General National Congress

military coup

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

occupied by Italy

oil

under Ottoman rule

Qadhafi coup

Soviet influenc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ar in

Lieberman, Joe

Likud Party

Lloyd, Selwyn

Lloyd George, David

London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Levant

l'Orient

Louis IX, King

Louis Philippe, King

Lyautey, Marshal Hubert (and Lyautey system)

Macbeth

MacDonald, Ramsay

McMahon, Sir Henry

McPherson, Joseph

Madrid Conference

Maher, Ali

Mahmud I

Mahmud II

Majid, Ali Hasan al- (Chemical Ali)

Makhzan

Malek, Anouar Abdel

Maliki, Nouri al-

Mamluks

Mardam, Jamil

Marj Dabiq, battle of

Maronite Church

Maronite Phalangists

see Phalangists

Maronites

Martin, Cliff

martyrdom in Hizbullah

Massoud, Ahmad Shah

Massu, General Jacques

Matni, Nasib

Maude, General Sir Stanley

May 17 Agreement

see Israeli-Lebanese Agreement

Mecca

Medicis

Medina

Mehmed II (Mehmed the Conqueror)

Mehmed Rashid Pasha

Meir (Meyerson), Golda

Mello, Sergio Vieira de

Mercier (historian)

Mesopotamia

see Iraq

Middle East Defense Organization (MEDO)

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

Middle East Quartet

Mikdadi, Lina

see Lina Tabbara

Milestones

military coups

Milner, Lord

Mishaqa, Mikhayil

Mitija Plain

Moawad, René

Mobil

Mogador

Mohammed V, King

Mohammed VI, King

Moms

Mongols

Montefiore, Moses

Moriscos

Moroccan Question

Morocco
becomes Franco-Spanish protectorate
bomb attacks
Communists
France in
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Party (Istiqlal)
under Lyautey
nationalist movement
Rif War
Spanish interests in
Western influence
in WWI
Morsi, Mohamed
Mosul
Mount Lebanon
Movement of the Dispossessed
Movement of the Muslim Revolutionaries of the Arabian Peninsula
Moyne, Lord
Mubarak, Gamal

Mubarak, Husni

Muhammad (the Prophet)

ancestor of Abd al-Qadir

ancestor of Ahmad Urabi

as role model

Muhammad‘Ali Pasha

ambitions of

birth of

and Citadel massacre

founder of dynasty

as governor of Egypt

innovator in Egypt

invades Sudan

modernization

as Ottoman commander

and printing

and religious equality

threat to Ottomans

and Wahhabi campaign

Muhammadia Palace

Muhammed Bey Abu al-Dhahab

Muhammed Bey Quatamish

Munich Olympics attack

Murad, Sayyid

Murad IV

Murad Pasha

Murtagi, General Abd al-Muhsin

Muslim Brotherhood

Muslim Ladies' Society

Muslim Sisterhood

Mussolini, Benito

Mustafa Pasha

Mustafa Reshid Pasha

Mutawakkil III, caliph al-

Muzayrib

Nabulsi, Sulayman al-

Naguib, General Muhammad

Nagy, Imre

nahda (cultural renaissance)

Nahhas, Mustafa al-

Napier, Admiral

Napoleon (Bonaparte)

Napoleon, Louis (Napoleon III)

Naqib, Sayyid Talib al-

Nashashibi/Husayni rivalry

Nasif, Malak Hifni

Nasser, Gamal Abdel

Nasuh Pasha

National Bloc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Egypt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LN)

National Movement

National Pact

nationalism

NATO

Navarino Bay, battle of

Nazi atrocities against Jews

Nazli, Princess

Nelson, Admiral Horatio

Neo-Destour party

Netanyahu, Benjamin

New Order (Nizam-i Cecid) army

The New Woman

Nezib, battle of

Nile, battle of the

Nile Navigation Company

Nixon, Richard

Nizam-i Cecid (Nizami) army

Non-Aligned Movement

Nour, Ayman

Nubar Pasha

Numayri, Ja'far al-

Nuqrashi, Mahmud Fahmi al-

Nusra Front

Nusseibeh, Sari

OAS (Secret Armed Organization)

Obama, Barack

Occidental Petroleum

October War (Arab-Israeli War 1973)

Office of the Arab Maghrib

oil

in 1967 Arab-Israeli war

embargos

fires in Kuwait

location of reserves

multinational profits

royalties

in twentieth century

as a weapon

Omar, Mullah

OPEC

Operation Desert Storm

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

Operation Peace for Galilee

Oran, French occupation of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see OPEC

Oslo Accords

Osman III

Ottoman Empir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Albania

Ali Bey revolt against

Arab threat to

and Barbary pirates

battle of Navarino Bay

conquests (1516-17)

Constitution

corruption

decline in authority

and Druze

in Egypt

end of

and Enlightenment ideas

European threat to

in First World War

foreign debt

on good government

Greek uprising

and Hasa region

judiciary

in Lebanon

in Libya

and Mamluks

masscare at Gaza

and Mount Lebanon

Muhammad 'Ali Pasha threat to

and nationalism

Nizami troops

partition proposals

postwar plans for

Reform Decrees

reforms

reforms and Islamic doctrine

and religions

Russian War (1768-74)

Russian War (1877-78)

and Safavid Empire

Second Egyptian Crisis

slave embargo

and Spain

Tanzimat period

territorial losses

troops

and Wahhabi challenge

Ottoman Era

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 (PDA)

Ottoman-Russian War (Crimean War)

Oujda

Ourabah, M.

Pahlevi, Shah Mohamed Reza

Paice, Marvyn

Pakistan

Palestine

al-Nakba (The Disaster)

al-Qastal

Arab states invade

Arab-Israeli War (1967)

Beisin

British in

British reprisals

British soldiers hanged

conquered by Ibrahim Pasha

Dayr Yasi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economic decline

Haganah activity

Haifa captured

Irgun activity

Israeli occupation

as Jewish national home

Jews declare war on Britain

and Jordan

Karamah

King David Hotel bombing

Lehi (Lohamei Herut Yisrael)

liberation movements

medical convoy ambush

Oslo Accords

partition proposals

Phalangist atrocities
and PLO
population diversity
refugee resettlement
riots and demonstrations
Safad
Second Intifada
Stern Gang
UN Partition Resolution
UNSCOP report
White Paper
in WWI
Zionists in
see also Hamas; Israel
Palestine Liberation Army
Palestine Liberation Movement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see PLO
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PNC)
Palestine Student Union

Palestine War, 1948

Palestinian Authority

Palestinian Legislative Council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two-state solution

Palmerston, Lord

Pan Am

Paris Peace Conference

Passfield White Paper

Peace of Kütahya

Peace of Paris

peace process

Peel Commission

Peninsula Shield Force

People's Party (Egypt)

People's Party (Syria)

Peres, Shimon

Perpetual Treaty

Pétain, Marshal Philippe

Pflimlin, Pierre

PFLP

Phalangists

pharaohs

Philippeville massacres

Pineau, Christian

piracy

PKK (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LO

Pointe, Ali la

Polignac, Prince Jules d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see PFLP

Popular Front (France)

Port Lyautey

Porte

see Sublime Porte

Postwar (WWI) Settlement

Powell, Colin

The Prophet

prostitution in Damascus

Pundak, Ron

Putin, Vladimir

Qadhafi, Colonel Muammar al-

Qadhafi, Seif al-Islam

Qadir, Abd al-

Qadiriyya order

Qana

Qansuh al-Ghawri, al-Ashraf

Qasim, Brigadier Abd al-Karim

Qasimis (Mamluks)

Qassam, Izz al-Din al-

Qassem, Naim

Qatar

Qawuqji, Fawzi al-

Qazdughlis

Qur'an

    commentaries on

Qurie, Ahmad (aka Abu Ala)

Qusus, Awda al-

Qutb, Amina

Qutb, Muhammad

Qutb, Sayyid

Quwatli, Shukri al-

Rabat Summit

Rabin, Yitzhak

Radio Bari

Rahman, Moulay Abd al-

Rajab, Jehan

Ramadan, Taha Yassin

Raqqa

Ras al-Khaima

Rashidis

Reagan, Ronald

Red Line Agreement

Reform Decrees

refugees

- Syrian civil war

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

Rif War

Rifai, Samir al-

Rifqi, Uthman Pasha

Rightly-Guided Caliphs

Rigoletto

Riyad, Muhammad

Riyad Pasha

Riyadh Summit

Road Map

Rogers, William

Rommel, Field Marshal Erwin

Roosevelt, Franklin

Rothschild, Baron Edmond de

Russia

- postwar aims
- protects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 Syrian civil war intervention
- territorial claims
- threat to Britain
- *see also* Soviet Union

Russian Revolution

Russian War (1768-74)

Russian War (1877-78)

Sa‘ada, Antun

Saadawi, Nawal El

Sabah, Jabar al-Ahmad al-

Sabah, Saad al-

Sabra camp

Sa‘cd, Ma‘ruf

Sadat, Anwar

Sadr, Anwar

Sadr, Musa al-

Safavid Empire

Safwat, General Ismail

Sa‘id, Nuri al-

Said Pasha

Salafism

Salan, General Raoul

Saleh, Ali Abdullah

Salem, Salah

Salim Pasha

Salman, Abu

Salman, Isa bin

Salmun (Damascus prostitute)

San Remo conference

Sana‘a

Sanussi, Sayyid Muhammed Idris al- (Idris I)

Sarkis, Elias

Sarrail, General Maurice

Sartre, Jean-Paul

Sa‘ud ibn Abd al-Aziz

Saudi Arabia

  and Arab Spring

  bomb attacks

  and Houthi insurgency in Yemen

  oil

  Western influence

Saudi-Hashemite conflict

Saudi-Wahhabi confederation (18th century)

Saudi-Wahhabi confederation (20th century)

Sayfas

Sayyid, Ahmad Lufti al-

Schultz, George 528 scramble for Africa

Second Egyptian Crisis

Secret Armed Organization (OAS)

self-denying protocol

Selim I (Selim the Grim)

Selim II

Selim III

September 11 attacks

Sétif repression

Sèves, Colonel

Seymour, Admiral Sir Beauchamp

Shaf‘i, Husayn al-

Shafi, Haidar Abdul

Shahbandar, Abd al-Rahman

Shakespeare, William

Shamir, Yitzhak

Sha‘rawi, Ali Pasha

Sha‘rawi, Huda

Sharett, Moshe

sharia (Islamic) law

Sharifian Solution

Sharja tribe

Sharjah

Sharon, General Ariel

Shartouni, Habib

Shatila camp

Shaw Report

Shaykh al-Balad

see Muhammed Bey Qatamish

Shertok, Moshe

Shiba Farms

Shihab, General Faud

Shihab family

Shiite Crescent

Shiite uprising in Iraq

Shiqaqi, Fathi

Shirazi, Ayatollah al-

Shuqayri, Ahmad

Siba‘i, Mustafa al-

Sicily

Sidi Bouzid
Sidi Ferrush
Sidqi, Ismail
Sinai Disengagement Accords
Sisi, Abdel Fattah el-
Six Day War (Arab-Israeli War 1967)
slavery
- abolition by France
- and Barbarossa
- boy levy
- Ottoman slave embargo
- and Qur'an
- slave soldiers
- slaves released at Tunis
- Spanish soldiers
- and Suez Canal

social contract
Society of Young Ottomans
Solh, Riyadh al-
Souqi, Samir

South Lebanon Security Zone

South Yemen, Soviet influence

Soviet Union

in Afghanistan

in Cold war

collapse

and Egypt

and Iraq

and Iraq invasion

Nasser and Khrushchev

oil

and Syria

and Yemen

see also Russia

Soviet-American cooperation

Spain

and Morocco

Muslim rule in

siege of Algiers

Special Operations Squad (Palestine)

Stack, Sir Lee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Stern, Abraham

Stern Gang

Stone Pasha

Sublime Porte

Sudan

  British/Egyptian occupation

  invaded by Egypt (Muhammad'Ali Pasha)

  Mahdi's Revolt

  military coup (1969)

Suez Canal

Suez Canal Company

Suez Crisis (Tripartite Aggression)

Sufi orders

Sufism

suicide bombings

Sulayman, Sidqi

Süleyman II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law-giver)

Sulh, Riyad al-

Sultan Pasha (Pasha al-Atrash)

Sunni militants

Supreme Muslim Council

Sykes, Sir Mark

Sykes-Picot Agreement

Syria

Alawaite Mountains revolt

Aleppo military academy attack

Aleppo revolt

Arab Renaissance Party (Ba'th Party)

and Arab Spring

Arab-Israeli War (1948)

Arab-Israeli War (1967)

Ba‘th Party

Charter of 1930

CIA plot against

civil war

colonial rule

Communists

Egyptian rule

Egypt/Syria union

famine

and France

the Friday of Dignity

independence

Iron Hand Society

joins United Nations

and King-Crane Commission

Kurds

and Lebanon

military coup

Muhammad 'Ali Pasha and

Muslim Brotherhood

National Bloc

nationalism

occupied by British

occupies Beirut

oil

under Ottoman rule

refugees

Syria - *cont.*

riots/demonstrations

Russian intervention

Soviet influence

Tadmur Prison

Syrian Central Committee

Syrian General Congress

Syrian Legion

Syrian Revolt

Syrian Union Party

Taba summit

Tabbara, Lina

Tadmur Prison

Tafna Treaty

Tahtawi, Rifaʻa al-

Taif Accord/Agreement

Tal al-Zaʻtar

Talabani, Jalal

Taliban

Tall, Mustafa Wahbi al-

Tall al-Kabir

Tamarod movement

Tamimi, Azzam

Tangier(s)

Tanzimat period

Taqla, Bishara

Taqla, Salim

Tawfiq Pasha (later Khedive)

Tehran Agreement

Temple Mount

Tenet, George

Tergeman, Siham

Texaco

Thinni, Abdullah al-

Tiberias, siege of

Tlemcen

Topkapi Palace

torture

    abolition

Abu Ghurayb Jail/prison

in Algeria

following Urabi assassination plot

in Hama

in Kuwait

of Muslim Brothers

in Palestine

in Transjordan

of Zaynab al-Ghazali

Transjordan

air strikes on

Arab-Israeli War (1948)

and partition

tax strike

Treaty of Berlin

Treaty of Fez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Iraq/Soviet Union)

Treaty of Madrid

Treaty of Preferential Alliance

Tripartite Aggression (Suez Crisis)

Tripoli

troika

Troupes Spéciales (Syrian Legion)

Trucial States

Truman, Harry

Tumanbay, al-Ashraf

Tunbs

Tunis

    and Arab Spring

    bankruptcy

    Ottoman vassals

    Regency government

Tunisi, Khayr al-Din al-

Tunisia

    and Arab Spring

    constitution, 1863

    constitution, 2014

    demonstrations

    development projects

    elections, 2014

foreign loans
French occupation
and Khayr al-Din
Neo-Destour party
political transition
Western influence
Tunisian Constitution
Turaba
Turayqi, Abdullah al-
Turco-Circassians
Turcomans
Turkey
bankruptcy
bomb attack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as Sick Man of Europe
and Syrian civil war
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
Tussun Pasha
TWA

U Thant

Um al-Qaiwain

Umar, Zahir al-

Umayyad dynasty

unified Arab state proposal

Union of Arab Emirates

see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ted Arab Republic (UAR)

United National Command (UNC)

United Nations

Arafat visit

Emergency Force (UNEF)

Lebanon joins

and Libya

Partition Resolution (Palestine)

peacekeeping after Suez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42)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338)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60)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61)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62)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70)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78)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87)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UNSCOP)

Syria joins

and Syrian civil war

United Arab Emirates joins

UNSCOP report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Arab relations (after 1967)

attack on USS *Liberty*

CIA involvement

in Cold war

drone attacks

Eisenhower Doctrine

as Great Satan

invasion of Iraq

and Iran

and Israel

in Lebanon

Marine barracks bombing

Obama era

September 11 attacks

and Suez Crisis

and Syria

war on terror

Urabi, Colonel Ahmad

USS *Liberty*

Uthman Pasha

Verdi, Giuseppe

Vernet, Horace

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

Viollette, Maurice

Voice of the Arabs (radio station)

Wafd nationalist party

Wafdist Women's Association

Wafdist Women's Central Committee

Wahhab, Muhammad ibn Abd al-

Wahhabi

attack on Hijaz

attack on Karbala

attack on Mecca

attack on Medina

attack on Southern Iraq

attack on Taif

and Muhammad ‘Ali Pasha

as zealous warriors

Wahhabi-Saudi confederation

Wahhabism

Waldheim, Kurt

War of Attrition

Wazir, Khalil al-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Weitzman, Chaim

Weizmann, Chaim

West Bank

Wilhelm II, Kaiser

Will, George

Wilson, Sir Arnold

Wilson, Sir Charles Rivers

Wilson, Harold

Wilson, Woodrow

Wingate, Sir Reginald

Wolfowitz, Paul

Wolseley, Sir Garnet

women in politics

women's rights

World Bank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Worth, Robert

Yacef, Saadi

Yahya, Imam

Yahya, Mohammed al-

Yahya, Tahir

Yamani, Ahmad Zaki al-

Yassin, Ahmad

Yazbek, Samar

The Year of the Elephant

Yegen, Dawud Pasha

Yellow Fleet

Yemen

- and Arab Spring
- and China
- civil war
- and Egypt
- elections, 2012
- Houthi insurgency
- humanitarian crisis
- military coup
- and Nasser
- 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 as Ottoman vassals
- Saudi embargo
- Yemen Arab Republic declared

Yemen War

Yezidi, the

Yom Kippur War (Arab-Israeli War 1973)

Younes, Colonel Mahmoud

Young Algeria movement

The Young Algerian: From Colony to Province

Young Men's Muslim Association

Young Turks

Youssef, Moulay

Zaghlul, Sa‘d

Zahir Shah, King

Zahleh, siege of

Za‘im, Colonel Husni al-

Zarqawi, Abu Musab al-

Zaydanis

Zaydi Sect (Yemen)

Zaydis, the

Zeid, Prince

Zimala encampment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

Zionists

Ziyada, Mai

Zuaytir, Akram

Zurayk, Constantine

独霸中东

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

强敌环伺下的弹丸小国何以成为军工强国？

一份来自前线的调研报告，一部有血有肉的以色列史

THE WEAPON WIZARDS

How Israel Became A High-Tech Military Superpower



[以色列]雅科夫·卡茨 [以色列]阿米尔·鲍伯特——著

王戎——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独霸中东

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

[以色列]雅科夫·卡茨

[以色列]阿米尔·鲍伯特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9-17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以）雅科夫·卡茨（以）阿米尔·鲍伯特著；王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11

ISBN 978-7-213-09500-9

I. ①独… II. ①雅… ②阿… ③王… III. ①军事史-以色列 IV. ①E3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6958号

Copyright©2017 by Yaakov Katz and Amir Bohbo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W. Bernstein Corp.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

［以色列］雅科夫·卡茨 ［以色列］阿米尔·鲍伯特 著 王戎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丛书策划：王利波

营销编辑：陈雯怡 陈芊如

责任编辑：汪　芳

责任校对：陈　春

责任印务：程　琳

封面设计：张庆锋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9.125

字　　数：200千字

插　　页：6

版　　次：2019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500-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出版者言

当今的世界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将会走向哪里，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思考者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应该努力回应、解答的问题。出版者应该成为文明的瞭望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活，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新。出版“好望角”书系，正是我们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解答读者灵魂之惑、精神之惑、道路之惑的尝试和努力。

本书系所选书目经专家团队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好望角”，让读者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打开新的视野，突破一隅之见。当然，书中的局限和偏见在所难免，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非洲南部“好望角”本名“风暴角”，海浪汹涌，风暴不断。1488年2月，当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的船队抵达这片海域时，恰风和日丽，船员们惊异地凝望着这个隐藏了许多个世纪的壮美岬角，随船历史学家巴若斯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海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佳评推荐

以色列生存下来的方式非同寻常。在缺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以色列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成为农业和安全技术领域的强者。《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让我们看到，人是未来最宝贵的资源，让一片土地变得真正富饶的是一个个工人、战士和开拓者。

——以色列前总统和前总理　西蒙·佩雷斯

本书回顾与分析了以色列军队和技术部门创造与筹划的一系列具有颠覆性的武器和战略。卡茨和鲍伯特完美诠释了一个国家生存下来并开拓进取的秘密：追随圣经中基甸那样的军事天才，并培养各种“麻烦制造者”。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R.詹姆斯·伍尔西

如果没能在技术上领先对手很多步，以色列根本没法存活到今天。本书首次讲述了以色列是如何解决各种看似无法解决的技术挑战的。卡茨和鲍伯特是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优秀记者，只有他们才写得出这样既有权威性又才华横溢的作品。

——《创业的国度》作者之一　索尔·辛格

对于任何希望理解以色列及其军队的人而言，这都是一本必读之作。作为以色列最知名的两位国防事务记者，卡茨和鲍伯特生动地讲述了以色列如何在无尽的冲突中勇往直前并最终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的故事。

——以色列国防部前部长和国防军前总参谋长　沙乌勒·莫法兹中将

本书精彩地解释了以色列是如何成为全世界军事创新的重要起源地的。从用玩具飞机改装无人机到对伊朗发动网络战，《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为我们讲述了以色列的神奇故事。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

富有活力的创新文化使以色列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创业和科技驱动型经济体之一，而作者非常巧妙地阐释了这种创新文化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华尔街日报》

本书生动阐述了以色列发展成为军事强国的历史……如果将《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视为一部小说，它特别像霍雷肖·阿尔杰的作品；如果将其视为圣经故事，它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大卫同歌利亚间的战斗。

——《纽约时报书评》

身为军事记者和国防分析员的雅科夫·卡茨与阿米尔·鲍伯特回顾了以色列成为世界六大军火出口国之一的发展历程……讲述了这个两千年来没有国家的古老民族如何回到故土，面对重重困难，不仅生存下来，还实现了繁荣的故事。

——改革派犹太教网

引人入胜。

——《国家利益杂志》

本书内容十分丰富，从导弹防御系统到无人机，以色列在利润丰厚的军事科技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以至于改变了中东乃至全球战场的面貌。

——谢尔顿·科什纳，《以色列时报》

许多精确作战武器都源自以色列。本书为我们讲述了这个小国如何以及为何研发这些先进武器。

——《新亚特兰蒂斯》

为何这个弹丸小国能成为先进武器研发的先锋，在无人机、卫星、导弹防御系统、网络战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作者在书中很好地提出

并解答了这个问题。

——《生存》

非常精彩……作者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了以色列发展提升国防能力的历程。

——《美国思想家》

通过阅读《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我们可以真实感受到保卫犹太国之艰难……其中关于武器研发的内容不仅吸引人，还非常重要。

——《犹太杂志》

在许多领域，以色列取得了许多国家联合起来都难以取得的成就，其中有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复制。任何一位关心就业增长的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和任何一位致力于领导力和团队建设的首席执行官都应当学习这些经验。《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应当列入每一位行政人员、政治家和公司经理的必读书目当中。

——本·罗斯科，《以色列时报》

精彩绝伦……作者讲述的关于武器和创新的故事非常吸引人。

——《圣路易斯犹太之光》

本书介绍了现代军事世界一些鲜为人知的领域，很有启发性。

——《柯克斯评论》

卡茨和鲍伯特成功地为我们展示了以色列一直以来通过极具创新和有效的方式应对安全问题的独特文化。

——以色列鲁宾研究中心

译者序

以色列的传奇色彩无需更多笔墨渲染。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国短短几十年间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创造了诸多奇迹。谈到以色列军事，许多人都首先会想到高科技武器，如“梅卡瓦”坦克和“铁穹”防御系统。但这些武器是如何研发出来的？为什么成功研发出这些武器的是以色列，而不是其他国家？雅科夫·卡茨和阿米尔·鲍伯特所著的《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一书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本书原著于2017年出版。作为军事记者，两人长期跟踪和报道巴以冲突与地区军事动态；作为以色列公民，他们都拥有在国防军服役的独特经历。《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体现了两人10多年来的业务积累和学术思考，是了解以色列高科技武器的必读之作。卡茨1979年出生于美国，后来移民以色列，定居耶路撒冷。他曾担任以色列教育部前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的高级外交顾问，目前担任以色列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刊之一《耶路撒冷邮报》的主编，同时在哈佛大学教授新闻学。除了从事教学和新闻工作，卡茨积极尝试专著创作，他的第一本书《以色列和伊朗：影子战争》于2012年出版。鲍伯特也是以色列人，出生于1974年，长期在以色列各大报刊和媒体工作，先后在以色列《晚报》和瓦拉网担任军事记者和国防分析员。他在巴伊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军队、情报界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经常就以色列安全问题发表演讲和接受媒体采访。

在很多人心目中，以色列是“高科技武器”的代名词，但实际上，以色列在这方面起点很低，缺“小米”，少“步枪”，还没“子弹”。作者在《地下工厂》一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接下来，卡茨和鲍伯特从无人机、坦克、卫星、火箭弹拦截系统、情报机构、网络病毒和军火外交等方面介绍了以色列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在各个章节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武器系统研发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着重分析了高科技武器发展背后的驱动力。

第一，在作者看来，以色列所具有的历史背景和所处的安全形势是

发展高科技武器一个极为重要的动因。自建国以来，以色列面临的战争和冲突几乎从未停息，如果连续几周新闻没有报道任何袭击事件，以色列人反而会感到些许不适应。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孤独”的以色列人必须“不择手段”“先人一步”，正如书中引用的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辛贝特一位前任局长的话：“这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在别人约你吃晚饭前，先约他吃个午饭。”由于资源有限，他们无法靠数量取胜，只能凭借科技获取质量上的优势，这一理念从一开始就成为以色列国防安全战略的核心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的科研投入比例居全球之首，占国内生产总值约4.5%，在许多排名中均被列为全世界最具创新性的国家。庞大的科研投入中有大约30%用于具有军事性质的产品”。

第二，以色列人的“虎刺怕”精神和以色列等级观念的缺失也有利于创新。“虎刺怕”一词源于意第绪语，在日常生活中常被理解为“胡搅蛮缠”或“厚颜无耻”，但在本书中应该理解为“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译者曾在以色列留学和生活，在同以色列人交往时，书中提到的“虎刺怕”精神经常会让人感到难以适应，但用在做事上却非常管用。可以说，正是以色列人的“虎刺怕”精神导致以色列等级观念的弱化和缺失，而习惯打破等级制度的文化倾向又强化了以色列人“虎刺怕”式的民族性格。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士官敢同将军就一个问题争论，但在以色列，这事一点也不奇怪。

第三，移民社会为以色列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作者在介绍以色列人物时常常会用到“移民”一词：“莱纳特1921年出生于匈牙利，9岁时随家人移民到美国，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阿比·卡雷姆1937年出生于巴格达，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随家人移民以色列”。的确，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同地区的移民带来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而不同思想的碰撞往往能产生新的想法。在以色列内部，国防军是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发挥着重要的熔炉作用。以色列实行义务兵役制，年满18岁后，男性需服役32个月，女性需服役18个月，不管是基布兹成员，还是正统教徒，不管是美国移民，还是俄罗斯移民，都要穿上国防军的军装，朝夕相处，并肩作战。以色列的开国之父们早就看到了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会融合上可以发挥的巨大作用，并使之

成为一个弱化阶级差异和促进社会融合的绝佳场所。

第四，密切的军地关系也是以色列成为高科技军事强国的关键。以色列大多数高科技公司和军火公司的创始人与研发人员都有军队服役经历，有的甚至曾是军队高级指挥官，他们知道战场上军队需要什么样的武器。在离开国防军后，他们大多成为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的一员，随时可能被召回参加训练或参与行动，所以，他们一直同军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也离不开国防军的支持，国防军不仅为高科技产业输出人才，还输出技术，助推经济发展。

第五，美国因素在以色列成为军事强国的道路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色列诸多武器系统的研发都离不开美元。在建国后的多次战争中，美国几乎全都站在以色列一边，美以特殊关系得以形成：美国公开使用以色列军事设施，并帮助以色列修建半公开共享军事设施，进行军事情报搜集与预警合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还在以设立了军事代表处。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两国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1948—2014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额高达1200亿美元，其中75%用于购买美国商品。2007年，根据美以达成的有效期为10年的《安全合作协议备忘录》，美国同意为以色列提供3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016年9月，美国和以色列达成一项新的军事援助协议，从2018年起10年内为以色列提供约380亿美元的援助。包括“铁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都离不开美国的资助。当然，美以特殊关系也成为以色列同中国等国家开展军事外交和军火贸易的障碍。

对于一个经历了漫长的大流散和长期的反犹主义折磨的民族而言，“不安全感”已成为以色列“民族基因”的一部分，有的学者称之为“岛民心态”。在其作用下，只有通过不断发展军事科技，使自己的武器系统在技术上遥遥领先于本地区其他国家，以色列人才能获得“相对的安全感”。译者认为，这种深层次的不安全感也是促使以色列成为高科技军事强国的重要原因。但正如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其他国家或组织的军事技术也在飞速发展。比如，作为一个无人机大国，以色列已开始应对来自哈马斯和伊朗的无人机威胁；继以色列成功发射卫星后，2009年，伊朗成功将第一颗自行研制的“希望号”卫星发射到太空，2015年，又成功发射了一颗侦察卫星；当以色列成功借助“震网”病毒使伊朗的离心机瘫痪

后，伊朗也成立了自己的网络作战单位，每年投入10亿美元用于研发有效的攻击手段，连本书作者也承认，“两国间一场更大规模网络战的爆发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从作者的这些话中，我们一方面能体会到他们对以色列的信心，但另一方面又能感受到他们对未来的一丝忧虑。即便赢得未来所有的战争，以色列能做到毫发无损吗？能获得长久和平吗？可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以色列人仍将生活在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中，高科技军事强国的地位并不会实质性改变以色列的命运。在全书的论述过程中，两位作者就军事论军事，没有太多政治性判断，对于以色列如何解决地区冲突，如何应对未来必然出现的种种危机，他们并没有提供太多哲学层面的思考，这或许和两人都是记者出身有一定关系。我相信，在读完本书后，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位读者应该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

作者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介绍以色列的军火外交。面对国际社会的孤立，军火外交在打开外交局面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作者还解释了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事实上，“由于军队规模很小，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都很难通过常规采购刺激本土国防企业研发高端武器。因此，以色列国防企业生产的大多数产品都用于出口。只有这样，这些企业才能保持生产线的正常运行，并降低国防军的采购价格”。在某种程度上，正如2007年出版的《创业的国度》是以色列人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一次成功营销，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创业的国度》的一种补充，也可视为对以色列武器的一次营销尝试。但另一方面，武器一旦卖到其他国家，以色列就失去了绝对控制权。未来这些武器或技术是否会落到敌人手中？这也是以色列始终面对的一个窘境。

此外，我想谈一谈本书的一些特点。受以色列国防军保密要求的限制，本书对于武器本身的介绍难以深入，有时会给人意犹未尽之感。书中谈到的许多行动属于秘密行动，还未解密，所以作者经常会用到“据报道”这样的表达。此外，本书篇幅有限，只能展现最能体现以色列特点的武器系统，无法面面俱到，如果读者想深入了解，可以将本书当作路标，搜索和研读专门论述相关问题的书籍和文章。

本书看似是一本军事书，实则侧重历史，更多篇幅在讲述武器研发

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和事件，以及这些人物所展现出来的品质和精神。从这个角度看，本书提供了一条了解以色列历史和以色列人民族性格的线索，也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以色列史。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写作时的假想读者是对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国防军都有一定了解的人，因此，译者在文中添加了脚注，对部分专有名词进行了解释。为了让读者有更流畅的阅读体验，译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对以色列国防军做一简要介绍：

以色列国防军向来具有神秘色彩，从不公布军力和战略，但根据全球军力（Global Fire Power）2019年的数据，以色列现役军人大约有17万人，预备役部队大约有44.5万人。

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为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地下武装组织“哈加纳”（Haganah，希伯来语中“防御”之意）。1948年建国后不久，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结束了哈加纳的“秘密地位”，成立以色列的官方军队——以色列国防军。包括伊尔贡、莱希在内的地下组织也并入国防军。

以色列国防部负责以色列国家防卫事务，其办公室位于特拉维夫的基尔亚（HaKirya），书中提到的“波尔”指挥中心就位于此。国防部部长由文职政治家担任，被认为是以色列内阁的二号人物。安全历来是以色列的头等大事，因此总理有时兼任国防部长，许多国防部长后来也成了总理。

总参谋部（希伯来语简写音译为马特卡尔）全面负责陆、海、空三军作战指挥和训练。总参谋长实际上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司令，也是全军唯一一名中将。总参谋长在国防部部长的推荐下由政府内阁任命，直接向国防部部长汇报工作。以色列总参谋长影响力很大，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和巴拉克都曾担任总参谋长。本书前言中提到的总参谋长甘茨2015年卸任后组建蓝白党，参加了2019年以色列大选，成为有望打破内塔尼亚胡长期统治的有力竞争者。

以军实行“总参谋部—战区（军种）司令部—师”三级指挥体系。通常情况下，以军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通过战区司令部和海军、空军司

令部对所属的陆、海、空三军实施逐级指挥，较之世界其他国家军队，以军指挥链更短，效率更高。总参谋部下设六个部、四个战区司令部和海、陆、空三军。总参六部分别为计划部、作战部、军事情报部、人力资源部、C4I（C4I是指挥、控制、通信、电脑和情报的集成）部和科技后勤部；四个战区司令部分别为北部战区司令部、中部战区司令部、南部战区司令部和后方司令部。总参谋部的直属单位还包括军事法院、军事学院等。2011年，以色列军方宣布成立“纵深司令部”，负责在伊朗等地实施特种作战。纵深司令部实际上是一个设在总参谋部的指挥部，负责指挥以色列精锐侦察部队和特种部队。

以色列陆军人数最多，包括步兵、装甲兵、炮兵、工兵和战场情报搜集兵（战场情报搜集兵不同于军情部下属的情报部队）等。步兵中最精锐的为伞兵旅，许多以色列人都以当过伞兵为荣；其他知名步兵单位包括戈兰旅、南部的纳哈尔旅以及吉瓦提旅，这些军事单位在建国以来的各大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以色列空军被认为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空军力量。以色列空军在20世纪70年代前主要使用法国制造的战斗机获取战场制空权。70年代后，开始大规模换装美制飞机，同时以色列开始尝试自行设计战斗机。2016年，美国将首批F-35战斗机交付以色列，逐渐取代之前的F-16战斗机。

20世纪50年代末，在法国的协助下，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的迪莫纳建立了核武器设施。但以色列采取“核模糊”政策，既谋求核威慑，也规避“国际合法性”的问题。通过“海豚”级潜艇、“杰里科”导弹和战斗机，以色列理论上能够通过海、陆、空实现核武器投放。

以色列实行义务兵役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兵进入作战部队，这成为以军一大特色。以色列的义务兵役仅限于犹太人、德鲁兹人和切尔克斯人等民族，不征召阿拉伯人服义务兵役。极端正统教派的犹太人通常推迟服役，直到超出法定服役年龄，这种做法起源于本-古里安时代，现在争议很大，成为不同政党间的矛盾焦点之一。以色列军人服完义务兵役后，退出现役，成为预备役人员，也可在服役期快满时提出申请，继续和军队签订合同，成为职业军人。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的规模更大，组织结构更为稳定，它们保持着现役时期的上下级关系、武

器装备和训练模式，在战时能迅速转化为战斗力。

以色列由于国小人少，平时无力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因此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就创立了高效的动员机制，在军队和地方都有相应的动员机构；由于在世界其他地方还分布着大量犹太人，以色列还拥有一套吸收海外犹太人参军入伍的制度。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48小时后，国防军动员了约30万预备役人员，约占当时总人口的7.9%，使总兵力由11万人迅速增加到40余万人，为以色列转败为胜奠定了兵力基础。但近年来，由于爆发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以色列对预备役人员进行大规模动员的可能性也随之下降。

国防安全战略以国家目标为基础，以色列的国家目标包括确保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以色列国的犹太性和民主性、以色列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以色列在地区和国际上地位的稳固和提高。从总体上看，以色列国防安全战略的内容包括先发制人、速战速决、威慑战略、武器质量优势、高度戒备与快速动员。

人们一般认为以色列三面受敌，地缘政治环境极为恶劣，但实际上，以色列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分别同埃及、约旦实现和平，“阿拉伯之春”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实力大减，周边紧张局势大幅改善。目前以色列面临的直接威胁主要来自南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北边黎巴嫩的真主党和更遥远的伊朗，其中对以色列威胁最大的还是伊朗，尤其是伊朗导弹的威胁。基于以色列周边和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未来以色列国防军的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维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力；对威胁来源保持实时情报覆盖；维持空军在中东地区的绝对优势；提供多层次的防空体系；提高静态防御能力，限制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地道等途径向以色列渗透；继续维持袭击远距离大量目标的能力；维持部队的科技优势。

在对外关系上，以色列和美国、法国、印度、德国、英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都存在较为密切的军事关系。但毫无疑问，目前以及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美国都将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国和以色列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自两国建交以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以色列也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支点。其实，

不只是高科技军事武器，这个国家和民族很多方面都值得学习。虽然中以关系的发展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限制，但作为两个最为古老的民族，我们一方面应该吸收各自古老文明的智慧，一方面应该不断开拓创新，探索出一条长久的合作共赢之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最后，我想在此感谢在翻译本书过程中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师长和朋友，其中包括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武官张溯大校、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副教授刘海龙、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讲师李志博、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修光敏和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汪芳。

王戎

2019年10月

序言

本书源于我们两人在2012年春天的一次对话。当时，“铁穹”（Iron Dome）防御系统刚刚在加沙地带的作战中证明了其有效性，以色列在其他科技领域也突飞猛进。不过以色列的敌人同样如此：2012年2月，伊朗将其第三颗卫星独立送入太空；叙利亚旷日持久的内战仍在继续；邻近的黎巴嫩真主党[(1)]则利用这一地区形势继续囤积火箭弹，其数量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作为以色列资深军事记者，我们两人每天都在报道以色列国内、周边和整个地区频繁爆发的事件与冲突，但我们总感觉这个故事讲述得还不够完整。以色列军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拥有新型无人机、隐形飞机和潜艇，以色列导弹的精度越来越高，坦克的防护能力也越来越强。但以色列敌人的军事能力也在提升，特别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这场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多年来我们一直重点关注以色列军事。我们两人都是以色列国防军的老兵，现在仍在预备役部队服役。我们不仅是以色列所处冲突的观察者，也是参与者。在第二次因提法达[(2)]、以色列撤出黎巴嫩行动、以色列撤出加沙行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和国防军在加沙地带的多次行动中，我们都身临前线进行采访，有时甚至深入敌后。

由于工作原因，我们登上过以色列的潜艇和导弹舰，坐过以色列的直升机和C-130运输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3)]的黎明前突袭中，还和以色列国防军步兵并肩坐在装甲车里。

我们长期关注以色列国防军的变化和发展，观察这支军队如何适应新的威胁和挑战，不管是巴勒斯坦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真主党火箭弹还是伊朗核计划。近年来，中东地区空前混乱，以军也变得更为警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地区形势发生剧烈变化，以色列南部和北部边界外出现了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新的敌人。

以色列极度依赖它长期以来努力创造的威慑力。我们认为这种威慑力有三个核心支柱：以色列可能存在的核武器能力、以色列和美国的战

略联盟关系以及国防军的常规作战能力。

这是第一本专门讲述以色列如何在军事领域研发和创造高新技术与尖端武器的书。从建国到今天，这个国家一直面临着来自整个地区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本书的内容在时间上涵盖了整部以色列国的历史。

为了把故事讲好，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是根据以色列擅长的技术和武器将书分为不同章节。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遵循时间顺序原则，但有时也会在时间轴上来回跳跃，比如从20世纪60年代跳跃到当下，然后又跳回60或70年代。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每一种武器是如何诞生的，发明者是谁，是什么让这些人和这些技术如此与众不同。本书中每个章节都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而组合在一起则能构成一幅更为庞大和全面的图景。

(1) 该组织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地区，受伊朗和叙利亚支持。——译者注

(2) 因提法达是Intifada的音译，在阿拉伯语中是“抖落”“摆脱”的意思，指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对以色列人发动的大起义。有时也译为“巴尔斯坦大起义”，本书采用音译的方法。——译者注

(3) 以色列于1967年从约旦手中夺得的位于约旦河以西的领土，圣经时代称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译者注

目录

出版者言
佳评推荐
译者序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地下工厂
第二章　“玩具”飞机
第三章　无敌装甲
第四章　侦察卫星
第五章　反导科技
第六章　情报系统
第七章　网络病毒
第八章　军火外交
结语　末日战场
致谢
注释
原书索引
返回总目录

前言

“把望远镜给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本尼·甘茨中将吩咐他身旁的军官。他将眼睛对准目镜，对焦到几英里外的画面，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甘茨正在卡比尔山上做着他最爱做的事：进行区域评估，观察这个他要保护的国家的每一寸土地。

向北望去，他清楚地看到叙以边境上黑门山白雪皑皑的山峰。向东转90度，他看到约旦，把望远镜角度调低一些，还可以看到居住有13万巴勒斯坦人的小城纳布卢斯。

从望远镜中看到的这些画面在提醒他：以色列太小了！甘茨站在那感慨道：这里根本没有战略纵深可言，敌人近在咫尺。

“那是什么？”甘茨向地区旅旅长尼姆罗德·阿洛尼问道。和总参谋长一样，阿洛尼的军旅生涯也是从伞兵部队开始的。甘茨用手指着那个方向说道：“那里！那个满是窗户的白色大型建筑是……？”

阿洛尼把挂在胸前的枪挪到一边后，也拿起望远镜对焦，然后说道：“哦，那是一个商场。”

纳布卢斯不是普通的巴勒斯坦城市。在始于2000年的那场被称为第二次因提法达的骚乱中，纳布卢斯成为以色列通缉犯的大本营。当时甘茨所指挥的师专门负责约旦河西岸的安全，来自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1]的激进分子在纳布卢斯老城（也称为卡斯巴城）的石头迷宫中建立了许多炸弹实验室和指挥所。卡斯巴城最早由罗马人修建，后来经马穆鲁克人和土耳其人扩建，拥有复杂的地道网络和隐蔽的藏身处，为逃亡的激进分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以色列国防军经常被派到这座城市实施突击行动，搜捕激进分子。但近年来，纳布卢斯发展迅速，激进主义处于历史低点，国防军也明显减少了在这座城市的活动。

第二次因提法达之后的几届以色列政府，都试图同巴勒斯坦人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2008年，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向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解决方案，但遭拒绝。2009年，为了重启和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同意冻结定居点建设，这是以色列前所未有的举动。最终，虽然双边对话得以重启，但还是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2012年甘茨此次视察边境时，位于纳布卢斯的巴勒斯坦证券交易所的指数创下新高，而当时阿拉伯世界的证券市场普遍处于熊市。因新一轮和平谈判即将开始，人们对此抱有很大希望。

当然，甘茨这时视察约旦河西岸还有另一个目的。

几年前，发生在突尼斯的街头抗议活动像野火般迅速蔓延，“阿拉伯之春”由此诞生。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被捕并被处决；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埃及的统治被推翻；巴沙尔·阿萨德开始同反政府武装作战，叙利亚这场血腥和充满争议的内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伊斯兰国”和全球“圣战”组织的崛起；在黎巴嫩，真主党不断囤积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支威胁以色列的力量不再只是游击队，而逐渐成为一支成熟的武装力量。

以色列国防界很担心这种不稳定局势会继续蔓延，甘茨想要确保约旦河西岸的稳定，如果不能，以色列国防军必须时刻做好作战准备。

甘茨一开始并非总参谋长的人选，但由于第一人选被认为资历不够，他很意外地获得了这个职位。

所以，已经退休的甘茨被召回，穿上熟悉的军装，接受了这一要职。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本尼·甘茨中将在2011年一次军事训练中和战士们谈话（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他曾和人们说：“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我的战士们待在前线。”

听取了几个军情简报后，视察结束。甘茨登上他那辆装甲吉普车的后座，准备前往附近的直升机停机坪。他的随从参谋开始有些紧张，和往常一样，甘茨在时间上已落后于行程安排。吉普车离开基地，开上一条颠簸小路，绕过小山，从车上可以看到山上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定居点房屋的外墙都被刷成白色，屋顶都是红色的。

“停车！”甘茨突然对司机说道。

“怎么了？”司机望着眼前径直穿过约旦河西岸中心地带的荒无人烟的道路。

总参谋长语气更加坚定地重复道：“停车。靠边停在那吧。”

司机迅速一脚刹车，将车停了下来。

总参谋长对随从参谋说：“给我接通尼姆罗德。”尼姆罗德就是刚才陪同他视察的地区旅旅长。接通后，甘茨拿起电话说道：“尼姆罗德，我的吉普车被路边炸弹击中，我受伤了，我的一名战士被劫持。”阿洛尼还没来得及回答，甘茨就挂掉了电话。

甘茨走下吉普车，看了看他那块银色的百年灵手表，然后坐在旁边

一块石头上。他捡起一根树枝，抖落上面的尘土，一边用手折树枝一边说道：“现在我们开始等他们。”

几分钟后，一群全副武装的战士出现在道路上，开始搜寻“被劫持”的战友；几辆军用悍马吉普车开到附近的高地，车上装有显示附近所有军力部署情况的等离子显示屏；天上还传来无人侦察机的引擎声。

时间在流逝，甘茨一边看着这些战士，一边看着自己的手表。10分钟后，阿洛尼出现在他跟前，但甘茨并没太多话要同他说。

“好吧，辛苦了，再见！”说完，他登上吉普车，只留下一团扬起的尘土。

这只是甘茨一个普通工作日，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中东局势极为混乱，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必须确保部队能够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

甘茨说：“鉴于地区的不稳定程度，下一次战争来临时，我们很可能没有太多预警时间。但我们会获得胜利，因为我们的战士已做好准备，他们还拥有最好的科技支持。”

以色列有不少军事科技在国际军火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从那天下午甘茨组织的突击演习中我们已经可以领略到几分以色列军事科技的风采。

首先赶到现场的悍马吉普车内配备的等离子显示屏是国防军所使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这一具有革命性的系统被称为“查亚德”（Tzayad），希伯来语中是“猎手”的意思。该系统工作原理同全球定位系统（GPS）导航类似，但不同于导航系统，它能够精确显示所在地区所有军力的确切位置，并能够区分友军和敌军。如果一名战士发现一个敌人的位置，他只需在电子地图上标注该敌人的位置，这一信息就可以马上出现在该系统所有用户的屏幕上。

这一科技正在改变作战方式，带来明显的战场效果，它大大缩短了从发现敌人到开火之间所需的时间（也称为“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周期）。“查亚德”系统的准确性及其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成功运用已被广泛

认可。2010年，澳大利亚为采购该系统支付了3亿美元；2014年，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投入1亿美元购买该系统。

在营救“被劫持”士兵的演习中，匆忙跑到现场保护总参谋长的战士所持的是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IWI）研发的“塔沃尔”（Tavor）突击步枪。由于重量轻、精度高、尺寸小，“塔沃尔”突击步枪已取代美式M-16突击步枪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首选武器。自从该步枪在以色列服役以来，从哥伦比亚到阿塞拜疆，从马其顿到巴西，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甘茨那辆在假想中被炸弹袭击的吉普车装备有普拉桑·撒萨公司设计和生产的防护装甲，这家以色列公司位于动荡的黎以边境附近一个小型基布兹[(2)]内。

20世纪80年代，这家公司成立于该基布兹的白色粉刷外墙房屋和猕猴桃果园中，凭借极具创新性的装甲迅速引起以色列国防军的注意。通过使用高密度复合材料，这些装甲能够在不显著增加车辆重量的情况下为车辆提供防护，减少火箭助推榴弹（RPG）和简易爆炸装置（IED）带来的伤害。

美国先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开战，在战场上，简易爆炸装置很快成为造成美军伤亡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撒萨公司的订单量猛增，公司利润也很快从2003年的2300万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5亿美元。

在纳布卢斯上空，以色列国防军无人机在密切监视这座巴勒斯坦城市和附近以色列军队的部署情况。2011年初，以色列国防军启动了“天空骑士”计划。随着该计划的推进，每个野战营都配备了轻型“云雀”（Skylark）无人机。研制这款无人机的是以色列主要国防承包商埃尔比特系统公司（Elbit Systems）。“云雀”无人机的发射方式就像橄榄球四分卫发球一样简便，它所提供的近距离情报对于步兵作战行动至关重要。该无人机的列装进一步巩固了以色列在无人机和无人系统研发上的世界领先地位。

从卫星到导弹防御系统，从无人机到网络战，以色列在现代战场的各项军事技术领域都处于世界前沿。作为一个仅有800多万人口的小

国，以色列如何成为一个世界军事强国，并研发出改变全球战争方式的科技？这正是本书要讲述的故事。



2013年，在以色列南部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一名以色列国防军战士正在发射一架“云雀”无人机（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由于以色列的成功，许多航空航天业巨头、武器制造商甚至国家政府纷纷来到这个犹太国家取经，学习创新、驱动力和科技的独特结合方式。

美国、法国、英国、印度、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大型企业，经常同规模远小于它们的以色列国防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60年前，以色列的主要出口产品是橘子和假牙，而今天，已变成电子产品、软件和先进医疗设备。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

根据英国简氏信息集团的军事贸易出版物的统计，以色列是世界六大武器出口国之一，仅武器一项就占到该国出口总额的10%。2007年以来，以色列军火的年均出口额约65亿美元。2012年，以色列1000家军工企业共出口了价值75亿美元的军火，创造了新的纪录。[1]

尽管国家很小，但以色列的科研投入比例列全球之首，占国内生产总值约4.5%。在许多排名中，以色列都持续被列为全球最具创新性的国家。庞大的科研投入中有大约30%用于军事类产品，相比之下，德国该

比例只有2%，即便美国也只有17%。[2]

对于以色列，著名报刊专栏作家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亚曾这样写道：“它的武器更加先进，通常比对手的武器要领先一代。以色列的技术优势对现代战场产生了深远影响。”[3]

以色列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这就是本书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我们将通过介绍以色列具体的武器和战术的发展历程来作答。每一种武器都是因时因势而出现的，武器的发明者拥有不同的灵感和动机，并借鉴了这个国家诸多的民族特性，而这一切又共同创造了以色列独特的创新文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特性能独立存在，以色列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离不开这些民族特性的共同作用。

以色列文化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充满矛盾的文化。几十年来，以色列人试图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但直到今天，他们都没能重复1979年同埃及以及1994年同约旦取得的成功。以色列人不分男女都要服兵役，但这并没有让以色列社会变得纪律严明，相反，军队被认为是这个国家随意性和非正式性特点的主要来源。

以色列只有800多万人口，自然资源匮乏，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却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建国以来虽然军事冲突不断，但每年却能吸引300万名海外游客。

以色列经济和军事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这个国家面临的一系列威胁和建国以来为了生存而不断进行的战争。

甘茨将军的母亲在大屠杀期间曾是伯根·贝尔森纳粹集中营的一名囚犯，二战结束后才来到以色列，是成千上万逃离欧洲、寻找新家园的犹太难民之一。以色列宣布建国后，又有几十万来自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塞法迪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来到以色列。

追求生存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开始，全国的食品只能限量

供给，没有公共交通，医疗服务严重滞后，人们一度怀疑这个国家能否支撑下去。

1948年独立战争爆发后，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刚刚坐船到达码头，迎接者就发给他们枪支，并把他们派往前线。他们中许多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学一句希伯来语就已战死沙场。据那些和他们并肩作战并活下来的人说，在战场上，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人视死如归。

由于条件异常艰难，为了生存下来，面临困境的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具备一些关键的能力，比如即兴发挥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以色列前国家安全副顾问鲁文·盖尔解释说："以色列国防军刚成立时，献身精神、昂扬斗志、情报保障和应变能力弥补了部队在人员、武器与训练上的不足。这些特点最终成了以色列战士的标志。"[4]

除了新移民这一人力资本，以色列几乎没有其他资源可言，以色列人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建国之初，以色列内部困难重重，外部不断传来要灭亡以色列的声音（直到今天，伊朗等地还在发出这样的声音），以色列人必须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创新思维，以色列根本无法存活。

创新和生存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显，正如以色列卫星计划提出者哈伊姆·埃塞德对我们所说的："断头台阴影下的头脑更敏捷。"

但这只能算原因之一。世界上在逆境中崛起的国家还有很多，韩国也在类似的国家安全威胁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韩国在先进武器研发上远落后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等级结构的弱化。

这看上去不太像是一个优势，但正是社会等级结构的解体刺激了创新行为的产生。

等级缺失现象在以色列比比皆是，不管是在军队中，还是在大街上，甚至在政府办公室里，低层员工都可以直呼部长的昵称。

以色列简直是一个昵称之国：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被公开称为“毕比”，国防军前参谋长摩西·亚阿龙被人们称为“博吉”，总统鲁文·里夫林常被叫作“鲁维”，反对党领袖艾萨克·赫尔佐格则被叫作“布吉”。

在日常生活中，以色列人惯于省去社交中的繁文缛节。在这样一个小国，每个人和领导人或公众人物间的距离都不会太远，不管是进大学还是预约一位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他们都很善于使用“普罗泰克西亚”（这个词来自波兰语，“关系”的意思，相当于走后门）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前面提到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以色列国防军被认为是以色列非正式性特点的主要来源。在军队中，以色列人对等级制度特别反感，表现出强烈的“虎刺怕”精神。这个词来自意第绪语，大概可以翻译成“大胆”“厚颜无耻”或“魄力”。

按规定，新兵应当称指挥官为“长官”，但几个月后指挥官就会开始一项“拉近官兵距离”的活动，士兵可以直呼其名，甚至可以不用敬礼。

可以想象一下，在以色列军队这个本应该固化组织结构和强调士兵纪律的单位，居然存在一个专门用来打破等级制度的仪式性活动。

著名军事历史学家马丁·范·克里费德对我们说：“非正式和无等级是以色列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最大的优势。以色列比较小，人们互相都认识，加上几乎人人都在国防军服役过，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很容易被打破。”

缺少等级秩序的非正式文化表面看来会影响一个国家或组织进行长远战略思考的能力，但在以色列恰恰相反。沟通障碍的打破有利于创造一种鼓励思想自由交流的环境，当不同级别的军官在一起平等自由地对话时，他们往往能碰撞出新的思路。

比如，以色列空军（IAF）司令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你可能会以为他会带一位和他一样的资深飞行员，但实际上，他一般会让一名有时年龄只有他一半大的年轻飞行员坐在后排。

以色列前空军司令伊多·内胡什坦少将就曾同一名25岁的中尉一起飞

过F-16战斗机。任务结束后，少将对我们说：“在机舱内没有上下级之分。”

这样一来，年轻人能从前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反之亦然。飞行任务结束后，初级飞行员甚至可以批评高级飞行员的表现，不用担心被降职、失去晋升机会或受到惩罚。实际上，他们被鼓励这样做。

内胡什坦解释道：“这种开放、专业和公平的文化正是我们通过不断努力创造出来的。”

外国军官访问以色列时，这种文化经常会让他们感到震惊。

1992年，曾担任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的美国空军中将罗恩·卡迪什第一次访问以色列时，就深切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冲击。

当时，美国F-16战斗机坠机事件频发，作为美国空军F-16项目负责人，卡迪什来到这个除美国之外拥有最大规模F-16战斗机机群的国家进行咨询。

到达空军基地后，负责接待他的以色列人带他参观了各飞行中队，还向他展示了一些机身涂有击落敌机标记的飞机。这些中间有蓝点的红圈记录着这些飞机在十年前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中击落敌机的数量，其中一架以色列F-16战斗机曾击落过7架叙利亚飞机。

参观结束后，卡迪什被带到基地指挥官办公室讨论飞机的技术问题，桌上摆着以色列的特色茶点：加热过的脆皮芝士，土豆三角面包，再配上又浓又苦的土耳其咖啡。美以双方人员一起对飞机进行机械和技术上的评估。

这时，一名参加讨论的以色列人员和基地指挥官就飞机存在的问题争吵起来。卡迪什询问他的身份，原来这位和准将争吵的是一名士官机械师。虽然级别很低，但他的观点很有道理，所以大家耐心地听完了他的陈述。

卡迪什回忆说：“我坐在那儿感到惊讶极了。美国的军队等级更加分明，人们不会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在以色列军队却完全看不到这一

点，以色列空军就更不用说了。”

卡迪什看到的就是典型的以色列“虎刺怕”现象。在美国军队从没听说过有人敢说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话，更别说在外国军官到访时和自己的指挥官争吵了。但在以色列，没人会这样想。这位机械师所做的就是他多年来被训练和被鼓励去做的事情：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色列预备役部队比现役部队更强调这种精神。作为一名军官，要想晋升，你不但要在上级那留下好印象，还得让下属佩服你。

退役准将舒基·本-阿纳特曾担任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司令，他对我们说：“如果一位预备役人员没有得到他要的答复，他会直接去找更高一级的指挥官。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破坏制度，而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才不会在乎等级制度。”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后，亚历山德罗尼旅（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最精锐的步兵旅之一）旅长什洛米·科恩上校在召集士兵开战况分析会时，也亲身经历了类似事件。

战争爆发后，亚历山德罗尼旅的预备役人员被大批召回部队，当时有两名以色列士兵被绑架，火箭弹不断落在以色列境内，没错，这又是一场关乎国家生存的战争。

然而，实现停火后，当预备役人员回到以色列境内，他们难以控制内心的苦恼和愤怒。被派到黎巴嫩时，他们拿到的都是些过时或有故障的装备，他们不得不自己筹钱购买防弹衣和手电筒。在战场上，科恩的指挥也让他们感到很不满，他下达的命令经常变更，明显缺乏决断力。有好几天时间，他们受命待在黎巴嫩南部的村庄中，似乎在等着真主党进攻。由于补给物资从没送到他们手里，他们不得不冲到黎巴嫩杂货店找食物，有的人出于内疚会在柜台上留下一些钱。

战争结束两天后，科恩召集部队开会，试图解决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会议地点就在北部古城采法特附近的松树林里，这座城市在战争期间曾频繁遭到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在会议上，科恩提醒预备役战士不

要总是抱怨，否则后果自负，他还批评他们士气过于低落。

这时，预备役战士们忍无可忍，有的对他吼起来，还有的开始向他发出嘘声，直至科恩起身离开现场。他的言论让预备役战士非常愤怒，其中几人还决定到耶路撒冷的总理办公室抗议。

战士们的不满传到了指挥系统高层，最后，这位本来前程似锦的军官被派到一个东欧国家当以色列武官，在那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西方军队中，对高级军官发出嘘声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在以色列则不无可能。预备役人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过分，既然一名军官犯了错误，他们就应该表达不满，至于这名军官是他们的上级，且他们自己身上还穿着军装，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本-阿纳特能理解这些预备役人员的挫折感和失望。1973年赎罪日战争[(3)]后，他有过同样的感受，当时国家调查委员会发现这场战争中存在大量系统性失误和错误。那时他还是一名战士，在战争中，他所在连队的坦克数量一度只有敌方的五十分之一。这场战争和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让他看到发展预备役部队的重要性，也让他明白以色列经不起打一场没有准备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虽然服役年限已满，但他决定继续服役。大多数预备役军人每年要被召回14—21天，但本-阿纳特的年服役天数达到120天，他在预备役部队的级别因此也越来越高，虽然他的正式工作岗位是在以色列的一个情报机构。2008年，他在服役了35年后晋升为准将，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司令。

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常规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非常倚重预备役人员，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国防军建军时确立的人民军队原则和义务兵役制度。本-阿纳特指出，虽然成立预备役部队的最初目的是确保紧急情况下拥有足够的兵力，但预备役人员的存在还对军队产生了许多其他方面的积极影响。

他解释道：“预备役人员每年只在特定时间来到部队，所以千万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在浪费他们的时间。这让整个体系变得更为高效。”

军队以预备役部队为基础意味着士兵退伍后，哪怕已经上大学或进入职场，每年还要回到军队服役一段时间。预备役飞行员每周会抽出一天时间进行飞行训练，作战部队战士每年被部队召回2—3周，其中一半时间用于训练，另一半用于执行常规巡逻或边境行动。

同样，军工企业的工程师并不只在会议室和战士们讨论武器设计方案，每年被召回部队时他们也会穿上军装，成为战士。

当年的战场经验和后来在预备役部队的训练作战经验能够帮助以色列工程师更好地理解国防军在下一场战争中需要什么，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求。也就是说，军队就新武器系统提出的每一项“作战需求”都会简洁而明确，且照顾到每个细节。因为这些工程师亲身经历过战争，很清楚部队的需求。

为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坦克生产防护装甲的普拉桑·撒萨公司的一名员工说：“我们知道坐在军车中的感受，甚至知道车辆被爆炸装置击中或被火力扫射时车内人员的感受。”[5]这些经历已深深刻在他们的脑海中。

海法大学商学教授丹·佩莱德说：“以色列工程师既熟悉以色列的国防需求又熟悉科技，这在其他国家难以想象。”[6]

比如，美国会在国防承包商研发团队安排军代表，但他们常被视为外人。在以色列，这些“外人”就是自己人。他们的军旅生涯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们的双重身份是重要的国家资产。

范·克里费德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手下95%的人都没服过兵役，也没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你怎么能指望他们设计出创新性武器？”

1992年访问以色列时，另一个让卡迪什中将大开眼界的是该空军基地飞行员和战士的年轻化程度。在同等岗位上，他们很多人的年龄甚至只有美国和欧洲国家军官的一半。

美军的平均年龄是29岁，而以色列国防军的平均年龄是20岁出头。

这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军人，以色列初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拥有更高的权限，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此外，他们的上级军官也更少，

以色列高级军官和作战人员比例为1：9，美国则达到1：5。很多时候，以色列的年轻士兵不得不独自做出一些重要决定。

在以色列，刚参军几年的年轻情报分析员经常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部长和总理汇报工作。23岁的年轻人就可以成为连长，负责约旦河西岸边界某一段的安全，一旦这一区域有恐怖分子渗透，或出现大规模袭击活动，他们就将被问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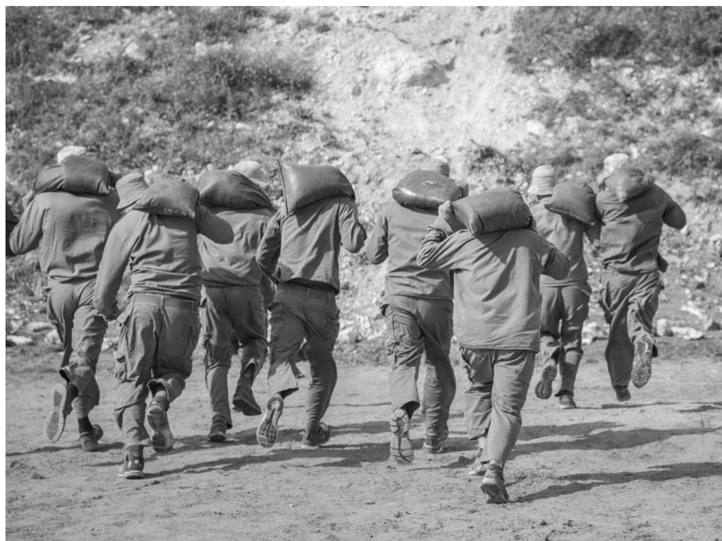
让年轻人承担责任有利于培养他们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不但能在军队中发挥作用，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也一样管用。由于以色列长期处于冲突状态，战士们在年轻时就要经历很多险情，有时不止一次要做生死攸关的决定。

以色列前空军司令和国防部前任总司长大卫·伊夫里告诉我们："哈佛大学毕业生可能得到了一流的教育，拿到博士学位，但他们学习的都是理论知识。在以色列国防军，战士们得到的是关于人生的博士学位。"

以色列在战士身上的投入很大，他们被视为无价之宝，是全体以色列人的宠儿。以色列社会的确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战士的。2011年，以色列释放了1000多名囚犯用于交换一名在加沙地带被哈马斯绑架的士兵。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的交换行动已有多次。

在中东其他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很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名士兵不仅对他的家人而言很重要，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当一名士兵被绑架，每个家庭都会感到非常痛苦，他们明白，他们深爱的亲人也可能是那个被绑架的人。

义务兵役制还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了另一个影响：军队发挥着熔炉的作用。这一点和以志愿兵役制为基础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在大约10年前的美国，44%的士兵来自乡村地区，41%来自相对落后的南部，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来自家庭收入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县。[7]



2016年3月，戈兰旅的新兵训练（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在以色列几乎人人都得服兵役，男性服役约3年，女性服役约2年。来自特拉维夫的富家子弟被召到作战部队时，会发现和自己一起训练的不但有来自南部欠发达城市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来自北部的俄罗斯移民，还有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宗教人士。国防军不允许社会壁垒的存在。在这里，从没接触过高科技设备的穷孩子可以拥有操作这些设备的机会，在一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可能突然被训练为网络操作人员。一旦穿上军装，社会经济和种族的标签都不复存在。

熔炉作用也是促进创新的动因之一。只有当人们在一起畅所欲言时才能产生创造力，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彼此了解，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文化。在以色列，军队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绝佳场所。

以色列国防军鼓励军官接受跨学科教育。这一理念源于以色列可支配资源的匮乏，这不仅体现为原材料的匮乏，也体现为人才的匮乏。以色列人常开玩笑说，在国外航空公司，每一种螺栓或保险丝都有专家，但在以色列，工程师必须掌握多个领域的技能，同时完成多项任务。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高级军官或军工企业高管都拥有多个领域的学位。一位获得电子学学士学位的军官可能会在硕士阶段学习物理学或公共政策。

“铁穹”防御系统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武器系统，其幕后策划者丹尼·戈尔德就是追求跨学科教育的榜样。在空军服役期间，他利用休假时间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企业管理学，一个是电气工程学。在本书相应章节中，我们会详细介绍为何他需要这两个学位来启动“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工作。

国防军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很大，特别注重跨学科教育，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特比昂”（Talpiot）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服役的都是以色列最优秀、最聪明的战士。

“特比昂”一词来自《旧约·雅歌》中的诗句，意为城堡的防御工事。“特比昂”也是目前以色列一支精锐的技术部队，每年有数千人申请加入，但只有大约30人能最终被录取，他们还得同意服役9年，这是一般服役年限的3倍。

这些战士一般拥有很全面的技能，能够胜任精英突击部队中飞行员或武器装备操作员的岗位。“特比昂”拥有人才的优先选择权，只要是它想要的人，一般都能得到，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特比昂”人才培养项目诞生于一场灾难——1973年赎罪日战争。叙利亚和埃及在犹太人神圣的斋日发动进攻，让以色列措手不及。这场战争中，2000多名战士牺牲，数不清的飞机和坦克被摧毁。在那之前以色列一直认为自己拥有军事优势，但灾难过后，这个国家感受到建国25年来从未有过的脆弱和无助。

虽然最终守住了领土，但这场战争给以色列人内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它提醒以色列，单纯依靠创新策略不足以保持军事优势，以色列需要的是技术优势。但如何才能获得技术优势？

战争结束后不久，时任空军技术部负责人的阿哈龙·贝斯-哈拉契米上校接到希伯来大学物理学教授沙尔·雅兹夫的电话。同年早些时候，两人在阿哈龙·贝斯-哈拉契米到希伯来大学参观雅兹夫研发的高功率激光时见过面。当时苏联人和美国人都在开展激光方面的研究，贝斯-哈拉契米认为以色列国防军也应该在类似项目上进行投资，至于如何应用到军

事领域可以留到以后考虑。

雅兹夫在电话中说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商量，并会带一个朋友来。几天后，他带着另一位物理学家菲力克斯·多森来到贝斯-哈拉契米的办公室。在贝斯-哈拉契米看来，这次会面有一种穿越到圣经时代见到摩西和亚伦的感觉。和摩西一样，多森不善言谈，需要雅兹夫在一旁帮他表达自己的观点。

雅兹夫说，多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设立一个名为“特比昂”的项目。这个项目只针对以色列的天才们。这些战士将经历为期40个月的培训（时间远远长于国防军其他新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但要拿到物理学、数学或计算机科学的学位，还要同精锐伞兵部队一起完成作战训练。

在培训后期，学员将到军队不同单位挂职，40个月后，他们最终将被分配到一个特定单位，主要是空军和情报部队。

贝斯-哈拉契米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他也为以色列在上一场战争中的表现感到忧心忡忡，希望能够提高以色列国防军的科技能力。他答应向上级汇报这一建议。

“特比昂”项目的关注点很特别，它的目的并不是教授单一技能，而是让参与者接受跨学科教育，熟悉以色列国防军科技能力的各个方面，使他们能够打破组织上和科技上的局限，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并非每个人都对这个想法感兴趣，空军和军事情报机构的军官很快就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希望最优秀的新兵成为飞行员和战场指挥官。在总参谋部，贝斯-哈拉契米最常听到的回答就是：“把他们放在其他地方纯属浪费人才。”他在空军的地位有限，因此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时机。

几年后，贝斯-哈拉契米被提拔为以色列国防军研究与发展机构的负责人，成为总参谋部的关键人物之一，可以随时见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在一次周例会上，贝斯-哈拉契米介绍了成立“特比昂”项目的想法，并完全说服了埃坦。这位总参谋长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开会进行论证。

不到3个月，“特比昂”项目就进入试验阶段。

贝斯-哈拉契米很快发现这个项目非常成功。成立几年后，总理主持了一次专门讨论该项目的安全内阁特别会议。在会上，一些将军抱怨“特比昂”毕业生在军队各部门的分配不够均衡，自己所在的部门分得太少。几乎每个单位，包括以色列间谍机构，都希望获得更多的“特比恩”（“特比昂”毕业生）。这次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后来总理不得不做出决定，规定“特比昂”毕业生必须分配到全国各个安全机构，包括警察系统。直到现在，平均下来，每个“特比昂”毕业生都会有5个单位进行竞争。

贝斯-哈拉契米告诉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看到，要想取得突破，并不需要太多人，需要的只是正确的人，并让他们接受正确的训练。”

这个项目拥有无数成功的案例，其中大多数案例都属于机密范畴。一位“特比昂”毕业生用电能取代化学能将炮弹的速度提高10倍。

另一位“特比昂”毕业生当初在收到医学院的录取信后毅然放弃，选择参军入伍，进入该项目。他为直升机飞行员发明了一种新型座椅。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服役时发现，许多飞行员都有腰疼的毛病。因此他重新设计了座椅，将其安装在直升机模拟器上，并在座椅靠背上打了个洞，在中间放置一支笔抵住飞行员的后背，然后用高速相机记录下直升机震动对飞行员腰背部的影响，最后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对座椅进行了改进。[8]

在加沙地带，许多激进主义者在边境朝以色列方向挖地道。对此，有一位“特比昂”毕业生在研发跨国界地道侦测系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特比昂”的项目规模很小，成立40年来只培养了大约1000名毕业生，但其对军队和国家的影响却非常大。许多毕业生成为以色列学术界和科技界的精英，在科技公司或在其他公司中担任重要职务，不少公司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同样毕业于“特比昂”、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网络局局长的埃瓦塔尔·马塔尼亚说：“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没有这样的项目。一名‘特比恩’就能单

枪匹马让一个单位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果有2—3个‘特比昂’毕业生，那就更厉害了。”[9]

我们相信以色列成功的秘密不仅在于以上提到的这些方面，在深层次上还源于以色列的国民特性。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长期经历激烈的冲突。敌人近在咫尺，当边境线上的极端组织频繁向你家和学校发射火箭弹，或派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来到你所乘坐的公交车时，容不得你有半点大意。

面对这样的现实，安全事务绝非儿戏。不少以色列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安宁后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他们说，这太不现实了，这一定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在埃及和叙利亚战场上，以色列成为第一个同苏联武器过招的西方国家；远早于纽约、伦敦、马德里或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以色列是第一个经受激进分子实施的街头自杀式袭击考验的现代国家。以色列常常计划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偶尔还在约旦河西岸搜索激进分子嫌疑人，承受着大多数国家从未面临过的威胁。为了应对这些威胁，以色列必须不断发展先进军事科技。

以色列国防部前任总司长乌迪·沙尼同我们在特拉维夫见面时说：“最让我们受益的是三个因素的综合：我们有创新人才；我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来判断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有将研发成果马上运用于实战的能力，因为我们几乎一直处于冲突状态。”

以色列的武器研发的确改变了现代战争的形态，但这一切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发生在中东这一全世界最动荡的地区。以色列可能认为之所以需要发展先进武器是因为面临外部威胁，但另一方面，这种科技优势恰恰加剧了以色列试图避免的军备竞赛。

2010年，以色列发动了“震网”行动，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网络袭击行动之一。根据一些估算数据，凭借这种高效的电脑病毒，以色列成功摧毁了伊朗铀浓缩主体设施中大约1000台离心机，将这个国家的非

法核计划推迟了将近两年。但此后，伊朗也成立了自己的网络作战单位，每年投入10亿美元用于发展有效的攻击手段。两国间一场更大规模网络战的爆发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中东的动乱不断蔓延，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也面临着来自“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城市恐怖主义威胁。因此，以色列在应对类似威胁过程中所积累的战术和研发的科技存在很大的需求。

比如，“铁穹”防御系统就帮助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射来的火箭弹这一战略威胁降级为可控的战术威胁，使以色列领导人得以专注于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更核心的挑战和威胁。

安装在以色列国防军“梅卡瓦”主战坦克上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能够拦截火箭助推榴弹和反坦克导弹，让这些钢铁机器能够在非对称战争和城市战时代继续发挥作用。当前许多国家正在逐步淘汰装甲部队，以色列没有随大流，反倒迎难而上。

以色列的故事常常让世人惊讶。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弱小的古老民族重回故土，建立国家，在饱经苦难后，不但存活下来，还实现了繁荣。

这本书将为这个故事添加一个新的维度，使其变得更加完整。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以色列如何通过科技获得的胜利和成功，而是以色列人和独特的以色列文化，因为这才是以色列获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的世界，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每个人细读。

(1) 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的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译者注

(2) 基布兹最早是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集体社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几十年内，基布兹是最具以色列特色的组织。——译者注

(3) 即第四次中东战争，由于发生在犹太民族的赎罪日，这场战争被以色列人称为赎罪日战争。——译者注

第一章　地下工厂

1945年，以色列建国3年前，巴勒斯坦的犹太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委任统治结束和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只是时间问题。犹太人明白，一旦那一天到来，阿拉伯人就会发动进攻。

犹太人手上的武器严重不足，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在英国统治下，一旦被发现持有武器，犹太人就会被送进监狱，有时甚至被判死刑。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纳（后来发展为以色列国防军）急需弹药和武器，但这些物资将从何而来？

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哈加纳高级指挥官约瑟夫·阿维达尔。阿维达尔出生于俄国，他的一位非犹太人邻居曾在沙皇部队服役过，在这位邻居的帮助下，他在9岁时就参加过基础军事训练。这些技能让他受益终身，到以色列不久后他就脱颖而出，迅速晋升为哈加纳的高层领导人。在1929年阿拉伯人暴乱中，他是耶路撒冷老城犹太守卫力量的指挥官，他用一支枪和11发子弹成功抵挡住阿拉伯人的进攻。在之后发给哈加纳指挥部的一份电报中，他批评了部队存在的浪费弹药的行为，这反映出当时犹太社团的弹药有多么紧缺。

他在电报中说："我们本可以用7发子弹就抵挡住他们的进攻，结果白白浪费了4发子弹。"

暴乱活动让阿维达尔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白，以色列要想生存下去，犹太人必须接受大量军事训练。因此，不久后的一个周六上午，他来到斯科普斯山希伯来大学附近的露天剧场，为50名犹太男青年讲解如何投掷手榴弹。当时哈加纳并没有像样的手榴弹，所以阿维达尔只能用走私来的自制手榴弹进行演示。当他扬起手准备投掷的瞬间，手榴弹提前爆炸，他的手臂被炸得血肉模糊。爆炸的声音传到几英里外，英军不久后就将赶到现场。虽然身受重伤，阿维达尔仍然等到所有人都安全撤离后才离开现场。

当时形势的确非常紧迫。犹太社团急需不会在自己战士手中爆炸的武器，但英国人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极为严密，犹太移民都很难从海上登

陆，更不要说武器了。因此，阿维达尔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在以色列建立第一座弹药工厂。这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想法。首先，伊休夫（以色列建国前对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称呼）并没有生产武器的经验；其次，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到处是英国人，很难在他们眼皮底下偷偷建起一座弹药厂。

但阿维达尔决心已定。他知道，这件事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正确的厂址。他跑遍全国，最后看中了雷霍沃特（著名的学术机构魏兹曼研究所就坐落于此）旁的一座小山。1932年，一小拨犹太人曾在这座小山的山顶定居，后来面对阿拉伯人的进攻，为了增强犹太人在城市的抵抗力量，他们搬到了城里。

这座小山的山顶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它与外界相对隔离，但又靠近城市和电网；第二，它地势较高，有足够的空间修建地下工厂，不易被英军发现。

另一点让阿维达尔满意的是这个小山靠近英军密集的雷霍沃特火车站，他认为英国人怎么也想不到犹太人会在他们眼皮底下修建一座兵工厂。

但阿维达尔需要找一个理由解释为什么一群犹太人突然跑到那座山上常住。他听说一群从属于犹太青年运动的新移民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基布兹。一天，阿维达尔出现在这些新移民的食堂，请求他们稍微调整一下计划：与其建立基布兹，不如直接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他告诉他们，定居到那座山顶后，哈加纳会营造生产武器所需的建筑，他们将在这座工厂工作。这群人同意了他的建议。

到春天时，已经有几十名20多岁的小伙子搬到山顶，他们种柑橘，开展各种集体活动。他们的生活看上去再普通不过。

与此同时，被称为阿亚隆研究所的地下兵工厂已经动工，许多之前就有的建筑，包括浴室、鸡舍、厨房和餐厅，都得以改造和翻新。

为了建造这个地下空间，阿维达尔从耶路撒冷请来了20世纪20年代曾在斯科普斯山修建希伯来大学的建筑承包商。在那个年代，希伯来大

学属于大型建筑工程，几年前阿维达尔正是在那里受的重伤。在22天的时间内，建筑承包商在地下约30英尺处挖出了一个长达100英尺的大厅。

每当有人问起，这些先驱们都会说，他们之所以修建大型地下室，是为了储存附近果园和田地采摘来的水果与蔬菜，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农产品新鲜。

这个秘密地下室的房顶有很厚的混凝土隔层，上面只有两个入口，这两个入口处都修建了新的建筑，一个入口在面包房，另一个在洗衣房。在地下室，一条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设备组装而成的生产线已经建成。这些设备购买自华沙，然后借道贝鲁特被走私到以色列境内。制造弹壳所需的铜被装在标记为口红盒的板条箱走私到巴勒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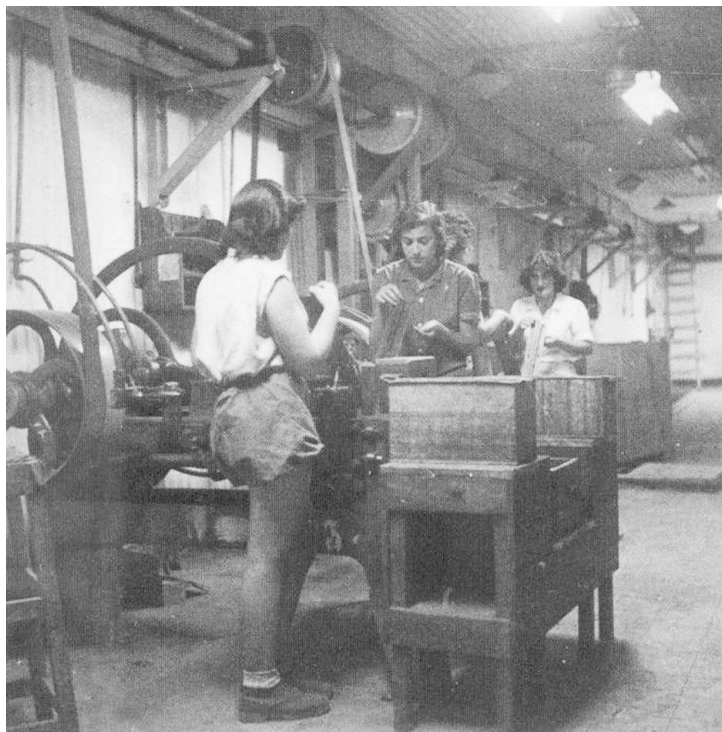
生产子弹的机器噪音很大，为了掩盖噪音，阿维达尔必须让洗衣房24小时不间断工作。为了找到足够多的洗衣客户，阿维达尔让团队在雷霍沃特市中心开了一个洗衣公司门店，它很快便承包了该地区大部分的洗衣业务，并拿下了附近一家医院的竞标，后来还为英军提供洗衣服务，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迷惑英军。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地下室还安装了太阳灯，这样才能把生产弹药的“基布兹成员”的皮肤晒黑，让外人觉得他们成天在田野里劳作。

在那个面包房，他们用一个10吨重的大型石炉挡住入口，炉底与轨道连接，炉子沿轨道移动后，可以打开一个通往地下室的秘密楼梯井。在洗衣房，地下室的入口则被一台洗衣机挡住，可以通过拉动杠杆来移动洗衣机。

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早期将领之一和以色列驻苏联大使的阿维达尔，为了不让人疑惑为什么这个新建的小型基布兹耗费这么多电，设法秘密走线将工厂的电线并入附近的电网。

最后，为了减少外来人员，基布兹成员在城镇散布谣言，说这里爆发了手足口病疫情，他们还在基布兹大门口立了块牌子，要求来访者在进入前务必将鞋子放在消毒水里消毒。



在一个修建在洗衣房地下被称为阿亚隆研究所的弹药工厂，基布兹女成员正在工作（阿亚隆研究所提供）

他们的计划非常成功，英国人从没起过丝毫疑心，但有过几场虚惊。1948年初，一辆载有英军士兵从加沙地带开往卢德的火车经过山下时因引爆地雷而脱轨，28名士兵遇难，几十人受伤。实施这次袭击的是比哈加纳更为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莱希（也被称为“斯特恩帮”）。

英国人很可能会怀疑这个基布兹参与了袭击行动，并到山上的建筑进行搜查，因此，地下弹药厂立即停工，所有的工人都被命令离开地下室。

如何阻止英国人搜查基布兹？情急之下，工人们决定来到事故现场提供帮助，带去食物和水，并提供医疗救助服务。英国人自然而然地认定这个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基布兹不可能参与这次爆炸袭击行动。

从1945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阿亚隆研究所运行了将近3年，生产了200多万发9毫米子弹。在产量峰值时，该工厂每天生产4万发刻有字母“E”和“A”的子弹，“E”代表“以色列国”（希伯来语音译为“Eretz

Yisrael”），“A”代表“阿亚隆”。

独立战争结束后，阿亚隆研究所并入以色列第一家军工企业军事工业公司（IMI），这家公司被认为是当今全球领先的导弹、火箭弹和装甲研发企业。

但这些成就都是很晚以后取得的。当时，这个即将成立的国家急需武器，随着战争的临近，这一需求变得日益迫切。但包括美国、英国和苏联在内，当时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向这个身处困境的国家销售军火。

唯一一个例外是捷克斯洛伐克。

最早在以色列空军服役的飞机就是纳粹德国空军遗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4架“梅塞施密特”飞机。这几架飞机被拆解后运送到以色列，然后重新组装，每架飞机配备有一挺机枪和4枚70千克炸弹。

还有的飞机来自意大利。为了增加续航里程，确保能直飞以色列，这些飞机的座椅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油箱。

捷克还同意为以色列提供大量步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过的4门火炮。只要还能打出炮弹，以色列就照单全收。

除了这些武器交易，以色列还使出不少奇招以获取武器。一群以色列军火采购商曾到英国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声称准备拍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他们雇用了一整套剧组人员（包括制片人）和演员团队，还买了一架专门用于拍摄的飞机。

电影刚开拍不久，在拍摄空战一幕时，这架飞机在伦敦的迷雾中起飞，在摄像机的拍摄下，它越飞越远，然后掉头向南，朝以色列飞去。

这些奇招很成功，但以色列领导人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以色列必须找到更稳妥的获得武器的方法。但这件事情得先缓一缓，因为一场关乎以色列存亡的战争已经爆发。

1948年5月，不出所料，独立战争爆发了。经过密切的协调，中东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同时向以色列发动进攻。这个新生国家似乎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更强，拥有众多坦克、重型火炮和一支成建制的空军，而以色列既没有火炮也没有坦克。

人们对以色列将在战争中有什么样的表现有着不同的判断，但对于战争结果的看法却出奇地一致：以色列必败无疑。一位以军高级指挥官在给犹太领导人的汇报中也指出，这个新生国家生存下来的概率只有50%。

他说："我们的胜负概率各半。"[1]

这场战争非常残酷。以色列在人员和武器上都处于劣势，6000多名以色列人牺牲，15000人受伤。但最终，凭借非常规的战术、惊人的献身精神和史无前例的随机应变能力，犹太国存活了下来，以色列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场战争中有许多让人感慨的案例：在加沙地带以北、地中海沿岸，有一个名为雅德莫迪凯的小型基布兹。在那里，面对埃及一支机械化师的进攻，150名犹太人，凭借75支步枪、300枚手榴弹和一个反坦克火箭弹发射器，竟然顽强抵抗了整整6天时间。

另一个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卢·莱纳特的故事。

莱纳特1921年出生于匈牙利，9岁时随家人移民到美国，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经常被殴打和嘲讽，深受反犹主义之苦。他从小就明白，要想生存下来，他必须变得强壮，因此他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莱纳特后来成为一名飞行员，在长达7年的服役期间，他在冲绳岛和日本本土都完成过飞行作战任务。二战结束后，他得知自己在匈牙利的亲戚在奥斯威辛遇难。到洛杉矶后，他开始思考关于以色列——确切地说，由于以色列还没有建国，当时还是巴勒斯坦——的事情。

许多年后同我们聊起那段悲惨岁月时，他说："我的许多家人都在奥斯威辛遇害，我认为大屠杀幸存者也有权拥有生命和一些最基本的快

乐，但除了在以色列的同胞，没有人愿意接纳他们。”

他加入了洛杉矶一个致力于帮助以色列的群体，其成员都是犹太飞行员。1948年4月，就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夕，他来到以色列，负责组装来自捷克的阿维亚S-199“骡子”战斗机。

5月中旬，战争已经爆发，飞机终于组装完毕。在经历了一周的作战后，以色列已身处绝境。由15000多名埃及士兵、500辆军车和坦克组成的埃及纵队沿着地中海沿岸的公路一路向北推进，虽然暂时被拦截在阿什杜德附近，但他们离特拉维夫只有几英里之遥。前一天晚上，为了阻止埃及军队推进，以色列士兵炸毁了一座桥梁，但埃及人再过几小时就能修复这座桥梁，如果顺利恢复通行，第二天早晨埃及军队就可以进入特拉维夫。特拉维夫一旦陷落，以色列就回天乏术了。

当得知埃及军队的推进情况后，莱纳特把他们的飞行员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现在必须向南飞行轰炸埃及军队。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飞机刚刚组装完毕，并没有执行过飞行任务，谁也不能确保飞机能正常飞行；第二，当时其他国家并不知道这些飞机的存在，以色列并没有计划用这种方式向世界宣布以色列空军的成立。

以色列危在旦夕，此刻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了这群飞行员。作为飞行编队队长，莱纳特驾驶飞机首先飞到埃及纵队上空，朝一个车队方向俯冲，然后投掷炸弹。幸运的是，炸弹击中了一辆油料车，引发一系列二次爆炸。其他飞行员紧随其后发动攻击，用机枪朝地面部队扫射。

这次突袭完全出乎埃及人预料，几小时后，他们放弃占领特拉维夫，转而向东开进，加入约旦军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战斗。特拉维夫幸免于难。那座暂时挡住埃及军队的桥梁后来被称为“哈洛姆”，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到此为止”。

莱纳特并没有时间考虑这次行动成功的深远意义，他说，至于这到底是运气使然、命中注定，还是本能反应，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接下来他们得继续战斗，赢得这场战争。

“老头”[(1)]说：“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麻烦的军事问题，那就是敌众我寡。”

1953年，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作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和以色列版的乔治·华盛顿，大卫·本-古里安知道下一场战争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作为只有几十万犹太人的弹丸小国，以色列如何在成百上千万阿拉伯敌人的包围下生存下去？这个基本问题让本-古里安深感不安。

为了得到答案，他休假离开耶路撒冷，来到他在斯代博克基布兹的一座简朴的小屋。斯代博克基布兹坐落在内盖夫沙漠南部的著名自然景观拉蒙天坑附近。

几天后，他带着一份文件回到了位于耶路撒冷的总理办公室，这份文件名为《国家武装部队防御方针》，直到今天，这份文件中的大部分观点仍然是以色列国防战略的基础。[2]

这份文件的主要观点非常简单，对于今天的以色列仍然适用：以色列需要强大的质量型军事优势。

以色列士兵比叙利亚少，所以必须让士兵接受更好的训练；坦克比埃及少，所以必须拥有更先进的坦克；以色列采购了沙特阿拉伯同样拥有的F-15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空军必须在飞机上加装专门设计的智能炸弹和先进的电子战系统。总之，以色列要确保自己的武器和战士拥有质量优势。不一定能有数量优势，但一定要有质量优势。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时谁也不会相信这个新成立的资源匮乏的国家能具备并维持独立研发和生产的能力。[3]

所以，本-古里安得出的结论是应当寻找愿意卖军火给以色列的国家。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谈何容易。当时，美国、英国和法国发表停止向中东出口武器的《三方宣言》。这三个国家认为，如果它们为以色列提供军火，苏联也会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如果不向以色列提供军火，苏联也会保持克制。

这样一来，以色列可行的选项只剩一个：另辟蹊径，通过各种计策

和冒险寻找武器，有时甚至不惜与最不可能的人联手。

本-古里安将这份事关国家命运的工作交给一位年仅26岁的波兰裔基布兹成员来领导，他原名叫西蒙·佩尔斯基（Szymon Perski），移民以色列后他将自己的名字希伯来化，改为“西蒙·佩雷斯”。

独立战争期间，佩雷斯担任本-古里安的助手，给总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位犹太领导人认为，佩雷斯能在外交场合优雅地出席鸡尾酒晚宴，但晚宴过后，又能在码头上撸起袖子将非法购得的武器搬运到集装箱里。佩雷斯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他的任务非常明确：为以色列国防军寻找和采购军火。

佩雷斯曾同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领导人吉米·霍法这样危险的人物会面，也去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这样危险的地方。有一次去波哥大时，他乘坐的飞机因为引擎着火而紧急迫降。还有一次，他通过谈判签订了一份从墨西哥购买46辆坦克的合同，甚至还拿到了坦克钥匙，结果发现这些坦克根本无法交付，早就消失在墨西哥边境附近。

在各地出差的过程中，佩雷斯发现，没有人真正关心以色列的命运。因此，和许多伟大的销售人员一样，佩雷斯意识到，要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首先要让合作者明白通过合作自己能够获利，即便是同刚诞生不久就陷入孤立的犹太国合作。

在哈瓦那，佩雷斯曾尝试说服古巴情报机构高层领导，在购买军火一事上帮助刚建国就陷入困境的犹太国。他中午12点准时到达警察总局，本以为这是约好的见面时间，结果对方秘书笑着告诉他，埃弗拉莫先生白天从来不和人见面。

“先生指的是午夜。”接待人员解释道。

午夜12点，佩雷斯又来到警察总局，结果他没有被邀请到办公室，而是被这位古巴主人带到了当地一家夜总会。和当地姑娘一块喝了会儿酒后，佩雷斯和埃弗拉莫才开始谈正事。

佩雷斯后来解释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许多交易都是同这种背景复杂的人物达成的，有的人甚至来自黑帮。我们实在别无他法。”[4]

一年后，佩雷斯得知加拿大准备出售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留下来的加农炮，这正是以色列急需的。经过调查他很快得知，加拿大愿意将这些火炮卖给以色列，但要价200万美元，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个天价。

佩雷斯决定筹集这笔资金，于是他来到蒙特利尔同塞缪尔·布朗夫曼见面。塞缪尔·布朗夫曼是著名的犹太慈善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酿酒公司之一。

布朗夫曼答应同加拿大政府交涉，将价格压低。当他把价格谈到100万美元后，他问佩雷斯到底谁来支付这笔钱。

“当然是你啊!”这位以色列人回答道。

这样犀利的回答让布朗夫曼有些惊讶，但很快，他从容地让妻子列出一个50人名单，当即邀请这些人共进晚餐。他看了一眼佩雷斯，发现他穿着一套蓝色西装和白色袜子，于是说道：“你的袜子不太适合今晚的场合。”然后让这位客人在回去的路上赶紧去百货商店买一双正装袜。

当晚，在上主菜时，佩雷斯在宾客面前就加农炮采购事宜发表了一席演讲，解释了这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发展和以色列的生存有多么重要。演讲过后，宾客们纷纷打开了他们的支票簿。

以色列诞生于危难之中，生存在困境之下，“工合”[(2)]文化成为以色列的一大特点。在这一背景下，佩雷斯为了走私武器而使用的这些手段就很好理解了。为了以色列的未来，情急之下，几乎没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

在纽约期间，佩雷斯还联系了老朋友阿尔·史威默，独立战争前这位飞行工程师曾帮助以色列走私飞机，其中包括莱纳特用于轰炸埃及军队的战斗机。

两人相识于独立战争期间，在本-古里安身边工作的佩雷斯当时就非常欣赏这位美国人过人的远见、坚定的信念和对本民族的忠诚。

史威默曾在环球航空公司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美国空军，执行过200多次飞越大西洋的飞行任务。史威默本来并不在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当他参观完一所被解放的犹太人集中营并同一群大屠杀幸存者见面后，他心中突然燃起了帮助犹太人在历史故土重获独立的强烈愿望。他相信，犹太人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才能安全生活下去。

回到美国后，史威默联系上哈加纳驻纽约的代表，表示愿意为其效力。过了一段时间后，哈加纳向他提出了一个明确而莽撞的要求：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空军。之所以说莽撞，是因为这并不合法。根据中立法，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美国公民不得向战争国家出口军火。

但这并不能阻挡史威默，作为一名老兵，他有权低价购买军方多余的飞机。他召集了一群同他在二战期间并肩战斗过的犹太飞行员和工程师，然后一起采购飞机，所有能弄到手的可以飞起来的东西他们都不放过。大多数成员都不知道这些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他们只是听说史威默准备帮助巴拿马建一条向欧洲运牛的航线。

这些飞机被运到洛杉矶附近的机库进行检修，然后被拆卸并装入条板箱，被海运或空运到意大利。在那里，哈加纳利用一个废弃飞机场组装飞机，组装好后直接飞往以色列。

以色列独立战争后，尽管面临刑事指控，史威默还是回到了美国，和手下工作人员租下了让内特·麦克唐纳的别墅，这位好莱坞明星在20世纪30年代演过许多经典音乐剧。

史威默接受了审判，最后被判有罪，但未受牢狱之灾，而是被处以1万美元的罚款，剥夺选举权和老兵权益，并且不得在联邦政府任职。他从未寻求赦免，但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卸任前宣布了对他的刑罚赦免。

法院对他的定罪并没有放缓他的脚步，很快，在佩雷斯的鼓励下，他重新开始从事走私活动。为了掩盖这些活动，他成立了国际航空公司，办公室就设在洛杉矶北部的伯班克，位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厂的一个角落里。

佩雷斯和史威默最早的合作项目是向以色列走私“野马”式战斗机。

美国空军已经淘汰了这种可执行轰炸任务的单座战斗机，但拒绝卖给以色列，而是卖给得克萨斯州垃圾场。然而，政府不知道的是，这家垃圾场的老板立马将这些飞机以原价转手给了史威默。

当这些飞机一运到伯班克，史威默和他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重新组装的工作，以确保飞机能够正常飞行，然后再次拆解，装入板条箱，打上“制冷设备”的字样后发往以色列。

1951年，这个团队秘密将多架“蚊”式轻型轰炸机从美国发往以色列。有的被拆解后用集装箱运到以色列，有的直接飞到特拉维夫，虽然中途需要加几次油。然则，在一次走私行动中，有一架飞机在加拿大纽芬兰省失踪。

驾驶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雷·库尔兹，他是一名来自布鲁克林的美国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空军服役。战争结束后，库尔兹在布鲁克林福斯特大街250号的消防公司担任一名消防员。1947年，他辞去了这份工作，加入了史威默的非法走私飞机的团队。

库尔兹曾执行过当时以色列航程最远的轰炸任务，在那次令人难忘的行动中，他驾驶着一架B-17轰炸机从捷克某空军基地出发，径直飞往开罗，计划轰炸埃及总统的一处住宅，结果没有击中目标，炸弹落在了总统府附近。即便如此，这次轰炸行动对这个新成立的国家而言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以色列人成功深入埃及的要害部位。

可惜这位以色列的英雄在为这个国家走私更多飞机的行动中失踪了。佩雷斯和史威默决定立即开展搜寻工作，并在靠近北极的小镇古斯贝设立了行动指挥部。

之所以在这里展开搜索，是因为当地爱斯基摩人声称看到一架“蚊”式轰炸机坠入雪地。救援队伍在当地的冰川和山脉上空飞行了整整7天，但什么也没找到。

尽管行动失败，但正是在古斯贝，一个即将对以色列产生巨大影响的想法产生了。在北极附近漫长的夜晚，佩雷斯和史威默促膝长谈，畅

想以色列不再依靠秘密渠道获得飞机的那一天。一天，佩雷斯像先知一样突然对大伙说，以色列将来一定会拥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公司，并生产自己的飞机。

佩雷斯一直记得大多数救援团队成员听到这句话后那满脸无奈的表情。他们认为他在做白日梦。一个得靠取道北极走私飞机的小国，怎么可能制造飞机？但是史威默不但不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还告诉佩雷斯这非常可行。佩雷斯后来说："在古斯贝，以色列飞机制造业宣告诞生。"[5]

回到纽约后，佩雷斯得知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本-古里安刚刚抵达加利福尼亚，于是他和史威默一块儿登上飞机去向"老头"汇报这次失败的救援行动。

他们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伯班克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厂附近，他们还带本-古里安参观了史威默的修理厂。本-古里安满脸惊讶地走在厂房里，他简直不敢相信史威默仅凭这些设备就能修好飞机。随后，总理问道："你为什么不来以色列？我们需要拥有自己的航空工业，我们要自力更生。"

对本-古里安而言，独立的航空工业正符合他几年前提出的质量型军事优势原则。建立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能够确保以色列在整个中东地区拥有制空权。

说服史威默并没有那么容易，他明白这当中的风险。但最终，他答应了本-古里安的要求，但提出了条件：这家公司禁止任人唯亲，必须按照美国公司的方式运作。

本-古里安答应了这些条件，说道："以色列需要你，快来吧！"

不到一周时间，史威默起草了一份30页的工作计划，列出了起步阶段所需的每一种设备，包括液压起重机和各种型号的螺栓与螺钉。

接下来的环节最为麻烦：他们需要说服政府资助这个项目。为此，佩雷斯和史威默专程飞到以色列，同政府和军方高层领导频繁会晤，宣传他们建立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想法。

不出所料，一开始他们就遇到很大的阻力。空军司令表示以色列不需要飞机制造公司，财政部不愿提供预算，交通部部长甚至拒绝考虑这个问题，他还说，以色列连自己的汽车都造不出来，怎么能考虑造飞机？

佩雷斯没有放弃。他成功募集到一些资金，加上部分国防预算的补充，足以启动这一项目。几个月后，新机库的建设工程在卢德郊区启动，这里靠近以色列的国际机场。与此同时，史威默飞回美国采购所需设备。

1955年，这家公司正式开始运营，从世界各地购买的“空中堡垒”轰炸机、“达科塔”运输机、“蚊”式轰炸机、“斯梯曼”教练机等各种机型的飞机，都被运送到这里进行维修和保养。

一年内，这家公司已拥有超过1000名员工。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员工数量达到1万名，成为以色列雇员最多的单位。

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并没有满足于飞机维修和保养业务。1960年，该公司在法国图纸的基础上自主生产出战斗机，这一里程碑事件让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有信心接受更复杂的挑战。这家以色列公司逐渐发展为航空业的国际巨头。

1951年底，佩雷斯回到了以色列。本-古里安对他这位弟子在纽约取得的成绩很满意，任命他为以色列国防部总司长，这是以色列国防体系中最高的非政党文职职位。此时，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刚刚起步，以色列还没有独立生产武器的能力，它需要一个国家能为它稳定地提供军火。

佩雷斯当时对他的助理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下竿，说不定就有鱼上钩了。”[6]

当时，《三方宣言》仍然有效，留给以色列的选择少之又少。然而，在1955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决定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提供价值2.5亿美元的现代高科技武器（在独立战争时，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为以色列提供了重要的武器支持）。一场潜在的冲突正在酝酿之中，西

方国家明白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埃及和苏联的这笔军火交易包括先进的“米格”战斗机、远程轰炸机以及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这让以色列政府感到非常紧张。以色列迫切需要得到帮助。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摩西·夏里特提出应当向美国求援。美国是联合国成员国中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美国有约500万犹太人，同犹太国的文化联系紧密。

夏里特相信只要以色列在政策上表现得更加克制，就能够说服美国为其提供武器，并且在质量和数量上同苏联提供给埃及的武器相当。

但问题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前就制定了美国不做中东主要武器供应国的政策，此时，美国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一政策。美国人愿意向以色列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武器。

接下来的选择是英国。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平哈斯·拉冯认为，英国可以成为以色列的主要军火供应国。佩雷斯专程来到伦敦，但遭到冷遇。英国对以色列国防军不久前在加沙的行动很不满，甚至拒绝向以色列交付当年早些时候订购的坦克。英国还同意卖给埃及两艘驱逐舰，以色列这时已不太可能改变英国的立场。

这样一来，有可能的选项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国。除英国外，法国是唯一一个自主生产包括战斗机、坦克和火炮在内本国大多数武器的欧洲国家。

当时以色列还没有同法国建立正式的防务关系。以色列曾通过一位住在巴黎的波兰伯爵在法国采购过一些武器，但两国在防务领域没有任何官方联系。佩雷斯只能直接飞到巴黎，安排了一次同法国副总理的见面。几周后，他成功谈下155毫米火炮的订单。

佩雷斯到巴黎时，这个共和国正处在政府频繁更迭的混乱期，以色列政府担心政局的不稳不利于两国建立明确的战略合作关系，但佩雷斯看到的却是机会。他意识到，政局的不稳和混乱有助于他自由穿梭于不同的党派间，建立关键的私人联系。这样一来，不管最后哪个党执政，他都可以找到正确的人来促使两国达成协议。



1964年，西蒙·佩雷斯（左二）陪同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左三）在法国会见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右二）（以色列国防部提供）

佩雷斯还准备利用他所察觉到的法国国防界对以色列的理解和同情。20世纪50年代，为了维持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法国一直在同这个北非国家争取独立的势力作战。而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则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在佩雷斯看来，这是典型的“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朋友”的场景。

当佩雷斯在巴黎开展游说时，以色列国内民众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1956年初，苏联军火开始陆续抵达埃及。以色列宣布国家进入特殊状态，呼吁民众牺牲个人时间加入全国防御工事的修建当中。为了让国家有钱购买军火，许多人将自己的珠宝和手表捐给国防部。大家都认为，一旦埃及拥有足够的武器，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就会发动进攻。

佩雷斯频繁地往返于巴黎和耶路撒冷之间，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最终他成功让以色列同法国建立起必要的联系，来自法国的武器开始不断运往以色列。

以色列同法国的关系迅速发展，很快两国的合作不再局限于军售。1956年7月，纳赛尔决定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佩雷斯再次看到了机

会，决定利用这次危机将法以联盟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说服巴黎向以色列出售核反应堆。

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不到一天时间，佩雷斯就和法国国防部部长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见面了，后者想知道，以色列需要多长时间越过西奈半岛并获得对运河的控制权。当布尔热-莫努里问以色列是否愿意加入英法开展一次三方军事行动时，佩雷斯抓住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在一定条件下，我认为我们愿意做好一切行动准备。"

这个"条件"正是以色列一直梦寐以求的核反应堆交易，一旦这个核反应堆顺利在沙漠小镇迪莫纳建成，以色列就能对整个中东拥有史无前例的威慑力。法国答应了这个条件。几周后，为了最终敲定入侵埃及计划，法国、英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在色佛尔会面，就在秘密条约签订前，佩雷斯还私下会见了法国总理和国防部部长。

佩雷斯回忆道："正是在那次私下会面中，我和这两位领导人最后达成协定，法国将帮助以色列在南部的迪莫纳建立一座核反应堆，并提供这座核反应堆运行所需的天然铀。"[7]

当月月底，以色列国防军入侵埃及，史威默和佩雷斯几年前走私到以色列的"野马"式战斗机首先在战场上亮相，以色列人在机身上安装了特殊缆线，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切断埃及的通信联系。这一举措导致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出现混乱。几天后，法军和英军加入以军的行动，虽然战争没有向三国之前预期的方向发展，但以色列如愿进一步巩固了同法国的关系。

1958年，法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军售仍在继续，两国开始讨论将先进战斗机纳入军售范畴，中东似乎又将回到权力平衡的态势。

以色列一直希望深化以法两国的合作，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问法方能否让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加入法国的试飞员课程。法国同意了这一请求，并铺上红地毯迎接以色列飞行员的到来。

以色列派出的飞行员是丹尼·沙皮拉，一位以色列土生土长的后起之

秀。小时候，当看到德国齐柏林客运飞艇从海法上空飞过时，他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航空飞行。

15岁时，只要有关于战斗机飞行员或飞机的电影，哪怕里面只有几个短短的镜头，他都会溜到电影院去看。他玩悬挂式滑翔机，还跑到附近基布兹的青年俱乐部阅读所有关于航空知识的书。1944年，19岁的沙皮拉拿到了飞行员执照。

1948年5月，当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正在全力备战时，包括沙皮拉在内的一批犹太飞行员被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飞行作战训练。5月13日，就在本-古里安宣读《独立宣言》的前一天，他们一行乘坐最后一趟民航班机离开巴勒斯坦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以色列空军第一期飞行员课程。

1959年，鉴于在独立战争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英勇表现，沙皮拉成为以色列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由于以色列空军急需自己的试飞员，所以以色列空军司令埃泽尔·魏茨曼少将派沙皮拉到法国参加试飞员高级课程，沙皮拉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课程考核。随后，魏茨曼命令沙皮拉暂时留在法国，评估一款名为“幻影”的新型战斗机。

这款由法国飞机制造商达索公司研发的战斗机当时还属于最高机密，但法国已经生产出两架原型机，并有意同以色列空军签订军火大单。采用三角翼设计的“幻影”战斗机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由于其特殊的火箭助推系统，“幻影”战斗机成为欧洲设计的第一款飞行速度能达到2马赫的飞机。

魏茨曼对法国人说，虽然他对这款飞机很感兴趣，但需要派自己的试飞员对飞机进行检查和试飞。而法国人坚称只有法国飞行员才能驾驶“幻影”战斗机。

魏茨曼用典型的以色列“虎刺怕”方式告诉达索公司首席执行官本诺-克劳德·瓦利尔雷斯：“我把丹尼·沙皮拉送到你们的试飞员学校学习，你们给他颁发的证书上写着他可以试飞各种机型，所以没有理由不让他试

飞！如果不让丹尼·沙皮拉试飞，这桩生意就不要再谈了。”

法国人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

第一次试飞非常顺利，飞机的性能给沙皮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1959年6月26日，他将在魏茨曼面前试飞“幻影”战斗机。

试飞当天，沙皮拉很早就来到基地穿戴装备。“幻影”战斗机飞行员需穿戴特殊加压服和氧气罩。由于过度紧张，沙皮拉穿过跑道准备登机时才发现自己忘了换作战靴。马上就要起飞，换靴已经来不及了。刚开始飞行非常顺利，沙皮拉轻松爬升到4万英尺的高度。接着他打开火箭助推开关，飞机突然加速，强大的推背感让沙皮拉都感到有些吃惊。

“1.1马赫，1.3马赫，1.9马赫，2马赫。”沙皮拉向指挥室汇报飞机的飞行速度，而此时，站在指挥室的魏茨曼已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他对身边的达索公司行政人员大声说道：“两千年来第一次达到2马赫！”他话中的两千年指的是犹太人重新建国所花的时间。

当魏茨曼欢呼雀跃时，沙皮拉正经历着生死考验，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飞机在不断爬升，沙皮拉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对自己说道：“丹尼，你在飞离地球。”

突然，驾驶舱一个红灯亮了起来，提示沙皮拉飞机已超过最高时速。飞机达到6.4万英尺的高度时，沙皮拉才关掉火箭助推器，但由于速度下降过快，飞机开始剧烈抖动，沙皮拉以为机身要解体了。最终，他成功控制住飞机，适应了超音速状态下驾驶飞机的方法，安全降落在达索机场。

虽然吓出一身冷汗，但沙皮拉对飞机的性能非常满意，魏茨曼也一样。沙皮拉的下一个任务是让达索公司对这款飞机的技术参数进行调整，从而更好地满足以色列的需求。“幻影”战斗机被设计为高空截击机，而不是用来携带炸弹执行地面攻击任务。

但以色列需要多功能的飞机，在同一任务中既要同敌机进行近距离空战，又要轰炸地面目标。法国人同意了沙皮拉的要求，答应对这款本

用于拦截苏联轰炸机的飞机进行改装，使其能够携带空对地炸弹。

“我们还需要在机身上安装航炮。”沙皮拉对法国工程师说。

这个要求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惑，沙皮拉得到的回答是：“那是老掉牙的东西，完全没必要，只有老式飞机才需要航炮。”

但后来成为以色列传奇人物（就像查克·耶格尔之于美国的意义一样）的沙皮拉拒绝妥协，他知道，当以色列飞机同埃及和叙利亚飞机进入近距离战斗时，根本没有足够的距离使用空对空导弹，因此，以色列空军飞行员需要能够近距离开火的武器，航炮是最佳选择。

在沙皮拉的坚持下，法国人最终让步，在飞机上装备了两门30毫米航炮。丹尼·沙皮拉完美展现了以色列典型的“虎刺怕”精神，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通过一己之力成功说服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国防企业之一重新设计其战斗机，给出的理由也仅仅是他的个人见解。

第一批“幻影”战斗机于1962年到达以色列，在几年后的六日战争(3)中，这些战斗机正是用航炮击落了51架敌机。

1967年六日战争过后，以色列和法国的亲密关系结束。为了恢复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法国战争英雄和总统夏尔·戴高乐以六日战争为借口停止了与以色列的合作。他对中东实行严格的军火禁运，特别是对以色列。

林登·约翰逊总统在位期间，美国最终取代法国成为以色列的现代武器主要供应国。

虽然美以关系之后不断发展，但法国还是让以色列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为了生存下去，犹太国不能仅仅依靠外部援助，而是应该设法发展自己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这才是生存下去的长久之计。

(1) “老头”指的是本-古里安。——译者注

(2) 英文为gung-ho，来自汉语中“工合”的英译，衍生出“起劲”“卖力”“热心”，甚至是“过分热心”的含义。——译者注

(3) 以色列将第三次中东战争称为六日战争。——译者注

第二章　“玩具”飞机

“我们的特工带着照片回来了。”一名情报分析员将头探进沙伯泰·布里尔的办公室对他说道。

时间是1968年，鉴于当时紧张的情报战形势，这可是一个重大新闻。听到这个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希伯来语缩写的音译为“阿曼”）的布里尔少校连忙放下手头的报告站起身来。

布里尔经常看秘密情报，但今天的情报很特殊。这位“特工”是一年前六日战争结束后最早渗透到埃及的以色列间谍之一，他拍到的照片可以反映埃军的作战计划，包括埃军在停火线后方的潜在准备行动。

在军事情报局，有一个房间是该部门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情报先汇聚到这里，然后分发给各情报案件官员。此时，在这个房间，一小拨人正围在这位特工周围。布里尔的顶头上司亚伯拉罕·阿尔南上校正在仔细端详一张照片。

“你们怎么看？”他向一群情报分析员问道，“这看上去像一座军用桥梁。”

那的确是一座军用桥梁，而且，埃军已将桥梁移到离苏伊士运河不到1英里的地方。这条极具战略意义的水道的另一边就是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的埃及领土。通过这座军用桥梁，埃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可以横穿运河，入侵以色列。此时这座桥梁离运河已经太近了，显然没法让以色列安心。

在将特工派往埃及前，以色列尝试过利用其他途径获取关于埃军在运河以西活动的情报。一位军官曾设计出一个可以安装在坦克上的特殊观察台，站在上面，情报官可以将视线越过埃及在运河那边修建的30英尺高的沙障观察对面的情况。这个方法似乎挺有效，直到有一天，一个观察台被埃军狙击手击中。

后来，以色列空军派出侦察机从边界上空向地面拍照，由于埃及部

署有地对空导弹，侦察机不得不保持高空飞行，因此拍出来的照片几乎毫无价值。这样一来，以色列国防军只剩下最后一招：人力情报。他们将特工化装成埃及人，从欧洲入境埃及，然后以游客的身份来到苏伊士运河附近拍照，从而让以色列了解边境的具体情况。

阿尔南急忙拿着照片去向军事情报局高层领导汇报。布里尔则站在原地，他在想，一张照片竟然能对以色列的生存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这简直不可思议。

他不禁问道："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仅仅是为了获得运河那边的一张照片？"他明白这份情报的重要性，但同时又总感觉事情有些奇怪。他认为，了解几百英尺外的情况，一定存在更简单的方法。

晚上，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还在思考着获得运河情报更简单的方法。他回忆起几周前在特拉维夫看的一部电影。在正片开始前有一段新闻短片，其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美国犹太男孩在成人礼上收到一架玩具飞机。具体情节已经不再重要，布里尔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他记得，那架彩色飞机可以通过遥控器远程无线控制。布里尔想到一个极为简单的方案：买几架遥控玩具飞机，在底下装上相机，然后遥控它们飞至苏伊士运河上空拍摄埃军阵地的照片。

布里尔知道，要想实现这个想法，他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于是他来到空军基地，通过打听，他认识了什洛莫·巴拉克，这位军官经常在周末玩遥控飞机，是能够帮助布里尔实现这个想法的不可多得的人选。

布里尔尝试让空军负责这个项目，但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空军技术部门的军官对布里尔说："遥控飞机只是玩具，对我们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于是他试图让自己的上级领导接受这个想法，他对阿尔南说："我们只须花很少的经费就可以买一些遥控飞机，安上摄像头后就能飞到苏伊士运河上空监视埃及人。"阿尔南不太相信，他要求首先看看实际效果。

不到一周时间，布里尔和阿尔南再次碰面，地点是特拉维夫郊外一个简易飞机跑道。在飞行演示中，巴拉克操纵一架遥控飞机完成了一些

空中动作，进行了几次翻转，最后完美降落。阿尔南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但他需要知道实现这个想法的成本。布里尔没法马上回答他，而是和巴拉克一起列出一份清单：3架飞机，6个遥控器，5个引擎，一些备用轮胎和螺旋桨，一共需要850美元。

阿尔南批准了这笔经费，然后，一名访问纽约的以色列国防代表团成员来到曼哈顿玩具店购买了这些装备，并用大使馆的外交包裹将它们寄回以色列。这样一来，谁也不会问他行李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玩具飞机。

这些玩具飞机安全运达以色列后，被送到军事情报局的技术小组进行改装，装上了德国制造的35毫米胶片相机和计时器，在计时器的控制下，相机每10秒就会自动拍照。

玩具飞机运到以色列几周后，布里尔告诉阿尔南："我们已经准备好将其投入实战了。"但高层军官仍然心存疑虑，他们害怕飞机被埃及防空导弹击落，所以建议先让国防军的防空部队试试，能否将其击落。

一个炎热的夏日，阿尔南和布里尔驾车来到以色列国防军在内盖夫沙漠的防空训练基地，他们将一条道路封锁起来用作飞机跑道，并提示防空炮手飞机的飞行方向。布里尔非常紧张，因为一旦飞机被击落，他的计划将会被立即终止。

飞机起飞后在一块沙地上空盘旋，炮手朝它开火，震耳欲聋的响声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看不到飞机的踪影，布里尔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当炮火的浓烟散去后，玩具飞机仍在高空翱翔。巴拉克让飞机的高度从1000英尺降到700英尺，最后甚至降到300英尺，但由于目标太小，防空炮手根本无法击中目标。飞机降落后，满脸惊讶的阿尔南转身面向布里尔，同意飞机到埃及上空执行任务。



1969年，一位不知姓名的以军战士正在组装一架准备飞往苏伊士运河上空的玩具飞机（沙伯泰·布里尔提供）

他们选定的第一个侦察目标是位于伊斯梅利亚附近的一处埃军阵地，伊斯梅利亚这座小城位于苏伊士运河河畔，靠近提姆湖（也称为鳄鱼湖）。行动小组由两人组成，一人是操作遥控器的“飞行员”，另一人是拿着120×20双筒望远镜观察飞机的“领航员”，后者负责确保飞机不会超出他们的视线范围。

但1969年7月玩具飞机的第一次试飞开展得并不顺利。一开始，由于地面到处是坑，很难找到一块能用作飞机跑道的平地。好不容易找到一块长达100英尺的狭长平地后，上级才批准了飞机起飞。阿尔南下令他们操纵飞机向埃及方向飞行到纵深1英里左右的位置，但很不巧，起飞后不久飞机就进入一团沙尘，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大家立刻紧张起来，因为一旦飞机坠毁在埃及，以色列新研制的秘密武器会立马暴露。担任“领航员”的巴拉克让“飞行员”操纵飞机在天空盘旋，并爬升到更高的地方。他对“飞行员”说：“别紧张，接着飞，我们会看到它的。”

经过紧张的时刻后，飞机终于从沙尘中飞了出来，“飞行员”将它顺利降落在以色列领土。胶片当即被送去冲洗，当照片送回来后，阿尔南和布里尔都感到非常惊讶：照片的清晰度非常高！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埃军沿着运河修建的战壕，连阵地之间的通信电缆都能看清。

以色列第一次得到能够清晰显示埃及沿苏伊士运河所修防御工事以

及为未来战争所做准备情况的照片。

之后，他们又在西奈半岛执行了一次任务，任务完成后，阿尔南将团队派到约旦河谷地，对约旦阵地进行了类似的空中侦察，再次取得良好效果。当年夏末，军事情报局局长阿哈龙·亚里夫少将决定成立一个正式的开发小组，负责研发一种体积更小、更加结实并能够整合到常规部队中的遥控飞机。亚里夫还写信表扬布里尔：“谢谢你的这项发明。没有来自各级官兵的创新，就不会有今天的以色列国防军。”

几周后，布里尔得到晋升，负责西奈半岛的早期预警情报系统。他以为自己启动的项目已有人接管，自己可以去探索新的领域了。但几个月后的一天，军事情报局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局里终止了那个项目。亚里夫成立的团队并没有采用布里尔设计的飞机，而是另起炉灶重新设计，结果新飞机总是在飞行过程中坠毁。所以，军事情报局高层认为这个项目成本太高，应当由空军负责，便终止了此项目。

布里尔并没有放弃，1969年，他向亚里夫和情报界其他官员写了好几封信，说明放弃这个项目的严重后果，并请求这些指挥官不要终止该项目，但布里尔未能说服他们。

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一天，埃及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成功渡过苏伊士运河，在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西奈半岛。以色列最终守住了自己的国土，但这场残酷的战争给这个国家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共有2000多名战士牺牲，这是独立战争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沙伯泰·布里尔的玩具飞机第一次试飞时拍摄到的苏伊士运河沿岸埃及港口的照片（沙伯泰·布里尔提供）

布里尔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他敢肯定，如果无人机项目没被取消，以色列可以提前发现埃军的行动，及时加强防御，甚至避免战争的爆发。如果当时看得见边界线那一边的动态，数千人的生命就不会白白葬送。

他说："如果我们当时继续对运河以西3英里范围区域拍照，我们就可以看到埃及正在调集坦克、桥梁设备和其他物资，也能够明白他们在准备发动战争。但很不幸，我们没有这样做。"

军事情报局也意识到这个错误，于是重新启动了布里尔的计划，联系到当地国防公司，委托他们设计一种小型无人驾驶飞机（UAV），现在我们一般称其为无人机。

新设计的以色列机型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投入使用，但在这期间，有两件事情已经明确：第一，以色列需要高质量的情报；第二，为了满足这个需求，以色列必须发展无人机。布里尔当时还不知道，1969年他在苏伊士运河开创的事业将发展为一项数十亿美元的巨大产业，并帮助

以色列成为全球军事强国。

经过几年的研发和试飞，以色列第一款无人机“侦察兵”（Scout）终于在1979年交付空军。最早的“侦察兵”无人机需要使用火箭助推器进行发射，但不久以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就对该机型进行了升级，使其能够像普通飞机一样使用跑道起飞。

“侦察兵”无人机很快被用于实战。

1982年6月，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断越过北部边界向以色列发动武装袭击和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决定入侵黎巴嫩，从根源上消除这些隐患。叙利亚当时在黎巴嫩贝卡谷地部署了将近20个“萨姆”导弹（苏制地对空导弹）连，严重限制了以色列空军的机动能力，成为以色列面临的首要障碍。

以色列空军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几周前，“侦察兵”无人机已经飞到谷地上空搜集到“萨姆”导弹连的雷达和通信频率，这些数据对以色列空军的下一步行动至关重要：利用电子手段压制导弹连。

以色列于6月6日发动全面进攻，电子战系统让大多数叙利亚导弹系统失效，“侦察兵”无人机还协助以色列战斗机识别并炸毁了导弹发射系统。这次行动大获全胜，以色列空军摧毁了几乎所有的叙利亚“萨姆”导弹，并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击落了82架叙利亚“米格”战斗机。

这次行动改变了许多以色列人的认识，特别是那些之前不相信无人机的军官。现在人们突然发现，这些小型无人机拥有无限的潜力。

当以色列“侦察兵”无人机屡立战功时，以色列最主要的盟友美国在无人机的研发道路上却走得极为艰难。几十亿美元已经投了进去，但项目一个接一个地失败，没有任何办法。

几年前，五角大楼曾资助过“天鹰座”无人机的研发，这款无人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在起飞时需要几十个人协同操作，但在试飞过程中经常坠机。1987年，在烧掉了10亿美元后，五角大楼决定终止这一

计划。[1]

波音公司当时也在研制一种名为“秃鹰”的无人机，计划用这种无人机替代U-2传统侦察机，但这种无人机的翼展过长，达到200英尺，是U-2侦察机的两倍。这个项目在投入了3亿美元后也被终止，最终只制造出一架样机，现在被悬挂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博物馆里。[2]

1983年12月，美国终于决定向以色列寻求帮助。几周前，部署在贝鲁特附近的叙利亚防空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国间谍飞机，作为回应，美国海军对叙利亚导弹连发动袭击，但行动不但失败，而且损失惨重：两架美国飞机被击落，一名飞行员遇害，一名领航员被俘。虽然部分叙利亚防空火炮被摧毁，但叙利亚防空火力迫使美国飞机在远离目标的地方提前投弹。事后调查发现，附近海域美国战列舰上舰炮的火力范围完全可以覆盖这些叙利亚防空系统，根本没必要让美国飞行员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问题在于，美国海军不知道叙利亚导弹系统的具体位置，它需要一双能够停留在空中的眼睛来指挥舰炮。

行动失败几周后，美国海军部部长约翰·莱曼来到贝鲁特，并决定利用这一机会飞到特拉维夫了解以色列无人机的使用情况。他听说“侦察兵”无人机曾用于1982年战争，但从未亲眼见到过这款无人机。到达以色列军事指挥部后，莱曼被带到一个作战室，坐在一台小电视机前，然后以方人员交给他一个操作杆，直接让他操作一架飞行中的无人机。同样，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保罗·X.凯利将军曾为了无人机项目专程访问以色列，在他行程快结束时，以色列人为他展示了一段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其画面效果和家里播放的电影差不多，看到其中一些镜头时，凯利的脸都快贴到屏幕上了。[3]

他们两人都很欣赏以色列的无人机技术，下一步的工作是推进双方的合作。美国的官方手续非常复杂，但莱曼决定跳过一般流程，直接让美国海军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签订合同，在“侦察兵”无人机基础上研制一款新型无人机。美国希望这款无人机更大更结实，并装备更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为战列舰提供校射服务。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很快开发出一款被称为“先锋”的原型机，在莫哈韦沙漠试飞后，美国海军非常满意，并订购了175架。

“先锋”无人机从1986年开始交付，不久后就参加了实战。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了解放这个海湾国家，美国加入战争。在一次作战行动中，一架“先锋”无人机飞到一群伊拉克士兵上空，看到这架飞机后，士兵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先进武器，赶紧脱下身上的白色内衣向空中挥舞，示意投降。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例一个军事单位向一台机器投降的案例。

回到美国几个月后，莱曼得知有人在洛杉矶研发另一种无人机，而且这种无人机也可以为军舰提供校射。其设计者来自“先锋”无人机开发单位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他曾是那里的高层管理人员，现在来到美国试试运气。

阿比·卡雷姆1937年出生于巴格达，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随家人移民以色列。8岁时他就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几年后，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航空科学。14岁，他制作出人生中的第一架（玩具）飞机。又过了不到两年，他成为高中玩具飞机俱乐部的一名教练。高中毕业后，卡雷姆到以色列理工学院（相当于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学，服完兵役后，他来到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工作。[4]

1973年赎罪日战争时，卡雷姆研制出他的第一架无人机，当时以色列空军很难突破埃及苏式防空系统的防线。卡雷姆的团队仅用了几周时间就研制出一种诱饵飞机，简单说这是一种可以通过操作杆控制的诱饵弹。以色列空军可以通过这种诱饵飞机使埃军启动雷达，确定雷达的位置，然后让附近的战斗机发射反辐射导弹[(1)]摧毁这些雷达系统。虽然在战争中立下奇功，但战争过后，以色列空军决定购买美国的类似武器，卡雷姆的发明无人问津。他不断强调，以色列要想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必须加大对自主系统的投资，但没人听他的建议。于是，失意的他放弃了以色列的工作，来到美国寻找新的机会。

卡雷姆和家人搬到洛杉矶，但他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同时买房和租赁办公场所，所以卡雷姆和妻子不得不采取折中方案：房子供家人使用，后院则用来研发无人机。几个月内，正是在哈仙达岗这个600平方英尺的后院，卡雷姆成立了领先系统（Leading Systems）科技公司，并同两位兼职员工一起开始了新型无人机的研发。他们吸取卡雷姆在以色

列航空工业公司的教训，试图将无人机的成本降到最低。这款被称为“琥珀”的原型机由胶合板和玻璃纤维制成，其使用的二冲程引擎是卡雷姆从一辆卡丁车上拆下来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处于测试阶段的“琥珀”无人机每天都进行飞行试验，有时单次连续飞行时间能达到30小时。在莱曼的坚持下，美国海军宣布了购买200架“琥珀”无人机的计划，卡雷姆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但没想到，1987年国会否决了这笔采购经费。卡雷姆没有放弃，开始着手设计适合出口的“琥珀”无人机机型。但这时银行给他打来电话，通知他500万贷款的还款日到了，为了筹到这笔钱，卡雷姆只好把领先系统科技公司卖给了休斯飞机公司。收购完成后，领先系统科技公司更名为通用原子公司。卡雷姆担任该公司的顾问，并研发了另一型号的“琥珀”无人机——“蚋蚊”750。

卡雷姆的转折点来自两个他意想不到的地方：波斯尼亚和以色列。1993年，前南斯拉夫地区爆发内战，参战人员中既有正式部队士兵也有民兵，但他们穿着便装，这让美国政府难以评估地面的真实情况。

这个问题摆在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R.詹姆斯·伍尔西的面前。一天，在（中情局总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举行的一场寻找对策的会议上，伍尔西突然回忆起几年前对以色列的一次访问，在那时他第一次看到飞行中的无人机。访问期间，伍尔西在之前担任海军部副部长时结识的一些以色列国防官员的带领下，参观了以色列国防军新成立的无人机单位。这个单位主要负责黎巴嫩的侦察任务。一名以色列国防军上校带他参观了该单位的基地，并介绍他认识了一些无人机操作人员。

伍尔西对这名上校说：“这些人在业务上非常专业，但他们看上去也太年轻了。”以色列军官笑了笑回答道：“这里相当于以色列的飞机模型俱乐部，我们只是在征兵时把这些爱好者招到了同一个单位。”

接着，上校把伍尔西带到附近的一个帐篷内，向他展示了在不久前的行动中搜集到的视频。在屏幕上，伍尔西看到3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组成的车队正行驶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条公路上。上校解释说，根据情报，坐在第二辆轿车中的一名乘客是真主党高级特工。接着，一架无人机用激光指示器对这辆轿车进行标记后，附近的以色列空军直升机立即

发射导弹将其摧毁。

在越南战争时，担任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总顾问的伍尔西见过激光制导在实战中的运用，当时激光标记工作由战斗机完成，他至今还记得被标记后飞机总能精准地击中目标。此次访问结束回国后，伍尔西一直对无人机很感兴趣。

现在，作为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面对美军在波斯尼亚存在的重大情报空缺，他明白现在需要什么。他对手下说："我们需要能长时间工作的无人机。"他将国防部无人机团队召集到兰利，问他们需要多长时间造出一架能在波斯尼亚使用的无人机。国防部官员回答说："我们可以做到，但需要6年时间和5亿美元。"对伍尔西来说，这个时间太长，投资太大。

他突然想到阿比·卡雷姆。几年前他们曾有过一面之交，卡雷姆的创新思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拨通卡雷姆的电话后开门见山地问道：

"如果由你来研发一种能够在波斯尼亚使用的无人机，需要多少钱？需要多长时间？"

"6个月，500万美元。"卡雷姆回答道。

"厉害，你给的数字比五角大楼的人少了两个零。我们来好好聊聊这件事。"中央情报局局长说道。

伍尔西派中央情报局一位名为简的工作人员配合卡雷姆开展这个项目，这位员工曾研发过一种特殊的无人机指挥控制系统。卡雷姆和简立马投入工作，6个月后，"蚋蚊"750无人机如期在波斯尼亚上空执行侦察任务。几天后，伍尔西在兰利中情局总部七楼的办公室装上了能够直播无人机拍摄视频的设备，中情局局长可以一边观察莫斯塔尔古桥上的人流，一边通过一款早期聊天软件同操作无人机的地面站进行交流。[5]

国防部对"蚋蚊"无人机非常满意，当即决定利用这次成功继续开发军用无人机的应用。他们和通用原子公司再次签订合同，要求他们研发一种比"蚋蚊"更强大的机型，要求引擎的功率更大，机翼也要重新设计。

这种新型无人机在“蚋蚊”的基础上发生的最大改变来自通用原子公司在上面安装的卫星通信链路。公司认为更先进的无人机需要一个新的名字，通过竞争，最终胜出的名字是“捕食者”。这款无人机后来声名远扬，成为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和也门执行过无数次袭击任务。正是以色列和一名以色列工程师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无人机对军队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其适合执行“3D”任务[2]，它们不怕枯燥、不怕污染，也不怕危险。

“枯燥”主要指的是边界巡逻和海上监视等例行任务的乏味。这些任务对体力的要求很高，极具重复性。人类在连续工作10—12小时后会感到非常疲劳，而以色列的“苍鹭”无人机（2005年以来，以色列空军主要用于执行例行任务的无人机机型）可以在空中连续作业50小时。

“污染”主要指进入被化学或生物制剂污染的空域，在这些情况下，人类需要穿戴笨重的护具，但无人机却没有任何风险，可以正常执行任务，适应更多类型的作战环境。

至于“危险”，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主要指那些飞行员有可能受伤或牺牲的任务，可以派机器来执行。

相对于普通战斗机，无人机具有许多优点：体积更小，重量更轻，造价更低，在空中飞行的时间也更长。战斗机可以冲破音障，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高速飞行在近距离空战或执行需要快进快出的任务时至关重要，但这意味着飞机位置暴露得也很快。无人机的声音更小，当它在目标位置高空盘旋时，其发出的噪音会和城市交通产生的噪音融为一体，不易识别，所以无人机特别适用于追捕和清除恐怖分子等移动目标。

自1979年“侦察兵”无人机交付以来，以色列空军已经使用和退役了多种型号的无人机。不同于从海外采购的大型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和运输机，这些无人机全部由以色列本土公司研发和制造。

1985年以来，以色列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出口国，出口份额占全球市场的60%，排在第二的美国只占23.9%。[6]以色列无人机的客户包括美国、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和巴西等几十个国家。2010年，5个北约国家都使用以色列无人机在阿富汗执行任务。

今天，以色列国防军各军兵种都使用无人机。比如，以色列空军一直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各前线地带使用“苍鹭”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

“苍鹭”无人机机身长度约27英尺，比“赛斯纳”轻型飞机略短，但翼展却要长出20英尺。该飞机的螺旋桨推进器后置，运行时持续发出类似割草机的声音。“苍鹭”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自动飞行系统，操作员可以在起飞前设定飞行路线，只需4个按钮就可以完成起飞，随后飞机会飞到目标地点，并在任务结束后飞回之前设定的降落点。这样一来，操作员可以专注于任务本身，而不是飞机的操控。

“苍鹭”无人机的生产商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从未公布过制造这款无人机的确切成本，根据行业估算，其单机造价大概在1000万—1500万美元之间，远低于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如果参照以色列空军最近购买F-35第五代多用途战斗机的价格，一架F-35的采购资金可以购买10架“苍鹭”无人机。

“苍鹭”无人机的飞行模式分为视距模式和卫星模式。采用视距模式操作时，操作员同无人机间的距离必须保持在250英里以内；在卫星模式下，无人机通过连接卫星进行控制，其飞行距离完全取决于所携带燃料的数量，不受操作员位置的影响。但无人机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其有效荷载。仍然以“苍鹭”无人机为例，它有多个部位可以携带设备，包括机舱下方、机翼上以及机头下方的万向节，在万向节中可以根据不同任务需求安装不同的传感器，包括昼夜摄像机、红外夜视仪、激光目标指示传感器和识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特殊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其中一款由以色列设计的传感器名为“烈火战车”，可以通过探测地形的微弱变化来发现地下火箭发射器的位置。哈马斯经常把火箭发射器藏在地下，所以这种传感器在加沙等地能发挥重要作用。简言之，这种传感器能够看到其他手段无法识别的

东西。

以色列无人机最初设计用于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任务，即飞到目标上空监测地面情况变化。其实从一开始以色列的武器设计人员就明白，无人机可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完成更多类型的任务。

无人机可以通过激光指示器对目标进行标记，然后由直升机或战斗机攻击目标。无人机既然可以携带激光指示器，为什么不能携带导弹？据报道，包括“苍鹭”在内的以色列无人机已经具备定位目标并将其摧毁的能力。[7]以色列从未承认其无人机具备攻击能力，但大量证据都表明其已具备这种能力。在一次防务展上，以色列展出过机翼下安装有导弹的无人机。在维基解密泄露的电报中，以色列也曾承认部分加沙地带的袭击行动是武装无人机所为。据报道，“苍鹭”无人机和“赫尔墨斯”450型无人机（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研发的另一种中型无人机）可携带“海尔法”激光制导导弹和体积更小的导弹，如以色列研发的“长钉”导弹。“长钉”导弹的附带毁伤很小，据说在精确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中非常有效。

以色列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受影响最大的是加沙地带。在加沙狭窄的巷子里，人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天空传来无人机发出的割草机般的声音。加沙人称这些无人机为“扎那纳”，阿拉伯语中是“噪音”或“唠叨的妻子”的意思。

这些无人机在加沙搜集情报，帮助以色列国防军建立冲突爆发后可供使用的“目标库”。在2012年11月发生在加沙的“防务之柱”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攻击了将近1000个地下火箭发射器和200条地道，这些目标都是根据无人机搜集的情报定位和识别的。其实，“防务之柱”行动的第一波攻击就是在无人机的帮助下发起的，当时，一枚导弹击中了哈马斯最高军事指挥官艾哈迈德·贾巴里驾驶的起亚轿车。没想到，这名在之前四次暗杀行动中死里逃生的以色列通缉要犯最终被无人机清除。[8]

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火箭弹袭击展开报复性轰炸之前，无人机主要用于侦察目标附近的情况。比如，在直升机和战斗机轰炸那些载有火箭发射器的汽车前，无人机会先确认没有儿童进入杀伤区；当以色列国防军步兵包围哈马斯成员藏匿的建筑时，无人机会提供实时空中援助，引

导战士安全地进入该建筑。在必要情况下，无人机也可直接向目标发起攻击。

以色列国防军中的很多微型无人机并不是从空军基地起飞，而是从战士背包里拿出来，然后像橄榄球运动中四分卫掷球那样抛向天空。2010年交付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的“云雀”无人机就属于这一类。“云雀”无人机的重量只有13磅，可以收纳到单兵背包中，但一旦飞到天空，可以在3000英尺的高度持续工作3小时。该无人机适用于多种类型的作战行动，包括在约旦河西岸的随机巡逻和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地的大规模地面行动。

凭借这种新型战争武器，指挥员能迅速获得近距离情报，不再完全依靠以色列空军。同样，以色列空军也可以专注于完成更具战略意义的任务。

截至2016年，以色列的微型无人机在各国军队中深受欢迎，已被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韩国、法国、瑞典和秘鲁等国使用。

无人机不但影响了战争方式，还改变了军队的组织结构，各军兵种都不得不适应这项新科技带来的变化。以色列建国后，第七装甲旅曾成立过一支代号为“帕萨尔”(3)的负责远距离侦察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的战士相当于移动的前哨。在坦克出动前，他们已摸清前方地形，并发回了敌人的位置信息。然而，2010年“云雀”无人机投入使用后，以色列国防军认为现在需要重新考虑这支部队存在的必要性，或者说，需要重新定义战士的角色。毕竟，坦克出动前，无人机可以完成同样的任务，为什么还要让战士去冒险？

2009年，以色列无人机的性能开发取得了新的进展。[9]

1月中旬，以色列士兵深入到加沙地带执行作战任务，这是4年前以色列从这片巴勒斯坦领土单方面撤离以来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地面行动。一年来，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2000多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认为不能再忍下去了，所以以色列发动了“铸铅”行动。

当全国人民密切关注着以色列步兵和装甲旅在加沙的战况时，在遥远的苏丹，以色列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威胁。

根据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4]的情报，一艘载有伊朗先进武器“法基尔”[5]火箭弹的船只已停靠在红海边的苏丹港。这不是普通的火箭弹，它极有可能打破中东的军力平衡。

在此之前，依靠哈马斯的武器库，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已威胁到以色列南部100万居民的生命，“法基尔”火箭弹的射程更远，可以直接打到特拉维夫。此外，摩萨德还获悉，这些装有火箭弹的集装箱正在装车，计划取道苏丹和埃及运往加沙边境的一个仓库，接着通过地道走私到加沙。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加比·阿什肯纳兹中将开始制订攻击这支运输车队的计划，但时间非常紧迫。一旦卡车进入埃及境内，以色列就无法实施打击计划，因为埃以之间签订有和平协定，在埃及境内发动袭击很可能打破这一脆弱的和平状态。加沙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一旦火箭弹运到加沙后很快就会被分散到人群中，虽然以色列在加沙的情报覆盖做得非常好，但定位这些火箭弹谈何容易。换句话说，要想阻止这些火箭弹进入加沙，以色列必须在苏丹境内发动袭击。

以色列国防高层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鸽派人士反对发动袭击，因为以色列在国际上正变得越来越孤立。加沙的死亡人数在不断上升，不少地方遭到以色列严重破坏，许多国家对以色列提出严正抗议。这时如果以色列在另一个国家发动袭击，很难从道义上自圆其说。另一方的鹰派人士则认为以色列不能坐以待毙，如果先进武器进入加沙，其后果难以估量。

这个事情最终只能由总理奥尔默特决定。其实，奥尔默特和不少秘密行动有着紧密的关系。有报道称，2007年，他不顾美国反对，批准了以色列袭击叙利亚西北部一座正在秘密修建的核反应堆的行动。还有人认为以色列许多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和伊朗科学家的高调刺杀行动也是由他授权的。

在批准这些行动前，奥尔默特一般会了解完成任务的技术难度和风

险大小。但这一次，除了这些一般程序，他还要确保外界无法将这次袭击归罪于以色列，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不能留下任何“指纹”。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向苏丹派出战斗机非常危险，一旦有一架飞机被埃及或沙特阿拉伯的雷达发现（红海那一区域正好被沙特阿拉伯雷达覆盖），整个任务就可能失败。

此外，该行动还存在技术上的困难。袭击目标是移动的卡车车队，因此很难追踪。攻击时机非常重要，情报必须绝对精确。由于战斗机燃料有限，无法在苏丹领空停留太久。

接下来，阿什肯纳兹与作战部负责人开始制订任务计划。他们两人咨询了空军作战研究小组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弹药专家，这些人员对目标进行了评估，推荐了摧毁目标需使用的飞机和炸弹。他们给出了多种方案，经过慎重考虑，以色列国防军选择了一种非常规方案：用无人机袭击车队。[10]

这种方案之前从未尝试过。虽然有报道称以色列曾使用无人机对加沙地带个别恐怖分子实施过小规模袭击，但大多数时候无人机只在加沙、黎巴嫩等邻近区域执行侦察任务，从来没有长途奔袭到苏丹这么远的地方实施过袭击。不过，这个决定是有道理的：无人机可以在广阔的苏丹沙漠上空盘旋较长时间，等待车队的出现。

这次袭击后，以色列安全领域一名消息人士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说：“当你攻击一个固定目标特别是大型目标时，你最好使用战斗机。但如果袭击随时变换位置的可移动目标，无人机是最佳选择，因为它们可以盘旋在敌方看不见的高度等着目标出现。”[11]

随着准备工作的推进，参与人员的名单也变得越来越长。所以，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了他们在筹备敏感行动时经常采取的策略：区隔化。只有极少数军官知道任务的所有方面，其他人只知道并专注于其中的一个方面。大家知道，如果走漏风声，任务就会被取消，伊朗火箭弹将会被运到加沙，要想再次见到这些火箭弹，很可能就是火箭弹打到他们家的时候了。

内盖夫沙漠烈日炎炎，这里降水极少，缺少植被，大部分地区十分贫瘠。由于很少有以色列人居住在沙漠，这片广袤而干燥的地区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最主要的训练场所。在之前的训练中，以色列的无人机操作员已经掌握了跟踪移动车辆的技巧，但仅局限于跟踪驾驶汽车或摩托车的单个激进分子。在针对这次任务的准备时期，他们必须学会定位和追踪多辆载有火箭弹的卡车。但在广阔的苏丹沙漠，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难。

本次任务选用的是“苍鹭”TP和“赫尔墨斯”450型两种无人机。“苍鹭”TP无人机是以色列最大的无人驾驶飞机，其翼展与波音客机相当；“赫尔墨斯”450型无人机是以色列最主要的攻击型无人机。根据计划，“苍鹭”TP无人机将首先出发，到达指定地点后，在无法被发现的高空对这支车队进行定位和跟踪。接下来，“赫尔墨斯”450型无人机（有必要的话战斗机也要参战）向目标俯冲并进行攻击。

轰炸行动的当晚是典型的苏丹1月的天气，虽然局部地区多云，但大部分区域都很晴朗。行驶在沙漠中，苏丹和巴勒斯坦的走私分子们怎么也想不到以色列无人机会从几千英尺的高空发现他们的位置，当他们看到迎面飞来的导弹时，一切都晚了，这次行动中有43名走私分子被杀，所有卡车都被摧毁。首战告捷。但几周后的2月，伊朗进行了第二次尝试，奥尔默特再次批准袭击行动。据报道，这一次40名走私分子被杀，10多辆卡车被摧毁。



正在以色列起飞的“苍鹭”TP无人机（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提供）

苏丹人感到非常震惊，奥马尔·巴希尔政府知道伊朗和哈马斯在利用苏丹秘密走私军火，但他们万万没想到以色列敢在一个非洲主权国家发动袭击，因此他们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美国是袭击行动的策划者。2月24日，在第二次袭击发生几天后，苏丹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喀土穆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在青尼罗河河畔，费尔南德斯和苏丹外交部美国司负责人纳斯尔丁·瓦里进行了会面。[12]

瓦里对费尔南德斯说：“我要和你说一个很敏感且很令人担忧的事情。”这名美国官员表现得非常镇定，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叫来。瓦里看了看自己用阿拉伯语写的谈话要点，然后打开一张破旧的苏丹地图，指着东部一块沙漠地区的位置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他大声向费尔南德斯读出死亡人数和被毁车辆数量，然后对这位美国外交官说：“我们认为发动袭击的是你们的飞机。”

苏丹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几周前，费尔南德斯还在苏丹外交部谴责苏丹政府允许伊朗通过其领土将武器走私给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苏丹一定认为，美国在提出正式外交抗议未果后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费尔南德斯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瓦里则不断对美国在苏丹领土单方面发动袭击表示遗憾，并强调两国在安全上的“密切合作”关系。

最后，瓦里总结道：“我们抗议并谴责这一行为，为了维护主权，苏丹有权在适当时机以适当形式做出合理的回应。”费尔南德斯并没有否认苏丹方面的谴责，只是承诺向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汇报此事。[13]

即使美国知道这是以色列国防军所为，费尔南德斯也不会向喀土穆出卖以色列。反倒是奥尔默特忍不住在公开场合暗示以色列参与了这一行动。在费尔南德斯被召见的几天后，以色列总理在特拉维夫附近举行的安全会议上发言，表示以色列在离家“不那么近”的地方执行了一次反恐行动。

总理说：“我们攻击了他们，这提升了我们的威慑力，也强化了我们的威慑形象，对于以色列而言，这种威慑作用有时比攻击本身更为重要。没有必要说得太详细，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实际上，只

要稍做调查，任何人都能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以色列不能开展行动的地方。”

虽然以色列没有公开，但此次行动表明，无人机在以色列战争中的参与方式和参与规模都在发生变化。现在，以色列空军每年将近一半的飞行小时数由无人机完成，无人机每天的侦察总时长达到数百小时。以色列步兵行动也经常需要无人机支援。空军高层最近组织过一次代号为“2030”的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专门讨论和决定无人机部队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在会议快结束时，大多数与会人员达成共识：在未来几年，以色列空军将逐渐淘汰F-15和F-16战斗机，成为一支几乎完全由无人机组成的空军，未来的无人机有的将小到能装进口袋里。[14]

对帕尔马希姆空军基地的一次访问让我们了解到以色列无人机的另一面。在这一带起伏的沙丘中坐落着以色列空军第一支无人机飞行中队。地中海沙滩不远处，在开着空调的可移动营房中，穿着绿色连体式军装的年轻男女们正操控着黑色操纵杆，全神贯注地盯着无人机发回的监控视频。

2008年12月，这支飞行中队的副指挥员吉尔上尉（根据保密规定，以色列空军人员只能使用个人名字，不能使用家庭姓氏）本在计划着期待已久的海外旅行，而在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铸铅”行动后，他不得不取消旅行计划，将这些操作无人机的年轻男女们集合到一起。

他对战士们说：“我们有两个目标：一是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二是尽可能降低平民伤亡。”

一个周日，吉尔在一辆指挥车内值班。在以色列各大情报部门的密切配合下，他正在跟踪一名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怀疑是哈马斯高级别官员的男子。当该男子离开位于加沙北部难民营的家，吉尔开始从空中对他进行跟踪。

这名男子并不知道自己被跟踪，他开始忙着处理手头一些看上去像是电线的东西，吉尔担心他在安装路边炸弹，准备伏击正在附近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国防军部队。

“这看上去很可疑。”他通过头戴式耳机说道。

以色列国防军南部战区司令部的目标专家同意吉尔的判断，于是下令让部署在附近的飞机实施袭击。就在这时，吉尔又仔细看了一眼画面，他突然发现这名男子并不是在安装路边炸弹，而是在晒衣服，于是立马通过耳机大声喊道：“不对，停止进攻！”

几天后又轮到吉尔值班，他发现一名以色列国防军战士正走在加沙北部的一条小巷子里，但这个画面存在疑点。这名男子虽然穿着国防军的橄榄色军装，但他独自行动，单肩挎着M-16步枪，没有按国防军的规定将枪支斜挎在胸前。“一名以色列国防军战士怎么会独自出现在这儿？”吉尔向指挥车内一位无人机操作员问道。这名男子马上成为他们的跟踪目标。

在这两次事件中，吉尔都体验到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优势：避免无辜者被袭，不让被通缉的恐怖分子逃跑。

吉尔在飞行中队指挥部与我们见面时说：“虽然远离目标，但我能通过长时间观察确保目标的正确性。”不难想象，他们的责任重如泰山。吉尔才30岁出头，已经是飞行中队中比较年长的无人机操作员，其他操作员大多只有20多岁。他告诉我们：“我日夜坚守在此，为的就是这份责任，我们要将附带毁伤降到最低。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向战士保证某一区域安全，结果他被敌方狙击手击中，我也得负责。风险真是无处不在。”

这么年轻就要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战士们不得不摆脱思维定式，并迅速成长起来。和许多其他指挥岗位的军人一样，无人机操作员没有白纸黑字写有作战计划和方法的手册，他们必须随机应变，在几秒钟内迅速做出决策，然后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下班回家。正如吉尔所说的：“操纵无人机？那只是我们工作中最简单的部分。”

以色列取得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小国在无人机行业的发展上总能领先世界一步？

由于长期处于战争当中，以色列必须不断尝试新的战术和科技，因此许多方面常常领先其他西方国家几十年。由于没有现成的平台，以色列不得不自主研发，无人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回顾自己50多年的航空工程师生涯，卡雷姆指出以色列能够成为世界无人机引导者的两大因素：

第一是以色列的客观环境。他说："我同来自以色列、法国、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都共事过，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基因，我们拥有的只是打赢战争、生存下去的压力，我们不得不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

第二是以色列人的思维融合。每个以色列人都要在军队服役，后来去军工企业工作的人仍然同军队的朋友保持联系，他们经常会一块聊天，交流思想，大家相互都认识。这种环境能够缩短研发过程，创新者之间也因此能够迅速交换观点，如果某个点子已经被尝试过，他们就会继续想下一个。如果没有，只要一个电话的工夫，他们就可以得到来自战场最真实的反馈。

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无人机部的年轻航空工程师阿米特·沃尔夫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刚刚高中毕业的沃尔夫和其他同学一起被招到以色列国防军服役。和许多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人一样，他尝试进入一支以"朱鹭"（希伯来语音译为"马格兰"）这种鸟命名的精锐部队。在经过特殊设计的武器系统的帮助下，这支几年前刚成立的部队专门深入敌人后方发起行动。和朱鹭这种鸟一样，这支部队的战士学会了如何迅速融入环境，隐蔽地移动，并定位目标的位置。

在沃尔夫服役时，"朱鹭"部队主要在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南部活动。在黎巴嫩，该部队几乎每天都对真主党恐怖分子发起行动。从国防军退伍后，沃尔夫来到以色列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学，毕业后来到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无人机部工作。

2008年的一天，他和几个同事在办公室附近的咖啡馆简单聊了聊各自的创意，其实在军队服役时，他就考虑过设计一款能够供单兵轻松携带的无人机，用于迅速开展近距离侦察。

他还清楚地记得，在加沙地带和部分约旦河西岸等人口密集区域，走在危险的小巷，他根本无法知道下一个拐角会遇见什么，这种感觉非常难受。当我们在特拉维夫郊外的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总部见面时，他告诉我们：“我们开始讨论设计一种微型无人机，它可以从背包中轻松取出，垂直起降，无需跑道。”

在那个咖啡馆，沃尔夫在他卡布奇诺咖啡杯下的餐巾纸上画出了新型无人机的草图。几天后他找到科研负责人，在听取了他的想法后，该负责人拨给他3万美元的研发启动经费。这笔投资收到成效：两年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推出了“黑豹”无人机，这是世界上第一款倾转旋翼无人机，可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在目标上空1万英尺的高度续航6小时。“黑豹”无人机的重量很轻，单兵可以将其放进背包背在身上执行作战任务。

“总之，我们的想法来自很多渠道。”当我们漫步在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总部的绿色草坪上时，沃尔夫细声细语地说道，“我们关注国际互联网上的其他发明。为了理解以色列国防军的需求，我们和国防体系的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毫无疑问，我们很多人也会受到战场上个人经历的启发，我们都上过战场，知道有哪些不足之处。”

的确，沃尔夫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一名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战士，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航空工程师。正是这种双重身份赋予了他发明新武器系统的必要知识和经验。

军民间的密切关系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国家财富。

有些讽刺的是，另一个促进以色列无人机技术发展的是“狮”式战斗机研发计划的取消。这是以色列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飞机研发项目。该项目从1982年启动，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计划研发这款被称为“狮”式的多功能、单引擎第四代战斗机，作为未来以色列空军的主战飞机。该项目共花费10多亿美元（大部分投入来自美国援助），已经制造和试飞了多架原型机，但1987年，以色列议会以12票赞成、11票反对的结果终止了该项目，直到今天许多已退休的以色列国防官员还在就这个决定进行争论。之所以被终止，一方面是由于研发费用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因为美国希望以色列购买F-16

战斗机取代“狮”式战斗机。

“狮”式战斗机研发计划的取消对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该集团不得不辞退数百名工程师，但之前的研发工作积累下来的知识并没有白费，而是被运用到以色列的卫星、导弹防御和无人机等蓬勃发展的项目中，一架飞机的星星之火在以色列国防和高科技产业形成燎原之势。

以色列发明的无人机让现代战争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各国军队在评估目标、搜集准确情报和获得战场优势时可以投入更少的地面部队。这项发明着实不易，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诞生的。

然而，2006年夏天，以色列在这方面的优势受到挑战。7月12日，伊朗支持下的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入侵以色列，劫持了两名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人员，以色列随即展开报复行动，持续1个月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

一开始，战争双方的实力似乎非常不对等：以色列是一个拥有先进武器系统的民族国家，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一个激进组织既没有固定的军事基地，也没有成建制的空军和海军；真主党武装人员身着便装，和当地环境融为一体；真主党的总预算只有以色列每年国防预算的零头。然而，战争爆发几天后，以色列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实力：真主党在战场上非常善战，打死了121名以色列士兵，尽管以色列不断发动空袭，真主党平均每天仍能发射120枚火箭弹。此外，真主党还入侵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无线电系统，实施了高超的网络攻击，并破坏了边界地区的以色列移动电话网络。

最让以色列吃惊的是，在战争快结束时，真主党竟然出动3架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携带20多磅爆炸物进入以色列境内，虽然这些无人机没有到达预定攻击目标（其中两架坠毁，一架被以色列战斗机击落），但这足以震惊以色列国防军高层。他们没想到，作为无人机的发明国，以色列居然成为第一个被非国家行为体操作的无人机入侵的国家，成为自己所发明武器的打击目标。

2012年，另一架敌方无人机进入以色列境内，在深入到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的南部城市迪莫纳附近几英里处时被击落。2014年又有无人机飞入以色列境内，这一次操作无人机的是来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

和2006年一样，这些无人机都被以色列国防军击落，但哈马斯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这些无人机上面不但载有炸弹，还有空对地导弹。当然，人们普遍认为这与哈马斯的科技水平不符，炸弹和导弹显然是为了拍这段视频临时安装上去的。2015年10月，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宣布他们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附近逮捕了多名恐怖主义团伙成员，这些人正在策划向以色列派出一架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

在最近的冲突中，真主党和哈马斯用行动表明，不仅以色列，整个西方世界都要适应新的战争形式。科技是一个优势，但科技的优势并不能让人高枕无忧。真主党和哈马斯等非国家行为体已经证明它们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运用他国的高科技武器来攻击这些国家。

真主党和哈马斯对无人机的使用迫使以色列国防军不断做出改变，特别是以色列空军。在真主党使用无人机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认为整个地区只有以色列使用无人机，虽然伊朗拥有一两架无人机，但在技术上落后以色列无人机很多代，根本无法进入以色列。因此，以色列雷达在设计和程序上无法探测无人机，只能用于发现大型飞机。边境出现敌方无人机后，以色列不得不通过发明新式雷达或改进旧雷达来增强其探测能力。

据报道，以色列还在更隐蔽的战线同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做斗争。比如，2013年，真主党负责无人机机群的高级指挥官哈桑·拉基斯在贝鲁特被枪杀。根据黎巴嫩报道，两名伪装成游客的杀手在靠近哈桑·拉基斯乘坐的汽车后用无声手枪将其杀害。真主党立即谴责以色列。对于是否参与了这次行动，以色列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很明显，以色列在想尽一切办法遏制真主党的无人机作战能力。

以色列难以接受哈马斯和真主党使用无人机，但另一方面，这些组织的选择其实很好理解。无人机体形小，可以低空和慢速飞行，很难被常规雷达系统探测和跟踪。

无人机的出现让交战规则也变得非常模糊。如果一架无人机入侵另一个国家，这应该同战斗机轰炸或导弹袭击一样被视为战争行为吗？2012年，当真主党无人机飞到迪莫纳附近时，为了避免大规模战争，以色列并没有做出回应。如果一架无人机成功在以色列发动袭击，又会如何？以色列会以此为由发动全面战争吗？

这些问题暂时没有答案。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和机器人一样，无人机虽然还不具备自我决策能力，但它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战争的形态。

(1) 反辐射导弹又称反雷达导弹，是指利用敌方雷达的电磁辐射进行导引，从而摧毁敌方雷达及其载体的导弹。——译者注

(2) dull，dirty和dangerous三个英文单词都是以字母d开头，所以称之为“3D”任务。——译者注

(3) 希伯来语中“侦察连”的意思。——译者注

(4) Mossad，以色列三大情报机构之一，主要负责海外情报。——译者注

(5) 波斯语中“黎明”的意思。——译者注

第三章　无敌装甲

“前进！”第四〇一装甲旅第九营营长埃菲·德夫林中校通过无线电大声下达命令。

2006年8月11日，以色列即将发动后来充满争议的萨鲁基战斗，针对真主党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即将结束，以色列决定在停火生效之前最后发动一轮攻势。位于特拉维夫的军事指挥部匆忙决定让国防军渡过黎巴嫩南部的萨鲁基河占领一片重要区域，因为真主党射向以色列的大多数火箭弹被认定是从这一区域发射的。以色列认为这次地面行动能让其在联合国停火谈判中拥有更多筹码。虽然战争即将结束，但政府认为值得最后一搏。

以色列坦克缓慢穿行在狭窄的山路上，完全暴露在反坦克导弹的射程内。坦克履带在岩石上发出的刺耳噪音让战士们把真主党武装分子抛到脑后，但殊不知，以色列国防军这些价格不菲的坦克即将进入敌方埋伏区域。

真主党侦察部队已经发现以色列坦克车队正在靠近山口，立刻将信息发给正在附近村子里待命的反坦克小组。以色列这支队伍的指挥官德夫林的坦克上有许多天线，很容易被识别。真主党游击队战士很快在指定地点集结，等待车队的出现。根据惯例，他们首先找到对方指挥官乘坐的坦克，然后用“短号”（Kornet）反坦克导弹瞄准目标并发射。几秒钟后，坦克发出一声闷响，立马冒起烟来。德夫林一脚踢到炮手身上，愤怒地说道：“你脑子有病吗？谁叫你开火的？”

“不可能！”炮手结巴地回答道：“我没有开火……我们可能被导弹击中了。”

他们的“梅卡瓦”4型主战坦克在继续前进。“这不可能。”德夫林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时他朝坦克后方看了一眼，突然发现3枚导弹朝他的方向呼啸而来，原来之前的无线电通话声完全盖过了导弹飞行的声音，使人无法察觉。其中第一枚导弹击中坦克，但没有打穿装甲；第二枚导弹从坦克上方飞过；当听到第三枚导弹击中坦克的巨大爆炸声后，德夫林

的记忆就断片了。



在2006年打击真主党的战争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个藏有反坦克导弹等大量武器的武器藏匿点（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以色列原本并不想和黎巴嫩真主党作战，但在2006年7月12日那天，以色列已别无选择。真主党游击队进入以色列境内袭击了一支国防军边境巡逻队，并劫持了两名预备役人员。为了改善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局势，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以此为理由宣战，带领国家在时隔20多年后再次进入一场大规模战争。

战争爆发几个月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就军队一系列结构调整方案进行过一次为期两天的研讨，准备马上取消一些军事单位的编制。

装甲部队的前景十分堪忧。当时，以色列国防军的首要任务是遏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活动，由于很多人认为坦克在其中的作用有限，总参谋部考虑裁掉几个装甲旅，并减少每年坦克的生产数量。就在真主党劫持人质事件发生后1小时，又一事件敲响了“梅卡瓦”坦克的丧钟：一个大当量爆炸装置在一辆部署于黎以边境的坦克下方爆炸，一名坦克乘员当场死亡，这辆代表以色列国防工业骄傲的坦克也遭到严重损坏。

德夫林的哥哥是一名伞兵，在德夫林入伍几年前，他的哥哥在同真主党游击队的冲突中身受重伤。德夫林本想和哥哥一样成为一名伞兵。在以色列，伞兵被视为国防军的精锐兵种，许多从伞兵部队成长起来的

军官后来都进入国防军高层，有人甚至成为总参谋长。高中时德夫林喜欢长跑和举重，后来通过了伞兵部队苛刻的体能测试，结果国防军医生说他的身体不适合当伞兵，他本想退而求其次进入步兵部队，结果被招到声望更低的装甲部队。

1991年5月，德夫林进入第七装甲旅，来到以色列南部的阿拉瓦沙漠进行基础训练。他根本就不想来这儿，心情就像那里的沙尘暴和干旱的气候一样糟糕。在基地入口处，他看到一个用油布盖着的巨大机器，这里面藏着的正是以色列的国家机密：新型坦克。德夫林根本不在乎这辆坦克，眼前的坦克只会让他想到他错过的机会，他还沉浸在自己脸上涂着迷彩色、肩上挎着M-16步枪的想象中。他打了几份报告，要求调到步兵部队，但都被拒绝了。几个月过后，德夫林逐渐向命运妥协，高级训练课程快结束时，他被选为发表告别演说的标兵。

他所在单位的军士长经常在点名时教导德夫林和他的战友们。在一个雨天，战士们列队站在泥泞的戈兰高地，军士长指着边境的方向对他们厉声说道："那边是叙利亚，这边是以色列，你们在中间，保护这个国家的只有你们和这些坦克，别无他人！"

德夫林和战友们明白军士长的话。的确，边境那边就是叙利亚军队，也是最后一个同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的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战士们每周都要随机进行紧急处置演练，指挥官们要让每名战士明白，当叙利亚的作战旅向以色列北部城镇推进时，他们启动坦克的速度越快越好。叙利亚发动进攻只是时间问题，每个人都要保持战备状态。

每当和战士们说起坦克，指挥官们的语气中都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感。每周五，擦拭坦克成为他们迎接安息日[(1)]的主要方式。他们把坦克里面擦得一尘不染，外面擦得闪闪发光。不仅在作战训练时，当战士们用肥皂水和海绵擦拭坦克时，战士和坦克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亲密。人们常说，坦克是有灵魂的，需要悉心照料。

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战事不断，军队深陷在黎巴嫩南部。当德夫林完成军官课程训练回到戈兰高地后，他多次参与了袭击真主党激进分子据点的行动。在那里，他也第一次遇到了坦克的克星：反坦克导

弹。一天晚上，德夫林将他的坦克停在一个黎巴嫩村庄附近，他当时的任务是为附近执行侦察任务的步兵部队提供掩护。为了打发时间，他在坦克内蘸着鹰嘴豆泥吃皮塔饼，当他把头伸出舱口准备透透气时，突然一股浓烟从他头顶快速飞过，这枚“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只偏离目标几英尺，险些击中德夫林的坦克。两周后，就在同一地区，另一枚导弹射向以色列坦克，这些坦克乘员就没有德夫林那么幸运了，一名国防军军官当场牺牲。

当时，“梅卡瓦”2型坦克是以色列国防军最现代化和最具创新性的坦克，这款坦克刚刚服役，取代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使用的在美国“巴顿”坦克基础上升级而成的“马加赫”坦克。

2004年的一天，已经担任坦克连指挥官的德夫林被派到犹地亚沙漠的拿比牧撒训练基地，参观新型“梅卡瓦”4型坦克。当时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研制新型坦克，但没有一个军官亲眼见到过。这种坦克当时是以色列的最高国家机密，极具神秘色彩，许多传言都声称其具有颠覆性设计和卓越的性能。

根据规定，参观坦克的军官不得拍照，也不能向外传播坦克的性能细节。对很多人来说，这款坦克看上去像一艘宇宙飞船。它比大家之前驾驶的坦克更大，动力也比上一代“梅卡瓦”坦克更强，其柴油发动机功率能达到1500马力，大幅提高了坦克的速度，使其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通过复杂地形。先进的指挥控制系统使指挥员能够更快地识别目标和进行射击。

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以色列国防军再次进入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大量预算需要用于常规安全巡逻以及检查点和隔离墙的修建，国防军高层认为需要改组军队，取消义务兵役制，打造一支规模更小、智能化程度更高、专业性更强的军队，不再需要那么多坦克。

此后，以色列坦克数量一度降到赎罪日战争以来的最低点。训练计划内容大幅削减，许多装甲部队战士只有在大型仪式上和教室的幻灯片中才能看到他们心爱的坦克。这些战士的主要任务也从之前的阻止叙利亚军队入侵变为在加沙地带进行常规安全巡逻以及搜寻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人员。德夫林都快忘了驾驶坦克的感觉。

2006年夏天，形势突然发生变化。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后，德夫林的装甲营被紧急调往北部进行短期集训，重拾操作“梅卡瓦”坦克的基本要领。没过几天，德夫林和战友们的自信心就回来了，他们做好了进入黎巴嫩作战的准备。有的战士开玩笑说，开坦克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只要学会了，永远忘不掉。

多年来，德夫林和其他坦克手一直听说，自2000年以色列撤出黎巴嫩以来，真主党囤积了大量反坦克导弹，等待着以色列坦克的到来。据说，真主党武器库中有“混血儿”（Metis）、“巴松管”（Fagot）和RPG-29等型号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串联战斗部反坦克导弹。但其中最让他们害怕的还是“短号”反坦克导弹，这种成为西方装甲部队噩梦的导弹最早由俄罗斯卖给叙利亚军队，然后被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以私人礼物的形式秘密送给真主党。这种激光制导导弹是世界上最危险和最精准的反坦克导弹，配备有7千克重的串联战斗部，能够穿透1300毫米的装甲。该反坦克导弹属于发射后不管导弹，也就是说，一旦它锁定目标就一定能击中。

德夫林参与的强渡萨鲁基河的行动计划在7月中旬战争爆发伊始就已制订，之后该计划被不断修改和推迟，直到8月11日星期五才开始执行。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以色列得到消息，当天晚上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当晚的会议上宣布几天后实施停火计划，结束这场战争。在经历了34天[(2)]的战斗后，以色列将不得不服从安理会的决议，但奥尔默特总理还想利用最后的机会尝试让联合国决议更有利于以色列，让联合国向黎巴嫩南部派出更多国际部队，而要做到这一点，以色列人不得不在最后一刻深入黎巴嫩境内作战。

德夫林并不喜欢这个作战计划。午夜过后部队才接到最终的命令，要求他们开进到距以色列边境10英里处的萨鲁基地区，这意味着他的坦克将在天亮后到达指定地区，完全暴露在真主党反坦克小组的火力下。虽然纳哈尔步兵旅和戈兰步兵旅的战士将提前乘直升机到河对岸，为即将开来的坦克提供掩护，但德夫林和他的战士在过河前需要经过一段狭窄的山口，在这期间根本无法得到友军的火力掩护。

就在前一天，德夫林同他手下的连长以及几位预备役军官坐在沙盘前对行动进行了推演，并讨论了行动计划的几个薄弱点。一些预备役军官提醒德夫林，在经过山谷的时候，他的部队非常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德夫林告诉他们：“打仗又不是买保险。”并预测最多只会有一两辆坦克被击中，因为根据国防军情报，真主党在该区域最多只有两个反坦克小组。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情报有误。在第一枚导弹击中他的坦克后，德夫林在无线电中大声喊道：“我是指挥官，任何情况下不要停下来……”他所乘坐的坦克继续前进，接着第二枚导弹从坦克上方呼啸飞过，随后第三枚导弹飞来，再次击中坦克。德夫林感觉自己无法呼吸，他的喉咙像被一个巨大的异物堵住了一样，然后他就失去了意识。

“指挥官倒下了。我再重复一遍：指挥官倒下了。”作战参谋在德夫林所乘坦克的无线电话筒中喊道。谁也不知道德夫林的具体情况，但当时顾不了那么多，时间非常紧迫，坦克车队必须继续前进，真主党的反坦克小组还在不断发射导弹。

醒过来后，德夫林吐了很多血，肺部一阵痉挛后，又失去了意识。虽然“短号”反坦克导弹并没有穿透“梅卡瓦”4型坦克的装甲，但德夫林身受重伤，生命垂危。国防军医生把这位营长抬出坦克，就地手术。他们开始和时间赛跑。在敌方炮火的攻击中，德夫林被成功运回以色列领土，就近送往位于采法特的齐夫医院。

该营的作战参谋保持镇定，指挥德夫林的坦克，带领部队成功推进到萨鲁基地区。但他们损失惨重：在20个真主党反坦克小组的火力打击下，12名国防军战士牺牲，11辆坦克被击中。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报道，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国防军消灭了几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第二天，双方宣布停火。

德夫林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将近3周，身体恢复的过程极为艰难。出院后，他立即回到了自己的装甲营，听取了手下指挥官和战士的工作汇报。接着，他去探望了阵亡官兵的父母，注视着这些人的双眼，向他们讲述当时的情况。

德夫林的身体逐渐恢复正常，但装甲部队还在为生存苦苦挣扎。萨鲁基战斗中装甲部队战士和坦克损失如此惨重，这让国防界感到非常震惊。和2004年一样，国防部的走廊里又开始出现关于削减装甲部队的争论。坦克的前景堪忧，预算削减似乎已是不可避免之事。

回到基地几周后，德夫林被邀请到国防部下属的负责以色列坦克设计和生产的“梅卡瓦”坦克研发局。原来，在他住院期间，人们对他乘坐的那辆“梅卡瓦”4型坦克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坦克上每个划痕都被仔细查看并进行X线扫描。整个车体被拆分，然后重新组装。军队和国防部想了解这辆坦克被导弹袭击的每一个细节。

一名高级军官交给德夫林一个标有“高级机密”的灰色文件夹，德夫林取出文件夹中的照片。照片上是他的坦克，上面标记有两枚击中坦克的导弹的弹着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坦克被击中和烧黑的样子，德夫林感觉像是突然穿越到了当时的战场上一样。

德夫林问道：“我记得当时我所处的位置，现在又看到了导弹击中坦克的位置……但我现在怎么会在这儿？我为什么能活下来？”

那名高级军官解释说，虽然被多次击中，但没有一枚导弹穿透坦克。“梅卡瓦”坦克经受住了迄今单辆坦克承受过的最猛烈的攻击。这台以色列机器创造了历史。

有了这张照片，德夫林重新拥有了回到坦克的勇气。正如他后来告诉我们的，这张照片证明“梅卡瓦”坦克是尖端技术的缩影。

几个月后，这名曾经梦想成为伞兵的军官晋升为上校。萨鲁基战斗给德夫林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很多年后他才愿意和人分享自己的这段经历，但是，他后来却成为“梅卡瓦”坦克最坚定的支持者。

不是每个人都像德夫林那样对坦克充满信心。媒体强烈抨击装甲部队，一家以色列主要日报在大标题上写道：“炮塔已被暴露。”[1]英国和美国的报纸也报道了曾经坚不可摧的“梅卡瓦”坦克所经历的失败，并质疑道：“这款被大肆吹嘘的坦克在真主党反坦克导弹面前为何如此不堪一击？”[2]

军队中主张减少坦克生产数量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军官说："它们没有用处。"这些人认为，军队应该投资研发防护性更好、机动性更强的新型装甲车，不能再把钱投到坦克上了。

争论非常激烈。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结束后，军队的预算有限，而降低坦克生产量省下来的经费能用在国防军其他重要事务上，如增加步兵训练、整修防空避难室、研发导弹防御系统等。欧洲的新闻也有相似的论调。西方军队也在重新审视坦克的未来。比如，美国正计划退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部署在欧洲各大军事基地的坦克。

为了能够削减国防预算，将更多资金用于教育、福利和卫生部门，一些政治家将"梅卡瓦"坦克与"狮"式战斗机进行类比。以色列于20世纪80年代研发的这款战斗机一度是以色列国防工业的骄傲，但经过长期的政府内部斗争后研发计划被取消，国家最终决定直接从美国购买战斗机，将研发经费投到其他地方。

不少专家认为"梅卡瓦"项目也应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国防部收到各种各样的方案，有的人建议以色列应从美国和欧洲采购价格更为合理的坦克。还有人提出方案，呼吁将"梅卡瓦"生产线转移到美国。这样做虽然能降低成本，但也会增加部分坦克技术被泄密的风险。

德夫林和他的同事们不遗余力地同这些声音抗争。他们知道坦克仍然很重要，如果爆发战争，只有在坦克的掩护下地面部队才能快速占领对方领土。这其中当然存在诸多风险，但这并不构成以色列国防军放弃"梅卡瓦"坦克的理由。

在他们的努力游说下，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最终被说服。他们没有停止"梅卡瓦"计划，当然，他们也不是将这个计划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改进坦克。

直到今天，"梅卡瓦"坦克仍然是以色列密级最高的计划之一。几十年来，"梅卡瓦"坦克一直笼罩在神秘色彩下，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在"末日之战"到来时，这个钢铁怪兽能够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打败以色列的敌人。

参与“梅卡瓦”坦克研发和生产的人很多，但其中一位国防军军官至关重要，他就是“梅卡瓦”坦克之父，绰号“塔里克”的塔尔少将。

1924年出生于以色列的塔里克，年幼时就知道在以色列生活有多么危险。1929年阿拉伯人的暴乱席卷巴勒斯坦地区，100多名犹太人遇害。一天，塔里克在北部采法特家中的房门被暴徒封住，房子被点着。塔里克本以为这将是他的末日，好在他的叔叔带着一群英国警察从街上及时跑来，赶走了暴徒，冲进房屋将5岁大的侄子救了出来。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影响了他一生。

17岁时，塔里克志愿加入英军，成为一名坦克炮手，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他加入以色列地下组织，帮助这个即将成立的国家购买武器。独立战争期间，他还只是一支机枪部队的指挥官，之后他在国防军不断被提拔，先后担任装甲部队司令、总参作战部部长、南部战区司令部司令，最后成为国防部部长特别顾问。塔里克于2010年去世。他被视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五位装甲兵指挥官之一，写有他名字的纪念牌现在就挂在美国肯塔基州的巴顿骑兵和装甲兵博物馆的墙上。

以色列建国之初就开始苦苦寻找坦克。在独立战争期间，国防军第七旅多次冒着枪林弹雨试图夺取被外约旦阿拉伯军团占领的拉特伦（之前是英国警察的一个要塞），但始终无法攻下这个横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公路的战略要地，因为他们没有突破约旦防御工事的手段。

以色列国防高层将领、政治家和游说者试图说服西方国家将坦克卖给国防军，虽然他们成功达成了一些交易，但武器禁运始终存在。后来，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通过占领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色列几乎将领土扩大了一倍。以色列知道，敌人迟早会试图收复失地，要想在下一场战争中再次获胜，以色列需要更强大的装甲部队。

六日战争后，第一批来自法国和美国的坦克先后交付以色列。20世纪60年代末，以色列又购买了当时英军武器的中流砥柱——“百夫长”主战坦克。以色列对这款坦克进行了一些改装，安装了威风的105毫米坦克炮，改造了炮塔的结构，并给它取了一个新的名字：肖特（希伯来语中“鞭子”的意思）。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以色列还购买了两辆“酋长”坦克，当时这款配备有120毫米坦克炮的坦克还处在研发阶段，属于英国的高级机密。经过这些尝试后，以色列本想和英国达成更多交易，但被英国人以政治考虑为由拒绝了。

英国人的决定让以色列非常吃惊。苏联在继续武装埃及和叙利亚，以色列急需新型坦克，却哪也买不到。

对于这笔交易的中止，塔里克的记忆非常深刻。意识到无法依靠任何国家后，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以色列将制造属于自己的坦克。很多人都认为塔里克疯了。在这之前，以色列没有飞机、舰船或装甲车等主要军事平台的制造经验，但塔里克坚信这是可行的。他认为，通过研究“酋长”坦克，以色列学习到一些技术，完全可以以此为基础推进这项事业。于是，他找到几位合作者，开始画新型坦克的设计草图。1969年，他的想法已被证明具有一定可行性，下一步的关键在于两点：自主研发和生产坦克在经济上是否可行？以色列是否拥有科技实力生产足够好的坦克，与苏联提供给叙利亚和埃及的坦克抗衡？

1970年夏天，时任国防部部长、以色列战斗英雄摩西·达扬和财政部部长平哈斯·萨皮尔会面，讨论是否推进塔里克关于坦克研发的计划。在他们会面之前，一支由安全专家和经济专家组成的团队已就该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研究了该计划的各个方面：塔里克提出的坦克研发计划是否可行？坦克研发能够给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带来经济利益吗？在萨皮尔看来，“梅卡瓦”坦克计划很可能产生极为重要的经济推动力，安全利益反而退居其次。

“我支持，”萨皮尔对达扬说，“你同不同意？”

达扬开始担心这笔投资会影响到其他军事项目和军队海外采购计划，但最终他还是同意了。坦克计划进入第一阶段：研发。

1971年春季的一天，阿维格多·卡哈拉尼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端的人声称自己是“塔里克的秘书”。她说，明天上午会派司机来接卡哈拉尼参加一个会议，让他务必着正装待命。

第二天，一辆深绿色的普利茅斯勇士轿车（军队当时给高级军官配发的车辆）停在卡哈拉尼家门口的路边。司机示意他坐到后座。卡哈拉尼完全不知道这次会议的主题，但他顾不了这么多。塔里克是以色列的传奇性人物，如果他打电话叫你，你必须得去。汽车停在特拉维夫以南特兹瑞芬（Tzrifin）陆军基地一个大型仓库的入口处，卡哈拉尼刚从车里出来，仓库的大铁门突然打开，停在附近建筑上的鸽子被吓得一齐飞了起来。塔里克出现在大门口，他示意卡哈拉尼跟他进来，然后将大厅中央原本遮盖某物的伪装网掀了起来。

一开始卡哈拉尼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好几秒钟后他才明白，这是一辆坦克。但这不是一辆普通的坦克，而是木头模型。坦克的形状也很奇怪。“这辆坦克没屁股。”卡哈拉尼说道，“发动机往哪放？”

塔里克一边和卡哈拉尼绕着自己精心设计的木头模型走着，一边向他解释着新坦克外形如此独特的原因。他说：“这是全新的设计，引擎和传动装置都在前面，后面是一个舱门。”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设计，在此之前所有坦克都采用引擎后置的设计，坦克乘员从炮塔顶部进出坦克。

塔里克之所以邀请卡哈拉尼来看坦克，是为了获得这位年轻军官的支持。卡哈拉尼是国防军中成长很快的一名指挥官，六日战争期间，他在“百夫长”坦克内表现非常英勇，获得了“杰出勋章”。后来，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作为第七十七营的营长，卡哈拉尼创造了历史，击退了叙利亚在戈兰高地的进攻。



2015年，在以色列北部的一次演习中，一辆“梅卡瓦”坦克正和国防军士兵一同前进（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赎罪日战争爆发时，驻扎在戈兰高地的卡哈拉尼从不同军事单位临时调集了大约150辆坦克，投入同叙利亚军队的战斗中。当时发动进攻的叙利亚军队是以色列军力的5倍，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卡哈拉尼成功抵挡住叙利亚人的攻势，摧毁了数百辆敌方坦克，重新占领了之前被叙利亚攻占的制高点。鉴于他的表现，卡哈拉尼得到了以色列最高级别的军事勋章——“英勇勋章”。塔里克之所以会安排1971年的那次见面，是为了确保卡哈拉尼这类年轻坦克手愿意驾驶着他设计的这款坦克参加战斗。

早在铸造坦克的钢水被倾倒进模具之前，塔里克就已经看到这款坦克在阅兵场上英姿飒爽、跃跃欲试的样子。他从来不会让自己受到那些悲观主义者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担心钱被打水漂的财政部官员们。他不断积累必要的投资、知识和人际关系，用于建造一条能够铸造坦克车体、生产加农炮、制造光学和火控系统的生产线。

1979年底，第一辆“梅卡瓦”坦克驶下生产线。之前，人们在升级坦克和解决技术难题上的分歧很可能推迟坦克下线时间，但塔里克用他的决心和魅力扫除了这些障碍。3年后，第一次黎巴嫩战争爆发，这款坦克在以色列北部前线展现出惊人的作战能力。又过了两年，“梅卡瓦”2型坦克驶下生产线。以色列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坦克。

塔里克曾在“梅卡瓦”坦克研发局对他的战士们说：“我们因为身体里的犹太人基因而被世界视为异类。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学习，只有傻子才拒绝学习。”

塔里克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比如来自“坦克世家”的雅隆·利夫纳特。利夫纳特的父亲曾是国防军坦克维修部队的负责人。利夫纳特本来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学习电子工程学，读书期间以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进入国防军。他的梦想是研制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导弹。但梦想和现实还是有很大差距，完成军官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坦克研发局。他本以为事情已不可能更糟糕了，没想到他接着又被派到基层装甲部队，每天参加野外训练。

塔里克认为技术人员只有亲临战场才能明白战士们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而不是一切都从虚无缥缈的理论出发。他不允许技术人员和一线部队之间产生距离，不管是在文化上还是在物理上。利夫纳特在第七装甲旅待了两个月，在这期间，和其他战士们一样，迎着火力冲山坡，爬沙地，给坦克装弹，听指挥官和战友们讲述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在这些经历的启发下，他在脑海里罗列了许多坦克需要改进的地方。

利夫纳特回忆道：“没人明白我为什么会在那儿。他们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他们还对我说，放着办公室不坐跑到戈兰高地来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但我心里知道自己去那里需要观察和感受的东西，同样重要的是我同那些战士和军官们建立起来的业务关系，后来他们很多人都成为营长和旅长。”

第一眼看到这位年轻工程师，塔里克就喜欢上了他。利夫纳特有“虎刺怕”精神，从不循规蹈矩。在他看来，所有的规则都只是建议。塔里克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天，塔里克把这位年轻军官叫来谈话，让他成为自己身边的参谋长。

利夫纳特虽然受宠若惊，但礼貌地拒绝了这一邀请。他解释说：“我是一名年轻工程师。让我着迷的是技术，我不愿意离开技术的世界。”

塔里克很少被人拒绝，但他很欣赏利夫纳特的坦诚。

他告诉利夫纳特：“敢对我说‘不’的人，基本上就不要在部队混了。但你不一样，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凭借刚柔并济的行事方式，塔里克网罗了国防军一批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他也是个信守承诺的人，从那以后，利夫纳特在研发关键系统的过程中经常得到他的支持。在塔里克的培养下，利夫纳特被任命为“梅卡瓦”3型坦克火控系统工程的总指挥，正是凭借在这一项目中的出色表现，利夫纳特获得著名的以色列国防奖。

“梅卡瓦”坦克之父一直在关注全球坦克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末，他发现各国军队都在尝试提高坦克移动过程中的射击精度。塔里克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静止交火已一去不复返，“梅卡瓦”坦克也要适应这一变化，力争具备在高速移动的前提下精准命中远距离目标的能力。

一天，塔里克对利夫纳特说：“你必须将移动射击精度提高到和静止射击一样。我要看到一模一样的结果。你设计的系统必须要将指挥官解放出来，他们不用让坦克停下来射击。”

塔里克提出的这个要求完全出乎利夫纳特的意料，他鼓起勇气说这不太可能，移动中坦克的射击精度不可能比得上静止坦克，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但塔里克认为这是可行的，要求工程师寻找解决方案。最终，他们不辱使命，研发出被称为“猎鹰”（Baz）的新型火控系统。

利夫纳特告诉我们：“塔里克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技术人员，他很多时候是靠自己没有太多科学依据的第六感。”他还说：“塔里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名坦克炮手，在他办公室里有一个皮质公文包，里面记录了他的坦克击中目标的情况。原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出了那么多发炮弹，这已成为他的第二天性。”

凭借这种第六感，塔里克提醒利夫纳特和他的团队，要想找到解决方案，首先要分析无法击中目标的原因。为什么坦克在运动过程中难以让炮筒保持稳定？通过研究他们发现，运动中的坦克能否击中目标主要取决于炮弹精度、炮筒稳定性以及炮手在移动中精准识别目标的能力。

通过大量实验，利夫纳特发现，已有火控系统虽然能够加入移动产生的变量从而实现校准，但炮手难以在短时间内考虑这么多事情。也就是说，虽然坦克乘员能够测算距离、瞄准和射击，但一旦炮手注意力稍有不集中，就无法击中目标。

1989年，利夫纳特和他的团队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将摄像头整合到自动追踪系统中，这样一来炮手不用再计算目标距离和方向，他要做的只是开火。当然，只有在确保目标被锁定的情况下他才会将炮弹发射出去。

塔里克经常提出看似难以完成的要求，但实际结果至少能接近他的预期。

此外，塔里克也赋予他的工程师极大的自主性，他相信这些人，知道他们都是各自行业的顶级专家，在如何改进坦克这件事上往往比他更有发言权。有一次，利夫纳特带着写有30条坦克改进建议的清单来找塔里克，塔里克让他回去根据重要性将这些建议进行重新排序，分成两个清单，当一小时后利夫纳特带着新的清单来找他时，塔里克依旧埋头读着手里的文件，漫不经心地说道：“A清单通过，B清单搁置。”对于这个决定未来坦克性能的决策，塔里克表现得像在点一份三明治一样随意。

从一开始塔里克就强调这款坦克的可塑性，以求能够不断适应以色列战场上的变化。

因此，这款坦克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升级。2003年，以色列国防军已推出“梅卡瓦”4型坦克，不同于以往各型“梅卡瓦”坦克，“梅卡瓦”4型坦克的行驶速度和射击速度更快，并配备有新型模块化装甲，可根据具体任务更换不同防护级别的装甲。进入有反坦克导弹威胁的区域需要重型装甲，没有这一威胁则可降低防护等级以减轻自重，这还意味着坦克乘员可以在战场上快速更换坦克上的受损装甲部件，不用开回修理厂。

这种适应能力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显著特征，其根源在于以色列资源紧张。不同于美国或一些欧洲国家，以色列无法根据战争形式的变化不断取消和启动武器研发项目，只能尽可能延长飞机、舰船和坦克的使用寿命，确保它们能长期适应现代战场。

攻击目标就是以色列坦克需要面对的一个变化体。以前，坦克攻击的主要是坦克，但在现在的中东，以色列的敌人几乎没有坦克。经历了多年内战的摧残后，叙利亚的军力已大不如前，哈马斯和真主党则完全没有坦克。要想适应新的形势，以色列坦克必须能用于对付隐藏在一栋居民楼三楼的哈马斯火箭弹发射小组，或盘踞在学校里的真主党激进分子小组。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以色列国防军研发出新的武器（很多通过卫星制导），通过这些武器，坦克乘员不但能够精准打击建筑物和反坦克小组，甚至还能击中飞机。其中一款极具创新性的武器是“卡拉尼特”空爆弹，这款炮弹能飞越掩体后在激进分子上空爆炸，或穿过混凝土外墙后在建筑物内部爆炸。

“卡拉尼特”空爆弹的特别之处在于坦克乘员可以在两种爆炸方式间自由选择。一方面，它可以像常规炮弹一样用于攻击强化结构或车辆，在弹着目标时爆炸。另一方面，它可以攻击常规坦克炮弹无法正常攻击的激进分子小组，在这种模式下，“卡拉尼特”空爆弹可被设定飞行到激进分子小组上空时再引爆炮弹内的6个弹头，产生出数千块致命弹片。

以色列现在的坦克还配有国防军研发的先进的“查亚德”战场管理系统。简单地说，每辆坦克内都有一块电脑屏幕，战士们能在这块屏幕上看到敌军和友军的军力分布情况。如果发现一个新的敌方位置，指挥官只需在电子地图上输入这个位置，附近所有的国防军部队——包括坦克、炮兵和武装直升机——都能看到这一信息。

新版“查亚德”软件还可以让系统推荐攻击某个特定目标应该使用的弹药类型，或向指挥官推荐带队进入战斗区的路线。



一名士兵正在练习使用“查亚德”数字陆军系统（埃尔比特公司提供）

“查亚德”战场管理系统能够大幅缩短“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周期，即我方发现敌方部队到同该部队交战所需的反应时间。根据一些估算，以色列国防军能将反应周期降到几分钟之内。

以色列坦克最大的改变来自2012年推出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该系统能够拦截向“梅卡瓦”坦克发射的反坦克导弹。在此之前，世人只听说过“箭”式（Arrow）导弹等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但从没听说过能够单独保护一辆坦克的防御系统。

事实上，这个想法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坦克遭到埃及反坦克部队猛烈进攻，损失惨重。一名军官提出可在坦克四周安装一条可爆炸的空心带状物，一旦接触导弹就会引爆，这样一来导弹将在坦克外爆炸，不会穿透坦克。

但几年后，“梅卡瓦”坦克诞生，这个想法被搁置。因为“梅卡瓦”坦克拥有比以往更为强大的装甲，不再需要安装可爆炸的空心带状物等昂贵的主动防御系统。

但后来的黎巴嫩战争（特别是萨鲁基战斗）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方案。虽然德夫林的坦克完好无损，但真主党的反坦克武器构成的威胁不可小觑。有情报显示，在加沙，哈马斯也在学习黎巴嫩战争的经验，开始充实自己的先进反坦克导弹武器库。据报道，叙利亚采购了数

百辆摩托车，训练特种部队如何一边驾驶摩托车一边发射反坦克导弹。坦克将难以发现和击中这类小型移动目标。

在坦克四周安装可爆炸的空心带状物的方案被重新启用，交给政府持股的主要导弹开发企业拉斐尔公司负责。最终的研发成果就是“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该系统利用小型雷达系统探测来袭导弹，然后呈烟雾状发射出大量金属小球对导弹进行拦截。“战利品”系统的雷达还可以无缝对接“查亚德”战场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战利品”系统可以自动向坦克乘员提供敌方发射导弹的反坦克小组的坐标，从而方便坦克乘员迅速还击。

2014年夏天，在针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的“护刃”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第一次将“战利品”系统投入实战。上一次大规模使用“梅卡瓦”坦克还是在8年前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那一次，为了能够抵达萨鲁基河，埃菲·德夫林差点牺牲。但在这一次行动中，“梅卡瓦”坦克所向披靡，哈马斯向以色列坦克发射了几十枚反坦克导弹，大多数打偏，20枚导弹被“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成功拦截，没有一辆坦克受损。

现代战争形式再次被以色列改写。

但为什么是以色列？在众多国家中，为什么只有以色列通过长期摸索发现坦克可以不断改进，在现代战场上继续发挥作用？

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老陆军基地也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这个被称为特哈绍莫（Tel Hashomer）的地方原本是一个英军基地，独立战争期间被以色列占领，成为许多国防军单位的驻地，其中有一个单位是希伯来语缩写被音译为“玛莎”的7100维修中心，这里就是“梅卡瓦”坦克组装和维修的地方。

根据“梅卡瓦”坦克研发局局长巴鲁赫·马兹里亚准将的回忆，该单位年轻的工程师经常在战场上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完成作战任务的坦克，有时甚至会来到危险的前线。为了更好地改进坦克性能，工程师会仔细检查坦克的每个细节，并询问坦克乘员各种问题。这些工程师并不是坐在开着空调的办公室等着战士们去找他们，从塔里克那里他们明白，同一

线部队保持密切关系至关重要。

在马兹里亚的办公室有一个标记了“绝密”字样的棕色文件袋，里面是1994年在黎巴嫩南部一辆坦克被真主党伏击的材料。真主党武装人员一度向该坦克发射了迫击炮炮弹和10多种弹药，全部击中目标。任何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认为这辆坦克将被击成碎片，不可能幸存下来。整个区域都被浓烟笼罩，坦克乘员也认为自己的末日到了。

马兹里亚从文件袋中抽出一张布满灰尘的照片，他告诉我们：“每一个圈代表一枚导弹的弹着点，这辆坦克每一面都被无情地击中，但最后只有一名战士牺牲。一方面，这个结果很残酷，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梅卡瓦’坦克的防护能力有多强。”

在马兹里亚等工程师看来，坦克并不是凭想象设计出来的。这些工程师长时间待在一线部队，同在坦克部队服役的官兵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他们甚至经常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装甲部队当兵。有一位工程师的儿子就牺牲在一辆被袭击的“梅卡瓦”3型坦克中。马兹里亚解释道：“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这也是每个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工作的原因。”

由于建国以来就长期处于各种冲突中，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以色列需要更早地去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威胁，有时早于世界其他地区很多年。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坦克被“萨格尔”导弹击中，这是这款苏联先进反坦克导弹第一次真正用于实战。2006年真主党向以色列坦克发射“短号”反坦克导弹，这是激进组织最早使用常规军队战术的案例之一，标志着激进组织开始具备常规部队的特点。

以色列只能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发展诸如“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等能适应新形势的武器。以色列没有时间等待其他国家开发这些武器，它现在就要让坦克参加战斗，现在就要加强坦克的防护能力。

所以，以色列在2012年成立了一个负责设计新型坦克的技术团队，这款坦克被称为“拉基亚”，希伯来语中“天堂”的意思。其最显著的变化将体现在机动性、乘员数量和火控系统上。

尽管以色列在技术上不断发展，但2015年1月发生的事件再次提醒

以色列，先进武器正在中东地区大量流通。真主党武装向以军在黎以边界巡逻的车队发射了5枚“短号”反坦克导弹，2名战士阵亡，7人受伤。很多人认为，这类反坦克小组遍布在黎巴嫩南部将近200个村庄中，随时等待着以色列的入侵。这些游击队员穿着便装，住在普通人家中。也就是说，未来以色列将要面对来自任何地方的袭击，包括学校和医院，甚至救护车。

在中东，战争的形式正不断变化。2014年，在加沙，以色列国防军看到哈马斯成员从边界地道中钻出来发动奇袭，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驾驶商务车对村庄发动进攻，西奈半岛的极端萨拉菲主义团体已成功利用装甲车对埃及军事哨所发动袭击。

以色列的关键词仍然是“适应”。边境的形势不容乐观，对“梅卡瓦”坦克下一场考验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1) 安息日为犹太人每周一次的节日，从周五太阳落山开始，到周六太阳落山结束。——译者注

(2)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于2006年7月12日，结束于8月14日。——译者注

第四章　侦察卫星

赎罪日战争对以色列造成巨大伤害，战争过去5年后，以色列政治家们终于做好准备同一个阿拉伯国家，而且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实现和平。

让我们回到1978年的春天。几个月前，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历史性地访问耶路撒冷，在以色列议会的演讲中，他呼吁两国结束30年的战争和流血。为了准备9月即将举行的戴维营和平谈判，华盛顿、耶路撒冷和开罗之间频繁传递着秘密外交电报。

这让以色列的哈伊姆·埃塞德坐立不安。他认为其中的风险太大了。一旦同埃及签订和平协议，以色列必须撤出西奈半岛，这是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占领的埃及的大片领土。

西奈半岛对以色列非常重要。1967年前，这一区域是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缓冲地带，以色列占领这一区域后，如果埃及地面部队再次入侵以色列，它首先需要占领西奈半岛，这能给以色列充分的准备时间。埃塞德认为，如果以色列不能找到监视地面情况的办法，就不应该从该地区撤退。

作为阿曼（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研发部的负责人，埃塞德的工作就是为作战问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面对即将撤出埃及的现实，他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卫星。不是普通的卫星，而是以色列自主研发的卫星。

埃塞德是军队中的异类。当战士时他有着傲慢无礼和目无纪律的坏名声，但现在的他礼貌而优雅，说着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

埃塞德1939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年后随家人移民到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建国时他虽然才8岁，但看到同胞们为了国家生存不懈奋斗，他决心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凭借自己在技术上的特长，埃塞德选择了多学科教育。他拿到了以

色列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学位和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拉拉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学位。

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后，他扎实的技术功底很快派上用场，他在军队中也得到迅速晋升。六日战争前几个月，还是一名下士的他就得到一枚荣誉勋章。

时至今日，我们只能通过伊扎克·拉宾（当时的国防军总参谋长，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和总理）在证书上的寥寥数语来猜测埃塞德为什么会获得勋章："哈伊姆·埃塞德表现出极强的技术能力，为提高国防军战备能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即便拥有如此出众的履历，要想说服政府投资卫星谈何容易。太空被认为是以色列这类小国的禁地，是超级大国的专属地。当时，全世界只有7个国家成功发射过卫星。最后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是英国，那也是1971年的事儿了(1)。

之所以说这个想法非常大胆，还有另一层原因。之前，以色列在太空科技领域的经验非常有限。1961年，以色列发射了一个名为"沙维特"（希伯来语中"彗星"的意思）的气象研究火箭。当然，"研究"二字只是幌子，以色列真正的目的是赶在埃及之前成功发射地对地导弹，摩萨德认为埃及在德国科学家的帮助下正在进行相关研发工作。

1965年，以色列考虑启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项目，提交给政府的这个方案呼吁投资研发军民两用的卫星和火箭，由于过于超前，方案被否决。[1]

对于这段历史，埃塞德非常清楚，但他仍然下定决心推进这一计划。他首先试图获得自己的上级、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耶霍舒亚·萨吉的支持。萨吉对此很感兴趣，同意了他的方案。他们两人一起来到空军基地探讨这个方案的可行性。但飞行员们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对萨吉和埃塞德说："这超出了我们的科技水平。"

他们接下来把这个想法向国防军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做了汇报，但后者认为这是"鲁夫特盖谢夫"（Luftgesheft），这个意第绪语词汇可直

接翻译成“空气事务”，意为纯属浪费时间的事情。

埃坦认为，以色列当务之急是将驻扎在西奈半岛的部队移防到国内其他地方，研发卫星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总参谋长还指出，空军的人告诉他，在撤出西奈半岛后，飞机可以用于国家所需的空中侦察。

埃坦还说，一旦实现了和平，萨吉可以自己开车去西奈半岛，直接看看埃及人是不是在准备发动战争。萨吉回答说：“这不可能。要想知道那里的情况，我必须进入每个贝都因人帐篷里查看。”

埃坦对卫星和火箭计划的反对得到最高层的支持。一年多前，以色列总理拉宾到华盛顿同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会面。拉宾成为美国200周年诞辰之际第一位访问美国的国家元首，不但享受到最高礼遇，还受众议院议长卡尔·阿尔伯特之邀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但在同一些美国议员会面时，拉宾突然被问到以色列为什么需要卫星。原来，以色列国防部向美国提交了一个列有以色列购买各种军事平台和武器的“意向清单”，其中包括一颗价值10亿美元的卫星。美国议员们担心这项采购会影响中东和平进程。

拉宾在1979年的自传中谈到这件事时写道：“这些就我们交给美国的采购清单的提问让我非常难堪。对于‘以色列为什么需要价值10亿美元的卫星’这个问题，我只有一个严肃和明确的回答：‘我们不需要这个系统。’”[2]

但问题是，由于情况特殊，替代卫星的侦察飞行行动很难获得高质量的照片。拉宾在赎罪日战争后当选总理，在这场战争中，100多架以色列战斗机被击落，其中大多数是被苏联地对空导弹“萨姆”（SAM）击中。为了避免对埃侦察任务引发新的军事危机，拉宾要求国防军每次执行侦察飞行任务前必须获得他的批准。因此，这样的飞行行动少之又少，无奈之下，以色列空军只能在以色列领空抓拍埃及的地面照片，但这些照片的质量很差，以色列人无法通过这些照片充分掌握边境线那边的情况。

接下来传言四起。以色列军事情报局一些高级军官尝试赶走埃塞

德。一位军官甚至直接找到萨吉，要求他将埃塞德调走，并警告说，卫星和火箭计划将会在浪费掉大量经费后以失败告终。

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埃塞德都会解释说，他并不在乎这个计划的成功可能给他带来军衔和职务上的晋升，他在乎的是更为核心的事情：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通过国防军常规渠道的尝试失败后，埃塞德找到埃泽尔·魏茨曼，这位曾经立下许多战功的飞行员当时是以色列国防部部长。

魏茨曼在指挥系统的地位太高，一名普通上校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他，但他们两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联合作战行动中相识。不管怎样，为了避免麻烦，对此次会面埃塞德非常低调。

一个潮湿的夏日，埃塞德走进特拉维夫的国防部大楼。向安保人员出示自己的证件后，他爬到二楼，然后左拐，沿着走廊来到国防部部长的办公室，从那右拐就是总参谋长的办公室。

以色列许多艰难的决定都是在这层楼做出的。在这里，国防军策划了揭开六日战争序幕的对叙利亚和埃及空军的突袭。1973年赎罪日，当以色列南北两线被袭击后，以色列国防军高层同样是在这里召开的紧急会议。

等待魏茨曼时，他抬头看了看旁边墙上挂着的历任国防部部长的照片，这些政客中既有以色列国父和国防军创始人本-古里安，也有带领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大获全胜、接着又在1973年将国家拖入灾难的战斗英雄摩西·达扬。

魏茨曼属于以色列人中的精英。他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的侄子。出生于特拉维夫的埃泽尔·魏茨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英国皇家空军，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后来他参与了以色列空军的筹建工作，并将其打造成一支相对于邻国具有显著质量优势的部队。

当秘书来叫埃塞德时，他站起身来，再次整理了自己的军容，然后走进了魏茨曼的办公室。魏茨曼坐在一张大木桌后，他喜欢穿白色衬衣，最上面的两粒扣子都解开，露出一点和他胡子一样灰白色的胸毛。

魏茨曼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卫星地图，还有几张他当飞行员时的照片。一旁的茶几上放着一台刚刚为国防部部长安装的特殊电话，通过这台直通开罗萨达特办公室的电话，魏茨曼能直接同埃方沟通。

埃塞德开始了他的演讲。

他对魏茨曼说："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有一个解决方案。"

他解释说，在撤出西奈半岛前，如果埃及决定进攻以色列，他们首先要穿越西奈半岛，因此以色列有足够的时间动员部队，将埃军阻挡在以色列实际领土之外。但撤出西奈半岛后，即便埃及部队已经突进到西奈半岛，以色列也不得而知。因此，以色列需要一双能监视地面的眼睛。

接着，埃塞德指着国防部部长身后地图上以色列和埃及间长长的边界线说道："撤出西奈半岛后，卫星能帮助我们掌握那里的情况。"

空军曾建议必要时在埃及上空使用侦察机，但埃塞德认为这不可行。

他对国防部部长说："我们不能对刚刚同我们实现和平的国家这样做。那是违反协议的行为。但卫星没关系。"

魏茨曼问了几个技术上的问题，他想知道卫星的造价和研发周期，以及卫星图像的画质能否满足情报需求。

离开国防部部长办公室时，埃塞德并没有达到他之前设定的此行的目的，但他得到了他最需要的东西：机会。正如魏茨曼讽刺地说道的，"一次体验失败的机会"。

几周后，埃塞德坐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到美国，访问了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这里是美国很多先进卫星的研发和生产地。接着，他飞到法国，访问了欧洲航天局。

埃塞德的最终结论是，以色列具备研发卫星的能力。

接下来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并非制造卫星的资金，而是在基础阶段让以色列国防企业进行可行性调查的资金。

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光靠坚持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一点儿运气。

1981年初，萨吉来到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兰利，同中央情报局人员进行会晤。这时以色列已经同埃及签订和平协议，并做好了撤出西奈半岛的准备，萨吉此行的目的同埃及无关，而是为了另一件事。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计划对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修建的核反应堆发动军事袭击，希望从美国获得卫星图像。

作为第一位从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内部提拔上来的局长，萨吉是一名非常有科技意识的情报大师。在他的任期内，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在科技方面突飞猛进，发明了跳频发射机，配备给在海外执行秘密任务的特工。跳频技术的使用让敌方难以截获和记录情报发送者传输的信息。

萨吉对来自卫星等途径的视觉情报（visual intelligence，缩写为Visint）很感兴趣。电话可能会被追踪，电话信号也可能被干扰，但当时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能改变摄像机拍下的内容。当然，唯一的缺点在于，单纯依据照片有时难以判断对方的真实动机。比如，如果敌军的装甲师被动员，往往需要更多的情报来确认该部队是在进行演习还是在准备发动战争。

萨吉的要求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以色列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卫星图像上的合作时好时坏，有时能否达成合作完全取决于谁是中央情报局局长。[3]

1973年10月初，以色列武官曾来到五角大楼，请求了解关于叙利亚和埃及军队军力部署的卫星图像，以色列已得到这两个国家准备入侵以色列的情报，希望获得更确切的佐证。然而以色列武官却被告知，美国卫星目前无法使用，因此无法提供照片。

1976年，乔治·H.W.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美方的态度发生转变，同意向以色列提供实际图像。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赶紧把握住这次机会，派了两名分析员（其中一人曾在国防军担任厨师）来到兰利，

他们俩坐在一间独立的房间内，从那儿向中央情报局的卫星图像分析员提出特定申请，得到照片后进行分析，然后将信息发回特拉维夫。

布什的继任者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上台后改变了这一政策，他只允许向以色列提供卫星在侦察任务中搜集的信息，而不是实际图像。1981年，随着威廉·凯西的上任，中情局对以政策再次改变。凯西将提供给以色列的照片范围严格限定为对以色列构成直接威胁的目标。[4]

到达兰利后，萨吉要求的不只是图像，还包括美国侦察卫星的直接使用权。对于这个不情之请，以色列准备好了充分的理由：美国计划卖给沙特阿拉伯一套先进的机载预警指挥系统（AWACS），这相当于一个飞行在空中的雷达站。如果美国致力于维持以色列的质量型军事优势，那么以色列理应获得补偿。以色列给了美国两个选择：向以色列提供现有卫星“完全和平等的使用权限”，或提供一颗全新的卫星和一个地面站。[5]

美国答应考虑这些请求，但直接拒绝了萨吉一个更小的请求：提供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图片。回到特拉维夫后，沮丧的萨吉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没有到总参谋部继续游说，而是直接从军事情报局的部门经费中挪出500万美元，然后将埃塞德叫了过来。

萨吉对埃塞德说：“我允许你开展卫星研究。别让我失望。”

埃塞德马上联系两家重要的以色列顶级国防承包商，要求它们提供方案。一般情况下，方案申请必须通过国防部审批，但作为一个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经常以“国家安全”为由绕过这些官僚程序。

要想实现这个计划，首先需要扫清两个主要障碍。第一，以色列能否研发出安装在卫星上并能从太空拍照的光电相机，其照片分辨率必须足够高才具有价值。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就相机性能提出的要求是能够精确到5英尺距离，这样才足以区分坦克和卡车。[6]

第二，运载火箭的研发。

埃塞德同一位名叫多夫·拉维夫的工程师进行了会面。出生于罗马尼亚的拉维夫是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导弹工厂的负责人。据称，正是在这

个希伯来语缩写为“玛拉姆”的工厂里研发出了“杰里科”导弹[2]，这是一款三级固体燃料远程导弹，据说能够携带核弹头，攻击中东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

之所以来找拉维夫，是因为埃塞德想知道，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是否能够制造可用作卫星发射的运载火箭。埃塞德提出了一些特殊的需求，如卫星发射的方向。在此之前，为了与地球自转保持一致，所有国家都朝东发射卫星，但以色列的东边是约旦和伊拉克，所以不能这样做。如果运载火箭意外落在一个阿拉伯国家，很可能被视为入侵行为，从而引发战争。此外，如果卫星坠毁，以色列的科技成果将落入敌人手中。

因此，以色列必须向西发射卫星，同地球自转方向相反。简单说，这意味着以色列工程师必须研发动力更强的运载火箭，因为为了将卫星送入太空，火箭不但要克服地心引力，还要逆地球轨道飞行。虽然很有挑战性，但拉维夫认为这是可行的。

1981年6月7日，8架以色列F-16战斗机从西奈半岛的一个飞机场起飞前往伊拉克，成功轰炸了奥斯拉克核反应堆。这让全世界都感到非常震惊。虽然大家都知道伊拉克的核计划是以色列的心头大患，但没人料到以色列能够对1000英里外的伊拉克发动袭击，然后成功返航。

以色列战斗机在前往伊拉克核反应堆的途中飞越了沙特阿拉伯和约旦领空。在飞越亚喀巴湾时，这些飞机被正在自己游艇上度假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发现。看到飞机上的以色列标志后，侯赛因赶紧让约旦军队向伊拉克发出警告，但伊拉克没有收到，这时以色列空军的飞机已成功潜入伊拉克。

世界一片哗然，谴责接踵而至，连白宫也不例外。这次行动中使用的F-16战斗机是美国刚刚交付以色列的，这些飞机原计划卖给伊朗，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转而卖给了以色列。迫于惩罚以色列的压力，罗纳德·里根总统暂停了其他战斗机的交付，中央情报局也将以色列分析员团队赶出了兰利。

以色列如何在美国拒绝提供卫星画面后获得必要的目标信息？美国对此展开了调查，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博比·英曼下令调出过去6个月以色列申请获得的所有图片。

英曼发现，虽然凯西在位时规定以色列只能获得构成直接威胁的目标图像，但实际上这些图像中不但有伊拉克的画面，还包括远离犹太国的利比亚、巴基斯坦等国的图像。

调查结果让英曼感到非常愤怒，于是他制定了新的标准，将为以色列提供的图像照片严格限制在以色列边境线外250英里的范围内。以色列可以申请更远距离目标的照片，但需要由中情局局长亲自视具体情况审批。

尽管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向美国国防部部长卡斯帕·温伯格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英曼新加的限制性条件被保留下来。

在以色列，埃塞德已经完成了可行性研究。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以色列具备自主制造卫星的科技手段和技术积累。中央情报局对以色列在卫星图像分享方面的限制政策出台后，许多之前反对埃塞德计划的官员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们也意识到，以色列在这方面需要具备自主能力，依赖美国会危及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曾经担任过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和摩萨德局长的梅厄·阿密特解释道：“如果靠别人施舍面包屑为生，你会举步维艰；如果拥有自主能力，你将游刃有余。”[7]

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拉克充满争议的袭击，重新引发人们对以色列申请获得美国卫星权限的讨论。有的人支持批准以色列的申请，他们指出，如果以色列拥有美国卫星使用权限，掌握伊拉克核反应堆的真实情况，也许就不会发动对伊拉克的进攻。还有的人反对批准以色列的申请，他们警告说，以色列一旦拥有美国卫星的使用权，将有能力在该地区发动更多的袭击。反对者还担心，如果美国允许以色列使用其卫星，苏联也会对阿拉伯国家做出同样的事情。

成功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几周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举行了

一次讨论卫星方案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贝京要么批准该计划，下拨必要的预算，要么埋葬以色列的卫星之梦。

这将是最后一搏。萨吉和贝京之前有过会面。作为军事情报局局长，萨吉负责以色列国家情报评估，因此经常需要秘密会见总理。在一次见面时，萨吉提到研发卫星的想法，贝京听完后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首先，他担心如果以色列失败，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个消息，这将极大地削弱以色列的威慑力。其次，他还担心全世界将以色列卫星视为威胁，因为这与以色列的小国身份不匹配。

贝京当时对萨吉说："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当萨吉和埃塞德走进会场时，他们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至少他们相信这个项目的命运交到了最明智的人手中。他们都非常敬仰贝京，他们知道，如果以色列只有一位领导人能够明白自主研发卫星的重要性，那就是贝京。

贝京出生于立陶宛，年少时被犹太复国主义[(3)]深深吸引，一心梦想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迫害贯穿着他对早期生活的记忆：他的父亲曾为阻止一名波兰警察剃一名拉比的胡子而遭痛打。这些画面一直留在贝京的脑海中。

在同吉米·卡特的一次会面中，贝京告诉这位美国总统："关于童年，有两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对无助的犹太人的迫害和我父亲捍卫自己尊严时表现出的勇气。"[8]

童年时期的贝京身体瘦弱，肤色苍白，但同父亲一样，在学校操场上，面对那些仇恨犹太人的人，他从来都是勇敢地反抗。1930年对于青年贝京来说是一个人生转折点。这一年，发起修正主义运动的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来到布里斯克发表演讲。雅博廷斯基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即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他认为，必须毫不妥协地在以色列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17岁的贝京来到雅博廷斯基发表演讲的剧院。在演讲结束时，他明白，只有自己的国家才能保护自己的民族，犹太人在流散地没有未来。

贝京加入了修正主义青年团体贝塔尔，成长为该组织的核心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波兰军队，被派到巴勒斯坦。一年后，纳粹来到他的家乡，将500名犹太人集合到一起淹死在附近一条河中，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后来，他的母亲也从病床上被带走，惨遭杀害。

1943年，30岁的贝京被任命为伊尔贡[(4)]负责人，伊尔贡是从犹太社团主要准军事组织哈加纳中分裂出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当时，伊尔贡有解体的危险，追随者不足，武器短缺，还缺少明确的发展方向。贝京让这个组织重新开始运作，并对英军开展了一系列定点袭击，其中最著名的是1946年的大卫王酒店爆炸事件，大卫王酒店是当时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所在地，这次袭击导致91人遇难。

这次袭击的影响非常大，但在贝京看来，其中的逻辑很简单：要想成立以色列国，英国人必须离开巴勒斯坦，要想让英国人离开，必须发动伤亡惨重的袭击。

1977年，作为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袖的贝京上台，打破了左翼政党在政府长达30年的统治地位，国家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贝京政府执行了许多与之前工党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

不管是作为一名地下组织战士，还是一名政治家，纳粹大屠杀一直是贝京生命中无法逃避的阴影。他常在讲话中说，大屠杀的历史是他参加1978年戴维营谈判、签订埃以和平协议的主要原因。1981年，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前，面对许多质疑这次行动的声音，贝京经常说：“我不想再次成为大屠杀的见证者。”[9]

他后来透露说，当F-16战斗机在飞往目的地时，他脑海中浮现的全是大屠杀和他父母的画面。

让我们回到那次关键的会议。在会上，埃塞德首先陈述了制造卫星的方案，萨吉对此表示支持，并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单纯依靠美国等盟友，应该争取更大的主动权。

接下来进入讨论阶段。包括国防军总参谋长埃坦在内的与会人员提出了对该方案的质疑，他们认为以色列卫星计划是资源和时间的巨大浪

费，军队在这两方面都耗不起。有的军官试图说服贝京支持其他方案，指出与其将钱浪费在卫星运载火箭上，不如投资研发巡航导弹。

但贝京对卫星方案很感兴趣。由于技术不是他的强项，总理回避了细节，而是提出几个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除了商业用途，卫星能否在以色列国防中发挥关键作用？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贝京感到很满意。以色列自主研发的卫星完全符合他的信念：大屠杀过去不到40年，以色列不能再次将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

正是在这一信念的引领下，贝京不顾美国和欧洲的反对，毅然授权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如果说贝京从大屠杀那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在生存这个基本问题上，犹太人永远不能依靠任何人，哪怕是最好的朋友。

贝京对埃塞德说："犹太人有能力创造奇迹，实现它的时机到了。赶紧行动起来吧！"[10]

埃塞德离开会场时，贝京还在和与会人员讨论当天的其他议程。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刚刚迈出了多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也不知道这一步对确保以色列未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地位将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

但这一切并不容易。首先面对的困难是，以色列如何能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搜集研发卫星的信息。

贝京明白，如果美国人发现以色列在制造自己的卫星一定不会高兴，他们之前就警告这一行为会引发中东的军备竞赛。

他想到一条妙计：创立以色列航天局这一民事机构，并任命尤瓦尔·内埃曼为局长。

内埃曼曾经是贝京政府的科技部部长，是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军界和学界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担任过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

高级情报官，后来在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任职。20世纪60年代，当约翰·F.肯尼迪总统就以色列核计划向本-古里安不断发问时，正是内埃曼在本-古里安旁建言献策。

为了确保这个计划能成功，贝京决定，只有内埃曼能代表以色列航天局在公开场合讲话，他的名字将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中，一切都掩盖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埃塞德的名字也将出现在该组织董事会名单中，但仅仅是以教授这一学术身份，他在军队的军衔和职位都严格保密。

埃塞德和内埃曼很快就明白，他们只能研发小型卫星，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的运载火箭无法运载重量太大的卫星。因此，以色列第一颗卫星“奥菲克”（希伯来语中“地平线”的意思）上连相机都没有安装。主要目的是测试“沙维特”运载火箭能否将这颗卫星送入太空。

这颗卫星不仅要小，而且必须特别小。美国当时的主要卫星KH-11重达13吨，埃塞德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设计的卫星重量将只有155千克。

埃塞德回忆说：“每一千克都需要慎重考虑。这个项目中所有的东西都要专门设计。”

下一个挑战是寻找资金。虽然贝京批准了项目，但国防军中还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总参谋部也不愿拨出必要的款项，根据估算，启动资金需要将近2.5亿美元。

但萨吉有自己的办法。之前担任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时，他和一些南非军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其中有的人经常带着夫人来以色列旅游。萨吉家住在特拉维夫南边一个田园小镇的大房子里，萨吉和妻子汉娜经常在这里招待这些客人。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和南非的关系非常好，因为南非需要武器，以色列需要资金。一天，萨吉向一名与他级别相同的南非军官提到卫星项目需要资金，对方当即同意资助几亿美元。他们间的协议被定为“绝密”，直到15年后南非才透露资助了以色列弹道导弹和卫星运载火箭的研发项目。[11]

1983年，萨吉从国防军退役，离开了军事情报局局长的职位。他的继任者是埃胡德·巴拉克，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后来成为以色列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和总理。巴拉克认为军事情报局和以色列这个国家都不需要卫星，侦察机从以色列领空倾斜拍摄的航拍图像完全够用。

他的观点很可能让这个项目夭折。军事情报局是卫星的主要使用者，如果巴拉克反对研发卫星，那么卫星即便被研发出来，也没有用武之地。当然，如果未来没有作战需求，卫星也不可能被研发出来。[12]

空军也不看好卫星的前景。空军司令阿维胡·本-努少将建议放弃卫星计划。他担心研发卫星的预算会挤占购买战斗机的预算，认为战斗机对这个国家更为重要。他还指出，以色列完全可以从法国人或美国人那里购买卫星图像。

空军还给出了另一个理由：他们需要的是战术情报。要想做到这一点，以色列在太空需保持大约20颗卫星的运行，才能让所有卫星在不改变轨道状态下持续监视地球上的特定区域或作战行动。这显然不在以色列的财力范围之内。

即使萨吉不在身边，埃塞德也坚持自己的立场。后来他对别人说：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不可能”这个词。

发射日期临近，政府又面临一个新的挑战：这个秘密计划即将以极为高调的方式公之于众。以色列决定在特拉维夫以南的帕尔马希姆空军基地进行卫星发射。届时，全国和全世界都将知道以色列的秘密。

此外，由于《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登记公约》）于1976年生效，联合国成员国有义务向联合国登记卫星发射信息。虽然以色列官方之前一直拒绝承认关于其在制造卫星的报道，但这时也不得不服从该公约。

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伊扎克·拉宾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卫星计划的解密工作。委员会的代表来自政府各部门、各军事单位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拉宾选任航空工业公司经验丰富的发言人多伦·苏斯里克负责所有的媒体简报和新闻稿。国防部部长将保持沉默。该委

员会就媒体可能提出的问题准备了一份手册，苏斯里克将在回答中强调这次发射的科学价值，淡化其军事价值。

在整个过程中军队将保持低调，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觉得这次卫星发射是一个科学项目，没有任何军事目的。

1988年9月19日，晚于原计划一天，“奥菲克”1型卫星成功发射到太空，以色列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中国、英国和印度之后又一个具备独立发射卫星能力的国家。

这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天，正如之前计划的一样，以色列强调了这次发射的科学意义。

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在卫星成功发射几天后说道：“这次技术试验……让以色列成为现代科技时代顶级国家中的一个合作者。我们应当主要考虑这一事件在技术上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在这一领域，以色列的国际声誉得到大幅提升。”[13]



2014年，以色列在特拉维夫以南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奥菲克”卫星（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提供）

尽管沙米尔和苏斯里克的工作已做得很到位，但全球媒体的关注重点并不是卫星本身，而是运载火箭。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学推理：如果以色列的运载火箭可以将卫星送入太空，那么以色列就已经拥有能够携带核弹头打击中东任意地点的弹道导弹。

虽然这颗卫星上没有相机，以色列甚至还否认正在制造间谍卫星，但阿拉伯国家非常明白，以色列很快就会具备全天候、全方位监视阿拉伯军队的能力，这只是时间问题。

这次发射也向华盛顿传递了一个信号。虽然以色列一直在公开场合对美国的军事援助表示感谢，但卫星发射表明，以色列对美国的依赖是有限的。正如贝京之前所预料的，自主发射卫星的成功意味着以色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两年后，以色列成功发射了第二颗卫星，这一次也没有安装相机。确认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后，国防部认为发射侦察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向以色列发射了39枚“飞毛腿”导弹，这一事件再次向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了卫星的重要性。没有侦察卫星，以色列国防军根本无法定位伊拉克导弹发射架的位置，也无法为以色列公民就来袭导弹提供预警。

“飞毛腿”导弹在以色列境内爆炸的当晚，以色列国防军高层将领聚集在特拉维夫国防部地下经过加固的“波尔”指挥中心。国防军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并制订了作战计划，其中包括用直升机将特种部队空运到伊拉克沙漠，找到并摧毁“飞毛腿”导弹发射架。但由于美国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伊扎克·沙米尔总理搁置了这些方案，屈服于美国的施压。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一旦以色列发动报复行动，其在伊拉克艰难组成的阿拉伯联合部队就会土崩瓦解。

后来的一天晚上，当看到更多的导弹落在特拉维夫时，时任国防部总司长的大卫·伊夫里警告说更猛烈的袭击还在后面。

他在“波尔”指挥中心对其他国防军将军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仅仅是40枚左右的‘飞毛腿’导弹，未来这根本不算什么。”

伊夫里很了解伊拉克。1981年他任以色列空军司令时，指挥了对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轰炸任务。正是他让贝京总理相信以色列飞行员有能力完成这次袭击。

时任国防部部长的摩西·阿伦斯本身是一位著名的航空工程师，他同

意伊夫里对未来威胁的判断。海湾战争结束后，他立刻召集国防军的研发团队，要求他们拿出一个新的侦察卫星计划。阿伦斯说：“我们现在就需要侦察卫星！”

然而，当1993年国防军第一次发射侦察卫星时，运载火箭没能成功进入太空，卫星失踪在地中海的某处。在国防界，以色列这颗卫星被戏称为“反潜艇卫星”。

埃塞德的上级、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局长乌兹·埃拉姆需向国防部部长汇报这次发射失败的情况，而在上一次大选后，以色列总理拉宾兼任国防部部长。拉宾是前两次卫星发射的总负责人，发射成功后，总理办公室来了许多重要人物和行业高管，但这一次，他的房间空空如也。[14]

从一开始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后，一个由没有参加过卫星计划的导弹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成立，负责评估发射失败的原因。他们找到了五个可能的技术故障，大多与运载火箭有关。

但埃拉姆和埃塞德知道自己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麻烦，坠毁火箭上运载的是以色列唯一一颗可运行的侦察卫星，他们没有第二颗卫星，也没有资金生产第二颗卫星。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QM卫星，这是那颗坠毁卫星的复制品，之前被用作试验台。也就是说，科学家在真实卫星上安装系统前会在这个平台进行测试。但问题是，QM卫星在生产时并没有考虑太空环境，也没打算用于发射。

国防体系出现了两个声音。一派持谨慎态度，反对发射QM卫星，主张发射一颗同作战卫星一样重达250千克的卫星模型，专门测试之前发射失败的运载火箭。

埃拉姆和埃塞德属于另一派。他们主张改装QM卫星，使其满足发射要求。他们打算随机应变，而不是按套路出牌。

这样做风险很大，埃拉姆和埃塞德心里很清楚，没人会容忍他们再次失败，如果失败，卫星计划将就此终结。

如果想保守起见，他们当然需要继续等待，直到确保经过调试的新运载火箭能够进入太空，这个选择的确很吸引人。但埃拉姆和埃塞德不愿妥协，他们要求尽快使用QM卫星再次尝试发射。他们指出，如果不这样做，以色列将失去为之付出如此之多的自主能力。

他们将这个冒险的方案递给拉宾，经过一番劝说后，他批准了这一方案。

QM卫星经过两年多的调试和改装，发射日期最终定在1995年4月5日。来到帕尔马希姆空军基地，埃拉姆看到一个装饰有大卫星标志的运载火箭矗立在发射场，在运载火箭的最上方是一颗真正的侦察卫星，而在此之前一直是测试卫星。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埃拉姆坐在发射指挥间的一面玻璃墙后。在玻璃墙的另一边，国防军的军官们在做火箭发射前的最后准备，检查部署在基地附近确保火箭能够正常发射的遥测和雷达系统。

在海上，海军舰船已经在地中海上清理出一条通道，万一再次发射失败，确保民用船只不会和运载火箭相撞。

大厅传来内部通话系统发出的低沉的声音：“5分钟倒计时……3分钟倒计时。”

这一刻，只有一位担任首席安全官的国防军预备役上校可以中止火箭发射。即使国防部部长坚持发射火箭，他也有权取消。埃拉姆看了他一眼，此时这位上校的手就放在红色的中止开关上，他做好了随时按下按钮的准备。

当进入10秒倒计时，火箭已启动自动控制状态，支撑梁收起。突然，内部通话系统中有人喊道：“停下来!停下来！”

埃拉姆心头一沉，时间只剩下最后几秒，他赶紧转过身面向指挥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首席安全官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但看了一眼各个系统的运行状态后，他的手从开关上移开了。接下来，扣人心弦的一刻来到了，火箭发动机喷发出火焰后运载火箭开始上升，留下一团巨大的白色浓烟。刚才的声音属于误报，大家虚惊一场。

几分钟后，第一级火箭助推器分离，坠落在利比亚海岸附近。又过了几分钟，一个燃料箱坠落在阿尔及利亚附近的地中海海域。

发射已经成功，但埃拉姆知道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他在等待最终将卫星送入太空的第三级火箭的情况。和其他重要人物一起，埃拉姆一动不动地待在玻璃墙的另一边。

没过几秒钟，他们终于听到了一直期盼的消息："卫星和火箭成功分离，卫星已进入轨道。"

指挥间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埃塞德在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总部观看发射，那里也是卫星控制室的所在地。卫星已进入太空，现在他们需要检验卫星能否正常运行以及太阳能电池板能否顺利打开。

埃拉姆打电话到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但他几乎听不清埃塞德在激动地说些什么，于是大声喊道："哈伊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卫星运行正常吗？"[15]

12小时后，他们才确定卫星的具体状况，截至那时，"奥菲克"3型卫星已环绕地球8圈，并发回了卫星图片，画面质量远远高于人们的预期，连本-古里安机场飞机上的以色列标志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次发射成功迅速让以色列获得了很高的国际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它打消了国防军内部很多反对人士的疑虑。现在，每个人都开始支持以色列的卫星计划。

1988年，"奥菲克"1型卫星的成功发射开启了以色列航天事业的新纪元，自那以后，以色列逐渐成长为卫星大国。和它擅长的其他制造平台一样，以色列独辟蹊径，没有像美国那样制造25吨重的"巨型卫星"，而是专注于设计300千克的"迷你卫星"。

2014年，以色列成功发射了"奥菲克"10型卫星，至此，以色列已拥有7颗间谍卫星，其中大部分使用光电传感器相机，能够拍摄出高分辨率的照片。例如，2010年发射的"奥菲克"9型卫星搭载的是以色列制造

的“朱庇特”多光谱相机，该相机能够在几百英里外分辨出50厘米大小的物体。

除了成像卫星，以色列还有两颗卫星装有合成孔径雷达，这种雷达系统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画面，相对于照相机具有巨大优势。相机无法穿过云层或雾霾进行拍摄，但雷达可以在任何天气下工作，甚至可以看到伪装网下面的东西。

有了7颗卫星在太空，以色列有能力实现集群操作。在超出直接传输范围时，卫星可以将其拍摄的图像传给另一颗卫星，最终由距以色列最近的卫星将图像实时发回地面总部。

以色列在研发先进卫星和相关载荷上取得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2005年，法国人决定充分利用以色列在这方面的专长，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一起研发一款新型卫星。这颗被称为“维纳斯”的卫星主要用于研究包括植被、农业和水质在内的陆地资源。2012年，意大利支付1.82亿美元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订购了一颗侦察卫星。据报道，这些年来新加坡和印度也购买了以色列卫星。

考虑到以色列卫星计划起步和发展的艰难历程，这些成就的确来之不易。

以色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埃塞德和萨吉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有开拓创新的精神，还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些品质也是“虎刺怕”精神的表现。他们拥有崇高的梦想，那就是将以色列的力量边界拓展到太空，他们相信这个梦想可以实现，不管遇到多大的阻碍也不放弃。

埃塞德的所作所为和许多被保守机构束缚的梦想家们一样：他们选择改变规则。

在他位于特拉维夫的海景公寓中，埃塞德对我们说：“贝京当时同意这个计划让我非常惊讶，直到今天我都感到这让人难以置信。军队高层反对的人很多，我当时觉得我们根本无法说服总理。”

打破层级结构有时似乎会危及一个组织制定长远战略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它也有积极的意义，能够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氛围，让人们自由地交流思想，毫无畏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埃塞德指出，创新者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他们必须确定自己的提议是人类可以实现的，用埃塞德的原话，即“不违背基本物理学”。

第二，就是坚持，说白了，就是要“脸皮厚，腰杆直，不怕羞辱，哪怕有时别人会往你脸上扔烂番茄”。

操控以色列卫星的是位于国家中部的一个秘密指挥中心，人们称这个单位为9900部队。在这支部队一个满墙都是等离子屏幕的房间里，战士们密切跟踪卫星的运行情况，操控卫星执行各种任务，等待着卫星“产出”各种图像。



哈伊姆·埃塞德在特拉维夫附近展出的“沙维特”运载火箭模型旁留影（哈伊姆·埃塞德提供）

自成立以来，9900部队一直利用卫星监视各个战略目标以及遥远地

区的敌人，特别是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侦察机和无人机难以到达的地方。2000—2006年，以色列卫星的主要关注地区是伊朗，主要任务是跟踪阿亚图拉核计划的进展。

这一关注重点在2006年夏天发生了改变。这一年，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爆发了为期1个月的战争。以色列士兵在缺少准确情报的情况下被派到黎巴嫩，他们手上的地图很陈旧，也完全不知道真主党游击队员藏在哪里。

战争过后，9900部队进行了改组，关注重点发生改变，这一变化取得了成效。在打击哈马斯的“防务之柱”行动前，该部队搜集了大量相关情报。2012年12月，行动结束才几周，该部队就由于在情报上的突出贡献受到表彰。

改变关注重点并非易事。以前，9900部队需要关注叙利亚军队的动态，并监视伊拉克的情况。但加沙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同正规军队截然不同，这类敌人常常混杂在民房当中，为了发现他们，卫星操作员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毕竟，发现躲藏在学校操场地下的火箭弹发射器远比跟踪叙利亚装甲部队要困难。

在指挥中心，9900部队针对黎巴嫩、叙利亚、加沙等各条前线建立起被国防军称为“目标银行”的数据库。该部队一名初级军官解释说：“基于这些数据，我能精确地告诉飞行员瞄准和射击的具体位置。”[16]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最新行动中，将卫星操作员和分析员配属到国防军各地面师的前沿指挥中心，这样做是为了打通情报搜集和分析单位与情报使用者（即深入敌后作战的地面部队）之间的情报通道，实现多兵种协同作战。

搜集情报只是这支部队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对图像进行分析。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国防军在9900部队中设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单位。这个单位的人员都是具有非凡视觉和分析能力的战士，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共同点：都是自闭症患者。

招募自闭症患者入伍的想法来自塔米尔·帕尔多。2016年之前他曾担任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局长。他主动找到一个专门帮助自闭症青年

融入劳动力队伍的以色列非政府组织。他当时说："一定有办法让他们的才华在以色列情报界发挥作用。"



以色列国防军卫星图像部队（9900部队）中患有自闭症的战士正在电脑前工作（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提供）

这些"特殊"的战士被送去参加为自闭症患者特殊设计的新兵培训课程。刚开始国防军还有些犹豫，这些自闭症患者虽然能力很强，但参军入伍还是存在一定风险。但几个月后，这个项目的成功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这些战士能够发现地形微妙的改变，一片灌木丛位置移动了几英尺，或一座建筑被小规模扩建，他们都能很快察觉，一般人也许很容易错过这些地形变化。在9900部队看来，这些变化至关重要，很可能因此发现一个火箭弹发射点或秘密的武器藏匿点。

这种操作方式很特别。大多数国家都会不假思索地对自闭症患者免除兵役，更不会为他们设计专门的培训计划。但在以色列这一点也不奇怪。患有自闭症的战士拥有特殊的能力，以色列资源有限，所有的资源都必须发挥到极致。

卫星让现代战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让以色列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搜集能力，远远超过中东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然而，尽管以色列在不断加强其太空存在，2009年以色列还是清醒地看到自己已不再是中东地区该领域的垄断者。这一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功将第一颗自行研制的"希望号"卫星发射到太空。和1988年以色列发射的第一颗卫星一样，"希望号"卫星也没有携带相机，并且伊朗也

声称发射卫星完全出于科学目的。但到了2015年，伊朗就发射了一颗侦察卫星。

2009年伊朗卫星发射的影响非常大。它证明了伊朗政权在弹道导弹研制上取得了长足进展。如果伊朗可以自主将卫星送入太空，它就有能力将携带核弹头（一旦拥有的话）的导弹发射到中东地区的任意地点，甚至发射到欧洲部分地区。

伊朗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在太空立足的中东国家。2007年，埃及成功发射第一颗间谍卫星，这颗卫星由埃及和俄罗斯共同研制，发射地点也在俄罗斯（确切说是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租赁的发射基地）。但3年后，这颗卫星出现故障，无法使用。埃及继续雄心勃勃地推进太空计划，2014年，埃及在俄罗斯发射了第二颗间谍卫星。但不到一年后，这颗卫星再次出现故障，同地面站失联。

伊朗和埃及的活动表明，1988年以色列加入的卫星俱乐部不再像以前那样封闭。能够自主发射卫星的国家越来越多，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大。以色列不再是该地区唯一一个可以监视邻国的国家，现在，周边国家也可以监视以色列。

(1) 第七个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是印度，时间为1980年7月。——译者注

(2) “杰里科”1为近程导弹，“杰里科”2为中程导弹，“杰里科”3为远程导弹。此处其实是指“杰里科”3远程导弹。——译者注

(3) 字面翻译为“锡安主义”。——译者注

(4) 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成立于1931年，别名为“埃策尔”（Etzel）。——译者注

第五章　反导科技

本来只是以色列南部最大城市贝尔谢巴的一场普通婚礼，美丽的鲜花，动听的音乐，丰盛的酒食，新人邀请了大约300名客人。婚礼筹备人员一大早就在布置户外婚礼的现场。

下午4点，以色列空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一辆行驶在加沙居民区街道的银色起亚轿车。攻击目标是神出鬼没的哈马斯军事指挥官艾哈迈德·贾巴里。当时是2012年11月14日，旨在终止加沙地带火箭弹袭击的“防务之柱”行动由此拉开帷幕。

贾巴里可能都没听到导弹飞向他汽车的声音。一架盘旋在（加沙）上空的以色列无人机已经跟踪他好几个小时，等待最合适的进攻时机。贾巴里的座驾行驶在街道上时，经过一辆坐满人的巴士，当他的车远离这辆巴士时，导弹被发射出去，成功命中其座驾，爆炸产生的碎片四处飞散，车内人员当场死亡。

暗杀完成后，负责民防工作的国防军后方司令部立即下达指示，要求所有在哈马斯火箭弹射程范围内的学校停课，100人以上的户外聚会活动全部取消。但这对新人决定按原计划举行婚礼。虽然，根据犹太传统，举办婚礼仪式的华盖（Chuppa）被设在户外，但婚礼现场旁边就是大厅，一旦听到防空警报，所有人都可以迅速跑到室内。所以，尽管收到加沙地带报复性火箭弹袭击的警告，但这对情侣还是决定如期举行婚礼。

夏伊·马鲁尔是这次婚礼的摄像师，下午2点时他同新郎新娘碰面，开始了当天的拍摄。工作了2小时后，他在广播中听到贾巴里被暗杀的新闻。他回忆说：“我当时就知道，很快会出现‘巴拉干’。”以色列人经常用“巴拉干”这个希伯来语词汇形容“极度混乱的局面”。他拨通妻子的电话，要她接完孩子后直接回家。他自己则打算把手头的工作做完。他解释说，他当时刚刚拍摄了一部分，总不能就这样走人。

晚上7点半，大多数客人都到场了。婚礼现场准备有丰盛的自助餐，装满酒水饮料的杯子被层层叠起。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8

点15分时，防空警报突然响起，客人们大多朝婚礼现场的大厅走去。为了保险起见，马鲁尔也决定和他们一块儿进去。当他将摄像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时，镜头不小心对到天空，这时他看到几道光芒像烟花一样升向天空，当又有几道光束升起时，他赶紧到大厅躲避。

后来马鲁尔将视频上传到Youtube网站，从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5个小光点朝天空中不同方向飞去，看上去就像是爆炸前的烟花。但实际上，这些快速移动的光点是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发射的拦截导弹，用于拦截几秒钟前从加沙地带发射的10多枚“喀秋莎”火箭弹。在视频中，这些光点接连爆炸，从加沙袭来的火箭弹被成功拦截。

“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负责人丹尼·戈尔德准将这时已经退休，在Youtube网站上看到这个视频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火箭弹被成功拦截的画面，而是现场的奇特氛围。警报响起后，虽然部分参加婚礼的客人赶紧跑到室内，但还有一些人留在户外，继续伴着美国摇滚乐队魔力红翻唱的《星期天早晨》尽情起舞。

这是一场“铁穹婚礼”。

“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过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许多特质：“虎刺怕”、坚韧不拔、随机应变和开拓创新。

加沙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最主要的武器是近程火箭弹，“铁穹”防御系统对这种武器有很高的拦截率。在2012年为期8天的“防御之柱”行动中，“铁穹”防御系统击落了85%射向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弹。在2014年夏天针对哈马斯的“护刃”行动中，“铁穹”防御系统的拦截率高达90%。

如此之高的成功率，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没有任何国家拥有“铁穹”这样的系统。

以色列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开始发展导弹防御能力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邀请美国盟友参加“星球大战”计划，该

计划是指美国正在研发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旨在防御来自苏联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伊扎克·拉宾建议以色列也参与该计划。的确，以色列做不了太大贡献，但拉宾的想法很简单：以色列必须强化和美国的关系，在导弹防御系统上的合作说不定可以带来新的机会，况且这一合作近期并不需要任何财政投入。

为了表达以色列的诚意，拉宾命令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希伯来语缩写为“马法特”，等同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将一些想法落实为文字，当时机成熟时可以交给美国人。对以色列国防企业来说，这并非难事。如果能做出一些有前景的项目，美国人很可能会投入很多资金进行资助，哪怕对美国人来说是很小的投资，在以色列人看来也是一笔巨款。

但以色列国防军中很多人对拉宾的决定持怀疑态度。一个由情报专家组成的小组刚刚对以色列面临的导弹威胁进行了评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威胁很小，不值得在导弹防御上投入巨资。叙利亚的确拥有大量“飞毛腿”导弹，但并没有超出常规威胁的范围；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库也确实构成严重威胁，但以色列可以通过向公众发放防毒面具将这一威胁降到最低程度。

由于美国的这个计划明显针对苏联，许多以色列人担心加入该计划会加剧同苏联的对立。莫斯科是以色列敌对国的主要武器提供者。一旦以色列加入“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就有借口对以色列采取更苛刻的立场，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更多先进武器，并减少苏联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数量。

但拉宾让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继续推进这项工作。发展局任命乌兹·鲁宾来负责这个项目。这名年轻的航天工程师很有才华，已经在许多机密国防项目中证明了自己，在世人眼中他是一位非常务实的管理者。

鲁宾马上行动起来。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以色列国防企业就拿出了三个很有吸引力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一名“特比昂”项目毕业生提出的能以超高射速发射60毫米炮弹的化学加农炮。另一个方案提出研发导弹防御测试台，也就是能够在电脑上模拟导弹防御系统的实验室。

最后一个方案最为宏伟，称为“箭”式反导系统。该计划试图研发一种能在大气层外击落来袭弹道导弹的拦截弹，简言之是一种能够击落导弹的导弹。

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想法。提出该方案的多夫·拉维夫认为，这项技术对以色列国防至关重要。他说，由于以色列领土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弹道导弹可以打到以色列的任意地点，因此以色列需要一个用于高空拦截导弹的防御系统，能够在邻国领空击落敌方来袭导弹，为以色列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时机成熟后，鲁宾带领一个以色列国防代表团来到华盛顿宣传这三个方案。“箭”式反导系统的方案让美国人感到非常惊讶，更让他们难以置信的是拉维夫声称该武器系统的研发费用只需1.58亿美元，而根据美国人自己的估算至少需要5亿美元，而且很可能需要追加投资。出乎意料的是，美国决定资助以色列带来的所有方案。

以色列国防军高层并没有因为华盛顿对这些方案表现出热情而感到高兴。总参谋长埃胡德·巴拉克甚至给国防部部长写了一封信，反对投资“箭”式反导系统。他的理由很简单：以色列国防军需要的是坦克、战斗机和海军攻击舰。正如空军司令当时在总参谋部会议发言中所说的：依靠导弹防御系统无法赢得战争，只有进攻才能取胜。

在另一次会议上，巴拉克提出，将预算用到导弹防御计划上会降低国家赢得未来战争的可能。他敦促国防部部长拉宾把所有可用的钱用于购买进攻性武器系统，他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迅速结束战斗。

巴拉克还说，如果拉宾坚持要拥有导弹防御系统，完全可以购买美国正在研发的“萨德”反导系统（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其价格远远低于“箭”式反导系统的研发费用。

在这个问题上，鲁宾和大卫·伊夫里形成统一战线。伊夫里之前担任空军司令时指挥了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行动，此时他任国防部总司长。在同国防军官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箭”式反导系统的反对者们引用了大卫·本-古里安的名言：以色列要想生存下来，必须把战争推到敌方领土。他们声称，投资在本国领土使用的防御系统违背了国家这一战

略原则。

针对这一论调，伊夫里说：“本-古里安说得没错。但你们忘了，在建国之前，为了保卫犹太社团，他也非常重视防御。他知道，防御和进攻同样重要。”

1987年底，以色列得到新的情报，叙利亚正在研发能够安装在“飞毛腿”导弹上的生化弹头，而且该国拥有大量“飞毛腿”导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以色列一直知道叙利亚拥有大量生化武器，但在此之前，叙利亚只能使用飞机在以色列上空投掷生化炸弹，以色列空军有充分的把握将叙利亚飞机拦截。但现在，叙利亚可以向以色列境内直接发射载有生化弹头的弹道导弹。

几乎在获得这份情报的同时，在两伊战争的战场上，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打到了德黑兰，导致大量民众从城市撤离。以色列亲眼看到弹道导弹对民众心理产生毁灭性影响。

以色列国防军并没有因为这种形势而采取相应行动。但伊夫里不愿再等下去，1988年3月，他写了一封密信发给国防部部长、总参谋长、军事情报局局长和空军司令。

伊夫里在信中警告：“地对地导弹是以色列面临的最严峻的战略威胁，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他直接批评了空军和军事情报局的高级军官们，指责他们对这一威胁视而不见，严重低估了其影响范围。“他们的言论根本不能表明现实的严峻性。”

这封信和其中严厉的批评在国防军引起轩然大波。空军和军事情报局的负责人立刻向拉宾抱怨。几天后，伊夫里写了另一封信，声称如果上封信言辞过于尖锐，他愿意道歉。但他坚持认为以色列应该把钱投到“箭”式反导系统上。

虽然国防军提出反对，但拉宾最终站在了伊夫里和鲁宾一边，批准了一个用于研发“箭”式反导系统的多年预算计划，但金额很小。拉宾在另一次会议上说：“这个计划的预算就这么多了，不会再有其他投资。”

这项计划的命运非常坎坷，1990年险些被永久终止。然而，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萨达姆·侯赛因向以色列发射了39枚“飞毛腿”导弹，整个国家几乎陷入瘫痪，数百万以色列人不得不戴着防毒面具躲进封闭的房间，整个以色列都陷入恐慌。战争结束后，“箭”式反导系统计划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政府决定增加研发预算。美国也增加了对该项目的财政资助，但拉维夫之前的估算有误，这个项目的支出比他预想的还要少。

以色列又经过了几年才完成“箭”式反导系统的研发，2000年，以色列空军终于建立起第一个可投入实战的“箭”式导弹连，以色列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此时，巴拉克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1999年当选总理后，他造访了制造“箭”式反导系统的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工厂。他向“箭”式反导系统计划负责人乌兹·鲁宾承认道：“你当时的判断是对的……我从没想到我们能打败美国人，早于他们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1]

以色列第一次拥有防御伊拉克和叙利亚导弹的能力。但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以色列当时还不知道，新的火箭弹威胁即将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袭来。



2016年在以色列举行的美国—以色列联合导弹防御演习期间展示的“箭”式反导系统拦截弹发射器（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在以色列南部城市斯德洛特，市长艾利·穆瓦亚尔当时正坐在自家门廊前。逾越节两天前刚结束，穆瓦亚尔这会儿正在享受着这座沙漠小城宜人的暖风。突然，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他家的窗户被震得砰砰直响。没过多久，爆炸声再次响起。他本来没多想，直到他看到城市远处升起浓烟。他从椅子上唰地站了起来，朝浓烟的方向赶去。到达现场后，他看到地上被炸出一个洞，洞里还插着一根像金属管一样的东西。

一位赶到现场的国防军高级军官对市长说：“先别对任何人说，初步判断，两枚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落在了斯德洛特。”

当时是2001年4月。穆瓦亚尔简直不敢相信这名军官的话，他问道：“什么？他们能打到斯德洛特？”[2]

哈马斯称这种武器为“卡桑”火箭弹，这个名字来自该组织下属武装部队卡桑烈士旅，这支部队臭名昭著，对以色列人实施过无数次自杀式爆炸袭击和枪击。最初，这种火箭弹的射程有限，勉强能达到1英里的距离，但2005年哈马斯已成功将“卡桑”火箭弹的射程提高到10英里，2006年射程达到13英里，2008年达到26英里。2012年，哈马斯已获得能够攻击40英里外特拉维夫的伊朗火箭弹。[3]截至2014年，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了1.2万枚火箭弹，其中超过1000枚落在斯德洛特，这座小城在以色列建国后曾是土耳其和伊朗犹太人的避难所，现在这里深受火箭弹袭击之苦，常常因为袭击而陷入瘫痪。

这个变化在人们意料之外，但其实也有一定的必然性。20世纪90年代，哈马斯的标志性手段是在以色列全境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有时也会进行驾车袭击。一开始人们认为火箭弹制造不在哈马斯能力范围内。事后看来，哈马斯使用火箭弹是有原因的。几十年前，意识到自己无法对抗以色列空军和步兵，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在袭击方式上进行了类似的改变。火箭弹能够避开以色列空军和步兵的优势，而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恰恰是哈马斯最主要的学习对象。

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以色列加强了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区域的管控，并严控加沙地带海上通道和陆地口岸，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基本被封锁在这个狭窄区域。如果哈马斯想攻击以色列，就必须找到新的办法，火箭弹是最佳选择。



以色列海军在一艘开往加沙地带的船上发现据称来自伊朗的火箭弹，并将其没收（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以2001年袭击以色列的火箭弹为例，其最大的优势在于生产火箭弹所需的原材料极易获得。这些火箭弹重量小，便于运输，也不需要复杂的发射系统。简单的金属支架就可以当作发射器，有时路灯杆都可以改装成火箭弹。更为重要的是，在发动袭击时，哈马斯武装分子不需要经过以色列检查站，也不需要躲避国防军巡逻队，火箭弹可以从这些障碍的上空飞过去。

2005年以前，哈马斯的火箭弹主要有两个来源。近程“卡桑”和“喀秋莎”火箭弹在加沙地带就地设计与生产。射程更远的火箭弹则通过地道走私到加沙。该组织在同埃及交界的一段只有9英里长、被称为“费城走廊”的地区修建和维护着一个复杂的地道网络。有时，由于火箭弹体积太大，无法进入地道，他们就将其拆分后走私到加沙，然后再由哈马斯工程师进行组装。

穆瓦亚尔那天看到的并非以色列第一次遭火箭弹袭击的事件。之前，真主党就从其位于黎巴嫩的基地向以色列北部发射过火箭弹。但那两枚“卡桑”火箭弹传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息：以色列将在更大范围内遭受火箭弹的威胁，而对此这个国家竟无能为力。

以色列经过一段时间才充分感受到这一新威胁有多么可怕。2001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还建有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虽然经常遭到袭击，但大多是迫击炮弹袭击，偶尔有个别哈马斯持枪者渗透到定居点，从来没有遭到火箭弹袭击。火箭弹袭击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2001年只有4枚火箭弹打到以色列，这一数字在2002年上升到34，在2003年上升到155，增长趋势非常明显。[4]

面对这一趋势，以色列自以为已经找到解决方案。1996年，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关于联合研发“鹦鹉螺”激光反导系统的协议。这项研究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黎巴嫩的“喀秋莎”火箭弹，但以色列政府认为该武器系统也可应用在其他地方。没想到的是，激光武器的研发时间远远超出预期，甚至无法确定最终能否用于实战。

2004年，丹尼·戈尔德准将被任命为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局长，这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戈尔德进入空军时是一名无线电工

程师，但他对武器研发有着敏锐的嗅觉。20世纪90年代，已是上校的他负责空军的武器研发，在这期间他利用休假时间参加了特拉维夫大学两个博士课程计划，一个是企业管理，另一个是电气工程，不到两年时间他就学完了所有课程。

来到新岗位后，他立即投入工作中。戈尔德决定将消除来自加沙日益加剧的火箭弹威胁列为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的工作重点。他这样决定完全出于直觉。的确，这一威胁刚出现不久，但戈尔德认为它很可能成为全国性的战略挑战。

一开始，戈尔德按规章制度办事，通过标准政府流程提交了用于技术调研的预算申请。但不管在哪个部门，他都听到同样的回答："别想了，没钱。"当他继续追问，同他见面的将军们不外乎会给出以下四个理由：第一，这个想法注定失败；第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20年时间；第三，这要花几十亿美元；第四，当火箭弹拦截系统研发出来的时候，它已经落伍了。在这些将军看来，以色列应将投资用于提高进攻能力，而不是建立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这和他们之前反对"箭"式反导系统的论调如出一辙。

戈尔德没有放弃。他提出，这个火箭弹拦截系统可以增强以色列在战场上的攻击性。如果以色列民众得到有效保护，以色列就不会迫于火箭弹袭击的压力去平息冲突。他还警告说，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很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他说："如果我们成功了，这个系统不仅能保护以色列民众，还能在遭到袭击时为政府争取更多的时间思考反制措施。"

尽管遭到大多数人反对，戈尔德还是决定继续推进这一计划。虽然所在部门的经费有限，他还是拨出一小笔预算用作启动资金，成立了一支研发团队。

在团队正式运作前，戈尔德专程到军事情报局听取专家对火箭弹威胁的预判。情报分析员告诉他，哈马斯提高火箭弹制造技术，以至于能对以色列国土构成战略性威胁还需要几年时间。因此，他们说，没必要急于研发新的系统。

戈尔德反问道："这是什么逻辑？即使需要几年时间，哈马斯终究会

具备这一能力，而我们研发系统也需要时间，所以现在就应该启动研发计划。”戈尔德听说过“鹦鹉螺”激光项目，也知道该武器的研发已经耗费了很多钱。但他的判断是，这个武器现在根本无法使用，未来也很可能失败。

所以，2004年8月，戈尔德向以色列国防企业征求信息，让它们提出关于研发火箭弹拦截系统的想法。几周后，他的研发团队收到24个方案，其中包括和“箭”式反导系统相似的动能拦截导弹、对“鹦鹉螺”激光反导系统的各种改进和高射速火炮。但军队高层对这些方案持严重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不可能击落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特别是那些发射几秒钟后就落在斯德洛特的火箭弹。

但戈尔德的团队对所有方案进行了详细评估。

其中一个系统是基于“密集阵”的近程防御武器系统，这是美国通用动力公司设计的帮助海军舰船防御反舰导弹的高射速火炮。美国人当时试图将该武器系统用于陆军，帮助其部署在伊拉克的前沿作战基地防御火箭弹和火炮袭击。但该武器用于以色列存在一个问题：火炮每分钟朝来袭火箭弹发射4000枚炮弹，而火箭弹从加沙发射而来，这意味着这些拦截炮弹都将落到加沙。以色列因为几枚迫击炮弹和火箭弹就向加沙地带发射这么多炮弹，这在道义上实在说不过去。

另一个是“鹦鹉螺”激光反导系统的改进版，该系统被称为“天空卫士”。经过评估，戈尔德团队认为这个方案也不合适，主要有三个原因：激光无法在多云天气下使用；系统体积太大，难以快速移动；无法有效拦截弹幕。此外，这个系统要想用于实战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戈尔德团队专程到美国、法国和德国参观了一些已经列装的武器系统，但都和他们想要的相距甚远。对于这个武器系统，戈尔德列出一些明确的原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成本必须低。几个月后，2005年年中，戈尔德和他的团队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想要的武器系统。以研制空对空导弹闻名的政府企业拉斐尔公司提出了一个依托新型火箭弹拦截导弹的拦截系统方案。

这个被称为“铁穹”防御系统的方案极具创新性，该系统主要由三部

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拦截器，也就是拦截敌方来袭火箭弹的导弹；第二部分是一个功能强大的雷达，能够探测到敌方领土火箭弹的发射；第三部分是一个基于先进算法的战场管理系统，能够在火箭弹发射后几秒钟内计算出火箭弹的轨迹和落点。这样一来，以色列国防军既能向特定目标区域的民众发出警报，又可以减少拦截弹的使用，不去拦截那些将落在空旷地区的火箭弹。只有落在人口稠密地区的火箭弹才会成为拦截目标。

此外，由于从火箭弹发射到拦截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该系统必须能够自动运行，不需要人为干预。最后，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拦截弹的造价必须足够低，戈尔德说："如果一颗拦截弹的造价要100万美元，就算拦截率很高，军队也不会采购。"他还指出："如果造价很高，敌人可以通过发射大量火箭弹让我们破产。"

为了推进这项计划，戈尔德做了一些比一般以色列"虎刺怕"精神还要夸张的事情：他打破了规则的限制。2005年，他批准拉斐尔公司启动该系统的研发工作，还命令拉斐尔公司一旦研发完毕就直接开始生产，置各项规章制度于不顾。在以色列，只有国防军总参谋长或国防部部长才有权这样做。他还制定了该系统最终交付的时间表，并对自己的团队说："我们要尽快将这项能力投入实战。"

这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新武器系统的研发必须经过以下流程：以色列国防军制定新武器的标准，接着戈尔德这样的研发人员构建概念，然后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进行招标，最后，国防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方案。但戈尔德没有按照国防军的规则行事。他的这些行为并非无人知晓。2009年，以色列国家审计长发布了一份批评"铁穹"项目的报告，在其中严厉指责了戈尔德违反军事规定的行为。审计长在文中总结道，戈尔德"早在该项目得到相关机构批准之前就赋予自己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和内阁成员所特有的权力"。但这已经不重要，因为当这份报告发布时，"铁穹"防御系统已经获得成功。

2005年，戈尔德在和拉斐尔公司董事长伊兰·比然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中，承认了自己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他说："政府根本没有资助这个计划。我自己有五六百万美元的研究预算，如果你能暂时补足资金缺口，

我可以把这些钱全部投到这个项目上。”

比然说愿意尝试一下。为了让他放心，戈尔德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找到全面开发和生产所需的预算。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戈尔德还做了一件很不符合军队风格的事情：他联系了一位在美国的以色列风险投资家，让他准备好5000万美元投资款。戈尔德在几年前和这位商人共同投资过一家国防初创公司，当时戈尔德代表的是以色列空军。他对这位投资家说：“我没法告诉你我为什么需要这笔钱，但把钱准备好，我随时可能打电话来要。”

比然要求戈尔德给他几天时间咨询一下公司的工程师和导弹专家。在他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他要高级导弹研发人员给他一个简单的答复：这到底是否可行？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约西·德鲁克尔身上。这位经验丰富的导弹研发人员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在拉斐尔公司工作，是该公司导弹部的主管。德鲁克尔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7个不同的导弹项目，他们就是拉斐尔公司的导弹研发核心团队。

拉斐尔公司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研发出第一代空对空导弹（AAM），但直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空对空导弹才取得战绩。在这场战争中，“蜻蜓”空对空导弹击落了近100架敌机。5年后，拉斐尔公司在技术上取得新进展，推出了“怪蛇”3空对空导弹。

“蜻蜓”空对空导弹只能从敌机正后方击中目标，列装“怪蛇”3空对空导弹以后，以色列空军可以从不同角度和方位击落敌机。在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中，“怪蛇”3空对空导弹击落了将近40架敌机。这款导弹不断被改进，2006年以色列空军使用的主要是“怪蛇”5空对空导弹，这种导弹能在发射后锁定目标，飞行员闭着眼都能击落敌机。

一天，德鲁克尔向团队解释道：“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可以用导弹干掉一架飞机，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导弹拦截其他导弹。”

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瞄准飞机时，导弹锁定的目标很大，但如果要击落一枚直径170毫米的火箭弹，拦截弹锁定的目标非

常小，哪怕在距离几英尺处的地方爆炸都无法引爆敌方火箭弹，必须靠得更近才行。战争期间向天空发射导弹之所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还有另一个原因。空军必须确保天空安全才能让飞机起飞或着陆，但现在，空军需要担心在天空中朝不同方向飞行的拦截弹，以色列的领空将变得非常拥挤。但德鲁克尔说：“这是有点麻烦，但我们可以解决。”比然授权德鲁克尔组建一支工程师和科学家团队，开始研发工作。

由于经费很少，拉斐尔公司和戈尔德的团队必须降低成本，用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所需材料和部件。比如，在研发过程中，他们碰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给发射器上的导弹发射筒装弹，每个发射筒要装8枚导弹。戈尔德团队的一名成员，有一天在上班路上看到一辆垃圾车利用叉式起重机抬起街边巨大的垃圾箱后，他立刻联系生产厂商，几周后，一台类似的叉式起重机被交付到拉斐尔公司总部。

研发工作在不断推进，但由于缺少政府支持，最后期限不断往后推延。这一情况在2006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006年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员非法入境以色列，袭击了一支以色列国防军边境巡逻队，两名预备役人员被绑架。为了切断渗透者的撤退路线，正在附近的一辆“梅卡瓦”坦克冲过边境，但压上一枚重型炸弹，这辆象征着以色列国防工业骄傲的机器被瞬间炸成碎片。

人员被绑架，坦克上4名战士牺牲，这两条消息震惊全国。埃胡德·奥尔默特总理决定采取报复行动，时隔25年后以色列再次进入战争状态。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最终为以色列北部边界赢得了10年的平静，但也让以色列真正见识到火箭弹威胁有多么可怕。在短短34天内，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惊人的4300枚火箭弹，平均每天超过120枚。以色列公众遭受巨大的创伤，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以色列北部几乎成为无人区。

战争结束几天后，国防部部长阿米尔·佩雷茨在他位于特拉维夫的办公室举行了一次会议，重新讨论火箭弹防御方案。战争对佩雷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的政治生涯岌岌可危。佩雷茨曾在以色列总工会工作，是一名立场鲜明的社会改革家，也是以色列工党这一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的领袖。几个月前的大选结束后，佩雷茨请求担任财政部部

长，但奥尔默特担心这会导致国家经济发生剧烈动荡。虽然奥尔默特的顾问们反对他任命佩雷茨为国防部部长，但奥尔默特坚持了这个决定，并对他们说，作为总理，他可以监督和指导佩雷茨的工作。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在被以色列空军轰炸前拍摄的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之前的国防部部长大多是以色列国防军将领，但佩雷茨除了义务兵役外几乎没有任何国防工作的经历，军队内外对他的能力都表示质疑。尽管如此，他对火箭弹还是有些了解，他之前长期生活在斯德洛特，还担任过该市市长。在过去的6年中，他的家人一直生活在对火箭弹袭击的恐惧之中，成为国防部部长后，他终于有机会改变这一切。

佩雷茨在那次会议上说："'铁穹'防御系统是目前最重要的项目，尽管开支很高，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加快项目进程。"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战争前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下一任总参谋长的副总参谋长摩西·卡普林斯基少将认为这样做操之过急，这位在国防军打拼多年的将军说道："现在许多人刚在防空洞躲了一个月的时间，人们当然容易做出支持研发该系统的决定，但这一决定很可能带来消极的后果。"佩雷茨则毫不在乎这些警告，在会议快结束时，他命令戈尔德加快火箭弹防御系统的研发工作。

几周后，奥尔默特也第一次参加了关于“铁穹”防御系统的情况简介会议，但接下来的讨论让戈尔德很失望，几乎所有的国防军高层将领都反对该项目。迫于压力，奥尔默特拒绝将其他项目上的政府资金转移到该项目上。

战争对拉斐尔公司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司的导弹工厂就位于以色列北部，许多工程师和工人都住在附近城市。在战争期间，他们有的人逃到南部，有的人则在防空洞中躲了整整34天。虽然没有政府资助，“铁穹”防御系统却突然成为拉斐尔公司的重点攻坚项目。

作为导弹部负责人，德鲁克尔知道乌兹是项目经理的最佳人选，但他刚出发前往智利，准备进行一场徒步旅行，为了这个假期他计划了好几个月。一两天后，德鲁克尔通过电话联系上乌兹，对他说：“回家吧，我们需要你。”得知具体任务后，乌兹要求给他几天时间考虑，他得说服妻子提前结束他们的梦想假期。妻子同意了这个要求。一周之内，乌兹回到拉斐尔公司。

乌兹没花几天时间就熟悉了情况，并非常支持有关这个项目的想法。他很快对手下的人说：“在这个项目里没有‘不可能’一词。”与此同时，戈尔德继续在国防军的反对者当中周旋。2006年11月，他再次违反规定，单方面和拉斐尔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全面生产。戈尔德跳过了许多关键程序，因为国防军还没有完成内部报告，以确定操作该系统的军事单位和该单位的具体职能。

2007年初，佩雷茨来到拉斐尔公司导弹工厂和工程师们见面，并参观了装配线。他准备将自己作为国防部部长的全部影响力都押在“铁穹”防御系统上。考虑到已在该项目上拨款数百万美元，他想亲眼看看这里的情况。

拉斐尔公司导弹工厂坐落在以色列北部风景如画的加利利山区，在电子围栏和武装保安的守护下，这里是以色列安防级别最高的设施之一。军队一些最为敏感的导弹和炸弹都是在此研发与生产的。在行政主楼的大厅展示着多年来拉斐尔公司研发的各种导弹，证明着公司显赫的

科技研发能力。

访问导弹工厂时，佩雷茨的民众支持率正处于历史最低点。许多从黎巴嫩回来的预备役人员对政府处理战争的方式极为不满，他们在耶路撒冷搭起帐篷进行抗议，呼吁国防部部长辞职，要求国家对战争中暴露的问题展开正式调查。

雪上加霜的是，几周前，佩雷茨来到戈兰高地视察一场军事演习。第二天，媒体到处刊登他视察时的一张照片。在照片中，他拿着望远镜观看演习情况，但望远镜的镜头盖居然都没有打开。这很快成为一个国际笑柄。

不同于很多其他高科技公司，拉斐尔的特别之处在于，在这里绝不会按照年龄论资排辈。走在工厂的厂房中，佩雷茨看到许多70多岁的老工程师同刚刚从以色列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一起工作。年长的工程师用铅笔在黄色工作簿上做着记录，年轻的工程师则在电脑前敲个不停。

工作人员带佩雷茨参观了不同型号的导弹，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接着德鲁克尔带佩雷茨来到装配线进行参观。

佩雷茨说："我希望你们能分成三个班次不间断工作。"

但德鲁克尔的回答让国防部部长非常惊讶，他说："不用，我们只有一班，每班工作时间是24小时。"

佩雷茨还不知道，公司在周六也正常工作，这一天是犹太教的安息日。为了让装配线不间断运行，公司从拉比那儿获得了特殊的允许。以色列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生产"铁穹"防御系统就是为了拯救人的生命。

戈尔德、佩雷茨和拉斐尔公司都在全力推进"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但在国防界仍可以听到很多批评的声音。一名曾在拉斐尔公司高层工作过的人仍在为"天空卫士"积极游说，这是之前"鹦鹉螺"激光系统的改进版。这其中的斗争非常激烈。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批评"铁穹"防御系统的文章，声称该系统无法应对弹幕，就算可以，国家经济也会被拖垮，因为一颗拦截弹的价格在5万—10万美元之间。

2007年6月，之前担任过总理和国防军总参谋长的埃胡德·巴拉克取代佩雷茨成为国防部部长。上任几周后，巴拉克要求戈尔德及其研发团队再次评估“天空卫士”系统，讨论是否可以研发出和“铁穹”同样效果的激光系统。戈尔德虽然反对这样做，但不得不配合。拉斐尔公司高层很紧张，他们担心最终的评估结果会支持“天空卫士”系统，这样他们之前付出的工作和经费就全都白费了。但戈尔德告诉他们：“别担心。我们的系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虽然戈尔德和拉斐尔公司都坚持研发“铁穹”防御系统，但政府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就算该系统研发成功，以色列哪来资金购买足够的导弹发射单元和拦截弹来保卫国土安全？

大家一致认为，答案在6000英里外的华盛顿。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向美国人提出申请资助的要求。以色列国防部在一次会议后决定向美国提出技术合作初始申请。这份申请书最终被放到玛丽·贝思·隆恩桌上，她是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手下负责国际合作的助理国防部部长。

为了对这一申请进行评估，五角大楼派出一个专家团队来到以色列与“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者进行会晤，但回美国时，他们对“铁穹”防御系统并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美国团队认为，以色列低估了“铁穹”防御系统的成本，一旦陷入长期冲突，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可以让国家经济陷入崩溃。美国工程师还认为以色列对拦截率的判断也很离谱，“铁穹”防御系统拦截火箭弹的实际成功率最多只有15%。

团队成员对隆恩说：“这个方案不可行。”

几周后，以色列国防部代表团来到五角大楼会见隆恩及其团队。代表团为首的是国防部政治军事局局长阿摩司·吉拉德，他曾经是一名国防军情报官。

隆恩开门见山，尖锐地问道：“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我这儿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刚刚达成了一个计划，你们已得到有史以来最多的军事援助。”隆恩指的是几个月前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新的谅解备忘录，这项备忘录规定未来10年以色列每年能得到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的确是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国外军事援助计划。

新的援助计划是以色列和美国多年谈判的结果，黎巴嫩战争对计划的达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以色列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多，乔治·W.布什政府明白，要想让以色列为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而冒险，必须使这个国家有足够的安全感。

隆恩认为，以色列如果执意研发“铁穹”防御系统，应该从每年的30亿美元中获得经费。但问题是，国防部早就安排好了美国军事援助的用途，主要用于购买战斗机和补充在战争中消耗的导弹。对于这个理由，隆恩很不满意，她敦促吉拉德及其代表团重新考虑他们的申请，“在让我们做出艰难的预算决定前，我至少要看到你们已经做出艰难的预算决定”。她说道：“不要在我看不到任何你们已经做过同样的努力的迹象之前，就跑来让我在我的组织内找钱。”

此外，以色列还面临着政府程序上的障碍。在美国国防部，隆恩所在的部门只能资助已经通过实践检验的武器计划，而不是仍处在研发过程中的系统。这意味着“铁穹”防御系统还需要通过五角大楼另一个部门的评估。对以色列而言，这意味着需要更长的时间。隆恩本可以公然拒绝这个方案，但她没有，而是决定再给以色列一次机会，虽然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她委任国防部中东政策负责人罗宾·兰德准将成立一个近程火箭弹防御工作组，同以色列国防部一起消除双方的分歧。在以色列北部的拉斐尔公司导弹中心，工程师们将“铁穹”发射器装上一辆卡车，长途运输到公司位于南部埃以边界附近的导弹靶场。他们准备进行一次“试射”，测试被称为“塔米尔”的拦截弹，确保其能正常发射。在此之前，所有的测试都只是电脑上的模拟，这一次才是实弹测试。

实弹测试即将开始，操作员开始倒计时：“5，4，3，2，1。”此时，包括拉斐尔公司研发团队、国防军军官和国防部官员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指挥间中央的两块屏幕：一块屏幕上显示的是发射器的现场彩色画面；另一块上显示的是模糊的红外图像，通过这个图像，研发人员能够在拦截弹穿越云层时继续对其进行追踪。

然而，当操作员按下发射按钮后，什么也没发生。他用更大的力气又按了一次，发射器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德鲁克尔和他的团队最担心的就是出现这样的新闻：他们的研发系

统以失败告终。由于媒体一直密切关注着“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进度，这样的新闻极可能让这个项目在一枚导弹都没有发射的情况下就被终止。

德鲁克尔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将发射器装上卡车，拖回到拉斐尔公司。几天后，工程师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原来由于一根电线意外脱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正常运行。两周后，他们重新回到靶场进行测试时，操作员按下发射按钮后，“塔米尔”拦截弹顺利射向天空。

虽然测试成功，但“铁穹”防御系统仍然前途未卜。2009年，就在一次现场拦截测试的前一天，工程师们发现了该系统在软件上的一个错误。

有的团队成员对戈尔德说：“我们应该推迟测试时间。到时候所有的军队高层都会到现场，如果失败，我们会非常难堪。”思考了几分钟后，戈尔德决定按原计划进行测试，他对手下的人说：“就算没有成功拦截，我们也能通过测试来总结经验。”

第二天早上，团队又驾车来到测试靶场。快到上午11点时，模拟的“喀秋莎”火箭弹被发射出来，每个人都盯着“铁穹”防御系统操作员前的屏幕，果然，雷达立刻侦测到火箭弹的发射，几秒钟后，“塔米尔”拦截弹成功发射。大家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直到听见一声让整栋建筑都颤动的巨响。“铁穹”防御系统第一次成功击落“喀秋莎”火箭弹，在场的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的人高兴得又蹦又跳，房子都快让他们给震塌了。

以兰德为首的美国团队饶有兴趣地关注着这些进展。接下来的多次测试证明，该系统的拦截率远远高于美国之前的估算。“铁穹”防御系统至少可以击落80%的来袭火箭弹。然而，美国国防部还是不愿意资助该项目，以色列人需要继续等待。

2008年7月，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美国年轻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来到以色列。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也是他成为总统竞选人后第一次到访。他在以色列只停留了两天，在这次旋风之旅期间，他还访问了科威特、约旦、德国和法国。相对于他的竞争对手、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

恩，奥巴马在外交政策上几乎没什么经验。这次出访的目的就是弥补他在这方面的不足。

奥巴马在以色列的行程包括必去的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和西墙，此外，他还来到深受哈马斯火箭弹之苦的南部城市斯德洛特。在当地警察局，他参观了一个被称为“火箭弹停尸房”的大院子，里面堆满了落在这座城市的火箭弹残骸。之所以安排这个参观点是因为奥巴马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准备强调终止伊朗核计划的必要性。

随后，一名记者问奥巴马能否接受一座美国城市像斯德洛特一样不断受到火箭弹袭击。

奥巴马回答说：“我认为没有任何国家会接受自己民众被火箭弹袭击的现实。如果有人朝我两个女儿正在安睡的家中发射火箭弹，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阻止这一行为。我希望以色列人也这样做。”

斯德洛特之行让这位未来的总统感慨良多。此后，奥巴马对他的助理说，如果能赢得大选，他的政府将设法帮助以色列提高防御加沙地带火箭弹袭击的能力。

但美国大选还有几个月，以色列向美国申请资助的文件仍然摆在五角大楼，已经落满了灰尘。现任总统还有几个月就要离任，没人指望他会在这时启动新的资助计划。以色列明白，即便在大选之后也不能立即向奥巴马政府提这件事，新一届政府的工作全面展开还需要一段时间。

2009年4月，事态出现转折，乔治城大学外交政策专家科林·卡尔教授被任命为负责中东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助理，他的任务就是负责监督美国对这一动乱地区的军事政策的执行，寻找促进地区稳定的方法。由于和平进程已陷入僵局，奥巴马决心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因此不断向内塔尼亚胡总理施压，要求他冻结定居点的修建。要想达到这一目的，美国需要更多的筹码。

在此期间，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埃胡德·巴拉克来到华盛顿，向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列有以色列基本安全需求的文件。只有满足这些需求，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出约旦河西岸，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以色列最担心的

是，一旦从约旦河西岸撤离，以色列中部也会受到火箭弹袭击，这正是几年前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后果。这时卡尔才在桌上看到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的资助申请文件，后来他回忆说，他经历了一个“灯泡时刻”，想出了个好主意。

卡尔带着这个想法找到当时负责中东北非事务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丹·夏皮罗（后来被任命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卡尔对夏皮罗说：“‘铁穹’防御系统看上去很有希望，如果成功，我认为它能促使以色列承受更大的风险，同意两国方案。”(1)

卡尔和夏皮罗一致同意派一个新的导弹防御专家团队前往以色列评估该系统。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举动，因为当时美国还在试图让以色列人购买基于“密集阵”的近程防御武器系统，虽然戈尔德及其团队早就抛弃了使用这种高射速火炮的方案。但没想到，卡尔派出的新团队回来后对“铁穹”防御系统评价非常高。

2009年6月，卡尔第一次正式访问以色列。国防军用直升机搭载他参观了以黎边界，在这里向他汇报了2006年黎巴嫩战争以来真主党的情况及其军事实力的发展近况。接着他乘飞机来到南部加沙边界，听取了关于哈马斯日益强大的火箭弹发射能力的情况汇报。

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以色列战略纵深如此狭小，不管在北部还是南部，许多城镇时刻都处在敌方威胁下。回到华盛顿后，卡尔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白宫立即授权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铁穹”项目。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以色列需要安全上的保证，这正是“铁穹”防御系统可以提供的。有了“铁穹”防御系统，总统可以重启和平谈判，以色列也可以多一层安全保障。

2011年3月，以色列国防军在贝尔谢巴部署了第一个“铁穹”防御系统导弹连，标志着该系统正式投入使用。“铁穹”很快就被运用到实战当中。4月7日，“铁穹”防御系统击落了第一枚火箭弹，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它又拦截了8枚火箭弹。

事实证明，“铁穹”防御系统不但拯救了以色列人的生命，还改变了

战争的形式。在以色列国防军最近的加沙军事行动中，“铁穹”防御系统的拦截成功率大约为90%。所以，在2012年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根本没有派出地面部队。在2014年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地面部队只针对地道发动了小规模作战行动。由于“铁穹”防御系统能够击落大部分飞向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外交机动性”，在做出反应前能够进行更为充分的思考。在危机时刻，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能力。

类似“铁穹”这种规模的系统一般需要7年时间才能完成设计和生产，但该系统实际只用了3年时间。以色列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研发出“铁穹”这样具有革命性的武器系统？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像戈尔德这样的以色列军官和商人不像其他西方国家的军官和商人那样害怕风险。以色列教育部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曾同我们分享过一段他作为高科技行业创业者的经历。贝内特曾在国防军两支精锐部队担任过军官，一支是总参谋部侦察部队（希伯来语缩写的音译为“萨耶雷特-马特卡尔”），一支是“朱鹭”侦察部队。这两支部队都擅长深入敌后发动秘密行动。21岁时，贝内特就带领100名士兵在黎巴嫩执行秘密行动。

离开部队几年后，他创立了一家高科技初创公司。有一次，贝内特和合伙人一起站在纽约一家银行的门口，准备为自己的公司做第一次商业宣传。他们研发了一款新的反诈骗软件，几年后这款产品以1.45亿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另一家公司。贝内特回忆说：“当时每个人都很紧张。于是我对合伙人说：‘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大不了就是被拒绝，对不对？没人会死，也没人会踩到炸弹。’”实际上，贝内特的处事方法与戈尔德对待“铁穹”项目的做法非常相似。他能看到事情的最终回报，所以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

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戈尔德会违反军事规定：他为什么不走一条安全性更高的路径？当我们在特拉维夫见面时，戈尔德告诉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以色列根本没有等待的资本。他说：“我们当时都知道，加沙有数千枚火箭弹，黎巴嫩有数万枚。我们应该做什么？静观其变？”

以色列研发的导弹防御系统同样改变了现代战争的形态，使以色列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在战争中使用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

对以色列而言，“铁穹”防御系统和“箭”式反导系统的意义不仅在于拯救生命，更在于为国家领导人在决定是否对火箭弹和导弹袭击发动报复行动时争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凭借这些武器系统，以色列国防军能有效保护军事基地的安全，确保作战的连贯性，即便飞机跑道成为火箭弹的攻击目标，以色列飞机也可以正常起飞和着陆。

以色列目前正在研发第三套系统，这套被称为“大卫投石索”的反导系统，主要用于拦截对“铁穹”防御系统而言太大、对“箭”式反导系统来说太小的目标。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在投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建立起由多个不同防御系统组成的多层次防御体系。

虽然以色列已经研发和部署了这些系统，但以色列人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铁穹”防御系统刚刚部署时，一些国防部官员预言，如果奏效，哈马斯将放弃火箭弹袭击。该组织将意识到这已经没有效果，于是停止在火箭弹武器库上的投入。

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实。以色列的敌人们还在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囤积火箭弹和导弹。根据最近的以色列情报评估，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库已非常惊人。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主要依靠叙利亚和伊朗的援助，该组织成功将火箭弹数量从1.5万枚提升到10万枚，还拥有大约1万枚能够发射到以色列任意地点的导弹。

以色列面临的威胁不仅来自导弹和火箭弹的数量，还来自其不断改进的质量。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将真主党武器库过去10年发生的六大变化称为“火力6”。

现在，真主党越来越多的导弹射程更远，携带弹头更大，精度更高，发射地点也不局限于边界，还可以从内陆的防御工事和地下发射井进行发射。

比如，叙利亚生产的M600导弹有200英里的射程，可携带500千克炸药的弹头，并配备先进制导系统。这种导弹让真主党拥有空前的精确

制导能力。据以色列判断，真主党在散布于黎巴嫩南部和中部的地下发射井与仓库中存有数百枚M600导弹。

正是这些不断出现并扩大的威胁迫使以色列不断创新。为了生存下去，以色列人不得不思考对策。以色列导弹防御机构前负责人阿里耶·赫尔佐格解释道：“我们要么创新，要么消失。”赫尔佐格1941年出生于波兰，当时正是纳粹入侵波兰的第二年。父亲被纳粹分子杀害后，赫尔佐格的母亲将自己化装成基督徒农民，带着儿子逃到匈牙利，躲过了战争的劫难。

每次美国导弹防御局的官员访问以色列，作为以方的接待者，赫尔佐格都会在谈正事前带他们参观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他说：“只有看到我们民族承受过的苦难，你才能明白，我们必须确保这样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这不是虚拟的威胁，而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

(1) 两国方案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并存的解决方案。——译者注

第六章　情报系统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经过多年的追踪，以色列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构辛贝特终于锁定了加沙地带一名行踪诡异的头号通缉犯：穆罕默德·戴夫。对于情报官员来说，这可是职业生涯难得的成就。在特拉维夫郊区，辛贝特总部的特别指挥中心灯火通明，官员们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旁，他们前方有一个巨大的等离子屏幕，来自线人、无人机和卫星的情报不断被送到这个房间。

在空军指挥部，人们对戴夫疑似藏匿点的建筑结构进行了分析，专家们正在仔细考虑轰炸该建筑应使用的炸弹类型。为了减小附带毁伤，炸弹当量不能太大；但为了完成任务，击毙这名多次死里逃生的通缉犯，炸弹的当量又不能太小。时间非常紧迫，因为戴夫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但是，情报必须反复验证。在经过一段看似无比漫长的时间后，行动终于被批准，两架战斗机起飞后向目标所在的加沙城谢赫拉德万地区一座小型公寓楼飞去。当时是2014年8月19日，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护刃”行动已进入第五周。

戴夫可不是一般的通缉犯。他是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之一，20年来他总能神奇地逃避追捕。这不是以色列第一次试图暗杀他。上一次是在2006年，在那次袭击中，戴夫受了重伤，但活了下来。他总能鬼使神差般地逃掉。

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伤亡人数不断攀升，全国各地仍在遭受火箭弹袭击。在这时清除戴夫可提升以色列低落的士气。获得关于戴夫精确位置的情报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除了身边几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保镖之外，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哪儿，而以色列竟然能够确定他的具体位置，这是情报战线取得的重要成果。

炸弹在公寓楼爆炸后不久，戴夫被暗杀的消息很快传开。被确认死亡的是戴夫的一个妻子和她8个月大的儿子。现场还发现另一具尸体，但无法确定是否为戴夫。不管怎样，哈马斯武装卡桑旅因此受到重创，因为戴夫是该部队最高指挥官和精神领袖，也是几十年来巴勒斯坦反抗

以色列的杰出代表。如果戴夫死亡，他将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

以为自己的上级已经丧命，之前一直躲藏在暗处的两位哈马斯重要人物露面，准备参加一次特别会议。他们分别是哈马斯南部地区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沙马拉和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拉伊德·阿塔尔。他们在这时“现身”，究竟是听到戴夫被暗杀的消息后在惊恐之下做出的鲁莽决定，还是为了赶在对方之前接替指挥官的位置，直到今天人们也不得而知。

暗杀戴夫行动两天后，以色列就得到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消息。辛贝特在加沙地带南部小城拉法发现了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的行踪，这座城市靠近埃及边境，是哈马斯一个重要据点。以色列人开始同时间赛跑，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在这一地区，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导致这两名哈马斯指挥官逃跑，使以色列错过再次重挫哈马斯权力高层的机会。

以色列无人机开始在该区域上空盘旋，试图掌握地面的情况。所有的信息都被汇集到辛贝特的指挥中心。以色列最终确认两名哈马斯高层人士所在的建筑后，不到1分钟时间，导弹就发射出去了。后来，清理完废墟后，巴勒斯坦承认这两人遇害。这样一来，以色列又消灭了两名重要的激进分子，哈马斯再次受到致命一击。

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都出生于1974年，年龄上只相差几个月。他们两人都来自拉法难民营，这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在当时，即便是以色列国防军战士都不敢轻易进入该地区。他们两人从小就被作为激进组织成员培养，每天在当地清真寺接受反以教育。17岁时，他们进入哈马斯武装部队，成为哈马斯敏感设施的守卫人员。很快，他们得到上级的信任，接受了激进组织的武装训练。20世纪90年代，他们参加了多次枪击行动，建立起自己的名声。在1994年的一次行动中，他们枪杀了国防军纳哈尔旅的盖伊·奥瓦迪亚上尉。后来，在基苏费姆检查站（以色列进入加沙的主要通道）附近的一次袭击中，他们又杀害了一名17岁的以色列空军飞行员。

当辛贝特查明他们参与过这些袭击事件后，他们就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遵循巴勒斯坦逃犯的“逃亡准则”，定期更换住所和身份，避免联系亲人朋友。他们只有经过伪装才会上街，很少向哈马斯其

他成员寻求帮助。他们只相信自己。

1995年，他们因涉嫌谋杀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军官而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逮捕，这两人的激进分子的职业生涯似乎走到了尽头。这时亚西尔·阿拉法特已经回到加沙，他的安全部队也开始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不久后，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被释放，这是巴勒斯坦“旋转门”的典型表现，激进分子经常被搜捕、囚禁，最终又被释放。出狱后，阿布·沙马拉进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但几个月后，由于想念儿时的伙伴，他居然脱下了军装，重新回到哈马斯。为了表明他对哈马斯的忠诚，他再次谋杀了一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军官。不久后，他们两人再次被安全部队逮捕，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两人再次被释放，同其他危险囚犯一起加入武装反抗以色列的运动中。

得知他们被释放的消息后，辛贝特重新对他们进行追捕。10年后，阿布·沙马拉成为哈马斯南部地区指挥官，负责指挥之前由他的好友拉伊德·阿塔尔指挥的拉法旅。辛贝特多次发现两人的藏匿点，但每次他们都得以逃脱。

多年来，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策划与执行了数十次针对以色列的武装袭击，行动中多次利用地道穿过边界入境以色列。2002年，阿塔尔帮助策划了对雷姆沙洛姆过境口岸附近一个以色列军事哨所的袭击，造成4名国防军战士阵亡。2004年，阿塔尔的手下将一条地道挖到另一个国防军哨所的下方，在地道里装满爆炸物，然后将哨所炸毁，造成6名士兵死亡。2006年夏天，哈马斯成员利用隧道潜入以色列，劫持了国防军士兵吉拉德·沙利特，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都参与了这次行动。沙利特在哈马斯被囚禁了5年，最终于2011年被释放，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

除了挖地道，阿塔尔还成立了一支被称为“努克巴”（阿拉伯语中“被选中者”之意）的哈马斯精锐部队。通过训练，该部队成员能够徒步或开摩托车在地道中进行快速机动作战。2014年夏天，“护刃”行动开始后不久，在阿塔尔的亲自指挥下，13名哈马斯成员通过一条地道进入以色列。后来，阿塔尔所指挥的旅的一支下属部队参与了对拉法的袭击，在

这次行动中哈马斯带走了一具以色列国防军军官的遗体。

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被定点清除后，哈马斯似乎再次出现权力真空。但混乱局势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月后，当“护刃”行动结束后，以色列国防军透露穆罕默德·戴夫并没有死。显然，当晚投掷的炸弹有很多没有爆炸，戴夫虽然受伤，但再次活了下来。对他的追杀还将继续。

在建国将近70年后，以色列成为第一个精通定点清除“艺术”的国家，并将这种手段有机融入常规军事条令和军事作战行动中。以色列在战场上成功利用这种战术的历史有20年之久，这一成功离不开以色列先进的科技、高质量的情报和优秀的人才。

根据2010年的联合国报告，定点清除是一种有预谋的致命武力行为，各国使用这种方式清除不在控制范围内的特定个人。具体使用武力的方式很多，包括无人机袭击、巡航导弹攻击和特种部队突袭等。[1]

定点清除并非以色列首创。在圣经时代、罗马统治以色列地[(1)]时期、奥斯曼帝国时期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早期，这种手段都被广泛运用。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等犹太地下武装组织也对敌人使用过定点清除战术。

建国后，以色列继续执行定点清除和暗杀。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暗杀了两名埃及情报军官，因为他们曾帮助“费达因”[(2)]分子对以色列城镇和定居点发动了一系列袭击。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向帮助埃及研发导弹的几位德国科学家寄出邮件炸弹。1972年，11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被谋杀后，经果尔达·梅厄总理授权，所有参与谋杀的嫌疑人都成为以色列的目标。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报复行动是以色列最后一次出于复仇而谋杀他人。后来政策发生了改变，以色列定点清除的目标仅局限于未来可能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人。

一位辛贝特前任局长在分析新政策时说：“这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在别人约你吃晚饭前，先约他吃个午饭。”[2]

1988年，对以色列发动过多次袭击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阿布·杰哈德

在突尼斯被以色列一个精锐暗杀小组谋杀。1992年，以色列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黎巴嫩南部向真主党领导人阿巴斯·穆萨维发射了一枚“海尔法”导弹，导致穆萨维当场死亡。在这两个案例中，两个被定点清除的目标都是激进组织高层领导人，他们对多次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负责，并在策划更多的袭击。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奥斯陆协议》，之后定点清除的频率大幅降低，双方都在尝试实现和平。当然，在这期间，杀戮行为也没有完全停止。1995年，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法特希·沙贾奇在马耳他街头被枪杀；一年后，绰号为“工程师”的哈马斯炸弹制造专家叶海亚·阿亚什在使用手机时，安装在手机中的爆炸物在他头部附近引爆，导致他当场死亡。除了这些成功的案例，以色列也有一些行动以失败告终，其中比较有名的一次发生在1997年。当时，几名摩萨德特工尝试将致命毒药喷射到哈马斯领导人的耳朵里，结果在约旦被逮捕。

这些行动几乎都被认为是以色列发动的，虽然以色列很少宣称对这些行动负责。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暗杀少数激进分子来威慑更多人，让他们明白，不管躲到哪里，以色列都可以找到他们。

2000年底，这一政策再次发生改变。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在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下，暴力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色列的对手不再是普通民众，而是武装精良的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其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的频率和效率可以同工厂的流水线媲美。

在一次行动中，身着便装的国防军战士朝塔齐姆军事组织[3]的一名资深激进分子射击，导致他在位于杰宁的家门口当场死亡。几周后，另一名激进分子在手机被引爆后死亡。巴勒斯坦各个激进组织的领导人明白，以色列很可能又回到了慕尼黑惨案后的暗杀政策时期。这一判断在2000年11月得以证实，当月，以色列第一次公开承认其在伯利恒附近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一架以色列阿帕奇直升机向一辆汽车发射了一枚激光制导导弹，塔齐姆高级领导人侯赛因·阿巴亚特被杀。几个月后，阿拉法特手下的第十七突击部队军官马苏德·伊亚德在另一次直升机袭击中被杀，以色列声称他正筹划在加沙地带建立真主党武装的秘密基地。

武装直升机的使用（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标志着以色列将冲突强

度升级。每当利用飞机执行暗杀，以色列都会宣布负责。



一名来自以色列国防军精锐侦察部队的战士正在约旦河西岸执行任务（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随着辛贝特和以色列国防军暗杀人数的上升，以色列境内自杀式袭击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之前的第一次因提法达中，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死亡人数比为25：1，但现在，死亡人数比达到3：1。[3]

截至2001年年中，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公交车、熙熙攘攘的咖啡店和人潮拥挤的舞厅实施了几十次自杀式袭击，因提法达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许多人都要求以色列领导人采取更加强势的行动。不管怎样，要想阻止恐怖袭击潮的蔓延，他们必须做些什么。

以色列无法逮捕每一名激进分子，特别是那些活动在加沙地带腹地的激进分子。所以，国防军指挥官决定精简定点清除的目标，专门暗杀激进组织的领导头目，从而摧毁敌方指挥链。时间很紧迫，以色列很快起草了司法准则，批准了大体上的战术标准。民众的支持也加快了这一措施推进的速度，根据2001年7月一份报刊的民意调查结果，90%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一战术。

国防军总参谋长随身携带存有数百名通缉人员的信息簿。有时，名单上的人数超过1000人。所有的定点清除目标都来自这个名单，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塔齐姆等不同激进组织都在名单中被以不同的颜色进行了标记。一旦一个目标被清除，他的名字上就会被打上叉。

但2002年7月，民众对这一战术的支持率开始下降。哈马斯军事组织负责人萨拉赫·谢哈德在以色列通缉人员名单中排在第一位，他是哈马斯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也是该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武装行动方案的制定者。他直接策划和实施了多次造成以色列重大人员伤亡的武装袭击，但由于他身处加沙，并不断更换住所，以色列根本无法实施逮捕。

空袭行动被批准，7月22日，一架F-16战斗机向谢哈德在加沙城的住地投掷了一枚1吨重的炸弹，除了谢哈德和他的助手，还有13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国际社会立即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色列的一个非政府人权组织甚至向国家最高法院提出请愿。迫于压力，政府不得不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这次空袭的合法性。

虽然最高法院在2006年最终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判定定点清除合法，但国防军明白，他们再也不能为了消灭躲在平民中的激进分子而投掷1吨重的炸弹或发射“海尔法”导弹。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附带毁伤，国防军不得不研发精度更高的武器，制定更严格而明确的战术程序。

这一时期以色列研制出了一种炸药当量仅为200克的弹头，这种导弹可以炸毁高楼中的一套公寓房，或行驶在拥挤道路上的一辆汽车或摩托车，却不会对旁边的人造成致命伤害。

情报搜集方法也得到调整，同时以色列加强了对实施定点清除前决策过程的控制。无人机的使用频率则大幅上升，在无人机没有事先对目标进行侦察的情况下，以色列很少会发动定点清除行动。

武器和情报还远远不够。许多激进分子藏在医院、清真寺甚至私人住宅等民用设施中，这让国防军感到非常棘手。定点清除行动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权衡袭击造成的整体结果和单个激进分子死亡的利弊。换句话说，如果被通缉的激进分子躲在医院里，那么消灭他带来的价值同对整个建筑物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失显然不成正比。如果他躲在家里，身边只有一两个平民，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很可能会做出袭击的决

策。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2009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为适应战场的变化，制定了一个被称为“敲屋顶”的新战术。当时“铸铅”行动已经开展几天，这是三年半之前以色列从加沙单边撤离后针对哈马斯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前一年辛苦搜集而来的情报显示，加沙地带大量房屋被用作武器储藏点。但国防军明白，虽然这些房屋已成为合法军事目标，但不能直接轰炸。于是，在行动前，国防军和辛贝特会搜集相关的电话号码，然后通过电话向居民发出警告，让他们在轰炸前撤离。这个办法在前54次都被证明非常有效，但第55次使用时却失败了。

那天，在接完电话后，居民爬到房屋的屋顶，并站在那儿向国防军的无人机挥手。在国防军总部，人们就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空袭行动被迫取消。

第二天，国防军给另一户人家打电话，没想到，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当天在作战室的一名国防军军官回忆说：“当时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失去了战术上的主动权。”

这让国防军陷入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不轰炸这些房子，藏在地下室的火箭弹第二天就可能落在以色列。但由于房屋内有妇女和儿童，以色列无法进行轰炸。

这时，来自南部战区司令部的几名军官想到一个新办法：先打电话，等居民爬到房顶后，命令附近的武装直升机向房顶的角落发射小型导弹。他们考虑使用弹头很小、弹片散布面有限的导弹，只要把控得好就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在最早使用这一新战术的一个案例中，国防军先按照常规程序，给一栋三层楼建筑中所有住户打电话。根据以色列情报，该建筑地下有一个大规模哈马斯武器储藏点。电话这头的国防军军官用阿拉伯语敦促居民在这栋楼被轰炸前立即离开，这些居民并没有被吓到，他们爬到屋顶，朝着天上他们看不见的无人机挥手。很明显，他们并不打算离开。

这时一架武装直升机接到命令，朝建筑旁的空地发射机枪弹。站在

楼顶的部分居民明白了国防军的意思，匆忙离开了那栋建筑。但意识到自己的房子可能会被摧毁，很多年轻人坚定地留在屋顶。

这时，飞行员得到命令使用导弹攻击屋顶的一个角落。当导弹击中建筑后，留在屋顶的人明白自己的存在并不能阻止以色列摧毁这栋建筑，于是也选择了逃跑。最后，空军可以从容地轰炸这栋无人建筑。记录轰炸过程的视频显示，建筑的倒塌导致藏在地下的武器库发生一系列二次爆炸。这一次，以色列彻底“敲破”了巴勒斯坦人的屋顶。

使用新战术后，以色列国防军发现平民伤亡人数不断下降。2002年，平民和战斗人员的死亡比例为1：1，也就是说，国防军每消灭1名战斗人员，就会有1名平民丧生。截至2009年初，这一比例下降到1：30。

这一比例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国防军独特的战术，另一方面，空袭中使用的大量精确武器和智能炸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铸铅”行动中，国防军在加沙地带发射了超过5000枚导弹，其中81%为智能炸弹，这一比例在现代战争中是史无前例的。相比之下，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初期，多国部队所使用导弹中只有68%为智能炸弹；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这一比例只有35%。[4]

随着平民伤亡的减少，以色列政府对国防军作战能力的信心得以提升。由于国防军在成功清除激进分子目标的同时将平民伤亡降到最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施压也小多了。

发生在美国的“9·11”袭击事件是定点清除战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事件后，美国发现自己的敌人根本不是常规军队，而是穿着平民衣服、藏在妇女儿童当中的武装分子。为此，美国派出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到南部战区司令部学习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追捕激进分子的经验。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以色列国防军运用的战术，还包括国防军将线人、辛贝特特工、高科技侦察手段、军事情报分析员和空军等因素进行充分整合的能力。

随后，布什政府也决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定点清除战术。2009年后，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扩大了这种战术的适用范围，针对许多恐

怖组织和国家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2016年，美军透露他们在空袭伊拉克“伊斯兰国”目标时也使用了“敲屋顶”战术。

起源于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战术成为反恐战争的全球标准。

但为什么是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如何能制定打击恐怖主义的世界标准？

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在特拉维夫两座普通大楼里的工作人员身上找到答案。这两座大楼位于城市的不同方向，一座是辛贝特总部，这里聚集着以色列最优秀的一线特工，另一座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总部，许多原始情报都汇聚到这里由年轻的国防军战士和军官进行分析。在这两栋大楼里，以色列的创新战术、高科技武器与情报特工和分析员构成的人才库被有机整合在一起。

在声望上，拉卡兹课程之于辛贝特就像以色列空军飞行学院之于国防军一样重要。每年，数千名25—30岁的以色列公民都为加入这个课程展开激烈的竞争，但入选者很少，能完成培训的就更少了。

参加该课程的人员首先需要在被称为“乌尔潘”[(4)]的辛贝特语言学校上课。在建国初期，大多数拉卡兹学员都出生在阿拉伯语国家，他们在一次次移民潮中来到以色列。而最近20年，许多报考者都不会阿拉伯语，但经过为期42周的强化训练后，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能同巴勒斯坦商人、政客和农民自由交流，还能在网上用阿拉伯语通信。他们不仅精通语言，还能熟背《古兰经》，熟知希伯伦地区巴勒斯坦人的习俗和文化，了解他们和杰宁、加沙等地巴勒斯坦人的区别。

从乌尔潘毕业后，拉卡兹学员将被送到辛贝特情报学校进行为期10个月的培训。在这期间，培训者将放弃之前的身份，成为以色列反恐无形战线上的一员。与此同时，培训者还会得到一个化名，不管是在雇佣线人时，还是在特定地理范围的责任区内从事其他活动，他们都使用化名。

经过培训，拉卡兹学员会尊重敌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文化。

当握手时，对方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当他和线人通过电话交谈时，他会记住对方提供的信息，还会注意线人的情绪和语调，甚至线人身边的声音。拉卡兹学员对线人的情况掌握得非常全面，包括他们的儿子数学考试是否及格、他们配偶的生日是哪天以及当地社区这周的新鲜事。

一名优秀的拉卡兹学员要不断深化自己对责任区在人口结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了解。他要不断熟悉不同部族、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掌握当地富人所居住街道的地形，甚至得知道昨天谁结婚了，谁在父亲病逝后能得到一大笔遗产。

经过训练的拉卡兹学员对一切保持怀疑。当他看到一名妇女披着头巾走在街上，他必须仔细排查，确保她不是一名以色列追捕多年的恐怖分子；当希伯伦舒哈达街的商店罢工停业，他必须思考，这里是否有人准备发动恐怖袭击；当纳布卢斯附近的巴拉塔难民营有几个居民突然购买大量罐装食品，他必须想到，他们是不是藏匿了通缉犯或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每一名辛贝特特工都坚持这样的原则：“并非每件事都像你表面看到的那样。”

拉卡兹学员必须不断保持思考状态。他们通过个人关系和相互信任获得情报，这种工作方式已成为他们的传统。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他应该和线人建立非常亲近的关系，还是应该保持一定距离，从而维持自己的威信？拉卡兹学员可以让线人冒生命危险去获取情报吗？如果激进分子小组的负责人对一名线人起了疑心，命令他射杀一名国防军士兵以表忠诚，该怎么办？

辛贝特前任局长雅科夫·佩里以前就是约旦河西岸的一名拉卡兹学员。他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说服的艺术”，因为他要说服巴勒斯坦人背叛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同以色列合作。他解释说，辛贝特最得力的线人并不是通过提供金钱、医疗和出国等利益获得的，也不是通过威胁，而是通过拉卡兹学员的个人魅力。

拉卡兹学员的工作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以前，激进分子小组的结构非常明晰，每个小组的负责人都有一个助手，手下还有一批固定的成员。现在，激进分子小组可由海外总部进行指挥，成员虽然都来自约旦河西岸，但互不相识。2015年，辛贝特就在约旦河西岸发现了指挥部门

设在加沙、卡塔尔甚至土耳其的激进分子小组。

在这类激进分子小组中，虽然成员相互不认识，但每一名成员都构成暴力袭击的重要一环。比如，第一名成员负责购车，将车停在第二名成员租好的房屋旁，第三名成员在汽车内安装炸弹，第四名成员将车开到目标附近，最后，第五名成员通过电话引爆汽车炸弹。

2014年夏天以色列打击加沙地带哈马斯的“护刃”行动中，拉卡兹学员和国防军纳哈尔旅的战士们一同进入加沙北部的贝特哈农。拉卡兹学员对当地的了解让纳哈尔旅的步兵军官非常惊讶：他们熟知街道和部分居民的名字，甚至知道哈马斯激进分子家中厨房暗门后藏着什么。战士们进入加沙前就知道了这一切。

为了获取这些信息，除了线人提供，对加沙地形的研究也很重要。以色列空军在训练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模拟器，飞行员可以在执行任务前通过模拟器操作虚拟飞机演练轰炸操作，模拟器中的地形和未来目标附近的一模一样。

以前，来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威胁主要是枪击、石块、燃烧瓶，有时威胁也来自组装管状炸弹和路边炸弹的炸药实验室。但近几年，辛贝特的拉卡兹学员还需要关注地道、导弹的研发和生产、伊朗导弹的走私以及哈马斯对无人机的使用。拉卡兹学员这会儿可能同一名巴勒斯坦商人在聊税收和加沙烦琐的进出口手续，几分钟后又会和一名挖地道的人聊天，了解最近走私到加沙的一款新型火箭弹的尺寸和型号。

这项工作是头脑的竞争，必须不断尝试领先敌人一步。

在特拉维夫另一边也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建筑，这里是军事情报局总部。以色列搜集到的所有情报都被汇集到位于总部的情报研究处。该处的工作就是将从间谍、卫星、无人机、媒体等信息源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筛选和分析，并对未来形势进行预判。伊朗会违反2015年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被称为P5＋1）签订的协定吗？马哈茂德·阿巴斯会无条件答应同以色列重启和平谈判吗？约旦阿卜杜拉国王的政权究竟是否稳定？

对于这些问题，情报研究处需为以色列军队和政治领导人提供最合理的预判。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牵涉许多不断变化的因素。

2014年8月中旬，许多情报分析员聚到一起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时，“护刃”行动已开展40多天，以色列迫切希望缩短行动时间，尽早结束战斗。但最终，这场行动又持续了一周时间，成为1948年以来耗时最长的一场战争。情报军官在进入会场前将手机放在场外一个棕色的特殊盒子里。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正在对以色列进行窃听，即使关机，手机仍然可能通过远程控制被用作窃听设备。

战士们将这个办公室简称为“沙特兹”，只有拥有最高安全权限的官员才能进入。房间的入口是一扇厚钢板做成的门，通过旁边的电子键盘控制。闭路摄像头对这里保持全程监控。房间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面真主党旗帜，上面写着对不久前一位退役军官的祝福语，这面旗帜时刻提醒着人们敌人的存在。房间里另一扇通过密码键盘控制的门通往一个小型作战室，室内有很多电视屏幕、电脑和能直接接通相关国防军和辛贝特办公室的加密电话。在这里，不间断值班的战士们紧盯着屏幕，分析各种画面，为无人机操作员提供寻找目标的线索。这些工作看似徒劳，一旦成功，收获巨大。

“沙特兹”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一个精锐单位。每次在加沙开展行动前，该小组的成员都会负责拟定暗杀名单，寻找那些以色列试图消灭的目标。为了做到这一点，“沙特兹”小组需要掌握关于目标的所有信息，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住所、经常去的地方，有时还包括他们的幽会之处。这些信息需要不断更新，以便在袭击命令下达后他们能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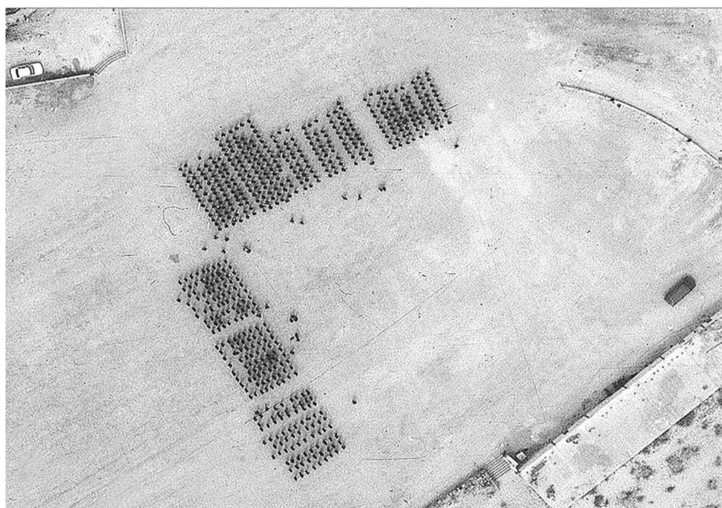
让我们回到2014年8月的会议。在会上，情报军官们提出了几个重创哈马斯从而使其放弃火箭弹袭击的方案。他们很快达成一个共识：必须清除哈马斯高级别激进分子。国防军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的位置，但问题是，他们大多隐藏在医院、清真寺等地，或故意让很多平民生活在他们的住家周围。考虑到附带毁伤，特别是对平民造成的伤亡，大多数袭击行动都无法顺利开展。

但这次会议明确地提出一个新的方针：全天候搜集高价值目标的信

息，增加可行的袭击目标。与此同时，安全内阁随时可能授权这些分析员消灭某个哈马斯高级别激进分子，他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几天时间已经过去，“沙特兹”办公室中，人们一如既往地忙碌着。星期五，连续11个周末都在值班的S中尉（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规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公布情报军官的全名）难得有机会休息一会。但没想到，几小时后，他的“山玫瑰”手机（Mountain Rose，军队配发的一款由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加密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里，他的指挥官说：“行动被批准了，我们现在去找古勒。”

原来，安全内阁刚刚批准了对哈马斯的资金募集者穆罕默德·古勒进行定点清除。古勒之前将数百万美元调拨到该组织的武装部队，并资助了多条通往以色列的地道的修建。但相对于他手头一沓沓的美元和谢克尔，他头脑里的信息更有价值。他知道银行账号，熟悉开罗和安曼可靠的货币兑换人，也知道在埃及边界通过哪些走私地道能将钱运到加沙。



以色列2008年公布的一张显示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训练营的照片（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沙特兹”的电脑屏幕显示着无人机从古勒家上空发回的画面。他一直和妻子以及3个孩子躲在家里，但根据最新情报，他妻子准备带孩子回一趟娘家，古勒将有一段独处的时间，这正是以色列苦苦等待的时机。不久后，一辆汽车停在他家门前，古勒的妻儿上了车。但不到1分钟，古勒也走出了房子，来到车上，驾车离开。无人机确认了车上没有

其他人。

从家里出来时，远处以色列空军轰炸该地区的爆炸声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沙特兹”军官已经对他可能经过的道路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了一些理想的袭击地点，最终选择了一个既能杀死古勒又不会伤及他人的地点。在这一过程中，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军总参谋长还打来电话，询问行动进展。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名正在值班的空军高级军官，只有他能下达最终袭击命令。

无人机跟踪了古勒一段时间，他将车开到另一户人家，从车上拖出一大袋东西，可能是交给一组哈马斯人员的现金。虽然已经得到授权，但这位空军指挥官还在等待时机，他希望不造成任何平民的伤亡。当导弹最终发射后，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强烈的爆炸炸碎了古勒的那辆银色小轿车，他当场死亡。许多美钞被炸到半空中，然后飘落在街道上。

S中尉刚服兵役时在空军管理新兵，后来被提拔为排长。由于人格魅力和领导能力都很出众，很快被空军高层看中，当时高层正在发掘一批聪明的创新型军官从事空军情报工作。具体而言，这项工作包括研究袭击选项、创建目标库、思考追捕通缉人员的创新方法。

经过3年的训练（其中包括极为苛刻的安全和人格测试），S被任命为一个情报单位中追踪加沙地带高级别激进分子的负责人。他掌握了情报工作的窍门，知道如何拼凑各种零散的信息，准确地预测那些同以色列斗智斗勇的目标人物未来的行为。几个月后，他又负责指挥两个研究小组。才20多岁的S和同事们一起，已经开发出一种用于军事情报工作的特殊研究工具。

许多年轻的国防军战士像S一样在关键岗位工作，他们认为相对于世界其他情报部门，年轻人担当重任的做法是以色列的一大特色。

他说：“我们迫切希望改变现状。我们经常谈论如何进行创新，提出颠覆规则的方式和想法。这绝对是一个优势。”

在以色列，像S这样的年轻情报分析员能够直接同军队和政界高层

见面。他们在工作中逐渐成长，不断随机应变，处理突发情况。对S和他的同事而言，战场从来就是近在咫尺的。

他说："我的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因为我在保护自己的家人、朋友和祖国。我每天都能看到自己工作的结果，就算当天看不到，也可以在下一场战争中看到。"

许多国防军情报分析员都要做出事关生死的决定，S只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每天都要追踪激进分子，观察看上去再寻常不过但疑似藏匿有哈马斯或真主党火箭弹和其他武器的公寓楼。如果他掌握的一个目标在移动，监视系统的操作人员会马上通知他。如果他监视的一栋建筑开始装修，他会立马将其标记下来。总之，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一切都要用怀疑的眼光审视。

S和他的同事每天都会收到目标人物的日常行动情报，他们能猜到，目标出门是去见情妇还是探望母亲，是去超市还是自助洗衣房。一旦这些分析员发现情况异常，他们有权发出预警，让军队高层召开紧急会议。这些年轻人承担的责任是其他西方军队无法想象的，但在以色列，这样的军官有数百名。

据报道，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战术多年来被运用在国家各条战线和相关"利益地区"。由于目标每天都在变化，以色列在这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东正处于历史性动荡当中，传统边界也在变化，这一点在叙利亚表现得尤为明显。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前，以色列情报机构监控的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支等级明晰的军队。但到2016年，叙利亚的局势变得非常复杂，这里有真主党武装分子、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基地组织小组和数千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一座叙利亚城市可能被巴沙尔·阿萨德控制，但几英里之外另一座城市却被"伊斯兰国"控制。

国际社会并不支持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以色列经常因为发起定点清除行动而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以及违反国际法。国际社会的持续施压迫使以色列加强对行动开展和目标确定的法律监督。

由于周边和整个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与常规军队的控制力在不断下降，以色列虽然仍需袭击对手的关键基地，但实现这一点变得极为复杂。哈马斯、真主党或“伊斯兰国”等组织没有明晰的权力来源，它们通常没有领土，更不要说明确的基地。但另一方面，它们始终拥有领导者，其关键指挥官或武装人员的死亡能给这些组织带来致命打击，迫使其终止军事行动。而这正是“沙特兹”的使命所在。

(1) 以色列地的英文为the land of Israel，主要指古代以色列王国所在地，区别于现代以色列。——译者注

(2) fedayeen，阿拉伯语中“自我牺牲者”或“敢死队”之意。一般指20世纪50年代攻击以色列的阿拉伯敢死队员。——译者注

(3) 法塔赫下属军事组织。——译者注

(4) 由于建国以来以色列需要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以色列有许多希伯来语速成学校，这些学校统称为“乌尔潘”。——译者注

第七章　网络病毒

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南200英里左右的纳坦兹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这里以凉爽的气候、优质的水果、陶砖建筑和附近一些苏菲教团圣地而闻名。

2002年8月14日，这座小城竟然登上了世界各大报刊的头版。原来，一个名为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NCRI）的伊朗反政府组织，在华盛顿特区的威拉德酒店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该组织揭露了伊朗在纳坦兹附近的地下修建有一处戒备森严的铀浓缩设施。

这立刻成为一个爆炸性新闻。全世界都知道伊朗在布什尔建有核反应堆，这项工程最早由德国人启动，后来又得到俄罗斯人的支持，但德黑兰一直声称核计划属于和平性质。多年来虽然一直存在关于秘密场所的传言，但从未被证实。在伊朗广阔的沙漠地区要找到这些核设施谈何容易。

当天在华盛顿，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不但揭露了纳坦兹的核秘密，还公布了阿拉克附近正在建设中的一个重水反应堆。要不了几年时间，阿拉克反应堆就可以生产武器级钚。

但相对而言，人们更关注纳坦兹，因为那里的设施不是一般的设施。该设施戒备森严，并修建在地下。每一个地下室都有70英尺深，为了阻止空对地导弹穿透，地下室上面不但有很厚的混凝土层，还有钢板层，一般空袭对它根本不起作用。显然，伊朗人吸取了1981年伊拉克核反应堆被以色列空袭炸毁的教训。

许多分析人士马上怀疑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公布的信息实际上是摩萨德提供的。但不管信息源自哪里，后果都一样。伊朗秘密修建核设施被抓了个现行，全世界再也无法忽视发生在伊朗的事情，毫无疑问，阿亚图拉正在制造核武器。

以色列借此大肆宣传伊朗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对伊朗施加压力，这一措施很快产生效果，联合国核监管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被允许检

查纳坦兹。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确认，纳坦兹设施中安装有先进的离心机，这些离心机是根据来自巴基斯坦的图纸的参数建造的。

出于对伊朗核计划和伊朗追求地区霸权的担心，海湾国家不遗余力地让这个问题出现在国际会议议程当中。以色列也一样，反复声称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包括军事选项。伊朗革命卫队并不认为这些威胁属于虚张声势，他们加强了在核设施附近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的部署。

纳坦兹核设施的目的非常明确。该设施有两个地下室，每个地下室的面积约10万平方英尺，能够容纳数万台离心机。这种大型钢铁机器专门用来提纯浓缩铀。如果伊朗想拥有核武器，首先要在这时进行浓缩铀的提纯。

然而，2009年，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许多离心机莫名其妙地停止工作。一天，地下室一边的一排离心机坏了，第二天，另一边又坏了几排。看上去这些故障之间并没有联系，控制离心机级联的电脑显示，一切工作正常，伊朗人百思不得其解。

不久后的2010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已经暂停了纳坦兹核设施的作业。几天后，意识到这个消息已经泄露，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轻描淡写地承认伊朗的敌人对很多核设施的电脑造成了有限的破坏。他还说，问题的根源已经发现并得到控制。

他在撒谎。在纳坦兹将近9000台离心机当中，有1000台因故障报废。也就是说，某个敌人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就干掉了伊朗超过10%的离心机。

问题是，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这一切起源于“奥运会”。此“奥运会”并非体育比赛，而是一个密级很高的网络武器研发计划，是以色列和美国在2006年启动的一次秘密行动。主要目的是阻止伊朗核计划。[1]

不管对以色列还是美国，这都是一个全新的想法，谁也不知道能否

成功。但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网络武器不会留下任何指纹，让敌方无迹可寻。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或美国不需要派战斗机对伊朗核设施进行轰炸，但其毁灭性并不亚于导弹袭击。

这次美以合作是在两国防务关系空前紧密的背景下展开的。当时的以色列还没有完全从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美国则在试图缓解以色列对伊朗的担忧。如果网络武器联合研发项目能延缓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在白宫看来就是值得的。

这次行动的目标选取为纳坦兹，说得更具体些，是那里控制着一排排离心机的西门子工业计算机系统。

这种后来被称为“震网”的蠕虫病毒针对的是控制离心机马达转速的设备，离心机只有通过马达的高速运转才能实现浓缩铀的提纯。“震网”病毒修改控制电机的变频器的频率，首先将电机加速到1400赫兹，接着又降到2赫兹，让电机慢得快要停下来，然后又升高到1000多赫兹。

总之，“震网”病毒不断加快和减慢伊朗离心机电机的转速，直到电机烧坏。

一开始，伊朗人不相信纳坦兹的问题是由电脑病毒引起的，因为核设施的电脑并没有连接国际互联网。后来他们发现，唯一的可能就是一名隐蔽特工利用移动存储介质将病毒拷贝到核设施的一台电脑上。

为了确保行动成功，将蠕虫病毒复制到纳坦兹的计算机系统还不够，攻击者还需知道伊朗计算机系统的具体布局，甚至要精确到每一条传输数据的线路。这样一来，蠕虫病毒才能确定感染路径，从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换句话说，以色列和美国必须获得计算机网络系统布局图。

接下来，他们还要弄清谁的电脑能被感染，从而将其当作进入纳坦兹网络的跳板。在这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完全依赖以色列，他们相信，以色列的线人已经打入到伊朗核设施内部。[2]

这种方法并非以色列和美国的首创。2008年，一名美国士兵在中东

地区美军基地附近发现了几个U盘，有人已经在U盘中植入了计算机蠕虫病毒，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本能地捡起U盘，插入电脑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该士兵也不例外。策划这次行动的外国情报机构就等着美军士兵上钩，最终他的行为给美军带来巨大的损失。该蠕虫病毒入侵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计算机系统，美国花了14个月时间才将其彻底清除。[3]

据报道，“震网”病毒由以色列和美国的团队共同开发。在以色列，这项工作由8200部队（其在国防军的职能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局）主导，摩萨德辅助。[4]在美国，该项目主要由国家安全局负责。8200部队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这个项目上合作了很多年。

“震网”病毒在伊朗爆发后，德国信息技术专家拉尔夫·兰纳是最早分析病毒代码的独立专家。当看到病毒的15000行代码时，他目瞪口呆。根据他的分析，该“蠕虫”病毒使伊朗核计划推迟了两年的时间。[5]

他说：“从军事角度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兰纳和其他专家发现这种病毒已经在伊朗电脑中潜藏了好几年，并成功扩散到10多个国家，大概有10万台电脑发现被感染，其中8万台在伊朗。

艾哈迈迪-内贾德提到的“破坏”活动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震网”病毒不仅是一种电脑病毒，还是一种引发新规则、改变现代战争形式的武器。

电脑专家很快断定以色列是这种蠕虫病毒的制造者，因为以色列阻止伊朗核计划的动机最强，其在伊朗核问题上发声也最强烈。此外，人们还在代码中发现了其他线索：代码中有一个日期和“番石榴”一词，前者显然指的是一位伊朗犹太慈善家被刺杀的日期，后者可能暗指以斯帖(1)，她是古代波斯王国的犹太裔王后，犹太传统节日普林节正是为纪念她的英雄事迹。[6]

对于是否参与了这次网络作战行动，以色列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我们还有一条线索。2011年，一位国防军总参谋长退役时，根据传统，军队为他举行了一场告别会，总理、总统、国防部部长和军队高

层等国家领导人都来到现场。告别会上播放了一部展现这位国防军指挥官军旅生涯的短片，其中提到他亲自参加过的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以及他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指挥过的许多次作战行动。在视频最后出现了代表他指挥过的行动的另一幅画面，“震网”两字在屏幕上快速闪过。

表面上看，以色列和伊朗的敌对关系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两个国家没有共同边界，是中东地区仅有的两个非阿拉伯国家。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两国很快就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然而，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一切。在那之前，有传言说以色列考虑卖给伊朗先进的弹道导弹，但在那之后，它们从好友变为宿敌。

一开始，双方的冲突主要是由于伊朗对反以激进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以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但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色列情报机构确定伊朗正在全力研制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成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矛盾焦点。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伊朗就在美国的支持下启动了核计划。伊斯兰革命结束后，毛拉们一度暂停了这项工作，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核计划的另一个潜在作用：核武器能让伊朗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2002年，以色列加强了对伊朗核计划的遏制。那一年，阿里埃勒·沙龙总理任命国防军退役将军梅厄·达甘为摩萨德局长，摩萨德是以色列一个神秘的间谍机构。

在国防军服役的几十年中，达甘声名远扬。他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也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战术大师。他以勇敢著称，曾从敌人手里夺过一枚手榴弹，并因此获得英勇勋章。

1970年，时任南方司令部司令的沙龙任命达甘指挥一支被称为“萨耶雷特·里蒙”[2]的部队，这支部队的战士常常化装成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发动突袭，抓捕巴解组织的激进分子。

达甘担任摩萨德局长期间的工作基调可以从他办公室的装饰中看出

来。他的房间很简朴，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一位留着长胡子的犹太老人，他身披塔利特（犹太祈祷披巾）跪在地上，面前站着两名纳粹战士，一人手里拿着棍子，另一人拿着枪。

达甘经常会对客人说："看这张照片。跪在纳粹分子面前的人就是我的爷爷，这就是他被杀害前的场景。我每天都会注视这张照片，我绝不会让大屠杀再次发生。"

据说，在达甘的领导下，摩萨德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伊朗科学家的人数开始减少。有的人投向西方怀抱，还有的人则在德黑兰街头被蒙面枪手刺杀。

2007年1月，伊朗资深科学家阿尔达希尔·侯赛因普尔被发现死在伊斯法罕转换站的办公室里，很多人认为他是被"毒气"杀死的。2010年1月，伊朗另一名关键的核科学家马苏德·阿里·穆罕默迪被杀，一辆装有炸药的摩托车在他位于德黑兰的家门口被引爆。同年11月，一颗炸弹在德黑兰市中心爆炸，另一名高级核科学家马吉德·沙哈里阿里被炸死。

为了阻止伊朗核计划，暗杀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关于破坏行动的报道也从未停止过。2007年，纳坦兹用于调节电压的电力组件神秘地发生了爆炸，几十台离心机被摧毁。此外，以色列间谍机构还同世界各地的公司达成合作，当伊朗为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购买设备时，这些公司会故意卖给伊朗有问题的硬件。

虽然摩萨德延缓了伊朗的核进程，但阿亚图拉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福利项目、医疗系统和大学挪用大量资金，给科学家配备保镖，并禁止其出国。各地的安保也变得极为严格。

2005年前后，以色列情报部门得出结论，伊朗已经掌握了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所有技术，一旦做出决定，很快就能具备这一能力。如果以色列不能很快想出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军事打击将成为唯一选项。但军事打击很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许多人认为这将给两国带来悲剧性后果。

"震网"病毒事件并不是世界上第一次网络攻击，但其产生的效果让

世人感到非常恐惧。在此之前，针对国际互联网网站的攻击所产生的损害比较有限。比如，2007年，针对爱沙尼亚的一次网络攻击导致银行、政府各部门和当地媒体的网站短时间崩溃。“震网”病毒则不一样，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铁路系统停止运行，或关闭一座城市的电网。正如时任俄罗斯驻北约大使德米特里·罗戈津所言：“震网”病毒可以引发“又一次切尔诺贝利事件”。

伊朗决定发起反击。“震网”病毒被发现后不到一年，伊朗就成立了自己的网络部队，斥资10亿美元发展起强大的网络攻防能力。

伊朗计算机专家明白，“震网”病毒只是冰山一角，接下来很可能会有技术上更先进、破坏性更强的网络病毒攻击。的确，2012年，伊朗发现全国很多电脑都感染了另一种被称为“火焰”的病毒。据说，这种由以色列和美国联合研发的病毒主要用于掌握对方计算机网络的架构，并从被感染的计算机上窃取数据。[7]

作为回应，伊朗获得了在暗网上操作的新工具。暗网是国际互联网的阴暗面，有很多敌对势力和网络罪犯都活跃于此。有人认为，伊朗还在暗网上与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党分享了知识和技术。一旦同以色列爆发战争，这个平台将让伊朗力量倍增。

同年，美国情报机构透露，伊朗的网络能力在“深度和复杂性”上大幅提高。“震网”病毒出现两年后，伊朗也加强了网络攻击活动，攻击对象包括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卡塔尔一个天然气公司和多家美国银行。[8]

为了应对伊朗日益发展的网络能力，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召见他的军事秘书举行了一次特殊会议，讨论以色列的下一步对策。虽然以色列拥有强大的网络防御系统，但考虑到伊朗网络能力的发展，内塔尼亚胡担心其会突破这些防线。军事秘书建议内塔尼亚胡咨询自己以前在空军的战友艾萨克·本-伊斯雷尔，现在他是国家安全和安全技术方面的国际知名专家，在网络战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

几天后两人安排了一次见面，从内塔尼亚胡的话中，本-伊斯雷尔体

会到时间非常紧迫。为了阻止和防御伊朗可能发动的网络攻击，以色列必须采取行动。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黑客愿意为最高出价者提供网络武器，这让以色列如坐针毡。

本-伊斯雷尔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成功者的故事。他1949年出生，父母都是以色列建国前犹太地下武装组织莱希的成员，所以，本-伊斯雷尔从小就知道安全对以色列的重要性。

高中毕业后，他以学术兵的身份加入了国防军，继续学习物理和数学，很快成为一名极具创新性的思想者，参与了多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在空军情报系统多个岗位都工作过。1972年，本-伊斯雷尔研制了一种新型战斗机轰炸系统，大大提升了“鬼怪”式战斗机的攻击力，并因此获得著名的“以色列国防奖”。一年后，在赎罪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以色列100多架战斗机被击落，他和空军高层一起出谋划策，并同其他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一起开展恢复以色列空军战斗力的工作，重新确保了空军的技术优势。

1992年冬天，本-伊斯雷尔在柏林参加了同德国军方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德国同事们谈到互联网及其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前景。本-伊斯雷尔不太明白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德国军官答应把一些相关学术论文发到他的邮箱。其实，德国军官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因为1992年底，最初由美军作为军事项目研发出来的互联网刚进入民用市场，以色列也才开始接触互联网。

回到特拉维夫后，本-伊斯雷尔阅读了大量美国作家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作品，包括《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财富的革命》等著作。托夫勒谈到在互联网控制下的世界景象，本-伊斯雷尔对此很感兴趣，他的脑海里不断思考着这对以色列国防军和未来战争意味着什么。

1995年，本-伊斯雷尔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应该成立一个从事计算机作战的单位，当时人们甚至还没有使用“赛博”（Cyber，电脑网络的意思）一词。他找到国防军总参谋长，出乎他的意料，总参谋长居然同意他的想法，并拨出一大笔预算。但空军得知这个消息后，许多军官希望能保持空军在科技上的既有优势，因此马上站出来反对说：“现在投资这

项技术为时过早。”

尽管遭到反对，但本-伊斯雷尔还是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者，他就是来自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年轻军官平哈斯·布克里斯。布克思斯曾在总参谋部侦察部队担任指挥官，立下许多战功，因参加过多次重大行动而在军界闻名，包括1976年在乌干达恩培德机场解救法航班机人质的行动，正是通过这次英勇的突击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向全世界证明了它的远距离作战能力。

布克里斯后来成为8200部队的指挥官和国防部总司长，当时作为一名年轻上校，他就决定在军事情报局下成立一个负责监督网络作战的单位。本-伊斯雷尔和布克里斯一致认为，这个单位将致力于基于计算机的攻防行动。很多人当时甚至都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但不久以后，包括利用计算机攻击敌人的各种想法都开始产生。

1998年，本-伊斯雷尔晋升为少将军衔，被任命为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局长。他的任务很多，一方面，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要持续为当下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它还需保持对未来趋势的关注，发明能够让以色列赢得未来战争的武器。很快，网络战研究就成为本-伊斯雷尔的重点工作之一。

2000年，本-伊斯雷尔致信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提醒他以色列极易受到计算机攻击。他告诉巴拉克，一旦敌军发现国防军成立了计算机部队，很可能提前发动网络攻击，让整个国家陷入停滞。这可能对以色列各个行业造成严重破坏。

当时，巴拉克正忙于和亚西尔·阿拉法特达成和平协议，以避免巴勒斯坦再次发动起义，但他非常重视本-伊斯雷尔信中提到的问题，于是下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以色列水、电、气等关键基础设施上的脆弱性进行评估。这项工作持续了一段时间，两年后，政府正式成立了一个被称为“雷埃姆”（“国家信息安全局”的希伯来语缩写）的新部门，专门负责保护国家的基础设施。

2011年，内塔尼亚胡会见本-伊斯雷尔，批准成立几个研讨以色列如何备战未来战争的工作组，而网络攻击无疑是未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本-伊斯雷尔召集了80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既有学者，也有政府高官。他们被分到不同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要就经济、高科技产业、军队以及以色列高校等方面提出一个建议清单。其中第八委员会是国防体系委员会，由布克里斯负责。不到几个月，本-伊斯雷尔就交给总理一份250页的报告和长长的建议清单。

即便在当时，人们也可以明显看到，以色列网络空间已经很拥挤，包括摩萨德、军事情报局和辛贝特在内的多个组织都在从事网络活动，但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协调，因此，以色列急需为不同部门建立一个共同的机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伊斯雷尔建议成立一个直属总理办公室的国家网络局作为监控网络活动的最高权威部门，负责不同机构的协调工作，并在出现威胁和问题时迅速提出解决方案。其他委员会则建议加强以色列高校对网络空间的研究，为私营部门提供更多政府预算，以及成立新的网络研究中心。截至2016年，以色列已经拥有5个网络研究中心，其中，特拉维夫大学的布拉瓦尼克跨学科网络研究中心就由本-伊斯雷尔担任主任。

布克里斯领导的秘密委员会建议在8200部队内部成立一个军事网络司令部。8200部队是以色列国防军编制最大的一支部队，主要负责信号情报的搜集和处理，信号情报几乎包括所有在电话和互联网上传输的信息。

8200部队与过去20年以色列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8200部队退役的老兵成立了许多非常成功的以色列科技公司，这支部队也因此成为国防军中人们最想去的单位。在这里服役后，战士们不但能够掌握先进的科技技能，还能具备强烈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该部队的官兵和以色列快速发展的网络公司合作，开发了很多内部技术。他们的工作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难，他们要监听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通话，截获重要邮件，跟踪最新事态的进展。

虽然以色列官方从不提及国家的网络能力，但毫无疑问，以色列在全球网络安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网络产品的年出口额达到60亿美元，可以和以色列国防产品相媲美。作为一个人口仅800多万的小国，以色列在全球网络市场的份额居然占到10%（仅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退役人

员就成立了数百家网络高科技公司），同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不相上下。[9]

以色列如何取得网络领域的巨大优势？本-伊斯雷尔认为，以色列之所以可以成为网络强国，可以追溯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三点决策。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本-古里安很清楚，以色列单凭人数无法战胜阿拉伯敌人。要想存活下来，这个国家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是以色列需要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提高男女公民的参军比例。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建国后国防军人数一直占到全国总人口的5%，在其他西方国家这一比例仅在0.2%—0.4%之间。

第二是在征兵时强调人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他推崇建立一支教育程度很高的军队，由聪明而富有创新精神的战士组成。建国以来许多犹太人从欧洲和北非地区移民到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带来崇尚教育和学术的犹太传统。战士们懂得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我们在特拉维夫大学与本-伊斯雷尔见面时，当谈到全世界有超过20%的诺贝尔奖得主是犹太人，其中很多是以色列人时，他对我们说：“这不是因为基因，而是因为文化。”

第三是在军队内部强调科技的重要性。以色列国防军正式成立后，不但拥有传统的海陆空部队，还设有科学部队，成为最早设立该兵种的军队。

但是，以色列人18岁就服兵役，从哪儿去招军队需要的工程师、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为此，以色列国防军成立了“阿图达”项目，这是一条为以色列年轻人设计的学术发展道路。进入该项目后，战士首先要在大学学习，然后在军队服役6年，比常规服役年限多出3年，但很多以色列年轻人都欣然接受了这个要求。

以色列军队视“阿图达”项目为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该项目毕业生被称为“神奇小子”，在军队各个技术部门服役，负责研发和操作最先进

的系统。有的毕业生会签订6年以上的服役合同，服完兵役时，他们的年龄在28—30岁之间，这时已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离开部队，有的人会选择回到大学，成为学者，但大多数人会加入以色列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

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阿图达”项目变得更为重要。当时，法国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实施的武器禁运政策仍未废止，而以色列的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系统急需进口配件。以色列意识到，尽管财政困难，但必须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

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以色列的军事工业突飞猛进，雇佣人数从之前的几千人上升到4万人。但国家发展军事工业的成本也很高。这些企业研发和生产最先进的科技与武器系统，但因为担心失去科技优势，他们又不能将这些产品卖给外国军队。因此在军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历届政府不得不承担这些企业每年的亏损。

虽然明白军售存在安全上的隐患，但最终以色列还是决定让国防企业逐渐走向国际市场。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色列每年的国防出口额都超过10亿美元。10年后，这一数字达到40亿美元。考虑到其中的风险，以色列国防企业走向世界的脚步很慢，但毫无疑问，以色列在逐渐成长为一个军事强国。

雅尼夫·哈雷尔就是毕业于“阿图达”项目的一名“神奇小子”，2015年之前他担任国防部网络局局长。哈雷尔的父母是大屠杀幸存者，他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他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的郊区长大，1992年加入“阿图达”项目，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学习电子工程专业。学业快结束时，他申请加入以色列军事情报局下属的一个机密情报单位，由于成绩优异，他成功进入该单位，并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他从不循规蹈矩，也不怕打破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官僚壁垒。在哈雷尔看来，合作就是力量，但这和情报界的文化背道而驰，许多情报指挥官都不愿分享自己掌握的敏感信息。哈雷尔曾因主持的一个保密项目而荣获“以色列国防奖”。

2007年，服役了15年的哈雷尔脱下军装，回到院校，继续攻读特拉维夫大学战略管理学的博士学位。他当时心情很复杂，毕竟，他告别了自己工作多年的军事单位，军队见证了他作为一名军官的成长历程。

拿到学位后，哈雷尔拒绝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一个高级职位，选择加入国防部，成为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网络部负责人。他当时发现，对于军队到底需要多大规模的网络部队这个问题存在激烈争论。一些人主张扩大8200部队的编制，加入几百名战士和军官，同时研发新的系统和武器。但哈雷尔不同意。他主张8200部队向民用市场开放，同那些科技上突飞猛进的公司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他对其他军官说："我们不需要更多人来重复我们已经做到的事情。我们要和地方公司建立更好的关系，开创一片新天地。"

哈雷尔的这个建议极具开创性。在此之前，以色列的网络能力是被严格保守的秘密，所有的技术都由8200等军事单位内部研发，并在内部使用。

哈雷尔明白，全球网络列车已经发车，并在全速前进，如果以色列国防军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无法扩大网络技术及其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就会被敌人反超。上任一年后，他同15家以色列初创公司达成合作项目，截至2014年，合作项目多达80个。

哈雷尔认为，以色列之所以能成为网络超级大国，是因为这个国家具有接受失败的文化。我们采访他时，他正担任易安信公司网络解决方案事业部负责人，他在公司总部办公室里对我们说："在很多文化中，个人一旦失败就被淘汰，因此，他不得不谨小慎微，担心自己的行为危及自己的职位。但大多数以色列人不怕失败，敢于冒险。"

哈雷尔指出以色列的另一个优势：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当讨论到关键问题时，人们鼓励低级军官提出异议，甚至公开反对他们的上级指挥官。在这种文化中，军官绝不会因为军队等级制度而私自隐瞒某些关键信息。

哈雷尔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着莱特兄弟站在一架飞机旁的照片。在

哈雷尔看来，这张照片代表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当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打开了一扇通往新的战争形式的大门，不知道未来将出现空军、隐形战斗机和攻击型无人机。同样，现在通往网络空间的大门也被打开，这条路将通向哪里，人们还看不清。

一场极具传奇色彩的行动充分诠释了这种新型作战方式的特点，直到今天人们也只敢小声讨论这次融合了谍战、网络战、电子战和核武器的军事行动。[10]

2007年9月6日，叙利亚官方媒体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SANA）最早报道了这一事件。该通讯社称，叙利亚防空部队前一天晚上在叙境内发现了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防空部队发射导弹后，以色列飞机被迫离开。报道还说，飞机在沙漠中投掷了炸弹，但没有击中任何目标。

这则空袭的新闻很特别，但这并不是以色列战斗机第一次袭击叙利亚。2003年，一名以色列男孩被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炸死，为了报复，4架F-16以色列战斗机轰炸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位于拉塔基亚的夏宫，当时他正在那儿度假。以色列想通过这种方式羞辱阿萨德，要他控制好他在黎巴嫩支持的恐怖组织。由于飞机的飞行高度很低，当时夏宫很多玻璃都被震碎。几个月后，19名以色列人在一次自杀式爆炸事件中死亡，为了报复，以色列空军轰炸了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叙利亚的一个训练基地。2006年，由于阿萨德在大马士革为哈马斯领导人提供庇护，以色列空军再次来到他在拉塔基亚的住所进行低空飞行。

但2007年的行动和以往行动有所不同，这一次，以色列一直保持沉默，媒体提问也得不到任何答复。几天后，美国国务院承认他们通过第三方报道听说了这一事件，但否认掌握更多情况。第一个能够证明这一事件的是土耳其《自由报》，该报刊登了在土耳其与叙利亚交界处发现的两个以色列飞机燃料箱的照片，显然，这个地点就在战斗机的飞行路线上。又过了几天才有报道称，此次袭击的目标实际上是叙利亚东北部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的核反应堆。

这则新闻让世人非常惊讶。人们都知道阿萨德支持真主党，也知道

他拥有大量化学武器，但没人知道他在非法制造核武器。消息出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始向叙利亚施压，要求叙利亚允许该机构向其核反应堆派出检查人员，但遭到阿萨德拒绝，他声称被袭地点是一个空仓库。

据报道，完成这次袭击任务的是10架以色列空军F-15战斗机。起飞几分钟后，编队机组接到进攻命令，7架飞机离开编队，加速进入叙利亚领空，几秒钟后它们首先向雷达设施投掷炸弹。又过了两分钟后，飞机到达核反应堆上空后发射了每枚重达半吨的AGM-65“小牛”空对地导弹。

飞行员返航准备飞离敌方领空时，叙利亚军队才发现遭到袭击，于是盲目地向天空齐射防空导弹，但这时飞机早已离开射程范围。

当晚飞到叙利亚的以色列飞行员在几个小时前才得知目标的真实性质。在那之前，他们一直在进行叙利亚轰炸任务的训练，但对轰炸目标一无所知。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以色列第二次成功摧毁核反应堆，只是不同于1981年轰炸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这一次飞行员即便对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也无法透露任何与任务相关的信息。

很多人不知道，以色列在轰炸叙利亚核反应堆时还创造性地运用了电子/网络攻击手段，成功骗过了叙利亚的防空系统。该方法一开始让雷达显示天空没有飞机，过一会儿又使雷达显示有数百架飞机。[11]

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技术。国际上都知道网络攻击和电子战，但从未见过这两种手段在战术上融为一体。

显然，以色列已经掌握了在美国被称为“舒特”系统的技术，该系统专门用来欺骗雷达系统，导致雷达识别出根本不存在的物体。这项技术几年前由美国国防部研制，很多人并不知道以色列已经掌握。以色列是如何掌握这项技术的？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秘密，但可以初步确定，这是以色列工程师内部研发的结果。[12]

不管何种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只关注核反应堆被摧毁的消息本身，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袭击当晚，以色列在实战中运用了网络技术，开创了战争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2000年夏天，巴沙尔·阿萨德取代他的父亲成为叙利亚总统。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这位在英国接受过教育的眼科医生将带领国家走向开放，在多个领域进行改革，甚至有可能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但没想到阿萨德早已有了自己的计划。他加强了同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联系，并同朝鲜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2004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现朝鲜和叙利亚之间的通话越来越多。在叙利亚这边，电话似乎都来自幼发拉底河畔小城代尔祖尔附近的沙漠地区。据说，美国国家安全局马上把这个消息发给业务上对口的以色列8200部队，后者随即成立了一个由分析员组成的团队，调查以色列以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开始，他们并没有怀疑叙利亚和朝鲜在核计划上存在合作。毕竟，修建核反应堆会留下一系列能被以色列发现的线索。所以，比较合理的假设是两国在合作研发弹道导弹。两个国家都拥有大量弹道导弹，他们很可能想继续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总之，阿萨德让叙利亚再次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不大，他的父亲曾考虑过这件事，但在20世纪90年代错过了向巴基斯坦科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购买核技术的机会后，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

据报道，2006年底，摩萨德派了几名特工到伦敦向英国从事海外间谍活动的军事六处（MI6）进行咨询，讨论如何瓦解叙利亚和朝鲜的同盟关系。[13]

到达伦敦后，摩萨德特工大吃一惊。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当时，一名叙利亚政府高官也在访问伦敦，下榻在肯辛顿一家高档酒店。这位叙利亚人在伦敦期间不管去哪都随身携带一个装有电脑的手提包。但有一次，他离开酒店参加一场会议，将电脑留在了房间。摩萨德特工接到命令闯入房间，入侵了这台电脑。整个行动只持续了几秒钟时间，这几名特工进入房间后在电脑里植入木马程序，然后离开。

几分钟后，木马程序将大量信息从这台电脑发回摩萨德在特拉维夫的总部。这台电脑的硬盘是一座情报宝库，里面的内容包括叙利亚核反应堆的施工计划和已修建部分的照片。在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两名50多岁的男子，一人有着亚洲面孔，穿着一身蓝色运动服，另一位是阿拉伯

人。那个亚洲人就是朝鲜著名核科学家千智富，那个阿拉伯人是叙利亚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易卜拉欣·奥斯曼。照片改变了一切。以色列关于朝鲜在叙利亚所作所为的所有假设都是错误的。[14]

接下来以色列需要查明核反应堆的具体地点，这项任务就交给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负责图像情报的9900部队，该部队的职责就是搜集和处理以色列侦察卫星搜集的所有图像资料。研究人员很快就锁定了一个疑似地点：叙利亚东北部一片树林中的几栋低层建筑。为了保持低调和隐蔽，不被侦察卫星发现，叙利亚工程师在选址上可谓处心积虑。疑似核反应堆建筑的外墙面被修建得和叙利亚乡村到处都有的拜占庭城堡一样，而且该建筑建在山沟里，只有从高处才能看到。为了不引起怀疑，建筑物周围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施，包括防空系统和高射炮。但有一些设施他们怎么也无法隐藏，那就是重水反应堆所需的水泵站及其通往1英里外幼发拉底河的水管。

据说，这些情况第一时间被汇报给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他召集了两个特别讨论会。第一个讨论会的成员包括国防部部长阿米尔·佩雷茨、摩萨德局长梅厄·达甘、国防军总参谋长加比·阿什肯纳兹中将、军事情报局局长和空军司令。第二个讨论会的成员包括西蒙·佩雷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埃胡德·巴拉克。[15]

安全讨论会提出三个不同的袭击方案：第一个方案为动用少量飞机实施隐蔽的空袭行动，这个方案能给以色列一定的推卸责任的空间；第二个方案是调动大量军事力量的空中作战，目的是公开羞辱阿萨德；第三个方案是派以色列特种部队深入叙利亚目标所在地安装炸弹，摧毁核反应堆，这个方案风险最大。[16]

奥尔默特和佩雷茨命令国防军同时准备这三个方案，但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明白，第一个方案是最优方案，因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17]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以色列情报分析员警告说，袭击必须在核反应堆被激活前进行，否则将导致活化反应堆污染幼发拉底河，这可能会对叙利亚和土耳其民众造成伤害。

虽然已经有了在伦敦搜集到的核反应堆照片和施工计划，但为了确

保情报准确无误，以色列情报机构还在尽可能获取更多信息。据报道，2007年3月，他们又抓住一次机会。这一次，叙利亚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易卜拉欣·奥斯曼来到维也纳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举行的一次会议。摩萨德特工闯入他的房间，在其电脑上安装木马程序后离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从这次行动得到的信息再次证明叙利亚正在制造核武器。[18]

奥尔默特决心阻止叙利亚的勾当，但他并不想让以色列使用武力，而是希望美国人执行这一行动。4月，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计划访问以色列，这是过去将近10年来美国国防部部长首次访以。盖茨到达以色列后，他的随行人员马上得到通知，几个小时后，佩雷茨将来酒店同盖茨进行秘密会谈。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请求，但以色列国防部官员坚持这一行程安排，并对美国人说："他要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与此同时，摩萨德局长达甘也在前往华盛顿的路上，计划同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会面。他的目的就是呈送刚刚得到的关于叙利亚核反应堆的情报。

得知这一真相，美国人非常惊讶，但这并不是奥尔默特的目的，据说，他直接请求乔治·W.布什总统命令美军袭击核反应堆。据在场美国官员的回忆，布什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方案，但最终拒绝了以色列的请求。已深陷两场中东战争的布什不愿在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开辟新战场。如果一定要发动袭击，只能靠以色列自己。

最终，对叙利亚核反应堆的轰炸行动表明以色列正在探索新的作战形式，一种结合了谍战、突击部队、侦察卫星和网络战并以空袭结束的新型战法。

未来会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网络空间的战争目前还没有任何手册可供参考。类似"震网"病毒那样的网络攻击或在外国政府人员的电脑上安装木马程序，可以像空袭和地面入侵一样被视为战争行为吗？毕竟，虽然"震网"病毒延缓了伊朗的核计划，但德黑兰并没有发动报复行动。叙利亚的核反应堆被摧毁，大马士革也同样保持了沉默。

如果被网络攻击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会怎么办？是做出回应，还

是像伊朗和叙利亚一样保持沉默？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但有一点已经很明晰：未来战争将与以往完全不同。现在，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在内的许多军队已经拥有“网军”这一兵种，他们的武器就是键盘，随便敲几个键，他们就可能让一个国家陷入瘫痪。整个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以色列在这方面的发展。

(1) 根据圣经记载，以斯帖的原名为哈大沙，即番石榴树的意思。——译者注

(2) 希伯来语中“手雷侦察队”的意思。——译者注

第八章　军火外交

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波音707客机从本-古里安机场起飞，1小时后降落在以色列南部度假城市埃拉特。当时已是深夜，对于那些在海滩木板路上散步的游客看来，这架飞机没有任何特别之处。1小时后，飞机再次起飞，这次朝东飞去。经过10小时的航程，飞机在印度加尔各答的机场停留了几小时，补充燃料后再次起飞。这架飞机正飞往中国南部一个省会城市：广州。顺利到达广州后，几名能说德语的中国领航员登上飞机，接着飞机开始第四段航程，飞往最终目的地，位于中国首都北京郊区的一个封闭军事基地。

降落在北京后，这群“老外”（中国人都这样称呼他们）终于能够离开飞机，被带到附近一个曾被用作比利时大使馆的院子。他们被告知不得离开这个院子。

这群“老外”相互间几乎不说话，他们怀疑这个院子里每个房间都装有窃听器，他们的对话会被录音。如果有重要事情需要商量，他们会来到户外，虽然北京的夜晚非常寒冷，空气污染也很严重。

中国人并不清楚这20多个“老外”的确切身份，他们只被告知，这群人是商人，同几家重要的国际军工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其中包括以色列企业。殊不知，这只是他们的掩护身份。事实上，这个代表团的组织方是以色列政府控股的国防企业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代表团成员中还包括来自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

当时是1979年2月，这是以色列国防官员第一次来到中国。

这次出访策划了很长时间。由于以色列和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次出访属于需严格保守的秘密，除了代表团成员、总理、国防部部长等人，没有任何人知情。以色列知道，一旦走漏风声，美国人会非常生气。但另一方面，在策划期间以色列得知美国即将和中国建交，如果要冒一次险的话，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这是一次双赢之行。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开始对西方开放；在伊

朗，阿亚图拉霍梅尼刚刚结束在法国的流亡生活回到国内，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以色列将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军火客户，而中国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为以色列打开中国军火市场的是犹太富商索尔·艾森伯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其他两万名大屠杀难民逃到上海。战后，他在远东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成为最早同中国、日本和韩国做生意的西方人之一。他利用个人关系让中国对以色列武器产生兴趣，还在1979年用自己的波音707客机将以色列代表团送到北京，这也成为中以关系中的“首航”。[1]

但中国人有很多顾虑。他们不想因为突然向以色列开放而影响同苏联和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维持的盟友关系。以色列和中国都得谨慎行事。

作为中间人，艾森伯格同不少其他亚洲国家达成过军火协议，所以他对以色列国防产品非常熟悉。同中国人举行了一系列初步会谈后，他带着一份包括导弹、雷达、火炮和装甲车在内的采购清单回到以色列，并敦促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国。

在以色列，前往中国的决定并非一蹴而就。梅纳赫姆·贝京总理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但他没有马上同意，而是让国防部部长埃泽尔·魏茨曼亲自审查采购清单，确定以色列公司哪些东西能卖，哪些不能。[2]

中国人被告知，代表团成员都是艾森伯格的朋友，他们在以色列有关系，能够获得中国需要的武器。而以色列人对于中方人员的身份则是一头雾水。

一名代表团成员回忆道：“他们是工程师、情报人员还是军官？他们都穿着中山装，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同我们说话的到底是谁。”

从到北京那周起，代表团成员就被要求不得同国内联系。其中一位成员的母亲在他出访期间去世，但以色列的家人无法通知他。登机返回时他才得知这一消息。

在中国期间，这些“老外”发给中国人各种武器的宣传册，并声称他

们能从以色列弄到这些武器。中国人非常感兴趣，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之后，以色列又多次派出代表团同中方秘密会晤，有的会议就在以色列空军的飞机里举行，飞机上的蓝色大卫星标志已被去除。这时，中国人已经明白他们在直接同以色列政府合作。每当双方确认了新的采购清单，就会交由贝京和魏茨曼审批。

双方的谈判体现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以色列人希望就整体框架签订一个合同，能长期适用于未来的交易，换句话说，他们想建立一个销售平台。但中国人不习惯过于复杂的合同。有一次，在谈判过程中，以色列人坚持在合同中增加一条不可抗力条款，中国人问道："什么是不可抗力条款？"当以色列人解释说，如果出现无法预测的上帝的行为，该条款可解除违约一方的责任。听到这里中方人员回答说："这样的话，那没必要，因为我们不信上帝。"

经过为期1年的漫长谈判，双方终于达成框架协议。第一批以色列坦克于1981年被运到中国。

以中双边关系继续发展，但即便在联系十分紧密时，这些交易仍然完全保密。中国人拒绝前往以色列，仅仅通过看几张武器照片（偶尔会有一段录像）就签下数亿美元的合同，连生产线都没有看到过，这种信任程度在军火交易领域实属罕见。

1985年，中以之间的关系才开始逐渐公开化，变得不那么神秘。这一年，为了学习以色列创新农业技术，中国第一次向9名以色列农业管理人员发放签证，其中一人是农业部官员。同年，以色列重新开放10年前关闭的驻香港领事馆。[3]以色列希望同北京正式建交，但这个想法直到苏联解体和1991年马德里和会后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当阿拉伯人公开和以色列人坐下来谈判时中国人才愿意建交。

1992年，以色列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两国民间贸易迅速发展，贸易额从1992年的1亿美元增长到20年后的80亿美元，中国也成为以色列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而这一切都开始于1979年那次军火交易之行。

以色列建国以来，发展对外防务关系特别是军火贸易，为这个国家赚取了许多美元，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但以色列发展防务关系的目的远不止于此。由于被阿拉伯敌国环绕，以色列不得不利用先进的科技和军事能力，同包括俄罗斯、中国、新加坡和印度在内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否则这些国家根本不会同犹太国建交。

在发展同以色列关系方面，各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有的国家非常钦佩以色列的快速发展，希望复制以色列的成功。还有的国家像以色列一样面临许多苏制武器的威胁，希望学习以色列在多年冲突和战争中积累下来的经验。

武器贸易虽然帮助以色列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但以色列也为此付出过代价，导致以色列和最重要的盟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

最典型的例子是“费尔康”事件，这大概是以色列进入国际军火市场以来最惨痛的一次经历。“费尔康”预警机是安装有空中预警、指挥和控制系统（AEWC&C）的飞机，中国计划购买多架“费尔康”预警机，总价可能达到20亿美元，成为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火订单。中国对以色列敌对国具有一定影响力，以色列希望这笔交易不但能够巩固以色列作为中国第一武器供应国的地位，还能增强以色列对北京外交思维的影响。

关于“费尔康”交易的谈判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启动，虽然当时两国还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3年，就在以色列设立驻中国大使馆的第二年，伊扎克·拉宾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以色列总理，这次出访也极大地推进了此项军售谈判的进程。当时，中国发布了一份全球招标公告，以色列、俄罗斯和英国提交了官方投标方案。

空中预警、指挥和控制系统能提供实时情报与雷达探测，是获取和保持制空权的重要条件，在现代战场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机上装载的该系统由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子公司埃尔塔公司研发和生产，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空中预警、指挥和控制系统之一，能够同时跟踪几十个目标。中国希望利用“费尔康”预警机掌握其海上边界线附近的情况，并向整个亚洲投射军事力量。

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拉宾要求国防部部长向美国国防部汇报以色列参加中国该项目招标的意向。拉宾这样做并没什么不妥，几年前，以色列和美国已达成谅解，只要不涉及美国技术，以色列可以将武器卖给中国。

以色列准备将“费尔康”系统（包括雷达系统和电子情报系统）安装在一架标准的波音飞机上，但中方强烈要求使用俄罗斯伊留申航空集团生产的运输机作为预警机。这样一来，事情变得极为复杂。以色列从未从俄罗斯购买过军事硬件，俄罗斯还是以色列敌对国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不仅如此，这次投标俄罗斯输给了以色列，因此不可能帮助以色列。

但拉宾决心完成这笔交易。1995年，他直接向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请求购买这款飞机，叶利钦的反应比较积极，但没作承诺。两年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亲自到莫斯科敲定了这笔交易。这样一来，没人知道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内塔尼亚胡对身边记者也说这架飞机是以色列需要的。[4]

内塔尼亚胡结束访问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摩西·克雷特飞到莫斯科落实技术细节，他成功把价格压到4500万美元，但接下来的任务是让俄罗斯工程师明白飞机在设计上需要做哪些调整，以便安装雷达系统，使其成为一架“费尔康”预警机。这个过程非常辛苦，因为伊留申航空集团的母公司虽然在莫斯科，但“伊留申”运输机的组装地点在乌兹别克斯坦，发动机则来自乌克兰。

同莫斯科达成协议后，以色列立即和中国签订了“费尔康”预警机交易合同，并收到预付款。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内塔尼亚胡认为整个交易要保持透明。达成交易后，他向比尔·克林顿总统汇报了这一进展。美国人当然说不上高兴，但也没有反对。然而，1999年，事情发生变化。这一年，埃胡德·巴拉克当选为总理，几个月后，经过改装的“伊留申”运输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几天后，这架拥有巨大圆顶的外形奇特的飞机的照片就登上了当地报纸的头条，同中国的军火交易已不再是秘密。

当一切被公开后，中国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决定访问以色列，了解交易进展。这是中国国防部部长的第一次访以行程，这次访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以色列万万没想到，迟浩田在特拉维夫检阅仪仗队的照片竟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全球极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A.M.罗森塔尔撰文谴责巴拉克政府允许中国国防部部长访问以色列。他还在文中说，犹太国连一把手枪都不能卖给中国，更不要提技术，这些技术很可能帮助北京击落美国飞机。[5]

由于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此事开始引起美国国会的注意，事情接下来变得越来越糟。

2000年4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威廉·科恩公开谴责这笔交易，并警告称这很可能削弱美国在亚洲的行动自由。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反对这笔军售的非约束性决议。众议院外国行动拨款委员会主席索尼·卡拉汉议员建议削减2.5亿美元的对以军事援助，这正好是中国已支付给以色列的预付款金额。[6]

美国国防部官员向以色列国防部官员质问道："如果纽约戈德堡夫人的儿子在太平洋地区服役时，其驾驶的飞机因为犹太人的空中预警、指挥和控制系统而被击落，她会说些什么？"

克雷特飞到华盛顿，尝试向K街[(1)]的顶级游说公司寻求帮助，挽救"费尔康"订单。但只有一家公司答应研究一下这个案子，其他公司全说无能为力。克雷特失望而归，他明白这笔军火交易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接下来能做的只剩下在公开场合承认这次交易失败。

2000年年中，巴拉克结束了以色列在黎巴嫩长达18年的军事存在，完成撤军，并做好了戴维营谈判的准备。在谈判中，他向亚西尔·阿拉法特提出一个全面和平协议，但遭到拒绝。要想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以色列需要美国的支持，说得更准确些，以色列需要美国的经济资助，用于以色列国防军的能力提升和以色列人从犹太定居点的撤离。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必须牺牲"费尔康"交易。



2012年，中国海军少将杨骏飞在海法港受到以色列海军准将埃利·沙维特的热情欢迎（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同“费尔康”预警机事件一样，后来的“哈比”无人机事件也让美国国防部非常愤怒，在2004年的这次事件中，美国指控以色列使用美国技术升级几年前卖给中国的无人机，这导致美以关系再次出现危机。作为回应，美国暂停了在F-35联合攻击机研发项目中以方人员的参与活动，而该型号隐形战斗机正是以色列计划在未来购买的。美国国防部和以色列国防部之间的关系也降到冰点，以色列必须选边站。迫于巨大压力，以色列同意无限期完全停止向中国出售武器。

“费尔康”事件给以色列一个深刻的教训。军售可用于打开进入一个国家的大门，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瞬间让大门关上，有时甚至为此失去不止一个国家。

这下，不但飞机没卖出去，而且由于违约，以色列不得不向北京支付一笔巨额的赔偿金。这时，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几乎已完成了预警机雷达系统和相关子系统的安装工作，因此，以色列急需寻找新的买家。

克雷特到印度拿下了这一大单，他卖出的不是一架“费尔康”，而是以11亿美元的高价卖出了3架。很多人都没想到印度会成为以色列的买家。毕竟，这个国家同以色列建交的时间还不足10年，完成这笔交易时，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联系，知道两国间防务关

系的人就更少了。

同中以军事关系一样，印以军事关系也是在两国正式建交前就开始建立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印度军官经常访问以色列，印度人在克什米尔同巴基斯坦人打仗，所以需要向以色列寻求帮助。印度人对新战术特别感兴趣，特别是以色列擅长的电子战这一新兴作战形式。两国间的武器交易规模当时很小，而且大多是通过第三方进行。

虽然从与以色列的关系中受益，但印度一直以秘密方式同以色列联系，其中原因很多，包括冷战结盟关系、担心激怒国内大量穆斯林以及维持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需要。

1990年，两国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期。时任以色列国防部总司长的大卫·伊夫里（以色列空军前司令）秘密飞往伦敦，同（印度总理兼）印度国防部部长V.P.辛格会面。克什米尔的战事仍在继续，印度人需要升级军队装备，主要是针对一些过时的苏制武器。

几个月后，伊夫里派出一个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军官和国防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来到新德里。然后他也飞到那里，同印度总理P.V.纳拉辛哈·拉奥举行会谈。这也是以色列国防部高官和印度元首之间的第一次会晤。

参加会谈的还有印度国防部秘书。伊夫里带来了以色列国防部部长伊扎克·拉宾的一封信，在信中，拉宾希望印度能同以色列建立正式防务关系。会议期间，当双方人员做完介绍后，拉奥让他的手下离开房间，要求同伊夫里单独谈几分钟，听听以色列能为印度提供什么，了解犹太国到底希望将其同印度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

伊夫里向拉奥简单介绍了以色列的军事能力，向他展示了拉宾的信，解释了印以关系继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伊夫里说：“我们不会在交易中增加任何附加条款。我们是一个小国，只有超级大国才会在防务关系中增加外交条款，我们不会。”

听到这些话，拉奥很高兴。在同以色列接触之前，印度尝试从美国购买武器，但被告知，交易被批准前他们需要满足一个长长的外交条款

清单，其中主要是关于人权的条款。

拉奥打电话把印度国防部秘书叫回房间，特许他同以色列签订价值20亿美元的国防订单。关于如何同印度人做生意，以色列人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两国间军火贸易后来发展很快，截至2014年，以色列向印度出售军火的累积交易额超过100亿美元，成为除俄罗斯外印度的第一大武器供应国。[7]军火交易还改变了印度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外交立场。2015年，在联合国3个反以决议的投票中，印度出人意料地投了弃权票。

还有一个国家也是在同以色列建立军事联系后才建立起外交关系的，那就是新加坡。[8]目前，新加坡已成为以色列的重要盟友，有不同报道显示，以色列国防军许多先进武器系统的研发都得到新加坡的资助。当今，新加坡军队成为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之一，这个岛国每年有20%的总预算用于国防建设。

新加坡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可以追溯到1965年。那一年，新加坡刚刚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获得独立。当时的新加坡没有一兵一卒，英国人帮助马来西亚建立军队，但并没有向新加坡提供同样的帮助。新加坡迫切需要这样的帮助。

建国后，刚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的吴庆瑞秘密邀请以色列驻泰国大使莫迪凯·基德隆访问新加坡。很快，基德隆就和一名摩萨德的代表来到这个刚成立几天的国家，以色列给他们的指示非常明确：为这个新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这对于新加坡而言很有吸引力。和新加坡一样，以色列的建国时间也不长，但却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两个国家面积都很小，并都与敌对国相邻，以色列周围有埃及和叙利亚，新加坡则与马来西亚隔水相望。[9]

新加坡国父、第一任总理李光耀之前就认识基德隆，而且很欣赏他。几年前，新加坡还属于马来西亚时，基德隆就找到李光耀，请求在新加坡设立一个以色列领事馆。虽然李光耀很信任犹太国，但他还是命令吴庆瑞不要急于谈判，等他得到印度和埃及的回信后再考虑同以色列建交一事。原来，他已向这两个国家发出了提供军事援助的请求。然而，几天后，李光耀得到的消息令他很失望。印度只是祝新加坡“幸福和

繁荣”，完全不提军事援助的请求。埃及的回复也大同小异，承认新加坡的独立，派出海军顾问的请求则没有下文。李光耀一直将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视为好友，对此他特别失望。[10]

由于没有其他选择，李光耀批准国防部继续同以色列展开防务合作，但要求这件事必须保密，避免激怒马来西亚这个伊斯兰国家。3个月后，一位名叫杰克·艾拉扎里的上校带领一行以色列人来到新加坡。为了掩护他们以色列人的身份，新加坡人称他们为“墨西哥人”。

出发前往新加坡之前，艾拉扎里去见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拉宾对他说：“记住，我们并不打算把新加坡变成以色列殖民地，你的工作是教授他们军事专业知识，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双腿站起来，最终实现管理一支自己的军队。”[11]

以色列的确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开设大规模培训课程，而是集中将少数拥有军事经验的新加坡人培养为指挥官。他们还参与了军事基地的建设和军事条令的撰写，并助其建立起必要的军政关系结构。在以色列的帮助下，新加坡一共有200人应征入伍，并被培养为指挥官。[12]

李光耀希望像以色列一样建立一支基于强制兵役制的人民军队。刚开始，这位新加坡领导人希望以色列团队只招募新加坡无业人员进入军队，并称这些人为“社会原始人”。李光耀引用了英国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打败了教育水平更高的英军，这证明士兵并不需要才智，只要服从命令就行。

艾拉扎里和他的团队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向李光耀解释说，日军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之所以能服从命令、拼命战斗，是因为他们效忠于天皇。以色列人说：“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动机问题。”最终李光耀被成功说服。

以色列团队在新加坡工作期间，基德隆再次来到新加坡，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他说，新加坡应该考虑和以色列建交，两国可互派大使。李光耀说现在考虑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同以色列建交不但会让新加坡国内的穆斯林感到不安，还会激怒和阿拉伯国家保持一致立场的马来西亚。

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以色列的获胜让李光耀深感欣慰，但也给新加坡出了一个难题。联合国正在讨论关于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李光耀知道，如果新加坡支持这一决议，艾拉扎里及其团队就会放弃这个国家。但如果他投弃权票或反对票，全世界很快会明白以色列和新加坡的关系非同寻常。这让他感到非常为难。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位新加坡领导人最终决定投弃权票，这相当于承认了这个岛国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接下来，新加坡不得不满足以色列之前的请求，1968年10月，以色列被允许在新加坡设立一个贸易办公室，6个月后设立大使馆。

中国、印度和新加坡是以色列通过“武器外交”实现正式建交的3个案例。在其中，伊夫里1990年向拉奥总理提出的不在军售中增加任何附加条款的原则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帮助以色列成功占领了一些西方国家很难进入的市场，包括非洲、东欧和亚洲。

建国之初，以色列并没有太多朋友，特别是在周边的中东地区。

由于军队规模很小，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都很难通过常规采购刺激本土国防企业研发高端武器。因此，以色列国防企业生产的大多数产品都用于出口。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生产线的正常运行，并降低国防军的采购价格。

2014年，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78%的销售额来自外贸。其他以色列国防企业基本也是如此。这在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想象。在美国，国防军工企业的国外销售只占总销售额的一小部分。波音公司国防部门的国际销售额只占总销售额的35%，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一比例更是低至20%。

以色列空军最先进的“突眼”（Popeye）导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款由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国有公司研发的导弹能够穿越60英里外的窗户并准确击中目标。这是空军能从敌方防空区以外发射的最智能化的远程导弹。但以色列空军才需要多少导弹？为了压低价格，必须向国外出口导弹。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愿意将先进武器卖到美国、印度、韩国、

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而不是像许多国家那样选择单独持有。[13]

简言之，如果不出口“突眼”导弹，拉斐尔公司根本支付不起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费用。

但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像卖给中国“费尔康”预警机一样，有争议的军售很可能造成盟友间的紧张和怀疑。盟友必须相互信任，而军售可能会破坏这种信任。

对华军售引发美以关系危机后，2005年，以色列国防部制定了新的监管国防产品出口的机制。之前，以色列国防部国际防务合作局（SIBAT）负责监督工作，但该单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海外军售业务，帮助企业同外国政府建立联系。在新的机制下，以色列成立了国防产品出口管制局（DECA），专门负责注册出口商，审批销售订单，并颁发海外市场销售许可证。

以色列还同意加强同美国的协调。可以说，只要涉及敏感武器的销售，以色列就会咨询美国国防部。以色列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之前的独立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为了维持同华盛顿的友好关系，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2008年底，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到美国呈送这个新的监管机制方案。他们还准备同美国讨论一笔前所未有的订单：以色列准备卖给俄罗斯价值10亿美元的军用无人机。

这可不是一般的军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机出口国，以色列无人机远销非洲、欧洲、南美、美国和亚洲。但以色列从没向俄罗斯出口过武器，更不要说无人机。几十年来，俄罗斯是以色列敌对国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尤其是伊朗和叙利亚。包括反坦克导弹在内的俄罗斯武器已经落到真主党和哈马斯手中。如果以色列将无人机卖给俄罗斯，最后无人机很可能也会落到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区的敌对分子手中。

俄罗斯之所以对以色列无人机感兴趣，主要是因为2008年夏天在南奥塞梯同格鲁吉亚发生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5天，虽然最终俄罗斯获胜，并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但战争暴露了俄罗斯军队在科

技能力上的严重不足，特别是无人机技术。

在战争爆发前几周，由于担心俄罗斯准备占领之前分裂出去的领土，格鲁吉亚派出无人机在冲突地区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他们使用的不是普通的无人机，而是“赫尔墨斯”450型无人机，这是由以色列埃尔比特公司生产并列装以色列空军的无人机。在3个月时间内，俄罗斯击落了3架无人机，其中有一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格鲁吉亚发布了一段一架“米格”战斗机发射导弹击落这架无人机的视频。

击落无人机本身很了不起，但格鲁吉亚对无人机的使用也暴露出俄罗斯的一些问题。一方面，俄罗斯无人机在战场上太落后，无法提供实时情报，莫斯科不得不派出战斗机和远程轰炸机执行常规侦察任务。在战争中俄罗斯使用了老式“酥油草”无人机，俄罗斯后来也承认，这款无人机噪音太大，很容易被发现和拦截。

另一方面，格鲁吉亚军队有效搜集了大量情报，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小规模以色列造无人机编队实现的。[14]

战争结束几周后，俄罗斯找到以色列，要求购买格鲁吉亚使用的“赫尔墨斯”450型无人机。刚开始以方人员感到非常惊讶，俄罗斯之前从来不在海外购买武器，更不要说在以色列。但这次战争给莫斯科敲响了警钟，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需要技术援助。

很多人都认为，以色列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正在本国空军服役的无人机卖给俄罗斯。在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真主党向以色列坦克发射了几十枚俄罗斯反坦克导弹，以色列可不想看到自己的无人机出现在敌方队伍中。

但接着，国防部官员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如果将无人机卖给俄罗斯，以色列是否能够阻止俄罗斯将先进武器交付给伊朗和叙利亚？如果可以的话，以色列不但能够承受这个风险，还非常值得这样做。[15]

以色列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外交部支持这笔交易，声称这能够加强同莫斯科的关系。伊朗正在推进核计划，此时加强俄以关系非常重要。这些官员还说，对俄出售无人机能加强以色列对俄罗斯在伊朗等

问题上的政策的影响。国防部一方面承认这样做能够加强对莫斯科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非常担心无人机技术有一天会落到伊朗、叙利亚甚至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手中。

当时，俄罗斯有一笔军售是以色列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的，那就是向伊朗交付S-300防空导弹系统。这个最初价值8亿美元的交易合同于2005年秘密签署，但迫于来自以色列和美国的压力，俄罗斯一直在推迟交付时间。

以色列之所以会想到通过对俄出售无人机来阻止俄向伊朗销售防空导弹系统，理由很简单：S-300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经受过实战考验，能够同时跟踪100个目标，可能让以色列无法空袭伊朗核设施。

俄罗斯人很清楚以色列对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担忧，双方领导人几乎每次对话时都会提及这件事。南奥塞梯战争结束一周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和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就通了电话。俄罗斯很担心以色列为格鲁吉亚提供武器和无人机，在通话中，奥尔默特同意暂停以色列向格鲁吉亚的军售，但同时对莫斯科向叙利亚和伊朗的武器出售施压。[16]

克里姆林宫官方向以色列保证，俄罗斯不会交给伊朗有损地区稳定的武器，这似乎可以理解为俄罗斯不会向伊朗提供S-300防空导弹系统。但同时，莫斯科又向以色列解释说，如果伊朗履行了其对联合国和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义务，那就需要重新考虑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付问题。[17]克里姆林宫还指出，不管怎样，S-300防空导弹系统只是防御系统，如果以色列有任何担心，就应该选择放弃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

俄罗斯一直拒绝透露真实目的。2009年初，美国参议员卡尔·列文访问俄罗斯。当时，列文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访问莫斯科的目的是加强美俄间在导弹防御上的合作，以应对伊朗对核武器的不断追求。列文非常支持以色列，因此，在访问期间他提到S-300防空导弹系统，敦促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终止将该武器系统交付给伊朗。但里亚布科夫的立场非常强硬，他说这笔交易虽然目前已冻

结，但不断提及对任何一方都不利。

他说：“我们不希望再听到华盛顿提这件事，提得越少越好。”[18]

交易冻结的消息并没能缓解以色列的担忧。在耶路撒冷，有人认为应该在S-300防空导弹系统部署到伊朗之前发动袭击。

以色列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海湾地区一些同其保持友好关系的温和阿拉伯国家。2009年初，阿联酋总参谋长哈马德·塔尼·鲁迈希在会见美国驻阿布扎比大使理查德·奥尔森时，向美方提出紧急请求：希望美国立即在阿联酋部署5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他给出的理由是，由于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易，以色列马上会对伊朗发动袭击，而作为报复，伊朗会接着对阿联酋发动袭击。[19]

鲁迈希对奥尔森说：“我必须非常坦诚地告诉你，这一地区发生了一些让我们非常担心的变化。”他解释说，“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将部署在阿布扎比及其周边，以防止伊朗在以色列袭击后发动报复性导弹袭击。被问到这一判断的根据时，鲁迈希才提到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付。他补充说道：“我不相信俄罗斯人。我认为俄罗斯人和伊朗人都不可信。”

在以色列，无人机交易变得越来越紧迫。最终决策权并不在国防部，而在外交部，但另一方面，即便外交部否决这一交易，国防部仍然可以提交以色列安全内阁进行讨论，而安全内阁有权撤销外交部的决定。

2009年，安全内阁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这笔交易。针对俄罗斯计划购买格鲁吉亚在战争中使用的那款长航时无人机的发盘，以色列给出还盘：以色列可以考虑出售无人机，但只出售已经在以色列空军退役的老型号无人机，比如“搜索者”无人机。

2009年6月，刚刚担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长的阿维格多·利伯曼飞到莫斯科。由于利伯曼出生于摩尔多瓦，这一时期以色列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截至那年夏天，有5名以色列内阁部长访问莫斯科，两国间旅游

来往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过程中，俄罗斯还考虑在莫斯科举办一次中东和平会议。

在华盛顿，一些圈内人士甚至担心以色列准备让俄罗斯取代美国成为其最主要盟友。当时美以关系已经出现问题，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后，已多次和美国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发生摩擦。



2006年9月，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卡特（右）在五角大楼会见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美国国防部提供）

在莫斯科会谈期间，利伯曼提到了S-300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人之前就公开反对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这次他们对利伯曼说，S-300防空导弹系统“只有当你准备袭击伊朗时才能发挥巨大作用”，并拒绝放弃销售该系统。[20]

离开莫斯科时，利伯曼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得出明确的结论：完成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易关系到俄罗斯人的尊严，所以最终这一定会成为现实。如果说之前在是否有必要对俄出售无人机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多疑虑，当利伯曼回到耶路撒冷后，这些疑虑已不复存在。

几周后，美国和以色列高级官员相聚特拉维夫参加一年一度的战略对话论坛，成立这个论坛是为了讨论地区形势变化和确保以色列相对于邻国具有质量型军事优势。会上，S-300防空导弹系统再次被提及，以色列人向美国人透露了最新发现，如果美国继续推进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俄罗斯也将继续推进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

易。[21]

这成为以色列推进无人机交易的最佳时机。

要想同莫斯科签订合同，以色列还有最后一个阻碍，那就是美国。俄罗斯和美国是老对手，如果以色列将先进的无人机卖给俄罗斯，美国当然不会高兴，毕竟，俄罗斯曾是美国的敌人，现在这两个国家在很多领域仍然针锋相对。

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玛丽·贝思·隆恩是最早听到这个销售计划的美国官员之一，也是最早支持"铁穹"防御系统的美国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隆恩非常惊讶，主要是因为当时以色列还请求美国不要将先进武器卖给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隆恩对与她职位相同的以色列官员说："你们的意思是说，美国在未经你们允许的情况下不能将武器卖给阿拉伯国家，但你们可以将包含或不包含美国科技的先进武器卖给俄罗斯？"[22]

以色列人给出了两点理由：第一，他们声称出售给俄罗斯的无人机不涉及任何源自美国的科技；第二，他们告诉隆恩，卖给俄罗斯的无人机只比俄罗斯目前的无人机略微先进，和中国准备卖给俄罗斯的无人机相差无几。[23]

隆恩问道，俄罗斯未来有没有可能将无人机转给真主党或伊朗？以色列人向她保证，即便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用担心，以色列目前使用的无人机比卖给莫斯科的无人机要领先一代。

如果以色列将无人机卖给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就需要以色列提供保养、零配件和相关知识。以色列认为这种依赖性有助于增强以色列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俄对以色列的阿拉伯敌对国军售的问题上。如果克里姆林宫做出有损以色列利益的事情，以色列可以拒绝向俄罗斯提供零配件或日常保养，让俄罗斯无人机只能停在地面。

隆恩把这些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研究以色列无人机的小组，负责证明准备出售的以色列无人机确实不包含美国科技，以及同中国准备卖给俄罗斯的无人机处在同一技术水平。最终，虽

然美国对以色列向俄罗斯靠拢很不满意，但还是批准了这笔交易。

隆恩回忆说：“由于这牵涉双方的利益，俄罗斯被合同掣肘，以色列人认为这能在未来影响俄罗斯在伊朗乃至更广阔地区的决策。”

如果俄罗斯和伊朗的交易已成定局，以色列也可以与俄罗斯达成类似的交易。

后来将近5年的时间里，以色列的无人机交易似乎达到了既定目标。伊朗不断催促俄罗斯交付S-300防空导弹系统，但克里姆林宫一直拒绝。在这期间经常出现伊朗人在俄罗斯接受S-300防空导弹系统操作训练的新闻，这让以色列感到非常紧张，但该系统并没有运离俄罗斯。

2015年夏天，这一切发生了改变。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大国（P5＋1）[2]同伊朗历史性地达成了旨在遏制其核计划的协议。有了该协议，俄罗斯又开始声称没必要再推迟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付了。俄罗斯国有科技公司说合同已“重新生效”。

以色列刚准备发动新的外交攻势，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爆发了。9月，为了拯救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开始轰炸位于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目标。俄罗斯不但在叙利亚部署了多个飞行中队，还向地中海派出军舰和潜艇。20世纪70年代以来，俄罗斯军队从未如此靠近以色列边界。由于担心两国因为误解而引发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立即飞到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见面，决定立即建立处理以色列国防军和俄罗斯军队间微妙关系的协调机制。

11月，俄军一架“苏霍伊”轰炸机被土耳其击落。愤怒的莫斯科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并暂停了和安卡拉的贸易关系。普京还做了另一件事，他将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升级版本S-400防空导弹系统部署到该地区，接收该武器的国家不是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同以色列抗争的伊朗，而是以色列空军的后院——北部邻国叙利亚。

和S-300防空导弹系统一样，S-400防空导弹系统也能同时追踪和拦截远至几百英里外的多个目标，但后者拥有升级后抗干扰能力更强的雷

达系统和由多种导弹组成的多层防御系统。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射程更远，能够击落特拉维夫上空的飞机。

这个消息令以色列非常震惊。一位以色列空军军官说：“在最糟糕的噩梦中，我们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除了战术上的影响（以色列空军需要改变之前的飞行队形），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防空导弹系统的事实还让以色列明白，之前的军售对俄罗斯的影响非常有限。在中东这个复杂的地区，理想总是会被现实打败，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1) K街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一条主干道，是许多美国院外游说团体的驻地。在政治话语中，“K街”已借指华盛顿游说行业。——译者注

(2) 此处翻译尊重了原文。但实际上，“P5＋1”为包括中国在内的5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译者注

结语　末日战场

按照计划，哈马斯指挥官在加沙策划的这次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将震惊全国，成为以色列的“9·11”事件。在这次进攻面前，之前旷日持久的战争、自杀式爆炸袭击、火箭弹袭击和流血事件都将黯然失色。审判日即将到来。

凌晨4点半，大约有10多名身着迷彩服的武装分子从地洞里钻了出来，他们全副武装，装备有AK47自动步枪、火箭助推榴弹（RPG）、手枪、手榴弹和夜视镜。为了能将这次行动摄录下来，有的人头盔上还装有GoPro相机。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一片黄瓜地里。

当时是2014年7月17日，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最近一次的战斗已持续了一周。每天都有几十枚火箭弹从加沙射向以色列城镇，以色列则出动空军对加沙进行轰炸，摧毁激进组织基地、火箭弹发射架、指挥所和武器储藏地，并追捕哈马斯指挥官。

以色列已经做好了应对哈马斯通过地道发动袭击的准备，但并不知道地道的具体出口。截获的情报锁定了大致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在这些区域附近部署重兵，无人机也持续在天空盘旋。

后来，以色列国防军发布了一段无人机拍摄的黑白热成像视频，其中显示，哈马斯武装分子从地面一个洞口爬了出来，迅速在田野里分散开来，但当发现自己位置暴露后，他们又赶紧朝洞口跑去，并一个接一个地爬回地道。最后一个人刚爬进洞口，以色列导弹就发射过来，摧毁了这个地道的入口，消灭了这个小组的几名成员。

这些武装分子试图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协议生效前几小时发动地道袭击。但对以色列而言，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约10天前，以色列刚刚炸毁了此处以南发现的一个大型地道，那个地道竟能直接通到附近的一个基布兹。

以色列知道哈马斯一直在沿着边界挖“进攻地道”，甚至还组建了一支名为“努克巴”（阿拉伯语中“精英”的意思）的秘密突击队。经过训

练，这支部队的高级成员能够徒步或骑小型摩托在狭窄的地道中移动和作战。[1]

以色列国防军声称，哈马斯计划通过大约30条地道让数十人渗透到以色列境内，这些地道的路线经过精心设计，每条地道都通往不同的基布兹或城镇。这些武装分子将闯入私人住宅、餐厅和幼儿园大开杀戒。这个小组有的成员负责劫持以色列人，再通过地道强行将人质带到加沙，作为未来同以色列交换战俘的筹码。他们的目标是杀死几十人，绑架几十人。如果目标实现，这将极大挫伤以色列的民族士气。

加沙地道的存在并不是秘密。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埃以之间签订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并将加沙南部的拉法一分为二。从那时起，加沙地带开始出现大量地道。但当时地道主要用于边境走私。1989年，地道第一次被用于武装袭击，哈马斯激进分子马哈茂德·马巴胡赫在绑架和谋杀了两名国防军战士后通过地道逃离以色列。后来，马哈茂德·马巴胡赫成为哈马斯高级特工，负责武器采购。2010年，他死在迪拜一家酒店房间内，据说是摩萨德暗杀小组所为。

截至2000年，埃及和加沙边界上有数百条可使用的地道，所有能从地道运输的东西都能走私到加沙，包括武器、香烟、炸药、等离子电视甚至汽车。

拉法靠近埃及边界，那里的加沙人几乎都是挖地道的高手。他们经常利用儿童修建地下通道和运送走私品。他们首先在边境附近的家中向地下打竖井，然后再横向挖地道。地道的修建周期从两周到两个月不等，费用有时能达到10万美元。虽然成本不菲，但一条成功的走私地道能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

随着时间推移，哈马斯开始将更大更先进的地道同其作战方法结合起来，利用地道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的基地。2004年，一枚重达1.5吨的炸弹在靠近拉法的一个以色列国防军阵地下方的地道被引爆，接着，哈马斯突击队对该哨所发动猛攻，5名国防军战士牺牲。

从战术角度分析，哈马斯使用地道的原因很好理解。持续的火箭弹袭击虽然对以色列民众造成有效威慑，但由于边界地区戒备森严，哈马

斯很难发动能够震惊整个犹太国的大规模袭击。除了巨大的隔离墙，以色列在边境地区还部署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密集的观察哨所和大量巡逻人员，从地面根本无法突破这道防线。地下通道自然成为他们进入以色列、发动袭击并迅速撤离的最佳途径。地道拥有巨大的潜能。



2014年，一名以色列士兵站在加沙边境发现的一个哈马斯的地道入口（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哈马斯的地道挖掘能力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014年10月，以色列国防军在靠近加沙边界的恩哈什洛沙发现了一个巨型地道。恩哈什洛沙是20世纪50年代由一群拉丁美洲移民建立的田园基布兹。以色列之前掌握了一些零星的情报，当地军民也经常声称他们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凭借这些线索，以色列非常幸运地找到了这个地道的位置。

这条地道有50英尺深，将近1英里长，地道内部高度达到6英尺，大多数人站在里面根本不用弯腰。修建这个巨型地下通道使用了超过500吨混凝土。一位基布兹居民说，这个地道的模样让他联想到纽约地铁。以色列情报部门称这条地道的建设成本为数百万美元，哈马斯原本计划利用它渗透到基布兹，对当地居民展开屠杀。

虽然一直知道地道的存在，但发生在2014年夏天的事件还是让以色列措手不及。7月17日的袭击发生后，以色列安全内阁决定向加沙派出以色列地面部队，定位和标记这些跨界地道，并将其摧毁。但以色列面

临两个问题：第一，以色列情报机构并不知道所有地道的具体位置；第二，即便发现了地道的位置，以色列也没有摧毁这些地道的详细战术。所以，国防军战士们虽然明白自己的任务，但对于如何完成任务却是一头雾水。

于是，针对地道，一批部队授命进入加沙地带，执行一次规模有限但意义重大的专项行动，行动中目之所及的一切让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惊讶不已。哈马斯修建了大约30条从加沙通往以色列的地道，大多数已经完工，有的还处于收尾阶段。这些地道完全不同于以色列之前发现的狭窄的短距离地道，它们设有通风管道和通信线路，墙也是水泥砌的，人可以在里面直立。有的地道绵延数英里，主线路之外还有分支，这意味着发现地道的一个入口并没有用，因为它可能还有好几个入口，只有进入地道，以色列国防军才能摸清地道的实际路线。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给以色列带来两个挑战：第一是如何定位和识别地道，第二是如何摧毁地道。对于第一个挑战，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想法。早在行动前，利用蜂窝网络和信号扫描技术，以色列情报部门通过追踪地道挖掘者的手机信号成功发现地道的出口。以色列发现，当挖掘者进入地下时，手机信号会突然消失，几小时后他们从同一地点出来，信号再次恢复。[2]一旦出现大量类似情况，基本可以确定在这附近存在地道入口。

2000年初，以色列国防部就开始测试各种用于探测地道的系统。2007年，国家审计长在报告中对国防部和国防军在这方面工作的不足之处提出强烈批评。的确，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当国防军战士2014年进入加沙地带时他们手足无措，得不到任何技术上的支持。在这场针对地道的行动开始前，国防部部长预计只需要2—3天的时间就能实现既定目标。但事实上行动持续了将近3周，在这期间，哈马斯持续通过地道发动袭击。

由于缺少探测和摧毁地道的明确方法，以色列国防军选择随机应变，不断尝试新的方法。在发现地道后，一开始他们会炸毁地道的竖井，但国防军很快意识到如果该地道存在分支线路，这样做无济于事，事实上，几乎所有地道都有分支线路。

后来战士们选择将机器人放入地道，探测地道的线路。为了炸毁地道主体部分，有时他们会选择向地道倾倒液体炸药。在极少数情况下，战士们会直接进入地道，在墙体上安装炸弹和地雷。空军也为摧毁地道的行动提供了支持。一旦地道的线路被查明，飞机会沿地道线路投掷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这是一种专门用来穿透地表的精确制导炸弹。以色列国防军称这种方法为“动能钻井”。

然而，即使以色列部队正在进行定位和摧毁地道的行动，哈马斯仍然成功地利用地道发动了多次袭击。在一次袭击中，一群哈马斯武装分子从纳哈尔奥兹基布兹附近的地道口冲出来。哈马斯后来公布了一段从固定在该武装分子头盔上的GoPro相机拍摄的视频，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武装分子爬出地道后，在光天化日下跑过田野，进入附近以色列国防军一个边境哨所，枪杀了5名士兵，然后，这名渗透者又跑回地道口，逃回加沙。

针对加沙地道的行动结束时，以色列成功摧毁了大约30条地道，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惨重，几十名以色列士兵和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此外，另一个本该在短短几天内结束的军事行动竟然持续了50天，成为1948年独立战争以来以色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武装冲突。

这场战争给以色列敲响了警钟，以色列一直清楚哈马斯把武器和指挥中心隐藏在医院或学校，但这次行动发现的地道表明一种新的战争形式的产生。利用这些地道，哈马斯可以发动相当于“9·11”事件规模的袭击。

以色列在2014年加沙战争中遇到的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以色列国防军本以为自己为这场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国防军战士都被训练为巷战专家；国防军的坦克装备有最新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能够防御反坦克导弹的攻击；“铁穹”防御系统能够有效拦截射向以色列的“喀秋莎”和“卡萨姆”火箭弹，拦截率远高于之前的预期。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地道让这些准备工作变得毫无意义。

这属于典型的“颠覆性创新”，这个词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造，专门形容那些让传统竞争对手（以色列国防军）失去竞争力的创新（激进分子的地道）。

但最终，以色列国防军攻克了这个难题，虽然花的时间比预期要长，双方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国防军最终找到了定位和摧毁地道的方法。通过不断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以色列国防军创造出新的战术战法，成为世界各国军队争相学习的对象。

以色列也许是第一个在边境面临激进分子地道挑战的国家，但未来，这样的地道也可能出现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或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这些威胁并非危言耸听。

加沙战争的经历让人们明白，不管国防军认为自己的战备有多么充分，随时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对以色列而言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感受，特别是在军队。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后，部署在埃以边境的以色列坦克不断被一种神秘的导弹击中。刚开始，指挥官们以为这只是敌方步兵发射的普通火箭助推榴弹，于是命令坦克向后撤离了一段距离，本以为这样能处于敌方火力范围之外，结果仍被击中。

随着战斗的持续，以色列国防军的坦克兵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威胁，通过有线制导，这种导弹由单兵发射后能够精确命中1英里外的目标。这款由苏联研制的新型反坦克导弹被称为“萨格尔”导弹。为了应对这种导弹，以色列国防军必须适应新的形势，提出新的应对方案。后来，每当发现有该导弹发射，坦克就会互相通告，然后开始毫无规律地朝各个方向行驶，扬起巨大的沙尘，阻挡导弹发射者的视线。

这一战术非常成功，后来被北约部队采用。不过，此法虽然有效，但这并不能完全避免以色列坦克被导弹击中，在战斗第一天，超过180辆以色列坦克退出战斗，其中一半是被“萨格尔”导弹击中的。[3]

不仅在1973年和2014年，事实上，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在逆境中和战场上一直表现出极强的随机应变能力。本书从头到尾都在展示以色列这一标志性特征，每当遇到挑战和威胁，以色列都会运用这一能力。

从以色列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积极备

战，未雨绸缪，但未来总是充满变数。以色列本以为自己成功阻止了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付，但没想到更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被部署在叙利亚；以色列本以为来自加沙的火箭弹袭击不会构成战略性威胁，但没想到后来有数千枚火箭弹射向以色列的城市。中东地区仍处于历史上最剧烈的动荡期，以色列国防军的指挥官们知道还有更多预想不到的情况将要发生，他们能做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小这些情况的不利影响。

为不确定性做准备，这个说法听上去有些矛盾，但这正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并不能确定未来战争将会是怎样的，但和其他现代军队一样，它将努力为未来战争而不是已经过去的战争做准备。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防部地下几百英尺处有一个名为“波尔”（希伯来语中“洞穴”的意思）的地下指挥中心，这里是以色列未来战争的实验室。

波尔指挥中心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神经中枢，所有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在这里策划和指挥。进入这个地下指挥中心需要经过两道巨大的铁门，一旦遇到非常规袭击，这两道大门就会封闭起来。在大门外标有很大的提示语，提醒访客将手机存放在门外。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采用各种手段监听以色列，以色列必须极度谨慎，容不得半点侥幸心理。波尔指挥中心拥有独立的空气净化系统和发电系统。即使地表建筑被摧毁，指挥中心仍可以继续运行。

地下的楼梯可能有数英里长。在其中一层楼，一个房间门外写着“北部战线：叙利亚”，穿过大厅，还有房间门外写着“加沙”“黎巴嫩”和被国防军称为“纵深”的战线名称，“纵深”战线的部队有时需要远离以色列边界执行深度渗透行动。在这些房间里，作战参谋研究地图，制订未来行动计划，并决定在不同的行动和战场派遣哪个军事单位与使用何种型号飞机。

再向下走几层就来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会议室。以色列军队高层指挥官每周都会围坐在U形会议桌旁，审批各类行动，讨论适用于以色列未来冲突的作战原则和战术。房间的墙上挂有记录着以色列以往危急时刻在此召开会议的照片，照片中的一位位将军神情严肃，若有所思，这些照片在不断提醒人们，在这里做出的决定关乎国家的命运，绝

不能向外界泄露。

在会议室一边是一个落地玻璃围成的房间，这个房间被称为作战室，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的长桌上摆满了电脑和不同颜色的电话（根据颜色区分加密级别），长桌中间是总参谋长的位置。所有将军都面对着一面挂满各种屏幕的墙，屏幕上显示有不同传感器（包括安装在飞机、海军舰船和卫星上的）发回的图像。总参谋长凭借这些信息指挥作战行动。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结束几年后的一个夏日，一位国防军将军在总参谋长的会议室就以色列的未来战场发表演讲。他解释说，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中东动荡给以色列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更多的是威胁和挑战。一方面，曾经是以色列最主要敌人的叙利亚军队已不复存在，这意味着犹太国不再面临常规战争的威胁。他说，以色列担心敌国使用坦克入侵并占领以色列领土的岁月似乎已一去不复返。

但另一方面，这名将军继续说，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不再是小型组织。未来以色列国防军将面对一场“拼图式”战争，以色列必须知道如何同时应对反坦克导弹（常规战争）、士兵劫持（武装袭击）和从地道中钻出来的激进分子（游击战）。战斗机对于轰炸战略目标和在广阔地区投射力量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有50名哈马斯分子从地道中钻出来袭击附近的基布兹食堂，战斗机就无能为力了。

为了应对这些“拼图式”冲突，以色列国防军近年来强调在三个方面的能力建设：提高协同能力，加强安全距离/机器人平台的建设，以及确保以色列作战行动的国际合法性。

“协同能力”是指军队各单位之间合作的能力。在最基本的层面，这意味着飞行员和步兵能够使用共同的语言，比如，当地面士兵尝试指挥飞行员轰炸某一目标时，他们能听懂对方的语言。在更高的层面，提高协同能力还能对科技产生直接影响。以前，空军飞行员在驾驶舱中看不到地面部队正在攻击的目标，但现在通过高科技可以实现。

“协同能力”的提高离不开许多军官的努力，这其中包括哈南·伊塞罗维奇上校的参与。2015年以前，他担任以色列国防军精锐计算机部队马

姆拉姆部队的指挥官。马姆拉姆是希伯来语“计算机和信息系统中心”缩写的音译，这支部队主要负责以色列国防军的网络维护，确保部队在战术层面上具有良好的连通性。这支部队声望很高，从这里退伍的老兵都成为科技公司争相抢夺的人才。

该部队最近发明了一个被国防军称为“水晶球”的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指挥官只需在屏幕上一点，就能将战场的实时录像上传，并将目标坐标加载到数字地图中。

这样一来，坐在指挥中心的军官可以看到无人机和其他装备的传感器提供的录像，以此为依据选择进攻目标，并将目标迅速转换成数字坐标，发送到该区域所有作战部队的数字地图系统中。

“水晶球”和其他类似系统能够缩短以色列国防军“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周期，以前这一过程可能需要20分钟，现在要快很多。

伊塞罗维奇深知这些系统的重要性。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伊塞罗维奇是纳哈尔旅第五十步兵营的指挥官，他的部队被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一天，他的无线电通话系统响了起来，原来，一名以色列北部战区司令部的情报官在向他提供一条非常重要的情报。

这名情报官说：“附近一座房屋建筑内有一个真主党反坦克导弹小组，请做好准备。”

在战场上很少能得到这样精确的情报。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原计划通过入侵黎巴嫩来结束真主党在边境附近的存在，但国防军无法获取关于该组织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具体位置的高质量情报，这条情报却非常精准。通过夜视镜，伊塞罗维奇在几英里外发现了这个真主党反坦克导弹小组。形势非常紧张，当时虽然伊塞罗维奇已经发现了对方，但真主党战士还没有发现以色列国防军的位置。一旦他们发现以军，这将是一场非常血腥的战斗。

伊塞罗维奇通过无线电联系上附近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请求飞行员对这个藏匿有真主党小组的房屋进行轰炸。但伊塞罗维奇足足用了15分钟才向飞行员解释清楚真主党小组和以色列部队的位置。飞行员

需要确保不会意外轰炸到伊塞罗维奇和他的士兵所躲藏的建筑。为了核实他们说的是同一个目标，两人竟然交流了10多次。

这样的经历让以色列国防军意识到部队在协同能力上的严重不足。拥有了“水晶球”等系统后，伊塞罗维奇等指挥官只需在电子地图上标记真主党武装分子所在建筑的坐标，同一网络下所有部队就都能看到这一位置，包括战斗机和直升机。

一位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军官解释说：“不管是真主党还是哈马斯，现在的敌人都非常低调，非常非常狡猾，经常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活动。我们需要知道如何迅速而精准地发现、识别和攻击这些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进行的第二个变革是将更多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自动系统融入作战体系。2015年，以色列空军大多数飞行任务都由无人机完成。未来几年，这一比例还会继续上升，以色列空军计划在2030年前拥有一支由无人机和隐形战斗机组成的机群。

无人系统并不局限于在天空执行任务的无人机。在地面，以色列国防军也使用了很多无人系统，比如能扔到房间内拍摄内部情况的球形照相机和能在加沙、叙利亚等动荡边界取代战士执行侦察任务的无人地面车辆（UGV）。



以色列国防军一辆“守护者”无人地面车辆正在加沙地带边境巡逻（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未来还可以在地面部队到达前向敌方领土派出无人地面车辆。以前由精英侦察部队执行的危险任务现在也可以由配备有360度摄像头、扬声器和自动步枪的小型无人沙丘车来完成。在不知道屋内情况时就发起强攻的做法也将成为历史。很快，蛇形机器人将在战士发动进攻前爬到敌方指挥部进行侦察。此外，还有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制的无人侦察艇“保护者”，艇上装备有武器套件和执行非致命任务的高压水管。这款基于小型快艇设计的无人侦察艇已在加沙海域成功完成了多次海军试验。

在不久的将来，空中和地面的机器人将冲在战场最前线。在未来，就算战士仍然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们的模样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同于现在的制式战靴和防弹衣，未来的战士们将穿戴机械化装甲，这些装甲不但能提供更好的防护，还能让士兵的移动速度更快、能够轻松地背带更多装备。他们还会配备一个用于提高态势感知的个人头部显示器，他们的冲锋枪所使用的子弹还能够识别敌军和友军。

在未来战场上，坦克也将实现无人驾驶，并安装有能够连续工作几个星期的混合动力引擎。空中的无人机在机翼上将安装太阳能板和燃料电池，凭借这两个动力源，无人机可以一直在空中飞行，只有日常维修检查时才让其降落到地面。

空军在战场发射的纳米卫星集群将为地面部队提供实时图像，并能够在远离国土的地方被用作以色列通信设备的“蜂窝塔”。袭击预定目标将主要使用精确制导火箭弹，只有执行远距离战略性任务才使用空军的隐形战斗机。

如果未来再次发生六日战争，以色列甚至无须派出飞机轰炸埃及和叙利亚机场，可以利用先进而强大的网络武器让敌方所有的飞机都无法起飞。

这就是未来以色列的作战方式。

然而，如果缺少国际合法性，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个国家可以研发和生产最先进的武器，甚至将这些武器卖到全世界，但是，如果全世

界都不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再先进的武器也没有用武之地。

对以色列这样的国家而言，合法性非常重要。由于非常依赖国际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几乎在每次军事行动前都会寻求许可，哪怕只是默许。在最近的加沙和黎巴嫩冲突中是如此，考虑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袭击时亦是如此。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以色列最终没有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

战争并不能在战场上结束，特别是针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战争。战场上行动结束后，战争将继续在媒体、法庭和联合国安理会谈判桌上展开。现在的公众支持比10年前更为重要，如果缺少支持，战争很可能在达成军事目标之前就提前结束。

2006年7月30日上午，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已进行了两周时间。突然，黎巴嫩南部小镇加纳村发出一阵巨大的爆炸声，爆炸物是前天晚上以色列空军投掷的炸弹，由于故障，炸弹在落地后没有立即爆炸。

根据最初的报道，60多人在这次事件中死亡，其中一半是儿童。几乎每个国际新闻网都立即通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从废墟现场发回了实况报道。以色列声称加纳村附近区域是真主党的“喀秋莎”火箭弹发射点所在地，但直到12个多小时后以色列才拿出确凿的证据。

那天的事件成为战争的转折点。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利用这次爆炸事件，要求以色列在未来48小时内停止在黎巴嫩上空的一切空中行动，对于战争中的以色列而言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国际社会对以色列针对真主党行动的支持几乎消失殆尽。

也许，如果以色列当时能更快拿出证明加纳村真实情况的证据，国际社会对这次行动的支持就可以延续。不管怎样，加纳村事件和后来发生的其他事件都迫使以色列适应新的现实，在袭击目标前，以色列必须要考虑将袭击全过程摄录下来，并考虑这次袭击可能带来的国际法律后果。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外交官的利益，这些行动也可能对军官造成影响。实施行动的军官以后还能在全球自由通行，不担心被捕吗？国际社

会是否会对以色列高级军官发出逮捕令？

2016年的一天，当来到特拉维夫北部海边的一座公寓楼时，我们的心情有些忐忑。我们即将和以色列前总理和前总统西蒙·佩雷斯见面。还有几分钟就到预约时间了，说实话，我们真不知道93岁高龄的佩雷斯能给我们多少时间，甚至不确定他还能否记起我们想从他那儿得知的事情。但后来佩雷斯的讲话出乎我们的意料。

佩雷斯是一位伟大的以色列政治家。在他公寓的书架上摆满了他70年政治生涯留下的纪念品，其中有他和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合影、在国外获得的奖项，包括他同伊扎克·拉宾、亚西尔·阿拉法特共同获得的富有争议的诺贝尔和平奖。

佩雷斯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是怎样一路走来的：独立战争期间他在本-古里安身边工作，后来负责为这个新成立的国家购买军火。是佩雷斯说服阿尔·史威默来到以色列建立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也是佩雷斯让以色列和法国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并通过这段关系秘密启动了核计划。

在政府中，他几乎在每个部门都工作过，包括交通部、国防部、财政部和外交部。他两次担任以色列总理，2007—2014年担任以色列总统，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份工作。

如果只有一个人能解释为什么以色列能为世界研发出如此之多极具创新性的武器，我们认为这个人非佩雷斯莫属。

其实，佩雷斯能成为本-古里安的助手纯属巧合。佩雷斯从小生活在一个坐落于约旦河谷的基布兹，1947年，该基布兹决定派一名年轻人到特拉维夫，成为哈加纳的志愿者。一个周六的晚上，基布兹秘书处举行了一次投票，第二天早上，当时24岁的佩雷斯就上路了，准备前往哈加纳在特拉维夫被称为“红房子”的总部。当时，他在基布兹的朋友往他口袋里塞了3里拉，这就是他全部的盘缠。

但他到那儿后，谁也不知道该给他安排些什么工作。在楼里闲逛时，他碰到一位熟人，于是佩雷斯问道：“你知道我应该在这儿做什么工

作吗？”

他的朋友回答说：“不知道，我们真不知道让你做什么。”

佩雷斯开始有些慌张。难道这一趟白跑了？来这儿一天就回去，他该怎么向基布兹的朋友解释？正当他思考这些问题时，身后楼梯上有人大声对他问道：“你到这儿了？”

佩雷斯转过身，发现站在眼前的正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他们两人因都是左翼政党马帕伊党成员而相识，几年后这个政党合并到现在大家熟知的以色列工党。

“是啊。”佩雷斯回答说。本-古里安走到他跟前，从夹克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佩雷斯，然后说道：“这就是我们目前所有的军火和武器的清单。”接着他快速说出哈加纳武器储存点机枪和子弹的数量。他还说：“如果在武器不足的情况下受到进攻，我们将被摧毁。我们需要武器，这是现在最紧迫的任务。这就是你的工作。”

虽然受到本-古里安的热情接待，但其他哈加纳领导人还是冷落他。那天晚些时候，那位朋友又找到佩雷斯，并告诉他，虽然没有具体工作，但他可以坐在哈加纳总参谋长雅科夫·多里的办公室办公，这位总参谋长正在休病假。

佩雷斯来到多里的办公室，坐在他那张巨大的木桌旁。闲着无聊，佩雷斯翻看了一下抽屉，发现了两封写给本-古里安的信。他打开其中一封，读后大吃一惊。

在信中，一位以色列国防军将军向本-古里安解释了关于自己拒绝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新任总参谋长的原因。这位将军说，虽然这一邀请让他受宠若惊，但在发现犹太国的军火库里只有600万发子弹后，他决定拒绝这一邀请。

这位将军写道：“在战争中我们每天需要100万发子弹，我不想成为一个只能在任上干6天的总参谋长。”

佩雷斯之前从来不知道形势有如此可怕。但他没有在这种情绪中停

留太久，因为他很快有了具体的工作要做。他的任务是在本-古里安身边运营一个由世界各地联络人员组成的网络，这些人负责想尽办法为以色列国购买武器和军火。这成为接下来10年佩雷斯的主要工作。

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佩雷斯独特的性格。在不遗余力购买武器的同时，他也在思考以色列该如何弥补自己在武器方面的巨大不足。建国早年，以色列没有坦克和飞机，也没有国家愿意向以色列出售这些武器。所以，佩雷斯想到许多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比如，让以色列独立研发反坦克导弹和高射炮，这样以色列至少能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

他告诉我们："如果前方有一堵墙，只有傻子才会用头去撞墙。你应该做的是想其他方法完成工作，你必须有创造性。"

这一路走得并不顺利。比如，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开始生产自己的步枪。但当以色列国防军试射这些步枪时，子弹总是在枪管里爆炸。战士们换其他的步枪试射，结果还是一样。军官们感到很困惑，他们反复检验了子弹和步枪，但怎么也找不到故障原因，直到一名工程师决定检查制造子弹的铜。原来，存放铜的仓库有鼠患，老鼠的尿液腐蚀了这些铜，所以生产的这一批子弹都存在缺陷。

在本-古里安的支持下，佩雷斯带领以色列走上了一条"科技强国"的道路。但是，当他到以色列国防军总部建议购买超级计算机时，他直接被赶出了房间；当他建议投资研发导弹时，将军们对此嗤之以鼻，讽刺地说道："我们连子弹都没有，你却在这儿谈导弹和计算机。"

这些阻碍一直都在，但佩雷斯从不言败。当财政部部长告诉他"一分钱"都不能花在修建核反应堆上时，佩雷斯在预算之外成功筹集了数百万美元；当以色列各所大学拒绝在武器研发上进行合作时，他从其他地方找来科学家。佩雷斯总能在别人认为危险的地方看到机会。他从不轻易放弃，哪怕知道有人在他背后冷嘲热讽或恶意中伤，他也毫不在意。

当回忆起1947年11月29日晚上联合国就分治决议投票后他和本-古里安坐在一起的场景时，他严肃地说道："我们从一开始就遭到进攻，因此别无选择。"本-古里安在那天晚上说："今天他们在跳舞，但明天就会

发生战争。”

但以色列撑过了这场独立战争，打败了敌人。佩雷斯说，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是依靠以色列的高素质人才和惊人的斗志。

他说：“犹太人在DNA中就有一种永不满足的基因。不管给犹太人任何多不好用的东西，他们都可能将其修好或进行改进。给以色列空军一架飞机，他们也能进行改进……我们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我们问这位年长的以色列政治家是否担心以色列会失去军事上的质量优势。我们说，近年来，美国宣布计划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先进军事平台。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在体制上越来越接近正规军队，并使用了包括反坦克导弹、无人机等以前常规部队才拥有的武器。

佩雷斯思考了片刻，然后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展望。他说：“要维持以色列在军事上的质量优势，我们需要把钱花在战士的大脑上，而不是花在他们的肌肉上。”

这就是为什么佩雷斯最近建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批准每名战士在服兵役前先读大学，拿到学士学位。这也是为什么他最近建议教育部在幼儿园开设教两三岁幼儿第二外语的课程。

佩雷斯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补充说，同样，没有任何事情会自动发生，要想让其发生，我们需要不断去推进，有时甚至仅凭一己之力。

通过那天的见面我发现，佩雷斯是一名梦想家。这位为以色列军队和国家拥有核能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在科学、技术、机器人、和平等问题上同样侃侃而谈。他告诉我们，未来武器和未来战争的关键在于利用“拥有巨大潜力”的太空和理解如何使用更少的能源。他还饶有兴致地谈到纳米科技，认为这项技术能够帮助以色列研发出更小、更智能和更可靠的传感器与武器。他激动地说：“我们要用更少的投入换来更大的产出。”

在谈话快结束时他说，多年的战争让以色列人有些悲观，对未来有

些怀疑，但他坚持认为，科技可以改变这一现象。他说：“未来不会是坦途，但我们可以改变人的性格，我们可以利用科技让人变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对未来更抱有希望。”

佩雷斯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位前总统在93岁高龄还畅想着50年以后的事情，这一点着实让我们感到佩服。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深感自己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作为记者，我们每天在报道阿以冲突的各个方面，同时又看到新的武器不断被研发和引入这一地区，这不得不让我们感慨这个时代的复杂和神奇。

以色列的武器正在改变现代战场，这些武器对战争方式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以色列边界以内，而已经辐射到更广阔的中东、欧洲、非洲和亚洲地区。这些武器的研发一方面吸取了战争中积累的军事经验，另一方面也融入了长期创新的成果，因此，关于这些武器的故事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力。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奔波于世界各地，包括亚洲和欧洲，当然，还有以色列和美国。在我们到访之地，大多数人对以色列都很熟悉，但对于其科技实力和先进的武器却所知甚少。

我们相信，在以色列几乎没有人希望发生战争，但这个国家建国以来平均每10年就要经历一场大规模战争，直到今天其周边仍有敌人叫嚣要灭亡这个国家。所以，以色列必须时刻做好准备。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毫无疑问，以色列的武器必将成为书写未来故事的重要力量。

致谢

如果没有数百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同我们分享他们的见解，这本书根本无法完成。他们中的许多人讲述了自己在以色列军队和国防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不少人属于外交官，在世界权力走廊中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部分人要求在书中匿名，我们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雅科夫非常感谢安·玛丽·利平斯基和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的其他成员，这本书最初的想法就是在该基金会成形的。雅科夫参加了该基金会安妮·波尼斯和佩奇·威廉姆斯两位优秀导师主持的写作研讨会，从书中您可以感受到这次学习的效果。他还要感谢《耶路撒冷邮报》，目前他担任该报主编，在过去15年里他一直利用这个平台向全世界讲述以色列的故事。

阿米尔想感谢瓦拉网（Walla），过去6年来他一直在这家以色列主要新闻网站工作。在这之前，他在以色列《晚报》（*Maariv*）工作了12年。来到瓦拉网后，由于新的团队水平高、追求前沿科技且具有创新精神，在这个团队的支持下，他的写作水平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阿米尔还要感谢巴伊兰大学，他的论文导师是该校的什洛莫·沙皮拉教授，他是以色列在情报和恐怖主义研究方面的国际知名专家。

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编辑伊丽莎白·黛茜加德，她从一开始就为本书感到非常兴奋。我们还要感谢我们非常敬业的代理人彼得和艾米·伯恩斯坦，他们一直在帮助我们推敲文中的思想，陪伴我们走过了这项工作的全过程。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家人。夏娅（雅科夫的妻子）和法妮（阿米尔的妻子）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为了让我们能够拥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她们花费了很多精力照顾孩子（雅科夫的孩子：阿塔拉、米基、莱利和艾利；阿米尔的孩子：罗恩、亚哈里和塔马里）。夏娅和法妮一直鼓励我们将这项工作做到极致。没有她们的支持，我们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

注释

前言

1. Gili Cohen，“Israeli Defense Exports in 2014: $5.6 Billion”［Hebrew］，*Haaretz*，May 21，2015，http:||www.haaretz.co.il/news/politics/1.2642295.

2. Marcus Becker，“Factory and Lab: Israel's War Business，”*Der Spiegel*，August 27，2014，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defense-industry-the-business-of-war-in-israel-a-988245.html.

3. Fareed Zakaria，“Israel Dominates the Middle East，”*Washington Post*，November 21，201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fareed-zakaria-israel-dominates-the-middle-east/2012/11/21/d310dc7c-3428-11e2-bfd5-e202b6d7b501story.html.

4. Reuven Gal，*A Portrait of the Israeli Soldier*（Westport，CT: Greenwood Press，1986），10.

5. Arthur Herman，“How Israel's Defense Industry Can Help Save America，”*Commentary*，December 1，2011.

6. Becker，“Factory and Lab.”

7. Ann Scott Tyson，“Youths in Rural US Are Drawn to Military，”*Washington Post*，November 4，2005.

8. Christopher Rhoads，“How an Elite Military School Feeds Israel's Tech Industry，”*Wall Street Journal*，July 6，2007，A1.

9. Ben Caspit，“Talpiot Industrial Zone，”*Maariv*，March 29，2010，10.

第一章

1. Golda Meir，*My Life*（New York: Dell，1975），213，222，224.

2. Yuval Steinitz，“The Growing Threat to Israel's Qualitative Military Edge，”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Jerusalem Issue Brief*，Vol.3，No.10，December 11，2003.

3. Ignacia Klich，“The First Argentine-Israeli Trade Accor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Vol. 20，1995; and Shimon Peres and David Landau，*Ben-Gurion: A Political Life*（New York: Schocken Books，2011），16.

4. Michael Bar Zohar，*Shimon Peres: The Biography*（New York: Random House，2007），81.

5. Ibid.，77.

6. Ibid.，106.

7. Avner Cohen，*Israel and the Bomb*（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53.

第二章

1.“The Dronefather，”*The Economist*，December 1，2012，http:||www.economist.com/news/technology-quarterly/21567205-abe-karem-created-robotic-plane-transformed-way-modern-warfare.

2. Richard Whittle，“The Man Who Invented the Predator，”*Air and Space Magazine*，April 2013.

3.“Military UAVs: Up in the Sky，an Unblinking Eye，”*Newsweek*，May 31，2008，http:||www.newsweek.com/military-uavs-sky-unblinking-eye-89463; and Phil Patton，“Robots with the Right Stuff，” *Wired*，March 1，1996，http:||archive.wired.com/wired/archive/4.03/robots pr.html.

4. 源于本书作者之一2013年夏天对卡雷姆的采访。

5. Frank Strickland，“The Early Evolution of the Predator Drone，”*Studies in Intelligence*，Vol.57，No.1，March 2013.

6. George Arnett，“The Numbers behind the Worldwide Trade in Drones，”*Guardian*，March 16，2015.

7. See Anshel Pfeffer，“WikiLeaks: IDF Uses Drones to Assassinate Gaza Militants，”*Haaretz*，September 2，2011，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wikileaks-idf-uses-drones-to-assassinate-gaza-militants-1.382269.

8. Nick Meo，“How Israel Killed Ahmed Jabari，Its Toughest Enemy in Gaza，”*Daily Telegraph*，November 17，2012，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israel/9685598/How-Israel-killed-Ahmed-Jabari-its-toughest-enemy-in-Gaza.html.

9. 下文关于以色列在苏丹发动袭击的叙述主要依据外国媒体报道（包括《时代周刊》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和作者在对该行动理解基础上的推断。

10.“How Israel Foiled an Arms Convoy Bound for Hamas，”*Time Magazine Online*，March 30，2009； and Uzi Mahnaimi，“Israeli Drones Destroy Rocket-Smuggling Convoys in Sudan，”*Sunday Times*，March 29，2009，http:||www.thesundaytimes.co.uk/sto/news/world_news/article158293.ece.

11. Mahnaimi，“Israel Drones Destroy Rocket-Smuggling Convoys in Sudan.”

12. WikiLeaks，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KHARTOUM249_a.html.

13. See WikiLeaks diplomatic cable 09KHARTOUM249 created February 24，2009，https:||wikileaks.org/cable/2009/02/09KHARTOUM249.html.

14. 同注释9。

第三章

1. Amnon Barzilai，“Turret Exposed”［Hebrew］，*Globes*，July 29，2006，http://www.globes.co.il/news/article.aspx?did=1000137025.

2. Josh Mitnick，“Mighty Merkavas Fail in War Gone Awry: ‘Boom，Flames and Smoke，’”*Observer*，August 21，2006，http://observer.com/2006/08/mighty-merkavas-fail-in-war-gone-awry-boom-flames-and-smoke-2/.

第四章

1. Deganit Paikowsky，“From the Shavit-2 to Ofeq-1，a History of the Israeli Space Effort，”*Quest*，Vol.18，November 2，2011.

2. See Paikowsky，“From the Shavit-2 to Ofeq-1”; and Y. Rabin，Diary，Tel Aviv，*Maariv*［Hebrew］，1979，Vol. 2，497-498.

3. Bob Woodward，“CIA Sought 3rd Country Contra Aid，”*Washington Post*，May 19，1984，A13.

4. E. L. Zorn，“Israel's Quest for Satellite Intelligence，” 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kent-csi/vol44no5/pdf/v44i5a04p.pdf.

5. Bernard Gwertzman，“Israel Asks US for Gift of Jets，Citing Saudi Sale，”*New York Times*，April 4，1981，2.

6. Amnon Barzilai，“Here We Build a Force Multiplier”［Hebrew］，*Haaretz*，September 25，2001，http://www.haaretz.co.il/misc/1.736130.

7. Glenn Frenkel，“Israel Puts Its First Satellite into Orbit，”*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0，1988，A16.

8. Lawrence Wright，*Thirteen Days in September*（New York: Knopf，2014），35.

9. Moshe Nissim，“Leadership and Daring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sraeli Reactor，”*Israel's Strike Against the Iraqi Nuclear Reactor 7 June，1981*（Jerusalem: Menachem Begin Heritage Center，2003），31.

10. Shlomo Nakdimon，“Begin's Legacy: ‘Yehiel，It Ends Today，’”*Haaretz*，February 22，2010.

11. Barzilai，“Here We Build a Force Multipier.” See also“Meeting Minutes Regarding Israel-South Africa Agreement，” Woodrow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4148.

12. Amnon Barzilai，“Somewhere Beyond the Horizon，”*Haaretz*，September 26，2001.

13. Paikowsky，“From the Shavit-2 to Ofeq-1.”

14. Uzi Eilam，*Eilam's Arc*（Eastbourne，UK: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1）, 232-237.

15. Ibid.

16.“We Operate on the Border of Imagination, ”Mako News Website [Hebrew] , March 27, 2014, http:||www.mako.co.il/pzm-units/intelligence/Article-0b71c430eb30541006.htm.

第五章

1. Amnon Barzilai, “How to Build a Wall” [Hebrew] , *Haaretz*, November 13, 2002, http:||www.haaretz.co.il/misc/1.839763.

2. Lior Avni, “A Decade under Fire: 10 Years to the First Kassam” [Hebrew] , *NRG*, April 14, 2011, http:||www.nrg.co.il/online/1/ART2/232/334.html.

3. David Horovitz, “Only a Drill?”*Jerusalem Post*, May 25, 2010.

4. Anshel Pfeffer, “Behind the Scenes of Iron Dome” [Hebrew] , *Haaretz*, November 23, 2012, http:||www.haaretz.co.il/news/politics/1.1871793.

第六章

1. See“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 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ons, ” May, 2010,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ouncil/docs/14session/A.HRC.14.24.Add6.pdf.

2. Laura Blumenfeld, “In Israel, a Divisive Struggle over Targeted Killing,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7, 200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6/08/27/in-israel-a-divisive-struggle-over-targeted-killing/2e6d9107-6a81-4500-a7e4-001b4fc853c9/.

3. Steven R. David, “Fatal Choices: Israel's Policy of Targeted Killing, ”*Mideast Security and Policy Studies*, No.51（Ramat, Israel: The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Bar-Ilan University, 2002）.

4. Yaakov Katz, “Analysis: Lies, Leaks, Death Tolls & Statistics, ”*Jerusalem Post*, October 29, 2010, 1.

第七章

1. David Sanger, *Confront and Conceal: Obama's Secret Wars and Surprising Us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Crown, 2012）, 188.

2. Ibid., 195.

3. Peter Beaumont, “Stuxnet Worm Heralds New Era of Global Cyberwar, ”*Guardian*, September 30, 2010.

4. Ibid.

5. 源于本书作者之一对拉尔夫·兰纳进行的一次电话采访。

6. John Markoff，“In a Computer Worm，a Possible Biblical Clue，”*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9，2010.

7. Ellen Nakashima，“U.S.，Israel Developed Flame Computer Virus to Slow Iranian Nuclear Efforts，Officials Say，”*Washington Post*，June 19，2012.

8. James Clapper，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January 31，2012.

9. Barbara Opall-Rome，“Israeli Cyber Exports Double in a Year，”*Defense News*，June 3，2015，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defense/policy-budget/cyber/2015/06/03/israel-cyber-exports-double/28407687/.

10. 下文关于以色列在叙利亚发动袭击的叙述主要依据外国媒体报道（包括《明镜周刊》和《纽约客》）和作者在对该行动理解基础上的推断。

11. Sharon Weinberger，“How Israel Spoofed Syria's Air Defense System，”*Wired*，October 4，2007，http:||www.wired.com/2007/10/how-israel-spoo/.

12. Ibid.

13. Eric Follath，“The Story of Operation Orchard，”*Der Spiegel*，November 2，2009，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the-story-of-operation-orchard-how-israel-destroyed-syria-s-al-kibar-nuclear-reactor-a-658663-2.html.

14. Ibid.

15. David Makovsky，“The Silent Strike，”*New Yorker*，September 17，2012.

16. Ibid.

17. Ibid.

18. Ibid.

第八章

1. Yoram Evron，“Sino-Israel Rel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INSS Strategic Assessment*，Vol.10，No.2，August 2007，http:||www.inss.org.il/index.asp?id＝4538&articleid＝1479.

2.“Weizman Initiated Eisenberg's Involvement in Chinese Arms Sales 20 Years Ago”［Hebrew］，*Globes*，February 4，1999，http:||www.globes.co.il/news/article.aspx？did＝82076.

3. Thomas Friedman，“Israel and China Quietly Form Trade Bonds，”*New York Times*，July 22，1985.

4. Amon Barzilai，“The Phalcons Didn't Fly，”*Haaretz*，December 26，2001.

5. A. M. Rosenthal，“On My Mind; The Deadly Cargo，”*New York Times*，October 22，1999.

6. Sharon Samber，“Congress Urged Not to Link Israel Aid to China Arms，”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June 13，2000.

7. Sadanand Dhume，“Revealed: The India-Israel Axis，”*Wall Street Journal*，July 23，2014.

8. 下文中对以色列和新加坡关系的叙述主要依据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自传。Lee Kuan Yew:*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1965-2000*（New York: Harper，2000）.

9. Amnon Barzilai，“Israeli Officers Reveal: This Is How We Founded the Singapore Military”［Hebrew］，*Haaretz*，July 15，2005.

10. Lee Kuan Yew，*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15.

11. See Barzilai，“Israeli Officers Reveal.”

12. Ibid.

13. Duncan Lennox，ed.，“AGM-142 Popeye 1/2?（Have Nap/Have Lite/Raptor/Crystal Maze）（Israel），Offensive Weapons，”*Jane's Strategic Weapon Systems*，Issue 50（Surrey: Jane's Information Group，January 2009），78-80. See also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s Israel Section: http:||www.nti.org/country-profiles/israel/delivery-systems/.

14. Nicholas Clayton，“How Russia and Georgia's ‘Little War’ Started a Drone Arms Race，”*Global Post*，October 23，2012.

15. WikiLeaks cable 09TELAVIV2757_a，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TELAVIV2757 a.html.

16. WikiLeaks cable 08Moscow2785，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8MOS-COW2785 a.html.

17. WikiLeaks cable 09MOSCOW2800_a，https:||search.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MOSCOW2800 a.html.

18. WikiLeaks cable 09MOSCOW1111_a，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MOSCOW1111 a.html.

19. WikiLeaks cable 09ABUDHABI192_a，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ABUDHABI192 a.html.

20. WikiLeaks cable 09TELAVIV1340_a，https:||search.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TELAVIV1340 a.html.

21. WikiLeaks cable 09TELAVIV1688_a，https:||search.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TELAVIV1688 a.html.

22. Interview with Mary Beth Long in November 2015.

23. See WikiLeaks cable 09TELAVIV2757_a.

结语

1. Adam Ciralsky，“Did Israel Avert a Hamas Massacre?”*Vanity Fair*，October 21，2014，http:||www.vanityfair.com/news/politics/2014/10/gaza-tunnel-plot-israeli-intelligence.

2. Asa Fitch，“Early Failure to Detect Gaza Tunnel Network Triggers Recriminations in Israel，”*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10，2014.

3. Saul Singer and Dan Senor，*Start Up Nation*（New York: Twelve Books，2009），42.

原书索引

Abayat，Hussein

Abbas，Mahmoud

Abdullah of Jordan

Abu Shamala，Mohammed

advanced airborne warning and control system (AWACS)

AEWC&C (airborne early warning，command and control)

AGM-65 bombs

Ahmadinejad，Mahmoud

air force. *See* Israeli Air Force; US Air Force

aircraft

  F-15s

  F-16s

  F-35 Joint Strike Fighter

  Messerschmitt

  MiG fighter jets

  Mirage combat aircraft

  Mosquito bombers

  Mustang combat aircraft

  Phalcon AEWC&C aircraft

stealth fighter jets

U-2 manned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See also drones; helicopters

AK47 rifle

al Attar , Raed

Al-Lakkis , Hassan

Al Qaeda

Aloni , Nimrod

Aman. *See* intelligence: Israeli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Aman)

Amit , Meir

Arab riots (1929)

Arab Spring , x

Arafat , Yasser

Arens , Moshe

Arnan , Avraham

Ashkenazi , Gabi

al-Assad , Bashar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Israel)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Syria)

autism

Avidar , Yosef

AWACS. *See* advanced airborne warning and control system (AWACS)

Ayalon Institute (underground weapons factory)

Ayatollah Khomeini

ayatollahs

Ayyash , Yahya

balagan (chaotic mess)

Barak , Ehud

Barak , Shlomo

al-Bashir , Omar

Battle of the Saluki

Begin , Menachem

Ben-Anat , Shuki

Ben-Gurion , David

Ben-Israel , Yitzchak

Ben-Nun , Avihu

Bennett , Naftali

Betar (Revisionist youth movement)

Beth-Halachmi , Aharon

Biran , Ilan

Bourgès-Maunoury , Maurice

Brill , Shabtai

Bronfman , Samuel

Buchris , Pinchas

Bush , George H. W.

Bush , George W.

Callaghan , Sonny

Camp David peace talks (1978)

Camp David summit (2000)

Central Command , US

Chibu , Chon

Chinese-Israeli relations

Christenson , Clayton

Cohen , Shlomi

Cohen , William

“collage war , ”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Convention on Registration of Objects Launched into Outer Space

Cuba

cyber warfare

cyber attack on Natanz

Cyber Department (Defense Ministry)

Israeli success

National Cyber Bureau

Stuxnet

Suter military computer program

Trojan horse

Unit 8200

Dagan , Meir

Dark Net

Dassault (French aircraft manufacturer)

Dayan , Moshe

De Gaulle , Charles

Defense Export Control Agency (DECA)

Defense Ministry

Cyber Department

and diplomacy

Merkava Tank Directorate

and missile defense systems

R&D Directorate (Mafat)

and satellites

SIBAT

and terror tunnels

Defrin , Effie

Deif , Mohammed

diplomacy

Israeli-Chinese relations

Israeli-Indian relations

Israeli-Singaporean relations

Israeli success

and Phalcon sales

and Russia

“Disengagement” (Israeli withdrawal from Palestinian territo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Doctrine of Defense and State of Armed Forces , ”

Dori , Yaakov

Dothan , Felix

drones

and 3D missions (dull , dirty and dangerous)

advantages of

Amber

Aquila

background

Condor

and diplomacy

and First Lebanon War

and Gaza Strip

Gnat

and Gulf War

Hermes

Heron

and ISR missions (intelligence ,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Israeli exports

Israeli success

line-of-sight mode

and missiles

Panther (tilt rotor drone)

Pioneer

Predator

satellite mode

Scout

and Second Lebanon War

sensors

Skylark

Sudan drone strikes (Operation Cast Lead , 2009)

and Yom Kippur War

and Yuguslav wars

Drucker , Yossi

Egypt. *See* Camp David peace talks (1978); Seuz Crisis; Yom Kippur War (1973)

Eilam , Uzi

Eisenberg , Saul

Eisenhower , Dwight D.

Eitan , Raful

Elazari , Jack

Elbit Systems

Eshed , Haim

exports , Israeli weaponry

Fernandez , Alberto

Fernando , Alberto

First Intifada. *See also* Second Intifada

First Lebanon War

Free Polish Army

free trade agreement

Gaddafi , Muammar

Gal , Reuven

Gantz , Benny

Gates , Robert

Gaza war (2014)

al-Ghoul , Mohammed

Gilad , Amos

Gold , Danny

Gulf War , First

Hadley , Stephen

Haganah. *See also* Israeli Defense Forces (IDF)

Hamas

and anti-tank missiles

and drones

and Gaza war (2014)

and Israeli intelligence

Kassam Martyrs Brigade

and Operation Cast Lead

and Operation Pillar of Defense

and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and prisoner exchanges

and rockets

and terror tunnels

and weapons smuggling

Haotian , Chi

Harel , Yaniv

helicopters

Apache

See also aircraft

Herzog , Arieh

Herzog , Isaac

Hezbollah

Holocaust. *See also* World War II

Hosseinpour , Ardeshir

Hussein , Saddam

Hussein of Jordan

IAEA. *Se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IAI. *See* Israel Aerospace Industries (IAI)

IDF. *See* Israeli Defense Forces (IDF)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s)

Indian-Israeli relations

Inman , Bobby

intelligence , military

Israeli success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Aman)

Mossad (Israeli spy agency)

Rakaz (Shabak course)

and Second Intifada

Shabak (Israeli internal security agency)

Shatzi room

and targeted killing of al-Ghoul

and targeted killings

Ulpan (Shabak language school)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interoperability

Intifada. *See* First Intifada; Second Intifada

Iran. *Se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ran-Iraq War

Iraq

nuclear program

Iraq War

Irgun (underground Zionist paramilitary group)

Iserovich , Hanan

ISIS

Islamic Jihad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 and cyber warfare
- and drones
- Isfahan conversion plant
- Islamic Revolution (1979)
- nuclear program
- Omid satellite
- Revolutionary Guards

and weapons smuggling

See also Hezbollah

Islamic State. *See also* ISIS

Israel Aerospace Industries (IAI)

and drones

establishment of

and missile defense

and Phalcon AEWC&C aircraft

and satellites

Israel Defense Prize

Israel Military Industries (IMI). *See also* Ayalon Institute (underground weapons factory)

Israel Space Agency

Israel Weapons Industries (IWI)

Israeli Air Force (IAF)

Israeli Defense Forces (IDF)

Alexondroni Brigade

Armored Corps

Atuda Program

the Bor (fortified underground command center)

“Breaking the Distance , ”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Crystal Ball (computerized defense system)

General Staff

Home Front Command

and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and interoperability

“knocking on the roof” (Israeli anti-terror tactic)

Maglan military unit

Mamram (computer unit)

and multidisciplinar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Reserves Corps

Sayeret Matkal (General Staff Reconn-aissance Unit)

Scientific Corps

Sky Rider Program

Southern Command

and standoff/robotic platforms

Talpiot (technology unit)

Tzayad (command-and-control system)

War Room

and youth

See also cyber warfare; diplomacy; drones; intelligence , military; rockets and missile defense; satellites; tunnels

Ivry , David

Iyyad , Masoud

Jabari , Ahmed

Jabotinsky , Vladimir

Jane's(British military trade publication)

JDAMs (precision-guided bombers)

Jewish Scouts movement

Jihad , Abu

Jihad , Global

Johnson , Lyndon B.

Jordan

Kadish , Ron

Kahalani , Avigdor

Kahl , Colin

Kaplinsky , Moshe

Karem , Abe

Kelley , P. X.

Keret , Moshe

Khan , A. Q.

kibbutz

Kidron , Mordechai

Kosovo War (1999)

Kuan Yew , Lee

Kurtz , Ray

Labor Party

Land of Israel

Langner , Ralph

Lavon , Pinchas

Leading Systems

Lebanon. *See* Hezbollah; First Lebanon War; Second Lebanon War

Lehi (Zionist group)

Lehman , John

Lenart , Lou

Levin , Carl

Libya

Lieberman , Avigdor

Likud Party

Livnat , Yaron

Lockheed Martin

Long , Mary Beth

M-16 rifles

al-Mabhouh , Mahmoud

MacDonald , Jeanette

Mach speeds

Madrid Peace Conference (1991)

Malam missile factory

Malul , Shay

Mandate for Palestine

Mashal , Khaled

Matanya , Evyatar

Mazliach , Baruch

McCain , John

Medvedev , Dmitry

Meir , Golda

Merkava tanks. *See* tanks: Merkava tanks

missiles. *See* rockets and missile defense

Mohammadi , Masoud Ali

Mossad (Israeli spy agency)

Moyal , Eli

Mubarak , Hosni

Musawi , Abbas

9/11

Nablus

Nasser , Gamal Abdel

National 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 (NCRI)

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Authority (Re'em)

NATO

Ne'em Yuval

Nehushtan , Ido

Netanyahu , Benjamin

Nor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and capability

deterrence

Iran

Iraq

Israel

Syria

Obama , Barack

Olmert , Ehud

Olson , Richard

Operation Cast Lead

Operation Pillar of Defense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Oslo Accords (1993)

Othman , Ibrahim

Ovadia , Guy

P5 + 1

Pardo , Tamir

Peled , Dan

Peres , Shimon

Peretz , Amir

Peri , Yaakov

Plasan Sasa (armor manufacturer)

protexia (connections)

Rabin , Yitzhak

Rafael (missile development company)

Rand , Robin

Rao , P. V.Narasimha

Raviv , Dov

Reagan , Ronald

Re'em (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Authority)

Revisionist Movement

Rice , Condoleezza

Rivlin , Reuven

rockets and missile defense

  air-to-air missiles (AAM)

  Arrow missile defense system

  David's Sling missile defense system

  Fajr artillery rockets

  Hellfire missiles

  Iron Dome rocket defense system

  and First Lebanon War

  Israeli success

  Kassam rockets

Katyusha rockets

Kornet missiles

M-600 missiles

Nautilus missile system system

and Operation Pillar of Defense

Python air-to-air missiles

rocket-propelled grenades (RPGs)

Scud missiles

and Second Lebanon War

Skyguar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surface-to-air missiles (SAMs)

Star War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and Yom Kippur War

Rogozin , Dmitry

Rubin , Uzi

Rumaithi , Hamid Thani al

Russia. *See also* Soviet Union

Ryabkov , Sergei

S-300 air defense system

S-400 air defense system

Sadat , Anwar

Saguy , Yehoshua

Sapir , Pinhas

satellites

9900 (command center)

and autistic soldiers

and bombing of Osirak reactor

cameras

and Disengagement

Israeli success

launchers

Ofek satellites

and Second Lebanon War

Tecsar

Visint (visual intelligence)

Saudi Arabia

Schwimmer , Al

Second Intifada 2. *See also* First Intifada

Second Lebanon War

Security Cabinet

September

Shabak. *See* intelligence , military

Shahriari , Majid

Shalit , Gilad

Shamir , Yitzhak

Shani , Udi

Shapira , Danny

Shapiro , Dan

Shaqaqi , Fathi

Sharett , Moshe

Sharon , Ariel

Shehadeh , Salah

Short-Range Rocket Defense Working Group

Singaporean-Israeli relations

Singh , V. P.

Six Day War (1967)

South Korea

Soviet Union

  anti-tank weapons

  arms supplies to Egypt and Syria

and missile defense

surface-to-air missile (SAM) systems

tanks

See also Russia

State of Israel

Strategic Dialogue (forum)

Sudan

Suez Crisis

Suslik , Doron

Swee , Goh Keng

Syria

civil war

and cyber warfare

nuclear program

SANA (official news agency)

and Six Day War

weaponry

See also Yom Kippur War (1973)

tanks

Centurion

Chieftain
fire control system
Israeli success
and Kalanit shells
Merkava tanks
and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and Second Lebanon War
Shot
and Six Day War
and Trophy active protection system
and Tzayad command-and-control system
and War of Independence
and Yom Kippur War
Tavor (assault rifle)
Technion
THAAD (U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offler , Alvin
Tripartite Declaration
Trophy active protection system
Tunisia

tunnels

cross-border tunnels

and Gaza war (2014)

terror tunnels

Turkey

Turner , Stansfield

United Nations (U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See also* drones

unmanned ground vehicles (UGVs)

US Air Force

US Missile Defense Agency

Vallières , Benno-Claude

Van Creveld , Martin

Wali , Nasreddin

Wanted Code of Palestinian fugitives

War of Independence (Israel)

Weinberger , Caspar

Weizman , Ezer

West Bank

Western Wall

Wolff , Amit

Woolsey , R. James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See also* Holocaust

Ya'alon , Moshe

Yad Vashem Holocaust Museum

Yariv , Aharon

Yatziv , Shaul

Yishuv (Jewish community in pre-state Israel)

Yom Kippur War (1973)

Zakaria , Fareed